奥威尔作品集

动物庄园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郝海龙 译

ANIMAL FARM

奥威尔首先是先知，其次才是圣徒。
他能够在目睹最糟境况的同时为最美好的东西而战。
——Granville Hicks



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奥威尔作品集

动物庄园 〔英〕乔治·奥威尔 著 郝海龙 译

缅甸岁月 〔英〕乔治·奥威尔 著 郝爽 张旸 译

奥威尔信件集 〔英〕乔治·奥威尔 著 李莉 廖晓玮 余扬 黄颖 译

致敬加泰罗尼亚 〔英〕乔治·奥威尔 著 胡萌琦 曹思宇 黄颖 译

通往维根码头之路 〔英〕乔治·奥威尔 著 郑梵 胡萌琦 钱晓筱 唐迎欣 译

巴黎伦敦落魄记 〔英〕乔治·奥威尔 著 甘露 郭嘉慧 杨惠乔 朱文婷 译

奥威尔日记 〔英〕乔治·奥威尔 著 韩阳 刘晓婷 译

1984 〔英〕乔治·奥威尔 著 韩阳 王喆 译

奥威尔散文集 〔英〕乔治·奥威尔 著 罗爽 易小又 曹聿菲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总　目　录

动物庄园

缅甸岁月

奥威尔信件集

致敬加泰罗尼亚

通往维根码头之路

巴黎伦敦落魄记

奥威尔日记

1984

奥威尔散文集

奥威尔作品集

动物庄园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郝海龙 译

ANIMAL FARM

奥威尔首先是先知，其次才是圣徒。
——止庵

他能够在目睹最糟境况的同时为最美好的东西而战。
——Granville Hicks



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自由的保障，良知的坚守

自由的保障，良知的坚守

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动物庄园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郝海龙 译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物庄园/（英）奥威尔 著；郝海龙 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7

（奥威尔作品集）

ISBN 978-7-5680-1133-4

Ⅰ.①动… Ⅱ.①奥… ②郝… Ⅲ.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185858号

动物庄园 [英]乔治·奥威尔 著 郝海龙 译

策划编辑：刘晚成

责任编辑：刘晚成

特约编辑：郝海龙

封面设计：喃风

责任校对：李琴

责任监印：张贵君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3

印　　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5.5

字　　数：73千字

版　　次：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26.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要译名对照表

Ⅰ.猪

老麦哲：原文为Old Major，本意为“老少校”，他的演讲为动物起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书中常简称为“麦哲”。

拿破仑：原文为Napoleon，动物庄园最高领袖，实际掌权者。

斯诺鲍：原文为Snowball，本意为“雪球”，动物庄园前期领袖之一，后被拿破仑驱逐。

斯奎拉：原文为Squealer，本意为“发出尖叫的人”，也有“打小报告的人”、“号角”的意思，动物庄园领袖之一，主要负责政治宣传工作。

米尼莫斯：原文为Minimus，本意为“最小的东西”，善于写诗，主要工作是为拿破仑写赞歌。

品客艾：原文为Pinkeye，本意为“红眼”，负责为拿破仑试吃食物，以防被下毒。

Ⅱ.马、驴

布克瑟：原文为Boxer，本意为“拳击手”，公马，动物庄园最为忠心、勤恳的劳动者，临近退休时被拿破仑卖到屠马场。

克莱弗：原文为Clover，本意为“苜蓿”，母马，布克瑟的最为亲密的朋友。

莫丽：原文为Mollie，为琼斯拉车的白色小母马，后叛逃出动物庄园。

本杰明：原文为Benjamin，驴，动物庄园年龄最大、脾气古怪的动物。

Ⅲ.其他动物

穆里尔：原文为Muriel，山羊，常与本杰明、克莱弗在一起的白色母山羊。

布鲁贝尔：原文为Bluebell，本意是“风铃草”，母狗。

杰西：原文为Jessie，母狗。

品彻：原文为Pincher，本意是“钳子”，公狗。

摩西：原文为Moses，乌鸦。

Ⅳ.人

琼斯：原文为Jones，动物起义之前曼娜庄园（Manor Farm，动物庄园本名）的庄园主。

皮尔金顿：原文为Pilkington，与动物庄园相邻的福克斯伍德庄园（Foxwood Farm）庄园主。

弗里德里克：原文为Frederick，与动物庄园相邻的品彻菲尔德庄园（Pinchfield Farm）庄园主。

温伯尔：原文为Whymper，威灵顿的生意人，长期担任动物庄园与外界联系的中间人。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第一章

这天晚上，曼娜庄园主琼斯先生锁上了鸡舍，但因为喝醉酒而忘记关上牲口进出的小门洞。在马灯摇曳的光芒下，琼斯先生步履蹒跚地穿过院子，在后门口踢掉自己的靴子，去洗碗间喝干了桶里最后一杯啤酒，摸索着上了床，而此时床上的琼斯太太早已鼾声如雷了。

当卧室的灯光熄灭的时候，一阵躁动划过整个庄园。白天大家就在传言：得过“中等白鬃”奖的老麦哲在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很想就此与其他动物交流。大家一致同意，在确保琼斯先生离开之后，在大谷仓集合。老麦哲（他一直被这么称呼，尽管当时他参展时用的名字是“威灵顿美人”）在庄园中的威望很高，大家都乐意牺牲掉一小时的睡眠来听他讲话。

在大谷仓的一角有一块凸起的平台，上面是用稻草铺好的垫子，麦哲已经坐在那里，头顶的横梁上挂着一盏马灯。他已经十二岁了，最近有点发福，但是仍可以说是一头威严的猪。尽管长着长长的獠牙，但他的面容透着智慧和慈祥。不多久，别的动物陆续到达，并按他们自己舒服的方式坐稳了。最先来的是三条狗——布鲁贝尔、杰西和品彻，然后是猪，他们很快在讲台前面的稻草上就座。鸡卧在窗台上，鸽子飞到屋椽上，羊和牛则坐在猪后面，嘴里还在反刍食物。两匹拉车的马——布克瑟和克莱弗——是结伴来的，他们走得非常慢，每次都轻轻放下毛茸茸的大蹄子，生怕稻草里藏着什么小动物。克莱弗是一匹已经做了母亲的胖胖的母马，她年近中年，自她生第四胎后体型就没恢复过。布克瑟身材高大，大约有两米高的个头，大概有两匹普通马加起来那么壮。鼻子上延伸出的一条白纹让他看起来笨笨的，事实上他也没有一流的智慧，但他凭借自己坚毅的品质和辛勤的劳作赢得了广泛的尊敬。随后到达的是白山羊穆里尔和一头叫本杰明的驴。本杰明是庄园中最老的动物，同时也是脾气最坏的。他很少说话，但开口也不会有什么好话，比如，他会说上帝给了他一条尾巴让他驱赶苍蝇，但是他宁肯既没有尾巴也没有苍蝇。在庄园所有动物中，只有他从来没有笑过。如果有谁问起他为什么不笑，他会说没有什么好笑的。不过，尽管他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但是他对布克瑟却很热诚。他俩经常会在星期天一起去果园后面的小牧场，并肩吃草，却从不交谈。

那两匹马刚卧好，一群失去了妈妈的小鸭子列队走进了谷仓，他们边走边发出微弱的吱吱声，为找到一个不会被踩到的地方徘徊了很久。克莱弗用她巨大的前肢把他们围住，小鸭子们很舒服地偎依其中，并很快进入了梦乡。然后，那头给琼斯先生拉车的傻乎乎的白色母驴莫丽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嘴里还不忘嚼一块糖。刚在前面寻到了一个位置，她就开始摆动她的白色鬃毛，希望大家能注意到编在上面的红绶带。最后来的是那只猫，她像往常一样四处寻找最暖和的地方。最终她挤在了布克瑟和克莱弗中间，整场演讲中间，她一直在那里心满意足地发出咕咕的喉音，没有听麦哲一句话。

除了那只被驯服的乌鸦摩西，所有的动物都已到场，此刻乌鸦正睡在后门后面的一个架子上。在麦哲看到大家都已入座，正在聚精会神地等待之后，他清了一下嗓子开始讲话：

“同志们，你们已经听说了，昨天晚上，我做了个奇怪的梦。但在讲这个梦之前，我想先讲点别的。同志们，我感觉我将不久于世，在我死之前，我有必要给大家传授一些我领悟到的哲理。我活了很久，所以我有很长的时间独自在屋里思考。我想我对这个世界的生活本质的了解不亚于任何一个活着的动物。这就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看看，我们的生命痛苦、劳累并且短暂。我们出生后，被那些人强迫工作，直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而他们给我们的仅仅是少到只能维持生命的食物；当我们变得无用时，立马就被他们残忍地屠杀。任何一个英格兰的动物在他一岁以后都不会再感受快乐和闲适。任何一个英格兰的动物都没有自由。动物的一生就是痛苦和被奴役的一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自然法则就是这样的吗？难道是因为这片土地过于贫瘠以至于不能让我们过上体面的生活？不，同志们，一千个不！英格兰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现在生活在这里的动物的数量远远没有达到这片土地可以养活的最大数量。仅仅这个农场就可以养活十二匹马、二十头牛、成百上千的羊，并让他们过上我们难以想象的舒适体面的生活。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如此糟糕呢？因为我们所有的劳动成果几乎都被人类窃取了。同志们，这就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词——人类。我们真正的敌人只有人类。把人类赶走，我们将永不再有饥饿和过度的劳作。

“人是唯一只消费不生产的生物。他不产奶，不下蛋，羸弱的身体

拉不了犁，跑起来慢得连兔子也抓不到。然而他却是所有动物的主人。他驱使动物们工作，除了给他们少得可怜的食物以避免他们饿死之外，剩余的一切都收归他自己所有。我们在土地上劳作，用我们的粪便给土地施肥，而我们唯一能拥有的不过是自己身上的那张皮。在我面前的这些牛，你们去年共产了几千加仑[1]的奶？要是这些奶都用来哺育我们的小牛呢？可是每一滴都流进了我们敌人的喉咙。还有母鸡，你们去年共下了多少蛋？又有多少孵出了小鸡呢？其余都在市场上变成钱落进了琼斯和他的雇工的口袋。还有你，克莱弗，你生的四个小马驹哪去了？谁来赡养你，让你安度晚年呢？他们每一个都在一岁的时候被卖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中任何一个了。作为你生育和在地里劳作的回报，除了少得可怜的一些草料和一间马厩之外，还有什么呢？

“这种不幸的生活甚至不让我们正常死亡。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是这里面最幸运的一个。我十二岁了，有超过四百个孩子。这就是一头猪最正常的一生。但是没有动物最终能逃过那残忍的屠刀。坐在我面前的这些小猪，你们中每一个都将在一年内在砧板上尖叫着失去生命。我们都要面对可怕的现实：牛、猪、鸡、羊，一个都不剩，甚至连马和狗也不能幸免。布克瑟，在你失掉你有力的肌肉的那一天，琼斯会把你卖给屠夫，你就会被屠宰为猎狗的美餐。至于狗呢，当他们老得掉牙的时候，琼斯会在他们脖子上系一块砖头，让他们沉入最近的池塘。

“这些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同志们？所有这些罪恶的根源就是人类的暴行。只有摆脱人类的统治，我们才能把劳动成果收归己有。我们可以在一夜之间变得富裕和自由。那么我们要做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日没夜从身体到灵魂为人类的挥霍而劳作呢！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同志们，起义吧！我不知道起义什么时候会到来，可能在一周内，也可能要等一百年。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就像我清楚地知道我脚下有稻草一样，那就是正义终将到来。同志们，请在你短暂的余生正视它！最重要的是，你们要把我今天告诉你们的传递下去，让下一代坚持奋斗，直到胜利。

“请记住，同志们，你们的决心不可动摇。任何理由都不能让你们误入歧途。永远不要相信人类与动物有共同的利益，什么‘人的荣耀就是大家的荣耀’，全都是谎言。人类只会关心他们自己。我们动物要团结一致，在战斗中要有纯洁的同志之谊。所有的人都是敌人，所有的动物都是同志。”

这时会场上有一阵骚动。在麦哲讲话的时候，四只大老鼠悄悄溜出

洞并且坐在他们自己的后腿上，聆听演讲。狗突然看见了他们，在一声与洞口的碰撞声之后，老鼠才保住了性命。麦哲举起蹄子示意安静。

“同志们，”他说，“有一点必须明确。野生的动物，比如老鼠和兔子，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呢？让我们来表决一下。我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老鼠是同志吗？”

表决结果很快出来了，绝大多数认为老鼠是同志。只有四票反对，三条狗和一只猫，后来发现他们在两次表决时都举手了。麦哲继续道：

“我还有一点话要讲。我仅仅重复一遍，永远记住你们对于人类以及所有人类行为的仇恨。只要是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只要用四条腿走路的，或者是有翅膀的，都是朋友。还要记住，我们要与人类作斗争，永远不要变得和他们一样。即使我们征服了他们，也不要接受他们的恶习。所有动物都不得住在房子里，也不能睡在床上，不能穿衣服，也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不能碰钱，不能进行商业活动。人类所有的习惯都是罪恶的。最重要的是，所有动物都不得欺压同类。无论强壮与否，聪明与否，我们都是兄弟。任何动物不得杀害别的动物。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同志们，现在说说我昨天晚上的那个梦吧。我无法向你们描述它。那是一个关于没有人类的世界的梦。但是它让我想起了一些我已经忘记了很久的事情。

“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头小猪的时候，我的妈妈和别的母猪经常传唱一首老歌，她们只知道调子和歌词的前三个单词。我曾在我年幼的时候记得歌的调子，但已经有很久记不起来了。然而，昨天晚上，它在我梦中浮现，而且，还有那首歌的歌词。我确定，这首歌曾在很久之前在动物中传唱，但已经失传了好几代了。同志们，现在我要把那首歌唱给大家听。我老了，嗓音有些沙哑，但当我把这首歌的旋律唱给大家后，大家就可以唱得比我更好。歌名叫作《英格兰兽》。”

老麦哲清了清嗓子开始唱歌。正如他所说，他的嗓子有点沙哑，但他唱得已经够好了，慷慨激昂的旋律介于《克莱门泰》（*Clementine*）和《蟑螂歌》（*La Cucuracha*）之间。歌词如下：

英格兰兽，爱尔兰兽

普天之下所有的兽

请聆听我的好消息

关于我们闪耀的未来

迟早会有那么一天

人类的统治将被推翻

所有英格兰的果园

都只让兽类徘徊

鼻子中不再有环

背上不再有鞍

嚼子和马刺永远生锈

残忍的鞭子也被打断

难以想象的富足生活

小麦、大麦、燕麦、牧草

苜蓿、豆子，还有甜菜

所有这些都可无偿获得

光明将洒满英格兰

泉水会更加纯净

微风也会拂来丝丝香甜

在我们自由的那一天

为了那一天我们要全力以赴

直至死亡也不能停止

母牛、马、天鹅，还有火鸡

每一个都要为自由而战

英格兰兽，爱尔兰兽

普天之下所有的兽

请仔细听好并将它广为流传

关于我们闪耀的未来

歌声穿过动物群中，群情振奋。几乎不等老麦哲唱完，他们就自己唱了起来。即便是他们中最笨的也可以用几个单词哼哼调子，而比较聪明的一些动物，比如猪和狗，在听了几分钟后就可以完全唱下整首歌。然后，在试了几次之后，整个庄园响起了《英格兰兽》。牛哞哞地唱，狗呜呜地唱，羊咩咩地唱，马咴咴地唱，鸭子嘎嘎地唱。他们太兴奋了，一口气连唱了五遍，如果不是被打断的话，肯定会唱整整一夜。

不幸的是，喧嚣吵醒了琼斯先生，他从床上跳起，还以为是一只狐狸进了院子。他抓起一直放在角落里的猎枪，在黑暗里朝天放了几枪。子弹射进了大谷仓的墙，聚会很快终止了。每个动物都回到了自己住的地方。鸟跳上巢，动物们在稻草上安身，很快整个庄园进入梦乡。

---

[1] 加仑，英美制容量单位，英制1加仑约为4.5升，美制1加仑约为3.8升。

第二章

三天后，老麦哲在睡梦中悄然离去。他被葬在果园的一个角落里。

这是三月上旬的事，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动物们进行了许多秘密行动。麦哲的演讲使庄园里较为聪明的动物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不知道麦哲预言中的起义何时会发生，他们也没有理由奢望会在有生之年发生，但他们清楚自己有义务为此做一些准备。教育和组织工作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猪的身上，他们是庄园里公认最聪明的动物。所有的猪当中最为优秀的是两头年轻的公猪——斯诺鲍和拿破仑。他们是琼斯先生打算养大后卖掉的。拿破仑是一头威风凛凛的伯克夏种猪，也是庄园里唯一的伯克夏猪，不太说话却凭借其非凡的魅力获得了声誉。斯诺鲍比起拿破仑更为活跃，讲话更加生动并独具匠心，但大家觉得还是拿破仑更有深度。庄园里其他的公猪都是肉猪。他们中最有名的是一头名叫斯奎拉的小胖猪，圆圆的脸上长着一双闪亮的眼，身手敏捷，声音尖细。他是一位很有才气的演说家，争论问题的时候会用一种跳跃式的方法，经常摇晃着他的尾巴，使他在任何时候都极具说服力。其他动物都说斯奎拉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

他们三个把老麦哲的教诲精心总结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称之为动物主义。每周都有那么几晚，在琼斯先生熟睡后，他们在大谷仓举行秘密会议，向其他动物宣讲动物主义的基本准则。开始的几次会议他们遭遇了很多麻木和冷漠。一些动物认为要对琼斯先生效忠，他们叫他“主人”，或者简单地说，“琼斯先生饲养我们，如果他走了我们就会饿死。”其他动物问一些诸如此类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关心我们死后才会发生的事情？”或者“如果无论如何起义都会发生，我们是否为此努力又有什么关系呢？”而那些猪也很难让他们明白，这些和动物主义的精神是相悖的。白色的母驴莫丽的问题无疑是所有问题当中最愚蠢的。她最初这样问斯诺鲍：“起义成功后还有糖吗？”

“没有，”斯诺鲍坚定地说，“我们无法在这个庄园里生产糖。而且，我们也不需要糖。你将得到你想要的燕麦和牧草。”

“那我还可以继续在我鬃毛上佩戴绶带吗？”莫丽又问。

“同志，”斯诺鲍说，“那些绶带是你作为奴隶的象征。你难道不明白自由比绶带更有价值吗？”

莫丽同意了，但她觉得这话听起来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

猪付出了更大的努力来抵制那只已被驯服的乌鸦摩西的谎言。摩西是琼斯先生的特殊宠物，是个间谍，也是个传谣者，但也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发言人。他声称有一个神奇的国度叫作糖果山，所有的动物死后都会去那里。据说，那个地方在天上，就在云后面不远处。在糖果山，一周七天都是星期天，全年都生长着苜蓿，篱笆上长满了糖块和亚麻仁饼。动物们都讨厌摩西，因为他只讲故事不工作。但还是有一些动物相信糖果山的传说，这使猪不得不费尽口舌去说服他们，让他们明白这样一个地方并不存在。

他们中最信奉那些基本准则的是那两匹拉车的马——布克瑟和克莱弗。他俩很难自己想通任何事情，但是他们接受那些猪老师教给的任何东西，并通过一些简单的讨论把它们传播给别的动物。他们从未缺席过大谷仓的秘密聚会，而且每次都要在聚会结束时唱《英格兰兽》。

事实证明，起义远比想象中来得更早更容易。虽然琼斯先生曾经是一个辛勤的主人、一个很有能力的农场主，但是后来就堕落了。由于官司打输了，赔了很多钱，琼斯先生变得很沮丧，只好借酒浇愁。整天懒洋洋地躺在厨房的温莎椅上，看报，喝酒，偶尔用沾着啤酒的面包渣喂喂摩西。他的雇工懒散不忠，地里长满杂草，屋顶也有破洞，篱笆没人维护，动物们也经常吃不饱。

到了六月份，又到了该收牧草的时候。夏至前一天是周六，琼斯先生去了威灵顿红狮酒吧喝酒，一直喝到周日中午才回来。他的雇工在大清早挤了牛奶，然后就出去抓兔子了，因为怕麻烦，就没有喂那些动物。而琼斯先生回来后，马上就去客厅的沙发上睡觉，脸上盖着一份《世界新闻》。于是，动物们直到晚上也没有吃到东西。他们终于忍无可忍。一头牛用角撞坏了兽棚的门，所有的动物都开始想办法离开笼子。就在这时琼斯先生醒了。他和他的四个雇工马上去了兽棚，拿着鞭子到处乱挥。对此饥饿的动物们已经无法忍受，大家不约而同地向那些折磨自己的人猛撞过去。琼斯和他的人马上陷入了动物头撞脚踢的包围当中，局势已经不在他们掌控之中了。这些动物如此勇敢，这些曾经被他们鞭笞虐待的动物吓得他们魂飞魄散。不多一会，他们就放弃了抵抗，任动物们踢打。仅仅一分钟之后，他们五个乘着车从大路上落荒而

逃，动物们在他们后面乘胜追击。

琼斯夫人从卧室的窗子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赶紧往包里塞了一些金银细软，从另外一条路逃走了。摩西呱呱叫着跟着她飞走了。同时动物们把琼斯和他的雇工追到路上并且关上了庄园的大门——五栅门。在大多数动物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们的起义成功了。琼斯被赶跑，他们成了曼娜庄园的主人。

开始的几分钟里，动物们还不敢相信他们有如此好运。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绕着庄园的边界狂奔，好像是要确保没有一个人躲在这里。然后他们跑回庄园里自己的房间，将琼斯统治时期留下的那些让他们讨厌的最后一丝痕迹抹掉。在马厩角落里那个放马具的小屋子被打破。里面的嚼子、鼻环、狗链及琼斯先生过去常常用来残忍地阉割猪和小羊羔的刀子被统统扔掉。缰绳、笼头、马眼罩，还有令他们感到羞耻的马粮袋都被当成垃圾扔到院子中间的大火里烧掉。鞭子也扔了。当看到鞭子在熊熊火焰中燃烧的时候，所有的动物欢呼雀跃。斯诺鲍也把绶带扔到大火里，那是往常在集市上装饰尾巴用的。

“绶带，”他说，“应该被认为是衣服，是人类的标志。所有的动物都应该一丝不挂。”

当布克瑟听到这些，就把夏日里用来赶走耳边苍蝇的小草帽拿出来，和其他东西一样扔到火里。

很快动物们就销毁了能让他们想起琼斯先生的所有东西。然后，拿破仑让大家回到贮藏室，给他们分了双份口粮，给每条狗两个小点心。他们又把《英格兰兽》连续唱了七遍，那一夜他们睡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好觉。

他们却像往常一样，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醒来，但马上想起了昨天他们所做的伟大的事情，开始尽情地在牧场奔跑。一条小路通向牧场旁边的一座小山，在那里几乎可以看到整个牧场。动物们冲上山顶，看山下晨光中的景色。没错，都是他们的——所有可以看到的都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沉浸在这种美妙的感觉中，嬉戏耍闹，欢呼雀跃。看到沾满露水的青草，他们蜂拥而至。满满咬一口夏日香甜的青草，踢起黑土块，猛嗅它肥沃的气息。然后他们又在庄园视察了一周，带着惊叹的神气巡视田地、草地、果园、池塘、灌木林，激动得说不出话。就像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些东西一样——他们还是不敢相信这一切已经属于他们自己。

然后他们列队回到庄园，静静地站在农舍门前。那里也是他们的，但他们不敢进去。过了一会，斯诺鲍和拿破仑用肩撞开门，动物们排成一列走了进来，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打扰到任何东西。他们用脚尖点地，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不敢高声说话，也不敢凝视那让他们敬畏的难以置信的奢华：床上的羽绒床垫，窥视镜，马鬃沙发，布鲁塞尔的地毯，以及客厅壁炉前挂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当他们走下楼梯时，发现莫丽不见了。大家回去找她，发现她正待在最好的一间卧室里。她把琼斯夫人梳妆台上的一条蓝绶带往自己肩膀上别，并对着镜子扭捏作态，自我陶醉。别的动物都狠狠地责备她，并走出屋子。挂在厨房的一些火腿被大家埋起来，啤酒桶被布克瑟一脚踢进炉子，屋子里别的东西都没有动。在场的动物都认为应该把农舍作为一个博物馆保存起来，并一致同意动物都不能住在那里。

动物们吃过早饭，斯诺鲍和拿破仑又把大家召集在一起。

“同志们，”斯诺鲍说，“现在是六点半，我们还有很长的一天。今天我们开始收割牧草。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事先明确。”

猪过去三个月自学读写的成果现在派上了用场，他们用一本很旧的拼写书学习。那本书本来是琼斯的孩子的，却被他丢进了垃圾堆。拿破仑要来几桶黑漆和白漆，沿着路一直提到那扇正对着大道的五道栅栏的大门前。然后斯诺鲍（他最擅长书写）用他的两瓣蹄子拿起一个刷子，把大门顶端横梁上的“曼娜庄园”涂掉，改写为“动物庄园”。这是这个庄园今后的名字。然后他们回到庄园里的建筑中间，斯诺鲍和拿破仑在大谷仓侧面的墙上架起了梯子。他们解释说，通过三个月的学习，他们已经把动物主义的原理精练为“七诫”。这七诫现在要被记录在墙上；这将是永恒不变的法，永远约束生活在动物庄园的所有动物。斯诺鲍艰难地（一头猪在梯子上保持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爬上梯子开始工作，斯奎拉在下面拿着油漆桶。戒条用巨大的字体写在涂了黑焦油的墙上，字是白色的，三十码[1]外也可以看到。它们是：

七诫

1.任何两条腿行走的都是敌人；

2.任何四条腿行走的或者有翅膀的都是朋友；

3.任何动物不得穿衣服；

4.任何动物不能睡在床上；

5.任何动物不能饮酒；

6.任何动物不能杀害其他动物；

7.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写得非常不错，除了“朋友”（friend）的“i”和“e”位置不对和有个地方把“s”写反外，再没有其他拼写错误。斯诺鲍大声读给大家听，帮助大家理解。所有的动物都点头表示完全同意，一些聪明一点的动物已经开始用心学习七诫了。

“现在，同志们，”斯诺鲍扔掉刷子，大声讲道，“去草地！我们一定要比琼斯和他的雇工更快收割完牧草，来证明我们并不比他们差。”

但这时，已经难受了的好一阵子的三头奶牛，终于忍不住哞哞地叫起来。她们已经二十四小时没有挤奶了，她们的乳房快胀破了。猪想了一会，拿来几只桶，开始挤奶，奶挤得还算比较顺利。他们的蹄子很适合做这样的工作。很快挤好了五大桶冒着泡的全脂牛奶，许多动物都充满期待地看着奶桶。

“这些奶怎么办呢？”有个动物问道。

“琼斯有时会在我们的饲料中掺一点。”一只鸡说道。

“不必担心牛奶，同志们！”拿破仑站到奶桶前面，大声喊道，“它会被照看好的。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收割牧草。斯诺鲍同志将带大家前去。我几分钟之后就到。前进吧，同志们！牧草在等着我们呢！”

于是动物们列队去草地收割，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牛奶已经不见了。

---

[1] 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3英尺，合0.91米。

第三章

为运回牧草，他们付出了多少辛勤和汗水！但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收获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有时，工作起来很困难：工具是为人设计的，而不是为动物设计的，没有动物能够使用那些需要只靠两条后腿站着才能使用的东西，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障碍。但猪是如此聪明，他们总是能设法排除各种困难。至于马，他们了解每一英寸[1]土地，事实上，他们比琼斯和他的雇工更精通割草和耕地。猪其实并不工作，但却对其他动物进行指导和监督。博闻强识的他们理所当然地担当着领导职务。布克瑟和克莱弗给他们自己戴上割草机和马耙（当然，这时候已经用不着嚼子和缰绳了），迈着稳健而沉重的步伐，一圈一圈在地里行进，猪跟在他们后面，根据不同情况，有时喊“驾，同志！”，有时喊“吁，同志！”在搬运和堆积牧草时，每个动物都谦逊到了极点。就连鸭子和鸡也整天在太阳下面忙碌地来回奔跑，每次都用嘴衔一点点牧草。最终，他们完成收割的时间比琼斯他们整整少了两天。更重要的是，这是该庄园有史以来最大的收获。他们没有浪费任何东西，鸡和鸭子凭借敏锐的目光收集起最后一根秸秆。庄园里的任何动物都没有偷吃哪怕一小口。

整个夏天，庄园里的工作都进行得有条不紊。动物都很快乐，而这些都是他们以前无法想象的。每一口食物都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因为这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食物，是自己为自己生产的，而不是吝啬的主人发给他们的。随着那些寄生的人们的离去，动物们有了更多的食物，也有了更多的闲暇，尽管他们还缺乏经验。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但猪的智慧和布克瑟雄健的体魄总能让大家渡过难关。比如，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收获小麦时，因为庄园里没有脱粒机，他们不得不使用最原始的办法踩压麦子并吹去麦壳。每个动物都对布克瑟赞叹不已。在琼斯时期他就是一匹勤劳的马，而现在他似乎更像是三匹马，有时候整个庄园的活都压在他强壮的肩膀上。从早到晚，不停地推呀拉呀，哪里的工作最难，他就去哪里。他和一只小公鸡达成一个协定，每天早晨提前半小时叫醒他，在日常工作开始前就自愿做一些急需的工作。对每一个难题，每一次挫折，他的回答都是“我会更加努力工作！”——这句话已经成为他的座右铭。

不过每个动物都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工作。比如，鸡和鸭子在收获时把撒落的谷粒收集起来，这样就节省了五蒲式耳[2]小麦。没有谁偷吃，也没有谁再为口粮而抱怨，过去那些习以为常的争吵、撕咬和嫉妒再也见不到了。没有动物——或者说几乎没有动物——逃避他们的工作。倒是有一个真实的例子：莫丽不太习惯早起，而且总是借故蹄子里卡了个石子而早早离开地里的工作。猫的表现也多少有些特殊。他们很快注意到，每当有工作的时候总是找不到猫的身影。她通常消失一连几个小时，直到用餐的时间，或者在晚上收工以后才若无其事地出现。但她却总能找到绝好的借口，而且她热情体贴的嗓音让人不得不相信她的用意是好的。老本杰明，就是那头驴，他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因为起义而有多少改变。像琼斯时期一样，他依旧慢慢吞吞地干活，从不偷懒，也不会自愿承担额外的工作。对于起义和起义最终的结果他总说没意见。当被问及是否对琼斯的离去而开心时，他总是说：“驴都长寿，你们还没见过死驴呢。”其他动物也只好接受如此神秘的回答。

星期天没有工作。早餐会比通常晚一个小时，早餐后是一个每周都有的仪式。首先是升旗。斯诺鲍在农具室找到一块琼斯夫人的绿色桌布，并在上面画上一个白色的蹄子和犄角，它于每个星期天的早晨在农舍花园的旗杆上升起。斯诺鲍解释道，绿色的旗子代表英格兰绿色的大地，而蹄子和犄角标志着未来的动物共和国，最终，它将在彻底推翻人类后诞生。升旗仪式结束后，所有动物列队到大谷仓参加一个被称为“动物大会”的会议。会上将计划未来一周的工作，并提出和讨论各项决议。提出议题的总是猪。其他动物知道如何表决，但从来没有想过要亲自提出一项议题。斯诺鲍和拿破仑是讨论中最活跃的。但很显然他们两个从来没有过一致的意见：其中一个提出的建议，另一个总是反对。甚至对已经表决过的议题，比如有个事实上谁也不会反对的议题：把果园后面的小牧场留给年老退休的动物，他们也有争执。此外，他们还曾就各种动物的退休年龄展开激烈的辩论。动物大会总是在《英格兰兽》的歌声中结束，而下午是他们纵情娱乐的时间。

猪已经把农具室当作他们的总指挥部了。晚上，他们在这里，通过从农舍里拿来的书籍，学习打铁、木工和其他必要的技能。斯诺鲍还忙于组织其他的动物加入他所谓的“动物委员会”。为这些他不知疲倦。他为母鸡设立了“蛋类生产委员会”，为牛设立了“洁尾联盟”，还有“野生同志再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设立目的是驯化老鼠和兔子），还为绵羊发起了“毛更白运动”等，除此之外，还设立了读写班。总体来看这些项目算是失败的。比如，驯化野生动物的尝试几乎立即中断。这些野

生动物的表现一如既往，每当对他们宽容的时候，他们就想从中占点小便宜。猫也曾加入再教育委员会，并且一度表现得相当活跃。有动物看到她有一天坐在屋顶上，和一些她够不着的麻雀交谈着。她告诉麻雀，所有动物都是同志，任何麻雀都可以在她的爪子上逗留，可麻雀总是和她保持距离。

读写班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到了秋季，庄园中所有的动物都在一定程度上扫了盲。

至于猪，他们已经精通了阅读和书写。狗的阅读能力不错，但除了七诫之外，它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山羊穆里尔比狗读得稍微好一点儿，她会在晚上从垃圾堆里找来报纸碎片读给大家听。本杰明和猪读得一样好，但从来没有发挥过自己的本领。他说，据他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值得一读的东西。克莱弗学会了所有字母，但还不会拼单词。布克瑟从来没有学会过D以后的字母。他用硕大的蹄子在土上写A、B、C、D，然后翘着耳朵站在那儿盯着那几个字母，不时抖一下额头的毛，在他所有的记忆里竭力搜寻下一个字母是什么，但从没有想起来过。事实上，有好几次，他确实学会了E、F、G、H，但每当记住它们的时候，总是发现他已经忘记了A、B、C、D。最后，他决定满足于前四个字母，并坚持每天写一两遍来巩固他的记忆。除了用来拼写她名字的几个字母外，莫丽拒绝学习任何东西。她会找一些细树枝整齐地摆出自己的名字，然后用一两朵鲜花装饰一下，接着绕着它们转圈，边转边不住赞叹。

庄园里其他动物都只学会了字母A。他们发现那些比较笨的动物，如绵羊、鸡和鸭子，还不能熟记七诫。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斯诺鲍宣布七诫实质上可以简化为一条准则，即“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他说，这包含了动物主义的精髓。谁完全掌握了它，谁就可以免受人类影响的威胁。起初，鸟类反对，因为他们似乎也只有两条腿，但斯诺鲍向他们证明其实并不是这样。

“同志们，鸟类的翅膀，”他说，“是一个推进前行的器官，而不是用来操纵的器官，因此它也应该被看作是腿。这与人类的标志——手是不同的，那是他们作恶的器官。”

鸟类听不懂斯诺鲍的长篇大论，但他们接受了他的解释，所有笨一点的动物都开始着手熟记这条新法则。“四条腿好，两条腿坏”被刻在谷仓的侧墙上，位于七诫的上方，字体比七诫更大。绵羊刚熟记这一法

则，就对它非常喜欢，经常躺在地上咩咩地叫“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一连叫几个小时，从来不知疲倦。

拿破仑对斯诺鲍的委员会没有任何兴趣。他说比起现在为这些成年的动物做的事情，教育年轻一代更为重要。刚巧在收割完牧草之后，杰西和布鲁贝尔产下九条健壮的小狗崽。小狗刚一断奶，拿破仑就从他们母亲那里把他们带走了，并说他将亲自负责教育他们。他把他们带到阁楼里，那间阁楼只有通过农具室的梯子才能上去。处在这样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庄园里其他动物很快就忘记了他们的存在。

不多久，牛奶的神秘去向弄清楚了。原来它每天都被掺在猪饲料里。早茬苹果已经熟了，草地上满是被风吹落的果实。动物们认为这些果实理所当然应该被平分；然而有一天，发布了这样一条命令：所有被风吹落的果实都要收集起来送到农具室供猪食用。一些动物为此喃喃地抱怨，但这没有用。所有的猪一致同意这条命令，斯诺鲍与拿破仑也不例外。他们派斯奎拉来给大家做必要的解释。

“同志们！”他大声喊道，“你们不会把这当作是猪的自私与特权吧？我希望不会。事实上，我们当中的许多猪并不喜欢牛奶和苹果，我自己就不喜欢。我们进食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保持我们的健康。牛奶和苹果（这一点已经被科学证明，同志们）包含的营养是猪的健康不可或缺的。我们猪是脑力劳动者，我们负责整个庄园的管理和组织工作。我们夜以继日地关注着你们的福利，就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吃苹果。如果我们失职了，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吗？琼斯就会回来！这是肯定的，同志们，”斯奎拉几乎是用恳求的声音对大家喊道，同时左蹦右跳，摇着尾巴，“在你们中间，肯定没有谁想看到琼斯回来吧？”

此刻，如果说动物们还剩一件事可以肯定的话，那就是他们不想让琼斯回来。鉴于此，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使猪保持健康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大家没有更多争论，一致同意：牛奶和吹落的苹果（以及苹果的成熟后的主要收成）应该特供给猪食用。

---

[1] 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等于1英尺的1/12，合2.5cm。

[2] 蒲式耳，英美制容量单位，1蒲式耳等于8加仑。英制1蒲式耳合36.3升，美制1蒲式耳合35.2升。

第四章

到夏末时分，动物庄园发生的一切已经传遍了半个郡。斯诺鲍和拿破仑每天都派出鸽子，鸽子们混到邻近农场的动物中，告诉他们起义的故事，并教他们唱《英格兰兽》。

这段时间琼斯先生经常坐在威灵顿的红狮酒吧，向每一个愿意听他唠叨的人抱怨他所遭受的巨大不公：被一伙畜生从自己的领地上赶了出来。其他庄园主大都很同情他，但最初并没有给他太多的帮助。暗地里，他们都在想能否从琼斯的不幸中捞到一些好处。幸好与动物庄园相邻的两个庄园的主人彼此关系一直很差。一个叫福克斯伍德庄园，是一个巨大的、疏于管理的老式庄园，林地边上有很多杂草，所有的牧场都已荒废，篱笆也破败不堪。庄园主皮尔金顿先生是一个随和的乡绅，根据季节的不同，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钓鱼和打猎上。另一个庄园叫品彻菲尔德，小一点，但是管理得不错。庄园主弗里德里克是个精明的壮汉，永远都有官司缠身，落下一个斤斤计较的名声。他们两个人互相看不惯对方，以至于永远都不可能达成一致，即使是在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但他俩都被动物庄园的起义完全震惊了，生怕自己庄园里的动物对此知道得太多。起初他们装作对动物管理自己庄园的想法嗤之以鼻。他们说，整个事件会在两个礼拜之内结束。他们说曼娜庄园（他们坚持这样称呼，他们觉得“动物庄园”的名称难以接受）里的动物无休止地互相争斗，而且他们很快就会饿死。随着时间的推移，动物们显然没有饿死，弗里德里克和皮尔金顿改变了他们的论调，开始说动物庄园如今邪恶猖獗。他们说动物们残酷地吞食同类，用烧红的马蹄铁互相折磨，并过着共妻的生活。弗里德里克和皮尔金顿说，这就是对抗自然法则的后果。

然而，对于这些说辞，谁也不会完全相信。一个美好的庄园，那里人类被赶走，动物主持自己的事务，这样的传言继续以各种模糊的、改编的形式流传着。这滋生了全年的反叛浪潮，遍及整个村庄。一头已被驯服的公牛突然变野了，绵羊毁坏篱笆并大肆吞食苜蓿，牛踢翻了奶桶，猎马不肯跨过栅栏而把骑手甩到栅栏另一边。最重要的是，《英格

兰兽》的曲子和歌词无处不在，并仍然以惊人的速度流传着。人们无法遏制听到这首歌时的愤怒，尽管他们假装觉得它滑稽可笑。按他们的说法，他们无法理解动物们怎么会唱如此不堪入耳的垃圾歌曲。任何唱这歌的动物都会当场受到鞭笞。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首歌的蔓延之势。乌鸫在篱笆上嘎嘎地唱它，鸽子在榆树上咕咕地唱它，歌声飘进了铁匠铺，夹杂在教堂的钟声里。每当人们听到歌词中对末日的预言，就吓得暗暗发抖。

十月初，谷物已经收割完毕并且堆好，其中有一些已经脱粒，一群鸽子疾速飞回，像受了刺激一般落在了动物庄园的院子里。琼斯和他的雇工，还有六个从福克斯伍德庄园和品彻菲尔德庄园来的人，已经进入了五栅门，沿着庄园的车道走来。除了领头的琼斯手里是枪以外，剩下的人都带着棍子。显然，他们试图收复这个庄园。

这是预料之中的，所有准备工作早已就绪。斯诺鲍负责指挥这场保卫战，为此他曾研习过一本讲述凯撒大帝征战的旧书，这是他在农舍中找到的。他果断下令，几分钟后，所有的动物已经各就各位。

当人们接近庄园的建筑时，斯诺鲍下令发动第一轮攻击。所有的鸽子，大概有三十五只，在人们头顶盘旋，在半空中一齐向他们拉屎；当人们在应付这个的时候，原本躲在篱笆后的鹅群猛冲出来，狠狠地咬他们的腿肚子。然而，这还只是一个轻微的打击，只是为了制造一点混乱，人们也很轻易地就用手上的棍子把鹅轰走了。这时斯诺鲍发动了他的第二轮攻击。斯诺鲍带着穆里尔、本杰明以及所有绵羊冲上前去，从各个方向对这伙人又戳又顶，本杰明还转过身用他的小蹄子一通狂蹬。但对动物们来说，他们的棍子和钉靴太厉害了。突然，斯诺鲍发出了“撤退”的尖叫声，所有的动物转身从大门逃进院子。

那伙人发出胜利的欢呼。正如设想的那样，他们看到仇敌四散而逃，于是他们胡乱追击着。这正是斯诺鲍所期待的。他们一进入院子，埋伏在牛棚里的三匹马、三头牛和其余的猪就冲到他们背后，截断了他们的后路。这时，斯诺鲍发出了进攻的信号，他自己直接向琼斯冲去。琼斯见他冲来，举起枪就开火。子弹擦伤了斯诺鲍的背，一只绵羊中弹身亡。不等他反应，斯诺鲍马上借自己几百磅重的身体摔向琼斯的双腿。琼斯猛跌在粪堆上，手中的枪也甩了出去。但最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还在布克瑟这里，他像一匹种马一样，靠后腿直立起来，用他巨大的铁蹄进行攻击，第一下就打中了福克斯伍德庄园一名马夫的脑壳，结果那马夫死在了泥坑里。有几个人见势不妙，扔掉棍子就想逃。人们陷

入了恐慌，接着所有动物追着他们满院子乱跑。他们被戳、被踢、被咬、被踩，庄园里的所有动物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报仇。就连猫也从房顶上跳到一个牛倌肩上，用爪子猛戳他的脖子，疼得他大叫起来。这帮人终于逮到一个出口被让了出来的机会，他们喜出望外，夺路而逃。这样，这场五分钟的侵袭以人们的原路溃逃而告终。一路上还有一群鹅跟在后面嘘叫，啄着他们的腿肚子赶他们走。

除了那个被踢倒的人之外，所有人都跑了。回到院子里，布克瑟用蹄子扒了一下那个脸朝下趴在泥里的马夫，想把他翻过来。这哥们儿一动不动。

“他死了。”布克瑟伤心地说，“我不是故意的，我忘了我钉过蹄铁。谁会相信我不是故意的呢？”

“别感情用事了，同志！”伤口还在滴着血的斯诺鲍喊道，“战争就是战争。只有死人才会是好人。”

“我并不想杀生，即使他是人类。”布克瑟念叨着，满眼泪花。

“莫丽去哪儿了？”不知谁喊道。

莫丽的确失踪了。一时间大家陷入了惊慌，他们担心那帮人伤害她，甚至把她拐走。最终却发现她在她的马厩里，头钻在槽里的干草中。枪一响她就逃跑了。后来又发现，那个马夫只不过是晕了过去，在大家找莫丽的时候，他苏醒过来逃跑了。

在极度的喜悦中，动物们又重新聚集在一起，每一位都用最大的嗓门讲述着他们在这次战斗中所做的贡献。马上就举行了一个自发的庆功仪式，他们升了旗，唱了许多遍《英格兰兽》，然后给死去的绵羊举办了一个庄严的葬礼，并在她的坟前种了一棵山楂树。斯诺鲍在坟前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他强调，如果需要的话，每个动物都应该时刻准备着为动物庄园奉献自己的生命。

动物们一致决定设立一个“一级动物英雄”的军功章，并当即授予了斯诺鲍和布克瑟。并有一枚铜质奖章（那是由一些从农舍里发现的，是用有点泛旧的真铜制成的），他们可以在星期天和假日佩戴。同样，死去的绵羊被追封为“二级动物英雄”。

大家对如何给这场战斗命名的问题发生了不小的争论，最终被命名为“牛棚大战”，因为伏击是从那里发起的。他们在泥里发现了琼斯先生的枪，又从农舍里弄到了子弹。于是他们决定把枪架在旗杆上，就像一门大炮一样，每年鸣响两次——一次是在十月十二日，也就是“牛棚大战”纪念日；另一次是在夏至日，也就是起义纪念日。

第五章

随着冬天的临近，莫丽变得越来越烦人。她每天早晨都不能按时工作，理由总是自己睡过了。她抱怨说自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疼痛，但她的胃口却一直很好。她经常凭借着各种各样的借口，放下手里的工作，跑去饮水的池塘边，站在那里，呆望着自己的倒影。还有一些比这更加严重的传言。有一天，莫丽正在院子里悠然地闲逛，一边摆弄着她那长长的尾巴，一边嚼着一根牧草。克莱弗把她叫到了一边。

“莫丽，”她说，“我有一些很严肃的话要对你说。今天早上，我看到你在动物庄园和福克斯伍德庄园交界的篱笆处，向另一边眺望。皮尔金顿的一个雇工站在篱笆的另一边。我离得很远，但基本上可以确定：他和你说话，而你也让他抚摸你的鼻子。这是什么意思，莫丽？”

“他没有！我也没有！这是没有的事！”莫丽边叫边跳，并用蹄子刨着土。

“莫丽！看着我的脸，你能以你的名誉向我担保，那个人没有抚摸你的鼻子吗？”

“这是没有的事！”莫丽反复说着这一句话，但是她没能直视克莱弗的脸，反而立刻拔腿向田野里跑去。

克莱弗心中泛起一个念头。她没有告诉其他动物，独自来到莫丽的厩中，用蹄子翻开稻草。稻草下面藏着一小堆糖块和几捆不同颜色的绶带。

三天后，莫丽失踪了。好几个星期都不知道她的下落。后来鸽子告诉大家，他们在威灵顿的另一边看到了莫丽。她拉着一辆黑红二色轻便马车，马车停在一家小旅店门外。一个穿着格子裤和长筒靴的红脸胖男人——看上去像是店老板——正抚摸着她的鼻子，并喂她糖吃。她的皮毛新近修剪过，前鬃上还挂着一条鲜红的绶带。鸽子们说，她看上去很享受。从此动物们再也不提莫丽的事了。

一月份，天气变得恶劣起来。田地冻得像铁一样结实，什么活也干

不了。大谷仓里召开了多次大会，猪忙着计划下一个季节的工作。猪显然要比其他动物聪明一些，于是大家都同意应该由猪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应对庄园里碰到的问题，不过他们的决策依然要经大多数动物投票同意。若不是因为斯诺鲍和拿破仑之间的争执，这种决策安排应该运作得很好。可是只要在某个论点上有可能发生争执，这两头猪就一定会有不同意见。如果他们中有一个提议多种几亩大麦，另一个必然会提议多种几亩燕麦；如果他们中有一个说某个地方最适合种圆白菜，另一个必然会说那里不种薯类就浪费了。他们有各自的追随者，相互之间也有一些激烈的争论。在开会的时候，斯诺鲍通常能够通过自己出色的演讲赢得大多数的支持，而拿破仑更擅长在会议之外的时间为自己游说到更多的选票。在绵羊那里，拿破仑的策略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最近，不管适时与否，绵羊总是咩咩地叫着“四条腿好，两条腿坏”，还经常以此来打断大会。斯诺鲍曾在农舍找到几本过期的《庄园主和畜牧业者》，并进行过深入研究、满脑子都是创新和改良的计划。他讲起农田排水系统，窖藏饲料和钢渣磷肥等概念时显得很内行。他还制定了一个复杂的计划，让动物直接在田里排便，并让他们每天选择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样就可以省去运送粪便的劳力。拿破仑自己没有拟定出任何计划，私底下却经常说斯诺鲍的那些计划终会一场空，看上去拿破仑是在伺机而动。在他们所有的争执当中，最为激烈的莫过于那个有关风车的争议。

在广阔的大牧场上，离庄园房屋不远的地方，有座小山丘，那里算是整个庄园的制高点。经过对那块土地的勘察，斯诺鲍宣称那里是最适合建造风车的地方。风车可以推动一个发电机，并给整个庄园提供电力。这可以用来照明取暖，还可以带动电锯、割草机、切片器和电动挤奶器。动物们之前从未听过这类事情（因为这是一座老式庄园，只有最原始的机器）。当斯诺鲍在描述有了那些奇妙的机器之后的梦幻场景时，动物们都听呆了：那些机器替他们工作，他们就可以在田里悠闲地吃草，或者通过阅读和交流来提高心智。

几周之内，斯诺鲍的风车计划就全盘出炉了。机械方面的细节大都来自琼斯先生的三本书：《一千件对居室有益的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泥瓦匠》和《初级电学》。斯诺鲍的书房以前是一个小孵卵棚，铺着光滑的木地板，非常适宜在上面作画。他经常屋门紧闭，在里面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他用石块压着打开的书，两瓣蹄子夹着一截粉笔，在屋子里快速走来走去，一边画着一道道的线条，一边兴奋地哼哼着。渐渐地，设计图已经有了大量复杂的曲柄和齿轮，覆盖了大半块地板。其他动物根本看不懂是什么东西，但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的动物每天

都至少来看一次斯诺鲍的设计图。就连鸡和鸭也来看，他们非常小心，生怕踩到地上的粉笔线条。只有拿破仑对此持回避态度。一开始，他就声称反对风车计划。然而有一天，拿破仑出人意料地也来检查这个设计图。他在棚里缓慢地走着，仔细查看每一处细节，还用鼻子嗅过那么一两次。然后他稍微站了一会，斜眼打量着设计图。突然，他抬起腿，在图上撒了泡尿，然后一声不吭转身离去。

整个庄园在风车这件事上截然分为两派。斯诺鲍不否认建造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采石砌墙，制作风车叶片，之后还需要制造发电机和电缆（至于如何完成这些程序，斯诺鲍不置一词）。但他坚持这项任务可以在一年内完成。而且他还声称，在风车建成之后，可以节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动物们可以每周只上三天班。另一方面，拿破仑却说，当前最为紧要的任务是增加粮食生产，如果把时间浪费在风车上，大家都会饿死。动物在这种情况下分为两派，各自的口号分别是“拥护斯诺鲍的每周三日工作制”和“拥护拿破仑的粮食富足制”。本杰明是唯一一个不加入任何派系的动物。他既不相信粮食会更充足，也不相信风车会节省劳动力。他说，风车不风车的都无所谓，生活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辛苦总是难免的。

除了风车之争外，还有关于庄园防御问题的争议。大家都心知肚明，尽管人类在牛棚大战中被击败了，但是为了夺回庄园并重新让琼斯接管，他们会有更为凶狠的侵犯。再加上他们打败仗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乡间，邻近庄园的动物也越发不安宁，他们就更有理由这么干了。像往常一样，斯诺鲍和拿破仑又产生了分歧。按照拿破仑的说法，动物们必须武装起来并自学如何使用武器。而按斯诺鲍的说法，他们应该派出更多的鸽子，去煽动其他庄园的动物起义。一个争辩说如果不能保卫自己，就注定要被征服；另一个说如果到处都有起义，他们也就不必自卫了。动物们先听拿破仑的，再听斯诺鲍的，然后就不知道到底谁说的对；事实上，他们发现，谁在讲话，他们就会同意谁的看法。

一天，斯诺鲍终于完成了风车设计图。就在这个星期天的大会上，就要针对是否建造风车进行表决。当动物们在大谷仓集合后，斯诺鲍便站起来，陈述了自己热衷于建造风车的理由，尽管整个过程不时被绵羊的咩咩声打断。随后拿破仑起身反驳，他轻声说道，建造风车完全是扯淡，并号召大家不要支持他，说完就突然坐下了。他的发言仅仅持续了不到半分钟，似乎对发言的效果毫不在意。这时，斯诺鲍又跳了起来，喝止了又开始咩咩乱叫的羊群，慷慨激昂地呼吁大家拥护风车的建设。

此前，动物们对双方的支持度基本没有差异，但此时斯诺鲍的口才征服了他们。他用热情洋溢的话语，描绘出一幅在大家卸下肩上沉重的劳作担子之后动物庄园的新景象。此刻，他的设想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割草机和切片器了。他说电除了可以让每个动物的屋子都拥有电灯、热水、凉水和电炉之外，还可以带动脱粒机、犁、耙、轱辘、收割机以及打捆机。演讲结束后，动物们将会如何表决已经显而易见了。但就在这时，拿破仑又站了起来，用他特有的斜眼瞥了斯诺鲍一眼，发出了一声吼叫，之前动物们从未听他发出过这样的吼叫。

仓外传来一阵可怕的犬吠声，紧接着，九条凶恶的狗，戴着铜钉项圈，一同跳进大谷仓。他们径直冲向斯诺鲍，他只好从座位上跳起来，刚好躲过那些狗尖利的爪子。转眼斯诺鲍跑到门外，这些狗就在后面追。动物们吓得瞠目结舌，全都挤到门口，观看这场追逐。斯诺鲍正在通往大路的牧场上狂奔。他用尽全身力气跑着，而狗已经快追到他的后脚跟了。忽然他滑到了，眼看着就要被狗抓住了。可他又重新站了起来，用更快的速度飞奔。狗又一次追上了他，其中一条狗差不多就要咬住他的尾巴了，但斯诺鲍还是及时甩开了尾巴。然后他一个冲刺，在狗还差几英寸就要追上他的时候，从篱笆的一个缺口窜了出去，再也看不到他了。

动物们在惊愕中跑回大谷仓。转眼那些狗也跳着跑了回来。起初，大家都不知道这些家伙是从哪里来的，但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解答：他们就是先前被拿破仑从狗妈妈身边带走并偷偷养大的那九只小狗崽。尽管现在他们还没有完全长成，但也已经不小了，看上去像狼一样凶猛。他们始终在拿破仑身边。大家注意到，这些狗向拿破仑摇着尾巴，一如往日其他狗向琼斯先生摇尾巴的样子。

这时，拿破仑在狗的跟随下，走上往日麦哲发表演说的讲台。他宣布，周日早晨的动物大会就此告终。他说，这些会议毫无必要，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今后一切有关庄园工作的问题，将由一个由猪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解决，这个委员会由他亲自掌管。今后他们将私下碰头，然后再把决议告诉其他动物。在周日早晨，动物们仍然要集合，向庄园旗帜敬礼，合唱《英格兰兽》，并接受下周的工作安排，但不会有什么辩论了。

虽然驱逐斯诺鲍这事已经给了大家不小打击，但这个通告让他们更为惊恐。若非找不到合适的论点，一些动物早就开始抗议了。甚至连布克瑟也觉得大惑不解，他把耳朵向后贴平，抖动了几下额头的鬃毛，试

图理清思路，但最后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有几头猪倒是想得很清楚。前排的四只小猪发出反抗的尖叫，马上跳起来准备发言。但是，突然间，卧在拿破仑身边的那群狗发出一阵低沉恐怖的咆哮，于是那四头小猪立即住口，回到了座位上。接着，绵羊又开始高声咩咩地叫着“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叫声持续了将近一刻钟，这样一来任何讨论都没法进行下去了。

随后，斯奎拉被派出来，针对这个新的安排给大家一个解释。

“同志们，”他说，“我相信这里的每一个动物都对拿破仑同志所做出的牺牲心怀感激——他独自扛起了多余的工作。同志们，不要以为当领袖是一种享受！相反，这是一种深切而沉重的责任。没有谁比拿破仑同志更坚定地相信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他也确实很乐意看到大家都能为自己做主。可是，有时候你们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同志们，之后我们会怎样呢？想想如果你们决定追随斯诺鲍和他那异想天开的风车计划会怎样呢？而斯诺鲍，就我们现在所知，不过是个犯罪分子。”

“在牛棚大战中，他作战很勇敢。”不知道谁说了一句。

“勇敢是不够的，”斯奎拉说，“忠诚和服从更为重要。至于牛棚大战，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斯诺鲍的战功被吹得太大了。纪律，同志们，铁的纪律！这是我们今天的口号。一步走错，我们的敌人就会回来。同志们，你们绝对不想让琼斯回来吧？”

这番话同样无可辩驳。毫无疑问，动物们肯定不想让琼斯回来；如果星期天早晨的辩论有可能导致他回来，那么辩论就一定要停止。布克瑟想了好一阵子了，用一句话说出了他的整体感受：

“如果拿破仑同志这么说，那么就一定是对的。”从此以后，他就把“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这句格言，当作他自己原来的座右铭“我会更加努力工作”的补充。

这时，天气已经变暖，到了春耕的时节。斯诺鲍用来画风车设计图的那间小屋一直被封着，大家猜地板上那些设计图早已被擦得一干二净了。每个星期天的早晨十点，动物们都聚集在大谷仓，接受他们下周的工作安排。他们把头骨现在已没有肉的老麦哲从果园里挖了出来，安置在旗杆下的一个树桩上，在那杆枪的一侧。升旗之后，动物们要恭恭敬敬地列队走过那个颅骨，然后才能走进大谷仓。现在，他们也不像以往

一样全体都坐在一起。拿破仑和斯奎拉，以及另一个叫米尼莫斯的猪，共同坐在讲台的前面。米尼莫斯在谱曲作诗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那九条年轻的狗在他们身后卧着，围成一个半圆形。其他猪坐在他们的后面，别的动物面对着他们，坐在大谷仓中间。拿破仑用一种略显粗暴的军人风格宣读下周的计划，然后全体合唱一遍《英格兰兽》就解散。

驱逐斯诺鲍之后的第三个星期天，拿破仑宣布要建造风车，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多少有点吃惊。拿破仑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自己改变了主见，只是告诫大家，这项额外的任务意味着非常艰苦的工作，甚至有可能会减少他们的食物配额。不过，建设计划全部都已准备好，并已经进入最后的细节部分。在过去的三周，一个由猪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一直在为此工作。风车的建设，加上各种各样的改进，预计需要两年时间。

当晚，斯奎拉私下对其他动物解释道，事实上，拿破仑从未反对过风车建设。相反，恰恰是他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个计划。斯诺鲍在孵卵棚的地上画的那个设计图其实是从拿破仑的文件中剽窃的。事实上，那个风车是拿破仑自己的发明。然后，有动物问道，为什么他曾如此强烈地反对这项计划？这时斯奎拉显得非常诡秘。他说，这是拿破仑同志的谋略，他假装反对风车建设，目的是赶走斯诺鲍，因为斯诺鲍是个危险分子，并有着极坏的影响。既然现在斯诺鲍已经逃走了，计划也就可以顺利无阻地进行了。斯奎拉说，这就是所谓的策略。他一连说了好几遍：“策略，同志们，策略！”还一边活蹦乱跳地摇着尾巴，一边陶醉地笑着。动物们拿不准这个词的含义，但斯奎拉说得如此令人信服，三条凑巧跟着他的狗又在恐怖地咆哮着，大家只好不再发问，接受他的解释。

第六章

那一整年，动物们都像奴隶一样工作。但是他们乐于工作，也甘于奉献与牺牲，因为他们明白，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自己和后辈的利益，而不是为了那帮懒散成性、以偷窃为生的人类。

整个春天与夏天，他们每周都要工作六十小时。到了八月，拿破仑又宣布，星期天的下午也要工作。这项工作是完全自愿的，但任何动物如果缺勤，就会减掉一半的口粮。即便这样，大家还是会发现有些工作就是干不完。收成比上一年要差一些，而且，由于没有及时地完成耕作，本该在初夏种上薯类的两块地也没有播种。可以预见，即将到来的冬季会是一段艰苦的日子。

风车建设产生了意外的困难。庄园里有很好的石灰石矿，同时又在一间屋子里发现了大量的沙子和水泥，因此所有的建筑材料均已齐备。但起初动物们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该如何把石头打到适合的大小。似乎除了动用鹤嘴镐和撬棍外，没有别的办法。可是动物们又都不会使用这两种工具，因为他们无法仅靠后腿站立。几个星期徒劳无功的努力之后，才有动物想出一个好主意，就是利用重力。在石矿的矿床中，到处都是那种因太大而无法直接使用的大石头。动物们用绳子把石头绑住，然后由牛、马、羊及所有能抓住绳子的动物——在一些关键时刻，甚至猪也会搭把手——一起拖着石头，极其缓慢地运送到采石场的坡顶。从那里，他们把石头推到崖下，石头就摔成了碎块。运送这些碎石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马一整车地拉，羊一块一块地拖，甚至连穆里尔和本杰明也套上一辆旧车，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到暮夏时分，石头储备已经充足，然后，在猪的监督下，风车建设开工了。

但采石是一个缓慢而艰辛的过程。把一块大石头拖到坡顶往往需要精疲力竭地干上一整天，而有时把石头推下崖又摔不碎。要是没有了布克瑟，恐怕什么也干不成，他的力量似乎与其他所有动物合在一起相当。每当动物们被大石头拖着一起滑下山坡而发出绝望的哭喊时，总是靠布克瑟竭力拉住绳索才能将巨石稳住。他一英寸一英寸吃力地爬坡，呼吸变得急促，蹄尖紧扣着地面，汗水打湿了他宽厚的脊背。看到这些，动物们无不满怀敬佩。克莱弗有时会告诫他小心不要太过劳累，但

布克瑟从来都不放在心上。对他而言，他的两句箴言“我会更加努力工作”和“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似乎已经足以解答任何问题。他已经同那只小公鸡约好，把先前每天早晨提前半小时叫醒他，调整为提前四十五分钟。在所剩不多的空闲时间里，他还会独自来到采石场，装一筐碎石，仅凭他一己之力拖到风车基地。

虽然工作很辛苦，但那个夏天动物们过得还不算太坏。尽管他们所得的粮食不比琼斯时期多，但至少也不比那时少。现在他们只需要养活自己，不再需要供养那五个奢侈的人，与这种优越感相比，许多挫折都显得微不足道。另外在很多情况下，动物们干起活来更加高效省力。比如锄草这种工作，动物们做得要远比人类彻底。而且，既然现在没有动物偷盗，就不需要用篱笆把牧场和农田分开，这样就节省了大量维护篱笆和栅栏门的工作。然而，夏季过后，各种意料之外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他们需要煤油、钉子、绳线、狗饼干和马蹄铁，但庄园里无法生产这些东西。后来，又需要种子和化肥，以及各种工具，最后，还有风车用的机器。对于如何获取这些东西，动物们就无从想象了。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在动物们集合接受任务分配时，拿破仑宣布，他已经确立了一项新政策。从现在起，动物庄园将与邻近的庄园展开贸易，当然这不是为了任何商业目的，只是为了获取某些急需的物资罢了。他指出，风车所需要的东西凌驾于其他任何事物之上。因此，他正打算卖掉一堆牧草和当年小麦收成的一部分，往后如果再需要钱的话，就只能卖鸡蛋了，因为在威灵顿，鸡蛋总是有市场的。拿破仑还说，母鸡应该乐于做出这样的牺牲，这是她们对建设风车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动物们又一次感受到一种隐隐的不安。永不与人往来，永不与人交易，永不碰钱——这些难道不是琼斯被驱逐后的第一次动物大会上的决议吗？所有的动物都记得通过了这样的决议，或者至少他们认为自己是记得的。曾在拿破仑废除动物大会时提出反对的那四只小猪胆怯地开口了，但他们很快在狗可怕的怒吼中噤声。紧接着，像往常一样，绵羊又开始咩咩地叫着“四条腿好，两条腿坏！”短暂的尴尬局面就这样顺利地应付过去了。最后，拿破仑抬起前蹄让大家肃静，宣布他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任何动物都无须从事与人类打交道这样的工作，这显然也是大家最讨厌的工作。他愿意以一己之力肩负起这项重任。有一位温伯尔先生，他是威灵顿的一个揽生意的人，已经答应来担任动物庄园与外界事务的中介人，并将在每周一早晨来动物庄园接受任务。拿破仑照例以一句“动物庄园万岁”结束了他的讲话。动物们唱完《英格兰兽》就解散

了。

之后，斯奎拉在庄园里转了一圈来使动物们安心。他保证说，以前根本就没通过什么反对贸易和金钱的决议，这类决议甚至从未提出过。这纯粹是臆想，追本溯源，很可能是斯诺鲍散布的谣言。可一些动物还是有些许疑惑，但斯奎拉狡猾地问道：“你们敢肯定这事不是你们做梦的时候想到的吗，同志们？你们对这样的决议有过任何记录吗？写在哪儿啦？”既然可以确定这类东西并没有文字记录，动物们便确信是他们自己搞错了。

温伯尔先生每周一都如约而至。他是个一脸奸诈的小个子，留着八字胡。他经营的业务不大，却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使他能比别人预先想到动物庄园会需要一个经纪人，并且佣金不会少。动物们带有几分恐慌地看着他来来去去，并尽可能避开他。不过，看到四条腿站立的拿破仑在向两条腿站立的温伯尔发号施令，他们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对这种新的安排感到安心。他们同人类的关系的确今非昔比了。人们对动物庄园的憎恨并没有因为庄园的兴盛而有所消解，反而恨之更甚。人们都坚信，动物庄园迟早会破产，尤其是那个风车项目将注定失败。他们经常在小酒店相聚，互相之间用图表来证明风车必定会倒塌；或者，即使真的能建成，也永远无法正常运转。但是，他们对于动物们自行管理事务的能力却不由刮目相看了。表明这种态度的其中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开始使用动物庄园这个名称，不再有意把它称作曼娜庄园了。他们也不再支持琼斯，而琼斯自己也早就对夺回庄园失去了信心，并移居到该郡的另一个地方。尽管动物庄园只通过温伯尔与外界联系，但不断有传言说拿破仑将与福克斯伍德的皮尔金顿，或者品彻菲尔德的弗里德里克签订一份明确的商业协议——但是，据传，不会和两家同时签订协议。

大约也就在这段时间，猪突然搬到农舍里住了下来。动物们似乎又想起他们早先通过的一项决议反对这么做。斯奎拉也再一次做到让大家确信根本就没有这个决议。他说，猪就是整个庄园的大脑，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这是切实需要的。而且，对于领袖（最近他谈到拿破仑已经开始使用“领袖”这一称呼了）的尊严而言，住在房子里要比只是住在一个猪圈里更为合适。尽管这样，当一些动物听说猪不仅在厨房里吃饭，把会客室当作娱乐室，而且还睡在床上时，还是为此感到不安。布克瑟照例说了一句“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便不再关心此事。但是克莱弗却认为她记得有一条明确的戒律反对在床上睡觉，于是她跑到大谷仓

的后墙，试图在那里题写的七诫中，找出答案解决自己的疑惑。当她发现自己只认得几个字母时，她找来了穆里尔。

“穆里尔，”她说，“你帮我念一下七诫的第四条。它不是说决不能睡在床上吗？”

穆里尔有些吃力地拼读着那些文字。

“上面写的是，‘任何动物都不能睡在床上，如果床上铺了床单的话。’”她终于读出来了。

太奇怪了，克莱弗从来不记得第四条戒律提到过床单；但既然墙上是这么写的，那它一定原本就是如此。这时，斯奎拉在两三条狗的陪伴下凑巧经过这里，正好能给整个事情一个合理的解释。

“同志们，如此说来，你们已经听说了我们猪现在都睡在农舍里的床上吧？”他说，“可为什么不能呢？我确信，你们不会认为真的有条戒律反对睡床吧？床的意思仅仅是指一个睡觉的地方。从适当的角度看，畜栏里的一堆稻草就是一张床。这条戒律反对的是床单，床单是人类的发明。我们撤掉了农舍里床上的床单，裹着毯子睡觉。这几张床也非常舒适！但是，同志们，我可以告诉你们，就我们现在必须从事的所有脑力工作而言，所需的舒适度更甚。你们不会不让我们休息吧，同志们？你们不会想让我们因为太过劳累而失职吧？确定你们谁都不想让琼斯回来吧？”

针对这一点，动物们马上给出确定的答案，并且再也不提猪睡到农舍床上的事情了。而且几天后，当猪宣布说往后他们要比其他动物晚一小时起床时，大家也没有为此抱怨。

一直到秋天，动物都非常劳累，但却很快乐。这一年他们已经过得很艰难了，再加上卖掉了一些牧草和小麦，过冬的粮食储备也不够充足，但风车补偿了这一切。此时，风车已经完成了差不多一半。秋收之后，有好一阵子都是干燥晴朗的好天气，动物们干起活来比以前更卖力。他们心里想的是，只要能让墙再增高一英尺[1]，那么终日来回搬运石头就是值得的。布克瑟甚至在夜间也会出来，在中秋的月光下独自工作一两个小时。在空闲时间，动物们会绕着那已经完成一半的工程走来走去，赞叹那笔直结实的围墙，同时为他们居然能造出如此伟岸的工程而感到欣喜。只有老本杰明对风车没什么热情，同往常一样，除了那句

神秘的“驴都长寿”之外，不肯多说一句话。

伴随着凛冽的西南风，十一月来临了。因为天气太潮湿，没有办法和水泥，不得不中止风车的建设。后来，在一个晚上，狂风大作，吹得连庄园里房子的地基都在震，还吹落了大谷仓顶上的一些瓦片。鸡从睡梦中醒来，惶恐地叫着，因为她们同时都梦到了远处的一声枪响。早晨，动物们走出房间，发现旗杆已经被吹倒，果园边的一棵榆树像萝卜一样被连根拔起。就在他们还在注意这些的时候，所有动物的喉咙中都爆发出一声绝望的哭喊。一幅骇人的场景呈现在他们面前：风车变成了一堆废墟。

他们不约而同地冲到了事发现场。平日里很少走路的拿破仑冲在了最前方。是的，全部躺倒在地基上的正是他们的奋斗成果，那些他们费了很大力气弄碎并运来的石头散落得到处都是。起初，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只是站在那里悲伤地盯着那些塌下来的散乱的碎石。拿破仑一言不发地走来走去，偶尔在地面上嗅一嗅。他的尾巴变得僵硬，剧烈地摇摆着，这是他大脑快速活动的一种表现。他猛地站住，好像打定了什么主意。

“同志们，”他平静地说，“你们知道这是谁干的吗？你们知道昨晚推到我们风车的仇敌是谁吗？斯诺鲍！”他突然雷鸣般地嘶吼道：“这是斯诺鲍干的！多么险恶的用心，想通过破坏我们的计划来为他可耻的被逐报仇，这叛徒趁天黑偷偷爬到这儿，摧毁我们近一年的劳动成果。同志们，此时此地，我宣布判处斯诺鲍死刑。任何动物若能让他伏法，将授予‘二级动物英雄’称号，另加半蒲式耳苹果。如果能活捉他，将得到一蒲式耳苹果！”

动物们得知斯诺鲍居然犯下如此罪行时，感到极度震惊。他们怒吼一声，开始思索如果斯诺鲍再回来的话，该如何活捉他。差不多就在同时，他们在小山丘不远处的草地上发现了猪蹄印。那些脚印只延伸了几码的距离，但看上去，方向朝着篱笆上的一个洞。拿破仑深深地嗅了嗅蹄印，便宣称这些蹄印是斯诺鲍的。在他看来，斯诺鲍很可能是从福克斯伍德庄园方向来的。

“别再耽搁了，同志们！”检查完那些蹄印后，拿破仑叫道，“还有活要干。就从今天早晨开始，重建风车。而且，我们要在整个冬天进行建设，风雨无阻。我们要让那个卑鄙的叛徒知道，想破坏我们的工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记住，同志们，我们的计划绝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们

要坚持到实现它们的那一天。前进，同志们！风车万岁！动物庄园万岁！”

---

[1] 英尺，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等于12英寸，合0.3米。

第七章

这是一个严酷的寒冬。风暴天气刚过去，又下起了雨夹雪，接着又是大雪。然后是一场严重的霜冻，直到二月份才见缓和。动物们都在为重建风车全力以赴，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外界正关注着他们，如果风车不能按时完工，那些嫉妒的人便会幸灾乐祸。

一些心怀恶意的人佯装不相信是斯诺鲍毁坏了风车。他们说，风车之所以会倒塌，是因为围墙还不够厚实。动物们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不过，大家还是决定这次要用3英尺厚的墙来取代上次的1.8英尺的墙。这也意味着要采集更多的石头。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采石场积雪成堆，无法干活。在随后干燥的霜冻天气，倒是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真是一项令人痛苦不堪的工作。动物们也不像以前那样对此充满希望。他们一直都在挨冻，还常常要挨饿。只有布克瑟和克莱弗还斗志昂扬。尽管斯奎拉常常做一些精彩的演讲，通常是服务的乐趣和劳动的尊严之类的话题，不过，还是布克瑟的精力和他永远高呼的“我会更加努力工作”让动物们更受鼓舞。

一月份，食物开始短缺。谷物配给骤减，不过有通知说要配给额外的土豆来弥补。随后却发现大部分土豆已经被霜冻坏了，原因是盖得不够厚。土豆开始变软，失色，只有一小部分还可以吃。有一段时间动物们只能靠吃糠麸和甜菜度日，饥荒似乎就要降临。

对外界隐瞒这一事情是极其必要的。风车的倒塌让人们有了底气，他们针对动物庄园捏造出了一些新的谎言。他们再次散布谣言说，动物们正因为饥荒和疾病而挣扎在死亡边缘，他们无休止地争斗，已经到了同类相食和吞食幼崽的地步。拿破仑很清楚，要是食物短缺的事情泄露出去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于是他决定利用温伯尔先生散布一些相反的言论。迄今为止，温伯尔每周光顾时，动物与他几乎都没什么接触；但这一次，有一些动物被选中（大多数是绵羊），他们接到指示，要在温伯尔能够听到的地方，装作不经意地聊起有关食物配给增加的事情。不仅如此，拿破仑还下命令，给贮藏室里已经几乎空了的大箱子装满沙子，用所剩不多的粮食盖在上面。然后找了个适当的借口，带温伯尔走过贮藏室，让他能够瞥见那些大箱子。这招果然奏效，温伯尔不断地向

外界传达说，动物庄园根本不缺粮食。

然而，将近一月底的时候，事情就再明显不过了，他们必须从别的地方获取一些额外的粮食。这些日子，拿破仑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整天都待在农舍中。农舍的每一道门都由面目狰狞的狗把守。当他出现，也会以一种仪式感很强的方式出现，六条狗簇拥在他四周，如果谁走得太近，他们便发出恶吼。甚至在星期天早晨，他也常常不露面，而是由另外一头猪来宣布命令，通常会是斯奎拉。

一个星期天早晨，斯奎拉宣布，所有要开始下蛋的鸡必须上交他们的鸡蛋。通过温伯尔，拿破仑已经签订了一份每周提供四百枚鸡蛋的合同。用这些鸡蛋所赚的钱可以买回足够的粮食，庄园就可以维持到夏季，到那时，境况就会有所好转。

鸡听到这话，爆发出一阵强烈的抗议。尽管她们之前接到过警告，说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但她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真的发生。她们刚准备好春季用来孵小鸡的蛋，因此抗议道，此时把蛋拿走无异于谋杀。这是自琼斯被驱逐之后，庄园里第一次出现反叛的气息。在三只年轻的黑色米诺卡鸡的带领下，她们决定尽全力去挫败拿破仑的计划。她们的做法是飞到房梁上下蛋，这样鸡蛋落地后就摔得粉碎。拿破仑立即采取了强硬措施。他下令停止向鸡供应口粮，同时颁布法令，任何动物，只要给鸡提供哪怕一粒粮食，都将被处以死刑。由狗来执行这些命令。僵持五天之后，鸡投降了，回到了她们的窝里。在这期间，共有九只鸡死去。她们遗体被埋葬在果园中，对外则宣称她们死于球虫病。温伯尔对此事并不知情，鸡蛋按时足量交付，每周都会来一辆食品店的车，把鸡蛋拉走。

这段时间大家都没有再见过斯诺鲍。有传言说他躲在附近的一个庄园里，不是福克斯伍德就是品彻菲尔德。此时，拿破仑与其他庄园主的关系也比以前稍有改善。碰巧院子里有一堆木材，十年前在清理一片山毛榉树丛的时候就堆在了那里。于是温伯尔建议拿破仑把它卖掉，还说皮尔金顿先生和弗里德里克先生都非常想买。可拿破仑在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决。大家都注意到，每当他似乎要与弗里德里克先生达成协议时，就有传言说斯诺鲍躲在福克斯伍德；每当他倾向于和皮尔金顿合作时，就有传言说斯诺鲍在品彻菲尔德。

在初春时节，突然发现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斯诺鲍经常在晚上秘密潜入庄园！动物们惶恐不安，躺在房间里难以入睡。据说每天晚上他

都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爬进来，无恶不作。他偷走谷物，打翻奶桶，打碎鸡蛋，践踏苗床，咬掉果树的树皮。无论何时，只要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通常都会归咎于斯诺鲍。要是窗子坏了或者水道堵了，会有动物断定这是斯诺鲍在夜里干的。贮藏室的钥匙丢了，所有动物都坚信是被斯诺鲍扔到了井里。非常奇怪的是，当他们发现钥匙是被误放在粮食袋下面时，仍然对先前的判断坚信不移。奶牛们异口同声地宣称，在她们睡觉的时候，斯诺鲍偷偷溜进牛棚，挤走了她们的奶。那些在曾在冬天给他们带来麻烦的老鼠，也被说成是斯诺鲍的党羽。

拿破仑下令针对斯诺鲍的活动进行一次全方位的调查。他在狗的护卫下，开始对庄园里所有的房屋进行仔细巡查，出于恭敬，其他动物与拿破仑保持着一段距离，远远尾随着他。每走几步，拿破仑都要停下来嗅一嗅地面，他说通过气味可以分辨出斯诺鲍的足迹。他嗅遍了每一个角落，从大谷仓、牛棚、鸡窝到菜园，几乎到处都有斯诺鲍的踪迹。每到一处，他就把鼻头伸到地上，深深嗅几下，然后便用一种可怕的声音叫道：“斯诺鲍！他来过这儿！我能很清楚地闻到！”“斯诺鲍”三个字一说出口，所有的狗都龇牙咧嘴地发出令人生畏的咆哮。

动物们彻底吓坏了。斯诺鲍就像一个看不见的阴影，笼罩在他们周围，用各种危险的手段威胁着他们。那天晚上，斯奎拉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脸上带着一种惶恐的表情，说他有一些重要的消息要公布。

“同志们！”斯奎拉一边略带神经质地跳着，一边喊道，“发现了一件最为可怕的事情。斯诺鲍已经把自己卖给了品彻菲尔德庄园的弗里德里克，那人甚至现在都在策划攻打我们，想要夺取我们的庄园！这次攻击开始后，斯诺鲍将会是他的向导。更加糟糕的是，我们曾经以为斯诺鲍造反是因为他的虚荣和野心。但我们搞错了，同志们，你们知道真正原因是什么吗？他一直都是琼斯的密探。我们刚刚发现一些他留下的文件，里面的信息证实了这一点。依我看，这解释了不少问题，同志们。幸亏在牛棚大战中，他的阴谋没有得逞，但我们难道看不出来他是想让我们失败并彻底遭到毁灭吗？”

动物们听得目瞪口呆。比起斯诺鲍毁坏风车，现在说的这一恶行要严重得多。但是他们在完全接受这一点之前，迟疑了好几分钟。他们都记得，或者是认为自己记得，他们曾看到，在牛棚大战中，斯诺鲍曾冲在最前面，在每一轮攻势之前都是他在重整旗鼓，即使子弹擦过他的脊背，他也从未退缩。起初，他们实在难以看出，这怎么能说明他和琼斯是一伙的，就连很少质疑的布克瑟也大惑不解。他卧在地上，前蹄弯在

自己身子下面，闭上眼，费了很大力气去梳理他的思路。

“我不相信，”他说，“斯诺鲍在牛棚大战中作战英勇。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战斗一结束，我们不是马上就授予他‘一级动物英雄’称号吗？”

“这是我们的失误，同志们。因为我们现在才知道，事实上他试图诱使我们灭亡。这一切在我们发现的秘密文件中都写得很清楚。”

“但是他负伤了。”布克瑟说，“我们都看到他流着血在跑。”

“这也是阴谋的一部分！”斯奎拉叫道，“琼斯的子弹只不过擦伤他的皮而已。如果你识字的话，我就会让你看看他自己写的原话。他们的阴谋，就是在关键时刻，让斯诺鲍发出一个逃跑的信号，把庄园拱手让人。他差一点就成功了，同志们，我甚至敢说，要是没有我们英勇的领袖拿破仑同志的话，他早就成功了。难道你们不记得，当琼斯一伙人攻入院子的时候，斯诺鲍突然转身而逃，还有很多动物随他而去吗？还有，难道你们不记得，就是在那个弥漫着恐慌、千钧一发的时刻，拿破仑突然冲上前去，大喝一声‘人类灭亡’，随即就咬住了琼斯的腿？你们肯定记得这些吧，同志们？”斯奎拉一边大声叫着，一边左蹦右跳。

既然斯奎拉把这一场景描述得如此生动，动物们似乎记得的确有这么回事。无论如何，他们记得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斯诺鲍转身逃走是确有其事。但布克瑟还是觉得有一点不舒服。

“我不相信斯诺鲍从一开始就是个叛徒，”他终于说道，“他之后做了什么是另一回事。但我认为他在牛棚大战中是一个好同志。”

“我们的领袖，拿破仑同志，”斯奎拉用一种缓慢而坚定的语气宣布，“已经坚决地表明——坚决地，同志们——斯诺鲍从最一开始就是一个密探，是的，远在我们打算起义之前就是了。”

“啊，那就不同了！”布克瑟说，“如果是拿破仑同志说的，那就一定是对的。”

“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精神，同志们！”斯奎拉大叫道，但大家注意到他用自己滴溜溜的眼睛很讨厌地瞥了布克瑟一眼。他刚转身要走，突然又停下来强调了一句：“我警告庄园里的每一个动物都睁大眼睛。我们有理由认为，此时有许多斯诺鲍的密探正潜伏在我们之中。”

四天之后，在傍晚时分，拿破仑让所有的动物在院子里集合。集合完毕后，拿破仑从农舍出来，佩戴着他的两枚勋章（他最近授予自己“一级动物英雄”和“二级动物英雄”称号），他那九条大狗蹦跶着围在他身边，发出的恶吼让所有动物毛骨悚然。动物们默默地蜷缩在自己的位子上，似乎预感到将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

拿破仑站在那里，用严厉的目光向下面扫了一眼，接着就发出一声尖叫。那几条狗立刻一跃而上，咬住四头猪的耳朵拖着他们走，那四头猪在疼痛和恐惧中大声哀嚎。他们被拖到了拿破仑脚下，猪的耳朵流血了，狗尝到了鲜血的滋味，兴奋地发狂了好一阵。让所有动物都震惊的是，有三条狗扑向了布克瑟。布克瑟看到他们扑来，伸出大蹄子，在半空中踏住一条狗，把他踩在了地上。这条狗尖叫求饶，另外两条狗夹着尾巴逃了回去。布克瑟看着拿破仑，想知道是该把这条狗踏死还是放他走。拿破仑的脸色一下就变了，喝令布克瑟放掉那条狗。于是布克瑟抬起蹄子，狗带着伤哀嚎着逃跑了。

骚动立即平息下来。那四头猪哆哆嗦嗦地等候发落，脸上的每一条皱纹似乎都历数着他们的罪状。拿破仑命令他们坦白自己的罪行。他们正是反对废除星期天大会的那四头猪。没等再催，他们就招供道，自从斯诺鲍被驱逐后，他们就与他保持着秘密联系，曾与他勾结在一起毁坏风车，并和他达成协议，要将动物庄园拱手让给弗里德里克先生。他们还补充说，斯诺鲍曾私底下向他们承认，过去的这些年他一直是琼斯的密探。他们的招供刚一结束，那几条狗就冲上去咬穿了他们的喉咙。拿破仑厉声喝问，还有没有别的动物要坦白什么。

在鸡蛋事件中曾试图带头叛乱的那三只鸡走上前去，说斯诺鲍曾在梦中煽动他们去抵制拿破仑的命令。她们也被处死。接着一只鹅上前供认，他在去年秋收时，私藏了六穗谷子，并在当天晚上偷偷吃掉。随后，一只羊坦白说她曾在饮水池里撒尿，并说这是斯诺鲍指使她这么干的。另外两只羊交代，他们曾谋杀过一只老公羊，他们在他正患咳嗽的时候，追着他绕着一堆野火跑，而这只公羊是拿破仑的忠实信徒。这些动物都被当场处死了，招供和行刑仪式就这样进行着。拿破仑的脚边垒起了一大堆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自从琼斯被驱逐之后，第一次闻到这样的气味。

等这一切过去之后，剩下的动物，除了猪和狗之外，都挤成一团爬走了。他们感到震惊和害怕。他们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使他们更害怕——是与斯诺鲍结盟的动物的那种背叛，还是刚刚目睹的残忍刑罚。过

去，这种血流成河的场景也并不鲜见，但这一次，对他们来说要恐怖得多，因为这次发生在他们同类之间。从琼斯离开庄园至今，还没有出现动物杀害动物的情形。他们甚至连老鼠都不曾杀害。这时他们已经走到了小山丘上，建成一半的风车正矗立在那儿，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躺下来依偎在一起，好像是在取暖。克莱弗、穆里尔、本杰明、奶牛、绵羊，以及一群鹅和鸡——除了那只猫之外——每个动物全都在这儿。那只猫在拿破仑命令集合的时候，突然失踪了。一时间，大家都不说话。只有布克瑟仍然站着。一边心烦地踱来踱去，一边用那又长又黑的尾巴不断抽打着自己的身躯，偶尔发出一声惊愕的嘶鸣。最后他说话了：

“我不明白。我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庄园之中。这一定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照我看来，唯有更加努力工作。从今往后，每天早上我要提前一个小时起床。”

说完，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了采石场。到了那儿，连着装了两车石头，并且拉到风车那里，一直干到晚上。

动物们都挤在克莱弗周围，沉默不语。他们躺着的地方，可以俯瞰整个村庄，视野能够遍及动物庄园的绝大部分：延伸向大路的长长的牧场、牧草场、树丛、饮水池、耕种过的田地里长出的茁壮而碧绿的新麦，以及庄园里红色的屋顶和烟囱里冒出的袅袅轻烟。这是一个晴朗的春日傍晚，夕阳的光辉洒落在草地和那有些破烂的篱笆上。带着某种惊讶，他们忽然想到这是他们自己的庄园，庄园的每一英寸土地都是他们自己的，而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发觉这个庄园是如此可爱。克莱弗饱含热泪向山坡下望去。如果她有办法说出此刻的想法的话，她一定会说，几年前他们致力于推翻人类的时候，想要建立的并不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老麦哲第一次鼓动大家起义的那个晚上，他们所向往的并不是这种恐惧和杀戮的情形。如果她对未来有什么构想的话，那么将会是这样一幅画面：在这个社会里，没有饥饿和鞭笞，全体平等，各尽所能，强者保护弱者，就像在麦哲演讲的那天晚上，她用自己的前腿保护着那群失去母亲的小鸭子一样。她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会处在这样一个相反的境地：当那些凶狠咆哮的狗四处乱跑时，当看到自己的同志在坦白了罪行后被撕成碎片时，谁都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她从来没有过反叛和违命的念头。尽管这样，她明白，他们还是要比琼斯时期好得多，而且，防止人类卷土重来还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无论发生了什么，她仍然要忠心耿耿，努力工作，坚持完成交付给自己的任务，服从拿破仑的领导。可是，她，以及所有其他的动物寄托希望并为之劳作的，并不是今天这

番场景。他们建造风车，甘冒琼斯的枪弹，也不是为了今天这些。这就是她的想法，可是她无法言说。

最后，她觉得有一种方法可以代替言语来表达她的想法，于是她开始唱《英格兰兽》。围在她身边的动物跟着她一块唱了起来。他们从头到尾唱了三遍，曲调非常和谐，但唱得柔缓而伤感，以前从未用这种方式唱过这首歌。

他们刚刚唱完第三遍，斯奎拉就在两条狗的陪同下走了过来，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他宣布，拿破仑同志颁布了一项特殊命令，《英格兰兽》已经废止。从今往后，禁止再唱这首歌。

动物们都惊呆了。

“为什么？”穆里尔叫道。

“因为不再需要了，同志们，”斯奎拉冷冷地说，“《英格兰兽》是一首起义歌曲，但起义已经完成。今天下午对叛徒的处决是最后的行动，内敌外敌均已被击垮。在《英格兰兽》中，我们表达了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希冀，但这个社会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很明显，这首歌已经不会再有任何意义了。”

虽然他们感到害怕，但有些动物可能还是会提出抗议。不过就在这时，羊群又照例咩咩地叫了起来：“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持续了好几分钟，也就终结了可能的争论。

于是，再也听不到《英格兰兽》这首歌了。取而代之的是，善于写诗的米尼莫斯写的另外一首歌，开头是这样的：

动物庄园，动物庄园，

你将永远不受侵犯！

每个星期日早晨，升旗仪式结束后，大家就唱这首歌。但不知怎么，动物们总是觉得，这首歌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无法与《英格兰兽》相媲美。

第八章

几天之后，那次行刑引起的恐惧平息了，有些动物才记起——或者他们以为自己记得——第六条戒律是：“任何动物不能杀害其他动物。”虽然他们谁也不敢在狗和猪的耳边提起这个话题，但是他们还是觉得上次那种杀戮与这一戒律相悖。克莱弗请求本杰明给她念一下第六条戒律，但本杰明像往常一样，表示不愿意介入这类事情，于是她又找来穆里尔。穆里尔把那条戒律读给她听，上面写的是：“任何动物不能杀害其他动物，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不知怎么，对于最后这八个字动物们都没什么印象。但现在他们明白，他们并不曾违犯那条戒律，因为杀死那些和斯诺鲍勾结的叛徒，理由实在是太充足了。

这一整年，动物们的工作甚至比上一年还要辛苦。为了重建风车，不但要筑起比上次厚一倍的墙，还要按预定日期完工。再加上庄园的日常工作，任务惊人的繁重。动物们不止一次感受到，他们的工作时间比琼斯时期更长，吃得却和那时一样差。在每个星期天早上，斯奎拉会用蹄子捏住一张长长的纸条，宣读各类粮食产量数据，有的增产了百分之二百，有的增产了百分之三百，还有的增产了百分之五百。动物们觉得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尤其在他们已经记不清起义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过有些时候，他们仍然会觉得不如少给点数字，多来点粮食。

现在所有的命令都由斯奎拉或者另外一头猪发布。拿破仑则两周都难得在公众面前出现一次。当他出现的时候，不仅要带着他的狗随从，还会带着一只黑色小公鸡，作为他的号手在前面开道。在拿破仑讲话之前，小公鸡要先高叫一声“喔——喔——喔！”据说在农舍的房间中，拿破仑也有自己专属的一部分。他在两条狗的伺候下单独用餐，而且还要使用原本放在客厅玻璃橱柜中的皇冠德贝餐具。另有通知说，每年拿破仑的生日也要鸣枪庆祝，与其他两个纪念日一样。

现在，对拿破仑的称呼已经不能是简单的“拿破仑”了。提到他永远要用正式的称呼“我们的领袖拿破仑同志”。那些猪还喜欢给拿破仑加上一些其他头衔，比如“动物之父”、“人类克星”、“羊群保护神”、“小鸭子的良友”，等等。斯奎拉演讲的时候，总是要泪流满面地盛赞拿破仑的智慧和善良，以及他对普天之下所有动物的热爱，尤其是对那些还生活

在其他庄园中遭受奴役并不自知的不幸的动物。每一项成就，每一点好运气，通常都要归功于拿破仑。你会经常听到一只鸡对另一只鸡讲：“在拿破仑同志的领导下，我六天下了五枚蛋。”或者两头正在饮水的奶牛说：“多亏拿破仑同志的英明领导，这水味道真好！”米尼莫斯写的一首名为《拿破仑同志》的诗很好地诠释了庄园里动物们的整体感受，诗的全文如下：

孤儿的良友！

幸福的源泉！

赐予粮食的恩主！

啊，当我注视您的时候，

我的灵魂在燃烧，

您那宁静严肃的双眸，

仿佛青天白日，

拿破仑同志！

是您赐予您的所有动物

渴求的一切，

每天两餐饱食，整洁的草垫；

无论大小，每个动物

都在房间中安然而眠，

这都是因为有您在照看，

拿破仑同志！

如果我有一头小猪，

在他长大以前，

即便他还小得像一个奶瓶或者一根擀面杖，

他也应该学会

要对您忠心诚实，

是的，他的第一声尖叫必是

“拿破仑同志！”

拿破仑对这首诗很是赞许，于是就下令把它题写在与七诫相对的大谷仓另一侧的墙上。诗的上方是一幅拿破仑的侧面肖像，是斯奎拉用白漆画的。

这期间，由温伯尔做中间人，拿破仑正在与弗里德里克和皮尔金顿进行着一系列烦琐的谈判。那堆木材还没有卖掉。这两个人当中，弗里德里克更急于购买，但却给不出一个合理的价钱。与此同时，有一个消息又重新开始流传，弗里德里克和他的手下正密谋攻打动物庄园并想毁掉那座让他妒火中烧的风车。大家都知道斯诺鲍仍然藏在品彻菲尔德庄园。仲夏时分，动物们惊讶地得知，竟有三只母鸡主动坦白说，由于斯诺鲍的煽动，她们曾参与过一个刺杀拿破仑的阴谋。她们立刻被处决了，于是为了拿破仑的安全，又采取了一些新的防备措施。夜间有四条狗守卫着他的床，每个床脚一条。同时又有一头名为品客艾的猪负责在拿破仑吃饭前试吃他的食物，以防有毒。

差不多这时，大家听到消息说拿破仑决定把木材卖给皮尔金顿先生；他还将进一步拟定一项常规协议，用于交换动物庄园和福克斯伍德庄园出产的某些产品。尽管他们只通过温伯尔联系，但拿破仑和皮尔金顿的关系也算是相当不错了。动物们不信任皮尔金顿，因为他是人类，但比起让他们又恨又怕的弗里德里克来，他们宁愿和皮尔金顿打交道。随着夏天过去，风车即将竣工，那个阴谋攻打动物庄园的传言也传播得越来越频繁。据说弗里德里克将率领二十个全副武装的人前来攻打他们，并且他已经买通了行政长官和警察，如此一来，只要他能拿到动物庄园的地契，官方将对此不再过问。此外，有关弗里德里克虐待动物的可怕消息也从品彻菲尔德庄园流传出来。他曾用鞭子抽死一匹老马，也饿死过他的牛，还把一条狗扔到炉子里烧死了；到了晚上，他还会把刀

片绑在鸡爪子上，然后斗鸡取乐。当动物们听到他们的同志正遭受着如此的不幸时，个个都义愤填膺，热血沸腾。有时他们甚至叫嚷着要去攻打品彻菲尔德庄园，赶走那里的人类，解放那里的动物。但斯奎拉劝大家切勿轻举妄动，要相信拿破仑同志的战略部署。

即便如此，反对弗里德里克的情绪还是日益高涨。在一个星期天早上，拿破仑在大谷仓现身，解释说他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把木材卖给弗里德里克。他说，与这样的流氓打交道实在是有辱他的身份。现在仍会派出鸽子散步起义的讯息，但以后不准他们在福克斯伍德庄园落脚了。同时还宣布，把他们以前的口号“人类灭亡”换为“埋葬弗里德里克”。暮夏时分，斯诺鲍的另一个阴谋又败露了。麦田里杂草丛生，却发现原来是斯诺鲍在某个夜晚潜入庄园，在种子里偷偷掺了草籽。一只鹅向斯奎拉坦白了罪行，说他曾参与此事，随后就吞食毒草莓自尽。动物们现在才知道，与他们此前的想法相反，斯诺鲍从来没有获得过“一级动物英雄”称号。这仅仅是斯诺鲍在牛棚大战后散布开来的一个神话。他非但未曾接受过嘉奖，反倒是因为他在战斗中的怯弱表现而受到过谴责。再一次有动物对此表示疑惑，但斯奎拉很快就让他们确信是他们记错了。

到了秋天，经过大家的艰苦奋斗，在保证秋收顺利完成的同时，风车也竣工了。当然还需要安装机器，温伯尔也在为购买机器的事情积极协商，不过风车的建筑工程总算是完成了。尽管他们的每一步都困难重重，尽管他们缺乏经验，尽管他们的工具非常落后，尽管他们遭受过厄运和斯诺鲍的阴谋，整个工程到底还是按时完工了！动物们精疲力竭，却倍感自豪，他们绕着自己的杰作一圈一圈地转着。在他们眼里，这次的风车要比第一次漂亮得多。而且，这次的围墙也要比上次厚上一倍。这一次，除了炸药，任何东西都休想把它摧毁！他们不知为此付出了多少辛劳，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但一想到风车的叶片带着发电机一起开始转动时，他们的生活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就忘记了疲惫，开始绕着风车欢呼雀跃。在狗和公鸡的簇拥下，拿破仑亲临现场视察，并亲自对动物们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同时他宣布，风车将被命名为“拿破仑风车”。

两天后，动物们被召集到大谷仓召开了一次特殊会议。当听到拿破仑宣布那堆木材已经卖给了弗里德里克时，动物们个个都目瞪口呆。明天弗里德里克就会派车来运走木材。原来在这段时间，拿破仑表面上一直假装向皮尔金顿示好，实际上却和弗里德里克暗中达成协议。

与福克斯伍德庄园的一切关系就此破裂，他们开始向皮尔金顿发送

侮辱信。鸽子们也接到通知，他们要避免去品彻菲尔德庄园宣传，把原来的口号“埋葬弗里德里克”改为“埋葬皮尔金顿”。同时，拿破仑向动物们保证，即将攻打动物庄园的消息完全是子虚乌有，有关弗里德里克虐待动物的传言也被大大夸张。所有这些谣传都很有可能来自斯诺鲍和他的密探。总之，现在看来斯诺鲍并没有藏在品彻菲尔德庄园，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有去过那里。他正住在福克斯伍德，享受着他的奢侈生活，而且多年以来，他一直靠皮尔金顿供养。

猪都为拿破仑的精明感到欢欣鼓舞。通过表面上向皮尔金顿示好的行为，迫使弗里德里克的出价提高了十二英镑[1]。斯奎拉表示，拿破仑思想超乎寻常的本质在于，他从不信任任何人类，即使对弗里德里克也是如此。弗里德里克曾打算用一种叫作支票的东西结账，那看上去就是写着承诺保证支付的一张纸。但是拿破仑岂是他能糊弄得了的。他要求必须用真正的五英镑面额的现金支付，并且要在运走木材前付清。弗里德里克已经结清款项，钱款总数刚刚够用来购买风车所需的机器。

与此同时，木材很快就被拉走了。等木材全部拉走后，他们在大谷仓又召开了一次特殊会议，让动物们观赏弗里德里克支付的钞票。拿破仑面带微笑，胸前佩戴着他的两枚勋章，端坐在台上那块稻草垫上。钱被整整齐齐地码在他身旁的瓷盘里，那盘子是从农舍的厨房里拿出来的。动物们列队缓慢地走过，每一个都要盯着那盘钞票看个够。布克瑟还用鼻子闻了闻那钞票，伴随他的气息，那些轻飘飘的白色的东西竟然飞舞起来并簌簌作响。

三天以后，爆发了一阵恐怖的骚动。温伯尔骑着他的自行车疾驰而来，面如死灰。他把自行车往院子里一扔，直奔农舍而去。接着，就听到拿破仑的房间内发出一声狂怒的咆哮。大事不妙，这消息像野火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庄园。钞票是假的！弗里德里克一分钱没花，就拉走了木材！

拿破仑立即召集所有的动物，用恐怖的嗓音判处弗里德里克死刑。他说，抓住这家伙后，要把他扔到锅里煮烂。同时他警告大家，这次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后，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了。弗里德里克和他的手下随时都有可能发动他们蓄谋已久的攻击。他们已在通往庄园的所有路口都安置了哨兵。此外，四只鸽子被派到了福克斯伍德，他们带着一封和解信，希望能与皮尔金顿重修旧好。

就在第二天早晨，敌人就发动了攻击。动物们正在吃早餐，哨兵飞

奔而来，报告说弗里德里克和他的随从已经走进了五栅门。动物们勇敢地出击，但这一次他们没法像牛棚大战那样轻易取胜。对方这次一共来了十五个人，并带着六支枪，他们走到五十码之内的时候就立即开火。动物们无法抵抗那可怕的爆炸声和尖利的子弹，尽管拿破仑和布克瑟费了很大劲把他们集结起来，但不一会儿就被打退。其中很多动物已经负伤。于是他们逃进庄园的房间中躲了起来，透过墙缝和木板上的节疤孔小心翼翼地向外窥视。整个大牧场，包括风车，已然落入敌手。此时，好像连拿破仑也束手无策了。他一言不发地踱来踱去，尾巴变得僵硬，并在不停地抽搐。渴望的目光朝着福克斯伍德的方向投去：如果皮尔金顿和他的手下能来支援他们的话，他们仍有可能赢得战斗。但就在这时，昨天派出去的四只鸽子回来了，其中一只衔着一张来自皮尔金顿的纸片，上面用铅笔写着两个字：“活该”。

这时弗里德里克和他的随员已经站在了风车边上。动物们一边看着他们，一边发出一阵绝望的轻呼。有两个人已经取出一根撬棍和一柄大锤，准备把风车推倒。

“不可能！”拿破仑喊道，“我们的墙筑得很结实，即便他们花一个礼拜时间，也不可能把它推倒。鼓起勇气，同志们！”

但本杰明仍然专心地注视着那帮人的行动。拿着撬棍和大锤的那两个人正在风车的地基附近钻孔。然后，本杰明带着几乎有点调侃的表情，慢慢地动着他长长的嘴巴。

“我早就想到是这样。”他说，“你们没看出他们在干什么吗？一会儿他们就会往钻好的孔里装炸药。”

太可怕了，动物们不安地等待着。此时此刻，要冒险冲出房间是不可能的。几分钟后，只见那些人朝不同方向散开，接着就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鸽子立刻被卷到半空中，除拿破仑外，其他所有动物都趴倒把脸埋到了地里。等他们再次起身，在原先风车所在地的上空飘浮着一团巨大的黑色烟云。微风缓慢地将它吹散，风车已经荡然无存！

看到此情此景，动物们又重新鼓足勇气。他们刚才所感受到的胆怯与绝望，都被眼前这种卑鄙可耻的行为所激发的愤怒淹没了。一阵复仇的高呼响了起来，不必等下一步的行动指令，他们便一齐向敌人冲去。这一次，他们不再管那如冰雹般飞来的残酷子弹。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那帮人不断开火，等动物到了他们身边时，他们又用棍子打，用厚

重的皮靴去踢。一头牛、三只绵羊和两只鹅被杀害，几乎每个动物都负了伤。就连一直在后方指挥作战的拿破仑也被一颗子弹削掉了尾巴尖。但人类一方也不是全无损伤。三个人的头被布克瑟的蹄子踢破，另有一个人的肚子被牛角刺穿，还有一个人的裤子差点被杰西和布鲁贝尔撕掉。给拿破仑当贴身护卫的那九条狗，奉命在篱笆的掩护下迂回到敌人的侧翼。他们突然出现在那帮人身旁，凶恶地吼叫起来，这下把那帮人吓坏了。他们意识到自己有被包围的危险。趁着还有退路，弗里德里克喝令撤退，那帮害怕自己小命不保的家伙当下就逃之夭夭了。动物们一直把他们追到田地的尽头，在他们钻过那带刺的篱笆时，还最后踢了他们几脚。

动物们胜利了，可是他们也疲倦了，还流着血。他们一瘸一拐地慢慢走回庄园。看到同志们的尸体横躺在草地上，一些动物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在那个原本矗立着风车的地方，他们默默地站了好一会儿。是的，风车没了，他们辛勤的劳作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迹！甚至连地基都被毁掉了一部分。即使要重建，他们也不可能像上次重建那样还有倒塌的石头可用。这一次，所有的石头都不见了，爆炸的威力把它们抛到了几百码之外。此刻，这里好像从来就没有过什么风车。

当他们走近庄园时，斯奎拉正蹦跶着朝他们走来，他不仅毫无理由地不参加战斗，而且此时还得意地摇着尾巴。接着，动物们就听到从庄园房屋那边传来了庄严的枪声。

“为什么要鸣枪？”布克瑟问。

“为了庆祝我们的胜利啊！”斯奎拉喊道。

“什么胜利？”布克瑟问。他的膝盖还在流血，又掉了一只蹄铁，于是蹄子也裂开了，还有十几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腿。

“什么胜利？同志们，难道我们没有把敌人赶出我们的土地，赶出我们动物庄园神圣的土地吗？”

“可他们把风车毁了，我们为此付出了两年的辛劳！”

“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将会另建一座风车。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再建六座都没问题。同志们，你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敌人占领了我们脚下的土地。而现在，多亏拿破仑同志的英明领

导，我们又夺回了每一英寸土地！”

“那么我们只不过是夺回了原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布克瑟说。

“这就是我们的胜利。”斯奎拉说。

他们一瘸一拐地走进院子。布克瑟腿里的子弹让他疼痛万分。他明白，摆在眼前的是从地基开始重建风车的繁重工作，他还想象着自己已经为此重新振作起来。但这时他第一次想到，他已经十一岁了，恐怕他强壮结实的肌肉也已经大不如前了。

不过当动物们看到绿旗飘扬，再次听到鸣枪——一共鸣了七响——，听到拿破仑的演讲，听到他称赞大家的表现时，他们似乎又觉得，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动物们为战斗中牺牲的同胞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布克瑟和克莱弗拉着灵车，拿破仑亲自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庆祝活动持续了整整两天。有唱歌，有演讲，还有更多的鸣枪。每个动物都得到一个苹果作为特殊的礼物，每只飞禽得到了两盎司[2]的谷子，每条狗得到了三块饼干。大家接到通知，这次战斗将被命名为“风车大战”，拿破仑还设立了一种新的勋章“绿旗勋章”，并授予了他自己。在这种狂欢的气氛中，那次不幸的钞票事件就被大家抛诸脑后了。

几天之后，猪偶然间在农舍的地窖里发现一箱威士忌。在他们刚住进农舍时，没有注意到这箱酒。当天晚上，从农舍方向传来一阵嘹亮的歌声，令大家惊讶的是，中间居然还夹杂着《英格兰兽》的旋律。大约九点半左右，动物们清楚地看到，拿破仑从后门出来，头戴一顶琼斯先生的旧圆顶礼帽，在院子里飞快地跳了一圈后，又钻进了房中。但在第二天早晨，农舍内一片死寂。任何猪都没什么动作。将近九点钟时，斯奎拉出现在大家面前。他步履蹒跚，面带沮丧，双目无神，尾巴无力地垂在身后，一副病怏怏的样子。他把动物们召集到一起，说要传达一个沉痛的消息：拿破仑同志生命垂危！

庄园内顿时响起一阵恸哭。农舍的门外铺着稻草，动物们轻点着足尖从那里走过。他们含泪互相询问：“要是领袖走了，我们可怎么办？”此刻庄园内到处都有传言说斯诺鲍终究还是在拿破仑的食物里下了毒。到了十一点，斯奎拉又出来发布了另一项通告。他说拿破仑同志在垂死之际颁布了一项神圣的法令：任何饮酒者皆须处以死刑。

然而，到了傍晚，拿破仑看上去有所好转，第二天早上，斯奎拉就告诉大家领袖正在逐渐地康复。那天晚上，拿破仑就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第二天，动物们才了解到他曾让温伯尔在威灵顿买过一些有关酿酒和蒸馏的小册子。一周之后，拿破仑下令把果园后面的小牧场开垦出来。那个小牧场原本是留给退休动物的草料场。现在开垦的理由是牧草已经干枯，需要重新播种。但不久之后，大家就知道了真相：拿破仑打算在那里种植大麦。

大约就在此时，庄园里发生了一件几乎令每个动物都摸不着头脑的怪事。一天半夜十二点左右，只听院子里传来了一声碰撞发出的巨响，动物们立刻冲出房间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在大谷仓写着七诫的那一侧的墙脚，躺着一架断为两截的梯子。斯奎拉趴在梯子旁边，一时间昏迷不醒。他的蹄边放着一盏马灯、一把漆刷，还有一桶打翻的白漆。狗立刻把斯奎拉围到中间，等他刚一苏醒，就马上把他护送回农舍。除了本杰明之外，所有的动物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本杰明舔舔他的长嘴，好像明白了什么，但又什么也没说。

不过，几天之后，穆里尔自己在看七诫的时候，注意到又有一条戒律大家都记错了。他们一直以为第五条戒律是“任何动物不能饮酒”，但是后面还有两个字他们都忘了，那条戒律实际上是：“任何动物不能饮酒过量。”

---

[1] 英镑：英国国家货币和货币单位名称。1英镑等于240便士（旧制），约为10元人民币。

[2] 盎司，英美制重量单位，1盎司等于1/16磅，合28克。

第九章

布克瑟蹄子上的裂口愈合起来得花很长时间。在庆祝胜利的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天，重建风车的工作就开始了。布克瑟不肯给自己留哪怕一天的假期，工作时，他尽量不让别的动物看出他的疼痛，并引以为豪。到了晚上，他才会悄悄告诉克莱弗，他的蹄子疼得厉害。克莱弗就用嘴巴嚼好草药，给他敷在蹄子上。她和本杰明都在苦劝布克瑟不要干得那么辛苦。“马的肺不是永不衰竭的。”她对他说。但是布克瑟不听。他说，他这辈子最后的一个心愿就是能够在退休之前把风车的建设扶上正轨。

当初动物庄园在制定法律的时候，规定的退休年龄分别是：马和猪十二岁，牛十四岁，狗九岁，绵羊七岁，鸡和鹅五岁。同时还许诺，对于退休动物会有养老金。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动物真正退休并领到养老金，但最近这个话题被讨论得越来越频繁了。如今果园后面的小牧场已经被留为麦田，因而有传言说大牧场的一角将用篱笆围起来留给年迈的动物做草料场。据说一匹马的养老金是每天五磅谷子，冬天的时候则是每天十五磅牧草，在公共假日会另加一根胡萝卜或者也有可能是一个苹果。布克瑟十二岁的生日就在次年的暮夏时节。

此时的生活十分艰苦。冬天像去年一样冷，食物短缺则更加严重。除了猪和狗之外，所有动物的粮食配额再次减少。斯奎拉解释说，严格的等量配额是与动物主义的原理相悖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可以很轻易地向其他动物证明，不管看起来是怎么样，事实上都并不存在粮食短缺。当然，有必要重新调整一下配额（斯奎拉总是用“调整”这两个字，从来都不说“减少”），但与琼斯时期相比，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斯奎拉用他尖细的嗓音快速地读出一大串数字，他用这些具体的数字向大家证明：和琼斯时期相比，他们有了更多的燕麦、更多的牧草、更多的萝卜、更短的工作时间、更好的饮用水质、更长的寿命、更高的新生幼崽存活率，同时，房间里有了更多的草垫，跳蚤也减少了。动物们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说实话，琼斯以及和琼斯相关的一切早已淡出了大家的记忆。他们知道现在的生活异常艰苦，常常饥寒交迫，只要没在睡觉，基本上就是在干活。但无疑过去要更差一些。他们宁愿相信是这样。另外，往日他们是奴隶，现在他们却是自由身；正如斯奎拉也常常

说的那样，这一点就足以使过去和现在有天壤之别。

现在又多了许多张要吃饭的嘴。秋天，有四头母猪差不多同时产下幼崽，共添了三十一头小猪。这些小猪的毛色黑白相间，他们的父亲是谁也很容易猜到，因为拿破仑是庄园内唯一的种猪。大家接到通知说，等过些日子买好了砖和木材，就在农舍的花园里给他们盖一座学堂。目前，拿破仑将在农舍的厨房里亲自给这些小猪上课。这些小猪会在花园里做操，同时又被禁止和其他动物的幼仔一起玩耍。大约就在这时，又颁布了一项新的规定：当其他动物在路上与猪相遇时，必须避让。此外，无论地位高低，所有的猪都享有星期天在尾巴上佩戴绿色绶带的特权。

庄园又度过了相当美好的一年，但他们的钱还是不够用。他们需要购买修建学堂所需的砖、沙子和石灰，同时为了修建风车，他们也必须攒钱。农舍需要的灯油和蜡烛，拿破仑食用的糖（他禁止其他猪食用糖，原因是吃糖会发胖），以及所有的日常用品如工具、钉子、绳子、煤、电线、铁块和狗饼干，这些也都需要添置。他们卖掉了一堆牧草和一部分土豆收成，鸡蛋的合同也改为每周供应六百枚，这使得母鸡没有足够的蛋去孵小鸡，因而鸡的数目没有办法维持在过去的水平上。十二月减少了食物配给，二月份又减少了一次，同时为了省油，动物们的房间内禁止点灯。但是猪过得好像还很舒适，纵然有上述情况，他们的体重事实上还有所增加。二月底的一个下午，一股新鲜浓郁的馋人香味从厨房背后的酿造间中飘了出来，那个酿造间在琼斯时期就废弃不用了。动物们从来没有闻到过这样的香味，有的说这就是煮大麦的气味。他们贪婪地嗅着，心想这可能是在为大家的晚餐准备热气腾腾的大麦糊呢。可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什么大麦糊。等到星期天，反而接到通知，从今往后，所有的大麦都将预留特供给猪。果园后面的那块地上早已种上了大麦。不久之后又有消息传了出来：每头猪每天可以领到一品脱[1]的啤酒，拿破仑自己则有半加仑之多，并且永远要用皇冠德贝的瓷质汤碗盛给他。

可是，尽管生活充满艰辛，只要他们一想到自己现在活得比以前有尊严，就又觉得这一切都不算什么。歌唱、演讲、列队活动等都增加了。拿破仑已经下令，每周必须举行一次叫作“自发游行”的活动，来赞颂动物庄园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到了指定的时间，动物们要放下手里的工作，列队绕着庄园的边界游行一周。猪带队，然后是马、牛、羊，最后是家禽。狗在队伍两侧，拿破仑的黑色小公鸡走在队伍最前

面。布克瑟和克莱弗永远扯着一条绿色横幅，上面画着蹄子和犄角，并写着“拿破仑同志万岁”的标语。随后大家会背诵歌颂拿破仑的诗歌，接着是斯奎拉的演讲，由他向大家发布最新的粮食产量的增长数据。有时还会鸣枪庆祝。绵羊是“自发游行”活动最忠实的拥趸，只要有任何动物抱怨（在猪和狗不在的时候，有些动物会偶尔发发牢骚）说这是浪费时间，说这不过是站在那里受冻，绵羊就肯定会高声地咩咩叫“四条腿好，两条腿坏”，顿时就中断了他们的抱怨声。但总体上，动物们还是喜欢这类庆祝活动的。毕竟，这类活动提醒着他们，自己真真切切是这一切的主人，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这让他们感到非常欣慰。于是，在歌声中，在队伍中，在斯奎拉列举的一连串数字中，在雷鸣般的枪声中，在小公鸡的啼叫声中，在飘扬的旗帜中，他们至少可以在短时间内忘记自己还空着肚子。

四月份，动物庄园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这就有必要选举一位总统了。候选人只有一个，就是拿破仑，于是他全票当选。当天，据传又发现许多新文件，揭露了一些斯诺鲍与琼斯串通的更为具体的细节。现在看来，斯诺鲍不仅仅像他们以前认为的那样，在“牛棚大战”时企图用一些卑鄙的伎俩让他们失败，而且还公然为琼斯而战。事实上，他才是人类真正的头目，参加战斗时嘴里还高呼着“人类万岁”。有些动物仍然记得斯诺鲍背上负过伤，但那实际上是拿破仑咬破的。

仲夏时分，乌鸦摩西在失踪数年之后，突然又出现在庄园里。他基本上没怎么变，仍旧不工作，像往常一样谈论着“糖果山”。谁要愿意听，他就落到一个树桩上，拍打着他黑色的翅膀，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在那边，同志们，”他一本正经地说道，并用他长长的嘴尖指着天空，“在那边，就在你们现在看到的那团乌云的背后——那里有座‘糖果山’。那是一个幸福的国度，我们这些可怜的动物将在那里永远地安息，彻底不用工作！”他甚至声称，他曾在一次高空飞行中到过那里，并看到那里全年生长的苜蓿，篱笆上长满了糖块和亚麻仁饼。许多动物都相信他。他们推想，既然现在忍受着饥饿和劳苦，那么在另一个地方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难以判断的是猪对摩西的态度，他们都轻蔑地宣称有关“糖果山”的一切都是谎言，但又允许摩西留在庄园里，不用干活，每天还能领到一及耳[2]啤酒作为津贴。

布克瑟蹄子上的伤痊愈后，工作起来就更加卖力了。事实上，在这一年，所有的动物都像奴隶一样工作。除了庄园里的日常工作和重建风车之外，还要给小猪盖学堂。这项工程是三月份动工的。在食不果腹的

情况下长时间劳作有时会让动物们感到难以忍受，但布克瑟从不退缩。在他的言行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精力已经不如从前了。只有外貌发生了一点变化：他的皮毛不如以前光洁，庞大的身躯似乎也有点萎缩。其他动物说：“等到春草长出来的时候，布克瑟的体型就会恢复。”但春天到了，布克瑟却依然不见长胖。有时候，在通往风车的山坡上，当他用尽全身力气拉着那些大石头往上走时，支撑着他的似乎只剩下了他那坚持不懈的意志。这种时候，看他嘴唇的动作，好像在说：“我会更加努力工作。”却听不到任何声音。克莱弗和本杰明一再警告他要注意身体，但布克瑟却从不理会。他十二岁的生日就要来了。他什么都不在乎，只求能够在他退休之前积攒足够多的石头。

就在这个夏天的一个深夜，有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庄园，说布克瑟出事了。此前他曾独自外出，又把一车石头拉到风车那里。真的，这消息是真的。几分钟后两只鸽子疾飞而来，带来消息说：

“布克瑟倒下了！他侧躺在那里，站不起来了！”

庄园里大约有一半动物冲到了风车所在的小山丘上。布克瑟躺在那里，躺在一辆马车的车辕中间，他伸着脖子，抬不起头来，两眼呆滞，全身大汗淋漓。一条血丝从他的嘴里流了出来。克莱弗跪在他的身边：

“布克瑟！”她大喊道，“你怎么了？”

“我的肺，”布克瑟用微弱的声音说道，“不要紧的。我想没有我，你们也能建成这个风车。石头已经攒得足够多了。不管怎么说我也只剩下一个月就要退休了。说实话，我一直渴望退休。本杰明也老了，也许他们会让他也一同退休，和我做个伴。”

“我们得赶紧找个谁来帮忙，”克莱弗说道，“快，谁能跑去给斯奎拉说一声。”

所有其他动物都马上跑回农舍，向斯奎拉报告消息。只有克莱弗和本杰明留了下来。本杰明一言不发地躺在布克瑟身边，用他长长的尾巴替布克瑟驱赶苍蝇。大约过了一刻钟，斯奎拉满怀着同情和挂念来到现场。他说当拿破仑同志得知庄园里最忠实的劳动者遭受此等不幸时，心里非常悲痛，并已经安排布克瑟去威灵顿的医院里就医。动物们对此感到有些不安，因为除了莫丽和斯诺鲍之外，其他动物都没有离开过庄园。把一位生病的同志交到人类手上这种事情，他们想想都觉得不是很

情愿。不过，斯奎拉很快就让他们确信，针对布克瑟目前的状况，威灵顿的兽医院可以提供比庄园更好的治疗。又过了大约半小时，布克瑟的身体有所好转，他挣扎着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回他的房间，克莱弗和本杰明已经在里面给他铺好了一张舒服的稻草床。

随后的两天，布克瑟一直待在他的房间里。猪拿出了一大瓶粉红色的药，那是他们在卫生间的药橱里找到的。克莱弗负责在每次饭后给布克瑟服用，每天两次。每天晚上，克莱弗会躺在布克瑟的房间里和他说话，本杰明则替他驱赶苍蝇。布克瑟说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他并不后悔。如果他能顺利康复，他希望还能活上三年。他很期待日后能在大牧场的角落里度过一段平静的时光。这样的话，他总算是第一次有空去学习，去提高他的心智了。他说，他打算利用余生去学习字母表上剩下的那二十二个字母。

本杰明和克莱弗只有在收工后才能和布克瑟待在一起，可是，那天一辆大车来把布克瑟运走的时候却是正午时分。当时，动物们正在猪的监督下在萝卜地里除草，他们惊讶地看到本杰明正从庄园房屋的方向狂奔而来，一边跑一边扯着脖子大喊。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见到本杰明如此激动，事实上，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狂奔。“快，快！”他大声喊道，“快来啊！他们要把布克瑟带走！”不等那头猪下令，动物们纷纷抛下手里的工作，迅速跑了回去。没错，院子里停着一辆由两匹马拉着的大篷车，车的两旁写着字，还有一个面容狡诈的人坐在驾驶位上，头上戴着一顶低檐的圆顶礼帽。此时布克瑟的房间已经空了。

动物们拥在大篷车周围。“再见，布克瑟！”他们异口同声地叫着，“再见！”

“蠢货！一群蠢货！”本杰明大喊道，一边绕着他们跳，一边用他的小蹄子敲击地面，“蠢货！你们难道没有看到马车上写着什么吗？”

这使得动物们犹豫了一下，场面也顿时安静下来。穆里尔开始拼读那些单词。但本杰明把她推到一边，在一片死寂中，他念道：

“‘阿尔弗雷德·西蒙兹，威灵顿的屠马商兼制胶商。供应皮革、狗食骨头、狗舍。’你们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吗？他们要把布克瑟拉到屠马场！”

顿时所有动物都发出一声恐怖的哀嚎。就在这时，那个赶车人抽了

一鞭子，他的两匹马便拉着大篷车一路小跑出了院子。所有的动物都紧随其后，拼命叫喊着，克莱弗硬是挤到最前面。车子开始加速，克莱弗也试图用她肥胖的四肢赶上去，甚至开始慢跑。“布克瑟！”她喊道，“布克瑟！布克瑟！布克瑟！”就在这时，布克瑟似乎听到了外面的呼喊声，他那鼻子上有一条白纹的脸，出现在了车子背后的小窗子里。

“布克瑟！”克莱弗声嘶力竭地喊道，“布克瑟！出来！快出来！他们要带你去送死！”

所有的动物也跟着大叫起来：“出来！布克瑟，出来！”但那辆大篷车已经加快了速度，离他们而去。他们不确定布克瑟是否真正听懂了克莱弗的话。但是过了一会，他的脸在后窗上消失了，接着车内响起一阵马蹄的蹬踏声——他是想踹开车子从里面出来。这要是以前，布克瑟几下就可以把整个车厢踢个粉碎。可是，唉！此时他已经没有力气了。过了一会，马蹄的蹬踏声越来越弱，并最终消失了。动物们在绝望之际，开始哀求那两匹拉车的马停下来。“同志，同志！”他们大喊道，“不要拉你的兄弟去送死！”但是那两个愚蠢的畜生，竟然蠢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把耳朵放平，只顾着加速奔跑。布克瑟的脸再也没有出现在后窗上。有动物想赶在马车出门前关上五栅门，但太晚了，大车很快冲出大门，飞快地消失在大路的尽头，再也见不到布克瑟了。

三天后，大家得到消息说，虽然布克瑟受到了一匹马能够享有的最为贴心的照料，但还是在威灵顿的医院中去世了。这个消息是由斯奎拉宣布的，他说，在布克瑟的弥留之际，他一直守候在身旁。

“那是我生平见过的最感人的一幕！”斯奎拉一边说，一边抬起蹄子抹掉一滴眼泪，“在最后一刻，我守候在他的身边。临终前，他虚弱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凑在我的耳边轻声说，他唯一的遗憾就是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风车完工。他轻声告诉我：‘前进，同志们！以反抗之名前进。动物庄园万岁！拿破仑同志万岁！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这就是他的临终遗言，同志们。”

说到这儿，斯奎拉神情举止突然变了。他沉默了一会，用他那双小眼射出的怀疑眼神扫视了一下会场，才接着讲下去。

他说，据他所知，在布克瑟被拉走时，有一个愚蠢的、不怀好意的谣传。一些动物注意到拉走他的大篷车上写着“屠马商”的字眼，就随便下结论说布克瑟被拉到了屠马场。斯奎拉说，他不敢相信竟然有这么蠢

的动物。“绝对的，”他一边摇摆着尾巴左蹦右跳，一边愤怒地喊道，“他们绝对有必要加深对我们敬爱的领袖拿破仑同志的理解！其实，事情解释起来很简单。那辆车以前的主人是一个屠户，后来兽医院买下了它，只不过他们还没有把旧名字涂掉，这才引起了大家的误会。”

动物们听到这里，已经感到非常宽慰。接着斯奎拉绘声绘色地讲述布克瑟临终时的细节：他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拿破仑同志也曾不惜一切代价为他支付昂贵的医药费用。当他们听到这些时，最后一丝疑虑也消失了。想到自己的同志在幸福中死去，他们的悲伤也随之消解了。

这周星期天早晨的大会上，拿破仑亲临会场，并诵读了一篇纪念布克瑟的悼词。他说，尽管已经不可能把他们所怀念的同志的遗体埋葬在庄园里，但他已经下令，用农舍花园里的月桂编一个大花圈，送到布克瑟的坟前。几天之后，猪还打算为布克瑟开一个追悼宴会。最后，拿破仑用布克瑟生前最心爱的两句格言结束了他的演讲。他说，每个动物都要以“我会更加努力工作”和“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这两句格言自勉，这才是好同志。

到了举行追悼宴会的那天，从威灵顿来了一辆食品车，在农舍卸下了一个大木箱。当天晚上，农舍里传出一阵喧闹的歌声，随后好像又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吵闹声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最后在一声打碎玻璃的巨响中戛然而止。第二天中午之前，农舍里没有任何动静。又有传言说，猪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一些钱，用这些钱又买了一箱威士忌。

---

[1] 品脱，容量单位，主要在英国、美国及爱尔兰使用。

[2] 及耳，英美制容量单位，1及耳等于1/4品脱。

第十章

几年过去了。在季节轮替中，寿命较短的动物相继死去。如今，除了克莱弗、本杰明、乌鸦摩西和一些猪之外，没有谁还记得起义之前的日子。

穆里尔死了，布鲁贝尔、杰西、品彻都死了。琼斯也死了，他死在了该郡的另一个地方，一个收留酒鬼的房子里。斯诺鲍被大家遗忘了，布克瑟也被大家遗忘了，当然除了几个本来就认识他的动物。克莱弗也成了一匹体态臃肿的老母马，她的骨节僵硬，眼里还常常带着一团眼屎。她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两岁了，但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动物真正退休过。把大牧场的一角划给年迈的动物养老这种说法也早就没谁再提了。如今拿破仑已经长成了一头三百多磅的成年壮猪。斯奎拉胖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睁眼看东西都有些困难。只有老本杰明还是老样子，就是嘴巴周围的毛色变得苍白了一些，还有就是自从布克瑟死后，他变得更加忧郁、更加寡言。

庄园里新添了不少动物，不过增长的数目不如早些年预期的那么大。许多动物出生在庄园，对于他们来说起义的故事不过是个模模糊糊的口头传说而已。还有一些动物是从别的地方买来的，在他们来之前，从未听说过起义的事。除了克莱弗之外，庄园里现在还有三匹马。他们都是好同志，诚实正直，勤于工作，但就是太笨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能够学会字母表中“B”以后的字母。关于起义的故事和动物主义的原则，只要讲给他们听，他们就全盘接受，尤其是克莱弗讲给他们听的时候——对于克莱弗，他们都有着一种近乎孝顺的尊敬。但他们究竟能否理解所说的这一切，就很值得怀疑了。

现在庄园更加繁荣，组织也更加有序：甚至还添置了两块地，这两块地是从皮尔金顿先生那里买来的。风车最终也成功地建成了，庄园里也有了自己的脱粒机和草料升降机，另外添了不少各式各样的新建筑。温伯尔也为自己买了一辆轻便的双轮马车。然而，风车却没有用来发电，而是用来碾谷子，这也为庄园增加了不少利润。不过，动物们又开始为修建另外一座风车而忙碌，据说等这座风车完工，就会安装发电机。但是，像当年斯诺鲍谈论过的，梦想中那享不尽的舒适，带着电灯

和冷热水的房间，一周三天的工作制，如今却不再被提起了。拿破仑早就斥责这种想法与动物主义的精神相悖。他说，最最真实的幸福在于勤奋的工作和朴素的生活。

不管怎样，庄园看上去要比以前富裕，尽管动物们自己一点也不觉得变得富裕，当然猪和狗除外。也许部分原因是猪和狗都太多了吧。这两种动物并不是不工作，而只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从事劳动。正如斯奎拉一直都毫不厌倦地解释的那个样子，在庄园的组织和监管方面，他们有着无穷无尽的工作。有很多这些方面的工作是别的动物做不了的，因为他们太笨了，理解不了工作内容。例如，斯奎拉曾和他们说过，猪每天都要把大量的精力花在诸如“档案”、“报告”、“会议记录”和“备忘录”这样一些神秘的事情上。这些文件都写在很大的纸上，填写起来要非常仔细，但一旦写完，就要扔到炉子里焚毁。“这些对于庄园的福利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斯奎拉说道。但无论是猪还是狗，都没有亲自生产过一粒粮食，而他们的数目却又总是那么多，胃口也一直都很好。

至于其他动物的生活，就他们目前所知，还是和往常一样。他们经常挨饿，睡的还是草垫，喝的还是池塘里的水，仍然在田间劳作。冬天他们要忍受严寒，夏天还要遭受苍蝇的侵扰。有些时候，一些年长的动物会竭尽全力在他们模糊的记忆中搜寻一些信息，想要确定到底是起义之初，也就是刚刚赶走琼斯的时候过得好一些，还是现在过得好一些。但他们什么都想不起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与当前的生活相比较，除了斯奎拉列出的数据之外，而斯奎拉的数据永远表明一切都在越变越好。动物们觉得这个问题搞不清楚，不过他们现在也很少有时间去推敲这个问题。只有老本杰明声称他记得自己漫长的一生中的每一个细节；他觉得事物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变得更好或更坏——饥饿、艰辛和失望，就是生活永恒不变的规律。

不过，动物们从来没有放弃希望。确切地讲，他们从来都没有——哪怕只是短短一刻——失去自己作为动物庄园一员的那种自豪感和优越感。他们的庄园仍然是整个国家——整个英格兰王国中——唯一一所由动物所有、动物经营的庄园。庄园里所有的成员，就连最年轻的，甚至还有从一二十英里[1]外的庄园购买来的新成员，他们无不为此满怀欣喜。尤其当他们听到枪声鸣响，看到旗杆上绿旗飘扬时，心中更是充满了难以抑制的豪情，此时他们的话题也会转向那史诗般的岁月：他们如何赶走琼斯，怎样题写七诫，以及在大战中如何击退人类侵略者。旧日

的梦想也从未被丢弃。当年麦哲预言的那个“动物共和国”，那个整个英格兰的田野不再被人类践踏的时代，依然为大家所坚信。那一天一定会到来，也许不会马上到来，也许现在活着的任何动物在有生之年都无法见证这一时刻，但那一天终将到来。甚至《英格兰兽》的调子也说不定还在被偷偷哼唱：不管怎样，庄园里每个动物其实都记得它，只是没有一个敢放声唱出来。也许他们活得很艰辛，也许他们的希望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他们明白，他们和其他动物不一样。如果他们食不果腹，也不会是因为他们用食物供养人类；如果说他们工作太辛苦，那么他们至少是在为自己而辛苦。他们中间，谁也不用两条腿走路，也没有哪个动物称呼另外一个动物“主人”。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初夏的一天，斯奎拉命令所有的绵羊都跟他出去，把他们领到了庄园的另一端，那是一块长满桦树苗的荒地。在斯奎拉的监督下，绵羊在那里吃了整整一天树叶。晚上，斯奎拉独自回了农舍，但他告诉绵羊说，既然天气暖和了，他们就待在那里吧。他们在那里整整待了一个星期。在此期间，其他动物没有谁曾见过他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里，斯奎拉都和他们待在一起。他说，他正在教他们唱一首新歌，需要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绵羊回来后不久，在一个宜人的傍晚，动物们刚刚收工，正准备回房的时候，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一声凄厉的马嘶。动物们吓了一跳，全都停下了脚步。那是克莱弗的声音。她又嘶鸣了一声，于是所有的动物都冲到了院子里。然后他们就看到了克莱弗看到的场景。

一头猪正在用他的两条后腿行走。

是的，那是斯奎拉。他还有点笨拙，好像还不太习惯以那种姿势去支撑他肥胖的身躯，但却能很好地掌握平衡，他正在院子里散步。不一会儿，从农舍的门中又走出一长队的猪，全都用后腿直立行走。有几头猪走得要好一些，还有一两头猪有点站不稳，似乎很需要一根拐杖。不过每头猪都成功地绕院子走着。最后，在一阵异常响亮的狗吠声和黑色小公鸡尖细的啼叫声中，拿破仑亲自走了出来，他威严地直立着，用一种傲慢的目光四下扫视。他的狗则在他周围左蹦右跳。

他的蹄子中间夹着一根鞭子。

一片死寂。看着那一队猪绕着院子缓缓行走，动物们惊恐地挤做一团，仿佛天塌了下来。过了一会，他们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此时

他们无暇顾及别的一切——无暇顾及对狗的恐惧，也无暇顾及多年来养成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永不抱怨、永不批评的习惯——他们要抗议。但就在这时，像是得到了一个信号一般，所有的绵羊突然爆发出一阵高声的咩叫：

“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

咩叫声持续了五分钟之久。等绵羊安静下来，抗议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因为猪已经列队走回了农舍。

本杰明感觉到一个鼻子在他肩头上蹭着。他回头一看，是克莱弗。她那两只衰老的眼睛看上去更加黯淡无神。她没说一句话，只是轻轻拽着他的鬃毛，把他拉到大谷仓的侧墙，就是题写七诫的地方。他们站在那里凝视着写着白色文字的黑焦油墙，看了足有一两分钟。

“我的视力衰退了。”她终于说道，“就算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不认识上面写的是什么。不过我觉得那面墙看上去不太一样了。七诫还是像往常一样吗，本杰明？”

本杰明第一次愿意破例把墙上的文字读给她听。如今那面墙上只有一条简单的戒律，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上面写的是：

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

更加平等。

读过这个之后，当他们第二天看到所有的猪在庄园里督工时蹄子上都夹着一根鞭子时，也不觉得奇怪了。当他们得知猪给他们自己买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并正打算安装一部电话，还订阅了《约翰牛》《趣闻集萃》《每日镜报》之类的报刊时，也不觉得奇怪了。当他们看到拿破仑在农舍花园里散步时叼着一只烟斗，甚至当猪把琼斯先生落在衣柜里的衣服拿出来穿在自己身上时，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了。如今拿破仑身着一件黑色大衣，下身穿着一条打猎用的马裤，还绑着皮绑腿，而他宠爱的一头母猪则穿着琼斯太太过去常常在周日穿的一件波纹绸长裙。

一周之后的一个下午，庄园里来了许多双轮马车。邻近庄园的一些代表应邀来观光视察。他们参观了整个庄园，对庄园里所有的事物都赞叹不已，尤其是当他们看到风车的时候。当时动物们正在萝卜地里除草，他们都在认真地工作，几乎从不抬头看一眼。他们自己也搞不清他们到底是更怕猪，还是更怕人。

那天晚上，农舍中传出了一阵欢歌笑语。听到这种混合的声音，动物们突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这是第一次动物和人平等的聚会，里面会发生什么事呢？于是他们一起悄悄爬向农舍的花园。

在花园的门口，他们停住了脚步，大概是因为害怕而不敢前行，但克莱弗带头走了进去。他们踮着蹄子走到房子旁边，一些个头够高的动物就从餐厅的窗户向里窥视。六个庄园主和六头最有声望的猪坐在屋子里的长桌周围，拿破仑坐了首席。猪坐在椅子上，感觉没有丝毫不适。他们正在一起玩纸牌，但中间暂停了一会，显然是准备祝酒。一个很大的酒壶在他们当中传递，杯子里重新添满了啤酒。没有谁注意到窗外正有许多惊诧的面孔注视着他们。

福克斯伍德的皮尔金顿先生站了起来，手里正举着一杯啤酒。他说，一会他要请在座各位一起干杯，但干杯之前，他想先说几句话。

他说，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欣慰的事情，并且他敢说，对在座各位来说也是如此，因为长久以来的猜疑和误会现在已经终结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无论是他还是在座的各位都没有今天这样的感觉，的确有一段时间，尊敬的动物庄园的主人曾受到邻近的人类的关注，但与其说那是敌意，不如说那只是某种误会。曾经发生过不幸的事件，也流传过错误的观点。一个由猪拥有并经营的庄园听上去多少有些不太正常，很容易让人觉得靠不住，并有可能给邻近的庄园带来一些骚扰。于是许多庄园主就草率地断言，在这样的庄园里，一定充斥着散漫放肆的风气。他们担心这会影响他们自己的动物，或者他们的雇工。但所有的疑虑现在都已消解。今天，他和他的朋友们参观了动物庄园，亲眼看过了动物庄园的每一英寸土地。他们发现了什么？这里不仅有与时俱进的生产方式，而且纪律严明，井然有序，这是所有庄园主都应该效仿的典范。他相信他的判断没错：动物庄园里所有的下等动物比全郡任何动物干得都更多，吃得都更少。事实上，他和他的同访者今天看到了很多独具特色的地方，他们马上就打算把这些东西引进他们各自的庄园中。

在结束讲话之前，他再次强调动物庄园与他的邻居之间已经建立并

且应该建立友好关系。在猪和人之间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任何利益冲突。他们奋斗的目标和遇到的困难不都一样嘛。劳工问题处处不都是相同吗？讲到这里，皮尔金顿先生显然打算说一句精心准备的俏皮话，但话还没出口，自己就有点乐不可支，以至于一时语塞。他笑了很久，下巴都憋得发紫了，才勉强说出一句：“如果说你们有你们的下层动物要对付……”他接着说：“那么我们也有我们的下层阶级要对付！”这句意味深长的妙语惹得一阵哄堂大笑。皮尔金顿先生再次为他在动物庄园所见到的食物配给少，劳动时间长，并能保持艰苦朴素作风这些现象向猪表示祝贺。

最后他说：“现在，请在座各位起立，把酒都满上。”“先生们，”皮尔金顿说出了他的结语，“先生们，我敬你们一杯：愿动物庄园繁荣昌盛！”

房间内响起了一阵热烈的喝彩声和跺脚声。拿破仑非常开心，他离开了座位，绕着桌子走到皮尔金顿这边和他碰杯，然后才把酒干了。喝彩声刚停下来，用后腿直立的拿破仑示意，他也有几句话要说。

这次讲话像拿破仑所有的演讲一样简洁有力。他说，他也为误解的终结而感到高兴。长期以来，一直有谣言说他和他的同行之间是一种颠覆和背叛的关系，但这肯定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仇敌散布的。过去很多人误以为他们企图煽动邻近庄园的动物造反。但是，任何谎言都掩盖不了真相！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能与邻近的庄园和平共处，并保持正常的贸易往来。另外他补充道，他有幸能管辖的这个庄园仍然是合作经营的。他手里的那张地契其实要归全体的猪共同所有。

他说，他相信已经不存在任何猜疑了，但是最近要对庄园的惯例做一些修改，这将进一步促进他们彼此之间的信任。此前庄园里有一个愚蠢的习惯，就是互相称呼对方为“同志”。这个习惯将被废止。还有一个不知怎么产生的奇怪习惯，就是在每个星期天早晨都要列队经过花园里一个被钉在柱子上的公猪颅骨。这也将废止，而且颅骨也已经被埋了。他的来宾也许已经看到了，旗杆上现在飘扬着一面绿旗。如果真的看到了的话，也许会注意到之前画在旗子上的白色蹄子和犄角现在已经没有了。从今往后，它将是一面纯绿色的旗。

他说，对于皮尔金顿先生刚才那篇精彩而友好的演讲，他只有一点小小的意见，那就是皮尔金顿先生一直在用“动物庄园”这个名字。他当然不知道——因为这也是拿破仑第一次公布——“动物庄园”这个名字已

经作废。今后庄园将被称作“曼娜庄园”，拿破仑相信，这不仅是它本来的名字，也是它正确的称呼。

“先生们，”拿破仑总结道，“我想再次请大家举起酒杯，不过这一次我将换一种说法。把你们的酒满上。先生们，这次的祝酒词是：愿曼娜庄园繁荣昌盛！”

房间里又响起了一阵和刚才一样的喝彩声，大家举杯一饮而尽。但在窗外注视着这一切的动物却觉得有一些怪事正在发生。这些猪的脸都在发生着什么变化呢？克莱弗老眼昏花，目光在这些猪的脸上挨个扫过。他们有的有五个下巴，有的有四个下巴，还有的有三个下巴。但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消融，在改变，到底是什么呢？随后，喝彩声结束，他们又拿起纸牌，继续刚才的游戏，动物们也就悄悄地爬走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走出二十码，就突然停了下来。农舍中传出一阵喧哗。于是他们又跑了回去，站在窗子旁边往里看。是的，里面正在激烈地争吵。有的在咆哮，有的在拍桌子，有的射出猜忌的锐利目光，有的在愤怒地矢口否认。争吵的原因似乎是拿破仑和皮尔金顿先生各自同时打出一张黑桃A。

十二个嗓门同时在咆哮，看上去全都是一个样子。于是也就不用再去思索猪的脸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窗外的动物看看猪，再看看人，然后再看看猪：但他们已经无法辨别哪个是猪，哪个是人了。

1943年11月—1944年2月

---

[1] 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等于5280英尺，合1.6公里。

译后记

第一次看《动物庄园》这本书还是在初中的时候。当时对书中的政治隐喻并不能完全理解，但还是被小说荒诞的故事情节迷住了。我清晰地记得有一次班主任让我们搜集名言警句，我随手就写了一句，“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结果全班同学看了都不知所云。

上了高中以后，对这本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开始在全班范围内推荐这本书。不幸的是，当时班上所有同学判断一本书是否值得一读的标准是是否对高考有帮助，于是尽管在听完我介绍之后，大家对此书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最终基本上没有人看。当时语文老师还让我们续写名著练笔，我就续写了《动物庄园》，结果他的评价是“没有看过《动物庄园》，像这样的小众书籍不推荐续写，哪怕要续写，也应该对前面的情节有所交代”。这件事让我大吃一惊：我想《动物庄园》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排行榜中如果说排不进前十位，那么也至少在前二十之列，而我们这位语文老师在整个高中也算是最博学的一位。我甚至想亲自去办公室给他推荐一下这本书，不过想了想高考是指挥棒，也就作罢了。

2008年，在上大学期间，有幸看到了这本书的英文原版。当时自己的英语水平很差，考虑到兴趣可能是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动力，于是就开始以学习为目的翻译这本书。当时只译了前两章，译文质量很差，一些英文习语常常翻译错。到了2009年，英文阅读水平稍有起色，陆续又译了三、四两章。同时想到自己翻译文章既然是为了学习，就不如发到网上让大家批评指正，于是就放到了当时刚刚兴起的翻译网站译言。非常感谢译言网的网友指出了我不少错误。后来因为学习和工作的原因，这本书也就没有再接着译下去。

2010年，我阴差阳错地成了一名GRE教师。GRE作为北美研究生入学考试，题目当中涉及了很多英美文化概念，其中不乏一些政治学概念。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中国大部分学生只要不是学相关专业的，在政治、经济、法律、艺术等方面就存在着常识性的欠缺。因此某些相关概念解释起来非常费劲，但我注意到乔治·奥威尔的两本小说（本书和

《1984》）当中很具体形象地描述了一些相关概念，于是就经常在课堂上推荐这两本书，有时也会选择书中的一些事例来讲解相关概念。有些同学课后注意到我的博客上有我自己翻译的《动物庄园》前四章，就用微博或者邮件询问什么时候能翻译完。我一般都回复说，翻译这本书纯粹出于兴趣，得等到时间比较宽裕的时候才会继续翻译。同时我会推荐一些其他人的译本。但令我惊讶的是，有些朋友会再次回复，说我的翻译要比我推荐的译本更好。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于是我找来两三部经典译本，与自己的译本对照了一下。发现最大的差别是，我的译本更贴近当下汉语的使用习惯。一些老译本毕竟年代久远，难免会出现一些生涩的表达。这无疑又成了我继续翻译此书的动力。

2012年辞职准备留学，日子稍微清闲了一点，就想起了这本书。做了两年多出国考试培训教师，英语水平比以前有了大幅提高，翻译起来也更加有信心。于是就重新把前四章修订了一遍，又一鼓作气译完了后面的六章。

可以说，这本书与我有着不解的渊源。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书的标题英文原文是Animal Farm，译成中文一般有三种译法，分别是“动物农场”、“动物农庄”、“动物庄园”。开始翻译为“动物庄园”纯粹是因为自己看的第一个版本就是这个译名，后来自己认真思考了一下，觉得“动物农场”和“动物农庄”似乎更合适一些，但读来读去还是喜欢“动物庄园”这个名字，也就没改，权且当作是译者的一种特权吧。

最后，我想感谢每一个能让此书纸质版得以顺利出版的人，尤其是译言古登堡计划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老师们。如前面所说，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虽然在英文世界享有盛誉，但国内的不少朋友对其人其书所知实在不多，出版他的书甚至不能算是一件经济上非常划算的事情，因此也就需要格外的勇气和魄力。但我相信，每一个阅读乔治·奥威尔作品的人都会同意——这样的付出物超所值。

郝海龙

2015年8月31日

奥威尔作品集

缅甸岁月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郝爽 张旸 译

BURMESE DAYS

奥威尔首先是先知，其次才是圣徒。
——止庵

他能够在目睹最糟境况的同时为最美好的东西而战。
——Granville Hicks

在不让他们获得自由的前提下，他觉得他们是这世上最可爱的人了。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缅甸岁月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郝爽 张旸 译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缅甸岁月/（英）奥威尔著；郝爽，张旸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7

（奥威尔作品集）

ISBN 978-7-5680-1132-7

Ⅰ.①缅… Ⅱ.①奥…②郝…③张… Ⅲ.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185758号

缅甸岁月

[英]乔治·奥威尔 著 郝爽、张旸 译

策划编辑：刘晚成

责任编辑：薛蒂

特约编辑：徐心 王瑜玲 郝爽

责任校对：马燕红

封面设计：喃风

责任监印：张贵君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3

印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1.25

字数：262千字

版次：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48.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由的保障，良知的坚守

在不让他们获得自由的前提下，他觉得他们是这世上最可爱的人了。

译者序

谈到乔治·奥威尔，大家再熟悉不过他的《动物庄园》（Animal Farm）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了，但知道《缅甸岁月》的人却相对较少。这是奥威尔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于1934年。我倒是觉得，相比起上述两部经典的政治寓言，《缅甸岁月》带给大家的是一个更加真实的奥威尔。小说故事建立在奥威尔本人在缅甸生活的经历上。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奥威尔来到了缅甸，当了五年的殖民警察。也正是这段经历，使奥威尔看到了一些东方人的愚昧、势利、奴性等劣根性，同时自己又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产生了深深的厌恶。这些情绪都在这本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以至此书一开始就在印度被禁止发行。小说中不管是当地土著人的形象还是白人萨布（老爷）的形象几乎无一是正面的。但即便如此，整本小说还是充满了奥威尔对殖民地的矛盾情绪，他虽然同情被殖民的东方民族，但代表他本人的小说主人公弗洛里在白人萨布被土著包围之后，还是充当了保卫白人阵营的角色。弗洛里厌恶白人萨布的那一套作风，却又摆脱不了它对自己的影响。奥威尔本人也在从事五年殖民地警察的工作后，在矛盾之中最后选择了辞职，即使他以后要面对的是巴黎和伦敦最底层的生活。在这里，我不想透露太多小说的内容，正如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乌克兰版的序中说的那样，“如果作品不能自己说明问题，那它就是失败之作”，而这本《缅甸岁月》绝非失败之作。

翻译这本小说，对我来说既是荣幸，又是挑战。书中保留有相当数量的非英语词汇，包括印地语、缅甸语等等。这着实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奥威尔这样的处理，让我想起了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的《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以及《灿烂千阳》（A Thousand Splendid Suns）。这两本小说中也保留了相当多的达利语和普什图语，为的就是让读者切实感受到更加真实的阿富汗。那么，在《缅甸岁月》中保留印地语、缅甸语，想必也是要为读者呈现最真实的英属印度殖民地（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生活。于是，我和本书的另外一位译者张旸先生商讨过后，决定尽量保留这样的“异国风味”，不去剥夺中国读者了解当时那种真实殖民地生活的权利。翻译本书的另一挑战，便是书中出现的诸多典故、名言，以及文化特定词。这些概念对于大部分中文读者来说是陌生的。那么到底要怎样

翻译奥威尔这种引经据典的描述呢？无非是，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95年在《译者的隐身》[1]中提出的两种办法：“译者要么尽可能地不去打扰原文作者，让读者向原文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地不打扰译文读者，让原文作者向译文读者靠拢。”最后，我们两个译者商量决定还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奥威尔，让本书的读者向他靠拢。于是在碰到这样的内容时，我们采取的方法多为保留原意，再作注解。这样做的理由有二： 一是要在中文中找到恰当的比喻、典故以求让中文读者的感知与英文读者的感知达到一致实属困难；二是选择读奥威尔的读者，大多不光满足于了解他笔下的那个单纯的故事，也一定希望多去体会这位大文豪独特的文风以及幽默感。

其实一本书的译者序本没必要赘述过多，只需将读者读本书之前所需要知道的东西交代便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有必要先在译者序里澄清我们的一些翻译策略，好让读者更好地调整，达到更佳的阅读体验。

奥威尔在《我为何写作》[2]（Why I Write）一文中总结了四个写作的动机：完全的自我中心、热衷于美的事物、基于历史的使命、政治性目的。很多读者会同意奥威尔多数小说是出于政治性目的而创作的，但我想，这本《缅甸岁月》的创作主要是基于第三个动机，即“想要了解事情的样貌、挖掘事件的真相，并将结果留存下来，以流传于后世”。当时的奥威尔政治观尚未完全成熟，他是用自己的文字在摸索，内心充满了困惑、矛盾与愧疚感，但正是这段经历，为他之后仇视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观打下了基础，让他对自己心中的信念更加坚定，促使他创作出了经典的传世之作《动物庄园》和《1984》。

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香港浸会大学的黎翠珍教授，在本人翻译过程中为译文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感谢我的缅甸朋友，香港大学的Wai Yan Phyo同学，为我们翻译缅甸语以及当地各种方言提供了帮助。同时，也特此感谢本书的另外一名译者张旸先生，与我一起完成了这一挑战。最后，我希望将此译本献给张旸先生与我共同的恩师——外交学院范守义教授。

郝爽

2015年4月于香港浸会大学

[1] 劳伦斯·韦努蒂.《译者的隐身》.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 乔治·奥威尔著，张弘瑜译，《我为何写作》，台北：五南文库，2009.

主要译名对照表

约翰·弗洛里（John Flory）：中年英国木材商，善打猎，喜爱东方文化，早年生活放荡不羁，脸上有胎记。

维拉斯瓦米医生（Dr. Veraswami）：印度医生，弗洛里的朋友，皎塔达职位最高的土著文官。

郭斯拉（Ko S'la）：弗洛里的缅甸仆人。

玛拉美（Ma Hla May）：弗洛里的缅甸情人。

伊丽莎白·拉克斯廷（Elizabeth Lackersteen）：未婚的年轻英国女孩，父母双亡，到缅甸投奔叔叔婶婶。

拉克斯廷夫人（Mrs. Lackersteen）：拉克斯廷先生的妻子，伊丽莎白的婶婶，英国人。

拉克斯廷先生（Mr. Lackersteen）：木材公司地区主管，拉克斯廷夫人的丈夫，伊丽莎白的叔叔，英国人，酗酒。

麦格雷戈先生（Mr. MacGregor）：皎塔达地区副行政长官，欧洲俱乐部主席，英国人。

维罗尔中尉阁下（Hon. Lieutenant Verrall）：临时驻扎的宪兵军官，年轻的英国贵族，善骑术。

埃利斯（Ellis）：木材公司地区主管，极端种族主义者，英国人。

马克斯韦尔（Maxwell）：皎塔达地区森林管理员，英国人。

韦斯特菲尔德（Westfield）：皎塔达地区警长，英国人。

吴波金（U Po Kyin）：狡猾腐败的缅甸文官，善用手段，被弗洛里和维拉斯瓦米医生称为“鳄鱼”。

玛庆（Ma Kin）：吴波金的妻子，虔诚的缅甸佛教徒。

拉佩（Hla Pe）：吴波金的亲信，缅甸文员，善于写作煽动性、诽谤性文章。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四章
- 第二十五章
- 译后记

第一章

吴[1]波金安坐在自己家的阳台上，他是缅甸北部皎塔达镇的分区法官。那是四月的一天，刚刚八点半，天气闷热得令人窒息，正午沉闷难捱的时光就要到来。时而掠过的微风，带来一丝凉意，吹拂了从屋檐垂下的刚刚浇过水的兰花。兰花后面，触目可及的是棕榈树那弯弯的树干，上面落满灰尘。再往远处，就是那湛蓝耀眼的天空。遥望苍穹，几只秃鹰在空中静静地盘旋，它们飞得如此之高，抬眼望去，令人目眩。

吴波金眼睛一眨不眨，活像一尊瓷像，目光直望向那刺眼的太阳。年过半百的他满身赘肉，几年以来在无人搀扶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起身离开座椅。可他虽然肥满，却体型匀称，甚至算得上是有丰腴之美。白人一发福就满身松弛，鼓鼓囊囊，而缅甸人却不然，他们胖得均匀，就像熟透了的水果。他有张巨大的黄脸，基本没有皱纹，眼睛是褐色的。他的脚又短又宽，脚背很高，脚趾平齐，他光着脚，留着小平头，身上穿着鲜亮的阿拉坎笼基[2]，上面印有绿色和紫红色的格子图案，这是缅甸人在休闲场合所穿的服饰。他嚼着从桌子上那个漆盒中拿出的槟榔，回想着自己的上半辈子。

那真可谓是飞黄腾达的半辈子啊。吴波金的思绪飘回到了记忆的最深处，那是19世纪80年代，他当时还是一个一丝不挂、肚子滚圆的小男孩，看着英军趾高气扬、浩浩荡荡地开进曼德勒，注视着那一排排吃牛肉长大的英国人、一个个穿着红色军装的赤脸大兵，看着他们扛在肩头的长长的来复枪，听着他们有力、有节奏的踏步声，当时的恐惧仍记忆犹新。还没看了几分钟，他就吓得一溜烟儿地跑开了。以一个孩子的逻辑，他也能分析出自己的族人根本不是这群巨人的对手。即便他当时还是个孩子，他也已暗自下了决心，将来要给英国人做事，仰仗着英国人。

十七岁那年，他申请过一个政府的工作，但遭拒绝。三年以来，他穷困潦倒、无依无靠，在曼德勒那些如迷宫般错综复杂、臭气熏天的集市上帮别人卖粮，还时不时搞一点小偷小摸的勾当。二十岁那年，他走运勒索到了四百卢比[3]的不义之财。他随即动身去了仰光，给自己在政府中买了个文员当。虽说工资不高，但算个肥差。当时一些文员靠侵吞

政府储备来捞油水，而波金（那个时候，他还是波金，代表尊称的“吴”是之后才加上的）自然而然也就近墨者黑了。但是，区区一个文员只谋可怜的蝇头小利，对他来说可谓是太屈才了。有一天，他发现政府正缺一些低级官员，准备在他们这批文员中选拔。这个消息其实要等一个星期之后才公布出来，但波金有个本事，那就是在任何消息公开的前一星期他准能得到风声。他抓紧了机会，搞了个突然袭击，揭穿了和他同流合污的那帮人。他们大多都锒铛入狱，而波金却因为“品行诚实”，跃升为副镇长。自那之后，他就平步青云。现在五十六岁的他已经是分区法官了，而且他很有可能再获提拔，当上代理副行政长官，和很多英国人平起平坐，甚至当上他们的上司。

作为法官，他审理案件的方法很简单，再多的钱也买不来胜诉，因为他晓得一个判错案子的法官迟早要进监狱。他采取更稳当的办法，两边都捞点好处，然后完全秉公办事。因此，他赢得了公正的好名声。除了从当事人口袋里赚钱，吴波金还在他管辖区的村子里没完没了地征税，这属于私自征税。如果哪个村子胆敢不进贡，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武装流氓土匪就会进村扫荡，村里的头头含冤入狱，等等——用不了多久，所欠的税款就一定会补上。管辖区内发生的所有大规模抢劫，他都会从中分得一杯羹。当然了，这里面大多数的猫腻都是人尽皆知的，除了吴波金的上司们（任何英国官员都永远不会听信关于自己人的谗言）。所有试图揭发他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他的亲信为数众多，一个个都让赃物喂得忠心耿耿。每当遭到指控，吴波金只需买通几个证人就能让控告烟消云散，不仅如此，他还反咬一口，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真算得上是刀枪不入，因为他极善识人，绝不会用错人，而且他太爱算计，绝不会吃亏在疏忽和无知上。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他绝不会被查处，他会愈发飞黄腾达，攒下几十万的身家，死后还受人敬仰。

即便是死之后，他的功德仍然会延续下去。佛家思想认为，人这辈子作恶，下辈子投胎就会成为老鼠、青蛙或是其他劣等生物。吴波金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他希望完全避免这样的下场。暮年之时，他将全力做善事，让功德弥补之前的罪孽。或许他会出资修建佛塔，四座、五座、六座、七座佛塔，僧侣会告诉他多少就够了。修建的佛塔要有石雕、镀金的塔顶，和随风叮咚作响的铃铛，每次的铃响都代表一声祷告。这样一来，他下辈子就仍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出现在尘世，因为女人的地位几乎和老鼠、青蛙差不多，顶多是像大象这样更高级点的生物。

这些思绪快速在吴波金脑海中闪过，大多是历历在目的景象。他的

思维虽然狡猾，但却十分直接。如果不是有明确目标，脑子就基本不转。他不可能做到纯粹的冥想。此刻，又有什么东西让他的脑筋转了起来。他将一双三角形的短小的手往椅子扶手上一放，稍稍转了下椅子，气喘吁吁地喊道：

“巴泰克！嘿，巴泰克！”

巴泰克是吴波金的仆人，他从阳台的珠帘后走了出来。他身材矮小，满脸麻子，看上去一副怯生生、吃不饱的样子。吴波金一分钱也不付他，因为他是个定了罪的小偷，只要一句话就能让他去蹲监狱。巴泰克走上前来行了个什科礼[4]，头压得低低的，好像要后退似的。

“老爷？”

“有没有人求见，巴泰克？”

巴泰克掰着手指数了数访客的数量，说：“大人，迪品基村的村长求见，他带了礼物来。还有两个村民，请您审理斗殴案件，他们也带了礼物。郭[5]巴盛，就是副行政长官办公室的主任文员，想见您。还有阿里沙，那个警察，和一个土匪，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想他们是为盗窃金手镯的事起了争执。还有个村里的女孩，她抱着个婴儿。”

“那女孩儿想干什么？”吴波金问道。

“她说孩子是您的，老爷。”

“哦。那村长带了多少钱？”

巴泰克觉得他只带了十卢比和一篮芒果。

“告诉那个村长，”吴波金说，“至少二十卢比，如果明天我还见不着钱，他和他们村就等着吃苦头吧。剩下的人现在就见。叫郭巴盛进来。”

不一会儿，巴盛进来了。他腰板笔直，肩膀狭窄，在缅甸人中算是个大个子。他的脸十分光滑，就像是咖啡奶冻。吴波金觉得此人甚为中用。他虽然刻板乏味，但踏实肯干，是个优秀的文员，而且他深得副行政长官麦格雷戈的信赖，知道不少其公务上的秘密。吴波金马上有意识

地变得和颜悦色，朝巴盛笑着打了个招呼，招呼他吃槟榔。

“哎，郭巴盛，我们的事情进展怎么样啦？我希望，拿麦格雷戈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吴波金随即讲起了英文，“eet ees making perceptible progress（一切顺利）？”

听到吴波金的小笑话，巴盛没笑，而是僵硬笔直地坐在椅子上，回答道：

“进展非常顺利，先生。我们今早收到了报纸，请过目。”

他拿出了一份双语报纸，报纸名为《缅甸爱国者报》，只有八个版面，印刷拙劣，文字突兀地印在纸上，如同吸墨纸的印刷效果。小报的消息要么是抄自《仰光报》，要么就选登一些没人信的民族主义口号。最后一版，铅字错位了，整个版面一团黑，就好像为报纸如此之小的发行量进行哀悼一样。吴波金翻看的那篇文章的风格与其他文章大不相同。文章写道：

在这样幸福快乐的时光里，伟大的西方文明不仅拯救了我们贫困的黑人大众，而且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福祉：电影、机关枪、梅毒，等等。还有什么能比欧洲恩人的私人生活更加让人激动的事情呢？所以，我们认为读者一定会对皎塔达内陆偏远地区发生的大事感兴趣，特别是当牵涉到麦格雷戈先生，该区尊敬的副行政长官的时候。

麦格雷戈先生是个优雅的老派英国绅士，在这样欢乐祥和的日子里，身边这样的榜样实在数不胜数。我们亲爱的英国兄弟姐妹们称他为“顾家男人”。十足的顾家好男人啊，比如说，他在皎塔达地区任职刚一年，就在本区有了三个孩子。在上一任区瑞犹，他有过六个子女。也许是麦格雷戈先生疏忽了吧，他的这几个年幼的孩子现在无人养活，而且其中几个孩子的母亲已到了快要饿死的境地……

有个专栏专门刊登类似的内容，虽然令人读起来很难受，但相较其他版面，文笔却更胜一筹。吴波金有远视眼，他伸直了手臂拿着报纸，仔细地阅读文章，抿着嘴唇，一副沉思的样子，露出满嘴又小又整齐的牙齿。由于嚼槟榔，他的牙齿都变成了血红色。

“编辑要为此判上六个月监禁。”他终于开口了。

“他才不在乎呢。他说只有进了监狱，他的债主才不会骚扰他。”

“你刚才说这篇文章是你的小徒弟拉佩自己写的？他是个聪明孩子，有前途！别再跟我说政府办的高中都是浪费时间。一定让拉佩转正，正式成为文员。”

“先生，那您觉得光凭这篇文章就够了吗？”

吴波金并没有马上回答，只是喘了喘气，吃力地出了一声。他试图从椅子上站起来。巴泰克对这个声音极为熟悉。他撩开珠帘，走了出来，然后他和巴盛一人架住吴波金的一个腋窝，扶着他站了起来。吴波金站了一会儿，挪了挪他耷拉在腿上的肚子，就像搬鱼工调整抱起的箱子一样。然后，他挥手示意巴泰克下去。

“不够啊，”他回答巴盛，“当然是不够的啊。还有很多事要做，但这是个好的开头。听我说。”

他走到阳台的栏杆处，吐出血红色的槟榔，然后开始在阳台上迈着小步踱来踱去，双手放在背后。两条粗壮的大腿蹭来蹭去，让他走得有点晃。他边走边讲，说的尽是政府部门不太纯正的行话，夹杂着缅甸语的动词和一些抽象的英文短语：

“现在，咱们重新梳理一下。我们要共同对付维拉斯瓦米医生。他是个公职外科医师，也是监狱长。我们要诽谤他，让他身败名裂，然后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要小心行事。”

“是的，先生。”

“此事虽说没有风险，但我们得慢慢来。我们不是在对付一个卑下的文员或者是警察。我们对付的是个高级官员，虽然此人是印度人，但毕竟不像对付个文员那么简单。要整一个文员怎么办？简单。一个指控、二十来个证人就足以让他革职查办，关进监狱了。但这种办法在此人身上行不通。软招，软招，出软招，这才是我的风格。不搞丑闻，最紧要的是不搞官方调查。不提出控告，不留一点辩护的机会给他，但不出三个月，我就会让皎塔达的所有欧洲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个医生是个祸害。我该给他安个什么罪名呢？受贿不行，医生一般也无贿可受。那还能是什么呢？”

“或许我们可以策划一场监狱暴乱，”巴盛说，“作为监狱长，医生他必然难辞其咎。”

“不行，太危险了。我可不想让狱警们拿着枪到处扫射。再说，这样做要浪费很多钱。那么很显然，我们要告他不忠——搞民族主义，煽动宣传。我们必须让欧洲人以为医生不再忠于他们，有反英思想。这个罪名就大了，比受贿严重得多。当地官员受贿，是他们意料中的事，但只要扣上不忠的罪名，这个人立马就完蛋。”

“很难证明他不忠啊，”巴盛提出反对意见，“医生对欧洲人可谓是忠心耿耿。只要听到不利于欧洲人的话，他立马翻脸。他们都知道这一点，您不觉得吗？”

“荒谬，太荒谬了，”吴波金轻松地说，“欧洲人都不会在乎证据，对于黑皮肤的人，怀疑就是铁证。几封匿名信就足以搞得他鸡犬不宁。唯一要做的就是坚持，告发，告发，继续告发，这才是和欧洲人打交道的方法。一封信接另一封信，轮流寄给每个欧洲人，等到他们的疑心被完全激起了，”吴波金从身后抽回了一只他那短短的胳膊，打了个响指，补充道，“我们就实行第一步，在《缅甸爱国者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欧洲人看了一定会暴跳如雷。然后，下一步就是要让他们以为文章是医生写的。”

“他有一些欧洲朋友，恐怕这样做很难吧。这些欧洲人病了都找他。这个冬天他刚治好麦格雷戈先生的肠胃气胀。我想他们都觉得他医术高明啊。”

“郭巴盛，你一点也不了解欧洲人的心思！欧洲人去找维拉斯瓦米看病，完全是因为皎塔达没别的医生了。欧洲人才不会信任黑人呢，才不会。匿名信就只管多发。我保证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众叛亲离。”

“有个弗洛里先生，就是那个木材商，”郭巴盛说（他念成了“弗落疾先生”），“他是医生的好朋友。我见他只要在皎塔达，就每天早上都去医生家。他甚至还邀请医生共进过两次晚餐。”

“嗯，这次你说到点子上了。如果弗洛里果真是他的朋友，那对咱们很不利。很难对付一个有欧洲朋友的印度人。这让他有——他们老爱说的那个词是什么来着？——声望。一旦医生惹了麻烦，弗洛里会马上和他绝交。这些人对土著永远不可能谈得上忠诚。而且，我知道弗洛里

是个懦夫。我来对付他。郭巴盛，你的任务就是盯紧麦格雷戈的一举一动。他最近有没有给行政长官写信，我的意思是，给他寄过密函？”

“两天前他写过，但是我们用蒸汽打开信封后，发现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嗯，正好，我们给他点写作素材。他一旦开始怀疑医生，我们就做我和你说的另一件事。这样我们就能——麦格雷戈先生怎么说的来着？——哦，对，‘一石二鸟’。一举多得，哈哈哈！”

吴波金的笑声是从肚子里传来的一阵令人作呕的翻腾声，就像准备咳嗽时发出的声音。但他笑得很开心，甚至有点孩子气。他并没有继续说“另一件事”，因为这件事是机密，即便在自家阳台上也不能随便说。巴盛意识到会面要结束了，于是站起来，鞠了个九十度的躬，就像一把三角尺。

“大人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吩咐？”他问道。

“确保麦格雷戈先生拿到一份《缅甸爱国者报》。你最好告诉拉佩用腹泻做借口，请个假。我想让他来写匿名信。就这样吧。”

“那我告退了，先生？”

“主与你同在。”吴波金心不在焉地说，然后马上就喊起了巴泰克。他从不浪费一分一秒。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处理完了其他求见者的事情，并且一个子儿也没掏就把那村里的女孩儿打发走了，他只是端详了一下她的脸，说不认识她。现在到了他吃早饭的时间。阵阵饥饿感让他胃疼得慌，每天早上这个时间，这样的感觉就会准时到来。他急促地大喊：

“巴泰克！嘿，巴泰克！庆庆！我的早餐！快点，我快要饿死了。”

在窗帘背后的客厅里，一桌饭菜已经备好，有一大碗米饭和十几盘菜，盛着咖喱、干虾和切好的青芒果条。吴波金摇摇晃晃地走到桌前，发着呼噜声，一坐下来就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他的妻子玛[6]庆站在他身后，侍候着他用餐。她是个瘦弱的女人，四十五岁，一副慈祥的样子，她浅棕色的脸有点像猿猴。吴波金吃饭时完全注意不到妻子。他鼻子贴着碗，呼吸急促，飞快地用油乎乎的手指往嘴里塞食物。他的每顿饭都是极其丰盛，并且他都要心急火燎地一口气吃完。与其说那是在

吃饭，还不如说每顿都是和咖喱米饭的放荡狂欢。饭后，他靠在椅背上，打了几声饱嗝，并吩咐玛庆给他拿一支绿色的缅甸雪茄来。他从来不吸英国烟，他说抽不惯。

此时，在巴泰克的帮助下，吴波金穿上了官服，在客厅的长镜子前站了一会儿，欣赏着自己的雄姿。客厅是木制墙，有两根柱子，还能看出是柚木做的，支撑着房梁。虽然吴波金把房间装饰成“英伦风格”——镶木的餐柜和椅子、英国皇室的画像、灭火器——房间还是阴暗邋遢，就像所有其他缅甸的房屋一样。地板上铺着竹席，溅满了酸橙汁和槟榔汁。

玛庆坐在角落的席子上，缝着因基[7]。吴波金在镜前慢慢转动了一下，想看一眼后背。他头上裹着一个浅粉色的丝绸岗包[8]，身上穿着上了浆的平纹细布做的因基，还有一件曼德勒丝绸做的橙红色帕索[9]，上面用金线绣着图案，甚是气派。他费力地转过头，看着亮闪闪的长袍紧紧地裹在自己硕大的臀部上，他非常满意。他为自己的胖感到骄傲，因为他认为不断养起来的膘是伟大的象征。曾经一度卑贱、饥饿的他现在有了肥肉，家财万贯，令人敬畏。他是踩着敌人的身体飞黄腾达起来的，一想到这里，一种近乎诗意的感觉就油然而生。

“嘿，庆庆，我的新帕索真便宜，才二十二卢比？”他说。

玛庆埋着头，做着针线活儿。她很简单、很传统，她养成的欧式习惯甚至比吴波金还少。每当坐在椅子上，她就浑身不自在。每天清晨，她都会头上顶个篮子去市场上，就像一个村姑一样；晚上，人们会看到她跪在花园里朝着镇子上最高的佛塔的白色塔尖念经祈祷。二十多年来，吴波金所有的阴谋诡计都不瞒着她。

“郭波金，”她说，“你这辈子造了不少孽。”

吴波金挥了挥手，“那有什么关系？我修建的佛塔能弥补我的一切罪孽。往后时间还长着呢。”

玛庆又低下了头，继续缝补，一副倔强样儿，每次她不赞成吴波金的行为，她都会这样。

“但是，郭波金，真的有必要这样算计和密谋吗？我听见你和郭巴盛在阳台讲的话了。你们在密谋合起伙儿来对付维拉斯瓦米医生。你们

为什么要害那个印度医生？他可是个好人啊。”

“你这女人懂什么？这是公务。那个医生挡了我的道儿。首先，他拒绝受贿，这就等于给我们全体出难题啊。而且——哎，算了，反正有些事情，你这脑子永远也想不明白。”

“郭波金，你现在既有钱又有权，但是这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呢？比起现在来，我们穷的时候更开心。哎，我还清楚地记得，你那时还是个镇长，我们搬进了第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那时候多骄傲啊，家里有柳条编的家具，还有你那支金笔夹的自来水笔。那个年轻的英国警官来咱家的时候，坐在咱家最好的椅子上，喝着啤酒，咱那时感到多光荣啊！钱不能代表快乐。你现在一味地要更多的钱有什么用呢？”

“一派胡言，你这女人真是荒谬！做好你的饭，缝好你的衣服就行了，还是让懂得公务的人处理公务吧。”

“嗯，我是不懂。我是你老婆，从来都听命于你。但至少是越早行善越好。要努力多做善事啊，郭波金！比如买些活鱼，然后放生，可以吗？这样做能积攒不少功德。而且今早僧侣来化斋的时候，他们说寺里新来了两个僧侣，都吃不饱饭。你难道不打算给他们点东西，郭波金？我什么也没给他们，就是为了让你去施舍，攒下这份功德。”

吴波金从镜子前走开了。妻子的这番劝说，起了点作用。只要不麻烦，他就不会放过任何积德的机会。在他看来，积攒功德就像是往银行里存钱一样，他的储备在不断壮大。每条放生的鱼，每次给僧侣的施舍都让他离极乐世界更近了一步。这么想让他很安心。于是他下令将村长带来的那一篮芒果送到寺庙去。

此时，他出了门，沿着路往前走，巴泰克跟在他身后，抱着一摞资料。他慢吞吞地走着，腰杆笔直，好平衡他那巨大的肚子，他还在头顶举了把黄色的丝绸伞。他的橙红色帕索在阳光下光彩夺目，就像一颗光滑的杏仁糖。他正前往法庭，去审理这一天的案子。

---

[1] 吴（U），缅甸语对长辈或有地位的人称“吴”，意为叔伯。

[2] 阿拉坎笼基（Arakanese longyis），缅甸的一种颜色鲜亮的传统服饰。

[3] 卢比，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本位货币。缅甸也曾使用过卢比。

[4] 什科礼（shiko），缅甸人在神像或地位高的人面前双手合十、伏地跪拜的大礼。

[5] 郭（Ko），缅甸语对平辈或青年男子的人称“郭”。

[6] 玛（Ma），缅甸妇女一般在名字前加“玛”，不管已婚与否都是如此，以此表示谦恭。

[7] 因基（ingyi），是缅甸的传统服饰，一般在节庆时穿着。

[8] 岗包（gaungbaung），缅甸传统配饰，是头上戴用的素色的薄纱或丝巾。

[9] 帕索（paso），缅甸男性穿着的笼基。

第二章

正当吴波金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时，木材商“弗落疾先生”，维拉斯瓦米医生的朋友，刚刚从家里出来，准备去俱乐部。

弗洛里差不多三十五岁，不高不矮，长得也不错。他头发乌黑，又短又硬，贴着脑袋，还留着短短的黑色小胡子。他的皮肤天生就是土黄色的，让太阳晒得变了色。他并没有发福，也没有秃顶，所以并不显老，但除了被晒变色，他的脸一副憔悴样，脸颊瘦长，干瘪的眼窝深陷下去。很明显，他今早没有刮胡子。他穿着平常总穿的那件白色衬衣、一条卡其色的斜纹短裤和一双长袜，但是他没戴遮阳帽，而是戴了顶破旧的印度特赖帽[1]，帽檐遮住了一只眼睛。他手里拿着一根带腕带的竹拐杖，身后跟着一只名叫弗劳的黑色可卡犬。

但这些都不是他最明显的特征。人们见到弗洛里，首先会注意到他左脸上那块丑陋的胎记——不规则的月牙形，从眼部一直延伸到嘴角。从他左脸望去，他一副历经沧桑、愁眉苦脸的样子，那块胎记就好像是块青得发黑的瘀伤。他也知道这胎记是多么丑陋。在人前，他总是侧着身子，不想让别人看见他那块胎记。

弗洛里的房子在山顶的练兵场上，就在丛林边缘的不远处。从他家大门开始，整个地势急转为下坡，卡其色土地被烤得焦黄，房子周围分布着六间亮白色的平房，透着热浪望去，都在微微颤动。在半山坡的一面白墙里面，有一片英国墓地，附近有一座锡顶的小教堂。教堂后面，便是欧洲俱乐部了。这是座破旧的单层木头建筑，当你看见这个俱乐部时，在你眼前的就是这个镇子真正的中心了。在印度[2]的任何一个城镇，欧洲俱乐部都是精神圣地，是英国权力的集中地，是当地官员和百万富翁可望而不可即的极乐世界。而在皎塔达，更是如此，因为令皎塔达骄傲的是，这里的欧洲俱乐部从来不接纳东方人做会员，也许这在全缅甸也仅此一家。俱乐部外面，赭色的伊洛瓦底江水浩浩荡荡，在阳光下波光粼粼，闪着钻石一样的光芒。大江后面是大片大片荒弃的水稻田，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最远处，与连绵的青山相接。

当地的城镇、法院及监狱都在右边，大多藏在绿色的菩提树丛中。

佛塔的塔尖冲出树丛，就好像是镀了金的细长矛。皎塔达是个非常典型的缅甸北部城镇，从马可·波罗年代到1910年就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要不是由于这里建了火车终点站地理便利，皎塔达怕是要在中世纪再沉睡个一百年了。1910年，政府将其封为分区的首府、重点发展的对象——也就是建立了一系列法庭，里面充斥着大腹便便、贪得无厌的辩护律师，建了一所医院、一所学校，有一座坚固的大型牢房，从直布罗陀到香港，英国人建造的这样的监狱随处可见。这里人口大概有四千，包括两百个印度人、几十个中国人和七个欧洲人，还有两个欧亚混血，弗朗西斯先生和塞缪尔先生，分别是一个美国浸信会传教士和一个天主教传教士的儿子。镇子里没有什么奇闻异事，除了有个印度苦行僧在市集边的一棵树上住了二十年，每天早上都用篮子把食物吊上来。

弗洛里出了大门，打了个哈欠。前一天晚上，他喝得半醉，耀眼的阳光让他烦躁起来。望着山坡下，他心想：“该死，该死的破地方！”周围除了他的狗，没有别人，于是他开始用“神圣，神圣，神圣，啊，您是如此的神圣”的曲调大声唱“该死，该死，该死，啊，你是如此的该死”，他沿着烫脚的红色山路往下走，边走边唱，还一边朝着路边干枯的草丛挥舞着手里的拐杖。快九点了，太阳越来越毒，热浪劈头盖脸地朝他袭来，持续不断地猛压过来，就好像在被一个巨大的垫子不断地当头猛击。弗洛里在俱乐部门口站了一会，琢磨到底是进去还是继续往下走，去拜访维拉斯瓦米医生。然后，他突然想起，今天是“英国邮政日”，报纸应该送到了。于是他走了进去，绕过那张巨大的网球网，上面爬满了藤蔓，还长着淡紫色的星形小花。

路边的绿化带里面种着一排排英国品种的花——福禄考花、飞燕草、蜀葵花和矮牵牛——目前还没被太阳晒死，开得花枝招展、妖娆饱满。矮牵牛长得很大，几乎和树一样大。这儿没有草坪，但有一丛丛当地树木和矮灌木——繁茂的凤凰树就像是血红色的伞，鸡蛋花树上面则开着奶油色的没有花茎的花朵，紫色的九重葛、鲜红的木槿、粉红的月季花、绿得扎眼的巴豆、长着如同羽毛般蕨叶的罗望子，开得姹紫嫣红，让人看着目眩。一个几乎赤身裸体的园丁，手里拿着一个水壶，在花丛中穿梭，就像一只巨大的食蜜鸟。

在俱乐部台阶上，站着一个浅棕色头发的英国人，须髭如戟，一双灰白的眼睛眼距很宽，两个小肚腿简直瘦得出奇，双手插在短裤的口袋里。这是韦斯特菲尔德先生，这个地区的警长。他无聊地哼着小曲儿，踮着后脚跟，前后不停地晃动着，他翻着上嘴唇，用小胡子刮着自己的

鼻子。看见弗洛里，他脑袋稍微歪了一下，和他打了个招呼。他交流的方式总是简短干练，绝不多说一个字。从他口中讲出的话几乎都是在开玩笑，但他说话的语气却苍白而忧郁。

“嗨哟，弗洛里老兄。今儿早上真他妈够难受的，是不？”

“我想这个时节就是这样。”弗洛里说道。他把身子斜了斜，试图不让韦斯特菲尔德看见他的有胎记的左脸。

“是啊，真该死。还要忍受两个多月呢。去年一直到六月都没下一滴雨。看看这该死的天，连一片云都没有，他妈的就和个搪瓷的蓝色平底锅差不多。上帝呀！真希望现在在皮卡迪利大街啊，是不？”

“英国报纸送来了吗？”

“来了。《笨拙周报》[3]、《粉安报》[4]、《巴黎人生活报》都到了。读起来会想家，是不？趁冰还没化，进来喝一杯吧。拉克斯廷那老家伙一直在酒里泡着呢，已经半醉啦。”

他们走了进去，韦斯特菲尔德用他那悲伤的声音说道：“来，麦克德夫。”[5]俱乐部里面，墙是柚木的，房间里一股石油的味。俱乐部一共只有四个房间，其中一间是一个无人光顾的“阅览室”，里面放着五百多本发了霉的小说，另一间房里有一张脏兮兮的旧台球桌，但是几乎没人在这儿打球，因为每年都有大半年的时间，成群结队的飞虫会在电灯下嗡嗡打转，桌布上也爬满了飞虫。还有一间棋牌室和一间“休息室”，“休息室”外面有个宽敞的阳台，朝向江面。但每天这个时候，所有的阳台都拉上了绿色的竹帘。休息室丝毫没有家里的感觉，地上铺着椰棕地毡，桌子椅子都是柳条编的，上面丢满了鲜亮的插图报纸。房间装饰有几幅“邦左”画，还有几个落满灰尘的黑鹿头骨。挂在天花板的布屏风扇懒洋洋地转动着，将灰尘卷入温热的空气中。

房间里有三个男人。在风扇下，有个满脸通红、长相不错、稍稍发胖的四十岁男人，他两脚摊开躺在桌上，双手捂着脸，痛苦地呻吟着，这个人就是拉克斯廷先生，木材公司的地区经理。前一天晚上他喝得烂醉如泥，现在正受罪呢。埃利斯是另一家公司的地区经理，他站在公告牌前，痛苦地集中全部精力阅读着一条告示。他个头小小的，头发又硬又直，长着一张苍白而又棱角分明的脸，很是好动。马克斯韦尔是代理地区林业管理员，他正躺在长椅上读着《旷野报》，人们只能看见两条

大骨架的腿和两条汗毛浓密的粗壮小臂。

“看看这个不让人省心的老东西，”韦斯特菲尔德一面说，一面不失温柔地摇着拉克斯廷先生的肩膀，“给年轻人做的什么榜样，啊？不过谁都有喝醉的时候。看看他你就知道自己四十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了。”

拉克斯廷先生哼哼了一声，好像想说“白兰地”。

“可怜的老家伙，”韦斯特菲尔德说，“老酒鬼了，是不？酒都从他的毛孔中渗出来了。看见他，就让我想起了一个睡觉不用蚊帐的上校。人们问他的仆人他为什么不用蚊帐，仆人说：‘晚上，老爷醉得不省人事，根本注意不到蚊子在叮他；早上，蚊子醉得不省人事，根本注意不到老爷。’看看他那样子，昨晚喝得醉醺醺，然后还要喝。他的侄女要来他家住，人今晚就到了，是吧，拉克斯廷？”

“哎呀，别烦那个酒鬼了。”埃利斯说道，头也不回。他操一口伦敦东部口音，语气总是透着凶狠。拉克斯廷先生又哼哼了一声：“侄女儿！给我拿点白兰地，看在上帝的份儿上。”

“真是侄女的榜样，是不？看着叔叔一周七天倒在桌子下。嘿，管家！给拉克斯廷老爷拿点儿白兰地来！”

管家是一个深色皮肤、壮实的达罗毗荼人[6]，黄色的眼睛水汪汪的，就像狗的眼睛一样。他用黄铜托盘端来了白兰地。弗洛里和韦斯特菲尔德点了杜松子酒。拉克斯廷吞了几口白兰地，然后坐回了自己的椅子，更加无奈地呻吟起来。他长着一张淳朴而结实的脸，小胡子活像一支牙刷。他真的是个想法很简单的人，除了他说的“自在”之外，也没有什么大的志向。他妻子用唯一可行的方式管着他，那就是从来不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超过一两个小时。只有一回，那是他们结婚一年后，她有两个星期不在家，后来她提前一天回来了，居然发现拉克斯廷先生喝得醉醺醺的，两边各扶着一个一丝不挂的缅甸女孩，还有另一个女孩正在竖着威士忌瓶子往他嘴里灌酒。自那以后，她就紧盯着他，他经常抱怨：“她就跟只猫似的，紧盯着那该死的老鼠洞。”但是，他还是想办法享受到了那么几次“自在”，虽然这样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

“上帝呀，今天早上我的脑袋是怎么啦？”他说，“再叫管家过来，韦斯特菲尔德。我老婆来到之前，我得再喝杯白兰地。她说侄女儿过来

之后，要控制我喝酒，每天只能喝四杯。去她娘的！”他闷闷不乐道。

“都别犯傻了，来听听这个。”埃利斯阴阳怪气地说。他说话的方式很奇怪、很伤人，一开口就会冒犯别人。他故意凸显自己的伦敦东部口音，因为这样能让他的话听起来更加嘲讽。他说：“你们看过老麦格雷戈写的告示了吗？可真是恩赐呀。马克斯韦尔，起来听着！”

马克斯韦尔放下手中的《旷野报》。他是个金发年轻人，气色很好，不到二十五六岁——对于他这个职位来说，他算是很年轻的。他四肢粗壮，长着浓密的白色睫毛，让人马上就联想到拉车的小马驹。埃利斯愤怒地一下把告示从通告栏上面扯了下来，然后大声朗读起来。这则告示是由麦格雷戈先生写的，他除了是副行政长官以外，还是俱乐部的主席。

“听听吧。‘既然俱乐部目前为止还没有东方人会员，而且登报任命的官员，不管是土著还是欧洲人，加入欧洲俱乐部，现在已经是大多数欧洲俱乐部习以为常的事了，我们应当考虑在皎塔达也遵循这一惯例。下次大会将公开讨论此事。一方面，有些人或许会说……’哎，得了，剩下的也不必念了。他写个几行字，就词穷了。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他想让咱们打破所有规矩，欢迎亲爱的老黑进俱乐部。就比如，亲爱的维拉斯瓦米医生，我管他叫猥琐死咖喱医生。真让咱们这儿蓬荜增辉啊，不是吗？那些大肚子的老黑们在桥牌桌上朝你脸上吐着大蒜味。上帝啊，简直不敢想啊！在这件事上，我们一定要马上团结一心，坚定立场。你们说呢，韦斯特菲尔德？弗洛里？”

韦斯特菲尔德冷静地耸了耸自己单薄的肩膀，他刚才在桌前坐了下来，点了一根黑色、难闻的缅甸方头雪茄。

“我觉着，肯定得忍气吞声，”他说，“现在，那些当地的王八蛋进了所有的俱乐部。我听说，甚至还进了勃固俱乐部。在这个国家，这是大势所趋啊，知道吗。在缅甸，我们几乎是最后一个抵制‘这些人’的俱乐部了。”

“没错，而且，我们一定要他妈的坚守领地。要是让我看见这里面有个黑人，还不如让我掉到臭水沟里死了算了。”埃利斯拿出一个铅笔头。他把告示重新订回了通告栏，虽然只做了个很小的动作，但仍显得凶神恶煞，然后他用铅笔在麦格雷戈先生的签名处写了小小的几个字“臭傻帽”，字迹很工整。“好了，这就是我对此提议的看法。他来了

我也会告诉他的。你怎么看啊，弗洛里？”

弗洛里刚刚一直没说话。虽然他本性并不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他很少参与俱乐部的谈话。他坐在桌子前，一边阅读着G.K. 切斯特顿在《伦敦新闻报》上发表的文章，一边用左手抚摸着弗劳的头。埃利斯就不同了，他总是不停地唠叨，催别人讲出他们自己的观点。他又问了一遍，弗洛里这下抬起头来，他们四目相对。埃利斯鼻子周围的皮肤突然变得惨白，几乎成了灰色的。对他而言，这是愤怒的表现。毫无任何铺垫，他突然破口大骂，蹦出一连串污言秽语，如果不是其他人每天早上都要听他骂上一通，还真的会吓一大跳呢。

“我的上帝，我原本以为在这样的事情上，在抵制那些臭烘烘的黑猪进入我们唯一可以享受的地方这个问题上，你会识大体地支持我。就算那个大肚子的、油头满面的、下贱的小黑佬医生是你最好的弟兄。我可不在乎你和集市里的那些狐朋狗友混。如果你乐意去维拉斯瓦米家和他那些黑伙计一起喝威士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俱乐部外头，你想怎样就怎样。但是，上帝呀，你要说让那些老黑进俱乐部来，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猜你肯定想让维拉斯瓦米进来，是吧？在我们交谈的时候插嘴，用他那汗淋淋的爪子碰我们，朝着我们的脸呼出大蒜的恶臭味。上帝啊，只要让我看见他那黑乎乎的猪鼻子进了这个门，我准用靴子把他请出去。油头满面，大肚子的小……”

他继续骂了几分钟。很奇怪，他的话居然挺能打动人的，因为他说得是那么认真。埃利斯真的恨透了东方人，怀着满腔的仇恨，永远地鄙视着他们，认定他们邪恶肮脏。作为一个木材公司的助理，他的生活与工作永远都避免不了同缅甸人打交道，他总也见不得任何黑色的脸。任何对东方人示好的细微举动，在他看来都是一种可怕的变态行为。他是个聪明人，在公司里很能干，但不幸的是他属于那一类英国人——正常人——这种人本来就不该来东方。

弗洛里坐在那里，抚摸着趴在自己腿上的弗劳的脑袋，他并没有同埃利斯对视。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由于胎记的缘故，他也不愿直视他人。当他想好说什么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声音在颤抖，因为在本该坚定的时候，声音却颤抖了；还有他的脸，有时就会控制不住而抽搐起来。

“冷静点，”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带着愠怒，但又很微弱，“冷静点。没有必要这么激动。我从来没提议让任何土著入会。”

“哼，是吗？但是，我们都他妈知道你就想这么做。不然你为什么天天早上去那个油里吧唧的巴布[7]家里呢？和他坐在一张桌子上，好像他是白人一样。用他那肮脏的黑嘴以前舔过的杯子喝酒，光想想就让我想吐。”

“坐下，老伙计，坐下，”韦斯特菲尔德说，“算了吧。喝点酒。不值得吵架，天儿本来就热。”

“我的上帝呀，”埃利斯冷静一点了，来回踱了一两步，“我的上帝呀，我真搞不懂你们这群家伙。真搞不懂。现在那个蠢货麦格雷戈毫无理由地要让老黑入会，而你们还坐在这儿，一句话也不说。上帝啊，那咱们在这国家干嘛呢？如果咱说了不算，为什么不他妈的拍屁股走人？在这儿，咱本来就应该使唤这群该死的黑猪，从开天辟地起他们就是奴隶了。他们天生就是被统治的，而咱没有去统治他们，居然还对他们平等相待。而你们这堆傻帽就这样默许了。先是弗洛里，他最好的哥们儿是个黑巴布，那人在印度某个所谓的大学里待过两年，就封了自己个医生当。还有你，韦斯特菲尔德，一看见你手下那群X型腿、贪污腐败的胆小鬼警察们，就骄傲得跟潘趣[8]似的。然后还有马克斯韦尔，成天追着那些欧亚杂种骚货。没错，说的就是你，马克斯韦尔。我听说你在曼德勒的风流事儿了，和那个叫莫莉·佩雷拉的臭婊子。我猜要不是他们把你调来这儿，你没准儿就真要娶了她吧？你们好像都挺喜欢那群脏兮兮的黑畜生的。神啊，我真想不通咱们都怎么了。真搞不明白。”

“好了好了，再喝一杯，”韦斯特菲尔德说，“嘿，管家！趁冰还没化，再来点儿啤酒，嗯？啤酒，管家！”

管家拿来了几瓶慕尼黑啤酒。埃利斯随即在大家桌前坐下来，然后用两只小手握住了一个冰凉的啤酒瓶。他额头上冒着汗，还是闷闷不乐的，但已经从盛怒中缓了过来。他总是恶狠狠、倔巴巴的，但他的狂怒总是很快平息，他也从来不为自己的脾气道歉。俱乐部里，吵架是家常便饭。拉克斯廷先生感觉好些了，拿起了《巴黎人生活报》，翻看着上面的插图。现在九点多了，房间闷热得让人窒息，满屋子都是韦斯特菲尔德抽的雪茄的刺鼻味。大家都大汗淋漓，衬衣都黏在后背上。那个在门口拉布屏风扇吊绳的默默无闻的童仆在刺眼的阳光中睡着了。

“管家！”埃利斯大喊，管家过来后，他说，“去把那个该死的童仆叫醒！”

“是的，老爷。”

“管家，还有！”

“老爷？”

“我们还剩多少冰？”

“差不多二十磅吧，老爷。我想，只能撑过今天了。我发现，现在给冰块保冻非常困难。”

“你他妈的别那么讲话，还‘我发现非常困难！’你吞了字典还是怎么的？‘嗯，老爷，不能冻冰’，你该这么讲话。要是哪个家伙英语讲得太好了，我们准把他炒了。我特受不了会讲英语的仆人。听见了吗，管家？”

“是的，老爷。”管家说完就退下了。

“上帝啊，得到周一才有冰！”韦斯特菲尔德说，“你等下回树林吗，弗洛里？”

“嗯，本来现在就该到那儿了。是因为今天有报纸，我才进来的。”

“我想去旅游。挣点差旅津贴。我真受不了这种天气在该死的办公室待着。坐在那该死的风扇下面，没完没了地在签单据、啃文件。上帝啊，我真希望再打一场仗啊！”

“我后天要出去，”埃利斯说道，“那个该死的随军牧师不是这周日要来主持礼拜吗？反正我可不去，简直就是罚跪。”

“下周日，”韦斯特菲尔德说，“我答应要去的。麦格雷戈也会去。我得说，那可怜的牧师太惨了。六个星期才来一次，至少也得有人捧捧场呀。”

“真该死！我会对牧师行行好，虚情假意地唱赞美诗的，但我实在受不了这些当地基督徒挤进咱们的教堂。一群马德拉斯[9]下人和克伦族[10]教师，还有那两个黄肚子，弗朗西斯和塞缪尔，他们也自称基督徒。上次牧师来的时候，他们胆敢走上前和白人一起坐在第一排。这事

儿得有人跟牧师反映一下。咱们他妈的都脑子缺根弦，让这些个传教士在这个国家肆意妄为！跟那些集市上扫大街的人讲，他们不比我们差。‘拜托，先生，我基督徒，和老爷一样。’真他妈恬不知耻。”

“这双腿美不？”拉克斯廷先生边说边把《巴黎人生活报》递了出去，“你会讲法语，弗洛里，下面这行字什么意思？上帝啊，让我回想起在巴黎的时光，我第一次休假，那时我还没结婚。天哪，真想再去一次啊！”

“你们有没有听过‘沃金姑娘’那个笑话？”马克斯韦尔说道。他是个话不多的年轻人，但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他喜欢荤段子。他给大家讲了沃金姑娘的笑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韦斯特菲尔德接着讲了个情绪古怪的伊灵姑娘的笑话，然后弗洛里也插话进来，讲了个事事谨慎的助理牧师霍舍姆的笑话。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就连埃利斯也缓和了情绪，讲了几个笑话；埃利斯的笑话总是非常诙谐有趣，但同时又无比下流。大家这下都高兴了起来，屋里虽然热，但气氛友好。他们刚刚喝完啤酒，准备再要，突然听到门口台阶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一个低沉有力的声音把地板震得颤抖，开玩笑地说道：

“是的，简直太有趣了。我在《布莱克伍兹》[11]杂志发表的几篇小文章里就有一篇把它写进去了。我还记得，在卑谬任职的时候，发生的另一件——啊——有趣的事儿，那事儿……”

很显然，麦格雷戈先生来俱乐部了。拉克斯廷先生大喊一声：“见鬼！我老婆来了！”随即将自己的空酒瓶尽全力推了老远。麦格雷戈先生和拉克斯廷夫人一起走进了休息室。

麦格雷戈先生是个大块头，非常壮实，将近五十岁，面相和善，脸长得有点像哈巴狗，戴了副金框眼镜。他肩膀很粗壮，还老是把脑袋往前伸，让人奇怪地联想到海龟。事实上，缅甸人就给他起了个“乌龟”的外号。他穿着一件干净的丝质西装，腋窝下已经被汗水浸湿了。他向大家开玩笑地做了个敬礼的手势，然后就立在了公告栏前，满面笑容，活像个在背后摆弄着教鞭的校长。他脸上随和的表情显得很是真诚，但是他总给人一种故作亲善、刻意不去摆官架子的感觉，所以在他跟前，也没人觉得自在。他的言谈显然是从他早年认识的那些幽默的校长或牧师那里学来的。凡是长单词、引用语、谚语，在他脑袋瓜里都是笑话，并且常常在发出一声笨拙的“嗯”或“啊”之后，才讲出来，好提示大家他要讲笑话了。拉克斯廷夫人大约三十五岁，她虽长得瘦长，没有什么曲

线，但这样却挺好看，像个时髦的女人。她说话总是唉声叹气、抱怨连连。她进来时，其他人都站了起来，然后她就精疲力竭地一屁股坐在了风扇底下最好的椅子上，用她那像蝾螈般细长的手扇着扇子。

“哦，老天，热死了，热死了！麦格雷戈先生让我搭他的车过来的。他人太好了。汤姆，那个拉人力车的混蛋又在装病。真的，我觉得你该给他顿鞭子尝尝，让他老实点。每天在这大太阳下来回走可够要命的。”

拉克斯廷太太忍受不了从自己家到俱乐部那四分之一英里[12]的路程，于是从仰光买了一辆人力车。除了牛车和麦格雷戈先生的汽车外，这辆人力车就是整个皎塔达唯一带轮的交通工具了，因为整个地区的公路加起来也不过十英里。在丛林里，拉克斯廷夫人忍受了所有湿淋淋的帐篷、蚊子叮咬和罐装食物的折磨，就算这样也不愿让丈夫放任自由，但她也找到了补偿自己的方式，那就是回到总部的时候，不停抱怨这些琐事。

“我真觉得这些下人的懒惰程度已经让人瞠目结舌了，”她叹了口气说，“是不是，麦格雷戈先生？好像现在我们管不了这些土著了。看看那些可怕的改革，还有他们从报纸上学来的那套傲慢的架势，在某些方面，他们几乎跟咱们本国的那些下层阶级一样可恶。”

“哎呀，我想还没严重到那个程度。但话说回来，恐怕民主精神确实正在萌发啊，即便是在这里。”

“而且就在不久之前，就在打仗之前，他们那么温顺，那么有礼！你在路上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会行额手礼[13]，多讨人喜欢。我记得以前我们每个月只给管家十二卢比，就这样，他还是像条狗似的爱戴我们。现在他们张口就要四十、五十，我发现这年头要想保住个管家，就得拖欠他好几个月的工资。”

“以前那样的下人越来越少了，”麦格雷戈表示同意，“我年轻的时候，谁家的管家要是没规矩，就会被送到监狱去，还附上张字条‘请打此人十五鞭子。’哎，逝者如斯夫！恐怕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呀。”

“嗯，你说的没错，”韦斯特菲尔德沮丧地说，“这个国家是待不下去啦。要我说，英属印度要完蛋啦，成了‘失守的自治领’什么的。咱是该撤的时候了。”

这时，房间里每个人都小声附和，表示赞同，甚至包括众所周知的有点逆反思想的弗洛里，还有来这国家不到三年的马克斯韦尔。没有哪个在印度的英国人会否认印度的情况每况愈下，他们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印度，就像《笨拙周报》一样，已告别了昔日的辉煌。

这时，埃利斯从麦格雷戈先生背后的通告栏上取下那个令人不快的告示，然后拿给他看，一边酸溜溜地说：

“嗯，麦格雷戈，我们看过这个告示了，我们都认为选一个土著入会实在是太……”他本想说“太扯淡了”，但他想到拉克斯廷夫人也在场，所以就改成了，“实在是太没道理了。毕竟，这个俱乐部是唯一一个能让我们自在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希望那些土著进来到处乱翻东西。我们就想有个地方能让我们完全摆脱他们。其他人也全都是这么想的。”

他看了看大伙儿。“讲得好啊！”拉克斯廷先生生硬地说。他知道他老婆一定会猜到他喝了酒，他觉得说句话做做样子会给他喝酒提供一个借口。

麦格雷戈先生笑了笑，把告示接过来。他看到了自己签名旁边的用铅笔写的“臭傻帽”，他打心眼里觉得埃利斯这样的行为很无礼，但还是开了个玩笑以缓和气氛。他为了在俱乐部扮好人，可没少忍气吞声，在工作时间也是如此，以此来维持自己的尊严。“我猜，”他说，“我们的伙计埃利斯不大欢迎——嗯——他的雅利安[14]兄弟入会啊。”

“不，不欢迎，”埃利斯讥讽地说，“也不欢迎我的蒙古兄弟。一句话总结就是，我不喜欢老黑。”

听到“老黑”一词，麦格雷戈先生直发僵，这个词在印度很是忌讳。他自己并不歧视东方人；其实，他挺喜欢他们的。在不让他们获得自由的前提下，他觉得他们是这世上最可爱的人了。看着他们被肆意凌辱，他总是很心痛。

“玩笑是不是有点开大了啊？”他严肃地说，“叫他们老黑——他们自然很厌恶这个词——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黑人啊。缅甸人是蒙古人，印度人是雅利安人或达罗毗荼人，他们全都不同于……”

“哼，见鬼去吧！”埃利斯说，他一点也不畏惧麦格雷戈先生的地

位，“老黑、雅利安人，随便你想怎样叫都行。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想在俱乐部看见任何黑皮肤的人。如果让大家投票的话，你就会看到我们几人一条心，都反对，除非弗洛里想让他亲爱的伙计维拉斯瓦米入会。”他补充道。

“说得好啊！”拉克斯廷先生又说了一遍，“反对这帮人入会算我一个。”

麦格雷戈先生撅了下嘴唇，样子很奇怪。他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选个土著入会不是他自己提议的，而是行政长官要求的。但是，他不想以此作为借口开脱，于是他用缓和的语气说道：

“我们可否把讨论推迟到下一次大会再进行？这段时间大家也可以深思熟虑一下。那现在，”他挪到桌前说，“谁想和我一起来点儿——啊——饮料？”

管家应声而来，拿来了他们点的“饮料”。现在到了最热的时候，大家都渴了。拉克斯廷先生正要点酒喝，突然瞄到妻子的目光，耸了下肩膀，郁闷地说：“算了。”他把手放在膝盖上，坐在那儿，一副委屈的样子，看着拉克斯廷夫人把一杯掺了杜松子酒的柠檬水一饮而尽。麦格雷戈先生，虽然是他签单点的酒，但只要了杯纯柠檬水。在皎塔达所有欧洲人当中，他是唯一一个坚持傍晚前不喝酒的人。

“好吧，”埃利斯咕哝道，两只手臂放在桌上，烦躁地把弄着酒杯，和麦格雷戈先生的拌嘴又让他开始焦躁不安了，“好吧，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这个俱乐部，土著免进！咱们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让步，毁了整个帝国。这个国家已经在煽动暴乱中沦陷了，就是因为我们太过心慈手软。唯一可行的政策就是视他们为粪土，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粪土。现在是危机时刻，我们要争取任何一点点能得到的威望。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告诉他们：‘我们是主人，你们是乞丐——’”埃利斯把他小小的拇指按在了桌上，就好像在碾死一只蛆一样，“你们这群乞丐别蹬鼻子上脸！”

“别指望了，老家伙，”韦斯特菲尔德说，“完全没希望啊。让这些个繁文缛节捆绑住双手，你又能做什么？那些土著、乞丐，他们都比我们更懂法。他当面侮辱你，你只要一揍他，他就反咬你一口，送你进局子。你只能沉住气忍辱负重，等他们先动手，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他们如果没种，不跟你动手，你又能怎么办呢？”

“曼德勒的长官萨布[15]经常说，”拉克斯廷夫人插话说，“最后我们直接离开印度就算了。年轻人再也不用来这儿了，累死累活一辈子，得到的却是恶语相向和忘恩负义。咱们只管走就对了。当那些土著求着我们别走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们：‘不行，曾经给过你们机会，你们没有好好把握。好了，我们要走了，你们自己治理自己吧。’这下子，就给他们一顿痛快的教训！”

“都是这些法律、秩序之类的让咱们到了今天的田地。”韦斯特菲尔德忧郁地说。韦斯特菲尔德总是提起，是墨守成规导致了印度帝国的灭亡。他认为，唯独一场大规模造反和随之而来的军事戒严才能阻止这个帝国走向衰落。“整天就是啃文件、签单据，当官的巴布才真正统治着这个国家。咱们时日不长了。最好就是关门歇业，让那些人自生自灭去吧。”

“我不同意，我就是不能同意，”埃利斯说，“只要我们想，一个月内就能整顿好。只要下一点决心就行。看看阿姆利则[16]，看看他们事后是如何屈服投降的。戴尔[17]知道该怎样对付他们。可怜的老戴尔！摊上这么个苦差事，都怪英格兰的那群胆小鬼。”

其他人也都连连叹气，就像是罗马天主教徒听到别人提起“血腥玛丽”[18]时发出的叹息一样。就连麦格雷戈先生，一个如此厌恶流血事件和军事戒严的人，听到戴尔的名字也摇了摇头。

“哎，可怜的人啊！做了佩吉特家族议员们的牺牲品。哎，也许他们会发现自己的错误的，可到时候已是覆水难收了。”

“我之前的总督曾讲过一个故事，”韦斯特菲尔德说，“在一个土著人的军团里，有个老印度军士。有人问他英国人要是离开印度会发生什么。那个老家伙说……”

弗洛里把椅子往后一推，站了起来。心想：坚决不能，实在不能……不，这个话题绝不能再讨论下去了！他必须马上离开这个房间，不然他一定会发疯，开始乱砸家具，往画上扔酒瓶子。这群讨人厌、醉醺醺的肥猪蠢货们！他们会不会就这个问题絮絮叨叨上一周又一周、一年又一年、一遍一遍、一字一句重复着这些邪恶的蠢话，就好像《布莱克伍兹》杂志拙劣地仿写一篇低俗故事一样。难道就永远没人能想出点儿新的东西讨论吗？哎，这是什么破地方，这都是什么人啊？咱们这算哪门子文明，不崇拜上帝，反倒崇拜起威士忌、《布莱克伍兹》和“邦

左”画！上帝宽恕我们吧，我们都身陷这样的文明了。

弗洛里这通话没说出口，他非常努力才忍住，没表现在脸上。他站在椅子旁，稍稍侧对着大家，似笑非笑，就好像不确定自己是否受欢迎。

“我恐怕得走了，”他说，“可惜早餐之前我还有事。”

“留下再喝一杯，老伙计，”韦斯特菲尔德说，“才一大清早。喝杯杜松子酒。开开胃。”

“不，谢了，我必须走了。走了，弗劳。再见，拉克斯廷夫人。大伙，再见啊。”

“老黑的兄弟布克·华盛顿[19]退场，”弗洛里走出去后，埃利斯如是说，任何人离开的时候埃利斯都会冷嘲热讽两句，“我猜他去找‘猥琐死咖喱’了。或者在付酒钱之前故意溜掉了。”

“行了，他不是什么坏人，”韦斯特菲尔德说，“时不时发表几句逆反的言论，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他都不是那个意思。”

“哎呀，非常好的伙计，当然啦。”麦格雷戈先生说。每个在印度的欧洲人都理所当然，或更贴切地说是装模作样的好伙计，直到突然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欧洲人”本身就是个名誉称号。

“他有点太逆反了，我受不了。我不能忍受有谁和土著称兄道弟。我就在想，他自己不会也有点黑人血统吧。这样，他脸上的那块黑疤就说得通了，杂种。而且他长得也像个黄肚子，看他那黑色的头发、柠檬色的皮肤就知道。”

他们又聊了些关于弗洛里的乱七八糟的流言蜚语，但不多，因为麦格雷戈先生不喜欢流言蜚语。这些欧洲人在俱乐部又待了一会，又点了一轮酒。麦格雷戈先生讲了他在卑谬的故事，不管大家正在讨论什么，他都有可能讲这些故事。之后，谈话就又回到那个老生常谈、总也说不烂的话题上了——傲慢无礼的本地人，消极怠工的政府，还有那不复存在的光辉岁月：那时英属印度还是英属印度，那时主人们可以写张“请打此人十五鞭子”的字条。这个话题从来不会搁置太久，部分原因是埃利斯总是念叨。而且，欧洲人的牢骚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和东方

人一起工作和生活简直是考验圣人的脾气。所有欧洲人，特别是当官的，都知道他们要忍受嘲弄和侮辱。几乎每天，当韦斯特菲尔德或者麦格雷戈先生甚至是马克斯韦尔走在街上的时候，那些长着稚嫩的黄脸的高中男生，光滑的脸蛋就跟金币一样，上面写满了让人恼火的不屑——这是蒙古人脸上天生的特色——就会嘲笑他们，有时还在他们身后起哄，发出土狼般的笑声。在印度的英国官员生活也并不轻松。要忍受不舒适的营地、闷热的办公室、昏暗的充满尘土和石油味的驿站旅馆，也许这让他们获得了一些脾气暴躁的权利。

现在快十点了，酷热难忍。每个人脸上和男人们光着的前臂上都冒出了一排排晶莹的汗珠。麦格雷戈先生的丝质外套背后的汗印越来越大。外面耀眼的强光，不知怎么的似乎钻进了拉了绿色珠帘的窗户，照得大家眼睛生疼，脑袋发懵。大家一想到油腻的早餐和那即将到来的漫长难熬的时光就头疼。麦格雷戈先生叹了口气，站了起来，扶了扶顺着汗水从鼻子上往下滑的眼镜。

“真可惜咱们这么愉快的小聚也要到此为止了，”他说，“我得回家吃早饭了。还要处理帝国的公事。有谁和我顺道吗？我的车夫在门口等着呢。”

“哦，谢谢，”拉克斯廷夫人说，“捎上汤姆和我吧。不用在这大热天自己走路，真是让人松了口气。”

其他人也站了起来。韦斯特菲尔德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我想最好还是走吧。再待一会就睡着了。要在办公室泡一整天！文件都堆成山了。哦，主啊！”

“大伙儿别忘了今晚来打网球，”埃利斯说道，“马克斯韦尔，你这个懒货，这次别再偷偷溜走了。拿着你的球拍，四点半准时出现在这里。”

“您先请，夫人。”在门口，麦格雷戈先生亲切地说。

“来，麦克德夫。”韦斯特菲尔德说。

他们走出去，进入了耀眼的白色日光中。热浪从大地上腾起，就像烤炉的热气一般。花儿让人看着难受，花瓣一动不动，在这万恶的太阳下，绚丽得刺眼。强光透入骨头，让人精神不振。这个场面有些可怕

——那蓝色而刺眼的天空，在缅甸、印度、暹罗、柬埔寨、中国没完没了地延伸，万里无云，永无尽头，想想都可怕。麦格雷戈先生等在门口的车上，车牌热得烫手。一天当中最毒的时光就要到来，缅甸人称之为“脚步无声”的时段。几乎任何生物都不再动弹，除了人之外，就只有一排排黑色的蚂蚁了，高温让这些蚂蚁变得兴奋，它们就像缎带一样成群结队地穿过道路，还有就是天上的几只无尾秃鹰了，它们在气流中展翅翱翔。

---

[1] 印度特赖帽（Terai hat），一种印度的阔边毡帽。

[2] 印度（India），这里指英国在1858—1947年间于南亚建立的殖民统治区域——英属印度，也包括今天的缅甸。

[3] 《笨拙周报》（Punch），伦敦一种适合中产阶级趣味的幽默刊物，于2002年停刊。

[4] 《粉安报》（Pink’ un），英国的一份体育报纸，最初印在粉红色的纸上，故得此名。

[5] “来，麦克德夫”（“Lead on，Macduff.”），此句出自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七场，朱生豪译本。原文为“Lay on，Macduff.”麦克德夫要求麦克白投降，麦克白拒绝，并对他说：“来，麦克德夫。”现在，这句话的意思多为“我们走吧。”

[6] 达罗毗荼人（Dravidian），主要聚居在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北部。

[7] 巴布（babu），印度人对男子的尊称，贬义的用法是指略懂一点英语的印度人。

[8] 潘趣（Punch），英国传统滑稽木偶剧《潘趣和朱迪》中的鹰鼻驼背滑稽木偶。

[9] 马德拉斯（Madrassi），当时印度次大陆西部、北部、中部的人对南部人的贬称。

[10] 克伦族（Karen），居住在缅甸东部以及泰国西部的民族。

[11] 《布莱克伍兹》（Blackwood’ s），英国杂志，发行于1817—1980年间。

[12] 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约为1.609公里。全书同。

[13] 额手礼（salaam），穆斯林的额手礼，姿势为深鞠躬，将右手掌置于额头前。

[14] 雅利安人（Aryan），这里指印度雅利安人。雅利安人原属高加索人种，其中一个分支约在公元前14世纪，迁徙至南亚次大陆，称印度雅利安人。

[15] 萨布（sahib），源于印地语，是英属殖民地人民称呼欧洲人的类似于“老爷”、“夫人”、“小姐”、“少爷”等的尊称。

[16] 阿姆利则（Amritsar），印度西北部城市，历史上曾发生阿姆利则屠杀惨案，是1919年4月19日英国军队对印度人开枪屠杀事件。

[17] 戴尔（Dyer），英国将军戴尔是当时率领英军在阿姆利则大肆屠杀印度民众的将军。

[18] 血腥玛丽（Bloody Mary），原型为英国女王玛丽一世。她因为想在英国恢复罗马天主教而处决了三百多名反对者，而被称为“血腥玛丽”。

[19] 布克·华盛顿（Booker Washington），美国黑人运动代表人物。

第三章

弗洛里出了俱乐部的大门朝左拐去，在菩提树的树荫里，沿着集市的小路走了下去。一百码[1]开外传来一阵音乐声，那儿有一队宪兵，他们都是些瘦长的印度人，穿着泛绿的卡其布军装，正在齐步朝着队伍走回去。在他们前面，一个廓尔喀[2]男孩正在吹着风笛。弗洛里正要去见维拉斯瓦米医生。医生的房子是用涂满沥青的木头盖起来的一个长长的平房，下面用木桩子支撑，还有一个很大、很凌乱的花园，紧挨着俱乐部的花园。房子背朝小路，面朝医院。医院的另一端就是河流了。

弗洛里一进院子，屋里就传来一声女人的惊叫和急促的奔跑声。很显然，他差一点就碰见医生的妻子。他绕到房子前面，朝着阳台喊：

“医生！你忙不忙？我能上楼去吗？”

维拉斯瓦米医生个子很矮，整个人黑乎乎的，穿了件白大褂，他从房子里突然出现，活像个盒子里的玩偶。他冲到阳台扶手边，殷勤地喊道：

“如果您愿意的话，当然，当然，现在就上来吧！哎呀，弗洛里先生，见到您真高兴啊！快上来，快上来。您喝点儿什么呢？我家有威士忌、啤酒、苦艾酒和其他欧洲酒。啊，我亲爱的朋友，我一直盼望着与您进行些文雅的交谈啊！”

医生身材矮小，胖乎乎的，长着黑皮肤、毛茸茸的头发和一双圆圆的眼睛，一幅容易上当的样子。他戴着钢框眼镜，穿着很不合身的白大褂和一双笨重的黑靴子，裤腿像六角形手风琴的风箱一样折叠地包住靴子。他的声音透着殷切和激动，发“s”这个音的时候，总带出嘶嘶声。弗洛里上楼的时候，医生又冲回阳台的另一端，在一个很大的锡制冷藏箱里，来回翻腾，然后迅速夹出他刚刚说的所有那些酒。阳台又宽又暗，房檐很低，上面挂着一篮蓝蕨类植物，整个阳台看上去就像掩藏在瀑布般的阳光后面的一个山洞。阳台上放着许多长藤椅，它们是监狱里的人做的。在阳台的另一端，有个书架，上面的书都不怎么有趣，基本上是爱默生[3]、卡莱尔[4]、史蒂文森[5]风格的论文集。医生很爱读书，

他喜欢收集他所谓的有“道义”的书。

“医生啊，”弗洛里说，同时，医生把他推搡进一把长椅，并把搁腿板拉出，让他躺下来，还把香烟和啤酒摆到他够得着的地方，“医生啊，怎么样了啊？大英帝国这个老太婆怎么样了？还瘫着呢？”

“哎，弗洛里先生，她情况很糟糕啊，很糟糕！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又是败血症，又是腹膜炎，还有神经节麻痹。恐怕我们得叫专家来看看了。哈哈！”

这是两人之间的玩笑话，他们假装大英帝国是医生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女病人。两年以来，医生对这个笑话始终乐此不疲。

“啊，医生，”躺在长椅上的弗洛里说，“离开了那个该死的俱乐部到这儿来，真高兴啊。每次我来你家，都感觉自己像个新教[6]牧师，偷溜去城里，领了个妓女回家。摆脱他们，真让人像是过节一样开心，”他用一只脚跟朝俱乐部的方向指了指，“摆脱了我亲爱的打造帝国的同胞们。大英的威望，白人的责任，毫无畏惧、十全十美的白人萨布，你懂得。躲开那乌烟瘴气的言论，哪怕一会儿，也让人松一口气啊。”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好了，好了，拜托了！绝对不至于啊。您可不能这么议论那些尊敬的英国绅士！”

“那是因为你不用听那些尊敬的英国绅士的谈话啊，医生。我今天早上已经听到忍无可忍了。埃利斯在那儿说什么‘肮脏的老黑’，韦斯特菲尔德在那儿开玩笑，麦格雷戈在那儿拽拉丁文，还说什么‘请打此人十五鞭子’。但他们讲到那个印度老军士的故事时——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说如果英国人撤离印度、奸淫掳掠便会成为这里的家常便饭的那位亲爱的老军士——哎，我就真是再也忍受不了了。这个老军士也真该退役了。自从1887年金禧庆典[7]开始他就老是说这同一番话。”

医生有些焦躁不安，每当弗洛里数落俱乐部成员的时候，他都会这样。他站在那儿，用包在白大褂里的胖屁股靠着阳台的栏杆，还时不时做几个手势。当他在想用哪个词的时候，就会把他那黑黑的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就好像要去抓住飘在空气中的好主意一样。

“但是，说真的，说真的，弗洛里先生，您不能这样说！为什么您

老是骂您所谓的那些白人萨布呢？他们是世上最优秀的人。想想他们的丰功伟绩——想想那些造就今日英属印度的伟大的总督们。想想克莱夫、沃伦·黑斯廷斯[8]、达尔豪西[9]和寇松[10]。他们都是这样的人——我引用你们国家伟大的莎士比亚的话来讲就是——整个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像他们那样的人了[11]。”

“哼，你还想再见到他们那样的人吗？我可不想。”

“而且，想想英国绅士们都是多么的高尚啊！他们对彼此忠贞不渝！弘扬公学精神！就算有些英国人举止不得体——我承认，有些英国人挺傲慢的——但他们还是有我们东方人所没有的伟大而又高尚的品质。在他们粗犷的外表下藏着一颗金子做的心啊。”

“我看是镀金的吧！在这个国家的英国人之间有种虚伪的友好。一起喝酒，分享美味，装作是彼此的朋友，这是个传统，但其实大家骨子里都恨透了对方。我们管这叫互相扶持。都是出于政治需要。当然酒是维持这个机器运转的基础。没了酒，不出一个礼拜，我们就都会发疯，然后互相残杀起来。医生啊，有个题目可以供你那些高尚的散文家写写，酒是帝国的支柱。”

医生摇摇头，“真的，弗洛里先生，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您变得如此愤世嫉俗。与您的身份太不相符了！您，一个德才兼备的英国绅士居然说一些《缅甸爱国者报》才会说的煽动言论！”

“煽动？”弗洛里说，“我才没煽动呢。我可不想让缅甸人把英国人都赶出国门。但愿不会如此！我是来这儿挣钱的，就像其他人一样。我见不得的是，那些虚伪的白人老是鬼话连篇，说自己有责任治理世界。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烦死了。如果不是我们天天都伪装着过日子，甚至连俱乐部里的那帮蠢蛋都会更容易相处一些。”

“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你们怎么伪装了？”

“哼，当然，我们装作是来这里帮助我们的黑人兄弟脱贫的，但其实是来这里抢劫的。我想这自然算得上是种伪装吧。但这使我们堕落，以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式堕落。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小偷，是骗子，这样的感觉一直折磨着我们，驱使我们永不停歇地为自己辩解。这就是我们对当地人兽性大发的一部分原因。只要我们大方承认自己是小偷，然后偷窃的时候一点都不装好人，那我们这些驻印英国人倒也让人能够忍

受。”

医生兴致上来了，捏起了拇指和食指。“您的论点有个漏洞，我亲爱的朋友，”想到自己的反讽，他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说，“漏洞在于，你们根本不是小偷。”

“这个嘛，我亲爱的医生……”

弗洛里从长椅上坐起来，一是因为他后背痱子就像是千万只针尖生生地扎在肉上，二是因为聊到了他最喜欢和医生争辩的话题。他们之间的这种辩论，本质上带点政治意味，每次他俩见面都会发生。立场好像有点颠倒，因为英国人一个劲儿地说英国人的坏话，而印度人却狂热地忠心。维拉斯瓦米医生疯狂地崇拜着英国人，虽然英国人千百次地对他冷言相对，他还是毫不动摇。他还是会明确热切地坚持，他自己，作为一个印度人，属于低人一等、堕落颓废的种族。他对英国司法的信任是如此坚定，以至于就算他不得不去监督一场监狱的鞭刑或者绞刑，回家时黑色的脸吓得惨白，要用威士忌来服药，也完全不会动摇。弗洛里煽动性的观点让他震惊，但这也同时带给他一种战战兢兢的愉悦感，就像一个虔诚的教徒听到有人倒着念主祷文一样。

“我亲爱的医生，”弗洛里说，“你怎么就认为我们来这里绝不是来盗窃的呢？很简单啊，当官的把缅甸人按在地上，商人们就开始翻他的口袋。就拿我们公司举个例子，要不是因为英国人统治着这个国家，你觉得我们能签到木材合同吗？其他木材公司、石油公司、矿厂、种植园、商人，能签到合同吗？要不是有政府在背后撑腰，稻圈公司怎么能够继续剥削那些可怜的农民？大英帝国就是英国人获得贸易垄断的工具，或者更确切点讲，是那帮犹太人和苏格兰人的工具。”

“我的朋友，听到您这么说，我感到很悲哀，悲哀至极啊。您说你们是来做生意的？没错，的确是这样啊。缅甸人自己能做生意吗？他们能造出机器、船、铁路、公路来吗？没了你们，他们就手足无措啊。如果英国人不来的话，缅甸的森林会怎样？会马上就卖给日本人，他们会滥砍滥伐，毁掉这些森林。而现在，在你们的管辖下，森林用在了好的地方。你们的商人们在开发我们国家的资源，与此同时你们的官员们，秉着公益的精神，在教化大众，努力将我们提升到他们的层次。简直是高尚的舍己为人啊。”

“一派胡言，我的医生。我承认我们教这里的年轻人喝威士忌，踢

足球，但除此之外几乎就没别的了。看看我们的学校，生产廉价文员的工厂。我们从没教过印度人一种有用的手艺。不敢啊，怕给本地工业带来竞争。我们甚至已经摧毁了不少工业。印度平纹细布现在都到哪儿去了？40年代前后那会儿，印度人能制造海轮，还能派人驾船出海。现在你们连能出海的渔船都造不了。18世纪时，印度人制造的枪支从任何方面来说都赶得上欧洲的水平。现在，我们在印度统治了一百五十年，你们整个大陆连个铜弹壳儿也造不出来。仅有的几个发展较快的东方民族全部是独立的民族。我都不用举日本的例子，暹罗就是例证……”

医生激动地摆了摆手。他每次都是谈到这儿的时候打断弗洛里（因为弗洛里老是会这样说，几乎每次都一字不差地重复），医生觉得暹罗的例子对他的观点很是不利。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您忘了东方人的性格了。以我们的冷漠和迷信，国家怎么可能得到发展？最起码你们带来了法律和秩序，坚不可摧的英国司法和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天下太平。”

“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天下大乱，医生，是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天下大乱还差不多。不管怎样，和平是给谁的？债主和律师们。我们当然要在印度维持和平，这符合我们的利益啊，但这些法律和秩序又意味着什么呢？更多的银行和监狱——仅此而已。”

“简直是歪曲事实，荒唐至极啊！”医生惊呼，“监狱难道不是必要的吗？再说了，难道除了监狱，你们就什么也没带来？想想锡袍[12]在位时的缅甸，肮脏、折磨、愚昧，然后再环顾一下周围，就从这阳台上望出去，看看那医院、右边的学校和那警察局，看看这一片欣欣向荣的现代进步。”

“当然，我不否认，”弗洛里说，“我们在某些方面使这个国家现代化了。这是我们控制不了的。事实上，在我们玩儿完之前，我们定会毁掉整个缅甸民族文化。我们不是在教化他们，而只是在污染他们。这最终会带来什么？你所谓的一片欣欣向荣的现代进步吗？只会带来我们那堆恶心的留声机和圆顶硬礼帽。有时我就想，两百年之内，这一切……”他用脚指向地平线，“这一切就都不复存在了——森林、村庄、寺庙、佛塔，统统都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每隔五十码就有的粉色别墅，漫山遍野，视线所到之处都是，一栋接着一栋，里面的留声机都放着同一首曲子。所有的森林被砍得精光，碾成木浆来印刷《世界新闻报》[13]，或者被锯了来做留声机盒子。但是森林也是会报仇的，就像

《野鸭》[14]里的那老家伙说的那样。你读过易卜生，对吧？”

“哎，没读过，弗洛里先生，哎呀！就是那个伟大天才易卜生吧，你们杰出的萧伯纳这样称呼他。我很想拜读一下他的作品。但是，我的朋友，您没有看到的是，你们的文明最差的一面，对我们来说都是进步。留声机、圆顶硬礼帽、《世界新闻报》，都比东方人的懒骨头强多了。在我眼里，就算是最碌碌无为的英国人，也是……也是……”医生正在极力思考如何表达，然后想起了估计是史蒂文森说过的话，“也是前进道路上的火炬手。”

“我不这么看。我觉得他们是带洁癖的、自鸣得意的现代化虱子。滋生至全世界，到处盖监狱。每盖一座监狱就管它叫做进步。”他说出来后就有些后悔，因为医生听不出这里边的影射。

“我的朋友，看来您就抓住监狱这个问题不放了啊！想想看，你们英国人还有别的功绩啊。他们修建公路，灌溉沙漠，消除饥荒，建立学校，开设医院，治疗疾病，如瘟疫、霍乱、麻风、天花、性病……”

“可病都是他们带来的。”弗洛里插了一句。

“不，先生！”医生回话道，急忙为他的国人们“正名”，“不，先生，是印度人把性病带到这个国家的。印度人带来疾病，英国人治疗疾病。这就是对您的悲观情绪和煽动言论的反驳。”

“得啦，医生，咱们是永远不会同意对方的。其实，你喜欢这些个现代进步的玩意儿，而我更倾向于看到事物肮脏的一面。我想锡袍统治下的缅甸可能更适合我。我之前也说过，如果我们真的带来了文明，那也是为了更加大规模的扫荡。要是得不偿失的话，我们就会立马消失。”

“我的朋友，您其实不是这样想的。如果您真的厌恶大英帝国的话，就不会在私下里讨论了。您会站在房顶上大声喊出来。我了解您的个性，弗洛里先生，比您自己都更了解。”

“不好意思，医生。我是不会站在房顶上大喊的。我可不敢喊。我只要‘卑微低下的安逸’，就像《失乐园》中那个堕落天使彼勒一样。这样更安全。在这个国家，要么就做白人萨布，要么就去死。十五年来除了和你，我没跟别人讲过真心话。我在这儿说的话，都是在发泄，偷偷

地搞黑弥撒[15]，如果你能明白的话。”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凄凉的哭喊声。老家伙马图，那个给欧洲教堂看大门的印度人，顶着烈日站在阳台外面。他是个得了热病的老头，与其说他是人，不如说他更像是一只蚂蚱，他身上裹着几英尺褪了色的破布。他就住在教堂附近一个用压瘪的柴油罐搭的小棚子里，有时欧洲人经过那里，他便会冲到人家面前，深深地行个额手礼，然后向其哭诉自己的“达拉布”[16]，每个月只有十八卢比。他可怜巴巴地抬头望着阳台，用一只手揉搓着自己土黄的肚皮，另一只手做往嘴中送东西的动作。医生掏了掏自己的口袋，从阳台的扶手丢了一个四安那[17]的硬币给他。他的软心肠可是出了名的，皎塔达所有的乞丐都盯着他呢。

“看看这东方，竟衰落至此，”医生一边说，一边指着马图，马图将自己像一只毛毛虫一样对折起来，一边鞠躬，一边不断念叨着感激的话，“看看他那细胳膊细腿儿。他的小腿还没有英国人的手腕粗呢。再看看他那穷酸的奴才样。看看他多无知，在欧洲，除了智障收容所之外，就再也找不出这么无知的人了。有一次我问马图他多大了。‘萨布，’他说，‘我觉着我今年十岁。’弗洛里先生，您怎么就能装作自己不是天生就比这种货色高一等呢？”

“可怜的老马图，欣欣向荣的现代进步好像不知怎地把他给漏掉了啊，”弗洛里说，还一边又朝阳台外扔了四安那，“去吧，马图，买点酒喝。想怎么堕落就怎么堕落。乌托邦还远着呢。”

“啊，弗洛里先生，有时候我觉得您讲的一切都是在——那个词儿怎么说的来着？——插科打诨。英国人的幽默感啊。我们东方人毫无幽默感，这是人尽皆知的。”

“算你们走运啊。有这该死的幽默感是我们的损失。”他将双手放在脑后，打了个哈欠。马图又说了一通感激的话后，踉跄地走开了。“我想，趁这该死的太阳还没爬得更高，我最好先走了。今年这天气肯定会热死，我从骨子里都感觉得到。好了，医生，咱们光顾拌嘴了，我也没问你有什么新鲜事儿。我昨天才从林子里回来，后天又该过去，但还没定。最近皎塔达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有什么丑闻吗？”

医生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摘掉眼镜，这时他的脸还有他那深色晶莹的眼睛让人联想到一只黑色寻回犬的样子。他把头扭向一边，声音比之前略显犹豫。

“是这样的，我的朋友，有一件特别可恶的事情在密谋当中。您可能会笑话我——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但是我有大麻烦了。更确切点说是，我有惹上麻烦的危险。这是暗箱操作。你们欧洲人绝不会直接听闻此事。在这个地方，”他抬起一只手，指了指集市，“永远充斥着阴谋诡计，您听也没听过。但对于我们来说，却干系重大。”

“那到底怎么了？”

“是这样。有人正在密谋着算计我。这是个要命的阴谋，会玷污我的品格、毁了前途。你们英国人是不会明白这些事情的。我得罪了一个人，估计您不认识，吴波金，这儿的分区法官。这人是个狠角色。他要是想害我，后果不堪设想。”

“吴波金？是谁啊？”

“那个长着很多牙的大胖子。从这条路往下走一百码就是他家。”

“哦，那个肥恶棍啊？我跟他熟着呢。”

“不，不，我的朋友，不，不！”医生颇为激动地惊呼，“您绝不可能真正认识他。只有东方人才会了解他的为人。您是个英国绅士，思想上绝不可能沦落到吴波金之辈的卑劣地步。他不止是个恶棍，他是……怎么说呢？无法形容了。在我看来，他像条披着人皮的鳄鱼。有着鳄鱼的奸诈、凶残和兽性。您看看他造的那些孽就知道！他做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还有他毁掉的那些女孩，当着她们母亲的面强奸她们！哎，一个英国绅士是绝对想象不出有这样的人的。就是这个人，铁了心地要毁了我。”

“我从很多渠道听说过这个吴波金的好多事情了，”弗洛里说，“他看起来像是缅甸法官中的一个好代表啊。有个缅甸人跟我说打仗的时候，吴波金负责征兵，结果他把自己的私生子组了个营。这是真的假的？”

“这不太可能，”医生说，“因为他的私生子们还没到那年龄呢。但他这种流氓行径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他决心要毁了我。首先，他恨我是因为他的事我知道得太多了；其次，就是他和所有稍微正直点的人都对着干。他会耍手段——他那种人惯用的把戏——那就是诽谤。他会到处散布关于我的谣言，极其险恶而不实的谣言。他已经开始了。”

“但是谁会不相信你而去相信他呢？他只是个低级的法官而已。你是高官啊。”

“哎，弗洛里先生，您不清楚东方人的狡猾。比我官职高的人都被吴波金整过。他有门道能让别人信他说的。所以——哎，是件棘手的事啊！”

医生在阳台上踱了一两步，用手帕擦着眼镜。很显然有些事情，他有些顾虑，憋在心里没讲出来。一时间，他的举止显得极其忧虑，弗洛里都想问他自己能不能帮上忙，但他没问，因为他知道如果干涉东方人的争斗，是什么忙都帮不上。任何欧洲人都没法真正参与这些争斗，总有些东西是欧洲人不能参透的，一个阴谋背后还藏着另一个阴谋，一个诡计里面还包含着另一个诡计。再者，远离“土著”的是非也是白人萨布的十大戒律之一。他含糊地问：

“到底是什么棘手的事？”

“情况是，要是.....哎，我的朋友，我怕您会笑话我。是这样的：要是我是你们欧洲俱乐部的一员就好了！我的情况就远不是这样了。”

“俱乐部？为什么？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我的朋友，在这种事儿上，声望就是一切啊。吴波金不会公然挑衅我的，他才不敢呐。他只会在背后中伤我、诽谤我。别人是否相信他全看我和欧洲人的交情了。在印度就是这样。如果有声望，就高高在上；没有声望，就任人宰割。一个点头、一个眼色就能胜过千百份官方报告。对于一个印度人来讲，进入欧洲俱乐部所能带来的声望是您没法想象的。在俱乐部里，他基本上就是个欧洲人了。什么样的诬陷也动不了他。俱乐部的会员就是神圣的象征。”

弗洛里从阳台的扶手边望了出去。他站起身来，好像要走的样子。医生的黑皮肤使他根本无法入会，每当这一点不言而喻的时候，弗洛里总会感到愧疚和不安。自己的好朋友在社会地位上低自己一等，是件很令人不快的事情，但这种事在印度已是司空见惯了。

“下一次大会，他们可能会选你入会的。”他说，“我不是说他们一定会选你，只是有可能。”

“弗洛里先生，我希望您并没觉得，我是在要求您提名我入会吧？千万别这样想！我知道您也是没办法。我只是说，如果我是俱乐部的成员的话，我马上就可以刀枪不入……”

弗洛里把帽檐往上拽松了一点，并用拐杖点了点弗劳的脑袋，它在椅子下睡得正香。弗洛里觉得很不自在。他明白，如果他能勇敢点与埃利斯吵上几次，完全可以帮助维拉斯瓦米医生拿下俱乐部的会员身份。毕竟医生是他的朋友，没错，几乎是他在缅甸唯一的朋友。他们在一起聊天、辩论过无数次，医生去他家吃过饭，甚至还曾经要把弗洛里介绍给他的妻子认识，但她是个虔诚的印度教教徒，惊慌失措地拒绝了。他们还曾一起去打猎，医生挎着子弹带，拿着猎刀，气喘吁吁地爬上落满竹叶的湿滑的半山腰，什么都瞄不准。按常理来讲，他出于道义应该支持医生的。但他也知道医生是永远不会开口请他帮忙的，而且要让一个东方人入会，俱乐部里肯定会吵得不可开交。不行，他绝对不能去吵架！不值得。他说：

“跟你说实话吧，这件事已经在讨论过了。他们今天早上就在讨论此事，那个小王八蛋埃利斯又开始他宣扬那套‘肮脏的老黑’的言论。麦格雷戈建议选一个土著入会。我想是上面要求这么做的。”

“是的，我听说了。所有这些我们都听说了。就是这个原因让我想入会的。”

“六月的大会会讨论这件事。我不知道到时会怎样——我想这得看麦格雷戈的。我会投票给你的，但剩下的就爱莫能助了。很抱歉，但我真的没办法。你绝对想象不到到时候的口水战会是怎样。他们很可能会选你，这是因为必须选一个，所以是被逼无奈地选人。他们已经表达了强烈的决心，要保持他们所谓的‘全白’俱乐部。”

“当然啦，当然啦，我的朋友！我完全理解。老天啊，千万别让您因为我的缘故和您的欧洲朋友翻脸。千万，千万，别让您自己受到牵连！别人都知道您是我的朋友，单单这个事实就已经给我带来您想象不到的好处啦。弗洛里先生，声望就像是一支晴雨表。每次有人看见您来我家，水银就会上升半个刻度。”

“那么，我们必须尝试一直保持晴天啊。恐怕我能为你做的就这么多了。”

“这已经帮我很多了，我的朋友。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您，虽然我恐怕您会笑我。就是您自己也要当心吴波金。当心这条鳄鱼！他要是知道您在帮助我，就一定会暗算您的。”

“好了好了，医生，我会当心这条鳄鱼的。虽然我觉得他奈何不了我。”

“至少他会想办法害您的。我了解他。他会挑拨我所有的朋友。或许他甚至敢满世界诽谤您。”

“诽谤我？天哪，没人会相信任何中伤我的话。本人罗马公民是也[18]。我是英国人，没人会怀疑我。”

“即便如此，还是要当心他的奸诈，我的朋友。别小看此人。他会清楚如何对付您的。他是条鳄鱼。而且就像鳄鱼一样，”医生紧紧捏住拇指和食指，他的比喻有时会变乱套“像鳄鱼一样总会咬人最薄弱的地方。”

“医生，鳄鱼总会咬人最薄弱的地方吗？”

两人都笑了。他们关系很棒，有时会一起笑话医生蹩脚的英语。也许，在医生的内心深处，弗洛里没有答应提名他入会，他还是感到些许失望，但是他就算死也不会说出来的。而弗洛里却很高兴话题就此打住，这话题令人太不舒服，他希望这事根本就没被提起过。

“好了，我真的得走了，医生。去林子里之前估计见不到你了，先道个别。我希望下次大会上你的事儿一切顺利。麦格雷戈也不是个混球。我敢说他一定会坚持让他们选你的。”

“但愿如此吧，我的朋友。要真选上了，来一百个、一千个吴波金我也不怕。再见啊，我的朋友，再见。”

然后，弗洛里把特赖帽戴好，穿过晃眼的练兵场，回家吃早餐去了。一早上又是抽烟、又是喝酒、又是聊天，他已经没胃口吃饭了。

---

[1] 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约为0.914米。全书同。

[2] 廓尔喀（Gurkha），位于尼泊尔中部。

[3] 爱默生（Emerson），美国思想家、文学家。

[4] 卡莱尔（Carlyle），苏格兰评论家、历史学家。

[5] 史蒂文森（Stevenson），苏格兰小说家、诗人。

[6] 新教（Nonconformist），不信仰国教的新教徒。

[7] 金禧庆典（Jubilee in ‘eighty-seven’），1887年正值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所举行的庆典活动被称为金禧庆典。

[8] 克莱夫（Clive）、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他们都是早期英属印度建立时的关键人物。

[9] 达尔豪西（Dalhousie），1847—1856年间担任英国驻印总督。

[10] 寇松（Curzon），1899—1905年间担任英国驻印总督。

[11] 此句改编自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二场。朱生豪译本。原句为：他是一个堂堂男子；整个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

[12] 锡袍（Thibaw），锡袍是缅甸的末代国王，于1878—1885年在位。

[13] 《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英国报纸，自1843年期发行。于2011年7月10日，由于窃听丑闻而停刊。

[14] 《野鸭》（The Wild Duck），易卜生的戏剧，刘森尧译。此句出自第五幕，原文为“森林自己报仇了”（The woods revenge themselves），出自剧中艾科达尔之口。

[15] 黑弥撒（Black Mass），撒旦崇拜者进行的弥撒。

[16] 达拉布（Talab），源于印地语，意为经济收入。

[17] 安那（anna），旧时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的货币单位。一安那等于1/16卢比。

[18] “本人罗马公民是也”（Civis Romanus Sum），此句原文为拉丁语，表示说话者享有罗马公民一切的权利和地位。英国首相帕默斯顿爵士曾引用此句话表示，任何英国公民的权利都受英帝国保护，就像罗马公民的权利曾受罗马帝国保护那样。

第四章

弗洛里正躺在被汗水浸湿的床上睡觉，除了一条黑色的掸族[1]裤子以外什么也没穿。他游手好闲了一整天。每个月有三个礼拜他都在林子里的营地度过，每次回皎塔达也就待个几天，主要是为了消遣，因为他也没什么文案工作可做。

他的卧室是个很大的正方形房间，墙壁是白泥砌成的，没有窗，也没有天花板，只有椽木的屋顶，麻雀还在上面搭了窝。屋里没什么家具，有一张有四根帷木的床，蚊帐卷在上面就像华盖一样，一张柳条编的桌子和一把椅子，还有一面小镜子，再就是一些粗糙不堪的书架，上面摆着几百本书，这些书在雨季的时候发了霉，让衣鱼[2]蛀食得千疮百孔。墙上趴着一只壁虎，扁扁的，一动不动，就像一只纹章里的龙。窗台外屋檐上方，日光就像亮闪闪的白油一样倾泻了下来。竹林中几只鸽子不断发出单调的咕咕声，有趣的是，这声音配上这闷热的天气正合适。那是让人昏昏欲睡的声音，但并不是催眠曲的感觉，而是给人灌了麻醉剂的感觉。

两百码外就是麦格雷戈先生的平房，他家的看门人像个活闹钟一样在一截铁轨上敲了四下。声音叫醒了弗洛里的仆人郭斯拉，他起床进了厨房，吹旺了柴火堆的火苗，烧了一壶水泡茶。接着他穿戴好粉红色的岗包和细布因基，然后把茶盘端到了主人的床边。

郭斯拉（此人原名是貌[3]山拉，郭斯拉是个简称）是个小个子、宽肩膀，长得土里土气的缅甸人，他的肤色很深，倦容满面，留着黑色小胡子两边向下卷回来围住了他的嘴巴，但正如大多数缅甸男人一样，他没什么络腮胡。自打弗洛里来缅甸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服侍他了。两人年纪相差不到一个月。他们一起长大，曾并肩撵过鹬和鸭子，曾一起坐在狩猎台上等待始终也没有出现的老虎，曾一起体验过上千次扎营和远足的艰辛；郭斯拉还曾为弗洛里拉过皮条，帮他从中国放债人那里借过钱，在弗洛里喝醉时将他背上床，在他发烧时照顾他。在郭斯拉眼里，弗洛里还是个孩子，因为他还没结婚，而郭斯拉自己已经成家了，有五个孩子，然后又娶了一个老婆，成为默默无闻的重婚殉道者。就像所有单身汉的仆人一样，郭斯拉又懒又脏，但他对弗洛里却极为忠诚。

他绝不会让别人来服侍弗洛里进餐、替他拿枪或是在他骑马时替他牵马。在旅途中，如果他们遇到河流，他便会背弗洛里过河。他总是可怜弗洛里，一是因为他觉得他很天真，老是容易上当，二是因为那块胎记，他觉得那胎记很是吓人。

郭斯拉轻轻地将茶盘放在桌上，然后绕到床尾挠了挠弗洛里的脚趾。他的经验告诉他，这是叫醒弗洛里而不惹他生气的唯一方式。弗洛里翻了个身，骂骂咧咧地把额头埋进了枕头。

“钟敲了四下了，老爷，”郭斯拉说，“我拿来了两个茶杯，因为那个女人说她要来。”

那个女人指的是玛拉美，弗洛里的情人。郭斯拉一直称呼她为那个女人，以此来显示他的不赞成，并不是说他不赞成弗洛里找情人，而实际是他嫉妒玛拉美在家里的地位。

“老爷今晚打网球吗？”郭斯拉问道。

“不了，太热了，”弗洛里用英文说，“我什么都不想吃。把这堆东西端走，给我拿点威士忌来。”

郭斯拉完全能听懂英文，只是不会讲而已。他拿来一瓶威士忌和弗洛里的网球拍，他有意将球拍靠在床对面的墙上。在他看来，网球就是一种神秘的仪式，所有英国人都义不容辞地要参加，他不喜欢看到老爷在晚上虚度光阴。

弗洛里满脸嫌弃地将郭斯拉拿来的面包和黄油推开，往自己的茶里倒了些威士忌，喝完后感觉好多了。他从中午就开始睡了，现在他的脑袋和全身的骨头都在疼，嘴里的味道就像是纸烧焦了一样。他已经有几年没好好享受一餐了。缅甸所有的欧洲食品都或多或少地让人反胃——面包又湿又软，是混着砂糖椰汁发酵做成的，吃起来就像是放坏了的廉价面包，黄油是罐装的，牛奶也是罐装的，除非是送奶人那里的兑了水的灰牛奶。郭斯拉退下后，外面传来了一阵凉鞋刮擦地面的声音，然后听到一个缅甸女孩的尖嗓门说：“我家老爷醒了吗？”

“进来。”弗洛里不痛快地说。

玛拉美在门口把红漆凉鞋一甩，走进了房间。她拥有一项特权，就

是可以来和弗洛里一起喝茶，但不能留下用餐，也不能在老爷面前穿凉鞋。

玛拉美大概二十二三岁，身高可能有一米五几。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绣了花的中国缎子制成的笼基和一件上过浆的白色细布因基，上面挂了几个金吊坠。她把头发紧紧地盘起，盘成一个黑色的圆柱，看起来就像一段乌木，头上还装饰着几朵茉莉花。她那瘦小、扁平、纤细的身躯没有什么曲线，就像树上刻着的浅浮雕一样。她就像是个玩具娃娃，平静的鹅蛋脸上有着像新铜一样的颜色，她还有着一双窄窄的眼睛。她看上去像一个很奇怪的玩具娃娃，但却怪得好看。她一进屋就飘来一股檀香和椰子油的味道。

玛拉美绕到床边坐下，突然伸出胳膊搂住了弗洛里。她以缅甸人的方式，用她那扁平的鼻子闻了闻他的脸颊。

“我家老爷今天下午为什么没找人叫我过来？”她说。

“我在睡觉。天儿太热，做不了那事儿。”

“那么，您宁愿独自睡觉也不愿同玛拉美一起睡咯？您一定觉得我丑陋不堪咯！我是不是丑八怪，老爷？”

“走开，”他说，一边推了一下她的背，“这个点儿，我不想见到你。”

“那至少用您的双唇碰碰我嘛。（缅甸语中没有表达亲吻的词。）所有白种男人都那样碰他们的女人的。”

“这样行了吧。现在别来烦我了。拿几根烟过来，然后给我点上一支。”

“为什么如今您都不愿和我上床了呢？哎，两年前多不一样啊！您那时候多爱我啊。您从曼德勒买来金手镯和丝绸笼基送给我作礼物。再看看现在——”玛拉美伸出一只纱制笼基包裹住的细胳膊，“一个手镯都没有。上个月我还有三十个呢，现在全都给当了。一副手镯都没有，一件笼基也没得换，您让我怎么上街呀？在其他女人面前我丢死人了啊。”

“你把手镯都当了，难道怪我吗？”

“两年前，您会把它们全都赎回来给我的。哎，您再也不爱玛拉美了！”

她又用胳膊搂住了他，亲吻他，这是他教给她的一种欧式习惯。她身上散发出一种气味，混合着檀香、大蒜、椰子油以及头发上茉莉花的味道。这种味道总是让他牙齿打颤。他心不在焉地把她的头按在枕头上，低头看着她那奇怪的、年轻的脸，她那高高的颧骨、细长的眼睛和匀称的小嘴。她长了一口整齐的牙，就像小猫咪的牙齿一样。两年前，他从她父母那里把她买来，花了三百卢比。他开始轻轻抚摸她棕色的脖子，她从无领的因基中露出来的脖子就像是一支光滑、纤细的花梗。

“你喜欢我，仅仅是因为我是白人，而且有钱。”他说。

“老爷，我爱您，爱您超过人世间的一切。您为什么要这么说？难道我有对您不忠吗？”

“你有个缅甸情人。”

“真恶心！”玛拉美假装恶心地打了个颤，“他们用可怕的黑手摸我，想想就恶心！要是让缅甸男人摸了，还不如死掉算了！”

“你尽撒谎。”

他把手放在了她的乳房上。其实，玛拉美并不喜欢这样，因为这会让她想起自己其实还有胸部。缅甸女人的理想身材就是没有乳房。她躺着任他尽兴，很顺从，倒也满足，她似笑非笑，就像一只任人抚摸的猫咪。弗洛里的怀抱对她一文不值（郭斯拉的弟弟巴佩就是她的秘密情人），但看到弗洛里一点儿也不理会他俩的这桩事，她倒是很受伤。有时她甚至往弗洛里的食物里下春药。她真正爱的是小情人悠哉自在的生活，穿得光鲜亮丽地回到村子里，炫耀自己是个“波卡多”——也就是白人的妻子。她已经让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深信她是弗洛里的合法妻子了。

完事后，弗洛里转过身去，他精疲力竭、羞愧不已，静静地躺在那里，用左手捂住自己的胎记。每当做了羞耻之事，他总会想起自己的胎记。他嫌恶地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湿乎乎的，还有股椰子油味儿。房

间里热不可耐，外面的鸽子还在咕咕地哼着。浑身赤裸的玛拉美斜躺到了弗洛里身边，从桌上拿起一把柳扇，轻轻地为弗洛里扇着风。

不一会儿，她起身穿好衣服，点了支烟。然后，她又坐回床上，开始轻轻抚摸弗洛里赤裸的肩膀。他白皙的肤色令她着迷，上面透出的新鲜而强大的感觉令她神魂颠倒。但弗洛里猛甩了下肩膀，甩开了她的手。这时候他觉得她很讨厌、很恶心。他只想让她从眼前消失。

“出去。”他说。

玛拉美把嘴里的烟拿出来，递给弗洛里。“为什么每次老爷跟我做完爱，都会生我的气？”她说。

“出去。”他重复了一遍。

玛拉美还继续抚摸弗洛里的肩膀。她从来都没有完事走人的觉悟。她觉得淫荡是一种妖术，赋予女人神奇的力量以掌控男人，削弱其力量，最终将男人变为半痴呆的奴隶。每一次的拥抱攻势都将消耗弗洛里的意志力，增强她的魔力，她对此深信不疑。她又展开攻势，想让他再来一次。她放下手中的烟，一边伸出双臂抱住他，试图让他转过来，好亲吻他背过去的那半边脸，还一边怪他太冷漠。

“走开，走开！”他发火了，“去翻翻我短裤的口袋，里面有钱。拿五卢比，然后给我立马走人。”

玛拉美翻到一张五卢比的钞票，把它塞进因基的胸衬里，但还是没有打算走的意思。她在床边晃来晃去，不断烦扰着弗洛里，最终他勃然大怒，跳了起来。

“从这儿滚出去！我叫你走。完事儿后我不想看见你。”

“您就这么跟我说话！就好像我是个妓女。”

“你可不就是妓女吗？滚吧。”他一边说，一边推搡着她的肩膀，把她推出了房间，还把她的凉鞋也踢给了她。他们的见面大都以这样的方式收场。

弗洛里站在房间中央，打了个哈欠。他在想，到底要不要去俱乐部里打网球呢？算了，要去的话还得刮胡子，在几杯酒没下肚之前他可懒

得刮胡子。他摸了摸自己满是胡渣的下巴，晃到镜子前仔细地看了看，然后又走开了。他不想跟镜子里自己那张干瘪的黄脸面面相觑。有那么几分钟，他懒散地站在那儿，看着壁虎在书架上悄悄接近一只蛾子。玛拉美留下的那根香烟也烧尽了，留下一股刺鼻的气味，把纸都熏黄了。弗洛里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书，翻开它，然后又厌恶地丢在了一旁。他甚至连看书的力气都没有了。哦，上帝啊上帝，这可恶的夜晚剩下的时间该怎么打发才好呢？

弗劳摇摇摆摆地走进房间，不停地摇着尾巴，想要弗洛里带它去散步。弗洛里闷闷不乐地走进铺着石头地板的小厕所，厕所门就正对着卧室，他把温水朝脸上一泼，换上了衬衫和短裤。太阳下山前他必须设法做做运动。在印度，一天中如果一次也没有把自己弄得满身臭汗，简直就是罪过了。这给人带来的罪恶感会超过一千次纵欲。到了深夜，在游手好闲了一天以后，无所事事的感觉会达到近乎让人疯狂、想死的程度。工作、祷告、看书、喝酒、聊天……在这种无聊面前都无济于事，赶走它的唯一方式就是从皮肤的毛孔中将其发散殆尽。

弗洛里出了门，一路沿着上坡走进了丛林。最初走过的是生长着密灌木丛的低矮丛林，这里唯一的树木就是些半野生的芒果树，上面结着李子大小、渗着油脂的果实。一直走，道路两旁出现了更加高大的树木。每年这时候，丛林就十分干燥，一片死气沉沉的景象。路边，落满灰尘的树木紧密地排列着，暗沉的叶子是茶青色的。放眼望去，看不到任何鸟儿，除了一些棕色的动物笨拙地在灌木底下跳跃，看上去像是讨人厌的画眉；远处传来另一种鸟“啊哈哈！啊哈哈！”的鸣叫声。声音透着孤独、空灵，就像是一声大笑的回音。被碾碎的叶子散发出常青藤一样的味道，令人反胃。即便太阳已经不再晃眼，斜阳已经变成黄色的了，天气还是很热。

他们走了两英里，来到了小路的尽头。一条浅浅的小溪边。这附近的丛林更加翠绿，因为这里有水，树木也长得更高。溪边有一大株死去的彬加都木，树干上垂下蛛网似的兰花，这里还有几株酸橙木，上面开满了柔软的白花，散发出浓郁的香味，闻起来像是佛手柑。弗洛里走得很快，汗水浸湿了他的衬衫，额头上的汗滴下来流进了眼睛，辣得他生疼。流了一通汗，他心情好多了。而且，这条小溪总是能让他开心起来，小溪的水很清澈，这在这么一个肮脏的国家很少见。他踩着石头穿过小溪，弗劳跟在他身后，弄得水花四溅，他踏上一条熟知的窄道，穿过灌木丛。这条小道是牛群来溪边喝水而踏出来的，很少有人走过这条

路。他们沿着小路走了五十码，便来到了上游的一个池塘边。这里生长着一棵菩提树，一个六英尺[4]宽的庞然大物，像是一面扶壁，无数枝条交织在一起，像是一团被巨人缠死的电缆线。树的根部自然形成一个洞穴，清澈、淡绿的水在里面冒着泡。四面八方都被浓密的树叶包裹得严严实实、密不透光，整个地方就像是树叶筑起的一个绿色岩洞。

弗洛里匆匆脱掉衣服，下了水。这里有树荫，比外面凉爽些，他坐下去时，水正好漫过他的脖子。一群群银色的印度鲃，个头还没有沙丁鱼大，游过来轻轻地顶着、咬着他的身体。弗劳也扑进了水里，摆动着蹼一样的脚爪，就像只水獭一样静悄悄地游着。它很熟悉这池塘，因为弗洛里在皎塔达的时候，他们经常来这里。

高高的菩提树冠上传来一阵骚动，像烧开了水那样的冒泡声。一群绿鸠在树上吃菩提果。弗洛里仰着头仔细端详着翠绿的树冠，想辨识出那上面到底是什么鸟；但根本看不到它们的踪影，它们的羽毛与树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整个菩提树都因为有它们而生机盎然，闪烁着光芒，就好像鸟儿的灵魂在不停地摇晃着大树。弗劳正趴在树根上休息，它朝着树上看不见的家伙吠了几声。突然，其中一只绿鸠扑腾着翅膀飞下来，落在了一个较低的树枝上。它全然不知有人在观察着自己。它娇小纤弱，体型的大小还不及家养的鸽子，背上的羽毛翠绿如玉、光顺如丝，颈部胸部都色彩斑斓。两条粉嫩的腿就像牙医使用的粉蜡。

这只绿鸠在树枝上摆来摆去，蓬起胸部的羽毛，让珊瑚色的喙靠在上面。弗洛里突然一阵心酸。孤独啊，孤独，形单影只的苦楚！总是这样，置身于丛林这样孤单的地方，他有幸看到美好的事物——鸟儿、鲜花、树木——美得不可言喻，要是有谁能一同分享眼前美景，那该多么美好。美，如果没人分享，岂不是毫无意义。要是能够有人，哪怕只有一人，来分担他的孤独，那该多好！突然，绿鸠看到了树下的人和狗，随即冲向高空，像一颗子弹一样迅速地飞走了，只留下一阵抖擞翅膀的声音。人们很少能够近距离观察活着的绿鸠。它们飞得很高，把窝搭建在树梢上，很少落到地面来，即便下来也是为了找水喝。被子弹打中后，如果没有立即死亡，它们会紧紧抓住树枝，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人们厌倦了等待并走远后，才掉下来。

弗洛里从水里走出来，穿上衣服，又回到了小溪的另一边。他没有沿之前的小道回家，而是沿着向南的一条人们踏出的小道走向林子里去，他想迂回绕过一个丛林边上的村庄，他家就离那里不远了。弗劳在下层灌木丛中蹦蹦跳跳地走着，时而消失，时而显现，长耳朵被刺扎到

时，它就呜呜叫上两声。它曾经在这附近咬死过一只野兔。弗洛里慢悠悠地走着。一缕平静的烟从他的烟斗里直直地向上飘去。这趟散步和那滩清澈的水让他变得愉快而平静。天也凉快下来了，但在浓密的树下还是会感觉到一股股热气，光线也柔和了下来。远处，牛车轮子刺耳的吱吱声都显得很平静。

没过多久他就在林子里迷路了，在死去的树木和错综复杂的灌木迷宫中徘徊。他前面的路走不通了，小路被一片丑陋巨大的植物挡住了，看上去像是大号的蜘蛛抱蛋，叶子长长的末梢上长满了刺。一丛矮灌木底部有一只萤火虫，闪耀着绿光。丛林深处已然迎来了黄昏。这时，在另一条平行的小路上，小牛车吱吱扭扭地越走越近。

“嘿，saya gyi，saya gyi[5]（师傅，师傅）！”弗洛里喊道，抓着弗劳的项圈以防它乱跑。

“Ba le-de（怎么了）？”缅甸人喊话回来。同时传来向牛车喊叫和牛蹄突然刹住而前倾的声音。

“哦，尊敬而又博学的先生！能否麻烦您过来一下？我们迷路了。请停下来，哦，伟大的佛塔建造者！”

缅甸人跳下车，穿过丛林，用他的短刀砍着藤蔓。他是个矮胖的中年男人，只有一只眼睛。他带着弗洛里回到牛车停放的那条小路，弗洛里爬上了低平而又不舒服的牛车。缅甸人拿起缰绳，朝牛喊了喊，用短杖捅了一下几只牛的尾巴根部，然后车轮子发出一声尖响，车子便摇摇晃晃地向前驶出了。缅甸牛车车夫很少给轮轴上油，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轮子刺耳的声音可以起到驱鬼的作用，但每当有人问起，他们就会说是因为他们太穷了，买不起油。

他们经过一个用石灰水刷白的木佛塔，塔身还没有一个人那么高，在藤蔓卷须的遮蔽下若隐若现。然后牛车绕进了一座村庄，村里有二十座破败不堪的木头房，房顶是稻草搭成的，几棵光秃秃的枣椰树下有一口井。在棕榈树上安了家的白鹭正在树梢上方朝着窝的方向飞回来，就像白色的箭。有一个黄皮肤的胖女人，笼基围在腋下，正在绕着房子追着一只狗跑，边笑边用竹竿打它，那只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大笑着。村子的名字叫良礼彬村——“四颗菩提树”的意思；现在一颗菩提树也没有了，可能一百年前就被砍掉、被忘却了吧。村民们在镇子和丛林中间开垦了一条细细的庄稼田，他们还制作牛车，推到皎塔达出售。房屋墙根

处随处可见牛车轱辘；这些直径五英尺的大玩意上装配着粗糙但结实的辐条。

弗洛里下了车，赏给车夫四安那。几条棕色条纹的恶狗从房屋底下猛冲过来，来回嗅着弗劳，一群肚子滚圆、没穿衣服的孩子们也过来了，个个头上顶着个发髻，带着好奇打量着这个白人，但不敢走近。村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是个肤色暗黄的干瘪老头，他行了几个什科礼。弗洛里在村长家门口的台阶上坐下，点着了烟斗。他口渴了。

“你们这口井里的水能喝吗，村长？”

村长想了想，用右脚的大脚指指甲挠了挠左腿的小腿。“德钦[6]，愿饮则能饮，不愿饮则不能饮。”

“啊。真是充满智慧啊。”

刚才追着狗跑的胖女人拿来一个烧黑了的陶制茶壶和一个没有手柄的碗，给他端来了些清淡绿茶，尝起来就像柴火烟味。

“我必须得走了，村长。谢谢您的茶。”

“上帝与您同在，德钦。”

弗洛里沿着通往练兵场的小路走回了家。天色已暗，郭斯拉换上了干净的因基，并已经在卧室候着了。他给弗洛里烧好了两油桶的洗澡水，点上了汽油灯，摆好一身干净的西装和衬衫。摆出干净衣服的用意是暗示弗洛里去刮胡子、穿戴好，然后吃完晚饭后去俱乐部。有时候，晚上弗洛里就穿着掸族裤子，无所事事地拿本书坐在椅子里，郭斯拉很见不得这个习惯。他讨厌看到自家老爷跟别的白人先生做不一样的事。弗洛里经常醉醺醺地从俱乐部回来，但在家就会很清醒。即便是这样也不能改变郭斯拉的这种想法，因为喝醉酒在白人当中是最正常不过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个女人去集市了，”他说，一脸高兴的样子，玛拉美每次离开，他都是这个表情，“巴佩打着灯笼和她一起去了，好陪她回来。”

“很好。”弗洛里说。

她去花那五卢比了，毫无疑问是去赌博。“老爷的洗澡水准备好了。”

“等等，咱们先得给狗清理一下。拿梳子来。”弗洛里说。

两人一起蹲在地上用梳子捋着弗劳顺滑的皮毛，用手指掏它的趾缝，把虱子都挑出来。每晚都要这么做。它在白天会招来大量的虱子，这些可怕的灰色家伙刚跳到它身上时还是针头大小，然后拼命狂吃，直到变成豌豆大小。每抓出一只虱子，郭斯拉就把它搁到地上，小心翼翼地用他的大脚趾碾死它。

在那之后，弗洛里刮了胡子，洗了澡，穿好了衣服，坐下来吃晚餐。郭斯拉站在他椅子背后，为他上菜，并用柳扇为他扇风。他在小桌的中央布置了一碗鲜红色的木槿花。晚餐徒有外观、难以下咽。这些聪明“好学”的厨师都是几世纪前法国人培训出来的印度仆人的后裔，可以把食物做得花里胡哨的，就是难以下咽。晚餐过后，弗洛里走着去了俱乐部，去玩桥牌，然后喝到七八分醉意，他在皎塔达的大多数夜晚都是这样度过的。

---

[1] 掸族（Shan），分布在缅甸曼德勒省、克钦邦与克伦邦。

[2] 衣鱼（silver fish），蛀食纸张、衣物等的银色昆虫。

[3] 貌（Maung），“貌”为缅甸人对幼辈的称呼。

[4] 英尺，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为0.3米。全书同。

[5] 师傅（saya gyi），缅甸语中saya意为老师，gyi是字尾尊称。用来称呼陌生人时，可表示尊敬。

[6] 德钦（Thakin），缅甸语，意为“老爷”或“主人”。

第五章

尽管弗洛里在俱乐部喝了些威士忌，那天晚上他还是没怎么睡着。流浪的恶狗们在朝着月亮狂吠。已是午夜，娥眉月也快落下去了，但这些狗在炎热的白天已经睡饱了觉，现在开始此起彼伏地朝着月亮叫起来了。一条狗不太喜欢弗洛里家的房子，开始全神贯注地朝着房子叫喊，叫声还带有规律。它坐在离房子大门五十码的地方，发出尖锐、愤怒的嚎叫，每半分钟就嚎一声，简直就和时钟一样准时。它会就这样叫两三个小时，直到公鸡开始打鸣。

弗洛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实在头痛。有个傻瓜曾说过，人不会真正跟一只动物过不去；这个人应该来印度过夜试试，听听这恶犬吠月的声音。最后，弗洛里实在忍受不了了。他爬起来，在床底下放着的那个锡制的制服箱子里翻来翻去，找到了一支来复枪和两颗子弹，然后来到了阳台上。

空中的娥眉月相当的亮，他看见了那条狗，找准了枪的准星。他靠在阳台的木头柱子上，聚精会神地瞄准目标。然后，当他感受到硬硬的橡胶枪托抵在他赤裸的肩膀上时，他畏缩了。这把来复枪会有很大的后坐力，如果开枪，一定会在身上留下淤青。他柔软的肩膀微微发抖。他放下了枪，没有勇气冷血地开枪。

他根本无法入睡。他拿了件外套和几根烟，开始在花园的小径上踱来踱去，身边都是幽灵般的花。天很热，蚊子嗅到了他的气味，在他身后嗡嗡地飞着。练兵场上到处是狗儿彼此追逐的影子。左边，英国公墓里的墓碑闪着白光，令人毛骨悚然，还可以看见附近的小土丘，那些是以前中国人留下来的坟冢。人们说这面山坡闹鬼，俱乐部里的那些童仆每次奉命夜间从这条路上山，都会哭上一鼻子。

“狗杂种，真没种，”弗洛里心想；他并没有激动，因为这种想法已是司空见惯了，“畏畏缩缩、游手好闲、嗜酒如命、轻浮放荡、良心不安、自怨自艾的狗杂种。你得意洋洋地觉得自己比俱乐部那群傻瓜乡巴佬更高一等，其实所有这些人都比你强，每一个人都比你强。他们虽然愚蠢，但都有男人样。不是什么懦夫、骗子。都没有半死不活、身心堕

落。再看看你自己……”

他完全有理由这么骂自己。那天晚上在俱乐部发生了一件极其恶心、卑鄙的事情。这件事很平常，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但仍然是一件卑鄙、懦弱、耻辱的勾当。

弗洛里到俱乐部的时候，里面只有埃利斯和马克斯韦尔。拉克斯廷夫妇借了麦格雷戈先生的车去火车站接侄女去了，他们将坐夜车抵达。他们玩起了三人桥牌，气氛融洽，然后韦斯特菲尔德进来了，他非常愤怒，浅黄色的脸都气红了，他手里拿了一份缅甸报纸，就是《缅甸爱国者报》。报上刊登着一篇攻击诽谤麦格雷戈先生的报道。埃利斯和韦斯特菲尔德都气炸了。他们是那么生气，让弗洛里很难装出他也是那么生气，好让他们满足。埃利斯骂骂咧咧了五分钟，然后，通过很奇怪的分析，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那篇文章是维拉斯瓦米医生写的。而且，他已经想好回敬他的招儿了。他们要在通告栏里贴张公告，回应并反对麦格雷戈先生前一天贴出的公告。埃利斯一转眼工夫就写好了，字迹小而清楚：

我们的副行政长官最近受到侮辱侵犯，鉴于这种懦弱的行为，我们联名发表声明，认为现在讨论选举老黑加入俱乐部之事宜乃最不恰当时期……

韦斯特菲尔德对“老黑”一词提出异议，于是用一条细线划去这个词，用“土著”代替了。这张公告下面签了好几个名字，“R.韦斯特菲尔德，P.W. 埃利斯，C.W. 马克斯韦尔，J. 弗洛里”。

埃利斯对自己的主意十分满意，心中的怒火也平息了一半。公告本身并不会起作用，但这个消息会马上传遍镇子，明天就能传进维拉斯瓦米医生的耳朵里。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整个欧洲人圈子里都会公开称呼医生“老黑”。埃利斯想想就高兴。那晚剩下的时间里，他老忍不住要看那块通告栏，每过个几分钟，他就会兴高采烈地大叫：“这回可是让那个大肚子的矮个子好好掂量掂量，是不？掂量掂量他自己在咱们看来是个什么货色。就要这样让他们老实点，是不？”等等。

与此同时，弗洛里也签署了这张当众羞辱自己朋友的公告。他之前做过上千回这种事情，理由一如既往，那就是他缺乏拒绝别人所需要的那一星半点的勇气。因为，当然啦，他要是愿意，完全可以拒绝；而且，也当然啦，拒绝就意味着要和埃利斯及韦斯特菲尔德来场口水战

了。哎，他真是讨厌死吵架了啊！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嘲弄讽刺！一想到吵架，他就畏缩了；他感觉到胎记在他的脸上愈发明显，喉咙中不知有什么东西，让他声音变低、心虚不已。不能这样！还是侮辱自己的朋友来得更容易些，虽然他心知肚明，他的朋友一定会听说此事。

弗洛里来缅甸十五年了，在这里，必须学会避免跟大家的观点唱反调。但他这个毛病早就有了，自打娘胎里就有了，自打老天爷让他脸上长了个青黑色胎记起就有了。他回想起了小时候胎记给自己带来的遭遇。他九岁，第一天上学，大家都盯着他看，几天后，就有男孩子们朝他大喊大叫了，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黑青天”，直到学校有个会写诗的学生（弗洛里记起了，此人现在是一个评论家，给《国家》杂志写了不少好文章）写了首诗：

新生弗洛里，

样子真稀奇。

脸上大黑记，

活像猴屁屁。

于是，他的外号又成了“猴屁屁”。之后几年都是如此。每个星期六晚上，大一些的男孩子会举行“西班牙异端裁判所”[1]。他们最喜欢的酷刑叫做“别样多哥”，就是用令人极其痛苦的姿势把你抓住，这种抓人的姿势只有少数几个“圣明先知”知道，然后有人用绳子系住一个七叶树果子打你。但弗洛里很快就摆脱了“猴屁屁”这个外号。他会撒谎，足球踢得很好，这是要在学校混好的两个必要条件。他在校的最后一学期，他和另一个男孩用“别样多哥”的姿势架住了那个写诗的同学，足球队长用钉子鞋捆了他六下，就因为发现他写了首十四行诗。对弗洛里来说，这是性格形成的时期。

离开那所学校后，他去了一所廉价的三流公学。这地方既拙劣又山寨。还去模仿一流的公学，学人家崇尚英国国教教义、板球和拉丁诗歌的传统，校歌名字是《人生如争球》，歌词中把上帝喻作总裁判员。但是它缺乏一流公学最核心的优势，那就是它们的文化学术环境。在这个三流公学，孩子们几乎学不到任何东西。没有足够严厉的训斥来让这些学生吞下课上讲的所有单调无味的垃圾，学生也不大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那些可怜兮兮、酬不抵劳的男老师的启迪。毕业后，弗洛里还是个

没什么文化的乡巴佬。但就算这样，他心里还是清楚，在他身上有某种可能性，他很可能会捅娄子。但当然了，他把这种可能性扼杀了。一个刚进校门就让人戏称为“猴屁屁”的男孩，必定已经吸取教训了。

他来缅甸时，还不到二十岁。他父母人都不错，很爱他，给他在一个木材公司谋了份差事。他们费了很大劲才给他争取到这份工作，还花了笔钱，数目大得让他们无法负担，他回报他们的方式就是隔几个月给他们敷衍潦草地回封信。他在缅甸的头半年是在仰光度过的，本来他该在那里学习文案业务。他和其他四个年轻人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那四个人整天沉迷于酒色。真可谓花天酒地啊！他们大口痛饮威士忌，但他们私下很讨厌这种酒，他们围着钢琴声嘶力竭地嚎着极度下流、愚蠢的歌曲，他们花上百卢比招来上了年纪的犹太妓女，她们的脸丑得跟鳄鱼似的。当时正是他的性格形成的时期。

他从仰光到曼德勒北边的丛林里面扎营，去采伐柚木。虽然不怎么舒服，虽然孤独，但丛林里的生活还算不错，那恶心、单调的食物或许才是在缅甸最难以让人忍受的事情吧。他那时还很年轻，还喜欢搞英雄崇拜呢，在公司里也有些朋友。那时他还去打猎、钓鱼，也许每年还要匆匆去一次仰光，借口说去看牙医。啊，去仰光的时候多高兴啊！冲到斯玛特和木克多书店去买从英国运来的新小说，在安德森餐厅吃晚饭，那里的牛排和黄油都是冷冻着从八千英里外运来的，还有酣畅淋漓的豪饮！他那时太年轻，还不能意识到这样的生活将带他走向何处。他看不到未来的那些年头是多么孤独、无聊、萎靡。

他适应了缅甸。他的身体也适应了这里热带气候那种奇怪的节奏。每年的2月到5月，烈日就像天空中的一位发怒的神灵，吐出熊熊烈焰，然后突然间，季风向西吹来，首先传来的是狂风怒号的声音，随之而来的就是永不停息的倾盆大雨，浸湿了所有的东西，如衣服、床铺甚至是食物永远都不会干了。这时节，天气还是很热，又闷又湿。丛林低洼地带的小路都成了泥沼地，稻田在积水里荒着，发出恶臭味、老鼠味。书籍和靴子都发了霉。一丝不挂的缅甸人头上顶着一码宽的棕榈叶，骑着水牛，在齐膝深的水中犁着稻田，随后，女人和小孩就用三叉耙子把绿油油的水稻苗安插进泥里。整个7月和8月，雨几乎不停地下着。然后，某天晚上，你会突然听到高空中鸟儿喳喳大叫，但却不见其踪影。那是鹬从中亚地区南下飞过来的。雨量逐渐减少，10月份雨季就结束了。田地变干了，水稻成熟了，孩子们丢着贡印果的果核玩着跳房子，在凉爽的风中放风筝。短暂的冬季开始了，缅甸北部就像让英国的幽灵附了身

一样，随处可见盛开的野花，和英国的野花不完全一样，但很接近。茂密的灌木中盛开的忍冬，野蔷薇闻上去就像梨形的小硬糖，丛林深处甚至还有紫罗兰。太阳在低空中升起落下，夜间和清晨寒冷得刺骨，笼罩山谷的白雾就像是大茶壶里升腾出的蒸汽。人们会去捕猎鸭子和鹅。有数不清的鹅，还有成群的大雁从沼泽地里飞上天，大声鸣叫着，就像装载着货物的火车驶过铁桥。成熟的水稻齐胸高，黄灿灿的，看上去就像麦田。缅甸人头上裹着布，双臂交叉端在胸前，冻得脸色焦黄、憔悴。清晨，你穿过雾蒙蒙、乱糟糟的旷野，穿过林间的空地，那里长着湿漉漉的野草，像极了英国本地的草，还有光秃秃的树，猴子蹲在高高的树干上，等待着阳光的出现。夜晚，沿着寒冷的小径回到营地，你会看到男孩子们骑着水牛往家走，水牛巨大的角在雾中若隐若现，就像空中的月牙。营地里，你的床上有三条毯子，你可以吃到野味馅饼，不必再吃一成不变的鸡肉。晚餐过后，你可以坐在巨大的营地篝火旁的木桩上，喝喝啤酒，聊聊打猎。火焰像红色的冬青枝一样舞动着，放射出一圈圈光晕，光晕的边界上蹲着一群仆人和苦工，他们不好意思打扰到白人老爷们，只能像狗一样慢慢向火焰靠近。躺在床上，你能听到露水从树上滴落的声音，像是温柔的大雨。对于不需要回顾过去、也不用思考未来的年轻人来说，这确实是好日子。

那时，弗洛里二十四岁，马上就要休探亲假了，世界大战却爆发了。他逃过了服兵役，那时候，这样做显得易如反掌、自然而然。在缅甸，没去当兵的人有一种自我安慰的理论，那就是“恪尽职守”（多好的表达！“恪尽职守”和“赖着不走”区别多大啊）才是真正的爱国行为；他们甚至私底下对抛弃工作而参军的人怀有敌意。事实上，弗洛里没参军是因为东方已经让他变得堕落了，他不想以放弃他的威士忌、他的仆人还有他的缅甸情人们为代价，而换来无聊的操场阅兵和让人精疲力竭、苦不堪言的行军。战火不断蔓延，就像席卷大地的风暴。这个炎热、肮脏的国家，虽然远离危险的战火，但给人孤单、被遗忘的感觉。弗洛里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他学会了在无聊的时候，沉浸到书中的世界。他慢慢地成熟起来，厌倦了幼稚的欢愉，学会了独立思考，尽管有些无奈。

他二十七岁的生日是在医院度过的，从头到脚长满了丑陋的疮，虽然叫做“泥疮”，但很可能是喝多了威士忌或者是老吃糟糕的食物引起的。泥疮在他身上留下的小坑两年后才消失。突然之间，他看上去就老多了，自己也觉得老多了。他的青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东方生活了八年，热病、孤独、断断续续地饮酒，都在他身上刻下了烙印。

自那之后，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更加孤独、更加难挨。现在，他所有思想的核心，也是糟蹋了一切的想法，就是他对生活其中的帝国主义愈发地憎恨。因为随着思想的进步——你没办法让思想停滞不前啊，而且对于只有半吊子教育水平的人来说，他们的悲剧之一就是，他们的思想发展得晚，待发展之时早已误入歧途——他才看清了英国人和大英帝国的真面目。英属印度帝国就是专制主义——虽然看似仁慈，这毫无疑问，但归根结底是以偷窃为目的的专制主义。至于在东方的英国人，这些白人萨布，弗洛里虽然要和他们打交道，但实则对他们怀恨在心，以致无法对他们做出公平判断。因为，这些可怜的恶棍毕竟也没比其他人坏到哪儿去。没人羡慕他们的生活，他们在陌生的国度一住就是三十年，收入卑微，然后回国时，肝也喝坏了，屁股也因为坐藤椅而坐成了菠萝样，在某个二流俱乐部里遭人厌烦，百无聊赖地度过余生，真是不值得。另一方面，也不能那么理想化这些白人萨布。有个很普遍的看法认为那些在“英帝国附属地区”工作的人最起码能干、勤奋。这是个错觉。在印度，除了科研部门——林业部、公共设施部之类的部门——一个英国官员没必要非常称职。这里的英国人很少有人能比英国某个小镇的驿站长还要努力、上心地工作。真正的行政工作主要是由一些土著下属来做的，因为专制政权的真正核心并不是官员，而是军队。有了军队，这些官员、商人就能平平安安地勉强过日子，即便他们很愚蠢也无妨。他们中大部分人也确实愚蠢。这是一个无趣而体面的民族，在二十五万把刺刀后面保护、捍卫着自己的这种无趣。

这里简直令人窒息、令人迟钝。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每个字眼、每个想法都会受到监督。在英格兰，这样的一种环境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英格兰，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人前可以出卖灵魂、装模作样，但私下、与朋友在一起时，就可将其再买回来，畅所欲言。但当每个白人都成为这专制政权大轮子上的一颗轮齿时，友谊也就难以生存了。言论自由是不可想象的，你倒是可以得到所有其他形式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当酒鬼、懒汉、懦夫、诽谤者、私通者，但就是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当遇到任何一个稍微有点意义的问题时，你的想法已经让白人萨布准则给规定好了。

最后，这不为人知的逆反心态会像一个潜在的疾病，吞噬着你。整个人生都要在谎言中度过。年复一年，你坐在吉卜林[2]阴魂不散的小俱乐部里，右手边是威士忌，左手边是《粉安报》，听某个二流上校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说那些该死的民族主义者都该下油锅，你还得热切地表示赞同。你听到自己的东方朋友被人称为“油腻腻的小巴布”，而且作

为分内之事，你还必须承认，他们确实是油腻腻的小巴布。你看到刚毕业的小毛孩用脚踹着白发苍苍的仆人。这时，你怒火中烧，恨透了自己的国人，希望土著能站起来反抗，让帝国血流成河。这样的想法一点都不崇高，甚至一点都不真心实意。因为，说到底，英属印度帝国是不是个专制政权，印度人是不是让人欺负、剥削，你真的在乎吗？你在乎只是因为你言论自由的权利被剥夺了。你是专制政权的受害者，是一个白人萨布，你被一系列坚不可摧的禁令绑得严严实实，还不如和尚或是野蛮人自由。

时光流逝，每过一年，弗洛里都会发现自己对白人萨布的世界愈发生疏，他在认真地谈论任何事情的时候，也愈发容易惹上麻烦。所以，他学会了内向地、低调地沉浸在书的世界中，沉浸在秘密的思绪中，这样的思绪不能言说。甚至和医生的谈话，也好像是和自己对话，因为医生虽然是个好人，可不大听得懂弗洛里在说什么。但是一个人要伪装起他真正的生活，实在是让人堕落。人应该顺着生活的洪流去过活，而不是逆流而行。就算当个最愚蠢的白人萨布，边打着嗝，边说“四十年来的生活”，都比安静孤独地生活在乏味的世界里、在秘密的思绪中寻求自我慰藉好得多。

弗洛里还没回过英格兰。为什么呢，他心里虽然很清楚，但却无法解释。最初，一些事情耽搁了回国的计划。首先是世界大战，战争过后则是他的公司急缺能上手的助理，所以没放他走，让他再干两年。然后，他终于还是出发了。他热切希望回到英格兰，但他害怕面对它，就像个没领子、没剃须的男人害怕面对一个漂亮姑娘一样。他刚离开家时，还是个前途一片光明的男孩，虽然长了块胎记，但还是英俊潇洒；可如今，才过了十年，他就皮肤暗黄、身材瘦削、嗜酒成性，从外表和习惯上看，几乎和中年人没什么两样了。但他对英格兰的渴望依旧不减。船乘风破浪向西驶去，就像块打得很粗糙的银疙瘩，后面刮着冬季的信风。由于吃得好，再加上闻到了海的味道，弗洛里的面色红润了起来。然后他突然意识到——在缅甸令人窒息的环境中，他忘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还年轻，可以从头来过。他要在文明社会住上一年，遇见个不嫌弃他胎记的女孩——一个有教养的女孩，不是什么萨布夫人——然后他会娶她，再在缅甸继续忍受上十年、十五年。之后，他们就退休了，他也许能拿到一万二到一万五千英镑的退休金。他们会在乡下买个小屋，和朋友们在一起，有书陪伴、儿女绕膝，再养些动物。他们会远离作为白人萨布、萨布夫人这一切的烦扰。他会全然忘记缅甸，这个可怕的国家，这个差点毁了他的国家。

当他到科伦坡[3]的时候，有一封电报已经在等他了。公司里有三个人突然得了黑尿热[4]死了。公司很抱歉，但恳请他即刻回仰光，并保证，下一次一有机会，一定马上让他休假。

弗洛里诅咒着这该死的霉运，登上了下一班去仰光的船，然后又乘火车回到了公司总部。他那时尚未回到皎塔达，而是到了缅甸北部的另一个镇子里。他全部的仆人都站在月台上等他。他之前已经把他们统统转交给了他的继任者，结果这人却得病死了。再次看到他们熟悉的脸简直感觉太怪了！仅仅十天前，他还在全速返回英格兰，感觉就像是已经回到了英格兰的怀抱一样；可现在，又回到了这个脏兮兮的老地方，浑身赤裸的黑苦工为了行李的事吵个不停，还有个缅甸人在路上朝自己的牛大喊大叫。

仆人们一拥而上，一圈谄媚的棕色脸庞围住了他，奉上了各种礼物。郭斯拉带来一张黑鹿皮，印度仆人们送上了一些蜜饯和一个金盏花环，巴佩，他那时候还是个小男孩，送了他一只关在柳条笼子里的松鼠。牛车候在那儿，准备拉行李。弗洛里朝房子走回去，脖子上的大花环晃来晃去，看上去滑稽极了。寒夜光线昏黄，显得很柔和。房子门口，站着一个土黄色皮肤的印度老人，正拿着一个小号镰刀割着草，厨师和园丁的老婆们正跪在仆人宿舍前面，在石板上磨着咖喱酱。

弗洛里心里开始琢磨着什么。经常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突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生命中发生的巨变和堕落。因为他意识到，猛然意识到，回到这里让他很高兴。这个他曾憎恨的国家现在就是他的祖国、他的家乡。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年，缅甸的泥土融入了他身体里每一个细胞。这样的场景——夜晚昏黄的光、割草的印度老头、车轱辘嘎吱嘎吱的响声、一行行的白鹭——都比英格兰感觉更加亲切。他在这样的异国他乡，深深地扎了根，也许再也不可动摇。

在那之后，他甚至没再申请探亲假。他的父母相继去世了，家里那些长着马脸、令人讨厌的姐妹们也都嫁人了，他从来就不喜欢她们，现在也几乎断了联系。除了书籍，他现在与欧洲再无联系。因为他意识到仅仅回到英格兰还不足以治愈他的孤独。他已参透了预留给驻印英国人的地狱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了。哎，那些巴斯[5]和切尔滕纳姆[6]的老废物，整天无聊地絮絮叨叨！那些和坟墓没什么两样的寄宿公寓，里面挤满了驻印英国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被腐化了，没完没了地讲1888年在博格利瓦拉发生的事情！可怜的恶棍们，他们明白，心让一个陌生的、

叫人憎恨的国度偷去是什么滋味。他清楚地看到，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找到一个能同他分享缅甸生活的人——真正分享生活的人，分享他的内心世界、他的秘密想法，离开缅甸时，能拥有和他一模一样的记忆，能像他一样爱这个国家，像他一样恨这个国家，能帮助他不再隐藏自己、压制情感，能理解他。说到底，就是一个朋友。

朋友，抑或是妻子？那个不可能存在的她。例如，像拉克斯廷夫人那样的？可恶的萨布夫人，瘦削的黄脸婆，喝着鸡尾酒造谣生事，喋喋不休地指责佣人，在缅甸待了二十年，一句缅甸语都不学。老天啊，千万别是这样的人。

弗洛里俯身探出了大门。月亮消失在丛林厚厚的绿墙后面，但狗儿们依旧嚎叫个不停。吉尔伯特的几句诗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庸俗愚蠢的押韵诗，但此时此景还算贴切，好像是“抒发你那乱如麻的心境”[7]。吉尔伯特是个有才华的小混账。难道，他所有的烦恼就让这一句诗道尽了吗？只有复杂、怯懦的抱怨，可怜的富家女孩之类的东西吗？他不就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借着自己的闲散无病呻吟吗？一个精神上的维蒂特利太太[8]？一部没有诗意的《哈姆雷特》？也许吧。如果是这样，这一切会不会更容易忍受？痛苦不会减轻多少，因为内心深处明知道自己有可能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却还是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这丢脸、可怕的徒劳中，荒废生命、腐败堕落，这些也许都是自己的过错。

啊，上帝啊，请将我们从这自怜自哀中拯救出来吧！弗洛里回到了阳台上，拿出了那把来复枪，微微地闭起一只眼，朝那条野狗开了枪。枪带着回声咆哮了一番，子弹没有命中目标，射进了练兵场的土地里。一个紫红色的淤青在弗洛里肩膀上冒了出来。那狗儿吓得嚎了一声，拔腿溜走了，跑到五十码之外，又坐了下来，重新有节奏地吠叫了起来。

---

[1] 西班牙异端裁判所（Spanish Inquisition），为了维护天主教的正统地位，1478年西班牙卡斯提尔伊莎贝拉女王要求教宗成立此裁判所，以极其残忍的酷刑惩罚宗教异端分子。

[2] 吉卜林（Kipling，1865—1936），著名的英国诗人、小说家。其作品突出体现了英帝国的扩张精神。因而他也被称为“帝国主义诗人”。

[3] 科伦坡（Colombo），斯里兰卡首都。

[4] 黑尿热（black-water fever），一种严重的疟疾。

[5] 巴斯（Bath），英格兰西南部城市。

[6] 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的自治市镇。

[7] “抒发你那乱如麻的心境”（discoursing on your complicated state of mind），出自吉尔伯特《唯美主义者》一诗。此句话原文实为“You must lie upon the daisies and discourse in novel phrases of your complicated state of mind.”梁实秋译本

中，此句的翻译是“你必须躺在一片雏菊上，以新词丽句表达你的心情。”

[8] 维蒂特利太太（Mrs. Wititterly），狄更斯的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人物，酷爱读书，精神崇高，很理想化，在小说中雇佣女主角凯特担任她的伴读。

第六章

清晨的阳光斜斜地爬上练兵场，黄如金叶的光芒印照在平房白色的墙上。四只青紫色的乌鸦俯冲下来，落在了阳台的栏杆上，伺机冲进屋里偷走郭斯拉给弗洛里准备在床边的面包和黄油。弗洛里从蚊帐里爬出来，朝郭斯拉喊了喊，让他拿杜松子酒来，然后就进了浴室，在装满水的锡制浴缸里坐了一会儿，洗澡水本该是凉的才对。杜松子酒下肚后，感觉好多了，他刮了胡子。通常，他都拖到晚上才刮胡子，因为他的络腮胡长得又黑又快。

就在弗洛里郁闷地坐在浴缸里的时候，麦格雷戈先生穿着一身汗衫短裤，正躺在专门铺在卧室的竹垫上，一边做着诺登弗吕希特的“久坐人士健身操”，一边嘴里费力地念着五、六、七、八、九。麦格雷戈先生从未，或者说很少落下早操。第八式（平躺，双腿绷直抬起，与身体垂直）对于一个四十三岁男人来说，可真够受罪的；第九式（平躺，竖直坐起，指尖触碰脚趾），更要命。但就算疼，也得保持健康啊！当麦格雷戈先生身体猛然向前趴，痛苦地去触碰脚趾时，他的脖子上出现一片砖红色，脸也憋得通红，几乎有中风的危险。他宽阔肥壮的胸脯上，汗水亮晶晶的。坚持住，坚持住！不惜任何代价都要保持健康。男仆穆罕默德·阿里的胳膊上搭着麦格雷戈先生的干净衣服，他在半开的门外看着麦格雷戈先生。他又窄又黄的阿拉伯面孔上透出既不理解也没兴趣的表情。他已经观察这种扭曲的姿势五年了，每天早晨都是如此，他隐约可以猜到这是一种祭祀仪式，献给某个神秘而苛刻的神。

就在同时，早已出门的韦斯特菲尔德靠在警察局里满是凹口和墨印的桌子上，而一个胖胖的副督察正在审问一个由两个警察看守着的嫌犯。嫌犯是个四十岁的男人，脸色灰白，看上去非常胆怯，他只穿了件卷到膝盖的破笼基，膝盖下面是他瘦削、弯曲的小腿，上面虱子的咬痕密密麻麻。

“这家伙是谁？”韦斯特菲尔德说。

“小偷，先生。我们发现他有个戒指，上面镶了两颗非常昂贵的翡翠。他没给任何解释。他怎么可能——一个穷苦工——拥有翡翠戒指

呢？一定是他偷的。”

他凶神恶煞地向嫌犯转过去，像只公猫一样把脸凑上去，几乎要贴住那人的脸了，然后狂吼道：

“戒指是你偷来的！”

“不是。”

“你有案底！”

“没有。”

“你蹲过监狱！”

“没有。”

“转过来！”副督察突然心血来潮地吼道，“弯下腰！”

嫌犯把脸转向了韦斯特菲尔德，他灰白的脸上写满痛苦，韦斯特菲尔德则移开了目光。两个警察抓着他，把他扭过去，让他弓着身子，副督察一把扯下嫌犯的笼基，露出了他的屁股。

“看看吧，先生！”他指着些伤疤说，“他之前挨过竹条。说明这人是个惯犯啊。所以戒指就是他偷来的！”

“好吧，把他关进牢里。”韦斯特菲尔德不太高兴地说，他双手插在兜里，从桌前晃开了。他心里其实很讨厌拘留这些惨兮兮的普通小偷。强盗土匪、反叛分子……没问题，但就是别拘留这些可怜巴巴、阿谀谄媚的老鼠！“貌巴，牢里现在有多少人了？”他问道。

“三个人，先生。”

牢笼在楼上，就是六英寸[1]宽的木条钉起来的一个笼子，一个持卡宾枪的警察看守着笼子。那里光线十分阴暗，热得令人透不过气来，里面除了个臭气熏天的泥糊的马桶就什么东西也没有了。两个犯人蹲在木条边上，不愿靠近剩下的那个犯人，一个印度苦工，从头到脚长满了癣，就像套了身盔甲一样。一个结实的缅甸女人，是警察的老婆，正跪在笼子外面，用长勺把米饭和稀豆汤舀进锡制的小盘子里。

“吃得好不好？”韦斯特菲尔德问道。

“挺好的，老爷。”犯人们连连回答道。

政府给犯人们提供的伙食是每人每餐两个半安那，警察的老婆还要从这里面捞上一安那。

弗洛里出了门，走下来进了院子，用手杖将野草戳进土里。在这个钟点，万物皆显现出模糊而美丽的颜色——叶子的嫩绿色、土地以及树干的红褐色——就像透明水彩画的薄涂层，过一会儿，在强光下就会消失。朝练兵场下面望去，一群体型娇小的褐果鸠飞得低低的，来回追逐着彼此，还有翠绿色的蜂虎[2]，蹦蹦跳跳的，就像动作缓慢的燕子。一群清洁工，排成纵队，每人手里的垃圾都让衣服挡住一半，他们正在往丛林边上的一个可怕的垃圾坑走去。这群忍饥挨饿的可怜鬼们，四肢瘦得像木头棍一样，膝盖虚弱得直不起来，披着土黄色的破布，他们就像一群用裹尸布裹着的骨架子在路上行走。

园丁在大门附近的鸽棚那儿，正忙着开垦新的花床。他是个呆滞、愚笨的印度年轻人，几乎生活在完全的沉默中，因为他讲话带曼尼普尔邦[3]口音，没人能听懂，就连他的泽巴蒂[4]妻子也听不懂。而且，他长了个巨大的舌头，嘴里都放不下。他向弗洛里深深地行了个额手礼，用手捂住脸，然后又挥起锄头重重地、笨手笨脚地砸向干燥的大地，背上柔嫩的肌肉颤动着。

一声尖利刺耳的叫声“呀！”从仆人宿舍那里传来。郭斯拉的老婆们开始了她们例行的早间斗嘴。尼罗，一只家养的斗鸡，昂首阔步地沿小路跑下去，它蜿蜒前行，躲着弗劳。巴佩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只盛满稻谷的碗，和弗洛里一起喂了尼罗和鸽子们。仆人宿舍又传来几声大叫，还有男人低沉沙哑的声音，试图制止争吵。郭斯拉可在老婆们手下遭了不少罪。大老婆玛普，是个骨瘦如柴、面色严峻的女人，多次怀孕让她瘦得青筋毕露。“小老婆”玛伊，更加年轻，她浑身赘肉，像只懒猫。这两人，等弗洛里一去总部，或者两人一见面，就吵个不停。有一次，玛普抄起竹竿，追着郭斯拉跑，他躲到了弗洛里背后，结果这一竿子就狠狠地打到了弗洛里的腿上。

麦格雷戈先生正沿着小路轻快利落、大步流星地走上来，手里挥舞着一根粗手杖。他身穿一件卡其色、头巾布面料的衬衫、一条军队短裤，头戴一顶屠夫帽。除了做早操之外，一有时间，他早上就会散步两

英里。

“老兄早上好啊！”他用晨间热情亲切的嗓音朝弗洛里打了声招呼，还故意加上了爱尔兰口音。早上的这个钟点，他已经养成习惯，总是一副轻松、精神、清爽的样子。而且，前一天晚上，他刚刚读了《缅甸爱国者报》的那篇诽谤他的文章，很受委屈，所以才专门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来掩盖心中的不快。

“早安！”弗洛里也尽最大努力热情亲切地回了一句。

空话连篇的恶心老王八蛋！他看着麦格雷戈先生走上来，心里暗暗咒骂。看看他那屁股，从紧身短裤里凸显出来，跟画报里恶心的中年男童子军团长一样，像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同性恋者。穿得不伦不类，露出他那短粗、凹回去的膝盖，就因为只有白人萨布早餐前才锻炼——真恶心！

一个缅甸人走上山坡，穿着白色与洋红色的衣服。那是弗洛里的助理职员，刚从他小小的办公室赶过来，办公室就离教堂不远。快走到大门口时，他行了个什科礼，递上了一个脏兮兮的信封，邮票贴在信封口盖处，这是缅甸的习惯。

“早上好，先生。”

“早上好。这是什么？”

“地方信件，大人。早上邮差刚送来的。我想是封匿名信，先生。”

“噢，该死。行了，我大概十一点去办公室。”

弗洛里拆开了信封。信是写在一张大页书信纸上的，内容如下：

约翰·弗洛里先生：

先生，本人，即署名人，恳请并提醒您留意以下重要信息，大人必将从中受益。

先生，皎塔达地区对大人您与公职外科医师维拉斯瓦米的非凡友谊及密切交往议论纷纷，您经常去拜访此人、邀此人到府上做客，等等。先生，我们恳请您知悉上述的维拉斯瓦米医生并非善类，并且完全不配

做欧洲绅士的朋友。医生是个极其不诚、不忠、腐败的公务员，此乃人尽皆知之事。在医院里，此人用颜料水看病，其出售给病人的药品都是为了谋取私利，除此之外，此人还收受贿赂、敲诈勒索，罪行不胜枚举。此人曾用竹条鞭笞两名罪犯，并威逼其亲属给钱，否则将把辣椒揉进患处。同时，此人与民族党亦有瓜葛，并于近期为《缅甸爱国者报》上刊登的一篇居心叵测的文章提供材料，以攻击我们尊敬的副行政长官麦格雷戈先生。

同时，此人在医院强迫多名女患者与其发生性关系。

鉴于此，我们极其希望大人能够回避上述的维拉斯瓦米医生，并避免与此类人为伍，他们只能坏了大人名声。

祝大人福体安康、兴旺发达。

（署名）

一个朋友

这封信出自集市上一个专业写信人之手，是用正楷圆体写的，字迹战战兢兢，就像一个醉汉的描红练习一样。但是，这个写信的，绝不可能认得“回避”这样的词语。信一定是某个文员口述出来的，毫无疑问，幕后黑手一定是吴波金。“那条鳄鱼”寄来的，弗洛里心想。

他不喜欢这封信的语气。表面上谦卑，实则暗含威胁。“要么就和医生绝交，要么就等着接招”，这才是这封信传达的真正信息。其实也不必担心什么，任何一个英国人都从没觉得一个东方人能带来什么真正的危险。

弗洛里手里攥着那封信，琢磨着。接到匿名信，只有两个处理办法：要么只字不提；要么拿给当事人看。很明显，正确的做法是把信拿给维拉斯瓦米医生看，然后让他自己拿主意。

然而，和整个这件事撇清干系岂不是更安全。重要的是（也许算得上是白人萨布十大戒律中最重要的一条）不要卷入“土著”斗争。和印度人，毫无忠诚可言、毫无真正的友谊可言。有好感，甚至喜爱，可以。英国人确实经常很喜爱印度人——土著警察、护林员、猎人、文员、仆人。一个英国上校退休后，他手下的印度兵会像孩子一样抹眼泪的。某

些情况下，甚至与他们密切接触都可以。但结盟、结伙，绝对不行！哪怕想搞清楚“土著”斗争里的是非黑白，都有损威望。

如果他公开此信，会招致一场争吵和官方质询，这样，实际上，他也就和医生站在一边了，和吴波金成为了对手。吴波金倒是微不足道，但欧洲人就不可小觑了。如果他，弗洛里，公然与医生结盟了，代价将会是惨重的。倒是假装从未收到这封信会更好。医生是个好人，但是要是为了支持他而引来白人萨布们的狂轰滥炸……啊，不行，不行！救赎了自己的灵魂却失掉了整个世界，这怎么能划得来？弗洛里把信撕成了两半。这封信泄漏出去的危险性非常渺小，非常微妙。但在印度，你必须十分小心微妙的危险。威望，生命的元气，本身就很微妙。他仔细地把信撕成碎片，扔出了大门。

这时，传来一声可怕的尖叫，和郭斯拉老婆们的尖叫大为不同。园丁放下了锄头，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郭斯拉也听到了，从仆人宿舍急忙跑出来，头巾都没裹，弗劳猛然跳起，尖声吠叫了两下。又传来一声尖叫，是从房子后面的丛林里传出的，那是个英国人的声音，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惊慌失措地大喊着。

房子的后院没有出口。弗洛里翻过大门，下来时让碎石子擦破了膝盖的皮，流了点血。他绕过院子的围栏，进了树林，弗劳跟在他身后。就在房子背后，在第一层灌木后面，有一片洼地，里面满是积水，良礼彬村的水牛经常来这里。弗洛里穿过灌木丛，只见洼地里有一个英国女孩，她脸色煞白，蜷缩起身子靠在一棵灌木上，一只巨大的水牛顶着它月牙一样的牛角，怒视着女孩。一只毛茸茸的小牛犊站在它身后，显然这小牛是引起事端的原因。还有另一只水牛，泡在洼地的泥浆里，只露出个脖子，架着一张沧桑而冷静的脸，观察着这一切，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弗洛里走近时，女孩朝他投去痛苦的眼神。“啊，快过来！”她大叫着，声音愤怒而急促，那是受惊吓之人惯有的声音，“求求你！救救我！救救我！”

弗洛里大吃一惊，顾不上多问。他急忙冲向她，手里也没拿任何棍棒，一巴掌狠狠地甩到了水牛的鼻子上。这只大牲口吓了一大跳，笨拙地转过脸去，摇摇晃晃地走了，小牛犊也尾随其后。剩下的那只水牛也从泥浆里冒了出来，跌跌撞撞地走开了。女孩冲向弗洛里，差点撞进他的怀里，还没从惊吓中缓过劲来。

“啊，谢谢你，谢谢你！啊，那些可怕的东西！它们到底是什么啊？我以为它们会要了我的命。多恐怖的动物！它们到底是什么啊？”

“仅仅是水牛而已。是从上边的村子里来的。”

“水牛？”

“不是野水牛，不是我们所谓的野牛。它们就是缅甸人的一种家养牛。我想，它们可吓坏你了吧？真可怜啊。”

她仍然紧紧地贴着他的手臂，他能感觉得到她在颤抖。他低下头去，但看不到她的脸，只能看到头顶，她没戴帽子，头上黄色的头发很短，就像男孩子的头发一样。他看到她放在自己手臂上的一只手，纤长、稚嫩，还有像女学生一样的布满斑点的手腕。上一次他见到这样的手已是几年前了。他注意到紧紧贴在自己身上的那个柔软、年轻的身体，以及它散发出的热气，他心中的某种东西开始融化、慢慢变暖。

“好了，它们走了，”他说，“不用再害怕了。”

女孩从惊吓中稍稍地恢复了镇定，站得也离他稍远了一些，但一只手还是抓着他的胳膊。“我没事，”她说，“没什么事。我没受伤。它们没碰到我。只是它们的样子太吓人了。”

“它们其实一点也不危险。它们的角长得太靠后，根本无法攻击人。它们其实是非常愚蠢的畜生。只是在带着小牛的时候，才假装摆出要打架的样子。”

现在，两人全然分开站着，突然间气氛都有点尴尬。弗洛里已经侧站着了，以防她看到他有胎记的那半边脸。他说：

“我想，这真是一次奇怪的初次见面！我还没问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你从哪儿来？如果你不觉得这样问很唐突的话。”

“我刚从我叔叔的花园里出来。这是个美妙的早晨，所以我才打算出来走走。然后这些可怕的家伙就开始追赶我。你知道，我是刚来这个国家的。”

“你叔叔？噢，对了！你是拉克斯廷先生的侄女。我们听说你要过来。我说啊，咱们不如去练兵场那儿吧？这附近肯定有条小道。来皎塔

达的第一个早上就这么惊心动魄！恐怕缅甸给你留下了一个很糟糕的印象吧。”

“噢，没有，只是这里一切事物都很奇怪而已。灌木长得多茂密啊！互相缠在一起，很有异域的感觉。在这里，转眼间就能迷路。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丛林吗？”

“低矮丛林。缅甸大部分地区都覆盖着丛林，要我说，这就是一个绿得让人不爽的地方。我要是你，就不会穿过那片草丛。种子会钻进你的袜子，然后想方设法地钻进你的皮肤。”

他让女孩走在他前面，这样她就看不见他的脸了，他会感觉更自在。她在女孩子里算身材高挑的，也很苗条，身穿一条淡紫色的棉质连衣裙。举手投足间，让他觉得她也就二十岁出头。他还没仔细看过她的面容，但知道她戴了一副圆框的龟壳纹眼镜，而且她的头发几乎和自己的一样短。除了在画报里，他以前还从没见过女人留寸头呢。

他们走上了练兵场，他向前上了一步，与她并排走着，她扭过头来面对着他。她长着一张椭圆形的脸，五官清秀而匀称，也许算不上美，但在缅甸却显得很美，因为这里的英国女人都面黄肌瘦的。他猛地将脸侧了一下，虽然她本来就看不见那块胎记。他绝对不能让她近距离看到自己憔悴的面容。他好像觉得眼睛周围布满皱纹的皮肤就是块伤疤似的。但他记起自己早上刮过胡子，这又给了他些许勇气。他说：

“我想刚才的事一定让你惊魂未定。你回家之前，愿不愿意到我家休息几分钟？而且，这个钟点出门不戴帽子也不行啦。”

“噢，谢谢，我愿意去坐坐。”女孩说道。他想，她不可能懂得在印度什么样的行为才算得体。“这里是你家吗？”

“是的。我们必须从前面绕进去。我叫仆人拿把遮阳伞给你。你留着短发，可经不住晒。”

他们沿着花园小径走着。弗劳围着他们蹦蹦跳跳的，试图引起注意。一见到陌生的东方人，它总是会朝他们汪汪叫，但它却很喜欢欧洲人的气味。太阳越来越毒。小径旁边的矮牵牛丛那里，飘来一阵黑加仑的味道，其中一只鸽子扑腾着翅膀落到地上，弗劳朝它猛地一扑，吓得它又急忙飞到空中。弗洛里和女孩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来赏花。一股莫

名其妙的幸福感突然涌上两人心头。

“这样的烈日下，你千万不能不戴帽子啊。”他重复着，而且这样说让他感觉到一种微妙的亲密感。不知怎的，他就是没法不去提及她的短发，他觉得那短发真是太美了。仅仅是谈及它，都会让他感觉像是在用手抚摸着它。

“哎呀，你的膝盖在流血，”女孩说，“是赶来救我的时候弄伤的吗？”

在他卡其色的长袜上有一小股血迹，已经快干了，变成了紫色的。“不值一提。”他说，但那时两人谁都没觉得这件事不值一提。他们开始情绪高涨地谈论起花儿来。女孩说她“热爱”鲜花。弗洛里带着她沿着小路往上走，滔滔不绝地讲着一草一木。

“看呐，这些福禄考花长得多好呀。在这个国家，它们能连续开六个月呢。它们啊，有多少阳光都晒不够。我觉得，那些黄色的花简直就和报春花一个颜色。我都十五年没见过报春花了，还有桂竹香。那些百日菊很漂亮，对不对？——就像画里的花一样，还有绝妙的底色衬托着。这些是非洲金盏花，它们太普通了，基本就跟野草没什么两样，但你还是忍不住喜欢它们，它们是那么生机勃勃、茁壮坚韧。印度人特别钟爱这种花，他们走到哪里，金盏花就出现在哪里，即使是它们已在丛林中销声匿迹，几年后你还是会看到它们。我还想带你到我的阳台上，看看兰花。我种了些兰花，必须给你看看，它们简直像金子做的铃铛——真的像极金子了。它们散发出蜜的味道，浓烈得让人招架不住。这个可恶的国家就这点好处，很适合花生长。你喜欢园艺吗？希望你喜欢。在这个国家，这就是我们最好的慰藉。”

“啊，我简直是爱死园艺了。”女孩说道。

他们走进了阳台。郭斯拉匆匆忙忙地穿上因基，裹上他最好的粉色丝质岗包，从屋里走了出来，手上端着个盘子，上面有个装了杜松子酒的醒酒瓶，还有两个酒杯和一包香烟。他将这些放在桌上，用带点疑惧的眼神打量着女孩，将两手平合在一起，行了个什科礼。

“我想早晨这个钟点请你喝酒，你是不会喝的吧？”弗洛里说，“我就是没法让我的仆人明白，有些人在饭前不喝杜松子酒也活得好好的。”

他把自己也算进去了，郭斯拉拿酒给他的时候，他挥手拒绝了。女孩坐在了郭斯拉在阳台边上为她准备的柳条椅子上。兰花深色的叶子就悬挂在她脑袋后面，几束金黄的花绽放着，散发出蜜一样的香甜气味。弗洛里靠着阳台栏杆站着，侧脸对着女孩，掩藏起有胎记的那半边脸。

“你这里的风景简直太美妙啦。”她边望着山下边说。

“确实啊，是吧？烈日当空的这黄晕，简直美极了。我很喜欢练兵场上那昏黄的颜色，还有那一团团火红火红的凤凰花。天边的山峦，几乎是青黑色的。我的营地就在山的另一头。”他说。

女孩有远视眼，她摘下眼镜，向远处望去。他注意到，她的眼睛是清澈的淡蓝色的，比风铃草的颜色还要淡。他观察到她眼睛周围的皮肤细腻光滑，几乎像是花瓣一样。这又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和憔悴的面容，于是他又把脸侧过去一些。然后一时兴起，他说：

“我觉得，你能来皎塔达，我们太幸运了！你都想象不到能在这种地方见到一张新面孔是多么难得。好几个月都只能痛苦地和已经认识的这帮人打交道，偶尔来个出差的官员，或者就是几个美国环球旅行者拿着相机一路从伊洛瓦底江过来。我猜你是直接从英格兰来的，是吗？”

“噢，其实不是直接从英格兰过来的。来这儿之前，我住在巴黎。跟你说，我母亲是个艺术家。”

“巴黎！你真的在巴黎居住过？天哪，从巴黎到皎塔达，太不可思议了！你知道吗，在这种鬼地方简直不敢想象世界上还有像巴黎这样的地方。”

“你喜欢巴黎吗？”她问道。

“我从没去过。但是，上帝啊，我想象中的巴黎啊！在我脑海里就是一连串的画面：咖啡馆、林荫大道、艺术家工作室、维荣[5]、波德莱尔[6]、莫泊桑[7]交织在一起。你不晓得在这里，那些欧洲城市的名字听起来是什么感觉。你真的在巴黎住过？在咖啡馆里和学艺术的外国学生坐在一起，一边喝着白葡萄酒一边聊着普鲁斯特[8]？”

“嗯，我想差不多吧。”女孩笑了笑，说道。

“你会发现这儿的生活和原来简直是天壤之别！这儿没有白葡萄酒，也没有普鲁斯特，倒可能有威士忌和埃德加·华莱士[9]之类的。但你要是想读书，也许会在我的藏书中找到你爱读的。俱乐部阅览室里的书都是垃圾。但是，当然啦，我这儿的书都过时得无可救药了。我想你已经读遍世间万卷书了吧。”

“啊，没有没有。但我确实爱好读书。”女孩说。

“能遇见爱书之人，多好啊！我是说爱读有价值的书，而不是俱乐部阅览室里的垃圾。如果你觉得我这个人啰哩啰嗦，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碰到愿意读书的人，我的话就会像温啤酒一样喷涌而出啊。在这种国家，你得原谅这样的过错。”

“啊，但是我很喜欢谈论书。我觉得阅读太美妙了。我的意思是，生活中没有了阅读会是怎样啊？简直是……是……”

“是与世隔绝的阿尔赛下[10]。没错！”

他们随即热情饱满地畅聊起来，先是聊书，然后又聊打猎，女孩似乎对此很感兴趣，缠着弗洛里让他讲打猎的事。当他聊到几年前猎杀大象的事时，女孩听得激动不已。弗洛里几乎没发现，也许女孩也没注意到，都是弗洛里一人在滔滔不绝地讲话。他没法停下来，闲聊是如此令人愉悦，而女孩又很愿意听。毕竟，是他把她从水牛面前救了下来，再说，她到现在都不信那些凶狠的畜生不会攻击人，那一时刻的他，在她眼里，俨然是一个英雄。你一生中要是得到了某种赞赏，通常都是无功受禄。谈话进行得那么的轻松，那么的自然，好像要一直聊下去，永不停歇。但就在这时，愉快的感觉突然烟消云散了，他们惊了一下，不说话了。因为他们发现身边还有其他人。

在阳台另一端的栏杆中间，一张长着炭黑色小胡子的脸正带着极大的好奇窥视着。这是老萨米的脸，那个“好学”的厨师。他身后还站着玛普、玛伊和郭斯拉家的老大到老四，以及一个不知道是谁家的光不溜的小孩，还有两个老妇人，她们听说这里来了个“英格莱玛”[11]，于是从村里赶过来看看。她们的两张脸就跟柚木雕像一样呆板，嘴里还插着一英尺长的雪茄，这两个老家伙目不转睛地盯着这“英格莱玛”，就像英国的乡巴佬们盯着全副武装的祖鲁武士一样。

“这些人……”女孩看着他们，很不自在地说。

萨米意识到自己被发现了，十分内疚，于是假装在整理自己的头巾。围观的其他人也感到些许窘迫，只有那两个呆板的老妇人，还是脸不红心不跳。

“真是厚颜无耻！”弗洛里说。一股冰冷的失望感涌上心头。发生了这样的事，女孩是不能在他的阳台上久留了。突然之间，他俩都意识到彼此也还是十足的陌生人。她的脸微微泛红。随即，她戴上了眼镜。

“恐怕这些人还从来没见过英国女孩儿啊，”他说，“他们没有恶意。走开！”他生气地加了一句，朝围观的人群挥了一下手，然后他们便散去了。

“那个，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我该走了，”女孩站起身说，“我出来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可能会想我跑到哪里去了。”

“真的要走了吗？时间还早。我给你找个东西，在回家的路上遮阳。”

“我真的得……”她又开口了。

话没说完，她停下来看着门口。原来是玛拉美出现在了阳台上。

玛拉美一手叉腰，走上前来。她刚从屋子里出来，看上去从容不迫，好像她天经地义地应该出现在这里。两个女孩面对面地站着，相隔还不到六英尺。

两人的对比再奇怪不过了：一个皮肤白皙，就像是苹果花；另一个肤色暗沉，打扮花哨，圆柱形的乌黑发髻和橙红色的丝质笼基都有如金属似的闪闪发亮。弗洛里想到自己之前从未察觉玛拉美的脸竟如此之黑，她瘦小、僵硬的身体看上去竟如此之怪，就像军人的身体一样笔直，除了臀部像花瓶一样的突起外，没有丝毫曲线。他靠在阳台扶手上，看着两个女孩，两个女孩谁也没理他。有将近一分钟，两人就死死盯着彼此；但并不清楚到底哪个女孩觉得眼前的对方更稀奇古怪、难以置信。

玛拉美转过头去，看着弗洛里，两条黑色的眉毛细得就像铅笔画出的线，她皱起双眉。“这女人是谁？”她没好气地质问道。

他很随意地答了一句，就像吩咐仆人做事一样：

“马上消失。你要是给我找麻烦，我非拿竹棍子揍你，打断你的肋骨，一根好的都不剩。”

玛拉美犹豫了一下，耸了耸她瘦弱的肩膀，然后走开了。女孩看着她离开，好奇地问道：

“刚才那是个男人还是女人？”

“女人，”他说，“我想是一个仆人的老婆。她来问洗衣服的事，仅此而已。”

“噢，缅甸女人长那个样子啊？她们长得真古怪！来这儿的时候，我在火车上看到好多这样的人，你知道吗，我以为她们都是男孩子呢。她们简直就像一种荷兰娃娃[12]，对不对？”

她开始往阳台的台阶那里走，玛拉美走开后，女孩就对她失去了兴趣。他没留她，因为他觉得玛拉美很有可能再回来，然后大吵大闹。这样倒也没什么关系，反正两个女孩谁都听不懂对方的话。他朝郭斯拉喊了一声，郭斯拉赶紧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把很大的油伞，是丝质的，伞骨是竹条做的。他毕恭毕敬地撑开伞，在台阶下候着，女孩走下来时，将伞举到了她的头顶。弗洛里将他们送至大门那儿。两人停下来握手，在强光下，他稍稍侧了侧头，掩藏起他的胎记。

“我这个伙计会送你回家。你能进来坐坐真好。你不知道能认识你我有多高兴。你来到皎塔达，一定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大不同的。”

“再见，嗯——啊，真有意思！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弗洛里，约翰·弗洛里。那你呢——拉克斯廷小姐，对吗？”

“对。我名叫伊丽莎白。再见，弗洛里先生。实在太感谢你了啊。那头可恶的水牛。你简直是救了我的命啊。”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我希望今晚能在俱乐部看见你，你会去对吧？我想你叔叔和婶婶会过去的。那回见咯。”

他站在门口，目送他们走远。伊丽莎白——多美的名字，这年头，

很少有姑娘叫这个名字了。他希望她的名字是带Z的那个伊丽莎白[13]。郭斯拉在她身后以一种古怪又难受的步态快步跟着，伸直了胳膊为她撑着伞，身体却尽最大努力与她保持距离。山坡上吹过一阵凉爽的风。在缅甸，像这样短暂的风一般只会在凉爽的天气里偶尔出现，不知从哪里吹来，惹得人们渴望与怀念那清凉的海上泳池、美人鱼的拥抱、瀑布和冰窟。清风刮过凤凰树宽大的树冠，沙沙作响，卷起了半小时前弗洛里扔在门口的匿名信碎片。

---

[1] 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约为2.54厘米。全书同。

[2] 蜂虎（bee-eater），一种鸟，以蜂及其他昆虫为食。

[3] 曼尼普尔邦（Manipur），属印度，位于印缅边界。

[4] 泽巴蒂（Zerbadi），穆斯林男人与缅甸女人的后代称为泽巴蒂。

[5] 维荣（Villon，1875—1963），法国著名画家。

[6] 波德莱尔（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象征派诗人。

[7] 莫泊桑（Maupassant，1850—1893）法国小说家。其著名作品包括《羊脂球》。

[8]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小说家。其著名作品包括《追忆逝水年华》。

[9] 埃德加·华莱士（Edgar Wallace，1875—1932），英国犯罪小说作家、记者、编剧。

[10] 阿尔赛下（Alsatia），位于伦敦，是旧时负债人和罪犯避难的地区。

[11] 英格莱玛（Ingaleikma），缅甸语，意为“英国女人”。

[12] 荷兰娃娃（Dutch Doll），一种荷兰的木制娃娃，带有可弯曲的关节。

[13] 带Z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with a Z），英文名伊丽莎白有两种拼写方式：Elizabeth和Elisabeth。

第七章

拉克斯廷家的客厅里，伊丽莎白正躺在沙发上，架着双脚，枕着垫子，读着麦克·阿伦[1]的《这些迷人的人》。总的来说，麦克·阿伦是她最喜欢的作家，但当她想读一些更加严肃的东西时，她就更倾向于威廉·洛克[2]的作品了。

浅色调的客厅非常凉爽，石灰水刷过的墙足足有一码厚。房间本来很大，但因为屋里到处乱摆着临时桌以及贝拿勒斯[3]的铜器饰品，看上去就没那么大了。房间里有一股印度印花布和败了的花的气味。拉克斯廷夫人在楼上，正睡觉呢。外面的仆人们也在宿舍里安静地午睡，倒在木头枕头上，睡得正沉。拉克斯廷先生在路那头的木制小办公室里，八成也在睡觉。只有伊丽莎白这儿还有动静，还有在拉克斯廷夫人门外拉风扇绳的那个童仆，他仰面朝天地躺着，一只脚拉着绳套。

伊丽莎白刚过二十二岁，是个孤儿。她父亲虽没有他兄弟汤姆酗酒厉害，但也是半斤八两。他生前是个卖茶叶的生意人，财运大起大落，但他生性乐观，在手头宽裕的时候也没攒下几个钱。伊丽莎白的母亲是个无能又愚蠢、自负又自怜的女人，她仗着文艺方面的悟性，甩掉了生活中本应承担的一切正常责任，虽然事实上她根本没有这种悟性。她胡乱地搞了几年诸如“女性选举权”、“更高的思想境界”之类的东西，又好几次进军文学界无果，最终决定要画画了。作画是唯一不需要天分，也不需要勤奋就能上手的艺术。这位拉克斯廷夫人自认为是个艺术家，被放逐于“平庸之辈”里——其中，毫无疑问，就包括她丈夫——这样的姿态给了她无穷的力量，把自己变成了个十足的讨厌鬼。

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伊丽莎白的父亲设法逃过兵役，并赚了大钱，刚刚休战后，他们一家就搬到了海格特的一栋巨大、荒凉的新房子里，有很多暖房、灌木、马厩和网球场。她父亲雇来了一大批佣人，甚至，极度乐观的他还请了个管家。他把伊丽莎白送到了一个昂贵至极的寄宿学校待了两学期。啊，美好的时光，美好的时光，那两学期让人难忘的美好时光啊！学校里有四个女孩是贵族，她们几乎每人都拥有一匹小马，学校准许她们在星期六下午骑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短暂的定型期来决定此人以后的性格，对伊丽莎白来说，这个定型期就是那

两个学期，她与富人朝夕相处的那两个学期。自此，她生活的全部准则就可以总结成一个信念，一个简单的信念，那就是“好的”东西（她的用词是“美妙的”）就等同于昂贵的、优雅的、贵族的；而“坏的”东西（她的用词是“糟糕的”）就等同于廉价的、低等的、破旧的、艰苦的。也许世上之所以有这种昂贵的女校，就是为了弘扬这一信条吧。伊丽莎白慢慢长大，这种感觉也日渐微妙，充斥于她全部的思想里。任何事物，不管是一双长袜，还是一个人都可以按“美妙的”和“糟糕的”来分类。不幸的是——由于后来她父亲的财运断了——“糟糕”的东西几乎成了她生活中的唯一。

1919年底，她们家不可避免地垮掉了。伊丽莎白被迫退学，去到一连串廉价、糟糕的学校继续学业，中间由于父亲支付不起学费还休学了一两学期。她二十岁的时候，父亲得流感去世了，留给拉克斯廷夫人每年一百五十英镑的收入，直到她也去世。以拉克斯廷夫人的持家方式，两个女人不可能以每周三英镑的开销在英格兰过活。于是她们搬去了巴黎，那里生活成本更低，而且拉克斯廷夫人也下定决心要在那里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艺术事业。

巴黎！生活在巴黎！弗洛里想象中的巴黎生活，就是与大胡子艺术家们在绿油油的法国梧桐下随心所欲地畅谈，这与伊丽莎白在巴黎的境况实在相去甚远。她的生活远不是如此。

她母亲在蒙帕纳斯区开了间工作室，然后马上又陷入了邋遢、迷茫和闲散的生活状态。她不善理财，最后导致生活拮据、入不敷出，有那么几个月，伊丽莎白几乎都吃不饱饭。之后，伊丽莎白找了份工作，去一个法国银行经理家教英语。他们管她叫“我们的英国小姐”。这个银行家住在第十二区，离蒙帕纳斯很远，于是伊丽莎白就在附近的一栋膳宿公寓租了个房间。这座黄色的公寓十分狭窄，坐落在一条小路上，面对着一个卖家禽的商店，店里挂着的野猪尸体臭气熏天，老头们每天早上都要来这家店，然后像老色鬼一样销魂地闻个没完。家禽店隔壁是一家满是苍蝇的咖啡厅，挂着“友谊咖啡厅·过瘾黑啤酒”的招牌。伊丽莎白简直恨死那个膳宿公寓了啊！女房东是个鬼鬼祟祟的老婆子，总是从头到脚一身黑，她成天蹑手蹑脚地在楼梯上爬上爬下，想逮着在洗手盆里洗袜子的寄膳者。这些寄膳者都是些嘴上不饶人的寡妇，她们脾气暴躁，个个都在追求着公寓里那个唯一的男人，那个性情温和的秃顶男人，他在莎玛丽丹百货公司工作，她们就像麻雀一样惦记着他这块面包皮。吃饭的时候，她们都紧紧盯着别人的盘子，好看看谁分到的食物最

多。浴室是个很昏暗、很简陋的小房间，墙皮都鼓了起来，就像麻风病人的皮肤，还有个摇摇晃晃、生满铜绿的热水锅炉，它总是往浴池里吐上两英寸的温水后，就顽固地罢工了。那个让伊丽莎白教自己的孩子们英语的银行家五十岁了，胖脸上总是满脸倦容，暗黄色的秃顶活像个鸵鸟蛋。她去教书的第二天，他走进孩子们正在上课的房间，在伊丽莎白旁边坐了下来，刚坐下就掐了一下她的手肘。第三天他掐了她的小腿肚，第四天是膝盖后面，第五天是膝盖上面。从那以后，每天晚上，他俩之间就会上演无声的战争，她的手在桌子下面，不断反抗着那只毛茸茸的手，让它别碰自己。

这真是卑贱、糟糕的生活。事实上，简直到了“糟糕透顶”的程度，伊丽莎白之前都不知道有这种糟糕的境界。但是最让她沮丧、最让她觉得沦陷到了可怕的下层社会的，其实是她母亲的工作室。拉克斯廷夫人是那种离了佣人就一团糟的人。她生活在画画和打扫房间永恒交替的噩梦之中，但从来没好好做过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她时不时会去“学校”里，在一位老师的指导下画出灰不溜秋的静物图来，老师的画功是在脏乎乎的画笔下练出来的；其余时间，她就在家痛苦地摆弄茶壶和煎锅。工作室的气氛对伊丽莎白来讲压抑得无法承受，简直是堕落，堕落至极。那里又冷又脏，简直就是个猪圈，地上到处堆满书和纸，生锈了的煤气灶上摆着好几顿饭用过的炖锅，油腻腻的，下午之前，床铺从来都不整理好，而且到处都是混进颜料的松节油罐和半满的凉红茶壶，每个犄角旮旯，都有可能被踩到或者被踢翻。你要是从椅子上拿起一个垫子，就会发现下边有个盘子，盘子上还盛着剩下的荷包蛋。只要伊丽莎白一走进屋，她就会大喊：

“哎呀，妈妈，亲爱的妈妈，您怎么能这样？看看这房间的样子！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简直太可怕了！”

“房间吗，亲爱的？怎么了？很乱吗？”

“乱！妈妈，您非得把那盘米粥摆在床中间吗？还有那些炖锅！看起来真恶心。要是有人来怎么办！”

这时，拉克斯廷夫人就透出专注而超凡脱俗的神情，每当要干活的时候她的眼神就是如此。

“我的朋友谁都不会介意，亲爱的。我们艺术家，都是自由奔放的人。你不了解我们是多么陶醉于绘画当中。你看，你就没有这种艺术气

质，亲爱的。”

“我得去洗干净这几个炖锅。你邋遢成这样，我就是想想都受不了。你把锅刷子搁哪儿了？”

“锅刷子？呃，我想想，我之前还在哪儿见过。哦，对！昨天我用锅刷子洗我的调色板来着。你好好用松节油洗洗它就成。”

伊丽莎白干活的时候，拉克斯廷夫人就会坐下，继续用炭精笔在一张素描纸上描描画画。

“你真好，亲爱的。真能干！我不知道你是遗传了谁的。现在对我来说，艺术就是一切。我好像觉得体内有汪洋大海在翻滚，吞噬了所有无关紧要的琐事。昨天我拿了本《纳什》杂志当盘子吃午饭，省下了洗盘子的时间。多棒的主意！你想要干净的盘子，直接撕下一张纸就好了……”

伊丽莎白在巴黎没有朋友。她母亲的朋友要么和她一个德行，要么就是些无用的老剩女，靠微薄的收入过活，整一些不值一提的、根本算不上艺术的把戏，比如说木雕啦，或者在瓷器上画画啦之类的。伊丽莎白所接触的其他人就都是外国人了，而且，只要是外国人她统统都不喜欢，或者说最起码是所有的外国男人，他们的穿着一看就是便宜货的衣服，吃相令人作呕。那时，她生活中一大慰藉就是去爱丽舍大街的美国图书馆看画报。有时星期天或者某个没事的下午，她就会在那里的又大又亮的桌子前坐上几个小时，一边读着《素描报》、《散图报》、《图画报》和《体育戏剧报》，一边做梦。

啊，画报上描绘的一切多美好啊！“波罗迪恩勋爵沃里克郡之豪宅，查尔顿礼堂草坪上举行名犬展。”“园内，泰克鲍尔比贵夫人，牵来了她那俊美的德国牧羊犬，此犬名叫忽必烈汗，曾于今年夏天在克鲁弗兹名犬展上斩获二等奖。”“戛纳日光浴。从左到右：芭芭拉·皮尔布里克小姐、爱德华·图克爵士、帕姆拉·韦斯特罗普女勋爵、塔比·贝纳克雷上校。”

美妙啊美妙，那金色的世界！有两回，她在画报上看到了自己以前一个校友的照片，让她简直心痛得要死。看看她那些老校友们，有马，有车，还有当骑兵的丈夫；再看看她自己，让可怕的工作、可怕的膳宿公寓和她可怕的母亲束缚住手脚！会不会再也无法逃离这样的生活？难

道她就这样被永远地困在了这悲惨又卑微的世界里，再也翻不了身，再也回不了那个体面的世界？

眼前有了她母亲这个例子，伊丽莎白名正言顺地鄙视艺术也是自然之事了。事实上，任何要求过度思考的事——用她的话讲是“要大动脑筋”的事——在她眼里，几乎都属于“糟糕”的事。真正的人，她觉得，体面的人——即那些捕猎松鸡、去阿斯科特赛马会、在考斯开游艇的人，可一点也不爱思考。人家就没有整天瞎折腾着写书，或者是拿着刷子乱挥一气；也没有琢磨那些高深莫测的想法——社会主义什么的。“高深莫测”在她的字典里可是个贬义词。之前有那么一两次，她遇到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这人愿意一辈子一穷二白地搞艺术，而不是给银行或者保险公司卖命，遇上这种情况时，她对此人的鄙视就远远超过对她母亲那帮半吊子的鄙视。一个男人放着好日子、体面的日子不过，非要为了无用之事白白牺牲自己的年华，这真是可耻、丢脸、堕落。她虽害怕到头来自己变成老剩女，但就算这样过上几千个轮回，也比嫁给这样的男人强。

伊丽莎白在巴黎待了快两个年头的时候，她母亲突然食物中毒去世了。其实真正令人惊奇的是，她为什么现在才食物中毒身亡。当时，留给伊丽莎白的，就只有不到一百英镑了。她叔叔婶婶随后立即从缅甸发电报来，让她来和他们一起住，并称还有封信随后寄到。

拉克斯廷夫人在信纸前左思右想，嘴里叼着笔，她清秀的瓜子脸低下来看着信纸，就像一条正在冥想的蛇。

“我想，咱们必须让她过来了，好歹也得住上一年。真是讨厌！但是，但凡她有点姿色，不出一年，也就应该能嫁出去。汤姆，我跟这侄女说点什么呀？”

“说什么？哦，就说在这儿找老公比在家乡容易多了。就这种话，知道了吧。”

“我亲爱的汤姆！你净扯些不靠谱的！”

拉克斯廷夫人写道：

当然了，这是个小地方，我们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丛林里度过的。恐怕习惯了巴黎的花花世界，你会觉得这里出奇地无聊。但说真的，这

些小地方，从某些方面来讲，对一个年轻姑娘也有好处。你会觉得自己在土著中间就像一个女王。单身汉们寂寞不堪，正盼着与哪个年轻姑娘红尘作伴呢……

伊丽莎白花三十英镑买了几身夏天穿的连衣裙后，就立即坐船上路了。船头，海豚翻腾着、欢呼着，船乘风破浪，驶过地中海，穿过苏伊士运河，驶入了一片如珐琅般耀眼的蓝色汪洋，之后又来到了印度洋一片绿浪中，成群结队的飞鱼让这驶来的大船吓得掠过海面。夜晚，海面发着磷光，船头掀起的浪花就像飞驰着、燃着绿火的箭头。伊丽莎白“热爱”船上的生活。她爱夜晚甲板上的载歌载舞，还有鸡尾酒，船上的每个男人好像都在争着请她喝酒，还有甲板游戏，但在其他年轻人玩腻了这些游戏的时候，她也就玩腻了。母亲两个月前才去世，她一点也不难过。她从没有很爱她的母亲，而且这里的人对她一无所知。败兴地生活了两年后，重新呼吸到奢华的空气真是美妙。不是说大多数船上的人都是有钱人，而是在船上，人人都表现得像有钱人一样。她会爱上印度的，她确定。从别的乘客的谈话中，她已经想象出了印度的样子；她甚至学了几句有用的印度斯坦语[4]，比如“idher ao”（过来）、“jaldi”（快点）和“sahiblog”（白人萨布），之类的。在她的想象中，她几乎感受到了俱乐部愉快的气氛，布屏风扇转动着，裹着白头巾、光着脚丫的男孩子们毕恭毕敬地行额手礼；练兵场上，皮肤晒成了古铜色、留着修剪整齐的小胡子的英国男人们跑前跑后地打着马球。人们在印度的生活，就几乎和变成富豪一样棒。

在碧绿如镜般的海域，海龟和黑蛇浮出水面，沐浴在阳光中，客船慢慢驶入了科伦坡。一群舢板突然冲出，划船的人皮肤炭黑，因为嚼槟榔的缘故，嘴唇被染得鲜红如血。乘客们下船时，他们就费劲地将舢板靠近舷门，大声叫喊着。伊丽莎白和她的朋友们下船时，两条舢板的船头不断摩擦着客船的舷门，上面的船夫急切地朝他们喊话。

“别坐他的船，小姐！别跟他走！他没安好心，不配载小姐！”

“别听他胡说八道，小姐！恶心下流的东西！他尽整些恶心下流的把戏，恶心的土著把戏！”

“哈哈！好像他不是土著似的！哎呀，不是！人家是欧洲人，也是白皮肤，小姐！哈哈！”

“别吵吵了，你俩，再吵吵我就一人踹你们一脚。”伊丽莎白朋友的

丈夫说，他是个种植园主。他们上了其中一条舢板，驶向了阳光明媚的码头。这个揽到活的船夫扭回头去恶狠狠地朝他的对手吐了口唾沫，这一口唾沫他一定攒了很久了。

这就是东方。海面上闷热、潮湿的空气中，到处都是椰子油、檀香木、肉桂与姜黄的气味。伊丽莎白的朋友们将她带到芒特拉维尼亚[5]，在像可口可乐一样飘着泡沫的温热海水中沐浴。然后晚上的时候，她又回到客船上，一个星期之后便到达了仰光。

曼德勒北部，烧柴火的火车在一片巨大、干燥的平原上缓慢爬行着，一小时行驶十二英里，平原的尽头是此起彼伏的蓝色山峦。白鹭镇静自若、一动不动地站着，像极了苍鹭。阳光下，一堆堆的红辣椒闪烁着耀眼的深红色。有时候，一座白色佛塔会突然映入眼帘，就像仰卧着的女巨人的乳房。热带的傍晚降临了，火车依旧缓慢地颠簸前行，停靠在每个小站的时候，都会听到夜色里那野蛮的叫喊声。半裸的男人们，脑袋后面头发扎成小球，在火把的光芒中穿来穿去，在伊丽莎白看来，他们都跟恶魔一样丑陋得不堪入目。火车爬进丛林，看不见的树枝扫过窗户。差不多晚上九点的时候，火车到达了皎塔达，伊丽莎白的叔叔婶婶开来了麦格雷戈先生的车，他们正在车站等她，几个随行的仆人拿着火把。她婶婶走上前来，用她那纤细得如同蜥蜴般的手搭住伊丽莎白的肩膀。

“我想，你就是我们的侄女伊丽莎白咯？我们见到你太高兴了。”她说，并吻了她。

拉克斯廷先生借着火光从她老婆的肩膀上望过去。不由地轻轻吹了个口哨，惊叹道，“哇，好家伙！”然后他抓住伊丽莎白，吻了她，她觉得叔叔热情过头了。她之前从没见过他俩。

晚饭后，在客厅的风扇下，伊丽莎白和婶婶聊起了天。拉克斯廷先生在花园里溜达。表面上是出来闻闻鸡蛋花，实际上是在偷偷摸摸地喝酒，酒是一个仆人从房子后面偷给他的。

“我亲爱的，你长得多俊啊！让婶婶再看看你，”她抱着她的肩膀，“我真觉得这种伊顿式短发适合你啊。你在巴黎剪的吗？”

“是啊。大家都剪这种头发。脑袋小的人剪这种发型好看。”

“真好！还有龟壳纹眼镜，真新潮！我听说所有，呃，南美的交际花们都开始戴这样的眼镜了。我真没想到我侄女是这么漂亮迷人的一个美女。亲爱的，你刚刚说你多大了？”

“二十二。”

“二十二岁！明天我们带你去俱乐部，那些男人该乐坏了！他们寂寞得要命，可怜啊，总也见不到新面孔。你在巴黎整整待了两年？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那儿的男人没近水楼台先得月，居然放你走了。”

“婶婶，我恐怕没遇着很多男人。那儿都是外国人。我们得低调生活。而且我还要工作。”她补充了一句，觉得承认自己工作，实在是丢人。

“当然啦，当然啦，”拉克斯廷夫人叹了口气说，“哪里都有这样的事。漂亮姑娘们得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真不公平！我觉得有些男人好自私，这么多可怜的姑娘在寻觅伴侣，他们就是不结婚，是吧？”伊丽莎白没有接话，拉克斯廷夫人又叹了口气，继续说：“要是我还是个年轻姑娘，我一定会嫁人，什么人都成！”

两个女人目光交汇了。拉克斯廷夫人想说的有好多，但她不想挑明了说，只想给些暗示。她的好多话都是话里有话的，但是她也尽力使侄女明白自己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她用一种温柔而又客观的语气讲话，就好像在泛泛谈论一个无关痛痒的话题。

“当然，我必须指出来。有时候吧，女孩儿找不到老公，是她们自己的错。就连在这里都有这种事儿。我记得，就在不久前，一个女孩儿到了社交年龄，她在她哥哥那儿待了一整年，上门求亲的什么人都有——警察、林业官、木材公司相当有前途的男人们。但她把人家都拒绝了，我听说她想嫁个驻印度的文官。哼，最后还能怎样？当然了，她哥哥也不可能一辈子养着她。我听说，现在她回国了，可怜的孩子，给人家当侍女，和仆人没什么两样。一星期才挣十五先令！这种事儿多可怕，对不？”

“太可怕了！”伊丽莎白回应道。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了。早上，伊丽莎白从弗洛里家回来后，正在给叔叔婶婶讲述着她的遭遇。他们正在吃早饭，餐桌上摆着鲜花，头顶上

风扇在转，一个高个子、长得像只鹳的穆斯林管家，一身白色套装，头上裹着头巾，手里端着托盘，站在拉克斯廷夫人椅子后面。

“还有啊，婶婶，好有趣！在阳台上我遇到一个缅甸女孩儿。我以前还没见过缅甸女孩儿呢，就算见过，那时也不知道她们是女孩儿。她们真是好奇怪的小东西——黄皮肤、圆脸蛋，还有头顶上的黑发髻，她几乎就像个玩偶。她看起来只有十七岁的样子。弗洛里先生说她是他家的洗衣女工。”

印度管家长长的躯体绷了一下，他低头斜眼看着女孩，黑脸上两颗白眼珠显得很大。他英文很不错。拉克斯廷先生停了一下，他举着叉子，上面插着鱼肉，正准备往他那粗糙、张大的嘴里送。

“洗衣女工？”他说，“洗衣女工！我说，见鬼去吧！这个国家才没什么洗衣女工呢，知道不。洗衣服的活都是男人干的。要我说啊……”

然后，他突然不说话了，就好像桌子底下有人跺了他一脚。

---

[1] 麦克·阿伦（Michael Arlen），亚美尼亚散文家，编剧，小说家。

[2] 威廉·洛克（William J. Locke），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3] 贝拿勒斯（Benares），印度城市瓦拉纳西的旧称。

[4] 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包括印地语和乌尔都语。

[5] 芒特拉维尼亚（Mount Lavinia），斯里兰卡一个海滨城市，位于首都科伦坡南部。

第八章

那天晚上，弗洛里叫郭斯拉把理发师找来——此人是城里唯一一个理发师，是个印度人，他靠给印度苦工们剃头为生，每月向他们每人收八安那，两天干剃一次。欧洲人也找他理发，因为没有其他理发师了。弗洛里打完网球回来时，理发师已经候在阳台上了，弗洛里用开水和消毒液给剪刀消了消毒，然后开始理发了。

“把我最好的棕榈滩套装拿出来，”他跟郭斯拉说，“再拿件丝衬衣，还有我那双黑鹿皮鞋。还有上个礼拜从仰光寄来的那条新领带。”

“拿出来了，老爷。”郭斯拉说道，其实意思是他这就去拿。当弗洛里走进卧室时，他发现郭斯拉站在已经准备好的衣物旁边，略微绷着脸。刹那间，非常明显，郭斯拉知道弗洛里为什么要精心打扮一番（就是希望见到伊丽莎白），而他并不赞成此事。

“你怎么还不走？”弗洛里问道。

“帮您更衣，德钦。”

“今晚我自己更衣。你退下吧。”

他是要去刮胡子，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二次了，他不想让郭斯拉看见自己把剃须用品拿进浴室。他上次一天刮两次胡子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他暗自想，上个礼拜正好让人从仰光寄来了那条新领带，真赶巧啊。他认真仔细地穿戴整齐，然后用了将近一刻钟的时间梳头发，理完的头发僵硬地站在脑袋上，怎么梳都压不下来。

感觉好像转眼之间，他就已经和伊丽莎白一起沿着集市的路往下走了。之前，他是在俱乐部的“阅览室”里找到她的，她独自一人，他突然鼓起勇气问她愿不愿和自己出来走走，她立刻就答应了，令他大为吃惊，她甚至没和叔叔婶婶打声招呼。他在缅甸住了太久，都忘记英国的处事方式了。市集路上的菩提树下一片昏暗，绿叶虽遮住了弦月，但树叶的缝隙中还是闪耀着点点微弱的白色星光，就像一盏盏亮灯，悬挂在隐形的线上。一股股气味相继扑鼻而来，首先传来的是鸡蛋花甜腻的气

味，然后是维拉斯瓦米医生家对面的棚子里散发出的恶臭味，不是屎臭味，就是腐臭味。不远处还传来阵阵鼓声。

听到鼓声后，弗洛里想起路前方的吴波金家对面正在进行皮威舞[1]表演；实际上，是吴波金请人来演出的，虽然掏腰包的不是他。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弗洛里心头。他可以带伊丽莎白去看看那皮威舞表演！她会喜欢看的，一定会的，只要是长眼睛的人就无法抗拒皮威舞表演。也许等他们一起消失了这么久后，回到俱乐部时，就会传出他们俩的绯闻，但管它的呢！有什么关系？她和俱乐部那群傻瓜可不一样。而且一起去看皮威舞该多好玩啊！正在此时，轰隆一声巨响，音乐开始了，笛子声又尖又细、响板声噼里啪啦、鼓声低沉沙哑，在音乐的衬托中，一个男人的唱腔又大声又刺耳。

“那是什么声音啊？”伊丽莎白停下了脚步说道，“听上去就像个爵士乐队！”

“当地音乐。他们在表演皮威舞呢——是一种缅甸的戏剧，介于历史剧和滑稽剧之间，如果你能想象到这样一种形式的话。我想你会挺感兴趣的。过了转角就是。”

“哦。”她犹豫地回答道。

他们过了转角，走进了一片强光中。整条路上三十码的地方都让前来看皮威舞的观众堵得水泄不通。后边，在火光跳跃的汽油灯下，有个加高舞台；台子前面的乐班吹吹打打，奏出尖利的音乐；台上两个穿着戏服的男人手拿长弯刀摆着姿势，他们让伊丽莎白想起了中国的佛塔。整条路都挤满了穿纱制白袍的女人的背影，她们肩上裹着粉色的围巾，头上梳着黑色的圆柱形发髻。几个女人趴在席子上睡得正香。一个中国老人端着一盘花生，穿过人群，凄楚地拖着长音喊着，“Myaype！Myaype！（花生嘞！花生嘞！）”

“你如果想看，咱们就停下看上一会儿。”弗洛里说。

耀眼的灯光和乐班吓人的演奏几乎让伊丽莎白感到不知所措，但最令她惊讶的是眼前这群人就这样坐在路中间，就好像这里是剧院的观众席似的。

“他们总是这样在路中间看戏吗？”她说。

“每次都是如此。他们随便搭个台子，然后早上再拆掉。通宵表演。”

“但是规定允许他们这样堵住整条路吗？”

“啊，当然啦。这儿可没有交通规则一说。没有交通，哪来的规则，对吧。”

她觉得这太奇怪了。这时，几乎所有观众都从席子上回过头来，直勾勾地盯着这位“英格莱玛”。人群中间有六张座椅，上面坐着几个文员和官员，其中就包括吴波金，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自己那臃肿笨拙的身子转过来，跟欧洲人打招呼。音乐声刚落，满脸麻子的巴泰克就匆匆穿过人群，向弗洛里深深地行了个什科礼，神情还透着胆怯。

“老爷，我家主人吴波金问您和这位年轻的白人小姐愿不愿意过去看一会儿我们的皮威舞。他为你们准备好了座椅。”

“他们邀请我们过去坐，”弗洛里对伊丽莎白说，“你想看吗？很有趣的。那两个家伙马上就退下了，之后会有舞蹈表演。你要是觉得不无聊，咱们就坐下看一会儿吧？”

伊丽莎白非常犹豫。不知怎的，走进那帮臭烘烘的土著中间就是感觉不对，甚至感觉不安全。但是，她相信弗洛里，他应该知道怎样做是合适的，于是她就跟着他向座椅走去。席子上的缅甸人给他们让出了路，他们两眼盯着她，窃窃私语着。她的小腿擦过穿着纱制衣服的温热身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心的汗臭味。吴波金向她鞠了个躬，将腰弯到了他的极限，然后带着很重的鼻音说道：

“请您入座，女士！能认识您真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耀。晚上好，弗洛里先生！真是意想不到的惊喜。要是我们早知道您要大驾光临，就会准备些威士忌和欧式茶点了。哈哈！”

他笑着，让槟榔染红了的牙在灯光里闪着光，就像红色的锡纸。他如此肥胖、如此丑陋，让伊丽莎白不由地向后躲。一个身着紫色笼基的瘦小年轻人，朝她鞠了一躬，呈上了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两杯黄色的冰冻果子露。吴波金猛地拍了下掌，“Hey haung galay！（嘿，小子！）”他朝着身边的一个男孩喊。他用缅甸语下了一些命令，然后男孩费力地挤到了台前。

“他去让他们把舞技最好的演员叫出来给我们表演，”弗洛里说，“看，她出来啦。”

刚刚蹲在台子后面一个抽烟的女孩走上了台，来到了灯光下。她很年轻，肩膀瘦削，胸部平坦，她身着一件淡蓝色的缎子笼基，遮住了双脚。她臀部上方，因基的裙摆被衬裙撑开，并向外卷曲，这是缅甸古典的因基样式，就像一朵花蕊向下的花。她无精打采地将雪茄扔给乐班中的一个男人，然后她伸出一只纤细的手臂，抖了一下，像是在放松肌肉。

瞬间，一阵巨大而又尖利音乐声从乐班爆发出来。有像风笛一样的笛声，还有一种奇怪的乐器，由竹板组成，一个男人用小锤敲击着这些竹板，乐班里还有一个男人待在十二个大小不一的高鼓中间。他用手掌根部迅速地拍击着一个又一个的鼓。过了一会儿，女孩开始跳舞了。但刚开始，那还不能算作是舞蹈，她只是跟着节奏点着头，手肘来回扭曲，摆着姿势，动作就像老式旋转平台上的关节木偶一样。她脖子和手肘扭动的样子简直和关节娃娃一模一样，但又极为连贯灵活。她手指尖聚拢起来，就像蛇头一样扭曲转动着，弯回来几乎能和前臂平行。一点一点地，她加快了速度。她开始左右跳跃，虽然长长的笼基限制住了双脚，她还是会像行屈膝礼一样蹲下，然后又极为敏捷灵活地一跃而起。然后她又摆出了一个奇异的动作，膝盖弯曲，就像坐着一样，身体前倾，手臂伸出并扭动着，脑袋也跟着鼓点动。音乐的节奏到达了一个高潮。女孩直直站起，旋转起来，就像陀螺一样灵活，她因基的裙摆飞扬，就好像雪花莲的片片花瓣。然后，和之前突然响起一样，音乐戛然而止，女孩又俯身屈膝，观众爆发出喧闹的叫好声。

伊丽莎白观看舞蹈时百感交集，有惊愕，有厌烦，还有种近乎恐惧的感觉。她刚刚嘬了一口饮料，发现这饮料尝起来就像发油。她脚边的一张席子上，三个缅甸女孩枕着同一个枕头，睡得正熟，她们的三张椭圆形脸蛋排成一排，就像小猫的脸一样。在音乐声中，弗洛里朝着伊丽莎白的耳朵低声评论着舞蹈。

“我知道你会对此感兴趣的，这才带你来这儿。你饱读诗书，又在文明的地方待过，你可不像我们这儿这些可悲的粗人。你难道不觉得这舞蹈虽然挺怪异，但也挺值得观赏吗？看看那女孩儿的动作，看看那个奇怪的前倾动作，她就像一个牵线木偶，还有她手臂随着手肘扭动，就像准备进攻的眼镜蛇。很怪异，甚至丑陋，有种故意扮丑的感觉，而且动作中透露出些许邪恶，展现出蒙古人种的可怕。但当你仔细观察，你

就会发现舞蹈背后又传承了什么样的艺术，多少个世纪的文化啊！那女孩儿的每个动作都经过世世代代的研究和传承。每次仔细品鉴这些东方民族的艺术时，你都会看到一种不断追溯至远古的文明，几乎可以追溯到我们涂抹靛蓝蔽体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我也说不太清，缅甸人的全部生活和精神都可以透过那女孩儿扭动胳膊的姿势展现出来。你观赏她表演时，你会看到稻田、柚木下的村庄、佛塔、黄袍僧人、清晨在河里游泳的水牛、锡袍王的宫殿……”

音乐停止，弗洛里也突然不说话了。有一些东西，其中就包括皮威舞，能让他打开话匣子，让他轻率鲁莽地大谈特谈。但此时他意识到自己一直都像个小说中的人物在讲话，而且还是本不入流的小说。他将视线移开了。伊丽莎白听他讲话，感到既沮丧又难受。这个男人到底在讲什么啊？这是她的第一感觉。而且，她又听见了那个令她厌恶的词——艺术，还不止一回。她才第一次意识到弗洛里是个十足的陌生人，和他单独出来太欠考虑了。她环顾四周，看到的尽是黑色的脸和耀眼的灯光，这种奇异的场景几乎吓坏她了。她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像这样坐在这群黑人中间，几乎紧挨着他们，闻着他们身上的大蒜味和汗臭味，肯定不该这样吧？为什么她现在不是在俱乐部里，和其他的白人在一起呢？为什么他要带她来这里，坐在这群土著中间，看这种丑陋野蛮的表演呢？

音乐再度响起，皮威舞女孩又开始跳了。她脸上涂了厚厚的粉，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就像是一副有两只真人眼睛的白垩粉面具。她那毫无生气的椭圆形白脸和像木偶一样的动作，让她看起来丑陋可怕，就像个恶魔。音乐改变了节奏，女孩开始唱了，声音刺耳。这首歌有着轻快而扬抑顿挫的节拍，欢乐而又激烈。观众纷纷响应，一百多个声音一起哼唱着这刺耳的音节。女孩还是摆着刚才那个屈膝的姿势，她转过身来，撅着屁股对着观众。她那丝质的笼基像金属一样闪着光芒。她双手和手肘不停转动，臀部来回摇摆着。接着令人惊叹的技艺上演了，透着笼基还清晰可见，她的双臀开始随着音乐各自扭动。

观众掌声雷动。那三个在席子上熟睡的姑娘，这时也醒了，开始疯狂地鼓掌。一个文员带着鼻音用英语喊道：“好哇！好哇！”好让欧洲人听懂。但吴波金皱了皱眉并且挥了一下手。他很了解欧洲女人。而伊丽莎白，也已经站起来了。

“我要走了。是时候回去了。”她突然说。她移开了目光，但弗洛里可以看到她脸颊微微泛着红色。

他在她的身旁，站起身来，很是失望。“但是，哎呀！不能再待几分钟吗？我知道挺晚了，但他们现在就让这女孩儿上来了，本来她再过两小时才上场呢，就是为了招待我们。就再待几分钟？”

“我也没办法，本来很早前就该回去了。我不晓得我叔叔婶婶会怎么想。”

她马上就小心翼翼地从人群中挤了出去，他都没来得及感谢皮威戏班子这么大费周章，就赶紧跟在她后面。缅甸人给他们让开了路，脸上带着不悦。这些欧洲人怎么能这样，打乱了表演顺序，叫人家最好的舞者表演，然后人家才刚开始跳，他们就拍屁股走人了！弗洛里和伊丽莎白离开后，这里出现了一阵吓人的争吵，跳皮威舞的女孩不肯继续跳，观众又要求她继续。但之后，两个小丑匆匆上台，放了几个爆竹，讲了几句淫秽笑话，争吵就平息下来了。

弗洛里一路可怜兮兮地跟着女孩。她走得很快，头扭到一旁不看他，而且有时候还不说话。他们相处得好好的，真不敢相信发生这样的事！他一直试着道歉。

“我真的很抱歉！我不知道你会介意……”

“没事。有什么好抱歉的，我只是说是时候该回去了，仅此而已啊。”

“我本应该想到的。在这种国家，很难注意到这些事。这些人对得体的概念和我们不同，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加的严格，但……”

“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这个！”她气急败坏地喊道。

他发现自己越解释，情况越糟糕。他跟在她身后，两人一言不发地往前走。他很难过。自己真是蠢到家了！但是这么长时间了，对于惹她生气的原因，他还是摸不着头脑。不是皮威舞女孩的行为本身惹恼了她，这只不过激化了她的情绪而已。整个这次外出要专门跟那些臭烘烘的土著混在一起，给她留下了糟糕的印象。她肯定认为这不是白人男士该有的行为。还有他刚才怪里怪气、不知所云的评论，总用些长长的单词。她会愤怒地认为，他几乎是在吟诗作赋啊！同她在巴黎时不时遇到的那些糟糕的艺术家一个腔调。直到今晚，她都一直认为弗洛里很有男子气概。这时她又想起今天早上的惊险一幕，以及他是怎样赤手空拳对

付那头水牛的，她的愤怒也就稍稍平息一些了。等走到俱乐部门前的时候，她又想要原谅他了。弗洛里这时也鼓起了勇气再次开口。在一块空地上，他停下了脚步，她也站住了，借着透过树枝的点点星光，他可以隐约看清她的脸。

“哎呀，哎呀，我希望你真没生气。”

“没有，当然没有。我刚刚就说没有了。”

“我不该带你去那儿的。请原谅我。你知道吗，我并不打算告诉其他人你去哪儿了。也许说“你去花园里溜达了一会儿会更好一点”诸如此类的话。他们可能觉得一个白人女孩儿去看皮威舞很奇怪。我不会告诉他们的。”

“哦，我自己当然也不会说的！”她同意道，语气中的温和让他颇感意外。这之后，他明白她已经原谅自己了。但自己究竟是怎么惹她生气了，他还是没想明白。

他们分开走进了俱乐部，彼此心照不宣。这次外出是失败的，毫无疑问。今晚的俱乐部休息室有点开盛会的氛围。所有欧洲人都在等着欢迎伊丽莎白，管家和那六个童仆穿上了他们最好的上了浆的白色套装，在门两边排成两列，微笑着行额手礼。欧洲人都问候过伊丽莎白后，管家拿了一个巨大的花环来，这花环是仆人们为“萨布小姐”准备的。麦格雷戈先生发表了非常幽默的欢迎词来介绍大家。他说马克斯韦尔是“我们当地的树木专家”，韦斯特菲尔德是“法律和秩序的守护者，呃，还是当地土匪强盗的噩梦”，等等。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这么个漂亮姑娘的出现让大家都心情不错，甚至能去欣赏麦格雷戈先生的演讲了——说实话，为了这个演讲，他几乎准备了一个晚上呢。

埃利斯一瞅准时机，马上就一脸狡猾地抓住了弗洛里和韦斯特菲尔德的胳膊，将他俩拉进了棋牌室。他心情比平日好多了。他用他那又小又硬的手指掐了掐弗洛里的胳膊，掐得他很疼但动作不失亲切。

“哎哟，伙计，大家都在找你呢。你这么长时间都去哪儿了？”

“噢，去溜达了一会儿。”

“溜达！和谁？”

“和拉克斯廷小姐。”

“我就知道！这么说你就是那个上了钩的大傻瓜，对吧？大家还没看清‘鱼饵’长什么样呢，你就吞下去了。我以为你是老手了，不会上钩了，上帝啊，我真这么想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瞧瞧，还假装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嗨，我是说拉克斯廷夫人已经为她的宝贝侄女儿挑中了你啦，当然是这样。假如你不格外小心的话，就逃不掉啦。是不是呀，韦斯特菲尔德？

“没错，老伙计。又年轻，条件又优秀的单身汉。婚姻的羁绊什么的。他们盯上你啦。”韦斯特菲尔德说。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想法都是那里冒出来的。人家姑娘在这儿待了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呢。”

“够长了，你还不是已经跟人家到花园漫步了。你小心点。汤姆·拉克斯廷是个酒鬼没错，但他也不傻，他可不想下半辈子摊上个侄女儿养着。当然啦，伊丽莎白也清楚自己的出路在哪儿。所以啊，你长个心眼儿，别自个儿跳到人家的陷阱里。”

“该死，你没有权利这么说别人。毕竟，那姑娘还是个孩子。”

“我亲爱的老东西”——有了新的桃色话题，埃利斯现在几乎深情地抓住了弗洛里的大衣翻领，“我亲爱的，亲爱的老东西，你别犯傻了。你以为那姑娘很单纯吗，她才不呢。从国内赶来的女孩儿都一个样。‘是个男的就嫁，但婚前不同居’就是她们的座右铭，无一例外。不然的话，你觉得为什么那姑娘要来这儿呢？”

“为什么来？我不清楚。我想是因为她想来吧。”

“你这傻瓜！明摆着，她来这儿就是要虏获个老公啊。这太明显了吧！一个女孩儿，她要是在哪儿都找不到丈夫，就会来印度，这儿的男人做梦都盼着能遇着个白人女人。她们管这儿叫印度婚姻市场。生肉市场还差不多。每年一船又一船的女人来到这儿，就跟冷冻的羊肉一样，就指望着像你这样的恶心老光棍去哄抢呢。还是冷冻的。直接从冰上拿

下来的，鲜美多汁的大块肉。”

“你说得真恶心。”

“上等草料喂养出来的英国肉，”埃利斯开心地说，“新鲜到货。保证绝佳品质。”

他做了一套假装检查生肉的肢体动作，还销魂地吸了几口气。这个玩笑可够埃利斯再消遣好长时间的了，他的玩笑通常都是如此，而且没什么事能比抹黑一个女人的名声更令他兴奋了。

那天晚上，弗洛里没见到伊丽莎白几回。大家都在休息室里，喋喋不休地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在这些话题上，弗洛里总是聊不了多久。但对于伊丽莎白来说，俱乐部文明的氛围、周围白皮肤的面庞、亲切的画报以及“邦左”画，都让她在经历皮威舞那段烦人的小插曲后安下心来。

拉克斯廷一家在九点钟离开了俱乐部，步行陪他们回家的不是弗洛里，而是麦格雷戈先生。在凤凰树弯曲而微弱的影子中，他慢悠悠地走在伊丽莎白旁边，活像一只友好的蜥蜴怪兽。那个卑谬的故事，还有其他故事，有了新的倾诉对象。任何一个刚来皎塔达的人都会成为麦格雷戈先生的最佳听众，因为其他人都认为他无聊透顶，无人能及，而且在俱乐部里，他的故事被人打断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但伊丽莎白天生就是个好听众。麦格雷戈先生觉得自己很少遇到这么聪明的女孩。

弗洛里又在俱乐部待了一会儿，和其他人一起喝酒。人们下流地大聊特聊着伊丽莎白。关于维拉斯瓦米医生入选俱乐部的争吵也暂且搁置不谈了。而且，埃利斯前一天晚上张贴出的告示也被扯了下来。早上来俱乐部的时候，麦格雷戈先生看到了那张告示，他摆出一副公正无私的样子，立即坚持叫人扯了下来。于是这告示就这样被打压了，但它已经发挥出了预期的效果。

---

[1] 皮威舞（pwe），缅甸的一种民间舞蹈。

第九章

接下吴来波的金两与星维期拉，斯许瓦多米事医情生接之踵间而的至争。斗全面爆发。整个城镇都分成了两大阵营，每个土著，从地方法官到集市上扫大街的，都选择了自己支持的阵营，也都准备好在需要的时候出来作伪证。但两个阵营当中，医生的阵营力量颇显薄弱，诽谤工作也进展得相对不太顺利。《缅甸爱国者报》的编辑因煽动叛逆与诽谤污蔑正在接受审判，保释的请求也遭拒绝。他被逮捕在仰光激起了一场小型暴乱，两名暴乱分子死亡后，这场暴乱被警方镇压。这位编辑在牢里绝食，但六个小时之后就因受不了而放弃了。

在皎塔达也一样，发生了许多事。一个名叫俄瑞欧的土匪从监狱神秘逃跑了。有传闻说本区会爆发有预谋的土著造反，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这些传闻——目前还都比较抽象——都集中在一个叫做宋割的村子里，离马克斯韦尔割取柚木树皮的营地不远。据说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个魔术师，预言英国的统治要倒台，并且在分发魔法防弹夹克。麦格雷戈先生并没把这些传言太当回事，但也还是要求增派一支宪兵警力。据说一支由英国指挥官率领的印度步兵连马上就会派到皎塔达来。当然，韦斯特菲尔德一听说要出事了就马上赶到了宋割村，他还盼着出点什么事呢。

“上帝啊，他们要是能起来正儿八经地反抗上一回该多好！”出发前，他对埃利斯如是说，“但肯定和以前一样，无果而终。这些个造反都一个样，还没开始，就蔫儿了。你信吗，我从来都没朝人开过枪，连个土匪都没开枪打过。十一年了，除了参加世界大战，我还从来没杀过人呢。真没劲。”

“哎，得啦，”埃利斯说，“要是他们不采取什么行动，你还是可以抓几个团伙头头，私下里地用竹条狠狠抽上一顿。这总比让他们在我们那该死的监狱疗养所里养尊处优强吧。”

“嗯，也许吧。现在可不能这么做了。那些事无巨细的法律条文，我想，咱们还是得遵守的啊，谁让咱们当初犯傻制定了这些条文呢。”

“哎，让这些条文都见鬼去吧。竹条伺候是唯一能让这些缅甸人长

记性的办法。见过被打了的人是什么样吗？我见过。让牛车从监狱里给拉出来，鬼哭狼嚎的，女人们往他们屁股上抹香蕉泥。这滋味儿他们清楚着呢。要是我亲自上阵，我就像土耳其人那样抽他们的脚底板。”

“啊，得了。希望他们这次有点种，真正能折腾起来。然后咱们就派出宪兵，扛着步枪什么的。开枪打死几十个，绝对能让他们消停。”

但他们期盼的机会并没有来临。韦斯特菲尔德和随他一起去宋割村的十二个警察——一群兴高采烈的圆脸廓尔喀[1]男孩，迫不及待地想让自己手中的阔头弯刀沾点血，却失望地发现这个地区很是安宁。不管何处，连造反的影子都见不到，只有像季风一样规律的年度逃税，就是有些村民想逃过人头税而已。

天气越来越热。伊丽莎白第一次长了痱子。俱乐部里也基本没人打网球了，就算要打，人们也只是没精打采地玩上一局，然后就陷进椅子里，喝上好几品脱[2]温热的酸橙汁。果汁是温热的，因为每周只从曼德勒运来两次冰块，运来后也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全部化掉。凤凰花开得正艳。缅甸女人们为了不让她们的孩子晒伤，用黄色的颜料一条条地抹在他们脸上，看起来就像是非洲巫医一样。成群的绿鸠以及像鸭子那么大的皇鸠在集市道路两旁的菩提树上吃着果子。

这个时候，弗洛里已经把玛拉美赶出家门了。

肮脏、下流的勾当！这是个非常有力的借口——她偷了他的金烟盒，并且到李叶[3]家当掉了，李叶是个中国杂货商，也是集市上的非法典当老板——但其实，这就是个借口。弗洛里心里十分清楚，玛拉美也明白，所有仆人也都知道，他赶她走是因为伊丽莎白，是因为玛拉美口中的那个“染了头发的英格莱玛”。

一开始，玛拉美没有哭闹。弗洛里在给她写一张一百卢比的支票时，她站在那儿，一脸愠怒地听着弗洛里说她不用再来了，李叶或者集市上的一些印度商贩可以兑现支票。他比她还羞愧，不敢直视她的脸，声音变得模糊，充满罪恶感。帮她搬行李的牛车到了之后，他把自己关在卧室，一直躲到这一幕过去。

牛车慢慢腾腾地向前行驶，能听到那里传来几声男人的叫喊声；然后，突然之间爆发出一阵惊悚的尖叫声。弗洛里走了出来。一群人都顶着太阳在大门口纠缠。玛拉美抱住门柱不放，郭斯拉试图撵走她。她满

脸愤怒和绝望地盯着弗洛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德钦！德钦！德钦！德钦！德钦！”自己把她打发走后，还听见她这么喊自己德钦，弗洛里钻心地难受。

“怎么了？”他说。

原来玛拉美和玛伊在抢一顶假发，她们都说是自己的。弗洛里把假发给了玛伊，又给了玛拉美两卢比算作补偿。牛车颠簸着渐渐走远，玛拉美一脸郁闷，直挺挺地坐在她的两个柳条筐旁边，抚摸着膝上的一只小猫，这猫咪是他两个月前才送给她的礼物。

虽然郭斯拉早就盼着玛拉美被扫地出门，但现如今她真的走了，他倒没有高兴到哪里去。当他看到他家老爷去教堂——他称其为“英国佛塔”——就更不高兴了，因为随军牧师来的那个周日，弗洛里还在皎塔达，他就和其他人一起去教堂了。一共有十二个信众去了，包括弗朗西斯先生、塞缪尔先生以及六个土著基督徒，拉克斯廷夫人在一架只有一支脚踏板的小簧风琴上弹奏《主与我同在》。除了参加葬礼之外，这是十年内弗洛里第一次去教堂。“英国佛塔”里发生的事，郭斯拉也是云里雾里，但他知道去教堂就意味着体面，同其他单身汉的仆人一样，郭斯拉恨透了这个特质。

“这下麻烦了，”他闷闷不乐地和其他仆人说道，“这十天来，我观察他（‘他’指的是弗洛里）好久了。他抽烟少多了，一天才十五根，早饭前也不喝杜松子酒了，而且几乎每天晚上都刮胡子——虽然他以为我不知道，那个傻瓜。而且他又订了六件丝衬衣！我必须监督着裁缝干活，还得骂他狗娘养的，他才能按时完工。不祥的兆头啊！要我说，不出三个月，这家里准保要底朝天了！”

“啥，他是要结婚了吗？”巴佩说道。

“肯定的啊。一个白种男人开始去英国佛塔的时候，就是，这么说吧，毁灭的开始。”

“我伺候过好多主人，”老萨米说，“最糟糕的一个是温普尔上校萨布，他之前让他的勤务兵把我按在桌子上，然后他从后面冲过来用厚厚的靴子踹我，就因为我上香蕉炸面团太勤了。有些时候，他喝醉了酒，就拿起左轮手枪朝着仆人宿舍的房顶开枪，就在我们脑袋上方开枪。但我宁愿再伺候温普尔上校老爷十年也不愿意伺候一个萨布夫人，忍受她

的颐指气使。老爷哪天结婚，我就哪天走人。”

“我不会走的，我都伺候了他十五年了。但我清楚，那女人来了之后，等待咱们的是什么。家具上有灰尘，她就会朝咱们大声嚷嚷；下午咱们还在睡觉的时候，她就会叫醒咱们，让咱们端茶倒水；她还会动不动就到厨房检查，抱怨锅还没洗和面粉盒里有蟑螂。我敢打包票，这些女人晚上不睡觉，尽想些折磨仆人的新把戏。”

“她们有个小红本，”萨米说道，“上面记着集市上的每笔花销，这儿花个两安那，那儿花个四安那，让人家一分钱也赚不到。就连买一个洋葱头，她们也要斤斤计较，一个萨布为了五卢比的东西都没这样。”

“哎，我能不清楚吗！她比玛拉美还要可怕。女人啊！”他总结性地加了一句，还稍稍叹了口气。

大伙儿也都跟着叹气，就连玛普和玛伊也叹气了。两人谁都没觉得郭斯拉的话攻击的是她们女人，在她们看来，英国女人是另一个人种，也许都不是人类，她们是如此的可怕，以至于一个英国男人要是结婚了，就往往意味着他家的每一个仆人，包括跟了他许多年的仆人，都要开始远走高飞了。

---

[1] 廓尔喀（Gurkha），西方人称尼泊尔人为廓尔喀人。

[2] 品脱，英美制容量单位，1品脱约为5.7毫升。全书同。

[3] Li Yeik。

第十章

其实，郭斯拉的担心还为时过早。弗洛里认识伊丽莎白十天了，但与她的关系比起第一天两人初次见面时并没有增进多少。

碰巧大部分欧洲人都到林子里工作了，这十天，他几乎独占了伊丽莎白。弗洛里根本不该在总部消磨时间，因为每年这时候，伐木工作正是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不在，那个无能的欧亚混血监工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他还是没去林子里，借口说有点发烧，那个监工几乎每天都给他寄来绝望的求助信，报告工作中遇到的各种灾难。一只大象病了，将柚木运往河边的轻载重火车的引擎坏了，十五个苦力逃跑了。但弗洛里还是没动身，只要伊丽莎白在皎塔达，他就没办法离开——虽然至今还没什么戏，但他还抱有希望——想找回他们初次相见时那种轻松愉悦的友谊。

他们天天见面，早上见，晚上见，没错。他们每晚都在俱乐部打一场网球单打，每年这个时候，拉克斯廷夫人就浑身乏力，拉克斯廷先生也脾气暴躁，都不愿打网球，他们打完网球后，就会坐在休息室里，四个人边聊天边打桥牌。但即使弗洛里好几个小时都陪着伊丽莎白，而且他们也经常有机会独处，他还是时时刻刻都感觉不自在。他们聊天——只要是聊些平凡琐事——就能够无拘无束，但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远，就像是陌生人。在她面前，他感到浑身僵硬，他没办法忘记自己的胎记，他每天刮两次的下巴感到阵阵刺痛，威士忌瘾和烟瘾也折磨着他——因为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试图少吸烟少喝酒。十天过去了，他们的关系好像没有朝着他希望的方向更近一步。

不知为什么，他从来没办法像他希望的那样和她交谈。交谈，仅仅是交谈而已！听起来多容易，做起来多难！当你几近中年，深陷难捱的孤独时，对世界上任何东西的真实看法都被周围的人视作大不敬，对交谈的需求也就摆在首位了。但他就是没法和伊丽莎白正经地交谈。他们就像被下了咒，所有的谈话都被困在这陈词滥调里：留声机唱片、狗、网球拍——这些沉闷的俱乐部话题。好像除了这些，她压根不想聊别的事情。他刚刚聊到一个可能会有趣的话题，就会听到推脱之词，她口中就会流露出“我不想聊这个”的语气。他发现她读书的品位之后，简直失

望透顶。但她还年轻，他提醒自己，她不是还在巴黎的法国梧桐树下喝过白葡萄酒，聊过马塞尔·普鲁斯特吗？过一阵子，毫无疑问，她就会理解他的，成为他想要的伴侣。或许，他仅仅是还没有赢得她的信任罢了。

在她面前，他一点都不圆滑老练。就像所有孤独惯了的男人一样，他适应想法比适应人要来得容易。所以，虽然他们的谈话都很肤浅，他有时还是令她烦躁，不是因为他说的话，而是因为他的话外话。他们之间有种不自在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但经常差点因此吵起来。如果一人已经在一个国家住了很久，而另一个人是初来乍到的，两个人在一起时，前者绝对会成为后者的导游。这些天，伊丽莎白正在渐渐熟悉缅甸，自然而然，弗洛里就是她的翻译，说说这个，讲讲那个。他讲的话，或者是他说话的方式，激起了她心中模糊却又深刻的反感。因为她发现每当弗洛里聊起“土著”，他几乎总是向着他们说话。他总是在称赞缅甸习俗和缅甸特色，有时他甚至觉得缅甸人能比得过英国人。这让她很烦躁。毕竟，土著就是土著，有趣倒没错，但到头来还是“臣服于人”的民族，长着黑脸的劣等民族。他的态度太过包容了。至于自己是怎么惹着她了，他自己也一头雾水。他太想让她像自己一样热爱缅甸，而并不是用萨布小姐的那种呆滞、冷漠的眼光来看缅甸！他忘记了一点，那就是一个生活在国外的人，只有在鄙视当地人的时候，才能过得自在。

他太急于使她对东方的事物感兴趣了。就比如，他试图说服她学缅甸语，但没能成功。（她婶婶对她说过，只有传教的女人才说缅甸语呢，正经的女人会觉得会乌尔都厨房用语就足够了。）他们之间还有无数个像这样的分歧。她隐约领悟到，他的观点都不是英国男人应有的观点。她更加确信的一点是，他想让她喜欢缅甸人，甚至钦佩他们，钦佩那些长着黑脸的人，那些和野人没什么两样的人，想想他们的样子，都让她恶心得发抖！

什么场合都能引发这个话题。路上，一群缅甸人经过他们身旁。她会用充满新鲜感的眼神盯着他们，眼神带着一半好奇，一半厌恶。然后她就会跟弗洛里说，身边如果是其他人，她也会这样说：

“这些人简直丑得让人恶心，是吧？”

“是吗？我总觉得他们缅甸人长得挺迷人的。他们的身体多好看啊！看那家伙的肩膀，就像尊铜像。要是英国人都像他们一样光着膀

子，你想象一下会看到怎样的景象！”

“但他们脑袋的形状也太丑了吧！他们的头骨就像公猫一样，是向上斜回去的。还有他们的额头是斜上去的，显得他们凶神恶煞。我记得以前在哪本杂志中读过一篇关于人脑袋形状的文章，里面说斜脑门的人容易犯罪。”

“哎呀，得了，这有点一概而论吧！世界上差不多一半的人都是这种脑门。”

“嗯，是呀，如果你把有色人种也算上的话，那当然啦！……”

又或者也许一群女人经过他俩，向井边走去：五大三粗的乡下姑娘，浑身古铜色，头顶着水壶，身体笔直，像母马一样壮实的屁股凸出来。缅甸女人比缅甸男人还让伊丽莎白恶心，她总觉得自己和她们有种联系，也非常憎恨这种同黑脸生物的联系。

“她们也真够可怕的，是吧？长相真是粗俗，就像某种动物一样。你觉得真有人会认为这些女人有魅力吗？”

“她们本国的男人吧，我觉得。”

“可能会吧。但那黑皮肤，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能忍受得了！

“但，你知道的，迟早你会习惯这棕色皮肤的。其实啊，有人说——我觉得说得有道理——在这种国家待上个几年，就会觉得棕皮肤比白皮肤还要顺眼了。毕竟，棕色皮肤确实更加自然。就拿整个世界来看吧，白色就显得格格不入。”

“你有些想法可真够奇怪的！”

如此云云。她始终都觉得他的话让她有些不满和不安。尤其是在那晚，弗洛里允许弗朗西斯先生和塞缪尔先生这两个遭遗弃的欧亚混血在俱乐部大门口缠着他聊个没完。

伊丽莎白碰巧比弗洛里早到俱乐部几分钟，当她在门口听到他的声音时，就绕过网球场的围栏去找他。那两个欧亚混血悄悄地走上来，把弗洛里围在墙角，就像两只狗闹着要和主人玩一样。大部分时间都是弗朗西斯在讲话，他很瘦弱，极易激动，她母亲是个南印度女人，所以他

浑身的颜色就像烟叶一样棕黑；塞缪尔的母亲是个克伦人，他浑身浅黄色，红色的头发没什么光泽。两人都穿着破破烂烂的粗纹布衣裳，大大的遮阳帽下他们那纤细的身躯就像毒蘑菇的杆一样。

伊丽莎白一路过来时，正好听到一段又长又复杂的自传的只言片语。找白人聊天——专门聊自己的事——是弗朗西斯生活的一大乐趣。每隔几月，当他找着个欧洲人听他讲话，他的人生历程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地从他嘴里一涌而出。他单调的声音中带着鼻音，抑扬顿挫，语速快得不可思议：

“说到我父亲，先生，我不太记得他了，但他脾气非常暴躁，老是拿超级大的竹棍打我、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和两个母亲。而且，有时主教来的时候，我和弟弟就得穿上笼基混进其他缅甸小孩儿中间，好不泄露真实身份。我父亲从没当上过主教，先生。二十八年里，只说服了四人皈依，而且他超级爱喝中国米酒，这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影响了我父亲那本名叫《酒精的祸害》的小册子的销量。这是仰光浸信会出版社出版的，每本一卢比八安那。我同父异母的弟弟之前在一个大热天死了，他老是咳嗽，咳个没完。……”

两个欧亚混血见伊丽莎白来了，两人都脱帽鞠躬，夸张地咧嘴笑，露出牙齿。他们俩估计有几个年头没跟一位英国女士说过话了。弗朗西斯比以往更加激动地喋喋不休起来。他滔滔不绝地讲着，明显是怕别人打断自己，打断这个话题。

“祝您晚上好，女士，晚上好，晚上好！认识您真荣幸，女士！这几天太闷热了，对吧？但四月就是这样。我想您没因为长痱子受太多罪吧？把酸角碾碎，涂在患处，绝对没错。我每天晚上都得忍受痱子之苦啊。这玩意儿在咱们欧洲人中间很普遍啊。”

他把“欧洲人”念成了“欧洲银”，就像《马丁·翟述伟》[1]里的肖洛普先生一样。伊丽莎白没有回话。她冷冷地看着两个欧亚混血。她只是差不多晓得他们是谁，或者说是什么东西，她觉得他们和她讲话简直太冒失了。

“谢了，我会记住酸角治痱子的。”弗洛里说。

“这是著名中医的特效药，先生。还有，二位先生、女士，四月份的时候，只戴阔边帽是不明智的啊，先生。土著这样没事儿，他们脑壳

硬着呢。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很容易中暑啊。太阳对于欧洲人的脑壳来说太危险了。我是不是耽误您的时间了，这位女士？”

说这话时，他语气失落。伊丽莎白其实已经打算要冷落这两个欧亚混血了。她不知道弗洛里为什么要让他们缠着自己说个没完。她转身走向网球场，用手中的拍子在空中做了个练习动作，提醒弗洛里早就该过来打网球了。他看到了这个动作，于是不太情愿地跟着她过来了，因为他并不想冷落可怜的弗朗西斯，虽然说他确实无聊。

“我得走了，”他说，“晚安，弗朗西斯。晚安，塞缪尔。”

“晚安，先生！晚安，女士！晚安，晚安！”他们又挥了挥帽子，退去了。

“那两人到底是谁啊？”弗洛里跟上来时，她问道，“真是奇怪的家伙！他们星期天去教堂了。其中一个看上去几乎是白人了。但他肯定不是英国人吧？”

“不是的，他们是欧亚混血——父亲是白人，母亲是土著。我们给他们起了个亲切的外号，叫黄肚皮。”

“但他们在这儿做什么啊？他们住哪儿？有工作吗？”

“他们在集市上混。弗朗西斯给一个印度放款人打杂，塞缪尔是给几个状师干活吧。要不是一些土著的接济，他们肯定得经常饿肚子。”

“土著！你的意思是他们向土著讨饭吃？”

“我想是吧。要是一个人愿意的话，很容易就能讨着饭。任何人饿肚子，缅甸人都看不下去。”

伊丽莎白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这些男人，至少有一半白人血统，就这样穷得叮当响，活在土著中间，想想都让她感到震惊，于是她在小路上站住了，打网球也因此耽搁了几分钟。

“但，这也太离谱了吧！我是说，真是丢人现眼！这就简直跟我们当中某个人生活得那样窘迫一样糟糕。就不能帮帮他们？大家捐点钱，把他们打发走，或者想点别的法子？”

“恐怕那样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沦落到这个地步的。”

“但他们就不能找个正经的工作吗？”

“不见得能找到啊。你看，那种欧亚混血，在集市上长大，从没受过教育，从一开始就毁了。白人连用拐棍碰他们一下都不愿意，也完全不准他们在低级政府机构谋事做。除了讨饭，他们什么也做不了，除非放下有欧洲血统的那种自命不凡。你可别指望这些惨兮兮的家伙会这么做。那一丝白人血统是他们唯一的资产了。可怜的弗朗西斯，我和他素未相识，他就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他长痱子了。你也知道，土著是不会长痱子的，这都是一派胡言，但人们都相信。中暑也是一样。他们戴上那种大大的遮阳帽，就是要告诉人们他们长的是欧洲人的脑袋。就好像一种象征身份的盾徽。你也可以说是一种代表庶出的盾形纹章。”

这么说未能令伊丽莎白满意。她觉得弗洛里，和往常一样，又在偷偷地可怜欧亚混血。这两人的出现，在她内心又激起了一种很特别的厌恶感。她给他们贴好了标签。他们看上去就像是拉丁佬[2]。就像电影里演坏人的墨西哥人、意大利人，或者别的拉丁佬。

“他们看上去可真够堕落的，是吧？骨瘦如柴、软弱无力、阿谀谄媚，而且看上去一点都不诚恳。我想这些欧亚混血本来就够堕落的吧？我听说混血儿总是会遗传两种血统的缺点。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大部分欧亚混血都不怎么样，以他们这种教养，也很难有什么出息吧。但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实在是挺糟糕的。一说起他们，就好像他们都是从地里冒出来的蘑菇，长出来之前就已经缺点缠身了。但话又说回来，他们来到这世上，我们也是有责任的。”

“他们来到世上，我们有责任？”

“呃，他们的父亲不都是白人吗，对吧。”

“哦……那是自然……但毕竟，你没有责任啊。我是说，只有那种很低级的男人才会，呃，和土著女人有染的，对不对？”

“哦，没错。但我想那两个人的父亲都是神圣的神职人员。”

他想起了罗莎·麦克菲，1913年他在曼德勒勾引的那个欧亚混血女孩；他想起过去曾坐着马车，拉上窗子的挡板，偷偷溜到那个女孩家；他想起了罗莎那螺旋状的卷发；他想起了她年老干瘪的缅甸母亲在黑漆漆的客厅里给他上茶，客厅里还有养着蕨类植物的花盆和柳条编成的长沙发。后来，他把罗莎甩了，就收到了那些讨厌的信，带香味的信纸上写满了她的哀求，最后，他干脆都不拆开了。

打完网球后，伊丽莎白又回到了弗朗西斯和塞缪尔的话题上。

“那两个欧亚混血大家和他们有来往吗？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之类的？”

“老天啊，才不呢。他们完全被排斥了。事实上，和他们说话都显得很有失身份。我们大部分人都只是跟他们说句早安，埃利斯连说早安都不肯呢。”

“但你刚才和他们讲话了啊。”

“哦，对，有时候我也会破例。我是说，一个白人萨布或许不应该让人看见和这些人讲话。但你看，我会试着——只是有时候，当我有勇气的时候——不去做一个白人萨布。”

这话说得很不明智。到现在，她已经完全明白“白人萨布”是什么意思，以及它所代表的身份了。他这话让他们之间的分歧更加清楚明了。她瞪了他一眼，几乎带有敌意，眼神出奇地锐利。她虽然年轻，虽然拥有像花一样光滑的皮肤，但她的脸有时候看起来会很冷漠。那个时髦的龟壳纹眼镜，让她看起来十分泰然自若。眼镜的表达力强得出奇，甚至，比眼睛表达的东西都要多。

目前，他并不了解她，也没有得到她的信任。但最起码，表面上，他俩的关系还没有恶化。有时候他会令她烦躁，但第一天早晨他给她留下的好印象还没有消失殆尽。很奇怪的一个事实是，到现在她都没怎么留意他的胎记。而且她很爱听他讲某些话题，比如，打猎——她好像对打猎很有兴趣，这在女孩子中间倒是挺与众不同的。她对马也很感兴趣，但他对马懂得比较少。他已经安排好了，过些日子，等自己准备好了，就抽一天时间和她一起去打猎。两人都热切盼望着这次出行，不过原因不尽相同。

[1] 《马丁·翟述伟》（Martin Chuzzlewit），狄更斯的小说。于1843—1844年每月以连载的方式发表。小说的主题是人性的自私。狄更斯认为这是自己最出色的小说。

[2] 拉丁佬（Dago），拉丁人，尤其是指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或者葡萄牙人。

第十一章

弗洛里和伊丽莎白沿着集市的路走着。虽然还是早上，但天气十分炎热，在这种天气中漫步，就像是趟过酷热的海水一样。络绎不绝的缅甸人打集市那边过来，脚上的凉鞋嘎吱作响，一群群女孩四五并排地迈着小碎步匆匆走过，还一边叽叽喳喳地聊着天，她们的头发光滑又亮泽。快到监狱的地方，路边的一株菩提树用它强壮的树根掀翻了一座石塔，把碎片摔得到处都是。草丛里，散落的石塔碎片上雕着恶鬼的脸庞，它们凶神恶煞地望向天空。附近的另一株菩提树缠绕在一棵棕榈树上，将其连根拔起，向后弯曲，这个摔跤的姿势已经持续了十年之久。

他们继续前行，来到了监狱，这是一座正方形的楼房，长宽均为两百码，磨得锃光瓦亮的混凝土墙有二十英尺高。监狱里养着的一只孔雀，正沿着矮防护墙，迈着内八字步，一步一晃地走着。六个犯人过来了，他们低着脑袋，拽着两辆沉重的手推车，上面堆满了土，几个印度狱警正看着他们干活。他们都是长刑期的犯人，几个人笨手笨脚的，穿着粗白布做的囚服，剃光了的头上还戴着圆锥帽[1]。他们怯生生的脸扁平得出奇，脸色灰白。他们的脚链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一个头上顶着一篮子鱼的女人走过，两只乌鸦在篮子周围盘旋着，几度扑向里面的鱼，那女人则用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扇着，好撵走它们。

不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转过去就到集市了，”弗洛里说，“我想今天有早市。去看看应该很有趣的。”

他叫她和自己一起去集市，跟她说她一定会觉得好玩的。他们转过街角就到集市了。集市四面被围了起来，就像一个巨型牛棚，围栏四周的小摊矮矮的，顶棚大多是用棕榈叶搭的。围栏内，人群熙熙攘攘，人们喊叫着、推搡着，他们衣服五彩缤纷的颜色汇聚起来，就像从罐子里倾泻出成百上千的人。集市的远处可以看到一条宽广、泥泞的河流。树枝和一条条的浮藻以每小时七英里的速度顺流直下。河边停着一排舢板，在泊杆那里晃荡着，船头尖尖的，就像鸟喙一样，上面还画着眼睛。

弗洛里和伊丽莎白驻足观望了一阵子。一群群女人经过他们的身

边，手按着头上的菜篮，好让其保持平衡，孩子们瞪大了眼睛紧盯着欧洲人看。一个中国老人匆匆走过，身上那粗蓝布衣裳褪色很严重，都变成了天蓝色，他仔细地咀嚼着一条血淋淋的猪肠子，已辨识不清具体是哪个部位。

“咱们去摊子前看看，好不好？”弗洛里说。

“要走到人群里吗？到处都脏死了。”

“哎呀，没关系的，他们会给我们让路的。你会感兴趣的。”

伊丽莎白将信将疑地跟他过去了，甚至还有些不情愿。他为什么总是带自己来这种地方？他为什么总是把自己拽进“土著”中间，想让自己对他们产生兴趣，观察他们那种肮脏、恶心的习惯？反正，一切都不对劲。她觉得自己也讲不清楚为什么不愿意去，但她还是跟去了。一股让人窒息的空气迎面而来，那是一股混合着大蒜味、干鱼味、汗味、土味、茴芹味、丁香味和姜黄味的恶臭。人群朝他们涌来，有一大群粗矮结实、脸色棕黑的农民、脑袋后面盘着白色发髻的干瘪老头老太太，还有胯上抱着婴儿的年轻母亲。弗劳被踩了一脚，痛得尖叫了一声。那些农民光顾着砍价，都没工夫盯着白人小姐看，他们用力挤过小摊时，低矮、有力的肩膀就会撞击到伊丽莎白。

“看那儿！”弗洛里用手杖指着一个小摊，嘴里念叨着什么，但他的声音完全让两个女人吵架的声音淹没了，她们为了一篮子菠萝，正在朝对方比画着拳头。恶臭味和嘈杂声让伊丽莎白直向后退缩，但他压根没注意到，还一个劲地把她往人群中间领，一边指点着各种小摊。销售的货物看起来都像是外国运来的，样子古怪、质量拙劣。挂在绳子上的像绿色的月亮一样的巨大柚子、红香蕉、成筐成筐的个头能赶得上龙虾的淡紫色对虾、成捆成捆的脆鱼干、红辣椒、剖开像火腿那样熏制好的鸭子、绿椰子、独角仙[2]的幼虫、甘蔗段、短刀、喷了漆的凉鞋、印着格子图案的丝质笼基、大得像肥皂块一样的壮阳药、上了釉的四英尺高的土陶罐、中式糖蒜、绿色和白色的雪茄、紫色的茄子、柿子的种子穿成的项链、柳条笼子里叽叽喳喳的鸡、黄铜佛像、心形的槟榔叶、瓶装的克鲁什盐、假发、红粘土做的锅、牛蹄铁、纸板做成的牵线木偶、成条形的功效神奇的鳄鱼皮。伊丽莎白的头开始发昏。集市的另一头，阳光直穿过僧侣血红色的阳伞，就像从一个巨人的耳朵里照射出来一样。一个小摊前，四个达罗毗荼女人在用力地捣着木研钵里的姜黄。辛辣的黄色粉末飞扬到空中，折磨着伊丽莎白的鼻孔，让她连打喷嚏。她觉得自

己在这里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她碰了碰弗洛里的胳膊。

“这人群……这地方简直要热死了。不然咱们去阴凉处待会儿，怎么样？”

他回过头来。说实话，他光顾着讲话了，基本上没人听得见，因为周围声音太嘈杂，所以根本没发现炎热的天气和恶臭味很让她受不了。

“哎呀，那个，真对不起。那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吧。要不这样，咱们去李叶的店里看看吧，他是个中国杂货商，他会给咱们准备饮料的。这儿太闷热了。”

“这些香料真是呛鼻子。闻起来像鱼一样的那种怪味儿是什么呀？”

“哦，是他们用虾做的一种酱。他们把虾埋进土里，然后几周后再挖出来。”

“真是恶心死啦！”

“我想算是健康食品吧。别去碰！”他转向弗劳喊了一声，弗劳正在嗅着一篮子鱼，它们像小鲃鱼一样，腮上还长着刺。

李叶的店铺正对着集市的远端。其实在体验过集市的那种野蛮和粗俗后，伊丽莎白只想直接回俱乐部，但李叶店门口的欧式货品给了她些许安慰，店前堆着兰开夏产的纯棉衣裳和便宜得惊人的德国钟表。他们刚要踏上台阶，一个二十岁的瘦小伙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向他们走来，身上的笼基、蓝色的板球衣、亮黄色的鞋搭配起来很是难看，他留着分头，还按照“英格莱时尚”抹了发油。他别扭地做了个幅度很小的动作向弗洛里致敬，好像差一点就行了个什科礼。

“什么事？”弗洛里说。

“您的信，先生。”他拿出一个肮脏的信封。

“稍等一下好吗？”弗洛里对伊丽莎白说，一边拆开了信封。是玛拉美给他的信，或者说是玛拉美找人代写的，她在上面画了个十字押。信里索要五十卢比，还暗含威胁的语气。

弗洛里把年轻人拽向一边。“你会讲英语？告诉玛拉美我等下再处

理这事儿。告诉她要是她胆敢敲诈我的话，她一个子儿也甭想拿到。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先生。”

“赶紧走吧。别跟着我，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是，先生。”

“一个文员想谋份工作，”他们上楼时，弗洛里向伊丽莎白解释道，“他们成天来烦你。”然后，他感觉到信的语气十分奇怪，因为他没想到玛拉美这么快就开始敲诈他了，但他现在没功夫琢磨这信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们走进了商铺，刚从外面的强光中进来，这里显得格外昏暗。李叶正在一筐筐货物中间坐着抽烟，店里没有柜台，当他看见进来的客人是谁后，热情地摇晃着走上前来。弗洛里是他的朋友。他一身蓝色服装，膝盖弯曲，梳着一根辫子，一张黄脸上颧骨很高，下巴很短，就像个面善的骷髅头。他用缅甸语里那种像鹅叫一样的鼻音跟弗洛里打了声招呼，然后马上又摇摇晃晃地走到店后面，叫人拿点心。店里弥漫着一股清新、香甜的鸦片味。墙上贴着长长的红纸条，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在店铺的一边有一个小的香案，供奉着两尊面色安宁、穿着绣花袍子的大神像，前面有两柱香在慢慢燃烧。两个女人，一老一少，正坐在席子上用玉米秆和碎马毛一样的烟草卷着香烟。她们穿着丝质的黑色裤子，而她们的脚，足弓又鼓又肿，整个脚被塞进了红色鞋跟的木头便鞋里，这鞋子还没有木偶的鞋子大呢。一个光溜的小孩正在地上来回爬，就像一只巨大的黄色青蛙。

“看那些女人的脚！”李叶一转过身去，伊丽莎白就轻声说道，“简直太可怕了！她们是怎么把脚弄成那样的？肯定不是天生的吧？”

“不是的，她们人为裹成那样的。我想现在的中国女人已经不裹脚了，但这儿的人不太赶得上时代变化。老李的辫子也过时了。过去中国人认为小脚才美。”

“美？简直太吓人了，我都不敢看。那些人绝对没开化！”

“哦，不！他们的文明很发达，我觉得比我们的还要发达。对美的

定义完全是品味的问题。这个国家有一个叫做巴朗的民族，他们喜欢长脖子的女人。于是巴朗女孩们就戴上宽铜环来抻脖子，她们不断往脖子上加铜环，直到最后脖子看起来像长颈鹿的脖子。就像裙撑和圈环裙一样，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时，李叶带着两个脸圆圆的、胖乎乎的缅甸女孩出来了，两人明显是姐妹，她们一边咯咯笑着，一边在两人中间搬着两把椅子，还有一个蓝色的中国茶壶，里面大概能盛半加仑的水。两个女孩是，或者曾经是李叶的小妾。老李拿出了一个装着巧克力的锡罐，一边撬开盖子，一边如慈父般地笑着，露出三颗让烟熏黑了的长牙。伊丽莎白心情极度不安地坐了下来。她十分确信接受这些人的盛情款待绝对不合适。其中一个缅甸女孩马上绕到了椅子后面，开始给弗洛里和伊丽莎白扇风，另一个女孩则跪在他们脚下为他们倒茶。女孩在后面给自己的后脑勺扇风，老头在前面冲着自己咧嘴笑，这让伊丽莎白觉得很是愚蠢。弗洛里好像总是让自己陷入这般难受的境地。她从李叶拿来的罐子里取出一块巧克力，但就是没法张口说出“谢谢”。

“这合适吗？”她轻声对弗洛里说道。

“合适？”

“我是说，咱们真的应该坐在这些人家里吗？这难道不是……不是有失身份吗？”

“在中国人家里没关系的。在这个国家，他们这个民族很受欢迎。他们的想法也很民主。最好和他们平等相处。”

“这茶看上去糟糕极了。颜色太绿了。还以为他们懂得往里面加牛奶呢，是不是？”

“味道不错的。是老李从中国带回来的一种特殊的茶。我想里面还泡了橙花。”

“啧！尝起来和土没什么区别。”她尝了一口后说道。

李叶站在那儿端着烟斗，那烟斗有两英尺长，金属的斗钵壁有橡果那么大，他观察着两个欧洲人，看他们是否喜欢自己的茶。椅子后的女孩用缅甸语说了句什么，话一出口，两个女孩又开始咯咯笑了。跪着的

那个女孩抬起头来，用充满天真和羡慕的眼光望着伊丽莎白。然后，她转向弗洛里，问他这位英国小姐是否穿胸衣。她把胸衣说成了“熏衣”。

“去！”李叶愤怒地说道，并用自己的脚趾头碰了碰女孩，让她闭嘴。

“我不会问她这个的。”弗洛里说。

“啊，德钦，问问她嘛！我们真的很想知道！”

一场争论开始了，椅子后面的女孩也加入了其中，连扇风也顾不上了。看上去，两个女孩一直以来做梦都想亲眼看见一件真正的“熏衣”。她们听说过好多关于胸衣的传言：它是根据紧身衣的结构用钢制成的，它非常紧，以至于把女性的胸部裹得非常平，看起来完全没有胸部！女孩们把手压在她们肥乎乎的肋部比画着。弗洛里就不能行行好，问问英国小姐吗？店后面有个房间，她可以去那里把衣服脱掉。她们太想看看“熏衣”是什么样子了。

然后，谈话突然中断了。伊丽莎白僵直地坐着，手里握着一小杯茶，这茶她实在不想再喝一口，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东方人们突然感到一阵沮丧，他们意识到了这位不和他们讲话的英国小姐觉得不自在了。她那种刚刚还令人着迷的优雅和异域美开始令他们有点望而生畏。甚至弗洛里也有同感。与东方人在一起时，有时会出现的那种尴尬境地又出现了，大家都躲避着彼此的目光，极力想要说点什么，但什么都想不出来。这时，那个光溜的小孩，在店后面折腾过各种篮子之后，爬到了欧洲人坐着的地方。他兴趣十足地观察着他们的鞋袜，然后抬起头来，看到他们的白脸后，吓了一大跳。他放声大哭，把地上都弄出了一道水迹。

中国老太太抬眼看了一下，咂了咂舌头，继续卷着香烟。没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地板上出现了一个小水滩。伊丽莎白吓坏了，赶紧把杯子放下，还洒了里面的茶水。她抓住弗洛里的胳膊。

“那小孩儿！看看他在干嘛啊！天啊，就没人……太恶心了！”刹那间，大家都惊讶地看着她，然后他们全都意识到了问题所在。紧接着是一阵慌乱和咂舌头的声音。之前没人去管那个小孩——这种事情再正常不过了，没人会在意的——现在他们都觉得丢死人了。大家都开始怪罪那个小孩。有人喊着：“这孩子真不害臊！这孩子真恶心！”中国老太太

抱起孩子，嘴里还骂着，走到了门口，把孩子架空在台阶上，就好像拧干一块沐浴海绵一样。与此同时，弗洛里和伊丽莎白已经从店里出来了，他追着她回到了路上，李叶和其他人沮丧地看着他们的背影。

“那就是你所谓的文明人！……”她大喊道。

“对不起，”他低声说道，“我没想到……”

“这些人真是恶心到家了！”

她怒不可遏，脸上泛起了惊人的淡粉色，就像提前一天盛开的罂粟花。这是她脸上可能呈现的最深的颜色了。他一路跟着她穿过了集市，回到了主路上，然后他们又走了五十码，他才鼓起勇气再度开口。

“我很抱歉，发生了这种事情！李叶这老家伙是个不错的人。要是冒犯了你，他会自责的。真的，刚才应该再待几分钟的。感谢他请我们喝茶。”

“感谢他！发生那种事之后还感谢他！”

“但老实说，你不该太在意这种事。在这个国家不该在意。在这儿，人们的思维和我们的相去甚远。你得适应。就比如，假设你回到了中世纪……”

“我想这个话题还是就此打住吧。”

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吵架。他十分痛苦，甚至都无法自问到底怎样冒犯到她了。他不断努力让她对东方的事物产生兴趣，却没有意识到，对她而言只是执拗、粗鲁地专门给她找恶心、“糟糕”的事情做。甚至直到现在，他都不明白她到底是怎样看待“土著”的。他只知道，每次他试图让她分享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审美时，她都会像一匹受惊的马儿退缩得老远。

他们沿着路一直走，他在她左边，还稍稍落后一点。他看着她转到一边的脸颊，还有夹在她脖子后面和阔边帽边缘的几小缕金发。他是多么爱她，多么爱她啊！他自责地走在她身后，不敢露出脸上的胎记，他似乎从没有像此刻这样爱她。他几次欲言又止。他的声音还不镇定，而且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才不会有冒犯到她的危险。最后，他装作什么事都

没发生一样平淡地说：

“这天儿越来越热，真是糟糕透顶，是吧？”

树荫里的温度都达到了32℃，所以这句话基本上是句废话。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她竟然热情地接过了话茬。她转过脸来看着他，脸上又浮现出了笑容。

“简直就是个蒸笼！”

这下，他们又和好了。这句傻里傻气的陈词滥调带给她俱乐部闲谈那样的亲切感，立即有效地抚慰了她的心情。落在后面的弗劳喘着气追上了他们，嘴里直流口水，随即他们就像往常一样聊起了狗。回家剩下的路上，他们一直在聊关于狗的话题，几乎一刻没停。狗是个聊不完的话题。两人在往炎热的山上爬的时候，越来越毒的太阳就像烈火的热浪一样，透过薄薄的衣服烤着他们的肩膀，弗洛里暗自想：狗，狗！除了狗就不能谈点别的话题了吗？不是聊狗，就是留声机唱片和网球拍，没别的可聊了吗？但是，当他们聊着这些废话的时候，气氛是多么轻松友好啊！

他们走过了白得发亮的墓地围墙，来到了拉克斯廷家门口。周围环绕着几株老凤凰树，还有一丛八英尺高的蜀葵，上面长着圆形的红色花朵，就像女孩泛红的脸庞。树荫下，弗洛里脱掉帽子，朝脸上扇着风。

“好了，我们赶在天气最热之前回来了。恐怕集市之行不能算成功啊。”

“哦，怎么会呢！我玩得很开心，真的。”

“哪有……我不知道，好像每次都会遇上点糟糕的事情。哦，对了！我们后天去打猎，你没忘记吧？我想后天你有空吧？”

“有空，我叔叔会把枪借给我。一定会非常好玩的！你得教我打猎，从头教起。我真的太期待了。”

“我也是。这个季节打猎不太合适，但咱们尽量打。那先再见了。”

“再见，弗洛里先生。”

虽然他已直呼其名地叫她伊丽莎白，她还是管他叫弗洛里先生。他们分头走开了，两人都想着打猎的事，都觉得下次出行或许能抹掉他们之间的不愉快。

---

[1] 圆锥帽（dunces’ caps），旧时英国学校戴在笨孩子头上的锥形纸帽。

[2] 独角仙（rhinoceros beetle），热带甲虫，多危害椰子树。

第十二章

客厅里又黏又热，让人昏昏欲睡，由于挂了珠帘，房间里几乎是昏暗的。吴波金踱来踱去，自吹自擂。他时不时会把手伸进汗衫，挠一挠他那汗津津的肥硕得像女人那样的乳房的胸脯。玛庆坐在席子上，抽着细长的白雪茄。从卧室开着的门望进去，可以看到吴波金那张巨大方形床的一角，床柱是雕了花的柚木做的，就像是个棺材架，就是在这张床上，他强奸了无数良家妇女。

玛庆这才知道那促使吴波金攻击维拉斯瓦米医生的“另一件事”。虽然吴波金十分鄙视她的头脑，但他所有的秘密，总是迟早都会吐露给玛庆的。在他的亲信中，玛庆是唯一一个不怕他的人，所以他乐于在她面前显示自己的能耐。

“嗯，庆庆，”他说，“你看，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已经写了十八封匿名信了，每一封都是精品啊。要不是因为你根本鉴赏不来的话，我倒想念几封给你听听呢。”

“但万一欧洲人不拿你那些匿名信当回事儿呢？那怎么办？”

“不当回事儿？哎呀，这不用担心！我想我还是了解欧洲人的心理的。告诉你吧，庆庆，要说我有一件事在行，那就是写匿名信。”

这话不假。吴波金的信已经起到作用了，特别是在主要对象，也就是麦格雷戈先生身上。

就在两天前，麦格雷戈先生纠结了一晚上，想搞清楚维拉斯瓦米医生到底有没有对政府不忠。当然，问题不是说医生有没有公然的不忠行为，这点毫不相干。问题在于，医生是不是会有煽动性想法的那种人？在印度，评判一个人的标准不是其行为，而是其身份。对于其忠诚的一丝怀疑，就足以毁掉一位东方官员。麦格雷戈先生为人实在公正，就连对待一个东方人，他都没办法不经考证就立即给他定罪。他一直熬到了午夜，翻看着各种机密文件，其中除了韦斯特菲尔德捎来的用仙人掌刺钉在一起的两封信外，还有他收到的另外五封匿名信。

不光是信件，四面八方也都传来关于医生的流言蜚语。吴波金十分清楚光给医生扣上叛徒的帽子远远不够，要从各个有可能的角度诋毁他的名声。给医生加的罪名不仅有煽动叛乱，还有敲诈勒索、强奸民女、实施酷刑、非法手术、醉酒做手术、投毒谋杀、巫术谋杀、进食牛肉[1]、向杀人犯出售死亡证明、在佛塔院落内穿鞋行走、试图和宪兵队的年轻鼓手搞同性恋。听了关于医生的种种传闻，你一定会觉得医生是马基亚维利[2]、理发师陶德[3]、萨德侯爵[4]的结合体。麦格雷戈先生一开始没太在意。他对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就在那最后一封匿名信里，吴波金使出了无比高明的一招。

这封信是关于土匪俄瑞欧从皎塔达监狱越狱一事的。俄瑞欧之前正在服刑，那是他罪有应得的七年监禁，几个月前他开始策划越狱，一开始他外面的朋友买通了一个印度狱警，狱警先收了一百卢比，借口说去给亲戚送终而请了假，实则是在曼德勒的妓院里忙了好几天。过了一段时间，越狱的日子一再拖延。与此同时，那个狱警越来越想念妓院了。他最终决定把这越狱计划透露给吴波金，再捞上一笔。但是吴波金，一如往常地发现了机会。他以重罚相威胁，让狱警闭嘴，然后，在越狱当天晚上，等来不及采取任何措施的时候，写了一封匿名信给麦格雷戈先生，透露说有人计划逃狱。不用说，信上还加了一句，称监狱长维拉斯瓦米医生也是收了好处，才坐视不管的。

早上，监狱里一片骚乱，狱警跑来跑去，警察到处都是，俄瑞欧越狱了。（他早已沿河顺流直下了，乘的正是吴波金提供的舢板。）这回，麦格雷戈先生是被弄了个措手不及。不管是谁写的信，此人一定知情，而且关于医生纵容越狱，此人说不定讲的是实情。这件事很严重。一个受贿纵容罪犯逃跑的监狱长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虽然事情的逻辑关系也许不太清楚，但对麦格雷戈先生来说已经足够了，所以针对医生的主要控告——煽动叛乱，就变得更加可信了。

同时，吴波金也向其他欧洲人下了手。弗洛里是医生的朋友及其声望的主要来源，他轻易地就被吓唬住了，已经背弃了医生。对付韦斯特菲尔德要困难一点。韦斯特菲尔德作为一名警官，知道吴波金的很多事，也许会坏了他的计划。警察和法官们向来势不两立。但就算是这样的事实，也能让吴波金加以利用。吴波金声称，当然是匿名指出的，医生和那个臭名昭著、收受贿赂的流氓恶棍吴波金是一伙的。这样就搞定了韦斯特菲尔德。至于埃利斯，不需要给他写任何匿名信，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比现在还鄙视医生了。

吴波金甚至写了封匿名信给拉克斯廷夫人，因为他晓得欧洲女人的力量。信里写道，维拉斯瓦米医生正在鼓动土著劫持、强奸欧洲女人。没有交代任何细节，其实也没必要交代。吴波金摸到了拉克斯廷夫人的软肋。在她看来，像“煽动”、“民族主义”、“造反”、“自治”这样的词汇只会带来一种后果，那就是自己被一群转着白眼球的黑苦工轮奸。想到这一幕，她有时都吓得夜不能寐。之前欧洲人给予医生的种种好评瞬间就土崩瓦解了。

“这下懂了吧，”吴波金自鸣得意地说道，“这下知道我是怎么整他的了吧。他就像一颗从底部锯断了的树，轻轻一推马上就倒。三星期之内，我亲手来推。”

“怎么推？”

“你听我说啊。我觉得是时候该让你知道了。这种事情上你没有谋略，但还算守口如瓶。你听说了宋割村附近正在酝酿的那场暴乱了吧？”

“听说了。那些村民太蠢了。他们的短刀和长矛能拼得过印度兵吗？他们会像野兽一样挨枪子儿的。”

“这是自然。要是引发冲突的话，那将是一场大屠杀。但他们就是一帮迷信的农民。认定了发给他们的那些荒谬的防弹夹克能保命。我真鄙视他们的愚蠢。”

“可怜啊！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郭波金？没必要抓任何人。你只要去村里告诉他们你知道他们的计划了，他们就不敢继续了。”

“对啊，我要是愿意呢，完全可以阻止他们。但我不愿意。我有自己的用意。你看，庆庆——你可别说出去啊——这个啊，其实是我发起的暴乱，我亲自安排的。”

“啥！”

玛庆手里的雪茄掉了。她眼睛瞪得大大的，稍微发青的眼白聚拢在瞳孔周围。她吓坏了，开始大喊：

“郭波金，你说什么呢？你不是认真的吧！你，发起一场暴乱？绝

对不是真的！”

“绝对是真的。而且进展还很顺利呢。那个魔术师是我从仰光带回来的，聪明着呢。他之前在马戏团里变戏法，表演遍及整个印度。那些防弹夹克是在惠罗百货[5]买的，每件一卢比八安那。可花了我不少钱呢，跟你说吧。”

“但，郭波金！一场暴乱！可怕的打斗和枪战，很多可怜的老百姓会无辜惨死！你没发疯吧？你就不怕自己被打死吗？”

吴波金停下了脚步。他十分诧异。“老天哪，你这女人，你脑袋瓜里想什么呢？你不会以为我要反抗政府吧？我是一个有三十年资质的政府公务员！老天啊，才不会呢！我说的是我发起了暴乱，可没说我要参与暴乱啊。是那些傻瓜村民要去送命，又不是我。别人做梦都不会想到我和暴乱有任何关系，以后也是如此，除了巴盛和其他一两个人。”

“但你说是你鼓动他们去造反的啊？”

“当然啦。我指控维拉斯瓦米发动暴乱反抗政府。那么，我就得拿出一场暴乱啊，是不是？”

“啊，我懂了。到时候暴乱爆发了，你就会说是维拉斯瓦米医生领导的。对吧？”

“你怎么反应这么慢！我觉得就连个傻瓜都知道，我发起暴乱就是为了亲自镇压下来。我是——麦格雷戈先生用的那个词儿是什么来着？——Agent provocateur（密探），这是拉丁语，你听不懂的。我是个Agent provocateur。首先啊，我鼓动宋割村那帮傻子去造反，然后呢再把这些叛乱分子抓起来。暴乱一触即发的时候呢，我就杀那几个造反头头个措手不及，然后把他们全都扔进监狱。这之后，我敢说有可能会爆发冲突，会死一些人，还有一些人会被送去安达曼群岛[6]。暴乱的同时呢，我会第一个就奔赴现场。吴波金，千钧一发之际镇压了凶险的起义。我会成为整个地区的英雄。”

吴波金正理所当然地为自己的计划感到洋洋得意，他又开始在房间里踱步了，双手背到身后，满脸笑容。玛庆安静地思考了一会儿这个计划。最终她开口了：

“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郭波金。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这跟维拉斯瓦米医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简直就是不开窍啊，庆庆！我一开始不就跟你说了吗，那个维拉斯瓦米碍着我事儿啦，这场暴乱就能除掉这个祸害。当然啦，咱们永远证明不了是他发起的暴乱，但这重要吗？所有的欧洲人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在这里头掺和了一脚。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医生这辈子就毁了。他倒了，我就起来了。把他抹得越黑，我就能越光彩。现在懂了吧？”

“嗯，我懂了。而且我觉得这是桩卑鄙恶毒的陷害。我就纳闷了，你怎么脸不红心不跳地就告诉我了。”

“得了吧，庆庆！你不会是又要开始你那乱七八糟的一套了吧？”

“郭波金，为什么你只有使坏的时候才高兴呢？为什么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要给别人带去灾难呢？想想那个可怜的医生，就要丢掉饭碗啦，还有那些村民，他们就要挨枪子儿、挨竹棍、终身被监禁啦。真的有必要这么做吗？你都已经这么富了，还要那么多钱干嘛啊？”

“钱！跟钱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啊，你这女人就会明白世上除了钱还有别的要追求的东西。比如，名望、伟业。你有没有想过，就为我在这件事上的忠诚，缅甸总督也许会在我胸前挂上勋章呢？我有这样的荣誉，就连你也会感到骄傲吧！”

玛庆不屑一顾地摇了摇头。“郭波金，你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你活不了一千岁？想想那些恶人的下场吧。比如，他们下辈子会变成老鼠或是青蛙，甚至会下地狱。我记得以前一个僧人给我讲过地狱，他从巴利语[7]经文里翻译过来的，地狱太可怕了啊。他说：‘每一千个世纪，两根烤红了的长矛将刺穿你的心脏，然后你就要对自己说，这一千个世纪的折磨就此结束，但此罪罚将循环往复，永不间断。’想想这些，难道不可怕吗，郭波金？”

吴波金笑了笑，漫不经心地挥了一下手，意思是“我建佛塔啊”。

“哎，我希望你到最后还能笑得出来。如果是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可不愿看到这样的一生。”

她瘦弱的肩膀不以为然地斜对着吴波金，重新点着了她的雪茄烟，吴波金继续在屋子里来回踱着。他再张嘴说话的时候，语气明显变得严肃，还带着些许胆怯。

“你知道吗，庆庆，这件事背后还有一件事。我没告诉你，也没告诉任何人。就连巴盛都不知道。但现在我想告诉你。”

“如果是更邪恶的计划，我可不想听。”

“不，不是的。你刚才问我这么做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猜，你认为我狠整维拉斯瓦米是因为我讨厌他，讨厌他不喜受贿。其实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关系你我二人。”

“什么原因？”

“庆庆，你难道从没有更高远的志向吗？你难道从没有觉得我们虽然这么成功——应该说，我这么成功——但我们的地位一点都没提高吗？我敢说，我身家有二十万卢比，但看看咱们是怎么活的！看看这房间！绝对比一个农民家里都好不到哪儿去。用手吃饭，只跟缅甸人打交道——贫穷的劣等民族——就跟你说的那样，像个苦兮兮的镇长一样活着，这日子我过腻了。光有钱是不够的，我还想要有地位上的提升。你难道就从没想要过更加——怎么说呢——高贵的生活吗？”

“我想不出我们为什么还嫌现在拥有的不够多。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怎么也想不到以后会住上这样的房子。看看那些英式椅子，我这辈子从来也没坐过那玩意儿。但看见它们时，想到自己拥有它们时，就会感到自豪。”

“切！那你当时干嘛还从村里嫁出来啊，庆庆？你就配站在井边，头顶个石水罐，和别人拉家常。但感谢上帝，我比你志向远大。现在我跟你说说我陷害维拉斯瓦米的真正原因。我下定了决心，要做大事！高贵、光荣的大事！一个东方人能做的最光彩的事。你当然懂我的意思，是吧？”

“不懂。你什么意思？”

“哎哟喂！我这一生所追求的最伟大的成就！你猜也猜得到吧？”

“啊，我知道了！你想买辆汽车。但，哎呀，郭波金，你可别指望我会坐进那玩意儿！”

吴波金厌恶地甩了一下双手。“汽车！你简直和集市上卖花生的一个智力水平！我想要汽车的话，能买二十辆。再说了，这地方用得着汽车吗？不是这个，我想要的比这高贵多了。”

“那是什么啊？”

“是这样的。我碰巧得知，不出一个月，欧洲人会选出一名土著加入他们的俱乐部。他们虽然不愿意，但这是行政长官下的命令，他们必须服从。他们自然会选维拉斯瓦米，因为他是本区官职最高的土著。但我让维拉斯瓦米名声扫地了。于是呢……”

“于是什么啊？”

吴波金没有马上回答。他看着玛庆，他那张巨大的黄脸、肥硕的下巴和数不清的牙齿，变得柔和起来，就像个孩子。他那茶色的眼睛里甚至还带着泪水。他几乎带着敬畏的语气低声说道，就好像他嘴里的那件大事宏伟得让他透不过气来：

“你还不明白吗，女人？维拉斯瓦米的名声要是毁了，他们就会选我，你还不明白吗？”

这句话威力惊人。玛庆没再与他争论。吴波金的计划显示出的野心把她吓得呆住了。

而且不无道理，吴波金这辈子的成就和这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低级别的东方官员千方百计地钻进欧洲俱乐部，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胜利。在皎塔达这个地方，更是如此。欧洲俱乐部，那个遥远、神秘的殿堂，那是圣地中的圣地，想要进去着实比踏入极乐世界还要难！吴波金，这个曼德勒贫民区的光溜小孩，这个偷鸡摸狗的文员，这个芝麻小官，就要踏进那个圣地了，管欧洲人叫“老家伙”，喝威士忌和苏打水，在绿桌子上把那些白球捅来捅去！玛庆，这个出生在搭着棕榈叶顶棚的竹屋里的乡下女人，就要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双脚蹬上丝袜和高跟鞋（是的，在那里，她可是真的要穿鞋的！）和英国女人们用印度斯坦语聊婴儿的小衣裳！这样的幻想会让任何人都如痴如醉。

玛庆沉默了好久，她的双唇微张着，想象着欧洲俱乐部以及它能带来的荣耀。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带反对情绪地审视着吴波金的密谋。能在玛庆那颗谦和的心里播下野心的种子，也许需要的是比跻身俱乐部更大的能耐。

---

[1] 在印度，绝大部分人信仰印度教，印度教以牛为尊，禁止信众食用牛肉。

[2] 马基亚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哲学家，提出了共和主义理论，著作有《君主论》、《论李维》等。

[3] 理发师陶德（Sweeny Todd），小说《一串珍珠》中的杀人犯，2007年被拍摄成电影。

[4] 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1740—1814）是一位法国贵族，擅长写色情小说和哲学小说。由于他的小说中描写了大量性虐待的场面，以他的姓氏命名的“萨德主义”（Sadism）也就成了“性虐待”的代名词。

[5] 惠罗百货（Whiteaway & Laidlaw’ s），惠罗公司于1882年由两个苏格兰人在印度加尔各答创建，后发展成重要的连锁百货公司，分布于亚洲很多城市。

[6] 安达曼群岛（Andamans），印度洋北部一群岛，距离缅甸197公里。1789年被指定为犯人流放地之一。

[7] 巴利语（Pali），古印度的一种语言，现在是佛教的一种宗教语言。

第十三章

当弗洛里进入医院大门时，四个衣衫褴褛的清洁工从他身边经过，他们抬着一个死去的苦工，尸体用粗麻布包裹着，他们准备把他埋到树林里的一个一英尺深的坟坑里。弗洛里穿过医院棚屋间的空地，院子的地面像砖头一般坚硬。宽敞的阳台上挂满了没铺床单的轻便床，上面躺着脸色灰白的病人，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医院里还有一群肮脏的恶狗，它们有的在打盹儿，有的在抓跳蚤，据说它们专吃截掉的肢体。整个地方都弥漫着邋遢和腐烂的气息。尽管维拉斯瓦米医生想尽办法保持清洁卫生，但面对灰尘、糟糕的供水、懒惰的清洁工和半生不熟的实习医生，他还是束手无策。

有人告诉弗洛里，维拉斯瓦米医生在门诊部。门诊部就是一间屋子，屋里只摆放了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灰泥墙上挂着一幅落满灰尘的维多利亚女王肖像，还挂歪了。缅甸农民们排着队进入房间，到桌子前面依次就诊。在褪色的破布衣服下面，能看到他们粗糙的肌肉。医生只穿了件衬衣，忙得大汗淋漓。他看见弗洛里来了，便一下子站了起来，发出一声惊喜的感叹，并像往常一样急忙客气地把弗洛里推到空椅子上坐下，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罐香烟。

“弗洛里先生，欢迎光临！请自便。喔，这种地方还真是委屈您，哈哈！一会儿去我家，我们可以一边聊天，一边舒舒服服地喝啤酒。现在我要给大家看病，失陪了。”

弗洛里刚坐下，热汗就冒了出来，浸湿了他的衬衣。这屋里的热浪让人窒息。这些农民身上的毛孔中都散发着大蒜味。每来一个病人，医生都要从椅子上跳起来，戳几下病人的背，把黑色的耳朵贴在病人的胸前听一听，再用缅甸语粗鲁地问一连串问题，然后回到桌前，潦草地开一张处方。病人们拿着处方就到院子另一头去找配药师，配药师给他们的药就是一瓶水再兑些植物染料。配药师的收入大部分都来自于贩卖药品，因为政府每个月只付给他二十五卢比。但医生对此一无所知。

大多数早晨医生都没时间到门诊部给病人看病，这任务就交给了某个实习医生。实习医生的诊断方法很草率。他就简单地问每个病

人：“你哪儿疼啊？头疼，背疼，还是肚子疼？”病人回答后，他就从事先准备好的三叠处方里拿出一张，递给病人。病人倒也更喜欢实习医生的这种方法，因为医生总是问他们是否有性病——这个问题既没礼貌又没意义。医生有时还会建议做手术，这可把他们吓坏了。按他们的话说，手术就叫“开膛破肚”。大部分病人宁可死十次也不愿被“开膛破肚”。

最后一个病人走了之后，医生终于如释重负地坐在椅子上，用处方簿往脸上扇着风。

“啊，真热啊！有几天早上，我都觉得我鼻子里的蒜味一辈子都消失不了了！这蒜味居然会融入他们的血液，这太不可思议了。您没有觉得呼吸困难吗，弗洛里先生？你们英国人的嗅觉进化得太发达了。在我们这肮脏的东方，你们可真够遭罪的！”

“所有来这儿的人啊，都别在意自己的鼻子啦，什么？他们也许会把这句话用到苏伊士运河上去。你今天早上挺忙啊？”

“每天都这样。但我的朋友啊，在这个国家当医生真够让人沮丧的！这些村民——肮脏、愚昧的野人！我们能把他们弄到医院来看病就不错了，他们宁愿死于坏疽，他们宁愿带着个西瓜一样大的肿瘤生活十年，也不愿动刀子。还有那些他们所谓的‘医生’开给他们的药！新月下采集的草药，老虎的胡须，犀牛的角，尿液，还有经血！人怎么能喝这么恶心的玩意儿啊！”

“还挺有画面感。医生，你应该去编一部缅甸药典，那就几乎跟卡尔培波[1]一样伟大了。”

“野蛮的畜生，野蛮的畜生，”医生一边说，一边费力地套上他的白外套，“咱们到我家去吧？我那儿有啤酒，应该还剩下一些冰块。我10点钟有台手术，绞窄性疝，挺紧急的。在那之前我都有空。”

“好的。其实我有件事想和你谈一谈。”

他们再次穿过院子，走上了医生家阳台的台阶。医生把手伸到冰箱里，发现冰块早融化成温水了，于是他开了一瓶啤酒，然后小题大做地吩咐仆人在湿稻草篮子里多挂几瓶啤酒。弗洛里站在阳台上，望向远处，帽子也没摘下来。他其实是来道歉的。事实上，自从他在俱乐部那

张侮辱性的通知上签名起，他就一直在躲着医生，已经快两个星期了。但歉还是要道的。虽然吴波金看人很准，但他也失算了，两封匿名信还不足以把弗洛里从他的朋友身边吓跑。

“那个，医生，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

“我？不知道。”

“不，你肯定知道。是几周前我对你做的那件卑鄙的事情。埃利斯把那份通知贴在俱乐部通告栏上，我也签了名。你肯定听说了。我想解释一下……”

“不，不，我的朋友，不，不！”医生惊慌失措，赶紧冲过阳台，一把抓住弗洛里的胳膊说：“您不需解释！请再也不要提这件事了！我理解您——完完全全理解您！”

“不，你不了解，你不可能了解。你不明白是什么样的压力迫使一个人做出那样的事。当时没人逼着我签名。我要是拒绝了，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没有法律规定我们要残忍地对待东方人，恰恰相反，法律鼓励我们善待东方人。但是，如果维护东方人意味着要与其他人为敌的话，就没有人敢维护东方人了。这当然也不是事实。只是如果我当时坚决不签那份通知，之后的一两个礼拜我在俱乐部里肯定会受辱。所以我又照例退缩了。”

“我求您了，弗洛里先生，我求您了！您要是继续说的话，肯定会让我更难受的。您这么说，就好像我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您的处境似的！”

“我们的座右铭是‘英国人在印度，入乡不随俗’，这你知道的。”

“当然，当然。还有一个崇高的座右铭，你们称之为‘同舟共济’。这就是你们比我们东方人优越的秘诀。”

“嗯，一个劲儿道歉也没有多大用处。我这次来是向你保证，这种事以后绝不会发生了。其实……”

“好了，好了，弗洛里先生，您以后要是再也不提这件事，我就感恩戴德了。事情都过去了就忘了吧。您快把啤酒喝了吧，免得一会儿就

跟茶一样热了。另外，我也有件事要告诉您。您还没问我有什么消息呢。”

“哦，你有消息。是什么消息呀？一切可还安好？大英帝国这个老太婆怎么样了？还在垂死挣扎否？”

“哎，糟糕啊，实在是糟糕！不过也没有我现在的处境糟糕啊，我现在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的朋友。”

“怎么了？又是吴波金？他还在诋毁你么？”

“我倒希望是他诋毁我呢！这次的事情……唉，这次糟糕透顶了。我的朋友，这个地区就快要爆发叛乱了，您听说了么？”

“我听到不少说法。韦斯特菲尔德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屠杀了，可我听说他找不到任何叛乱分子。只有汉普登村的人不交税而已，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啊，对呀。这些可怜的傻瓜！您知道他们拒绝交的税是多少钱么？五卢比！他们抗议累了很快就会交税的。我们每年都有这个麻烦。可至于叛乱——所谓的‘叛乱’，弗洛里先生——我希望您明白，事情比咱们眼前看到的复杂得多。”

“哦？那是什么？”

医生怒气冲天，做出了一个粗暴的手势，把啤酒洒了一大半，这让弗洛里很是吃惊。医生把酒杯放在阳台的栏杆上，大声喊道：

“又是吴波金！那个罄竹难书的恶棍！那条麻木不仁的鳄鱼！那个……那个……”

“接着说。‘那个充满着怪癖的箱子，那个塞满着兽性的柜子，那个水肿的脓包’[2]——继续啊。他这回又要干什么？”

“干一桩无可比拟的罪行。”然后医生就把假叛乱的阴谋大致概括了一下，这与吴波金告诉玛庆的内容相差无几。医生唯独不知道的细节就是吴波金企图让自己入选欧洲俱乐部。要说医生的脸气得通红，可能不大准确，但他愤怒的脸上确实多了几道深色的阴影。弗洛里听了，震惊

得站着不动。

“这个狡猾的老恶魔！谁能想到他还有这本事？那你是怎么发现的？”

“啊，我还剩下一些朋友。现在您看到了吧，我的朋友，他挖了多大个火坑等我跳啊？他之前就到处诽谤我诋毁我，弄得我防不胜防。等这荒唐的叛乱爆发了，他肯定会竭尽所能把我牵连进去。我告诉您吧，人们只要对我的忠诚有一点点怀疑，我就被毁了，毁了！如果有人传出去，说我支持叛乱，我就完了。”

“但是，真见鬼，这太荒唐了！你肯定有办法为自己辩解吧？”

“无凭无据的，我什么都证明不了，我用什么为自己辩解啊？我知道事情肯定是这样，可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申请公开调查，我要找来一个证人，他就能找来五十个。您不明白他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没人敢跟他对着干。”

“但你为什么一定要证明自己的忠诚呢？你为什么不去找老麦格雷戈，把事情告诉他呢？他是个非常公正的老伙计，做事有自己的方法。他会仔细听你说的。”

“没用的，没用的。弗洛里先生，您心里没想着去算计人，当然不知道阴谋家的心思。我越解释，就越像是掩饰，我这不是越描越黑么？大声疾呼说别人算计自己，一点用也没有。”

“那你要怎么办？”

“无能为力。我就只能干等着，盼着我的声望能帮我渡过难关。遇到这样的事，本地官员的名誉危如累卵，根本就不是有没有证据的问题，全靠名声。人们要是觉得我名声好，就不会信；要是觉得我名声不好，肯定就信了。声望就是一切。”

他们沉默了片刻。“声望就是一切”，弗洛里再清楚不过了。复杂的纠纷他见惯了，怀疑总是比证据重要，声誉比一千个证人还顶用。他脑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这想法让他有些不安，有些害怕。三个礼拜前，他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人才会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不管心里有多么想逃避，还是觉得一定要履行这一职

责。他说：

“假如，比方说，你入选俱乐部了，这会对你的声望有所帮助么？”

“假如我入选俱乐部了！哈，是啊！俱乐部！那可是个坚不可摧的堡垒。一旦入选了俱乐部，就再也没人会听信关于我的流言蜚语了，就像没人会听信关于您、麦格雷戈先生或者任何一个欧洲绅士的流言蜚语一样。可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已经被玷污了，我还怎么指望他们会选我呢？”

“现在，听我说，医生，我告诉你吧。下次全体大会的时候，我会提名你。我知道到时候肯定会讨论这件事，如果有人提名一个候选人，我敢说，除了埃利斯，没人敢投反对票。而在同时……”

“啊，我的朋友，我亲爱的朋友！”医生情绪激动，差点说不出话来，他握住弗洛里的手，“啊，我的朋友，您这样做太高尚了！实在是太高尚了！但我恐怕承受不起。我害怕您又得罪您的欧洲朋友，比如埃利斯先生。如果您提名我，他会受得了么？”

“噢，让埃利斯见鬼去吧。但你得明白，我不能保证你一定能入选。那还取决于麦格雷戈怎么说，取决于大家的心情怎么样。有可能到头来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医生还把弗洛里的手攥在自己胖乎乎、潮乎乎的双手里。泪水也开始在他的眼眶中打转，他的眼睛被镜片放大，在弗洛里看来活像狗水汪汪的双眼。

“啊，我的朋友！如果我入选了，那我所有的烦恼都迎刃而解了！但我的朋友，就像我刚说的一样，这事急躁不得。要小心吴波金！他现在肯定把您列为他的敌人了。即便是您，也不能小觑他的敌意。”

“噢，我的天啊，他可奈何不了我。何况他现在也没干什么，除了几封愚蠢的匿名信。”

“我可没您那么确定。他总是狡猾地出击。他为了不让我入选俱乐部，一定会弄得天翻地覆。我的朋友，如果您有弱点，要好好防住。他总能找到别人的弱点，然后一击致命。”

“像条鳄鱼。”弗洛里补充道。

“像条鳄鱼，”医生表示同意，表情严肃，“啊，我的朋友，我如果成为你们欧洲俱乐部的成员，是多么高兴的一件事啊！能与欧洲绅士为伍，是多么大的荣幸啊！但还有件别的事，弗洛里先生，我以前都不愿提。那就是，我希望您能明白，我没有企图通过任何方式来利用俱乐部。我想要的就是成为会员而已。即便我入选了，我都不会，绝对不会，冒昧到俱乐部去的。”

“不到俱乐部来？”

“对，对！我如果强迫欧洲绅士们与我结交，天理不容。我交纳会费就好。这对我来说也是一项至高无上的特权。我相信您能理解吧？”

“完全理解，医生，完全理解。”

弗洛里走上山坡时，忍不住笑了出来。他现在是铁了心要提名医生了。其他人要是听说了，肯定会大吵一番，唉，吵个没完没了！但奇怪的是，一想到这些，弗洛里反而想笑。一个月前会让他惴惴不安的事，现在反而让他欣喜若狂。

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许下诺言？这本是一桩小事，也没什么风险，没什么好逞能的，但这不像他的作风。为什么在多年之后，在小心谨慎地当白人萨布多年之后，突然破例？

他知道原因。是因为伊丽莎白走入了他的生活，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他获得了新生，过去那些惨不忍睹、放荡不羁的日子就抛之脑后了。她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思维的轨道。她为他带来了英格兰的气息——亲爱的英格兰，在那里思想是自由的，在那里不会被迫终日跳“白人萨布之舞”以教化低等种族。“我的余生将何去何从？”他思考着。仅仅是她的存在就给了他足够的理由来堂堂正正地做人，甚至让他觉得堂堂正正地做人是理所应当的事。

“我的余生将何去何从？”他走进花园大门时，又思考起了这个问题。他很开心，很高兴。因为他领会到虔诚的教徒们说的是真的，救赎确实存在，生命确实能重新开始。他走在花园的小路上，在他看来，他的房子，他的花草，他的仆人，所有的生命在不久之前都还沉浸在倦怠和乡愁之中，现在仿佛都重获新生，变得生机盎然，美不胜收。要是有

人能和你分享这一切，将会多么有趣啊！要是你不再孤单，你将多么热爱这个国家啊？尼罗也在小路上，顶着大太阳，啄着稻米吃，稻米是园丁拿去喂山羊时撒落的。弗劳喘着粗气猛地冲向尼罗，尼罗嗖的一下跃到空中，跳到了弗洛里的肩膀上。弗洛里进了屋，怀里抱着那只红色的小公鸡，抚摸着它脖子上丝绸般柔顺的羽毛，还有背上光滑的菱形羽毛。

他刚走上阳台就发现玛拉美在屋里，根本就不用郭斯拉急匆匆地从屋里出来，然后一脸不详的表情告诉他。弗洛里闻到了她的味道，檀香、大蒜、椰油还有头发里茉莉的气味。他把尼罗放在了阳台栏杆外边。

“那个女人回来了。”郭斯拉说。

弗洛里的脸色早已变得苍白。他脸色苍白时，他的胎记就让他显得格外丑陋。他痛苦不堪，仿佛一把冰刀刺穿了他的五脏六腑。玛拉美出现在了卧室的门口。她低着头站着，目光透过低垂的眉毛看着他。

“德钦。”她低声说道，声音闷闷不乐，但好像又有急事。

“走开！”弗洛里生气地对郭斯拉喝道，把自己的恐惧和愤怒都发泄到了仆人身上。

“德钦，”她说，“到卧室里来。我有件事要跟您说。”

他跟着她进了卧室。就过了一个礼拜，仅仅一个礼拜，她的容貌便大不如前。她的头发看上去很油腻，吊饰也都不见了，她裹着一个曼彻斯特产的印花棉布笼基，就值两卢比八安那。她脸上的粉涂得太厚，就像是小丑的面具一样，粉遮不住发根的皮肤，自然的肤色就显露了出来，像缠了一条棕色的绸带。她看上去就像个妓女。弗洛里无法直视她，只能愤懑地望着门廊远处的阳台。

“你这副样子回来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没回村里？你为什么没回你家？”

“我一直待在皎塔达，住在我表亲家。发生了这些事，我还怎么回村里？”

“你让人来找我要钱又是什么意思？我一个礼拜前才给了你一百卢比，你怎么还想要钱？”

“我怎么回去？”她重复道，完全忽视他刚才说的话。她的音调突然变高，让他转过了身来。她站得笔直，一脸愠色，紧锁着黑色的双眉，撅着嘴唇。

“怎么就不能回去了？”

“在那些事之后！在您对我做的那些事之后！我还怎么回去！？”

她突然爆发了，开始愤怒地声讨他。她的声音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尖叫，就像是集市里的泼妇吵架一样。

“我还怎么回去？去被那些我瞧不起的愚蠢贱民嘲笑奚落、指指点点么？我可是个波卡多，是白人的妻子，我怎么能回父亲的家里，然后和那些丑得找不到丈夫的老太婆一起干农活啊！啊，真丢人，真丢人啊！我做了您两年的妻子，您爱我，关心我，然后您突然毫无征兆、毫无理由地把我像条狗一样赶出了家门。我还得回到村里，钱也没有了，珠宝首饰也没有了，丝绸笼基也没有了，人们会指着我说：‘那就是玛拉美，她以为她比我们都聪明。瞧啊！她的白人丈夫还不是这样对待她。’我完蛋了，完蛋了！我在您家里和您同居了两年，哪个男人还会娶我啊？您把我的青春都夺走了。啊，真丢人，真丢人啊！”

他无法直视她。他无助地站着，脸色苍白，愁眉苦脸。她说的句句都在理，但要怎么告诉她，他也是别无选择呢？要怎么告诉她，继续做她的情人是天理不容的呢？他几乎被她吓得畏缩了，而那胎记赫然印在他黄色的脸上，就像是溅上去的墨水一样。他直截了当地说，本能地谈到钱，因为钱从来没让玛拉美失望：

“我会给你钱的。你要的五十卢比，我会给你，以后还会给你更多。下个月之前，我都没有钱了。”

这是实话。他之前给她的那一百卢比，还有他花在衣服上的钱，基本上就是他所有的现金了。她大哭大嚎了起来，让他很心慌。她白色的“面具”变得皱皱巴巴，眼泪一下涌了出来，划过她的脸颊，留下一道长长的印迹。他还没来得及制止她，她就在他面前跪了下来，弯下腰，额头贴到地面，行了一个极其谦卑的什科大礼。

“起来，起来！”他大叫道。这卑躬屈膝的大礼让人弯着脖子，扭着身体，就像在讨打一样，这总让他十分厌恶。“我受不了这个。立刻给我起来。”

她又哀嚎了起来，试着要抱住他的脚踝，他急忙后退。

“现在就给我起来，别鬼哭狼嚎了。我都不知道你在哭些什么。”

她没站起来，只是跪直了起来，又开始向他哭喊。“您为什么要给我钱啊？您以为我就是为了钱才回来的是么？您当初把我像狗一样赶出门外，您以为我只在乎钱么？”

“起来。”他重复道，他已经往后退了几步，以免她抓住他，“你不要钱，那你想要什么？”

“您为什么要恨我？”她哭诉道，“我做了什么伤害您的事？我偷了您的香烟盒，您也没生气。您要娶这个白种女人，这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但那又怎么样呢？您为什么一定要把我赶走？您为什么要恨我？”

“我不恨你。我解释不了。起来，请起来。”

她现在厚着脸皮继续抽泣。毕竟，她也不过就是个孩子。她泪眼朦胧地望着他，焦急地观察他有没有露出怜悯的表情。接着，她做出一件可怕的事，她全身趴在了地上，脸都贴到了地面上。

“起来，起来！”他用英语大叫道，“我受不了这个，这太可恶了！”

她没有起来，而是像条虫一样在地上蠕动，朝他的脚爬去。她的身体爬过布满灰尘的地面，留下一条宽丝带一样的痕迹。她拜倒在他面前，脸深埋着，手臂伸开，就像是拜倒在神灵的圣坛前一样。

“主人，主人，”她啜泣道，“您为什么不能原谅我？就原谅我这一次吧，就这一次！让玛拉美回来吧。我愿做您的奴隶，我愿为您做牛做马。只要您别抛弃我就行。”

她的手臂绕住了他的脚踝，她在亲吻他的脚趾。他低着头站着，无可奈何地俯视着她，两手插在裤兜里。这时弗劳从容地走进房间，走到马拉美躺着的地方，嗅了嗅她的笼基。它轻轻地摇了摇自己的尾巴，还认得她的气味。弗洛里忍受不了了。他弯下腰抓住玛拉美的肩膀，把她

拉了起来，让她跪坐着。

“立刻站起来，”他说，“看到你这样我很难过。我会尽力帮你。哭有什么用？”

她重新看到了希望，立刻哭喊了出来：“那您愿意让我回来了？噢，主人，让玛拉美回来吧！谁也用不着知道。那个白种女人来了之后，我还继续待在这儿，她会以为我是某个仆人的妻子。您还不愿意让我回来么？”

“不行。这不可能。”他说着，又把头扭向了一旁。

她听出了他语气里的坚决，于是发出了一阵难听刺耳的哭声。她又弯下身去行什科大礼，把额头磕在地面上。这太可怕了。而让他觉得比这一切更可怕的，让他伤心的，是隐藏在这些乞求之下的厚颜无耻和凉薄无情。因为在她的乞求之中，没有半点对他的爱意。即使她声泪俱下、卑躬屈膝，那也只是为了她那曾经拥有的情人地位，那悠闲的生活、富丽的衣裳和可供使唤的仆人。这其中的酸楚难以言喻。如果她爱过他，他把她赶出家门时也绝不会那么愧疚。那些连一点高尚的痕迹都没有的伤心事最让人痛苦。他弯下腰，把她搂在自己的臂弯里。

“听我说，玛拉美，”他说，“我不恨你，你也没做什么伤害我的坏事。是我辜负了你。可现在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了。你必须回家，之后我会给你钱。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在集市里开家店铺。你还年轻。只要你有钱，只要你能找个丈夫，这些事对你来说都没关系。”

“我被毁了！”她又开始哭嚎，“我要自杀。我要从码头上跳到河里去。受了这样的耻辱，我还怎么活得下去啊？”

他把她抱在怀里，几乎是在爱抚她。她紧紧地靠着他，把脸埋在他的衬衣里，身体也随着抽泣而抖动。檀香的味道飘到他的鼻孔里。或许直到现在她还以为，只要她用手臂搂着他，用身体紧贴着他，就能对他重施魔力。他轻轻地让自己挣脱了出来，看到她没再跪下去了，便站到了一旁。

“够了。现在你必须走了。还有，我答应给你的那五十卢比，我会给你。”

他从床底拖出一个锡制的制服箱子，拿出五张十卢比的钞票。她把钱默默地塞进她因基的胸口里。她突然间不流眼泪了。她默不作声地走进洗手间，过了一会儿出来了，脸已经洗回了天然的棕色，头发和裙子也重新梳理过了。她面有愠色，但不再像刚才那样歇斯底里了。

“德钦，我最后问您一遍：您不让我回来是么？这是您最终的决定么？”

“是的。我也是不得已。”

“那我走，德钦。”

“好的。上帝与你同在。”

他靠着阳台的木柱子，望着她在强烈的日光下沿着小路走远。她腰板挺得笔直，背和头都呈现出非常生气的姿态。她说的一点不假，他夺走了她的青春。他的膝盖情不自禁地颤抖。郭斯拉悄悄地走到他身后。他发出祈求宽恕般的咳嗽声，以吸引弗洛里的注意。

“又怎么了？”

“老爷您的早饭要凉了。”

“我不想吃早饭。给我拿些喝的，杜松子酒。”

自己的余生将何去何从？

---

[1] 尼古拉斯·卡尔培波（Nicholas Culpeper），英国17世纪著名植物学家、草药学家、医学家，著有《卡尔培波药草志》。

[2] 引用自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上篇第二幕第三场，朱生豪译。

第十四章

独木舟载着弗洛里和伊丽莎白沿着小溪逆流而上，就像是两根长长的弯针在刺绣上穿梭，这条小溪连接着内陆和伊洛瓦底江的东岸。今天是狩猎出行的日子——短暂的午后出行，因为他们不能在丛林里一起过夜。他们计划在相对凉爽的傍晚打几个小时的猎，然后赶回皎塔达吃晚饭。

每只独木舟都是由一根单独的树干凿空制成的，它们迅捷地划过深褐色的水面，几乎没惊起一点涟漪。水葫芦伸展着大量绵软的叶子，开着蓝色的花朵，覆盖在水面上，几乎堵塞了河道，只留下一条四英尺宽的玉带蜿蜒在水面上。阳光透过纵横交错的树枝，变成了绿色。他们时而能听见鹦鹉在头顶鸣叫，但却看不到任何野生动物的踪影，只碰到一条蛇，匆忙地游过水面，消失在水葫芦里。

“我们还要多久到村子？”伊丽莎白转身向弗洛里问道。他在后面一只较大的独木舟里，与弗劳和郭斯拉在一起，给他们划船的是一个衣衫褴褛、满脸皱纹的老妇人。

“婆婆，还有多远？”弗洛里问划船的女人。

那老妇人把雪茄从她嘴里拿了出来，把桨放在膝盖上开始思考。“男人喊一嗓子就能听见的距离。”她想了想说。

“大约半英里。”弗洛里翻译道。

他们已经划了两英里。伊丽莎白感到背疼。这独木舟一不留神就容易翻船，所以你必须在没有靠背的窄椅子上坐得笔直，还得尽量把脚抬高，因为船底里都是污水，里边还有些死虾，随着污水晃来晃去。给伊丽莎白划船的是个缅甸男人，他六十岁，光着膀子，露出棕色的皮肤，身体和年轻小伙子一样强壮。他的脸饱经沧桑，看上去很温和，又有些滑稽。他一头黑发，发质比大部分缅甸人都好，他的头发松散地扎在一侧的耳朵旁，散落了一两捋垂在他的面颊上。伊丽莎白把她叔叔的枪放在膝盖上，轻轻擦拭着。弗洛里之前提出帮她保管，但被她拒绝了。实际上，摸到枪的感觉让她非常高兴，所以她不愿把枪交给别人保管。在

今天之前，她从没碰过枪。她穿着粗布裙子，还有类似男式的粗革皮鞋和丝绸衬衣，她知道，搭配她的阔边帽，这套装束肯定很好看。尽管她的背很疼，流出的热汗让她的脸很痒，还有那花斑大蚊子绕着她的脚踝嗡嗡地飞，她仍然非常开心。

水面变窄了，水葫芦覆盖的河床被陡峭的河岸替代，河岸上的泥浆闪闪发光，像巧克力一样。河面上搭着许多不牢固的茅草屋，茅草屋由打在河床里的木桩支撑着。一个光着身子的男孩站在两个茅草屋之间，放飞一只系在绳子上的甲虫，就像放风筝一样。他看见欧洲人就大叫了起来，于是不知从哪儿冒出许多孩子。缅甸老男人把船划到码头，码头就是横在泥浆里的一棵棕榈树干，树干上覆盖着藤壶，所以能勉强立足。他跳上了岸，然后扶伊丽莎白上岸。其他人带着行李和弹药也跟着上了岸，而弗劳一如既往地摔进了泥浆，陷了下去，只露了个脑袋在外边。一个枯瘦如柴的老头走上前来，他身着紫红色的帕索，脸上有一颗痣，上面长着四根一码长的白毛。他上前行了什科大礼，然后用巴掌打了打那些围在码头上的孩子的脑袋。

“那是村长。”弗洛里说。

老头带领大家去他的屋子，他步态蹒跚地走在最前面，身体蜷缩着，活像倒过来的字母“L”——这是风湿病再加上作为低级政府官员要不停行什科礼的结果。一群孩子快步地跟着这些欧洲人行进，还有越来越多的狗加入到行列中，它们汪汪狂吠，吓得弗劳靠在弗洛里的脚上直哆嗦。在每个茅草屋的门口，都有一群月亮一样圆圆的乡下面孔瞪着这个“英格莱玛”。整个村庄在宽大树叶的遮蔽下显得有些昏暗。在雨季，溪水泛滥，会把村庄低洼的地方变成脏乱的木头威尼斯，村民们只得一开家门就上独木舟。

村长的屋子比别人的大一点，还有波形铁皮的屋顶，尽管这屋顶在雨天会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噪音，但它仍然是村长一生的骄傲。为了支付这个屋顶的钱，他放弃了修建一座佛塔，这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他涅槃的机会。他加快了脚步，接着轻轻地踢了一下睡在他阳台上的年轻人的肋骨。然后他转过身，又向这些欧洲人行了个什科大礼，邀请他们进屋。

“我们进去吧？”弗洛里说，“估计我们还要等半个小时。”

“你不能让他抬几把椅子到阳台上来吗？”伊丽莎白说。自从在李叶

家的那次经历之后，她早已暗自决定，只要有办法，就坚决不再进本地人的家里。

屋里一阵混乱，然后村长、年轻人和几个女人拖出了两把椅子，椅子是经过特别装饰的，上面挂着红色的木槿花，还有一些种在煤油罐里的秋海棠。很显然，他们早已在屋里为欧洲人准备了双人宝座。伊丽莎白刚坐下，村长又出现了，手里拿着一个茶壶和一串很长的鲜绿色香蕉，还有六支煤黑色的方头雪茄。但当他为她倒了一杯茶时，伊丽莎白摇了摇头，因为这茶看上去甚至比李叶家的还要糟糕。

村长有些尴尬，擦了擦鼻子。他转向弗洛里，问他这位年轻的德钦玛是否需要在茶中加牛奶。他听说欧洲人喝茶会加牛奶。如果小姐需要，村民们可以去抓奶牛挤奶。然而，伊丽莎白还是拒绝了他的茶。但她很渴，于是她叫弗洛里派人去取一瓶苏打水，这些苏打水是郭斯拉备好放在他包里的。村长看到这些，为自己准备不足而感到很愧疚，便退下了，把阳台留给了这两个欧洲人。

伊丽莎白依然把枪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擦拭，而弗洛里靠着阳台的栏杆，装作在抽村长给的方头雪茄。伊丽莎白十分渴望狩猎现在就开始。她向弗洛里盘问了无数个问题。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你觉得我们带的弹药够吗？我们要带几个赶猎助手？噢，我真希望我们能走运！你也觉得我们肯定会打到些什么的，对不对？”

“可能也打不到什么好东西。我们肯定能打到几只鸠，或许还能打到几只原鸡。现在是原鸡的禁猎期，但打几只雄鸡也没关系。他们说这附近有一头豹子，上周差点捕杀了村里的一头小公牛。”

“噢，一头豹子！如果我们能打到它就好了！”

“恐怕不大可能。在缅甸打猎的唯一法则就是别抱什么希望。结局总是让人失望。这丛林里充满了猎物，但往往你连开枪的机会都没有。”

“为什么会是这样？”

“丛林太茂密了。一只动物就离你五码远，你可能都看不见它，它

们还经常能成功地躲避到赶猎助手的后方。即使你看见它们了，它们也只是一闪而过。而且，这儿到处都有水，所以动物都不会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地点。比方说老虎，只要它愿意，可以逛个数百英里。丛林里那么多猎物，只要它觉得有可疑之处，就绝对不会回去吃已经被杀死的猎物。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整晚守在发出恶臭的奶牛尸体旁边，等着老虎来，可我等了一晚又一晚，老虎也没有来。”

伊丽莎白靠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她的肩胛骨。这是她非常高兴的时候偶尔会做出的动作。她爱弗洛里，当他这样讲话的时候，她真的很爱他。关于打猎的最为琐碎的信息都让她兴奋不已。他要是不谈书籍、艺术还有那讨厌的诗歌，而是一直讲打猎的事，那该有多好啊！顷刻间，她对弗洛里仰慕不已，这让她突然发觉弗洛里真是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他有自己的味道。他看上去男子气概十足，他的帕里布衬衣开到领口，还有他的短裤、绑腿和狩猎靴子！还有他的脸，有些皱纹，晒得黝黑，就像军人的脸。他侧身站着，让她看不见自己有胎记的那半边脸。她求他继续说下去。

“请再给我讲些打老虎的故事吧。实在是太有趣了！”

他讲述了多年前狩猎老虎的经历，那肮脏的食人兽咬死了他的一个苦工。他在到处是蚊虫的狩猎台上等着；老虎的眼睛穿过黑暗的丛林慢慢靠近，像两个绿色的大灯笼；它把苦工的身体缠在下方的木桩上，吞食着，发出喘气和垂涎的声音。弗洛里轻描淡写地讲述着这一切——这些驻扎在印度的英国人是出了名的无聊，他们不总是在聊狩猎老虎的事吗？——但伊丽莎白又开心地扭了扭她的肩膀。他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谈话打消了她的顾虑，补救了他曾经让她无聊和忧虑的所有时光。六个头发蓬乱的年轻人沿着小路走来，他们肩上扛着短刀，带头的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头，他青筋暴出但敏捷灵活。他们在村长的屋子前停下了，其中一个人嘶哑地喊了一声，于是村长出来了，并解释说他们就是赶猎助手。如果年轻的德钦玛不嫌太热的话，他们现在就可以启程了。

他们出发了。村子的一边是小溪，另一边被一堵六英尺高十二英尺宽的仙人掌篱笆围了起来。他们走过一条仙人掌丛生的小道，然后沿着牛车小路前进，小路上布满车辙，尘土飞扬，两旁茂密地生长着高如旗杆的竹子。赶猎助手们排成一列，快速地行进在最前面，他们每个人都把短刀架在自己的前臂上。老猎人走在伊丽莎白的前面，他的笼基提到了腰间，像一块缠腰布，他瘦弱的大腿上刺着深蓝色的图案，图案如此复杂，就好像他穿着蓝色的蕾丝内裤一样。一棵手腕般粗的竹子倒了，

挡在了路中间。领头的赶猎助手把他的短刀往上一挥，便砍断了竹子，竹筒中的水随即喷涌而出，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走了半英里，他们来到了开阔的地方，由于他们走得很快，太阳又很毒，每个人都大汗淋漓。

“那就是我们要打猎的地方，就在那儿。”弗洛里说。

他指着这片收割过的稻田，这是一片宽阔的灰褐色平地，被泥埂划分成了若干块，每块都有一两英亩[1]。这里异常平坦开阔，除了几只雪鹭以外毫无生机。在远处的平地边缘，一片高大的树林突兀地拔地而起，就像一道深绿色的悬崖。赶猎助手们走到了二十码开外的一棵类似山楂的小树跟前。其中一个人跪在地上，一边向那棵树叩拜，一边嘴里嘟囔着什么，而老猎人把一瓶浑浊的液体倒在了地上。其他人站在一旁观看，表情严肃而厌烦，就像教堂里的人一样。

“这些人在做什么？”伊丽莎白问道。

“祭祀当地的神灵。他们把他叫做守护神，是一种树精。他们在祈祷我们能有好运。”

猎人走了回来，他用沙哑的声音解释道，在进入广阔的丛林之前，他们先要到右边的一小片灌木丛里驱赶猎物。显然守护神建议这样做。猎人用他的短刀指着弗洛里和伊丽莎白应当站的位置。那六个赶猎助手跳进了灌木丛，他们准备迂回，然后把猎物赶回稻田里。距离丛林边缘三十码的地方有几片野玫瑰丛，弗洛里和伊丽莎白就躲藏在后面，而郭斯拉则蹲在稍远的一片灌木丛后面，他抓着弗劳的项圈，轻抚着它，让它别发出动静。弗洛里打猎的时候，总是让郭斯拉和他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他如果射偏了，郭斯拉就会发出令人恼火的咂舌头的声音。此时，远处传来了回声——敲打的声音和奇怪沉闷的喊叫声。赶猎开始了。伊丽莎白立刻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连她的枪杆都在抖动。一只鸟从树上飞了出来，朝他们俯冲而去，这鸟比画眉大一点，翅膀是灰色的，身体鲜红得发亮，非常漂亮。敲打声和喊叫声越来越近。丛林边缘的灌木丛开始猛烈地晃动，某只大动物要现身了。伊丽莎白举起了她的枪，她努力想把枪端稳。但那只是个光着身子、黄色皮肤的赶猎助手，手里还拿着短刀。他见自己出来了，便叫其他人也一起出来。

伊丽莎白放下了她的枪，说：“怎么了？”

“没什么。赶猎结束了。”

“原来那儿什么都没有啊！”她非常失望地大叫道。

“没关系，第一轮赶猎没人能打到东西。下一轮我们的运气会变好的。”

他们穿过凹凸不平的茬地，跨过划分稻田的泥埂，在丛林高耸的绿墙对面就位了。伊丽莎白已经学会了如何往枪里装子弹。郭斯拉吹出一声尖锐的口哨，这轮赶猎就开始了。

“注意！”弗洛里大叫道，“快，它们来了！”

一群绿鸠以惊人的速度在四十码的空中朝他们猛冲了过来。它们就像弹弓射出的一把石子在天空中飞驰。伊丽莎白兴奋得不知所措。一时间，她竟动弹不得，然后她把枪举到空中，瞄准那群鸟的方向，然后猛烈地扣动扳机。什么也没发生，她扣在了扳机护环[2]上。正当鸟儿们从头顶飞过时，她找到了扳机，于是她同时扣动了两个扳机。一声枪响震耳欲聋，后坐力把她震得后退了一步，她的锁骨也险些被震断。她射偏了三十码。与此同时，她看见弗洛里转动他的枪，瞄准目标。两只鸠突然停止了飞行，打了个转，然后像箭一样直直地栽到了地面上。郭斯拉欢呼着，然后和弗劳快速跑了过去。

“快看！”弗洛里说，“那是一只皇鸠。我们把它打下来！”

那是一只又大又重的鸟，比其他鸟飞得慢许多，它正拍打着翅膀从头顶飞过。经过前一次的失利，伊丽莎白不愿意开枪了。她看着弗洛里把一发子弹推进后膛，举起枪，然后一缕白烟从枪口冒出。那只鸟翅膀被击中了，盘旋着，狠狠地摔了下来。弗劳和郭斯拉兴奋地跑上前去，弗劳嘴里叼着那只大皇鸠，郭斯拉咧着嘴笑，从他的克钦包里拿出两只绿鸠。

弗洛里把一只小绿鸠的尸体展示给伊丽莎白。“看看它。真的很漂亮，对不对？这是亚洲最好看的鸟。”

伊丽莎白用指尖触碰它光滑的羽毛。这让她心里嫉妒不已，因为这不是她打下来的。而奇妙的是，她看到弗洛里这么会打猎之后，几乎对他萌生了爱慕之情。

“看看它胸前的羽毛，就像珠宝一样。射死它们简直就是谋杀。缅甸人说，当你打死这样一只鸟的时候，它就会呕吐，意思就是说：‘看吧，这是我所有的东西，我又没拿你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杀我？’我从没见过鸟儿呕吐，这我必须承认。”

“它们好吃吗？”

“很美味。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杀死它们非常遗憾。”

“我多希望自己能像你一样会打猎啊！”她羡慕地说。

“只是小把戏罢了，你很快就会掌握的。你已经知道如何拿枪了，这比多数人刚开始学打猎的时候强多了。”

然而，后两轮赶猎，伊丽莎白还是一无所获。她已经学会了两个枪管不要同时开火，但她兴奋得动弹不了，根本无法瞄准。弗洛里又打到几只鸠，还有一只青铜色翅膀、铜绿色后背的小鸽子。原鸡非常狡猾，从不现身，但可以听到它们到处咯咯地叫，有一两次还能听到雄鸡喇叭一般洪亮的叫声。他们现在进入了丛林深处。光线变得灰暗了，一束束阳光透过丛林，晃得人眼花缭乱。无论朝哪边看，你的视野都会被一排排数不清的树、杂乱的灌木丛和藤蔓植物遮挡住，这些藤蔓缠绕着自己的据点，就像是海水围着码头的木桩翻滚一样。树林太茂密了，就像绵延数英里的荆棘丛，人的眼睛仿佛都要被挤碎了。有的藤蔓大得像巨蟒。弗洛里和伊丽莎白寻着猎物隐约的踪迹，沿着湿滑的河岸跋涉，荆棘撕扯着他们的衣服。他们俩的衬衣都被汗水浸湿了。空气闷热得让人窒息，还夹杂着碎树叶的味道。有时一连好几分钟，藏在树上的蝉会一起发出尖锐刺耳的鸣叫，像是夏威夷吉他的弦音，然后戛然而止，留下一片突如其来的寂静，让人惊慌不已。

在第五轮赶猎中，他们来到一棵巨大的菩提树前，能听见皇鸠在高处咕咕的叫声。这声音仿佛是奶牛在很远的地方哞哞地叫。一只鸟振翅飞了出来，独自停在最高处的树枝上，只能看见它浅灰色娇小的身形。

“试试坐着开枪，”弗洛里对伊丽莎白说，“看见它就开枪，别犹豫。别闭左眼。”

伊丽莎白举起了枪，跟之前一样抖动个不停。赶猎助手们也停下了，站在一起观望，他们中的一些人忍不住咂舌头。他们看见女人拿枪

很震惊，觉得这匪夷所思。伊丽莎白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自己的枪端稳了片刻，然后她扣动了扳机。她没有听见枪响，因为击中目标时，都听不见枪响。那鸟儿似乎从树枝往上跳了一下，然后掉了下来，一圈圈地翻滚着，然后卡在了十码高的树杈上。一个赶猎助手放下了他的短刀，仔细地扫视了一眼那棵树，然后他走到一根很粗的藤蔓边，那根藤蔓足有人的大腿那么粗，像麦芽糖一样扭曲着，从一个树枝上远远地垂下来。他快速地爬上藤蔓，轻巧地跟爬梯子一样，然后他站直身子走在那个宽树枝上，把鸠带回了地面。他把这只柔软的鸟放到了她的手上，它的身体还有余温。

她爱不释手，这种感觉让她欣喜若狂。她甚至想亲吻它，把它抱在自己的怀里。所有人，弗洛里、郭斯拉还有赶猎助手们，看见她爱抚这只死去的鸟儿，都彼此微笑。她依依不舍地把它递给郭斯拉装进包里。她感到一种强烈的欲望，想猛然搂住弗洛里的脖子然后亲吻他，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射中了这只鸠才让她有了这样的感觉。

第五轮赶猎之后，猎人向弗洛里解释说，他们必须穿过一片种植菠萝的空地，然后到另一片丛林赶猎。他们走出了密林，暴露在阳光之下，经过刚才丛林里的阴暗，现在的太阳光让他们觉得格外刺眼。这块从树林里开辟出来的椭圆形空地有一两英亩，就像是长长的草丛里有一块被割掉了一样。地里种着一排排菠萝，这种植物像仙人掌一样长着刺，周围的杂草都快把它们盖住了。一排低矮的荆棘丛把这片田地从中间一分为二。在他们就快穿过田地的时候，荆棘丛另一边传来雄鸡喔喔的叫声，十分洪亮。

“哎呀，听啊！”伊丽莎白停下来说，“那是雄原鸡的声音吗？”

“是的。它们这个时候出来觅食。”

“我们过去开枪射死它们吧？”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些家伙可狡猾了。这样吧，我们要悄悄地靠近荆棘丛，走到它们的对面去。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声音。”

他让郭斯拉和赶猎助手们先行一步，他和伊丽莎白绕过田地，沿着荆棘丛悄悄地前进。他们为了让自己不被看见，不得不把腰弯得很低。伊丽莎白走在前面，汗水从她脸上往下流，弄得她上嘴唇很痒，她的心

怦怦直跳。接着他们俩都笔直地站了起来，一起盯着荆棘丛的另一边。

十码开外，一只矮脚鸡[3]大小的小雄鸡正在用力啄食。它的样子很好看，长长的颈毛非常柔顺，鸡冠隆起成拱形，还有浅绿色的尾巴。在它旁边还有六只褐色的母鸡，它们体型要小一些，背上菱形的羽毛就像蛇鳞一样。伊丽莎白和弗洛里看着它们，还没超过一秒钟，随着一阵咕咕乱叫和扑扑的扇翅膀声，这些鸟儿跳起来像子弹一样飞向了丛林。伊丽莎白立刻不假思索地举起枪开了火。她不知道这一枪有没有瞄准，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手里拿着枪，她的思想仿佛就飞在子弹的后面，推动着子弹正中目标。甚至在她扣动扳机之前，她就知道那只鸟死定了。那只雄鸡扑腾着，散落了许多羽毛，到三十码之外的地方才停下。“好枪法，好枪法！”弗洛里大喊道。他们两人都兴奋地放下了枪，跨过荆棘丛，并肩奔向那只鸡躺着的地方。

“好枪法！”弗洛里重复道，简直跟她一样兴奋，“好家伙，我从来没见过谁能在第一次打猎就击中一只飞着的鸟儿，从没见过！你的枪法快如闪电。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面对面地跪下，死去的鸟儿躺在他们中间。他们惊奇地发现，他们的手，他的右手和她的左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们手牵手地跑到了这个地方，他们自己竟然都没有察觉。

沉默突然笼罩了他们俩，感觉一定会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弗洛里伸出手，握住她另一只手。她也把手顺从而欣然地交给了他。他们就这样双手紧握跪了一会儿。太阳照耀着他们，他们的身体里呼出了温热的气息，他们就仿佛在温暖而欢乐的云端漂浮。他扶着她的上臂，轻轻地把她拉向自己。

突然间，他把头转开，站了起来，把伊丽莎白也拽了起来。他放开了她的手臂。原来他想起了自己的胎记。他不能这么做！不能在这儿，不能在大白天！这一怠慢之举实在糟糕透了。为了掩盖此刻的尴尬，他弯下腰去，把那只雄原鸡捡了起来。

“太棒了，”他说，“你不需要别人教了。你已经会打猎了。我们最好快点，要赶上下一轮赶猎。”

他们刚刚跨过荆棘丛，捡起他们的枪，就听见丛林边缘处传来的一阵阵叫喊声。两个赶猎助手大步流星地向他们冲过来，在空中使劲地挥

舞他们的双臂。

“怎么了？”伊丽莎白说。

“不知道。他们可能看见动物或者别的了。看他们的样子，应该是好东西。”

“噢，太好了！快来啊！”

他们立刻开始奔跑，快速地穿过田地，跨过菠萝树和坚硬多刺的野草。郭斯拉和五名赶猎助手站成一圈，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另外两名赶猎助手在兴奋地向弗洛里和伊丽莎白招手。他们俩走近时，看见人群中有一个老妇人，她一手撩起破烂的笼基，另一只手夹着雪茄比画着手势。伊丽莎白能听见一个类似“查”的字反复被提到。

“他们在说什么？”她问道。

赶猎助手们朝弗洛里围了过去，他们一边急切地说着话，一边指着丛林。问了几个问题之后，他挥手示意他们安静，然后转向伊丽莎白说：

“要我说，今天真是走运！这个大姐刚刚走在丛林里，她说，就在你刚才射鸟枪响的时候，她看见一头豹子从小路上跑过去。这些人知道它可能会躲在哪儿。如果我们快点，他们兴许可以在它溜走之前把它围住，然后把它赶出来。我们要试试么？”

“噢，那我们试试吧！噢，多么有趣啊！如果我们抓到那头豹子，该有多好啊，该有多好啊！”

“你明白这很危险吗？我们要紧靠在一起，应该会平安无事，但徒步狩猎豹子，没有绝对的安全。你准备好了吗？”

“噢，当然了，当然准备好了。我不怕。噢，我们就快点开始吧！”

“你们来一个给我们带路，”他对赶猎助手们说，“郭斯拉，牵好弗劳，然后和其他人一起走。它跟着我们老是发出动静。我们得赶紧点。”他又向伊丽莎白补充道。

郭斯拉和赶猎助手们沿着树林的边缘匆匆离去。他们打算插入树

林，然后从远处开始赶猎。另外一个赶猎助手，也就是之前爬到树上捡鸠的那个年轻人，钻入了树林，弗洛里和伊丽莎白紧随其后。他迈着快速的小步，几乎是在小跑，带着他们俩沿着猎物错综复杂的踪迹前行。有些的灌木丛实在太矮了，为了寻找猎物的踪迹，他们不得不匍匐前进。小路上挂着许多藤蔓，就像地雷的绊线一样。地面铺满灰尘，踩上去静寂无声。在丛林里的某个地标处，赶猎助手停了下来，指了指地面，意思是这个地方就行，然后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再次示意他们不要发出声响。弗洛里从口袋里取出四颗大号铅弹[4]，拿过伊丽莎白的枪，悄悄地装上了弹药。

他们背后传来一阵微弱的窸窣声，他们都吓了一跳。一个衣不遮体的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他拿着一把弹弓，站在灌木丛中。他看着那个赶猎助手，摇了摇头，然后指着那条小路。这两个年轻人比画了一会儿，接着那个赶猎助手似乎同意了。于是他们四个人一言不发、蹑手蹑脚地沿着小路走了四十码，拐了个弯，然后又停了下来。就在同时，一阵可怕的嘈杂喊叫声，还夹杂着弗劳的吠叫声，从几百码外传来。

伊丽莎白感觉到赶猎助手的手在她的肩膀上，把她往下摁。他们四人蹲在带刺的灌木下躲着，欧洲人在前面，缅甸人在后面。在远处，嘈杂的喊叫声和短刀砍到树干上的声音十分响亮，让人难以相信六个人能制造出那么大的声音。这些赶猎助手们互相照应，豹子应该不会回去攻击他们。伊丽莎白盯着一些又大又白的黄蚁，它们爬过灌木的荆棘。有一只蚂蚁落到了她的手上，又爬上了她的前臂，她也不敢把它掸掉。她默默地祈祷：“上帝啊，求求你了，让豹子出来吧！噢，上帝，求求你了，让豹子出来吧！”

突然传来一阵踩在树叶上的“嗒嗒声”，非常响亮。伊丽莎白举起了她的枪，但弗洛里猛地摇了摇头，把她的枪杆按了下去。原来是一只原鸡迈着大步快速地从小路上跑过，发出嘈杂的声音。

赶猎助手们的喊叫声似乎也没有靠近，丛林的这一边却如坟墓般寂静。伊丽莎白手臂上的蚂蚁狠狠地咬了她一口，掉到了地面上。一阵可恶的绝望袭上了她的心头，豹子不会出来了，它肯定溜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把它跟丢了。她简直希望压根就没听说豹子这件事，这种沮丧的感觉让她苦恼至极。就在这时，她感觉到赶猎助手捏了捏她的手肘。他伸着脖子，头部前倾，他那光滑而灰暗的黄色面颊离她的脸只有几英寸远，她都能闻到他头发里椰油的味道。他粗糙的嘴唇皱了起来，就像

要吹口哨一样。他听到了动静。紧接着，弗洛里和伊丽莎白也听到了，那个极其微弱的飒飒声，就仿佛是空中的某个生物滑翔飞进丛林，然后用脚蹭了一下地面。就在这时，豹子的头和肩从灌木丛中露了出来，就在沿小路十五码远的地方。

它停了下来，前爪趴在小路上。他们能看见它，它的头低埋着，耳朵扁平，上尖牙露出，厚实的前腿让人害怕。在阴影中，它看上去不是黄色的，而是灰色。它在仔细地听着丛林里的一举一动。伊丽莎白只见弗洛里一跃而起，举起枪，立即扣动了扳机。子弹咆哮着，几乎在同时传来一声巨响，那野兽倒在了杂草中。“当心！”弗洛里大叫道，“它还没死！”他又开了枪，子弹命中时又发出砰的一声。豹子还喘着气。弗洛里立刻打开枪膛，把手伸到口袋里摸子弹，然后猛地把所有弹药都扔到小路上，并蹲下身开始快速地寻找。

“真见鬼！”他大叫道，“这里面连一颗大号铅弹都没有。我究竟把它们放哪儿去了？”

豹子倒下之后就消失了。它像一条受伤的蟒蛇，在灌木丛里烦躁不安地翻来滚去，发出咆哮和呜咽的叫声，既狂暴又可怜。它的叫声似乎越来越近了。弗洛里找到的每颗子弹底部都标着6或8。剩下的大号子弹都在郭斯拉那儿。翻滚声和咆哮声现在就在五码以内，但树林太浓密了，他们什么也看不见。

两个缅甸人大叫道：“开枪！开枪！”然后叫喊“开枪”的声音越传越远。他们正跑向最近的可以爬的树。灌木丛里又发出一声撞击，撞击如此之近，伊丽莎白身边的树丛都在晃动。

“天啊，它几乎到我们面前了！”弗洛里说，“我们必须想办法把它赶走。冲着声音的方向开枪。”

伊丽莎白举起她的枪。她的膝盖像响板[5]一样颤抖，但她的手却稳如磐石。她快速地开枪，一枪，两枪。撞击声减弱了。豹子向远处逃走了，跌跌撞撞，但仍然很迅速，看不见它的踪影。

“干得漂亮！你把它吓跑了。”弗洛里说。

“但是它逃跑了！它逃跑了！”伊丽莎白大叫道，着急得手舞足蹈。她准备去追它。弗洛里跳上前去，把她拽了回来。

“不要害怕！你留在这儿等我！”

他往枪里装上两颗小号子弹，然后沿着豹子的声音追去。一时间伊丽莎白既看不见野兽也看不见人，接着他们重新出现在三十码外的一片空地上。豹子的肚皮贴在地面上，扭动着身体挣扎前行，一路呜咽。弗洛里举枪瞄准，在四码外开枪。子弹命中，那豹子跳了起来，就像是人击打软垫，垫子弹起来一样，接着它打了个滚，蜷缩着，然后躺着不动了。弗洛里用枪杆戳了戳它的身体，它没再动弹了。

“没事了，它死了，”他叫道，“过来瞧瞧吧。”

两个缅甸人从树上跳了下来，和伊丽莎白一起走到了弗洛里身旁。那头豹子——它是头雄豹——两爪抱着头蜷缩着躺在地上。它看上去比活着的时候小很多，看着非常可怜，像一只死去的小猫咪。伊丽莎白的膝盖还在抖。她和弗洛里站在一起，低头看着那头豹子，但这次没有双手紧握。

不一会儿，郭斯拉和其他人也欢呼雀跃地来了。弗劳嗅了一下死去的豹子，尾巴垂了下来，然后呜咽着跑出五十码外，不管怎么引诱，它都不肯靠近了。大家都围着这头豹子蹲了下来，仔细注视着它。他们抚摸它美丽的白色肚皮，像野兔的皮毛一样柔软，他们捏住它扁平的鼻子，好把它的利爪扒拉出来，然后掰开它黑色的嘴唇，检查它的尖牙。之后，两个赶猎助手砍下一棵高大的竹子，把豹子的四个爪子绑在竹竿上，豹子长长的尾巴垂了下来，然后他们得意洋洋地返回了村子。尽管天色尚早，但没人提继续打猎的事。所有人都非常着急回家，把自己的功绩好好地吹嘘一番，包括两个欧洲人。

弗洛里和伊丽莎白并肩穿过茬地。其他人扛着枪支和豹子，走在他们前面三十码，弗劳远远跟在后面，扭扭捏捏地走着。夕阳西下，太阳落到了伊洛瓦底江的远处。阳光几乎水平地掠过田地，给茬地的秸秆镀上一层金，柔和的黄色光束也照射在他们的脸上。两人并行时，伊丽莎白的肩膀几乎碰到弗洛里的肩膀。他们被汗水浸湿的衬衣也已经被晒干了。他们没说太多话。两人都对这种筋疲力尽而最终大有所获的经历带来的极度快乐感到欣喜不已，生命之中其他的任何事——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喜悦——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这豹皮归你了。”他们快到村子时，弗洛里说。

“噢，可它是你杀的啊！”

“没关系，这豹皮是你应得的。天啊，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少女人能像你一样在那种时候保持头脑清醒！我看她们都会尖叫然后晕倒。我会帮你把这豹皮送到皎塔达监狱去处理一下。那儿有个犯人能把皮毛处理得像天鹅绒一样柔软。他被判了七年刑，有的是钻研这门手艺的工夫。”

“好吧，那太感谢了。”

然后他们就没说话了。之后，等他们洗去身上的汗渍与尘土，吃了东西，休息好，自然会在俱乐部再次碰面。他们没有约好碰面的地点，但不言而喻的是，他们会再次碰面的。同样不言而喻的是，弗洛里会向伊丽莎白求婚，虽然之前也没人提起这件事。

在村子里，弗洛里付了每个赶猎助手八安那，并监督他们把豹皮剥了下来，然后给了村长一瓶啤酒和两只皇鸠。豹皮和头骨被打包好，装上了一只独木舟。尽管郭斯拉想尽力看管好豹子的胡须，可它们还是都被偷走了。村子里的一些年轻人搬走了豹子的遗骸，他们要吃它的心和其他内脏，因为他们相信吃这些东西能让自己变得和豹子一样强壮和敏捷。

---

[1] 英亩，英美制面积单位，1英亩约为0.004平方公里。全书同。

[2] 扳机护环（trigger-guard），一个环形物，环绕在扳机外围，用来防止意外性的射击（误触）。

[3] 矮脚鸡（bantam），又名万丹鸡，因产于印度尼西亚城市万丹而得名，这种鸡身材矮小，体态匀称，雄鸡生性好斗。

[4] 大号铅弹（SG cartridges），00号8.4mm直径的铅弹，又名鹿弹，有多枚弹丸，是狩猎大型动物常用的猎枪弹，在英国被称为“小型猎物（Small-Game）铅弹”。后文出现的6号和8号铅弹是射鸟用的小号铅弹，又名鸟弹，直径分别为2.79mm和2.29mm。

[5] 响板（castanet），碰奏体鸣乐器，以贝壳形的两块乌木碰击发音，流传于西班牙民间，主要用于歌舞的伴奏，后亦用于欧洲艺术音乐中。

第十五章

当弗洛里来到俱乐部时，他发现拉克斯廷一家人情绪低落，十分反常。拉克斯廷夫人像往常一样坐在布屏风扇下最好的位置上，读着文职人员薪俸表，这个表相当于缅甸的《德布雷特氏英国贵族名鉴》[1]。她正在跟她的丈夫发脾气，因为拉克斯廷先生不听她的，刚到俱乐部就要了一大杯白兰地与苏打水混合的烈酒，然后还读起了《粉安报》，这更是违抗了她的命令。伊丽莎白一个人在闷热的小阅览室里，翻阅着一期旧的《布莱克伍兹》杂志。

自从与弗洛里分开之后，伊丽莎白遭遇了极不愉快的经历。当她洗完澡准备去吃晚饭，衣服穿到一半的时候，她的叔叔突然出现在她的房间里——借口是要听听白天的打猎经历——然后开始揉捏她的腿，意图再明显不过了。伊丽莎白吓坏了。这是她头一回知道，有些男人连占侄女的便宜这种事都做得出来。生活就是这样，吃一堑，长一智。拉克斯廷先生想把这件事当玩笑一样糊弄过去，但他笨手笨脚，又几乎喝醉了，才没能得逞。幸好他的妻子没听见，否则很可能闹出一桩轰动的丑闻。

在此之后，晚餐变得非常尴尬。拉克斯廷先生闷闷不乐。这些女人装腔作势，不让你好好快活一把，多么讨厌啊！这女孩非常漂亮，让他想起《巴黎人的生活》里的插图，见鬼！难道不是他在花钱养活她吗？真是太遗憾了。但对伊丽莎白来说，她的处境十分不妙。她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只能寄人篱下。她远涉重洋，从八千英里外的地方来到这里，如果才过了两个星期，她叔叔的房子就住不下去了，那真是件糟糕的事。

因此，她的脑海里有一个念头变得前所未有地坚定：如果弗洛里向她求婚（他肯定会的，这点基本上毫无疑问），她就答应。要不是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她或许会做出不同的决定。这天下午，在那愉快、兴奋、甚至可以说是“美妙”的探险之旅的催化作用下，她几乎爱上了弗洛里，竭尽所能地爱上了他。但即便是这样，她的疑虑或许还会卷土重来。因为弗洛里身上始终有很多让人犹豫之处：他的年龄、他的胎记、他古怪反常的谈话方式，他那“高深莫测”的言论让人不知所云、心烦意

乱。之前有些日子，她甚至讨厌他。但是现在她叔叔的所作所为扭转了局面。不管发生什么，她都必须逃离她叔叔家，越快越好。没错，只要弗洛里向她求婚，她毫无疑问会答应！

他走进阅览室，就从她的脸上看到了答案。她的神情无比优雅，比他以往所看见的还要温柔。她穿着淡紫色的连衣裙，就是他们初次见面的那个早上她穿的那条，一见到熟悉的连衣裙，他就有了勇气。连衣裙仿佛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那些时不时令他感到气馁的陌生和文雅也随之烟消云散。

他拿起她刚才读的那本杂志，发表了一些评论。两人说了一会儿套话，这是他们几乎避免不了的。人们聊天时习惯废话连篇，喋喋不休，这实在奇怪。但即便是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也无意识地向门口走去，接着走到了室外，然后走到网球场旁高大的鸡蛋花树下。一轮满月挂在夜空中，发着耀眼的光，像一枚炽热的硬币，明亮得几乎能灼伤人的眼睛。月亮快速地在烟雾缭绕的蓝色夜空中爬升，空中还飘过几缕淡黄色的云。天上一颗星星都看不到。巴豆丛在白天奇丑无比，像得了黄疸病的月桂，而夜晚，沐浴在月光中，却变成了锯齿状的黑白图案，仿佛美妙绝伦的木板刻画。在院子的围栏旁边，两个达罗毗荼苦工正走在路上，他们身形模糊，白色的破衣衫反射着月光。透过温热的空气，鸡蛋花树散发出的气味让人难以忍受，就像是自动售货机里飘出的化合物的气味一样。

“看那月亮，你快看啊！”弗洛里说，“就像白色的太阳一样，照得夜晚比英国冬季的白天还要明亮。”

伊丽莎白抬头看着鸡蛋花的树枝，月亮似乎把它们变成了银色的枝条。月光仿佛可以触摸得到，厚厚地堆积在万物上；月光就像闪闪发光的盐一样，给地面和粗糙的树干铺上一层外壳；月光还像白雪一般，每一片树叶都似乎承载着它们的重量。即使是平时对这类事物漠不关心的伊丽莎白，也感到非常惊讶。

“太美了！在家乡你永远看不到这样的月光。实在是太……”除了“明亮”没有别的形容词能够描绘眼前的月光了，于是她没再继续说下去。她有个习惯，就跟罗莎·达特尔[2]一样，喜欢不把话说完，但是她们的原因各不相同。

“是啊，月亮在这个国家真是尽力展现最美的一面了。那棵树真难

闻，是吧？热带这些东西真可恶！我讨厌一年四季都开花的树，你呢？”

他有些心不在焉地说着话打发时间，等那两个苦工走远。苦工消失以后，他伸出手搂住伊丽莎白的肩膀，见她没有抗拒也没有说话，便把她转了过来，让她贴近自己。她的头靠在他的胸前，她的短发摩擦着他的嘴唇。他用手托着她的下巴，把她的脸庞抬到自己面前。她并没有戴眼镜。

“你不介意吗？”

“嗯。”

“我的意思是，你不介意我……我这个东西吗？”他轻轻地摇了摇头，暗示他指的是自己的胎记。在吻她之前，他必须要先问她这个问题才安心。

“不，不，当然不介意。”

他们俩的嘴唇贴在一起不久，他就感觉到她裸露的手臂轻轻地搂住了他的脖子。他们紧贴着站在一起，靠着鸡蛋花光滑的树干，身体贴着身体，嘴唇贴着嘴唇，足足有一分钟，或许比那还要久。鸡蛋花树恶心的气味与伊丽莎白头发的气味混在了一起。这气味给他一种精神错乱的感觉，仿佛伊丽莎白离自己非常遥远，但此刻伊丽莎白就在他的怀中。这棵异域的树对他而言象征着太多太多，他的流浪，他的秘密，他荒废的岁月——它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横亘于他和伊丽莎白之间。他要如何让她明白，他从她身上想要的是什么？他停止了接吻，把她的肩膀轻轻地靠在树干上，低头凝视着她的脸庞，尽管背对着月光，他还是能看得非常清楚。

“我想告诉你，你对我意味着什么，但这没有多大意义，”他说，“‘你对我意味着什么！’这措辞多么生硬啊！你不知道，你肯定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但我还是要试着告诉你。有很多事我都必须告诉你。我们最好回俱乐部去吧？他们可能已经来找我们了。我们可以在阳台上接着聊。”

“我的头发乱吗？”她说。

“你的头发很漂亮。”

“可我的头发乱了吗？你来帮我捋一捋，好吗？”

她朝他低下了头，他用手轻抚着她凉凉的一缕缕短发。她朝他低头的方式给了他一种奇怪的亲密感，比亲吻还要亲密很多，就好像他已经成了她的丈夫一样。啊，他必须拥有她，这是肯定的！只有娶她为妻，他的生命才能得到救赎。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向她求婚。他们慢慢地走过棉花丛，回到俱乐部，他的手依旧搂着她的肩膀。

“我们可以在阳台上接着聊，”他重复道，“不知怎么的，咱们从没真正聊过天，就你我二人。我的上帝啊，这些年来我多么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啊！我要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地跟你谈天！这听上去很无聊。恐怕确实会很无聊。我得请你忍受一小会儿了。”

她发出了一个声音，表示不同意“无聊”这个词。

“不，确实很无聊，我知道的。我们驻印英国人一向被视作无聊的家伙。我们确实是挺让人厌烦的。但我们也无能为力。你看，有一个——该怎么说呢？——有一个恶魔在我们体内，驱使着我们说话。我们四处漂流，承载着一大堆记忆，我们渴望分享这些记忆，但不知怎么的，总是不能如愿。这就是我们来这个国家要付出的代价。”

他们在侧阳台，非常清净，没人打扰，因为没有门直接通向这里。伊丽莎白坐了下来，把手臂放在了柳条编的小茶几上，而弗洛里还在来回踱步，手揣在外衣口袋里，一会儿走进从阳台东侧屋檐上泻下来的月光里，一会儿又走回阴影里。

“我刚才说我爱你。爱！这个词已经被滥用到没有任何意义了。但你得听我解释。今天下午你跟我一起打猎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的上帝啊！终于有人能和我一起分享我的生活了，而且是真正地分享，真正地和我一起生活，你知道吗？”

他准备向她求婚，他之前确实打算向她求婚，一刻也不再等。但那些话还没有说出口，相反，他发现自己在自顾自地讲个没完。他控制不住自己。她应当明白，他之前在这个国家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她应当领会，他想让她赶走的孤独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些都太重要了，但想要解释清楚实在是太难了。他承受的一种无法名状的痛苦实在是太可怕了。

那些确诊为某种疾病的人是多么幸运啊！那些贫穷、患病、为爱所恼的人是多么幸运啊，因为至少别人都知道他们的问题所在，都会满怀同情地倾听他们的抱怨。但那些没有经历过漂泊异乡之苦的人，又有谁会明白其中的痛苦呢？伊丽莎白就望着他走来走去，在那片月光下进进出出，月光把他丝绸的外套都染成了银色。她的心还在为刚才那个吻而怦怦直跳，但她的思绪却随着他的独白开始漫游。他要向她求婚吗？他在这方面动作太慢了！她隐约感觉到他要说关于孤独的事。啊，当然了！他要告诉她，在他们结婚之后，她得在树林里忍受寂寞孤独。他完全可以不费这番口舌。或许有些时候，你在树林里确实会感到很孤独？离哪儿都好几英里远，没有电影院，没有舞会，除了对方没人可以说话，晚上除了读书就没有别的事可做，这样的生活简直太无聊了。不过，你可以搞到一台留声机。如果那些新式的便携式收音机能带到缅甸来，那可就大不一样了！当她正准备说这些时，他又补充道：

“我向你解释清楚了吗？你能想象出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吗？异域他乡，孤独寂寞，抑郁忧伤！异域的树木，异域的花草，异域的风景，异域的脸庞。这里简直就像另一个星球一样陌生。但你知道吗——这就是我非常想让你明白的——你知道吗，只要你有哪怕一个人与你共同分享生活，那么或许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也没有那么糟糕，这甚至是能想象到的最有趣的事。一个能透过同你一样的眼光看世界的人。这个国家对我来说就是个孤独的地狱——对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如此——但我要告诉你，只要你不再孤身一人，这里便是天堂。这些听上去是不是很像无稽之谈？”

他在茶几前停下了，拿起了她的一只手。在昏暗中，他看到她的脸就是个黯淡的椭圆形，像一朵花，但一碰到她的手，他立刻知道了，她根本一个字都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是啊，她又怎么会明白呢？这一通绕来绕去的话，本身就没有意义！他想要马上问她：“你愿意嫁给我吗？”不是还有一生的时间可以谈心吗？他拿起了她的另一只手，温柔地把她拉了起来。

“请原谅我说了这么多废话。”

“没关系的。”她喁喁细语道，希望他能吻她。

“不，我说的都是些废话。有些事能用语言说清楚，有些事却怎么也说不清。另外，我这么满腹牢骚地一直说我自己的事也太无礼了。但我是想为一件事做铺垫。其实，我想说的是，你愿……”

“伊——丽——莎——白！”

传来拉克斯廷夫人尖锐而哀怨的嗓音，是她在俱乐部里叫喊。

“伊丽莎白？你在哪儿，伊丽莎白？”

很明显她快到前门了——过不了多久就到阳台了。弗洛里把伊丽莎白搂到怀里，两人匆忙吻了一下，然后他放开了她，可还握着她的双手。

“快点，还有时间。回答我，你愿意……”

但这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完，他的脚下就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地板像海浪一样颠簸摇晃了起来，就好像向他猛然盖了过来，他站不稳，头晕目眩，摔倒在了地上，狠狠地撞到了前臂。他倒在地上的时候，发现自己猛烈地来回颠簸，就好像下面有一头巨大的猛兽在拼命摇动自己背上的房子一样。

像喝醉了酒一样摇摇晃晃的地面突然之间就恢复了正常。弗洛里坐了起来，他头昏眼花，但没怎么受伤。他隐约看到伊丽莎白摊开四肢躺在自己的身旁，俱乐部里还传出阵阵尖叫声。大门外有两个缅甸人在月光下飞奔，长发在身后飘了起来。他们声嘶力竭地大喊道：

“恩伽因在摇晃啦！恩伽因在摇晃啦！”

弗洛里不解地看着他们。恩伽因是谁？“恩伽”是对罪犯称呼的前缀。那么恩伽因肯定是个土匪。他为什么要摇晃？接着弗洛里想起来了。恩伽因是缅甸神话里的巨人，就像堤福俄斯[3]一样，被埋在地壳之下。毫无疑问！刚才那是地震。

“地震了！”他大叫道，他想起了伊丽莎白，便过去扶她。但她已经坐了起来，并没受伤，正在揉自己的后脑勺。

“刚才是地震吗？”她用惊恐的语气问道。

拉克斯廷夫人高大的身形爬过了阳台的拐角，她紧贴着墙壁，就像一只细长的蜥蜴。她歇斯底里地大叫道：

“噢，天啊，是地震了！噢，摇晃得太可怕了！我受不了了——我

的心脏受不了了！天啊，天啊！地震了！”

拉克斯廷先生踉踉跄跄地跟在她身后，他的步伐很不协调，一半是由于地震颤动，另一半是由于杜松子酒的酒劲。

“地震，真见鬼了！”他说。

弗洛里和伊丽莎白慢慢地站起身来。他们都进了屋，他们的脚底都有种奇怪的感觉，就像从摇晃的船上一脚跨上岸的感觉。老管家急匆匆地从仆人宿舍赶过来，一边走一边往他头上缠头巾，后边还跟着一群叽叽喳喳的童仆。

“地震了，先生，地震了！”他急切地连声说道。

“我他妈当然知道是地震了，”拉克斯廷先生一边说，一边谨慎地弯腰坐在椅子上，“嘿，管家，给我拿点酒来。上帝啊，发生这种事了，我可得喝上两口。”

他们都喝了几口。管家单脚站在桌旁，一手端着托盘，有些胆怯，但一脸笑容。“地震啊，先生，大地震啊！”他兴奋地重复道。他满心渴望想要谈论这件事，其他人又何尝不是呢。一旦摇摇晃晃的感觉从他们腿上消失了，他们就沉浸在了这件离奇的生活趣事上。一次地震在结束后，竟变得如此有趣。试想一下，你完全有可能已经死了，被埋在一堆废墟之下，但事实是你还活着，这多么让人欣喜啊。于是，他们七嘴八舌地讨论开了：“天啊，我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强烈的震动。”“我都已经完全平躺在地上了。”“我还以为是哪条该死的野狗在地板下面挠痒痒呢。”“我还以为肯定是哪儿爆炸了。”等等寻常的震后闲聊，就连管家也被拉入了谈话。

“我想你应该记得很多次地震，对吧管家？”拉克斯廷夫人说，这语气对她来说已经算是非常和蔼了。

“是的，夫人，许多次地震！1887年，1899年，1906年，1912年……很多很多次地震，我都记得，夫人！”

“1912年那次地震挺大的。”弗洛里说。

“噢，先生，1906年那次更大啊！震得非常厉害，先生！庙里有个

很大的异教神像倒了下来，砸到了佛教长老身上，夫人，我们缅甸人认为这是凶兆，预示着稻田要歉收，口蹄疫要爆发。还有就是1887年的地震，那是我记得的最早的地震，我那时候还是个小男仆，麦克拉根少校萨布躲在桌子下边，发誓明天一早就签署禁酒令。他不知道那是地震。还有两头牛被倒塌的屋顶压死了……”。

欧洲人在俱乐部待到深夜，管家跑进屋里足足六次，来讲述新的趣闻轶事。欧洲人不但没有冷落他，反而鼓励他讲。没有什么事能像地震一样把人们凝聚在一起。再震一次，或者两次，他们或许就会让管家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了。

同时，弗洛里的求婚计划也被搁置了。地震刚过，肯定不能马上求婚。无论如何，那天晚上他就再也没能与伊丽莎白独处。但这不要紧，他知道她已经是他的人了。到了早上，有的是时间。这样一想，他就放心了，忙了一整天，他也筋疲力尽，便上床睡去了。

---

[1] 《德布雷特氏英国贵族名鉴》（Debrett），全称为《德布雷特氏贵族和男爵及陛下授权证书持有者名鉴》，由J.德布雷特于1802年初次出版。

[2] 罗莎·达特尔（Rosa Dartle），狄更斯半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角色。

[3] 堤福俄斯（Typhoeus），希腊神话中的百头巨怪，有一百个喷火的龙头，能用很多舌头发出的咆哮之声。它创造了旋风并和宙斯作战，后被宙斯抛到火山下。

第十六章

在墓地旁高大的彬加都木上，秃鹰扇着翅膀从沾满白色鸟粪的树枝上飞了起来，然后平稳地滑翔，接着盘旋着向更高的天空飞去。天还很早，但弗洛里已经出门了。他准备去俱乐部，等伊丽莎白来，然后正式地向她求婚。有一种说不清的直觉，驱使他要赶在其他欧洲人从丛林里回来之前把这件事了结。

当他走出院子大门时，他看见皎塔达新来了一个人。一个年轻人骑着一匹白色的小马慢跑穿过练兵场，他手持长矛，就像拿着一根针似的。一些锡克人正跟在他后面跑，看上去像印度兵，他们牵着两匹小马，一匹是红棕色的，一匹是栗色的。当年轻人跑到与弗洛里平齐时，弗洛里停在了路上，喊了声早安。他不认识这个年轻人，不过在这种小型驻地，欢迎陌生人也是习以为常的事。年轻人瞧见有人向他问好，便漫不经心地调转了马头，绕了个圈子来到路边。这年轻人二十五岁上下，身材瘦高而挺拔，一看就知道是个骑兵军官。他的脸像个兔子，这种脸型在英国士兵当中很常见，眼睛是淡蓝色的，两唇之间可以看到门牙，形状有点像三角形；但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他的顽强和无畏，甚至是冷酷——或许就像一只兔子，不过是一只尚武的硬汉兔子。他骑在马上，就仿佛和马融为一体。他看上去年轻健壮，英气逼人。他光鲜的脸庞被太阳晒得变成了暗色，与他浅色的眼睛刚好很配，他头戴白色的鹿皮遮阳帽，锃亮的马球靴仿佛用旧的海泡石烟斗[1]，他优雅得就像画里的人物。从他一开始出现，弗洛里就觉得很不自在。

“幸会幸会！”弗洛里说，“你是刚到吗？”

“昨天晚上坐最后一班火车到的，”他的声音很傲慢，带着些孩子气，“我带着一个连的人被派驻到这里待命，免得你们当地的恶棍们惹什么麻烦。我的名字是维罗尔，宪兵军官。”他补充道，但却没有询问弗洛里的名字。

“哦对。我们之前就听说要派人来。你在哪儿留宿呢？”

“暂时住在驿站旅馆。昨晚我进去的时候，有个老黑待在那儿，是个征税官什么的，被我撵了出来。这可真是肮脏的地方啊，不是

吗？”他说话的时候头往后仰了一下，暗示他指的是整个皎塔达。

“我觉得这儿跟别的驻地没什么两样。你要待很久吗？”

“就一个月左右吧，感谢上帝。一直到雨季来临。你们这儿的练兵场糟糕透了，是吧？他们也不修剪一下，实在是太可惜了，”他一边用长矛拨弄干枯的草，一边补充道，“打马球什么的是没希望了。”

“恐怕你在这儿可打不了马球，”弗洛里说，“我们顶多也就只能打打网球。我们在这儿总共就只有八个人，大部分人四分之三的时间还都待在丛林里。”

“天啊！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啊！”

之后便是一阵沉默。围在马头那边的一群身材高大的大胡子锡克人，不太友好地打量着弗洛里。维罗尔厌倦了这次谈话，想抽身离开，这点再明显不过了。弗洛里这辈子都没觉得自己是如此多余、如此苍老、如此落魄。他留意到维罗尔的小马驹是匹漂亮的阿拉伯母马，脖颈高傲，弧线优美，尾巴如同羽毛一般。这匹乳白色的尤物要值好几千卢比。维罗尔已经拉紧了缰绳，准备扭头离去，他心里肯定在想，这一上午说的话可够多的了。

“你这匹小马驹可真漂亮啊！”弗洛里说。

“她还不赖，比那些缅甸的次货强多了。我是出来玩马上挑桩游戏[2]。在这个破地方想打马球是没希望了。驾，希拉·辛格！”他叫道，然后骑马转过身去。

牵着红棕色马的那个印度兵把缰绳递给了一个同伴，跑到四十码开外的一个地点，然后把一个窄小的黄杨木桩固定在地面上。维罗尔没再理会弗洛里。他举起长矛，摆出好像在瞄准木桩的姿势，与此同时那些印度人把马牵到一边，不让它们挡着路，然后用挑剔的眼光驻足旁观。维罗尔用膝盖夹了夹小马的肋部，他的动作很小，几乎察觉不到，马儿立刻像出了膛的子弹般飞驰了出去。这个瘦高而挺拔的年轻人俯下身子坐在马鞍上，放低长矛，精准地刺穿了木桩，整套动作轻松得就像一头半人马。一个印度人粗声咕哝道：“真棒！”维罗尔用标准姿势把长矛置于身后，然后骑马慢跑绕了回来，把挑起来的木桩递给那个印度兵。

之后维罗尔又骑马挑了两次木桩，每次都命中了。他的姿态无比优雅又极为庄重，所有人，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他挑木桩的整个过程，仿佛这就是一场宗教仪式。弗洛里也站着观望，完全被忽略了——维罗尔的脸有个特征，就好像他在专门忽视自己不喜欢的陌生面孔一样。由于自己受到了冷落，弗洛里就更不甘心勉强离开了。不知怎么的，维罗尔让他全身充斥着可怕的自卑感。他还在尝试找个借口，延续刚才的谈话，这时他抬头往山坡看去，伊丽莎白一袭浅蓝，正从她叔叔家的大门走出来。她肯定是看见维罗尔第三次挑中木桩了。他的心一阵刺痛。他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种鲁莽的念头往往会带来麻烦。他用手杖指着另外两匹马，对几码开外的维罗尔喊道：

“这两匹马也会吗？”

维罗尔神情傲慢地扭过头。他本以为不搭理弗洛里，弗洛里就会识相地离开。

“什么？”

“这两匹马能行吗？”弗洛里重复道。

“那匹栗色的也不赖。不过你要是驾驭不了它，它会受惊乱跑的。”

“让我也来试试挑木桩，行吗？”

“行啊，”维罗尔不友善地说，“可别摔个嘴啃泥。”

一个印度兵把马牵了过来，弗洛里装作检查勒马绳，其实他是在拖时间，等伊丽莎白到三四十码远的地方。他心里想好了，当伊丽莎白经过时，他要刚好挑起木桩（骑着缅甸的小马很容易办到，只要它直直地往前跑），然后他要举着挑起来的木桩，策马来到她的面前。这显然是正确的举动。他要让她看到，会骑马的不只是那个年轻的粉面小崽子。他穿着短裤，骑在马上不是很舒服，不过他知道，自己在马上的样子是最帅的，几乎所有人也都是如此。

伊丽莎白走近了。弗洛里跨上马鞍，从印度人手中接过长矛，然后挥舞了一下，向伊丽莎白致意。但她没有回应。或许她是在维罗尔面前不好意思。她把脸扭向一旁，朝墓地看去，脸颊绯红。

“出发！”弗洛里对那个印度人说，然后用膝盖夹了夹马的肋部。

接下来的一瞬间，马还没跃起来，弗洛里就猛地被甩到了空中，重重地摔倒了地面上，摔得肩膀都几乎都脱臼了，还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所幸长矛没有扎伤他。他仰卧着，模模糊糊地看见蓝色的天空和飞翔的秃鹫。然后他的眼睛聚焦在一个戴着卡其色头巾、脸色暗沉的锡克人身上，这人络腮胡一直延伸到眼角，正弯着腰看着他。

“发生什么了？”他用英语说道，然后痛苦地用手肘把自己支撑起来。那个锡克人用手指指点点，没有好气地应答。弗洛里看见栗色的小马急速飞奔到了练兵场的另一边，马鞍挂在肚皮下。原来肚带没有系紧，刚才打滑了，他这才摔了下来。

当弗洛里坐起来时，他感到疼痛无比。他衬衣的右肩已经被撕破了，还浸满了鲜血，他都能感觉到有更多的血从他的脸上渗出来。地面太硬，让他擦破了皮。他的帽子也不见了。在极端的痛苦中，他想起了伊丽莎白，他看见伊丽莎白向他走来，就离他不到十码，她直勾勾地看着他趴在地上的倒霉样。我的天啊，我的天啊！他想，我的上帝啊，我看上去肯定就是个傻瓜！这个想法甚至让他顾不上疼了。他用手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胎记，但其实受伤的是另一半脸。

“伊丽莎白！喂，伊丽莎白！早上好！”

他急切地叫道，带着恳求的语气，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看上去很傻的时候，就会这样。她没有答应，更奇怪的是，她还一个劲地往前走，一秒也没停留，就好像她根本没看见他或者听见他一样。

“伊丽莎白！”他又惊讶地叫道，“你看见我摔下马了吗？马鞍打滑了。那个笨蛋印度兵没有……”

毫无疑问，这下她肯定听见他在喊了。她把脸转到了他的方向，看了一会儿，眼神放空，就好像他根本不存在一样。然后她便把目光投向墓地的远方了。这可太糟糕了。他难过地追喊着：

“伊丽莎白！我说，伊丽莎白！”

她继续往前走，一句话也没说，一个手势也没做，一眼也没看。她沿着马路径直往下走，随着一串鞋跟的声音，她的背影也逐渐远去了。

印度兵朝弗洛里围了上来，维罗尔也骑马来到弗洛里躺着的地方。有的印度兵向伊丽莎白敬了礼；维罗尔无视了她，或许他根本就没看到她。弗洛里酸痛地站了起来。他的瘀伤很严重，但没有伤筋动骨。印度人把帽子和手杖还给了他，但并没有为他们的粗心大意道歉。他们看上去有点心怀蔑视，似乎觉得弗洛里是自己活该。不难想到，肚带是他们故意弄松的。

“马鞍打滑了。”弗洛里说，语气很弱，听上去很蠢，谁在这种时候说话都是这样。

“上马之前你为什么不检查一下？”维罗尔轻描淡写地说，“你应该知道，这些乞丐根本靠不住。”

说完这些，他拉了拉缰绳，骑马离去了。印度兵跟着他走了，也没跟弗洛里敬礼。当弗洛里回到自家门口时，他往回看了看，那匹栗色的小马已经被抓住，并且重新套上马鞍了，维罗尔还骑着它在挑木桩。

这次落马对弗洛里的打击很大，以至于他现在都难以集中思想，为什么让她刚才这么做？她看见他伤痕累累、疼痛不已，而她就这样从他身边走过，装作没看见，就好像他是一条死狗。这怎么可能？这是真的吗？难以置信。他惹她生气了吗？他在别的方面冒犯到她了吗？所有仆人都等在院子的围栏旁边。他们是出来看骑马挑木桩的，他们每个人都看见了弗洛里刚才自取其辱的惨痛一幕。郭斯拉跑到半山腰来接他，一脸的关心。

“老爷伤到自己了吗？我可以背老爷回家吗？”

“不用，”弗洛里说道，“去给我倒点威士忌，再给我拿一件干净衬衣。”

回到家后，郭斯拉扶弗洛里坐到床上，帮他脱下了破烂的衬衣，血已经把衬衣粘到了他的身体上。郭斯拉咂了咂舌头说：

“我的天啊！伤口里全是泥土。您不应该骑那些奇怪的小马，玩这些小孩子的游戏，德钦。对您这样年纪的人来说，这太危险了。”

“马鞍打滑了。”弗洛里说。

“这种游戏，”郭斯拉继续说道，“对年轻的警官来说倒是不错。但您已经不再年轻了，德钦。您这把年纪，摔一次就不得了。您应该更好地照顾自己。”

“你觉得我很老吗？”弗洛里生气地说。他的肩膀疼得厉害。

“您都三十五岁了，德钦。”郭斯拉礼貌而坚定地说。

这实在是太丢人了。玛普和玛伊暂时处于和睦的状态，他们拿来了一壶不知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她们声称对伤口有好处。弗洛里让郭斯拉悄悄地把它扔出窗外，换成了硼酸软膏。然后，他坐在温热的浴盆里，郭斯拉用海绵擦出了他伤口里的泥土。随着他的脑子越来越清醒，他就对刚才发生的事越发无助、越发困惑、越发沮丧。他肯定严重地冒犯了她，这点毋庸置疑。可是，昨天晚上之后他就没再见到过她，他怎么可能冒犯到她呢？这完全没有合理的答案。

他向郭斯拉解释了好几遍，他这次从马上摔下来是因为马鞍打滑了。郭斯拉虽然很同情他，但显然不相信。到了最后，弗洛里也觉得这次落马可能就是因为他自己骑术不佳。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两周前他赶走了那头无害的水牛，确实也赢了不少不应得的声誉。看来命运多多少少是公平的。

---

[1] 海泡石烟斗（meerschaum pipe），一种珍贵的多孔矿物，主要成分为含水硅酸镁，由于石质细腻、柔软，故容易在外壁雕刻出十分精巧细致的浮雕图案。海泡石烟斗经长时间的反复使用在烟油和手汗的内外共同作用下，会渐渐从原来的白色变成深邃和高贵的棕金色。

[2] 马上挑桩游戏（tent-pegging），源于印度的游戏，即骑马以长矛挑出埋在地里的帐篷木桩。

第十七章

晚饭后弗洛里去了俱乐部，在此之前他都没有再见过伊丽莎白。他虽然想过要去找她，但最后没去，没去要一个解释。当他看到镜中自己的脸时，便失去了勇气。他的脸一边有块胎记，而另一边有些擦伤，这让他看起来愁眉苦脸又狰狞可怕，因此他不敢在白天露面。当他走进俱乐部的休息室时，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胎记，借口说是额头被蚊子叮了。在这样的时刻，他可没有勇气把自己的胎记露出来。然而，伊丽莎白并不在。

弗洛里没见到她人，却不小心卷入了一场出乎意料的争吵之中。埃利斯和韦斯特菲尔德刚从丛林里回来，正坐着喝酒，心情烦躁。从仰光来的消息说，《缅甸爱国者报》的编辑在对麦格雷戈先生的诽谤一案中，只被判处了四个月的监禁。埃利斯对这一轻判怒不可遏，所以弗洛里进来时，埃利斯便开始用“小老黑猥琐死咖喱”这样的言辞试图激怒他。弗洛里当时虽然疲于争吵，但回答却有些鲁莽，所以争吵还是发生了。事情愈演愈烈，埃利斯把弗洛里叫做“老黑生的娘娘腔”，弗洛里也以牙还牙，这时韦斯特菲尔德也开始大发脾气。韦斯特菲尔德生性和蔼，但弗洛里逆反的想法时常会触怒他。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当所有的事情都黑白分明时，弗洛里总是乐于选择错误的一方。他告诫弗洛里：“不要像那些该死的海德公园煽动者一样说话。”然后给他读了一段言辞犀利的短小训诫，以此作为白人萨布的五大福气，即：

“我堂堂白人，要护我威望，手腕强硬（毋须客气），同心协力，团队合作，提防土著得寸进尺。”

想见伊丽莎白的焦虑心情啃噬着弗洛里的心，以致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另外，他也的确是太常听到这种观点了——一百遍了，说不定有一千遍了，自从他刚到仰光的第一周起，他的长官萨布（一个苏格兰人，喜欢喝杜松子酒的老酒鬼，非常擅长养赛马，后来由于用同一匹赛马冠上不同名字参加比赛的肮脏勾当，被逐出赛马场）看到他经过当地一场葬礼时脱掉了遮阳帽，就斥责他说：“记住，小伙子，你要永远记住，我们是萨布，而他们只是贱民！”现在他不得不听这无稽之谈，这让他感到恶心。因此，他打断了韦斯特菲尔德的话，毫不客气地说：

“噢，闭嘴！老是这个话题，烦死了。维拉斯瓦米是个好伙计，他比我能想到的一些白人还要优秀。不管怎么样，召开全体大会时，我都要提名他加入俱乐部。或许，他能给这个糟糕的地方带来一点生气。”

管家听到这边的高声争吵后赶了过来，要不是他过来了，争吵很可能一发不可收拾。俱乐部里发生的大多数争吵都在他出现后得以平息。

“老爷您叫我吗？”

“没有，滚一边儿去。”埃利斯不悦地说。

管家退了下去，而争吵也就此结束了。俱乐部的外面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声，拉克斯廷一家已经到了。

当他们走进休息室时，弗洛里甚至没有勇气直视伊丽莎白，但他注意到拉克斯廷一家三人都比平时穿着得更为讲究。拉克斯廷先生甚至穿了一件晚宴夹克——他选择了应季的白色——并且毫无醉意。硬胸衬衣和凸纹马甲像一件胸铠，似乎让他的身体变得挺直，品格也坚定起来。拉克斯廷夫人身着一袭红色连衣裙，看起来俊美俏丽，曲线动人。拉克斯廷一家隐约给人一种印象：他们正等着接待某位贵客。

叫完酒水后，拉克斯廷夫人抢占了布屏风扇下方的位置，而弗洛里则坐在了人群之外的一把椅子上。他还是不敢与伊丽莎白搭讪。拉克斯廷夫人开始谈论起了亲爱的威尔士亲王，语气非同寻常，又显得十分傻气，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临时上阵的合唱队姑娘在表演一出音乐喜剧里的公爵夫人。其他人都暗自纳闷，这女人到底抽什么风。弗洛里几乎就坐在伊丽莎白的后面。她穿着一身黄色连衣裙，剪裁很短，正是当下流行的款式，下身搭配了香槟色的丝袜和便鞋，还拿着一把大大的鸵鸟羽毛扇，看起来非常的时髦，非常的成熟，以至于弗洛里比以往还要畏惧她。他竟然曾亲吻过她，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伊丽莎白从容地与所有人一起攀谈，他也时不时鼓起勇气插上一两句。但是，伊丽莎白一直没有直接回他的话，这让他也说不清，她是否故意在忽视自己。

“好了，”拉克斯廷夫人说道，“现在，谁想来玩盘似桥牌[1]？”

她刻意强调了“盘似”一词。在发出每一个字时，她的口音都变得更为贵族气，这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看来埃利斯、韦斯特菲尔德和拉克斯廷先生都要去玩“盘似”桥牌。当弗洛里看到伊丽莎白不会参与的时候，

他马上就拒绝了拉克斯廷夫人的邀请。他现在如果不抓住机会与伊丽莎白独处，以后就没机会了。当人们陆续走进棋牌室时，他看到伊丽莎白走在了最后，害怕的同时又松了口气。他停在棋牌室门口，挡住了伊丽莎白的去路，脸色变得惨白。伊丽莎白退让了一小步。

“不好意思。”他们俩不约而同地说道。

“就一会儿，”弗洛里说，他的声音在控制不住地颤抖，“可以跟你谈一会儿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有些事我必须跟你说。”

“请你让我过去好吗，弗洛里先生？”

“拜托，拜托了！现在只有我们俩，我只是想谈谈，你不会拒绝的，对吗？”

“那么，谈什么呢？”

“我就是想说，不管我做错了什么事，冒犯了你——请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告诉我，让我补救。我宁愿砍掉我的手也不愿意冒犯你。就请你告诉我吧，别把我一直这样蒙在鼓里。”

“我真的不懂你在说些什么。‘告诉你，你是怎么冒犯到了我？’你为什么会冒犯到我呢？”

“但是，我一定是冒犯到了你！你才那个样子的！”

“‘我才那个样子？’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我根本不明白你说话为什么这么奇怪。”

“但是你甚至都不跟我说话！今天早上你还装作不认识我。”

“我自然可以想怎样就怎样，而不必受审问是吧？”

“但是，拜托，拜托！你难道不明白么，你肯定明白，我突然遭受冷落是什么样的滋味。毕竟，昨晚你才……”

她脸红了。“谈论这些事情，你真是……真是下流卑鄙！”

“我知道，我知道，我全都知道。但我还能做什么呢？今天早上你

从我身边走过，就好像我是一块石头。我知道我一定是在哪里冒犯到了你，我只是想知道我做错了什么，难道这也不行吗？”

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每一个字都把事情弄得更糟。弗洛里认识到，不管他做了什么，逼她说出这件事比事情本身还要让她难受。她并不打算解释。她就是要让他摸不着头脑——冷落他，然后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是女人们的惯常做法。然而，他又一次恳求她：

“请告诉我。我不能让我们之间的一切就这样结束。”

“‘我们之间？’‘结束？’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结束什么啊。”她冷冷地说道。

这个无礼的回答伤到了弗洛里，他很快说道：

“你不是这样的人，伊丽莎白！你先对一个男人好，又将他搁置一旁，然后再拒绝他，甚至还不告诉他缘由，这实在是太不地道了。你可以对我直话直说，请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伊丽莎白充满怨恨地斜瞥了他一眼，怨恨并不是因为他做的事，而是因为他逼她说出来。但是，或许是急于结束现在这个场面，她说：

“好吧，如果你非要我说的话……”

“是什么？”

“有人告诉我，当你假装……嗯，当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哦，太糟糕了！我说不出口。”

“说吧。”

“有人告诉我，你养了一个缅甸女人。好了，现在你可以让我过去了么？”

然后她大步流星着走了过去——真的只能用“大步流星”来形容——她大步流星地走过他的身旁，短裙摩挲出嗖嗖声，然后消失在了棋牌室里。弗洛里就呆站在那里看着她离去，惊讶得无法言语，看起来有些难以摹状的滑稽。

事情真是糟透了。他以后再也没脸见她。弗洛里转身要冲出俱乐部，他甚至不敢从棋牌室的门口经过，怕她看见。他进入休息室，不知该如何溜走，最终他翻过阳台上的围栏，跳到一小片一直通向伊洛瓦底江的草坪上。汗水从额上流下，他想要愤怒地、悲痛地大声呼喊。真是倒霉！这样的事情居然被逮到，“养了一个缅甸女人”——这根本不是真的。但现在矢口否认也没有多大用处了。噢，究竟是什么样倒霉的巧合才会让这种事情传到她的耳朵里？

但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巧合。有一个完美合理的原因，这也是今晚拉克斯廷夫人在俱乐部里行为古怪的原因。就在前一天晚上，地震发生前，拉克斯廷夫人正在浏览文职人员薪俸表（文职人员薪俸表明确列出每一位缅甸官员的收入），这对她来说是无限的乐趣。当她正合计一位在曼德勒认识的森林管理员的薪酬津贴时，忽然想到查一查“维罗尔中尉”这个名字，她曾听麦格雷戈先生提起，中尉会在第二天率领一百名宪兵抵达皎塔达。而当她找到这个名字时，发现名字之前的两个字，这让她震惊不已。

这两个字是“阁下[2]”！

阁下！不管在哪里，中尉阁下都太罕见了，就像印度陆军里的钻石，或者是缅甸的渡渡鸟一样罕见。如果你是方圆五十英里以内唯一一位适婚少女的婶婶，然后又听闻中尉阁下在第二天就会抵达自己的城镇……天哪！拉克斯廷夫人惊慌地想起，伊丽莎白正在外面的花园跟弗洛里在一起——倒霉的酒鬼弗洛里，他每个月只有七百卢比的薪水，而且他很有可能已经向伊丽莎白求婚了！于是，她赶紧去叫伊丽莎白进来，但正在那时，地震发生了。不过回家的路上还是有时间说说话的。拉克斯廷夫人深情地将手放在伊丽莎白的手臂上，用她能发出的最温柔的声音说：

“我想你一定知道吧，亲爱的伊丽莎白，弗洛里养了一个缅甸女人？”

有那么一瞬间，这颗毁灭性炸弹根本没炸开。伊丽莎白还不太熟悉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因此刚才的言论并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在她听起来“养了一个缅甸女人”就和“养了一只鹦鹉”没什么区别。

“养了一个缅甸女人？为什么？”

“为什么？亲爱的！男人养女人还能为了什么？”

毫无疑问，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弗洛里在河岸边站了很久。月亮升起来了，倒影在水中，像一块宽阔的琥珀金[3]盾牌。室外的冷空气让弗洛里的情绪有了一些变化。他连发怒的心情都已经没有了。因为他既清醒又悔恨地认识到，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自己罪有应得。有那么一会儿，弗洛里感觉有一长排数不清的缅甸女鬼在月光下走过他的身边。老天啊，到底有多少！一千……哦不，但至少有一百个。“向右看齐！”他沮丧地想到，鬼魂们把头齐齐转向他，但她们都没有脸，只是一张张没有特色的圆盘。他想起了一件蓝色的笼基，还有一对红宝石耳环，但就是想不起一张的面孔或者一个名字。公正的天神使我们的风流罪过（确实是风流！）成为惩罚我们的工具[4]。他已经自甘堕落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而现在的这些就是对他的惩罚。

弗洛里慢慢地穿过巴豆丛，绕着俱乐部的房子慢慢地走。过度的悲伤已经使他感受不到这场灾难的全部疼痛了。如同所有深深的伤口一样，这场灾难将会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一点一点刺痛他。当他穿过大门时，他听到身后的树叶摇动了一下。他吓了一跳。传来一阵刺耳的低语，是缅甸语的音节：

“Pike-san pay-like！Pike-san pay-like！”

他迅速转过身。“Pike-san pay-like！（把钱给我）”的声音不断重复着。他看见一个女人站在凤凰树的阴影里。那是玛拉美。她警惕地走到月光下，充满了敌意，似乎是害怕他会打她，所以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她的脸上涂满了粉，在月光下显得苍白无比，看起来就像骷髅头一样丑陋，充满了挑衅意味。

她吓了他一跳。“你他妈的怎么到这儿来啦？”弗洛里生气地用英语问道。

“Pike-san pay-like！”

“什么钱？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跟着我？”

“Pike-san pay-like！”她不断重复着，几乎是在尖叫，“您答应过给

我的钱，德钦。您说过您会给我更多的钱。我现在就要，现在就要！”

“我现在怎么给你钱呢？下个月我再给你。况且我已经给了你一百五十卢比了。”

让他惊慌的是，她又开始大声尖叫“Pike-san pay-like！”和一些类似的句子。她仿佛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叫声之大让人吃惊。

“别叫了！俱乐部里的人会听到的！”他大叫道，然后立刻后悔让她知道了他的担忧。

“哈哈！现在我终于知道什么能让您害怕了！马上把钱给我，不然我就会大喊救命，把他们都引到这里来。快点，现在就给我，不然我就叫了！”

“你这个贱人！”他边说边向她迈了一步。她敏捷地跳开，快速脱去她的便鞋，抗拒着他。

“快点！现在给我五十卢比，其余的明天再给我。拿出钱来！不然我就大声叫，集市那么远的人都能听得见！”

弗洛里咒骂着，但现在可不是发脾气的时候。最终，他拿出他的袖珍本，在里面找到二十五卢比，然后把钱扔到地上。玛拉美猛地扑向那些纸币，算了起来。

“我说了五十卢比，德钦！”

“我没有那么多，怎么给你？你觉得我会随身带着几百卢比吗？”

“我说了五十卢比！”

“哎呀，走开！”他用英语说，并且从她身边挤了过去。

但这个讨厌的女人是不会让他走的。她一路跟在他身后，像一只不听话的狗，大叫着：“Pike-san pay-like！Pike-san paylike！”就好像噪音能变出钱来一样。他加快步伐，一方面想要让她离俱乐部远一点，一方面想要甩掉她，但是她似乎做好了准备，如果有必要的话就一直跟着他回到家里。不一会儿，他就忍无可忍了，转身想把她赶走。

“马上给我走！如果你再跟着我，你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Pike-san pay-like！”

“愚不可及，”他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我身上连一个铜板也没有，怎么给你钱？”

“您瞎说！”

他无助地摸了摸衣袋。他现在心里太烦了，只要把她打发走，他愿意给她任何东西。他的手指摸到了香烟盒，那是金子做的。他把它拿了出来。

“看，如果我给你这个，你会离开么？你可以把它当掉，换三十卢比。”

玛拉美似乎考虑了一下，然后闷闷不乐地说：“给我吧。”

他把香烟盒丢在了路边的草地上。她上前捡起了香烟盒，然后立刻跳了回来，把香烟盒塞进自己的因基里，生怕他又抢回去。他转身走向自己的房子，谢天谢地，终于摆脱了她的声音。这个香烟盒就是她十天前偷走的那一个。

他在门口回头看了看。玛拉美还站在山脚下，在月光下宛如一尊灰色的小雕像。她一定是盯着他上山，就像狗盯着可疑的陌生人走出视野一样。真是奇怪。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几天前她给他敲诈信时，行为怪异，不像是她的做法。她展现出的执拗是他从来不曾料到的，好像有人从旁怂恿她一样。

---

[1] 盘似桥牌（rubbah），本应作“盘式桥牌（rubber bridge）”，拉克斯廷夫人故意读错。盘式桥牌由四名玩家进行，是桥牌的一种形式，一般属于联谊性质，但有时也会有赌金。

[2] 阁下（the Honourable），对英国官员及贵族子弟的尊称，在姓名前略作Hon.。

[3] 琥珀金（electron），又称“电金”，是指自然产生的金银合金，根据黄金和白银的比例不同，颜色范围会出现由苍白色到亮黄色的变化。

[4] 引用自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李尔王》第五幕第三场，朱生豪译。

第十八章

那天晚上争吵之后，埃利斯就一直想找机会激怒弗洛里。他给弗洛里起了个外号叫“娘娘腔”——“老黑生的娘娘腔”的简称，但女士们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还编造了些谣言诋毁弗洛里。不管是谁和埃利斯吵了架，他都会给对方编造谣言，谣言一传开，大家添油加醋，就变成了传奇故事。弗洛里那天漫不经心的言论，说维拉斯瓦米医生是个“好伙计”，很快就被夸张成一通亵渎和煽动的言论，足以占据整期《每日工人报》。

“以我的荣誉发誓，拉克斯廷夫人，”埃利斯说——发现了维罗尔的大秘密之后，拉克斯廷夫人突然讨厌起弗洛里来，所以她很愿意听埃利斯讲的闲话，“以我的荣誉发誓，如果你昨天晚上在这儿，听见了弗洛里那个人说的话——哎哟喂，你肯定会不寒而栗的！”

“真的吗！你知道，我一直都觉得他的想法很古怪。他又说什么了？但愿不是社会主义之类的吧？”

“比那还离谱。”

随后就是埃利斯的长篇大论。然而让埃利斯失望的是，弗洛里并没有待在皎塔达等着被他激怒。被伊丽莎白拒绝的第二天，他就回到了营地。伊丽莎白听说了关于他的大部分传闻。她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他的品行了。她明白了为什么他老是让自己心烦意乱、恼怒不已。原来他是个学问高深的人——她最讨厌的一类人——学问高深得可以和列宁、亚瑟·库克[1]还有蒙帕纳斯咖啡馆里那些下流的小破诗人相提并论了。她宁可原谅他有个缅甸情人，也不能原谅他“学问高深”。三天之后，弗洛里给她写了一封语气软弱、言辞生硬的信，并亲手送了过去——从他的营地走到皎塔达要一天的时间。伊丽莎白并没有回信。

对弗洛里来说幸运的是，他太忙了，根本没时间思考。他离开那么长时间之后，整个营地乱七八糟。将近三十个苦工不见了踪影，生病的那头大象病得更重了，还堆着一大堆柚木。这些柚木十天前就应该发出去了，无奈机器坏了。弗洛里对机械一窍不通，他费力地鼓弄着机器的内部零件，搞得自己一身漆黑，全是机油，郭斯拉毫不客气地提醒他，

白人就不应该干这些“苦工活”。机器终于肯工作了，至少是开始转动了。生病的大象原来是染上了绦虫。至于苦工，他们是因为鸦片供应断掉了才离开的，他们没了鸦片，就不愿意待在丛林里，因为他们觉得鸦片可以预防热病。原来是吴波金捣的鬼，他让税务官搞了一次突击检查，收缴了鸦片。弗洛里向维拉斯瓦米医生写信求助。医生寄回了一些非法获取的鸦片，给大象的药中还有一封信，信里详细说明了用法。一条二十一英尺长的绦虫被排了出来。弗洛里一天要忙上十二个小时。到了晚上如果没什么事可做的话，他就会钻到丛林里去，然后就一直走，一直走，直到眼睛被汗水刺痛、膝盖被荆棘刺破，他才回去。晚上的时光对他来说很难熬。那件事给他带来的痛苦正一点一点地渗透他的内心，痛苦就是这样，时间越久，沉淀得越深。

与此同时，好几天过去了，伊丽莎白连维罗尔的影子都没见着。他刚到的那天晚上并没有在俱乐部露面，这让人非常失望。拉克斯廷先生恼怒不已，因为他被逼着穿上了晚礼服，到头来却白忙活了一场。第二天早上，拉克斯廷夫人让丈夫给驿站旅馆送去一张便条，邀请维罗尔到俱乐部来。可仍然没有回音。又过了几天，维罗尔仍旧没有任何加入当地社交圈的意思。他甚至无视公务上的报到，连麦格雷戈先生的办公室都懒得去。驿站旅馆在城镇的另一头，靠近火车站，他在那儿待得挺自在。按规定，在驿站旅馆居住满一定时间之后必须搬出来，但维罗尔也置之不理。欧洲人只有早晨和晚上在练兵场上才能看到他。在他抵达的第二天，他手下的五十个人拿着镰刀在练兵场上清理出一大片空地。之后，便看见维罗尔策马奔驰，来回练习马球的击球姿势。沿路经过的欧洲人，他都完全不理会。韦斯特菲尔德和埃利斯恼羞成怒，就连麦格雷戈先生也说维罗尔的举动“太没礼貌”。如果他展现出了哪怕一丁点的礼貌，他们都会拜倒在这个中尉阁下的脚下。可事实上，除了两位女士，所有人都从一开始就讨厌他。有头衔的人向来如此，不是令人仰慕就是招人憎恨。如果他们接受你，那就是迷人质朴；如果他们无视你，那就是恶心势利。没有折中的情况。

维罗尔是一个贵族家庭里的幼子，手头一点都不阔绰，但除非法令逼迫，他极少付账，并以此在他唯一在意的两件事上保持了体面：服饰和马匹。他最早是随一支英国骑兵团来到印度的，后来调换到了英属印度陆军中，因为那儿花销小，还能让他有更大的自由打马球。两年之后，他债台高筑，于是进了缅甸宪兵队，那儿可是出了名的省钱。但他痛恨缅甸——不是骑手能待的国家——于是他又申请调回原团。他属于那种想什么时候调换岗位就什么时候调换岗位的军人。反正他只在皎塔

达待一个月，根本没打算与这里这些无关紧要的白人萨布打交道。他很清楚缅甸这种小型驻地的社交圈——阴险狡诈、阿谀奉承、连马都没有的乌合之众。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们。

但维罗尔瞧不起的不光是他们。如果要详细列出他鄙视的人，得花很长时间。除了几位有名的马球手，他鄙视整个印度不是军人的居民。他还鄙视整个陆军，除了骑兵。他鄙视所有的英属印度军团，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他都鄙视。话说回来，他自己确实就隶属于一个土著兵团，但这也是为了他自己的方便。他对印度人没有丝毫兴趣，他的乌尔都语也基本上都是骂人的话，所有的动词还都是第三人称单数。在他看来，他手下的宪兵也没比苦工好到哪儿去。“老天啊，都是些可恶的蠢猪！”经常有人听见他在检阅队列时这么咕哝，而他的印度老头连长就跟在后面替他拿着军刀。维罗尔也有一次因为对土著军队出言不逊而惹上麻烦。那是在一场阅兵式上，维罗尔和一群军官站在将军的身后。一支印度步兵团行进过来接受检阅。

“是……步枪队。”有人说。

“瞧他们那样儿。”维罗尔用年少轻狂的声音说道。

满头白发的步枪队上校就站在旁边。他气得脖子都红了，然后他向将军告了维罗尔的状。维罗尔被训斥了一番，但将军本人就是个英国陆军军官，也就没有反复严厉地训诫他。反正无论维罗尔有多么无礼，他也一直都没摊上什么大麻烦。整个印度，无论他在哪儿驻扎，他都会玩忽职守，得罪一些人，再拖欠一些账，然后拍屁股走人。那些早就应该落到他头上的耻辱从来也没有降临。他这辈子注定无灾无祸，也不光是他的头衔救了他。他眼里有一种东西，让债主、长官萨布夫人甚至上校们都畏惧三分。

他有一双令人惶恐不安的淡蓝色眼睛，有一点外凸，但极其清澈。只用大概五秒钟冷冷地观察你，他就能看透你，掂量你到底几斤几两，发现你的欠缺之处。如果你属于体面人的话——比如你是个骑兵军官或者马球手——维罗尔会觉得这理所应当，甚至会对你有一种略带傲慢的尊敬；如果你是其他类型的人，不管是什么类型，他都会彻底地鄙视你，即使他想掩饰都掩饰不住。你有钱没钱对他来说没有多大区别，因为他也不过是个势利鬼，在乎的只是你的社会地位。当然，就像所有富家子弟一样，他觉得贫穷让人恶心，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甘愿沾染恶习。但他也鄙视舒适的生活。尽管他在衣服上花了一大笔钱，更确切

地说是欠了一大笔钱，但他的生活就像个苦行僧。他不停地锻炼身体，到了对自己残忍的地步，他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酒和吸烟，在行军床上睡觉（穿着丝质睡衣），即使在寒冬腊月也洗冷水澡。骑术和健壮是他心中仅有的神。练兵场上的马蹄印，与马鞍像半人马一样融为一体的强有力的身体，还有他手中弹力十足的马球棍，这些都是他的信仰，都是他的生命之所在。而驻缅甸的欧洲人——那些饮酒作乐、沉溺女色、形容枯槁的游手好闲之徒——维罗尔一想到他们的恶习就反胃。至于形形色色的社会责任，他称之为走狗行径，一概不理。他痛恨女人，在他看来，女人就是妖精，她们的目标就是诱惑男人，让男人远离马球，让男人陷入无尽的争吵和网球聚会之中。可是他也不能完全抵抗女人的诱惑。他风华正茂，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向他投怀送抱，他也时不时地向诱惑屈服。但很快他就对自己的堕落感到深恶痛绝，一旦这种感觉袭来，他就会冷酷无情、头也不回地离开。在印度的两年里，他已经这样逃离过十几次了。

整整一周过去了，伊丽莎白还是没能跟维罗尔相识，真是让人着急啊！每天早上和晚上，伊丽莎白和她的婶婶都会穿过练兵场前往俱乐部再返回。维罗尔就在练兵场上，击打印度兵投给他的马球，完全无视这两位女士。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更糟糕的是，两位女士都认为直接提及此事不太合适。有天晚上，维罗尔打得太用力，马球嗖嗖地穿过草丛，从她们前面的道路上滚了过去。伊丽莎白和她的婶婶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但跑来捡球的只是个印度兵。维罗尔显然看见了两位女士，但还是站得远远的。

第二天早上，她们走出大门的时候，拉克斯廷夫人停住了。她最近不坐她的人力车了。在练兵场的底端，宪兵正在集合，排成了灰褐色的一列，刺刀闪闪发光。维罗尔面对着他们，他没穿制服——他很少在早上列队的时候穿制服，他觉得跟宪兵在一起没那个必要。两位女士装作没在看维罗尔，同时又设法通过某种方式偷瞄他几眼。

“糟糕的是，”拉克斯廷夫人说——她话锋一转，不过这个话题也不需要铺陈过度——“糟糕的是，我恐怕你叔叔很快就得回营地了。”

“他非回不可吗？”

“恐怕是的。每年的这个时候待在营地实在是太可恶了。噢，那些蚊子啊！”

“他不能再多待些日子吗？比如说，一个礼拜？”

“我看是不行。他在总部已经待了快一个月了。公司要是听说了会非常生气的。当然了，我们俩都得跟他一起走。真烦人！那些蚊子……太可怕了！”

实在太糟糕了！伊丽莎白还没来得及向维罗尔打声招呼，就得离开了！如果拉克斯廷先生要走，她们肯定得跟着一块去。放任他不管是万万不行的。“撒旦差闲汉，欲把坏事干[2]”，即便在丛林里也不例外。印度兵在离开前拆卸刺刀，远看仿佛火焰在队列中跳跃。这支灰蒙蒙的队列向左转，敬礼，然后排成四列离开了练兵场。勤务兵们牵着小马，拿着马球棍，从宪兵队列那边走了过来。此时，拉克斯廷夫人做出了一个英勇的决定。

“我想，”她说，“我们抄近路穿过练兵场吧。这比走大路绕个圈子快多了。”

确实能近大约五十码，但从没有人步行走过那条路，因为草籽会掉进袜子里。拉克斯廷夫人大胆地冲进草丛，甚至不再装作是要去俱乐部了，伊丽莎白紧随其后。两个女人都死也不承认她们在抄近路。维罗尔看见她们过来了，骂骂咧咧地勒住缰绳。现在她们直奔自己过来了，他也不好再假装没看见。这两个女人脸皮真厚！他策马慢慢向她们走去，脸上的表情闷闷不乐，一边还轻轻地击打着马球。

“早上好，维罗尔先生！”拉克斯廷夫人在二十码之外和颜悦色地大声叫道。

“早上好！”他看见了她的脸，傲慢地回答道。在他看来，她不过是只在印度驻地常见的枯瘦如柴的老母鸡。

随后伊丽莎白也跟上来了。她已经摘下了眼镜，手正拿着她的阔边毡帽扇风。这节骨眼儿，她才不担心中暑呢。她心里很清楚自己的短发有多漂亮。一阵轻风吹来——噢，多么轻柔、美妙的微风啊，在这令人窒息的大热天，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吹来的！——轻轻拂动她的棉质连衣裙，贴在她的身体上，展现出她完美的曲线，像柳树一样苗条曼妙，婀娜多姿。她突然出现在这个风吹日晒、一脸枯黄的老女人旁边，对维罗尔来说是个不小的惊喜。他的意外惊喜惊动了胯下的阿拉伯雌马，它立刻扬起前腿用后腿站立起来，他只得勒紧了缰绳。在此之前，他都一直

不知道，也懒得去打听，在皎塔达是否有年轻的女士。

“这是我的侄女。”拉克斯廷夫人说。

他并没有回话，但他已经扔开了马球棍，并摘下了遮阳帽。他和伊丽莎白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他们年轻的脸庞在无情的阳光下显得光滑无瑕。草籽让伊丽莎白的小腿痒得难受，而且没戴眼镜，维罗尔和他的马在她眼里就是一团模糊不清的白色。可她心里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她的心怦怦直跳，血液涌上她的面颊，把它染得像一抹水彩画。“天啊，美人儿！”这个想法从维罗尔的脑海里猛地闪过。那些闷闷不乐的印度人摸着小马的头，好奇地盯着这一幕，就好像这两个年轻人的美貌甚至让他们也印象深刻一样。

拉克斯廷夫人打破了这持续了足足半分钟的沉默。

“你知道，维罗尔先生，”她用一种调皮的口气说，“我们觉得你一直不理睬我们这些可怜的人，这实在是太无情了，我们可都希望俱乐部里能有新面孔出现呢。”

他回答的时候依旧盯着伊丽莎白看，不过语气有了明显的变化。

“我这几天一直都想过去来着。但实在是太忙了，部署我的手下各就各位之类的。很抱歉，”他补充道——他可没有道歉的习惯，但他决定为这个特别的姑娘破次例——“我也很抱歉没有回复你们的便条。”

“哦，没关系！我们太了解了。不过我们真的希望今晚能在俱乐部见到你！因为，你也知道，”她总结道，语气更调皮了，“如果你再让我们失望的话，我们就要觉得你是一个淘气的小伙子了！”

“很抱歉，”他重复道，“今晚我会过去的。”

接着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两位女士便向俱乐部走去。但她们就待了五分钟。草籽弄得她们小腿瘙痒难耐，她们不得不马上回家换袜子。

维罗尔当晚如约到了俱乐部。他比其他人到得稍早一些，可他到了还没有五分钟，便让所有人领教了他的厉害。埃利斯进俱乐部的时候，老管家冲出棋牌室拦住了他。老管家痛苦不堪，眼泪流过他的双颊。

“先生！先生！”

“究竟他妈的出什么事了！”埃利斯说。

“先生！先生！新来的老爷打我，先生！”

“什么？”

“打我，老爷！”说到“打”字时，他的声调提高了，拖着长长的恸哭声，“打我——！”

“打你？那是对你好。谁打了你？”

“那个新来的老爷，先生。那个宪兵萨布。他用脚踢我，老爷——这儿！”他揉了揉自己的屁股。

“见鬼！”埃利斯说。

他走进休息室。维罗尔正在读《旷野报》，除了他棕榈滩花纹的裤腿和那双光亮的黑棕色皮鞋之外，其他部分都被遮住了。听到有人进屋了，他也懒得动弹。埃利斯站在他面前。

“嘿，你，你叫什么来着——维罗尔！”

“干嘛？”

“你是不是踢了我们的管家？”

维罗尔一只阴沉的蓝眼睛从《旷野报》的边角上露出来，就像是某种甲壳动物从岩石边上凝视过来一样。

“什么？”他简短地重复道。

“我说，你刚才是不是踢了我们那位该死的管家？”

“没错。”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个乞丐敢跟我顶嘴。我让他给我倒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他给

我拿来的却是温乎乎的东西。我让他加一点冰，他不但不听，还扯他妈的废话，说要节省最后的几块冰。所以我踢了他的屁股，是他活该。”

埃利斯的脸都气白了。他怒火中烧。管家是俱乐部的财产之一，不是用来给外人踢的。然而最让埃利斯生气的，是想到维罗尔很可能怀疑他同情管家，或者说，怀疑他不赞同这样踢仆人。

“他活该？要我说，他还真他妈的是活该被打。但这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踢我们的仆人？”

“别跟我胡扯，我的好伙计。他就是欠揍。你让这儿的仆人都无法无天了。”

“你他妈这只傲慢无礼的小王八蛋。他欠揍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连俱乐部的会员都不是。踢仆人是我们的事，不关你的事。”

维罗尔放下《旷野报》，另一只眼睛也露了出来。他傲慢的语气一点也没变。他从来没对欧洲人发过脾气，从来没有这个必要。

“我的好伙计，谁跟我顶嘴，我都会踢他屁股。你也想被我踢一脚吗？”

埃利斯所有的怒火瞬间都爆发了。他并不害怕，他一生中从未害怕过；只是，维罗尔的眼睛让他实在受不了。那眼睛能让人觉得自己身处尼亚加拉大瀑布之下！快到嘴边的咒骂被埃利斯咽了回去，他的声音也几乎不听使唤了。他不满甚至有些哀怨地说道：

“但是，可恶，他不把最后几块冰加给你是完全正确的。你以为我们是专门给你一个人买的冰块？我们在这儿一周只能搞到两次物资。”

“那就是你们经营不善的问题了。”维罗尔说完就回到《旷野报》后面去了，志得意满地不再提这件事。

埃利斯感到很无助。维罗尔重新回去读报纸，完完全全忘记了埃利斯的存在，这样平静的方式令他非常恼火。难道他不应该狠狠地踢上这个年轻的小混蛋一脚，让他醒醒吗？

但不知何故，这一脚始终也没踢。维罗尔的一生欠了很多脚，但他从来没被踢过，或许也永远不会被踢。埃利斯无助地、灰溜溜地回到棋

牌室，把情绪都发泄在管家身上，而维罗尔则继续占据着休息室。

当麦格雷戈先生进入俱乐部大门时，他听到一阵音乐声。灯笼发出黄色的光，透过覆盖在网球场围栏上的藤蔓的缝隙，照了过来。麦格雷戈先生今晚的心情不错。他期待能与拉克斯廷小姐——如此绝顶聪慧的女子！——愉快地畅谈一番，他有一件非常有趣的轶事要告诉她（其实这件事早就在他发表在《布莱克伍兹》杂志上的一篇短文中出现过了），是关于1913年发生在实皆[3]的一桩抢劫案。她会喜欢听的，他知道。他满怀期待地绕过网球场的围栏。下弦月的月光和悬挂在树上的灯笼的光芒交相辉映，维罗尔和伊丽莎白正在球场上跳舞。童仆搬出了椅子和一张放置留声机的桌子，欧洲人或坐或站，围在四周。当麦格雷戈先生在球场角落驻足时，维罗尔和伊丽莎白旋转着从他身旁滑过，离他几乎不到一码远。他们跳舞时贴得很近，伊丽莎白的身体向后弯曲，维罗尔轻压在她之上。他们俩谁都没有注意到麦格雷戈先生。

麦格雷戈先生继续绕着球场走。一阵孤独的寒意涌上他的心头。罢了，与拉克斯廷小姐的谈话就此作罢！当他走到桌前的时候，他努力地强颜欢笑，找回平时幽默滑稽的神情。

“舞蹈家之夜！”他的声音还是不由自主地带着忧郁。

没有人响应。他们都注视着球场上的那一对。伊丽莎白和维罗尔完全忘了其他人，尽情地滑过一圈，一圈，又一圈，他们俩的鞋在光滑的水泥地面上轻巧地滑动。维罗尔跳舞如同在骑马，带着无与伦比的优雅。留声机里播放着《回家路》[4]，那时，这首歌就如瘟疫般席卷全世界，也传到了遥远的缅甸：

“指给我回家的路，我已疲倦，想要入眠；我喝了一点酒，约一小时前，现在正是微醺时！……”

这沉闷而压抑的曲调在花香树影间飘来飘去，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全因为拉克斯廷夫人在唱针差不多快到中间的时候，又把它拨回到了开始的位置。月亮爬得更高了，黄澄澄的，看起来就像是从地平线那边黑云的黝黯之中升起一般，抑或像是一个生病的女人从床上爬起。维罗尔和伊丽莎白不停地跳着，不知疲倦，俨然成为黑暗中朦胧而撩人的身影。他们移动得如此协调，仿佛融为一体。麦格雷戈先生、埃利斯、韦斯特菲尔德和拉克斯廷夫人站在一旁注视着他们，双手插兜，缄默无言。蚊子叮咬着他们的脚踝。有人点了酒水，但威士忌在口中味同嚼

蜡。四位老男人心里都妒火中烧。

维罗尔和伊丽莎白终于就座后，维罗尔没有邀请拉克斯廷夫人跳舞，也没有理睬其他欧洲人。他只管继续独占了伊丽莎白半个小时，然后对拉克斯廷一家说了一句简单的晚安，就离开了俱乐部，理都没理其他人。跟维罗尔跳的这支悠长的舞蹈让伊丽莎白陷入了梦境。他刚才居然邀请她策马同游！他还打算借给她一匹自己的小马！伊丽莎白完全没有注意到，埃利斯已经被她的行为激怒了，正尽可能地公然表现出无礼。拉克斯廷一家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但无论是伊丽莎白还是她的婶婶都丝毫没有睡意。她们兴奋地熬到了午夜，将拉克斯廷夫人的一条马裤改短，放宽小腿的位置，以适应伊丽莎白的身材。

“我希望，亲爱的，你会骑马？”拉克斯廷夫人说道。

“哦，当然！我以前在国内骑过很多次呢。”

她可能一共就骑过十多次，那时她才十六岁。但没关系，她无论如何都能应付过去！只要维罗尔陪着她，让她骑老虎都不在话下。

马裤终于改好了，伊丽莎白试穿了一下，拉克斯廷夫人看着她叹了口气。伊丽莎白穿马裤的样子非常迷人，实在太迷人了！一想到再过一两天，她们就要离开皎塔达、离开这个最称心如意的小伙子了，回营地去待上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真是太遗憾了！当她们上楼时，拉克斯廷夫人在门口驻足片刻。她突然决定要做一次伟大而痛苦的牺牲。她搂住伊丽莎白的肩膀，亲吻了她，展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真情实意。

“亲爱的，现在让你离开皎塔达真是太遗憾了！”

“是啊，太遗憾了。”

“亲爱的，那要不我们不去那可怕的丛林了！让你叔叔自己去。咱俩就留在皎塔达。”

---

[1] 亚瑟·库克（Arthur James Cook），英国矿工，著名的工会领袖，1926年英国大罢工的关键人物之一。

[2] 引用自英国牧师、圣歌作家艾萨克·瓦茨（Isaac Watts）的对句：“For Satan finds some mischief still，for idle hands to do.”张旸译。

[3] 实皆（Sagaing），缅甸中部城市，实皆省首府，在曼德勒西南16公里，伊洛瓦底江右岸，18世纪下半叶曾一度（1760—1764）为缅甸首都。

[4]《回家路》（Show Me the Way to Go Home），1925年英国音乐组合欧文·金（Irving King）创作的流行歌曲，讲述的是酒醉后从伦敦坐火车归来的事，曾在英格兰、爱尔兰和北美风靡一时。

第十九章

天气愈加炎热。四月已经快过完了，可未来的三个星期仍然没有下雨的希望，或许再过五个星期也未必会下雨。即使是在舒适而短暂的黎明，一想到漫长而灼热的时光即将到来，也让人兴致全无。漫长的白天让人头疼，刺眼的阳光能穿透任何遮蔽物，像胶水一样粘住人的双眼，让人焦躁不安地睡去。无论是东方人还是欧洲人，没人能在酷热的白天毫无倦意地保持清醒；而在晚上，狗叫个没完，身上积的汗水渗得痱子又痒又疼，没人能睡得安稳。俱乐部的蚊子太猖獗了，以致每个角落都要点上蚊香，女士们坐下时就把腿套在枕套里。只有维罗尔和伊丽莎白不在乎这酷热。他们都很年轻，流淌着新鲜的血液，维罗尔能坚忍地承受一切痛苦，而伊丽莎白是太开心了，根本不在意天气。

这几天，俱乐部里有很多争吵，还流传了不少丑闻。维罗尔可把每个人的鼻子都气歪了。他已经习惯每晚到俱乐部待上一两个小时，但他完全忽视其他的会员，拒绝他们请的饮料，每当有人想跟他说话，他就傲慢地蹦几个字做答。他会坐在风扇下方的椅子上，这把椅子一度是专属于拉克斯廷夫人的宝座，然后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报纸，直到伊丽莎白来了，他便会花上一两个小时跟她跳舞聊天，然后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匆匆离去。与此同时，拉克斯廷先生一个人待在营地，据传回皎塔达的小道消息说，他正与形形色色的缅甸女人寻欢作乐，聊以打发寂寞的时光。

伊丽莎白和维罗尔现在几乎每天晚上都要一起出去骑马。早上阅兵之后，维罗尔的时间是专门用来练习马球的，但他已经决定放弃晚上的时间来陪伊丽莎白了，他觉得这很值得。而伊丽莎白自然喜欢上了骑马，就像她之前喜欢上打猎一样；她甚至信誓旦旦地告诉维罗尔，自己在英国的时候“经常打猎”。他一眼就看出她在撒谎，但好在她的骑术不算太差，没让维罗尔看她不顺眼。

他们通常沿着红色的马路骑行，进入丛林，在那棵被兰花覆盖的大彬加都树的地方，涉过小溪，然后骑上狭窄的马车道，那儿的土地要柔软些，马儿可以疾驰。满是尘土的丛林里热得令人窒息，远处总会有光打雷不下雨的雷声在低响。灵巧的圣马丁鸟在马儿上方轻快地盘旋，它

们与马的步调保持一致，捕食马蹄撩起来的苍蝇。伊丽莎白骑着那匹红棕色的小马，维罗尔骑着白马。回家的时候，他们会骑着被汗水浸湿的马并肩而行，靠得非常之近，以至于他们俩的膝盖都会偶尔碰到。维罗尔只要愿意，就可以放下他傲慢无礼的架子，与人友善温和地交谈，当他和伊丽莎白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愿意这样做。

啊，一起骑马让人多么的喜悦啊！那种骑在马背上、进入马的世界的喜悦——打猎与赛马、马球与骑马猎野猪的世界！伊丽莎白就算不为别的而爱他，也会因为他把马带进了她的生活而爱他。她缠着他聊与马相关的事，就像当初她缠着弗洛里聊打猎一样。维罗尔不是个健谈的人，这是事实。生硬、断断续续地聊几句马球和骑马猎野猪，概括一下印度的驻地与军团的名称，这就是他的极限了。但不知怎么，他寡言少语，伊丽莎白却很是兴奋，大概是因为弗洛里从来都絮絮叨叨个没完吧。光是看到他骑在马背上，就比任何言语都更能唤起她的激情。他身上笼罩着骑士与军人的光环。从他晒黑的脸上，从他挺拔结实的身体上，伊丽莎白就能看到他所有的冒险故事，还有他骑兵生涯十足的派头。她看到了西北边境[1]和骑兵俱乐部；她看见了马球场地和炙热的营场，还有棕色的骑兵中队在策马奔驰，他们的长矛已经握好，他们头巾的尾部在风中飘扬；她听到了军号奏响，马刺叮当，军乐队在食堂外面演奏，而军官们身着笔挺华丽的军装坐着吃晚饭。那是多么精彩啊，马背上的世界是多么精彩啊！这是她的世界，她属于其中，她生来就该在其中。这些天，她每天骑的是马，时刻想的是马，夜夜梦的是马，都几乎跟维罗尔一样了。此刻她不单单是谎称自己“经常打猎”，甚至她自己都快相信这是真的了。

在任何一个方面，他们都如此合得来。他从没像弗洛里那样让她觉得无聊和烦躁。（事实上，她这几天已经快把弗洛里给忘了，每当她想到他的时候，不知为何，她想到的总是他的胎记。）维罗尔甚至比她更厌恶“学问高深”的东西，这让他们又多了一个共同点。有一次他告诉她，自从十八岁以后，他就再也没读过一本书，实际上他对书“恨之入骨”，“当然，除了乔若克斯[2]什么的”。他们第三次或者第四次策马同游的晚上，在拉克斯廷家的大门口道别。维罗尔之前已经拒绝了拉克斯廷夫人所有共同进餐的邀请，所以他并没有进入过拉克斯廷家的府邸，他也没打算进去。马倌牵走伊丽莎白的小马时，维罗尔说：

“这样吧，下次我们出去的时候，你骑贝琳达，我骑那匹栗色的马。我觉得你骑得不错，应该不会把贝琳达的马嘴摔烂。”

贝琳达是一匹阿拉伯母马。维罗尔养了它两年，直到现在，他都不曾让任何人骑过它，马倌都不行。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大的恩惠了。伊丽莎白非常明白维罗尔的想法，所以她深知这份礼物贵重，非常感激。

第二天晚上，他们并肩骑马回家，维罗尔用手臂搂住伊丽莎白的肩膀，把她从马鞍上抬了起来，抱到自己面前。他的力气很大。他另一只手放下了缰绳，托起她的面庞，与她四目相对，他们的唇吻到了一起。他就这么抱了她一会儿，然后把她放到地面上，再从自己的马上滑下来。他们相拥而立，汗水浸湿的薄衬衫紧紧地贴在一起，两匹马的缰绳都挂在他的臂弯上。

大约在同时，二十英里外的弗洛里决定回皎塔达。他站在丛林边缘一条干枯的小溪的河岸上，一路走到这里让他疲惫不堪，他正注视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雀鸟啄食高茎草的种子。雄鸟是铬黄色的，雌鸟很像麻雀。它们太小了，都压不弯茎秆。它们飕飕地飞过去，在途中抓住茎秆，然后用自己的体重把它们拽到地面上。弗洛里漠不关心地看着那些鸟儿，甚至有些恨它们，因为它们无法使他激起一丁点兴趣的火花。他百无聊赖，于是用他的大刀向它们挥舞，把它们都吓跑了。要是她在这儿就好了，要是她在这儿就好了！所有的一切——鸟、树、花……——都因为她不在而变得毫无生机、毫无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觉得自己已经失去她了，这个意识在他心里变得越来越确定、越来越真实，直到无时无刻都让他觉得痛苦不已。

他漫无目的地沿着一条小路进入丛林，用他的大刀挡开藤蔓。他四肢无力，就像灌了铅一样。他看到一株野香草绕着灌木生长，便弯下腰去闻它那柔嫩芳香的豆荚。那香味反倒给他一种腐烂、厌烦和倦怠的感觉。孤独，孤独，就像生命之海中的小岛！[3]心中的痛苦太剧烈了，他攥紧拳头向树打去，他的手臂猛地震动了一下，擦破了两个指关节。他必须回到皎塔达。那天的他们俩的争吵过去还不到两周，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给她时间把这事淡忘，这简直是荒谬。不管怎样，他还是得回去。这个鬼地方毫无生机，陪伴他的只有自己的思绪和那无边、单调的树叶，他实在不能继续待在这儿了。

他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高兴的念头。他可以带上那张送到监狱处理的豹皮给她。这样他就有借口去见她了，而当一个人来送礼的时候，对方往往会听他说的话。这一次，他不会在一个字都没说的时候就让她打断自己。他会向她解释，减轻他的罪责，让她明白，她之前对自己是多么的不公平。她因为玛拉美的事谴责自己是不对的，他已经为了伊丽

莎白把玛拉美赶出家门了。当她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想必会原谅他的吧？这一次她一定得听他把话说完；如果她不听，他就会拉住她的手臂，强迫她听自己把话说完。

当天晚上他就回去了。沿着被压出车辙的马车道，路程一共二十英里，但弗洛里决定在晚上赶路，因为晚上凉快些。仆人们听说要在晚上赶路，差点就暴动了，就在要出发之前，老塞米还半真半假地痉挛晕倒了，给他喝了松子酒才清醒过来。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他们借着灯笼的光前进，灯光里，弗劳的眼睛像祖母绿一样闪烁，公牛的眼睛就像月光石。太阳出来的时候，仆人们停下来捡柴火、做早饭，但弗洛里心急如焚地想回皎塔达，他便一个人向前赶路了。他一点疲惫的感觉都没有。一想到豹皮，他的心里就充满了无限希望。他乘舢板渡过波光粼粼的河流，然后直奔维拉斯瓦米医生的平房，大约在十点钟到达了。

医生邀请他共进早餐，然后——把女人们赶到合适的地方躲起来之后——把他带进自己的盥洗间，让他洗漱剃须。早餐的时候，医生非常兴奋，一个劲地谴责那条“鳄鱼”，因为现在那场假叛乱貌似马上就要爆发了。直到早饭之后，弗洛里才有机会提到那张豹皮的事。

“噢，对了，医生。那张送到监狱里去的豹皮处理得怎么样了？弄好了吗？”

“呃……”医生稍微有点不安，揉了揉他的鼻子说道。他走进了屋里——他们在阳台上吃早餐，因为医生的老婆强烈反对把弗洛里带进屋——过了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捆卷起来的豹皮，走了出来。

“其实……”他一边展开豹皮，一边说道。

“哎呀，医生！”

豹皮已经完全被毁了，硬得像张硬纸板，皮裂开了，毛褪色了，甚至有些地方的毛还被蹭掉了，而且还恶臭无比。这张豹皮不但没有被处理好，反而变成了一摊废物。

“哎呀，医生！他们把这糟蹋成什么样子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对不起，我的朋友！我正准备道歉呢。我们已经尽力了。现在监狱里没人懂怎么处理皮毛。”

“但是，见鬼了，那个罪犯以前能把皮毛处理得很漂亮啊！”

“啊，是啊。但他三个星期前就出去了，唉！”

“出去了？我记得他要坐七年的牢啊？”

“什么？您没听说吗，我的朋友？我以为您知道过去是谁在处理皮毛呢，是俄瑞欧。”

“俄瑞欧？”

“吴波金协助逃跑的那个土匪。”

“噢，见鬼！”

这件倒霉的事严重地打击了他的信心。不过，下午洗完澡、换上干净的套装之后，他还是在四点左右去了拉克斯廷家。这个时候登门拜访未免太早了，但他想确保赶在伊丽莎白下山去俱乐部之前见到她。拉克斯廷夫人本来在睡觉，不料有人到访，于是很不情愿地接待了他，甚至都没请他落座。

“伊丽莎白恐怕还没下楼。她在梳妆打扮，准备出去骑马。要不我帮你带个口信吧？”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见见她。我给她带来了上次我们一块儿打到的豹皮。”

拉克斯廷夫人把他一个人留在客厅里，客厅变得异常沉闷和宽敞，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在她把伊丽莎白带了出来，在门外她还不忘抓住机会对伊丽莎白小声说道：“快赶走那个讨厌的男人，越快越好，亲爱的。这个时候跑到我们家里来，真让我受不了。”

伊丽莎白一进屋，弗洛里的心就猛烈地跳动起来，双眼发红发晕。她穿着一件丝质衬衫和一条马裤，皮肤稍稍晒黑了一点。即便在他的记忆里，她也不曾这么美丽。他胆怯了，一时间他竟不知如何是好，刚刚积攒起来的勇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本该上前去迎她，哪知竟后退了两步。他身后突然发出一阵可怕的碎裂声，原来他碰倒了一张临时桌，把一碗百日菊摔到了地上。

“实在是太抱歉了！”他惊恐地大声说道。

“噢，没关系！请不必担心！”

她一边帮他抬起桌子，一边开心而轻松地闲聊，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你离开了好长时间啊，弗洛里先生！你都快成陌生人了！我们在俱乐部可想你了！”如此等等。她每隔几个词就要加重一下语气，态度轻松愉快得让人觉得可怕，女人凡是想要逃避道德责任，说话的时候就会这样。他被她吓到了，他甚至不敢直视她的脸。她拿出一盒香烟，递给他一支，但他拒绝了。他的手抖得太厉害，根本拿不住烟。

“我给你带来了那张豹皮。”他泄气地说。

他把豹皮摊开在刚抬起来的桌子上。那张豹皮残破不堪、肮脏无比，他此刻真希望自己没把它带来。她向他靠近，好仔细看看那张豹皮，近到她如花般娇嫩的脸颊离他不到一英尺，他都能感觉到她身上的体温了。他实在太害怕她，于是赶紧退后了几步。就在同一时间，她闻到了豹皮的恶臭，也充满嫌恶地退后了几步。这让他感到十分羞愧，就好像那股恶臭是从自己身上发出的，而不是那张豹皮。

“真的非常感谢你，弗洛里先生！”她原地又退了一码，“真是一张美妙的大豹皮啊，不是吗？”

“是啊，但可惜他们把它糟蹋了。”

“噢，没有的事！我很喜欢它！你回到皎塔达很久了吗？营地那边肯定热死了吧！”

“是啊，那儿非常热。”

事实上，有三分钟的时间他们都在谈论天气。他也没办法。他决心要说给她听的所有理由和恳求，到了嘴边全蔫了。“你这个笨蛋，你这个笨蛋，”他想，“你在干什么？赶了二十英里路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聊这些吗？快点啊，快说出你想说的话！把她摁在怀里，让她好好听着，踹她，揍她……怎么样都行，就是别让她用这些废话把你的嘴堵住。”但他就是开不了口，无能为力。除了那些无用的琐事，他再也说不出其他话来。她把所有的交谈都弄得像俱乐部里的闲聊，她那轻松愉快的态度让他在张嘴之前就已沉默，他又怎么能够向她恳求或者解释

呢？她从哪儿学会这可怕的嘻嘻哈哈的本事？从那些叽叽喳喳的现代女子学院里，毫无疑问。桌上的那张臭烘烘的东西让他每时每刻都更羞愧。他站在那儿，几乎一言不发。昨晚一夜没睡，他的脸又黄又皱，再加上那个污垢一般的胎记，他简直丑陋不堪。

几分钟后，她就想摆脱他了，“那个，弗洛里先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真的应该……”

他几乎是在嘟哝而不是在说话：“什么时候咱们俩再一起出去，好吗？散步，打猎之类的？”

“我最近都没什么时间！每天晚上好像都安排满了。今晚我要去骑马，跟维罗尔先生一起。”她补充道。

她之所以补充那句话很可能就是为了刺痛他。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她和维罗尔是朋友。他抑制不住声音中那种可怕而直白的嫉妒：

“你经常和维罗尔一起出去骑马吗？”

“几乎每天晚上都去。他马骑得太棒了！他有好几匹打马球骑的小马呢！”

“哎，当然啦，我没有那种打马球骑的小马。”

到目前为止，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认真的话，却还是冒犯到了她。然而，她依然用之前那种轻松愉快的态度回答他，然后把他送出了门。拉克斯廷夫人回到客厅，嗅到了臭味，随即叫仆人把那张臭气熏天的豹皮拿出去烧掉了。

弗洛里在他家花园的大门口闲逛，假装在喂鸽子。他无法否认，在看到伊丽莎白和维罗尔双双骑马的时候，自己很是痛苦。她对他太粗鲁、太残酷了！当别人连架都不愿跟你吵的时候，这交情就没救了。此刻，维罗尔骑着一匹白色小马走到了拉克斯廷家，旁边跟着一个骑栗色小马的马倌，等了片刻之后，两人一起出现了，维罗尔骑在了栗色小马上，而伊丽莎白骑上了白色小马，两人策马小跑着上了山。他们有说有笑，她穿着那件丝质衬衫，肩膀紧贴着他。谁都没有向弗洛里这边看。

在他们消失在丛林里后，弗洛里还在花园里游荡。耀眼的阳光逐渐

减弱，成了淡黄色。园丁正在忙着拔去那些英国花，大部分的花都已经被阳光暴晒死了。他又种了一些凤仙花、鸡冠花以及更多的百日菊。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位神情忧郁、土黄色皮肤的印度人从大路上闲逛过来，他裹着一条缠腰布，戴着橙红色的头巾，头上还顶着一个洗衣篮。他将篮子放下，向弗洛里行了一个额手礼。

“你是谁？”

“我是书商，萨布。”

书商是穿梭于缅甸北部各个驻地巡回卖书的小贩。他的交易规则是，你可以用四安那外加任何一本其他的书来换他那捆书中的一本。其实也不是任何一本书，书商虽然是个文盲，但还是学会了如何辨认《圣经》，并且拒绝交换。

“不，萨布，”他会可怜兮兮地说，“不，这本书（他会不以为然地用他那双平坦的棕色手掌把那本书还给你），这本黑色封皮、烫着金字的书，我不能收。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萨布都给我这本书，但却没有人买它。这本黑色的书里写了些什么呢？肯定是些邪恶的东西，毫无疑问。”

“把你的破书拿出来看看。”弗洛里说道。

他想在书堆里找一本刺激的惊险小说——埃特加·华莱士、阿加莎·克里斯蒂[4]之类的；他只想找点什么东西来让自己烦躁不安的心平静下来。当他弯腰找书的时候，他看到园丁和书商都指着丛林的边缘大叫起来。

“快看！”园丁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喊道，就像嘴里含了个李子。

两匹小马从丛林里跑了出来，却不见骑手。它们小跑着下了山，带着马儿逃离主人时的那种傻傻的愧疚之情，马镫在它们肚子下面摇晃着、碰撞着。

弗洛里不自觉地将一本书紧扣在胸口。维罗尔和伊丽莎白下马了。这不是一场意外，没有人相信维罗尔会从马上摔下来。是他们下马了，然后小马们跑开了。

他们下马了。为什么呢？啊，他知道原因！根本不用怀疑，他清楚地知道。他能够想象整件事正在发生，细节是如此的详尽，如此的污秽下流，令人难以忍受。他把书狠狠地扔了下去，走回屋内，只留下那个失望的书商。仆人们听见他进了屋，然后他叫了一瓶威士忌。他喝了一杯，也没让他感觉好点。然后他又倒了大半杯酒，兑水兑到勉强能喝的地步，就一饮而尽。这酒就像一副恶心污秽的药，这一杯没等完全咽下去，他就又倒了一杯喝。许多年前在营地的时候，他就这么干过，当时他深受牙痛折磨，而牙医却在三百英里之外。七点钟时，郭斯拉像往常一样进屋，告诉他洗澡水已经热好了。弗洛里躺在一张长椅上，没穿外套，衬衣的领口也扯开了。

“可以洗澡了，德钦。”郭斯拉说道。

弗洛里没有回答，郭斯拉碰了碰他的胳膊，以为他已经睡着了。弗洛里喝得太多，根本无法动弹。空酒瓶从地板一头滚到了另一头，留下一条威士忌的痕迹。郭斯拉叫来了巴佩，然后一边捡起酒瓶，一边咂舌。

“瞧瞧这个！这一瓶酒他喝了四分之三还要多呢！”

“什么，又这样？我以为他已经戒酒了呢？”

“我想，一定是那个可恶的女人。现在我们得小心地把他抬起来。你抬他的脚，我来抬他的头。对，就这样。把他抬起来！”

他们把弗洛里抬到另一间屋子里，轻轻地放在床上。

“他真的打算娶这个英格莱玛吗？”巴佩问道。

“天知道。她现在是那个年轻警官的情人，别人是这么说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不同。我想我知道他今天晚上想要什么。”他一边说，一边解开弗洛里的背带——这是郭斯拉作为单身汉的贴身男仆的必备技能，为主人宽衣而不吵醒他。

仆人们看到主人重归单身的旧习倒也很高兴。弗洛里半夜才醒来，赤身裸体，汗流浃背。他的头涨得厉害，仿佛有某个大型的尖角金属物在他脑袋里四处撞击一样。蚊帐已经搭好，一个年轻女人正坐在床边，为他扇着一把柳条扇。她黝黑的面庞倒也很可爱，在烛光下泛着青铜色

的金光。她解释说自己是一个妓女，郭斯拉自作主张花了十卢比雇她过来。

弗洛里的头快要炸开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弄点喝的。”他无力地对那个女人说。她给他倒了点郭斯拉提前凉好的苏打水，然后把湿毛巾敷在他的额头上。她是一个丰满而和蔼的人。她告诉弗洛里她的名字是玛盛嘉蕾，除了接客以外，她还在李叶商店旁边的集市上卖水谷箩。弗洛里的头感觉好些了，于是要了一支香烟。玛盛嘉蕾取来香烟，天真地问道：“我现在该脱衣服了吗，德钦？”

为什么不呢？他迷迷糊糊地想到。他在床上为她腾了点地方。但当他闻到熟悉的大蒜和椰油的味道时，一阵痛苦就袭上了心头。他头枕在玛盛嘉蕾丰腴的肩膀上，竟然哭了起来，自从十五岁后，他就再也没有哭过了。

---

[1] 西北边境（North-West Frontier），1901年英国在南亚殖民期间创建的一个省，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该省在当时被认为是印度次大陆最难征服的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军事意义。

[2] 乔若克斯（Jorrocks），又被称为“铁阉马（The Iron Gelding）”，著名的盎格鲁-阿拉伯赛马，在1846年赢得了三十次冠军。

[3] 引自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诗歌《再致玛格丽特》（To Marguerite-Continued），张旸译。

[4]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英国著名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世界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代表作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上的惨案》等。

第二十章

第二天早晨，整个皎塔达一片骚动，谣传已久的叛乱终于爆发了。当时，弗洛里只是模模糊糊地听说了这件事。醉酒那晚之后，他一感到自己清醒些可以走路了，就立刻赶回营地，直到几天后他才从维拉斯瓦米医生一封义愤填膺的长信中了解到这次叛乱的来龙去脉。

维拉斯瓦米医生的书信风格很奇怪。他的句法不够严谨，在使用粗体字时，他像17世纪的牧师一样随意，而在使用斜体字的时候，又完全不逊于维多利亚女王。他那小而凌乱的笔迹占了整整八页纸。

我亲爱的朋友（信中写道），非常遗憾，您马上就要听到这么一个消息了，鳄鱼的圈套已经设好了。叛乱——所谓的叛乱——已经完全结束了。而且，它，唉！它远比我预想的还要卑鄙下流得多。

一切都如我当初向你预言的一样。就在你回皎塔达那天，吴波金的密探就通知他，受他蛊惑的那些可怜而不幸的人们正在宋割附近的丛林里集结。当天晚上他就和警察局长吴卢加尔——也是个跟他一样的大流氓——再带上十二个警察悄悄出发了。他们迅速突袭了宋割，让叛乱者们措手不及，叛乱者们总共才七个人呢！！当时他们正在丛林里的一个破草屋里。马克斯韦尔先生听到叛乱的传言后，也带上手枪从自己的营地赶来，及时加入了吴波金的警察部队，共同突袭了那间草屋。第二天早上，那个专给吴波金干些卑鄙勾当的走狗文员巴盛得到吴波金的命令，极尽夸张之能事及大肆渲染这次叛乱的声势。造势很成功，麦格雷戈先生、韦斯特菲尔德先生和维罗尔中尉闻讯全都赶到了宋割，除了民警之外，他们还带了五十个配备步枪的印度兵。但在他们到达之后发现一切都结束了，吴波金正坐在村子正中的一棵大柚木下，装腔作势地训斥着村民们，他们充满恐惧地向他跪拜，额头触地，发誓将会永远忠于政府，叛乱就这么结束了。那个所谓的巫师，不过就是个马戏团的魔术师，也是吴波金的奴才，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六个叛乱者被逮捕了。叛乱就此结束了。

另外我还应该告知你一件最可悲的事，就是死了个人。我猜是马克斯韦尔先生太过急切想要使用他的步枪了，当一个叛乱者试图逃跑时，

他开了枪，击中了他的腹部，那个叛乱者当场毙命。我想，村民们因为这件事对马克斯韦尔先生有一些不好的感觉。但从法律的角度上看，马克斯韦尔先生的所作所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那些人无疑都在密谋反对政府。

啊，但是，我的朋友，我相信你能理解，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灾难！我想你能明白，这对我和吴波金之间的较量有多么大的影响，这会给他带来多么大的帮助。这是鳄鱼的胜利。吴波金现在是这个地区的英雄，是欧洲人面前的红人。有人跟我说，就连埃利斯先生都称赞了他的行为。你真应该亲眼见识见识他那令人憎恶的自负，见识见识他是如何谎称七个叛乱者是两百个！还有他是如何握着左轮手枪粉碎了那些叛乱者——他只是站在安全距离外指挥行动，而马克斯韦尔先生和那些警察们悄悄包围草屋——我保证你会觉得他真是令人作呕。他竟然还厚颜无耻地在这次事件的官方报告的开头部分写道：“全靠我的忠贞、机敏以及奋不顾身的勇气。”我听说他这连篇的谎言肯定是在事发之前好几天就写好了。真恶心。一想到他占了上风，我就知道他又要竭尽所能恶意中伤我了……

叛乱者所有的武器都被收缴了。他们本打算在自己人集结后，装备这些武器进军皎塔达。收缴的武器包括：

物品一 一把霰弹枪，左枪管已损坏，三年前从森林管理员处偷得。

物品二 六把自制枪，锌制枪管从铁路上偷得。把钉子推入火门，再用石头击打，勉强可以开火。

物品三 三十九发十二毫米口径的子弹。

物品四 十一把柚木刻成的假枪。

物品五 一些大型中国炮竹，用来燃放以起震慑作用。

而后，两名叛乱者被判处了十五年流放，三名叛乱者被判处三年监禁和二十五下鞭刑，一名叛乱者被判处两年监禁。

这次可悲的叛乱结束得毫无悬念，欧洲人自然没有觉得自己处在危险之中，马克斯韦尔也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回到了自己的营地。弗洛里

打算在下雨之前就待在营地里，或者至少待到下一次俱乐部大会。虽然现在吴波金和医生之间的明争暗斗让他厌烦，再加上他还有自己头疼的问题，但他答应了医生要参加大会，并且还要提名医生入会。

日子又捱过去了几周。天气热得要命，迟来的雨似乎让空气变得更热了。弗洛里身体欠佳，工作却不辞辛苦，那些本可以交给监工去做的琐事他也会操心，弄得苦工们甚至仆从们都有些讨厌他了。他成天喝杜松子酒，但现在即便是酒也无法分散他的心思。伊丽莎白躺在维罗尔怀里的景象就如同神经痛或者耳朵痛一样反复折磨着他。那样的画面栩栩如生，令人厌恶，会在任何时刻袭来，叨扰他的思想，让他睡意全无，吃饭也味同嚼蜡。他偶尔还会突然大发雷霆，有一次甚至打了郭斯拉一顿。比一切都更糟糕的是细节——细节总是污秽不堪——想象的场景都会在细节中一一呈现。细节是如此详尽，似乎证明了一切都是真的一样。

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奢望一个你永远不可能得到的女人更丢人、更无耻呢？这几周以来，弗洛里的脑海中总是充斥着或残忍或猥琐的想法。这就是吃醋的正常反应。他曾经在精神上爱着伊丽莎白，或者说是在情感上爱着她，他渴望得到她的同情胜过得到她的爱抚；现如今，他失去了她，却饱受最粗俗的性欲折磨。他甚至不再把她理想化。他现在觉得她几乎就是愚蠢、势利、无情的女人，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她的渴望。这能有一丝一毫的影响吗？在夜不能寐的晚上，他把床拖到帐篷外面，寻求一点凉爽，他仰望着如天鹅绒般的黑夜，耳边偶尔会传来阵阵犬吠，他恨自己，恨自己脑海中的画面怎么也挥之不去。太卑劣了，完全就是在嫉妒一个比自己优秀的男人横刀夺爱。这是嫉妒！说吃醋都太轻巧。他有什么资格吃醋呢？他喜欢上了一个对他来讲太过年轻也太过漂亮的女孩，然后这个女孩拒绝了他，这也是理所应当。他受到了应得的冷落，没有任何反驳的理由。他不可能重拾青春，也不可能抹去他的胎记和他十几年的孤独放荡。当那个比他优秀的男人抢走她的时候，他只能伫立在侧，眼巴巴地看着他，嫉妒他，就像，就像什么，不提也罢。嫉妒是魔鬼，不同于其他任何苦楚，因为它不能掩饰，也不会升华为悲剧。嫉妒绝不仅仅是痛苦，它可恶至极。

但是，等等，他的怀疑都是真的吗？维罗尔真的成为了伊丽莎白的情人吗？无人知晓，但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像皎塔达这样的地方，如果真有这样的事，肯定是瞒不住的。就算别人没有猜到，拉克斯廷夫人也肯定已经猜到了。无论如何，至少有一件事是明了的，那就是

维罗尔肯定还没有求婚。一周过去了，又一周过去了，三周了；三周对于一个印度的小驻地来说已经够久了。维罗尔和伊丽莎白每晚都在一起骑马，每夜都在一起跳舞；但维罗尔却从没去过拉克斯廷家里。当然，伊丽莎白又惹来了数不尽的流言蜚语。城里所有的东方人都自然而然地把她看作维罗尔的情人。吴波金的版本是（他一直能算准事情的大方向，尽管细节上有所出入）伊丽莎白做过弗洛里的情人，但由于维罗尔付给她的钱更多，于是就抛下了弗洛里转而投向维罗尔的怀抱。埃利斯也对伊丽莎白的事妄加揣测，搞得麦格雷戈先生很不舒服。拉克斯廷夫人作为伊丽莎白的亲人，并没有听闻这些流言蜚语，但她越来越紧张。每天晚上，当伊丽莎白骑马回家后，她都会满怀希望地迎接她，期待听到她说："哦，婶婶！你怎么看！"——紧接着就是汇报好消息了。但这消息始终未曾传来，而且，不管她多么认真地解读伊丽莎白的神情，也无法猜测出任何事情。

三周过去后，拉克斯廷夫人有些焦躁，终于也有点生气了。一想到她的丈夫一个人——或恐怕，不是一个人——待在营地里，她就烦躁。她毕竟是为了给伊丽莎白和维罗尔创造机会才打发他一个人回营地的（拉克斯廷夫人自己当然不会说得这么庸俗）。一天晚上，她开始拐弯抹角地教导并威胁伊丽莎白。谈话中充满了哀怨的独白和长长的停歇，因为伊丽莎白根本就一声没吭。

拉克斯廷夫人由远及近，先聊了聊《闲谈者》[1]的一张照片，说照片上那些穿着宽松的沙滩裙裤的摩登女孩非常放荡，这会让男人们觉得她们非常的掉价。一个女孩，拉克斯廷夫人说道，永远不能让男人觉得掉价；"掉价"的反义词好像是"昂贵"，听起来也不怎么对劲，于是拉克斯廷夫人转变了策略。她又继续跟伊丽莎白聊一封家里写来的信，信里又传来了那个很可怜、很可怜的女孩的近况，她曾来缅甸待过一段时间，而且愚蠢地不把婚姻当回事。她的遭遇十分悲惨，这正好说明了一个女孩应该嫁人，哪怕是随便嫁给一个人，都会幸福。那个很可怜、很可怜的女孩丢了工作，挨饿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她不得不当厨房女仆，粗俗可怕的厨师还要狠心地欺辱她。而且，那个厨房里的蟑螂简直多得难以置信！难道伊丽莎白不觉得可怕么？蟑螂啊！

拉克斯廷夫人安静了一会儿，好让蟑螂的威慑力充分发挥作用，然后才补充道：

"雨季来临后维罗尔先生就要离开我们了，真是太遗憾了。没有他，皎塔达好像都无趣之极！"

“雨季一般什么时候来呢？”伊丽莎白装作漠不关心地问道。

“我们这儿，差不多在六月初吧。只有一两周了……亲爱的，再提这件事可能有点荒谬，但那个很可怜、很可怜的小女孩在爬满蟑螂的厨房里工作，这场景始终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拉克斯廷夫人又不止一次地谈到蟑螂。直到第二天，她才放下了闲聊的语气，正经地说道：

“对了，我想弗洛里六月初就要回到皎塔达了。他说他准备参加俱乐部的大会。或许我们应该找时间请他吃顿饭。”

自从弗洛里给伊丽莎白带来那张豹皮后，这还是她们俩第一次提到他。在被遗忘了数周之后，他才再次回到了两个女人的脑海中来，拉克斯廷夫人想用他这个权宜之计来刺激伊丽莎白。

三天后，拉克斯廷夫人捎话让丈夫回皎塔达。他在营地已经待了很久，足够让总部给他放个小假了。他回来时气色比以往都要好——他解释说是太阳晒的——但双手却抖得厉害，都快没法点香烟了。但是，那天晚上他为了庆祝自己回家，把拉克斯廷夫人支出了门，然后闯进伊丽莎白的卧室，精神饱满地企图强奸她。

在整段时间里，进一步的暴动正在酝酿之中，却没有哪个重要人物知道。那个“巫师”（如今躲得很远，就在马达班向无知的村民们兜售贤者之石[2]）可能比他原计划做得更好。无论如何，这儿可能又有了新的麻烦——大概就是某个人无用的愤怒。就连吴波金也不知道此事。但跟往常一样，老天总是站在他这一边，因为任何进一步的叛乱都会让第一次的叛乱显得更为严重，他也会因此更添荣耀。

---

[1] 《闲谈者》（Tatler），1709年创刊的英国杂志，1901年改版成为服装杂志，专注于报道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

[2] 贤者之石（philosopher’s stone），一种存在于传说或神话中的物质，其形态可能为石头（固体）、粉末、液体。它被认为能拿来将一般的非贵重金属变成黄金，或制造能让人长生不老的万能药，又或者医治百病。

第二十一章

噢，西风，汝何时吹，小雨何时下？[1]这天是6月1日，俱乐部开会的日子，至今连一滴雨也没下。弗洛里正在去俱乐部的路上，下午的阳光从他的帽檐上斜射过来，毒辣地炙烤着他的脖子，让他很不舒服。园丁摇摇晃晃地走在路上，用扁担挑着两个装满水的汽油桶，他胸前的肌肉上满是汗水，显得非常光滑。他把桶猛地放下，一点水洒在了他棕色瘦削的脚上，他向弗洛里行了个额手礼。

“喂，园丁，雨还能下吗？”

园丁朝西边做了一个模糊的手势，“山把雨挡住了，萨布。”

皎塔达几乎被群山团团围住，这些山能挡住早期的阵雨，所以有的时候要等到六月底皎塔达才有降雨。花坛的泥土被锄头翻松，又大又乱的一块块泥土看上去又灰又硬，就像水泥一样。弗洛里走进休息室，看到韦斯特菲尔德靠在阳台上打发时间，竹帘卷了起来，他正远眺着河面。在阳台的下面，一个童仆正躺在太阳下，脸上遮着一片宽大的芭蕉叶，用脚后跟拉着风扇的绳子。

“嘿，弗洛里！你瘦得跟竹竿似的。”

“你也一样。”

“嗯，是啊。该死的天气。除了喝酒一点胃口也没有。上帝啊，等听到青蛙开始呱呱地叫了，我该有多高兴了啊。其他人还没来，我们先喝一杯吧。管家！”

“你知道都有谁要来开会吗？”管家端来威士忌和温热的苏打水后，弗洛里问道。

“我觉得大家全都会来吧。拉克斯廷三天前就从营地回来了。上帝啊，这家伙没有老婆看着可真是爽翻了！我手下的督察把营地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了。一群一群的小妞啊，肯定是从皎塔达专门弄过去的。等他家里那个老娘们看见他在俱乐部的账单，他就有好受的喽。才两周

的时间，他就要了十一瓶威士忌送到他的营地去。”

“那个小年轻维罗尔来吗？”

“不会的，他只是个临时会员。反正他也懒得来，小崽子。马克斯韦尔也不会来。他说他现在不能离开营地。他还捎话说，如果要投票，就让埃利斯代他投。不过别指望有什么投票，对吧？”他补充道，斜眼看了看弗洛里，两人都记得他们上次因为这个话题发生的争吵。

“我想这还得看麦格雷戈的。”

“我的意思是，麦格雷戈肯定把推选土著会员这件该死的事放下了，对吧？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刚发生了叛乱什么的。”

“对了，叛乱怎么样了？”弗洛里说，他现在还不想为推选医生的事挑起一场争吵，反正一会儿还得吵，他想先清净几分钟，“有什么新的消息吗？依你看，他们还会再造反一次吗？”

“不会了，恐怕已经全结束了。他们本来就是懦夫，已经全都投降了。整个地区平静得就像他妈的女子学校一样。真扫兴。”

弗洛里听见隔壁房间有伊丽莎白的声音，他的心脏似乎暂停跳动了一下。这时麦格雷戈先生进来了，埃利斯和拉克斯廷先生紧随其后。这样一来人就齐了，因为俱乐部的女性成员是没有投票权的。麦格雷戈先生穿着一身丝质西服，胳膊下夹着俱乐部的账本。即使是俱乐部会议这样的小事，他也能设法营造出官僚气氛。

“既然我们人都到齐了，”照例的寒暄问候之后，他说，“那——我们就——开始工作吧？”

“来，麦克德夫。”韦斯特菲尔德坐下说道。

“谁把管家叫来吧，看在上帝的面子上，”拉克斯廷先生说，“我可不敢让我老婆听见我叫管家。”

“在我们进入正式议程之前，”麦格雷戈先生拒绝了一杯酒后说，其他人则一人接过一杯酒，“我想诸位都希望我把这半年来的账目通读一遍吧？”

大家其实并不想听，但麦格雷戈先生对这种事乐此不疲，于是把账目完完整整地通读了一遍。弗洛里开始走神，过一会儿就要大吵一通了。噢，争吵真是可恶！一会儿他们发现自己最终还是要提名医生，肯定怒不可遏。伊丽莎白就在隔壁房间，上帝保佑，一会儿争吵的时候，不要让她听见。她要是听见其他人都在取笑自己，肯定会更瞧不起自己的。自己今晚还能见到她吗？她还会跟自己说话吗？他呆呆地望着一公里宽的波光粼粼的河面。在河的对岸有一伙人，其中一个人戴着绿色的岗包，等在舢板旁边。在靠近这一岸的河道中，一艘笨重的印度大驳船正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逆水而行。每划一次水，十个瘦骨嶙峋的达罗毗荼桨手都要身体前倾，然后猛地把桨摇到水里，他们的桨很长很原始，桨叶是心型的。他们绷紧自己瘦弱的身体，拖拽、摇动，再拉紧桨，痛苦得就像黑色的橡皮人。即便是这样，笨重的船体也只会向前移动一两码。然后桨手们又气喘吁吁地前倾，再把桨摇到水里，免得被水流冲退。

“现在，”麦格雷戈先生更加严肃地说，“我们进入议程的重点。这，当然，就是——嗯——那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恐怕我们还是得面对，就是选举一名土著入会。我们之前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真见鬼！”

插话的是埃利斯。他非常激动，一下子站了起来。

“真见鬼！我们怎么又开始讨论那件事了？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居然还要讨论选举一个该死的黑佬加入俱乐部！我的上帝啊，我觉得连弗洛里这回都不想讨论这件事了！”

“我们的朋友埃利斯好像有些吃惊啊。我记得这件事以前我们讨论过。”

“我他妈当然知道以前讨论过这件事！我们还都说了我们的观点。上帝呀——”

“请我们的朋友埃利斯坐下来一会儿。”麦格雷戈先生忍耐着说。

埃利斯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大叫着：“真他妈的该死！”河对岸，弗洛里看见一群缅甸人在上船。他们把一捆形状奇怪的、长长的东西抬到了舢板上。麦格雷戈先生已经从他的文件夹里拿出了一封信。

“或许我最好先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行政长官告诉我，政府下达了一份通知，要求那些没有土著会员的俱乐部至少增选一名土著，也就是说，自动接纳一人为会员。通知上说——啊！找到了——‘轻视德高望重的土著官员是一项错误的政策。’我必须说，我对此断然反对，毫无疑问，我们大家都是如此。我们这些切实从事政府工作的人与那些——嗯——在上面对我们指手画脚的佩吉特家族的议员们，看问题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行政长官也非常同意我的观点，但是……”

“可这都是他妈的扯淡！”埃利斯插嘴道，“这跟行政长官或者其他人有什么关系？我们在他妈的自己的俱乐部里，还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下班时间，他们就没权向我们发号施令。”

“说得没错。”韦斯特菲尔德说。

“我正准备说这个。我告诉行政长官，我得把这件事交给本俱乐部会员讨论。他的建议是：如果俱乐部里有人支持这个想法，那就最好增选土著会员；而如果全俱乐部都反对的话，那这件事就算了。也就是说，必须一致反对。”

“行啊，绝对一致反对。”

“你的意思是，”韦斯特非尔说，“选不选土著会员取决于我们喽？”

“我想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好吧，那我们就说我们全体毫无例外地反对。”

“还要说得无比坚定，以上帝之名。我们要把这种想法踩死在脚下，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说得好！说得好！”拉克斯廷先生粗声说道，“不让黑佬蠢货入会。我们要讲求团队精神什么的。”

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能指望拉克斯廷先生说出一些义正词严的话。在他的内心里，他根本不在乎，也从来没在乎过什么英属印度的统治。无论是跟东方人一起喝酒还是和西方人一起喝酒，他都一样开心。不管是谁提议鞭笞某个无礼的仆人，或是让民族主义者下油锅，他总是乐于

高呼“说得好，说得好！”他引以为豪的是，自己虽然时不时喝醉酒什么的，可自己绝对忠诚，这就是自己受人尊敬之处。麦格雷戈先生看见大家都一致反对，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如果要增选任何东方会员，那一定是维拉斯瓦米医生了，而自从那次俄瑞欧疑点颇多的越狱之后，他就对医生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感。

“那我就当作你们都一致反对喽！”他说，“如果是那样，我就去向行政长官汇报了。否则的话，咱们就必须讨论候选人。”

弗洛里站了起来。他必须说他该说的话。他的心仿佛提到了嗓子眼，噎得他说不出话来。从刚才麦格雷戈先生说的话来看，非常清楚的是他完全有能力通过发表异议来确保维拉斯瓦米医生入选。但是，噢，多么烦人、多么讨厌啊！会引起多么可怕的一片哗然啊！他多么希望自己从未给过维拉斯瓦米医生任何承诺啊！不管怎么说，他已经承诺了，就不能言而无信。如果在不久之前，他或许还会违背承诺，作为一个白人，这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啊！但现在不行，他必须坚持到底。他侧了侧身，好不让别人看到他的胎记。他已经能感觉到自己的嗓音开始变得模糊而内疚了。

“我们的朋友弗洛里有话要说吗？”

“是的。我要提名维拉斯瓦米医生成为俱乐部的会员。”

其他三个人立刻惊惶不安地大叫了起来，麦格雷戈先生不得不使劲地敲桌子，提醒他们女士们还在隔壁房间呢。埃利斯根本顾不上这些，他再次跳了起来，鼻子周围的皮肤变得惨白。他和弗洛里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剑拔弩张。

“喂，你这个该死的蠢货，还不赶紧收回那句话。”

“不，我不收回。”

“你这头圆滑的猪！你这个黑佬生的娘娘腔！你这个卑鄙、无耻的该死的杂种！”

“秩序！”麦格雷戈先生大叫道。

“你们看看他，看看他！”埃利斯大声疾呼道，几乎都要哭了，“为

了一个大肚子的黑佬，让我们所有人丢脸！我们跟他说了那么多！我们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把蒜臭味永远地拒之于俱乐部门外，在这种关键时刻，我的上帝啊，看到一个人行为如此，你难道还不会恶心得把肠子都吐出来？”

“收回你的话吧，弗洛里，老伙计！”韦斯特菲尔德说，“别他妈的犯傻了！”

“彻头彻尾的逆反思想，真该死！”拉克斯廷先生说。

“你们以为我会在意你们说的话吗？这关你们什么事？麦格雷戈先生说了才算。”

“那你——嗯——坚持你的决定吗？”麦格雷戈先生沮丧地说。

“是的。”

麦格雷戈先生叹了口气说：“真遗憾！好吧，这样的话，我想我也别无选择……”

“不，不，不！”埃利斯大叫道，愤怒得手舞足蹈，“别让他得逞！我们来投票。如果这个狗娘养的不跟我们一起投反对票，我们就先把他从俱乐部赶出去，然后，就这样！管家！”

“萨布！”管家出来说。

“把投票箱和选票球拿过来。现在就滚去拿！”他恶狠狠地补充道，管家赶紧照做。

气氛变得非常僵，不知怎么的，风扇也停止了转动。麦格雷戈先生站了起来，带着不太赞同但又故作公正的神情，从投票箱里取出一抽屉白球、一抽屉黑球。

“我们必须按秩序进行。弗洛里先生提名文职医生维拉斯瓦米成为俱乐部会员。这太不应该了，在我看来是大错特错，但是！在对此事投票之前……”

“噢，干吗还发表些长篇大论啊？净搞些没用的，”埃利斯说，“这是我的票！还有一个是马克斯韦尔的。”他把两个黑球投到了箱子里。

这时，他心中的怒火让他突然抽了风，他猛地抢过那抽屉白球，扔到地上，白球滚得满地都是，“来呀！你要想用，自己捡一个起来啊！”

“你这个该死的傻瓜！你觉得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吗？”

“萨布！”

他们都吃了一惊，然后环顾四周。那个童仆正趴在阳台栏杆上瞪着他们，他是从下面爬上来的。他一只皮包骨的手臂抓着栏杆，另一只手指着河流。

“萨布！萨布！”

“什么事？”韦斯特菲尔德说。

他们都跑到窗户旁。弗洛里刚才看见的河对岸的舢板现在停靠在这一岸的草坪边，其中一个人抓着一棵矮树，防止船被冲走。戴着绿色岗包的那个缅甸人正在往外爬。

“那是马克斯韦尔手下的护林员！”埃利斯用异样的声音说道，“上帝啊！出事了！”

护林员看见麦格雷戈先生，连忙心事重重地行了个什科礼，然后回到舢板处。其他四个人是农民，他们随后也爬了出来，然后费力地将弗洛里刚才从远处看见的那捆奇怪的东西抬上了岸。它有六英尺长，用布裹着，就像个木乃伊。每个人心里都紧张不安。护林员扫了一眼阳台，发现没有路可以上去，便带领农民们沿着小路绕到了俱乐部的正面。他们把那捆东西扛在肩上，就像是出殡的护柩者扛着棺材一样。管家再次快步来到休息室，他黑色的脸甚至有些苍白——也就是灰白。

“管家！”麦格雷戈先生尖声喊道。

“先生！”

“快去把棋牌室的门关上。关紧了，别让萨布夫人看见了。”

“遵命，先生！”

缅甸人扛着东西，步履沉重地来到走廊。他们一进屋，领头的人就

打了个趔趄，差点跌倒，原来他踩到了散落在地面上的白球。缅甸人跪了下来，把东西放到地面上，然后站到一旁，表情怪异而恭敬，他们微微鞠躬，像行什科礼那样双手合十。韦斯特菲尔德跪下身去，把布揭开。

“上帝啊！看看他啊！”他说道，但并不十分吃惊，“看看这可怜的小……”

拉克斯廷先生退到了房间的最里边。从这捆东西抬上岸那一刻起，他们就都知道里面裹的是什么了。是马克斯韦尔的尸体，被短刀几乎砍成了碎块，而凶手就是他开枪打死的那个人的两个亲戚。

---

[1] 引自英国16世纪流传下来的小调《西风》（Westron Wynde）的歌词，原歌词为“西风，汝何时吹，小雨何时下。上帝啊，但愿爱人在我怀中，让我们共枕重相爱。”张旸译。

第二十二章

马克斯韦尔的死在皎塔达引起了剧烈的震动，而且还会震撼整个缅甸。在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名字被遗忘多年以后，这件案子还会继续被人们提起——“皎塔达那件案子，你还记得吗？”但从纯个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人为他的死感到痛苦不堪。马克斯韦尔生前也几乎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不过是个和其他一万个缅甸的有色人种一样的“好伙计”罢了，他还没有亲近的朋友。欧洲人中没人真正地哀悼他。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不愤怒。相反，他们现在几乎愤怒得快要发疯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是不可原谅的——一个白人被杀了。这种事发生后，每个在东方的英国人都不禁毛骨悚然。每年大约有八百人在缅甸被杀，他们都无关紧要，但谋杀一个白人就是兽行难赦，就是亵渎神灵。可怜的马克斯韦尔的仇肯定是要报的。不过，为马克斯韦尔流泪的只有一两个仆人，还有那个替他收尸、挺喜欢他的护林员。

另一方面，也没有人真的高兴，除了吴波金以外。

“这简直就是老天送给我的一件大礼！”他对玛庆说，“我自己都安排不了这么好。为了让他们更重视我的这场叛乱，我唯一需要的就是一点流血事件。这不就有了吗！我告诉你吧，玛庆，我每过一天都更加确定，有某种强大的力量在冥冥中帮助我。”

“郭波金，你真的一点羞耻感都没有吗！我真不明白你怎么敢说出这种话。你背上了血债，你的灵魂难道不会颤抖吗？”

“什么？！我？我背上了血债？你在说什么呢？我这辈子连只鸡都没杀过。”

“但这个可怜的孩子的死让你从中获益。”

“从中获益！当然我要从中获益！为什么不呢？别人选择了谋杀，难道还要怪我不成？渔夫抓了鱼，他就该被诅咒，我们吃鱼难道也要被诅咒吗？当然不会。鱼既然已经死了，为什么不吃呢？你念经应该再多用点儿心啊，亲爱的庆庆。”

葬礼在次日早餐之前进行。所有的欧洲人都出席了，除了维罗尔，他同往常一样在练兵场上飞驰，几乎就在墓地对面。麦格雷戈先生主持了葬礼。一小群英国人围站在坟墓旁边，他们把遮阳帽拿在手中，汗水渗进了他们翻箱倒柜找出来的黑西装。早晨刺眼的阳光无情地炙烤着他们的脸，在丑陋破旧的衣服衬托下，他们的脸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黄。除了伊丽莎白，每张脸都又老又皱。维拉斯瓦米医生和六个东方人也出席了葬礼，但他们都老实地站在后面。这个小小的墓地里一共立了十六块墓碑：木材公司的助理、军官还有在被人遗忘的冲突里牺牲的士兵。

“庄严纪念已故的英属印度帝国警察约翰·亨利·斯帕尼奥，他恪尽职守，死于霍乱”等等。

弗洛里还隐约记得斯帕尼奥。他震颤性谵妄[1]第二次发作之后，就在营地里突然死去了。在墓地的一角，还有一些欧亚混血儿的坟墓，上面插着木制的十字架。蔓延的茉莉铺满了整个墓地，它们开着小花，花心是橘黄色的。茉莉丛中，还有几个大老鼠洞，通向坟墓深处。

麦格雷戈先生以稳重、恭敬的声音念完了悼词，带领大家走出了墓地，他把灰色的遮阳帽压在自己的腹部——在东方，遮阳帽就相当于大礼帽了。弗洛里在大门口徘徊，希望伊丽莎白能和他说话，但她从他身边走过，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今天早上每个人都不搭理他。他可谓颜面扫地，这场谋杀让他昨晚背信弃义的表现显得更加可恶。埃利斯扶着韦斯特菲尔德的手臂，一同走到坟墓旁，拿出他们的烟盒。弗洛里能够听见他们粗俗的对话从空旷的墓地传过来。

“我的上帝，韦斯特菲尔德，我的上帝啊，我一想到那个可怜的小……就躺在那儿，噢，我的上帝，我的血液都沸腾了！我整晚都睡不着觉，实在是太生气了。”

“确实够惨的，我也承认。没关系了，我保证这两个家伙会被绞死的。两条命抵他一条，我们能做的也就这些了。”

“两条命就够了？！起码要五十条命！我们就算是弄得天翻地覆也要把这些家伙抓住绞死。你知道他们的名字了吗？”

“当然知道！！整个地区都炸开锅了，全都知道是谁干的。对于这种案子，我们总会知道是谁干的。让那些该死的村民开口说话，这才是

唯一的麻烦。”

“好吧，看在上帝的面子上，这一回一定要让他们老老实实地开口说话。别管那该死的法律了。一定要从他们嘴里撬出东西来。严刑拷打，怎么着都行。你要是想贿赂目击证人，我愿意出几百个子儿。”

韦斯特菲尔德叹了口气说：“恐怕不能做这种事。我也想啊。我要是把话放出去，我的手下都知道怎么逼供证人。把他们绑在蚂蚁丘上，然后倒红辣椒水什么的。可如今这套行不通了，得遵守咱们该死的傻瓜法律。但不用担心，那些家伙肯定会被绞死，错不了。我已经掌握了必要的证据。”

“那太好了！等你抓住他们的时候，要是拿不准能不能给他们定罪，就开枪打死他们，千万要打死他们！就说他们要逃跑什么的，千万别让这帮杂种给无罪释放了。”

“不会无罪释放他们的，你别担心。我们抓住他们的，无论如何，也会抓住一些人的。宁可杀错人了也比不杀好。”[2]他说道，无意中引用了别人的话。

“就要这样！要是没看见他们被绞死，我这辈子都再也睡不了安稳觉了，”埃利斯一边说，他们一边从坟墓旁边走开，“上帝啊！咱们躲开着太阳吧！我都快要渴死了。”

每个人都差不多快要渴死了，但葬礼刚结束便去俱乐部喝东西似乎有些不妥。于是欧洲人都各回各家了，留下四个清洁工用铲子把水泥一样灰色的泥土填到坟坑里，然后堆起高低不平的土丘。

早餐之后，埃利斯拿着手杖，步行下山去他的办公室。天气热得人头晕目眩。埃利斯已经洗过了澡，换回了衬衣和短裤，但刚刚才穿了一个小时厚西装，就捂出了痱子，让他非常难受。韦斯特菲尔德已经带着一名督察另外六个手下出发了，驾驶着他的摩托艇去逮捕凶手。他命令维罗尔同他一道——倒也不是他需要维罗尔，而正如韦斯特菲尔德所说，让这个小崽子干点活对他自己有好处。

埃利斯扭了扭肩膀，他的痱子简直让他无法忍受。怒火就像苦啤酒一样正在他的体内发酵。他整整一夜都在反复思考发生的事。他们居然杀了一个白人，一个白人。这群该死的混蛋，这群卑鄙懦弱的畜生！

噢，这些下流坯子，这些下流胚子，他们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为什么我们要制定这些该死的温和法律？为什么我们什么事都要忍气吞声？想想这种事要是发生在战前的德国殖民地会怎么样吧！那帮德国佬！他们最清楚怎么对付老黑了。报复！用犀牛皮鞭子抽他们！劫掠他们的村庄，杀了他们的牲口，烧了他们的庄稼，宰了他们的人，用大炮把他们轰死！

埃利斯凝视着那可怕的一束束阳光从树林的缝隙里照射进来。他青绿色的眼睛又大又悲伤。一个和善的中年缅甸男子走来，肩上扛着一棵大竹子，当他从埃利斯身边经过时，他把竹子从一边肩膀换到了另一边肩膀上，还咕哝了两句。埃利斯随即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杖。他想，要是那个下流胚子现在攻击他就好了！或者甚至是侮辱他，不管做什么，他就有权狠狠地揍他一顿！要是那群胆小的杂种敢做出任何想打架的样子就好了！而不是遵纪守法地从他身边溜过去，不给他任何报复的机会。唉，来上一次真正的叛乱就好了，实行军事戒严，绝不宽大处理！血腥的场面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成堆的土著尖叫着，士兵们大肆屠杀他们。射杀他们，践踏他们，马蹄把他们的内脏都踩出来，鞭子把他们的脸抽成碎片！

五个高中男生并排从路上走了过来。埃利斯看见他们走来，一排黄色的、不怀好意的面孔——毫无阳刚之气，格外细皮嫩肉，他们朝他咧着嘴笑，明显有蓄意挑衅的意味。他们想故意激怒这个白人。他们或许听说过谋杀案了，而且他们像所有男生一样都是民族主义者，所以把这件事当成一大胜利。当他们从他身边经过时，咧开嘴朝着他大笑。他们试图公然激怒他，因为他们知道法律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埃利斯觉得自己的肺都要气炸了。他们讥笑他的面孔，就像一排黄色的肖像，在他脑海里乱转，气得他怒发冲冠。他突然止步，说：

“喂！你们这帮小兔崽子，笑什么呢？”

男孩们回过头来。

“我问你们他妈的在笑什么呢？”

其中一个男孩傲慢无礼地回答，但他蹩脚的英语或许让他的语气比他想的还要无礼。

“不关你的事。”

有那么大约一秒钟的时间，埃利斯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这一秒钟的时间里，埃利斯使尽全力把手杖扔了出去，手杖落下来，“啪”的一声裂开了！正好打在那个男孩的眼睛上，男孩吓得连连后退。与此同时，其他四个男孩向埃利斯围了过去。可相比之下，埃利斯实在是太壮了。他把他们甩到一旁，跳转身来，愤怒地挥舞手中的棍子，以至于他们没人敢靠近他。

“都给我滚远点，你们这群狗娘养的！滚开，否则我就以上帝之名再狠狠地揍你们一顿！”尽管他们是以四对一，他对他们来说还是太强大了，吓得他们掉头就跑。那个被打伤的男孩跪在地上，双手捂着脸，大叫道：“我被打瞎了！我被打瞎了！”其他的四个男孩突然转身，向二十码外一堆用来修路的红砖土飞奔而去。埃利斯手下的一个文员出现在办公室的阳台上，着急得上窜下跳。

“快上来，先生，赶紧上来。他们会杀了你的！”

埃利斯虽不屑于临阵脱逃，但还是朝阳台的楼梯走去。一团红砖土从空中呼啸飞来，砸在柱子上就碎了，文员赶紧躲到屋里。但埃利斯却站在阳台上直面男孩们，他们就在下面，每个人都抱了一大捧红砖土。他得意洋洋地咯咯笑。

“你们这群该死的肮脏的小老黑！”他冲他们喊道，“这回你们可没想到吧，不是吗？到阳台上来跟我打啊，四个一起上啊！你们没这个胆儿。四打一你们都不敢！你们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男人吗？你们这群肮脏卑鄙的小耗子！”

他用缅甸语爆粗口，骂他们是猪生的杂种。而他们则朝他扔捏成块的红砖土，但他们的手臂没什么劲，扔的方法也很笨拙。他都能轻松地躲过，他每躲过一次，都要洋洋得意地大笑。不久后，路上传来一阵骚动，原来是警察局听见了刚才的声音，派来几个警察看看出什么事了。男孩们见状害怕了，赶紧逃跑了，留下大获全胜的埃利斯。

打架给埃利斯带来了由衷的喜悦，但这场闹剧一结束，他还是怒不可遏。他给麦格雷戈先生写了一张言辞激烈的便条，声称自己被无端地攻击了，要求对此进行报复。他派了目睹当时情景的两个文员和一个信使去麦格雷戈先生的办公室，以证明这件事属实。他们的谎言全部一致，天衣无缝。“那些男孩无缘无故地就攻击了埃利斯先生，他只好自卫”如此等等。埃利斯为了伸张自己的正义，或许自己也相信这就是故

事的真实版本。麦格雷戈先生却多少有些不安，他命令警察去抓捕并审问那四个学生。不过，那些男孩早料到会发生这种事，于是躲了起来，警察在集市搜查了一整天，也没抓到他们。当天晚上，那个受伤的男孩被带去看一个缅甸医生，那个医生把一些有毒的树叶捣碎，混在一起，敷在他的左眼上，这下他是彻底瞎了。

当晚，欧洲人们照例在俱乐部聚会，除了韦斯特菲尔德和维罗尔，他们还没回来。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好。谋杀案，再加上对埃利斯无缘无故的攻击（这是大家公认的描述），让他们又害怕又气愤。拉克斯廷夫人叽叽喳喳地发表“我们都会被谋杀在自己的床上”的论调。麦格雷戈先生为了打消她的疑虑，告诉她暴动的时候，欧洲女士会被锁在监狱里，直到一切平息后才会把她们放出来，可她听了之后也并没有觉得宽慰。埃利斯对弗洛里很无礼，而伊丽莎白更是装作不认识他。他跑到俱乐部来，天真地希望能够弥补上次争吵产生的不快，而她的举止让他非常痛苦，以至于他大半个晚上都躲在阅览室里。直到八点钟，大家都几杯酒下肚了，气氛这才缓和了一点，埃利斯说：

“派两个童仆到咱们家里去，把晚饭拿过来吃怎么样？咱们要不打几局桥牌吧，总比在家里神不守舍好。”

害怕回家的拉克斯廷夫人立马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欧洲人如果想晚点回家，偶尔会在俱乐部共进晚餐。他们叫来了两个童仆。一听他们的吩咐，童仆们立刻放声大哭。原来他们坚信，如果上山的话，肯定会碰见马克斯韦尔的鬼魂。于是这个任务交给了园丁。园丁出发的时候，弗洛里注意到，今天又是一个月圆之夜，他在鸡蛋花树下亲吻伊丽莎白的那一夜已经过去四个礼拜了，而如今回想起来真是遥远得不可言喻。

他们在桥牌桌旁坐下，拉克斯廷夫人由于不安忘了跟牌，突然有东西砰的一声砸在屋顶上。每个人都吓了一跳，连忙抬头看。

“掉下来一个椰子！”麦格雷戈先生说。

“这儿根本就没有椰子树。”埃利斯说。

接下来一时间发生了好多事。又有东西砸到屋顶上，发出比刚才更大的巨响，一盏气油灯从挂钩上掉了下来，摔到了地面上，险些砸到拉克斯廷先生，幸好他大叫着跳到了一旁。拉克斯廷夫人开始尖叫，然后管家冲进了屋，也没裹头巾，脸色就跟劣质的咖啡一样。

“先生，先生！坏人来了！他们要来把我们全都杀了，先生！”

“什么？坏人？你什么意思？”

“先生，所有的村民都在外面！手里拿着大棒和短刀，张牙舞爪！他们要割断主人的喉咙，先生！”

拉克斯廷夫人一下子摊在椅子上。她一直大声地尖叫，盖过了管家的声音。

“嘘，别吵了！”埃利斯转向她严厉地说，“你们听！快听！”

外面一阵低沉的嗡嗡声，杀机四伏，仿佛一个愤怒的巨人在哼叫。麦格雷戈先生已经站了起来，他听见这声音身体都僵硬了，扶了扶架在鼻子上的眼镜，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这是骚乱！管家，把那盏灯捡起来。拉克斯廷小姐，去照顾你的婶婶，看看她受伤了没有。其他人跟我来！”

他们都向前门走去，前门被人关上了，应该是管家。大量小鹅卵石猛烈地击打在门上，就像是下冰雹一样。拉克斯廷先生听见这声音便害怕了，退到了其他人的后面。

“我说，该死，来个人把那扇该死的门闩好。”他说。

“别，别！”麦格雷戈先生说，“我们必须出去。如果不面对他们，会出人命的。”

他打开门，大胆地出现在楼梯的顶端。门口的小路上有大约二十个缅甸人，他们手持短刀或大棒。在围栏之外的公路两侧全都站满了人，密密麻麻，人山人海，一直延伸到练兵场。这儿至少聚集了两千人，在月光下黑白分明，到处都有弯曲的短刀在闪闪发光。埃利斯冷静地站在麦格雷戈先生旁边，两手插在裤兜里。而拉克斯廷先生则不见了踪影。

麦格雷戈先生抬起手，示意他们安静。“这是什么意思？”他严肃地大喊。

底下一片叫嚷，几个板球大小的红砖土块从公路那边飞过来，但所幸没砸到任何人。门口小路上的一个人转过身去，向其他人挥舞手臂，

大叫道现在还不是扔土块的时候。然后他走上前去，要和欧洲人交涉。他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壮小伙，看上去挺温厚，留着向下弯曲的小胡子，穿着一件汗衫，笼基卷到膝盖处。

“这是什么意思？”麦格雷戈先生重复道。

那人咧开嘴爽朗地笑了笑，然后用不是很无礼的口气大声说道：

“我们不是冲着您来的，大人。我们来找那个木材商埃利斯（他说成了‘埃利特’）。他今天早上打的那个男孩已经瞎了。你们必须把埃利特交出来，好让我们惩罚他。你们其他人不会受伤的。”

“记住那个家伙的脸，”埃利斯转过头向弗洛里说，“这事儿完了，我们要判他七年刑。”

麦格雷戈先生的脸一下子变成了紫红色。他怒火中烧，几乎呛得说不出话来。好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当他终于说出话来的时候，说的还是英语。

“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二十年来我都没见过如此傲慢无礼的行为！赶紧滚，否则我就叫宪兵了！”

“您最好快点，大人。我们知道你们的法庭对我们没有正义，所以我们必须自己惩罚埃利特。把他交出来，不然的话，你们所有人都会遭殃的。”

麦格雷戈先生愤怒地挥了挥拳头，就好像在锤钉子一样，“滚开，狗娘养的！”他大叫道，这是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骂人。

公路上传出雷鸣般的咆哮，石头如雨点般砸了过来，每个人都被击中了，包括门口小路上的缅甸人。有一块石头迎面击中麦格雷戈先生的脸，险些把他击倒。欧洲人急忙撤回屋里，把门闩好。麦格雷戈先生的眼镜被打碎了，鼻子也在流血。他们回到休息室，只见拉克斯廷夫人在一条长椅上来回翻滚，活像一条发了疯的蛇，而拉克斯廷先生优柔寡断地站在屋子中间，手里拿着一个空瓶子，管家则跪在角落划着十字（他是个罗马天主教徒），童仆们在一边大哭，只有伊丽莎白还算镇定，不过她也脸色苍白。

“出什么事了？”她大叫道。

“出什么事了，我们有麻烦了！”埃利斯生气地说，一边摸着脖子后面被石头击中的地方，“缅甸人把我们包围了，一个劲儿地扔石头。但我们要镇定！他们还没那个胆子破门而入。”

“马上叫警察！”麦格雷戈先生含糊不清地说，原来他在用手帕堵鼻血。

“行不通啊！”埃利斯说，“你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四处望了望。他们已经把我们团团围住了，这帮该死的混蛋！根本没人能到宪兵队去。维拉斯瓦米的院子里也全是人。”

“那我们就只能等着。我们要相信他们会自己撤走的。镇静下来，亲爱的拉克斯廷夫人，请你镇静下来！危险很小的。”

危险听上去一点也不小。喧闹声此起彼伏，成百上千的缅甸人似乎都涌入了院子。喧闹声震耳欲聋，连自己说话都听不见，除非扯破嗓子大喊。休息室里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了，那些用来挡虫子的锌制多孔百叶窗也拉下来闩好了。窗户被打碎了，又是一阵猛烈的撞击声，然后四面八方都是石头砰砰不断撞击的声音，砸得薄木头墙来回摇晃，就像要把墙砸裂一样。埃利斯打开一扇百叶窗，恶狠狠地向人群中扔出一个瓶子，谁知十几块石头呼啸着砸了进来，他只得急急忙忙关上百叶窗。除了扔石头、大喊大叫和砸墙之外，缅甸人似乎并没有别的计划，但仅仅是喧闹声就足够让人焦虑不安的了。起初，欧洲人都被吵得茫然不知所措。没人想到要去怪罪埃利斯，毕竟他才是整件事的罪魁祸首，但共同面临的危险似乎让他们一时间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麦格雷戈先生没有眼镜已然成了半个瞎子，他心烦意乱地站在屋子中间，右手任由拉克斯廷夫人抚摸，还有一个童仆抱着他的左腿大哭。拉克斯廷先生再一次消失了。埃利斯气得直跺脚，冲着宪兵队的方向挥拳头。

“警察都他妈的到哪儿去了？那帮胆小鬼！”他叫嚷着，全然不顾在场的女士，“他们为什么还不出现？我的上帝啊，这种机会真是百年不遇！咱们这儿要是有十支步枪就好了，咱们就把那群狗娘养的全打死！”

“他们马上就会到了！”麦格雷戈先生大喊着回应他，“冲破人群总得花一点时间。”

“那他们干嘛不开枪呢？这群该死的狗娘养的！他们要是开枪就能让这帮人血流成河。噢，上帝啊，居然错过这大好的机会！”

一块大石头砸破了一扇锌制百叶窗，又有一块石头从这个洞里砸了进来，击中了一幅“邦左”画，然后弹了回来，划破了伊丽莎白的手肘，最后掉到桌子上。外面传来一阵胜利的欢呼声，接着便是房顶上一连串的撞击声。原来是有的小孩爬上了树，兴高采烈地从树上滑到下面的屋顶上。拉克斯廷夫人声嘶力竭地尖叫了一声，比之前她所有的尖叫都更刺耳，轻易盖过了外面的喧闹。

“谁快来把这个该死的老太婆的嘴给我堵上！”埃利斯大叫道，“人家还以为我们在杀猪呢。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得做点什么。弗洛里，麦格雷戈，来啊！谁能想个办法突出重围！”

伊丽莎白突然失去了勇气，崩溃得大哭起来。刚才的石头划伤了她。令弗洛里始料未及的是，他发现她居然紧紧抓住了他的手臂。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这个动作也让他的心沸腾了起来。之前他一直很超脱地看待当前的局势——应该是被喧闹吵懵了，但他并不怎么害怕。他总是不太相信东方人会造成真正的危险。直到他感觉到伊丽莎白的手抓住了他的手臂时，他才意识到事态的严峻。

“噢，弗洛里先生，求求你了，求你想个办法吧！你能行的，你能行的！千万不要让那帮可怕的人闯进来啊！”

“我们当中要是有人能赶到宪兵队去就好了！”麦格雷戈先生抱怨道，“由一名英国官员领导他们！大不了我亲自试一试。”

“别犯傻了！你要是去，只怕是会被割破喉咙的！”埃利斯叫嚷道，“如果他们真的快要闯进来了，那我就去。不过，唉，被这群下流胚杀死！我在九泉之下都会愤愤不平！要是我们能把警察叫来就好了，把这群该死的人全杀光！”

“沿着河岸过去不行吗？”弗洛里绝望地喊道。

“门儿都没有！他们有好几百号人在来回巡视。我们被隔断了，三面都有缅甸人包围，另外一面是河！”

“河！”

一个惊人的想法在弗洛里的脑海闪过，这种想法太过明显，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视。

“河！对呀！我们到宪兵队去简直易如反掌。难道你们没发现吗？”

“怎么去？”

“哎呀，下河！到水里去！游泳过去啊！”

“噢对，好伙计！”埃利斯大叫道，捶了一下弗洛里的肩膀。伊丽莎白捏了捏他的手臂，还高兴地跳了一两步舞。“你们要是同意的话，我去！”埃利斯喊道，但弗洛里摇了摇头。他已经开始脱鞋了，显然现在一刻也不能耽误。缅甸人现在已经失去理智了，他们要是设法冲进来了，说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管家已经克服了一开始的恐惧，他试着打开了面朝草坪的窗户，然后斜着四处张望了一下。草坪上也就不到二十个缅甸人。他们认为河流已经截断了退路，所以没有留人防守俱乐部的后方。

“拼命从草坪跑下去！”埃利斯冲着弗洛里的耳朵大喊，“他们一看见你就会立马散开的。”

“命令警察立刻开枪！”麦格雷戈先生从另外一边喊道，“我授予你这项权力。”

“别忘了告诉他们瞄低点！别朝着天上打。开枪就要打死他们。最好就打肚子！”

弗洛里从阳台上跳了下去，双脚落在坚硬的地面上感觉生疼，他六步就冲到了河岸。正如埃利斯所说，缅甸人看见他跳下来以后，退缩了一会儿，紧接着就扔了几块石头，但没人追他，毫无疑问，他们认为他只是想逃命，而且在明亮的月光下，他们也看得出来他不是埃利斯。下一秒他就已经穿过树丛，冲到水里去了。

他陷得很深，河里的软泥困住了他，他的膝盖都陷了进去，过了好几秒钟，他才挣脱出来。他露出水面，一团热乎乎的白沫粘在了他的嘴边，就像是烈性啤酒的泡沫一样，还有一团软绵绵的东西漂进了他的喉咙里，噎得他喘不过气，原来是一小枝水葫芦。他好不容易才吐了出来，这才发现急促的水流已经把他冲出了二十码远。缅甸人在河岸上漫

无目的地跑来跑去、大喊大叫。弗洛里的视线和水面齐平，他看不见围攻俱乐部的人群，但他能听见他们低沉可怕的怒吼，声音似乎比在岸上听还要嘈杂。当他游到宪兵队对面时，河岸上似乎没有人。他奋力地从水流中站起来，挣扎着穿过软泥，左脚上的袜子都被吸了去。河岸前面不远有两个老人坐在围栏边，正在削着栏桩，仿佛一百里内根本没有暴动似的。弗洛里爬上了岸，翻过了围栏，穿着他那湿漉漉、往下垂的裤子，步履沉重地穿过被月光照亮的阅兵场。从声音来判断，他知道宪兵队里没什么人。在右边的马厩里，维罗尔的马受了惊，扬起后蹄奔窜了起来。弗洛里跑到公路上，才看到是怎么回事。

所有的警察，包括民警和宪兵，大约一百五十人，他们只装备了警棍，已经从人群的后方开始攻击。他们完全被吞没在人潮之中。人群实在是太密集了，就像是一大群蜜蜂在嗡嗡地绕个不停。到处都能看见深陷在缅甸人群中的无助的警察，他们愤怒地挣扎，但完全徒劳无益，拥挤得连他们的警棍都施展不开。整群人都缠在一条条展开的头巾里，就像是拉孔奥[3]一样。人群中有三四种语言的大声咒骂，有飞扬遮天的尘土，还有金盏花和汗水混在一起的令人窒息的臭味，但似乎没人受重伤。缅甸人并没有使用他们的短刀，很可能是因为害怕引来警察开枪。弗洛里挤到了人群中，立刻也像其他人一样被人潮吞没了。人群如海潮一般把他包围，将他从一边挤到另一边，来回撞击着他的肋部，人体的体温也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挣扎着往前走，这感觉就仿佛在做梦一样，此情此景如此荒唐、如此不真实。整场暴动从一开始就非常荒唐，而最为荒唐的是，这些本可能杀了他的缅甸人，在看到他挤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却不知道拿他如何是好。有的人冲着他当面大声辱骂，有的人推挤他、踩他的脚，还有的人甚至给他这个白人让路。他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在挣扎着逃命，还是仅仅要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去。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无助地被困在人群里，手臂紧贴着身体两侧，后来，他发现自己正在跟一个比自己强壮许多的矮胖的缅甸人扭打在了一起，再后来，又有十几个人像海浪一样向他涌来，把他推向了人潮的更深处。突然，他感到右脚趾疼痛难忍，有人穿着靴子踩到了他的脚。原来是宪兵队的印度人连长，一个拉其普特人[4]，他非常肥胖，留着八字胡，头巾早已不知去处。他正抓着一个缅甸人的喉咙，准备捶打他的脸，汗水从他光秃秃的头顶流了下来。弗洛里用手抱住印度人连长的脖子，一把将他从他的对手身边拽了过来，冲着他的耳朵大喊。弗洛里无法用乌尔都语表达，他用缅甸语大喊道：

“你们为什么不开枪？”

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听懂那个人在回答些什么，然后他才听懂一句“Hukm ne aya！（我没有接到命令！）”

“白痴！”

这时，另一群人又向他们冲来，有一两分钟，他们都被挤得动弹不得。弗洛里意识到印度人连长的兜里应该有个哨子，于是费力地想把它掏出来。最后他终于掏出了哨子，使劲吹了几下，发出了刺耳的声响，但让大家集合起来确是无望，除非能让大家都到一片空地去。想要从人群中挣扎出去简直是既费力又可怕，就像淌过一片齐颈深的黏糊糊的海域一样。有时，弗洛里的四肢实在是疲惫无力，他完全不使劲也能站着，他就任由人潮来回拥挤，甚至是把他往后推。最终，得益于人潮的自然旋转，而非他自身的努力，他从人潮中挣脱了，来到一片空地。印度人连长同样也出来了，还有十到十五个印度兵和一个缅甸督察。大多数印度兵都累得筋疲力尽，他们的脚也被踩瘸了，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

“快点，都起来！给我拼命跑回宪兵队！去拿些步枪来，一人再拿一个弹夹！”

他实在太激动，以至于连缅甸语都说不出来，但那些人还是明白了他的意思，一瘸一拐、步履沉重地朝宪兵队走去。弗洛里紧随其后，以免人潮再次向他袭来。当他赶到宪兵队大门时，印度兵正拿着枪往回走，已经准备开枪了。

“萨布请下命令！”印度人连长气喘吁吁地说。

“喂，你！”弗洛里朝督察大喊，“你会说印度斯坦语吗？”

“会，先生。”

“那就告诉他们朝上边开枪，让子弹正好从他们头上飞过。最重要的是，要一起开枪齐射。让他们明白我的意思。”

那个胖督察的印度斯坦语连弗洛里都不如，全靠跳上跳下、指手画脚才解释清楚。然后印度兵举起了步枪，枪声轰鸣，紧接着从山坡传来一阵起伏的回声。一时间弗洛里还以为他的命令被违抗了，因为离他们最近的整片人群都扑倒了下去，就像收割干草一样。不过，他们仅仅是

吓得趴下了而已。印度兵们又举枪第二轮齐射，但已经没有必要了。人群立刻从俱乐部开始往外涌，就像一条改道的河流。人流从公路上倾泻而下，他们看见全副武装的人堵住了他们的去路，就退缩了，于是前面的人和后面的人开始扭打在了一起。最后，整个人潮冲出了公路，向外扩散，慢慢地涌上了练兵场。人群前脚刚撤走，弗洛里和印度兵便后脚跟上，缓慢地向俱乐部进发。刚才掉队困在人群中的警察也三三两两地跟了上来。他们的头巾不见了，绑腿拖在地上好几码远，但除了瘀伤之外并无大碍。民警押着少得可怜的几个犯人。当他们抵达俱乐部大院时，还有缅甸人在往外涌，一排看不到头的年轻人优雅地跃过篱笆之间的缺口，就像是一排瞪羚。弗洛里感觉此时天色已晚。一个身着白衣的小个子人影从人群末尾挣脱了出来，一瘸一拐、匆匆忙忙地跑过来抓住弗洛里的手臂。原来是维拉斯瓦米医生，他的领结已经被撕开，但他的眼镜却奇迹般的完好无损。

“医生！”

“啊，我的朋友！啊，我累得筋疲力尽了！”

“你在这儿做什么？你刚才就在人群中间吗？”

“我在试图阻止他们，我的朋友。您来之前我已经绝望了。但我想至少有一个人在暴动中挂彩了。”

他伸出一只小小的拳头，让弗洛里看他受伤的指关节，可现在天色太暗，看起来很费劲。就在这时，弗洛里听见身后传来浓重的鼻音。

“啊，弗洛里先生，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跟往常一样还是转瞬即逝。光是我们俩就够他们受的了，哈哈！”

原来是吴波金。他带着英勇的神情向他们走来，手里拿着一根巨大的手杖，皮带上别着一把左轮手枪。他故意身着便装——汗衫和掸族裤子——来给人以急急忙忙冲出家门的印象。在危险结束前，他一直保持低调，躲在一边，而现在局势稳定了，他便急急忙忙跑出来邀功。

“干得漂亮，先生！”他满腔热情地说，“瞧他们都窜到山上逃命去了！咱们把这群乌合之众打得溃不成军。”

“咱们！”医生喘着粗气愤慨地说。

“噢，我亲爱的医生！我没注意到您也在这儿。您也参加了战斗，这可能吗？您……不顾您最为宝贵的生命！谁会相信这种事啊？”

“你来得真够从容不迫的啊！”弗洛里生气地说。

“呵呵，先生，反正我们把他们赶走了就行了，”他注意到了弗洛里的口气，于是带着一丝满足感补充道，“他们是冲着欧洲人的房子来的，您也看到了。我想他们在回去的路上，难免会想抢点儿东西。”

不得不佩服这个人的厚颜无耻。他把大手杖往腋下一夹，屈尊俯就、闲庭信步般地走在弗洛里身边，而落在后面的医生不由自主地感到窘迫不安。在俱乐部门口，三个人都停了下来。此时天黑得出奇，月亮也消失不见了。在低空中，依稀可见黑色的云朵仿佛一群猎狗向东飘去。一阵凉风从山坡上吹了下来，在前方卷起一团尘土和水汽。空气中突然弥漫一股很潮湿的气息。风越刮越快，树开始沙沙作响，紧接着开始猛烈地彼此拍打，网球场边的那棵大赤素馨树撒下一大片若隐若现的花朵，如同梦幻的星云一般。三个人都急忙转身寻找避雨的地方，两个东方人各回各家，弗洛里则回俱乐部。雨终于开始下了。

---

[1] 震颤性谵妄（delirium tremens），酒精依赖者在停用酒类后出现的急性反应，包括明显的神经功能紊乱、震颤、幻觉、错觉与妄想等，甚至可以致命。

[2] 引自萧伯纳的小说《安德洛克勒斯与狮子》（Androcles and the Lion），张旸译。

[3] 拉孔奥（Laocoon），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城的阿波罗神祭师，因警告特洛伊人提防木马计而触怒天神，后与两个儿子被雅典娜派来的巨蟒缠绕致死。

[4] 拉其普特人（Rajput），意思是王公之子，是中世纪初期在印度中西部兴起的部族，他们声称是原印度武士阶级刹帝利的后裔。

第二十三章

第二天，整个城镇比一座设有大教堂的城市的礼拜一早晨还要安静。暴动之后通常都是这样。除了少数几个犯人以外，每一个可能参与袭击俱乐部的人都有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俱乐部的花园看上去就像被一群狂奔的野牛践踏过了一样，但俱乐部的房子没有遭到掠夺，欧洲人里也没有新的伤亡，只是事后，人们在台球桌底下发现了拉克斯廷先生，他抱着一瓶威士忌，醉得不省人事。韦斯特菲尔德和维罗尔一早就回来了，把杀害马克斯韦尔的凶手缉拿归案，或者说，至少先抓两个人回来绞死，为马克斯韦尔的死出一口气。韦斯特菲尔德听说暴动的事以后，非常郁闷但也没办法。又发生这种事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暴动，而他却没在场镇压！似乎命里已注定，他这辈子是杀不成人了。除了沮丧还是沮丧。而维罗尔对此唯一的评论是：弗洛里（一个文员）居然向宪兵发号施令，“真他妈的放肆”。

与此同时，雨几乎下个不停。弗洛里一醒来，听见雨点敲打房顶的声音，就立刻穿上衣服，冲了出去，弗劳紧随其后。在没人看得见的地方，他脱掉衣服，任由雨水冲刷他赤裸的身体。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自己浑身都是昨晚留下的瘀伤，但雨水还是在短短三分钟之内把他浑身上下所有痱子的痕迹都冲刷得一干二净。雨水的治愈能力实在是太神奇了。弗洛里向维拉斯瓦米医生家走去，他的鞋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雨水一阵阵地从他特赖帽的帽檐上流到他的脖子里。天色灰暗，不计其数的旋风在练兵场上互相追逐着，就像是一队队骑兵。一些缅甸人从他身边走过，他们头顶着巨大的斗笠，尽管如此，他们的身体还是像喷泉里青铜神像一样，任由雨水冲刷。溪流编织成了一张网，把路上的石头冲刷了出来。弗洛里抵达的时候，医生刚刚到家，正站在阳台上向栏杆外边甩着湿雨伞。他兴奋地向弗洛里打招呼。

“上来吧，弗洛里先生，快点上来吧！您来得正是时候。我正准备开一瓶老汤米杜松子酒[1]呢。快上来吧，我得敬您一杯，祝您健康，您可是皎塔达的救星啊！”

他们长谈了一阵子。医生一直处于志得意满的情绪之中，似乎昨晚的事奇迹般地解决了他所有的烦恼。吴波金的计谋破产了，医生再也不

用被他摆布了，而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医生向弗洛里解释道：

“您看，我的朋友啊，这场暴动——或者应该说，您在其中高尚的行为——大大出乎吴波金意料。他之前发动了那场所谓的叛乱，然后又独占了镇压叛乱的功劳，他肯定算计着，叛乱升级还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功劳。有人告诉我，当他听说马克斯韦尔先生的死讯的时候，他高兴得不得了，”医生把大拇指和食指掐在一起，“我想说的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污秽？”

“噢对，污秽。据说他当时差点要跳起舞来了——您能想象如此令人作呕的场景吗？——他还大叫道，‘现在他们可不能小看我的叛乱了！’这就是他对人命的态度。但现在，风水轮流转。这场暴动让他半道栽了个跟头。”

“此话怎讲？”

“您还没看出来吗，因为镇压暴动的功劳不是他的，是您的啊！而大家都知道我是您的朋友，这么说，我就沾了您的光。您不是时下的大英雄吗？昨晚您回俱乐部的时候，您的欧洲朋友们难道没有张开双臂欢迎您吗？”

“还真是，我必须承认。以前我可从没有过这样的待遇。拉克斯廷夫人都一个劲儿地讨好我，她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弗洛里先生’。她现在对埃利斯怀恨在心。昨天埃利斯管她叫该死的老太婆，还让她不要像猪一样嚎，她可记着呢。”

“啊，埃利斯先生有时说话是太重了，这一点我也注意到了。”

“唯一让他们扫兴的事，是我让警察不要直接朝暴民开枪，而是朝他们头顶上方开枪。因为直接朝他们开枪好像是违反所有政府法令的。埃利斯对此颇有微词。‘你既然有机会，干嘛不打死几个狗娘养的？’他这么说。我说那有可能击中人群里的警察；可他却说，反正他们都是老黑。不管怎样，我所有的过错都被原谅了。麦格雷戈还引用了一段拉丁文——我想应该是的贺拉斯[2]的名言。”

半小时后，弗洛里向俱乐部走去。他之前答应要和麦格雷戈先生会

面，确定医生入选的事。而现在看来，这件事不会有任何困难。在这场荒唐的暴动被遗忘之前，大家都会对他言听计从。他甚至可以进俱乐部发表一通赞美列宁的言论，大家也会默默忍受的。美妙的雨水从他身体上流下来，他从头到脚都湿透了，鼻孔里也充满泥土的味道，这种味道在过去干旱难熬的几个月都被遗忘了。他走进残破的花园，几乎所有的花都被踩死了，园丁正弯着腰拿着小泥铲为百日菊挖洞，雨水就哗啦啦地溅落在他裸露的后背上。伊丽莎白站在侧阳台上，似乎是专门在等他。他摘下帽子，把帽檐上的一滩水朝身后甩了甩，然后转身走到她跟前。

“早上好！”雨点打在低矮的屋顶上，发出很大的声音，于是他抬高嗓门说。

“早上好！雨可算是下下来啦！简直就是倾盆大雨啊！”

“噢，这还不算是真正的雨。等到了七月份，整个孟加拉湾的水都会向我们倾泻下来，一场雨接着一场雨。”

他们每一次见面似乎都在谈论天气。虽然她的嘴里说的是这些套话，可她脸上的表情却大不相同。自从昨天晚上起，她的举止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鼓起了勇气说：

“昨天石头打着你的那个地方怎么样了？”

她把手臂伸向他，让他握住。她的神情非常温柔，甚至可以说是温顺。他意识到，昨晚自己的英勇事迹已经让自己成为她眼中的英雄。她并不知道其实根本没太大危险，她原谅了他的一切，甚至包括玛拉美，就因为他在关键时候展现出了勇气。这简直就是水牛和豹子事件的重演。他的心脏在胸口怦怦直跳。他的手沿着她的手臂向下滑动，然后扣住了她的手指。

“伊丽莎白……”

“会被人看见的！”她说，她抽回了自己的手，但并不生气。

“伊丽莎白，我有话对你说。你还记得我在丛林里给你写的那封信吗？就在我们……就在几个星期之前？”

“记得。”

“你还记得我写的什么吗？”

“记得，很抱歉我没有回信，我只是……”

“我当时也没指望你回信。我只是想提醒你我在那封信里写的话。”

诚然，他在那封信里非常无力地写道，他爱她——不管发生什么，他会一直爱她。他们面对面站着，靠得非常近。出于一时冲动，他拥她入怀，紧紧地抱着她。事情发生得很快，事后他都不敢相信这件事发生过。一时间，她没有反抗，任由他抬起自己的脸庞亲吻自己；突然间，她又退却了，连忙摇头。或许是因为她怕别人看见，或许是因为他的胡须淋了雨太潮湿。她一言不发，挣脱了他，匆匆跑进了俱乐部。她的脸上有一丝忧愁或者后悔，但她看上去并没有生气。

他不紧不慢地跟着她进入俱乐部，正好撞见心情愉快的麦格雷戈先生。一看见弗洛里，他便用低沉洪亮的嗓音亲切地说：“啊哈！英雄凯旋啦！”然后，他又用正经的语气，再次向弗洛里表示祝贺。弗洛里抓住时机说了几句医生的好话，非常生动地描绘出了医生在镇压暴动中的英雄事迹。“他就在人群中间，像一头猛虎一样战斗”诸如此类的。这也没有太夸张，因为医生确实冒着生命危险。麦格雷戈先生对医生的表现刮目相看，其他人听说了之后也是如此。一直以来，一个欧洲人的证词对一个东方人的作用比他的一千个东方同胞还要大；而此时此刻，弗洛里的意见就非常有分量。医生的好名声基本上是修复了，他入选俱乐部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然而，这件事还没有最终达成一致，因为弗洛里要赶回营地。他当晚就在夜色中出发了，走之前也没有再见到伊丽莎白。那场徒劳的叛乱明显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穿越丛林很安全。雨季开始之后，几乎没人再去谈论叛乱的事了，缅甸人都忙着耕作，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体型庞大的人都是无法在灌满雨水的农田里通行的。弗洛里计划在十天之后返回皎塔达，那个时候刚好赶上随军牧师每六周一次的停留。说实话，伊丽莎白和维罗尔都在皎塔达的时候，弗洛里根本就不想待在这里。但说来奇怪，所有的苦痛——之前让他备受折磨的所有污秽想象、眼红嫉妒——在他知道她已经原谅他之后，全都烟消云散了。现在阻挡他们俩的，就只有维罗尔了。哪怕是想到伊丽莎白躺在维罗尔的怀中也很难让他嫉妒，因为他知道，再风流的韵事也有结束的那一天。维罗尔

很明显不会娶伊丽莎白，因为像维罗尔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不会娶在某个印度驻地偶然遇见的穷女孩的。维罗尔不过是用伊丽莎白找找乐子罢了。不久之后，维罗尔就会抛弃她，而她就会回到他身边，回到弗洛里身边。这就够了，这比他之前奢望的好多了。真爱有时要知足，这一点有时还挺可怕的。

吴波金怒不可遏。这该死的暴动突然爆发，让他猝不及防，就像往他的如意算盘里撒了一把沙子一样。诋毁医生的任务又只能从头开始了。当然，一开始要写一大堆匿名信，拉佩又只得请两个整天的假——这次的借口是支气管炎——才能写完。匿名信控告医生的罪名，从鸡奸到盗用政府邮票，可谓应有尽有。那个放俄瑞欧逃跑的狱卒已经受了审讯，吴波金花了两百卢比贿赂证人，才让他成功地被无罪释放了。麦格雷戈先生收到更多的匿名信，这些信都详细地试图证明维拉斯瓦米先生才是越狱案的主谋，而他试图把责任推卸到一个无助的下属身上。然而这些匿名信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麦格雷戈先生给行政长官写了一封密信，汇报暴动的情况，可信被他们用蒸汽熏开了，信里的语气很让他们担忧——麦格雷戈先生称医生在暴动当晚“表现得相当可靠”——吴波金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

“是时候出狠招了。”他们在早饭前坐在前阳台上召开秘密会议，吴波金对其他人说。玛庆、巴盛和拉佩都在场，后者是一个样子机灵、大有前途的十八岁男孩，举手投足间昭示日后必定大有所为。

“我们在锤打一面砖墙，”吴波金继续说，“这面墙就是弗洛里。谁料想到这个卑鄙的懦夫还真力挺自己的朋友？可事情就是这样。只要维拉斯瓦米有他的支持，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我跟俱乐部的管家聊过了，先生，”巴盛说，“他告诉我，埃利斯先生和韦斯特菲尔德先生还是不愿意让医生入选俱乐部。一旦他们淡忘了暴动这件事，你觉得他们难道不会和弗洛里继续争吵吗？”

“他们当然会争吵，他们一直都在争吵。可到了那个时候，生米都已经煮成熟饭了。想想吧，他如果真的当选了！如果他真的当选了，我非得气死。不，我们还有一步棋可以走。我们必须把矛头指向弗洛里本人！”

“攻击弗洛里，先生！可他是个白人啊！”

“怕什么？我以前又不是没整过白人。弗洛里一旦身败名裂，医生也就完蛋了。他必须身败名裂！我会把他诋毁到再也没脸到俱乐部去！”

“但是，先生！白人啊！咱们要挑他什么毛病啊？谁会相信对白人不利的话啊？”

“你一点谋略都不懂，郭巴盛。咱们不挑白人的毛病，咱们得抓他的现行。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抓个正着，让他蒙受羞辱。我得想想怎么安排。现在你们别说话，让我好好想想。”

会议中断了片刻。吴波金站了起来，盯着阳台外面的雨景，两只小手在背后紧扣，靠在自己臀部这个天然的垫子上。其他三个人从阳台的另一端望着他，刚才关于攻击白人的谈话几乎把他们吓着了，现在的局面超越他们能力所及了，他们正等着吴波金的神来之笔让局面豁然开朗。这个场景有点像一幅名画（是梅索尼耶[3]的画吗？），画的是拿破仑在莫斯科聚精会神地研究地图，而他的元帅们手拿三角帽在一旁安静地等着。不过吴波金当然比拿破仑更胜任此时的任务。他的计划在两分钟之内就想好了。当他转过身时，宽大的脸盘上充满狂喜。医生把吴波金说成是想要跳舞，显然是搞错了，吴波金的身材根本跳不了舞，但如果他能的话，此时此刻肯定就跳起来了。他挥手把巴盛叫来，然后在巴盛的耳边低语了一会儿。

“这一步错不了，对吧？”他最后说道。

巴盛慢慢地大咧开嘴，脸上露出了一个勉强而怀疑的笑容。

“五十卢比应该就能解决所有的开销了。”吴波金容光焕发地补充道。

吴波金把计划详细地讲给他们听。他们听明白了之后，全都不能自已地开怀大笑起来，即便是平时很少笑的巴盛，即便是打心眼里并不认同这个计划的玛庆，也都笑了起来。这个计划实在太完美了，让人无法拒绝，简直是天才的计划！

雨一直下，一直下。弗洛里回营地之后的那一天，雨一口气下了三十八个小时，有时淅淅沥沥，就像英国的雨一样，有时倾盆而下，就像是大瀑布一样，让人以为整个海洋里的水现在都被吸到云里去了。雨点

敲打屋顶数个小时之后，声音简直令人发狂。雨停的间歇，太阳还是像往常一样刺眼，照得水分蒸发，泥土开裂，人浑身上下又长出大片大片的痱子。雨一开始下，成群的飞虫便破茧而出，还有一种叫臭虫的可恶生物也泛滥成灾，它们会成群结队地钻进房屋，饭桌上到处都是，让人根本吃不下饭。晚上雨要是下得不大，维罗尔和伊丽莎白还是会出去骑马。对维罗尔来说，所有天气都差不多，但他不愿意看见自己的马驹沾上一身泥水。快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比以前更亲密，也没有更疏远。伊丽莎白对他的求婚深信不疑、满心期待，维罗尔却一直没有提起。然后发生了一件令她担忧的事。麦格雷戈先生带来的消息迅速在俱乐部传开了，维罗尔要离开皎塔达了，宪兵将继续驻扎在皎塔达，但会有另一名军官来接替维罗尔，没人确定是什么时候。伊丽莎白担心得要命。当然，如果他要走的话，他肯定会把事情说得明确一些吧？她不能质问他，甚至不敢问他是不是真的要离开，只能等他自己来说。可他却什么也没说。然后有一天晚上，他连招呼也没打就没去俱乐部。接下来的两个整天，伊丽莎白连他的影子都没见着。

这太讨厌了，但她却无能为力。维罗尔和伊丽莎白在过去几周形影不离，可现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却形同陌路。他一直都和其他所有人保持距离，他甚至从没进过拉克斯廷一家的宅邸。以他们和他之间的熟悉程度，他们不会冒昧到驿站旅馆去找他，或者给他写信；他也没再出现在早晨练兵场的晨练上。除了等他自己重新出现，他们别无选择。而当他重新出现的时候，他会向伊丽莎白求婚吗？一定会的，他一定会的！无论是伊丽莎白还是她的婶婶都坚信他肯定会向她求婚的（但她们谁都没说出来）。伊丽莎白对他们的下次见面充满期待，这期待几乎成为了一种痛苦。上帝啊，求求你了，他至少要一周之后才会离开！如果她能和他一起再骑四次马，或者三次，哪怕只有两次也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上帝啊，求求你了，让他快些回到她的身边吧！如果他来只是为了说再见，那实在是太过分了！两个女人每天晚上都到俱乐部去，一直坐到深夜，一边听着外面的动静，希望能听到维罗尔的脚步声，一边却又装作根本就没在听的样子。可他一直没有出现。埃利斯非常明白当下的情况，幸灾乐祸地看着伊丽莎白，全当消遣。最糟糕的是，现在拉克斯廷先生没完没了地缠着伊丽莎白。他变得无所顾忌，几乎当着仆人的面，他就敢拦住她，抱住她，然后用最恶心的方式捏她、抚摸她。她唯一的防卫方式就是威胁说要告诉她的婶婶，幸而他实在太蠢了，意识不到她根本不敢这么做。

第三天早上，伊丽莎白和婶婶刚好赶在一场猛烈的暴雨前到达了俱乐部。她们在休息室里坐了几分钟，然后听见走廊里有人跺脚甩水的声音。两个女人的心都为之一紧，因为那有可能是维罗尔。紧接着一位年轻的男士进了休息室，进屋的时候还一边解着长雨衣的扣子。他是一个结实、欢乐、笨头笨脑的年轻人，大约二十五岁，脸颊肥胖而清爽，头发是黄油一样的颜色，没有额头，而且笑声震耳欲聋，这一点大家日后就会领教。

拉克斯廷夫人发出一些口齿不清的声音——是由于失望才从嘴里结结巴巴地蹦了出来。这个年轻人却立刻友好地和她们打招呼，他显然是那种一见面就跟人熟络、说话很近乎的人。

“哈喽，哈喽！”他说道，“白马王子驾到啦！希望我没打扰你们啥的吧？没打断你们的家庭聚会啥的吧？”

“完全没有！”拉克斯廷夫人吃惊地说。

“我的意思是，我想我就到俱乐部来一趟，到处看一看，是吧。适应一下本地的威士忌品牌。我昨天晚上刚到这儿。”

“你被派驻到这里？”拉克斯廷夫人困惑地问，因为她们并不认为会有新人来。

“是的，没错。非常荣幸，非常荣幸。”

“但我们并没听说……噢，当然！我想你是林业部派来的吧？接替可怜的马克斯韦尔先生？”

“什么？林业部？当然不是！我是新任的宪兵军官啊。”

“新——什么？”

“新任的宪兵军官，接替亲爱的维罗尔老弟。亲爱的老弟接到命令要回军团，得赶紧出发。而且他肯定也给你们留下一大堆烂摊子吧。”

这个宪兵军官是个非常迟钝的青年，可连他都注意到伊丽莎白的脸色立刻变得惨白了。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拉克斯廷夫人也过了好几秒才惊叫出声来：

“维罗尔先生要走了？他肯定还没出发吧？”

“出发？他已经走了！”

“已经走了？”

“唔，我的意思是，火车半个小时之后就开了。他现在应该在火车站等着了。我派了杂役队去送他，好帮他把那些马驹啥的运上车。”

他可能还做了一些解释，可无论是伊丽莎白还是她婶婶都一句话也听不进去了。总之，她们连再见也没对那位宪兵军官说，在十五秒之内就冲出了房间，来到前门的台阶上。拉克斯廷夫人尖声地呼叫管家。

“管家！马上把我的人力车叫到前门来！去火车站，快！”她看见人力车师傅一出现，就马上补充道。她一坐上人力车，就使劲用雨伞戳人力车师傅的后背，好让他快点出发。

伊丽莎白穿上了雨衣，拉克斯廷夫人则蜷缩在雨伞下面，但这些在雨面前都不顶用。雨水大片大片朝她们迎面扑来，还没出大门，伊丽莎白的连衣裙就全浸湿了。人力车险些被大风掀翻。人力车师傅埋着头，呻吟着在雨中艰难前行。伊丽莎白痛苦不堪。这是个误会，这肯定是个误会！他肯定给她写过信，那封信肯定弄丢了。就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他肯定不会故意不辞而别的！就算他真的不辞而别……不，就算是那样，她也不能放弃希望！当他在站台上看见她的时候，见她这最后一面的时候，他肯定不会残忍到抛弃她！当她们快到火车站的时候，她由于惯性猛地撞到人力车的后部，把脸颊撞出了血。一队宪兵队的印度兵拖着脚步从她们旁边匆匆走过，他们推着手推车，身上单薄的军装湿得像抹布一样。他们一定是送维罗尔的杂役队。谢天谢地，还有一刻钟。火车还有一刻钟才开。谢天谢地，至少她还有机会见他最后一面！

她们到站台的时候，正好看见火车出站，随着几声震耳欲聋的汽笛声，火车开始加速。站长个子很小，又胖又黑，他正站在警戒线上，遗憾地望着火车离开，他一只手扶着头顶的防水遮阳帽，另一只手挡着两个大吵大闹的印度人，这两人围着他不放，非要给他看什么东西，吸引他的注意。拉克斯廷夫人把身子探出人力车，激动地在雨中大喊：

“站长！”

“夫人！”

“这是哪班车？”

“到曼德勒的车，夫人。”

“到曼德勒的车？不会吧！”

“我向您保证，夫人！这的的确确是到曼德勒的车。”他向她们走来，摘下了遮阳帽。

“可是维罗尔先生——那个宪兵军官，他不会就在车上吧？”

“是的，夫人，他已经走了。”他朝火车挥了挥手，现在火车已经迅速地消失在一片烟雨之中了。

“但现在还没到发车的时间啊！”

“是的，夫人。还有十分钟才到发车的时间。”

“那它怎么走了呢？”

站长把他的遮阳帽从身体一边挪到另一边，以示歉意。他那又黑又胖的脸显得非常苦恼。

“我知道，夫人，我知道！简直前所未有！但那位年轻的宪兵军官坚决地命令我发车！他说既然都准备好了，他就不愿意再等下去了。我指出这不合规定。他说他才不管什么规定不规定。我反复劝诫，可他一味坚持，所以总而言之……”

他又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维罗尔是那种我行我素的人，哪怕是让火车早开十分钟这种事也不例外。谈话停顿了一下。那两个印度人以为自己机会来了，连忙冲到前面，一边恸哭，一边拿出几张脏兮兮的便条让拉克斯廷夫人看。

“这两人到底想干嘛？”拉克斯廷夫人心烦意乱地喊道。

“他们是草商，夫人。他们说维罗尔中尉欠了他们一大笔钱，还没还就离开了。他们一个人是卖干草的，一个人是卖谷物的。这跟我没关

系。”

远去的火车发出一声汽笛声。火车在转弯，它就像一只黑色的毛毛虫，一边爬行，一边左顾右盼，然后慢慢消失在视线里了。站长湿漉漉的白裤子在风中凄凉地拍打着他的双腿。维罗尔让火车提前出发，到底是为了躲伊丽莎白，还是为了躲草商，成了一个永远弄不清的有趣问题。

她们沿着公路返回，然后顶着大风费力地爬上山，风太大了，有时甚至把她们吹得连退几步。当她们回到阳台上的时候，几乎都喘不过气来了。仆人们接过她们湿淋淋的雨衣，而伊丽莎白从头发里甩出一些水。她们离开火车站后就再也没说话，此时拉克斯廷夫人打破了沉默：

“哎呀！实在是太粗鲁了！简直就是可恶至极！”

尽管伊丽莎白的脸刚刚经历了风吹雨打，可还是掩盖不住她脸色自然的苍白和憔悴。但她却还是向着维罗尔。

“我想他可能等了一会儿，想跟我们道别。”她冷冷地说。

“听婶婶一句吧，亲爱的，摆脱了他简直是万幸！……我一开始就说了，他是一个非常可恶的年轻人！”

不久之后，她们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坐下吃早饭，这时感觉好一点了，拉克斯廷夫人说道：

“我想想，今天礼拜几啊？”

“礼拜六，婶婶。”

“啊，礼拜六。那亲爱的随军牧师今天晚上就到了。那明天的礼拜会有多少人去呢？哎呀，我想我们都得去！多好啊！弗洛里先生也会去的。我想，他说过他明天就从丛林回来了，”她非常亲切地补充上一句，“亲爱的弗洛里先生！”

---

[1] 老汤米杜松子酒（Old Tommy Gin），18世纪风靡英国的一种杜松子酒配方，口感略甜，现在很罕见。

[2] 贺拉斯（Horace），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著名的诗人、批评家、翻译家，代表作有《诗艺》等，是古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之一。

[3] 梅索尼耶（Meissonier），法国古典主义画家、雕塑家，以战争题材闻名，尤其是对拿破仑的描绘，代表作为《1814年法国战役》。

第二十四章

快到晚上六点时，老马图拉响了教堂里那口可笑的大钟。大钟装在教堂六英尺高的锡制尖顶上，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落日的余晖被远方的暴雨折射了过来，漫天耀眼而美丽的红光洒满了整个练兵场。今天早些时候已经下过一场雨了，不久可能会再下一场。皎塔达的十五名基督教信众正在教堂门前集合，准备进行晚间的礼拜。

弗洛里已经到了，麦格雷戈先生也到了，他戴着灰色的遮阳帽，还有弗朗西斯先生和塞缪尔先生，他们穿着新洗好的粗斜纹布套装，正在饶有兴致地四处闲谈，因为这六周一次的教堂礼拜是他们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社会活动。随军牧师是一个高个子，有着一头灰色的头发，还有一张优雅却没有光泽的脸。他戴着一副夹鼻眼镜，穿着在麦格雷戈先生家换上的教士服和牧师白袍，站在教堂的台阶上，看着那四个脸颊粉红的克伦族基督徒，露出了亲切却又无助的笑容，他们向他鞠了个躬，但他不会说他们的语言，而他们也不会说他的。另外，还有一位东方基督徒谦卑地站在后面，他是个印度人，神情悲哀，肤色黝黑，不知道是哪个种族的。他经常出现在教堂礼拜上，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信基督教。但毫无疑问，他从小就被抓了起来，并接受了传教士的洗礼，因为大多数在成年后才皈依基督教的印度人总是会违背教义。

弗洛里看到伊丽莎白走下山坡，她身着淡紫色的衣裳，跟她的婶婶和叔叔一道。早上，他已在俱乐部见过她，在其他人进来之前，他们独处了短暂的一分钟。他只问了她一个问题。

“维罗尔走了吗？再也不回来了？”

“嗯。”

无须多言。他一把拉住她的手臂，将她拥入怀中。她欣然接受，甚至乐意之极，就算是在这亮堂的白天，能清楚地看到他丑陋的胎记。有那么片刻时间，她如同一个孩子般贴紧他，就好像他拯救了自己，或者保护了自己一样。他抬起她的脸，亲吻了她，却惊讶地发现她哭了。但那时已经没有时间再聊了，就连“你愿意嫁给我吗？”这句话都来不及说

出口。不过没关系，礼拜之后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或许下次他再来做礼拜的时候，也就是从现在算起六周之后，随军牧师就会为他们二人主持婚礼了。

埃利斯、韦斯特菲尔德和新任宪兵军官正从俱乐部赶来，他们在那儿赶紧喝了几杯，好熬过接下来的礼拜仪式。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那个派来接替马克斯韦尔的森林管理员，他是个面色苍黄的高个子男人，除了耳朵前面还有一撮胡须一样的鬓发外，已经完全秃顶了。伊丽莎白到了之后，弗洛里只来得及说了一句“晚上好”。马图见所有人都到了，便不再敲钟。牧师带领大家进入教堂，麦格雷戈先生紧随其后，把遮阳帽靠在了腹部，再后面是拉克斯廷一家和当地的基督徒。埃利斯捏了一下弗洛里的手肘，醉意朦胧地在他耳边低声说：

“来吧，排好队。该去假惺惺哭着鼻子大游行了。齐步走！”

埃利斯和宪兵军官走在别人后面，他们手挽着手，迈着舞步向前走，宪兵扭着他肥臀，模仿着皮威舞者的姿势，一直扭着走进了教堂。弗洛里和他们俩坐在同一排长凳上，就在伊丽莎白的右侧。这是他第一次冒险坐在她的右边，将自己的胎记对着她。“闭上眼睛，默数到二十五。”当他们就座后，埃利斯悄悄说，引得宪兵军官一阵窃笑。拉克斯廷夫人坐在了脚踏式风琴前，风琴不过只有一张写字台那么大。马图伫立在门口，开始拉动布屏风扇——这风扇安排得极为巧妙，只能扇到前面几排长凳，也就是欧洲人坐的地方。弗劳穿过走廊，找到弗洛里的长凳，然后趴在了长凳底下。礼拜开始了。

弗洛里时不时地走着神。他恍恍惚惚地意识到自己起立和跪下，对那冗长的祈祷说着“阿门”，他还意识到埃利斯轻轻推着他，用赞美诗卷挡着脸，低声跟他说亵渎神明的话。可他实在太开心了，完全无法集中心思。冥王要放出欧律狄刻[1]了。黄色的光芒从开启的门口倾泻而入，给麦格雷戈先生的丝质外套镀上了一层金色，他宽厚的背影就如同穿上了黄金织就的衣服。伊丽莎白就在狭窄的过道对面，靠弗洛里非常近，他几乎能听到她裙子摩挲出的沙沙声，似乎能感觉到她体温。但他却不会看她哪怕一眼，因为担心其他人会注意到。拉克斯廷夫人正努力地踩着那只仅存的尚能使用的踏板，想往风琴里注入足够的空气，导致风琴的声音就像得了支气管炎一样颤抖。他们的颂歌听起来参差不齐，十分怪异——其中既有麦格雷戈先生一丝不苟的浑厚之声，又有其他欧洲人害羞的低吟，此外还掺杂着人群后方克伦基督徒发出的无字哼唱，因为他们只知道赞美诗的曲调，却不知道歌词。

他们又一次跪下来。“他妈的，又要下跪。”埃利斯悄悄说道。天色转暗了，屋顶传来一阵轻轻的雨滴声，屋外树影婆娑，一片片的黄叶回旋着飘过窗户。弗洛里透过指缝看着那些落叶。二十年前在国内的时候，他总在冬季的礼拜天坐在教区教堂的长凳上，望着那些黄色的落叶在沉闷的灰色天空中飘转、游荡，就和现在的情景一样。难道现在这一切就不能重新来过吗，就如同他从未经历那些肮脏的岁月？透过指缝，他偷偷瞟了一眼坐在侧对面的伊丽莎白，她跪在地上，颔首低眉，将面庞隐匿在她年轻而略有斑点的双手之中。等到他们结婚了，等到他们结婚了该有多好啊！在这片陌生却亲切的土地上，他们将会共同度过怎样精彩的生活啊！他看到伊丽莎白住在他的营地里，他下班后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时，她亲切地迎接他，而郭斯拉则拿着一瓶啤酒，从帐篷中匆匆赶来；他还看到他们俩漫步林间，一起欣赏菩提树上的那些犀鸟，一起采摘那些无名的野花，一起穿过寒冷的薄雾，在沼泽牧场里徒步寻觅鹬和水鸭；他看到伊丽莎白重新装饰他们的房子；他看到他的客厅不再邋遢，添置了从仰光买来的新家具，桌上有一碗粉红色的凤仙花，就像玫瑰花蕾一样，还有那些书籍，那些水彩画，还有一架黑色钢琴，这里不再是单身汉的房间了。尤其是钢琴！他的思绪徘徊在钢琴之上——可能因为他不通音律，钢琴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象征着文雅的标志，一个意味着安定生活的符号。他永远地摆脱了过去十年的堕落生活——纵情酒色，谎话连篇，背井离乡，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混迹于妓女、债主和白人萨布之间。

牧师走上那个小小的木质讲台，这个讲台也用作布道坛。他打开一篇布道上的扎带，轻咳了两声，然后朗诵起一段经文。“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阿门。”

“看在上帝的分上，长话短说吧。”埃利斯嘀咕道。

弗洛里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布道中的经文平和地流过他的脑海，那些潺潺流动的诵经之音模糊朦胧，他几乎都没有听见。等到他们结婚了，他还在幻想，等到他们结婚了……

喂！发生什么了？

牧师在一个词中间突然停顿了。他摘下夹鼻眼镜，神情忧虑，颤抖地指着门口的那个人。那人发出一阵可怕的、沙哑的尖叫。

“把钱给我！把钱给我！”

教堂里的每个人都站了起来，转身看着门口。原来是玛拉美。就当他们转身时，玛拉美走了进来，一把推开了马图，朝着弗洛里挥舞着拳头。

“把钱给我！把钱给我！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弗洛里，弗洛里！（她念成了弗落疾。）坐在前排那个黑头发的人！转过来看着我，你这个懦夫！你答应给我的钱在哪里？”

她像个疯子般尖叫着。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她，惊讶地动弹不得。她的脸色灰暗，涂满了脂粉，油油的头发散乱地垂下来，笼基的末端已经残破不堪。她看起来就像是集市上骂街的丑老太婆。弗洛里万念俱灰。哦，上帝啊，上帝哪！他们一定都知道了——伊丽莎白一定知道了——那个女人不就是他的情人么？他多么希望出现什么误会，但此时已经没有希望了，一丝一毫的希望都没有了，不容任何辩解。她一遍又一遍地叫喊着他的名字。弗劳听到了熟悉的声音，从长凳下面蠕动出来，穿过走廊，朝着玛拉美摇着尾巴。这个可恶的女人正高声细数着弗洛里对她做过的所有事情。

“看着我，你们这些白种男人，还有你们这些女人，都看着我！看看他是如何摧残我的！看看我穿的这些破布烂衣！而那个骗子、那个懦夫，却坐在那里假装没有看见我！他会让我像条贱狗一样在他家门口挨饿。啊，但我会让你颜面扫地的！转过来啊，看看我！看看这我这给你亲过上千次的身体，看啊——看啊——”

她竟然开始撕扯自己的衣服，这是出身卑微的缅甸女人最大的羞辱。拉克斯廷夫人惊厥地抽搐了几下，风琴也随之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人们终于回过神来，开始起哄。牧师刚才一直嘟囔都没人听，现在他终于恢复了音量，厉声说道：“把那个女人赶出去！”

弗洛里的脸白得吓人。他马上转头去，自始至终背对大门，拼命闭紧牙关，装作事不关己的样子。但这却是徒劳的，全部都是徒劳的。他的脸如骨头般苍黄，汗水在额头上闪光。弗朗西斯和塞缪尔做出了大概是他们一生中第一件有用的事，他们从长凳上一跃而起，抓住玛拉美的手臂，将这个扯着嗓子叫不停的女人拖出了门外。

他们把她拖出很远，直到再也听不到她声音，教堂里显得格外死

寂。刚才的场面实在太震撼、太污秽了，所有人都被弄得心烦意乱，甚至连埃利斯都显得很愤慨。弗洛里话也说不出来，一动不动。他坐在那里，直勾勾地盯着圣坛，面庞僵硬，毫无血色，胎记就像是脸上的一道蓝色水彩，格外刺眼。伊丽莎白隔着过道看了他一眼，她心中的厌恶之情让她的身体也变得不适起来。玛拉美在说什么，她一个字也没听懂，但那个场面的意义已经表露无遗。一想到他曾是那个灰头土脸的疯女人的情人，她就觉得不寒而栗。但是更糟糕的是，比一切都糟糕的是，他此时此刻流露出的丑陋之态。他的脸吓坏了她，那是一张惨白而僵硬的老脸，就像是个骷髅头，上面就只有那块胎记还有些生气。她现在因为那块胎记而讨厌他。直到现在她才知道，那是一个多么见不得人、多么不可饶恕的东西。

就像鳄鱼一样，吴波金总能找到你的弱点，然后一击致命。不用说，这又是吴波金干的。他像往常一样看到了机会，他设身处地地站在玛拉美的立场上，极为用心地教导她该如何行事。教士几乎立刻终止了布道。布道一结束，弗洛里就冲了出去，没看任何人一眼。幸好，这时天色已晚。弗洛里在跑出教堂五十码的地方停了下来，看到其他人正三三两两地走向俱乐部。在他看来，人们都十分匆忙。啊，他们自然匆忙啊！今晚俱乐部终于有点谈资了！弗劳肚皮朝上，在他脚踝处撒欢，想玩游戏。“滚，你这该死的畜生！”他说道，一脚把它踢到一旁。伊丽莎白站在教堂门口。麦格雷戈先生找到了个好机会，似乎是想把她引荐给牧师。不一会儿，两位男士就朝着麦格雷戈先生的房子走去，牧师要在那里住一晚，而伊丽莎白则跟其他人走了，离人群大约有三十码的距离。弗洛里追了过去，差不多到俱乐部门口时才赶上她。

“伊丽莎白！”

她回头看见是他，脸色变得苍白，然后一言不发地继续往前走。但他实在太着急了，于是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伊丽莎白！我必须……我一定要跟你谈谈！”

“让我走，放开我！”

他们扭打了起来，然后突然停了下来。两个克伦族基督徒从教堂出来，正站在五十码开外的地方，透过稀薄的夜幕饶有兴趣地盯着他们。弗洛里又压低声音说道：

“伊丽莎白，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像这样拦住你。但是我必须跟你说，必须！请听听我解释吧。求求你不要不理我！”

“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抓住我的胳膊不放？松手，快点！”

“好，好，我松手。好了，你看！但是，请听我说！回答我一件事。发生了这些事情后，你还能原谅我吗？”

“原谅你？原谅你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我丢尽了脸。这是最为恶劣的事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并不是我的错。当你冷静一点就会知道了。你觉得——不是现在，事情太糟糕了，但是以后——你觉得你能忘掉这件事吗？”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忘掉这件事？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件事真是恶心极了，但这跟我没有关系。我根本就想不通，你为什么要问我这样的问题。”

他几乎已经绝望了。她的语气，甚至用词，都跟他们之前一次的争吵一模一样。整个过程都简直一模一样。她不想再听他说下去了，她想要逃避他、摆脱他，她要装作他对她无权过问的样子，以此来冷落他。

“伊丽莎白！请回答我。请对我公平一点！这次我是认真的。我不指望你能立刻原谅我。在我被当众羞辱过之后，你肯定不会立刻原谅我。但是，毕竟，你几乎答应过要嫁给我。”

“什么！答应过要嫁给你？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嫁给你？”

“你并没有说出口，我知道。但这件事我们俩都心照不宣了啊。”

“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对这种事心照不宣！我觉得你的行为极为恶劣。我现在就要去俱乐部了。再见！”

“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听着。没有听我解释就对我妄加指责是不公平的。你之前就知道我做过什么，你之前就知道我在遇到你之前过着怎样不同的生活。今晚发生的事情只是一个意外。那个可恶的女人，她，我承认，曾经是我的……嗯……”

“我不想听，我不想听这些事情！我要走了！”

他又一次抓住了她的手腕，这次他抱紧了她。幸好那两个克伦族基督徒已经不见了。

“不，不，你一定要听我讲！我宁可真正冒犯你，也不愿让这件事不了了之。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开诚布公地跟你说话。你可能不知道或者根本就不关心，你让我受了多少苦。但这次你必须回答我。”

她在他的怀里用力挣扎，出人意料地猛烈。他从未见过或者想象过，她的脸会变得如此气愤。她太讨厌他了，如果不是双手受制，她一定会打他的。

“放开我！哦，你这个禽兽，禽兽，放开我！”

“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我们居然要动手了！但我还能怎样呢？你不听我说，我就不能让你走。伊丽莎白，你必须听我说！”

“我不听！我不想谈这件事！你有什么权利质问我？让我走！”

“原谅我，原谅我！就这一个问题。你会吗——不是现在，以后，当这件肮脏的事情最终被遗忘的时候——你会嫁给我吗？”

“不，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别这么说！别把话说得那么死。如果你不愿意，你可以现在说不，但一个月以后，一年以后，五年以后……”

“我不是已经说过不了吗？为什么你要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呢？”

“伊丽莎白，听我说。我曾反复尝试告诉你，你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噢，现在说这个真是没用！但是请你试着理解我。我不是告诉过你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吗？可怕得让我们虽生犹死！这里的堕落，这里的孤独，还有这里的自怨自艾，试着去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你就会意识到，你是这世上唯一能够将我拯救出来的人。”

“你能放开我了吗？你为什么非得大闹一场呢？”

“我说我爱你的时候，对你难道就毫无意义吗？我想你从未意识到我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如果你愿意，我就娶你，并且我可以保证永远

不碰你。即便如此我都不介意，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我不能没有你而独自生活，总是那样孤身一人。难道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就算世界上就剩下你一个男人，我也不会嫁给你的。我宁愿嫁给那个——那个清洁工！”

她现在已经开始哭了。他见她意已决，泪水也湿润了他的眼眶。他又说道：

“我再说一遍。请记住，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深爱着你，这是很幸运的事。请记住，尽管你会找到比我更富有、更年轻、在各个方面都更优秀的男人，但你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爱你的人了。虽然我并不富裕，但至少我可以给你一个家。我们可以生活得文明，体面……”

“你说够了吗？”她更加平静了，“趁别人还没来，你能放开我吗？”

他松开了她的手腕。他失去了她，这一点是肯定的了。他又一次在幻境中看到了他们的家，他痛苦而清楚地知道这是幻觉：他看到了他们的花园，伊丽莎白正在夹竹桃树边的车道上给尼罗和鸽子们喂食，那些夹竹桃树呈现出硫磺色，已经长到她肩膀那么高了；他看到他们客厅的墙壁上挂着水彩画，瓷碗中的凤仙花倒影在桌子上，还有书架和黑色钢琴。那架不可能存在的虚构钢琴，还有它象征的一切美好之事，都已经被这场愚蠢的灾难击得粉碎！

“你可以有架钢琴。”他绝望地说。

“我不弹钢琴。”

他放她走了。再继续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她实在是太讨厌他了，他一松手，她就迫不及待地跑进了俱乐部的花园。她在树丛中停下，摘下眼镜，擦了擦脸上的泪痕。哦，真是禽兽，真是禽兽！他把她的手腕弄得生疼。噢，他真是一个坏得难以形容的禽兽！她想到他在教堂时的那张脸，苍黄反光的皮肤上爬着着那块丑恶的胎记，她简直希望他去死。让她害怕的不是他做过的事。他就算做过成百上千桩恶事，她都会原谅他。但当她见过那个丢脸的、污秽的场面之后，见证过当时他魔鬼般丑陋的面容之后，她就再也无法原谅他了。说到底，还是那块胎记毁了他。

她婶婶要是听说她拒绝了弗洛里，肯定会非常愤怒。再想到那个对她动手动脚的叔叔，夹在他们俩之间，继续住在这里恐怕是不可能了。她或许最终还是要单身回国了。蟑螂！没关系。任何事情——单身，做苦工，任何事情——都好过那种选择。她永远，永远都不会委身一个颜面扫地的男人！还不如让她早点死了算了，早死早超生。如果说一小时前她还抱有一些唯利是图的想法，那现在她早已忘记了。她甚至已经不记得维罗尔抛弃她的事情了，也不记得只有嫁给弗洛里才能挽回她的面子了。她只知道，他已颜面扫地，辜负了作为一个男人的荣誉，她知道她讨厌他，就像她讨厌一个麻风病人或者一个疯子一样。本能比理性甚至自我利益更加深刻，她无法抗拒本能，就如同无法停止呼吸。

弗洛里转身走上山坡，他并没有奔跑，只是尽他所能地快步行走。他要做的事情必须得快。现在已经很晚了。可怜的弗劳到现在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它慢慢地跑近弗洛里的脚踝，自怜地抽泣着，责备他今天踢了它。当他走上花园小径时，一阵风吹过大芭蕉林，带来一片潮湿的气息，摇得残破的树叶嘎吱作响。又快要下雨了。郭斯拉已经摆好了晚餐，正在把那些扑进油灯里自取灭亡的甲虫弄走。显然，他并没有听闻教堂里的那一幕。

“老爷的晚餐已经准备好了。老爷现在要用餐吗？”

“不，还不用。把那盏灯给我。”

他拿起那盏灯走进卧室，关上了房门。陈腐的灰尘和香烟的味道扑面而来，他从油灯摇晃的白光之中看到那些发霉的书籍和墙上的壁虎。就这样，他又回来了，回到那个陈旧、见不得人的生活之中——历经这一切之后，他又回到了从前的地方。

难道就不能忍受了么！他曾忍受过。这里有许多缓和剂——书籍、花园、酒、工作、嫖妓、打猎、跟医生聊天。

不，他无法再忍受这一切。自从伊丽莎白来了之后，那些他曾经以为已然逝去的忍耐力量和希望的力量，全都死灰复燃。他曾经那种一半舒适一半倦怠的生活早已破碎。如果他现在再忍受这一切，未来要忍受的事只会更加糟糕。不久她就会嫁给别人。他想象着那样的情景——想象着他听说那则消息的时刻！——“你听说了吗，拉克斯廷家的那个女孩终于结婚了？可怜的老某某，预定了圣坛，上帝保佑他。”如此云云。然后又是一些闲谈——“噢，真的吗？什么时候啊？”——他会一脸

僵硬，装作毫不关心的样子。然后她的婚期临近，她的新婚之夜……啊，不要！肮脏，污秽。好好睁着你的眼睛看看。污秽。他从床底下拽出那个锡制的制服箱，拿出那把自动手枪，将一梭子弹滑入弹夹，上好了膛。

他的遗嘱里没有忘记郭斯拉，可弗劳还没有安置好。他将手枪放在桌上，走了出去。弗劳跟郭斯拉的小儿子巴辛正躲在厨房的背后玩耍，那是仆人们堆柴火渣的地方。小男孩的肚子在柴火渣的光芒中显得红红的，他轻轻地扇打着弗劳，而它则围着他跳来跳去，露出牙齿装作要咬他，他大声笑着，又有些害怕。

“弗劳！过来，弗劳！”

它听到他的呼唤，顺从地跑了过来，却在卧室门口突然停下来。它似乎也发现有什么事不对劲了。它后退了几步，担惊受怕地站在那里望着他，不愿意走进卧室。

“到这儿来！”

它摇了摇尾巴，但却没有移动。

“过来，弗劳！乖狗狗！过来！”

弗劳突然恐惧起来。它哀鸣着，尾巴垂了下来，害怕地向后退。“过来，真是被你气死了！”他大喊着，提着它的项圈把它扔进屋里，然后关上了门。他走向桌子去拿枪。

“快过来！照我说的做！”

它蹲下来哀求他的原谅。他听到后也非常难过。“过来，乖狗狗！亲爱的乖弗劳！主人不会伤害你的。过来！”它慢慢地爬向他的脚边，趴在地上，哀鸣着，低着头，好像是不敢看他。当它离他还有一码远的时候，他开枪了，子弹把它的头骨打得粉碎。

它碎裂的脑浆看起来就像是红色的天鹅绒。到时候他的样子也会是这样吗？那就打心脏吧，不打头了。他听到仆人们大叫着跑出宿舍，他们一定听到了枪声。他急忙扯开外套，将枪口压在自己的衬衫上。一只果冻般晶莹剔透的小壁虎正沿着桌边追踪一只白色飞蛾。弗洛里用大拇

指扣动了扳机。

郭斯拉闯进房间的那一瞬间，他只看到狗的尸体。随后他看到了老爷的脚，脚跟朝上，从床边伸出来。他大喊着让其他人把孩子们拦在屋外，所有人大叫着涌回门口。郭斯拉跪在弗洛里的尸体旁边，与此同时，巴佩穿过阳台跑了过来。

“是他开枪自杀了吗？”

“我想是的。把他翻过来，面朝上。哎呀，看啊！快跑去请那个印度医生！能跑多快跑多快！”

弗洛里的衬衣上有一个平整的洞，比铅笔穿过一张吸墨纸留下的洞大不了多少。很明显，他已经死了。由于其他仆人都拒绝触碰尸体，郭斯拉费了很大工夫才将他拖到床上。医生过来只花了二十分钟。他只稀里糊涂地听说弗洛里受伤了，于是骑着自行车在暴雨中飞驰上山。他将自行车扔在花坛里，急匆匆地穿过阳台进了屋。他上气不接下气，眼镜上全是水，什么都看不见。他摘下眼镜，凑近床边仔细地盯着。“怎么了，我的朋友？”他焦急地询问道，“您哪儿受伤了？”然后他又凑近了一点，看清了床上的情形，随即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

“啊，这是怎么了？他怎么了？”

医生跪了下来，扯开弗洛里的衬衣，将耳朵贴在他的胸口上。痛苦的表情爬上他的面庞，他紧紧地抓住死者的肩膀使劲地摇晃，好像依靠这样的暴力就能将他救活一样。一条手臂软绵绵地垂在床边。医生又抬起这只手，然后双手握住这只死人的手，突然泪如雨下。郭斯拉站在床尾，他棕色的脸上挂满了泪痕。医生站起来，无法自持了好一会儿，只能靠着床柱，背对着郭斯拉声泪俱下，嚎啕大哭。他肥大的肩膀不停地颤抖。不久，他平静了下来，再一次转过身。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听到了两声枪响。是他自己开的枪，这一点可以肯定。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怎么知道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一场意外？”

郭斯拉静静地指向弗劳的尸体，以此作为回答。医生想了一会儿，然后用他轻柔而熟练的双手将尸体用床单包裹起来，在头部和脚部打好结。弗洛里这一死，他的胎记也立刻褪色了，变成了一团模糊的灰色污点。

“马上把狗埋了。我会告诉麦格雷戈先生说，他是在清洁左轮手枪时发生了意外。一定要把狗埋了。你家老爷是我的朋友。他的墓碑上可不能写他是自杀身亡的。”

---

[1] 欧律狄刻（Eurydice），歌手俄耳甫斯之妻，新婚之夜被蟒蛇咬死，其夫以歌喉打动冥王，冥王准她返回阳世，但要求其夫在走出冥界前不得回头看她，不得与她说话，其夫未能遵守禁令，最后她仍被抓回阴间。

第二十五章

所幸的是，随军牧师要赶第二天晚上的火车，所以应该还没离开皎塔达，这样他就能正式地主持葬礼，甚至发表一篇关于逝者美德的简短演讲。每个英国人死的时候都是道德高尚的。正式的结论是“意外死亡”（维拉斯瓦米医生用尽全身的法医学解数，才证明了当时的情景是一场意外），而且这一结论被正式地刻在了墓碑上。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弗洛里真正的墓志铭是那句间或被人说起的话——因为英国人死在缅甸，往往会很快被遗忘——“弗洛里？哦，对，就是那个皮肤黑黑的伙计，脸上有道胎记。他1926年在皎塔达拔枪自杀了。人们都说是因为一个女孩儿。真是个蠢货。”除了伊丽莎白，或许没有人会对发生的一切感到特别诧异。在缅甸自杀的欧洲人不少，都不会引起太大的诧异。

弗洛里的死有几个后果。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后果就是，维拉斯瓦米医生被毁了，正如他自己预见的那样。作为白人的朋友，这份荣耀——之前曾经救过他——已经荡然无存。弗洛里和其他欧洲人的关系本来就不怎么好，这是事实，可他毕竟是个白人，与他结交带给了医生某种威望。他一死，医生被毁就是肯定的事了。吴波金等到了必要的时机，便再次出击，下手比以往更狠。还不到三个月，他就让皎塔达每个欧洲人都坚信医生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但吴波金却从来没有对他发起过公诉，他对此尤为谨慎。就连埃利斯也说不上来，医生到底犯了什么罪，让他成了个坏蛋，可大家都一致同意他就是个坏蛋。日积月累，对他的普遍怀疑浓缩成了一个缅甸词——“肖代”。人们都说，维拉斯瓦米是个挺聪明的小伙计——在土著当中算个相当不错的医生——可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肖代。肖代的大概意思就是靠不住，只要一个土著官员被认为是个肖代，他就完了。

有人心怀不轨地向上边一点头一眨眼，医生的职称就回到了助理医师，还被调到了曼德勒总医院。他现在还在那里，并很有可能继续待下去。曼德勒是个让人很不愉快的城市——尘土飞扬，热得让人难以忍受，据说那里有五大特产，全部都以“P”开头，也就是佛塔、贱民、猪、僧侣和妓女[1]。医院里的例行工作单调乏味。医生住在医院外边一间平房里，那是一个面包店，院子很小，围了一圈陨铁栅栏。晚上的时

候，他的私人诊所就会开门营业，以贴补他缩减的收入。他加入了一家印度的辩护律师经常光顾的二流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最大的荣耀便是有一位欧洲会员——一个名叫麦克杜格尔的电工，他来自格拉斯高，由于酗酒被伊洛瓦底舰队公司[2]解雇了，现在开了个汽车修理厂勉强度日。麦克杜格尔是个又呆又蠢的人，只对威士忌和磁发电机感兴趣。可医生始终不相信白人里也有傻瓜，每天晚上都尝试和麦克杜格尔进行他所谓的“文化人之间的交谈”，但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

依照弗洛里的遗嘱，郭斯拉继承了四百卢比，于是他和家人在集市开了个茶馆。但茶馆后来倒闭了，家里两个女人整天打打闹闹，倒闭也是早晚的事。郭斯拉和巴佩不得不回去继续当仆人。郭斯拉本来是个挺能干的仆人，他既能拉皮条，又能跟债主周旋；既能在主人喝醉的时候抬主人上床，又能在第二天早上准备好提神饮料，也就是著名的草原蚝[3]，这都是些实用的技艺。除此之外，他能缝，能补，能上子弹，喂马，熨衣，样样精通，还会用捣碎的树叶和染色的米粒把餐桌装饰出复杂好看的图案。他本来一个月能挣五十个卢比。但他和巴佩在服侍过弗洛里之后都变懒了，在谁家都干不了几天就被解雇了。有一年他们穷困潦倒，小巴辛染上了咳嗽病，最后在一个沉闷炎热的夜晚把自己咳死了。郭斯拉现在在给仰光的一个米商打下手，这个米商有个神经兮兮的老婆，整天唠唠叨叨个没完，巴佩也在同一家当送水工，每个月挣十六个卢比。玛拉美去了一家曼德勒的妓院。她容颜不再，嫖客们只给她四安那，有时还会踢她、打她。她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惋惜弗洛里活着的美好时光，那个时候她老找弗洛里要钱，却不懂把那些钱存起来。

吴波金实现了所有的梦想，只有一个例外。医生被贬黜之后，吴波金入选俱乐部就成为了必然，即使埃利斯强烈抗议，可他还是成功入选。到头来，其他欧洲人还很欣慰他们选了他，因为他是个说得过去的新成员。他并不常来，言行举止阿谀逢迎，酒量也好，桥牌更是一学就成了高手。几个月后，他就获得了升迁，从皎塔达调走了。退休前的一整年，他都在实际行使副行政长官的职权，单单这一年，他就收受了两万卢比的贿赂。退休后一个月，他被召唤到仰光接受总督的正式接见，印度政府授予了他荣誉勋章。

授勋的场面令人难忘。讲台上挂着旗帜和鲜花，总督穿着礼服大衣坐在宝座上，后边站了一群参谋和秘书。整个大厅到处都站着高大、留着络腮胡的传令骑兵，这些都是总督的卫队，他们手持燕尾旗长矛，就像闪闪发光的蜡像。大厅外边，乐队会每隔一段时间奏响军乐。走廊里

的缅甸女郎穿着白色的因基，戴着粉色的围巾，显得非常欢乐。在大厅里，一百多个男人正在等待授勋，有身着光彩夺目的曼德勒帕索的缅甸官员，有头戴金丝织就的头巾的印度人，有盛装礼服、佩剑叮当的英国军官，还有把白发盘在脑后、银把短刀挂在肩膀上的村长。秘书用洪亮而清晰的声音宣读获奖名单，奖项包括印度帝国勋章和浮雕在银框里的荣誉证书，等等。不久，就轮到吴波金了，秘书从名册上念道：

“授予已退休的副行政长官助理吴波金，以表彰其长期而忠诚的工作，尤其是在粉碎皎塔达地区最为危险的叛乱中的及时援助”如此等等。

随后，两个特意安排的亲信把吴波金笔直地扶了起来，他大腹便便、摇摇摆摆地走上台，鞠了一躬，弯腰弯到肚子实在下不去的地步，然后正式接受了勋章，并得到了祝贺，而玛庆和其他的拥护者则在走廊疯狂地鼓掌、挥舞围巾。

凡人能做的事，吴波金都已做尽。现在是为来世做准备的时候了。简言之，就是该修佛塔了。但不幸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失策了。接受总督接见仅仅三天之后，吴波金的赎罪塔一块砖都还没来得及砌好，他就中风了，一句话都没说就死了。任何盔甲都抵御不了命运。[4]这场灾难让玛庆伤心欲绝。即便她自己修建再多的佛塔，也对吴波金无济于事。只有亲力亲为，才能为来世积攒功德。一想到吴波金现在会在哪里游荡——天知道是哪一层地狱，里面肯定全是烈火和黑暗、毒蛇和魔鬼——她就痛苦不堪。即使他逃过了最坏的情况，他的另一个担心也会成为现实，他会转世投胎成一只老鼠或者青蛙。或许此时此刻，一条蛇正在吞噬他呢。

至于伊丽莎白，结局比她预想的要好。弗洛里死后，拉克斯廷夫人立刻撕下所有的伪装，开诚布公地说在这个糟糕的地方已经没有男人了，唯一的希望就是离开此地，然后在仰光或者眉谬[5]待上几个月。但她不能让伊丽莎白一个人去仰光或者眉谬，因为她一去就基本等于给患上震颤性谵妄症的拉克斯廷先生判了死刑。几个月过去了，雨季到了高潮，就在伊丽莎白下定决心要身无分文、单身待嫁地回国的时候，麦格雷戈先生向她求婚了。他心里其实早有此意，只是要等到弗洛里的死平息一段时间而已。

伊丽莎白欣然接受了他。他或许确实很老，可副行政长官的职务不是谁都能小看的。他自然远比弗洛里更配得上伊丽莎白。他们两情相

悦。麦格雷戈先生一直都很宽厚仁慈，结婚之后，他变得更加和蔼可亲了。他的声音不像以前那么低沉了，他也放弃了晨练。伊丽莎白也变得成熟起来，而且速度惊人，她的举止一直有些强硬，现在更加明显了。即使她不会说缅甸语，她的仆人们都生活在对她的恐惧之中。她谙熟文职人员薪俸表，时常举办精致可爱的晚宴，还知道如何让下属官员的妻子们各就各位。简言之，她完全成功地胜任了上天从一开始就为她设计好的位置，那就是一位萨布夫人。

---

[1] 这五个词在英文中均以“P”字母开头，分别是pagodas，pariahs，pigs，priests，prostitutes。

[2] 伊洛瓦底舰队公司（Irrawaddy Flotilla Company），苏格兰人在缅甸开办的客运及货运渡轮公司，1865年建立，20世纪20年代发展到巅峰，20世纪40年代末倒闭。

[3] 草原蚝（prairie oyster），一种由生鸡蛋、醋或辣酱油、盐和胡椒组成的饮料，可以治疗宿醉。

[4] 引用自英国戏剧家、诗人詹姆斯·雪利（James Shirley）的诗歌《我们鲜血和国家的荣耀》（The glories of our blood and state），张旸译。

[5] 眉谬（Maymyo），缅甸中部城市，在曼德勒以东50公里。

译后记

乔治·奥威尔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算高，知道奥威尔的读者大多也是通过《动物庄园》和《1984》两部旷世奇作。不少人问我：“奥威尔是谁？”我想了想回答说：“就相当于英国的鲁迅。”

奥威尔和鲁迅诚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擅长写杂文和小说，笔触辛辣，针砭时弊，说到人性总是一针见血；奥威尔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后来当了记者，而鲁迅弃医从文；奥威尔来自宗主国英国，在殖民地缅甸当警察，而鲁迅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日本求学；都是英年早逝，甚至都是死于肺病；英国设有奥威尔奖，中国有鲁迅文学奖……我把乔治·奥威尔比作“英国的鲁迅”，二位先生如若地下有知，应该也不会怪罪晚生吧。

在中国，鲁迅可谓家喻户晓，而奥威尔的读者却并不多，国内甚至连一套完整的中文版“奥威尔作品集”都没有。今年是乔治·奥威尔诞辰110周年，我很荣幸能与郝爽女士一同为“译言古登堡计划”翻译《缅甸岁月》这部作品，把奥威尔的第一部小说介绍给中国读者，让更多中国读者了解并喜爱这位“英国的鲁迅”。

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缅甸。小说采用双线叙事，一条线是白人弗洛里的感情生活，另一条线是土著吴波金和维拉斯瓦米医生的权力斗争。作者巧妙地安排两条线索在交替发展的过程中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最后以弗洛里的悲剧和维拉斯瓦米医生的失败告终。

有批评家把《缅甸岁月》评价为“仅次于福斯特《印度之行》和吉卜林《基姆》的英属印度殖民地文学作品”，但我认为这种评价有失偏颇。殖民统治、种族歧视和身份认同是《缅甸岁月》的三大主题。小说在对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表现上或许确实不如《印度之行》或《基姆》深刻，但在身份认同方面，《缅甸岁月》塑造出了最为成功的角色——主人公弗洛里。奥威尔刻画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弗洛里，他在身份认同危机中苦苦挣扎，一边是对东方文化的痴迷和无可自拔，另一边却放不下自己作为白人萨布、统治阶级的社会地位。他讨厌欧洲人无聊的闲谈，却乐意与一个坚持“白人至上”的土著医生结交；他养了个缅甸情

人，却爱上了年轻的英国女士；他反感英国殖民掠夺，却在缅甸人起义的时候率领警察镇压；他如此无畏不羁，却总是被脸上的那块胎记所累，在他每每鼓起勇气准备表白的时候，让他胆怯、自卑、欲说还休……“内心深处明知道自己有可能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却还是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这丢脸、可怕的徒劳中，荒废生命、腐败堕落，这些或许都是自己的过错。”

或许《缅甸岁月》就不应当归到“殖民地文学”这个类型当中，它或许只是一部爱情悲剧，碰巧发生在英属印度殖民地而已，就连奥威尔本人也在《我为何写作》一文中指出“我想写的，是一种有着悲伤结局的长篇自然主义小说”。

说到悲伤结局，读者看完《缅甸岁月》，不免会对弗洛里的悲剧扼腕叹息。假如当时没地震，弗洛里和伊丽莎白不就在一起了吗？假如玛拉美在教堂门口被拦住了，弗洛里不就过上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了吗？假如弗洛里没有缠着伊丽莎白向她解释，她难道不会随着时间推移原谅他吗？他为什么要自杀呢？他为什么一定要以悲剧收场呢？

我一直都对“悲剧的必然性”持怀疑态度。我从来不认为弗洛里性格里的懦弱导致了他的“必然悲剧”，我也从来不认为他的悲剧有“社会的必然性”。按照鲁迅的说法，“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自然主义的悲剧想必就是任由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自我毁灭，让读者在一边看吧。这最后急转直下的悲剧大结局，就像奥威尔在书中解释的那样，“说到底，还是那块胎记毁了他”，没有任何必然性，只是他选择了自我毁灭而已。

再说《缅甸岁月》的翻译过程。英汉翻译本身就不简单，把英国人在缅甸的故事翻译给中国人看，就更是难上加难。郝爽女士和我尽量音译缅甸语以保留异域风情，尽量用中文再现奥威尔大师级的犀利而幽默的文风，在四个多月的翻译过程中互相鼓励，互相批评，合作得非常愉快。

感谢我的同学刘帆先生和周翔宇先生在翻译中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还要感谢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我们能够在海量的线上资料中轻易地搜索和浏览，这都是前辈翻译家难以想象的。最后，我希望将此译本献给郝爽女士与我共同的恩师——外交学院范守义教授。

张旸

2015年5月于外交学院

奥威尔作品集

奥威尔信件集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李莉 廖晓玮 余扬 黄颖 译

LETTERS FROM GEORGE ORWELL

奥威尔首先是先知，其次才是圣徒。
——止庵

他能够在目睹最糟境况的同时为最美好的东西而战。
——Granville Hicks

拥有自己的孩子，
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而我一直也这样梦想着。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自由的保障，良知的坚守

自由的保障，良知的坚守

拥有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而我一直也这样梦想着。

奥威尔信件集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李莉 廖晓玮 余扬 黄颖 译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威尔信件集/（英）奥威尔 著；李莉等 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7

（奥威尔作品集）

ISBN 978-7-5680-1141-9

Ⅰ.①奥… Ⅱ.①奥… ②李… Ⅲ.①奥威尔，G.（1903～1950）—书信集 Ⅳ.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185868号

奥威尔信件集 [英]乔治·奥威尔 著 李莉等 译

策划编辑：刘晚成

责任编辑：刘晚成

特约编辑：徐心 王瑜玲 余扬

封面设计：喃风

责任校对：张琳

责任监印：张贵君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5

印　　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5.25

字　　数：70千字

版　　次：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26.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序

著名学者止庵说，只能用两个词来形容乔治·奥威尔：一是“圣徒”，指这个人；一是“先知”，因为他写出了《1984》和《动物庄园》。

我们熟悉乔治·奥威尔，大多是因为《1984》和《动物庄园》。而这两部闻名天下的作品，也让人误会奥威尔是专职“政治讽喻小说家”和“反乌托邦者”。

但其实这并不完全对。通过本书，你可以对这个有着敏锐洞察力的“走基层”的新闻工作者、正直有勇气的知识分子，有更多的解读。

“多一个人读乔治·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奥威尔信件集》提供了诸多不加修饰的细节，还原奥威尔的感情世界和心路历程，让你窥见这个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的作家的写作动机里埋藏着怎样的秘密。

至少，你可以窥见这些细节：

一个左派知识分子的“偶像”，生前不仅不是万人迷，甚至对友人自嘲“从来没有哪位年轻女士对我说‘你真迷人’”。

一个跌进了生活的茅坑还能爬起来写就伟大著作的作家，却是一个面对雪茄“心都要融化了”的雪茄重度痴迷者（甚至因此而患上肺病，1950年因病去世），还是一个细腻温情的丈夫。

一个有着良知和热忱的作家、新闻工作者，却在讲真话的道路上屡屡碰壁，连T.S.艾略特都拒绝出版他的《动物庄园》，而这本著作最终被《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作者本人也被称为“天才预言家”。

- 在寄宿学校时寄给母亲的三封信
- 在复活节时寄给母亲的信和图画
- 在寄宿学校时寄给母亲的信和图画
- 我当业余流浪汉时的第一次历险——致郎西曼（1920年8月）
- 致丹尼斯·科林斯
- 致丹尼斯·科林斯（1931年8月27日）
- 在肯特郡采摘啤酒花时寄给丹尼斯·科林斯的信（1931年9月4日）
- 在阿尔库维耶雷时寄给詹姆斯·汉利
- 艾琳·布莱尔致伦纳德·穆尔
- 艾琳·布莱尔在巴塞罗那时寄给母亲的信
- 在蒙弗洛里特医院时寄给艾琳·布莱尔的信（1937年4月）
- 艾琳·布莱尔在巴塞罗那时寄给伦纳德·穆尔的信（1937年4月12日）
- 致维克多·戈兰茨（1937年5月9日）
- 致雷纳·赫彭斯托尔
- 致雷纳·赫彭斯托尔（1940年4月16日）
- 武装人民 ——致《岁月》
- 致约翰·莱曼
- 致詹姆斯·拉夫林
- 致神父约沃思·琼斯（1941年4月8日）
- 致多萝西·普劳曼（1941年6月）
- 我们正与敌人同流合污
- 致R.R.德塞（1943年3月3日）
- 致伦纳德·穆尔（1943年12月6日）
- 致菲利普·拉夫
-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1月9日）
- 致格列布·斯特鲁夫
-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3月19日）
- 致维克多·戈兰茨（1944年3月19日）
-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3月25日）
-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4月5日）
-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4月15日）
- 致菲利普·拉夫（1944年5月1日）
-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5月9日）
-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6月8日）
-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6月24日）
- T.S.艾略特关于《动物庄园》的退稿信（1944年7月13日）

-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8月29日）
- 关于P.G.伍德豪斯
- 致索尼娅·布朗内尔
- 致弗雷德里克·沃伯格（1945年10月22日）
- 致伦纳德·穆尔（1948年10月22日）
- 致弗雷德里克·沃伯格关于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1949年3月30日）
- 致朱利安·西蒙斯
- 致大卫·阿斯特
- 致鲁斯·费希尔（1949年7月15日）
- 致伦纳德·穆尔（1949年7月24日）
- 致大卫·阿斯特（1949年7月18日）
- 致托斯科·法伊弗尔
- 致伦纳德·穆尔（1949年8月12日）
- 致弗雷德里克·沃伯格（1949年8月22日）
- 致弗雷德里克·沃伯格（1949年8月24日）
- 关于文学评论家德斯蒙德·麦卡锡寄给奥威尔的一封信（1949年12月29日）

在寄宿学校时寄给母亲的三封信[1]（1911年）

第一封

我亲爱的妈妈：

希望你最近过得不错。我算术得了第一名，而且拉丁语也有进步。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看你的信，不过我已经读了玛姬[2]的信。多格[3]怎么样了？我们前几天做了个神奇的灯笼。

今天是柯克帕特里克[4]的生日，他八岁了。上次我们一起踢球的时候，我还进了7个球呢。

E.A.布莱尔[5]

附言：忘记告诉你了，我收到了一封玛姬的信，正打算写回信。告诉艾薇儿[6]我爱她。

第二封

我亲爱的妈妈：

希望你最近过得不错。我们昨天踢了三场球赛，而且都赢得太轻松了。第一场7：1，第二场7：1，最后一场6：0。对手是格兰杰小学。我会给你寄一张明信片的，告诉你比赛是什么时候踢的，哪些是首发的11个人。

E.A.布莱尔

第三封

圣塞普里安

伊斯特本

我亲爱的妈妈：

希望你最近过得开心。昨天是威尔克夫人[7]的生日，我们过得超级开心。下午茶后我们就满屋子玩儿，到处做游戏。而且大家都去了比奇角[8]散步。

我算术得了第3名。

今天真是太无聊了，而且看起来天气也不会暖和些了。谢谢你给我写信。

马上就要期末了，还有18天。这周六晚上我们要举行一个舞会，我还要在会上朗诵一首小诗，其他一些男孩子们还要唱歌。

跟爸爸和艾薇儿说我爱他们。多格还好吗？我们昨天看了三场牛津和剑桥的比赛，第一场和第三场都是剑桥赢了。霍尔上校[9]给了我一些邮票，我很开心。他去年就说要给我了，不过可能是他忘记了。今天整天都在下雨，又湿又冷。

听说那些难闻的小白鼠们又回来了，我真不喜欢这群讨厌的小怪物。

希望现在它们不会像之前那只一样难闻，这样的话我才有可能喜欢它们。

你可爱的儿子

E.A.布莱尔

---

[1] 奥威尔在英国萨塞克斯郡伊斯特本市的圣塞普里安预备学校给母亲写下这些信件。

[2] 玛姬（Marjorie Frances），奥威尔的姐姐，出生于1898年4月21日。

[3] 多格（Togo），奥威尔家的一只硬毛小猎狗，后来跑丢了。

[4] 柯克帕特里克（Colin Kirkpatrick），奥威尔在圣塞普里安预备学校的伙伴，后来成了一名银行家和商人，在罗德西亚定居。

[5] E.A.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奥威尔的原名。

[6] 艾薇儿（Avril Nora），奥威尔的小妹妹，出生于1908年4月6日。

[7] 威尔克夫人（Mrs.Vaughan Wilke），校长的妻子，也是圣塞普里安预备学校的所有者。威尔克夫人还出现在奥威尔的散文《这，这就是快乐》中。

[8] 比奇角（Beachy Head），位于英格兰东南沿岸，是著名的“自杀胜地”，也是1690年法国海军战胜英荷军队的战场。

[9] 霍尔上校（Colonel Hall），1912年末到1915年下半年，奥威尔一家住在英国的希普莱克，霍尔上校是他们当时的邻居。

在复活节时寄给母亲的信和图画[1]（1912年2月25日）

我亲爱的妈妈：

谢谢你的来信，可惜信我还没来得及看就被人撕掉了。要是你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告诉我，就写在下封信里吧，希望下次不会被撕掉。周三的那节讲月亮的课非常有意思，我们过得很开心。而且席勒[2]先生还用一个涂了些糖的足球，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月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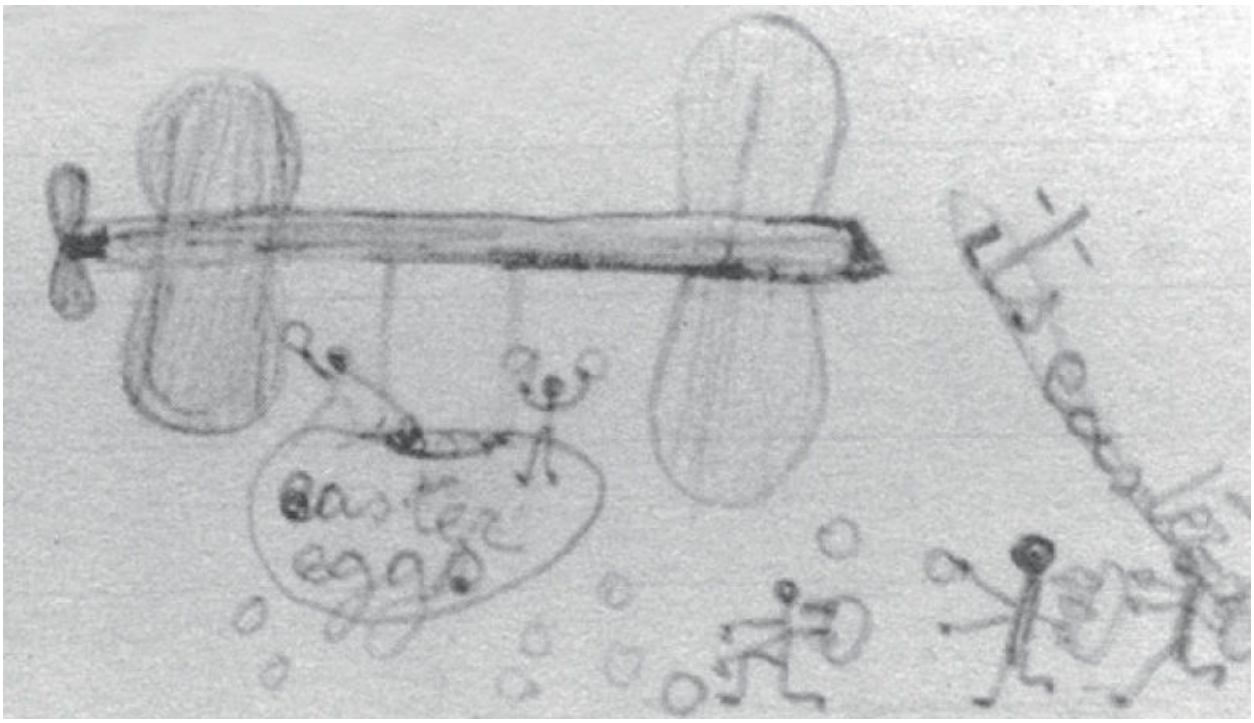
好像我之前在家里存了些普通邮票，如果有就把它们寄给我。这儿有个男孩儿叫莫伦斯三世，他想从英国寄信，却没有邮票，所以很需要几张。

噢，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我们还上了节超精彩的课，讲各种各样的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看了钢铁、折叠小刀和其他类似东西的制造过程，还看了肥皂是怎么做的。还有些别的东西，好多呢！但我没时间一一跟你讲了。

我法语和英语得了第五名，拉丁语得了第一，算术是第二名。

给你很多的爱

E.A.布莱尔



[1] 这封信同样写于圣塞普里安预备学校。少年奥威尔在写这几封信时，出现了不少拼写错误。

[2] 席勒（Robert L.Sillar），即奥威尔的散文《这，这就是快乐》中的“布朗先生”，教地理和绘画，深受学生爱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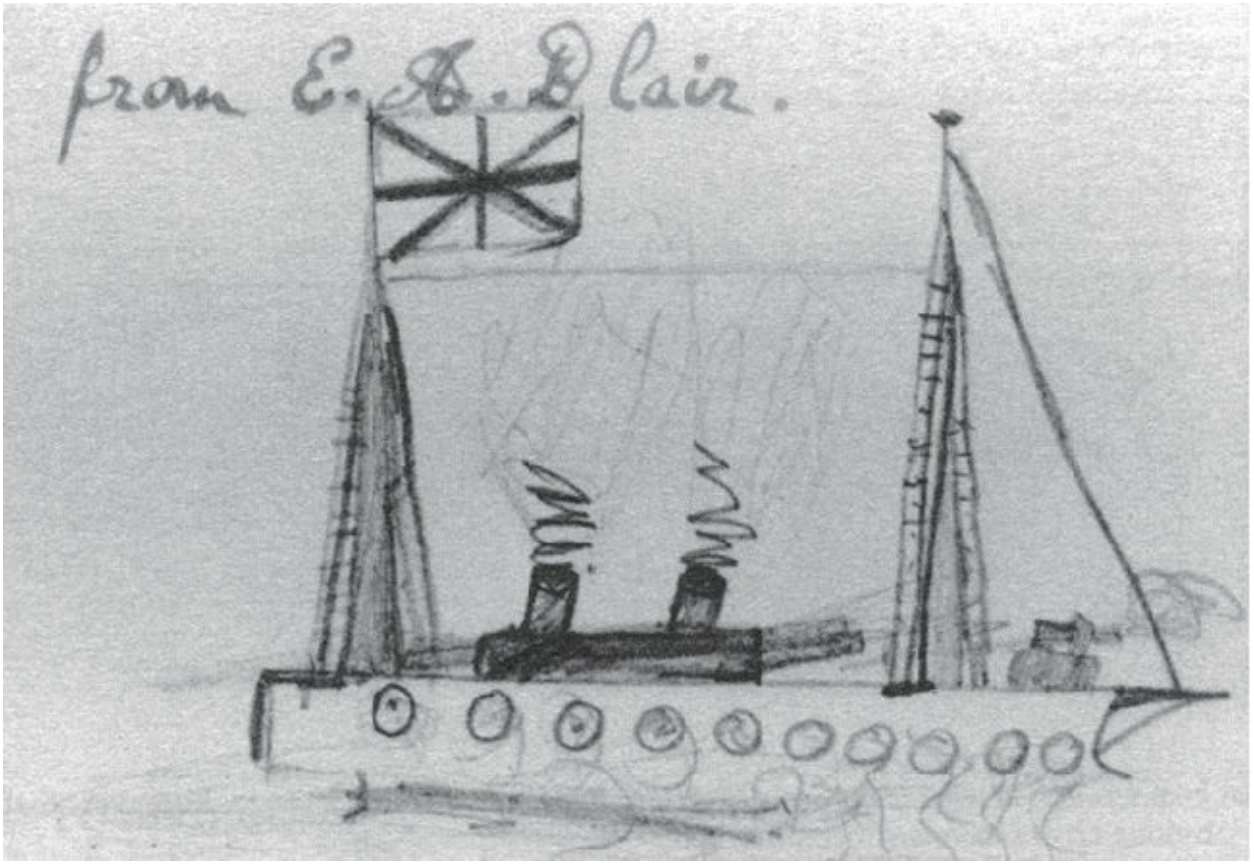
在寄宿学校时寄给母亲的信和图画[1]（1912年3月17日）

我亲爱的妈妈：

谢谢你给我写信，请告诉我小猪是什么颜色的。我们4月3号就能回来了，然后5月1号再回学校。

你什么时候才能尽快有一只你自己的黑色小猫呢？

我们这儿又有很多人来踢球了，周四的时候有6个，有一个是我们曾见过的踢得最好的，不过两边都没有进球。



你在泰晤士河上见过有人为了去比赛而练习划船吗？我希望大家都

好，动物们好吗？我拉丁语和算术得了第一名，英语和法语是第三名。

替我跟家人说我爱他们。这有一只好大好大的船，这是它快要沉了的样子。你看，它的桅杆都竖起来了。

给大家很多的爱

E.A.布莱尔

---

[1] 这封信同样写于圣塞普里安预备学校，依然出现了不少拼写错误。

我当业余流浪汉时的第一次历险——致郎西曼（1920年8月）

我亲爱的郎西曼[1]：

我有点空闲时间，我感觉一定要给你说说我第一次当业余流浪汉的历险。像大多数流浪汉一样，我也是爱好所致。当我到达德文郡一个又破又小的地方——锡顿枢纽站时，迈纳斯[2]因为转车也来到这儿。他来我所在的车厢说，那个一直缠着要和我坐同一个车厢包间的厚脸皮城里人要求见我。由于身在一堆陌生人中，我只好起身出去找这个人，但这时火车启动了。需要两只手才能够进入移动的火车，而我一手拿旅行袋和皮带等，只能用一只手。简单地说，就是我被落下了。我发了一封电报，说我可能会迟到（这辆火车隔天到）。大概两个半小时后，我在北路的普利茅斯等到了一辆火车，可是当天晚上却没有到卢港的车次。那时，天色已很晚，邮局关门了，我没办法打电话。我检查了一下我的财政状况，我的钱只够付剩下的车费，我总共有大约7.5先令[3]。所以，我要么饿着肚子去每晚6先令的基督教青年会睡一晚；要么吃点东西，但没有睡觉的地方。我选择了后者，寄存了旅行袋后，我用6先令买了12个小圆面包。九点半时，我偷偷地溜进了某个农户的田间——几块地夹杂在成排的贫民房舍中间。在那样的光线下，我看起来像个四处巡逻的士兵——一路上，还有人问我有没有退役。最后，我在菜园附近的一块地里的角落歇下来。我突然记起，经常有人在别人的地里睡两个星期，还“没有任何明显的生活来源”——尤其是我这种只要做什么大动作，隔壁的狗就汪汪乱叫的情况。这个角落里有一棵大树可供栖息，有灌木丛可以藏匿，但真的寒冷难耐；我没有盖的，帽子就是枕头，“用战袍（卷起的斗篷）裹住自己”躺在地上。我打了个盹，一直发抖到凌晨一点左右，然后调整了我的绑腿，之后就长睡了一觉，结果错过了4:20的火车，晚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只能继续等7:45的那趟。醒来时牙齿还在咯噔打战。到了卢港之后，我还被迫在烈日下走了4英里[4]；我对这次历险十分自豪，但绝对不会“重蹈覆辙”了。

挚友

[1] 这是一封奥威尔从康沃尔郡波尔佩罗寄给斯蒂文·郎西曼（奥威尔在伊顿公学的同班同学）的信。

[2] 即罗杰·迈纳斯，他是奥威尔在伊顿公学创办的《选举时代》校报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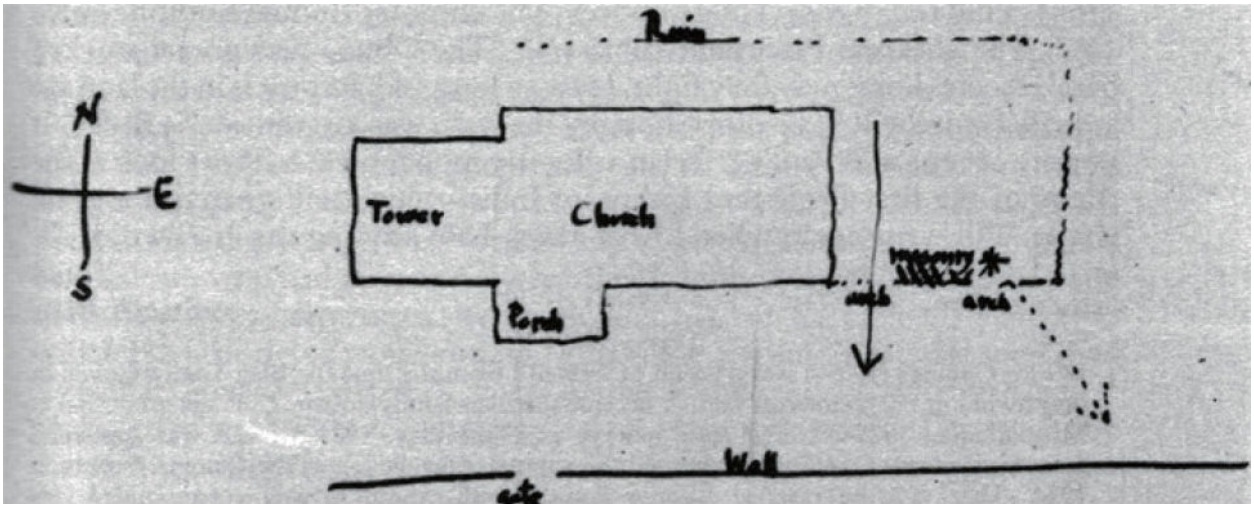
[3] 先令，英国的旧辅币单位、奥地利的旧货币单位和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的货币单位。旧制1先令＝12便士，新制1先令＝5便士。

[4] 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等于5280英尺，合1.6公里。

致丹尼斯·科林斯[1]（1931年8月16日）

亲爱的丹尼斯：

我说过会给你写信。除了下层阶级，我都没有特别感兴趣想报道的，我实际是写信告诉你我在沃威克教堂见到的一个鬼魂。在我忘记细节之前，我得先在纸上画下来。看下方的示意图：



（乔治·奥威尔画的沃威克教堂的鬼魂）

上方就是我所记得的沃威克教堂。1931年7月27日，大概下午5点20分时，我正坐在标记着“  ”号的位置，顺着虚线箭头的方向望去。我无意间朝我肩膀上方瞥了一眼，看到一个身影沿着另一条箭头线走过，消失在石屋后，猜想是进了教堂院子。我当时没有直接盯着它看，所以没能看清楚，只觉得是个男人的身形，矮小、驼背，身穿淡褐色的衣服；应该说是一个工人。在我印象中，他路过时朝我这里看了一眼，但是，我一点也记不得他有什么特征。他路过时，我什么都没想。但几秒钟以后，我突然意识到，刚才那人走过时没有一点声响。于是，我尾随他进入教堂院子，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沿路正常范围内都没有人——这距离我看到影子时大概只有20秒钟；不管怎样，我在那条路上只看到两

个人，一个都不像刚才的身影。我往教堂里望去，里面只有一个身穿黑衣的牧师和一个工人，我记得那个工人一直在锯木头。而且，相比刚才的身影，他太高了一点。所以，这个身影就这样消失了。或许是一场幻觉。

我从月初就一直在小镇上。我已经计划好去采啤酒花，但是得等到九月初才开始。同时，我的工作也很繁忙。最近遇到了一家新报纸的一位编辑，这份报纸计划于10月出版，我希望能从他们那谋些事来做——虽不足以维持生计，但至少对我的生活有所帮助。我最近一直在对流浪汉做一些调查。之前认识的三个流浪汉朋友，一个据说被车碾死了；另一个开始酗酒，然后消失了；最后一个正在汪兹沃思服刑。今天碰到一个人，他六周前还是一名金匠，但因为右手食指受到毒物腐蚀，没办法，只能切除上关节的一部分；这也意味着他以后要在大街上乞讨为生。小小的事故便摧毁了一个用双手努力工作的人的生活，实在是太可怕了！说起双手，他们说，连续摘几个星期的啤酒花就能让你的手残废——不过，等我亲自做了之后再描述给你听。

你有没有试过往圣经公会某个商店的窗户里看一眼？我今天就这样做了，看到巨大的墙面上写着标语“最便宜的罗马天主教圣经，5先令6便士。最便宜的新教圣经，1先令”，以及“杜埃版本缺货”，等等。我说，愿他们长久奋战；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免受罗马天主教的毒害——顺便提一下，这家商店刚好在圣保罗教堂外面。要是你什么时候在圣保罗教堂附近，又感觉心情阴郁的话，可以走进这家商店，看看印度第一位新教主教的雕塑，定能让你哈哈大笑。等我有消息再给你写信。我现在把信寄去绍斯沃尔德。

挚友

埃里克·A.布莱尔

---

[1] 丹尼斯·科林斯（1905—？），旅行家兼收藏家，奥威尔一生的朋友。

致丹尼斯·科林斯（**1931**年**8**月**27**日）

亲爱的丹尼斯：

请原谅我用铅笔写信，字迹也很潦草，因为我正在一间旅社[1]里写这封信。这间索斯沃克的旅社睡一晚7便士——可以说，看着也值这个价；我想这是伦敦唯一一家这么便宜的旅社。我们明早要动身去采啤酒花：坐2便士的有轨电车到布罗姆利，剩余路程徒步前行。

这两天在特拉法尔格广场上露营很有意思。每年这个时候，这里大概有两百多流动人口。你可以舒舒服服地背靠北墙，全天都有茶喝，因为附近一家咖啡馆提供免费开水，或者花1便士买一满壶水（顺便说一下，这里的壶叫“桶”）。我昨天一整天都在那儿，本来打算在圣马丁教堂过夜，但是，因为要排一个小时的队才能有好位子，所以我们决定留在广场。记住我的忠告：永远都不要在特拉法尔格广场上睡觉。午夜之前，我们还勉强觉得舒适，除了一件事——每隔5至10分钟，警察就会过来，叫醒睡着的人，还让坐在地上的人站起来。每隔10分钟，便会听到有人说，“兄弟，留神，‘条子’（警察）来了，收起你的床快走”，等等。然后，警察说“喂喂，起来。要坐就坐凳子上”，诸如此类的话。两百多个人只有四十条凳子，不过我们也休息了一会，因为警察一走我们又开始睡觉。过了午夜，空气中的寒冷变得刺骨。也许有十来个人睡着了，其他人在街上慢慢溜达，偶尔坐下来歇息——整整四个小时都这样。凌晨四点，有人扯了一大堆报纸广告，拿来当毯子用。“兄弟，给你，缩在这破‘羽绒被’下吧。我们躺在这些白色法袍下真他妈像牧师！之前我把《首相戏剧性的诉求》围在我脖子上。这应该可以让你暖和一点，是吧？”我们把自己裹进一个大的报纸包裹里，相对暖和一些，但是并没有暖和到可以睡着的程度（除了警察的干扰之外）。我怀疑，两百多个人里有没有超过十个或二十个人夜里真正睡着了一会儿。早上5点钟，我们都去了圣马丁大街上的斯图尔特咖啡店。据了解，你可以花2便士买一杯茶，从5点到9点一直坐那儿；或者可以更便宜些，经常会有两三个人总共才有2便士，他们合起来买一杯茶一起喝。早上7点之前，你可以把头趴在桌子上睡觉，之后，店主会叫醒你。这是特拉法尔格广场“睡觉者”的普遍规律。和我在一起的两个家伙连续7周都这样，有的人全年都这样。他们利用清晨的打盹来弥补无眠的夜晚。特拉法尔

格广场上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规矩非常奇怪，作为人类学家的你一定很感兴趣。从早上到中午，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甚至在喷泉里刮胡子），除非你睡着了又被警察叫醒。中午到晚上9点，你可以坐在凳子上或者雕像的底座上，但你要是坐地上，就得让你走开。9点以后，就不可以坐在雕像的底座上。晚上9点到午夜之间，警察每隔5分钟便会叫醒睡着的人；过了午夜，则变为半小时一次。所有这些都没有明确的原因。

昨晚大概8点的时候，一个女人过来痛声哭嚎。她好像是个妓女，有人和她发生了关系后没付钱就溜了，本该是6便士一次。看来，广场上两百多人中的十几个女人，一半都是妓女；但是，她们是为失业者服务的妓女，通常挣的都很少，所以只能在广场上过夜。6便士是平常的价格，然而，她们在这种刺骨寒冷的几小时里做这种事，为的只是一支烟。这些妓女和那些贫困潦倒的妇女和睦相处。但是，今早在斯图尔特咖啡店里，一个在科文特加登过夜的老太婆咒骂两个妓女。这两个赚够了钱，在床上睡了几个小时，还吃了一顿很好的早餐。她们每次再要一杯茶时，老太婆都会大吼，“又要被人上一次！这是你们为了一个硬币，就让他妈的老黑上你们一次换来的。”等等这样的话。

今天和昨天过得差不多，由于我们还要等待长长的一天，于是今晚我决定去弄一张床。我的同伴已经去了圣马丁教堂，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在一顿有肉的早餐上。这是一个相当肮脏的地下室，像地狱一样闷热，空气中混杂着尿、汗和奶酪的味道。

有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应该是什么劳工，但看上去有肺病。他在火苗前不断地高声吟诵着诗歌。很明显，他真的很享受。你应该听听他念的诗：

还从未有过杜鹃迎春，

声声啼得如此震动灵魂，

在遥远的赫布利底群岛

打破过大海的寂寥。[2]

他描述自己“因顾虑而像个病夫”[3]。我应该喜欢他朗诵“啊！圣洁的希望！高远的谦逊。”[4]我还碰到其他一些奇怪的人，等我有时间再

写给你看，还有伦敦同性恋的普遍存在以及逃票者。这次我听到的歌曲是《哈利路亚，我是个乞丐》，我想应该是美国人写的。还有一首这样的歌：

敲啊，敲啊，敲啊敲，

我是这行的好能手，

这儿敲一点，那儿敲一点，

我四处在敲打。

敲打=乞讨。或许是一首歌舞杂耍的老歌。

希望这封信不要显得太混乱，太难辨认。等我有了更多消息，并且有一个更适合写作的地方时再给你写信。如果你两周都没有收到我的信件，那很可能我已经因为乞讨而被捕了，因为和我在一起的同伴都是相当老练的“乞讨人”，和小偷小摸的人是半斤八两。

挚友

埃里克·A.布莱尔

---

[1] 即索斯沃克桥路的旅社。

[2] 选自威廉·华兹华斯的诗歌《孤独的割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飞白译本。

[3] 原句应该是“And thus the native hue of resolution is sicklied o’er with the pale cast of thought / And enterprises of great pith and moment”，选自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哈姆雷特的独白。朱生豪的译本中这一整句的译文是“所以，（理智）能使我们成为懦夫，而（顾虑）能使我们本来辉煌之心志变得黯然无光，像个病夫。”

[4] 出自英国诗人亨利·沃恩的诗歌Friends Departed。

在肯特郡采摘啤酒花时寄给丹尼斯·科林斯的信（1931年9月4日）

亲爱的丹尼斯：

我希望这种差事离我而去后不要去找你，因为我们在骇人的雪海之中四处晃荡，没法工作，也没有工作，还得想办法用潮湿的木头生火。第一次做完一整天的工作后，我就一直在这里。这次经历真让我失魂落魄。我们四个人每人身上带着4先令出发，到第三天，我们才赚了1先令，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是怎么生活的。第一天，我们一直走到布罗姆利，然后在田间扎营，之后继续爬艾德山。其中两个人去了贫民窟的临时收容所，我和同伴扎营在树林里。第二天，我们穿越赛文欧克斯到达席尔，为了找份工作，从一个农场走到另一个农场，大概走了10英里。最后，我们在一所没有完工的房屋中睡觉，然后继续前往西莫灵。因为下着大雨，我们在收容所睡了一宿。第二天，我们下山来到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们一路上的食物大都是靠乞讨得来的，除了香烟，也不缺什么。不过，户外夜宿的寒冷和难受要比你想象的还糟。我把这些都记在日记里，稍后再进行补充，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寄一份给你。

和我一起的同伴挺有意思。他26岁，在少管所待了三年，去了军队两年，进了三次监狱，结了婚又丧偶。他看起来就是个典型的小偷，也确实是个小偷，但是真的很招人喜爱。

至于这次的采摘啤酒花，完全是个骗局。只是因为有很多什么都愿意做的临时工，才得以继续。东伦敦人相当喜欢到乡村旅行。这里的工钱是6蒲式耳[1]啤酒花给1先令。工作时间9到10个小时，一个非常熟练的采花工在这么长时间里可以摘20蒲式耳，也就是3先令4便士。我累得半死才坚持工作了一整天，也是唯一的一整天，却只摘了10蒲式耳，希望之后能争取每天摘15蒲式耳。实际上，有些农场的工钱是8蒲式耳1先令。最近通过的一项法令要求农场主给他们的采花工提供适宜的住所，这就让人猜想他们以前究竟住的是什么房子。我们这儿，四个人住在一个12英尺宽的锡制小屋，窗户上没装玻璃， 四面都能进雨吹风，里面

只给了一大堆干草。我们一晚上都在瑟瑟发抖，直到早上5:45起床，生火，沏茶，急匆匆地赶去地里，一直摘到12:30，然后有半小时吃饭休息时间。之后，继续采摘，直到下午5点。有很多人为了生火和剃胡须的事情而争斗。吃过晚饭，大概9点钟上床睡觉。所有这些工作，一周大概能有15先令。不过，短期来讲，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至少可以写一篇让报纸大卖的文章。

等我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后（我已经有10天没坐过椅子了），给你写一封更有趣的信，不过，现在我这有一两条收集来的实用经验。好好留着，谁知道哪天你也会走这条路呢。

用木头生火烧水时，将一条木片放在水里能去除水中的烟熏味。

要制作烧水用的罐子（也叫作“桶”），最可靠的锡应该是鼻烟盒的锡，最好两磅重。不过，很难弄到手，因为大多数烟草商都不产鼻烟。

星期六晚上总能从屠夫那讨点肉来吃。

露天夜宿时，把外套脱下来盖在身上比直接穿着衣服暖和。

至于新词，这里有一些，不过，我觉得它们只是当前的俚语，不是真正的本地话。

“招揽（生意）”的意思是“生火”。

“老人形啤酒杯”（也可以说成“成为老人形啤酒杯”）的意思是“流浪者”。

“聊天”的意思是“卑鄙的家伙”。

“小马”的意思是“屎”。

“当船长”的意思是“露天夜宿”。

“得到”是一个有辱骂意味的词（名词），意思不确定

还有，我之前以为“同韵俚语”[2]差不多消失了，但在这儿，偶尔还能听到人们说。“墓中穴”表示剃须，“热十字小面包”表示太阳。记得把随信附带的东西给你父亲，他可能会感兴趣。过一段时间再给你写信。

挚友

埃里克·A.布莱尔

附言：过去流浪汉们常常在乞讨过的人家房门上做记号，表示他们受到何种待遇，关于这个我又询问了碰到的流浪汉。不过，似乎这种风俗已经消失，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种事。

---

[1] 蒲式耳，英美制计量单位。英制1蒲式耳约为36.3升。

[2] 同韵俚语，用来表示单词或词组的俚语，并且与该词押韵。

在阿尔库维耶雷时寄给詹姆斯·汉利[1]的信（1937年2月10日）

韦斯卡省，阿尔库维耶雷镇

欧斯库里欧山

伊比利亚社会主义青年团

指挥官科普[2]

亲爱的汉利先生：

谢谢你的来信。信到我手里时已经拆封了，所以我想我妻子[3]肯定已经看过，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都是她在帮我处理信件。这封信我写不了太长，实在抱歉——我在这里过得并不太习惯——但不管怎样，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很高兴你喜欢那本书[4]。我估计它3月10号才会正式出版，那时我应该还在前线，不知道到时会有什么反响。戈兰茨[5]觉得书里的一些内容可能有些偏激，也许会冒犯读者。不过即使这样，我觉得仍然值得冒险。

你真挚的

埃里克·布莱尔

---

[1] 詹姆斯·汉利（James Hanley，1897-1985），英国小说家。

[2] 即乔治·科普（George Kopp，1902-1951），出生于俄罗斯的比利时人。他曾是奥威尔在西班牙时的指挥官，是个土木工程师。

[3] 即艾琳·布莱尔（Eileen Blair，1905-1945），奥威尔的第一任妻子。

[4] 指《通往维根码头之路》，这本书于1937年3月8日出版。

[5] 即维克托·戈兰茨（Victor Gollancz，1893-1967），英国出版家、共产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他于1927年创建了自己的出版公司，出版包括乔治·奥威尔在内的一些作家的书。他是左翼书社的创始人之一。

艾琳·布莱尔致伦纳德·穆尔[1]（1937年2月11日）

伦敦东南10区，格林尼治

克鲁姆山24号

亲爱的穆尔先生：

谢谢你的来信。同你一样，我也认为戈兰茨应该把《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的第一部分单独出版，但愿他真的会这么做。

听说《通往维根码头之路》最终被左翼书社选中了，这真是个好消息！我很想现在就拿到一本，因为可能下周我就要去西班牙了——不管怎样，下下周之前我希望能出发。这些天我在城里收拾准备，为了避免遗漏一些本该完成的事，我走之前会去你办公室一趟。不过现在先处理一些吧。

我跟我丈夫的银行谈过了，所有寄到他们那儿的给他的支票，他们都将记入他的账户。所以你能不能把给他的支票都寄到位于赫特福德郡鲍尔多克镇的巴克莱银行？寄给那里的经理就好。虽然这样会给你添些麻烦，但我想这样是明智的，因为寄往西班牙肯定很不保险。银行在巴塞罗那给我们预留了一些信贷额度，我需要时能取些钱。

我在巴塞罗那的住址是：巴塞罗那市兰布拉斯大道洲际酒店。在那里我应该能跟我丈夫保持密切的联系。

我现在能想到的唯一剩下的事是赠书。我丈夫建议我请你来帮他寄书，收件人名单附在后面。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收到左翼书社的版本——如果有的话，他们可以寄到上面这个地址，和赠书一起给我哥哥劳伦斯·奥肖内希。我当然想在走之前亲自做这些事，不过我丈夫可能月底休假，他希望我尽量早些到巴塞罗那。

万分感谢！

真挚的

艾琳·布莱尔

附言：请给以下地址各寄一本《通往维根码头之路》：

理查德·瑞斯先生，西区，切舍姆普莱斯9号。（请转寄）

亨利·米勒先生，巴黎14区，维拉苏哈18号。

辛克莱尔·菲尔茨女士，西北区，戈德斯格林，奥克伍德路1B。

丹尼斯·柯林斯女士（转P.雅各斯女士），绍斯沃尔德镇附近，雷登，福威斯。（请转寄）

杰弗里·戈尔先生，西北6区，菲茨罗伊公园，埃尔姆斯。

亚当女士[2]，赫特福德郡，鲍多克镇附近，沃林顿，斯托尔斯。

R.M.布莱尔先生&女士，萨福克郡，绍斯沃尔德，蒙太古之家。

劳伦斯·奥肖内希先生，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西南10区，格林尼治，克鲁姆山24号。

还请寄两本给埃里克·布莱尔女士，西班牙，巴塞罗那，兰布拉斯大街，洲际酒店。

如果有富余的左翼书社出版的书，请寄给劳伦斯·奥肖内希先生。

万分感谢！

真诚的

艾琳·布莱尔

---

[1] 伦纳德·穆尔（Leonard Moore，1887-1968），乔治·奥威尔的文学经纪人。

[2] 即内莉·利莫新，奥威尔的姨妈。

艾琳·布莱尔在巴塞罗那时寄给母亲的信[1]（1937年3月22日）

巴塞罗那

兰布拉学业街10号

英国区

我最亲爱的妈妈：

我在信封里装了张刚在战壕里写给你的“信”！信结束得很仓促，而且似乎还弄丢了一张信纸。我的笔迹看上去很难辨认，但这毕竟是一封在真正的前线写的信，你得读上很多遍才能明白我大概在说什么。我非常享受在前线的时光。假如这儿的医生再好一些的话，那么我不管怎样都会留下来做一名护士的（在看到医生之前，我确实尝试过留下）。前线仍还很平静，所以他们有时间把我训练得更专业些。但是这里的那位医生极度无知而且非常邋遢。他在蒙弗洛里特的这家小医院包扎村民们被割伤的手指，处理可能出现的一切急救或战斗负伤。只要窗户是开着的，用过的旧布条就会被随手丢出窗外。若窗户是关着的，布条就会弹落到地板上。人们也从来没见他洗过手。所以我想他必须要有一个受过训练的助手（我看到过一个，是个男的）。埃里克去找他看过，他说没什么大碍，只是过于疲惫，而且又感冒什么的。的确，埃里克是太累了，好在天气已有好转。不过休假又被推迟了，因为不久前韦斯卡前线一个兵团发动了一次进攻，损失惨重，所以现在休假是不可能了。独立工党派遣团团长鲍勃·爱德华兹[2]要出去几周，这段时间就由埃里克来指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很有趣。我在前线的探访结束得很顺利，科普觉得我还能多待几个小时，就安排了一辆车在3:15送我离开蒙弗洛里特。于是我和埃里克在10:00的时候去睡了会儿，科普3:00来叫醒了我。希望我起来后乔治[3]（我不记得这封信是写给埃里克他们家还是写给你们了）接着去睡。这样他连续睡了两个好觉，气色也好了很多。这次来访对于我似乎很不真实，因为这里没有任何灯光，也没有蜡烛和火把。人们在漆黑中起床，在漆黑中入眠。昨晚我就是在黑暗中出门的，在几

乎没到膝盖的泥地中一路跋涉，直到把那些奇怪的建筑远远地抛在身后，我才看到了军事委员会上空的微光，科普已经在他的车旁等着我了。

周二，我经历了在巴塞罗那的唯一一次空袭。空袭很有意思。西班牙人平时格外喧闹，也喜欢相互推挤，但此时在紧急情况中却非常安静有序。虽然也并不是特别紧急的情况，但相比于往常， 炸弹落在了更靠近市中心的地方，这已经足够引起人们的恐惧了。好在这次的伤亡很小。

之前我想要做些改变，而现在的我又开始享受在巴塞罗那的生活了。你可以接着把这封信寄给埃里克和格文，谢谢他们给我寄了东西。那3磅茶叶我已经收到了，我会好好品尝的。鲍勃·爱德华兹给我讲，他的独立派遣团就快要全军覆没了。而且也像往常一样，总是在有人要启程去巴黎的最后时刻，我才写下这些给埃里克的话。我的支票簿仍不在身边，不过他会在两周之内收到10英镑[4]的支票。此外，埃里克要是能把那些比塞塔[5]给芬纳·布罗克韦[6]的话，我会很感激的。（为了避免像上一封信一样闹笑话，我让他换10英镑的比塞塔，然后亲手带给芬纳·布罗克韦。这里物价很低，不过我帮独立工党派遣团垫了不少钱，他们需要很多东西，却没有钱来买。我还借给了约翰[7]500比塞塔，他身上已经一无所有了。我自己另外存了5英镑，现在汇率还不错，这些钱可以在我们再次穿越边境的时候备用，随便是谁都可以用。）

我希望大家都很好。希望能尽快收到你们报喜的信。格文上次给我写了封激情洋溢的长信，我读过之后竟也想同所有人一起，为英格兰而呐喊了。在英属殖民地那边，我想应该也是这样热闹。有一次，一个服务员给我点了支烟，我称赞他的打火机很漂亮。他立马回答我说：“对，当然了，这是英国货！”然后他把火机递给了我，想我会端详一番。那是个登喜路牌打火机——我想肯定是在巴塞罗那买的，因为那边有很多像这种牌子的打火机，不过这些并不算太流行。而且埃里克的指挥官科普一直很想要的李派林牌辣酱油[8]，我竟然在巴塞罗那意外地发现有卖的，而且他们还卖克洛斯&布莱克威尔牌的泡菜。这些东西都不贵，只可惜好吃的英国果酱早早就卖完了。

看望过乔治后，我相信我们在冬天前会回到家的，也许还会早些。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给姨妈[9]另写一封信。我从未收到过她的信，埃里克也没有，这让我们很是担心。她肯定在沃林顿生活得很不开心吧。另

外，乔治想要一个煤气炉，让我立马就写信去订一个。但我想还是等到我们回来之前再订吧，而且我还没有收到穆尔支付那本书[10]预付金的消息。说到这儿，这让我想起来，人们对这书的评论比我预计的要好些，我想随后应该还会有更有趣的评论。

昨晚我在浴缸里泡了个澡，真令人兴奋。我这连续三天的晚餐都很丰盛，不知以后我会不会怀念现在天天喝咖啡的生活。每天我大概喝三杯咖啡，喝酒也频繁些了。尽管理论上说我的伙食费很寒酸，但有时我还是会去一些人人都喜爱的餐馆，他们的菜肴虽然很少，但是都很美味。每天我都想早点回家，这样可以写信或者写些别的东西。但实际上每天真正到家时，都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这儿的咖啡馆开到凌晨1:30，人们大约在10点的时候开始喝晚餐后的咖啡。但这里的雪利酒简直令人无法下咽，我本来还想带几桶回家的！

告诉玛德[11]我爱她，有时间我会给她写信的。还有那些我没法一一写信给他们的人，替我向他们问个好吧。（这封信也是写给三个“奥肖内希”[12]的，所以我用的是“你们”，而非“他们”。）这肯定又是一封无聊的信吧。我应该，或者说我本来是想，把我的生活写得更生动有趣些的。

我爱你们

艾琳

---

[1] 奥威尔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期刊《西班牙革命》的办公室写下这封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期间成立的一个共产主义政党。

[2] 鲍勃·爱德华兹（Bob Edwards，1905-1990），英国人。1935年时，他还是不成功的独立工党议员。1955—1987年，他是工党与合作党双料议员。1937年1月，爱德华兹作为独立工党的派遣团团长前往西班牙，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建立联系。随后在同年3月离开西班牙去往格拉斯哥参加独立工党会议。此后因为英国政府禁止英国人参与西班牙内战，而无法返回西班牙。

[3] 艾琳在这里最开始时写的是“埃里克”，后来却写上了“乔治”。艾琳的哥哥劳伦斯·弗雷德里克·奥肖内希博士也叫埃里克（小名），他是个有名的胸外科医生。奥肖内希博士的妻子格文也是个医生。

[4] 英镑，英国国家货币和货币单位名称。1英镑＝240便士（旧制），约为人民币10元。

[5] 在《致敬加泰罗尼亚》这本书的一个注脚里，奥威尔写道：比塞塔的汇率大概是“4便士”。500比塞塔约等价于8英镑6先令8便士或41美元。

[6] 芬纳·布罗克韦（Fenner Brockway，1888-1988），1964年，被封为布罗克韦爵士。他在1928年以及1933—1939年间担任独立工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独立工党在西班牙的代表。在很多方面他都是一个热忱的工作人员，尤其尽力于争取和平。

[7] 即约翰·麦克奈尔（John McNair，1887-1968），英国社会主义政治家，他为社会主义工作了一生。他曾是独立工党的秘书长（1939-1955），也是第一个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去往西班牙的英国人（1936年8月—1937年6月），任独立

工党驻巴塞罗那代表。麦克奈尔在西班牙接待来自英国的志愿者时，认识了乔治·奥威尔。

[8] 李派林牌的辣酱油（Lea & Perrins Worcester Sauce），辣酱油是一种起源在印度的地方调料，在十九世纪末进入了中国的上海和香港，被称作“喼汁”在西餐行业调味料中流行至今。

[9] 指奥威尔的姨妈内莉·利莫斯，当时她住在奥威尔郊外沃林顿区的房子里。

[10] 指《通往维根码头之路》。

[11] 据后来推测，很可能是艾琳的一个名叫玛德的姑妈。

[12] 指艾琳的妈妈、哥哥埃里克和嫂子格文，他们都姓奥肖内希。

在蒙弗洛里特医院时寄给艾琳·布莱尔的信（1937年4月）

我最亲爱的：

你是个完美的妻子。一看到那些雪茄，我的心都融化了，终于可以不再为找烟而忧愁。麦克奈尔告诉我，你手里还算宽裕。而且鲍勃·爱德华兹带钱来的时候，你还可以找他借些，日后还上就好。不过不管怎样，千万不要苦了自己。可能的话，也要尽量多准备些食物和烟。每当你说你感冒了或身体虚弱时，我总是很难过。所以别太劳累自己了，也别担心我，我已经好多了，正等着明后天重回前线。谢天谢地，我手上的毒素没有扩散，虽然伤口毫无疑问还未愈合，但就要恢复了。今天手的感觉不错，我还尝试着刮了刮胡子，有五天没有打理了。天气也好转了许多，到处的春色让我想起了我们的花园，不知那里的桂竹香有没有开花，哈切特有没有播下土豆的种子。说起波利特[1]的那篇评论，那写得真是太差了，不过也算替我的书做了些宣传吧。他肯定听说了我曾是马克思统一工人党民兵团的一员。《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评论[2]我一点也不在乎，维克托·戈兰茨在那儿做足了宣传，他们不敢贬低他出版的书，而《观察家》上的言论相比于上次也已经好多了。我跟麦克奈尔说，如果我这次再回来，就为《新领袖》写篇他们想要的文章。但鲍勃的刚刚发表，我写的肯定没他出彩，所以他们也许不会发表我的文章。而一想到在4月20号之前都没什么希望离开这儿，我就更加烦躁了。与我一同前来的人都已经在休假，而我却只是从一个连换到另一个连而已。若他们建议我早些回去，我绝不会拒绝，但他们不会这样，我也不想强迫他们让我走。我猜想这可能有别的含义：他们正在附近筹划一个行动，让我留下，只是因为觉得我还能帮得上忙。但这猜想似乎并不可靠。我待在医院时，每个人对我都很好，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看我。现在天气正好转，我想我还能再坚持一个月，到时我们可以好好放松一下。可能的话，我们还可以去钓鱼。

写这封信时，迈克尔、帕克和巴顿肖[3]回来了，你真应该看看他们进门时看到人造黄油的样子。还有，那些照片很多人都想要，我已经在每张背后注明了需要的张数，也许你能多印几份。这应该不会花费太多

吧——我可不想让那些西班牙的机枪手们失望。不过有的照片照得确实挺糟糕的，你看有一张巴顿肖的样子很模糊，那是因为当时有颗炸弹在房子后面爆炸了，你可以看出照片左侧有些模糊。

就写到这儿吧。我想封好这封信交给麦克奈尔，不过不知他回来没有。亲爱的，谢谢你给我寄这些东西，好好保重，希望你过得开心。我跟他说了，休假时一起聊聊现在的局面。也许你也可以找个机会跟他说说我打算去马德里的事。再见，我的爱人。我很快会再给你写信的。

献上我所有的爱

埃里克

---

[1] 波利特（Harry Pollitt，1890-1960），兰开夏郡的一个锅炉制造商，也是1920年建立大不列颠共产党的成员之一，并在1929年成为了该党的秘书长。他与拉贾尼·帕姆·杜特一起领导该党直到去世。不过1939年秋天，他被赶下台。直到1941年7月德军入侵苏联时，才因为他当时反对法西斯主义、宣扬民主战争的姿态才重获权力。他关于乔治·奥威尔《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的评论发表在1937年3月17日的《工人日报》上。

[2] 《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上的评论，即1937年3月14日，爱德华·尚克斯和休·马新汉姆对于《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的评论分别发表于《星期日泰晤士报》和《观察家》上。

[3] 都是奥威尔的战友，分别来自英国、南非和美国。

艾琳·布莱尔在巴塞罗那时寄给伦纳德·穆尔的信（**1937**年**4**月**12**日）

巴塞罗那

兰布拉学业街10号

英国区

亲爱的穆尔先生：

《通往维根码头之路》首次出版后，你给我们寄来了两本书，希望之前的信件已经替我传达到了谢意。这次另寄来的四本（两本定价为10先令6便士的版本和两本左翼书社的版本）我周六已经收到了，再次感谢！新闻剪报也做得不错，总的来说，一切都很令人满意。大家对此一片赞誉，我也很想听听你的评价。

一个月前我去前线看望了我丈夫。由于这是一场革命的战争，我得以整天都待在那儿的防空洞里。那天法西斯的军队对我们进行了小规模的轰炸，并加以猛烈的机枪扫射。当时这在韦斯卡前线十分少见，所以这次探访的确是一次有趣的经历。我从来没有如此开心过！埃里克他很好，就是人十分疲倦。之前他手臂中毒，在距离前线两英里的地方获得了些许喘息。我想现在他又回到前线了，战事也从上周开始变得愈加激烈。不过，他一直在认真记着日记，我对他的书也充满了期待。可惜前线的战事，多少耽误了他的休假。已经推迟很久了，但愿他在一两周之内就能回到巴塞罗那。

不知道戈兰茨是不是已经支付了第二笔预付款，如果你知道的话那就太好了，因为之前他说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们手里还有些钱，不过等到埃里克回来后，我们可能就要指望着这笔预付款了，因为还得讨论一下未来的计划。说不定银行的信已经在路上了。现在信件在路上走得很慢，也没什么规律，这让人什么都做不了。

万分感谢！

真诚的

艾琳·布莱尔

致维克多·戈兰茨（1937年5月9日）

巴塞罗那大陆旅馆

亲爱的戈兰茨先生：

谢谢你为《通往维根码头之路》写的引言，我之前一直没机会感谢你。实际上我十天前休假开始时才开始看这本书，之前我连左翼书社的版本都没看过。一到休假，我倒变得更忙碌。休假的第一周我身体稍有不适，之后我们又都或多或少被卷入持续了三四天的巷战——实际上想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我很喜欢你的引言，但我也会就你的一些批评做出回应。这才是大家真正想要的评论，却似乎很少能从职业书评家那里得到。我收到了很多书评，其中有些颇有敌意；不过从书的影响力角度而言，我觉得这应该是好事。另外，我也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

我应该在不久后会重返前线。不出意外的话，我应该可以在前线待到八月左右。之后我应该会回家，我觉得那时差不多可以开始写另一本书了。我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在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这样就可以把我的经历写成一本书[1]。在这里，除了亲身经历之外，很难掌握一些事实。尽管有这些局限，我还是看到了很多引起我强烈兴趣的事情。一方面，我意外地加入了马克思统一工人党民兵团，而非国际纵队[2]。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挺可惜：因为这样我就没法去马德里前线了。不过另一方面，这也使我接触了很多西班牙人而非英国人，尤其是认识了很多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我希望自己能有机会记录下亲眼目睹的事实。英国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文章大部分都是骇人听闻的谎言，碍于审查制度我只能点明至此。如果我能在八月回国，我会争取在明年年初将这本书写好给你。

你忠诚的

埃里克·A.布莱尔

---

[1] 这封信写完后十一天，奥威尔的喉咙被射穿。塞克&沃伯格出版公司于1938年4月25日出版了《致敬加泰罗尼亚》。

[2] 国际纵队主要由外国志愿者组成，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在马德里的保卫战中举足轻重。国际纵队的总部

设在阿尔瓦塞特。

致雷纳·赫彭斯托尔[1]（1940年4月11日）

亲爱的雷纳：

那些照片好了么？如果好了的话，我很希望你能把一些看上去值得重洗的照片寄给我，并告诉我那些底片的价格。我刚收到美国文学名人录的请求，他们希望将我收录其中，但需要照片。这算是一种广告，我想我最好照办。

希望你那边一切顺利。我在这儿一个人住，艾琳有时周末有空会来看我。她在办公室[2]一直超负荷工作，所以我想可能的话让她离开那个岗位，不过我现在连自己的工作都没影儿呢。我还没开始写自己的小说[3]，而是忙于写那些书评，好能勉强维持生计。花园那边，春种也忙得如火如荼。为了抵御冬季可能发生的饥荒，我的目标是种上6英担[4]的土豆。对了，你有没有去过在朗格汉姆[5]举行的复活节会议？他们想让我去做一个演讲，而我忙得无法脱身便给他们寄了一份演讲手稿，让其他人代读。这份手稿里，我对和平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我不知道他们对此有何感想，很希望听到现场人士的评价。代我向玛格丽特[6]问好，我希望她一切顺利。

你的

埃里克

---

[1] 雷纳·赫彭斯托尔（Rayner Heppenstall，1911-1981），英国小说家、诗人兼评论家，作品包括《正午的光辉》《四个缺席者》。他与奥威尔相识于1935年春，两人的友谊持续了一生。本信是奥威尔在赫特福德郡北巴尔多克镇沃灵顿村的商店写下的。

[2] 这里指的是审查部门的办公室。

[3] 这部小说预计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冒险故事，但奥威尔并没有认真开始写。

[4] 英担，英制质量单位。1英担约为50.8千克。

[5] 艾萨克斯郡朗格汉姆的阿德尔菲中心成立于1936年，是英国文学刊物《阿德尔菲》的分支机构。该中心被用来举行暑期课程和会议等，以促进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在奥威尔写这封信时，这个中心的主管是马克思·普罗姆。普罗姆是一个热心的和平主义者。

[6] 雷纳的夫人。

致雷纳·赫彭斯托尔（1940年4月16日）

鲍尔多克，哈茨郡

威灵顿

海岸

亲爱的雷纳：

祝福新生儿，我希望也相信母子两人都很平安。请带给玛格丽特我诚挚的祝贺和祝福。拥有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而我一直也这样梦想着。不过雷纳，你千万不要给她起个没人知道怎么拼写的凯尔特人[1]的名字，来折磨这个小家伙。否则她长大后会成为巫师或者什么的，因为人们总是变得和自己的名字一样。像我将近花了30年，才摆脱了被叫作埃里克的阴影。如果我希望我的女儿长得美丽水灵，我会叫她伊丽莎白。如果我想她诚实善良又有好厨艺，我会叫她玛丽或者简。问题是你要是叫她伊丽莎白，大家会以为你照女王的名字取的，好像她哪天真能当上女王一样。

谢谢你给我寄来的照片。不过你还没告诉我，这些底片和别的东西一共花了多少钱。我把标记着“3”和“5”的照片寄给了别人。我觉得那张标记着“3”的照片最像我。当然，我最熟悉的还是自己的正脸。希望照片能达到预期效果。既然这些是打算寄给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寄一张英俊的空军战士的照片或者是别的什么人的照片呢？我觉得自己一点魅力也没有。这些天我收到了不少读者来信，大多数人都是非常傲慢地指出我的错误，从来没有哪位年轻女士对我说“你真迷人”。有一次我读到了一位助产护士的美妙的信。在回信中我没有告诉她我已经结婚了。但后来我发现她是一个35岁而且有4个孩子的女人，这件事让艾琳笑了好久。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城里。我被那些需要写评论的书淹没了，自己的书的进展也不顺利。天知道我能不能写完，或者是否两年后

还能出版小说。

祝你一切都好。

你的

埃里克

---

[1] 凯尔特人：公元前2000年左右活动在中欧的一些有着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特质的有亲缘关系的民族的统称。

武装人民——致《岁月》[1]杂志编辑（1940年6月22日）

先生：

几乎可以肯定，英格兰将会在今后几天或几周内遭到侵占，一场渡海部队的大规模侵略活动也极有可能发生。在这种关头，我们的口号应该是“武装人民”。我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驱逐侵略这一广泛的问题，但我认为，法国的战役和西班牙最近的内战清楚地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当民众没有得到武装时，伞兵队、自行车队和乱窜的坦克不仅会造成重大破坏，而且还会将本该抗击主要敌人的大部分常规军的力量转移走；第二，武装人民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将武器放到错误的人手中所带来的危险（这也是西班牙战争已经证明了的）。自战争爆发时开始的递补选举[2]表明：只有一小部分英国普通民众对政府不满；而且，大部分持不满意见的人的印象分也在降低。

“武装人民”本身是个模糊的词组，当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武器可以拿来立即分发。但是，今后三天，至少有几件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去做的事：

（1）分发手榴弹。这是战争中唯一一件可以简单快速制造的现代武器，也是最有用的武器之一。成千上万的英国男人都非常熟悉手榴弹的用法，他们个个准备充分，无须他人指导。都说手榴弹对付坦克很有用，如果敌人伞兵带着机枪进驻到我们的大城镇里，那么手榴弹一定必不可少。我曾在1937年5月的巴塞罗那，坐在汽车前排目睹巷战实景。那次经历居然让我相信，几百个手拿机枪的人可以让一座大城市的生活瘫痪，毕竟子弹连一面普通的砖墙也不能穿越。大炮虽然可以炸毁它们，但是不可能总是随身携带。另外，西班牙早期的巷战表明，手榴弹可以将武装人士赶出石砌建筑物，如果策略使用得当，炸药包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2）分发猎枪。有人说，该让部分本土防卫志愿军[3]的分遣队使用猎枪。如果常规军征走了所有的步枪和布朗式轻机枪，这就是非常必

要的。不过这种情况下，应该马上开始分发工作，同时从军械工的商店里征用所有武器。几周前就有人说到这件事，但实际上，许多军械工在橱窗里展示的成排枪支，不仅摆在那毫无用处，其实还是个危险，因为它们很容易遭到洗劫。应该通过广播向民众解释猎枪的威力和局限性：如需要大号铅弹，以及60码[4]之内致命。

（3）设置障碍物，阻止飞机降落。这一点谈得很多，但是至今所做的工作都是零零散散的。原因是，这项任务留给了志愿军，而他们既没有充足时间，也没有征用物资的权力。在英格兰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的小国家，我们只需几天时间就可以让飞机找不到飞机场以外的任何降落地点。这需要的只是劳力。因此，当地政府应该有权力征召劳动力，并且征用他们需要的物资。

（4）喷涂地名。这一点在路标方面做得很好，但写着自己位置的商店门面和商人货车等依然随处可见。当地政府应该有权强制要求立即喷涂覆盖这些标识。这也包括酒吧外酿酒商的名字。大多数酒吧都集中在很小的一个区域，做事严谨的德国人可能也知道这一点。

（5）配备收音机等设备。每个本土防卫志愿军总部都应该有一套无线电接收设备，如有必要，可以通过无线电接收命令。紧急关头只依靠电话，则具有致命的危害。同武器一样，政府应毫不犹豫地征收它所需要的东西。

所有这些事情都只需几天时间便可完成。同时，让我们继续重申“武装人民”，期待越来越多的声音能够来响应。几十年来，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有想象力的政府[5]，至少他们还有可能聆听人民的声音。

我和其他人等

乔治·奥威尔

---

[1] 《岁月》，即Time and Tide。这是由玛格丽特·麦克沃思于1920年创办的一份英文周刊，主要刊登政治和文学评论。

[2] 递补选举，为了填补在正常选举之前出现空缺的政治职位而举行的选举，通常是在任者死亡或辞职，或者不足以继续胜任这项工作时。

[3] 本土防卫志愿军，家园护卫队的前身，是英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防卫组织。由平民组成，作为军队的分遣队，以防敌人侵略。

[4] 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3英尺，合0.91米。

[5] 1940年5月10日，张伯伦政府垮台，温斯顿·丘吉尔出任联合政府的首相。

致约翰·莱曼[1]（1940年7月6日）

伦敦西北一区

艾佛地区查格福德街

多赛特公寓18号

亲爱的莱曼：

感谢你的来信，这两封信是装在一个信封里寄到的。非常抱歉，答应过要给你写信，但我一直没有动笔。我当时提笔写了一些，但之后战争局势开始恶化。发生这种事情，我实在没有办法写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除了书评，其他什么都没有写。而且，我也一直忙于为本土防卫志愿军奔波。这种局势下最糟的就是无事可做。政府不愿让我发挥任何才能，连个书记员都不让我当，由于肺部问题，我也未能进入军队。我感到自己一无是处，这真是很糟糕。我还得眼看着身边都是一些笨蛋和亲法西斯的人担任重要职务。不过，事情稍稍有了进展。战争办公室[2]通知我说，他们不会再对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人抱有偏见。你喜欢的话，当然可以再使用大像素描画，两枚几尼[3]应该很棒。至于你在其他信中提到的照片，一定得是真的肖像画吗？快照可以吗？我通常都不太上相。随附的照片是为了办身份证之类的事而拍的，和我本人极为相像，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放大。万一需要我照一张正式的照片，我的地址就是上方那个，至少这两周还是。我现在帮《岁月》杂志写剧评，所以一直住在伦敦。

您最诚挚的

乔治·奥威尔

---

[1] 约翰·莱曼（John Lehmann，1907-1987），英国诗人、文学家，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编辑之一。他通过密友汤姆·温特林厄姆结识了乔治·奥威尔。

[2] 战争办公室，英国政府17世纪至1964年间负责管理英国军队的部门，1964年其职能转交给国防部。

[3] 几尼，英国的旧金币，值1镑1先令。

致詹姆斯·拉夫林[1]（1940年7月16日）

伦敦西北一区

艾佛地区查格福德大街

多塞特公寓18号

亲爱的拉夫林先生：

我刚刚收到您的来信，非常感谢。是的，您当然可以重印亨利·米勒[2]的文集。我不知道我和出版商之间的合同上是怎么写的，我给他写了信，相信他不会反对。我收到他的回复后，会再次写信向您确认这件事的。我相信，信都会顺利到达您手上的。

我想知道您是否清楚亨利·米勒目前在哪儿。我从1939年年初起就再没有他的消息了。这本书刚出版时，他通过一个在英国的人联系我，让我将此书寄一本到他在美国的地址。我照做了，他却一直没告诉我书收到没有。他的朋友阿尔弗雷德·佩莱斯现在在这里，加入了英军。就像您说的那样，所有出版这些书的计划都可能因为战争而灰飞烟灭。就在我的一本书要在巴黎重印的一两周之前，希特勒攻入了巴黎。有意思的是，几天后我就收到了为书的重印支付所得税的要求。实际上除了为报纸杂志继续写稿外，我现在已经不动笔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无法安心写作，几个月之后很多书就会因为纸张的严重短缺，而无法交付出版。总之我觉得我们所理解的文学已经快走到尽头了。目前的形势真是一片灰暗。我们所有人都在为不太可能发生的入侵积极地做着准备。个人而言，我更害怕希特勒在横扫北非和近东后讲和。所以我倒更希望他能入侵这里。这里的人们士气高昂，无论如何我们一定可以干掉这些让我们深陷水深火热中的敌人。不过我相信您一定比我更了解目前欧洲的局势。过几天我会再寄给您一封信，是关于文章确认的事情。谢谢您的来信。

您的

埃里克

---

[1] 詹姆斯·拉夫林（James Laughlin，1914-1997），美国新方向出版社（New Directions）的出版商，同时也是个编辑兼作家。

[2]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891-1980），美国“垮掉派”作家，是20世纪美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个富有个性又极具争议的文学大师。

致神父约沃思·琼斯（**1941**年**4**月**8**日）

伦敦西北8区

阿比路

兰福德法院 111号

亲爱的琼斯先生：

谢谢你的来信[1]。可能有时我表达自己的事情时太过含混，借此机会，我想回答一些你的疑问，也好把事情讲得更清楚些。

（1）“即使大商业计划能够实施，美国想调度它的资源也还需要一年。”对此，你评论说这是因为罢工者阻碍了生产。当然，的确是这样，但我想谈谈更深层次的障碍。只有人力和资金同时到位，才能满足战时国家的需要。而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我们的人员要像军队一样训练有素，苏联和一些极权国家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但除非社会上每个阶层都有着同样的纪律性，这一点才是现实的，否则就会出现持续的不满和社会摩擦，表现为罢工和蓄意破坏。从长远看来，我觉得最难使之屈服的是商人。因为更换现有体系对他们造成的损失最大，所以有时他们甚至明显地支持希特勒。一旦到了某个临界点，他们就会为了自己失去的经济自由而反抗。只要他们反抗，劳工的动乱就会持续下去。

（2）关于战争的目的。显然，我赞成宣布我们的战争目的，尽管在战后重建中，提出任何过于详细的框架都是有风险的。只要我们宣布了战争的目的，希特勒肯定会提出一个更高的要价来胁迫我们就范，尽管他从不兑现承诺。我在书中所反对的是这种观点——不展示军事力量的宣传可以达成任何目标。我曾经提到过阿克兰德[2]的书《我们的奋斗》，它似乎假定并论证，只要我们告诉德国我们想要应得的和平，他们就会停止战斗。人民会议[3]的那帮人（普里特[4]公司）也在散布类似的观点，当然，他们不过是说说而已。

（3）印度亲法西斯派的叛乱。我想这次叛乱的主要参与者不是印度人，而是在印度的英国人。一个想发动法西斯政变的将军一定会把印

度作为跳板，就像佛朗哥[5]在摩洛哥所做的一样。当然，这种可能性在此时的战事中并不存在，但我们都应该看得长远些。假如将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强加于英国的企图得逞的话，那么当中一定使用了有色部队。

（4）关于甘地与和平主义。也许我并不该暗示和平主义者们本身过着一种受庇护的生活，但事实上，“纯粹的”和平主义者们一般都来自中产阶级，他们成长的环境都极其优越。毫无疑问，只有在那些人们感受不到外国侵略和国家被征服的地方，和平主义运动才会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和平主义运动总是在沿海国家发生的原因（甚至在日本都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和平主义运动）。政府不能被“纯粹”和平主义者的准则所左右，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使用武力的政府，会被任意一群愿意使用武力的人们，甚至是个人所推翻。和平主义者拒绝面对政府的问题，也不愿设身处地地思考问题，他们脸上总是一副旁观者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不负责任”。

二十多年来，甘地一直被印度政府看作是他们的一个得力助手。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曾经在印度警察局任职过。人们经常用一种冷嘲热讽的口吻承认：其实甘地让英国人更容易统治印度。因为在他的影响下，人们不再认为采取行动会对现实有所改变。之所以甘地在狱中总是受到仁慈对待，而且每次在他延长绝食、生命垂危时，总会收获一些政府的让步；是因为英国的官员们害怕他死了之后，他的继任者会因不再相信“精神的力量”，而更愿意扛起炸弹。甘地这个人当然是十分诚实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被如何地利用，而他正直的人格，让他显得极具利用价值。我不敢担保，从长远来看，他的方式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为了阻止暴力和防止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人们总能说，至少甘地的做法会让印度的问题得到最大程度的和平解决。但想靠这种方法让英国人退出印度，简直是天方夜谭，起码现在在印度的英国人绝不会这样想。至于德国对英国的征服，甘地肯定会建议我们不要跟德国人抗争，让他们统治去吧——事实上他也确实是这么提议的。假如希特勒征服了英国，我猜想他一定会发起一个全国的和平主义运动，以便化解顽强的反抗，从而驯服英国。最后，谢谢你的来信。

真诚的

乔治·奥威尔

---

[1] 在之前一封信中，就奥威尔在《狮子与独角兽》中提到的几个观点，神父约沃思·琼斯向他询问更深入的解释。

[2] 即理查德·阿克兰德（Richard Acland，1906-1990），英国人，二战期间英国社会主义政党Common Wealth Party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45年参加了英国工党（Labour Party）。

[3] 人民会议（The People’s Convention），由英国共产主义分子于1941年成立的组织。

[4] 丹尼斯·诺埃尔·普里特（Denis Nowell Pritt，1887-1972），1934-1940年间担任工党国会议员，王室法律顾问。之后，他因政策分歧被驱逐出党，直到1950年一直担任独立社会主义国会议员。

[5] 即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西班牙政治家、军事家。他是西班牙内战期间推翻民主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军队领袖，一个法西斯主义独裁者。

致多萝西·普劳曼（1941年6月）

伦敦西北20区

阿比路

兰福德法院 111号

亲爱的多萝西[1]：

关于马克思[2]的去世，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知道，人死之后，再多安慰都只是一种徒劳。最让我悲伤的是，他居然在这场残酷的战争还未结束时便去世了。我有快两年没见过他了。虽然在有关和平主义的话题上，我们一直有着很大的分歧，我也对此感到很遗憾，但你一定会和我一样，觉得其实这没什么要紧的。我一直认为，即使是我和马克思之间存在着最根本的分歧，也绝不会改变我们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他不拘小节，而且也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对如此真诚的观点心存怨恨。虽然马克思和我之间几乎对于所有事情都意见向左，但我理解他拥有这样的生活看法。我很喜欢他，他对我也很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约在12年前，他还是第一个出版我作品的英国编辑。

我之前通过你向一个未告知姓名的资助人[3]借了300英镑。我希望这没有让你觉得尴尬。现在我还没法还清这些钱，虽然如此，我希望你明白，我没有放弃还钱的想法。如今仅是谋生都非常困难。在这种噩梦般的环境，人没法写出什么东西。我虽然能找到足够多的写新闻和做广播的活，但这样也只是勉强糊口而已。几乎从大战开始起，我们就待在伦敦。我们把那幢小屋装饰了一下，只偶尔去住一下。艾琳在审查部已经工作一年多了，她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我总劝她别在那儿干了。她最近会好好休养，也许以后会找个更有意义些的而且也不会常常感到愤怒的工作。我体检之后被评D级，所以不能参军，不过我现在正在地方志愿军里服役（还是个中士！）。我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理查德·瑞斯[4]的消息了，上次听说他还在运煤船上做护卫枪手。

艾琳要我向你传达一下她的爱意，也别忘了替我向皮尔斯[5]和其他

人带声问候。我从你的明信片里得知皮尔斯现在在英国，但愿你能保护他免于危险。对于生者来说，这是一个正在腐烂的时代，但我想任何一个像皮尔斯这么大的孩子都应该有机会去见见更好的世界。

你的

埃里克·布莱尔

---

[1] 即多萝西·普劳曼（Dorothy Plowman，1887-1967），马克思·普劳曼的遗孀。

[2] 即马克思·普劳曼（Max Plowman，1883-1941），记者和作家，出版了《布莱克研究简介》《索姆河上的中尉》《信仰呼唤和平主义》等多本书籍。在奥威尔写作的初期，马克思·普劳曼一直鼓励着他，并且最先出版了他的作品。普劳曼夫妇是奥威尔一生的朋友。

[3] 即小说家L.H.迈尔斯（L.H.Myers），奥威尔作品的一个敬仰者。1938年夏天，他在艾尔斯福德的疗养院里第一次见到奥威尔，当时身边还有普劳曼夫妇。在得知奥威尔需要去一个气候温暖的地方修养时，他通过多萝西·普劳曼匿名借给了奥威尔300英镑。奥威尔知道这是有人借给他的，但一直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4] 理查德·瑞斯（Richard Rees，1900-1970），画家，作家和评论家。他的作品包括《乔治·奥威尔：胜利营的逃难者》《西蒙·威尔》《我的时间之理论》等。1930至1936年间，作为当时的报纸《阿德尔菲》的编辑，他结识了年轻的奥威尔，并且一直保持着挚友的关系，直到奥威尔去世。多年来，瑞斯一直持续地关心，帮助和鼓励着奥威尔。

[5] 皮尔斯（Piers），普劳曼夫妇的儿子。

我们正与敌人同流合污[1]——致《泰晤士报》编辑（1942年10月12日）

伦敦西北6区

克雷森特 莫蒂默10a号

先生：

英国政府决定对德军战俘予以报复，迄今为止并没有激起任何抗议，请允许我对此事发表一点看法。

作为对德军暴行的回应，我们也用铁链把他们的战俘[2]拴起来了。这在一个普通的旁观者眼里，无疑就意味着我们是在与敌人同流合污。若回顾最近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民主和法西斯之间深刻的道德差异。但假如我们总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来行事，定会使人们慢慢忘记这些差别。而且跟敌人比冷酷无情，我们毫无胜算。就像意大利的电台刚刚宣称的那样，法西斯的原则是点滴之仇，十倍甚至百倍相报。总有一天，英国的公众舆论会在这样的恐吓前退缩，我们不难预见将来会发生什么。作为对我们的回应，德国人会用铁链拴住更多的英国俘虏，而我们也会如法炮制，绑住更多的轴心国战俘。这将循环往复，直到两边所有的战俘都被铁链拴住。当然，我们肯定会先对这种行为感到恶心，然后宣布不再使用铁链。但毫无疑问，被铐住的英国战俘会比轴心国战俘多。于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会显得既无耻又无力，既损害了自己的名誉，也没能震慑住敌人。

我想，对于德国人更文明些的回应也许该是这样：“你们宣称说，因为我们在迪耶普袭击战中把大约6个德国人绑了一段时间，所以你们才把成千的英国战俘拴住。这真是恶心的谎言。首先，你们本身在过去的十年间就有了足够多的恶行；其次，在到达安全的地方之前，军队必须要保证战俘的生命安全，这与你们用铁链把本就关在监狱里的无辜战俘铐住双手有本质上的区别。此时，我们没法阻止你们虐待我们的战俘，但别指望我们在最后算总账时会忘掉这件事，也别以为我们会在还

击时手下留情。你们是纳粹，我们是文明人。你们最近的这些行为就是我们之间差别最好的诠释。”

现在看来，这并不是个十分令人满意的回复。但是我想三个月后人们再回头看时，一定会发现这将比我们现在的所为好很多。而且在采取进一步愚蠢至极的报复之前，能保持清醒的人有义务抗议这种行为。

真诚的

乔治·奥威尔

---

[1] 这是一封写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但最终未发表在《泰晤士报》上。

[2] 1942年8月时，英国和加拿大的军队突袭了迪耶普。德军声称在突袭中，英国军队将一些德军战俘的双手捆住，所以作为报复，德军同样将一些英国战俘用铁链捆住。而同时，英国政府宣称他们也计划将同样数量的德军战俘捆住。

致R.R.德塞（1943年3月3日）

亲爱的德塞：

印度政府发了封电报给我，想请我用古吉拉特语[1]做一些关于《贝弗里奇报告》[2]的文章，所以我想也许得借用一下你下周一的古吉拉特语课了。很明显，他们想让我完整地叙述整件事，比如这个计划所倡导的观点以及议会制辩论的历史等。审查制度不允许评论以任何形式出现，我想这就不用我多说了。比如对政府缓和修改贝弗里奇计划这一行为的批评，就是被禁止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该客观地写一些议会制辩论上关于这一计划争论的不同观点。我想我们可以简单地陈述一下这个报告的条款，无须描述太多细节，但要强调那些更重要的条款，尤其是家庭补贴这一块。之后我们可以提一下议会制辩论，并解释这个报告中有哪些部分是政府提议通过的。保险起见，你可以说不管最终结果怎样，家庭补贴这一条差不多是肯定会被通过的。然后你当然可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进步，很可能会提升英国的出生率。不过，相比于一个宣传式的陈述，印度政府显然更想要一个中立客观的报道。你可以把整个上课时间用在《贝弗里奇报告》上，也可以只陈述十分钟，预留三分钟谈一谈一周主要新闻，随便你。我希望你能及时地让我们看看你的稿子。我已经给我们在印度的朋友发了电报，告诉他们我们这周会讲讲贝弗里奇了。

你的

印度部门会谈制作人埃里克·布莱尔

附言：我很希望在周六就能看到你的稿子。

---

[1] 古吉拉特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的印度-雅利安语支，为印度22种官方语言与14种地区性语言之一，同时也是巴基斯坦少数民族语言。全球有大约4600万人讲这种语言，为世界上第23大语言。

[2] 该报告全称为《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该书是素有“福利国家之父”之称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爵士的传世经典，对整个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致伦纳德·穆尔（1943年12月6日）

亲爱的穆尔先生，

万分感谢你的支票。我终于又在写一本新的书[1]了，你听到这消息会很开心吧。在BBC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时间动笔，但在《论坛报》[2]这边，我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一周腾出两天空闲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情。我目前要写的东西非常短，所以如果没有什么干扰因素的话，三四个月就可以完成了。

把一系列评论文章再版成书，我觉得这终究不会是个坏点子。但我觉得那些少于2000字的文章就没有必要再版了。那些由短文拼凑起来的书，总是给人一种仓促而零碎的感觉。不过，因为人们很快会忘了《在鲸腹中》[3]，我觉得应该再版那篇关于狄更斯的文章。这本书中的其他两篇文章也在期刊中有过再版。

您挚爱的

E.A.布莱尔

---

[1] 这里指的是《动物庄园》。

[2] 《论坛报》（*Tribute*）创刊于1937年，是一本民主社会主义周刊。1943年，奥威尔辞去BBC的工作，任《论坛报》的编辑。

[3] 《在鲸腹中》（*Inside the Whale*），奥威尔1940年发表的评论集。

致菲利普·拉夫[1]（1943年12月9日）

亲爱的拉夫：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你看上面的日期，我今早才收到你10月15号的信。我对现在的邮递速度已经无可奈何了。有人说现在海运要快一点。另外，我之前想过为12月的杂志多写一点，现在已经完成了。如果你想做季刊，并在12月出第一期的话，我觉得下一期应该是在1944年3月。所以我应该让你在2月底收到我的文章，对吗？这样我1月中旬就得寄出。希望我没算错，如果你及时收到了这封信，你可以确认一下时间。看现在邮递速度的情况，似乎不可能让你尽快收到我从伦敦发过去的信。不过，只要我注明日期，你就可以知道我写信时的观点了。

你当然可以再版《地平线》[2]上那篇文章。康诺利不会反对，但我会告诉他你在做这件事。我不知道稿酬怎么付。你最好把稿酬先交给康诺利。如果稿酬是我的，他会转交给我。

德怀特·麦克唐纳[3]给我写信，说他要创办另外一本评论杂志，邀请我投稿。我不知道这本杂志和《党派评论》会不会是竞争对手，但我写信说我可以给他写点关于“文化”的东西，绝对不写任何和“政治”有关的东西，因为我和《党派评论》有这方面的合约。

我在BBC荒废了两年，之后离开了，现在是《论坛报》的文学编辑。你可能看过《论坛报》这本左翼周刊。现在的工作给了我一点空余时间，之前在BBC可没能这样，所以我现在还在写另外一本书[4]。如果没什么干扰，我希望在几个月内能写完。我会给《党派评论》寄一本最近出版的有关BBC印度专栏的书[5]。这本书很值得一看。因为它是英国宣传制度的一个样本。（当然不是正面样本，不过好在我们印度专栏不受重视，我们相对就有自行决定做什么节目的权利。）

祝一切安好。

你的

[1] 菲利普·拉夫（Philip Rhav，1908-1973），美国文学评论家、随笔作家，与威廉·菲利普斯创办了《党派评论》杂志。

[2] 《地平线》（*Horizon*），英国1940-1949年间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其出版人为西里尔·康诺利。

[3] 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1906-1982），美国作家、编辑、电影评论家、哲学家和激进政治人物。1937-1943年任《党派评论》编辑，后退出，于1944-1949年办了自己的杂志《政治》。他还任《纽约客》专栏作家和《时尚先生》影评人。麦克唐纳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对集权主义。

[4] 这里指的是《动物庄园》。

[5] 这本书为Talking to India。这本书将BBC做过的关于印度的节目整合起来，由奥威尔撰写引言。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1月9日）

亲爱的穆尔先生：

谢谢你的来信。我想我再写完计划中的一两篇文章时，就基本可以定下再版的这本书的基调。我觉得那些已经出版过两次的文章已经没有再版的价值，我想提供一些其他可以出版的文章：

《查尔斯·狄更斯》（约12000字？）

《威尔斯、希特勒和世界国》（约2000字）

《鲁德亚德·吉卜林》（约4000字）

《威廉·巴特勒·叶芝》（约3000字）

《甘地在梅菲尔区》（约3000字）

其中最后四篇都收录在《地平线》里。另外，我拿到书后会为一个美国杂志写篇关于“拉菲兹”[1]的文章，大概3000～4000字。我还为自由法国[2]的杂志《喷泉》写过一篇约2000字的关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也可以加进去，但我想再扩充一下内容。我之前做过一期与乔纳森·斯威夫特[3]的“假想的对话”广播访谈。要是我能拿到谈论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4]的那期节目的脚本，应该也可以收入书中。所有这些能汇集成一本3万多字的书。

我现在工作太忙，还不能着手负责这块儿。我正在写书，如果我没有生病或发生其他意外，我希望在3月底能完稿。这之后我要负责《影像中的英国》系列中的一部分，但这不会花太长时间。

我手头上在写的一本书很短，只有2万到2.5万字左右。它是本童话，也是本政治隐喻小说，我觉得我们可能难以找到出版商。找戈兰茨甚至沃伯格[5]都没有多大用。但如果在别的地方暗示说我有本书快写完了，这样可能会有用。你知不知道哪些出版商纸量充足、哪些很匮乏吗？

您诚挚的

埃里克·布莱尔

---

[1] 奥威尔这里提到的文章为《拉菲兹与布兰蒂什小姐》，这篇评论文章对比了以A.J.拉菲兹为主人公的犯罪小说和惊悚小说家詹姆斯·哈德利·柴斯的《没有布兰蒂什小姐的兰花》。

[2] 自由法国，二战时法国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反纳粹德国侵略的抵抗组织。

[3]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作家，讽刺文学大师，以《格列佛游记》和《一只桶的故事》等作品闻名于世。奥威尔当时在BBC的广播节目中假想自己与斯威夫特进行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

[4] 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Ger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英国诗人。他在写作技巧上的变革影响了20世纪的很多诗人，其中比较出名的有W.H.奥登、C.戴.刘易斯和狄伦·托马斯。

[5] 即弗雷德里奇·沃伯格（Fredric Warburg，1898-1981），与乔治·奥威尔交往很深的英国出版家，塞克&沃伯格出版公司的合伙人。

致格列布·斯特鲁夫[1]（1944年2月17日）

亲爱的斯特鲁夫先生:

原谅我这封信写晚了，感谢您送给我《苏联文学25年》这么好的礼物，我特别喜欢它精彩的题词。我对苏联文学了解肤浅，希望您的书会填补我这方面知识的空缺。您的这本书已经激起了我对扎米亚京[2]的《我们》的兴趣，我之前还没听说过它。我对这一类型的书很感兴趣，也一直在做笔记，希望我早晚也能写一本[3]。您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勃洛克[4]的书的精准译本？大概十年前，我在《生活与信件》[5]里看过一些翻译段落，但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好的翻译。

我现在在写一篇讽刺文章，你看了之后可能会觉得有意思，不过它政治上有点敏感，我现在不确定有没有人能帮我出版。也许你已经能猜出它的主题了。

您诚挚的

乔治·奥威尔

---

[1] 格列布·斯特鲁夫（Gleb Struve，1898-1985）：生于圣彼得堡，1932-1947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斯拉夫与东欧研究系教书，1947-1965年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研究方向为斯拉夫语言文学。他是《苏联文学1911-1950》和《苏联流放文学》的作者。

[2] 即尤金·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1884-1937），俄罗斯科幻小说家、政治讽刺作家。最有名作品为1921年的小说《我们》，故事的背景设在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警察政权中。这也使它成为了苏联审查委员会封禁的第一本书。

[3] 这是奥威尔第一次向别人推荐《1984》。

[4] 即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勃洛克（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Blok，1880-1921），20世纪早期俄罗斯诗人、戏曲家，代表作《十二个》。

[5] 《生活与信件》（*Life and Letters*），1928年6月到1935年4月期间的一本英国文学杂志。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3月19日）

亲爱的穆尔先生:

我已经写完了《动物庄园》，很快会给你发过去。我现在正在打字，全文大约3万字。为了不浪费时间，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前商量怎么把它给戈兰茨。根据我们的合同，他有我的小说的优先购买权。《动物庄园》这本小说是个童话，确切地说是一个有政治隐喻的寓言。但我觉得戈兰茨不会出版这本书，因为它有强烈的反斯大林倾向。和沃伯格商榷也是浪费时间吧，他可能根本不愿碰有这种倾向的题材。而且，据我所知，纸张也很稀缺。所以我建议，我们应该在联系戈兰茨时，先告诉他这本书可能不适合他，如果他确定要读，我们再把书稿发给他。我现在就打算这样告诉他。关键是如果戈兰茨和他的编辑拿到了书稿，即使最后他们不出版，书稿也很可能会留在他们手上好几周。所以我要先写信，这样在你拿到书稿前，他就了解这些情况。

至于要联系哪个出版商，我觉得尼科尔森&沃森出版公司是最好选择。我跟他们的人说过我有本书要出版，那人似乎很急切地想拿到书稿。或者哈钦森，我和他们的罗伯特·纽曼有联系。又或者任何一家有足够纸张且不站在斯大林这边的人，当然后面这个条件更重要。……假如我们能克服这些困难，我希望能参考各出版社现在的出版物来挑选一家。

我打算给你寄两本。也许我们也该试试美国出版商。大概一年前，戴尔出版公司曾写信给我，让我把下一本书寄给他们，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喜欢《动物庄园》。

我现在签了合同，要写一本《影像中的英国》，大概会花费6-8周时间。这之后我打算为两本杂志写两篇稍长一点的文学随笔，一篇关于《没有布兰蒂什小姐的兰花》，一篇关于《萨尔瓦多·达利》。写完这两篇后，我们就会有足够的材料来再把这些随笔出版成书了。

你诚挚的

埃里克·布莱尔

致维克多·戈兰茨（**1944**年**3**月**19**日）

亲爱的戈兰茨先生:

我刚写完一本书，几天后会打出来。您有我的小说的优先购买权。这本书可归入小说类，大概3万字，是个含有政治意味的童话故事。但我得告诉你，我觉得从你的观点看，它在政治上是完全不被接受的（它有反斯大林的隐喻）。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下你还想不想看这本书。如果你的确想，我当然可以给你发去书稿，但我不想书稿被耽搁太久。如果你不在意它的政治问题，想看这本书的话，你能告诉我或者我的代理人（克里斯蒂和穆尔）吗？穆尔手上会有书稿。如果不想看，能不能也告诉我一下？这样我就可以把书稿送到其他地方，不必浪费大家的时间。

您诚挚的

埃里克·布莱尔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3月25日）

亲爱的穆尔先生：

谢谢你的来信。我刚刚听戈兰茨说，他的确想读一下《动物庄园》，你能给他看下吗？但我还是觉得他不大可能出版。如果你已经读过这本书，你会明白书中的隐喻。如果他不想出版的话，你能让他尽早归还书稿吗？

我觉得我应该直接想办法出版一个美国版本，不是吗？我想知道这里有没有戴尔出版公司的人。如果困难大了，我就去让我在《党派评论》的朋友想办法。他们和很多出版商都有联系，有一两次还问过我有没有书要出版。

如果戈兰茨那边不行的话，我们就要决定还可以联系谁。我当然知道尼科尔森&沃森公司是哈奇来管理，但他们会提前支付稿酬吗？我听说他们很大方。至于哈钦森公司那边，罗伯特·纽曼正在安排战后要在欧洲出版的一些书，也问了我有没有合适的书。但纽曼还提到，他们在联系常规名单上的作家。有个叫安南德的印度小说家刚刚离开凯普公司，去了哈钦森，他说他现在得到的预付款是凯普的4倍。

你可以稍微问下戈兰茨对出版随笔合集的看法。合集会包括《在鲸腹中》的一两篇文章，整本书共8篇随笔，大约4万字。

请告诉我关于这本书的进展。

你诚挚的

埃里克·布莱尔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4月5日）

亲爱的穆尔先生：

你很快会收到我的电报。戴尔出版公司回过电报说“立即发送”。我不知道什么方式发送消息最快——我觉得航空邮件最安全，但如今它们的速度也变慢了。我想，我最好还是发送书稿的复印件，因为现在美国的打字质量很可能比我们的好。

戈兰茨在信中说他不能出版《动物庄园》[1]，我早就料到这点。我联系了我在尼科尔森&沃森出版公司的朋友，看看他们会提出怎样的条件（我给了他们书稿复印件，他们下周会告诉我结果）。我没觉得找他们出版这本书会有什么不妥。唯一的坏处就是他们可能会还欠着我的稿费，就宣告破产。为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最好要他们预付稿费。他们的资金状况是不好，但在精神上很令人尊敬。比如说，他们发表了《伦敦诗歌》，还成功出版了粮食部的食谱。当然，他们可能也不想出版《动物庄园》。但如果他们愿意，也提出了优厚的条款，那么我可不会傻到要拒绝他们。（当然，我不能承诺未来还会有书找他们出版，我和戈兰茨签过合同。）如果你读了我这本书，你会明白我书中的隐喻，你也一定会明白在英国出版会有多么困难，尽管在美国可能会容易些。我当然想印出这本书，如果我的所有途径都失败，我会去找几家严肃的小型出版社。如果戴尔出版公司也拒绝了我，虽然我不知道我还能找哪家美国出版商，但我会给我在《党派评论》的朋友写信寻求建议，那儿有很多有文化的出版商，但我不知道他们中有谁会接受这本书的政治立场。我想如果戴尔出版公司接受的话，这本书多版本的同步出版就应该没问题，我猜首印应该是在美国。现在国与国之间几乎没有书的流通，英国这儿的销售不会受到影响。

我已经开始准备《影像中的英国》这本书，预计在5月完成，之后我就可以按计划去写各种文学随笔了。

你诚挚的

埃里克·布莱尔

[1] 1944年4月3日，戈兰茨写信致谢伦纳德·穆尔送来《动物庄园》一书，表示他会尽快阅读此书。他没有食言，第二天就把手稿还给穆尔，还附了一张给奥威尔的纸条。戈兰茨对穆尔说，尽管他高度批判苏联政策的很多方面，但不能像“布莱尔期待的那样”去出版《动物庄园》这样的一本带有普遍攻击意味的书。他给奥威尔的纸条只是简单的几句：“你没错，我错了。抱歉不能出版，手稿已还给穆尔。”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4月15日）

亲爱的穆尔先生：

尼科尔森&沃森出版社拒绝出版《动物庄园》，给的理由和戈兰茨的差不多——用这种方式攻击盟国政府首领是种低级趣味，等等。我知道这本书会有很多麻烦，至少在这个国家是这样。与此同时，我也把书稿拿给了凯普，他们的韦奇伍德小姐经常让我拿些作品给他们看看，不过，他们如果做出同样的回答，我也不会惊奇。我想费伯出版社只是有可能，劳特里奇出版社有纸的话大概也是如此。凯普现在已经有了书稿，我打算听听艾略特和赫伯特·里德的意见[1]。我最近看了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的一本书，我想他们应该没有问题——或许正如你所说，我把他们和伯恩斯&奥茨&沃什伯恩出版社混淆在一起。这些都失败的话，我会尝试让某家文学修养较高的小出版社出版，实际上，或许这才是最有可能的一搏。我知道有一家刚起步的出版社，他们有一定的资金来“挥霍”。我当然想让这本书出版，因为我认为它所表达的思想需要说出来，尽管并非当前潮流所趋。

希望这份书稿已经在寄往美国的途中。我想你还有一份复印件，或许你可以寄给我，万一我联系上里德，可以给他看一下。

我和戈兰茨的版权怎么说？等我完成所有工作之后，我可以整理那本文集，我非常想把戈兰茨之前出版的关于狄更斯的散文收进去。我想，如果我和其他出版商谈定了《动物庄园》的事，比如凯普出版社，那么他们应该会要我的下一本书——这些随笔。我有没有权利力重印关于狄更斯的文章？这本书现在已经停印了。

您最诚挚的

埃里克·布莱尔

---

[1] T.S.艾略特在费伯&费伯出版社工作，赫伯特·里德在劳特里奇出版社。艾略特为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和编辑，代表作有《荒原》《空心人》。

致菲利普·拉夫（**1944**年**5**月**1**日）

亲爱的拉夫：

非常感谢你4月17日的来信。信今天收到，看来航空邮件的服务明显有所提升。我4月17日从伦敦寄了一封信，5月底之前你应该能收到，除非因为审查而被扣留。信寄出后，我才想起，里面有一些内容可能是审查制度不允许的（当然不是安全问题，而是政策原因），不过我还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说他们拦截了这封信，所以我想应该没事。顺便提一句，审查的人没有打开你的信。

我敢肯定，戴尔出版公司的人现在应该收到了我的书稿[1]。因为你说过和他们认识，所以我想你可不可以要求他们让你看一下稿件。我觉得你会同意这是一本值得出版的书，尽管它传递的“信息”这种时候不太流行。通常，我的作品出版都没什么问题，现在还经常有出版商争着要我的书稿，不过为了这部小说，我可是想尽一切办法在这儿找出版商。几周之前，我经常投稿的一家报社拒绝刊印我的一篇书评，因为它的调子是反斯大林。滑稽的是，斯大林派在这家报社影响力不大，但斯大林似乎逐渐成为一个和曾经的佛朗哥十分相似的形象——一位塑造出来却不能批评的基督徒绅士。苏联政府通过一些安排，使得大多数鼓吹俄罗斯的书都在哈钦森出版社出版。这个像大八爪鱼的出版社不仅出版廉价的劣质小说，还有邪恶的反左翼宣传册，以及来自范斯塔特[2]追随者的半法西斯主义玩意儿。

对于要在戴尔出版的其他几本书，有几本确实已经在美国发行（一直都卖得不多）。我关于西班牙内战的那本书应该再版，当然，这是现在所有计划里最没有希望的一个。我不知道企鹅出版社出版的书在美国卖了没有。1934年哈珀出版社出版的关于缅甸的小说[3]，现在让企鹅出版社负责再版。即使企鹅出版社不能将书卖到太平洋对岸，那里估计也会有人愿意出版，因为最近新闻里经常提到缅甸。我觉得版权是属于我的，不过可以核实一下。还有几本我认为值得再版的书，问题是，这些内容都太本土化，在美国可能很少有人感兴趣。然而，我打算今年秋天重印一本文学评论集。以前就可以这样做了，但我想多写几篇再发表成书，却因为一直忙于其他事情而没有完成。不过，7月底我应该能全部

写完，戴尔出版公司或许会感兴趣。如果能在这儿同时出版，我想应该没什么大碍。

乔治·奥威尔

---

[1] 指的是《动物庄园》的书稿。

[2] 范斯塔特，二战时期的英国高级外交官。

[3] 实际上，《缅甸岁月》这部小说直到1950年1月19日才在美国出版，几天之后，奥威尔病逝。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5**月**9**日）

亲爱的穆尔先生：

我刚刚见过凯普，他愿意出版《动物庄园》，那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关于我和戈兰茨现行的合同细节，我让他去找你帮忙确认。我真不记得合同内容。凯普想让我和他们合作，我当然愿意了，我受够了和戈兰茨那永无休止的政治生意。不管怎样，如果凯普提出出版《动物庄园》的条件是要我把以后的作品都给他们，那么请接受这个条件。我非常希望这本书是基于政治立场出版的。但是，反过来，也尽量说服凯普答应尽快出版这本书。至于下一本计划中的书，也就是再版的几篇，我想应该不难安排。我的合约中还剩三篇文章，不过7月底应该能全部完成，之后便可以装订成书。

您最诚挚的

埃里克·布莱尔

附言：我让我在《党派评论》的朋友看一下《动物庄园》的书稿，看看如果戴尔不愿意接受，出版商会怎么做。我设想的是，如果在这儿能让一家像凯普那么有声望的出版商出版的话，应该会很有帮助。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6月8日）

亲爱的穆尔先生：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关于戈兰茨的事情[1]，真是令人尴尬。然而，我真不记得合同中关于小说正常字数的任何说明。我记得它说的只是我今后的三本小说（你可以在合同里核实这一点）。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动物庄园》应该算作其中之一，因为它当然是一部小说。不过，“正常字数”到底什么意思？即便如此，还需要再算一部小说。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和凯普商量一下，既然戈兰茨推掉了我下一部小说（如果《动物庄园》不算的话，那应该是两部），我其他的作品——包括与戈兰茨合同期满之后的小说，都让凯普出版？这样的话，我只需要凯普等待一两周时间。（顺便提一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写另一部小说。现在看起来不是写作的最佳时刻。）不管怎么样，我也不会再让戈兰茨出版我的非小说类书籍。他的政策变得太快，我都适应不了。你能了解一下凯普对这件事的看法吗？

同时，我们怎么可以对再版的事情坐视不管呢？凯普想出版的话，他们也可以有模子。但是，关于狄更斯的那篇文章之前是由戈兰茨出版的，我打算重印这篇文章。问题是版权归戈兰茨，还是我？我只要再写一篇散文，就可以集结成册了。

《保持叶兰繁茂》一书的事很抱歉，但我认为不值得去重印一本我不在乎的书。如果你告诉雷恩他们我不想重印这本，那么我敢说，他们一定更乐意出版《上来透口气》[2]。

希望凯普那边没有问题，这本书也不用再被出版社抛来抛去。如果可能的话，我真的希望它今年能问世。

您最诚挚的

埃里克·A.布莱尔

---

[1] 约翰逊·凯普于1944年5月26日写信给维克多·戈兰茨说，他打算出版《动物庄园》和奥威尔以后的作品，他想知道戈兰茨是否同意。1944年6月1日，戈兰茨给穆尔写信说，他有一个1937年2月1日的合同，合同里同意出版奥威尔的三

本小说，但他只收到了《上来透口气》这一本稿子。戈兰茨认为自己退稿《动物庄园》并不影响那份合同。之后，穆尔又给奥威尔写了信（信件原件没有找到），这封信就是奥威尔对穆尔的回复。

[2] 奥威尔在世时，企鹅图书没有出版《上来透口气》。这本书于1948年5月在塞克&沃伯格出版公司的同型版系列第一卷中再版。之后在美国出版，该书第一版由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于1950年1月出版，正是奥威尔病逝的那个月。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6月24日）

亲爱的穆尔先生：

关于凯普的事[1]，太可惜了。我打电话给T.S.艾略特，告诉他情况，并且打算周一给他再寄一份书稿。我毫不怀疑，艾略特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是站在我这边的，但正如他所说，他可能没法动摇费伯出版社其他董事的意见。

至于和戈兰茨的合同，如果3万字都不算“正常字数”[2]，那么多少才算“正常字数”？我们现有的合同中有说明具体字数吗？如果没有，可否让戈兰茨出一份明确的声明，解释他所认为的小说的正常字数？合同中规定了这一条，却没有明确的解释，这一点也不合理。

您最诚挚的

埃里克·布莱尔

---

[1] 约翰逊·凯普于1944年5月26日写信给维克多·戈兰茨说，他打算出版《动物庄园》。凯普的主要读者丹尼尔·乔治和C.V.威治伍德都强烈要求出版，这两人当时都为凯普做事。然而，1944年6月19日，凯普写信给伦纳德·穆尔说，他不打算出版这本书。凯普的确担心过奥威尔必须把之后的两部小说都卖给戈兰茨，但是他拒绝的根本原因是基于一位他咨询过的“信息局要员”的陈述。他的结论是“这时候出版此书是十分欠缺考虑的”：部分原因是，这不是针对广义的独裁者的攻击，而是直指苏联；另一部分原因是“选择猪作为统治阶级”可能显得太冒犯。伊内兹·霍尔登在1967年5月27日写给伊恩·奥格斯的信中，总结了凯普拒绝出版的原因和奥威尔的反应：“他说他不能出版，因为他担心“斯大林不太喜欢”。乔治觉得很好笑，我引用他对这句话的回应：“想象一下，（对欧洲语言一窍不通的）老约瑟夫坐在克里姆林宫，一边阅读《动物庄园》，一边说：‘我不喜欢这本书。’”

[2] 穆尔办公室的注解，“合同里只写了‘正常字数’。”

T.S.艾略特关于《动物庄园》的退稿信（1944年7月13日）

亲爱的奥威尔：

我知道你想要我们尽快回复关于《动物庄园》的事情：但至少需要两位董事的意见，而这一周之内是不可能完成的。本来为了尽快给你回复，我应该让主席也看一下这本书。然而，另外一位董事对于主要的几点问题和我持相同意见。我们承认这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书中对寓言的处理技巧十分娴熟，故事的叙述让读者为之吸引，完全进入到故事情景中——自《格列佛游记》之后，很少有作家能做到这一点。

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确信这是不是批评当前政治局势的正确观点（我敢肯定其他董事没有一位能确信）。尽管对于那些假装其他利益和动机高于纯粹的商业财富的出版社来说，出版反时代潮流的书籍肯定是它们的职责；然而不管是哪家出版社，都需要公司里至少有一个人确信这是当前需要说出的事情。我找不到任何好的理由来劝阻其他人出版这本书——如果他相信它所主张的观点。

现在，我自己对这则寓言不满的地方是：它的效果是纯粹负面的。它应该激起读者对作者所宣扬事物的支持，并且赞同他对某些事物的反对；而书中的积极观点——我个人认为基本上都是托洛茨基主义[1]——说服力不够强。我认为你分散了投票，却没有得到任一方更为强力的支持——一派从纯理论的共产主义观点批评俄罗斯倾向；另一派观点截然不同，他们对小国未来忧心忡忡。毕竟，你书中的猪比其他动物聪明多了，所以它们最适合管理庄园——但事实是，如果没有其他动物，就不会有“动物庄园”。因此，真正需要的（有些人可能会辩驳）不是更多的共产主义，而是更多具有公共精神的猪。

我非常遗憾，因为不管谁出版了这本书，自然会有机会出版您以后的作品：我很尊重您的作品，因为这是一部十分真实的好作品。

谢尔登小姐将会用单独的信封把稿件寄还给你。

您最诚挚的

T.S.艾略特

---

[1] 托洛茨基主义，里昂·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宣扬的共产主义政治经济理论，通常包括全世界范围的永久革命原则。

致伦纳德·穆尔（1944年8月29日）

亲爱的穆尔先生：

我刚见过沃伯格。他已经十分确定要在1945年3月左右安排出版《动物庄园》，或许你可以联系他谈谈合同的事情。他愿意付100英镑的预付款，今年圣诞节先付一半[1]。我打算把我以后所有书籍的出版权都交给他，但是希望不要完全限制我，因为我有时出于一些特殊原因，会抽出一本让其他出版社负责。我已经完成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我会尽快打印出来，寄给你一份。沃伯格可能要等到明年什么时候才能出版，不过，同时我们应该尝试出一份美国版的。戴尔出版公司已经要求看一下这本书，我差不多也答应寄给他们[2]。

您最诚挚的

埃里克·A.布莱尔

附言：从9月1日起，我的地址将变为：

伦敦北一区

伊斯林顿

加南柏里广场1号[3]

我可能9月8日才搬进去，所以邮寄现在《论坛报》的地址最保险。

---

[1] 奥威尔的账本上显示他收到塞克&沃伯格出版公司45英镑的版税，没有写具体日期。这刚好是100英镑减去10%的经纪人佣金后的一半金额。

[2] 奥威尔信中的注解表明，穆尔9月1日给塞克&沃伯格出版公司写过信。有一个便条，上面写着：给塞克打电话，查询“布莱尔最后一笔款项”。还有一条关于戈兰茨出版公司版税标准的注解，最后一部分看不清楚：戈兰茨 10% 2000，15% 3000，20%（辨认不清）。

[3] 这里的数字“1”不清晰，奥威尔的地址应该是加南柏里广场27B。

关于**P.G.**伍德豪斯[1]寄给奥威尔的两封信（**1945**年）

在奥威尔的书信中，有两封P.G.伍德豪斯的来信，分别于1945年7月25日和8月1日从他的公寓（巴黎第16区保罗杜穆尔大街78号）寄出。伍德豪斯非常感谢奥威尔在《为P.G.伍德豪斯辩护》一文中对他的评价。

他在第一封里写道：“我想，我从没读过比这更好的评论。您对我作品的每一处点评都相当准确。太不可思议了。”

第二封信中，他说：“我想再次感谢您的这篇文章。您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这样写作，实在是太友善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一直在反复阅读这篇文章，越发被点评的精妙所折服。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我对文中的每一个字都非常认可。”

很明显，奥威尔在巴黎为《观察家》工作时，曾经带伍德豪斯一家去大堂[2]附近的一家餐馆就餐。奥威尔大概曾经希望以一种平和直接的友善态度，续写这篇文章。自此之后，伍德豪斯一家再也没去过餐馆，但P.G.伍德豪斯非常迫切地希望，如果奥威尔重返巴黎，自己能够答谢他，他觉得自己欠了奥威尔“一顿顶级大餐”。

奥威尔似乎回复了伍德豪斯7月25日的来信，还告诉他艾琳的死。8月1日的信中，伍德豪斯对奥威尔的丧妻之痛表示十分同情：“恐怕，现在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用，但我和妻子对您的遭遇是感同身受。约莫一年前，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女儿，我们很能理解这样的伤痛。”

伍德豪斯在1945年4月29日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奥威尔对他作品的评论十分精彩。他赞赏奥威尔“以一种当时很不受欢迎的角度”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还说“他真是个好人。”这段话似乎表明，奥威尔曾经提前给伍德豪斯寄了这篇文章的打字稿或修订稿。奥威尔辞世后，伍德豪斯于1951年8月11日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口吻给丹尼斯·麦凯尔（J.M.巴里[3]的传记作者）写了一封信。他将这篇文章描述为“实际上，就是你们记

者的一篇长篇痛斥文，你难道不厌恶这种为了说明一个观点而虚构事实的评论吗？”他抱怨的是奥威尔描述的“伍德豪斯难以亲近”。伍德豪斯声称，这是他在美国的生活所导致的。因为他在那儿写不了美国故事，而“美国大众唯一会看的英国人物就是夸张的花花公子”。这两封信刊登在《星期日电讯报》1990年8月19日评论版的专题《敬启：普拉姆[4]》。

---

[1] 即佩勒姆·格伦维尔·伍德豪斯，英国幽默小说家。二战期间在法国被德国人监禁，拘留一年。出狱之后，纳粹怂恿他以狱中幽默段子为基础写一系列广播剧，听众对象是美国。广播播出后，人们指责他站在纳粹一边，出卖祖国。伊夫林·沃和乔治·奥威尔为他辩护，认为他不是叛国者。

[2] 大堂，Les Halles，法国巴黎的一个区域，位于第一区，时尚的蒙特吉尔街的南端。

[3] J.M.巴里，苏格兰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是《小飞侠》。

[4] 普拉姆，P.G.伍德豪斯的昵称。

致索尼娅·布朗内尔[1]——关于朱拉岛之行（1947年4月12日）

阿盖尔郡

朱拉岛

巴恩希尔

最亲爱的索尼娅：

打字机在楼下，这封信我就手写吧。我们昨天安全到达了。理查德[2]表现得很好，克服了最初的陌生感后，他睡得十分香甜。可能是因为周围很吵，我们在格拉斯哥刚上飞机，他就睡着了。我之前来这里从未坐过飞机，坐飞机真的方便很多。虽然要多花2到3英镑，但节约了近5个小时的时间，还免去了船上的无聊。即使你觉得不舒服，也只难受45分钟，但是在船上你要是不舒服，碰上坏天气，你得足足忍上5到6个小时。现在的气候跟英格兰一样，看不到任何盛开的花，而且昨天还下了场大雪。不过现在这里已是非常舒适的春天，我新年种下的植物大部分似乎也都存活了下来。我仍然在全力对付着这片未开垦的草地，不过我想到明年这就会有个漂亮的花园了。当然，今天一整天都在整理东西，忙得我们焦头烂额。理查德还太小，什么都帮不上。但慢慢地我们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至少现在屋子里看起来很整洁。想要把交通的问题完全解决，可能还得几个星期，否则我们早已装备好了。鸡舍搭好之后，我就叫人去弄些母鸡来。今年我还存了些酒，所以每天我们都能喝一点朗姆酒。想起去年那时候，我们还总想着留到明天喝。我想一周之内能把一切理顺，等做完花园里必要的活计，之后便可以安心工作了。

我给杰内塔[3]写了信，请她随时来做客，也告诉她旅行的注意事项。只要她能带着孩子，而不是来回接送孩子的话，事情就好办多了。我想告诉你这趟旅程的全部细节，其实没有报纸上写得那样令人望而生畏。事实是这样：

周一、周三、周五有去朱拉岛的船。你们早上8点必须要在格拉斯哥赶上港口联运火车，这就意味着前一天晚上你们最好在格拉斯哥过夜。因为通宵火车总是晚点一两个小时，这样肯定会错过港口联运火车。具体的时间表如下：

早上8：00离开格拉斯哥中央车站去古罗克。

在古罗克乘去塔伯特的船。约中午12：00到达东塔伯特。

乘公共汽车去西塔伯特。（公共汽车和船的运营时间相互对应。）

在西塔伯特乘坐港口联运火车去克雷格豪斯（朱拉岛）。

约下午3：30到达克雷格豪斯。

雇一辆车去利尔特，我们在那等你。

如果你想坐飞机来，每天都有航班（我想除了周日）。除非雾很大，否则航班不会被取消。这是行程单：

10：30到达苏格兰航空的办公室，在格拉斯哥的圣恩诺赫站（航空办公室就在火车站里面）。

10：40乘公共汽车去格拉斯哥伦弗鲁机场。

11：15乘飞机去艾莱。

中午12：00 到达艾莱。

雇一辆车（或者坐公共汽车）去渡口，那里有船去朱拉岛。

大约下午1：00，摆渡过去。

雇一辆车去利尔特。

你来之前一定要提前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得去雇车。这里每周只收两次邮件，所以我只有两次机会把信寄到克雷格豪斯去预订车辆。如果你坐船来，在码头问问，应该很容易能找到车；但如果你们坐飞机来，若不提前预订，在渡口（离克雷格豪斯好几英里）那里可不会有车

的。所以如果你决定，比如说6月15号来，那最好6月5号左右就写信过来。因为根据你寄出的日期，可能四五天后我才会收到，而且我寄出的预订信还得三四天后才能到。发电报不管用，这里的电报都是邮递员递送的。

你需要一件雨衣，如果可能的话也带上结实的靴子或鞋子——比如胶靴，如果你有就带上吧。这里可能会有富余的胶靴，不过我不确定——防雨衣这类倒挺多的。如果可以的话，能带上些口粮吗？带一周的分量就好，因为在这里给新来的人准备一份得花点时间。你顺便也可以带些面粉和茶叶。

我在想我是不是把这趟旅程讲得太吓人了，其实一切都很简单，我这里的房间也很舒适。你住的那间比较小，但是窗外就是大海。我非常希望你能够来这里。但愿那时我已经给船装好了发动机，这样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能去岛的西边、那些无人的海湾去转转了。那里有白色的沙滩、清澈的海水，还能看见海豹游泳。其中一个海湾有一个岩洞，下雨时可以避雨。另外一个海湾有间牧羊人的废弃小屋，但还能住人，甚至可以在里面野餐一两天。不管怎样，你一定要来。什么时候都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只要提前告诉我就行了。同时，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持愉快的心情。

我刚刚记起来，上次你给我带的白兰地，我一直没付给你钱，所以这次我把3英镑装在了信封里。大概是这么多，对吧？那瓶白兰地口感很好，在旅途中尤其为人喜爱。在这里想弄到酒十分不易。（在另一个岛——艾莱——有提纯的威士忌，但全是运往美国。）上次我给一个卡车司机倒了一大杯白兰地，比双份还多，他一口就干了，那酒似乎一瞬间就落到了他的肚子里。

献上我所有的爱

乔治

---

[1] 索尼娅·布朗内尔（Sonia Brownell，1897-1985），奥威尔的第二任妻子。奥威尔在40年代初遇见她，并于1949年与她结婚，此时距离奥威尔去世只有3个月。索尼娅是《地平线》杂志的两个编辑助理之一（1945-1950年担任）。奥威尔的朋友托斯卡·法伊弗尔在《乔治·奥威尔：私人回忆录》中写道：“1945年艾琳去世后，（奥威尔）与索尼娅·布朗内尔……有过一段短暂的（并不令人满意的）感情。”

[2] 理查德，1944年6月，奥威尔和他的第一任妻子艾琳·奥肖内希领养了一个男婴，取名为理查德。

[3] 即杰内塔·伍利（Janetta Woolley），她是杂志《地平线》和《辩论者》出版人的一个朋友。她结识乔治奥威尔可能是通过她的前夫汉弗莱·斯拉特（Humphrey Slater）；不过更可能的是通过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她的

女儿尼科莱特（Nicolette）当时大约4岁，就是信中提到的那个孩子。索尼娅·布朗内尔曾建议奥威尔，尼科莱特可以成为小理查德合适的小伙伴，所以奥威尔邀请了她们，不过杰内塔和尼科莱特最终并没有前往朱拉岛。此外，杰内塔和大卫·阿斯托尔（David Astor）还是乔治·奥威尔和索尼娅·布朗内尔的证婚人。

致弗雷德里克·沃伯格（1945年10月22日）

阿尔盖郡

朱拉岛

巴恩希尔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现在应该收到我的电报了，如果你还想说什么，你可以在收到这封信后再给我发电报。上天保佑，希望我能在11月初将此书写完。想到要将此书打出来我就想打退堂鼓，在床上打字实在太别扭了，而我每天还得有一半的时间待在床上。副本的事情也很令我头疼，这本书实在是太长了，会超过10万字，也许会达到12.5万字。我的手稿很潦草，没法请别人替我打字，没有注释其他人是无法彻底弄明白的。但如果我眼皮底下有一个掌握技能的打字员，应该就可以轻松地应付这个差事。如果你觉得有谁愿意干这个差事，我会将路费和所有注意事项寄给她。她在这儿应该可以过得很舒适。这里有足够的食物，我也会确保她的工作环境温暖舒适。

我目前对这本书还不满意，但也不算完全失望。我第一次构思这本书是在1943年，我觉得构思很好，但如果我没被肺结核折磨，还能写得更好。我还没完全确定书名，在“1984”和“欧洲最后的人”这两个标题之间犹豫不决。

我刚刚收到了你出版的那本萨特反犹太主义的书[1]，我会写一篇书评。我觉得萨特就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我准备好好批判一通。

你的

乔治

[1] 萨特的那本书是指《反犹太主义者的肖像》，奥威尔的书评于1948年11月1日发表在《观察家》上。

致伦纳德·穆尔（**1948**年**10**月**22**日）

阿尔盖郡

朱拉岛

巴恩希尔

亲爱的穆尔：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我很高兴获悉瑞典语版《动物庄园》正在翻译中。

我基本上写完了手上的小说，11月初应该可以定稿，然后准备打出来。我之前承诺12月初之前全部完稿，这应该没问题。这本书非常长，应该会有10万字，甚至达到12.5万字。我还没决定书的名字，我倾向于叫“1984”或者“欧洲最后的人”，不过一两周内我也许能想出别的名字。

你忠诚的

埃里克·布莱尔

致弗雷德里克·沃伯格关于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1949年3月30日）

格洛切斯特

克兰汉姆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谢谢你的来信。[1]几年前，我读过《我们》，不过我并没有说一定要看到它的重印版。我不想强迫你什么，只是觉得不管是由你还是由别人来做，这本书都值得再版。毫无疑问，这本书里也有错误的观点，但至少对于我而言，它构成了一系列乌托邦书中有趣的一环。一方面，这本书揭示了乌托邦的超理性和享乐主义（我认为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2]在一定程度上抄袭了这本书）；另一方面，书中也考虑到了它的魔鬼性质和一种回归文明早期形式的趋势，即部分的集权主义。对我来讲，《我们》和《铁蹄》[3]都是有价值的书，但前者写得更好些。当然，没人知道这样的书出来会不会好卖，我也不想给你讲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我只是觉得有人应该出版这本书。因为在如今这样一个垃圾横行的时代，若如此一本有着有趣的历史和内在特质的书都不能出版，那将是一件可耻的事。

我最近感觉很糟，有时甚至咯血。所以这封信我是用手写的。此外，他们这周还禁止我使用打字机，可能担心我天天打字会累坏吧。请向大家转达我的关心。

你的

乔治

---

[1] 1949年1月1日，格列布·斯特鲁夫从旧金山伯克利（他教书的地方）写信给奥威尔，告诉他有家出版社准备出版扎米亚京的《我们》，但这家名叫韦斯特豪斯的出版社现在却在一些公司资产清理人的手中。虽然扎米亚京夫人（在巴

黎）拿到了25英镑的预付款，但还有很多款项没有被支付。斯特鲁夫问奥威尔是否知道一些沃伯格那边的消息。1949年1月26日，沃伯格写信给了斯特鲁夫。约两个月后，奥威尔与沃伯格在聊天中谈及《我们》在出版中的一些问题。沃伯格说公司的资产清理者们已向他确认，只要他有意，他就能拿到接管韦斯特豪斯的一些证明。在1月的第3周，奥威尔给沃伯格看了斯特鲁夫1月1日寄来的信，而沃伯格也向斯特鲁夫确认，他仍然怀着巨大的热情想出版《我们》这本书。当时斯特鲁夫还是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他1月22日回信给沃伯格说，之前的英文译本并不令人满意，但在他的建议下已经被修订了，现在应该很准确了。他在信中也评论说，“弗洛斯特的译文（斯埃夫修订）比1925年出版的美国译本好多了，虽然那位美国的出版人（杜顿）否认了这一点。”沃伯格3月8日回信给斯特鲁夫说，公司资产清理人希望最近就与我们探讨一下《我们》这本书的问题。

[2] 《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英国作家奥尔德斯·伦纳德·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于1931年创作、1932年发表的反乌托邦作品。与《1984》和《我们》并列为世界三大反乌托邦小说。

[3] 《铁蹄》（*The Iron Heel*），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政治幻想小说。

致朱利安·西蒙斯[1]（1949年6月16日）

格洛斯特市

克拉汉姆区

克拉汉姆旅馆

亲爱的朱利安：

我想《时代文学·增刊》上《1984》的书评应该是你写的。真的很感谢你这篇给予我极高评价的书评，写得很出色。我之前并未预料到你可以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将书的精髓把握得如此到位。关于101房间[2]的那些粗话，你的意见是对的。我写作的时候其实注意到了这点，但我想不出还能用其他什么方法能表达出我想要的效果。

自从上次与你见面之后我就一直病得很严重，最近几周才稍微好转，希望我现在已经算渡过难关了。我看过的医生都在鼓励我，不过也嘱咐我要静心养病，长时间内不要工作。他们说可能的话一年之内都别工作，我当然不希望这么长。那样会很乏味，不过如果能康复也是值得的。理查德整个夏天都住在附近，每周都会来看望我一次。他已经开始上幼儿园了，这个冬季就会去朱拉的乡村学校上学，我不知道他得在那儿待上多久。我想等他再长大一点把他送到威斯敏斯特。据我所知，威斯敏斯特的学校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只收贵族学生了。这是一所走读学校，我很喜欢这点，当然它还有其他优点。不管怎样，我会先打听一下，如果合适的话就替他报名。尽管没有谁知道1956年之前又会发生什么，但我们总得事先计划好，如果日后风平浪静也用得上。

燕卜荪[3]一家在北平，不知你有没有他们的消息？我不确定你是不是认识他们。由于听到了很多关于他的各式各样的流言，我正试图从他的美国出版商那里打听他的消息。

你读过鲁斯·费希尔的《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了吗？此外，我想她明天会来看望我。

祝大家一切安好，宝宝茁壮成长。请向你的妻子带去我的问候。

你的

乔治

---

[1] 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1912-1994），英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评论家。

[2] 101房间，奥威尔在《1984》中提到的一个恐怖房间，是极权主义权力支配的象征。

[3] 燕卜荪（1906-1984），英国诗人、著名文学批评家，他跟奥威尔在二战时是BBC东方部的同事。1937-1939年，燕卜荪先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燕卜荪”是他为自己取的一个中国名字。

致大卫·阿斯特[1]（1949年7月14日）

格洛斯特市

克拉汉姆区

克拉汉姆旅馆

亲爱的大卫：

我才见过里奥·罗伯森。我跟你提到过，他是我在缅甸的老朋友。我让他写信给你，看你能不能和他面谈一次。他大概55岁，出生在印度，小时候也在印度长大，后来赴英读书，在缅甸做生意，又在印度入了伍。他先是在缅甸当律师，1942年时又成为了一名法官。缅甸民族解放后，他又干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除了对缅甸了如指掌，对印度略知一二之外，还会说中文，且去过中国；不过我想他只去过中国的云南。他翻译中文著作，但他的专业却是印度哲学。他写了很多文章，但大部分都不是新闻稿的风格。我肯定这个人和他的背景知识，能多少为你所用。不管怎样，我想他会自己写信联系你的。

我恢复得很好，这过程虽缓慢，但我觉得自己好多了。

理查德也一切平安，他住得离我很近，每周都会来探望我一次。

你的

乔治

---

[1] 大卫·阿斯特（David Astor，1912-2001），英国著名报纸出版商。

致鲁斯·费希尔（1949年7月15日）

格洛斯特市

克拉汉姆区

克拉汉姆旅馆

亲爱的费希尔小姐：

真的很感谢你寄来的那些巧克力，前些日子就收到了[1]。希望你在德国过得愉快，不至于太压抑。我的身体基本上还是老样子，稍稍有些好转。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会再待在法兰克福，也许这封信得托人转交给你了。如果你还在法兰克福，我想知道你是否见过一份叫《珀西佛》[2]的俄罗斯民主党报纸，在法兰克福有印刷厂。《珀西佛》那边寄给我一个文件夹，里面是格列布·斯特鲁夫翻译的俄语版《动物庄园》。我很了解这个译者。他们说打算出版这个译本，显然这是个好主意，但这样的出版需要募集资金。我猜这份报纸的编辑是很善良的人，而且不是白方的人[3]。

你忠诚的

乔治·奥威尔

---

[1] 根据奥威尔于1949年6月16日写给朱利安·西蒙斯的信，鲁斯·费希尔将在6月17日探访奥威尔。7月4日，鲁斯致信奥威尔，感谢他寄去的《缅甸岁月》的书。鲁斯信中说，书“几天前”就到了。她还感谢奥威尔能抽出时间见她，又怕这样会令奥威尔“身心疲劳”。

[2] 俄语版的《动物庄园》是由M.克里格和格列布·斯特鲁夫合译，发表在社会与政治周刊《珀西佛》上。珀西佛周刊社成立于1945年，是在战后德国成立的第一家俄罗斯出版机构。“珀西佛”意指“种子的播种”，暗含“从苏联逃生”的意味。珀西佛在伦敦和法兰克福都设有办公室（后者于1962年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炸毁）。《珀西佛》“公开反苏联”，并向苏联公民发放书籍，鼓励他们在国内“为了基督教民主而斗争”。

[3] 白方的人，指的是反革命的人，也就是白军，是1917-1921年列宁苏堆埃革命期间红军的对立方。“白”也暗指法国旺代区的保皇主义势力，他们反对法国大革命，他们的徽章是白色百合的图案。

致伦纳德·穆尔（1949年7月24日）

格洛斯特市

克拉汉姆区

克拉汉姆旅馆

亲爱的穆尔：

谢谢你22号的来信。

关于《动物庄园》俄语译本的事情，我想多了解一些你正在进行的谈判，毕竟有两点需要解决。首先，如果你和他们真的能谈妥一些事，他们也许可以用《珀西佛》已经发表的版本，这样也能节省他们的时间。我相信《珀西佛》的版本一定翻译精良，因为我很了解译者格列布·斯特鲁夫先生。其次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有任何俄文版本能印刷成册，就应该将这些书运到苏联境内。这书仅仅在难民中传阅无济于事，尤其是我并不觉得苏维埃民主党党内有很多说俄语的人。《珀西佛》那边说他们知道如何能带一批书过境——他们一定有办法，毕竟他们身处德国。因此我愿意拿出我能拿的资金来资助印刷，毕竟偷偷带入苏联境内的那批书只会被免费传阅。你能否再打听一下，看看跟你谈判的那些人知不知道如何在苏联境内发放这些书？也许他们可以和《珀西佛》那边的人共同制订出计划。当然，要谨慎行事。我不希望乌克兰语版的悲剧重演[1]。

你忠诚的

埃里克·布莱尔

---

[1] 美国军政府查封了一批乌克兰语版的《动物庄园》，交给了苏联官方。根据塞克&沃伯格出版公司的统计，这次被收缴的有5000本。而从之前1947年9月20日奥威尔写给亚瑟·科斯特勒的信中看，当时奥威尔听到就有1500本被收缴。

致大卫·阿斯特（1949年7月18日）

格洛斯特市

克拉汉姆区

克拉汉姆旅馆

亲爱的大卫：

不知道你最近怎么样。我从查罗克斯[1]处听说“跟预期的一样”，你恢复得并不太顺利，这让我稍稍有些吃惊。我还以为你做的是个小手术。你能提笔写字的时候别忘了告诉我你身体如何。

理查德昨天回到了朱拉，他会去阿尔德鲁萨村里的学校开始冬季学期，这月底就会开课。我很高兴他在幼儿园过得很愉快，成绩也不错，我都没注意到他已经学了那么多东西。

我最近过得马马虎虎，有起有伏。我明白他们说的疾病恶化是什么意思了，就是周期性的高烧等，不过总体来说我觉得我好多了。专家莫兰下周会来看望我。等我身体恢复了，大概是明年吧，我打算再婚。我猜大家都会感到震惊，但这对我不失为一个好的打算。我想如果结了婚，有个人照顾我的话，我能活得更久一些；当然我也有其他考虑。新娘是索尼娅·布朗内尔，她是《地平线》杂志的编辑助理，我不记得你是否知道她，不过可能认识。

很明显我应该接受一段长时间的医疗护理，甚至退烧之前都不能下床。过些日子我可能会搬到伦敦附近的一个疗养院，莫兰应该有相关打算，但目前我觉得我的身体无法承受长途奔波。

你读过《裸者与死者》[2]了么？这本书棒极了，可以算是以二战为背景的小说里最好的书了。方便时请回信。

你的

[1] 查罗克斯是照片装框师和修补师。奥威尔在把照片寄到朱拉的途中时受损了一张，阿斯特介绍他来给奥威尔修补照片。

[2] 《裸者与死者》写于1948年，作者是诺曼·梅勒。奥威尔在1949年8月将此书列入自己的已读书目。

致托斯科·法伊弗尔[1]（1949年8月11日）

格洛斯特市

克拉汉姆区

克拉汉姆旅馆

亲爱的托斯科：

十分感谢你和玛丽寄给我的这些好吃的蜜饯。这些蜜饯现如今已经很难买到了，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还在卖。对于推迟上周六与你们见面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希望并没有完全打乱你们的计划。当时我突发高烧，体温骤然上升。高烧并不会持续太久，但却很恼人，发病时我都快不成人形了。

理查德这周末会回到朱拉，因为他准备回到乡村学校上学，课程这个月末就会开始。虽然我并不能明显感到书本知识对他的改变，不过我想他在幼儿园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想暂时把他安置在威斯敏斯特，但他要到1957年才能去那儿，天知道到时又会发生什么。

我只能就此搁笔了。现在我连写一封信都能筋疲力尽，实在太不可思议了。请再次向大家转达我浓浓的爱与感谢。

你的

乔治

---

[1] 托斯科·法伊弗尔，奥威尔离开《论坛报》后，法伊弗尔担任《论坛报》文学编辑。法伊弗尔写过一本关于奥威尔的回忆录。

致伦纳德·穆尔（1949年8月12日）

格洛斯特市

克拉汉姆区

克拉汉姆旅馆

亲爱的穆尔：

日本来的合同已随函附上。我很抱歉没注意到其中一份写成了“埃里克·布莱尔”，我已改成我名字的首字母“G.O”。不过我猜这样的修改应该不碍事。

关于《动物庄园》的翻译版本，以下这些版本我都有不止一本：分别是德语版、乌克兰语版、葡萄牙语版、波兰语版、丹麦语版、波斯语版、荷兰语版。

我也有意大利语版、法语版、瑞典语版及挪威语版的，不过都只有一份。我想西班牙语版、日语版、韩语版、现代希伯来语版以及多种印度语版的应该都在翻译中，虽然我还没见过这些版本，不代表它们还没出版。西班牙语版肯定已经出版了，我曾经看过一篇对此的评论。

对于我提到的那些我仅有一份的版本，也许你可以复印一本？或者去买一本？

我已经给《珀西佛》写了信，告诉他们继续我们之前的计划，也说了你正在联系列弗·拉尔[1]先生。关于书的情况我又问了些问题，他们明确表示没有什么问题。

你忠诚的

埃里克·布莱尔

---

[1] 列弗·拉尔（Lew Rahr，1913-1980），苏联流亡文学作家。奥威尔写这封信时，列弗·拉尔在伦敦担任BBC的俄

语编辑，同时也为一家俄语杂志工作。

致弗雷德里克·沃伯格（1949年8月22日）

格洛斯特市

克拉汉姆区

克拉汉姆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能请您把《缅甸岁月》和《上来透口气》通过《地平线》杂志社各寄一本给索尼娅·布朗内尔么？

莫兰今天晚上又要来拜访我。我最近经常感到极度恐惧。这种感觉一阵一阵的，我又总会周期性地发高烧，等等。我会告诉你莫兰说了些什么。理查德已经回到了朱拉，冬季学期开学时会去村里的学校上学。除此之外，我暂时还没有其他计划。我本来已打算将他安置在威斯敏斯特，但他要到1957年才能去那儿，天知道到时又会发生什么。我告诉过你我会做些什么：如果我还能活着的话，我想再婚（娶索尼娅）。我猜大家知道后都会震惊，我真的觉得如果结婚了我能活得更久，这是一个因素，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我已经把明年要出版的文集的计划草拟出来了，不过我还想加上两篇关于约瑟夫·康拉德和乔治·吉辛的长文。当然，我只有在身体完全恢复后才能动笔。

爱大家的

乔治

沃伯格8月23日在办公室写了回信，这是部分摘录：

“关于你信中提到的一部分，我会按要求将《缅甸岁月》和《上来

透口气》各寄一份给索尼娅。关于文集的事情，如果一定要等到你写完关于康拉德和吉辛的散文，那书可能就无法在1950年出版了。对于书里是否需要这些文章，你一定比我更清楚。不过我有个好办法，当你状况好些后，你可以先给我一份清单，告诉我哪些文章已经完稿可以被收入书内。最好能标注每篇文章的字数。”

致弗雷德里克·沃伯格（1949年8月24日）

格洛斯特市

克拉汉姆区

克拉汉姆旅馆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和祝福。我和莫兰计划到他在伦敦的医院里住上一两个月，但还没确定具体日期，我想应该是两三个星期后。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有其他合适的疗法，不过莫兰和这里的人们都觉得这样的改变对我是好事。

对于计划出版的文集，除了两篇关于康拉德和吉辛的长文章（这两篇合计约15000字），我还想重印下面这些文章：

《李尔王、托尔斯泰及弄人》（1947年发表于《争论》杂志）约6000字；

《政治与文学》（对斯威夫特的评论）（1947年发表于《争论》杂志[1]）约6000字；

《回想甘地》（1949年发表于《党派评论》杂志）约3000字；

《政治与英语》（1946年发表于《地平线》杂志）约6000字；

《猎象记》（1936年发表于《新写作》杂志）约3000字；

《穷人之死》（1945年发表于《现在》杂志[2]）约3000字

我觉得有必要加上康拉德和吉辛这两篇文章，这是我无论如何都要

写的。我会在身体恢复时动笔。

爱你们每一个人的

乔治

沃伯格于8月26日回信，信中对奥威尔将很快前往伦敦的这一好消息感到很欣慰。他希望奥威尔不至于被疏忽，而“浪费太多时间拖着病躯待在克拉汉姆”。他确信换一个环境对奥威尔有好处，当奥威尔“稳妥地在学院医院安顿”后，一切都会有所改观。他承诺他会记住奥威尔给文集提出的建议，不过他也在信中对奥威尔写道：“只有当你身体康复了，能动笔写最后两篇文章时，书才能开始编印。”

---

[1] 这里存在笔误，这篇文章实际上发表于1946年。

[2] 这里存在笔误，这篇文章实际上发表于1946年。

关于文学评论家德斯蒙德·麦卡锡寄给奥威尔的一封信（**1949**年**12**月**29**日）

奥威尔的书信中，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来自文学批评家、记者德斯蒙德·麦卡锡（1877-1952）。他说他曾给奥威尔写过两封信，不过都因为言不达意而撕掉了。他借着和索尼娅一起吃饭的机会，让她帮忙向奥威尔致以问候。他认为奥威尔在“英语文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评价奥威尔是“这一代人中仅有的几位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在结尾写道：“我们并不怎么相识，不过我想告诉您，我非常尊敬您这样的一位作家。”

奥威尔作品集

致敬加泰罗尼亚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胡萌琦 曹思宇 黄颖 译

HOMAGE TO CATALONIA

奥威尔首先是先知，其次才是圣徒。
——止庵

他能够在目睹最糟境况的同时为最美好的东西而战。
——Granville Hicks

我的整个经历反而令我更加坚信人类的善良。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致敬
加泰罗尼亚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胡萌琦 曹思宇 黄颖 译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敬加泰罗尼亚/（英）奥威尔 著；胡萌琦，曹思宇，黄颖 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7

（奥威尔作品集）

ISBN 978-7-5680-1140-2

Ⅰ.①致… Ⅱ.①奥…②胡…③曹…④黄… Ⅲ.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5801号

致敬加泰罗尼亚

Zhijing Jiatailuoniya

[英]乔治·奥威尔 著 胡萌琦等 译

策划编辑：刘晚成

责任编辑：杨静

特约编辑：徐心 王瑜玲 胡萌琦

责任校对：何欢

封面设计：喃风

责任监印：张贵君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3

印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9

字数：159千字

版次：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由的保障，良知的坚守

我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无足轻重，留下的回忆也大多不愉快，但我仍庆幸自己曾经参与这场战争。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第一章

我参加民兵组织的前一天，在巴塞罗那的列宁营中看见一名意大利民兵正站在军官的桌前。他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外表粗犷，长着一头发红的金发，肩膀宽大有力，皮质大盖帽压得低低的，遮住了一只眼睛。他侧对着我站在那儿，低着头，不解地皱着眉，盯着另一名军官摊在桌上的地图。他的脸上有某种东西深深打动了我。这是一张敢于杀戮、不惜为朋友献出生命的面孔——带着那种无政府主义者的漠然神情，尽管他很可能是共产党员。这张脸既坦率又凶悍，还透着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对所谓文化人的很勉强的敬重。很显然，他对那张地图茫无头绪，而且把看地图当成一项了不起的知识分子的专利。不知道为什么，很少有哪个人——我的意思是任何人——能够在初次见面就博得我的好感。当时他们正围着桌子讨论，有人提到我是个外国人，于是那个意大利民兵抬起头，快速地问：“意大利人？”

我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回答：“不，英国人。你呢？”

“意大利人。”

我们正要出门时，他穿过房间，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这种对陌生人突然产生的情感真是太神奇了！仿佛他的精神和我的精神在一瞬间跨越了语言和传统的鸿沟，紧密相连。我喜欢他，希望他也同样喜欢我。但我也知道，为了保留他在我心中的第一印象，我就不能再见到他。当然，我也的确再没有与他重逢。在西班牙，人们之间的联系通常就是如此。

我之所以提起这个意大利民兵，是因为他始终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他那破旧的制服，那张融合着野性、狂热与伤感的脸庞，于我而言，这就是当时那种特殊气氛的象征。他与我关于那段战争的所有回忆交织在一起——巴塞罗那的红旗，满载着衣衫褴褛的士兵缓缓前行的破旧的火车，铁路沿线那些灰暗的饱受战争之苦的城市，以及山间泥泞、冰冷的战壕。

那是1936年12月下旬，距此时我写下这些文字还不到7个月，然而那段时光已然褪色。之后发生的事件彻底冲淡了它，人们对它的记忆甚

至还不及对1935年或1905年清晰。我最初来到西班牙是打算写一些新闻报道，但一到那儿就加入了民兵组织，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似乎是唯一可以做的事。加泰罗尼亚仍处于无政府主义者控制之下，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虽然对于任何从革命伊始就身处其中的人而言，革命高潮似乎在当年12月或次年1月就已过去，但在一个从英国初来乍到的人眼中，巴塞罗那的方方面面却着实令人震惊。这是我第一次置身于由工人阶级掌控的城市。大大小小每一座建筑都被工人占领，挂上了红旗或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旗帜；每一面墙上都涂画着锤子和镰刀的图案以及革命党的缩写标记；几乎每一所教堂都遭到洗劫，圣像被焚烧，各处的教会建筑统统被拆毁；每一间店铺和咖啡馆都挂出了告示，声明已归集体所有；甚至连擦鞋匠们也被集体化了，他们的工具箱被涂成了红黑两色。服务员和商店的导购员直视着顾客，将他们视为平等的对象。再也见不到卑躬屈膝的言行，哪怕是形式上的礼节也暂时消失了。没有人用“先生”或“Don”[1]之类的字眼，就连“您”也不再使用；大家彼此以“同志”和“你”相称，问候语也由“早安”变成了“祝你健康！”法律禁止支付小费，我初来乍到时就因给电梯服务生小费而被酒店经理教育了一番。这里的私家车均被征用，所有的电车、出租车以及其他各类交通工具都被涂成红黑两色。革命标语随处可见，满墙红色或蓝色的海报鲜明而夺目，令所剩无几的旧广告形同涂鸦。在这个城市宽阔的主干道兰布拉斯大街上，拥挤的人流往来穿梭，大喇叭从早到晚播放着革命歌曲。而最为怪异的则是这里的人。从表面上看，这个城市的富裕阶层已不复存在。除了少数妇女和外国人，城里根本见不到“衣着考究”的人。几乎人人都穿着简朴的劳动阶层的服装，像是蓝色的工装裤，或是类似民兵制服的衣服。所有这一切都如此奇特而动人。这其中有很多东西我弄不明白，甚至就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不喜欢，但我立即可以断定它值得我为其战斗。此外，当时我认为，正如我所见到的那样，这里是一个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国家，资本家们或逃亡或被消灭，或已自愿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但我并没有意识到，大批的资产阶级分子只不过是潜伏下来，暂时伪装成无产者而已。

与这一切并存的则是罪恶的战争气氛。城市伤痕累累，道路和建筑物年久失修，出于对空袭的恐惧，夜晚的街道灯光昏暗，店铺大多破旧且空空荡荡。肉制品稀少，牛奶也几乎供应不上，煤、糖、汽油之类的物资匮乏，面包供应短缺尤为严重，等待买面包的队列时常有几百码[2]长。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依旧充满希望。没有人失业，生活物资的价格仍相当低廉；城里几乎见不到穷困潦倒的人，除了吉普赛人之外也没有乞丐。最重要的是，人们对革命和未来充满信心，感到突然间进入

了平等与自由的时代。人们正试图活得像个真正的人，而不是资本家的机器上的齿轮。理发店里张贴着无政府主义者的通告（那些理发师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郑重声明理发师不再低人一等。大街上的彩色海报呼吁妓女们从良。在冷漠自负的英国人眼里，这些奉行理想主义的西班牙人着实可悲，他们竟然还相信那套革命的陈词滥调。当时那些通俗的革命歌曲宣传的都是无产阶级的兄弟情谊和墨索里尼的邪恶罪行，大街上随处可见这类歌谱，几分钱就能买到一份。我经常看见目不识丁的民兵买下一份歌谱，辛辛苦苦地拼读，一旦摸着门道，就起个调儿唱起来。

那段时间我待在列宁营，名义上是进行赴前线前的训练。我参加民兵组织之初即被告知，次日就会被派往前线，但事实上，我不得不待在新连队做准备。这些工人民兵是在战争初期由工会临时挑选出的，尚未被整编为常规的军队建制。民兵队伍的最小建制是“小队”，约30人，一个“连队”约100人，而“纵队”的人数通常更多。列宁营是一片壮观的石建筑群，包括一所骑兵学校和一个用鹅卵石铺就的巨大的庭院。以前这里是骑兵营，在7月的战斗中被占领。我所在的连队以兵营马棚为寝室，石头马厩下还刻着当初那些骑兵的名字。所有的马匹都已被收缴派往前线，但整片地方仍弥漫着马尿和烂燕麦的气味。我在军营里待了约莫一个星期，只记得马匹的气味、断断续续的号角声（我们所有的号手都是外行——我最初就是在法西斯控制区外听会了西班牙号角的）、军营里钉子靴发出的踢踏的响声、冬日清晨阳光下的长长的队列，以及骑兵学校砾石操场上乱哄哄的50人一队的足球赛。军营里总共约有1000名男性和大约20名女性，除此之外还有些民兵的妻子负责做饭。当时仍有女民兵，尽管人数不多。在之前的战斗中，她们曾与男人们并肩作战，这在革命时期似乎是件很自然的事。然而现在人们的想法已悄然改变。当女民兵们在骑兵学校操练时，男民兵们必须离开，以免他们的嘲笑令她们分心。几个月前可没人觉得女性摆弄枪械不是一件滑稽可笑之事。

整个军营既肮脏又混乱，民兵破坏了他们所占领的每一栋建筑，似乎革命就该如此。随处可见一堆堆被砸坏的家具、破损的马鞍、黄铜骑兵头盔、空剑鞘和腐烂的食物。浪费食物的现象相当严重，尤其是面包。单以我所在的营房为例，每顿饭都要丢弃整篮的面包——平民还在忍饥挨饿，这里却发生如此不光彩的事。我们在长长的高腿桌边，用总是油腻腻的锡盘吃饭，就着一种被称为波隆[3]的可怕的容器喝酒。波隆是一种带有长尖嘴的玻璃瓶，只要把瓶身稍稍倾斜，酒水便从尖嘴里汇成一股细流喷涌出来，这样你的嘴唇就不必接触瓶口，大家也可以轮流

享用。我一看见波隆就立即提出抗议，要求得到一只饮水杯。在我看来，那玩意儿实在太像夜壶，尤其是盛满了白葡萄酒的时候。

新兵们开始分批领到制服，不过这里是西班牙，人们做事总漫不经心，因此没有人清楚各人领到了什么，各种诸如皮带和子弹盒之类最为必要的装备，直到我们临上火车前的一刻才配发。我用“民兵制服”这种说法可能会造成误解。那其实并不是确切意义上的制式服装，或许称其为“不统一服装”倒更贴切。所有的衣服大体相似，但没有任何两件完全相同。几乎每个人都穿着灯芯绒马裤，而所谓的整齐划一也就止于此了。有的人打绑腿，有的人穿灯芯绒护腿，另一些则套着皮裤或高筒靴。每个人都有拉链外套，不过有些是皮革的，有些则是羊毛的，而且五颜六色。帽子的式样更是五花八门，帽子的前檐通常别着党徽，此外，几乎每个民兵都在脖颈上系了一条红色或红黑两色的手帕。如此装扮的民兵队伍看上去不啻为一群扎眼的乌合之众。不过工厂也只能赶制出这样的衣服，鉴于当时的情况，这还不赖。衬衫和袜子是单薄的棉制品，根本无法御寒。我不敢想象民兵们在最初缺乏组织的几个月经历了怎样的情形。我记得大约两个月前的一份报纸报道，一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袖在视察前线之后表示，他会尽力确保让“每个民兵都有一条毯子”。假如你曾经在战壕里过夜，听到这样的话定会不寒而栗。

我进入军营的第二天，可笑的“训练”开始了。起初的情形简直混乱不堪。新兵大多是来自巴塞罗那街头的十六七岁的男孩子，充满革命热情却根本不明白战争的含义。这些新兵完全没有纪律观念，甚至让他们排好队都是妄想，如果有人不喜欢某项命令，就直接走出队伍和军官争吵。负责训练我们的中尉是个身材健壮、容光焕发的可爱的年轻人，他以前是正规军军官，现在也仍保持着有力的步伐和整洁的制服，风采依旧。奇怪的是，他竟是个热忱的社会主义者，对实现社会各阶层完全平等的执着甚至超过了那些民兵自身。我还记得当一名无知的新兵称呼他为“长官”时他那痛苦的惊叹。“什么，长官？是谁叫我长官？难道我们不是同志吗？”这种态度对他的工作是否能有任何帮助，我表示怀疑。同时，新兵并没有得到丝毫有用的军事训练。我被告知外国人不必参加“训练”（我发现那些西班牙人抱有某种可怜的信念，认为所有的外国人在军事问题上都比他们自己懂得更多），但我很自然地加入了其他人的行列。我迫切想学会如何使用机枪，我还从未有机会接触这种武器。沮丧的是，没有人教授我们任何武器的使用方法。所谓的训练只不过是最老套、最愚蠢的那种队列操练，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三人成列齐步走，以及所有那些我15岁就学过的毫无用处的扯淡。这就是游击队

所接受的“了不起”的训练。很显然，如果你只有几天时间去训练一个士兵，你就必须教给他最有用的知识，比如如何隐蔽，如何在空旷地带前进，如何修筑工事——最重要的，如何使用武器。然而，这帮将要在几天之内被扔上前线的跃跃欲试的孩子们，甚至连如何使用步枪或引爆炸弹都不知道。当时我并不了解，后来才知道个中原因在于军营里根本没有武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步枪短缺的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新部队要到抵达前线之后才能从换防部队那里接过枪械。在整个列宁营，我相信，除了哨兵手中的步枪之外没有多余的枪支了。

几天之后，尽管从任何常规标准而言我们仍是彻头彻尾的一帮新兵，却已被认定可以公开亮相了。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早晨，我们在西班牙广场外的山顶公园集合。除了新成立的人民军警卫队和第一批特遣队，各党派的民兵也都在这里训练。公园里的景象奇特而令人振奋。沿着各条大道和小径，一队队男人挺着胸在花丛中来来回回僵硬地行进，努力表现得像士兵。他们全都手无寸铁，没有完整的制服，多数人身上的民兵制服都打了补丁。每一次的训练总是大同小异。3个小时里，我们来来回回摇摇摆摆（西班牙式的行进步伐，短小而快速），然后下操，解散，口干舌燥的人群蜂拥至半山腰一家卖廉价酒的生意兴隆的小杂货店。每个人对我都很友好。作为英国人，我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军官也对我格外关注，替我买酒。只要一有机会和我们的中尉待在一起，我就嚷嚷着要学习使用机枪。我曾经从口袋里掏出雨果字典，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冲他发问：“我使步枪。我不使机枪。我学机枪。什么时候我们学机枪？”

回答永远都是带着困惑的微笑和承诺，说明天应该会进行机枪训练。不用说，明日复明日。几天过去了，新兵们多多少少学会了齐步走和立正，但至于武器，他们所知的全部就是子弹是从哪一头射出来的。有一天，我们训练结束后，一名荷枪实弹的警卫队员走过来，允许我们看看他的步枪。结果发现，我所在的整个小队中除我之外竟没人知道如何给步枪装填子弹，更不用说如何瞄准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常为西班牙语而犯难。除我之外，军营里只有一个英国人，甚至包括军官在内没人会说一星半点儿法语。更糟糕的是，我的同伴们彼此交谈时通常使用加泰罗尼亚语。我唯一的办法就是随身携带一本小字典，遇到紧要关头便从口袋里将它掏出来。尽管如此，相比于其他大多数国家，我宁愿待在西班牙。在西班牙交朋友太容易了！一两天之内就有20来个民兵能叫得上我的教名，给我作示范，用他们的

热情感染着我。我这么说倒不是在帮他们做宣传，也并不想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理想化。整个民兵系统的确存在严重问题，人员参差不齐，因为彼时自愿入伍的人数正在减少，而且其中许多优秀者已经或上了前线或战死沙场。我们之中总有相当比例的人毫无用处。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们被其父母送来参军，坦率地说就是为了谋得当民兵每天10比塞塔[4]的薪水，此外还可以把分配给民兵的大量面包偷偷带回家给父母。尽管如此，我倒不信有哪个像我一样身处西班牙工人阶级之中的人——或许应该说是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因为除了几个阿拉贡人和安达卢西亚人之外，我周围都是加泰罗尼亚人——没有被他们的高尚所打动。最重要的是，他们既直率又慷慨。西班牙人的慷慨，就通常意义而言，有时甚至会令人尴尬。如果你向他要一支烟，他会强迫你接受一整包。除此之外，他们的慷慨还表现在更深层的方面，一种真正的博大的情怀，我在那最令人绝望的环境中曾反复体验到。有些在西班牙战争期间在此旅行的记者和外国人宣称，西班牙人暗地里嫉恨外国援助者。对此，我只能说，我从来没有遇到此类情形。我记得在我离开军营的前几天，有一群人刚从前线返回休整。他们激动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热情赞扬在韦斯卡[5]与之并肩作战的法国军队。他们说法国人非常勇敢，还忙不迭地补充说："比我们勇敢！"对此我当然有异议，于是他们解释说，法国人更懂得作战的技能——对炸弹、机枪等更在行。无论如何，他们的评价很中听。换作是英国人，他宁可把自己的手砍下来也不愿这么说。

每个在民兵组织服役的外国人起初几个星期都在学习如何热爱西班牙人，但与此同时却往往被他们的性格激怒。在前线，我的愤怒有时达到了极点。西班牙人擅长很多事情，但不包括打仗。所有的外国人都对他们的效率低下感到震惊，最要命的是他们那足以令人发狂的不守时。有一个西班牙语单词，没有哪个外国人没领教过，那就是mañana——"明天"（字面意思是"早晨"）。只要有可能，今天的事必然拖到明天。这个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西班牙人自己也拿它当笑话。在西班牙，小至就餐大到战斗，从没有哪件事在预定时间发生。通常事情都发生得太晚，但偶尔——因此你也不能指望它们会迟到——也会来得太早。本该8点出发的火车通常会在9点到10点间的任意时间离开，但也许每周会有一次，司机一时心血来潮，7点半就开车了。此类事件着实让人恼火。从理论上讲，我很羡慕西班牙人，他们不像我们北方人那样神经质般地恪守时间，不幸的是，我有守时的习惯。

经过了没完没了的谣传和延迟，我们突然接到命令在两小时之内开

赴前线，而我们的装备仍未配齐。军需处陷入了可怕的混乱，最后，很多人不得不在装备不全的情况下出发。军营中瞬时满是女性，她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帮着男人们卷毯子、打背包。我不得不让一名西班牙姑娘示范如何挎上我的新皮质子弹匣，真叫人害臊。她是另一个来自英国的民兵威廉斯的妻子，温柔，有一双深色的眼睛，有强烈的女性气质，看上去好像一生都在摇摇篮，但事实上早在7月间她就勇敢地战斗在街头。那时，她背着一个在战争爆发后10个月出生的婴儿，那婴儿说不定还是在街垒边产下的。

列车本应于8点离开。大约8点10分，心烦意乱、大汗淋漓的军官试图让我们在军营操场整队。我清楚地记得现场的景象——喧闹、兴奋，火光中红旗猎猎，一队队的民兵背着背包，肩上挎着铺盖卷儿和破损的子弹带；叫喊声、靴子的踢踏声、锡盘子的碰撞声此起彼伏，之后终于有人发出了响亮的嘘声要求大家安静；接着某个政治委员站在一条巨大的红色条幅下用加泰罗尼亚语向我们发表了一通演说。最后，他们让我们列队前往车站，走的是最长的路线，足有三四英里，好将我们展示给整个城市的市民。在兰布拉斯大街，他们让我们停下，而一支借来的乐队则演奏了一些革命歌曲。又是一通战无不胜的英雄之类的废话——欢呼声、掌声，红旗和红黑色旗帜漫天飞舞，友好的人群挤满了道路，大家都想看我们一眼，女人们从窗户中朝我们挥手。当时那一切看上去多么自然，而现在想来却如此遥远而难以置信！火车拥挤不堪，几乎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更别说座位了。在最后一刻，威廉斯的妻子冲上月台，递给我们一瓶葡萄酒和一英尺[6]长的红肠——就是吃起来味道像肥皂且会让你腹泻的那种。火车缓缓驶出了加泰罗尼亚，以每小时低于20公里的常规战时速度驶向阿拉贡高原。

---

[1] Don，西班牙语中置于男士名字前，表示尊称。

[2] 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约为0.91米。

[3] 波隆，一种西班牙传统的葡萄酒容器，长颈、大肚，壶嘴长而尖。

[4] 比塞塔，西班牙及安道尔在2002年欧元流通前所使用的法定货币。

[5] 韦斯卡，位于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

[6] 英尺，英国及其前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使用的长度单位。1英尺约为0.30米。

第二章

虽然距离前线路途遥远，巴瓦斯特罗[1]却是一派阴森凄凉、满目疮痍的景象。衣衫褴褛的民兵蜂拥而至，在街上游荡徘徊，试图让身子暖和些。在一面破败的墙上贴着一幅海报，落款日期是去年。上面写道：某年某月某日，于竞技场内宰杀“6头雄健的公牛”。业已褪色的海报看上去是何等萧索，而那雄健的公牛和风度翩翩的斗牛士又该向何处去寻？眼下，斗牛活动似乎已在巴塞罗那城内绝迹了，不知是何缘故，最杰出的斗牛士都是法西斯主义者。

他们用卡车将我们的部队送至谢塔莫，然后向西去往阿尔库维耶雷，那里紧挨着萨拉戈萨前线。围绕谢塔莫爆发了3次争夺战，最终这里在10月份被无政府主义者占领。纷飞的炮火将这儿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大多数房屋都被步枪子弹摧残得面目全非。我们位于海拔1500英尺的高处，天寒地冻，不知从何处而来的浓雾笼罩着这里。从谢塔莫到阿尔库维耶雷的途中，卡车司机迷路了（这是战时常有的事），我们不得不在迷雾中跋涉了好几个小时。等我们抵达阿尔库维耶雷时已经夜深。有人领着我们穿过泥沼来到一处骡厩。钻进谷糠堆里，我们立马沉沉地睡去。睡在干净的谷糠里还不错，虽然不及干草，但比稻草要好些。直到晨光照进来，我才发现谷糠堆里尽是面包皮、旧报纸、骨头、死老鼠和破牛奶盒。

我们此刻离前线很近，近得能够闻到战争特有的气息——凭我的经验判断，那是一种排泄物和腐坏食物的气味。阿尔库维耶雷从未遭到炮弹侵袭，因而相比其他多数紧邻前线的村庄而言要完整得多。可我相信，即使在和平年代到访此处，人们也很难不为阿拉贡村落那特有的污秽环境所震惊。村落被建得好似要塞一般，围绕着教堂周围的是许多由泥土和石头搭成的小屋。纵使是春天，依然难见鲜花的踪影。房屋都没有花园而只有后院，几只瘦小的家禽在满地的骡粪上踱步。天气十分恶劣，迷雾和雨水交替降临。狭窄的道路上尽是泥洼，有些地方竟有两英尺深。卡车驱动着飞速转动的车轮在泥泞中挣扎，农民们驾着骡子牵拉的笨重货车，有时一辆车需要6头骡子拉动方可前进。来往不息的部队让这个村庄变得肮脏不堪。这里没有，也不曾有过厕所或任何样式的排污设施，放眼望去没有哪怕一平方米的地方能让人放心落脚。教堂周围

及其方圆一英里[2]内的田地长期以来都被当做厕所使用。每每回忆战时头两个月的经历，我都会想到田边那些冬季作物残茎上覆盖着的粪便。

两天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拿到步枪。要是你看到战争委员会所在地墙上成排的洞隙——步枪齐射留下的弹孔，各色法西斯主义者都在墙前被处决——你就会明白在阿尔库维耶雷所目睹的一切。前线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伤员很少。最令人兴奋的是看到法西斯的逃兵，他们被人从前线转移至此处看押。在这里，许多和我们对阵的部队根本不是法西斯，他们不过是些可怜的新兵蛋子，战事爆发时他们正在服役，只是由于害怕而不敢逃跑。时不时会有他们的小股部队冒着危险向我方投诚。要不是因为许多士兵的家属留在了法西斯管控地区，毫无疑问会有更多的人这样做。这些逃兵是我平生第一次亲见的“活生生的”法西斯主义者。我感到很惊讶，除了身着卡其布外套以外，他们看起来和我们并无二致。来到我们这里时他们总是一副饿鬼的模样——考虑到他们在无人区四处躲藏了一两天，变得饥肠辘辘实在是再自然不过，可总是有人以胜利者的姿态把这当作法西斯部队正在忍受饥饿的佐证。我见过其中一个逃兵在农舍吃东西的样子，那场景其实颇让人心酸。那是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孩，高高的个子，脸上尽是风吹引起的冻疮，穿着破旧的衣衫，畏缩在火堆前捧着一锅食物狼吞虎咽。与此同时，他的眼睛不安地扫过站在周围看守他的民兵。我想他仍然难以断定我们是否真的是凶残嗜血的“赤匪”，担心自己一吃完饭就会被拉出去枪毙。看守他的士兵荷枪实弹，不断轻拍他的肩膀好声劝慰。有个日子令人难忘，那天一下子有15名逃兵被押到这里。有个人骑着白马走在前面，以一副胜利者的模样领着逃兵们经过村庄。当时我设法拍了一张颇为模糊的照片来记录这场景，可后来照片却被人偷走了。

我们到达阿尔库维耶雷的第三天，步枪终于运到了。在骡厩里，一名面容粗犷、脸色深黄的中士把枪分发给我们。看着手里的武器，我既惊讶又失望。那是一杆1896年产的德国毛瑟枪——已经使用超过40年了！枪身锈迹斑斑，枪闩不好使，木质枪托也断了。我望了一眼枪膛，里面已然生锈，难以使用。大多数步枪都这般不堪，有的甚至更加糟糕。也没人打算把最好的武器配给懂得如何使用的人。这批军械里面最好的一支步枪出产不过10年时间，却发给了一个15岁的小毛孩。这家伙蠢笨得很，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娘娘腔。那位中士花了5分钟时间给我们做了“指导”，包括如何为步枪装弹以及如何把里面的子弹取出来。很多民兵之前从没摸过枪，依我看，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瞄准器是派什么用场的。我们每个人分到50发子弹，然后就排成队伍，整装背包，开赴

3英里外的前线。

我们这个百人队伍其实只有80个人和几条狗，艰难地沿着道路曲折前进。每支民兵队都配有至少一条狗作为队伍的吉祥物。和我们一起行军的那条可怜的狗身上烙着大大的字母“POUM”，它似乎也感觉到了自己外表有些许不妥，一路上总是躲躲闪闪。队伍排头的红旗旁，壮硕的比利时指挥官乔治·科普骑着一匹黑马。在他前面不远处，一个来自民兵骑兵队的年轻人——骑兵队的人都给人满身匪气的感觉——骑着马来回欢腾跳跃，每逢上坡时便策马快跑，在高处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西班牙骑兵队的上乘马匹在革命时期大部分被征用，分派给了民兵们，而民兵们所做的就是骑着骏马把它们累得半死。

道路在暗黄贫瘠的田地间蜿蜒，农田自从去年丰收以来便无人耕作。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位于阿尔库维耶雷和萨拉戈萨之间低矮的齿状山脊。眼下，我们正在接近前线、炸弹、重机枪和泥浆。内心深处，我感到恐惧。我知道前线目前还是一片宁静，但相比于周围大多数人，我的年纪已足以让我清楚地记得那场大战[3]，尽管当时太小未能参与。对我而言，战争意味着呼啸的炮弹和纷飞的铁片，更意味着泥泞、虱子、饥饿和严寒。有趣的是，我对严寒的畏惧远甚于敌人。在巴塞罗那期间，那份对寒冷的恐惧始终困扰着我。我甚至会在夜晚惊醒，脑海中浮现出阴冷的战壕，在可怖的破晓时分整装待发，扛着结霜的步枪长时间放哨，冰冷的泥浆漫过靴筒渗进来。此外，我承认每次看着同行的人，心头也会萌生某种恐惧感。你简直难以想象，我们看上去是怎样的一群乌合之众。我们散漫地前进，走了不到两英里，后排的家伙便已掉队，连羊群都比我们更有凝聚力。队伍中有一大半所谓的男人还只是孩子——我是说，他们是真正的孩子，最大不过16岁，然而一想到最终将抵达前线，他们都倍感兴奋快乐。随着距离前线愈来愈近，孩子们在队伍前挥舞着红旗，开始呼喊口号：“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万岁！”“法西斯主义者是娘娘腔！”——口号的本意是想激发战斗热情，起到威慑敌方的作用，可这些孩子稚嫩的嗓音听上去就像是可怜的小猫叫唤，令人感到悲哀。这群衣衫褴褛的孩童拿着不知如何使用的老旧步枪，而他们居然是共和国的保卫者，这实在令人骇然。我记得自己曾一度怀疑，如果有法西斯战机飞过我们的头顶，飞行员是否会俯冲下来用机枪对我们一阵扫射？相信即使从高空俯瞰，飞行员也会看出我们不是真正的士兵，根本无需多此一举。

走到齿状山脊后，我们向右拐上岔路，在山侧一条蜿蜒的狭窄骡道

上攀爬。西班牙这片区域的群山外形奇特，呈马蹄形，山顶平坦，山坡陡峭，底部一直延伸至幽深的峡谷。除了矮灌木和石楠，斜坡高处寸草不生，到处都是凸出的白色石灰石。由于这里是多山地区，因此前线并非是连在一起的战壕，而仅仅是一连串被称作“据点”的加强防御的岗哨，位于每一个山顶。大老远便可望见我们的据点坐落在“马蹄”的顶部。沙堆垒起了简陋的掩体，红旗在空中飘扬，烟雾从战壕中升起。再走近些，还能闻到一股略带甜味的令人作呕的恶臭，这种臭味此后在我的鼻腔里滞留了好几个星期。我们据点的正后方堆放着数月来倒在这儿的废弃品——面包皮、排泄物、生锈的罐头，垒成了一座散发着极度恶臭的废物山。

我们所替换的民兵队正在整理装备。他们已经在前线待了3个月，制服上沾满污泥，靴子破得稀烂，脸上胡子拉碴。该据点的指挥官名叫莱文斯基，但大伙都管他叫本杰明。这名犹太人出生在波兰，母语却是法语。他爬出自己的战壕前来迎接我们。他是个身材矮小的年轻人，大约25岁，一头坚硬竖立的黑发，苍白、热切的脸庞在战争期间总是脏兮兮的。有少数流弹从我们头顶划过。这个据点是个半圆形围圈，直径约50码，由沙袋和石灰石堆成了一道防护墙。墙后的地面挖了三四十个老鼠洞一般的战壕。我、威廉斯以及他的西班牙裔连襟迅速钻进了离我们最近的无人壕沟，这儿看上去尚可容身。前方不知何处传来枪声，奇异的回响在山间绵延回荡。我们刚扔下自己的装备爬出壕沟，枪声又响了，我们队伍里的一个孩子从防护墙那儿飞也似的跑回来，脸上鲜血直流。他开了一枪，不知怎么的，当他试图吹去膛内的残片时，弹药突然炸了。他的头皮被弹片伤得惨不忍睹。这是我们的第一名伤员，而且竟然是自残。

我们下午站了自己的第一班岗，本杰明领着我们把据点各处熟悉了一遍。防护墙前有一片狭窄的在岩石上凿出来的壕沟，上面带有用石灰石垒成的极其粗糙的射击孔。这儿有12个岗哨，分别位于壕沟和内层防护墙后的不同位置。壕沟前方布满倒钩防护网，然后便是山坡，延伸至深不见底的山谷。对面是光秃秃的群山，目光所及之处尽是岩石险峰，灰蒙蒙的，凄凉无比，活物难见，哪怕一只飞鸟的踪影都没有。我透过一个射击孔向外好奇地张望，试图寻找法西斯分子的战壕。

“敌人在哪儿？”

本杰明挥了挥手，“在那儿。”本杰明会说英语——非常糟糕的英语。

“哪儿呀？”

凭我对战壕的想象，法西斯分子的阵地应该位于50到100码处。而我什么都没发现——他们的战壕似乎伪装得很好。可看到本杰明所指的地方，我顿感沮丧。越过横亘的深谷，在对面山顶，至少700米开外的地方，隐约可见红黄两色旗和防护墙的轮廓——那儿就是法西斯的据点。难以言状的失望之情涌上心头。我们离他们远着呢！我们的步枪根本打不着他们。正在此时却响起一阵激动的呼喊。远处两个法西斯分子正在对面光秃秃的山坡上攀爬，就像两个灰色的小雕像。本杰明抄起离自己最近的人的步枪，瞄准目标，扣动扳机。咔嚓！是一发哑弹。我想这不是好兆头。

新一班哨兵刚刚在战壕中就位便开始漫无目的地乱射一通。我可以看见的法西斯分子只有蚂蚁般大小，在他们的防护墙后东躲西藏。有时会有一个黑点静止不动，那是有敌人莽撞地冒头了。开枪显然没有用处。可当时，我左手边的哨兵体现了西班牙人特有的风格，他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悄然潜到我身旁，一个劲儿地鼓动我开火。我试图解释说，除非撞大运，不然隔着那么远的距离，用这些步枪根本打不中人。但他只是个孩子，端着枪牢牢锁定其中一个黑点，咧着嘴，就像一只等待主人扔出石子的狗。最终，我朝700米远的地方随便放了一枪。黑点消失了。我希望子弹命中的地方离他够近，足以吓他一跳。有生以来，这是我头一回朝人开枪。

目睹了前线的情形之后，我感到无比厌恶。他们管这叫战争，我们甚至连敌人的边儿都没沾着，我甚至没有尝试把头缩进战壕内。可不久之后，一颗子弹带着可怕的破空声划过我的耳边，打在身后的背墙上。天哪！我立马蹲下身。我一直发誓，当第一颗子弹从我身边擦过时决不能蹲下身。但此时此刻，这样的动作实在是本能反应，几乎每个人都至少有一次这样的经历。

---

[1] 巴瓦斯特罗，伊斯兰教时期，西班牙地区最北部的村庄。

[2] 英里，英制的长度单位。1英里约为1609米。

[3] 大战，这里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三章

在战壕中作战，5样东西至关重要：柴草、食物、香烟、蜡烛和敌人。冬天在萨拉戈萨前线，这些东西的重要程度正如上述排序，敌人只能名列末位。除了夜晚总会遭到突袭之外，没人会担心敌人。他们仅仅是偶尔出现在远处，像小黑点似的来回跳跃。取暖问题才是双方的心头大患。

可以这么说，在西班牙的日子里，我极少见到战斗场景。我在阿拉贡前线从1月待到5月。1月至3月下旬，除了特鲁艾尔[1]，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任何战事。3月份，韦斯卡爆发了激烈交火，而我在其中的作用无足轻重。接着在6月份，韦斯卡遭到毁灭性打击，仅一天就有数千人丧命，可在那之前我便已负伤，无法战斗。人们一般所想到的那些关于战争的可怕事情甚少降临在我的身上。没有飞机在我附近投下哪怕一枚炸弹，没有任何炮弹在我周围50码内爆炸。我只经历了一次近身战（但我觉得哪怕只有一次也足矣）。当然，我经常遇到重机枪攻击，不过大多都离得很远。即使是在韦斯卡，只要稍加小心，一般都是安全的。

平静的战事带来的乏味与不安充斥着萨拉戈萨附近的山峦。日子犹如城市小职员的生活一般规律，平淡无奇。站岗、巡逻、挖战壕、再巡逻、再站岗。每个山顶上，无论是法西斯分子还是保皇派，衣衫破烂、污秽不堪的士兵们都在旗帜旁瑟瑟发抖，试图让身子暖和些。漫无目的的子弹终日在空荡荡的山谷间来回往复，但击中人的可能性极其渺茫。

我时常凝望着冬日的景象，惊叹这徒劳的一切。这样的战争实在让人难以捉摸。大约在10月份或再早点，所有山头都爆发了惨烈的战斗，但由于人员和武器——尤其是大炮短缺，之后无法再发起任何大规模战事。于是每支部队深挖工事，在占领的山顶上驻扎下来。我们的右方有一处前沿岗哨，也属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控制，而在我们左边，即我们斜下方的支脉上有一处加联社党[2]的据点。据点的前方是一处更高的支脉，有几处法西斯的小型岗哨分布在峰顶。若不是每个据点都插着旗帜，很难分清所谓的分界线。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加联社党的旗帜都是红色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则是红黑两色；法西斯分子一般挂的旗帜是保皇派旗帜（红-黄-红），偶尔也挂共和国旗帜（红-黄-

紫）。这里的景色令人赞叹，当然前提是你得忽略以下事实：每个山顶都被军队占领，到处是空罐头和排泄物。右方的齿状山脊向东南延伸，被一片穿越韦斯卡的宽广平坦的山谷截断。谷地中央四散着少许骰子似的方屋；那是被保皇派控制的罗布莱斯镇[3]。早晨，山谷通常被云海所遮蔽，唯有青绿的高山冒出云端，使得此间景色同照相底片有着奇特的相似之处。韦斯卡之外有许多类似的高山，山上覆盖的白雪每天都显出不同的模样。远处比利牛斯山脉巍峨的险峰上，白雪终年不化，好似在半空飘荡。甚至平原也是光秃秃的，一切都显得死气沉沉。我们对面的山岳就像大象的皮肤一样灰蒙蒙、皱巴巴的。天上几乎从来都没有鸟儿飞过。我想自己还从未见过哪个国家的飞鸟会如此稀少。唯一常见的鸟是喜鹊，而夜晚山鹑突兀的鸣叫会把人吓一大跳。偶尔有老鹰缓缓地从头顶滑翔而过，毫不理会身后响起的步枪射击声。

雾气弥漫的夜晚，小队被派到处于敌我之间的山谷中巡逻。天寒地冻，加之容易迷路，这差事让人避之不及。但不久后我发现，只要借口去巡逻就能随意离开岗位。在坑洼不平的深谷中找不到任何道路，唯有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线前进，并且每次都要留下新的路标。从最近的法西斯岗哨射出的子弹只要飞行700米就能到达我方岗哨，但双方间的唯一道路却长达1.5英里。在漆黑的山谷中游荡实在有趣，流弹从高空划过，发出的声响就像是红脚鹬的鸣叫。大雾天巡逻比晚上巡逻要好些，雾气终日不散，总是积聚在山顶附近，而山谷则变得一览无遗。靠近法西斯防线时，人必须缓慢地匍匐前行。在山侧悄无声息地移动非常困难，那里布满了容易发出声响的灌木和石灰石。尝试了三四次之后，我才找到了通向法西斯阵地的路。浓雾遮天蔽日，我爬到防护网处侧耳倾听。法西斯分子正在阵地后交谈哼曲。突然我警觉起来，脚步声响起，有几个人下山朝我这边走来。我惊慌地躲到一棵灌木后。作为隐蔽物而言，此刻这灌木显得太小了。我试图悄悄举起步枪，然而敌人却拐往了别处，从我的视野中消失。我在躲藏的灌木后发现了之前战斗留下的各种遗迹——一堆空弹壳、一顶有弹眼的皮帽和一面显然属于我方的红旗。我把旗帜带回了据点，可它后来却被毫不留情地撕成了碎片当抹布用。

刚抵达前线我就被任命为下士，或者叫班长，有12名部下。这可不是什么清闲差事，尤其刚开始时，责任更是重大。我们的百人队根本没有经过训练，大多是十来岁的小孩。各支民兵队伍中随处可见十一二岁的孩子，他们通常是法西斯管辖区的难民，当初为了维持生计而应征入伍。他们一般在后方干些轻松的活儿，可有时也会设法来到前线，结果

给大家造成了威胁。记得有个小毛孩朝壕沟的火堆里扔了一颗手榴弹，之后却说只是“恶作剧”而已。我估计驻守波塞罗山的民兵都大于15岁，但平均年龄肯定低于20岁。这个年龄的孩子绝不应该出现在前线，因为他们无法忍受睡眠不足，而这在战壕中是家常便饭。一开始，我们的据点晚上几乎无法确保有人正常放哨。要弄醒我们部队里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只有把他们拖起来，可你才刚刚转过身，他们就离开岗哨溜进掩体内。他们甚至会不顾刺骨的寒冷，倚靠着战壕的壁面站着进入梦乡。所幸敌人缺乏魄力。有那么几个夜晚，我觉得20个拿着气枪的童子军就能把我们的据点一锅端了，甚至20个拿着板球拍的女童军指不定也能做到。

当时以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加泰罗尼亚民兵队就像战争开始时那样坚守着原有的阵地。佛朗哥[4]反叛初期，各工会以及政党匆匆忙忙地组织了民兵队，每支民兵队本质上都是一个政治团体，效忠于自己的政党以及中央政府。“人民军”组建于1937年初，是由普通行业组成的“非党派”军队，理论上囊括了各政党民兵组织。但长久以来，所有的变化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到了6月份，新的“人民军”队伍方才抵达阿拉贡前线。直到那时，民兵组织体系仍未有丝毫改变。该体系的核心在于长官和士兵平等。从将军到士兵，所有人同酬、同食、同衣，绝对平等。如果你想拍拍指挥官的后背向他要根烟抽，大可放心这么去做，没人会觉得有什么稀奇。总体而言，每个民兵队都是民主的，绝没有论资排辈。民兵们清楚命令必须执行，但那是同志与同志之间传达命令，而非上级向下级发号施令。这儿有军官和军士，但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军衔差别；这儿没有军阶，没有军衔，没有立正敬礼。他们试图在民兵部队内构建一种无阶级差别的工作模式。当然，不存在绝对平等，但我从未见过，也未曾想到，在战时会出现这样一种如此接近绝对平等的模式。

然而我必须承认，初见前线的状况着实把我吓坏了。这样一支军队怎么可能打胜仗呢？当时所有人都这么说。尽管这是事实，可苛责也毫无道理。因为在那样的情形下，民兵不可能比这更出色。不可能凭空变出一支现代化机械部队，如果政府坐等部队训练完毕才行动，那么根本无法抵御佛朗哥阵营的进攻。之后的日子里，诋毁民兵体系形成了风气，还因此把缺乏武器和训练带来的问题统统归咎于平等主义产生的必然恶果。事实上，新组建的民兵队伍缺乏纪律并不是因为军官称士兵为“同志”，而是因为任何队伍在创立之初必然如此。实际上，这种民主的、带有革命性的纪律比预计的更加可靠。工人民兵队理论上也正是靠着自觉履行纪律。这种纪律建立在阶级忠诚之上，而资产阶级征召士兵

履行纪律则根本上是出于恐惧。（替代民兵组织的人民军则介于两者之间。）在民兵组织中，寻常部队常见的欺凌和辱骂绝不会被容忍。正常的军事惩罚是存在的，但只在犯了严重错误时才会施行。当有人拒绝执行命令时，军官不会立刻惩罚他，而是首先以同志的名义去规劝他。没有管理过士兵的愤世嫉俗者会立刻认为这不会“起作用”，可事实上，长远来看这的确“有效”。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连最差劲的民兵也有所进步。1月时，为了让12个没经验的新兵达到要求，我忙得头发都快变白了。5月里有一小段时间，我担任代理中士指挥大约30个人，既有英格兰人，也有西班牙人。我们都历经了数月的炮火洗礼，我从未遇到有人不服从命令或是无人自愿接受危险任务的情况。革命性的纪律建立在政治觉悟之上——理解为何命令必须执行。灌输这种理念需要时间，但要把人变成兵营里的机械人也同样需要时间。那些嘲讽民兵体系的记者经常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当人民军在后方训练时，阵地是靠民兵驻守的。而民兵能够待在阵地上本身就应归功于“革命性”纪律的力量，因为直到1937年6月，唯一支撑民兵驻守阵地的就是其对本阶级的忠诚。单个逃兵可能会被击毙——偶尔的确有人被击毙——但难以阻止1000个人一起离开阵地。一支强征的队伍如果面临相同的情况——在战地指挥撤离以后——早就四处逃散了。可尽管胜绩寥寥，民兵却坚守阵地，甚至连逃兵都很少。在四五个月内，我只听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队里出现过4个逃兵，据说其中的两个还是混入队伍来刺探情报的间谍。最初，民兵组织混乱不堪，缺乏训练，为了让命令得到执行通常要费上5分钟的口舌，这些都让我感到骇然和愤怒。我具有英式军队理念，而西班牙民兵队伍当然和英国军队天差地别。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形，这支队伍远比预期的要好多了。

同时，柴草也是问题——柴草自始至终都是问题。那段时间里，我的每一段日记都会言及柴草，或是提到柴草短缺。我们的据点位于海拔高度约为两三千英尺的地方，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气温并不是特别低，许多晚上甚至没有结冰，中午时分，冬天的太阳会当空照耀一个小时。可即使天气不是极度寒冷，但相信我，感觉上真的冷极了。有时，凛冽呼啸的寒风连帽子都能吹走，头发被风吹得东倒西歪；有时，迷雾像液体一般灌入战壕，好似要渗入骨骼。雨经常下，甚至哪怕一刻钟的降水也足以让环境变得难以忍受，石灰石上面那薄薄的土层会立刻变得滑如油脂。在这样的斜坡上根本无从立足。在漆黑的夜晚，短短20码距离我常常会摔倒十几次。这很危险，因为枪管会被淤泥堵塞。多日以来，衣服、靴子、毯子和步枪都或多或少沾上污泥。我已经尽可能多带了些厚衣物，但许多人仅凭单衣御寒。整支队伍大约有100人，却只有

12件大衣，每班哨兵不得不轮流替换衣物，大多数人都只有一条毯子可供保暖。一个冰冷的夜晚，我在日记中列出了自己身上所穿的衣物。记录一个人身上能穿多少件衣服怪有意思的。我当时穿了一条厚背心和内裤、一件法兰绒衬衫、两件外套、一件羊毛夹克、一件猪皮夹克、一条灯芯绒长裤、绑腿、厚袜子、靴子、一件厚实的军用大衣、一条围巾、一副皮手套和一顶羊毛帽子。尽管如此，我仍然冻得像肉冻似的瑟瑟发抖。不过我承认，自己的确对寒冷异常敏感。

柴草此刻尤为重要。柴草的问题关键在于事实上根本找不到柴草。即使在植物生长旺季，我们那可怜的山上也总是光秃秃的。数月来，挨冻的民兵们早已将山上搜了个遍，凡是比手指粗的东西都被当作柴火烧了取暖。除开吃饭、睡觉、站岗和干杂活，其他时间我们就去据点后方的山谷中搜寻柴草。回想起那段日子，我只记得自己在几乎垂直的山坡上攀爬，越过那些把靴子弄得破烂的乱石，兴奋地扑向细小的树枝儿。3个人搜寻数小时的成果仅够在战壕里生一小时的火。对柴草的渴望把我们个个都变成了植物学家。根据燃烧的状况，我们将山上的植物分类：许多石楠和草堆很容易点燃，但不消几分钟就烧尽了；野生迷迭香和小棘豆只有在火已经烧得很旺时才比较容易点着；比醋栗枝小一些的橡树枝特别难点燃。有一种干芦苇非常容易点火，可它只生长在据点左边的山顶，必须冒着枪林弹雨才能收集到。法西斯机枪手一旦看见你，立马会开枪扫射。通常，他们瞄得很高，子弹会像飞鸟一样从头顶掠过，但有时他们也会击中离你很近的石灰石，此时得马上卧倒。然而，你得继续搜寻芦苇，因为没什么比柴草更重要。

除了严寒，其他各种不适似乎都不值一提。当然，我们所有人总是显得脏兮兮的。和食物一样，我们的用水都是靠骡子从阿尔库维耶雷运来的，每人每天定量约1夸脱[5]。水质很糟糕，简直和牛奶一般浑浊。照理说，那些水只能用来饮用，可我总是悄悄盛出一小杯用于早晨的梳洗。我会第一天洗脸，第二天刮脸，没有足够的水用来同时做这两件事。据点臭气熏天，兵营防御圈外到处都是排泄物。有些民兵喜欢在战壕里方便。当你不得不在黑暗中通过壕沟，那实在是再恶心不过。不过，我倒从不介意污秽。人们对于污秽物太小题大做了。你会马上习惯不用手帕，适应在同一个小罐里吃饭和洗漱，那过程快得惊人。只消一两天，和衣而眠也不会是什么难事。当然，夜晚睡觉也不大可能脱掉衣服和靴子，你必须做好准备，一遇攻击，立马投入战斗。虽然白天偶尔会脱掉衣服，但在那80个夜晚，我只脱过3次。对虱子来说，那天气太冷了，可鼠类却依旧猖獗。常言道，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看到两种老鼠。

但只要食物充足，这真的会变成现实。

其他方面的情况倒没那么糟。食物够好，酒也充足。每天都能分到一包香烟，火柴则隔天分发，甚至还能拿到蜡烛。那些蜡烛非常细，就像是圣诞节蛋糕上插的那种，大伙估摸着应该是从教堂里搜掠来的。每个战壕一天会分到3英寸[6]长的蜡烛，大约可以燃烧20分钟。当时尚能买到蜡烛，我也随身带来了几磅。之后，火柴和蜡烛的短缺令生活变得异常糟糕。只有缺少这些东西时才会明白它们有多重要。比如，晚上警报响起时，战壕里每一个人都会争相去抓自己的枪，结果却踩到别人的脸。是否有火光照明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每个民兵都有一个火绒打火机和几码长的黄色油绳。对士兵而言，这两样东西的重要性仅次于步枪。火绒打火机的好处在于它在风中也能打火，但它只能阴燃[7]，所以不能用来生火。火柴稀缺最严重时，生火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子弹从弹壳中取出来，用火绒打火机点着火药。

那是一段不寻常的生活——一种与众不同的参与战争的方式，假如可以称之为战争的话。全体民兵都对按兵不动感到恼怒，骚动频发，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不允许发起攻击。但显而易见，除非敌人动手，不然很久都不会有战事发生。乔治·科普在例行视察时对我们交代得很清楚。“这不是一场战争，”他曾这么说，“这是一出夹杂着死伤的滑稽戏。”事实上，阿拉贡前线的僵局背后有其政治因素，而我当时对此却一无所知。但仅就军事上的难题——除了兵员储备不足以外——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头一个难题便是这个国家的自然风貌。我方和法西斯分子设立的前线都由地势条件极佳的据点组成，一般只能从某一侧靠近。如果挖好几个壕沟，那么除非步兵数量具有压倒性优势，不然根本无法攻占。在我们以及周围的大多数据点内，12个人加两挺机枪就足以抵挡一整个兵团的进攻。我们占据了山顶上有利的地形，本应用大炮炸出些漂亮的印记，可我们却没有大炮。有时，我会凝望四方，期盼能得到几门大炮——啊，那渴望是何等热切！假使愿望成真，那么敌人的据点将被一个接一个地摧毁，就像用榔头敲开核桃壳一般轻而易举。但我方偏偏没有大炮。法西斯分子偶尔能从萨拉戈萨搬来一两门大炮，并把极少的炮弹打向我们。炮弹少得以至于他们从未弄清射程，弹片坠入空荡荡的山谷，难以伤人分毫。在遭到机枪射击而没有大炮可还击的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只有3件事：在安全的距离——比方说400码远——挖个战壕躲起来；在开阔地上进军然后被乱枪打死；或是发起不会影响全局走势的

小规模夜袭。但事实上，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按兵不动，要么自寻死路。

除此之外，常规武器极度匮乏。不费点周折是无法明白当时民兵的武器装备有多糟糕的。任何一家英格兰军官训练学校的队伍都比我们更像现代军队。我们的武器装备差劲得令人震惊，实在值得详细记录下来供后人一阅。

我们所在的部队里，整个炮兵队只有4门迫击炮，每门迫击炮只配有15枚炮弹。炮弹实在太过珍贵，不能轻易浪费，所以迫击炮被安置在阿尔库维耶雷。机枪与士兵人数比约为1：50。这些机枪已十分陈旧，但在三四百码范围内命中率还挺高。除此之外就只有步枪了，且大部分锈迹斑斑。有3种步枪可供使用。一种是毛瑟长枪，它们的使用时间大多不少于20年，瞄准器同路边损坏的测速器一样没什么用了，这些枪中的大部分膛线已被严重腐蚀，无法使用，10支枪中大约只有1支还能凑合着用。第二种是毛瑟短枪，也叫骑兵步枪，这是一种真正的骑兵武器。这种枪十分轻便，易于携带，即使在战壕中也不显麻烦，因而最受欢迎。同样也因为它们相对而言比较新，看上去也挺好用，可实际上它们几乎毫无用处。这些枪是用零散部件拼装而成，没有一个扳机是原配的，其中3/4的枪开火5次后保准卡壳。还有少数温切斯特步枪，很好使，但准心很差，而且弹膛没有弹匣，每次只能开一枪。弹药极度匮乏，每个到前线的人只分到50发子弹，其中大部分还糟糕透顶。西班牙产的弹药都是二次装填的，即使最好的步枪也会因此卡壳。墨西哥产的子弹质量好些，因此都留给机枪使用。质量最好的要数德国产的弹药，可只有从俘虏和逃兵那里才能缴获，因而数量很少。我总在口袋里留着一匣德国或墨西哥产的子弹以备不时之需。可实际上，真的发生紧急情况时我也很少开枪，我非常害怕那该死的子弹会卡壳，怕弹药会突然走火。

我们没有钢盔，没有刺刀，左轮手枪或自动手枪也很少，5到10人之中只有一颗手雷。我们当时使用的手雷是个可怕的东西，叫做“F.A.I.手雷”，由无政府主义者在战争伊始制造。这种手雷外形很像米尔斯式手雷[8]，但使用时不用保险销而是拉一条带子。必须拉断带子，接着尽可能快地扔出去。人们常说这种手雷“绝不偏私”：投弹者以及被投弹者都难逃一死。另外几种手雷更加原始，但或许稍微安全些——我指的是对投弹者而言。直到3月下旬，我才第一次看到一颗像样的手雷。

除武器之外，战争所需的一切物资也都出现短缺。比如，我们没有

地图和海图。西班牙从未被全面勘测过，这片地区唯一可用的详细地图是陈旧的军用地图，且大多掌握在法西斯分子手中。我们没有测距仪、望远镜或潜望镜，除了少数私人所有的望远镜外，还缺少野外双筒望远镜。我们没有照明弹或维利照明弹[9]，没有铁线钳和军械师所需的工具，甚至几乎没有清洁工具。似乎西班牙人从未听说过枪膛清洁掸，我动手做了一个，他们看了之后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以前需要清理步枪时，你得把枪交给中士，他会用一根铜质长杆来清理枪膛，只是那长杆总是弯曲不直，因而把枪膛刮得乱七八糟。那会儿甚至连擦枪机油都没有。要是找到橄榄油，就用它给步枪上油。我给枪上油时用过凡士林、冻奶油，甚至熏肉油。不仅如此，这里既没有路灯，也没有手电筒——我相信当时我们整个前线部队里找不出一只手电筒。要买手电筒，最近得到巴塞罗那，可甚至连那里也不容易买到。

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断断续续的枪声在山间回荡。我愈加感到疑惑，是否会发生些什么，好给这愚不可及的战争增添一丝生气，哪怕是死亡也好。我们对抗的不是敌人，而是肺炎。当双方壕沟间的距离超过500码时，除非凑巧，否则双方都不会被击中。当然也有伤员出现，但大多是自残。没记错的话，我在西班牙见到的头5个伤员都是被自己的武器所伤——倒不是故意为之，而是出于大意。我们的那些破枪本身就很危险，有些枪的枪托一触地就会走火，我见过一个士兵就这么被子弹打穿了手。没有经验的新兵总是在黑暗中相互误伤。一天晚上，当时还未到黄昏时分，一个哨兵在距离我20码开外的地方朝我放了一枪，子弹击中我身旁1码处——天知道西班牙人那糟糕的枪法救了我多少回。还有一次，我在浓雾天出去巡逻，去之前还仔细叮嘱过卫兵长。可返回时我被一棵灌木绊倒在地，闻声色变的哨兵大喊说法西斯分子来了，可笑的是我还听到那个卫兵长命令所有人朝我迅速开火。所幸我当时卧倒在地，子弹从我上方飞过。没有什么能让西班牙人（至少是西班牙年轻人）相信武器的危险性。之后过了很久，有一次我给几个机枪手拍照，他们端着枪，枪口直挺挺地对着我。

“别开枪。”我一边调着焦距，一边半认真半玩笑地说。

“哦，不，我们不会开枪的。”

旋即，一声可怕的巨响，一串子弹朝我打来，子弹紧贴着我的脸飞过，火药把我的脸颊灼得生疼。那些机枪手们并非当真想害我，只是把这当做玩笑。仅仅几天前，他们刚看到一个赶骡子的人被一位党派代表误伤，那个代表当时正在摆弄一把自动手枪，结果5发子弹击中了赶骡

人的肺部。

当时部队使用的口令很难记，因而也带来了一些危险。那是一种无聊的双词口令——前一个词必须和后一个词对应。口令的内容通常都带有激励和革命性质，例如：文化——发展，我们——不可战胜。一般来说，那些文盲哨兵不可能记得这些高级词汇。记得有个晚上的口令是加泰罗尼亚——英雄，有个叫贾米·多梅尼克的圆脸农家青年走到我跟前，满脸疑惑，让我给他解释一番。

“‘英雄’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他，这个词和“勇敢”是一个意思。之后没多久，他在黑暗的壕沟中蹒跚前进，哨兵喝住他：

“站住！加泰罗尼亚！”

“勇敢！”贾米喊道。他坚信自己说对了口令。

砰！

所幸哨兵没有打中他。在这场战争中，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干过此类打偏的把戏。

---

[1] 特鲁艾尔，西班牙中部省份，位于阿拉贡自治区南部。

[2] 加联社党，即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包含了加泰罗尼亚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共产主义政党。

[3] 罗布莱斯，位于阿拉贡自治区韦斯卡省。

[4] 佛朗哥，即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西班牙内战期间推翻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军队领导者，法西斯主义独裁者。

[5] 夸脱，容量单位，1夸脱=1.136升。

[6] 英寸，英制长度单位，1英寸约为0.03米。

[7] 阴燃，指无火苗，有时会冒烟的燃烧。

[8] 米尔斯式手雷，一种英国生产的手雷。

[9] 维利照明弹，美国军官爱德华·维利（Edward Very）发明的一种照明弹。

第四章

我在前线待了约3周后，英国独立工党[1]从本国派了一支二三十人的分遣队抵达阿尔库维耶雷。为了将前线所有的英国士兵统一组织起来，我和威廉斯也被派到了这支队伍中。我们的新据点位于奥斯库罗山，在之前驻守的据点以西数英里，从这儿可以望见萨拉戈萨。

据点位于凸出的石灰岩上，岩石犹如剃刀背般锋利，战壕以水平走势一直延伸至悬崖，好似崖沙燕的窠臼。战壕位于地底极深处，里面漆黑一片，异常狭小，人在其中甚至无法跪地，更别说站立了。我们左方的山峰上驻扎着另外两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队伍，其中的一支队伍吸引着前线所有士兵，因为那里有3个负责炊事的女民兵。这些女人算不得漂亮，但也足以使该据点在这清一色男兵的环境里独树一帜了。我们右方500码，在阿尔库维耶雷公路拐弯处是一个加联社党的据点。夜幕中，可以看到我方沿着阿尔库维耶雷公路蜿蜒前行的补给车的灯光，同时，法西斯分子的车辆则从萨拉戈萨驶来。西南方12英里外，稀疏的灯光组成了一条细长的光带，好似从舰船舷窗透出的灯光。自从1936年8月起，政府军便对该地虎视眈眈，现在依旧如此。

我们这支分遣队大约30人，包括1名西班牙人（威廉斯的连襟拉蒙），还配有12名西班牙机枪手。除了一两个讨厌鬼——众所周知，战争中总是不乏流氓人渣——英国士兵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心智上都是极为杰出的。其中最棒的要数鲍勃·斯迈利——其祖父是著名矿工领袖——可他后来却惨死于巴伦西亚。尽管言语不同，沟通困难，英、西两国士兵却一直相处融洽，西班牙人的个性由此可见一斑。我们发现所有西班牙士兵都会两句英语。一句是“好了，宝贝”，另一句则是巴塞罗那妓女用来招揽英国水手的话，恐怕排印工不会把它排印出来，在此略过不表。

前线依旧平静如故，零星有子弹的破空声，极少情况下会传来法西斯分子迫击炮的炮响，彼时，所有人都会冲向壕沟顶，看看炮弹在哪个山头爆炸了。此处，敌人距离我们更近些，相隔大约三四百码。敌方最近的据点正对着我们，那排机枪射击孔总是挑惹着我们攻击的欲望。法西斯分子甚少动用步枪射击，但只要有人冒头，就会遭到机枪集中扫

射。不过直到十几天后我们才出现第一名伤员。与我们对峙的是由西班牙人组成的部队，但据逃兵的消息称，其中还有少部分德国士官。过去那里还有摩尔人[2]——那些可怜的家伙，他们肯定被冻得够呛！——在无人荒地上曾出现摩尔人的尸首，成了当地的一道独特景观。我们左方一二英里处的阵地不再连成一片，那儿是一片低洼地，草木繁茂，属无人占据的中间地带。白天，我们和法西斯分子都曾在那一带巡逻。尽管我从未在数百码内遇到过法西斯巡逻队，但类似童子军的任务倒也不失趣味。匍匐潜行很长时间后，我们可以穿过法西斯的部分前沿防线，甚至可以看到飘扬着保皇党旗帜的农舍，那里就是当地的法西斯总指挥部。偶尔，我们会用步枪对着那儿一阵齐射，然后趁敌人的机枪锁定我们之前迅速隐蔽起来。我希望能够打碎几扇窗户，可我们和农舍相隔足足有800米远，而且考虑到我们手上尽是些破枪，甚至连能否打到农舍都难说。

天气大多晴朗且寒冷。正午间有时出太阳，但寒冷依旧。山坡上到处可见野番红花和鸢尾花的绿苗破土而出，显然，春天正在降临，只是脚步姗姗。夜晚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冷。有时站岗完毕，我们会将炊事房的余火灰扒到一起，站在火红的灰堆上取暖。这对靴子来说很不好，可双脚却大为受用。有些清晨，山顶破晓时分的景致非常壮观，即便不做晨祷，早起也是值得的。我讨厌山，无论它们看起来有多么壮观。可有时，我们后方的山顶出现破晓的晨光，第一缕细细的金光如同利剑划破黑暗，渐强的光亮和火红的云海继而向无尽的远方伸展。即使彻夜未眠，膝盖以下双腿发麻，或许还得再等3个小时才有东西吃，这样的景致也值得一看。我在战时所看过的晨景比之前所见的——我希望，也包括余生岁月——总和还多。

我们这里人手不足，这意味着每个人的站岗时间更长，自然也更加疲惫。即使是在战事最平静的时候，睡眠时间也难以保障。由于睡眠不足，我已开始感到不适。除了站岗和巡逻以外，夜间警报和执勤也始终不停。待在一个好似兽穴的壕沟内，双脚冻得生疼，在这种情形下，无论如何都难以好好休息。在前线的头三四个月里，我连续24小时不睡估计不超过12次，但睡饱的次数也没那么多。一周只睡二三十个小时是家常便饭。睡眠不足的影响倒没想象的那么糟，只是人会变得木讷，在山里爬上爬下变得愈加困难。这倒还能挺得住，只是饥饿感始终萦绕不去——天哪，我们简直饿疯了！所有食物看起来都那么美味，哪怕是千篇一律的扁豆。凡是在西班牙待过的人最终看到这东西都会觉得反胃。我们的用水来自数里之外，靠骡子和可怜的小毛驴驮至前线。不知为何，

阿拉贡地区的农民对骡子爱护备至，对毛驴却是一副硬心肠。如果有毛驴在半道上拒绝前进，赶驴的经常就朝着它的驴蛋子踢上一脚。蜡烛不再配给，火柴也已告罄。西班牙士兵教我们如何用压缩牛奶罐、子弹夹和少许破布制作橄榄油油灯。一般很难弄到橄榄油，但只消一点儿，就能点着灯，摇曳的火苗伴着烟雾，亮度只有蜡烛的1/4，只能让人勉强看清步枪摆放的位置。

这里似乎没有爆发任何真正战斗的可能性。我们离开波塞罗山时，我清点了一下自己的弹匣，发现在将近3周时间里，我只朝敌方开了3枪。有人说杀死一个敌人需要1000发子弹，照这么算，要打死一个法西斯分子，我还得等上20年。在奥斯库罗山，双方阵地更加接近，交火也更频繁，但我有理由相信自己一个敌人也没打中过。实际上，当时在前线，真正的利器不是步枪而是扩音喇叭。既然无法杀死敌人，那么就朝对方大声嚷嚷。这种作战方式非比寻常，有必要对其解释一番。

只要敌我双方阵地间的距离近到可以听见彼此的声音，呼喊声便在战壕间此起彼伏地响起。我们会喊：“法西斯分子——娘娘腔！”而对方则回应道：“西班牙万岁！佛朗哥万岁！”或者，当知道我方阵营有英国人时，他们会高喊：“英国佬，滚回家去！我们的国家不需要外国佬！”那些支持政府的民兵组织常用高喊煽动性口号的方式打击敌方士气。在处于有利地形的据点内，士兵（通常是机枪手）人手一个扩音喇叭，负责向敌方喊话。一般而言，他们喊话的内容都有固定套路，言辞满溢着革命激情，告诉法西斯士兵，他们不过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马前卒，他们所反对的是自己的阶级等诸如此类的言语，并敦促他们弃暗投明。这些口号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有时几乎彻夜不止。喊话无疑起了作用，所有人都认为法西斯逃兵源源不断地前来投诚的部分原因正在于此。可以想见，某个可怜的哨兵——很可能是个被强征入伍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工会成员，在岗哨上冻得瑟瑟发抖，此时，黑暗中不断响起“不要和你自己的阶级为敌！”的口号声，定然会对他造成影响。选择逃跑还是坚守就在这一念之间。当然，这种做法显然与英国士兵的战争观格格不入。第一次目睹这种做法时，我承认自己感到震惊和反感。不去打死敌人，反而琢磨着如何策反敌人，天下竟有这般道理！不过现在，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我觉得这都不失为一种得当的策略。在没有大炮的情况下，要在交火中击伤敌人且自己全身而退是极其困难的。如果能策反一定数量的逃兵，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事实上，逃兵比死人更有用，因为他们能提供情报。可一开始，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不妥，觉得西班牙人对待战争的态度不够严肃。我们右下方加联社党岗哨

里负责呼号的家伙实在是个中翘楚。有时候，他喊的不是什么革命口号，而是仅仅告诉法西斯分子我们吃的东西比他们好得多。他关于政府物资配给的言论多少有点臆想的成分。“黄油土司！”——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间回荡——“咱们就在这儿享用黄油土司！多诱人的黄油土司啊！”在那冰冷的夜晚，听到黄油土司能令许多法西斯分子垂涎欲滴。其实，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和我们一样，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或者好几个月没见到过黄油了。尽管我明知他在撒谎，但也不禁口水直流。

2月的一天，我们发现有法西斯飞机朝我方飞来。和往常一样，机枪被架到开阔地带，枪管朝上，每个人都仰卧在地瞄准目标。像我们这样孤立的据点并不值得轰炸，法西斯经过我方上空的少数的几架飞机往往会选择绕行，从而避开机枪火力网。可这一回，飞机径直飞了过来，但飞行高度超出了机枪射程。飞机上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白色的闪光物，在空中不住地翻滚。其中的少部分落入了我们的据点。原来是法西斯报刊《阿拉贡先驱报》，上面刊载了马拉加沦陷的消息。

当晚，法西斯分子发动了一次袭击，结果无功而返。当时我刚准备躺下休息，就在半梦半醒之时，头顶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枪弹声，有人在战壕中高喊：“敌人进攻了！”我抄起步枪，潜行至自己位于据点最高处的岗位，岗位旁就是机枪。那里一片漆黑，骇人的喧嚣响彻天际。根据对方火力，我判断有5挺机枪在朝我们射击。又响起了一阵巨大的爆炸声，法西斯的那些傻瓜大概把手雷投到了己方的防护墙上，结果炸弹在自己的据点引爆了。周遭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左侧山谷下亮起一片步枪的绿色火光，可能是一组法西斯巡逻小队正准备包抄。黑暗中，子弹在我们周围乱飞，响起阵阵爆裂声。有一小部分炸弹从头顶呼啸而过，但落点都离我们很远，而且大多都是哑弹（这在战争中是常有的事儿）。我所面临的局势颇为严峻，因为后方的山顶又有另一架机枪开始射击——这枪实际上是支援我方的，但当时我们误以为自己陷入了包围。我们自己的机枪卡壳了，那些该死的弹药总是卡住枪膛，而清膛杆也在黑夜中不知去向。显然，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站在那儿等死。西班牙机枪手不屑于隐蔽，甚至刻意暴露自己，我也只好效仿。那是我经历的第一次交火，让我感到羞愧的是，我发觉自己吓坏了。我注意到，人在遭到猛烈攻击时都有相同的感受——相比被子弹击中而言，更令你害怕的是不知道哪里会被击中。你会不住地胡思乱想，究竟子弹会打中身体哪个部位，而这会令你全身高度紧张，异常痛苦。

一两个小时过后，交火渐渐平息。其间，我们只有一人受伤。法西斯分子把几架机枪推进到了无人地带，但他们始终和我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并未企图向我们的防护墙发动猛攻。事实上，他们并非真的想要进攻，只是浪费些子弹，制造点喧闹，庆贺他们攻占了马拉加。关于这次交火，我收获的最宝贵的经验在于，不要轻信报刊上的讯息。因为一两天之后，报纸和广播报道了以下消息：敌人的骑兵队和坦克部队向我方发动了猛烈进攻（交火地点可是在垂直的山坡上），但被英勇的英国人击溃了。

对于法西斯分子散布的马拉加沦陷的消息，我们只当是谎言。可第二天，谣言越传越真。一两天之后，消息被官方证实了。这个令人感到耻辱的事件一点点浮出水面——守军如何不做丝毫抵抗就放弃了城镇，意大利人的怒火没能发泄在撤离的部队身上，却反而拿可怜的平民撒气，部分平民遭到机枪驱赶至100英里以外。这则消息令前线的所有人都颇感丧气，无论事实究竟是怎样，所有的民兵都相信马拉加的沦陷是因为叛徒出卖。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谈论背叛和分歧。头一遭，关于这场战争的怀疑在我心中隐隐浮现。而在此之前，对与错显得那么简单明了。

2月中旬，我们撤离奥斯库罗山，同该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部队一起被派去围攻韦斯卡。卡车载着我们行驶了50英里，穿越冬季的平原，那里修剪过的葡萄藤还未发芽，冬麦的嫩叶从土壤中探出头来。新战壕距离韦斯卡4公里，从这里可以看到韦斯卡灯火闪烁，城里的建筑小得好似玩具一般。数月之前，当攻下谢塔莫时，政府军将领曾乐观地表示：“明天我们将在韦斯卡城内喝咖啡。”结果，他的话落空了。虽然攻势猛烈，但政府军并未能攻克韦斯卡。于是，那句“明天我们将在韦斯卡喝咖啡”的豪言成了全军流传的笑话。假如我有机会重回西班牙，定要在韦斯卡喝上一杯咖啡。

---

[1] 英国独立工党：成立于1893年，是英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2] 摩尔人：中世纪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北非穆斯林的贬称。

第五章

直到3月下旬，韦斯卡东边平安无事——真的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事。我们距敌军1200米远。法西斯分子被赶回韦斯卡时，控制这条战线的共和国军队并没有迫切推进的意愿，于是战线形成了口袋状。之后，战线不得不向前推进——由于顶着敌人的火力，那是个不小的难题——但就当时而言，敌人好像完全不存在，当务之急是取暖和吃饭。事实上，那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令我很感兴趣，我会在之后的篇幅中讲到。鉴于要在这里介绍政府军内部的政治立场，我会尽量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来叙述。

起初，我忽视了这场战争的政治意义，而此刻我不得不去注意它。假如你对党派政治的恐怖行为不感兴趣的话，请跳过以下内容。正因如此，我试图将涉及政治的部分独立出来，自成章节。然而，单纯从军事角度去记录西班牙战争是不可能的。首先，这是一场政治战争。除非对暗藏在政府军阵线内的党派斗争有所了解，否则就无法理解在战争第一年内发生的任何事情。

当我抵达西班牙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于政治形势，我既无兴趣，也不知情。我知道正在打仗，但对这战争到底是何性质却一无所知。如果你问我为何要加入民兵队，我会回答说：“为了打倒法西斯。”如果你问我为何而战，我会说：“为了共同利益。”当时，我认同《新政治家》的观点：这场战争是为了守护文明，抵抗希特勒支持的布林普斯上校发起的疯狂进攻。巴塞罗那的革命氛围曾一度深深吸引着我，但我却没有试着去理解它。纷繁林立的党派、工会以及它们那些惹人厌的名称——PSUC（Partido Socialista Unificado de Cataluña，即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POUM（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即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FAI（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即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CNT（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即全国劳工联盟）、UGT（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即劳工总会）、JCI（Juventud Comunista Ibérica，即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团）、JSU（Juventudes Socialistas Unificadas，即社会主义统一青年团）、AIT（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即国际劳工联合会）——只会令我恼火，给人造成的第一印象是首字母缩略词正在西

班牙泛滥成灾。我知道自己服役的组织名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我加入该组织仅仅是因为我来到巴塞罗那时携带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介绍信），但我并未意识到，各党派之间差异巨大。在波塞罗山时，有人指着我们据点左边说："那些人是社会主义者"（指社会主义同盟成员），当时我觉得难以理解，问道："我们不都是社会主义者吗？"依我看，既然大家都搏命斗争，那么再有党派之分就实在显得愚蠢。对此，我的态度一直是这样的，"我们何不抛弃荒唐的政治因素，专注投身战争呢？"当然，这是正统的"反法西斯"态度，也是英国报刊竭力宣扬的态度，为的就是尽可能地阻止人们了解该战争的真正本质。但在西班牙，尤其是加泰罗尼亚，没有人能够或是真正恪守这种态度。无论有多么不情愿，每个人或早或晚都得选择自己的立场。因为即便一个人对党派和"阵线矛盾"毫不关心，他自身的命运也交织其中，难脱干系。作为一名民兵，他是反抗佛朗哥的战士，但置身于两种不同政治理论论战的大背景中，他也只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当我在山区搜寻柴草时，心中满是疑惑，这到底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还是《新政治家》编造出来的战争？当我在巴塞罗那暴动中躲避共产党人的枪林弹雨时，当我在军警的追捕下最终逃离西班牙时——我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加入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队而非加联社党的组织。两组首字母缩写词背后竟是天差地别。

要想弄明白政府军方面的联盟关系，就必须要清楚战争是如何爆发的。7月18日战事爆发时，欧洲所有的反法西斯者或许都感到了一丝希望。因为显然在这里，民主力量终于奋起反抗法西斯主义了。过去多年中，所谓的民主国家面对法西斯主义步步退让。日本在满洲里为所欲为；希特勒掌权，继而屠杀各阶层的政治异见者；墨索里尼轰炸阿比西尼亚[1]时，53个国家（我记得是53个）宣称"不干涉"。可出乎意料的是，当佛朗哥意图推翻一个温和的左翼政府时，西班牙人民揭竿而起了。这看上去似乎是——也可能就是——历史的转折点。

然而有几个事项未引起普遍注意。首先，严格来讲，佛朗哥不能等同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他是通过由贵族和教会支持的军事政变而崛起。而且总的来看，尤其是叛乱伊始，他的意图与其说是推行法西斯主义，不如说是为了恢复封建统治。这意味着佛朗哥不仅站在了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而且也成了自由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敌人——当法西斯主义以现代化的面目出现时，自由资产阶级正是其支持者。更为关键的是，与英国人不同，西班牙工人阶级并非以"民主"和"惨淡现状"的名义反抗佛朗哥，他们的斗争伴随着——也可以说包含着——绝对的革命情感的迸

发。农民占有了土地；工会占据了许多工厂和绝大多数交通工具；教堂被毁，教士遭驱逐或屠杀。在天主教教士的欢呼声中，《每日邮报》把佛朗哥形容成一名爱国者，是他将国家从凶残的“赤匪”手中解救出来。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佛朗哥真正的敌人是工会而非政府。起义爆发伊始，被组织起来的城镇工人们便响应号召施行大罢工，接着要求——在一场冲突过后——分得火药库的武器。假如他们的行动并非出于自发，且或多或少是独立的话，那么佛朗哥很可能永远都不会遭到阻碍。当然，这种假设无法求证，但至少让人有理由作此猜测。政府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试图阻止早有迹象的叛乱，而当问题爆发时，政府的态度也显得软弱和犹豫不决，以至于西班牙一天之内竟更换了3名总理[2]。不仅如此，对于将武器发给工人这一能够挽回时局的决定也仅仅是爆发了激烈的群众运动后才不得已施行的。然而，武器终究还是分发给了工人，在西班牙东部的大城镇中，法西斯遭到挫败，其中的主要抵抗力量正是工人阶级，此外还有部分仍忠于政府的武装力量（如突袭卫队等）。这样的抵抗力量只可能来自具有革命意识的人——比如说，他们相信自己是为了改变现状而战斗。在叛乱的各个中心地带，估计每天有3000人葬身街头。手持粗制炸药的男男女女们在空旷的广场上奔走，朝着手持机枪、训练有素的士兵所把守的堡垒发动进攻。法西斯分子在战略要地建立起的机枪火力网被时速60英里的出租车冲撞得支离破碎。即使有人没听说农民占据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等，也很难相信作为抵抗力量中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是为了保卫资本主义民主。尤其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眼中，资本主义民主不过是集权统治的欺诈形式。

与此同时，工人们武器在手，当此时局，他们也拒绝放弃武器。（甚至在一年以后，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工团组织估计仍拥有3万支步枪。）在许多地方，亲法西斯大地主们的地产被农民占有。在工业和交通实行集体化管理的同时，人们通过地方委员会、工人巡逻队取代旧式亲资本主义警力，建立以工会为基础的工人民兵队等方式，并试图建立初级的工人政府。当然，各地实施的进程并不一致，加泰罗尼亚地区实行的程度超过了其他地区。有些地区的政府机构几乎未受丝毫影响，还有的地区原政府机构甚至和革命委员会并立。在少数地区建立了独立的无政府主义者公社，其中的一些公社始终在运行，直到大约一年后才被政府武力镇压。最初的几个月里，加泰罗尼亚的实际权力主要掌握在无政府主义工团手里，他们掌控了城市命脉。事实上，西班牙发生的并不仅仅是一场内战，而是一场革命的开始。正因如此，西班牙境外的反法西斯媒体竭力去掩饰这一事实。这场战争被狭隘地归类成“法西

斯对抗民主”，而其中革命的性质却被尽可能地隐藏起来。在英格兰，媒体受中央政府控制，民众也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受蒙骗，因此关于西班牙战争只有两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右派所说的基督教爱国者同血淋淋的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以及左派所说的温和共和主义者平定一场军事叛乱。事件的核心被成功地掩盖了。

这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亲法西斯媒体散布革命暴行的骇人谎言，而善意的宣传者们毫不怀疑自己否认西班牙“倒向红色政权”是在帮助西班牙政府。但以下才是主要原因：除了各国的小规模革命团体外，全世界都决心阻止西班牙发生革命。尤其是以苏维埃俄国为靠山的西班牙共产党倾尽全力反对革命。共产党认为，时下的革命是致命的，西班牙国内的目标不在于工人夺取政权，而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资本主义者也持相同观点，理由不言自明。国外资本在西班牙有众多投资利益。例如，巴塞罗那公共运输公司代表了不列颠上千万的资本，而此时工会掌握了加泰罗尼亚所有的运输工具。如果革命继续推进，外国投资者不会得到赔偿，即使有赔偿也数量甚小；而如果资产阶级胜利的话，国外投资便会得到保障。既然革命终究要被扼杀，那么假装革命压根没发生会令一切变得简单许多。这样一来，每个事件的真正意义都能被掩盖，工会和中央政府之间每次权力交替都可以被描绘成军事重组的必要步骤。这使得局势变得极为滑稽。在西班牙境外，很少有人知道爆发了革命；而在国内，没人怀疑革命的存在。即使是共产党控制的、或多或少支持反革命政策的加联社党报刊也会谈论“我们光荣的革命”。而与此同时，国外的共产党报纸却竭力宣称没有革命的迹象，占据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等都没有发生——或者虽有发生，但没有“政治意义”。《工人日报》（1936年8月6日刊）写道，那些声称西班牙人民正在为社会革命或是为一切非资产阶级民主战斗的人是“彻头彻尾的骗子”。然而，巴伦西亚政府成员胡安·洛佩斯于1937年2月宣称：“西班牙人民正在抛洒鲜血，为的不是民主共和或是成文宪法，而是……为了革命。”由此可见，“彻头彻尾的骗子”也包括了政府成员，而我们则为其效命。有些国外反法西斯报纸甚至不惜撒下弥天大谎，声称教堂只是在被用作法西斯堡垒时才受到冲击。事实上，各处的教堂都遭到劫掠，因为人们深知西班牙教堂是资本主义者时常光顾的场所。在西班牙的6个月里，我只见到过两处未被损毁的教堂。直到1937年7月为止，除了马德里的一两处新教教堂，其他所有教堂都被禁止开放或举行仪式。

但这毕竟只是革命的开始，而非全部。甚至当工人们——当然是在加泰罗尼亚，也可能包括其他地区——有能力那样做时，他们也没有推

翻或是完全取代现有政府。显然，他们不能那么做，因为佛朗哥还在叫阵，而中产阶级各派别还站在他们一边。这个国家正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要么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要么回到普通资本主义共和国模式。农民获取了大多数土地，除非佛朗哥赢得胜利，否则农民很可能继续保有手中的土地。所有的大型企业都实施了集体所有制，但最终哪一方获胜将决定它们是保持现状还是恢复资本主义。最初，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半自治政府都完全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中央政府由左翼社会主义者卡瓦列罗领导，包括几名代表工人联盟[3]（社会主义工会）和劳工联盟[4]（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工团联盟）的部长。而加泰罗尼亚半自治政府则实际上一度被反法西斯防御委员会[5]取代，后者主要由工会的代表组成。这个防御委员会后来解散，半自治政府得到重组以代表工会和各个左翼政党。但伴随着之后的每一次重组，政府的右倾倾向愈发严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首先被逐出政府；6个月后，卡瓦列罗被右翼社会主义者奈格林取代；不久，劳工联盟被清除出中央政府，接着轮到了工人联盟，再接着劳工联盟被排挤出自治政府；最终，革命战争爆发一年后，政府完全被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党人和共产党人掌控。

全面右倾始于1936年10月至11月。当时，苏联开始向中央政府提供武器，权力也开始从无政府主义者转移至共产党人手中。除了苏联和墨西哥，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对西班牙政府伸出援手。显然，墨西哥无法提供大量武器，结果苏联占据了主导权。面对他们“阻止革命，否则武器免谈”的要求，西班牙政府很难说不。而作为扼杀革命的第一步棋，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逐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就是出自苏联的授意。尽管苏联政府对此施加直接影响的说法被否认了，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所有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都可能施行苏联的政策，而且也无人否认共产党是主要推手。首先对付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接着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卡瓦列罗阵营的社会主义者，并且对革命政策施行全面封杀。苏联的干预保证了西班牙共产党的胜利。首先，得益于苏联提供的武器，尤其是国际纵队抵达之后，共产党人胜利在望的情形大大提升了共产党的威望。其次，苏联的武器通过共产党及其联合政党派发，从而受到严格控制，极少落到敌对党派[6]手中。再次，通过宣扬非革命政策，共产党人得以团结了对极端主义心存畏惧的一切势力。例如，通过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体主义原则，共产党人很容易将富农团结起来。加入共产党的人数迅速增加，而这些新鲜血液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商店店家、官员、军官和富农等。这场战争本质上是一种三角斗争。反抗佛朗哥的斗争必须进行下去，但政府同时还要从工会手里夺回原有的权力。夺权由一系列细微的、总体而言十分巧妙的行动组成——有人把这称作“干扰

政策”。表面上没有反对革命的行动，直到1937年5月前都很少需要动用武力镇压。工人们总是无可奈何，只要简单地说一句“除非你这么做，或那样做，要不然我们就会输掉战争”，他们便会就范。不消说，每次工人们听从军令放弃的似乎都是他们在1936年亲手赢得的东西。但这种手段百试不爽，因为输掉战争是革命党派最不想接受的结果。假如输掉了战争，那么民主和革命，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字眼。作为唯一成气候的革命党派，无政府主义者们不得不一次次选择退让。集体化的进程受到阻碍，地方委员会被撤销，工人巡查队被解散，战前的警察体系得以恢复——很大程度上甚至得到加强，武器装备也十分精良。工会控制的各核心行业被政府接手（占领巴塞罗那电话局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这直接导致了“五月战斗”）。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以工会为基础的工人民兵组织逐渐被解散并整编至新人民军中。新人民军是一支属于半资产阶级阵线的“非党派”军队，军内酬劳不尽相同，军衔有高低之分。在当时的境况之下，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步。相比其他地方，这种情况在加泰罗尼亚发生得较晚，因为这里是革命政党势力最强之地。显然，工人们取得胜利的唯一保障就是保留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同往常一样，借着提高军事效率的名义，民兵队伍被解散了。没人否认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军事重组。然而事实上，在不改变民兵由工会直接领导的前提下对其进行重组、提高军事效率是完全有可能的，实施整编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无政府主义者拥有自己的军队。不仅如此，民主精神令民兵们极其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共产党人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们无休止地猛烈抨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均富同酬的原则。全面的“资产阶级化”正在发酵，这是对革命最初几个月内平均主义思想的刻意破坏。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迅速，人们到访西班牙前后相隔不过数月，眼中所见竟是大不相同。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一度是工人当家做主的国度开始向传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变，贫富差别再度显现。1937年秋天，“社会主义者”奈格林在公开讲演中宣称“我们尊重私人财富”，而在战前因亲法西斯主义而逃离西班牙的议员们又重新归国。如果你没有忘记资产阶级和工人是迫于法西斯的压力而暂时结成联盟的话，那么整个过程就不难理解了。这个联盟被称作“人民阵线”，本质上是由敌对集团组成的联盟，它的命运很可能以其中一个集团吞并另一个集团告终。西班牙局势唯一出人意料的特点——在西班牙境外造成了深深的误解——在于政府一方的党派中，共产党人并不属于极左阵营，而是极右阵营。事实上，这本不应该令人惊讶，因为各国共产党的策略（尤其是在法国）都证明了，当时官方的共产党无论如何都应该被视为反革命力量。共产国际的全部政策此时都为保卫苏联服务（考虑到全球局势，这也情有可原），而保卫苏联则仰仗军事同盟体

系，尤其是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法国的同盟关系。如果资本主义力量在法国被削弱，那么同盟关系对苏联来说就作用甚微，因此，法国共产党的政策必须是反对革命。这不仅意味着法国共产主义者在三色旗的引领下行动，口中高唱马赛曲，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得不放弃在法国殖民地颇有成效的宣传活动。法国共产党书记托雷斯曾宣称法国工人绝不会遭受蒙骗，绝不会和他们的德国同志们为敌[7]。然而不到三年的时间，他摇身一变成了法国声势最大的爱国者。某一国共产党的举动多少会与该国同苏联实际或潜在的军事关系息息相关。比如，英格兰的立场尚不明朗，因此英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依旧保持敌意，同时也公开反对重新武装。但假使大不列颠同苏联缔结同盟或达成军事互信，那么英国共产党就会和法国共产党一样无可选择地成为爱国者和帝国主义者，这早就有迹可循。作为苏联的同盟，法国势必会强烈反对一个革命气氛高涨的邻国，使尽浑身解数来防止西属摩洛哥的解放，这一事实无疑对西班牙共产党“路线”造成了影响。受莫斯科资助的《每日邮报》刊登了大量红色革命流言，较之往常更为出格。事实上，在西班牙最反对革命的就是共产党。之后，右翼力量全面掌权，相比自由派，共产党人对将革命领袖赶尽杀绝展现出了更强的意愿[8]。

我已经尽可能对西班牙革命头一年的经过做了大致描绘，因为这有助于人们理解此后各时期的局势。但我并不想暗示说，我在2月间便已在头脑中形成了上述想法。首先，那些对我产生重大启发的事件尚未发生，而且我的同情心从某些方面而言与现在大为不同。部分原因在于战争的政治因素令我厌倦，而我一般都会排斥经常听闻的观点——例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独立工党的观点。我周围的英国人大多是独立工党的成员，还有少数是共产党员。同我相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接受了更好的政治教育。在韦斯卡周边没有战事发生的无聊时期，一连数周，我发觉自己置身于永无休止的政治讨论之中。在四面透风、臭气熏天的农舍谷仓中，在窒闷黑暗的壕沟里，在午夜寒风凛冽的防护墙后，人们就矛盾的党派“路线”争论不休。在西班牙人的部队中情况也是如此，而在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报纸上，党派间的宿怨也成了主要内容。除非是聋子或者傻瓜，否则很难不受到不同党派立场观点的影响。

在纷繁的政治理论中，真正重要的只有三个党派的观点：加联社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这大抵是个无政府主义党派）。我首先提到加联社党是因为它是最重要的党派，该党最终取得了胜利，即便是此时，它也明显占优势。

有必要解释一下，人们提起加联社党“路线”的时候，其实指的是共产党“路线”。加联社党（全称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是加泰罗尼亚的社会主义政党；在战争之初，它由多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合并而成，其中包括了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但此刻它被共产党完全掌控，并隶属于第三国际。在西班牙的其他地方，都没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正式联盟，但在人们眼中，各地的共产主义和右翼社会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简单来说，加联社党是劳工总会（社会主义工会）的政治机构。在西班牙全境，工会的成员大约有150万人，其中包括了许多蓝领工人。但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大量涌进的中产阶级成为其中坚力量，因为在“革命”早期，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认为加入劳工总会或者劳工联盟有利可图。这两个组织有些重合，但其中，劳工联盟更像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组织。因此，加联社党里部分是工人，部分是小资产阶级——商家、官员和富农。

在全球的共产主义或亲共产主义报刊中，加联社党的“路线”大致表述如下：

“此刻，唯一重要的就是赢得战争。在战争中，除了胜利，其他的一切都没有意义。因此，当下不适合探讨推进革命。强制推行集体制，失去农民的支持，这样的损失我们承受不起；中产阶级正在与我们并肩作战，我们也无力承受吓跑他们的后果。最重要的是，为了提升效率，我们必须防止革命带来的混乱。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取代地方委员会，必须打造出一支训练精良、全副武装的队伍，并使之接受统一的领导。机械地重复革命口号绝无益处。这不仅会妨碍我们的事业，甚至会让革命倒退，因为这会引发分裂，而法西斯分子则会利用这一点来对付我们。此刻，我们不是为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而是为了议会民主而战。无论何人，凡是意图将内战转变为社会革命，都将正中法西斯分子的下怀，即使不是出于本意，也事实上成了叛徒。”

除了对赢得战争重要性的认识以外，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路线”观点同加联社党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政党，这种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党派过去几年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过。它们反对的是事实上或表面上改变共产主义政策。该党由部分前共产党员和部分工农团体组成。从人数上来说，这是一个小党[9]，在加泰罗尼亚之外影响甚微，但重要的是它有相当一部分具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党员。该党在加泰罗尼亚的根据地是莱里达。它并不代表任何工会组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大多是劳工联盟的成员，但党员则实际

上主要隶属于劳工总会。然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劳工联盟的影响力有限。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路线”大致如下：

“通过资产阶级‘民主’来反对法西斯主义是天方夜谭。资产阶级‘民主’只是换了招牌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也是如此，以‘民主’对抗法西斯主义是用一种资本主义对抗另一种资本主义，而前者很容易随时转变为后者。唯一真正能取代法西斯主义的是工人掌权。假如不以此为目标，要么会将胜利拱手送给佛朗哥，要么会让法西斯乘势而入。与此同时，工人们必须牢牢抓住自己赢得的一切，假使向半资产阶级政府屈服，那么他们注定将遭受欺骗。工人民兵队和警察力量必须以现有的形式保存下来，必须抵制任何将他们‘资产阶级化’的意图。如果工人不掌握武装力量，那么武装力量将控制工人。战争和革命是不可分割的。”

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没有那么明确。在任何情境下，“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宽泛的字眼都可以将许多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包括在内。劳工联盟由大量工会组织组成，有大约200万成员，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作为其政治机构。虽然和大多数西班牙人一样总是受到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影响，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的成员并不一定是纯粹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尤其自战争伊始，他们更多地遵循普通社会主义的方向，因为时局迫使他们参与集权机构，甚至背离自己的原则去加入政府。然而，他们同共产主义者有着本质区别，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一样，目标在于工人掌权而非实现议会民主。他们认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口号：“战争与革命不可分割”，尽管他们对此并不教条刻板地遵循。简而言之，全国劳工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的立场如下：（1）所属行业的工人直接控制该行业，例如交通、纺织等；（2）由地方委员会进行管理，反对一切形式的中央集权；（3）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和教会。最后一点尽管定义最为宽泛，但却是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极其反对大多数所谓的革命，尽管原则十分模糊，但他们对于特权和不公平痛恨至极。从哲学角度而言，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不同的两个极端。实际上——比如在理想的社会形态方面——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于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却很难调和。共产主义者总是强调中央集权和效率，而无政府主义者强调的却是自由和公平。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根深蒂固，当苏联的影响逐渐减弱时，无政府主义颇有压过共产主义之势。在战争最初的2个月中，正是无政府主义者挽救了局势，而在此之后，尽管无政府主义民兵纪律涣散，却是西班牙武装力量中最具战斗力的。大约自1937年2月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就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融合。假如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

统一工人党和左翼社会主义者在一开始就有联合的意识并宣传实际可行的政策，战争的历程或许会不同。但在战争早期，各革命党派似乎都胸有成竹，因此联合是不可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不睦由来已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无政府主义持怀疑态度，而从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来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比共产主义者的“斯大林主义”好多少。然而，共产主义者的策略促使两党走到了一起。5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加入了巴塞罗那的惨烈激战，这主要缘于其支持全国劳工联盟的本能；而之后，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遭到镇压时，也唯有无政府主义者敢于为其出头直言。

因此，简而言之，各派联合情况如下：一派是支持工人掌权的全国劳工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部分社会主义者；另一派则是支持中央集权政府和武装军队的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党人和共产主义者。

此时，相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观点，我更青睐共产主义立场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共产党人的政策明确可行，从常识来看，这种政策虽然仅能预见数月后的情势，却显然是更好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策朝令夕改，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极不善于宣传，否则他们应该能吸引更多的追随者。最关键的是，共产主义者——至少从我的观点来看——积极投身战争，而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却毫无作为。在当时，这是民众的普遍感受。通过迎合中产阶级反对革命，共产主义者掌握了权力，党员规模迅速扩大，当然其中部分原因也在于看起来他们是唯一可能赢得战争的人。共产主义者手握苏联的武器，领导部队开展了壮烈的马德里保卫战，这让他们成为西班牙的英雄。正如人们所说，每一架飞过头顶的苏联飞机都是共产主义者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纯粹革命理念尽管在我眼中有其逻辑，但却很难实现。毕竟，赢得战争才是最重要的。

与此同时，党内宿怨见诸报刊、宣传册、海报和书本——到处可见。当时，我看得最多的报纸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战斗》和《前线》，报上对“反革命”的加联社党无休止地吹毛求疵令人生厌。此后，我更深入地研究了加联社党和共产主义者的报纸，才意识到与对手相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直无可指摘。撇开其他不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宣传机会少得可怜。和共产主义者不同，他们在国外没有任何宣传渠道，而由于共产党人掌控了主要的报纸审查权，马克思主

义统一工人党在国内的宣传也尽落下风，一旦出现不利言论，他们的报社就很容易遭到查封和罚款。尽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无休止地宣扬革命、引用列宁语录，但平心而论，他们很少进行个人诽谤。他们的论战主要限于报纸文章；大幅的彩色宣传海报（在西班牙海报很重要，因为西班牙国内有大量文盲）并不攻击敌对政党，而仅仅是宣传反法西斯或抽象的革命思想；民兵们传唱的歌曲亦是如此。共产主义者的攻击则大相径庭。关于这点，我会在之后的篇幅中写到。这里，我只能简略地提一下共产主义阵线的攻击。

从表面上来看，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之间的争论在于策略不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赞成立刻进行革命，而共产党却不同。双方的策略都可圈可点。不仅如此，共产党抗议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宣传分化，削弱了政府力量，因而令战争形势恶化。尽管说到底我对此观点并不认同，但这未尝不可以引发一个有益的讨论。然而共产党人的策略的特点却在此显现。一开始先试探，接着声势渐起，他们开始声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政府力量的分裂并非出于糟糕的决断，而是刻意为之。他们声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过是一群伪装起来的法西斯，在佛朗哥和希特勒的支持下，打着伪革命的宣传旗号，实则是为法西斯事业开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组织，是“佛朗哥的第五纵队”。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包括上万名在前线战壕中瑟瑟发抖的士兵和成百上千来到西班牙抵抗法西斯的外国人（他们为此牺牲生计和国籍），到头来却成了受敌人雇佣的叛徒。这种说法通过海报等宣传手段传遍了整个西班牙，并且在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和亲共产主义报刊上反复报道。我要是想收集这些报道言论，可以写整整一打书。

当时，他们就是这么评价我们的：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法西斯、叛徒、凶手、懦夫、间谍等。我承认这令人不快，尤其是想到某些人故意抹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看着15岁的男孩被担架抬下前线，从盖着毯子里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庞，再想想伦敦和巴黎那些滑头正在杜撰宣传册以证明这孩子是伪装起来的法西斯分子，这实在让人心里不是滋味。战争最可怕的一点在于，所有的战争宣传，所有的口号、谎言和仇恨总是来自那些没有参加战斗的人。我在前线认识的加联社党民兵和先后遇到的国际纵队共产主义者从未将我称作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叛徒；这些言论完全出自后方那些记者。那些写小册子攻击我们，在报纸上丑化我们的人都安安稳稳地留在家中，最差也待在巴伦西亚的报馆里，离子弹和泥泞千里之遥。除了因党派宿怨引起的诽谤之外，一切战事、宣

传、英雄事迹、丑化敌人，通常都是由那些从不参加战斗或一开打就落荒而逃的人杜撰的。它让我明白，左翼报纸同右翼报纸是一丘之貉，虚假伪善[10]。我的确觉得在我们这一方——政府阵营——这场战争和普通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同；但就战争宣传的本质，你永远猜不透。战事刚开始，右翼和左翼报纸同时卷入谩骂流言的泥沼。我们都记得《每日邮报》的海报："赤匪折磨修女"，而《工人日报》评论佛朗哥的外国军团是一群"杀人犯、白奴贩子、瘾君子和欧陆各国的杂碎"。直到1937年10月，《新政治家》仍在编造说法西斯的防线都是用活生生的小孩身体筑成的（这种筑防材料实在难找），阿瑟·布赖恩特先生宣称，西班牙保皇党人"锯掉一个保守党商人的腿"是"家常便饭"。写这些东西的人从来不参加战斗，他们或许认为写作能替代战斗。所有战争皆是如此，战士打仗，记者摇旗呐喊，除了极短的宣传旅行之外，一切伪爱国者从未接近前线战壕。有时，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格局会令我稍感安慰。因为下一场大战来临时，我们或许会看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形：一名中弹的沙文主义者。

就记者而言，这场战争同其他战争一样喧嚣纷乱。但有一点不同，那就是记者并没有对敌人展开激烈的口诛笔伐，反倒是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互相攻击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演愈烈，远远超过了二者对法西斯分子的声讨。然而，当时的我并未十分在意。党派斗争甚至令人作呕，但在我看来这些争执却是开明民主的体现。我不相信这会改变任何东西，也不相信有什么是真的无法调和的。我理解共产主义者和自由党人反对推进革命，但我没想到他们竟能令其倒退。

对这一点我有充分的理由。一直以来我都待在前线，而前线的社会和政治氛围未曾改变。我从1月初离开巴塞罗那，直到4月下旬才离开前线。在此期间——事实上直到之后一段时间里——在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部队控制的阿拉贡地区，局势始终如一，至少表面如此。革命氛围如同我最初知晓的那样始终未变。将军和士兵、农民和民兵依旧平等；人人同酬，衣着相同，食餐无两，称呼别人"你"和"同志"；没有上级，没有下级，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律师，没有牧师，没有屈膝谄媚者，没有盲从愚忠者。我呼吸的是平等的空气，我天真地以为整个西班牙都是如此。我没有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凑巧置身于西班牙最具革命性的工人阶级部队中。

因此，当政治上受过更多教育的同志们告诉我，一个人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态度来看待战争，要在革命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做出选择时，我很

想嘲笑他们。总的来说，当时我接受了共产党人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打不赢战争，革命免谈”；而我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观点，即“我们必须前进，否则就会倒退”。之后，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观点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要比共产党人的观点更正确，这并不完全是理论推断。从表面上看，共产党人的论点很有吸引力，可问题在于其实际行动令人很难相信他们是带着坚定的信仰在前进。有一条口号时常被提起：“战争第一，革命靠后”，尽管普通加联社党民兵对此笃信不疑，坚信待赢得战争之后革命会继续下去，但这实在是一句空话。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将西班牙的革命推迟至一个更恰当的时刻，而是确保革命永远不会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阶级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各阶层的革命人士被投入监牢，这一点也变得愈加明显。每一项行动都打着军事需要的旗号，因为借口是现成的，而结果却是将工人从有利位置赶走。待战争结束后，他们才会发觉已无法抵制重新推行资本主义。请注意，我所说的一切并非针对普通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成千上万英勇战死在马德里的共产党人。但这些人无法影响政党政策。至于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他们却是有目的的。

然而最终，即使革命失败了，赢得战争依然是有价值的。我开始怀疑，从长远来看，是否是共产党人的政策带来了胜利。似乎极少有人这样反思，不同的政策或许适合战争的不同时期。无政府主义者也许在最初的2个月里挽救了局势，但超出某个节点之后，他们便无力组织抵抗行动；共产党人或许在10月至12月间挽救了时局，但彻底赢得战争还需另当别论。在英格兰，共产党人的战争政策被毫无争议地接受了，因为极少有批判意见会被允许出现在报刊上，而且它的基本路线——消除革命混乱，加快生产，部队军事化——听上去是现实有效的。然而我们有必要指出其内在弱点。

为了遏制一切革命倾向，使战争尽可能像一场普通战争，就有必要放弃实际存在的战略机遇。我已经描绘过在阿拉贡前线的我们是如何缺少武装的。毋庸置疑，武器被刻意收缴以防止流入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因为他们日后可能会用这些武器发动革命。阿拉贡攻势本可以令佛朗哥撤出毕尔巴鄂或马德里，结果却未能实现。不过相对而言，这只是小事一桩。更重要的是，一旦战争被定义为“为民主而战”，那么就不可能得到大量海外工人阶级的支援。如果我们正视事实的话，就必须承认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对西班牙战争的冷漠态度。数万人前来参加战斗，但数以千万计的人却隔岸观火。在战争的头一年，全体英国民众据说向各种支援西班牙基金会捐助了约25万英镑——这个数目大约还不及他们一周

内花在看电影上的钱的一半。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真正能够帮助他们的西班牙同志的方式就是发起行业行动——罢工和抵制。这样的情况却始终未曾发生。各国的工党和共产党领导人声称那样的做法是难以想象的。毫无疑问，只要他们声嘶力竭地高呼“红色”西班牙并不是“红色的”，那么他们就是正确的。自1914年至1918年以来，“为民主而战”就附带着一种不祥之意。多年以来，共产党人教导各国的好战工人，“民主”是资本主义的雅称。他们起初说“民主是一场骗局”，接着又呼吁“为民主而战”，这么做可不高明。因为有苏联这个大靠山在支持，假如他们不是以“民主西班牙”，而是以“革命的西班牙”的名义来吸引世界各地的工人，很难相信他们不会得到响应。

但最重要的是，假如采用非革命政策攻击佛朗哥的后方，纵然并非不可能，却十分困难。直到1937年夏天，佛朗哥所控制地区的人口数依然多于政府所控制地区的人口数——如果将殖民地也计算在内的话，那么差距就更大了——而双方掌握的部队数量大致相当。众所周知，当自己的后方有敌对民众存在，那么在保住军队的同时就必须派出同样庞大的部队去保护通信系统，镇压肆意破坏等行为。因此，显然佛朗哥的后方没有爆发真正的人民运动。无论是城镇工人还是贫困农民，很难想象佛朗哥辖区内的民众会喜爱或需要佛朗哥。但随着一次次右倾行为，政府的优势逐渐减弱。摩洛哥的例子能说明一切。为何在摩洛哥没有爆发起义？佛朗哥试图建立臭名昭著的独裁统治，而相比于人民阵线政府，摩尔人竟更加青睐佛朗哥。显而易见，没有人试图在摩洛哥策划发动起义，因为这么做意味着将革命建立在战争之上。要让摩尔人接受政府阵线的善意，第一步就必须宣布摩洛哥的解放。可以想象，法国人对此会感到多么快乐！战争最佳的战略机遇在安抚英法资本主义的空想中丧失殆尽。共产党政策的倾向在于将这场战争化为一场普通的、非革命性质的战争，而政府在此政策中自然会遭受重创。对于这样的一场战争，必须通过加强武器军备的方式来取胜，也就是说，最终倚仗的是源源不断的武器供给。苏联是政府方面的主要武器提供者，但相比意大利和德国，它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极大劣势。或许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口号——“战争和革命不可分割”并没有听上去那么不切实际。

共产党的反革命政策是错误的，对此我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理由，但就它对战争走势的影响而言，我希望自己的判断是错的。我打心底里希望自己错了。我希望能够赢得战争，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行。当然，我们无从知晓会发生何事。政府可能会重新倒向左翼阵线，摩尔人可能会自

发揭竿而起，英格兰可能会决定收买意大利，战争也许会直接通过军事途径解决——这一切都无从知晓。我提出上述观点，而时间会告诉世人，究竟我是对是错。

不过在1937年2月，我的看法并非如此。我对阿拉贡前线的不作为感到厌恶，认为自己没能履行应当承担的战斗责任。我曾想起巴塞罗那的征兵海报，上面以责备的口吻问过路人："你为民主做了什么？"我觉得自己只能这么回答："我已尽力了。"加入民兵队时，我曾立誓要杀一个法西斯分子——毕竟，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干掉一个法西斯分子，那么他们很快就会被消灭殆尽——可我至今没能实现自己的誓言，几乎没有机会让我去完成它。当然，我想过前往马德里。部队里的每个人，无论持何种政治观点，都希望去马德里。那样的话，我或许就得加入国际纵队，因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马德里的部队不多，而无政府主义者的部队规模也不及以往。

当然，当时人们只能留在前线，但我告诉所有人，等我们可以离开时，我会加入国际纵队，这意味着我将接受共产党人的指挥。许多人试图劝阻我，但没人想要干涉。平心而论，考虑到其特殊环境，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极少有纠察异端政见的情况，只要不是亲法西斯主义分子，没有人会因为持有不同政见遭受处罚。在民兵队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严厉批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路线"，但却从未因此惹上麻烦。尽管大多数民兵都是该党党员，但没有人会逼你加入该党派。我自己就从未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正因为如此，后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遭到镇压时，我感到十分惋惜。

---

[1]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

[2] 三人分别是基罗加、巴里奥斯和吉拉尔。前两人拒绝将武器分发给工会。

[3] 工人联盟是西班牙的主要工会组织。

[4] 劳工联盟是西班牙的一个工人运动组织，宣扬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成为共和军的主力。

[5] 反法西斯防御委员会，其代表从各组织中按比例选出，9人代表工会，3人代表加泰罗尼亚自由党，2人代表各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西班牙共产党等）。

[6] 这就是为何在阿拉贡前线极少有苏联武器的原因，那里的部队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直到1937年4月，除了有些飞机可能是苏联制的以外，我唯一见过的苏联制武器就是一挺机枪。

[7] 托雷斯1935年在下议院的发言。

[8] 弗朗兹·博克瑙的《西班牙战场》对政府方面各党派相互的影响作了精彩描述，这是迄今为止有关西班牙战争的最佳著作。

[9]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人数如下：1936年7月，1万人；1936年12月，7万人；1937年6月，4万人。但这些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公布的数据。保守预计，这组数据可能被夸大了4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每个西班牙政党都高

估了自己的党员人数。

[10] 我愿意将《曼彻斯特卫报》视作例外。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必须查阅许多英国报刊档案。在我们的大报中，这是唯一一家令我对它的诚实格外尊重的报刊。

第六章

与此同时，我们日常的工作——尤其是夜里——仍旧是放哨、巡逻、挖工事。周遭尽是泥泞、雨水、呼啸的寒风和飘落的雪花。直到4月，天气才明显暖和起来。高原之上，3月的天气和英国的3月很相似——天空蔚蓝，寒风凛冽。冬小麦足有一尺高，樱桃树上结出了猩红色的花蕊（此处阵地穿过荒弃的蔬果园），假如你搜寻战壕，可以发现紫罗兰和一种野风信子，这种风信子好似惹人怜的蓝铃草。紧挨着阵地之后有一条美丽的溪流，翠绿的溪面上冒着水泡，自从来到前线后，这是我头一回见到清澈的水。一天，我咬紧牙关，悄悄潜入溪水之中，这是我6个星期来第一次洗澡。这个澡或许算不得彻底，因为溪流中尽是初融的雪水，水温不会比冰点高多少。

此期间没有战事，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英国人已然习惯说，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出血淋淋的哑剧。我们几乎没有遭受法西斯分子的直接攻击。唯一的威胁来自流弹，由于各条战线犬牙交错，子弹从不同方向飞来。当时所有的伤亡都因流弹而起。阿瑟·克林顿被不明来路的子弹击中了左肩，恐怕手臂会落下终身残疾。偶尔也会响起炮声，但却没有丁点儿效果。炮弹的破空之声仅仅被视作小小的娱乐。法西斯分子的炮弹从未落到我们的防护墙上。我们据点后方数百码处有一座农庄，叫作拉格兰哈，那里有不少农舍被用作仓储室、指挥总部和炊事房。那里才是法西斯分子攻击的目标，但是法西斯分子距离此处五六公里远，且他们的准心很差，仅仅能够震碎玻璃和墙壁。只有当你迎着炮火走上大道才可能遇到危险，弹片会落在你身侧的田地里。人们很快学会了一种神奇的本领，可以根据声音判断炮弹落地之处离自己有多近。当时，法西斯分子打出的炮弹真是糟糕透顶。尽管大炮口径有150毫米，但炸出的弹坑不过6尺宽4尺深，其中1/4都是哑弹。破坏法西斯工厂的传奇时常被传颂，有人说哑弹中装填的不是火药，而是写着“红色前线”字样的纸团，不过我从未亲眼见过。事实是，那些炮弹实在太陈旧了，有人曾拾到过一根铜引线，上面刻着生产日期——1917年。法西斯分子的炮弹的型号和口径与我们的一样，哑弹也经常会被重新修理装填后再打回去。据说，有一枚老旧的炮弹因此得了绰号，只因它每日来来回回地飞行却从不爆炸。

晚上，小股巡逻队会被派往无人荒地，躲在靠近法西斯阵地的壕沟中，偷听敌方发出的声响（军号声、发动机的轰鸣声等），希望从中获悉他们在韦斯卡的动向。法西斯部队时常往来调动，根据窃听者提供的报告可大抵算出敌人数量。我们经常接到特殊命令，要记录教堂鸣响的钟声。因为法西斯分子似乎在行动前总是以钟声为集结号。田地和果园中有荒废的泥墙小屋，堵上窗户，点燃火柴，便可放心地在屋中搜索。有时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小斧或者法西斯分子的水壶（质量远比我们的好，大伙儿都想得到它们）。大白天也可以搜寻，只是必须匍匐着行动。在空旷肥沃的田地里爬行实在很诡异，正值收获季节，农作物却无人问津。去年成熟的庄稼至今没有收割，未修剪的葡萄藤蜿蜒地附着在地面，玉米棒子硬得像石头一般，饲料和甜菜高度萎缩，成了巨大的木疙瘩。农民们该有多么痛恨交战双方啊！有时，小队人马会前往无人区搜寻食物。我们右方约一英里处，双方的阵地更接近，那里有一片土豆地，我方和法西斯分子时常在那里挖土豆。我们在白天去那片地里，而因为我们的机枪威胁，敌人只在夜晚前往该处。一天晚上，他们倾巢出动，把土豆挖得干干净净，这让我们恼火极了。在稍远处，我们又发现了一片土豆地，但那里几乎没有隐蔽处，我们不得不趴在地上挖——这可是个累人的活儿。假如被敌人的机枪手发现，那就不得不把身体展平了紧贴地面，就像老鼠钻门缝时一样，因为子弹会将后方几码远的地方扫射得尘土翻飞。在当时来看，这种风险是值得的，因为土豆变得愈加稀缺。如果能带着一整袋土豆回到炊事房，我们可以用它换到满满一水壶的咖啡。

依旧无事发生，看上去压根儿不会发生任何事。“我们什么时候发动进攻？为什么不进攻？”日日夜夜，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问着相同的问题。当你思考战争意味着什么时，士兵们渴望战斗的情形实在令人费解，但他们无疑就是这么期望的。战事停歇期间，所有士兵都渴望以下3件事：一场战役、更多的香烟和一个星期的假期。我们的装备比过去稍好一些。每个人都有150发弹药而非之前的50发，还领到了一些刺刀、钢盔和手雷。流言始终不绝，传说战役即将打响，我认为这种流言是有人故意制造的，以此来保持部队士气高涨。无需太多军事知识便可洞悉，韦斯卡这一侧不会有重大行动，至少在那段时期内是如此。通往哈卡的道路在另一侧，那里才是战略要地。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对哈卡要道发起攻击时，我们的任务就是展开“有限度的进攻”，从而迫使法西斯分子将另一侧的部分兵力转移至我部所在地。

大约6周的时间里，我们这一侧的前线阵地仅有一次行动。当时我

们的突击小队攻击了一座废弃的精神病院——法西斯分子把这里建成了要塞。有数百名德国难民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部队服役，他们组成了一支别动队，叫作“德切克兵团”。从军事角度来看，他们有别于其他民兵——的确，除了突击队和部分国际纵队，他们是我在西班牙见过的最有战士风范的一群人。一如往常，这次行动失败了。我很困惑，在这场战争中，政府军到底有多少次行动是以失败告终的？别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了精神病院，另一支部队（记不清是哪支民兵队）本应当攻下邻近一座俯瞰精神病院的山头，可他们却溃不成军。率领那支队伍的上尉是正规军中的一名军官，政府方面坚持任用他，但他的忠诚度却极为可疑。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叛变，他在距离敌方还有200码处就投掷了一枚手雷，令法西斯分子有所防备。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的部下将其就地击毙。然而，奇袭没能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敌人猛烈的炮火把民兵队彻底打垮，队伍被迫撤到山下。傍晚时分，别动队也不得不放弃已经攻占的精神病院。运送伤员的救护车彻夜行驶在通往谢塔莫的道路上，不少重伤员因路途颠簸而丧了命。

当时，我们身上都长了虱子。尽管天气依旧寒冷，但对虱子来说已足够暖和。对各种寄生虫，我深有体会，可单就恶劣程度而言，那些虱子实在比我遇到过的任何寄生虫都可恶。其他昆虫，比如蚊子，会令人感到更加痛苦，但至少不是寄生虫。体虱有点像是小龙虾，主要在人的裤子里生长。要想摆脱它们，除了烧掉所有衣物，别无他法。虱子会在你裤缝处产下亮晶晶的白色虫卵，好似小小的饭粒，这些虫卵会以可怕的速度孵化并继续繁殖。我想，和平主义者们如果在宣传册上刊出虱子的放大照片，定会事半功倍。战争的荣耀，可不是吗！战争中，所有的士兵都长了虱子，至少在天气暖和时是如此。在凡尔登、滑铁卢、弗洛登、森拉克和温泉关战斗过的人，每个人的睾丸上都叮满了虱子。为了抑制虫害，我们用火烘烤虫卵，尽可能多地找机会洗澡。只有虱子能迫使我不顾一切跳入冰冷的溪水中。

一切物资——靴子、衣物、烟草、肥皂、蜡烛、火柴和橄榄油都出现短缺。我们的制服烂成了碎布，许多人没有靴子，只好以系带拖鞋代替。到处可见成堆的破旧靴子，它们用来生火倒是不错。有一次，我们用一堆靴子烧了足足两天。当时，我的妻子在巴塞罗那，她曾给我寄过茶叶、巧克力甚至是雪茄。可即使在巴塞罗那，各种物品也十分稀缺，尤其是烟草。尽管没有牛奶，也很少有糖，但茶叶当真是天赐之物。始终有包裹源源不断地从英格兰寄给军队中的士兵，可这些包裹从未被送到士兵手中，食物、衣物和香烟——所有物品要么遭邮局拒绝投送，要

么被法国扣押。可笑的是，唯一将茶叶包——有一次甚至还有一罐饼干——送到我妻子手上的竟是陆海军商店。可怜的老陆军和海军啊！他们履行职责，令人钦佩，但如果这些物资送至佛朗哥阵地的壁垒中，他们或许会更加高兴。烟草稀缺是最糟糕的事。起初，我们每天都能分到一包烟，接着减至1天8根，然后又变成5根，到最后，要命地一连10天里1根烟都没有。我在西班牙头一回见到了伦敦街头每天都出现的场景——人们从地上捡烟屁股。

将近3月底时，我的一只手中了毒，不得不开刀绑绷带。我必须前往医院，可为了这么一点小伤就把我送到谢塔莫实在不值得，因此我就留在蒙福特的一家医院里。这家所谓的医院充其量不过是一处伤员处理站。我在那儿待了10天，有部分时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医院的医师把我身上凡是值点钱的东西全偷走了，包括我的相机和所有照片。在前线，人人都有偷盗行为，这是物资匮乏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医院里的偷盗行为总是最为恶劣。后来，在巴塞罗那的医院里，一位加入国际纵队的美国人向我讲述了他的经历。他搭船来西班牙的途中，船只被意大利潜水艇发射的鱼雷击沉，负伤的他被人救到岸上，抬进救护车时，担架员顺手偷走了他的手表。

手臂缠着绷带的时候，我在乡间散步，度过了几天惬意的日子。蒙福特到处是泥石筑成的屋舍，卡车驶过狭窄蜿蜒的巷道，路面好似月球坑洼的表面。教堂损毁严重，但还是被当作军需仓库。整个地区仅有两处农庄——托雷洛伦索和托雷费边——也仅仅只有两座真正高大的建筑，农庄的主人显然曾是乡间权倾一时的人物，他们的财富在农民肮脏屋舍的反衬下是多么扎眼。河水后面靠近前线处有一座巨大的磨坊，还有一座农庄与之相连。看着这巨大昂贵的机器白白地生锈报废，木质面粉滑道被劈成柴火，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之后，为了给后方部队提供柴火，卡车载着成群的士兵前来系统地进行拆卸损毁。为了获得木地板，他们曾直接在屋里引爆了一枚手雷。拉格兰哈是我们的仓库和炊事房，这里原先是一处修道院，有巨大的院子和外屋，占地至少1英亩[1]，还配有三四十根拴马桩。从建筑学角度而言，西班牙这片地区的农庄无可称道之处，但那些由石灰浸过的石头建成的农田建筑，带有圆形拱门和恢弘的顶梁，却是高雅之所，工程建造遵循计划，虽历数个世纪未曾变更。有时，看着民兵们对待已攻占建筑的方式，心底不禁会对往昔拥有建筑的法西斯分子心生同情。在拉格兰哈，闲置的屋子都变成了厕所——毁坏的家具和排泄物四散各处，真是可怕极了。毗邻的小教堂的墙壁上弹孔遍布，地板上的粪便足有数英尺厚。在厨师们分配定量食物的

大院子里，到处都是锈铁罐、泥巴、骡粪和腐败的食物。正应了那首军中旧歌谣：

这儿有老鼠，老鼠，

老鼠大如猫，

躲在指挥仓库里！

拉格兰哈的老鼠当真是大如猫，至少差不太多，这些肥硕的畜生在遍地的粪便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除非开枪射击，不然这些猖狂的东西根本不会逃跑。

春天终于来了。蓝色的天空更加柔和，空气也突然变得清新宜人。青蛙在水沟里交配。在村里骡子的饮水池周围，我发现了通体翠绿的青蛙，只有1便士硬币大小，它们看上去是如此晶莹，令旁侧碧绿的嫩叶相形见绌。农家的孩子会提着小桶出去抓蜗牛，然后把它们放在铁板上烤着吃。天气甫一好转，农民们便着手春耕。西班牙土地革命的情状迷雾重重，这种情况十分典型，我甚至无从知晓，究竟是实行了土地集体化，还是农民们自行划分了土地。这里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控制区，所以理论上来说，我想应该是实行了土地集体化。无论如何，地主们已不见踪影，田地得到耕种，人们似乎心满意足。农民们对我们表现出的友善一直令我感到惊讶。对一些老人来说，战争一定显得毫无意义，只会造成物资匮乏，生活凄凉乏味。即使是在情况最好的时候，农民们也讨厌部队驻扎在他们的土地上。然而，他们始终都表现得很友好——依我估计，原因在于无论我们有多么令人难以忍受，毕竟替他们赶走了曾经的地主。内战是奇特的。韦斯卡距此不到5英里，是当地人赶集的城镇，他们在那儿都有亲戚，每周都会去那儿兜售自己养殖的家禽和种植的蔬菜。而眼下，整整8个月的时间里，倒钩铁网和机枪成了横亘在两地之间的障碍。偶尔，旧日时光会在他们的记忆中闪现。有一次，我和一位老妇人交谈，她有一盏西班牙人烧橄榄油的铁制小灯。我问：“到哪里才能买到一盏这样的灯呢？”“在韦斯卡能买到。”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随后我们俩都笑了。村里的姑娘们都是活泼的可人儿，披着如煤炭般乌黑的长发，步伐雀跃，豪迈直爽的气度或许便是革命的副产品。

男人们穿着破旧的蓝色衬衣和黑色灯芯绒马裤，戴着宽沿草帽，骡子有节奏地扇着耳朵，而男人们则跟在骡子后面耕作田地。他们的犁糟

透了，只能翻土，无法犁出我们所说的犁沟。所有的农具都很陈旧，让人不免心生同情。这里的一切都根据金属的价值贵贱来管理。比如，一把破犁补了又补，直到最后上面尽是修补的痕迹。犁耙和草叉是木制的。在这群很少穿过靴子的人中，压根没人知道铁锹是何物。如同在印度的情况一样，这儿的人用一种原始的锄头来刨土。有一种犁耙则令人仿佛直接回到了石器时代。这种犁耙由许多木板拼接而成，约有一张厨房桌那么大，每块木板上都打了成百上千个小孔，里面塞着燧石，所有石块都被打磨成型，恰似上万年前人们打磨的石器一般。我记得，当我在无人的荒地一处废弃的棚舍里第一次看到这东西时，内心是多么骇然。费尽心思捉摸了好半天，总算弄明白这是一把犁耙。想到制作这么一件农具所耗费的心血，我的心里很不痛快，是贫穷迫使农民不得不用燧石代替钢铁。从此，我对工业主义的态度变得更加积极。不过，村里倒有两辆新式农用拖拉机，不用说，肯定是从某个大地主那里收缴来的。

有那么一两回，我来到竖立着围墙的小墓地，那儿离村子约摸1英里。前线牺牲的士兵通常都被送到谢塔莫，埋葬在这里的则是村里的死者。这儿同英国的墓地有着天壤之别。这里对死者毫无尊重可言。灌木和杂草疯狂地生长，遍地都是人骨。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墓碑上的立碑日期都在革命爆发之前，但碑上几乎全无宗教铭文。我印象中只有那么一次，看到经常出现在天主教教徒墓碑上的“为某某的灵魂祈祷”的字样。大多数铭文都是纯粹世俗意味的，内容是称颂死者美德的滑稽诗歌。四五座墓碑中大约只有一座刻着小十字架或刻着粗略提及天堂的字眼，且通常已被孜孜不倦的无神论者用凿子凿掉了。

这令我触动很大，西班牙这一地区的人们肯定没有宗教感情——我指的是正统的宗教意识。奇怪的是，我在西班牙期间从未见到有人比划十字。无论革命与否，你会认为这一动作是本能的。显然，西班牙教会将卷土重来（正如俗话所说的，夜晚和传教士总会归来），但毫无疑问，革命爆发时，教会崩塌瓦解的程度，即使连同样日薄西山的英格兰教会看来也会觉得不可思议。对西班牙人而言，教会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毫无疑问已经摇摇欲坠。基督教信仰可能已在某种程度上被无政府主义所取代，后者的影响被广为传播，影响甚广，无疑也带有些许宗教气息。

我从医院回来的那天，部队将阵地推进了1000码，这才是真正合适的据点。阵地毗邻一条小溪，离法西斯分子的阵地有数百码远。这项行

动早在数月前就该执行了。之所以现在行动，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们正在攻击哈卡要道，而我们在这一地区向前推进能牵制敌人的部队。

我们有60到70个小时没有睡觉了，我的记忆力开始退化，或者说脑海浮现的只是一系列画面。我们在距离卡萨弗朗塞斯100码的无人荒地执行监听任务，那里是法西斯阵地上的一处加固农舍。我们在可怕的沼泽中潜伏了7个小时，身体在长满芦苇且恶臭扑鼻的泥水中愈陷愈深。芦苇的臭味，叫人麻木僵直的寒冷，夜空中静止不动的星辰，沙哑的蛙鸣，尽管是4月天，但这却是我记忆中在西班牙最冷的一个晚上。我们后方仅100码处，作业队正在加紧构筑工事，但除了蛙鸣，万籁俱寂。那天晚上，我只听到一次声响——铁锹拍打沙袋发出的熟悉的声音。西班牙人能一次又一次地完成团队壮举，真是叫人感到奇怪。整个行动计划周详，7个小时内，600名士兵构筑了1200米长的壕沟和防护墙，距离法西斯阵线150码至300码不等，行动过程是如此隐秘，以至于法西斯分子毫无察觉，整个晚上仅有一人负伤。当然，第二天受伤的人数有所增加。每个人都分配到了任务，甚至连炊事房的勤务员也在工事完成后迅即送来了一桶桶兑了白兰地的葡萄酒。

黎明时分，法西斯分子才猛然发现我们的存在。尽管相距200码，卡萨弗朗塞斯白色的方形堡垒好似耸立在我们之上，而堵着沙袋的窗户口里成排的机枪就像是直指着底下的战壕。我们都站在那儿，紧紧盯着机枪，心中纳闷为何法西斯分子瞧不见我们。突然，密集的弹雨朝我们袭来，所有人都飞也似的跪在地上，发疯一般刨挖战壕，加深壕沟，在内部挖出小小的藏身洞。我的手臂还绑着绷带，因而不能挖工事，那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读一则侦探故事——名字叫《失踪的放贷人》。我已记不起故事的情节，但坐在那里阅读的感受却依旧清晰。我身下是壕沟底部潮湿的泥土，我的双腿不停变换位置，以便士兵们在战壕中躲闪，子弹在头顶一两英尺处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托马斯·帕克的大腿根部中了弹，就像他说的，他恐怕要因此获得英国杰出服役勋章了。整条战线伤亡不断，但如果敌人在那天晚上发现我们的话，结果会惨烈得多。后来，一名逃兵告诉我们，有5名哨兵因当晚玩忽职守而被处决。如果敌人主动调来几门迫击炮，他们当时也能把我们消灭殆尽。将伤员抬到狭小拥挤的壕沟里十分困难。我见过一个可怜的家伙，他的裤子已浸透了鲜血，血水从担架上流下来，伤员在痛苦吃力地喘气。他必须被抬着走很长一段距离，约1英里甚至更远，因为即使在道路畅通时，救护车也不敢过分靠近前线。如果离得太近，法西斯分子会开枪射击——毫无疑问，在现代战争中，原则上讲没人会用救护车来运送军

械。

第二天，我们在托雷费边准备发动进攻，可无线电在最后一刻传来了取消行动的命令。我们等候的谷仓里，地上是浅浅的一层糠麸，底下是厚厚的一层骨头，人骨和牛骨混杂在一起，老鼠横行。这些肮脏的东西在各个角落上蹿下跳。如果要说我最痛恨的一件事，那就是黑夜中有只老鼠从我身上蹿过。不过，我抓到过一只老鼠，给了它重重的一击，送它上了西天，可真痛快。

我们在距离法西斯防护墙50至60码处等待进攻的命令。士兵们排成一排，蹲伏在灌溉渠里，手握刺刀，从缝隙中向外张望，眼白在黑夜中闪烁着光芒。科普、本杰明和另一个家伙蹲在我们身后，那个家伙的肩上扛着一台无线电接收机。西方地平线上，伴随着玫瑰色的机枪火光，每隔数秒就有巨大的爆炸。接着，无线电里传来噗噗噗的杂音，低得好似耳语的命令要求我们等待适当的时机撤退。我们照做了，但还是不够迅速。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团（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青年团，相当于加联社党的社会主义统一青年团[2]）的12个可怜的孩子距离法西斯分子的防护墙仅仅40码距离，他们未能在黎明前找到机会逃脱。他们不得不在那里趴了一整天，因为仅有少量野草遮盖，他们稍有移动，法西斯分子便开枪扫射。至夜幕降临，他们中的7人丧命，剩余5人得以趁夜色逃脱。

之后许多天的早晨都能听到无政府主义者攻击韦斯卡另一侧的声响。那声音总是相似。突然，同时响起数十枚炸弹爆炸的震天响声——甚至几英里外都能听到那爆炸声——接着传来大量步枪和机枪的隆隆声，连续不断的巨响同鼓声有着奇特的相似之处。渐渐地，交火迅速在韦斯卡周边所有阵地蔓延开来，我们则跌跌撞撞地躲进战壕，睡意蒙眬地斜靠在防护墙上，而劣质的枪弹则从我们头顶漫无目标地飞过。

白天的枪声时断时续。我们当时的炊事房托雷费边遭到炮弹袭击，部分已被摧毁。奇怪的是，当你在安全距离外观看炮火时，总是希望炮手能命中目标，哪怕目标正是你的饭食和同志。那天早晨，法西斯分子的准心不错，可能操作的是德国炮手。他们对托雷费边实行了精确打击。一发炮弹落在目标后方，一发落在前方，之后的炮弹将屋椽炸向空中，一块纤闪石自天空落下，好似一张缺了角的扑克牌。接下来的一发炮弹将建筑的一角整齐地削掉，就像巨人手起刀落。不过，厨师们还是准时做好了饭——这是值得铭记的功绩。

日子一天天流逝，那些看不着但听得见的火炮声都有其独特的个性。有2门苏制75mm口径火炮架在我们后方很近的地方，不知怎地，这让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胖子击打高尔夫球的景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苏制火炮——准确地说是听到。它们弹道很低，速度非常快，因而炮弹出膛的声响、破空声和爆裂声几乎是同时传进我的耳朵。蒙福特后方有2门重型火炮，每天都要发射数次，发出的炮响低沉压抑，好似远处被缚的怪兽发出的嘶吼。在阿拉贡山上，政府军去年攻下了一座古堡垒（据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这处要塞是通往韦斯卡的咽喉要道，配备了重型火炮。要塞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9世纪。巨大的炮弹飞行得十分缓慢，以至于让人觉得自己完全能跟在它旁边并排奔跑。这门火炮发射的声响同人在骑车时吹口哨的声音实在是像极了。尽管口径狭小，迫击炮发出的声响却是最可怕的。它们的炮弹实际上是一种有翼鱼雷，外形像酒吧里投掷的飞镖，大小好似1夸脱[3]容量的酒瓶，爆炸时发出可怕的金属迸裂声，如同生铁制的大圆球在砧板上被击碎一般。有时，我方的飞机会飞过头顶，投下的炸弹所发出的巨大回响令2英里外的土地也颤抖不止。法西斯分子的防空火炮在天空留下图案，就像劣质水粉画出的小小云彩，但我从没见过它们击中飞机周围1000码距离之内。当一架飞机俯冲直下，用机枪扫射时，从下面听来好似鸟儿振翅的声音。

我们这一区域没有发生太多战事。我们右侧200码处，法西斯分子驻守在高地，他们的狙击手杀死了我们几名同志。左侧200码处溪流上有座桥，法西斯分子用迫击炮与在桥另一头修筑水泥路障的士兵进行对决。可恶的小炮弹在空中飞也似的打来，叮——轰！叮——轰！炮弹落在沥青路上时，发出的噪声倍加恐怖。站在100码以外，你就可以安全地欣赏泥土和黑烟在空中飞舞，恰似魔法树一般。白天大部分时间里，桥周围那些可怜的家伙都瑟缩在壕沟里挖出的藏身洞中。不过，伤亡比预计的少，路障——2英尺厚的水泥墙也很快竖立起来，并为2挺机枪和小野战炮预留了射击孔。水泥墙还用旧床架进行了加固，这显然是唯一可用的铁器了。

---

[1] 英亩，面积单位。1英亩约为0.40公顷。

[2] 社会主义统一青年团，成立于1936年，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合并后建立的青年组织。

[3] 夸脱，容量单位。1夸脱约为1升。

第七章

某天下午，本杰明告诉我们他需要召集15名志愿者，当晚将对法西斯防守阵地发起攻击。这次突袭本来早有计划，上一次却在执行前被取消了。我用油擦了擦那10颗墨西哥制造的子弹，又把我的刺刀抹脏（如果刺刀反光得太厉害，会暴露你的位置），然后将一大块面包、3英寸长的红肠和一支雪茄塞进包里。雪茄是我妻子从巴塞罗那寄来的，我珍藏了很久。我们每个人领到了3枚手雷。西班牙政府终于能够制造出像样的手雷了。这种手雷是依照米尔斯手雷的原理制造出来的，不同的是，它有两个保险销。拉开保险销后，手雷过7秒钟才会爆炸。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其中一个保险销很紧而另一个很松。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两个保险销保持在原处不动，那么在紧急时刻就很可能拉不出那根紧的；要么先把紧的保险销拉出来，可这样就会陷入长时间的焦虑，生怕这手雷在口袋里就爆炸。不过这种手雷体积小，扔起来很方便。

接近午夜时分，本杰明领着我们15个人前往托雷费边。从傍晚开始，大雨滂沱。灌溉渠里的水一直向外溢，一旦你踉踉跄跄跌入沟渠，水就会没过腰际。大雨倾盆而下，漆黑之中，隐约可见一群人在农庄里等我们。科普先用西班牙语，后用英语进行了一番演说，并阐述了这次攻击的行动计划。法西斯分子的战壕在这里形成了一条“L”形的弯，而我们需要攻击的那座堡垒就在这“L”形拐角的山丘上。参加这次行动的大约有30人，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西班牙人，由我们营（军队里一个营大约有400人）的指挥官豪尔赫·罗加和本杰明带领，准备匍匐而上剪断法西斯分子的铁丝网。豪尔赫会先扔出一颗手雷作为信号，剩下的人跟着发动一连串的袭击，把法西斯分子从堡垒中逼出来，并赶在他们集结之前占领这座堡垒。与此同时，70名突击队战士将攻击右侧200码之外法西斯分子的另一个阵地，两个阵地间由一条交通壕相连。我们得戴着白色臂章作为辨认标志，以防在黑暗中误伤自己人。这时一个信使跑来报告说这里没有可做臂章的材料。黑暗中，一个声音喃喃道：“我们难道不能让法西斯分子戴上臂章么？”

离正式行动还有一两个小时。骡厩旁的谷仓被炮火摧毁得太严重，没有灯无法在里面走动。一半的地板都被弹片炸飞了，地板之下的石板上也被炸出了一个20英尺深的坑。有人找到了一柄鹤嘴锄，撬开了一块

烧毁严重的地板。不过一会儿，我们就生起了火，湿漉漉的衣服在火堆旁开始冒蒸汽。还有人掏出了一副牌。就像其他战时特有的谣言一样，据说要给大家分发掺着白兰地的热咖啡的谣言散播开来。我们迫不及待地排队从摇摇欲坠的楼梯上走下来，在院子里到处游荡，想打听哪儿能找到咖啡。唉！其实根本没有咖啡嘛！不仅没有咖啡，他们还让我们集合，呈单列列队。豪尔赫和本杰明很快冲入了黑暗中，我们其他人紧跟而上。

雨还在下，周围一片漆黑，不过风倒是停了。道路泥泞不堪，甜菜地间的那条小径简直就是泥浆铺成的，滑得像油腻的独木桥，到处都是大水洼。在离开我们自己的阵地前往目的地的路上，每个人都跌倒多次，步枪上沾满了泥浆。一小群人已经先期抵达前沿阵地，他们是我们的后勤队，还有医生带着担架。我们列队穿过防护墙的缺口，费了好大劲才趟过一条灌溉渠。哗啦！咕咕！水又一次漫过了我们的腰际，又脏又黏的泥浆渗进靴子。豪尔赫站在前面的草地里，等待我们全部顺利通过水渠。接着，他俯下身子开始慢慢前进。法西斯分子的阵地离我们只有150码远，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屏住呼吸悄悄地靠近。

我、豪尔赫和本杰明走在队伍的前面。我们猫着身子，仰着脸观察前方，在一片黑暗中缓缓向前，一步比一步缓慢。雨点轻轻地打在我们的脸上。我回头瞥了一眼，离我最近的人弓着身子，像巨大的黑蘑菇一样徐徐挪动。每次我的头稍一抬高，紧紧贴着我的本杰明就会严厉地在我耳边轻声说：“把头低下！把头低下！”我本想告诉他不必担心，凭经验，我知道在黑夜里无法看清20步之外的人。相比把头低下，悄然无声地前进更为重要。如果发出声响被他们听见，我们就完了。他们会在黑暗中用机枪扫射，我们除了逃跑就只有送死。

然而，在泥泞的地面上前进，想不发出任何声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脚都会陷进泥浆里，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最糟糕的是，尽管雨还在下，风却停了，夜晚因而显得十分宁静，任何声响都会在这寂静中回荡很久。最可怕的一次是我不小心踢到了一个罐头，我本以为数英里之内的法西斯分子肯定会听见。幸好什么都没发生，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人开枪，法西斯阵地里没有一点动静。我们继续猫着腰前进，越来越慢。我实在无法表述出自己多么渴望到达敌方阵地。只要在敌人发现我们之前到达手雷的袭击范围内就行了！在这种时刻，你不会感到一丝恐惧，满脑子都是一种强烈的近乎绝望的渴望，想着尽快到达敌人的阵地。这和我打猎时逼近野兽的感觉很像，同样痛苦

地期盼能快点到达捕猎距离内，也同样如做梦般确定那不可能实现。这段距离怎么感觉这么长！我对这片地形很了解，仅仅只有150码，感觉却有一英里远。当你以这般缓慢的速度行进时，就像是一只蚂蚁爬行在一望无际、起伏不平的土地上。一会儿是茂密而平滑的草地，一会儿是黏糊糊的黏土，还要避开沙沙作响的草丛，成堆的石头几乎让你绝望。想不发出任何动静地到达敌人的阵地根本不可能。

我们弓着身子走得太久，以至我怀疑我们走错了方向。黑暗中，我隐约看见一些深色的相互平行的线，那就是法西斯阵地的外围铁丝网（他们会设置两道铁丝网）。豪尔赫跪在地上，在口袋里摸索着。我们唯一的钢丝钳在他的口袋里。咔嚓，咔嚓。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剪断的铁丝放在一边，等待队伍末尾的人跟上。他们发出了极大的声响。现在离法西斯分子的堡垒也许只剩50码了。我们猫着身子继续前进，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像猫靠近鼠洞一样轻轻地落脚，停下脚步侧耳倾听，确定敌方没有任何动静再迈出下一步。有一次我抬起了头，本杰明一声不吭地用力按下我的肩。下一道铁丝网距离敌人的堡垒也就20码左右。30个人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到那儿简直不可思议，单是呼吸声就足以暴露我们。不过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做到了。法西斯分子的堡垒近在眼前，一个黑色的巨大物体隐约浮现在我们前上方。豪尔赫再一次跪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钢丝钳。咔嚓，咔嚓，悄无声息地剪断铁丝网。

内围的铁丝网也被剪断。我们加快速度，从剪断的网中爬过。如果有时间在这里部署的话会更顺利。豪尔赫和本杰明向右爬去，而后面分散开的人要想从铁丝网上窄小的破口中爬过，就得呈一列纵队。就在此时，伴随着一道亮光，法西斯的堡垒中传出了枪声。哨兵终于循声发现了我们。豪尔赫单膝跪地，平衡了一下身体，像投球手那样抡起胳膊。砰！手雷在防护墙后爆炸了。很快，10到20支步枪同时开火，轰鸣的枪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堡垒中传出。毕竟，他们时刻在提防着我们。顷刻间，每个沙袋在火光中都清晰可见。后方离我们很远的同志们开始投掷手雷，可是有些手雷在离堡垒尚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爆炸了。敌方壁垒上的每个射击孔都喷射着火焰。在黑暗中遭射击是最让人头疼的事，每道火光闪过都让人感觉步枪是在瞄准自己。不过这一切都还不及手雷糟糕。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手雷在身边爆炸的感觉，就无法想象出这玩意儿有多可怕。白天时，只有爆炸声，而黑夜中，你还要忍受那灼眼的红光。在敌人第一波扫射时我就立即卧倒了。我侧身躺在黏糊糊的泥浆中，一边还在笨拙地试图拉开手雷的保险销。可这该死的东西怎么都拉不出来，我最后才意识到拧反了方向。拉开保险销，起身跪着，用

力掷出手雷之后，我再次立即卧倒。这颗手雷在我右侧的壁垒外爆炸，而我的手臂也被火焰灼伤。与此同时，另一颗手雷在我的前方爆炸，距离如此之近，我甚至能感觉到爆炸产生的热浪。我立即紧贴地面把头埋进泥浆里，动作幅度太大还扭着了脖子，疼痛感让我以为自己负伤了。喧嚣之中，我听见身后有人用英语轻声说道：“我中弹了。”这颗手雷让我周围的很多战友都受了伤，偏偏没有伤到我。我再次起身跪地，扔出第二颗手雷，不过现在已经记不起这颗落在了哪儿。

法西斯分子们在开火，我身后的战友们也在开火，我很清楚自己被夹在了中间。感觉一颗子弹飞过之后，我意识到一个战友正在我后面开枪。我立刻站起来冲着他喊：“你个笨蛋，别对着我开枪！”正喊着，我看见了本杰明，他在离我10到15码的地方，正在向我挥手，示意我跑到他那儿去。这意味着我得穿过这阵枪林弹雨。起跑之前，我用左手拍了拍脸。这实在是个愚蠢的动作，仿佛一只手就能阻挡子弹似的。我真的很害怕面颊被射中。本杰明跪在地上，一副兴奋而又残酷的表情，用自动手枪瞄准那些闪光处射击。豪尔赫在敌方第一波扫射时就受伤倒地了，此时已不知所踪。我跪在本杰明身旁，拉开保险销，扔出了我的第三颗手雷。啊！不用怀疑，这颗手雷在堡垒内部爆炸了，就在机枪掩体旁的角落里。

法西斯分子的火力似乎顿时减弱。本杰明猛地站起来叫道：“前进！冲啊！”我们冲上了堡垒所在的陡坡。虽然我用了“冲”这个词，实际上说“笨拙地爬上去”会更合适。因为浑身湿透，从头到脚都是泥浆，还背着一支沉重的步枪、一把刺刀和150发子弹，根本没法走快。我琢磨着法西斯分子一定在堡垒顶端严阵以待，如果他们开枪的话，我肯定会中弹。不过我倒不太希望他们开枪，更希望他们用刺刀攻击。我能想象出用刺刀搏斗的情景，还想着他们的臂力会不会比我更强。然而，堡垒顶部并没有法西斯分子。意识到这是一座低矮的堡垒，那些沙袋也提供了很好的立足点，我感到些许轻松。按理说跨过这些障碍物是很困难的。堡垒内的一切都被炸得粉碎，到处是倒塌的横梁，纤闪石瓷砖的碎片遍地。我们的手雷炸毁了所有的临时营房和防空壕，可我们还没看到一个活人。我猜想敌人都潜藏在地下，便用英语（那时竟想不出一句西班牙语）吼道：“快出来！投降吧！”无人应答。接着，昏暗中，一个模糊的身影从一处被炸坏的营房顶部跳出来，一下子蹿到左边。我立马跟上去，在黑暗中用刺刀笨拙地乱戳。绕过营房的角落，我看见一个人顺着通向法西斯另一阵地的交通壕逃走了，不过不确定这和我之前看到的是不是同一个人。我看得这么清楚，当时一定离他很近。他没戴头盔，

除了双手紧紧抓着裹在肩上的毯子之外，好像什么都没穿。如果我当时开枪，他一定会被打死。可是因为害怕误伤己方，我们进入堡垒之后只允许用刺刀。再者，无论如何我当时也没想到用枪。相反，我当时想到了20年前，学校里的拳击老师用生动的手势向我们展示他当年是如何在达达尼尔海峡刺伤一个土耳其人的。我握着步枪的底端，刺向了那人的背部，只差一点点就可以刺中。我又刺了一次，结果还是差了一点儿。我们俩就这样跑了一小段，他在战壕里逃，我在路面上追，一边还用刺刀试图戳他的肩部，可是始终没够着。日后想来，这一段挺滑稽的，当然对他来说也许没这么好笑。

他显然比我更了解地形，不过一会儿就从我的眼皮底下溜走了。我回到阵地时，大家都在吵吵嚷嚷。枪击声听起来没那么激烈了。法西斯分子们依旧从三个方向朝我们猛烈开火，不过距离更远。

我们暂时击退了敌军的火力。我还记得自己以神谕似的口吻说："我们还能控制这个地方半小时，没法再久了。"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说是半小时。从右边的防护墙望过去，可以看到无数步枪开枪时的绿光射穿黑暗的夜空。不过那些火光离我们很远，有100到200码。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搜索这片阵地，拿走一切能拿的战利品。本杰明和其他人已经开始在堡垒中间的大营房和防空壕的废墟中找寻了，他踉跄地从烧毁的顶棚上走下来，兴奋地拖着一盒弹药。

"同志们！弹药！这儿有好多弹药！"

"我们不要弹药，我们需要步枪。"一个人说道。

这倒是事实。我们中一半人的步枪都被泥浆堵住了，根本没法用。虽然可以清理，可是在黑暗中拔出枪栓实在太危险，弄不好就再也找不到枪栓了。我有一个很小的手电筒，是我妻子设法从巴塞罗那买到的，这是我们身边唯一的照明光源。有些人断断续续地冲着远处黑暗中那些绿光开火。大家都不敢连续射击，因为即使是最好的步枪，如果过热也容易堵塞。堡垒里有16个人，其中一两人负伤了。很多受伤的人，不管是英国人还是西班牙人，都躺在堡垒的外面。一个来自贝尔法斯特的爱尔兰人帕特里克·奥哈拉受过些急救训练，他拿着绷带来回跑动，替伤员包扎伤口。每次他跑回堡垒时总会被当成是敌军遭到误射，即便他每次都气得大喊："我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

我们开始搜索阵地。地上躺了几具死尸，我并没有停下来仔细检

查。我留心搜寻的是机枪。我们趴在堡垒外等待时机的时候，我就疑惑为什么他们的机枪没有开火。我用手电筒照进机枪槽，大失所望，机枪根本不在那儿。只剩下三脚架、一些弹药盒和一些备用的零件，机枪不见了。他们一接到警报就把枪卸下运走了。他们无疑是遵从了上级命令，不过这倒是挺窝囊挺愚蠢的，如果他们把枪留在堡垒内，完全可以把我们全部干掉。我们为此都很气愤，大家着实太渴望拥有机枪了。

我们用刺刀到处乱戳，依旧没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地上散落了很多法西斯分子的手雷，我拿了几个放在口袋里作战利品。这是种很低级的手雷，只要拉出一根线就能引爆。我被法西斯防空壕内这一派贫困的景象震惊了。在一般防空壕里能看到的备用军装、书、食物以及士兵们琐碎的个人用品，在这儿统统没有。看来，这些被强征入伍还没有报酬的士兵们，除了毛毯和一些浸了水的面包之外一无所有。在堡垒的最远端有一个很小的防空壕，稍稍高出地面，有一扇小小的窗户。我们用手电筒照着窗户往里看，一下子欢呼起来。一个套着皮套的圆柱体斜靠在墙上，大概有4英尺高，直径有6英寸，明显是机枪的枪管。我们立即冲上去，进了门，却发现套着皮套的并不是机枪。不过对于我们这支如此缺乏武器的队伍来说，皮套里的东西比机枪更珍贵。这是一个巨大的望远镜，至少可以放大六七十倍，还有一个折叠的支架。我方的阵地上肯定不会有如此规格的望远镜，我们又恰恰急需它。我们得意洋洋地把它抱出来斜靠在墙上，以便待会儿搬走。

突然有人大喊道：“法西斯分子正在包围我们。”确实，交火的喧嚣声越来越大。不过法西斯分子肯定不会从右面反击，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得穿过无人地带来进攻他们自己的堡垒。如果他们还有点理智的话，会从阵地内侧对我们进行反击。我跑到防空壕的另一侧。法西斯的这处阵地大约呈马蹄状，防空壕在中间，左侧还有一面防护墙可以掩蔽我们。激烈的枪声正是从那个方向传来，不过威胁并不大。真正的危险在前方，因为前方没有防护措施。一波子弹刚刚从我的头顶飞过。这些子弹肯定是来自较远的另一处法西斯分子阵地，显然我们的突击部队并没能将其拿下。这一次枪声震耳欲聋，如连续的击鼓声，是由大批步枪开火发出的。类似的声音我以往从远处听过，这次是真的身临其境。到此时为止，交火的战线已经延伸至数英里。道格拉斯·汤普森斜靠在防护墙上，用一只手拿枪瞄准那些火光射击，他的另一只受伤的手臂悬着，帮不上任何忙。一个自己的步枪卡壳的士兵在帮他装弹。

我们这儿有四五个人。我们很清楚必须做什么：从前面的防护墙拖

出沙袋，堆积在没有任何防护的一侧，以筑起一道防护墙。我们必须得手脚快点。现在的火力很大，不过随时可能小下去。借助周围的火光，我能看出敌方有一两百人。我们开始松动沙袋，搬到前面20码的地方，再把它们堆积起来。这是个苦差事。这些沙袋很大，每个都有1英担[1]重，要想把它们撬松就得使尽全身的力气。在这个过程中，腐烂的麻袋会破裂，潮湿的沙子瀑布般地撒满全身，灌进领口和袖子里。我依稀记得自己当时对一切都充满憎恶：混乱、黑暗、可怕的喧嚣，在泥中滑来滑去，与破裂的沙袋较劲——步枪也碍手碍脚，但由于害怕弄丢，又不敢把枪放下。我和另一个人踉踉跄跄合搬一个沙袋时，我甚至冲着他喊："这就是战争！是不是很残忍！"突然，几个高大的身影接连跳进我们前面的掩体里。待他们走近，我从制服辨认出他们是我们的突击队员。我们欢呼着，以为援军来了，哪知道只来了4个人，3个德国人和1个西班牙人。

我们事后才得知突击部队的事。由于不熟悉地形，他们在黑暗中摸错了地方，被法西斯的铁丝网困住，很多人阵亡。这4个人是途中掉队的，幸运地保住了性命。这3个德国人不会说一句英语、法语或者西班牙语。我们只能艰难地比划着向他们解释我们在做什么，让他们帮着一起修筑掩体。

这时法西斯分子搬来了一挺机枪。一两百码外，枪口喷出的火焰像爆竹一样，子弹连续不断地朝我们呼啸而来。不一会儿，我们搬来了足够多的沙袋建成一堵低矮的防护墙，足以掩护我们在阵地这边的人卧倒开火。我跪在其他人身后。一枚迫击炮弹旋转着飞过，在无人之地爆炸。迫击炮是另一大威胁，不过他们得花些时间摸准我们的位置。我们现在不必再和那些讨厌的沙袋较劲了——其实搬沙袋在某种程度上也挺有趣——然而依旧得忍受噪音、黑暗和逼近的火光，我方也在对着那些火光回击。我甚至还有时间思考些什么。我记得当时我寻思着自己到底害不害怕，答案是否定的。在攻击堡垒之前，我倒是有些胆战心惊，尽管那时所面临的危险远不及现在。突然又有人喊道："法西斯分子在包围我们。"这次是千真万确的，那些步枪发出的火光越来越近，有一道火光甚至离我不到20码。很明显敌方在沿着交通壕进攻。在20码的距离内，他们的手雷命中率很高。我们八九个人挤在一起，只要有一颗手雷命中就能把我们全部炸得粉碎。鲍勃·斯迈利突然站起来扔了颗手雷，他脸上的小伤口一直在流血。我们立刻弯下身子等待手雷爆炸。手雷在空中划过，导火索嗞嗞作响，泛着红光，但并没有爆炸。这些手雷中至少有1/4都是哑弹。我手上只有法西斯分子的那些手雷，而我又不清楚

该如何使用。于是我大声问其他人谁还有多余的手雷。道格拉斯·莫伊尔在口袋里摸索了一阵，递给我一个。我扔出去便立即掩面趴下。真是撞了大运，这颗手雷正好命中敌方。随着一声爆炸的轰鸣声，不远处紧接着传来了恶魔般的惨叫和呻吟。不管怎样，我们炸到了一个敌人，我不确定他最后有没有死，但肯定受了重伤。可怜的家伙！听见他的惨叫，我隐约有些难受。就在同时，借助那些步枪开火发出的微弱的光线，我看见火光不远处站着一个人，或许只是自以为看见了。我举枪便射，接着又是一声惨叫，似乎还是刚才那个被手雷炸伤的人。战友们又扔出了一些手雷。下一波火光已经离我们很远了，至少100码之遥。看来，我们暂时击退了他们。

每个人都开始咒骂，质问究竟为什么还不派援军。只要给一挺冲锋枪，或者20名带着不堵塞的步枪的援兵，我们就能守着这处阵地抵抗敌方一个营。这时，本杰明的副官帕迪·多诺万跳入前面的防护墙，来传达命令。

“喂！快出来！所有人立即撤退！”

“什么？”

“撤退！快出来！”

“为什么？”

“这是命令。立即撤回我们自己的阵地。”

说着，大伙儿已经从前面的防护墙里爬了出来。有些人在试图搬动一个很重的弹药盒。我想起了那个被我斜放在另一处防护墙边的望远镜。但就在这时，我看到那4个突击兵已经跑向了交通壕，我想他们一定是先前收到了什么特殊指令。这个交通壕通向另一处法西斯阵地，如果他们跑到那儿的话必死无疑。他们渐渐消失在黑暗中。我立刻跟上，试图想出西班牙语“撤退”该怎么说，最终我喊出了“后面！后面！”，或许能表达出正确的意思。那个西班牙人听懂了，并把另外3个德国人一起叫了回来。帕迪在堡垒里等着。

“加油！快点！”

“但还有那个望远镜呢！”

“——望远镜！本杰明在外面等着呢。”

我们从防护墙里爬了出来，帕迪替我们把铁丝网掀开。我们一从法西斯阵地的掩体里出来，法西斯分子那穷凶极恶的子弹就从四面八方袭来。我知道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人射出的，现在每个人都在开火。不管我们转向哪个方向，立刻就有一波新的子弹从身边呼啸而过，在黑暗中我们犹如一群羊被赶到这里赶到那里。除了缴获的一盒手雷和一些法西斯分子的步枪之外，我们费力拖着的弹药盒并没有给我们帮上什么忙，这其中有一盒重达一英担，里面装了约1750发子弹。不过一会儿，我们就彻底迷路了，尽管两处防护墙之间还不到200码，我们也对地形很熟悉。我们意识到自己在一块泥泞的地上站不稳，而对周围的情况，则除了感到子弹从两边呼啸而来之外一无所知。黑暗中，天上没有月亮。我们的阵地在韦斯卡东部。我想一直待在这里，直到第一缕晨光指引我们哪儿是东哪儿是西，不过其他人并不同意。我们向前一步一滑地挪动，中途变了好几次方向，大家轮流拖着那个弹药盒。终于，我们看到前方隐约出现了阵地里低矮平整的防护墙影子。这阵地也许是我们的，也许是法西斯分子的。我们中没有任何人知晓正在前进的方向，哪怕是一点点模糊的概念也没有。本杰明在高高的枯草丛中俯身前行，直到离防护墙大约20码时才冒险喊了一声。回应他的是一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我们立刻起身，沿着防护墙找到回去的路。再一次跳进灌溉渠——哗啦！咕咕！——我们终于安全了。

科普和其他西班牙人在防护墙后等我们。医生和担架都不见了，看来所有的伤员都已经被接走。除了豪尔赫，我们中一个叫西德斯通的人也不见了。科普来回踱着步，面无血色，连脖颈后的赘肉都显得苍白。他对成片飞过低矮防护墙的子弹毫不在意，有些就从离他头很近的地方擦过。我们大部分人都蹲在掩体后面。科普嘀咕着：“豪尔赫！会没事的！豪尔赫！”又用英语说着：“如果豪尔赫死了那就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豪尔赫是他的挚友，也是他麾下最得意的军官之一。科普突然转过身面对我们说，需要5名志愿者，2个英国人和3个西班牙人，去寻找那些失踪者。莫伊尔和我以及另外3个西班牙人自愿前往。

我们出发时，西班牙人嘀咕着天越来越亮，让行动变得更危险了。他们说得没错，天色已经微微变蓝。法西斯的防守阵地里传来阵阵兴奋的大叫声，显然他们已经来了更多的援兵，重新夺回了自己的阵地。在离防护墙还有十六七码的时候，他们肯定觉察到了我们的动静，突然猛烈开火，逼得我们立即趴下。其中一人把一颗手雷扔出防护墙，显然，

他们开始慌张了。我们俯身卧在草丛中，等待行动的机会。我们似乎听见法西斯分子的声音越来越近，现在我丝毫不怀疑那只是我的想象，不过在当时这一切显得那么逼真。他们离开了防护墙开始逼近我们了。“快跑！”我冲莫伊尔喊着，然后立即起身。哦，天哪，我跑得真快！夜里早些时候我还以为在从头到脚都湿透又背着步枪和子弹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法跑的，而现在我明白，当身后有50到100个全副武装的敌人在追赶时，总是可以跑得飞快。不过如果说我跑得很快的话，其他人则跑得更快。在我飞奔的时候，有些人像流星一样从我身边飞过。那3个西班牙人，已经远远跑在了前面，等他们到达我方阵地很久之后，我才赶到。事实上，我们几乎精神崩溃。不过我明白，在昏暗的环境里，1个人比5个人更不易被察觉，于是我决定独自回去寻找。我尝试着到敌方外围的铁丝网边尽全力仔细搜寻，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因为我只能趴在地上寻找。这里没有豪尔赫或西德斯通的影子，我只好再爬回阵地。后来我们才听说，他们俩已经在早些时候被送往救护站了。豪尔赫只是肩膀微微受了点伤。西德斯通的伤严重得多，他的左臂被子弹射穿，身上多处骨折，而就在他无奈地躺在地上的时候，一颗手雷在他身旁爆炸，造成他身上多处被炸伤。我很庆幸他已康复。后来他告诉我，他用背贴着地面试图蹭了一段距离，碰到了另一个受伤的西班牙人，他们俩互相搀扶着走了出来。

天色越来越亮。绵延数英里的战线上，仍不时响起散乱而又毫无意义的枪声，就像暴风雨过后依旧下着的零星细雨一般。我依然记得当时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显得那么苍凉，遍地的泥潭，仿佛在低声哭泣的白杨树，战壕里淤积的黄泥水。战友们面容憔悴，脸上的胡子很久没刮，沾满了泥巴，眼圈被火药熏得发黑。当我回到自己的防空壕时，其他3人已沉沉睡去。他们没卸下任何装备，手里还紧紧握着沾满泥浆的步枪。防空壕里里外外所有东西都被浸湿了，我搜寻了很长一段时间总算收集到一些干柴，足以生上一小堆火。接着我开始抽起那根珍藏了很久的雪茄，经历了这样的夜晚，它居然没断。

事后，我们听说此次行动大获全胜。其实这不过是一次突袭，为的是吸引法西斯分子从韦斯卡的另一侧抽调兵力，以配合无政府主义者再一次发动进攻。我当时判断法西斯分子调集了一两百人进行反击，不过一个逃兵告诉我当时有600人之多。我敢说他一定在撒谎，逃兵么，毕竟是喜欢拍马屁的。没能带上望远镜真是太遗憾了，丢掉了那么好的战利品，让我至今不能释怀。

[1] 英担，重量单位，1英担约为51千克。

第八章

天气渐渐开始变热，连夜晚都有些闷热。我们防护墙前是一棵弹痕累累的树，结满了成串的樱桃。在河里洗澡不再因天气寒冷而显得痛苦，反而成了一件乐事。托雷费边周边，野玫瑰在弹坑边蔓延，粉红色杯碟状大小的花朵争相开放。在我们的阵地后面，能看到将野玫瑰戴在耳朵上的农民。夜晚，他们经常带着绿色的网出去捕鹌鹑。只要将网在草丛上方铺展开来，躺下学雌鹌鹑叫，周围的雄鹌鹑听到叫声就会飞过来。当雄鹌鹑飞到网下的时候扔个石头，它就会受惊向上飞，被网缠住。这种方法显然只能抓住雄鹌鹑，我觉得实在太不公平。

一群安达卢西亚人来到我们的阵地旁，我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如何到这儿的。目前得到的解释是，他们从马拉加逃出来之后跑得太匆忙，忘了在巴伦西亚停下。不过这种解释肯定是加泰罗尼亚人说的，他们最擅长嘲笑安达卢西亚人，把他们看成是未完全开化的种族。诚然，安达卢西亚人是挺无知的。他们中很少有人识字，甚至连西班牙人都知道的事——自己属于哪个政党——都不知道。他们以为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又不能确定，也许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皮肤粗糙，长相质朴，脸庞被南方强烈的阳光晒得黝黑，也许曾经是放牧人或者橄榄园的工人。他们的到来对我们帮助很大，这群人可以熟练地将晒干的西班牙烟草卷成烟卷。部队里已经不再配发香烟了，不过在蒙福特偶尔能买到几包最便宜的烟草。这些烟草的外表和质地都像切碎的干草，味道倒还行，不过因为太干，即使成功地卷起来，烟草也会立即散落，留下一个空荡荡的纸筒。而这群安达卢西亚人卷出来的烟卷却相当棒，他们裹烟嘴的技术堪称精湛。

两名英国人因中暑倒下了。对那段日子，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正午的烈日和光着上身扛沙袋的劳作，肩膀得忍受灼晒导致的蜕皮和沉重沙袋的双重折磨。衣服和鞋子上的泥垢成块地掉落，和骡子的扭斗也很让人头疼。给我们驮运补给的骡子，不怕枪声，但会被在空中爆炸的炸弹吓得狂奔。此外，还有开始活跃的蚊子和老鼠，老鼠甚至会啃我们的皮带和弹药袋。除了偶尔被零星的炮火和空袭击伤的伤员之外，这段日子风平浪静。阵地边缘的白杨树已经长得枝繁叶茂，我们在此搭建了便于狙击手射击的台子，像狩猎台一样。韦斯卡另一侧的攻势逐渐减弱。无

政府主义者损失惨重，但仍未将哈卡公路完全切断。他们设法在公路两边扎营，试图将道路置于机枪火力控制之下，以阻断敌人通行。可是这之间相隔1000米，而法西斯分子也建造了一条地下通道，好似巨大的壕沟，这样部分卡车就能在这条地下通道来来往往。逃兵们报告说，韦斯卡武器多粮食少。但很明显这座城不会被攻破，想用现有的这1.5万名装备不全的士兵拿下它谈何容易。6月间，政府从马德里前线调来了援军，用大批飞机护送，集中3万兵力在韦斯卡，仍然没能攻克。

截至休假前，我已经在前线待了150天。当时我觉得这段日子也许是一生中最碌碌无为的时光。为了抗击法西斯，我加入了民兵队，可竟然没怎么参加战斗，一直很被动。除了被寒冷和缺乏睡眠折磨外，我几乎没做什么事，却照样能领到补给，或许大部分士兵的军旅生活都是如此吧。不过时至今日，回想这段时光，我也不那么懊悔。我真的希望那时能更好地为西班牙政府效力，不过从个人角度而言，也就是从我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前线的那三四个月并不如之前所想的那么毫无收获。这段时间成为我生命里的一段空档期，与之前和之后的经历都迥然不同，它所教给我的东西是我通过其他任何途径都无法学到的。

最主要的是那个时期我基本与世隔绝——在前线的人几乎无法与外界交流，即便是巴塞罗那的情况，我们也只是隐约知道——身边都是那些可以大致被称作革命者的人。这就是民兵体制造成的结果。在阿拉贡战线，这种体制直到1937年6月才被彻底改变。工人民兵团受此影响，涌向了全国革命情绪最高昂的地方。他们来自工会，都持有相同的政治观点。多少出于偶然，我恰好来到了西班牙，这个西欧唯一一个政治意识和对资本主义的怀疑都较其他地区更强烈的地方。在阿拉贡前线的成千上万人之中，大部分都是工人阶级，大家生活水平相当，因为信奉平等而走到一起。从理论上来说，每个人都绝对平等，现实中也差不多如此。我觉得大家在这里预先感受到了社会主义氛围，我的意思是，这里的主导气氛是社会主义的。许多文明社会里再平常不过的行为，如势利、敛财、畏惧上司，在这儿都不复存在，一般的社会等级差别基本消失，这在充满铜臭味的英国是不可想象的。这里除了农民和我们民兵，没有其他社会等级的人，也没有任何人会被他人主宰。显然这样的社会状态不会持久。在这个世界正在进行的这场宏大的游戏里，这种情形不过是暂时和局部的。但对于每个经历过的人来说，它持续的时间足以在人们心中留下印记。无论我们当时如何咒骂，事后都明白自己与某种奇特而有价值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大集体里，希望永远多于冷漠和愤世。在大多数国家，“同志”这个词更多的只是欺骗，而在这里却代表

着真挚的友谊。这儿的每个人都能呼吸到平等的空气。我很清楚现在流行的看法，大家都不承认社会主义和平等有任何关系。各个国家里都有大批的政客和圆滑的教授在忙着“证明”社会主义不过是有计划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掠夺的本质并未改变。幸运的是，也有一批截然不同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存在。能吸引普通人为社会主义奋斗甚至愿意为之献身的，正是平等的理念，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奥秘所在。对于广大群众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没有社会等级，又或许并不意味着什么。也正是因为此，当民兵的那些日子对我来说异常重要。西班牙民兵团只要存在，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缩影。在这样的集体里，没有任何人追名求利，什么东西都短缺，但没有任何特权和巴结，人们由此大约能够了解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什么样的。这不但没有令我对社会主义的希望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这段经历让我有了更强烈的欲望，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强烈，想要看看社会主义的建立。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有幸与西班牙人共事。如果能把握好机会，凭着他们与生俱来的正派作风和无时不在的无政府主义精神，一定可以建设出像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当然，那时候我并没有发觉自己身上的变化。与周围人一样，我的脑海里只有无聊、热、冷、脏、虱子、贫困和时不时存在的危险。现在则大不一样了。那段看似平淡无奇而鲜有成就的时光，现在对我却很重要。这段时光和我生命中其他的经历有着天壤之别，它已然具有了那种通常只有陈年往事才能散发出的魅力。它发生之时的确残酷，但却成了我宝贵的回忆。真希望我能把当时的气氛完完全全地表述出来。但愿在本书的前几章我已多多少少写出了这种氛围。这段记忆融合了严冬酷寒、破旧的民兵制服、西班牙士兵椭圆的脸庞、机枪发出的如电报般嘟嘟嘟的声音、尿液和腐烂食物的臭味，以及端着脏兮兮的盘子狼吞虎咽，煮豆汤时散发出的金属味。

这段记忆在我的脑海里异常清晰。在我的印象中，这段生活里充满着极其琐碎的事。我仿佛又回到了波塞罗山的防空壕里，以石灰石为床，年轻的拉蒙的鼻子压着我的肩胛骨，正在打鼾。我在脏兮兮的壕沟里踉踉跄跄地走着，周围雾气萦绕，如同凝结的蒸气。半途中，我路过山坡上的一道断裂层，为了保持平衡我拼命抓扯地上的迷迭香根。头顶上空，子弹胡乱飞过。

我和科普、鲍勃·爱德华以及3名西班牙士兵躺在地上，藏身在奥斯库罗山西边洼地的冷杉树丛中。右边光秃秃呈灰色的山丘上，一群法西

斯士兵像蚂蚁一样爬上来。他们慢慢向内包围，这时，响起了法西斯分子的号角声。鲍勃像个顽童一样将手指放在鼻子边嘲笑这号角声，让我忍俊不禁。

我现在仿佛又到了拉格兰哈肮脏的院子里，周围的人都拿着锡罐争抢着大锅里的炖汤。那个胖乎乎的厨子被惹恼了，拿着大长勺试图维持秩序。旁边的桌子上，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士兵正把一条长面包切成五块，他的皮带上别着一把特大号自动手枪。我身后，有人用伦敦腔唱着歌，那是比尔·钱伯斯，我跟他吵过一架，他后来在韦斯卡城外阵亡。

这儿有老鼠，老鼠，

老鼠大如猫！

躲在……

突然，炮弹呼啸而过。15岁左右的小战士们一下子卧倒在地，厨子赶快躲到了大口锅的后面。直到炮弹坠落到100码开外，所有人才惊魂未定地站了起来。

我在哨兵岗上来回踱步，头顶是黑压压的大白杨树枝。沟渠里溢满了水，老鼠们在水里挣扎着，发出水獭般的声音。金色的曙光从身后慢慢升起。安达卢西亚籍的哨兵裹着大衣，开始哼起小曲。隔着一两百码开外的无人之地，法西斯的哨兵也在唱歌。

4月25日，另一支队伍终于替下了我们。我们交出了步枪，打理好了行李，行军返回蒙福特。我并不后悔离开前线。裤子里的虱子越来越多，怎么都弄不死。一个月前我就已经没袜子可穿，靴子也被磨得只剩鞋底，几乎就是在打着赤脚走路。我太渴望洗一次热水澡，穿上干净的衣服，然后睡在床上，正常生活在文明世界时，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对此产生如此强烈的欲望。我们在蒙福特的一个谷仓里睡了几小时，下半夜又跳上一辆卡车，在巴瓦斯特罗赶上早上5点的火车，又幸运地在莱里达换上快车，最终于26日下午3点到达了巴塞罗那。从此之后，麻烦也开始了。

第九章

在缅甸北部，可以坐火车从曼德勒到眉谬。眉谬是该省内坐落在山上的一个大城镇，处于掸邦高原边上。这是一次颇为奇特的旅程。出发时感受到的是典型东部城市的氛围：炽热的阳光，沾满灰尘的棕榈树，鱼腥、大蒜与香料混杂的味道，熟透了的热带水果，面色黝黑的人群摩肩接踵。正因为早已对此习以为常，甚至在火车车厢里也能感受到这种氛围，因此当火车停靠在海拔4000英尺高的眉谬时，思绪却还停留在曼德勒。可是只要踏出车厢，就好像立刻踏入了另一个半球。突然间，你能呼吸到凉爽清甜的空气，就像在英格兰一样。四周是绿荫、蕨菜、冷杉树和提着篮子卖草莓的面颊红润的女人。

在前线待了3个半月后回到巴塞罗那，让我想起了在缅甸的这段经历，似曾相识的那种突兀的变化。回巴塞罗那的途中，火车里还弥漫着前线的气息：肮脏、噪音、不安、破旧的衣衫、困顿、同志之情与平等。车离开巴瓦斯特罗时已塞满了民兵，每到一站又会涌上来更多的农民。农民们带着成捆的蔬菜，倒拎着受了惊吓的家禽，还有人带着袋口扎紧满地乱滚的麻袋，原来里面装满了活兔子。最后上来了一大群羊，把车厢塞得水泄不通。民兵们大声唱着革命歌曲，歌声盖过了列车轰隆隆的行驶声。每当有俊俏的姑娘走过，他们就会亲吻姑娘的手，向她们挥舞红黑两色手帕。一瓶瓶葡萄酒、茴香酒，还有浑浊的阿拉贡白酒被人们传来传去。用西班牙的羊皮酒壶，你可以轻松地从车厢的一侧将酒射入任何一个朋友的嘴中，省却了不少麻烦。我身旁一个黑眼睛的15岁男孩正对两个满脸皱纹的农民讲述他自己非凡的前线经历，那两个农民听得目瞪口呆。我敢说他这些故事都是编的。不一会儿，这些农民就打开行李，分给我们一些黏稠的红黑色葡萄酒。每个人都笑逐颜开，我甚至无法完全描述出那种愉悦的气氛。然而当火车穿过萨瓦德尔进入巴塞罗那时，我们立即感觉到了异样和敌对情绪，好似到了巴黎和伦敦。

每个在战争期间内造访巴塞罗那的人，都会感慨于这里的巨大变化。有意思的是，不管是8月来过巴塞罗那并于1月重返的人，还是像我这样先后于12月与4月来的人，都会有同样的印象：革命气氛已经烟消云散。8月在巴塞罗那的人，会看见街道上尚未凝结的血迹，会看见驻扎在小旅馆里的民兵。12月的巴塞罗那对他们来说则像个资产阶级的城

市。而对于我这样刚刚从英格兰到来的人而言，巴塞罗那比我所能想象的更像一个工人阶级的城市。如今，革命的浪潮已经退去，这座城市再次回归平凡，满目皆是战争带来的贫困和破败景象，不再像是一个由工人阶级掌权的城市。

人们的变化更令人吃惊。城里的人不再身着民兵制服或者蓝色工作服，而是穿上了西班牙裁缝特制的时髦夏装。满城都是身材臃肿的男人、仪态优雅的女士和锃光瓦亮的轿车。城里似乎还没有私人轿车，但大凡“有头有脸”的人都能调用车辆。新人民军的军官人数剧增，我当初离开巴塞罗那时这支部队还不存在。军官与士兵的人数比例约为1：10。军官里有一部分人当过民兵，出于技术指导的需求，他们被从前线调了回来。不过更多的军官则是那些不愿当民兵而去读军校的年轻人。军官和普通士兵的关系并不像一般资产阶级军队里的上下级关系，但就薪酬和制服而言，官兵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异。普通士兵穿着粗糙的棕色制服，军官则穿着收腰的精致卡其布制服，有点像英军军官制服。我估计这些军官每20人里真正上过前线的不超过一个，但他们所有人腰上都别着自动手枪，而我们在前线无论如何也得不到这样的枪。走在街上，我注意到居民们都盯着我们脏兮兮的外表看。和所有在前线待了几个月的人一样，我们的形象糟透了，我知道自己看上去像个稻草人。我的皮夹克已经被扯烂，羊毛帽子也早已没了原形，耷拉在眼睛上，靴子除了开裂的鞋面外所剩无几。其他人也都差不多。加之我们满身泥垢、胡子拉碴，难怪大家会盯着我们看。然而人们的眼神多少还是让我有点沮丧，令我感到在过去的3个月间这里一定发生过一些古怪的事。

之后的日子里，无数的迹象告诉我，我的第一印象是对的。这座城市经历了彻底的改变。主要有两个事实可以说明：第一，市民们已经对战争提不起兴趣；第二，贫与富、上层与底层的差异重新显现。

人们对战争普遍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令人震惊，甚至惹人厌恶。这让从马德里或巴伦西亚来的人骇然。也许这种漠不关心部分是由于巴塞罗那远离交火中心。一个月后在塔拉戈纳时我也注意到同样的现象，这个海滨小城的生活一如既往。全西班牙的志愿军从1月起显著减少。2月，加泰罗尼亚掀起了第一场声势浩大的参加人民军的动员行动，虽然人们表现得热情洋溢，人民军的队伍却并没有显著壮大。战争爆发仅仅约6个月的时候，西班牙政府就开始大规模征兵，这种举动在对外战争中很正常，但在内战中却极少见。毋庸置疑，这是因为战争开始后人们发现

革命并不如意，对革命颇感失望。加入民兵团的工会成员在最初几周就将法西斯分子逼退至萨拉戈萨，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正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为工人阶级而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也越发明显，工人阶级注定无法掌权。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被迫卷入各种战争——或是内战，或是对外战争——的城市无产者，他们不该因为对战争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冷漠而被指责。没有人不想赢得这场战争，可大部分人更希望战争早点结束。这在哪儿都是一样。所到之处总会有人漫不经心地说："这场战争很糟糕，对吧？什么时候能结束呢？"但凡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明白，与其说这场战争是为了反抗佛朗哥政权，毋宁说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两败俱伤的斗争。对于平民而言，食物短缺才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前线"这一概念，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虚幻而遥远的地方，大批年轻人在那里消失，要么永远不回来，要么在三四个月后满载而归。民兵在退伍时都会拿到欠付的薪酬。伤兵们并没有受到特殊关照，即使他们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当民兵再不是一件受追捧的事情。作为最能体现大众喜好变化的晴雨表，商店的变化即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我第一次到巴塞罗那的时候，无论店面如何破旧，都会售卖民兵装备。每家店的陈列窗里都摆放着军帽、拉链夹克、山姆布朗武装带、猎刀、水壶和左轮手枪的皮套。现在的商店则漂亮了很多，战争早已被抛到了脑后。日后在返回前线前购买装备时我才发现，很多前线将士急需的东西已经很难买到。

与此同时，一系列反对民兵团、支持人民军的宣传正在进行。这里的情况有些匪夷所思。从2月开始，按理说全部的兵力都该被并入人民军，民兵团应按人民军的番号改编，在薪水、军衔等方面进行调整。每个师本该重新混编，即部分来自人民军、部分来自民兵团，但事实上真正改变的只是名称。比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原先的列宁师，现在叫第29师。直到6月，人民军仅有极少量兵力到达阿拉贡前线，因此民兵团能一直保持自己原有的架构和特征。不过政府工作人员却在每面墙上刷上"我们需要人民军"的字样，而无线电台和共产党的报纸也不时指责民兵，称他们缺乏训练、军纪涣散等；与此相对，人民军则一直被称赞为"英雄"。从这些大量的宣传中，人们会形成一种印象，那就是主动去前线是不光彩的事情，坐等应征才值得赞赏。然而目前真实的情况是，在前线浴血奋战的都是民兵，人民军则在后方训练，当然，这个事实不会被宣传。民兵重返前线时，也不再雄赳赳气昂昂地敲着鼓挥着旗在街上走过，而是早上5点悄无声息地爬上火车或卡车黯然离开。有几批人民军即将奔赴前线，他们像从前的民兵一样声势浩大地穿过大街小巷。不过即便是他们，也由于大众对战争兴趣的衰减而未能得到热情欢

呼。民兵团在名义上是人民军这一事实被新闻界别有用心地利用。在前线取得的任何战绩都归功于人民军，而任何差池却都得民兵团担着，所以在同一部队里，一方被嘉奖而另一方被责难的事情经常发生。

除此之外，最令人诧异的还是社会氛围的变化——若非亲身体会，你很难想象。我第一次到巴塞罗那时，以为这是一座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太大贫富差距的城市。当时的巴塞罗那也正是那样。时髦的衣服难得一见，没有人阿谀奉承或收取小费，服务员、卖花女和擦鞋童都会直视你并称呼你为“同志”。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其中混杂着人们的希望与伪装。工人阶级信仰的这场革命虽拉开了序幕，却毫不稳固，资产阶级被震慑住了，便暂时伪装成工人。在革命初期，成千上万人为了活命刻意穿上工作服，高喊着革命口号。而现在，一切都回到了从前。豪华餐厅和旅馆里聚集着有钱人，他们正在大快朵颐。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物价飞涨的同时工资却没有相应上涨。除此之外，各种物资也时常短缺，而这对穷人的影响当然比对富人的影响大得多。餐馆和旅馆货源充足，而在工人聚居区，等待买面包、橄榄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人排成几百码的长队。我早前在巴塞罗那时，曾为那里没有乞丐而惊讶，而如今乞丐随处可见。在兰布拉斯大街北边的熟食店外，每当有人买完东西出来，一堆光脚的孩子就会蜂拥而上，喊着要一点点吃的。革命式的话语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陌生人不会再彼此称呼“你”或者“同志”，而是变回了“先生”及“您”。“日安”再次替代了“祝你身体健康”。服务员又重新穿上浆洗的衬衫，商场导购员又换上了那副奉承的嘴脸。我和妻子走进兰布拉斯大街上的一家袜子店买袜子，店员哈着腰不停地搓手，那副模样只在二三十年前的英格兰才能见到。付小费的习惯又暗地里恢复了。工人巡逻队已经被强令解散，战前的警队重新开始在街上巡逻，其结果就是先前被工人巡逻队勒令关闭的卡巴莱歌舞表演厅以及高级妓院[1]又重新开始营业。烟草短缺虽然无关大局，却明显体现出所有事情都在朝着有利于富人的方向发展。对于广大群众而言，烟草的缺货让人绝望，大家只能去街上购买卷着甘草根的香烟。这种烟我试过几次。很多人都试过这种烟。佛朗哥控制着加那利群岛，那里是西班牙的烟草种植地，因此政府手中只有战前库存的烟草。库存烟草紧缺，烟草商只得每周仅营业一天。如果幸运的话，在排了几小时的队后你能买到一包3/4盎司[2]的烟。理论上政府是不允许进口烟草的，因为这样会消耗原本用于军备和其他必需品的黄金储备。可实际上，很多昂贵的烟草都通过走私入境。好彩牌烟等就给走私商提供了大把牟利的机会。如果你付得起10比塞塔（相当于民兵一天的收入），就可以在高档酒店里买到香烟，即使在大街上买烟也不用遮遮掩掩。走私是为了富人的利益，因而得到纵容。除

了定量供应的面包之外，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买到任何数量的任何东西。在几个月前工人阶级掌控（或者说几乎掌控）这座城市的时候，绝不存在如此明显的贫富差距。当然，这不能全怪罪于政权转移。造成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在于巴塞罗那的生活相对平静，除了偶尔的空袭之外，很少有什么能让人们意识到自己还处于战争期间。这里的生活很平稳。每个去过马德里的人都说那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马德里，共同的危险让各个阶层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同志般的情谊。臃肿的富人啃着鹌鹑，而孩子们却在乞讨面包，这种令人生厌的场景不会出现在炮火纷飞的城市中。

巷战后的一两天，我穿过一条富人街，看见一家糖果店的橱窗里已经摆满了精致的点心和糖果，价格令人瞠目结舌。这是那种在邦德街与和平路常见的商店。我依旧记得当时那种混杂着震惊和滑稽的莫名感受，在这样一个因战争而满目疮痍的国家，居然还有人为这种东西一掷千金。希望我的这种感觉不是出于什么虚假的个人优越感。经历了前线那几个月的艰苦生活，我无比渴望能享受上好的食物、葡萄酒、鸡尾酒、美国香烟等。我承认我已经把所有买得起的奢侈品都享用过了。在第一周，也就是巷战之前，我心里一直想着几件事，而这几件事又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相互影响。首先，就像我之前说的，我正忙着让自己的生活尽可能舒适些。紧接着我就因为大吃大喝，一整周都身体不适。我感到不太舒服就爬上床睡半天，接着再起来大吃一顿，又把自己吃到不适。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偷偷地找人，想买一把左轮手枪。我真的很想得到这种难得一见的武器，它们在壕战里比步枪要好用得多。政府给人民军和警察配备这类枪械，却不给民兵，因此我只得从无政府主义者的秘密商店里私自购买，当然这是违法的。经过一番周折，一个无政府主义朋友帮我买到了一把很小的旧的26英寸自动手枪，只能对付5码之内的敌人，不过总比没有好。除此之外，我还在着手准备离开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民兵组织，加入其他能把我送到马德里前线的部队。

很久以前我就告诉别人我要离开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就个人偏好而言，我本该加入无政府主义组织。劳工联盟的成员可以加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不过我听说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更有可能把我送到特鲁埃尔而不是马德里。如果想去马德里，就得加入国际纵队，这意味着我得有共产党员的推荐才行。我找到一个在西班牙医疗救护队工作的朋友，向他解释了我的情况。他看上去非常急于接受我，还问我能否说服更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英国人一起加入国际纵队。如果我身体好些的话，准会一口答应。现在看来，也很难说清如果我当时答应

了情况会有什么不同。很可能我会在巴塞罗那战斗开始之前就被派往阿尔瓦塞特，那样的话我就不可能亲眼目睹这场战斗，只能相信日后的官方说辞。另一方面，如果战斗期间我在巴塞罗那，一边受着共产党的指挥一边还保留着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同志们的忠诚，我也未必有现在的立场。不过我还有一周的假期，迫切希望能在上前线前恢复身体。此外，还有件事——这样的小事通常会决定命运——我得等鞋匠帮我做一双新军靴。整个西班牙部队里都没找到一双适合我的鞋子。我告诉那个共产党朋友，过段时间再做最终决定，同时也想休息一阵子。我甚至打算和妻子去海边待上两三天。多好的主意！然而这里的政治氛围警示我，去海边度假可不是当前想做就能做的事情。

在城市的奢侈与不断增长的贫困人口的表面之下，在看似喜庆，满是花店、彩旗和宣传画报的街道之外，在拥挤的人群背后，隐藏一种明显而恐怖的气氛：政治对抗与仇恨情绪。受各种观点影响的人们都有不祥的预感：“不久就会出大事。”所谓的危险清晰明了。这种敌对存在于希望革命继续的人和希望革命停止或阻止革命的人之间，说到底也就是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除了加联社党及自由党联盟之外，加泰罗尼亚没有其他武装力量的存在。与之相反，全国劳工联盟的力量倒让人捉摸不透。他们虽然没有精良的装备，对自己的目标也不如对手清楚，但他们人数占优势，且控制着很多重要行业。考虑到这几股力量的博弈，麻烦必然难免。从加联社党的角度而言，要想保全他们的地位，眼下最紧要的就是解除劳工联盟工人的武装。正如我之前指出的，对民兵团的瓦解实际上就是为了达到该目的。与此同时，战前的武装警察、国民警卫队等已经重新回到岗位，而且从人数到武器配备都有了很大幅度的增加。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尤其是国民警卫队，相当于那种欧洲大陆国家的宪兵队，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都充当着有产阶级的保镖。政府还颁布了一条法令，所有的私人藏枪都得上缴。这项命令自然无人遵守，无政府主义者手中的枪只能通过武力没收。在此期间，由于新闻审查制度，关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大小冲突的流言总是含糊不清、自相矛盾。在很多地方，武装警察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营地发起了攻击。靠近法国边界的普奇塞达，一群卡宾枪手攻下了原本由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海关，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安东尼奥·马丁也被杀害。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费卡洛斯和塔拉戈纳。在巴塞罗那，由工人阶级控制的郊外，发生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争斗。劳工联盟和工人联盟的成员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时常相互残杀。通常，谋杀过后都会举办隆重而带有挑衅意味的葬礼，故意挑起彼此之间的政治仇恨。不久前，一名劳工联盟成员被杀害，成千上万穿戴整齐的劳工联盟成员给他送葬。就在4月底我刚刚回

到巴塞罗那的时候，一个名叫罗丹的著名工人联盟成员遭谋杀，大家都怀疑是劳工联盟的人所为。政府下令关闭了所有的商店，并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参加的人大部分来自人民军。送葬的队伍很长，要两个小时才能从队首走到队尾。我透过旅馆的窗户冷眼相看。很明显，这所谓的葬礼不过是为了炫耀他们的实力，类似的事件还会发生，还会有杀戮。就在当晚，我和我妻子被一阵激烈的枪声吵醒，枪声是从200码之外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传来的。第二天，我们听说一名劳工联盟成员被枪击，据说是工人联盟的人下的手。再明显不过的是，这些谋杀很可能都是内奸干的。从对罗丹之死的大肆渲染，到对报复性谋杀的只字不提，我们可以揣测出国外资本主义媒体对共产党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矛盾的态度。

5月1日就快到了，大家都在谈论着劳工联盟和工人联盟准备举行的盛大游行。劳工联盟的领导们比他们的大多数支持者更温和，正在试图与工人联盟和解。的确，他们的政策主旨就是试图将这两大联盟联合起来。他们主张劳工联盟和工人联盟应该一起游行，以显示团结。但在最后一刻，游行被取消了。谁都知道游行只可能引起暴动。5月1日悄然无事，这倒挺奇怪。号称革命之城的巴塞罗那，可能是欧洲法西斯势力范围外的唯一一座没有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城市。不过我承认，没有游行倒让我松了一口气。独立工党的分队本该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游行队伍，大家也都觉得会出乱子。我最不希望出现的事情就是被卷入一些无意义的巷战里去。跟随着红旗在街上游行，条幅上贴着鼓舞人心的口号，突然间却被楼上窗户里一个手持冲锋枪的陌生人打死，这可不是我所期望的有价值的死法。

---

[1] 工人巡逻队声称他们关闭了75%的妓院。

[2] 盎司，既是重量单位，又是长度单位。此处为重量单位，1盎司约为28克。

第十章

大约5月3日，中午时分，一个朋友穿过旅馆休息室时不经意间说了句：“我听说电话局出事了。”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并没太注意。

下午三四点之间，我正走在兰布拉斯大街上，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了几声步枪响。我转过身，看见一群年轻人手持步枪，脖子上缠绕着象征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手帕，慢慢靠近兰布拉斯大街北边的一条小巷。显然他们正与一座八角楼（我猜是座教堂）里的人交火，这座八角楼是小巷的制高点。我立刻想到：“开始了！”对此我并不太意外，过去几天里大家都预料到战斗一触即发。我意识到该立即回旅馆看看我妻子是否一切安好。但小巷入口处的无政府主义者示意人们后退，还大喊着让人们不要越过火线。枪声越来越密集。高楼里射出的子弹飞过大街，惊慌的人们沿着路边跑开以躲避战火。大街上到处都是嘭嘭嘭的声音，店主们慌忙关闭钢制百叶窗。我看见两个人民军军官手持左轮手枪，小心翼翼地紧贴着树撤退。在我前面，人群正涌向兰布拉斯大街中间的地铁站躲避。我当即决定不跟着人群进地铁站，因为那样可能会在地下堵上几小时。

就在这时，一个和我一起上过前线的美国医生跑向我，并抓住了我的手臂。他看上去异常兴奋。

“快点！我们得立刻去猎鹰旅店！”猎鹰旅店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管理下的寄宿公寓，主要为休假的民兵提供住宿。“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家伙们都在那儿等我们，麻烦已经开始了，我们一定要团结。”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医生一路拉着我向前跑。他太兴奋了，什么都说不清楚。看来当几辆载着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员的卡车开往由劳工联盟的工人控制的电话局并突然发动袭击时，他就在加泰罗尼亚广场。袭击没过多久，无政府主义者就赶到了电话局，双方发生冲突。从他的描述中，我大概明白了今天早些时候所谓的“麻烦”是由于政府要求劳工联盟交出电话局遭到拒绝引发的。

我们沿着街道跑着，迎面一辆卡车疾驰而过，车上满载握着步枪的无政府主义者。前方，一名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趴在一堆床垫上，面前放着一挺轻机枪。当我们到达位于兰布拉斯大街最南边的猎鹰旅店时，门前挤了一堆人。场面混乱不堪，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除了几个担任楼层保安的突袭队员外无人持枪。我朝着几乎就在对面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地方委员会跑去。楼上民兵领薪水的房间里同样挤满了人。一个穿着便装、身材高大、脸色苍白的30多岁的男子正试图维持秩序，并从角落里拿出皮带和弹药盒。看上去目前这里并没有步枪可用。刚才那个美国医生已经不见了踪影——我想一定是有伤员需要他处理——又来了个英国人。接着，那个身材高大的家伙和其他人从里屋抱着成捆的枪走出来，开始发放。那个英国人和我因为是外国人，大家有些疑心，并没有发给我们枪支。直到一个我在前线认识的民兵走进办公室，认出了我，他们才有些不情愿地给了我们枪和几匣子弹。

街上空无一人，远处传来了一声枪声。人们都说现在兰布拉斯大街以北已被封锁。国民警卫队已经抢占了沿街的制高点，对过往行人扫射。我本想冒险回旅馆，不过隐约觉得地方委员会可能随时会受到攻击，最好留下来保卫。楼里挤满了人，三五成群站在楼梯上和外面的过道里兴奋地交谈。大家似乎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并没有确切的概念。我所能收集到的信息就是国民警卫队占领了电话局以及其他一些战略要地，而从这些战略要地能俯视其他由工人阶级掌控的大楼。大家一致觉得国民警卫队的“目标”是劳工联盟和工人阶级。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没有任何人怪罪政府。在巴塞罗那，劳苦大众将国民警卫队视作爱尔兰王室警吏团般的角色，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次是他们主动发起攻击。一旦了解事情的大致情况，我便安心多了。情况很明了：卷进冲突的一方是劳工联盟，另一方是警察。我对资产阶级心目中理想化的“工人”形象并没有太多的偏爱，不过当我看见工人们以血肉之躯与他们的天敌警察战斗时，我知道自己必须得站在他们一边。

过了很久，我们这一带似乎并没有什么动静。我没想到要打个电话回旅馆询问妻子是否安全，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电话局已经停止运转，可事实上只是暂停了几个小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两座大楼里约莫聚集了300人，其中大部分是贫民，来自码头边的穷街陋巷。人群中有很多女人，有的手中抱着孩子，还有一群衣衫褴褛的小男孩。我想他们中大部分人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跑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大楼里避难。大楼里还有不少正在休假的民兵以及若干外国人。据我估计，我们仅有约60支步枪。楼上的办公室里很多人在索要枪械，但都被

告知已经发放完毕。年轻的民兵们四处游荡，似乎把外面的局势当成儿戏，还企图从拿到步枪的人手里哄骗或干脆去偷取武器。没过多久，一个男孩就巧妙地抢走了我的步枪，溜之大吉。于是除了那只小小的自动手枪和一匣子弹外，我再次几乎被缴械了。

天色渐晚，我饿了，不过看上去猎鹰旅店里没什么可吃的，我和一个朋友溜去不远处他住的旅馆吃晚饭。街道上一片漆黑，没有一个人影，百叶窗拉得严严实实，不过路上还没有设置街垒。朋友住的旅馆大门紧锁，门口堆了很多栅栏，一阵争吵之后他们才放我们进去。我回到大楼时听说电话局已经重新运转，便跑到楼上的办公室里去给我妻子打电话。偏偏这座大楼里没有电话簿，而我又不知道大陆旅店的电话号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挨个搜了近一小时之后，我终于在一本旅游指南里找到了大陆旅店的电话号码。我没能联系上妻子，不过设法联系上了独立工党驻巴塞罗那的代表约翰·麦克纳尔，他告诉我那里一切正常，没有人遭到枪击，还问我在地方委员会是否安全。我说如果有点香烟的话会更好。这不过是句玩笑话而已，想不到半小时后麦克纳尔竟带着两包好彩牌香烟出现在大楼里。他冒着生命危险走过漆黑的街道，无政府主义者的巡逻队两次用枪顶着他让他停下，并要求检查他的证件。他这一小小的壮举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很高兴终于有烟可抽。

他们在大部分窗口安排了武装人员，并让一组突袭队员在楼外的街道上盘查过往行人。一辆无政府主义者的巡逻车开来，车上装满了武器。司机身旁坐着一个大约18岁的漂亮的黑发姑娘，她膝上放着一把冲锋枪。我花了不少时间在大楼里转悠，这栋楼很适合漫步，不管走多久都难以熟悉其地形。满目皆是垃圾、损坏的家具以及碎纸，仿佛这些都是革命不可避免的产物。人们随处席地而眠，两个码头边来的穷苦女人正躺在走廊里的沙发上打鼾。这栋楼在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接管之前是卡巴莱歌舞厅，有些房间里有凸起的舞台，其中一个舞台上还摆着一架三角钢琴。终于，我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武器库。我不知道事态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况且我实在太需要武器了。我早就听说加联社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劳工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之类的对立党派都在巴塞罗那囤积武器，所以绝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这两座主要大楼里只有刚才所见到的区区五六十支步枪。存放武器的房间外无人把守，大门很薄，我和另一个英国人很轻松就撬开了门。我们进入房间之后才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人说的没错，房间里没多少武器，只找到24支老式的小口径步枪和一些猎枪，没有任何子弹。我跑到楼上的办公室询问他们是否还有多余的手枪子弹，回答是否定

的。不过倒是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巡逻车送来的几箱手雷。我拿了一些放进自己的弹药盒。这些手雷粗制滥造，通过摩擦顶部一个类似火柴的东西来引爆，一不小心就会爆炸。

遍地都是睡得四仰八叉的人。有一间房间里，一个婴儿在不停地哭叫。尽管已是5月，夜晚依旧寒冷。有一个舞台还挂着幕布，我便用刀割了一块幕布下来，把自己裹进去睡了几小时。我睡得不踏实，总担心压到那些可怕的手雷，被它们炸上天。凌晨3点，一个高大英俊看起来像是负责人的男子把我叫醒，塞给我一支步枪让我在某个窗口前站岗。他告诉我警察局局长萨拉斯因为对攻击电话局的行动负有责任，已经被逮捕。不过日后我们听说，他实际上只是被免职。即使这样，这条新闻还是证实了大家的普遍想法，国民警卫队的这次行动是自作主张。天刚破晓，楼下的人们就开始动手修建两道街垒，一道在地方委员会的大楼外，一道在猎鹰旅店外。巴塞罗那的大街是由方形卵石铺成的，用这些石头修筑街垒很方便，而方形卵石下的小石头则适合装沙袋。修建街垒的场景奇特又美妙，我真该拍摄下来。一旦西班牙人认定了要干什么事，他们身上就会迸发出无限激情。带着这种激情，成排的男女老少们在撬卵石，用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手推车搬运卵石。由于沙袋太重，大家都走得踉踉跄跄。在地方委员会的门口，一个犹太女孩正面带微笑地观望，她穿着民兵长裤，裤膝纽扣垂到了脚踝。不到几小时街垒就已有一人高，有人持枪站在射击口旁。一道街垒后生起了火，人们在煎鸡蛋。

他们再次收走了我的步枪，这里看上去没有其他事可做，于是我和另一个英国人决定回大陆旅店。远处有人交火，但看上去并不在兰布拉斯大街上。回去的路上，我们顺道走进了食品市场。那里只有一小部分摊位还在营业，这些摊位被一群来自兰布拉斯大街南边工人住宅区的人围得水泄不通。我们刚到市场，外面就响起了轰鸣的枪声，屋顶上一些窗格的玻璃被震碎，那群人立刻冲向后门逃走了。还有一些摊位照旧营业，我们每人买了一杯咖啡，又买了一条山羊奶酪塞在手雷旁。几天之后我很庆幸还能吃到奶酪。

一天前我目睹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警卫队交火的那个街角，现在已经竖起了街垒。街垒后的人喊着让我小心点（我当时站在街的另一侧），教堂塔楼里的国民警卫队员正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每个过往行人扫射。我停了一下，便从街垒缺口处冲了过去。不出所料，一颗子弹从我身边划过，近得令人汗毛倒竖。当我快靠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行政大楼时，站在大楼门口的突击队员冲着我大声警告，不过当时我并没

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我和大楼之间隔了几棵树和一个报摊（西班牙的这种街道中间都有宽大的人行道），我也无法看清他们在指什么。我跑进大陆旅店，确认一切安好，便洗了把脸，返回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行政楼听候命令（行政楼和大陆旅店之间约有100码距离）。这时候，步枪声和机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俨然一场真正的战斗。我找到了科普，问他我们该怎么办。楼下传来一阵可怕的轰鸣声，声音如此之响，以至于我以为一定是有人用野战炮在向我们开火。实际上那只是手雷，不过声音在石楼间回荡，显得更响。

科普向外瞄了一眼，把手杖竖在背后说：“我们调查一下。”随后便如往常那样漫不经心地走下楼梯，我紧随其后。靠近门口的地方，一群突击队员像玩撞柱游戏一样把手雷抛到外面的人行道上。手雷在20码开外处爆炸，和步枪的砰砰声混杂在一起，发出震耳欲聋的骇人声响。街道中间的报摊后面，一个脑袋探了出来，简直和集市上的椰子一模一样。原来那是我认识的一个美国民兵。事后我才得知到底发生了什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大楼旁有一家二楼兼做旅馆生意的咖啡店，叫摩卡咖啡。一天前，二三十个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员走进咖啡店，并于冲突发生后突然占领了该建筑。估计他们是受命先占领咖啡馆，为以后攻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大楼做准备。凌晨早些时候，他们试图从楼里出来，便发生了交火，一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突击队员严重受伤，一名警卫队员死亡。警卫队员随后逃回咖啡店。当那个美国民兵走出来时，尽管手无寸铁，警卫队仍朝他猛烈开火。这个美国民兵一下子跳到报摊后隐蔽，突击队员便不停地朝警卫队扔手雷，试图把他们赶进室内。

科普大致扫了一眼现场，冲上前把一个红发的德国突击队员拽了回来，那人正用牙齿咬开一颗手雷的保险丝。科普大声嚷嚷着让大家离开门口，又用几种语言告诫我们要避免流血事件发生。接着他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当着警卫队员的面用夸张的动作掏出手枪，放在地上。两个西班牙的民兵军官也做了同样的动作，接着他们3人慢慢走向咖啡馆门口，那几个警卫队员正在门口挤成一团。这种事给我20英镑我也不会去。他们两手空空，慢慢走向那群警卫队员。警卫队员虽然荷枪实弹，但是都被吓坏了。一个穿着长袖衬衫、吓得脸色青白的警卫队员走了出来，要与科普谈判。他一脸不安地不停指着人行道上还没爆炸的两颗手雷。科普回来告诉我们，最好引爆那两枚手雷，留在那儿对行人很危险。一名突击队员对着其中一枚手雷开了一枪引爆了它，但没射中另一枚。我让他把枪给我，然后我蹲下来朝着另一枚射了一枪。很可惜，也

打偏了。

这是我在整个混乱中开的唯一一枪。人行道上撒满了摩卡咖啡店招牌上掉下的碎玻璃，外面还停了两辆车。其中一辆是科普的，车身已经弹痕累累，挡风玻璃也被炸弹炸碎了。

科普再次把我带到楼上，并解释了整个局面。如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大楼受到袭击，我们就必须保卫大楼，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指示我们只采取防御姿态，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火。大楼的正对面是一家叫波利欧拉玛的影院，影院楼上是家博物馆。这座楼的顶部远远高出其他建筑物，上面有个瞭望塔。这个瞭望塔是整条街的制高点，只要有几个持枪的士兵站岗就可以阻止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大楼的袭击。影院的看门人是劳工联盟成员，应该会允许我们进去。而在摩卡咖啡店的警卫队员应该也不会为难我们，毕竟他们也不想挑起冲突，自然乐意双方都没有伤亡。科普再次强调，我们得到的指令是如果我们自己或大楼没有受到攻击，就万万不要开火。即使他没说，我还是琢磨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对被扯进该事端很恼怒，但也不得不与劳工联盟保持同一战线。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已经在瞭望塔布置了一些守卫。接下来的3天3夜，除了溜到旅馆用餐外，我一直守在波利欧拉玛影院的顶层。我所在的地方很安全，需要忍受的无外乎就是饥饿和无聊，但这依旧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几天。没什么能比巷战的那几天更令人讨厌、更令人绝望、更伤脑筋。

我坐在屋顶上，惊叹着眼前这一切愚蠢的行为。从瞭望塔小小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方圆数里的景致：一座接一座高耸的大楼，玻璃穹顶，古怪的弧顶上贴着耀眼的绿色和古铜色瓦砖；向东方远眺，是波光粼粼的淡蓝色海面，这是我到西班牙以来第一次见到大海。这个拥有100万人口的大城市陷入了接连不断的暴力冲突中，噩梦般的噪音层出不穷，城市却毫无生气。阳光下的街道上空无一人，除了子弹不断从街垒和堆着沙袋的窗户后飞出外，没有任何动静。路上没有车辆行驶，在兰布拉斯大街一带，有轨电车纹丝不动地停着，司机在冲突刚开始时就溜之大吉。可恶的枪声，在成千上万座石楼间不断回荡，回荡，整座城市仿佛正在经历一场热带暴风雨。噼里啪啦、咯咯嗒嗒，轰鸣声不断，有时减弱为几点零星的射击声，有时又迅速变成震耳欲聋的万枪齐发声，不到夜幕降临这些枪声就不会停息，而第二天凌晨又会准时响起。

究竟发生了什么？谁在和谁打？谁赢了？这些疑问起初很难弄明白。巴塞罗那的市民对巷战已经司空见惯，他们熟悉地形，不用猜就知道哪个政党会占领什么街和什么大楼。而外国人则逊色了很多。从瞭望塔向外看去，巴塞罗那的主干道兰布拉斯大街将城市一分为二。兰布拉斯大街以西，在工人聚居区有团结的无政府主义者；兰布拉斯大街以东，一场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战斗正在弯弯曲曲的小巷里进行，不过在那里加联社党和警卫队多少掌控了局面。而靠近我们这边，在加泰罗尼亚广场周边，局势更加复杂，如果不是每栋楼上飘扬的党旗，根本无法辨别哪栋楼属于哪个政党。这里的主要地标是加联社党的总部科隆旅馆，那是加泰罗尼亚广场周边的制高点。旅馆外墙上挂着巨大的“科隆旅馆”字样，从靠近倒数第二个字母“o”的窗户里伸出了一挺能让广场血流成河的机枪。兰布拉斯大街南边，也就是从我们这儿向东100码的地方，隶属于加联社党的社会主义统一青年团（类似于英格兰的共青团）正守在一家大百货商店里，堆砌着沙袋的窗口正对着瞭望塔。他们降下自己的红旗，升起了加泰罗尼亚的地区旗。在电话局这个冲突开始的地方，加泰罗尼亚的地区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并排飘扬。暂时性的和解已经达成，电话局正常运转，大楼里并未发生交火。

我们这一带出奇地平静。摩卡咖啡店里的警卫队员把钢制百叶窗拉下，并用店里的家具堆成了一道屏障。接着他们中的6个人跑上了我们对面的楼顶，用床垫堆成了另一道屏障，上面还插了一面加泰罗尼亚地区旗。不过很明显他们并不想和我们交火。科普和他们定下了明确的协议：如果他们不开火，我们也不会回击。到目前为止，科普已和警卫队员处得不错，也去咖啡店拜访了他们几次。不用说，他们已经把咖啡店里一切能喝的东西洗劫一空，还给了科普15瓶啤酒作礼物。作为回报，科普给了他们一支我们自己的步枪，以补偿他们前些日子不知怎么弄丢了的那支。不过即使这样，坐在屋顶的感觉还是很别扭。有时我真的厌倦了这一切，对可恶的声响充耳不闻，花几小时阅读一系列企鹅出版社出版的书，那是我不久前刚买的。有时候我能察觉到50码外有持枪的人在盯着我，这有点像回到战壕的感觉。好几次出于习惯，我把警卫队员叫成了法西斯分子。楼顶上大约有6个人，我们在每个瞭望塔都布置了一个守卫，剩下的就坐在铅制屋顶上，屋顶上除了石栏杆外别无他物可做掩护。我明白，警卫队员随时会接到电话指令而开火。他们同意在开火之前会先警告我们，但也不能因此断定他们一定会守信。只有一次，冲突似乎真的一触即发。对面一名警卫队员跪在地上，准备从屏障后开枪射击。当时轮到我守卫瞭望塔，我立即瞄准他，并大喊道：

“喂！别冲我们开枪！”

“什么？”

“我说别对我们开枪，否则我们会还手的！”

“啊不！我不是在冲你们开枪！看下面！”

他用枪指着我们楼下的小巷。一个穿着蓝制服的年轻人握着步枪，在角落里东躲西藏。很明显，他刚才冲着楼顶的警卫队员开过枪。

“我在冲他开枪，他先向我开枪的。”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我们不想冲你们开枪，我们都是工人，跟你们一样。”

他行了一个反法西斯的敬礼，我向他回礼，又冲他叫道：

“你那儿还有多余的酒么？”

“没了，全喝完了。”

同一天，在大街很远处的社会主义统一青年团大楼里，一个人突然莫名其妙地举起枪，在我探出窗外的时候冲我开了一枪。也许我做了什么引人注目的动作，我并没有回击。尽管他离我才100码远，但子弹偏得太厉害，连楼顶的瞭望塔都没碰着。和以往一样，西班牙人糟糕的射击水平救了我一命。此后，我又遭到来自那栋大楼的若干次袭击。

令人厌恶的枪声持续不断。不过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判断，双方都是出于自卫。大家只是待在各自的大楼里，躲在障碍物后向对面的人射击。在离我们半英里的街道上，劳工联盟和工人联盟的主要办公室是面对面的，那个方向传来的枪声最为激烈。冲突结束后的第一天，我从那条街上走过，看见橱窗的窗格被子弹打得像筛子一般。巴塞罗那大部分商铺的窗户都被店员用长条纸条交叉贴好，这样当子弹射中窗格的时候玻璃就不会碎得四溅。有时候步枪和机枪的嗒嗒声会被手雷的爆炸声打断。远处响起十几次巨大的爆炸声，每次间隔时间较长，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听上去像空投的炸弹，但鉴于这里并没有飞机飞过，因此绝无可能。事后我得知，内奸为了造成更大的恐慌情绪，引爆了多处炸药。这个说法很可能是真的。不过并没有火炮。我一直注意倾听，因为一旦炮声响起，就说明事态变得严重（火炮在巷战中起到决定性作

用）。随后报纸上有很多关于巷战中使用火炮的小道消息，但没人能指认出到底哪座楼被炮弹击中过。对于熟悉火炮声的人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听漏。

几乎从冲突刚开始就出现了食物短缺问题。我们只能趁着夜色的掩护（因为国民警卫队员时常在兰布拉斯大街进行伏击）艰难地从猎鹰旅店将守卫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大楼的15到20个民兵所需的食物递送过来。不过食物并不够分，所以我们大家都尽可能去大陆旅店用餐。大陆旅店已经被自治政府施行“集体化”了，不像大部分旅店被劳工联盟或者工人联盟掌控，这里还是中立区。冲突伊始，这家旅店就被各色人等挤得满满当当。这里有外国新闻记者；形形色色的政治嫌疑犯；一个在政府工作的美国飞行员；各类特工，其中包括一个面目狰狞的胖苏联人，自称是国家政治安保局的特工，外号查理·钱，他腰带上还挂着一把左轮手枪和一枚小巧玲珑的手雷；一些看上去像法西斯同情者的西班牙富人；两三个受伤的国际纵队队员；一群卡车司机，他们本打算把一车车橙子运回法国，却因为冲突而无法继续上路；还有许多人民军的军官。人民军整体而言在整个冲突中保持中立，不过有些士兵溜出兵营以个人名义参战，周二早上我曾经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街垒前看见一些人民军士兵。冲突伊始，在食物短缺问题还没变得棘手，报纸尚未大肆渲染仇恨情绪之前，就出现了将整件事看成笑话的趋势。大家都说这种事每年都会在巴塞罗那发生。我们的一位挚友，意大利新闻记者乔治·迪欧里穿着满是血迹的裤子走进旅店。他原本是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却在人行道上替伤员包扎时被人开玩笑地投以手雷，幸亏他伤得并不重。我还记得他曾感慨地说巴塞罗那的铺路石都应该标上号码，这样搭建及拆除街垒时能省却很多麻烦。有一天，我站了一夜岗，当我拖着疲惫、饥饿、脏兮兮的身子回到旅店，看见几个国际纵队的成员正坐在我房间里。他们的态度完全中立。我想如果他们忠于自己的政党，就一定会催促我改变立场，甚至会把我捆绑住，搜走我口袋里的手雷。然而事实却是，他们对我在休假期间还得在房顶站岗表示同情。他们的基本态度是“这只是无政府主义者和警察之间的小冲突，不值得大惊小怪”。无论这场冲突波及的范围有多大，伤亡人数有多少，相比于官方的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反叛的说法，我相信这几个人的说法更接近事实。

大约是在周三（5月5日），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门窗紧闭的大街显得死气沉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必须得出门的行人，都挥舞着白手帕猫着腰小心翼翼地前进。在兰布拉斯大街中段，行人基本不会受到子弹的袭击，一些人正对着空荡荡的大街叫卖着报纸。周二，无政

府主义者的报纸《工人团结报》将国民警卫队对电话局的袭击称为“悍然挑衅”（或者类似的字眼），然而到了周三就换了口风，并恳求大家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人也在电台发布了类似的信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报《战斗报》的办公室因无人防守，大约在电话局遭袭击的同时被国民警卫队攻占，不过报纸在另一处办公室被印制出来并分发。我力劝大家留在街垒后，人们心事重重，焦虑地想着这一切究竟会如何收场。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已经离开了临时掩体，不过大家都已对这些毫无意义的冲突心生厌倦。这些冲突显然无法带来实质性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让其发展为大规模内战，因为如果那样就意味着会输掉反抗佛朗哥的战争。我随处可以感觉到类似的担忧。从目前大家谈论的信息来看，劳工联盟的普通成员一直以来想要的无外乎两件事：交还电话局，以及解除可恶的国民警卫队的武装。如果自治政府能够答应这两件事，并承诺不再从食品供应中牟取暴利，所有的街垒在两小时内必能全部清除。不过很显然，自治政府不会妥协。居心叵测的谣言漫天传播。据谣传，巴伦西亚政府会派出6000人占领巴塞罗那，而5000名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士兵已经离开阿拉贡前线去堵截那6000人。实际上只有前者是真的。从瞭望塔上远眺，我能看见灰色的类似战舰的船只慢慢逼近海港，水手出身的道格拉斯·莫伊尔说看上去像是英国驱逐舰。我们事后得知，那些确实是英国驱逐舰。

那天晚上，我们听说在西班牙广场有400名警卫队员已向无政府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有消息说郊外（主要是工人聚居区）已被劳工联盟控制。看上去似乎是我们赢了。不过就在当夜，科普派人找到我并一脸严肃地告诉我，据刚掌握的消息，政府正准备取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并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我被这个消息震惊了。这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可能会成为整个事件的牺牲品。我隐约预感到，当冲突结束后，所有的责任都会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毕竟它是最弱势也是最适合当替罪羊的党派。同时，我们也无法继续保持中立。如果政府对我们宣战，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自卫，而身处行政大楼的我们很清楚，隔壁的警卫队可能会得到命令来攻击我们。我们取胜的唯一机会就是先发制人。科普一直在电话边候命，一旦我们确信政府下令取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就要立即做好占领摩卡咖啡店的准备。

整个漫长而噩梦般的夜晚，我们都在巩固大楼的防御措施。我们锁上了入口的铁帘，并在铁帘后用工人装修时留下的石板搭建了一道屏障，接着仔细检查了我们的武器库存。算上对面波利欧拉玛电影院楼顶

的6支步枪，我们一共还剩21支枪，其中1支已经损坏，每支步枪还可以配上50发子弹。除了这些以及几十枚手雷外，我们只剩下几把普通手枪和左轮手枪。有12个人，主要是德国人，表示如果警卫队发动攻击，他们愿意主动袭击摩卡咖啡店。我们应该在下半夜的某时从楼顶袭击，杀他们个措手不及。他们人数更多，不过我们的士气更高，一定可以攻下咖啡店，虽然这样做势必会造成伤亡。除了几块巧克力外，我们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吃，到处都传言说“他们”会切断水源。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是指谁，也许是掌控水厂的政府人员，也许是劳工联盟。我们花了很久把厕所的每个水池以及能找到的所有水桶都蓄满水，最后把警卫队给科普的早已喝光的15个啤酒瓶也拿来盛水。

此时的我大脑一片空白，筋疲力尽，已经60个小时没有好好睡觉了。现在已经临近午夜，楼下的路障后躺满了人。楼上有一间带沙发的小房间，我们原本打算把这里当做救护站，不过在楼里并没能找到碘酒和绷带。我妻子从旅店赶来，准备充当护士。我躺在沙发上，打算在攻打摩卡咖啡店之前休息半小时，也许我会牺牲。别在腰带上的手枪抵着我的背部，很不舒服。我只记得突然醒来时看见妻子站在我身旁。天色已大亮，什么都没发生，政府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宣战，水源也没被切断，除了街上零星的枪声外一切正常。妻子说不忍心弄醒我，于是就睡在了隔壁房间的靠椅上。

那天下午出现了短暂的停火。枪声渐渐消失，街道上出乎意料地人头攒动。一些店家拉开了百叶窗，即使很多摊位已经空空如也，市场里还是挤满了一大群嚷着要买食物的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轨电车并没有开始运行。警卫队员仍然躲在他们设在摩卡咖啡店的街垒后，两边的防御建筑也没有被清除。大家都在四处奔波购买食物。到处都可以听到急迫地询问：“你觉得冲突结束了么？你觉得还会再打起来么？”冲突就像飓风或地震似的自然灾害，随时会降临在每个人头上，而我们无力阻止。我猜停火时间大约有几小时，但感觉上不过几分钟而已，突然间枪声大作，如6月的暴雨吓得每个人撒腿就跑。钢制百叶窗又被啪啪地关上，大街上如被施了魔法一般瞬间空无一人，街垒旁的人们各就各位，战斗重新开始。

带着强烈的厌恶和愤怒情绪，我又回到了楼顶的岗位上。当你参与到类似事件里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创造历史，按理说你应该觉得自己是个历史人物。然而你不会有这种感受，因为此时具体的生理需求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事情。整个冲突中，我从来没有“分析”过几百英里外

的记者们胡编乱造出来的局势。我迫切关心的不是这个两败俱伤的残局里的是与非，而是一直待在楼顶上有多么的难受与无聊。此外，还有越发严重的饥饿感，从周一开始我们所有人就没好好吃过一顿饭。我满脑子都想着只要这场战斗一结束，就得立即回到前线，这实在令人恼火。我已经在前线待了150天，回到巴塞罗那不过是渴望能在舒适的环境中得到稍许休息，而现在却不得不一直守在楼顶，面对着对面同样无聊的国民警卫队员。他们时不时冲我招手，并说服我他们也是“工人”（意思是希望我不要冲他们开枪），可他们一旦接到命令就会立即向我们开火。如果这就是历史，给人的感觉却一点也不像历史，这更像是在前线痛苦的日子。由于人员不足，我们不得不超常规的长时间站岗。那可不是为了当什么英雄，而只是无聊地待在岗位上，随时可能睡着，同时丝毫不关心这么做的目的。

在旅馆里，那群形形色色连脑袋都不敢探出门外的乌合之众中间，有一种可怕的互相怀疑的气氛正悄然生长。很多人都像感染了间谍症似的，鬼鬼祟祟地到处走动，悄悄议论着谁是共产党间谍，谁是托派分子，谁是无政府主义者，又或谁什么都不是。那个肥胖的苏联间谍正挨个盘查所有的外国难民，并振振有词地解释说整个事件不过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能说谎的人，除非把记者也算上。在步枪发出的嗒嗒声中，在关合的百叶窗下，这里对上等酒店生活的拙劣模仿令人生厌。当一颗子弹射穿窗户并击毁了柱子后，临街的餐厅就被弃用了，旅客们都挤在后面一个漆黑的房间里用餐。餐桌始终紧张。服务员的数量有所减少，他们中有一些是劳工联盟成员，参加了大规模罢工。侍应生脱下了上过浆的衬衫，不过依旧有人以一种装腔作势的姿态上菜。其实这里根本没什么可吃的，周四晚，每个人的主菜就是一条沙丁鱼。旅馆里的面包已经断货多天，酒也即将告罄。我们花的钱越来越多，喝的酒越来越少。战斗结束后很久，食物短缺的问题才得以缓解。连续3天，我和妻子的早餐只是一点山羊奶酪，没有面包，也没有喝的。这里唯一还充足的就是橙子，那些法国卡车司机带来了成堆的橙子。他们长相粗野，身边总是跟着一群艳俗的西班牙女孩以及一个穿着黑衬衣的高大搬运工。若是在往日，类似旅馆经理之流的势利鬼会千方百计整得他们不舒服，甚至会拒绝他们留宿；而现在他们却吃香得很，不像其他人，他们可以享受自己储备的面包，而其余的人都得低声下气地向他们乞求一点。

最后一晚我仍然守在屋顶上，第二天，这场冲突看似真的要结束了。我觉得那天，也就是周五，枪战已减弱了很多。没有人确切地知道

巴伦西亚的军队是不是真的来了，其实他们在当晚就已抵达。政府正播报着半是安慰半是威胁的消息，命令大家回到自己的屋内，说在某时之后会逮捕街上所有携带武器的行人。尽管没有人关心政府在广播里说什么，但大家都开始慢慢离开街垒。我想人们这么做的原因一定是由于食物短缺。到处都能听到类似的说法：“没有食物了，我们得回去工作。”而另一方面，警卫队员仍然坚守在岗哨上，因为只要城里还有食物，他们就能得到定量供应。到了下午，除了那些被遗弃的街垒还没被清除，街道上一切都已恢复正常。兰布拉斯大街上熙熙攘攘，商铺几乎都开张了，最让人振奋的是，停了那么久的电车也突然发动，开始运营。警卫队员依旧把守着摩卡咖啡店，并没有拆除他们的街垒，不过有些人已经搬出了椅子，把步枪竖在膝盖之间坐在人行道上。我路过的时候朝他们中一个人挤了挤眼，却被报以不友好的一笑，显然他认出了我。飘扬在电话局上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被撤下，只剩加泰罗尼亚地区旗，这意味着工人们失败了。尽管由于我对政治的无知，不清楚自己该做什么，却意识到政府一旦看准时机定会采取报复行动。不过当时我对这方面的事情并不感兴趣。我被一种强烈的轻松感所包围，可恶的枪声终于结束，在回到前线之前大家终于可以买些食物，好好休息一番，享受几天闲适的日子。

那天，来自巴伦西亚的部队出现在街道上时一定已经很晚了。那些是突击卫队，编队和国民警卫队及警卫（主要从事警察事务）相似，是共和国的精兵。他们好像突然从地里冒出来似的，街道上随处可见他们10人成一队在巡逻。这些士兵身材高大，身着灰色或蓝色制服，肩上架着长长的步枪，每队还配有一挺冲锋枪。当时，我们有一项棘手的任务要完成。那6支我们站岗时用的步枪还遗留在瞭望塔上，无论如何都得把它们带回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大楼。问题是，该如何带着它们顺利过街。虽说这批枪属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大楼常备军械，但是抱着它们上街违反了政府的规定。如果被发现，我们肯定会被逮捕，更糟糕的是这些步枪还可能被没收。连同这几支枪，大楼里总共剩21支步枪，我们实在损失不起。经过一番讨论，确立了最佳方案后，我和一个红发的西班牙男孩准备把它们偷偷运出去。躲开突击卫队的巡逻很简单，可是怎么避开摩卡咖啡店的警卫队员却很伤脑筋。他们知道我们在瞭望塔上有步枪，如果让他们看见我们带着枪过街，我们就会露馅。我们每个人都脱去部分衣服，把枪吊在左肩上，枪托抵着腋窝，枪管塞到裤腿里。很不幸，这些都是长长的毛瑟枪，即便是像我这么高的人，都无法把一支长毛瑟枪轻松地塞进裤管。拖着一条僵硬而完全无法弯曲的左腿走下瞭望塔的螺旋形楼梯，真是一件令人无法忍受的差事。到了街上，

我们意识到要想不被察觉出异常，只能走得非常非常慢，慢到都不需要弯曲膝盖。在电影院门口，一群人好奇地盯着我以龟速前进。我不禁寻思，他们会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也许是在战争中受了伤？不过最终，所有的步枪都被安全偷运回大楼。

第二天，突击卫队遍布全城，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大街上游荡。不用说，政府是在炫耀武力，来震慑那些他们自己也知道不会抵抗的平民。如果政府害怕会有新的暴动发生，那么这些突击卫队应该待在兵营里，而不是成群结队地分散在大街上。这是我在西班牙见到的最华丽的军队，尽管我知道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是“敌人”，但仍禁不住喜欢他们的军容。真的，看见这支部队来回巡逻时我异常惊讶。在阿拉贡前线，我已经看惯了那些制服破烂、没有良好军备的民兵，我不知道原来共和国还有这样的精锐之师。这些士兵不仅仅是身体素质出类拔萃，他们配备的武器才是最令我震惊的。他们所有人都配备了崭新的“苏式步枪”（这些步枪是从苏联运送到西班牙的，不过我相信是美国制造的）。我仔细查看过一支，这种步枪虽不完美，但比我们在前线用的那种糟糕的老式大口径短枪好得多。他们每10人配备一挺冲锋枪，每人还有一把自动手枪。而我们在前线时，50个人才会配备一挺机枪，至于手枪和左轮手枪，只能通过非法渠道购买。实际上，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哪儿都是一样的。那些从来不去前线的警卫队和警察，装备比我们精良，制服比我们华丽。我想所有战争都是如此，后方穿着时髦的警察和前线衣衫褴褛的士兵之间总是形成鲜明对比。一两天后，突击卫队和老百姓已能融洽相处。他们到达的第一天，一些队员挑衅的姿态引来了不少麻烦，我猜他们也是奉命行事。他们一行人登上电车，对乘客进行搜查，如果乘客的口袋里有劳工联盟党员证，这些证件就会立即被撕毁、踩踏。该举动导致了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冲突，造成了一两人身亡。不过很快突击卫队队员便放下了胜利者的姿态，和民众的关系也友好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是，一两天后他们中大部分人就勾搭上了小姑娘。

巴塞罗那的战斗给了巴伦西亚政府机会，给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加强对加泰罗尼亚的控制的借口。工人民兵团被拆散，整编进人民军。巴塞罗那的上空到处飘扬着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除了在法西斯分子的战壕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在工人聚居区，所有的街垒都被陆陆续续地拆除，相比于建造街垒，把石头都搬回原位则困难得多。加联社党大楼外的街垒被允许保留，其中很多直到6月才被拆除。警卫队依然占领着战略要地。他们从劳工联盟的据点里没收了大量武器，不过我相信仍有不少武器已被转移。《战斗报》还在印发，不过受到严格审

查，头版几乎都是空白。不过加联社党的党报并没有受到审查，仍在刊登一些煽动性的文章，呼吁取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伪装的法西斯组织。有一张漫画被加联社党成员到处派发，漫画上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摘下了画着镰刀锤子的假面具，露出一张带有纳粹十字记号、面目可憎而狂热的脸。很明显，关于巴塞罗那之战的官方说法已经定型：这是一次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以法西斯第五纵队身份策划发起的暴乱。

在旅馆里，可怕的相互猜忌与敌对的氛围随着战斗的结束愈演愈烈。面对各方的指责，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邮局恢复了运营，外国的共产主义报纸陆续送达，而这些报刊对战斗的描述不仅带有强烈的偏袒性，且与事实大相径庭。我想那些亲眼目睹了前后经过的共产主义者们一定也会对这些歪曲的报道而感到诧异，当然，他们还是得拥护自己党派的立场。我的共产党朋友再次联系上我，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国际纵队。

我很惊讶。“你们的报纸说我是法西斯分子，作为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转去的人，我一定会成为政治嫌疑犯。”

“哦，那不碍事。毕竟你也是按命令行事。”

我不得不告诉他，经过这次事件，我不会再加入任何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加入他们意味着迟早会被利用来对付西班牙工人阶级。没人知道这样的事情何时会发生，但如果在类似事件里我必须举起枪，那么我宁愿拿着枪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他对我的反应表现得非常宽容。然而从现在开始，气氛完全不同了。人们无法再像从前那样“求同存异”，与政敌举杯对饮。旅馆的休息室里不断爆发出阵阵令人生厌的争吵。与此同时，监狱里已经人满为患。冲突结束后，无政府主义者释放了他们手上的战俘，而国民警卫队的做法却截然相反，他们不经审讯就将大部分战俘投进监狱，很多人被连续关了数月。像以往一样，无辜的人由于警察的愚蠢而遭逮捕。我之前提到，道格拉斯·汤普森早在4月初即受伤，之后我们便与他失去了联系。这于伤员是很常见的，他们会被不断地从一个医院转移到另一个医院，不便联络。事实上，他曾住在塔拉戈纳的医院，并于冲突开始时被送回了巴塞罗那。周二早晨我在街上见到了他，他被满街的战火弄得不知所措。他问了我一个每个人都在问的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尽可能详细地向他做了解释。汤普森立即说道：

“我可不想被卷入其中。我的胳膊还没恢复，我应该回旅馆待着。”

他回到了自己所住的旅馆。不幸的是，该旅馆所在地处于国民警卫队控制范围内。这说明在巷战中了解当地环境是多么的重要。旅馆遭到了突袭，汤普森因此被捕，被塞进了监狱，在一间狭小拥挤无处可躺的牢房里待了8天。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不少有着可疑政治背景的外国人匆忙逃离，一边被警察追踪，一边担心被告发。情况对于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就更糟了，他们没有护照，很多人都被自己国家的秘密警察通缉。如果他们被捕，很可能会被驱逐到法国，那意味着将会被遣返回国。天知道等待他们的是多么可怕的结局。一两个外国女人正急着“嫁给”西班牙人，以获得合法身份。有一名没有任何身份证件的德国女孩，为了躲避警察，接连好几天不得不假扮成某人的情妇。我记得那次无意中看到她从那个男人的房间里走出来，一脸的羞愧与痛苦。显然她不是那人的情妇，但她肯定以为我是这么认为的。此时的朋友可能随时会向秘密警察告发你，想到这儿就令人不禁心生痛恨。我的神经一直紧绷着，为这漫长的噩梦般的战斗，为噪音、食物短缺及缺觉，为坐在屋顶上的紧张与无聊，还为不知道下一分钟我会不会被射中又或者被迫向他人开枪。我已经紧张到一有敲门声就立即抓起手枪的程度。周六早上，室外又响起了喧嚣的枪声，每个人都大叫：“又开始了！”我跑上街一看，只不过是几名突击卫队队员在射杀一条疯狗。在巴塞罗那，无论是当时还是几个月后，没有人能忘记那由恐惧、怀疑、仇恨、被审查的报纸、人满为患的监狱、购买食物的长队以及巡逻的武装士兵所造成的可怕氛围。

我试图描述身处巴塞罗那巷战中的感受，但无法成功表达出那个时期的奇怪感觉。日后回忆时，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彼时与我萍水相逢的人们，是偶然间瞥见的平民，对于他们来说，整个事件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暴动。我记得当枪声从一两条街外响起时，一名衣着时尚的妇人仍在兰布拉斯大街上漫步，一手挎着购物篮，一手牵着白色狮子狗。可以想见，她已双耳失聪。我还记得那个双手挥动着白手帕，从空无一人的加泰罗尼亚广场跑过的男人。还有一批身着黑衣的人，花了近一小时试图穿过加泰罗尼亚广场却始终没有成功，每次他们从角落里的小巷中探出身子，就会被科隆旅馆里加联社党的机枪手的扫射逼得后退。鉴于这群人都手无寸铁，我不知道那些加联社党成员为何要那么做。我一直觉得那群黑衣人是要赶去参加葬礼。我也记得那个波利欧拉玛电影院楼上的

博物馆看守人，他个子很矮，似乎把整个事件当成社交的机会。他很高兴有英国人来拜访他，他说英国人非常可爱，他很希望冲突结束后我们能再次去拜访他，我也确实去了。还有另一个小个子男人，躲在门口，对着加泰罗尼亚广场那该死的战火兴高采烈地摇晃着脑袋，说（看起来像在评论一个美好的早晨似的）：“7月19日又回来了！”我记得那些在鞋店帮我制作战靴的人。我在巷战前去过那儿，之后于5月5日停火期间又在那儿待了一会儿。这间鞋店东西很贵，店员或许是工人联盟的成员，也可能是加联社党的成员，不管怎样我们都是政敌，而他们也知道我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服役。即便如此，他们对整件事仍显得漠不关心。“发生这种事很遗憾，不是么？太影响生意了。真遗憾这战斗还没结束！好像类似的事情在前线发生的还少似的！”肯定有不少人，或许是巴塞罗那的大部分居民，对整个事件丝毫没有兴趣，或者说他们对此的感受并不比受到空袭更强烈。

在这一章里，我只是描述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下一章里我会尽力谈一谈更重要的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是什么？整个事件里的是非如何？如果有人要对此负责，那么又该是谁？巴塞罗那之战产生了很多政治资本，所以尽量提供一个客观的视角极有必要。关于这一话题的文章已经很多，足以凑成无数本书，而当我说这其中90%都是虚假的时候，我并不是在夸大事实。几乎所有的新闻稿都是那些远离战场的记者杜撰出来的，这些虚假新闻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根本就是记者刻意歪曲事实。一如往常，只有一个侧面被允许传递给大众。与所有彼时身处巴塞罗那的人一样，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临近街区里发生的事，但我的见闻已经足以揭穿那些广为流传的谎言。如果你对政治争论以及各党派那些繁杂的名称（就像中国战争故事里将军的头衔一样令人困惑）不感兴趣，大可以跳过。层层挖掘党派纷争的细节是件可怕的事，就好似跳进了一个污水坑。但只要有可能，就有必要去澄清真相。你会发现，这个遥远城市里肮脏的争斗比最初你所想象的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第十一章

关于巴塞罗那之战，由于没有必要的记录，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准确、公正的描述。除了大量的攻击性报道和党派宣传，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无从着手。我自己的信息也颇为有限，均为亲眼所见或从其他可靠的见证者处得到。尽管如此，我仍可以驳斥某些赤裸裸的谎言，帮助人们从某个角度了解该事件。

首先，究竟发生了什么？

早先，整个加泰罗尼亚的局势已然剑拔弩张。在本书之前的章节里，我已经讲述了一些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争斗。到了1937年5月，事态发展到白热化，暴动几乎无可避免。冲突的直接原因在于政府命令收缴所有私人武器，与此同时决定建立“非政治”的警察部队，这就将工会成员排斥在外。此举的意图路人皆知，下一步的举动也显而易见，即接管由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所控制的某些重要行业。此外，由于贫富差距增大，工人阶级也颇有怨言，他们隐约感到革命成果遭到了破坏。不少人对于5月1日竟然没有出现骚乱深感意外。5月3日，政府决定接管电话局。自战争伊始，该部门就被劳工联盟控制，但当局认为其管理混乱不堪，连官员们的电话也被录音。警长萨拉斯（他有可能超越了职权）派了3卡车武装国民警卫队占领了大楼，而便衣武警则封锁了楼外的大街。大约同一时间，国民警卫队占领了另几栋至关重要的建筑。无论真实意图何在，人们普遍相信这是国民警卫队和加联社党（由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成）对劳工联盟发动总攻的信号。各类传言迅速传遍全城，由工人控制的建筑被袭击，武装起来的无政府主义者走上街头，罢工、战斗一触即发，如此等等。当晚和次日清晨，城里到处都在修筑街垒，但战斗直到5月6日早晨才打响。不过，双方在这次战斗中均以防御为主。建筑物虽遭围攻，但据我所知没有一栋被攻陷，也没有一方使用火炮。大体而言，全国劳工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占据着工人聚集的郊区，武装警察和加联社党则控制了市中心地带和政府机构。5月6日，双方一度停火，但冲突很快再次爆发，其原因可能是国民警卫队试图尽早解除劳工联盟成员的武装。次日上午，人们开始自愿从街垒边撤离。总体而言，直到5月5日夜晚，劳工联盟仍处于优势，有大批国民警卫队员缴械投降。但劳工联

盟既没有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制，也缺乏明确的行动计划——事实上，明眼人都能看出，他们除了模糊不清的抵抗国民警卫队的决心之外根本没有任何计划可言。劳工联盟和工人联盟的领导人呼吁每个人回到工作岗位，而最致命的则是出现了食物短缺问题。在这种形势下，谁也没有是否能够继续战斗的把握。5月7日下午，局势基本恢复正常。当晚，6000名来自巴伦西亚的突击队员由海路抵达，控制了全城。政府颁布命令，除正规军外，解除所有人的武装，在之后的几天里，大批武器被收缴。据官方统计的伤亡数据，此次战斗中共有400人死亡，约1000人受伤。400人死亡的说法恐怕有些夸张，可是由于无法考证，我们不得不权且接受。

其次，这场战斗所造成的影响。很显然，我们不可能给出肯定的结论。尽管照理而言，雁过留声，但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冲突对整个战争进程有任何直接的影响，当然，倘若再持续几天，情形定然不同。冲突为巴伦西亚政府将加泰罗尼亚直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提供了借口，加速了民兵组织的分裂，并抑制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壮大，无疑同时也削弱了卡瓦列罗政府。但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事件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当时的情形下，走上街头的劳工联盟成员通过斗争究竟为自己争取到了什么，还是得不偿失。我个人认为，当然纯粹是猜测，他们得到的多于失去的。占领巴塞罗那电话局只不过是一长串过程中的一个事件而已。自上一年以来，工会已经逐渐失去了直接控制权，革命的总体趋势偏离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而转向中央集权统治，从而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说，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复活。事实上，就此而言，暴力抵抗有可能令此过程减缓。战争爆发一年后，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失去了很多权力，但他们的处境仍然比较有利。倘若他们一开始就能明确表示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挑衅都不会逆来顺受，事情或许会好得多。有时候，挺身反抗总比坐以待毙好。

最后，倘若此次冲突的背后有什么目的，那么目的是什么呢？是企图实施某种政变或革命吗？真的是旨在推翻政府吗？是有预谋的吗？

我个人的看法是，仅就该次战斗是在所有人的预料之中这个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事前策划的。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某一方有非常明确的计划。在无政府主义者方面，几乎可以肯定行动是自发的，因为参与者主要是普通民众。人们走上街头，而他们的领袖们则或勉强跟随，或根本没有参与。在此种革命气氛下，唯一敢于出声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隶属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的一个极端主义小团

体“杜鲁提之友”。但我要再次重申，他们仅仅是跟随着群众，而不是领导群众。“杜鲁提之友”的成员散发了一些革命传单，但这是在5月5日之后，不能说是已于两天前爆发的战斗的导火索。劳工联盟的官方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否认了整个事件与他们有关。个中原因有多种。首先，劳工联盟仍然在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其领导人必然相对于其成员更加保守。其次，劳工联盟领导人的主要目标是与工人联盟结盟，而战斗则势必加剧劳工联盟与工人联盟之间的分裂，至少在当时情况下是如此。第三，虽然当时大部分人不知道，但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担心，如果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某个限度，工人占领了全城，如同5月5日一度出现的情况，就有可能招来外国干预。英国的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已经逼近港口，不远处无疑还有其他军舰。英国报纸报道说这些船只驶往巴塞罗那“以保护英国的利益”，不过事实上，他们并没有采取行动，也就是说，他们既没有登陆也没有转移任何难民。我们虽无法肯定，但至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面对佛朗哥的进攻，未对西班牙政府施以任何援手的英国政府，此次会迅速介入冲突，帮助政府打压工人阶级。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对该事件并未袖手旁观，事实上，他们鼓励属下坚守街垒，甚至对“杜鲁提之友”散发的极端主义传单大加赞扬（见5月6日的《战斗报》）。关于传单存在很大的疑点，现在似乎没有人能拿得出一份样本。根据某些外国报纸的描述，这些“极具煽动性的海报”贴满全城。当时绝对没有这类海报。通过对照不同报道我可以得出结论，这些传单呼吁：（一）成立革命委员会；（二）枪毙袭击电话局的肇事者；（三）解除国民警卫队的武装。此外，还有一些事情不甚明确，比如《战斗报》在多大程度上赞同传单的内容。我既没有亲眼见到传单，也没有读那天的《战斗报》。在冲突期间我唯一看过的传单是一小帮托洛茨基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于5月4日散发的。主要是呼吁“每个人都要守卫街垒——除军工行业外，在其余一切行业发动总罢工”。换言之，只不过是在呼吁已经发生的事。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态度摇摆不定。他们向来不赞成在赢得反抗佛朗哥的战争胜利之前发起暴动；而另一方面，工人却已经走上街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笃信马克思主义教条，即一旦工人们走上街头，革命党就有责任与他们并肩战斗。因此，尽管打出了“重新唤醒七一九精神”之类的革命口号，他们仍尽力将工人的行动限制在防御层面。举例而言，他们从未命令进攻任何一栋建筑，只是下令保持警戒，正如我在上一章提到的，只要有可能就避免交火。《战斗报》也刊发了指令，命令部队不许离开前线[1]。如此看来，我应该说，倘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需要对此事件承担什么责任，那么责任仅在于他们呼

吁群众坚守街垒，或许还说服了相当一部分人坚守得更久。那些在当时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有过私下接触的人（我不在此列）告诉我，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其实对整个事件感到沮丧，但又觉得必须与工人们团结一致。当然，事后他们一如往常地捞取到了政治资本。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戈尔金在日后提及这次战斗时甚至将其描述成“5月的光辉之日”。从宣传的角度来看，这么做也许是对的。可以肯定的是，在遭镇压前的短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支持者在数量上有所上升。就战术而言，支持“杜鲁提之友”散发的传单可能是一个错误，他们是一个非常小的组织，且通常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采取敌对态度。考虑到民众的情绪以及双方的态度，传单除了强调“坚守街垒”之外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然而在无政府主义的报刊《工人团结报》否定它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却公开表示支持它，这就让共产主义报刊轻易抓住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把柄，事后称战斗是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单方面策划的暴乱。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共产主义报刊无论如何都会这么说。相比之下，之前和事后发生的事情更加无从对证。劳工联盟领导人的态度更为谨慎，自然也没有从中获得什么好处。他们虽因忠诚而受到称赞，然一旦时机成熟就被政府踢出了局。

到目前为止，从人们当时的言论可以判断，工人们并没有任何真正的革命意图。守卫街垒的只是劳工联盟的普通成员，也许还有若干个工人联盟的成员，他们的做法无论正确与否，其目的并不在于试图推翻政府，而是在遭到警察攻击时守卫自己的领地。他们的行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这些行动是否应该像几乎所有的外国报纸所描述的那样，被称为“起义”，对此我表示质疑。起义意味着要有积极的行动和明确的计划。更确切地说，这只是一次骚乱——一场充满血腥味的骚乱，双方有武器在手，且毫不迟疑地让它们派上了用场。

不过另一方的意图是什么呢？如果这不是一场无政府主义者的政变，那么有可能是一场共产主义者的政变——一个一举粉碎劳工联盟的计划吗？

我不这么认为，尽管某些事情可能会令人做此猜测。诚然，极其相似的事件（巴塞罗那方面授命武装警察占领电话局）两天后也在塔拉戈纳发生。而在巴塞罗那，电话局被袭击亦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大批国民警卫队员和加联社党成员占领了全城各处具有战略意义的建筑，占领行动倘若不是在战斗正式打响前即已完成，则那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不

过，必须记住的是，这些事情发生在西班牙，而不是在英国。巴塞罗那是一个具有悠久巷战历史的城市。在这样的地方，事态发展迅速，各派系早已有所准备，每个人都熟悉当地地形，一旦开火，所有人立刻各就各位，几乎就像一场军事演习。想必那些负责攻占电话局的人也预料到了可能出现的障碍——虽然规模与实际情况相左——并做好了应对准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计划对劳工联盟发动全面攻击。我不相信任何一方准备进行大规模战斗，原因有以下两个。

（1）任何一方事前都没有将军队召回巴塞罗那。战斗只发生在当时留在巴塞罗那的人之中，主要是平民和警察。

（2）几乎立刻就出现食物短缺问题。任何曾在西班牙待过的人都知道，西班牙人在战争中唯一擅长的事就是喂饱部队。任何一方如果打算进行为期一到两周的巷战和大罢工，却不提前存储食物，这是万万不可能的。

最后，关于该事件的是与非。

该事件在国外反法西斯新闻界掀起轩然大波，但一如往常，只有一面之词。其结果是巴塞罗那之战被描述成由背信弃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挑起的暴乱，是“在西班牙政府背后放冷箭”，等等。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毫无疑问，当你与大敌殊死交锋之际，最好不要发生内讧，但也别忘了，一个巴掌拍不响，除非是受到了挑衅，否则人们不会无故构筑街垒。

麻烦自然是源于政府命令无政府主义者交出武器。英国的报刊对此做了英国式的解读：阿拉贡前线急需军火，而由于毫无爱国心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拖延，军火迟迟不能送达。这样的解读忽视了西班牙的实际情况。众所周知，无政府主义者和加联社党都拥有武器，而当巴塞罗那之战爆发时，这一点就更加显而易见了。无政府主义者清楚地知道，即便自己交出武器，加联社党——这支加泰罗尼亚的主要政治力量，仍将保留他们的武器。事实上，这正是战后所发生的一幕。与此同时，大批前线急需的武器却被留给了后方“非政治”的警察部队。掩藏在这些表象之下的，是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这迟早导致某种形式的斗争。自战争爆发以来，西班牙共产党迅速壮大，并取得了大部分政治权力。此外，又有成千上万的外国共产党人进入西班牙，他们之中许多人公开表示，一旦赢得反佛朗哥战争的胜利，就将“清算”无政府主义。在此情况下，不能指望无政府主义者自愿交出在1936年夏天

得到的武器。

占领电话局只不过是引爆了一枚业已存在的炸弹。或许，那些该为此负责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它会引发麻烦。据说加泰罗尼亚地区长官康帕尼在数天前曾笑称无政府主义者会继续忍耐[2]。但这肯定不是明智之举。过去几个月中，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已在西班牙各地发生了一系列武装冲突。在加泰罗尼亚，尤其是巴塞罗那的局势紧张，已发生了街头斗殴、暗杀等事件。突然间，消息传遍全城，说武装人员袭击了由工人们在7月战斗中占领的建筑，而这些建筑寄托了工人们深厚的情感。我们必须记住，国民警卫队并不受工人阶级的欢迎。在过去几十年，卫队只不过是地主和资本家的附庸，而由于人们有理由怀疑其对反法西斯事业的忠诚，更加备受公众的憎恶[3]。在冲突最初的几个小时里促使人们走上街头的情感，与在战争初期促使他们抵抗反叛军的情感，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或许是相同的。当然，人们对劳工联盟成员是否应该毫不抵抗地交出电话局仍存有争议。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取决于其看待集权政府和工人阶级统治的态度。或许更理性的观点是：“的确，劳工联盟的举动很可能事出有因。但毕竟是在战争期间，他们没有理由搞内讧。”对此我完全同意。任何内部混乱都有可能反助佛朗哥。然而，究竟是什么促成了这场战斗？政府未必有权占领电话局，关键在于，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这种举动必然会导致冲突。这是一种挑衅行为，实际上无疑是对劳工联盟说：“你的权力到头了——现在我们接管。”不指望遇到反抗才不符合常理呢！如果人们能客观公正地看待问题，就一定会意识到错误不是——在这类事件中也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出现一面之词的原因仅仅在于西班牙的革命政党在外国新闻界没有根基。尤其在英国新闻界，在战争的任何一个阶段，想找到任何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正面报道都得花很长时间。无政府主义者一直遭到系统性的诋毁，据我个人的经验所知，几乎不可能找到替他们辩护的文章。

我试图客观地描述巴塞罗那之战，尽管很显然，没有人能在此类问题上完全保持客观。事实上，人们不得不做出选择，而我也必须在此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再次重申，我在此处以及其他相关内容的叙述上不可避免地会与真相有所出入。由于缺乏非政治宣传性资料，很难准确地描述西班牙内战。我的叙述必然存在偏见和错误，但我已经尽可能做到诚实。我的叙述与国外，特别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媒体的描述完全不同。查证共产主义媒体的说法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在世界各地出版，后续报道及时，且可能是最被广泛接受的版本。

共产主义和亲共产主义的媒体将整个巴塞罗那之战的责任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根据那些报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该事件不是自发的，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反政府暴乱，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单方面策划，并得到了少数被误导的“不受控制者”的协助。此外，该事件绝对是一个法西斯阴谋，是受到了法西斯分子的指使，在大后方发动的一场内战，旨在令政府陷入瘫痪。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佛朗哥的第五纵队”——一个与法西斯结盟的“托派”组织。据《工人日报》（5月11日）的报道：

那些德国和意大利代表打着筹备臭名昭著的“第四国际大会”的旗号涌进巴塞罗那，实则带着一项重大任务，即：

他们——与当地的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合作——策划混乱和流血事件，使德国和意大利可以借机宣布“由于巴塞罗那的混乱局面，无法有效行使对加泰罗尼亚海岸的海上控制”，因此，“不得不派遣军队进驻巴塞罗那”。

换言之，他们正在准备的是让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有一个可以向加泰罗尼亚海岸公开派兵的借口，两国政府可以宣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持秩序”……

为德国和意大利政府准备好这一切的组织，就是“托派”组织，即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臭名昭著的犯罪分子以及一些受迷惑的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策划、组织、领导袭击后方卫队，算准时机以配合法西斯在毕尔巴鄂的进攻，等等。

在文章的随后部分，巴塞罗那之战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攻击”，而当期的另一篇文章则声称“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要为加泰罗尼亚的流血事件承担全责”。《视点》（5月29日）称，那些在巴塞罗那设置街垒的人“全都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为了该目的组织起来的”。

我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不过似乎已经够清楚了。根据这些报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就是罪魁祸首，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执行法西斯的命令。稍后我将摘录更多来自于共产主义报刊的文章，你可以看出它们自相矛盾、毫无价值。但在此之前，我需要提出几个原因，

说明为什么关于五月战斗的这个版本，即其是由法西斯挑起、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策划的这种说法几近荒唐。

（1）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足够的人力或影响力挑起如此大规模的混乱，也缺乏号召总罢工的能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个在工会中没有基础的政治组织，他们在整个巴塞罗那制造罢工的能力并不比（比方说）英国共产党在格拉斯哥各地发动总罢工的能力强。正如我早前所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态度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战斗的蔓延，但即使他们希望，也无力发动整个事件。

（2）所谓法西斯阴谋的断言纯属臆想，所有的证据都与之相左。我们被告知，该计划是为了使德国和意大利政府能向加泰罗尼亚派兵，但事实上并没有德国或意大利的军舰接近海岸。至于“第四国际大会”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代表”也纯粹是天方夜谭。据我所知，这里甚至都没有人提起“第四国际大会”。倒是有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及其兄弟政党（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等）会议的模糊计划，暂定在7月的某一天——也就是两个月后——彼时还没有任何代表到达。所谓“德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只存在于《工人日报》的字里行间。任何在当时曾到过边境的人都知道，根本没那么容易“涌进”或离开西班牙。

（3）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主要根据地莱里达，还是在前线，一切风平浪静。很显然，如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想协助法西斯，他们就会命令民兵撤离阵地，让法西斯长驱直入。然而事实上既没有此类行动或意向，也没有任何人事先离开前线，虽说这很容易，比方说，以各种借口调一两千人回巴塞罗那，甚至连间接破坏前线的企图都没有。食品、弹药等物资的运输一如往常，我事后对此进行了查证。最重要的是，此类有计划的暴动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筹备，并要在民兵中进行策反宣传。但是，没有任何相关迹象或传闻。前线的民兵根本没有参与“暴乱”就是证据。倘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确在策划政变，却没有动用他们唯一的1万人左右的武装力量，那是不可思议的。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主义媒体认为巴塞罗那之战是法西斯授意下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暴乱”的论断毫无根据。我会继续补充一些共产主义报刊的摘要。他们对袭击电话局这个揭幕事件的报道很有启发性。这些文章互相矛盾，只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将责任推给另一方。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共产主义报刊首先将矛头指向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才对准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原因相当明显。不是每个英格兰

人都听说过“托洛茨基主义”，但每一个说英语的人都对“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名称胆战心惊。一旦让人们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与此有牵连，便恰到好处地为偏见营造了氛围，之后就可以安全地将矛头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于是，《工人日报》是这么开头的（5月6日）：

一小撮无政府主义者于周一和周二夺取了电话局大楼，他们试图据守这些建筑，并向大街上开火。

再没什么比一开头就颠倒黑白更阴险的了。国民警卫队攻击劳工联盟驻守的建筑，就这么被描述成了劳工联盟自己攻击自己。另一方面，5月11日的《工人日报》称：

左翼加泰罗尼亚公共安全部长阿瓜德和联合社会主义公共治安总长罗德里格·萨拉斯派遣共和国武装警察至电话局以解除大楼员工的武装，员工中大部分是劳工联盟成员。

这段报道似乎和第一段报道不太一致。不过《工人日报》没有承认早前的报道有误。5月11日的《工人日报》称，“杜鲁提之友”散发的不为劳工联盟所认可的传单出现在5月4日和5月5日，即战斗过程中。《视点》（5月22日）则称该传单出现在5月3日，即战斗爆发前，并补充说，“鉴于这些事实”（各种传单的出现）：

5月3日下午，由警察总监亲自率领的警方占据了电话局。警方在执行任务时遭枪击。这是挑衅者开始在全城发动暴乱的信号。

这儿是5月29日的《视点》：

公共治安总长萨拉斯同志于下午3点前往电话局大楼，该大楼在前一天晚上被50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和其他不可控分子占领。

看上去真奇怪。50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占领电话局，那情形可谓独特，可以想见当时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似乎过了三四个星期才被发现。在《视点》的另一篇文章中，50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变成了50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这几篇短短的报道所包含的矛盾简直无以复加。一会儿是劳工联盟袭击电话局，一会儿又变成他们在那儿受到攻击；传单出现在攻占电话局之前，且是该事件的诱因，或者，传单出现在攻占电话局之后，是该事件的结果；攻占电话局的人忽而是劳工联盟成员，忽而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如此

等等。在《工人日报》之后刊发的一篇文章里（6月3日），J.R.坎贝尔先生告诉我们，政府占领电话局仅仅是因为彼时街垒已然筑成！

鉴于篇幅有限，我只能以关于一个事件的报道为例，但类似的问题出现在共产主义阵营媒体的所有报道之中。此外，还有各种显然纯属捏造的声明。例如，这里有一段被《工人日报》（5月7日）所引用的，据说是由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发布的声明：

此次暴乱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巴塞罗那诸多房屋的阳台上挂出了旧保皇派的旗帜，毫无疑问，那些参加了暴动的人已经成了当前局势下的主子。

《工人日报》或许忠实地转载了这则声明，但西班牙大使馆负责该事件的人必然是存心撒谎。任何西班牙人都能对国内情况做出很好的解读。保皇党旗帜出现在巴塞罗那！这可是一件能让交战各派瞬时团结起来的事情。甚至当时在场的共产主义者读到这则报道时都哑然失笑。这与各种共产主义报纸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暴乱”中所使用的武器的假想报道如出一辙。只有对事实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弗兰克·皮特凯恩先生在5月17日的《工人日报》上声称：

暴乱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使用了各种武器。既有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们偷盗、藏匿的，也有在暴乱初期从军营里偷来的坦克。很显然，大量的机枪和几千支步枪仍掌握在他们手上。

《视点》（5月29日）也声称：

5月3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布置了几十挺机枪和数千支步枪……在西班牙广场，托洛茨基主义者动用了装备有75毫米火炮的炮兵部队，这些火炮肯定是为阿拉贡前线准备的，却被民兵私藏了。

皮特凯恩先生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何时、如何发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拥有几十挺机枪和数千支步枪的。据我估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控制的3栋主要建筑中大约总共有80支步枪和几枚炸弹，没有机枪，也就是说大约刚刚够武装起守卫大楼的警卫。当时，几乎所有党派都在自己的建筑中布设警卫。奇怪的是，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镇压，其建筑被占领之后，这数千支步枪就消失了，尤其是坦克和火炮，它们可没法儿藏在烟囱里。上文的两篇报道显示出作者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据皮特凯恩先生所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军营里”偷坦克。

他没有告诉我们是从哪个军营里偷的。巴塞罗那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由于党派直接招募民兵的行为被禁止，现在已所剩无几）与大批人民军一起驻扎在列宁营。皮特凯恩先生要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在人民军的纵容之下偷走了坦克。在藏匿75毫米火炮的“场所”问题上也是同样。文中没有提到这些“场所”在哪儿。那些炮兵在西班牙广场上开火的消息出现在很多新闻报道里，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压根儿就不存在。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在战斗中虽然距西班牙广场仅一公里之遥，却没有听到炮声。几天后，我查看了西班牙广场，找不到任何建筑物遭炮弹袭击的痕迹。一名在整个战斗中始终在附近的目击者称，从没有火炮出现。顺便说一下，关于被盗的火炮的传说，可能出自俄罗斯总领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之口。他通过某种方式将这个故事讲述给了一个著名的英国记者，而后者此后在一份周刊上将这个故事一字不落地复述了一遍。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因而被“清除”。我不知道该事件会对他的信誉有何影响。当然，事实是，之所以有这些关于坦克、火炮等的传说，仅仅是因为如果它们不存在，便难以解释为何巴塞罗那之战的规模如此之大，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数如此之少。宣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要为战斗承担全部责任很有必要；宣称它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没有追随者，援引《视点》的说法，“手下不过数千成员”，同样也很必要。要让这两个说法都显得可信，就只有假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拥有现代机械化部队的所有武器。

大凡读了共产主义阵营的新闻报道的人不可能没意识到，他们是在故意利用公众对事实的无知，其目的仅在于误导大众。例如，皮特凯恩先生在5月11日的《工人日报》中说“暴乱”被人民军平息了。这种说法是要给外界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整个加泰罗尼亚团结一心对抗“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是，在巴塞罗那的每个人都知道人民军在整个战斗中保持中立，很难相信皮特凯恩先生竟然不知道。再例如，共产主义媒体为了夸大冲突规模而在伤亡数字上做手脚，共产主义媒体广泛援引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迪亚斯的说法，称有900人死亡，2500人受伤。加泰罗尼亚宣传部长给出的数据则是死亡400人，受伤1000人。宣传部长在此问题上几乎不可能低估数据，而共产党给出的数据则翻了1倍，还加了好几百。

总体而言，外国资本主义阵营的报刊将战斗的责任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不过也有几家跟随共产主义报刊的论调。其中之一是英国《新闻记事报》。该报记者约翰·兰登·戴维斯先生当时在巴塞罗那，我在这里引用他的部分文章：

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叛

……这不是一次无政府主义者的起义，而是“托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通过其控制的组织“杜鲁提之友”和自由青年团[4]实施的一次失败的政变……悲剧始于周一下午，政府向电话局派驻武装警察，解除那里的工人武装，那些工人主要是劳工联盟成员。他们在工作中的严重违规一直是个丑闻。大批人群聚集在加泰罗尼亚广场外，劳工联盟的人进行抵抗，层层败退至楼顶……这起事件尚未明了，但有传言说是政府与无政府主义者反目。街上到处都是手持武器的人……天黑时，每个工人活动中心和政府大楼前都布设了街垒，10点钟，第一波进攻打响，第一批救护车开始呼啸街头。黎明时分，整个巴塞罗那已是枪声一片……这一天即将结束时，死亡人数已超过100人，人们可以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无政府主义的劳工联盟和社会主义的工人联盟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不是“走上街头”。他们守卫在街垒后，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向大街上任何持有武器的人开枪……“帕库斯”令情况雪上加霜——这些离群索居的人通常是法西斯分子，他们在屋顶漫无目标地随意射击，极力增加公众的恐慌……然而，到周三晚上，幕后主使开始明朗。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煽动性海报，呼吁人们立即进行革命，枪毙共和国和社会党的领导人。署名是“杜鲁提之友”。周四早上，无政府主义者否认与该组织有任何关系，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报刊《战斗》转载了该海报，并对其给予高度赞扬。巴塞罗那，西班牙第一大城市，被奸细利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个策反组织拖入血泊之中。

这段文章与我之前所引用的共产主义报刊的说法不尽相同，但即便如此，也是自相矛盾。首先，该事件被描述为一次“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叛”，可接下去的内容却表明该事件是由电话局被袭导致的，且公众普遍认为是政府与无政府主义者“反目”。城市里构筑了街垒，劳工联盟和工人联盟都参与了街垒守卫。两天之后，出现了煽动性海报（实际上是一张传单），文章暗示海报的出现引发了整个事件——影响了前述的起因。不过，这里有一处严重失实。兰登·戴维斯先生将“杜鲁提之友”和自由青年团描述成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控制下的组织”。这两个团体都是无政府主义组织，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任何联系。自由青年团是无政府主义青年团，其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关系相当于社会主义统一青年团之于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而“杜鲁提之友”则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下属的一个小型团体，且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向来不和。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人身兼两个组织成员身份。而文章中所述无异于将社会主义联盟[5]说成是英国自由党“控制下的组织”。兰登·

戴维斯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了吗？如果意识到了，在提及这个复杂问题时本该更谨慎些。

我不是在对兰登·戴维斯先生的诚信进行攻击，不过无可否认的是，战斗一结束他就离开了巴塞罗那，彼时他本可以开始认真调查。他的报告通篇都显示出，他在没有充分验证前就接受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反叛”的官方说法。单从我所引用的这一段就可一目了然。“天黑时”建成街垒，“10点钟，第一波进攻打响”。这些都并非出自目击者之口。由此你可以总结出，通常人们会等待敌方修筑好工事之后才发动进攻。文章给人的印象是，在布设街垒和发动第一次攻势之间相隔好几个小时。噢，当然，也可能恰恰相反。我和其他许多人在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就看到了第一波进攻。还有那些“离群索居的人通常是法西斯分子”，从屋顶上开枪，兰登·戴维斯先生并没有解释他是如何得知这些人都是法西斯分子的。想必他并没有爬上屋顶询问他们。他只是在重复道听途说的东西，而既然这些传闻与官方版本吻合，也就无可置疑。事实上，在他的文章开头不小心提到了宣传部长，这或许是他大部分消息的来源。在西班牙的外国记者在宣传部的控制下都快绝望了，尽管人们可能会认为单单这个部门的名称就是个有力的提示。当然，宣传部长大约有可能对巴塞罗那事件给予客观的评价，就好像（比方说）已故的卡森爵士会对1916年的都柏林起义给予客观评价一样[6]。

我已经给出了共产主义者关于巴塞罗那之战的说法不可信的理由。此外，我必须就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受佛朗哥和希特勒雇用的秘密法西斯组织的指控阐述一些看法。

这项指控被共产主义阵营的报刊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特别是从1937年初开始。这是由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正统共产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驱动的，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则被认定是“托派”在西班牙的代表。根据《红色前线》（巴伦西亚共产党报）的解释，“托洛茨基主义不是一个政治学说。托洛茨基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官方组织，是一个从事犯罪和破坏活动的反人民的法西斯恐怖帮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个与法西斯结盟的“托派”组织，是“佛朗哥的第五纵队”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很明显的是，找不出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一指控，该指控仅仅是貌似权威的断言。攻击者竭尽所能地实施人身诽谤，完全不顾其有可能给战争造成的影响。相比于诋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许多共产主义作家似乎认为泄露军事机密算不了什么。例如，在2月份的一期《工人日报》里，一名作家（温妮弗雷德·贝茨）被允许

披露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前线的实际兵力只有其声称的一半。这不符合事实，但想必作者相信这是事实。因此，她和《工人日报》绝对乐意通过报刊文章给敌人送去最重要的情报。拉尔夫·贝茨先生在《新共和》中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部队“在无人区和法西斯分子踢足球”。事实上，当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部队正遭受惨重的伤亡，其中就有我的一些朋友。此外，还有一幅广为流传的充满恶意的漫画，首先出现在马德里，后来传到巴塞罗那。漫画中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摘掉了画着锤子镰刀的面具，露出了带有法西斯十字标记的脸。假如政府不是实质上受共产党控制，就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在战时发生。这是对士气的蓄意打击，不仅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也影响了其他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并肩作战的人。被告知与你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部队居然是叛徒，这可不会鼓舞士气。事实上，我怀疑是否是来自后方的谩骂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意志消沉。但可以肯定是，肇事者一定算计好了，对他们而言，政治斗争比反法西斯同盟更重要。

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指责可以总结如下：作为一个拥有上万人的机构——其中几乎都是工人阶级，也有众多国外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大多是来自法西斯国家的难民，以及数千名民兵——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实际上是一个受法西斯雇用的庞大间谍组织。此事有悖常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历史也足以证明该说法不足为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所有的领导人都有革命背景。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了1934年的起义，大多数人曾因在莱罗斯政府或君主制时代参与社会主义活动而入狱。1936年，正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华金·莫林对佛朗哥即将发动反叛发出了警告。战争爆发后，他在敌后组织抵抗运动过程中被法西斯分子抓捕。当叛乱爆发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抵抗叛军的战斗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在马德里，该组织的许多成员死于巷战。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最先在加泰罗尼亚和马德里组织民兵的机构之一。似乎根本不可能将这一系列行动解释为受法西斯雇用的党派的行为。一个受法西斯雇用的党派完全可以直接投靠敌营。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战争中也没有任何亲法西斯的迹象。关于这一点存在争论——虽然说到底我不会同意——有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要求更加革命性的政策，分化了政府力量，从而帮助了法西斯。我认为任何改革型的政府都有理由将像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样的政党视为麻烦。但是这和公然背叛截然不同。如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真的是法西斯组织，就无法解释为何其民兵会保持忠诚。有8000

到10000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在1936至1937年春的恶劣条件下坚守在战略要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战壕里一待就是四五个月。很难想象他们为什么不干脆离开前线或投靠敌方。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而且在当时，其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然而他们却继续战斗。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遭政治打压后不久，风波未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彼时尚未被重新分配至人民军中——即参加了对韦斯卡以东地区的猛烈进攻，一两天之内有数千人阵亡。凭借与敌方的“深厚交情”，民兵中至少该不断出现逃兵吧；但是，正如我早前指出的，逃兵数量异常稀少。同样，也该有些亲法西斯的宣传和“失败主义”等论调吧，然而也没有任何此类迹象。显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必定混入了法西斯间谍和奸细，不过所有左翼政党中都有这样的人，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的奸细比其他党派更多。

的确，一些共产主义媒体很勉强地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受法西斯雇用，其部队和下属不在此列。但这只不过是在试图离间普通成员与其领导人而已。该指控实质上是在暗示，普通成员、民兵等全都脱不了干系，因为很明显，如果宁、戈尔金以及其他人真的是受法西斯雇用，与他们接触的下属很可能对此了解得比那些远在伦敦、巴黎和纽约的记者更清楚。况且，当共产主义控制的秘密警察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时，其做法是假定人皆有罪，逮捕了每一个他们能找到的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过接触的人，甚至包括伤员、护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的妻子，有时连孩子也不放过。

最终，在6月15日至16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镇压，并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这是奈格林政府自5月上台以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被关进监狱时，共产主义媒体的反应如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法西斯阴谋。全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报刊一时间都充斥着这样的东西（6月21日的《工人日报》总结了西班牙共产党各报刊的文章）：

西班牙托派分子与佛朗哥的阴谋

继巴塞罗那和其他地方的大批“托派”分子被逮捕……周末，战争期间发生的最阴险的间谍活动之一，迄今为止最丑陋的“托派”背叛事件的详情，终于大白天下……根据警方掌握的文件以及不少于200名被抓捕者的供词，罪证确凿，等等。

这些材料所“证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通过电台向佛

朗哥传送军事机密，与柏林方面有接触，在马德里与秘密法西斯组织合作。此外，还有诸如用隐形墨水书写秘密消息的耸人听闻的故事，一份署有字母N（代表着宁）的神秘文件，如此等等。

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这样：事发6个月后，即我写作此书时，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仍在狱中，但他们从未受到审判，而与佛朗哥通过电台联系等指控甚至从未有明确说辞。如果他们真的犯有间谍罪，就会像此前许多法西斯间谍一样，在一周内被审判、枪决。但除了刊发在共产主义报刊上的不足为信的声明之外，找不到一丁点儿证据。至于200份“供词”，如果确实存在，本已足够用于定罪，却再也没被提起。事实上，那不过是某些人的200个想象而已。

此外，西班牙政府的大部分成员都否认他们完全相信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指控。最近，内阁以5：2的比例赞成释放反法西斯政治犯，两张反对票均来自于共产党的部长。8月，一个由詹姆斯·马克斯顿议员率领的国际代表团前往西班牙调查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指控及安德列斯·宁的失踪。国防部长普列托、司法部长易卢霍、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总检察长奥尔特加·加西特、普拉特·加西亚以及其他人全都否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犯有间谍罪。易卢霍补充说，他已经查看了该案的卷宗，没有一条所谓的证据经得起推敲，至于那份据称是宁签署的文件更是“毫无价值”——也就是说，文件是伪造的。普列托认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要对巴塞罗那的5月战斗负责，但驳斥了关于他们是法西斯间谍的说法。“最严重的是，”他补充说，“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逮捕不是由政府决定的，警察擅自实施了逮捕行动。指挥行动的不是警方负责人，而是他们的下属，共产党人按照一贯做法已渗透到了这些人中。”他列举了其他一些警方非法实施的拘捕事件。易卢霍同样宣称警方已成为“准独立”机构，实际上处于外国共产主义势力的控制下。普列托向代表团明确暗示，政府不能在苏联人提供武器的同时得罪共产党。另一个由约翰·麦戈文议员率领的代表团于12月抵达西班牙，他们得到的答复和之前一样，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用更加明确的表述重复了普列托的暗示。“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苏联的援助，因此不得不默许共产党的某些行为，尽管我们不喜欢。”据悉，即便带着监狱总监和司法部长签署的命令，麦戈文和其他人员仍未获准进入共产党在巴塞罗那的“秘密监狱”。[7]这可以作为警方自行其是的例证。

我想应该已经足够清楚了。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实施间谍活动

的指控仅仅是基于共产主义媒体的报道和共产党控制的秘密警察的活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和他们成百上千的追随者仍身陷囹圄，在过去的6个月里，共产主义报刊始终嚷嚷着要处决“叛徒”。不过奈格林和其他人保持了冷静，拒绝上演一场对“托派分子”的大屠杀。考虑到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此举值得赞赏。同时，根据我以上所引述的情况，很难相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确实是法西斯间谍组织，除非有人认为马克斯顿、麦戈文、普列托、易卢霍、苏加萨戈伊蒂亚和其他人都被法西斯雇用。

最后，谈谈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指控。这个词现在越来越遭到滥用，其被使用的方式很具误导性，且往往是使用者的故意误导。我们有必要在此花点笔墨明确该词的定义。“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个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

（1）像托洛茨基那样，主张“世界革命”，反对“单一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的人。广义上指革命极端分子。

（2）由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实体组织的成员。

（3）特指冒充革命者在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法西斯分子，但通常情况下也泛指一切分裂和破坏左翼力量的人。

按照定义（1），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也许可以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英国独立工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法国左翼社会党等也都符合该描述。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托洛茨基或“托派”组织没有联系。战争爆发后，国外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来到西班牙（约15到20人），起先他们的确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工作，因为该党与他们的观点最为接近，不过他们并没有成为该党党员。之后，托洛茨基下令他的追随者攻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策，“托洛茨基主义者”于是被清除出党部，虽然其中一些人仍然留在民兵组织。继莫林被法西斯逮捕后，宁成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他曾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但几年前就离开了他，联合各共产主义反对派和较早前成立的工农联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宁与托洛茨基的一度合作被共产主义媒体用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真正的“托派”的证据。按照同样的论证逻辑，英国独立工党就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组织，因为约翰·斯特雷奇先生一度曾与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有过联系。

就定义（2），也就是这个词的唯一准确含义而言，马克思主义统

一工人党当然不是“托派”组织。这个区别相当重要，因为大多数共产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符合定义（2）的“托派”必然符合定义（3）——整个“托派”组织就是法西斯间谍工具。“托洛茨基主义”只是在苏联肃反时期才引起公众注意，将一个人称为“托派”分子实际上等于认为他是一个杀人犯、间谍等。但同时，任何站在左翼立场批评共产党政策的人都容易被指责为“托派”分子。那么，可以由此断言每个自称是革命激进主义者的人都受法西斯雇用吗？

在现实中，革命激进主义者也许是，也许不是法西斯间谍，这得视具体情况而定。当马克斯顿率代表团前往西班牙时，《真理报》《红色前线》以及其他西班牙共产主义报刊立即指责他是“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是盖世太保的间谍等。然而，英国的共产主义媒体却谨慎地未重复这一指控。在英国共产主义媒体的报道中，马克斯顿只是被含糊地称为“工人阶级的反动敌人”。当然，究其原因很简单，几个深刻的教训已经让英国共产主义媒体对反诽谤法心存畏惧。该指控在一个需要提供充分证据的国家里没有被提及，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指控纯属谎言。

看起来，我就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指控所做的讨论似乎超过了必要篇幅。相比于内战造成的巨大创伤，这种党派间难免带着不公与不实指控的相互攻击也许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相信，此类诽谤、打压，以及其背后的思维习惯，会对反法西斯事业造成最致命的伤害。

任何对这个问题稍加关注的人都知道，这种利用莫须有的罪名对付政治对手的策略由来已久。如今的罪名是“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以前则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自俄罗斯等国家审判“证明”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利昂·布卢姆和英国工党的杰出成员——酝酿军事入侵苏联的巨大阴谋至今才不过六七年。然而，今天的法国共产党却乐于接受布卢姆的领导，英国共产党人则想方设法加入工党。我怀疑这样的事情是否有好处，即便是从党派的角度来看。与此同时，对“托洛茨基－法西斯主义”的指责所导致的仇恨和纷争是毋庸置疑的。各地共产党人都被引入到一场毫无意义的追杀“托洛茨基分子”的政治迫害中，诸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样的党派被描述成反共产主义政党，陷入了危险境地。全世界工人运动分裂的苗头已然出现。再多几个对社会主义者的诽谤，再多几个类似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诬陷，裂隙将变得不可弥合。唯一的希望是将政治争论置于一个可以充分进行讨论的平台上。在共产党人和那些站在或声称站在左派立场的人之间的确存在差异。共

产党人认为，可以通过与部分资产阶级结盟（人民阵线）击败法西斯；他们的反对者则认为，这种行为只不过是给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新的温床。问题必须要解决，错误的决定可能会让我们陷入半奴役状态长达数个世纪。但倘若争论仅仅以叫嚷着对方是“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的方式进行，讨论也就无从开始。比方说，我觉得不太可能与一名共产党员辩论巴塞罗那之战的是与非，因为没有共产主义者——也就是说，没有“好”的共产主义者——会承认我如实讲述的真相。如果他尽职尽责地遵循其党派的“路线”，他就必须宣称我在说谎，或者，最客气的情况下，说我被无可救药地误导了，说任何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只要瞟一眼《工人日报》的头条，对巴塞罗那发生的事知道得都比我多。在这种情况下，连达成一致所需的最起码的前提都达不到，遑论争辩。说马克斯顿是受法西斯雇用的，其目的何在？目的就在于让严肃的讨论化为泡影。这恰如在象棋赛中一个棋手突然开始尖叫，说对手犯有纵火罪或重婚罪。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诽谤无济于事。

---

[1] 刊登在《视点》上的报道与之截然相反——《战斗报》命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军队从前线撤离！关于这个疑点，只要查看一下那天的《战斗报》便可水落石出。

[2] 来自《新政治家》（5月14日）报道。

[3] 战争爆发时，各地国民警卫队依附于实力较强的党派。在战争后期，有些地方的国民警卫队全体投靠了法西斯，例如桑坦德。

[4] 自由青年团，即伊比利亚自由青年团，成立于1932年，是一个自由社会主义组织。

[5] 社会主义联盟，成立于1885年，是英国早期的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组织。

[6] 卡森爵士，即爱德华·亨利·卡森，爱尔兰工会联盟和北爱尔兰联盟党领袖，反对爱尔兰地方自治。1916年都柏林起义，也称复活节起义，是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为争取爱尔兰独立发动的起义。

[7] 关于这支代表团的报道，参见《人民报》（9月7日）、《箭头》（9月18日）。关于马克斯顿代表团的报道刊登在《独立新闻》（巴黎吕圣丹尼斯大街219号）以及麦戈文的小册子《恐怖在西班牙》上。

第十二章

巴塞罗那之战结束后第3天，我们重返前线。经过此战——尤其是报刊的口水大战，我很难再用以前那种天真的理想主义态度去看待这场战争。我猜但凡在西班牙逗留过几周的人，没有哪一个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对西班牙感到失望。我回想起到达巴塞罗那的第一天遇见的那个报社记者，他对我说：“这场战争和其他任何战争一样，只是一场闹剧。”这句话深深地震撼了我，当时（12月）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即使是现在，到了5月，我也不完全相信这是真的，但它正在变得真实。事实是，任何一场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斗的持续，其理想主义的一面都会逐渐丧失，因为诸如个人自由和客观报道之类的事与军事效益格格不入。

人们现在可以开始猜测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不难看出，卡瓦列罗政府将要倒台，由受共产主义影响更深的偏右政府取而代之（一两个星期后果真如此），新政府将一举清除所有工会力量。之后，即便佛朗哥被打败——撇开重建西班牙带来的诸多严峻问题不谈——前景也不容乐观。报刊将此称为“为民主而战”，那纯粹是障眼法。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无法在一个如战后的西班牙这样存在巨大分歧且满目疮痍的国家里看到民主的希望，哪怕是英国或法国式的民主。它肯定会变成一个独裁国家，而且很明显，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专政的机会。这意味着总体趋势是朝某种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发展。这里所说的法西斯主义，毫无疑问应该使用某种更加含蓄的名称——因为这是在西班牙——与德国或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相比更人道、更温和。摆在西班牙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接受可怕的佛朗哥独裁统治，要么是以西班牙的四分五裂而告终（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

无论选择哪条路，前景都令人沮丧。但这并不表示共和国政府不值得我们为之而战，因为相比之下，佛朗哥－希特勒法西斯更加野蛮、极端。无论战后的政府犯下怎样的错误，佛朗哥政权都只会更糟。对于工人——城镇无产者——而言，最终谁是赢家没什么太大区别。但西班牙是个农业国家，农民无疑会从政府的胜利中受益，至少他们可以保有已经获得的那部分土地，此外还有可能分得之前被佛朗哥占领的土地，西班牙部分地区曾存在的农奴制度将一去不复返。政府在战后肯定会反教会、反封建，这将暂时抑制教会的权力，并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例

如修建道路、促进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也已朝这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至于佛朗哥，他不仅是意大利和德国的傀儡，还与封建大地主狼狈为奸，并维护教会和军阀集团的利益。人民阵线或许是场骗局，但佛朗哥却是时代的弃儿，只有百万富翁或幻想家才会希望他获胜。

此外，法西斯主义的国际声势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始终如噩梦般纠缠着我。自1930年以来，法西斯战无不胜，现在该对他们迎头痛击了，至于打击来自何方并不重要。如果我们能赶走佛朗哥及其外国雇佣军，即便西班牙自身将因此陷入令人窒息的独裁统治，即便西班牙的优秀人士将身陷囹圄，但或许会令世界局势大有改观。单单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去赢取战争。

这就是我当时的态度。可以说，现在我对奈格林政府的期待值比其刚上台时高得多。面对艰难的战斗，政府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勇气，并表现出比所有人预期的更大的政治肚量。但我仍然相信——除非西班牙分裂，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战后政府的发展倾向必然是法西斯主义。同样的，我抛出这个想法，希望时间能给我答案。

我们刚刚抵达前线就听说鲍勃·斯迈利于返回英国的途中在边境被捕，被送至巴伦西亚的监狱。斯迈利在前一年的10月就到了西班牙。他曾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机关工作了几个月，并于英国独立工党的其他成员抵达之后加入了民兵组织。照计划，他本打算在回英国参加巡回宣传之前在前线待上3个月。我们花了好一阵子才弄清他被逮捕的原因。他被单独囚禁，甚至连律师也见不到他。在西班牙——现实中——不存在人身保护法案，可以不经起诉就将某人关进监狱数月之久，更无需审判。最终，我们从一个被释放的犯人那儿打听到，斯迈利因“携带武器”被逮捕。所谓的“武器”，据我所知，就是两枚战争初期使用的最老式的手雷，他打算将其带回去与弹壳碎片及其他纪念品一起在演讲上展示。手雷的引信和保险丝已经被拆除了——只不过是个完全没有危险的小钢罐。很明显，这无非是个借口，真正原因在于他被查出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接触。巴塞罗那之战刚刚结束，当局此时非常紧张，不想让任何可能打破官方说法的人离开西班牙。因此人们有可能在边境因多少有些莫名其妙的借口被逮捕。他们很可能最初只是想扣留斯迈利几天。不过问题在于，这是在西班牙，无论是否经过了审判，一旦进了监狱就得一直待在那里。

我们仍被派往韦斯卡，不过向右侧推进了些，正对着几星期前我们

一度占领的法西斯据点。我现在作为中尉——估计相当于英国陆军少尉——指挥着大约30名英国人和西班牙人。他们将我的名字呈报上去，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接受任命。以前民兵军官拒绝接受任命，认为此举意味着获得额外的薪水，与民兵组织的平等观念相悖。不过现在他们不得不这么做。本杰明已经被任命为上尉，科普的少校委任令正在公示中。当然，政府虽不能将民兵军官免职，但没有批准过任何超过少校级别的军衔任命，大概是为了将较高的军衔保留给正规陆军军官和从军事学校毕业的新军官。结果，在我们29师以及其他许多师团，一时间出现了师长、旅长、营长都是少校的奇怪现象。

前线无战事。围绕哈卡公路的战斗已近尾声，在6月中旬之前不会重新开战。在我们的阵地上，最主要的麻烦来自狙击手。法西斯战壕远在150码之外，但他们所处的地势较高，且位于我们两侧，我们的阵地则呈突出的直角形。突出的拐角处是个危险的地方，向来是狙击手的袭击目标。法西斯时不时向我们发射枪榴弹或类似武器。这令人神经紧绷——你时时处于不安中，因为等你听到枪榴弹呼啸而来时已经来不及躲闪——不过也算不上太危险，枪榴弹在地面爆炸形成的弹坑还不及一个洗衣盆大。夜晚暖和宜人，白天则酷热难当，蚊子使我们不得安宁，尽管我们从巴塞罗那带来了干净衣服，这些衣服却几乎立刻变得污秽不堪。战壕外无人区荒芜的果园里，樱桃在枝头变红。下了两天的暴雨，防御工事里灌满了水，防护墙塌陷了一英尺。之后我们不得不多花了好几天时间清挖黏土，那该死的西班牙铲子没有手柄，像锡质汤勺般容易弯曲。

上司答应过要给我们配备迫击炮，我热切期待着。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巡逻——不过比以前更危险，因为法西斯的战壕修得更好，士兵也变得更警觉。他们在防线外散布了锡罐子，一听到罐子的响声就用机枪扫射。白天，我们在无人区进行狙击。爬行100码可以到达一条隐藏在茂密草丛中的沟壕，在那儿恰好可以俯瞰法西斯战壕的缺口。我们已经在沟里架了一支步枪架。如果你等待的时间够长，通常能看到一个身着卡其色制服的人匆匆穿过缺口。我开过几枪，不知道有没有打中过——打中的可能性不大，我的步枪枪法不好。不过挺有趣的，法西斯不知道子弹从哪儿来，我相信我迟早能打中一个。然而，事与愿违——我反倒被一个法西斯的狙击手击中了。事发时是我回到前线的第十天。被子弹击中的整个体验非常有趣，值得详细描述一番。

当时是早上5点，在战壕的拐角处。这个时间向来危险，因为曙光

从我们的背后射来，如果你把脑袋探出防护墙，就会清晰地暴露在天光映照之下。我正和准备换岗的哨兵交谈。话刚说了一半，突然间我觉得——很难形容当时的感受，虽然那感觉在我的记忆中刻骨铭心。

大致说来就是处于爆炸中心的感觉。似乎有一声巨响，一道刺目的光包裹着我，我感到了巨大的冲击力——身体没有痛苦，只是被猛烈地冲击，就像触到了电极，极度虚弱，整个人像是被击中、收缩、消失了，眼前的沙袋迅速远去，变得遥不可及。我猜这和被雷电击中的感觉差不多。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中弹了，但由于爆炸和闪光的假象，我以为是附近的某支步枪走火打中了我。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一秒钟之内。接下来我的膝盖一软，我倒下去，头猛地撞到地面，幸好并没有二次受伤。我感到麻木眩晕，意识到自己伤势严重，但并没有感受到通常意义上的疼痛。

之前正和我说着话的美国哨兵冲上前来。“天哪！你中弹了！”民兵们围拢过来。如往常那样一阵忙乱——“把他抬起来！打中哪儿啦？把他的衬衫扣子解开！”，等等。那个美国哨兵喊着要找把刀割开我的衬衫。我知道我口袋里就有一把，试着想把它掏出来，但我发现右臂动弹不得。没有痛苦，我甚至隐隐约约感到些满意。这回我妻子该高兴了，我想着。她一直希望我受伤，免得在大决战时丢了命。直到此时我才好奇自己被击中了哪儿，有多严重。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但能意识到子弹打中了身体正面的某个地方。我试图说话却说不出，只能发出微弱的吱吱声，我再次尝试，终于问出自己被击中的部位。他们说在喉咙上。担架员哈里·韦布拿来了用于战地包扎的一条绷带和一小瓶酒精。当他们把我抬起来时，大量鲜血从我口中喷涌出来，我听到身后的西班牙人说子弹打穿了我的脖子。我感觉到了酒精，平时这玩意儿会像烈火一样灼烧，此时泼到伤口上却带来令人愉悦的凉意。

有人抬来了担架，他们再次把我放下。我一得知子弹穿透了脖子，就认定自己没救了。我从未听说过有人或动物被子弹射穿脖子正中还能活下来的。血从我的嘴里不断涌出来。“动脉破了，”我想。我不知道颈动脉被切断后还能活多久，大概没几分钟。一切都非常模糊。大约有两分钟时间，我认定自己被打死了。这也很有趣——我的意思是，知道自己临死前的想法也挺有趣。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妻子，这想法很传统。接着我意识到自己不得不离开这个，不管怎么说，相当适合我的世界，于是强烈的怨恨感油然而生。我有时间去细细体味这一切。极度的坏运气激怒了我。毫无意义，就这么被干掉了，甚至都不是在战斗中，而是

在这个破破烂烂的战壕角落里，全怪我一时疏忽大意！我还想到了那个打中我的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样，是西班牙人还是外国人，他是否知道自己打中了我，等等。我丝毫不怨恨他。我琢磨着，他是个法西斯，因此如果有机会我也会杀了他，但如果此刻他被俘虏了，并被带到我面前，我只会称赞他枪法好。可能人之将死，想法会与平时大不一样吧。

他们刚把我抬上担架，麻木的右臂就恢复了知觉，开始钻心地痛起来。当时我以为肯定是自己倒下时弄折了。不过这疼痛倒令我宽慰了些，因为我知道濒死之人的感官不会变得更敏锐。我觉得自己好多了，开始对那四个抬着我的可怜家伙感到愧疚，他们汗流浃背，担架在肩上直打滑。从这儿到救护站有一英里半远，路程艰险，道路湿滑、崎岖不平。我一两天前曾协助运送过一名伤员，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儿。银叶杨的叶子垂进战壕，拂过我的面颊。活在这个长着银叶杨的世界里多好啊！但我的胳膊始终疼痛难忍，让我想要咒骂又不得不忍着，因为如果每次呼吸太用力，血就从口中冒出来。

医生重新为我包扎了伤口，给我打了一针吗啡，然后送我去谢塔莫。位于谢塔莫的医院是一个临时搭建的木屋，通常伤员只在这里停留几个小时就被送往巴瓦斯特罗或莱里达。吗啡让我的感觉迟钝下来，但我仍觉得无比痛苦，我几乎无法动弹，需要不时地把血咽回去。尽管我处于这种状态，没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仍试图强行把医院的饭菜——一大碗汤、鸡蛋及油腻腻的炖菜之类——塞进我的喉咙，似乎还对我吃不下而感到惊讶。这可真是典型的西班牙医院的护理方法。我想抽烟，不过那段时间烟草匮乏，医院里一根烟也找不到。此时，两位得到许可能离开前线几小时的同志出现在我床边。

“喂！你还活着呢。好。我们想要你的手表、左轮手枪和手电筒，还有刀，如果你有的话。”

他们拿走了我所有的随身装备。这种事时常发生——伤员的一切将立刻被瓜分。这么做有道理，因为手表、左轮手枪等在前线相当珍贵，如果随着伤员一起撤走，肯定会在途中被盗。

到了晚上，伤病员已足够凑满几辆救护车，于是他们把我们送往巴瓦斯特罗。这是怎样的一段旅途啊！我曾听说在这场战争中，假如你四肢受伤尚可复原，但倘若伤及腹部则必死无疑。现在我明白其中的原因了，没有哪个内出血的人能够挺过那数英里的颠簸。坚硬的路面被重型卡车碾压得支离破碎，且自战争伊始就从未得到修整。爆炸，碰撞，冲

击！让我回想起童年时在白城博览会上看到的那个可怕的叫做“摇摆怪物”的东西。他们忘了把我们固定在担架上。我的左臂有足够的力量抓稳，但有个倒霉蛋被甩在地上，天知道遭了多少罪。另一个坐在救护车角落里的轻伤员吐得满地都是。巴瓦斯特罗的医院拥挤不堪，几乎床挨着床。第二天早晨，他们把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抬上医院的列车，送往莱里达。

我在莱里达待了五六天。这是一个很大的医院，伤员和普通平民患者混杂在一起。我所在的病房里有些人伤势严重。邻床的黑发年轻人患有某种疾病，药物令他的尿液绿得像翡翠，他的集尿瓶简直是病房里的一道风景。一个会讲英语的荷兰共产党员听说医院里来了个英国人，便过来和我交朋友，还给我带来了英文报纸。他在10月份的战斗中身受重伤，便设法在莱里达医院安顿下来，和这里的一个护士结了婚。他的一条腿已经因伤萎缩，还不及我的胳膊粗。我在前线的第一个星期遇到过的两个民兵正在休假，前来看望受伤的朋友，他们认出了我。这两个孩子大约18岁。他们笨拙地站在我床边，努力寻思着说点儿什么，接着，为了表示对我的受伤感到遗憾，他们突然把口袋里所有的烟草都掏出来给我，并趁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们就逃之夭夭。典型的西班牙人！后来我发现，在这个城市根本买不到烟草，他们给我的是他们整整一个星期的配给。

几天后，我可以吊着打了绷带的胳膊下床四处走动了。不知什么原因，垂下胳膊的时候痛得更厉害。当时，我还承受着倒地受伤造成的巨大痛楚，此外我的嗓子几乎发不出声音，但并未感到来自枪伤本身的疼痛。似乎通常情况下都是这样。子弹的巨大冲击力破坏了被射伤部位的局部神经，而冲击力略弱的弹壳或炸弹碎片则如锯齿一般，被其伤到的地方可能会让人痛得要命。医院里有个宜人的花园，花园里有个小水池，养着金鱼和一些暗灰色的小鱼——我猜是银鲤鱼。我常常在那儿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只是看着它们。莱里达的行事方式让我得以了解到阿拉贡前线的医疗体系——前线其他地方的情况是否也这样，我就不得而知了。就某些方面而言，这儿的医院都很好。医生们技术过硬，药品和设备似乎也并不短缺。但这里存在两大缺陷，我毫不怀疑，成百上千个本该得到救治的人正是因此而白白死去。

问题之一是，靠近前线的所有医院基本上只作为伤员中转站。其结果是，如果伤员的伤势过重无法转移，在那里便得不到救治。从理论上讲，大多数伤员会被直接送往巴塞罗那或塔拉戈纳，但由于交通不便，

往往需要1周到10天才能到达。在此期间，他们得一直等候在谢塔莫、巴瓦斯特罗、蒙松、莱里达或其他地方，除了偶尔更换绷带外得不到任何治疗，有时甚至连绷带也没有。被炸伤的、骨头破碎的人裹着绷带、打着石膏，石膏表面用铅笔记录着伤情。按照规定，直到伤员10天后到达巴塞罗那或塔拉戈纳才能拆除石膏。在途中检查伤势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医生应付不了这么多工作，只能匆匆地从你床边走过，说一句："是的，是的，到了巴塞罗那他们会照顾你的。"而我们每天都听说，医院的火车明早会开往巴塞罗那。另一个问题在于缺乏得力的护士。显然，西班牙没有训练有素的护士，也许是因为在战前这项工作主要由修女承担。我并非在埋怨西班牙的护士，她们总是尽可能和善地对待我，不过她们的确无知。所有护士都只知道如何量体温，其中有一些也知道如何打绷带，但仅此而已。结果，那些病得无法照顾自己的人竟然往往被忽略了。护士们任由伤病员连续一周便秘，也很少帮助那些无力自己清洗的人。我记得有个断了一条胳膊的可怜家伙告诉我，他已经3个星期没有洗脸了。甚至连床铺也几天无人整理。各家医院的伙食都很好——太好了，真的。而且，相比于其他地方，在西班牙，人们似乎更喜欢给病人填塞油腻食物。莱里达的伙食当真叫人咋舌。早餐大约6点供应，包括汤、煎蛋、炖菜、面包、白葡萄酒和咖啡，而午餐更丰富——此时大部分平民还在忍饥挨饿。西班牙人似乎没有清淡饮食的概念。他们给病人和健康者提供同样的食物——永远那么丰盛、油腻，每一样食物都被橄榄油浸透了。

一天早上，有人宣布我们病房的人员将于当天被送往巴塞罗那。我设法给妻子发了份电报，告诉她我要回来了，目前他们正把我们往车上装，准备带我们去火车站。直到临开车，陪同我们的医院勤务员才无意中说出，我们根本不去巴塞罗那，而是去塔拉戈纳。我猜是火车司机改了主意。"典型的西班牙人做法！"我想。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也同样具有西班牙特色，他们同意等我另发一份电报后再开车，还有更具西班牙特色的，就是那份电报永远都没送到。

我们被安置在普通三等车厢的木椅上。许多人伤势严重，那天早上是他们受伤后第一次下床。没多久，由于炎热和颠簸，半数人都处于虚脱状态，有几个人吐得满地都是。医院勤务员在横七竖八如尸体般躺着的伤员间摸索着穿行，背着一只装满水的大山羊皮水囊，不时朝这张或那张嘴里倒一些。那水真难喝，我到现在还记得那股子味儿。我们在夕阳西下时到达塔拉戈纳。铁轨沿着海岸线伸展，与海边约一箭之遥。当我们的火车徐徐驶进车站时，一列载满国际纵队队员的军用火车正从站

里开出，一群人站在桥上冲他们挥手。这列车很长，车厢里塞满了人，运送野战炮的敞篷车皮里还有更多的人围炮而坐。我对这列在昏黄的暮色中驶过的火车记忆犹新，一扇接一扇的窗户后面露出微笑的黝黑脸庞，长长的倾斜的枪杆，鲜红的领巾飘扬——这一切在绿宝石色海面的映衬下缓缓滑过我们眼前。

“Estranjeros[1]”有人说，“他们是意大利人。”他们显然是意大利人。没有其他哪个国家的人能够让自己的队伍显得如此有精神，或是以如此优雅的方式向人群回礼，尽管火车上大约半数人都在抱着酒瓶一饮而尽。后来我们听说，正是这支部队在3月份赢得了伟大的瓜达拉哈拉之战的胜利，现在他们休整完毕，正转往阿拉贡前线。他们中大多数人恐怕都在几周后死于韦斯卡。两车交错时，我们列车里凡是能站得起来的人都走到窗边向这些意大利人欢呼。人们把拐杖伸出窗外挥舞着，缠着绷带的手臂行着革命的敬礼。这犹如一幅战争漫画：一车生力军逆风起飞傲然挺进，残兵败将黯然撤退，敞篷车皮上的火炮一如既往地令人心潮激荡，它唤起了人们那种对危险的感觉，那种让人难以挣脱的感觉，毕竟，战争是光荣的。

塔拉戈纳的这家医院很大，住满了来自各条战线的伤员。在这儿什么样的创伤没有啊！他们有一种治疗特殊创伤的方法，我猜是最新的医疗手段，但治疗场面极其惨不忍睹。该方法就是让伤口完全敞开，只在支架外盖上一层纱布防止苍蝇叮。透过薄薄的纱布，能看见红色凝胶状的半愈合的伤口。有个人的脸部和咽喉受了伤，他的整个脑袋都被放进一种球形的纱布头盔里，嘴被封了起来，只通过一个固定在嘴唇间的小管子呼吸。可怜的家伙，他显得如此孤独，来来回回地踱步，透过薄纱笼望着你却说不出话来。我在塔拉戈纳住了三四天，体力在渐渐恢复。有一天，我设法慢慢走到海滩。见到海滨生活依旧，这种感觉真奇怪，精致的咖啡馆沿着海滨栈道分布，大腹便便的当地资产阶级们泡着海水浴，或躺在躺椅上晒太阳，好像千里之内没有战争似的。然而，我看见一个泡海水浴的人淹死了，在这片平和宁静的海滩发生这样的事或许令人难以想象吧。

终于，在离开前线八九天后，我的伤口得到了诊查。新到的伤员在手术室接受检查，医生们用大剪刀拆除了前线救护站为肋骨或锁骨破碎的伤员固定的石膏胸板，笨重胸板的脖颈口外，是一张焦急、肮脏、因一周未刮胡须而胡子拉碴的脸。替我诊查的医生是个活跃、英俊的男子，大约30岁。他让我坐在椅子上，用一块粗糙的纱布抓住我的舌头使

劲儿往外拉，又把一只牙医用的镜子伸进我的喉咙，让我说“啊！”一直折腾到我的舌头流血，眼泪不住地往外冒，他才告诉我，我的一条声带断了。

“我的嗓音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我问。

“你的嗓音？哦，永远也恢复不了了。”他乐呵呵地说。

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大约有两个月时间，我只能发出细微的耳语，但之后，我的声音突然恢复正常，剩余的声带“补偿”回来了。我的胳膊疼痛是由于子弹撕裂了脖子后面的一丛神经。这是一种放射性的神经痛，持续了约一个月，晚间尤其疼得厉害，几乎让我无法入睡。右手的手指也处于半瘫痪状态。即便是现在，5个月后，我的食指仍感到麻木——由脖颈创伤造成的奇怪后遗症。

由于我的伤口有些不寻常，引得若干医生都来查看，都啧啧感叹：“万幸！万幸！”其中一人用权威的口气告诉我，子弹离动脉只有“大约1毫米”。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判断出的。当时我遇见的所有人——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病友——无不认为颈部被子弹穿透还能活下来的人是最幸运的。可我不禁寻思，没被击中才更幸运呀。

---

[1] Estranjeros，西班牙语，意为外国人。

第十三章

我在巴塞罗那度过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空气中弥漫着某种奇特而邪恶的气氛——猜疑、恐惧、无常，以及隐隐的仇恨。五月之战给巴塞罗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随着卡瓦罗列政府的倒台，共产党人掌握了实权，内政管理大权已落在共产党人手中，人们都相信，只要有一丁点儿机会他们就会痛击政敌。目前还没有一丝风吹草动，我自己也猜测不出将要发生什么。然而对危险的预感始终挥之不去，我下意识里感到有某种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哪怕并未参与其中，那气氛也逼得你觉得自己就是同谋。似乎你时时刻刻都在咖啡馆的角落里与人低声耳语，猜疑邻桌的人是否是密探。

由于新闻审查制度严格，各种可怕的谣言满天飞。其中之一是奈格林·普列托政府打算调解这场战争。当时我倾向于相信这一点，因为法西斯正逼近毕尔巴鄂，而政府显然打算对此袖手旁观。巴斯克的旗帜出现在全城各处，姑娘们在咖啡馆里募捐，广播里照常播报着“英勇的捍卫者”，然而巴斯克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帮助。这不免会令人认为政府在玩两面派的游戏。之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我大错特错了，但倘若当初得到稍许支持，毕尔巴鄂亦不致沦陷。如果在阿拉贡前线发动一场进攻，即便不成功，也将迫使佛朗哥分散部分兵力。然而政府发动攻势时为时已晚——直到毕尔巴鄂陷落他们才有所行动。劳工联盟散发了大量传单，上面写着“你们要小心！”，并暗示“某政党”（指的是共产党）正在策划一场政变。另一种普遍的担心就是加泰罗尼亚将遭到入侵。早先我们回前线时，看见战线后方正在修建数十英里长的防御工事，巴塞罗那到处都在挖新的防空洞。空袭和海袭警报频频被拉响，大多数时候是一场虚惊，但每次警笛响起，全城就陷入一片漆黑，长达数小时，胆小的人只好躲进地窖里。警方的密探无处不在。监狱里仍挤满了在五月之战中抓捕的囚犯——当然，还有别的犯人。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支持者三三两两地被秘密送进监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受到审判或指控——甚至没有受到任何与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有关的指控，只是被长期囚禁，且通常是单独监禁。鲍勃·斯迈利仍被关押在巴伦西亚的监狱里。我们得不到任何消息，只知道无论是当地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还是聘请的律师，都不允许见他。越来越多来自国际纵队的外国人和其他民兵被关进了监狱。他们通常是以逃兵的罪名被逮捕。往往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民兵究竟是志愿者还是正规兵。几个月前，但凡在民兵组织登记的人都被告知是作为志愿者入伍，只要想离开，随时可以得到退伍批准。可现在，政府似乎改变了主意，民兵变成了正规士兵，假如试图回家就会被认作临阵脱逃。但即便是这个规定，似乎也没人拿得准。在前线某些地方，当局仍批准退伍。而在边境，则有时认可退伍批准，有时不认可。倘若未被认可，你就会被立刻关进监狱。后来，监狱中的外国“逃兵”数量增至数百名，但当此事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掀起轩然大波时，其中大部分人已被遣返回国。

街头随处可见成队的武装突击队员在巡逻，国民警卫队仍据守着有战略价值的咖啡馆和其他建筑，加联社党的许多建筑前仍设着沙袋和街垒。警方在全城各处布设了岗哨，并拦下路人检查他们的证件。每个人都警告我切勿出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证，只出示护照和医院证明即可。被发现曾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服役是有危险的。受伤或休假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会受到苛刻的处罚——比如，让他们难以领到军饷。《战斗报》仍在发行，但差点儿被查封，《团结报》和其他无政府主义报刊也被严格审查。新规定要求报刊被查禁的栏目不能空白，必须用其他内容填补。结果，人们常常无从判断究竟什么内容遭到了查禁。

在整个战争期间不时发生的粮食短缺问题目前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面包稀缺，廉价面包里掺杂了大米，军营里分配给士兵们的面包则如油泥一般恶心。牛奶和糖是紧俏品，除了昂贵的走私香烟外几乎找不到烟草。在西班牙人生活中用途广泛的橄榄油也严重匮乏。排队买橄榄油的妇女们由国民警卫队骑兵维持秩序，他们有时故意让马走进队列踩踏妇女们的脚趾，以此取乐。当时的另一个小麻烦是小面额货币不足。银币都已被收缴了，而新货币尚未发行，于是也就没有10生丁[1]以上、2.5比塞塔以下面额的货币，10比塞塔以下的货币也难得一见。对于穷人来说，这无疑令粮食短缺问题雪上加霜。如果一名妇女仅有一张10比塞塔面额的钞票，那么她可能会在杂货店门外排上几个小时的队却空手而归，因为杂货商没有零钱，而她又不能花掉整张钞票。

想要描述当时噩梦般的气氛并非易事——不断变化的各种传闻、严格的新闻审查，以及随处可见的武装人员，无不令人惴惴不安。这种气氛之所以难以描述，是因为英国并不曾有过这种气氛。在英国，对政治异见的不宽容尚未公开化，政治迫害采用的是一种较为隐讳的方式。假如我是个煤矿工，我不会在意被老板知道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但“好

党员”——大陆式政治活动的模仿者仍然罕见，仅仅因为某个人与你意见相左就对其实施“清算”或“消灭”，这样的事还不那么常见。然而在巴塞罗那，这种情况就似乎再正常不过了。“斯大林主义者”正当权，因此每个“托派分子”自然在劫难逃。不过，所有人都担心的事毕竟还没发生——一旦新巷战爆发，人们会像以前一样，将过错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头上。有好几次，我发觉自己的耳朵竟然在等着捕捉第一声枪响。有一些惊人的消息在全城流传。大家都能感受到异样的气氛，并且议论纷纷。奇怪的是，所有人的表述似乎都一模一样：“这地方的气氛太恐怖了，就像在疯人院里。”但我或许不该说每个人。有些英国游客在西班牙匆匆而过，从一家酒店到另一家酒店，他们似乎并没有察觉到气氛有什么不对劲儿。我读到了阿索尔公爵夫人的记述（《星期日快报》，1937年10月17日）：

我造访了巴伦西亚、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三座城市秩序井然，全然不见任何武力。我下榻的酒店不仅“正常”“体面”，而且非常舒适，尽管缺少黄油和咖啡。

这真是一群独特的英国旅客，他们不相信除了奢华酒店之外还存在其他事物。我希望阿索尔公爵夫人能找到黄油。

我住在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管理的莫林疗养院。这家疗养院位于蒂维达沃山附近，奇形怪状的山峦高耸在巴塞罗那城后，传说此山正是撒旦将地球展示给耶稣的地方（山名由此而来）。这所房子以前属于富有的资产阶级分子，革命时被收缴。住在这里的大多数人是因伤病从前线撤下来的，他们有的落下了永久残疾——被截肢等。其中还有几个英国人：威廉斯，一条腿受了伤；斯塔福德·科特曼，一名18岁的男孩，因疑似肺结核被从前线送来；阿瑟·克林顿，他的左胳膊粉碎性骨折，这只胳膊被绑在西班牙医院使用的那种硕大的绰号叫飞机的架子里。我妻子仍住在大陆旅店，因此我白天一般回巴塞罗那。早上我通常去总医院给胳膊做电疗。这是种古怪的疗法——一股电流刺激各组肌肉上下抽动——但似乎有些效果，我的手指功能恢复了，疼痛也减轻了些。我和妻子都认为最好尽快回英国。我当时极度虚弱，说不出话，似乎永远也无法说话了，医生告诉我，最乐观的情况下也要再过几个月才能重返战场。我迟早得去赚钱，留在西班牙占用其他人急需的食物似乎不太道德。不过更主要的是出于私心。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摆脱这一切，远离可怕的政治猜疑和仇恨气氛，远离满是武装警察的大街，远离空袭、战壕、机枪、呼啸的电车、没加奶的茶、油腻腻的食物，以及香

烟短缺——远离我所知的一切与西班牙有关的东西。

总医院的医生已经给我出具了不适宜继续参战的医学证明，但想要得到退伍批准，我还得亲自去前线附近的一所医院面见医学委员会，然后去谢塔莫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司令部盖章。科普满心欢喜地从前线回来了。他刚刚参加了战斗，说终于快要攻下韦斯卡了。政府从马德里前线调来了军队，集结了3万人以及大批飞机。我之前见到的那些从塔拉戈纳奔赴前线的意大利人已经对哈卡公路发动了进攻，不过伤亡惨重，还损失了两辆坦克。无论如何，科普说此战势在必得。唉！事实并非如此。这次攻击情况混乱不堪，唯一的结果是引来媒体的一片虚假的鼓吹。与此同时，科普不得不去巴伦西亚参加军事部的面试。他带着东线指挥官波萨斯将军的信——一封普通的推荐信，说科普为人“充满自信”，推荐他到工程部担任某个特殊职位（科普战前是名工程师）。我们同一天出发——6月15日，他去巴伦西亚，我去谢塔莫。

这是我回巴塞罗那的前5天。我们一车人于午夜时分到达谢塔莫，刚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司令部，连姓名都没核对，他们就让我们列队，开始分发步枪和弹药。看起来似乎进攻开始了，随时需要后备人员。我口袋里虽揣着医院证明，却无法拒绝与其他人同往。我抱着弹药盒当枕头躺在地上，心情沮丧。受伤使我此时的神经变得脆弱——我相信通常都是如此——想到要再次身处战火之中，我不寒而栗。然而，一如往常，总还有明天，毕竟我们还没有接到立刻出发的命令。次日清晨，我出示了医院证明，开始寻求退役的机会。这意味着我将办理一系列混乱而又麻烦的手续。像往常一样，他们让我来来回回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谢塔莫、巴瓦斯特罗、蒙松，接着回到谢塔莫盖退役章，然后再次经过巴瓦斯特罗和莱里达返回——在韦斯卡集结的部队完全阻断了交通，一切都变得杂乱无章。我记得自己不得不在某些奇怪的地方过夜，一次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一次在沟里，一次在一条窄凳上（结果半夜摔了下来），还有一次在巴瓦斯特罗的某个市政寄宿点。一旦离开了铁路就无法继续前行，除非能搭上偶尔经过的货车。你不得不在路边等上几个小时，有时一连三四个小时，与一帮挑着鸭子、兔子的闷闷不乐的农民一起，冲着一辆又一辆货车徒然地挥手。之后，总算拦下一辆没有塞满了人、面包或弹药盒的卡车，但一路的颠簸几乎要将你摔成烂泥，连烈马都从未将我如此高高抛起。唯一的办法是大伙儿彼此紧挨在一起。惭愧的是，我发觉自己仍然太虚弱，没有别人的帮助连卡车都爬不上。

我在蒙松的医院待了一晚，接受医学委员会的检查。邻铺是名突击队员，左眼受了伤。他很友好，还给了我香烟。我说：“要是在巴塞罗那，我们本会互相开枪的。”我们都笑了。真奇怪，只要一靠近前线，平日里的态度似乎都变了，几乎所有的党派仇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前线期间，从未遇到哪个加联社党成员因为我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而表现出敌意。那一类事情只会出现在巴塞罗那或远离战场的地方。谢塔莫有很多突击队员，他们是从巴塞罗那被派往韦斯卡参战的。突击队不是前线的作战主力，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前从未经历过战争。在巴塞罗那，他们可以在大街上称王称霸，但在这里他们是新手，还赶不上在前线待过几个月的15岁的民兵娃。

蒙松医院的医生照例为我做了拉舌头、照镜子的检查，也同样乐呵呵地向我保证我的声音再也无法复原，并在我的证明材料上签了字。在我等候检查时，手术室里正在进行可怕的无麻醉手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打麻药。一声接一声的惨叫，没完没了，当我进去的时候，诊室里的椅子歪倒在地，地上有一摊摊的血和尿。

最后那段旅途的细节在我的脑海中异常清晰。我的心情与过去几个月截然不同，更多了些观察的兴致。我已经得到了退役证，上面盖了第29师的印章，外加医生宣布我“无用”的证明。我随时可以回英国，于是几乎是头一回，我觉得可以仔细看看西班牙。由于每天只有一班火车到英国，我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逗留在巴瓦斯特罗。在此之前，我曾经对这里有过匆匆一瞥，当时它在我眼中只是战争的一部分——一个灰蒙蒙、泥泞而寒冷的地方，到处是呼啸而过的货车和衣衫褴褛的士兵。而现在一切都变了。漫步于城中，我留意到了曲折的街巷，古老的石桥，酒店里一人多高的酒桶。奇妙的半地下店铺里，男人们正在制作车轮、匕首、木勺子和山羊皮水壶。我好奇地看着一个人制作皮水壶，以前我从未发现，他们制作时并不把毛去掉，而是把毛面做里子，因此使用皮水壶喝水事实上是在喝山羊毛过滤水。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喝了好几个月这样的水了。城镇后面有一条浅绿色的河流，一面陡峭的石壁从河边拔地而起，两侧的岩石上筑了屋子，住在那里的人可以直接从卧室窗口朝脚下100英尺深的河里吐口水。无数的鸽子栖息在崖壁的孔洞中。在莱里达有一些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屋檐下有成千上万只燕子筑巢，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那些疙疙瘩瘩的鸟巢就像洛可可时期的雕花。真奇怪，我在这里将近6个月了，却对这些景象熟视无睹。口袋里揣着退役证明，我再次感觉自己既像个西班牙本地人，也有点儿像个游客。几乎是头一次，我觉得自己真的身处西班牙，那个我一直向往的国

家。在莱里达和巴瓦斯特罗僻静的街道里，我似乎捕捉到了一抹稍瞬即逝的景象，一种存在于人们幻想中的关于西班牙的古老传说中的景象。白色的山脉、牧羊人、宗教裁判所、摩尔人的宫殿、黑色的骡队、灰色的橄榄树、柠檬树林、披着黑色头纱的女孩、马拉加和阿利坎特葡萄酒、教堂、红衣主教、斗牛、吉普赛人、小夜曲——总之，这就是西班牙。在整个欧洲，只有这个国家让我如此的向往。很可惜，当我终于来到这儿，却只看到了严冬里混战中的东北一隅。

回到巴塞罗那时已经很晚了，找不到出租车。虽然莫林疗养院就在城外，但我没法回去，于是我前往大陆旅店，途中吃了晚饭。我记得与一位慈父般的服务员谈论他们店里盛葡萄酒用的铜箍橡木酒壶。我说我想买一套带回英国。服务员一脸惋惜。“是啊，它很漂亮，是不是？可惜现在买不到了。没人做了——没人造任何东西了。这场战争——太可惜了！”我们一致认为战争是一大遗憾。我又一次感觉自己就像个游客。服务员客气地问我是否喜欢西班牙，是否会再来西班牙？哦，是的，我应该会重返西班牙。由于紧接着发生的事情，这场谈话的平和气氛在我记忆中变得愈发难以磨灭。

我到旅店时，妻子正坐在休息室。她站起身来，带着一种令我震惊的怪异的神情向我走来。接着，她用一只胳膊环住我的脖子，露出甜蜜微笑。她在我耳边低声说：

“出去！”

“什么？”

“马上离开这里！”

“什么？”

“别站在这儿！你必须赶快出去！”

“什么？为什么？什么意思？”

她挽着我的手臂朝楼梯走去。中途我们遇到了一个法国人——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虽然他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在我们身处困境时始终伸出援手。他满脸关切地看着我。

“听着！你不能来这里。快出去，在他们报警之前藏起来。”

这还没完！在楼梯口，一名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酒店工作人员（我猜他的身份尚未被管理层发觉）偷偷溜出电梯，用蹩脚的英语让我快离开。直到此时我还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踏上人行道我就问。

“你还没有听说吗？”

“没有。听说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说。”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镇压了。警方已经占领了所有建筑。几乎所有人都被关进了监狱。据说警方已经开始杀人了。”

原来如此。我们必须找个地方说话。兰布拉斯大街上所有大点儿的咖啡馆都挤满了警察，不过我们在一条小街上找到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我妻子向我解释了在我离开期间发生的事。

6月15日，警方突然在安德烈斯·宁的办公室逮捕了他，并于当晚袭击了猎鹰旅店，逮捕了所有人，其中大多数是休假的民兵。旅店立刻变成了监狱，短短的时间内就关满了各类囚犯。第二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其各办事处、书报亭、疗养院等均被查封。同时，警方逮捕了他们能找到的每个曾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过联系的人。一两天之内，执行委员会的40名委员几乎悉数被捕。可能有一两个逃走了，但警方采取的手段是，如果某人失踪了，就扣押他的妻子作为人质（该伎俩在这场战争中被广泛使用）。有多少人被捕无从得知。我妻子听说单单在巴塞罗那就有约400人，我始终认为应该远不止这个数。最优秀的人都已遭逮捕。有时候，警方甚至将受伤的民兵从医院拖走。

这真令人沮丧。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能理解他们取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举动，可是为什么抓人，我找不出理由。显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取缔具有后期效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如今成了非法组织，因此以前参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人就犯了法。像往常一样，所有被逮捕的人无一被起诉。然而与此同时，巴伦西亚的共产党报刊在报道这个事件时却用了个醒目的标题——“法西斯的阴谋”，内容无非是通过电台与敌人联系，用隐形墨水签署文件，等等。我以前就

见过这种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报道仅出现在巴伦西亚的报刊上。任何一份巴塞罗那报刊，无论是隶属于共产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或是共和派的，对该事件或取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之事均不置一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确切指控，我们最早不是通过西班牙的报纸了解到，而是通过一两天后送达巴塞罗那的英国报刊。当时我们不知道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背叛和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并非来自政府，政府成员之后也否认了此事。我们只隐约知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想必也包括我们其余的人，被指控接受法西斯的雇用。有关被捕者在监狱里遭秘密枪毙的传言沸沸扬扬。这种说法虽未免有些夸张，但肯定不是空穴来风，而且无疑发生在宁身上。宁被逮捕后先被送到巴伦西亚，再转至马德里。6月21日，巴塞罗那开始有传言说他已被枪杀。之后的传闻更是绘声绘色：宁已经在监狱里被秘密警察杀死，曝尸街头。这个传闻有若干个来源，其中之一是前政府官员费德里科·蒙森尼斯。从那天起，再也没有关于宁活着的消息。此后，政府面对来自各国代表的质问，只是推说宁失踪了，他们对他的下落一无所知。有些报纸捏造谎言说宁逃到了法西斯控制区。该说法没有任何证据。司法部长易卢霍事后宣称西班牙的新闻记者伪造了他的官方声明[2]。无论如何，像宁这样重要的政治犯绝不可能有机会逃脱。除非未来的某一天发现他还活着，否则我们不得不认为他已在监狱中被谋杀了。

追捕事件持续了数月，直到政治犯人数上千，这其中还不包括法西斯分子的数量。在此事件中低级别警察表现出的自主性值得注意。许多逮捕是非法的，不少由警察局局长下令释放的人在监狱门口被再次逮捕，送进了“秘密监狱”。库尔特·兰多和他的妻子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大约于6月17日被逮捕，紧接着兰多就“失踪”了。5个月后，他的妻子仍然在监狱里，既未受到审判，也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她宣布绝食后司法部长捎话给她，证实她丈夫已经死亡。不久之后，她被释放，但几乎当即再次被捕入狱。很显然，无论哪个级别的警察，似乎全然不顾其行为将对战争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跃跃欲试，不经批准就逮捕担任要职的军官。大约在6月底，第29师总指挥乔斯·罗维拉在前线附近被来自巴塞罗那的警察逮捕。他的部下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军事部抗议。结果发现，无论是军事部还是警察局局长奥尔特加竟对此一无所知。整个事件中有个细节或许不那么重要，却令我如鲠在喉，即前线部队完全被蒙在鼓里。正如你所看到的，无论是我还是其他在前线的人，都没有得到任何关于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消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总部、红色救援中心等照常运作，直到6月20日，哪怕是在距巴塞罗那仅100英里的莱里达，也没有人听说发生了什么事。巴塞罗那的报刊

对相关事件只字不提（热衷于刊登间谍故事的巴伦西亚报纸则到不了阿拉贡前线）。毫无疑问，逮捕所有在巴塞罗那休假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的原因之一正是在于防止他们把消息带回前线。我所接到的于6月15日返回前线的调遣一定是最后一次征兵。我对事情如何能做到这般保密仍然困惑不解，因为在此期间运送物资的卡车依旧往来不断。但消息的确被封锁住了，而且据我所了解，前线的人直到事发几天之后才略有耳闻。这么做的动机很明显。对韦斯卡的进攻刚刚打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仍是独立的战斗力量，他们或许担心如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得知了正在发生的事会拒绝战斗。事实上，当消息传到前线时，什么也没发生。那段时间里，一定有相当多的人牺牲了却不知道自己被大后方的报纸称作法西斯分子。这种事情不免令人耿耿于怀。我知道对部队封锁坏消息是常规的政治做法，或许作为一项规则来说还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把人们送上前线却不告诉他们，就在他们身后，他们的政党被镇压，他们的领袖被控背叛，他们的亲朋好友被关进监狱，那就该另当别论了。

妻子开始对我讲述我们几个朋友的遭遇。有些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已经通过了边境。威廉斯和斯塔福德·科特曼在警察对莫林疗养院的突袭中逃脱，他们此刻正藏身于某处。约翰·麦克奈尔也一样，他之前在法国，并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重返西班牙——这么做有些鲁莽，但他不愿自己在同志们遭遇危险时只顾个人安危。至于其他人，则一律是“他们已经抓到了某某”。他们几乎抓到了每个人。但得知他们也抓到了乔治·科普，我着实吃了一惊。

“什么！科普？我以为他在巴伦西亚。”

这么看来科普已经回到了巴塞罗那。他带着一封军事部写给上校的关于东线工程的信函。他当然知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已经被取缔，但大概没有料到警方会愚蠢到在他带着紧急军务前往前线的途中逮捕他。他来大陆旅店取行李，当时我妻子出去了，旅店的人编造了些故事设法拖住他，同时报了警。我承认当我听说科普被捕时非常愤怒。他与我有私交，我曾为他工作了几个月，曾与他并肩作战，了解他的经历。他牺牲了一切——家庭、国家、生活——只为了来西班牙反抗法西斯。由于他在比利时军队服预备役时未经许可就离开比利时并加入外国军队，加之早前曾协助西班牙政府非法制造军需品，如果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将会被判入狱数年。1936年10月他就上了前线，从普通士兵一直晋升为少校，参加的战斗不计其数，还曾负伤一次。在五月冲突中，我亲眼

见到他制止部下互相残杀，并很可能因此挽救了10到20人的生命。而他们对此的回报就是把他扔进监狱。生气固然无济于事，但这种愚蠢恶毒的事情如何叫人不恼火。

与此同时，他们还没有抓到我妻子。尽管她一直待在大陆旅店，警方并没有采取任何抓捕行动。很显然，她被用来作为诱饵。不过，几天前的凌晨，6名便衣警察闯入我们房间进行搜查。他们搜走了我们的每一片纸，幸好留下了护照和支票簿。他们拿走了我的日记、我们所有的书籍、过去几个月收集的剪报（我常常好奇那些剪报对他们来说有什么用）、我所有的战争纪念品及信件。顺便说一句，他们带走了一些我的读者来信，其中一部分我还没来得及回复，当然现在也没有地址了。如果有谁曾就我的上一本书给我写过信却没有得到回信，读到这几行时，可以接受我的歉意吗？后来我得知，警方也收缴了我留在莫林疗养院的各种物品，甚至带走了一包脏亚麻布。或许他们认为上面有用隐形墨水写的消息吧。

显然，对于我妻子而言，无论如何此时留在旅店都比较安全。如果她试图躲藏，他们会立即追捕她。至于我自己，应该赶紧躲起来。当前的形势令我无比厌恶。尽管遭逮捕的人不可胜数，我却无法相信自己会有任何危险。整个事件看起来实在荒唐。同样是拒绝把这种愚蠢的袭击当真，科普进了监狱。我不停地问，为什么有人要逮捕我呢？我做了什么？我甚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当然，我曾经在五月战斗中拿起了武器，但估计有四五百人也有同样的举动。此外，我迫切需要睡眠。我想冒险回旅店去。我妻子不同意，她耐心地向我解释当前的事态。我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并不重要，现在不是在逮捕罪犯，而完完全全是政治恐怖。我没有犯下任何明确的罪行，但我犯了“托洛茨基主义”，我曾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团服役的事实就足以让我进监狱。在西班牙抱着英国那套只要守法就能安全的概念是无济于事的。实际上，法律是由警方“制定”的。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躲藏起来，隐瞒我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一切关系。我们一一检查了我口袋里的文件。我妻子让我撕掉印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名称的民兵卡，还有与一群民兵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旗帜前的合影。这种东西在如今只会给我招来牢狱之灾。但我必须保留我的退役证明，即便这东西也很危险，因为文件上盖着29师的章，而警方可能知道29师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但若没有这些文件，我就可能会被当作逃兵而逮捕。

我们现在得考虑的是离开西班牙。既然待在这里迟早要进监狱，留

下也就毫无道理。事实上，我们俩都很想留下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我猜西班牙的监狱恐怕是个糟糕的地方（实际情况比我想象得还要糟得多），一旦进了监狱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此外，我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胳膊依旧疼痛。我们约好第二天在英国领事馆见面，科特曼和麦克奈尔也会去那儿碰头。我们或许要花几天时间准备护照。离开西班牙之前，我们必须持护照在3个不同的地方盖章——警察总局、法国领事馆和加泰罗尼亚移民局。警察局当然是个危险的地方，但也许英国领事馆有办法可以不让他们发觉我们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任何关联。显然，警方肯定有一张外国“托派分子”嫌疑人名单，我们的名字极有可能都在其中，但如果运气好，我们或许可以赶在名单被送达边境之前出境。这其中必然会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和没完没了地拖延。幸好这是在西班牙而不是德国，西班牙的秘密警察虽有点盖世太保的精神，却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于是我们就此分手。我妻子回旅店，我则在黑暗中游荡，想找个地方睡觉。我记得当时自己又气恼又无聊。我多么想在床上躺一晚啊！然而我无处可去，无处可藏。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几乎没有地下组织。显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虽然一直意识到很可能会受排挤，但从未想到会遭到如此彻底的清剿。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事实上，直到被镇压的那一天，他们仍在改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大楼（其中包括将一座旧的银行行政楼改建成电影院）。因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根本没有任何一个革命党派本应拥有的接头和藏身之处。天知道那一晚有多少人因房屋被警方搜查而露宿街头。我已经经历了5天恼人的旅行，睡在令人根本无法入睡的地方，我的胳膊疼得厉害，现在这群傻瓜又四处追捕我，我得再次在野外过夜。当时我只能想到这么多。我没有从任何政治角度去考虑。事情发生时，我从来不从政治角度考虑。当我被战争或政治挟裹时总是这样——我意识到无法改变现状，迫切希望摆脱这该死的境遇。事后我可以看出它的意义，但事发时只是想着脱身——这或许有些不太光彩。

我走了很多路，到了总医院附近。我想躲开那些如猎犬般查看证件的警察，找个地方躺下。我试着躲在一个防空洞里，但洞是新挖的，还在滴水。之后，我来到一所革命时期被烧毁的教堂废墟前。教堂只剩下外壳，没有屋顶，四面残垣立在一堆瓦砾之中。我在半明半暗中摸索着，找到了一个类似坑洞的地方容身。躺在破碎的砖石上很不舒服，幸好夜晚还算温暖，我设法睡了几个小时。

[1] 货币单位，法国辅币，1法郎为100生丁。

[2] 参见我在第11章提到的关于马克斯顿代表团的报道。

第十四章

在巴塞罗那这样的城市被警方通缉，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所有店铺都很晚才营业。露宿街头时，通常拂晓就会醒来，而巴塞罗那没有一家咖啡馆9点以前开门。我要再等好几个小时才能喝到一杯咖啡或者刮刮胡子。奇怪的是，理发店的墙上仍张贴着无政府主义的告示，禁止付小费。“革命打破了我们的枷锁”，告示上写着。我想告诉理发师，如果不多加小心，枷锁很快就会回来。

我走回了市中心。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建筑上的红旗已经撤去，被共和派的旗帜取代，成群的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员在门口闲逛。位于加泰罗尼亚广场一角的红色援助中心的大部分窗户被警察砸碎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书报亭的书刊已被洗劫一空，兰布拉斯大街两侧的公告栏贴满了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漫画——戴着面具，露出法西斯嘴脸的那幅。在兰布拉斯大街尽头靠近码头的地方，我看见了一个奇怪的景象：一队来自前线的民兵，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疲惫地瘫坐在擦鞋匠的椅子上。我知道他们是谁——真的，我认出了其中一人。他们是几天前刚从前线撤回来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发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镇压，自己的家被搜查，不得不流落街头。此时回到巴塞罗那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立刻躲起来，要么进监狱——经历了三四个月前线的煎熬，这般待遇可不令人愉快。

我们处在一种古怪的境况之中。夜间是被追捕的逃犯，白天却几乎可以正常生活。每一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支持者可能藏身的房子都被监视——或者至少极有可能被监视，旅馆或出租屋也住不得，因为当局已颁布法令，但凡有陌生人到来，旅店老板必须立即通知警方，这就意味着我们得在户外过夜。而另一方面，白天，在像巴塞罗那这样规模的城市里却相当安全。街上到处都是国民警卫队员、突击队员、武装警察和普通警察，除此之外，天知道还有多少便衣特务。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不可能盘查每个路人，如果你看上去普普通通，或许就不会被注意。你需要做的就是不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建筑周围出现，并且避开那些服务员能认得出你的咖啡馆和饭店。那天以及接下来的一天，我花了很长时间在一家公共浴室里洗澡。我觉得这是个躲开警方视线的好方法。不幸的是，很多人也有同样的想法，我离开巴塞罗那几天之

后，警方突击搜查了一家公共浴室，抓捕了一大批赤身裸体的“托派分子”。

我沿着兰布拉斯大街走着，途中遇见了一个来自莫林疗养院的伤兵。我们用当时人们常用的方式不动声色地互相递了个眼神，悄悄约好在路尽头的一家咖啡馆碰面。他在莫林疗养院遭遇突袭时逃了出来，但与其他人一样流落街头，且只穿着长袖衬衫——逃跑时没穿外套——身无分文。他向我描述了一名国民警卫队员是如何从墙上撕下大幅彩色的莫林肖像，并将它扯成碎片的。莫林（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被关在法西斯的监狱中，据说当时已被枪杀。

10点钟，我在英国领事馆与妻子会合。麦克奈尔和科特曼随后也到了。他们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鲍勃·斯迈利死了。他死在巴伦西亚的监狱里——死因无人知晓。尸体被立即掩埋，英国独立工党的代表戴维·默里就在该地，但未被允许查看他的遗体。

我自然当即认定斯迈利是被枪杀的。当时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但事后我觉得自己或许弄错了。后来，他的死因公布了，是阑尾炎。我们之后从另一名被释放的犯人那儿获悉，斯迈利在监狱中的确患了病，因此，阑尾炎的说法或许是真实的。拒绝让默里看他的遗体或许纯粹是出于怨恨。尽管如此，我必须声明，鲍勃·斯迈利年仅22岁，是我见过的身体最强壮的人。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无论是英国人还是西班牙人，他是唯一一个在战壕里待了3个月而没有生过一天病的人。身体这么棒的人，只要得到适当的照料，通常不会死于阑尾炎。不过倘若你看到西班牙的监狱——临时搭建的用于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是什么样子，你就会意识到病人在那儿得到适当照料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些监狱只能被形容为地牢。在英国，你得回到18世纪才能找到可以与之相比的地方。一群人被关押在狭小的空间里，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躺下，而且通常是在地窖或其他不见天日的地方。这可不是临时关押——有的人被一关就是四五个月，见不到一丝阳光。他们每天得到的食物只有肮脏不堪、分量少得可怜的两碟汤和两片面包（几个月后，食物似乎略有改善）。问问任何曾被囚禁在西班牙的政治犯就知道，我丝毫没有夸大其词。我从不同渠道了解到的西班牙监狱的状况，全都一模一样，再说，我自己也曾见识过一间西班牙监狱。另一位后来也遭监禁的英国朋友写道，他的牢狱经历使他更容易接受“斯迈利的遭遇”。我对斯迈利的死难以释怀。这位勇敢而有天赋的男孩，放弃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学业，只为了来西班牙抗击法西斯。我亲眼见到他凭着惊人的勇气和顽强的意志奋战在前线，

而他们却将他扔进监狱，任由他像个被遗弃的动物那样死去。我知道，在一场规模如此巨大而血腥的战争中，为一个人的死亡斤斤计较毫无用处。一颗投在拥挤街道上的飞机炸弹就能造成比政治迫害更多的伤亡。但令我愤怒的是，这样的死亡毫无意义。在战斗中死亡——是的，那是人们可以预料的；但连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都没有，而只是由于盲目的政治仇恨就被扔进监狱，在孤独中死亡——这就另当别论了。我看不出这种事情——发生在斯迈利身上的事似乎不是个例——能够为我们带来任何胜利的希望。

当天下午，我和妻子去探望科普。警方允许探望未被单独监禁的囚犯，但去多了也不安全。警察会注意前来探望的人，如果来得过于频繁，就会被认定为“托派分子”的朋友，很可能最终也落得进监狱。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在许多人身上。

科普没有被单独监禁，我们没费什么周折就获得了探视许可。当我们被领着穿过铁门走进监狱时，我在前线认识的一个西班牙民兵正被两个国民警卫队员押着走出来。我们的目光相会，又是不动声色地一眨眼。在监狱里我们遇见的第一个人是个美国民兵，他几天前打算返回家乡，所有文件都齐全，但照样在边境被逮捕，或许是因为他仍穿着灯芯绒马裤，因此被认了出来。我们擦身而过，好像完全是陌生人。这太可怕了！我认识他，我与他同在一条战壕共处了好几个月，我受伤时，他曾把我抬下前线。但现在我们只能如此。身穿蓝制服的卫兵监视着每一个角落。在这里认识的人太多是相当危险的。

所谓的监狱其实是间店铺的地下室，被隔成约20平方英尺的两间屋子，关押着近百人。这地方真像是18世纪的新门监狱[1]，污秽、杂乱、没有什么家具——只有光秃秃的石地板、一张板凳和几条破烂的毯子，钢制百叶窗遮住了窗户，光线昏暗。肮脏不堪的墙壁上潦草地画着“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万岁！”“革命万岁！”之类的革命口号。这个地方在过去数月中被用来关押政治犯。喧闹声震耳欲聋。正是探视时间，监狱里挤满了人，寸步难行。几乎所有来探视的人都来自最贫穷的劳动阶层。妇女们打开馐简陋的包裹，里面装着为被囚的男人们准备的食物。囚犯中有几个来自莫林疗养院的伤员。有两人的腿已被截肢，其中一个人入狱时没带拐杖，只能靠一只脚跳来跳去。这里还有一个不到12岁的小男孩。显然，他们连儿童也不放过。监狱里弥漫着成群人待在一起却没有通风设施时发出的那股子恶臭。

科普挤过人群和我们见面。他饱满红润的脸庞看上去如往常一样，

在那样肮脏的地方，他仍保持制服整洁，甚至还设法刮了胡子。囚犯中还有一名身穿人民军制服的军官。他和科普在错身而过时互相敬了个礼，不知何故，敬礼的手势却显出几分悲怆。科普的精神似乎不错。“好吧，我猜我们所有人都会被枪毙。”他乐呵呵地说。“枪毙”这个词令我不寒而栗。不久前一颗子弹才钻进我的身体，那感觉记忆犹新。想象这样的情形将发生在你熟悉的人身上，真不好受。当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所有的主要人物，包括科普都会被枪毙。关于宁的死讯的传言刚刚消散，我们也知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控犯有背叛和间谍罪。一切都暗示了会有一场精心酝酿的大审判，接着就是对“托派分子”领导人的大屠杀。眼看着朋友身陷囹圄，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这是怎样的痛苦啊。我无计可施，哪怕向比利时当局求援也无济于事，因为科普为了来到这里已经违反了他自己国家的法律。我尖细的嗓音淹没在周围的嘈杂声中，因此我不得不靠妻子来传话。科普对我们讲述了他在狱中结交的朋友，还有那些警卫，他们有些人很善良，但有些人则恃强凌弱。至于食物，简直是“泔水”。幸好我们给他带了包食物和香烟。接着，科普提起他被逮捕时从他身上搜走的文件，其中之一是军事部写给负责东线部队工程建设的上校的信。警方扣押了信件，拒绝交还。据说信件在警察总局。如果能拿回那封信，情况或许会大不一样。

我立刻意识到这条消息有多么重要。那样一封签署了军事部和波萨斯将军的意见的公函可以证明科普的忠诚。但问题在于如何确定这封信还在。如果信到了警察总局，肯定会被密探或其他人毁掉。只有一个人有可能拿回那封信，就是收信人本人。科普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他写了封信，想让我悄悄带出监狱寄走。不过，亲自送去显然更快、更可靠。我让妻子和科普在一起，自己冲出去，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一辆出租车。我知道时间就是一切。现在大约是5点半，上校可能会在6点离开办公室，而明天，天知道那封信会怎样——或许已经被毁了，或者随着一批接一批嫌疑犯的被捕而淹没在杂乱的卷宗堆里。上校的办公室在靠近码头的军事部。当我急匆匆跑上台阶，在门口值勤的突击队员用他的长刺刀挡住了我的去路，要求查看“证件”。我冲他挥了挥我的退役证明，他显然没看清，就被这份神秘的“证件”唬住了，竟放我通行。这栋建筑呈庞大复杂的口字形结构，中央有个庭院，每层楼有数百间办公室。而且，由于是在西班牙，言语交流不顺利，没人知道我要找的办公室在哪里。我不停地重复着：“上校——总工程师，军队！”人们只是笑笑，优雅地耸耸肩。所有为我指路的人都将我引向不同的方向，从这儿上楼，从那儿下楼，沿着长长的通道一直走下去，结果竟然是死胡同。时间转瞬即逝。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像是在做一场噩梦：在楼梯上跑上跑下，

神秘的人们来来往往，办公室敞着门，一片混乱，纸张散落各处，打字机叮当作响，时间在溜走，一条生命危在旦夕。

不过我总算及时赶到。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诉求居然得到了倾听。我没有见到上校，但他的助手或是秘书，一个身穿漂亮制服、长着细长眼睛的军官走出来，在会客室接待了我。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我的故事。我代表我的上司前来。乔治·科普少校肩负着紧急任务前往前线，却被误抓入狱。给上校的信是机密，应该立刻找到。我已经与科普共事数月了，他是一名最出色的军官，他被逮捕显然是个误会，警察把他和其他人弄混淆了，等等。我一直在强调科普的任务对于前线的迫切性，因为我深知这一点最为关键。但我蹩脚的西班牙语一到紧要关头就卡了壳，变成了法语，因此这个故事听上去一定古怪离奇。最糟糕的是，我刚说了没几句就几乎声嘶力竭了，只有拼着命才能发出一点嘶哑的声音。我担心这一丁点儿声音会完全消失，而那个小军官会对如此费力地听我说话感到厌烦。我时常在想，他是否会认为我的嗓子出了什么问题呢——他是否会以为我喝醉了酒，或者仅仅是心虚。

然而他耐心地听着，频频点头表示同意。是的，听起来似乎是弄错了，当然应该予以研究。明天——不要等到明天！我抗议。这是紧急问题，科普本该已经到前线了。那军官再次表示同意。接着，我担心的问题来了：

“这个科普少校——他效力于哪支部队？”

那个可怕的字眼不得不冒了出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我希望能向你描述出他声音中的震颤。你得记住当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被如何看待的。人们对间谍怕到了极点，或许所有共和派人都一度相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受德国法西斯雇用的庞大间谍组织。对一名人民军军官说这样的事，无异于在红色恐慌之后旋即走进骑兵俱乐部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他斜着眼扫视着我。又是一次长长的停顿，然后他缓缓地说：

“你说你在前线与他共事。那么说你自己也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民兵服役？”

“是的。”

他转过身去，一头扎进了上校的房间。我能听见里面传来激烈的对话。“全完了，”我想。我们永远也别想拿回科普的信了。此外，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服役，他们无疑会给警察打电话把我抓走，又多了一个“托派分子”落网。不过那名军官再次出现了，他戴上帽子，严肃地示意我跟他走。我们要去警察总局。这段路挺长，步行需要20分钟。小军官走在前，一板一眼地迈着行军步。整个路上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当我们到达警察总局时，一帮相貌可怖的无赖在门外游荡，他们显然是警方的密探、线人、间谍之类的。小军官走了进去，又是一次漫长而激烈的交谈。你能听到愤怒的嗓门儿越来越大，可以想象出他们互相恼火地比划着，耸肩，拍桌子。显然，警方拒绝交出信件。然而，那军官终于出来了，满脸通红，拿着一个大大的公文信封，是科普的信。我们赢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结果却没有丝毫改变。信固然要按时送达，科普本人却出不了狱。

军官向我保证这封信会被送达。可是科普怎么办？我问。难道不能释放他？他耸耸肩。那是另一回事。他们不知道科普为什么被逮捕。他只能告诉我他们会进行适当的调查。没什么可说的，我们都该走了。我们互相微微鞠了一躬。接着发生了一件奇妙而动人的事，那小军官犹豫了一下，然后走过来和我握了握手。

我不知道能否让你感受到那个举动如何深深地打动了我。听起来是件小事，但事实并非如此。你得明白这举动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当时，到处都笼罩在猜疑和仇恨的可怕气氛中，谎言满天飞，宣传海报叫嚣着我和每个像我一样的人都是法西斯特务。此外，你还得记住，我们正站在警察总局门口，当着那帮密探奸细的面，而他们中可能有人知道我被警察“通缉”。这就好像在大战期间与一个德国人公开握手。我猜，他出于某种原因已经认定我不是法西斯特务。真的，他能与我握手真好。

我记录这些听起来或许很琐碎的事，原因在于它代表了某种典型的西班牙气质——那种在极端恶劣的境况下，西班牙人身上散发出的光辉。西班牙给我留下了可怕的回忆，但我对西班牙人的印象却极少有不好的。我只记得自己有两次真的生了西班牙人的气，而每次事后想想，我都相信其实错在自己。他们无疑是慷慨、高贵的，并不真正属于20世纪。正是这一点，让人们可以期望，在西班牙，即便是法西斯主义也可能呈现相对宽松的形式。很少有西班牙人具备现代集权国家所要求的该

死的效率和一致性。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发生的一出奇怪的小插曲可以为例，当时警察来搜查我妻子的房间，事实上，搜查过程挺有趣，我希望自己也在场，不过不在场也好，因为我恐怕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

警方以格别乌[2]或盖世太保的行事风格进行了搜查。凌晨，随着一阵敲门声，6名男子冲进房间，打开灯，立即控制了房间的各个角落，明显事前已经商定好。接着，他们彻底搜查了两个房间（其中一间是浴室）。敲墙壁，掀垫子，检查地板，摸窗帘，搜查浴缸和暖气片底部，倒空每一个抽屉和箱子，把每件衣服举起来对着光查看。他们搜走了所有的文件，包括纸篓里的废纸和所有的书。他们发现我们拥有一本法文版的希特勒著的《我的奋斗》，便欣喜若狂。如果那是他们发现的唯一一本书，那我们可就惨了，因为读《我的奋斗》的人必定是个法西斯分子。可是接下来，他们发现了一本斯大林的小册子《清算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两面派的方式》，这多少打消了他们的疑虑。有一只抽屉里有几包卷烟纸，他们打开每个包，一片一片地检查每张纸，以防漏掉了写在上面的什么消息。他们总共花了近2个小时，这期间始终没有搜查床。我妻子当时一直躺在床上。显然，床垫下面可能藏了半打机枪，更不用说枕头下面可能有大量“托派”文件。然而警探们对床碰也没碰，甚至连床底下都没看。我不敢相信这是秘密警察的常规做法。要知道，警方几乎完全在共产党控制之下，且这些人本身可能就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同时也是西班牙人，把一个女人赶下床的行为对于他们而言有些太过分。于是这部分工作就被悄悄省略了，而整个搜查也因此变得毫无意义。

那天晚上，我和麦克奈尔、科特曼躺在一片废弃建筑工地边的杂草丛中。当时正是西班牙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我们都没怎么睡。我记得在咖啡馆开门之前那漫长的几个小时里，我们无限凄惨地四处游荡。自从来到巴塞罗那之后，我第一次去看大教堂——一座现代教堂，也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建筑之一。教堂顶部有4个高耸的形如酒瓶的尖塔。不像大多数位于巴塞罗那的教堂，这座教堂在革命期间没有遭破坏——据说是因其“艺术价值”才得以幸免。无政府主义者当时虽然在塔楼上挂上了红黑条幅，却没有摧毁它，这着实体现出他们糟糕的品位。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最后一次去看望科普。我们无力为他做什么，除了给他的西班牙朋友们留些钱，好让他们给他买食物和香烟外，只能道声再见。然而，我们离开巴塞罗那之后没多久，他就被单独监禁，甚至连食物也没法送进去。那天晚上，我们走在兰布拉斯大街上，路过仍由国民警卫队把守的摩卡咖啡店。我一时冲动走了进去，与其中两个背着步枪靠在柜台边

的警卫队员攀谈起来。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五月战斗中是哪些同志在这里守卫。他们一无所知，而且带着西班牙人惯有的糊涂，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打听到。我说我的朋友乔治·科普被关在监狱里，可能会因与五月战斗有关的事情受审。当时驻守在这里的人应该知道是他阻止了战斗，救了一些人的命，他们应该站出来作证。其中一个听我说话的人是个木讷的家伙，他听不清我那被嘈杂的车辆声淹没的话，不停地摇头。但另外那个人不同。他说他从一些同志那儿听说过科普的事迹，科普是个好人。然而即便在当时我也知道，这完全是徒劳。就算科普曾经努力阻止流血事件，在这样的审判中也会有人伪造证据。如果他被枪毙（恐怕极有可能），那么他的墓志铭将会是这样：他是可怜的国民警卫队员眼中的好人，虽身处于黑暗的体系之中，但仍保持了足够的人性，能够明辨是非。

我们此时的生活极不寻常。晚上我们是罪犯，但在白天却是富有的英国游客——至少我们摆出这样的姿态。哪怕一整晚露宿街头，只要刮个胡子、洗个澡、擦擦鞋，就能让自己的面貌焕然一新。目前最安全的做法是让自己尽可能看上去像个资产阶级。我们出没于城里无人认识我们的富人区，光顾高档餐厅，在服务员面前摆出一副十足英国人的架势。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喜欢上了在墙上涂鸦。我在几家豪华餐厅的过道里尽可能大而潦草地写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万岁！”在此期间，虽然确切说来我是在躲躲藏藏，但并不觉得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整个事情看起来太荒谬了。我脑子里那种英国式的“除非触犯了法律，否则不会被拘捕”的观念根深蒂固。但在政治大屠杀期间抱有这种观念是很危险的。当局已经签发了逮捕麦克奈尔的拘捕令，我们其余的人可能也在名单上。突袭、搜查、逮捕仍在无休止地进行，我认识的人中，除了那些仍在前线的，其余的几乎都进了监狱。警方甚至定期登上法国船只，带走难民并逮捕“托派”嫌疑分子。

多亏了英国领事，我们的护照终于准备妥当，他们那个星期一定为此大费周折。我们越早离开越好。晚上7点半应该有一班火车前往布港，通常在8点半左右开车。我们商量好，由我妻子事先预订一辆出租车，然后收拾行李，去旅店前台结账，并在最后一刻离开旅店。如果她引起了旅店人员的注意，他们肯定会报警。我大约7点到火车站，却发现车已经开走——7点差10分就离开了。司机一如往常临时改了主意。幸运的是，我还来得及通知我妻子。第二天早晨也有一班火车。麦克奈尔、科特曼和我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晚饭，我们经过谨慎试探，发现餐厅老板是劳工联盟成员，为人友善。他不仅给我们腾出了一个三

人间，而且没有通知警方。5天以来我第一次不必和衣而眠。

次日早上，我妻子成功溜出旅店。这列火车晚了近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给军事部写了一封长信，向他们讲述了关于科普的情况——即他毫无疑问是被误抓的，前线急需他，无数人可以证明他的无辜，等等。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看了那封信，那封我用颤抖的手（我的手指仍然不太灵活）和蹩脚的西班牙语写在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上的信。总之，无论是这封信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见效。就在我写作本书之际，也就是事发6个月之后，科普（如果他还没被枪毙）仍然在监狱里，既未受审判也未被指控。起初我们还收到他的两三封信，是由被释放的囚犯悄悄带到法国寄出的。信的内容如出一辙——被囚禁在肮脏黑暗的小屋子里，食物又差又少，由监禁条件引发严重疾病，但警察拒绝送医。我从英国和法国的若干个其他渠道证实了这些消息。最近，他消失在一所“秘密监狱”里，我无法与他取得任何联系。他的遭遇也是数以百计的外国人以及成千上万的西班牙人的遭遇。

我们最终平安越过边境。这列火车设有头等车厢和餐车，这可是我在西班牙头一次见到。直到不久前，加泰罗尼亚的列车仍只有一类车厢。两个警探在车里来回巡视，登记外国人的名字，不过当他们看到我们在餐车就餐时，似乎对我们的体面颇有好感。真奇怪，一切都变了。仅仅半年前，当无政府主义者仍在掌权时，表现得像个无产者才会让你获得尊重。在从佩皮尼昂到塞贝尔的路上，车里的一个法国商人曾严肃地对我说：“你不能这副模样去西班牙。把领结和领带摘了。在巴塞罗那，他们会把这些玩意儿扯碎的。”他的话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当时加泰罗尼亚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当时守卫边境的无政府主义卫兵将一个衣冠楚楚的法国人和他的妻子遣返回国，仅仅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看起来太像资产阶级。而现在却恰恰相反：看起来像资产阶级反而能得救。在查验护照的办公室里，他们在一张嫌疑犯名单上查找我们的名字，幸亏警方办事效率低下，别说我们的名字，甚至连麦克奈尔的名字都尚未在列。我们被从头到脚搜了身，但除了我的退役证明之外没有发现任何罪证，而那个搜查我的警察不知道第29师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于是我们蒙混出关，时隔6个月，我再次站在了法国的领土上。我从西班牙带出的唯一的纪念品是一只羊皮水壶和一盏阿拉贡农民用的小铁灯——这盏灯的形状几乎与两千多年前罗马人用的红陶土灯一模一样——我是从一间倒塌的小屋子里拣到的，不知怎么就塞进了我的行李包。

无论如何，事实证明我们走得还算及时。我们在法国看到的第一份报纸上就刊登了麦克奈尔犯有间谍罪被通缉的消息。西班牙当局公布这一消息有点为时过早。幸好“托洛茨基主义”不是可以引渡的罪行。

刚刚从一个战乱之国踏上和平之地，我有些手足无措。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冲进烟草店，把雪茄和香烟塞满口袋。之后，我们去自助餐厅喝了杯茶，一杯我们向往了数月的加了鲜牛奶的茶。我过了好几天才习惯可以随时买到香烟的事实，我总是担心烟草店关门，窗户上贴出“烟草售罄”的通知。

麦克奈尔和科特曼打算去巴黎。我和妻子想休息一阵子，便在第一站巴纽尔斯下了火车。当地人发现我们来自巴塞罗那，表现得不太热情。我好几次遇到了相同的问话：“你从西班牙来？你为哪一方作战？政府？哦！”——于是态度明显冷淡下来。这个小镇似乎是亲佛朗哥派，毫无疑问是因为众多西班牙法西斯流民不断涌入的缘故。我经常光顾的那家咖啡厅的服务员是个亲佛朗哥的西班牙人，他在给我端开胃酒时对我翻白眼。在佩皮尼昂则恰恰相反，那儿的人支持政府军，但那儿的各个派别明争暗斗，几乎与巴塞罗那的情形一模一样。在某一家咖啡店里，只要说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个字眼儿便能立刻交上法国朋友，服务员也会笑脸相待。

我们在巴纽尔斯停留了3天，这是段怪异而心神不宁的日子。在这个宁静的渔业小镇里，远离炮弹、机枪、购买食品的长队、政治宣传和阴谋，我们本该深感欣慰，但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感觉。在西班牙的所见所闻并未随着我们的离开而被淡忘，反而时常涌上脑海，较之以往愈发清晰。我们成天回忆着、谈论着，甚至梦到西班牙。过去的几个月以来我曾一直对自己说“离开西班牙以后”，我要去地中海附近安安静静地待一段时间，或许可以钓钓鱼。但现在真的到了这儿，却只有无聊和失望。天气寒冷，海风呼啸，波涛汹涌，靠近码头的水面上漂浮着杂物——软木片和死鱼内脏等，海浪撞击着岸边的礁石。或许听起来有些疯狂，不过我们都想返回西班牙。虽然这不仅对任何人都没好处，反而可能对我们自身造成严重的伤害，但我们俩都希望当时可以留在那儿与其他人一起被关进监狱。我恐怕无力表达出在西班牙的那几个月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已经记录了一些事件，但我无法描述那些事件带给我的感受。那感受混合了景象、气味和声音，绝非文字所能够承载：战壕里的气味，山谷的黎明，冰冷的子弹碎片，炸弹的呼啸声和闪光，巴塞罗那早晨清冷的曙光，军营里靴子踩地的声响，那个人们仍相信革命的12

月，购买食品的长队，红黑色的旗帜，西班牙民兵的脸孔。尤其是民兵的脸孔——那些我在前线结识的人，此刻天知道他们飘零在何方，有的战死沙场，有的落下残疾，有的锒铛入狱——我希望他们中的大部分仍安然无恙。祝他们所有人好运。我希望他们能打赢这场战争，把所有的外国人赶出西班牙，不管是德国人、俄罗斯人还是意大利人。我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无足轻重，留下的回忆也大多不愉快，但我仍庆幸自己曾经参与这场战争。如此一场灾难——即便抛开大屠杀和肉体上的痛苦不谈，西班牙战争仍是一场令人震惊的灾难——然而结局未必只是绝望。奇怪的是，我的整个经历反而令我更加坚信人类的善良。我希望我的叙述不会给读者造成过多的误导。我相信在这样的问题上，没有人能够做到绝对公正。除了你亲眼所见的，很难确信任何事，而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某个党派的立场去阐述。如果我没有在本书之前的篇幅中做出声明，那么现在我要说：请注意我会有党派偏见，会弄错事实，我的一面之词不可避免地会有失偏颇。当你阅读其他讲述这一时期的西班牙的书籍时，同样要注意这个问题。

尽管无事可做，但出于应该有所作为的想法，我们比原计划提早离开了巴纽尔斯。在前往法国北部的旅途中，每多走一英里，景色就更加葱绿柔和。我们远离了山峦与藤蔓，重新回到草地和榆树的怀抱。当初我途经巴黎前往西班牙时，巴黎给我的印象是既腐朽又灰暗，与我8年前所见的巴黎相距甚远，当时物价尚低廉、希特勒还是个无名之辈。而现在，我早先所知的咖啡馆中有半数因顾客稀少而倒闭，每个人都饱受物价昂贵之苦，对战争充满恐惧。如今，见识过了可怜的西班牙，就连巴黎看起来似乎也显得生机勃勃。展览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不过我们却设法避免前往。

再接着回到英格兰——英格兰南部，这儿也许是世界上最平坦的地方。当你经历了漫长的旅途，尤其是刚刚从晕船中恢复过来，躺在联运列车的长毛绒靠垫上，你很难相信某个地方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日本在地震，中国在闹饥荒，墨西哥在革命？别担心，牛奶一定会在明早送到家门口，《新政治家》一定会在周五出版。那些工业城镇远在他方，硝烟和苦难隐藏在地球的另一端。这里仍然是我所熟悉的英格兰：铁轨隐没在野花丛中，骏马奔跑在广阔的草原上，缓缓流动的溪水绕过柳树，榆树下的绿荫，农舍小院里的飞燕草；接着是伦敦郊外一望无际的宁静的荒野，浑浊的河道里的驳船，熟悉的街道，海报刊登着板球比赛和皇家婚礼的消息，戴圆顶礼帽的男人，特拉法加广场上的鸽子，红色巴士，身着蓝色制服的警察——所有这一切都在沉睡，有时我不由得担

心我们会长睡不醒，直到炸弹呼啸而来。

---

[1] 新门监狱，为伦敦著名的监狱。

[2] 格别乌（OGPU），全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奥威尔作品集

通往维根码头之路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郑梵 胡萌琦 钱晓筱 唐迎欣 译

THE ROAD TO WIGAN PIER

奥威尔首先是先知，其次才是圣徒。
——止庵

他能够在目睹最糟境况的同时为最美好的东西而战。
——Granville Hicks

通过与那些虽未必比你更优秀但与你截然不同的人们交流，你那中产阶级的观念和偏见将得到检验。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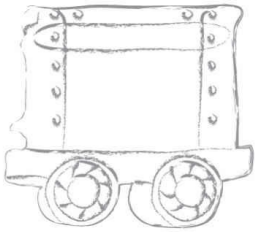
自由的保障，良知的坚守

自由的保障，良知的坚守

通过与那些虽未必比你更优秀但与你截然不同的人们交流，你那中产阶级的观念和偏见将得到检验。

通往
维根码头之路

[英] 乔治 · 奥威尔 著
郑梵 胡萌琦 钱晓筱 唐迎欣 译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 · 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往维根码头之路/（英）奥威尔 著；郑梵等 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7

（奥威尔作品集）

ISBN 978-7-5680-1134-1

Ⅰ.①通… Ⅱ.①奥… ②郑… Ⅲ.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185859号

通往维根码头之路 [英]乔治·奥威尔 著 郑梵等 译

策划编辑：刘晚成

责任编辑：吴丽程

特约编辑：徐心 王瑜玲 郑梵

责任校对：李琴

封面设计：喃风

责任监印：张贵君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5

印　　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8.5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第一章

清晨钻入耳中的第一缕声响来自磨房姑娘们的木质拖鞋在鹅卵石小道上的敲打。比那更早的，恐怕便是工厂的集合哨声了，尽管我从来没有在醒的时候听到过。

我的床在右手边离门最近的角落里，床脚那头还挤着另一张床，两张床紧紧地挤在一起（只有这样放才能开门）。于是我每日只能蜷着腿睡觉，否则就会踢到另一张床上那个人的后背。那张床上的房客是个叫雷利先生的长者，在煤矿“顶上”勉强做个技师。好在他每天5点便要去上班，之后我才有幸伸直腿好好睡上几个钟头。我的对床是一个苏格兰的矿工，遭遇了一场矿难（一块大石头在他身上压了好几个小时才被人撬开），拿了500英镑的赔偿金。他40来岁，是个高大英俊而又强壮的男人，稍稍泛白的头发和修剪整齐的胡须让他看起来更像个兵长。他会在床上抽着他的短烟斗一直躺到午后。还有一张双人床则被各种旅行推销员、报纸推销员和按揭推销员占用着，他们通常只住几个晚上。这张双人床大约是这里最好的一张床了。我在这儿的第一个晚上就是在这张床上度过的，不过后来不得不转让给新来的房客们。依我看来这张床似乎就是一个“诱饵”，所有新来房客的第一个晚上都会睡在这张床上。房间里的每扇窗户都关得严丝合缝，并且底下用红色的沙袋抵着。每天早晨，这房间臭得就像个臭鼬笼子。人在房间里是无法察觉的，但倘若你一早出了门再回来，这恶臭就会像一记重拳扑面而来。

其实我从未留意过这间屋子里有多少个房间，不过奇怪的是在布鲁克一家来之前这里便有了浴室。屋子楼下是常见的敞开式厨房，接连着客厅，每日烟雾升腾。屋子的唯一光源来自于一扇天窗，因为房子一边是一家小店，而另一边是一个储藏室，连通到某个更深不可测的脏兮兮的储藏室。一张不成形的沙发堵住了储藏室半边的门，而沙发上倚坐的则是似乎永远抱病，裹着脏兮兮的毛毯的房东太太：布鲁克夫人。她大而蜡黄的脸上无时无刻不透露出焦虑，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她是什么毛病。不过以我的推测，大概只不过是因为她吃太多罢了。火堆前面几乎一直有湿漉漉的衣服挂晾着，而中间的大餐桌则供家里人和所有房客们吃饭。我从来没看见餐桌整个儿露出来过，各时的覆盖物却又不尽相同。最下面是一层沾着伍斯特沙司的旧报纸，上面是一层黏黏的白油

布，再上面是一层绿色的哔叽布，之后又盖了一层粗麻布，从来不曾更换也很少被揭下。早餐留下的面包屑基本上晚餐时还在桌上。我曾经可以凭外形认出每一块面包屑，并观察它们在餐桌上日复一日颠簸来回。

小店是那种狭窄阴冷的房间，窗户外侧粘着一些白色字母，是些陈年巧克力广告纸遗留的碎屑，如星星一般散落着。窗户里侧有一块大石板，上面铺着一层层白花花的牛肚子，还有灰色毛茸茸的东西，被他们称为“黑肚子”[1]，还有一些已经煮熟的惊悚的半透明猪脚。这其实是一间再平常不过的卤煮店[2]，除了面包、香烟和一些罐头食物就再没什么别的存货了。虽然窗口也写着有茶供应，但是如果客人想要一杯茶的话，通常会被以各种理由推脱掉。布鲁克先生从前的职业是矿工，尽管他已经失业两年了，他和他的妻子却一直开着各式各样的小店作为副业。他们曾经开过一家小酒馆，但是因为纵容赌博而被吊销了执照。我很怀疑他们有没有哪一桩生意是盈利的，其实他们经营这些生意大概主要是为了能有些什么东西来抱怨。布鲁克先生皮肤黝黑，小骨架，有着一张愠怒的爱尔兰人的脸，而且惊人的脏。我从未见过他的手有干净的时候。因为布鲁克太太现在是个病号，他要准备大多数的食物。而且像所有双手永远脏兮兮的人一样，他会用一种非常紧握而缓慢的方式拿东西。比如说他给你一片黄油面包，上面一定会有个他专属的黑手指印。大清早他下到布鲁克夫人的沙发后面的神秘巢穴去把牛肚捞出来的时候，手就已经是黑的了。关于贮藏牛肚的地方，我从其他房客那里听说了很多可怕的故事，传说那里爬满了蟑螂。我不清楚他们多久订一次新鲜的牛肚，但是间隔时间一定很长，因为布鲁克太太每次都会用这来记事。比如“让我想想，在那之后我又进了三批冷冻牛肚”之类的。我们房客从来都没吃过他们家的牛肚，当时我以为是牛肚太贵了，但后来想想，大概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多了。因为我发现就连布鲁克夫妇他们自己也从来不吃牛肚。

仅有的长期房客是那个苏格兰的矿工——雷利先生，两个年事已高的退休人员，和一个拿社会补助的失业人员乔，他是那种没有正经家族姓氏的人。那个苏格兰矿工，如果你近距离接触他，会发现他其实十分无趣。像大多数失业者一样，他花太多时间在看报纸，如果你不打断他，他可以就黄祸[3]、行李箱分尸案[4]、占星学以及科学与宗教的分歧谈上好几个小时。那两个高龄的退休人员，和很多老人一样因为收入调查[5]被家人赶了出来。他们每周向布鲁克夫妇交10先令，以交换价值对等的可想而知的食宿，即小阁楼里的一张床和以黄油面包为主的伙食。其中一个老人为人高傲，又恶疾缠身，命不久矣——我估计是癌症。他

只有在去拿他的养老金的时候才会下床。另一个老人被大家称作老杰克，从前是个矿工，78岁高龄并且有着超过50年的矿区工作的丰富经验。他是那种谨慎又智慧的长者，但是奇怪的是他似乎只记得他少年时候的事情，而对于所有现代矿山的机械及其发展都忘得一干二净。他还曾给我讲过在狭窄的地下矿道和野马打斗的故事。当听说我打算下几个矿区看看的时候，他非常轻蔑地声称像我这个头的人（6英尺2.5英寸）[6]绝不可能完成这样的“旅行”。而且就算你跟他说现在的“旅行”比以前好一些了也是完全说不通的。但是他总是十分友好地对待每个人，而且总会在爬上他房梁下面某处的小床上之前，跟我们恰到好处地大喊一声“晚安，小伙子们”。最让我敬佩的是老杰克他从来没有向谁乞求过什么，他总在一周还没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抽光了他身上所有的烟，尽管如此他还是会拒绝别人递过来的香烟。布鲁克夫妇已经为这两位老人上了那种一周6便士[7]的保险。据说有人偶然听到他们焦虑地询问保险推销员“癌症患者能活多久”。

乔，和那个苏格兰人一样，看了太多的报纸，而且几乎成日地泡在公共图书馆里。他是那种典型的未婚无业游民，看起来颓废不堪且着实邋遢。他那一张圆圆的几乎是稚气的脸上总是带着天真顽皮的表情，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被人忽略的小男孩儿，而不是一个成年人。我猜完全是因为责任感的丧失才让很多这样的男人看起来比他们实际年龄要小。仅看外表的话，我会以为乔大概28岁的样子，而让我极为惊讶的是他居然已经43岁了。他钟爱引用名言，并且对于自己逃避婚姻的机智选择洋洋得意。他总是对我说“婚姻是枷锁”，显然自认为这是非常微妙且有先见之明的论调。乔的总收入是每周15先令，他交付给布鲁克夫妇的房费便要六七先令了。有时候我会看到他在厨房的火炉上给自己煮一杯茶，但是其他时候他都在外面吃，我估计也就是一片干面包或者一包炸鱼薯条之类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像旅行推销员、报纸推销员、旅行演员这样的比较穷困的流动房客。旅行演员在北方比较常见，因为在北方，大多数的酒馆会在周末的时候雇用各种艺人。而报纸推销员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一类人，他们的工作在我看来毫无希望，可怕到我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选做这行而不干脆去监狱蹲着。雇他们的一般是周报或者周日报，他们会拿着一些地图和街道的名字作为指引，从一个镇穿梭到另一个镇来完成他们每日的工作。如果他们不能完成每天最少20笔订单的指标，那就会被炒鱿鱼。只有完成指标任务，他们才可以得到一点微薄的薪水——我估计是一周两英镑。如果有超额完成的部分，他们还可以拿

一点儿少得可怜的佣金。不过这份工作也不像听起来那么难，因为在工薪阶层所在的小区几乎每家每户都会订一份2便士的周报，然后每隔几周会换一种，但是我很怀疑有人能坚持工作上几周。这些周报会吸引一些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可怜人，比如失业职员和旅行推销员这样的人，他们会在一段时间内发疯似的争取把销售额维持在最低的水准。过一段时间这种丧失人性的工作会把他们的精力消磨殆尽，然后他们会卷铺盖走人，新人又会来填补他们的空缺。我曾经结识了两个替那种臭名昭著的周报干活儿的人。两个人都是人到中年必须养家糊口，其中一个甚至已经做了祖父。他们每天要奔波10个小时，在指定的街道上“工作”。晚上还要填一些他们周报暗藏猫腻的表格——里面通常有些小把戏，比如如果你连续订上6周他们的报纸再汇上2个先令就可以得到一套陶具之类的。那个胖胖的祖父经常脑袋耷拉在一堆表格上就睡着了。他们两个都付不起布鲁克夫妇家每周1英镑的全套食宿费用，一般只付一点床位钱，然后在厨房的角落里糊弄一点有失体面的食物，一般来说是他们存放在行李箱里的一些培根、面包和人造黄油。

布鲁克夫妇有很多儿女，大多数已经逃离这个家很久了。按照布鲁克夫人的说法，一些孩子在“加拿大镇”。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一个体格庞大像猪一样的男孩儿住在附近，在汽车修理厂工作，而且经常来他的父母家蹭饭。他的妻子每天都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待在这里。大多数洗衣做饭的家务活儿都是他的妻子和艾米在做。艾米是布鲁克夫妇另一个在伦敦的儿子的未婚妻，是个鼻子尖尖、一脸不悦的金发姑娘。她在磨房工作，拿着食不果腹的收入，还要每晚在布鲁克夫妇家做苦力。我听说他们的婚礼被无限延期，而且很有可能永远都不会举行了。但是布鲁克夫人已经擅作主张地视艾米为媳妇，并用那种病人特有的斤斤计较的方式对她喋喋不休。剩下的家务活都是由布鲁克先生负责的，当然有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做。布鲁克夫人除了去吃她的饕餮大餐以外几乎从没离开过那张沙发（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她都在那张沙发上度过），而且她过度虚弱以致什么都不能做。一直以来都是布鲁克先生看店，为房客们提供伙食，清理客房。而且他可以用让人难以置信的缓慢速度完成一件令他讨厌的工作，然后开始另一件。晚上6点客房的床还没铺好是很正常的事。一天中的任何时候你都有可能在楼梯上碰见他端着满满的夜壶，而且拇指还紧紧地扣住壶口。早上他会端一盆脏水坐在火堆旁边用慢镜头一般的速度削土豆。我从来没见过谁可以像他这般哀怨地削土豆，似乎你都可以看见他口中的“该死的娘们儿干的活”的怨恨，像苦涩的汁液一样在他心头发酵。他是那种会像反刍一样反复抱怨自己的不幸的人。

当然由于大多数时候我都待在屋子里，我能听见布鲁克夫妇所有的埋怨，像是这儿的人怎么欺骗他们啦，如何知恩不报啦，小店如何亏本啦，旅舍基本上不赚钱啦。按照当地的标准，其实布鲁克夫妇过得不算差，因为他们不知用何种方法躲过了收入调查，从PAC[8]那里领取着生活补助，但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向任何愿意聆听的人抱怨他们生活的水深火热。布鲁克夫人时常倚在她的沙发上，像是一堆自怨自艾的脂肪，能把同样的事情翻来覆去地抱怨好几个小时。“现在好像都没有客人光顾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些牛肚摊在那儿成天没有人来买。那都是些上好的牛肚啊。现在做生意真是难啊，不是吗？”如此等等。布鲁克夫人的抱怨都是以“现在做生意真是难啊，不是吗？”来结尾，就像歌曲里的副歌部分似的。其实小店亏本也是意料之中的事，那地方是毋庸置疑的尘埃满布，苍蝇蚊虫四处乱飞，这样的生意定是持续不下去的。不过对他们解释为什么小店没人光顾简直就是对牛弹琴。就算有人好心劝诫，比如说有人告诉他们小店窗口躺着去年的死苍蝇是会把客人吓跑的，他们夫妇也完全听不进去。

但是最折磨他们的是对于住在楼上的两个退休工人的顾虑——占用着他们的房间，吞食着他们的食物，而且一周只付10个先令。我很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在这两个老房客身上亏钱了，但这一周10先令之中的利润肯定是很少的。在他们眼中，这两位老人就像是黏在他们身上的寄生虫，寄养在他们的施舍之中。老杰克他们还算可以忍受，因为他大多数时候都不在屋里待着，不过他们真的很痛恨那个赖在床上的名叫胡克的老人。布鲁克先生总是用一种奇怪的腔调念他的名字，H不发音，而故意拖长U，听起来就像是乌克。我听过关于老胡克的各种抱怨，比如关于他铺床的搅闹，或是他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的挑剔，还有他从不懂得对人抱有感恩之心，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竟然自私固执地活着，拒绝去死！布鲁克夫妇对于时时巴望他死的这件事毫不忌讳。如果真的事到临头，他们还乐得拿一份保险赔偿金。对于布鲁克夫妇来说，这两个老人的存在是如此真切，好像他们肠子里的寄生虫，日复一日地啃噬着他们的生计。布鲁克先生会在削土豆的时候偶尔抬头，撞上我的眼神之后又会带着难以言喻的痛苦表情把头扭向天花板老胡克房间的方向。他似不想说但又禁不住地说道：“他真是个……不是吗？”我都已经听过他们关于老胡克的所有唠叨了。不过布鲁克夫妇对待所有的房客都有如此这般的牢骚。我自己也毫无疑问身列其中。乔，以吃低保度日，被布鲁克夫妇与那两个退休老人列为同类。这个苏格兰人即便每周按时交1英镑钱给布鲁克夫妇，他们还是不乐意，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成天在屋子里晃荡”。报纸推销员尽管每日出门在外，布鲁克夫妇又很反感他们自备食

物。就连他们这里最好的房客雷利先生，也被布鲁克夫人抱怨每日凌晨下楼时会干扰她的清梦。对于这样无止尽的抱怨，布鲁克夫妇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因为他们无法得到理想中的房客，那种出手阔绰且成日在外奔波的“儒商”。最好是一周付30先令，并且早出晚归的那类人。我意识到似乎所有的房东都讨厌他们的房客。他们想要房客们的房费，却又把房客看作他们生活的入侵者。他们总以一种嫉妒的心态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房客，最终不过是为了剥夺这些房客的归属感。然而房客们出门在外寄人篱下，这恐怕也是无法避免的结果。

布鲁克家的伙食可谓是千篇一律地令人反胃。早餐通常是两片培根和干巴巴的煎蛋，另加一些隔夜切好的带着黑拇指印的黄油面包。不管我如何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布鲁克先生都不让我自己切面包。他还是会一片一片地递给我，而且每片都牢牢地捏在他的黑大拇指间。正餐一般是那种廉价的罐头午餐肉——我估计是他们自家小店的存货，还有白煮土豆和稀饭。下午茶时间会有几块黄油面包，和一些大概从糕饼店弄来的过了期的又干又糙的蛋糕。晚餐也就是一些软塌塌的兰开夏奶酪和一点儿饼干。布鲁克夫妇从来不会把这些饼干称作饼干，他们总是郑重地把它们叫做奶油脆饼——“再来一块儿奶油脆饼吧，雷利先生，搭着奶酪吃一定会合您胃口的”——以此他们便能堂而皇之地掩盖他们晚餐只有奶酪的事实。桌子上永远会有几瓶伍斯特沙司和半罐子果酱。人们不管吃什么，哪怕只是一片奶酪都会沾着酱吃。不过一般都是蘸伍斯特沙司，我从没看见谁有勇气去碰那个无法形容的黏糊糊的沾满灰尘的果酱罐子。布鲁克夫人总是和我们分开吃，但是不论何时，只要我们在用餐，她都会过来吃上两口，并且再来一杯浓茶——她美其名曰“壶底”。她有个不停拿毛毯擦嘴的毛病。我住在那里的最后几天，她开始把报纸撕成条擦嘴。所以每天早晨地板上到处都有报纸揉成的小球，好几个小时都没有人来清理。厨房的味道也无比可怕，不过和卧室的情况一样，你要外出再回来才会有所察觉。

让我震惊的是，这样的小旅舍在工业时代一定是极为常见的，因为所有的房客都没有抱怨。唯一一个表示出不满的是个个头矮小、黑头发、鼻子尖尖的伦敦佬。他是个烟草公司的旅行销售员，以前从未来过北方，而且我估计他不久以前还属于那种待遇优厚，一直住商务酒店的人。这大约是他第一次体验这种底层人民的留宿之地，那种一般旅行销售人员在他们旅途漫漫中的落脚之处。清晨我们在洗漱穿衣的时候（当然他是睡在那张双人床上的），我看见他以嫌恶的眼神环顾了一下这凄凉的房间，之后他撞上我的眼神，便即刻料定我是他的南方同胞。“这

些龌龊肮脏的混蛋！”他咬牙切齿道。之后他收拾好行李，意志坚定地下楼告诉布鲁克夫妇他在这儿住不惯，并且要求立刻退房。布鲁克夫妇自然无法理解这其中的缘由，大惊失色，一脸的受伤。对于他们来说，只这么匆匆住上一晚，不辨原由便要退房离去是多么忘恩负义的事啊。随后的日子里，这件事被加入到他们苦大仇深的故事集中，被一遍一遍以各种姿态讲述着。

在一个早餐餐桌下还放着夜壶的清晨，我决定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开始让我抑郁。不仅仅是因为那些灰尘、异味和令人生厌的食物，更是由于那种一潭死水又毫无意义的衰退的感觉，那些在地底下工作的人散发出的味道如爬虫一般，那是一种被禁锢在充满污秽的劳作和刻薄的抱怨的泥沼之中，一圈一圈兜兜转转无法消散的气息。像布鲁克夫妇这样的人，最让人忍无可忍的是他们对于同一件事情一遍又一遍发着牢骚的方式。这让你觉得他们并不是活生生的人，而像是某种神神道道反复呢喃胡言乱语的幽魂。最后布鲁克夫人那千篇一律、自怜自艾的话语永远都是以“这真的太难了，不是吗？”结尾，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然而即便高喊着布鲁克夫妇这样的人如何恶劣并把他们抛于脑后也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有成千上万像他们这般的人，他们是典型的现代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你接受现在的文明，便无法无视这些人的存在。因为这都是工业时代一手造成的。哥伦布穿越大西洋，第一架蒸汽机摇摇晃晃地开始运转，大不列颠的方阵在滑铁卢举着法式火枪严阵以待，19世纪的独眼海盗一边向上帝祈祷，一边往自己的口袋里捞钱。这些都直接导致了迷宫一般的贫民窟和昏暗的厨房里像蟑螂一样踱来踱去的年迈老人。时不时到这样的地方来感受一下是一种责任，特别是感受一下这儿的气味，这会让你铭记他们的存在。虽然此处不宜久留。

火车载着我行至远方，穿过滔天的煤渣堆、烟囱、成堆的铁屑、肮脏的运河和灰烬上木底鞋留下的纵横交错的脚印。本应是阳春三月，天气却冷得可怕，四周都是黑乎乎的雪丘。我们缓慢驶过城市边缘时，右边路堤处一排排灰暗的贫民窟房子被火车遗留在后面。在一座屋子的后院，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跪在石头上，用一根棍子捅着一根铅灰色的废弃管道。我想恐怕是联通水槽的水管被堵上了。我有幸有足够的时间观察她的全部——她的粗麻布围裙，笨拙的木底鞋，被冻红的手臂。火车经过的时候她抬头望了一眼，距离近到足以让我捕捉到她的眼神。她有一张圆而苍白的脸庞，那种贫民窟姑娘常见的精疲力竭的神色可以让一个25岁的姑娘看起来有40岁。这都是流产和苦力造成的。我看她第二眼的时候，她的眼中透露出我从未见过的绝望与凄凉。我猛然意识到我

们一直所说的“这种苦日子对于他们和对于我们来说是不一样的”和贫民窟的人只知道贫民窟的生活其实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我在她脸上看到的并不是牲畜一般无知的痛苦，她非常清楚她正遭受的一切——对于在凛冽的寒风中跪在贫民窟后院细长的石板上通下水管道的悲惨命运，她和我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不过火车很快驶入了开阔的荒野，这感觉很奇特，甚至有点不自然，好像这荒原是某个大公园。因为在工业发展地带总让人有一种烟雾和尘埃会永远在此滞留的感觉，并且没有一寸地表能够逃离其魔掌。总的来说，像我们这样肮脏的小国家，对于污秽也是习以为常的。渣堆和烟囱应该是比草地树木更为常见的景象。就算是在草原腹地，如果你用一把叉子叉进土里，大概也可以撬起一个瓶子或者一个生锈的罐头。但是在远处雪未被践踏过的地方，厚厚的积雪只留出石墙的顶端，在小山上曲折蜿蜒像是黑色的甬道。我记得劳伦斯[9]写过这一段景色，或者是类似这附近的景色。他写道，白雪皑皑的山丘像隆起的“肌肉”一样绵延至远方。但在我眼里，这些白雪黑墙更像是轧有黑色滚边的白色礼服。

尽管阳光如此明媚地照耀着，雪还是几乎没有融化。躲在火车紧闭的窗户之内竟也觉得一丝温暖。黄历上现在是春天了，一些鸟儿似乎就信以为真了。我人生第一次，在铁路边的一块空地上，见证了一对乌鸦的交合。交合是在地上进行的，而不是我想象中的在树上。它们求欢的方式很特别，雌鸟张着嘴站在原地，而雄鸟在它身边一圈一圈踱步，好像在给她喂食。从布鲁克家里屋的厨房到空旷的被雪覆盖的山坡，才不到半小时的车程，似乎已经是一段漫长的路了。阳光安详地普照着，大鸟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整个工业区是一个庞大的城镇，几乎和大伦敦有着相同的人口。值得庆幸的是这里的地方要大得多，所以中间还留有一些干净像样的土地。这其实是一种令人欢欣鼓舞的想法，因为人们尽管穷其所能，也无法把他们的邋遢遍及每个角落。世界如此之辽远广阔，即便是在这文明的污秽中心，你还是能发现青翠而非灰暗的草地。如果你细心寻找，甚至可以在小溪里找到游弋的小鱼儿，而不是沙丁鱼罐头。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20分钟，火车才从荒原驶入遍布村落的文明地带，之后又开始出现另一个工业城镇的贫民窟、渣堆、吞云吐雾的大烟囱、高炉、运河、汽油表。

---

[1] 黑肚子，即毛肚。

[2] 卤煮店，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常见的一种副食店，提供牛肚、猪蹄、豆子等菜式。

[3] 黄祸，针对亚洲人的一种理论，宣扬黄种人对白人的生活构成威胁。

[4] 行李箱分尸案，1934年发生在布莱顿的两起几乎不相关的行李箱分尸案。

[5] 收入调查，Means Test针对发放政府补助而进行的收入调查。

[6] 6英尺2.5英寸，相当于1.89米。

[7] 一周6便士，Tanner-a-week company.Tanner为1970年以前英国发行的一种价值6便士的硬币。

[8] PAC，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公共账目委员会。

[9] 劳伦斯：大卫·赫伯特·劳伦斯，（1885年9月11日—1930年3月2日），20世纪英国作家，是20世纪英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之一。作品中最著名的包括《儿子与情人》（1913）、《虹》（1915）、《恋爱中的女人》（1920）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

第二章

按照切斯特顿[1]的说法，我们的文明是建立在煤炭上的，你若不停下来仔细想一想，就无法意识到这样的依赖有多严重。那些维持我们生活的机器，以及那些制造机器的机器，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煤炭。在西方世界中，矿工是第二重要的，仅次于耕田的农夫。矿工像一个女像柱[2]，支撑着几乎所有事物不受淤泥污染。因此如果你有机会又不嫌麻烦，值得前去看一看采煤的实际过程。

当你到达矿井下，最重要的就是尽量趁“装填工”不注意时，试着溜去采煤工作面看看。这并不容易，因为当矿井在运作的时候，有人参观是很麻烦的，没有人会愿意让你进去，但是如果你在其他时候去，又会留下错误的印象。比如说在星期天，矿井看起来几乎是很平静的。你应该在机器咆哮、空气黑沉沉的时候去，才可以看到矿工们在做些什么。此时矿井便如地狱一般，或者说至少如我想象中的地狱一般。如果真的有地狱的话，人们总是会联想到灼热的温度、嘈杂的环境、混乱的场面、无边的黑暗、浑浊的空气，还有最重要的，是不堪忍受的逼仄空间。而这些都存在于矿井中，除了火。地下没有火，只有戴维安全灯[3]和手电筒的少许光束隐约穿透浓重的煤尘。

当你匍匐爬过最后一条矿用支柱，终于到了那里（去那里本身就已是一项壮举，之后我会就此说明），看见眼前是一面三四英尺[4]高的闪闪发亮的黑墙，那便是采煤工作面了。头顶上光滑的顶板是煤矿开采完后的岩层，身下的也是岩层，所以你所在的坑道就只有煤层本身这么高，大概是一码[5]多一点儿。此时充斥你耳膜的便是来自传送皮带的震耳欲聋的可怕声音。由于煤尘散射开了灯的光束，你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你可以看见你两边各跪着一排赤膊的人，前后各相距四到五码。他们把铲子插入掉落的煤炭中，然后飞快地从左肩抛掷出，装运到传送带上去。传送带是一条移动的橡胶带，大约几英尺宽，在他们身后一到两码的地方。这条传送带就这样无休无止地运送着一条闪闪发光的“煤河”。在一个大的矿井，一条传送带每分钟可以运送数吨的煤炭。煤炭被送到主巷道上，倾倒入半吨装的木桶中，然后被拖至升降车，运到地面上。

观看矿工工作，你很难抑制住对他们健壮身躯产生的强烈嫉妒感。他们的工作令人生畏，在凡人看来这完全是超人才能完成的工作。不仅是因为他们要装运成千上万吨的煤炭，他们工作的姿势也使工作难度翻了两倍，甚至三倍。他们必须一直这么跪着——几乎一抬起膝盖，头就会撞到天花板——你试一下就知道这意味着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铲煤的工作在站着的时候还相对轻松一点，因为你可以借用膝盖和大腿的力量带动铲子；而当你弯着膝盖的时候，所有的负担都落在了手臂和小腹的肌肉上。其他的环境条件也没有让这个工作好过一点：这里的高温，每一个矿井不一样，有的矿井热得几乎令人窒息；而煤尘堵塞了你的喉咙和鼻孔，积满了你的眼皮；轰鸣不休的传送带在那狭小的空间里简直就是一挺嗒嗒扫射的机关枪。但是矿工工作起来就像是铁人一般。他们看起来真的就像是包裹在煤灰这件光滑外衣下的铁铸的雕像，煤灰粘得他们从头到脚都是。只有当你亲眼看到赤膊的矿工你才会感受到他们有多么健壮。他们大多不高（高大对于这份工作是一种劣势），但是几乎所有矿工都有健壮的身体，宽阔的肩膀连接着纤细而灵活的腰身，小而高耸的臀部和结实的大腿，身上没有1盎司[6]多余的赘肉。在闷热的矿井里，他们只穿一条内裤、一双木底鞋和一对护膝；在最热的矿井就只穿木底鞋和护膝。从外表看你很难判断他们的年龄，年纪最大的可能有60岁，甚至是65岁，但由于他们黝黑而赤裸，看起来都差不多。没有年轻的身体和士兵般的体格是没有办法完成他们的工作的。只要腰上哪怕多几磅的赘肉，就无法一直如此弯着腰了。那样的景象你只要见过一次就终生无法忘却——他们跪下时的体型，弓弩般的线条，全身上下的煤黑色，他们挥动着巨大的铲子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量铲起煤矿。他们一天工作7个半小时，理论上是不间断的，因为没有“休息”的时间。事实上，他们会在轮班时的每个小时抽出一刻钟左右来吃点他们带来的食物，通常是一大块油脂抹面包以及一瓶凉茶。第一次去观看矿工工作时，我伸手碰到了煤灰上一团黏滑的东西，那是一团咀嚼过的烟草。几乎所有的矿工都嚼烟草，据说这样可以防止脱水。

在弄清楚开采流程之前你很可能需要下好几次矿井。这主要是因为光是爬到那里就精疲力尽，无法注意到其他的事情了，从某个方面说来这挺让人失望的，或者至少和你所期待的不一样。升降车是一个铁箱子，大约和公用电话亭差不多宽，但有公用电话亭的两三倍长，你走进升降车，里面一般可以装10个人，像在沙丁鱼罐头里一样紧紧挤在一起，而高个子在里面根本没有办法站直。那扇铁门在你面前关上，上头开升降机的工作人员就会把你降到下面的井里。通常你的胃里会泛起一阵短暂的恶心，耳朵有一种爆裂的感觉，但是在快要到底部前你是无法

感受到你在移动的，当升降车突然间减速的时候你几乎确信它又弹上去了一点。在运行过程中，车厢大约能达到60英里[7]每小时的速度，在深一点的矿井里速度甚至更快。当你从升降车里爬出来时，可能已经在地下400码了，这就相当于有一座中等大小的山正在你上面；数百码的岩石、已灭绝野兽的骸骨、下层土壤、燧石、植物的根、绿色的草还有在草上放牧的牛群——这一切都悬在你的头顶上，只被像你小腿肚一般粗的木头柱子撑着。但是由于升降机下降的速度很快，下降途中又黑得不见天日，你很难感觉到自己已经在这么深的地底下了，甚至还不及在皮卡迪利大街[8]地铁底部感受到的深度。

从另一方面来说，需要在地底下穿过的水平距离倒是长得惊人。在我真正下到矿井之前，我还一直以为矿工走出升降车后就可以在几码外的煤层上工作，没想到他们需要沿着通道爬行相当于从伦敦大桥到牛津广场的距离[9]才能开始工作。当然刚开始的时候，矿井就挖在煤层边，但是在这个煤层挖完后，就会去新的煤层，工作地点就会离矿井底越来越远。井底到煤层的平均距离是1英里，有时3英里也是很正常的，据说也有5英里左右的。这里的距离和地面上的完全没有可比性，因为在这1英里或者3英里中，基本没有可以站直的地方。

直到爬出了几百码远你才意识到这个情况带来的影响。这条地道灯光灰暗，8到10英尺宽，5英尺高，墙壁像是德比郡[10]的石墙一样由岩石厚片组成。沿着这条地道你微微弯着腰开始出发。每1到2码都会有木支柱支撑着的横梁和纵梁，有一些纵梁已经被压弯成惊人的曲线，而你必须低头避开这些。通常脚下也非常不好走，地上有厚厚的尘土或是大块锯齿状的岩石，在一些有水的矿井里，积水像是农场里的一样脏。那里也有煤车的轨道，像是小型铁轨，枕木间距只有一两英尺，因此走起路来非常碍事。所有的东西在尘土下都是灰色的，所有的矿井似乎都散发着一样炽热的尘土味。你会看见一台台根本不知何用的神秘机器，一捆一捆的工具挂在电线上，有时候会有老鼠从灯光下迅速窜走，老鼠在矿井出奇地常见，尤其是在有或曾经有夹石[11]的矿井。也不知道它们最初到底是怎么到矿井里来的，也许是从竖井里掉下来的——他们说老鼠不管从多高的地方掉下来都不会受伤，因为它们的表皮面积相对于体重来说非常的大，不怕摔。当地面上控制着的看不见尽头的钢索牵引着几排煤车缓缓地颠簸前往竖井时，为了给它们让位，你不得不把自己紧紧地贴在墙上。你爬过麻布帘和厚厚的木门，当门开着的时候，会排出一阵猛烈的空气。这些门是通风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风扇会将废气从一个通风井排出去，而新鲜的空气就会自行从另一个通气井吸进来。但

是如果听任空气自行流通的话，那么空气会选择最近的线路循环，深处的巷道就会无法通风，所以所有的这些近路都会被隔开。

刚开始弯腰走路的时候实在是令人发笑，但是这种笑意马上就消退了。由于我的个子格外高，所以行进起来十分麻烦，但是当天花板降到四英尺或者更矮的时候，对所有人来说都变得相当困难了，除非是侏儒或小孩。你不仅仅需要委身而行，还需要时刻抬着头，只有这样才能在看见横梁和纵梁时避开它们。因此，你的颈部一直是抽筋的，但这和你的大腿与膝盖的疼痛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在前行半英里以后这就变成了（我丝毫没有夸张）难以忍受的剧痛。你开始怀疑你究竟能否坚持到最后——更要命的是，你到底要怎么回去。你的脚步开始越来越慢。在前行几百码以后，你来到一片低矮的坑道，必须得用蹲伏的姿势才能继续前行，之后豁然开朗，天花板突然升到不可思议的高度——也许是旧的坠石事发现场——然后整整20码你都可以站直了，放松的感觉铺天盖地而来。但是在这以后会是另外100码的矮坑道，然后又是一连串的横梁，你必须得四肢着地从下面爬过去。但是在蹲伏的姿势以后，即使这样也能算是一种放松，当你终于到了横梁的尽头，试着站起来的时候，会发现你的膝盖暂时罢工了，根本站不起来。于是你可耻地喊了暂停，说你想休息一到两分钟。你的向导（一个矿工）很同情你，他知道你的肌肉和他们的不一样。“只剩下400码了。”他鼓励你说，你感觉他还不如说还有400英里。但最后你终于还是爬到了煤矿开采面。你爬1英里大约花了1个小时，但是矿工却最多不会用超过20分钟。你只好四仰八叉地在煤尘里躺上好几分钟以恢复体力，否则你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神智来观看他们如何工作了。

回程甚至比来的时候还要困难，不仅仅是因为你已经精疲力竭，更是因为回到竖井的路是有一点上坡的。你在通过低矮处时速度慢得像乌龟爬一样，现在你在膝盖罢工时喊暂停也完全不感到羞耻了。甚至你拿着的灯也成了累赘，可能你绊倒时就让它掉在地上，假如是戴维安全灯就熄灭了。你需要花费越来越多的力气来躲开横梁，有时你甚至忘记躲了。你想要像矿工一样低着头前行，于是就撞到了脊椎。即便是矿工们也经常会撞到脊椎。这就是为什么在炎热的、必须半裸着进去矿井里，大多数矿工都有所谓的“背上的领扣”——也就是在脊椎上的永久疤痕。下坡的时候，矿工们有时会把他们下部中空的木拖鞋架在煤车的铁轨上滑下去。在“旅途”很糟糕的矿区，所有矿工都会带上一根两英尺半长的拐杖，把手柄以下的地方掏空，在普通高度的地方把手放在拐杖上端，在低矮的地方把手伸进掏空的一端。这些拐杖帮了很大的忙，再加上一

种木制的安全帽——相对现代化的一项发明，这两样东西简直是神赐之物。安全帽看起来很像是法国或者是意大利的钢盔，但是由某种树心做成，又轻又牢固，即使头部被猛击也没有感觉。当你终于回到地面时，也许在地下待了3个小时，步行了2英里，但感觉比在地面上走了25英里还要疲惫不堪。在之后的一个星期，你的大腿都会异常僵硬，就连下楼都步履维艰，必须用一种绷直膝盖倾斜身子的怪异方式才行。你的矿工朋友发现了你走路时的僵硬姿势，就会开你的玩笑（“在矿井下工作的感觉怎么样，哈？”之类的）。即使是一个矿工，由于生病或者其他事很久没有下井工作，再回去的前几天也会饱受痛苦。

你也许会觉得我言过其实，但一个下过老式矿井（英格兰大多矿井都是老式的）并真正到达过煤矿开采面的人是不会这么说的。而我想强调的是，爬一个来回这件可怕的事，对于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已足够构成一整天的艰难工作了。但是对于矿工来说，这根本就不是工作，这不过像是都市人的日常地铁出行罢了。矿工每天需要爬一个来回，除去中间吃三明治的时间，还要做7个半小时残酷的工作。我从来没有去过1英里以外的煤矿开采面，但是有时候他们需要爬3英里远。也就是说，我以及大多数的非矿工是根本无法到达那里的。很多人都会忽略这一点。当你想到煤矿时，你会想到深度、高温、昏暗、全身被染黑的人影砍向煤墙，但你根本不会想到需要来回爬行的距离。这当然还有时间上的问题，矿工的工作班次是7小时，听起来不算太长，但每天还必须加上起码一小时的“旅途”时间，也经常会是两小时甚至是三小时。当然，严格意义上这趟“旅途”并不算工作，所以也就没有工资，但其实这和工作没什么两样。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说矿工们并不在乎这个，确实，这对他们来说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从小就开始做这个了，他们练就了所有需要用到的肌肉，他们可以在地下灵活得惊人，甚至可以说是可怕了。在我只能蹒跚而过的地方，矿工低着头，跨着大步便跑了过去。在巷道里他们四脚着地，几乎像狗一样跳跃着躲过坑木。但如果你觉得他们这样很享受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曾经和许多矿工都闲聊过这一点，他们都承认这趟“旅途”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只要你听到他们在讨论矿井，这段“旅程”永远都会是讨论话题之一。据说矿工们回来的时候总是比去时快，但他们都说在一天的辛苦工作后还要这样地爬回去是最令人烦躁的。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完成，但显然是非常艰苦的，就好像你要在上班前后分别爬一座小山一样。

下过了两到三个矿井以后，你开始大致明白周围进行的工作流程了（顺便得说一下，我对技术层面的采矿一无所知，只是描述我所看到

的）。煤炭位于两层巨大的岩层中间的薄煤层中，所以本质上来说，采煤的过程就像是把三色冰淇淋的中间那层挖出来。过去矿工们是用镐和铁撬棍直接凿进煤中的，这样的工作速度很慢，因为原生煤矿像石头一样坚硬。而现在初步的准备工作是由电力驱动的采煤机完成的，机器大体上是一把非常坚硬而有力的带锯[12]，水平而非垂直地运作，带锯上有一排几英寸[13]宽、半英寸厚的锯齿。它可以依靠自身动力前后移动，而操作人员可以控制它向各个方向旋转切割。这个机器还顺带发出我有生以来听过的最可怕的噪音，所到之处煤尘喷涌而出，使人根本无法看到两三英尺以外的东西，也几乎无法呼吸。采煤机沿着煤层推进，把大约5～5.5英尺深的煤层全部挖松，这样松动过以后采煤就相对容易多了。当遇到“难以前进”的地方时，就会用炸药爆破。工人会拿着一把像是修路的钻头的缩小版的电钻，在煤矿上相隔一定距离钻上孔，装上爆破炸药，塞上黏土，如果有转角就躲到转角后面（他理应退到25码外），用通电开关引爆炸药。这并不是为了把煤炸下来，只是为了松动一下。当然有时候炸药威力太猛，不仅炸下了煤，还把天花板整个带了下来。

爆破完成后，“装填工”就可以把煤挖出来，铲碎并装上传送皮带。刚开始被送出来的是巨大的岩石块，足有20吨重。传送带将煤炭装上煤车，然后煤车被拖向主巷道，长得看不见尽头的钢索将它拉向升降车。升降车将煤吊起来，到地面上会用滤网对煤进行分类，有必要的话会洗煤[14]。那些页岩杂质会尽可能地用于井下铺路，剩下的都会被送到地面上堆起来。巨大的石堆就像是一座丑陋的灰色的山，这也是煤区的标志性景象了。在之前的机器切割过的煤都被开采完后，煤矿开采面的深度就被推进了5英尺，此时就需要架起新的支柱来支撑新露出来的顶板。在下一个班次的时候，就要拆散传送带，向前挪5英尺然后再重新组装起来。如果可能的话，切割、爆破和开采这三个步骤最好是在三个不同的班次完成。下午切割，晚上爆破（有法律规定，当有其他人在附近工作时是不能进行爆破的，虽然没什么人遵守），然后“装填”安排在早班，也就是从早上6点到下午1点半。

即使你去观看了采煤的流程，也只能匆匆掠过，如果不计算一下，你仍无法意识到“装填工”的工作量有多惊人。通常每个人都要清理4～5码宽的分区，切割机已经将煤挖了5英尺深，所以如果煤层高3～4英尺的话，每个人需要挖掘、铲碎并装上皮带的煤就是7～12立方码[15]。每立方码煤的重量是27英担[16]，那么每个工人运煤的速度就达到了每小时两吨。我有过不少挖和铲的经验，足够让我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当我

在自家花园挖沟时，如果一下午挖了两吨的土，那么我就得好好休息一下了。但是和煤矿相比，土是比较好挖的，而且我也不用跪着工作，不用在1000英尺的地下，冒着令人窒息的高温，每吸一口气都吞下一点煤尘。我也不用在工作前蹲着跪着走上1英里。矿工的工作就像是表演空中飞人，或者是赢得全国越野障碍赛马一样，对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不是体力劳动者，也祈祷上帝永远不要让我成为体力劳动者。但是如果非要我做体力劳动，有一些还是能完成的。我可以凑合做个道路清洁工，不太称职的园丁，或者是最劣等的雇农。但不管付出多少努力或进行多少训练我都不可能变成矿工，这份工作不用几个星期就会要了我的命。

看到矿工的工作，你会马上感受到人们生活在多么不同的世界里，地下的煤矿世界和地上的世界是隔绝的，人们可以对地下世界一无所知而轻松地度过一生，也许大多数人宁愿不要听说地下的世界。但地下世界又是地上世界必不可少的副本，事实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从吃冰激凌到横渡大西洋，从烤面包到写小说，都需要直接或间接地用到煤矿。和平时期的所有行业都需要煤，如果战争爆发了，就更需要煤。在革命时，矿工也需要继续工作，否则革命就得中止。革命需要煤，反动也需要煤。所有在地面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需要采煤工作一直持续，最多不能中断超过一个星期。为了让希特勒可以迈着正步前进[17]，教皇可以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18]，人们可以聚在罗德板球场[19]观看板球运动，诗人可以互相吹捧，都需要有现成的煤，但是我们却基本上意识不到。我们都知道“必须有煤”，但我们很少或从来都不会想到煤是怎么来的。现在我坐在煤火前舒适地写作，已经四月了我仍然需要烤火。每两个星期运煤的车都会开到门口来，穿着皮衣的工人们用散发着煤油味的麻袋装着煤拿进屋子，然后哗啦一声倒进楼梯下的煤库中。只有当我非常难得地做一些特定的思考时我才会把这煤和远方的苦力矿工联系在一起。这就只是煤而已，是我的生活必需品，来自某个没有详细地址的神秘地方的黑漆漆的东西。就像是甘露[20]一样，只不过你需要付钱。你可以开车轻松横穿北英格兰，完全不会想到在你行驶的公路下几百英尺深处，矿工们正在铲着煤，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矿工们在驱动着你的车。他们那个用灯光照亮的地下世界之于阳光照耀的地上世界就像是根茎之于花朵一般必不可少。

就在不久前，矿井的条件比现在还要更糟糕。现在还有一些年轻时在地下工作过的老妇人活着，当时她们腰上绕着挽具，腿间系着链条，四脚着地匍匐着拖动煤车。那时候她们即使怀孕了还是要继续工作。即

便是如今，如果必须孕妇来拉煤车才能产煤的话，我想为了不至于失去煤，我们还是会愿意让孕妇们去工作。当然大多数时候我们会宁可忘了她们正在这样做。所有的体力劳动都是这样，它让我们得以活着，我们却遗忘了它的存在。也许矿工可以比其他工人更能代表体力劳动者，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是那样令人生畏，更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如此不可或缺却又离我们如此遥远，如此不起眼。我们就像是忘记了血管里流淌着血液一般忘记了他们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看矿工工作甚至是令人羞耻的，它能瞬间让你对自己“知识分子”、上层人士的地位产生怀疑。至少在你观看的时候会深刻地认识到，正是这些矿工们卖命工作，上层人士才得以保持上层的优越。你、我以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编辑、诗人、坎特伯雷大主教[21]和《马克思主义入门》的作者某同志——我们所有人都应将我们相对体面的生活归功于地下的穷苦体力劳动者，那些熏黑了双眼，喉咙塞满煤尘，用手臂及小腹钢筋般的肌肉挥动着铲子的体力劳动者。

---

[1] 切斯特顿，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1874年5月29日—1936年6月14日），英国作家，集小说家、评论家、诗人、新闻记者、随笔作家、传记作家、剧作家和插图画家等于一身的全才。

[2] 女像柱，作柱子用的女士雕像，在古希腊雕像中十分常见。

[3] 戴维安全灯，1815年，英国科学家戴维发明的一种安全灯，在矿井里点燃不会引起瓦斯爆炸。

[4] 英尺，英制长度单位，1英尺=0.3048米。

[5] 码，英制长度单位，1码=3英尺=0.9144米。

[6] 盎司，英制重量单位，1盎司≈0.0283千克。

[7] 英里，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1609.344米。

[8] 皮卡迪利大街，英国伦敦的一条主要街道，西到海德公园角，东到皮卡迪利圆环。

[9] 伦敦大桥到牛津广场的距离，直线距离约1千米。

[10] 德比郡，德比郡，英国中部的郡，中部为丘陵，多石灰岩溶洞。

[11] 夹石，又称夹层，指夹于矿体（层）内部和处于紧邻矿体（层）之间的非矿岩石（包括低于边界品位的含矿岩石），其形状呈透镜状、层状或不规则状。

[12] 带锯，应用于木材加工和金属工作，也应用于各种各样的其他材料的切割机。得名于其刀片包含金属带与牙。这条金属带被垂直设置于两个大轮子之间。带锯被使用于切口不规则的形状。其锯曲线的半径由刀片的厚度决定。

[13] 英寸，英制长度单位，1英寸=0.0254米。

[14] 洗煤，洗煤是煤炭深加工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序，从矿井中直接开采出来的煤炭叫原煤，原煤在开采过程中混入了许多杂质，而且煤炭的品质也不同，内在灰分小和内在灰分大的煤混杂在一起。洗煤就是将原煤中的杂质剔除，或将优质煤和劣质煤进行分门别类的一种工业工艺。

[15] 立方码，英制体积单位，1立方码=0.7645536立方米。

[16] 英担，英制重量单位，1英担=50.80234544千克。

[17] 正步走，希特勒认为正步走能够强有力地整顿纪律，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在纳粹党冲锋队内部率先推行普鲁

士军队的正步走。在1933年，纳粹党执政后，正步正式成为了纳粹党卫队和德国国防军的步法。

[18] 教皇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为反对苏联、墨西哥、西班牙反宗教的暴行，决定在1937年3月18日发布“神圣救主”通谕，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错误，他对苏联、墨西哥、西班牙的人民表示同情，提议用天主教义中的爱来代替共产主义欺骗人而实际想夺取政权的行动。

[19] 罗德板球场，罗德板球场是世界板球界最重要的球场，也是国际板球协会（ICC）的总部，始建于1814年，并在同年举办了第一场板球比赛。

[20] 甘露，原文“manna”，指古以色列人在经过荒野时所得的天赐食粮。

[21] 坎特伯雷大主教，全英格兰的牧首，是在大公教会中的圣礼事保持者。他是全英国教会的主教长，又是全世界圣公会的主教长和普世圣公宗精神领袖，主持自1867年起的每十年一度的全世界圣公会主教会议。

第三章

当矿工从矿井里上来时，他的脸是如此苍白，即便脸上布满煤粉也十分明显。这是因为他呼吸了污浊的空气，过一会儿脸上才会恢复血色。对一个刚来矿区的南方人来说，几百个矿工从矿井里面蜂拥出来的场面会让人感到些许陌生与不安。那些疲惫的脸，所有凹进去的部分布满煤粉，显得野蛮剽悍。其他时候，当他们的脸干干净净时，就与其他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他们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这是长时间在地下弯腰行动的副作用，不过他们绝大多数身材矮小，不合身的衣服遮住了他们健美的身材。他们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鼻子上的蓝色疤痕。每个矿工的鼻子和额头都有蓝色的疤痕，一直到死都有。地下的空气里弥漫着煤粉，煤粉钻进伤口，等新皮肤长出来后就会形成一种好似文身的蓝色印记。有些老矿工的前额纹路因此看起来像洛克福奶酪[1]。

矿工一上到地面就会用少量水把嗓子眼和鼻孔里的灰尘洗掉，然后才回家；至于洗不洗澡就要看他们个人的习惯了。以我所见，大部分矿工都喜欢先吃东西后洗漱，如果处在同样的环境里，我也会这样做的。看见一个满脸乌黑的矿工坐着喝茶是件很正常的事，那张涂黑的吟游诗人[2]一般的脸上只有红色的嘴唇因为吃东西的缘故才是干净的。吃完东西后他会装一大盆水有条不紊地清洗，先是手，然后前胸、脖子、腋下、前臂、脸和头（头上的灰是最多的），然后他的妻子用毛巾给他擦洗后背。他只能洗上半截身子，肚脐眼里很可能还留有很多煤粉，可即便这样，想用一盆水勉强洗个澡也是需要技巧的。我下完煤矿以后起码需要满满两浴缸的水才能把自己洗干净，光是把眼皮洗干净就得花上10分钟。

在某些设施比较好的大型煤矿里配备有矿井澡堂[3]，这是个巨大的进步，不仅能让矿工每天舒服而奢侈地洗个澡，而且在澡堂里面他还有两个储物柜，可以把工作服和日常衣服分开，于是只需20分钟他就可以不再像一个黑人，而是穿着体面地骑着车去看足球比赛了。不过有澡堂的煤矿相对比较少，因为一个煤矿不可能永远开采下去，所以没有必要每挖一个煤井就建一座澡堂。我无法给出确切的数据，看起来大约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矿工可以使用矿井澡堂。绝大部分的矿工很可能一周里至少有6天时间腰部以下全都是黑的。他们想在自己家里彻底洗干净几

乎是不可能的。每一滴水都需要被加热，而且在一间狭小的客厅里面包括了厨房、家具、妻子和几个小孩，很可能还有一条狗，哪还有空间再放上一个浴缸。就算用盆子也会把水溅到家具上。中产阶级的人都喜欢说这些矿工就算可以也不会愿意洗澡，可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事实上只要有矿区澡堂，几乎所有矿工都会洗澡。只有那些年纪很大的人除外——他们坚信清洗腿部会“导致腰痛”。而且现有的矿区澡堂全部或部分由矿工自己负担费用，出自矿工福利基金。有时是煤矿公司定期捐款，有时基金负担所有开销。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即便是现在，布莱顿旅馆[4]里的老妇人还是会说：“如果你给那些矿工提供浴缸，他们只会用来装煤。”

让我们非常吃惊的是，矿工们经常会洗澡，因为他们工作与睡眠之间的时间如此之短。那种认为一个矿工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是7个半小时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7个半小时只是实际工作时间，但就像我前面说的，还要加上“旅途”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很少少于1个小时，经常要3个小时。另外大部分矿工在来去矿区的路上还要花去一些时间。工业区的住房紧缺，只有在那些小矿区，房子才绕着矿井，矿工才可以住在矿井边。在我待过的那些大矿区，几乎每个人都是坐巴士上班的；一个星期半克朗[5]的车费是很正常的。有个和我住一起的矿工是上早班的，从早上6点到下午1点半。他不得不凌晨3点45分就起床，然后下午3点多回来。我寄宿过的另一家有一个上晚班的15岁小男孩。他晚上9点动身上班，早上8点回来，吃完早餐以后马上上床睡到晚上6点；所以每天他的空闲时间大约是4个小时——如果你除掉洗澡、吃饭和穿衣的时间，真正空闲的时间还要少得多。

当矿工从一个班次换到另一个班次时，他的家庭也不得不随之调整，这必然相当麻烦。如果他上晚班，那么就是在吃早饭的时候回家，上早班就是在下午回家，而上下午班时到家的时间就是在半夜；当然，无论上什么班次，他一到家就想立刻吃上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我注意到威廉·拉尔夫·英奇牧师[6]在他的作品《英格兰》里批评矿工暴饮暴食。不过就我的观察，他们吃得特别少。大部分和我打过交道的矿工吃得都比我少。他们中不少人说如果开工之前吃得太多就没法工作，他们的便当只是一份快餐，通常是油脂抹面包[7]和凉茶。他们把食物装在一个他们称之为扣罐[8]的扁铁盒子里，挂在皮带上。当矿工深夜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会等着他，不过若是上早班，他就得遵照惯例自己做早餐了。显然，那种认为在早上上班之前看见女人是个坏兆头的迷信依旧存在。据说以前一个矿工要是一大早碰见一个女人，通常他就会转身回家

不去上班了。

在来矿区前，我和很多人一样有种错觉，即矿工们的收入相对还不错。据说一个矿工上一个班次的收入是10～11先令，我们做个简单的乘法可以算出每个矿工的周薪大约是2英镑，一年大约是150英镑。可是认为一个矿工上一个班次收入就有10～11先令是很有误导性的。首先，只有真正的“采煤工”收入才能达到这个水平；而其他工种，比方说负责处理坑道顶的“计日工”收入则要低些，通常一个班次8～9先令。当“采煤工”要按量计酬，即按照1吨煤合算多少钱的时候——很多煤矿都这样算——那么他的收入就要依赖于煤的质量。每出现一次机器故障或者一个断层——即一条岩石带贯穿煤层——都可能令他失去一两天的薪水。但无论如何人们都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个矿工每周要工作6天，一年工作52周。几乎可以肯定，有些时候他是“停工”的。1934年英国所有矿工的平均工资——包括所有年龄段和性别——是每班次9先令1.75便士（数据来源于1935年的《煤矿年鉴》和《煤炭行业名录》）。如果所有人每天都上班，那么矿工的年收入是142英镑多一点，或者说每周将近2英镑15先令。但他的实际收入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因为9先令1.75便士只是实际上班的平均收入，而没有把停工天数考虑在内。

我面前放着一个约克郡矿工1936年初5个星期（非连续的）的工资条，平均周薪大约是2英镑15先令2便士；平均一个班接近9先令2.5便士。但这是冬季的工资条，几乎所有煤矿都是全天不停地开工。当临近春季，煤炭贸易开始停滞的时候，很多人就“暂时停工了”，而其他工作的人每周也会有一两天是停工的。所以一个矿工年收入150英镑甚至142英镑都是明显高估了。事实上，1934年全英国所有矿工的平均年收入只有115英镑11先令6便士。各地区差异也很大，在苏格兰最高可以有133英镑2先令8便士，而在杜伦[9]还不到105英镑，周薪仅仅是2英镑多一点。这些数据摘自刊登在《冷窗》上的约克郡巴恩斯利市市长约瑟夫·琼斯先生的文章。约瑟夫·琼斯先生说：

这些数据涵盖了所有的年轻人、成年人，收入比较低的、比较高的，那些特别高的也包含在内，比如某些高级职员以及那些因为加班多而收入较高的人。

这些数据，因为是平均的，没有办法体现出成千上万实际收入在平均线以下的工人的状态，他们的周薪只有三四十先令，甚至更少。

琼斯先生的话用的是斜体字。但请注意，就算这一点可怜的收入还

只是总收入。所有各种各样的其他费用都要在矿工的周薪里面扣除。下面是一份兰开夏郡[10]很有代表性的每周其他费用列表：

	先令	便士
保险（失业和医疗）	1	5
租用矿灯		6
打磨工具		6
监秤员[11]		9
医务室		2
医院		1
慈善基金		6
工会会费		6
总计	4	5

这中间有一些费用，比如慈善基金和工会会费，可以说是矿工应该给付的，而其他的则是煤矿公司强行征收的。每个地区略有不同。比方说，让矿工付钱租用矿灯这样可恶的事情（每周6便士，一年的租金可以买好几盏矿灯了）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不过费用的总数都差不多。那个约克郡矿工的5张工资单上显示，平均每周的总收入是2英镑15先令2便士；扣掉其他费用以后的平均净收入只有2英镑11先令4便士——每周少了3先令10便士。而且很自然，工资单只会显示出那些由煤矿公司强行扣除的费用；还需要加上工会会费，这样一来扣除费用的总数就差不多要超过4先令了。可以说每个成年矿工的周薪里面要减掉约4先令的其他费用。因此，1934年全英国矿工平均年收入名义上是115英镑11先令6便士，实际则应为近105英镑。与之相对的是，大多数矿工有一些实物补偿——可以以折扣价买自用的煤炭，通常是八九先令一吨。不过根据琼斯先生所说，“全国的平均补贴只折合每日4便士”。而这4便士还常常被往返煤矿的路费抵销掉了。所以从这个产业整体来看，矿工实际可以拿到手的钱约略少于2英镑一周。

那么与此同时，矿工平均每人开采了多少煤呢？

每个矿工的年开采量增幅虽缓慢，却始终稳步上升。1914年每个矿工平均开采253吨；1934年是280吨（数据来源于《煤斗》，《煤矿年鉴》和《煤炭行业名录》给出的数据则略高）。当然这是包括所有工种的矿工在内的平均数；那些实际在煤面工作的矿工开采量比平均数大得多——很多时候每个人的开采量可能会超过1000吨。可就拿280吨这个数字来看，你也会发现这是个多么巨大的成就。把矿工和其他人比较一下就会很清楚。如果我活到60岁应该可以出版30种小说，刚好能填满两层中等大小的书架。而每个矿工在同样的时间里平均可以开采8400吨煤，足够在特拉法尔加广场[12]铺上两英尺厚，或者可以给7个大家庭提供超过100年的燃料。

在我前面提到的5张工资单里，至少3张上面有“死亡扣费”字样的橡皮图章印。通常当一个矿工在工作中遇难后，其他矿工会为他的遗孀做一次捐款，一般是每人一先令，由煤矿公司负责收取并且自动从他们的工资里面扣除，而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橡皮图章印。相比其他行业，采煤行业的事故率如此之高，其伤亡率堪比一场小型战斗。每年900个矿工里面就有一个矿工遇难，6个矿工里面就有1个受伤；当然大部分的受伤都比较轻微，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是完全致残的。这意味着如果1个矿工的工作年限是40年，那么他受伤的概率几乎达到1/7，而死亡率也将近1/20。没有哪个行业有如此大的危险；其次危险的职业是航海业，一个水手每年遇难的几率略高于1/1300。当然我的这个数字是用全体矿工来计算的，因为那些实际在地下工作的矿工受伤几率更加高。与我交谈过的每个从事这一行已有些年头的矿工都或亲身经历过严重事故，或目睹过工友遇难，每一个矿工家庭都会跟你讲他们的父亲、兄弟或者叔叔在工作中遇难的故事（诸如“他掉到了700英尺下面，除了一件新的防水衣什么都没有找到”，等等）。其中有一些故事极其骇人听闻，例如，有个矿工和我说他的同伴，一个“计日工”是怎样被落石埋掉的。他们冲过去想办法把他的头和肩先露出来让他可以呼吸，他当时还活着并同大家说话，不久大家发现坑道顶部即将再次坍塌便不得不赶紧跑开以便保护自己；这位“计日工”第二次被埋了。大家赶紧又一次冲过去让他的头和肩露出来，他依旧活着，又开始和大家说话。没多久坑道顶部第三次坍塌了，这次大家花了好几个小时也没能把他再救出来，而最后，当然，他死了。但和我说这个故事的矿工不觉得这有多恐怖（他自己被埋过一次，不过比较幸运的是他的头卡在两腿之间，所以还有一小块空间给他呼吸）。他所要强调的是，这个“计日工”十分清楚自己工作的地方是不

安全的，每天下去的时候都预感会发生事故。“这个感觉一直在他脑海盘旋，所以上班之前他都会吻一下妻子。她后来告诉我，他这样亲吻她已经二十多年了。”

事故最容易理解的原因是瓦斯爆炸，矿井的空气里或多或少都有些瓦斯。有种很特别的灯可以用来检测空气中的瓦斯，当瓦斯比例过高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矿灯的蓝色火焰检测出来。如果把灯芯拨到最大而火焰还是蓝色，那么就表示瓦斯的比例已经高得危险了；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检测到瓦斯，因为它在空气中的分布很不均匀，经常聚集在岩石裂隙里。矿工在开始工作之前常常会拿着矿灯在所有的角落检测一下瓦斯。爆破作业时的一个火花，凿石头时的火花，一盏坏的灯，或者是“采空区火灾”[13]——聚集在煤粉下面发生的自燃难以扑灭——都会引发爆炸。那些不时发生的数百人遇难的重大矿难常常都是由瓦斯爆炸导致的，所以人们会觉得瓦斯爆炸是采矿时最主要的危险。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事故都来自矿井里日常的危险，特别是塌方。还有“坑洞”——一块大得足以砸死人的石头以枪弹般的速度从圆孔中射出来。在我的记忆中，我所遇到的所有矿工除了一人之外，都认为新式机器和“加快生产速度”常常使工作变得更危险。这其中部分原因或许是因为保守，不过他们可以给出许多理由。首先，现有的开采速度意味着挖进去的那截坑道顶部在几个小时以内是没有支撑的。其次，机器的振动会把所有东西都震得松松垮垮，而巨大的噪音让人很难察觉到危险信号。你得知道，井下矿工的安全很大程度是依靠他们自己的谨慎与技术。一个有经验的矿工声称对不安全的坑道顶有一种直觉，他解释说自己“可以感觉到压在身上的重量”。比方说他能听到支撑物微弱的嘎吱声。木制支撑物仍然比铁制支撑物受欢迎的原因就在于快要坍塌的时候木制支撑物会发出嘎吱声作为警报，相反铁制支撑物会突然倒下。机器发出的巨大声响让人不可能听到任何其他的声音，因而增加了危险。

矿工受伤的时候是不可能得到及时救助的。他们在地底一些可怕的裂缝之下，被数百吨重的石头压住，就算被救出来，也还要在直不起腰的坑道里被拖上1英里甚至更长的距离。通过与曾受伤的矿工交谈，你会发现等到他被送回地面，那已是好几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当然有时还有升降机[14]的事故。升降机以特快列车般的速度上下几百码距离，而操作员待在地面，看不见实际情况。有很精确的指示器可以告诉他升降机的位置，但依旧有可能犯错，所以有时升降机会以最大速度撞击井底。这对我来说是种很恐怖的死法。因为当这个很小的铁盒子在黑暗中呼啸坠落时，里面的10个人总有那么一刻意识到了不对劲；而那被摔得

粉碎的前一刻令人不忍想象。有个矿工和我说有次升降机出事时他刚好在里面。升降机在应该减速的时候没有减速，他们觉得一定是缆绳断了。幸运的是他们最后安全到达了井底，不过爬出来以后他发现自己裂了一颗牙齿——在预感到那可怕撞击要到来之时，他紧紧地咬住了牙关。

除了事故之外，矿工总体而言似乎还算健康，考虑到他们需要强健的肌肉力量，因此很显然也必须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他们容易得风湿病，肺部功能不健全的人在那种充满灰尘的环境中也熬不了多久，但最特殊的职业病是眼球震颤[15]。这是一种眼部疾病，眼球在接近光线时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不停颤动。这大概是在昏暗环境下工作的结果，有时候会导致完全失明。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致残的矿工可以得到煤矿公司的赔偿，有时是一次性赔偿，有时是分每周领取赔偿金。赔偿金的金额不会超过每周29先令；如果不到15先令，伤残矿工还能从失业救济金或者公共援助委员会那里再领一点。如果我是伤残矿工，那么我宁可一次性付清，因为不管怎样我都拿到了赔偿金。伤残赔偿金是不受任何中央资金担保的，所以一旦煤矿破产了，那么这个伤残矿工的赔偿金也就没了，虽然他也是债权人之一。

在维根，我曾经和一个患有眼震病的矿工一起住过一段时间。他可以看到房间对面，不过再远一些就看不清了。过去9个月他每周领到了29先令的赔偿，但现在煤矿公司要改为每周14先令的“部分赔偿”。这完全取决于医生认为他是否适合“地面上”的轻松活。可就算医生觉得适合，显然也没什么活儿是轻松的，但这样一来他就能领取救济金，因而煤矿公司每周可以省下15先令。看着他去煤矿公司领取赔偿金的情景，我不禁感叹，时至今日，身份差别依然能够带来如此巨大的差异。他因为从事一项最不可或缺的工作而近乎失明，无论如何，他也绝对有权领取一份赔偿金。然而他无法提出这样的要求——比方说他没法在自己需要的时候以自己希望的方式领取。他不得不每个星期在煤矿公司指定的时间前去领取，到了煤矿公司以后还要在寒风中等上好几个小时。据我所知，他还要向给他发钱的人脱帽致谢；至少他必须要花上一下午的时间还有6便士的车费。若身为中产阶级，哪怕像我这般潦倒，情况也会截然不同。就算忍饥挨饿，我仍可以因自己中产阶级的身份而得到不错的对待。我挣的比矿工多不了多少，但至少薪水是以某种体面的方式支付到我的银行账户里，并且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取出来。就算我的账户里已经没钱了，银行职员还是会对我较为礼貌。

繁琐且备受羞辱，不停地等待，做什么事情都不得不以别人方便为前提，这是工人阶级的惯常生活。有太多的因素把工人不断压迫成一个很被动的角色。他没法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是被迫按照周围的环境来行事。他感觉自己受制于某种神秘的权威，并且坚信“他们”绝不允许他去做这件事、那件事或者其他事。我在采摘啤酒花的时候曾经问过那些汗流浃背的采集者（他们时薪不到6便士）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工会。我马上被告知说“他们”绝不允许这样做。我问，“他们”是谁？没人知道，但很明显“他们”是无处不在的。

出身中产阶级的人在生活中都会有些有限度的合理期望。因此，面对压力，“受过教育的”人往往会挺身而出。他们在此方面并无天生禀赋，所受的“教育”也通常没什么用处，但他们习惯于受到尊重，且具备当指挥官所必要的小聪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都被认为理所当然地要上前线。在利沙加勒[16]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里有一个很有趣的段落，是描写巴黎公社被镇压后进行枪决的情形。当权者开始枪决带头的人，可他们不知道谁是带头的人，他们挑选的原则是出身较好的那些人可能就是带头的。一个军官经过一排囚犯，把看起来比较像的那些挑了出来。有个人被枪决是因为他带了一块手表，还有一个是因为他“有张聪明的脸孔”。我应该不会因为有张聪明的脸而被处决，不过我承认，几乎所有反抗运动中，其领袖往往是那些能够正确地发H音的人。

---

[1] 洛克福奶酪，一种产自法国南部的绵羊奶蓝纹奶酪。

[2] 吟游诗人，原文Christy-minstrel，一个19世纪的美国黑人乐团的名字。

[3] 矿井澡堂，原文pithead baths。

[4] 布莱顿旅馆，原文Brighton boarding-house，Brighton，位于英格兰南部海滨；boarding-house，俗称B&B，可以短租，也可以长租，提供膳食。

[5] 克朗，5先令旧币，相当于60便士。

[6] 威廉·拉尔夫·英奇牧师，威廉·拉尔夫·英奇（1860—1954），英国高级教士和作家，被称为“忧伤教长”。

[7] 油脂抹面包，一种英国的传统食物，把猪油或牛油蘸着面包一起吃。

[8] 扣罐，一种带扣的容器。

[9] 杜伦，英国北部城市。

[10] 兰开夏郡，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郡。

[11] 监秤员，代表矿工核对煤矿验重员测重是否准确。

[12] 特拉法尔加广场，英国伦敦最著名的一个广场，是19世纪初为了纪念著名的特拉法尔加海战而修建的。

[13] “采空区火灾”，采空区是由人为挖掘或者天然地质运动在地表下面产生的“空洞”，煤矿开采过程中采空区存在

大量遗留的浮煤，浮煤的存在为煤矿自燃提供了物资条件。

[14] 升降机，原文Cage，矿井里的升降机。

[15] 眼球震颤，简称眼震，是一种不自主的、有节律性的、往返摆动的眼球运动。常由视觉系统、眼外肌、内耳迷路及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引起。

[16] 利沙加勒（1838—1901），法国记者，1871年巴黎公社参加者。

第四章

穿过工业城镇时，你会在迷宫中晕头转向。这个迷宫到处都是被烟熏得发黑的小砖房，包围在毫无规划的泥泞胡同和灰不溜秋的院子中，院子里到处都是臭气熏天的垃圾箱、成堆待洗的脏衣物，还有半废弃的厕所。房子的内部结构大同小异，房间数目一般在两间到五间。房子的客厅很相似，面积10～15平方英尺，带一个开放式厨房；稍大的房子会有个洗涤间，小的那种则把水槽和龙头安在客厅里。房屋后面是院子，或者几个房子共用一个院子，大小刚够容纳垃圾桶和厕所。没有一个房间是通有热水的。尽管住在这里的都是矿工，每天只要工作就会从头到脚弄得黑乎乎，可我想，即便你顺着这些街区走上几英里也找不到一间可以洗澡的房子。在厨房里装一个热水系统其实很容易，但是建造者为了能让每套房屋节省大约10英镑就没有装，而且建房的时候压根就没人想过矿工也是需要洗澡的。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的房子年代都已久远，至少五六十年了，以正常标准来看大多数都不适合居住。它们继续出租仅仅是因为没有其他可以住的地方了。工业区住房的最根本问题不在于这些房子窄小、难看、不卫生、不舒适，抑或它们在喷着废气的工厂、臭气熏天的运河和硫黄烟滚滚的矿渣堆围绕着的脏得可怕的贫民窟里——尽管这些都是事实——而在于没有足够的房子。

“住房紧缺”虽是自大战以来反复出现的问题，但那些每周收入高于10英镑，甚至只有5英镑的人对此并没有什么切身体会。当租金很高的时候，找房子不难，但找租客比较难。溜达在伦敦富人区的任何一条街道，你都能看见半数房屋的窗户上写着“出租”的字样。但在工业区，住房问题却成了贫困带来的最大麻烦之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忍受一切——千疮百孔的贫民窟、讨厌的臭虫、腐烂的地板和开裂的墙，还有吝啬房东的勒索和中介的敲诈——只为了找到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我曾经住过一些特别糟的房子，是花钱请我也住不了一个礼拜的那种，我发现里面的房客已经住了二三十年了，而他们心心念念的就是希望自己运气够好，能在这儿一直住到死。这些状况一般都被视为理所当然，虽然不总是如此。有些人似乎根本不知道世上存在像样的房子，把臭虫和漏水的屋顶当做上帝的旨意；另一些人则尖酸地谩骂他们的房东。但

所有人都死死地守住自己的住处，以免更糟的情况发生。因此，只要房屋短缺问题还在持续，当地政府就无法采取行动改善现有房屋的居住条件。他们可以给某栋房子“判死刑”，但在房客们租到其他房子前都不可能强制将它推倒；于是，这些被判了死刑的房子仍旧立在那儿，且变得更糟，因为房东不会在一所迟早要被拆掉的房子上浪费太多精力。比方说，在维根这样的小镇上，很多年前就打算拆除的房子超过两千幢，如果有可能建新的房子取而代之的话，那么整个镇上的房子将全部被推倒。那些像利兹和谢菲尔德的小镇拥有成千上万这种“背靠背”式的房子，它们属于危房，但几十年后仍会屹立不倒。

我看过许多不同矿区村镇的房子，并记下了它们的主要问题。我想，随机挑选一些笔记就可以充分描述这些房子究竟是什么状况。它们不过是只言片语，后面我会再做详细解释。以下是一些关于维根地区房子的记录。

1.位于沃尔盖特区的房子。只有一侧门窗，后墙封死。上面一间，下面一间。起居室大概12英尺长、10英尺宽，楼上的房间面积相同。楼梯下的空间大概5英尺长、5英尺宽，可用作储藏室、洗涤间和煤仓。房间的窗户可以打开。距离厕所50码。租金4先令9便士，税2先令6便士，总共花费7先令3便士。

2.附近的另一所房子。面积和上面提到的差不多，但楼梯下的可用空间，只是凹进去2英尺以便放置水槽——没有空间做储藏室等等。租金3先令2便士，税2先令，总共花费5先令2便士。

3.位于斯科尔斯区的房子。危房。上面一间，下面一间。房间15英尺长、15英尺宽。水槽和龙头安在起居室里，煤仓在楼梯下。地板下陷。窗户不能打开。房间很干爽。房东很好。租金3先令8便士，税2先令6便士，总共花费6先令2便士。

4.另一间位于附近的房子。上下各两间，有煤仓。墙壁完全脱落。楼上的房间渗水很严重。地面不平整。楼下窗户开不了。房东不好。租金6先令，税3先令6便士，总共花费9先令6便士。

5.位于格里诺街的房子。上面一间，下面两间。起居室13英尺长、8英尺宽。墙壁开裂并且漏水。后面的窗户开不了，前面的可以。住了10个人1户的家庭，其中8个是年纪差不多大的小孩。因为人太多，市政当局努力想把他们赶走，但因为找不到其他地方安置而作罢。房东不

好。租金4先令，税2先令3便士，总共花费6先令3便士。

维根地区的记录就这么多。我还有很多页类似情形的记录。下面是关于谢菲尔德的一个数以万计的“背靠背”式房屋的典型例子。

房子位于托马斯街。背靠背，上面两间，下面一间（亦即房屋有三层，每层一间）。下面有地下室。起居室长14英尺、宽10英尺，上面的房间大小相同。水槽在客厅。顶层没有门，但是有开放式楼梯。客厅的墙壁有点发潮，顶楼的墙面开裂，每一面都在渗水。房间昏暗，必须整天开着灯。电费每天估计在6便士（可能有些夸大）。家里住了6个人：父母和四个孩子。丈夫（受助于公共援助委员会）是个结核病人。一个小孩住院，其他孩子看起来都挺健康。在这里住了7年。希望搬走，但没有别的房子可以搬。租金6先令6便士，含税。

以下是巴恩斯利的相关记录。

1.位于沃特利街的房子。上面两间，下面一间。起居室长12英尺、宽10英尺。水槽和龙头安在起居室，煤仓在楼梯下。水槽几乎被磨平，水常常溢出。墙壁不太坚固。一盏投币瓦斯灯。房间非常暗，瓦斯灯每天估计要花上4便士。楼上的两间房实际上是由一个大间分隔而成。墙壁很糟糕——后面那间的墙壁整个都裂开了。窗框基本朽烂，以致不得不用木头塞住。很多地方都漏雨。下水道经过房子底下，夏天的时候非常臭，但是政府却说他们“无能为力”。房间住了6个人：2个大人和4个小孩。最大的15岁，倒数第二小的去医院做检查，被怀疑患有结核病。租金5先令3便士，含税。

2.位于皮尔街的房子。背靠背，上下各两间，有一个很大的地窖。起居室带龙头和水槽。楼下的另一个房间也是同样大小，本来是要做客厅的，但是被用作卧室。楼上的房间和下面的差不多大。起居室非常暗。瓦斯灯估计每天要花上4.5便士。距离厕所70码。8个人睡4张床——两位年老的父母，两个已成年的女儿（大的27岁），1个小伙子和3个小孩。父母一张床，长子一张，剩下的5个人睡余下的两张床。臭虫很多——“当它们爬出来时，你根本没办法弄死它们”。楼下的房间脏得难以形容，楼上的气味让人实在无法忍受。租金5先令7.5便士，含税。

3.位于梅普威尔（靠近巴恩斯利的一个小矿村）的房子。上面两间，下面一间。起居室长14英尺、宽13英尺。起居室带水槽。墙上的灰泥已经开始脱落。烤箱没有架子。瓦斯有点轻微泄漏。楼上的房间都是

长10英尺、宽8英尺。4张床（6个人睡，都是成年人），但是“有一张不能用”，估计是因为床上用品不够。靠近楼梯的房间没有门，楼梯又没有扶手，所以当你下床的时候，你的脚是悬空的，并有可能摔到10英尺下的石头地板上。楼板严重干裂，你都可以透过地板看到楼下的房间。有虫子，但是“我拿羊用驱虫水把它们杀死了”。房前的土路就像烂泥堆，据说冬天几乎没法走。院子尽头的厕所已呈半废弃状。房客在这里住了22年。拖欠了11英镑的租金，为此每周需要额外给付1先令。房东现在拒绝这样，多次要求他们搬走。租金是5先令，含税。

诸如此类的，我可以举出大量例子——倘若有人想在工业区逐户调查的话，会发现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另外，我要对我提到的说法做些解释。“一上一下”指的是每层都有一间房子——即一栋两居室的房子。“背靠背”式的房子是两栋一体式房屋，房子的前后每一面都是1户人家的正门，所以如果你走过一排房子，看上去似乎是12幢，但实际却是24幢。前排的房子面向街道，后排的则朝向院子，每栋房子只有1个出口。这样的建筑特点所造成的不便是显而易见的。厕所位于后面的院子里，所以，如果你是住在朝街的这一面，去厕所或者倒垃圾你都得先出门走到街的尽头再拐进来——距离大约有200码左右；不过，如果你住在后面，触目所及的风景只能是一排厕所。还有一些房子叫做“后墙封闭”型，那是些单房，但是建造者没有造后门——显然是故意的。窗户打不开是老矿区房屋的特点。有些镇被之前的开采严重破坏，地面不断下陷，上面的房子开始倾斜。在维根，你会发现你经过的成片的房子都以令人吃惊的角度倾斜着，它们的窗户都偏离水平线10～20度。有时前面的墙体向外凸出就好像怀孕了7个月一般。表面是可以整修的，但是翻新以后墙体很快又凸了起来。一旦房子突然下沉，窗户就会被卡住，门也得重修。当地人对此已习以为常。有个好笑的故事，说一个矿工下班回到家，发现他只有用斧头把门砸开才能进去。有些时候我会注明“房东比较好”和“房东不太好”，因为这些贫民区住户口中描述的房东差异很大。我发现——有人或许已经料到了——小房东通常是最糟糕的。这么说或许不招人待见，不过你能够明白其中缘由。按照人们的想象，贫民区最差的房东理应是肥胖的邪恶男人，很有可能是个主教，靠着昂贵的租金敛得巨额收入。实际上，最差的房东往往只是个贫穷的老妇人，用毕生的积蓄买了三套贫民区的房子，自己住一套，依靠另外两套的租金勉强生存——因此，根本没有什么钱去维修保养。

这样简单的记录只是用来提醒我自己的。再读到它们的时候，会让我想起曾经看到过的场景，而它们本身无法充分说明北方那些可怕的贫

民区里的条件如何。文字是如此无力，什么叫“屋顶漏水”或者“8个人睡4张床”？你的眼睛扫过这些词以后，不会留下什么印象。但这些词里包含着多大的痛苦啊！例如人满为患吧，你经常会遇到8个甚至10个人住在1套3居室的房子里。其中的1间是客厅，可能有12平方英尺，里面包括厨房、水池、1张桌子、几把椅子和1个餐柜，再没什么空间容得下1张床。所以这8到10个人就要睡在两间小房间里，至多4张床。如果其中有需要工作的成年人，情况就更加糟糕。我记得在1间房子里，3个成年的女孩共用1张床，在不同的时段上班，其中1个起身或者下班回来都会打扰到其他两个；在另一间房子里一个年轻的矿工上晚班，白天在小床上休息，而另一个家庭成员则是晚上休息。若有成年的孩子的话就更加困难了，你不可以让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睡在同一张床上。我拜访过的一个家庭中有父母亲、1个儿子和1个17岁大的女儿，总共只有两张床。父亲和儿子睡1张床，母亲和女儿睡1张床，要避免乱伦危险的话只能这么安排。房顶漏水和墙壁开裂也是问题，在冬天，这使得有些房间几乎无法居住。此外还有虫子。只要虫子进了屋，就会一直待到房屋倒塌，没什么办法能将它们彻底消灭。还有就是窗户不能打开。我不需要解释，夏季在一个小小的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因为做饭而或多或少要烧火究竟意味着什么。另外背靠背的房子还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去厕所或垃圾箱要走50码，这着实不利于保持清洁。住在前排房子里的——只要是市政疏于管理的小街小巷——女人们养成了把垃圾扔到门外的习惯，于是排水沟里总是布满了茶叶和面包屑。此外，不妨设想一下那些在后排房子里长大的孩子们的情形，他们目力所及的只有一大排厕所和一堵墙壁。

在这种地方，女人只是做着无穷无尽工作的可怜苦力。她们或许可以打起精神，但没有办法保持干净和整洁。总有事情要做，做什么事都不方便，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你刚给一个小孩洗完脸没多久，另一个又脏了；这一顿饭的碗还没洗好，下一顿又来了。我拜访过的家庭之间差别很大。在那种环境下，有些房子还是能够保持得体的，另一些则恶劣不堪，以致我压根就不想对其详尽描述。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难以形容的气味，又脏又乱！这里满满一桶脏水，那里满满一盆没洗的碗，还有一些碗堆在角落里，到处都散落着碎报纸，屋子中央总是放着一张邋遢的桌子，盖着一层黏糊糊的油布，桌上凌乱地堆着炊具、熨斗、织补了一半的长袜、几片陈面包和几块用油乎乎的报纸包着的奶酪！房间很拥挤，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成了一段穿行于家具间的艰难旅程，挂着的湿衣物每次都会打在你脸上，而小孩子们就像脚下疯长的蘑菇一样！这些场景从我的记忆中鲜活地浮现出来。小矿村里一间小屋的

起居室，家徒四壁，全家失业，每个人看起来都营养不良；家里成年的子女们无所事事，每个人都长得异常相似，都有一头红发，骨骼分明，脸因为营养不良、百无聊赖而显得苍白干瘦；那个高个的儿子无精打采地坐在壁炉边，甚至没有注意到陌生人的到来，慢慢地从没穿鞋的脚上脱下一只脏袜子来。在维根一间糟糕的房子里，家具看起来就像是用货箱和木桶板子做成的，好似要散架了一般；一个脖子乌黑、头发散乱的老妇人操着兰开夏郡的爱尔兰口音骂着她的房东；她的母亲，已经90多岁了，坐在充当马桶的木桶上，仰着一张发黄、呆滞的脸，目光空洞地望着我们。类似的场景我可以足足写上好几页纸。

当然，这些人的房子邋遢不堪有时得归咎于他们自身的原因。即便你住在这种背靠背式的房子里，有4个小孩，每周的收入只有从公共援助委员会领到的32先令6便士，也并不意味着无需清倒客厅的尿盆。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环境是无法唤起他们的自尊心的。小孩的数量是决定因素，我见过室内环境比较好的通常是没有小孩的家庭或者只有一到两个小孩的家庭；换句话说，一栋只有6个房间的房子如果有6个小孩，想保持房间的得体是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楼下从来都不是最脏的地方。你或许看过不少房子，甚至是失业者中最穷困的家庭的房子，并由此产生了某种错觉。你或许会觉得，倘若这些人仍有不少家具和餐具，那么家境一定不至于太潦倒。然而，楼上的房间才真正暴露了这些家庭的贫困状况。这些人是出于自尊心才尽力保留起居室的家具，又或者因为床上用品更容易典当，我不知道，但我看到过的不少卧室的确非常糟糕。对于那些常年失业的人来说，拥有一整套的床上用品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的家里通常没有可以称之为床上用品的东西——不过是锈迹斑斑的铁架床上放着一堆旧大衣和破布罢了。这种情况下，家里的人多，会更加麻烦。我知道的一家，有4口人，父亲、母亲和两个小孩，有两张床，但只睡其中的一张，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床上用品铺设另一张床。

如果有谁想领教住房短缺的最糟情况，不妨去看看北方小镇那些数量庞大的大篷车。自从开战以来，在完全没有办法找到房子的情况下，有一部分的人口涌入了由固定式大篷车组成的临时住所里。例如，人口8.5万的维根，周边大约有200辆大篷车，每辆车里有一家人——合计约1000人。很难准确地计算出整个工业区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大篷车居住地。当地政府对此只字不提，就连1931年的人口普查报告似乎也对此忽略不提。不过，到目前为止，通过调查我还是发现，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一些较大的城镇都能看到类似的情况，更远的北方或许也一样。可

能整个英格兰北部有数千个，或许数万个家庭（不是个人），除了一辆固定大篷车外无处居住。

但是“大篷车”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误解。它会使人想起一幅温馨的吉卜赛营地的画面（当然，是在天气宜人时），燃烧的火堆发出噼啪声，小孩捡拾着黑莓，挂着一排排五颜六色的衣物。那些在维根和谢菲尔德的大篷车居住地可不是这个样子。我看过一些，我非常认真地观察过维根的居住地，除了在远东，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脏的地方。的确，我一看见大篷车就立刻想起了缅甸的印度苦力们住的肮脏的狗窝。但是事实上，东方的一切远没有这里这么糟，因为那里没有我们这里的刺骨、潮湿和阴冷，阳光是很好的消毒剂。

维根肮脏的运河沿岸是一片片的废弃荒地，驻扎于其上的大篷车好似从垃圾桶里抛撒出的垃圾。它们中的一些的确是吉卜赛大篷车，年久失修。大部分都是老式的单层巴士（10年前那种很小的巴士），取掉轮子而用木头支撑着。有些只是车皮，顶上是半弧形的薄板，再蒙上帆布，于是里面的人和外面的空气之间只有帆布相隔。篷车内部通常有5英尺宽、6英尺高（我在任何一辆车里都没法完全站直），6到15英尺长不等。有些我觉得只能住一个人，但是我从未见过里面少于两个人的，有的还住着1个大家庭。比方说，有一辆车14英尺长，住了7个人——7个人住在450立方英尺的空间里；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全部居住空间比一个公共厕所的隔间还要小。除非亲眼看见，特别是亲自闻到那个气味，否则你着实难以想象这些地方的肮脏与拥挤。每辆车子里都包括一个很小的简易厨房，并且塞满了家具——有时是两张床，更多的时候是一张，全家人尽可能地挤在一起睡。睡在地上几乎是不现实的，因为下面非常潮湿。有人给我看过一张床垫，到早上11点还是湿得可以拧出水。冬天车里非常冷，厨房里不得不白天黑夜都生着火，不用说，窗户根本开不了。居住地的水一般是取自消防栓，有些大篷车住户不得不走上150或200码去打一桶水。这儿根本没有什么卫生设施。大多数人是在大篷车外的一小块地上弄了一个简易的小棚当做厕所，每个星期挖一个深坑来埋掉这些排泄物。我在这些地方见到的所有人，特别是小孩，都脏得难以形容，我毫不怀疑他们的体质也很差，没有别的可能。当我在大篷车间进进出出的时候，总有个念头困扰着我，如果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有人死了会怎么样？当然，这样的问题你是不太好问的。

有些人在大篷车里住了很多年。理论上政府正着手废除这些大篷车聚集地，让这些人搬进房子里住，但是房子并没有建好，所以大篷车仍

然存在。大部分和我交谈过的人都放弃了能住上一所像样的房子的想法。他们都没有工作，一份工作和一所房子对他们来说都是渺无希望的事情。有些人几乎不太关心，而有些人则十分清楚自己的情况是多么糟糕。有一张女人的面孔总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憔悴而瘦削，显得非常痛苦和落魄。当时我在那个猪窝般可怕的篷车里，她正努力让她的一大群孩子保持干净，她当时的感觉一定就如同让我浑身沾满粪便时的感受那样。有一点必须记得，这些人并不是吉普赛人；除了在这出生的小孩，他们全都是体面的英国人，曾经有他们自己的房子；另外，他们的大篷车比那些吉普赛人的差很多，而且无法移动。毫无疑问，尚有些中产阶级的人认为他们底层社会的人不会在意这些事情，如果他们坐火车经过这些大篷车居住地，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这些人是自己选择住在这里的，我现在从不和这种人争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住在大篷车里的人并不能因此而省下钱，因为他们付的租金和住房子的是差不多的。我从没听说租金低过每周5先令的（200立方英尺的地方需要5先令），甚至有的租金高达10先令。有人一定从这些大篷车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不过，导致大篷车依旧存在的直接原因是房屋短缺而非贫困。

我曾经和一个矿工聊天，问他居住的地方房屋短缺的情况是何时变得严重的，他说“就在他们告诉我们的时候”，这意味着如今人们的要求是如此之低，以致不管多么拥挤他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他还说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家11个人睡在一间房子里，他也没觉得有什么，再后来，在他长大以后，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个老式的背靠背式房子里，去上厕所不仅要走上几百码的路，而且到了以后还得排队，这个厕所是36个人共用的。他的妻子生病了，病得都快没命了，她依然需要走200码的路才能到达厕所。这就是他说的人们可以忍受的那类事情——“直到有人告诉他们”。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没有人再认为11个人睡一间房是可以忍受的，甚至那些收入丰厚的人也会隐约被“贫民窟”的问题所困扰。因此，战后我们会不时听到谈论“重新安置”和“拆除贫民窟”的声音。主教们、政治家们、慈善家们和其他这类人喜欢做秀式地谈论“拆除贫民窟”的问题，因为这样他们便可以将大家的注意力从更严重的问题上转移开去，就好像拆除贫民窟你就能消灭贫困一样。但是所有的讨论带来的成果都微乎其微。目前看来，拥挤的情况比十几年前好不了多少，可能更糟。不同城镇在解决住房问题的速度上很不一样。有些城镇的房屋建设几乎停滞，而另一些城镇的建设速度非常快，私人业主正逐渐失去生意。比如利物浦就已经大规模重建了，主要是政

府在做。谢菲尔德也同样开始大规模拆除，并以极快的速度重建——尽管考虑到其贫民窟乱七八糟的状况，重建速度或许还不够快。1936年开始，谢菲尔德重建过程中的政府房数量为1398间。据说，要想完全取代贫民区，谢菲尔德需要至少1万间房。

我不知道为什么重新安置工作总体进展得如此缓慢，为什么有些城镇申请建设贷款会比其他城镇更轻而易举？这些问题需要那些比我更了解地方政府事务的人来回答。一间政府房的成本通常为300～400英镑，而直接生产成本比按合同建造的低很多。这些房子的租金平均是20多英镑一年，不含税。所以有人会觉得，即便算上管理费用和贷款利息，政府也能收回足够的资金以便按需盖房。当然，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房子会租给拿公共救济金的人，所以政府人员要做的仅仅是左口袋出右口袋进的事情——例如，以救济金的形式把钱发出去，用租金的形式把钱又拿回来。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发放救济金，而现在他们付的一部分还被私人业主给吞了。导致房屋建设速度缓慢的原因，一是资金短缺，二是选址困难——因为市政住房不是单独一栋就可解决问题的，而是要成片建设，有时一次要建数百栋。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点是，很多北方城镇在急需住房的同时却怡然自得地建起了巨大奢华的公共建筑。比方说巴恩斯利镇，最近花了将近15万英镑建了一座新的市政大厅，尽管他们需要至少两千套新的工人阶级住房，更不用说公共浴室了。（巴恩斯利的公共浴室有19个男式浴缸——这个镇有7万居民，大部分是矿工，他们的家里都没有浴室！）政府本可以用15万英镑建造350间政府安置房，还剩下1万英镑去建造一座市政厅。然而，正如我所说，我不理解当地政府的想法。我只是将房子紧缺而建造速度却慢如蜗牛的事实记录下来。

当然，住房还是在继续建造，政府建的住宅小区是一排排红色的小房子，鳞次栉比，像极了两排豌豆（这种形容方式是从哪儿来的？豌豆可比这些房子有个性多了），这是工业城镇郊区的典型特征。这些房子究竟怎么样，与贫民区的房子相比如何，通过我日记里的两段记录就可以一目了然。房客对于房子的看法截然不同，所以我挑选了一个喜欢的和一个不喜欢的记录。这些都发生在维根，都是最便宜的“无客厅型”的房子。

1.在比奇山住宅区的房子。楼下：大起居室，带壁炉、橱柜、固定梳妆台，组合地板。小过道，比较宽敞的厨房。从政府处租用的最新式的电炊具，和燃气炊具同样的价格。楼上：两间稍大的卧室，一间小的

——只适合做储物间或临时卧室。带浴室、厕所，有冷、热水。小花园：住宅区里的每一个花园都不一样，不过大多数都比一块小菜地还要小。家里有4个人：父母亲和两个小孩。丈夫的工作不错。房子建筑质量很好，看起来很舒适。限制颇多。禁止饲养家禽或鸽子、收留房客、转租或者在搬离市政房之前经商（收留房客这一条很容易控制，其他条款则不然）。住户对房子非常满意并引以为豪。这个小区的房子都保持得很好。市政当局维修得不错，但是要求住户保持房子的整洁，等等。租金11先令3便士，含税。到镇上的车费是2便士。

2.在威利住宅区的房子。楼下：起居室长14英尺、宽10英尺，厨房非常小，楼梯下的储藏室也很小，浴室虽小但相当不错。配有燃气炊具、电灯和户外厕所。楼上：一个长12英尺、宽10英尺的卧室，带一个很小的壁炉，另一间同样大小，但没有壁炉，还有一间长7英尺、宽6英尺。最好的卧室带有一个入墙式的小衣柜。花园大概有20码长、10码宽。家里有6口人，父母和4个小孩，最大的儿子19岁，最大的女儿22岁，除了最大的儿子，其他人都没有工作，住户非常不满。他们抱怨房子很冷，窜风而且潮湿。起居室的壁炉供暖不足，还会把房子弄得很脏——原因是安装得太低。最好的那个卧室里的壁炉太小，起不了什么作用。楼上的墙壁开裂。由于最小的卧室毫无用处，5个人睡在一个卧室里，一个（最大的儿子）睡在另一间。在这个住宅区，花园全都废弃了。租金10先令3便士，全包。距离镇上1英里多一点——这里没有巴士。

我还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但这两个已足够，因为各地由市政当局建造的房子相差不大。但有两点是很明显的。第一，最差的政府房也比贫民区的房子要好很多。单单是拥有浴室和小花园这一点就足以弥补其他任何不足。第二，房租贵得多。一个原本每周付六七个先令住在危房里的人如今搬进政府住宅，每周支付10个先令的情况十分常见。这只会影响那些有工作的或者最近要有工作的人，因为如果一个人受助于公共援助委员会，他的租金就设定为他的救济金的四分之一，如果超过了这个数，他还可以获得一份额外的补贴；不过，某些级别的政府房是不允许领取救济金的人住的。但不管你有工作与否，还是有其他因素使得住在政府房里需要巨大的生活花费。首先，由于房租高，这里的商店不仅少而且物品售价更贵。其次，远离肮脏拥挤的贫民区的独立大房子，房间会冷很多，不得不烧更多的燃料。再次，对于一个工作的人来说，还需要支付往来镇上的开销。上述问题中的最后一点也是拆迁安置最显著的麻烦之一。贫民区拆迁意味着人口的迁移，当你进行大规模重建时，结

果就是空出城镇中心，把人口重新分散到郊区。这固然是个不错的办法，你让人们从恶臭的小胡同搬到了可以呼吸的地方；但是从这些人自身的角度来看，你所做的就是把他们扔到离上班地点5英里以外的地方。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建公寓。如果人们住在大的城镇里，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在彼此的楼上生活。但是北方的工人不大接受公寓；他们甚至轻蔑地称这些公寓为“廉租房”。几乎每个人都会和你说他“想要一套自己的房子”，显然，对他们来说，一幢绵延100码的连体房屋中的一间比半空中的公寓更像“他们自己的房子”。

回到我刚刚提及的两套政府房中的第二套。住户抱怨房间又冷又湿。也许房子真的粗制滥造，但也有可能是他夸大其词。他从我之前看到过的位于维根城中的一间破烂小屋里搬到这里；尽管他非常努力才申请到一所政府房，但住了没多久又想回到贫民区。从表面上看起来这像是在吹毛求疵，但背后包含着相当真实的不满。很多时候，也许是多半时候，我发现住在政府房里的人们并不喜欢这些房子。他们很高兴可以离开臭气熏天的贫民区，也知道小孩子有地方可以玩耍会比较好，但他们没有家的感觉。例外的是那些工作比较好的人，还有那些“上等”人，他们可以多花一点钱在燃料、家具和旅途上。其他那些典型的贫民区居民，很怀念乱七八糟却温暖的贫民区，他们抱怨“在偏远的郊区”，即在城镇的边缘，他们在“挨饿”（受冻）。当然大部分的政府房在冬天都非常阴冷。我去过的有些房子，坐落在没有树的黏土坡上，顶着凛冽的寒风，对居住者而言，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并非像大腹便便的中产阶级所臆想的那样，贫民区的居民们自己想这么脏、这么拥挤。（比方说看看高尔斯华绥的《天鹅之歌》里关于贫民区拆迁的对话，小说借一个慈善的犹太人之口说出了食利阶层的观念，即贫民区居民造就了贫民区，而不是相反。）给人提供一所体面的房子，他们很快就会学会保持这种体面。而且，住在一所好看的房子里可以增加他们的自尊心和洁净度，他们的小孩也能有更好的机会开始生活。不过，住在政府房里会有一种不安的、被监禁的感觉，住在那里的人们最清楚不过了。

现在要说到关于住房问题最主要的困难了。当你走过曼彻斯特烟雾弥漫的贫民区时，你会觉得除了把这些难看的房子拆掉，原地重建一些好看的房子外没什么要做的了。但问题是拆掉贫民区的房子的同时，你也破坏了其他的一些东西。房屋紧缺但建得不快，目前正在进行重新安置，不过却是以一种——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极其不人性的方式进行，这并非只是说房子很新却很丑陋。所有的房子在一段时间里都是新的，事实上政府正在兴建的房子看起来根本不丑。在利物浦的郊区，镇

上的房子全都是政府兴建的住宅，它们看起来就很不错。镇中心的工人公寓街区非常漂亮，我觉得是仿造维也纳的工人公寓而建。但是整个看起来有点冷冰冰的，毫无生气。举个例子来说，你住在一所政府的房子里会受到各种限制，他们不允许你把房子和花园弄成你想要的样子——有些住宅区甚至规定所有花园的篱笆必须是一样的，不允许你饲养家禽或者鸽子。约克郡的矿工很喜欢养家鸽，他们在后院饲养，星期天带出来较量一下。但是鸽子很脏，政府理所当然要控制它们。对商店的限制就更加严格。在政府住宅区里的商店的数量有硬性规定，据说偏向于合作商店和连锁商店；这不一定很准确，但住宅区内常见的确实是这一类商店。这对普通民众已经够糟了，对独立经营的店铺老板来说更是像一场灾难。很多小店主被一些忽视他们存在的安置计划彻底毁掉了。整个镇区被全部废弃，现有的房子被推倒后，居民被转移到数英里以外的住宅区。这样一来，这里所有小店主的主顾被一次性带走了，而他们却没有获得哪怕1便士的赔偿。他们不能把生意转到住宅区去，因为就算他们可以承担搬迁的费用和更高的租金，也可能拿不到执照。至于小酒馆则几乎完全被逐出住宅区，剩下几间是由大型酒厂开的那种沉闷的、假都铎式的酒馆，非常昂贵。这对中产阶级的人来说是个麻烦——这可能意味着喝杯啤酒需要走上1英里；对于把酒馆当做俱乐部的工人阶级来说，这是对他们的社区生活的严重打击。让贫民区居民住上像样的房子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不幸的是，由于我们处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人们认为剥夺他们最后仅存的一点自由也是必要的。这些居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也正是这种感觉让他们有理由抱怨新房子——作为房子是比他们之前住的那些好多了，但冰冷、令人不安、没有“归宿感”。

有时我在想，付出一些自由的代价不会像永远肮脏不堪一般总是如影随形。有些政府住宅区的新房客得先系统地清除虱子，才被允许住进房子。他们所有的东西，除了随身穿戴的，全部都要熏蒸以后再送进新房子。这个程序的确是有必要的，因为把虱子带进新居将会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只要有半点机会虱子就会顺着你的行李跟进来），但是这种事会让你想把“卫生”这个词从字典里去掉。虱子固然不好，但人们居然让他人把自己当成羊一般清洗则更糟糕。然而，但凡涉及贫民区拆迁，或许就免不了种种限制和非人性化的手段。毕竟，最重要的是人们将住在像样的房子里而非猪圈。我见过许多贫民区住户，因为这个陷入了切斯特顿式的欣喜中。在这里，儿童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妇女从繁重的家务中稍得解脱，男人有一块小花园可以莳花弄草，比在利兹和谢菲尔德臭气熏天的小巷要好很多。总的来说，政府房比贫民区的要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多少。

在研究住房问题的时候，我对不同矿区的村庄和城镇的大量房子进行拜访和调查，总共大约有一两百间。在结束这一章前，我不能不提到我在每个地方获得的礼遇和善意。我不是孤身前往——总有一些当地的失业者朋友带着到处走——但就算如此，敲开陌生人的门然后要求看看卧室墙上的裂缝始终是失礼的。然而每个人都相当有耐心，看起来几乎不需要解释什么就明白为何我要询问他们以及我想要看什么。如果一个人未经允许跑进我家，开始问我屋顶有没有漏水、我有没有因为虱子而头疼、我怎么看待我的房东，我也许会对他说见鬼去吧。我只遇见过一次意外，有个妇女有点轻微的耳聋，把我当成了贫困状况调查员，但过了一会她的态度缓和了，提供了我需要的信息。

有人告诉我，作者引述他自己的评论是一种很不好的方式，但是在这里我要回应一位《曼彻斯特卫报》评论家对我的书做出的中肯评价：

奥威尔先生住在维根或白教堂区后，仍然用一种准确无误的方式对所有善行视而不见，为的是全力丑化人性。

你错了。奥威尔先生在维根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但并未唤起他丑化人性的欲望。他非常喜欢维根——喜欢的是那里的人，而非风景。真的，他所见到的只有一处不如意，那就是他渴望看到著名的维根码头。唉！维根码头已经被拆掉了，甚至连它曾经存在的地点都不能确定了。

第五章

当看到失业者的人数是200万的时候，人们会以为只是两百万人没有工作，余下的人则相对而言衣食无忧。我承认直到最近我都习惯于这么想。我过去认为，如果你将已经登记失业的约200万人归入贫困行列，再加上那些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登记的人，在英格兰食不果腹者的数量（所有领取救济金的人或者差不多状况的人都属此类）至多为500万。

这一数据大大低估了真实人数，原因在于：第一，能够出现在失业数据里的是那些实际领取救济金的人——亦即他们通常是家里的户主。失业者的家属不会在名单上显示，除非他们也能单独领取一份补贴。一名劳工介绍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要想获得依靠（不是领取）救济金生活的人的真实数据，你得在官方数据的基础上大约乘以3。仅仅这样就使得失业人数达到约600万。此外，很多人虽然有工作，不过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可能和失业也差不了多少，因为他们领到的工资连基本生活都满足不了。（例如，一份兰开夏郡纺织厂最近的调查显示，超过4万名全职工人每人每周的工资低于30先令。在普雷斯顿，仅以其中一个镇为例，这个镇里周薪超过30先令的人数是640人，而低于30先令的有3113人。）考虑到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再加上之前提到的领取养老金的年老者、穷人以及其他无法归类的人，得到的食不果腹的人数远远超过1000万。约翰·欧尔爵士[1]认为应该有2000万。

作为工业矿区的典型，维根的参保工人数在3.6万上下（2.6万男性和1万女性）。其中，1936年初失业人数大约为1万人。不过这是冬季的数据，此时矿工们都是全天候工作的，夏季的失业人口则可能达到1.2万人。将以上数字乘以3，可以得到3万人或者3.6万人。维根的总人口数略低于8.7万人，因此，无论何时都有超过总人数三分之一的人——不仅仅是登记在册的工人——是领取或者依靠救济金生活的。这1万或1.2万失业人口包括由4万～5万矿工组成的稳定的核心人群，他们在过去的7年时间里不断失业。作为一个工业城镇，维根之前的状况并不是特别差。就连前两年因战争和战争传言而表现强劲的谢菲尔德，失业人数的比例也是一样的——注册工人中有三分之一失业。

男性首次失业后，只有当他的保险印花用光了，他才能领取“全额补贴”，额度如下：

	每周
男性	17先令
妻子	9先令
每个14岁以下的小孩	3先令

因此一个典型的父母加3个小孩，其中1个孩子年满14岁的家庭，每周的总收入为32先令，外加最大的孩子可能挣到的钱。当一个男人的保险印花用光后，在转到公共援助委员会之前，他可以从失业援助委员会领取26周的“过渡性救济金”，额度如下：

	每周
单身男性	15先令
夫妇	24先令
14～18岁的孩子	6先令
11～14岁的孩子	4先令6便士
8～11岁的孩子	4先令
5～8岁的孩子	3先令6便士
3～5岁的孩子	3先令

因此，一个接受失业援助委员会救济的典型5口之家，如果孩子没有工作的话每周收入大概是37先令6便士。当男性领取失业救济金，他四分之一的救济金会被算作房租，但房租每周不得低于7先令6便士。如果他付的租金超过了救济金的四分之一，他就可以获得一份额外的补助，但是如果少于7先令6便士，相应的部分也会被扣除。公共援助委员会的补贴理论上是依照当地的标准派发的，但由中央基金支撑。补贴的标准是：

	每周
单身男性	12先令6便士
夫妇	23先令
最大的孩子	4先令
其余的每个小孩	3先令

由于当地机构有自行裁定权，这些标准略有不同，一名单身男性每周是否可以领取额外的2先令6便士，决定了他的补贴能否上浮到15先令。根据失业援助委员会的规定，一个已婚男人救济金的四分之一会被当做房租。因此，上面提到的典型失业家庭每周的总收入大概是33先令，这里面有四分之一是房租。另外，大部分地区在圣诞节前6周和后6周都会有每周1先令6便士的煤炭补贴（1先令6便士相当于1英担[2]的煤）。

由此可见，一个领取救济金的家庭每周收入平均为30先令左右。这里面至少有四分之一要被扣除当做房租。也就是说，无论孩子或成人，平均每人每周用于吃、穿、取暖，以及其他开销的费用只有六七先令。有大批的人处于这样的生活水平，至少占了工业区人口的三分之一。收入状况调查执行得很严格，只要有任何细微的迹象表明你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就会取消救济金发放。比如码头工人，通常是被雇佣半天，他们不得不每天去劳务介绍所登记两次。如果没有登记就会假定他们是有工作的，救济金就会相应地减少。我见过一些逃避收入调查的案例，但我得说，工业城镇仍然有一定的社区生活，而且每个人都有认识的邻居，逃避调查比在伦敦要困难得多。比较常用的方法是，实际上仍和父母同住的年轻人编造一个住址，假装已经独立生活，从而可以单独领取补贴。但是周围有很多的密探和搬弄是非的人。我记得有个人在邻居外出的时候帮着喂鸡，有人向政府报告，说他“有一份喂鸡的工作”，而他也难以反驳。在维根最出名的笑话是一个男人申请救济被拒，理由是他“有一份运送木柴的工作”。据说有人看见他在夜里运送木柴。他不得不辩解他并未运送木柴，只是夜里躲债潜逃，那些“木柴”其实是他的家具。

收入调查最残酷、最恶劣的后果是令许多家庭分崩离析。卧床不起的老人因此会被赶出家门。比如，一名领取养老金的年老者，倘若丧

偶，通常会与他的其中一个孩子同住，他每周10先令的补贴会被用于家庭开支，他得到的照顾可能不会太差。然而，在收入调查中，他却被算作一个“租客”，如果他住在家里，那么他子女的救济金会相应减少。于是，到了70或75岁的年纪，他不得不搬去出租屋住，把他的养老金交给出租屋的房东，生活在饥饿的边缘。我亲眼见过许多这样的例子，由于收入调查制度，现在全英国都是如此。

不过，尽管北部工业区失业状况相当严重，伦敦的贫困现象——特别是赤贫——却比北部工业区更显而易见。虽然北部工业区的东西看起来更破旧，汽车也少，衣着讲究的人更少，但明显贫困的人却不多。甚至在类似利物浦或曼彻斯特这样规模的大城市，遇见行乞者的机会也是少之又少。而伦敦如同一个漩涡，将各类被遗弃的人吸入其中，伦敦很大，这里的生活也相对独立而隔绝。除非触犯法律，否则无人关注你。在这里，或许你已完全崩溃。而在邻里们彼此相识的地方就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在工业城镇，旧的社交生活方式尚未瓦解，传统依然强势，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因此，也就有了一个潜在的避难所。在一个有5万或10万居民的镇上没有什么临时的和来历不明的人口，例如，没有人睡在街上，而且失业条例里也并没有条款反对人们结婚。每周有23先令收入的夫妇离饥饿线不远，但他们也可以勉强组成一个家庭。他们比每周拿15先令的单身汉的情况好太多了。一个单身失业男人的生活糟糕透顶。他有时住在普通的公寓，更多时候是每周花上6便士住在一间带“家具”的房间里，用剩下的9个便士努力生活（每周6便士用在食物上，3便士花在衣服、烟和娱乐上）。当然，他既无法有像样的食物，也无法真正安顿好自己。此外，每周房租6便士的人恐怕是不会乐意待在家里的。所以他只能通过在图书馆或其他可以取暖的地方闲逛来打发时间。取暖——几乎是一个失业的单身男人在冬天唯一的念头。在维根最受欢迎的避难所是电影院，价钱特别便宜，花上4便士你就可以找个座位，在有些地方甚至花2便士你就可以在日场找到座位。就算是处在饥饿边缘的人也乐意花上2便士，以便远离冬日下午的阴冷。在谢菲尔德，我被人带去一个公共大厅听牧师的演讲，这是我听过的，也是我所能想象出的最愚蠢最乏味的演讲。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坚持到演讲结束，演讲还不到一半，我的脚不由自主地把我带了出去。然而大厅里挤满了失业者，为了能待在一个温暖的地方，比这更烂的胡说八道他们也会听完。

有时我会看见一些靠救济金生活的单身汉，他们的生活境况非常凄惨。我记得在一个镇上，有这么一群人非法蜗居在一所废弃的几乎要垮

掉的房子里。他们找来了一些旧家具，想必都是别人不要的，我还记得他们仅有的桌子是一个大理石面的旧洗手池架，不过这样的事只是特例。单身工人并不多见，只要结了婚，失业对他的生活方式就不会有多少改变。他的家就算再穷也仍然是一个家，值得注意的是，因失业导致的错位现象——男人没有工作但女人工作照旧——并未改变两性之间的地位关系。与女人和孩子是中产阶级家庭的中心不同，在工人阶级家庭中，男人才是家庭的统治者。比如，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几乎没有男人会做家务，而失业并没有改变这个看起来有些不公平的习惯。男人从早到晚都很空闲，而女人还像以前一样忙碌——事实上甚至更忙，因为她不得不用更少的钱来持家。然而到目前为止，就我的经历而言，女人们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我相信她们和男人一样，觉得倘若一个男人仅仅因为没工作就变成家庭妇男，会使他失去男子气概。

但是毫无疑问，失业给每个人都带来了消极、负面的影响，无论已婚还是单身，且对男人的影响比对女人的大，最出色的知识分子也无法幸免。我见过一两个真正有文学才华的失业者，还有一些我没见过，但偶尔会在杂志上看见他们的文章。这些人中间或许会有人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或一个小故事，很显然比绝大部分评论家吹捧的那些东西要好很多。但他们为什么不充分利用自己的天分呢？他们整天都很闲，为什么不坐下来写书呢？因为写书不仅需要舒适和独处的环境——对于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来说独处是不可能的——你还需要内心的平静。当失业的阴云笼罩着你的时候，你根本静不下心来，也无法开启创造一切希望的灵感。习惯于与书本打交道的失业者至少可以用阅读打发时间。可是那些阅读有障碍的人怎么办？比如一个矿工，从孩提时代就在矿上工作，除了挖矿一无所长。见鬼，他该如何打发空闲的时间？说他应该去找工作是很荒谬的，所有人都知道根本没有工作可找。你不可能一连7年天天去找工作。租种小菜地的确既可以打发时间又可以帮助养家糊口，但偌大的一个城市，只有小部分人有菜地。镇上几年前已经开办了帮助失业者的就业中心，但总体而言，这样的举措没什么用，仅有一些中心还挺不错。我曾经参观过一两家。有一些避难所可供人们避寒，还有一些关于木工、制靴、皮革、手工织布、编篮子、海草编织之类的定期培训。这么做的初衷不是为了让人们可以制作家具之类的卖钱，而是提供免费的工具和廉价的材料以便他们制作自用器具。绝大部分和我聊天的社会学家都反对该措施，他们也同样反对那个时常被提起但从未兑现的项目——分给失业者一小块土地。他们说职业中心仅仅只是一个让失业者闭嘴的诡计，给他们一种确实有人替他们着想的错觉。毋庸置疑，那的确是开办职业中心的潜在动因：让一个人忙于制靴他就不太可能去看《工

人日报》了。而且，这些地方一进去你马上就可以感觉到那种令人厌恶的基督教青年会氛围。经常出没于此的失业者大多是那类绝对服从权威的人——这类人会圆滑地告诉你他很“节制”，他们会支持保守党。然而，即便如此，你还是觉得很矛盾。也许一个人把他的时间浪费在像海草编织这样差劲的工作上也比一年到头游手好闲要好。

到目前为止，帮助失业者工作做得最好的是NUWM——全国失业工人运动[3]。这是一个试图把失业者联合起来的革命组织，在罢工期间不让他们成为工贼，并为他们对抗收入调查制度提供法律建议。这个运动从无到有，靠的是失业者们自己的钱和努力。我见过很多参加全国失业工人运动的人，对他们充满敬佩之情。他们与其他人一样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却维系了这个组织的运转。我更钦佩的是他们的老练和耐心，因为从领救济金的人口袋里哪怕是骗出每周1便士的捐款也是很不容易的。就像我之前说的，英国的工人阶级没有显示出太多的领导能力，但是他们在组织工作上拥有非常好的才能。整个工会运动就是很好的证明。了不起的工人俱乐部——真正非常不错的合作社，组织有序——在约克郡也同样随处可见。在不少镇上，“全国失业工人运动”设有一些避难所，并安排一些共产主义者进行演讲。但即便在这些避难所里，出没的人也依旧无所事事，只是围坐在火炉边偶尔玩玩多米诺骨牌。如果这个运动可以结合职业中心的做法，会更贴近现实需要。看着一个有技术的人年复一年绝望，无所事事地堕落下去是件很痛心的事。给他们机会用自己的双手为家里做做家具这类的东西，同时又不变成一个成天只会喝基督教青年会可可饮料的家伙，这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不妨面对现实：英格兰有几百万人——除非爆发另一场战争——根本不可能在踏进坟墓前拥有一份真正的工作。有件事也许可以去做，而且是非做不可的，即如果有失业者提出申请，那就给他们提供一小块地和免费工具。认为那些依靠公共援助补贴生活的人不应该有机会为自己的家庭种种菜，这样的想法着实可耻。

想了解失业状况及其影响，你应该去工业区看看。在南部地区也有失业现象，但很零散且不太引人关注。很多郊区几乎没听说有谁失业的，你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整个街区的人依靠救济金和公共援助委员会生存的景象。只有租住在那些所有人都没工作的街区，待在那些得到一份工作比拥有一架飞机或中50英镑足球彩票的可能性更小的地方，你才能了解我们在文明化进程中发生的变化。毫无疑问，一切正在发生变化，对贫苦工人阶级的态度与七八年前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

我最初察觉到失业问题是在1928年。那时我刚从缅甸回来，失业在那儿还只是一个说辞而已，而我去缅甸的时候也还是个孩子，战前的繁荣还没有完全结束。当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失业者时，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中的不少人对于失业感到非常羞耻。那时的我很无知，但还没有无知到认为因海外市场缺失而失业的200万人比那些在“加尔各答清扫”马赛里赌输的人更应该受到责备。不过那时没人愿意承认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旦承认，就意味着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中产阶级仍然说着“领着救济金的无业懒汉”以及“这些人如果愿意的话都可以找到工作”，这些观点很自然地渗透到工人阶级本身。我记得自己第一次与流浪汉和乞丐——打小别人就告诉我他们是游手好闲的寄生虫——为伍时，震惊地发现他们中有相当部分人，或许四分之一，是相当不错的年轻矿工和纺织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哑口无言，就好像掉进了陷阱的动物。他们就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被抚养长大是为了去工作的，瞧！看起来他们似乎再也没有机会工作了。在这种境况之下，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堕落感所困扰。因为那个年代对待失业的态度是：这是发生在你个人身上的一场灾难，你自己该对此负责。

当100万矿工里有四分之一失业时，埃尔夫·史密斯，一个住在纽卡斯尔小巷的矿工，也即将失业了。埃尔夫·史密斯只是这25万矿工里的一个统计单位。但没有人能够简简单单地把自己当成一个统计单位。只要住在街对面的贝特·琼斯仍然有工作，埃尔夫·史密斯就必然感到丢脸、失败。于是，那种无力和绝望的可怕感觉在接受公共援助的失业者心中滋生，这种感觉几乎是失业状态下最糟糕的情绪——远比任何困苦、比被迫无所事事的沮丧更糟，只比埃尔夫·史密斯的孩子出现生理疾病的情况稍好些。每个看过格林伍德的戏剧《救济金之爱》的人一定记得那可怕的一幕：贫穷、善良而愚蠢的工人敲着桌子叫喊着：“噢，上帝，给我一份工作吧！”这不是戏剧性的夸张，这是来自真实生活的感触。在过去的十五年里，那些叫喊定然几乎只字不差地在数万、或许数十万英国家庭中响起。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或者至少不会再如此频繁。现实情况是：人们不再做无谓的争辩。毕竟就连中产阶级——是的，甚至连冥顽不化的乡下蠢蛋——都开始认识到失业问题的存在。诸如“亲爱的，我才不相信关于失业的鬼话。怎么着，就在上个礼拜我们想找个人给花园除除草，可就是一个也请不到。他们只是不想工作，就是这样的！”这些五年前在任意一张像样的茶桌边都能听到的话，也明显减少了很多。至于工人阶级自己，他们已经具备了大量的经济常识。

我相信《工人日报》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对读者圈子之外的人也产生了影响，不仅因为失业如此普遍，更因为失业持续了很长时间。一旦人们靠救济金生活了几年就开始习以为常，领取救济金虽说仍让人不太舒服，但也不再觉得羞耻。于是，过往的、独立的、对济贫院敬而远之的传统被打破了，就像以前对债务的担心被分期付款打破了一样。在维根和巴恩斯利的小巷里，我见识了每一种贫困，但我见到的意识上的痛苦或许比十年前少得多；至少人们知道失业是没有办法的事。现在不仅是埃尔夫·史密斯没有工作，贝特·琼斯同样也没有工作，而且他们俩都“落魄”很多年了。当每个人都一样的时候，事情就会变得很不一样了。

于是，所有人就这么安顿了下来，一辈子都得靠救济金过活。他们能够这样活下去而没有精神崩溃，让我佩服，心中充满希望。一个工人不会像一个中产阶级的人一样在贫困的压力下崩溃。举个例子来说，工人阶级觉得在领着救济金的情况下结婚没什么不妥的。这让不列颠的老太太们很烦恼，但这也是他们主要优点的一个证明：他们明白没有工作并不意味着你不再是一个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贫困地区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生活仍然相当正常，比你期待的更正常。家庭是很贫困，但是家庭体系并没有被打破。事实上，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之以往大大缩水。他们通过降低生活水平来勉强度日，而不是用暴力反抗他们的命运。

但是他们不是通过放弃奢侈品只买生活必需品的方式来降低标准，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更自然的方式，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由此，实际上在一个空前萧条的年代，所有廉价奢侈品的消费量都会增加，起决定性作用的或许是两件事：一是电影，二是战后大量生产的廉价而漂亮的衣服。那些十四岁便离开学校的年轻人此后要做着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到二十岁失业，然后可能终生都会如此。但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付上2英镑10便士他就可以买到一套西装，刚穿上身远远望去，像是在萨维尔街[4]上定做的一样。女孩子甚至可以花更少的钱就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时尚达人。你口袋里可能只有三个半便士，在这世上毫无奔头，只能住在漏水卧室的一角；但是穿着新衣服，你就可以站在街角，做着自己的白日梦，想象自己就是克拉克·盖博或者葛丽泰·嘉宝[5]，这可以给你带来巨大的安慰，甚至在家喝茶——一杯“好茶”——也有同样效果。而父亲，虽然从1929年就已经失业，但是正因为有了关于皇太子障碍赛马比赛[6]的小道消息暂时高兴着呢。

自开战后，为了满足吃不饱的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市场交易不得不

进行自我调整，导致一件奢侈品几乎总比生活必需品便宜。一双式样平平但做工结实的鞋的价格可以买两双时髦劣质鞋。一顿饭的价钱可以买到2磅便宜的糖果。你花3个便士买不到多少肉，但你可以买很多炸鱼薯条。牛奶要3便士1品脱，而淡啤酒是4便士，但是阿司匹林每7片才合1便士，四分之一磅的茶包可以煮出40杯茶。而最主要的是赌博，这是所有奢侈品里最廉价的。就算是在饥饿边缘的人，也会花一个便士在彩票上去买个几天的希望（他们称之为“某些盼头”）。有组织的赌博现在几乎已经上升为主要产业了。例如足球彩票，一年有600万英镑的营业额，几乎全都来自工人阶级的口袋。当希特勒重新占领莱茵兰[7]的时候我恰好在约克郡。希特勒、《洛迦诺公约》[8]、法西斯主义以及战争的威胁根本无法激起当地人的一点点兴趣，但是足协停止提前公布赛程表的决定（这是为了给足球彩票降温的一项措施）却让整个约克郡陷入到了愤怒的风暴中。此外，还有食不果腹的人们沉浸在现代电气科技中的奇特景象。你可以因为没有铺盖而哆嗦整晚，但是到了早上你可以去图书馆看看那些从旧金山和新加坡用电报为你发来的新闻。2000万人吃不饱肚子，而在英格兰，每个人都有一台收音机；我们在食物上的损失通过电器得到了弥补。无法满足真正需求的工人阶级，从解决表面生活问题的廉价奢侈品上得到了部分补偿。

你觉得所有这一切令人满意吗？不，我不这么认为。但工人阶级这种自我心态的调整或许已是当前环境下他们所能做的全部了。他们既没有发动革命也没有丧失他们的自尊；他们所做的仅仅是耐住性子安顿下来，按照炸鱼薯条的标准努力生活。接下去是天知道怎样无止境的绝望和痛苦；或者他们可以发动一场暴动，在一个像英格兰这样强权统治的国家，只会带来无谓的屠杀和当局野蛮的镇压。

当然，战后廉价奢侈品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统治者而言是件幸运的事，很有可能是炸鱼薯条、人造丝袜、罐装鲑鱼、降价巧克力（5条2盎司的巧克力棒只需花费6个便士）、电影、收音机、浓茶和足球彩票避免了革命的爆发。因此，时常有人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统治阶级的巧妙手段——一种“面包和马戏”[9]的手法——以便稳住这些失业者。根据我对统治阶级的了解，我觉得他们没那么聪明。事情确实已发生，但只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是制造商对市场的需求与半饥半饱的人们对廉价商品的需求之间一种自然的互动作用。

---

[1] 约翰·欧尔（1830—1971），英国医学博士、营养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英国政府的粮食政策顾问。战后任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第一任总干事，为解决战后世界饥荒作过不懈的努力，194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

[2] 英担，1英担相当于50.8公斤。

[3] 全国失业工人运动（NUWM）即The National Unemployed Workers’Movement，英国的一个组织，1921年由英国共产党党员建立，1946年解散。

[4] 萨维尔街，伦敦定制男装很著名的一条街。

[5] 葛丽泰·嘉宝（1905年9月18日—1990年4月15日），电影女演员。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逝于美国纽约。她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女明星之一，曾获颁奥斯卡终身成就奖。1999年，她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5名。

[6] 皇太子障碍赛马比赛，因俄国皇太子（后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赞助了马会300英镑，所以以此命名。

[7] 希特勒重新占领莱茵兰，指1936年3月7日凌晨，德军出动19个营和12个火炮连共约3万人，越过莱茵河进入非军事区。

[8] 《洛迦诺公约》，1925年10月16日签订，规定：德、法、比相互保证不破坏凡尔赛规定的德比、德法之间的边界现状，遵守关于莱茵非武装区的规定。但是，希特勒要想向东方发动侵略战争，就不能不首先占领与法国接壤的莱茵非武装区，以解除德国西部大门洞开的后顾之忧。

[9] 面包和马戏，古罗马统治者有时为民众免费提供用以欺骗和麻醉他们的一种手段；泛指统治者的小恩小惠。

第六章

当我还是个小孩，在学校上学时，有名大学讲师每学期都会就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著名战役给我们做一次精彩讲解，诸如布伦汉姆战役[1]、奥斯特立兹之战[2]，等等。他喜欢引用拿破仑的格言“有多少粮草行多远军”。在讲演结束时，他会突然向我们提问：“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则要大声回答“食物！”倘若我们未如此响应，他便会大失所望。

从某种意义而言，他显然是对的。人说到底就是只装食物的大口袋，我们的其他功能和才华看上去或许更神圣，但那些毕竟不是首要的。人死化成灰，他的言行也会随之被遗忘，然而他有生之年食物的优劣却在死后依旧带给其子孙或好或坏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宣称，饮食变化的重要性远胜于王朝更迭，乃至宗教变革。例如，倘若罐头食品尚未问世，就不会有世界大战[3]。倘若我们没有在中世纪末期引进根茎作物和其他各种蔬菜，之后也没有引进非酒精类饮品（茶、咖啡、可可）以及尚未被当时习惯于喝啤酒的英格兰人所熟知的蒸馏酒，英格兰过去四百年的历史便会截然不同。不过奇怪的是，人们很少意识到食物的重要性。政治家、诗人、主教们的雕像比比皆是，厨师、熏肉师或果蔬园丁的雕像却闻所未闻。据说查理五世曾经给烟熏鲱鱼的发明者塑过像，不过，这是我眼下能想到的唯一例子。

因此，或许对于失业者而言，提起未来，真正重要且最最根本的东西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正如我先前所说，无业家庭每周的平均收入大约是30先令，其中至少四分之一要用于支付房租。剩下的钱怎么花，就得精打细算。我这里有一份失业矿工和他的妻子给我的开销清单。我让他们尽可能准确地列出通常情况下一周内的所有支出。这名失业矿工的补贴是每周32先令，除了妻子家中还有两个孩子，一个2岁零5个月，另一个才10个月。以下是他的账单：

	先令	便士	
房租	9	0	1/2

服装俱乐部	3	0	
煤	2	0	
瓦斯	1	3	
牛奶	0	10	1/2
工会费	0	3	
保险（子女）	0	2	
肉制品	2	6	
面粉（2石[4]）	3	4	
酵母	0	4	
土豆	1	0	
烤肉油	0	10	
人造奶油	0	10	
熏肉	1	2	
糖	1	9	
茶	1	0	
果酱	0	7	1/2
豌豆和包菜	0	6	
胡萝卜和洋葱	0	4	
桂格燕麦片	0	4	1/2
肥皂、洗衣粉、染料等	0	10	

合计　　1英镑 12先令 0便士

此外，婴幼儿福利诊所每周送给孩子3包奶粉。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这份清单里略去了很多项目——鞋油、胡椒、盐、火柴、引火木、剃刀片、替换餐具、衣服、家具和床上用品的损耗——只包含了最先想到的一些开销。在以上未列出项目中的任何一笔花费都意味着要从其他方面抠出钱来。另一笔不容小觑的开销是烟草。这名矿工抽烟并不凶，尽管如此，他每周在烟草上花的钱也很难少于1先令，这意味着得进一步节衣缩食。失业者每周要向“服装俱乐部”支付可观的费用，这些俱乐部由遍布所有工业城镇的大布商经营，若非如此，失业家庭根本无力添置新衣。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从这些俱乐部里购买床上用品，因为我碰巧结识的这个家庭几乎没多少此类物件。

在上述清单中，假如你再算上买烟草的1先令和这样那样的非食品开销，那么就只剩下16先令5.5便士。我们权且算作16先令，且不考虑婴儿的开销——因为婴儿每周可以从福利诊所获取牛奶。这16先令得提供三个人——其中两名成人——所需的所有营养和燃料。那么，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用16先令满足3个人一周的给养，这在理论上究竟有无可能？就在人们对收入调查争执不下之际，出现了关于能够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周收入的令人作呕的公开争论。我记得，有一所营养师学校得出的结论是5先令9便士，另一所学校则大方些，给出了5先令9.5便士。之后，便有一群人致信报社，声称一周只花4先令便可喂饱自己。我从众多周预算中随手拣出了一份（该预算刊发在《新政治家》和《世界新闻》上）：

	先令	便士	
3个全麦面包	1	0	
1/2磅人造奶油	0	2	1/2
1/2磅烤肉油	0	3	
1磅奶酪	0	7	
1磅洋葱	0	1	1/2
1磅胡萝卜	0	1	1/2

1磅碎饼干	0	4	
2磅枣子	0	6	
1罐淡奶	0	5	
10只橙子	0	5	
合计	3	11	1/2

请注意，这份预算中没有包含任何燃料费用。事实上，该作者明确表示他无力购买燃料，所有食物均生食。这封来信真实与否，抑或只是个恶作剧，眼下无关紧要。我认为应该承认的是，这份清单可以被视作最精打细算的开销计划。如果你不得不靠3先令11.5便士生存一周，那么该清单可以令你最大限度地获取食物。如此说来，或许依靠公共账目委员会（PAC）的补贴喂饱自己是有可能的，但仅限于必要食品，别无其他。

现在，将这份清单与我先前给出的失业矿工的清单进行对比。矿工家庭每周仅花10便士购买绿色蔬菜，10.5便士买牛奶（你要知道，他们的一个孩子还不满3岁），没有水果，但他们要花费1先令9便士买糖（也就是大约8磅糖），1先令买茶叶。花在肉制品上的半个克朗或许只是用于做炖菜的一块骨头，而不太可能是四五罐牛肉罐头。因此，他们的基本食物是白面包和人造奶油、腌牛肉、加糖的茶和土豆——多么糟糕的食谱。倘若他们多花点钱在健康食品上，比方说橙子、全麦面包，或者甚至像那个致信《新政治家》的作者那样省下燃料费，生吃胡萝卜，岂不更好？是的，没错，不过问题在于没有哪个普通人会这么做。普通人要是只吃黑面包和生胡萝卜，那早就饿死了。尤其糟糕的是，通常钱越少的人就越不愿意花钱购买健康食品。百万富翁或许乐于用橙汁和瑞维塔饼干当早餐，但失业者可不会。我在上一章末尾提到的那种倾向此时便起到了作用。当你失业时，也就是说当你食不果腹、困顿无聊、辛酸凄惨时，可不会想要吃什么单调的健康食品。你会想吃点儿有“滋味”的东西。总有一些廉价的美味诱惑着你。来3便士的薯片吧！出门买2便士的冰激凌！烧壶水，来杯美妙的热茶！这就是当你拿公共账目委员会补贴时脑子里琢磨的。白面包加人造奶油以及加了糖的茶并不能给你更多营养，但它们比黑面包加蘸肉汁和冷水更可爱（至少大多数人如此认为）。失业是一种无尽的苦难，需要时常得到温暖，尤其是热茶——英格兰人的鸦片。一杯茶，甚至一片阿司匹林所带来的短暂慰

藉远胜于一块干巴巴的黑面包。

所有这一切对生理造成的影响显而易见，你可以亲眼观察或者经由统计数据推理得出。工业城镇居民的平均身体素质极差，远逊于伦敦。在谢菲尔德，你会感觉好似行走于洞穴人之中。矿工们生机勃勃，但通常身材矮小，他们长年劳作锻炼出的肌肉并不能令其子女生有一副好体质。无论如何，矿工们的体质在当地人中已经算是相当好了。营养不良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所有人的牙齿都很糟。在兰开夏郡，你得踏破铁鞋才能找到一个牙口尚好的工人。事实上，除了孩子，几乎没人还能保有牙齿。而即便是孩子们的牙齿也微微发青，我猜是缺钙所致。有些牙医告诉我，在工业区，年满30岁还能有真牙的人着实罕见。维根的很多人都认为最好能尽早掉光牙齿。“牙齿纯粹就是痛苦。”一名妇女对我说。我曾寄居的一户人家除我之外有5口人，最年长的43岁，最小的是个15岁的男孩。这个孩子是家中唯一还有牙齿的人，而他的牙显然也长久不了。据统计，所有大型工业城镇贫困人口的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都是富裕居民的两倍——有的地方还不止两倍——我想，我无需多言了。

当然，我们不能将这种普遍体质差的状况单纯归咎于失业，因为或许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身体素质水平下滑的现象在整个英格兰都存在，而非仅仅出现于工业区的失业人口中，这一点从统计数据中无法证实，但只要你仔细观察，结论便一目了然。哪怕在乡村，甚至如伦敦般繁华的城市亦是如此。乔治五世的遗体穿过伦敦城前往威斯敏斯特的那天，我恰好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人群中滞留了一两个小时。望着这些人，你不能不为现代英国人的体质下降状况所震惊。我周围的人大多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店主、旅行推销员之类，家境良好。然而他们都是怎样一副模样啊！四肢纤细、病气恹恹，呆立在伦敦那阴沉沉的天幕之下。放眼望去，几乎看不到一个健壮的男人或俊美的女子，见不到一张有生气的面孔。国王的棺木经过时，男人们摘下帽子，当时在河岸街另一侧的朋友事后对我说，“目力所及，唯一的色彩就是那些秃头。”在我看来，就连卫兵们——有一个方阵的卫兵随棺木行进——也今非昔比。二三十年前那些虎背熊腰、长着两撇鹰翼般的小胡子，从我童年的视野中大步流星走过的彪形大汉哪儿去了？埋了，我猜，都埋在了佛兰德斯的泥巴里。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面色苍白的男孩子，他们因身高优势被选中，可看上去总让人联想起顶着外套的竹竿——事实上，在当今的英格兰，身高超过6英尺的男人通常瘦得皮包骨头。倘若说英国人的身体素质在下滑，那么毫无疑问，其部分原因在于世界大战从英国精心挑走了数百万最优秀的男人，他们还没来得及传宗接代便统统被送上了屠宰

场。然而这一现象在战前就已显现，因而只能归咎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我指的不是城镇生活习惯——在很多方面，或许城镇里的习惯比乡村更健康——而是给你提供廉价替代品的现代工业技术。从长远而言，我们或许会发现罐装食品比机枪更致命。

很不幸，英国的工人阶级——在此我指的是英国本土人——对食物异常无知，浪费也相当惊人。我在别处曾指出法国建筑工人对于食物的观点较之于英国人是多么先进，我相信，在英国家庭里司空见惯的浪费现象绝不会出现在法国家庭里。当然，在极度贫穷、所有成员都失业的家庭中，并不存在多少浪费，但那些能够承受得起浪费粮食的家庭则经常如此。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出不少触目惊心的例子。就连北方人自己烤面包的习惯也多少有些浪费，因为劳累不堪的主妇每周至多烤一两次面包，而她们事先不可能估计出会浪费多少面包，于是大量面包通常就这么被扔掉。一次烘烤六只大面包和十二只小面包是很常见的事。这是古老、慷慨的英国式生活观的一部分，固然优雅，但在现阶段却是灾难性的。

据我所知，英国各地的工人都拒绝食用黑面包，在工人聚居区，全麦面包几乎无处可寻。有时候，他们会解释说那是因为黑面包“脏”。不过我猜真正的原因是过去人们常常混淆黑面包和黑色面包的概念，而后者在传统观念上则与天主教和木屐联系在一起。（兰开夏郡有很多天主教徒和木屐，遗憾的是，那里同样没有黑色面包！）如今，英国人的口味，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口味几乎对健康食品有一种自动的排斥。选择罐装豌豆和罐头鱼而非真正的豌豆和鱼的人数逐年上升，很多买得起真正的牛奶的人也开始使用罐装牛奶——哪怕那可怕的罐装牛奶是用糖和玉米淀粉制成的，外包装上还用大大的字母标明“婴儿不宜”。有些地区已经着手让失业者更多地了解食物的营养价值，学会明智地消费。当你听闻这样的事，会觉得左右为难。我曾经听见一名共产党发言人在台上大发雷霆。他说，在伦敦，有些社会党贵妇人如今大摇大摆地走进伦敦东区的窝棚里，给那些失业者的妻子们讲解购物心得。他将这个例子视作英国统治阶级心理作祟。你首先宣布一个家庭每周只有30先令，接着又冒冒失失地对他们该如何花钱指手画脚。他说得很对，我打心眼儿里同意。但与此同时，遗憾的是，仅仅由于缺少恰当的传统，人们像浇粪肥一样把罐装牛奶倒进喉咙，根本不知道那玩意儿比牛奶制品差远了。

然而，我怀疑即便失业者们学会了如何更经济地使用金钱，最终能否真的从中受益。正是由于他们不那么节俭，才使得补贴能够保持如此

高的水准。一名拿公共账目委员会补贴的英国人之所以每周能得到15先令，是因为15先令是他能够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数目。倘若他是个，比方说，印度或者日本劳工，可以依靠米饭和洋葱过活，那就不会得到每周15先令——每个月能拿15先令就算运气了。我们的失业补贴尽管少得可怜，仍是基于高标准生活而非节约概念设定的。如果失业者学会了更好地管理收入，其境况固然会明显改观，但我想，用不了多久，他们得到的救济金也会被相应削减。

北方的失业压力小得多，因为这里的燃料价格低廉。在煤炭产区，煤的零售价约为每担1先令6便士，而在英国南部则约为半克朗。此外，仍在上工的矿工可以以每吨8到9先令的价格直接从矿井购买，家中有地窖的人有时会购买1吨煤，然后转手卖给那些失业者（我猜这么做是非法的）。除此之外，失业者中还存在大量盗窃煤炭的行为。我称之为盗窃，是因为严格说来，这的确是盗窃，尽管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从矿里运出的“泥土”中含有相当数量的碎煤，失业者一点一点将它们从渣堆里分拣出来。在那些奇怪的灰色土堆周围，从早到晚都能见到人们拿着麻袋和篮子在硫黄浓烟（很多渣堆内部都在燃烧）中穿行，挖出混埋在各处的小煤块。你能遇见男人们来来往往，推着自家制作的神奇古怪的自行车——这些自行车是用生锈的废品制成，没有坐垫，没有链条，通常也没有车胎——车上载着大约半担煤，这是他们半日的战利品。在罢工期间，当所有人都缺少燃料时，矿工们就带着铁锹、铲子，一头扎进渣堆，于是大多数渣堆都呈丘状起伏。大罢工期间，在那些煤层露出地表的地区，矿工们会一直掘入地下几十码深处。

在维根，失业者之间为废弃煤渣引发的竞争如此激烈，以至于演变成了一种被称作“抢煤大战”的独特风俗，颇值得一看。说真的，我倒奇怪怎么从未有人将其拍成电影。一天下午，一个失业矿工领我前往观战。我们到了目的地：一座遍地陈年渣堆的山头，铁轨从山下的谷地间穿过。数百名衣衫褴褛的男人，个个上衣后摆里都别着麻袋和煤锤，在“坡”上等待着。泥土从坑洞中运出来后会被装上车皮，运到另一个距此四分之一英里远的渣堆上。抢煤大战的序幕从行驶着的火车上便已开启，只要能成功爬上任何一节移动的车皮，车皮里的东西就算是你的了。不久，火车驶进视野。随着一声狂放的呼喊，100名男子冲下山坡，在弯角处追上了它。即便在拐弯，火车的时速也达到20英里。男人们一跃而上，抓住车皮后方的把手，攀悬在保险杠上，每节车皮上都挂了5至10人。司机毫无察觉，他开着车驶向渣堆顶，卸开车皮，将车头开回矿坑，随即带来另一挂车皮。于是又将有一拨衣衫褴褛的身影呼号

着冲刺，一如刚刚发生的那样。最终，只有大约50名男子没能成功爬上车。

我们登上渣堆顶。男人们正忙着将泥土铲出车皮，他们的妻儿们则跪在下方用手在潮湿的泥土中飞快地扒拉，挑拣出如鸡蛋大小甚至更小的煤块。你会看见某个女人猛扑向一个小碎片，在围裙上擦拭着，以确定那的确是煤块，然后生怕被别人抢走似的赶紧将它扔进自己的麻袋。当然，在你攀上车皮之前并不知道里面载的究竟是什么，或许真的是来自公路的“泥土”，又或许只是顶层的页岩。倘若是运页岩的车，那就根本没有煤，不过页岩中偶尔会掺杂另一种名为烛煤的可燃性岩石，看上去很像普通的页岩，但色泽略深，有平行的条纹，就像石板一样。这种石头权且可作燃料，虽没什么经济价值，但足以吸引失业者苦苦寻觅。页岩车上的矿工们挑拣出烛煤，用自己的锤子砸碎。“坡”脚下那些没能爬上车的人们则在拾取从坡上滚落的细小煤屑——煤屑比榛子还小，不过拣到的人们也满心欢喜。

我们在那儿一直待到车皮被掏空。短短几小时之内，人们就把泥里的煤渣翻得一干二净。他们把麻袋扛在肩上或搭在自行车上，踏上返回维根的漫漫2英里之路。大多数家庭都收集到约半担煤渣或烛煤，因此这次抢煤大战总计盗得5至10吨燃料。冬季里，像这样的劫泥车事件在维根天天上演，且不止发生在一个矿井。这当然十分危险。那天下午我所在的地方没有任何人受伤，但几周前有个男子断了双腿，而几周后又有一男子失去了几个手指。严格说来这属于偷盗行为，但众所周知，即便这些煤渣没有被偷走，也只会白白浪费掉。鉴于规章制度，煤矿企业时不时会起诉捡拾煤炭的人，当地的晨报上有一则消息提到2名男子被处以10先令的罚金。不过没有人会在意起诉——事实上，报上所提到的其中一名男子当天下午的确在现场——参与拣煤的人们协商凑齐了罚金。这是理所当然的。所有人都明白，失业者必须通过某种途径获得燃料。于是便有了每天下午的这一幕，数百个男人冒着折断脖子的风险，数百个女人在泥巴中摸爬滚打争抢数小时——一切都是为了半担劣质燃料，仅值9便士而已。

那一幕久久留存在我的脑海中，成了我对兰开夏郡的印象之一：矮墩墩的女人们披着披肩，系着粗麻布围裙，穿着笨重的黑色木屐，跪在灰泥中顶着刺骨的寒风急切地搜寻着丁点儿大的碎煤块。她们心甘情愿地忙碌着。冬季里燃料紧缺，几乎比食物更重要。与此同时，放眼四望，目力所及之处遍布矿井的渣堆和升降机，没有任何一个矿井能够将

所产煤炭全部卖出。这一点应该提请道格拉斯少校注意。

---

[1] 布伦汉姆战役，170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转折性战役。

[2] 奥斯特立兹之战，指1805年拿破仑在奥斯特立兹击溃俄奥联军。

[3] 世界大战：此处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4] 石，英制重量单位，1石约合6.35千克。

第七章

一路向北，直到过伯明翰之前，看惯了英格兰南部或东部风光，你并不会感受到太多变化。在考文垂你或许会觉得就像在芬斯伯里[1]，伯明翰的斗牛场[2]也与诺维奇市场大同小异，而中部地区的所有城镇则遍布着与南方地区相似的别墅。只有当你进一步北上，到达生产陶器的城镇，才开始见识到工业化的丑陋面目——如此可怕，如此触目惊心，以至于你被迫正视它。

渣堆狰狞，杂乱无用，就好像清空巨人的垃圾桶时倒在地上的一堆东西。矿区小镇周边的景观丑陋不堪，地平线完全被参差不齐的灰色山脉环绕，脚下是泥土与尘埃，头顶上方的钢缆悬着成桶成桶的土石，晃晃悠悠穿行于方圆数英里的乡间。渣堆通常在燃烧。夜晚，你可以看见红色的火流蜿蜒而来，缓缓移动的蓝色硫磺火焰忽明忽灭。即便渣堆最终坍塌，也依旧成小丘状，其上只能长出可怖的棕色植被。维根的贫民区就有这么一片小丘，被用作操场，看上去好似汹涌的海面突然被冻结，当地人称之为“垫子”。即便几个世纪之后，当你耕犁曾经采矿的土地时，会发现原本是陈年渣堆的地方依旧凹凸不平。

我记得，一个冬日的午后漫步在维根可怖的郊外，四周尽是月球环丘般的渣堆。继续向北，穿过矿渣山之间的通道，你能看见工厂的烟囱冒着烟柱。运河堤岸混合着煤渣和冰冻的泥土，被无数木屐踩踏出纵横交错的脚印。四下里，但凡有渣堆的地方就有“反光”，那是陈年旧坑形成的死水潭。数九严寒，水潭表面覆盖着褐色的冰层，驳船船员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船闸上也结了冰。在这个世界里，全然不见植被的踪影，除了浓烟、页岩、冰雪、泥浆、灰尘和脏水，别无他物。不过若与谢菲尔德相比，维根实在可以算得上风光旖旎了。在我看来，谢菲尔德堪称旧大陆[3]最丑陋的城镇，而当地居民争强好胜，很可能也会对这一头衔当仁不让。该地区拥有50万人口，像样的建筑却比东安格利亚地区仅有500人的小村庄还少。还有那股子恶臭！倘若你偶尔闻不到硫的气味，那只不过是由于你开始吸入瓦斯。就连穿城而过的浅浅河水也通常因含有这样那样的化学物质而呈亮黄色。有一次，我在大街上驻足，清点视线所及的工厂烟囱，33个，但若不是烟尘使能见度降低，本可以看到更多。有一幅景象至今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一片

可怖的荒地（其肮脏程度连伦敦也望尘莫及），寸草不生，随处可见废报纸和旧平底锅。在它右方是一排孤零零、破旧不堪的四居室房子，外墙本是暗红色，却已被烟熏得发黑。左边是一望无际的工厂烟囱，一个接一个，一直没入昏暗的黑色雾霾中。在我身后是用熔炉矿渣铺成的铁轨路基。眼前，一栋用红色和黄色砖头砌成的方形建筑横亘在荒地中，标着“托马斯·格鲁考克，运输承包商”的字样。

入夜，当你无法看清那些房屋的狰狞面目，周遭的一切都被黑暗吞噬时，谢菲尔德这样的城镇便显得异常险恶。有时候，铸造厂排出的浓烟被硫和如圆锯般跳动的火焰染成玫瑰红色，从烟囱罩下喷薄而出。从铸造厂敞开的大门望进去，你能看见被火光映得通红的小伙子们拖着滚烫的铁条来来往往，你能听见蒸汽锤的呼啸与锤打声以及蒸汽锤下钢铁的哀号。制陶镇也几乎同样丑陋。成排被熏黑的狭小房屋之间的部分街道成了“陶器储存所”，锥形的砖制烟囱好似埋在土里的硕大勃艮第瓶，排出的烟尘扑面而来。宛如巨兽般的黏土裂隙长达数百英尺，也几乎同样深，裂隙一侧散布着腐烂的小桶，另一侧，工人们像海蓬子采集者那样用镐子在岩面上挖掘。我路过那里时是个下雪天，就连雪也是黑的。好在这些制陶城镇规模都很小，不出10英里你便能踏上未被污染的乡村，站在几乎光秃秃的小丘之上，而那些制陶小镇则成了遥远的污点。

注视着这般丑陋景象，有两个问题向你袭来。首先，这一切是必然的么？其次，这重要么？

我并不认为工业化必然意味着丑陋。工厂，甚至是煤气厂并不一定比宫殿、狗窝或者大教堂丑陋。一切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建筑风格。北方地区的工业城镇之所以丑陋不堪，乃是因为它们恰好是在现代化的钢结构施工和烟尘减排技术尚未问世时建造的，当时人们只顾着赚钱，对其他事情概不关心。而这些城镇之所以一直保持着丑陋风格，则是由于北方人已经习惯了这副模样，见怪不怪了。谢菲尔德和曼彻斯特的很多人若是呼吸到康沃尔峭壁一带的空气，恐怕还会觉得淡而无味呢。但自战争爆发以来，工业生产逐步南迁，厂房也随之变得几乎可以算得上漂亮。典型的战后工厂既不像破败的营房，也不是黑乎乎乌烟瘴气的一团糟，而是由玻璃、钢铁构成的漂亮白色建筑，周围绿草茵茵，郁金香环绕。当你乘坐大西部铁路[4]列车旅行时，不妨看一看伦敦郊外的那些工厂，它们或许算不得艺术杰作，但绝对不至于像谢菲尔德煤气厂那样不堪入目。不过，尽管工业化之丑陋显而易见，且遭到所有新来者的极力声讨，我却并不认为这有多重要。或许，工业化根本不该试图伪装自

己。正如阿道斯·赫胥黎[5]先生所说，黑暗的恶魔工厂看上去就应该像个黑暗的恶魔工厂，而不是辉煌的神殿。此外，即便在最糟糕的工业城镇，也能见到不少从狭义审美学角度而言并不丑陋的事物。浓烟滚滚的烟囱或臭气熏天的贫民窟之所以令人厌恶，是因为它意味着扭曲的生活和病恹恹的孩子。若从单纯审美的角度而言，其中倒或许包含某种可怖的情趣。我发现任何古怪得异乎寻常的事物最终通常能让我着迷，哪怕我对其厌恶不已。昔日身处缅甸时，当地的景致曾令我震惊，好似梦魇，可之后却时常浮现于脑海，以至于我不得不写本小说一吐为快。（所有关于东方的小说中对于景致的描写都是真实的。）从黑暗的工业城镇中提炼出某种美感或许并非难事，正如阿诺德·本涅特[6]所做的那样；你也完全可以想象，比方说，波德莱尔[7]写作一首关于渣堆的诗。然而，工业化的美丑无足轻重，倒是其蕴含的真正罪恶要深刻得多，亦难以根除。记住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始终有一种误导性观点认为，只要既清洁又有序，工业化就是无害的。

然而，当你进入工业化的北方地区，除了陌生的风光外，也会觉得如同身处一个陌生的国度。其中部分原因固然是由于两地之间的确存在差异，但更主要的则是因为长期以来南北对立的观念已经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在英格兰有一种对北方的奇特崇拜，某种近乎于势利的北方情结。来南方的约克郡人总会委婉地让你意识到在他眼中你低他一等。倘若问他这想法从何而来，他会解释说只有北方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北方的工业劳动才是“真正的”工作，北方的居民才是“真正的”汉子，南方人只不过是一群食利的寄生虫。北方人有“胆量”，坚定、严肃、刚毅、热心肠、崇尚民主；南方人势利、懒惰、娘娘腔——总之大体就是这么个理论。因此，头一次去北方的南方人会带着文明人进入野蛮人地区冒险的那种不确定的自卑心态；而约克郡人就像苏格兰人一样，来到伦敦后有种野蛮人出门打劫的感觉。这种由传统造成的情感不会被直观的事实所改变。正如一名5英尺4英寸高、胸围29英寸的英国人会觉得自己作为英国人比南欧人更优越，北方人对南方人也有同样的心理优势。我记得曾遇到过一个弱不禁风的小个子约克郡人，就算有只猎狐梗冲他叫几声也会吓得他拔腿就跑，可就是这么个家伙居然告诉我，在英格兰南部他觉得自己“像个蛮族入侵者”。这种自大心理常常会传染给那些并非出生在北方的人。一两年前，我的一个在南方长大、后移居北方的朋友开车载我穿过萨福克。途中，我们经过一个相当漂亮的村庄。他不以为然地瞟了一眼那些乡间别墅，说道：

“当然咯，约克郡的乡村大多很丑，但约克郡人仪表堂堂。这儿

呢，恰好相反——漂亮村庄猥琐人。那些住在别墅里的人全都不中用，完全不中用。”

我忍不住问他是否认识那村子里的人。不，他不认识，不过既然这里是东英格利亚，那么这儿的人就肯定不中用。我的另一个同样出生在南方的朋友一有机会就歌颂北方、贬损南方。以下摘自他写给我的一封信：

我在莱恩斯的科里塞罗……我觉得荒野和山林间流淌的水比南方那些凝滞的死水迷人得多。“傲慢的银色特伦特河。”莎士比亚如是说；而我要说越往南越傲慢。

这是个关于北方崇拜的有趣例子。不仅仅是你、我以及所有生活在英格兰南部的人在他笔下被描绘成“肥胖迟钝”，就连高纬度地区的水也不再是H_2O，而成了具有某种神秘的优秀品质的东西。不过这段文字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其作者是个异常明智、思想“开放”的人，平时对民族主义不屑一顾，倘若听到“一个不列颠人抵得上三个外国人”之类的论调定会凛然反驳。不过但凡涉及南北问题，他便立刻概而论之了。所有种族差异论调——不外乎是因为头骨的形状不一样或者操不同的方言而声称自己优于他人——都是虚假的，但只要有人相信，这些论调就不容小觑。毫无疑问，英格兰人认为那些生活在比自己所处区域更南的人们不如自己，哪怕我们的外交政策正是由那些地区主导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探讨一下这种观念是何时形成的，以及背后的原因何在。

在民族主义成为一种信仰之初，英国人看着地图，发现自己的岛屿位于北半球的高纬地区，进而便演化出了住得越北就越有德的“迷人”理论。我小时候被灌输的历史知识通常在一开头就解释说，从自然角度而言，寒冷的气候令人们充满活力，而炎热的气候则使人懒惰，正因如此，我们击败了西班牙舰队。这种关于英国人（事实上英国人是全欧洲最懒惰的）精力充沛的胡言乱语持续了至少一百年。1827年的季度报告中写道：“我们宁可为祖国做苦力，也不要沉迷于橄榄、葡萄和罪恶之中。”“橄榄、葡萄和罪恶”概括了普通英国人对拉丁民族的印象。在嘉来勒、克雷西等人的神话作品中，北方人（起初是条顿人，之后是北欧人）身强体壮，充满活力，长着金色的胡须，品质纯洁，而南方人则狡诈、懦弱、放荡。这个理论从未在逻辑上被推到极致，否则就将意味着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是爱斯基摩人，不过它的确承认生活在我们北方的人比我们更优秀。于是，在过去五十年中，对苏格兰和苏格兰事物的崇拜

便深深影响了英国人的生活。但令南北差异呈现出奇特的不平衡状况的却是北方的工业化进程。直到近代，英格兰北方地区还实行落后的封建制度，工业主要集中在伦敦和东南部地区。例如内战[8]，简而言之就是金钱对抗封建制的战争，北部和西部为国王而战，南部和东部为议会而战。但随着煤炭工业的逐步北移，渐渐兴起了一个新的阶层，即白手起家的北方商人——狄更斯笔下的朗斯维尔先生和庞德贝先生。北方商人抱着其可恶的“要么成功要么滚蛋”的哲学理念成为19世纪的主导力量，并至今阴魂不散地统治着我们。这是一类受阿诺德·本涅特启发的人——一类从半个克朗起家、到头来赢得5万英镑的人，他们最可吹嘘之处就是赚了钱之后变得比以前更粗鲁。他们唯一的优点就是会赚钱。我们被教导要推崇这样的人，仅仅是因为他们尽管心胸狭窄、卑鄙、愚昧、贪婪又粗鲁，却有“胆识”，他“成功”了。换言之，他知道如何赚钱。

这类空话如今已经过时，因为北方商人不再成功。但传统不会被事实所抹杀，北方人有“胆识”的老观念依旧存在。你仍会依稀觉得北方人会“成功”，比方说赚到钱，而南方人会失败。在每个来到伦敦的约克郡人和苏格兰人的脑海深处都有一幅迪克·惠廷顿[9]式的画面，在画中，他自己就是那个从小报童一路成长为市长大人的英雄。而这个，说实话，对他而言根本算不上自大。但人们往往会犯个大错误，以为这种想法会进而促成真正的工人阶级。当我几年前第一次去约克郡时，曾想象着自己会置身一个粗人的世界。我习惯了生活在伦敦的约克郡人那种没完没了的高谈阔论和自以为谈吐风趣（“就像我们在西区说的，‘及时一针抵十针’”）的想法，以为会遇到许多无礼之举。但我压根儿没遇到那种情况，至少在矿工中没遇到。事实上，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矿工们对我既友善又有礼，甚至让我感到难堪。如果说有一类人令我自愧不如，那就是煤炭工人。当然，没有人对我来自另一个地区表现出丝毫鄙夷。鉴于英国的地域偏见一如微缩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一点便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表明地域偏见并非工人阶级的特质。

尽管如此，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确存在差异，人们对英格兰南部的描绘中至少有一点是真实的，即布赖顿住着不少花花公子。由于气候的原因，食利阶层喜欢待在南方。在兰开夏郡的一个产棉镇，你或许待上几个月也听不到一句“有教养的”腔调；反之，在英格兰南部城镇，随便扔一块砖头就能砸中某个主教的侄女。因此，在未受上流社会影响的北方，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现象虽有出现，其发展却缓慢得多。例如，所有的北方口音都顽强地存在着，而南方口音则在电影和BBC的冲击下

土崩瓦解。因此，你那所谓“有教养的”腔调正表明你是个外来人，而非小绅士。这可是个巨大的优势，它使得与工人阶级的交流变得容易得多。

然而和工人阶级真正打成一片究竟有无可能？关于这个问题，我稍后会讨论，眼下我只想说我认为不可能。但毫无疑问，比之于南方，你在北方更容易与工人阶级以大致平等的身份相处。寄住在矿工家里并被他们接纳为一家人并非难事，而想在南部乡村的农民家中尝试相同的事却几乎不可能。我和不少工人打过交道，因此不会将他们理想化，但我确信，只要你能走进工人家庭就能从中学到很多。最重要的是，通过与那些虽未必比你更优秀但与你截然不同的人们交流，你那中产阶级的观念和偏见将得到检验。

以对待家庭的不同态度为例。工人阶级的家庭纽带同中产阶级家庭一样紧密，但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却远没有那么紧张。男性工人不必背负大磨盘般沉重得要命的家庭声誉。我在早前已经指出，一名中产阶级者会在贫困的重压下彻底崩溃，这主要得归咎于其家庭影响——家庭成员们从早到晚抱怨他没能获得“成功”。工人阶级知道如何合作，而中产阶级对此一无所知，这或许是由于他们对所谓的家庭忠诚有着不同的理解。跻身中产阶级之列的工人们无法组成一个有效的工会，因为在罢工期间，所有中产阶级家庭的妻子们都会怂恿自己的丈夫充当工贼、谋取他人的工作岗位。工人阶级的另一个特质——起初会令人不安——在于他们对任何他们平等相待的人都直言不讳。如果你给某个工人他并不想要的东西，他会直截了当地拒绝你；而中产阶级者则会接受，以免显得冒犯。此外，还有一个差别，即工人阶级对于“教育”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如此朴实，与我们的如此迥异！工人们通常对学习抱有某种模糊的敬意，但倘若“教育”涉及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则会立刻洞悉真相并出于某种健康的本能而拒绝。我曾经想象着那些14岁的孩子们被拖离课堂，送去从事暗无天日的工作，我曾为这一虚幻的景象哀叹。在我看来，“工作”的厄运竟然降临在14岁的少年头上，那是多么可怕。当然，如今我明白了，在工人阶级家庭中，不朝思暮想着离开学校的孩子千里也难寻一个。他们希望从事真正的工作，而不是将时间浪费在诸如历史、地理之类可笑的垃圾课程上。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在学校待到几近成年的想法既可鄙又懦弱。一个本应每周为家里挣1英镑的18岁大小伙子居然穿着滑稽的制服去上学，不做功课甚至还要挨打，这是什么观念啊！设想一下一个18岁的出身工人家庭的小伙子挨打的场景吧！同龄人还是小宝宝的时候他就已经成长为男子汉了。塞缪尔·巴特勒的小说

《众生之路》中的主人公欧内斯特·庞蒂菲克斯在浅尝了真正的生活之后回顾自己的公学和大学教育，发现当初接受的教育“羸弱而荒唐”。从工人阶级的角度而言，中产阶级的生活也同样羸弱而荒唐。

在工人阶级家中——我此处指的不是失业者家庭，而是家境相对较好的家庭——你可以感受到在别处难以体验的温暖、正直、充满人性的氛围。我认为，假如一名体力劳动者能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可观的薪水——这个“假如”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那么他或许会比一名“受了教育”的人更容易感受到快乐，他的家庭生活会更自然地进入理智、温馨的轨迹。工人阶级家庭中那种心平气和、其乐融融的景象时常令我为之动容。尤其是冬季的夜晚，喝过茶，火盆里的火苗散发着温暖，金属挡板上火光的倒影摇曳，身着便装的父亲坐在火盆一侧的摇椅里翻看比赛结果，母亲坐在另一侧织补，孩子们捧着1便士的薄荷糖心满意足，狗儿懒洋洋地趴在破布垫上——这是个宜人的去处，它为你提供的不仅是个安身之地，更是一份归属感。

这一幕依旧在大部分英国家庭中反复上演，尽管较之战前有所减少。家庭的幸福主要取决于一个因素——做父亲的是否有工作。不过请注意，我刚刚回忆起的那幅画面，一个工人家庭吃过了腌鱼、喝完浓茶，围坐在炭火边，这一幕只属于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在过去或将来都不可能出现。跳过两百年进入未来乌托邦社会，你所见到的景象将会截然不同。我脑海中的一切在那个社会里将荡然无存。到那个时候，不再有体力劳动者，所有人都“受过教育”，那个父亲不会再是个长着一双大手的粗人，喜欢穿着便衣悠然坐着说“俺在街上”[10]。壁炉里亦不复有炭火，只有某种无形的加热器。家具用橡胶、玻璃和钢铁制成。倘若仍有晚报之类的东西，那么上面一定不会再刊登赛况，因为在一个消除了贫困的世界里，赌博将变得毫无意义，而赛马也将从地球上销声匿迹。狗会由于卫生因素被限制。此外，只要生育控制者们能想出办法，未来世界亦不会有那么多孩子。不过倘若退回到中世纪，你会同样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世界。没窗户的小茅屋里烧着木头，由于没有烟囱，烟气扑面而来，发霉的面包、粗茶淡饭、虱子、坏血病，年复一年，孩子出生又死去，神父拿地狱的故事不停地吓唬你。

有趣的是，不是现代工业的辉煌胜利，不是收音机、放映机、每年出版的五千部小说，也不是阿斯科特赛马场的人群或者伊顿和哈罗公学的比赛，而是对工人阶级的记忆——尤其是在战前，我童年时代，英国依旧昌盛之时——才令我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毕竟不算太糟。

[1] 芬斯伯里，伦敦北部的一个地区。

[2] 斗牛场，伯明翰的大市场。

[3] 旧大陆，指欧洲、非洲和亚洲地区，是相对于美洲新大陆的概念。

[4] 大西部铁路，英国的一家铁路公司，其旗下铁路连接了伦敦至英格兰西部、西南部以及威尔士地区。

[5] 阿道斯·赫胥黎（1894—1963），英国著名作家，《美丽新世界》的作者。

[6] 阿诺德·本涅特（1867—1931），英国作家。

[7]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著名诗人，象征派诗歌的先驱。

[8] 内战，此处指的是17世纪英王查理一世和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英国议会之间的战争。

[9] 迪克·惠廷顿，英国童话故事，主人公迪克·惠廷顿自幼父母双亡，独自一人去伦敦讨生活，因为偶然卖了一只猫而发财，最终当上伦敦市长。

[10] “俺在街上”，原文“Ah wur coomin’opp street”为模仿未受过教育者的浓重口音，或为“I was coming up street”。

第八章

从曼德勒到维根路途漫漫，为何选择这条路，个中原因并非一目了然。

在本书的前几章，我已经零零碎碎地描述了自己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产煤区的见闻。我去那里的原因部分在于想看看大规模失业会糟糕到何种地步，部分是想近距离了解最典型的英国工人阶级。由于我多少有些偏向于社会主义，这么做便极有必要，因为在你能够确定是否真的认同社会主义之前，必须弄清楚目前的状况是否可以容忍，必须得对异常复杂的阶级问题有个明确的态度。在此我要稍稍偏离主题，解释一下我对阶级问题的态度是如何转变的。很显然，这其中会涉及我自身的经历，倘若我不自认为是这个阶级的典型代表——或者更准确地说，具备某种重要的特质——就不会这么做。

我出生的家庭或许可以勉强算作上层中产阶级。一如吉卜林[1]的诗歌中所表现的那样，在19世纪80和90年代达到鼎盛的上层中产阶级是一群维多利亚辉煌时代逝去后的遗老遗少。又或许换个说法，不用“群”而用“层”——年收入在2000英镑下至300英镑的社会阶层。我家处于这个阶层的底部。请注意，我用金钱来定义这个阶层仅仅是因为这通常是最容易被理解的方式。尽管如此，英国社会阶层体系的特点并不能完全用金钱解释。简单说来，起到阶层划分作用的既有金钱，也有某种晦暗不明的种姓因素，整个体系就好像一栋中世纪鬼魂出没的偷工减料的现代平房。因此，上层中产阶级的下限标准延展至年收入仅为300英镑——也就是远远低于没有特殊社会地位的普通中产阶级的收入。在有的国家，你或许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收入预测他的观点，但在英格兰就行不通，你得始终考虑到他的家庭背景。一名海军军官的收入可能和一个杂货商相差无几，但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只有在那些诸如战争或总罢工的大话题上——或许连这样的话题都不行——才能立场一致。

当然，如今上层中产阶级已经没落了。在英格兰南部的每个小城镇——更不用说荒凉破败的肯辛顿和伯爵府——那些昔日辉煌年代里曾声名远扬的东西已经濒临死亡，被如今这个不再遵循古道的世界所抛弃。每当我翻开吉卜林的书，或走进那些上层中产阶级一度趋之若鹜的无聊

的大型商场，无不想到“周遭的变化和衰退”。但在战前，上层中产阶级尽管已不复昔日盛况，却仍然保有自信。在战前，你要么是个绅士，要么不是。倘若是绅士，那么无论收入如何都要处处表现得体。那些年收入400英镑与年收入2000英镑、甚至1000英镑的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400英镑收入者却会极力忽视这种差异。上层中产阶级最明显的标志或许就是家族中绝无人经商，而主要涉足军事、政治和专业领域。

这个阶层的人没有土地，但他们自觉在上帝眼中是土地的拥有者，保持着一种半贵族化的眼界，投身于专业研究和军事而非商贸。这些家庭的小男孩们曾数着盘子里的梅核、念着顺口溜占卜各自的命运，“陆军、海军、教会、医学、法律”，而且即便“医学”在以上各行业中也略逊一等，完全是为了充数才权且被考虑。年收入只有区区400英镑却跻身这个阶层是个相当古怪的境况，因为那意味着你的所谓绅士派头纯粹是空谈。可以说，你同时活在两个阶层的夹缝中。从理论上讲，你精通如何管理、赏赐仆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或许只有一个，或者至多两个仆人。理论上你知道该如何穿衣打扮、如何点餐，现实生活中却无力请个好裁缝或去家像样的餐馆。理论上你知道如何打猎骑马，现实中却既没有一匹马可骑也没有一寸领地可供狩猎。这便可以解释为何印度（以及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地）对上层中产阶级中的底层人士来说有着如此强烈的吸引力。作为士兵或军官去那些地方不是为了金钱，而是因为印度有廉价的马匹、免费狩猎场和大批黑仆，可以轻轻松松当个绅士。

我提到的这类落魄绅士之家对于贫穷的担忧远胜于任何处于贫困线以上的工人阶级家庭。房租、服饰、学费无一不是永无止境的噩梦，每一件奢侈品，哪怕区区一杯啤酒，也是不可接受的挥霍。家庭的全部收入都用来撑场面。很显然，那类人处境异常，有人或许认为他们是少数特例、无足轻重，打算把他们忽略。然而事实上，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比方说，很多牧师、校长、几乎所有英裔印度官员、大量士兵和水手，以及为数众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艺术家都在此列。不过，这个阶层真正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乃是资产阶级的减震器。真正的资产阶级，即年收入达到2000英镑或更高的阶层可以用金钱将自己与受他们剥削的阶层完全隔离开。提到下层社会，他们想到的就是雇员、仆人和小商贩。但对于那些拿着和工人阶级相差无几的薪水，却要为了体面生活苦苦挣扎的上层中产阶级的底层可怜虫而言，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些家伙不得不接近工人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还要和他们亲密相处。我怀疑，传统的上层阶级对待“普通”人的态度正是由此而来。

什么样的态度？一种带着优越感的窃笑，同时夹杂着难以抑制的厌恶。翻看过去三十年间随便哪期《冲击》[2]，你便会发现，无论在何处，出身工人阶级的人总是那个滑稽角色，除非他很偶然显出过于成功的苗头，不过那样一来他就不再是个小丑，而成了恶魔。这种态度根本不值得一驳，倒不如来看看它是如何形成的，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明白工人阶级在那些与他们相处但又有着不同习惯和传统的人们眼中是何模样。

破落绅士家庭的处境与那些居住在黑人街区的“穷白人”家庭并无二样。在这样的境况下，你必须坚持自己的身份，因为那是你唯一拥有的东西；与此同时，你又因自己趾高气扬的行为和标志着雇主阶层身份的语气、态度而被他人憎恨。我第一次意识到阶级差异的时候还很小，刚满六岁。在那之前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们基本上都来自工人阶级，因为他们似乎总是在做很有趣的事情，比如渔夫、铁匠和泥瓦匠。我记得康沃尔一家农场的帮工们在种萝卜时曾让我骑在播种机上，有时候还会挤羊奶给我喝；我记得替邻居造房子的工人们让我搅和湿砂浆玩，我就是从他们那儿第一次学会了“b—”这个词；我还曾和住在街那头的管子工家的孩子们一起去掏鸟窝。但不久我就被禁止再与管子工的孩子们玩耍，我被告知他们太“普通”，要同他们保持距离。你可以认为这种想法很势利，却也颇有必要，因为中产阶级的人们不能容忍他们的孩子们在庸俗的口音中成长。因此，从很早开始，工人阶级在我们眼中就不再友好、优秀，而成了敌人。我们意识到他们憎恨我们，但却从不理解个中缘由，只是将其归结为纯粹的恶意。对于童年时代的我而言，对于几乎所有我这类家庭中的孩子们而言，“普通”人几乎等同于这类人。他们面容粗糙、腔调粗鄙、举止粗鲁，他们痛恨所有和他们不一样的人，只要有一星半点机会就会用野蛮的方式侮辱你。这就是我们眼中的他们，尽管不真实却可以理解。别忘了，战前英格兰的阶级仇恨可比现在严重得多。那时候，你很可能仅仅因为外表像个上层社会的人就受到侮辱；而如今恰恰相反，上层社会的外表倒有可能让你受到巴结。所有年过三旬的人都能记得，当年一个衣冠楚楚的人穿过贫民区是不可能不遭哄赶的。由于“盲流”（现在几乎已销声匿迹）的存在，大城镇的贫民区被视为不安全场所，伦敦满大街的流浪醉鬼大呼小叫、肆无忌惮，令那些不愿屈尊计较的人们生活痛苦不堪。我小时候，假日里常常出现的恐怖状况是被五到十个“下流人”围住。然而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始终是我们这类人居于主导地位，而“下流人”受到压制。我记得1916年冬天，发生了好几次大规模野蛮冲突。这种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公开敌对传统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显然从未改变。19世纪60年代的《冲击》上有幅经典

卡通画，是一个身材矮小、神色慌张的绅士骑马穿过贫民街区，一群街头仔朝他逼近，嚷嚷着“来了个小白脸！我们吓吓他的马！”想象一下如今街头仔试图吓唬他的坐骑的场面吧！他们很可能只是围着他，希望讨点小钱。在过去几十年中，英国工人阶级的奴性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增长。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他们被失业这个可怕的武器吓坏了。在战前，他们的经济地位相对较强，当时虽然没有失业救济金可以依赖，但并没有多少人失业，且雇主阶层的权力不像如今这般庞大。人们并不会因为对某个“纨绔子弟”有放肆之举而招致灭顶之灾，因而很自然地，只要他觉得这么做安全，就会对“纨绔子弟”无理。G.J.赖纳在《奥斯卡·王尔德》一书中指出，继王尔德审判之后出现的怪异、猥琐的大众愤怒之爆发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社会属性。“伦敦的乌合之众给一名上流社会的成员来了个措手不及，并不断耍弄他。”这一切不仅自然，甚至恰如其分。如果你曾受到英国工人阶级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遭受的待遇，就一定会明白他们为何愤怒。另一方面，破落绅士家庭的孩子们倘若带着对工人阶级的憎恶长大并将那些人归类为“下流胚”，亦无法单纯责怪他们。

然而，还有另一个更严肃的难题。接下来，你要面对的是西方社会阶级差异的真正秘密——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欧洲人，哪怕他自称社会主义者，不经过一番努力也无法将工人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一员的真实原因。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可怕的字眼，这四个字如今令人们羞于启齿，但在我小时候却常被随口提起，即：下等人臭。

那就是我们被教导的——下等人臭。这样一来，你眼前显然出现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没有什么喜恶之感能像生理感受这般切肤。种族厌恶、宗教憎恨、教育差异、性格、智力、甚至道德观的差异都可以被跨越，唯有生理上的排斥无从化解。你可以对杀人犯或鸡奸犯产生好感，但却无法对呼吸有臭味的人——我是说总是臭烘烘的——有好感。无论你多么想祝福他，无论你多么尊重他的思想和人格，只要他呼吸有臭味就是个可怕的家伙，你就会打心底里厌恶他。是否大多数中产阶级者从小就被灌输诸如工人阶级无知、懒惰、酗酒、粗野、不诚实之类的观念或许并不重要，真正有害的在于他们打小就相信工人阶级是肮脏的，我在童年时代便是被如此教导的。你早年便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工人阶级的身体有种难以言表的恶臭，于是便尽可能远离他们。你望着一个满身大汗的建筑工人扛着铁镐走在路上，看着他褪了色的上衣和被陈年泥灰弄得僵硬的灯芯绒裤子，想象着外衣下面那层层油腻腻的破布烂衫和久未清洗的躯体，浑身的肌肤呈棕色（我通常如此想象），散发

着强烈的近似于熏肉的臭味。你看着一个流浪汉在水沟边脱下鞋子——呃，太恶心了！你从未认真考虑过，流浪汉或许并不喜欢弄得满脚黑乎乎。即便是你相当了解的“下等人”——比方说仆人——也多少有些令人倒胃口。他们的汗臭味、粗糙的皮肤都和你迥然不同。

每个受过良好教育、住在带有卫生间的房子中、有仆人伺候的人都是在这样的感受中长大的，西方社会中不可逾越的阶级裂痕便由此产生。奇怪的是，人们很少承认这一点。眼下，我只能想起一本书对此直言不讳，即萨默塞特·毛姆先生的《在中国的屏风上》。毛姆先生描述了一名中国高官走进一家街边客店，对每个人大呼小叫、颐指气使，好让众人都明白自己是达官显贵而其余人只是小小毛毛虫。五分钟后，他用自以为适当的方式抖够了威风，便坐下来和和气气地与挑担工共进晚餐。作为一名官员，他觉得有必要让旁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但他并不认为苦力们和自己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在缅甸时也观察到无数类似的情形。在蒙古人中，在我所知的所有亚洲人中，有一种天生的平等，人与人之间亲密相处，这在西方人眼中是无法想象的。毛姆先生补充道：

在西方，我们依气味而彼此相隔。劳动者是主宰，企图用铁手统治我们，但这并不能抹杀他们臭的事实：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因为一大清早要赶在上工哨子响起之前洗个澡可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事；也没有人会认为重体力劳动者身上的气味好闻。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更换衣服，因为每周的洗涤工作要由他们的刀子嘴妻子承担。我并不因劳动者身上有股子怪味而贬损他们，但他们的确很臭，这给那些嗅觉灵敏的人与他们交往造成了难度。清晨沐浴比出身、财富或教育更能有效地划分阶层。

那么，“下等人”果真臭么？当然，从整体而言，他们比上层社会的人更脏。他们受制于生活环境，因为即便时至今日，在英格兰，拥有浴室的家庭也不足半数。此外，每天彻底洗个澡的习惯在欧洲还是个新鲜事，而工人阶级往往比资产阶级更保守。不过，英国人已经明显越来越干净了，或许在未来的一百年内有望接近日本人的清洁程度。遗憾的是，那些将工人阶级理想化的人们往往认为有必要美化工人阶级的所有特质，因而假说肮脏本身也值得炫耀。有趣的是，社会主义者和切斯特顿式浪漫多情的天主教徒有时也会加入吹捧的行列，这两类人都会告诉你肮脏就是健康、“自然”，而清洁只不过是一时潮流，或者至多是一种奢侈。（按照切斯特顿的说法，肮脏仅仅是某种“不舒适”，因此也就标

志着自我禁欲。遗憾的是，由肮脏造成的不适主要得由他人去承受。身上脏并不太痛苦——根本比不上冬日清晨洗冷水澡那般受罪。）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曲解概念，即认为工人阶级之所以肮脏乃是基于他们的选择，而非客观因素。事实上，只要有条件去浴室的人通常都会沐浴。然而，最要紧的是，中产阶级不仅相信工人阶级肮脏——从上文引述的段落能看出，毛姆先生也执此观点——更有甚者，还认为这种肮脏与生俱来。我小时候所能想象出的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用工人用过的瓶子喝水。我13岁时有一次搭乘从集镇开出的火车，三等车厢里挤满了去卖牲口的羊倌和猪倌。有人拿出了四分之一瓶啤酒和众人分享，那瓶子从一张嘴转到另一张嘴，每个人都灌上一口。我无法形容当那瓶子渐渐朝我传来时心中的恐惧。假如我就着这碰过那些下等男人嘴巴的瓶子喝上一口，肯定会呕吐；可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让我喝，我又不敢拒绝，生怕冒犯了他们——你瞧，中产阶级就这样陷入了两难境地。如今，感谢上帝，我再也没有那样的感觉了。劳动者的躯体在我眼中不再比百万富翁的更丑陋。我仍然不喜欢用别人用过的杯子或瓶子——我是说，别的男人，对于女士我并不介意——不过至少其中不再掺杂阶级因素。与流浪汉为伍的经历治愈了我的毛病。英国的流浪汉其实并不太脏，但他们背负着肮脏的恶名。当你与流浪汉分享过同一张床、用同一把壶喝过茶，便会觉得自己已然见识过最糟糕的情况，而即便是那些情况也无法令你畏惧。

我之所以在这些话题上大费笔墨，乃是因为它至关重要。要想消除阶级差异，你首先必须理解另一个阶级眼中的自己。单单止步于指责中产阶级“势利”是无济于事的。倘若你不能意识到所谓势利乃是与某种理想主义相联系，便无法深入理解。这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早年所受教育的衍生品，他们早在被教导要清洗脖子的同时就接受了要时刻准备为国献身、鄙视“下等阶级”的观念。

在此，我会被指责为落后于时代，因为我的童年跨越了战前和战争时期，人们或许会声称如今的孩子们是在更开明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当前的阶级情感不似往日那般苦涩，这或许不假。在某些方面，工人阶级曾公开表达敌意，如今却变得顺从。战后廉价的服装生产以及人们态度的缓和从表面上平抑了阶级间的差异。但最根本的感觉无疑依旧存在。每个中产阶级者内心都埋藏着阶级偏见，只消一件小事就会被重新唤醒。一个年过四旬的人或许会固执地认为自己的阶层为下等阶层做出了牺牲。倘若你告诉某个没头脑的、为了保持每年四百到五百英镑的收入而苦苦挣扎的普通绅士，说他是食利者阶层，他一定会认为你疯了。

他会诚心诚意地列出一打理由来说明自己远不及一名普通劳动者。在他眼中，工人不是被淹没的奴隶，而是险恶的洪水，汹涌而来，吞噬了他和他的朋友们以及他的家庭，将所有的文明与礼仪一扫而净。于是，他们便怀着一种古怪而明显的焦虑，生怕工人阶级快速崛起。在战后不久——当时煤炭价格仍然很高——发行的几期《冲击》中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四五个面容冷峻阴险的矿工开着一辆廉价汽车路遇一个朋友，那朋友大声问他们从哪儿借来的车，他们回答“我们买的”！你瞧，这样的画就“符合《冲击》的要求”，因为矿工们居然买得起车——哪怕是四五个人合买——这简直是咄咄怪事，是违背自然的犯罪。虽说这是十几年前的观点，我却至今没见到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工人阶级被荒唐地宠坏了，因得到救济、养老金、免费教育等等而毫无希望地堕落了，种种观念如今依旧盛行，或许只是因人们近来意识到失业问题的确存在才稍稍有所动摇。在大批中产阶级者，特别是绝大多数年过半百的人们眼中，典型的劳动者仍然骑着电动自行车去劳工介绍所，仍然用浴缸存放煤炭，“而且，亲爱的，相信我，他们依靠救济金结婚！”

阶级仇恨似乎有所缓解的原因在于如今的报刊不再刊登这类话题，这其中部分得益于当代人说话更委婉的习惯，部分是因为现在的报纸，甚至书籍意图吸引工人大众。通常，通过私人交流才能获取真相。不过，倘若你想要白纸黑字的证据，那么不妨看看已故的塞恩斯伯里教授的附带论述。塞恩斯伯里是位博学之士，想必也是位明智的文学评论家，但若是谈论起政治或经济问题，他和他那个阶层的其他人的唯一区别就是脸皮太厚且出生得太早，不懂得假充斯文。按照塞恩斯伯里的说法，失业保险完全是“对懒惰的游手好闲的小混混的支持”，而工会运动则无非是某种有组织的行乞：

“乞丐”曾经只是个词汇而已，如今几乎完全可行了，不是么？尽管身为乞丐意味着完全或部分依靠他人的钱财生活，但这却成了件激动人心的事情，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一部分人以及某个政党的诉求。

（手稿第二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塞恩斯伯里承认失业问题必然存在，事实上，他认为只要尽可能让失业者受罪，失业问题就应该存在：

那些“临时”工作难道不正是安全而健康的劳工体系之存续的秘诀与保证么？

……在一个复杂的产业和商业环境中，在固定工资基础上的保持恒定就业率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与工资有着同样效果的失业救济补助却从一开始就会让人意志消沉，并迟早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手稿终部）

当恰好没有临时工作时那些“临时工”究竟会怎样，文中并没有提及。想必（塞恩斯伯里对《贫困法案》大加赞扬）他们要么得设法找到工作，要么就得露宿街头。至于所有人都理应有机会得到足以为生的食物的主张，塞恩斯伯里则不以为然：

即便是“生存权”，也仅限于反谋杀的保护权。慈善机构当然会、道德体系也许会、公共事业或许也应该为维系生存提供些额外的保护措施，但严格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是否有此要求就另当别论了。

至于所谓生于斯国即享有对该国土地之所有权的疯狂说法，更是不值一提。

（手稿终部）

在此值得花点时间思考一下上段话的美妙含义。有趣的是，这类文字（在塞恩斯伯里的大作中比比皆是）居然能够发表。大多数人多少都会羞于将其诉诸笔端。但塞恩斯伯里所说的正是那些每年能安安稳稳拿上500英镑收入的小毛虫们所想的，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你得佩服他敢于直言不讳。要卑鄙到如此公然的地步，还真得有些胆量。

这就是一个公开的保守主义者的面目。那么，那些并不保守的“开明”中产阶级者又如何呢？在他那革命的面具之下的，是否真的和其他人不同呢？

一个中产阶级者或许会信奉社会主义，甚至加入共产党。然而，这究竟会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呢？显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架之下，他必须得谋生，你不能因他依恋资产阶级经济地位而指责他。不过，他的品位、习惯、态度、他的思维背景——用共产主义的行话来说就是他的思想意识——是否有所改变呢？除了他现在开始在选举中为劳工，或者有可能的话，为共产主义者投上一票之外，有没有其他变化呢？显而易见，他仍然习惯性地和自己所属的阶级为伍；他的座上宾更可能是一个来自于本阶级、将他视为危险的左翼分子的人，而非一个赞

同他的观点、出身工人阶级的人；他在食物、酒、服饰、书籍、绘画、音乐、芭蕾方面的品位依旧是资产阶级化的；最重要的是，他依旧与本阶级的人成婚。看看任何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吧。看看大不列颠共产党成员、《马克思主义启蒙读本》的作者×同志吧。×同志恰好是个老伊顿人。从理论上讲，他会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可你注意到没有，他仍然敞着上衣下摆的扣子[3]。他将无产阶级理想化，但其自身的习惯却和他们没有丝毫相近。他或许曾有一次装模作样地没撕掉标签就抽雪茄，但他不可能把奶酪戳在刀尖上直接放进嘴里，或者进了门还戴着帽子，又或者从茶碟里喝茶。我认识不少出身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我听过他们长达数小时的关于反对本阶级的长篇大论，然而我从未见他们习得无产阶级的餐桌礼仪，一次也没有。原因究竟何在？为什么一个视无产阶级为十全十美的人仍旧要忍受喝汤不得出声的痛苦约束？原因只可能是在他的内心，他感到无产阶级的方式令人作呕。因此你瞧，他依旧被童年时所受的教育影响，他从小便被教育要痛恨、恐惧、鄙视工人阶级。

---

[1] 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生活年代恰逢英国海外扩张时期，其部分作品也被指责为带有帝国主义色彩。

[2] 《冲击》，创办于1841年的英国漫画杂志，主要刊登幽默、讽刺作品，2002年停刊。

[3] 上衣下摆的扣子，就座时解开上衣下摆的扣子是一种传统绅士做派，为的是保证上衣平整。

第九章

十四五岁的时候，我是个惹人讨厌的小势利眼，当然我也没有比同班的那些男生更糟糕。世界上能将“势利”二字如此长久地保持下来，或者以如此精炼而微妙的方式教化众人的，除了英国的公立学校，怕是别无他处了。在这儿英式“教育”至少不能算是失败的。你会在离开学校几个月以后便把学的希腊语、拉丁语忘个一干二净——我学了不知八年还是十年的希腊语，而如今我33岁，却连希腊字母表都读不出来——但是你的自命不凡，除非你能坚持把它像喇叭花一样连根拔除，它会一直跟着你进坟墓。

在学校里，我的地位很尴尬，因为学校里大多数男生家境都比我优越。我能来公立学校只不过是因为我碰巧拿了奖学金。在中等偏下的中产阶级家庭中，这种现象很常见。比如牧师，英裔印度官员的儿子等等。所以在这点上我受到的影响并不少见，一方面我对我的修养紧抓不放；另一方面我也对家境比我富裕且乐于向我炫耀的同学更加怀恨在心。我鄙视所有算不上“绅士”的人，但是我也憎恶贪婪的富豪，特别是那种暴发户。优雅而端庄在我看来应该是出身高贵，却鲜有家产。这是中上阶层中较低等的人群的信条，它有一种令人宽慰的，如同被放逐的詹姆斯党人[1]一般的浪漫主义。

但在那个战争时期和战后不久的年代里，有一段时间学校的氛围很古怪，因为当时英国已经快有一个世纪没有过革命的感觉了。几乎全国上下都暗涌着一股早已被颠覆、忘却却又残留着各种沉积的革命浪潮。本质上来说，虽然人们主观上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战争直接导致了战后年少者反对长者的现象。战争时期，年轻人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为国捐躯。而年长者的行为，即便经转几年，也还是让人不忍细看；他们在不伤毫发的安身之处做着他们的爱国主义者，而不顾他们的儿孙在德国的机枪下如枯草一般成片倒下。更甚的是这战争主要是年长者在指挥，而他们的作战指挥水平是极端不合格的。到了1918年，所有40岁以下的人都对他们的长辈没有好脸色。战后自然产生的反军事主义，则更是被扩大成宏观的反正统、反权威。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中盛行着对于仇恨“老头子”的古怪崇拜。他们用“老头子”的当权来解释所有人性阴暗面，由于被“老头子”们支持拥护的，从斯科特小说到英国上议院[2]之类

所有广为接纳的组织都遭到了嘲讽。英国当时充斥着各种浅薄的唯信仰论、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女权主义、恋爱自由、离婚改革、无神论、生育控制——比平常时期更容易听到这些理论。当然这种革命情绪也传染到了那些尚且年轻未能远征沙场的公立学校的学生。那时候我们都自认为是新时代的觉悟者，抛开了那些“老头子”们强加给我们的正统观念。虽然基本上我们都保留着势利的特质，而且还理所当然地拿着我们的额外津贴或者做着一份轻松的闲差，但是我们也很自然而然地“反对着政府”。

我们嘲讽军官训练团[3]、基督教会，甚至是学校的必修游戏和皇室家族。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不过是在参与一种全球反战的消极情绪。有两件带有当时古怪的革命情绪的事让我印象深刻。一天，我们的英文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常规知识问答的卷子，里面有一个问题：“列举你认为当今在世的十位最伟大的人”。班上16个学生中（我们平均年龄是17岁）有15个人把列宁列入其中。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势利当道、学费昂贵的公立学校，当时的时间是1920年。而那时，恐怖的十月革命对于人们来说还记忆犹新。1919年所谓的和平庆典也是，我们的老一辈决定以传统的那种欢呼敌人倒下的礼节庆祝和平。我们冲向操场，举起火把，高唱着“《统治吧！不列颠尼亚》”这样的爱国歌曲。那些男生们——我认为他们是引以为傲地——嘲笑着整个庆祝过程，且用亵渎而又具有煽动性的词语唱和着。我很怀疑这样的事情在今天会不会再次发生，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今那些公立学校的学生们，至少是我认识的那些，即便是最聪明的，都比十五年前我和我的同龄人要“右翼”得多。

于是，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我既是一个势利眼也是一个革命者。我反对所有的权威，我把萧伯纳、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当时他们都是危险的“先进”的作家）所出版的所有作品读了一遍又一遍。我含糊地把自己形容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我并没有了解很多的精髓。而且我根本没有工人阶级也算是人的概念。以书为媒——比如杰克·伦敦的《深渊居民》[4]——隔着遥远的距离，我仿佛可以切身体会他们遭受磨难时的痛苦。但在任何接近他们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憎恶和鄙视，还是会抗拒他们的口音，并且被他们习惯性的粗鲁所激怒。必须铭记在心的是，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会儿，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情绪还未消退。那是发生大量矿工罢工事件的非常时期，矿工被看做是恶魔的化身，而老太太们必须每晚检查床肚底下，唯恐罗伯特·斯迈利[5]会藏在那里。贯穿整场战争以及战后的一小段时间里，英国都有着高额的

薪水和充裕的就业机会；而现在的情况则比平常时期更糟糕，工人阶级自然会起来反抗。壮年们当年被美好的誓言引诱入了伍，而戎甲凯旋之时，国内却是没有工作甚至连住房都没有的萧条境地。更甚的是，他们参与过战争，带着他们的军人习性对待家乡的生活，那基本上就是一种毫无纪律、无法无天的生活态度。空气中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一首专属于那个年代的歌里这样唱道：

富人更富有，穷人更多子

除此之外万事不可知；

与此同时，

当其之时，

我们却也安其无所失。

即便有一杯又一杯的清茶聊以慰藉，人们还是没有安分地接受从今往后都失业在家的命运。他们还是朦胧地期盼着他们为之奋斗的乌托邦，而且更变本加厉地公然表现出他们对H发音阶级[6]的恶意。所以对于我这类的资产阶级避震器来说，“普通人”看起来还是残暴又令人生厌的。回顾那一段时光，我似乎把一半时间用在谴责资本主义体系上，而另一半时间则为公车乘务员的傲慢态度而大动肝火。

在二十岁不到的时候，我去了缅甸，供职于印度帝国警署。像缅甸这样的“帝国主义边缘地带”[7]，乍看之下阶级问题是被抛在一边的。那儿没有什么明显的阶级斗争，因为你是否在一个好的学校里接受教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的肤色是不是白的。事实上缅甸的大多数白人并不是英国意义上的“绅士”，但除了普通士兵和一些不好归类的人，他们都过着“绅士”级别的生活——即有人侍奉左右，把晚饭称作“晚餐”——而且官方意义上来说他们都从属于同一个阶级。他们是“白人”，是与那些下等阶级的“当地人”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们对待这里的“当地人”与对待家乡的“下等人”并不相同。最本质的一点就是“当地人”，即任何一类的缅甸人，不会让他们有生理上的抗拒感。我察觉到，他们虽然看不起“当地人”，但他们也做好了要与他们亲密接触的准备，即便种族歧视最露骨的白人也不例外。当你有众多仆人侍奉左右的时候，就很容易懒惰成性，而我就习惯性地纵容我自己，例如会让我的缅甸男仆为我更衣。因为他是缅甸人，并不令人作呕；我是绝对无法忍受一个英国男仆

对我作出如此亲昵的举动的。缅甸人给我的感觉，和女人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像大多数其他种族一样，缅甸人身上也有一种特殊气味——我无法形容它：那是一种让人牙齿微颤的味道，但一直都不使我反感。（顺带一提，东方人说我们是有体味的。我相信中国人说白人的体味像是尸体的味道[8]，而缅甸人也这么说——尽管没有哪个缅甸人会粗鲁到对我直言不讳。）而且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的立场是站得住脚的。因为接受现实的人必须承认蒙古人种有着比白人更好看的体格。缅甸人有丝织一般的皮肤，不到四十岁绝对不会有皱纹，而且之后只会像干皮革一样稍有干枯，相比之下白人的皮肤则有着粗糙的颗粒，并且松弛下垂。白人的腿上，手臂外侧，和前胸的一大块都有既长又丑陋的体毛。缅甸人只在适当的地方长一两绺硬硬的黑色的毛发；他们其他部位几乎不长毛，也没有胡须。白人总是会变成秃头，但缅甸人就很少甚至几乎没有此类现象。尽管被槟榔汁染了色，缅甸人的牙齿还是很完美的，而白人总是会有蛀牙。白人总的来说看起来病怏怏的，而他们发福的时候，脂肪总会在难以置信的地方堆积起来；蒙古人有着俊美的骨架，而且即便年老也不会走样。不可否认，白人种族会出现个别有那么几年有着惊艳美貌的特例；但总的来说他们远远没有东方人漂亮。然而相对于缅甸人，我更抗拒英国“下等阶级”的原因并不是这些。我还停留在早年习得的阶级偏见的意识中。我二十出头的时候在一个英国雇佣兵团里待了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地也崇拜着这些私人佣兵，就像大多数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崇拜那种比自己大五岁，稳重乐观且胸前佩戴伟大战役勋章的有为青年一样。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厌恶他们，他们只不过是“普通人”，而我并不屑于接近他们。在炎热的早晨，整个佣兵团在街上行军，我和一个少尉跟在后面。前面百来个大汗淋漓的躯体散发出的蒸气直叫我的胃里翻江倒海。而这一切，你看，就是赤裸裸的偏见。因为军人恐怕和男性白种人一样，生理上是无害的。他们还算年轻，由于新鲜的空气和锻炼，他们几乎一直是身强体健的，严格的纪律也使他们非常注意个人卫生。但我没办法往这方面去想，我只知道我闻的是下等阶级身上的汗水味儿，而这让我感到恶心。

随后的时光里，在我摒弃阶级偏见，或者说一部分阶级偏见的时候，是以一种迂回渐进的方式，而且整个过程花了好几年。而让我改变对待阶级问题态度的则是一些间接的因素——几乎就是些无关紧要的因素。

我在印度警署待了五年，在最后的时光里我痛恨帝国主义。我当时是以一种难以言表的痛苦在执行我的工作。在英国自由的氛围中，那样

的东西是无法让人理解的。帝国主义，你必须身在其中方可嗤之以鼻。局外人看来，英国在印度的律法似乎是善意的，甚至是必要的，且事实也确实如此；而毫无疑问，法国在摩洛哥的律法，荷兰在波罗州的律法也是一样，因为比起统治本国人，人们总是更擅长统治外国人。不处于这个不公的暴政之中是不可能成为这个体制的一部分的。就算是皮厚的英裔印度人[9]都意识到了，在街上看见的每一张“当地人”的脸都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背负的侵略的罪恶有多么巨大。大多数英裔印度人，至少是间歇性的，不像英国人认为的那样自满于他们的地位。最出人意料的是，我从那些高居政府的嗜酒老混蛋嘴里听说“我们在这个该死的国家显然毫无实权，我们只是难违天意驻守这里罢了”。事实上没有哪个当代人打心底里相信侵略他国且以武力制伏其人民是颠扑不破的。相比于经济压迫，对外国的压迫的罪恶更是显而易见。因此为了满足五十万懒散无用的人的奢侈生活，英国人温顺地认可且默许掠夺。但是我们一定会在中国人打回来之前战斗到最后一个人[10]；同样的，昧着良心拿着他们不应得的额外津贴的人们，对于去一个不受本国人欢迎的国家作威作福实为不法之举，自然也是心知肚明。这导致所有英裔印度人心头总有一丝罪恶感附身，即便他穷其所能去掩饰压抑也于事无补。因为他们没有那种言论自由，只听说过由于散布反动言论而自毁前程的人。在印度到处都是私底下憎恶这个体制又身在其中的英国人；只有偶然的机会，当彼此能够确定对方与自己同一阵营时，他们才流露出隐匿的苦涩来。我在火车上遇见过一个在教育部工作的陌生人，至今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时酷热难眠，于是我们整晚都在促膝谈心。有半个钟头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互相打探，只为了确保彼此是“安全”的。之后数个小时，火车在漆黑入墨的夜晚颠簸着，我们抱着啤酒瓶，坐在我们的铺位上破口大骂大英帝国——发自内心而又机智透彻。这让我们两个都感觉很好，但是我们聊的都是些禁闭之言。憔悴的晨光中，火车缓缓驶入曼德勒，我们好像偷情的情侣那样愧疚地彼此作别。

目前为止，据我观察，几乎所有的英裔印度官员都有过受到良心谴责的瞬间。除了从事着那些无论英国有没有占领印度，都无疑是有用的职业的人，比如林业人员、医生和工程师。但是我在警署，也就是独裁暴政体系的一分子。更甚的是，在警署你可以近距离看到那些肮脏的手段，而且直接从事这种肮脏勾当和只是从中获利有着明显的区别。大多数人都赞成死刑，但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做绞刑手。甚至其他在缅甸的欧洲人也都有些许鄙视警署，因为他们必须做些残忍的工作。记得有一次我在视察一个警局的时候，一个我算熟识的美国传教士为了办事也在那里。像大多数非国教[11]传教士一样，他完全就是个混球，但也算是

个热情的家伙。当时我的一个当地下级视察员正在欺负一个嫌疑犯（我在《缅甸岁月》中描述过这个场景），那个美国人看到了，转向我意味深长地说：“我一点儿都不想干你的工作。”这让我感到无地自容，那就是我曾做过的工作！就连一个美国的异教传教士混蛋，一个中西部来的滴酒不沾的处男，都有权看扁我，同情我！即使没有旁观者的指责我也早该为此感到羞愧了。我开始对这所谓的正义体制产生一种难以言表的痛恨。无论如何，我们的刑法（顺便提一下，刑法在印度其实比在英国人性得多）是极为恶劣的，需要极为麻木不仁的人去执行。那些蹲在恶臭的上了锁的笼子里的囚徒，那些长期被恐吓得面色灰暗的罪犯，那些男人们被鞭笞得血肉模糊的臀部，那些女人和孩子们在他们的顶梁柱被逮捕时的哀嚎——这样的事情在你直接的权责之下，已经超越了可以忍耐的极限。我目睹过一次绞刑，在我看来那比千刀万剐还要残酷。每次我去监狱都有一种（大多去监狱的访客都有同样的感受）我才应该是待在铁栅栏里面的那个人的感觉。当时我觉得经过的任何一个罪犯在道德上都要比喜欢判人绞刑的法官高尚，而我至今仍然这么觉得。但是每一个在东方的英国人身上都被强加了几乎绝对的缄默，所以我必须把这些想法深埋于心。最终我研究出一种无政府的理论：所有的政府都是邪恶的，刑罚总是比犯罪带来更多的伤害，只有政府从群众中消失，我们才能相信人民会凭良心做事。当然这只不过是感情用事的无稽之谈。如今我意识到了当时所没有意识到的事，即有必要保护爱好和平的人民永远远离暴力。在任何可以利用犯罪牟利的社会阶层中，严厉的刑法和严酷的执法人员都是必不可少的；另一个选择是去做阿尔·卡彭[12]。但刑罚是罪恶的想法，正不可避免地在执法人员的心中生长。我可以料定即使在英国本土，许多警察、法官和狱卒之类人都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深藏着隐秘的恐惧。但是我们在缅甸的行为是一种双重压迫，因为我们不仅在施人以绞刑，送人进监狱，而且是以不受欢迎的外来入侵者的身份在做这些事。缅甸人自己也从未把我们的律法放在眼里。当小偷被捕，锒铛入狱，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被正义制裁的罪犯，他会认为自己是外国侵略者的受害人，而我们对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残暴行为。监狱锁的轴木棒和铁栅栏背后他的那张脸，已经把这一切都表达得一清二楚。不幸的是我还没办法对人们脸上的表情漠不关心。

1927年回家休假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决定要辞职了，一闻到英国的空气我便下定了决心，我再不要回到那残暴的独裁中去。但我要逃离的并不仅仅是我的职责，我在压迫的体制中待了五年，这让我受到良心的谴责。无以计数的面孔——码头上囚犯的面孔，审判牢笼里等待的人的面孔，被我欺负的下属的面孔，被我斥责的农夫的面孔，被我在怒火

中烧时拳打的仆人和苦力的面孔（几乎每个在东方的人都时不时会这么做：东方人有的时候很会挑衅）——让我不堪其扰，饱受折磨。我意识到，我的愧疚感让我如负千斤重担，必须寻求救赎。大概这么说听起来很夸张；但你若一连五年都做着你不能认同的工作，大概也会感同身受。我把所有的感受都简化成一种单一的理论，即被压迫者永远是对的，而压迫者永远是错的。这是一种谬论，但若自己就是压迫者，这便成了自然而然的结论。我觉得我需要逃离的不仅仅是帝国主义，而是任何一种人对人的统治形式。我想隐藏自我，融入被压迫者中去，与他们并肩反抗他们的暴君。而且因为我总是独自一人思考这件事，我把对压迫统治的憎恨扩大到了惊人的境地。那时，对我来说唯有失败才是美德。对于自我进步，甚至是一年挣上几百英镑的所谓的“成功”的任何一点心存侥幸，在我看来都是灵魂的污点，是一种恃强凌弱。

我是这样把我的关注点转向英国的工人阶级的：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且从他们开始只是因为他们具有类比的意义。他们是非正义的受害者的形象，他们之于英国，就像缅甸人之于缅甸。在缅甸，问题很简单，那就是白人崛起、黑人没落，人们便理所当然地同情黑人。我现在意识到其实不用千里迢迢地去缅甸寻找暴政和剥削。在英国的国土上，在我们的脚下，渗透着工人阶级，以及他们同东方人一样遭受的大同小异的痛苦。“失业”这个词挂在每个人的嘴边。在缅甸之行后，这对我来说多少是新鲜的，但中产阶级的那些鬼话（那些人失业是因为他们没有受雇的能力等等）并没有骗到我。我经常想，这样的谎言大概连一个彻底的傻子都骗不过。另一方面，那时候我对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或者其他经济理论都没有什么兴趣。那时候我认为，经济上的不公正是只要我们想停就可以停下来的，关于这一点，至今我都常常这么觉得。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果我们真的想停下来，用什么样的方式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但我对工人阶级的状态一无所知。我看了失业数据，但完全不明白这其中暗指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我并不知道“可敬的”贫穷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最糟糕的。一个正经工人的悲惨命运就是在老老实实地工作了一辈子之后突然被弃之街头，他痛苦地对着他看不懂的经济法挣扎，家道突然衰落，他被羞耻感所吞食——这些都不在我的生活经历之列。贫穷在我脑中的概念只是残酷的饥荒景象，所以我的关注点立即转向了极端人群，被社会驱逐的人：流浪汉、乞丐、罪犯、妓女。这些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而这些就是我想接触的人群。我当时内心深处想要的，是找到一个出口，让我远离这个备受尊敬的世界。我在这件事上沉

思了很久，甚至把一部分想法起草成了详细的计划：一个人如何变卖所有家当，把所有财产拱手相让，更名改姓，白手起家。但现实生活中没人会这么做；除了考虑到亲友，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能否在面对阳关大道时还能坚持走这座独木桥这一点，也值得怀疑。但至少我可以走到这些人群中去，去观察他们的生活，让自己暂时在他们的世界停留。一旦我走入他们中间，并被他们接受，就应该能摆脱我的部分愧疚，而这也正是我所感受到的，虽然当时我都觉得这毫无理智可言。

几经思考后，我决定了要做的事。我会稍作乔装，去莱姆豪斯和怀特查佩尔之类的地方，住在普通的出租公寓，和码头劳工、街边小贩、无家可归的人、乞丐，或者可能的话也和不法之徒称兄道弟。我会去了解流浪汉和联系他们的方式，找到住进临时收容所[13]的方法，然后待到时机成熟，我便会自己上路。

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容易，这意味着要乔装。但是我实在没有表演天赋，比如说我没办法遮掩我的口音，无论如何只要短短几分钟，估计我一开口就会被认定是个“绅士”，所以我准备了一个时运不济的故事以防万一。我拿到了合适的衣服，并在合适的地方把他们弄脏。我是一个很难乔装的人，因为我异常的高。但是至少我知道，流浪汉看起来是怎样的（顺带一句，很少有人知道这点！看看任何一张流浪汉的照片，他们的着装总是过时二十年）。一天晚上，在一个朋友家准备好了以后，我一直向东漫步，到达一个普通的青柠屋堤上的小旅舍。那是个黑乎乎又脏兮兮的地方，我是看见窗户上的“好汉睡好床”才知道这家店是旅店的。天哪，我得鼓起多大的勇气才敢走进去！现在想想这简直就是荒谬至极，不过你看我还是有点怕工人阶级的。我想去接触他们，甚至想成为他们的一员，但是我还是把他们看作危险的外人；走进那间普通旅舍昏暗的走廊，我觉得像是走入了充满耗子的下水道一样恐怖的地方。进去时我完全准备好了要大干一场，里面的那些人一定会一眼就认出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从而推断出我是来监视他们的；然后他们就会攻击我，把我整个儿扔出去——这就是我预想的状况，我并不享受这样的预期，但我觉得我不得不这么做。

门内不知从何处冒出一个穿衬衣的男人，这个人是“管理员”，于是我告诉他我要留宿。我注意到我的口音并没有招来他异样的目光，他只要了我9便士，然后指了指通向肮脏昏暗的地下厨房的路。那有一群码头装卸工，几个海军和水手围坐着，一边喝茶一边玩国际跳棋。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几乎没看我一眼，但这是周六晚上，一个强壮年轻的码头工

人喝多了在屋子里发酒疯，抱怨着这间屋子。转身时，他看见了我，涨红着他那张宽阔的大脸摇摇晃晃地向我走来，危险的气息在他的眼中闪烁着。我故作镇定，战火一触即发！下一瞬间，这个码头工人猛然瘫倒在我胸前，搂住我的脖子道“来喝杯茶吧”。他含着眼泪大喊“来喝杯茶吧！”

我喝了一杯茶，这有一点像是洗礼，之后我的恐惧烟消云散。没有人质问我，没有人表现出无理的好奇；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很绅士，让我觉得宾至如归。我在那个小旅舍待了两三天。在这之后几周，也了解了一些穷苦人的生活习惯，然后我便踏上了我的旅途。

这些我都在《巴黎伦敦落魄记》[14]里描述过（几乎所有我描述过的故事都真实地发生过，不过被我重新安排了先后），无意再去重复。之后的旅途历时更久，有时我是自愿上路，有时是迫于需要。我在普通的旅舍总共住了好几个月，但那第一天的大冒险最为历历在目，因为那种陌生的感觉——终于走入“下等人中的下等人”中间去，终于和工人阶级绝对平等的奇妙感觉。事实上，流浪汉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典型；即便如此，你混迹在流浪汉的人群中，便与一些下层的工人阶级交融了，而且据我所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有好几天，我和一个爱尔兰流浪汉在英国伦敦北部郊区游荡，我是他临时的伙伴。我们晚上睡一间小房间，他告诉我他的人生经历，我也告诉他我虚构的过往。之后我们轮流去看似好心的人家乞讨，并瓜分所得。那时我过得很开心，我就在那儿，在“下等人中的下等人”中间，在西方世界的根基中！统治阶级的枷锁被破除了，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在肮脏的，事实上是无聊至极的流浪汉的下层世界中，我感受到了刺激和解脱。如今回头观望，可谓是荒谬无度，但在当时那足以让我感受到生命的色彩。

---

[1] 詹姆斯党，指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君主詹姆斯二世及其后代夺回英国王位的一个政治、军事团体，多由天主教教徒组成。光荣革命后詹姆斯二世逃亡到法国。

[2] 英国上议院议员，包括王室后裔、世袭贵族、终身贵族、上诉法院法官和教会大主教及主教。

[3] 军官训练团，原文Officers’Training Corps。

[4] 《深渊居民》，是杰克·伦敦描写1902年伦敦东区人民生活的一部著作。其内容都是他自己的亲身体验，数月里，他一直待在该地区的济贫院，甚至露宿街头以体验生活。

[5] 罗伯特·斯迈利（1857—1940），苏格兰煤矿工人的领袖，工人党的政客。

[6] H发音阶级，英国当地有把字母H发音作Aich和Haich的区别。发Haich的被认为是没有接受教育的下等阶级。到今天，英国本土仍有此类歧视。

[7] 帝国边缘地带，英国于1824年至1885年间先后发动了3次侵缅战争并占领了缅甸。1886年英国将缅甸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

[8] 白人的体味像是尸体的味道，性爱学家埃里斯在他的《性行为心理学——男人的性爱取向》中提到中国人认为白人闻起来像尸体。

[9] 皮厚的英裔印度人，印裔英国人或英裔印度人。本文指后者，即在殖民统治期间驻留印度的英国人。

[10] 在中国人打回来之前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指北伐革命中，民国政府陆续收回汉口、九江等英租界。

[11] 非国教，英国国教即安立甘宗。安立甘宗是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与信义宗（路德宗）、归正宗（加尔文宗）合称新教三大流派，中国常称圣公会。该宗在英格兰为国教，称英国国教会。联合王国其他地方及其他国家的圣公会均为非国教，组织上也不从属于英国国教会。

[12] 阿尔·卡彭，黑帮教父、芝加哥王，1925—1931年掌权。卡彭时代的黑手党徒风衣下藏着冲锋枪，火拼时用手榴弹开路，强硬残忍的作风令其他黑帮胆寒。

[13] 临时收容所，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机构之一，发放免费伙食和住宿。但由于供小于求，常常需要排队，留宿也只能是暂时的。

[14] 《巴黎伦敦落魄记》，奥维尔的另一部作品，该书描写了一个英国人在巴黎与伦敦落魄的故事，场景先是20世纪30年代的巴黎，后来回到伦敦，作者亲身体验了巴黎与伦敦的贫民生活，对劳工与失业者的辛酸与痛苦有深切的体会。作者下笔诙谐、生动活泼，处处显露其生花妙笔，因此其笔下人物的遭遇与处境扣人心弦、栩栩如生，使读者能感同身受。

第十章

然而，与流浪汉结伴而行并不能解决阶级问题，充其量也不过是撇去一些你自身的阶级偏见。

流浪汉、乞丐、罪犯和社会边缘的人总是特立独行的一群人。要说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典型，就好像是说文学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典型一样。与一个外国的“知识分子”亲密交往实则并非难事，然而要与外国的普通中产阶级一员同音共律则好比是水中望月、镜中观花了。比如说有多少英国人真正见识过一个普通法国中产阶级的家庭？除非是联姻，不然这大概也是不太现实的。同样的，对于英国的工人阶级来说，只要你有门路，想与扒手称兄道弟根本不在话下；但是若想和搬砖工人结义金兰就没那么容易了。

但是为什么和社会边缘人物结交就如此轻而易举呢？人们总是对我说：“你确定你和流浪汉同行，他们把你当自己人？你确定他们不会因为你的口音对你另眼相看？”等等。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的流浪汉，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样子，是不会留意这些事情的。首先，很多人都听不出口音差别，他们只凭你的穿着来评判。在我去别人家后门行乞的时候，总是会为这样的事实而感到震惊。有些人很显然讶于我“有教养”的口音，而其他人则完全听不出来；他们只能看见我的衣衫褴褛邋里邋遢。再者，流浪汉们来自英国的各个角落，而英语的口音也是变幻无常。流浪汉听惯了他同伴们来自四面八方的口音，有的对他来说甚至生疏得有碍理解。而且比如一个来自加蒂夫或者达勒姆或者都柏林的人并没有必要去了解哪种南方口音才是“有教养”的。不管怎样，带着“有教养”的口音的流浪汉虽不多见，但也并非特例。然而即便真的有流浪汉发觉你与他们出身不同，他们也未必会改变对你的态度。对他们而言，唯一重要的就是你其实与他们一样，以天为被，以地为席。而且在那个世界里的人不爱追问太多问题，你可以自发地告诉别人你的故事，大多数流浪汉也会用最谦逊的态度来陈述他们的经历。你没有任何义务去讲述你的过往，而且不论你说什么都不会有人来质疑。即便是一个主教，回家后换上合适的衣服，都可以到流浪汉的人群中去；就算他们知道他是主教也不会怎样，因为他们同样深信，他其实也是一穷二白的。你一旦进入那个世界并且好似融入其中，那么你的过往都再不值一提。它像是某种世

外桃源，那里人人平等，是一个渺小而又邋遢的民主社会——这大概是英国现有的最贴近民主的社会。

但若你想融入普通的工人阶级，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融入他们没有捷径可言。只要穿上合适的衣服去临时收容所待着，你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一个流浪汉。但是你无法成为一个挖掘工，或者是矿工。就算你能胜任，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份矿工或挖掘工的工作。通过社会主义文人你可以结识一些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但同流浪汉和窃贼一样，他们并不能代表典型的工人阶级。剩下的方法就只有混入工人阶级的小旅舍，以房客的身份在他们的屋檐下留宿，但这和去“贫民窟”留宿一样危险。一连好几个月，我都住在矿工的家里，我和他们的家人一起用餐，在厨房的水池洗漱，和矿工们共用一室，一起喝啤酒玩飞镖，和他们一聊好几个钟头。但是尽管我在他们之中，希望并且相信他们没有觉得我很讨厌，我还是没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这点，他们比我更了然于心。不论你多么欣赏他们，不论你对他们的话题有多感兴趣，阶级差异总像一根可恶的倒刺，让你浑身不自在，就好比豌豆公主床垫下面的豌豆一样。这不是不喜欢或者不待见的问题，仅凭这一点点的差异就可以让真实的亲密感变为白日做梦。即使是和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矿工们对话，我也需要不动声色地暗中引导，以防他们称我为“先生”。而他们所有的人，除却激动难耐的时候，都会刻意软化他们的北方口音来配合我。我很欣赏他们，并且也希望他们青睐我；但我在他们之中总像是异类，这点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不论你如何地妥协退让，这阶级差异总像是厚重的石壁挡住你的去路。比起石壁，说像是海洋馆中的玻璃幕窗可能要更为贴切；故作视而不见甚是容易，但它的确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

不幸的是，如今假装这道玻璃幕窗不存在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每个人对于阶级偏见的存在都心中有数，但同时又声称他已经用某种神秘的方式将其清除。自命不凡，是那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恶劣秉性。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信徒和实践者，每个“自作聪明的人”都觉得他至少是在这个阶级怪圈之外的；他与他的邻里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是有能力辨别财富、名誉、头衔等等的荒谬性的。“我才不是势利眼”如今已是某种各地通用的信条。有谁没嘲讽过上议院、军衔、皇室、公学、狩猎射手、切尔特汉姆学院宿舍的老太太、“郡县”制[1]的恶劣，以及这个社会阶层系统？这已经成为人们下意识的行为，尤其是在小说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每个自傲的小说家都对比他们更上等的阶级抱有一种讽刺的态度。当一个小说家必须用到一个无可厚非的上层人物形象——例如

公爵，或者男爵——时，他的故事字里行间一定或多或少地流露着出于本能的冷嘲热讽。而现如今上层社会语言的平淡无奇是导致这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有教养”的人的话语，既了无生趣又缺乏个性，以至于小说家们都对此束手无策。因此现在最简单的娱乐大众的方式就变成了嘲笑这群人，假装每个上层阶级的人都是一无是处的草包。这在小说家们笔墨之间不胫而走，最终几乎成为了一种条件反射。

然而一直以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清楚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想法。我们都反对阶级差异，却很少有人真的想要彻底根除这种差异。至此你面临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每个变革的观点都因那隐晦的因循守旧的信念而失去了力量。

对此若想有一个更通透的理解，你可以去拜读一下约翰·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和戏剧。关注一下那些事件的先后顺序。高尔斯华绥是优秀敏感、情深意切又饱含热泪的战前人道主义者的典范。他开创了一种病态的同情心复合体，以至于他认为每个已婚的女人都是被色魔上了枷锁的天使。因为那些过劳的职工，收入微薄的农夫，堕落的女人、罪犯、妓女、动物，他永远都在无尽的怒火中颤抖。这个世界，在他眼里就如他早期书中（《有产业的人》[2]《正义》，等等）描写的那样被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压迫者如巨石一般高高在上，这世上任何一种炸药都无法将其推翻。但是他真的想将其推翻吗？相反，在他与无法撼动的暴君斗争的同时，他也被自己不过是蚍蜉撼大树的想法禁锢着。当事情开始有了出人意料的转变，而他所熟知的世界秩序开始分崩离析，他才意识到世道的变迁。因此，作为下等人民反抗暴君和不义的典范，他最终转向拥护工人阶级（参见《银匙》），他主张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应该将工人们像牲口一样运送到殖民地去。如果他能多活个十年，大概可以想出某种文雅的法西斯主义来。这对于感情用事的人来说是无法避免的命运，他所有的观念，但凡经过现实的刷洗，都会露出截然不同的模样来。

那些充满虚情假意的、沉闷而又班门弄斧的意识倾向布满了所有“先进”的观念。打个比方，拿帝国主义的问题来说，所有左翼“知识分子”事实上都是反帝国主义者。他自诩处于帝国主义框架之外，也便自然而然地自我修正至处于阶级的框架之外。即便是右翼的“知识分子”，那些并不绝对抵触大英帝国主义的人，对其也有一种装腔作势的避讳，想要针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显现机智可谓易如反掌。《白人的负担》[3]、《统治吧，不列颠尼亚！》[4]、吉卜林[5]的小说和英裔印度人

的烦恼——有谁能不在提到这些的同时暗自发笑？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这辈子都至少有那么一次在取笑那个说“如果英国人离开印度他们不会在白沙瓦和德里（或是无论何处）留下一个卢比或一个处女”的老印度陆军士官。这就是反帝国主义的左翼分子的典型态度，一种彻头彻尾没有骨气没有原则的态度。万不得已之时，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究竟想要一个大一统的大英帝国，还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大不列颠。因为撇去别的顾虑不谈，我们在英国所享受的荣华富贵，都依赖于这个日不落帝国的统一，特别是印度非洲这样的热带地区。在资本主义的结构中，为了保证英国人可以相对舒适地生存，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必须在饥饿的边缘求生——这是事情的邪恶一面，但每每当你踏进一辆出租车，或是享用一盘沾了奶油的草莓时，你都默许了这种邪恶。而另一条路则是把这庞大的帝国拆解分离，将英国削弱为一个阴冷而又无足轻重的小岛国，每个人都必须辛勤劳作，大多数时候只能依靠继承产业和土豆维持生计。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左翼分子都不愿看到的。然而左翼分子却仍然不认为自己对这帝国主义担负着任何的道德责任：他敞开大门欢欣地准备接受帝国主义的恩赐，而通过对维护这个帝国的人嗤之以鼻来救赎他们自己的灵魂。

事已至此，人们开始紧紧抓住那些对待阶级问题的不现实的态度。只要是关于改善工人们待遇的问题，每个正直的人都会予以赞同。就拿矿工来说，除了痞子和流氓以外，每个人都乐意看到矿工们改善生活条件：比如说如果矿工可以坐着舒服的小车去采矿面，而不是四肢并用地爬过去。又比如，如果他们可以每三个小时就轮一次班，而不是七个半小时。如果他们可以住进像样的五居室，带上个浴室，拿着一周10英镑的薪水，这简直是妙不可言。此外，任何有脑子的人都知道，这是在可行范围之内的。这个世界，至少从潜力上来看，是无比富有的；只要方法得当，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像王子一样地生活。草草瞥一眼这个问题的社会层面，答案也是非常简单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所有人都愿意看见阶级差异被废除。显然我们在当代英国感受到的人与人之间的这永无止境的种种不易，已成为一种诅咒和滋扰。故而引出了少数童子军团长般善意的怒吼，别叫我“先生”了，兄弟！我们不都是一样的人吗？记着我们都是平等的，车轮压来，我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我知道怎么搭配领带而你不懂，我喝汤的时候不出声音而你喝汤的时候咕噜咕噜像水流进废弃水管，还有类似的，等等，这有什么关系。所有这些都是腐蚀人心的废话，但表达得当的时候却也是相当的诱人。

但不幸的是，你也就只能停留在盼望阶级差异得到消除的阶段，更

确切地说，暗许它的消亡是必要的。但是你的愿景苍白无力，除非你能抓紧它所牵扯进来的东西，即一个你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想要废除阶级差异，等于废除一部分的自我。像我这样，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的一员，叫我说出我想让阶级差异消亡殆尽简直易如反掌。但我所有的行之所至，思之所及都来源于这阶级特质。我所有的观念，我的善与恶、悲与喜、笑与怒、美与丑，本质上都是中产阶级所拥有的概念；我读书、穿衣、饮食的品位，我的幽默，我的礼节，甚至我的一言一行、一平一仄，都是一种在社会阶层中自抬身价的特殊举措。当我意识到这点，我也同样意识到了我在无产阶级背后所给予他们的鼓励和平等的徒负虚名；若我果真想和他接触，我必须做出一些我毫无准备的努力。逃离阶级框架，不仅仅意味着我要摒弃我自己的优越感，更要舍去我大多数其他的品位以及偏见。我必须彻底改头换面，以至于最终，从前的那个自我荡然无存，无人能辨。这里牵涉的不仅仅是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也不仅仅是避免愚蠢的自命不凡的姿态，而是彻底抛弃中上层阶级的生活态度。而且是与非，大约都取决于我自己的意识需求。

然而很多人都幻想着他们可以在不影响安逸的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废除阶级差异。因此激进的阶级破除进程在各个方面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到处都是怀抱天真美好的愿景投入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人们。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们激情满怀地为无产阶级和悔过自新的资产阶级开办着“夏令营”，并且认为他们会从此永远要好地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资产阶级的访客称赞这精妙至极，令他们茅塞顿开（而无产阶级则诉说着截然不同的故事）。然后还有郊区的装逼党[6]和威廉·莫里斯[7]时代的醉汉，会出人意料地说出“为什么我们要委身降级，不能让他们升级吗？”的话。而这让工人阶级“升级”的提议（升到和他们同一等级）是通过卫生措施、果汁、生育控制、诗歌，等等方式来实现的。即便是约克郡的公爵（如今的乔治国王四世）每年都会举行让公学学生和平民学生混在一起平等相处一段时间的活动，就像那种“欢乐大家庭”的动物笼子，里面装着一只狗、一只猫、两只雪貂、一只兔子、三只金丝雀，只要驯兽师在场，全体就装作相安无事一样。

所有这些关于破除阶级的良苦用心，我深信，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有时他们不过是徒劳无用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通常只是激化阶级偏见。若你细细斟酌，便会发现这点是唯一可预见的事。你逼迫阶级与阶级之间共生一种不易且不自然的平等；原本应深埋的容易产生摩擦的感情，恐怕要永远地暴露出来。正如我提到的高尔斯华绥，感情用事之人的观念在一碰触现实之后便会变得迥然不同。刮开一个和平主义者的表

象，你会发现一个沙文主义者[8]。中产阶级的独立工人党党员[9]和爱喝果汁的大胡子，只要你从望远镜的反面望去，都一样并不在乎阶级；如果逼迫他们和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接触——比如在周六的晚上让他们和渔夫打架——他们都会动摇成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势利眼。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都不会和醉醺醺的渔夫大打出手；当他们真的与一个工人阶级坦诚相待的时候，通常都是和工人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被尖锐地划分成两类：一类人只愿意留在工人阶级——继续做着技工或者码头工人这样的职业，并且不屑于改变他们工人阶级的口音和习性，但是在他的业余时间“提升思想意识”并效力于独工党或共产党；而另一类，则切实地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至少表象上是这样的，并且通过公立奖学金而成功跻身中产阶级行列。这第一类人大概是我们能拥有的最优秀的公民了。这让我想起几个类似的人，即便是迂腐不堪的保守党员也无不对他们表示欣赏和钦佩。而另一类，除了劳伦斯这样的特例，就不那么受人尊重了。

首先，纵然这是种莫大的遗憾，无产阶级思想通过文学知识分子渗透进中产阶级终究是奖学金体制的自然产物。因为如果你为人耿直，那想要无故闯入文人圈子并不容易。当代英国文坛，不管是哪个高高在上的领域，都不过是荒草丛生的地带罢了。如果你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写手，比如写侦探小说的作家，既作为文人又保持你的文学涵养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但想成为那种可以在高端杂志立足的非同凡响的大家，那就意味着让自己卷入明争暗斗工于心计的恐怖竞争中。阳春白雪的世界，并不是你文学功底深厚就可以进去的，而是要心甘情愿地生活在鸡尾酒会和对小有名气的人的阿谀奉承之中。而这就是为那些准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无产阶级敞开的大门。工人阶级家中“聪明”的孩子，那种拿了奖学金的，必定也是吃不了苦的孩子，可能对于爬入上层的社会有别的法子，比如参与到工人党的政治活动中去。然而文人圈的办法则远比那些通用得多。伦敦的文坛充斥着这样的无产阶级出身而拿了奖学金的年轻文人。他们中有很多人都不太讨喜，也并不能代表他们自己的阶级。而最为不幸的是，凡是中产阶级社交范围内所能遇见的，大多数都是诸如此类的无产阶级。纵然在原本毫无瓜葛时，中产阶级尚能把无产阶级理想化。而如今，中产阶级都因此变回了狂暴的势利眼。整个过程，若你置身事外袖手旁观，有时候就如一出滑稽喜剧。可怜好心的中产阶级张开双臂，渴望着拥抱他来自无产阶级的兄弟，而几分钟后他就悔不当初，丢下手里的五镑假钞，怨声载道：“但是，妈蛋，他真不绅士!”

让中产阶级们感到张皇失措的是，像这样的接触，让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专业在遭受严重的威胁。我已经指出了左翼分子对于普通的“知识分子”的观点都是虚假的，纯粹出于人云亦云的原因，他嘲笑着那些他其实深信不疑的东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公学里的荣誉宣誓，“团队精神”“绝不落井下石”，等等诸如此类朗朗上口的废话，有谁不去嘲笑他？有谁胆敢自居“知识分子”而不嘲笑类似的东西？但若你遇见一个外人嘲笑这事，感觉就会稍有不同；正如我们成天破口大骂英格兰，却不允许任何一个外国人对其妄加指责一样。没人比《每日快报》[10]的“海滩拾荒者”[11]更喜欢讽刺公学了。他恰到好处地嘲笑把打牌出千使诈作为最恶劣的罪过的条例。然而“海滩拾荒者”他自己的朋友被逮到出千使诈时，他还会觉得好笑吗？我看不然。只有当你遇见来自另一种文化的人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你自己的信仰究竟是怎样的。如果你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你也会多少幻想着成为无产阶级，因为那样更容易去嘲笑爱国主义、教会报章、老校友、顽固不化之人，等等。然而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至少是从那些完全生于资产阶级文化之外的人的角度来看，你与那些老顽固们相似之处其实多于不同。他很有可能把你和老顽固归于同类；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对的，尽管不论你还是老顽固们都不会去承认。于是若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成功地相遇了，也不总是像失散多年相见恨晚的兄弟一般抱成一团，大多数时候只会因为迥然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而引发战争。

我是从一个在信仰被挑战之后，倒退回可怕的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角度看问题的。但人们也必须看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产生的反抗情绪。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使自己脱离了原本所属的阶级，期盼着广阔的自由和智慧的升华；而他大多数时候所看到的，不过是一种空洞死寂而又毫无人间温情的画面——即任何一种现实社会的画面，有时候他觉得对他而言资产阶级并非是血肉之躯，他们不过是钞票堆砌着的、血管里流着白水的假人而已。凡是你遇到的出身于无产阶级的青年文人，大概都会跟你说起诸如此类的话。这些也就是我们今天必须忍受的“无产阶级”的诋毁。时至今日，每个人都应该了解，怎么说呢，资产阶级已“死”（“死”这个字眼因为毫无疑义又令人印象深刻，如今被广泛地运用），资产阶级的文化已经腐朽垮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也令人鄙夷，等等；如果你要举例佐证，去看看任何一期的《左翼评论》或者任何一个年轻共产党文人的作品，比如阿里·布朗、飞利浦·亨德森等等。他们的真诚都值得怀疑。但是劳伦斯，且不管他有没有别的品质，他至少是真挚地把他自己的思想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阐述着。令人好奇的是他为何将英国资产阶级都死了的、或者至少是被阉割了的观点翻来

覆去地撩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2]中的守门人梅勒斯（以劳伦斯自己为原型），曾有过远离他自身阶级的机会，而且他并没有刻意地想要回到他们中间去，因为英国工人有各式各样“令人不悦的习性”；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他多少也把自己融了一点进去，可是对他来说却也是了无生气的太监一样的人群。然后有一首关于那个年轻男子（再次以劳伦斯自己为原型）的诗歌，他登上了枝头，又跳下来说道：

汝若一猢狲，

攀枝高一寸，

不及旧时君，

悬悬碌无能。

此处鸣叽叽，

彼处声啾啾，

枝头猢狲盛，

但无铿锵词。

何以气弱稀，

何以力单薄，

原是枝头声，

无雄遍地雌。

你几乎无法让他更直白了，枝头上的人，劳伦斯貌似指的是真正的资产阶级，那些一年拿两千英镑甚至更多的人。但我并不这么认为，他更可能指的不过是多少身在这资产阶级的文化里面的人，那种拿腔捏调，家里有一两个仆人伺候的人。这时候你才能感受到“无产阶级”伪善谎言的危险，你才能意识到这可怕的对抗是可以被唤醒的。因为当你碰上这样的诬告的时候，你也是束手无策的。劳伦斯说因为我进过公学，所以我是个太监。好吧，那又如何呢？我可以开出反驳他的生理医学证明，但是那又如何呢？劳伦斯的控告还在那里。如果你说我是无耻之

徒，我可能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你要说我是太监，那你便是在挑衅我的反击，而且不管出于何种形式都是合理的。如果你想无端生事，那你就告诉对方他无药可救了。

这便是大多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遇的结果：它们都存在于被“无产阶级”的伪善激化的、彻底的、迫使阶级与阶级相遇的对抗中。唯一明智的方法就是慢慢来，不要急于求成。如果你自以为绅士，比那些卖菜摊贩的跑腿儿要高一筹，那直接说出来远比欺骗要好。最终你还是得放下你那自命不凡的架子。但若你在做好准备之前假装放下了，那才是病入膏肓。

与此同时，人们可以从每个角度观察到这令人沮丧的局势。中产阶级在二十五岁的时候是热心的社会主义者，但而立之年变回轻蔑的保守主义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蜕变是理所当然的，无论何时人们都能看见他思想的转变。也许没有阶级的社会并不意味着理想的状态，除了阶级和傲慢废除，其余一成不变；这也许意味着一个荒凉的世界，我们的理想，我们的誓言，我们的品味，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事实上都毫无意义。也许这破除阶级并非如看上去那般简单，而相反的，这是一次深入黑暗的狂奔，其结局或许只是百兽之王脸上的一抹微笑。我们略带傲慢，却满眼笑意地欢迎着我们的无产阶级兄弟们。但是注意了！我们无产阶级的兄弟们，以目前我们对他们的理解来看，并没有要求我们的欢迎，他们要将我们逼上绝路。当资产阶级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立刻踏上他们的飞机，若飞得够快，他们足以飞到法西斯的世界中去。

---

[1] 郡，在英格兰具有管理上、政治上，以及地理学上的划分作用，许多现存的郡是基于古代传统。“郡”（country）一词是源于古代的地区管理者“伯爵”（count）。

[2] 《有产业的人》，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书中所描写的福尔赛世家正处于由兴盛到衰落的转折时期。福尔赛一家是金融家、交易所经纪人、拥有房地产或者股票的资产阶级，他们对立身处世、待人接物，对衣食住行、家庭关系，对殖民地、不列颠帝国等都形成了本质上相同的看法，这就是书中所讲的“福尔赛精神”，它的主要特征是“紧抓住财产不放，不管是老婆，还是房子，还是金钱，还是名誉”。

[3] 《白人的负担》，英国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作品。

[4] 《统治吧，不列颠尼亚！》，英国著名爱国歌曲。

[5]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年12月30日—1936年1月18日），生于印度孟买，英国作家及诗人。由于吉卜林所生活的年代正值欧洲殖民国家向其他国家疯狂地扩张，他的部分作品也被有些人指责为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各执一词，极为矛盾。他笔下的文学形象往往既是忠心爱国和信守传统，又是野蛮和侵略的代表。

[6] 装逼党，原指罗马的天主教公共场合矫揉造作的言行举止，后泛指公共场合中装逼的形式。

[7] 威廉·莫里斯，19世纪英国设计师、诗人、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及自学成才的工匠。

[8] 沙文主义，原指极端的、不合理的、过分的爱国主义（因此也是一种民族主义）。如今的含义也囊括其他领域，主要指盲目热爱自己所处的团体，并经常对其他团体怀有恶意与仇恨，是一种有偏见的情绪。

[9] 独立工人党，1893年成立于英国布拉德福德的社会主义政治党派。

[10] 《每日快报》，英国全国性通俗报纸之一，1900年由比弗布鲁克爵士在伦敦创刊，由统一报纸公司属下的快报公司出版。

[11] 海滩拾荒者，即莫顿，英国作家和记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后开始写作，出版过许多富于讽刺、幽默和幻想的书，还有一些历史著作。自1924年起在《每日快报》上以“海滩拾荒者”的笔名固定发表幽默专栏文章。

[12]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之一。此时的劳伦斯对人物及情节的刻画已经炉火纯青，对他所探索的两性关系也有了更深思熟虑的答案。

第十一章

此时，社会主义又如何呢？

毋庸赘述，此刻我们正生活在一团混乱中，就连最愚笨的人也无法不察觉到。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没有什么人是安全的，也几乎没有人可以坦诚待人却不因坦诚丧命。大多数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我在本书第一章已做了描述，而这样的状态一点根本好转的迹象也没有。英国工人阶级能期盼的最好情况就是偶尔有这个或那个产业因为重整军备之类的人为刺激而暂时降低了失业率。即便是中产阶级也有史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手头拮据。他们还没有真正到挨饿的地步，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正在无边的沮丧中挣扎，他们越来越无法说服自己是快乐的、积极的或是有价值的。甚至是那些幸运的上层人士，那些真正的资产阶级也间歇性地意识到了世间的灾难，对险恶未来的恐惧搅得他们心神不宁。而对于一个经过百年的掠夺而仍然富足的国度来说，这只是一个初期阶段。天晓得现在这里正孕育着怎样的恐怖，在这个掩蔽的岛屿，这样的恐怖是前所未有的。

有脑子的人向来都明白，全力以赴地实施社会主义这个世界体系理论将会是一种摆脱困难的方法。它起码可以保证我们有足够的东西吃，尽管有可能会夺去我们其他的所有东西。从某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是太过基本的常识，我有时很奇怪为什么它没有自行树立起来。这个世界就像是一艘在空间中航行的皮筏，筏上有足够所有人吃的食物补给，我们齐心协力，每个人完成公平分配的工作，得到公平分配的食物补给。这样的观点听起来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以至于可以说只有对现有系统怀有腐败动机的人才会反对这样的观点。但是现在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社会主义并没有自行建立起来。社会主义事业不但没有前进，反而明显在后退。如今在法西斯主义大举进攻前，无处不在的社会主义者却在撤退，事件正在以可怕的速度进展。当我写下这些时，西班牙法西斯武装势力正在袭击马德里，非常有可能在此书出版前，我们的法西斯国家阵营将会再多一员。就更不用提法西斯对地中海区域的控制了，这也许会将英国的外交政策递交到墨索里尼[1]的手中。但是我并不想在这里讨论更狡猾的政策问题，我关心的是社会主义在正应该获得支持的地方却节节败退。每一个挨饿的人都是社会主义的一份论据。而现在这里有

这么多对它有利的存在，社会主义的理念却还没有十年前的接受度广泛。现在普通思考着的人群不仅不是社会主义者，还积极地反对社会主义。这其中主要的原因一定是错误的宣传方式。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现在呈现给我们的形式，有一些固有的令人不愉快的东西，这些东西把应该支持社会主义的那些人赶走了。

也许在几年前，这看起来并不重要。社会主义者，尤其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带着高傲的微笑告诉我社会主义将要通过一些神秘的所谓“历史的必然”进程而达到内部的统一，这样的事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也许这个信仰犹存，但至少可以说已经被动摇了。于是各国共产党人突然开始尝试向他们反抗多年的民主武装力量寻求结盟。事到如今，探析社会主义失去其号召力的原因变得无比必要。把大众对社会主义的厌恶归罪于愚昧和腐败的动机是毫无用处的。想要化解厌恶，首先必须了解它，这意味着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反对者的心灵深处，或者至少需要设身处地看待这个观点。不去公正地聆听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因此，说起来非常自相矛盾，为了给社会主义辩护，就得先攻击它。

在之前的三章中我试图分析我们落伍的阶级制度造成的困难；现在我还得再提及这一话题，因为我相信目前对于阶级问题极其愚蠢的处理方式会使大量的潜在社会主义者变成法西斯主义者。在下一章我想要讨论一下使思想敏感的人疏远社会主义的某些潜在的假设。但在这一章中我只针对那些显而易见的、初级的异议——那些非社会主义者（我不是指“那些钱是哪里来的呢？”这一类的人）在你就某科目向他征税时，他首先会对你说的。这些反对的理由也许会显得琐碎而自我矛盾，但这并不是重点；我只是讨论症状，所有能使我们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被接纳的事情。请注意我是支持社会主义而不是反对它的，但此刻我是故意唱反调的人。那些赞同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的人，有“头脑”可以看清社会主义是可行的人，但是在实际上当有人提及社会主义的时候却转而攻击的人，我将为这类人列出他们的理由。

当你质问这些人的时候，你通常会得到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我不反对社会主义，但我确实反对社会主义者”。从逻辑上来讲这是一个很蹩脚的论述，但它却影响了很多人。像基督教一样，社会主义最糟糕的广告就是它的信徒。

对于围观者，最需要让他们知道的是，社会主义的成熟形式是完全限于中产阶级范围的理论。胆小的老妇人会把典型的社会主义者想象成面目狰狞的工人，穿着油腻的工作裤，声音沙哑，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典型的社会主义者通常是一个年轻、势利的共产党，可能在五年内娶一个场富有的妻子然后改信天主教，或者更典型的会是一本正经的年轻男子，有一份白领工作，经常是不为人知的禁酒者，还有素食倾向，曾经是新教教徒，但最重要的是，他不想丧失他的社会地位。这最后一种人在每一个社会主义的阵营里都普遍得令人吃惊，也许是从旧英国自由党[2]全盘接手过来了。更令人惶恐不安的是，只要是社会主义者聚集的地方，就狂热地流行着奇装异服。有时候人们会有这样一个印象，仅仅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词，就像是磁铁一般吸引了英国每一个喝果汁的素食主义者、裸体主义者、穿着拖鞋就外出的人、性欲狂、贵格会[3]、信服“自然疗法”的江湖郎中、和平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今年夏天有一次我坐车经过莱奇沃思[4]，公交车停下来时两个面目可怖的人走了上来。他们都六十来岁，面红耳赤，矮胖，都没有戴帽子。其中一个是可憎的光头，而另外一个留着一头灰白的长发，做成了劳合·乔治[5]的造型。他们穿着淡草绿色的衬衫和卡其色的短裤，肥硕的臀部紧紧地挤在短裤里，你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块肥肉被勒出的凹凸纹路。他们的外形在公交车上引起了一阵轻微的恐慌，坐在我边上，看起来是旅行推销员的人瞟了我一眼，瞟了他们一眼，又回过头看着我，然后嘟囔道：“社会主义者。”就像是人家说“红种印第安人”[6]的语气一样。他可能是对的——英国独立工党[7]在莱奇沃思开办了暑期班。但问题在于，对于他这样一个普通人来说，怪人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就等于怪人。他可能会觉得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是古怪的，而这样的想法甚至在社会主义者中都是存在的。比如说，我这里有另外一个暑期班每个星期都会发来入学简介，然后他们会问我是不是素食主义者，他们觉得理所当然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事赶走了很多正直的人士，而他们的直觉是完全合理的，那些养生怪人很显然就是愿意将自己与人类社会隔绝，只为了能再苟延残喘五年的人，也就是不接触共同人性的人。

此外还要加上另一个丑陋的事实：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渴望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却又像胶水一样附着在他们社会威望的可怜碎片上。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伦敦（北方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因为那里的资产阶级没有分布得如此稠密）参加独立工党的部门会议时产生的恐惧感。我想，难道这些卑鄙的小畜生就是劳动阶级的战士了吗？那里的每一个人，不管是男是女都带有轻蔑而又糟糕的，来自于中产阶级优越感的烙印。如果一个真正的劳动人民，比如一个矿区来的浑身污泥的矿工突然来到他们中间，他们会感到窘迫、愤怒、憎恶，有些人在我看来，甚至可能会捏着鼻子逃走。在社会主义文学中，你也可以看到相似的趋势。即便那些作品没有坦然地写出他们自命不凡的优越感，也总是在思

维模式和语言习惯上把工人阶级抹灭得一干二净。像科尔夫妇[8]、韦伯夫妇[9]、斯特拉奇夫妇[10]等，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很难说现在是否有真正可以称为无产阶级文学存在——就连《工人日报》[11]都用的是标准的南方英语——但是一个优秀的杂耍剧场的喜剧演员比任何一个我能想到的社会主义作家都更接近于创造无产阶级文学。至于共产党员的技术术语，早就像数学教科书语言一样被从常见对话中摒弃了。我记得我听过一个专业共产主义演说家对劳动阶级听众的演讲。他的演讲是很普通的书本上的东西，充满了长句和括号，还有“之乎者也”“言而总之”“无产阶级同舟共济”之类的东西。在他说完后，一个兰开夏郡的工人走上去，用他们粗俗易懂的语言对群众说了一番。无需多说这两人中谁更接近听众，而且我也完全不怀疑这位兰开夏郡工人拥有正统共产党员的身份。

我们必须牢记，一个工人，只要他还仍然是个工人，就几乎或者完全不可能是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这是逻辑上始终如一的道理。很有可能他会投票给工党，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会投给共产党，但是他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受过书本教育的高层社会主义者是截然不同的。对于星期六晚上在任何一个酒馆子里都能看到普通工人来说，社会主义只不过意味着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作时间，且没有人使唤他们而已。而对于参与反饥饿示威游行而被雇主列上黑名单的那一种革命者来说，社会主义这个词是团结起来呐喊，反对武装镇压，是对未来暴力的威胁。但是就我目前的经验来看，还没有真正的工人掌握到社会主义更深层次的含义。我认为工人通常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像别人经常会忘记，他一直记得社会主义意味着公正和尊严。但他没有掌握到的是社会主义不能仅限于经济上的公平，并且这种程度上的改革将会牵连到我们的文明以及他自己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他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想象是把现在社会中最糟糕的暴行剔除，然后在周围添加上一些有趣的事——家庭生活，小酒馆，足球以及地方政治。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部分，像三杯魔球的把戏一样，有三个神秘的本质、论点、反题与合题，我从来没有碰到哪个工人对这些有一丁点儿兴趣的。当然，许多书本理论型的社会主义者也都是工人阶级出身，但他们肯定不是工人，他们不靠双手工作，只有靠双手工作的人才是工人。他们既不属于我在上一章提到的那一类人，那种通过文学知识分子界挤进中产阶级的人，也不是工党议员，同样不是高层公会的官员；而这最后一类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荒凉的景象之一。他们被挑选出来为自己的同伴而战，但这对他来说不过意味着一份轻松的工作以及一个变成“更好的”自己的机会。通过对抗资本主义，他自己已经变成了资本家，而同时很有

可能他依然还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至今还没有见过一个思想上有鉴别力的矿工、铁板工、纺织工、码头工人、挖掘工或类似的工人。

共产主义和罗马天主教的相似处之一就是，只有受过教育的信徒才是完全正统的。关于英国罗马天主教徒——我不是指真正的天主教徒，而是改变信仰的人，诸如罗纳德·诺克斯[12]、阿诺德·伦恩[13]之类的人——最直接的打击便是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显然他们从不思考，当然也不会去写作，除了他们是罗马天主教徒外任何别的事情；这样的事实以及他们的自我夸耀，形成了天主教文人的整个气质。但最搞笑的是，这些人可以把正统本应有的旨意曲解进生活的各个细枝末节，直到那些暗示包含了生活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即使是你喝的饮料，显然也可以是正统的或是异教的；因此切斯特顿[14]，“比奇科默”[15]等人都反对茶叶，支持啤酒。据切斯特顿说，“喝茶”是“异教的”，而喝啤酒是“基督教徒的”，咖啡则是“‘清教徒’的鸦片”。很不幸，这些理论后来都没有成功，因为天主教徒盛行“戒酒”运动，而且世界上最喜欢狂饮茶水的就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了；而这里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食物和饮料也可以作为宗教偏执、党同伐异的理由。劳动阶级的天主教徒就绝对不会荒谬地支持这些，他不会把时间花在对他是罗马天主教徒耿耿于怀这一事上，对于他非天主教徒的邻居，他也没有感觉到有特别的差异。跟一个利物浦[16]贫民窟的爱尔兰码头工人说他的那杯茶是“异教的”，他会说你真是蠢货。即便是在更严肃的问题上他也并不总能抓住他信仰的启示。在兰开夏郡的罗马天主教避难所中你可以看到墙上挂着耶稣受难像，而桌上却摆着《工人日报》。只有“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精通文学的人才知道怎么做一个盲目信仰者。若在一些必要的细节上稍作修改的话，共产主义也是一样的，在真正的无产阶级中从来就没有纯粹的教义信条。

也许你会说，虽然受到过书面理论训练的社会主义者不是个工人，至少是他对劳动阶级的热爱激励他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他尽力摆脱资本家的地位为无产阶级而奋斗——显然这肯定就是他的动力。

但真的是这样吗？有时我看着一个社会主义者，那种知识分子，会编写小册子类型的社会主义者。看着他的羊毛套衫，柔软卷曲的头发，和他引用着的马克思的话——就会怀疑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这通常很难让人相信是出于对某人的热爱，尤其是对劳动阶级的爱，毕竟他离劳动阶级是最遥远的。我认为，很多社会主义者的潜在动机只是对规则的过分痴迷。如今的世态使他们不适并不是因为造成了穷困，更不是因为

无法获得自由，而是因为它的凌乱，他们基本上是想把世界归整成一个棋盘一般的存在。就拿像萧伯纳[17]之类的终生社会主义者的剧本来说，他们会在舞台上表现多少对劳动阶级生活的理解，或者甚至是舞台上到底有多少表现工人阶级的存在呢。萧伯纳自己也承认只能把工人搬上舞台作为“同情的对象”。而现实连这样都不如，工人只是作为W.W.雅各布斯[18]式的搞笑角色，就像在《巴巴拉少校》[19]中和《布拉斯邦德船长的转变》[20]中一样。他对劳动阶级最好的态度也就是《笨拙周报》[21]那样的暗讽了，而在更严肃的时刻（比如说，想想那个在《错姻缘》[22]中代表了流离失所的人们的年轻男人），他只觉得他们卑劣而令人生厌。贫穷，乃至贫穷给人带来的思维习惯，都应该自上而下地全部废除，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应使用暴力，暴力甚至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显然对他来说（参见他对伊塔洛·阿西比亚人战争和斯大林·威尔斯的谈话的评论），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几乎是差不多的人；因此，他崇拜“伟人”，向往法西斯或是共产党一样的独裁权力。在西德尼·韦伯夫人[23]的自传中你也可以看到用更拐弯抹角的方式说出的类似的意思。这在无意中也揭露了高傲的社会主义者只是贫民窟游客的形象。事实就是，对于很多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人来说，革命并不意味着他们旨在联合广大群众所进行的运动，而是“我们”这些聪明人强加于“他们”下层社会的一系列改革。另一方面，把受过书本教育的社会主义者看做是完全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也是错误的，尽管鲜有证据可以证明他们对被剥削者的喜爱，但是他们对剥削者的仇恨是显而易见的——那是一种古怪的、假设的、空洞的仇恨。因此社会主义的老前辈总是慷慨激昂地谴责着资产阶级。奇怪的是为何几乎每一个社会主义作家能如此轻易地煽动起自己对资产阶级狂热的仇恨，而明明他生来或者后天都完全属于这个阶级。有时候对于资本主义的习惯和“意识形态”的敌意已经远远延伸到了书中资产阶级的形象。据亨利·巴比塞[24]所说，普鲁斯特[25]、纪德[26]等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人们希望看到的对手的特征”，你会发现他们是“对手”。我应该想到是普鲁斯特与对手的经历让他痛恨他们。但是“资产阶级”虚构的形象和现实中的是不太一样的，而资产阶级想必也不会回击。

关于扭曲资产阶级的文学，至今我发现的最好的例子便是米尔斯基[27]的《英国知识分子》。这是一本非常有趣、写法巧妙的书，所有想要知道法西斯是如何崛起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米尔斯基（即之前的米尔斯基公爵）是一个来自白俄罗斯的流亡者，移居英国后曾在伦敦大学出任了几年俄国文学讲师。后来他改信共产主义，回到了俄国，之后出了一本书，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现身说法，批判了英国的知识分

子。这是一本怀有敌意的邪恶之书，全书明显透露着一股子“现在你抓不到我了，我想说你什么就说什么”的调子。除去一些常见的误解，书中还包含了不少歪曲事实的现象，有一些必定是蓄意的，也有一些可能是无意的。比如说，他说康拉德[28]“帝国主义的思想不比吉卜林[29]少”，而D.H.劳伦斯[30]被批为“裸体色情文学”者，以及“抹去了他无产阶级出身的所有痕迹”，好像劳伦斯曾经是个屠夫而现在跻身了上议院似的。想到该书的读者会是无法求证书的准确性的俄国人，这些说法都令人相当不安。但此时我关心的是这本书会对英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这是一个贵族出身的文学家，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以某种平等或接近平等的身份跟任何一个工人说过话，就怨恨地尖叫控告着他的“资本家”同僚。为什么呢？从表面上来看纯粹是出于恶意，他在与英国知识分子抗争。但是为何而抗争呢？书中没有指出。因此像这样的书的唯一影响就是给外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共产主义中除了仇恨空无一切。因此你又一次想到了共产主义和（改信）罗马天主教之间诡异的相似之处。如果你想找一本像《英国知识分子》一样邪恶的书，很可能会在大众的罗马天主教护教论者那里找到。你会发现那里的书一样邪恶，一样虚伪。尽管公平地说来，天主教徒并没有这些恶习。怪人米尔斯基同志的精神兄弟应该是——神父！共产党员和天主教徒表达的并不是一样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说的恰恰是相反的观点，如果情况允许，他们都很乐意将对方放进油锅中煎熬，但是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却是差不多的。

事实上，社会主义现在所呈现的样子，吸引的主要是不尽如人意的甚至是没有人性的人。一方面有热心的，没有头脑的社会主义者，就是那一类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只想废除贫困，并不能把握到这意味着什么。而另一方面，还有那些知识分子，受过书本教育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知道必须抛弃我们现有的文明，也愿意这么做。而这一类人首先都来自于中产阶级，而且是那种无所归依的，在城市长大的中产阶级。更不幸的是，这一类人中包含了我一直很讨厌的那种人，而且人数众多，使得局外人看来完全是由他们构成的。他们就是一些虚无的资本主义控告者，得寸进尺的维新派，而萧伯纳就是这当中的一个典型；那些现在是共产党员的在社会文学中努力往上爬的见风使舵的年轻人，五年后就会成为法西斯，因为那时法西斯将会是最流行的；那些高傲沉闷的女性，那些穿凉鞋的人还有胡子拉碴的喝果汁的健康饮食者，就会像苍蝇闻见死猫一样对之趋之若鹜。那些正直的普通人，那些赞成社会主义根本目标的人，会觉得在运行的社会党中没有留给他们这样的人的位置。更糟糕的是他会愤世嫉俗地觉得社会主义就是世界末日，它一定会

来，但必须尽可能久地阻止它到来。当然，如我之前建议的，以其追随者来判断一个活动，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公平的；但问题在于人们总是会这么做，而现在对于社会主义者的普遍看法就是一群无趣的或是令人讨厌的人。“社会主义”被塑造成我们那些有话语权的社会主义者完全闭门造车，在家里想出来的东西，这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如果你委婉地提出来，一般人可能不会抗拒无产阶级专政，但如果让道学先生来独裁，他是随时准备反抗的。

现在有一种普遍的想法，所有社会主义已成为的现实的文明都与我们的文明类似，就像是来自勃艮第[31]的葡萄酒瓶装着博若莱[32]葡萄酒一样。无可否认，我们生活在文明的残骸中，但这个文明也有辉煌的时候，如果打上补丁，现在依然可以几乎泰然自若地熠熠生辉。用勃艮第的葡萄酒打个比方，想象社会主义的未来，是一瓶虽然还有酒香，但味道却是铁腥味的水。因此令人悲伤的事实就是，艺术家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说服成为社会主义信徒。相比于画家之类的艺术家，作家的政治意见更直接也显然与他的工作更息息相关，因此作家在这个事实上就尤为甚。如果你面对事实，就必须承认，以英国现在的情况，几乎所有可以称为社会主义文学的东西都是沉闷、乏味而糟糕的。整整一代人在多少熟悉社会主义的观点中成长了起来，而现在高水准的社会主义文学却如W.H.奥登[33]一样，像是没有勇气的吉卜林，（奥威尔后来收回了这条评论。见Seeker & Warburg整理的《英国本色》中第120页《在鲸腹中》）以及与他相关的，甚至更加苍白无力的诗人。每一位重要的作家，每一本值得阅读的书都在反对的那一面。我情愿相信在俄国不是这样的——虽然我对俄国完全不了解，然而推测将来——大革命后的俄国，纯粹的暴力事件就能带来一系列有活力的文学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西欧，社会主义没有产出任何值得阅读的文学作品。不久之前，当情形还未如此明朗，还有一些有活力的作家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用社会主义这个词作为模糊的标签。因此，如果易卜生[34]和左拉[35]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这只能说明他们是“进步分子”，而对于阿纳托尔·法朗士[36]，这就仅仅代表他是个反圣职者，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那些写宣传文的作家，都是些迟钝的、空洞的饶舌之人——萧伯纳、巴比塞、厄普顿·辛克莱[37]、威廉·莫里斯[38]、沃尔多·弗兰克[39]等等。当然我并不是说由于文学术士不喜欢，社会主义就该受到谴责，我甚至不提议要创造社会主义文学，虽然我也觉得没有任何值得唱诵的社会主义歌曲并不是一个好迹象。我只是想指出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作家通常并不关心社会主义，有时大肆责备，也有时敌对。而这不仅仅对于作家本身，同时对社会主义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因为社会主义更需要他们。

而这就是普通人畏惧社会主义的肤浅观点。我非常了解这整场枯燥的争论，因为我了解双方。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对那些想要让我改信的狂热社会主义者说过，也对那些我想要说服他们改信社会主义的生来就是非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说过。这一整件事实际上是由于个别社会主义者，尤其是独断的马克思论证派而引起的不愉快。被那样的事影响是不是很幼稚呢？是不是很愚蠢呢？是不是几乎令人鄙视呢？答案确实都是肯定的，但问题是有时它就是会发生，所以把它牢记心头就显得尤为重要。

---

[1] 墨索里尼（1883年7月29日—1945年4月28日），即贝尼托·墨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的党魁、独裁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1922年至1943年期间任意大利王国首相。

[2] 英国自由党，英国资产阶级政党。前身是1679年成立的辉格党。1832年议会改革后（见英国议会君主制），辉格党逐渐转向自由主义，要求自由贸易和自由政治。1839年，J.罗素开始使用自由党名称。1867年第2次议会改革后，自由党领袖W.E.格莱斯顿4次出任首相。此时，自由党已成为英国资产阶级的政党。

[3] 贵格会，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又称教友派或者公谊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该派成立于17世纪，创始人为乔治·福克斯。该派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不尊敬任何人也不要求别人尊敬自己，不起誓，主张任何人之间要像兄弟一样，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

[4] 莱奇沃思，英国城市，距伦敦56公里。

[5] 劳合·乔治，英国自由党领袖，1890年当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1911年任财政大臣期间提出国民保险法，被公认为英国福利国家的先声。

[6] 红种印第安人，即北美印第安人，带有冒犯口气的说法。

[7] 英国独立工党，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政党。其宗旨是：保证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实行8小时工作制，禁止使用童工，实行失业津贴和社会保险；1893年1月建立，党的领袖是矿工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等。随着一些旧工联成员和受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加入，该党一开始便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醉心于议会斗争，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英国。

[8] 科尔夫妇，指乔治·道格拉斯·霍华德·科尔，英国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作家及历史学家，及其妻马克里特·科尔，夫妻俩曾合力完成多部侦探小说。乔治·道格拉斯·霍华德·科尔曾是反战主义者，后于1938年左右放弃立场，声称“希特勒治愈了我的反战疾病”。

[9] 韦伯夫妇：指悉尼·韦伯及其妻比阿特丽丝·波特·韦伯，他们是著名的英国工联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家、改良主义政治活动家、知识渊博的学者。

[10] 斯特拉奇夫妇，指利顿·斯特拉奇，英国作家，批评家及其第二任妻子简·格兰特，妇女参政运动领导者。

[11] 《工人日报》，1930年于英国创立的报纸，是英国共产党的报刊，后于1945年更名为《晨星》。

[12] 罗纳德·诺克斯，英国牧师、神学者。原被指定为英国国教牧师，后于1917年改信天主教。

[13] 阿诺德·伦恩，英国滑雪运动员、登山运动员、作家。曾是不可知论者，批判天主教，后于45岁改信天主教，成为天主教护教论者。

[14] 切斯特顿，即吉尔伯特·基斯·切斯特顿，英国作家、神学家、诗人、哲学家等，常被称为“悖论小王子”。

[15] 比奇科默，英国《每日快报》幽默专栏《顺便说说》中，两名专栏作家使用的笔名，原词义为流浪者。

[16] 利物浦，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著名港口城市，英国第五大城市，是默西河畔都市郡的5个自治市之一。英国著名商业中心，也是第二大商港，昔日利物浦市是英国著名的制造业中心。

[17] 萧伯纳，爱尔兰剧作家，1925年因为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他认真研读过《资本论》，公开声称他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一个社会主义者”，反对暴力革命。

[18] W.W.雅各布斯，英国小说家，是家中的长子，母亲在他小时候去世，父亲在伦敦码头工作。写过大量讽刺小说和恐怖小说。

[19] 《巴巴拉少校》，萧伯纳的戏剧作品，以救世军为题材，反映了贫富不均和劳资冲突等尖锐的社会问题。

[20] 《布拉斯邦德船长的转变》，萧伯纳1900年的戏剧作品。

[21] 《笨拙周报》，伦敦出版的符合中产阶级趣味的幽默刊物。

[22] 《错姻缘》，萧伯纳1909年的戏剧作品，以反讽的形式表示了他对婚姻、社会主义、“新女性”的看法。

[23] 西德尼·韦伯夫人，指悉尼·韦伯妻子比阿特丽丝·波特·韦伯，著名的英国工联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家、改良主义政治活动家、知识渊博的学者。

[24] 亨利·巴比塞，法国作家，生于法国一个新闻工作者和剧作家家庭，受父亲熏陶，从小爱好文学，16岁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

[25] 普鲁斯特，即马塞尔·普鲁斯特，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也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26] 纪德，即安德烈·纪德，法国作家，保护同性恋权益代表，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27] 米尔斯基，俄国政治文学史家，通常被称为米尔斯基公爵。

[28] 康拉德，波兰裔英国作家，英国现代小说的先行者之一，其作品表现了他对殖民主义的憎恶。

[29] 吉卜林，即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小说家、诗人，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由于吉卜林所生活的年代正值欧洲殖民国家向其他国家疯狂地扩张，他的部分作品也被有些人指责为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

[30] D.H.劳伦斯，即戴维·赫伯特·劳伦斯，20世纪英国作家。贯穿在他一切作品中的一条主线是阶级意识。其特点是：一个下层阶级的男人和一个上层阶级的女人的结合。上层阶级的男人通常是萎靡不振，缺乏人性本能力量的。

[31] 勃艮第，法国南部地区，曾为英国殖民地。主要出产酒体从中等至丰满不等的红葡萄酒，以及干白葡萄酒。

[32] 博若莱，位于勃艮第南部的产区，因其新酒而扬名。

[33] W.H.奥登，近代英国诗坛上最知名的诗人，认为处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西方文化正在堕落，而人民则在机器的压榨下疲倦地毁灭下去。

[34] 易卜生，即亨利克·约翰·易卜生，影响深远的挪威剧作家，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在作品中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痛斥宗教道德，并提出了他自己的道德理想，激愤地鼓吹精神上的极端个人主义，表现出不妥协的精神。

[35] 左拉，即爱弥尔·左拉，法国作家，是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领袖，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被视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遗产的组成部分。

[36] 阿纳托尔·法朗士，法国小说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出生于巴黎书商家庭，早年创作受巴那斯派的影响，后来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怀疑。

[37] 厄普顿·辛克莱，美国小说家，以创作“揭露黑幕”的小说闻名。

[38] 威廉·莫里斯，英国设计师、诗人、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及自学成才的工匠。

[39] 沃尔多·弗兰克，西班牙裔美国小说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社会批评家，以其对西班牙语拉丁美洲文学文化的研究而著名。

第十二章

然而比起我在上一章中讨论的本土的、暂时的反对意见，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困难。

聪明的人总是站在我们的对立面。面对这一事实，社会主义者常会将其归咎于腐败的动机（有意或无意地），觉得他们无知地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行”，或仅仅是对恐怖事物心怀畏惧以及对社会主义建立前的革命时期感到不安。不可否认这些确实都很重要，但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并没有受到以上这些观念的影响却依然对社会主义充满敌意。他们对社会主义望而生畏的原因是精神上的，或者说是“意识形态”上的。他们并不是认为它不“可行”而反对它，而恰恰是因为它太“可行”了。他们不是害怕他们在世时会发生的事，而是在遥远的未来，社会主义建立后将会发生的事。

我鲜少见到过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可以领悟这样的想法：社会主义表现出来的前进目标吓跑了很多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而不予理会。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并不擅长于了解他们对手的想法，如果他们懂得读心的话，欧洲的现状可能就不会如此令人绝望。由于他们掌握了一种几乎可以解释一切的方法，于是就不愿再去费心猜测别人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了。举个例子来说明我想要阐述的道理，现今最有才华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之一N.A.霍德威先生[1]为了说明一个广为流传且颇有道理的观点——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产物时，是这样写的：

关于共产主义促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古老传说……这其中的本质是这样的，共产主义活动的出现提醒了统治阶级，民主形式的英国工党已经无法控制工人阶级了，而资本家独裁统治想要存活下去就必须采取另一种形式。

这个说法的缺陷是，因为他看到了法西斯主义潜在的经济目标，就默认它的精神层面不重要。法西斯被写作是“统治阶级”的手段，虽然本质上也确实是这样，但这只能解释法西斯为什么能吸引资本家。那些数百万的非资本家，那些完全无法从法西斯主义获取物质利益也知道自己

无法获利的人，依然成为了法西斯主义者又是为什么呢？显然，他们的方式完全是由意识形态路线演化而来，它们只能成为法西斯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正在侵害或者说似乎在侵害某些比经济目的更深层次的东西（爱国主义、宗教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共产主义确实促成了法西斯主义。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总是只专注于将经济从意识形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确实揭露了真理，但却害得他们大多数的宣传都没有达到目标。本章我想讨论一下对社会主义的精神反抗，尤其是在敏感的人群中所体现的反抗，我会进行详细的分析，因为这一点很普遍也很有力，但在社会主义者中却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理念和机械化生产理念是息息相关的，或多或少都有点难舍难分。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城市化主义，它多少是和工业主义一同成长起来的，它一直扎根于城镇无产阶级和城镇知识分子中，很值得怀疑它是否能在非工业社会中兴起。诚然，工业主义理所当然地造就了社会主义理念，因为私有制只有在每一个个体（或家庭或其他单位）都至少可以适度地自给自足时才可以被接受，但工业主义的影响却是让任何人都无法实现哪怕一刻的自给自足。当工业主义克服了相对较低的水平时，就必定会产生一定形式的集体主义。当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它可能会造就奴隶制国家，而法西斯主义就是一个预兆。反之亦然，机械化生产启发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也必然包括机械化生产，因为它需要的一些特定的东西与原始生活方式是无法共存的。比如说它需要世界上所有人类之间保持持续的相互联系与物品交换，它需要所有人类几乎拥有相同的生活标准，也许还要有统一的教育。因此可以说所有社会主义世界至少需要像现在的美国一样高度机械化，也许更甚，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社会主义者否认这一点。社会主义世界常被描绘成完全机械化的、井然有序的世界，完全依赖于机械，就像古代社会依赖于奴隶一样。

到目前为止，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大部分理智的人都不喜欢机械文明，但除了傻瓜，人们都明白现在说要废除机器是荒谬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社会主义像通常所展现出来的那样，与机械进步的思想密不可分，不仅仅是一种必要的发展，而且是本质上的目标，几乎像是某种宗教一样。比如说这种观点，在大部分的有关苏俄快速的工业发展（第聂伯河水电站[2]、拖拉机等）的宣传物中都有暗示。卡雷尔·恰佩克[3]在《万能机器人》[4]的恐怖结局中将此描绘得淋漓尽致：当机器人屠杀了最后一个人，宣布他们的目标是“造很多房子”（你看，为了造房子而造房子）。那些最乐意接受社会主义的人，也同样对机械进步充满了热

情。这也差不多是社会主义者通常无法理解有反对意见存在的原因。他们通常能想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就是告诉你，现在世界的机械化程度和社会主义建立后世界机械化的程度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如果现在有一架飞机，到那时候就有五十架！所有现在手工做的工作到了那会儿都能用机器完成。所有现在用皮革、木头和石头做成的东西到了那时候都会用橡胶、玻璃和钢铁的材料代替。那时没有混乱秩序，没有断尾工程，没有荒蛮野兽，没有野草丛生，没有疟疾遍地，没有穷困潦倒，也没有劳筋苦骨，等等，如此这般。社会主义世界首先是一个有序的世界，一个高效的世界。然而恰恰就是这类对未来闪耀夺目的威尔斯[5]式世界的幻想吓退了思想敏感的人。请注意，这个关于“进步”的说法并不是社会主义宗旨的必要组成；但大家都觉得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潜伏在各类人群中的容易兴奋的保守主义者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反对社会主义。

每个敏感的人都曾怀疑过机械化，也从某种程度上怀疑过自然科学。但是对于科学和机械怀有敌意的动机在不同的时候大不相同，所以特别需要对各种动机进行分类，并且要完全漠视迂腐文人的嫉妒之情，他们憎恨科学是因为科学抢走了文学的风头。我所知道的对于科学和机械化最早的大篇幅抨击是《格列佛游记》[6]。但斯威夫特[7]的抨击虽然精妙绝伦，却是文不对题，甚至是愚蠢的，因为他的出发点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人——虽然这样说《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有点奇怪。对斯威夫特来说，科学只不过是徒劳无功的扒粪运动[8]，而机器更是无意义、永远无法运行的花瓶摆设。他的标准是实用性，但他没有想象力，无法看到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东西在将来可以产生效果。在书中其他地方他提到，所有成就中最好的就是“在以前只能长一片草的地方长出两片草来”，他显然没有察觉到这恰恰就是机器可以完成的。不久之后他们轻蔑不已的机器便开始工作了，自然科学拓宽了它的使用范围，于是就有了我们祖父辈时发生的那场著名的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争论。争论结束时双方都做了退让并且声称自己获得了胜利，但大多数宗教信仰者的意识中依然残留着反科学的歧视。整个19世纪，反对科学和机器的声音都十分高涨（例如狄更斯[9]的《艰难时世》[10]），但通常都是因为工业主义正处在残忍而丑陋的初级阶段这一浅显的原因。塞缪尔·巴特勒[11]在《埃瑞璜》[12]广为流传的那一章中对机器的抨击又另当别论。但巴特勒本身生活的时代不像现在这么令人绝望，那时上流人士还可以偶尔拥有业余爱好，因此这一整件事对他来说就像是一种智力测试。他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对于机器那可怜的依赖，但他没有想要弄明白这种依赖的结果，只是像笑话一样夸大它。只有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机械化生产终于胜利了，我们才真正感受到，机器剥夺了完全的人类生活的可能

性。没有人偶尔看见煤气管椅子就条件反射地认为机器是生活的敌人，可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天方夜谭。然而通常来说，这样的感受是出于本能，而不是理性。

人们清楚地知道，从某种角度来说，“进步”不过是一场骗局，但他们是用快速推算的方法得到这个结论，而我的工作就是提供通常被省略了的逻辑步骤。但首先人们应该要问，机器的作用是什么？显然它们的基本功能是节省劳动力，那些可以完全接受工业文明的人很少看到需要长远思考的理由。比如有人曾经声称，或者可以说是呐喊，说他在现代工业社会过得十分自在。我将引用的这段话来自约翰·比弗斯先生[13]的《没有信仰的世界》[14]。他是这样说的：

现在周薪2英镑10先令到4英镑的职员都比不上18世纪的农场长工，也比不上现在或从前任何专门农业公社的劳工或农民，这样的说法实在是无稽之谈，简直是大错特错。控诉文明对工作的影响，将田野和农场里的工作和在大型蒸汽机工厂或是汽车工厂里的工作相比是愚蠢至极的。工作是恼人之事，我们工作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做，所有工作都是为了给我们空闲并尽可能享受这样的闲暇。

以及：

人将会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寻找自己在地球上的天堂，而不是去担忧那个神的天堂。地球将会变成一个令人无比愉快的地方，神父和牧师将会成为遗留的传说。他们中的一半都会在一次干净利落的打击中被淘汰。

等等诸如此类的。

有一整章都在讨论这些（约翰·比弗斯书第四章），就像是完全粗鄙、无知、肤浅的机器崇拜展览。这就是现代摩登世界中一大部分真实的声音。每一个住在远郊、服用阿司匹林[15]的人都会对它热情回应。当比弗斯先生听说自己还比不上自己的祖父，还有更可怕的，当他听说如果我们回到简单的生活方式后他必须得为了工作而练就结实的肌肉时，听听他发出的愤怒而刺耳的哀嚎声（那可不止是嗷嗷之声）。你看，他说工作是为了“给我们提供空闲时间”。那空闲时间要用来干什么呢？想必是用来变得更像比弗斯先生吧。尽管实际上你是可以根据那段“地球上的天堂”的描述，合理推测他所期待的文明是怎么样的：像是莱昂斯小吃馆[16]几个世纪后更大更聒噪的样子。觉得自己适应机械世

界的人写的所有书，比如H.G.威尔斯写的任意一本书，你都可以从中找到这一类的段落。我们常常听到那令人振奋的，“机器是奴隶的新种族，可以释放我们的人性”之类等等的说法，对于这些人来说，虽然机器唯一可能产生的危险就是可能会被用于破坏性的目的，比如飞机被用于战争。除了战争和不测之祸，他们将未来设想为机器急速发展的进军，用机器来省工，用机器来思考，用机器省去痛苦，卫生、高效、有序，更卫生、更高效、更有序，更多的机器——直到你终于来到了如今早已熟知的威尔斯式乌托邦，就像赫胥黎[17]在《美丽新世界》[18]中所讽刺的小胖男人们的天堂一样。当然在他们的白日梦中，那些小胖男人们既不小也不胖；他们是“神一样的男人”[19]。但为什么这么说呢？所有的机器进步都趋向于越来越有效率；那么最终就会走向一个万无一失的世界。但在一个不会出错的世界里，许多威尔斯先生称之为“神迹”的美德无非只会像动物们动动耳朵一样毫无价值。《神一样的男人》《梦境》[20]中出现的人类都被描述为勇敢、慷慨、身强体壮的。机器进步的趋向是在消除危险，那么在一个没有肉体危险的世界中，还会有肉体的勇气存在吗？它是可能存在的吗？而且在一个不需要体力劳动的世界里，为什么会保留身体的力量呢？而至于忠诚、慷慨之类的品德，在一个万无一失的世界中，不仅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我们赞美的许多人类的美德，只能在应对灾难、痛苦或困境时才有用，但工业发展的趋势正在消除灾难、痛苦和困境。像在《梦境》《神一样的男人》之类的书中，都假定力量、勇气、慷慨之类的品德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因为这些是人类的优秀美德，是人类的必要属性。想必乌托邦的居民会人工制造一些危险来锻炼他们的勇气，会做一些哑铃运动来雕塑他们永远也用不到的肌肉之类的吧。在此你就能发现进步观点中的巨大矛盾：机械进步的趋势是使生活环境更安稳，而你却还在努力变得勇敢坚强。你在猛烈奋力前进的同时又在绝望踟蹰退缩，这就仿佛一个伦敦的股票经纪人穿着一套盔甲去办公室，还坚持使用古拉丁语。所以归根到底，支持进步的人，也在拥护着时代错位。

与此同时，我假设机械进步的趋势是将生活变得安稳，这也可能会有争议，因为在任何时候，近期的机器发明所造成的影响都有可能是相反的。就比如从马到汽车的转变，刚开始人们可能会说，考虑到大量交通死亡事故，汽车并没有让生活更安全。而且成为土路驾驶员和成为驯马师，或者参加全国越野障碍马赛的难度是不相上下的。然而所有机器发展的趋势都是更安全更容易操作。如果我们更认真地处理道路规划问题，交通事故危险就会排除，而且我们迟早都会这么做；而就如今汽车的发展程度而言，只要不是失明或者瘫痪，任何人都可以在上过几堂课

后开始驾驶汽车。甚至现在熟练驾驶汽车比熟练地骑马所需的勇气、技巧更少；二十年后，也许就完全不需要什么勇气和技巧了。因此不得不说，从整体社会来看，从马到汽车的转变确实提高了人类的安全程度。还有一些新的发明，比如说飞机，虽然乍看之下它并没有让生活更安全。第一个坐飞机的人实在是勇敢的，即便在今天，成为飞行员依然需要不小的勇气，但它的趋势和汽车是一样的。像汽车一样，飞机将会变成傻瓜也能操作的，上百万个工程师几乎毫无意识地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最终——这只是个目标，不一定会实现——成为飞行员不会比婴儿在摇篮车中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技巧，所有的机器进步都会也都必须向这个方向发展。机械的进步是为了变得更有效率，也就是说，更容易操作。因此机械进步的目标就是一个傻瓜都能操作的世界——这也许意味着一个被傻瓜占据的世界，也有可能不是。威尔斯先生可能会反驳说世界永远都不会被傻瓜占据，因为无论效率达到多高的水平，都会有更复杂的困难存在，比如说（这是威尔斯最喜欢的观点，他在不知多少结束语中都用到过），当你已经将我们生活着的星球塑造到完美时，你就会开始实施你殖民其他星球的庞大计划。但这只是把目标推向遥远的未来而已，目标本身并没有变。殖民其他星球后，重新开始机器进步的游戏；对于那个傻瓜操纵的世界，你只是用傻瓜操纵的太阳系，傻瓜操纵的宇宙代替了而已。当你一心系于机械效率的理想时，你也就将自己捆绑在了软弱的理想上。然而软弱是令人作呕的，因此所有的进步都仿佛是朝着一个你祈望永远也不要到达的目标前进时疯狂撕裂的挣扎。偶尔你会遇见一些人，他们可以理解通常所谓的进步也意味着通常所谓的退化，但这个人依然赞成进步。因此萧伯纳先生在乌托邦中为福斯塔夫[21]建了一座雕像，因为他是第一个公开表明赞成怯懦的人。

而麻烦远远比这更棘手。到目前为止，我只是指出了以机械进步为目标的愚蠢，以及保留一些在机械进步下已经可有可无的美德的荒谬之处。人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是，是否还存在不被机器统治而摧残的任何人类活动。

机器的功能是省工。在一个完全机械化的世界，所有乏味的苦差事都会由机器来完成，让我们可以追求更有趣的事，这样听起来是再好不过了。在一些简单易操作的机器几分钟就可以挖完土的时候，看见十来个男人汗如雨下地挖一个排水管道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为什么不让机器来做这项工作，让人去做些其他的事情呢？但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他们能做些其他什么事呢？按说他们被从“工作”中解救出来，为了做一些“非工作”的事。但什么是工作，什么又不是工作呢？挖掘、木工、种

树、砍树、骑马、钓鱼、打猎、喂鸡、弹琴、拍照、造房、烹调、缝纫、装饰帽子、修车，这些是工作吗？所有这些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工作，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就是游戏。事实上几乎所有活动都可以根据你对它的看法不同而既可以是工作又可以是游戏，那些从挖掘中解脱出来的劳工可能想用他的闲暇或部分闲暇时间来弹钢琴，而专业钢琴家却只是很想去土豆田中挖挖土。因此说工作就是难以忍受而乏味的、非工作就是令人愉悦的，这种对比是错误的。事实上当一个人放纵地吃、喝、睡、做爱、聊天、玩游戏或只是四处闲逛——而这些事都不能填满他的一生——他需要工作，而且经常会去寻找工作，尽管也许他不会称之为工作。除去一些低智商的残障人士，人们的生活都是建立在努力之上的。粗鄙的享乐主义者似乎认为，人只是行走着的胃，但人并不只是这样，人有手，有眼，有脑子。如果你停止用手，你就会失去一大片知觉。现在再回过头来想想那十几个挖排水管道的人，机器将他们从工作中释放出来，所以他们得找其他的娱乐活动——比如说木工。但无论他们想做些其他的什么，都会发现有另外一台机器将他们从中解放出来。完全机械化的世界已经不需要木匠、厨师或是修车工等等的人了，就像不需要挖掘工一样。从捕捞鲸鱼到雕刻樱桃核，几乎没有事情是机器无法胜任的。机器甚至会侵占我们如今称之为“艺术”的活动；事实上现在就已经如此了，通过相机和收音机。等到世界被最大程度机械化时，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有机器阻隔你工作的机会——也就阻隔了你的生机。

乍看之下这似乎并不重要，为什么不继续你“创造性的工作”，无视那些替你工作的机器呢？但其实没有听起来的这么简单。就拿我来说，我在保险事务所工作，每天八小时，在空闲的时间我想做些“创作”，于是我选择做一些木工——比如给自己做张桌子。请注意在开始的时候整件事情就有点奇怪，因为工厂完全可以提供比我自己做的好得多的桌子。但即便我开始做我的桌子，我的感觉也不可能与几百年前橱柜工匠对桌子的感觉相同，甚至还比不上鲁滨逊[22]的感受强烈。因为在我开始前，机器已经帮我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我用的工具只需要最简单的技术。比如说，我可以用刨子刨出任何形状，但几百年前的木匠只能靠各种凿子来完成，而这些事就需要真正的眼和手的技巧。我买的木板已经是刨好了的，桌腿也是用旋床旋成了圆形的。我甚至可以去木工市场购买已经加工好的所有桌子的部件，然后把它们组装起来，我的工作就只剩下敲几颗钉子或再用一张砂纸。如果现在已经是如此，在工业化的未来就更甚了。工具和材料已经准备好了，就没有任何出差错的可能，也就没有技艺的存在空间了。做一张桌子会比削土豆更简单。在这样的环境下谈论“创造性工作”是荒谬的。总之手工艺（以学徒的体系代代相

传）在那时早已消失了，有一些手工艺现在就已经在机器的竞争下消失了，你看无论在哪个乡村教堂，都已经无法找到1820年以后制作的精美墓碑了。石雕的艺术或者说手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想要复兴它需要花上几个世纪。

但也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不保留机器的同时也保留“创造性的工作”呢？为什么不做一些过时的事来陶冶情操呢？很多人都曾粗略地思考过这个点子，这看起来可以轻松完美地解决机器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听说乌托邦里的居民，在完成了番茄罐头厂每天两个小时转动把手的工作后回到家里，会有意地恢复到更原始的生活方式中，用一些浮雕细工、陶器上釉、手工编织的工作来慰藉他们的创造本能。而这样的场景显然是荒谬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则，虽然我们一直遵循却不曾意识到过，那就是只要有机器在，人就一定会使用它。当打开水龙头就能取水时，没有人会再从井里打水。在旅行上我们可以更好地进行阐述，每一个在不发达国家用原始方式旅行过的人都知道，那种旅行和现代的火车、汽车之类的旅行简直是天壤之别。那骑马或走路的游牧民把他们的包裹放在骆驼或牛车上，在旅途中需要忍受各种不适，但至少他是活着的；然而那乘坐特快列车或豪华游轮的乘客，他的旅途只是一段空白，是一种短暂的死亡。而且只要有铁轨，人们就得乘坐火车旅行——或是汽车、飞机。就好像我距离伦敦40英里，当我想去伦敦的时候，为何不收拾行囊放上骡背，然后徒步启程，行走一两天过去呢？因为每隔十分钟就有绿线大巴从我身边呼啸而过，相比之下，徒步的旅行就麻烦得令人难以忍受了。为了让人可以享受原始的旅行方式，就应该取消其他可行的旅行方式。没有人会舍近求远，用不必要的麻烦方式来完成一件事。因此在乌托邦中，用浮雕细工来拯救灵魂的画面是荒谬的。在一个任何事都可以用机器完成的世界里，所有的事就都会用机器完成。有意地回到原始的生活方式，使用古老的工具，为自己添一点愚蠢的小麻烦，会是一种矫揉造作附庸风雅的文艺做派，这就好像一本正经地坐着用石器吃晚餐。在一个机器时代恢复手工艺，就好比你现在回到老式英国下午茶店或是墙上布满装饰横梁的都铎风格[23]庄园。

机器进步的趋势就是阻挠人类对于努力与创造的需求，它使得人们不再必须使用眼睛和手，甚至使眼与手的活动完全无法进行。“进步”的信徒有时会宣称这是不重要的，但通常只需指出这一进程可以误入怎样的歧途，就可以把他逼到角落。比如说，你究竟为什么要用手呢？——为什么要用手来擤鼻涕或是削铅笔呢？你真的愿意在肩膀上装一个钢筋和橡皮的组合装置，然后让你的手臂萎缩成皮包骨的残肢吗？其他所有

的器官与功能也都一样。人类除了吃、喝、睡觉、呼吸和生育以外真的没有必要再做其他事了，因为所有的事机器都会帮我们完成。照此逻辑推理，机器进步的结局就是把人类简化成像是装着大脑的瓶子之类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业已走上的道路，尽管我们显然不想达到这个目标；就好比一天喝一整瓶威士忌的人也并不想要肝硬化一样。“进步”中隐含的目标也许不一定就是装着大脑的瓶子，可至少也是某种可怕的、非人的软弱和无助。不幸的是，现如今“进步”这个词与“社会主义”几乎在所有人的脑中都密不可分。那些不喜欢机器的人也理所当然地讨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总是支持机械化、理性化、现代化，或者至少是认为自己应该支持这些。比如说就在最近，一位杰出的独立工党党员带着一种难以启齿的羞愧向我坦白，说他“对马情有独钟”，那样子就好像这是件不太正当的事。正如你所知，马属于业已逝去的农业社会，而所有与过去相关的感情都是带有暧昧的异教意味的。我不觉得必须如此，但事实确实就是如此。这样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解释为何有头脑的人会疏远社会主义。

在上一代人中，所有的智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革命者；但如今几乎可以这么说，所有的智者都是保守派。因此我们需要对比H.G.威尔斯的《当睡者醒来时》[24]与三十年后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两本都是悲观主义的乌托邦，是类似于道学先生对天堂的幻想，在那儿，所有“进步主义者”的梦想都实现了。单从虚构作品的角度而言，我觉得《当睡者醒来时》优秀得多，但它却充满了矛盾，因为威尔斯作为“进步主义”的忠实信徒，不能写任何有悖于“进步”信念的东西。他描绘了一个辉煌而又异常阴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特权阶级过着浅薄而没有生气的享乐主义生活，而工人们则完全沦为了奴隶，如次人类一样无知愚昧，像是史前洞穴人在地下洞穴中那样艰难地工作。只要检查一下这个想法（在后来的《时空的传说》中发展成了一个精妙的短篇故事），就能看到其中的前后矛盾。在威尔斯描绘的完全机械化的世界中，工人为什么需要比现在更艰辛地工作呢？显然机器进步的趋势是使人们摆脱工作，而不是增加工作。在机器世界中，工人们有可能被奴役、受虐待，甚至是挨饿，但显然他们不用做无休止的体力劳动；不然要机器干什么呢？你可以让机器来做所有的工作，或是让人来完成所有的工作，但这两种情况不可能同时并存。那些地下工人的大军，穿着蓝色的制服，说着低等的半兽人的语言，在小说中出现只是为了“让你心惊肉跳”。威尔斯想指出，“进步”有可能误入歧途；但他能想象到的弊病只是不公平而已，即一个阶级夺走了所有的财富、权利，并纯粹出于恶意地压迫其他阶级。如果我们将小说的旨趣稍稍歪曲，他似乎是

想说，打倒特权阶级（事实上是将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一切问题就将迎刃而解。机械文明仍然继续，只是需要公平共享产出。他不敢面对的想法是——机器本身可能就是敌人。所以其更典型的乌托邦作品（比如《梦境》《神一样的男人》）中，他又恢复了乐观主义，人类被机器“解放”了，他们晒着日光浴，聊天的唯一主题就是他们相比祖先们的优势。《美丽新世界》则更晚一点出现，属于看透了“进步”骗局的一代人。它有它自己的矛盾（主要矛盾在约翰·斯特雷奇先生[25]的《未来的权力斗争》中已指出），但它对于大腹便便者的至善论的抨击是十分值得纪念的。除去一些夸张讽刺的手法，它可能表达了大部分思考者对工业文明的感想。

敏感的人对于机器的敌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机械化已成定局，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仍值得一提。我们必须接纳机器，但最好是像接受药物那样去接受它——也就是说，抱着勉强、猜忌的态度。机器和药物一样，是有用的、危险的，而且容易上瘾。人类越常向它妥协，它就将人类掌控得越紧。你只要环顾四周，就会意识到机器正在以多迅猛的速度将我们纳入它的势力范围。首先就是在一个世纪的机械化后，我们的品味发生了可怕的退化，这一点太显而易见众所周知了，几乎不用我再指出来。但只以品位的狭义定义，即味觉为例，在高度机械化的国家，由于罐头食物、冷藏以及合成香料等等的存在，味蕾简直变成了废弃的器官。看看蔬果贩子的店铺你就会明白，大多数英国人认为苹果就是一团来自美国或澳洲的色泽鲜亮的棉绒，他们狼吞虎咽之后，显然还很愉悦，却让英国的本土苹果在树下烂掉。美国苹果标准化生产的光鲜外表吸引了他们，而英国苹果上乘的口感他们愣是没有注意到。再看看生产线上用铝箔包装的芝士和杂货店里的“混合”黄油，看看那整齐得可怕的食物罐头正占据越来越多食品店的货架，就连奶制品也是，看看廉价的蛋糕卷或者更低廉的冰激凌，再看看人们以啤酒之名咽下嗓子的肮脏的化学副产品。无论你往哪里看，都能看到华而不实的机械制品正在战胜仍然保有原本味道的传统食品。适用于食物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家具、房屋、衣服、书本、娱乐以及此外所有构成我们生存环境的东西。现在的人口有几百万，而且每年都在增加，对他们来说，相比牛叫鸟鸣，高声刺耳的收音机倒是越来越可以接受，也越来越普遍。如果我们的品味或是舌尖上的味蕾不曾退化的话，世界机械化的脚步也走不了多远，因为大部分的工业产物都是令人生厌的。在健康的世界中完全不需要罐头食物、阿司匹林、留声机、煤气管子、机关枪、日报、电话或是汽车，等等，相反地，对机器无法制造的东西的需求则会一如既往。然而机器出现了，且它的破坏力几乎

无可避免。就算有人痛骂它，也会继续使用它。即使是一个光屁股的野蛮人，只要有机会也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学会文明的“恶习”。机械化使品位退化了，品位的退化导致了对机械制品的需求，也就需要更高的机械化程度，于是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除此之外，全球机械化还有一个不受我们意志控制的趋势。因为事实上现代西方人已经被刺激并培养了发明机器的能力，直到其变成一种本能。人们几乎在不知不觉地发明新的机器，并改良现有的机器，就像梦游的人在梦中继续工作一样。在过去，当生存注定艰难而辛劳时，使用祖先们的笨拙工具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每每要过若干个世纪才会出现寥寥怪人，试图创新；因此纵观这漫长的岁月，那些牛车、犁、镰刀之类的东西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据记载，螺丝从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了，但却直到19世纪才有人想到把螺丝头磨尖，之前的几千年时间它都是平头的，在插入螺丝前得先钻孔。而在我们的时代，这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几乎每一个现代西方人的发明能力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人发明机器就像是波利尼西亚岛[26]的居民游泳一样自然。给西方人一份工作，他就会立刻着手发明一台机器来代替他完成工作；给他一台机器他则会想法改进。我相当理解这样的趋势，因为我也曾徒劳地这么想过。我既没有这样的耐心，也没有这样的机械技术来发明任何可以运作的机器，但我仍抱有一丝期待有机器可以省去我的体力和脑力的劳动。更有机械天赋的人此时可能就会建造一些机器并且投入使用了。但在如今的经济体制下，能否建造机器，或能否让人从中获益，都要看它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因此，社会主义者宣称社会主义建立后机械进步的速度会更快是对的。在机器文明下，发明和改良的进程会一直持续下去，但资本主义会使其速度放缓，因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所有无法立刻产生盈利的发明都会被忽视，甚至对于一些可能威胁到减产的发明就会像佩特洛尼乌斯[27]提出的柔性玻璃一样被无情地打压。（就像几年前有人发明了一种留声机唱针，可以使用数十年。最大的留声机公司之一买下了这个专利，而这也是最后一次为人所知。）建立社会主义，废除利益原则，发明家就有了自行决定的权利，那么如今已经相当迅速的全球机械化进程将会——或者至少是能够——迅猛加速。

这样的前景有些危险，因为就连现在的机械化进程显然都已失控。之所以有如今的局面，只是因为人类养成了习惯。化学家精练了合成橡胶的方法，或是技工设计出了新的活塞销的样式。为什么呢？并不是为了什么清晰明了的目的，而仅仅是出于发明与改进的冲动，现在这种冲动已经变成了本能。把一个和平主义者安排到炸弹工厂去，两个月后，

他也会着手发明新型炸弹。于是，诸如毒气这类，其发明者也无法想见有益于人类的残忍东西能得以问世。我们对待毒气之类的东西的态度应该像大人国[28]的国王对火药的态度一样；但由于我们生活在机械化和科学至上的时代，都染上了这样的想法：无论发生什么事，“进步”的脚步都应该继续，而知识永远不能镇压。毫无疑问，我们嘴上都认同机器是为人类而造的，并非人类为机器而活；但事实上所有抑制机器发展的企图在我们眼中都变成了对知识的攻击，因此也就是大逆不道的。而且就算所有人类都突然开始反抗机器，决定逃往一种更简单的生活方式，这种逃离也会是异常艰辛的。不会像巴特勒的《埃瑞璜》中描写的那样，从某一天起砸碎所有发明出的机器；我们同样还要粉碎的是在旧机器被毁后身不由己地又发明新机器的惯性思维。而我们大家的脑子里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惯性思维。在世上所有国家，科学技术的大部队像列队的蚂蚁一样盲目地沿着“进步”之路行军，而余下的人则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没有多少人希望这样，大多数人并不愿意事情走到这步田地，然而它已然发生了。机械化的进程本身也变成了一台机器，一台刺眼的巨大车子，载着我们去往某个未知的地方，很有可能朝向威尔斯那个瓶子里装着大脑的世界。

这就是反对机器的例子，无论是否合理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每一个反对机器文明的人都可以反复重复这些或是与之类似的论据。不幸的是，由于“社会主义——进步——机器——俄国——拖拉机——卫生——机器——进步”这样几乎存在于每一个人脑中的联想，反对机器文明的人通常也敌对社会主义。憎恨集中供暖和煤气管椅子的人在你提到社会主义时也会嘟囔着“蜂窝之国”，然后带着痛苦的表情走开。据我观察，很少有社会主义者可以领悟到这是为什么，甚至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事实。把一个喜欢唱高调的社会主义者逼到角落，然后不停地对他重复我本章所讲的主旨，看看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吧。事实上你会得到很多答案，我太熟悉他们了，几乎可以背出这些答案来。

首先他会告诉你，现在已经不可能“回去”（或是“将进步之手放回去”——好像进步之手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多次被粗暴地放回去过似的），然后他会指责你是中世纪爱好者，并开始控诉中世纪的惨状：麻风病、宗教法庭等等。事实上，主要由现代化护教士所提出的对于中世纪的攻击大多都是离题千里的，因为他们的主要手段就是设计出一个现代人，带着他的洁癖和对舒适的高标准，回到对这些东西闻所未闻的时代。但请注意无论如何这都不能算是一个回答。对于机械化未来的厌恶并不意味着推崇过去。D.H.劳伦斯比中世纪爱好者聪明一点，选择将我

们所知甚少的伊特鲁利亚人[29]理想化。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将伊特鲁利亚人或皮拉斯基人[30]或阿兹特克人[31]或苏美尔人[32]或任何已经消失的浪漫人群理想化。当一个人描绘理想的文明时，他只是将其作为一个目标，并不需要假装它在时空中存在过。如果你坚持这个观点，并说明你是希望将生活变得更简单更努力而不是更软弱更复杂，社会主义者通常会认定你想要回归“自然状态”——也就是说旧石器时代那些散发着恶臭的洞穴：好像在凿石取火和谢菲尔德[33]炼钢厂，或是在兽皮制成的小圆舟和玛丽皇后号豪华游轮之间，就没有其他可能了一样。

但最终你会得到一个更为切题的答案，内容大致如下：“是的，你说的这些从某一立场看来都非常好，令自己坚强、远离阿司匹林和中央供暖系统，这些做法无疑非常高尚。但重点是，你看，没有人真正想要这样，这会意味着回到农业生活方式，也就意味着繁重的工作，这和在园林里玩耍是完全不同的。我不想做繁重的工作，你也不想做繁重的工作——所有知道它意味着什么的人都不会想做的。你嘴上这么说是因为你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一天的重活。”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真实的，这就相当于是说，“我们是软弱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让我们继续软弱下去吧！”这起码是现实的。就如我之前指出的，机器已经将我们纳入它的掌控范围，想要逃脱是异常困难的。但这样的回答实在是闪烁其词，因为它没有解释清楚我们“想要”这个或那个是什么意思。我是堕落的半个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不能每天喝到早茶或是不能在每个星期五拿到我的《新政治家》[34]杂志，我会生不如死。显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不“想要”回到更简单、更艰苦，或是更农业化的生活方式。同样地，我也不“想要”减少酒量、还债、做足量运动、对妻子忠贞不贰等等。但从另一个更长远的角度来讲，我却是想要这样的，也许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想要的那种文明中，“进步”并不意味着让小胖人们生活得更安稳。我列出的这些实际上是我在对有思想的，受过书本教育的社会主义者们解释他们是如何赶走了潜在信徒时，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唯一回答。当然，还有一种老调说，无论人们是否喜欢，社会主义都必然到来，因为万能的“历史必然性”在发挥作用。但是“历史必然性”，或者毋宁说是对它的信仰，并未能将我们从希特勒手中拯救出来。

同时，那些有头脑的人在思维上通常属于左翼，但在性格上却往往倾向于右翼，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大门前徘徊不定。他们无疑明白应该成为社会主义者，但先是看到了个别迟钝的社会主义者，然后又看到社会

主义理想的明显弱点，于是便离开了。直到近段时间之前，改变观点成为信仰无差别论都是正常的。十年前，甚至是五年前，那些典型的文人骚客会写一些关于巴洛克建筑的书，却对政治很冷淡。但那样的态度正变得有些困难，甚至过时。时代变得愈加苛刻，问题也变得更清晰，那种一切都不会变的信仰（比如，你一直会有稳定的收益）越来越不流行了。文人骚客骑在中立的墙头上，曾经就像坐在教堂长座椅的毛绒垫上一样舒适，现在却是如坐针毡；他越来越表现出倾向于一方或另一方。有趣的是你会发现有多少重要的作家，在几十年前都为了艺术而艺术，认为用文字来写选举甚至是参加选举都是粗俗的，但他们现在都有了一定的政治立场；而大多数的年轻作家，至少是他们中不傻的那些人，从开始就是“有政治倾向的”。我认为在危机时刻来临时，会存在一个可怕的危险，即大部分知识分子会转向法西斯主义。只不过不知道这危机时刻什么时候到来，这也许要看欧洲会发生什么大事；而也许就在两年内，或者甚至一年间，那决定性的时刻就会到来。但那也将会是每一个有脑子或正派的人会彻底明白他必须站在社会主义这一边的时候。但他也许不会自愿走到这一边，会有太多古老的偏见从中作梗。需要有人说服他，因此也就需要有人了解他的观点。社会主义者已经不能再浪费时间对已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做宣传了，他们现在的任务是尽快制造社会主义者，而不是像他们时常做的那样，制造法西斯主义者。

提到英国的法西斯主义时，我并不一定是指摩兹利[35]和他长着青春痘的小跟班们。法西斯主义出现在英国时，很可能会采取安静而微妙的形式（想必刚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被称为法西斯主义），摩兹利邮票上吉尔伯特与萨利文[36]的重骑兵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不过是个笑话罢了；就连摩兹利也看习惯了，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参见希特勒和拿破仑三世的政治生涯），对于那些攀爬权利之峰的政治家来说，在职业生涯刚开始时不被重视有时也是可以利用的优势。但此刻我考虑的是，法西斯分子的观点无疑正在赢得人们的认同，而人们本该对此有更清醒的认识。在知识分子中出现法西斯主义时，有一点类似于镜像——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义的镜像，而是看似合理却被歪曲过的社会主义的镜像。它可以被归结为无论神秘的社会主义者做什么都要和他们对着干的决心。如果你用糟糕而误导人的方法呈现社会主义，即让人们觉得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教条者的命令下把欧洲文明统统冲进下水道，你就是在冒险将知识分子推向法西斯主义。你恐吓他们，让他们处于愤怒防守的状态，于是他们会单纯地拒绝倾听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话题。眼下有一些人就已经明显有这样的态度了，例如庞德[37]、温德姆·刘易斯[38]、罗伊·坎贝尔[39]之类的作家，以及大部分的天主教作家

和许多道格拉斯信贷组织[40]，还有畅销小说家，甚至还有——如果你能看透表面现象——那些自命清高的保守知识分子，例如艾略特[41]和他数不胜数的追随者。如果你需要一些法西斯主义情绪在英国滋生的确凿证据，请看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42]时每天寄往出版社的成千上万封信件，其中总有一些赞同意大利的举动，还有天主教和圣公会神职人员听说西班牙出现法西斯主义时的欢呼雀跃（见1936年8月7日《每日邮报》）。

要对抗法西斯主义，我们就必须了解它，这也就需要承认法西斯主义除了邪恶之外也包含有某些优点。在现实中，法西斯显然只是声名狼藉的暴政，就连其最忠诚的护教士对于它获得执掌权力的方法也宁可避而不谈。但法西斯主义的潜在情感，那种最初吸引人们加入法西斯主义阵营的情感，也许没有那么可鄙。《星期六评论》总是让人觉得法西斯是布尔什维克妖怪的恐怖尖叫，而事实不总是如此。只要稍微关注过法西斯运动的人都知道，普通的法西斯主义成员通常是好心人，比如，他总是热切地渴望改善失业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事实上法西斯主义不仅保留了保守主义的缺点，也汲取了它的优点。对于任何一个有传统和纪律意识的人来说，法西斯主义具有与生俱来的吸引力。对于那些受够了社会主义的笨拙宣传的人来说，可能就非常容易将法西斯主义视为欧洲文明精华的最后防线。即使是法西斯主义者中最欺凌霸道者——那些一手拿着橡胶警棍，一手拿着蓖麻油瓶的人——也未必觉得自己是个恶霸；他也许觉得自己更像是过去伦塞斯瓦列斯隘道的罗兰伯爵[43]，为保卫基督教与野蛮人对抗。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法西斯主义在各地都有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者的错。部分是因为共产主义阻碍民主政治的错误政策，也就是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更多的是因为社会主义者，这么说吧，给人们留下了关于社会主义的错误印象。他们从来没有充分向人解释清楚，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公正与自由。他们过于关注经济状况，又进而断定人没有灵魂，还或直白或含蓄地将唯物主义乌托邦作为自己的目标。因此法西斯主义就可以利用所有反对享乐主义和“进步”这个廉价观念的本能。它可以伪装成欧洲传统文化的支持者，以此来呼吁人们信仰基督，崇尚爱国主义和军人的美德。用“极度残暴”之类的简单词句去形容法西斯主义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弄得更糟。如果你自欺欺人地认为这只是一时偏激，不久就会自行停止，那你就真是在做梦了，只有等别人用橡胶警棍狠狠揍了你才会醒来。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认真审视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了解其并非一无是处，然后让世人知道，法西斯主义包含的优点也同样蕴含在社会主义中。

目前的状况是令人绝望的，即使没有更糟的事降临在我们身上，我在书中前面部分提到的一些状况，在现有的经济体系下也不会改善。眼下更紧迫的是法西斯分子有可能控制欧洲。我们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推翻法西斯主义，除非社会主义学说以有效的形式迅速而广泛地普及，因为社会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唯一需要面对的真正的敌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政府就算自己面临覆灭，也不会下定决心抵抗法西斯主义。我们的统治者中那些可以理解当下情况的人，宁愿向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交出大英帝国的每一寸土地，也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胜利。当我们以为法西斯是狂热的民族主义时，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嘲笑它，因为似乎很显然，每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都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爱国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他们之间会互相冲突。但是这些并没有发生，现在法西斯主义是一场国际运动，也就意味着法西斯国家不仅可以为侵略而联合，他们也在摸索某种全球体系，尽管现在可能还是一知半解。极权国家的观念已演变成极权世界的观念。正如我之前所说，机器技术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某种形式的集体主义，但不一定是平均主义，也就是说，未必是社会主义。按照经济学家的思维，很容易设想这样一个全球社会，其经济上采取集体主义——即去除利益原则——而政治、军事和教育力量则掌握在少数统治者及其拥趸手中。这种社会，或者类似的社会体系正是法西斯主义的目标。而这显然就是奴隶制国家，更准确地说是奴隶制世界。考虑到科技爆发后世界的巨大财富，奴隶们会营养充足而满心欢喜，那么它也许会是一种稳定的社会形态。通常说法西斯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蜂窝之国”，这对于蜜蜂来说太不公平了，说是由白鼬统治兔子的世界倒可能更接近一点。正是为了对抗这种残忍的可能性，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

而我们唯一可以联合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潜在理想，即公正与自由。但将这样的理想称作是“潜在的”还言之不及。因为它几乎完全被遗忘了，它被深深地埋在层层叠叠的教条主义说辞、党派争论、半瓶子醋的“进步主义论”之下，像是藏在一山粪便下的钻石一般。而社会主义者的工作就是把它再次挖掘出来。公正与自由！这是必须像号角般回响在整个世界的词语。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尤其近十年，都是恶魔当道。当“社会主义”出现时，我们正处于这样的境地：一面是飞机、拖拉机和轰鸣的玻璃混凝土工厂的画面，另一面又是留着络腮胡的素食者、布尔什维克人民政委（一半是恶棍，一半是夸夸其谈的人）、穿着凉鞋的热切女人、说着生涩词语的蓬头垢面的马克思主义者、逃走的贵格会新徒、计划生育狂热分子还有工党蛀虫的画面。至少在这个岛国，社会主义已经不再带有革命或是推翻暴政的气息；它充盈着古怪、机器崇拜以

及对俄国的愚蠢、狂热崇拜的气息。除非你可以去除这些气息，否则法西斯主义将会迅速取得胜利。

---

[1] N.A.霍德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家，学校教师。

[2] 第聂伯河水电站，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1927年至1939年建设，由美国工程师援助建设。该电站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志。

[3] 卡雷尔·恰佩克，捷克著名的剧作家和科幻文学家、童话寓言家。他擅长讽刺幽默和幻想，以运用虚幻、象征的现代派手法为世人瞩目。他的童话作品以鸟禽牲畜和幻想的形象来揭露、讽刺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

[4] 《万能机器人》，卡雷尔·恰佩克于1920年发表的科幻剧本，发明了机器人这个词，此剧本已成为世界科幻文学的经典。

[5] 威尔斯，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英国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创作的科幻小说对该领域影响深远，如“时间旅行”“外星人入侵”“反乌托邦”等都是20世纪科幻小说中的主流话题。

[6] 《格列佛游记》，乔纳森·斯威夫特以笔名执笔的匿名小说。原版因内容招致众怒，经大幅修改于1726年出版，1735年完全版出版。作者假借虚构人物外科医师莱缪尔·格列佛所写一系列神奇的旅行经历，对当时的科学家、辉格党、汉诺威王室进行激烈讽刺，批评英国对爱尔兰的压迫和辉格党的外交政策，揭示人类的劣根性。

[7] 斯威夫特，即乔纳森·斯威夫特，英国作家，以《格列佛游记》和《一只桶的故事》等作品闻名于世。根据历史记载，他有多重身份，包括神职人员、政治小册作者、作家、诗人和激进分子。

[8] 扒粪运动，19世纪下半叶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将这些专门揭丑的记者称之为“扒粪者”，把他们比喻为著名的宗教小说《天路历程》中的“扒粪者”。小说中有一位扒粪者手拿粪耙，目不旁视，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满目都是地上的秽物。

[9] 狄更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位以反映现实生活见长的作家。狄更斯的作品在其有生之年就已有空前的名声，在20世纪时他的文学作品受到评论家和学者广泛的认可。狄更斯的小说和短篇故事继续广为流行。

[10] 《艰难时世》，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作品，发表于1854年，故事描写某工业市镇的生活。

[11] 塞缪尔·巴特勒，在世期间，自费印书，却亏损不少，直到戏剧大师萧伯纳对他的作品发出惊呼，赞誉巴特勒是“19世纪后半期英国最伟大的作家”，才于死后成名。

[12] 《埃瑞璜》，塞缪尔·巴特勒的第一部作品，书名是英文单词乌有乡倒过来的拼写，作为地名。

[13] 约翰·比弗斯，生于英国约克郡，获剑桥大学英语硕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拥护共产主义，后于40年代改信罗马天主教。

[14] 《没有信仰的世界》，约翰·比弗斯于1934年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15] 阿司匹林，一种历史悠久的解热镇痛药，诞生于1899年。

[16] 莱昂斯小吃馆，20世纪英国的高级连锁餐厅，售卖冰激凌、小吃等。

[17] 赫胥黎，英国博物学家、教育家、作家，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是一位兴趣广泛而又才华横溢的人。他不仅是捍卫科学真理的斗士，也是一位充满才情的具有极高文学禀赋的科学家。

[18] 《美丽新世界》，赫胥黎所著，20世纪最经典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之一。这部作品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书，在国内外思想界影响深远。主要刻画的是机械文明下的未来社会中，人的“人”性被机械剥夺殆尽，处于“幸福”状态的人们以几种种姓产生于工业化的育婴房，接受种种安于现状的教育，热爱机械化的工作与生活方式。

[19] 《神一样的男人》，H.G.威尔斯所著的小说，作者称它为“科学的幻想”，小说描述了一个乌托邦世界。

[20] 《梦境》，H.G.威尔斯所著的小说，讲述一个来自未来乌托邦的人的梦境。

[21] 福斯塔夫，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人物。《亨利四世》展现的是国内局势动荡的画面，贵族们联合起来反叛国王，但叛乱最终被平息；王子早先生活放荡，后来认识错误，在平定内乱中立下战功。

[22] 鲁滨逊，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所著的现实主义回忆录式冒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主人公。

[23] 都铎风格，都铎王朝（1485—1603）时期流行的建筑风格，墙上多有裸露横梁，是一种富有装饰性的木屋架构。

[24] 《当睡者醒来时》，H.G.威尔斯的一部科幻小说，说的是异星球上的主人公在冬眠了200年后醒来，发现未来世界的大都市比过去的时代更为糟糕。首次发表于1899年，修改后于1910年再版。

[25] 约翰·斯特雷奇，英国工党政治家、作家，于1923年加入英国工党，是《镜报》的编辑。《未来的权力斗争》为其于1932年发表的作品。

[26] 波利尼西亚岛，是由位于太平洋中南部，大致在180°经线以东及南、北纬30°之间，一大群超过1000个以上的岛屿所组成，陆地总面积2.6万平方公里，岛屿零星分布，人烟稀疏。

[27] 佩特洛尼乌斯，古罗马作家，书中提到的柔性玻璃，是指一个古罗马的传奇发明家因发明了柔性玻璃被指威胁到了金银的价值而被砍头的故事。

[28] 大人国，《格列佛游记》中的地方。

[29] 伊特鲁里亚人，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生活在亚平宁半岛中北部的一个民族，位于罗马北部。

[30] 皮拉斯基人，古希腊最早的土著居民，来自西亚，同时也是米诺斯文明的创造者。

[31] 阿兹特克人，北美洲南部墨西哥人数最多的一支印第安人。

[32] 苏美尔人，历史上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中下游）早期的定居民族，他们所建立的苏美尔文明是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最早，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产生的文明。

[33] 谢菲尔德，位于英国的中心，建在七座山之上，坐落于南约克郡，是英国的第四大城市。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谢菲尔德是钢铁工业的代名词，以至于英国人都改称它为“钢铁之城”。

[34] 《新政治家》，英国《新政治家》杂志是英国较有影响的一份杂志，创刊于1934年，在伦敦出版，主要发表有关政治、社会问题、书刊、电影、戏剧等方面的评论，读者多为知识界人士。

[35] 摩兹利，指奥斯瓦德·摩兹利，英国政客，英国法西斯联盟创始者。

[36] 吉尔伯特与萨利文，指维多利亚时代幽默剧作家威廉·S·吉尔伯特与英国作曲家阿瑟·萨利文的合作。从1871年到1896年的合作中，共同创作了14部喜剧，其中最著名的为《皮纳福号军舰》《彭赞斯的海盗》和《日本天皇》。

[37] 庞德，即埃兹拉·庞德，美国著名诗人，意象派的代表人物。他和艾略特同为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领军人物。1898年庞德首次赴欧，之后于1902年、1906年及1908年先后共四次去欧洲。1908年定居伦敦，以后一度成为伦敦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38] 温德姆·刘易斯，英国小说家、画家，生于加拿大，漩涡派画法创始人之一。

[39] 罗伊·坎贝尔，南非诗人、讽刺作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抨击在英国知识分子中红极一时。

[40] 道格拉斯信贷组织，最初是建立在币制改革的社会信用理论上的澳大利亚政治党派。

[41] 艾略特，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是一位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诗歌现代派运动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来到英国，并定居伦敦，先后做过教师和银行职员等。1922年发表的《荒原》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被评论界看做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诗作，被认为是英美现代诗歌的里程碑。1927年，艾略特加入英国国籍。

[42] 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侵略的两次战争。埃塞俄比亚的第一次抗意战争维护了自身的独立和主权，埃塞俄比亚的第二次抗意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部分。

[43] 罗兰伯爵，公元8世纪时查理曼大帝麾下的一名军事领袖，同时也是描写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法国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之一。据《查理大帝传》记载：公元778年，罗兰伯爵与查理曼大帝辎重部队行军至伦塞斯瓦列斯隘道时，遭到巴斯克人的袭击。在罗兰伯爵的指挥下，法兰克军队展开了一场殊死反击战。最后，在战斗中，罗兰伯爵壮烈牺牲，他的事迹也因此而流传了下来。

第十三章

最后，我们可以就此做点什么呢？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通过一些简单的侧面描述说明了当下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在第二部分，我试图通过自己的角度来解释为何有如此多正经人拒绝接受唯一的补救措施——社会主义。显然，未来几年最紧迫的是抢在法西斯主义使出致命花招之前，将那些普通正经人争取过来。我在此不想讨论党派问题和政治手段。用有效的形式传播社会主义学说比任何政党标签（尽管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在当下无疑会催生某种人民阵线）来得更重要。人们必须准备好，像一名社会主义者那样行动起来。我相信，有无数人已经下意识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只要有人能找到合适的话语去触动他们，就能毫不费力地赢得他们的拥护。每个理解贫穷为何意的人、每个对暴政和战争深恶痛绝的人实质上都站在社会主义者一边。因此，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对如何能在社会主义和它的有理智的敌人之间达成和解给出建议——当然，只是泛泛而谈的建议。

首先，我们来说说敌人——我是指所有那些意识到资本主义是邪恶的但又反感、害怕社会主义的人。正如我之前指出的，该问题可以追溯到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不少社会主义者本身卑贱；二是社会主义常常伴随着大腹便便、无神论的“进步”观念，这就触怒了钟情于传统或具有审美情趣的人们。让我先来分析第二个原因。

在那些多愁善感的人群中普遍存在的对“进步”以及工业文明的厌恶只能解释为一种心态。由于这种态度臆断了某个并不存在的非此即彼的情况，故而不能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恰当理由。当你说“我拒绝机械化和标准化，因此我拒绝社会主义”时，你实际上是在说“如果我愿意，我就可以不受机械的束缚随心所欲”，这着实是胡扯。我们都依赖于机器，如果机器停止工作，大部分人会死去。或许你痛恨工业文明，或许这种痛恨不无道理，但目前的问题不是接受抑或拒绝。工业文明已然到来，我们只能从内部对其进行批判，因为所有人都置身其中。只有那些浪漫的蠢材会吹嘘自己逃脱了工业化，就像那个待在配备冷热水洗手间的都铎茅屋里的文人，以及那些带着曼利夏步枪和四大车罐头食品遁入丛林过起“原始”生活的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工业文明将会继续取得

辉煌胜利。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会自我毁灭或停滞不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战争很快会“毁掉文明”的说法颇为流行。然而，尽管下一次大战无疑会极为恐怖，令以往所有的战争都如同儿戏，却不太可能阻止工业化进程。的确，像英格兰这样的弱国，或许外加整个西欧，会因数千枚准确投掷的炸弹而陷入混乱，但目前我想象不出哪场战争能够一举毁灭所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无论你多么渴望，我们都可以断定，回到简单、自由、机械化程度较低的生活方式不会发生。这不是宿命论，只是接受事实。因拒绝蜂窝国[1]而抵制社会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蜂窝国就在这里。眼下，我们不是要在人本世界和非人本世界中做出选择，而是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充其量也就是没有德行的社会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因此，有头脑的人们的任务不是排斥社会主义，而是下定决心将其变得更人性化。一旦社会主义进程开始起步，那些能够识破“进步”骗局的人们或许就会发觉他们自己成了阻力。事实上，这正是他们的特殊作用。在机械化的世界里，他们一定要成为某种永久的反对力量，而这与单单当一个妨碍者或叛逆者是不同的。不过这是后话。眼下，对于任何正经人——无论是保守人士还是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唯一可行的就是努力建立社会主义。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将我们从当前的苦难与未来的梦魇中解救出来。在现在这个关头，当二千万英国人食不果腹、法西斯征服了半个欧洲之时，反对社会主义无异于自杀。就如同哥特人已踏破边境，而我们却开始打内战。

因此，最重要的是消除建立在非理性异见上的对社会主义的神经质的偏见。正如我已指出的，很多没有被社会主义吓跑的人反倒被社会主义者吓破了胆。社会主义目前并不吸引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从表面看来它是愤世嫉俗者、独断论者、空话连篇的布尔什维克们等等之类的玩物。然而我们应该记得，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局面，乃是因为无人阻止那些愤世嫉俗者、独断论者捷足先登。如果有更理性、更文明的人介入这场运动，那么那些令人反感的东西便不再会成为主导。就目前而言，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忽视丑陋的一面；一旦这场运动被人性化，那些不良因素便会大大减少。此外，这也无关紧要。我们要为公正与自由而战，而撇开胡言乱语，社会主义也的确意味着公正与自由。唯有根本宗旨才是我们应当牢记的。因为很多社会主义者是下等人而畏避社会主义，这和因为不喜欢检票员的脸而拒绝乘火车同样荒唐。

其次，关于社会主义者本身——特别是那类公开表达政见、写作政

治小品文的社会主义者。

我们正处于急需各派左翼力量搁置差异、团结一致的时刻。事实上，这一局面已经在小范围内出现。显然，较为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已与那些并非百分百赞同他们的人携起手来。照理说他完全有理由不愿这么做，因为他看得出，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拖入某种褪色骗局的真实危险甚至比劳工党议会更糟糕。比方说当前的一个重大危险是，面对法西斯主义应运而生的人民阵线并不会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特色，而只是一种对抗德国和意大利（不包括英国）法西斯主义的策略。因而，联合对抗法西斯的需求有可能使得社会主义者被迫与他的大敌结盟。不过，这种做法所抱持的理念是：倘若坚持运动的根本方向，就永远不会陷入与错误的人结盟的危险境地。那么，社会主义的根本为何？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标志又是什么？我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希望看见暴政被推翻的人——不仅仅是不反对，而是要切实地希望。不过我猜测，大部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接受这一定义，或者只是勉强接受。有时候，当我聆听这些人演讲时、阅读他们的书籍时，会产生一种印象：在他们眼中，社会主义运动只不过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追捕异端者的活动——巫医伴着手鼓的节奏跳来跳去，唱着“啡-发-缶-放，我闻到了右翼分子的血味儿！”[2]正因如此，当你置身于工人阶级中时才更容易觉得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工人阶级中的社会主义者一如工人阶级中的天主教徒，不善言辞，很难开口不说错话，但他对问题了然于胸。他抓住了核心要点，即社会主义意味着推翻暴政和“马赛曲”。如果我们能着眼于他的利益，那么将远比任何辩证唯物主义的长篇大论更能打动他。当前，如果还要坚持认为接受社会主义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外加奉承俄国，那就纯粹是在浪费时间。社会主义运动没有时间去变成辩证唯物主义者们的社团，它必须成为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阵营。你必须吸引那些真心诚意的人，必须赶走拐弯抹角的自由派，那些人之所以希望粉碎国外法西斯主义只是为了自己可以继续平平安安地获利，他们就是那些通过“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提案的骗子，其主张无异于既反对老鼠也反对老鼠药。社会主义意味着推翻暴政，无论在家庭内部抑或公众场合。只要你牢牢记住这个事实，就永远不会为谁才是你真正的支持者而困惑。至于那些次要的分歧以及深奥的哲学差异，与拯救二千万营养不良的英国人相比实在无足轻重，可以待以后再争论。

我不认为社会主义者需要做出任何根本性的牺牲，但他无疑得在表面上做出巨大让步。比方说，如果可以去除目前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古怪行径，那么整个运动将受益良多。但愿凉拖鞋和天然染料上衣都能被一

把火烧掉，所有素食者、禁酒者和信奉基督的人都待在韦林花园城的家里静悄悄地练瑜伽！不过，那种事怕是不会发生。相反，那些更理智的社会主义者不再用愚蠢的、莫名其妙的方式排斥任何可能的支持力量，这倒是有可能的。很多所谓的大道理完全可以放弃。比如说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文学的死板态度。说到这个问题，我脑海中能蹦出很多例子，这里只举一个。这件事看似微不足道，实则不然。旧版的《工人周刊》（《工人日报》的前身）曾经有一个叫“编辑的案头书”的专栏。该专栏连续好几个星期都在讨论有关莎士比亚的话题，于是，有名愤怒的读者写信抱怨：“亲爱的同志，我们不想听到莎士比亚这类资产阶级作家的话题。你就不能给我们来点更无产阶级的东西么？”编辑的回答相当简单：“如果你翻开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目录，”他写道，“就会发现其中若干次提到莎士比亚。”请注意，单单这个就足以让反对者闭嘴。莎士比亚只要得到了马克思的祝福就会被推崇。正是这种心理使得具有正常理性的人们远离社会主义运动。你用不着关心莎士比亚是否被抵制之类的事情。此外，还有那些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很有必要、却令普通人望而生畏的行话。当普罗大众听到诸如“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大团结”之类的表述，他不会受到鼓舞，而只会产生反感。哪怕单是“同志”这个词也多少会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阻碍。一个在运动边缘徘徊、摇摆不定的人或许去参加了一些公众集会，见到那些自信满满的社会主义者们忠诚地以“同志”相称，于是满怀幻灭地悄悄躲进附近的啤酒吧，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他的直觉在警告他，为什么要给自己贴上一个哪怕反复练习仍羞于启齿的可笑标签？让抱着观望态度的普通人带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穿凉拖鞋、高谈阔论唯物主义的想法而逃之夭夭，这对社会主义运动是致命的。你必须让人们明白，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有人本主义的容身之地，否则一切玩完。

这便提出了一大难题。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现实地面对阶级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状况。

我已经花了三个章节讨论阶级难题。我认为，我们要面对的首要事实在于，尽管英国的阶级体系已经过时，却没有垂垂将死的迹象。这极大地困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提出的设想（比如说阿里·布朗先生那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有趣的《中产阶级的命运》），即社会阶层只取决于收入。毫无疑问，从经济角度而言，只有两个阶级——富人和穷人；但就社会层面而言，阶级与阶级之间有着分明的等级，各阶级的人自幼习得的行为举止和传统不仅有天壤之别，而且——这一点很关键——在他们身上打下了一辈子的烙印。于是你便在每个阶级中都能发现

异常个体。你会发现如威尔士和贝内特这样的作家，他们出身富有，却完完全全保留着底层中产阶级新教徒的偏见；你会发现不会准确发音的百万富翁；你会发现有些吝啬的小店主收入远低于泥瓦匠，却自认为（也被他人视为）高出泥瓦匠一等；你会发现寄宿学校的男孩子们掌管着印度领土，而公学毕业生却在兜售吸尘器。倘若社会层级与经济层级完全对应，那么当公学毕业生的年收入低于200英镑时，他理应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伦敦佬。可情况是这样么？恰恰相反，他立刻变得比公学生还要公学生，他会死死抱着那条校友领带。此外，那些发音不标准的百万富翁，即便有时会模仿演说家或BBC的发音，也很难成功地完全掩饰自己的出身。就文化而言，一个人的确难以逃离自身的阶层。

随着经济衰退，这种社会阶层异常的状况变得更加普遍。倒不是发音不标准的百万富翁增加了，而是有越来越多兜售吸尘器的公学人和小店主被迫进了工厂。大量中产阶级正逐渐失去产业，但问题在于，他们中没有任何人看上去像个无产阶级。比方说我自己，就有着中产阶级的教养和工人阶级的收入。我算是哪个阶级的？从经济条件而言，我属于工人阶级，但我几乎无法想象自己不是中产阶级的一员。假设我要选边站队，该选择哪一方呢，是极力排挤我的上层阶级还是与我趣味不相投的工人阶级？就我个人而言，可能在重要问题上会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不过，其他数万、数十万处于相同境况下的人们会如何选择？还有那些更庞大的群体——数以百万计的形形色色的公司职员和工薪阶层的人——会如何选择？他们的传统习惯固然不能与中产阶级相提并论，但他们也绝不会愿意被视为无产阶级。以上所有人都和工人阶级有着相同的利益、共同的敌人。他们都受到剥削，都被相同的体制所伤害。然而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呢？当危机来临时，几乎所有人都站在了压迫者一边，去反对那些本该成为他们盟友的人们。一个中产阶级者跌入贫困的深渊却仍牢牢抱着反工人阶级的观念，这样的情形是不难想象的。不用说，这恰恰为法西斯提供了现成的预备队。

很显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趁为时未晚吸引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必须吸引数量庞大的公司职员，倘若他们懂得如何团结一致，将力量无穷。可惜同样明显的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尚未这么做。最不具备革命观念的是文员或旅行推销商。为什么？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掺杂了社会主义宣传的“无产阶级的”口号。为了表现阶级斗争，他们或多或少设立了一些虚构的“无产阶级”形象：一边是身板结实、满身污垢、受压迫的人，与此相对的是“资本家”——肥胖、虚弱，带着高帽子，穿着裘皮衣。不用说你也能猜到，二者之间没有他人，非此即彼。

当然，真实情况是，在英格兰这样的国家，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实际处于这两个阶层之间。倘若你要喋喋不休地谈论“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最起码要先解释谁是无产阶级。然而，由于社会主义者倾向于将体力劳动者理想化，这一概念便始终未得澄清。有多少可怜的、战战兢兢的文员和推销员把自己视作无产者呢？在某些方面，他们甚至比矿工或码头工人更凄惨。然而在他们所受的教育中，无产者意味着身无分文。因此，当你试图通过谈论“阶级斗争”来打动他们时，却只能将他们吓走；他们会忘记自己的收入，只记得自己的口音，于是飞奔进剥削阶级的阵营。

摆在社会主义者面前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他们必须超越怀疑，辨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界线。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此处的要点在于所有收入微薄且不稳定的人们都在一条船上，应该并肩作战。或许，我们可以少谈点“资本家”和“无产者”，多谈谈剥削和被剥削。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放弃那种只有体力劳动者才是无产阶级的具有误导性的观点。一定要让文员、工程师、旅行推销商、“脚踏实地”的中产阶级、乡村杂货商、低级公务员，以及所有持怀疑态度的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就是无产阶级，让他们明白社会主义无论对于苦力、工人还是他们自身都意味着公平。一定不能让他们认为这场斗争是受过良好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的斗争，否则他们便会加入敌方。

我的意思是，必须说服不同的阶级暂时不考虑阶级差异，团结一致。这听起来有些危险，听起来太像约克公爵的夏令营，含含糊糊地说什么阶级合作、努力奋斗，要么就是大空话，要么就是法西斯主义，或者兼而有之。真实利益截然相反的阶级之间无法合作。猫鼠不能达成共识，假如猫真的提出合作而老鼠愚蠢到居然答应，那么要不了多久老鼠就成了猫的盘中餐。不过，只要基于共同的利益，合作就总有可能。那些需要团结一致的人都是些被老板压迫、想起房租就瑟瑟发抖的人。这意味着小土地所有者要同工人联合起来，打字员要和煤矿工联合，小学校长要和汽修工联合。如果能让他们明白自身的利益所在，就有希望使他们这么做。但倘若他们的社会偏见——在有些人心中，这种偏见不逊于经济地位——造成了不必要的仇恨，那么联合就无法实现。毕竟，银行职员和码头工人之间存在着真实的习惯与传统差异，银行职员的优越感是根深蒂固的。往后他得抛弃这个旧习，不过眼下不宜对他如此要求。因此，如果可以暂时放下那些既毫无意义又刻板的关于资本主义的话柄——这几乎已经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宣传的一部分——将大有裨益。通观左翼人士的所思所写——从《工人日报》的头版文章到《新闻记录》的漫画专栏，所有一切——无不弥漫着反上流社会的情绪，一种持

久的、且通常相当愚蠢的对上流作风和忠诚感（或者用共产主义者的行话叫“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嘲笑。这多半是场骗局，却带有极大的杀伤力，因为它用鸡毛蒜皮的小事掩盖了主要问题，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核心事实上引开，即无论你工作时使用什么工具——镐子还是钢笔——贫穷就是贫穷。

在此我要再次重申，我出身中产阶级，每周总收入大约三英镑。就我个人价值而言，最好让我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而非变成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可是，如果你不断地用“资本主义观念”来恐吓我，如果你让我觉得自己因为不从事体力劳动而在某种程度上低人一等，那么你将招致我的反抗。因为你实际上是在说，我该用某种超出我能力的方式实现自我转变，否则就毫无用处。我无法让自己的口音或某些品位、信仰变得无产阶级化，即便能做到也不会愿意。为什么非得那样呢？我并没有要求任何人用我的腔调说话，为何其他人可以要求我？接受那些微不足道的阶级印迹，尽量不去强调它们，岂不好得多？这个问题可以参照种族差异，经验告诉我们，在必要情况下，人们可以同外国人、甚至是不喜欢的外国人合作。从经济角度而言，我和矿工、苦力、工厂工人境况相同，因此我将和他们并肩作战。但从文化背景而言，我又与矿工、苦力、工人有区别，倘若着眼于此，你便可以指望我与他们为敌。如果我只是个个例，那么大可忽略，然而像我这样的人数不胜数。每个会被失业的噩梦惊醒的银行职员、每个摇摆于破产边缘的小店主实际上都处于此种境况中。大部分没落的中产阶级都固守着本阶级的风度，认为那就是能让他们免于没顶的救命稻草。因此，从一开始便让他们扔掉这根稻草并不是个明智的主意。目前我们面临一个很明显的危险，即未来几年大量中产阶级有可能会突然转向右翼势力，这样一来形势就变得相当恐怖了。迄今为止，中产阶级的弱点导致他们尚未学会与任何力量联合，但如果你让他们感到威胁，以至于被推向敌方，那你就会发现自己唤醒了一个恶魔。此种可能性从大罢工便可窥知一二。

总而言之，除非我们能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政党，否则就既无法纠正我在本书前几章描述的情形，也无法从法西斯手中拯救英国。这个政党不仅要有真正的革命意图，还要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达成。为此，我们得设立一个普通人既能理解也有所期望的目标。故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理智地宣传。少说一些“阶级意识”“剥夺剥削者的财产”“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大团结”之类的口号，更别提什么神圣姐妹、论点、对立、团结；多谈些公平、自由和失业困境。少说些机械化进程、拖拉机、第聂伯河大坝以及莫斯科新建的三文鱼罐头厂，那类事情并不

能推进社会主义学说，而只会让很多社会主义运动需要的人避之不及，其中包括大部分文人。我们需要的是将两个事实打造成一个公共意识，即第一，所有被剥削者的利益是一致的；第二，社会主义对寻常礼仪可以兼收并蓄。

至于阶级差异的难题，眼下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举重若轻，不要为此吓走更多的人。最重要的是，不要再装模作样地试图否认阶级差异。如果你来自资产阶级，不要太急着冲上前拥抱你的无产阶级兄弟；他们或许并不喜欢你这么做，倘若他们表现出反感，你便会发现阶级偏见并未如你想象中那样已销声匿迹。倘若你属于无产阶级——无论是出身抑或信仰——不要不假思索地嘲笑老派公学生；只要你懂得如何与他们相处，就会发现在他们的校友领带之下藏着可以为你所用的忠诚。

然而我相信，当社会主义蓬勃发展，成为大量英国人真正关心的事物时，阶级差异有望迅速自我化解。在未来的若干年中，我们要么能得到所需的有效的社会主义政党，要么无所作为。倘若是后者，则我们将迎来法西斯主义，或许是带有英国特色的法西斯——有教养的警察而非纳粹打手，用狮子和独角兽[3]代替万字标志。不过，如果是前者，则接下来定会有一场斗争，实实在在的斗争，因为大富豪们可不会安安静静地服从一个真正革命性的政府。当截然不同的阶级在必要情况下联合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并肩作战时，他们或许会对对方产生不同以往的感受。接着，或许阶级偏见的苦涩感会淡去，我们这些没落的中产阶级——私立小学的校长、填不饱肚子的自由撰稿人、陆军上校的年收入只有75英镑的独身女儿、失业的剑桥毕业生、没有船的船员、小职员、公务员、旅行推销商、三次破产的乡村布店老板——或许会心甘情愿地融入到我们本应属于的工人阶级中，或许到了那时，一切并不像我们担心的那么恐怖，因为毕竟，除了口音，我们什么也不会失去。

---

[1] 蜂窝国，指的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2] “啡-发-缶-放，我闻到了右翼分子的血味儿！”，改编自英国经典童话故事《杰克与豆茎》中巨人唱的一首歌谣。童话中的原句是“Fee-fi-fo-fum，I smell the blood of an Englishman.Be he live，or be he dead，I’ll grind his bones to make my bread.”大意为：啡-发-缶-放，我闻到一个英国人的血味儿。管他是活是死，我要磨碎他的骨头做面包。

[3] 狮子和独角兽，英国王室徽章上的图案。

George Orwell

奥威尔作品集

巴黎伦敦落魄记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甘露 郭嘉慧 杨惠乔 朱文婷 译

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

奥威尔首先是先知，其次才是圣徒。
——止庵

他能够在目睹着最糟境况的同时为着最美好的东西而战。
——Granville Hicks

这个肮脏的贫民窟和住在其中的古怪众生，既是贫穷的实例教材，也是我亲身经历的背景环境。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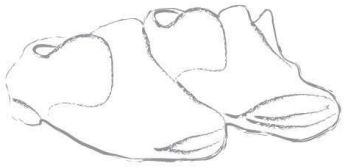
自由的保障，良知的坚守

}kt}自由的保障，良知的坚守}/kt}

}kt}这个肮脏的贫民窟和住在其中的古怪众生，既是贫穷的实例教材，也是我亲身经历的背景环境。}/kt}

巴黎伦敦落魄记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甘露 郭嘉慧 杨惠乔 朱文婷 译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伦敦落魄记/（英）奥威尔 著；甘露等 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7

（奥威尔作品集）

ISBN 978-7-5680-1139-6

Ⅰ.①巴… Ⅱ.①奥… ②甘… Ⅲ.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185866号

巴黎伦敦落魄记 [英]乔治·奥威尔 著 甘露等 译

}hr/}

策划编辑：刘晚成

责任编辑：吴丽程

特约编辑：徐心 王瑜玲 金玲

封面设计：喃风

责任校对：张琳

责任监印：张贵君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3

印　　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10

字　　数：176千字

版　　次：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42.00元

}hr/}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四章
- 第二十五章
- 第二十六章
- 第二十七章
- 第二十八章
- 第二十九章
- 第三十章
- 第三十一章
- 第三十二章
- 第三十三章
- 第三十四章
- 第三十五章
- 第三十六章

- 第三十七章
- 第三十八章

第一章

巴黎，金鸡街，早晨七点。一阵狂怒而令人窒息的叫喊声从街上传来。经营着我住处对面的小旅店的蒙赛夫人跑到人行道上对着三楼的房客喊话。她光脚穿着木屐，披散着灰色的长发。

蒙赛夫人：“婊子！婊子！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别把虫子拍到墙纸上！你以为自己把整个旅店买下来了吗？你怎么就不能像别人一样把它们扔到窗外去？妈的！婊子！”

三楼的女人：“老母牛！”

随即窗户纷纷打开，半条街都加入了这场争吵，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十分钟之后他们突然闭了嘴——一队骑兵经过，人们停止了叫嚷，转而去看他们。

我勾勒出这个场面，只是想传达金鸡街的常态。争吵不是那里会发生的唯一事情，但是我们很少有哪个早晨不经历一两次这种“暴乱”。争吵声、街头小贩凄凉的叫卖声、在鹅卵石缝中找橘子皮的孩子们的叫喊声、夜里的高声歌唱以及垃圾车的酸臭味，构成了这条街的氛围。

这是一条非常狭窄的街道——如同一道峡谷，两边的房屋又高又脏，以古怪的姿势东倒西歪，就好像在倒塌时突然凝固住了一样。所有的房子都是小旅店，满满当当地住着房客，大多是波兰人、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旅店底层是小酒馆，在那里你只要花一个先令就可以喝到酩酊大醉。在周六晚上，这一带有三分之一的男人都喝得烂醉。这里会为了女人而发生斗殴，住在最廉价的旅店里的阿拉伯苦工常常因为不可思议的事争执，总是抡起凳子甚至拔出左轮手枪来解决问题。晚上警察必须结伴才能从街上走过。这是一个相当喧闹的地方。但就在这喧嚣和污秽之中，也住着普通且值得尊敬的法国店主、面包师、洗衣女工等，他们不与外人交往，一声不响地积累起小小的财富。这是一个典型的巴黎贫民窟。

我住的旅店叫做三雀旅店。这是一个黑暗、拥挤、摇摇欲坠的地方，共有五层，用木板分成四十个房间。房间又小又脏，沉积着污垢，

因为没有女仆，而店主F太太也没有时间打扫。墙壁薄得像火柴木，一层层粉色的墙纸试图掩盖墙壁上的裂缝，但因开裂而成了无数虫子的寄居所。白天长串的臭虫在天花板附近如行军般爬来爬去，到了晚上则恶狼一般扑下来，所以人们必须每几个小时就起来对它们进行大屠杀。有时候若虫子闹得太凶，人们就烧硫黄把它们熏到隔壁去，于是隔壁的房客便以同样的方式反击，并把它们赶回来。这是个肮脏的地方，但有家的感觉，因为F太太和她丈夫都是好人。房租每周三十到五十法郎不等。

房客的流动性很大，多数是不带行李的外国人，待上一个礼拜就消失。他们来自各行各业——鞋匠、砖瓦匠、石匠、工人、学生、妓女、拾荒者。有些人一穷二白。一个阁楼上住着一个保加利亚学生，他制作时髦的鞋子销往美国。每天六点到十二点，他坐在床上做出一打鞋子，赚三十五法郎；剩下的时间里他去索邦大学[1]听课。他学习神学，神学书面朝下扔在满是皮革的地上。另一间房里住着一个俄罗斯女人和她的儿子，她儿子自称艺术家。那位母亲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织补每只二十五生丁的袜子；与此同时，她的儿子衣着光鲜地在蒙巴纳斯的咖啡馆[2]里游荡。有个房间租给了两个不相干的房客，一个白天上班，另一个晚上上班。在另一个房间里，一个鳏夫和他的两个患肺病的成年女儿挤一张床。

旅店里有很多古怪的人。巴黎贫民窟是怪人聚集地——人们陷入孤寂、半疯的生命低谷，不再试图回归正常或体面的生活。贫穷将他们从一般的行为规范中解放出来，就像金钱将人们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一样。我们旅店里的一些房客过着难以形容的古怪生活。

比如又老又矮、衣衫褴褛的鲁吉耶夫妇，他们做着很特别的买卖。他们在圣米歇尔大道[3]上卖明信片。奇怪的是，他们假装明信片含有色情内容，把它们密封在小口袋里卖，可实际上印的只是卢瓦尔河[4]畔的城堡照片；买家发觉时已太迟，也无话可说。鲁吉耶夫妇每周挣大约一百法郎，勒紧裤腰带才能过上半饥半醉的日子。他们的屋子臭得楼下那层都能闻到。据F太太说，鲁吉耶夫妇四年没换过衣服了。

还有在下水道干活的亨利。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满脸忧郁的卷发男人，穿着下水道工人的长靴时看起来十分浪漫。亨利的怪癖是，除非为了工作的事，否则他真能一连几天不说话。仅仅一年前，他还是个司机，工作很好并且在攒钱。一天，他恋爱了，女孩拒绝他时他大发脾

气，踢了她一脚。被踢了之后，女孩疯狂地爱上了亨利，他们同居了两周，花了亨利一千法郎。后来女孩出轨了，亨利在她上臂上捅了一刀，于是他在监狱里待了六个月。被捅之后女孩更爱亨利了，两人尽释前嫌，约好等亨利出狱后买一辆出租车，他们就结婚定居。但两周之后女孩又一次出轨，亨利出狱时她已经怀孕。亨利这次没捅她。他取出所有积蓄，大醉一场，结果又在监狱里蹲了一个月，之后他就去当了下水道工人。谁都没法引诱亨利说话。你问他为什么在下水道工作，他从来不回答，只是双拳交叉表示手铐，然后朝着南边的监狱猛点头。厄运似乎在一夜之间把他变成了智障。

还有英国人R，他每年有六个月和父母住在英国的帕特尼，另外六个月住在法国。在法国的时候，他每天喝四升酒，除了周六喝六升。他曾经远游到亚速尔群岛，因为那里的酒比欧洲任何地方都便宜。他是个文雅和顺的人，从不与人争吵，同时也从不清醒。他会在床上躺到中午，然后直到午夜他都缩在小酒馆的角落里，安静而有条不紊地喝酒。喝酒时，他用一种优雅，宛如女士的声音讨论古董家具。除了我，R是这里住的唯一一个英国人。

这里还有很多过着这样古怪日子的人：罗马尼亚人朱尔斯先生，他有一只玻璃假眼却从不肯承认；利穆赞[5]来的石匠福瑞克斯；守财奴鲁科勒（虽然我来之前他就死了）；旧衣商老劳伦，他常常照着他口袋里的一张纸练习自己的签名。如果谁有时间的话，给他们写点小传大概会很有意思。我试图描绘住在我们这一带的人，并不是只出于好奇心，而是因为他们都是这故事的一分子。我在书写贫穷，而我正是在这个贫民窟里第一次接触到它。这个肮脏的贫民窟和住在其中的古怪众生，既是贫穷的实例教材，也是我亲身经历的背景环境。正因如此，我才努力想让人们了解那里的生活。

---

[1] 索邦大学，巴黎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也是现巴黎大学的一部分。

[2] 蒙巴纳斯的咖啡馆，蒙巴纳斯是巴黎的一个著名文化街区，其三家咖啡馆曾吸引大批艺术家和文人，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艺术和思想界的神圣“金三角”。

[3] 圣米歇尔大道，位于巴黎拉丁区最热闹的地带。

[4] 卢瓦尔河，法国最长河流。卢瓦尔河畔有著名城堡群。

[5] 利穆赞，法国中部大区。

第二章

这一区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小酒馆，它在三雀旅店的底层。这是一个地面铺砖的小房间，半截在地下，店内的餐桌上满是葡萄酒的浸渍，墙上挂着一张葬礼照片，上面写着“信用已死”；系着红腰带的工人用大折刀切着香肠；还有F太太，她是个很厉害的奥弗涅[1]村妇，有一张刚毅的牛脸，整天“为了她的胃”大喝马拉加葡萄酒；人们在这里掷骰子赌开胃酒；时常能听到关于“草莓和覆盆子”的歌谣，还有《马德隆歌》[2]，“我喜欢整个团，为何嫁给一个士兵？”；这里还有不少在大庭广众下调情的人。晚上半个旅店的人都在酒馆里碰面。我倒希望谁能在伦敦找到有这里四分之一的欢快的酒吧。

在酒馆里可以听到古怪的话，比如查理说的话，他可是当地奇人之一。

查理是个出身不错、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离家出走，靠着时不时的汇款过日子。他年轻，肤色粉红，有着小男孩般的嫩脸蛋和柔软的棕色头发，嘴唇像樱桃一样红润。他的脚很小，手臂短得不正常，双手像婴儿一样带有小窝。他说话时总是手舞足蹈，仿佛他实在太高兴，一刻都静不下来。下午三点，酒馆里只有F太太和另外一两个没有工作的人，不过对查理来说，只要让他能够谈论他自己，跟谁说话都一样。他像个站在街垒上的演讲家那般慷慨陈词，嘴里滔滔不绝，短胳膊比比划划。那双猪眼一样的小眼睛里闪烁着热情。不知何故，他看起来十分令人恶心。

他在谈论爱情，这是他最喜欢的话题。

“啊，爱情，爱情！啊，女人毁灭了我！唉，先生们，女士们，女人毁了我，彻彻底底地毁了我。二十二岁我就精疲力尽了，彻底完蛋了。但我学到了无数东西，有哪一道智慧的深渊我不曾探究过！获得真正的智慧，成为一个词义上最高级的文明人，变得文雅、堕落，这是多么了不起啊！”

“先生们，女士们，我能感觉到你们很悲伤。啊！但生活是美好

的，你们一定不要难过。要更快乐，我请求你们！

把萨摩斯的美酒斟满一盅，

让我们且抛开这样的话题！[3]

“啊，生活是美好的！听着，先生们，女士们，由于我的经历是如此丰富，我要给你们讲讲爱情。我要向你们解释爱情的真正含义，什么是真正的感情，这种只有文明人才知晓的、更高级、更微妙的欢愉。我要给你们讲述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唉，但是我已经过了能那样理解这幸福的年纪了。永远过去了，获得这种幸福的可能性，甚至对它的渴望，都永远过去了。

“那么，听着。两年前，我兄弟在巴黎，他是个律师，我父母让他来找我并带我出去吃饭。我和我兄弟彼此憎恶，但我们还是没有违背父母之命。我们吃了饭，他喝了三瓶波尔多葡萄酒，醉得很厉害。我把他带回他住的旅店，路上我买了一瓶白兰地，到达之后给他灌了一杯，跟他说这是给他醒酒的。他喝了之后立刻烂醉如泥，倒了下去。我把他抬到床上，让他躺下，然后搜遍了他的衣袋。我找到一千一百法郎，赶紧揣着钱跑下楼梯，跳进一辆出租车逃走了。我兄弟不知道我的地址，因而我很安全。

“男人有钱的时候会去哪里？自然是妓院。但你们可不要认为我会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只配给苦工放荡的破烂地方。该死，我可是个文明人啊！兜里有一千法郎，你明白的，我挑剔又苛求。直到午夜我才找到想要的地方。我遇到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十八岁小伙子，他穿礼服，留美国式的发型。我们在离林荫大道很远的一家僻静小酒馆里聊得很投机，彼此十分了解。我们东拉西扯，讨论如何消遣玩乐。不久我们就一起打了辆出租车走了。

“出租车停下的这条街窄小偏僻，只有一盏煤气灯在尽头发光。石头地上有黑色的水坑。街道一边是一家修道院高高的黑色墙壁。我的向导把我带到一间高大破败、百叶窗紧闭的房子前，在门上敲了几下。不久就传来了脚步声和拉开门闩的声音，门打开了一点点。一只手从门缝里伸出来，这只手大而扭曲，掌心向上，伸到我们鼻子底下要钱。

“我的向导把脚插到门和台阶之间。‘你想要多少钱？’他说。

“‘一千法郎，’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马上交钱，否则就别想进来。’

“我在这只手里放了一千法郎，把剩下的一百给了我的向导。他道了晚安就离开了。我能听见屋里清点钞票的声音，随后一个女人把鼻子探了出来。她又老又瘦，穿着黑色连衣裙，像只乌鸦，狐疑地注视了我一会才让我进屋。屋里十分昏暗，我只能看见一片被煤气灯照亮的水泥墙，其余一切都被笼罩在更深的阴影中。那里有一股耗子和灰尘的味道。老女人一言不发地在煤气灯上点燃一支蜡烛，然后在我前面蹒跚地走过一条石头通道，来到一段石阶的顶端。

“‘那就是了！’她说，‘下到地下室里，然后随心所欲吧。我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不知道。你是自由的，你明白，百分之百的自由。’

“哈，先生们，我还需要向你们描述吗——你们自己一定知道啊——在这种时刻瞬间传遍人全身的那种战栗，半是因为恐慌、半是因为欢喜的那种？我慢慢摸索着向下走，周围一片寂静，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还有鞋子和石头摩擦的声音。在台阶末端，我的手摸到了一个电开关。我打开开关，一架有十二个红灯泡的支形电吊灯把地下室照得一片通红。看哪，我不是在地下室，而是一间卧室，一间富丽花哨的巨大卧室，上上下下都刷成红色。自己想象吧，先生们，女士们！地上是红地毯，墙上是红墙纸，椅子上是红色长毛绒，甚至天花板都是红色的，处处都是红色，在我眼里燃烧着。这是一种沉重、令人窒息的红色，就好像光线照射过盛着鲜血的碗。在屋子的里端有一张巨大的正方形床，被子是同样的红色，上面躺着一个穿着红色天鹅绒连衣裙的女孩。一看到我她就退缩了，努力想用短裙盖住膝盖。

“我在门边停住。‘过来，我的小妞儿，’我对她叫道。

“她恐惧地呜咽了一声。我一下跳到床边，她试图躲开我，但我掐住了她的喉咙——就像这样，你们看到了吗？——紧紧地掐住！她挣扎着，乞求我的怜悯，但我紧抓着她，把她的头往后扳，盯着她的脸看。她大概二十岁，一张傻孩子般的脸宽大呆滞，但涂脂抹粉，她愚笨的蓝眼睛在红色的光线里闪烁着，眼神受惊而扭曲，人们只有在这种女人的眼中才会看到那种眼神。她无疑是个乡下女孩，被父母卖身为奴。

“我二话不说把她拉下床扔到地上，然后像饿虎一样扑到她身上！

啊，那种快乐，那无可匹敌的狂喜时光！先生们，女士们，那是我将向你们解释的；那就是爱情！那就是真正的爱情，那就是这世上唯一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没有它，你的一切艺术和灵感、哲学和信条、美言和傲态，都像灰尘一样苍白无用。当一个人经历了爱情——真正的爱情——这世上还有何物不过是欢愉的幻影？

“我的进攻越来越野蛮。女孩一次次地试图逃走，她一再哭着乞求怜悯，但我嘲笑了她。

“‘怜悯！’我说，‘你认为我是来这里表达怜悯的吗？你认为我花了一千法郎就是为了那个？我对你们发誓，先生们，女士们，要不是那见鬼的法律抢走了我们的自由，我那时一定会杀了她。’

“啊，她尖叫的声音是多么痛苦悲伤。但没有人能听到；在巴黎的街道下面，我们就像在金字塔中心一样安全。眼泪哗哗地从那女孩的脸上流下来，和着粉黛冲出长长的污渍。啊，那回不来的时光！先生们，女士们，你们这些没有培养出对爱情灵敏感觉的人，对你们来说这种欢愉是不可思议的。而我也一样——既然我的青春已一去不回——啊，青春！——永远看不到如此美丽的生命了。完了。

“啊，是的，过去了——永远过去了。啊，人类的欢乐如此贫乏、稀缺、令人失望！因为在现实中——因为在现实中，爱情的高潮才能持续多久。微不足道，一瞬间，也许一秒。一秒钟的狂喜，在那之后——尘土、灰烬、一无所有。

“就这样，只有那一瞬间，我获得了那至高的欢乐，那人类所能获得的最高的、最微妙的情感。与此同时，一切都结束了，只剩下我——可我还剩下什么呢？我所有的野蛮和热情都如玫瑰花瓣一样散落。我只感觉又冷又累，心里满是无用的悔恨；在感情剧变之时，我甚至对地板上那个哭泣的女孩感到了一种怜悯。我们竟然会成为如此卑劣感情的牺牲品，这不令人作呕吗？我没有再看那个女孩，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这里。我加快脚步走出地下室，来到外面的街上。大街上空无一人，又黑又冷，石板在我脚下发出空洞而孤独的回声。我的钱花个精光，甚至连打出租车的钱都没有。我独自走回我那寒冷孤单的屋子。

“但是，先生们，女士们，那就是我承诺要向你们阐述的。那就是爱情。那就是我生命中最高兴的一天。”

查理是个典型的怪人。我描述他只是为了表明，在金鸡街地区能够找到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怪人。

---

[1] 奥弗涅，法国中部的一个大区。

[2] 一战时期歌谣。

[3] “把萨摩斯的美酒……话题！”出自拜伦长诗《唐璜》第三章中《哀希腊》第十一节，此处取查良铮译本。

第三章

我在金鸡街一带住了大概一年半。夏季的一天，我发现自己只剩下四百五十法郎，除此之外只有每周教英语课挣来的三十六法郎。迄今为止我从没考虑过未来，但现在我意识到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我决定开始找工作，而且——事实证明，幸亏如此——为了以防万一我提前付了一个月的房租两百法郎。不算上英语课挣的钱，我可以靠着剩下的二百五十法郎活一个月，在此期间我很有把握能找到工作。我打算给某个旅行社做导游，或是当个口译员。然而，我走了霉运，没能实现计划。

一天，旅店里来了一个自称是排字工的年轻意大利人。他这个人难以捉摸，留着络腮胡子，这表明他要么是个恶棍，要么是个知识分子，没人说得清他是哪个阶层的人。F太太不喜欢他的外表，让他预付了一周的房租。那意大利人付了租金，在旅店待了六晚。在此期间他配了几把钥匙，在最后一晚洗劫了十二个房间，包括我的在内。不幸之万幸，他没有找到我口袋里的钱，所以我还不至于身无分文。我只剩下了四十七法郎——相当于七先令十便士。

这终结了我找工作的计划。我现在必须过每天只花六法郎的日子，从一开始这就很难，我没什么心思去想别的事情。从这时起，我的贫穷之旅开始了，每天花六法郎如果不算是赤贫，也至少在它的边儿上了。六法郎就是一先令，要是知道方法，你可以靠一先令在巴黎过一天。但这是件很复杂的事情。

总的来说，初尝贫穷的滋味很怪异。关于贫穷你已经想过很多，终其一生你都在害怕它，知道它迟早会发生在你身上；它和你想的真是完全不一样。你以为它很简单，其实它极端复杂。你以为它很糟糕，其实它只是可怜又无聊。你首先发现的，就是贫穷所致的特别低人一等的感觉，它带给你的变化，以及一言难尽的吝啬和锱铢必较。

比如，你发现了贫穷所属的秘密。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下，你沦落到每天只有六法郎收入的地步。当然你不敢承认，而且必须装得和以前活得一样好。从一开始你就陷入了谎言的网中，甚至难以圆谎。你不再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衣妇在街上截住你逼问原因；你含糊应付，她

就认为你把衣服送到别处去洗，永远跟你结了仇。卖烟草的一直问你为什么减少了吸烟量。有些信需要回复，但是由于邮票太贵而没法回。还有吃饭，这是最大的困难。每天到了饭点你就出去，表面上是去餐馆，其实是在卢森堡公园看了一个小时鸽子。之后你偷偷把食物装在口袋里带回去。你吃面包和人造黄油，或是面包和酒，甚至食物是什么也要说谎。你必须买黑面包而不是家庭面包，因为它虽然贵点，但却是圆形的，可以藏在衣袋里。这每天浪费掉你一法郎。有时候为了装装门面，你还得花六十生丁喝酒，因而导致没饭可吃。你的衣服床单脏了，肥皂和剃须刀也用光了。你需要理发，试着自己动手结果不堪入目，最后不得不求助于理发师，然后花掉一天的饭钱。从早到晚你都在说谎，代价昂贵的谎言。

你发现每天六法郎的生活极其不稳定。刻薄的倒霉事降临夺走你的食物。你花掉最后八十生丁买了半升牛奶，放在酒精灯上煮。煮的时候一只虫子在你的前臂上爬，你用指甲一弹，它就扑通一声掉进牛奶里。除了倒掉牛奶饿肚子之外你别无他法。

你到面包店去买一磅面包，等付钱的时候女店员在给另一个顾客切一磅面包。她笨手笨脚，切了不止一磅。“请原谅，先生，”她说，“我想您不介意多付两个苏吧？”面包卖一法郎一磅，你只有一法郎。你想到自己可能被要求多付两个苏，不得不承认自己付不起，于是你只能落荒而逃。几个小时之后你才敢再走进一家面包店。

你到果蔬店去花一法郎买一公斤土豆。但是凑出这一法郎的硬币里有一个是比利时硬币，店员拒收。你逃出店铺，以后再也不去那里。

你在一个高级街区闲逛，看到一个显赫的朋友走来。为了避开他，你躲进最近的咖啡店。进了咖啡店你就必须买喝的，所以你花掉最后五十生丁买了一杯黑咖啡，结果里面有只死苍蝇。这类事情还有很多，它们都是缺钱生活的组成部分。

你明白了挨饿是什么样子。吃过了面包和人造黄油，你出门，看着路边商店的橱窗。到处都是大堆大块的食物在捉弄你：整只整只的猪、一篮篮热乎乎的面包、大块大块嫩黄的黄油、一串串香肠、堆积如山的土豆，还有磨刀石一般的格鲁耶尔干酪。看着这么多食物你几欲落泪，被自哀淹没。你想要抢一条面包就跑，在被人抓住之前就把它吞进肚子，但由于胆怯，你还是没这么做。

你发现随贫穷而来的是无聊，当你无事可做又腹中空空时，别的事情都无法让你提起兴致。半天你躺在床上，感觉自己就像是波德莱尔诗中骨瘦如柴的年轻人[1]。只有食物才能让你起身。你发现人要是整周靠面包和人造黄油过活，他也不算是人了，只不过是一个肚子加上几个附属器官。

所有这些，以及更多说不尽的同类事情，就是每天靠六法郎过活的日子。在巴黎有数千人都是这么活过来的：挣扎的艺术家和学生、揽不到生意的妓女、各种各样失业的人。可以说，这就是贫穷的边缘了。

我又这样过了大概三周。那四十七法郎很快就花光了，我只能靠着教授英语课挣的三十六法郎勉强过活。由于缺乏经验，我很不善于理财，有时一整天都吃不上饭。这种时候我就只能变卖衣服，偷偷把它们装在小包里带出旅店，拿到圣吉纳维芙山大街上的一家二手商店典当。店主是一个极难相处的红发犹太人，一看到顾客就大发脾气。从他的举止可以推测，我们的光顾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妈的！”他大叫道，“你又来了？你以为这是什么？施粥场吗？”他出的价低得难以置信。一顶我花了二十五先令买来、还没戴过几次的帽子他只愿出五法郎；一双好鞋，五法郎；衬衫，每件一法郎。他总是喜欢以物易物而不是花钱收购，并且常玩花样，强行把没用的东西塞进别人手里，然后假装人家接受了。有一次我看见他从一个老太婆那儿收了一件好大衣，往她手里塞了两个白台球，她还没来得及抗议就被他快速推出了店门。要不是怕担不起后果，打扁这个犹太佬的鼻子绝对大快人心。

这三周过得又脏又难受，而且显然更糟的还在后头，因为我的房租马上就要到期。然而，事情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糟糕。因为当你接近贫穷时，你总会得到一些比其他发现更有价值的发现。你发现了无聊、卑贱的并发症和饥饿的开始，但你也会发现贫穷的可取之处：事实上它盖过了未来。在一定条件之下，你的钱越少你越不担心。当你有一百法郎时你会陷入极度的恐慌。但当你只有三法郎的时候你却会很淡定；因为三法郎能让你挺到明天，你也不会想以后的事情。你感到厌烦，但并不害怕。你茫然地想，“我应该会挨饿个一两天——太可怕了，不是吗？”然后就开始想其他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只有面包和人造黄油的食谱本身就聊以自慰。

受穷时，还有一种感觉很可以安慰人。我相信每个曾经受过穷的人都经历过。知道自己终于真真正正地穷困潦倒了——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几乎令人愉悦。你曾无数次谈论过一蹶不振的情况——看，现

在就是了，你已经到了这步境地，而且还能忍受。这能消除很多焦虑。

---

[1] “波德莱尔诗中骨瘦如柴的年轻人”，指的是夏尔·波德莱尔，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这一典故出自其诗作《恶之花·忧郁与理想》，其中描写了一位病入膏肓、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的年轻人。

第四章

一天，我的英语课突然停了。天气越来越热，我的一个学生懒得上课，就解雇了我。另一个则毫无预警地从租住的地方消失了，还欠了我十二法郎。我只剩下三十生丁，烟也没了。整整一天半，我既没东西吃，也没烟抽，最后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我把剩下的衣服装进皮箱拿到当铺去。这样我就不能再装自己还有钱，因为我不能不征得F太太同意就把衣物都带出旅店。然而我记得，当我跟她打了招呼而不是偷偷带走衣物时，她非常惊讶。在我们这一带，躲债夜逃是常见的伎俩。

那是我第一次进法国当铺。走过宏伟的石头大门（当然了，上面刻着“自由，平等，博爱”，在法国他们甚至把这个写在警察局门上），进入一个像学校教室一般又大又空的屋子，只有一个柜台和几排长椅。四五十个人在里面等着。人们把典当物递到柜台里然后坐下。过一会儿，店员估好了价就会叫：“某某号，五十法郎成吗？”有时候只有十五法郎、十法郎甚至五法郎。不论多少钱全屋都能听到。我进屋的时候店员正在挑衅地叫道：“八十三号——过来！”还吹了个口哨做了个手势，就像是在叫一条狗。八十三号走到柜台前，他是个长着胡子的老人，穿着一件扣到脖子的大衣，裤脚磨破了。店员一言不发地把他的包扔过柜台——显然是一钱不值。包裹掉到地上散开了，露出四条羊毛男裤。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可怜的八十三号把他的裤子收拾起来，蹒跚着自言自语地走出去。

我要当的衣服加上箱子，买来时花了我至少二十英镑，现在还很新。我觉得现在肯定值十英镑，而十英镑的四分之一（你只能指望当铺会出四分之一的价）就是两百五十或者三百法郎。我毫无压力地等着，指望能至少拿到二百法郎。

最后店员叫到了我的号码：“九十七号！”

“在，”我答应着站起来。

“七十法郎？”

值十英镑的衣服只出价七十法郎！但争论是没有用的，我曾看到有

人想争辩，店员马上就拒收典当物。我拿了钱和当票就走了。现在我除了身上穿的肘部磨破、当不出去的大衣和一件衬衫之外，什么衣服都没有了。后来我得知要下午去当铺才对，不过为时已晚。店员都是法国人，像大多数法国人一样，他们在吃午饭之前总是脾气很坏。

我回去的时候F太太在酒馆扫地。她走上台阶迎接我，从她的眼睛里我能看出她很担心我的房租。

“那么，”她说，“你那衣服当了多少钱？不多，是吧？”

“两百法郎。”我立刻说。

“天哪！”她惊叹道：“那真不错。那些英国衣服肯定很贵！”

这个谎言省去了很多麻烦，而且奇怪的是，它后来成真了。过了几天，我收到了之前为报纸写文章得到的两百法郎稿费，虽然很心疼，但我还是把钱一分不差地交了房租。所以，尽管接下来的几周我差点饿死，但至少还有容身之所。

现在必须得找活儿干了，我想起一个朋友鲍里斯，他是个俄国侍应，有可能会帮我。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一家医院的公共病房里，他在治左腿的关节炎。他说如果我有麻烦随时都可以去找他。

我得先介绍一下鲍里斯，因为他是个怪人，而且我们的交情很不错。他大概三十五岁，是个高大威猛的男人，曾经很英俊，不过因为卧病在床而变得极胖。就像大多数俄国流亡者一样，他的人生充满了各种冒险经历。他那在革命[1]中被杀的双亲曾经很有钱，战时他在西伯利亚第二步枪团服役，据他说那是俄军最好的团。战后他先是在一家毛刷厂工作，然后在巴黎中央市场做搬运工，后来又成了洗碗工，最后才做了侍应。生病之前他在斯克莱伯酒店工作，每天能挣一百法郎小费。他的志向是做到侍应领班，攒够五千法郎就去右岸开一家精品小餐厅。

鲍里斯总是说战时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他酷爱战争和军事，读过无数战略和战争史的书籍，可以跟你讲所有拿破仑、库图佐夫[2]、克劳塞维茨[3]、毛奇[4]还有福煦[5]的理论。任何跟军事有关的东西都能让他高兴。他最喜欢的咖啡馆是蒙巴纳斯的丁香园咖啡馆，仅仅是因为外面有内伊[6]元帅的雕像。后来鲍里斯和我一起去商业街。如果我们坐地铁去，鲍里斯总是在康布罗纳站而不是商业街站下车，尽管商业街站

更近一些；这与他对康布罗纳将军的喜爱有关，滑铁卢战役时敌人劝这位将军投降，他只回答了一句“滚他妈的”！[7]

革命给鲍里斯留下的东西只有奖章和他们团的旧照片；他把其他所有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只留下这些。他几乎每天都要把照片铺在床上，对其大谈特谈。

“看，我的朋友。你看我站在前排。多棒的壮小伙儿，是不是？不像那些法国小耗子。二十岁就做了上尉——不错吧？没错，第二步枪团的上尉；我父亲是个陆军上校。

“啊，但是，我的朋友，人生的起起落落啊！一个俄军上尉，然后，啪！革命一来，一切都没了。1916年我在爱德华七世旅馆待了一周；1920年我在那里努力找工作。我做过打更的、管酒窖的、刷地板的、洗盘子的、搬行李的，还看过厕所。我给过侍应小费，也被别人给过小费。

“啊，但我知道如何像绅士一样生活，我的朋友。我不是想自夸，不过有一天我算这辈子有过多少个女人，结果会发现有两百多个。没错，至少两百……啊，话说回来，坚持就是胜利。勇敢点！”

鲍里斯脾气古怪，喜怒无常。他总希望回军队去，但他做侍应也有了前途。虽然他攒的钱从没超过几千法郎，他还是理所当然地觉得以后能自己开饭店发家致富。后来我发现，所有侍应说的想的都是这个，这样他们作为侍应才能心理平衡。鲍里斯总是兴致勃勃地说起在酒店的生活。

“做侍应就是赌博，”他曾说，“你可能到死都穷得要命，或者一年就发了财。你没有基本工资，靠的是小费，也就是账单的百分之十，另外还有香槟酒公司按照瓶塞给的回扣。有时候小费多得很。比如马克西姆餐厅的酒保，一天挣五百法郎，旺季还不止五百……我自己每天挣二百法郎。那是在比亚里茨的一间酒店，是旺季的时候。从经理到洗碗工，所有人每天干二十一个小时。二十一个小时干活，两个半小时睡觉，连着过了一个月。不过很值得，一天能挣二百法郎呢。”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交上好运。有一次我在皇家酒店，有个美国顾客在晚饭前叫我，点了二十四份白兰地鸡尾酒。我用一个托盘把酒全都端过去。‘现在，小伙子，’那个醉醺醺的顾客说，‘我喝十二杯，

你喝十二杯，喝完你要是能走到门口，就能拿到一百法郎。’我走到了门口，他给了我一百法郎。整整六天，每个晚上他都这么干，十二杯白兰地鸡尾酒，然后就是一百法郎。几个月之后我听说他被美国政府引渡回去了，因为私吞公款。你不觉得这些美国人还是挺好的吗？”

我喜欢鲍里斯，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开心，下棋、聊聊战争和酒店的事情。鲍里斯总是劝我去做侍应。“这种生活很适合你，”他说，“有工作的时候每天挣一百法郎，还有个漂亮的情人，多好。你说你要写作，那都是胡扯。想靠写东西挣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娶个出版商的女儿。但是如果你把那小胡子剃掉，肯定能做个好侍应。你个子很高，还说英语——做侍应主要就靠这些。等我能弯弯这该死的腿，我的朋友。还有，如果你什么时候失业了，就来找我。”

由于就要租不起房吃不起饭了，我想起了鲍里斯的话，决定马上去找他。我并不指望能像他保证的那样，轻轻松松当上侍应，但我当然知道怎么洗盘子，毫无疑问他能在厨房里给我找个活干。他说夏天要找洗盘子的活，打个招呼就行。想到自己终究有个有点势力的朋友可以求助，真是感到极大的安慰。

---

[1] 指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

[2] 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元帅，著名将领、军事家，俄罗斯民族英雄。1812年率领俄国军队击退拿破仑的大军，取得俄法战争的胜利。

[3] 克劳塞维茨（1780—1831），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普鲁士少将。著有《战争论》。

[4] 毛奇（1800—1891），德国总参谋部参谋长，军事战略家。

[5] 福煦（1851—1929），法国陆军统帅。著有《战争原理》《战争指南》等。

[6] 内伊（1769—1815），法兰西帝国“军中三杰”之一，1804年被授予帝国元帅称号。

[7] 关于康布罗纳此事真实性无法确定，至今存疑。

第五章

不久之前，鲍里斯给了我一个地址，在白袍区的市场街。他在信里只是说“事情不算太坏”，我猜想他回到斯克莱伯酒店挣他的一天一百法郎去了。我满怀希望，感叹自己怎么这么愚蠢，没能早点想到去找鲍里斯。我想象自己在一家舒适的餐厅工作，欢乐的厨师一边往平底锅里打鸡蛋一边唱情歌，每天能吃上五顿大餐。想到快挣工资了，我甚至花了两法郎五十生丁买了一包高卢烟。

早上我走路去白袍区的市场街，震惊地发现，那是一条和我住的地方一样烂的后街。鲍里斯所在的饭店是街上最脏的一家。一股肮脏的酸臭味从那阴暗的走廊里溢出来，那是一种泔水和汤渣混合的味道——二十五生丁一份的压缩牛肉汤。我立刻感到了不安。喝压缩牛肉汤的人都是挨饿的或是快要挨饿的人。鲍里斯真的能每天挣到一百法郎吗？办公室里一个阴沉的老板告诉我，对，那个俄国人在家——在阁楼里。我爬上六层狭窄盘旋的楼梯，走得越高牛肉汤味越浓烈。我敲门，但鲍里斯没有应门，所以我开门走了进去。

房间是个阁楼，十平方英尺，只靠一扇天窗照明，仅有的家具是一张窄小的铁床架、一把椅子，还有一个瘸了条腿的洗手架。一长串虫子排成S型慢慢爬过床上方的墙壁。鲍里斯一丝不挂地躺着睡觉，他的大肚子在脏兮兮的被单下面隆起。他的胸口上满是虫子咬的斑点。我进门的时候他醒了，揉了揉眼睛，声音低沉地哼哼着。

“我的老天！”他叫到，“啊，我的老天啊，我的后背！天杀的，我相信我的背肯定断了！”

“怎么啦？”我惊呼到。

“我的背断掉了，就是这样。我整晚都躺在地板上。啊，我的老天啊！你要是知道我的背是什么感觉就好了！”

“我亲爱的鲍里斯，你病了吗？”

“不是病了，只是饿——是的，再这样下去就要饿死了。除了在地

板上睡觉，我已经有好几个礼拜每天只靠两法郎生活了。太可怕了。你来得真不是时候，我的朋友。”

看来问鲍里斯是不是还在斯克莱伯酒店工作没什么意义了。我赶紧下楼买了一条面包。鲍里斯扑上去，一下就吃掉了一半，他感觉好了一些，坐在床上给我讲他出了什么事。由于瘸得厉害，离开医院后他没能找到工作，钱花光了，东西也当得精光，最终饿了好几天。有一个礼拜他睡在德奥斯特利茨桥[1]下码头上的几个空酒桶中间。过去两个星期他跟一个犹太技工一起住在这个房里。事情很难解释，不过似乎那个犹太人欠了鲍里斯三百法郎，通过让他睡地板和每天给两法郎饭钱来还债。两法郎可以买一杯咖啡和三个圆面包。犹太人每天早上七点出去工作，鲍里斯就离开他睡觉的地方（在天窗下面，下雨时会漏水）到床上去。因为有臭虫，他在那里也睡不了多久，但可以在睡了地板之后歇一歇他的后背。

我原本是来找鲍里斯求助，结果看到他过得比我还差，这真是让人大失所望。我解释说我大概只有六十法郎了，必须马上找到工作。不过这时，鲍里斯已经吃光了剩下的面包，变得开朗健谈。他毫不在意地说：

“老天爷，你担心什么呀？六十法郎——哎呀，那可是一大笔钱啊！请把那只鞋递给我，我的朋友。等那些臭虫爬近些，我就打死几只。”

“但是你觉得有机会找到工作吗？”

“机会？那是必须的啊。事实上，我已经有准备了。过几天商业街有一家新的俄国餐厅就要开业了。说好了让我去做侍应领班。我可以轻松在厨房里帮你搞到工作。五百法郎一个月，管饭吃，如果你运气好还有小费。”

“但是现在呢？我快要交房租了。”

“哦，我们会有法子的。我还有几张牌没出呢。比如说，巴黎到处都有人欠我钱呢。有一个马上就要还钱了。再想想那些和我好过的女人！女人从不忘情，你知道——我只要开口她们就会帮我。另外，那个犹太人跟我说他要在干活的修车厂偷磁电机，他会每天给咱们五法郎，咱们负责清洗磁电机，然后他再卖掉。那就够养活咱们的了。别担心，

我的朋友。没有什么比钱更好弄的了。”

“那么咱们现在就出去找工作吧。”

“现在，我的朋友。我们不会饿死的，别害怕。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有无数次比现在还惨呢。坚持就是胜利。记住福煦的格言：‘进攻！进攻！再进攻！’”

直到中午鲍里斯才决定起床。他只剩下一套衣服，包括一件衬衫，一条衣领加领带，一双快要穿坏的鞋子，还有一对满是洞的袜子。他还有一件大衣，等到危急关头才会当掉。他有个衣箱，虽然是价值二十法郎的可怜兮兮的纸壳箱，但却十分重要，因为旅馆老板相信那里面都是衣服，否则早就把他扫地出门了。事实上里面装的是奖章和照片，各种杂碎东西，还有一大捆情书。尽管如此，鲍里斯还是能打扮得很潇洒。他刮胡子时不用肥皂水，靠一把使用了两个月的破刀片，领带打得看不出上面有破洞，鞋底小心用报纸垫好。最后，穿戴整齐后，他就拿出墨水瓶，把从袜子洞里露出来的脚踝皮肤涂黑。等到一切就绪，你绝不会想到他最近睡在塞纳河桥下。

我们来到里沃利街的一家小咖啡馆，那是个知名的餐厅经理跟雇工见面的地方。它后面有一个洞穴般的、阴暗的小房间，各种酒店工作者都坐在那里：衣着光鲜的年轻侍应，别人衣着没那么光鲜，而且明显饥肠辘辘；满面红光的胖厨子；油滑的洗盘工；衰老的擦洗女工。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杯没动过的咖啡。事实上那地方是个职业介绍所，饮料钱算是老板的佣金。有时，一个体格结实、看似重要的人——显然是个饭店老板——走进来跟酒保说话，酒保就会从咖啡馆后面叫出一个人。但是他从来没叫过鲍里斯和我，两小时之后我们离开了，按照惯例，买一杯饮料只能坐两小时。后来我们知道了窍门，就是必须贿赂酒保，不过为时已晚，如果你能给他二十法郎，他一般就会给你安排个事儿做。

我们去了斯克莱伯酒店，在人行道上等了一个小时，希望经理能出来，但他没有。然后我们拖着身子来到商业街，结果发现那家正装修的新餐厅大门紧闭，老板也不在。天色已晚，我们在人行道上走了十四公里，精疲力尽，结果只能花一个半法郎坐地铁回家。走路对鲍里斯的瘸腿是种巨大的折磨，随着天色渐暗，他的乐观主义精神渐渐被消磨干净。在意大利广场下地铁时他已经绝望了。他开始说浪费精力找工作没用——除了犯罪别无他法。

“抢劫比挨饿好，我的朋友。我一直这么盘算。一个有钱的美国胖子——在蒙帕纳斯的某个阴暗角落——用袜子包一块鹅卵石——砰！翻空他的口袋然后逃跑。这是可行的，你不觉得吗？我可不怕——别忘了我当过兵。”

他最后还是决定不这么做，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容易被认出来。

回到我的房间，我们又花了一个半法郎买面包和巧克力。鲍里斯吞下他的那一份，立刻又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活跃了起来，食物对他身体的影响就像鸡尾酒一样快。他拿出铅笔，开始列出那些有可能给我们活儿干的人。他说有几十个这样的人。

“明天我们就会有事做了，我的朋友，我打心底里知道，要时来运转了。再说，我们都有头脑——有头脑的人不会挨饿。”

“有头脑的人就了不起！有脑子干啥都能挣钱。我原来有个波兰朋友，真是个天才，你知道他是怎么干的？他买个金戒指拿去当铺换十五法郎。然后——你知道店员写当票有多粗心——他在店员写的‘金质’前面加上‘镶钻石’，再把‘十五’改成‘一万五’。漂亮，对吧？你看，这样他拿当票去抵押，就借到了一万法郎。这就是我说的有头脑……”

后来整个晚上，鲍里斯都满怀希望，谈论着我们一起在尼斯或比亚里茨做侍应，住漂亮的房间，有足够的钱找情人。他累得没法再走三公里回旅店，当晚就拿大衣包住鞋子当枕头，睡在我房间的地板上。

---

[1] 德奥斯特利茨桥，塞纳河上的一座单层钢拱桥，它是巴黎地铁网络5号线的专用桥梁。

第六章

第二天我们还是没找到工作，直到三周之后才转了运。我的两百法郎让我不用担心房租，但是别的方面都不能再糟了。日复一日，鲍里斯和我在巴黎街头游荡，以每小时两英里的速度穿过人群，又饿又无趣，而且一无所获。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塞纳河两岸往返十一次，我们在员工通道外徘徊几个小时，经理一出来就马上拿着帽子点头哈腰地迎上去。我们总是得到相同的答复：他们不要瘸子，也不要生手。有一次我们差点就被雇佣了，跟经理谈话的时候鲍里斯没拄手杖，站得笔直，经理没发现他是个瘸子。“好，”他说，“我们需要两个人在地下室干活。你们应该能行。进来吧。”可是鲍里斯一动就完了。“啊！”经理说，“你是个瘸子。真遗憾——”

我们在中介所登记，应征招聘广告，但我们去哪儿都得靠步行，这拖慢了我们的速度，我们似乎每次都因为迟到半个小时而错过了某个工作。有一次我们马上就要得到一份清洗铁轨的工作，可在最后一刻他们拒绝了我们而雇了法国人。另一次我们应征马戏团助手。你要搬长椅，扫垃圾，以及在表演的时候站在两个桶上，让一只狮子从你两腿之间跳过去。我们提前一小时到，发现已经有五十号人在排队等着。显然狮子有某种吸引力。

一次，一间我几个月前登记过的中介所给我发了蓝色急件，告诉我有位意大利绅士想上英语课，信里要求我“马上过去”并承诺每小时给二十法郎。鲍里斯和我当时正陷入绝望之中。这是个绝妙的机会，但我没法接，因为我不能穿着肘部磨破的大衣去中介所。后来我们想到我可以穿鲍里斯的大衣——它跟我的裤子不搭配，但裤子是灰色的，从远处看，也许会被当成是法兰绒。衣服对我来说太大了，我只能不扣扣子，一只手还要放在衣兜里。我匆匆出门，花了七十五生丁坐巴士去中介所。我到的时候发现那个意大利人已经改变主意离开巴黎了。

还有一次，鲍里斯建议我去巴黎中央市场找个搬运工的活儿。早晨四点半，那儿刚刚开工，我就到了。我看到一个戴着圆顶礼帽的矮胖男人在指挥几个搬运工，我走上前，告诉他我想找活干。答话之前他抓住我的右手，摸了摸手掌。

“你身体强壮吗？”他问。

“很壮的。”我撒谎道。

“好。把那个箱子抬起来给我看看。”

那个是装满了土豆的巨大柳条筐。我抓住它，发现我根本没法挪动它，更别说抬起来了。圆顶礼帽男看着我，耸了耸肩就转身走了。我也匆匆离开。走出一段，我回头发现，四个人把那个筐抬到了推车上。它大概有三英担[1]重。那人看出我没什么用，就用这个办法赶走了我。

有时如果鲍里斯感到有希望，就会花五十生丁买邮票，给他的某一个前情妇写信要钱。但是只有一个人回信。那个女人除了是他的前情妇，还欠他二百法郎。当鲍里斯看到回信并认出笔迹的时候，他满怀希望，几乎发狂。我们抓住那封信，跑到鲍里斯的房间里读，就像偷了糖的孩子。鲍里斯读了信，然后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信是这么写的：

我亲爱的小色狼：

我怀着无比愉悦之情，打开这封可爱的信笺，它勾起我对往昔的追忆，彼时我们倾心相爱，它亦令我忆起，你双唇所给予的甜蜜香吻。此番记忆，永存心间，恰似鲜花虽逝，芬芳依旧。

可是，你索要的二百法郎，唉！我亦无能为力。你有所不知，亲爱的，听闻你生活窘迫，我伤心欲绝。但又能如何？生活如此悲伤，人人深陷麻烦。我亦不能幸免。我的小妹妹疾病缠身（唉，可怜的小东西，她遭罪无数呀！），我们已无力再支付医生诊金。我发誓，我们已经一穷二白，身无分文，生活无比艰辛。

勇气，我的小色狼，永远勿忘勇气！铭记苦难不会永存，无论现状如何面目可憎，窘境终将烟消云散。

亲爱的，请宽心，我发誓将你永生铭记。不曾停止爱你的我，为你献上最真挚的拥抱，你的伊冯娜。

这封信让鲍里斯大失所望，他直接上了床，那一天都没去找工作。我的六十法郎撑了大约两周。我已经不再装作是下馆子吃饭，我们在房间里吃东西，一个坐在床上，另一个坐在椅子上。鲍里斯贡献出他的两

法郎，我出三四法郎，我们买面包、土豆、牛奶和奶酪，用我的酒精灯熬汤。我们有一个炖锅、一个咖啡碗和一把勺子，每天都要为谁用炖锅、谁用咖啡碗吃饭而推让一番（炖锅装的多一些），而且让我暗自生气的是，每天都是鲍里斯先妥协，得到用炖锅吃饭的机会。有时晚上我们的面包多一些，有时候不多。我们的铺盖越来越脏，我三周没洗澡了，鲍里斯说他有几个月没洗了，靠着抽烟我们才能忍受这一切。我们有足够多的烟，因为早前鲍里斯遇到了一个当兵的（他们有免费烟发），从他那里以每包十五生丁的价格买了二三十包。

和我相比，这一切对鲍里斯来说更糟糕。徒步行走和睡地板使他的腿和后背一直很疼，而且他那俄国人的大胃口让他遭受着饥饿的痛苦，尽管他看起来没有变瘦。总的来说，他快乐得让人吃惊，总是满怀希望。他曾很严肃地说有个守护神保佑着他，情况非常糟糕时，他就在下水沟找钱，说守护神总会在那里丢个两法郎。一天我们在皇家大街等着，那附近有家俄国餐厅，我们想去那里找份工作。鲍里斯突然决定去马德莱娜教堂[2]为他的守护神点五十生丁的蜡烛。出来后他说还得做些什么以确保万无一失，于是便庄严地把一张五十生丁的邮票点燃，献给永生之神。或许那些神灵和圣人相处不和，反正我们最后没得到那份工作。

有几个早上，鲍里斯会陷入极端绝望。他躺在床上几乎要哭出来，诅咒那个跟他住一起的犹太人。最近那个犹太人对于每天支付两法郎变得不耐烦了，更糟糕的是他摆出一副施舍的架势，令人难以忍受。鲍里斯说我作为一个英国人，无法想象接受犹太人的施舍对俄国人来说是多大的折磨。

“一个犹太人，我的朋友，一个货真价实的犹太人！他根本不知羞耻。想想看，我，一个俄军上尉——我跟你说过我在第二步枪团做过上尉吗，我的朋友？没错，一个上尉，我的父亲是陆军上校。结果我在这儿靠一个犹太人吃饭。一个犹太人……”

“我要告诉你犹太人是什么样子的。刚开始打仗的时候，有次，我们行军时停在一个村子里过夜。一个可怕的老犹太人，他长着犹大那样的红胡子，偷偷摸摸跑到我的营地。我问他要什么。‘尊敬的阁下，’他说，‘我给您带来了礼物，是个只有十七岁的漂亮姑娘。只要五十法郎。’‘谢谢你，’我说，‘你可以再把她带走。我可不想染上什么病。’‘染病？’那犹太人大叫道，‘但是，上尉先生，没必要害怕那个。这是我的亲闺女儿！’犹太人就是那个德性。”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的朋友，在以前俄国军队里，朝犹太人吐沫是不应该的？没错，我们认为一个俄军军官的高贵口水不值得浪费在犹太人身上……”

那些天鲍里斯总是声称自己病得不能出去找工作了。他在脏兮兮的灰被单里一直躺到晚上，一边抽烟一边看旧报纸。有时候我们一起下国际象棋。我们没有棋盘，但是我们在一张纸上写下棋步，后来我们用一个包装箱的侧边做了棋盘，拿扣子、比利时硬币等东西做了一套棋子。就像多数俄国人一样，鲍里斯热衷下国际象棋。他说国际象棋的规则跟谈恋爱以及战争是一样的，你其中一样会赢，其他两方面也会赢。他也说如果有棋盘就可以不在乎饿肚子，但在我看来完全不是这样。

---

[1] 英担，重量单位，1英担=50.8千克。

[2] 马德莱娜教堂，法国首都巴黎第八区的一座教堂，始建于18世纪。原为纪念拿破仑军队的荣耀。

第七章

我的钱慢慢花光了——八法郎，四法郎，一法郎，直到二十五生丁；二十五生丁毫无用处，除了报纸，什么都买不了。我们靠干面包撑了几天，后来有两天半我什么都没吃。这是很难受的经历。有人做禁食疗法达三个星期以上，他们说到第四天之后禁食会变得很愉悦；我可不知道，我没挨饿超过三天。大概自愿斋戒而且之前没挨过饿的话，感觉会不一样。

第一天，我懒得不想找工作，而是借了鱼竿到塞纳河钓鱼，用绿头蝇做鱼饵。我希望能钓到够吃一顿的鱼，不过那当然不可能。塞纳河里全是鲦鱼，但是它们在巴黎围城期间变得机灵了，从那时起除非用渔网，否则绝对抓不到它们。第二天我想去当掉大衣，但走去当铺太远了，我在床上待了一天，读《福尔摩斯回忆录》，不吃饭，我只有力气做这个。饥饿使人丧失骨气，脑中空空，很像流感后遗症，就好像变成了水母，或是血液被抽走换成温水。我对饥饿的主要记忆就是懒得做任何事，不得不经常吐口水，口水是奇怪的白色絮状，像是沫蝉的吐沫。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是任何饿过几天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一点。

第三天早晨我感觉好了不少。我意识到自己必须马上做点什么，决定要鲍里斯和我分享他的两法郎，只要一两天，怎么分都行。我到的时候发现他躺在床上，怒气冲冲。我一进门他就爆发了，激动得差点呛到自己。

“他把它拿走了，那个贱贼！他把它拿走了！”

“谁把什么拿走了？”我问。

“那个犹太人！拿走了我的两法郎，那条狗，那个贼！他趁我睡觉时打劫了我！”

看来前一晚那个犹太人断然拒绝每天支付两法郎。他们争论不休，最后犹太人同意给钱。鲍里斯说他以最无礼的态度给了钱，一边给一边说自己多么善良，非要人低头感激。然后，早晨他趁鲍里斯没睡醒把钱偷走了。

这可是个打击。我无比失望，因为我已让肚子对食物有所期待，在挨饿的时候这是大错。然而，令我颇为吃惊的是，鲍里斯并不绝望。他在床上坐起来，点起烟斗分析情况。

“现在，听着，我的朋友，这下死路一条了。我俩只有二十五生丁，我觉得那个犹太人不会再给我两法郎了。无论如何他的所作所为令人无法忍受。你相信吗，有天晚上他下流到把一个女人带回来，我还在地板上呢。那低贱的畜生！我还有更糟糕的事要告诉你。那个犹太人想从这儿逃走。他欠着一周的房租，他的想法是逃掉房租同时把我踹掉。要是那个犹太人跑了我就无处可去啦，旅馆老板会扣下我的衣箱抵房租，他妈的！咱们可得好好走下一步。”

“好吧，但是我们能干什么？在我看来，唯一的法子就是当掉咱们的大衣搞吃的。”

“我们当然会那么做的，但我必须先把我的东西从这房子里弄出去。不敢想象我的照片会被人扣住！好了，我计划好了。我要抢在那犹太人前面先跑掉。开溜撤退，你明白的。我觉得这一步应该这么走，嗯？”

“但是，我亲爱的鲍里斯，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开溜？你一定会被抓住的。”

“啊，当然，这需要策略。我们的老板时刻盯着，以防有人不付房租开溜，他以前就那样。他和他老婆整天轮流蹲在办公间里——真是吝啬鬼，这些法国人！不过我想到个办法，如果你能帮忙就能成。”

我没什么心情帮他，但还是问了鲍里斯他的计划。他仔细向我解释。

“现在，听着。我们必须从当大衣开始。先回你的屋子去把你的大衣拿来，然后回来拿我的，把它藏在你的衣服下面偷偷带出去。把它们拿到法兰克斯布尔茹瓦街的当铺去。幸运的话你应该能搞到二十法郎。然后去塞纳河岸，往口袋里装满石头，回来把石头放在我的箱子里。你明白了吗？我会尽可能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卷在报纸里，然后下楼问老板最近的洗衣店怎么走。我会厚着脸皮假装很随意，你明白的，那样老板当然会觉得这只是一捆脏衣服。或者如果他起了疑心，那偷偷摸摸的吝啬鬼就会像往常一样，到我的房间去试试我箱子的重量。那些石头的斤

两会让他以为箱子是满的。很有才，是吧？之后我就可以回来，把我自己的东西放在衣袋里带走。”

“但是那箱子怎么办？”

“哦，箱子？我们得放弃它了。那可怜玩意儿也就值二十法郎。再说，撤退的时候必须有放弃。看看拿破仑在别列津纳河[1]的时候！他放弃了整个军队。”

鲍里斯为这个计划（他管这叫战略）高兴得几乎忘记了饥饿。他忽略了这个计划的主要缺点——逃跑之后他就没有地方睡觉了。

一开始，战略进展得很顺利。我回家取了自己的大衣（这样我已经空着肚子走了九公里），然后成功将鲍里斯的大衣偷运出去。之后就出问题了。当铺伙计是个暴脾气、苦瓜脸、爱管闲事的小个子男人——典型的法国办公员——他拒收大衣，理由是它们没有给包起来。他说衣服必须用旅行箱或纸壳箱装起来。这毁了一切——我们什么箱子都没有，仅有的二十五生丁也买不起一个箱子。

我回去告诉鲍里斯这个坏消息。“他妈的！”他骂道，“这下糟了。唉，不论如何，总会有办法的。咱们把大衣放在我的衣箱里吧。”

“但是我们怎么过老板那一关？他就在办公间门口坐着。没辙啊！”

“你真容易绝望啊，我的朋友！我读到的英国人的那股子倔脾气哪去了？勇敢点！我们会做到的。”

鲍里斯考虑了一小会儿，然后又提出了一个狡猾的点子。最困难的在于要吸引老板的注意力大概五秒钟，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带着箱子逃出去。不过凑巧店老板有一个弱点——他喜欢看《体育报》，时刻准备着有人过来跟他讨论报纸内容。鲍里斯在一份旧的《小巴黎人》上读了一篇关于自行车比赛的文章，之后他打探好楼梯的情况，下去跟老板说话。与此同时，我在楼梯脚下等着，一只胳膊下夹着大衣，另一只夹着衣箱。鲍里斯觉得时机合适就咳嗽一声。我在那儿等着，浑身发抖，因为老板娘随时都可能从办公间对面的门里出来，那就玩完了。然而，不久鲍里斯便咳嗽了。我飞快溜过办公间跑到大街上，为我的鞋子没有嘎吱作响而欢欣鼓舞。要是鲍里斯瘦一些，计划可能就会失败，他硕大的双肩挡住了办公间门口，他的大嗓门盖过了我发出的噪音。我安全离开

之后他也来了，在街角找到我，我们一起开溜。

然后，如此折腾一番后，当铺伙计再次拒绝收我们的大衣。他告诉我（能看出他毫不通融，他的法国灵魂在为此自鸣得意）这是因为我没有足够的身份文件，身份证还不够，我必须出示护照或是带地址的信封。鲍里斯倒是有几十封带地址的信封，但他的身份证过期了（他没有去更新，以此逃税），所以我们不能用他的名字当大衣。我们能做的只有走回我的住处，带上必需的文件，把大衣拿到皇家林荫大道的当铺去。

我把鲍里斯留在房间里，自己去了当铺。我到的时候发现它已经关门了，要到下午四点才开门。现在大约是一点半，我走了十二公里，六十个小时没吃东西。命运似乎在与我开一系列毫不可笑的玩笑。

然后我奇迹般地转运了。我在布洛卡路上往家走，突然在鹅卵石中间看到了一枚闪闪发亮的五苏硬币。我扑上去，又赶紧跑回家拿了我们另外的五个苏，买了一磅土豆。炉子里剩的酒精只够把它们煮熟，也没有盐，但是我们狼吞虎咽地把这些土豆连皮吃掉。之后我们感觉自己焕然一新，坐着下棋等当铺开门。

四点钟我回到当铺。我不抱希望，既然我上次只拿到七十法郎，我还能指望这装在纸壳箱里的两件破烂大衣换多少钱呢？鲍里斯说二十法郎，但我觉得只会有十法郎，甚至五法郎。更糟的是我可能会被拒绝，就像上一次那个可怜的八十三号。我坐在前排长椅上，这样店员说五法郎时就不会看见别人嘲笑我了。

最后店员叫到了我：“一百一十七号！”

“在。”我站了起来叫道。

“五十法郎？”

这几乎跟上次的七十法郎一样令人震惊。现在我相信那个店员一定是把我跟其他人的号码弄混了，因为谁也不可能把那两件大衣卖五十法郎。我赶紧回家，手放在背后，一言不发走进屋子。鲍里斯在把玩棋盘。他急切地抬头。

“你拿到多少？”他问。“什么？没有二十法郎？无论如何你至少拿

到十法郎了吧？五法郎——那太可怕了，我的朋友，别说只有五法郎。你要是告诉我只有五法郎我就要考虑自杀了。”

我把那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扔在桌上。鲍里斯的脸色像粉笔一样惨白，跳起来抓住我的手，握得我骨头都要碎了。我们跑出去买了面包、酒、一块肉，还有烧炉子的酒精，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

吃了饭，鲍里斯变得前所未有的乐观。“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早上只有五个苏，看看现在。我就说过，没什么比钱更好弄了。这提醒了我，我有个朋友在方达瑞路，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他骗了我四千法郎，那个贼！他清醒的时候是天下最大的贼，但奇怪的是他在喝醉的时候异常诚实。我觉得晚上六点他应该已经醉了。我们去找他吧。他很可能分期先付一百。他妈的！他可能给两百呢。我们走吧！”

我们到方达瑞路找到了那个人，他喝醉了，但我们也没拿到那一百法郎。他跟鲍里斯一见面就在人行道上爆发了可怕的争执。那个人宣称他不但不欠鲍里斯一分钱，反倒是鲍里斯欠他四千法郎，两个人都争着问我的意见。我一直都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人吵来吵去，一开始在街上，后来在一家小酒馆里，接着在一间餐价固定的餐馆，之后又是另一家小酒馆。最后，彼此骂了对方两小时小偷后，他们俩一起狂饮了一番，花光了鲍里斯的最后一个苏。

那天晚上，鲍里斯在一个鞋匠家过的夜，那人也是个俄国流亡者，住在商业区。与此同时，我还剩下八法郎，有足够的烟抽，吃饱喝足，东西都堆到嗓子眼了。在过了糟糕的两天之后，这种转变实在如奇迹一般。

---

[1] 别列津纳河，现在白俄罗斯境内。1812年，拿破仑军队从莫斯科撤退到斯摩棱斯克，在抢渡别列津纳河时发生战役。由于被俄军从三路发动袭击，法军兵力折损两万五千余人。

第八章

现在我们手头有二十八法郎，又可以开始找工作了。不可思议的是，鲍里斯还在鞋匠家睡着，而且他从一个俄国朋友那里借到了二十法郎。他在巴黎到处都有朋友，多数跟他一样以前是军官。有些做侍应或洗碗工，有些开出租车，有些靠女人过活，有些设法把钱财从俄国带了出来，开着汽修厂或舞厅。总的来说，待在巴黎的俄国流亡者们勤劳能干，能忍受同阶级英国人无法忍受的厄运。自然也有例外。鲍里斯给我讲过他遇到的一个流亡的俄国公爵，他经常出入收费昂贵的餐厅。吃饭时，公爵就在侍应中找出做过俄军士官的人，吃完饭就友好地叫他过来。

“啊，”公爵会说，“所以说你像我一样是个老兵？那些日子可真苦啊。唉，唉，俄国军人无所畏惧。你是哪个团的？”

“某某团，先生。”侍应回答说。

“那是个英勇无比的团啊！1912年我去视察过。顺便说一句，我不幸把皮夹落在家里了。我知道，一个俄国军人肯定会借我三百法郎的。”

如果侍应有三百法郎，他会如数奉上，当然这笔钱以后再也要不回来。公爵就这样弄到不少钱。或许侍应们并不在乎被骗。即使是在流亡，公爵就是公爵。

鲍里斯从一个俄国流亡者那儿听说了个法子，似乎很有希望挣到钱。当掉大衣后，过了两天，他神神秘秘地对我说：

“告诉我，我的朋友，你有什么政治立场吗？”

“没有。”我说。

“我也没有。当然，人总是爱国的，不过——摩西不是还说过掠夺埃及人的话吗[1]？作为英国人，你肯定读过《圣经》。我的意思是，你不会反对挣共产党人的钱吧？”

“不，当然不会。”

“嗯，巴黎好像有个俄国秘密社团，也许他们多少能帮到咱们。他们是共产党人；事实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他们表面上是个联谊社团，与流亡的俄国人保持联系，想让他们加入布尔什维克。我的朋友加入了他们社团，他觉得如果咱们过去找他们，他们会帮忙。”

“但他们能怎么帮咱们？不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帮我，因为我不是俄国人。”

“重点就是这个。他们似乎是莫斯科一家报纸的通讯员，他们需要写有关英国政治的文章。如果我们现在去找他们，或许他们会雇你写文章。”

“我？但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他妈的！他们也不懂。谁懂政治呀？那很容易。你只要从英文报纸上抄下来就行。不是有《每日邮报》吗？抄它就行。”

“但是《每日邮报》是保守党的报纸。他们讨厌共产党。”

“哦，那就照《每日邮报》的内容反着写，那样就没问题了。我们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的朋友。也许能挣几百法郎呢。”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因为巴黎警察对共产党盯得很紧，尤其是外国来的，而且我已经被怀疑了。几个月前，一个密探看到我从一家共产党的周报的办公室里出来，于是警察给我找了不少麻烦。如果给他们逮到我去了这个秘密社团，我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可是这个机会很好，不容错过。那天下午，鲍里斯的朋友——也是个侍应，带我们去了集会地。我不记得街名了，不过那是一条破落的街道，从塞纳河岸边向南延伸，离下议院不远。鲍里斯的朋友要我们加倍小心。我们假装随意在街上闲逛，记住了我们要进的那个门——那是家洗衣店——然后再逛回来，密切留意所有窗口和咖啡馆。如果这里被发现有共产党出没，很有可能会被监视，我们打算一旦看见任何可能是密探的人就回家。我很害怕，但是鲍里斯很享受干这些鬼鬼祟祟的事，完全忘记了他将要跟杀死他父母的人做生意。

确认安全无事后，我们迅速钻进门。洗衣店里有个法国女人在熨衣

服，她告诉我们那些“俄国绅士”在天井对面的楼梯上。我们登上几段黑暗的楼梯来到一处楼梯平台。一个体格强壮、一脸阴沉的年轻人站在楼梯上端，他头上发线很低。我上去的时候他狐疑地盯着我，伸开双臂拦住去路，用俄语说了些什么。

“口令！”看到我没应声，他严厉地说道。

我停下脚步，心里很害怕。我没想到还有口令。

“口令！”那俄国人重复了一遍。

鲍里斯的朋友原来走在后面，现在走上前说了几句俄语，可能是在说口令或解释情况。这样一来，一脸阴沉的年轻人似乎很满意，带我们进入一间又小又破的屋子，里面的窗户是毛玻璃窗。这里看起来是个破旧的办公室，墙上钉着俄语的宣传海报和一张粗制滥造的巨幅列宁像。桌旁坐着一个只穿衬衫、没刮胡子的俄国人，他面前放着一堆报纸做的包装纸，他正朝上面写地址。我进门时他对我说法语，口音很怪。

“你们这样太不小心了！”他大惊小怪地叫着，“你们怎么不带包要洗的衣服来？”

“要洗的衣服？”

“每个人来的时候都带着要洗的衣服。这样看起来他们像要去楼下的洗衣店。下次记得带一大捆衣服来。我们可不想被警察盯上。”

这比我所预料的还要鬼鬼祟祟。鲍里斯坐在唯一的一张空椅子上，他们不停用俄语交谈。只有那个没刮胡子的人在讲话，一脸阴沉的年轻人只是靠在墙上瞪着我，好像还在怀疑我。这很古怪，我站在一个贴满革命海报的小密室里，听着他们用我完全不懂的语言交谈。俄国人说话又快又急，有时微笑有时耸肩。我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想，他们会彼此称呼“小爸爸”“小鸽子”“伊万·亚历山大诺维奇”，就像俄国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他们应该是在谈革命的事。那个没刮胡子的男人应该会坚定地说：“我们从不争吵。争吵是资本家的消遣。我们用行动证明。”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不会这么说。他们要二十法郎，显然是入会费，鲍里斯答应支付（我们总共只有十七法郎）。最后鲍里斯拿出我们宝贵的积蓄，交了五法郎。

这时候那个一脸阴沉的男人看起来不那么怀疑我了，他在桌边坐下来。没刮胡子的男人开始用法语问我问题，并在纸上做记录。他问我答。——是共产党员吗？——算同情者吧，我从未加入过任何组织。——了解英国的政治形势吗？——哦，当然。我提了几个大臣的名字，又批评了工党几句。——那《体育报》呢？能在《体育报》上写东西吗？（在欧洲大陆，足球和社会主义有种神秘的联系。）——哦，当然了。那两个人严肃地点点头。没刮胡子的人开口说话：

“显然，你对英国的情况有着全面的了解。你能为一家莫斯科周报写一系列文章吗？我们之后会告诉你详情。”

“当然可以。”

“那么，同志，我们明天会通过第一批邮件联系你。也可能是第二批。我们的稿酬是每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下次来的时候记得带上一包衣服。再见，同志。”

我们下了楼，小心朝洗衣店外张望，确保街上没有人，然后溜了出去。鲍里斯欣喜若狂。他被狂喜冲昏了头脑，觉得需要破费庆祝一下，于是冲进了最近的一家烟草店，花五十生丁买了一只雪茄。出来后，他喜气洋洋地用手杖敲打地面。

“最后！最后！现在，我的朋友，我们终于交好运了。你成功骗过了他们。你听到他喊你同志了吗？一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看在上帝的份上，真走运！”

第二天早上，我一听闻邮差来了，就冲到小酒馆去取信；令人失望的是没有我的信。我在家等第二批邮件，还是没有我的信。三天过去了，我仍没收到秘密社团寄来的任何东西，我们放弃了希望，认定他们找了其他人写文章。

过了十天，我们又去了那个秘密社团的办公室，还特地带了包衣服装作是拿去洗。可那个秘密社团消失了！洗衣店里的女人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说“那些先生”几天前因为房租的问题离开了。我们拿着包裹站在那里，看起来无比愚蠢！但我们只交了五法郎，而不是二十法郎，这也算是种宽慰。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听说那个秘密社团。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谁，

或者是何组织。我个人觉得他们跟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猜他们只不过是骗子，编造一个社团，好向俄国流亡者骗取入会费。这十分安全，毫无疑问，他们现在肯定在别的什么城市干着相同的勾当。他们很聪明，戏演得很像。他们的办公室看上去完全就是秘密共产党办公室应该有的样子，至于要带一包衣服，那真是只有天才才想得到。

---

[1] 应指《圣经·出埃及记》，其中有神降十灾惩罚埃及。

第九章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仍四处奔走找工作，然后回到我的住处喝汤吃面包，分量一天比一天少。现在还有两个地方有希望。一个是协和广场[1]附近的X酒店，鲍里斯听说在那儿也许能找到工作；另一个是商业街的新餐厅，那里的老板终于回来了。下午我们去见他。一路上鲍里斯都在说如果我们得到工作就能挣多少钱，还说给老板留下好印象很重要。

“仪表——仪表就是一切，我的朋友。给我一套新西装，我就能在晚饭前借到一千法郎，可惜我没趁有钱时买条衣领。今天早上我把领子翻过来穿了，可是有什么用呢，两边一样脏。你觉得我看着像是在挨饿吗，我的朋友？”

“你脸色苍白。”

“见鬼，只吃面包土豆能做成什么事儿？看起来像是在饿肚子很要命。这会让人们想踹你。等一下——”

他在一家珠宝店的橱窗前停了下来，狠狠拍打自己的脸，好让脸上有点血色。然后在血色消退之前，我们赶紧走进餐厅，对老板做了自我介绍。

老板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矮胖子，一头灰色的卷发，身穿一套时髦的对襟法兰绒套装，身上散发出香水味。鲍里斯告诉我他以前也是俄军上校。他的妻子也在，一个可怕的法国胖女人，脸色死灰，嘴唇鲜红，让我想起西冷牛肉和西红柿。老板和蔼地问候了鲍里斯，之后他们用俄语交谈了几分钟。我在后面站着，准备就我的洗碗工经历撒几个弥天大谎。

然后老板向我走来。我不自在地拖着脚走上前，努力让自己显得很恭顺。鲍里斯向我灌输过“洗碗工是奴隶中的奴隶”的想法，我预料老板会待我如粪土。令人惊讶的是，他热情地攥住了我的手。

“所以说你是英国人！”他叫道，“多好呀！我都用不着问你会不会打高尔夫吧？”

“当然会打。”我看出他期望我这样回答。

“我一直想学打高尔夫。我亲爱的先生，你愿意给我演示一些基本击球法吗？”

显然这是俄国人的做事方法。老板聚精会神地听我解释发球杆和铁头杆之间的区别；然后突然告诉我一切都定好了，餐厅开张后鲍里斯做侍应领班，我做洗碗工，如果做得好还可能升任洗手间服务员。餐厅什么时候开张？我问道。“正好两周之后，”老板潇洒地回答道，（他有个习惯，挥手的同时弹掉烟灰，这看上去很潇洒）“正好两周之后，赶在午饭前开张。”接着，他满怀自豪地带我们参观了餐厅。

那是个小地方，有一个酒吧间，一个饭厅，还有个跟普通浴室差不多大的厨房。老板把它装饰成一种徒有其表的“如画般”的风格（他管这叫“诺曼式”，不过就是把些假柱子立在石膏座上），他想管餐厅叫让·克塔尔餐厅，好营造出一种中世纪的感觉。他印了一些传单，上面全是有关本区历史的谎话，居然声称餐厅所在位置原先有一间酒馆，查理曼大帝[2]经常光顾那里。老板对此很是满意。他还在吧台挂了几幅沙龙艺术家画的不太雅观的画。最后他给我们每人一支昂贵的雪茄，又聊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我强烈感觉到我们不会再从这家餐厅得到任何好处。在我看来老板就是个骗子，甚至是个不够格的骗子，而且我看到两个明显是来讨债的人在后门晃悠。但鲍里斯丝毫不感到泄气，因为他相信自己又能当侍应领班了。

“大功告成啦——只要再撑两个礼拜。两个礼拜算什么？管他妈的！想想看，再过三个礼拜我就能有情人啦！不知道她皮肤是黑是白？没关系，只要别太瘦就行。”

接下来的两天过得很糟。我们只剩下六十生丁，拿它买了半磅面包和一个涂面包的蒜头。在面包上涂蒜是因为蒜味会在嘴里停留很久，让人产生刚刚吃饱的幻觉。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坐在植物园[3]。鲍里斯用石块扔那些温顺的鸽子，但是一直打不中，之后我们在信封背面写下晚餐菜单。我们饿得无法去想食物以外的东西。我记得鲍里斯最后为自己挑的晚饭：一打牡蛎、罗宋汤（红色的甜菜根汤，上面有奶油）、小龙虾、炖小鸡、牛肉炖李子、新鲜土豆、沙拉、牛油布丁和罗克福干酪，还有一升勃艮第葡萄酒和一些陈酿白兰地。鲍里斯喜欢吃各国美食。后

来我们有钱的时候，我偶尔会看到他轻松吃掉同样分量的大餐。

花光了所有的钱后，我不再找工作，又一天没吃饭。我不相信让·克塔尔餐厅真会开张，也看不到别的希望，但又懒得什么都不想做，只想躺在床上，之后突然就转运了。晚上大概十点钟，我听到街上传来一声急切的喊叫。我起床走到窗边。鲍里斯在楼下，满脸堆笑，挥舞着手杖。开口说话前，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条挤弯了的面包，扔上来给我。

“我的朋友，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得救了！你觉得呢？”

“你不是找到活儿干了吧？”

“在协和广场附近的那个X酒店——每月五百法郎，还包饭。我今天已经开始在那儿干活儿啦。谢天谢地，我可是大吃特吃了一通！”

工作了十或十二个小时后，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拖着瘸腿走三公里到我的住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还有，他让我第二天在杜伊勒里公园[4]等他，如果他能偷到一些吃的，就在下午休息时给我。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坐在公共长椅上等鲍里斯。他解开马甲，拿出一个压扁了的大报纸包，里面是一些碎牛肉、一块卡门培尔乳酪、面包和一块指形泡芙，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

“瞧！”鲍里斯说，“这是我给你偷带出来的东西。看门的真是头狡猾的猪。”

在公共长椅上从报纸上拿东西吃，感觉非常难受，尤其是在杜伊勒里公园里，这里到处都是漂亮姑娘，但我实在饿得不行，根本管不了那么多。我一边吃一边听鲍里斯解释他在饭店备餐间的工作，备餐间就是英国人说的食品间。看来备餐间的工作是全酒店最低下的，对侍应来说是一种可怕的堕落，但在让·克塔尔餐厅开张前，鲍里斯可以凑合在那儿工作，同时我每天可以跟他在杜伊勒里公园见面，他会尽量多偷些吃的带给我。我们这样过了三天，我完全靠他偷的食物过活。不久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么麻烦，因为X酒店的一个洗碗工走了，鲍里斯推荐我去顶替，这样我自己也开始在那儿工作。

---

[1] 巴黎协和广场，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北岸。始建于1757年，曾命名“路易十五广场”。大革命时期改为“革命广场”。1795年又改称为“协和广场”。

[2] 查理曼大帝（742—814），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人。他被后世尊称为“欧洲之

父”。

[3] 巴黎植物园，位于法国巴黎市区的塞纳河左岸，紧邻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原为17世纪路易十三王朝时代开辟的“皇家草药园”。

[4] 杜伊勒里公园，坐落于卢浮宫与协和广场之间，建于1644年，曾是杜伊勒里宫的一部分。

第十章

X酒店规模很大，气势宏伟，门面是古典风格，一边有个阴暗如鼠洞的小门，专供服务人员出入。早上六点四十五我就到了。一群裤子油腻的人匆忙依次进门，接受坐在一间小办公室里的门房的检查。我等了一会儿，然后人事经理来了，他相当于副经理，他问了我几个问题。他是个意大利人，长着一张苍白的圆脸，由于工作过度而显得憔悴。他问我是不是当过洗碗工，我说是的；他瞥了眼我的双手，知道我在撒谎，不过一听说我是英国人，他改变了态度，雇用了我。

“我们一直在找人帮我们练英语，”他说，“我们的顾客都是美国人，英语我们只会……”他说了些伦敦小男孩会在墙壁上写的词儿。“你可能会有用。下楼吧。”

他带我走下旋转楼梯，来到一条狭窄的过道，过道深入地下，矮得让人不得不弯腰。里面闷热阴暗，昏黄的灯泡间隔着好几码。迷宫般的黑暗小道似乎有几英里长——事实上，我想一共有几百码[1]——这奇怪地令人想起大客船靠下的几层，同样闷热狭窄，有股食物的温热臭气，还有类似引擎发出的嗡嗡噪音（是从炉子里发出来的）。我们经过几个门口，里面时常传来咒骂声或闪出火光，也有从冰库里溢出的令人发抖的冷气。我们正往前走，什么东西猛地打在我的后背上。那是一块一百磅重的冰块，由一个系着蓝围裙的搬运工扛着。他后面跟着一个男孩，肩上扛着一大块牛肉，他的脸颊压在湿乎乎、软绵绵的肉上。“滚开，白痴！”他们边喊边把我推到一边，继续前进。墙上一盏灯的下方，不知是谁工整地写了一句话：“你能在冬日发现万里无云的蓝天，却不能在X酒店发现处女。”这里看起来还真是奇怪。

我们经过一条岔道来到洗衣房，一个脸瘦得像骷髅的老妇人给我一条蓝围裙和一堆洗碗抹布。然后人事经理把我带到一个小地下室——事实上比地下室还要地下室——那里有个水池和一些煤气炉。屋顶太矮，我无法站直，可能有华氏一百一十度。人事经理解释说，我的工作就是给酒店的高级员工送饭，他们在楼上的一间小餐厅吃饭，我还要打扫那间餐厅，为他们洗餐具。他走了之后，一个意大利侍应把他那毛茸茸的头伸进门里，面露凶相，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英国人，嗯？”他说，“喂，这儿我负责。如果你干得好——”他做了个举起酒瓶大声吮吸的动作。“否则——”他重重踢了门框几脚，“对我来说，扭断你的脖子就跟吐痰一样容易。如果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相信我而不是你。所以当心着点。”

之后我就开始忙碌工作。我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晚上九点一刻，中间只休息了半个小时，先是洗盘子，然后擦员工餐厅的桌子和地板，接着擦拭玻璃杯和刀叉，之后送饭，再洗盘子，然后再送更多的饭，洗更多的盘子。这活儿不难，我能应付，除了去厨房取饭的时候。我从未见过或想象过这样的厨房——一个如地狱般的地窖，天花板低矮得令人窒息，炉火发出红光，充斥着震耳欲聋的叫骂声和锅碗瓢盆的叮当声。那里太热了，除了炉子，一切金属制品都必须用布包起来用。正中央是炉子，十二个厨师在那里窜来窜去。他们虽然戴着白帽子，脸上还是不停滴汗。四周是台子，一大群侍应和洗碗工端着托盘吵吵嚷嚷。打杂的赤裸着上身，有的烧火，有的用沙子擦洗大铜锅。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匆忙，脾气很大。厨师长是个留着八字胡的红脸男子，站在中间一刻不停地嚷嚷着，“把那两份炒蛋端走！一份牛排加土豆端走！”他偶尔会突然停下，大骂某个洗碗工。这里一共有三个台子，我第一次去厨房时，不知不觉把托盘送错了地方。厨师长吹胡子瞪眼地走过来，上下打量着我。然后他向早餐厨师示意了一下，指了指我。

“看到了吗？现在他们只会给我们弄来这种洗碗工。你从哪来的，蠢货？我猜是从查瑞顿来的吧？”（那里有一家大型精神病院。）

“我从英国来的。”我回答。

“我早该猜到。那么，亲爱的英国先生，要我提醒你你是个婊子养的吗？还有，现在——滚去那张台子那儿，那是你该待的地方。”

每次去厨房我都会受到这种待遇，因为我总是犯错误，他们觉得我应该知道怎么干活，所以我常挨骂。出于好奇，我数着自己一天被骂成是“蠢猪”的次数，结果是三十九次。

到了四点半，意大利人告诉我可以歇歇，但不够时间出去闲逛，因为五点又要开工。我去厕所抽了支烟；这里严禁吸烟，鲍里斯警告我说只能在厕所抽烟。然后我一直工作到九点一刻，侍应探头进来告诉我，不用洗剩下的盘子。令我惊讶的是，在叫了我一整天蠢猪、鲭鱼之类的称号后，他突然变得很友好。我明白了，那些咒骂只是一种试探。“可

以了，小伙子，”那个侍应说，“你不算机灵，但干得还不错。上来吃晚饭吧。酒店允许我们每人喝两升酒，我又偷了一瓶。我们要好好喝一顿。”

我们大吃了一通，吃的是高级员工的剩饭。侍应变得温和起来，给我讲他的风流韵事，说自己如何在意大利刺伤了两个男人，还有他怎么逃兵役的。了解他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人很不错，不知为何，他让我想起本韦努托·切利尼[2]。我很累，满身是汗，但吃了一天饱饭之后我如获新生。工作并不难，我觉得蛮适合我。不过我不确定能不能干很久，因为我只是个干了一天的“临时工”，只挣二十五法郎。门房板着脸数出钱，留出五十生丁说是保险费（后来我发现这是骗人的）。然后他走出过道，让我脱下外衣，仔细搜我身，检查我有没有偷吃的。接着人事经理来跟我说话。和那个侍应一样，他见我愿意干活，态度也变得好起来。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给你一份固定工作，”他说，“侍应领班说他很乐意骂骂英国人。你能签一个月的合同吗？”

终于有工作了，我本来准备立马答应。可我想起了那家俄国餐厅，它还有两周就要开张了。答应工作一个月却中途离开似乎不太厚道。我说我很快会有另一份工作——能不能签半个月？人事经理耸了耸肩，说酒店只按月雇工。显然我错失了得到这份工作的机会。

按照约定，鲍里斯在里沃利路的拱廊等我。我跟他讲了发生的事情，他非常生气。自打我认识他以来，他第一次把仪态抛到了脑后，大骂我是个白痴。

“白痴！绝对是白痴！我给你找了个工作，结果你下一秒就不干了，这算什么？你怎么会这么笨，说还有别的餐馆？你应该答应干一个月。”

“告诉他们我可能会离开，这样显得比较诚实。”我反对道。

“诚实！诚实！谁听说过诚实的洗碗工？我的朋友，”他突然抓住我的领口，真诚地说道，“我的朋友，你在这儿干了一整天。你看到了在酒店工作是什么样。你觉得洗碗工配有荣誉感吗？”

“不，大概不配。”

“那好，赶快回去告诉人事经理，你可以工作一个月。就说你要推掉另一份工作。然后，等到我们的餐厅开张了，我们直接走就是了。”

“但如果我毁约，工钱怎么办？”

见我如此愚蠢，鲍里斯在人行道上砰砰地敲着手杖，大叫起来：“要他们每天付你工钱，这样一个苏都不会少。你觉得他们会因为一个洗碗工毁约就去告他吗？洗碗工低贱得都不值得去告。”

我赶紧跑回去找人事经理，告诉他我可以工作一个月，他立刻和我签约。这是我在洗碗工之道上学到的第一课。后来我才明白我那些顾虑有多蠢，因为大酒店对自己的员工很无情。他们雇人或炒人完全看工作需要，每到旺季结束，他们就会炒掉百分之十甚至更多的人。要是有人临时辞职，他们很容易找人顶替，因为巴黎到处都是失业的酒店员工。

---

[1] 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约为0.91米。

[2] 本韦努托·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金匠、画家、雕塑家、战士和音乐家。

第十一章

结果我并没有毁约，因为直到六个星期之后，让·克塔尔餐厅才显示出一点点要开业的迹象。这期间我每周在X酒店工作六天，四天在备餐间干活儿，一天给四楼的侍应打下手，一天顶替餐厅清洁女工。幸运的是周日不用上班，但要遇上有人生病，我就得替班。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两点，再从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不过打扫餐厅那天要干十四个小时。尽管如此，按照一般巴黎洗碗工的标准来看，这已经短得出奇了。这样的生活中唯一令人不好过的，就是迷宫般的地下室，里面又闷又热，让人透不过气来。除去这点，这间酒店规模很庞大，管理得当，是个舒适惬意的地方。

我工作的备餐间是个阴暗的地下室，二十英尺长，七英尺宽，八英尺高，塞满了咖啡壶和面包刀一类的东西，挤得挪不动步，几乎走一步就会撞到什么东西。照明的是一个昏黄的电灯泡，另外还有四五盏煤气灯，发着刺眼的红光。屋里还有个温度计，刻度从来都没落到过华氏一百一十度以下，有时还能蹿到一百三十度。地下室一端有五部送货用的升降机，另一端是储存牛奶黄油的冰柜。一走进冰柜，才迈出一步，温度就好像降了一百度，那总能让我想起格陵兰岛的冰山和印度的珊瑚海岸。在备餐间里工作的除了我和鲍里斯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叫马里奥，是个大块头的意大利人，很容易激动，看着像个警察，动作却像在演歌剧；我们管另一个叫“马扎尔人”，他的毛发浓密，像个未开化的动物。我觉得他来自特兰西瓦尼亚，或者别的什么更远的地方。除了马扎尔人，我们几个都是大个子，忙起来的时候总要撞到一起。

备餐间里忙起来是一阵一阵的。我们倒是从来都不闲着，不过要真忙起来，一次也就两个小时，我们把每次的工作高峰期叫做“一轮轰炸”。第一轮“轰炸”是在早上八点，那是楼上的客人们起床叫早餐的时间。八点一到，各种碰撞声、喊叫声瞬间充斥整个地下室，四面的铃铛响个不停，系着蓝围裙的人在过道里横冲直撞，送货的升降机也总是“哐当”一声落下，一楼到五楼的侍应都冲着升降机井用意大利语朝下咒骂。我现在已记不清所有要做的事情了，但是应该包括沏茶、煮咖啡、冲热巧克力饮料、从厨房端饭菜、去地下室取葡萄酒、从餐厅拿水果之类的东西、切面包片、烤土司、抹黄油、涂果酱、开牛奶瓶、数方

糖块、煮蛋、熬粥、碎冰、磨咖啡等——所有这一切，都要为一百至两百位客人准备。厨房有三十码远，餐厅则有六七十码远。通过升降机运送的所有物品都有清单凭证，这些凭证必须小心保管，丢块方糖都会惹大麻烦。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为酒店员工提供面包和咖啡，给楼上的侍应送饭。总的来说，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差事。

我曾算过，我们一天里连走带跑加起来大约有十五英里，而比起体力消耗，脑力消耗造成的压力更大。乍一看，这种愚蠢的体力活再简单不过，但想做得手脚麻利却极为困难。我们不得不同时做好几件事，有点像掐着钟点理牌。比如说，你正在烤吐司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升降机降下来了，要你准备茶、面包卷和三种不同的果酱，就在这时又是“砰”的一声，另一个升降机下来了，点了炒蛋、咖啡和葡萄柚。于是你冲去厨房拿鸡蛋，再折到餐厅拿水果，赶在吐司烤糊之前跑回备餐间，还不能忘了沏茶冲咖啡，这还不算后面排队等着的一大堆事情。与此同时，总有几个侍应喜欢跟在屁股后面找你麻烦，问你怎么丢了一瓶苏打水，你还得跟他们理论。这活儿可没有别人想的那么简单。马里奥说，在备餐间干活儿要让人信得过，得花一年时间。这话真是一点没错。

八点到十点半的这段时间里，我们都处在一种极度亢奋之中，有时忙得好像这辈子只剩五分钟了似的。有时如果没有订餐，一切又忽然归于平静，我们就扫扫地上的垃圾，撒上点干净的锯末，用陶罐大口喝酒、喝咖啡、喝水，喝什么都行，只要是液体。我们经常打碎大冰块，干活的时候含在嘴里。煤气灯周围的热气蒸得人直犯恶心。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水，不出几个小时，就连围裙都被汗水打湿了。有时候工作量大得让人绝望，我们死活都赶不上，有些客人在出门前都没能吃上早饭，不过马里奥总能带我们渡过难关。他在这一行干了十四年，看家本领就是同时做好几件事，来回切换间一秒钟都不会浪费。马扎尔人蠢得不行，我是个新手，鲍里斯又喜欢偷懒，至于他偷懒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腿瘸，另一方面是他觉得自己之前是侍应，对在备餐间工作感到耻辱。不过马里奥是真厉害，他可以右手伸到屋子一头灌咖啡壶，左手够到屋子另一头煮蛋，同时看着炉子上烤的吐司，嘴里大声嚷嚷着指挥马扎尔人，中间的小空档还能哼哼《弄臣》[1]里的小调，真是一绝。老板很识货，付给他每月一千法郎的报酬，我们几个只有五百。

早餐时段的混乱十点半就平息下来了。之后我们擦桌子扫地，擦亮铜器，早上活儿不多的时候，还能轮流溜到盥洗室抽根烟。虽说这是我

们的休闲时间，其实也没那么休闲，因为我们的午餐时间只有十分钟，而且没有一次能一口气吃完。客人们的午餐时间是十二点到两点，这跟早餐时段一样混乱。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从厨房往外端饭菜，这也意味着不停挨厨子的谩骂。到了这会儿，他们已经在炉子跟前流了四五个小时的汗，脾气早跟着一路见长。

两点一到，我们忽然就自由了。脱下围裙丢到一边，换上自己的外套，匆匆跑出门，有钱的话就一头扎进最近的小酒馆。乍一从火烧火燎的地下室来到街上，感觉有点奇怪。外面的空气干净寒冷，令人目眩，就像北极区的夏天。闻惯了汗水和食物的恶臭，汽油味真是香甜无比！有时候在小酒馆里能遇到认识的厨子和侍应，他们都很客气，还请我们喝酒。在酒店里我们是他们的奴隶，但酒店的规矩是工作之外人人平等，所以那些骂人的话不能作数。

五点差一刻的时候我们回到酒店。六点半之前都不会有什么事情，这段时间我们就擦擦银器，洗洗咖啡壶，做些杂七杂八的零活。随后，一天中最混乱的时刻开始了，这就是晚餐时段。我真希望变成左拉[2]，一会儿就行，只为好好形容一下晚餐时段。重点在于，有一两百人同时就餐，一餐有五六道菜，菜式各不相同，五六十个人得煮菜、上菜，之后还要清理剩菜、收拾餐桌，但凡是在餐饮行业干过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每到此时，工作量翻倍，员工精疲力竭，不少还醉醺醺。我可以洋洋洒洒地大写一番来描述当时的场景，但还是没办法让人身临其境。在狭窄过道里横冲直撞，大吵大嚷，费尽力气拖板条箱、端托盘和运冰块，腾腾的热气，阴暗的光线，气急败坏的争吵可却根本没时间争出结果，难以一一细述。第一次踏进地下室的人会以为自己掉进了疯子堆。而到了后来，等我明白了酒店的运作方式，才发现这混乱之中其实井然有序。

一过八点半，所有工作便戛然而止。九点才能下班，但我们经常直接四肢摊开躺在地上，好好歇歇腿脚，甚至都懒得走几步到冰柜里拿点喝的。有时候人事经理会带啤酒过来，因为辛苦忙活一天后，酒店会请我们喝酒。给我们的食物只能勉强下咽，但老板对喝的很大方，他准许我们每人一天喝两升酒，因为他知道如果洗碗工一天喝不到两升酒，就要偷三升。我们还会喝客人喝剩的酒，结果导致我们经常喝得太多，这倒也是好事，因为带点酒劲干活似乎更利索。

一周里有四天都是这么过的，除了周日外还要工作两天，一天好一些，一天糟一些。这样工作一周下来，我感觉需要个假日。那是周六晚

上，因此小酒馆里的每个人都忙着喝个不停，因为第二天不用干活，我也准备加入其中。到了凌晨两点，我们全部喝得酩酊大醉，回房睡觉，打算一觉睡到大中午。五点半的时候我突然被叫醒，床边站着个守夜人，是酒店打发来的。他扯着我的衣服使劲晃我。

“快起来！”他说，“你怎么醉成这副德行，嗯？好吧先不说这个，今天酒店那边人手不够，你得去帮忙。”

“为什么我要上班？”我提出抗议，“今天该我休息。”

“哪儿有什么休息！有活儿要你做呢，快起来！”

我起床出门去，感觉背都要断了，脑袋里都是热煤灰，我觉得肯定撑不了一天。不过，在地下室里才待了一个小时，我就发现其实自己好得很。在热气腾腾的地下室里就像是在蒸土耳其桑拿，不管喝了多少酒都能从汗里蒸出来。洗碗工都知道这点，还都指望它呢。洗碗工可以大口喝酒，而酒精在开始伤害身体之前就会连同汗水一起被排出体外，这种本事便是对他们生活的一种补偿。

---

[1] 《弄臣》，G.威尔第创作的意大利歌剧。

[2] 左拉，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批判作家，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有《萌芽》《娜娜》等。

第十二章

在酒店工作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在我给四楼的侍应打下手那天。我们在一间小餐具间干活儿，那里靠升降机与备餐间联系。待过了地下室，这里真是让人神清气爽，主要工作也就是擦拭银器和玻璃餐具，倒还像是人干的活儿。侍应瓦伦蒂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们俩独处时，他几乎平等地待我，尽管如果有人在场，他得对我恶语相向，因为侍应不能给洗碗工什么好脸色。要是哪天他赚得多了，还会给我五法郎的小费。瓦伦蒂仪表堂堂，今年二十四岁，但是看上去就像十八岁，他跟大多数侍应一样，仪态得体大方，深谙穿衣之道。他身着黑色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青春鲜活的面庞配上光泽亮丽的褐色头发，看上去就像个伊顿公学[1]的学生。不过从十二岁起他就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从贫民窟里一路打拼到了今天。他的经历曲折而丰富，先是没有护照偷渡过意大利边境，在北方的林荫大道上推着独轮车卖板栗，又因为在伦敦打黑工坐了五十天大牢，到酒店之后有个老富婆看上了他，送了他一枚钻戒，之后又指控他偷窃。空闲的时候我们会坐在升降机井边抽烟，我很喜欢跟他闲聊。

打扫餐厅的日子就是我的噩梦。我不用洗盘子，那是厨房的人干的活，我只需要负责盘子之外的餐具，包括银器、餐刀和玻璃餐具。尽管如此，一干就是十三个小时，算下来我一天要用三四十块洗碗布。法国旧时的洗碗方法只会让清洗餐具的工作量翻番。餐具架是什么？没听说过。肥皂片也没有，只有黏糊糊的软肥皂，在巴黎的硬质水里还打不出泡沫。我干活的地方是个肮脏拥挤的小屋，既是餐具间又是后厨房，直接连着餐厅。除了洗洗刷刷的工作之外，我还得给侍应送饭，伺候他们吃饭。大多数的侍应都傲慢无礼，让人难以容忍，不止一次，我得靠拳头才能让他们对我客气一点。通常做这活儿的是另一个女人，这帮家伙让她的生活痛苦不堪。

有时候四处打量这间肮脏狭小的后厨房，发现还挺有意思，想想看，餐厅跟我们中间就隔了一道双扇门而已。门的那边坐着顾客，一切光鲜亮丽——一尘不染的桌布、一盆盆的鲜花、镜子、镀金的檐口和画着小天使的壁画；而门的这边，距离仅仅几步之遥，我们这里脏得令人作呕，因为这间后厨确实脏得令人作呕。我们忙起来得到晚上才有空扫

地，地上都是肥皂水，混合着莴苣叶、碎纸片和被踩烂的食物。几个侍应脱了外衣，露出流汗的腋窝，他们坐在桌边搅拌沙拉，把大拇指插进奶油罐子里。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食物和汗水交杂在一起的味道。橱柜里的餐具后面，随处可见侍应们偷来的食品，也都脏兮兮的。后厨房只有两个水槽，没有洗手盆，所以经常能看到侍应在清洗餐具的水槽里洗脸，不过反正顾客看不见。餐厅门外有一张椰壳垫子和一面镜子，侍应通常会在那里精心打扮一番，好以干净整洁的形象出去示人。

侍应走进餐厅的画面很有启示意义。穿过门的一刹那，他身上的一切便忽然起了变化。肩膀一下子就挺起来了，什么灰尘啊不耐烦啊火气啊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他从地毯上轻轻走过，带着牧师一般肃穆的神色。我记得我们的副侍应领班，一个暴躁易怒的意大利人，他在餐厅门前停下大骂一个学徒，因为他打碎了一瓶酒。他高举拳头上下挥舞，不停大声嚷嚷（幸好门还有点隔音功能）。

“气死我了——你管自己叫侍应吗，小混蛋？去你妈的侍应！你连给你妈待的窑子擦地板都不配！下三滥！”

后来他找不出话说了，就转身走到门口，开门时最后骂了一句，就像《汤姆·琼斯》里面的威斯特恩乡绅[2]一样。

然后他走进餐厅，端着餐盘轻盈地走过大堂，优雅得像只天鹅。不出十秒钟，就看见他恭恭敬敬地对着一位顾客鞠躬。看着他那样训练有素的侍应在那里鞠躬赔笑，你不禁会想到，被这么一位贵族服侍，顾客会不会心生愧意。

洗碗的活儿从头到脚都让人生厌，不是说有多难做，而是乏味愚蠢到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地步。一想到有人要成年累月都干这份工作，我就觉得不寒而栗。我顶替的那位女工六十岁上下，每天要在水槽前站十三个小时，一周站六天，全年如此。另外，她还被侍应欺负得很厉害。她跟大家说她曾经是名演员，而实际上，我猜其实就是妓女而已。大多数的妓女最终都会沦为女佣。虽然她都到了这把年纪，生活落魄成这样，她还是带着淡金色的假发，涂着浓重的眼影，把脸画得像个二十岁的姑娘，看起来很奇怪。所以很显然，即便一周工作七八十个小时，人还是能剩下一些活力。

---

[1] 伊顿公学，著名英国贵族中学，仅招收13~18岁的男生。

[2] 《汤姆·琼斯》，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著，威斯特恩乡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性格粗暴专横，思想保守顽固。

第十三章

在我到酒店工作的第三天，人事经理把我叫了过去。他平时对我说话都挺和颜悦色的，那天却毫不留情面：“你，就是你！马上把你的小胡子给刮了！我的上帝，谁听说过洗碗工还留小胡子的？”

我正要表示抗议，他就打断了我：“洗碗工还留小胡子，真是胡扯！要是明天我看到你的胡子还在，你给我当心点！”

回家路上，我问鲍里斯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他耸了耸肩膀。“你得按他说的做，哥们儿。酒店里除了厨子，没人留小胡子。我还以为你已经注意到了。为什么？没为什么，这就是规矩。”

于是我明白，这是约定俗成的，就跟穿晚礼服不能配白领带一样，于是我刮掉了胡子。后来我才弄清楚这规矩的缘由，因为高级酒店里的侍应都不留胡子，他们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便勒令洗碗工也不能留胡子，而厨子偏要留胡子，以显示他们对侍应的不屑。

这就多多少少体现了酒店里微妙的等级制度。我们总共有大约一百一十名员工，等级划分就跟部队里的军衔一样细致。厨子和侍应比洗碗工高一等，如同上尉比列兵军衔高一样。经理是至高无上的，想炒谁就炒谁，厨子也不例外。谁也没见过老板，我们对他仅有的认识，便是给他准备的饭菜得比给客人的都精心。旅店里所有的纪律都靠经理维持，他是个认真负责的人，总是四处巡查看有没有人偷懒，但是我们对付他还是绰绰有余的。酒店里有一套完善的服务拉铃系统，全体员工拿它当做通风报信的工具，一声长，一声短，两声长，意思是经理要来了，一听到这样的信号，我们就立马装出一副很忙的样子。

经理下面一级是侍应领班。他不用伺候客人，除非是勋爵一类的人，他负责指挥侍应，并协助采购食品。他拿的小费加上香槟公司给的回扣（他退回一个瓶塞可得到两法郎），一天下来能有二百法郎。他并不怎么跟其他员工待在一起，有单独的用餐间，桌子上摆着银质餐具，还有两个穿着干净的白色短上衣的学徒伺候他。比侍应领班略低一级的是厨师长，一个月能领五千法郎。他在厨房吃饭，但是可以自己独享一张桌子，还有一个厨师学徒专门服侍他用餐。再接下来就是人事经理，

他一个月薪水只有五百法郎，但是他穿黑色外套，不用干体力活，还能解雇洗碗工、处罚侍应。再下一级就是一般的厨师，每个月的薪水从七百五十法郎到三千法郎不等。厨师下面是侍应，除了为数不多的底薪，每天还能挣大约七十法郎的小费。之后是洗衣女工和做缝补活儿的女工；侍应学徒次之，他们不能拿小费，但是每个月有七百五十法郎工钱。之后才是洗碗工，每个月也是七百五十法郎。然后是女佣，一个月五六百法郎。最末才轮得上我们这种在备餐间干活儿的，一个月才五百法郎。我们这些人就是这间酒店里底层的渣滓，没人正眼瞧我们，谁都不拿我们当回事。

还有许多分工不同的员工，有办公室文员，人们管他们叫信使，还有仓库保管员、酒窖管理员、搬运工人、门童、制冰工人、面包师、守夜人和门房。不同种族的人做不同的事情。办公室文员、厨子和缝补女工都是法国人，侍应是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巴黎几乎没有法国侍应这回事），洗碗工则涵盖了欧洲的所有人种，就差阿拉伯人和黑人了。法语是通用语言，连意大利人互相交谈都用法语。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生财之道。巴黎所有的酒店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把碎面包以八苏一磅的价钱卖给面包房，把泔水低价处理给养猪的，卖的钱由洗碗工平分。偷窃现象也很严重。侍应都偷吃的，实际上我几乎没见过哪个侍应会吃酒店提供的食物，厨子在厨房偷得更厉害。我们在备餐间偷喝茶和咖啡。酒窖管理员偷白兰地酒。酒店规定侍应不准存烈酒，要是有客人点，就得去酒窖管理员那里领。酒窖管理员每倒一杯酒，就会偷偷盛出大概一茶匙，时间一长就攒下不少。要是他信得过你，你花五苏就能在他那里喝上一大口那些偷来的白兰地。

员工当中也有小偷，你要是把钱落在外套口袋里，一般来说就都没了。门房负责给我们发薪水，搜我们的身，看谁偷了食物，但其实他才是整个酒店里最大的贼。我每个月只挣五百法郎，这家伙能在六周内骗走我一百一十四法郎。当时我要求酒店每天付我工资，所以门房每天晚上给我十六法郎，周日不给钱（当然本来是应该给的），这样就有六十四法郎进了他的口袋。另外，有时我周日加班，照理来说能多拿二十五法郎，而我压根儿不知道这么回事儿。这钱门房也没给过我，算下来就又是七十五法郎。直到最后一周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坑了，而我手里没有证据，所以只赔给我最后那个周日的二十五法郎。[1]脑子不够灵光的员工都被他这招给算计过。他说自己是希腊人，但其实是亚美尼亚人。认识了他之后，我才明白还是老话说得好：“相信毒蛇也别相信犹太

人，相信犹太人也别相信希腊人，相信希腊人也别相信亚美尼亚人。”

侍应里也有不少怪人。有一位年纪轻轻的绅士，上过大学，原本在一家商行里工作，收入颇丰。结果染上了花柳病，工作丢了，居无定所，现在当上了侍应，自认为已是万幸。很多侍应都是偷渡到法国的，有一两个还是间谍——不少间谍都靠做侍应当掩护。有一天，侍应用餐的餐厅里发生了可怕的争吵，吵架的是莫兰迪和另一个意大利人。莫兰迪两个眼睛分得很开，看面相绝非善类。吵架的缘由，似乎是因为莫兰迪跟那个男人的情妇有一腿。那个意大利人有些软弱，而且显然他很怕莫兰迪。他含糊不清地对着莫兰迪放狠话。

莫兰迪讥讽他：“好吧，那你要怎么着？我睡了你的女人，还睡了三次，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能干吗，嗯？”

“我要秘密向警察揭发你，你是个意大利间谍。”

莫兰迪没有否认。他只是从燕尾服口袋里摸出一把剃刀，在空气里快速地比划了两下，就像在划别人的脸一样。很快另一个侍应就把刀拿走了。

我在酒店里见过的最奇怪的家伙，是一个“编外人员”。有一回马扎尔人生病了，那个家伙来替他的班，一天二十五法郎。他是塞尔维亚人，二十五岁上下，身材结实，反应很快，能说六种语言，包括英语。他仿佛了解酒店里全部的工作，从早上到中午，他干活儿勤恳得像个奴隶。然后，时针一指到十二点，他的脸就拉了下来，开始偷懒、偷酒喝，最后甚至放肆到极点，公然叼个烟斗到处溜达。抽烟自然是不允许的，发现了要受重罚。消息传到了经理那里，经理火冒三丈，亲自跑下来审问这位塞尔维亚人。

“你他妈的抽烟到底是什么意思？”经理咆哮道。

“你他妈的拉这么个长脸又是什么意思？”塞尔维亚人平心静气地答道。

我没法形容这句话的杀伤力有多大。如果一个洗碗工敢这么跟厨师长说话，一定会被劈头盖脸地浇一锅热汤。经理立马就说：“你卷铺盖滚蛋吧！”于是下午两点，塞尔维亚人领了他的二十五法郎，如愿以偿地被炒了。在他走之前，鲍里斯用俄语问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塞尔维

亚人如是说：

“哥们儿，你得这么看，只要我干到中午，他们就得付我一天的工钱，不是么？那是法律规定。既然拿到钱了，还有什么必要干活儿呢？所以我跟你说，我到一家酒店当个临时工，老老实实工作到中午，然后十二点一到，我就开始故意滋事，他们没办法就只能炒了我。干净利落，不是吗？一般刚十二点半我就被炒了，今天拖到了两点半，不过无所谓，还是省了四个小时。唯一的麻烦就是一家酒店没法干两次。”

看起来，他在巴黎一半的酒店和饭馆都玩过这一招。这把戏在夏天大概还是比较容易得逞，不过酒店对这类人有所防范，通常还会有一份黑名单。

---

[1] 数据疑似有误，在此依据原文。

第十四章

没过多少天，我就领会了酒店运营的要义。任何第一次踏足酒店后勤区的人，都会被高峰时段可怕的嘈杂和混乱所震惊。酒店与商店、工厂那种平稳有序的工作非常不同，乍看之下，还以为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这种混乱局面，而实际上这样的情形没法避免，而且是酒店存在的根基。酒店工作并没多难，但因为工作的性质，干起活儿来总是匆匆忙忙，而且没法儿省事。举个例子吧，不能客人那边还没点单，你这边就提前俩小时把牛排烤好了。你得等到最后一刻才能动手，可到了那会儿，手边已经攒了一大堆的活，于是你就得手忙脚乱地同时完成这些活。结果就是到了用餐时间，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儿，这么一来，想要没有嘈杂、没有争吵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争吵是整个过程里不可或缺的环节，如果没人指责别人无所事事，工作效率是上不去的。所以在高峰时段，所有员工都像恶鬼那样火冒三丈恶语相向。那个时候，除了“操”之外再听不到其他动词。面包房有个姑娘才十六岁，嘴巴却比出租车司机还脏。（哈姆雷特不是还说过“像个帮厨那样骂人”的话吗？毫无疑问，莎士比亚一定见过帮厨干活的样子。）不过我们可没有失去理智，也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在相互激励，竭力把四个小时的活儿压到两个小时内完成。

支持酒店正常运作的，是每个员工对自己工作发自内心的骄傲之情，尽管工作本身既烦人又单调。如果有人偷懒，马上就会被其他人发觉，大家会一起出谋划策让他被炒掉。厨子、侍应和洗碗工尽管存在很大的分歧，但都同样对自己的高效率感到非常自豪。

不用说，酒店里最有手艺而且脾气最大的阶层就是厨师。他们挣得虽然没有侍应多，但声望更高，工作也比较稳定。厨师并不觉得自己是伺候人的，而是把自己看作手艺人，通常他们被称为“师傅”，可从来没人这么称呼过侍应。他们知道自己的能耐，一个餐厅是成也厨师、败也厨师，如果他的动作慢了五分钟，那后面就全都得乱套。他们瞧不起厨师之外的所有员工，羞辱等级低于侍应领班的所有人，觉得这样才有面子。他们打心底里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觉得自己像个艺术家。烹饪需要高超的技巧，不是说做饭本身有多难，而是难在能按点儿完成。在早餐和午餐时间段，X酒店的厨师长会接到几百份点菜单，每位顾客要

求的送餐时间还都不一样。厨师长很少亲自动手下厨，但是每道菜都是在他的指挥下完成，送到客人桌上之前他还要亲自把关。他拥有非凡的记忆力。点菜的单据就钉在板子上，但是厨师长几乎看都不看一眼，所有东西都在他的脑子里，精确到具体几分钟上菜他都记得。每做好一道菜，他就会大喊“小牛排一份，端走”，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从来没失手过。他的横行霸道让人受不了，但同时他又是个艺术家。比起女厨师，男厨师更受青睐，这是因为他们准时，而并非是在烹饪技艺方面有过人之处。

侍应的观念却大不相同。他们也为自己的技艺自豪不已，只不过他们的技术主要体现在伺候人上。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他们的心态不像手艺人，更像势利小人。他们的生活中永远充斥着有钱人，站在餐桌边，听富人对话，一脸阿谀奉承的微笑，小心翼翼地说一两句俏皮话拍人家马屁。他能尝到替人花钱的快感，不仅如此，他还总有机会发财，虽然大多数侍应到死都穷困潦倒，但他们时不时就会撞大运。林荫大道上的几家咖啡厅里，侍应都富得流油，他们甚至贴钱给老板让自己当侍应。结果就是，侍应们一方面能一直看到钱来钱往，一方面总想着发财，他们甚至都有点儿把自己当成客人。他们会竭尽全力服侍客人用餐，尽量做到优雅体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也参与了用餐。

我记得瓦伦蒂给我讲过，有一次他在尼斯的一次宴会上当侍应，那次宴会花了二十万法郎，被人们津津乐道了好几个月。“那真叫一个气派啊，老兄，气派得很！我的老天！那香槟，那银餐具，还有桌子上那兰花，我从没见过那么好的东西，那回可算是开眼了。啊，真是太完美了！”

“可是，”我说道，“你不就只是在那里伺候人吗？”

“当然了，不过真是壮观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永远不用为一个侍应难过。有时候，餐厅打烊都一个半钟头了，而你还坐在那里吃个不停，桌边站着的侍应已经疲惫不堪，你觉得他一定很鄙视你，其实不然。他盯着你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是“看这个撑得要死的蠢货”，他想的是“等哪天我赚够了钱，我也要跟他一样”。他正在服侍别人享受，一种他彻底了解且非常羡慕的享受。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几乎没有哪个侍应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业工会，还情愿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其实在不少咖啡馆里，侍应一天要工作十五个小时，全年无休。他们就是势利小人，觉

得侍候人的活儿让人心旷神怡。

洗碗工跟他们的观点又不一样了。他们的工作没什么前途，还累得要死，而且没有一丁点的技巧和乐趣可言。只要女人够结实，她们都能做得来。唯一的要求就是马不停蹄地一直忙活，忍受长时间的劳碌和拥挤的工作环境。他们摆脱不了这种生活，薪水微薄到攒不下一个子儿，一周六十到一百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让他们无暇接受其他职业训练。他们能指望的，也就是能找到个稍微轻松点的活儿，比如当个守夜人或是洗手间服务员。

不过，尽管洗碗工地位卑微，也依然有自己的骄傲。这是做苦工的骄傲，不管工作量有多大，他们都能胜任。到了那个地步，像头牛似的任劳任怨、不停工作便是他们身上唯一的美德。每个洗碗工都希望别人喊他们多面手，意思是不管别人让他做多么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都能想办法做到。X酒店厨房里有个德国来的洗碗工，是远近闻名的多面手。一天晚上来了个英国勋爵，愁坏了所有的侍应，因为勋爵想要桃子，可是酒店一个桃子都没有。当时天色已晚，商店都关门了。“交给我吧。”德国人说。接着他就出去了，十分钟之后他拿着四个桃子回来了，都是他跑到隔壁的餐厅里偷来的。这就是多面手的涵义。最后英国勋爵为每个桃子付了二十法郎。

马里奥是备餐间的负责人，他有着典型的苦工心态，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完成“活儿”。如果你埋怨任务太重，他会公开批评你。他在地下室工作了十四年，骨子里的所有惰性都给消磨光了，整天忙这忙那的像个活塞杆。“挺住”，一有人抱怨，他就这么说。经常能听见洗碗工在吹牛，说“我挺得住”，就好像自己是个军人，而不是男佣。

因此，酒店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荣誉感。一旦工作遇到压力，大家会团结一致共同渡过。各个部门之间为了保证效率，一直斗个不停，因为每个人都坚守自己的利益，拼命阻止其他人游手好闲或是顺手牵羊。

这是酒店工作好的一面。酒店里人手不足，却一直维持着整个庞大而复杂的机制不停运行，这都因为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职责，并且恪尽职守地完成各自的工作。但仍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员工做的工作并不一定是顾客花钱想买的。在顾客看来，花钱是为了得到优质服务，而在员工看来，拿工资是因为干了“活儿”，这“活儿”一般来说就是貌似提供了优质服务。结果就是，尽管酒店从不怠慢一分一秒，但是论起真正重要的

方面，这家酒店简直比最糟糕的私宅还差劲。

就拿清洁来说吧。前脚踏进后勤区的地界，后脚地上的灰尘就造反了。在我工作的备餐间里，黑暗的角落里成年累月地积着灰尘，面包柜里成群的蟑螂招摇过市。有一次我向马里奥建议杀杀蟑螂，结果被他呵斥了一番，“为什么要杀死这些可怜的小动物？”碰黄油之前我想先洗洗手，又被其他人嘲笑。不过如果我们发现清洁是“活儿”的一部分，我们也会打扫。我们使劲擦洗桌子，定期擦亮铜器，因为上面命令我们这么干。不过没人命令我们彻底打扫干净，而且也没有时间那么做。我们只是尽到自己的责任而已，而我们的首要责任是按时完成工作，于是就在卫生上省时间了。

厨房里还要脏。如果汤是给别人做的，法国厨师会朝里面吐口水，这不是什么修辞比喻，只是在陈述事实。他是个艺术家，可是他追求的不是清洁的艺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因为他是个艺术家，所以他才脏，因为菜要想看着美观，烹饪的过程就干净不了。比如说，当一块牛排送到厨师长那里检验，他可不是用叉子对付牛排。他用手指抓起牛排，摁在盘子上，大拇指在上面蘸一下，舔一下尝尝咸淡，再转一圈再舔一下，然后后退一步，认真地凝视牛排，就像艺术家在鉴赏一幅画作，之后用他粉红色的粗手指满怀怜惜地把它摆到合适的位置，他的每个手指头一早上能舔上百遍。等他满意了，就拿块抹布擦掉盘子上的手指印，然后交给侍应。当然，侍应也会把手指浸到肉汁里，他的手指油腻腻的，十分恶心，每天要从搽得油光锃亮的头发上抹过无数次。在巴黎，如果哪道荤菜价格超过十法郎，那我可以肯定，这道菜就被这样处理过。而廉价的小饭馆就不这样，那里的食物不需要那么麻烦，每道菜做好了都是用铲子直接从锅里捞出来，随便扔到哪个盘子里，没人去摆弄它。大致来说，你为一道菜付的钱越多，吃到的汗水和吐沫肯定就越多。

肮脏是酒店和餐厅的顽症，因为食物的卫生得给准时和美观让路。酒店员工为准备食物手忙脚乱，忙得都忘了这可是要吃的东西。一顿饭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执行“命令”，就像垂死的癌症患者对医生而言只是一份“病例”而已。如果有位顾客点了一片吐司，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某位忙得不可开交的员工就得准备它。然后他停下对自己说，“这片吐司可是要给人吃的，我必须得让它真的能吃才行”，这可能吗？他满脑子就是这片吐司必须卖相好，而且三分钟之内端上桌。大滴大滴的汗水从他的额头落到吐司上。他为什么要担心？之后吐司又掉到了布满脏锯

屑的地板上。何必要自找麻烦重做一份？把锯屑去掉要快得多。送上楼的路上吐司又掉地上了，还是抹黄油的那一面朝下，只需要再擦一下就行了。一切皆是如此对付。在X酒店，只有员工和老板的食物是干净的。每个人都不断重复一句话，“小心伺候老板，至于顾客，爱咋地咋地吧”。后勤区的每个角落都布满了令人作呕的污垢，像一道看不见的脉络，如同人体里的肠道，在酒店光鲜亮丽的外衣之下蜿蜒。

不仅仅是卫生条件恶劣，老板自始至终都在欺骗顾客。大部分的食材都非常劣质，不过厨师知道怎么化腐朽为神奇。肉类最多可算一般货，而蔬菜呢，好的管家在菜市场看都不会看一眼。按照惯例，奶油都是用牛奶稀释过的。茶和咖啡都用的次品，果酱是从没贴标签的大铁皮罐子里舀出来的合成品。至于葡萄酒，用鲍里斯的话来说，都是有股怪味的便宜货。酒店里有条规矩，员工弄坏的东西都要原价赔偿，这么一来，东西坏了很少被扔掉。有一次，三楼的一个侍应把一只烤鸡掉到了升降机井里，底下就是一堆垃圾，里面尽是面包屑和废纸之类的东西。我们也就是找了块布擦了擦，就又送上去了。楼上有各种恶心的故事，比如用过的床单洗都不洗，湿了湿水重新熨好就放回床上了。老板对自己人就跟对顾客一样抠门。偌大个酒店，居然没有一把刷子，没有一口平底锅，我们只能拿把扫帚举块板子将就着用。进了员工盥洗室就跟到了中亚差不多，连个洗手的地方都没有，要洗手就只能到洗餐具的水槽里。

尽管如此，X酒店依然是全巴黎最昂贵的酒店之一，顾客的消费高得惊人。住一晚的价钱通常是二百法郎，还不含早餐。烟酒的价格正好是普通商店里的两倍，老板进货当然是批发价。如果哪位顾客有贵族头衔，或者是个有名的百万富翁，那么他们的费用自然水涨船高。有一次四楼住进一个节食的美国人，早饭就要了盐和热水，这可把瓦伦蒂气坏了。“我的老天！”他说，“我那百分之十的服务费可怎么办？盐和水的百分之十！”就这顿早餐，瓦伦蒂要价二十法郎，那位顾客一声没吭就把钱付了。

按照鲍里斯的说法，全巴黎所有的酒店都是这样，或者至少所有大型高档酒店。不过我觉得X酒店的顾客尤其好骗，因为来的大部分是美国人，很少有英国人，法国人则压根儿一个没有，这些美国人好像对美食没有一点概念。他们会塞一肚子恶心吧唧的美国“燕麦片”，喝茶的时候配果酱，在餐后喝苦艾酒，花一百法郎点份“女王小鸡”，然后蘸着伍斯特辣酱油吃。有一位从匹兹堡来的客人，每天晚上在卧室用餐，就吃

葡萄干、坚果和炒蛋，喝可可饮料。这样的人上不上当也没什么区别。

第十五章

我在酒店里听过不少古怪的故事。有关于瘾君子的，有关于老色鬼常来酒店勾搭漂亮门童的，还有关于偷盗敲诈的。马里奥告诉我，他曾经在一家酒店待过，有个女佣从一位美国贵妇那里偷了一枚价值连城的钻戒。连着好些天，员工下班的时候都要被搜身，还来了两位探员把酒店搜了个底朝天，但是戒指愣是没找到。原来女佣的情夫在面包房工作，烤面包的时候把戒指藏进了面包卷里，所以直到调查结束，它都一直安然躺在那里，没人起疑心。

还有一次休息的时候，瓦伦蒂给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

“你知道的，哥们儿，这家酒店待着很舒服，但要丢了工作，那就是地狱。我想你该知道要是没东西吃会怎么样吧，嗯？你肯定知道，不然你也不会在这儿拼命刷盘子。好吧，我不是洗碗工这种穷鬼，我是个侍应，我曾经有一次连着五天都没吃东西。五天啊，连面包皮都没吃，我的老天！

“我跟你说，那五天真是糟透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提前付了房租。我住在拉丁区的圣埃洛伊塞街上的一间旅社里，旅社肮脏狭小，但是价钱便宜，名字叫做苏珊·梅，这是帝国时期一位名妓的名字。我一直挨着饿，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也去不成酒店老板招待应的咖啡馆，因为我身上连买杯饮料的钱也没有，我只好躺在床上，任凭自己越来越虚弱，看着虫子在天花板上爬来爬去。我可以告诉你，那种日子我是一天也不想再过了。

“到了第五天下午，我已经处于半疯癫的状态，至少现在看来是那么回事。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版画，是一个女人的头像，我开始好奇那是谁，过了一个钟头，我才意识到那肯定是圣埃洛伊塞，她是拉丁区的守护神。我之前从来没注意过墙上的这玩意儿，但当时，我躺在床上盯着它看，脑子里蹦出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想法。

“‘听着，亲爱的，’我对自己说，‘如果再这么下去，你就会饿死。你得做点什么才行，干吗不试试向圣埃洛伊塞祈祷呢？跪在地上祈求她施舍点钱吧。反正又不会有什么坏处，试试吧！’

“挺神经的吧？不过一个人要是饿疯了，没什么做不出来。还有就像我说的那样，反正又没什么坏处。我下床开始祷告。我是这么说的：

“‘亲爱的圣埃洛伊塞，如果您真的存在，请施舍我点钱吧。我要的不多，够我买点面包买瓶葡萄酒就行，好让我恢复体力。三四法郎就够了。如果这次您肯帮我，圣埃洛伊塞，我真是感激不尽。您要是真能给我点什么，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街上的教堂，为您点上一支蜡烛。阿门。’

“我提到蜡烛，是因为我听说圣人都喜欢别人点蜡烛纪念他们。当然，我是真的打算履行我的诺言。不过我是无神论者，我也不是真信会发生什么。

“然后我又回到了床上，五分钟之后，有人捶了一下门。捶门的是玛利亚，一个又高又胖的乡下姑娘，也住在这间旅店。她头脑简单，但是心肠很好。我也不是很介意她看到我当时的那副德行。

“她一看到我就失声大叫起来。‘我的上帝！’她说，‘你这是怎么了？大白天你在床上待着做什么？你这是什么样子！你都没个人样了，像具死尸。’

“可能我看着是不怎么样。我已经五天没吃东西了，差不多一直赖在床上，胡子也三天没刮了，脸也没洗。房间还跟以前一样，就是个猪圈。

“‘你这是怎么了？’她又问了一遍。

“‘怎么了！’我说，‘老天！我饿死了，我都五天没吃东西了，就是这么回事。’

“玛利亚吓坏了。‘五天没吃东西？’她说，‘可是为什么呢？你没钱了吗？’

“‘钱！’我说道。‘你觉得我要是有钱还会在这挨饿吗？我兜里就剩五个苏，所有东西都给当光了。你瞅瞅这屋子，还有什么东西能卖或者能当出去。如果你能找出一件能值五十生丁的东西，就算你比我聪明。’

“玛利亚开始在屋子里四处打量。她在散落一地的垃圾中戳戳这里，翻翻那里，然后一下子兴奋起来。她肥厚的嘴唇惊讶得没法合拢。

“‘你这个蠢货！’她大喊一声，‘白痴！看这是什么？’

“我看见她从墙角捡起一个空油壶，那是我几周之前买的，配着油灯使的，后来油灯也给卖掉了。

“‘那个？那是个油壶啊，怎么了？’

“‘白痴！为了这玩意儿你不是付了三个半法郎的押金吗？’

“是啊，当然了，我是付了三个半法郎。借油壶时，他们总要你付押金，还回去的时候押金才能拿回来。我给忘干净了。

“‘没错——’我刚一开口说话。

“‘白痴！’玛利亚又大喊了一遍。她兴奋得不得了，开始在屋子里四处跳舞，跳到后来，我觉得她的木屐都要把地板踩穿了。‘白痴！你这个大傻瓜！真是大傻瓜！除了把油壶送回去拿回押金你还能怎么办？三个半法郎就在你眼皮子底下，你居然还能饿肚子！白痴！’

“我真不敢相信，这五天来我一次也没想起来要把油壶送回店里。三个半法郎的现钞啊，我居然压根儿没想起来！我从床上坐了起来，‘快！’我对玛利亚大叫，‘你帮我还回去。把油壶拿到街角的杂货铺去，快，能跑多快跑多快，再给我带点吃的回来！’

“跟玛利亚都不用多说，她一把抓过油壶，咚咚咚冲下楼，动静大得像是一群大象跑过。不出三分钟她就回来了，一只胳膊下面夹着两磅面包，另一只胳膊下面夹着半升葡萄酒。我连谢谢都顾不上说，一把抓过面包张嘴咬了上去。饿了好久之后再吃面包是什么味道，你知道吗？又冷又湿，一股生面团味，就跟油灰差不多。但是我的老天，那对我就是人间美味！我一口气就把所有的酒喝了个精光，那酒仿佛直接注入我的血管，如同新鲜血液般在体内流动。啊，吃饱喝足之后确实不一样了！

“我把两磅面包一扫而光，一口气都没歇。玛利亚双手架在屁股上，站在那里看着我吃。‘感觉好点了吧？’吃完之后她这么问我。

“‘好多了！’我说，‘我感觉好得不得了！跟五分钟之前完全两样。现在我只想再要一样东西——一根烟。’

“玛利亚把手伸进她的围裙口袋里，‘你抽不了。’她说，‘你那三个半法郎就剩这么点了，七个苏，根本不顶用，最便宜的香烟也要十二苏一包。’

“‘那我抽得起！’我说，‘我的上帝啊，真是走大运了！我这还有五个苏，正好够。’

“玛利亚拿着这十二苏奔向烟草店。然后我想起了一件事，之前给忘得一干二净，就是倒霉的圣埃洛伊塞！我许诺过的，要是她能给我钱，我就要给她点根蜡烛。说真的，谁能说我的祈祷没实现？‘三四法郎就够了”，我就是这么说的，然后我就这么有了三个半法郎。这是没法逃避的事实，我应该花那十二苏去买蜡烛。

“我把玛利亚给喊了回来。‘用不着烟了，’我说，‘还有个圣埃洛伊塞要管呢，我许诺要给她点蜡烛的，十二苏得花到这上头。挺傻的，是不是？我是没法抽烟了。’

“‘圣埃洛伊塞？’玛利亚说，‘圣埃洛伊塞怎么了？’

“‘我之前向她祈祷，要是她能施舍给我钱，我就要为她点根蜡烛，’我说，‘她回应了我的祷告，不管怎么说吧，钱是来了，所以我得去买蜡烛。是挺烦人的，不过我可能还是应该遵守诺言。’

“‘可你是怎么想起圣埃洛伊塞的？’玛利亚问。

“‘因为她的头像，’我回答她，把事情的原委解释给她听。‘你看，她就在那里，’我把墙上的画像指给她看。

“玛利亚看着那幅画像，让我意外的是，她大笑起来。她笑得越来越厉害，不住地跺着脚走来走去，两手叉在粗壮的腰边，好像不扶着身子就会爆炸一样。我觉得她已经疯了，她笑了足足两分钟才能开口讲话。

“‘白痴！’末了她大喊一声，‘你这个傻瓜！大傻瓜！你想跟我说你真的跪下跟这幅画像祷告吗？谁告诉你这是圣埃洛伊塞的？’

“‘但我敢肯定这是圣埃洛伊塞！’我说。

“‘蠢货！这根本不是圣埃洛伊塞。你觉得这会是谁？’

“‘是谁？’

“‘这是苏珊·梅，这家旅社就是以她命名的。’

“我之前是在向苏珊·梅祷告，就是那位帝国时期的名妓……

“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难过。我和玛利亚大笑了一阵，然后聊了聊这件事，我明白了我什么都不欠圣埃洛伊塞。显然，回应我的祷告的并不是她，我也没必要给她买蜡烛了。所以最后我还是买了包烟。”

第十六章

时间一天天过去，让·克塔尔餐厅还是没有要开张的意思。一天下午休息的时候，我和鲍里斯过去看了看，发现改建工程还是一样也没完成，只不过挂上了几幅下流的贴画，讨债的从两个变成三个。老板招呼了我们，还是那么和气，然后立马向我（他未来的洗碗工）求助，借了五法郎。之后，我可以肯定这家餐厅也就是嘴上说说的事。不过，老板再一次把开业时间定在“从今天起的整整两周后”，还为我们引见了一位女士，开张以后她就是这里的厨师。她是俄国人，来自波罗的海边，身高只有一米五几，屁股得有一码宽。她告诉我们，沦落到做厨师之前自己是名歌手，艺术修养颇高，酷爱英国文学，尤其是《汤姆叔叔的小屋》[1]。

两周的时间里，我完全习惯了洗碗工的生活，几乎想不到任何别的事情。洗碗工的生活可以说是一成不变，每天早上五点四十五突然惊醒，胡乱把油腻腻硬邦邦的衣服套到身上，匆匆忙忙跑出去，顾不上洗脸，也顾不上不听使唤的肌肉。那会儿还是黎明，街上的窗户都还黑着，只有工人咖啡馆还亮着灯。天空像一面一望无际的深蓝色围墙，上面粘着黑纸剪成的屋顶和尖塔。哈欠连天的清洁工拿着十英尺长的扫帚在清扫人行道，衣衫褴褛的几户人家在翻垃圾箱。工人，还有一手拿巧克力一手拿羊角面包的姑娘们涌进了地铁站。载着更多工人的有轨电车隆隆驶过，那场景让人心情压抑。我急忙冲进车站，拼命挤上车，要乘早上六点的巴黎地铁绝对要拼上老命，挤在一大群乘客之中随着车身来回摇晃，跟一些面目丑陋的法国人鼻尖儿挨着鼻尖儿，他们的呼吸里带着酒和大蒜的酸臭气。出了地铁就一头扎进迷宫般的酒店地下室，直到下午两点才能重见天日。那时候，炙热的太阳烘烤着大地，地上乌压压的都是行人和车流。

在酒店干了一周之后，我经常利用下午休息的时间补觉，有钱的时候就泡在小酒馆里。除了一小部分颇有上进心的侍应会去上英语课，所有的酒店员工都跟我一样无所事事，早上一通忙活之后，大家都懒得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有时候，六个洗碗工会结伴去逛西耶斯街一个相当差劲的窑子，那里每次只收五法郎二十五生丁，相当于十个半便士，被戏称为“定价”，那些大家伙们经常把自己在那里遇到的事情当笑话来讲。

那里是酒店工人最喜欢的约会场所，因为就洗碗工这点薪水，结婚是肯定不够的，而且在地下室工作的人，也没条件挑三拣四的。

接下来的四个小时我们待在地下室，之后满头大汗地走到凉爽的大街上。路灯发出奇怪的紫光，这是巴黎路灯特有的光，河那边的埃菲尔铁塔，从上到下弯弯曲曲地亮着广告牌，如同一条巨大的火蛇。车流悄无声息地划过，女人们在拱廊下踱来踱去，昏暗的灯光将她们的面庞衬得十分秀丽。偶尔会有女士瞟到我或鲍里斯，但是一看到我们油腻腻的脏衣服后，眼神便匆匆移开了。晚上十点，另一场回家的地铁大战又打响了。一般来说，从晚上十点到午夜这段时间，我都待在我们这条街上的小酒馆里，小酒馆开在地下，阿拉伯苦工喜欢来这里。这可不是个打架的好地方，有时候能看见有人扔酒瓶子，有一次还引起了可怕的后果，但有一条规矩，阿拉伯人只准窝里斗，不会招惹基督徒。拉基酒是种阿拉伯酒，价钱相当便宜。小酒馆二十四小时不打烊，因为那群幸运的阿拉伯佬就有本事白天干一天活儿，晚上还能喝一宿酒。

以上就是洗碗工每天的生活，那时候感觉倒也不坏。我没觉得自己穷，因为就算付了房租，攒够烟钱、上下班路费和星期天的饭钱之后，我每天还能余下四法郎喝酒，有四法郎就算有钱人了。这种感觉很难用言语表达，当生活已变得如此简单，便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满足感，大概吃饱喝足的野兽会有这种感觉。没有什么比洗碗工的生活更简单不过的了。生活节奏就在上班和睡觉之间来回切换，没有时间思考，对外面的世界也没什么感觉。对一个洗碗工而言，巴黎的范围缩小到了仅剩酒店、地铁、小酒馆和床。就算他出远门，也只是去到几个街区之外的地方和某个女仆约会，让她坐在他的膝头吃牡蛎喝啤酒。不上班的时候，他就一觉睡到中午，穿件干净衬衫，跟人掷骰子赌酒喝，吃完午饭再回床上睡觉。对他而言，除了干活儿、喝酒和睡觉，其他事情都不怎么现实，其中睡觉又是重中之重。

有一天晚上，刚过午夜时分，我房间窗户下面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我被一阵可怕的叫喊声吵醒，我走到窗前，看见一个男人平躺在楼下的石头路面上，凶手一伙三人飞快消失在街角。我们几个下了楼，发现那个男人已经死了，一截铅管砸裂了他的头骨。我还记得他的血的颜色，是诡异的紫红色，就像葡萄酒。那天晚上我回房间之后，血依旧残留在鹅卵石路面上，有人说好几英里之外的学生都专门跑来看。但回想起这件事，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凶杀案发生之后不到三分钟，我就回床睡觉了。我们那条街上的大多数人也是如此，我们只是跑去确认那人的

确死掉了，然后就直接回去睡觉。我们是要工作的人，为了谋杀案牺牲睡觉时间有什么意义？

在酒店工作让我明白了睡觉的真正价值，就像挨饿让我明白了食物的真正价值一样。睡觉不再是简单的生理需求，而是近似感官享受，与其说是休息，不如说是纵情享乐。我再也没为房间里的虫子犯过愁，马里奥教了我一招，特别管用，就是在铺盖上撒一层厚厚的胡椒粉。虽然搞得我一直打喷嚏，但虫子都很讨厌胡椒粉，全跑到别人房间去了。

---

[1]《汤姆叔叔的小屋》，美国文学著作。

第十七章

我每周会花三十法郎喝酒，这样便能参与这一带的社交生活。每逢周六，我们会在三雀旅店楼下的小酒馆里，度过其乐融融的夜晚。

小酒馆有十五平方英尺，地板是砖砌的，满满当当挤了二十个人，烟雾缭绕，光线晦暗。小酒馆里的嘈杂声震耳欲聋，因为人们扯着嗓子不是在讲话就是在唱歌。有时候各种乱七八糟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有时候所有人会突然开始合唱一首歌，唱的可能是《马赛曲》《国际歌》《玛德隆歌》或是《草莓和覆盆子》。有个叫阿萨娅的大个儿乡下姑娘，每天在一家玻璃厂上十四个小时的班，她唱了一首歌，歌里讲什么“他丢了裤子，只会跳查尔斯顿舞”。阿萨娅的朋友玛丽奈特是个又黑又瘦的科西嘉女孩，脾气很犟，她把双膝绑在一起，跳了段肚皮舞。罗吉耶老两口进进出出，到处跟人讨酒喝，还老想给别人讲一个又臭又长的故事，说有人骗过他们一个床架子。R先生面色惨白，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默默地灌酒。查理完全喝醉了，半是跳舞、半是踉跄地来回晃悠，一只胖手试图端稳一杯劣质苦艾酒，另一只手在女人的胸前占点小便宜，同时嘴里还朗诵着诗歌。人们靠比赛玩飞镖和掷骰子来赌酒喝。曼纽埃尔是个西班牙人，他会拽几个姑娘到酒吧里，在她们的肚子上晃骰子盅，说这样能带来好运。F太太站在吧台里面，快速往锡质漏斗里倒光一瓶又一瓶葡萄酒，她手边总有一块湿抹布，因为酒馆里的所有男人都想跟她发生点关系。大个儿瓦工路易的两个私生子也在，俩人坐在角落里分一杯果子露。大家都兴高采烈，坚信这世界是个好地方，我们是一群显要人物。

过了一个多小时，这样的嘈杂声仍丝毫没有减弱。到了大约午夜时分，有人尖叫一声“人民啊！”，接着传来椅子落地的声音。一个金发红脸的工人站起来，砰的一声在桌子上砸了个酒瓶子。大家停止唱歌，纷纷说道：“嘘！弗莱克斯又开始了！”弗莱克斯是个怪人，来自利穆赞，是个石匠，他老老实实上一个礼拜班，一到周六就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大发酒疯。他丧失了一部分记忆，战前的事情一概不记得，要不是F太太看着他，他早就喝酒喝得小命不保了。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前后，F太太会找人“拦着弗莱克斯，别让他把工资都败光了”，等他被人拦着了，她就会把他的钱都拿走，留下几个散钱只够他喝一杯好酒。有一个星期

没能拦住他，结果他跑到蒙日广场喝了个烂醉，被车撞了，伤得不轻。

弗莱克斯身上有一点很奇怪，清醒的时候他是个共产主义者，可一旦喝醉了就会变成激昂的爱国者。晚上刚开始，他净说些美好的共产主义原则，四五升酒下肚之后，他就成了激进的沙文主义者，指责间谍，叫嚣着要跟所有外国人打架，如果这会儿不阻止他，他就开始扔酒瓶子。到了这个点上，他就会发表爱国演讲，每个周六晚上都是如此。演讲的内容总是如出一辙，连个词儿都不改：

“共和国的公民们，这里有法国人吗？如果有的话，我要站出来提醒你们，实际上，我要提醒你们战争年代的光辉岁月。当我们回首往事，回首当年的同志情谊和英雄主义——实际上，回首的就是当年的同志情谊和英雄主义。我们还记得牺牲的英雄，实际上，我们记得牺牲的英雄。共和国的公民们啊，我在凡尔登战役中负过伤——”

说到这，他会撩起衣服，给大家展示他在凡尔登战役中留下的伤疤。于是便会有人给他鼓掌喝彩。我们都觉得，弗莱克斯的演讲是全世界最滑稽的事情。他是这一区出名的景观，其他小酒馆里的人经常特地跑来看他发酒疯。

人们互相窃窃私语，逗着弗莱克斯上钩。有人向大家使眼色，让大家保持安静，然后邀请弗莱克斯唱一曲《马赛曲》。他唱得很好，优美的男低音很好听，一唱到“拿起武器吧，公民们！列好队！”的时候，胸腔深处还会发出充满爱国之情的呜咽声。货真价实的眼泪顺着双颊流下来，他醉得太厉害了，都没看出大家是在嘲笑他。在他快要唱完的时候，两个壮实的工人走出来，一人抓住他的一只胳膊把他撂倒，阿萨娅站在他刚好够不着的地方大喊“德国万岁”。受到这样的侮辱，弗莱克斯一下子变得脸色铁青。小酒馆里的人开始一起大喊“德国万岁！打倒法国！”，弗莱克斯挣扎着要起来抓住他们。不过他会忽然毁了我们的兴致，他变得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四肢也瘫软无力，还没等我们拦住他，他就吐了一桌子。然后F太太过来，像扛麻袋似的把他拖到床上。第二天早上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安安静静，彬彬有礼，还买了一份《人道报》。

那张桌子被抹布擦干净后，F太太又拿来几瓶一升装的酒和几条面包，我们开始正儿八经地喝酒，大家唱歌唱得更起劲了。一个流浪歌手带着班卓琴走进来，五个苏表演一次。一个阿拉伯人和街上另一家小酒馆里的一个姑娘跳了段舞，那男的来回挥舞一个彩绘的木质男性生殖

器，大小跟擀面杖差不多。这会儿小酒馆里的喧嚣声时不时会停顿一下，人们开始聊天，聊艳遇，聊战争，聊在塞纳河上钓鲃鱼，聊闹革命的最佳方式，还会讲故事。查理的酒又醒了，截住了人们的话头，就他自己的灵魂问题发表了五分钟的看法。门窗都打开了，给屋子里送进了凉风。街上空空荡荡，能听见远处的送奶车沿着圣米歇尔大道前进的隆隆声。冷风拂过我们的额前，粗制滥造的非洲酒尝起来还是很可口，我们依旧很高兴，但是心里装了心事，再没有兴致叫嚷或搞笑了。

到了凌晨一点钟，我们不再高兴，感到周六晚上的快乐正渐渐溜走，于是急急忙忙继续叫酒喝，可F太太开始往酒里兑水，因而酒的味道变了。男人们脾气越来越差。姑娘们被人粗暴地亲嘴，胸部被人乱掐，于是她们匆匆离开，以免遇上更糟的事情。大个路易，就是那个瓦工，彻底喝醉了，趴在地上汪汪乱叫，以为自己是条狗。别人开始烦他，他一经过就踢他。大家互相抓住胳膊，没完没了地吐露心声，要是发现别人没在听还要发火。人群慢慢散了。曼努埃尔和另一个赌棍到街对面的阿拉伯小酒馆去了，那边可以打牌打到天亮。查理忽然问F太太借了三十法郎就消失了，应该是逛窑子去了。大家干了自己杯里的酒，说了一句“女士们，先生们！”，就回房睡觉去了。

一点半的时候，最后一滴欢乐也蒸发了，除了头疼什么也没有留下。我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什么美好世界的美好居民，只是一帮工资少得可怜的工人，一帮肮脏凄惨的醉鬼。我们还在继续灌酒，不过仅仅是出于惯性，酒在嘴里一下子变得令人作呕。脑袋感觉胀得像气球，地板开始摇晃，舌头和嘴唇都给染成了紫色。最后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继续了。几个人跑到小酒馆的后院里去呕吐。我们爬回各自床上，衣服半脱地栽进被窝，一觉睡上十个小时。

大部分的周六晚上我都是这么度过的。总的来说，有那么两个小时里，心情好得不得了，好像后来的头疼也值了。对于住在这一带的很多单身汉来说，既然未来无望，每周跟大家一起喝酒正是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第十八章

一个星期六晚上，查理在小酒馆给我们讲了个精彩的故事。想象一下他当时的样子吧：尽管醉醺醺的，可又足够清醒到能滔滔不绝。他咣咣敲打镀锌的吧台，大叫着让大家安静：

“安静，女士们，先生们！静一静，求你们啦！我要给你们讲个故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一段精致、文明的生活的纪念。静一静，女士们先生们！

“那个时候，我手头有点紧。你们知道没钱是什么样的，真是糟糕，一名优雅的绅士竟会落到那般境地。家里的钱还没寄到，东西都给当光了，除了工作再没别的选择，而我打死也不想工作。那时候我跟一个姑娘住在一起，她叫伊芙娜，是个不错的乡下姑娘，傻乎乎的，有点像阿萨娅，黄头发，腿很粗。我们连着三天没吃东西。我的老天，真是遭了大罪了！伊芙娜老是捂着肚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嚎得像条狗似的，说她快饿死了。那日子真是糟透了。

“不过对于一个聪明人来说，一切皆有可能。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不用干活儿的话，什么法子来钱最容易？’答案马上就出来了，那就是女人，‘要想来钱容易，你得是个女人，哪个女人没有点能卖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想，我要是个女人会怎么办，于是我有了个主意。我想起了政府办的妇产医院，你们知道政府办的妇产医院吧？孕妇可以到那里免费领取食物，还不用接受盘问。这么做是为了鼓励妇女生育。任何女人都可以去那里要吃的，而且马上就能拿到。

“‘我的老天！’我想，‘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我一天换一个地方吃。反正又不检查，谁知道到底有没有怀孕呢？’

“我对伊芙娜说，‘快别叫了，我想到上哪儿弄吃的了。’

“‘上哪儿？’她说。

“‘很简单，’我说，‘就去政府办的妇产医院，告诉他们你怀孕了，需要食物，他们就会给你吃饭，而且不会问东问西。’

“伊芙娜大吃一惊，‘可是，我的上帝。’她大叫起来，‘可我没有怀孕啊！’

“‘谁管啊？’我说，‘那还不好办，拿个垫子冒充一下不就完了，不行的话拿两个。这可是天赐良机啊，亲爱的，机会难得别错过了。’

“最终我说服了她，我们借了一个垫子，准备妥当后带她去了妇产医院。他们热情接待了她，给她吃白菜汤、炖牛肉、土豆泥、面包、奶酪和啤酒，还传授了各种育婴知识。伊芙娜狼吞虎咽地吃个不停，直到快要把自己撑爆了，还想办法偷了点面包奶酪装在口袋里带给我。我每天都带她过去，直到我又有钱了。我的聪明才智救了我们俩。

“本来一切都挺顺利，结果一年后出岔子了。那时我和伊芙娜复合了，一天我们沿着皇家港口大道散步，走到兵营附近的时候，忽然伊芙娜的嘴巴大张，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妈呀！’她叫出了声，‘看那是谁来了！是那家妇产医院的护士，我完蛋了。’

“‘快！’我说，‘快跑！’可惜太晚了。护士认出了伊芙娜，笑盈盈地径直向我们这边走来。她又高又胖，带着一副金丝边夹鼻眼镜，脸颊红润得像个苹果，是那种很有母性、很爱多管闲事的女人。

“‘我希望你还好，我的孩子？’她和善地问道，‘你的宝宝呢，他还好吗？生的是男孩吧？你们不是想要个男孩吗？’

“伊芙娜全身发抖，我不得不抓住她的胳膊。‘不是。’最后她说了这么一句。

“‘啊，那不用说，是个女孩吧？’

“于是伊芙娜这个白痴的脑子彻底乱了。‘不是。’她竟然又说了一遍！

“护士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她大声说，‘又不是男孩又不是女孩！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大家自己想想吧，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可是危险时刻。伊芙娜的脸已经变成甜菜根的颜色了，眼看着就要哭出来了，下一秒没准儿她

就把实情说出来了。天知道那样会发生什么。但我呢，脑子还很清晰。我挺身而出挽救了局面。

“‘她生的是双胞胎。’我平静地说。

“‘双胞胎！’护士惊呼一声。她高兴得不得了，大庭广众之下扶着伊芙娜的肩膀，亲吻她的双颊。

“‘没错，是双胞胎……’”

第十九章

有一天，在X酒店干了五六个星期之后，鲍里斯忽然不声不响地消失了。晚上，我发现他在里沃利街等我，他兴高采烈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终于自由了，哥们儿！明天早上你去辞职吧，餐厅明天要开业了。”

“明天？”

“嗯，可能我们还要花一两天准备准备。不过不管怎么说，再不用管什么备餐间了！咱们要发达了，兄弟！我都已经把燕尾服给赎回来了。”

鲍里斯过于兴高采烈，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而且我一点也不想放弃酒店安逸稳定的工作。可是我之前答应过鲍里斯，所以我还是辞了职。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去了让·克塔尔餐厅。门上了锁，我只好去找鲍里斯。他又被房东撵了出来，在尼瓦赫十字街找了个住处。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睡觉，身边还躺着个姑娘，是前一天晚上找来的，他说这姑娘“很有同情心”。鲍里斯说餐厅已经准备就绪，再收拾几样小东西就可以开业了。

早上十点钟，我才想办法把鲍里斯弄出被窝，然后到餐厅开锁进门。只瞟了一眼，我就明白“几样小东西”有多少了。简单来说是这样的：装修改造从我们上次来这之后纹丝没动，厨房炉灶还没送来，水电线路还没接上，各种粉刷打蜡和木工活等着人来做。除非奇迹出现，不然这家餐厅根本不可能十天之内开张，单从店里的东西来看，感觉没等开张就会垮掉。显而易见这是怎么回事，老板手头紧，于是雇了员工（总共四个），好当工人使唤。我们几乎是免费替他干活，因为侍应没有薪水，尽管他要给我发工资，可餐厅开张前他都不用管我的饭。事实上，他这样提前好几天喊我们来，相当于骗了我们几百法郎工钱。我们啥也没图上，还因为这个丢了之前的好工作。

可鲍里斯却充满希望。他满脑子就一件事，就是他终于又有机会当

侍应穿燕尾服了。抱着这种信念，他很乐意白做十天工，哪怕最后可能丢了工作。“耐心些！”他不停这么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餐厅一开张，我们就能赚回来。耐心些吧，兄弟！”

我们的确需要耐住性子，因为日子一天天过去，餐厅一点进展也没有。我们几个清理了地窖，修好了储物架，粉刷了墙面，给木器打蜡，用石灰水抹了天花板，给地板上了色，但是排水管道、煤电供应的重头戏还没动，因为老板付不起钱。不用说，他兜里一分钱都没了，因为他连零钱都不肯给。有人问他要钱的时候，他还会耍瞬间消失的把戏。他动作很快，还带着贵族的派头，所以很难对付。愁容满面的讨债者整天找他，根据指示，我们要说老板在枫丹白露或圣克劳德，或其他什么地方，保证远得找不着就行。与此同时，我越来越吃不饱了。离开酒店的时候我还有三十法郎，现在我不得不回到只吃面包的日子。一开始，鲍里斯想办法从老板那里预支了六十法郎的薪水，但他花了一半用来赎回当侍应要穿的衣服，又在那个有同情心的姑娘身上花了另一半。还有个侍应叫朱尔斯，鲍里斯每天从他那里借三法郎买面包。有些日子我们连烟钱都没有。

有时候，厨师会过来看看事情的进展。每次一看到厨房连陶罐和平底锅都没有，她就要抹眼泪。朱尔斯始终不肯帮我干活儿。他是马扎尔人，肤色有点黑，身材瘦削，戴着眼镜，很是健谈。之前他是医学院的学生，因为没钱辍了学。他喜欢在别人干活的时候讲话，把他自己的老底和想法一股脑地倒给了我。他好像是个共产主义者，一肚子的奇谈怪论（他会用数据证明工作是错误的），跟大多数马扎尔人一样，他有强烈的自豪感。心高气傲的懒人是当不了好侍应的。朱尔斯最喜欢的吹牛段子是说，有一次一家餐厅的客人羞辱了他，他就顺着那位客人的脖子倒了一盘热汤，然后不等别人撵他，自己径直走出了餐厅。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朱尔斯越来越对老板耍的小把戏感到气愤。他气急败坏地滔滔不绝，像在发表演说。他经常挥着拳头走来走去，想煽动我也不要工作。

“把刷子放下，你个蠢货！你我都来自骄傲的民族，我们跟那些该死的俄罗斯农奴不一样，我们从不白出力气。我跟你说，上这样的当对我来说就是折磨。我这辈子碰见过几次，有人想骗我钱，哪怕是五个苏，我也会吐！没错，因愤怒而呕吐！

“另外，我的朋友，别忘了我是共产主义者，打倒资产阶级！有人

见过我在能躲避干活的时候干活吗？没有。而且我不仅不会像你们这群傻瓜一样，把自己累得精疲力尽，我还要偷东西，就是为了证明我不需要靠任何人。我之前在一家餐厅干过，那个老板觉得能把我当条狗来使唤。好吧，为了报仇我想了个办法，从罐子里把牛奶偷出来再把口封好，还不会被人发现。我跟你说，我每天早晚都猛喝牛奶，每天要喝上四升，还要吃半升奶油。就凭那个老板的脑子，打死他也想不出来牛奶去哪了。不是我想喝牛奶，你明白吧，因为我恨那玩意儿。这是原则问题，就是原则问题。

“过了三天吧，我肚子开始疼得要命，就去看医生。‘你平时都吃什么？’医生问。我说：‘每天喝四升牛奶，吃半升奶油。’‘四升！’医生说，‘赶快别这么吃了，再这么下去你就完了。’‘我在乎什么？’我说，‘原则就是一切。我就要继续喝牛奶，喝死也要喝。’

“第二天我就被老板抓了个现行。‘你被炒了，’他说，‘这个周末你就滚蛋。’‘不好意思，先生，’我说，‘我现在就走。’‘不，你走不了，’他说，‘周六之前我不会放你走。’‘很好，我的老板’，我心里默默想，‘我们看看谁先受不了。’然后我就开始到处打烂餐具。第一天我摔了九个盘子，第二天十三个。这么来了一出，老板很高兴看见我滚蛋走人。

“啊，我可不是你们这群俄罗斯乡巴佬。”

十天过去了，真是太糟了。我是真的身无分文了，房租也拖了好些天了。我们在空空荡荡、一派萧条的餐厅里闲晃，饿得连剩下的活儿都做不动。现在，只有鲍里斯一个人相信餐厅会开张。他一心要当侍应领班，还发明出一种理论，说是老板的钱给套在股市里了，他正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抛售。到了第十天，我饭也没得吃，烟也没得抽，我跟老板说，要是不给我预支薪水我就罢工。老板还是一如既往的和气，答应给我预支薪水，然后采取了他一贯的做法，溜之大吉。我朝着家里的方向走了一段路，但我觉得如果F太太要我付房租，我肯定没法应付，所以就在大街的长椅上凑合睡了一晚。睡长椅很不舒服，椅子扶手会硌在背上，而且天气比想象中要冷。从黎明到上班之前我都无所事事，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胡思乱想，觉得自己真是傻得可以，才会任由那群俄罗斯人摆布。

接着，到了早上，终于转运了。显然老板跟他的债权人达成了某种共识，因为他兜里揣着钱来了，还预支了我的薪水。我和鲍里斯买了通

心粉和马肝，这是十天来我们吃的第一顿热饭。

工人也请来了，改建也完成了，工赶得很快，质量也差得惊人。举例来说，桌子上本来要盖台面呢，可是老板发现台面价格不菲，就改用废弃的军毯，上面的汗味怎么也去不掉。当然，军毯上还会盖桌布（方格图案，为了搭配“诺曼”装修风格）。到了最后一晚，我们一直忙活到凌晨两点，才把一切准备妥当。餐具到八点才送来，因为是全新的，所以都需要清洗。刀具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送来，亚麻布也是，所以擦餐具的时候，我们只能用老板的一件衬衫和门房的一个旧枕套。我和鲍里斯把所有的活儿都包了，朱尔斯鬼鬼祟祟不知在干什么，老板夫妇坐在吧台里，跟一个讨债的和几个俄罗斯朋友一起喝酒预祝餐厅成功。厨师在厨房里，伏在桌上哭，因为她要做五十个人的饭，可厨房的罐子和平底锅都不够十个人的量。大约到了午夜，我们跟几个讨债的来了次颇为惊悚的正面交锋，他们打算拿走老板赊来的八个铜锅。最后我们塞给他们半瓶白兰地，把他们打发走了。

我和朱尔斯错过了回家的最后一班地铁，只好睡在餐厅的地板上。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就看见两只老鼠待在厨房桌子上啃火腿。这可不像什么好兆头，我比之前更加笃定，让·克塔尔餐厅会以失败告终。

第二十章

老板雇我当洗碗工；也就是说，我的工作包括：洗餐具、打扫厨房、洗菜切菜、泡茶、煮咖啡、做三明治、干些简单的烹饪活儿，以及跑跑腿。按照惯例，我的报酬是每个月五百法郎并且包吃，但没有休息日，工作时间也不固定。在X酒店，我见识到了餐饮业中的佼佼者，那靠的是无限的资金投入和良好的运营管理。如今，在让·克塔尔餐厅我了解到了糟糕透顶的餐厅是如何运作的。花点笔墨去描绘这些是值得的，因为全巴黎有几百间类似的餐厅，任何游客都难免偶尔进入其中一家用餐。

顺便多说一句，这间餐厅不是学生和工人常去的那种普通低档餐馆。想要在这里填饱肚子至少得花上二十五法郎；我们的餐厅环境优雅，富有艺术气息，这提高了我们的社会地位。吧台那里挂了几幅不太雅观的图画，餐厅里随处可见诺曼风格的装潢——墙上的假梁，烛台状的电灯，“农家”陶器，甚至在门口还有一块垫脚石——另外，老板和侍应领班都是前俄国军官，很多顾客都是有贵族头衔的俄国流亡者。一句话，我们餐馆毫无疑问是一间时髦餐馆。

尽管如此，厨房门后的景象说它是猪圈也不为过，我们后勤区的情况是这样的：

厨房长十五英尺，宽八英尺，一半的空间都被炉灶和桌子占据。所有的壶啊罐啊都要放到手够不着的架子上，厨房只够地方放一个垃圾桶，而且一到中午就塞满了垃圾。地面上总是堆着一英寸厚被踩烂了的食物。

至于厨房用火，我们只有三台煤气炉，没有烤炉，大块的肉都要送到外面的面包店去烤。

餐厅没有食物储藏室，我们就用院子里只有半个顶棚的小棚子代替，棚子中间还有一棵树。肉、蔬菜等东西就这样放在地面上，老鼠和猫都会来偷吃。

餐厅里面没有热水供应，洗餐具的水要在平底锅上加热，但一做菜

就不够炉子烧水，所以多数餐具还是要用冷水洗。再加上软肥皂和巴黎的硬水，这一切意味着要用小片报纸才能刮掉餐具上的油。

我们很缺长柄锅，所以每用完一个我就得马上清洗，不能留到晚上才洗。单单这一项工作，每天就要花掉我大概一个小时。

因为安装时能省则省，餐厅电灯的保险丝总在晚上八点就烧掉。老板只准我们在厨房点三支蜡烛，厨师说三这个数字不吉利，所以我们只能点上两支。

我们的咖啡研磨器是问附近一间小酒馆借的，垃圾桶和扫帚也是向门房借的。第一周后，好些块布送去洗后没送回来，因为没付钱。劳工督察也来找我们麻烦，因为他发现员工里没有法国人。他与老板私底下谈了几次，我想老板肯定有塞钱给他。供电公司仍在催我们交钱，催款的每天早上都会来，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会用开胃酒收买他们。我们还欠了杂货店钱，本来我们已经没法赊账了，但杂货店的老板娘（一个长唇髭的六十岁女人）很喜欢朱尔斯，朱尔斯便每天被派过去哄她。与此类似，我每天还要在商业路上浪费一个小时为了几个菜钱讨价还价，就为了节约那么几个生丁。

这些就是资金不足开餐馆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要求我和厨师每天做三四十桌饭，后来还要做一百桌。从第一天起我们就吃不消。厨师从早上八点工作到午夜，我从早上七点工作到深夜十二点半——十七个半小时，几乎没有休息。直到下午五点我们才能偷闲坐下歇一会儿，可除了垃圾桶都没别的地方可坐。鲍里斯住在餐馆附近，不需要赶地铁回家，他从早上八点干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每天十八个小时，每周七天。这样的工作时间虽不正常，但在巴黎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生活很快变得规律枯燥，这让我觉得在X酒店工作就像度假一样。每天早上六点我就逼自己起床，不刮胡子，有时洗把脸就赶到意大利宫地铁站抢座位。七点钟的时候，我就已经身处又冷又脏的厨房，周围一片狼藉，土豆皮、骨头、鱼尾都被乱扔在地上，一大堆油腻的盘子黏在一起，放了一整晚等着刷洗。因为水冷，我还不能开始刷盘子。我得先拿牛奶、煮咖啡，因为别人八点到，指望一来就能喝上咖啡。另外还总是有几口铜锅要洗。那些铜锅是洗碗工生活的痛苦之源。它们得用沙和链条擦洗，十分钟洗一口，洗完要用亮铜剂抛光外部。幸好铸造这种铜锅的手艺已经失传，越来越少的法国厨房里有这种锅子，不过还是能买到二手的。

我刚开始洗盘子，厨师便会叫我先剥洋葱；我开始剥洋葱了，老板就会喊我出去买卷心菜；我买完卷心菜回来，老板娘会叫我到离店半英里远的商店买盒胭脂。等到我做完这些回来以后，还有更多的蔬菜等着我洗，可是盘子还没有刷。就这样，因为能力有限，一整天里我们什么活都没干完。

到十点钟，工作才相对轻松一些，尽管我们干得很快，但没人发脾气。厨师会抽时间聊一下她的艺术修养，说一些诸如“我难道不知道托尔斯泰有多了不起吗”之类的话。她一边在砧板上切牛肉，一边唱上几句，秀一下她的女高音。可也是十点这个时候，侍应生开始嚷嚷着要吃午饭，他们的午餐时间要早一点。到了十一点，我们会迎来第一批客人。这时，大家都突然忙乱起来，脾气也变差了。这儿的忙乱吵嚷与X酒店的不一样，混乱、愤怒和无事生非的记恨才是这儿的氛围。最根本的问题是，这里让人感到不适。厨房里拥挤不堪，盘子只能放在地上，我们要时刻小心别踩上去。厨师在厨房走来走去时，她肥大的屁股总会撞到我，同时嘴上还不停唠叨着各种命令：

“笨死了你！告诉过你多少遍别让甜菜根流汁？快点，让我到水池边！把刀拿走，继续削土豆吧。你拿我的过滤器干吗？噢，别管土豆了。我不是叫你把牛肉汤上面的油撇掉吗？把炉子上的那罐水拿下来。先别洗东西了，把芹菜切了。不是这样切，你这个傻瓜，看着，这样切。你看看你，豌豆煮得要溢出来了也不管！现在快去把鲱鱼的鳞给刮了。你看，你说这个盘子洗干净了？用你的围裙把它擦干净。把那碟沙拉放到地上。对，就放到我会踩到的地方吧！小心点，那锅东西快满出来了！把那长柄锅拿下来给我。不对，是另外一个。把这个放到烤架上，把那些土豆扔了。别浪费时间，扔到地上。踩一踩。快撒一些锯屑吧，这地面简直就像溜冰场一样。看看你这个傻瓜，那牛排都要糊了。天哪，他们为什么要派这样一个白痴来给我洗碗？你在跟谁说话？你不知道我姑姑是个俄国女伯爵吧？”等等，等等，等等。

这样的情形会一直持续到三点钟，只是大约十一点时，厨师会突然神经崩溃，泪水哗哗直流。三点到五点对侍应生而言相当轻松，但厨师还是很忙，这也是我工作最繁忙的时候，因为有一大堆脏盘子等着我去洗，在晚餐前我得像比赛似地把这些洗完，至少要洗完一部分。洗碗的工作要多费很多事，因为条件很简陋，只有一个狭窄的排水板、温凉的水、湿漉漉的抹布和每个小时都会堵一次的排水槽。到了五点，厨师和我都感到有些站不稳了，因为从七点起我们就没吃过东西。我们通常会

瘫掉，她坐到垃圾桶上，我坐在地上，喝上一瓶啤酒，然后为今早我们说过的话道歉。只有喝茶才能让我们坚持下去。我们特地从早到晚在炉子上炖着一壶茶，每天都喝上几品脱。

五点半时，忙乱和争吵又开始了，这次比之前还要糟糕，因为大家都累坏了。厨师每到六点和九点都会神经崩溃，规律到人们都可以因此知道时间。她会趴在垃圾桶上，开始歇斯底里地哭泣，哭诉说她从来都不曾想过她会过上这种日子；她的神经要受不了了；她曾到维也纳学过音乐；她要照顾卧病在床的丈夫，等等。换个时候别人也许会同情她，可我们都很累，她的抽泣声只会惹怒我们。朱尔斯经常站在门口模仿她的哭声。老板娘絮絮叨叨，鲍里斯和朱尔斯整天吵架，因为朱尔斯经常偷懒，而鲍里斯作为侍应领班，小费要拿大头。餐馆开张才第二天，他们俩就为了两个法郎的小费在厨房打了起来，我和厨师只好将他们拉开。只有老板从不失态，他的作息时间和我们一样，不过他没活干，因为真正管事的是他老婆。他要干的，除了向供应商订货，就是站在吧台边抽烟，看上去一副绅士模样，在这方面他做得无可挑剔。

厨师和我通常会在十点到十一点间抽空吃晚餐。十二点时，厨师会偷一包吃的带给她丈夫，往衣服底下一藏就走了，边走边哭着说干这么久的活会要她的命，她第二天就要辞职。朱尔斯也会在十二点离开，通常是在和鲍里斯吵了一架以后，鲍里斯则因为要看着吧台，得工作到午夜两点。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之间，我会尽量洗完餐具。已经没时间让我把活干得漂亮了，我只能简单地用餐巾把餐具上的油擦掉。至于地上的脏东西，我只好不管了，或者把最脏的那些扫到炉子底下看不见的地方。

十二点半，我会穿上大衣快步出去。当我穿过走廊经过吧台时，仍如平常那般和气的老板会拦下我。“哎，亲爱的先生，你看上去很累啊！请赏脸接过这杯白兰地吧。”

他会恭敬地把那杯白兰地递给我，仿佛我不是洗碗工而是位俄国公爵。他对我们每一个都这样。这算是我们每天工作十七个小时的补偿。

通常来说，最后一班地铁几乎是空的，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可以坐下睡上十五分钟。通常我在一点半就上床睡觉。有时我会错过最后一班地铁，就只好在餐馆打地铺，不过这一点也不要紧，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鹅卵石上也能睡着。

第二十一章

这种日子持续了两周左右，客人多了，工作量也稍稍增加了。我本来可以在餐馆附近租间房，好每天省下一个小时，不过我好像不太可能挤出时间搬家，说起来，我也没时间剪个头发，看看报纸，甚至没时间脱光衣服。十天之后，我终于挤出十五分钟，写信给在伦敦的朋友B，问他能不能帮我找份工作，干什么都行，只要能让我每天睡五个小时以上。我真的受不了每天工作十七个小时，尽管很多人认为这没什么。当一个人超负荷工作时，治疗自哀自怜的方法就是——想一下有成千上万在巴黎餐馆打工的人，他们也工作这么久，而且还会继续干下去，不是几周，而是几年。我所住旅店附近的小酒馆里有个姑娘，她一年到头每天从早上七点开始干活，一直干到午夜十二点，只有吃饭的时间才能坐下来。我记得有一次我邀请她去跳舞，她笑了，说自己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走出过这条街了。她患了肺痨，就在我离开巴黎的前后，她去世了。

仅仅过了一周，我们都累得有点神经衰弱了，除了朱尔斯，他一直在偷懒。争吵起先还是断断续续的，现在变得没完没了。大家会连续几个小时不断地发无用的牢骚，每隔几分钟牢骚就会演变成暴风雨般的骂战。“把那个长柄锅拿给我，傻瓜！”厨师会喊道（她个子不够高，够不着放长柄锅的架子）。“你自己去拿吧，老婊子。”我会回敬她一句。这种话好像自然而然地从厨房的氛围中酝酿出来似的。

我们经常会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比如垃圾桶，它永远是争吵的来源之一。垃圾桶是应该放在我想要放的位置（那样就挡住了厨师的路），还是应该放在她想要放的位置（那就挡住了我去水槽）？有一次，她为了这事儿唠叨个没完，最后，我完全是为了泄愤，把垃圾桶放到地板中央，那样肯定会把她绊倒。

“现在，你这头母牛，”我说，“你自己搬去吧。”

可怜的老女人，垃圾桶太重了，她搬不动。于是她一屁股坐下，把头埋在桌上开始号啕大哭，然后我就嘲笑她。疲劳对人的行为举止就是有这样的影响。

几天后，厨师不再聊托尔斯泰和她的艺术天分了，除非为了工作，

我都不跟她说话。鲍里斯不跟朱尔斯说话，他们俩也不跟厨师说话。甚至我和鲍里斯之间也没有说过几句话。我们早就说好了工作时偶尔对骂不算数；不过有时我们骂得太难听，没法不往心里去，而且这种对骂根本不能算偶尔。朱尔斯越来越懒，还经常偷东西——他说是出于责任感。要是我们不肯跟他同流合污一起偷东西，他会管我们叫“jaune”——工贼。他有一种古怪恶毒的心理。他带着自豪的口吻跟我说，他有时会在为客人端上汤之前，把抹布的脏水拧到汤里，只是为了报复这个资产阶级的一员。

厨房更脏了，老鼠也更放肆了，尽管我们捉住了几只。环顾那肮脏的房间，生肉放在地上，周围净是垃圾，地上到处都是冷却了的、结了垢的长柄锅，水槽堵住了，上面蒙了一层油脂。我有时会纳闷世界上还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糟糕的餐馆。但他们三个人都说他们到过更脏的地方。朱尔斯看到这些脏东西甚至感到由衷的愉悦。下午没什么活干的时候，他会站在厨房门口嘲讽我们工作太认真了：

“你傻呀，干吗要洗那盘子？用你裤子擦擦就行了。谁会关心客人啊？他们又不知道什么情况。什么叫餐馆的工作？你在切鸡的时候，把鸡掉地上了，你道歉，鞠躬，出去。五分钟后，你从另外一扇门进来，端着原来的那只鸡。这就是餐馆的工作。”

另外，奇怪的是，尽管环境肮脏，员工不称职，让·克塔尔餐厅居然开得很成功。开始几天，我们的客人都是俄国人，是老板的朋友，后来就有美国和其他国家来的外国客人，不过没有法国人。有一天晚上大家都非常兴奋，因为我们终于有了第一位法国客人。以至于有那么一会儿，我们甚至忘记了争吵，齐心协力准备可口的晚餐。鲍里斯踮着脚走进厨房，用大拇指指向肩膀后方，怪腔怪调地小声说道：

“嘘！注意了，来了个法国人！”

不一会儿，老板娘进来小声道：

“注意，来了个法国人，要保证所有蔬菜都给他上两份。”

那个法国人用餐时，老板娘站在厨房的铁栅栏窗后观察他的表情。第二天晚上，那个法国人带着另外两个法国人来了。这证明我们有了好口碑；糟糕的餐厅的必然标志，就是只有外国人常来光顾。我们成功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老板买的餐刀很锋利，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灵

光闪现。锋利的餐刀，当然是一间餐馆成功的秘诀。我对此感到很高兴，因为这件事打消了我的一个错觉，就是法国人懂得鉴赏美食。或许按照巴黎的标准，我们的也算是一间挺不错的餐馆；那样的话，糟糕的餐馆一定无法想象。

在我写信给B之后过了几天，他回信说能帮我找份工作，是照顾一个天生的智障儿，在让·克塔尔餐厅工作过之后，这听起来是一个绝妙的休息机会。我想象自己在乡间小路上漫步，用手杖敲掉蓟花头，吃烤嫩羊肉和蜜糖馅饼，晚上盖着有薰衣草香味的被单，一觉睡上十个小时。B寄给我五英镑，让我用来当路费并且从当铺赎回衣服。钱一到手，我就提前一天通知老板辞职，离开了餐馆。我的突然辞职让老板很尴尬，因为他一直都没什么钱，可要一下子付给我三十法郎的工资。他请我喝了一杯库瓦西耶四八白兰地，估计他以为这样就算抵了少付的工钱。他们请了一个很能干的捷克洗碗工来顶替我的位置，那个可怜的老厨师在几个星期后被解雇了。之后我还听说，厨房来了两个一流的员工，洗碗工的工作时间被缩减到每天十五个小时。不过除此之外就没法再减了，因为厨房还没经过现代化改造。

第二十二章

不管值不值得，我想谈谈对巴黎洗碗工生活的看法。细想一下你会觉得奇怪，在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里，有成千上万人除了睡觉，就是在闷热的地下室里洗碗碟。我要问的是为什么这种生活会继续——有何目的，谁想继续以及为什么。我这么问，不是出于反叛和懒惰的态度，而是想要探讨洗碗工生活的社会意义。

我想首先得说，洗碗工是现代世界的一种奴隶。不是要为他们鸣不平，因为洗碗工比其他体力劳动者的情况要好，但比起被人随意买卖，他们不见得更自由。他们干的活和奴隶差不多，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他们的报酬只够勉强糊口，唯一的假期是被解雇的时候。他们与婚姻无缘，或者说，如果他们结婚，他们的妻子也必须得干活。除非他们交了好运，否则无法摆脱这种生活，除非坐牢。如今，很多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在巴黎刷盘子，每天工作十到十五个小时。不能说这是因为他们懒，因为懒人不可能当洗碗工。他们不过是被日常生活束缚，无法思考。如果洗碗工能稍微思考一下，他们早就会成立工会，举行罢工，争取更好的待遇。然而他们从没想过，因为他们没有空闲想这些，生活把他们变成了奴隶。

问题是，为什么这种苦役会继续存在？人们想当然认为，工作之所以得干，是因为有合理的目的。他们看到其他人在干苦活累活，以为说“这活必须要干”，就可以解决问题。例如采煤，这是个辛苦活儿，但这活必须得干，因为我们需要煤。在下水道工作是个苦差事，但这活必须得干。洗碗工也是一样的道理，总有人会在餐馆吃饭，也总要有其他人每个星期洗八十个钟头的碗碟。这是文明社会的运作，所以无可非议。但在我看来，这一看法值得商榷。

洗碗工干的活对文明社会真的有必要吗？我们有一种感觉，洗碗工干的活一定是“老实”的活儿，因为它辛苦又费力，而且我们已经对体力劳动有一种盲目迷信。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在砍树，便确信他是在满足一种社会需要，因为他在进行体力劳动；我们没有想到，他砍掉一棵漂亮的树，只是为了腾出地儿来摆一座丑陋的雕像。我相信在洗碗工一事上也一样，他们为了维持生计而挥汗如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干的活是有

用的，他可能只是在提供一种奢侈享受而已，而且通常，这种奢侈享受并非名副其实。

为了解释为什么我说奢侈享受并非名副其实，可以举个极端例子，这例子在欧洲几乎看不见，那就是印度的人力车夫或拉车的矮种马。在远东的任何一个城镇，都有几百个人力车夫，他们是皮肤黝黑的可怜虫，体重八英石[1]，围着腰布，有些生着病，有些已经五十岁了。他们日晒雨淋，连续跑几英里路，低着头拉车，汗水顺着灰色的胡子流下来。一旦走得太慢，乘客就会破口大骂。他们每个月只挣三十到五十个卢比[2]，拉车几年后就咳得没完没了。拉车的矮种马又瘦弱又不中用，卖得很便宜，因为它们只能再干几年活。它们的主人用皮鞭代替食物。这些马干的活可以用一个等式表示——皮鞭+食物=力气，通常是六成的皮鞭加四成的食物。有时它们的颈部会有一圈面积很大的溃疡，所以拉车时会拉到新肉。然而还是有办法让它们干活，只要狠狠地鞭打它们，让它们屁股比脖子痛得更厉害。几年后，等到鞭子也不管用了，马就会被拖去宰掉。这些就是非必要工作的例子，因为我们并不真的需要矮种马或人力车夫，他们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东方人认为走路没派头。坐人力车或马车是奢侈享受，可任何一个坐过这种交通工具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糟糕的奢侈享受，只提供了少许方便，无法抵消人和动物所受的痛苦。

洗碗工与此相似。比起人力车夫和矮种马，他可称得上是国王，但他的情况与前两者类似。他是酒店或餐馆的奴隶，可他所受的苦役其实是无用的。因为，毕竟大酒店和高档餐馆到底有何存在的必要之处呢？它们应该提供奢侈享受，但事实上它们提供的只是对奢侈享受的一种廉价劣质的模仿。几乎每个人都讨厌住酒店。有一些餐馆会好一点，不过要在餐馆，花一样的钱，吃一顿像住家菜一样好的饭是不可能的。无疑酒店和餐馆有存在的必要，但它们没有必要让几百人成为奴隶。酒店和餐馆的工作不是为了满足基本需要而定的，而是由代表奢侈享受的假象而定。所谓的“高档”，事实上仅仅意味着员工干的活更多，顾客给的钱更多。没有人得益，除了老板，他马上就能在多维尔[3]买一套别墅。基本上，所谓“高档”酒店，就是一个有一百个人累死累活，好让两百人为并非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破费的地方。如果酒店和餐馆不搞那些无聊的玩意儿，干活干得有效率一点，洗碗工可能每天只用干六到八小时的活，而不是十五个小时。

假设我们都认为洗碗工干的活几乎毫无用处，那问题就来了：为什

么有人想他们继续干活？我试图撇开直接的经济原因，探讨一下人们想起有人以洗碗碟为生时会产生何种快乐。因为毫无疑问，人们——那些养尊处优的人——想到这点确实会感到惬意。一个奴隶，如马库斯·加图所说，除了睡觉就应该干活。他干的活是否有必要并不重要，但他必须干活，因为干活本身是好的——至少对奴隶而言是这样。这种观点依然存在，还堆出一大座无用苦工的大山。

我相信这种让无用工作永存的原因，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出于对群氓的恐惧。群氓是一群低等动物（他们是这样想的），一闲下来就会带来危险，让他们忙得没空思考比较安全。一个心直口快的富人，如果恰好被问到改善工作条件的问题时，通常会这样说：

“我们知道贫穷不好过。事实上，既然贫穷离我们如此遥远，我们很愿意被贫穷的不快困扰，但别指望我们会为此做什么。我们同情你们下层阶级，就像我们同情一只长疥癣的猫一样，但我们会拼命反对改善你们的工作条件。我们觉得维持现状更安全。目前的状况让我们很舒适，我们不会冒险给你们自由，即使是每天一个钟头的自由也不行。所以，亲爱的兄弟，显然此后你们必须流血流汗，才能让我们有钱去意大利。你们就流汗吧，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这是有才智又有修养的人特有的态度，你可以从上百篇文章中读到。有修养的人很少一年收入少于（大概）四百英镑，他们自然会站在富人那边，因为他们认为给予穷人任何自由都会威胁到他们自身的自由。一想到可怕的马克思式的乌托邦[4]会成为现今社会的替代品，受过教育的人便宁愿维持现状。他们也许不是很喜欢他们的富人同侪，但他们认为，即便这些人中最粗鄙的，相较穷人，还是没那么能危害到他们的舒适感，所以他们还是支持有钱人为妙。正是因为惧怕假想出来的、会带来危险的群氓，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的想法都很保守。

对群氓的恐惧是一种迷信的恐惧。这种恐惧基于一种想法：富人与穷人之间有着难以解释的根本区别，就像两个不同的种族，如黑人与白人。但事实上，这种差别并不存在。许多富人和穷人只是靠收入多少来划分界限，别无其他因素，普通百万富翁与穿上新西装的洗碗工没什么两样。换换位子，换换角色，猜猜谁是法官，谁是小贼？任何一个混在穷人堆里的人都很容易回答。但那些有才智又有修养的人，从没有与穷人一起生活过，凭什么说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了解贫穷呢？我有一本维庸[5]的诗集，编辑竟然认为有必要为“只能看看窗台上的面包”加上注

解“饥饿与受过教育的人的经历相距甚远”。

由于这种无知，对群氓有迷信的恐惧是自然的结果。受过教育的人想象出一群低能者，一心想拥有一天的自由，只为洗劫他们的家，焚烧他们的书，让他们自己操作机器或扫厕所。“采取任何措施”，他们想，“任何不公正的措施都行，只要能够约束这批群氓。”他们不明白，许多富人和穷人之间并没有区别，所以让群氓脱离约束就不是问题了。实际上，群氓现在已经不受约束了，并且，他们正以富人的形象出现，利用自己的权力，建造了大量通过厌烦来折磨人的地方，比如“高档”酒店。

总而言之，洗碗工是奴隶，而且是多余的奴隶，干着愚蠢却基本上没必要的活。归根结底，他们被迫一直干活，因为人们有一种模糊感觉：一旦他们闲下来，就会带来危险。受过教育的人本应该站在他们那边，却默许这种情况发生，因为他们一点也不了解洗碗工，所以也害怕他们。我之所以提到洗碗工，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他们的状况，这些看法也适用于无数其他工种。这仅仅是我对洗碗工生活中基本情况的看法，并未考虑直接的经济原因，无疑很多都是老生常谈。我写出来，目的是想表达一个在酒店工作过的人的感想。

---

[1] 英石，英国度量单位，1英石约为6.35千克。

[2] 卢比，印度的一种货币单位。

[3] 多维尔，法国城市。

[4] 乌托邦，本意为“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名著《乌托邦》中虚构的地方。如今“乌托邦”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

[5] 维庸，法国中世纪最杰出的抒情诗人。

第二十三章

一离开让·克塔尔餐厅，我倒头就睡，睡了差不多整整十一个钟头。然后，我刷了我两个星期都没刷过的牙，洗了个澡，把头发剪短，从当铺取回我的衣服。我有两天的闲暇时光，我甚至穿着最好的衣服回到让·克塔尔餐厅，靠在吧台上，花了五法郎买了一瓶英国啤酒。我曾经在这儿当过奴隶中的奴隶，现在却是客人，这种感觉很奇怪。鲍里斯对我离开餐馆感到很可惜，因为我们当时形势大好，有机会挣大钱。我后来收到过他的信，他说自己每天挣一百法郎，和一个正经的姑娘在一起，而且那姑娘身上没有一点大蒜味。

整整一天我都在我住的街区闲逛，跟每个人道别。就在这天，查理跟我讲了以前住在这里的守财奴鲁科勒是怎么死的。很可能查理跟往常一样是在编故事，不过这个故事也挺有趣。

鲁科勒死的时候七十四岁，就在我来巴黎前的一两年，不过我来到巴黎后，这一带的人仍会提到他。他虽不及丹尼尔·丹瑟[1]这样的人，但也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每天早上到巴黎中央市场捡烂菜，吃猫肉，把报纸当内衣裤穿，用房间的护壁板当柴火，用麻袋给自己做了条裤子——可他在外面的投资却有五十万法郎。我要是能认识他就好了。

和许多守财奴一样，鲁科勒走到这般凄惨地步是因为钱都被骗了。有一天，这一区来了个犹太人，是个精明的小伙子，看着就像生意人，他有个绝妙计划，可以将可卡因走私到英国。当然，在巴黎很容易买到可卡因，走私可卡因本身也不难，只是总有一些叛徒会向海关或警方泄漏计划。据说，恰恰是贩卖可卡因的人会做这种事，因为走私贸易是由一个大型联合集团控制，他们不想有人和他们竞争。然而，犹太人发誓不会有危险。他有办法直接从维也纳买可卡因，不走一般渠道，也不会被敲诈一笔。他通过一个在索邦大学读书的波兰小伙子联系到鲁科勒，波兰人称如果鲁科勒肯出六千法郎参与这个计划，他就会出四千法郎。这些钱加起来能买到十磅可卡因，足够在英格兰发一笔小财。

波兰人和犹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从鲁科勒手中抠出钱来。六千法郎不算很多——他还有更多钱缝在房间的床垫里头——不过对于他

来说，拿出一个苏也会让他心疼不已。他们俩连着一个礼拜围着他转，先是解释，然后威胁，再是哄骗，又是争辩，最后甚至跪下来求他出钱。这老头徘徊在贪婪与恐惧之间，几乎快疯了。他一想到可能会赚到五万法郎，就禁不住内心的狂喜，但又不想用自己的钱冒险。他抱头坐在角落里，发出痛苦的呻吟，有时又痛苦地大声喊叫，他也会经常跪下来（他非常虔诚）祈求上天赐予力量，不过一直下不了决心。但最后，很可能是因为精疲力竭，他突然就屈服了。他撕开藏着钱的床垫，把六千法郎给了犹太人。

犹太人当天就带来了可卡因，接着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同时，不出所料，鲁科勒的大吵大闹让走私可卡因的事在这一带传开了。第二天早上，警察就到酒店进行突击搜查。

鲁科勒和那个波兰人急得焦头烂额。警察在楼下，从下到上依次搜查每个房间。桌上有一大包可卡因，无处可藏，而他们自己也无机可逃。波兰人主张把东西扔出窗外，但鲁科勒坚决反对。查理告诉我他当时在现场，说他们试图拿走鲁科勒的那包东西，可他把它紧紧抱在怀里，像个疯子一样不肯放手。虽然他已经七十四岁了，但因为恐惧，他野性大发，宁愿坐牢也不愿扔掉他的钱。

最后，当警察搜到他们楼下一层时，有人出了个主意。与鲁科勒住同一层的人有一打帮人出售的香粉罐头，有人建议把可卡因放进罐头冒充香粉。香粉被急急忙忙扔出窗外，然后装进可卡因来替代，罐头公然摆在鲁科勒的桌上，好像没什么需要隐藏似的。几分钟后，警察来搜查鲁科勒的房间。他们敲了敲墙壁，看了看烟囱，拉开抽屉，又检查了地板。他们什么也没搜到，就在他们准备放弃搜查时，检查员注意到了桌上的罐头。

“喂，”他说，“看一下这些罐头。之前我没留意到，里面都是些什么，呃？”

“香粉。”波兰人竭尽全力平静回答道。但就在这时，鲁科勒因为恐惧大吼了一声，警察马上就起疑心了。他们打开其中一个罐头，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检查员闻了闻，说他觉得这是可卡因。鲁科勒和波兰人开始以圣人的名义起誓，说这些不过是香粉。但这没用，他们越是抗议，警察就越是怀疑。两个人被带到警察局，半个街区的人都出来看热闹。

在警察局里，鲁科勒和波兰人被一个警长审问，那一罐可卡因则被送去检验。查理说鲁科勒大哭大闹的场面简直无法形容。他哭泣，祈祷，说自相矛盾的话，还突然指责波兰人，声音大得半条街之外都能听到。警察们几乎忍不住要笑他。

一个小时后，一个警察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拿着那罐可卡因和一张检验单回来了。

“这不是可卡因，先生。”他说。

“什么，不是可卡因？”警长说，“那，这是什么呢？”

“是香粉。”

鲁科勒和波兰小伙被当场释放，虽然被免了罪但他们非常生气，因为那个犹太人骗了他们。后来，当这件事平息下来后，人们得知原来那犹太人用同样的手段骗了这一区的另外两个人。

即使他的四千法郎打了水漂，波兰人还是很庆幸自己免除了牢狱之灾，但可怜的鲁科勒彻底崩溃了。他一回家就倒在床上，整整一天和大半个晚上，人们都能听到他拼命敲打东西，嘴里念念有词，有时甚至扯着嗓子喊道：

“六千法郎！耶稣啊！六千法郎！”

三天之后，他中风了，两个星期后，他死了——死于心脏破裂，查理这样说。

---

[1] 丹尼尔·丹瑟（1716—1794），英国历史上有名的吝啬鬼。

第二十四章

我坐三等舱经敦刻尔克[1]抵达蒂尔伯里[2]，回到英国。用这种方式穿越英吉利海峡[3]最便宜，而且又不至于最差。如果住客舱，你还得额外付钱，所以我就睡大厅，和我一起的还有大多数持三等票的乘客。我那一天的日记是这样开头的：

“二十七个男人，十七个女人，一起睡在大厅里。今天早上，没有一个女人洗过脸，男人大多数还会去洗个澡，女人们仅仅只是为了面子，才用脂粉把脏的地方盖住。这大概就是两性间的区别了吧。”

旅途中，我遇到一对罗马尼亚夫妇，他们还很年轻，准备到英国度蜜月。他们问了很多关于英国的问题，我趁机对他们大肆吹牛。在一座外国城市折腾了几个月后，我很高兴终于要回国了，我觉得英国简直就是天堂。英国有许多东西值得让你回去：澡堂、扶手椅、薄荷酱、煮得刚刚好的土豆、黑面包、柠檬果酱、用如假包换的啤酒花制成的啤酒——只要你付得起钱，就能享受这些好东西。只要你有钱，英国就是个好地方。当然，得到照顾一个听话的智障儿的工作，我也不会没钱了。一想到我不再是穷人，我的心中就燃起爱国之情。罗马尼亚夫妇的问题越多，我对英国的赞美之词就越热烈。诸如气候、风景、艺术、文学和法律，等等——英国的一切都是如此完美。

“英国的建筑怎么样？”罗马尼亚夫妇问。“好极了！”我说，“你应该看看伦敦的雕塑！巴黎的那些太粗陋了，一半是宏伟建筑，一半是贫民窟。但在伦敦……”

说着说着，船已经停靠在蒂尔伯里码头，我们在岸边第一眼看到的建筑就是那些大酒店，净是些灰色水泥粉刷的外墙和尖顶。它们突兀地矗立在海岸边，像一群精神病人呆呆地朝疯人院的墙外望去。我看着罗马尼亚夫妇，他们看着酒店，眼睛都快成斗鸡眼了，可出于礼貌我没有吱声。“这都是由法国建筑师建的。”我肯定地说。之后，当火车经东部贫民窟进入伦敦时，我仍觉得英国建筑是美的。所有对英国的赞美之词都不为过，如今我快要到家了，也不用再受苦了。

我来到B的办公室，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毁掉了我的好心情。“真对不起，”他说，“你的雇主出国了，病人也是。不过，他们会在一个月内回来。我想你能坚持到他们回来吧？”

我一直在街上游荡，直到突然想起要再问人借点钱。还有一个月要等，我手头只有十九先令六便士。这个消息让我吃了一惊。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一整天都在街上游荡，到了晚上，因为丝毫不知道怎样能在伦敦找到便宜的住处，我来到一家“家庭”旅馆，那里一个晚上收七先令六便士。付了钱后，我手上就只剩下十先令两便士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已经有了计划。虽然我迟早都要到B那儿拿更多的钱，但这样做似乎不太体面，同时我还要想办法省吃俭用，维持生存。以前的经历告诉我，不要把最好的衣服拿去典当。我打算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车站的行李寄存处，除了第二好的衣服，因为可以用它换便宜的衣服，没准还能赚一英镑。如果我想靠三十个先令过一个月，我必须穿很差的衣服——越破烂越好。我不知道三十个先令能不能维持一个月的生活。在这点上，比起伦敦，我更了解巴黎。或许我可以乞讨，或者卖鞋带。我想起在星期天的报纸上读过的一些文章，里面提到有些乞丐的裤子里居然缝了两千英镑。这样看来，无论如何，大家都知道在伦敦饿死是不可能的，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

为了把衣服卖掉，我来到伦敦朗伯斯区，那里的人都很穷而且有很多旧衣店。第一家店的老板很有礼貌，但不肯收我的衣服，第二家店的老板粗鲁无礼，第三家店的老板是个聋子，也许他是装出来的。第四家店的店员是个高大的金发年轻人，全身皮肤呈粉红色，看上去就像一块火腿。他看着我身上穿的衣服，轻蔑地用拇指和食指摸了一下。

“这货色很差劲，”他说，“非常差劲。”（其实这是一套挺好的衣服）“你想用它换什么？”

我解释说我想换一些旧一点的衣服，再加上他愿意付的钱。他想了想，挑了几件看上去脏兮兮的旧衣服，扔到柜台上。“那钱呢？”我说，希望可以拿到一英镑。他撅起嘴，拿出一个先令，放到衣服旁。我没有跟他争辩——我本来是准备跟他争辩的，但当我张开嘴准备说话时，他伸出手好像打算把那一先令拿走，那时，我知道没人能帮到我了。他让我在店铺后面的一个小房间把衣服换了。

换来的衣服是一件曾是深棕色的大衣、一条黑色粗棉布裤、一条围

巾和一顶布帽。我还穿着我自己的衬衫、短袜和靴子，口袋里还留着一把梳子和一把剃须刀。穿着这身衣服让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曾经穿过够差的货色了，但这套衣服要差得多。这身衣服邋遢又没型，它们，怎么说呢？难看极了，上面有如铜绿般积了很久的污渍，已经不能仅仅用不体面来形容。一个小时后，在朗伯斯区我看到了一个落魄的家伙向我走来，他显然是个流浪汉，我再仔细一看，原来那是我自己在商店橱窗里反射出来的样子，我的脸上沾满了尘土。灰尘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若你穿戴整齐，灰尘就离你远远的。但只要你穿得破破烂烂，灰尘就从四面八方朝你袭来。

我在街上待到夜深，不停地走着。穿成这样，我有点怕警察会把我当成无业游民给逮捕，我也不敢跟任何人说话，生怕他们会注意到我的口音和我的穿着不相符。（之后我发现这种情况并没出现。）我换的这身衣服让我立刻进入到一个新世界，每个人对我的态度似乎都突然转变了。我帮一个小贩扶起他弄翻的手推车。“谢谢，老兄！”他咧开嘴笑着说。在之前没人叫过我“老兄”，这是这身衣服产生的效果。这也是我第一次留意到，女人的态度是怎样随着男人穿着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男人经过，她们会露出厌恶的表情，打着战地躲开，就像他是一只死猫似的。衣着真是充满魔力，哪怕只是第一天穿上流浪汉的衣服，你都无论如何很难不感到，你真的变得身份低下。你可能会感受到第一天坐牢所感受到的那种耻辱，这种感受虽荒谬无理，但却非常真实。

到了大概十一点，我开始找睡觉的地方。我听说过提供床铺的小客店（顺便提一句，人们从来不叫它们小客店），我估计花大约四便士可以睡一晚吧。我看到一个男人，应该是劳工之类的人，站在滑铁卢路边，于是我停下脚步问他。我说我身无分文，想找个最便宜的地方睡一晚。

“噢，”他说，“你可以到街对面的那间房子，牌子上写着‘单身汉的好住处’。那是个睡觉的好地方，我时不时也会去那儿过夜，又便宜又干净。”

那房子很高，看上去很残旧，窗户透出昏暗的灯光。有些窗还用牛皮纸打了补丁。我走到一条石头铺的过道，看到一个睡眼惺忪无精打采的男孩在通向地下室的门口。地下室传来喃喃的低语声，一股热气混合着乳酪的味道冲了出来。男孩打着呵欠，伸出手。

“想过夜？先付钱。”

我付了钱，男孩领我上了一条摇摇晃晃又没有灯照的楼梯，来到一间卧室。里面混合着止痛膏气味和亚麻腐臭的味道，窗户似乎都关得严严实实，一开始里面几乎让人窒息。借着房间里点着的一支蜡烛，我发现这间房约摸十五平方英尺大，八英尺高，放了八张床，其中六张床上已经有人了，他们的身上堆着自己的衣服，甚至还有靴子，显得奇形怪状。有个人在角落里咳得很厉害，听得我无比厌恶。

我一躺在床上就发现床硬得像块木板一样，至于枕头，不过就是一块硬硬的圆柱状的木头而已。这比睡在桌子上还要糟，因为这张床不够六英尺长，而且还很窄，床垫凸了出来，睡觉时你得留神才不会掉下来。被单散发着浓烈的汗臭味，我的鼻子都不敢离它太近。另外，床上物品只有被单和棉布床单，所以尽管很闷可也不暖和。整个晚上，房间里的各种噪音此起彼伏。睡在我左边的那个男人——我猜应该是水手——差不多每隔一小时都会起来，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点香烟。另一个男人膀胱有毛病，一整晚起床六次去使用夜壶，响声很大。睡在墙角的那个男人每二十分钟都会咳嗽发作一次，规律得让人条件反射想要听他下一次咳嗽，就像在听狗对着月亮嚎叫一样。这种声音难听之极，简直难以用言语描述，咳嗽声里夹杂着一种冒泡和干呕的声音，就像那个男人的五脏六腑在翻江倒海。有一次他擦亮一根火柴，借着火光，我发现他是一个年纪非常大的老人，脸色灰白，双颊凹陷，如同死尸一般。他把他的裤子包在头上当睡帽，不知为什么，这让我很不舒服。每次他一咳嗽或者另外那个男人骂脏话，一个睡意蒙眬的声音就会从另一张床传来：

“闭嘴！看在老天的份上，闭嘴！”我总共只睡了一个小时。早上，我有种模模糊糊的感觉，有一个褐色的巨物向我压来，把我弄醒。我睁开眼睛，原来是水手的一只脚，伸出床来几乎碰到我的脸。它是深棕色的，就像印度人的脏脚，而且上面还有脏东西。墙壁上到处斑斑点点，被单三个星期才洗一次，已经变成赭色了。我起床换好衣服，然后下楼。地下室有一排洗脸盆，还有两条滑腻腻的毛巾。我口袋里有块肥皂，正当我准备洗脸的时，发现每条毛巾上面都有污垢——顽固、黏稠，就像鞋油一样黑。我没洗脸就出去了。总之，这客栈并不像描述的那般便宜干净。但后来我发现，它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客栈。

我过了河，朝东走了很长一段路，最后来到了塔山的一间咖啡店。那是一间普通的伦敦咖啡店，跟其他上千家差不多，但去过巴黎后，我

觉得它奇怪又陌生。店内不太通风，里面有四十年代很流行的高背长凳，当天的菜单用肥皂写在镜子上，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负责端菜。劳工们用报纸包裹着食物吃，拿无杯托的大杯子喝茶，就像中国杂技演员一样。一个犹太人独自在角落里，埋头伏在盘子上，狼吞虎咽般地吃着培根，好像生怕别人看到他吃东西一样。

“我想要茶、面包和黄油。”我对那个女孩说。

她盯着我看了看。“没有黄油，只有人造黄油。”她略带惊讶地回答道。然后她就以伦敦最常见的方式嚷道：“一大杯茶，两块面包。”就像在巴黎说要一大杯红酒一样。

我座位旁边的墙上有张告示，上面写着“禁止偷糖”，告示下有个会写诗的客人写下：

偷糖之人

会被称为卑鄙的——

但有人使劲地划掉了最后的一个单词。这就是英国。茶和两块面包花了我三个半便士，我还剩八先令两便士。

---

[1] 敦刻尔克，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

[2] 蒂尔伯里，英格兰东南部著名的重要港口。

[3] 英吉利海峡，又名拉芒什海峡，分隔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法国，并连接大西洋与北海的海峡。

第二十五章

靠着八个先令我过了三天四夜。有了在滑铁卢路糟糕的经历后，我向东走，来到了佩尼费尔斯的一个寄宿所过夜。这是一家典型的寄宿所，像伦敦其他的客栈一样。这里可以住五十到一百个人，是由一个“副手”管理，这人是老板的代理人，也就是说，这些客栈是营利的，属于有钱人的产业。一间宿舍能睡十五到二十个人，床也是又冷又硬，但被单倒是一个星期不到就洗一次，算是进步。住宿费用是九便士或一先令（收一先令的宿舍里，床与床之间的距离是六英尺，而不是四英尺），一般晚上七点就要付钱，否则就走人。

楼下是厨房，对所有房客开放，免费提供炉火、煮东西的锅、茶碗和烤面包用的叉，厨房里终年日夜烧着两盆火。房客们轮流负责烧火，打扫厨房和铺床。其中有个地位比较高的房客，看起来像诺曼人，名叫史蒂夫，是码头工人，他被称作“房子的头头”，负责仲裁争端，也是这里不收钱的打手，负责对付滋事的人。

我挺喜欢那厨房。它在地下深处，是个天花板很低的地下室，里面很热，焦煤烟让人昏昏沉沉，唯一的光源是炉火，照出角落一片黑天鹅绒般的光影。绳子从天花板拉下，用来晾换洗的衣服。人们的脸被热得通红，其中大部分是码头工人，拿着饭盆在火边走来走去。他们有些光着身子，因为衣服洗了，在等晾干。到了晚上，人们喜欢玩纸牌和跳棋游戏，一起唱歌，最喜欢唱的歌是“我是个爸妈都不喜欢的小孩”，另一首受欢迎的歌是关于船只失事的。有时夜深，有人会买一桶便宜的螺回来，大家一起吃。大家通常都会分享食物，而且会照顾失业的人。有个脸色苍白，身材瘦小的人，看上去似乎命不久矣，他们管他叫“气洞布朗”，看过好几次医生，身上都已经开过三次刀了，他一直都是靠别人救济的。

有两三个房客是领着养老金的老人。遇到他们之前，我从来没想过在英国居然会有老人靠每个星期十先令的养老金过活。这些老人除了养老金就没有其他收入了。其中的一个老人比较健谈，于是我问他是怎样生存下来的。他说：

“哦，住一个晚上是九便士，一个星期就是五先令三便士，星期六花三便士剃胡子，那就是五先令六便士，然后每个月花六便士理一次发，平摊下来一个礼拜三便士左右。这样就剩下四先令四便士吃饭抽烟。”

他觉得没有其他开销了。他吃面包和人造黄油、喝茶，到周末就只有干面包和不加牛奶的茶，也许他穿的衣服是别人捐的。他似乎很满足，比起食物，他更珍视他的床和炉火。但对于每个星期只有十先令收入的人来说，还花钱剃胡子，实在是很让人敬畏。

我整天在街上转悠，最东到沃平，最西到怀特查贝尔。很奇怪，去过巴黎之后，觉得伦敦安静且干净多了，但同时也更乏味。我怀念有轨电车刺耳的鸣叫，吵闹不堪的后街生活，还有警察列队浩浩荡荡走过广场。伦敦人穿着更体面，脸也更和善，甚至看起来更相像，不像法国人每张脸都那么有个性，有股凶猛的狠劲。伦敦没那么多酒鬼，没那么多尘土，也没那么多争吵，但却有更多无所事事的人。人们三五成群站在街角，看起来有点营养不良，靠着伦敦人每两小时就消耗一份的茶加两块面包过活。伦敦的空气没巴黎的那么热烈，这里是茶壶和劳务交换的地方，而巴黎充斥着小酒馆和血汗工厂。

观察人群是件挺有趣的事。伦敦东区的女人很漂亮（也许是混血儿的缘故），莱姆豪斯有很多东方面孔——中国人，吉大港的印度水手，卖丝巾的德拉威人，甚至还有些锡克教徒，天知道他们怎么来到这里。到处都是街头会议。在怀特查贝尔，被称为歌唱的福音的组织承诺要把你从六便士的费用负担中解救出来。在东印度码头路会有救世军在执行任务，他们依着《怎么对付一个喝醉酒的水手》这首歌的调调，唱“这里有人喜欢心怀鬼胎的犹大吗？”这首宗教歌曲。在塔山两个摩门教徒在召集会议，他们站的平台聚集了一群又吵又闹的人，有的人在指责他们一夫多妻的制度。一个满脸胡子的瘸子看起来是无神论者，一听到上帝这个词就开始咒骂。这里的喧闹声简直让人无所适从。

“我亲爱的朋友们，只要你们肯听完我讲的话，这就对了，让他们说去吧，别吵了。不，不，你回答我，你能指给我看上帝在哪儿吗？你指给我看的话我就信上帝。噢，闭嘴吧，别打岔，你自己闭嘴吧，一夫多妻主义者……是的，关于一夫多妻主义，我有很多话要说。别让女人工作，我亲爱的朋友，只要你们……不，不，你不要岔开话题。你见过上帝吗？你触碰过他吗？你跟他握过手吗？噢，别吵了，看在老天份上，不要吵了！”我听了二十分钟，很想了解一下摩门教，但整个会议

一直都只有争吵。这就是街道会议的命运吧。

在米德尔塞克斯街上，市场的人群中，一个裙子快拖到脚踝的女人拖着一个五岁大的孩子。她在他面前挥舞着一把锡做的小喇叭，吓得小孩直哭。

“你挺会自己找乐的呀！”那母亲嚷道，“你以为我带你来就为了给你买个破喇叭啊？你想从我脚边溜走吗？你个小混蛋，看来得给你点颜色看看才行。”

几颗唾沫星子喷到喇叭上。之后母亲和小孩便一边高声叫喊着一边离开了。在巴黎待过后，这一切看起来是多么怪异。

我在佩尼费尔斯的寄宿所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两个房客起了争执，吵得很难看。一个领养老金的七十岁老人，光着膀子（他的衣服洗了），对着一个短小精悍、背对炉火的码头工破口大骂。借着火光，我可以看到老人的脸，他又伤心又愤怒，几乎要哭出来了。显然，他们之间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

老人说：“你这个□□[1]！”

码头工说：“闭上你的嘴吧，你这个老不死的，不然我就收拾你！”

老人说：“你试试看，你这个□□，我比你大三十岁，但我可以毫不费劲地把你打得屁滚尿流！”

码头工说：“哈，我怕我到时会把你摔个稀巴烂，你这个老不死的！”

这样吵了五分钟，房客们闷闷地坐在周围，竭力无视这场争吵。码头工沉着脸，但老人也越来越火大。他不停地作势要冲向对方，昂着脸，像只在墙头上的猫似的隔着几英尺朝对方大叫，还吐口水。他好像真的很想朝对方扑过去，但终究没有这样做。最后他破口大骂道：

“一个□□！你就是一个□□！你就把那玩意儿塞到你的脏嘴吮吧，你这个□□！到时□□我会把你捏得粉碎，让你彻底完蛋。一个□□，你就是一个□□婊子养的。舔去吧，你，你就只配这个了，你□□你□□你这个黑杂种！”

这时，他突然倒在长凳上，用手捂住脸，开始哭起来。那个码头工看到大家都不站在他这边，就走了。

之后史蒂夫告诉我这场争吵的缘由。原来貌似一切都是因为一些值一先令的食物。不知怎么的，老人不见了他存放的面包和人造黄油，所以他接下来三天除了靠别人施舍，就没其他吃的了。码头工有工作，而且吃得饱饱的，就来嘲笑他，所以他们就吵了起来。

当我只剩下一先令四便士时，我到鲍尔的一家寄宿所住了一晚，哪里只收八便士。我顺着路往下走，通过一条小过道，来到了一个又深又闷的十平方英尺大的地下室。十个人映着强烈的火光坐在里面，他们大多都是劳工。已经是半夜了，但管事的那只有五岁的孩子还在劳工的膝边玩耍，他脸色苍白，喜欢黏人。一个老爱尔兰人对着小笼子里的灰雀吹口哨。笼子里还有其他会唱歌的小鸟，又小又不容易养活，它们的命运就是一直待在地下室里。房客们不时对着火撒尿，这样就不用穿过院子到厕所了。我坐在桌旁时，感到有东西扫过我的脚，于是往下看，原来是一些黑色的东西慢慢地穿过地板，是一些黑甲虫。

宿舍里有六张床，床单上印着大大的字“从第X号街偷来的”，散发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睡我隔壁床的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头，他是个马路艺术家，背驼得很厉害，弯到床外，离我的脸就只有一两英尺左右。他的背光光的，尘土在上面排成怪异的线条，就像大理石桌面一样。夜里有个醉鬼闯进来，就倒在我床边的地上。这里也有很多虫子，虽然没有巴黎那么多，但也足以让人睡不着觉了，实在脏得可以。好在管事的和他的妻子比较友好，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什么时候，都会给客人端上一杯茶。

---

[1] 原文中的脏话在出版时被略去，因此在译文中用“□□”代替，下同。

第二十六章

早上我照常要了份茶加两块面包，买了一盎司烟草，结果兜里只剩下半个便士。我还不想找B借钱，所以除了去临时收容所应该就没其他选择了。我不太清楚怎么去，但我知道罗姆顿有一家收容所，于是我便动身出发，下午三四点到的那儿。有一个瘦巴巴的老爱尔兰人倚在罗姆顿市场的猪圈旁，明显是一个流浪汉。我走过去靠在他旁边，把我的烟盒递给他。他打开烟盒，惊讶地看着里面的烟：

“老天，”他说，“你的烟真好呀！你到底怎么搞到的？你没走多远的路吧？”

“怎么，难道你们路上不抽烟吗？”我说。

“噢，我们也抽烟，看。”

他掏出一个生锈的铁盒，以前是用来装方糖的。里面有二三十个烟头，都是从人行道上捡回来的。爱尔兰人说他很少抽其他烟，他还说，如果留点神，一天可以在人行道捡到两盎司的烟。

“你是不是想在伦敦找地儿（临时收容所）住？”他问我。

我说是，心想这样他就会认为我和他一样是流浪汉，接着我问他罗姆顿的收容所怎么样。他说：

“唔，那儿发可可。有的地儿发茶，有的发可可，有的发燕麦粥。在罗姆顿，他们不发燕麦粥，感谢上帝，至少上次我住这儿时他们没给我喝燕麦粥。我还去过约克和威尔士。”

“燕麦粥怎么了？”我说。

“燕麦粥？底下放些该死的燕麦，再倒上热水，就是燕麦粥了。发燕麦粥的地儿最差劲。”

我们聊了一两个小时。那老爱尔兰人挺和善的，就是身上的味道不

好闻，不过知道他得了多少病后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他详细描述了他的病症，这些病彻底把他拖垮了。他头部得过湿疹，头发全掉光了；他有近视，但没戴眼镜；他有慢性咽炎，背部经常莫名其妙地痛；他消化不良，还有尿道炎；他静脉曲张，脚趾肿胀，而且还是扁平足。带着这一身病，他已经在街头流浪了十五年。

五点左右，爱尔兰人说：“一起喝杯茶吧？那地儿六点才开。”

“行啊。”

“唔，附近有个地方免费发茶和面包，那茶还不错。他们会要你念叨一堆经文。哎哟，该死的，时辰快过了。你快跟我走。”

他带我来到一条小巷，那儿有间锡顶小屋，有点像乡下板球场旁的小亭子。有二十五个左右的流浪汉在那儿等着。他们中有几个长期在外流浪，邋里邋遢的，不过大部分都还算干净，应该是从北方过来的，估计是失业的采矿工或制棉工人。这时门开了，一位女士让我们进去，她身穿蓝色丝质连衣裙，戴金边眼镜，胸前挂着十字架。里面有三四十张硬椅子，一台脚踏式风琴和一幅有点血腥的版画，描绘的是耶稣受难的故事。

我们不自在地脱下帽子坐下。那位女士为我们端来茶，我们吃吃喝喝的时候，她在一旁走来走去，和蔼地和我们讲话。她说了一些关于宗教的东西，说耶稣基督总是不忍心看到我们这样的穷人，说待在教堂，时间就会过得快，说流浪的人要是经常祈祷就会改变。我们很讨厌听这些。我们靠墙坐着，玩弄帽子（流浪汉一脱帽子就很难受，感觉被人看光光了），脸涨得通红，那位女士一对我们说话，我们就装作喃喃自语。显然她说这些都是出于好意。她端着一盘小面包走向一个北方佬，对他说：

“还有你，我的孩子，你多久没跪下祈祷并与天父交谈了？”

可怜的家伙，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不过由于看到了食物，他的肚子发出了一声不雅的咕噜声，替他做了回答。接着，他完全被耻辱感所笼罩，几乎吞不下面包。只有一个人按照那位女士的希望回答了她，那人鼻子红红的，动作敏捷，看起来活像一个因为醉酒而丢了袖章的下士。他能清楚说出“亲爱的主耶稣”这几个字，态度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大方，无疑以前他在监狱里学过这样的窍门。

茶喝完了，我看到流浪汉们偷偷对望。大家虽然没说出来，但都有同样的想法：祈祷开始前我们能不能先溜呢？有人开始在椅子上蠢蠢欲动，没站起来，只是不时瞟一下门口，似乎在煽动着大家溜号。那位女士用眼神制止了他，开始用更温柔的语调说道：

“我想你们没有必要这么快就走。临时收容所六点钟才开门，我们还有时间跪下向我们的天父说些话。我想向天父祈祷后我们会感觉好一点的，不是吗？”

红鼻子的家伙很乐意帮忙，他把脚踏式风琴拉到合适的位置，并分发祈祷用的小册子。他做这些事时是背对着那位女士的，他觉得分发这些小册子就像派发扑克牌一样好玩，还一边对每个人嘀咕：“伙计，给你的，喏，就这个，四张A和一个王！”等。

我们脱了帽，跪在一堆脏兮兮的茶杯旁，开始念念叨叨，说我们应该做的事没做，却做了我们不该做的事，我们都是有罪的。那位女士很热切地祈祷着，不过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们，观察我们是否用心祈祷。她没在看的时候，我们就咧开嘴笑，互相挤眉弄眼，小声开黄色玩笑，以显示我们对此并不在乎，不过有时我们说着说着就会顿住。只有红鼻子的家伙最沉浸在祈祷中，甚至还有所回应。唱歌时的情况略有改善，但有个老流浪汉除了会唱“前进，基督的士兵们”之外就不会唱别的了，而且经常会倒回去唱，破坏了歌曲的和谐。

祈祷持续了半个小时，接着，在门口握了手后，我们就散去了。一确定不会被那里的人听到后，就有人说：“嘿，麻烦事终于结束了，那些人估计要没完没了地祈祷。”

“你吃了面包，”另外一个人说，“总得付出点什么吧。”

“你是说付出祈祷吧？啊，你不会什么都不做就白拿的。你要是不跪下来求，他们连两便士的茶都不会给你。”

不少人表示赞同。显然，流浪汉对他们的茶并不心存感激。不过，那茶确实很不错，和一般咖啡馆的茶完全不同，就像真正的波尔多红酒和其他地方的殖民地垃圾红酒有天壤之别一样。我还确信，他们施舍这些都是出于善心，没有要羞辱我们的意思，所以公平起见，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尽管，我们还是没有这样做。

第二十七章

大约五点三刻，爱尔兰人带我到了收容所。这地方建在济贫院区[1]的拐角处，用烟黄色的砖头砌成。收容所和马路间隔着一行小铁栅栏窗、一堵高墙和几道铁门，看起来很像监狱。已经有很多流浪汉排起长队等着开门了，他们年龄各异，最小的有面带稚气的十六岁男孩，最老的有牙都掉光的七十五岁驼背老人，就像木乃伊一样。他们有些是长期流浪在外，可以从他们的手杖和黝黑的脸庞看出来，有些是失业的工人，有些是农民，一个小职员穿着衬衫打着领带，有两个明显是智障。看到他们大批聚集在这儿，让人感到很不舒服，他们不凶狠也不危险，但模样十分难看，浑身脏兮兮，几乎个个都穿得破破烂烂，明显营养不良。他们都很友善，但什么都没问。有很多人递烟给我，当然，大多都是烟头。

我们靠在墙上抽烟，流浪汉开始聊他们最近住过的收容所。从他们口中得知，似乎所有收容所都不一样，有优有劣，了解这些信息对于流浪的人很有用处。一个老手会告诉你英国所有的收容所的特点，比如说：在A收容所你可以抽烟，但天花板很多虫子；B收容所那里的床很舒服，但门卫很喜欢欺负人；C收容所的人很早就放你出去，但那儿的茶简直不能喝；在D收容所，只要你有点钱，管理人员就会想办法偷你的，等等。有无数这些信息。一般来说，不同收容所之间大约相隔一天的路程。别人告诉我巴内特-圣巴尔安斯之间的收容所是最好的，还警告我千万不要去比勒里基和切尔姆斯福特，还有肯特郡的艾德山。据说，切尔西的收容所是全英国最豪华的，有人称赞那里的毛毯不像收容所的，更像监狱里的，这可是赞美的话。夏天，流浪汉会到偏远一点的地方，到了冬天，他们会设法绕着大城市转，因为那里更暖和而且有更多慈善机构。不过你得一直走动，因为你一个月只能有一次机会进同一间收容所或伦敦两间收容所中的一间，否则就要承担两个星期不能进收容所的后果。

六点后收容所开门了，我们蜂拥而入。院子里有个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拿出名册，上面记录着我们的名字、职业和年龄，还有我们来的地方和要去的地方，这最后一项是为了记录流浪汉的行踪。我填的职业是画家，我画过水彩画——谁没画过呢？工作人员还问我们有没有带

钱，每个人都说没有。带超过八便士的钱进收容所是违法的，即便少于这个数目，都要在进门前上交。所以流浪汉都习惯私自带钱进去，他们把钱包在一块布里面，这样就不会叮当作响。通常他们会把它放到装茶和糖的包里，这种包每个流浪汉都有，或放在他们的“文件”里。这种“文件”会被视为神圣的东西，从不会被人搜查。

在办公室登记过后，我们被一个被称为收容所所长（他的职责是管理收容所，通常是个济贫院里的贫民）的人领进收容所，另外还有一个粗鲁凶狠的门卫，他穿着蓝色制服，像对待牛一样对待我们。收容所里实际上只有一个洗澡间、一个卫生间，其余的就是两排石屋，一共可能有一百多间。收容所由石头砌成，再刷上石灰水，里面空荡昏暗，勉强算是干净，带有一股独特气味，光看到外观我就能想象到气味——一种混合着肥皂、洗涤剂和公共厕所的气味，一种冰冷、令人沮丧的监狱般的气味。

门卫把我们集中到一个过道，让我们六个六个地进去洗澡，洗澡前要搜身，搜身的目的是看身上有没有钱或烟。在罗姆顿的收容所，你只要私自带烟进去就可以抽，但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没收。老手们告诉我们，门卫不会搜查膝盖以下的部位，所以进去洗澡前我们都把烟藏在靴子里脚踝的部位。脱衣服时，我们会把烟偷偷放到大衣里，因为大衣可以当枕头，所以允许带进去。

浴室的场景真的非常让人厌恶。五十个一丝不挂的邋遢男人挤在一间二十平方英尺的房间里，只有两个澡盆和两条滑腻腻的毛巾。我永远也不会忘掉那种脚臭味。只有一半不到的流浪汉真正地洗了澡（我听到他们说热水逐渐“变凉”），不过大家都洗了脸和脚，以及包裹在脚趾头上的滑腻腻的碎布片，只有洗全身澡的人才能用干净水，所以很多人用的都是别人的洗脚水。门卫把我们推来推去，一旦有人磨磨蹭蹭，他就会大声斥责这个人。轮到我洗澡时，我问洗澡前能不能把澡盆里的水倒掉，澡盆里已经积了一条条的污垢。他很干脆地回答：“闭上你□□的臭嘴，快点洗！”这种口气一下子就确定了其身份地位，我就再也没说什么了。

我们洗好澡后，门卫把我们的衣服捆起来，发给我们制服，是灰色的棉布衣服，干净程度很让人怀疑，就像缩号了的睡衣。我们马上被带到了小房间去，这时门卫和收容所所长从济贫院那边端来晚饭。每个人只能吃半磅涂了人造黄油的面包，和一品脱盛在锡铁罐里面的可可，可可没加糖，喝起来有点苦。我们坐在地板上五分钟就吃光了所有食物，

七点左右，小房间的门就从外面锁上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才开。

每个人都可以和自己的伙伴睡在一起，两个人睡一间房。我没有伙伴，就和另外一个也是独自一人的男人睡一间房，他很瘦，长满胡须，有点斜视。房间长八英尺，宽五英尺，高八英尺，石头砌成，只在墙的高处开了扇小铁栅栏窗，门上则有个窥视孔，就像监狱的牢房一样。里面有六张毯子，一个夜壶，一根热水管，没有其他东西了。我茫然地看了一下周围，总觉得少了点东西。然后，突然之间，我明白缺了什么，于是喊道：

“我就说嘛，该死的，床在哪儿？”

“床？”另外一个人吃惊地说，“这里没有床！你还想要什么？这就是让你睡地上的收容所。天啊，你还没习惯吗？”

看来在收容所没床睡是很正常的事。我们把外套卷起来，靠在热水管上，尽量让自己舒服些。房间开始有些闷，但并不让人觉得暖和，所以我们也不能把所有毯子都垫在身下，这样只能拿一条毯子减低地板的硬度。我们相隔一英尺躺下，呼出的气直吹到对方脸上，裸露的大腿和胳膊会经常碰到，睡着后一翻身就会压到对方。两个人都烦躁地翻来覆去，但这不怎么管用；不管怎么翻身，你都会先有一种麻麻的感觉，然后透过毯子接触到坚硬的地板而感到疼痛。你能够睡着，但时间不会超过十分钟。

半夜时，另外那个人开始对我做出同性恋的亲昵行为，这在反锁的黑暗房间里真是件龌龊的事。他不太强壮，所以我可以轻易制止他，但当然，之后我就睡不着了。余下的晚上，我们都没睡着，边抽烟边聊天。那人给我讲了他的生活：他是个装配工，失业三年了。他说自己一丢了饭碗，妻子就离他而去，他很久没碰过女人了，几乎已经忘了女人是怎样的。他说同性恋现象在流浪者中很普遍。

早上八点，门卫走过走廊，打开门喊道：“全部出来！”门一打开，冲出一股腐臭味。走廊里立刻挤满了浑身肮脏、身穿灰衣的人，每个人手上都拿着夜壶，争着去卫生间。看来早晨只有一盆水给我们洗漱，我们到那儿时，二十个流浪汉已经洗完脸了。我看了一眼飘在水面黑色的浮垢，没洗脸就走了。洗完脸后，我们分到与昨天晚餐一样的食物，我们的衣服得以发还，然后我们就被派到院子里工作去了。工作是削土豆给贫民当晚饭，这只不过是种形式，让我们在医生过来检查身体前有点

事做。大部分流浪汉都比较懒散。十点钟的时候医生到了，我们被告知要回到小房间，脱掉衣服到走廊上等待检查。

我们裸着身子，打着寒战，在走廊排成一列。你简直不能想象，我们站在无情的晨光中，看上去是怎样一群低劣丑陋的生物啊。一个流浪汉的衣服很破败，但毕竟也可以遮住更糟的东西。要看真实不加掩饰的人，你就要看他没穿衣服的样子。平足、大肚子、平胸、松弛的肌肉，各种身体缺陷尽收眼底。几乎每个人都营养不良，有些人明显有病，有两个人拄着拐杖，至于那个干枯得像个木乃伊的七十五岁老头，我们都不知道他平时怎么走得动。我们没刮胡子，也没睡好觉，个个无精打采，你要是看到我们的脸，准会以为我们已经喝了一星期酒。

检查只是为了看看我们有没有天花，不会注意别的状况。一个年轻的医学院学生，一边抽着烟，一边粗略地顺着队伍从上到下打量我们，并不询问我们是不是健康。我的室友脱了衣服后，我发现他胸前有一片红色的疹子，我还和他只隔着几英寸睡了一晚，很害怕被他传染天花。但医生检查了他的疹子后说这只是营养不良引起的。

检查完身体后，我们穿上衣服，被派到院子里去，门卫点名叫我们去拿留在办公室的物品，并分发了餐券。每张餐券值六便士，能在昨晚告知我们的咖啡店里用餐。有趣的是，不少流浪汉不识字，还得向我和其他“学者”请教，才能弄懂餐券上写了什么。

门一打开我们就散了。空气闻起来也是多么清甜，尽管这只是郊区的一条后巷，但比起收容所里闷着的恶臭好太多了！好在我现在有了一个同伴，是我在削土豆时认识的爱尔兰流浪汉，他叫帕迪·雅克，有点忧郁苍白，看上去干干净净斯斯文文。他准备去埃德伯里的收容所，提议我们一起去。于是我们一起出发，下午三点到达那里。全程十二英里长，我们却走了十四英里，因为我们在伦敦北部的贫民窟迷了路。我们的餐券可以在伊尔福德的一间咖啡店里使用。我们到了那里，一个毛手毛脚的女服务员看到了我们的餐券，大概知道我们是流浪汉，轻蔑地把头一扬，好长时间都不搭理我们。最后，她把两杯“大号茶”和四块面包重重地扔在桌上，这些食物加起来也就值八便士。看来这些店经常欺负流浪汉，从每张餐券抠下两便士。由于流浪汉花的是餐券而不是钱，他们既不能抗议也不能去别的地方吃。

---

[1] 济贫院，又称救济院、救贫院、贫民院，是为穷人提供工作和为弱者提供生计的机构。

第二十八章

之后的两个星期里，帕迪成了我的同伴，因为他是第一个我了解得比较深入的流浪汉，我想讲讲他的故事。我相信，英国有几万像他那样的流浪汉，他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他个子高高的，大约三十五岁，一头金发正逐渐变灰，一双蓝眼睛水汪汪的。他身体还不错，但脸颊已经瘦得凹陷了下去，而且由于长期只吃面包和人造黄油，导致面如菜色。他穿得比大多数流浪汉要好，上身是一件粗花呢猎装，下身是一条旧晚礼服裤，上面的镶边还在。显然，在他觉得这镶边能让他感受到零星的尊严，一有脱线，他就把它缝好。他很注重自己的形象，随身携带剃须刀和牙刷，而且不肯卖掉它们，尽管他早已卖掉了他的“文件”甚至随身携带的小刀。虽然如此，离他一百码开外都能看出他是个流浪汉，他走路姿势有点漫不经心，肩膀向前耸，显得很落魄。看到他走路的样子，你会觉得他很快就会摔一跤。

他在爱尔兰长大，战争爆发后当了两年兵，之后在一间金属抛光厂工作，但两年前丢了这份工作。他觉得做流浪汉很羞耻，但他自然而然养成了流浪汉的生活习惯。他不停留意人行道，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烟头甚至空烟盒，因为他要用烟盒的薄纸来卷烟。在我们去埃德伯里的路上，他看到人行道上有一个报纸包着的包裹，便一把抓了起来，发现里面有两个羊肉三明治，不过边上破掉了。他坚持要和我分着吃。每次经过自动机器，他都要拉一下把手，因为他说有时机器会出毛病，说不定会蹦出几个便士来。然而，他从没想过要违法犯罪。我们到了罗姆顿的郊区地带时，帕迪看到台阶上有一瓶牛奶，显然是放错了地方。他停下来，眼馋地看着那瓶牛奶。

“天啊！”他说，“好东西就要被浪费掉了。有人会打开它吗？打开它很容易的。”

我以为他想要自己“打开它”。他四下张望着，这是一个安静的居民区，附近没人。帕迪那张带着菜色、双颊深陷的脸看上去很渴望喝掉那瓶牛奶。但接着他转过身去，忧郁地说道：

“最好别碰它。一个男人怎么能偷东西呢？感谢上帝，我还没偷过东西呢。”

恐惧，饥饿产生的恐惧，让他保有美德。如果他连着吃了两三顿饱饭，他就会有勇气偷那瓶牛奶。

他聊天的主题有两个，一是落魄到成为流浪汉是种耻辱，二是如何免费吃到饭。我们流浪在街头时，他会自个儿滔滔不绝地用一种呜咽、自怜的爱尔兰腔调说：

“这样流浪真是糟糕，不是吗？要去该死的收容所真让人伤心。可又能怎么样呢？我已经两个月没有吃过肉了，靴子也越磨越破了。唉！天哪！要是去埃德伯里的路上能到女修道院要杯茶喝就好了，一般他们都会给我们茶喝。啊，一个人不信教又会怎么样呢？我在女修道院喝过茶，还有浸礼会和圣公会，各种教堂。我自己是信天主教的，也就是说，我已经有十七年没忏悔过了，但我还是有自己的宗教情感，你懂的。他们教堂总是喝茶的好地方。”这些话，他可以一整天这样说个不停。

他在很多方面的无知让人很吃惊。比如，他曾问过我，拿破仑是生活在耶稣之前还是之后。还有一次，在我朝书店橱窗里看的时候，他变得很不高兴，因为里面有一本书叫做《关于效法基督》，他认为这是对耶稣的亵渎。“他们那些家伙到底能效法耶稣的什么呢？”他生气地说。他认识字，但讨厌读书。在我们从罗姆顿到埃德伯里的路上，我走进一家公共图书馆，虽然帕迪不想看书，我建议他可以进去歇歇脚。他说他宁可在路边等。“不要，”他说，“一看到那些该死的印刷品我就恶心。”

和大多数流浪汉一样，帕迪非常吝啬火柴。我遇到他时他有一盒火柴，但我从没见他划过一根。我划自己的火柴时，他会说我太奢侈。他采取的方法是问陌生人借火，有时他宁愿半个小时不抽烟，也不愿用掉一根火柴。

自怜是他的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似乎觉得自己运气总是不好。他有时会打破长久的沉默，毫无缘由地突然大叫一声，“你的衣服已经开始长霉了吧？”或者“那个收容所的茶根本不是茶，是尿”。就好像这世上已经没别的事可想了。而且好像只要别人比他好，他就会产生一种阴暗、低贱的嫉妒心，不是针对富人，而是针对有工作的人，因为富人已经超过了他的社会视野。他非常渴望工作，就像艺术家渴望成名一

样。如果他看到一个老人在工作，他会恶狠狠地说：“看那个老家伙，害得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没工作。”如果是个孩子，他就会说：“那个小兔崽子居然从我们的嘴里抢面包吃。”对他来说，所有外国人都是“那些该死的洋鬼子”，因为根据他的理论，外国人要对失业问题负责。

他对女人既渴望又憎恨。年轻漂亮的女人离他太遥远，他根本不予考虑，但他看到妓女就会流口水。如果有几个嘴唇涂得猩红的老女人走过，帕迪的脸就会泛红，然后回头饥渴地盯着她们。“婊子！”他会低声嘟哝，就像个望着糖果店橱窗的男孩。他曾经告诉我，自从他失业以来，他两年没碰过女人了，也就是说，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可以找到比妓女还好的女人。他有着典型的流浪汉性格：卑躬屈膝、嫉妒他人，就像丧家犬。

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同伴，天性慷慨大方，能与朋友分享他最后的一片面包干。的确，他不止一次与我分享他最后一块面包干。要是能好好休养几个月，他可能也有能力工作。但两年的面包和人造黄油彻底降低了他的生活标准。他一直生活在这种对食物卑微的渴望中，这使得他的头脑和身体都充满了低等的东西。毁掉他男子气概的，是营养不良，而非天生的邪恶。

第二十九章

在去埃德伯里的路上，我告诉帕迪，我肯定能从一个朋友那儿弄到点钱，不如我们直接去伦敦，这样就不用在收容所再待一晚了。但帕迪最近没去过埃德伯里，出于流浪汉的本性，他不会浪费免费寄宿的机会。我们计划第二天早上前往伦敦，我只剩下半便士，帕迪倒还有两先令，这些钱够我们一人有张床睡，还能喝上几杯茶。

埃德伯里的收容所和罗姆顿的没什么差别。最糟糕的是进门时香烟全被收走了，我们还被警告说，只要有人抽烟被抓住，就会被立刻赶出去。根据《流浪法》，流浪汉会因为在收容所吸烟而遭到起诉。事实上，几乎可以因为任何事情起诉他们。不过，当地的执法机关一般都懒得这么做，而是直接将违规者扫地出门。我们俩没事可干，收容所的房间舒服得很。我们两人睡一间，“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也就是说，一个睡木板，另一个睡地上，上面铺着草荐，毯子也够盖，尽管有点脏，但没虫子。吃的和罗姆顿一样，只不过茶代替了可可。收容所所长会以半便士的价格卖给我们一大杯茶（这当然是违法的），这样早上我们就能多喝点茶。我们每人还分到了一大块面包和奶酪，准备带走当午饭吃。

我们抵达伦敦时，救世军寄宿所还有八个小时才开门。说来也怪，我竟会对周遭的一切置若罔闻。我到过伦敦无数次了，但直到那天，我才注意到伦敦最大的缺陷——想找个坐的地方都得花钱。在巴黎，如果你没钱，又找不到公共长椅的话，只管坐在马路边上好了。在伦敦，天知道坐在马路边上会有什么后果，很有可能是被抓去蹲班房。到四点时，我们已站了五个小时，因为长时间踩在坚硬的石板上，脚胀得通红。我们饥肠辘辘，因为刚离开收容所就把发的东西吃掉了，我的烟也抽完了，不过这对于帕迪来说是小事一桩，他捡烟头抽。我们到两家教堂去试试运气，结果都没开门。然后我们去了一家公共图书馆，但发现里面没有座位。抱着最后的希望，帕迪提议我们去罗顿之家[1]试试。按规定，七点前他们不会放我们进去，但可以偷偷溜进去。我们走到气势宏伟的大门前（罗顿之家确实气势非凡），故作轻松，努力装得像是常住的房客。我们刚要大摇大摆往里闯，一个在门口晃悠的尖脸男人拦住了我们，显然他是这里管事的。

“你们俩昨晚住在这里吗？”

“没有。”

“那就给我快滚。”

我们只能退出去，在街角又站了两小时。这滋味可不太好受，但我以后不会再用“街角闲人”的说法了，所以这也算是有所收获吧。

六点时，我们去了救世军寄宿所。我们要等到八点才能订床位，而且也不确定到时有没有空床，但有一个军官——他叫我们“兄弟”——同意放我们进去，条件是我们得付两杯茶的钱。寄宿所的大厅刷得很白，像个谷仓，空空荡荡，令人压抑，而且没有生火。两百个穿戴还算整齐，看起来不太会惹是生非的人挤坐在长条木椅上。一两个身着制服的军官来回巡视。墙上挂着布思将军[2]的画像，还有禁止做饭、喝酒、吐痰、骂人、吵架和赌博的告示。为了举个例子，我把其中一个告示逐字逐句抄了下来：

任何人被抓到赌博或玩牌，一律驱逐，绝不宽恕。

举报赌博、玩牌且消息属实者有奖。

当值军官要求全体住客协助保持住宿地远离赌博这一罪大恶极的陋习。

“赌博或玩牌”，这个短语真有意思。

在我看来，救世军寄宿所虽然干净，但远比最差的寄宿所还乏味。这儿有些人给人一种强烈的绝望感，他们外表体面，实则已经落魄得把衬衣也当掉了，却仍在找坐办公室的工作。为了保住颜面，住进还算干净的救世军寄宿所是他们最后的挣扎。我旁边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外国人，衣衫褴褛，但却难掩绅士风范。他们在玩口头国际象棋，根本没写下棋步。其中一个是瞎子。我听见他们说已经攒了很长时间钱，要买一副半克朗[3]的棋盘，却始终没买成。到处都是失业的小职员，他们面色苍白、郁郁寡欢。这群人中，有个又高又瘦、脸色惨白的小伙儿，正激动地说着话。他手握拳头，敲着桌子，夸张且亢奋地自吹自擂。当值的军官走远后，他突然开始咒骂起来，着实令人震惊：

“我跟你们说，哥们儿，明儿我就能得到那份工作。你们这些家伙真他妈低声下气，我可不像你们，我能照顾好自己。看看那个□□的告示吧！‘上帝会保佑你！’该死的上帝还真没少保佑我，我可不会再信□□的上帝。你们瞧着吧，哥们儿，我就快得到那份工作了。”等等之类的。

我看着他，被他说话时的疯狂和激动所震惊，他似乎已经歇斯底里，又或许是喝多了。一小时后，我走进了一个和大厅分隔开来的小房间，那是给人读书的地方，但里面没有书也没有报纸，因此很少有住客去。开门时，我看见刚才说话的那个小伙子一个人在里面，正跪着祈祷。把门关上之前，我刚好看见他的脸，上面写满了痛苦。看到这一神情，我恍然大悟，他已经饿得不行了。

床铺收费八便士，我和帕迪还剩下五便士，我们便把钱花在了“酒吧”里，这里的食物比较便宜，虽然不如一些公共寄宿所便宜。茶水好像是拿茶渣泡的，我猜是人们捐给救世军的，不过他们一杯茶就要卖三个半便士，味道还很差。十点钟的时候，一个军官吹着哨子在大厅里转了一圈，大家很快都站了起来。

“这是干吗？”我吓了一大跳，向帕迪问道。

“那说明你得去睡觉了，而且动作得利索一点。”

在军官的命令下，全部两百号人像绵羊一样听话，成群结队地去睡觉了。

宿舍是个很大的阁楼，像间营房，里面有六七十张床。床很干净，也还算舒服，就是很窄，而且床与床之间挨得太近，呼气的时候直接就呼到旁边那人脸上去了。房间里睡了两个军官，以防止熄灯后有人抽烟或说话。我和帕迪几乎一夜没合眼，因为不远处有个神经有毛病的人，可能是患有弹震症[4]，时不时就会喊一声“皮普！”，声音又大又刺耳，有点儿像汽车喇叭的声音。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叫，但这样注定是没法睡觉的。别人都管这家伙叫“皮普”，看来他是寄宿所的常客，每晚他都要把一二十个人弄醒。在这种集体管理的寄宿所，人们会因为各种原因睡不好，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早上七点，又响起一声哨子，军官们巡视一圈，把没有立即起床的人摇醒。从那以后，我在不少救世军寄宿所住过，发现尽管不同的地方

略有差异，但实行的都是这种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这种寄宿所便宜是便宜，但在我看来太像济贫院了。其中有些寄宿所每周还要做一到两次礼拜，强制要求所有住客参加，否则就得走人。事实上，救世军习惯了以慈善团体自居，甚至连开寄宿所都带上了慈善的意味。

十点钟的时候，我去了B的办公室，问他借一英镑。他给了我两英镑，并让我需要时再来。这样一来，我和帕迪至少一周内不用为钱发愁了。我们白天在特拉法加广场[5]游荡，去找帕迪的一个朋友，却始终没找着。晚上去河岸街[6]附近一条小巷里的寄宿所住宿，那里收费十一便士，可里面黑乎乎的，而且气味难闻，是个臭名昭著的同性恋出没地。楼下昏暗的厨房里，三个看上去有点暧昧的小伙子身着时髦的蓝色套装，分开坐在长椅上，其他住户没怎么理睬他们。我猜他们是同性恋。他们看上去跟巴黎街头的流氓痞子差不多，只是没留络腮胡子。火炉前，一个穿着整齐的人正跟一个光着身子的人讨价还价。他们是卖报纸的，穿着整齐的人正在向光着身子的人推销他的衣服，他说：

“看吧，你还没穿过那么好的衣服吧。外套半克朗，裤子两先令，靴子一个半先令，帽子和围巾一先令，总共七先令。”

“你要得太多了！外套我给你一个半先令，裤子一先令，剩下的我给你两先令。总共给你四个半先令。”

“要不一共五个半先令吧，伙计。”

“那也成，脱下来吧。我还得出城卖晚报呢。”

穿衣服的人把衣服脱了，三分钟后，他们就换了个样。原先光着身子的穿上了衣服，另一个脱了衣服，把一张《每日邮报》围在腰间，像是穿着苏格兰短裙。

宿舍光线很差，里面放了十五张床，显得很狭窄。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尿臊味，难闻得让人一开始只敢小口呼吸，否则肺里就会充满这股刺鼻的气味。我刚躺上床，一个男人从黑暗中出现，探身过来和我闲扯，虽然他说话醉醺醺的，但能听出来他受过教育。

“你在公学待过，是吧？（他听到我跟帕迪说过一些事）在这里可不太能见到从那种老学校出来的。我上过伊顿，你知道，二十多年过去了，一点没变过。”他开始唱起了伊顿的划船歌，声音颤抖，但不算难

听：

正是划船好时节，

又到收获干草时——

“闭上你□□的破锣嗓！”几个房客喊道。

“下三滥。”那个老伊顿生说，“真是俗不可耐。对你我来说，待在这种地方是不是有点滑稽，嗯？你知道我的朋友跟我说什么吗？他们说：‘M，你□□没救了。’一点没错，我就是没救了。我落魄得很，不像这里的人，他们想落魄还不一定落魄得了。我们这群倒霉蛋一块儿上吊得了。我们的脸庞依旧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你知道的。要来点酒吗？”

他拿出一瓶樱桃白兰地，与此同时，他没站稳，重重倒在我的腿上。正在脱衣服的帕迪一把把他拉起来。

“滚回你的床去，你个傻不拉叽的老□□！”

老伊顿生摇摇晃晃走回自己床边，衣服都没脱就钻进了被窝，连靴子也没脱。夜里有好几次我听见他在喃喃自语：“M，你没救了。”好像这句话很讨他喜欢。第二天早上，他和衣睡着，胳臂里夹着那瓶酒。他五十多岁，面容还算干净，但略显憔悴。奇怪的是，他穿得倒很时髦。他那双考究的皮鞋从脏兮兮的床上伸出来，让人看着觉得很别扭。同时我也发现，他那瓶樱桃白兰地的价格相当于我两个星期的住宿费，所以他可能并不是生活艰难。他经常光顾这样的公共寄宿所，可能是为了找同性恋。

床与床之间的距离不足两英尺。午夜的时候，我醒来发现睡我边上的人正试图从我的枕头底下偷钱。他偷的时候还在装睡，像老鼠一样悄无声息地把手伸到我的枕头下面。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他是个驼背，手臂长得跟猿猴似的。我把钱险些被偷的事同帕迪讲了，他笑着说：

“天呐！这你可得适应，这种寄宿所到处都是小偷。在有些宿舍里，只有穿着衣服睡觉才是安全的。我曾见过他们把一个瘸子的假腿给偷走了。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他有一百九十六磅重呢——带着四英镑十先令进来。他把钱藏在床垫下面，说：‘喏，想偷我的钱得先问问我的身子肯不肯。’但是他的钱还是被偷走了。第二天早上，他在地板

上醒来。四个小偷一人提着床垫一角，轻轻松松就把他抬了起来。那人之后再也没见着他那四英镑十先令。”

---

[1] 罗顿之家，一种租给穷人住的房屋，其条件优于仅提供宿夜铺位的寄宿所。

[2] 布思将军，即威廉·布思（1829—1912），英国人，“救世军”创始人，致力于为穷人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援助。

[3] 克朗，英国旧币，1克朗=5先令=25便士。

[4] 弹震症，即战争精神病，一般发生在离开战场的士兵身上，他们因为战争的残酷而产生极度恐惧和困惑。

[5] 特拉法加广场，建于1805年，英国伦敦著名广场，坐落在伦敦市中心。

[6] 河岸街，是伦敦西敏市一条街道的名称，西起特拉法加广场，东至圣殿关处与弗利特街汇合，以其旅馆和剧院著称。

第三十章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找帕迪的朋友，他叫博佐，是个街头画家，就是那种在人行道上画画的。帕迪可没有地址的概念，但他依稀记得在兰贝斯区[1]可能找得到博佐，结果我们在河堤一带遇见了他。那儿离滑铁卢大桥不远，当时他正拿着盒粉笔跪在人行道上，照着一本廉价笔记本临摹温斯顿·丘吉尔的速写，画得还挺像。博佐身材矮小，皮肤黝黑，鹰钩鼻，留着一头长长的卷发。他的右腿严重变形，脚极度扭曲，脚后跟向前翻，样子相当可怕。从外表来看，他很像犹太人，但他坚决否认这一点。他说他的鹰钩鼻是“罗马式”的，还颇以长得神似某位罗马大帝为荣，我猜他指的是维斯帕先[2]。

博佐说话的方式很奇怪，有伦敦土腔，但是思路清晰，富于表现力，看样子他读过不少书，却又懒得去修正自己的语法。我和帕迪在河堤待着聊了会儿天，博佐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街头画画这个行当。我在这里重复的基本上是他的原话。

“我是公认的专业画家。我可不像其他人那样，用写黑板的粉笔画画，我用的是画家才会用的颜料。这颜料价格真他妈的不便宜，尤其是红色。白天要是画得久一点，我得花掉五先令的颜料费，最少也不会低于两先令。[3]我擅长画漫画，你知道的，就是那种政治、板球什么的。看这儿，”他给我看他的笔记本，“这些肖像全是我从报纸上临摹下来的，这些家伙都是搞政治的。我每天画的漫画都不一样，比如：讨论预算案的时候，我画了幅丘吉尔使劲推大象的画，大象上写着‘债务’，我在下面写上：‘他推得过去吗？’懂了吗？画任何一个党派都可以，但绝对不能画拥护共产主义的，因为警察不允许。有一次，我画了幅漫画，一条名叫‘资本’的蟒蛇正在吞食一只名为‘工人’的兔子。警察过来看到了，说：‘你给我擦掉，放机灵点儿。’我不得不把它擦了。警察有权说你游手好闲并把你抓走，跟他们顶嘴可没好结果。”

我问博佐在街上画画能挣多少，他说：

“每年这个时候，不下雨的话，周五到周日我能挣个三英镑左右，你知道的，大家周五发工资。下雨天我没法干活，雨水会把颜料冲走。

一年到头，我平均每周能挣个一英镑，因为冬天干不了什么活。有几次碰上划船比赛和足总杯决赛，我还挣到过四英镑。但要知道，你得从他们身上挤出钱来。如果你只是干坐着看他们，连一先令都别想得到。给个半便士很正常，如果不跟他们搭讪，连半便士都没有。一旦搭上了话，不给你点钱，他们自个儿都会觉得不好意思。最好的办法是不断变着花样画，因为他们见你在画画，就会停下来看，但问题是，你拿出帽子一转身，这些家伙就四处散开了。干这一行确实需要个帮手，你画着画，把一群人吸引过来，你的帮手就不经意走到他们身后。他们不知道他是来帮忙的，然后他突然扯下帽子，他们就受到两面夹击了。从真正的阔佬那儿，你永远都别想得到一个子儿，那些穿得邋里邋遢的家伙反而给得最多，还有就是外国人。我甚至从日本佬、黑鬼这种人身上得到过六便士，他们可不像英国人他妈的那样小气。还有件事，记得把你的钱收好，帽子里留一个便士就行，要是看见你已经有了一两个先令，他们就不会再给你钱了。”

博佐特别看不起河堤一带的其他街头画家，称他们为“蹩脚货”。那时沿着河堤，几乎每隔二十五码就有位街头画家——每个画家公认的地盘至少是二十五码。博佐轻蔑地指着五十码开外的一个白胡子老头：

“你看到那个老傻瓜了吗？十年来，他每天画同一幅画。他给画取名为《忠实的朋友》，画的是一条狗正把一个孩子从水里救出来。这个老蠢货画得比十岁小孩好不了多少，他是画出经验来了，但画来画去只有一幅，就跟拼图玩多了顺手一样。这儿有很多这种家伙，有时他们还跑来剽窃我的创意，不过我是无所谓，这帮傻帽他妈的自己什么也想不出，所以我总是遥遥领先。漫画的精髓就在于与时俱进。有一次，有个小孩的头卡在切尔西桥的栏杆里了，我呢，听说后就在街边画出了这幅场景。画完后，他们还没把那孩子的头弄出来。我动作很快的。”

看起来，博佐还挺有意思，我很想多了解他一下。那天晚上，我去河堤一带找他，他在河的南面给我和帕迪找了个住处。他把人行道上的画冲洗干净，然后开始计算当天的收入，大约有十六先令，他说赚了十二三先令。我们向兰贝斯区走去，博佐一瘸一拐慢慢走着，步伐很奇怪，跟螃蟹似的，身体往一侧倾斜，后面拖着那只残废的脚。他两手各拄一根拐杖，肩上挂着颜料箱。过桥的时候，他在一个角落处停下来休息。有一两分钟他一言不发，我诧异地发现他正在看星星。他碰了碰我的胳膊，用拐杖指着天空。

“喂，你看得到毕宿五[4]吗？你看那颜色，真像只大红橙！”

从他的谈吐来看，他应该是画廊的美术评论家才对。我感到很吃惊。我得承认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哪颗是毕宿五，真的，我甚至从没注意过星星的颜色有什么不同。博佐开始给我灌输一些天文学基础知识，指给我看一些主要星座。他似乎很在意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惊讶地对他说：

“你好像很了解星星嘛。”

“不算太了解，但多少知道一点。皇家天文家学会给我写过两封信，感谢我写了有关流星的文章。我时不时会在晚上出去看星星，星星是免费演出，用眼睛看着就行，不用花钱。”

“好主意！我怎么从来都没想到过呢。”

“其实，你应该有某样兴趣爱好。一个人到处流浪，并不一定非要只想着一杯茶和两片面包。”

“但过着这种日子，要对某些事情感兴趣，比如星星什么的，岂不是很难？”

“你是说在街上画画？那可未必。要是你肯花点心思，培养一种兴趣爱好，不会把你变成一只该死的兔子。”

“可大多数人就跟我说的一样。”

“当然，看看帕迪就知道，一个老乞丐，就知道喝茶，只配讨些残羹剩饭吃。他们多数都是这样挨日子，我瞧不起他们。但人不是非得那样，你只要有知识，就算下半辈子流浪也没关系。”

“不过，我发现恰恰相反。”我说，“我觉得，你要是把一个人的钱拿走了，他就什么都干不成了。”

“不，不一定。你只要下定决心，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是一样的，不论贫穷还是富裕。你仍可以保留你的知识，坚持自己的想法，只要对自己说：‘我在这儿是自由的。’这样你就会过得不错。”说“这儿”的时候他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博佐就这个问题又谈了一会儿，我听得很专心。看来他是个很不一

般的街头画家，而且我也是第一次见人坚持觉得没钱没什么大不了。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因为下了好几天雨，他没法工作。他给我讲了他的人生遭遇，真可谓惊心动魄。

他的父亲曾是个书商，不过后来破产了，他十八岁就开始工作，当过油漆工，打仗时在法国和印度服了三年役。战争结束后，他在巴黎找了份油漆工的活儿，在那儿待了几年。和英国比起来，法国更适合他（他鄙视英国），他在巴黎混得不错，挣了钱，还和一个法国姑娘订了婚。不料有一天，这姑娘被公共汽车压死了。博佐整整一周都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又去工作，身体虚弱得很。当天早上，他在刷漆时从离地面四十英尺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他的右脚摔成了肉酱。不知为什么，他仅得到了六十英镑的补偿。于是他回到了英国，把钱都花在了找工作上。他在米德尔塞克斯街的市场上卖过书，还试过托着盘子卖玩具，最后决定要当街头画家。自此以后，他过得很拮据，整个冬天有一顿没一顿地过着，常常睡在收容所或河堤一带。

我认识他时，他除了身上穿的几件衣服、一些画具和几本书之外一无所有。衣服就是乞丐通常会穿的那种破布，但他穿了衬衣，打了领带，为此他很是得意。衬衣他已经穿了一年多了，领头经常松松垮垮挺不起来。博佐总是拿衬衣下摆处的布料来补，弄得那件衬衣几乎已经没有了下摆。他那条坏腿的情况越来越糟，很有可能需要截肢，他的膝盖因为跪在石头地上画画的缘故，老茧有鞋底那么厚。显然，对他而言，除了做乞丐，在济贫院终老外，没有别的出路。

尽管如此，他既不害怕，也不后悔，不以此为耻，也不自怨自艾。他早已接受这样的命运，并为自己总结了一套哲学。他说，做乞丐不是他的错，他既不在乎，也不想因此烦恼。他与社会为敌，只要逮着个好机会，他就会搞点破坏。他拒绝节俭。夏天他把钱花得精光，因为不好女色，他把赚来的钱都花在喝酒上。如果到了冬天，他身无分文，那么社会肯定会照顾他。他有备而来，准备尽自己所能榨干慈善机构，当然，前提是不用说谢谢。然而，他拒绝接受教会慈善机构的帮助，因为他说为了得到小面包而唱圣歌，感觉如鲠在喉。他还把其他很多事和尊严搭上边，比如，他吹嘘说哪怕再怎么饥饿，也绝不捡一个烟头。他认为自己比普通乞丐高上一等，他说那些人都是可怜的家伙，连拒绝低声下气的底气都没有。

他的法语说得马马虎虎，读过几本左拉的小说、莎士比亚所有的戏剧、《格列佛游记》和不少随笔。描述自己的经历时，他能说得让人难

以忘怀，比如，说到葬礼时，他对我说：

“你见过焚烧尸体吗？我见过，那是在印度。他们把一个老家伙放在火上，接下来的一幕把我吓得魂飞魄散，因为他的脚开始乱踢。其实这是由于肌肉受热而产生收缩反应，可我还是吓了一大跳。随后有那么一会儿，他像正在煤炭上煎烤的腌鱼那样扭动起来，然后他的肚子鼓了起来，砰的一声，爆裂开来，你在五十码以外都能听见那声响。我以后再也不敢看火葬了。”

又比如，说到他那次的事故：

“医生对我说：‘伙计，你是一只脚先着的地，真他妈幸运。’他说，‘如果你双脚同时落地，全身就会他妈跟手风琴一样压在一块儿，大腿骨会从耳朵里戳出来！’”

显然，这不是医生的原话，而是博佐自己的。他在遣词造句方面很有天赋。他做到了保持头脑清晰、思维活跃，因此什么都不能让他向贫穷低头。或许他衣衫褴褛，挨冻挨饿，但只要他还能阅读，还会思考，会观察天上的星星，就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在思想上是自由的。

他是个满腹怨气的无神论者（这类人与其说是不相信上帝，不如说是厌恶上帝），而且还幸灾乐祸地认为人类永远不会进步。他说，有时睡在河堤一带仰望火星或是木星，想到那里的河堤上或许也有人躺着，会感到很欣慰。对此他有套很奇怪的理论。他说地球上生活艰苦，是因为这个星球的生存条件不好。火星上气候寒冷，又缺水，资源肯定要比地球贫乏得多，生活条件也一定更加恶劣。在地球上，偷六便士只是会被关起来，在火星上，很有可能是把你活煮了。想到这些博佐就会很高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真是很特别。

---

[1] 兰贝斯区，英国大伦敦内的自治市，位于泰晤士河南岸。

[2] 维斯帕先，罗马四帝之年最后一位皇帝，成功恢复内战前的和平与稳定，建立弗拉维安王朝。

[3] 马路画家买来的颜料是粉状的，与炼乳调和后，制成饼状。

[4] 毕宿五，金牛座主星，夜空中的亮星之一，意为“追随者”。

第三十一章

博佐住的地方一晚上要九便士。那地方很大但也很挤，里面住着五百号人，是个出了名的流浪者、乞丐和小偷的聚集地，不同种族，甚至黑人和白人，都以平等的名义混居于此。那里有印度人，我用蹩脚的乌尔都语和其中一位说话时，他竟然用“你”[1]称呼我——这要是在印度后果肯定不堪设想。我们落魄到的层次之低，已经不存在肤色歧视了，你可以在这里尽览各色人生。有个人叫“老爷爷”，是个七十多岁的流浪汉，主要的营生方式就是捡烟头、卖烟丝，烟丝每盎司三便士。叫“医生”的那个人还真是个医生，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被吊销了执照，现在除了卖报纸，还给别人看个病，一次几便士。有个吉大港[2]来的小个子水手，是从船上逃出来的，他光着脚，饿着肚子，在伦敦转悠了好几天，迷茫又无助，甚至连自己在哪个城市都不知道，在我告诉他之后，他才知道这里不是利物浦。还有个专门写信求人捐钱的家伙，他是博佐的朋友，写了很多可怜巴巴的信，说是需要钱安葬妻子，可当信真起了作用，他却独自享用起了面包和黄油，把自己塞得饱饱的。他是个卑鄙贪婪的家伙，和他聊过后我发现，他和大多数骗子一样，对自己说的谎话都信以为真。整个寄宿所住满了这类人，像是阿尔塞西区[3]一般。

我和博佐待一块儿时，他教了我一些在伦敦乞讨的技巧，比我原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乞丐之间的差别很大，有的只想讨钱花，有的想让讨来的钱有用武之地，这两者间的界限很分明。坑蒙拐骗的“把戏”玩得不同，收入的差别也很大。周日的小报上有报道过，一些乞丐临死时，裤子里缝着两千英镑。这当然是假的，但有本事的乞丐的确能挣到相当可观的收入，走运的话一次就能抵好几周的花销。最赚钱的是在街头杂耍和帮人拍照。要是占到好位子，比如剧院门口的排队处，一个街头杂耍艺人一周通常能挣五英镑。街头照相的差不多也能挣那么多，但他们受天气限制。他们有一个招揽生意的诡计：看到目标走近了，一个人就跑到相机后面假装拍了张照，然后等到那人走过来时，他们就会大声说：

“好了，先生，给你拍了张不错的照片，一先令。”

“但我没让你们拍呀。”对方反击道。

“什么？没让我们拍？那你为什么要跟我们做拍照的手势呢，现在可好，浪费了一张胶卷，那可要六便士啊。”

对方听他这么讲，通常会觉得不好意思，最终还是会要了那张照片。拍照的人就会检查胶卷，然后说底片坏了，他们可以免费为他再拍一张。当然，他们根本就没有拍前面那张，所以就算对方拒绝，他们也没什么损失。

拉手风琴的跟街头杂耍的一样，都被称为艺术家而非乞丐。有个叫“矮子”的手风琴艺人是博佐的朋友，他告诉了我干他那一行的门道。他和搭档在白教堂区[4]和商业街附近的咖啡馆及酒吧“工作”。认为手风琴艺人一定是在街头谋生是错误的，他们所挣的钱十之八九都来自于咖啡馆和酒吧，不过他们只在一些低档酒吧演奏，因为高档的不让进。“矮子”通常在一家酒吧门外停下来演奏一曲，然后他的搭档进去，拿着帽子转一圈讨赏钱。他的搭档有条木制假腿，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同情心。得到赏钱后，“矮子”还会再演奏一曲，就像是一场加演，这也是他引以为傲的一点。他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表演者，而不是拿了钱就走人的那种。他和搭档每周能挣两三英镑，但因为手风琴是租的，每周得付十五先令的租金，所以每人每周只能挣一英镑。他们早上八点就上街，直到晚上十点才回去，周六回去更晚。

街头画家有的能被称为艺术家，有的则不然。博佐给我介绍了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那人曾在巴黎学过艺术，还在沙龙展出过画作。他擅长临摹早期大师的画作，技艺精湛，而且还能在石头上作画。他告诉我他是怎么变成街头画家的：

“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在挨饿。有天深夜我走回家，身上带着很多正在向画商兜售的画作，脑子里想着还有什么办法能多挣一两先令。这时，在斯特兰德，我看见有个家伙跪在人行道上画画，人们还给他钱。我经过他边上时，他起身进了一家酒吧。‘妈的，’我心想，‘如果他能靠这个赚钱，我也可以。’于是一时冲动，我也跪了下来，开始用他的粉笔画画。天知道我怎么会那么做，八成是饿昏了头。有意思的是，我从来没用彩色粉笔作过画，我得边画边琢磨技巧。不过，有人停下来说我画得还不错，并且给了我九便士。就在这时，那个画画的从酒吧里走出来，说：‘你他妈在我的地盘上干吗？’我解释说我很饿，得挣点钱。‘哦，’他说，‘来和我喝一杯吧。’然后我就和他去喝了一杯，打那以后，我就成了街头画家。我一周能挣一英镑，这点钱养活六个孩子肯定是不够，好在我老婆替人缝补衣服，也能赚些钱。”

“干这一行最要命的就是冷得很，第二糟糕的是你得忍受别人的干预。一开始，我还不太懂规矩，常常在人行道上临摹裸体像。第一次画，是在圣马丁大教堂外面，一个穿黑衣的家伙——我猜他是个教堂执事之类的——怒气冲冲地跑出来，叫道：‘你觉得我们会让这种污秽出现在上帝神圣的居所外吗？’所以我不得不把画擦了。那次我临摹的是波提切利[5]的维纳斯。还有一次，我在河堤一带临摹这幅画，有个警察经过看到了，他二话没说，就走过来用他扁平的大脚把画给擦了。”

博佐也曾给我讲过警察干预的事。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海德公园出了件“不道德行为”的案子，警察在那件案子里表现相当糟糕。博佐画了幅漫画，画中警察躲在海德公园的树丛里，题词为：“谜题：警察哪儿去了？”我跟博佐说应该把其中的潜台词挑明了，改为：“谜题：道德行为哪儿去了？”但博佐不肯听我的，他说不管哪个警察看到，都会把他赶走，他就会永远失去那块地盘。

比街头画家低一等的是唱赞美诗的、卖火柴的、卖鞋带的，或是卖信封的，那些信封里都装有一些薰衣草种子，美其名曰：香料。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乞丐，一脸可怜相，每天挣的钱不会超过半克朗。他们之所以还要装成卖这卖那的而不是直接乞讨，全是拜英国有关乞讨的荒唐法律所赐。按照现行法令，要是你走到陌生人面前问他要两便士，他可以报警，你就会因为乞讨而被关七天。但是，如果你不断烦人地重复唱着“愿上帝离你更近些”，或是拿只粉笔在人行道上乱涂乱画，又或是捧着火柴四处晃荡，简而言之，只要你招人厌烦，你就合乎法律规定，是在做正当的生意，而非行乞。卖火柴和街头唱歌无疑都是合法化的犯罪行为，但都不怎么赚钱。在伦敦，没有哪个在街上唱歌的或是卖火柴的能保证一年赚50英镑，可他们每周要在马路边站上八十四个小时，汽车擦着他们的后背飞驰而去，这样一比就会发现，他们的回报实在低得可怜。

乞丐的社会地位相当值得一谈，因为和他们打过交道后，你会发现他们都是普通人，你不禁会为社会对他们的态度而感到惊诧。人们似乎觉得乞丐和普通的上班族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是被异化、被遗弃的一类人，就像罪犯和妓女一样。上班的人“干活”，乞丐“不干活”；他们是寄生虫，从本质上来说一无是处。人们想当然地觉得乞丐不“劳”而获，不用像砖瓦匠和文学评论家那样靠“劳动”挣钱。乞丐只是社会的毒瘤，人们能容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讲人道的时代，但从实质上看来，他们是下贱的。

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乞丐的谋生方式和无数体面人相比，并没有根本区别。说乞丐不劳而获，那什么才是劳动呢？工人的劳动是挥动丁字镐，会计的劳动是计算数据，而乞丐的劳动则是不论刮风下雨都得站在户外，并因此患上静脉曲张、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当然，这一行和其他行业类似，都没什么价值，但很多体面的工作也没什么价值。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乞丐不见得就比其他人逊色。和大多数卖专利药的商贩相比，乞丐诚实可信；和办周日小报的商家相比，乞丐品格高尚；和以分期付款方式兜售商品的说客相比，乞丐和蔼可亲。总而言之，乞丐是寄生虫，但毫无危害。除了能挣点保命钱，乞丐很少向社会索取额外的东西，而且按照我们的道德观，他们所受到的一次又一次的煎熬，本就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我觉得乞丐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多数现代人也没权去鄙视他们。

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乞丐遭人唾弃？我这样问，是因为乞丐普遍都被人瞧不起。我想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法过体面的生活。事实上，没人关心工作是否有用，是否有成效，唯一的要求便是有利可图。现代人谈了那么多有关精力、效率、社会服务等话题，除了“赚钱，合法赚钱，赚很多钱”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意义吗？金钱已成了美德的重要试金石，乞丐没能通过这一考验，因此就遭到了唾弃。要是谁行乞一周，哪怕只是挣个十英镑，乞讨马上就会变成一种高尚的职业。从实际来看，乞丐不过是个生意人而已，他和其他商人一样，什么方便赚钱就做什么，以此维持生计。和绝大多数现代人相比，他并没有更多地出卖自己的尊严，只是选错了行，永远也不会发财罢了。

---

[1] 原文为“tum”，相当于中文的“你”，通常用于亲密的朋友之间或上司对下属说话，另外有尊称“ap”，相当于“您”。在印度的英国人绝对不会允许当地人用“tum”称呼自己。

[2] 吉大港，位于现孟加拉国东南部，全国第一大海港。

[3] 阿尔塞西区，位于伦敦市，14—17世纪曾是负债人及罪犯群避难之地。

[4] 白教堂区，伦敦东区塔村区的一个区域，1880年曾发生臭名昭著的开膛手杰克凶杀案。

[5] 波提切利（1445—1510），文艺复兴早期的著名意大利画家，代表作有《春》《维纳斯的诞生》。

第三十二章

我想尽可能简短地记录下伦敦的俚语和脏话。这些（略去人尽皆知的那些）是目前伦敦流行的部分黑话：gagger：乞丐或以任何形式表演的街头艺人；moocher：直接乞讨，而不假装做生意的人；nobbler：为乞丐收钱的人；chanter：街头歌手；clodhopper：街头舞者；mugfaker：街头照相的；glimmer：看管汽车的；gee（或jee，发音为jee）：给廉价货贩子做托儿的，假装买东西吸引别人也来买；split：侦探；flattie：警察；dideki：吉普赛人；toby：流浪汉。

drop：给乞丐的钱；funkum：装在信封里卖的薰衣草或其他香料；boozer：酒吧；slang：小贩的执照；kip：睡觉或过夜的地方；smoke：伦敦；judy：女人；spike：临时收容所；lump：临时收容所；tosheroon：半克朗；deaner：一先令；hog：一先令；sprowsie：六便士；clod：铜钱；drum：比利茶壶[1]；shackles：汤；chat：虱子；hard-up：烟头做的烟；stick或cane：盗贼用的撬棍；peter：保险箱；bly：盗贼用的氧乙炔喷灯；bawl：吸或吞咽；knockoff：偷窃；skipper：露宿。

这些词中，大约有一半要在大一点的词典中才能查到。猜一猜这些词的出处很有意思，尽管有一两个，比如“funkum”和“tosheroon”，是猜不出来的。“deaner”很可能来自于“denier”（一种法国旧银币）。“glimmer”（动词为“glim”）可能和旧词“glim”（表示光线）或另一个旧词“glim”（表示一瞥）有关，不过这只是一种新词的组成方式，因为就目前而言，这种方式不会比汽车（motor-car）一词的出现更为久远。“gee”是个怪词，可以想到它来自于“gee”，意为马，专指作掩护的假马。“screever”的出处很难讲。这个词肯定是出自scribo的，但在过去一百五十年，英语中没有类似的词，也不可能是来自于法语，因为法国没有街头画家之说。“judy”和“bawl”是东区用词，伦敦塔桥以西没有人说。“smoke”仅为流浪汉所用。“kip”是丹麦语，原来用“doss”这个词，虽然直到最近才不用，但已经算是过时的了。

伦敦的俚语和方言似乎变化得相当快。狄更斯和瑟蒂斯[2]笔下的老伦敦音，也就是把v发成w，把w发成v的方式，现在早已绝迹。我们知

道的伦敦腔大约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是在赫尔曼·梅尔维尔[3]的《白鲸》中出现，这是一本美国小说），当时这种口音已经变了。现在很少有人会像二十年前那样，总把“face”说成“fice”，把“nice”说成“nawce”。俚语也随着口音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二十五或三十年前，“押韵俚语”曾在伦敦风靡一时。“押韵俚语”就是用与该词押韵的多个词组合而成的一种俚语，如“hitormiss”（击中或错过）表示“kiss”（亲吻），“platesofmeat”（几盘肉）表示“feet”（双脚）等等。这种表达方式极为盛行，甚至在小说中都有出现，现在却几乎绝迹了[4]。也许我上面提到的这些词在未来二十年也会全部消失。

脏话也变了，或者至少应该说，他们随着潮流发生改变。例如，二十年前，伦敦的工人阶级习惯用“该死的”这个词，现在则不然，只有小说家在描述他们时还会用。如今，除非受过点教育的，土生土长的伦敦人（苏格兰或爱尔兰人就不一样了）不会说“该死的”。事实上，这个词的社会地位已有所上升，不再是工人阶级所专用的脏词了。目前在伦敦，每个名词前添加的定语都是“狗日的”。相信在不久后，“狗日的”会和“该死的”一样，登上大雅之堂，并被另一个词所取代。

说脏话，特别是英国人说脏话，总的来说是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论其本质，说脏话就跟变魔术一样匪夷所思，更确切地说，这也是在变魔术。但这本身也有矛盾之处，即：我们说脏话的目的是为了震慑和伤害对方，为此我们会说一些原本很私密的话，通常与性相关。但奇怪的是，一旦一个词真的成了脏话，它似乎便失去了原本的意思，也就是说，它失去了让其成为脏话的原因。一个词变成骂人的话，是因为它表示某种事物，但正是因为它变成了骂人的话，它便不再指代那个事物。比如“日”这个词，伦敦人现在已经不用，或者说很少使用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了。他们一天到晚把这个词挂在嘴边，但它仅仅是句脏话，没有任何意义。与之相类似的是“鸡奸者”，这个词也正在迅速失去其本来的意思。在法语里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如“foutre”（相当于“日”），现在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脏字而已。同样地，“bougre”（意思为“家伙”）这个词偶尔还能在巴黎听到，但用这个词的人，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原本的意思。我们能得出的规律似乎是：用作脏话的词有着某种神奇之处，把它们和其他词区别开来，使得其不能用于日常对话之中。

用来侮辱他人的词似乎和脏话如出一辙。一个词成了侮辱他人的话之后，人们会觉得那是因为它有不好的含义，但实际上，它侮辱性的用法和其本身的意义并无很大关联。例如：对于伦敦人来说，最恶毒的侮

辱是“杂种”，但就其含义而言，根本没有一点侮辱性。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巴黎，对女人最大的侮辱就是称她为“奶牛”，但这个词可能甚至是个溢美之词，因为奶牛是最受人喜爱的动物之一。显然，一个词之所以带有侮辱性，只是因为它就是用来侮辱人的，和字典里的含义无关。话语，尤其是骂人话，因公众的意愿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看看一句脏话如何在跨越了国界之后改变其本质会很有趣。在英国，没有人会反对你把“Jem’enfous”[5]印出来，但在法国你得把它印成“Jem’enf—”。再举个例子，“barnshoot”这个词，它是印度语“bahinchut”[6]的讹化，那个词在印度是个极其恶毒且不可饶恕的侮辱性用词，但在英国只是句玩笑话而已。我甚至在一本学校的教科书上看到过这个词，是在阿里斯托芬[7]的一部戏剧里，注释者提到这是一位波斯大使的乱语，并对其进行了解释。看来这位注释者知道这词的意思，但因为是个外来词，已经失去了原本作为脏话的本性，所以能印出来。

关于在伦敦说脏话，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是，男人通常不会在女人面前骂人，在巴黎可不一样。一个巴黎男工可能会尽量不在女人面前爆粗口，但他对此根本无所谓，女人们骂得也很随便。在这方面，伦敦人更有礼貌，或者说更拘谨一些。

这些笔记或多或少是我随意记下来的。可惜的是，那些有能力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没能把伦敦的俚语和粗话编成年鉴，每年精确记录下其中的变迁，这可能有助于研究词语的形成、发展及优胜劣汰。

---

[1] 比利茶壶，土著人煮茶的茶具，他们一般用树枝搭个架子，把这种茶壶挂在火上烤。

[2] 瑟蒂斯（1803—1864），即罗伯特·史密斯·瑟蒂斯，英国小说家，以幽默小说著称。

[3] 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之一，代表作为《波里尼西亚三部曲》《白鲸》等。

[4] 这种情况在某些缩写中仍有保留，如“useyourtwopenny”（用你的两便士）和“useyourhead”（用一下你的大脑）其实是一个意思。“两便士”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大脑——一块面包——两便士一块面包——两便士。

[5] Jem’enfous，意为“管他娘的”。

[6] 在印度语里，“bahin”指“姐妹”，“chut”指“性器官”，称某人为“bahinchut”是在声称你与他的姐妹有非常亲密的行为。英国水手将“bahinchut”变成“barnshoot”，并带回英国。这个词彻底丧失了原本的含义。

[7] 阿里斯托芬（约前446—前385），古希腊早期喜剧代表作家，有“喜剧之父”之称。

第三十三章

B给我的两英镑撑了将近十天。能用那么久，得多亏帕迪，露宿街头的生活让他学会了节俭，就连每天好好吃一顿饭，在他看来都是一种铺张浪费。对他而言，食物就是简单的面包加黄油，永远都是茶加两片面包，能挨上一两个小时才会饿。他教我每天怎样靠半克朗生活，有吃有住，还有烟抽。他晚上还能靠帮人看车挣几个先令的小钱，由于是非法的，干这活挺危险，但是能赚点钱，贴补一下我们的收入。

一天早上，我们试着去做“三明治人”[1]。早上五点，我们去了一片办公楼后面的小巷，但那里已经有三四十号人在排队等着了，两小时后，我们被告知已经没有工作了。我们没觉得有多大遗憾，因为做“三明治人”并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工作。他们每天工作十小时，才挣三先令，相当辛苦，特别是在刮风天，而且你还不能偷懒，因为时不时会有监工来，看看你是不是在岗位上。他们不仅辛苦，工作还是按天算的，有时会雇你三天，但从不会按周算，所以他们每天早上要等上好几小时才能有活干。愿意干这个活的失业者很多，以至于他们无力为争取更好的待遇而斗争。所有“三明治人”觊觎的工作就是发传单，待遇一样。你要是看到一个发传单的，可以帮忙接一张，因为他发完就能下班了。

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在寄宿所混日子，整天生活在污秽之中，无所事事，极度无聊。连着好几天，我们没事可做，只能在地下室厨房坐着，看看隔天的报纸，或者不知谁弄到的一本过期的《英国旗》[2]，也能翻翻。那段时间老是下雨，每个进来的人身上都是湿漉漉的，因而厨房里的气味特别难闻。唯一令人兴奋的只有定时供应的茶水和两片面包。我不知道伦敦有多少人过着这样的生活，至少得有几千吧。事实上对帕迪而言，这却是他两年来过得最好的日子。只有在手上有几先令的时候，他才能过上这样的日子而不用去流浪；流浪生活本就略差一些。听着他呜咽地诉说——他没在吃东西的时候，老是会哭哭啼啼的——你会意识到，失业对于他而言是极大的折磨。人们误以为失业者只会担心没有了收入来源，相反，一个没文化的人，会因为骨子里习惯了工作而想要干活，这个念头远胜于得到报酬。不得已而为之的无所事事是贫穷最大的危害之一，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勉强忍受。但像帕迪这样的人，因为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一失业就会像条被锁链拴住的狗一样悲

惨。因此，认为“从高处跌落”的人最需要同情的言论简直就是无稽之谈。真正需要怜悯的，是一开始就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他们面对贫穷，不知所措。

那段时间很无聊，除了和博佐的几次对话外，我都不记得别的事儿了。有一次，寄宿所来了群造访贫民窟的人。我和帕迪出去了，下午回来时，听见楼下有音乐声，下去发现有三个温文尔雅、衣着光鲜的人在我们的厨房里做礼拜。他们分别是：一位身穿僧袍、严肃而沉稳的先生，一位演奏便携式脚踏风琴的女士，和一个摆弄着十字架的无下巴的年轻人。看来他们是不请自来，并且一进来就开始做礼拜。

看寄宿者是如何对付这群不速之客是件有趣的事。他们对这些人没有丝毫的不敬，只是视而不见罢了。厨房里所有人（估计有上百号人）表现默契，好像那些探访者根本不存在似的。他们站在那里耐心地唱歌和劝诫，但就同在地上爬的蠼螋[3]一般，根本没人搭理。那位穿僧袍的先生在布道，但没人在听，布道声淹没在了唱歌声、咒骂声和锅碗瓢盆的叮当声中。人们坐在离脚踏风琴三英尺处吃饭、玩牌，全当它不存在。不久，探访者就放弃布道离开了，没有人侮辱他们，只是无视而已。毋庸置疑，他们一定会自我安慰，认为自己是多么勇敢，“冒险进入社会最底层”，等等。

博佐说，这群人一个月要来好几次。他们在警察那里有关系，“警官”不会赶他们走。真是奇怪，一旦你的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竟会有人理所应当地认为他们有权对你传教布道，为你祈祷。

九天后，B给的两英镑就只剩下一英镑九便士了。我和帕迪留下十八便士付床位费，每天的茶水和面包得花三便士，我们俩吃一份，与其说这是一顿饭，不如说是开胃餐。到了下午，我们实在饿得不行，帕迪想起来国王十字火车站[4]附近有座教堂，每周会给流浪汉施舍一次茶点，正好那天有，我们就决定去那儿。尽管那天下雨，而且身无分文，博佐也不愿意去，他说去教堂讨东西吃不是他的作风。

教堂外，足足有一百号人等着，都是邋里邋遢的那种，他们听说有免费的茶点，就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像是围在一头死牛周围的秃鹫。不一会儿，教堂门开了，一位牧师和几个女孩把我们领到教堂顶上的廊台。这是个福音教堂，非常简陋，墙上有关于血和火的经文，还有一本收录了一千两百五十一首赞美诗的书。我读了几首后得出结论，该书是典型的集劣诗之大成的选集。用完茶点后照例要做礼拜，平时的教堂会

众坐在底下的教堂天井里。那天是工作日，来做礼拜的只有十几个人，大多是筋骨结实的老太太，让人联想起了正在沸腾的鸡鸭。我们在长凳上坐成一排，等着分茶点；每人分得一磅用果酱瓶装的茶，六片面包加上黄油。茶点一吃完，为了躲过做礼拜，十来个守在门旁的流浪汉就溜之大吉了；剩下没走的，主要是不好意思，而不是真的感激。

管风琴响了几声后，礼拜就开始了。这像是一个信号，流浪汉们顿时乱作一团，无法无天。你根本无法想象教堂里竟会出现这番情形。整个长廊里，流浪汉们懒洋洋地靠在长凳上，嬉笑的嬉笑，聊天的聊天，还有的探出身子向楼下会众扔面包屑；我多少是用了些武力才阻止我边上的那人点烟。流浪汉们完全就是把这场仪式看成是一出滑稽戏。的确，这礼拜荒唐得很。做到一半，突然有人冒出一句“哈利路亚”，还有没完没了的即兴祷告，但没人管他们的行为。会众中有个老头——叫布特尔会友什么的——老是被叫起来带领我们祈祷，每次他站起身，流浪汉们就开始跺脚，就跟在剧院里一样。他们说上次的即兴祷告，他足足说了二十五分钟，直到牧师打断他为止。有一次布特尔会友站起来的时候，一个流浪汉叫道：“一赔二，赌他这次不超过七分钟！”声音大得整个教堂都听到了。很快，我们乱哄哄的声音就盖过了牧师。有时，楼下会有人愤怒地喊道：“嘘！安静！”但没人理睬。我们想方设法让礼拜没法进行下去，谁都别想阻止我们。

这种古怪的场面看着令人生厌。楼下是些头脑简单、怀着好意诚心祈祷的善男信女；楼上则是被他们喂饱的一百号人，却故意让他们没法祈祷。一帮邋里邋遢、满脸胡楂的家伙咧着嘴看着楼下，公然嘲笑他们。几个老弱妇孺又能拿这一百多个怀着敌意的流浪汉怎么样呢？他们害怕我们，我们也的确是在欺负他们。他们给予我们的施舍是种羞辱，我们以此来报复。

牧师是个勇敢的人，他布道时声音洪亮，宣读着一段关于约书亚[5]的长段经文，几乎不去理会楼上的窃笑声和闲谈声。不过到了最后，他还是忍无可忍，大声宣布：

“我要把布道的最后五分钟，送给还未被拯救的罪人们！”

说完，他抬头望向楼上的长廊开始布道，足足有五分钟，免得有人对谁已被拯救谁还未获救心存疑虑。可我们才不在乎呢！甚至当牧师拿地狱之火相威吓时，我们仍在卷烟，说完最后一声“阿门”，我们大喊一声便稀里哗啦地下了楼，很多人说好下周还要来这里吃免费茶点。

这一幕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和流浪汉平时卑躬屈膝的举止不太一样，和他们通常在接受施舍时心存感激的样子也不一样。当然，那是因为我们在人数上超过了会众，所以不怕他们。接受施舍的人一般都会憎恨他的恩人，这是人性中固有的特点；而且，如果有五十个或上百个人做后盾，他就会将这种本性显现出来。

喝完免费茶点的那个晚上，帕迪意外地靠帮人“看车”又赚了十八便士，正好够我们在寄宿所再住一晚，我们便把钱留着，一直饿到第二天早上九点才吃东西。本来博佐可能会带点东西给我们吃，但他出去了一整天。街道还是湿漉漉的，他便去了象堡[6]，他知道那里有块雨淋不到的地方。幸好我还有点烟丝，否则那天会更难熬。

八点半时，帕迪带我去了河堤一带，据说有个牧师每周会在那里发一次餐券。查令十字桥[7]下有五十个人在等，他们的身影映在明晃晃的水坑里。他们中有些人着实令人感到震惊——他们露宿在河堤一带，那里的状况比临时收容所还要糟糕。我记得，其中有个人穿了件没扣子的大衣，底下用绳子绑着，裤子破破烂烂，脚趾从靴子里露出来，其他什么都没穿。他的胡子长得像个苦行僧，胸口和肩上用像鲸油一样的东西划出一道道黑色的条纹，看起来脏兮兮的，很是恶心。满脸的灰尘和毛发下是一张惨白如纸的脸庞，不知是何种恶疾所致。我听过他讲话，口音优雅，像是个文员或商店巡视员。

过了一会儿，牧师出现了，这群人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成一列。牧师很和气，微胖，年纪不大，说来也怪，他和我在巴黎的朋友查理很像。他羞怯不安，除了道声晚上好，别的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沿着队伍匆匆走下去，塞给每个人一张券，也不等别人感谢。结果却是，人们这次真的感激起来了，每个人都说这牧师是个□□的好人。有人（我相信他听见了）喊道：“他永远都做不了□□的主教！”当然，这么说是一种真心的赞美。

餐券每张值六便士，仅限在附近的一家餐饮店使用。到了那儿后，我们发现店主知道流浪汉只能在这里用餐券，便耍起了花招，每张餐券只给四便士的量。我和帕迪把餐券凑在一起，换来的东西我们在大多数咖啡馆七八便士就能买到。那位牧师在餐券上的花费总共不止一英镑，所以很明显，这家店主每周要从流浪汉手里骗走七先令，甚至更多。在流浪汉的生活中，这种坑人的事是家常便饭，除非人们给的是钱而不是餐券，他们才能摆脱这样的局面。

帕迪和我回到寄宿所，肚子仍旧饿着，只能在厨房里熬着，用烤火来抵消饥饿感。十点半的时候，博佐回来了，他精疲力竭，形容枯槁，因为那条坏腿走起路来很是折磨人。他没靠画画赚到一分钱，所有淋不到雨的地方全被占了，他索性就乞讨了好几个小时，一边还要看有没有警察。他弄到了八便士，还差一便士才够付床位费。现在早过了付钱的时候，他只能趁管事的不注意溜了进来，随时都有可能被逮到，赶出去后就只能睡在河堤一带。博佐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仔细查看，考虑该卖哪样。他决定卖剃须刀，拿着它在厨房里兜了一圈，没几分钟就换来了三便士，这些钱够租个床位，买杯茶喝，还能剩下半便士。

博佐拿着他的茶，坐到火边烤衣服。他喝茶时，我看见他自己在笑，像是听了什么笑话似的。我很吃惊，便问他在笑什么。

“真他妈的好笑！”他说，“好笑得都能上《笨拙》杂志[8]了，你知道我都干了什么吗？”

“什么？”

“卖剃须刀前没先刮一下胡子，真是大蠢货一个啊！”

他从早上起来就没吃东西，拖着条残废的腿走了好几英里，衣服湿透了，身边仅剩下半便士，只能挨着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笑谈没了剃须刀一事，着实令人佩服。

---

[1] “三明治人”，指身前身后挂广告牌做广告的人。

[2] 《英国旗》，原文为“UnionJack”，是英国国旗的昵称，这里指某本杂志。

[3] 蠼螋，一种小昆虫，俗称“耳夹子虫”，常见于卫生间和厨房。

[4] 国王十字火车站，1852年启用的大型铁路终点站，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国王十字地区。

[5] 约书亚，圣经中的人物，是继摩西后以色列人的首领。

[6] 象堡，位于伦敦市区南部的购物区。

[7] 查令十字桥，位于英国伦敦查令十字区域内。查令十字是位于伦敦西敏市的一个交汇路口，是伦敦的传统中心点。

[8] 《笨拙》杂志，英国著名幽默杂志，以讽刺漫画著称。

第三十四章

第二天早上，我们的钱全花完了，我和帕迪出发去收容所。我们顺着老肯特街往南去克罗姆利；我们不能去伦敦的收容所，因为帕迪最近去过一次，不愿再冒险去一次了。走了十六英里的沥青路，脚后跟都磨出泡来了，我们饿得不行。帕迪不停扫视人行道，攒了一大堆烟头，准备到收容所里去抽。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捡到了一便士。我们买了一大块陈面包，边走边狼吞虎咽地吃完了。

我们到克罗姆利的时候，还没到收容所的开放时间，我们就又走了几英里，来到草地边的一片种植园，在那里坐了一会儿。这是一个典型的流浪汉聚集地，看看被践踏的草地、湿透的报纸和生锈的罐头便知。别的流浪汉也三三两两来到这儿。这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附近有一大块茂盛的艾菊丛；甚至到现在，我似乎还能闻到艾菊散发的刺鼻气味，那气味和流浪汉身上的气味交织在一起。草地上，两匹拖货车的小马驹正在一扇门边吃草，马身棕黄，鬃毛和尾巴都是白色。我们摊开四肢躺在草地上，浑身是汗，精疲力竭。有人找来几根干树枝生火，有人拿来不加奶的茶，大家把锡“锅”传了一圈，每个人都喝了点。

一些流浪汉开始讲起了故事。其中有个叫比尔的很有意思。他是个老派乞丐，身体结实，同赫拉克勒斯[1]一样健壮，却干不好活。他吹嘘说，凭他的力气，只要他想干，随时都能找份苦力的活儿，但是他一拿到第一周的薪水，就会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就被开除了。他时不时会去“乞讨”，主要是向开店的讨。他这样说道：

“肯特那地方真□□的不好混，那地方实在太抠门了。那儿要饭的人太多了，□□的面包商宁愿把面包扔了，也不愿给你。现在牛津才是要饭的好地方。我在牛津的时候，讨面包，讨培根，讨牛肉，每晚还能从学生那儿讨到六便士，租个床位睡。最后那天晚上，我还差两便士才能租到床位，我便走到一个牧师跟前，向他讨三便士。他给了我钱，然后一转身便以乞讨罪的名义告发了我。‘你在要饭？’警察说。‘不，我没有，’我说，‘我在问这位先生现在几点。’警察开始搜我的外套，搜出了一磅肉和两片面包。‘那么，这是什么？’他说，‘你最好跟我走一趟。’地方法官判了我七天，我再也不会向□□的牧师要钱了。但老天

啊！我干吗要在乎被关的这七天呢？”

似乎他的全部生活就是这样——乞讨、喝酒、拘留，周而复始。他边笑边说，把这当成是个天大的笑话。看起来，他靠乞讨好像过得不怎么样。因为他只穿了套灯芯绒的衣裤，戴着围巾和帽子，没穿袜子，也没穿衬衣衬裤。不过，他仍旧身材肥硕，心态乐观，甚至身上带有一股啤酒味，这在如今的流浪汉身上可不多见。

有两个流浪汉最近刚去过克罗姆利的收容所，他们讲了个那儿的鬼故事。他们说，好几年前，有人在里面自杀。一个流浪汉偷偷把剃须刀带进房间，在里面割破了自己的喉咙。第二天早上，收容所所长来巡视时，发现尸体把门给堵住了，为了开门，他们不得不弄断死人的胳臂。为了报复，那人在房间里阴魂不散，谁在里面睡过，就必定会在一年内死去；当然，应验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果你在开门的时候发现门卡住了，最好像躲瘟疫一般躲得远远的，因为这就是闹鬼的那间。

两个当过水手的流浪汉讲了另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有个人（他们发誓说认识他）打算混上一艘船偷渡去智利。船上有很多装满了货物的木条箱，通过一个码头工人的帮助，这人藏进了其中一个箱子。但是那个码头工人搞错了箱子上船后卸载的顺序。吊车抓住装有那人的箱子，高高吊起，放到货舱最底下，那箱子被压在几百只箱子下。直到航行结束，才有人发现那只箱子，那人已经窒息而死，尸体也已腐烂。

另一个流浪汉讲了关于苏格兰强盗吉尔德罗伊的故事。吉尔德罗伊被判处绞刑，他越狱逃跑，抓到了审判他的法官，把该法官绞死了（这家伙棒极了！）。当然，流浪汉都喜欢这个故事，但有趣的是他们篡改了整个故事。在他们的版本里，吉尔德罗伊逃到了美洲，但事实是，他最后还是被抓并被处死。毫无疑问，他们把故事内容改了，就像小孩修改大力士参孙[2]和罗宾汉的故事一样，给了它一个虚构的美好结局。

这个故事让流浪汉们聊起了历史，有个很老的老头称，“白咬法”[3]是贵族时代留下的旧俗，那时他们猎杀人而非鹿。有几个人笑话他，但他对此深信不疑。他还听说过《谷物法》和初夜权（他相信那确实存在过），还有资产阶级革命[4]，他觉得这是穷人对富人的革命——也许他把这和农民革命混为一谈了。我说不准那老头识不识字，当然他没有在复述报纸上的内容。他零碎的历史知识是流浪汉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恐怕有好几百年了。这种口口相传的传统，像是从中世纪传来的模糊回

声，久久无法散去。

晚上六点，我和帕迪去了收容所，第二天早上十点出来。这里和罗姆顿及埃德伯里差不多，我们也没看见什么鬼。收容所里有两个年轻人，名叫威廉和弗雷德，以前是诺福克[5]的渔民，他俩活泼好动，喜欢唱歌。他们唱过一首名为《不幸的贝拉》的歌，很值得记下来。之后的两天里，我听见他们唱了五六次，我便记住了这首歌，除了一两句是我猜的，整首歌如下：

年轻的贝拉，漂亮的贝拉，

闪亮的蓝眼，金色的头发。

哦，不幸的贝拉！

她脚步轻盈，心情舒畅。

那天天气晴朗，

她发现自己早已怀孕，

那个无情无义、残忍狠毒的家伙诱骗了她。

可怜贝拉年纪轻轻，她不相信

世态炎凉，人心险恶。

哦，不幸的贝拉！

她说：“我的男人不会不承认，

他现在就会娶我，因为他必须这么做。”

对那个无情无义、残忍狠毒的骗子，

她的心里充满爱和信任。

她去了他家，那个卑鄙的小人，

已经卷铺盖走人，

哦，不幸的贝拉！

她的女房东说：“滚出去，你个贱人，

我绝不会让你脏了我的门。”

可怜的贝拉走投无路，

都是为了那个无情无义、残忍狠毒的骗子。

她整夜走在冰冷的雪地上，

无人知晓她所承受的痛苦。

哦，不幸的贝拉！

清晨到来，红霞满天，

唉，唉，可怜的贝拉已经死去。

如此年轻便孤独地走了，

都是那个无情无义、残忍狠毒的骗子。

所以，你看，不管你做什么，

罪恶的果实仍旧会带来痛苦的折磨。

哦，不幸的贝拉！

人们把她埋入深深的墓穴，

男人说：“唉，这就是命运。”

但女人柔柔地低声吟唱：

“都是男人的错，肮脏的家伙！”

这首歌可能是个女人写的。

唱这首歌的威廉和弗雷德是彻头彻尾的无赖，就是那种人败坏了流浪汉的名声。他们碰巧知道克罗姆利的收容所所长存了些旧衣服，准备送给需要的人。他们进去找所长之前，脱下靴子，把缝合的地方扯破，还把鞋底割掉几块，几乎把靴子全毁了。然后他们申请要两双靴子，所长看到他们的靴子已经破成那样，就给了他们两双，几乎是全新的。第二天一早，威廉和弗雷德刚出收容所，就把靴子给卖了，得了一先令九便士。为了这一先令九便士，他们把自己的靴子弄得简直没法再穿，这在他们看来很是划算。

离开收容所后，我们全都往南边走，队伍很长，却松松垮垮，向着下宾菲尔德和艾德山前进。路上有两个流浪汉打了起来，他们吵了整整一晚（吵架起因很荒唐：一个对另一个说“胡扯”。另一个听成了“布尔什维克”[6]——这可是奇耻大辱），他们还为此在田野里打了一架。我们好多人停下来看热闹。这个场景之所以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是因为那个被打趴下的人的帽子掉了，露出了他几乎全白的头发。之后，我们中有几个人上去劝架，让他们停了下来。此时，帕迪上前打听了一下，发现果然不出所料，的确是为了几便士的食物打架。

我们很早就到了下宾菲尔德，帕迪趁这段时间去敲几户人家的后门找活干。一户人家给了他几只箱子，要他劈成柴火，他说外面还有个同伴，便把我叫进去一起干活。干完后，主人让女仆给我们倒杯茶喝。我记得她拿着茶杯出来时吓坏了的样子；后来实在怕得不行，她把茶杯往过道里一扔，便一路跑回屋子，把自己锁在厨房里。“流浪汉”这名号竟如此可怕。他们给我们每人六便士，我们买了三便士的面包和半盎司的烟，还剩五便士。

帕迪觉得我们最好把那五便士埋起来，因为下宾菲尔德的收容所所长出了名的专横，只要发现我们有一丁点儿钱，就有可能将我们拒之门外。把钱埋起来是流浪汉惯用的做法，要是他们想把一大笔钱偷偷带进收容所，通常会把它缝在衣服里，当然，一旦被抓到的话，就意味着坐牢。关于这点帕迪和博佐曾讲过一个不错的故事。有个爱尔兰人（博佐说是爱尔兰人，帕迪说是英国人），他不是流浪汉，身上带着三十英镑，困在一座小镇上找不到地方睡觉。他向一个流浪汉打听，对方建议他去济贫院。这种做法很常见，要是谁找不到别的睡觉之处，就可以去济贫院，付点钱就行了。但是那个爱尔兰人想耍点小聪明，这样不用花一分钱就能有地方睡，所以他假扮成普通的流浪汉，去了济贫院，把三

十英镑缝进了衣服里。与此同时，那个给他出点子的流浪汉看准了这个机会。那天夜里，他偷偷跑到所长那里，要求第二天早些离开收容所，说是要去找工作。第二天早上六点，他就被放了出来，穿着那个爱尔兰人的衣服溜掉了。爱尔兰人发现钱没了，就报了案，却因为冒充流浪汉进收容所而被关了三十天。

---

[1]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英雄，完成了十二项被誉为“不可能完成”的伟绩，英勇无比，后成为“大力士”的代名词。

[2] 大力士参孙，《圣经·士师记》中的犹太人士师，凭借上帝所赐的极大力气，徒手击杀雄狮，并只身与以色列的外敌非利士人争战周旋。后被情人出卖而落于敌手，向上帝悔改，与敌人同归于尽。

[3] “白咬法”，一项法律，规定狗主人不用为狗第一口咬别人而负责。

[4] 指1642至1651年间的英国内战。

[5] 诺福克，位于东英格兰东安格利亚地区的非都市郡，是历史上古代英格兰东安格利亚王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6] 在英语里，胡扯（bullshit）和布尔什维克（Bolshevik）发音相近。

第三十五章

到了下宾菲尔德后，我们摊开四肢，在草地上躺了很久，农民们在自家门前看着我们。一位牧师和他的女儿跑来默不作声地看了我们许久，就像是看鱼缸里的鱼一般，然后又走开了。我们有十几个人，威廉和弗雷德还在唱歌，打架的那两个人也在，还有个叫比尔的乞丐。比尔一直在向面包商乞讨，讨来了很多馊面包塞在衣服里，贴着他的光身子。他拿出来同我们分，大家都很高兴。我们中有个女的，这是我头一次看见女流浪者。她年约六十，身材微胖，面容憔悴，穿了条黑色拖尾长裙，浑身上下脏兮兮的。她摆出一副尊贵的模样，要是有人坐到她身旁，她便会嗤之以鼻，往旁边挪开一点。

“您去哪儿，太太？”一个流浪汉大声问道。

那个女人哼了一声，看着远方。

“得了吧，太太。”他说，“高兴点儿嘛，交个朋友，我们不都是在一条船上嘛。”

“谢谢，”那女人挖苦道，“哪天我愿意和一群流浪汉混在一起，我会通知你的。”

我喜欢她说“流浪汉”时的腔调，就像是让你瞬间看清了她的全部面目；一个内心渺小、狭隘的女性，根本没从多年的流浪生活中学到什么。无疑，她曾是位受人尊敬的寡妇，因为某些离奇的变故而成了流浪者。

收容所六点开门。那天是周六，按照惯例，整个周末我们都会被关在收容所；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过有种模糊的感觉，周日会发生某些令人不愉快的事。登记时，我在职业那一栏填了“记者”，这比填“画家”要真实些，因为我有几次靠给报社写文章挣钱，但这样写挺傻的，因为肯定会招来盘问。我们刚在收容所排成一排接受搜查，所长就叫了我的名字。他年约四十，严肃生硬，有副军人派头，看上去不像别人说的那样专横，但说起话来像老兵一样粗哑。他严厉问道：

“你们谁叫布兰克？”（我忘了我写的是什么名字了）

“是我，先生。”

“这么说你是个记者？”

“是的，先生。”我说道，声音有些颤抖。他再多问几个问题我就要穿帮了，那可能意味着要坐牢。但所长只是从上至下打量了我一番，说道：

“这么说，你是个有教养的人？”

“我想是的。”

他又看了我很久。“那你可真他妈不走运，先生。”他说，“真他妈不走运。”打那以后，他便对我另眼相待，偏爱中甚至带有一丝尊敬。他没有搜我的身，在浴室里竟还给了我一条干净的毛巾，让我独自使用，那真是闻所未闻的奢侈。在一个老兵的耳里，“有教养的人”一词竟会如此奏效。

七点钟不到，我们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面包，喝光了茶，回房里待着。我们一人一个小单间，里面有床架和草荐，按理说能睡个好觉。但没有一个收容所是完美的，下宾菲尔德最大的缺点就是寒冷。暖气管道供热不足，我们领到的两条毯子是用薄薄的棉花制成的，没什么用处。这时还只是秋天，却已冷得刺骨。晚上漫长的十二个小时里大家都在翻来覆去，睡着几分钟，继而又打着哆嗦醒来。我们不能抽烟，因为偷带进来的烟都藏在衣服里面，要到第二天早上才能拿到。整条走廊到处能听见呻吟声，偶尔有人开口大骂一声。我想没有人能睡着超过一两个小时。

早上吃完饭，医生检查过后，所长就把我们领进餐厅，锁上大门。房间里石灰刷墙，石头铺地，摆满了饭桌和长凳，感觉非常沉闷，还有股牢房的气味。装了栅栏的窗户太高，没法向外看，除了一只钟和一张印有济贫院规章的纸外，便没有别的装饰可看了。我们胳臂挨着胳臂坐在长凳上，才早上八点，却已经无聊透顶。没什么可做，也没什么可说的，甚至连动弹的地方也没有。唯一的安慰是能抽烟，抽烟被默许，只要别被当场抓住就行。有个名叫斯考蒂的小个子流浪汉没烟可抽了，他胡子拉碴，带有格拉斯哥[1]和伦敦的混合口音，昨天搜身的时候，他的

烟盒从靴子里掉出来被没收了。我给了他够卷一根烟的烟丝，我们偷偷吸着，一听见所长来了，就像学校里的男生一样，赶忙把烟塞进口袋里。

大多数流浪汉一连十几个小时都会待在这个极不舒服、毫无生气的房间里。天知道他们怎么会受得了，我比其他人要走运一些。十点钟时，所长找了些人去打杂，他挑了我去济贫院厨房帮忙，这是最令人羡慕的工作。这和那条干净的毛巾一样，都是“有教养的人”一词的神奇功效。

厨房里没什么活可干，我就偷偷溜到存放土豆的棚里，几个济贫院的贫民躲在那里不去做周日早上的礼拜。里面有几个包装箱，坐在上面很舒服，有几份过期的《家庭先驱》可以看看，甚至还有一本从济贫院图书馆拿来的《拉斐尔》。贫民们饶有兴致地聊着在济贫院的生活。他们告诉我，他们最讨厌济贫院的一点，就是得穿制服，那是代表慈善的标志；如果能穿自己的衣服，甚至是戴自己的帽子，围自己的围巾，他们就不介意当穷光蛋。我在济贫院的餐桌上吃了午饭，那顿饭是自从我在X酒店开始干活以来最丰盛的一顿，足足可以喂饱一条蟒蛇。贫民们说他们已经习惯于在周日饱餐一顿，然后在一周的其他几天里饿肚子。吃完饭后，厨师让我洗碗，还让我把吃剩下的食物倒掉。浪费的程度很是惊人，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吃了一半的大块大块的肉，一桶桶碎面包和蔬菜，都一起被当做垃圾倒掉，和茶叶渣一起腐烂。我装了满满五大桶还能吃的食物。我这么做的时候，五十个流浪汉正坐在收容所里，吃着他们的面包和奶酪，勉强能吃个半饱，也许因为是周日，还能额外加两个凉了的煮土豆。据贫民们说，宁愿把饭菜倒掉也不给流浪汉们吃是故意的。

下午三点，我回到了收容所。流浪汉们已经从早上八点坐到现在，连动一下胳膊的地方也没有，现在都快无聊得发疯了。烟也快抽完了，因为流浪汉的烟都是捡来的烟头，只要离开人行道几个小时，就会无烟可抽。大多数人已经无聊到不想讲话，只是挤坐在长凳上，茫然地瞪着眼睛，要是打一个大哈欠，满是胡楂的脸就会撕成两半。房间里弥漫着无聊和倦怠。

帕迪的背脊因为抵着硬椅背而疼痛起来，又要哭哭啼啼地诉苦了。为了打发时间，我去和一个稍微体面一点的流浪汉聊天，他是个年轻的木匠，穿着衬衣，打着领带。据他所说，他是因为缺少一套工具而不得不流浪。他与其他流浪汉稍微保持一定距离，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普

通人，而非流浪汉。他还爱好文学，口袋里揣着本《昆丁·达沃德》[2]。他告诉我说，除非他饿得不行，否则绝不进收容所半步，他宁愿在树篱下过夜或是去睡草垛。在南海岸，他白天乞讨，晚上就睡在海边的更衣室里，一连几周都是如此。

我们聊起流浪生活。他谴责这种济贫制度，说它白天把流浪汉关在收容所长达十四个小时，剩下的十小时随他们游荡，还要躲避警察。他说以自己为例，因为缺少一套几英镑的工具而过了六个月的济贫生活。真是荒唐，他说。

然后我跟他讲了济贫院厨房里浪费食物的情况，谈了我的想法，他一听，说话的口吻立即变了。我发现我唤醒了沉睡在每个英国工人内心的等级观念。虽然他和其他人一样挨着饿，但他马上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些食物该倒掉，而不是给流浪汉享用。他很严肃地告诫我：“他们必须这么做。”他说：“如果他们把这些地方弄得太舒适，全国的渣滓都会跑来。正是因为伙食不好，才能把他们挡在门外。这里的流浪汉都是懒骨头，不肯去干活，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你不能鼓励他们好吃懒做，他们就是渣滓。”

我和他争论了一番，想证明他是错的，但他听不进去。他一再说：

“你可千万别同情这儿的流浪汉，他们就是渣滓。你可别用你我这种人的标准来判断他们。他们是渣滓，渣滓而已。”

看他把自己与“这儿的流浪汉”微妙地区别开来很有意思。他已经流浪了半年，但他似乎在暗示，在上帝眼中，自己不是个流浪汉。我想应该有不少流浪汉感谢上帝没让自己沦落为流浪汉。他们就跟某些远足者一样，称其他远足者玩的是小伎俩。

三个小时总算熬过去了。六点时晚饭来了，我们却发现根本难以下咽；早上的面包已经够难啃的了（周六晚上切好的），到这时已经硬得像船上吃的饼干。幸好上面抹了一层油，我们就把油刮下来吃，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六点一刻，我们被勒令上床睡觉。这时有新的流浪汉来了，为了不混淆不同天进来的流浪汉（怕有传染病），新来的住单间，我们睡宿舍。我们的宿舍跟谷仓很像，三十张床紧挨在一起，还放了只桶，算是夜壶。宿舍里的气味极其难闻，年纪大一点的整夜咳个没完，还要起夜。但那么多人在一个房间倒也暖和，我们多少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早上十点，遣散的时间到了，我们做完最后一次体检，领了一大块面包和奶酪作为午饭。威廉和弗雷德仗着有一先令，把面包钉在了收容所的栏杆上，说是一种抗议。他们觉得这是肯特郡第二间难熬到没法待下去的收容所，简直就是个天大的笑话。就流浪汉而言，他们是开朗的那种。有个低能（每群流浪汉中都有个低能的）说他实在累得走不动了，抓着栏杆不肯走，最后所长不得不给他一脚，把他踹走了。我和帕迪往北去伦敦。其他多数人去艾德山，据说那儿的收容所是英国最差的[3]。

那天又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路上静悄悄的，偶尔有几辆车开过去。闻够了收容所里混杂着汗水、肥皂水和污水的恶臭后，空气像野蔷薇般芬芳。路上好像只有我们两个流浪汉，然后我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喊。是小个子斯考蒂，那个格拉斯哥流浪汉，他正喘着粗气追赶我们。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锈迹斑斑的盒子，满脸堆笑，像是来还人情的样子。

“伙计，这是给你的，”他诚恳地说，“我欠你几个烟头。昨天你请我抽烟，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所长把烟盒还给我了。知恩图报嘛。给你。”

他把四根受潮变形、腐烂变味的烟头塞到我的手里。

---

[1] 格拉斯哥，苏格兰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商港，英国第三大城市。

[2] 《昆丁·达沃德》，英国小说家司各特（1771—1832）的长篇小说，描写了路易十一和他的宫廷。

[3] 后来我去过那里，没那么糟糕。

第三十六章

我想就流浪汉问题谈谈我的一些想法。想想流浪汉，还真是一种奇怪的产物，很值得思考思考。成千上万的这类人，竟会像很多永世漂泊的犹太人一样，游荡在英国各处，真是个奇怪的现象。不过，虽然这一现象明显需要关注，但除非能排除一些偏见，否则思考无从谈起。这种偏见根深蒂固，认为每个流浪汉本质上都是无赖。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流浪汉都是无赖，因此在我们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想象的或是典型的流浪汉形象——令人生厌、相当危险的一类人，宁可去死也不愿去干活和洗澡，除了乞讨、喝酒、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什么都不想干。这种“流浪汉恶魔”和杂志故事中邪恶的中国佬一样，都不足为信，但流浪汉却难以摆脱这一形象。光“流浪汉”这个词本身就框住了这一形象，错误的观念又掩盖了有关流浪的真正问题。

看一个有关流浪汉的基本问题吧：到底为何会有流浪汉？这问题很有意思，但很少有人知道是什么让流浪汉选择了流浪。而且，基于对流浪汉是怪物的信念，什么稀奇古怪的理由都出现了。例如有种说法是，流浪汉流浪是为了逃避干活，乞讨起来更方便，可以找机会犯罪，甚至——这种理由最不可能——因为他们喜欢流浪。我甚至在一本有关犯罪学的书上看到说，流浪是种返祖现象，是人类向游牧时代的回归。然而同时，流浪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摆在面前。流浪当然不是回归游牧时代——还不如说旅行推销员是种返祖现象。流浪汉流浪，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而是同汽车必须靠左行驶的原理一样，因为正好有法律迫使他这么做。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如果得不到教区的帮助，只能求助于临时收容所，但每个收容所只能留他一晚，他自然就得不停换地方。他之所以四处流浪，是因为根据现行法律，他不这么做就会饿死。但人们从小就听惯了流浪汉是怪物的故事，所以他们宁可相信在流浪的背后，或多或少有点邪恶的动机。

事实上，有关流浪汉是怪物的传言很少经得起推敲。比如，流浪汉很危险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观点，事实却恰恰相反。危险的流浪汉极为少数，因为他们如果危险的话，就会被相应对待。一个临时收容所通常一晚能接纳一百个流浪汉，负责管他们的最多只有三个人。三个手无寸铁的人是不可能制得住一百个恶棍的。的确，如果你看见流浪汉是怎样任

由济贫院事务官凌辱，就会发现他们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听话、最没骨气的一类人。再举个例子，有个说法是，流浪汉全是酒鬼——这个观点一看便知道有多么荒唐。无疑，很多流浪汉一逮着机会就会喝酒，但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现在，一品脱啤酒在英国卖七便士，这玩意儿淡得跟水似的。想要喝醉，至少得花半克朗，但能随意掏出半克朗来的人通常不是流浪汉。认为流浪汉都是厚颜无耻的社会寄生虫（“一心要做乞丐”）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准确性只有百分之几。人们会在杰克·伦敦[1]的书中读到美国流浪汉的特性，他们故意为之、愤世嫉俗，但这种寄生性并不符合英国人的性格。英国人的道德感很强，贫穷会给他们带来很强的负罪感。你很难想象普通的英国人会故意沦为寄生虫，这种民族特性并不一定因为失业而改变。的确，如果在人们的印象中，流浪汉仅仅是个失业的英国人，迫于法律的压力而到处流浪，那么流浪汉是怪物的说法就会消失殆尽。当然，我不是说大多数流浪汉都有高尚的人格，我只是说他们是普通人，如果说他们真的比别人坏，那这也是他们所过的生活造成的，而非因为他们比别人坏，所以他们选择过那种生活。

可见，对流浪汉常有的“真他妈活该”的态度，跟用在残疾人和病人身上一样不公平。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人们就会设身处地地理解流浪汉的生活。那种生活极其无聊，极度没有生趣。我描述过临时收容所里的情形——那是流浪汉的日常生活——但还有三大不幸值得强调。第一是饥饿，这几乎是流浪汉的普遍命运。收容所大概本就没想给他们发足够的东西吃，想多吃一点就必须要乞讨——也就是说，通过犯法获得。结果，几乎每个流浪汉都被害得营养不良；想要证据的话，只需看看在任何一间收容所外排队的人即可。流浪汉生活的第二大不幸——乍一看没有第一大不幸那么严重，但的确排在第二位——即他完全无法和女性接触。这一点需要详述。

首先，流浪汉接触不到女性，因为他们这个生活层次里很少有女性。人们可能觉得穷人中的男女比例和别处一样均衡，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在某个社会层次之下，几乎清一色全是男性。下面这组数据是伦敦郡议会在1931年2月13日的一次晚间人口普查得出的，显示了贫困人口中的男女数量：

街头露宿：男性60人，女性18人[2]；

寄宿所及无照经营的公共寄宿站：男性1057人，女性137人；

圣马丁大教堂的地下室：男性88人，女性12人；

伦敦郡议会下属的临时收容所及寄宿所：男性674人，女性15人。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在需要救济的人群中，男女比例大致是十比一。原因可能是失业对于女性的影响要小于男性；而且任何一个有点姿色的女性，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都可以委身于某个男人。结果，对于一个流浪汉而言，他注定终生禁欲。原因当然不言自明，如果一个流浪汉在自身所处的阶层找不到女人，那么那些高于他的——哪怕只是高出一点点——都像是天上的月亮般遥不可及。其中缘由不值一提，但无疑女人从不，或者说很少会屈尊下嫁给比她穷得多的男人。因此，打从一个流浪汉踏上流浪之路开始，他就注定单身一辈子。他完全不可能娶妻、找情妇或是得到任何一个女人，除非他能弄到几个先令（但这情况很少）去找妓女。

结果显而易见：比如同性恋，还有偶尔出现的强奸案。但比这更糟糕的，是男人会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结婚，从此愈加萎靡不振。毫不夸张地说，性冲动是种最基本的冲动，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像饥饿一样摧残人的意志。贫穷的恶果还不至于给人带来极度的身心折磨，但无疑性饥饿会加剧这一折磨的过程。对于一个流浪汉而言，接触不到所有的女性会使他自我贬低，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和残疾人或疯子为伍的境地。没有哪种侮辱比这更伤男人的自尊了。

流浪生活的另一大不幸是强加给流浪汉的无所事事。我们的流浪法早就规定好了，流浪汉不是在路上走，就是在房间里坐着；或者介乎于两者之间，即躺在地上等收容所开门。很明显，这是一种消沉萎靡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对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而言。

除了这些，还能列举出很多小的问题。举一个例子：不适感，这和流浪生活紧密相连；需要记住的是，一般流浪汉除了身上穿的之外没有别的衣物，他们穿的靴子不合脚，一连几个月都没坐过椅子。但最重要的是，流浪汉所受的痛苦根本毫无意义。他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但又不知是为了什么。他们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每天可能有十八个小时都待在屋里或在路上。事实上，不可能有比这更碌碌无为的生活了。英国肯定至少有好几万名流浪汉，他们每天不知要消耗多少尺磅[3]的能量在毫无意义的走路上，这些能量足够开垦好几千亩地，修好几里路，造好几十座房子。每天，他们花大把时间盯着房间里的墙壁发呆，加起来估计有十年之长。他们每人每周至少要花掉国家一英镑，但却拿不出

任何东西来回馈。他们四处游荡，就像是在玩无聊的“瞎子送信”游戏[4]，没完没了，毫无意义，甚至本就没打算让他们对任何人产生意义。法律让此过程进行下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惊讶，但这样做很荒唐。

了解了流浪汉生活的无聊乏味，问题便是有无改善措施。显然是有可能改善的，比如，让收容所住起来更舒服些，实际上这一点已经开始实施了。去年，一部分收容所的状况已经得到了改善，变得认不出来了（如果情况属实的话），而且据说所有收容所都会得到改造。不过，这并没有涉及问题的核心。关键问题是，怎样把流浪汉从极度无聊、半死半活的游民变为自尊自重的人。仅仅把他们的生活变得舒适一些并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即使收容所变得富丽堂皇（这绝对不可能）[5]，流浪汉仍旧会虚度光阴。他仍是个穷困潦倒的人，与婚姻及家庭绝缘，对社会无用。真正要做的，是使他们摆脱贫困。那就得帮他们找份工作——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的那种，而是能从中获益的工作。目前，在绝大多数收容所里，流浪汉什么都不用干。他们曾被叫去开采石头，干了活才有饭吃，但后来这项工作停止了，因为他们开采的石头够用好几年，让开采工人都失业了。现在他们就这样无所事事，因为似乎没什么活好让他们干。但有种方法显然能让他们有用武之地，那就是：每个济贫院都能开辟一个小农场，或者至少有块自用菜地，每个身强体壮的流浪汉只要来报名，都能干一天实实在在的活。农场或菜园的收成就能用来养活流浪汉，总比那些脏兮兮的面包、黄油和茶水好。当然，收容所永远都不会完全自给自足，但他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从长远来看也许能惠及大众。我们必须意识到，在现行体制下，流浪汉对国家而言就是个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不仅不工作，而且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还有害健康；因此，这一体制导致了生命和财产上的双重损失。既给他们吃像样的食物，又让他们通过劳作生产一部分食物给自己吃，这样的方案值得一试。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农场或菜园不能用收容所里的劳力，但没有理由能解释为什么流浪汉只能在每间收容所待一天；如果他们有活干的话，本能待上一个月，甚至是一年。流浪汉不停在流动完全是人为造成的。目前，流浪汉花的是公众的钱，所以每家济贫院的目标就是把他们推给下一家，于是就有了一处只能待一夜的规定。要是他一个月之内又回来了，惩罚便是拘留一周，这和坐牢大体相似，自然他也就不停换地方。但是，如果他能为济贫院劳动，济贫院又能给他提供有营养的食物，情况就会有所不同。济贫院就会逐步变成自给自足的机构，流浪汉

则根据自身需要选一个地方住下，不用再去流浪。他们就会做些相对有用的事，得到像样的食物，过上安定的生活。如果这一方案奏效的话，他们甚至能渐渐摆脱贫民的身份，可以结婚，还能在社会上获得一席之地。

这只是个粗略的想法，肯定会有很多反对的意见。尽管如此，这条建议的确能改善流浪汉的生存状态，又不会给公众增加额外负担。而且不管怎样，解决方式一定与之相似，因为问题就是怎样对待吃不饱又无所事事的人，答案自然很明了——让他们自食其力。

---

[1] 杰克·伦敦（1876—1916），美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有《野性的呼唤》《海狼》《马丁·伊登》和《热爱生命》等。

[2] 这一数据肯定是低估的，不过比例大抵如此。

[3] 尺磅，一种能量单位。

[4] “瞎子送信”游戏，一种调换位置的室内游戏。

[5] 公平地说，有几家收容所的状况最近有所改善，至少从住宿条件来看是这样的。但是大多数收容所仍旧和以前一样，在吃的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改善。

第三十七章

下面来谈谈无家可归者在伦敦的住宿方式。目前，想在伦敦任何一家非慈善机构得到一张床位，至少得花七个便士。付不起的话，就得用以下一种方式凑合着过夜。

1.河堤一带。关于在河堤一带睡觉，帕迪是这么对我说的：

“在河堤一带睡觉，关键是要早点睡。在八点之前就得占好长椅，因为那儿的长椅不多，有时全被占满了。而且你得尽量马上睡着。那儿一过十二点，就冷得睡不着。第二天早上四点，警察就会把你赶走。不过要睡着可不容易，该死的电车总是在你头上开来开去，河对岸高楼上的广告牌总在你眼前闪啊闪。那儿冷得很，睡觉时一般都是用报纸裹住身子，但没什么用。要是你能睡上个三小时，算他妈走运了。”

我曾在河堤一带睡过，发现和帕迪讲的一样，但总比根本没得睡好得多；如果你是在其他街道过夜，根本没法睡觉。根据伦敦的法律，夜里你可以坐下来，可是警察一旦看见你在睡觉，就会把你赶走，只有河堤一带和一两个偏僻的角落是例外（莱森剧院[1]后面有一个）。这项法律显然是在故意折磨人。据说，制定它的目的就是防止有人死在街头。但很明显，如果一个人无家可归，那必定会死在外头，不管他是醒着还是睡着，一样都会死。巴黎没有这样的法律。在那里，人们成群地睡在塞纳河桥下、通道里、广场的长椅上、地铁的通风口周围，甚至是地铁站里，不见得有什么危害。只要有一点办法，谁都不愿露宿街头。既然他准备露宿了，只要他睡得着，还是让他睡一觉吧。

2.“两便士过夜处”。这比河堤一带稍微好些。在两便士过夜处，人们在长椅上坐成一排，身前有一条绳子，他们趴在上面就跟趴在栏杆上一样。有个人会在早上五点把绳子剪断，人们把这人戏称为“旅馆侍者”。我自己从没去过那地方，但博佐经常去。我问他用这样的姿势，怎么可能有人睡得着。他说这姿势听上去不舒服，实际上还行——不管怎样，总比睡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强。巴黎也有类似的过夜地，但只收二十五生丁（半便士），而不是两便士。

3.“棺材”，一晚四便士。来这里寄宿的人是睡在一个木箱子里，上

面盖着一层防水油布。里面很冷，而且最糟的是有臭虫。因为是关在箱子里，想躲都躲不了。

比这高一层次的就是普通的寄宿所，收费从每晚七便士到一先令一便士不等。最好的是罗顿之家，收费为一先令，你可以单独住一个小隔间，还有非常棒的浴室。你还能花半克朗住个“特间”，住宿条件和旅馆相差无几。罗顿之家造得很漂亮，唯一不足的就是管得太严，不允许做饭、打牌，等等。对于罗顿之家而言，也许最好的广告便是那里总是人满为患。布鲁斯之家也不错，价格为一先令一便士。

从卫生角度来看，仅次于前者的是救世军寄宿所，收费为七八个便士。它们各不相同（我住过一两家，和普通寄宿所差不多），但大多都很干净。浴室也不错，但洗澡得另加钱，不过你花一先令就能住到单间。八便士的宿舍里，床都很舒服，但床的数量太多了（按照规定，一间宿舍至少得有四十张床），而且全都挨在一起，想安安静静睡一晚是不可能的。还有数不尽的规定，和监狱及慈善机构类似。救世军寄宿所只会吸引那些最看重卫生状况的人。

除此之外是普通的公共寄宿所。不管你是花七便士还是一先令，都一样拥挤、吵闹，床一律又脏又不舒服。值得称道的是，里面放任自由的氛围和温馨暖和的厨房。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随时都可以在那里消磨时间。那里很脏，但能有一些社交生活。据说，女性寄宿舍一般都比男性差，而且很少有给夫妇住的寄宿所。事实上，对于无家可归的人而言，男人住一家寄宿所，他的老婆住另一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目前在伦敦，至少有一万五千人住在普通寄宿所里。对一个每周挣两英镑或者更少的未婚男人而言，住寄宿所很方便。他很难找得到既有家具，又那么便宜的屋子。寄宿所免费给他用炉子，提供浴室给他洗澡，还能和不同人打交道。至于脏，小问题而已。寄宿所的最大缺陷，其实是你花钱去睡觉，却不可能睡得安稳。你花钱能得到的只是一张长五英尺六英寸，宽两英尺六英寸的床，一个硬邦邦的床垫和一个硬得像块木头的枕头，铺着一张棉质床罩，还有两条发灰变味的床单。冬天有毯子，但永远无法御寒。而且放这种床的房间，床铺永远不会少于五张，有时则达五六十张，床与床之间只有一两码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没人能好好睡觉。除了寄宿所，能把那么多人挤在一起的就只有军营和医院了。在医院的公共病房里，谁都别指望能睡个好觉；在军营里，士兵们虽然都挤在一起，但他们的床睡着舒服，而且他们身体都很好；但在公共寄宿所里，寄宿者全都患有慢性咳嗽，很多人膀胱有毛

病，他们整晚都要起夜。结果就是房间里一刻不得安宁，根本不可能睡得着。据我观察，寄宿所里没有人能一晚睡满五个小时——这样的住宿条件却得花七便士甚至更多，真是可恶的诈骗。

就这一点而言，立法可以有所作为。目前，伦敦郡议会就寄宿所设立过各种各样的法规，但都不是从住客的利益出发。伦敦郡议会只是致力于敦促寄宿所禁止酗酒、赌博、斗殴，等等，没有一项法律规定寄宿所的床铺必须睡得舒服。其实这很容易做到，比禁止赌博要容易得多。法律应该规定寄宿所的经营者必须提供充足的床褥和更好的床垫，最重要的是，把宿舍隔成单间。单间有多小都无所谓，关键是睡觉时就应该一个人。就这几项改变，如果能严格执行，都会有显著效果。按正常的收费水平，把寄宿所弄得舒服一些并非没有可能。在克罗伊登[2]市立寄宿所，收费仅九便士，里面有单间，舒服的床和椅子（这在寄宿所中是少见的奢侈品），厨房在地上而非地下。收费九便士的寄宿所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完全说不过去。

当然，寄宿所的老板都会反对这样的改进，因为他们现在的生意能给他们带来暴利。他们一晚通常能赚五到十英镑，没有坏账（严禁赊账），除了房租，其他开销很少。任何形式的改进都意味着床位不会那么拥挤，可挣的利润也就更少。然而，优秀的克罗伊登市立寄宿所告诉我们，付了九便士之后能得到多么好的服务。只需几项有效执行的法律，每家寄宿所就都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如果当局真的要关注寄宿所，他们应该从改善其舒适度入手，而非制定愚蠢的限令，这无论在哪家旅店都行不通。

---

[1] 莱森剧院，位于英国伦敦市西区的一家剧院。

[2] 克罗伊登，英国大伦敦外伦敦的自治市，曾是一个古老的商业城镇，1956年起成为伦敦南部最大的商业、文化中心和办公区。

第三十八章

离开下宾菲尔德的收容所后，我和帕迪靠帮人除草和清扫花园挣了半克朗，那天在克罗姆利过夜，然后走回伦敦。一两天后，我和帕迪分手了。B最后借给我两英镑，我只需再熬个八天，苦日子就算到头了。我犯白痴的毛病比我预料的要严重，但我还没蠢到想回到收容所或让·克塔尔餐厅。

帕迪去了朴次茅斯[1]，他在那儿有个朋友，可能会帮他找份活干，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前不久，我听说他被车撞死了，但可能告诉我这事的人把他和其他人搞混了。就在三天前我有了博佐的消息，他在旺兹沃思[2]因为乞讨被关了十四天，我觉得坐牢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烦恼。

我要讲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故事很琐碎，我只是希望读起来能和旅行日志一样生动有趣。至少我可以说，如果哪一天你身无分文了，等待着你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早晚有一天，我会想更深入地探究这个世界，会想去认识像马里奥、帕迪和乞丐比尔这样的人，不是泛泛之交，而是更深入地了解；我想弄明白洗碗工、流浪汉和露宿在河堤一带的人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目前。我觉得我对于贫穷的认识仅仅只是些皮毛而已。

不过，我还是可以指出一两点我从这段艰苦经历中所学到的东西。我再也不会认为所有的流浪汉都是酗酒的无赖，不再因为给了乞丐一个便士而指望他对我表示感谢，不再因为看到失业者的无精打采而吃惊，不再给救世军捐财物，不再去当掉我的衣服，不再拒绝接一份传单，也不再去高档的餐厅就餐。这就是个开始。

---

[1] 朴次茅斯，地处英国东南部汉普郡，一直以其英国皇家海军港口的地位而著名。

[2] 旺兹沃思，是位于英国伦敦西南部的一个地区，在行政区上属于旺兹沃思伦敦自治市。

奥威尔作品集

奥威尔日记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韩阳 刘晓婷 译

ORWELL DIARIES

奥威尔首先是先知，其次才是圣徒。
——止庵

他能够在目睹最糟境况的同时为最美好的东西而战。
——Granville Hic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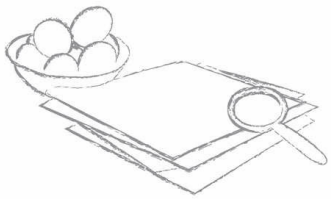
战争过程中，每隔几个月，人们就将鼻子探出水面一会儿，发现地球还是围着太阳转的。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奥威尔日记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韩阳 刘晓婷 译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威尔日记/（英）奥威尔 著；韩阳，刘晓婷 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7

（奥威尔作品集）

ISBN 978-7-5680-1420-5

Ⅰ.①奥… Ⅱ.①奥…②韩…③刘… Ⅲ.①日记—作品集—英国—现代 Ⅳ.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4332号

奥威尔日记　　[英]乔治·奥威尔 著 韩阳 刘晓婷 译

Orwell Riji

策划编辑：刘晚成

责任编辑：黄验

特约编辑：韩阳 徐心 王书平

封面设计：喃风

责任校对：曾婷

责任监印：张贵君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3

印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2.125

字数：285千字

版次：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55.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由的保障，良知的坚守

战争过程中，每隔几个月，人们就将鼻子探出水面一会儿，发现地球还是围着太阳转的。

- 1938年8—10月
- 1938年11—12月
- 1939年1—3月
- 1939年4—6月
- 1939年7—9月
- 1939年10—12月
- 1940年1—3月
- 1940年4—6月
- 1940年7—9月
- 1940年10—12月
- 1941年1—4月
- 1941年5—8月
- 1942年3—7月
- 1942年8—11月

1938年8—10月

1938年8月9日

在车道边的绿地里捉到一条蛇，长2英尺[1]6英寸[2]，灰色，腹部有黑色斑点，背部有箭头(⇧)一样的线，从颈部一直向尾端延伸。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蝰蛇，但我觉得蝰蛇背部的线应该是宽箭头（^）。草率处理也无所谓，于是我捏着它的尾巴把它拎起来了，这样它转头时差点儿就咬到我的手。开始，马克斯[3]对这条蛇还很感兴趣，但闻了闻它之后就吓跑了。通常，这里人碰到蛇就会将它打死。人们一直把蛇的舌头称作“毒牙”[4]。

1938年8月10日

牛毛细雨。晚上有浓雾。月亮泛着黄色。

1938年8月11日

早上有薄雾，外面所有东西都泛着潮气，屋子里也是。我的鼻烟壶上面有一层奇怪的沉淀物，明显是漆受潮产生的。天很热，下午有雨。

听说今天早上又有人捉到了一条蛇，这次肯定是草蛇。有个人看到他们捉蛇，说那些人用细绳缠住蛇的脖子，想用刀割掉它的舌头，这样它就没有办法“叮”人了。

今天第一次吃巴斯美苹果。

1938年8月12日

上午很热。下午有狂风暴雨。大雨刚下了一个半小时，在距离大门50码[5]外的马路和人行道上，积水就有1英尺深了。

黑莓开始变红。

1938年8月16日

最近天气变化无常，多雨，有时很热。大部分小麦和大麦都已收割堆好。两天前，孩子们就开始采摘快成熟的黑莓了。

前两天晚上，我看到了一只雪鸮，这可是两年来第一次。远处还有一只鸟，可能是纵纹腹小鸮。

七叶树的果实已经饱满，但还没熟透。啤酒花长到榛子那么大了。我昨天又去了一次动物园[6]，又有一窝小狮子降生了，比家猫稍大，长满斑点。一年前出生的那些已经有圣伯纳德犬的大小了。每只狮子分到的肉有六七磅，我估计它们每天只吃一顿。

撒丁摩弗伦羊[7]的乳房很大，和山羊的差不多，应该能挤出一品脱[8]的奶。我注意到斑马的蹄子很直，至少前面两只是这样。驴子和斑马杂交出来的斑骡的蹄子长得像马蹄。这种杂交品种，就外形来说，除了耳朵稍微大一些，几乎跟斑马没有区别。

1938年8月17日

晴朗温暖，大风。

从那块22英亩大的地里收割的大麦还没有码垛，小麦已经码了两垛，目测两个垛的长、宽、高分别是30英尺、18英尺、24英尺和18英尺、15英尺、20英尺。如果估计准确，14英亩地可以产出14040立方英

尺小麦。如果每英亩小麦产量为1吨，那产出每吨小麦就需要1000立方英尺地。注意：等全部码好垛之后再看。

猫薄荷、胡椒薄荷和艾菊已经凋谢。狗舌草和柳兰开始结籽。有些黑莓已经熟了。接骨木莓开始变紫。

树枝做成的橡木板和树干做成的不同，树枝做成的被称为劣等橡木，价格也相对便宜。

淘汰下来的铁路枕木在这里的售价是每英担[9]1英镑[10]，大约每块1先令[11]，也就是每英尺2便士。

1938年8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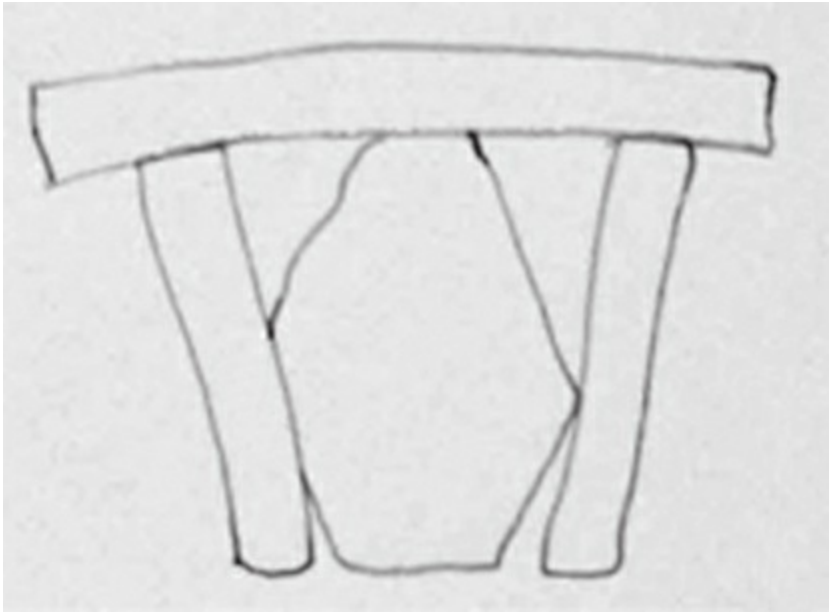
参考玉米地的收成，小麦地和大麦地实际也差不多。共有四堆玉米，其中两堆的体积是30*18*24（英尺），剩下两个是18*15*20（英尺）。如此，22英亩地可以产出28000立方英尺的庄稼。昨天晴，大风。很多黑莓已经熟了，接骨木莓颜色变得很快，榛子几乎已经完全成形，缬草和毛蕊花已经凋谢。

很冷，大风，潮湿。山楂已经很红了。下午有小雨。

1938年8月21日

昨天晴朗温暖。下午去看了吉斯卡蒂[12]，它类似督伊德教的祭坛，由四块石头组成，结构大概如此：

整个祭坛有8英尺高，最上面的石头的面积约为8平方英尺，厚1英尺多，因此，体积约为70立方英尺。1立方码（27立方英尺）的煤约重27英担，如果最上面的那块石头是煤，则应该重3.5吨，如果我估计的尺寸准确，或许还要更重。四块石头在一座很高的小山山顶上，看起来仿佛属于这个国家的另一部分。



1938年8月22日

还算暖和，阵雨。夜晚开始变冷，仿佛到了秋天。几棵橡树的树叶已稍稍染上了黄色。雨后，大鼻涕虫爬了出来，其中一条约有3英尺长，头部后方有两个大孔，可能是耳孔。这些虫子有两种明显不同的颜色，一些是淡黄褐色，其他的是白色，但腹部边上都有一道亮橙色，让人们认为它们是同一品种，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尾端有一团胶状物，像水蜗牛的卵壳。

有只体型和鹿角虫差不多大（但不是一类）的大甲虫，身体后端有段黄色的管状物凸出，长度和身体差不多。可能是产卵用的？

1938年8月22日[13]

早上很凉爽，一整天都在下雨。大部分庄稼已经收好。萨福克的黑莓成熟得比肯特的晚很多，但其他作物都差不多。

如果要修剪猫头鹰的翅膀，最好只修剪右边的（左边的用来给卵巢保暖）。

冷掉的茶是天竺葵的好肥料。

1938年8月25日[14]

萨福克的一切都要比肯特的干燥许多。我们到之前已经有好几周没下雨了，各种作物都歉收。在索斯沃尔德附近，我看见几块从燕麦地和大麦地收割来的庄稼，只堆了1英尺或者18英寸高，尽管如此，麦穗好像还算正常。据说全世界小麦的产量都比较高。

在后花园里发现了一只蓬子菜天蛾，科林斯医生[15]把它制成了标本。这只虫子显然是偶然从欧洲大陆来的，据说当地50年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虫子。

纵纹腹小鸮很常见，褐鸮似乎没有。

科林斯医生说我捉到的那条蛇是“滑蛇”，无毒，在这一带不多见。

依然很热。

摘啤酒花的吉普赛人陆续来了。他们刚把大篷车停好，就把鸡放出来了，显然这些鸡不会到处乱跑。他们用来做晾衣夹的马口铁是从饼干桶上剪下来的。三个人做晾衣夹，一个负责折成条，一个负责剪，另外一个将其钉牢。我估计要是一个人做（包括钉好后把夹子劈出来），每小时大概可以做10到15个。

晚上又看到一只雪鸮。

1938年8月26日

很热。清晨，浓雾笼罩着大地。大部分黑莓已经成熟，个头很大，比较甜。不少欧洲木莓也熟了。核桃已经基本长成，商店里有很多英国苹果出售。

1938年8月28日

前天晚上下了1小时雨。昨天阴天，很热。今天也是，下午下了点雨。再有大约一周就得开始摘啤酒花了。

1938年8月29日

阴天，很凉。昨夜大雨。大丽花已经盛开。

1938年8月30日

暖和点儿了。

郁金香的叶子开始变黄。向日葵和剑兰正盛开。

高代花的盛开期已过，鸢尾进入盛开期。接骨木莓已经成熟，深紫色的鸟粪到处都是，圆木上面也沾着这种紫色的污迹。鸟类能将吃下的大部分东西都消化掉，令人难以置信。那个养天竺鼠的当地人似乎不太确定天竺鼠是否睡觉，说它们有时会闭上眼睛，但不确定是不是在睡觉。今天第一次吃到英国产的梨。

1938年8月31日

早上很冷，之后晴朗温暖。

1938年9月1日

晴朗，温暖。

1938年9月2日

晴朗，温暖。

1938年9月3日

写于“河谷伊甸园”号客轮上，此船属铁行轮船公司“河谷姐妹”系列，总注册吨位23500吨，载客量为1063名。昨天晚上6点离开蒂尔伯里码头。上午（不确定是8点还是12点）的方位是北纬49.25度，西经3.34度，船已航行288英里，剩余航程1007英里[16]。下午5点左右驶过韦桑岛，岸边离左舷约5至10英里。目前正驶入比斯开湾，向南航行。明晚应该就能再次看到陆地了。目前海面很平静。一小群皮尔切德鱼或是沙丁鱼跃出过水面一两次，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追它们。有只小鸥之类的陆生小鸟飞到了甲板上，当时已经看不到陆地了。缆绳上有鸽子。

1938年9月4日

驶过了比斯开湾口。海上风浪较大，船轻微摇晃。没晕船（晕船药“瓦萨诺”效果不错）。下午5点左右经过了西班牙福斯特拉，有雾，什么也看不见。航行了（24小时）403英里。直布罗陀在格林尼治西5度方向。周一、周二要将表调慢半小时，到马赛后再调回来。预计周二（6号）早上7点到达丹吉尔，下午1点半到达直布罗陀。到达丹吉尔须航行1007英里，用时约89小时。

今天几只海豚从船边游过。昨天我看见一只以往从没见过的海鸥，这只海鸥深褐色，翅膀上有白色条纹，除此之外，没看到其他动物。

船长约250码，最宽处约25码。水面以上共有7层甲板。不知道具体有多少船员，包括乘务员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是印度人。

1938年9月5日

昨夜大雾，警报一直不断。早上海面平静了许多，呈铅色，灰蒙蒙、油乎乎的。随后，天气变得很热，海面是明亮的蓝色。上午10点左右通过了罗卡角，有雾，看不清陆地。下午6点通过圣维森特角时离岸边大概只有2到3英里。航行了（24小时）342英里，明天清晨应该能到丹吉尔。

不知道这一带的鸥鸟是什么品种，它们头部是深褐色或黑色，头部之下是白色的，在距离海面几英寸的地方捕食，就像飞过草地的猫头鹰。靠近陆地时能看到海面上的一团团海草。离陆地还很远时，燕子和紫崖燕就已跟在船后。有人说昨天看到两头鲸鱼，但我没看见。

这艘船用的是油涡轮发动机，开始我还以为是蒸汽涡轮机。船员估计有600人。经济舱（的确是在二等舱和三等舱之间）有1间餐厅和3间休息室。船上有两层甲板用作游戏场所，有一个室内游泳池，还有一台相当原始的电影放映机。船上会举行天主教弥撒和圣公会的祈祷仪式，每天一次。伦敦到直布罗陀的船费是6到10英镑[17]。

后来弄清了，船上有543名船员，共装载了八九千吨货物。

1938年9月7日

英国当天的报纸得通过铁行轮船公司送达直布罗陀，要花费四天时间。《直布罗陀时事官报》是当地的一家英文日报，共8页，其中2页半是广告，每份1便士。目前的发行量为31251份，有支持法西斯的倾向。当地西班牙报纸有《宣言报》和《号角报》，都是4页，大部分是广告，每份也是1便士，日报是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的，或者说略微支持佛朗哥政权。这里约有10到11种支持佛朗哥政权的报纸，另外有包括《工人团结报》在内的3种官方报纸，当地能买到的官方报纸至少都是6天前的，而且可信度不高。丹吉尔还有2份支持西班牙政府的报纸，《未来报》和《民主报》。报纸的售价都是以佛朗哥货币标价的。

不知道当地西班牙人的态度如何，只见到墙上有“佛朗哥万岁”的标语和长枪党的标志，但也不多。

城镇人口大约2万，大部分是意大利裔，几乎全部会讲英语和西班牙语。许多白天在此工作的西班牙人晚上还得返回西班牙。至少有3000名难民来自佛朗哥控制的区域。政府准备以拥挤为由驱逐他们。不知道当地的工资和食品价格水平如何。显然，这里的生活水平不低，大人都穿着鞋，大多数孩子也是。水果和蔬菜似乎很便宜，葡萄酒和烟草明显不用交税，或者说税费很低（英国香烟每100支的售价为3先令，西班牙香烟每100支的售价为10便士），丝绸也很便宜。当地没有英国产的糖或火柴，都是比利时产的。每品脱牛奶6便士。店主有的是印度人，有的是帕西人。

西班牙驱逐舰“何塞·路易斯·迪亚兹号”泊在港口，船体右舷处有个直径四五英尺的大弹孔，在船头后方水面上15到20英尺。船上挂着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子。开始船上的人肯定是不得上岸的，现在则可以在海军休闲区待几小时（但不准与当地人接触）。他们好像不打算修船。

偶然听到当地英国人说：“就快来了，希特勒快要拿下捷克斯洛伐克了，否则就会一直找麻烦，直到他得手为止。还不如直接给他。1941年我们就准备好了。”

1938年9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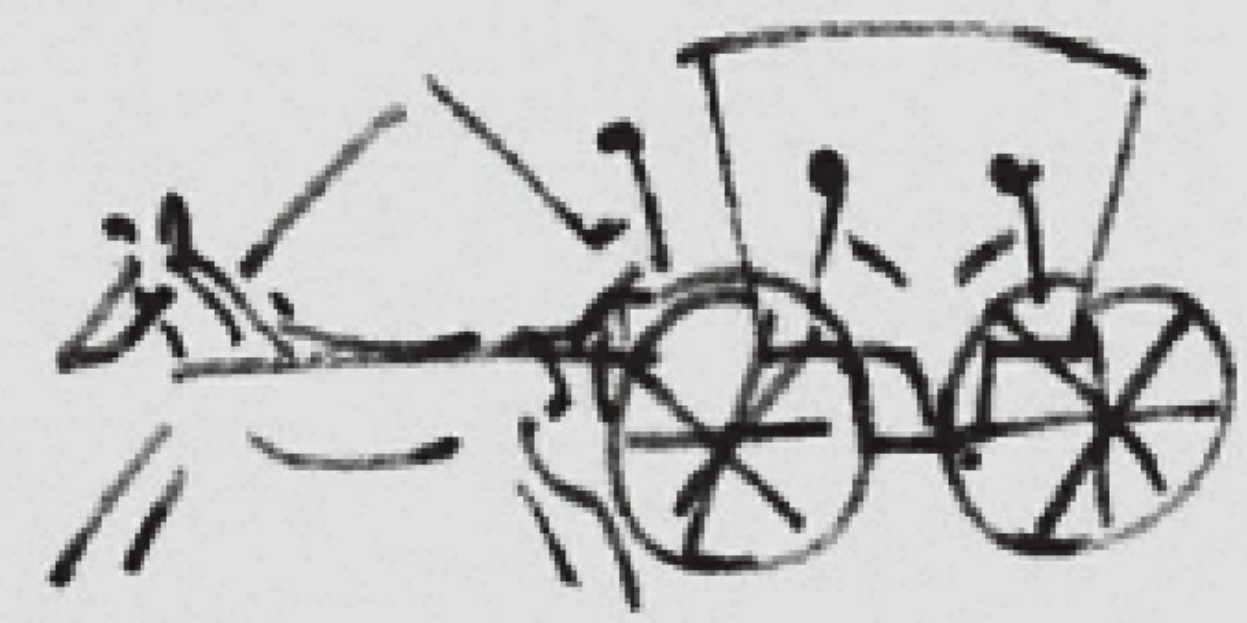
大部分时候都很热，有时晚上热得难受。大多数时候，海面波涛汹涌。风平浪静时能看到鱼，那些鱼至少在水下10英尺处。

据说，直布罗陀的巴巴利猕猴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因为扰民，政府打算将它们彻底消灭。每年到了一定的季节（我猜是因为缺少食物），猕猴就会从山上下来，闯进当地人的房子和花园。人们说猕猴的体型像狗，是大型猿类，只是尾巴很短。在正对面的非洲海岸也发现过同样的物种。

山羊是马耳他的品种，至少大多数是。这种山羊体型很小，上半身的毛又长又乱，一直垂到膝盖，显得腿很短。它们的耳朵低垂着。大多数山羊没有角，至于长角的，它们的角向后弯曲得很厉害，贴在头上，通常会弯成半圆形，角尖贴在眼睛旁边。它们的乳房下垂得很厉害，很多就像袋子，都看不见乳头，而有的只有半英寸长。羊有黑色的、白色

的，还有红褐色的（这种颜色的很多）。据说一天的产奶量约1公升。这些山羊不挑剔草的种类，我就见过有一群羊在路边吃野茴香。

驴子体型不大，和英国的类似。马车很奇怪，是半封闭的，像摘掉了侧板的印度马车。



山坡很陡峭，总的来说，牲口的日子并不好过。这里不养奶牛，每品脱牛奶6便士。时令水果蔬菜都已上市，有苹果、橘子、无花果、葡萄、甜瓜和仙人掌果等，还有茄子和各种英国蔬菜。仙人掌果能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母鸡很少，鸡蛋都很小。广告上的“摩尔鸡蛋”，好像是高品质鸡蛋。

猫是马耳他的品种，狗都带着口套。

1938年9月10日

丹吉尔有售的报纸有：《摩洛哥新闻》（卡萨布兰卡晨报，佛朗哥政权的坚定支持者）；《小摩洛哥报》（卡萨布兰卡晨报，态度中立）；《摩洛哥快报》（丹吉尔日报，倾向于佛朗哥政权）；《丹吉尔周报》（显然是周报，似乎不关心政治，属于商业公告类报纸）；《丹吉尔公报》和《摩洛哥邮报》（丹吉尔的英文周报，每周五发行，与上

述报纸相比，有反法西斯倾向，强烈反日[18]）。还有各种法语和西班牙语报纸，但似乎没有支持佛朗哥政权的本地西班牙语报纸。

有两栋建筑物上挂着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帜，其中一栋是“西班牙之家”——类似某种俱乐部，陈列有普通的政府海报。有些商店张贴着佛朗哥政权的海报（“西班牙崛起”的海报和政府海报别无二致）。墙上的标语不是很多，有的支持佛朗哥政权，有的支持政府，都很常见，但支持后者的可能稍微多一些。标语一般都比较简短，都是“佛朗哥万岁”或者“佛朗哥灭亡”之类的，也有“工人联合兄弟会”“全国工人联盟”，很少出现“总工会”的字样。除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长枪党”外，其他组织都没有采用党派首字母缩写的形式，“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也用过一次缩写。所有标语都是用西班牙语书写的。不知道摩尔人的态度如何。[19]

作为一个东方城市，这里并不算穷。虽然行乞的人越来越多，不过城镇的支柱产业仍是旅游业。真正的乞丐不多，然而给古玩店、妓院等拉生意的掮客却多如牛毛。大部分人讲西班牙语，也有很多人讲法语，所有涉及旅游业的人都会说几句英语。当地人体格不错，尤其是年轻的摩尔人和年轻的西班牙人。尽管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但几乎所有摩尔人还是会披着斗篷、戴着毡帽，而且大部分年轻女子都戴面纱。海边渔民的收入大概是每小时3便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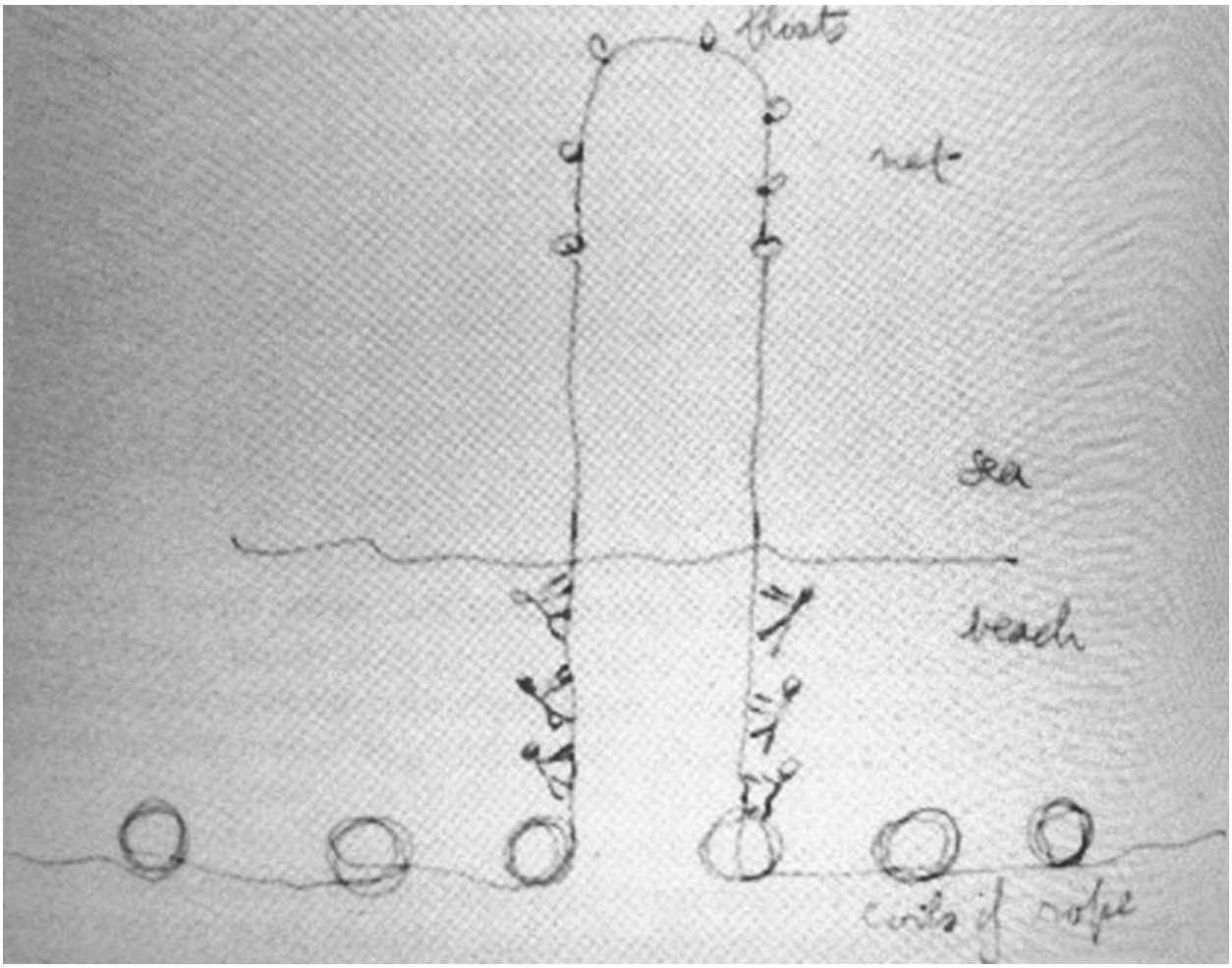
当地有四个邮局，一个法国的，一个英国的，两个西班牙的——分属佛朗哥政权和西班牙政府。邮票是英国的，丹吉尔收附加税。货币制度与法属摩洛哥相同。

1938年9月10日

据说，这里的气温最高也未达到85华氏度。海水相对温暖，很清澈，没有风的时候，可以看到水下二三十英尺的地方。海潮可达一英尺高，海港中的鱼很多，但不知为何，捕获的鱼都很小。有一种大鱼，有6英寸至1英尺长，棕色，有点像鳕鱼，成群地在石墩附近游动，每群有5到20条，但渔民们都说这种鱼是钓不到的。用渔竿和渔线钓小鱼的方法和钩钓很像。当地人使用的工具上有6个背靠背排列的小鱼钩，每个鱼钩上都有面包或肉作饵。将鱼钩放入水中，鱼群一旦聚集而来，就立

即提起渔竿。海边撒网捕鱼的过程如下：渔网长约150英尺，宽度可达6英尺，网眼自中间到边缘由密到疏。渔船拖着渔网出海，靠漂浮物固定在某处。渔网两端各系有一条绳子，至少有半英里长。之后，逐渐收拢渔网，拉着绳子的两队人逐渐靠近收网。每条绳子得有6到8个成年男子或者男孩子拉着。他们不是用手拉绳子，而是把绳子系在腰间，末端打结，直接套在腰上。渔民们靠身体拉绳子，全身后仰，右腿发力。绳子逐渐收回卷起，到绳卷处的渔民解开绳结，跑到靠近海水的那端后，再次系好绳结。收网至少需要一小时。我见过一次收网的过程，那次一共捕获了约30磅沙丁鱼（或者是类似沙丁鱼的小鱼）和5磅左右的其他海产品，包括乌贼、红鲣、长鼻鳗等，估计值（对渔民来说）5先令，是15个成年男子和男孩子工作两小时的成果，如果是20个成人工时，则每个工时的价值是3便士。

过度役使驴子的情况很严重。它们得做相当于9至10个劳动力的工作，至少负重200磅。赶驴人将大量货物放在驴背上后，自己也会坐在货物中间。这里的山非常陡峭，很多山的坡度在16至20度之间，但驴子依旧得驮着重担往上走，有时候甚至都快被货物压得看不见了。即便如此，它们还是非常耐心、顺从，一般不用拴缰绳，也不用驱赶，甚至不用人牵着。它们像狗一样跟在主人身后或走在主人前面，主人停它也停，主人进屋，它就在外面等着。驴子大多数都没有阉割，许多马也没有（体型很小，一点都不壮实）。



尽管天气很热，市场也杂乱不堪，但气味不算太难闻。

时令水果蔬菜有仙人掌果、各种瓜类、葡萄和茄子等，其他都是从欧洲进口的。水装在羊皮袋里卖。大无花果树上有青色和紫色的无花果，我之前不知道会有这种景象。有种爬行旋花科植物在这里很常见，同一株上的花有蓝色和粉色的，有时候同一枝上也开着两种颜色的花。美人蕉、叶子花和天竺葵正在盛开。草坪上生长着一种很粗糙的草。

这里生活着两种不知是燕还是紫崖燕的鸟。港口没有海鸥。

离晚上7点还早，天就渐渐黑了（是实际的7点钟，不是夏令时）。

黄油还不错，但鲜奶似乎很难买到。

1938年9月13日[20]

我注意到，西属摩洛哥实行夏令时，而法属摩洛哥则没有。车站里，佛朗哥士兵们的穿着和西班牙政府军的穿着几乎一样。上了火车，一个典型的西班牙长官会检查行李，但不怎么严格。另一位官员走进来，没收了所有法语报纸，就连最支持佛朗哥政权的报纸都未能幸免。法国旅行者们觉得很好笑，而那名意识到如此做法很荒谬的官员也觉得很好笑。

显然西属摩洛哥比法属摩洛哥落后，可能是因为西属摩洛哥某些地区的土壤比较贫瘠。法属摩洛哥在西属摩洛哥的南边，那里的土地由于摩尔人和欧洲人的耕种与西属摩洛哥的土地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属摩洛哥的广袤土地主要种植小麦（据说，3000名法国人和有色人种劳动力一共耕种了100万亩的土地），耕种面积非常大，从铁路两边分别看都望不到头。土壤肥沃程度也不同。有的地方是肥沃的黑土，有的则如碎裂的砖石一般。通常来说，卡萨布兰卡南部的土地都比较贫瘠，不适合放牧。马拉喀什以北50到100千米的范围内实际都是沙漠，布满沙地、沙丘和风化岩石，几乎没有植被。西属摩洛哥的边界处能看到骆驼，到马拉喀什附近，骆驼就和驴子一样常见了。绵羊和山羊的数量几乎一样多。马匹没有多少，几乎没有骡子。奶牛的数量还算多。马拉喀什附近有公牛耕地，但再往北就没有了。所有动物的健康状况都很差，几乎无一例外（据说是连续两年的饥荒造成的）。

卡萨布兰卡看上去完全是法国城镇的样子（人口约有15万到20万，其中三分之一是欧洲人）。显然，两个种族的人极度倾向于各自内部交往。欧洲人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也愿意做服务性工作，但显然薪水比摩尔人的高（电影院中，坐在最便宜位置的只有摩尔人；巴士上，很多白人也不愿意坐在摩尔人旁边）。这里的生活水平似乎不是很低，乞丐的数量明显比丹吉尔或马拉喀什的少。

马拉喀什有大片欧洲人聚集区，但实际上更像是典型的摩尔小镇。除了在餐厅，欧洲人很少从事低级劳动。[21]卡萨布兰卡的计程车司机是欧洲人，而马拉喀什的则是摩尔人。乞丐很多，行人穿越街道难之又难。毫无疑问，这里非常贫困。孩子们会讨面包，得到后就会狼吞虎咽。市场上，很多人都睡在街上，几乎每个商店门口都睡着一家人。盲人很多，有的人身上长着皮癣，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残疾。很多难民在城外聚集。听说他们是从遥远南部的饥荒区逃到北边来的。

据说，在花园里种植烟草是违法行为，将受到惩处。

1838年9月14日

我搭乘从丹吉尔到卡萨布兰卡再到马拉喀什的火车时看到一些鸟。朱鹭非常多，茶隼也很常见，还有两种大一些的鹰或鸢。我还看到几只独行的乌鸦，跟英国乌鸦很像。有人说这里有鹳，但我没看到。山鹑很少。马拉喀什的金翅雀和英国的一模一样，很常见。看见一个人拎着野兔，此外，没见到任何野生四足动物。听说在法属摩洛哥，除了一些野兔和豺外，别的基本上什么都没有。西属摩洛哥的骆驼不多，但到了卡萨布兰卡南部，骆驼就很常见了。骆驼站立起来通常有18掌宽[22]。所有骆驼都瘦骨嶙峋的，关节布满老茧，大多数都带着口套。马拉喀什的驴子驮的东西比丹吉尔的略少，但没有丹吉尔的温驯。

海枣快熟了。半熟的海枣呈明黄色，挂在树枝上，在棕榈叶和树冠相接的地方。每棵树上约有6簇海枣，总重约半英担。落在地上的海枣就像没有壳的橡果。这里的海枣树有好几个品种，有一种很矮小。

胡椒树上的胡椒差不多快熟了。显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假胡椒”，但也能满足一般用途。胡桃刚成熟，显然是当地特产。梨和桃还不太熟。柠檬是青色的，很圆，更像是印度青柠，不过个头更大、皮更厚。酿酒的葡萄产量很大，价格非常便宜。

卡萨布兰卡的海洋生物和英国的几乎一模一样，有海螺、帽贝、藤壶、陆栖蟹等，还一种海葵，看上去和英国的毫无差别。但没有看到海鸥。忘了说，有人在丹吉尔捕到过大个的鲭鱼。

马拉喀什的迷迭香长得很好。玫瑰也不错，矮牵牛花像印度的一样，一簇簇的。百日菊正在盛开。显然，如果水分充足，这里可以种植优质草种。

1938年9月15日

我在当地的小动物园外面捉到一只水龟，约8英寸长（尽管跟动物园里的是一类，但这只明显不是从里面跑出来的）。它当时在灌溉渠里，正逆流爬行，但仅能勉强停留在原地。让它四脚朝天的话，它自己就翻不回去了。尽管它很好动，状态也不错，但还是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这里没有常见的那种麻雀，但一种体型很小的雀类却很多。它们通身呈棕色，脑袋是蓝色的，尾巴很长。

动物园里有几株紫菀，让我感到很意外。橄榄马上要成熟了，有的变成了青红色，也许成熟后就是这种颜色。橙子还是青色的。显然，这些树得经常修剪。红花菜豆已经长出了豆荚，跟家乡的差不多。葡萄品质很差，干涩，没什么味道。

蚂蚁个头很大，半红半黑，正在扩建地下洞穴。有只蚂蚁正在搬运一颗四分之一英寸长、二分之一英寸厚的石子。苍蝇很烦人，蚊子相当多，但目前还没爆发过虫灾。

晚上7点，夜幕降临。

1938年9月16日[23]

发行量最大的两份报纸是《小摩洛哥报》以及《摩洛哥观察报》，前者中午就有售，后者晚上才会出售。两份报纸都持爱国的立场，多少有些反法西斯，但对西班牙内战和反共分子则持中立态度。当地周报《阿特拉斯》似乎并不受重视。昨天（9月15日），尽管张伯伦飞往柏林的新闻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大报纸也多有报道，但当地人并不相信战争即将来临，因此完全没有在意。无论如何，大批军队已被调遣至摩洛哥。马赛到丹吉尔再到卡萨布兰卡航线上的两艘法国班轮几乎满载着士兵。最近，当地空军军力大幅增强，据说有125名新任军官即将抵达。

1938年9月19日

海枣已在出售，除了半数亮橙色的，还有一些是如茄子般锃亮的紫色。大堆的石榴随处有售。有些橙子已逐渐变黄。有卖大个的西葫芦的，每个约有20到30磅。还有一种呈浅绿色的西葫芦，很光滑，特别长，可能是黄瓜的一种。集市上有自产自销的黑面包，可能是大麦面包，但看上去是黑麦面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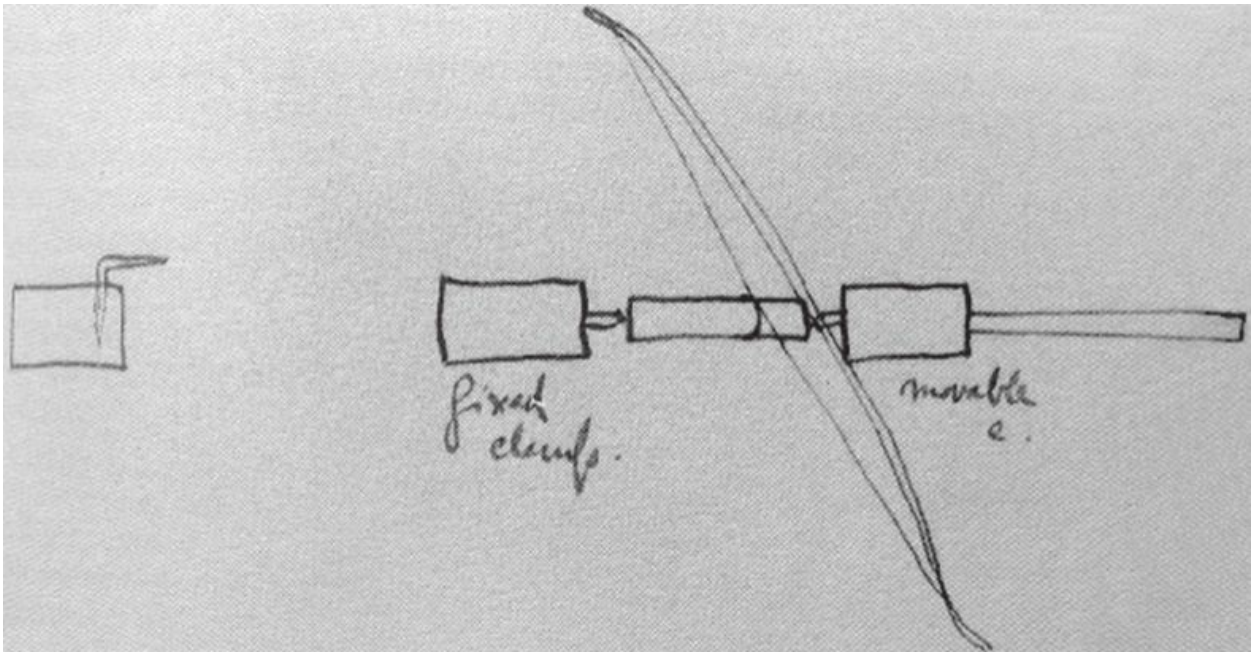
金翅雀随处可见。鹳似乎是从别处迁徙而来的，冬季中期才会出现在这儿。这里气温波动很大。今天和昨天还算凉爽，前天则热得难以忍受——下午6点，气温为25摄氏度（77华氏度），中午时分差不多是40摄氏度，据说这里室内最高温度可达45摄氏度（113华氏度）。通常下午4点后会凉快一些，6点钟左右又开始变热，可能是盛行暖风的原因。晚上睡觉时，盖张被单就可以，但凌晨时分，就得盖毯子了。

据说，一头驴子值100法郎（约12先令6便士）。

莴苣似乎很难生长。

1938年9月20日

犹太木匠用来做绳编椅的车床相当原始。车床上共有两个夹具，左边的是固定的，右边那个在铁棍上滑动，两个夹具都有金属尖头，用来固定木棒。旋转木棒时，尖头静止不动。将木棒固定在车窗前，要先用弓弦绕其一周。木匠用右脚控制可移动的夹具，右手操作弓，左手握住凿子，左脚保持凿子的稳定。如此一来，木匠就可以精准地转动木头，效果与真正的车床几乎毫无差别。凭肉眼判断，其精确度可达到0.01英寸。利用弓、木头车床能以惊人的速度旋转。



当地的土墙是使用地表以下4到6英尺深的土砌成的，可能是因为土质不同，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深度的土较为潮湿，适于筑墙。这种土呈独特的巧克力色，晒干后则成了砖粉色，是当地特有的。土被挖出后要与碎石和少许水混合，然后像浇筑水泥一样倒入木框中。接着，用大锤用力夯实。第一截泥土足够紧实，无需支撑即可竖立时，就可以浇筑下一截了，而且相接处也不会留有痕迹，几乎跟水泥一样。

据说，即使大雨倾盆，这种泥墙也能支撑多年。

街道两旁生长的橘子太苦，不能食用，是专门用来嫁接甜橙的。

橄榄树上除了普通的绿橄榄外，还有一些青红色的橄榄，不过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区别。

显然，也有阿拉伯人相信摸一摸驼背会让人走运的迷信说法。

中午，天气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其他时候还算凉爽。下午6点半后得穿外套。今天天气不够晴朗，看不清阿特拉斯山上是否有雪。

1938年**9**月**25**日

昨天上午阴天大风，之后下了几场大阵雨。今天没下雨，但气温很低，有大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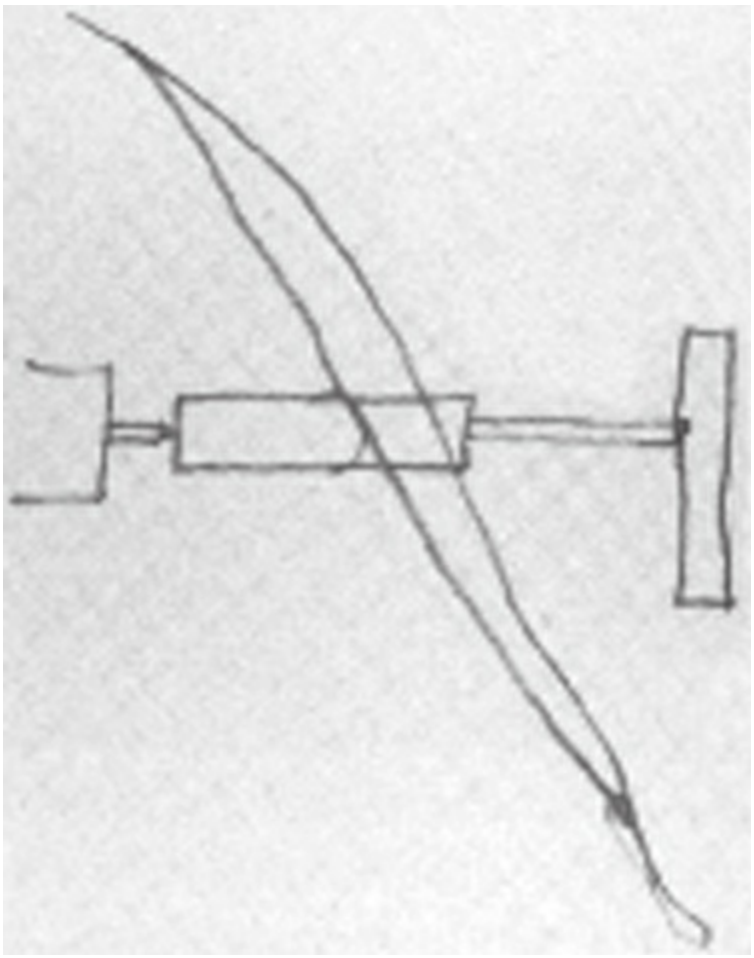
所有骆驼的膝盖上都有瘀伤，因为那是与地面接触的地方，而且它们经常要跪在石头上。当地几乎所有骆驼的背上都有磨伤。据说，每头骆驼只能由一个它熟悉的人驾驭，而且不到万不得已，人不能打骆驼。从身体比例看，骆驼驮的货物要比驴子驮的少得多。有些骆驼背上磨伤的地方叮着苍蝇或是长着蛆，但它们似乎毫不在意。孩子们也不太在意苍蝇，有时他们眼睛周围会结痂。

蜀葵花期刚过，向日葵也马上就要谢了。蜀葵可以长到10到12英尺高。

公园里的菊花长出了花蕾。美人蕉开得正好——有四种颜色。

现在阿特拉斯山脉上还没有雪，在晴天的日落时分，整座山会染上一层壮丽的紫红色。

机床上使用的弓也可以用在钻上。这种钻有一个圆柱形的木质把手，把手底部有一个孔，抵着钢尖。弓带动钻旋转，弓的另一端则顶在木头上，这样可以保持平衡。这种钻似乎和普通钻的效果差不多，而且速度很快。



上午花10法郎（买贵了）买了两只斑鸠。还花了15法郎买了个竹笼子，长、宽、高分别为20英寸、15英寸和20英寸。这些一共花了3先令左右。这些鸟应该很容易驯养。

当地有很多普通的画眉（或某种与其非常相似的鸟），纵纹腹小鸮（或者某种与之类似的枭）也很多。蝙蝠很大，体型是英国蝙蝠的两倍。

下午6点45分时开始天就会渐渐变黑。

1938年9月27日[24]

当地另一份日报是《摩洛哥新闻》，比《小摩洛哥报》更为右倾（至少更反苏、更支持佛朗哥）。

据说，马拉喀什驻扎着15000名士兵。除了军官、士兵和一支海外军团分队[25]外，都是阿拉伯人和黑人。尽管小分队的士兵们都很优秀，但显然，他们仍被视为危险的无赖，没有特别许可不得进入城里的某些地区。阿拉伯骑兵（臂章上看，应该是第二骑兵团的）精神抖擞，但步兵就差一些，和二流印度兵团差不多。这里还有很多塞内加尔步兵（也就是“土著士兵”——可能是用步枪的那种——臂章的图案是一个锚[26]）。他们体格健壮，善于行军，负责城镇某些地区的安全。此外，当地还有一支炮兵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不过最近我看到行进部队中有大口径野战炮，口径好像在75毫米以上），队里都是黑人士兵。不过，他们都只是运输兵，不知道如何瞄准。阿拉伯人的职责不在于此，显然是因为他们总能学到更多东西。听说士兵都随时待命，一声令下即可开拔。城镇的正西方向有座山，山上有一门大炮，瞄准阿拉伯人聚集区，以免“发生不测”。然而，当地的法国人对欧洲的危急形势漠不关心，认为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没人争着办理签证，而且除非别人问及，也没人主动谈论此事。咖啡馆里也没有人讨论这一话题。若就战事询问法国人，他肯定会说人们都清楚，一旦开战，“待在这里总比待在法国好”。所有人都接受过动员，但只有年轻人会被派往欧洲。法国和当地学校的开学日期都没有推迟。

想了解这里的贫困程度并不容易。显然，两年的干旱让这里的日子异常艰辛，土地无法耕种，现在已经完全沙漠化了，田地龟裂，寸草不生。因此，诸如马铃薯之类的很多农产品都异常匮乏。干旱地区的难民不断流动，而法国也向他们提供了一定的救济。广袤的法国麦田主要由女性耕种，年景不好时，无工可做的女人们便蜂拥入城，据说卖淫现象因此十分严重。毫无疑问，按照欧洲标准，城里的贫困现象异常严重。千百人露宿街头，乞丐随处可见——尤其是儿童乞丐。值得一提的是，不只旅游区有乞丐，当地人的居住区也有。一旦欧洲人出现，他身后肯定会跟着一群儿童乞丐。大多数乞丐你只要给他一个苏[27]就满足了（20苏即为一个半便士）。有两件小事值得说明：有一次，我让一个差不多10岁的孩子帮我叫计程车，后来我给了他50生丁（也就是3法新[28]，按当地标准是给多了）。另外十几个孩子看见了，马上围过来，抢走了我所有的零钱，甚至把我的手都抓出血了。我设法离开了，但他们转而去抢那个帮我叫车的男孩的钱——掰开他的手，硬生生地夺走了他的钱。还有一次，我在公园里喂鸽子时，一个政府雇的阿拉伯挖土工人过来找我要了片面包。我给了他，他便心满意足地把面包装在口袋里了。这种事只能引起人的一丝疑虑，这一地区的某些人，或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里的年轻人，已经死死抓住了旅游业这根稻草，认为欧洲人

相当富有而且容易上当。很多当地的年轻人假借导游或翻译的名义对游客进行敲诈勒索。

当地有很多小手艺人和计件工，比如木匠、金属工人、搬运工等，他们每小时大概赚取一两个便士。因此，很多东西都非常便宜，但包括面包在内的几种主食却并非如此——所有阿拉伯人能吃面包就吃面包，因此面包很贵。买四分之三磅的劣等白面包（欧洲面包更贵）得花1法郎，也就是1.5便士，所以都是以半块的形式出售。露宿街头的阿拉伯人，每天至少需要2法郎才能生活下去。贫穷的法国居民则认为阿拉伯仆人每天的合理工资是8到10法郎（工资包括餐费）。[29]

犹太社区更为贫困，至少比阿拉伯社区更不堪入目。除了狭窄的主干道，居民区的小巷子最多只有6英尺宽，大多数房子都没有窗户。显然，这里的拥挤程度让人难以置信，而且人们常在街角墙边便溺，弄得那里臭气熏天。尽管如此，有钱人也在这种肮脏不堪的环境中居住。城里大概有1万名[30]犹太人，大多数金属活计和木工都得靠他们完成。少数几个犹太人还算富裕，但比起欧洲人，阿拉伯人更仇视犹太人。而犹太人穿的衣服比阿拉伯人的还要脏，也不怎么整洁。很难说这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很正统，但显然，他们不会错过任何犹太节日，而且几乎所有三十岁以上的犹太人都会穿着犹太服装（黑色长袍和小圆帽）。尽管相当贫困，犹太社区的乞丐也要比阿拉伯社区的少。

比起卡萨布兰卡，马拉喀什的法国人对阿拉伯人的态度和英国人对待印度人的态度差不多。“原住民”完全是“土著”的意思，这种说法在报纸上随处可见。这里的法国人不像卡萨布兰卡的法国人，他们不会从事开计程车这种低级工作，不过咖啡馆里确实有法国侍者。在犹太社区，极少数潦倒的法国人正在渐渐变成“土著”，但总的来说还是不好区分，因为大部分犹太人也是白皮肤。会说法语的阿拉伯人比会说英语的印度人要多很多，实际上，所有与欧洲人有接触的阿拉伯人都能说些法语。法国人跟阿拉伯人交谈时，常常用第二人称的单复数的表达方式，阿拉伯人也会这样做，但可能并不明白其中所指（阿拉伯语中没有第二人称）。大多数法国人在这里待过一段时间后也都会说些阿拉伯语了，尽管并不会说太多。有时，法国军官与士兵讲话时会用法语。

1938年9月27日

昨天稍凉。下午打了雷，晚上连续下了一小时的雨。前几天一直没戴墨镜。

1938年9月28日

晚上明显更凉了。昨天一整晚都盖着毯子。红芙蓉开花了。

1938年10月1日

今天看见了阿特拉斯山上的雪，显然是昨晚刚下的。

骆驼的体型和毛色各不相同，有些骆驼的毛色几乎是全黑的。驴子也是，有的毛色是红棕色，有的毛色几乎是全黑，而黑色是最常见的毛色。昨天看到一只驴，显然已经成年，但还没长到3英尺高，骑驴的人有只脚还拖在地上。

阿特拉斯山据说有3200米高（约1万英尺）。（实际上应该是13500英尺高）

1938年10月2日

这里的夜鹰和英国的很像。今天看见了一只怀孕的母驴，腹中的小驴好像已经很大了，但仍驮着很多木头和它的主人。加上肚子里的小驴，母驴的负重至少有200磅。

阿尔及利亚骑兵骑的是种马，用的是阿拉伯马鞍，但没给马戴眼罩。这里有各种不同的颜色的马。这里的公驴基本从不阉割。

1938年10月4日

中午还是很热。集市上有卖骆驼油的（大概是从驼峰上取下来的），白花花的，像猪油，据说，只有“山民们”才会吃这种东西。

木勺是用小扁斧劈出来的，需要很高超的技巧才能将木勺完全掏空，之后再用凿子一样的工具（刀刃在边上）继续清理，最后用砂纸打磨。有些勺子有二三英尺长，勺头有早餐杯那么大。这些活儿多数都是孩子们做的，做木犁（很原始，产量很大，说明每年都得换新的）的活儿也是。

1938年10月6日

昨天酷热难耐，高温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6点左右，那时我才想盖毯子。苍蝇和蚊子仍然很猖狂。

一整天都热得让人受不了，这样的高温在这个季节显然很反常。

差不多6个月大的骆驼崽已经长到5英尺高了，不过它们相当大时还会继续吃奶。骆驼似乎挺温顺，就算换了主人，表现也相当正常，只有那些年幼的才会像受到惊吓一样，这和我之前听说的完全不一样。它们不仅在体型和毛色（从白色到几乎全黑，黑色的通常体型较小）上有区别，毛质也不一样，有的是卷毛，有的很顺滑，有几头的毛发像胡子一样，盖住了整条脖子。它们体味不大。



有些马长相英俊，它们都没阉割。阿拉伯人的马鞍像墨西哥人的，

但马镫很短，用薄薄的长铁片制成，四角很尖，也可以用作马刺。

阿拉伯人骑在马鞍上的姿态并不优雅，但他们擅长控制马匹——前进、变换步伐、停止等动作非常娴熟，缰绳很放松，显然他们控制马匹主要靠的是声音。人们总骑在骡子的臀部。很明显，这里的动物之所以驯顺，是因为从幼崽时就开始被驯养。

1938年10月9日[31]

偶尔能买到卡萨布兰卡的日报《摩洛哥晨报》，该报有插图，比其他报纸更左倾。纸张和印刷效果都比较差，而且显然报纸的发行量不大，内容没什么吸引力，实际上很难买到。

危机过后，所有人都如释重负，显然不像迫在眉睫时那般无动于衷了。我们认识一位很有教养且担任公职的法国女性，她给达拉第写了一封祝贺信。显然，媒体的措辞表明，即便是在有无产阶级白人存在的大城市里，人们也不愿意为了保护捷克斯洛伐克而参战。

我之前以为只有犹太人才会做黄铜工匠，但实际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会从事这种工作。而大部分制作木犁、木勺、黄铜和铜制器皿的工作以及某些铁匠的工作都是小孩子做的。6岁以下的孩子们完成相对简单的部分。8到10岁的孩子们就能使用扁斧和凿子工作了，他们很勤劳，手艺也娴熟。尚且站不稳的孩子们得驱赶水果摊上的苍蝇。尽管阿拉伯木器非常粗糙，而且加工工具非常原始，但还算不错，只不过他们用的木头没有彻底风干，所以极易变形。木犁的手柄就是用没有彻底风干的树干做的。也许是资金或仓储空间不够，农民们每年都得买一把新犁。

女仆的收入比男仆少。V夫人有时给佣人兼厨师的艾莎6.5法郎的日薪，不过大多数时候每天只有5法郎，有时甚至只给3.5法郎或3法郎。雇主们付出这些工资，便不会再提供食宿。艾莎的厨艺非常好，要是在英国，每年能挣50英镑，而且雇主还会提供食宿。

大多数用于骑乘或运载货物的牲口都非常便宜。巴布·艾尔·凯米斯牲畜市场上的价格如下（如果还价的话还能更便宜）：成熟但体型较小

的骆驼300法郎；15到16掌宽且状况良好的骑乘马275法郎；驴子75到150法郎；奶牛650法郎；骡子250到1000法郎；山羊（非常瘦弱）30到50法郎。[32]骡子价高是因为有钱人用它当坐骑，骑骡子已经成了富裕的象征。

盲人很多，在某些最贫穷的地方，走50码路可能得碰见三四个。有些人是装成盲人行骗乞讨，但无疑，叮在孩子们眼睛上的苍蝇才是罪魁祸首。然而，奇怪的是，一定年龄以下的孩子，大概5岁以下，似乎对苍蝇熟视无睹。

尽管阿拉伯妇女总是佩戴面纱，但一点都不害羞，她们不怕独自外出，也不怕与人争执，更不怕讨价还价，面纱对她们仿佛没有太大影响。比起大多数东方人，阿拉伯人并不太在意身体接触。阿拉伯男人常常会牵手同行，有时阿拉伯男人也会牵着女性的手（这对某些东方民族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有时在公交车上，阿拉伯女人也会和欧洲男人打情骂俏。人们似乎严格遵守了伊斯兰教的禁酒令，我从未听说有谁喝醉过。另一方面，很多人都吸食一种被称为“基弗”[33]的毒品，它显然是有些麻醉效果。这种行为是非法的，但随处可买到“基弗”。当地清真寺不准欧洲人进入。

法国当局招收了一批人组成特殊部队，称之为“安保部队”，配有警棍，负责在罪犯出现时对其进行围捕。我没得到具体可靠的消息，不过，似乎这些人和普通警察一样，有权不经审讯就对小偷施以野蛮的鞭刑。

我见过很多海外军团的士兵。他们看起来并不像危险的恶棍，而且通常体格不太健壮。他们穿的制服甚至比征召来的士兵穿的还差。

官方发布公告，招募公立学校女教师，招募对象明显是军官的女儿或类似阶层人家的女儿，工资为每个月900法郎（每周25先令左右）。

法国电影《荣誉军团》和《孟加拉骑兵》差不多，是一部政治宣传片，描写了法国撒哈拉地区抗敌英雄的故事。影片中提到的社会差异引人思考。法国军官和图阿雷格部落的人的交流主要依靠翻译。在给两个人安排特殊任务时，军官会叫士兵们的编号而不是名字。军官（几乎都是由贵族担任）抽雪茄时会带着纸圈，坐船回家时的业余时间里也会穿着制服。

读完危机时期的英国报纸后，我觉得法国媒体有组织地弱化了整件事情，原因显而易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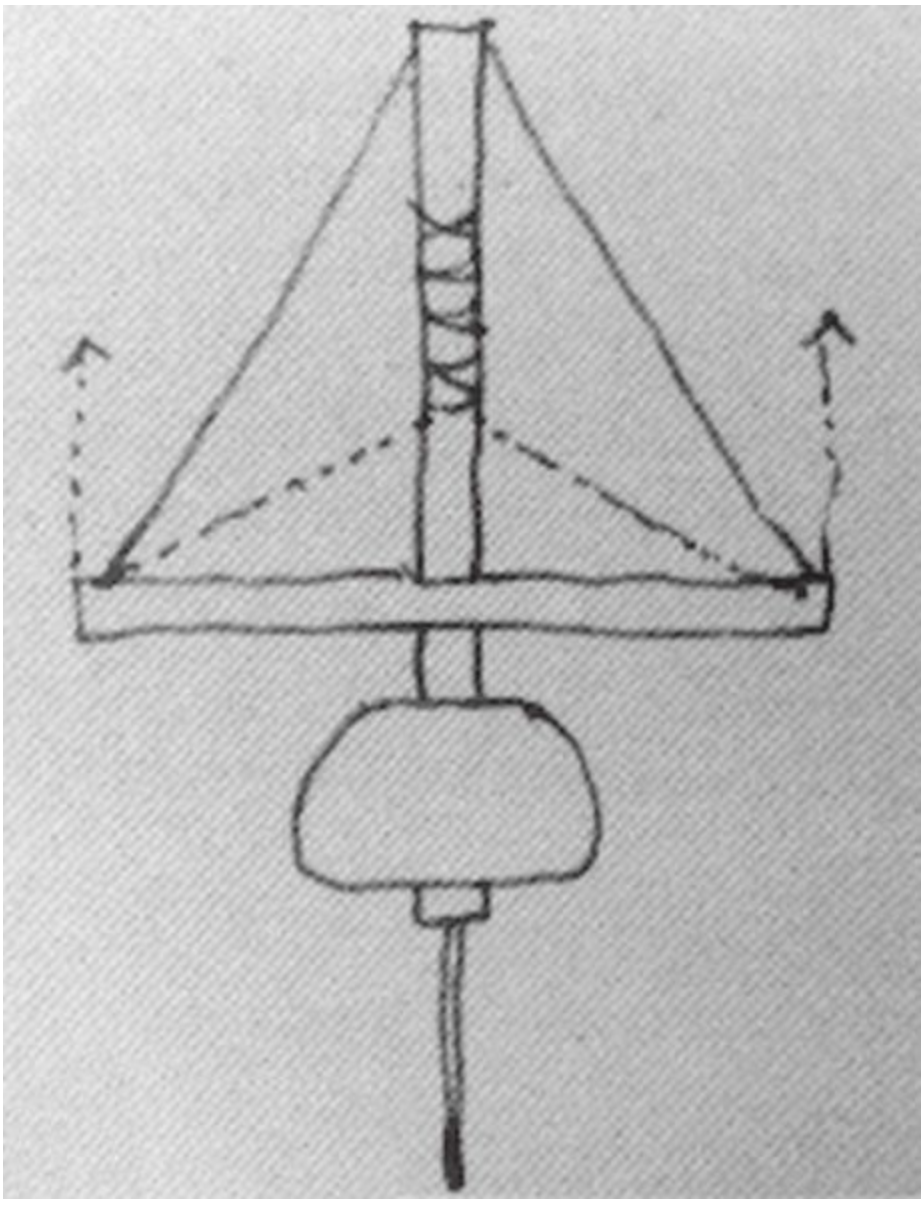
集市上，25生丁可以买到一小包茶叶（中国绿茶，阿拉伯人喝得很多）和约1盎司的糖，茶叶约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盎司。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这点钱肯定买不到这么多。1苏可以买到一杯水，或许是因为“苏”没有什么购买力。

在印度城市里，欧洲人经常可以感受到当地人的敌意，而这里却几乎没有这个问题。

1938年10月9日

前天仍热得不堪忍受，昨天凉快一些，但晚上很闷。今天中午很热，下午刮了一阵强沙尘暴，雷声阵阵，之后下了差不多1小时的暴雨，集市泥泞不堪。雨后，空气清新了很多。

不知道阿拉伯人使用的简易钻是只能钻木头，还是也可用于钻石头或陶器，其构造如下：钻头与立柱相连，立柱穿过一块重5到10磅的圆形石头。石头上有根横杆嵌在立柱上，但横杆可以移动。用绳子将横杆两端与立柱顶端相连，绳子缠绕立柱，横杆上下运动，带动立柱和钻头旋转，石头只是压重物。



阿拉伯麻药“基弗”据说有麻醉效果，用长竹筒吸食，竹筒上有一个烟斗大小的陶斗。“基弗”像割碎的草，味道很难闻，而且我觉得没什么效果。贩卖“基弗”是非法的，可尽管如此，人们仍随处可买到它，1法郎大约能买1汤匙。

在当地，人们很少闻到大蒜的味道，显然阿拉伯人不大使用大蒜。现在出售的成熟橄榄大多数是紫色的，或许黑橄榄就是用它们做的。冬枣已经熟透了，很干，品相不佳。

1938年10月10日

今天中午的温度（室内）是26摄氏度（78华氏度），比前几天要凉快许多。晚上很凉，得穿外套。

1938年10月12日

凉快多了。看不到阿特拉斯山上的雪，可能是被云遮住了。

我安顿好了母鸡和山羊。母鸡的大小和印度鸡差不多，但毛色各不相同，有的长着鸡冠，白色的那些很漂亮。有的应该能生小鸡，但现在还没生。我一共买了12只鸡，放在两只小篮子里，然后用驴子驮了5英里，最后发现死了一只，显然是被其他的鸡啄死的。它们似乎不怎么喜欢吃玉米，可能是不习惯，也可能是因为没把玉米弄碎，所以它们咽不下。阿拉伯人总把小鸡养在完全没有草的鸡圈中。我试着喂它们吃了点蔬菜，但它们没啄几下。希望它们以后能喜欢。

山羊个头很小。我找遍了整个市场，也没找到体型合适或者乳房较大的山羊，不过有人确实在山坡上看到过品相还可以的山羊在吃草。当地山羊的毛乱糟糟的，很容易弄脏。我们买了两只：一只是红色的小山羊，很快就要产崽了；另外一只要大一些，能产羊奶，但我怀疑它每天能不能产出半品脱，也可能喂养十天就能产一品脱奶了。阿拉伯人对于我用谷物喂养山羊的想法感到很吃惊，说我们只应该喂它们吃草，吃了谷物的话，山羊就会喝大量的水，会胀肚子。市场上出售细切的草（我觉得是苜蓿），10生丁一捆。如果只喂草料，1法郎的量就应该够两只山羊吃一天的。我给它们准备了第一顿大麦和麸皮混合而成的饲料。刚开始，可能是因为之前从未见过，它们并没注意到那些饲料，之后闻了闻就开始吃了。这两只山羊不会拒绝地上能吃的东西。它们很羞赧，但体型较小，易于控制，而且不会用角。它们相安无事，不会为了食物争斗。驴子身体两侧各挂了一个驮筐，两只山羊分别被放在两个驮筐中，驴子的主人骑在驴身上，就这样把它们送到了家。

这里唯一的鸡饲料是麸皮。杂货店主没听说过做布丁用的板油，显然其他人也没听说过。

M.西蒙先生[34]的橙子逐渐成熟。枣还没有成熟，但非常干瘪，品相不佳。胡桃长势不好。石榴肉色泽不错。很多枣尚在嫩黄时就被摘下，听说那是烹饪用枣。

这里的牲口生长状况普遍不好，但奇怪的是，绵羊却长得不错。它们属于长尾羊，体型很大，很肥（肉质不错，很嫩），羊毛又厚又硬。它们很温顺，喜欢聚在一起，很好管理。买羊人会把绵羊扛在肩上，绵羊就如大鼻涕虫一样趴在人身上，非常驯顺。这样扛着羊的买羊人通常要骑车。

1938年10月13日

今天还算凉爽，上午10点之前阴凉处甚至有点冷。晚上又有猛烈的沙尘暴，之后下起雨来。

1938年10月14日

天气很闷，但不太热。我第一次给小山羊（它可能没怀孕）挤了奶。尽管它乳房很大，看上去明显有奶，但挤了很长时间都没挤出一滴。最后我发现，如果不用平常那种顺着奶头挤的方法，而是抓住整只乳房，像挤海绵那样的话，很容易就能挤出奶了。两只羊的乳房形状明显不同。产奶量很低，两只羊加起来才产约半品脱羊奶。但它们很能吃，过一阵应该就好了。

成熟的胡椒从树上落下来了。鸡没有下蛋。

1938年10月16日[35]

昨天热得难以忍受。晚上暴雨，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地面积水达几英寸。

上午经历了一场噩梦，一只母鸡死了，另一只似乎奄奄一息，我不记得这种病的名字了，好像和喉咙有关系。它站不起来，头耷拉着。死的那只显然整晚都在栖木上，后来掉了下来。这可能跟它下雨还留在栖木上有关系，尽管我在棚子底下给它们搭了根栖木，但它们仍会那样做。

两只山羊更顺从了。那个阿拉伯人的妻子在橙子园里干活，还得照看绵羊，她说那只棕色的山羊确实是怀孕了。

1938年10月18日

算上开始那只可能是被啄死的，现在一共死了3只鸡了。症状都一样：站不住、耷拉头。肯定是麻痹症，不过阿拉伯人认为是禽类之间传播的黑寄生虫的缘故。目前还不知道其真正的原因和影响。阿拉伯人的治疗方法是用炭灰、盐和水的混合物擦拭小鸡。这个方法有点效果，至少那两只轻微感染的小鸡今天略有好转，能跑动了。剩下的八只似乎状况也不错，但就算体型不大，胃口也确实太小了。除非煮过，否则它们不肯吃玉米，对麦麸也没什么兴趣。

山羊更顺从了。我每天只给那只小的挤一次奶，两只山羊每天一共能挤出约半品脱羊奶，比前几天多一些。小的那只昨天有些拉肚子，可能是湿草料吃得太多了，所以我得把苜蓿晒成干草。就在这时，M.西蒙的一只绵羊莫名其妙地死了，说是吃了太多雨后新草的缘故。山羊几乎什么都吃，比如橘子皮之类的，也可以用煮过的玉米与其他饲料掺在一起喂它们。在当地买不到碎玉米片。山羊已经知道跟着主人了，也知道回羊圈的路。

上午看到一只蜥蜴顺着玻璃窗往上爬，这是我在摩洛哥看到的第一只蜥蜴。它大概有4英寸长，四肢粗短，像短吻鳄，尾巴上都是刺。

天更凉了，今天一丝风都没有。

大蚂蚁可以拖动带着细枝的两粒胡椒子。各种体型的蚂蚁都可以拖动一颗麦粒。

昨晚，母鸡第一次在新的栖木上休息。

1938年10月20日

两天后，两只斑鸠终于鼓足勇气飞离了巢穴，很快就消失不见了。阿拉伯人说它们不会回来了，可它们每天都回来找玉米吃，然后在房子后面的漆椒树上睡觉。

M.西蒙的羊可以到橙子园中吃草，显然，人们认为羊只吃杂草，不吃树叶（可能比较苦）。实际上，它们偶尔也会啃啃树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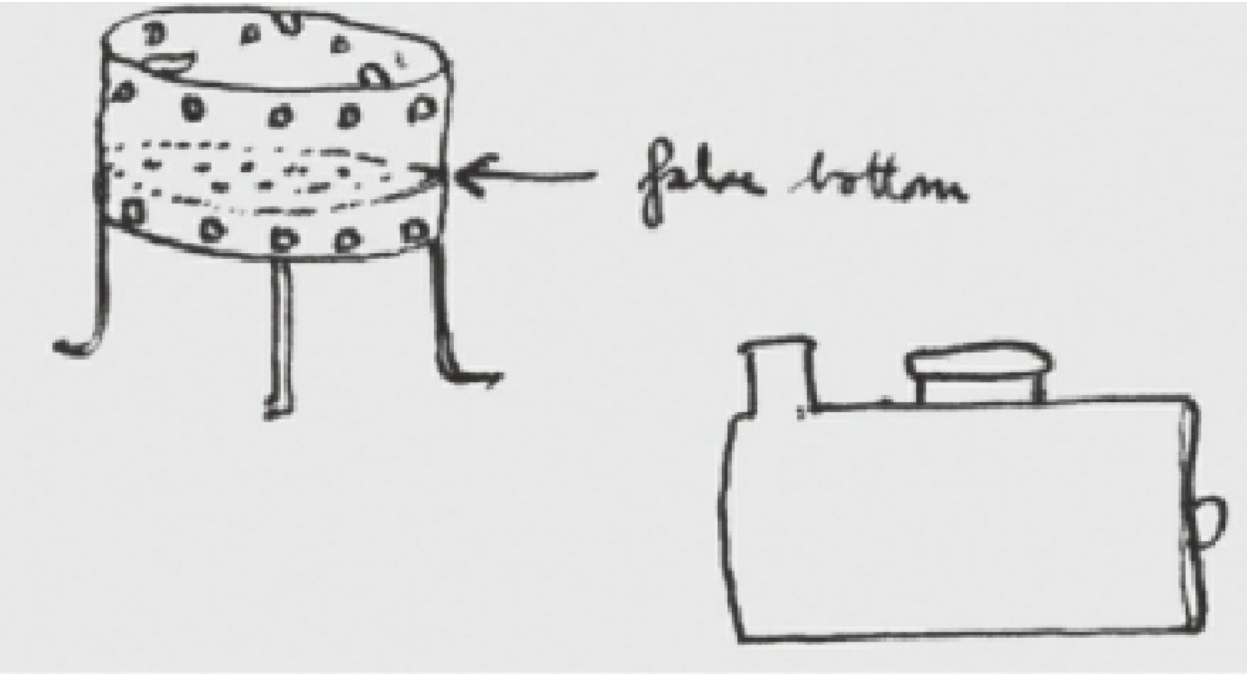
天更凉了，秋天的清晨让人心旷神怡。

山羊的产奶量增加了不少。尽管我每天只给那只棕色的挤一次奶，但也能挤出半品脱多的羊奶了。

母鸡的状况还不错，但还没有下蛋。虽然这些母鸡体型不大，但吃得实在太少了。

除了非常辣的大青椒，附近的阿拉伯人种的基本上都是英国蔬菜（胡萝卜、小萝卜卷心菜、西红柿、红花菜豆、洋蓟和西葫芦等）。大部分蔬菜的品质都很差。冬枣很干，品相不佳。绵羊会吃掉半熟的枣。

当地广泛使用的木炭火盆很适合做饭。一般直径为1英尺，深8英寸，有的盆壁上有许多小孔，有的是双层底，上面一层有孔。借用一点纸和木头就能点着火盆，木炭可以烧好几个小时。拉几下风箱，火盆就可以迅速加热。火盆上放着小锡炉，很适合烤制食物。



1938年10月21日

昨天走了2公里多路，看到了这一带的主要河流——塔西夫特枯水河。这条河约5码宽，1到3英尺深，但河道很多，在某些季节，水位可能会上涨。水质很差，但据说有小鱼。河岸和河底淤泥很多，河中有淡水蚌，和泰晤士河里的很像，在淤泥里来回移动，身后拖着一条很深的泥印。红脚鹬和剑鸻，或者是与之极为相似的鸟，会在泥滩觅食。有种轻软的灌木随处可见，我觉得是藤地莓，英国人会用这种东西做篱笆。草地一片一片的，和英国的很像。

仍然很热。昨晚深夜还是热得受不了。

水根本不能喝，不只有股泥腥味，而且很咸。

据说嫁接用的酸橙很适合做果酱，可能和塞维利亚橘同属一个品种。这里有些山羊的羊毛呈银灰色。上等西班牙山羊据说值500法郎。

1938年10月23日

这里的水明显含有某种矿物质，我们自到这里的那天开始就一直腹痛。在塔西夫特枯水河附近，我们注意到了退潮时留下的白色沉淀物。可能是泻盐类物质——至少肯定不是有机物，因为煮沸的水对其也毫无作用。我们准备从马拉喀什接引自来水（水还不错，听说来自阿特拉斯山）。各种瓶装水贵得离谱，甚至比最便宜的红酒还贵。

土壤层很深，至少地表以下4英尺内土质没有任何变化。这里的土质很松软，略红，晒干后可以当成砖头，据说需要大量施肥。

有些小橘子（柑橘）已经泛黄。有的柠檬快熟了，有的才刚刚开花，或许品种不一样。[36]

今天一整天都很凉爽，这还是第一次。阴天有风，下了一点雨，像英国9月时潮湿的天气。前天微雨，雷声很大。

不时有鸽子飞到房子这边，它们非常温顺，稍稍诱导就会到人的手里啄食。昨天在院子里看见了一只小鹧鸪。

我播种了金莲花、夹竹桃和三色堇。

灭蝇剂很管用，用它杀死了上千只苍蝇，否则真是让人难以忍受。

农田里晒着许多红辣椒，看起来像一张巨大的红毯。

1938年10月25日

天更凉了。昨天阴天，整天都很凉爽，偶有一阵急雨，晚上风大雨急。昨晚和今天早上都生了火，并非必须如此，但可以生火了。

棕色山羊不光不好挤奶，产奶量也很少，有时一点也没有。也许它真的要产崽了，如果这样的话，几周之内就会生小羊了。

早上，鸽子主动钻进了鸽子笼里，也就是我们第一天安顿它们的地方，现在它们非常温顺。

山羊很喜欢吃煮过的小麦和玉米。

1938年10月27日

周二（10月25号）下午有暴雨，像热带的雨，只是雨水是凉的。积水没过脚踝，现在地还没干。塔西夫特枯水河水流湍急，周围的低地成了一片沼泽。在塔西夫特枯水河附近，我见到了一个大水塘，一群野鸭正在游动。我费了一番功夫，才把它们吓得飞了起来。野鸭们盘旋了一阵，从头顶飞过，一共16只，明显是绿头鸭，和英国的一样，或者说非常相似。之后，我看到远处还有一群绿头鸭，这应该是我在当地见到的第一种猎禽。

园子里有很多常见的麻雀，但马拉喀什那边几乎没有。

约1英寸长的黑色甲虫四处爬动，数量很多，肯定是雨水带来的。我种了向日葵、香豌豆和金盏花。天气一直很凉（我们每天晚上都会生火），因此其他种子还没有发芽。当地的土地坑坑洼洼的，不适于耕种，但目前野草还不多，或许这场雨之后会多起来。有些野草和英国的类似，比如田旋花和茅草，但长势不好。这里有雪白杨或者与其类似的树。大片的地里还种着西红柿，不用搭架，枝叶长得很稀疏，西红柿个头很小，但果实不少。

昨天给棕色山羊挤奶的时候，发现挤出来的奶是酸的，而且很稠。这是因为每天只给它挤一次奶，而且它很焦虑，连续两天都没挤完奶。我把变质的奶直接挤到地上。到晚上，羊奶就正常了。晚上，有只母鸡的腿出了毛病，检查之后，我发现它身上长了很多的黑虱子，希望治疗能和以前一样有效。花山羊的产奶量比以前多了，但并没有多太多，每天仍是半品脱多一点。它吃的不少，但还是很瘦。目前山羊的固体食物包括：早晚各2把大麦加2把麸皮，另外每周一次玉米和麸皮熬制的饲料糊。

鸽子很喜欢吃玉米碴。

在鸽舍中看到了几只鸽子和几枚鸽子蛋。

雨后，房前的喷泉里蓄满了水，孑孓迅速繁殖。

昨天有1枚蛋（第1枚），今天没有。

1938年10月28日

1枚蛋。路上有许多被压扁的黑甲虫，黑甲虫的内脏是鲜红色的。雨后，人们赶着牛耕地。犁很破旧，没有轮子，所以人们只能浅耕。

1938年10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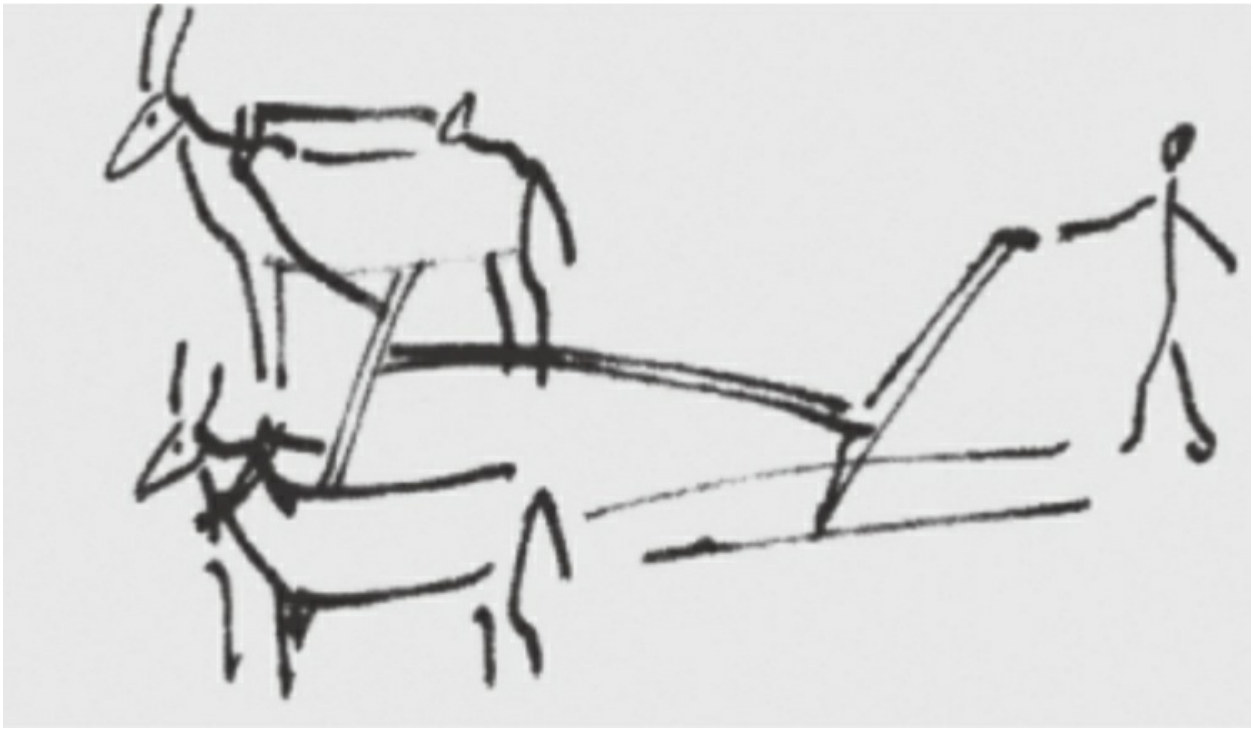
天气晴朗，不算很热。1枚蛋。

1938年10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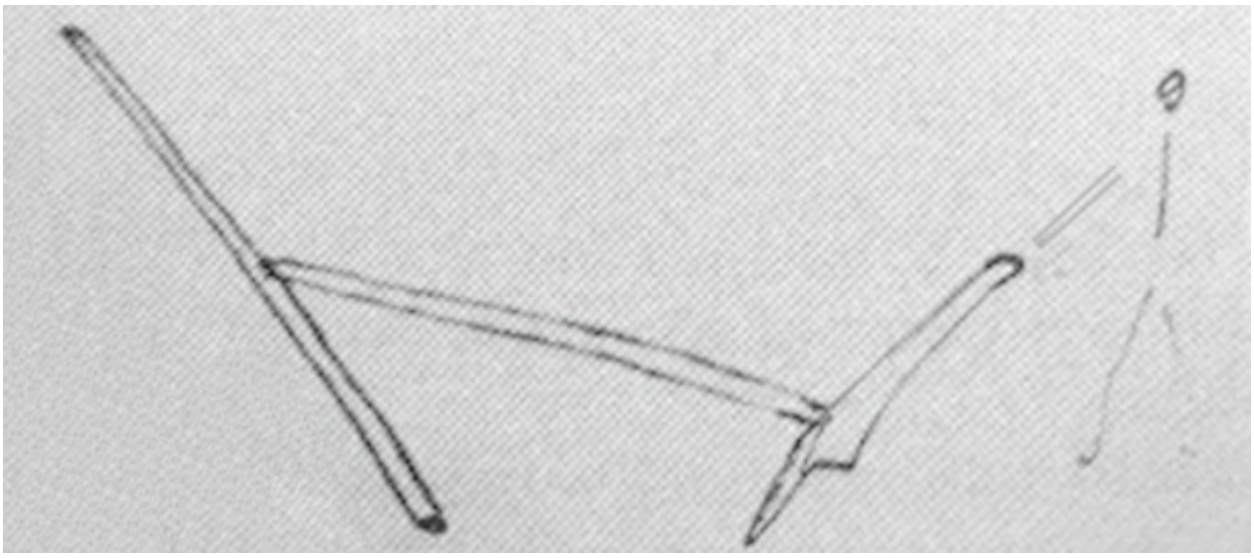
天气和昨天一样。1枚蛋。肚子又不舒服了。

当地出售的一种水果很像草莓，但里面全是种子，很难吃。

昨天往喷泉水里放了石蜡，喷泉约有30平方英尺，所以一杯石蜡就够了。早上，所有孑孓都死了。



这里使用的犁有根横木，从两头耕地牲口的肚皮下穿过，横木上拴着轭（牛用木制的轭，马用麻布的轭）。牛、骡子、马，甚至是驴子都可以用来耕地，有时候农民会将两种不同的牲口套在一起耕地。



农民走在已经犁好的耕地那边，一只手握着犁柄，犁完一垄后换手。犁头只是固定在木棒上的空心铁尖。农民可以将整副犁轻松地扛在肩上。由于没有轮子，这种犁很难控制。

[1] 英尺，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为0.305米。

[2] 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等于1英尺的1/2，合2.5厘米。

[3] 奥威尔的狗。

[4] 古人认为毒蛇通过分叉的舌头释放毒液，而不是通过牙齿，但其实毒液来自毒牙。于是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第三幕中写道：“请你让一条蜷伏的毒蛇来守卫它，那毒蛇的双舌或可用致命的一触，将你们君主的敌人杀死。”

[5] 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3英尺，合0.91米。

[6] 在梅德斯通附近。（作者原注）

[7] 一种原产于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山区的野生绵羊，现泛指所有长着大角的野生大绵羊。

[8] 品脱，容量单位，主要在英国、美国及爱尔兰使用。

[9] 英担，英国的法定重量单位，一英担相当于50.80千克。

[10] 英镑，英国国家货币和货币单位名称。1英镑=240便士（旧制），约为人民币10元。

[11] 先令，英国的旧辅币单位。旧制1先令=12便士，新制1先令=5便士。

[12] 离阿里斯福德北部不远的一处长条形古墓室。（奥威尔研究者彼得·戴维森注。他的注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3] 上一条日记标注的日期是8月22日，本条应该是8月23日。在前往北非之前，奥威尔去了索斯沃尔德探望父母。8月25日的日记条目中显示他回到普雷斯顿庄园，因此在索斯沃尔德的两天应该是8月23日和24日。（彼得·戴维森注）

[14] 此篇日记写于普雷斯顿庄园。

[15] 科林斯于1921年开始在索斯沃尔德镇任布莱尔家的家庭医生，他的儿子丹尼斯和奥威尔是朋友。（彼得·戴维森注）

[16] 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等于5280英尺，合1.6公里。

[17] 6英镑10先令，不是6到10英镑。（彼得·戴维森注）

[18] 注意：1934年起，日本重创了英国对摩洛哥贸易。英国当时是摩洛哥的第二大进口国，而现在日本则是第二大进口国，英国排名第六（《今日摩洛哥》，作者D.H.沃雷）。（作者原注）

[19] 据说，1939年1月23日《时代报》的头条文章（我还没有看过）严肃地指出，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法国或可接管西属摩洛哥。（作者原注）

[20] 这篇日记是在马拉喀什写下的。

[21] 很多长得像欧洲人的侍者用阿拉伯语交谈，或许是欧亚混血人。（作者原注）

[22] 掌宽，长度计量单位。古今中外均有使用，西方使用较多，主要用于测量马的体高。1掌宽=4英寸=0.1016米。

[23] 这篇日记是在马拉喀什写下的。

[24] 这篇日记是在马拉喀什写下的。

[25] 显然除了有色人种的士兵，还有一些白人士兵。（作者原注）

[26] 锚是武器。（作者原注）

[27] 苏，旧时法国的一种硬币，币值很小。

[28] 法新，英国1961年以前使用的旧铜币，等于四分之一便士。

[29] 女仆每天的工资是3到5法郎。（作者原注）

[30] 13000人。（作者原注）

[31] 这篇日记是在马拉喀什写下的。

[32] 每笔买卖，买家要付10%的税。（作者原注）

[33] 基弗（kiff，也拼作kef、keef或kif），印度语，大麻（或印度草），来自阿拉伯语“kaif”，意为“享受”“安乐”和“迷幻状态”。（彼得·戴维森注）

[34] M.西蒙，屠夫，奥威尔的房东，奥威尔租的别墅坐落在橙树林里，租期从1938年10月15日开始。（彼得·戴维森注）

[35] 这篇日记是在西蒙别墅写下的。

[36] 显然，奥威尔不知道，柠檬开花、结果的过程是同时发生的，后来他知道了。（彼得·戴维森注）

1938年11—12月

1938年11月1日

天气晴朗，不算热。人们都在耕地。耕犁只能翻动4到6英寸深的土壤。土质相差很大，有些土壤非常肥沃。有几大片土地可能是一年前耕种过的，现在已经沙化，甚至有岩石裸露在地表。雨后，某种杂草（是双子叶植物），长势迅猛，这样的话，很快就有牧草了。树上落下来的橄榄呈黑色。石榴快过季了。石榴树很小，也不起眼，像山楂树一样。有些小麦（也可能是其他谷物）正在发芽，它们的播种的时间显然和英国冬麦的差不多。

我遇见了一群羊，有只母羊刚刚产崽。牧羊人抱着小羊走，母羊就在后面跟着，一瘸一拐，胎盘还拖在身后。有的山羊在吃仙人掌，有的则四蹄跪地，摆出猫一样的姿势，只为了吃几口荆棘灌木上的绿叶子。

金莲花和金盏花发芽了，别的种子还没有。

肚子还是很不舒服。

另一种橙子的时令到了，但还没有完全成熟。这种橙子很酸，皮很厚，但味道不错。

1938年11月1日[1]

我还没弄明白这里的耕地制度。除了几座小山，在所有其他的土地中，有的已经用于耕种，有的适于耕种，只是还未被开垦。我们就在大型棕榈树种植园附近。种植园依马拉喀什北部建造，占地几千亩。棕榈树林中的土地也和田地一样被开垦过了。土地之间几乎没有界限，因此我不知道农民是拥有土地所有权还是只是租赁土地而已。我也不知道是人人各有一片土地，还是土地都归集体所有。休耕的土地上长着大片野

草，当地人可以在那放牧，成群的山羊和绵羊都在吃草，因此我觉得至少集体拥有部分土地。还有一种可能，即土地分归个人所有，但放牧权为共有。棕榈树的种植非常随意，所以很难相信这里的土地是归私人所有的。

菜园和果园紧挨着我们的房子，应该是农民们开垦了大片土地，而且打理得井井有条。商品菜园很大，用墙围着，而且经营得当，都是欧洲人或者富裕的阿拉伯人的个人财产，我觉得大多数应该属于后者。将其土地与普通农民的土地对比可以发现，铺设灌溉设备能给土地带来巨大变化。

大雨刚过，农民们都在耕地。从土地面积判断，种的应该是某种谷物。放眼望去，总有小麦或其他谷物发芽，跟英国种植冬麦的时间差不多。当地的犁很简陋，除了犁头都是木制的，就像在木棍上套了个铁头一样，整个工具可以轻易地扛在肩头。耕犁只能翻动4到6英寸的土地，大概更深层的土地还从未被开垦过。无论如何，土壤还算肥沃，有些地方的土壤层很深，有4英寸（我是指表土），比如我家附近的橘园就是如此。耕犁上没有轮子，给犁地的人畜增加了耕地难度，几乎无法犁出笔直的田沟。大多数农民用牛犁地，不过也可以用除了骆驼之外的其他动物。有时，农民们会让牛和驴子一同犁地。两头牛共轭犁地的话，一天能犁完半亩左右的地。

这里的主要作物包括棕榈、橄榄、石榴、玉米、辣椒、苜蓿、大部分欧洲蔬菜（豆子、卷心菜、西红柿、西葫芦、南瓜、豌豆和小萝卜等）、茄子、橘子和一些谷物——我分不清。橘子和柠檬差不多都是欧洲人种的。石榴和枣都快过季了。苜蓿长得很快，大概1英尺高就可以收割了，所以我觉得那应该是全年生长的作物。苜蓿是这里主要的饲料来源，3英寸厚的一捆大概卖10生丁。玉米也可作饲料，可能也是全年生长的作物，大部分蔬菜应该也是。大部分植物的长势不算太好，可能是土壤贫瘠和缺乏购买设备的资金共同造成的，比如，西红柿就没有搭架，所以长得很差。牲畜中只有绵羊能适应这里贫瘠的牧场，它们不仅能提供优质羊肉，其羊毛的品质也不错。

大多数动物的情况都不好，产奶的动物几乎都没有乳房。上等西班牙山羊的价格和一头奶牛差不多，足见后者的产奶能力如何。小母鸡们也很像印度母鸡。所有动物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但相当驯顺。当地人使用的农具也非常原始，没有铁锹也没有欧洲人用的耙子，只有印度式的锄头。由于缺水，耕种更为艰难，因为必须用土堤隔开土地，以此

节约用水。不只小孩子要做农活，年纪很大的妇女也要，用丁字斧清理植物根须的老妇人至少有六十岁，可能都七十岁了。

典型的阿拉伯村落是用高高的泥墙围起来的围场，就像一栋巨大无比的房子。村落中都是棚屋，非常简陋，大多是用稻草和棕榈叶搭的，形状如蜂巢一般，约8英尺宽，7英尺高。似乎所有人都怕强盗，晚上便闭门不出。除了住在为了看护成熟的庄稼而搭建的草棚里的人，没人在村落外面过夜。

我仍不明白谷物价格如此高的根本原因，市场上，10升小麦，也就是40磅左右，竟卖到30法郎，按英国货币计算，1磅小麦的价格也要超过1便士。因此，面包也很贵。（上个月，官方规定小麦的价格为1公担158法郎。）

伊斯兰教的斋月开始了。当地阿拉伯人似乎严格遵守戒律，但我觉得他们偶尔会吃些禁忌的食物。比如，我觉得他们有时会吃掉自然死亡的动物。我们的仆人和M.西蒙的看门人都认为，吃掉被同类啄死的家禽无伤大雅。但他们却严守禁酒令。

去附近靶场的士兵们会路过这里。他们军容整洁，士气高昂，比我想象中的好，也超过了那些法国义务兵。哈罗德·马拉尔曾在法国轻兵部队服役，他说法国义务兵大多都是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其他军团的人都瞧不起他们。我觉得，在摩洛哥的正统犹太人都不用服兵役。对犹太人的敌意随处可见，不仅是阿拉伯人，很多欧洲人也是如此。犹太人卖东西时缺斤短两、欺骗他人，还会抢走别人的活计（见1938年10月18日的《小摩洛哥报》）。

1938年11月3日

昨天有1枚蛋。晚霞很美，天色泛青。

金莲花和金盏花正在盛开。

昨天晚上肚子很不舒服。

天气很暖和。在一棵雪白杨树上发现了1只猫脸毛虫，约1英寸长。

我发现了死乌龟的壳。乌龟活着的时候，身上有地方被什么东西挤了一下，留下了一块凹痕。我觉得M.西蒙刚买来的驴吃不饱，因为它发现山羊有大麦吃时，竟然过来抢。

之前看到野鸭的那个池塘，已经见底了。

今天1枚蛋。

用来喂山羊的大麦快吃完了。三周吃了约20到25磅，也就是说每只山羊每天大约吃半磅大麦。

1938年11月4日

1枚蛋。

1938年11月5日

1枚蛋。

1938年11月6日

2枚蛋。

最近几天晚上的雨很大，白天晴朗温暖。下午，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下了几滴雨，之后就雷电交加，下起了大雨。

雨后，河水上涨，水龟到处都是。今天看到了十到二十只，而且都是三五成群的。一般，它们会趴在泥上，有人来了，就跳到水里。再过一会儿，它们就又会浮到水面，露出鼻子和眼睛，像西班牙的青蛙一样，一有动静就立刻回到水里。它们的行动似乎非常迅速。

山羊几乎没有奶水，可能是因为好几天没有吃大麦，不过在等大麦的时候，我还喂它们吃了其他东西，比如煮过的玉米。

金莲花现在已经完全盛开了。香豌豆已经出苗，夹竹桃和三色紫罗兰都没有发芽（已经两周了），所以种的肯定是死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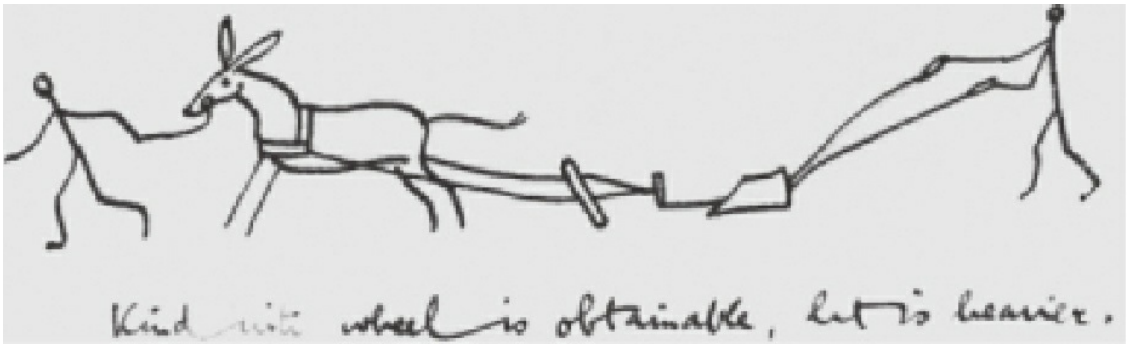
当地的枣还不错，色泽鲜亮，有黏性，外形圆润，大小形状和大个胡桃差不多。

我感觉肠胃好些了。

1938年**11**月**7**日

没有雨，有点凉，月亮很明亮。

今天，农民们用驴子在橘园里耕地。他们的耕犁又小又轻，没有轮子，但犁头是欧式的，很锋利，产自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得花一两英镑。犁地并不轻松，但对一头强壮的驴子来说这不是大问题，它一趟就可以耕出挺大一块地（大约25码长、5码宽，几乎长满了草）。



橙子现在已经熟了，前几天我们尝了一些（柑橘类的）。

新大麦到了，约30磅，花了17.5法郎，1磅将近1便士，比之前便宜。在房子旁边的旧石槽里发现了一个腐烂的动物的头，可能是狗头，但我觉得是豺头，好像这个国家的确有豺。不管是哪种动物的，脑壳还是很完整的，于是我把它挂在棍子上，好让虫子将它清理干净。

1938年11月8日

晴朗暖和。昨晚下了点儿雨。几株香豌豆发芽了。

1枚蛋。

乌龟在泥上留下的足印，很容易错认成野兔的。

1938年11月9日

种了香豌豆（之前种的大约只有6株发了芽）、康乃馨和紫罗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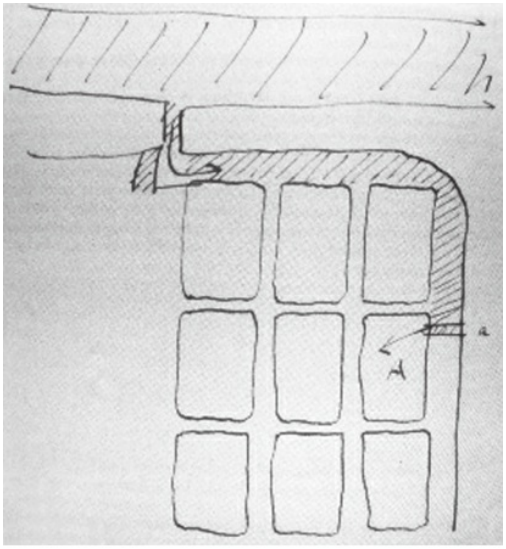
1938年11月10日

种了石竹花、高代花和山字草。

整天都是阴天有雨，但还算暖和。夕阳很美。天空泛青。大群椋鸟飞过。

1938年11月12日

1枚蛋。



当地的灌溉方法：将需要灌溉的农田分成多个长4英尺、宽3英尺的小地块。灌溉渠与流过农田边缘的溪流相连。灌溉地块A时，得先将灌溉渠封堵起来，然后将地块A的土堤移走一块，让水流入地块A。灌溉结束后，将土堤复原，再次打开灌溉渠，灌溉其他地块。

1938年11月13日

1枚蛋。

毛色很杂的那只山羊彻底不产奶了。

总的来说，最近几天，白天都很热。虽然晚上我都生火，但没多大必要。树上的橄榄已经熟了，大群椋鸟总飞来啄食，每群得有5000只。阿拉伯人整天待在橄榄园里，大声叫着驱赶椋鸟。艾琳将椋鸟叽叽喳喳的叫声比作真丝连衣裙的沙沙声。

前几天，我在一个灌溉池里看到好多乌龟，长度从3英寸到1英尺的都有，我捉了一只小乌龟。如果你蹚着水追小乌龟，那么跑不快的它们就逃不掉了。与陆生乌龟相比，水龟的脑袋伸缩并非特别自如，即便水龟被人拿在手里，其脑袋和四肢仍会留在壳外，它们也没有力气缩回尾巴。它们会把头缩进皮肤褶皱形成的洞里。它们仿佛在水下待不了多久就要上来透口气。我在同一个灌溉池里的一块石头下面发现了一些很小的水蛭，约四分之一英寸长，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国家看到水蛭。

我昨天晚上在花坛里发现了一只大蟾蜍，也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大小约是英国蟾蜍的两倍，身上的疙瘩很多，能跳很远。

地里的小葱快熟了。农民们给我们带了点儿嫩韭菜。

在路边看到一条死狗，可能是几天前过来跟我讨食的那条，应该是饿死的。

当地农民似乎不用耙或锄耕地，用犁耕一下地后就会在粗糙的垄上播种。尤为奇怪的是，尽管谷粒是播散的，但感觉就像按排播种一样。很多小麦已经发芽了，蚕豆大约长到了6英寸。

1938年**11**月**14**日

移植了金莲花。

1938年**11**月**16**日

1枚蛋。

1938年**11**月**17**日

1枚蛋。

1938年**11**月**19**日

2枚蛋。

1938年11月21日

2枚蛋。

1938年11月22日[2]

几天前我拜访了英国领事，他（罗伯特·帕尔）40岁左右，很有教养，非常热情，已婚，境况不错。他讲法语，说话非常小心，语法毫无差错，但带着很重的英国口音，似乎是边说边不断检查语法。助理领事，也就是副领事，是个年轻的英国人，他的父亲是传教士，他应该是在摩洛哥长大的，不过他的言谈举止比那些在印度长大的英国人更具英式风范。

帕尔觉得我没正确认识当地法国人对这次危机的态度。他认为，当地的法国人意识到了战争迫在眉睫，尽管早已厌倦战争，但已经做好了准备。无动于衷只是表面现象。他认为短时间内不会举行大选，称英国航空部的丑闻极为恶劣[3]，路人皆知，政府应该会先控制局面，避免在选举中受挫。他遇到一些还算典型的保守党人，那些人对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愈发不安，人数之多令他震惊。他认为，未来短时间内可能的发展态势，是对重振老自由党雄风的尝试。他自己的观点就比较保守，我不太确定他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是否了解有关当前局势的内幕，但我觉得他没有。

小麦价格说明：1公担约为2英担。最近花31.5法郎买了一些，应该是10公升，约40磅。换算后发现价格大体相同，1磅约40生丁，70生丁约折合1便士，所以这里的小麦价格与英国的相当。还没整理出完整的物价清单，但似乎这里的肉、部分水果蔬菜以及大部分手工产品（皮革、陶器、部分金属加工品和高品质毛织物）都比英国便宜一些（法郎被视为等同于其交换价值的情况下），当然，房租也是如此。进口商品的价格都很高，加工制品尤为如此，各种油都非常昂贵。

塞内加尔的黑人好像是法国公民，而摩洛哥的阿拉伯人不是，有部小说仍称这个省为舍利芬帝国。所有黑人都要服兵役，和法国人一样。（而在摩洛哥，只有法国人，也就是主要的欧洲人，才会服义务兵

役。）阿拉伯士兵们都是自愿参军，且从军时间都比较长。长期服役后，他们好像能领到一笔数额不小（按当地的标准）的退休金，比如我们的仆人麦赫贾布·穆罕默德就曾在一支阿拉伯的前线部队服役15年，现在每天的退休金约为5法郎。

忘了说，马拉喀什的入口有个收费站，所有要进城的卡车都得在此卸货，所有入城销售的货物都得交税，就连农民往城里市场运送的蔬菜也是如此。我不知道税率，但城里城外的蔬菜价格差别很大。

1938年11月22日

1枚蛋。

1938年11月23日

天气晴朗温暖，不太热。有时，晚上得生火。天空比较晴朗时，阿特拉斯山顶上的雪似乎近在眼前，仿佛只有几英里远（我觉得实际上得有50到100英里远）。除了金盏花、香豌豆和金莲花，其他种子都情况不佳，大部分都没发芽，肯定是种子存放时间过久的缘故。在这里种植小花很难，因为它们忍受不了酷热和干旱。花园里主要种的是灌木。

花了31.5法郎买了一个单位的小麦（大约40磅，相当于1便士1磅）。

16号开始就感觉不舒服（胸部），昨天能下床了，今天好些了。

1938年11月24日

1枚蛋。

昨天煤气用完了，共用了5周，通常可以给三盏（其中一盏的亮度

似乎要比其他的高，我估计得高出60个标准量）灯供气，偶尔还要再多一盏。

1938年11月25日

2枚蛋。

1938年11月27日

2枚蛋。

1938年11月28日

2枚蛋。

1938年11月29日

2枚蛋。

1938年11月30日

2枚蛋。

1938年12月1日

2枚蛋（自1938年10月26日以来，母鸡一共下了30枚蛋）。

1938年12月2日

天气凉多了，有几天天气晴好，如英国春天一般，有时则有浓雾。前天下了一场大雨。天气晴朗时，阿特拉斯山仿佛触手可及，轮廓清晰可见，而有的时候则完全看不清。

花种的发芽情况很差，只有金莲花、香豌豆、金盏花、康乃馨、石竹花和山字草发了芽。尽管土壤情况良好，夹竹桃、三色堇、紫罗兰、高代花、罂粟和向日葵却都没有发芽，可能与种子保存时间太长有关。

我发现两把弹弓中稍差的那个最远能将石块射出90码（比铅弹差一些），一把好弹弓应该能将铅弹射出150码远。

3枚蛋。

1938年12月3日

2枚蛋。

最高的棕榈树约有25码（到树叶的底端）。

1938年12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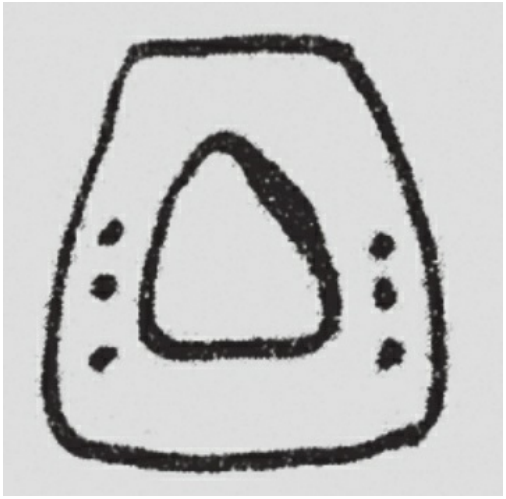
2枚蛋。

1938年12月5日

3枚蛋。

10月30日或之前一两天，我看到有人正在犁地，现在，那块地里的庄稼已有4到6英寸高了。

橙子已经成熟，到处都有卖的。市场上的石榴已经熟透了，颜色很特别，不是常见的红色，而是棕色。



上图是当地的一种驴蹄铁。

1938年12月6日

2枚蛋。

现在夜里很冷。

1938年12月7日

2枚蛋。

昨天下午比平时热很多。

观察河床可以看出溪水退得很厉害，但我不清楚是不是最近才枯水的。昨天，我们沿着一条小溪散步，那里实际上有三个河床，一个是它目前流过的，约6英尺宽、1英尺深；第二个河床大概10英尺宽，明显是溪水在最潮湿的季节上涨到的位置；再向外是另一处宽阔的河床，河道上的白色印记表明眼前这条小溪曾是一条大河。

附近又飞来了很多小鸟，我猜其中一些是候鸟。

石榴叶子变黄了。

1938年12月8日

2枚蛋。

早上有沙尘暴，接着下起了大雨。下午寒冷大雾，像英国一样。

1938年12月9日

2枚蛋。

我注意到朱鹭总是在翻地的人附近觅食，非常温顺，可能是在找虫吃。缅甸的朱鹭就不是这样，可能是因为这里的溪流附近几乎没什么食物。

1938年12月10日

1枚蛋。

1938年12月10日[4]

还没有完全明白当地的土地制度。不知道这里的农民们是自己拥有土地还是在租赁土地。土地似乎被分成了两三亩的小块。显然，这里有公共草场，关于水的分配也有某种共同的约定。根据需要，溪流被引向各处，利用地里的水渠和土堤，水流可以被引向任何需要的地方。尽管如此，农民耕地中的灌溉情况和欧洲庄园主或者富裕阿拉伯人的种植园中的有显著差异。由于水资源匮乏，人们的劳动量就增加了。当地的部分土壤是松软的白垩土，地表以下20英尺深的地方有地下河流经。通常情况下，地下河有几英寸宽[5]，为了得到地下水，当地人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打一口井。有时，农田周围布满了水井，相互之间的间隔只有几码。我不知道为何要打这么多水井，但很多农田里都是这样，我之前在一片农田周围看到了12口井。有证据表明，近年来，当地河流的水位严重下降。有的溪流有三条河床，一条是现在的河床，一条稍宽的是雨季的河床，还有一条非常宽，是过去某个时期的河床。一些新近开垦的田地似乎已经开始荒芜。如果水量不足，小种子很难发芽。

当地农民根本不用耙，但似乎会从不同方向犁地。犁好的地上有一道道犁沟，这样可以尽量让播撒的种子保持直线。这可能也是保持水分的好方法。

冬季谷物（我猜是大麦）现在有4到6英寸高了。树木的长势似乎比小庄稼要好，比如橄榄（黑色，因味苦而闻名）就长得不错。尽管如此，除了棕榈树和橄榄树，当地人并不种植其他树木。劈好的优质柴火[6]每吨大概70到80法郎（约为8先令）。木头和炭是当地仅有的燃料。附近有座新的橄榄树种植园，由法国人经营，像是阿拉伯工人的苦力集中营。但条件还算不错，比印度类似的地方要好很多。除了少数有钱人，村子里的阿拉伯人几乎都住在小草棚或棕榈树叶搭的棚子里，大约有8到10英尺宽，呈蜂窝状。还有一些人其貌不扬，住在小帐篷里，其实就是一根杆子撑起的一块布而已，没有墙，也没有门帘。这些人似乎多少把小帐篷当成了永久居所，因为他们还在周围建造了小围墙。通常，村子周围都围着10英尺高的泥墙，墙头上杂草丛生。男人负责犁地，女人负责田里的其他活计，比如除草这种费力的活，这和缅甸的情况一样。当地的孩子们在还不会说话时就得干活，通常就是放牧。他们精于此道，从不会分散精力，仿佛非常明白自己的职责。有人经过时，很多农民都会出门乞讨，这可能是看到欧洲人的自然反应。一般给他们20生丁就行了。农妇们都不蒙面纱，至少我没见过她们这么做。

仔细看了看《小摩洛哥报》，发现其版面安排如下：报纸共有10页

（有时是12页），分成60个栏目。内页至少三分之一都是广告，封底内页和倒数第二页也全是广告。广告主要包括宝莹洗衣粉和利弗尔公司的其他产品（我注意到利弗尔产品的包装上总会强调自己的产品产自法国），以及雀巢牛奶、各种船运公司、几种护眼液和其他专利药品。虽然摩洛哥新闻有专用版面，但并非头版的主要内容。报纸里没有书评栏目。尽管装订得不错，但与其他普通法国报纸相比，文章笔调相对乏味。

当地的所有报纸都带有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比如，在利奥泰元帅[7]的雕像抵达卡萨布兰卡的过程中，《小摩洛哥报》和《摩洛哥新闻报》连续三周都用至少一个专栏的篇幅报道此事，通常会几乎占满整个版面，这是在吹捧利奥泰。雕像落成的当天，《摩洛哥新闻报》的头版都在报道此事。《摩洛哥新闻报》经常要求打压共产党，而尽管《小摩洛哥报》认为达拉第[8]是英雄，也同情德·拉·罗克[9]，但并未如此要求。马拉喀什销量最大的报纸似乎是《坦诚》周刊，街头巷尾均有出售。然而，读者们会发现《坦诚》周刊不过是法西斯主义刊物，当地基本买不到左翼法国报纸。

M.西蒙嫌侯赛因太懒，于是解雇了他。侯赛因的工作（一个人）是照看约2英亩种着橙子和柠檬的地以及果树之间约20到30杆[10]的西葫芦，还要照看几只绵羊。按照欧洲标准，可以说侯赛因工作得非常努力了。M.西蒙抱怨说侯赛因（他明显有部分黑人血统）是个克鲁人[11]。据说克鲁人都愚蠢无能，阿拉伯人还说他们贪财，显然欧洲人也有这种偏见。不知道侯赛因的工资是多少，但算上食宿，每天应该不会超过10法郎。

1938年12月11日

2枚蛋。

1938年12月12日

昨晚整晚都在下大雨。阴天寒冷，像12月的英国。艾琳得了神经

痛，可能和昨天冒雨外出有关。

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

2枚蛋（自1938年10月26日以来共53枚，自1938年12月1日以来共23枚。有只母鸡正在孵蛋）。

1938年12月13日

2枚蛋。

1938年12月14日

3枚蛋。

天气晴朗寒冷。最近露水很重。

1938年12月15日

2枚蛋。

天气晴朗，不算太热。

1938年12月16日

2枚蛋。

天气晴朗，凉爽。家畜几乎什么都吃。驴子从垃圾堆里翻找风干的西葫芦叶。奶牛、山羊和绵羊吃的是洋蓟的剩菜叶。我注意到，当山羊

和绵羊在一起时，山羊之间会打架，但不会欺负绵羊。

捡到了体型较大的鹰吐出的未消化的东西。里面只有鞘翅类昆虫，大部分是潮虫。尽管我们刚捡到了一段刚蜕的蛇皮，但我还没有在摩洛哥见过蛇。

显然，成熟的橙子可以在树上挂一段时间，不会掉下来。橙子（至少是本地产的）的批发价格是2.5法郎或3法郎一打。

几天前看到了一只死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驴。在马拉喀什到塔西夫特枯水河的一条小路上，那只可怜的畜生倒在路边死了，而驴的主人就把它扔在那儿。几只狗在尸体周围转来转去，想吃但又无从下嘴。

1938年12月17日

1枚蛋。

昨晚暴雨，上午很冷，下午大概晴了半小时，之后又下起雨来。各处都被水淹了，塔西夫特枯水河水量猛增，某些地方的河床有50码宽。

那只死驴（1938年12月11日死的）现在差不多只剩一副骨架了。我注意到，它的头是最后被啃光的。

1938年12月18日

2枚蛋。

1938年12月19日

3枚蛋。

昨晚大雨。今天寒冷多云，伴有强阵雨和强风。

1938年12月20日

2枚蛋。

夜里开始下大雨，时断时续地下了一整天。我们前几天沿岸散步的小溪现在已经成了10码宽的急流。今天我看到了两条彩虹并排挂在天上，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

1938年12月21日

2枚蛋。

天气晴朗，气温较低，零星小雨。

有只鸽子死了，原因不明。

1938年12月22日[12]

经过几天的大雨，河水猛涨。塔西夫特枯水河平常只有10码宽，而现在河水已经填满了整片峡谷，约有300码宽。但从峡谷的植被看，这种情况已经多年没出现过了。

阿拉伯人的葬礼是我见过最不体面的葬礼。逝者身上盖着布，躺在简陋的木板上，由亲朋好友抬着。我不知道这是贫穷的缘故，还是穆斯林教徒不可以使用棺材的缘故。逝者被放在一个不到2英尺深的坑里，之后只是在他身上覆上一层黄土就作罢。此外，人们会在坑的一端放一块砖或一个破瓦罐，应该是在头部那端。按照惯例，墓地周围没有围墙，因此，除非那里安葬着某个富人，否则根本无从分辨哪是墓地——那只是一片小山丘遍布的空地。坟墓上没有任何标记。我在某个墓地附

近发现了一支钢笔和一瓶墨水，可能逝者是抄书匠。其他的墓地旁只有破瓦罐。我还在另一处墓地看到了一只珐琅锡罐。有些墓地是空的，还有一些很小，是给孩子们准备的。显然，妇女从不出席葬礼。

颇受当地人欢迎的报纸是《格兰格尔周报》[13]。这份报纸之前只报道花边新闻，现在却和《坦诚》一样具有可读性。我注意到，尽管这几份报纸的销量不错，广告也不少，但仍有很多色情广告在其中。此外，虽然这几份报纸都有右倾倾向，但也会发表多少有“左倾倾向”的作者们写的连载文章。我在一家咖啡馆洗手间的墙上看到了“布鲁姆去死”[14]的字样，字体很小。这是我第一次在法属摩洛哥看到政治口号。

1938年12月22日

3枚蛋。

上午颇为晴朗，下午有雨。

活下来的那只鸽子（可能是母的）坐在窝里，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活下来，但或许我们可以另买一只公的给它。

塔西夫特枯水河已经覆盖了整个峡谷，桥下的河面约300码宽（之前大概是10码）。根据峡谷里的植被判断，这种情况不太寻常。

1938年12月23日

鸽子下了2枚蛋，正在孵蛋。

寒冷晴朗。塔西夫特枯水河的水量退了些，只有原来的两倍那么多了。

3枚蛋。

1938年12月24日

4枚蛋。

2枚鸡蛋都碎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猫想钻到窝里，把小鸡吓飞了。可以看出2枚都是受精蛋，因为蛋黄里还黏着血。

天气晴好。

1938年12月25日

昨晚霜冻很大，早上外面一片白色，水面结了一层薄冰。树上的橙子和柠檬也结霜了，看上去很不同，柠檬花也冻硬了。不知道霜冻会带来怎样的伤害。

叶子花看上去还不错。霜冻似乎在这一带并不多见，但这段时间寒流侵袭了世界各地。远处的山峦覆盖着白雪，低处的山坡亦是如此。

4枚蛋。

1938年12月26—28日

病了。不知道下了多少蛋，大概是9枚。

天气晴好。

1938年12月27日用完了第二罐液化气，整整用了三周（和上次相同）。

1938年12月29日

2枚蛋。

天气晴好。我们买了一只公鸽（花了4.5法郎），然后把它放进母鸽笼子里，让它们相互熟悉。母鸽轻轻啄了啄公鸽的头，我想是在捉虱子。

1938年12月30日

大群鹳或者鹤（大约200只）飞过。这些鸟体型很大，长着白色羽毛，翅膀边缘是黑色的。它们向北飞，可能是来自欧洲的候鸟，盘旋着好像是在寻找落脚点。

天气晴好，寒冷无风。

2枚蛋。

1938年12月31日

3枚蛋（自1938年10月26日起约12周，共有102枚）。

---

[1] 这篇日记是在西蒙别墅写下的。

[2] 这篇日记是在西蒙别墅写下的。

[3] 可能指的是1938年5月12日英国议会对英国空军的调查要求。

[4] 这篇日记是在西蒙别墅写下的。

[5] 原文如此。

[6] 全是橄榄木，大部分是树根。（作者原注）

[7] 路易·赫伯特·贡萨伏·利奥泰（1854-1934），法国驻摩洛哥总督，摩洛哥发展的关键人物。1916年到1917年出任法国作战部长，1931年在巴黎组织了法属殖民地博览会。

[8] 爱德华·达拉第（1884-1970），法国社会党人，1938年到1940年出任法国总理，1938年9月30日与张伯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等人签订《慕尼黑协定》，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

[9] 德·拉·罗克（1885-1946），火十字团的极端右翼领导，该团体反马克思主义、反资本主义，后遭禁止，并重组为法兰西社会党，罗克反对德国，没有成为通敌者。

[10] 英制长度单位，1杆=16.5英尺。

[11] Cleuh（奥威尔还拼作Chleuh），可能是Shluh，是摩洛哥柏柏尔人的闪含语系语言。（彼得·戴维森注）

[12] 这篇日记是在西蒙别墅写下的。

[13] 《格兰格尔周报》声称发行量达50万份，比较可信。（作者原注）

[14] 莱昂·布鲁姆（1872-1950），1936年到1937年和1938年出任法国人民阵线政府总理，是法国第一位社会党总理。1942年至二战结束，他先后被囚禁在法国和德国，1946年到1947年再次出任总理。（彼得·戴维森注）

1939年1—3月

1939年1月1日

3枚蛋。

那只公鸽子刚开始被关在笼子里时，显然一点儿都不乐意，因为翅膀被束缚住了，不过现在它好多了，还会试着飞一会儿。起初，那只母鸽子会向它示爱，总是出现在它身边，还低头示意。

又有一头死驴，两只狗正往外扯着它的内脏。这是我见到的第三头死驴了。人们似乎不会把死驴埋起来。

9月时，胡椒树上的胡椒子就成熟了一拨，现在新的果实又长出来了。被霜打过的旱金莲花如今都快枯萎了，西葫芦也一样。茄子的叶子也都蔫了。

天气晴好，不怎么冷，阳光不错，没有风。

艾琳又看到了四只鹳。

霜冻一点都没影响到橘子，连柠檬花也没受到伤害。

1939年1月2日

2枚蛋。

1939年1月3日

3枚蛋。

1939年1月4日

3枚蛋。

天气晴好，但确实很冷（我穿着薄内衣、棉质衬衫、套衫、外套、薄短裤和灰色的法兰绒外裤），但还是觉得穿得不够多。

前天晚上，刚恢复飞行能力的公鸽子就消失了，肯定是阿拉伯人的狗把它吃了。我昨天又买了一只（花了6法郎）公鸽子，这只鸽子的翅膀没受伤。我把他放在笼子里，早上却看见母鸽子在笼子外面。我一打开笼子门，他们就一起飞走了。

1939年1月5日

2枚蛋。

1939年1月6日

3枚蛋。

1939年1月7日

3枚蛋。现在有三只母鸡能下蛋了。鸽子都很好。

昨天，我看到有人在塔西夫特枯水河钓鱼。河里的鱼和沙丁鱼差不多大小。鱼饵是一种长在河床边泥地里的小蚯蚓。

前天，我遇到几个人在一只母骆驼身边等候。那只母骆驼倒在枯水河上的一座桥中间。显然，母骆驼马上就要临盆了，它的肚子胀得很鼓，生殖器官一直在渗血。它侧躺着，抬着头，喘着粗气，有点惊慌失措，但显然不怎么痛苦。一个小时左右，情况也没什么改变。今天还是那样。地上有一大块血迹，还有什么东西被拖走的痕迹，可能小骆驼一出生就已经没了气息。

天朗气清，阴凉处有点冷，阳光下就很暖和。现在，我们每天晚上都能得到一瓶热水，床上还有三条毯子和一条小毛毯。

1939年1月8日

3枚蛋。

1939年1月8日[1]

把四个沉甸甸的包裹寄到英格兰花了大概400法郎。另外两个不算太沉，一共花了100法郎。这里邮局的各种规定比法国邮局的还麻烦。我和艾琳寄送包裹竟然用了两个小时。我们在柜台那里就先等了半个小时，倒不是因为圣诞节的缘故，而是这里一直如此。人们得填妥各式各样的表格，按照惯例，工作人员会翻开厚厚的手册，看看到底要填哪些表格。接着，邮局的人就会像之前一样说包裹包得不好，会散开，还说打包的绳子不够粗，而且另一个的布包没有缝好。后来，他们还说两个包裹没有密封。于是，我们只好出去买来密封蜡。这种事在法国的邮局是家常便饭。我注意到绝大多数低级职员都是法国人。除了邮局职员和其他办公室职员，甚至交警也是法国人。而在印度，这种工作通常会由印度人担任。可是这里根本没什么本地员工。和欧洲人有接触的阿拉伯人，大多会说一些法语，但我还没遇到能把法语说得很流利的阿拉伯人。

平安夜的霜冻非常严重，损失不小。从这里的植被类型和阿拉伯人的描述看，我觉得这样的霜冻并不常见。然而，我注意到橘子和柠檬还是没怎么受到影响。

这里的法国人似乎比在法国时更不在乎圣诞节，不过他们也庆祝新年。阿拉伯人都知道新年，还把它当成乞讨的借口。据说，今年游客的数量比往年这个时候的少。

摘苜蓿的人不用镰刀，而会用手把苜蓿拔下来，因此，每棵苜蓿上都会留一两英寸。别墅附近有个被墙围起来的小村庄，好像那个小村子的土地是人们共有的，因为他们总是做一样的工作，比如除草、犁地之类的。

最近，我去一个富翁的墓地仔细看了看。墓地周围有一圈泥巴，是很普通的水泥墓地，墓前放着一个用来烧祭品的香炉，墓碑上没有名字。有棵树的树荫刚好盖住墓地，树上挂满了小吉祥物，像某种小皮钱夹，里面还有一撮羊毛和一张写着字的纸。

1939年1月9日

2枚蛋。看到了一群绿千鸟，和英国的肯定是一样的。

天气晴好，下午很暖和。

1939年1月11日

1枚蛋。

1939年1月12日

3枚蛋。

1939年1月13日

2枚蛋（自1938年10月26日以来，已经有135枚蛋了）。

附近一座小山北边的岩石缝里长了一株类似当归的植物，叶子很长，上面覆盖着苔藓。

显然，这种东西只会长在一年四季都不见阳光的地方。

1939年1月14—17日

4枚蛋（现在生蛋的母鸡大概有4只了）。

前几天看到一只鹳站在一群朱鹭中间。那只鹳体型很大——相比之下，英国鹭显得很小。

和欧洲一样，这里也有绿金翅雀和金翅雀。

这里的蚕豆长得不错，根本没有受黑蝇的影响。好像霜冻只伤害到了柑橘，普通橘子没受什么影响。

1939年1月27日

刚从阿特拉斯的泰德特回来，那个地方离马拉喀什约95公里，我在那里度过了一周。泰德特海拔约为1650米，相当于5000英尺。走到平原上方2000英尺左右时（大约高出海平面1000英尺），你能发现山上开始出现许多不一样的植物——橡树和冷杉树逐渐减少，继而出现的是丘陵地带的草。到了4000英尺时，胡桃树则在四处茁壮成长，但并没有疯狂长得漫山遍野都是。5000英尺时，就能看到无花果树了，但长势并不好，杏树似乎长得还不错。总的来说，山坡上并没有多少植被覆盖，只有山谷主干道以上1000英尺处才渐渐有植物出现。村子以上500英尺处的低坡上根本没有植物，有裂口的石灰岩像矿渣堆一样。山羊大概要对此负部分责任。法国政府明显打算要重新植林，禁止在这些山上放牧。虽然这片区域靠近公路，但显然刚被精确测绘过，因为地标还是测绘人员不久前安插的。尽管公路不宽，路况却不错。巴士从马拉喀什到泰德

特要三个小时，回程需要约两个半小时。山上有很多像铁矿石的东西，但明显还没人开采。在有人居住的山谷中，不会像这里一样缺水。

站在高高的山峰俯瞰，你会发现，就算是公路附近的山谷，大概每二十条山谷中也只有一条山谷里有人居住。大部分山谷不过是裂缝罢了，显然，只有在阳光一天大部分时间都能照射到的地方才适合耕种。现在这个季节，每晚都有霜冻，背阴的地方，霜冻一天大部分时间都不会消失。6000英尺以上的地方，雪花四处飘飞，有时甚至会阻碍交通。和缅甸的山差不多，这里也都是梯田。梯田构筑巧妙，周围是石灰砌的墙，就像西班牙人做的那样。梯田土壤层也很深，大概有4英尺，当然了，那都是人工培育的。稍微背阴的山谷里和溪流两岸有小片草质不错的牧场，适合放养奶牛，而山羊则会到山顶上吃草。山上的山羊和山下的差不多，但绵羊却完全不同，而且绵羊毛分外顺滑。从向当地人了解的情况和大概情形看，所有村民都拥有一小块土地，虽然每个村子都有公共的领地，但放牧却不受限制。虽然我没办法准确判断，但我估计每个人大约拥有1英亩的土地。似乎这里在冬春交季时种植大麦（虽然没有山下长得快，但目前正是生长期），6月收获，之后便开始种植玉米。当地的法国人觉得克鲁人是优秀的农民，而且很明显，他们会使用粪肥。和山下一样，耕地靠的是牛和驴子。人们拥有很多牲畜，因此，他们的主食就是大麦和山羊奶。

这里的村落和平原上的大相径庭，因为这里的村子没有围墙。村屋是泥做的，偶尔也会用石灰石。屋子呈正方形，屋顶也是平的，铺着野金雀花，金雀花上还盖着一层土，这也许是当地天气干燥的原因。俯瞰时会发现，虽然屋内结构各不相同，但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房子通常都有一样的屋顶。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村民们过的是集体生活。这里的房子几乎没有玻璃窗，就连木制品也非常粗糙。

克鲁人的特征似乎很明显。男人的相貌和阿拉伯人差不多，但女人的出众外表却让人印象格外深刻。一般来说，女人们皮肤白皙，有的脸上甚至还透着红晕；她们都有一头黑发，眼睛也相当迷人。她们都不戴面纱，只在头上裹着头巾，上面系着蓝色或黑色的头绳；她们穿的衣服则以红色和蓝色为主。所有女人的下巴上都有文身，有的文身会一直延伸到脸颊。与大多数阿拉伯女人相比，她们的举止更为奔放。实际上，这里的人都穷困潦倒，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差不多。孩子们身上只裹了条破毯子，乞讨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事。女人们发现自己的首饰（琥珀和银质的，有些非常精美）很受欧洲人欢迎，便以与白银本身差不多的价

格出售。这里的孩子们刚学会走路就开始乞讨了，为了一个苏可以走上几英里山路。抽烟的人喜欢烟草，但我注意到，很多人不抽烟，而女人们都不抽烟。孩子们会讨面包，得到之后会非常高兴。然而，这里的贫困程度很难说明。也许这里并没有到赤贫的地步，至少大家都有家可归，也有一些家当。我看到人们任由核桃树下的核桃腐烂，因此，这里并没有严重的饥荒。但显然，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很低。山区的某些地方，人们还会制作毯子、皮具等。到了靠近泰德特的地方，主要的营生除了务农就是烧炭了。人们不花钱就能找到好木材（主要是橡树），但政府很可能最近就要对此进行干预。当地人用很原始的土灶烧炭，一大袋要12法郎（在马拉喀什要卖到35法郎左右）。尽管当地人并不高大，也没有运动员的体格，但身体强健。所有人都健步如飞，就连女人也能扛着一大包木头或者装有3加仑[2]水的罐子爬上陡坡。除了柏柏尔语，当地人也都会讲阿拉伯语，只是很少有人会说法语。有些人长着红头发。大多数村子里似乎都有一两个犹太人，但并不容易将他们和当地人区分开。

虽然都信奉穆斯林，但当地人的墓地和阿拉伯人的不同。通常情况下，当地人的墓地不过是一片草地，牛群也会在那里吃草。由于当地石头很多，所以坟冢上一般会堆砌着石头，而不只是土堆。不过，至于逝者是何许人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墓周围既没有名字，也没有任何标记。从几处已经塌陷的墓地判断，墓穴就是平常的石板砌成的洞，洞顶也要密封。起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野兽。有些墓穴很长，有8到10英尺。我看到过一次葬礼，是一个很普通的葬礼，参加葬礼的人都是逝者的朋友，其中一个嘴里还一直念叨着什么。

在泰德特，我和一个海外军团的德国人聊过几次。他的工作我不太懂，好像和电力设备安装有关。那个德国人很友好，也很聪明，法语说得很流利。他在这个军团里待了八年了，好像没什么不满意的，打算服满役期，领到年金就行。他说军团里没有烟草，服役时间很长之后，每天的津贴只有1法郎，因此，大部分新兵一般都不抽烟。那儿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倾向，他说自己离开德国时，失业人口有五百万人，而他则因为擅离职守而被通缉，无法回国。他没说多少对希特勒的看法。至于西班牙战争方面，他应该是支持政府的温和派。

今天，巴塞罗那陷落的消息传来了。虽然报纸上铺天盖地全是这件事，可马拉喀什的人都不怎么在意。我注意到，摩洛哥至少有两份社会主义周刊，一份是《菲斯电讯报》，另一份我不记得了。虽然这两份报

纸都不极端，也没怎么抨击帝国主义（这也是法国社会主义报纸可以流通而阿拉伯的则被禁止的原因）。但这两份报纸以及法国社会党的报纸都保留了法国报纸粗俗尖锐的传统，而更中立的报纸则不会那样。比如，《菲斯电讯报》就指名道姓地说德国腐蚀了法国媒体。而在英国或印度，这种做法一定会惹来官司，虽然结果可能只是罚款。另一方面看，在摩洛哥，显然，不用镇压，都没有媒体会发声说摩洛哥应该独立。如果报纸所述属实，就说明西班牙的丹吉尔人通过游行庆祝了巴塞罗那的陷落，而反对方却没有游行。然而，我之前认为，丹吉尔地区支持政府的西班牙人比其他地方的都要略多一些。

泰德特的酒店很像巴黎的廉价旅店，路上的一两家咖啡店也是。此外，那里的人完全“就像”普通中下层法国人，他们在这里的生活跟在法国时没什么区别，只是得说一些阿拉伯语。

1939年2月18日

阿塔拉斯山距马拉喀什约95公里远，我在海拔1650米的泰德特待了一周。自那时起，我已经病了快三周了（在床上躺了10天）。

我在另一篇日记[3]中记下了泰德特的重要方面。这里的鸟类有以下几种：渡鸦（我很怀疑这里所谓的乌鸦就是渡鸦）、山鹧（很常见）、大型猎食性猛禽，可能是老鹰（只在远处看到过）、原鸽、木鸽、蓝冠山雀还有其他和山下差不多的鸟类，但没见到鹳和朱鹭，也没看到兽类。在雪地里见到过类似欧洲盘羊的足迹，但也可能是山羊的。据说有一种被称为“布莱特”或“比莱特”（应该是阿拉伯语）的动物，总会来杀食小鸡。旅店里驯养的孔雀还挺好。家养动物和山下的都差不多，只是绵羊品种不一样，这里的绵羊毛如丝绸般柔顺。当地人也会使用骆驼，但不会让骆驼离开主路。驴子似乎能爬上所有山坡。

树木种类如下：橡树（矮小）、很小的矮栎、野金雀花、类似石楠的植物、黑莓、野水仙（或是某种野郁金香——现在还没开花）、白蜡树、小冷杉、山顶几种景天属和虎耳草属的植物，还有几株已经开花的雏菊。核桃树很多，但不是野生的。当地人还种杏树，看上去长势不错。无花果在约5000英尺的地方也会生长，但长得不太好。当地的春季作物是大麦，6月收割，之后人们就会种植玉米。绿草长得不错，可以

和英格兰的草地媲美。但只有溪水边的草地如此，显然是经过人工培养的。草地中有一种酢浆草，能用来拌沙拉。

两天前下过雨后，河水再度暴涨。前几天的河水很清澈，能看到差不多4英寸长的小鱼，像是鲃鱼（在水底游来游去）。等水位落下去之后，我就试着来抓几条。野草长势茂盛，田野一片绿色。我们的旱金莲开了一两朵花，香豌豆之类的长得也相当不错，但我之前没怎么打理过花园。

这几天生病了，就没数鸡蛋。我们不在的那周，母鸡一共下了19枚蛋。目前，只有一只母鸡还在继续下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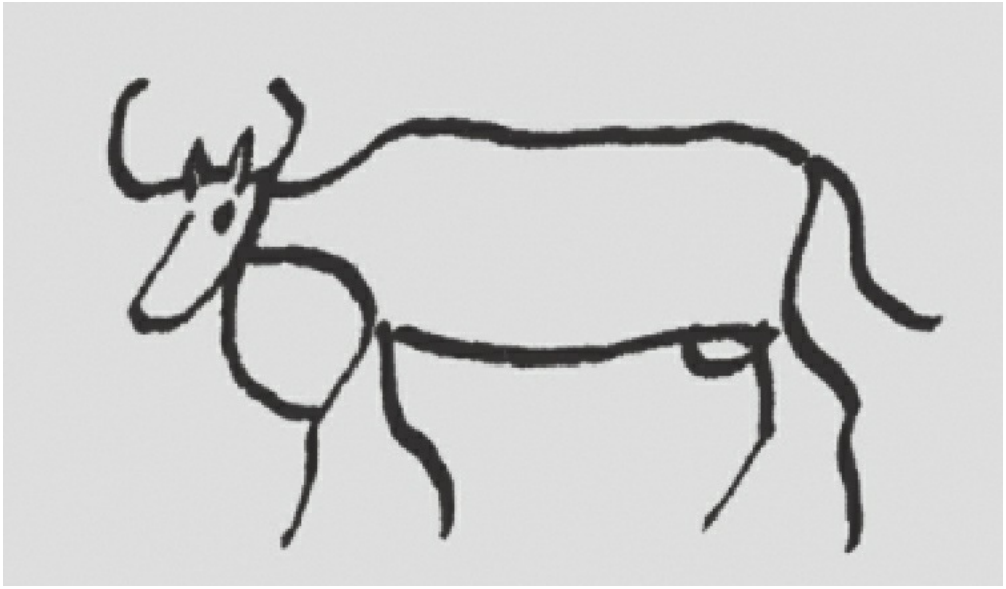
大概连续十天，奶油都有股大蒜味，有几天实在是吃不下去了。显然，奶牛是吃了某种野生大蒜。

威廉姆斯[4]说，1942年时，他在摩洛哥亲眼看到最后一只狮子被猎杀。据说，在阿塔拉斯山南面，豹子和瞪羚依然很常见。

1939年2月20日

附近咖啡店的桂竹香（很好的品种）开花了。石榴树刚刚吐出亮红色的嫩芽。野草长势茂盛，随处可见。这可能是这个国家最为绿意盎然的时候了，不过仍有斑斑点点干涸的土地。昨天看到青色的小麦已经开始吐穗了。

下图是当地人用草绳拴住奶牛的方法（从牛角根部一直到膝盖以下）。



今天，我看见了两只鹳筑巢。巢穴很大，大概是鹭巢的两倍宽，深度有几英尺，填了很多小树枝，凑起来差不多是一棵大树的一整条枝干了。雌鹳明显是在下蛋，雄鹳就站在旁边；一会儿，雌鹳站起来了，它们就并肩站着。

我们的雌鸽子在下了2枚蛋后孵了几天，接着，2只鸽子就神秘地消失了——就剩下几根羽毛。据说是被猫偷吃了，但我觉得是人为的。到现在，有4只鸽子都不见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再买了。显然，这里适合鸽子繁殖。咖啡馆的鸽子中，也有三四只下蛋了。

天气明显越来越热了，苍蝇又开始惹人心烦。

忘说了，泰德特的人们会把骆驼毛编成绳子，很柔韧，似乎也很结实。

1939年2月22日

昨天早上雾很浓。总体上说，天气明显热了。现在，很多野花都开了，有两种金盏花，一种雏菊，还有几种其他的。

1939年2月24日

昨晚和今天早上都有倾盆大雨。

发现了几撮茴香，显然，这里也会长茴香。看到了大型黑白色鸟儿，行动很慢，明显是鹰科。我忘了说，之前我在泰德特注意到人类影子的特殊现象。有时，你站在悬崖峭壁上，而影子会投射到几百英尺以下的地方。正常情况下，如果你站在峭壁边，影子就会叠在峭壁的影子上。但我注意到，尽管山石的影子是黑色的，而且很明了，但人的影子或超过50英尺高的物体投射下来的影子却不那么清楚明显，像灌木丛的影子。这一点，近距离是看不出来的，但从远处看，大约相隔200英尺或更远时，影子似乎就看不到了。一定距离内，影子只有身体的轮廓，比如说，通过影子就看不出胳膊具体的形状。岩石比人的身体更不透光，我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否与之有关，或许只是体积的问题。

1939年3月4日

天气热多了。但苍蝇没有以往那么恼人，也许是下了雨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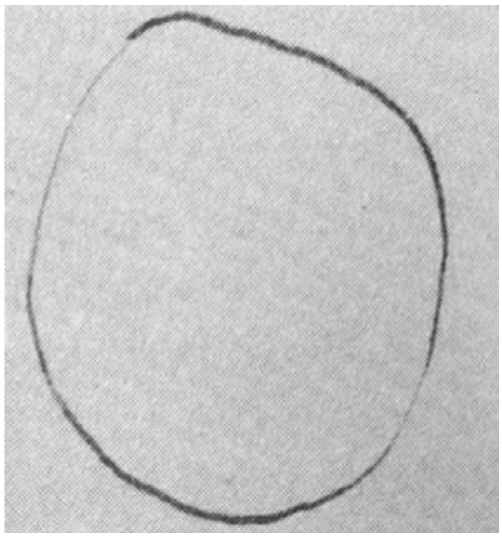
有个男孩卖了一只前两天抓到的鹌鹑给我，和西班牙鹌鹑没什么区别。

现在，野花有很多，其中一些和英国的一样，或者说非常相似。罂粟花、培根鸡蛋花[5]、一种和英国雏菊差不多的小雏菊、一种樱草属的小花、一些很像蒲公英的小花、花瓣像洋地黄但小一些的小紫花，还有牛舌草和鸟眼珍珠。野金盏花大概是最常见的，到处都能看到一大丛。

现在，尽管大麦还是青涩的，但很多已经结穗了。我认得出的谷物几乎都是大麦。大麦的长势不尽相同，但整体上说似乎还不错。所有的樱桃树都开满了花。苹果树开始长叶子了。石榴树的嫩芽正渐渐长大——显然，石榴树是先开花后长叶的。柠檬树上，有的还在开花，而有的已经长出了成熟的果实，显然柠檬树全年都会结果。无花果的花苞刚刚露出。蚕豆已经差不多到了可以采摘的时候（已经绿了），莴苣现在也长得不错，豌豆、胡萝卜和很小的芜菁长得很好。显然，有些蔬菜在这里可以全年种植。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很少有虫害。人们会割下长长

的草，虽然像小麦或者大麦，但实际并不是，那只是用来做饲料的。人们也会随时把到处生长的野草割掉，放在驴背上带回家。

前几天我抓到了一只小水龟，大概有下图中画的这么大，或许还要小一点。



小水龟长得还算圆，只是年纪还小，尾巴显得相对有点大。可能才刚破壳出来不久吧，这么说，现在肯定是产卵的季节。之前有段时间，我都没再看见到成年乌龟了。我昨天看到了一条蜈蚣，差不多有三四英寸长——那是我在这里看到的第一条蜈蚣。

1939年3月9日

非常热，但今天多云。大部分旱金莲都开花了，其他植物也长得很快。

蚊子很多。

M.西蒙用大量的血（他能轻而易举地得到血，因为他是屠夫）浇灌橘子树。

1939年3月11日

昨天我发现了一条死了的蛇，大概2英尺长，这是我来摩洛哥之后见过的第一条蛇。

很热。据说今年的降水量比往年多，所以应该有个好年景。

另有一种很常见的花，花瓣是淡黄色，到花心处逐渐变深，直径约有2英寸，很像小向日葵。

1939年3月12日[6]

几天前，一支刚演习完的部队经过了别墅。部队大概有5000人，一多半都是塞内加尔人。阿尔及利亚骑兵看着状态不错，比其他人体格健壮。马匹大概有14掌宽，非常强壮，但血统并不纯正。马匹毛色各不相同，以白色和灰色居多，有的应该已经阉割过了，有的没有，但并没有母马（这个国家的人都不骑母马）。我看到在射击场，所有马匹都已经适应了枪声。看着士兵们的模样，我现在觉得塞内加尔步兵也并不比阿拉伯人强（我之前不这么想）。他们看起来旗鼓相当。骑兵中还有一些小口径速射炮——但由于速射炮都裹在帆布里，所以我没见到什么机械装置，但显然速射炮的口径不会超过1英寸。轮胎上套着橡胶车胎。运输车的盘轮是纯钢的，由三头骡子拉着。此外，我还看到了重型炮（山炮）。这些大炮的口径约有3英寸，大概75毫米，但尽管如此，还是和75毫米的速射炮不同，因为速射炮是野战炮。整架大炮的运输显然得要6到8头骡子，光是后膛就得用一头骡子。除了山区，这样的纵队可以毫不费力地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调动。参加演习的军人们穿着厚重的卡其布外套，但负重似乎没有往常多，大部分士兵的负重都在40到50磅之间。

海外军团中有五位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士兵，他们时不时会来看望我们：

克雷格·格拉斯哥是爱尔兰人，支持奥兰基主义。他的父亲是办公室职员，薪水丰厚，因此，他是出身于上层工人阶级的，而他自己也曾是薪水颇高的职员。他大概25岁，身体健康，体格健壮。他明显有妄想

症的倾向（总是提起当年的荣耀），不过这是这种人的通病。他在海外军团待了快两年半了，期间由于两次想当逃兵，因此在战俘集中营待了一年多。他只会说一点法语，有点儿“反苏”，提到马克斯顿时还带着点敌意。他不怎么喜欢法国人，如果战争打响，也会尽量避免上战场。

威廉姆斯是美国人，黑头发，可能有点黑人血统。健康状况和体格都不太好。他差不多快服完十五年的兵役了，之后就能领到一小笔津贴（大概每个月500法郎），可能会留在摩洛哥。他现在是军官食堂的勤务兵。他虽然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性格不错，明显是个有头脑的人。

罗兰德大概30岁或者35岁，是“自我感觉良好”的那一类，口音有点像欧亚混血，一逮着机会就喝酒。他在海外军团待了差不多五年了，正想着退役（他们先服役五年，之后如果愿意，可以继续服役），他显然没遇到过什么麻烦。他脾气很好，也算有头脑，但不怎么聪明。

史密斯是美国人，大概四十岁左右，是军乐队的。还算爱喝酒，已经服役多年了。他不怎么聪明，但特别善良。

另一个年轻的苏格兰人我只见过一次。很明显，除了这几个人，军团（第四军团）里来自英国或美国的军人也就只有两三个了。显然，英国人不太适应这里，忍受不了这里的艰苦条件，而且也学不好法语，而德国人的法语学得就好些。上面提到的这几位还都是二等兵。军团里大多是德国人，而军士也通常都是德国人。

军团里现在的生活显然非常枯燥。之前提到的这几个人除了无关痛痒的小型遭遇战，没见过什么大型战斗。士兵们之间总会相互打斗，之前决斗很流行，但后来被禁止了。士兵们服役一年左右，每天的军饷仍旧只有2法郎（3便士），除非成了军士，否则一直都是这么多。中士每个月能有1200法郎，但得自己出钱吃饭或买衣服。制服并不怎么合身，但士兵们从来不缺衣服穿。他们必须得自己洗衣物。每位士兵每天能有半升酒。烟草不是免费的，新兵们前六个月一般都不能吸烟。

加泰罗尼亚沦陷后，《小摩洛哥人》立刻成了亲法派。每次将法国报纸和我们收到的英国报纸比较时，就会明显发现法国和英国媒体的新闻来源差别很大，因此，二者中的一个应该一直在撒谎，但更有可能的是，两个都在撒谎。例如，当地媒体没有提到加泰罗尼亚躲避机关枪的难民们，但英国媒体却提到了这一点。

据军团士兵们传出的谣言判断，战争仍有可能发生。有一次，传言还说当晚就要派兵。前几天，补给站收到了一大批机关枪和其他轻型武器，似乎是为了招募新兵。只要法国战舰到了卡萨布兰卡海岸，总会有水兵被送到马拉喀什和士兵们一起狂欢，无论他们是不是自愿的。

一些大麦已经结穗，长势非常好。按当地标准看，今年的降水似乎很充足，因此，谷物的收成应该不错。

1939年3月16日

昨天不太热，是阴天，尘土漫天。今天也一样，可能快下雨了。

这里的其他几种野花：一种小山萝花、几种野豌豆花——其中一种很漂亮，和豌豆花差不多大小，有粉色和洋红色两种颜色。前几天，我还看见了几个新品种，但我并不认识。很多地方都开满了花，主要是野金盏花和一种小雏菊。野金盏花是淡黄色的，接近深黄色，而雏菊则和英国的差不多。

昨天，一共有3只金丝雀、1只公鸡和2只母鸡站在电话线上：

1号金丝雀：“来点面包。”

2号金丝雀：“来点面包。”

1号金丝雀：“来点面包。”

2号金丝雀：“来点面包。”

3号公鸡：“奶—奶—奶—奶—奶—奶—酪！”

人们依旧在耕地。昨天有个人把包里的种子取出来播种，当成群的家鸽飞过来想偷吃种子时，农民们就会把它们赶走。

昨天我看到一只小骆驼仔，脐带还没掉，显然是前几天刚出生的。但它的腿已经和母骆驼的一样长了。

昨天骑兵走了。我注意到所有的马匹好像都是种马。

1939年3月21日[7]

昨天，苏丹对此地进行了正式访问，因此，马拉喀什提前就装饰了彩旗，几千名士兵也在街道两侧列队迎接。显然，这样的表忠心大游行是有意为之，与当前的危机有部分关系。很明显，这里的人，也就是阿拉伯人，对苏丹相当忠心，就连没什么阿拉伯人的圭利兹也相当热情。一起来的有很多小官员和他们的随从，组成了一支不太正规的骑兵，每个人都有一把前膛枪。显然，这些枪（射程最多只有两三百码）遍布民间并不会让法国人感到害怕。苏丹完全被法国人控制，而阿拉伯人则效忠苏丹，因此，法国人的日子就顺遂多了。V夫人说，听到广播中传来苏丹的声音时，阿拉伯人甚至也会行礼致敬。苏丹个头不高，样貌平常，三四十岁的样子。塞内加尔的士兵们集结在一起时，看着还不错。我之前见过海外军团的独立分队，和我之前的印象不同的是，士兵们的体格健壮，军容整洁。

这次，人们更关注战争危机。法国人不由自主地会提到这件事，而他们上次则没有这样。就连阿拉伯人也在谈论这件事，比如，我们的仆人麦赫贾布·穆罕默德就告诉我们“要开战了”，而且和上次一样，意思是敌人还是德国。麦赫贾布显然曾在欧洲参加过大战。他不识字，但有点地理知识，比如，他知道要过海才能到欧洲。

艾琳说阿拉伯的孩子们没有玩具，似乎的确如此。在阿拉伯人聚集区，没有任何玩具出售，没有娃娃、没有风筝、没有陀螺，什么都没有。而阿拉伯孩子们手里为数不多的玩具（有时只是一个皮球）还是欧洲生产的。无论如何，他们也没时间玩耍。大多数孩子们从6岁开始就得做工，仿佛绝大多数孩子从刚学会走路起就知道了钱的价值。

海外军团的士兵们如果没有特许是不能进药店的（出于毒品和毒药方面的考虑）。

1939年3月28日

在比斯开湾登上了靖国丸号邮轮（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以下内容于1939年3月21日写于马拉喀什，取出日记本后再誊写一遍：

从三四天前到今天下午，天气一直很冷。两天前的暴风雨中，还下了几分钟冰雹。

公园里，很多动物都在交配。乌龟也是，雄龟几乎是直立着，雌龟移动时就拖着他，所以我认为雄龟的阳具肯定又长又有柔韧性，可以绕过龟壳的边缘。鸵鸟也在求偶，雄鸵鸟把雌鸵鸟追到角落里，骑在它身上（不像会飞的鸟儿那样踩上去），雌鸵鸟害怕时就会把头躲进角落，如同被捉到的野兔一般，因此，也许童话中说的鸵鸟会把头埋在沙子里可能是真的。这两只鸵鸟应该同属一个品种，但外观相差甚远。雄鸵鸟的毛是黑色的，脖子是红色的，而雌鸵鸟的毛呈暗灰色，脖子也是灰色的。两只鸵鸟的脖子和腿都没有毛，不到7英尺高，也不吃面包。尽管已经能看到蝌蚪了，但青蛙们还在大声叫着。雄孔雀开屏时，尾羽会颤动，发出窸窣声，如风吹过一般。一只猴子（那种栖息在地上的无尾猴，多少有点像狒狒）抱着一只小猴子。那只小猴子应该出生两天了，很想自己走动，但它的妈妈却不肯顺它的心意。母猴四肢着地跑来跑去时，小猴子就伸出四肢挂在母亲身下，扭着头望着。小猴子的手指和成年猴子的不同。小猴子的父亲和另一只公猴对小猴子非常感兴趣，温柔地抱着它，仔细看的话，它们有时也会像生气时那样龇牙咧嘴的，但小猴子却并不害怕，仿佛并不知道那个动作代表的意思。看到我和艾琳，小猴子害怕地尖叫起来，这种事发生了两次。

乌龟产了1枚蛋。他们把蛋产在石栏中，所以，应该是不会孵化它了。

母猴抱着小猴子时，公猴又来与之交配，或者说想要那样做。

1939年3月26日下午4点，我们离开了卡萨布兰卡，28日早上7点经过菲尼斯特雷角，29日早上7点应该会到韦桑岛。过去12小时里，邮轮航行了378英里。（关于这艘船的信息，我记在了另一本日记里。）离开卡萨布兰卡之后，天气有些不稳定，我们现在穿过海湾时，海面还算平静，也就是说，海浪不足以动摇这种吨位的邮轮。我已经三次乘船经过海湾了，只有一次不太顺利。离岸边已经有50英里了，我根本没见到其他动物，除了从卡萨布兰卡追随而来的海鸥，以及一群向北飞的野鸭。尽管在刚开始的24英里，邮轮摇晃得很厉害，但我并没有晕船，不过要是没吃瓦萨诺，我肯定会反胃的。

在卡萨布兰卡的最后几天，天气实在太冷了。从马拉喀什坐火车返回卡萨布兰卡时，我被乡野面貌的变化震惊了——放眼望去，尽是绿色。尽管因地而异，但谷物看上去很茁壮。野花大片大片凑在一起，阿拉伯人的小屋周围长满了野草，有时都差不多会挡住小屋。艾琳看到骆驼耕地。我之前没见过，以为是无稽之谈，但显然，这种事在这里很平常，因为利奥泰雕像的底座就刻着这样的场景。这艘船上有好几种植物，有棕榈树、月桂树以及常见的几种日本冷杉盆栽，都长得很好。

1939年3月28日[8]

靖国丸号邮轮总注册吨位为11950吨。虽然我并不确定，但从船体震动情况判断，它应该是内燃机船。除了船桥，靖国丸号只有三层甲板在水位线以上。客舱以及其他设施都很不错，但问题是所有船员都是日本人，而且除了高级船员，大多数人都不太会说英语。从卡萨布兰卡到伦敦，二等舱的票价为6.1英镑。通常，邮轮从伦敦出发后，会直达直布罗陀海峡，之后绕路送交茶叶，从直布罗陀回程的船票价格应该也是一样的。搭乘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的船从伦敦到直布罗陀，二等舱的票价也是6.1英镑，但食物却没有这艘船上的好吃，而且这艘船上的服务要强多了，不过这也许是船上没什么乘客，因此服务人员不忙的缘故。由于空间相对有限，饮水设施和甲板上的游戏设施都不太好。

我不知道船上能容纳多少乘客，但至少能有500人。目前，二等舱里只有15人，三等舱里大约有12人，而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数量，但一等舱的乘客人数应该也不会太多。二等舱和三等舱里有一两个人来自丹麦或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其他国家，还有一两个来自荷兰，其余的都是英国人，包括刚从直布罗陀上船的几个二等兵也是。这艘船的这趟旅程应该也只会有这么几个人了。自从中日战争爆发后，远东地区的英国人就不再搭乘日本船了。据说，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的船因此爆满。

过去24小时里，这艘邮轮只航行了378英里，这还是在天气状况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1939年3月26日下午4点离开了卡萨布兰卡，加上在伦敦内河等待涨潮的时间，应该30日晚上或者31日早上就能到达目的港口了。（30日早上9点到港，从卡萨布兰卡到目的港口用时约87小时。）

每天，船上都会发放模板复印的报纸，偶尔会放电影（我还没去看过）。

我在卡萨布兰卡的时候去看过电影，于是就更确定法国政府可能参战的想法。第一部电影是关于士兵生活的，包括马奇诺防线上内部安排的不同部门，有几幅画面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其内部结构。显然，整部电影是匆忙之作，而且细节比正常水平下的同类电影更到位。另一部电影是百代电影公司的作品，电影里的播音员说的基本上都是谴责德国的话，此外就是英法军队的镜头。值得注意的是观众的态度——漠不关心，几乎没人鼓掌，也没几个人发表带有敌意的看法。

现在，所有法国人都确定战争会爆发。一些法国人会不由自主地谈起战争，尽管有时他们说希特勒是“畜生”，但所有人都为前景而惆怅（比如，有一两次，我就听到有人说“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好处，只有富人才能发战争财”之类的话）。

防空预警通知（也就是预防调查基金会）于3月20日在马拉喀什首次发布，招募提供帮助的志愿者。M夫人的儿子在圣西尔军校，据M夫人说，虽然军校学生们都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没有一个人希望真正开战。

---

[1] 这篇日记是在西蒙别墅写下的。

[2] 加仑，英美制容量单位，英制1加仑约为4.5升，美制1加仑约为3.8升。

[3] 1939年1月27日的日记。

[4] 可能是在法国海外军团中服役的美国人，1939年3月12日的日记里有描述。（彼得·戴维森注）

[5] 萨摩赛特人对水毛茛（Ranunculus fluitans）的别称，也是威尔特郡人对云兰（Linaria vulgaris）的称呼。

[6] 这篇日记是在西蒙别墅写下的。

[7] 这篇日记是在马拉喀什的商人旅馆写下的。

[8] 这篇日记是乘坐靖国丸号（日本邮轮株式会社）穿越比斯开湾时写下的。

1939年4—6月

1939年4月10日

我从1939年4月1日起就待在索斯沃尔德了，不过上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休息。

一周前刚到的时候，天气相当冷，没有风，雾却很大。1939年4月2日，海面上的雾气很重。有些地方的黑刺李已经开花了，报春花正在盛开。野水仙花开得也很多，但大部分都还只是半开着。果树出芽很快。两天前，我在背阴处看到了一棵不认识的树，树上开满了花朵（淡紫色的花）。玫瑰和其他草本植物也迅速发芽。1939年4月2日，椋鸟还是成群飞过，云雀放声高歌。有的芦笋已经露出地面几英寸了。

1939年4月12日

昨天的天气出乎意料的好，也很热，据说是最近70年最热的一天。不过今天好像更热了。

我们现在有26只母鸡，最小的才11个月大。昨天一共收获了7枚鸡蛋（母鸡们最近才重新开始下蛋）。所有的事都没人管，野草丛生。土地又硬又干，因为几场大雨之后的几周内滴水未落。

尽管离海岸线越远，灌木就越常见，但总的来说，春天还是迟到了。

花园里的花都在盛开：樱草、南庭荠、绵枣儿、葡萄风信子、酢浆草、水仙花。田野里有许多黄水仙，这些黄水仙都是双心的，显然不是野生的，只是球茎意外掉下来才发芽的。西洋李子和普通的李子树也都开花了。苹果树上已经有了花蕾，但还没开花。梨花正在盛放。玫瑰长势很好。我注意到，之前一株完全枯萎的玫瑰又从根部开始发芽了，因

此，接穗枯萎之后，新芽还是可以存活的。牡丹正在茁壮成长，番红花刚刚开败，几株郁金香也已经发芽了。除了韭葱和欧洲萝卜（萝卜没有遮盖，熬过了严冬，而顶端依旧是绿的），花园里就没有其他蔬菜了。这应该是因为霜冻太严重，所以这里的冬天没有什么绿色植物。

蝙蝠到处都是。还没看到鸟巢。

野花有紫罗兰、报春花、白屈菜和银莲花。

我看到一小株大黄。也许是没人除草，黑醋栗丛里到处都是野草。草莓长得很好，但都被野草盖住了。

我种了一点莴苣。

1937年底埋下的腐叶土（山毛榉）现在已经充分腐烂了。灌木丛下发现了2枚画眉鸟的蛋，但没看到鸟巢。这有些奇怪，但可能是某个孩子放在这里的。

今天给燕麦脱了粒，似乎没什么田鼠，也没太多老鼠。我拿1只活着的小老鼠逗了逗马克斯。他只是闻了闻，舔了几下，但没有吃。鸽子们正在求偶，先是笔直地飞上天空，再滑翔下来。

4枚蛋。

1939年4月13日

今天不怎么暖和。晚上下了场小雨。夜很黑。

紫罗兰和桂竹香开花了。三色堇和金盏花一样，都是自行播种的。红色虎耳草就要开花了。

10枚蛋。

1939年4月14日

多云，又下了几场小雨。又冷又黑。

我看到两只燕子（不是岩燕）。从当地情况看，燕子来得有点早，况且今年的春天也来得迟，还没人看到燕子。

我在草莓地里忙了一整天，那里自从去年起就没人管。一株草莓大概能长出12到15根分支。在坚硬的土壤里，这些分支似乎能长出最好的根须。我用其中一些填补了空位，又种了一排。尽管不知道它们是否能成活，但提特里[1]说现在还不算太晚。种在遮蔽处的桂竹香已经都开了，但苹果花都还没开。

霍林斯沃斯从我们的24枚鸡蛋（力康鸡和奥尔平顿鸡会生出苏塞克斯鸡）里孵出了12只小母鸡，从去年秋天到现在，它们已经产了1500枚鸡蛋了，平均每只母鸡每月产蛋20枚。自始至终，母鸡们吃的都是猪饲料，而不是平常的糊料。同一期间，由于没有妥善喂养，我们自己同窝孵出的母鸡却没有产蛋（但现在开始下蛋了）。

8枚蛋。

穆[2]头一次产了一品脱奶。

1939年4月15日

晚上很冷，有风，还下了几场小雨。我开始清理种着大黄的那块地，此外，还忙着转移鸡舍。显然，如果有人能在它们的新家里面或者附近引诱它们饱餐一顿的话，那就太好了，否则那些鸡总会想跑回鸡舍原来的位置。

穆里尔似乎是在发情，我不怎么确定，但应该记下日期（下一次应该是6月5日或者5月6日）。

又看到了一只燕子。画眉鸟在灌木丛里孵蛋。花丛里有一株枯萎的荨麻。黑刺李的花很美。两年前，我在灌木丛里种下了这棵小树，当时还以为它是寄生植物（因为我是在苹果树下发现它的，所以以为是寄生植物），结果发现那是西洋李子或者是野生李子。

8枚蛋。

1939年4月16日

天气很冷，偶尔会晴天，但风不大。早上飘了一阵雨。

花丛里间或会有九轮草，我觉得在这个季节算早的。风铃草也长出了花蕾，有几朵已经完全开放。毫无疑问，这更算早的了。野樱桃的花已经盛开。美国梧桐的树叶也已舒展。苹果花几乎全开了。又有一只画眉鸟在灌木丛里孵蛋。我发现了一个乌鸫的窝，里面还有几颗乌鸫蛋。目前为止，我只发现了这一个鸟窝。

教堂旁边的池塘已经成了死水，连浮萍都没有了，只有绿色的浮渣。无论如何，总算还有几只蝾螈。

今天起开始夏令时，早上从穆里尔那里挤的奶不多，但晚上就多了。

10枚蛋（昨天的鸡蛋每打卖了1先令9便士）。

1939年4月17日

非常冷，有点风，偶尔会下雨。

核桃树的花蕾开始绽放。1939年4月12日种下的莴苣发芽了。几朵郁金香马上就要开花。

10枚蛋（这周一共收获了57枚蛋）。

1939年4月18日

天气不错，就是有点冷。

我种下了蚕豆，之前种的长势很好。我还种了香雪球和金鱼草。

我找到了一枚被孵过的画眉蛋——今年的第一个。

5枚蛋。

核桃树要开花了。

1939年4月19日

天朗气清，很暖和。

这几天，八哥一直在求偶，衔着稻草飞来飞去。有只八哥，可能是雄鸟，坐在树枝上，脖子上的毛竖着，一会儿叫着，一会儿又用喙啄出“嗒嗒”的声音。燕子多了起来，但还没有雨燕。

我种了豌豆（诺卡特的林肯豆，种了1.5平方英尺），还把核桃树下一半的荨麻喷上了氯酸钠。受精蛋今天收到了，但孵蛋的母鸡还没找好。穆里尔今天很不安分，也没吃饭，可能还在发情。

天气晴朗，很适合观察日食（日环食，晚上6点28分开始，过程非常清晰）。晚上7点15分时食甚，大半个太阳都被遮住了。天黑下来，也很冷，但对鸟类没什么太大影响。母鸡也没回鸡舍。

9枚蛋（今天每打卖了1先令8便士）。

1939年4月20日

天气晴朗，一整天都很温暖。

风铃草随处可见。白色如星星一样的单个花朵现在全开了。花园里的勿忘我、郁金香，还有一两朵银莲花也在盛开。

如我所想，西洋李子树旁边的画眉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窝。显然，就算它们离开很长时间，鸟蛋也不会冷掉。

苹果花就要盛开了。

到处都找不到可以孵蛋的母鸡。

10枚蛋（加上4月14日以来额外产的5枚蛋）。

1939年4月21日

天气不错，一整天都很暖和，只是非常干燥。

我相信我今天看到了旋花冒出的第一个芽。我割下了一大把荨麻，看看效果。据说，如果每年割个三四次，它们就会彻底消失。被喷上氯酸钠的那些荨麻正在慢慢枯萎。

种了花椰菜、皱叶甘蓝、韭葱和莴苣。

13枚蛋。

1939年4月22日

天气很冷，有风，偶尔有阳光，落了几滴雨。

花菖蒲发芽了。苹果花也已经盛开。

我种了早熟马铃薯（大约10磅）。

我找到了两只能孵蛋的母鸡，但保险起见，得明天再让它们孵蛋。

每只母鸡花了3先令6便士。

显然，池塘里的水鸡在那里筑了个巢。

12枚蛋。

1939年4月23日

几乎一整天都在下雨，但雨势不大。

丁香快开花了。旋花长得不错。

为了让那两只母鸡孵蛋，我费了好一番功夫。其中一只母鸡开始很不情愿，后来只孵了8枚蛋。另一只根本就不愿意孵蛋，跑到母鸡群里去了。看来这窝蛋要浪费了（每打2先令6便士）。

我注意到那只母鸡跑进母鸡群里时，其他母鸡也没有像之前一样显露出敌意，也许是没有公鸡的缘故吧。汤姆·李德利[3]说，受精蛋等着母鸡孵化时，应该每天翻一翻，就像在孵化器里一样。

我换了一罐液化气。

13枚蛋（似乎提特里每打鸡蛋要卖2先令）。

1939年4月24日

大部分时间天气都是晴朗的，偶尔下雨，晚上很冷。

荨麻已被我喷了更多氯酸钠，之前被喷过的荨麻已经发黑了。

一只母鸡不肯孵蛋，我把它带回家，觉得可能在熟悉环境下，它就会孵蛋。另一只母鸡正在孵第11枚蛋，不过，它在进食的时候弄碎了1枚。于是，我就从另一个窝里拿了1枚补过去。不知道这枚能不能孵出来，毕竟比其他的蛋晚了大半天。

几株草莓开花了。

14枚蛋（从上周六算起，这周一共收获了76枚蛋，下周应该从周日

起算）。

1939年4月25日[4]

一整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很冷。14枚蛋。

1939年4月26日

晚上冷得刺骨。下雨了。早上下了一小会儿雪。那只犹豫不决的母鸡一晚上都坐在蛋上，但并不是在孵蛋。如果能再找到一只母鸡，我还是打算孵一孵蛋，观察一下结果。

15枚蛋（最多的一次）。每打卖1先令10便士。

1939年4月27日

晚上严寒，母鸡们的饮用水都冻住了。白天大部分时候，不是下雪就是雨夹雪。偶尔能见到阳光。盛开的花朵似乎都没受什么影响。

多年生的香雪球开了花。绵枣儿和葡萄风信子的花朵都谢了。

八哥忙着衔来稻草筑巢。安德森太太[5]早上5点45分时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我在厨房捉到了一只画眉，它毫发未伤，发育完全，喙的内侧呈深黄色。

16枚蛋（目前为止最多的一次）。

1939年4月28日

9枚蛋。

1939年4月29日

12枚蛋。

1939年4月30日

14枚蛋。我到了格林尼治。

1939年5月3日

在米勒医院[6]外，看到八哥和麻雀在啄树皮，它们显然是在筑巢。有些小树枝已经被啄秃了。

1939年5月8日

今天，我去了沃林顿。李子花谢了，苹果花全开了。第一批豌豆有1到1.5英寸高，第一拨菜豆已有3英寸高，第二拨菜豆还没发芽。大黄仍在生长，但长得不好（只有保护得好，它们才能长好，A先生[7]就会把大黄种在盆里）。草莓开花了。过去3天，主要种了马铃薯、洋葱、胡萝卜、芜菁、第二拨豌豆和小萝卜。

灌木丛下的画眉窝里有4只雏鸟。

这里的花有桂竹香、郁金香、三色堇、筷子芥（已经盛开，很好看）、黄色香雪球、南庭芥、勿忘我以及几朵水仙花。玫瑰还没长出花蕾。醋栗大部分都被霜冻和鸟儿毁了。我在空地上撒了草种，还撒了除苔剂。

这8天，母鸡下了92枚蛋。

1939年5月9日

医院窗外的鸽子孵出了一窝小鸽子。

1939年5月16日[8]

大部分时间里，伦敦都在下雨，偶尔会晴天。格林尼治公园里，栗子和粉栗（但不是生长在西班牙的那种粉色栗子）都在开花，丁香花和山楂树也开了花。我看到几只小鸭子跟在野鸭身后。玫瑰花冒了芽。郁金香和桂竹香快到了花期最盛的时候。我注意到以下几种郁金香，全都是名贵的品种：维纳斯（樱桃红色）、路易十六（棕紫色）、哈勒姆的骄傲（亮粉色）、追忆（淡紫色）、安布罗西亚（《每日邮报》的那种玫瑰色）、巴提贡（封蜡红）、航海（洋红色）、尤班克牧师（很淡的紫色）以及苏丹（深棕色，几乎是黑色）。

1939年5月21日

昨天和今天天气都不错，但还是不怎么暖和。玫瑰已经含苞待放。青李子长得很茂盛。羽扇豆就快开花了。“伦敦的骄傲”（一种大虎耳草）也快开花了。这里的园丁[9]说玫瑰的种类之多一定被夸大了，因为人们总会忘记那些过时的品种，然后又给它们起新名字。我昨天看到了一只雨燕和一只斑鸠，因为生病，这是今年我第一次看到这两种鸟儿。山楂树的花都盛开了，尤其是粉色的那种。草地看上去很不错。

1939年5月19日，我来到了动物园[10]。我对海牛很有兴趣，之前我只是听说过而已。这种动物就像大海豹，尾巴很宽，还有蹼一样的前肢。海牛的头有点像狗头，眼睛很小，身体有点像大象，但由于要下水，所以皮肤又黏又滑。海牛行动非常迟缓。它的嘴最为特别，周围有

一圈很粗的胡须，吃东西时仿佛是用吸的方式。这种动物非常温顺，可以供人抚摸，仿佛是海中唯一的素食哺乳动物。我不知道它是生活在淡水中还是咸水中，还是二者皆可。

大象不吃萝卜，而鹿和猴子都很爱吃。狨猴不吃小洋葱，而其他大多数猴子都爱吃。我注意到有些南美洲的猴子几乎只用尾巴就可以吊在树上，也就是说靠单手或者单脚配合尾巴吊在树上。某种北非的盘羊在动物园里自由繁殖，看上去比马拉喀什的那些生活条件要好。目前，动物园里有两窝狮子幼崽，显然，动物园正在尝试狮虎杂交。[11]

1939年5月25日

昨天和前天都很暖和。今天阴天，有点冷，还掉了几滴雨，得生火才行。

我在外面待了3周之后，昨天才回家[12]。土壤都干了，除了厨房花园那边，野草已经长疯了。现在，田地几乎全被荨麻和毒芹毁了，但还有大约200平方码的一两块地能长出草来。草长得很茂盛，到处都是，绿油油的。苹果树上果实累累。实际上，厨房花园里并没有黑加仑，也没有醋栗，但花园里零星的花丛中却有一些。第一拨（矮的那种）豌豆大约有4英寸高，第二拨（高的那种）大约有2英寸高，第一拨蚕豆差不多有6到8英寸。有些早熟的马铃薯已经开始发芽了（这些种得都比较晚），小萝卜也发芽了。草莓开了不少花，就连去年的纤匐枝也开了花。郁金香和桂竹香已经到了荼蘼的阶段。正在盛开的花有南庭荠、黄十字花（开得很好）、勿忘我、虎耳草和三色堇。已经长出花蕾的包括：石竹、牡丹、美洲石竹和蔷薇（不是攀缘蔷薇）。罗甘莓的花开得很好。

5月9日到5月23日，一共收获了200枚鸡蛋。5月24日收获了14枚。今天有17枚蛋。这周日就要重新开始计数了，但我觉得应该每天都有记录。有6只小鸡现在已经10天或者12天大了，很健康，但长得有点慢。这一窝（11枚蛋）没有全留下，可能和开始鸡舍下方被鼹鼠打了个洞有关系，因为有几只小鸡被活埋了。现在的鸡蛋质量不错，比一个月前的大了许多。我昨天发现了1枚小鸡蛋，和水鸡蛋差不错（当地人说像是双黄蛋，“不是一窝蛋里的第一个，就是最后一个”）。现在有3只母鸡

在孵蛋。

穆里尔还不错，很瘦，但胃口很好。每天的产奶量能超过1.5品脱（到现在快产奶一年了）。

昨天种了一打康乃馨。

1939年5月26日

天气暖和。土地很干。郁金香那边有些虫子。苹果结得更多了。

从现在起再过半个月，就该给草莓上网了。

提特里已经给马铃薯培过土了。他说卡特里奥纳马铃薯不适合作种子，但如果小心处理，能储藏很久。亚麻花开花了。有些醋栗差不多能摘了。又孵出了5只小鸡。我本来以为1只都孵不出来，因为当时过了3周，才找到孵蛋的母鸡，而母鸡1周后又罢工了，之后又过了1周，我才找到了另外1只母鸡来孵蛋。

种了金鱼草。

14枚蛋。

从4月12日到5月26日（包括起止日当天），一共收获了550枚鸡蛋（一共有26只母鸡）。

1939年5月27日

早上是阴天，下午天气晴好，很暖和。蓝色婆婆纳和筋骨草随处可见。金凤花长到了最高的高度。蒲公英的种子正四处飘散。田野里有大型伞菌。

用稻草给草莓搭建了小棚子。又给核桃树下剩下的荨麻喷了氯酸钠。

昨天看到画眉在一块平坦的石头上敲开了蜗牛壳。我原以为它是啄开的，可实际上是它将蜗牛叼起来，砸在石头上给弄开的。

15枚蛋。今天卖了10枚蛋，是目前为止卖得最多的一次（10枚鸡蛋卖了1先令10便士）。

目前一共收获了565枚蛋。

明天重新开始计数。

1939年5月28日

一大早非常冷，不过其他时间还算晴好。昨晚种了些鼠尾草。安布罗西亚花就快开了。多萝茜、帕金森和艾伯丁玫瑰已经长出了花蕾。雀翠花的花蕾马上就要长出来了，牡丹也就要开花了。

13枚蛋（加上7枚产在外面的，一共是20枚蛋）。今天开始新一周的计数。

1939年5月29日

天气晴好，很暖和。我给草莓铺了网。带着穆里尔去和一只公羊见面，但我有点担心它不发情了。N先生[13]说这种羊通常会在秋天或者春天发情。穆里尔非常害怕一头奶牛，可那头奶牛反而会害怕公羊仔。

16枚蛋。

1939年5月30日

天气晴朗，很暖和。我种了马铃薯（12个），还给它们盖上了粗布，避免阳光直射。一朵石竹开花了。早上下了好一会儿雨。我注意

到，就算给草莓覆上网，蜜蜂还是会来。

14枚蛋。

1939年5月31日

天气不错，很暖和，但太阳落山后就转凉了。西红柿（盖着粗布，免得阳光暴晒）长得还不错。有些四季豆和红花菜豆冒芽了。

穆里尔的交配过程并不顺利。我把它带回来后，发现它再也没产过奶（有两天了），而它的乳房也肿得很大。今天挤了奶，有一夸脱[14]，似乎不怎么酸，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因此减少产奶量。

17枚蛋（以2便士20枚蛋的价格卖了50枚）。

晚上看见了一只白色猫头鹰。

1939年6月1日

早上有点冷，稍后暖和了一些。风很大。开始给豌豆立杆，在鸡舍里新加了栖木。去掉了西红柿上的粗布。

11枚蛋。

1939年6月2日

天气很热，很干燥。风很大。幼苗有点儿蔫了。提特里的牡丹和耧斗菜都开花了，金银花也全开了。偶尔也能见到一些开放的美洲石竹。苹果长到了弹珠般大小，提特里的樱桃也差不多。

我收了一些晒干的荨麻作饲料，收了10枚鸭蛋，还收拾了一块地，准备种莴苣，并把小鸡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穆里尔受刺激了，产奶量急剧下降，昨天还不到1品脱。

15枚蛋。称了些鸡蛋，发现只有少数几枚不到20盎司重。

1939年6月3日

天气很热，也很干燥。我种了20棵提特里家的莴苣，还有1打（稍小一些的）我们自己的莴苣。像当初种西红柿一样，我也给莴苣盖上了粗布。艾琳种了7株大丽花。

母鸡把4枚鸭蛋推出了窝，但蛋已经凉透了。我换了一只母鸡孵蛋，拿走了1枚蛋。我不确定这样做的话，这些蛋还能不能孵出来（之前已经孵过24小时了）。

12枚蛋。以2先令20枚的价格卖了40枚蛋。这周一共收获了98枚蛋（外加7枚，一共是105枚）。

1939年6月4日

天气很炎热干燥。我给小鸡们搭建了更大的鸡舍，上面铺了粗布遮挡阳光。但我不得不把盖在莴苣上的粗布摘掉了，不过因为在一些地方也稍微盖了点粗布，所以莴苣才没有枯萎。一些美洲石竹花开花了，另一些小石竹花也是。晚上，这些花朵都会闭合，而欧洲蔓丛石竹则不会。我用香皂水喷了一遍青李子。今天，穆里尔产了1.5品脱奶，这样看来，它确实是恢复正常了。

14枚蛋。

艾琳昨晚又看到了一只白色猫头鹰。

1939年6月5日

天气热得让人难以忍受。所有东西都快要被晒得蒸发了。一朵美洲石竹开了花，仙翁花也是。我种了豌豆（“英国奇迹”那种），给西红柿盖了地膜。四季豆和红花菜豆的发芽情况不太好，于是我准备在盒子里再种一些。新种的那批马铃薯已经可以培土了，有一些已经发芽。

5枚蛋（可能是母鸡发情的关系）！

注意，我把半品脱的豌豆密集地种了一排（大约12码长）。

1939年6月6日

天气太热了，我不想到花园里工作，仅给之前种下的马铃薯培了土。

我们给母鸡换了福尔奥佩璞牌饲料，比克拉克的产卵期饲料糊要便宜些。在饲料中加了1英担谷物，这样也能省点钱。注意，今天才开始把1英担玉米和福尔奥佩璞牌饲料混合，每天用3磅，应该能撑到7月12日。孵蛋的母鸡不肯好好配合，每次喂食的时候，它都会跟别的鸡混到一起。不过，每次把它抓回笼子后，它都会过去孵蛋。

我看到了很多斑鸠。

11枚蛋。

1939年6月7日

天气又热又干燥，但有点风。晚上露水很重。

我种了两棵西葫芦，上面套了锡纸。之前，阿尔伯特·H[15]为我们磨了工具（花了1先令6便士），于是艾琳便用剪刀和割草机修剪了草坪，继续给豌豆插杆。

穆里尔产了将近1夸脱奶。我又买了一只山羊，是英国山羊和阿尔卑斯山羊杂交后的品种，上个月才生的，花了3英镑。

9枚蛋（加上5枚产在外面的，一共是14枚）。卖了20枚（2先令）。

1939年6月8日

天气很干燥，但并不太热。

我又准备了一块地，准备种西葫芦，这次挖的坑比之前浅一些，还铺了一层4英寸厚的草屑。之后我会比较一下这两种种植方式的结果。我给四季豆和红花菜豆除了草，只有一小半种子发了芽。我拿掉了盖在莴苣上的粗布。今天给苹果疏了果，只留了约60个果实，但可能最后只能剩下1打。

安布罗西亚花已经盛开，翠雀花也快开了。

穆里尔几乎没怎么吃东西，但产奶量没有下降。

12枚蛋（加上产在外面的7枚，一共是19枚）。

据说，鸭蛋的孵化期是28天到一个月，所以，大概在6月30日到7月2日之间，就会孵出小鸭子了。

1939年6月9日

天气相当干燥，但不太热，没有降雨的迹象。

我又种了两棵西葫芦，把之前盖在西葫芦上的粗布摘掉了，又除了草。芜菁都没了，洋葱剩下的也没几株了，还有一些已经枯萎了。我打算在下过雨后再种一些。除了莴苣，苗床里别的植物都没怎么发芽，好像一袋花椰菜种子里才有11颗发了芽。马铃薯现在已经长起来了，还不错。

艾琳把6只孵蛋的母鸡放在一个铁笼里，可能是为了保护它们。新买的山羊送来了。显然，它还没有被挤过奶。我给它挤了奶，大约有1.5品脱，晚上又挤出了半品脱。本以为能挤出来三四品脱，但这件事肯定会影响它，就像几天前影响了穆里尔一样。我准备让穆里尔轻松一些，逐渐减少它的产奶量，每天只挤一次，同时也会少喂它一些。穆里尔很嫉妒，总是用头顶那只新山羊，还偷那只羊的食物，而另一只山羊（给它起名叫凯特）也没有反抗。

10枚蛋。

1939年6月10日

天气极度干燥，也非常热。我给马铃薯除了草，除得相当彻底。莴苣和西葫芦长势不错。花园里的很多花正在凋零。雨水罐都快空了（这是头一次发生这种事，不过去年夏天只有艾琳一个人在这儿，我没在）。

凯特把自己绕在树桩上，接着后腿也被缠住，最后绳子死死绕在了它脖子上，没办法，我只能解开它的项圈，才救了它。结果，凯特有点瘸了，关节也肿了，但显然骨头没断。它今天的产奶量差不多在2到2.5品脱之间。

穆里尔（没挤完）的产量大概是1.5品脱。

8枚蛋（加上产在外面的9枚，一共是17枚）。以2先令20枚的价格卖了40枚蛋。

这周一共收获了90枚鸡蛋。

1939年6月11日

昨晚下了一场大雨，得有4到6小时，一切全都重新焕发了生机。今天是阴天，很凉爽。

正在盛开的野花有犬蔷薇、罂粟、剪秋罗、黑矢车菊（几朵而已）、鸡蛋培根花、轮峰菊（几朵而已）、接骨木和红豆草。野李子树上结了一些果子。凯特的腿好些了，但只产了2.25品脱奶，所以，我准备多喂它一些。

15枚蛋。

1939年6月12日

昨晚肯定下了雨。今天早上是阴天，而且非常冷，下午又下了4到6小时的大雨。

我给马铃薯除完草了，而马铃薯现在都已经成长起来了（我种了四排“伊壁鸠鲁”、十排“红国王”和两排“国王爱德华”。除了“伊壁鸠鲁”，其他的应该能有三英担的产量）。

孵鸭蛋的母鸡挪了两次位置，可能是下面挖洞的鼹鼠吵到了它，不过它倒是一直在孵蛋。

艾琳种了些半边莲。

12枚蛋。

1939年6月13日

阴天，间晴，偶尔有雨。

我把芜菁拔出来移植到别处，好让它们完成生长过程，对水仙花也是。开始搭建新的鸡舍（我花了17先令6便士从商店里买的，送来时没有涂木馏油，也没有搭毛毡顶棚，能住下10到12只成年母鸡）。H老先生又种了些莴苣。我开始给第一拨马铃薯再次培土，每四排间隔开来。我把孵蛋的母鸡引出来，希望至少能看到几只小鸭子。但我不得不扔掉1枚鸭蛋（现在只剩8枚了），因为母鸡把它给弄出来了。

有只寒鸦总在鸡舍附近转悠，显然是对小鸡图谋不轨。

11枚蛋。

1939年6月14日

又买了8只罗德岛红鸡，大概有三个月到三个半月大，它们长得很快，每只4先令6便士。

新的鸡舍搭好了，但还是没有涂木馏油，也没有铺上毛毡顶棚，而且门的地方也需要调整。看护第一拨小鸡的老母鸡的眼睛有某种炎症，可能得把眼球摘除了。

第三拨豌豆（矮的那拨，1939年6月5日种的）开始发芽了。盒子里的红花菜豆和四季豆（1939年6月6日种的）也发芽了。

昨天把铁笼子里的母鸡放出来了，所有（7只）都恢复正常了。

凯特现在一顿要吃11捧饲料，产奶量也增加了一些（差不多2.5品脱）。

12枚蛋（以2先令20枚的价格卖了30枚蛋）。

1939年6月15日

刮大风，很冷，偶尔有零星小雨。

我插好了竖杆，也绕好了铁丝，让红花菜豆顺杆生长。弄好了鸡舍的门，把它支起来了。

凯特的产奶量又增加了一些。

15枚蛋。

（注意，昨天开始服用新的补铁片。）

1939年6月16日

晚上下了大雨，白天也断断续续地下了一天，下午5点才放晴。外面太潮湿了，做不了什么。摆好了让豆子缠绕生长的绳子（太低了），准备再种一片芜菁，补上干旱中损失的那些。

今天给母鸡们喂了沙子和贝壳——这是我第一次喂它们吃这种东西，之前我以为它们生活在白垩土这种环境下，不用混这些东西吃。不过，最近的一些蛋壳尽管很薄，但却很粗糙。现在，新的鸡舍没建在地上，每天早上都有小鸡从缝隙中掉下来，所以得赶紧铺好底板，否则狐狸就会乘虚而入。

有的草莓已经红了。风铃草开花了，但需要插杆。下过雨后，草长得更好了。马铃薯地里的间隔似乎消失了。

15枚蛋。

1939年6月17日

天气晴朗，很暖和。

我种了康乃馨（混有多年生的品种），给鸡舍铺了毛毡顶棚，每码毛毡要9便士。

两只山羊的产奶量都大幅下降，肯定是昨天没吃草的缘故。在羊圈里的它们好像对硬质饲料也没什么胃口。

14枚蛋（以2先令20枚蛋的价格卖了）。

这周一共收获了94枚蛋。

1939年6月18日

上午天气不错，下午大部分时间都在下大雨。

今天我摘下了第一颗成熟的草莓。尽管有网子覆盖在上面，但鸟儿还是啄食了那些快要成熟的草莓。

凯特的产奶量仍在下降，今天只有1夸脱左右。

13枚蛋。

1939年6月19日

上午大部分时间天气都还不错，下午差不多一直在下雨，不怎么冷。现在地面太潮湿了，在花园里做不了多少事。往空地里移植了一些红菜头豆，种植了美洲石竹和桂竹香，修理了窗框，换上了玻璃窗。

我注意到玻璃窗上总会出现小洞，不知道能不能修补。开始给胡萝卜间苗，不过，由于干旱，大部分胡萝卜都已经间隔开了。

凯特的产奶量上升了（大概47盎司）。

15枚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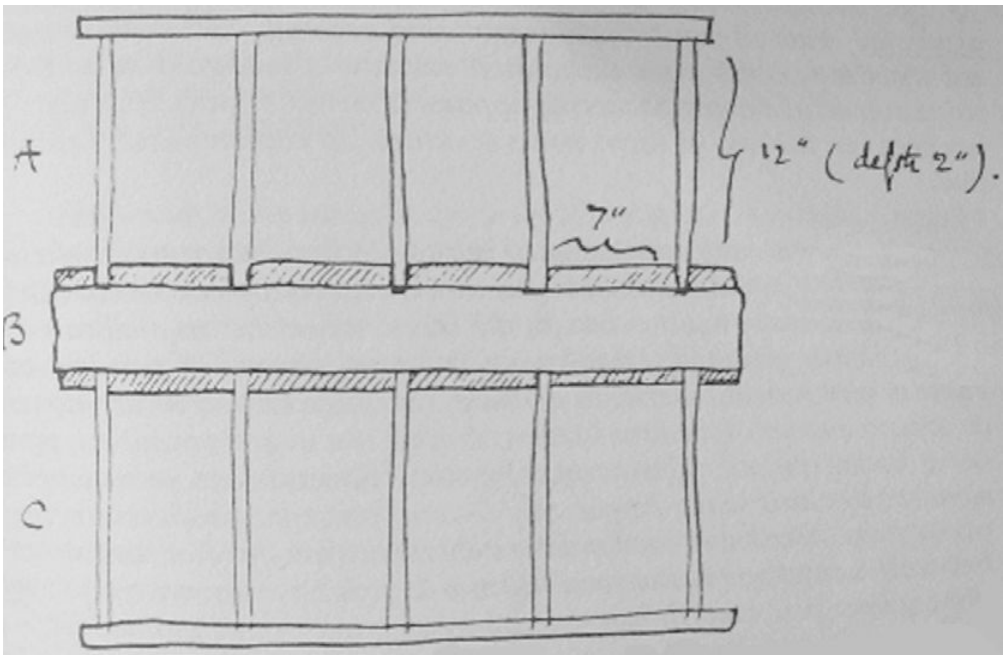
1939年6月20日

上午天气不错，下午有暴风雨。地面太潮湿，做不了太多工作。我又准备了一块地方，准备种花椰菜。牡丹快要开花了。攀缘蔷薇（黄色的）正在盛放。

16枚蛋。

下图为混凝土板模具。阴影部分用钉子钉住（比放入小栓更简

单）。A和C是木板，插入B中，侧板两段插入凹槽，并用重物使其固定。混凝土成型后，就可以取下A和C的部分。除了B部分，整件模具的长、宽分别为2英寸、0.5英寸。



1939年6月21日

天气有点冷，有风，下了一点雨。一整天屋子里都要生火。我没做什么户外工作；太冷了，也没让山羊出圈。常青风铃草（很小的花）开花了。

11枚蛋（以2先令2便士20枚的价格卖了40枚）。

1939年6月22日

一整天都很冷，风很大。早上有浓雾。没打理花园。

14枚蛋。

1939年6月23日

阴天，小雨，但不知为何，并不算太冷。今天我没打理花园。1939年6月19日种下的桂竹香（在窗台上）开始发芽了，而6月17日种下的康乃馨也发芽了。幸好下了雨，种在地垄上的胡萝卜露出了头。把英尼斯的大部分干草都捆好放进屋子里了。牡丹开花了。B夫人花园中的毛蕊也开花了。

1939年6月24日[16]

上午一直阴天，还下了雨。雨后天晴，也不太冷了。山羊在外面放养了一整天，这是这周的头一次。绿篱下，几株轮峰菊绽放，野花比一两周前要少。艾伯丁玫瑰更美了，但还没绽放。这种玫瑰和布什玫瑰的花苞都要半个月以上的时间才会盛开。我开始给马铃薯培土。尽管马铃薯长势不同，但都长在一起了，没什么空地。

14枚蛋。这周一共收获了96枚蛋。

1939年6月25日

夜幕降临前一直都很晴朗，也比较暖和。美洲石竹、两朵红玫瑰和一朵艾伯丁玫瑰都开花了。一株鼠尾草和金盏花也长出了花蕾。有些景天也已经开花，有一簇已经开了两三周了，而剩下的（都是仪器种下的）还含苞待放，所以景天的开花时间不怎么确定。

1939年6月26日

上午温暖而晴朗。下午有暴风雨的迹象，不过没有打雷，雨也不大。我给马铃薯培好土了。因为过了十几天，四季豆的发芽情况都不太理想，我就用窗台盒子里多种的四季豆补上了。四分之一的蚕豆植株上

都有墨蚊，但数量并不多，我给蚕豆掐了尖。风雨过后，四季豆依附生长的绳子缠绕到仪器了。显然，一排需要四五根竖杆。我给洋葱除了草，它们现在有三四英寸高了，但一排里有不少空余。菜豆和豌豆都生长得很快，红花菜豆的一些卷须已经比周六又长了几英寸。

12枚蛋。

1939年6月27日

天气很热，阳光不错。给胡萝卜疏了果，给豌豆除了草。我种了48棵烟草，拔掉了长势不好的美洲石竹。显然，虽然美洲石竹有时会连续几年都“快速成长”，但也不能揠苗助长。

15枚蛋，另有8枚在窝里。

1939年6月28日

今天凉快多了，偶尔会下雨。今天，哈切特先生切了干草收进屋子了。我在苗床里种了芜菁，还把一排蔬菜移植到了地里。两只母鸡今天都下了蛋，其中一只（较小的那只）还在鸡舍后面藏了3枚蛋。

14枚蛋，另有3枚在鸡舍里。

1939年6月29日

一天大多时候都很热，阳光不错。早上，一只小鸭子破壳而出。之后，我把母鸡转移到了新的鸡舍，让另一只母鸡孵化剩下的鸭蛋。晚上的时候，已经有七只小鸭子出生了，第八只还没有出生的迹象，但我还是让那只母鸡孵了一晚上。第一批小鸭的绒毛已经长好了，但还不能走路。显然，小鸭子走得比小鸡慢，因为“腿没有力气”（R夫人[17]说的）。我用可调节的粗布做了一个顶棚，往鸡舍里放了一盘水。

我给洋葱除了草，它们总算长起来了。西葫芦也在长，只有一个长得不错。

白玫瑰开花了。15枚蛋。

1939年6月30日

今天上午，小鸭子们还是跟着母鸡，但下午就自己出来吃东西了（黑面包屑配牛奶，加了一点点鸡饲料）。

一直打雷，下了大雨。

14枚蛋。

---

[1] 奥威尔的邻居。

[2] 穆里尔，奥威尔的山羊。（彼得·戴维森注）

[3] 奥威尔的邻居。

[4] 从1939年4月25日到5月9日都是艾琳的笔迹。

[5] 奥威尔的邻居。（彼得·戴维森注）

[6] 此处提到了米勒医院以及去格林尼治的行程。而艾琳的兄长劳伦斯·欧肖尼西就住在格林尼治。艾琳代笔书写日记可能说明奥威尔在欧肖尼西的指导下接受检查，应该住了一两天医院。（彼得·戴维森注）

[7] 可能是安德森先生，他是奥威尔在沃林顿的邻居。（彼得·戴维森注）

[8] 从5月16日起又是奥威尔的笔迹了。

[9] 可能是欧肖尼西家的园丁，也可能是格林尼治公园里的。

[10] 很可能是摄政王公园里的伦敦动物园。

[11] 结果就是虎狮，一种动物园的创造物。（彼得·戴维森注）

[12] 指回到了沃林顿。（彼得·戴维森注）

[13] 可能是尼古拉斯先生，奥威尔的邻居。（彼得·戴维森注）

[14] 夸脱，英美制容量单位，1夸脱约等于1136.52毫升。

[15] H一般代表“老哈切特”，因此这个人也许是奥威尔在沃林顿的另一位邻居，可能是阿尔伯特·霍林斯沃斯。（彼得·戴维森注）

[16] 1939年6月24日，奥威尔到索斯沃尔德陪伴病重的父亲。6月28日，其父理查德·布莱尔因癌症辞世。这期间，奥威尔一直陪伴在侧。6月30日，奥威尔回到了沃林顿。因此，6月24日到6月30日的日记由艾琳代写。（彼得·戴维森注）

[17] 可能是李德利太太，奥威尔的邻居。（彼得·戴维森注）

1939年7—9月

1939年7月1日

早上天气还不错，下午就下了大雨。花园里的植物生长状况良好。有些草莓成熟了，一些蚕豆也可以摘了，洋葱长得不错，红花菜豆才开始爬绳。我切了干草，捆成小捆，大概占了30平方英寸的地方，但不知道在这种天气下能不能保存。穆里尔的产奶量急剧下降。小鸭子们很健康，生机勃勃的，小鸡们也不错。红醋栗快成熟了。

金盏花（只有几朵）开花了。野轮峰菊也发芽了。

10枚鸡蛋（另有14枚产在外面，一共24枚）。

这一周以2先令2便士20枚的价格卖了72枚蛋。这周一共收获了120枚鸡蛋。

1939年7月2日

基本一天都是阴天，下午下了场大雨，很冷，得生火。两只守护小鸡的母鸡开始下蛋了，那只相对年纪小的会独自走开。这时，艾琳就会把它带回鸡群，留下年纪大的照顾小鸡。今天早上，年纪最小的两只鸡被啄伤了，很严重，尤其是那只不知道为什么长着白色鸡毛的。把这两只单独隔离后，我们准备让其他小鸡也马上离开那只母鸡，三只较大的已经能自己栖于高处了。

摘了约一磅重的草莓和一些蚕豆（有些还没熟，有些已经被啄空了，还有些完好的）。这些是花园第一批收获的作物。有的罗甘莓见红了。苹果长到了高尔夫球大小。山字草刚刚开花。

11枚蛋。

6月8日换的液化气用完了。

6月6日买的1英担福尔奥佩璞牌饲料明显少了，本应该能用到7月12日，实际上只能撑到8日或者10日了，因为我之前偶尔会用它喂小鸡。

1939年7月2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1]

（1）波兰宣布，如果但泽参议院支持德意志帝国，但泽地区就会被占领。（《星期日泰晤士报》）

（2）工党NCL[2]的德语广播和九月危机时的说法差不多。（《观察家报》）

2.党派政治

辛克莱、拉姆齐·穆尔、埃默里、伊顿、克里普斯和伯金都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反对德国入侵。（《星期日泰晤士报》）

1939年7月3日

今天暖和多了，差不多一整天都是晴天。

我种植了南瓜（种得有点晚，而且种植位置的光照并不充足），还给北侧的马铃薯培了土。地里没有空位，但有些植物还远没有成熟。我拔起了郁金香球茎。一块早熟的马铃薯枯萎了——我觉得不是因为病害。芜菁（1939年6月28日种的）开始发芽了。一只小母鸡的腿瘸了。

1939年7月4日

天气晴朗而温热。一些木莓变红了。草夹竹桃和佛手柑都长出了花蕾。今天早上，两只山羊逃出了羊圈，把不少水果树芽、玫瑰芽和夹竹桃的嫩枝都啃烂了。那只瘸腿小母鸡没有好转，可能得了某种瘫痪症，不过，这只小母鸡其他方面都挺健康的。给鸭舍装上了门，让鸭子们在外面跑一跑。今天用了新的1英担福尔奥佩璞牌饲料和1英担谷物。小母鸡们也开始吃谷物了，但还不能吃饲料糊。今天买了4只老母鸡，因此，饲料糊只准备24只母鸡的即可，谷物得准备够32只鸡吃的分量。因此，饲料糊应该能吃35天，谷物也差不多（每只鸡吃1.5盎司）。下次购买新的饲料前，得先用这批试试，看看效果。这一批估计能吃到8月8日，那天是周二。

今天，我开始给母鸡们喂卡斯伍德调味饲料。

1939年7月4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报道称伪满洲国与蒙古国在边境爆发战争。（《每日电讯报》）

2.社会

（1）目前，失业人数下降至135万人。（《每日电讯报》）

（2）1937年，英格兰及威尔士鸡蛋产量约为32.5亿枚。（《小农》）

1939年7月5日

天气很热，晚上下了一会儿雨。佛手柑长出了花苞。小白鸡情况不太好，瘸腿小母鸡的状况也没有好转。一些罗甘莓熟了，可以采摘。我开始给鸡舍涂木馏油。我种了萝卜、莴苣和西芹。艾琳种了四季豆。

10枚蛋（以2先令6便士20枚的价格卖了40枚）。

1939年7月5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伪满洲国边境战事的进一步报道。（《每日电讯报》）

2.党派政治

保守党的议员们请求丘吉尔进入内阁。《每日电讯报》的文章发表后，读者来信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愿。（《每日电讯报》）

1939年7月6日

一整天都在刮大风、下雨，但雨不大。天气太潮湿了，我没法进行户外活动。旱金莲开花了。玫瑰长得好极了。我又摘了2磅草莓（目前为止，一共摘了3.5磅了）我之所以要记下重量，是想看看这种面积大小的土地可以产出多少水果。

11枚蛋。

1939年7月6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英国向波兰、土耳其和罗马尼亚提供了1000万英镑的贷款，用于购买武器。（《每日电讯报》）

（2）波兰政府、土耳其政府及中国政府称，相信斯大林是真诚希望签订合约的。（《每日电讯报》）

2.党派政治

麦戈文再次抨击议会内的工党议员。（《每日电讯报》）

1939年7月7日

早上下了点雨，下午很热。我尽可能把洋葱移植到田地里了，但还是没种满。今天开始用一罐新的液化气了。

9枚蛋（以1先令半便士的价格卖了8枚）。

1939年7月7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本次关于伪满洲国边境的报道来自苏联方面（塔斯社）。（《每日电讯报》）

2.党派政治

国际工会联合会[3]苏黎世会议上，英国工党领导人支持苏联工会的加入。（《曼彻斯特卫报周刊》）

1939年7月8日

基本一整天都在下雨，晚上雨停了一段时间，风很大。我又摘了一些罗甘莓。一朵蜀葵刚刚绽放。红花菜豆长出了花蕾。西红柿开花了，西葫芦也开了几朵花。一两株金鱼草也即将开放。显然，小母鸡们是吃多了，还剩下了一点饲料糊。瘸腿的小母鸡没有好转，除此之外，健康状况还不错，所以我打算明天把它隔离起来。今天拔了几株自播生长的马铃薯植株，下面的马铃薯只有弹珠般大小。

今天开始给鸭子们喂饲料糊了。

10枚蛋（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了10枚）。这周一共收获了76枚鸡蛋。

1939年7月8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第一本《公共信息手册》（有关民防的内容）由邮局发行。今晚将在英格兰东南部进行大规模防空演习。（无引用出处）

2.党派政治

（1）国际工会联合会显然会拒绝苏联工会的加入，法国、墨西哥、挪威及英国的工会投了赞成票（但后两个国家是有条件的），美国及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工会投了反对票。（《每日电讯报》）

（2）对朱利安·比斯特罗的审判于今天在马德里举行，他曾参加过卡萨多议会。（《每日电讯报》）

3.其他

英国老鼠的数量大概有四五百万只。（《小农》）

1939年7月9日

温暖，没下雨。小苹果树（优士品种[4]）把枝条都压弯了，于是我们不得不找支撑物来撑住树枝。凯特的状况不太好，晚上没吃东西，而且生病了，还把反刍的食物吐了出来。不知为何，穆里尔的胃口也不太好。我怀疑这与它们在烈日下暴晒有关。

我发现了一些野生风铃草。林鸽还在孵蛋。尽管花园里的苹果长势良好，但那棵大树上并没有结山楂果。

似乎没有野樱桃。鸟儿把花园里的几株红醋栗给毁了。晚上捉了一些蝾螈蝌蚪并带回了家。它们先长出了前肢[5]（蟾蜍会先长出后腿——不确定青蛙是否如此），而且每只蛙掌上都长出了四根指头。它们比蟾蜍灵活得多，被追击时会钻到土里。据埃迪·W[6]所说，如果把成年蝾螈和蝌蚪放进同一个水箱，那么蝾螈就会吃掉蝌蚪。发现了一只水蜗牛，

它的壳很大，有我食指前两个指节那么长，这是我见过的最大个的水蜗牛。

我种了一株蔓性蔷薇，但我觉得种得有点早[7]，又采摘了罗甘莓。

23枚蛋。

1939年7月9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塔布依夫人认为苏、法、英三国签订条约的可能性很小，并暗示苏联希望重新将波罗的海附近的省份收回，如沙俄帝国时代一样。（《星期日电讯报》）

2.社会

苏格兰的人口总数已超过了五百万。（《星期日泰晤士报》）

3.党派政治

国际工会联合会拒绝了苏联工会的加入，不过并非以通过大多数否决的形式完成的。[8]（《星期日泰晤士报》）

1939年7月10日

阴天，温暖，没有风。蜀葵开了几朵花。圣母百合和佛手柑也要开花了。今天只是除了草，没再做其他花园里的工作了。凯特的胃口有点儿好转，但今天的产奶量还是很低（只有1.25品脱）。昨天，艾琳摘了大概1.5磅的草莓。

10枚蛋。

1939年7月10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据说，德国除了要求得到罗马尼亚全年产出的小麦，还想要1938年小麦的剩余部分。（《每日电讯报》）

（2）周六晚上进行的大规模熄灯演习据说很成功。（《每日电讯报》）

2.社会

朋友们一起参加民兵时会被拆散，这种现象非常常见，人们要求陆军部给出解释。[9]（《每日电讯报》）

3.党派政治

（1）7月3日，再次呼吁让丘吉尔进入内阁的报纸有《每日电讯报》《约克郡邮报》《新闻纪事》《曼彻斯特卫报》以及《每日镜报》。据说，共产党曾连续几个月要求让丘吉尔进入内阁，现在在这件事即将成真时，他们却警觉起来。（《社会主义通讯》）

（2）又有报道称贝拉·库恩在莫斯科被处决。（《无产阶级革命》）

1939年7月11日

今天天气暖和，但阳光并不充足。我摘了90多株桂竹香（火红色的）。T[10]觉得瘸腿的小母鸡可能是得了“某种疾病”（也许是球虫病），所以不得不杀了它。这种病确诊的症状是黄色的排泄物，但显然，左腿瘸掉是最初的征兆。

给山羊喂了棉籽饼，看看它们会不会吃。凯特的产奶量回到正常水平了（2.5品脱）。摘了2磅草莓。苏塞克斯母鸡开始换羽。

12枚蛋。

1939年7月11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有关伪满洲国边境冲突的进一步报道，足以说明双方已经开战了，虽然这场战争并非起决定性的作用。（《每日电讯报》）

（2）张伯伦的演讲再次强调，如果但泽被占，我们应该支持波兰，但似乎得等波兰人率先表态。（《每日电讯报》）

（3）德国报道称，苏联潜艇舰队的规模比预期更大，战舰首次在斯大林运河行进。（《每日电讯报》）

2.党派政治

《每日电讯报》又刊登了要求让丘吉尔进入内阁的消息，但报道中并没有强烈批评张伯伦。《每日电讯报》也刊登了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文章。而《泰晤士报》则说不会刊登任何持反对意见的文章。（《每日电讯报》）

3.其他

哈弗洛克·埃利斯去世了，享年80岁，《每日电讯报》头版有字号很小的讣闻。（《每日电讯报》）

1939年7月12日

天气有些热。圣母百合开花了。

篷子菜、锦葵和矢车菊夜开花了。石楠生了针褥瘿。

不是每次喂山羊吃棉籽饼它们都会吃，于是我决定一周喂它们一

次。

12枚蛋（以2先令8便士的价格卖了15枚）。

1939年7月12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意大利蒂罗尔省驱逐了除美国人以外的其他外国人。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德国军队进入意大利的事实。《旗帜晚报》的通讯员称那是空穴来风。（《每日电讯报》《旗帜晚报》）

（2）张伯伦的讲话显然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重视。（《每日先驱报》）

2.社会

（1）J.A.斯本德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封信，抨击A.辛克莱爵士，爵士拒绝对此书信做出回应。今天，几位知名自由党人士给《每日电讯报》寄送了一封联名信披露此事，于是《每日电讯报》便刊登了这封联名信。（《每日电讯报》）

（2）工党提出了对农业发展法案的修正案，想将农业工人的最低工资设为2英镑（目前平均工资为35先令）。该提案最终因四票之差而被否决。（《每日先驱报》）

3.党派政治

以《宇宙》为代表的天主教媒体目前强烈反对纳粹的所作所为，但并不太反对意大利。同时，在涉及西班牙事务时，天主教媒体则强烈反共。（《宇宙》）

1939年7月13日

天气很热。我把瘸腿的小母鸡隔离了，再观察一下情况。

14枚蛋。佛手柑开花了。

1939年7月13日

1.社会

J.A.斯本德继续攻击辛克莱爵士。《泰晤士报》刊登了其他抨击辛克莱爵士的信件，但持反对意见的文章则一篇都没有刊登。（《泰晤士报》）

2.党派政治

从某种角度看，工党拒绝与独立工党进行有条件联盟，而独立工党显然不同意无条件联盟。（《泰晤士报》《新领袖》）

1939年7月14日

天气暖和，但是多雨。我把草莓上的网撤掉了，开始除草，但在旋花疯长的时节，除草的难度很大。

夹竹桃（多年生）开花了。

12枚蛋。

1939年7月14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第二本《公共信息手册》（有关遮掩窗户等内容）今天发行了。德国游客说德国还没有开始分发防毒面具。（无引用出处）

2.社会

（1）《曼彻斯特周刊》刊登了关于斯本德信件的相关事实，也刊登了博汉姆·卡特对此事件的回应。（《曼彻斯特卫报周刊》）

（2）发行3周后，共产党反对征兵的手册被召回了。（《左翼论坛》）

1939年7月15日

天气暖和，晚上下了一会儿小雨。我尽可能给草莓除了草，摘下了成熟的那些。更多果实正在成长，但我怀疑如果没有网的话，这些果实应该都收获不了。[11]昨天发现了一个画眉的窝，里面有蛋（成鸟正在孵蛋）。一只白母鸡不见了——没准儿是坐在某个窝上，但我担心可能是丢了，因为从昨天起它就不见了。

14枚蛋（以2先令8便士的价格卖了40枚）。这周一共收获了86枚蛋。[12]

布彻说母鸡们的产蛋量又提高了，所以鸡蛋价格要跌了。

1939年7月15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东京爆发了反对英国大使馆的大规模游行。（《每日电讯报》）

（2）攻占巴士底狱150周年庆祝活动上，3万名士兵参与了阅兵式，其中有英国军人。（《每日电讯报》）

2.社会

（1）据说，德国已有5万人阅读了史蒂芬·金-霍尔中校的信件，该

信件在流通时使用了不同大小的信封和折叠方式，没有落到盖世太保手里。（《每日电讯报》）

（2）法国开始进行大规模揭发间谍的活动（参照美国的做法），并逮捕了各种与右翼报纸相关的人士。（《每日电讯报》）

3.党派政治

（1）经济协会指责和平请愿联盟是纳粹宣传的走狗。（《每日电讯报》）

（2）据说，反征兵联盟的个人会员已达到了4500人。附属机构包括281个妇女合作社、30个同业公会及工会分支、37个工党及妇女分部、10个合作党派、53个反征兵联盟分支机构以及其他机构。共产主义媒体指责反征兵联盟是法西斯团体。（《反征兵》《工人日报》）

4.其他

观看伊顿-哈罗大赛的人数预计将达到1万，据说，这是几年来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无引用出处）

1939年7月16日

上午下了场急雨，此后还算暖和。那只走丢的白母鸡回来了，肯定是在别的地方过夜了。我注意到英尼斯在割草机的链条和螺栓上镀了一层铜，就像我之前试着往钉子上镀铜一样。因此，这表明我的想法毕竟还不算特别不切实际。我之前弄的时候把螺栓的螺纹挡住了，于是就拧不动了。

森林里所有的小水塘都干涸了。我看到过一只水鸡筑的巢，之后水塘干涸后，它就不得不离开了。

风铃草结籽了，石楠正在结果。

12枚蛋。

在玻璃上钻孔（按照《小农》上的说法）：使用小螺旋钻，用玻璃刀确定位置，钻一两下，之后抹上油脂，喷上金刚砂或碳化硅后，轻轻下钻，不可用力。

1939年7月16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7月31日起，12000名海军预备役士兵将被征召约7周。（《星期日泰晤士报》）

（2）人们普遍认为，英苏条约不会签订。（《星期日泰晤士报》《星期日快报》）

（3）让丘吉尔进入内阁的真正目的是摆脱张伯伦。（《星期日快报》）

2.社会

（1）关于昨天被征召的3万名士兵的反对意见均没有提及。（无引用出处）

（2）从某种程度上看，利德尔·哈特[13]在《星期日快报》上发表的文章（有关潜艇威胁）有些扰乱人心。（《星期日快报》）

3.党派政治

（1）自由党保住了北康沃尔的席位，小幅度增强了之前的弱势地位。两位候选人的选票都大幅增加。（《每日电讯报》）

（2）比弗布鲁克的媒体指责和平请愿联盟支持纳粹，并且其未能正确引用文章。（《和平新闻》）

4.其他

伊顿-哈罗之间的比赛以打斗结束，这是自1919年以来的第一次。

（《星期日快报》）

1939年7月17日

上午还算暖和，下午有暴风雨。

摘了第一拨豌豆，大约有1磅重。芜菁看上去长势不错，没怎么被虫子咬，我给它们疏了疏苗。开始整理土地，准备种蔬菜了，但是地太潮湿，干不了太多活儿。

显然，就算大雨倾盆，在外面筑窝的母鸡还是会坐在窝里。放进水缸里的小螺螈蝌蚪似乎消失了。我估计是大蝌蚪把它们吃了，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件事应该是发生在晚上的。我发现水蜗牛能爬到水面的高度，而且还能浮在水面上——或者它们本就能浮在水面上，只是靠吸盘才能留在水底。[14]

1939年7月17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英国派出巡洋舰，对抗青岛进行的反英游行。东京对话显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每日电讯报》）

（2）英苏条约只出现在《每日电讯报》的头版。（《每日电讯报》）

2.社会

《每日电讯报》确认周六的征兵启示涉及的士兵（三万四千人）中，无一人缺席（生病等情况除外）。（《每日电讯报》）

3.党派政治

（1）印度国大党左翼（也就是“国大社会党”）反战的态度更为强

硬。他们发表了文章，从托洛基主义者的角度对共产党进行了猛烈抨击，但其另一篇文章则要求建立民主同盟。（《国大社会党》）

（2）独立工党在和平主义革命方面分歧严重。独立工党的成员们（伦敦分部）在《社会主义通讯》上发表了长篇声明，这也是对麦戈文的另一次抨击。（《社会主义通讯》）

1939年7月18日

一天基本都在下雨。地面太潮湿，做不了户外工作。

第一株西葫芦上长出了雌花。

11枚蛋。

1939年7月19日

阵雨，但大部分时间是晴天。所有植物都生长得很快。豌豆长了不少。西红柿长成了弹珠大小。一两个西葫芦长到了花生大小。

不知道是有小母鸡提前下蛋了，还是小母鸡在看护老母鸡下的蛋，总之，我今天在窝里找到了1枚鸡蛋。

我种下了风铃草（可能种得晚了，但如果把它们当成三年生的植物对待，它们也能长得很好。）

13枚蛋（有2枚很小）。以4先令3便士的价格卖了35枚（2先令6便士20枚——应该卖4先令4便士半的）。

1939年7月19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政府建议各家各户储存不易腐坏的食物，相关手册将很快发行。（《每日电讯报》）

（2）《每日电讯报》用了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整个英国战舰的图片。（《每日电讯报》）

（3）据悉，赴莫斯科的德国经济代表团的进展和英苏条约的谈判进展一样，暗示着三角谈判仍将继续。（无引用出处）

2.党派政治

（1）人民党首次出现是在海斯的补缺选举中。（《每日电讯报》）

（2）似乎利德尔·哈特的新书《保卫英国》让霍尔-贝利沙[15]收益不少。（《每日电讯报》，1939年7月18日）

1939年7月20日

早上有些阳光，其余时间基本都在下雨，没法做户外工作。我注意到，这种天气下，母鸡们通常没什么胃口。就算雨一直不停，干草堆最上面的几堆仍是干的。山羊们因为吃了湿乎乎的草，有点轻微腹泻。

《每日电讯报》今日刊登了一封信称，如果一个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使用电，那么除去定期用木炭取暖外，每年至少要用掉1800到2000单位的电。

12枚蛋（有1枚很小——是老母鸡下的）。

1939年7月20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第三本《公共信息手册》（有关撤离的内容）今日发行。晚上，这个村子里的探照灯至少有4盏。（无引用出处）

（2）但泽方面的消息似乎说明，所有人都认为但泽很快就会落入德国人之手。（《每日电讯报》）

（3）据说，法国倾向于接受英苏条约中苏联的条件，而苏联并没有更改有关波罗的海诸省的相关立场。（《每日电讯报》）

2.社会

（1）《人道》的一位编辑在巴黎警方排查间谍的行动中被问话了，但报告中未说明是正常问话还是因有共谋嫌疑而被问话。（《每日电讯报》）

（2）最近，陆军部规定任何军官不得辞职，这似乎是为了避免军士长买断服役期（目前价格为35英镑）而采取的措施。（《每日电讯报》）

1939年7月21日

天气还可以，但上午阴天了，还有点潮湿，下午又有暴风雨。小麦逐渐变黄了。我种了韭葱（38颗一排）。野草四处蔓延。上午，一株西葫芦的雌花开了，晚上闭合了，可能是完成了授粉。由于前一天的腹泻，山羊们的产奶量下降了。醋栗快成熟了。

13枚蛋。

1939年7月21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波兰的高级官员在但泽边界被暗杀，造成了“紧张感”。（《每日电讯报》）

2.社会

（1）《泰晤士报》的头版文章解释了（但没有太大说服力）斯本德公开信一事。（《泰晤士报》）

（2）《曼彻斯特卫报周刊》刊登了一封长信，鼓吹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政权。此外，还发表了一封对此做出回应的信件。（《曼彻斯特卫报周刊》）

3.党派政治

（1）保守党保住了海斯的议会席位，但其优势地位仍被削弱了，只得到37%的选民投票。人民党候选人得到了五六百张选票。（《每日电讯报》）

（2）伦敦独立工党内部的明争暗斗仍未见分晓，但显然已经弱化，变成了执行委员会与伦敦分部委员会的争吵。前者希望独立工党吸收更多的和平主义者，而后者则多少有托洛基主义倾向。明显，前者有希望占上风。（《新领袖》）

（3）议会就巴勒斯坦、非法移民等问题进行了辩论，争论不如预期中的激烈。（《每日电讯报》）

1939年7月22日

阴天，有些压抑。晚上下了一个小时的大雨。艾琳拔了三株早熟马铃薯（刚种下了三个月），一共挖了约1磅马铃薯，但还有些小马铃薯还在长。

12枚蛋（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了15枚）。这周一共收获了84枚。

1939年7月22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传言称英美即将与德国签订协议，据说与赫尔穆特·沃尔塔特[16]的到访有关，却尚未获得内阁的支持。10亿英镑的贷款以及对原材料的获取权利是协议的条件，以换取国际监督下军备的解除。（《每日电讯报》）

（2）苏联舰队进行了演习，显然是为了震慑波罗的海诸国。（《每日电讯报》）

2.社会

《每日电讯报》的闲话栏称，将近一百名保守党议员是地方自卫队士兵或皇家空军资源预备役士兵。（《每日电讯报》）

3.党派政治

（1）凯波·德·拉诺被解除了职务。（《每日电讯报》）

（2）《工人日报》对我的小说做出了正面评论。[17]（《工人日报》）

1939年7月23日

晚上有小雨，其余时间都很干燥，阴天，不怎么暖和。风信子开了许多花。我发现了第一颗成熟的露莓。有些地里的燕麦已经快熟了，小麦粒还是乳白色的。周围飞来了海鸥——这在此处可不常见。李德利的一朵大丽花开花了。

12枚蛋。

1939年7月23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从今天的报道来看，昨天本栏目中提到的提议似乎真的在讨

论中，但只是非正式的。内阁称对此毫不知情，可能只是放出风声，试探公众对此的态度。条件包括向德国贷款（未说明金额）、原材料的获取、与德国共同管理某些非洲殖民地、反对部分解除武器，以及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星期日泰晤士报》《星期日快报》）

（2）现在看来，与苏联订立条约已然无望。

（3）地方自卫军与海军预备役的征召暗示了8月第一周可能会有危险情况出现。（《星期日泰晤士报》）

2.党派政治

（1）据说，凯波·德·拉诺被解职的原因是他反对西班牙与轴心国联盟，并威胁宣布安达卢西亚的独立。（《星期日快报》）

（2）国家自由党人意图在布雷肯的补缺选举中分化政府的选票。（《星期日快报》）

（3）支持法西斯主义的《飞机》杂志编辑（格雷）因不明原因辞职。（《星期日快报》）

（4）比弗布鲁克的媒体现在更加反对与苏联签订条约，比之前几个月更加支持独立主义。（无引用出处）

1939年7月24日

早上天气晴朗，下午则又阴又冷。现在盛开的野花有仙鹤草、圣约翰草、红色野荨麻花、野木樨草、夏枯草、蜀羊泉和刺耳。我在教堂墓地的草地中发现了一窝野蜜蜂。飞蛾的巢和睡鼠的很像。大丽花长出了花蕾。今天摘下了第一拨莴苣，还摘了昨天成熟的以及第一批成熟的醋栗。豌豆长了不少。

14枚蛋（有1枚很小）。晚上下了小雨。

1939年7月24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与沃尔塔特的对话由R.S.赫德森（海外贸易部）主持，第二天，赫德森向首相做了汇报。显然，这件事是在获得许可的前提下故意披露的。意大利媒体的报道暗示，那（与德国合作）是一种威胁，意在震慑苏联。英苏条约再次占据了头版，报道暗示斯大林非常愿意签订条约。德国贸易对话恢复，可能是为了威胁英格兰。（《每日电讯报》）

（2）蒙古国边境交战事件是真的。（《每日电讯报》）

（3）日本媒体预测本国将就天津问题向英方提出条件，显然，英方不会接受。（《每日电讯报》）

1939年7月25日

天气很好，很热。费了一番功夫，把干草堆好了。12枚蛋（1枚很小）。

1939年7月25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英日协定措辞含糊，但事实上是英国做出了让步，相当于做出了不会帮助中国人的承诺。张伯伦简称英国政策没有变化。（《每日电讯报》）

（2）英苏条约再次出现在头版，而且签订条约的可能性变大。（《每日电讯报》）

2.社会

应对爱尔兰共和军的法案将禁止外国人入境、驱逐外国人并强制外国人登记。此外，如遇紧急情况，警长可以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进行搜查。据说，法案有效期仅为两年，该法案的通过未遭到强烈反对（以218赞成票和17反对票通过）。（《每日电讯报》）

1939年7月26日

天气晴朗温暖。我尽量用茅草盖住了屋顶，但做的不太好。然而，这也只是练习，为以后有更多干草的时候做准备。茅草堆的长、宽、高分别为8英寸、6英寸、5英寸。我给卷心菜和芜菁除了草，两种植物的长势都不错。

11枚蛋（其中1枚很小）。以2先令6便士20枚的价格卖了35枚（一共卖得了4先令3便士——本应该卖4先令4便士半）。

1939年7月26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国际媒体普遍认为英国已经在与日本签订的条约中做出让步。（《每日电讯报》）

（2）240架飞机再次飞到法国上空示威。据说，英法战机的产量现与德国的持平。（《每日电讯报》）

2.社会

全国记者联盟及英国职工大会合并的议案以微弱劣势被否决（投票结果显示，该提议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支持人数并未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每日电讯报》）

3.党派政治

（1）显然，佛朗哥履行了对轴心国的承诺，可能是在6月反对凯波

·德·拉诺、雅戈及其他人的政治清洗中获得了回报。（无引用出处）

（2）李维诺夫肯定受到了羞辱。（《每日电讯报》）

1939年7月27日

很热。晚上落了几滴雨。

鸡舍里有很多红蜘蛛，显然与天气炎热有关。我用开水和硫黄除红蜘蛛，希望有效果。注意，管道工人的喷灯是最佳工具。天气炎热时，母鸡们的胃口也不如往常好。我移植了一些莴苣，又除了草，就没做别的了。南瓜已经生根，但还没有长大。水蜗牛好像产了些卵，我不知道水蜗牛是不是双性的。

注意，储藏罐里20加仑[18]的空间可以储藏1英担饲料，谷物可以放得更多一点（大约1.25英担）。

14枚蛋（两枚较小——估计有只小母鸡在下蛋了）。

1939年7月27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伪满洲国边境仍在战火之中。据说，日军打算封锁俄属库页岛。（《每日电讯报》）

（2）法、英、苏准备进行参谋级别对话。有关波罗的海诸国的问题明显未得到解决。（《每日电讯报》）

（3）第四本《公共信息手册》（有关食品储藏的内容）今日发行。（无引用出处）

2.党派政治

（1）保守党保住了蒙莫斯的席位，但其优势地位被削弱了。两位候选人的得票数都下降了。（《每日电讯报》）

（2）凯波·德·拉诺被任命为西班牙驻阿根廷大使。（《每日电讯报》）

（3）1939年7月27日第20期《新英国周刊》总结了各个反战组织所做的努力。（《新英国周刊》）

（4）投票反对爱尔兰共和军法案的议员们（共19位）包括加拉赫、普利特和克里普斯。（《新领袖》）

1939年7月28日

昨晚下雨了。很热。我只除了草，割了蓟。

9枚蛋。

1939年7月28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美国显然决定废除与日本的贸易协定。（《每日电讯报》）

2.社会

（1）显然，政府在考虑提高养老金，这一举动无疑是为了大选。（《每日电讯报》）

（2）据说，加拿大大奴湖附近发现了大片金矿。（《每日电讯报》）

（3）小农以及小农场主显然受到了征兵令的影响。根据《军事训练法案》，第一特别法庭得处理20位拒绝服役的人，而这20个人拒绝服

役均不是出于政治原因。（《小农》《每日电讯报》）

3.党派政治

（1）莫斯科进行了新一轮政治清洗，其中被清洗的包括苏联驻蒙古国大使塔里奥夫。（《每日电讯报》）

（2）法国将价值800万英镑的西班牙黄金移交给了佛朗哥。（《每日电讯报》）

（3）根据《军事训练法案》，和平请愿联盟、反征兵联盟与和解之友协会将在第一法庭中获得代表权。（《每日电讯报》）

1939年7月29日

昨晚肯定下了点儿雨。今天很热。我清理了荨麻。6枚蛋（可能跟天气热有关系）！以2先令6便士20枚的价格卖了25枚。

这周一共收获了78枚鸡蛋。

1939年7月29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法国大选推迟两年进行（即推迟至1942年）。（《每日电讯报》）

（2）显然，西班牙国内的轴心国支持者（苏涅尔）以及传统势力（尤其是雅戈等将军们）正在进行相当激烈的斗争。一旦开战，佛朗哥可能还会保持中立。（《曼彻斯特卫报周刊》《每日电讯报》）

2.社会

《人道》的编辑因印发多篇指控德国在法国安插间谍的文章而受

审，最后被无罪释放。法庭对另一位撰写反犹太主义文章的记者签发了逮捕令。[19]（《每日电讯报》）

3.党派政治

（1）工党保住了科恩瓦力的选举，并巩固了多数党地位（工党选票增加了约一千张，自由党及反对派各减少了两三千张）。（《每日电讯报》）

（2）根据《曼彻斯特卫报》提供的数据，自5月起，每周有三百到五百人（共和党人）在加泰罗尼亚被枪决。（《曼彻斯特卫报周刊》）

4.其他

昨天，皇家卫队首次以散列队形进行了军旗敬礼分列式。（《每日电讯报》）

1939年7月30日

昨晚下了一点雨。今天很热。风铃草发芽了。今天拔了第一拨萝卜。地蜈蚣很恼人。

10枚蛋（2枚比较小）。

1939年7月30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议会应该如之前一样暂休至10月，暂休期间不开会。（《星期日泰晤士报》）

（2）现在已有六万名德国士兵（包括警察和纳粹党突击队员等）驻扎在但泽。（《星期日泰晤士报》）

（3）《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貌似权威的文章，称如果开战，南斯拉夫肯定会保持中立，但如果与苏联订立了条约，并且克罗地亚人同意给予其自治权，则南斯拉夫可能会支持同盟国。南斯拉夫有一千四百万人，包括五百万塞族人、五百万克罗地亚人、五十万匈牙利人、五十万德国人，其余的可能是斯洛文尼亚人。下层民众对大斯拉夫的感情很强烈。（《星期日泰晤士报》）

2.社会

（1）达拉第的一条政令是建立首相直接控制的宣传部门。行政部门的工作时间从每周40小时提高到了45小时。据说，法国目前的黄金储备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法国银行的黄金持有量为5.6亿英镑。（《星期日泰晤士报》）

（2）爱尔兰共和军嫌疑人中的大部分已被驱逐（目前有20人）。（《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

1939年7月31日

今天大部分时间都是阴天，中午时下了大雨，雷声轰隆轰隆。我给洋葱除了草，还移植了35株康乃馨。1939年7月11日种下的桂竹香现在已经有三四英寸高了。蜀葵刚刚开出了白色的花朵。现在，最初黑色的种子已经长出了四种颜色（深红色、淡红色、淡粉色和白色）。豌豆长势很好，数量多到我们都吃不完了。

今天早上用完了最后1英担谷物。这批谷物是从1939年7月4日开始用的，我之前以为能维持到8月10日，但过去三周时间里，我只用这个喂那八只小母鸡，有时候还会喂六只小鸡。和谷物一起买的福尔奥佩璞牌饲料还剩下三分之一。

11枚蛋。

1939年8月1日

天气暖和，下了点儿雨。我移植了桂竹香（黄色的）和美洲石竹的幼苗。大概算了一下，每排豌豆（约12码长）可以长出15到20磅的果实。今天开始使用新的1英担的小麦和粗玉米粉。这要用来喂养23只成年家禽和8只小母鸡（马上就是成年母鸡了）。按照每只鸡每天吃1.5盎司计算，这批谷物能支撑到9月8日。

10枚蛋（3枚小的——有3只小母鸡开始下蛋了）。

1939年8月1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本周，军事代表团可能出发前往莫斯科。代表团团长（普伦基特—厄恩勒—厄尔勒—德拉克斯上将）在大战前访问过苏联。（《每日电讯报》）

（2）波兰政府对但泽实行经济制裁，拒绝从那里的某些工厂进口产品。（《每日电讯报》

2.社会

（1）7月失业人数大约为125万人，比1938年同期减少了50万人。有保险的就业人数接近1300万人，与去年同期增加了五十多万人。（《每日电讯报》）

（2）第一批征召的34000名士兵中，只有58人无故缺勤。（《每日电讯报》）

（3）孟买管辖区开始实行禁令。（《每日电讯报》）

3.党派政治

（1）凯波·德·拉诺被任命为西班牙驻意大利军事代表团团长。（《每日电讯报》）

（2）《社会主义通讯》称投票反对爱尔兰共和军提案的工党党员

受到威胁，可能会受到工党议会党团的处分。（《社会主义通讯》）

（3）西班牙共产主义革命党青年团设法分发了一些传单。（《社会主义通讯》）

4.其他

（1）除掉欧洲蕨的新方法是先割草，再喷洒氯酸钠，每英亩只需要用20英镑氯酸钠，就可以彻底清除欧洲蕨。（《每日电讯报》《农民与畜产业者》）

（2）今年欧洲小麦的产量约为4400万吨，超过了苏联，比平均产量略高，但比去年的总产量减少了14%。（《每日电讯报》）

1939年8月2日

基本一天都是阴天，很冷。我今天只完成了除草的活儿。

12枚蛋（可能有2只小母鸡也产了蛋）以2先令6便士20枚的价格卖了30枚。

1939年8月2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今天，配给卡已印刷完毕，准备分发。（《每日电讯报》）

（2）张伯伦的演讲在苏联全境广播。（《每日电讯报》）

（3）几位乌克兰领导人在波兰被捕。（《每日电讯报》）

2.社会

（1）工党议员在议会中抗议民兵的生活条件太差，提到8名民兵要

睡在同一顶帐篷里。（《每日电讯报》）

（2）德国犹太难民似乎定居在伦敦某些地区，如戈尔德斯·格林附近。他们的资金充足，可以购买房产。（来自C.W的私人消息）[20]

3.党派政治

（1）传言称，在巴黎的西班牙难民高层因金钱及内格令和普列托发生了争执。（来自R.R的私人消息）[21]

（2）韦奇伍德上校在纽卡斯尔安德莱姆区的天主教选民（已有五千人，大多数都是工人阶级）提出请愿，称将投票反对韦奇伍德上校。（来自C.W的私人消息）

1939年8月3日

从早上到晚上8点一直在下雨。一两朵大丽花开花了。昨天我看到了黑色大鼻涕虫（伸展时约有4英寸长），它们总是在这个时候出来活动。我注意到鼻涕虫脑袋后面一点的位置有个奇怪的小洞，好似有节奏地开合，里面有西米露一样的白色物质，这是它的呼吸孔吗？

我收割了一些燕麦，差不多要成熟了，看上去很不错。小麦还没有成熟。

云兰开花了。野李子树上只结了一两个果实。

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给穆里尔喂了打虫药，打药之前还得先饿它一天才行。

12枚蛋（1枚很小——1只小母鸡现在下的蛋大一些了）。

1939年8月4日

基本一整天都在下雨，偶尔会放晴，有风。地面非常潮湿，植物长

得很快。我又拔了一些早熟的马铃薯（有三个半月了）。成熟的并没多少。今天早上我看到那只走失的母鸡了。安德森太太说自己连续几个早上都看到了那只母鸡，觉得它应该是藏在田地西边浓密的灌木丛里了。那只母鸡偶尔会出来找吃的，通常都是非常早的时候。问题是，它可能在孵好蛋之前就会被狐狸或者野狗吃掉。

12枚蛋（3枚小的）。

1939年8月4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英法军事代表团明天搭乘慢船启程，一个星期后到达列宁格勒[22]。《星期》报纸暗示这次出访目的性并不强。从芬兰报纸及瑞典外交大臣的演讲看，波罗的海诸国非常紧张。（《每日电讯报》《曼彻斯特卫报周刊》《星期》）

（2）据说德国正在考虑将斯洛伐克移交给匈牙利，以便匈牙利脱离波兰。还有留言称斯洛伐克的木料、食物和机械正在被系统性地销毁。（《曼彻斯特卫报周刊》）

2.社会

议员曼德（自由党）宣称英德协会是个支持德国的组织，并就是否能将其取缔的问题征询国土安全部门的意见。霍尔回复说，除非某个组织违法，否则不可随意将其取缔。（《每日电讯报》）

3.党派政治

工党以2500票的优势赢得了布雷肯区和拉德诺区的选举。工党得到的选票增加了750张，支持政府的选票减少了约4000张，此外，总投票数也有所下降。（《每日电讯报》）

4.其他

即将出版我的新书的信天翁出版社要求我删除部分（尽管不是全

部）对希特勒不友好的引用，因为他们出版的书主要在德国发行，因此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此外，他们还要求我删除一段文章，大概有1页，因为该段落暗示了战争的临近。（来自F的私人消息）

1939年8月5日

下午六点半雨才停。白天有段时间，雨非常大，据说鲍德克大街都被淹了。西葫芦涨势迅猛。四季豆和红花菜豆有三四英寸长了。苹果长得很快。

1939年7月7日开始用的液化气昨天用完了（用了27天）。今天开始用新的一罐。

9枚蛋（2枚比较小）。以2先令6便士20枚的价格卖了30枚。这周一共收获了77枚鸡蛋，其中15枚比较小。

1939年8月6日

没有雨，相当暖和。小巷子里的大山楂树没有结果，但其他树结了果子。黑莓只是开花，还未结果。榛子里面还是硬的。英尼斯家的母牛就快要生小牛了。

小水鸡还没有长大。有很多小兔子。在巷子里看到了一只死掉的猫。我注意到母鸡们会吃掉黑色的大鼻涕虫。忘记说，周四我看到了一只鸟，我觉得是蜡嘴雀。不时能在鸡窝里看到绿黄科鸣鸟，但金翅雀并不常见。

11枚蛋（3枚比较小）。

1939年8月6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针对苏德台地区领导人的政治清洗开始了，这显然是捷克施加了压力的结果。同时，这也是一系列温和措施施行的前奏。（《星期日泰晤士报》）

（2）显然，波兰政府将允许苏联使用波兰空军基地。（《星期日泰晤士报》）

（3）《星期日快报》认为，佛朗哥肯定会支持轴心国，但暗示着迄今为止已借给他500万英镑的法国银行及瑞士银行正在以不再提供贷款为由向他施加压力。（《星期日快报》）

2.社会

（1）显然，民兵的粮草出现了问题。首批应征者中，称自己出于良知而拒绝服兵役的人占2%。（《星期日泰晤士报》）

（2）彼得·霍华德对几名政治家凭内阁任职而获得的收入进行了估算：朗西曼7100英镑、劳合·乔治9400英镑、鲍德温7000英镑、霍尔7900英镑、西蒙7800英镑、丘吉尔9200英镑。（《星期日快报》）

3.党派政治

（1）彼得·霍华德认为，由于A.威尔逊爵士支持德国，其在希钦地区已渐渐不得人心。（《星期日快报》）

（2）据说，莫斯利的伯爵法庭体育场会议有两万五千人参加。有传言说，莫斯利失去了一部分伦敦东区工人阶级的支持，但获得了一些小企业主的支持。（《左翼论坛》）

（3）传闻说，“纽带”组织非常支持纳粹主义，并得到了和平请愿联盟的支持。（《左翼论坛》）

（4）显然，法国间谍丑闻在一定程度上被正式封杀。拉洛克要求达拉第发布政令——以法律形式将所有不以商业为目的而接受外资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观察家报》）

（5）《星期日快报》刊登了对日本态度友好的文章——漫谈类文

章。（《星期日快报》）

1939年8月7日

天气好多了。早上很冷，下了点雨，下午天气阴沉沉的，还挺暖和。

我整理好了土地，准备种些绿叶菜；还把鼻涕虫抓进了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想试试它们最喜欢吃什么。我昨天在路上看到了一只死掉的蝾螈，因此，它们现在应该要离开水塘了。总能看到今年出生的青蛙，大概只有红菜头豆大小。

9枚蛋（1枚很小）。

1939年8月7日

1.社会

（1）《社会主义通讯》重申了民兵营地的粮食问题，暗示从某种程度上看，士兵们受到的不良对待是有人蓄意为之。（《社会主义通讯》）

（2）报道称，五十七人因与马德里最近的政治谋杀（似乎被谋杀的是三个人）有牵连而被枪决。（《每日电讯报》）

2.党派政治

（1）由于参与反战活动，一些社会主义农工党党员在法国被捕。共产党称此事与纳粹组织有关。（《社会主义通讯》《星期》）

（2）又有报道称贝拉·库恩被枪决（此次消息来自越南方面）。（《每日电讯报》）

（3）“纽带”组织主席、海军上将巴里·多姆维尔爵士称霍尔和曼德

尔的声明是谎言，希望他们不要在议会重复发表那些言论了。（《每日电讯报》）

1939年8月8日

有点雷雨，但白天的天气还算不错，不太热。两只山羊的产奶量急剧下降，一共还不到1夸脱，这肯定是连续几天没有出去吃草的缘故。天黑得越来越早了。

12枚蛋（3枚比较小）。

1939年8月8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但泽参议院似乎在与波兰海关官员的争议中让步了。（《每日电讯报》）

（2）又有报道称大批阿斯图里亚斯的战士们仍在山区中战斗。（《每日电讯报》）

2.社会

（1）《每日电讯报》的整个栏目都在报道“纽带”组织，此外，头版还有另外一篇报道。“纽带”组织的负责人发表声明称，自己不是宣传团队，还说劳里教授因在德国出版社出版《德国现状》一书而得到了150英镑，而英国出版社则因该书“支持德国”而拒绝将其出版。声明中还说，“纽带”组织利兹分部由于组织者认为德国分支已被纳粹分子控制而自行解散了。（《每日电讯报》）

（2）《每日电讯报》用一个专栏（新闻版面）总结了格兰茨出版社出版的《德国开战的可能性》一书。该书是由匈牙利语翻译而来，而作者则因该书的出版而在匈牙利被起诉。（《每日电讯报》）

3.其他

列昂纳多·梅里克[23]的死讯登上了《每日电讯报》的头版（边角处）。（《每日电讯报》）

1939年8月9日

晚上下了点儿雨，其他时候还算暖和，但天是阴着的。我移植了60株花椰菜，这个季节种是有些晚了，而且幼苗看上去又细又长，长得不怎么好，但我希望他们能生根。找不到羽衣甘蓝，显然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太晚了。

10枚蛋（2枚比较小）。以2先令6便士20枚的价格卖了30枚。

1939年8月10日

一整天基本都在下雨。我剪掉了西红柿的旁枝（早就应该剪了），开始准备在另一块地上种青菜。我还给鸭子们搭建了新的鸭舍，因为七只鸭子很难挤在同一间鸭舍里。我发现未干的羊粪堆在一起可以产生热量，尽管似乎并不如马粪产生的热量高。

10枚蛋（2枚比较小）。

1939年8月10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佛朗哥基本获得了全部独裁权力。（《每日电讯报》）

（2）国王检阅了预备舰队的133艘战舰。（《每日电讯报》）

2.社会

（1）丹佛民兵营的抱怨（不太严重）表明，大量预备役士兵是被作为教官征召的。（《每日电讯报》）

（2）十四名因良知原因拒绝服兵役的人在法庭受审，尽管对他们的处罚并不严厉，但法庭坚持认为他们应该做有益于国家的事情来作为弥补。没有报道称被告中有因宗教原因而不能服役的。南威尔士矿工协会秘书参与了审判。

（3）《蛋》这一刊物上出现了反希特勒的笑话。（《蛋》[24]）

（4）伦敦巴士内部车灯现已配备可拆卸的蓝色灯罩，以方便在空袭中使用。（《每日电讯报》）

3.党派政治

（1）连续六周处于无政府状态后，荷兰国家政府组成了几个党派，包括两个社会民主党。（《每日电讯报》）

（2）有报道称，9月独立工党全国委员会将在大会上支持其与工党的无条件合并。（《每日电讯报》）

1939年8月11日

温暖晴朗。我看到水鸡和一只小雏鸡，在水库边上一动不动。我用铁杉树枝戳了戳水鸡，还把它翻了过来，但它还是没动静，我以为它死了。可它突然就扎进了水里，在水中待了几分钟。

水蜗牛卵好像孵化了，小东西们正到处爬，但它们还是像软软的果冻，仿佛还是胚胎的样子。但如我所想，它们是在发育完全之后才孵出来的。

我今天割了第一个西葫芦。豆子长了不少。

11枚蛋（3枚比较小）。

1939年8月11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莫斯科接待了20位比利时议员。（《每日电讯报》）

（2）英法军事代表团抵达列宁格勒。（《每日电讯报》）

2.社会

（1）最新报道称，法庭对拒绝服兵役者的审判表明，被告绝不会为了适应政治立场而拒绝服兵役（通常他们都是基督弟兄会等教会的成员）。（《每日电讯报》）

（2）《岁月》上发表了攻击“纽带”组织的文章，暗示“纽带”组织应该被取缔。（《每日电讯报》）

（3）批发商联合会再次否认禁止《时代》的发行是出于政治原因，但那显然不是事实。（《每日电讯报》）

3.党派政治

（1）独立工党全国委员会再次谈到无条件联合，但其建议的工党内部应采取的举措与工党目前在解除军备方面的立场背道而驰，因此可能不会被接受。（《新领袖》）

（2）出席下月为梅纳·舒克特[25]举行的招待会的有H.W.内韦森、查莫斯·米歇尔、法林登勋爵[26]、威尔逊（塞西尔）、兰斯贝里、A.麦克拉伦以及一些议员。舒克特是犹太-阿拉伯联合会的代表。（《新领袖》）

（3）与反战及反帝国主义活动有关的人士在法国被捕，包括卢西恩·韦茨[27]以及R.劳森（18个月）。（《新领袖》）

1939年8月12日

天气温暖晴朗。几朵康乃馨在盛开。

10枚蛋（2枚比较小）。先以2先令6便士20枚的价格卖了25枚较大的蛋，后以2先令2便士20枚的价格卖了10枚（小母鸡生的）。

这周一共收获了73枚蛋（16枚比较小）。

1939年8月12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曼彻斯特卫报》称，德国的战争动员会在8月中旬全面召开，并将采取某些恐吓波兰的措施。据悉，战争极有可能发生（昨天《岁月》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最令人震惊的是，所有媒体在陈述这件事的时候似乎都带着漫不经心的口吻，仿佛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事不会发生。（《曼彻斯特卫报周刊》）

（2）似乎已有迹象表明，由张鼓峰事件[28]引起的伪满洲国边境交火非常激烈，但尚未分出胜负。（《曼彻斯特卫报周刊》《无产阶级革命》）

2.社会

（1）据称，伦敦的难民问题正愈演愈烈，尤其是东部地区。然而，莫斯利似乎无法获得更多的支持者。（私人消息）

（2）似乎邮局的负责人可以在不拆开信件的情况下读到信里的内容，从而判定内容的性质。（私人消息）

3.其他

（1）我所有由方尖碑出版社[29]出版的书都被警察没收了。公诉人还警告说，如果我再次购买此出版社的书籍，就可能被起诉。显然，他们在希钦拆开了我给方尖碑出版社写的信。但我不知道是出版社的原因还是我自己的通信被监视的原因。

（2）据称，苏联已经成功地让马铃薯和西红柿杂交了。（《小农》）

1939年8月13日

温暖晴朗。

10枚蛋（2枚较小）。

1939年8月14日

温暖晴朗。有一些西洋李子快要成熟了。我整理好了准备种蔬菜的地。终于找到了那只走失的母鸡，它正在孵蛋，有13枚，刚好消失整整一个月。现在一共有6只孵蛋的母鸡了（一共有23只母鸡）。今天下午把母鸡都放到艾琳的鸡舍里了。昨天颇费了一番力气才给一只鸭子称了重。如果没错的话，那只鸭子有3.75磅重（6周半大）。我们明天打算把2只最大的带到市场上去出售，看看能卖多少钱。

10枚蛋（3枚比较小）。

今天，1英担的福尔奥佩璞饲料用完了。从1939年7月4日开始用的——大概用了40天时间。本来计划能吃35天的，所以可能有几天喂得少了些。而且天气一热，它们胃口也不好。

今天上午看到了一只布谷鸟。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过它们了，它们可能也要离开了。路上看到了一只死掉的鼩鼱。不知道为什么，每年这个时候都会看到死去的鼩鼱。

1939年8月14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据称，德、意对波兰问题的“妥协计划”很有可能已经形成，但波兰肯定不会接受。（《每日电讯报》）

（2）在莫斯科进行的参谋级对话已经开始。（《每日电讯报》）

2.社会

（1）昨天的《星期日快报》发表了一篇关于非法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新闻，实际上，这篇新闻是反犹太的宣传。（《星期日快报》）

（2）仿佛私拆与左翼党派人士相关人员的信件是平常事，外界已经不再关注此事了。（来自E.H[30]的私人消息）

（3）G.K[31]声称共产党在法国警察局和其他公共部门中根基很深，因此，政府对他们束手无策。

3.党派政治

（1）G.K称社会主义农工党的成员现在只有四千人。

（2）E.H称，由于托洛基主义分子不愿与和平主义者打交道，而且他们用非常激烈的言辞挑衅和平主义者，因此柏蒙齐反战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来自E.H的私人消息）

（3）E.H称，独立工党的老党员们基本上都不赞同合并，而新成员们则表示同意，但立场最坚决的反对者是C.A.史密斯[32]。（来自E.H的私人消息）

1939年8月15日

今天天气很热。我炖了一点儿西洋李子（太酸了）。地面很快就干了。几株雀翠花开花了，玫瑰花也开始开第二拨了（由于今年得了某种枯萎病，所以花开得并不好）。南瓜最长的一根枝条已经有1码长了，而且还开了一朵雌花，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及时长完，就是说还有六到八周的生长时间。我又看到了一只死掉的鼩鼱。大黄蜂越来越让人心烦

了。新蜗牛产了许多卵。现在，白色的母鸡不再孵蛋了，因为其他的动物在发现了它的蛋后，把蛋都吃掉了。偷吃的动物可能是只猫，但也可能是老鼠、寒鸦或者别的母鸡。

卖了2只7周大、重4.24磅的小鸭子，每只卖了2先令11便士（去掉佣金，每只是2先令8便士）。按这种情况，每只鸭子只能赚几便士，不过当时用的是每磅1.5便士的饲料，如果用福尔奥佩璞牌的饲料（每磅1.01便士）的话，还能多赚一些。

11枚蛋（2枚比较小）。

1939年8月16日

天气很热。地面还是很干。我给苗床里的洋葱和花朵除了草，给南瓜和西红柿浇了水，还把蚕豆给割掉了。那些蚕豆长得太大了，留下来也没什么用。有几株芜菁也可以拔了。我割了第二拨西葫芦。之前艾琳修剪过的草地现在长得很好。

10枚蛋（3枚比较小）。以2先令6便士20枚的价格卖了25枚。

成熟的李子每磅只能卖2便士。

1939年8月17日

天气很热。有的黑莓正在慢慢变红。我发现了几只蘑菇。大部分谷物都已经收割了，大家都趁天气好的时候忙着收庄稼。现在，成群的鹧鸪都长大了（八到十二只），但雏鸟特别小。看到一只不认识的鸟，从毛色、体型和飞行的样子看像是水鸡，但显然不是，因为它飞得很好，总在飞，况且也不是在水边看到的。这只鸟是和一只雌野鸡一起飞的，但根本不符合野鸡在任何一个生长阶段的形态，因此它肯定不是野鸡。马克斯吓了那些鹧鸪一跳，而鹧鸪妈妈则用了一个很常见的花招（有时，人们不认为鸟儿真的能做到）——它一边叫，一边慢慢飞，把马克斯引开，而小鹧鸪则趁机逃往相反的方向。尽管现在季节还有点早，但

我觉得那只鸟是田鸫。雄金翅雀的叫声像是“吱——瓦”，正在求偶（而绿黄科鸣鸟的叫声则更像是“起司”）。

8枚蛋（3枚比较小）。

1939年8月17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全国登记的计划已准备就绪。（《每日电讯报》）

2.党派政治

（1）在对待“纽带”组织的问题上，和平请愿组织持友好态度，独立工党则相反。（《新领袖》）

（2）更多证据显示内格令与普列托确实发生了争执。（无引用出处）

（3）基尔·哈迪纪念会上的发言人有马克思顿、达拉斯（工党执行委员会）、埃比·爱德华（英国劳工联合议会）、詹姆斯·巴里议员以及邓肯·格雷厄姆议员。（《新领袖》）

1939年8月18日

天气很热。我修理了鸡舍的门。

10枚蛋（3枚比较小）。

1939年8月18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曼彻斯特卫报》的外交通讯员认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旦开战，西班牙将保持中立。新内阁中的士兵和长枪党党员分庭抗礼。（《曼彻斯特卫报周刊》）

2.社会

（1）目前，尽管伦敦方面有人请愿提出人身保护，但似乎之前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四名中国人将被移交给日本政府。（《曼彻斯特卫报周刊》）

（2）全国登记的政策细节已经制定完成，但政府宣布只有在战争爆发或1941年全国人口普查时才可能推行这一政策。（《曼彻斯特卫报周刊》）

（3）据说，西班牙向墨西哥移民的行动非常成功。

1939年8月19日

天气很热。我种了抱子甘蓝、皱叶甘蓝和紫花茎甘蓝，各种了20株，各花了3便士。这些并不是好苗，非常干，不过根部长得非常好，所以应该能长得不错。我怀疑其中一株有根肿病（目前还未出现），就扔掉了。白色芜菁（1939年6月28日种下的）可以拔了。

《小农》称，萝卜地里的线虫可以用萘甲唑啉与新石灰的混合液杀灭，每平方码2盎司即可。

9枚蛋（3枚比较小）。以2先令20枚的价格卖了20枚。

这周一共收获了68枚鸡蛋（19枚比较小）。

1939年8月19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德国人正在大量采购铜和橡胶，并要求供应商立刻交货，因此橡胶价格一路疯涨。（《每日电讯报》）

（2）有迹象表明，正在莫斯科进行的参谋级会谈上出现了某种分歧（塔斯社称之与远东无关）。（《每日电讯报》）

（3）马德里方面用略官方的口吻宣布西班牙将保持中立。

2.社会

（1）美国“联盟”组织进行的活动正在接受调查，与“纽带”组织的境遇相似。有两点非常明显，一是两个组织都进行了纳粹主义宣传；二是当局将采取措施逐步切断德国与民主国家的文化纽带。（《每日电讯报》）

（2）警方渐渐了解了权宜婚姻（通过结婚的方式，让德国妇女获得英国国籍），之后可能采取措施将这些人驱逐出境。（《每日电讯报》）

（3）目前为止，被驱逐出境的爱尔兰共和军嫌疑人数已达到九十人。（《每日电讯报》）

（4）据称，很多民兵都是文盲。（《新闻纪事》）

3.其他

（1）农业部消息，1939年上半年的数据说明了以下几个情况：一是用于粮食生长及牧草生长的土地总面积为2475万英亩，减少了约8万英亩；耕地增加了约5万英亩；永久性草场减少了13万英亩。（据悉，在政府耕地补贴发放前，上述情况就已出现）

（2）小麦种植面积减少了15万英亩，土地种植面积减少了2万英亩，豌豆和卷心菜的种植面积也减少了，蚕豆的种植面积增加了。燕麦和大麦的种植面积分别增加了56000亩以及25000亩。

（3）除了猪和驿马外，其他牲畜的数量均有所增加。猪的数量减少了5万头，而驿马的数量则减少了14000匹。禽类数量增长了20万只。（《小农》）

1939年8月20日

上午很热，之后下了雷雨。今晚的雨很大。两只羊非常害怕打雷，穆里尔还挣脱了链子。

给南瓜掐尖了。最后一次给洋葱间了苗。第一拨豌豆差不多成熟了。翠雀花正在开花。西红柿的旁枝长得很快，都快打理不过来了。

8枚蛋（4枚比较小——显然，又有一只小母鸡开始下蛋了）。

1939年8月20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劳合·乔治预测但泽危机很快将到达顶点。他还暗示（《星期日快报》用双倍行距将这句话突出），如果波兰故意退让，我们也不必行动。（《星期日快报》）

（2）由于英国声称需要就中国货币问题与其他国家进行磋商，于是东京对话暂停了。（《星期日泰晤士报》）

2.社会

对斯本德文章的讨论仍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进行。

3.党派政治

（1）彼得·霍华德说到大选时，用确定的口吻预测说养老金是政府抛出的收买人心的政策之一。（《星期日快报》）

（2）如果秋季举行大选，政府则会通过一项法案维持现状，在选举期间应对危机。

1939年8月21日

前半晚很热，之后就是大雷雨。剪掉了西红柿的旁枝，在它们根部埋了些灰烬。清理了第一拨豌豆的残肢，烧掉了。重新翻了地，准备种韭葱。种了霍林斯沃斯太太送给我们的黄色花朵（有点像夏菊），但不知道最后他们能不能生根，有几株已经开花了。给翠雀花施了一点液体粪肥。翠雀花周围生长着很多自播的金鱼草。

称了称剩下的5只小鸭子，明天准备拿到市场上卖掉。这5只鸭子只有24磅重，最重的一只有5.25磅。他们才7周半大。

8枚蛋（2枚比较小）。

1939年8月21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美国民意调查协会的最新调查显示，认为美国将会参与世界大战的人数大幅增加（达到了75%），认为美国将向欧洲派兵的人数仍维持在25%左右。（《每日电讯报》）

（2）日本准备封锁香港，显然是为了向伦敦就中国货币问题施加压力。（《每日电讯报》）

（3）德、苏签订贸易条约，用德国工业品换取苏联的原材料，为期2年，总额为10万英镑。（《每日电讯报》）

（4）但泽通往东普鲁士的战略性桥梁已经完工。（《每日电讯报》）

2.社会

（1）半个月内，铁路方面可能会因为50先令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举行罢工。（《每日电讯报》）

（2）如果开战，英国的光学玻璃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每日电讯报》）

1939年8月22日

上午有小雨，之后天气晴朗，气温较高。凌晨时分有浓雾。我又翻了一些地，准备种韭葱，又给翠雀花施了一些液体粪肥。艾琳又种了一些高代花。5只小鸭子一共有24磅重，只卖了11先令。我的鸡蛋收获数量在记录簿上有完整的记录，但除了第一周喂给它们的牛奶面包外，他们一共吃了91磅饲料糊（其实可能多达95磅，因为它们偶尔还要吃些其他家禽的饲料）。这些鸡一共有32磅重，也就是说（将所有饲料算在内），鸡每增重1磅，需要3.25磅饲料。

一只蝾螈已经发育完成。它的腮已经消失，正伸着头待在水面上。昨天，水蜗牛吃了一片我扔给蝾螈的生肉。

我发现马克斯身上有很多虱子，耳朵上全是虱子的幼虫。毫无疑问，这种情况部分由于过热的天气。艾琳用消毒皂、灭虱粉和醋给它洗了澡。醋能让虱子的幼虫松开足，这样就能用梳子把它们梳掉了。

11枚蛋（4枚比较小）。今天开始用另1英担的谷物。

1939年8月22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德国官方在柏林宣布，里宾特洛普将于第二天飞往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随后，莫斯科的塔斯社以一种条约必会签署的态度确定了这条消息。报纸上的评论比较少，显然，报社也是早上才收到这条消息的，苏联媒体应该是在最后一刻才收到这条消息的。据报道，华盛顿方面认为这可能是苏联的手段（为了让英国和法国屈服），但其他各国似乎都认为这样做还是有表面意义的。整体上看，股市在下跌。德国人还在大量购买虫漆。昨天，军事对话还在继续进行。（《每日电讯报》《每日邮报》《新闻纪事》《每日镜报》）

2.社会

与德国自由运动广播电台立场相似的非法电台正在进行反征兵宣传

的播报。和平请愿联盟的秘书否认对此知情，但并没有否认此事与谈话有关。邮局的工程师称已经追踪到了电台的位置，范围已经锁定在几栋房子之内，真相很快就将浮出水面。据说，定位非法电台至少需要几天的时间。（《每日电讯报》）

3.党派政治

（1）《莱奇沃思的公民》重新刊登了A.威尔逊爵士发表在《星期日花苞》上的长篇文章，并非常赞同其观点。（《莱奇沃思的公民》）

（2）《社会主义通讯》印发了共产主义抵抗运动对战争问题的长篇声明，声明中提到的支持反法西斯的方案不仅没有可实施性而且相当复杂。同时，这份声明也让工人阶级醒悟过来。但声明中提到（可能是真的，因为塔尔海姆和其他人对苏联的情况很了解，至少很了解它几年前的情况），尽管苏联红军现在的情况和其他军队相差无几，但后备军接受的训练仍是一只革命军队应该接受的。此外，对独立工党的猛烈抨击的文章上有三个人签名，都是以首字母的形式署的名。奥德丽·布洛克维[33]还为第四国际提出了标语。（《社会主义通讯》）

1939年8月23日

天气很热。我又给韭葱翻了一块地。我把几只小公鸡（5只）转移到了小鸡围栏中，给鸡舍除了虱子。彻底消灭红蜘蛛很难，因为在这个季节，它们繁殖得非常快，而且必须用火才能消灭它们，可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它们会彻底消失。管道工的喷灯非常有效。鸡舍里的红蜘蛛太多时，母鸡就不愿意回到鸡舍里了。

我发现了一个窝有14枚蛋（罗德岛红鸡），显然这些蛋不怎么新鲜了。尽管我自己尝了一个，觉得并没有坏掉，但最好还是别卖了，也不算在总数里了。

8枚蛋（4枚比较小）。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还以1先令20枚的价格卖了10枚比较小的鸡蛋。

1939年8月23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议会明天开会，紧急权利法案将得以通过，某些阶层的预备役人员将会被征召，国王将回到伦敦。法国和德国也在征召预备役人员。议会将紧急立法，禁止德国继续购买镍、铜等物资。基本上，所有的股票都在下跌，显然与对这一法案的预测有关。《每日电讯报》上引述了各国媒体的评论，但观点都非常不明确。显然轴心国集团对苏联的新方针非常满意。（《每日电讯报》）

2.社会

铁路罢工在几天内就会开始。（《每日电讯报》）

3.党派政治

共产党党员约为17000人[34]，比去年增加了2000人。共产党再次申请加入工党。（《每日电讯报》）

1939年8月24日

天气很热。我种了两排韭葱（大概有75株）。翠雀花开了5种不同颜色的花。

9枚蛋（4枚比较小）。

1939年8月24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苏、德签署了条约。在柏林公布的条款表明，该条约为封闭式条约，没有“例外”条款。在今晚的广播新闻中，莫斯科方面确认了这

一消息。莫斯科的官方声明称，“苏德两国共同的敌对国家”试图离间苏德关系。英国大使与希特勒会面，而希特勒则称英国的任何行动都无法改变德国的决定。日方因德国背弃反共产国际公约而感到愤怒不已，而西班牙的态度显然也受到了影响。据称，罗马尼亚宣布中立。张伯伦在广播中的演讲非常强硬，似乎在援助波兰这一问题上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2）艾琳今天访问了陆军部，得知战争几乎无法避免。警方今早开始为士兵安排营房。有些人（外国人）下午过来询问住宿的地方——这已经是三天内的第二批人了。尽管我有仔细听，可酒馆太吵，没听清他们的对话。虽然所有人都知道战争无法避免，但我没听到有人主动发表评论，也没有人对当前的局势表示略微的关注。（《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新闻纪事》《每日快报》《每日先驱报》《每日邮报》《伦敦晚报》）

2.社会

（1）显然，《紧急权利法案》顺利通过了，其中的条款包括允许预防性逮捕、无证搜查以及秘密审讯等，但没有涉及工业征用的条款。（广播，下午六点）

（2）莫斯科机场装饰了万字旗，欢迎里宾特洛普的到访。《曼彻斯特卫报》还说苏联当局还把场地围了起来，以免其他莫斯科人看到。（《曼彻斯特卫报》）

3.党派政治

（1）共产党对苏德条约表示欢迎，声称这是和平的举动。他们还一如既往地敦促英苏条约的签订。《工人日报》没有刊登条约条款，但重新刊登了苏波条约涉及“例外条款”的部分，向读者暗示苏德条约一定也包含“例外条款”。（《工人日报》）

（2）今天的辩论中，辛克莱和格林伍德强烈支持政府，曼德则要求“强化内阁”，马克思顿称独立工党不支持政府参与战争。（广播，下午六点）

1939年8月28日

前几天我一直在旅行，因此没有按正常情况记日记。

主要情况如下：

希特勒提出了某种方案，N.亨德森将该方案带到内阁会议上进行多次讨论，昨天下午的内阁会议上也讨论了该方案，但政府还未就希特勒提案的性质发表任何声明。亨德森今天将带着英国政府的回复回国，但仍未有任何迹象能确切说明亨德森的提案或政府的回复会被公之于众。各路媒体均已发表声明，但官方称那些声明都是没有根据的。

苏德条约的意义尚无法确定。左倾媒体依旧认为该条约并没有太大意义，但人们似乎普遍认为苏联将为德国提供原材料，而且可能双方正在进行大规模交易，把欧洲划归德国，而将亚洲划归苏联。莫洛托夫即将发表简短声明。显然，无论如何，苏联解释时肯定会说英国阳奉阴违，并不希望英、法、苏三方签订条约。据说，苏联公众对立场的转换多少感到有些意外，西方左翼派别也是。左翼报纸继续谴责张伯伦，同时也为斯大林开脱，但显然收效甚微。法国方面显然已经开始反对共产党，据说，大批党员已经退党（《每日电讯报》引自路透社的报道）。《人道》已经暂时停刊，英、法军事代表团也已回国。

德国和波兰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动员工作。法国又征召了几个等级的预备役士兵，据说已经有四百万[35]武装人员。英国还没有征召大批预备役士兵。海军已经控制了所有船只，政府控制了外国股票的销售。伦敦的主要建筑物周围都正在垒沙袋。今天，疏散区进行了儿童疏散演习。伦敦一直次序井然。过去一两天，路人或许在街上讨论过局势，但只是使用了“会开战吗？”这种词句。昨天下午，内阁会议召开时，约一千人聚集在唐宁街，但大多数都只是旁观而已，没有高举条幅之类的行为。海德公园没有发生任何游行活动。唯一发表政治演讲的是一个托洛基主义分子，他的听众很多（大约200人）。火车站没有出现大批人员外流的状况，但有大量行李等待运输，从行李的外观看，它们都属于富裕阶级。

迈尔斯认为如果我们没将意大利卷入战争中，意大利就会坐视不管，直到我们陷入困境。此外，意大利在其他欧洲小国远离我们时，会站到德国一方。迈尔斯认为，富裕阶级的所有人都是叛徒，都准备与德

国人做生意。要么不开战，要么就会进行小规模伪装战，以维持表面和平，并会允许德国将法西斯制度强加至英国身上。[36]目前，西班牙宣布保持中立，而土耳其仍声称将支持法国和英国。

黄金价格已涨至历史新高（每盎司约155先令）。小麦价格仍非常低（最近，零售市场的价格已经跌到1英担4先令以下）。

显然，和平请愿联盟默不作声，也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独立工党发布了官方声明，称自己不会支持政府参战。（《每日电讯报》《新闻纪事》《每日镜报》《每日快报》《新政治家》《星期日泰晤士报》《观察家报》《雷诺新闻报》《帝国新闻》）

《紧急权利法案》以400：4票的优势得以通过。投反对票的议员包括马克思顿（另外两位独立工党议员是计票员）、兰斯贝里、塞西尔·威尔逊和一名无党派人士；加拉赫弃权；如艾伦·威尔金森和A.贝凡等极端主义者投了赞成票。

1939年8月29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N.亨德森带着英国政府的回复回到了柏林。议会今天下午开会，此事或许可以澄清。

（2）《紧急权利法案》已经生效。海军不仅控制了所有船只，还命令所有英国船只离开地中海及波罗的海。

（3）据说，学童的疏散演习非常成功。尽管现在并非上课时间，孩子们还是要留在学校待命。

（4）日本内阁大臣因苏德条约签订一事辞职。证据表明，日本方面的政策现在已变为支持英国了。（《泰晤士报》《新闻纪事》《伯恩茅斯回声报》《每日电讯报》）

2.社会

过去几天内，私家车主们购买了大量汽油。

3.党派政治

工党代表依旧拒绝就职，称一旦开战，工党代表只能在工党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就职。而他们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政府可能无法接受。（《新闻纪事》）

4.其他

据可靠的私人消息称，莫斯利爵士在性生活方面是极端的受虐狂。（私人消息）

1939年8月30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基本没有新闻。通讯从未间断，但内阁没有透露一丝消息。议会休会一周。比利时国王做出调停，波兰接受了该提议，而德国则表示赞同，但军队调动和边境冲突仍在继续。罗马尼亚方面加固了与苏边界上的防线。据说，二三十万苏联军队正在往其西部边界移动。

（2）苏联议会周末才会签署条约，显然是为了根据具体情况做出不同的解释。如有必要，苏联仍然可以拒绝签订该条约，以显示苏联的民主。

（3）哈罗德·尼克尔森[37]声称，一旦开战，苏联不会对德国提供原油。证券交易所的第三方信息暗示，三天前，议会非常确定希特勒不会行动。同时，迈尔斯说，几周前，温斯顿·丘吉尔与德国将军们进行了谈话，后来他就对此事持悲观的态度了。（《泰晤士报》《新闻纪事》《每日镜报》）

2.社会

议会休会一周的决定全票通过。（《泰晤士报》）

1939年8月31日

1939年8月24日到29日，天气都很热。昨天和今天有大雨。这个地区的黑莓成熟了。科鸣雀飞走了。凌晨雾气很重。

1939年8月31日

1.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没有确切消息。波兰召集了更多的预备役士兵，但还没有全面动员。德国还在继续侵占斯洛伐克。据称，已有三十万兵力驻扎在波兰边境的战略要塞。希特勒组建了六人内阁，而里宾特洛普并不在其中。

（2）一万六千名儿童已经从巴黎疏散。伦敦儿童的疏散应该也会在近期开始。关于认可苏德条约的消息仍未传出。据说，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略有缓和。而在纽约世博会苏联馆中，反德电影已经撤下。有报道称，伏罗希洛夫说苏联将向波兰提供武器援助。（《每日电讯报》《新闻纪事》《每日镜报》）

2.社会

（1）J.安德森爵士呼吁公众不要购买过多食物，也不要囤积食物。他还说不会出现食物短缺的状况。（《每日电讯报》）

（2）工程师联合工会同意不用非熟练工代替熟练工。（《每日电讯报》）

3.党派政治

艾琳对海德公园演讲的报道说明了共产党逐渐采取左翼路线，但并不急于研究解决苏德条约的问题。发言人（泰德·布拉姆利）称投票反对《紧急权利法案》的议员们包括加拉赫、威尔金森、A.贝凡以及另外一个人（实际上，是马克思顿、兰斯贝里、塞西尔·威尔逊和另外一人）。（私人消息）

1939年9月1日

入侵波兰的行动于今日开始，华沙被轰炸。英国进行了全面动员。法国也进行了全面动员，此外，还施行了戒严令。

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

（1）希特勒对波兰提出的条件可以归纳为：归还但泽并在走廊地区进行全民公决。公决应在一年之后进行，公决人数要以1918年人口统计数据为准。希特勒在提出条件的时间上使用了诡计，要求波兰方面在1939年8月30日前给出答复。而希特勒此前称其条件已被拒绝。（《每日电讯报》）

（2）海军预备役成员、陆军余部以及皇家空军预备役士兵均已被征召。对孩子们的疏散今天开始，约有三万人，预计需要三天时间。（广播，日期不明）

（3）苏德条约得到批准，苏联的武装力量进一步增强。伏罗希洛夫的发言被认为是苏德联盟不可能形成的证据。（《每日快报》）

（4）柏林报称苏联军事代表团将于今日到达。（《每日电讯报》）

1939年9月3日

我即将再次外出，所以今天会结束这本日记，它将作为战前纪实记录。

显然，今天上午11点，我们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关于撤出波兰领土的要求，德国政府还没有给出任何答复。意大利政府在最后一刻呼吁召开会议，和平解决争端，于是，媒体今早纷纷猜测战争是否会真的爆发。达拉第认为意大利的做法是“崇高之举”，人们可能会认为意大利的中立地位应受到尊重。

至于采取了何种军事行动，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德国占领了但

泽，但从由南至北四个攻击点攻击了波兰走廊地区。此外，只有对空袭的指责、反指责的报道，还有被击毁飞机的数量的报道。从《星期日快报》的报道和其他报道看，第一次空袭似乎没能波及华沙。传闻称英国军队已抵达法国。全副武装的士兵从滑铁卢登车离去，但每一批的人数都不多。今天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后，防空演习就立刻开始了。演习似乎很令人满意，因为很多人都以为空袭真的发生了。公共防空避难处很多，尽管大部分还需要一两天才能完工。防毒面具免费发放，公众似乎对此非常重视。志愿消防队表现积极，所有行动都非常有效率。目前，警方已戴上了钢盔。人们没有恐慌，也没有热情，实际上，对此也没什么兴趣。阻塞气球已经覆盖了伦敦上空，肯定能阻止轰炸机的低空飞行。当局在晚上实施了全面断电，对违反规定的处罚非常严苛。涉及三万人（只在伦敦一地就需要疏散一万人）的疏散工作正迅速进行，列车班次因此有些混乱。

丘吉尔和伊顿即将进入内阁。工党议员们目前仍拒绝就职。众议院中的工党议员们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效忠声明，但左派媒体描述此事件的笔调非常尖锐，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对苏德条约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仍在继续。《雷诺新闻报》上发表的所有支持信的重点已经从“和平之举”转移到苏联自保的措施上了。1939年9月2日的“行动”依旧鼓动人们反战。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战争暴行的报道，也没有激进的宣传海报。

《军事训练法案》扩大了范围，涉及18到41岁的男性。然而，他们显然还并不需要大量兵力，此法案通过的目的不过是有选择性地得到他们需要的人，也可能是为了日后施行工业征用。[38]

1939年9月5日

由于一直外出、战争造成的混乱等原因，我没能按时记日记。总的来说，天气很热，没有风。1939年9月2日晚上，下了场大雷雨，几乎持续了一整夜。

回到沃林顿后，我发现自己才离开十天，杂草就已经四处疯长了。芜菁长得不错。有的胡萝卜已经长得很大了。红花菜豆长得也不错。最后一拨豌豆没结多少果实。几个西葫芦和一个南瓜已经长到台球大小。

苹果快熟了。西洋李子和野李子都成熟了。冬季的蔬菜生根了。早熟马铃薯长得不好，每株只挂了五六个果实。但之后种的那些马铃薯看上去还不错。洋葱长得还可以。莴苣都结籽了。苗床里的花（桂竹香、美洲石竹和康乃馨）都长得很好。蜀葵和金盏花的花期快过了。玫瑰（不是蔷薇）再次绽放。翠雀花还开得很好。佛手柑的花已经谢了，草夹竹桃也差不多了。大丽花正在盛开。一些紫菀开得正好。十天里，草长高了很多。

似乎从1939年8月24日（大约12天）到现在，母鸡们只下了85枚蛋，大部分都是大的。所有的老母鸡都在换羽。上周克拉克没送来谷物，因此两只山羊啃了一个星期草，不过它们状况还不错，产奶量也还可以。

1939年9月6日

天气很热。我拔掉了第一拨荷兰豆，翻了地，打算种些春季卷心菜，还剪掉了西红柿的旁枝。西红柿长得并不好，叶子和茎长得太大了，上面只挂着几个小西红柿（有一两个要长熟了）。可能跟使用太多的动物粪肥和光照不足有关。

10枚蛋。

1939年9月7日

天气很热。我先给第一拨花椰菜除了草，又翻了地。我把苹果树下的荨麻割了，又喷了1磅的氯酸钠。苹果树上挂了不少果子，但长得不怎么好，也不够大，还被风吹落了很多。我用被风吹落的那些苹果做了两三磅苹果酱。

8枚蛋（1枚比较小）。

忘了说，我在林伍德见过几群金翅雀，有一次看到30多只。

注意，这周前几天每天有7枚蛋，我们不在的12天里，一共收获了85枚蛋，大小都差不多。

1939年9月8日

天气很热。黑莓还没成熟。我把剩下的早熟马铃薯都拔出来了，这些长得不好，每株上只有五个马铃薯。

8枚蛋。

1939年9月9日

天气很热。我把第三拨豌豆拔了，重新翻了那片地。红蜘蛛又开始大肆出现。大多数来亨鸡都开始换羽，但罗德岛红鸡还没有。我注意到在这个季节里，鸡都没什么胃口。山羊也不想吃东西，水喝得也不多。

11枚蛋（以2先令20枚的价格卖了35枚蛋），这周一共收获了58枚蛋。

1939年9月10日

今天还算暖和，不过是阴天。我收了两垄“国王爱德华”马铃薯（实际上，大多数并不是这个品种，而是更大的“大苏格兰”品种）。和上次的比，这次的要好一点，但还是糟糕。有些马铃薯软趴趴的，不得不将其丢掉。大家都说遇到了同样的事，显然是这里的马铃薯出了某种问题。第一批西葫芦结了很多果实，我们已经摘了两三个了，现在有4个已经长大，别的还在长。南瓜终于生根了，一下就长大了，这样的话，结霜之前应该能长得很大。

8枚蛋。

注意，在9月8日和9月9日，穆里尔有发情的迹象，所以它下次发情应该是在9月30日左右。

1939年9月11日

天气冷了一点，阴天，傍晚下了点雨。昨天的雨对土地没什么作用。

我给洋葱除了草，两三周内就能摘了，但长得不怎么好。我给核桃树下的荨麻喷了氯酸钠。我摘了1磅西洋李子和3.25磅野李子，用西洋李子做了近2磅果酱，野李子估计能做五六磅果酱。两垄马铃薯收了3小袋，我估计有五六十磅。因此，如果情况都是这样，我们顶多还能再收300磅马铃薯，这收成可远远不够。

我挑了两只能炖汤的老母鸡（一只是比较小的苏塞克斯老母鸡，另一只是孵第二拨小鸡的母鸡），准备明天带到市场上卖掉。

电线上开始有燕子聚集了。

9枚蛋。

1939年9月12日

天气很冷（得生火），阴天，有风。晚上下了点雨。我开始收马铃薯了，割掉了豆秸，准备翻地。其实，我可以过半个月再收拾的，这样秸秆就硬了。提特里给我的春季卷心菜还太小，不能移植，但半个月之后就可以了，应该是1939年9月25日左右。还能再种六七垄马铃薯，可收获100到150个。用野李子做了4磅果酱。

我卖了两只能炖汤的老母鸡，扣除1先令佣金，一共得到了6先令6便士。

我确定自己今天看到的是一群山鹬，它们可能正在迁徙。大概八点半时，十几只山鹬飞过，看到它们长长的喙，我还以为是麻鹬，而之前

这里从来没有过麻鹬。可跟麻鹬比起来，它们体型较小，而且飞得很快。它们刚飞过我头顶一会儿，我就看到了那个标志性的侧身俯冲动作，才意识到它们是山鹬。仍让我不太确定的原因不是它们有十几只在一起，而是现在相对于它们的迁徙时间来说太早了。我见过十月来萨福克海岸过冬的山鹬。

注意，挖出马铃薯的时候，留了其中一些当种子（大约28磅）。

1939年9月13日

上午阴天，下午放晴，接着又下了点雨。

我把马铃薯全都挖出来了，开始给西红柿旁边的那块地翻土。

有一两只小公鸡可以带到市场上卖了。

7枚蛋（以3先令20枚的价格卖了30枚）。

1939年9月14日

阴天，小雨，但还算暖和。我翻好了西红柿旁边的那块地，收获了第一垄“红国王”马铃薯，因为要撒石灰了，所以得先把马铃薯挖出来。马铃薯的收成很不好，但比“国王爱德华”的品种好一点，只有一两个烂掉的。西红柿估计是不会结果了，我打算把它们处理掉。我还想卖掉所有的鸡，因为以后只有周末才能来这里，不能照顾他它们了。我可能会把两只山羊送给N先生[39]作为礼物。

8枚蛋。

1939年9月15日

今天有雨，偶尔会放晴，有风。

我把剩下的“红国王”马铃薯挖出来了，收成很糟糕。据我估计，我最多能收300磅（10垄共200个）马铃薯。我把西红柿处理掉了，还给覆盆子剪了枝，就算有的还值得留一留，我还是都剪了，以后应该多施肥，我觉得它们还会结果。我开始给覆盆子旁边的土翻地。我用从霍林斯沃斯太太那里花6便士买的2磅黑莓（花园产的）做了2磅果酱。忘了说，我还摘了苹果，我觉得这棵苹果树的树龄得有五年了，22个苹果有7磅重。那棵大树上的苹果大部分都烂了，不过有些还挺好。

8枚蛋。

1939年9月16日

早上很冷，雾很重，白天还算晴朗，但不怎么暖和，下午下了一场大雨。

我把最后一拨豌豆拔下来了，烧了茎秆，整了地。我打算卖掉8只3个月大的小母鸡，每只卖5先令6便士（4先令6便士买的）。

11枚蛋（以3先令20枚的价格卖了20枚），这周一共收获了60枚鸡蛋。

1939年9月17日

今天有大风。我把马铃薯装袋了，显然得有差不多300磅。我给花椰菜撒了点木灰。两只山羊的去处已经安排好了。我摘了2磅黑莓。

6枚蛋。

1939年9月28日

外出的日子里，没顾得上记日记。[40]然而，鸡蛋的数量都已记录在册，尽管我觉得可能有些遗漏的地方。

现在是典型的秋季天气，只是早上没有雾。晚上的天空非常晴朗，月亮刚过满月，还很好看。有些树的叶子正渐渐变黄。

今天移植了60棵春季卷心菜，每20棵2便士。我继续清理屋子前面的花园。最难打理的是篱笆上长的罗甘莓，现在它长得太大了，没办法移植，有的罗甘莓的茎干已经有15到20英尺高了。紫菀已经开花了，菊花还没开。南瓜长到足球大小了，我觉得它成熟的时候也就这么大，因为叶子有点黄了。大多数移植的花椰菜都长得不错。上周，艾琳给花椰菜施了磷酸盐，又做了3.5磅的苹果酱。

我决定还是要卖掉那些老母鸡，并打算缩小小鸡的鸡舍。如果春天我们还在这里，就建一个孵化的地方（给来亨鸡和罗德岛红鸡）。另一部分土地可以整一下，用来种马铃薯。如果春天我们真的回来，我还打算养兔子和蜜蜂。兔子不受配给的限制。屠夫说，现在人们还不吃家养的兔子，但到了肉类短缺的时候，人们的想法就会变了。提特里说上次战争结束的时候，他靠养兔子赚了一大笔钱。

4枚蛋！（这周到今天为止，包括今天在内，一共收获了36枚鸡蛋）

菲尔德和其他人还在收拾刚刚割好的干草，还说其有点儿营养价值。

1939年9月29日

今天天气多云，但并不冷。现在，晚上和凌晨时分都比较暖和。

我打扫好了最大的花床，清理了厨房前面的那个。《小农》建议现在种植蚕豆和青葱，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种的。

6枚蛋。

泡了苹果，准备做苹果醋。

1939年9月30日

天气很好，没有风，还算暖和。我继续清理花园，快清理到格架了。我发现有几处的白蔷薇已经相互交叠了。我给所有的花椰菜施了硝酸钾，又摘了一些苹果，还有10到15磅没摘，但我不知道还能剩下多少。我尽量留下了比较大个的苹果。

5枚蛋，以3先令每20枚的价格卖了15枚（周三也卖了15枚）。这周一共收获了47枚鸡蛋，应该是今年收获鸡蛋数量最少的一周。

---

[1] 奥威尔习惯剪报，将报纸中的内容分为国际事务与一般事务、党派政治、社会和其他四个板块，从中提取有用信息。本书已删去剪报，只保留奥威尔概括的信息。全书同。

[2] NCL，National Council of Labour，全国工党委员会。

[3] 国际工会联合会，成立于1901年，是历史上两个最大的国际性工会组织之一。

[4] 优士品种的苹果是料理苹果，我之前以为是食用苹果。（作者原注）

[5] 并不太确定，他们在只有半英寸到四分之三英寸长时，似乎四条腿就长齐了。（作者原注）

[6] 埃迪·W是李德利夫人的女儿。（彼得·戴维森注）

[7] 它长得还可以，但没能熬过1940年1月的霜冻。（作者原注）

[8] 据说大多数否决是因为美国工会联盟主席格林拥有大量选票。（作者原注）

[9] 拆散朋友的做法，尤其是拆散来自同一地区朋友的做法，是为了保证某一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时，伤痛不会由同一城镇的人承担。这一政策制定的导火线是索姆河战役（1916年7月到10月）惨重的伤亡情况，当时，部队里的士兵均来自同一地区，他们一同受训，一同参战，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战死，给家乡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悲痛。（彼得·戴维森注）

[10] 可能是指提特里先生，奥威尔的邻居。（彼得·戴维森注）

[11] 到摘掉网时，一共收获了7.5磅草莓，每磅6便士，一共是3先令9便士。（作者原注）

[12] 比上周多了10枚。自1939年7月4日起，母鸡们就一直吃卡斯伍德调味饲料。（作者原注）

[13] 奥威尔曾写到他，“最受知识分子们欢迎的两位军事批评家就是利德尔·哈特中校以及富勒少将，前者宣扬防御比进攻重要，后者则认为进攻比防守重要。双方意见相左，但人们同时接受了这两种说法。他们在左翼分子中颇受瞩目的秘密是，两个人都与陆军部意见不合。”（彼得·戴维森注）

[14] 水蜗牛可以随时浮到水面，也可以不靠吸盘留在水底。（作者原注）

[15] 莱斯利·霍尔-贝利沙（1893-1957），1937年到1940年任英国陆军大臣，1942年到1945年任无党派国会议员。

[16] 赫尔穆特·沃尔塔特博士，是赫尔曼·戈林的经济顾问，当时正在英国参加捕鲸业的会议。毫无疑问，他与海外贸易部的R.S.赫德森进行了商谈。当时两人只是私人会面，但现在引起了公众的怀疑。1939年7月24日，张伯伦在众议院称两人的非正式谈话绝没有涉及两国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并向众议院保证没有做出贷款提议。

[17] 奥威尔之所以惊讶是因为《工人日报》在1937年曾抨击过他。（彼得·戴维森注）

[18] 注意，20加仑相当于整整3立方英尺。（作者原注）

[19] 并判处监禁。（作者原注）

[20] 可能是塞利尔·怀特，是奥威尔在西班牙服役时认识的朋友。

[21] 可能是奥威尔的朋友理查德·里斯，也可能是雷金纳德·雷诺兹（1905-1958）。雷诺兹是记者、作家、贵格党人，也是和平主义者，支持西班牙境内非共产主义人士的共和党人，也是独立工党优秀的发言人。（彼得·戴维森注）

[22] 今圣彼得堡。

[23] 列昂纳多·梅里克（1864-1939），原名米勒，小说家。现在几乎无人知晓，但他在1918年出版的一套小说集中，每本小说都由一位名家作序。（彼得·戴维森注）

[24] 科学家禽饲养者协会的官方刊物，于1919年以周刊形式创立。奥威尔于1939年7月26日和27日就母鸡饲养问题与该协会通过信。

[25] 沙俄时期的革命先驱，曾被监禁和流放。她坚持认为犹太-阿拉伯工人应该团结，并支持阿拉伯农民的事业。

[26] 法林登勋爵（1902-1977），是奥威尔在伊顿公学时的同学，曾任调查委员会的会计，于1936年进入西班牙参与不干涉政策的制定。1940年到1945年间，任公民自由全国委员会的会计。

[27] 巴黎《独立新闻》的编辑，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杂志有关，而奥威尔曾为该杂志写过文章。

[28] 1939年7月29日，三千名苏联军队在一百辆坦克的掩护下攻击了张鼓峰附近四英里长的边界。张鼓峰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西南约一百英里处。最终苏联撤退，苏方损失了四百名战士，日方损失了一百二十名。（《泰晤士报》）

[29] 位于巴黎，主要出版英文读物，在欧洲大陆范围内销售。英国当局认为，该社部分书籍有淫秽内容。（彼得·戴维森注）

[30] 可能是独立工党内的某个人物。

[31] 可能是奥威尔在西班牙时的指挥官乔治·科普。

[32] 《争议》的编辑，后来《左翼论坛》更名为《左翼》，他继续担任编辑一职。该杂志为支持社会主义者的月刊，致力于实现无阶级差别的社会。（彼得·戴维森注）

[33] 独立工党青年团的秘书，与独立工党内的托洛基主义分子吉姆·伍德结了婚。（彼得·戴维森注）

[34] 40%的党员在伦敦，工业领域的党员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共产党手册》）。（作者原注）

[35] 今天（1939年8月29日）为三百万。（作者原注）

[36] 注意，迈尔斯说自己是从另一名共产党员杰弗里·派克那里听来的。（作者原注）

[37] 哈罗德·尼克尔森（1886-1968），英国外交家、传记作家、小说家。

[38] 奥威尔对战前事件的记载到此结束。

[39] 可能是尼古拉斯先生。

[40] 在此期间，并不知道奥威尔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然而，在他1939年10月6日写给列昂纳多·莫尔德的一封信中提到，艾琳已经在政府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我目前还没找到”。（彼得·戴维森注）

1939年10—12月

1939年10月1日

天气还不错，但很冷。我又做了2磅苹果酱。摘了些黑莓，但没时间摘那些生长位置更好的。我又摘了些苹果，没剩下几个大个的苹果了。在架子上的麻袋后面放了10到15磅苹果，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希望能保存一两个月。

5枚蛋。

1939年10月2日

天气晴朗，很冷。山毛榉子熟了。我昨天看到了一群已经长大了的野鸡。

我选了两只小公鸡，准备明天到市场上卖掉，两只差不多能有10磅重。

我继续清理花床，已经清理到小棚子了，明天就能清理完，之后就会施肥，等几天再翻地。

4枚蛋。

我做了一两磅黑莓酱，但好像太稠了。

1939年10月3日

天气晴朗，很冷。下午下了小雨。清理好花园了，把一些挡路的小

植物移植走了，这样明天就可以施肥了。

5枚蛋。两只小公鸡卖了6先令6便士（佣金是7便士），差不多每磅肉8便士。

1939年10月4日

天气非常冷，风很大。今天我摘了第一拨胡桃，然而，成熟的没几个。我还施了肥，给韭葱除了草。由于干旱，春季卷心菜没怎么生根。收了洋葱，但收成不好。

6枚蛋（以3先令20枚的价格卖了14枚）。

做了差不多3磅苹果姜酒，我觉得姜放多了。

1939年10月5日

晚上下了点雨，白天阴天，闷热潮湿。下午下了一两场小雨。土地仍然非常干燥，表面几英寸都是干的。除了小花床，我把花园里所有的地都翻了一遍。土壤紧实后，就能种植新的花了。

6枚蛋。

1939年10月6日

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下了会儿雨。偶尔晴天，不怎么冷。我整理好了花园，种了两排卷心菜（36棵），整理了准备种植醋栗的地（现在移植还太早）。用煤粉和泥土试着做了几个煤饼。如果能成功，我准备做模具和筛子，再多做一些煤饼。显然，重要的是得用细煤粉做煤饼，而且得用大个的金属容器混合材料。

我今天晚上看到了一些荧光蠕虫，也可能是千足虫，我之前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种东西。走出草坪的时候，我注意到什么东西在发光，后来发现是一只在变大的某种东西。我以为是萤火虫，但萤火虫不会在身后留下荧光。借着手电筒的光仔细寻找后，我发现了一条细长如蠕虫的东西。它身体两侧有很多细足，头上还有两只触角一样的东西，触角大概有1.25英寸长。我抓住了它，放在试管里带回了家，但它的荧光很快消失了。

荧光蠕虫是浅黄色的，总在扭来扭去。

5枚蛋。

1939年10月7日

浓雾，没有风，下了几滴雨。山毛榉子现在都成熟了。我给一个大西葫芦（大约18英尺）剥了皮去了瓤，剩下的西葫芦大概就只有2.5磅重了。我买了艾克多堆肥养分剂，以2先令3便士的价格买了7磅，据说能做成7英担的肥料。然而，似乎不能在废弃物中放木料，也不能放入太大的根。我开始挖小坑，用来混合肥料。煤饼和煤混合使用的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打算再多做一些煤饼。方法是把泥土和水混合之后，放入煤粉，泥土只要能和煤粉黏在一起，呈糊状就可以了。模具必须得坚固，因为这种东西得用力压实。

7枚蛋（以3先令每20枚的价格卖了15枚），这周一共收获了38枚蛋（注意，今天开始使用新的一罐液化气了）。

1939年10月8日

我摘了2磅黑莓，还挖好了垃圾坑，给前两层堆肥喷了艾克多。雾很大，没风，很冷。

6枚蛋。

1939年10月9日

下午四点之前一直在下大雨。风很大，把玫瑰丛都吹乱了，还卷起了一些花椰菜。我给花椰菜打桩固定了，其他的没做什么，因为太潮湿了。

5枚蛋。

1939年10月10日

今天没风，温暖而晴朗。晚上下了几滴雨，地面很快就湿了。很多菊花的根被吹松了。我为蚕豆挖了沟，但土地条件不适合播种。那片地（红菜头豆旁边的）有很多细黏土，我捡了一些不怎么好的，埋了些沙子和木灰。我把肥料倒进了更大的容器中，因为我得用这个容器做腐叶土。我还给鸡舍转移了位置；收了洋葱，但收成很差，把它们挂在外面晾干了；挂了10串，但只有三四串能留下来用。我捡了些胡桃，但今年成熟的胡桃很少。

昨天做了2磅黑莓酱。注意，2.5磅黑莓能做2品脱果汁，也能做2磅果酱（实际上，还能剩下一些黑莓）。

5枚蛋。

1939年10月11日

没有风，晴天，还算暖和。地面干燥了不少。我移植了10株风铃草、大概20株美洲石竹、20株康乃馨、25株桂竹香（火红色的），如果明天不下雨就继续移植。我又添了点肥料，给菊花定了桩。提特里没买到木材，所以没法做鸡舍。昨天我弄断了铁锹的手柄，不过好像换手柄就行了，不用买新的。我试着做了些苹果酱，但似乎不怎么成功，一共做了25磅左右。

8枚蛋（以3先令20枚的价格卖了25枚）。

1939年10月12日

和昨天一样，天气晴朗。我移植了25株桂竹香、一些蜀葵、20株买来的和15株我们自己种的郁金香球茎（2株黑色的）以及30株水仙花。有的水仙花是买的，有的是我们自己种的。我割掉了西葫芦的叶子，好让它们长熟。每株上面都留了一片叶子，其中有一片叶子很大。

8枚蛋。

1939年10月13日

有雾，但不怎么冷。偶尔还能看到燕子，飞得很高。我给草坪剪了草。草又长高了，但我没剪掉多少，这可能是今年最后一次剪草了。除了格架旁边的一小块地还需要整理、草坪边缘需要修剪和铺小路之外，花园里就没有别的活要做了，不过铁锹修好之前，这些活我都做不了。我清理了那片种着大黄的地，准备翻土。给所有的花椰菜都施了磷酸肥，这应该是最后一次给它们施肥了。有的皱叶甘蓝可以收了，一些抱子甘蓝也快成熟了，但头茬都长得不好。我种了两打雪莲花球，还把鸡粪肥放到棚子里晾干，把煤粉和茶叶放在纸袋中混合后，烧得还不错。于是，我决定以后要留下所有的白糖包装盒，专门做这个用。

5枚蛋（1枚双黄蛋）。

1939年10月14日

昨天一整夜和今天早上都有大雨。下午天放晴了一些。我开始翻地，就是大黄旁边的那片地，别的就没做什么了。

5枚蛋（以3先令20枚的价格卖了15枚），这周一共收获了42枚鸡蛋。

1939年10月15日

一整天都在不断下大雨，做不了什么户外工作。

8枚蛋。

1939年10月16日

阳光很好，没有风，很暖和。我觉得昨晚有霜。昨晚我又看到了那只白色猫头鹰。我给紧挨着覆盆子的那片地撒了石灰。我没想给这块地施肥，想种一些根茎作物。在种大黄的那片地附近我又整了一片地。那里的土壤酸度很高，挖地的时候必须得放石灰。我割掉了红菜头豆，填了一层堆肥，又修了一段花园小路。

我以9先令的价格卖了4只小公鸡——价格不算高，但它们的个头确实也非常小。

3枚蛋！

1939年10月17日

今天没有风，天气很晴朗，不怎么冷。我去鲍多克那里花6先令买了把鹤嘴锄；还买了一点萘甲唑啉，据说与等量石灰混合能有效去除杂草。我清理了准备种黑莓的土地。榆树叶开始泛黄，山毛榉的叶子还没有。

6枚蛋。

1939年10月18日

天气很冷，下了几场大雨。

1939年10月19日

雨一直下到将近深夜，没法儿做户外工作。我翻了一点大黄地，清理了花园小路的最后一段。我得再弄点煤渣，否则就铺不成路了（过去十天都没有煤送来）。我尝试着用了些石灰和萘甲唑啉的混合物[1]，还弄了一点石盐，两种都可以用来去除杂草。现在，屋子周围都是山雀。地里的榆树上有种鸟，每天晚上都很吵，不知道是不是猫头鹰。

如果可以的话，11月底之前要做完这些事：

拆掉鸡舍的铁丝。

清理新整理的地和靠近老花园那一小片地上的所有杂草。

堆起草皮发酵。

把新整理的地大概翻一遍。

移植所有的浆果灌木。

清理现在浆果灌木的土地，翻一遍。

给空地、大黄地空出来的地方，还有浆果灌木现在的地方撒石灰。

清理灌木丛下面的空地，准备种攀缘蔷薇。

菊花枯萎后，把其中大部分拔掉。

拔掉大丽花，留下根部。

种青葱。

种蚕豆。

种夹竹桃和紫菀（如果季节不算太早）。

种植玫瑰、攀缘蔷薇和多花蔷薇，移植牡丹。

移植苹果树。

培育黑莓苗，种植黑莓。

收集几麻袋枯叶。

清理草莓地。

如果可以再做以下几件事：

修好花园里的小路。

在门边开垦新地。

5枚蛋。

1939年10月20日

天气不错，没有风，阳光不错，但并不算热。我翻好了种大黄的地，准备为枯叶弄个筐，又铺了一点路，收获了最后的一批荷兰豆。提特里还是没找到木桩，所以只能买铁条了。

5枚蛋。

1939年10月21日

天气很晴朗，万里无云，无风的秋日，有薄雾。早晚非常冷。艾琳、莉迪亚[2]和我一起摘了4.5磅黑莓。坚果似乎已经成熟了，都掉在地上了。橡树的叶子大部分都黄了，山楂和白蜡树的叶子开始飘落。

7枚蛋（以3先令20枚的价格卖了15枚），这周一共收获了41枚蛋。

1939年10月22日

浓雾，不太冷，下午晴了一会儿，没有风。把几袋马铃薯倒出来检查了一番，“国王爱德华”这个品种里有一些烂掉了，但“红国王”还不错，或者说坏的比较少。把坏掉的丢了，换上了新袋子，还撒了点石灰，希望这样就不会有更多坏掉的马铃薯了。我种了几丛南庭荠，摘了那个快熟了的南瓜，只有大概10磅重。提特里要卖掉第一批料理苹果（当地人称之为“米特普”——因为之前没见过这种苹果），每磅1便士。他还准备卖掉食用苹果（布伦海姆），每磅1.5先令。今天收获了第一棵皱叶甘蓝，准备以3先令6便士20枚的价格把鸡蛋全卖给送奶人，之前卖给屠夫的价格是3先令20枚。提特里说，按市场价格的话，20枚鸡蛋能卖到3先令8便士，但那样的话还得支付佣金。

6枚蛋。

1939年10月23日

不算冷，天气还算不错，晚上下了小雨。清理了假山和格架之间的空地，做了个苗圃，种了20株勿忘我，还为攀缘蔷薇准备好了地。现在花园里没多少事需要做，只是需要把花（草夹竹桃之类的）在长得差不多的时候移植到花园里、修好小路和反复锄草而已。昨天做了2磅苹果酱。发现了一些动物的卵，不是蠕虫的就是蜗牛的，只有火柴头大小，呈白色、半透明状。

6枚蛋。

1939年10月24日

昨晚显然下了大雨。今天阴天，不冷，下午下了小雨。现在，叶子落得更快了。

今天去鲍多克那里买了一个小筛子（花了2先令），没买到做铁丝网的铁丝，也买不到木料。想办法找了两根6英尺长的木桩，做鸡舍的

门柱。今晚做好了，明天要是不下雨，就装上铁丝。我本来想修整草坪，但割草机现在根本就没什么用，得等到明年春天用镰刀割了。K先生[3]用断叉的木柄修好了铁锹，修得不错，只不过铁锹变短了。我给了他1先令。土质还不怎么好，所以没办法种蚕豆。克拉克送来了青葱苗，有时间我就种上试试。注意，2磅青葱苗约为60棵球茎（大概两垄）。两只仓鸮住在尾外的榆树上，显然晚上吵个不停的就是它们。我想这就是被称作鸣角鸮的动物，因为普通的棕色猫头鹰会发出“鸣——呼”的叫声。

6枚蛋。今天开始给母鸡喂卡斯伍德饲料[4]，还给它们喂了不少贝壳粉。

1939年10月25日

天气晴朗，阳光不错，有冷风。开始清理老花园和新开垦的地之间的空地，还扫了一些垃圾，给另一垄地和大黄地撒了石灰，但还没把石灰翻进土里去。收集了一袋枯叶（山毛榉的叶子）。这两天都看到有只棕色的母鸡在附近出没，今天找到了它的鸡窝——有10枚蛋，1枚已经破了。我把鸡蛋拿走了，它们不是受精蛋，看起来还不错。今晚那只老母鸡回到空荡荡的窝里时，我把它放进了鸡舍，希望过几天它就能恢复正常。今天上午给鸡舍装上了铁丝，门柱的木桩不够长，但只要再加些木料就可以。昨天，给木桩打洞的时候发现，地表6英寸以下就是白垩层，但很可能不是整片地都如此。

4枚蛋（以3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卖给了送奶工。

1939年10月26日

昨晚的霜很重，都是白色的，应该是今年最重的一场霜了。白天阴天，间晴，非常冷。早上，母鸡的水盆都冻住了。我把冰敲碎了，可晚上还是有点冰碴。大丽花很快就枯萎了。我看恐怕正在成熟的西葫芦也撑不了太久，因为它们的颜色也有点儿变了，于是我就把它们放进屋里了。我还用秸秆堆了堆肥，现在差不多好了，不过稻草还在花园里。

我清理了荒地，把草皮堆成一堆，标记了花园小路的位置。又腾出来1码宽的地，开始翻地，准备种青葱。收了一袋枯叶，撒了点硝酸钠（听从了《小农》上的建议）。试着给枯叶编号，看看最后能产生多少肥土。老哈切特今年堆起来的枯叶已经发酵了，成了不错的细肥土，但我之前往草地上喷过氯酸钠，所以土地应该不会发酵得又快又彻底。在准备种蚕豆的地方撒了些木灰。如果这片地弄不好，就只得试试别的地方了，比如给黏土地多撒点石灰之类的。孵蛋母鸡每天都去窝里，昨天要不是我碰巧发现了它，它就会被冻死的。今天在花园里看到很多金翅雀。

7枚蛋。

1939年10月27日

我觉得昨天肯定有一点点霜。今天中午的时候，有隆隆的响声，可能是雷声，也可能是枪炮声。很快就下起了雨夹雪。下午还下了几场雨。地面又湿透了，因此没办法做太多户外工作。翻了些地，准备种青葱。

6枚蛋。

1939年10月28日

昨晚又结了霜（没有之前严重）。今天一整天几乎都在下雨，根本没办法做户外工作。今天有枚双黄蛋。

6枚蛋。这周一共收获了41枚蛋。

1939年11月3日

上周日（10月28日）以来一直出门在外，今天晚上才回来的。所有

东西都湿透了。我又种了几株西红花球茎，还把几株大丽花连根拔起，可能留着还能再种。在此期间，母鸡下了28枚蛋，平均每天还不到5枚。忘了说，走之前，以4先令的价格卖了20枚鸡蛋。

1939年11月4日

潮湿，但雨不大。给青葱翻好了地（还很潮湿，得等几天才能干），给大黄施了粪肥，开始清理新地上的蓟草。今天白天看到了那只白色猫头鹰。地里长出了好看的伞菌，浅浅的蓝绿色，细细的菌柄也是一样的颜色，还带着点淡紫色，整个伞菌都蒙着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又在枯叶堆上堆了半袋枯叶。

5枚蛋。这周一共收获了33枚蛋（显然，安德森太太没有喂饱母鸡）。

1939年11月5日

上午有点风，之后就是阳光灿烂的好天气。地面干了一些，晚上风很大，还下了几滴雨。实际上，风把小鸡舍的顶棚吹掉了。一大群八哥——大概有几万只一起飞过，发出的声音就像下大雨一样。树叶都快落光了，老树叶才刚刚飘落。我记得今年榆树落叶的时间比大多数其他的树早得多。

移植了一些醋栗苗，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弄伤它们。一两株醋栗苗还有绿色或者嫩绿色的叶子，有些苗的根长得太深了，我挖出来的时候只能破坏一点苗根。这里的土壤（花园的这头）在地下1米的地方就是黏土了。我挖出了一部分黏土，用沙子和草皮发酵的土壤尽可能地整了整土地，还给灌木丛撒了点石灰，希望这次风不会把它们吹跑。又加了一袋枯叶（3袋半）。

9枚蛋（可能有几枚是昨天下的）。以4先令20枚的价格卖了30枚蛋。

1939年11月6日

显然昨晚雨下得很大。今天风很大，下了几阵雨，但大部分时间都阳光明媚。移植了一些牡丹。据说，移植的牡丹很难存活，但它们在移植前就已经开始枯萎了，于是我移植的时候，给每株都保留了一大部分土。给一根小攀缘蔷薇插了枝，之前是把它养在花盆里。现在，这株蔷薇已经生根了，不过还非常小。我挖了一条沟，铺上了肥料，准备种第一拨红醋栗，但得等土地干一些再种。又给另一小片地撒了石灰。之前忘了说，昨天移植的一丛醋栗现在已经压条了，显然它们有时候会自然压条的。

5枚蛋。

1939年11月7日

很潮湿，做不了太多户外的工作。晚上下了大雨。移植了第一垄醋栗（6株红色的，5株黑色的）。用谷壳代替稻草垫了垫鸡窝，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花费更高成本，但应该容易清理鸡窝了，也容易生肥。

6枚蛋。

一丛醋栗根部有一小窝田鼠，我把那株植物撬起来时，它们一下全跑出来了，有五只。田鼠比家鼠更胖，毛色更浅，尾巴很长（我一直以为他们的尾巴很短），移动速度很慢，像是在蹦蹦跳跳地往前走，但最后它们都逃走了。

1939年11月8日

天气干燥，有风，阳光不错，不冷。周围有很多金翅雀。清理了剩下的荨麻，或者说清理了剩下的大部分荨麻。又种了两垄黑莓。给另一块地撒了石灰。又堆了一袋枯叶（4袋半）。

6枚蛋（以4先令4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

1939年11月9日

晴朗无风。所有东西都潮乎乎的，但显然昨晚没有下雨。又修了一段小路。但独轮车坏了，没法继续修路了，所以我正努力修好它。

5枚蛋。

1939年11月10日

天气非常好，阳光明媚，没有风。给新开垦的地挖了第一条沟，种了青葱（青葱苗还不够种两垄）。移植了3株攀缘蔷薇的插枝、一株艾伯丁玫瑰、一株黄白玫瑰以及一株我不知道品种的玫瑰。把小路修到了格架附近。提特里说保存大丽花球茎的关键就是将其倒置一段时间，它们之所以会烂掉是因为潮气顺着茎的空隙流到了根里。以每磅1.5先令的价格买了些苹果（布伦海姆）。提特里说他每20枚鸡蛋要卖到4先令6便士的价格。

9枚蛋。

1939年11月11日

天气很好，和昨天一样。鸟儿开始放声歌唱，如春日里一样。我在田地里发现了一些母马和小马的粪便，颜色很深，都快接近黑色了，也许是因为马被放在野外吃草，没有吃谷料的原因。又加了一袋枯叶（6袋）。

5枚蛋（以4先令4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这周一共收获了45枚鸡蛋。

1939年11月12日

没有风，有雾，隐约能看到太阳，非常冷。树林里有很多真菌，其中一种正生长到了某个特定阶段，因为它长出了白色的绒毛状霉菌，闻上去就像坏掉的肉。我看到了许多斑鸠和大量八哥。路过一片地，看上去里面都是杂草，但我觉得有可能是荞麦，有的当地人种荞麦喂山鹑。荞麦的种子很小，黑色的，呈三角形，像微缩般的山毛榉坚果。我把一块苔藓带回了家，贴在了假山上，希望它能继续生长。下午三点的时候，我把一块肉挂在外面喂山雀。不到五点，山雀们就飞过来了。

5枚蛋。

1939年11月13日

天气很好，没有风，阳光明媚。昨晚一点都不冷。不知道青葱是怎么冒出芽的，不知道是自己长出来的，还是鸽子们啄的。有时，它们出现的位置离我当初种下的位置有1英寸的距离。我在新开垦的地块上又挖了2条沟，翻了下堆肥，给另一片地撒了石灰。又加了一袋枯叶（7袋）。

有只母鸡肯定是在孵蛋。

6枚蛋。

1939年11月14日

风很大，中午时好像是下雨了，但实际并没有下。在新开垦的地上又挖了2条沟。因为这块地正中间是白垩层，有很多石头，不好挖，所以我的进度不快。又给剩下的醋栗挖好了沟。

6枚蛋。

1939年11月15日

昨晚下了点雨，今天还算晴朗，没有风，不冷不热的。又挖了2条沟。割了一些草本植物。又得给草夹竹桃分枝了。又有一枚双黄蛋。好像最近的双黄蛋都是同一只鸡下的，但当地人总说双黄蛋的出现象征着一窝蛋的开始或结束。

9枚蛋（以4先令4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

1939年11月16日

昨天晚上下了点雨，今天一整天仿佛都在不停地下雨，根本做不了多少户外的工作。我又给一垄地撒了石灰（石灰快用完了），移植了几株醋栗。现在，大多数树木是光秃秃的。榆树上还挂着几片叶子。所有的树中，似乎白蜡树是最后才落叶子的。

4枚蛋。

1939年11月17日

没有风，阴天，但下了点雨。移植了剩下的醋栗，只剩下两株，而剩下的这两株叶子还很绿，其中一株自己压条了。我把那根压条剪下来，试着种在地里。又给一垄地撒了石灰。剩下的石灰应该够撒完剩下那片空地了，但肯定不够洒在灌木丛里了。要想给整个花园撒上石灰，至少还得要1英担。又收集了一袋枯叶（8袋）。往肥堆里加了一点枯叶。

7枚蛋（实际上是8枚，有1枚破了）。

1939年11月18日

多雨。去了鲍多克那里，但没买到玫瑰。买了一株牡丹，我可以种在角落里，就不用种玫瑰了。克拉克的店员说，谷物短缺和交通困难的

状况比报纸上描述的更严重。看到了一只鸟，我认为肯定是金海鸥，不过到现在还从没听说这里出现过这种鸟。那只鸟比鹬大一些（所以显然不是鹬），飞的时候像红脚鹬，但其背部是褐色的。由于距离太远，我看不清它的喙。唯一让我疑虑的是，它的腹部几乎是白色的。

9枚蛋，以4先令4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按照克拉克的说法，政府准备将鸡蛋价格固定在4先令）。这周一共收获了46枚鸡蛋。

1939年11月19日

昨晚下了点雨。今天没有风，天气很好。今天开始冬令时（由于战争，推迟了两个月），所以大概下午三点就喂了母鸡。我又挖了一条沟，准备移植那株小玫瑰（就是那株被薰衣草遮住的玫瑰），还移植了一些牡丹（每株6便士）。第二年，它们应该还不会开花。我担心三株牡丹之间的距离可能太小。

5枚蛋（我注意到每次下过雨后，第二天母鸡的产蛋量总会减少，比如昨天就下雨了）。

1939年11月20日

晴朗，无风，还算暖和。种了6株羽扇豆（一共花了9便士买的），据说可以收获不同颜色的豆子。注意，提特里说种植羽扇豆之前应该先把它的根梳理开，而且不能种得太深。给最后一垄地撒了石灰，开始翻地。由于土地酸度很高，而且长满了杂草，所以需要更多的石灰。割掉了剩下的草夹竹桃，把之前被风吹歪了的菊花扶正。由于到了冬天，所以下午做不了多少事。菊花都已经开花了，大多数是深棕红色，有几株是很难看的紫色，还有一些是难看的白色，我应该不会留下它们了。玫瑰含苞待放，此外，花园里就没有其他的花了。紫菀已经过了花期，于是我割了一些。第二拨抱子甘蓝（1939年8月19日种的）发芽了，同时移植的皱叶甘蓝也长大了。那片地里的植株都比较小。尽管植株长得不错，但花椰菜还没长出来。提特里说橡树叶最适合做腐叶，其次是山毛榉的叶子。

8枚蛋，以每个2便士的价格卖了8枚（我算错价格了）。

1939年11月21日

没风，阴天，很冷。没做多少户外工作。今天开始用新的1英担福尔奥佩璞饲料。克拉克的店员说谷物短缺的情况比较严重，比如玉米和印度小米（小麦渣[5]）。前者是从阿根廷进口的；后者通常进口之后就送去碾磨，但目前英国磨坊的生产速度跟不上。没有出现小麦短缺的情况。

8枚蛋。

1939年11月22日

和昨天差不多。把撒过石灰的新地翻了翻，移植了剩下的醋栗。今天又有1枚双黄蛋，还有1枚像是《小农》上描述的粉刺蛋。汤姆说，昨天看见我们的花园里跑出了一只老鼠。

9枚蛋。

1939年11月23日

昨晚又下雨了，今天一整天都是小雨。很冷。根本做不了太多户外工作。又把洒了石灰的新地翻了翻。

8枚蛋。

1939年11月24日

晴朗，无风，很冷。翻了翻撒过石灰的地。移植了苹果树，拔起它的时候费了不少功夫，我担心自己严重损伤了它的根部。把剩下的紫菀割掉了，移植了其中的一丛。找到了一个有11枚蛋的窝，窝里没有母鸡，鸡蛋看上也还可以，应该可以拿去卖，但就不记录了。

4枚蛋。

1939年11月25日

昨晚的霜很重，下午四点就开始起霜了。今天早上十点才开始化霜。一整天都很冷，也很阴沉。从母鸡的水盆中拿出来的冰块，直到晚上还没有融化。点了篝火，往肥堆里加了些腐败的稻草。今天用完了艾多克堆肥剂，根本不像卖家说的那样能做7英担肥料，但也许是因为我用得太随意了。

7枚蛋（以4先令4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这周一共收获了49枚鸡蛋，还有12枚生在外面的窝里，一共60枚。

1939年11月26日

很冷，有风，白天下了点雨。试着种了一株石楠，但不确定它能不能成活，因为这株上面没有多少根。应该多种一些，因为我明年想试试芽接法。

10枚蛋（以每枚2便士的价格卖了4枚，以1先令的价格卖了5枚）。

1939年11月27日

昨晚和今天上午都有大雨。下午天气很好，没有风。所有东西都湿漉漉的。又挖了一条沟，现在基本上完成了我计划在这片地上挖的沟。又种了两株石楠。我打算种6种不同高度的石楠，看看它们会长成什么

样。又收了一袋落叶（大约10袋），填满了整个筐。我往上面盖了细土，明年之前都不会动它了。

7枚蛋。

1939年11月28日

没有风，不怎么暖和。晚上有些霜。翻好了那片新开垦的地，应该能种五六垄马铃薯。我让提特里看了看种下的石楠，提特里说应该去掉旁枝，把芽接到春天新长出的枝条上。

7枚蛋。

1939年11月29日

晚上又下雨了，今天是晴天，还算暖和。开始翻地，准备种些棺木。这片地的状况很不好，翻一遍得花好长时间。而且这里还有很多白垩土，土质不好，得好好施肥才行。开始修通往鸡舍的路了，但是那儿的路很泥泞。

6枚蛋（以4先令4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

1939年11月30日

不冷不热，没有风。只下了一点雨。蝙蝠出来了（前几天虽然有霜，但我还是看到有蠓飞过）。在杂草疯长的那块地上翻了翻。修好了小路的前半段。给白色的攀缘蔷薇剪了枝，希望这么做是对的。之前一段时间都没见到猫头鹰，也没听到它的动静。

8枚蛋。

1939年12月1日

今天的风比昨天大些，比昨天冷。除了除草，翻了翻堆肥，又移植了一株石楠，这株石楠生长的时间比较长。

9枚蛋。

1939年12月2日

晴朗，没有风，不怎么暖和。

9枚蛋（以4先令4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这周一共收获了56枚鸡蛋。

1939年12月3日

昨晚有霜。今天天气不错，有风，有点冷。那条公共小路上，有部分的积水已经到了膝盖。又移植了一株石楠。我注意到1939年10月18日打下的木桩上长了真菌（是那种水平生长的，质地比较硬，像耳朵一样的真菌），已经有1英寸宽了，显然这种真菌长得很快。

7枚蛋。

1939年12月4日

昨天前半夜下了大雨。今天上午有小雨。有风，很冷。

10枚蛋（以4先令4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

1939年12月5日

有风，阴天，特别冷。灌木丛上挂着几个黑刺李。鸽鸟蹲在地上叫着。

10枚蛋。

1939年12月6日

昨晚很冷，但没有霜。今天晴天，也很冷。

5枚蛋（以4先令2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

1939年12月7日

昨晚的霜很重，今天下午才开始化。晚上有浓雾。R先生[6]把冻土翻了翻，把霜翻进地里，这样就能杀死线虫了。

9枚蛋。

1939年12月8日

一整天都在下雨。

10枚蛋。

1939年12月9日

晴天，很冷。晚上下了点雨。

8枚蛋。这周一共收获了59枚。

1939年12月10日

上午阳光明媚，下午阴天，但不冷。又移植了一株野玫瑰。把4只小母鸡放到了大的鸡舍里。

8枚蛋。

1939年12月11日

刺骨般冰冷，一整天都是浓雾。

7枚蛋。

1939年12月12日

（在伦敦）阴天，寒冷。

1939年12月13日

寒冷，阴天，没有风。

1939年12月28日

回到了沃林顿。很冷，但没有风。伦敦下了几场霜，圣诞节前后有浓雾，基本不能出门。昨天起就非常冷，一整天都在下雪。所有东西上都覆着一层薄薄的雪，连铁丝网上都是。雪后，最美的植物就是薰衣草了。就连瓦楞铁也在被雪覆盖之后变得好看了。白色的来亨鸡在雪中看上去是暗黄色的。

我们离开的日子里，也就是从1939年12月12日到现在，一共收获了101枚鸡蛋——虽然产量下降了，但比我预期的好。现在，只能靠猜测填写每周的数据了，不过总数是对的。我不在的日子里，老鼠肯定很猖狂，估计把报纸撕成一条一条的了，所以必须得用点老鼠药了。

4枚蛋（肯定是因为太冷了的缘故）。

（注意，至于产蛋数：我是按照前两周每周45枚记录的，因此，还有30枚就可以算在本周周五、周六的产蛋数里，也就是说这周的产蛋数为周五、周六的产蛋数再加上30枚。这样，尽管每周的数字不够准确，总数依然是对的。）

1939年12月29日

一整天都冷极了，但没再下雪。今天早上水管冻住了。看见一只兔子从湖面的冰上跑过。农场里的人正忙着给燕麦打谷。

4枚蛋。

1939年12月30日

冰雪没有融化。又飘了一阵雪。

5枚蛋。这周一共收获了39枚鸡蛋。昨天以1先令的价格卖了5枚。

1939年12月31日

非常暖和，下午冰雪开始融化，但今晚似乎又冻上了。

5枚蛋。

---

[1] 提特里认为从长远角度看，这样会导致杂草丛生。然而，据说这种混合物能杀死线虫。（作者原注）

[2] 莉迪亚·杰克逊（1899-1983），自与艾琳1934年在伦敦大学学院认识后就成了朋友。1940年，公寓被炸毁后，莉迪亚就租住了奥威尔位于沃林顿的房子。10月21日是周六，所以艾琳可以从伦敦回来度周末。（彼得·戴维森注）

[3] 奥威尔的邻居。（彼得·戴维森注）

[4] 1939年11月14日才吃完这批饲料（26只母鸡）。（作者原注）

[5] 小麦渣是一种印度谷物，是小麦磨面后剩下的部分。（彼得·戴维森注）

[6] 奥威尔的邻居。

1940年1—3月

1940年1月1日

昨晚又结冰了。今天，向阳处的冰开始解冻，但背阴处仍结着冰。几个孩子在结了冰的池塘上滑冰。几个农民在地里犁地，那里的土质还不算太硬，机引犁就能翻开。据说，把霜翻进土里对土壤有好处，但把雪翻进去却有害（也许对黏层土有害）。犁1英亩草场，政府补贴2英镑，据说补贴对于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犁地成本已经足够了。据说，犁1亩地要用10加仑液状石蜡。

3枚蛋！

1940年1月2日

冰没化。白蜡树的树枝落下来了，树皮已经掉了，已经被兔子啃过了。白天放在外面的一锅水，一晚上就结了厚厚的冰。

6枚蛋。

1940年1月9日

在伦敦待了近一周，终于又回家了。冰解冻了，但依然很冷，一直潮湿多雾，而且水池上还结着厚厚的冰。厕所里的冰总算化了，但水槽里的还没化。菊花谢了，得连株割下来，丢掉颜色不好看的。春天，也要把其他的花移植或者隔开，但估计没时间。

过去7天，母鸡好像只下了25枚蛋。比之前少多了，显然安德森太太又没喂饱它们。安德森太太以3先令4便士的价格替我卖了20枚鸡蛋。

账目平衡：到周末收获了27枚蛋。

新的这一周结束了，包括1939年1月9日在内一共收获了12枚蛋。（包括我离开前下的鸡蛋，还得再加上25枚。）

1940年1月10日

又是一番彻骨寒。水放在外面，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结冰。教堂边的水塘也结了冰，我走在上面都不会裂，但沃伦田野里的池塘则不一样，那里根本没结冰。两只兔子受惊跑了出来。它们在田野里有个洞，但我不知道这两只有没有住在里面。我在教堂的墙上看到了一只松鸦和一只灰松鼠，可能是谁打下来之后放在那儿的。之前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有灰松鼠，也不知道它们到这个时候不再冬眠了。我割下了菊花。我试着生了几次火，但寒冷的天气里，柴火没有表面上那么干燥。一两株青葱（1939年11月10日种下的）冒芽了。一只小母鸡（5月孵的）开始下蛋了。

7枚蛋。

1940年1月11日

没有解冻。教堂边的水塘上可以溜冰了，可惜我没溜冰鞋。走在其他结冰的湖上还不稳。水甲虫（那种腿长得像桨的虫子）在冰面下游动。透过冰面看，浅水区湖底的砖呈现出奇怪的大小和形状，可能是砖块扔进湖水时，温度比水温高。在公共小路上，我惊起了一只鹬。今天没在田里看见兔子。鸟儿的胆子都很大，可能是饿极了。菜地里有几只秃鼻乌鸦，这可不常出现。一两株报春花和多花蔷薇冒着严寒发芽了。有棵榆树渗出了棕色的液体，可能是树汁，像冰柱一样吊着，就像太妃糖一样。冻住的牛奶都一层一层的，就像千层饼一样。

7枚蛋。

1940年1月12日

下午有那么一个小时好像没结冰，其他时间里，冰就没化过。晴朗无风。鸡粪都冻硬了，碰一下就碎。于是，我就把粪肥撒在一片地上，之后再翻。这片地（靠近树莓地里那片没施肥的地）以后能种洋葱。

9枚蛋。

1940年1月13日

下午，向阳处化了点儿水，之后又冻上了。4枚蛋（以3先令4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这周一共收获了39枚。

1940年1月14日

冰都没化。浓雾。无风，阳光不好，但并不太冷。

8枚蛋。

1940年1月15日

今天有点儿阳光，向阳的地方在下午解冻了一小会儿，其他地方都冻硬了。显然，前两晚的温度更低，室内的水管都冻住了。厨房水池里的几盆水现在基本都冻实了。这应该是1916年到1917年以来最严重的寒流了，当时的情况跟现在差不多（应该是1917年2月末左右）。

9枚蛋。

雪一样的白霜无处不在。今天，一枚蛋从鸡舍里滚了出来，结果给冻住了。我把蛋打破了，发现里面的蛋白变得像带气泡的果冻一样，而蛋黄稠得就像腻子一样。

1940年1月16日

冰没有化。下午的风猛烈刺骨，下了一点雪。

6枚蛋。

1940年1月17日

冰没有化。晚上飘了小雪，积雪约有1英尺。昨晚应该是最冷的一晚，村里的水泵都冻住了。雪没怎么化，踩上去咯吱作响。鸡舍里的鸡粪冻得很硬，我把它们打碎撒在另一垄地里了，以后可以种菜豆或豌豆。

5枚蛋（以3先令6便士20枚的价格卖了25枚）。

1940年1月18日

冰没有化。水管里的冰化不开。今天看到了一只小猫头鹰——我之前没在这一带见过。

11枚蛋。

1940年1月19日

冰没有化。昨天又下了点儿雪。厨房水龙头里的冰化不了，不过，下水道里的冰化了（我先往下水道里倒了沸水，之后在水管弯头处挂了瓶热水）。我本想挖个坑埋垃圾，但发现用镐也挖不开土，就算在6英寸深的地方，土也冻得像石头一样。

9枚蛋。

1940年1月20日

冰没有化。沃伦田野里的池塘上有人溜冰了。棚里收获的马铃薯全冻住了，表皮下有一层厚厚的冰。这些马铃薯上面之前没盖东西。我还没检查那些盖了东西的作物。

7枚蛋（以3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这周一共收获了57枚。

1940年1月21日

天更冷了，风也更大了，下了点湿气略大的雪。汤姆·里德利说，用焊枪喷一遍水管是让水管解冻的最好方法。

12枚蛋（几个月来产量最高的一天）。

据说昨天是21级严寒。[1]

1940年1月22日

昨晚又下了雪，积雪约有4英寸。今天也下了一点。冰还是没化，但确实没之前冷了。把煤油炉拿进厨房，水管最终解冻了，可有根水管破了。等我发现的时候，厨房和小房间里的积水已经有1英寸了。

斑鸠飞不起来，在厨房花园里走来走去，不是因为饿，就是因为冷。我看见它在啄卷心菜，可我懒得赶它。

8枚蛋（以3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

1940年1月23日

显然，昨晚又下了点雪。天气有些暖和了，但冰还没化。

6枚蛋（不算那枚下在鸡舍外地上被摔碎的蛋）。有3只小母鸡，所以肯定有2只在下蛋。

1940年1月24日

冰没有化。风很大。

6枚蛋（没算那只摔碎的，以3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

1940年1月25日

冰没有化。没什么风，不太冷。

11枚蛋（3只小母鸡肯定都在产蛋）。

1940年1月26日

冰没有化。下午的风很猛烈，下了雨，雨水很凉，一落地就冻住了，到处都是薄薄的冰皮。之后下起了大雪，非常松软。

4枚蛋。

1940年1月27日

冰没有化。昨晚明显暖和了些，接着又下起了大雪，湿气很大，雪很松软。今天晚上，地面结了厚厚的冰。鸟儿都很饿。看到一只画眉在小棚子附近走，看起来饿得发虚。

9枚蛋（以3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这周一共收获了56枚。

1940年1月28日

相当寒冷。昨晚下了大雪，积雪足有1英尺深。白天大多时间都在飘小雪。

8枚蛋。

1940年1月29日

迄今为止最冷的一天。昨晚的雪很大，四处都是白茫茫的景象，有的地方，积雪深度有4到6英尺。道路快没法通行了，所以一整天都没车来。风很大。今早，村里的水泵几乎完全被雪埋住了，可却没冻住。因为前几天人们给它解冻后用帆布把它层层裹住了，此后水泵就再也没冻住过。

5枚蛋。

1940年3月13日[2]

得了流感，所以这么长时间都没写日记。

1940年1月30日，我们走的那天，路都被积雪覆盖了。我们距离鲍多克有3.5英里路，只有1.5英里能在公路上走，其余的路程不得不在田野中穿行。因为田野里的雪冻得很硬，积雪也不太厚，而公路上有些地方的积雪至少有6英尺深。由于雪盖住了道路两旁的路堤，所以有时根本找不到路。野兔成群，有时估计有20只在田野中跑来跑去。

除了几株抱子甘蓝，严寒毁掉了所有的卷心菜。春天种的卷心菜不仅冻死了，而且完全没剩下什么，肯定是鸟儿吃了。韭葱侥幸熬了下来，但长势很糟。大多数桂竹香都活了下来，但我保留下来的那些开了两年的花都死了。生长时间比较长的康乃馨也死了，不过种下时间不长的花的成活率还可以。扦插的玫瑰只有一枝没能成活。雪莲花谢了，几

株黄番红花和多花蔷薇含苞待放，郁金香和水仙花长出了花苞，大黄和牡丹刚刚抽芽，黑醋栗和普通醋栗已经发芽了，但红醋栗还没有，我用爱德克配制的堆肥还没完全发酵。到处都是深褐色的草，病恹恹的。由于严寒，土壤颗粒很细，也很干。

没记下来产蛋量，不得不停止记录了。但无论如何，账目准确记录了7个月的鸡蛋量，可以作为日后的参考。送奶工说，1月29日至今，母鸡一共下了270枚蛋（约6周）。昨天有10枚。现在鸡蛋供过于求，不好卖，所以我打算用水玻璃[3]保存几枚。过去几天，阳光明媚，仿佛到了春天。今天冷了点儿，下午下了大雨。

我翻了一会儿地。给韭葱地锄了草。14枚蛋。

1940年3月14日

晚上下了大雪，白天大多时间也在下大雪。浸染着泥水的积雪很快就消融了，一切都脏兮兮的，让人没法在户外工作。

开始用水玻璃保存鸡蛋，试验一下。这种方法似乎只适用于刚产下来5到12个小时的鸡蛋，如果鸡蛋产出后，过了一两天才被放进水玻璃保存，那么可存储的时间就会缩短好几个月。我把二三十个不很新鲜的蛋（约有6天了）放在一个玻璃瓶里，优先食用；打算用大瓷盘放新鲜鸡蛋，蛋产下后24小时以内就会被放入大瓷盘。

16枚蛋。

1940年3月15日

昨天晚上的霜都冻住了，今早路面很滑。晴朗温暖。冰很快化了，不过大片草地上还覆盖着雪。开了几朵蓝番红花。

16枚蛋。

1940年3月16日

天气晴好。积雪化得差不多了。

19枚蛋，这周一共收获了75枚。

1940年3月17日

白天几乎整天都在下雨，所有东西都湿透了。玫瑰花苞长得不错。阿尔弗雷德·哈切特说现在是种黑莓（藤枝）的时候，不过今年应该长不了太好。

16枚蛋。

1940年3月18日

干燥了些。下了几滴雨。打算把种洋葱的地给翻一遍，也撒了些磷酸盐。几株桂竹香吐出了花苞，但基本都被严寒冻伤了。

15枚蛋。

1940年3月19日

风很猛。小雨时下时停。

翻了一垄地准备种蚕豆，另一垄准备种花椰菜，但现在还没法弄碎表土。

16枚蛋。

1940年3月20日

有点儿干了，但下了几场阵雨。又翻了些地，准备种黑莓。

9枚蛋。

1940年3月21日

天气越来越干。又下了几场阵雨。分拣了马铃薯，严寒毁掉了至少三分之一的马铃薯。不过按照目前的食用速度，只要剩下的都没烂，这些马铃薯还能撑几个月。又翻了一些地。一株小南霆雳开花了，几朵绵枣儿也开了。多年生的花草很快都长出了花苞。

用水玻璃保存了差不多100枚蛋。

16枚蛋。

1940年3月22日

天又干了些，但下了点儿雨。种了3株黑莓（藤枝）和2株大黄。开始清理草莓地。蓝色番红花和白色番红花都开了。

13枚蛋。

1940年3月23日

今天应该是头一个温暖的春日，不过下午下了一两场阵雨。西洋李子含苞欲放。

13枚蛋，这周一共收获了98枚。

1940年3月24日

一天基本都很明媚。黑刺李长出了花苞。山楂开了茉荚花和雌花。看到几只青蛙在求偶，还有几只青蛙已经在产卵了，而一些卵已经开始发育了。我把一些卵拿回了家。花园里开了朵报春花（多花蔷薇也开了），但在树林里看不到。不过我们碰到了尼克尔斯太太，她说在树林里也看到了几朵报春花。紫罗兰也开了。银莲花还没开。

18枚蛋。

1940年3月25日

白天天气基本不错，晚上湿度大了。清理了一小部分草莓圃。

15枚蛋（以2先令20枚的价格卖了30枚）。

1940年3月26日

一整天都在下雨，相当冷。拿回家的蝌蚪里，有的已经发育成形了，正努力挣脱卵膜。

15枚蛋。

1940年3月27日

天更晴好了些，但还不能播种。又翻了些地，给洋葱地撒了木灰。蝌蚪现在完全发育了，扭动着尾巴。

16枚蛋（以2先令10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

1940年3月28日

晚上有霜，不过好像没带来什么损失。天气更好了些，但还是很冷。清理了部分草莓地，又收拾了洋葱地，明天应该可以播种了。几只蝌蚪四处游动。第一朵水仙花开了，花园里其他花都还没开。但别人家花园里有的花已经开了。之前种的6株石南砧木中，有5株吐出了花蕾。

20枚蛋。

1940年3月29日

种下了洋葱（3排）。2盎司的洋葱种子本来能种满200英尺长的地，但只种了100英尺，肯定是因为我撒种撒得太密了。阴天，很冷，风也很大，下午下了点儿雨。

17枚蛋。

1940年3月30日

春日晴朗。我撒了一垄胡萝卜种。给草莓地除好了草，还施了点粪肥。留给蚕豆的地可以播种了。

花园里开了一两朵水仙。多亏政府补助，除了洛奇那边的英尼斯草甸，从沃林顿到鲍多克的路都开垦过了。

19枚蛋，这周一共收获了120枚（25只母鸡——应该是产量最高的一天了）。

1940年3月31日

相当冷，一整天的风都很大。报春花开了不少，白色紫罗兰、蓝色

的紫罗兰和白屈菜花也开了一些。没看到别的野花。我看到有只羊带着两只新生的小羊羔，这是我今年第一次看到小羊。注意到池塘里的蛙卵和一周前的相比没什么变化，而我当时拿回家的蛙卵却已经发育了，蝌蚪都在四处游动，肯定是水温的差异造成的。

18枚蛋。

---

[1] 21级严寒：大约相当于11华氏度或零下12摄氏度。（彼得·戴维森注）

[2] 1940年3月13日前均没有日记。

[3] 水玻璃，又称可溶性玻璃。在水玻璃稀溶液中浸过的鸡蛋可在常温下长久保存不坏。

1940年4—6月

1940年4月1日

风很猛烈，快把土壤吹干了。上午倒是很晴朗，傍晚阴云密布，但没下雨。紫罗兰正在盛开，随处可见。云雀唱着歌儿，这是我今年第一次听到，往年这个时候早就听到它们的歌声了。山鹑在求偶，秃鼻乌鸦和海鸥还没有。几株芜菁的头冠开始发育了。南芥正在盛开。我发现严寒没有冻坏留在地里的胡萝卜，但大部分胡萝卜都被冻得软塌塌的。

种了蚕豆，盒子里也种了一些，以后可以补种在地里。清理了一片地，准备种豌豆和防风草。又翻了些地。

17枚蛋。

1940年4月2日

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是晴好的天，但晚上下了半个小时的强阵雨，中午也下了一阵小雨。几株麝香兰的头冠开始发育。桂竹香也快开花了。看到了一只蝙蝠，这还是今年第一次。果树正迅速吐出花苞。

清理了一片地，明天天气好，就准备种洋蓟。

给大花园除了草。

15枚蛋（以2先令7便士20枚的价格卖了60枚，扣除佣金得7先令）。

1940年4月3日

昨晚雨好像下得很大。今天一上午都在下毛毛雨，下午基本上是晴天。在昨天那片地上种下洋蓟。这片地碎石头比较多，不过种洋蓟应该挺合适。撒了7磅种子，还剩7磅。给布拉斯李树下的那片地除了草，准备以后种西葫芦。鸽子在咕咕叫着。

16枚蛋（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

1940年4月4日

清晨飘了点小雨，之后天气晴朗，但风很大。中午又下了快两个小时的雨，之后又是晴朗的天，风也很大。又翻了地。土壤又湿透了。给韭葱和剩下的青葱用了硝酸钾。胡桃树上冒出了小松球一样的东西，也许是雄花。种了几株哈切特先生给我的多年生向日葵。

15枚蛋（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给送奶工）。

1940年4月5日

阴天，但没下雨。又翻了些地，还给草莓地锄了草，又种了几株向日葵。

15枚蛋。

1940年4月6日

昨晚有霜冻。今天白天天气晴朗，没有风，晚上又变冷了。又翻了些地。低温大大改善了土质，给醋栗和草莓地中间的那片地锄了草，还撒了石灰（花了6便士从提特里那里买了7到10磅石灰）。等把这些石灰翻进地里，就可以休耕到6月了，之后可以种冬季绿叶菜。在花盆里种了西葫芦和南瓜种子，西葫芦种在最靠近公路的那些花盆里。

19枚蛋（1枚双黄蛋）。以2先令20枚的价格（又跌了）卖了40枚。这周一共收获了115枚。

1940年4月7日

天气不错，白天基本上都挺暖和。地面干燥多了。苹果树很快就长出了花苞。翻好了马铃薯地，也整理好了准备种豌豆的地。现在，除了那片撒过石灰的地，就没有别的地要翻了。在地里捡到了一团猫头鹰的粪，很大，应该是之前谷仓里的猫头鹰回来了。南芥谢了。

13枚蛋。

1940年4月8日

很冷，阴天，飘了毛毛雨。地还没干透，还不能种豌豆。翻了那片石灰地，现在坑坑洼洼的。可以就这样待两个月。所有的地都翻了。

地里有许多旋花草茎，但都还没发芽，它们发芽所用的时间好像比大多数多年生草木都晚。给勿忘我除了草。

17枚蛋。

1940年4月9日

天冷晴朗。野兔在交配。雀鹰在空中求偶。种了一排胡萝卜（“短角”种）和一排防风草。明天打算种豌豆。

16枚蛋。

1940年4月10日

昨晚下了几滴小雨。今天很冷，风也大。种了豌豆（打算4月25日再种下一拨）。

17枚蛋（以2先令的价格卖了20枚，又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给送奶工）。

1940年4月11日

昨晚霜冻得厉害。今天晴好无风，阳光明媚，但不算温暖。地面已经算很干燥了。尽量割完了杂草。还给棚子旁边的花园除了草。给蜀葵施了粪肥护根。种了3株矮紫菀（每株花了2便士）。

17枚蛋。我一不小心把所有鸡蛋都摔破了。本来还以为能剩下几枚完整的，但事与愿违。

忘了说，前天彼得·霍林斯沃斯发现了一个喜鹊窝，里面有3枚蛋，另有一个农夫找到一个知更鸟巢，里面也有蛋。喜鹊蛋看上去和乌鸫蛋差不多，只是更黑，像秃鼻乌鸦蛋。喜鹊蛋的个头和乌鸫蛋差不多，也都是两头很尖。

1940年4月12日

昨晚肯定下了雨，但下午就干了。找了些木棍，留着给矮紫菀用。清理了一片地准备种金莲花（大概10天之后种）。烧了些垃圾，给桂竹香施了液态粪肥。大致犁了一遍马铃薯地。那片地的状况还是不好，但能播种了，看面积应该能种250到300株植物。之前只订购了2英担种子，所以最好再订1英担。

看见乌鸫在筑巢，斑鸠好像也是。现在只有报春花、紫罗兰和白屈菜花在盛开。嫩芽长势不错。有些花园里的风铃草开花了。

15枚蛋（以2先令的价格卖了20枚）。

1940年4月13日

没有风，不怎么暖和，阴天，但没下雨。种了羽衣甘蓝、皱叶甘蓝、抱子甘蓝、莴苣（科斯种）和小萝卜。没种花椰菜，因为我的种子是晚季品种，得五六月再种。还种了韭葱、10周大的涩荠苗和洋地黄。我还种了20株科斯莴苣苗（花4便士买的）。不知道它们能不能成活——如果有霜冻，估计就活不了。在植株顶上搭了个帆布棚。给草地施了点儿肥（花6便士买的沃尔沃思肥料）。地里需要雨水。

19枚蛋。这周一共收获了114枚（碎了17枚）。

花床里的作物顺序（从玫瑰剪枝处开始）：羽衣甘蓝、涩荠、抱子甘蓝、莴苣、皱叶甘蓝、韭葱、洋地黄、小萝卜和山字草。

1940年4月14日

晴朗干燥，不算暖和。耙了草坪上的空地，撒了些草种。给草莓围了铁丝网。种了些山字草（在花床里）。除了草。

17枚蛋（以2先令6便士20枚的价格卖了44枚）。

1940年4月15日

昨晚好像下了点儿雨。今天的天气总在变化。白天一直有大风，有太阳，但不算暖和，下了几滴雨。下午下了阵雨夹雪，晚上六点左右下了阵冰雹。平了平草地，给就要开放的郁金香施了液态粪肥，挖好了3片西葫芦苗床。

17枚蛋。

1940年4月16日

昨晚又有霜冻。白天一直都还晴朗，但不暖和。下午又下了点雪和雨夹雪。幸存的几株糜香兰开花了。几株青葱正在分枝。种了28磅马铃薯（马杰斯蒂克种），12排，约225株。剩下的地还能种4排马铃薯，所以打算再买10磅种子。不得不把许多马铃薯切成两半，我本来不想这么做的，但这些马铃薯没发芽，其中有几个还坏了。土壤也不太肥沃。综合上述原因，估计得等很长时间马铃薯才会发芽。腾好了准备种南瓜的地（够种3排）。

18枚蛋。

1940年4月17日

昨晚又有霜冻。今天没有风，阳光明媚，相当暖和。割了草，拔掉了一些长得十分猖獗的蒲公英。种了些金莲花。准备好了种山字草的地。似乎烟草不能有效防止麻雀啄食种子。一只头顶有白斑的画眉总在花园里飞进飞出。如果能用某种方式辨认鸟儿，就会发现每只鸟都有自己的地盘，而且同一只鸟总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16枚蛋（以3先令20枚的价格卖了50枚）。

1940年4月18日

风相当猛烈，白天一直都是刺骨的寒冷。下午下了一个小时的大雨，雨后暖和了些，风也小了点儿。水仙花逐渐谢了。种了香豌豆、山字草、草夹竹桃和向日葵（矮种），它们以后就会在各自那片地方开花。给几株玫瑰重新竖了爬杆，也给风铃草竖了爬杆。天气太冷了，也太潮湿，做不了户外工作。

17枚蛋。

1940年4月19日

昨晚显然下了大雨。今天上午是阴天，下午没什么风，阳光不错，也很温暖。今晚又下雨了，不过跟之前那场雨比，这场雨更像是4月的阵雨。下午第一次看到了燕子（有两只，靠近我的那只是燕子，不是雨燕，我一般都是先看到雨燕）。燕子到来的时节比往年要晚一些，不过也就晚了不到一周。又种了些向日葵种。平了平草地。

19枚蛋。

1940年4月20日

阴天，但不算太冷。早上，有人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但我没听见。中午下了点雨。灌木还是光秃秃的。冬麦看上去还不错。有些花园里的芜菁开花了。黑醋栗含苞欲放。种了3株羽扇豆（也许能生根，但今年肯定开不了花）。又买了10磅马铃薯种子（“国王爱德华”品种，每英担2先令3便士）。上午九点之后的某个时间听到了一声爆炸声。晚报说是伦敦的一家军工厂爆炸了，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这肯定是那声巨响。爆炸点距这里有45英里，直线距离也短不了多少。

14枚蛋。这周一共收获了118枚。

洋葱（1940年3月29日种下的）冒芽了，长得密密麻麻的，一些胡萝卜（1940年3月30日种的）也发芽了。

1940年4月21日

阳光明媚，天气温暖。今天是今年第一个真正的春日。黄花九轮草发芽了。小长春花也开了花。勿忘我含苞欲放。我还是没看到布谷鸟。艾琳种下了高代花和矢车菊。一两株豌豆（1940年4月10日种下的）冒芽了，但蚕豆都还没有。

18枚蛋，以3先令3便士20枚的价格卖了68枚（实际上，有50枚卖的

是这个价，还有18枚卖了2先令9便士）。

1940年10月22日

天气晴朗，很暖和，但风很大。这样的天气让我能观察郁金香开花的过程，每几个小时就有明显变化。种了芜菁（两排，白色）、豌豆（“英国奇迹”品种——比其他品种种得早，但因为种子之前没泡过，所以会晚一两天发芽）以及其余的马铃薯（“国王爱德华”品种）。这些种子种了16排，每排20到25株，共350株左右。如果生长状况良好，应该能收获5英担左右的马铃薯。

有些地方的黑刺李快开花了。野李树上开了几朵花。

18枚蛋。

1940年4月23日

无风，阴天，还算暖和。下午落了几滴雨。郁金香、勿忘我和桂竹香正在盛开。红醋栗和醋栗树上结了果。李子花和梨花开花了（花开得很晚——比往年晚了差不多3周）。秃鼻乌鸦正在抱窝。蚕豆苗长得很高。种了20株花椰菜（应该是小个品种）。

13枚蛋（下午三点收的）。

1940年4月24日

昨天傍晚到今天晚上，一直接连不断地下着蒙蒙细雨。4月10日到4月15日播下的种子都在冒芽。一星期前刚种下的山字草也发芽了。

20枚蛋（有些可能是昨天下的）。

1940年4月24日

春光明媚。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这是今年第一次）。看到了许多摇蚊。布拉斯李盛开了。割了草，挖了一条渠，打算种第三排豌豆，还给草莓地施了点粪肥。现在地里没有野草了。等到旋花草和一年生杂草长出来之后，我再给它们好好除次草，之后就能铺草上网了。几株蚕豆发了芽。

16枚蛋（以3先令3便士的价格卖了20枚给送奶工）。

1940年4月26日

今天也是个晴好的日子。有颗南瓜种子发芽了（1940年4月6日种下的）。1940年4月9日种下的胡萝卜也发芽了，但防风草还没有。所有的韭葱我只留了一排，别的都拔了，反正长得也不太好。挖了一条沟渠准备种红花菜豆，给草莓地锄了草，醋栗树上的果实很少，也许是移植过的缘故。红醋栗的状况好一些。

14枚蛋。

1940年4月27日

昨晚下了雨，今天晴朗温暖。晚上有阵雨。野李树开了许多花。我看到了一大群鸟，大概有100只，好像是斑鸠，站在电话线上，可能是刚飞回来的候鸟。把40株金鱼草（深红色和火红色的）和20株紫罗兰（各种颜色）移植到了地里。以8便士每20株的价格买的——这价格很贵，但是是早苗。氯酸钠的价格现在涨到了每磅10.5便士（战前价格为每磅8便士）。

18枚蛋（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了10枚）。这周一共收获了117枚。

蒲公英正在开花。野芝麻也开花了。

1940年4月28日

昨晚下了雨。今天晴朗温暖，而且没有风。一两株旱金莲发芽了（是自播的）。1940年4月22日种下的芜菁刚发芽。飞虫已经叮了它们和甘蓝幼苗。几株防风草（1940年4月9日种下的）发了芽。一两株洋蓟（1940年4月3日种下的）也刚发芽。给胡桃树边的荒地施了氯酸钠。开始给豆类搭爬绳，但最后没搭完。把20株很小的莴苣苗移植到了地里，盖了帆布作为保护。打算给山字草剪枝，但它们太小了，还剪不了。

17枚蛋。

1940年4月29日

我觉得昨晚飘了点儿雨。今天白天一直阴天，偶尔有薄雾，和毛毛雨似的。气温不算太低。修了栅栏，但桩子不够，所以没修完。把从提特里那儿买来的一打大莴苣苗种到了地里（2便士一打）。撤掉了小莴苣苗上的帆布。因为不知道自己会离开这里多久，所以把蝌蚪放生了。大致割了一遍草。当地人认为满月总会下霜的（也就是5月份的时候），人们就靠着这点经验播种红花菜豆。

15枚蛋。

1940年5月28日

今天是报纸广告彻底消失的第一天……《星报》[1]头版的一半集中报道了比利时的投降，另一半的新闻都在暗示比利时的抵抗，而且也赢得了国王的支持。可尽管如此，8页《星报》中有6页在报道赛马。

过去几天几乎没有发布什么确切的消息，所以推断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似乎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法国人真的将从南方开始反攻；二是他们想反攻，但德国的轰炸机让他们无法集结军队；三是北部的法军有信心坚持，因此指挥部决定暂不反攻，转而等待德国攻势减弱；四是北

方战局已不可收拾，部队只有四种选择：向南突围、投降、被歼灭或者冒着遭受巨大损失的风险从海上撤离。应该只有第四条路走得通。法国的官方声明称，索姆河与艾纳河的战线已经稳定，好像北方的军队不存在一样。尽管这很残忍，但我觉得，英国远征军[2]就算被歼灭也好过投降。

人们比之前更愿意谈论战争了，但还是不太热衷于此事。和去年一样，酒吧里还听不到人们谈论对战争的看法。昨晚我和艾琳在酒吧听到了九点钟新闻。是我们提出要求后，酒吧的女招待才打开收音机的，但似乎根本没人在听。

1940年5月29日

现在只能靠暗示和猜测获得重大信息。我印象最深的是，昨晚九点新闻前，达夫·库珀[3]说了一些振奋人心的话。之后，丘吉尔在讲话中说自己将在下周某个时间报告局势，说下议院必须准备好接受“负面沉重的消息”。这可能是说他们即将撤退，但“负面消息”究竟是指巨大的伤亡、部分远征军投降还是别的，就不得而知了。我在火炬剧院的某个高雅剧目的幕间休息时听说了这则消息。比起酒吧里的人，这里的听众更关心新闻。

艾琳说审查局的人把所有“左派”报纸归为一类，也就是《论坛报》[4]和《工人日报》[5]没什么区别。最近，《工人日报》和《行动》[6]都已禁止出口，艾琳的一个同事竟然问：“你知道这份叫《工人与行动日报》的报纸吗？”

目前有人传言说：比弗布鲁克[7]自任职起，突破了生产瓶颈，多生产了两千架飞机。对伦敦的空袭应该在两天内展开。希特勒计划用上千艘能穿越雷区的快艇入侵英国。步枪奇缺（好几个人都这么说）。普通的德军步兵精神萎靡。挪威战役期间，陆军部的信息极端匮乏，甚至不知道当时挪威的夜晚时长已经很短了，所以他们认为是在夜晚登陆的士兵实际恰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1940年5月30日

英国远征军正往敦刻尔克撤退，不知道撤出来多少人，就连现在有多少人也没人知道。昨晚，广播台播出了一则有刚从比利时撤回的上校参与的访谈——可惜我没听到。但艾琳说访谈中，播音员插话告诉公众是法国人和国内的军事当局造成了英国远征军现在的处境，因为前者没有反击德军，而后者提供的装备很差。别的媒体都没有这样指责过法国人，而且，在两天前的广播里，达夫·库珀还特意驳斥了这种说法……今天的态势图显示，比利时的法军似乎是因为英国远征军的撤退而牺牲的。

伯克努[8]说，英国显然正处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康诺利评论这句话时提到了一件事：最近，一艘搭载着难民和几名乘客的船驶离了法国北部，难民大多是孩子，他们在经历了恐怖的机枪扫射之后，都惊魂不定。据船上的一名女乘客说，她本想插队上船，被赶回去排队时愤怒道："你知道我是谁吗？"乘务员则回答："不管你是谁，你这个泼妇，给我回去排队！"如果是真的，那这件事就有意思了。

仍没有证据表明战争爆发了。然而，补缺选举和公众对招募新兵一事的反应都表明了人们此刻的态度。尽管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入侵英国的行动十分紧急，而且报道此事的文章铺天盖地，但人们似乎意识不到自己已身处险境，必须到了炸弹落在眼前的一刻他们才会意识到这一点。康诺利说，那时他们会慌成一片，但我不这么看。

1940年5月31日

昨晚看了丹尼斯·奥登的《平静的旅店》，整部剧都是胡言乱语。有趣的是，尽管背景设定在1940年，但全剧根本没提到战争。

尽管战争已经进行到现在，可被动员的士兵却依然很少，真让人吃惊。同往常一样，从街上望去，根本看不到一个穿军装的人……许多战略要地已经拉起了铁丝网，比如特拉法加广场上的查理一世雕像……我多次听说了关于步枪短缺的说法，所以应该是真的了。

1940年6月1日

昨晚去了滑铁卢和维多利亚，想打听一下艾瑞克[9]的消息。但几乎打听不到。撤回国的军人们有军令在身，不能与平民说话，而且很快就会被安排撤离火车站。实际上，我没看见几个英国士兵，也就是说，我没看见几个英国远征军士兵。相反，我倒是看到了不少比利时难民、法国难民、比利时士兵、法国士兵，还有一些包括海军战士在内的水手。难民原来大多都是店主、职员一类的中产阶级，他们穿戴齐整，带着不少个人物品。有家人还带了只装着鹦鹉的大笼子。有个女性难民在哭，或者说快哭了，她应该是被眼前的人和完全陌生的面孔弄糊涂了。维多利亚那边聚着一大群人，警察不得不把人流截断，好让难民和其他人上街。看到难民，人们默然不语，但看到水手则会热情欢呼。一名制服上浸着水渍的海军军官匆匆追赶公共汽车，他装备齐全，满脸微笑。女人们都朝他欢呼，还拍着他的肩膀，他也摸着自己的钢盔，朝她们笑着。

看见海军陆战队的一列纵队准备登上开往凯瑟姆的列车。他们强健的体格和飒爽的军姿让我很惊讶，他们步伐齐整、气宇轩昂，这一切把我带回到1914年，那时，我觉得所有的战士都是巨人。

今天早上，各大报纸均声称，约五分之四到四分之三的远征军已成功撤离。照片上，士兵们军容整齐、装备完好，不过照片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特意筛选的。

1940年6月2日

无法估计成功撤离的远征军的人数，但据各大报纸的数据，应该有15万人左右，而原先进驻比利时的士兵则约有30万人。至于当时撤离的部队中有多少法国士兵就不得而知了。有几家报纸暗示，最初计划的不是全部撤退，而是坚守敦刻尔克，但这只有在那个区域部署大量的飞机才能做到。如果撤离人数真有15万，那么更多士兵也可能撤离。6月4日后，意大利参战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也许参战前，他们会先提出和谈条件作为掩饰……人们普遍认为，德国想入侵英国，可能只是为德国和意大利攻占法国做掩护……显然，包括瓦勒拉[10]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德国可能会在爱尔兰登陆。直到前几天才有人提到这个说法，但开始

的时候这件事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在这个平常的星期天里，人们依旧往来穿梭，到处都是推婴儿车、骑自行车和遛狗的人，还有一帮在街上游荡的年轻人。从人们的表情和街角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意识到在数周之内，外敌就可能入侵。而同时，所有的周日报纸都在报道这件事。当局对转移伦敦城内儿童的再三请求也非常冷淡。他们的理由是：“上次突袭没发生，这次也不会发生。”不过在需要时，只要有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这些人也会表现得很勇敢。

以下是对今天的《人民报》[11]上所登广告的大致分析。

报纸有12页——共84栏。其中有26栏半（超过四分之一）是广告，划分如下：

食品饮料：五又四分之三栏

专利药：九又三分之一栏

烟草：一栏

赌彩：二又三分之一栏

衣服：一栏半

其他：六又四分之三栏

9则食品饮料的广告中，6则是不必要的奢侈品。29则医药广告中，有19则不是骗人的（包治秃头），就是有害的（克鲁什盐、胆汁豆之类的），要不就是讹诈型的（“孩子的胃需要氧化镁”）。其他有几种药物可能值得考虑。14则其他广告包括，4则汤品广告、1则化妆品广告、1则度假村广告以及2则政府的广告（其中1则呼吁全民节约）。所有类别中，只有3则广告是在发战争财。

1940年6月3日

以下摘自牛津夫人[12]写给《每日电讯报》的信，有关战时经济：

“伦敦大多数房子里都空无一人，因此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无论如何，大多数人都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厨子，住在旅馆里。”

显然，这些人无论如何都意识不到，世界上还有另外99%的人存在。

1940年6月6日

我和伯克努都认为，希特勒接下来可能不会进攻英国，而会把矛头对准法国。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没错。伯克努认为敦刻尔克大撤退无疑证明了一件事，即如果战舰上也有飞机，那么敌方的飞机绝不可能击沉战舰。官方数据说明，35万人大撤退的行动中，共损失了6艘驱逐舰和25艘其他各类舰船。撤离人数可能是准确的，但对于这样一场大撤退来说，即使损失的舰船数翻倍也不算什么，因为当时的情形对德国飞机相当有利。

伯克努认为希特勒的下一步计划是攻陷法国，还会把移交法军舰队作为和谈条件之一。这样，由海上登陆入侵英国就容易多了。

一辆公车侧面写着大字广告：“战时必需。带来健康、力量和信心。里格利口香糖。”

1940年6月7日

尽管禁止刊登报纸广告[13]，人们仍能经常看到卖报人举着广告页。他们似乎是在充分利用之前的海报，而“皇家空军突袭德国”和“德国损失惨重”之类的大字标题几乎总能用得上。

1940年6月8日

我想，身处可怕的战争中，每天都有千万人死于战火，可新闻却消失了。晚报重复早报的内容，而第二天的早报又重复着前一天的晚报。广播也重复着报纸上的内容。然而，至于新闻的真实性，与其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如说是保守的报道。伯克努认为，广播的出现让战争变得相对真实了，迄今为止，唯一的弥天大谎是德国宣布的被他们击沉的英军战舰数量。而那个数字根本就是无稽之谈。最近，一份晚报上说，德国人声称在10天内击沉了25艘英国主力舰，这个数字比我们现在拥有的主力舰数量还多10艘。

最近，史蒂芬·斯潘德问我：“你觉不觉得，过去的10年里，你对每件事的预测都比内阁成员预测的准？”我深表赞同。部分原因是阶级利益迷惑不了我，也就是说，不为经济利益羁绊的人一眼就能看透放手让德国和意大利主宰西班牙的危险，而许多右翼分子，甚至是职业军人，都看不出这个明显的事实。但我认为，我们比所谓的专家更明白当下的形势，不是说我们能预测具体的事件，而是说我们更理解自身所处的世界。自1931年，我就已经知道（斯潘德说他1929年就知道了），未来将会有一场灾难。我无法精确预测某次战争或革命的发生，但战争来临时我不会感到惊讶。1934年起，我就已明白英德战争正在酝酿，1936年我就意识到英德战争不可避免。仅仅凭直觉，我就知道了。和平主义者的窃窃私语和人民阵线对英国准备进攻苏联假惺惺的担忧都没能蒙蔽我。此外，苏联的大清洗也并不让我惊讶，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是蕴含在其布尔什维克统治中的——这不是对具体事件的预测，而是对这类事的大概预感。这一点也暗含在俄国文学中。

……倒退七年，谁会相信温斯顿·丘吉尔还有政治前途呢？一年前，克里普斯[14]还是工党里的坏分子，那时，工党将他开除，也不听他辩护，而保守党则认为他是危险的赤色分子。可他现在是驻莫斯科大使，是比弗布鲁克出版社带头呼吁任命他的。不过现在还说不好他适不适合做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如果苏联人愿意加入我们的阵营，那他也许合适；但如果苏联依然视我们为敌人，那也许应该换一个不亲近苏联政权的人。

1940年6月10日

刚听说意大利宣布参战，但报纸还没报道……同盟国正从挪威撤

军，部队将被派往别处，而被占领的纳尔维克港已经被破坏得无法供德国人使用了。事实上，冬天前，德国人也用不上纳尔维克港。既然挪威已经不再是中立国，那么纳尔维克港对他们来说也就没什么用处了。我不该认为同盟国的军队在挪威有足够兵力挽回颓势。撤军的真正原因是为了不浪费战舰。

今天下午，我生动地回忆起，1936年我在巴黎时同一个出租车司机之间发生的故事。本想写在这本日记里，然而，我现在觉得很悲哀，没心情写了。一切都在分崩离析。现在，写书评不只让我苦不堪言，甚至令我愤怒：现在居然还能做这种浪费时间的事。只要有办法骗过医生，我在陆军部的面试就可能成功。根据我之前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验，我知道自己一旦参军，就不会再关心公共事务了。目前，我的感觉和1936年法西斯军队逼近马德里时差不多，只不过情况更糟糕罢了。以后我会写下那个有关出租车司机的故事的。[15]

1940年6月12日

我和艾琳调查意大利店铺是否如报道中的那样遭到了破坏。报纸似乎夸大其词了，但我们确实看到了三家店铺的橱窗被砸烂了。大多数商铺匆匆挂出“英国”的牌子。那家名为“格纳里”的意大利杂货店贴满了标明“本店全是英国货”的告示，另一家专营意大利食品的意大利面馆也更名为“英国食品店”。还有一家店宣称自己是瑞士店铺，甚至有家法国饭店也称自己是英国的。有趣的是，显然这些告示是事先印好的。

……尽管这些对无辜的意大利店主的攻击着实令人厌恶，但也算有趣，因为尽管有时英国人会抢劫店铺，但总的来说，他们对外国政治没什么兴趣。我不记得埃塞俄比亚战争中有类似的事发生，而西班牙战争根本没有触动大多数民众。而且，直到近两个月，民众才采取针对德国居民的敌对行动。墨索里尼此刻宣战的行为既卑鄙又冷血，就算不读报纸的人也会对此产生强烈不满。

1940年6月13日

昨天，我在罗斯板球场会议厅参加了一次本土防御志愿者[16]的集体会议……上次去罗斯是在1921年，当时是去看伊顿公学与哈罗公学之间的比赛。当时我觉得非马里波恩板球俱乐部[17]的成员进入球员休息室就像在圣坛上方便一样。然而，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是违法行为，可能会遭到起诉。

我注意到一张招募先锋队的海报。上面有只脚踩着纳粹万岁标志，旁边写着“践踏它”。这是从西班牙战争中共和国海报那里抄袭来的创意，当然抄袭的是概念而已。这幅海报既庸俗又带有喜剧效果，但至少说明政府愿意学习了。

共产党候选人在鲍地区[18]的补选中获得了500张选票。这一选票数创了历史新低，然而黑衫军的得票更少（有次只有150张）。不同寻常的是，鲍地区是兰斯伯里的大本营，应该有不少的和平主义者，但总体投票率很低。

1940年6月14日

德国人肯定进驻巴黎了，比计划的提前了一天。希特勒肯定会去凡尔赛宫。为什么不在希特勒在凡尔赛宫的时候埋上炸药，把他炸成碎片？西班牙军队占领了丹吉尔地区，显然是要送给意大利人做基地。目前，以法属摩洛哥为跳板占领西属摩洛哥应该比较容易，还可以顺便占领其他西班牙殖民地。以一个另类政府的姿态扶持奈格令或与之相似的人，这将是对佛朗哥的沉重一击，但这决不在英国政府目前的考虑范围内。根本无法想象同盟国政府会采取何种行动。

和平常一样，我走进地铁，对那些广告感到十分厌恶。那些瞪着眼睛的蠢货和乱七八糟的色彩都在极力诱惑人们购买毫无意义的奢侈品和有害的药物，白白浪费劳动力和资源。如果能熬过夏天，这场战争能扫除多少垃圾啊！战争是文明的反面，它的座右铭是“邪恶即吾之美德”，而现代生活的许多美德实际就是邪恶，如此，战争的利弊还不好说。

1940年6月15日

我刚想到，巴黎的陷落是否意味着信天翁出版社的破产，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19]若真如此，那我就亏了30英镑。真是不可思议，现在人们竟依然如此看重长期合同、股票债券或保险单之类的东西，而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四处借钱、抢购实物。前不久，艾琳询问了纺织机的租售条款，发现公司居然可以把协议延长两年半。

彼得·沃森[20]说尤妮蒂·米特福德[21]之前在德国想饮弹自尽，可现在她都快有孩子了。听到这里时，一个满脸皱纹的小个子立刻大叫起来——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元首可不会做这种事！"

1940年6月16日

早报基本明确了一点，即在下一届美国总统选举前，美国不会有所行动。也就是说，美国不会宣战，然而美国的宣战却十分重要。如果美国不参战，就无法对资本和劳工进行有效管控，从而军火生产也无法加速。在上一次战争中，美国即使在参战后也没能做到这些。

我还没决定如果德国战胜了英国后要怎么做，但我绝不会逃跑。无论如何，就算能跑得再远，我最多只会逃到北爱尔兰。如果舰队依旧完整，那么战争似乎还会继续，且以美国和海外领地为基地。那我就会坚持活下去，哪怕是在集中营中里。如果德国也战胜了美国，那我就只能拼死一战，我必须战死，而且要先杀一个敌人。

昨天跟M[22]聊了一会儿，他是我所在的本土防御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名犹太队员。我说，一旦危机过去，保守党阵营里一定会有人背叛丘吉尔，意图再次压低工人工资。而他说，一定会发生革命，"或者希望会发生"。M是工厂主，所以我觉得他没什么经济压力。

1940年6月17日

法国投降了，昨晚的广播中就已出现了苗头。实际上，巴黎失守时，投降就已不可避免了——巴黎本有可能阻挡德军的坦克。从战略的角度看，法国现在最重要的筹码就是海军，但目前还没有关于它们的消

息……

今天，法国投降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街头巷尾的议论都有关于此。人们说得最多的就是“感谢上帝，还有海军”。一个佩戴着上次战争勋章的苏格兰大兵在地铁里半醉着做爱国演讲，其他乘客似乎都很爱听。晚报被哄抢，我去了四次才买到一张。

我现在就坐在打字机前面直接把书评打出来（不打草稿）。最近，也就是差不多半年前，我还绝不会如此，当时我一定会说自己不会不打草稿的。当时，我会把所有的内容都至少写两遍，书籍则要写三遍——个别段落甚至要写五到十遍。我现在这样做不是因为自己的写作能力提高了，而是因为我已经不在乎了，只要文章能通过审查，拿到酬劳就行。这种变化完全是战争带来的。

G[23]想把孩子送到加拿大。我去加拿大领馆询问时，发现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除了母亲外，任何16到60岁的人都不得离开，显然是担心发生恐慌大逃亡。

1940年6月20日

我今天去了《新政治家》周刊办公室，看看他们对本土防御有什么看法。C[24]成了那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强烈反对“武装人民”的立场，说其危险大于益处。一旦德军发现民众持有武器，就可能因此犯下极其残酷的暴行。如此，人人便都迫不及待地投降了。C还说普通民众的英勇顽强也是靠不住的，还以格拉斯哥的暴乱为例。那场暴乱中，一辆坦克在镇子周围绕圈时，人们就怯懦地四散而逃。然而，我认为应该就事论事。当时的人们手无寸铁，而且处于国内动乱中，每个人都知道，暴力斗争最终只会把自己送上绞刑架。C说自己认为丘吉尔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好人，但能力不足，无法做到必须要做的事。丘吉尔不愿动员整个国家战斗，庇护了张伯伦及其追随者。当然，我也认为丘吉尔对战争的看法和我们的不一样，但丘吉尔会采取所有必要措施赢得战争（比如把收入平均化以及允许印度独立等）。今天的秘密会议可能就会一次性把张伯伦及其追随者赶出议会。我问C的时候，他说这绝不可能发生。但我记得英军撤离纳姆索斯[25]时，我问过贝文和斯特劳斯[26]，张伯伦被赶下台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也说绝不可能。可结果是，新政府在一周之

后就成立了。[27]

目前，大部分人都相信政府高层存在赤裸裸的叛国行为。我个人认为，故意的背叛行为仅存在于支持法西斯的贵族阶层和军队指挥层中。至于不经意的破坏和愚蠢的举动则应该另当别论——比如处理意大利和西班牙状况时采取的措施。R.H[28]说，几个从敦刻尔克撤回的士兵跟自己聊过，他们都抱怨上级军官的行为，说军官们坐着汽车逃跑，却把他们丢在水深火热之中。败仗之后，总有人谈论这种事，真假不得而知。只有完整的阵亡名单公布后，我们才能通过比对名单验证这些说法。但无论如何，现在谈论这件事也并非全无益处，而且军队必须重整阶级构成，才不会导致突然的恐慌。新组成的军队中，绝大多数军官都由中产阶级担任，就连西班牙民兵队伍也是如此。这是个去除顽固保守派的问题，本土防御志愿者队伍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紧急形势下，只要有时间，我们肯定能完成去保守化，但问题的关键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

昨天，我突然想到：英国军队可以说是人数最少的军队之一，可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退役上校？

我注意到，我认识的所有“左翼”知识分子都认为，一旦希特勒到了英国，就会枪毙所有人，而且他的黑名单一定非常长。C[29]说，有项行动是清除我们在苏格兰场[30]的违法记录（显然我们都有）。还算有救！警察正是那种只要确定希特勒会赢就会毫不犹豫投奔他的人。算了，只要能坚持几个月，一年之内我们就能看到红色民兵进驻里兹大饭店了。那时，无论是丘吉尔还是劳合·乔治[31]领导军队，我都不会太惊讶。

一直想在赫布里底找个小岛，估计我永远等不到那天了，更别说真正拥有一个小岛了。坎普顿·麦肯兹说赫布里底群岛上的大部分岛屿都无人居住（有500座小岛，只有10%有人居住），而且大多数小岛上都有小片可耕种的土地，也有淡水，可以养山羊。R.H说，有位女士在赫布里底租了座小岛以躲避空袭，结果皇家空军在那里误投了一枚炸弹，那位女士反而成了空袭的遇难者。如果此事为真，那可真是个好故事。

前天晚上英国经历了第一场空袭，14人遇难，7架德国飞机被击落。报纸上登出了3架德国飞机的残骸，因此，这一数字可能是真的。

1940年6月21日

没什么实质性的新闻。昨天报纸上刊登了齐亚比[32]当选巴黎市政局主席的消息，可能是德国人施加了压力。之前有人说希特勒是工人阶级的朋友，是财阀集团的敌人，现在看来，说这些话的人可以闭嘴了。

昨天，是我们本土防御志愿班第一次操练。这些人真棒，只有三四个人不是老兵（总共约60人）。在场的有些军官也很出色，我想他们是来给士兵们训话的。

1940年6月22日

没什么德国对法和约条款的实质性新闻。据说，条款“相当复杂”，得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认为真正可能的是，德国人和贝当[33]及其追随者，双方试图联手制定一套方案，诱使殖民地的法军指挥官和法国海军投降。事实上，希特勒只能通过法国政府控制这些军队……我认为我们对于希特勒入侵英国一事的推断太过武断，实际上，这种推断路人皆知……如果我是希特勒，就会横穿西班牙，控制直布罗陀海峡，再横扫北非和埃及。如果英国军队有一支25万人的机动部队，就应该将其开拔到法属摩洛哥，并以此为跳板占领西属摩洛哥，举起共和国的旗帜。这样，另一片西班牙殖民地也就唾手可得了。算了，这种事绝不会发生。

显然，共产党人又开始反法西斯。早上，见到了一份谴责贝当及其追随者“背叛”法国的传单。然而，一两个星期前，这些共产党人还公开支持着德国。

1940年6月24日

德国的停火条件果然与之前预测的一样……有趣的是，整件事件恰好一步步地印证了传统的忠诚与荣誉感正在土崩瓦解。相当讽刺的是，“绝不让他们通过一步”就出自贝当之口，而目前为止，这仍是一句反法西斯口号。二十年前，会签署这样一份停火协议的法国人要么是极

端左翼分子，要么就是极端和平主义者，但即便如此，他们签字时也会有所顾虑。然而，现在在战争中摇摆不定的却恰恰是职业爱国者。至于贝当、赖伐尔[34]、弗朗丹[35]之徒，眼前的这场战争似乎是一场疯狂的自相残杀，而真正的敌人则在一旁等待下手的时机……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英国高层肯定也有人在准备相似的交易，而且就算德国没有入侵英国，也很难说他们的阴谋不会成功。这件事唯一的好处是，“希特勒是穷人之友”这个幌子被戳破了。实际上，愿意和他做交易的人都是些银行家、将军、主教、国王、工业大亨等。希特勒是资产阶级大反攻的领军人物，他们正在聚合，形成一个巨大的集团，虽然这样会丧失部分特权，但依然有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权利。抵抗这样一个集团的进攻时，任何资产阶级成员就算不是叛徒，也是半个叛徒，他们宁可忍受最可怕的耻辱也不愿选择真正的战斗……无论一个人如何看待这件事，不管是从宏观的战略层面还是局部的防御细节，他都会发现，真正的战斗意味着革命。显然，丘吉尔既看不到也不愿承认这一点，因此他肯定会垮台。但他的下台是否能将英国从被占领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则取决于大众弄清问题本质的速度。我担心的是，他们采取措施时就为时已晚。

从战略角度看，一切都取决于是否能撑过今年冬天……那时，占领军数量庞大，食物短缺将不可避免，人民因被迫劳动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切都会让希特勒陷入困境。我很想知道，那时，希特勒会不会把被镇压的法国共产党重新抬出来，借此瓦解法国北部的工人阶级，正如他用贝当瓦解保守的右翼分子一样。

如果入侵行动失败了，那就太好了。我们会得到一个左翼政府，自觉反对统治阶级。不过，我认为那些觉得苏联会因我们选出革命政府而对我们采取友好态度的人错了。西班牙内战后，我不自觉地认为，斯大林肯定会敌视任何发生真正革命的国家。这两者背道而驰。革命的爆发肯定会带来自由、平等等思想的广泛传播。但随之而来的是寡头政治的生长壮大，它和任何统治阶级一样，极力维护阶级特权。今早的《新闻纪事》报道称，苏联红军战士又开始对上级敬礼了。革命军队在开始时总是废除敬礼，这件小事也象征了整体形势。当然，这并不是说敬礼等的仪式毫无必要。

本土防御志愿者接到命令，所有左轮手枪都必须上交警察，视为军需。德国士兵都配备了冲锋枪，但英国士兵还紧抓着这种过时的武器不放，这就是典型的英国军队。不过，我认为上交手枪真正的原因是，防止武器落入“不法分子”之手。

艾琳和格温都坚持认为，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了，我应该去加拿大，这样就可以活下去，并坚持宣传。如果那时我还能做贡献，我就会去，比如如果政府迁往加拿大，那我就也会有工作，而不是以难民的身份过去，更不是那种远远躲开、惊声尖叫的流亡记者。这种流亡的“反法西斯人士”太多了。如果有必要，让我死也行，也许死能比侨居国外，靠他人的施舍生活带来更好的宣传效果。我并不想死，尽管我身体不好，也没有孩子，但有很多活下去的理由。

今早又看到了一份政府传单，上面有空袭伤亡数字。传单的基调和用语已经有了很大长进，广播节目也有进步，尤其是达夫·库珀的节目。实际上，他的节目完全是针对每周收入低于5英镑的穷人阶层。但他们都没有用生活化的语言，打动不了相对贫穷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甚至都听不太明白这些节目。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无论如何都意识不到，普通人理解不了抽象的词这一事实。在阿肯兰把他那篇愚蠢的《普通人宣言》四处传阅时（他自己写的，还找来了他自己选定的“普通人”签了字），他告诉我，他自己曾把初稿交给《大众观察报》审核。于是，报社就找来了普通工人试读，结果出现了许多最荒谬的误解……英国改变的第一个标志是收音机里那些甜美空洞的声音消失了。我在酒吧里观察到，只有在听到通俗用语时，工人们才会注意广播。但艾琳称，没受过教育的人在听到严肃而庄重的演讲时，即便不能理解内容，但只要感受到了震撼，仍会被打动——我觉得她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比如，A太太[36]就被丘吉尔的演讲所打动，尽管她并不能完全理解其内容。

1940年6月25日

昨晚凌晨一点钟时，防空警报响了。对伦敦来说，这是假警报，但显然，别处的确有险情发生。我们起床后穿好衣服，但没去掩体。每个人都一样——起床后站着聊天，看上去很傻。听到警报后起床是很自然的，但没有枪炮或其他险情，人们就不好意思走进掩体。

我从昨天的某份报纸上得知，尽管人们必须付钱，但美国正在分发防毒面具。英国民众似乎不太需要防毒面具，美国平民也差不多。分发防毒面具不过是全国团结的象征，下一步就该穿制服了……战争一打响，防毒面具就有了社会和政治意义。几天之内，像我这样拒绝戴防毒

面具的人就会遭人侧目，然后会被人们当成“左翼分子”。接着，这种习惯会逐渐消失，人们转而认为戴面具是极端谨慎的表现，是郊区纳税人。后来，坏消息传来，这种习惯又会死灰复燃。我看，现在大概有20%的人会戴面具。不过，如果一个人戴着面具的同时却不穿制服，也会被人侧目。大规模空袭来临前，人们才会意识到德国人不用毒气，但防毒面具的佩戴率可能被当成战时新闻对公众影响程度的指标。

下午去了趟征兵办公室，在国民军征兵册上写下了名字。周五还得去做体检，但我估计对30到50岁的人，体检标准会降低一些。负责登记的那个人还是那种常见的白痴，就是佩戴着上次战争勋章的老兵，他几乎不会写字。写大写字母时，他总会把字母写反。

1940年6月27日

似乎前天晚上空袭警报后，很多伦敦人都被解除危险的警报声吵醒了，以为那是空袭警报。他们在防空洞里待到第二天早上，等着警报解除。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个月，空袭预警信号已经向民众解释了无数次。

直到现在，政府都没进行任何征兵动员，因此宣传效果很不好……令人震惊的是，根本没有任何常见的反法西斯宣传海报。要是有人愿意向信息部展示西班牙战争中用过的海报就好了，哪怕是佛朗哥的宣传画也可以。但这些人主观上是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准备在意大利参战的那刻就立刻支持墨索里尼，这种人怎么可能动员全国人民反对法西斯？巴特勒[37]回答西班牙占领丹吉尔一事时说，英国政府已经接受了西班牙政府对此的“解释”，即意在维护丹吉尔的中立，而这竟发生在佛朗哥在马德里举行庆祝“征服”丹吉尔的游行之后！今天的晨报刊登了一则“否认”的消息，即否认身在马德里的霍尔[38]曾询问过停火事宜。换句话说，他正在这么做。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在接下来的几周及时摆脱这些人。

这场战争的本质是阶级战争，英国统治阶级毫无意识的背叛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不值一提了。难题是这种背叛多大程度上是故意为之的。迈尔斯认识统治阶级的人，至少见过他们，他说除了丘吉尔等个别几个，整个英国的贵族阶层都已腐化，他们根本没有起码的爱国精神，只关心如何能保证自己的生活水平。他说，他们很有阶级意识，明白自己

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富人紧密相连。对他们来说，墨索里尼垮台就是噩梦。目前，迈尔斯自战争之日起对战争的预测全部正确。他说冬天什么都不会发生；还说意大利不会遭受痛苦，但会突然对我们宣战；他还说德国人意图在英国建立傀儡政府，在大众尚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时，让希特勒统治英国……迈尔斯唯一判断失误的是认为苏联会继续同德国合作，在这一点上，我也错了。现在看来，苏德两国不可能继续合作。但当时，苏联可能并没有想到法国会迅速陷落。如果法国没有战败、贝当追随者最终成功的话，法国也会站到苏联的对立面，就如同当初苏联对英国所做的那样。有趣的是，苏德条约签订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该条约对苏联非常有利，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希特勒，不过，只要看看地图，大家就会明白事实绝非如此……在西欧，共产主义者和极端左翼分子现在已几乎全部陷入自我慰藉的状态。对事件发展无能为力的人假装自己是在以某种手段掌控事件发展。从共产主义的角度看，只要他们能说服自己苏联占据上风就行了，别的都不重要。但现在看来，苏联只是得到了喘息之机，至于是否从条约中有所获益还不一定。不过，在慕尼黑，他们的表现更好一些。也许，英苏最终不得不结盟，而这也将成为实际利益压倒意识形态仇恨的例证。

《新领袖》[39]斥责了贝当及其追随者的“背叛”行为，反对希特勒的“工人斗争”。如此，他们可能会在希特勒入侵英国时支持“工人”抵抗。工人们该用什么战斗？当然是武器。可同时，独立工党又呼吁破坏武器工厂。这些人几乎完全生活在自我慰藉带来的幻想中，实际上，他们的所言所语、所作所为对事情的发展毫无作用，甚至连颗子弹都变不出来。

1940年6月28日

事情的发展让我很受打击。早上去做了征兵体检，结果我被拒绝入伍。我的健康等级是C，军队目前不接收我这种健康状况的人……令人讶异的是，这种征兵系统毫无想象力，一个健康状况不及常人但至少不是残废的人竟无用武之地。一支军队需要大量的文职人员，但目前，这些工作都是身体健康但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完成的……如果政府准备集中全国的人力资源，将之从奢侈品行业转移到生产性工作中的话，那么人们就能原谅政府没有雇佣知识分子的做法。因为总的来说，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并不可靠。实际上，走在大街上，人们就知道这种改变不可能发

生。

苏联今天进入了比萨拉比亚，这件事基本没引起人们的兴趣。对此事的评论我并没有听到太多，但大家都对此事表示赞同，至少没有敌意，根本比不上公众对入侵芬兰一事的强烈情绪。我想，这种差异不是因为苏联对待芬兰和罗马尼亚的态度不同。可能是因为我们目前境况不好，苏联这样的举动可能会令希特勒难堪——我对此非常笃定，尽管希特勒是同意苏联的这一行动的。

1940年6月29日

英国政府已经承认了戴高乐政府，但言辞并不确切，也就是说，英国并没有否认贝当政府。

幸运的是，媒体站在我们这边，而且始终独立……但此事的另一面是，媒体的“自由”意味着它们不得不依赖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广告），很大程度上说，就是依赖奢侈品贸易。报纸可以抵制直接背叛的行为，却很难在奢侈品控制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因为巧克力广告和丝袜广告使之得以生存。

1940年6月30日

今天下午，全“军区”的本土防御志愿者在摄政王公园举行了阅兵，共有12个排参加，理论上每个排有60人（实际上人数略有不足）。参加阅兵的多是老兵，便装肯定会显得军容不整，因此，这些人还不错。其中，大约25%的人来自工人阶级。如果摄政王公园附近区域都能达到这样的比例，那其他地方的工人阶级比例一定还要更高。我不知道当局是否会在贫民区招募本土防御志愿者，以免工人阶级控制大方向。目前，整个组织混乱无序，事态发展存在多种可能性。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自发组织自卫团体了，民间甚至在用土法制作手榴弹。高层肯定会被事态的发展彻底吓坏的……参加阅兵的将军是常见的老白痴，老迈不已，他的演讲是我听过的所有演讲中最没有激励效果的，但士兵们却很乐意听。当人们知道步枪终于运到时，都不禁欢呼起来。

昨天，我和康诺利以及M夫妇[40]走在街上时，看到了海报上关于巴尔博[41]的死讯。我和康诺利都高兴极了。康诺利说巴尔博和他的同伙曾经把萨努西教团的长老从飞机上扔了下去。我看到连M夫妇（他们几乎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都没有不悦。艾琳也很高兴。晚上（我在克鲁姆斯希尔街[42]过的夜），我们发现有只老鼠钻进水槽后爬不出来了，于是便费尽力气用肥皂盒搭了个楼梯让它爬了出来。但当时，老鼠已经吓坏了，钻进下水槽边的铅条下，怎么都不肯出来。我们让它自己待了半个小时，可它依旧一动不动。最后，艾琳只能用手轻轻把它弄出来，再放它走。这种事情并不重要……但我想到西蒂斯[43]的灾难曾令我相当难过，甚至到了茶饭不思的程度时，就不由得觉得战争十分可怕，因为它竟能让人们听到敌方潜艇沉默的消息而欢欣鼓舞。

---

[1] 当时伦敦有三份晚报：《星报》《晚间新闻报》《旗帜晚报》。只有《旗帜晚报》至今仍在发行。

[2] 英国远征军，法国沦陷时驻法的英军部队。

[3] 达夫·库珀（1890-1954），保守党政治家、外交官、作家。因在慕尼黑事件中与张伯伦意见相左而辞去第一海军大臣之职，后成为爱国右翼阵营的领军人物。1940年5月，丘吉尔任命其为情报大臣。

[4] 一份社会主义周刊，当时由雷蒙·珀斯盖特主编，奥威尔为其写过多篇评论与短文。

[5] 英国共产党的日报。

[6] 英国法西斯联盟的会刊。

[7] 1940年5月，丘吉尔任命比弗布鲁克男爵一世，即加拿大传媒巨头马克斯韦尔·艾特肯，为飞机生产主管大臣。他效率很高，但饱受非议。（彼得·戴维森注）

[8] 弗兰茨·伯克努（1900-1957），奥地利社会学家、政治作家，出生于维也纳，1921年到1929年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奥威尔为他的《共产国际》以及《极权主义敌人》写过书评。

[9] 艾瑞克是艾琳最喜欢的哥哥，他是名优秀的胸腔心脏外科医生。

[10] 埃蒙·瓦勒拉（1882-1975），爱尔兰政治领袖，时任爱尔兰自由邦首相，于1959年当上总统。

[11] 英国一份广受欢迎的周日报。

[12] 玛戈特·阿斯奎斯（1864-1945），是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伯爵的遗孀，伯爵于1908年至1916年任英国首相。

[13] “禁止”暗含有新闻审查的意味。但实际上，这些广告（也就是卖报人举着的）被禁止完全是为了节省原料，从而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使用，节省运力。

[14]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1889-1952），英国工党政治家，1939年因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而被开除出工党，1940年到1942年任驻苏联大使，1947年到1950年任财政大臣。

[15] 奥威尔在1944年9月15日第42期的《论坛报》上发表了该故事。

[16] 即后来的地方防卫军。奥威尔于6月12日加入后来的伦敦旅第五郡C连，并很快被提拔为中士，指挥10人。

[17] 当时负责全英国乃至全球板球运动的团体。

[18] 一个位于伦敦东端的工人阶级选区。

[19] 战争爆发前三天，奥威尔与信天翁出版社签订了《上来透口气》的出版合同，但出版社最后没有出版此书。

[20] 维克多·彼得·沃森（1908-1956），一名富有的年轻人。1939年，他云游四方后决定献身艺术，与朋友塞瑞尔·康诺利一起创办了《地平线》杂志，他本人为杂志提供资金支持，以及艺术栏目的所有素材。1948年，他参与创建了当代艺术协会。他一直很欣赏奥威尔的作品。

[21] 尤妮蒂·米特福德（1914-1948），里兹代尔二世勋爵的四女儿，自1934年第一次见到希特勒起就一直仰慕希特勒。1940年1月，尤妮蒂自杀未遂，头部受伤。从德国回到英国之后，她就一直在疗养身体。她其实并未怀孕。（彼得·戴维森注）

[22] 可能是迈克尔，即奥威尔在1940年9月3日的日记中提到的那名小服装厂老板。（彼得·戴维森注）

[23] 格温·欧肖尼西，艾琳的嫂子。战争初期，英国政府曾资助将儿童撤往加拿大和美国的项目。1940年6月，格温的儿子劳伦斯19个月大，搭乘最后一批船只转移到了加拿大，后来疏散船只“贝拿勒斯城”号在大西洋上被德军击沉前。见1940年7月25日的日记。

[24] 可能是理查德·克劳斯曼（1907-1974），学者、记者和左翼政治家，1938年到1955年担任《新政治家》周刊的助理编辑，1970年到1972年任编辑。1945年到1970年曾担任工党议员，1964年到1966年任住房与地方政府部长，1964年到1970年任健康与社会保障部长。

[25] 英国第146步兵旅于1940年4月16日至17日在挪威纳姆索斯登陆，该地位于距奥斯陆以北约300英里处的海岸线上。5月2日到5月3日，146步兵旅撤退，同盟国最后一批军队于6月9日撤离。

[26] G.R.斯特劳斯（1901-1993），1979年受封为终身贵族，是工党议员，也是《论坛报》的副总监。

[27] 1940年5月10日，张伯伦主导的政府垮台。丘吉尔组建了一个联合政府，并让张伯伦成为内阁成员。

[28] 雷纳·赫彭斯托尔（1911-1981），英国小说家、诗人和BBC广播制片人。

[29] 不确定所指。可能还是理查德·克劳斯曼，也可能是塞瑞尔·康诺利。

[30] 苏格兰场，是英国首都伦敦警察厅的代称。

[31]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领袖，后于1916年至1922年担任英国首相。

[32] 让·齐亚比（1878-1940），1927年到1934年任巴黎警察局局长，亲法西斯分子，要对严厉镇压左翼势力的措施负责。（彼得·戴维森注）

[33] 亨利·菲利浦·贝当（1856-1951），法国陆军将领、政治家，1916年因在凡尔登战役中表现突出成为当时的英雄。二战法国战败后，他于1940年至1944年任维希政府元首，成为纳粹德国的傀儡。

[34] 皮埃尔·赖伐尔（1883-1945），法国政治家、社会党人。他于1931年至1932年和1935年至1936年两度担任法国总理。二战法国战败后，他于1942年出任维希政府总理。法国光复后，他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35] 皮埃尔·弗朗丹（1889-1958），曾在法国政府中先后担任多个职位，1934年至1935年出任首相。1940年任贝当政府的外交部部长，但曾试图抵制德国的要求，后被赖伐尔所取代。战后，他被禁止参与公共生活。

[36] 可能是安德森太太。尽管奥威尔在写这篇日记时已在伦敦住了五六周，但仍时常返回沃林顿。直到1947年，奥威尔才完全放弃在沃林顿的住所。（彼得·戴维森注）

[37] R.A.巴特勒（1902-1984），英国政治家，1938年到1941年任英国外交事务副大臣，后于1951年到1964年间在保守党政府中任外交大臣。

[38] 萨缪尔·霍尔爵士当时为英国驻西班牙大使。

[39] 独立工党的周报。奥威尔曾于1938年加入该党，并在西班牙内战中与独立工党纵队并肩战斗。二战爆发初期，奥威尔退出该党。（彼得·戴维森注）

[40] 所指不明。可能是指迈尔斯和他妻子，但他们并不符合“几乎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这一描述。

[41] 伊塔诺·巴尔博（1896-1940），意大利空军司令，对1935年到1936年轰炸埃塞俄比亚负有责任。

[42] 格温·欧肖尼西在格林尼治的家。

[43] 1939年6月英国潜水艇西蒂斯未能在试航中浮出水面。由于逃生装置有缺陷，103名船员中只有6人获救。

1940年7—9月

1940年7月1日

现在报纸只有6页了，也就是3张纸，印刷字体也变小了。大概数了一下今天的《新闻纪事》：6页共48栏。其中（不算小广告和头版标题）15栏是广告，也就是说约三分之一是广告。这当中有一个半专栏是招聘广告，但大部分都是关于不常用的消费品的。财经专栏也快成广告了，有一些关于董事会会议的报道等，可能是得到了那些公司的赞助。

今天的《每日快报》有6页共42栏，其中12栏是广告。

今天所有报纸上都提到有传言称，巴尔博是被自己人谋杀的，和弗理奇将军[1]的情况一样。现在，每次有重要人物阵亡，就会有这种说法出现。西班牙战争中的杜鲁提和莫拉[2]的死也说明了这一点。有关巴尔博的传言以皇家空军的声明为基础。皇家空军的声明称，自己对据称导致巴尔博阵亡的空战一无所知。如果此事不属实，那就说明英国宣传部门的这一步棋非常巧妙——事实上，这很可能是个谎言。

1940年7月3日

所有会思考的人都感到了一丝绝望，因为政府没有采取行动，指挥层依旧冥顽不化，指挥官们依旧支持法西斯。人们明确意识到，唯一确定的是，这场入侵行动并未成功。此外，另一件事也让人越来越担忧，也就是希特勒最终不会入侵英国，而是会转而攻击非洲和近东地区。

1940年7月5日

在奥兰击沉法国战舰的行动[3]中，英军几乎没有伤亡。显然，法国水兵肯定是拒绝开炮，至少对开炮没什么热情……尽管报纸上的清单列出了“法国战舰失去了战斗力”等事项，但从战舰名单上看，实际上，似乎一半法国海军都逃过了一劫，当然，完好的潜艇也超过一半。但报纸上没有说明有多少战舰落入了德国人或意大利人之手，也没说明尚在海上的战舰数量……德国广播中迸发了极为可怕的怒火（如果报道属实，他们甚至是在呼吁英国人民把丘吉尔绞死在特拉法加广场上），这恰恰证明了这次行动的正确性。

1940年7月10日

他们重创了停靠在喀尔港的法国战列舰黎塞留河号[4]，却没有攻占防守薄弱的法属西非港口的行动。据凡农·巴勒特[5]所说，如我先前所料想的那样，德国人会提出合约条款，如果英国不再插手欧洲战场，就可以保有英帝国的名号；丘吉尔政府下台，由支持希特勒的新政府接替等。有这样一个推断，英国有一个迫切希望接受这些条款的派系，而且他们无疑组织了影子内阁。除非战争已陷入僵局，否则让普通民众忍受这种条款简直难以想象……温莎公爵[6]被任命为巴哈马群岛总督，他已经启程前往那里，这无异于流放的判决。格兰茨出版的新书《有罪之人》如往常一样“控诉”慕尼黑会议，如刚出炉的蛋糕一样畅销。《时代周刊》称，美国共产党正与当地纳粹组织秘密合作，阻止美国军火运抵英国。至于共产党不同派系在当地的行动，人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直到最近，似乎他们还没有任何行动上的自由。然而，近期来看，他们在不同的国家，似乎实行了相互矛盾的政策。不过，如果坚守“底线”意味着灭亡，他们也可以随时放弃。

1940年7月16日

除了英国政府对日本的半妥协，同意在声明时期内停止通过缅甸公路输送物资外，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实质性新闻了。然而，这份声明尚留有余地，可以被替代性政府作废。F[7]认为，这是英国政府安抚日本的最后一次尝试（也就是试图保护其在香港的投资），此后，英国将坚定

地支持中国。可能如此吧。但这种方式糟糕透顶，不挨打就不知道前行，而且，此刻整个世界也已不再相信英国这样做是出于真诚了。

W[8]称，此刻的伦敦“左翼”知识分子都已成了失败主义者，认为局势无望，只等着投降。从他们在《人民阵线》上的表现，就该料到这些人的这副德行，我早就知道，真正的表演刚开始时，他们就会崩溃。

1940年7月22日

过去几天中，没什么实质性的新闻。目前，刚刚拉开序幕的大事是泛美大会。此外，苏联兼并了巴尔干各国，矛头直指德国。克里普斯的太太和女儿即将前往莫斯科，显然，克里普斯会在莫斯科待很久。据说，西班牙正在大量进口原油，显然是要提供给德国，而我们并没有阻止。今早的《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大堆佛朗哥希望保持中立的胡话，还说佛朗哥想抵制德国的影响等。事情的发展肯定会如我所述：佛朗哥会继续自己的“亲英”把戏，如此，英国政府就有理由善待西班牙，允许他们不受限制地进口物资，但最终佛朗哥还是会加入德国一方。

1940年7月25日

根本没有新闻……之前很多把孩子送到加拿大的人现在都后悔了[9]……上个月的数据显示，空袭造成约340人死亡。果真如此，那这个数字就比同一时期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还少……据说，本土防御志愿者队伍已经停止招募，因为人数已经超过了130万，而且名字也改成了地方志愿军。此外，有传言称，所有士兵都会被正规军取代。这似乎表明政府开始认真对待本土防御志愿者了，把他们当成真正的战斗力量，不过也可能是因为政府有所顾忌的缘故。

传言说，劳合·乔治是英国的贝当……意大利媒体也这样认为，还说劳合的沉默就已经说明了这个传言的真实性。当然，劳合坐了冷板凳，纯粹是因为怨恨和嫉妒才会这样，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我想象不到他竟会与托利党小团伙共谋，而后者显然会同意这种做法。

我走在街上，总会抬头看窗户，盘算着哪扇窗适合做机枪的掩体。D[10]说他也会这样做。

1940年7月28日

今天晚上，我在贝克街看到一只鹭飞过，但我一两周前看到的一幕会更让人觉得难以置信——有只茶隼在罗斯板球场正中央杀死了一只麻雀。我想，这大概也是因为战争吧，战争的发生导致车流行人减少，因此伦敦城里的鸟就更多了。

有个小个子的男人告诉我，他认识乔伊斯[11]，但我不记得那个小个子叫什么名字了。乔伊斯，人称“哈哈勋爵”，加入了法西斯的一个分支。那个小个子说，乔伊斯痛恨莫斯利，曾用最下流的语言辱骂过莫斯利。莫斯利[12]是希特勒在英国的主要支持者，有趣的是，希特勒任命的不是莫斯利的追随者，而是乔伊斯的。看来伯克努说的没错，希特勒不希望英国的法西斯党太过强大。显然，希特勒的动机就是分裂，甚至还要分裂那些分裂者们。德国媒体抨击了贝当政府，但原因不明，此外，德国控制的法国媒体也发表了相似言论。杜利奥特[13]显然是这种事的先驱。看到《星期日泰晤士报》也报道称，巴黎的德国人正在利用博格里[14]时，我感到非常震惊。然而，我知道，右翼分子和经过正式认可的左翼分子在涉及左翼异议小党派的事情上，会习惯性地说谎。因此，我有所保留地接受了这一说法。

1940年8月8日

意大利发动了对埃及的战争，或者，确切地说，是发动了对英属索马里的战争。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消息，但报纸暗示，依靠我们目前的军队，很难守住索马里。战略重心是丕林岛，一旦失守，就相当于关闭了往来红海的门户。

H.G.威尔斯很了解丘吉尔，说他是个好人，不会唯利是图，也没什么野心。他扮演着“苏联委员”的角色，自己用车也会写申请，但并不过分看重钱。但H.G.威尔斯说丘吉尔对时事视而不见，从不让自己的密友

失望也是他的一大弱点。因此，很多能力不足的人根本不会被撤换。威尔斯对难民受迫害一事强烈不满，认为陆军部是所有破坏行为的始作俑者。他认为，有些反法西斯难民与欧洲地下运动组织有关，可能某天就会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这在统治阶级眼里比战败还可怕，因此关押他们就是蓄意破坏。他说斯维顿勋爵[15]最应受到谴责。我问他是否觉得斯维顿勋爵是故意为之，因为这种事最难做决定，他说自己认为斯维顿勋爵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今晚听了一场配有幻灯片的演讲，主讲人是个军官，曾参加过敦刻尔克战役。演讲很糟糕。他说比利时人英勇善战，没提前警告（实际上比利时人提前3天就发出了警告）就投降了的说法是错的，还说了法国人的坏话。他有一张佐阿夫的部队打家劫舍后全军逃跑的照片，照片上有个士兵喝得烂醉，倒在路上。

1940年8月9日

经济每况愈下，快让人彻底无法忍受了……我给催收所得税[16]的工作人员写了一封长信，说战争几乎断绝了我的生活来源，而政府同时也拒绝给我一份工作。噩梦缠身的我根本无法写作，虽然这对政府来说无足轻重，对作家来说却事关重大……因此，能逃税我就会逃税，而且不会为此良心不安。但如果我认为有必要，就会为英国献出生命。在缴税方面，没人会爱国。

之前几天没什么实质性新闻，只谈到了空袭。如果报道属实，那么英国可谓胜仗颇多。我想和皇家空军的军官聊聊，好知道这些消息是否属实。[17]

1940年8月16日

攻打埃及，也就是在索马里进行的战斗是一次侧翼行动，显然，战况很糟糕。英吉利海峡上空的空战异常激烈，如果报道还算可靠，那德军的损失可以说是相当惨重。比如，昨天的报道就称有145架德军飞机被击落……如果每次的空袭都是真的，那么伦敦市区的人就会谨守规

矩。现在每个人都愚蠢至极，除了交通，一切都处于停滞状态，而且也没就此采取什么应对措施。空袭之后的前15秒，警报和口哨声此起彼伏，人们赶紧把孩子喊进屋里。之后，人们就会聚在一起，看着天空，目光里还有期待。白天，在听到爆炸声前，人们似乎还不太情愿躲到掩体中。

我周二和周三都在沃林顿，过得非常美好，既没有报纸，也没有人谈论战争。农民们在收燕麦，我们则带着马克斯追了两天的野兔，马克斯追野兔的速度非常快，让我很意外。这一切带我回到了童年，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体验这种生活了。

1940年8月19日

空袭的一个特点是：几乎所有人都会轻信远方遭受的损失。人们都觉得纽卡斯尔损毁严重，而刚从那里回来的乔治·M[18]却说纽卡斯尔损失不大，反而他来之前还以为伦敦已经是一片残垣断壁。乔治一到伦敦就问我们“是否经历了一段非常难挨的日子”。这些都可以理解：美国人会认为，伦敦已陷入一片火海，英国人正在忍饥挨饿等。同时，人们也会觉得我们对德国西部的空袭造成的打击并非如报道的那么严重。

1940年8月20日

英国媒体竭力粉饰索马里撤退一事，然而那还是一次惨败，是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失守的第一块领土……遗憾的是，英国报纸（至少《新闻记事报》是这样——我今天只读了这份报纸）依然把它报道成好消息。也许政府会因此再次调整，再赶走几个无用之人。空袭日益频繁，民兵自卫队也因为没有钢盔发牢骚。麦克纳马拉将军解释说，正规军仍缺30万顶钢盔，而此时已开战将近一年了。

1940年8月22日

与我看到的其他报纸头条相比，《比维布鲁克报》似乎有意淡化托洛茨基被奥格伯乌[19]所杀的说法。实际上，尽管《旗帜晚报》今天刊登了几条关于托洛茨基的报道，但对上述说法只字未提。无疑，尽管刊登了罗[20]的漫画，但该报纸还是密切关注苏联，尽一切努力安抚苏联人，然而背后也许有更狡猾的策略。目前看来，《旗帜晚报》中，制定支持苏联这一政策的人一定非常精明，因为他们明白，人民阵线的“路线”并不能确保同苏联结盟。此外，他们也同样清楚，英国大众的左派依旧想当然地认为，只有全面反法西斯的政策才能拉拢苏联。

吹捧苏联会将公众意见推向左派。奇怪的是，我总将这种不入流的动机归咎于他人，但我自己一点也不狡诈，因为即使在我觉得有必要的情况下，我也不愿使用间接的手段。

今天，我在波特曼广场看见了一辆四轮马车，挺干净的，拉车的是一匹好马，车夫像是1914年之前那种马夫的样子。

1940年8月23日

大约凌晨3点时，空袭警报响了。我起身看了看时间，觉得乏力，便赶紧又上床睡了。他们想重新调整警报系统，因为每次警报拉响都会耗费人们的时间，扰乱人们的睡眠，造成数千英镑的损失。如果要避免这种浪费，就得调整系统。目前，只要德国飞机要轰炸某个区域，那么整个一大片地区的警报就会全部响起，这就意味着有些人的睡眠和工作会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被打断。此外，人们也会有这样一种印象：空袭警报总是假的。显然，有如此想法非常危险。

等了两个半月，我终于拿到了民兵制服。

昨天晚上听了某将军的讲座，他控制着约有25万人的军队。将军声称自己从军已有41年，经历过佛兰德斯战役，显然是因为不称职而未获升迁。他详细阐释了民兵作为静态防御武装的说法，用不屑的口气坦言，他认为，我们练习隐蔽、“趴在地上匍匐前进”等根本没用，俨然一副奥斯特利庄园民兵训练学校中明星人物的口吻。他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死在岗位上。他擅长刺刀练习，暗示随后还会为我们解释正规军的军衔和敬礼等事项……可怜的顽固分子们，显然到了又老又蠢的时候，剩

下的只有一丝蛮勇。真可怜，要是他们不再折腾我们，我们也会同情他们一点儿。对于这些鼓舞性的演讲，普通民众的态度已从焦虑变成了过分热情，一听到笑话就会欢呼大笑，同时又会隐隐觉得某些地方不对劲——这种态度让我觉得很可悲。是到了要有人跳上讲台，告诉那些人，他们正在浪费时间，同时告诉他们打败仗的原因以及始作俑者的时候了。每每看到听着这些蠢话的人，我都会想到《塞缪尔·巴特勒笔记》中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讲述的是巴特勒看到小牛犊吃粪便的故事，而小牛犊并不清楚自己到底喜不喜欢那种东西，然而如果能有有经验的奶牛用牛角碰碰它，它就会一辈子记住，粪便是不能吃的。

我昨天在想，如果没有托洛茨基，俄国会怎样？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又会怎样？或许不得不再找一个人替补。

1940年8月26日

我认为，8月24号的空袭是伦敦经历的第一次真正的空袭，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炸弹的声音。东印度码头被击中时，我们就在前门看着。但周日的报纸却都没提到这件事，显然，重要目标被击中时，他们总会隐瞒真相……昨天的爆炸声很大，但并没引起人们的恐慌，也没让大地震颤，因此，显然，他们投下的并非杀伤力太大的炸弹。我记得，我在蒙弗洛里医院住院的时候，有两枚大炸弹落在维斯卡附近。第一颗落在离我们4公里的地方，爆炸声可谓惊天动地，房屋也颤动起来，吓得我们赶紧跳下床逃跑。也许那颗炸弹有2000磅重，而刚刚落下的也就500磅而已。

他们要有所行动，强化警报定位才行。现在，只要有飞机出现在伦敦，就会有数百万人无法入睡，或无法工作。

1940年8月29日

之前三个晚上，空袭警报一共持续了大约16到18小时……显然，夜袭的目的就是骚扰，因为人们听到警报就必须钻进掩体。只要人们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警报声响起就意味着要钻进防空洞，那希特勒每次只要派

出六七架飞机就可以了，这样，人们的工作无法完成，睡眠也难以继续。然而，这一招已经开始慢慢失效……20年来，我第一次见识到公交车售票员的粗鲁态度，他竟对乘客发了脾气。比如前几天晚上，我就听见暗处有人说：“女士，到底谁是售票员，我还是你？！”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上一次战争末期的情景。

……艾琳和我尽量不把空袭当回事。我内心一点也不担心，只是对空袭引起的混乱略感不安。早上执勤回来后，我像往常一样睡了几个小时，却做了一个十分不安的梦。我梦见一颗炸弹落在身边，吓得我魂飞魄散。这个梦和我在西班牙战争末期时做过的一个梦差不多，在那时的梦里，我趴在岸边一处开阔的草地上，而迫击炮弹就在我附近爆炸了。

1940年8月31日

现在，空袭警报每24小时要响六七次，简直让人不堪其扰。有种观点现在非常普遍：除非自己所在区域可能有大规模空袭，否则人们就会忽略这些警报声。我看，在摄政公园散步的人，一半多根本不理会警报……昨天晚上我们刚准备睡觉，就听见很大的爆炸声。过了一会儿，巨响又惊醒了我们，听说是有颗炸弹落在了梅达谷。艾琳只是简单地告诉我说声音很大，然后就睡了。睡着之后，我迷迷糊糊地听见有高射炮的声音，仿佛回到了西班牙内战的时候：某个晚上，我躺在舒服的稻草上，脚是干的，还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而如果足够远，那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就仿佛催眠曲。

1940年9月1日

前几天买了顶军便帽……7号以上的军便帽好像非常稀缺。显然，他们觉得所有士兵都是小脑袋。不过，某位大人物准备参军前在巴黎倒说对了：“天啊，你们不会觉得我们想让聪明人上前线吧，是吗？”民兵制服领子都只有20英寸宽……各个商店都想从地方军制服、卡其布衬衫等里面分一杯羹，他们把价格不菲的物品摆在橱窗里，还标着“民兵适用”的牌子。这就和巴塞罗那当年一样，战争刚开始，人们都热衷于参加民兵队。

1940年9月3日

昨天和C夫人[21]聊了一会儿，她前几天刚从卡迪夫回来。卡迪夫的空袭几乎一直不断，但最终还是决定无论是否有空袭，码头必须照常运营。然而，刚做出这个决定，一架德军飞机就投下了一颗炸弹，刚好落在一艘船的船舱里。C夫人说，船舱里七个工人的遗骸“只能用水桶装着提出来”。紧接着，码头工人就开始罢工，罢工结束后就去进行空袭隐蔽训练。报纸不会报道这种事。各方均报道称，交战双方在拉姆斯盖特等空袭中的伤亡数字都被官方最小化了，因此当地居民相当愤怒，他们不想看到死亡100人被描述为“损失微不足道”。人们会非常关注8月份的伤亡数字。我觉得，如果伤亡人数在2000人左右，他们会说实话；如果超过这个数字，他们就会有所隐瞒。[22]

迈克尔估计，他的私人小企业——小服装厂，仅仅因上周的空袭而停产就得损失50英镑。

1940年9月7日

空袭警报现在相当频繁，而且持续时间很长，因为人们会习惯性地忘记响声是空袭警报还是警报解除的信号。除非距离很近（差不多2英里以内），炸弹和炮火的声响已经成为人们睡觉和交谈时的背景声音了。但目前为止，我还没听到那种让人觉得性命难保的爆炸声。

丘吉尔在演讲中称，8月的空袭遇难人数是1075人。即便这一数字是真的，也可能是被大大低估了，因为这只代表了平民伤亡数……官方对空袭的具体情况保持沉默，今天的报纸称有颗炸弹落在“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但就算有上千人知道这件事，从报道上也根本看不出是哪一个广场。

1940年9月10日

这几天的疯狂难以付诸笔端。空袭本身倒不足为惧，但由此引发的

交通混乱、电话线路频繁故障以及店铺关张等让人深受其扰。然而，人们却还要正常工作，这一切令人筋疲力尽，生活只是仓皇争夺时间。关于爆炸，我要说以下几点。

我还没有见过深度超过12英尺的弹坑。格林尼治那所房子正对面有个弹坑（写到此处时被空袭打断，1940年9月11日继续写），和西班牙空袭时15厘米炮弹打出的弹坑差不多大小。总的来说，炸弹爆炸声是很吓人的，但并没有到让人心惊胆战的地步，比不上我在韦斯卡见过的那些大炸弹。除了那些“尖叫”炸弹，我经常能听到炸弹飞过的声音——估计炸弹落地点离我只有不到1英里——但即使这样，爆炸声也不算大。整体而言，我估计他们用的是小型炸弹。在老肯特路造成破坏的炸弹威力都比较小，通常是某座房子被炸成废墟，但临近的房子却只是轻微受损。燃烧弹也是如此，有时某座房子内部已经完全被烧毁了，但外表却根本看不出来。

延时炸弹造成了很大困扰，但当局似乎能找到大部分炸弹，并在炸弹爆炸前成功疏散周围群众。整个伦敦南部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人们愁眉苦脸地在街上游荡，手里还拿着箱子和包裹。这些人不是无家可归，就是因为有未爆炸的炸弹而被疏散的，后者居多。

目前为止，破坏情况主要如下：9月7日、8日码头大火，9月9日齐普赛街大火；英格兰银行稍有受损（弹坑距银行外墙只有约15英尺）；格林尼治海军学院也略有损毁；霍尔本破坏严重；马里波恩货场中落入一颗炸弹；杜莎夫人蜡像馆附近的影院被毁；其他几处也有大火；多处燃气管道和电缆破裂，多条道路被迫改道，伦敦桥和威斯敏斯特桥已经关闭了多日；铁路线破坏严重，铁路运输会受影响；伦敦南部某座电厂被击中，电车停驶约半天；据说伍利奇损毁相当严重；从火焰大小和烟雾浓度判断，泰晤士河三角洲地区一处或多处大油罐于9月7日被击中了；牛奶和信件的投递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一定影响，大部分报纸都会晚到好几个小时；所有剧院于9月10日关闭，我看到电影院也关闭了。

昨晚每隔15分钟，不远处就会传来炸弹飞过的呼啸声和之后的爆炸声，于是，我迫不得已在公共防空洞里度过了大半个晚上。尽管防空洞里设施齐全，有电灯、风扇，不过那里挤满了人，因此相当不舒服。大部分人都是上了年纪的，他们总在抱怨椅子太硬、夜晚太漫长，但没人说什么灰心丧气的话……现在每天黄昏时分，都能看到人们带着寝具在掩体外面排队，先进去的人抢到地板的位置，或许晚上还可以睡得舒服一些。不算白天的空袭，晚上的空袭相当规律：晚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4

点半，也就是从夜幕低垂时到黎明。

我觉得如果空袭能保持着前四晚那种强度并连续进行三个月，那所有人的士气都会垮掉。但我对此仍有疑虑，因为德国本土也在遭受着同等程度的损失，所以这种攻击强度应该很难保持三个月。

1940年9月12日

空袭正式开始后，看得出人们比以前更愿意与街上的陌生人交谈了……今天早上遇到了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穿着脏兮兮的连体衣，可能是汽车修理工。他对战争持有相当悲观消极的态度，伦敦南部残垣断壁般的景象更是令他惊恐不已。他说，丘吉尔视察了大象堡[23]附近遭受轰炸的地区，其中一处22座房子中有20座被炸毁了，而丘吉尔却说了句“还不算太糟糕”，那个年轻人说：“如果他当着我的面说，我肯定会拧断他那该死的脖子。”那个年轻人对战争前景非常绝望，认为希特勒一定会胜利，伦敦会沦落到和华沙一样的境地，当他说到伦敦南部那些因战争而无家可归的人时，言语中满是悲伤。我说政府应该征用伦敦西区的空房安置难民，他十分赞同。他认为，所有战争都是有钱人追逐利益的结果，也非常同意我认为这次战争或许会以革命告终的看法。这些说法表明，他并不是不爱国。他满腹牢骚的部分原因是过去六个月里，他曾四次尝试加入空军，但都未能成功。

他们今晚和昨晚都在试用新装置。这种装置可以连续发射防空火力，显然是盲目射击，或者说是靠收到的声音射击，我想他们可能有某种声音感应装置，可以估算炮弹的爆炸高度……噪音很大，几乎持续不断，但我并不介意，因为我感觉这是我方的炮火。昨晚在S[24]那里过的，广场上的大炮每隔一小会儿就会发射，整晚都没有停。我晚上睡得不错，那里听不到德军炸弹的声音。

各方消息表明，伦敦东部和南部所遭受的破坏异常严重……丘吉尔在昨晚的演说中郑重指出，德军的入侵迫在眉睫。如果德军是要入侵而且不是佯攻，那么可能会先摧毁南部海岸的空军基地，再密集轰炸地面防御设施，引发伦敦与其南部的通信与交通的全面混乱。德军也可能会尽量将我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南部，再攻击苏格兰或爱尔兰。

同时，在等了3个半月后，我们这个民兵排终于等到了步枪，每6个人配备1支，此外，还有一些燃烧弹，就再没有其他武器了。制服大概每四人一套。最后，他们坚决反对个人将步枪带回家。武器全部集中存放在一个地方，也许某天晚上，一颗炸弹就可能将它们全部炸毁。

1940年9月14日

密集火力掩护下的第一个晚上，也是火力最为猛烈的一晚。据说，我们一共发射了50万枚炮弹，也就是说，按平均5英镑一发炮弹计算，这些炮弹一共价值250万英镑。不过，这样做很值得，因为群众的士气得到了极大鼓舞。

1940年9月15日

上午第一次看到飞机被击落的情景。飞机慢慢从云层中跌落，机头朝下，像是在空中被射落的鹬。观看的人群高声欢呼，不时有人问："你确定这是德国飞机吗？"给定的说明指南让人迷惑不解，飞机型号也多种多样，人们根本分不清哪些是德军飞机，哪些是英国的。我唯一的判断方法是：如果在伦敦上空飞过的是轰炸机，那一定是德军的，如果是战斗机，那更可能是我方的。

1940年9月17日

昨晚对这一地区的密集轰炸一直持续到半夜11点……我在这所房子的门厅里和两个年轻人以及一个和他们一起的女孩交谈。他们三个人的心态很有意思，他们都非常害怕并毫不掩饰自己的恐惧，根本不觉得丢人，还说自己被吓得膝盖发抖。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都非常兴奋好奇，轰炸间歇，他们就会冲到门外去看，还会捡些弹片。之后，我到了楼下C夫人的小屋里。她的小屋加了固，屋里有C夫人、她的女儿、女仆以及三个年轻女房客。每次有炸弹落下，除了女仆外的所有人都会同时尖叫，紧抱在一起，捂着脸，而在爆炸间隙，她们则很正常，能够愉

快地交谈。夫人的狗很温驯，显然是吓着了，知道有地方不对劲。空袭期间，马克斯也是这样，一动不动，心神不定。但有些狗在空袭时会变得很狂躁，人们不得不将其射杀。有人说警报响起时，公园里所有的狗都会往家里冲，艾琳说格林尼治也有相同的情况。

昨天在城里理发时，我问理发师在空袭时是否会继续工作，他说会。我又问刮脸的时候是否也会接着刮，他也说是。也许有一天一颗炸弹落会在离他很近的地方，他就会吓得跳起来，把别人半边脸都给刮掉。

后来我等公交车时，有个人走过来跟我聊天。我觉得他是旅行推销员，愁眉苦脸的。他不停地说自己和妻子是怎么逃离伦敦的，还说自己神经衰弱，同时也有胃病等。我不知道这种事情还有多少……确实有很多人从东伦敦逃了出去，每天晚上，都会有大批的人涌到宽敞的防空洞。越来越多的人会花2便士买张票，到皮卡迪利等地方的地铁站过夜……和我聊过的每个人都认为，伦敦西边那些有家具的空房应该安置无家可归的人，但我想那些讨厌的富人有足够的能力阻止这件事。几天前，伦敦东边来了50个人，在一些区议员的带领下，来到了萨伏伊酒店，要求使用那里的空袭掩体。酒店管理人员没有办法撵走他们，空袭结束后，这些人才自行离开。看到富人们的生活一如往昔，然而战争却明显朝革命方向发展时，你就会想起1916年的圣彼得堡。

晚上巨大的吵闹声里，我几乎没办法写作。（电灯刚灭了，还好我还有些蜡烛。）这一地区的许多街道（电灯又亮了）用绳索围了起来，因为发现了没爆炸的炸弹。现在，从贝克大街回家，300码远的路程走得就像在迷宫深处寻路那般艰难。

1941年9月21日

好几天都没买到新的日记本了，紧挨着的三四家文具店，除了其中一家，都因为有没爆炸的炸弹被封锁了。

这样的景象随处可见：整街的扫成一堆的碎玻璃、四散的石块和打火石碎石、泄露的煤气味以及警戒线外驻足的人群。

昨天，一小群人站在附近一条街道的入口处，其中那个戴着黑色头

盔的人是空袭预警员。一声巨响后，一股巨大的烟尘腾起，那个戴头盔的人跑向空袭预警指挥部，一个戴白帽子的人随后从指挥部里走出来，大口嚼着面包和黄油。

戴黑头盔的人说：“杜塞尔特广场，长官。”

戴白帽子的人说：“好的。”（在本子上打了个勾。）

总有普通人游荡在街上，延时炸弹让他们不得不离开家。昨天有两个女孩在街上拦住我问：“先生，麻烦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她们外表优雅，只是脸不太干净。

此外，伦敦很多地方看上去都还算正常，白天每个人都很快乐，似乎根本不在乎即将到来的夜晚，就像看不透未来的动物，只要眼前有食物，有阳光，就乐得满足了。

1940年9月24日

昨天，从牛津广场到大理石拱门的整条牛津街上只有几个人，根本没有车。黄昏时分的阳光洒在空空如也的街道上，数不清的玻璃碎片映着阳光。约翰·刘易斯百货商店门外堆着一堆塑料服装模特，肤色粉红，如真人一般，看上去就像一堆尸体，从远处看很容易看错。当时，巴塞罗那也有类似的情景，不过那是从遭到亵渎的教堂里弄出来的石膏做的圣徒。

关于是否能听到一颗径直飞来的炸弹声（即它的呼啸声），人们议论纷纷。最终，大家认为这完全取决于炸弹的飞行速度是否比声音快……我想到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答案：炸弹落下时离你越远，能听到的呼啸声就持续得越长。听到短促的嗖嗖声时，就应该迅速隐蔽。我认为这是人们躲避炸弹的根本原则，是人的本能。

每隔几分钟就有德军飞机飞回来。就像在东方国家，你以为已经打死了蚊帐里的最后一只蚊子，而每次当你刚关上灯时，嗡嗡声就又会出现。

1940年9月27日

今天的《新闻纪事》明显流露出了消极情绪，可能是受昨天达喀尔消息的影响。但我觉得，《新闻纪事》无论如何都是失败主义政策的追随者。有可行的和平条件提出时，它马上就会跳出来。这些人没有明确的政策，毫无责任感，只是凭着新教的良心，对英国的统治阶层一直反感而已。他们只会制造噪音，和《新政治家》杂志差不多，一旦战况恶化到令人无法承受的地步，这些人将可能会崩溃。

昨晚德军又投了不少炸弹，但我想它们应该是全都落在了这所房子的半英里之外。单是炸弹在空中飞过的声音就很惊人了，而整座房子都会剧烈晃动，桌子上的东西都会摇晃。现在，德军投下的显然都是大炸弹。据说摄政公园里有颗没爆炸的炸弹，“有邮筒那么大”。几乎每天晚上电灯都要熄灭至少一次，但不是像断电那样突然灭掉，而是慢慢变暗，直到完全变暗，通常5分钟之后，灯就又会亮起来。好像没人知道为什么炸弹飞过时灯就会变暗。

---

[1] 魏勒·冯·弗理奇（1880-1939），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的保守派将领，从不掩饰对希特勒的鄙视。他于1939年阵亡，人们一直认为此事是由希特勒一手策划的。

[2] 布韦那文图拉·杜鲁提（1896-1936），原为西班牙共和国的一名枪炮工人，后成为将军和广受爱戴的领袖。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阵亡。其葬礼在巴塞罗那里引发了一场广泛的抗议示威。埃米利奥·莫拉（1887-1937），军事领袖，与佛朗哥平级，在西班牙内战初期被杀，因此无法与佛朗哥争夺权力。（彼得·戴维森注）

[3] 1940年7月3日，皇家海军在副元帅约翰·索姆维利爵士的指挥下攻击了停泊在奥兰港和阿尔及利亚梅斯埃尔克比港的法军战船。

[4] 1940年6月8日，皇家海军鱼雷艇重创了停靠在达喀尔港的法国战列舰黎塞留河号和卡萨布兰卡的让巴特号。

[5] 凡农·巴勒特（1894-1983），英国记者、作家、政治家，曾是自由派政治记者的领军人物。当时，他为《新闻纪事》（倾向于自由党的立场）工作，报道世界危机，尤其是涉及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远东地区的事件。

[6] 爱德华八世（1894-1972），任威尔士王子时曾广受人民爱戴，对失业人员和萧条地区的民众十分同情。1936年1月20日，爱德华登上王位，加冕为爱德华八世，但他决定与一名曾离过两次婚的女人辛普森夫人结合，从而引发了一场危机，最终导致他于1936年12月10日退位。此后，他与辛普森夫人婚后一直生活在法国，只担任过巴哈马总督一职。（彼得·戴维森注）

[7] 身份不明。

[8] 身份不明，可能是弗雷德里克·沃伯格，奥威尔的出版人。（彼得·戴维森注）

[9] 关于将儿童转移至加拿大一事，见1940年6月17日的日记。

[10] 身份不明。

[11] 威廉·乔伊斯（1906-1946），他本来是美国公民，但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英国度过，然而却从未取得英国国籍。此外，他还是狂热的国家主义者。后来，他成为一名法西斯分子，认为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的主张太过温和。1939年8月，乔伊斯前往德国，1940年加入德国国籍。战争初期，他一直通过广播向英国民众宣传纳粹。1946年1月3日，他被英国人绞死。

[12]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1896-1980），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的头目。

[13] 雅克·杜利奥特（1898-1945），法国政治家，曾加入共产党，后来转而支持法西斯主义，是德国资助的“法国人民党”领导人。

[14] 加斯顿·博格里（1892-1974），法国议员、知识分子，从极端右翼转变为极端左翼，在法国沦陷后与德国合作。（彼得·戴维森注）

[15] 菲利普·坎利夫-李斯特（1884-1972），1918年作为一名联合主义者（是保守党的紧密同盟）进入议会，1931年到1935年任殖民大臣，1935年到1938年任空军大臣，1940年到1942年任英国商业公司主席，1942年到1944年任驻西非内阁大臣，1944年到1945年任民航大臣。（彼得·戴维森注）

[16] 奥威尔在三十多岁的时候近乎一贫如洗，在这种情况下，被催缴所得税实在让人哭笑不得。1939年，只有20%左右的英国人会缴纳所得税。奥威尔生活窘迫，而这种情况对于当时的作家、演员以及其他一些职业很常见。或许是由于奥威尔之前（《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的版税）的高收入需要缴税才会被催收所得税。此外，艾琳的收入也计入他的收入来缴税。

[17] 这一时期，英德两国声称的击落对方飞机的数量都比实际击落的多。

[18] 此处可能指的是劳伦斯·奥桑尼斯的密友，即医疗顾问乔治·梅森。1945年，艾琳曾找他寻求医疗咨询。（彼得·戴维森注）

[19] 列夫·托洛茨基（1879-1940），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1917到1924年任外交官及战争委员，苏联红军的缔造者之一。1924年列宁去世，在随后的权力争夺中，他败给斯大林，流亡国外。由于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仍然反对斯大林，他在墨西哥被暗杀，有人认为，苏联秘密警察奥格伯乌应对他的死负责。

[20] 大卫·罗（1891-1963），左翼政治漫画家，先供职于《旗帜晚报》，后转投《曼彻斯特卫报》。（彼得·戴维斯注）

[21] 身份不明。

[22] 1940年9月英国在空袭中死亡的人数为6954人，重伤10615人。

[23] 这一地区主要是工薪阶层住宅区、购物中心及几条交通要道的汇集处。

[24] 斯蒂芬·斯彭德的公寓，《地平线》杂志的办公室，位于伦敦中西1区的兰斯顿连排公寓。

1940年10—12月

1940年10月15日

这篇是在沃林顿写的，胳膊发炎，反反复复持续了约两周。最近没什么新闻——都是国际事务，对我个人没什么影响。

沃林顿现在有11个被疏散出来的孩子（原来有12个，但有1个跑掉了只能送回家）。他们都是从东区过来的，有个斯特普尼来的小姑娘说自己的祖父家已经被炸弹炸过7次了。他们看上去都是些好孩子，很快就都安定下来了。但还是有人会抱怨，比如——某夫人就会抱怨和自己住在一起的7岁小男孩：“他就是个脏兮兮的淘气鬼，总尿床，还会弄脏裤子，要是能管得了，我肯定会好好拧他鼻子，这小鬼脏死了。”

人们对鲍多克镇犹太人的数量议论纷纷，称在地铁里避难的人大多数是犹太人，我得看看是不是真的。

今年天气比较干，可马铃薯的收成却非常好。

1940年10月19日

每天早上用去年的报纸生火时，瞥到火焰中当时还很乐观的新闻头条时，心里觉得很压抑。

1940年10月21日

看到地铁站里诸如“做个男子汉”之类的广告（要求身体健康的男人不要在那里避难，把空间留给妇女儿童），D[1]就说伦敦城里流传着一

个笑话：这些话不应该用英语写。

普利斯特利[2]周日夜间广播暗含社会主义宣传，已经停播了，这肯定是保守党的主张……看来马杰森[3]那些人有东山再起之势了。

1940年10月25日

前几天我观察了一下在法院巷站、牛津圆环站和贝克街站等地铁站避难的人，并不都是犹太人，但我觉得，和同样数量的人群相比，这里的犹太人更多。犹太人不好的一点是，他们本来就很显眼，还费尽心思张扬。我看到有个犹太女人很可怕，她从牛津圆环站拼命挤下车，用力推开挡路的人们，那行为做派和连环画中的犹太女人的形象根本毫无差别。这让我想起以前在巴黎地铁里的时光。

我很惊讶，D明明是支持左派的，可竟然也认同当下反对犹太人的态度。他说做生意的犹太人会慢慢地转而支持希特勒，或者说有这种苗头。这种说法有点儿不可思议，但D说犹太人对迫害自己的人都怀有崇拜之情。但我的确觉得所有犹太人，我是说欧洲犹太人，都更喜欢希特勒的那种社会体制，而不会喜欢英国的。英国只是他们的避难所，他们也对英国有无以复加的蔑视。就算他们没有直说，他们的眼神也已经说明了一切。事实上，岛国的观念根本无法与大陆国家的观念兼容并蓄。

F[4]说空袭时外国人比英国人更害怕。这场战争与他们无关，因此他们没什么支撑自身的东西。我想这也说明了另一个事实——尽管不能宣之于口，但我敢肯定这是事实——工人阶级要比中产阶级更害怕。

即将在法国、非洲、叙利亚和西班牙发生的事让人同样绝望。虽然能预见要发生什么，却无力阻止，而且人们也知道，英国政府根本做不到先声夺人。

空袭强度比前几天减弱了。

1940年11月16日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对炮火的声音充耳不闻，但我现在就是这样。

1940年11月23日

前天与杂志的编辑H.P[5]吃午餐，他对战争前景相当悲观，认为我们无法应对“新秩序”[6]，也就是当前政府无力应对，而且英国人和美国人很轻易就会接受这个“新秩序”。当我问人们是否知道相关的和平提议都是陷阱时，H.P说：“真该死！我能把它粉饰成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胜利，还能让人们深信不疑！”的确如此。一切都取决于以怎样的形式将其呈现给人们。只要报纸不耍花招，人们会对欧洲方面的和平提议置之不理。然而H.P确定霍尔及其同伙正在策划背叛行动。似乎H.P所在的杂志没有受到审查，但现在所有报纸都接到了警告，不得报道政府对西班牙的政策。几周前，达夫·库珀将新闻记者召集在一起，“以自己的名誉担保西班牙那边确实进行得比较顺利”。人们顶多可以说，达夫·库珀的名声比霍尔强一点儿。

H.P说，法国瓦解后，内阁曾经举行过会议，讨论是继续战争还是进行和谈。除了决定性的一票，投票结果实际上是50对50。H.P说决定性的一票来自张伯伦。果真如此，我想知道这件事是否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人们可能会说，那是可怜的老张伯伦最后一次为公共法案投票。

战争在冬天独有的声音：雨水落在钢盔上，如音符一般。

1940年11月28日

昨天和法国某报的编辑C[7]共进午餐，让我意外的是，他心情很好，毫无不满情绪。我还以为他作为一个法国难民会没完没了地抱怨食物等，然而C很了解英国，以前也曾住在这里。

他说，在法国的占领区和未占领区，法国人的抵抗行为远比英国人看到的多。然而，显然是因为我们与维希政府的联系，媒体故意淡化了这一点。他还说，法国沦陷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预料到英国会独自坚持，就连美国人也没想到。显然，他有点儿支持英国，认为君主立宪制

是英国的一大优势。因为在他看来，君主立宪制是阻止英国向法西斯主义妥协的最重要因素。他说爱德华八世之所以推诿，是因为S夫人[8]显然与纳粹分子有联系……事实上，总的来说，在英国，持反法西斯观点的人是拥护爱德华的，但显然C是在重复现在欧洲大陆流行的说法。

C曾任赖伐尔政府的新闻部长，赖伐尔在1935年曾对他说，英国“外强中干”，意大利才是真正有实力的，所以法国必须和英国断交，和意大利结盟。签订《苏法互助条约》回国之后，他说斯大林是全欧洲最有实力的人。总的来说，尽管赖伐尔很聪明，但他的预言都错了。

目击者对考文垂所受破坏的描述大相径庭。一个人可能根本没办法了解发生在远处轰炸的真实情形。在伦敦相对平静的夜晚里，我发现很多人都非常不安，仿佛是因为他们觉得工业城镇正在饱受折磨。每个人都暗暗想着：我们现在挺坚强的，别的地方的人就不一定了。

1940年12月1日

夏普那个混蛋终于死掉了。大家都很高兴，就像巴尔博死的时候一样。不管怎样，战争至少还弄死了几个法西斯分子。

1940年12月8日

前天晚上的广播说……一个波兰人，前不久刚通过某个他不愿透露的地下渠道从波兰逃出来……他说华沙被围攻时，95%的房屋受损，约25%的房屋成为废墟。包括水、电等在内的所有公共设施全部瘫痪。最后，人们对空袭失去了任何抵御能力，更糟的是对大炮也没有任何抵御能力。他说有人冲出去，从死于炮火的马身上割下一块肉，又被新一轮的炮火赶回屋里来了，但接着又冲了出去。华沙被彻底包围后，英国人会来救援的信念一直是人们的精神支柱，比如，有人说在但泽有一支英军等。

之前一星期里始终有一个传闻，说有报道称在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指挥官自杀，但现在确定这一报道其实是印刷错误。

在轰炸最猛烈之时，每个人都有点不正常，与其说是空袭造成的，倒不如说是断断续续的睡眠、通讯切断以及交通困难等引起的。我发现总会有荒谬的诗句残篇冒出来，都只是一两句，而轰炸强度减弱时，这种情况也就消失了。下面是几个例子：

一位罗马尼亚老农夫，

住在莫宁顿新月大街。

还有：

钥匙不配钟不响，

但我们都拥护上帝除了国王[9]。

以及：

社区检验员去休息了，

倚着棒子、杆子、栖木。

1940年12月29日

有家报纸这样描述空袭（无讽刺含义）：“炸弹像吗哪[10]一样从空中落下。”

---

[1] 身份不明。

[2] J.B.普利斯特利（1894-1984），多产的大众小说家、剧作家和作家。1940年到1941年，他曾做过一系列的广播谈话节目，每周播出一次，呼吁英国社会团结起来抵抗希特勒，推进英国的民主和平等。

[3] 戴维·马杰森（1890-1965），英国政治家1924年到1942年任拉格比镇保守党议员；1931年到1940年任政府首席党鞭；丘吉尔任期内，他继续出任联合政府党鞭，半年后出任陆军大臣。（彼得·戴维森注）

[4] 可能是托斯科·费维尔，奥威尔当时的工作伙伴。（彼得·戴维森注）

[5] 编辑身份和杂志名称不详。

[6] 希特勒主张的欧洲“新秩序”。

[7] 皮埃尔·科梅尔，法国记者，前外交官，法国沦陷之后来到英国。

[8] 华里丝·辛普森夫人，当时已嫁给温莎公爵。

[9] 人们对皇室遭受嘲讽这件事略感惊讶。（彼得·戴维森注）

[10] 吗哪，《圣经》故事中的一种天赐食物。（译者注）

1941年1—4月

1941年1月2日

右翼势力正全面反攻。马杰森此时进入内阁，无疑是趁机利用韦维尔在埃及取得的胜利果实。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几个月前，西迪巴拉尼的消息传来时，《地平线》发表了我就韦维尔为艾伦比所著传记的书评。我写道，由于韦维尔掌握着重要指挥权，因而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让读者了解韦维尔的能力，暗指我认为韦维尔不怎么聪明。所以，我现在成了被嘲笑的对象——但是天知道，我很高兴自己错了。[1]

现在，“闪电战”这个词被用来形容任何一次进攻，正如上次战争中的“扫射”一词。“闪电战”目前还没被用作动词，但我觉得快了。

1941年1月22日

——“人民大会”这种闹剧的危险性不容忽视，必须反击。他说，数千名头脑简单的民众被“人民大会”诱人的计划欺骗，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失败主义策略，以帮助希特勒为目的。他引用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一封信，信中说，“我希望你们明白，我全身心地希望战争胜利，我相信战争结束前，只有温斯顿·丘吉尔才能领导我们”（大意如此），可他却支持“人民大会”。似乎数千个人也同他一样。

至于——也就是说这件事，“人民大会”肯定从别处筹集了大量资金。他们的海报随处可见，《工人日报》也刊登了新海报。他们没付版面钱，但即便如此，印刷等其他工作仍是很大一笔开销。昨天，我撕下了很多这样的海报，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事，就好像夏天时，我用粉笔在墙上写下“开除张伯伦”几个大字，并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巴萨罗那被镇压后我又写下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万岁”等字样一样。平

时，我十分厌恶在墙上写字，也不喜欢干涉其他人写了什么。

洋葱短缺，每个人都对洋葱的气味相当敏感。在炖菜里加入四分之一个洋葱，就会让人觉得很呛。前几天，我亲吻艾琳时，她马上就发现我六小时前吃了洋葱这件事。

价格未受到管制的物品总会缺货，闹钟就是如此。现在最便宜的闹钟标价为15先令，德国造的这种劣质货以前只要3先令6便士。法国造的像小金属罐一样的闹钟以前要5先令，现在也卖到了18先令6便士，其他闹钟的涨价幅度也大抵如此。

《每日快报》将“闪电战”用作了动词。

早上的新闻称托布鲁克的防线被突破了[2]，《工人日报》被禁止发行[3]。虽然后者让我心存疑虑，但我很支持。

1941年1月26日

本周《新政治家》的排版如下：

托布鲁克沦陷（两万人被俘）——2行。

《工人日报》与《新闻周刊》[4]禁止发行——108行。

……所有有识之士都为这场战争的缓和感到担忧，认为新一轮的阴谋正在策划之中。但人们的乐观情绪或许会再次高涨，就算有几天没发生空袭，也绝不可掉以轻心。前几天我打电话时，无意间听到了别人的对话，最近，电话经常串线，这种事很常见。我听见两个女人在谈论“没太久就会结束了”之类的。第二天早上，我去J太太的店里，无意中说了一句战争可能还要再持续三年。J太太听了之后又惊讶又害怕：“噢，你不会真的这么想吧！噢，不可能！我们正打得他们节节败退，已经拿下了拜耳迪耶，之后就能进军意大利，然后进攻德国了，不是吗？”我认为J太太非常聪明，而且头脑冷静，但她并没意识到非洲在地中海的另一边。

1941年2月7日

人们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其实在一开始问题就已经很明显了，只不过人们最近才意识到：我们究竟是在与纳粹组织战斗还是在与德国人战斗。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英格兰究竟是否应该说明自己的战争目标，或者说明英格兰是否有战争目标。人们认为的唯一合理说法就是不赋予战争任何意义（我们的任务就是打败德国军队，这才是唯一值得讨论的战争目标），这种说法似乎注定会成为官方政策。据说，范西塔特[5]《憎恨德国》的小册子极为畅销。

法国还没有确切消息。显然，贝当将在同意拉瓦勒进入内阁这个问题上让步。之后德军会提出新的要求，比如要允许德军通过法国未占领区以及使用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基地等，而贝当再次申明“坚定的立场”后会做出更大让步。一切只取决于时间，即德军能否在意军溃败前立足非洲。也许，德军之后会将枪口对准西班牙，那时，我们会听到佛朗哥再次表明“坚定的立场”，证明英国政府之前对西班牙采取的安抚态度非常正确。最后，佛朗哥会妥协，进攻直布罗陀或允许德军从意大利借道而行。也可能在赖伐尔掌权后，会在短时间内拒绝德国更为极端的要求，从一个恶人摇身变成“立场坚定”的爱国者，就像现在的贝当。英国保守派不会理解，右翼势力自身没有政治力量，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被推翻。

1941年2月12日

本周，阿瑟·凯斯特勒[6]被征召入伍，将被分配到先遣兵部队[7]。由于他是德国人，所以不得进入其他部队。这一规定简直愚蠢至极，这个年轻人非常有才华，会多门语言，而且了解欧洲，尤其了解欧洲的政治态势，然而，他却只能砌砖头，发挥不了自己的优势。

今天，圣保罗教堂附近的大破坏让我十分害怕，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圣保罗教堂在空袭中几乎完好无损，像岩石一般屹立不倒。教堂穹顶的十字架如利剑一样直插天空，我第一次觉得教堂应该简朴一些，不该如此华丽。

说来也怪，艾恩赛德那个傻瓜居然成了“阿尔汉格尔艾恩赛德勋爵”[8]，但奇怪的是，人们对此没什么反应。这种草率之举着实令人震惊，无论一个人对苏联政权作何评价，都应该反对这样的行为。

1941年3月1日

B一家几周前刚到伦敦，还没见识过闪电战。他们说伦敦人的变化很大，都歇斯底里的，说话声比以前大了许多。果真如此，那变化肯定经过了一段时间，而且伦敦人自己察觉不到，就像孩子的成长也是不知不觉的过程。空袭发生后，我注意到的惟一明显的变化是人们更愿意与街上的陌生人交谈了……地铁站里没什么异味，新装的金属床非常舒适[9]，每个人的床铺都干净整洁，大家似乎对各方面都很满意——但正是这种现象让我不安。几个月来，这些人每天晚上都在地下过着非人般的生活，但近几周，伦敦上空根本没有战斗机飞过。孩子们竟然认为待在地铁站里是理所应当的，着实太令人诧异，他们甚至饶有兴致地搭乘地铁环线。前不久，D.J[10]从切尔滕纳姆来伦敦，看到火车上有个年轻女子和她刚刚接回来的两个孩子，之前，这两个孩子曾被转移到了西部某地。火车快到伦敦时，空袭开始了，结果在之后的路上，那位年轻女子一直哭个不停。她决定回来是因为当时伦敦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发生空袭，她断定伦敦“已经安全了”。别人会怎么看待他们的精神状态呢？

1941年3月3日

昨晚和格温一起去看了格林尼治教堂地下室的避难所。床铺是普通木头和帆布做的，很脏（天气暖和后肯定会有很多虱子），屋子光线不好而且臭气熏天，但昨天晚上住宿的人不是很多。地下室不过是一条连接几个墓穴的走廊，墓穴上刻着埋葬者的名字，最年轻的逝世于1800年……格温和其他人坚持认为我还没见识到地下室最糟的一面，据说，晚上人满为患时（约250人），那里的恶臭让人几乎无法忍受。尽管没人认同我的看法，但我坚持认为，与其让孩子们在满是尸体的地穴里面玩耍，还不如让他们忍受活人的臭味。

1941年3月4日

今天待在沃林顿。番红花四处盛开，几株桂竹香刚刚发芽，雪花莲开得正好。几对野兔坐在冬小麦丛中，彼此对望。战争过程中，每隔几个月，人们就将鼻子探出水面一会儿，发现地球还是围着太阳转的。

1941年3月14日

过去几天里，谣言满天飞，报纸上也有所暗示。据说，巴尔干半岛“将有大事发生”，也就是说我们要派远征军到希腊去。果真如此，那肯定是要派遣利比亚的部队，或者是派其中一部分过去。[11]一个月前，我听说梅塔克萨斯[12]临死前要求我们增援10个师，但我们只派了4个师，派遣任何部队到海峡以西的地方都极其危险。要对行动做出有效的策略判断，就必须知道韦维尔往利比亚派了多少兵，还要知道需要多少士兵驻守利比亚、航运状况如何、保加利亚与希腊的通讯是否畅通、德军是否将机械武器运出欧洲以及目前谁真正控制西西里岛与的黎波里间的海域。如果我们的主力部队被困在萨洛尼卡，而德军成功地从西西里岛渡海并夺回意军失去的所有阵地，那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这件事让人进退两难，何况派遣部队到希腊要冒很大风险，而且只有一点好处：一旦土耳其参战，我们的舰队就可以进入黑海。但如果我们不派遣部队，那便是彻底宣告我们不能也不愿意帮助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保持独立。我最担心的是，我们不是真心实意地想伸出援手，最后会像挪威那样落得一无所有。我赞成冒着失败的风险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我认为纯粹的军事意义上说的失败或胜利，都不如我们宣告自己扶弱惩强更重要。

问题是，欧洲人的想法越来越难理解了，他们似乎也理解不了我们。我和几个德国人交谈过，他们认为，我们在战争初期没有立即轰炸柏林而是散发愚蠢的传单，绝对是个让人惊诧的错误。但我认为，所有的英国人都支持这一举动（就算我们当时都知道，传单上写的都是无稽之谈）。我们认为，这种举动表明了一点，即我们与德国普通老百姓无冤无仇。另一方面，哈夫纳[13]在刚刚出版的书中表示，让爱尔兰人控制至关重要的军事基地是非常愚蠢的行为，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占领那里。他还说，允许爱尔兰这样伪独立的国家藐视英国，只会让英国受到

所有欧洲人的嘲笑。这就是欧洲人的观点，他们不理解讲英语的民族。实际上，如果我们事先没有做长期宣传，而是直接以武力占领爱尔兰军事基地，那么，不只给美国，也会给英国的民意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官方就埃塞俄比亚一事发表了声明，我很不赞同其基调。他们含糊其辞，说皇帝复位后，要安排一名英国“驻扎官员”，就像在印度王公宫殿里做的那样。如果我们这么做，无疑是授人以柄，承认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进攻埃塞俄比亚，而后果难以预料。如果能在短时间内赶走意军，我们或许有机会摆出最强硬的姿态，毫无争议地向大家证明，打仗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影响将波及全世界。但他们有胆量或责任心这么做吗？我不确定。我能预见到他们为了将埃塞俄比亚据为己有而提出华而不实的理由，也能想到那些有关于奴隶制度的废话等。

前几天夜里，多架德军飞机被击落，或许是因为那几夜天气晴朗，对战斗机有利，但人们兴致勃勃地说我们正在使用“秘密武器”。最流行的说法是，这种秘密武器是用金属丝制成的网，射到天上可以缠住飞机。

1941年3月20日

昨晚空袭声势浩大，但仅有一架飞机被击落，所以关于“秘密武器”的传言不过都是空穴来风。

格林尼治发生多起爆炸事件，我给艾琳打电话时，有颗炸弹爆炸了，谈话戛然而止，我耳中传来了“咚咚”的响声：

“刚才是什么声音？”

“没什么，是玻璃被炸碎了。”

炸弹在房子对面的公园里爆炸了，碎片割断了拴着气球的绳子，伤到了一个操作员和一位地方军人。格林尼治的教堂因此起火，大家顾不上水火混乱的场景，都躲在地下室里，直到守门人喊大家出去。

德国往丹吉尔派驻了领事（这是自1914年起的第一次），应该是考虑到了美国人的立场，我们同意将更多食物运送至法国。即使设立某种

中立机构调度此事，对法国依然没什么好处。德国允许他们留下小麦等食物，之后再又从别的地方克扣相应数量的食物。我们准备好让运送食物的船只进入法国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国政府是要敲诈法国——比如，驱逐在北非的德国间谍等。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等到法国饿到奄奄一息且贝当政府摇摇欲坠时再送去大批食物，同时作为交换条件，要让法国政府做出实质性让步，比如交出法国舰队中的某些重要舰船等。当然，目前看来，上述策略简直不可思议。真想知道他们那些同类到底是叛徒还是傻瓜。

重新翻看这本日记，我发现自己写日记的间隔时间变长了，而且并不像刚开始时那样关注公共事件了。无助感在每个人心里蔓延。人们发现，只有新的灾难发生时，公共舆论导向才会转移，但是我们已经经受不起新的灾难了，也无法想象新灾难的发生。最坏的情况是，我们即将面临的灾难是饥荒，而英国人民对此毫无经验。很快新的问题就会产生：到底是进口食物还是武器。如果最糟的时期在夏天就太幸运了，但如果人们看不到战争的目的，富人们依旧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的话，就只能用武力解决了，否则人们很难面对饥荒。如果我们是为了击退入侵的敌人，那么，有无战争目的就无关紧要，因为对英国人民来说，把侵略者赶出英国就够了。但是怎么能为了建造用于北非战争的坦克，而让孩子们挨饿？况且，目前在北非或欧洲进行的战争，到底与保卫英国有什么关系？人们对此也毫不知情。

伦敦南部的一堵墙上，某个共产党或黑衣党员用粉笔写下“我们要奶酪，不要丘吉尔”的字样。多愚蠢的口号啊，完全反映了这些人的无知心理。他们根本不明白：有人愿意为了丘吉尔死，但没有人愿意为了奶酪死。

1941年3月23日

昨天参加了地方军在教堂举办的游行，多少有点儿强迫的性质，还参加了全国祈祷日的祈祷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还有后备消防员、空军学员以及妇女空军后备军等。整场活动表现出来的沙文主义让我诧异不已。教堂宽容战争的行为并没有让我惊讶，虽然他们自诩是最忠诚的信徒，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接受政府就意味着接受战争，接受战争就意味着多数情况下会希望有一方获胜。至于主教祝福军团等行为，倒没有

让我有丝毫厌恶感。所有厌战的情绪都建立在感伤主义的基础上，认为战争与爱你的敌人背道而驰。然而，事实是，只有你愿意在某种情况下干掉敌人时，才可能爱你的敌人。但这种祝福仪式令人反胃的一点在于，它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当然，只有当我们比德国人好时，上帝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祷告仪式上，人们祈求上帝“让我们的敌人回心转意，帮助我们宽恕他们。让他们对自己的罪行产生悔改之心，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然而，却没有任何关于让敌人宽恕我们的内容。在我看来，基督徒认为，我们比德国人好不到哪儿去，我们都是可怜的罪人，但我方胜利才更圆满。所以，如此祈求上帝也无伤大雅……我想，如果我方人民知道敌人这样做有自己的理由，那势必会影响我方士气，但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毫无依据。但也许他们并没考虑到参加仪式的人们的心情，只是为了从这场全国范围内的祈祷中得到更直观的结果，即某种射向天使的弹幕。

1941年3月24日

之前有关德军重型巡洋舰在大西洋出现的传言显然是假的，不过是为了把英国主力舰引开罢了。[14]这可能是入侵的前奏。人们对于入侵的设想热潮已逐渐消退，大家普遍认为，希特勒无法将足够兵力送过海峡，除非他能在入侵之前大幅削弱英国的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否则无法占领英国。我想这大概是对的，所以希特勒在征服其他国家前不会入侵英国，毕竟入侵行动看起来本就是一场败局，需要其他方面的胜利弥补。但我认为，就算入侵失败，只要给英国造成了十万到五十万的兵力损失，也就算德国获得了胜利，因为英国的工业系统和食品供应链就会瘫痪。如果希特勒能让数千人的部队进入英国境内，并且坚持短短三周时间，就能沉重打击英国，造成的损失会比上千次空袭还严重。但这种行动不会立竿见影，所以只有在形势相当有利的情况下，希特勒才会如此。

显然，地方军的装备严重短缺，武器极度匮乏。此外，据说我们在北非缴获了数量巨大的战利品，政府不得不派专家过去专门清点。随后，政府会根据缴获的武器绘制图纸，进行大批量生产，而这些战利品也足以被当成一个全新武器库的核心了。

1941年4月7日

昨天贝尔格莱德遭到轰炸，今天早上，官方第一时间宣布，一支有约15万士兵的英国军队已抵达希腊。如此，关于英国驻扎在利比亚军队的去向终于有了解释，尽管这个疑问在英军撤离班加西时就已非常清楚了。目前尚不明确的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条约是否有任何意义，但要说这不会导致苏联和德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就很难让人相信了。从苏联对于埃塞俄比亚皇帝复辟一事的态度，人们就可以一窥苏德关系，比如，苏联政府是否认可这位皇帝，是否会派出大使。

……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愈发明显了，纺织品和家具的价格一直疯涨……在多年经济萧条后，二手家具交易行业再次繁荣……显然，政府打算用征兵来肃清不良分子。记者的服兵役年龄限制提高到了41岁——这样，顶多能多招几百个人，但如有需要，可以随时派他们去应对个人事件。十个月前，我因为健康状况被军队拒之门外，但如果他们突然发现我身体强壮到足以成为先锋军团的一名二等兵，该多有意思啊。

我一直在想我们在希腊的军队，万一军队被敌方赶到大海里就危险了。你很难想象，利德尔·哈特这样的战略家为此次鲁莽的行动花了多少心思。但如果着眼于将来的两三年，这在政治上绝对是正确的。顶多只能说，从狭义的战略角度看，有一定的成功可能性，不然将军们就不会参与了。希特勒选择的进攻时间显然晚了一个月。埃塞俄比亚无论如何也保不住了，他也没预料到意大利海军会遭受灾难性的损失。而且，如果巴尔干半岛的战事持续三个月，秋天时，德军就会开始缺粮。

1941年4月8日

刚读完了《不列颠之战》，这是英国新闻部的畅销书（这本书卖得太好，竟然一时脱销）。据说，这本书是由恐怖小说家佛朗西斯·贝丁编译的。我想内容不会太差，但得知它被译成多种文字，由全世界的人民阅读时，我认为这作为有史以来第一部记录大型空战的英文书籍，作者在写书时没有注意避免宣传语调，真是太遗憾了。这本书充满了“英雄主义”“辉煌的战绩”等说辞，但对德国人的描写多少有些轻视的意味。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冷静客观的文字来描述事实？毕竟，事实已经足以令人着迷了。他们丧失了一个鼓舞英军士气的大好机会，这是一个可

以在全世界建立标准化权威事实的机会，甚至可以用来驳斥德国人的谎言。

但当我阅读《不列颠之战》时，我也拿着日记对照着日期看，发现有些“史诗性的大事件”在当时并没那么重要。事实上，德国突破防线、轰炸码头那天发生的事，我记得一清二楚（我记得是1940年9月7日），但那大多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那天，我先乘公交车去康诺利家喝茶，坐在我前面的两个女人坚持认为，天空中爆炸的炮弹是降落伞，我一直强忍着没纠正她们。后来，我在皮卡迪利大街的一个店铺里躲避炸弹碎片，就像平时躲雨一样。接着，一连串的德国飞机从我头顶飞过，一些年轻的皇家军官和海军军官从酒店里跑了出来，踩过街道两旁的玻璃碎片。之后，我坐在康诺利的顶层公寓里，看着圣保罗教堂燃起熊熊大火，河里的油桶也被弹片击中，烟雾漫天。休·斯莱特坐在窗前说道：“就像马德里一样——太令人怀念了。”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康诺利，他带着我们爬上屋顶，凝视了好一会儿那窜天大火，接着说：“资本主义要灭亡了。这是神对我们的审判。”我不这么认为，但确实被火焰之美震撼到了。那天晚上，我夜不能寐，甚至还走到街上去看是否仍有火光——大火照亮了天空，甚至城里的西北部也是如此——但我并不认为这一切有任何历史意义。事后，德国放弃用空袭征服英国的计划后，我对法伊佛尔说：“这是特拉法加。现在又是奥斯特里兹了。”[15]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类比手法。

《新闻纪事》又是一种失败主义论调，强烈抗议我们放弃贝尔格莱德，言语之下不过是说我们应该在战争形势大好的时候直抵的黎波里，而不是把军队调往希腊。而对于那一拨人来说，如果我们当时直接占领了意大利而放弃希腊，他们也会扯着嗓子尖声反对。

1941年4月9日

政府的预算几乎超越巴尔干战事成为新闻热点。街头巷尾议论的都是预算案，而不是巴尔干战事。[16]

晚上的新闻好像很糟。希腊指挥部声称塞尔维亚部队已经撤退，并暴露了自己的左翼部队。这件事的重要性在于，政府通常不会用这种方式发布此类消息——塞尔维亚抛弃了希腊军队——除非政府认为事情的

走向确实太惨不忍睹。

地方军现在有了汤米冲锋枪，每个队伍配备两支枪。似乎距离我们配备猎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好久——当时可没有猎枪——而且当我问到是否会配备枪械时，大家都在嘲笑我的傻。

1941年4月11日

昨天的报纸报道说，英国打算借给西班牙250万英镑——我认为这是给予西班牙占领丹吉尔的回报。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整场战争中，每当我们身陷艰难险境时，就不得不向那些集权主义的小国家做出让步。

1941年4月12日

现在，大家都认为，德国的全部军队或部分军队一定是乘坐法国的船只，经由法属非洲到达利比亚的。当然，报纸上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解释。也许报社接到指令，要求撤掉所有指控法国维希政府的消息。

前天，我在一家鱼店里看到了待售的淡水鱼（鲈鱼）。而一年前的英国人，尤其是城里人，是绝对不会吃这种东西。

1941年4月13日

没有希腊或利比亚的消息……今天拿到了两份报纸，《周日画报》满是阴郁的失败主义论调，《周日快报》也好不到哪儿去。昨天的《标准晚报》上有篇“我们的军事记者”写的文章，语调极其悲愤。这一切都意味着媒体肯定得到了什么糟糕的消息却不能公布。天知道这一切到底有多糟糕。唯一令人慰藉的是，所有军事专家都认为我们对希腊的军事干预是灾难性的，可军事专家永远是错的。

近东的战事有了结果，局势稳定后，我就不再写这本日记了。它记

叙了1940年到1941年的春季动员。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我们会迎来全新的军事和政治局势。这本日记前六个月的内容记录了法国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准备阶段的事情。现在，我们明显又要面对另一阶段的灾难，但性质截然不同，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比较难理解，而且不一定会有相应的政治性改良。回头看看这本日记的前半部分，我发现我的政治预测都是错误的，但我预料的革命性变化正缓慢发生着。我曾写道，所有的墙面广告会在一年内全部消失。当然，广告并没有消失——令人讨厌的费曼咳嗽糖浆广告依旧贴满了大街小巷，还有沃辛顿“一个顶俩”的广告，以及“所有的宝妈都在用宝莹”的洗衣粉广告都在——但广告的数量减少了许多，政府的宣传海报变多了。康诺利曾说知识分子能看到事情发展的走向，却错误地预测了它们的发展节奏，实在太对了。[17]

周六我去军队的第38团报道，发现同伴们竟都身材矮小。当你看到这样一群按照生日挑选出来的人时，肯定会为工人阶级的老化程度而震惊。然而，他们的寿命并不比中产阶级的短，只是少活几年罢了。但他们的中年时期实在太长，他们从30到60岁都属于中年人。

1941年4月14日

今天的新闻简直震慑人心。尽管开罗予以否认，但德军已经到了埃及边境，而托布鲁克英军的退路也被切断了[18]。人们在两件事上意见不一：一是德军在利比亚是否拥有压倒性力量的军队；二是德军是否仅有一支小分队，而我们几乎没有兵力——大部分军队和战车在占领班加西后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前线。在我看来，后者的意见比较可信，很可能我们派往希腊的士兵们都是欧洲人，而大多数驻扎在埃及的部队都是由印度人和黑人组成的。D根据自己对南非战况的了解，认为军队从班加西撤退后很可能不是去了希腊，而是被派往埃塞俄比亚收尾。此行的动机纯粹是政治性的，就是为了给南非人民带去胜利，好安抚他们，因为他们多少对我们有些敌意。如果我们能坚守埃及，那么，这整件事就有了价值和意义，因为我们可以借此开辟红海的海上通道，为美国商船打开航道。但这样就得靠法属西非港口，而我们本该在一年前不费吹灰之力拿下的。

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政府公布的条款模棱两可。但条约里也许包含了苏联同意放弃中国的秘密条款，当然放弃的方式应该是

分步进行，不露痕迹的，就像当年放弃西班牙一样。不然，很难想象这种条约有什么意义。

希腊没有实质性消息。关于英国装甲车吓倒一批德国人的故事已经流传了三天。

1941年4月15日

昨晚我去酒吧听了9点的晚间新闻，不过晚到了几分钟，于是我就问女老板有没有什么新闻。“噢，我们从来不开收音机。你看，根本没人听。另外一家酒吧雇了人弹钢琴，他们也不愿意为了听新闻就把钢琴停掉。”而就在此刻，苏伊士运河正处在生死关头，就像是敦克尔战役最糟糕的时刻。在我的强烈要求下，酒吧女招待才打开收音机。还有，1936年德军重新占领莱茵区时，我正在巴恩斯利。刚得知此消息时，我走进一家酒吧，随口谈论了几句“德国军队已经越过了莱茵河”之类的。有人仿佛想起了什么，嘟囔着“Parley-voo”[19]。此外，就没有别人回应我了。1931年至今，每个危险时刻大家的反应都是如此。就像一直踢一面用愚蠢方式砌成的墙，却根本无法穿透。当然他们这种愚蠢有时还会带来好处。其他欧洲国家若身处我们现在的处境，早就高声喊叫求和了。

1941年4月17日

昨晚的空袭损失严重，应该是近几个月来最严重的一次，至少伦敦如此。有一枚炸弹落在伦敦劳德板球场（当时学生们正如往常一样在球场运动，离弹坑只有几码远），另一枚落在了圣约翰伍德墓区。炸弹没落在墓区，这是我一直害怕的事。今天早晨，我经过汉普斯特德的一条小巷，巷子里有栋房子被完全炸成了破砖碎瓦——这样的场景太常见了，几乎没什么人留意。当然这条小巷被封锁了，挖掘队正在工作，旁边等着几辆救护车。在那堆房屋碎片之下一定有断肢残体，也许会有幸存者吧。

几乎整整一晚，炮声都轰隆不停。今天我发现大家昨晚都没睡着，

艾琳也这么说。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整晚都没有合眼。”我觉得这都是胡说。当然，这样的喧嚣很难让人入睡，但是艾琳和我一定睡了大半个晚上。

1941年4月22日

在沃林顿待了两三天。周六晚上也能听到离这里45英里的空袭声。

我在沃林顿种了40到50磅马铃薯种子，可能会收获200到600磅马铃薯，剩下的就看天气了。如果到了秋天，我种的这些马铃薯比我写的文章和做的广播都更有收获，那就让人哭笑不得了——我不希望结果如此，但十有八九会是这样。

希腊—英国防线似乎南移了，紧靠约阿尼纳，距雅典娜北边不远。如果报道属实，那他们应该在损失不大的情况下顺利穿过了塞萨利平原。一件困扰所有人的事就是报道消息的虚假性，这也在澳大利亚掀起了轩然大波。丘吉尔在演讲中说，即使是政府也很难获得希腊方面的确切消息。最困扰我的就是政府反复强调我们给了德国重重一击，德军源源不断，但被我们大批大批地扫荡干净。这正像我们对之前在法国战役中的说辞一样。显然，西班牙即将袭击直布罗陀海峡，或者进行对其不利的举动。丘吉尔演讲越来越像张伯伦了——总在回避问题。

几天前，英国军队进驻伊拉克。目前还没有消息表明他们正在执行分内的任务，比如消灭德国间谍之类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在说：“就算希特勒拿下摩苏尔也没什么用。英国军队肯定会提前把那儿的水井炸毁。”我不禁想，是这样吗？之前有机会时，他们真的把罗马尼亚的水井炸了吗？这场战争中最令人气愤的不是我们注定要承受这些苦难，而是知道我们的领导人是个懦夫……仿佛你的生命取决于一场棋局的胜负，而你只能端坐着，看着别人帮你做出愚蠢的决定，一步步走下去，你却无力阻止。

1941年4月23日

希腊军队似乎准备撤退了。显然澳大利亚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20]。只要这件事能引起对希腊军队的调查，同时引发大规模争论，从而改写澳大利亚在各个帝国之间的地位，说不定就会使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朝着民主化发展，那这一切就是有意义的。

1941年4月24日

希腊方面还没有确切消息。唯一的消息是希腊军队已经投降，可能是一支军队，可能是部分军队，也可能是整支部队。不知道希腊有多少英军，也不清楚在希腊的英军境况如何，是否能顶住。《每日快报》的消息表明，我们在希腊没有机会。显然，意大利起草的停战协议的意图是把希腊战俘当成人质，威胁英国放弃克里特岛及其他岛屿。

苏联的态度尚不明朗。德军已经逼近达达尼尔海峡，进攻土耳其势在必行。那时，苏联人就不得不做出决定了，得明确是与德国为敌，向土耳其施压，使之不得抵抗，从而坐收伊朗；还是隔岸观火，看着整个黑海南岸落入德军之手。我认为苏联会选择后者，也可能会另有选择。但无论如何，他们肯定会鼓吹自己是仁义之师。

1941年4月25日

C是我所在的地方军里的一员，是做家禽生意的，目前做各种肉类买卖。昨天他从动物园里买了20头斑马，大概是给狗吃的，人肯定不吃[21]，看起来挺浪费的。据说，英国有2000匹赛马，每匹赛马每天要吃10到15磅食物。这群畜生每天竟然要吃掉一个师的面包供应量。

1941年4月28日

从语言的角度看，丘吉尔昨晚的演讲非常成功，却没什么实质内容。从中我能得到的唯一准确的信息是，韦维尔将军在利比亚作战时，从未集结超过2个师3万人的兵力。我是在地方军岗亭听的演讲，在场的

所有人都深受感动。但我想到的是，这群人中，只有两个人的收入每周不到5英镑。丘吉尔的口才令人钦佩，他演讲的方式很传统，但我不喜欢他的演讲风格。演讲中他不能说，或者不想说，抑或不允许说任何实质性的信息，真是太可惜。

---

[1] 奥威尔的书评发表于1940年12月。1940年12月9日韦维尔将军的部队在西迪巴拉尼突破了由格拉齐亚尼指挥的意军防线。

[2] 1941年1月22日，英国控制了托布鲁克。1942年6月21日，隆美尔将军指挥德军夺回了托布鲁克。

[3] 禁止发行的时间为1941年1月22日至1942年9月6日。

[4] 由克劳德·柯博恩主编的共产党时事期刊，主要面向私人订阅者发行。

[5] 罗伯特·范西塔特（1881-1957），外交家、作家，1930年到1938年担任外交事务常务副大臣，1938年到1941年担任外交大臣首席外交顾问。他对德国和德国人的批评直接坦白，因而在战前及战争初期十分出名。这里提到的小册子指的是《黑色记录：过去与现在的德国人》。（彼得·戴维森注）

[6] 阿瑟·凯斯特勒（1905-1983），生于布达佩斯，小说家、散文家。

[7] 先遣兵部队相当于美国的海军工程营。当局认为，一些士兵的政治背景很不可靠——这些士兵的大部分是来自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犹太难民。

[8] 威廉·埃德蒙·艾恩赛德（1880-1959），大英帝国陆军元帅，1918年任同盟军指挥官，被派往阿尔汉格尔与布尔什维克部队作战。1939年到1940年任帝国总参谋长，1940年5月至6月担任国防军司令。

[9] 政府安装了许多金属铺位，因此，避难的人们就可以相对安全舒适地在地铁站（躲避空袭的避难所）过夜了。

[10] 丹泽尔·雅各布，奥威尔本土防御志愿者所在区的成员之一。他当时刚从切尔滕那姆查账回来。（彼得·戴维森注）

[11] 1941年2月12日，丘吉尔在同一封电报中祝贺韦维尔将军攻占班加西，并命令他派最少的部队驻守昔兰尼加，再尽可能派遣部队前往希腊。结果证明奥威尔最大的担忧是真的。

[12] 扬尼斯·梅塔克萨斯（1871-1941），将军、政治家，1935年起任希腊首相，尽管他坚决支持君主制，但却建立了某种形式的独裁制。1940年，意军入侵时，他成功地进行了抵抗，但拒绝了英国提供的坦克和炮兵部队，因为他预见到丘吉尔能提供的帮助有限，接受英国的援助只会引来德国的入侵。1940年3月7日，英国远征军抵达比雷埃夫斯，德军于4月6日入侵希腊，并在4月28日攻占希腊。

[13] 赛巴斯提安·哈夫纳（1907-1999），德国记者及作家，1938年离开德国抵达英国。他不是犹太人，但他的太太是，而且他本人坚决反对纳粹。

[14] 根据史实，此消息属实。

[15] 纳尔逊海军上将在特拉法加海战中战胜了法国舰队，但拿破仑当年晚些时候取得了奥斯特里茨战事的胜利，击败了俄奥联军，迫使奥地利退出战争。奥威尔要表达的是，希特勒虽然在伦敦之战中败下阵来，但他也许会在其他战役中夺取胜利。

[16] 预算案将所得税的基本税率提高到每英镑10先令（50%）。

[17] 康诺利不仅说过这种话，还写了下来：“知识分子的判断失误点在于，他们能够准确预测到事情的走向，却看不到事情发展的节奏。”（1940年9月康诺利发表在《地平线》上的评论）

[18] 隆美尔将军的军队于1941年4月12日包围了托布鲁克。英军被迅速赶出了昔兰尼加（由于英军派了一部分兵力去希腊，所以兵力大大减弱）。然而，托布鲁克的军队一直顽强坚守，直到1941年12月4日被解救为止。

[19] 一战时的歌曲《阿尔芒地耶尔来的少女》中的副歌部分。

[20]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直担心，自己的军队会在战争中无故牺牲。

[21] 伦敦动物园之所以出售动物，是因为没有足够食物喂饱它们。

1941年5—8月

1941年5月2日

有人昨天早晨给我们的扶手椅缝制了一个椅套。他一副普通的布商模样，身材矮小，穿戴整洁，举手投足有点娘，身上有一套套别针。他说这是他今天接到的唯一一个私活儿。基本上他所有的时间都得为枪炮缝制罩布，似乎和缝制椅套差不多的套路——他说他基本上就靠这些大活儿维持生活。

1941年5月3日

从希腊撤离出来的兵力有41000到43000人，但有关部门声称我们在当地的人数比估计的要少，约55000人。伤亡人数估计有3000人，有七八千人被俘，这与德军给出的数字相符。据说我们损失了8000战车，我猜各种车型都应该包括在内了。当局没提到战舰的损失程度，但肯定有损失。一位名叫斯彭德[1]的澳大利亚部长公开声称“用步枪对于坦克就像弓和箭一样毫无用处”。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进步。

显然，伊拉克进入了战备状态。就算情况再乐观，这也会是一场灾难。我们很可能不会与所谓的伊拉克军队交战，当然，如果开战，我们能轻而易举地取胜。要么我们会和伊拉克签订某种协议，协议中我们同意放弃在伊拉克的一切，这样一来，之前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又会重演。或者，伊拉克政府会声称已经夺回石油掌控权，但这不是重点，因为伊拉克政府表明，会给予我们一切必要的设施支持。然后，德国政府已经派专家组乘坐飞机经由土耳其抵达了伊拉克的消息会传出。最后，我们才会进入防御状态，直到德国空运来大批士兵，那时，我们就不得不处于被动了。无论你如何思忖英国政府的政策，这一切自从1931年来就真实地上演着，就像你努力地踩油门，可汽车偏偏有个油缸坏掉了一样——这是一种致命的无力感。人们事先不知道政府到底要做什么，但

我们心里清楚政府不会成功，甚至可能无所作为，而知道时却已经晚了。如果仅考虑战争问题，我们心里还有点底气，但如果涉及战略和外交，就会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人们早已明白，保守党统治下的英国政府必然失败，因为政府根本就没有成功的信念。英国政府对攻击中立国有所顾忌——这就是目前战争时期我们和德国的主要战略差别——这正暗示了英国政府潜意识里想要失败的念头。人们为信仰而战时，他们便无所顾忌。

1941年5月6日

土耳其提议就伊拉克问题进行和解，这也许不是好兆头。现在伊朗开始进行战争动员。美国停止向苏联运送战争物资，这件事本身可能是好事，但可能又是个坏兆头。

夜晚的地铁站令人十分震惊。最惊人的是，现在的地铁站干净整洁，井井有条，空气也算新鲜。尤其是那些年轻夫妇，他们看起来就像那种从建房互助协会买家具的谨慎夫妇一样，盖着粉色的床单紧紧相拥。由父母带着好几个孩子的大家庭随处可见，他们并排躺在一起，就像砧板上的兔子。明亮的灯光下，他们已安然入睡。孩子们都仰面躺着，进入了梦乡，小脸就像蜡人的一样粉扑扑的。

1941年5月11日

过去几天，最重要的新闻被埋没在报纸的副刊里——苏联宣称，他们不再承认挪威政府和比利时政府。昨天的报纸说苏联对南斯拉夫也持相同态度。这是斯大林任总理以来的第一个外交举动，无异于苏联已经默许了德国的一切侵略行动。德国一定给苏联施加了巨大压力，莫洛托夫的离职[2]也表明苏联政策正逐步倾向德国，当然这需要斯大林的个人权力才能实现。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对土耳其和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了。

昨晚有一场猛烈空袭。这还是多年来，我的房子第一次在空袭中受损。凌晨2点左右，在往常的枪炮声和远处的炸弹声中，一声巨大的爆

炸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但窗户都没被炸裂，房子晃动得也不算厉害。艾琳起来走到床边看，她听到有人大喊自己的房子被炸了。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走廊里，闻到了浓浓的烟雾味和橡胶烧焦的味道。我们走上屋顶，看到了漫天的火光。几英里远的西边有冲天的火焰，一定是装满了易燃物品的仓库被点燃了。浓浓的烟雾漫过屋顶，但我们最终确定这条街并不是轰炸的目标。我们下了楼，又有人说被袭击的就是我们这条街，但大家都得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这时，浓烟滚滚，过道里根本什么都看不清。这时我们听到有人大喊：“对！是！111房间里还有人。”守门人嚷嚷着让我们都出去。我们披上外套，抓起几件东西就冲了出去，边跑边想着房子可能已经着火，我们也许就回不去了。这种时候，大家都拿上了对自己很重要的东西，我后来发现自己拿的竟不是打印机或者文件，而是枪和一袋子装好的食物。事实上，是有颗炸弹点燃了车库，停在里面的车辆都被烧毁了。我和艾琳去了D家，他们端来了茶水，还让我们吃了一条存了好几个月的巧克力。后来，我告诉艾琳，她的脸被烟雾熏得黑黢黢的，于是她说：“难道你不是吗？”我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的脸也是。之前我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

1941年5月13日

我根本不知道海斯的叛逃所为何事，这真是个谜。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如果这件事可以用来宣传的话，英国政府定会好好利用。

1941年5月18日

伊拉克、叙利亚、摩洛哥、西班牙，达尔朗、斯大林、拉希德·阿里还有佛朗哥——一听到就给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英国政府一有机会就犯错，这肯定是自然而然的事。

昨天还是前天的报纸布告上写着“纳粹使用叙利亚空军基地”，报道称，议会宣布这一消息时，有议员们大喊“耻辱啊”。显然，停战协议被破坏，法国殖民地被纳粹征用时，竟然还会有人对此感到震惊。但就连我这个局外人在法国退出战争时，就早已预见了这一天的到来。

显然，我们已经无法以体面的方式赢得战争。丘吉尔及其支持者已经打算放弃一切，用美国飞机和军人的鲜血再赢回所有。他们不会成功。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整个世界都会站起来反对，美国也是。用不了两年，我们要么会被征服，要么就会变成社会主义共和国，挣扎在生命线上，还有一支秘密的警察部队维持社会治安，但同时有一半人都在挨饿。至于英国的统治阶级，如果他们没能借机成功占领达喀尔、加纳利群岛、丹吉尔和叙利亚，肯定会后悔不已。

1941年5月21日

克里特岛备受世界“瞩目”。大家谈论的事情都一样——这说明入侵英国的可能性。也许会这样，但我们必须知道有关事实，比如在克里特岛有多少兵力、军队的武器配备如何等。如果我们只有一两万人，那么，德国的步兵团即使没办法使用登陆坦克，也会以数量上的优势压倒我们。总而言之，对德国来说，他们在克里特岛面临的形势远远好于他们即将在英国面临的形势。那么，如果德国对克里特岛的进攻只是一次演习，那很有可能是在为进攻直布罗陀海峡做准备。

1941年5月24日

克里特岛传来的消息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在平静的表面下却透露出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叙利亚和伊拉克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简直糟糕透了。达兰宣称自己不会交出法国舰队。不用说，他明显是在撒谎，就凭这点德国人还得多揍他几拳。

1941年5月25日

我私下听人说，我们在克里特岛之战中已经损失了三艘巡洋舰。报纸上给出的理由一律是没有空中掩护。关于我们为什么没能破坏克里特岛上的登陆点，导致德军成功运输部队去岛上，政府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也没解释为什么我们没有把岛上的居民武装起来，但一切都太迟

了。

1941年5月31日

我对埃塞俄比亚战事的结局深感不满。今天，我在新闻里看到，南非部队已经进军亚的斯亚贝巴。他们在皇宫前（或者其他建筑物前）先升起了美国国旗，之后才升起了埃塞俄比亚国旗。

1941年6月1日

英军正在从克里特岛撤退。政府说目前撤退人数为13000人，但没说总人数。如果英军全部撤离克里特岛，留下希腊军队独自作战，那可能会给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但单从军事角度来说，这是正确的军事策略。

英军目前进入了巴格达。要是他们能挺进大马士革就更好了。大家都知道，我们不会对伊拉克开出特别苛刻的条件，比如绝不会以停战协议作为条件，夺取伊拉克的油井。过去几天的新闻里，完全没有提到海斯。政府对于海斯现身议会的说法含糊其辞，否认汉密顿公爵曾收到海斯的信，并宣告英国新闻部之所以这样报道是因为收到了“假消息”，但整个下议院并没人说出到底是谁向新闻部泄露了这条消息，也没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做。这一切真是太丢脸了，我真想看看英国议会的议事录里到底是如何记载的，看看新闻报道里的内容是否审查过。

刚刚响起了防空警报，这是过去三周里的第一次。

1941年6月3日

现在克里特岛的撤退任务已经完成，大约有20000名士兵撤离。显然，新闻报道之前就已报道了此事，那些被击沉的舰船一定是在撤离过程中损失的。总损失包括10000名士兵、7艘舰船（3艘巡洋舰，4艘驱逐

舰），也许还有一些商船、多架防空炮、坦克和飞机等。这一切都白白损失了。报纸上的批评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猛烈。一家澳大利亚报纸公开声称，除非我们对叙利亚采取行动，否则防守塞浦路斯就没有任何意义。显然，目前英军未打算要这样做。今早的报道称，德军的装甲部队已经在拉塔基亚[3]降落。随之而来的模糊暗示是，英军也许已经入侵叙利亚。如果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不采取行动，以后就来不及了。

1941年6月8日

今天上午，英军进入了叙利亚。

1941年6月14日

苏德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个谜，没人知道确切的消息。我还没能联系上见过刚回国的克里普斯的人，只能推断大致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苏德两国的关系发展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除了自杀，只要有方法能避免战争，斯大林就不会和德国开战；二是，希特勒一直在利用斯大林对抗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因此，目前，让斯大林丢脸绝不是好事。与其直接进攻苏联，或者逼迫苏联签订任何不利的条约，德国更倾向于打着结盟的口号迫使苏联让步，或许会用进攻伊朗或伊拉克做掩护。然后，人们会听说苏德两国正在“进行技术人员交流”之类的说法，之后，会有好多德国工程师突然出现在巴库。但可能整个行动都只是虚张声势，为掩盖另外一个秘密行动，比如进攻英国。

1941年6月19日

德国和土耳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是对我军没有迅速扫荡叙利亚的奖赏。从现在开始，土耳其媒体将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这会对阿拉伯人产生重大影响。

德比赛马昨天在纽马克特举行，显然观众不少。就连《每日快报》

都对此嗤之以鼻。《旗帜晚报》一直称，希特勒将在80天内入侵英国，并暗示德国在东欧的一系列举动只是虚晃一枪——但我认为，这只会让人民更加努力工作。

英国政府不再给佩萨莫港发准运证，并且以芬兰现在属于敌占区为由扣下了三艘芬兰船只。[4]这是目前为止最明确的暗示——苏德之间确实有事发生。

1941年6月20日

过去几天都快热死人了。我突然想到，这场战争带来的一个小小的好处就是它打破了之前一个愚蠢的习惯，即报纸不再用前一天的天气做新闻标题了。

1941年6月22日

今早，德军入侵了苏联。

大家都兴奋极了。所有人都猜测这样的态势发展对我们极为有利。不过只有苏联真正奋起反抗，并且抵抗有效时，这样的猜测才成立。而且就算苏联人无法抵御德军，至少也要消耗一部分德国空军和德国海军。显然，德国的目标并非苏联的领土和石油，只是想彻底消灭苏联空军，拔掉自己背后的一根刺，好与英军最终决战。现在没办法猜测苏联会如何对抗德军。最坏的征兆是，如果德国对此没有把握，他们绝不会轻易冒险进攻的。

1941年6月23日

我认为丘吉尔的演讲很棒。虽然这未能够取悦左翼政党，但他们忘了丘吉尔是面向全世界的人民演讲的，包括有中西部的美国人、空军军官、海军军官、满腹牢骚的店主和农民、苏联人以及左翼政党的各种势

力。

很难想象希特勒的这一举动会在美国引起怎样的反响。有人认为，这可能会在英国形成一个强大的亲纳粹派，不过这样的想法错得离谱。毫无疑问，富人们都希望看到希特勒摧毁苏维埃政权，但那些人只占少数。天主教徒当然也希望如此，但他们太过精明，可能在苏联抵抗无力时才表明立场。当我和地方军的一些人聊到这件事时，发现保守的顽固分子和一些有钱的生意人都支持苏联，但他们对苏联的抵抗能力有很大分歧。在我记忆里，这是典型的对话：

家禽贩卖商："真希望苏联能狠狠地教训一下德国人。"

服装厂商（犹太人）："不可能。他们肯定会像上次一样被揍得屁滚尿流。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医生（带些外国口音，可能是难民）："你绝对错了。大家都低估了苏联的实力。他们会用纳粹的尸体和鲜血擦地板。"

家禽贩卖商："真见鬼，他们可有2亿人啊。"

服装厂商："是啊，不过他们都是些乌合之众。"

大家都很无知，但都表明了立场。三年前，大多数人的年收入超过1000英镑，或者每周收入超过6英镑时，都会站在德国一方反对苏联。但现在，人们对德国的憎恨让他们忘记了一切。

这一切都取决于英苏两国是否能够真心实意地进行合作，是否能不互相攻击。如果苏联再次转换立场，斯大林扮演贝当的角色，那么英国的共产党肯定会追随他，转而支持纳粹。如果苏维埃政权覆灭，或者斯大林被杀或被俘，我想许多共产党员肯定会投奔希特勒。目前，英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呼吁成立"人民政府"。一旦莫斯科传来新指令，他们又会转变态度。如果苏联下定决心抵抗到底，那么，击垮英国政府或者进行任何颠覆活动就都毫无意义了。不用说，这些共产党人十天内就会变成超级爱国者——他们的口号很可能是"一切权力属于丘吉尔"——大家会彻底忽视他们。但如果苏德两国是真心结盟，并且相互妥协，那么，这次结盟肯定会对两国的国内政治产生有利影响。之前西班牙内战中，对苏联援军造成不良影响这种事，绝对不会在英国发生。

大家都在预测，自由的苏联该多么无趣，可能和白俄罗斯一样无聊。大家都想象着斯大林在普特尼的一家小铺子里，卖俄式茶壶，跳高加索舞……

1941年6月30日

关于苏德战争没有确切消息。整整一个周，双方都在鼓吹自己摧毁了对方多少辆坦克。人们惟一能相信的就是有多少城镇失守。而德国目前似乎没太大收获。德军占领了利沃夫，好像还有立陶宛，声称自己绕过了明斯克，但苏联说德军的攻击已经停止。不管怎样，事情不会有什么转机。大家都过分乐观了。“德军太自不量力了。如果下周希特勒还没有突破防线，德军就完了。”有些人说，德军非常优秀，绝不会在没有权衡利弊的情况下贸然行动。更冷静的人会这样看：“如果十月份苏联军队依然继续抵抗希特勒，那么这个冬天，德国就会彻底完蛋了。”不知道苏联政府没收所有私人收音机要作何用途。这件事有很多种解释。

目前，无法确切判断我们与苏联的结盟属于何种性质。昨晚，大家听到广播中播放其他盟国的国歌后，都兴奋地等待着国际歌的播放[5]。现在当然不会再播放了。不过埃塞俄比亚国歌也是等了很久之后才被加入盟国的国歌的。他们最终肯定会播放代表苏联的歌曲，但如何选择是一件很微妙的事。

1941年7月3日

斯大林的广播演讲是对人民战线的直接回应，是为民主战线的辩护，但他的演讲内容与他及其追随者在过去两年里说过的话互相矛盾。但这是一次精彩的动员演说，与丘吉尔的演说相互呼应，并且，斯大林在广播里明确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苏联无论如何都不会妥协。不过，斯大林在演讲里似乎暗指，苏联可能考虑撤退。他在演讲里用友好的字眼描述英美两国，声称苏联多少把他们当作盟国看待，虽然目前三国还未正式结盟。里宾特洛甫及其一派人等被称作“食人族”，苏联的《真理报》也认同这种说法。显然，对于这样奇怪的措辞只有一个解

释，即俄语中有大量的辱骂性词汇，但英文却没有对应的词语。

1941年7月6日

好几家报社都感到不安，因为我们没有对苏联伸出援手。我不知道英国政府是否打算进行空袭以外的行动，但如果我们无动于衷，则不仅会产生严重的军事政治后果，而且会成为令人不安的导火索。目前，德军的150个师正忙于和苏联交战，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展地面攻势，那究竟得等到什么时候？我没听到任何军队调遣的消息，显然英国政府没打算组织军队远征苏联。惟一的新进展就是比弗布鲁克在大力加紧坦克生产，简直和他去年大量生产飞机如出一辙。但这也得在几个月后才看得到成果，而且我实在不明白这些坦克的用途。我不相信他们要用这些来抵御德国的入侵。如果德军真派了大量军队入侵英国，如果他们完全掌控了制海权和制空权，那我们就是彻底失败了。

尽管英苏两国之间多少有些友好交流，但没有任何我们与苏联结盟的说法，关于两国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任何澄清。当然，在我们和苏联正式结盟前不能贸然行事，所以即使苏联成功打退了德军，我们也要继续战斗。

前线没有任何可靠消息。德军已经越过了普鲁特河，但至于是否越过了别列津纳河，人们颇有争议。苏德两国宣布的灭敌数字显然不可信。苏联人称德国的伤亡人数已达70万人，那差不多是希特勒全部军队人数的十分之一。

我查看了好几份天主教报纸，想看看他们对英苏两国的准同盟关系持何种态度。天主教的报纸并不支持纳粹，以后或许也不会。显然他们的衡量标准是，由于客观上说，苏联站在我们这一方，所以我们必须支持苏联，但英苏两国并没有确定结盟关系。《真理报》一向不喜欢丘吉尔，但这次也和我们站在了同一立场，不过可能略微反苏。有几份爱尔兰的天主教报纸已经公开支持纳粹。如果真是这样，那美英也会做出相同反应。不知道那些被冠以“中立”的爱尔兰报纸，会不会对苏联采取同样的“中立”态度，毕竟现在苏联参战，而这些报纸不能对交战国发表任何评论。

现在，人民阵线全力支持政府，要求政府“全力以赴进行战争”——两周前，他们还在呼吁“全民和平”。目前，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据说，当希特勒入侵苏联的消息传到纽约的一家咖啡馆时，几个共产党人正在开会，其中一人中途离开去了卫生间，回来时却发现“党的战线”已经转变。

1941年8月28日

现在我已经是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名正式员工了。

东部战线大概途径塔林、高美尔、斯摩棱斯克、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赫尔松。目前，德军已经占领了一大片比德国本土还要大的领土，但仍未能摧毁苏联军队。三天前，英苏联军入侵了伊朗，而伊朗军队早已逃之夭夭。没听说任何关于伊朗调动军队的消息。现在他们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在欧洲大陆施展拳脚，不过，我认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在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的联合声明里，人们可以感觉到由于德军入侵苏联，美国人的反希特勒情绪已渐渐淡化。另一方面，没有任何暗示说明英国会因为德军入侵苏联而牺牲自己。虽然有民众抗议我们没有尽全力帮助苏联，但毕竟这些人只是少数。我认为苏德之间的战争很快就会告一段落，因为这个冬天，希特勒的军队不可能突破高加索和整个中东地区，但德军也不会溃败。因为他们给苏联造成的损失比自己遭受的损失要严重。目前看来没有赢家。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既沉闷又让人精疲力竭，让我们所有人都陷入贫困。我之前预测的战争新阶段已经到来，而且从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开始的半革命时期也已结束。因此，这本日记按计划就此结束。[6]

---

[1] 珀西·斯彭德（1897-1985），律师、政治家，时任澳大利亚战时内阁的陆军部部长。

[2]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于1930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改为苏联部长委员会），直到1941年才卸任，此后他一直担任副主席一职。

[3] 叙利亚的港口城市。

[4] 中立国（比如芬兰）的船只可以由领事馆官员发放准运证，允许船只和货物自由通行，可以不接受登船检查。

[5] 英国广播公司的传统是每周日晚上播放所有的盟国国歌。

[6] 这是奥威尔在1942年3月14日之前写的最后一篇日记。

1942年3—7月

1942年3月14日

时隔半年，我再次打开这本日记。战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克里普斯前往印度的具体日期尚不明确[1]，但推测一下，此时他可能已经动身了。他的离去让大家沮丧不已。普遍的说法是：“他们这样只是为了摆脱克里普斯。”（德国无线电台也是这样对外宣称的）这种说法简直愚蠢至极，反映了英国人的狭隘——没有认识到印度的重要性。消息灵通的人对此表示悲观，因为英国政府不愿公布关于印度的条款，显然，这说明这些条款并非是好的条款——他们不了解克里普斯手里掌握着多大的权力，因此，了解内幕的人也觉得很不乐观。可能的知情人肯定不会透露半分，只能间接获取信息了。比如，我接到了在新闻里[2]给克里普斯造势的指令后，就准备给他树立一个政治极端主义者的新形象。这样的做法引来了警告，“别做得太过分了”，这让我们猜测也许政府并不希望印度获得完全独立权。

各种流言四处散播。好多人猜测苏德会在今年单独媾和。通过研究德国和苏联的无线广播，我终于了解，苏联所谓的胜利绝大部分是假的，而且德国的计划在战争中也未全部实现，我认为苏联的胜利和我们的不列颠之战差不多——只是为了暂时避免失败，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我认为，除非苏联战败，否则单独媾和绝无可能。此外，其他一些人认为（我是从一个来自波罗的海的苏联人那里听说的，他坚定地支持斯大林主义，但本人不一定是苏联共产党党员），如果苏联能让德国人撤离自己的领土，就会表面上做出一番战争的样子，悄悄与德国讲和。

关于比弗布鲁克离开内阁的流言：

1.克里普斯坚持要把这件事作为自己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一个条件。

2.比弗布鲁克被罢免，因为他一直和戈林联系并试图妥协以求和平。

3.军方一直坚持要罢免比弗布鲁克，因为他一直给苏联提供飞机，而不是给利比亚和远东地区的国家。

我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已有半年。若我预测的政治变动真的发生，就会继续在这里工作，不然我就辞职。这里的工作环境既像女子学院，又像是个疯人院，大家的所作所为都是无用功，甚至还不如不做。我们的广播策略比军事战略更让人感到绝望。不过，在这里工作，很快就会变成极具宣传意识的人，做事也会比之前更机敏灵活。举个例子，我会定期在新闻稿里宣称日本正蓄谋攻击苏联。虽然我不相信这种说法，但我估计的结果是：

1.如果日本真对苏联发动战争，我们可以说“我早就说过了”。

2.如果苏联率先对日本采取行动，我们可以假装说是日本先发动的，毕竟事先也在新闻里为这种说法埋下了伏笔。

3.要是双方都没动静，我们可以宣称是因为日本太过于惧怕苏联。

即使有人说真话，说所有的宣传都是谎言。只要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那这就无可厚非了。

时事：

一位地方自卫队的女性[3]拦住了一个英国地方军人：“不好意思打扰了，您的前门开着。”

军人：“噢，您难道没注意有个又高又壮的哨兵在门口放哨吗？”

女人：“没有啊，我看到的只是一个老哨兵躺在一堆沙袋上。”

1942年3月11日，我说谎了，对三个不同的人说啤酒即将供应，然后饶有兴趣地等着看这个谣言什么时候再传回到我的耳朵里。

1942年5月30日，这个谣言都没有传到我这里，所以我并不清楚谣言传播的方式。

前几天和威廉·赫基聊了一会[4]，他刚从美国回来，告诉我美国人的士气非常低落，不仅生产停滞，而且受到天主教徒的影响，各种反英反苏的浪潮十分猖獗。

1942年3月15日

今天上午约11：30时听到了短暂的空袭警报。没有炸弹声，也没有防空炮的声音。这是十个月来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和其他人一样，我装作若无其事，对此绝口不提，直到警报解除声响起为止。

1942年3月22日

恩普森告诉我，英国外交部严禁任何有关日本要进攻苏联的暗示性说法。因此，远东地区的新闻广播刻意回避了这一主题，而印度新闻广播却反复提及这种说法。他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被警告，我们也没有收到正式的禁令，所以得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同样，我们的宣传版面也是一样混乱。比如，鉴于我写的评论吉卜林的文章，《地平线》差点拿不到额外的纸张刊印以供海外发行（但最后关头，哈罗德·尼克尔森[5]和达夫·库珀介入，一切都解决了），与此同时，英国广播公司让我写一份关于这篇文章的专题报道。

而德国方面的有关宣传却截然不同——这是有意而为之，任意许诺：给印度自由、解放卡菲尔人并对波尔人施行更严格的种族法律等。这让我看到了大部分人对政治的无知，他们只对眼前的事感兴趣，对这样前后矛盾的说法都无动于衷，但我认为，从宣传角度来说这样做合情合理。几周前，新英国广播电台[6]甚至攻击了“工人挑战”电台[7]，告诫人们不可听信，因为他们是“受莫斯科的资金援助”的。

墨西哥的共产党人仍在追捕维克多·塞尔吉[8]和其他托洛斯基分子的难民——这些人刚从法国过来，墨西哥方面声称要将他们驱逐出境。西班牙的情况也并无不同。看到这些古老的阴谋再次出现，我感到十分讶异。当然，这种感觉并不强烈，因为这种做法实在是有悖道德，让人不禁想到：过去二十年里，共产国际经常使用这种手法，而且他们一直

都是法西斯主义支持者的手下败将。因此，鉴于我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他们的失败也代表了我们的失败。

对于苏联打算单独媾和这件事现在已是路人皆知，但大家对此持怀疑态度。无论从地缘或心理的角度来说，只要苏联愿意放弃乌克兰，这件事就会相对简单得多，但显然，苏联不可能一声不吭就放弃高加索油田。这件事唯一的发展可能就是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一份秘密协议，希特勒掌管苏联侵占的全部或部分领土，随后德国不许攻击苏联，转而进攻伊拉克和伊朗，同时，苏德两国假装继续交战。在我看来，若英国今年进军欧洲大陆，那么，苏德的单独媾和则极有可能实现。因为如果我们成功羞辱了德国并吸引了德军注意力，那么，苏联很有可能会迅速抢占优势，夺回被占领土并以此讨价还价。然而我的想法是，既然英国舰队有能力，那么，我们就应该入侵欧洲。唯一可以阻止这场肮脏的骗局的办法就是英苏结盟，共同商讨即将爆发的战争的有关细节。但只要本届政府继续存在，这就不可能发生（但只要我们成立一个新的政府，找到某种可以越过斯大林直接与苏联对话的方法，这一切还是有可能的）。

现在人们的感觉和法兰西战役时的一样——没有任何消息，主要原因是人们总在看报纸。至于我，我每天看四五份新闻报纸，除了每日的监测报告，还要看好几份不同版本的晚报。大家看报时都会觉得每个版块的新闻量都很少，所以大家以为没什么大事发生。再说，若事情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人们是可以预见得到的。过去几周，唯一让我惊讶的就是克里普斯出使印度的事。

1942年3月27日

克里普斯带去印度谈判的条约明天就将出台。此时的传言虽然貌似可信，却相互矛盾。最有根据的说法是，此次与印度的条约和我们之前与埃及签订的大同小异。K.S.S[9]是让我们满腔怒火的敌人，他认为如果我们允许印度设立国防部、财政部和内政部，才可以接受条约。经过一两周的低潮期，在英国的印度人民乐观多了，他们似乎认为这样的条款（也许是受够了印度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脸色）也不算太差。

下议院对《每日镜报》[10]的报道进行了热烈讨论。安奈林·比万[11]

阅读了大量莫里森[12]自战争后发表在《每日镜报》上的文章片段，但那些反对《每日镜报》观点的保守党们倒是乐得看场好戏，看着两方保守党们互相抨击。卡桑德拉[13]宣布自己要辞职参军。有人预言说他三个月后就会重返原职。但三个月后我们又将在何方？

政府的候选人在格兰瑟姆的选举中以微弱的差距败下阵来。我想这应该是战争开始后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一两周前，我们连队的地方军突然被征召。整顿队伍和分发弹药花了四个半小时，部署队伍又用了半个小时。之所以耗时良久，主要是因为高层拒绝把弹药分发给个人，而要大家亲自去总部领取。我将此事写到备忘录上发给了汤姆·琼斯博士[14]，他又转交给了詹姆斯·格里格爵士[15]。然而，在我的连队里，我甚至没办法把信息直接递交连队指挥官，至少没办法让他本人看到。

透过战争新闻的阴霾，人们依稀可以瞥见那盛开的番红花。

收到了一封H.G.威尔斯辱骂我的信，信里他称我“你这坨狗屎”，还有其他骂人的话。[16]梵蒂冈和东京交换了外交代表。目前，梵蒂冈和所有的轴心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我想——没和任何同盟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个坏征兆，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梵蒂冈认为，比起同盟国，轴心国政策的反动性更强。

1942年4月1日

克里普斯的任务失败了，我失望透顶，很多印度人似乎也有同感，这一个月都垂头丧气的。我想，就算那些憎恶英国的人也会想要个解决办法。然而我认为，尽管英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抱有“不讨价还价”的态度，但最后迫于公众压力，政府终会修订这些条约。有人认为苏联一直暗地支持克里普斯，所以他才敢如此自负地提出这些明显让人憎恶的条款。既然没有对日宣战，苏联就无法对印度事务发表官方意见，但苏联很有可能对其追随者发布了指令，进而借此影响其他亲苏分子。目前，英国共产党尚未采取任何举措，但他们的一举一动可能会透露苏联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因此，我们只能靠猜测来制定宣传政策的安排，上层目前还没下达任何明确指令。

昨天，康诺利想在广播里插入一段《致敬加泰罗尼亚》中的话。我打开书，看到了这几句：

写这种文字的人从不参加战斗，可能他们以为写作已经足以替代战斗。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是如此，战士打仗，记者叫唤；除了短暂的宣传旅行外，以真正的爱国者自诩的人从不在前线的战壕里停留。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局面，这倒有时让我感到快慰无比。在下一次大战来临时，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史无前例的景象：一名弹片穿身的沙文主义者。

现在我在英国广播公司，距我写下这段话还不到五年。我想我们迟早都会写下自己的墓志铭。

1942年4月3日

克里普斯决定在印度再待一周，这可是个好兆头，此外，再没什么让人期待的事了。甘地正在故意制造各种麻烦，先是看到鲍斯[17]死亡的报道后发送吊唁信，之后证实报道是虚假的后又发了贺电。同时甘地还说服印度人民，如果其他国家入侵印度，绝不能采取焦土政策。甘地的行为让人完全摸不透。反对甘地的人声称其代表了印度最邪恶的资本主义利益，而事实上，他确实经常住在某个百万富翁的大厦里。这样的行为与他所谓的圣洁光环不一定完全相悖，但也许他是真心地推行和平主义理念。1940年局势动荡的时期，他同样主张英国在遭到入侵时不要抵抗。我不知道，究竟是甘地还是布克曼[18]更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拉斯普京。

安纳德[19]说流亡到这里的印度人情绪低落。他们仍坚信日本对印度没什么企图，而且他们一直都在讨论如何同日本和谈。这就是印度对苏联和中国宣称的忠诚，不过如此。我告诉安纳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几乎所有的印度人其实都不希望独立，也没法想象自己的国家独立会是什么样，而且他们心底也对此很抵触。他们期望一直都能站在反对的立场上，希望自己不用受苦受难就成为烈士，甚至还想着能和日本或者德国玩同样的小学生游戏，就像他们和英国玩的一样。某种程度上，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认同我的说法。他说这种“反对派心态”是印度人普遍共有的，尤其体现在印度共产党身上。而且克利须那·梅农[20]一直“期望谈判破裂”。他们很冷静地谈到背叛中国可以单独媾和的同时，

又叫嚣说中国在缅甸的军队无法得到很好的空中支援。我认为，他们这种言行简直太幼稚。安纳德说：“你不能太低估他们的幼稚，乔治，他们简直幼稚到了极点。”问题在于，在英国的印度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印度知识分子的观点。他们远离危险，而且很有可能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一直受前十个月那种和平氛围的影响。但从另一方面看，基本上所有在英国待过一段时间的印度人都多少沾染了西方社会主义的思想色彩，所以真正的印度知识分子的情况可能更糟。安纳德自己还未染上这些恶习。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而且曾为了支持英国违背了自己的感情，甚至不顾亵渎自己的名声，这都是因为他意识到，在反法西斯这件事上，英国的立场一向很客观。

1942年4月6日

乌克斯布里奇到邓汉姆的一条支线公路正在修建，我昨天观察了其中一段。工程的浩大让我惊讶不已。乌克斯布里奇西边是科恩尔山谷，公路就建在了一座横跨山谷的高架桥上，桥墩用砖头和混凝土建成。我估计整座桥约有400m长。高架桥后面还建起了一个高高的路堤，每个桥墩都有20英尺高，15英尺长和20英尺宽，两个桥墩之间相隔约15码。我想，建成每个桥墩大概需要4万块砖，这还不算地基，也不算桥墩上面的混凝土建筑。因此，每码公路都应该需要数吨钢筋混凝土。为了加固，公路两旁还存放了数量惊人的钢筋和巨大的花岗岩石板。

建造一条这样的支线公路并不容易，其劳动量都可以建造一艘大型军舰了。就算战后能建成，估计也没什么用武之地了。而且，现在社会上劳动力短缺。显然，那些卖砖的人都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同比，拿那些没用的地面防空掩体来说，对建筑稍有了解的人一开始就把这工程批判得一无是处。此外，伦敦那些无人居住的私人住宅根本没必要维修。）显然，丑闻闹到某种程度时，反倒无人问津了。

我在德拉姆看到一个人驾驶着一辆狗拉的车，装饰得还挺漂亮。

1942年4月10日

前三四天的战争里，英国海军损失了两艘巡洋舰，一艘航空母舰被击沉，一艘驱逐舰被击毁。而轴心国仅损失了一艘巡洋舰。

今天尼赫鲁在演讲中说：“印度将生，谁为之死？”左翼分子们一定相当欣赏这句话，而听到“英国将生，谁为之死？”时，他们又会怎样窃笑。[21]

1942年4月11日

最终，任务[22]还是失败了。但我认为这并非最终结果。克里普斯在德里发表了演说，我们在英国进行转播。这些偶尔来自德里的节目转播，是我们了解自己的广播在印度的收听效果的唯一方式。节目音质很差，噪音很大，而且根本没办法去掉杂音。演讲的前半部分还不错，声音很平稳，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但演讲的后半部分又变得轻松积极起来了。有意思的是，演讲比较激昂的部分，克里普斯似乎学会了丘吉尔的变音。真让人费解。不过这一点也许指明了真相——为什么在这样糟糕的局势下他依然接受了任务——他受到了丘吉尔很大的影响。

1942年4月18日

不用说，克里普斯的演讲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在印度。我怀疑除了印度，是否有好多人都在指责英国政府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过去多年来，美国一直用拙劣的言论空谈所谓的“印度自由”和英国帝国主义，但现在他们突然认清了事实——原来印度的知识分子根本不想独立，不愿意承担责任。尼赫鲁经常发表煽动性言论，表示所有英国人都一样，不论政治党派，还说美国人才是真正的战士，试图用这样的言论在英美两国之间制造麻烦。同时，他还不时强调自己并非亲日派，声称印度国会将自始至终守卫祖国。于是，英国广播公司从尼赫鲁的言论中单独挑出这部分广播，其中并未提及任何反英的言论，所以尼赫鲁抗议（当然理由很充分啊）自己的演说被曲解了。

最近公司收到一项指令，如果尼赫鲁的言论中同时有反英和反日的

内容，我们最好听而不闻。真是乱七八糟的。但我觉得，总而言之，克里普斯的任务还算完成得不错，因为他不但没有让自己蒙羞（话说这本来极有可能发生的），还澄清了整个事实。不论官方怎么说，全世界都会知道——英国的统治阶层并不会放弃，而且印度并非想要独立，因此不论战争的结果如何，印度都不会独立。

我跟温特林厄姆讨论了苏联会对克里普斯与印度的谈判持何种态度（当然，苏联并未对日本宣战，苏联政府也未提及）。我说，如果有尽可能多的苏联军队教官被派去印度的话，那整件事会容易许多。很有可能印度最终会被苏联占有，虽然我不相信苏联在印度的表现会比我们好，但由于苏英两国不同的经济体制，他们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措施。温特林厄姆说，苏联当年曾经把西班牙人看成“土著人”，因此，苏联在印度肯定还是这样。

很快，美国的舆论导向会再次转移，把印度目前的处境全部归咎于英国，跟之前的做法完全一样。很显然，从美国政府发布的文件中，人们能够感受到强烈的反英情绪，短暂沉默后，所有孤立主义者全都冒了出来，还打着以前的口号。让我感到害怕的是美国人极端无知的反英情绪。同上，英国的反美情绪也是如此。

1942年4月19日

昨天东京遭到轰炸，或者说有传言说遭到了轰炸。[23]目前为止，只有日本和德国报道了东京遭到轰炸的事。如今，我们理所应当地认为每个人都在撒谎，所以除非最后双方确认，否则大家都不会相信此类报道。就算日本声称自己的首都被炸，大家也会认为这样说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目的，而故意说谎罢了。

艾琳说安纳德昨天告诉她，英国会在今年单独媾和，仿佛理所应当一般，而且在艾琳提出反对意见后，安纳德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当然，印度人肯定会这样说，从1940年开始他们就这样讲，因为这是他们反战时的借口。此外，他们绝对不能对英国抱有任何好感，否则精神世界就会崩溃。法伊弗尔告诉我，1940年，张伯伦还在内阁工作时，他曾出席过一个会议，普利特和印度人也参加了。当时，在会议上，印度人就用那种伪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说：“在丘吉尔和张伯伦领导下的英国政

府必然会妥协谋求和平。”随后，普利特告诉他们，丘吉尔绝对不会议和，而且英国政府内部的唯一矛盾就是丘吉尔和张伯伦的分歧。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入侵欧洲——实在是说的人太多，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有什么苗头，不然媒体不会冒险大量报道后让大家的希望落空。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权力政治也含有人情因素。左翼媒体会习惯性地做两个假设：第一，开辟第二战场是阻止苏联单独媾和的办法之一；第二，我们为战争做的贡献越多，在战后裁决时就拥有越多的话语权。几乎没人想到——如果登陆欧洲成功，德国的军队真的撤出了苏联后，斯大林也就失去了继续战争的强烈动机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背叛盟国很符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宗旨以及苏日签署的协议。至于第二个假设，很多人认为，胜利才是战后裁决的有力棋子，是努力参战的奖励。但事实上，能够主宰战后局势的国家当然是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了，譬如一战后的美国。

现在，有两种方式可以扭转局势：第一，与苏联签署一份明确协议，以及一份（相当详细的）关于战争目标的联合声明；第二，入侵西班牙。但这一点在当前形势下是没有政治可能性的。

1942年4月25日

在苏联迫降的美国飞行员们由于轰炸日本东京而被扣押。据日本媒体报道，苏联正极力协助日本特工从瑞典（也就是从德国）经由苏联回日本。如果报道属实，这将是事态全新的发展，因为这条路在德国袭击苏联时就被切断了。

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一直行踪不定，有以下几种说法。

1.鲍斯消失时，英国政府声称他去了柏林。

2.在自由印度广播电台的广播中，有一个疑似鲍斯的声音出现。

3.意大利电台不止一次声称鲍斯在日本。

4.在英国似乎所有的印度人都认为鲍斯在日本。

5.虽然鲍斯逃去其他国家也不是不可能，但逃到日本要容易得多。

6.维希政府透露，鲍斯死于从曼谷飞往东京的飞机事故中，虽然这根本没有任何可信度，但似乎说明了维希一方也认为他在日本。

7.据工程师分析，把他的声音从东京加密传回柏林后整理和重播，是很有可能的。

目前，各种说法和谣言数不胜数。最难回答的两个问题是：如果鲍斯的确在日本，为什么要努力制造出自己在德国的假象？他在柏林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如果鲍斯在德国，他又是怎么过去的？当然，如果是苏联默许的，就要另当别论。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苏联之前就默许了鲍斯的行为，那么，苏联站在我们这一方参加战争时，有没有向对方透露消息呢？得知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能很容易地获悉苏联对我国的真实态度。不过，你很难在英国得到任何关于此类问题的信息。你必须暗地宣传，小心翼翼地避开。[24]

从德国的新闻报道判断，德国坚信同盟国即将在法国或挪威登陆。现在真是入侵西班牙的绝妙之机！不过，德国人已经确定了具体的登陆日期（5月1日），那么，他们也许讨论的只是登陆的可能性，一旦登陆失败，就可以尽情嘲笑盟军了。目前还没有任何准备登陆的迹象——没有关于军队和舰队整合的谣言，铁路时间表也没有重新安排。最有可能的迹象就是比弗布鲁克在美国发表的关于支持登陆的演讲。

今天几乎没什么实质性的新闻。报纸空空如也的情况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

美国大兵不时出现在街道上，他们平庸的体格和普通的外貌让我震惊。不过，在通常情况下，军官看上去比士兵好一些。

1942年4月27日

关于希特勒昨天发表的演讲，人们多有猜测。总的来说，他的演讲主要传达的是一种悲观主义情绪。作为鼓舞美国人民士气的一次讲话（从字面意义看），比弗布鲁克关于入侵的演讲是对苏联的安慰，告诉苏联人，我们绝不会在遭遇挫折之时袖手旁观，同时这也可以理解为攻

击丘吉尔的开始（丘吉尔可能不得不反对此次登陆行动）。如今，不论一个人说什么做什么，人们总想发掘你的潜在动机，认为这个人话中有话。

意大利广播里这样描述了伦敦的生活：

“昨天5先令只能买一个鸡蛋，1英镑只能买1公斤马铃薯。大米已经没有了，黑市也买不到，吃豌豆已经成了有钱人的特权。市场上已经没有糖了，但只要你愿意出高价，还是可以买到一点儿。”

有人会说这完全是胡诌，因为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英国早在几周前就会停止战争了。但假如英国没有停战，听众就会知道自己受骗了。事实上，听众没有任何受骗的反应。你可以一直说谎，即使是最明显的谎言，人们就算不怎么相信，也不会有太强烈的反感情绪。

我们都淹没在泥潭中。我和别人聊天或者看某些有所企图的人写的东西时，都会觉得智慧、诚信和公正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每个人都像在论战一样，大家都在努力证明自己的观点，甚至为了打压对手的观点，还会故意设置“障碍”。更有甚者，除了自己和朋友的痛苦，对所有的苦难都视而不见。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正沉浸在自怜自艾和对英国政府的憎恨中，对中国正在遭受的苦难冷眼相待。马恩岛集中营里的人们点燃了英国的和平主义者心中的怒火，而德国集中营里受苦的人们却丝毫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诸如此类还有很多。这些都是事实。人们在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人那里更容易注意到这一点，比如法西斯分子或者和平主义者，但大家其实都一样，至少对与自己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大家都会置身事外。在这一点上，每个人都一样，冷血无情。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政治私利，人们的同情心可以像水龙头一样开开关关。所有的左派，或者说左派中的大部分，都在战争前对纳粹的暴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怒，而战争一开始，他们就失去了兴趣，完全忘记了那些暴行，显然，他们对犹太人的同情心也消失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同样，有人一直憎恨苏联，把苏联人当成毒药，直到1942年6月22日苏联加入战争后，他们就忘了大清洗运动，忘记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等。我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撒谎，而是想表达自己的主观感受的真实变化。但难道就没有既立场坚定又思想公正的人吗？事实上，这样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是弱势群体，权力都掌握在偏执狂手里。

1942年5月6日

对于马达加斯加[25]事件，人们似乎并不如当初叙利亚事件发生时那样欣喜[26]，也许是人们没有完全领会马达加斯加的重要战略意义，但我认为这是因为没有事先进行大力宣传的缘故。叙利亚事件的危险性显而易见，关于德国入侵的连续报道以及政府是否会有所行动的长期不确定性，都让人们觉得政府是迫于公众言论的压力而做出的这个决定。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我所知，事实可能就是如此。而马达加斯加事件并没有这样的铺垫。一旦新加坡千钧一发的局势变得明朗，我就会立刻指出，我们必须攻打马达加斯加，而且最好在印度通讯方的新闻里制造舆论基础。几周前，我们接到了一个指示，我猜是外交办公室下发的指示，说不允许我们在新闻里再提到马达加斯加，理由就是（英军登陆后）“为了不露出马脚”，我当时就愣住了。结果，袭击马达加斯加在整个亚洲看来就成了帝国主义的掠夺。

今天看到两个女人开了一辆老式的小型二轮马车。一两周前我还看到了两个男人乘坐着一辆四轮马车，其中一个男人戴了一顶灰色的圆顶硬礼帽。

很多人都在猜测《论坛报》上的那篇文章原作者是谁，他竟然敢激烈地攻击丘吉尔，还署名“托马斯·雷恩巴勒”[27]。有人猜测是法兰克·欧文[28]，但我并不相信。

1942年5月8日

据W[29]说，英苏联盟条约即将签署，而且苏方代表已抵达伦敦。我不相信他的话。

土耳其广播（过去，我一直认为土耳其广播是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声称，德国和苏联都打算在后续的战争中使用毒气。

珊瑚海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海战。[30]交战双方声称沉船的数目巨大，人们不知道该相信哪一方。但日本广播似乎很愿意讨论这场战争，把这次战争称作珊瑚海之战，所以可以推测，日本已经达到了其作战目

的。

我猜，托马斯·雷恩巴勒的真实身份是汤姆·温特林厄姆。（没错！）

（1942年5月30日，温特林厄姆否认自己写过那些文章，但我还是认为就是他写的[31]。）

1942年5月11日

昨晚，丘吉尔在演讲中再次提到要小心毒气。我认为，不久之后，我们也要开始使用毒气了。

来自日本的广播：“为了充分尊重朝鲜人的爱国精神，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将在朝鲜实行义务兵役制。”

据说，德军入侵英国的日期是5月25日。

1942年5月15日

周三我见到了克里普斯，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跟他说话。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比我想象中的更平易近人，也更随和，愿意回答我的任何问题。虽然他已经53岁了，可有些行为还像个小孩子。此外，他还长了一个红鼻子。我是在上议院的一个接待室见到他的，房间里的墙上挂着一些有趣的老照片，座椅上和烟灰缸上都装饰着冠冕，但房间里还是隐隐透露出一股破败的气息，就像现在的议会机构一样。一大波平民等着见克里普斯。我等着和他的秘书说话时，脑子里闪过了一句话——“在前厅里发抖”，一到这种场合我就会想起来。在18世纪的书籍里，你总能看到描述人们等候在赞助人的客厅里“颤颤发抖”这样的说法。就像“不遗余力”和“千方百计”一样都是老生常谈了，但当你愈发靠近政治或者新闻业时，就会发现一切都非常真实。

克里普斯认为鲍斯肯定在德国。他说，大家都知道，鲍斯经由阿富

汗才得以逃脱。我问他鲍斯是个什么样的人，毕竟他曾经跟鲍斯的关系很好。他回答说，鲍斯是“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我说，毫无疑问，鲍斯本人十分支持法西斯主义。克里普斯说：“他只支持他自己。他只在乎自己。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他愿意做任何事。”

就鲍斯的广播看，我并不十分确信他是克里普斯嘴里说的那种人。我说过，我猜很少有印度人是真正反法西斯的。但克里普斯并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年轻的一代不是这样。他说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是真心实意反法西斯的，而且他们看待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时都有着西式的观念。希望真是如此。

1942年5月19日

艾德礼就像一条死鱼，只不过死而未僵罢了。

1942年5月21日

据说莫洛托夫在伦敦。我并不相信。

1942年5月22日

据说莫洛托夫不仅来到了伦敦，还签署了一份新英苏条约。[32]不过这是从瓦尔堡那里听来的，他时而过于乐观，时而又过于悲观——总是相信戏剧性巨变即将到来。如果他所说属实，这对英国广播公司来说是天赐良机，因为素材就会变得非常丰富了。毕竟，现在想找新闻素材越来越难，除了苏联的前线战争，没有其他事，而且无论是从苏联传来的消息还是从德国传来的，都愈发虚假了。我真希望自己能空出一周的时间，好好整理下过去一年苏联和德国的新闻报道，统计他们的各种宣传主张。我敢说，根据他们的报道，德国已经杀死了一千万苏军，而苏联已经入侵大西洋地区了。

1942年5月27日

以下内容摘自1942年5月26日《每日快报》的报道：

开罗，周一——为了不让烦琐拖拉的办事程序妨碍中东地区战争进程，奥金莱克将军[33]给“所有军官和指挥部”写了一封信。

以下摘自威灵顿公爵于1810年在西班牙写给陆军大臣布拉德福德勋爵的亲笔信：

阁下，如果我要给大量包围着我的无用信件回信，那就没办法处理真正重要的战事了。

只要我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职位，就务必会做到：在我指挥下的军官，不会因为忙于处理您办公室里那些无用公文而忽视自己的首要职责——训练自己手底下的士兵。

奥金莱克将军继续写：“我知道这与您无关，但请您务必保证这不会发生在您或是您手下的任何一个人身上。”

报纸上登出了这封信，广播里也有提及，但事实上，现如今毕竟没有人敢像这样对陆军部的人说话了。

有更多的传言说莫洛托夫在伦敦。报纸上也出现了奇怪的段落，暗示这可能是真的（当然没提到名字）。

1942年5月30日

我几乎每天都能在摄政街附近看到一个身材矮小、年纪很大、皮肤发黄的日本人，他看上去像是饱受苦难的猴子一样，慢吞吞地跟在一个大个的警察后面。有时，他们会严肃地谈话。我猜他应该是个外交人员，但不知道那位警察究竟是要阻止他搞破坏，还是保护他不受暴民的伤害。

关于莫洛托夫的流言渐渐淡去。沃伯格当初完全相信了莫洛托夫的

事，但现在似乎已经完全忘了，转而开始关注加文[34]被《观察家报》辞退一事里的内部消息，据说是因为加文拒绝抨击丘吉尔。而阿斯特家族因为丘吉尔支持苏联而决定让他出局，这次《观察家报》的人事调动就是阿斯特家族的策略之一。《观察家报》要把抨击的战火引到丘吉尔身上，同时引开有天赋的年轻记者，因为他们可能会赋予战争以重大的革命意义，所以要让他们把精力集中在无用之事上，然后再除掉他们。这些猜测并非空穴来风。此外，我不信任大卫·阿斯特[35]，任何类似的事情他都要掺和。比弗布鲁克出版社把苏联当成是“比过往更保皇的保皇党”，而且《北方工人之声》也突然发现加文这个知名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因为发表激进的观点而被解雇的事，真是让人好笑。一件让我十分震惊的事是，现在，几乎所有人的记忆力都很短暂。德斯蒙德·霍金斯[36]不久前告诉我，他买了一些炸鱼，外面是用1940年的报纸裹起来的。报纸的一面是一篇论述劣迹斑斑的红军的文章，另一面则是关于那位勇敢水手的报道——法国海军参谋长达尔朗[37]，他是个亲英派。

1942年6月4日

天气非常热，不过似乎一切正常，太不可思议了——没有步履匆匆的行人，也没有穿制服的士兵。人们慢悠悠地走在路上，有的推着婴儿车，有的在广场上闲逛看看山楂树丛，丝毫没有大战在即的状态。但车辆明显少了，到处都是车后身带有燃料转换机的汽车，看着有点像老式的运货马车。显然，黑市上的汽油也不好弄到。

1942年6月6日

关于莫洛托夫的流言还在继续。据说，他来这里是为了议定合约的，而且已经回去了。不过，各大报纸均没有任何关于此事的报道。

据说《新政治家》的职员们对第二战场的意见分歧很大。金斯利·马丁[38]过去一年里一直嚷嚷着“我们应该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现在反而临阵退缩了。他说，现在大家都说没法信任士兵，他们会在军官们的背后开黑枪——之前的战争进行过程中，总有人挑拨士兵与军官之间的关系。但在我看来，如果能够筹集到足够多的船只，第二战场是一定要开

辟的。

1942年6月7日

《周日快报》对第二战场的有关报道暂时告一段落。官方的意思似乎是我们进行的空袭就是第二战场了。显然报社接受了某种来自政府的暗示，对相关报道低调处理。如果政府仅仅希望报社不再报道一些误导人的谣言，那为什么不及时禁止？很可能政府已经决定要登陆，为了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报纸媒体才在表面上假装反对，虚晃一枪。在谎言交织的生活中，最显而易见的说法恰恰最令人怀疑。参见大卫·阿斯特讲的关于火车上两个犹太人相遇的故事：

第一个犹太人说：“你要去哪儿啊？”

第二个犹太人说：“柏林。”

第一个犹太人又说：“你这个骗子！你故意这样说来骗我。你很清楚，要是你说你去柏林，我就会以为你是要去莱比锡，但是你实际上要去柏林，你这个龌龊的骗子！”

上周二（1942年6月2日）晚我和克里普斯（之前他说想多和文化人接触）、燕卜荪[39]、杰克·科蒙[40]、大卫·欧文[41]、诺尔曼·卡麦隆[42]、盖伊·伯吉斯[43]，还有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一位官员）在一起长谈。我们谈了大概两个多小时。谈话跟平常一样，最后也没有得出像样的结论。不过克里普斯很通情达理，愿意听我们讨论。与克里普斯大胆辩论的杰克·科蒙言语有力。克里普斯讲了一些让我很吃惊的事，我甚至感到有点害怕。其中一件是：许多有头有脸的人都坚信战争将在十月份结束，也就是说，那时德国人就会投降。作为旁观者，我认为这事简单直接地说就是一场灾难（因为如果这场战争能如此轻易取胜，那美国又怎么会社会动荡，美国的百万富翁们怎会做出改变），但克里普斯似乎理解不了我的话。克里普斯说，一旦战争胜利，那么不论如何，幸存的大国都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这个世界，而且无论是资本主义大国还是社会主义大国，都不会有太大关系。大卫·欧文和那位我不知道名字的人都认同克里普斯的观点。我知道我反对官方的意见，他们将一切都归咎于管理问题，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自己甚至意识不到这一

点：如果某个集团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那么，其公德心也就不复存在。对于这些人的基本假设是，大家都希望世界可以正常运转，因此每个人都会尽一份力。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掌权的官员们根本不在乎这个世界，他们只想着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不禁意识到，克里普斯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44]无关金钱利益，无关阿谀奉承，无关权力名利，他可能真的不在乎这些：这样做仅仅是出于自身的责任感。而责任感会让人自然而然地变得胆怯。此外，一旦你掌权，视角就会缩小。就像鸟的视角和蠕虫的视角一样——它们都看得不真切。

温特林厄姆不承认自己是“托马斯·雷恩巴勒”，我想也许他真的不是。如果不是温特林厄姆，那可能会是温斯特勋爵[45]。

1942年6月10日

在英国广播公司里，只有早上6点到8点才能听到歌声。那时，清洁女工们正在工作。大批清洁女工几乎同时到达公司，坐在接待大厅里，等着发扫帚。她们吵吵闹闹的，就像是店里的鹦鹉。之后，她们会一边打扫过道一边齐声歌唱，声音凑在一起，形成了美妙的合唱。这时英国广播公司里的氛围跟之后的完全不一样。

1942年6月11日

德国人通过广播宣布一个叫利迪泽的捷克村庄（约有1200名村民）窝藏了暗杀海德里希[46]的刺客。因此，德国人枪杀了村里所有的男性，把女人们都送去了集中营，把所有孩子送去“洗脑”，甚至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还改了村名。我保留了这份公告的副本——原稿在英国广播公司早晨播报的报告里。

以下摘自英国广播公司的监测报告：

1942年6月10日

布拉格（捷克本地台）对保护德国的广播

关键词：为海德里希复仇；村庄大清洗；男人全被杀；公告。

正式通知：关于谋杀党卫队的大队长海德里希将军一事的搜索调查已经有确凿证据表明，克拉诺德附近利迪泽的村民支持并帮助了行凶者。尽管有关部门审问了当地居民，但是相关证据并不是在居民的协助下获得的。当地居民的恶劣如此态度，让人感到愤慨不已。此外，他们对第三帝国还有一系列敌对行为，例如发布对帝国不利的言论、窝藏武器弹药、非法使用无线发射机、控制大量货物以及主动为敌人的海外活动提供服务等，让人气愤难当。该村庄的居民帮助敌人谋杀党卫队的大队长海德里希将军并协助凶手的行径严重违反了法律，当地所有成年男性已被枪决，女性均被送往集中营，儿童移交给当地教育机构。村庄里的所有房屋被夷为平地，村庄的名字也已被抹去。

（注意：这是对晚上7点布拉格发布的捷克语公告的德语翻译，但当时的信号接收很差。）

他们的这种行为以及他们将其公之于众的做法都没有特别让我感到惊讶。真正让我惊讶的是，人们对此的反应竟然完全由当时的政治走向决定。因此，战前那些偏左派对任何来自德国或日本的暴行都坚信不疑。但现在偏左派已经不再相信对德国和日本战争暴行的指控了，他们自动把一切恐怖谣言都当成“宣传”。过不了多久，要是你说关于利迪泽的传言有可能是真的，就会遭人嘲笑。然而事实就摆在那里，德国政府已经承认，而且记录在了碟片上，肯定可以找得到。参见从1914年起的一系列暴行清单：德国在比利时、布尔什维克和土耳其的暴行，英国在印度的暴行，美国在尼加瓜拉的暴行，纳粹的战争暴行，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和昔兰尼加的暴行，西班牙的红白暴行，还有日本对中国的暴行[47]。对于每件事，人们都会根据自己的政治偏好来选择信或者不信，但他们对事实本身却毫不在乎，一旦政治方向变动，人们也会随意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

1942年6月13日

关于莫洛托夫来访一事，最不可思议的是，德国竟对此一无所知。直到条约正式签署，伦敦电台从未对此事做任何报道，而德国广播一直在大力叫嚣英国的共产主义倾向。显然，要是德方事先知道，他们肯定

会率先曝光此事。其他几件事（比如，去年，两名德国空降的业余间谍在英国被捕，他们的手提箱里装着便携式无线发射机和德国香肠），也说明德国在英国的间谍网络也不过如此。

以下是四份报纸上的新闻剪辑。

1.摘自1942年6月12日《论坛报》上关于威廉姆·梅洛[48]死亡的消息。

2.摘自1942年6月21日《雷诺新闻报》[49]上引用的希特勒演讲内容。

3.摘自1942年6月12日的《论坛报》（威尔弗雷德·马夏尔尼撰写的文章）。参见战前对轴心国的审查、无线电催眠等报道，以及德国政府关于科隆突袭发表的官方声明。

4.摘自《旗帜晚报》的《1942年我们如何生存》。有一幅五个女人的画像，标题是《苏联的冲锋枪女孩准备去战斗》。

1942年6月15日

开辟第二战场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了。所有的报纸每每谈及此事，都说这件事定会发生。莫斯科也对此进行了广泛宣传。当然，是否可行还有待观察。

1942年6月21日

英国广播公司里最令人哗然的不是败坏的道德风气，也不是我们现在做的无用功，而是一种沮丧感，一种什么事都不可能完成，甚至连想要成功做件坏事都做不了的感觉。我们的政策并不明确，组织杂乱无章，计划的变数太大，人们对情报局有一种恐惧和憎恨的感情，导致根本没办法制定任何广播宣传计划。有人策划访谈之类的节目，想要明确宣传时，开始会得到支持，随后就会被扼杀。理由不外乎说这样做“不

明智”或“为时过早”。之后，这个人又被告知要继续干，但是尽力淡化、删掉一切暗含的直白言论，接着又要用某种方式“修正”这样的言论，去掉其原本意思。但最后一刻，上级的秘密指令突然又叫停了全盘计划。后来，又要求你即兴策划一个不同的节目，但你对其毫无兴趣，这些言论也毫无意义。

你只能播一些毫无用处的内容，因为所有睿智的访谈节目总在最后一刻被叫停。此外，公司里人浮于事，很多人基本无事可做。就算有人成功地在广播里讲了一些不错的东西，也会因为这样的新闻无人收听而备受打击。我想，除了欧洲，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几乎没人会听，这是所有关注海外广播的人都知道的。他们对美国听众做过一次调查，据称，美国大约只有30万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在印度和澳大利亚，英国广播公司的听众则更少。近期的调查结果显示，许多有无线电短波收音机的印度人甚至都不知道英国广播公司对印度开通了无线电广播。

我参与的另一个公共活动也遇到一样的情形，也就是国家警卫队。成立两年以来，国家警卫队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训练，没有制定专业策略，没有确定的阵地，也没有建设防御工事——这都“归功于”不停改变的计划。我们根本毫无目标可言，而我们本应有一份完整具体的计划。部队组织的详细说明和阵地的规划等，一直在频繁变更，所以几乎没人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该有什么样的作战计划等。举个例子，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部队一直想在摄政王公园挖一条战壕，用来防范敌国空降部队的袭击。虽然我们一直挖来挖去，但目前还没完工，因为我们每次挖到一半，就会有新的计划，要求我们去执行其他任务。同上，所有事都是如此。不论做什么，你都知道总会有新的指令突然出现，不断改变，反复无穷。上面的人除了连续不断、举棋不定地改变计划，什么都做不了。于是，大家对改革产生了幻灭感。你能想到的最好情况就是，敌方的状况也和我们这里的差不多。

1942年6月24日

昨晚听了“哈哈勋爵”的广播——我说的不是威廉·乔伊斯，他已经从公众视线里消失一段时间了——乔伊斯听起来像是南非人，但广播里这个人带着点伦敦腔。广播里说了好多关于在曼谷的自由印度运动国会

的事。我惊讶地发现，播音员把所有印度人的名字都念错了，而且发音非常不标准——比如拉丝·巴哈利·鲍斯[50]这个名字就听起来像是拉什·贝瑞·鲍斯。可是，那些在德国做对印广播的印度人原本都可以纠正的这些错误的。他们说不定和“哈哈勋爵”一样每天出入同一栋大楼。能在战场另一边看到同样的疏忽，我觉得很有趣。

1942年7月1日

我在伍斯特郡的卡罗恩德村（待在一座农场里）。[51]没有噪音，只有飞机轰鸣声、鸟叫声和割草机的声音。除了偶尔谈论那些在附近农场里干活的意大利战俘，没人提及战争。人们觉得那些战俘干活不错，连采摘水果的活儿都让他们包揽了下来，这样就不用雇用本地的劳工们了——听说他们太滑头。尽管饲料短缺，但这里养了好多猪、鸭、鹅和火鸡。不过，这里的人们每顿饭还是能吃得上奶油的。[52]

大型轰炸机每天都从这里飞过，而且飞机飞行的样子非常奇怪，就像一架飞机用电线牵引着另一架飞机（也许是滑翔机？）或者是机身上背着另外一架小型飞机一样。

1942年7月3日

不信任案以475：25票被否决，这个数据表明弃权票很少。又是老一套——这场辩论被扭曲成了对丘吉尔信任票的辩论，而且因为没有人可顶替他的位置，所以大家不得不信任他。并且，某些攻击丘吉尔的政要明显动机不纯，比如说霍尔-贝利沙。如此，政府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不知道这场闹剧还要持续多久，但我猜不会太久。

丘吉尔的演说里没有提到开辟第二战场的事。

显然，日本很快就要进攻苏联了。他们的部队好像已经确定驻扎在了外阿留申群岛，看样子日本是要切断苏联与美国的联系。

自从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偏左翼政党的恐慌达到了顶点。《新政治

家》的头条新闻是《面对魔鬼党》。他们认为，放弃埃及是理所当然的。天知道这是否真的会发生，但他们此前常常预测埃及会失守，现在的老调重弹反倒让人觉得这件事不会发生。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们的举动总是和德国的期望一致——比如前一阵，他们要求我们停止对德国的袭击，然后把轰炸机转移到埃及去，后来又要求我们派轰炸机去印度。每次我们的所作所为恰恰都和德国“自由电台”的要求一样。更让人愤懑的是，左翼政党总是用一种轻蔑的态度讨论我们对德国的空袭——说空袭没造成太大的影响。而就是这些人，在对伦敦闪电战中叫嚣得最厉害。

1942年7月10日

一两天前，海军方面派来了几辆卡车，带来了一群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队员和水兵，花了好几个小时帮菲利普先生[53]拔萝卜。水兵们身穿蓝色裤子和白色背心，村庄里的女人为此都特别兴奋。“他们看起来真清爽，天啊！我爱死这些水兵了！他们看上去总是那么干净。”这些水兵和服务队队员们似乎很享受自己在岸上的休假时光，之后还能在酒吧小酌几杯。他们似乎属于某个志愿者组织，该组织负责把工人送到需要的地方去。菲利普夫人解释说：“这是来自莫尔文的一个志愿者组织。他们有时会派陆军运输勤务[54]，有时会派水兵出去。当然，我们很高兴他们能帮忙，这样就不必太依赖当地的工人了。现在，当地的工人都非常差劲，根本不肯多干一点儿活，因为他们知道你要依靠他们。而且现在，你也雇不到女佣做家务活儿了。村里没有电影院，女孩子们都不愿待在这里。我确实雇了一个女佣，但她什么活儿都不做。能有几个志愿者来干活真是帮了大忙。”

这是天大的好事。人们不应忽视农业生产，而且城里人也的确应该多接触土地，这非常合适。不过，有了这些志愿者组织，有士兵们来帮忙收干草，还有那些意大利囚犯，他们根本就是劳工破坏者——通过提供免费劳力损害劳工的利益。

政府在索尔兹伯里取得了胜利。《晨号》的编辑希普韦尔，曾是独立候选人。只要这骗子参选，政府都能自动获胜。要不是政府真金白银请他这么做，不然指定对他感恩戴德了。

蓝灵酒馆再次因为啤酒缺货关门了。因为一周内四五天人们都在开怀畅饮，啤酒才会缺货的。不过，有时，酒馆关门后，却有人看见当地官员在单间里喝酒，但普通士兵和工人们都被拒之门外。隔壁村“红狮子”酒馆的老板告诉我，他有一套不同的经营体系：“我没把所有的啤酒拿出来给夏天来这儿的游客。啤酒不够，我就说得先给当地人。很多时候，我的酒馆都不营业，只有当地人才知道怎么从后门进来。在田地里干活儿的农民想喝酒，他们现在吃得又不怎么好，但我只给他们限量供应。我跟他们说：‘你们现在看看这里，你们是总想喝啤酒的对吧？那你们是想每天晚餐的时候喝上一品脱，还是第一天喝四品脱第二天喝三品脱呢？’对于士兵们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不想阻止士兵们喝酒，但我只让他们第一次喝的时候喝一品脱，然后就说‘小伙子们，每次只有半品脱了。’这样，就能分啤酒给更多的人了。”

1942年7月22日

摘自艾哈迈德·阿里[55]最近从印度寄来的一封信。

这是我在老德里的一些见闻，你可能会感兴趣。

一条繁华的街道上，有个报童用乌尔都语大声叫喊着：“潘迪特·贾瓦哈拉尔[56]倒念《玫瑰经》啦。”报童的意思是此人对政府的态度有所变化。有人问他时，他会这样回答：“永远都别相信他，今天他站在政府这边替政府说话，说为战争付出了多少努力，明天他又会站在反政府的立场上。”然后，报童就转身离开了，继续大声叫喊着：“贾瓦哈拉尔向政府提出了挑战。”但是这样的“挑战”在报纸上根本找不到。

其他卖乌尔都语报纸的报童们大声叫嚷：“德国在第一次袭击中大败苏联。”不用说，第二天早晨我在英语报纸上看到了完全相反的内容。显然，乌尔都语报纸一直在重复柏林报道过的内容。没人阻止那些报童的随意叫嚷。

有天，我乘坐轻便双轮马车出行，听到车夫对自己后退不前的马嚷嚷：“你怎么能像萨卡尔一样后退！像希特勒一样前进吧！”然后他开始大声叫骂。

去市场和集市上很有趣，能听到各种各样闲聊的八卦——当然，如果天气不是很热的话。要是你感兴趣，我将对你一一道来。

1942年7月23日

比起以前，我现在很少写日记了，因为根本没多少空余时间。但我做的都是无用功，现在可以证明我没浪费时间的事情越来越少。大家应该都一样——最令人挫败的感觉莫过于终日游手好闲，净做愚事。这些事之所以愚蠢，并不是因为它们有关战争——战争的本质就非常愚蠢，而是因为做这些事根本没用，丝毫不会影响战争进程。但我们深陷于这个国家巨大的官僚机构中，这个机构认为做这些事很有必要。英国广播公司每天播报的新闻大都直接被淹没了，没人听，负责人也知道没人听。为了制作这些没用的节目，上百个技工聚在一起，每年花费国家成千上万英镑。上千个没有在工作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用之才，每天都坐在那里假装工作。这种状况随处可见，在政府部门里尤其突出。

然而，有时候你撒在水里的面包屑会漂到其他陌生的地方去。关于现代英语文学这个话题我们做了一系列访谈，共六期。这些访谈曲高和寡，在印度根本没人听。而一名中国学者萧乾听了这次节目深受感动，便用中文写了一本关于现代西方文学的书，其中大部分内容都引自我们的节目。如此，目标地为印度的宣传没在印度获得成功，却“吸引了”中国人，也许影响印度的最好方式就是向中国人播节目。

印度国民大党以及其出版社，又一次被合法化。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取消对《工人日报》的禁令，不然政府的处境简直荒谬。

这让我想起了大卫·欧文曾跟我讲过的一个故事，应该还没有在日记里提到过。当时，克里普斯抵达印度后，要求总督释放被囚禁的共产主义分子。总督同意了（我猜大部分人应该是被释放了），但最后一刻，总督临阵退缩，紧张不安地说：“你怎么肯定他们真的是共产党呢？”

据说，我们要增加20%的马铃薯消耗量。一部分是为了节省面包，还有一部分是为了解决今年生产过剩的马铃薯。[57]

1942年7月26日

昨天和今天参加了英国地方军的演习，路过了许多小军营和雷达站。军营里士兵们的样貌令人印象深刻。他们都身强体壮，但脸上残酷的表情让我们非常震撼。士兵们都很年轻，四肢圆圆胖胖，面容粉红，皮肤清亮。但他们脸上的神情阴沉而残忍——不是凶残，也不是邪恶，仅仅是被无聊、孤独、不满和无尽的疲劳折磨得麻木，剩下的只有健康的体魄。

1942年7月27日

今天和苏丹那聊天，他是一位马耳他语播音员。他说自己一直和马耳他有密切接触，那里的状况很糟。“今早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更像是——怎么说呢？——像个滤网一样。审查人员删掉了不少，你明白的。但我还是从里面悟出了点东西。”他接着告诉我，在马耳他买5磅马铃薯竟然要8先令。他认为最近那两个试图进入马耳他的车队，其中一个车队来自英国，带着军需品成功抵达；另外一个来自埃及，带着食物，却没能成功。我说：“他们为什么不用飞机运送脱水食品？”他耸了耸肩，似乎本能地认为英国政府决不会在马耳他这个小国家上大费周章。但看起来马耳他人坚定不移地支持英国政府，当然这都得感谢墨索里尼。

德国的广播节目声称伏罗希洛夫在伦敦，这不大可能，而且这里也没有这样的流言。也许这只是瞎猜，为了弥补最近莫洛托夫一战的失利。预测称有高级别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来到了这里。若果真如此，我就得改变我对德国在英国情报机构的看法了。

右翼报纸称，在特拉法加广场呼吁开辟第二战场的人数约有四万人，而左翼报纸则称实际上约有五万人。我的线人报告说，虽然现在支持共产主义的人喊着“所有权力归属丘吉尔”的口号，但实际上他们在背地里狠狠地抨击了政府。

1942年7月28日

现在我读报没有以往读得多了，但在我常看的几份报中，除了《新闻纪事》，其他的已经很少热衷于谈论第二战场的开辟了。《晚间新闻》在报纸的头版发布了一篇反对开辟第二战场的文章（作者是布朗明格将军[58]）。我跟赫伯特·里德[59]谈起此事，他沮丧地说："政府命令他们不许走漏半点风声。"当然，如果他们打算做点什么，看起来也肯定是要对此拒不承认了。里德认为，目前苏联的局势十分危急，他看起来忧心如焚，但在以前他比我更反对斯大林。我对他说："现在苏联处于困境，难道你对苏联的看法变了吗？"他说是的。其实，看到英国身陷险境，我对英国的看法也完全改变了。回想一下，过去苏联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十分强大时，我是反对苏联（确切地说是反斯大林）的，大概是1933年到1941年吧。但在此之前和之后，我却是支持苏联的。你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这种事。

昨晚，伦敦市郊发生了一起小规模袭击事件。我们用了新型火箭炮，其中一些现在只有地方军才配备，据说还击落了几架飞机（总共打中了八架飞机）。

这可以说是地方军成立后两年多以来第一次真正参与行动。

德国从不承认有军事设施遭到破坏，但这次大规模袭击后，他们承认有平民伤亡。两天前，汉堡袭击事件后，德国政府声称平民伤亡十分惨重。英国媒体十分自豪地报道了此事。但两年前，杀死平民百姓这种事会让人惊讶不已。我记得在某次闪电战时跟某人说过——当时英国皇家空军正尽全力进行回击——"一年内，你会看到《每日快报》上出现这样的头条标题：《成功袭击柏林孤儿院：婴儿身陷火海》。"还不到一年，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

[1] 克里普斯于3月22日飞往印度，同印度国大党，即印度独立的党派，探讨和解事宜。他希望战争期间能取得同印度的合作机会并获得印度的认可，希望在战争结束时能逐渐独立。但尼赫鲁和印度国大党只接受完全独立，所以谈判在4月10日破裂。

[2] 奥威尔在公司负责撰写关于印度的新闻。他写了55或56篇有关印度的英语新闻，30篇关于马来半岛，19篇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他还写了115或116篇新闻稿，后来被翻译成吉吉拉特语、马拉地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和印度斯坦语。

[3] 妇女辅助本土服务部队，后变成了皇家陆军妇女军团。

[4] 以"威廉·赫基"为名负责每日快报的社会专栏已有五十余年的历史，这个专栏先后出过多名编辑记者。此外指该专栏的一名记者。

[5] 哈罗德·尼克森（1886-1968），评论家、传记作家、国会议员。

[6] 指英国广播公司在德国的英语广播。

[7] 一个在德国的英语宣传广播站。

[8] 维克多·塞尔吉（1890-1947），作家、记者，出生于布鲁塞尔的一个流亡的俄国知识分子家庭，后被法国人领养。由于维克多和托洛茨基联系密切，他于1933年被驱逐到西伯利亚。

[9] 谢尔文卡博士（1906-1996），印度作家、记者，二战期间任印度驻英国的新闻通讯员。

[10] 《每日镜报》是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左翼报纸，由于采用了丘吉尔所谓的失败主义立场（即批评政府对战事的处理不当）而受到警告。

[11] 安奈林·比万（1897-1960），英国工党议员，1939年的大部分时候都与本党派议员的意见相左，尽管品行端正，但因支持克里普斯的人民阵线运动而被驱逐出党。1942年到1945年，他任《论坛报》编辑（对于像他这样13岁就辍学、基本没有读写能力的人，有此成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2] 赫伯特·莫里森（1888-1965），英国政治家，1923年起成为工党议员，1933年到1940年任伦敦郡议会会长，1940年到1945年任国土安全秘书长兼任大臣。1945年到1951年在克莱门特·艾德礼的两届政府中，担任下议院议长兼副首相。

[13] 威廉·康纳（1900-1967），卡桑德拉是他的笔名，一名颇有名气的激进派记者。

[14] 汤姆·琼斯博士（1870-1955），曾任劳合·乔治的内阁秘书。

[15]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1890-1964），英国政治家，1939年到1942年任常任陆军副大臣，1942年到1945年任常任陆军大臣。

[16] 这最初源于奥威尔的文章《威尔斯、希特勒和世界国》，于1941年8月发表在《地平线》上。后来奥威尔做了一档《重游欧洲》的广播节目，更是给这件事火上浇油，他还为此给《听众》写过文章。当时威尔斯和奥威尔就《地平线》上的文章一事大吵特吵。威尔斯认为德国将要战败，奥威尔认为这根本是对公众舆论的误导；而威尔斯指责奥威尔是个失败主义者，尽管后来他收回了这句话。虽然这次争吵的结局还不算太坏，但后来因为奥威尔的文章在《听众》发表，争吵再次升级，最终导致了上文提到的那封对奥威尔的辱骂性信件。

[17] 苏巴斯·钱德拉·鲍斯（1897-1945），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印度国大党的左翼国会成员。他是狂热的反英分子，曾组建印度国民军与日本合作共同对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后失败。

[18] 弗兰克·内森·丹尼尔·布克曼（1878-1961），福音传道士、宣传家。1921年创立了“道德重振”运动，该运动又因其创始地而被命名为“牛津团队运动”。

[19] 穆尔克·拉吉·安纳德（1905-2004），小说家、故事家、批评家。生于印度，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正是在西班牙，他遇到了奥威尔），后在伦敦郡议会成年人教育班上教授文学和哲学。1939年到1945年，他为英国广播公司写电影脚本。战后他回到印度，在多所大学里讲学。

[20] 克利须那·梅农（1897-1974），印度政治家、律师、作家、记者，曾旅居英国。曾热衷于英国左翼政治活动，并在印度独立运动中担任印度国大党在英国的发言人。

[21] “英国将生，谁为之死？”出自吉卜林的诗《为我们能成为的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22] 克里普斯去印度执行的任务。

[23] 1942年4月18日，16架B-25轰炸机在詹姆斯·杜利特尔上校的带领下，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这次事件产生的心理效应远大于军事效应。

[24] 1940年到1941年冬天，鲍斯在德国的帮助下，途径阿富汗逃离了印度。抵达莫斯科时，苏联“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却完全回避要帮他这件事。他去了柏林后，德国更是热情地接纳了他”。后来他在德国一直待到1943年的2月8日，随后乘坐一艘U型潜水艇，从基尔离开了德国。

[25] 同盟军于1942年5月5日在马达加斯加登陆，并于9月份占领整个小岛，鉴于在印度洋一战中他们海军损失惨重，马达加斯加就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了。马达加斯加岛之前一直支持贝当领导下的法国维希政府。

[26] 听说德国要在1942年6月从克里特岛向东前进了。于是，同盟军入侵叙利亚，随后从法国维希政府的军队手里夺取叙利亚。

[27] 托马斯·雷恩巴勒原是一位共和党人，曾在内战中为了英联邦共和国而斗争。在《论坛报》上采用的笔名是为了例证一种极端激进的平等主义观点。

[28] 法兰克·欧文（1905-1979），记者、作家、广播员，1929年到1931年曾是自由民主党的一员。1931年到1941年任《每日快报》编辑，1938年到1941年任《旗帜晚报》编辑（这两家报社都归右翼政治家比弗布鲁克所有）。

[29] 弗雷德里克·沃伯格（1898-1980），瑟克·沃伯格出版社的常务董事，奥威尔的出版人。

[30] 珊瑚海之战从1942年5月4日一直持续到5月8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海军参与由飞机带领进行的海战。

[31] 括号里这段话是1942年5月30日奥威尔在手写稿上加上的。

[32] 一个关于苏英合作的二十年契约，于1942年5月29日在伦敦正式签署。

[33] 克劳德·奥金莱克（1884-1981），英国著名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过美索不达米亚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参加1940年的挪威战争，后以失败告终。1941年7月，他在北美从总司令韦维尔手里接管了第八军团。虽然他在战争中曾屡打胜仗，但失去了温斯顿·丘吉尔的信任，被调去了印度。他在印度训练军队，参加了缅甸战役，为第十四军团提供物资，成就巨大。

[34] 右翼记者，1908年至1942年担任《观察家报》的编辑。

[35] 大卫·阿斯特（1912-2001），1940年至1945年在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服役（1944年被授予英勇十字勋章），后成为《观察家报》的一员。

[36] 德斯蒙德·霍金斯（1908-1999），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广播员，战争期间在英国广播公司做兼职。

[37] 弗兰克斯·达尔朗（1881-1942），法国海军总司令，1941年到1942年任维希政府的副总理和外交部部长。

[38] 金斯利·马丁（1897-1969），左翼记者，1930年到1960年任《新政治家》编辑。

[39] 威廉·燕卜荪（1906-1984），诗人、批评家，战前曾在东京和北京担任英国文学教授，和奥威尔一样，他也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负责远东区域新闻编辑和对华广播。

[40] 杰克·科蒙（1903-1968），泰恩赛德工人，任职于《阿德尔菲》，1930年6月任报纸推销员，1932年担任编辑助理。他和奥威尔在马拉喀什时成了朋友，当时他就住在奥威尔在沃林顿的小别墅里。

[41] 大卫·欧文（1904-1970），1942年2月19日到11月21日担任克里普斯的私人助理。

[42] 诺尔曼·卡麦隆（1905-1953），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朋友，同罗伯特和艾伦·霍奇一起，三人共同编辑了《密切合作》。

[43] 伊·伯吉斯（1911-1963），先后在英国安全局和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作为谈话节目制片人），后来进入外交部。

[44] 对克里普斯来说，他不太可能会在这样一次私人访谈中说出自己的想法，不过他提出的观点实在是有趣极了。（作者原注）

[45] 温斯特勋爵（1885-1961），英国政治家，1923年到1924年任英国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1940年5月到1941年12月在海军部任职。

[46] 莱茵哈德·海德里希（1904-1942），德国安全部（盖世太保、刑事警察和党卫队安全部）部长，海因里希·希莱姆的助手，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策划人，1941年9月被任命为“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摄政者”。1942年5月27日，几名受训于英国的捷克爱国者的人偷袭了他，海德里希身受重伤，于6月4日离世。为了替他报仇，德国人“清洗”了整个村庄。

[47] 奥威尔曾于1942年1月14日给萧乾的信中邀请他来做一次访谈节目，讨论关于日本侵华“所犯的公认的罪行”。这次节目后于1942年2月26日播出。

[48] 威廉姆·梅洛（1888-1942），左翼记者、作家，1903年至1930年任《每日先驱报》编辑。随后进入奥当思出版社担任助理执行编辑，1937年成为《先驱论坛报》的编辑。

[49] 《雷诺新闻报》是一份亲工党的周报。

[50] 拉丝·巴哈利·鲍斯（1880-1945），与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无任何血缘关系。1911年起他一直致力于印度独立运动。

[51] 这是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期间的唯一一次休假。从1942年6月28日到7月11日，他一直住在伍斯特郡的卡罗恩德，大部分时间都在钓鱼。

[52] 虽然当地允许制作少量奶油用于出售，但为了节约资源，已经停止了正常规模的生产和销售。

[53] 大概就是奥威尔住的那个农场的主人。

[54] 指皇家陆军妇女军团。

[55] 艾哈迈德·阿里（1910-1994），巴基斯坦作家、孟加拉国英语教授，曾于1942年至1945年担任英国广播公司驻新德里分公司的听众研究主管。

[56] 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先是担任印度的秘书长，后成为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总统，虽然与甘地的政见常常相反，他依然与甘地有密切联系。1947年印度独立后，他成为首任印度总理。

[57] 国家粮食部（艾琳工作的地方）推出了卡通人物“马铃薯皮特”，就是为了让人们每天可以多吃点马铃薯。

[58] 道格拉斯·布朗明格（1886-1946），英国将领，于1939年至1946年任英国远征军副官。1940年退休后，于1941年被聘任为英国地方军区和部门指挥官。

[59] 赫伯特·里德（1893-1968），诗人、批评家、教育家。

1942年8—11月

1942年8月1日

如果数据准确，那么上次空袭中，德国大概损失了10%的兵力。据彼得·梅斯菲尔德[1]说，这次损失跟新型火箭炮没任何关系，而是一种新型夜间战斗机造成的。他还告诉我，新研发的弗兰克-威廉姆斯190型号战机比任何现有的战斗机都厉害。飞机工程师鲍耶现在跟我们一起做节目，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奥利弗·斯图尔特[2]认为最近几次的德国突袭是侦查性的，德国很快会发动一次大规模空袭，不管怎样他们都要从苏联战场上腾出手来干别的。

周末银行放假，无事可做。[3]有时间，我就会搭建鸡舍。现在这种活儿需要创造力，因为木料不好找。每次做这种事，都不会有浪费时间的内疚感——相反，任何业余活动都很有用，至少是合理的。

1942年8月3日

大卫·阿斯特说丘吉尔在莫斯科，还说不会开辟第二战场。但如果政府真打算开辟第二战场，那他们肯定会不遗余力地传播相反的消息，而大卫·阿斯特可能就是传播谣言的人之一。大卫·阿斯特说突击队抵达时，德军都不反抗，而是很快撤离了战场。毫无疑问，他们肯定在执行命令。这件事被禁止公布——可以推测是为了避免群众变得盲目自信。

大卫·阿斯特称，克里普斯的确打算从政府部门辞职[4]，而且他也准备好了后备方案。当然，他不可能在公共场合这样讲，但私底下肯定说过。不过我听说，麦克姆雷[5]最近和克里普斯在一起时，根本没办法从他嘴里套出话来，所以也不知道克里普斯的政治意图。

1942年8月4日

土耳其无线电台（包括其他电台）都说丘吉尔在莫斯科。

1942年8月5日

印度政府公布了一次警方突袭国会总部时获取的文件——这一鲁莽举动引来了群众的不满和失望。[6]和之前一样，对重要文件可以有多种解读，但随之导致的争吵只会让国会中本来就摇摆不定的人更加坚定地支持英国。文件在美国的公布（也许还有苏联和中国）唤醒了反英情绪，长远来说，对我们并无好处。苏联政府声称文件揭露了一场沙皇复辟阴谋，真是老套。我不禁隐约觉得，这件事多少跟同一时间发现的甘地与日本合谋一事有关。

1942年8月7日

战争让休·斯莱特非常沮丧。他说，按照苏联撤军的速度来看，报道上称铁木辛柯的军队毫发无损地撤离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莫斯科报纸和广播显示，苏联军队士气低落。除了沃伯格，像我认识的大部分人想的那样，休·斯莱特认为不会开辟第二战场。这是大家根据丘吉尔去莫斯科访问一事得出来的结论。人们都在问：“为什么丘吉尔要特地飞去莫斯科告诉苏联我们要开辟第二战场？他肯定是去告诉他们，我们根本做不到。”要是丘吉尔像基钦纳的船一样在回国的路上沉了该多好，大家都很认同我的想法。[7]当然，丘吉尔也很有可能不在莫斯科。

昨晚我第一次成功拆卸了一把斯特恩式轻机枪[8]。这种枪没什么好研究的。要是枪出了什么问题，你直接扔掉它再换新的就好。不带弹夹的话，枪身重量为5.5磅——一把冲锋枪约重12到15磅。价格比我预想的50先令要低，只要18先令。我可以想象，把一两百万支这种冲锋枪、每把五百颗子弹的子弹量和一本说明书，通过小降落伞投放到整个欧洲的情景。要是政府有胆量这样做，就说明他们真打算背水一战了。

1942年8月9日

今天第一次用斯特恩式轻机枪进行了射击。没有反冲力，没有震动，声音很小，精准度还不错。我大约发射了2500发子弹，中间两次卡壳，其中一次是因为哑弹——只需要用手拉动枪栓就可以了。

1942年8月10日

尼赫鲁、甘地、阿扎德[9]以及许多其他人都进了监狱。印度大部分地区发生了骚乱，多人身亡，被捕的人不计其数。艾默里[10]发表了可怕的演讲，称尼赫鲁和指挥官为“恶人”“破坏分子”。当然，帝国广播已经播出这些内容，全印广播电台又进行了重播。最好笑的是，德国政府想尽办法试图堵住消息，却没有成功。

印度人民以及那些同情印度的人都十分沮丧。一位穆斯林联盟[11]成员博哈里几乎掉了泪，一直说要从英国广播公司辞职。这真奇怪，现在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比一次军事失利更让我失望。

1942年8月12日

今天早上政府发布了有关印度事件的政策，简直骇人听闻。这场暴乱毫无意义——政府已掌控局势——毕竟死亡人数不多。至于参加暴乱事件的学生们，可以用“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学生们对于参加这种事件总是很兴奋”等这样的说辞解释。几乎所有人都十分反感此事。一些印度人听到这样的事情后脸色煞白，真是让人感到奇怪。

大多数媒体选择了强硬的立场，《罗斯梅尔报》也是如此，实在令人不齿。即使目前对印度采取的遏制措施看起来颇有成效，对这个国家的长远影响也将非常糟糕。一切似乎都在为反动派的回归做准备，目前的政策看起来似乎就是要放任苏联。今天下午看到大卫·欧文·埃默里在多尔曼·史密斯[12]报告的基础上做的关于对缅甸战后政策的绝密声明，让人想到了今后五到七年一次“直接统治”的回归。缅甸的战后恢复将由

英国出资，而英国的大财团将按照以前的模式重建。上帝啊，请不要让这样的文件落入敌人之手。不过，我确实从欧文手里和其他机密文件里挖到了一些信息——目前为止，政府已经彻底实行了焦土政策。

1942年8月14日

今天是哈拉宾广播，我们一如既往地对听众介绍，他曾是韦尔的《历史史纲》和尼赫鲁的《世界历史总览》的地图绘制者。这些之前都被广泛报道过，哈拉宾和尼赫鲁的关系对印度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今天的广播里切掉了对尼赫鲁的介绍——因为他被关进了监狱，所以成了坏人。

1942年8月18日

摘自乔治·科普从马赛的来信（唠唠叨叨地讲了他目前正在做的工程）：“……我正打算开始工业化规模的生产。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要这么做，因为我和公司签了明确的合同，恐怕最近跟公司方面关系的发展会限制其独立性。也许另一家公司会最终从中得利，但我不想看到这种事发生，因为我和那家公司没有合约，今后也暂时不打算签订任何协议。要是被停薪留职，我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希望那些经常跟我通信的朋友们不会有太消极的情绪。要是这个领域没有工作前景，我就打算利用我的另一项跟建桥有关的技能。你还记得吗，战前我参与了圣马特奥大桥的修建。”

破解：“法国恐怕要和德国结盟。如果第二战场暂时不开辟，我将尽快逃回英国。”

1942年8月19日

今天英国对迪耶普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突袭，傍晚仍在继续。可能这是入侵的尝试性举动，我也不清楚。果真如此，那今天在对法国人的广

播里所谓的“这只是一次突袭，他们没有必要参加”的说辞可能只是烟幕弹。

1942年8月22日

大卫·阿斯特为迪耶普突袭一事心情低落，他近距离观察到了这次事件的全过程。他表示这次行动几乎是完败，仅仅是严重摧毁了德国的战机队，但这并非在计划之中。他说媒体的报道完全歪曲了这件事，现在给首相递交了错误的报道。事实是：这次行动有5000多人参加，其中至少2000人被杀或被俘。原计划的登陆时间比实际时间短（原计划下午4点撤离），但他们摧毁迪耶普全部防御工程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实际上，这次行动造成的破坏不算大，只打掉了几座炮台。而且三个小分队里只有一个队伍完成了任务，其余两个分队都没什么进展，许多士兵在海滩上就牺牲了。德军的防御体系令人恐惧，即使有炮火支援也很难攻破，因为他们的大炮都隐藏在悬崖下和巨大的混凝土掩体里。被炮火击沉的坦克登陆艇比上岸的还多。大约有二三十艘坦克船成功登陆，但没有一艘返航。报纸上刊登的关于坦克被运回英国的照片显然是假的。人们普遍认为，德军肯定是事先得知了这次突袭行动。[13]行动刚开始，德军就雇人在海滩上播报虚假的“目击”情况，还让另外一个人用英语广播虚假命令。此外，德军显然对我们的空袭支援能力非常惊讶。虽然他们经常让战斗机停在地面上保存实力，但他们听说坦克登陆后，就立即派出了战斗机，结果损失的飞机数量庞大，一些皇家空军的军官说估计有270架。由于英国空军力量强大，驱逐舰全天都停在迪耶普港口，其中有艘军舰被海岸炮台的炮弹击沉。军队接到命令攻击岸上的目标时，驱逐舰会排成队列开向岸边，对目标发射炮弹，同时还有战斗机在空中支援。

大卫·阿斯特认为，这次行动无疑证明了入侵欧洲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考虑他父母的身份地位，我们无法确定他是不是故意这样讲的。我不禁想到，他们能在这样一个防守严密的地点登陆，没有轰炸机和炮火的支援，也没有空降兵，只动用了驱逐舰（我猜是4.9厘米口径的枪），真是可观之绩。

1942年8月25日

印度人中流传着一个谣言：尼赫鲁、甘地以及其他人都要被流放到南非。这就是新闻审查和压制媒体的后果。

1942年8月27日

政府对《工人日报》的禁令取消了。[14]报纸将在9月7日重新发行（那天也是丘吉尔对议会发表声明的日子）。

德国广播再次宣称鲍斯在槟城。但他们在广播里暗示，这是因为鲍斯自己不小心说漏嘴才走漏了消息。

1942年8月29日

酒吧里一则关于提神药的广告——非那西汀或者类似的东西：

闪电战

医疗专家的大力推荐

“闪电般”的奇妙发明

百万人已服用

包治

宿醉

战争忧虑症

流感

头痛

牙疼

神经痛

失眠

风湿病

抑郁症等

不含阿司匹林

另一个在印度人中流传的谣言是尼赫鲁逃跑了。

1942年9月7日

显然，叙利亚是真的遇到麻烦了。今天有消息说——我们和莫莱森政府的意愿相反——戴高乐将军坚持说叙利亚仍然受法国管理，因此不可能像伊拉克一样签订协议。尽管戴高乐将军的态度可叹，可是法律权限又模糊不清，因此，莫莱森政府没办法签约。换句话说，叙利亚无法签订协议，这一切都应该归咎于我们的傀儡戴高乐将军，而且要是有可能，我们就该把叙利亚拿下占为己有。我看到今早鲁什布鲁克·威廉姆斯[15]胡言乱语时，大家都面无表情地听着。不知怎么回事，我想到了哈代的《列王》里关于拿破仑在米兰大教堂加冕的诗句：

不要为主教的话语踌躇，

他唇边的笑已经畸形，

为了保佑那些一心想赢得，

被其他游荡者温暖过的金色座椅的人？

《工人日报》重出江湖了——这次内容很温和，但是他们要求：开

辟第二战场；动用武装力量全力支援苏联；鼓动提高全国人民的收入。但第三点完全与前两点相悖。

1942年9月10日

昨晚在伦敦兰贝斯的莫利学院演讲。大厅很小，到场的约有100人，听众都是工人阶级里的知识分子（与英国左派读书俱乐部[16]的成员基本上是一类人）。在随后的问答环节，至少有六名听众都问“演讲者是否认为取消对《工人日报》的禁令是一个错误”——因为《工人日报》不可信，完全是浪费纸张。只有一位妇女为《工人日报》挺身而出，显然她是一位共产党人，在座的其他人中，有一两个人对她很不耐烦。（“老天，她来来回回总说那些！”）过去一年里不断出现解除禁令的呼声。如果一个人总听那些少数派的声音，就会忽略剩下99%的声音。就慕尼黑事件来说，虽然大部分人民都支持张伯伦的政策，但如果你只读《新政治》，就根本不会产生这种感觉。

1942年9月15日

丘吉尔在演讲中提到，他对印度的局势无能为力。顽固派打算再尝试一次他们认为的艰难举措，而且报纸的行为太无耻：他们分明知道公众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甚至没兴趣去验证事实的真假，还完全扭曲了整件事。最后一个是最坏的征兆——虽然我们对印度很冷漠，但比起印度知识分子对欧洲反对法西斯战争的冷漠，这态度还算好的。

1942年9月21日

昨天，我第一次和利德尔·哈特见了面。他是个悲观的人，我觉得他主观上是支持纳粹的。他对轰炸吕贝克的野蛮行为深感忧虑，认为近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在战争暴行和破坏性事件方面的记录相当差劲。虽说他反对开辟第二战场，但又迫切希望我们取消轰炸计划。在他看来，做这些根本没有意义，不会有任何结果，也不会削弱德国的军力。此

外，我们一开始就不应该轰炸（他一直坚持说是我们先开始的），因为这种举动只会换来敌方更强烈的报复。

奥斯伯特·西特韦尔[17]也在场。他曾经一度与莫斯利运动扯上关系，但与利德尔·哈特相比，他没那么亲德。两人都对我们这次夺取维希殖民地的举动表示不屑。西特韦尔说，我们的座右铭是“事情变糟时，我们就夺回马达加斯加”。他说在康沃尔，地方志愿军已经接到命令，一旦遭到入侵就枪毙所有艺术家。我认为康沃尔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西特韦尔说：“一些人的本能会让他们杀死好人。”

1942年9月22日

我们斯特恩式轻机枪的弹药大多是意大利制造的，或者说是德国为意大利制造的。我想这大概是英国军队拥有的第一个以毫米，而不是英寸计算口径的武器。英国当时打算制造一种廉价的新型自动化武器，而且刚好从埃塞俄比亚缴获了大量弹药，所以要生产口径符合这些弹药的枪支武器，而不是生产适用枪支的弹药。这样做的好处是，这种弹药几乎适用于欧洲大陆任何一种冲锋枪。真想看看德国和日本能不能制造出303毫米口径的武器来搭配使用从英国缴获的弹药。

1942年9月28日

昨天在摄政公园举行了一场露天教会游行。那场面本该非常感人——空心阵型的队列、冷溪卫队的军乐队，还有脱帽致敬的人们认真地唱着圣歌。美丽的秋天，笼罩着一层薄雾，就连叶子都静止了，几条狗在欢呼雀跃。不幸的是，布道内容竟然全是宣扬侵略主义的不耻言论，这样的场合总会发生这种事，而且我越听就越觉得自己想支持纳粹。还有一场特殊的祷告——“为了斯大林格勒的人们”——真是犹大之吻。在这种场合让我感到特别不舒服的一个细节问题就是牧师的白袍，在军装的背景下看起来尤其别扭。军乐队的职业素养让人钦佩，尤其是乐队指挥（一位头戴黑色近卫军尖帽的军官）。每段祈祷结束后，乐队就演奏激动人心的乐章，他们从手提箱里拿出了长号，乐队指挥的指挥棒扬起，所有人都做好了准备，牧师说“奉主耶稣基督之名”后，大家齐声喊

出了“阿门”。

1942年10月5日

印度即将任命新的总督，不知道会是谁。有人猜是奥金莱克将军——据说他跟印度左翼势力关系密切。

布拉德纳结束了六个月印度之行回来后，我跟他进行了一番长谈。他的结论令人十分沮丧，我没办法一一记录。简而言之——印度的真实情况比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了解的都要糟糕得多，其实印度的局势可以扭转，但由于政府坚决不让步，所以情况根本没办法改变。一旦日本入侵，印度的局势将会失控，陷入混乱之中，而且我们的广播也完全没用，因为根本没有听众。不过布拉德纳确实说过，印度人是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的，因为他们认为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比日本和德国的更可靠。他认为我们公司应该只广播新闻和音乐，其他什么都不要。这就是过去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说的。

1942年10月10日

今天，为了庆祝中国革命的纪念日，我们在广播大楼外高高挂起了中国国旗。但不幸的是，国旗挂颠倒了。

根据大卫·阿斯特的描述，克里普斯很快就要辞职了——战时内阁不过是虚有其表，丘吉尔才是内阁中唯一掌权的人。

1942年10月11日

加拿大当局囚禁了一批德国囚犯，而囚犯的人数正好和囚禁在德国的英国囚犯的人数相同。我们到底要怎样才肯罢休？

1942年10月15日

英国多少受到了印度的影响。几周以来，马拉地语的新闻被翻译成了英语，由一个叫科萨里的小个子男人广播。他体型偏胖，却还算聪明。据我目前判断，他非常反对法西斯主义。忽然之间，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负责招聘的神秘人士（我觉得是军情五处的人），知道了科萨里曾是一名共产党人，可能他现在也是，他热衷于学生运动，曾经下狱，所以要开除他。另一名年轻人在印度大楼工作，名叫贾萨，他政治上没什么问题，就顶替了科萨里的工作。马拉地语翻译不好找，而把马拉地语当成母语的印度人一到英国好像就把这种语言忘得一干二净了。几周之后，我的助理奇塔来小姐十分谨慎地告诉我，其实新闻还是科萨里写的。而尽管贾萨能读懂马拉地语，却写不出文章，所以科萨里就为他代笔，当然，贾萨的工资得两人平分。我们找不到更合适的译者，所以科萨里就一直这样工作。而对外的时候，我们权当不知道这件事。不管是从哪里找来的印度人，这种事都不可避免。

1942年11月15日

今早教堂的钟声响起了——为了庆祝埃及的胜利。这是两年多以来我第一次听到教堂的钟声。

---

[1] 彼得·梅斯菲尔德（1914-2006），1939年到1943年担任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第八航空队的通信记者。

[2] 奥利弗·斯图尔特（1895-1976），1939年至1962年任《航空学》编辑。

[3] 这个周末奥威尔在沃林顿的小屋里度过。

[4] 克里普斯之前差点辞职，但1942年11月22日才离开战时内阁。离职当天，他被任命为飞机生产部的部长，直到战争结束。

[5] 约翰·麦克姆雷（1891-1976），曾任伦敦大学教授。

[6] 1942年8月初，甘地发起了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了维持秩序，警察对国会总部进行突袭，查获了一份交由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保管的关于印度独立决议的原始稿件，随后将其公之于众。

[7] 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元帅（1850-1916），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陆军大臣。当时他搭乘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汉普顿”号去苏联执行任务，结果舰艇在海上触雷，基钦纳身亡。

[8] 斯特恩式轻机枪由于造价低廉和性能良好，受到战士们的一致好评。

[9] 阿布·卡拉姆·阿扎德（1888-1958），印度民族主义穆斯林领袖，1945年印度独立协商会议上担任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发言人。

[10] 里奥·艾默里（1873-1955），英国保守党下议院议员，曾于1940年至1945年担任印度的国务大臣。

[11] 穆斯林联盟成立之初是一个保护英属印度穆斯林利益的宗教组织。1935年前一直支持印度国民大会党，后印度教领导了国大党，该组织就发展成了一个政治团体。

[12] 多尔曼·史密斯（1899-1977），曾在1941年至1942年英国大撤退时期统治缅甸。

[13] 据说，德国人破解了英国军队的密码，所以才提前得知了突袭一事。

[14] 《工人日报》于1941年1月22日被禁止发行。

[15] 鲁什布鲁克·威廉姆斯（1890-1978），从1941年到1944年11月，任英国广播公司东方节目部主管。

[16] 左派读书俱乐部，由维克多·格兰茨于1936年成立，每月发行一本关于反法西斯或社会主义主题的月刊。俱乐部的本地小组会议在1942年中期又活跃起来，成立了大约50个支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就是在这个俱乐部的赞助下出版的。

[17] 奥斯伯特·西特韦尔（1892-1969），曾在伊顿中学上学，于1912年至1919年在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服役。

George Orwell

奥威尔作品集

1984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韩阳 王喆 译

NINETEEN EIGHTY-FO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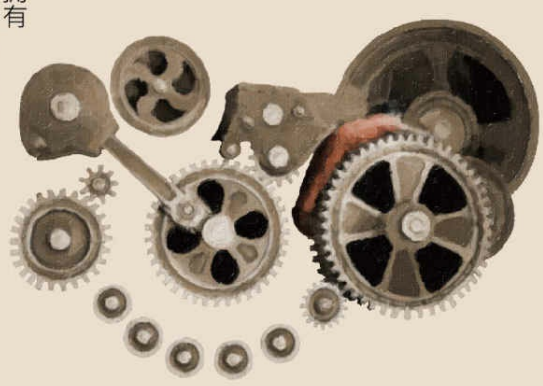
奥威尔首先是先知，其次才是圣徒。

——止庵

他能够在目睹最糟境况的同时为最美好的东西而战。

——Granville Hic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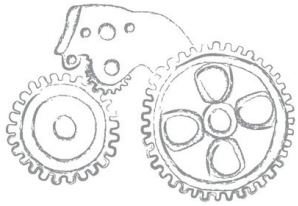
自由就是拥有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若此前提成立，其他皆顺理成章。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1984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韩阳 王喆 译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84/（英）奥威尔 著；韩阳，王喆 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3

（奥威尔作品集）

ISBN 978-7-5680-1419-9

Ⅰ.①1… Ⅱ.①奥…②韩…③王… Ⅲ.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Ⅳ.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4321号

1984 [英]乔治·奥威尔 著 韩阳 王喆 译

策划编辑：刘晚成

责任编辑：薛蒂

特约编辑：韩阳

封面设计：喃风

责任校对：张会军

责任监印：张贵君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3

印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2.75

字数：240千字

版次：201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55.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由的保障，良知的坚守

自由就是拥有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若此前提成立，其他皆顺理成章。

-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二部分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三部分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四月里一个寒冷的晴天，时钟报时十三点整。温斯顿·史密斯缩着脖子，下巴抵在胸口，尽力躲避肆虐的风。他快步穿过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但还是慢了一拍，一股沙尘打着旋随他进了门。

门厅里弥漫着煮白菜和旧地毯的气味。厅尽头的墙上钉着的张彩色海报，作为进门装饰画，显得过于巨大。海报上是一张巨大的脸，有一米多宽。这是一张四十五岁上下男人的脸，胡子漆黑浓密，脸型粗犷，英气逼人。温斯顿沿阶梯上楼。搭电梯是别想了，因为哪怕在情况最好的时候，电梯也几乎不运作，何况现在是白天的停电时段。停电是仇恨周筹备过程中所采取的一项厉行节约措施。从门厅到楼上的公寓要爬七层楼梯，而三十九岁的温斯顿右脚踝上方患了静脉曲张溃疡，不得不缓步上行，中途还得不时停下歇息。每上一层，在转弯处，海报上巨脸的目光都从电梯井另一端不偏不倚地落在他身上。世上有些画像被设计成这样：不论你走到哪里，画上人物的目光都会不偏不倚落在你身上。而这张海报便是其中之一。画像下标注着这样一行文字：

老大哥在看着你。

公寓里传来浑厚的人声，正在播报有关生铁产量的一系列数据。声音出自一个长方形金属板，宛如一面黯淡的镜子，镶在靠右手边的墙面上。温斯顿按下一个按钮，声音多少轻了些，但所说的内容依然清晰可辨。这个装置（名为电屏）的声音可以调低，但无法全然关闭。温斯顿朝窗口走去。矮小瘦弱的他，身着党员的蓝色工作服，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感觉。他发色浅淡，脸天生泛红，皮肤被劣质肥皂、钝剃须刀片以及刚刚过去的寒冬摧残得粗糙不堪。

尽管窗户紧闭，窗外世界看上去依然寒冷。下方街道上有尘土和纸屑在风中飞旋。尽管太阳高照，天蓝得刺眼，但除了四处张贴的海报之外，整个世界一片惨淡，像失了颜色。海报上那张黑胡子男人的脸从每

一个关键位置居高临下俯视一切。温斯顿正对面房子的墙上就有一张。标题印着：老大哥在看着你。画像上的男人与温斯顿四目相接，那对黑色的眸子几乎要把他看穿。临街墙上有另一张海报，一角已经脱落，在风中不时噼啪响拍打着，上面一个词时隐时现——“英社”。远处一架直升机在屋顶间掠过，如绿头苍蝇一般盘旋了一阵，继而快速划出一道弧线飞离。那是警察巡逻队，正透过人家的窗户窥探里面的动静。然而巡逻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思想警察才是最要命的。

温斯顿背后的电屏依然在滔滔不绝地播报有关生铁和超额完成第九个三年计划的事。电屏可以同时接收、发送信息。只要温斯顿发出比耳语稍高一点的声响，就会被电屏接收到。不仅如此，一旦进入电屏的视野范围，他的一举一动就会被捕捉。因此，你无从知晓自己是否被监视，也无从猜测思想警察会以何种手段，在何时接通你前方的电屏。他们可能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每一个人。只要他们乐意，就可以随时随地接通你面前的电屏。你不得不在这样一个假设下生活：你说的每一句话，发出的每一个声响都会被监听；只要有一点光线，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监视。这便是生活，你身处其中，且无从选择。这种生活状态起先只是一个习惯，慢慢就变成了本能。

温斯顿一直背对着电屏。这样比较安全，尽管他清楚地知道，哪怕只是背影也会暴露问题。一公里开外的真理部是他的工作单位。那座白色的大型建筑在一片脏污的市景中拔地而起。他在心中思忖——带着隐约的厌恶——这便是伦敦，第一空降场的主要城市，在大洋国所有行政区中人口总数排行第三。他绞尽脑汁搜寻儿时的记忆，试图记起伦敦是否一直是这番光景。这些摇摇欲坠的19世纪的房屋是否从来如此：墙用大堆木材撑着，窗格用纸板草草遮挡，屋顶上盖着瓦楞铁皮，眼看就要坍塌的院墙东倒西歪；空袭地点扬尘漫天，断壁残垣中野草丛生；被炸弹夷平的一小块空地上搭起了脏兮兮的木屋，仿佛一个个鸡棚。但是不行，他记不起任何东西，关于儿时的印象唯剩下一系列没有背景的光影残片，且多数难以辨认。

真理部——在新话中称为真部（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关于该语言的结构和词形变化参见附录），和视野中的其他建筑截然不同。这个巨大的金字塔形建筑由闪亮的白色混凝土建成，层层相叠直冲云霄，塔顶距地面足有三百米。在温斯顿站着的地方，能够勉强辨认建筑白色外墙上的三行字，字体隽雅，是党的口号：

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无知就是力量

据说，真理部仅地上楼层就有三千间房间，还有与之配套的地下网络。环顾伦敦，只有三座建筑在外观与体积上与之相仿。从胜利大厦顶层，可以看到这四座大楼屹立在那里，有着一览众山小的气派。这四幢大楼是政府四个分支机构的总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维持法律与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事务。在新话中，这四个部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仁爱部极其可怕，整座大楼一扇窗户都没有。温斯顿没有进过仁爱部，甚至从未涉足其方圆半公里之内的地域。除非执行公务，否则根本无法进入这个部门。如果非要进去，就得穿过错综复杂的铁丝网、重重铁门和机枪暗堡。通往仁爱部外围关卡的道路上，有携带警棍、面目狰狞、身着黑色制服的警卫巡逻。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摆出一副安静乐观的样子，这是面对电屏最得体的表情。他穿过房间，走进一间小厨房。在这个时间点离开单位就意味着放弃了食堂的午饭，但他发现厨房除了一大片留作明天早餐的发黑的面包外，没有其他可吃的。他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无色液体，瓶上一个白色的标签写着胜利金酒。这瓶东西散发出油腻的气味，就像是中国的米酒。温斯顿往茶杯里倒了将近一杯，鼓足勇气，像吞药水一样一口喝下。

立竿见影，他的脸变得通红，眼泪也呛出来了。这酒的味道简直像硝酸一样。不仅如此，一杯酒下肚，后脑勺像挨了橡胶棍重重一击。但片刻之后，胃里的烧灼感缓和了，眼前的世界逐渐变得明朗欢愉。他拿出一包压皱的香烟，盒上印着胜利香烟，从里面抽出一支，一不小心拿倒了，烟卷里的烟丝掉了一地。他又抽出第二支，这次比较成功。他回到客厅，在电屏左边的小桌旁坐下，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钢笔杆、一瓶墨水、一本四开大小的空白笔记本。书脊为红色，封面上有大理石的纹路。

不知什么原因，客厅里电屏的位置很特别，并没有按照惯例装在侧壁以监控整个房间，而是装在了正对窗户的墙面上。电屏一侧有一个浅浅的凹室，温斯顿就坐在那里。在建楼的时候，这块区域可能是为书架预留的。坐在凹室里，只要向后靠，便到了电屏的视线之外，也就不会

被拍到了。当然，他的声音仍然能够被听到，但只要保持不动，就不会被监视。这个房间的特殊布局在某种程度上诱使他动手做了接下来的事。

他做这件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从抽屉拿出来的笔记本。笔记本特别漂亮，乳白色的纸张光滑无比，由于时间的流逝稍稍泛黄。这种纸张至少已经停产四十年了。而他猜测这本笔记本的年头远不止四十年。他在贫民区一家肮脏的旧货店橱窗里看到了它（记不清具体是哪个贫民区了），当时突然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将其占为己有。党员是不得进入平常商店的（谓之“参与自由买卖”），但这条规定并没有那么严，因为诸如鞋带、剃须刀片之类的很多东西，根本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弄到。他先环顾了一下街道四周，接着溜进商店，花了两块五买下了它。当时他并没有考虑用它做什么。他把笔记本装进公文包，心虚地走回了家。尽管笔记本里一个字都没有，但拥有这件私有财产依然容易授人以柄。

他现在要做的事便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本身并不违法（因为已经没有了法律，所以没有违法一说），但如果被发现，很有可能会被判死刑，至少也得判二十五年劳改。温斯顿给钢笔杆装上笔尖，用嘴吸去笔尖上的油脂。钢笔已经过时很久，现在就算签名也很少用了，他费了不少劲偷偷搞到了一支，仅仅因为他觉得唯有真正的钢笔才配得上这漂亮的乳白色纸张，用彩色铅笔在上面乱画一气简直是暴殄天物。事实上，他并不习惯用手写字。除了写一些便签之外，通常都用说写器，而现在说写器显然无法满足需要。他才给钢笔蘸上墨水，犹豫了一秒钟，突然肚里一阵抽搐。在纸上落笔是一项决定性的行动。他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以下一行小字：

1984年4月4日

他向后靠到椅背上。一阵深深的无助感汹涌而来笼罩全身。首先，他完全不确定现在是否是1984年。不过应该也差不了多少，因为他很确定自己三十九岁，且自己是1944年或1945年生的。但如今根本无法把日期精确到一两年的范围之内。

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本日记到底是为谁而写？为将来，为后辈。他的思绪围绕着纸上那个不确定的日期停顿了一会，突然想起新话中的一个词汇——双向思维。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你如何与未来交流？从本质上说，这是不可能的。未来要么与当下相似，要么与当下不同。如前者为真，那他不论写什么都无足轻重；而若

后者为真，那他的困境就毫无意义。

他坐着，呆若木鸡，盯着面前的纸看了好一会儿。电屏的声音换成了刺耳的军乐。说也奇怪，他似乎不仅失去了表达能力，而且竟然忘记了自己起先想说的话。他为了这一刻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星期，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只有勇气还远远不够。真正动笔写东西并不难，只要把在脑中好几年来盘旋不休的独白转换成文字记到纸上即可。而在此刻，就连自己心中的独白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如此，静脉曲张溃疡痒得让他难以忍受。他不敢去挠，因为每次只要一挠，伤口就会发炎。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除了面前这张白纸、脚踝上方皮肤的瘙痒、刺耳的音乐、金酒带来的微醺，他再也没有其他感觉了。

突然，他发狂似的动笔写了起来，而并不十分清楚自己到底在写什么。他细小而幼稚的笔迹在纸上歪歪斜斜地铺展开来，先是忘了首字母大写，最后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丢了：

1984年4月4日。昨晚去看了电影。都是战争片。一部很好，讲一船难民在地中海某地遭到炸弹轰炸。其中一个场景让观众很开心，那个场景中，一个高大肥胖的男人在试图游走的过程中，被紧随其后的直升机射杀，一开始他在水中挣扎前行，随后他进入了直升机的射程，接着就被打成了马蜂窝，身边的海水被染成了粉红色，他一下子就沉下去了，就好像水从他身上的弹孔灌进去了一样，观众在他沉下去的时候哄堂大笑。接着就看到一个满载儿童的救生筏，直升机在上面盘旋。一个中年妇人，像是犹太人，坐在船头的一侧，怀里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尖叫，把头埋在母亲胸前，像要钻到母亲身体里，妇人双手环抱着孩子，尽管自己也吓得脸色发青，还依然在安慰孩子。她一直尽力用双臂罩住孩子，仿佛自己的手臂能让孩子免受子弹的侵袭。接着，直升机朝船上的人群投下一颗二十公斤重的炸弹，一阵强光过后，船被炸得粉碎。接着有一个精彩的镜头，一截孩子的残臂飞向空中飞得越来越高一定是一架前端装有摄像机的直升机跟踪拍下的党员席上掌声雷动但坐在群众席的一个女子开始大吵大叫说在孩子面前放这样的电影是不对的直到警察把她架到外面我希望她不要有什么事没人在意群众的言论这是典型的群众的反应他们从不——

温斯顿停下笔，部分原因是他的手抽筋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写下这么多废话。但很奇怪，他写的时候，头脑中一些完全不同的记忆变得清晰了起来，以至于他想把它们也写下来。他现在意识到，就因为发生了那件事，他才突然决定今天回家开始写日记。

如果那样一件朦胧不明的事也能称之为发生过的话，那么，此事就发生在早晨，地点就在部里。

差不多11点30分的时候，在温斯顿工作的档案司里，人们正在把椅子从工作隔间拖到大厅中央，面对电屏，准备观看两分钟仇恨节目。温斯顿正准备坐到中间的一张椅子上，这时有两个人出乎意料地走进房间。这两人温斯顿只打过照面，从未说过话。其中一个女孩常常在走廊里进进出出。尽管叫不出名字，但温斯顿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他有时候看到她满手油污，拿着扳手，于是推断她可能负责小说写作机的维修工作。女孩看起来很干练，约二十七岁，头发浓密，脸上有点点雀斑，动作像运动员一样敏捷。一条鲜红的窄腰带——这是青年反性团的标志——在她工作服外面绕了几圈，恰到好处地凸显了臀部曲线。温斯顿第一眼就对她没有好感，他知道原因在哪。因为她给人一种常用冷水洗澡，热衷于参加曲棍球、社区远足等活动，并保持思想全面纯洁的印象。温斯顿对所有女性都没有好感，尤其厌恶年轻漂亮的女人。女人们，尤其是那些年轻女人，都是党的狂热追随者，对党的口号一股脑儿全盘接受，充当着业余探子和告密者的角色。而这个女孩让他觉得尤其危险。有一次他们一起走过走廊，她瞥了温斯顿一眼，锐利的目光似乎要刺穿他的身体，一时间温斯顿觉得自己笼罩在一片黑色的恐怖中。他甚至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女人说不定是思想警察的探子。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不过只要她一靠近，温斯顿内心的不安就挥之不去，同时夹杂着恐惧与敌意。

另一人是个叫奥伯里恩的男人，作为核心党员的他身居要职，高高在上，遥不可及。温斯顿对这类职位的工作性质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身穿黑色核心党员制服的人一进门，椅子旁的人群就顿时安静了下来。奥伯里恩身材高大魁梧，脖子粗壮，脸型粗犷野蛮，略显滑稽。尽管穿着正式，但举手投足间依然散发着某种魅力。他有一项本领，就是推眼镜的动作能让人放下戒心——他的这一个动作给人一种很有教养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很难用言语表达。如果现在有人还能记得的话，有一种表达方式可以形容他的这个动作，就是很像18世纪的绅士拿出鼻烟盒待客的样子。这些年间，温斯顿见过奥伯里恩十几次。他觉得自己被其深深吸引，不仅因为奥伯里恩有教养的举止同他拳击手一般的体型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更多是因为温斯顿暗暗相信——或许不是相信，只是希望——奥伯里恩的政治倾向并没有那么正统。他脸上的某种表情让人不由自主地这么想。话说回来，也许他脸上显露的并不是离经叛道，不过是智慧而已。但不管怎样，从他的外表来看，他是那种你可以骗过电屏，

在私底下与其推心置腹的人。温斯顿并没有试着去证明他的这个猜测是否正确，事实上，他也无从证明。这时，奥伯里恩看了一眼腕表，快十一点半了，显然他决定留在档案司直到两分钟仇恨节目结束。他坐到了温斯顿同一排的椅子上，和温斯顿就隔了几个位置。坐在他们中间的是一个身材矮小、浅棕色头发的女人，在温斯顿隔壁的隔间工作。那个黑色头发的女孩紧挨着他们坐在后面一排。

接着，大厅那头的巨大电屏里传出一段讲话，像一台燃油即将耗尽的大型机器，声音可怕刺耳，令人牙齿发颤、汗毛直竖。仇恨节目开始了。

和往常一样，人民公敌伊曼努尔·古登斯坦的脸出现在电屏上。人群发出此起彼伏的嘘声。浅棕色头发的女子发出一声尖叫，声音中夹杂了恐惧与厌恶。很久之前（没人知道到底多久），古登斯坦曾是党的一位领袖，和老大哥几乎平起平坐，后来参与了反革命运动，被判处死刑，之后神秘地逃走并消失了。两分钟仇恨节目每天都不同，但古登斯坦每次都是主要人物。他是头号叛徒，就是他第一个玷污了党的纯洁性。所有的背叛变节、阴谋破坏、异端邪说、反革命路线都是由他唆使的。他现在还活着，在某个地方继续着阴谋活动：也许在海的那头，受他外国主子的豢养庇护，甚至也可能就藏在大洋国的内部——时而能听到这样的传闻。

温斯顿感到胸口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每次看到古登斯坦的脸，他都免不了心乱如麻。这是一张犹太人的脸，脸型瘦削，头顶有一圈蓬乱的白发，蓄着山羊胡——这是一张精明的脸，但又让人忍不住生厌，鼻子又长又尖，给人一种年迈昏庸的感觉。鼻尖上还架着眼镜。这张脸像极了绵羊，声音同羊的叫唤也十分相似。古登斯坦正在恶毒地攻击党的方针政策——他攻击的话语过于夸张牵强，就算是小孩子也能拆穿他的把戏，但还是会让人担心那些头脑不够清醒的人会受他蛊惑。他正在恶意攻击老大哥，指责党在搞独裁，他要求大洋国与欧亚国停战，鼓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嚣有人背叛了革命——他语速很快，在遣词造句上刻意模仿党的发言人，甚至还加进了很多新话的词汇：事实上他的新话词汇量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党员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量。为避免有人被古登斯坦哗众取宠的谎言所蒙蔽，电屏上他的脑后出现了数不清的欧亚国士兵列队行进的场面——一排接着一排健壮的士兵，长着亚洲人的脸，面无表情。他们涌现到电屏上，然后消失。前排消失后，后排士兵就会跟上来，表情和之前的几乎一模一

样。军靴沉闷而有节奏的踏步声构成了古登斯坦绵羊般嘶叫声的背景。

仇恨节目才进行了不到三十秒，房间里近一半的人已经按捺不住怒火，开始大声叫嚷。电屏上那张绵羊般的脸及其后面欧亚国可怕的军力让人们忍无可忍。除此之外，只要一看到古登斯坦，甚至一想到他，就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充满恐惧与愤怒。比起欧亚国和东亚国，古登斯坦被人们仇恨的频率更为频繁，因为大洋国一旦与一国交战，往往会和另一国保持和平关系。但有件事非常奇怪，尽管古登斯坦受到每个人的憎恶和鄙视，尽管每天在站台上、电屏上、报纸上、书上他的理论被批驳、粉碎、嘲弄，在大众心中，一切有关他的东西都是没用的垃圾——尽管做了如此多工作，他的影响力却从未减小。总是不断有人是非不分地被他引诱。每天都有受他指使的间谍和破坏分子的面具被思想警察揭下。他指挥着一支庞大的军队，藏匿在暗处，领导着叛乱者的地下网络，妄图阴谋推翻国家政权。他的组织据说名叫兄弟会。谣传还有一本可怕的书，由古登斯坦撰写，汇集了各种异端邪说，在四处秘密流通。这本书没有书名，人们就叫它那本书。但人们只是从不确切的传闻中知道这些事。不论是兄弟会还是那本书，所有普通党员都讳莫如深。

仇恨节目进行到了第二分钟，人群陷入癫狂状态——在座位上跳上跳下，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试图盖过电屏里传来的羊叫一般令人发狂的声音。那个浅棕色头发的瘦小女人脸涨得通红，嘴巴一张一合，活像一条被扔到岸上的鱼。就算是奥伯里恩那张宽大的脸，现在也成了红色。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宽厚的胸膛鼓了起来，微微颤抖，仿佛要直面巨浪的侵袭一般。温斯顿后面的黑发女孩开始大喊：“猪猡！猪猡！猪猡！”突然，她捡起一本厚厚的《新话字典》朝电屏扔去。字典砸中古登斯坦的鼻子然后弹开，电屏里的声音仍在继续。在片刻清醒中，温斯顿意识到自己正和其他人一起大喊，用鞋跟狠狠踢着椅子的横档。两分钟仇恨节目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强迫人参与其中，与此相反，是让人根本无法置身事外。不出三十秒钟，任何掩饰都显得多此一举了。一种夹杂着恐惧与报复的癫狂，对杀戮、折磨、用大锤把人脸砸得稀烂的渴望像电流一般传遍整个人群。甚至违背人的意愿将其变成了面部扭曲、尖声叫嚷的疯子。不过，人们所感受到的狂怒是一种抽象而没有任何指向的情绪，可以像喷灯的火苗一样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身上。因此，有那么一刻，温斯顿的仇恨并没有转向古登斯坦，恰恰相反，转向了老大哥，转向了党，转向了思想警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同情电屏上那个形单影只、备受嘲弄的异端分子。在这个充斥着谎言的世界里，只有他捍卫着真理和理智。而在下一个时刻，他又加入了身边众

人的行列，对他来说，针对古登斯坦的所有评论全部属实。在这时，他内心深处对老大哥的厌恶转化成崇拜，老大哥的形象看起来愈加高大，他是人民的守护者，无所畏惧、不可战胜，像巨石一样抵御着来自亚洲的蛮族。而古登斯坦尽管孤立无援，甚至是否活着都是个谜，但他就像一个邪恶的巫师，只需嘴里念念有词便可将文明层层瓦解。

有些时候，一个人甚至可以自发地通过多种方式转移仇恨。突然间，温斯顿把自己的仇恨从电屏上那张脸转移到了身后的黑发女孩身上，就像做噩梦的时候猛地把头从枕头上移开一样。他脑中闪过一些生动美丽的幻象：他想用橡胶警棍将她活活打死；把她扒光了绑在柱子上，用箭射满她全身，就像人们对圣塞巴斯蒂安[1]所做的一样；他会凌辱她，并在高潮的时候割断她的喉管。他现在终于比先前更清楚自己为什么恨这个女孩。他之所以恨，是因为她年轻漂亮却毫不性感；是因为他想把她弄上床却无从实现；是因为她曼妙的腰身似乎在呼唤着你的搂抱，现在却绑着一条可憎的红腰带，咄咄逼人地象征着贞洁。

仇恨节目达到高潮。古登斯坦的声音变成了真的羊叫声，他的脸突然也变成了一只羊脸，随后渐隐于一个欧亚国士兵身体中，这个士兵似乎正在冲锋，身材魁梧，表情凶悍，手中的冲锋枪突突轰鸣，这气势活像就要从电屏里跳出来一样。坐在前排的一些人吓得直往后靠。转瞬间，电屏上杀气腾腾的人形幻化成了老大哥的脸，须发乌黑，充满着力量和神秘的镇定。这张脸非常大，几乎占据了整个电屏，这让每个人都长舒了一口气。没人听得清老大哥到底在说什么。应该是几句激励的话，这类话一般都是在喧嚣的战场上广播，没法听清每一个词，但只要说了就能让人重拾信心。接着老大哥的脸又慢慢淡去，取而代之的是用黑体大写字母书写的三行党的口号：

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无知就是力量

尽管老大哥的脸只在电屏上停留了几秒钟，但其影像似乎在每个人眼中产生了过于强烈的冲击，一时间难以平复。那个瘦小的浅棕发女性跳过前面的椅子。用颤抖的声音念着一句像是“我的救星！”之类的话并向电屏张开手臂。接着她双手捂脸，显然是在祈祷。

这时，人群中出现了低沉、缓慢、节奏划一的吟颂：“大……大！大……大！”——一遍又一遍，非常慢，而且第一个“大”和第二个“大”之间有很长的停顿——这低沉的吟颂声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野蛮感，似乎还能听见赤脚踏地声和非洲鼓声作为伴奏一样。人群就这样吟颂了大约三十秒时间。这种吟颂是调节失控情绪的常见手段。一方面是对老大哥智慧和尊严的赞颂，另一方面更是一种自我催眠，故意用一种带节奏的噪音来麻痹意识。温斯顿的心似乎开始变凉。两分钟仇恨节目中，他不自觉地与众人一起癫狂。但对于“大……大！大……大！”这种未开化的吟颂，他总是感到不寒而栗。当然，他也加入了吟颂的行列：根本没有办法不这样做。掩饰自己的感受，控制自己的表情，和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已经成了本能反应。不过，有那么几秒钟时间，他的眼神很可能已经出卖了他。也就在这一瞬间，前面提到的那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这件事的确发生了的话。

他与奥伯里恩四目相接，不过只有一瞬间。当时，奥伯里恩站起身来，先是拿下眼镜，接着用他的招牌动作将其戴回鼻梁上。但就在这一瞬间，他们的视线相遇，虽然时间很短，但温斯顿足以发现——是的，他知道！——奥伯里恩和自己正在想着同一件事。他很确信这一点。就仿佛他俩可以通过眼神互相交流思想。“我支持你，”奥伯里恩仿佛在说，“我十分明白你的感受。我了解你的轻蔑、你的仇恨、你的厌恶。但别担心，我站在你这一边！”不过这心领神会的灵光转瞬即逝，奥伯里恩的脸又变得和其他人一样深不可测。

以上便是事情经过，他已经不能确定刚才的事是否真的发生了。这类事件不会有任何结果。充其量只是让他在内心深处相信，或者是希望，除了自己以外，身边还有别人与党为敌。也许地下阴谋活动普遍存在的传言到头来是真的——也许兄弟会真的存在！尽管逮捕、招供、处决接连不断发生，但仍然不能确定兄弟会只是一个传说。他有时候相信其存在，有时候不信。没有任何证据，短暂的眼神接触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无意中传入他耳朵的只言片语；厕所墙上模糊的涂鸦；还有一次他看到两个陌生人照面时他们手的细微动作，看起来就像是确认身份的暗号。这都只是他的猜测：有可能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臆想出来的。他回到自己的工作隔间，没有再去看奥伯里恩。连与其继续交往的念头都没有。哪怕他知道如何去做这件事，那无疑是极其危险的。他们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两秒钟眼神，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但即便这样，这依然是他封闭、孤独的生活中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温斯顿直起腰身，打了个嗝，金酒的余味从胃里泛了上来。

他把目光再次集中到纸上，发现在无助沉思的同时，自己也在写字。这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而且写得也不像之前那样潦草难看。他的笔酣畅淋漓地在光滑的纸上划动，用整齐的大写字母写道：

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写了几乎半页纸。

他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恐慌。说起来也荒唐，因为写下的这些字并不比手写日记这个行为更危险，但他一度想撕掉那几页写过字的纸，彻底放弃写日记的计划。

不过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明白这是没有用的。不论他写下打倒老大哥，还是抑制住下笔的冲动，并没有什么区别。不管他继续写日记还是不继续写，也没有区别。思想警察同样会把他抓起来。他已经犯罪了——哪怕他没有用笔在纸上写字，也依然已经犯下了罪行——这是一桩包含了一切罪行的重罪。他们称之为思想罪。思想罪是无法一直掩盖下去的。你逃得了一时，甚至几年，但他们注定是会抓到你的，这是早晚的事。

逮捕总是在夜里——无一例外地发生在夜里。从睡梦中突然被叫醒，粗糙的手摇晃着你的肩膀，晃眼的灯光下，一群表情冷峻的人围在你的床边，你看不清他们的脸，只能依稀看到轮廓。大部分案子根本没有审判，也没有关于逮捕的报道。人就这么消失了，这样的事情总是发生在夜里。户籍本上的姓名被抹去，你做过的所有事情的记录都被清除，你的存在被否定，随之被遗忘。你就这么被废除，从此湮灭：通常称为人间蒸发。

他们会枪毙我我无所谓他们会从脖子后面给我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他们常常从脖子后面给你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

他靠到椅背上，心里有些羞愧，随之把笔放下，接着又拿起笔奋笔疾书。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这么快！他像只老鼠一样坐着一动不动，徒劳地希望不论是谁，敲完门就赶紧离开。但是没有，敲门声仍在继续。耽搁在这时是最忌讳的

事。他的心七上八下，但由于长期养成的习惯，脸上却是面无表情的。他起身，踏着沉重的脚步朝门走去。

---

[1] 圣塞巴斯蒂安，基督教圣人和殉道者。在3世纪基督教受迫害时期，被罗马戴克里先皇帝杀害。在文艺作品里，他常被描绘成双臂被绑、万箭穿身的形象。

第二章

温斯顿的手刚握上门把手，突然看到桌上的日记本还摊开着。上面写满了打倒老大哥，字迹大到哪怕从房间另一端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想不到自己竟然做了这么蠢的事。但他意识到自己尽管怕得要死，却依然不想在墨迹还未干的情况下把日记本合上，因为那样会弄脏乳白色的纸张。

他深吸一口气，开了门。一股暖流瞬间从他体内流过，他深深松了口气。站在门外的是一个面色惨白、萎靡不振的女人，她头发稀疏，脸上爬满皱纹。

“啊，同志，”她闷声闷气地嘀咕道，“我刚才好像听见你回来了。能不能来我家看一下厨房的下水道？给堵了……”

这是同楼邻居的老婆帕森斯太太（党并不赞成人们使用“太太”这个词——所有人都应该以“同志”相称——但对有些妇女，人们会不自觉叫她们太太）。她三十岁上下，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她给人一种脸上的皱纹里积着灰尘的印象。温斯顿跟她穿过走廊。充当业余修理工是每天都会遇到的烦心事。胜利大厦是座老楼，大约建于1930年，现在已经摇摇欲坠了。墙上和天花板上的涂料不断剥落；水管一冻就会爆裂；天花板只要一下雪就会漏水；供暖系统在厉行节约期间会完全关闭，没有关闭时通常也只供应一半蒸汽量。维修只能自己动手，否则就得提交给某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审批，就算只是修一块窗玻璃，都可能拖上两年之久。

“当然，就因为汤姆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含糊其辞地说。

帕森斯家比温斯顿家大，呈现出另一种昏暗单调的氛围。一切好像先被砸了一通又踩过一遍，就像有大型野兽光顾过一样。体育用品散了一地——曲棍球棒、拳击手套、踢爆了的足球、汗湿的向外翻着的运动短裤……桌上乱七八糟堆着脏盘子和折了角的练习本。墙上挂着青年团和儿童特工队的旗帜，还有一张老大哥的大海报。屋内有一股这栋楼中到处都能闻到的煮白菜气味，除此之外，还有刺鼻的汗臭混杂其中。这汗臭来自于那个现在不在场的人——只消一闻便知，却难以道出缘由。

另一间房里，有人拿着梳子和一张卫生纸，试图用它们跟上电屏中仍在播放的军乐曲调子。

“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说着，不乏忧虑地朝门那边看了一眼。“他们今天没出去。当然……”

她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说话说一半。厨房水槽里面，绿汪汪的水几乎快漫出来了，散发出比煮白菜臭上百倍的恶心气味。温斯顿跪在地上，检查水管拐角接缝处。他讨厌用手，讨厌弯腰，因为这样会引起咳嗽。帕森斯太太一筹莫展地站在一边看着。

“当然要是汤姆在家的话，一下子就能修好了，”她说，“他就喜欢鼓捣这些。他双手可巧了，汤姆就是这样。”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下属。一身肥膘、做事积极，但带着不可撼动的愚昧，浑身上下充斥着无知的狂热——这样的人无疑是维护党统治的最佳人选，在这一点上，连思想警察都不及他。他三十五岁，前段时间才不情不愿地退出了青年团。入团前，他还超出规定年龄在儿童特工队多赖了一年。他在部里一个无需学识就能胜任的低层岗位任职，但他同时也是体育委员会和其他负责社区远足、自发游行、节约运动和一些志愿活动的一系列委员会的领军人物。他会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满心自豪地告诉你他连续四年每晚都去社区活动中心。他每去一个地方，都会带着让人难以忍受的汗味。甚至他走后，那股味道依然挥之不去。这在不知不觉中透露出他生活的艰辛。

“有扳手吗？”温斯顿一边问，一边用手拨弄着水管接口的螺母。

“扳手啊，”帕森斯太太说，接着马上像泄了气一般。“真不知道放哪里了。也许孩子们……”

孩子们冲进客厅，一边用靴子狠狠踏着地板，一边在梳子上狠命地吹了一口。帕森斯太太拿来了扳手。温斯顿把水从水管里放了出来，厌恶地从里面扯出一团堵住管道的头发。他打开龙头，用冷水尽可能地把手冲洗干净，接着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举起手来！”一个粗野的声音大喊道。

一个九岁的男孩，长得眉目俊秀、十分壮实，从桌子后面突然冒出

来，举着一把玩具自动手枪朝他耀武扬威，而比他大约小两岁的妹妹手拿一块碎木块，也摆出了相同的姿势。两个孩子都穿着蓝短裤、灰衬衫、脖子上系着红颈巾，这是儿童特工队的制服。温斯顿把双手举过头顶，但心中掠过一丝不安，这个小孩的行为那么咄咄逼人，看起来不像单纯的闹着玩。

“你这个叛徒！”男孩子大喊，“思想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枪毙你，我要让你人间蒸发，我要把你押到盐矿去！”

突然他们围着他又蹦又跳，嘴里大喊着：“叛徒！思想犯！”小女孩的一举一动完全模仿她哥哥。这着实有点吓人，好像两只蹦跳着嬉戏的虎崽，不久后将会长成吃人的大虫。这个男孩子眼中透出一种工于心计的凶残，很显然起了踢打温斯顿的念头，而且意识到自己很快就到能做这种事的年龄。还好他手上拿的不是真枪，温斯顿心想。

帕森斯太太的目光紧张地在温斯顿和孩子们之间徘徊。在客厅比较明亮的灯光下，温斯顿发现帕森斯太太脸上的皱纹中间果然嵌着灰尘，这一点让他觉得颇为有趣。

“他们闹腾起来就是这样，”她说，“他们不能去看绞刑，很失望，所以就这样子了。我太忙了没空带他们去，汤姆又在上班回不来。”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绞刑？”小男孩大声嚷道。

“要去看绞刑！要去看绞刑！”小女孩边叫边跳。

温斯顿记起来了，傍晚时候，公园里要绞死几个被指控犯了战争罪的欧亚国俘虏。这种公开处决大约每月一次，是很受人们欢迎的盛事。孩子们总会嚷着要大人带他们去看。温斯顿向帕森斯太太道了别，走向大门。而他出门刚走了不到六步路，脖子后面就被什么东西狠狠击中，感觉就像有一根烧红的铁丝刺进了肉里。他转过身，看到帕森斯太太正把她的儿子拉进门，小男孩把一个弹弓揣进口袋。

门关上的时候，小男孩大吼道：“古登斯坦！”而最令温斯顿震惊的是小孩母亲灰褐色的脸上那无可奈何的惊恐表情。

回到自己家，温斯顿快步走过电屏，坐回桌旁，手还在揉着脖子。电屏里的音乐停了，代之以军人抑扬顿挫、粗野的声音，念着一篇有关

新型漂浮堡垒战舰上的武器装备的报道。这艘战舰正驻扎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的海域。

他思忖，养着那样的孩子，那可怜的女人该是过着多么可怕的生活。再过个一两年，他们就会不分白天黑夜监视她有没有异端思想。当今几乎所有小孩都是恶童。最糟的是诸如儿童特工队一类的组织，一步步把小孩塑造成无法驾驭的小野人，但却又不让他们产生任何反党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以及与党相关的一切。歌曲、方阵、横幅、远足、木枪操练、呼喊口号、老大哥崇拜——一切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充满荣誉感的游戏。他们的所有恶意都是对外的，针对国家的敌人，针对外国人，针对叛徒，针对从事阴谋活动的人，针对思想犯。几乎所有三十岁以上的人都会害怕自己的亲生骨肉。这种害怕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泰晤士报》几乎每周都会刊登那些小告密者——报上经常用的一个词是“儿童英雄”——听到了一些反动的话，于是向思想警察告发自己父母的报道。

弹弓造成的刺痛消退了。温斯顿心不在焉地拿起笔，思忖着是否能继续在日记本上写些什么。突然间，他又想到了奥伯里恩。

几年前——多久来着？应该是七年前——他梦见自己走过一间漆黑的房间。正走着，身旁一个坐着的人开口说道：“我们会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声音很轻，而且几乎是漫不经心的，只是陈述，而非命令。他继续向前走，并没有停下脚步。奇怪的是，当时在梦里，这些话语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直到后来，这句话才逐渐有了意义。他记不得第一次看到了奥伯里恩是在做这个梦之前还是之后，他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才意识到梦里就是奥伯里恩在说话。但不管怎样，他的确辨认出来了，当时在黑暗中同自己说话的，就是奥伯里恩。

温斯顿一直无法确定——哪怕是在今天早上两人眼神交汇的一瞬间，依然无法确定奥伯里恩是敌是友。而且这件事似乎并不重要。他们之间可以互相理解，这种理解比情感与党派更为重要。“我们会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他曾经这么说过。温斯顿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这句话将会通过某种方式变为现实。

电屏里的说话声停止了。一阵清亮、优美的军号声划破了呆滞的空气。接着说话声又刺耳地响起：

“注意！全体人员注意！马拉巴前线传来简讯，我军在南印度大获

全胜。得上级授权，我在此宣布此次行动将很有可能结束这场战争。以下是此次简讯的详细内容——”

坏消息来了，温斯顿心想。不出所料，在播报完对欧亚国军队的屠戮，歼灭、俘虏大批敌军之后，宣布从下周起，巧克力的配给量从30克下降到20克。

温斯顿又打了个嗝。酒劲已经消退，残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也许是为了庆祝胜利，也许为了使大家忘却降低巧克力配给量这件事，电屏开始大放《献礼大洋国》。这首歌播放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起身立正。但他现在所处的位置，没人能看得到。

《献礼大洋国》之后，音乐变得柔和起来。温斯顿走到窗口，背对电屏。窗外依然寒冷晴朗。远处一枚火箭弹发出沉闷的爆炸声，回音阵阵。当下每周都会有二三十枚火箭弹落在伦敦。

楼下的街道上，那张一角脱落的海报在风中呼扇。“英社”一词时隐时现。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向思维、过去的可变性……他觉得自己好像在海底森林中漫无目的地走，迷失在这畸形的世界里，而他自己也是一个怪物，他是孤独的。过去已然死去，未来不可预见。他又有多少把握能确定当下有人能够支持他？又如何能知晓党的统治不会永远存续？仿佛给他答复一般，真理部白墙上三行口号映入他的眼帘：

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无知就是力量

他从口袋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硬币。这枚硬币上，也用清晰的小字铸着相同的口号。硬币另一面上，是老大哥的头像。就算是在硬币上，这双眼睛依然盯着你不放。硬币上、邮票上、书籍封面上、横幅上、海报上、香烟盒上——无处不在。这双眼睛总是看着你，声音总是包围着你。不论你是睡着还是醒着、工作还是吃饭、在家还是外出、洗澡还是躺在床上——无处可逃。除了头颅里几厘米见方的区域，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

太阳已经西斜，真理部大楼数不清的窗户由于没有阳光的照射，变

得阴森恐怖，仿佛碉堡上的一个个枪眼。他的心在眼前这个巨大的金字塔前战栗。这个建筑太过坚固，根本无法攻占。哪怕一千发火箭弹都不能将其摧毁。他又开始想自己到底在为谁写日记。写给将来，写给过去，写给一个可能是想象中的时代。而他所面对的不是死亡，而是泯灭。这本日记可能会化为灰烬，他自己也会人间蒸发。只有思想警察才会读到他所写的一字一句，然后将其销毁，再没有人会记得。如果连你自己的肉身都不复存在，连一个匿名的字都留不下来，你又如何能向将来申诉自己的内心。

电屏报时14点整。他必须在十分钟内离开家。他得在14点30分回去工作。

不可思议的是这次钟声似乎让他又振奋了起来。他像一个孤独的灵魂，讲述着一个未曾得闻的真理，而一旦开始讲，就一发不可收拾。他讲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公之于众，而是通过保持清醒，将人性的传统延续下去。他回到桌边，给钢笔蘸了墨水，写道：

致将来或过去，致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彼此不同且不再孤单的时代，致一个存在真理、做过的事无法被抹去的时代：

从一个千人一面的时代、孤独的时代、老大哥的时代、双向思维的时代，向彼时致以问候！

他认识到自己已经死了。似乎只有现在，当他能够清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的时候，才算是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的每一个行为所带来的结果，都蕴含在行为本身之中。他写下：

思想罪并不会导致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现在既然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死人，所以尽可能多活些日子就变得重要了。他右手的两个指头粘上了墨水。正是这类细节能让他的行为暴露。部里某个爱打听的积极分子（很可能是个女人，像那个矮小的浅棕色头发的妇女或是小说司的黑发女孩）可能就会揣测为什么他在午休的时候要写字，为什么要用老式的钢笔写字，他到底写了些什么——然后给有关部门通风报信。他去洗手间用一块深色的磨砂肥皂仔细地洗去手上的墨痕，这块肥皂用起来感觉就像砂皮纸一样，但用来洗墨水是再好不过的了。

他把日记本放到抽屉里。把日记藏起来是徒劳的，但他至少要确定这本日记有没有被人发现。在页末夹一根头发太明显了。他用指尖沾起一粒肉眼可见的白色尘埃，放到了封面的一角。如果有人动过这本日记，尘埃就一定会被抖落。

第三章

温斯顿梦见了母亲。

他觉得，母亲是在自己十岁或十一岁时消失的。她身材高挑、举止优雅、沉默寡言、做事不紧不慢，有着一头漂亮的金发。他对父亲的印象则较为模糊，只记得父亲又黑又瘦，总穿着笔挺的深色衣服（温斯顿记得很清楚，父亲的鞋底非常薄），戴着一副眼镜。他们两人都在50年代的一次大清洗中消失了。

现在她母亲正坐在他下面离他很远的某个地方，怀里抱着他的妹妹。他一点也记不得妹妹的样子了，只记得她是个瘦小孱弱的婴儿，总是不声不响，长着一双警觉的大眼睛。母女两人都仰起头看着他。她们在地底下某处，例如在井底，或在一个很深的墓穴中，而那个地方虽然现在已经够深了，但依然在不断下沉。她们在一艘沉船的大厅里，透过渐渐变黑的海水仰望着他。大厅里还有空气，三人依然可以互相望见彼此，但她们仍在不停下沉，沉入绿色的水中。不一会儿，海水将吞噬她俩，从而永世不得相见了。他在有光有空气的地方，而她们则被吸入海底死去，她们之所以沉到了下面，是因为他在上面。他们彼此都知道这一点，他能从她们的脸上看出来，她们是知道的。无论从脸上还是心里，她们都毫无责备之意，唯有一种认识，即她们必须死，这样他才有可能活下去，这是无法逃避的客观规律。

温斯顿记不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在梦中知道，母亲和妹妹为了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有这么一种梦，虽然保留了梦境的特质，但又为个人的精神生活做了补充。梦醒后，梦中发生的事情和想法依然新鲜并且珍贵，这个梦就是这样的。温斯顿猛然意识到，大约三十年前母亲的死是一个悲剧，令他无比悲伤，而这种事情现在几乎不可能发生了。他认为悲剧属于遥远的过去，当时世上仍有隐私、有爱、有友情。当时家庭成员之间会无条件地相互扶持。关于母亲的记忆之所以让他肝肠寸断，一方面是因为母亲对他的爱至死不渝，而他当时因为太过年幼自私，不知反哺；另一方面还因为母亲是以一种他现在记不起来的方式，为了一个私人的、至死不变的忠贞观念牺牲了自己。这样的事情，他觉得在当今是不可能发生的。当今世上只有恐惧、仇恨、痛苦。没有高贵

的情感，没有深沉、难以言表的悲伤。他似乎从母亲和妹妹的大眼睛里看到了这一切，她们透过几百英寻[1]绿色的海水仰望着他，并且还在不断下沉。

突然，他站在了一片草地上，草很短，富有弹性。时值夏日傍晚，夕阳西斜，阳光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金色。这个场景在他梦中出现多次，使他一直无法确定这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他醒过来回想时，将其称为“黄金乡”。这是一块被兔子啃得乱七八糟的古老草场，有一条小路从中间蜿蜒穿过，到处都能见着鼹鼠洞。草场另一头有一圈参差不齐的树篱，榆树枝在风中微微颤动，树叶繁茂，像大团大团女人的头发。虽然看不到，但附近有条小溪，清澈的溪水缓缓流淌，柳树下的池塘里有雅罗鱼在游弋。

那个黑发少女穿过草场向柳树走去。她一下子把身上的衣服扯掉，轻蔑地扔到一边。她的胴体雪白光滑，但却没有勾起他的任何欲望，事实上，他的目光几乎没有落在她身上。此刻充满他内心的是对她把衣服扔到一边这个动作的钦佩。这漫不经心地一抛，动作如此优雅，似乎像要摧毁所有文化、所有思维方式。仿佛老大哥、党、思想警察就在手臂华丽的一挥之下烟消云散。这也是古时才有的动作。温斯顿醒来，有一个名字几乎脱口而出：“莎士比亚。”

电屏发出刺耳的口哨声，保持着一个音高，一直持续了三十秒。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15分，是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起床时间。温斯顿挣扎着起了床——他一丝不挂，因为外围党员一年只有三千布票，而一件睡衣就要花掉六百布票——从椅子靠背上抓起一件颜色泛黄的汗衫和一条短裤，套在身上。还有差不多三分钟时间，广播体操就要开始了。就在下一刻，他就因为一阵急促的咳嗽弯下了腰，每次起床他都会经历这一番折磨。咳嗽把他肺部的气体完全清空了，他得躺在地上做好几次深呼吸才缓得过来。咳嗽使得他青筋暴起，静脉曲张溃疡又开始痒了起来。

“三十到四十岁年龄组！”一个尖锐的女性声音大声喊道，“三十到四十岁年龄组！请各就各位。三十到四十岁年龄组！”

温斯顿迅速站到电屏前，电屏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年轻女子的形象，女子体型消瘦，但全身肌肉，穿着紧身上衣和运动鞋。

“曲臂伸展！”她语速飞快。“跟我一步一步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跟上节奏，同志，打起精神！一、二、三、四！一、

二、三、四！……”

那阵急促的咳嗽并没有将那个梦留下的印象清除干净，而体操富有节奏的动作反而使其变得更为清晰。他一边机械地前后摆动自己的手臂，一边面带坚定又喜悦的表情，因为这样子做广播体操才是得体的。他试图在模糊的记忆中搜寻儿时的片段。这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50年代之后的一切记忆都渐渐褪去。因为没有外部的任何记录可以参考，就连他自己的生命轨迹都变得不再清晰。他只记得一些甚至可能并没有发生过的大事件，记得事件的每个细节，但无法捕捉当时的气氛，而且有很长一段空白期，对此他一无所知。当时，一切都是不同的，哪怕是国家的名字和疆域也是不同的。比如第一空降场，当年就不叫这个名字，而是被称为英格兰或不列颠，不过伦敦一直被叫作伦敦，对这一点他颇有把握。

温斯顿记不清自己的国家什么时候没有打仗，但很明显在他小的时候，和平持续了挺长一段时间。因为他儿时的记忆中里有空袭，而那场空袭是出乎当时所有人预料的。也许就是那个时候，原子弹落在了科尔切斯特。他不记得空袭这件事，但他能记得父亲拉着他的手向地下逃，他们一直往下逃啊逃，逃往地底深处的某一个地方。螺旋梯在他们脚下哐哐作响，他们不断绕圈。终于，他走不动了，开始哭泣，于是他们不得不停下休息。他的母亲，梦游似地慢慢走着，被他们甩开了一大段距离。她正抱着他的妹妹——或者仅仅是一卷毯子：他不确定妹妹当时有没有出生。最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吵闹拥挤的地方，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地铁站。

石板地面上站满了人，其他人则层层叠叠地挤在铁床上。温斯顿和他的父母寻找到一块空地，他们身边的铁床上坐着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妇。老头穿着笔挺的深色西装，后脑勺上扣着一个黑色布帽，满头白发，他脸色通红，蓝色的眼睛里噙满泪水。他浑身散发出金酒的气味，酒气就像要从毛孔中散出一样，人们甚至会觉得他眼中的泪水也是酒。尽管老人醉醺醺的，但他黯然神伤，看得出来，他的悲伤是真实的，让他肝肠寸断。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温斯顿觉得老人身上一定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无法原谅亦无从挽回的灾难。而且似乎温斯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某个老人深爱的人——也许是他的小孙女——死了。每过几分钟，老人嘴里就不停念叨：

我们就不该信他们。我早就说过，孩子他妈，是吧？这就是信他们的结果。我一直这么说的。我们就不该相信他们这些混蛋。

但他们不该相信哪些混蛋，温斯顿记不起来了。

差不多那时候开始，战争就一直在持续。尽管严格来说并不是一场战争。在他小时候，伦敦城里打了几个月混乱的巷战，有几场战斗他还记得很清晰。但追溯整段历史，他根本无法说清楚在某一特定时间，是哪两方在交战。因为除了现在的战争联盟之外，没有任何书面或口头的记录说明还存在着其他的联盟关系。比如当今，1984年（如果今年是1984年的话），大洋国正在和欧亚国交战，与东亚国结盟。没有任何人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承认这三个国家在任何时候有过不同的联盟关系。事实上，温斯顿很清楚，就在四年前，大洋国就与欧亚国联盟，和东亚国交战。但这只是他自己的观点，他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他的记忆没有被完全控制。根据官方的说法，大洋国从未改变过联盟关系。大洋国正与欧亚国交战，因此大洋国一直与欧亚国处于战争状态。当下的敌人代表着彻头彻尾的邪恶力量，因此不论从前还是未来，与其达成协议都是绝不可能的。

他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这时他正用力让肩膀向后伸展，这样的动作他已经做了近一万次（双手放在臀部，扭着腰，这个练习据说对背部肌肉有好处）。可怕的事便是一切可能都是真的。如果党插手过去，并说这件事或那件事从未发生过，那这将比单纯的拷打和死刑更为可怕。

党宣称大洋国从未与欧亚国结盟过。温斯顿·史密斯却知道，大洋国在四年之前还与欧亚国处于结盟状态。但这种认识的根据在哪里？仅在他的意识里，而这种认识不管怎样都会被很快地抹杀。如果其他人都接受了党的谎言——如果所有的记录都口径一致——那这样的谎言被录进了历史，最终就会成为真实。“谁控制过去，”党的口号如此说道，“也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当下，也就控制了过去。”答案是过去尽管说是可以改变的，却从未被改变过。只要是真实的东西，就永远都是真实的。这点很明确。他们要做的仅仅是不断战胜你自己的记忆而已。他们将此称之为“控制现实”。用新话来说，就是“双向思维”。

“稍息！”女教练吼道，声音稍稍和善了一点。

温斯顿垂下双手，缓缓吸气。他的思绪飞到了错综复杂的双向思维世界。知道的同时一无所知；无比诚实地说着精心编织的谎言；理所当然地同时持有两种观点，哪怕深知这两种观点互相矛盾，却仍然全盘接受；用逻辑驳斥逻辑；批驳道德的同时却又声称自己是道德的；相信民主不可能实现的同时相信党捍卫着民主；在应该忘记的时候忘记，在需

要的时候再记起，接着又立即将其忘记，最重要的是，将方法运用于方法本身。这便是极微妙之处：有意识地将自己催眠，接着将刚才自我催眠这件事也忘掉。哪怕理解“双向思维”这个词，都要用到双向思维。

女教练又一次叫他们立正。“现在我们来看谁能碰到自己的脚趾！”她兴奋地说。“同志们，请大家弯下腰去，呈一个直角。一、二！一、二！……”

温斯顿恨极了这个练习，每次做这个动作，他脚跟往上到臀部这一块就钻心地疼，而且经常做完后就剧烈地咳嗽。他从沉思中获得了些许快乐，他意识到过去不仅仅是被篡改了，而是被完全摧毁了。在除了记忆之外，完全没有其他记录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来证实哪怕是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他试着回忆具体在哪一年自己第一次听说老大哥。他觉得一定在60年代，但无法确定。毫无疑问，在党史里，老大哥有史以来就是革命的标志与领袖。他的功勋被渐渐向前推移到了传说中的三四十年代。当时资本家们头戴圆柱形的帽子，搭乘亮闪闪的轿车或坐着有玻璃窗的马车在伦敦街道上穿梭。无从知晓这样的传闻到底有几成是真的，几成是捏造的。温斯顿甚至无法记起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他确信自己在1960年之前从没听说过“英社”这个词，但这个词的旧话形式“英国社会党”是在此之前就有的。一切像笼罩了一层迷雾。的确，有时候，他可以确切地指出一些说法是极其荒诞的。比如党史上讲飞机是由党发明的，这不是真的。他记得飞机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但他无法证明，因为没有任何证据。他一生中只有过一次，掌握了能证明某一个史实被篡改的力证。在那种情况下……

“史密斯！”电屏里泼妇似的声音喊道，“6079号，温斯顿·史密斯！对，说的就是你！弯下腰！你是能弯得更低的。卖力点！弯下去！这样就好多了，同志。现在稍息，全班人员看我。”

一瞬间，温斯顿汗流浃背。但他脸上依然不露声色。千万不能流露出失望的神色！千万不要露出仇恨的表情！一个眼神就可能暴露自己。他站着看女教练双手伸过头顶——姿势谈不上优美，但非常干净利落——然后弯腰，用手指第一个关节扣住脚尖。

“就是这样，同志们！这就是我想要看你们做的。再看我做一遍。我现在三十九岁，是四个孩子的妈。看。”她又一次弯下腰。“你们看，我膝盖没弯。如果你们想做，一定也能做得到。”她直起身来后，又加了一句，“所有四十五岁以下的人，绝对都能碰得到自己的脚尖。我们

不能光荣地在前线战斗，但至少可以保持健康。想想那些在马拉巴前线战斗的小伙子们吧！还有漂浮堡垒上的水兵们！想想他们要忍受的艰苦。再试一次，这就好多了，同志，好多了。”女教练加了一句鼓励的话，因为温斯顿忍受着肺部的不适，成功使膝盖保持不弯，碰到了自己的脚尖，这是他这几年里第一次完成这个动作。

---

[1] 英寻：深度单位。1英寻≈1.83米。

第四章

温斯顿不觉深深叹了口气，哪怕电屏近在咫尺，也无法阻止他在开始每天工作之前叹气。温斯顿把说写器拉到身边，吹掉话筒上的灰尘，戴上眼镜。他办公桌右手边的气流输送管里掉下四个小纸卷。他把纸卷展开，用回形针夹到一起。

工作隔间墙上有三个洞。说写器右边的洞是用来传送书面指示的小型气流输送管；左边稍大一点的洞用来传送报纸；温斯顿手边侧墙上的洞为长方形，蒙着铁丝网，用来丢弃废纸。这栋建筑里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长方形洞，不仅每间房间里有，而且每条走廊上相隔不远距离就有一个。不知何故，人们将其称作“记忆洞”。只要有人得知一个文件须销毁或看到身边有废纸，都会下意识地就近打开一个记忆洞的挡板，将废纸扔进去。于是被投进记忆洞的纸就会由热气带到一个巨大的熔炉中销毁，这个熔炉隐藏在这栋建筑的某个神秘的地方。

温斯顿仔细看了一下刚才展开的四张纸。每张纸上用缩略语写着一两行指示——这些指示并不是用真正的新话写成，但用了很多新话词语——这种书写方式仅供部里内部使用。纸上写着：

泰晤士报17.3.84修正大大非洲不实演讲

泰晤士报19.12.83预报三年计划第四季度关于当今事件的83处错印

泰晤士报14.2.84修正富部巧克力错报

泰晤士报3.12.83，大大日示报道双倍不好，涉及非人，全部重写报上级归档。

温斯顿带着隐隐的满足感把第四条消息放到一边。这项工作比较复杂，而且责任重大，须最后处理。另三项只是常规工作，尽管第二项需要处理一堆枯燥乏味的数据。

温斯顿在电屏上输入“过期刊物”，索取《泰晤士报》相关版次。过了几分钟，他所要的报纸就从气流输送管里掉了出来。他接到的任务与

一些文章或报纸有关。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报纸需要修改，或用官方语言来说，需要“修正”。比如，3月17日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老大哥前些日子的一个演讲。当时他预测南印度前线不会有动静，而欧亚国将在短期内于北非登陆。但事实是欧亚国高级指挥官在南印度发起了攻势，北非反而没有动静。因此必须重写老大哥的演讲，通过这种方式让老大哥的预测与事实相符。还有，12月19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官方对1983年第四季度各种消费品产量的预估，这也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第六季度的产量。而今天的报纸上刊登了有关真实产量的报告，相较之下，之前预估的每一项都错得离谱。温斯顿的工作就是修正原先的数据，使之与后来的数据相吻合。第三项工作涉及一个简单的错误，只需几分钟就能完成。不久前，大约2月份的时候，富足部许诺（官方说法称为“明确承诺”），1984年内，巧克力配给量不会降低。但是，温斯顿记得就在这周末，巧克力配给量就会从30克降到20克。因此，把原先的承诺修改为预警即可，预警内容为很有可能要在四月份的某个时候降低配给量。

温斯顿一旦处理完一项指示，便把通过说写器修正完的文本夹到与之相对的《泰晤士报》上，并将其推进气流输送管。接着几乎是下意识地将记着指示的小纸条和他做的笔记揉成一团，扔进记忆洞焚毁。

气流输送管连接着一个看不见的迷宫，对迷宫里到底发生着什么事，他并不清楚细节，但知道个大概。只要有更正的必要，相应份数的《泰晤士报》将被收集、订正，并重新印刷，原先的报纸会被销毁，修正后的报纸则会取而代之进行存档。这种不停地修改不仅应用于报纸，而且应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海报、传单、电影、原声带、卡通、照片等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关的所有文献。使得过去每一天，几乎每时每刻都与现在保持一致，通过这种方式，使得资料显示的党的每一项预测都是正确的，不允许任何与当下情形相违背的新闻报道和观点的记录存在。所有历史事件就像写在一张可以擦去重写的羊皮纸上。只要有这个必要，就会立刻把原文擦得一干二净，重新书写。因此只要这么做，就绝没有可能证明有错误的存在。档案司中有一个最大的科室，比温斯顿工作的科室要大得多，里面工人的工作就是搜寻并收集所有须被取代并销毁的书籍、报纸等。若干版次的《泰晤士报》也许因为政治联盟的改变或老大哥预言的错误等原因被重写了几十遍，现在上面依然印着当时的时间进行存档，而且找不到任何与之相违背的版本。书籍也会被一次又一次召回重写，而且无一例外地重新发行，亦没有任何有关内容变更的声明。甚至温斯顿收到的工作指示上，也没有任何有关伪造行为的

陈述甚至暗示，仅仅声称出于准确的考虑，须更正一些遗漏、错误、错印、引用不当的地方。这些工作指示温斯顿一旦完成，就会无一例外地被立即销毁。

但事实上，温斯顿在更正富足部的数据时觉得这甚至不能算是伪造。完全就是以胡编来取代胡编。你所处理的大多数材料跟现实世界根本没有关联，甚至连谎言与现实之间的关联都没有。更正的数据和原始数据一样都是空想出来的。很多时候你需要凭空捏造出这些数据。比如富足部预估这一季度靴子的产量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双，而实际产量为六千二百万双。但是温斯顿在重写预估数量的时候，把产量缩减为五千七百万双，使得富足部可以和往常一样宣称超额完成了计划。不论怎样，不管是六千二百万双还是五千七百万双，或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都和事实没有关联。很可能根本就没有生产靴子这回事，甚至可能根本没人知道靴子的产量到底是多少，更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人们只知道报纸刊登着每季度靴子产量巨大，而大洋国可能有一半人打着赤脚。事无巨细，都是这样记录的。一切都消散在一个影子世界里，最终甚至连年份日期都无法确定了。

温斯顿朝大厅另一端看去。在正对面的工作隔间里，一个名叫特罗森的男人正在不紧不慢地干着活。特罗森身材矮小、穿着整齐、下巴黝黑，膝盖上盖着一张合起来的报纸，嘴和说写器话筒凑得很近。感觉他不想让自己所说的话被电屏之外的人听到。他抬起头，眼镜朝温斯顿方向反射出敌意的光芒。

温斯顿和特罗森几乎素昧平生，也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工作。在档案司工作的人通常缄口不提工作上的事。狭长的大厅一扇窗户都没有，两侧的工作隔间里不断传出翻纸的沙沙声和人们对着说写器说话的咕哝声。这个大厅里有几十个人温斯顿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尽管每天见到他们在走廊里来去走动，还有在两分钟仇恨节目时见到他们手舞足蹈的样子。他知道，自己隔壁工作隔间里那个浅棕色头发的女人天天忙个不停，她的工作只是在报刊上查找并删除那些已经人间蒸发、不再存在的人员名字。她多少是适合做这项工作的，因为她的丈夫就在几年前人间蒸发了。几个隔间外，有一个整天空想、身无长技的好好先生，名叫安普福斯。这人耳朵上汗毛很重，最擅长吟诗作赋。他的工作就是将一些由于某些原因依然需要被收录进诗集的反动诗歌作些修改，最后的定稿被称为“权威文本”。这个能容纳约五十人工作的大厅，不过是一个小科室，在档案司这个庞大而复杂的机构中，只是一个细胞而已。在这个科

室之外，上级和下级机关里有着大群工人在多如牛毛的岗位上工作。印刷厂规模庞大，里面有审校员、字体排印专家，还有专门为了假造照片而设的设备精良的工作室。电屏节目科里有工程师、制片人，还有专门的口技演员。还有大批资料员，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列出清单，清单上写明需要召回的书籍与期刊。存放已经修正过的文件的档案室极其巨大，用来销毁原件的焚化炉暗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某处，有一群负责管理的中枢人物，他们统筹整个机构的工作，并制定政策，决定哪些过去需要保留，哪些过去需要篡改，哪些过去直接抹煞。

而档案司终究也只是真理部的一个分支，真理部的主要工作并不是重构过去，而是为大洋国公民提供新闻、电影、教科书、电屏节目、戏剧、小说……只要是能想到的信息、指示、娱乐形式，从雕像到口号，从诗词到生物学专著，从儿童识字书到《新话字典》，无所不包。真理部不仅仅提供党内的各种需求，而且以同样的运作方式满足下层群众的需要。专门有相关部门负责群众文学、音乐、戏剧，普遍意义来说就是娱乐。有只刊登体育、犯罪、天文报道的垃圾报纸；有五分钱一本的中篇情感小说；有充斥着色情画面的电影；还有一些情歌，由一种形状像万花筒的写歌机生产出来。这些部门下面还专门设了一个科，新话叫色科，负责生产最低级的色情书籍，这些书籍被封装起来，除了制作人员之外，所有党员都不准翻阅。

温斯顿工作的时候，气流输送管里又滑出三条指示，不过都是简单的工作，他在“两分钟仇恨”节目开始之前就把它们都处理完毕了。“仇恨”节目结束后，温斯顿回到了工作间里，从书架上拿下《新话字典》，把说写器推到一旁，擦了擦眼镜，开始着手早上的大工程。

温斯顿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来源于他的工作。虽然大部分时候只是单调的常规工作，但有时候也会碰到特别困难复杂的活，让人能像解数学难题一样深陷其中忘记自我，如伪造那些棘手的数据，你没有任何参考，你只能凭借着对英社原则的认识和对党想要你说什么的估计来判断。温斯顿对这方面很在行。有时候他会被委托修正《泰晤士报》上的社论，这些社论完全用新话写成。他展开之前放在一边的纸卷，上面写道：

泰晤士报3.12.83，大大日示报道涉及非人，双倍不好，全部重写报上级归档。

如果用旧话（或者叫标准英语）来说，这句话应该是：

1983年12月3日的《泰晤士报》上，有关“老大哥每日指示”的报道涉及不存在的人，极为不妥。整篇重写，并在归档前将草稿提交给上级。

温斯顿将这篇问题文章通读了一遍。老大哥每日指示，看起来主要都在赞扬一个名为“漂堡物委”的组织，这个组织负责给漂浮堡垒上的海员提供香烟和其他改善生活的物资。有一个名叫威瑟的著名核心党员，被点名表扬并授予了一枚二级荣誉勋章。

三个月后，“漂堡物委”突然毫无理由地解散了。可以断定威瑟和他的同事已经失宠。但关于此事，媒体和电幕上完全没有相关报道。因为对政治犯的审判或公开批判通常不会发生，所以基本可以猜想是怎么回事。对成千上万叛徒和思想犯进行大清洗，公开审判，逼其供述自己所犯的罪行紧接着将其处死这类展示几年才有一次。更多时候，那些得罪党的人，会直接消失，再也没有消息。没人知道这些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除他的父母之外，大约就有三十个温斯顿认识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

温斯顿用回形针轻轻敲着鼻子。对面的工作间里特罗森同志依然对着说写器窃窃地说着。他把头抬起了一小会儿，眼镜又反射出凶光。温斯顿思忖，是不是特罗森同志和自己在做一样的工作。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不可能只交付一人来做：但反过来讲，如果把这项工作交给一个委员会来做，那就等于公开承认这种篡改行为是存在的。现在很可能有十几个人正在相互竞争，改写老大哥的讲话。而在核心党里，现在也有那么几个中枢人物负责选择某一个版本进行重新编辑，接着就有必要进行相互参照这一复杂程序，最后选择一个谎言，归入永久的档案，使其成为事实。

温斯顿不知道为什么威瑟会被免职。也许因为贪污，也许因为能力不够，也许老大哥单纯只是想摆脱过于受欢迎的下属，也许威瑟或他身边的人有反动倾向，也许——这种可能性最大——发生这种事仅仅因为大清洗和人间蒸发是政府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涉及非人”这个词是唯一的线索，这个词暗示威瑟已经死了。一旦出现了这个词，你基本可以确定当事人并不仅仅是被关押了。有时候他们会在被处决前获得一两年的自由。在极少情况下有些你觉得很早之前就死了的人，会像鬼魂一样出现在公开审判席上，供出几百个同伙后人间蒸发，而这次是真的永远人间蒸发了。然而威瑟现在已经是“非人”了。他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温斯顿认为单纯把老大哥的讲话反过来写还不够。最好要在讲话里

加上一些和原题完全无关的东西。

他可以把原文改写成常见的谴责叛徒和思想犯讲话，但这样太明显了，而前线的战争或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完成又会使其过于复杂。在这种时候，需要加上一些空想出来的东西。突然，他脑中闪出一个念头，一个在最近一场战役中英勇献身的奥格威同志迅速成形。有些时候，老大哥会在每日指示中纪念一些淳朴的基层党员，他们的生活事迹和为国捐躯的行为被树立为人们学习的榜样。而在这一天，老大哥会纪念奥格威同志。的确，根本没有奥格威同志这个人，但几行铅字、几张假照片就能很快让他存在于这世上。

温斯顿稍作思考，随后把说写器拉近，开始以老大哥惯用的说话方式记录了起来。这种说话方式在军队中曾被广泛使用，非常迂腐，即以一种明知故问的方式来说话（“同志们，从这件事，我们能学到什么？我们能学到的，也是英社的基本原则，即……”诸如此类），因此非常易于模仿。

奥格威同志三岁时，除了一面军鼓、一把冲锋枪、一架模型直升机之外什么都不要玩。六岁时，他以特招的身份提前一年加入少年特工队，九岁时已经是队长了。十一岁时，偷听到叔叔的谈话，认为其有犯罪倾向，于是就向思想警察检举揭发。十七岁时他已经负责组织青年反性团一个区的工作了。十九岁时，他设计了一种手榴弹，并被和平部采用，第一次试爆就一下子炸死了三十一个欧亚国俘虏。二十三岁时，他在一次行动中牺牲。当时他驾驶直升机携带重要文件飞越印度洋，被敌人的喷气式飞机跟踪，最后，为了不让敌人找到尸体，他怀抱重机枪跳出直升机，和文件一起沉入大海。老大哥说，这样的归宿不能不让人羡慕。老大哥还提了一下奥格威同志纯洁、一心献身革命的生活。他洁身自好，从不抽烟。除了每天去健身房锻炼身体之外，没有其他娱乐活动。他发誓终身不娶，认为婚姻与照顾家庭和每天二十四小时献身革命两者不可兼得。他开口必谈英社原则，除了打败欧亚国敌人，抓捕间谍、破坏分子、思想犯、叛徒之外，生活没有别的目标。

温斯顿对是否要授予奥格威同志奖章犹豫不定，最终他决定不这么做，因为一旦这么做，就要连带进行不必要的相互参照。

他又看了一眼对面工作隔间里的竞争对手。他隐隐感觉特罗森正在做同样的工作。无从知晓他们俩谁的文稿会被采纳，但他有自信最终被采纳的会是自己的稿子。奥格威同志一小时前还并不存在，现在他的事

迹已经是事实了。而有一件事让他感到很奇怪，即你可以创造死人，却无法创造活人。奥格威同志并不存在于当下，却存在于过去。一旦伪造行为被遗忘，他便会和查理大帝、凯撒大帝一样真实存在，并立足于同样的证据之上。

第五章

地下深处的食堂，天花板压得很低，午饭的队伍缓慢地挪动前行。柜台隔栏里，炖菜不断地倾倒出来，散发出一股发酸的金属味，然而这种味道依然没有盖过胜利金酒的气味。食堂另一端有一个小酒吧。说是酒吧，其实也就只有墙上一个洞而已。在那儿，只需一毛钱，就能买到足以喝上一大口的金酒。

“这不就是我想找的人嘛。”温斯顿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他转过身去。看到了在研究司工作的朋友塞姆。也许“朋友”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词。因为如今你身边已经没有朋友了，只有同志，只是有些同志相处起来会比其他人愉快些而已。塞姆是语言学家，专门研究新话。事实上，他是负责编纂第十一版《新话字典》庞大专家组的成员。他身材矮小，比温斯顿还要小上一圈，一头黑发，眼睛大而凸出，眼神忧伤并带着几分嘲讽。每次他和你讲话的时候，眼睛都像要近距离在你脸上搜寻什么东西一样。

“我问一下，你有没有剃须刀片？”他说。

“没！”温斯顿脱口而出，带着一丝心虚。“我哪儿都跑遍了，一片都买不到。”

所有人都在问你要剃须刀片。事实上，温斯顿还藏着两片没用过的。剃须刀片已经断货几个月了。党营商店里随时会出现某种东西断货。有时候缺纽扣，有时候缺缝衣服的毛线，有时候缺鞋带。现在，则是缺剃须刀片。你只有偷偷去“自由”市场，才有可能搞到这些断货的东西。

“我那片已经用了六星期没换了。”温斯顿又撒了句谎。

队伍又向前挪了一下。等队伍停下来的时候，温斯顿又把头转向塞姆。柜台末端有一堆油腻的金属餐盘，两人各拿了一个。

“昨天你去看绞杀俘虏没？”塞姆问。

“昨天我上班，”温斯顿不动声色地说，“我觉得电影会放的。”

“看电影哪能和现场比。”塞姆说。

塞姆嘲讽的眼神在温斯顿脸上游走。“我太了解你了。”他的眼睛似乎在说我把你看穿了，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看绞死俘虏。塞姆的思想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而这种恶毒又以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会带着幸灾乐祸的满足感谈论直升机对敌军村庄的袭击、思想犯的审判与招供、仁爱部监狱里处决囚犯之类的事，而他的这种态度听着就令人心生不快。跟他谈话的时候，常常都要把话题从这类事上岔开，尽可能让他讲新话的术语，因为在这个话题上他是专家，让人听着很有趣味。温斯顿微微别过头，躲避塞姆那双黑色大眼睛审视的目光。

“那天绞得真是漂亮，”塞姆边回忆边说，“不过他们把囚犯的腿绑起来真是大煞风景。我喜欢看那些人双脚乱蹬的样子。最精彩的是到最后那些人的舌头会伸出来，颜色发青，青得发亮。最吸引我的就是这类细节。”

“下一个！”一个穿着白围裙的群众拿着长柄汤勺喊道。

温斯顿和塞姆把托盘推到隔栏下面。一顿平常的午饭被迅速放到托盘上，盛在金属小盘里的粉褐色炖菜、一块面包、一块奶酪、一杯不加奶的“胜利咖啡”、一块糖精片。

“那边有桌子，就在电屏下面，”塞姆说，“去那边的时候顺道拿杯金酒。”

他们拿了用无柄陶瓷杯装着的金酒，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金属面的餐桌旁，放下托盘。桌子的一角有吃剩的炖菜，这难以名状的糊糊看着就像一摊呕吐物。温斯顿拿起装着金酒的杯子，定了定神，接着喝下一大口带着油味的酒。他眼泪都被呛了出来，突然他意识到自己饿了，开始大勺大勺舀炖菜吃。炖菜很稀，里面有海绵一样的粉色块状物，可能是肉。他们俩一言不发，直至把餐盘里的东西吃了个精光。温斯顿左手边桌上靠他背后位置，有人正在用很快的语速不停地讲话，喋喋不休的刺耳嗓音在餐厅的嘈杂声中特别明显，像鸭子的叫声。

“字典编得如何？”温斯顿提高嗓门，努力盖过食堂里嘈杂的喧闹声。

“进展很慢，”塞姆说，“现在我在弄形容词，特别有意思。”

一提到新话，塞姆整个人马上变得兴致高昂。他推开餐盘，伸出纤细的双手，一手拿面包，一手拿奶酪，朝温斯顿探过身来，这样就可以不用喊着说话了。

“第十一版是最终版了，”他说，“新话已经接近最终形态，到那个时候，就再没有人讲其他的语言了。我们的工作完成之后，像你这类人需要从头学起。我敢说你准是觉得我们就只是在造新词而已。其实完全相反，我们是在消灭字词，每天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我们把语言精简到只剩骨架。第十一版《新话字典》里的每一个词，直到2050年都不会淘汰。”

他饥不可耐地啃着面包，并大口吞下，随后带着书呆子特有的激情继续讲了下去。他消瘦而黝黑的脸生机勃勃，眼睛里没有了嘲讽，变得几乎如痴如醉。

“消灭字词是一件很美妙的事。当然，动词和形容词里没用的最多，有几百个名词可以去掉。不仅仅同义词可以去掉，反义词也可以去掉。归根到底，一个词如果仅仅只是和另一个词意思相反，这样的词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每个词本身就能变成与自己意思相反的形态。拿‘好’举例子。如果有‘好’这个词，为什么还需要‘坏’这个词呢？‘不好’就能表达这个意思了，而且表达得更准确，因为与其词义完全相反。再进一步，如果你要表达比‘好’更强烈的情感，何须那一连串意思模糊诸如‘优秀’‘非凡’之类的词呢？‘加好’就能表达这个意思了，或者如果你想表达的程度更深，就用‘双倍加好’。当然，这些形式现在已经在使用了，但新话的最终版本里，将不再有其他的表达方法。最终有关好坏的表达，只有六个词。你不觉得这很美好吗，温斯顿？当然，这个想法最初是大大提出来的。”他最后又不忘加了这么一句。

一提到老大哥，温斯顿脸上闪过一丝无精打采的向往。尽管只是一瞬，塞姆立即察觉到温斯顿似乎对他的话并不太感兴趣。

“你并没有真心欣赏新话，温斯顿，”他几近伤心地说，“尽管你用新话写文章，但心中想的依然是旧话。我偶尔读过几篇你在《泰晤士报》上写的文章。写得是很好，但依然只是翻译罢了。你心中依然抓着旧话不放，充斥着模棱两可和毫无用处的言外之意。你没有体会到消灭字词的美感。你知道么？新话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词汇逐年减少的语

言。”

温斯顿当然知道，但没敢搭腔，就怕说漏了嘴。他笑了一下，希望自己的笑里能透露出赞同之意。塞姆又咬了一口发黑的面包，稍微嚼了几口，继续说道：“你不觉得新话的目的就是缩小思想的范畴吗？最终，思想罪将不可能发生，因为根本没有字词可以将其表达出来。所有必需的概念都只能用唯一的字词表达，这个词的含义无比精确，所有言外之意都将被清除并遗忘。第十一版里，我们已经离这个目标不远了，但这个过程在你我死后仍然会继续下去，年复一年，词汇越来越少，思想的范畴越来越小。当然，就算是现在，也毫无理由或借口为思想罪开脱，这是个自律和现实控制的问题。但到了最后，就连这点也不需要了，语言完善了，革命也就成功了。新话就是英社，英社就是新话，”他话中带着一丝神秘的满足感，“你想过么，温斯顿，到2050年，到最后，世上没人能理解我们现在的谈话？”

“除了……”温斯顿带着疑问开口，但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那句在嘴边的话是“除了那些群众”。但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话，不能确定这样的话是否属于异端思想。然而塞姆猜到了温斯顿的想法。

“群众不能算人，”他轻描淡写地说道，“到2050年，也许要不了那么久，就没人懂旧话了。所有有关过去的文学都消失了。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等，有关他们的一切将只剩新话版。不仅仅是改变，而是变得与之前的截然相反。甚至党的文学也要改变，甚至口号也要改。当自由这个概念已经消失的时候，哪来“自由就是奴役”这样的口号？整个思想的大气候都会变得不同。事实上，根本不会再有我们现在所谓的思想。思想纯正意味着不思考，即不需要思考。思想纯正是下意识的行为。”

温斯顿突然深深确信，总有一天塞姆会人间蒸发。他太聪明了，看得太清楚，说话太直白。党不喜欢这类人。总有一天他会消失，塞姆的神情就说明了这一点。

温斯顿吃完了面包和奶酪，稍稍向椅子的一侧靠了靠，开始喝咖啡。他左手边桌上那个声音尖刻的男人依然在滔滔不绝。一个年轻的女人，可能是那男人的秘书，背对温斯顿。边听边连连附和，因为温斯顿时不时听到一个年轻女性愚昧的声音说着诸如“说得太对了，我太赞同了”之类的话。而另一个人的说话声哪怕在女孩说话的时候也从未中断

过。温斯顿觉得这男的面熟，尽管他除了知道对方在小说司里身居要职之外，对其一无所知。这男人三十来岁，脖子粗壮，一张大嘴上下翻飞。他的头稍稍后仰，由于角度问题，眼镜正好反光，温斯顿看不到他的眼睛，能看到的只是两个空无一物的圆盘。言语从他的嘴里倾泻而出，但几乎一个词都听不清，这多少有点恐怖。温斯顿只听出来了只言片语——“彻底消灭古登斯坦主义”——这几个词被快速说出，像雕版印刷一样合成一体。其他的话就只是噪音，嘎嘎嘎……尽管你无法听出这个男人到底在说什么，但依然可以听出总体思想。他可能在谴责古登斯坦，并要求对思想犯和从事阴谋活动的人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他可能在强烈谴责欧亚国士兵的暴行；他也可能在称颂老大哥或在马拉巴前线战斗的英雄。其实都差不多。不管是什么，你能确定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在思想上都是正统的，都是拥护英社的。温斯顿看着那个没有眼睛的脸，下巴不停地开合，心里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他不是真正的人类，而是一个人体模型。这个人说话并不通过大脑，只是用喉咙在讲而已。他讲的东西由字词组成，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话，而只是下意识制造出的噪音，就像鸭子嘎嘎叫一样。

塞姆沉默了一会，用勺子在炖菜里搅拌，像在描画某种图案。邻桌鸭叫一样的声音继续连珠炮般地发出，虽然周围很吵，但依然清晰可辨。

“新话里有个词，”塞姆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鸭话’，意思是像鸭子似的嘎嘎叫着说话。这是个有趣的词，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含义。用在你反对的人身上，是一种侮辱，而用在与你意见相合的人身上，则是赞美。”

毫无疑问，塞姆会人间蒸发，温斯顿又一次这么觉得。想到这里他心里闪过一丝忧伤。尽管很明显塞姆有点看不起他，也不太喜欢他，而且一旦被塞姆抓到一点马脚，极为可能会被当成思想犯并被告发。塞姆多少有点不正常。这个人缺少谨慎、超脱、以糊涂自保之类的东西。你不能说他不正派，他信仰英社原则、敬重老大哥、享受胜利、厌恶叛徒。这些并不是出于真诚，而是出于某种无尽的狂热。他还掌握着最新的资讯，而这是普通党员无法企及的。但他身上总隐隐有一种会让自己身败名裂的气场。他说着一些不如不说的话，他读过太多书，而且常去栗树餐厅和那些画家、音乐家混在一起。就算是不成文的法律也没有禁止人们去栗树餐厅，但那个地方多少有些不吉利。那些现在已经身败名裂的党的原领导人曾经常到那里聚集，直到最终被肃清。传言古登斯坦

本人有时候也会去那儿。但有一个事实不会改变，就是一旦塞姆发现温斯顿不为人知的想法，不用三秒钟，他就会立马倒戈向思想警察告发温斯顿。虽然对于告发这件事，其他人也会做，但塞姆是最会做这种事的人。能够这样，光有狂热还不够，思想纯正是下意识的行为。

塞姆抬起头，“帕森斯来了。”他说。

从他的语气听来，刚才这句话似乎要加上“那个该死的蠢货”才完整。温斯顿在胜利大厦的邻居帕森斯正从食堂另一头向他们走来。帕森斯体型肥胖，中等身材，长着浅色的头发和一张青蛙似的脸。他才三十五岁，脖子和腰上就堆满肥肉，不过走起路来一蹦一跳，十分幼稚。从外表来看，他就像一个发育过剩的小男孩。尽管穿着普通的工作服，但依然让人禁不住想象他穿着儿童特工队的蓝色短裤、灰色衬衫，戴着红颈巾的样子。只要一想到他，浮现在人们脑海的就是粗短的腿上向下凹陷的膝盖和卷起袖子后露出的粗短手臂。事实上帕森斯只要参加社区远足或其他体育活动，一有机会他都会无一例外地把裤腿卷起来。帕森斯兴高采烈地向他俩打招呼：“你好喔，你好喔！”接着坐到桌旁，一股汗味随之扑面而来。他脸上挂满汗珠，这个人实在是太能出汗了。在社区活动中心，从乒乓球拍柄的潮湿度就能判断他有没有打过乒乓球。塞姆拿出一张条状的纸，指间夹着彩色铅笔开始研究纸上的一长列单词。

“看啊，这个人午饭时间还在工作，”帕森斯用肘推了一下温斯顿说，“好认真啊，是吧？你在看些什么啊，小伙子？我觉得应该是我这个脑袋无法理解的东西吧。史密斯小伙子，我跟你说我为什么来找你吧，你忘了把捐款交给我了。”

“什么捐款？”温斯顿说完，下意识地去摸钱包。大约每人工资的四分之一需要被用作自愿捐款。因为捐款名目纷繁复杂，很难追溯这些钱到底被用到了哪里。

“是仇恨周，你知道的，每家每户都要捐。咱们栋的捐款由我负责收。大家正在拼尽全力办一场盛大的演出。我跟你说，要是胜利大厦挂的旗帜数量拿不到整条街第一名，那可不是我的错。你答应过的，捐两块。”

温斯顿掏出两张脏兮兮、皱巴巴的纸币递了过去。帕森斯用一种没读过书的人才会写的工整字体将其记在小本子上。

“对了，小伙子，”他说，“我听说我家那个小捣蛋鬼昨天拿弹弓射你。我狠狠地把他教训了一顿。真的，我还对他说如果他还那样，就把他的弹弓没收。”

“我觉得他只是因为没能去看绞刑有点不开心。”温斯顿说。

“啊，那个！我的意思是，他们这个想法是不错，是吧？虽然他俩都是小捣蛋鬼，但还是挺积极的！当然，他们满脑子想的就是儿童特工队和战争。知道我家小姑娘上周六做了什么吗？当时她们一群小特工队员正在伯克翰斯德街上远足，她带领两个小女孩，跟踪了一个陌生人一下午。她们在那个人身后尾随了两个小时，穿过了树林，随后走到了安玛西亚，向那边的巡逻队报告。”

“她们为什么这么做呢？”温斯有点惊讶地问道。帕森斯洋洋得意地继续说道：“我孩子确定他是敌人的间谍，可能是跳伞落到了那里。但现在我说的才是重点，小伙子，你猜是什么让我女儿开始怀疑他？她发现那个人穿着一双怪里怪气的鞋子，她说她从来没见过有人穿那样的鞋。所以这个人有可能是外国人。她才七岁，很机灵吧？”

“那个人怎么样了？”温斯顿说。

“啊，那我当然不好说。但就算是这样，我也觉得是在情理之中。”帕森斯模仿了举枪的姿势，咂了一下嘴作为枪声。

“不错。”塞姆心不在焉地说，仍然在看那张纸条，头也不抬。

“当然，要防患于未然。”温斯顿本分地表示赞同。

“我的意思是，毕竟还在打仗。”帕森斯说。

就像呼应帕森斯的话一样，他们头上的电屏中传出军号声。不过这次并不是宣告军队胜利，而仅仅是富足部发布的通知。

“同志们！”一个充满激情的年轻声音大声说道，“同志们，请注意！现在播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新闻。我们在生产上打了胜仗！到目前为止，各种消费品的产量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过去一年中至少提高了20%。今天早上，大洋国全国上下，人们自发组织了盛大的游行，工人们走出工厂和办公室，在街上高举横幅，表达对老大哥的感激之情。在

他的英明领导下，大家过上了幸福新生活。下面播报一些具体数字。食品……”

“幸福新生活”这个词反复出现了多次。最近富足部特别爱用这个词。帕森斯的注意力被军号声吸引，坐在那里听着，脸上带着一种一本正经的呆相和一种听明白后的厌倦。他的头脑跟不上具体数据，但觉得听播报的内容能带来某种满足。他早已拿出了一个巨大而肮脏的烟斗，烟斗里半满的烟叶已经焦黑。自从烟草的配给调整到每周100克以后，已经几乎不可能把烟斗填满了。温斯顿正抽着胜利香烟，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把烟水平夹着。明天才会公布新的配给量，而他现在只剩下4根香烟了。现在他不去理会远处的吵闹声，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电屏里传出的每一句话上。根据电屏的播报，似乎人们发起游行感谢老大哥把巧克力配给量提高到每周20克。而仅仅在昨天，他回忆起来，才有播报说巧克力配给量会减少到每周20克。才过去了二十四小时，怎么就能够把事实真相活生生吞掉了？是的，他们就真的把事实吞掉了。帕森斯以其牲畜一样的智商，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另一桌上看不见眼睛的那个人也满怀热情、臆想着接受了这种说法，并充满恶意地渴望着把那些提出上周配给量为30克的人搜寻出来，狠狠批斗，并使其人间蒸发。塞姆也一样，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通过双向思维接受了这种说法。而他，是不是只有他，还保有记忆？

振奋人心的数据源源不断地从电屏里倾泻而出。和去年相比，人们拥有了更多食物、更多服装、更多房屋、更多家具、更多厨具、更多燃料、更多战舰、更多直升机、更多书籍、更多婴儿……除了疾病、犯罪、精神病人之外，一切都比去年更多。一切都在逐年、逐分地快速进步。和塞姆先前一样，温斯顿拿起勺子，蘸进桌上流淌着的惨白色肉汁里，向外划出一长条，勾成某种图案。他带着一肚子怨气思考人生的物质表象。是不是从来就是这样？食物一直是这种味道的吗？他环顾餐厅，天花板很低，人群拥挤；墙壁经过数不清的人触碰，满是污垢；金属桌椅破损不堪，摆放得十分密集，坐下来会碰到旁边人的手肘；弯曲的勺子，凹凸不平的餐盘，粗糙的白色杯子；所有物体的表面都沾满油污，缝隙里嵌着脏东西；劣质金酒味、劣质咖啡味、炖菜的金属味，还有脏衣服的气味全都混在一起，像是馊掉了一样。你的胃和皮肤常常会抗议，你会有一种应得却未得，被欺骗了的感觉。确实，他记不起任何与现在截然不同的事了。他的记忆中，食物从来都是匮乏的，人们的袜子和内衣上满是破洞，家具破损摇晃，屋内供热不足，管道列车上挤满了人，房屋摇摇欲坠，面包颜色发黑，茶难得一见，咖啡特别难喝，香

烟供给不足——除了勾兑出来的金酒以外，没有一样东西充裕而便宜。的确，人们年纪越来越大，以上这些现实会愈加让人难以承受，如果不适、肮脏、匮乏，无休止的冬天、黏黏的袜子、从不运作的电梯、冰冷的水、含砂的肥皂、松散的香烟、味道古怪的食物这一切东西让人感到厌倦，可什么又能表明这不该是世界应有的样子呢？如果根本没有任何久远的记忆显示世界曾经并非如此，又有什么理由感到无法忍受呢？

他又一次环顾餐厅。几乎每个人都相貌丑陋，就算是换下了蓝色的工作服也依然如此。在餐厅另一头，有一个身材矮小、长得像甲虫的古怪男子正独自坐在餐桌旁喝咖啡，一双小眼睛充满警觉地左顾右盼。温斯顿心想，要是你没有看看周围的人，准会不假思索地相信党设定的标准体型确实存在，甚至比比皆是——高大壮硕的青年和胸脯丰满的少女，头发金黄，充满活力，小麦色皮肤，无忧无虑。事实上，在温斯顿看来，第一空降场的大多数人都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其貌不扬。奇怪的是，部里怎么就不断滋生出越来越多这类甲虫一般的人——又胖又矮，年纪轻轻就一身赘肉，腿很短却动作灵活，高深莫测的胖脸上长着一双小眼睛。在党的统治下，似乎这类人繁殖得最快。

又一声军号响起，富足部的通知播送完毕，取而代之的是尖细的音乐声。帕森斯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还没有从被数据轰炸后恍惚的兴奋状态里走出来。

“富足部今年干得真不错，”他摇了摇头，似乎领会了数据的含义，“对了，史密斯小伙子，你有没有多余的剃须刀片给我用一下？”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说，“我六个星期以来都在用同一片剃须刀片。”

“啊，好吧，我还以为问你准没错呢，小伙子。”

“不好意思。”温斯顿说。

邻桌鸭叫一样的声音在富足部通知的时候暂停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开始了，嗓门和之前一样大。不知怎么的，温斯顿突然想到了帕森斯太太，头发稀疏，脸上皱纹里积着灰尘，不出两年，他的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告发她。帕森斯太太将人间蒸发，塞姆将人间蒸发，温斯顿将人间蒸发，奥伯里恩将人间蒸发。与此相反，帕森斯绝不会人间蒸发。看不见眼睛的公鸭嗓男人绝不会人间蒸发，那些矮小的、甲虫一般的、在机

关部门迷宫般的走廊里灵活穿梭的男人们，也绝不会人间蒸发。那个黑发女孩，小说司的黑发女孩，也绝不会人间蒸发。似乎他本能地知道哪些人能够幸免于难，哪些人在劫难逃，然而让他们能够幸免于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却又难以形容。

这时他猛地从自己的臆想中被拉回现实。邻桌的女孩侧过身看着他。是那个黑发女孩，正斜眼看着他，但眼神出奇地专注。她刚与温斯顿四目相接，又立马望向别处。

温斯顿脊背上开始冒汗。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贯穿了他的身体。虽然恐惧几乎转瞬即逝，但留下了让人坐立不安的不适感。她为什么要看他？她为什么要跟着他？不幸的是他记不得自己坐过来的时候，这个女孩是否已经坐在邻桌了，抑或是之后坐过来的。但昨天播放两分钟仇恨节目的时候，她无缘无故地坐到了他背后。很可能她的真正目的是想听一听温斯顿是否喊得够响。

之前的想法又回到了他的脑海：也许她并不是思想警察的一员，但明显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业余探子。他不知道她盯着自己看了多久，但大概至少有五分钟了吧，在此期间他可能并没有很好地控制自己的一举一动。在公共场合或在距离电屏的一定范围之内任凭思绪飞扬是极其危险的。最微小的举动都可能将你的真实想法泄露出去。神经痉挛、无意识露出焦虑的神情、自言自语的习惯——任何反常的表现都会被认为是在隐藏什么。任何时候只要脸上露出不恰当的表情（比如在公布胜利的时候面带怀疑的神色）本身就是一种应该受到惩罚的犯罪行为。在新话里甚至还有一个与之对应的词：表情罪。

女孩又转了回去。可能她根本就没有在跟踪他，可能两天来她都坐在他旁边只是巧合而已。他的香烟熄灭了，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桌边。要是能让里面的烟丝不掉出来，他就能在下班后再回来把它抽完。邻桌的那个人可能就是思想警察的间谍，很可能自己三天内就会被关在仁爱部的监牢里，但烟蒂是不能浪费的。塞姆把纸条折起来放进口袋。帕森斯又开始说了起来。

“我有没有跟你提过，小伙子，”他说道，衔着烟斗笑了起来，“我家两个娃看到市场上一个老女人用大大的海报包香肠，然后就去把她裙子点着的事？他俩溜到她身后，拿出一盒火柴点了火。我想应该把她烧得不轻。真是两个小捣蛋鬼，是吧？不过这种精神值得称道！现在特工队给小孩子的训练一级棒，甚至比我当年都要好。你知道现在特工队发

给小孩子最现代的东西是什么吗？是一种能够通过钥匙孔监听的监听器！我家小姑娘前些天晚上就带了一个回家，在客厅的门上试了试，说比直接用耳朵听清晰两倍。当然，我得告诉你这毕竟只是个玩具，不过，应当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是吧？”

这时，电屏发出一声尖利的哨声，这是开工的信号。三人立马站起来加入了挤电梯的行列，温斯顿那根香烟里面仅剩的烟丝掉了出来。

第六章

温斯顿在日记中写道：

三年前。一个昏暗的黄昏，某个大型火车站旁的一条狭窄的巷子里。她在门口靠墙站着，头顶上是黯淡的街灯。她的脸看起来很年轻，粉抹得很厚。她的妆容的确吸引了我，白色的妆粉如同面具，双唇鲜红欲滴。女党员从不化妆。街上没有其他人，没有电屏。她说两块钱。我……

写到这里，实在难以继续下去了。他闭上眼睛，用双手压着眼皮，试图挤掉那不停浮现的画面。他有一种几乎不能自已的冲动想要扯开嗓子骂脏话，或用头撞墙，踢翻桌子，把墨水瓶扔出窗外——只有暴力、吵闹，做让自己疼痛的事情才有可能平息那段不停折磨着他的记忆。

他想到，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神经系统。任何时候，体内的紧张感都可能转化成某种可见的症状。他想到了几周前在街上和自己擦身而过的男人，其貌不扬，是个党员。三十五到四十岁，又高又瘦，拿着公文包。他们距离彼此几米远的时候，男人的左脸突然抽搐扭曲。他俩擦身而过的时候，男人的脸又抽搐了一下，抽动、颤抖的速度就像按动照相机快门那样快，但很明显已经习惯成自然。他记得自己当时的想法：这个倒霉鬼迟早会完蛋。最可怕的是那个人脸上的活动很可能完全是无意识的。最致命的危险是说梦话。在他看来，说梦话这件事根本防不胜防。

他吸了一口气，继续写了下去：

我和她进了门，穿过后院来到一个地下室厨房。墙边靠着一张床，桌子上有台灯，调得很暗。她——

他很不舒服，很想吐口唾沫。想到地下室厨房里那个女人的同时，他想起了凯瑟琳——他的妻子。温斯顿结过婚——曾经结过婚，不管怎么说都行。只要确信妻子还没有死，他现在大概依然能算是一个已婚的人。他似乎又闻到了地下室厨房那浑浊的空气，混杂着虫子、脏衣服、廉价香水的气味，尽管如此，那气味依然诱人，因为女党员不用香水，

甚至根本不会想到去用。只有那些群众才会用香水。在他的印象中，香水的气味和通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跟那个女人发生关系是他这两年左右的时间里第一次不检点的行为。招妓是明令禁止的，当然这是一条让人偶尔会不惜铤而走险去违反的规定。虽然危险，但并不会要你的命。如果因招妓被抓，可能会被判个五年劳改。如果你没有同时犯下其他的罪行，就不会吃更重的官司。而且在招妓过程中，避免被抓现行也并非难事。在贫民区有大批女人等着出卖自己的肉体。因为群众喝不到金酒，所以有些女的一瓶金酒就能搞定。虽然不明说，但是党倾向于鼓励卖淫，因为人类本能的冲动是无法完全压制的。淫逸之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只要不光明正大，不让人快活，而且只涉及那些卑贱的下层女人就行。党员之间胡搞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不过——尽管在大清洗的时候很多人都招供犯了这个罪——依然很难想象这类事真的会发生。

党的目的不仅仅是防止男女之间建立起忠于彼此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可能是其难以控制的。党不加言明的真实目的是抹杀性行为带来的一切快感。不论在婚内还是婚外，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所有党员之间的婚姻都要由专门的委员会批准，并且——尽管这个规定从未明说——一旦给人留下了两人在肉体上相互吸引的印象，婚姻申请就会被驳回。唯一公认的结婚理由是要生下孩子为党服务。性交被看成一种带有些许恶心的小型手术，就像灌肠一样。这个说法也从未明文写出，但却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从小灌输到每一个党员脑中。甚至有青年反性团这种组织，宣扬男女双方都要禁欲。所有小孩都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产生（新话中叫作人授）并由公共机构抚养。温斯顿意识到，这些说法并不完全是较真的，但多少符合党的基本思想体系。党试图抹杀性本能，或者如果没办法抹杀，就将其歪曲抹黑。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又觉得似乎理应如此。至少在女性身上，党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他又想到了凯瑟琳。他们应该已经分居了九年、十年，接近十一年了。很奇怪的是他几乎很少会想她。他会持续好多天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结过婚。他们仅仅在一起大约十五个月时间。党不准离婚，但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鼓励分居。

凯瑟琳身材高挑，一头金发，腰板直挺，举止优雅。她长着一张轮廓分明、鹰一样的脸。要是没发现这张脸后面几乎空空如也，你可能还会用尊贵来形容它。刚结婚没多久，他就确定——虽然原因可能是因为

她是他最熟悉的人——她无疑是自己碰到过最愚蠢、最庸俗、最无知的人。她脑中除了口号之外别无他物，只要出自于党，再蠢的话她都会信，而且是全盘接受。“活人录音带”，他在心中给她取了这么一个绰号。他之所以能够和她凑合生活在一起，就只是因为一个东西——性。

他一碰她，她就会退缩，变得浑身僵硬。抱着她就像抱着一个有关节的木头人一样。奇怪的是，尽管在她紧紧搂着他的时候，他也总能感觉到她同时是在尽力把他推开。她僵硬的肌肉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她会闭上眼睛躺着，既不抵抗也不配合，而是听之任之。这让人无比尴尬，随之感到可怕。但就算他们达成协议过无性生活，他依然愿意凑合跟她这样生活在一起。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凯瑟琳拒绝这个提议。她说他们俩如果有这个能力，必须生一个孩子。所以只要情况允许，他们就会一周一次，非常规律地做那件事。她甚至习惯在早晨提醒他，好像那件事晚上必须完成，绝不能忘记一样。对那件事她有两个说法。一个叫“生小孩”，另一个叫“为党尽义务”（对，她真的用了这个表达）。没过多久，一旦那天临近，他会自发地感到厌恶。但幸运的是她并没有怀孕，最终她同意不再尝试，之后没多久他俩就分居了。

温斯顿无声地叹了口气。再次拿起笔写了起来：

她躺到床上，没有任何预兆地以一种你能想到的最粗野、可怕的方式掀起了她的裙子。我——

他看到自己站在昏暗的灯光里，闻着虫子和廉价香水的气味，心里怀着一种忿忿的挫败感。这种感觉在当时甚至还与对凯瑟琳白皙身体的念想交混在一起，尽管这具躯体已经在党的催眠力作用下永远封冻了。为什么总是要这样？为什么他就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女人，非要隔个几年就偷偷摸摸出来干这龌龊的事？不过一段真实的爱情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女党员都一个样，禁欲观念和对党的忠心一样，在她们体内根深蒂固。通过幼年熏陶，通过各种游戏和冷水澡，通过在学校、特工队、青年团里被不断灌输的垃圾思想，通过讲座、游行、歌曲、口号、军乐，她们的天性已被抹杀。他的理性告诉自己，一定有例外，但内心并不相信。她们完全牢不可破，就像党所希望的那样。与被爱相比，他更想要的是攻破道德防线，哪怕一生只有一次也行。成功的性行为是反动。欲望是思想罪。如果他能够做到哪怕只是让凯瑟琳醒悟，也会被认为是诱奸，尽管她是他的妻子。

但剩下的故事必须写完。他写道：

我把灯调亮。灯光下我看到她——

黑暗中，煤油灯昏暗的灯光看起来也十分明亮。他第一次能够看清那个女人的模样。他朝她走近一步，随之停了下来，色欲熏心的同时充满了恐惧。他很清楚来到这里所要承担的风险，这种清醒的认识让他痛苦不堪。非常有可能巡逻队会在他出门的时候把他抓起来：现在他们可能就在门外等着。他都已经到这里了，如果什么都不做就出去——！

这必须得写下来，必须要坦白。他在灯光下猛然看到那个女人其实很老。她脸上的粉涂得很厚，看起来好像一个硬纸板面具，稍动一下就会咯咯作响。她头上有屡屡白发，但最要命的是她微微张开的嘴，里面除了深不见底的黑暗之外空无一物。她连一颗牙齿都没有。

他急速地乱写一气：

灯光下，我才发现她已经很老了，至少该有五十岁。但我依然上前和她做了。

他又一次用手指按住了眼睛。他最终还是写了下来，但什么都没有改变。这种疗法完全没用。想高声骂脏话的欲望一如既往地强烈。

第七章

温斯顿写道：“如果有希望，那么希望就在群众身上。”

如果有希望，必定就在群众身上，因为只有这个不被重视的，占大洋国85%人口的群体，才能形成足以把党推翻的力量。党是无法从内部被推翻的。就算有党的敌人，也无法集合起来，甚至无法知道彼此的身份。哪怕传说中的兄弟会真的存在——也许真的存在吧——也无法让人相信它能够集结起大批成员，恐怕顶多能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对他们来说，造反无非是一个眼神，一个声调转折，最多也就是间或窃语几句罢了。但是群众，只要他们能够多少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根本不需要密谋策划，他们需要做的只不过是站起来，像马抖动身体摆脱苍蝇一样晃一下身子而已。如果他们下定决心，明天早上就能把党摔成碎片。或早或晚，他们肯定就会去做的吧？不过——！

他记得有一次走过拥挤的街道，几百个女人震耳欲聋的喊叫声从前方不远处的小路上传来。巨大的叫喊声充满着愤怒和绝望，那低沉而响亮的“喔……喔！”就像钟声一样嗡嗡回响。他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开始了！他想。起义！群众终于挣脱了束缚！他走到事情发生的地点，看到大约两三百个女人将街边市场上的一个摊位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个个好像沉船上的乘客一样满脸悲痛。这时一个群体的失望分裂成许多单独的争吵。似乎一个摊位在卖锡制炖锅，卖的锅虽又薄又破，但当下不管什么类型的锅都十分稀有。现在供给又突然断了，成功买到锅的女人们都想拿着锅挤出推搡的人群离开，而剩下的几十个女人则围着摊位叫嚷，指责摊主偏袒一部分人，并把锅当作奇货可居。又传来一阵喊叫声，两个胖女人正在抢一个锅，其中一人头发都散了下来，抓住那锅想将其从另一个女人手里抢过来。她俩正在你争我夺的时候，锅柄掉了下来。温斯顿鄙夷地看着她们。但就在那时，仅仅几百个人就发出令人畏惧的叫喊声！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候，就从来没有人发出这样的吼声呢？

他写道：

他们不觉悟，就永远不会反抗；而不反抗，他们就无法觉悟。

他想起来，这句话似乎是党的一本教科书上面写的。当然，党声称

把群众从被奴役的状态解放了出来。革命前他们受到了资本家无情的压迫，他们忍饥挨饿，被四处驱使。妇女们被迫在煤矿里工作（事实上现在妇女们依然在煤矿工作），孩子才六岁就被卖到工厂做童工。但是与此同时，根据双向思维定律，党教导人们，群众生来就低人一等，需要通过制定几条简单的法令，让他们像动物一样无条件服从命令。事实上，人们对群众所知甚少，也根本没必要对他们有所了解。只要他们继续工作并繁衍后代，他们的其他活动便无关紧要。让他们自生自灭，就像阿根廷草原上的牛群一样，他们会回归到一种对他们来说很自然的远古生活方式。他们出生，在贫民区长大，十二岁工作，度过一段蓬勃却短暂的美貌与性欲旺盛期，二十岁结婚，三十岁进入中年，到六十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便会死去。繁重的体力工作、照看家庭和孩子、为琐事与邻居争吵、电影、足球、啤酒，尤其是赌博，将他们的头脑塞得满满当当。控制他们并不难。几个思想警察特务总是出没在他们之中，传播有误导倾向的流言，揪出个别他们认为具有危险倾向的人，并将其消灭。但从来没有人打算向他们灌输党的思想。群众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并不是一件可取的事。他们只需具备最原始的爱国主义情感即可。这样，就能在需要时唤起这种情感，让他们接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少的物资配给。哪怕他们变得有所不满——有时候他们的确会这样——他们的不满也不会导致任何结果。因为缺少最基本的思维能力，他们只会专注于具体而琐碎的不平事，而那些更大的罪恶则无一例外地被忽略。大多数群众家里甚至没有电屏。就算民警也很少干预他们。伦敦犯罪率很高，窃贼、强盗、娼妓、毒贩、诈骗人员应有尽有，自成一个王国。但因为这些犯罪都发生在群众内部，所以并不重要。只要涉及道德问题，他们都会遵循古老的法典。党那种清教徒式的性观念并没有强加给他们。乱交不会受到惩罚，离婚也是允许的。同样，只要他们有需求，也可以有宗教信仰。他们不配被怀疑。党有一句口号是这样说的：“群众和禽兽皆是自由的。”

温斯顿弯下身去小心地抓挠静脉曲张溃疡，那块地方又开始痒了。说来说去，总是回到了这个问题：你根本无法知晓革命前人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从抽屉拿出了一本从帕森斯太太那里借来的儿童历史教科书，并开始把其中的一段文字抄到日记本上：

在当时（书上这么写），光荣革命之前，伦敦并不像今天这么美丽。当时的伦敦黑暗、肮脏、贫困，人们几乎都吃不饱，成百上千的人连鞋都没有，只能睡在露天里。和你差不多大的孩子们为残忍的主人一天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如果手脚太慢，还会遭到鞭打，吃的东西只有不

新鲜的面包皮和水。但是在一片赤贫的状态下，依然有几座又大又漂亮的房子矗立着。那里面住着有钱人，伺候他们的仆人多达三十个。这些有钱人叫作资本家，他们又胖又丑，一脸恶相，就像旁边一页插图上画的那样。大家看他穿着长款黑大衣，这种衣服叫作长外衣，带着一顶亮闪闪的怪帽子，这种帽子的形状和火炉管一个样，名叫高顶礼帽。这就是资本家的装束，除了他们没有人可以这么穿。资本家占有这世界上的一切，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霸占着所有的土地、所有的房屋、所有的工厂、所有的金钱。如果有人不服从他们，他们就会把那个人关到牢里，或者让他失业然后饿死。普通人和资本家说话必须卑躬屈膝，向他们鞠躬、脱帽，并称他们为“先生”。资本家的领头人叫作国王，然后——

而他知道除了资本家以外的一系列名号。书里还会提到穿着细麻布法衣的主教、穿着白鼬皮法袍的法官、颈手枷、足枷、踏车、九尾鞭、市长大人的盛宴、亲吻教皇脚趾的习俗。还有一种叫“初夜权”的东西，不过在儿童教科书里可能不会提到。这是一项法令，规定每个资本家有权和自己工厂里任何一名女性睡觉。

你如何分辨其中有哪些是谎言？也许现在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确实比革命前要高。唯一的反证是你骨子里无声的抗议，你本能地觉得现在的生活条件难以忍受，一定有这么一段时间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当今不同。他突然想到现代生活最真实的特征不是残酷与缺乏安全，而仅仅是空虚、暗淡、倦怠。生活，如果你环顾周围，所有的一切不仅和电屏里传出的谎言大相径庭，甚至和党努力达成的理想也差之甚远。哪怕对党员来说，生活的大部分也是中立的，与政治毫不相关。生活中只有埋头苦干乏味的工作；在管道列车上挤出一个容身之地；缝补一只破了洞的袜子；乞讨一块糖精片；留存一段烟蒂而已。党设立的理想是宏大的，闪着光芒，令人生畏——由钢筋水泥、巨型机器、可怕武器构成的世界——由战士与狂热分子组成的民族，以整齐划一的方阵向前行进。有着统一的思想，喊着统一的口号，永不停歇地工作、斗争、胜利、迫害……三亿人都是同样的脸孔。事实上，城市正在腐坏，一片暗淡，吃不饱的人们穿着裂口的鞋子拖着脚步走来走去，住在修补多次的，常年弥漫着大白菜味和屎尿的骚臭味的19世纪房屋里。他似乎看到了伦敦的全景，这是一座有一百万个垃圾箱，巨大而破败的城市。这个影像和帕森斯太太的样子混杂在一起，那个脸上爬满皱纹，头发稀疏的女人，因为污水管道被堵而手足无措。

他探下身子又一次挠了一下脚踝。电屏没日没夜地用统计数据折磨着你的耳朵，以此证明如今人们和五十年前相比拥有更多的食物、更多的衣服、更好的房子，更好的娱乐。他们活得更久，工作时间更短，身体更高大、健康、强壮，更聪明、幸福，接受到更好的教育。这些话里没有一个词可以被证明是真的，也没有一个词可以被证明是假的。比如党曾经声称今天成年群众的识字率为40%，而据说革命前这个比例只有15%。党声称现在婴儿死亡率为160‰，而革命前是300‰……诸如此类。这就像是一个等号两边都是未知数的等式。很有可能，事实上历史书里面的每一个词，甚至人们不假思索接受的每一件事，纯粹都是幻想。据他了解可能从来就没有初夜权这种法律；从来没有资本家这种人；也从来没有高顶礼帽这种装束。

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迷雾。过去被抹杀，抹杀的过程被遗忘，谎言变成了真相。他一生中只拥有过一次对于篡改历史具体确实的证据——是在那个事件发生之后：这是关键所在。那个证据他曾经拿在手里长达三十秒。1973年，肯定是这一年——总之，那时候他和凯瑟琳大概已经分居。不过真正与之相关的日子比这个年份还要早个七八年。

这件事真实发生在60年代中期，正值大清洗。在那个运动中，革命元老们被彻底地清除掉了。到了1970年，除了老大哥本人以外，其他所有人一个不剩地都被当成叛徒和反革命分子揪了出来。古登斯坦逃走了，躲到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其他人当中少部分人就这么没了，而大部分人则在公开审判中供认自己犯的罪行以后被处决。活到最后的人里面有三人，分别叫琼斯、阿伦森、卢瑟福。他们三个确实早在1965年就被逮捕了。一如往常，他们先是消失了一年多，生死不明，接着突然被带出来以人们司空见惯的方式承认自己的罪行。他们承认通敌（在当时，敌人指欧亚国）、挪用公款、暗杀多位忠诚的党员、早在革命前就开始阴谋推翻老大哥的领导并且蓄意破坏，造成几十万人死亡。认罪后他们被赦免了，重新回到党内，被安置到几个听上去很重要、实际上是闲差的职位上工作。三个人无一例外地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低声下气的长文，分析自己变节的成因并保证进行弥补。

他们获释后，温斯顿的确在栗树餐厅看到过他们三个。他记得自己用眼角的余光既害怕又着迷地看着他们。他们年龄都比温斯顿大许多，是旧世界的遗老，几乎是仅剩的几个经历过党的光辉年代的大人物。他们身上依然带着经由地下斗争和内战磨练出来的魅力。尽管当时对事实和日期的概念已经模糊，但他有一种感觉，在听说老大哥之前，自己就

听说了他们的名字。但同时他们也是罪犯、敌人，是不能与之接触的人，肯定一两年间就会消失。只要落到思想警察手里，没人能够善终。他们现在就是等待回到坟墓的尸体。

他们周围的桌子旁一个人都没有。被看到和这些人离得太近是一件不明智的事。他们一言不发地坐着，面前放着这家餐厅的招牌——丁香味金酒。三人中，卢瑟福的外表给温斯顿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卢瑟福曾经是一名漫画家，他的漫画野性十足，在革命前和革命过程中点燃了人民的热情。哪怕在当今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漫画依然在《泰晤士报》上出现，但仅仅是对自己早期风格的模仿。而令人奇怪的是他现在的作品完全没有生命力和说服力。经常只是老生常谈——贫民区、忍饥挨饿的孩子、巷战、戴着高顶礼帽的资本家。哪怕在打仗的时候，资本家依然不愿脱下他们的高顶礼帽，他们不断努力想要重振雄风，却毫无希望。卢瑟福身材高大粗犷，一头褐色的长发满是油污，有着大大的眼袋，脸上满是伤痕，嘴唇厚得像个黑人。他当年一定很壮硕，而现在他庞大的身躯周身松弛、瘫软、肿胀、崩坏。他似乎正在人们面前解体，就像山崩一样。

时值15点，店里十分冷清。温斯顿记不起来自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咖啡馆。店内几乎空无一人。电屏里流淌出尖细的音乐声。那三人坐在角落几乎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店员主动给他们拿去了几杯金酒。他们桌上有一个棋盘，棋子摆好了，但并没有人下棋。就这么大约过了半分钟时间，电屏的内容起了变化。播放的旋律变了，音乐的调子也变了。突如其来，难以形容，这是一个古怪、沙哑、充满嘲弄意味的刺耳音符。温斯顿心中将其称为黄音。电屏里传出歌声：

在这繁茂的栗树下，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他们躺在那里，我们躺在这里，

在这繁茂的栗树下。

那三人一动也不动。但当温斯顿又看了一眼卢瑟福破了相的脸时，发现他双眼噙满泪水。他这才发现阿伦森和卢瑟福的鼻梁都被打断了，不禁打了个冷颤，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打冷颤。

之后不久，这三人又被抓了起来。似乎从上次被放出来的那一刻起，这三人又开始搞新的阴谋。在进行第二次审判的时候，他们把先前的罪行又招供了一遍，然后还坦白了一连串新的罪行。他们被处决。他们的下场被录入了党史，以儆效尤。大约五年后，也就是1973年，温斯顿打开从气流输送管传送到他桌上的一份文件时，发现一张显然被随手塞进去忘记取出来的纸片。他刚把纸片展开，就意识到了这纸片非同一般。这是一片从大约十年前的《泰晤士报》上撕下来的半页纸，是一个版面的上半页，所以能看见日期。纸上印有一张在纽约参加某个党务活动代表的照片，琼斯、阿伦森、卢瑟福位于照片中央。不会有错，就是他们三个，照片下面的说明里也印着他们的名字。

问题是两次审判中这三个人都供认，那天他们在欧亚国境内。他们从加拿大的一个秘密机场起飞，抵达西伯利亚某地与欧亚国总参谋部的人会面，并出卖了重要军事机密。这个日期之所以温斯顿记得很牢，因为碰巧是仲夏节。而这件事在其他无数文件里肯定也有记录。只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供词统统是谎言。

当然，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发现。哪怕在当时，温斯顿也从不认为大清洗中消灭的人真的犯下了他们被指控的罪行。但是那片报纸便是铁证，是被摧毁了的过去的残片。像一块骨骼化石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层中，瞬间瓦解了一个地质学理论。如果能以某种方式将其公诸于世，让世人了解其中的重要性的话，就足以让党灰飞烟灭。

他原本一直在工作。一看到这张照片并领会了它的意义所在时，立马用另一张纸把它盖了起来。幸好他打开报纸的时候，从电屏角度看，报纸的内容是上下颠倒的。

他把便条簿放在膝盖上，并把椅子向后推，尽可能离电屏远一点。保持面无表情并不难，只要努力一点，甚至连呼吸都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你无法控制自己的心跳，而电屏十分灵敏，能够捕捉到心跳声。他自己估计约莫坐了十分钟时间，内心像热锅上的蚂蚁，总在担心会发生意外让他暴露，譬如突如其来的一阵过堂风吹过桌面之类。然后，他再也没有将报纸打开，而是直接将其和别的废纸一起扔进了记忆洞中。也许再过个一分钟，这张报纸就会化为灰烬了。

这是十年还是十一年前的事了。如果在今天，他可能会保留这张照片。照片本身和它所记录的事情都已经成为记忆。不过，奇怪的是，对他来说，用手拿过这张照片这件事的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他想

知道，党对过去的控制是否会因为曾经存在过的一纸证据变得不曾存在而有所减弱？

然而在今天，即使照片能够从灰烬中复原，可能也根本成不了证据。他发现那张照片的时候，大洋国已经不再和欧亚国打仗了，而那三个已死的人必定是到东亚国的特务那里出卖祖国的。在那之后，战争的对象还有过变化，两次还是三次，他记不清了。很有可能的是供词几经改写，直到事实和原始的日期都变得毫不重要。过去不仅被篡改，而且被不断篡改。像噩梦般让他备受煎熬的是自己从来没有弄明白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伪造工作。篡改过去带来的好处立竿见影，但其终极目的却让人无从知晓。他又一次拿起笔写道：

我知道方法，却不知道缘由。

像之前很多次一样，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或许疯狂仅仅是一个人性格中的一小部分。有段时间，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被认作发疯的征兆。而今天，相信过去不能被篡改会被认为是疯子。可能怀有这种想法的人只有他一个，而如果真的只有他一个人这么想，那他就是个疯子。但是，觉得自己是个疯子的想法并没有让他困扰，可怕的是他的这个想法也有可能是错的。

他捡起那本儿童历史教科书，看着扉页上的老大哥画像。那双具有催眠能力的眼睛与他的目光相接。好像有种巨大的力量从他头上压下来，有某种东西进入你的头颅，撞击你的大脑，把你吓得放弃自己的信念，也几乎成功说服你否认那些证明自己仍有判断力的证据。最终，党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也不得不相信。很明显，迟早他们会这样宣布的，这是他们所处地位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的哲学不但不言而喻地否认了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了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最大的异端。可怕的不是他们会因为你有独立思想而杀了你，而是他们的理论有可能是正确的。说到底，我们怎么确定二加二等于四呢？怎么确定地球引力在起作用呢？怎么确定过去是不会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仅存在于意识中，而意识本身是可以控制的，那又当如何？

但是，这样不行！突然，他好像不由自主地勇气大增。没有经过特意地联想，奥伯里恩的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比之前更加清楚地知道奥伯里恩是站在自己一边的。他在为奥伯里恩写日记，在给奥伯里恩写日记。这日记就像一封无穷无尽的信，尽管没有人会去读，却因为写给某一个特定的人而变得有了色彩。

党告诉你，不能相信眼睛看到的和耳朵听到的任何东西。这是他们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命令。一想到反对他的力量是多么巨大，一想任何一个党内知识分子都能够在辩论中将他驳倒，一想到那些他无法理解，更不用说如何应答的微妙观点，他的心就沉了下去。不过，他站在对的一方！他们错了，自己才是对的！必须捍卫那些显而易见的、质朴的、真实的东西。不言而喻的就是真理，这个观点不可动摇！客观世界真实存在，自然规律不会改变。石头是硬的，水是湿的，悬空的东西会向地心方向掉落。他在对奥伯里恩说话，同时也在阐述一个重要的公理，怀着这样的感觉，他写道：

自由就是拥有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若此前提成立，其他皆顺理成章。

第八章

过道尽头的某处飘来了烘焙咖啡豆的香味——是真正的咖啡，而不是胜利咖啡——香气一直飘到了街上。温斯顿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在大约两秒钟时间里，他回到了自己几乎已经淡忘的童年。接着传来“砰”的一下关门声，那香气也似乎被突然截断，就像这关门声一样只存在于一瞬。

他已经在路上走了好几公里了，静脉曲张溃疡又痒了起来。三个星期里，这已经是他第二晚没去社区活动中心了。这是很轻率的行为，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参加社区活动的次数会被详细地记录在案。原则上党员是没有空闲时间的，除了上床睡觉之外，不能单独行动。按理说如果他不在工作、吃饭、睡觉，那就应该参加集体娱乐活动。只要有任何离群索居的苗头，哪怕只是独自散个步，都多少是危险的。在新话里有个词叫作“自活”，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怪癖行为。但今天晚上当他从部里走出来的时候，四月醉人的春风让他动了心。湛蓝的天空比前些日子多了些暖意。他突然觉得，在社区活动中心度过漫长而喧嚣的夜晚，玩那些乏味而累人的游戏，听演讲，靠金酒维系同志关系等种种都让人难以忍受。冲动之下，他掉头离开公交车站，在伦敦迷宫般的街道上漫游。先朝南，后朝东，接着折向北，迷失在从未踏足过的街道上，完全不考虑自己到底要走向何方。

“如果有希望，”温斯顿在日记里写道，“希望就在群众身上。”这句话反复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它陈述的是一个神秘的真理，显而易见又荒诞不堪。他走到了圣潘克拉斯火车站旧址东北方向的某个地方。现在这里是一片影影绰绰、棕褐色的贫民区。他在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走着，街道两边都是低矮的两层小楼。破败的门口正对人行道，给人一种类似鼠洞的奇怪感觉。鹅卵石间隙里积着一滩滩污水。昏暗的门口和街上两旁的巷子里人头攒动——抹着俗艳的唇膏，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追逐姑娘的小伙子；体态臃肿、步履蹒跚的胖女人，让你看到这些姑娘十年后的模样；迈着八字脚，慢吞吞走路的驼背老头；赤脚在水塘里玩耍的孩童，穿着破旧的衣衫，听到母亲的怒斥一哄而散。街边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窗玻璃是碎的，只能用纸板挡着。大部分人没有理会温斯顿的出现，只有少数几个带着警惕与好奇的神情看了他一眼。两个大块

头女人正站在一处门口说话，她们系着围裙，砖红色的手臂交叉在身前。温斯顿走近时听到了她们聊天的只言片语。

“‘是啊，’我对她讲，‘一点没错，’我说，‘你要是我，也会这么做。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说，‘你又没碰到我这样的问题。’”

“哎，”另一个人说道，“可不是嘛，就是这么回事。”

这两个尖嗓门突然不说话了。她们在温斯顿走过的时候带着敌意上下打量他。其实也称不上是敌意，而是警觉，就像看到一只不知名的动物从身边经过，一时定在了那里。在这样一条街上，穿着蓝色党员工作服的人并不常见。确实，被人看到穿成这样出现在这种地方也是不明智的，除非你有公务在身。如果遇到巡逻队，可能就会被拦下来。“同志，请出示一下证件。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什么时候下的班？你平常回家都走这条道吗？”如此这般，没完没了。并不是有规定说不能走另一条路回家，但如果让思想警察得知这件事，他们就会盯上你。

突然，整条街骚动了起来，尖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人们像兔子一般窜进门里。一个年轻女人从温斯顿前方不远的门内跳出来，一把提起正在水塘玩耍的小孩，用围裙一裹，又跳了回去，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与此同时，一个穿着六角风琴般黑色西装的男人从一侧的巷子里冒了出来，紧张地指着天空跑向温斯顿。

“喷气怪！”他喊着，“领导当心！头上有炸弹！赶紧卧倒！”

不知怎么，群众给火箭弹起了个外号叫作“喷气怪”。温斯顿立马趴下。只要群众发出了这种警告，总不会错。他们似乎有一种直觉，能够早几秒钟预知火箭弹的逼近，尽管火箭的速度理应比声音还要快。温斯顿双手抱头，只听一声巨响，似乎要把人行道整个掀翻似的。一阵零星的碎片像雨点一样砸到了他的背上。站起身来，才发现背上掉满了从附近窗户掉下来的碎玻璃。

他继续往前走。炸弹摧毁了前方200米的一大片房屋。一团黑烟升向天空，下方的废墟尘土弥漫，人群已经在那里聚集。他面前的人行道上也有一小堆瓦砾，瓦砾中央有一条鲜红色的东西。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一只被齐腕炸断的手。除了近手腕处血肉模糊，其他部分毫无血色，就好像由石膏制成的一样。

他一脚把它踢到水沟里，然后绕过人群拐进了右边的巷子。过了三四分钟，他离开了被轰炸的地区。附近街道上肮脏拥挤的生活照旧，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时间接近20点，群众经常光顾的喝酒的店铺（他们称之为酒吧）里人满为患，肮脏不堪的弹簧门开开关关，里面飘出混杂着尿骚、木屑、酸啤酒的气味。有一间房子门脸向外凸出，靠近门脸的墙边有三个人凑在一起，中间那个拿着一份叠好的报纸，另外两人挨着他的肩膀一起看。都不用走近看他们脸上的表情，从他们身体的线条就能看出他们是有多专注。显然他们在看一条重要新闻。温斯顿走到距离他们还有几步之遥的时候，三人突然散开，其中两个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一度几乎要大打出手。

“你他妈就不能好好听我说话吗？我告诉你，十四个多月以来末尾为七的号码从来就没中过！”

“中过！”

“没中过！我把过去两年来所有中过奖的号码都记在了纸上，就放在我家里，一次不落。我告诉你，尾数为七的号码根本就没……”

“中过了，尾数七的中过！我差不多能把那个鸟号码背给你听。尾数是四零七。2月份，2月份第二个星期那次。”

“你奶奶的2月！我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我告诉你，根本没有……”

“哎，别吵了！”第三个人说。

他们正在谈论彩票。温斯顿走出三十米后回过头。他们还在脸红脖子粗地争吵。彩票每周都开出无比丰厚的奖金，这无疑是群众特别关心的一个公共事件。可能对几百万群众来说，彩票就算不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也是主要理由。彩票是他们快乐的源泉、愚昧的明证、止痛的良药、头脑的动力。一谈到彩票，即使目不识丁的人都似乎精通算术，过目不忘。有一群人就靠教授下注法、预测中奖号码、兜售幸运符为生。温斯顿从未参与过售卖彩票的事。博彩业是富足部负责的，但他明白（其实所有党员都知道）奖金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实际支出的奖金很少，中大奖的人都是不存在的。由于大洋国各地并没有实质上的交流，所以这样的事不难安排。

然而如果有希望，希望就在群众中，你必须坚信这一点。你把这句话说出口，觉得似乎挺有道理。而当你走在人行道上，看着与你擦身而过的人群时，这句话就变成了一种信仰。他拐进的那条街是条下坡路。他觉得似乎之前到过这里，不远处应该还有一条大路。前面某个地方传来一阵叫喊声。街道有一个大转弯，尽头是一段台阶。台阶下面是一条路面凹陷的巷子。巷子里有几个小摊，正在售卖发蔫的蔬菜。这时温斯顿记起了自己身在何处。这条巷子通往一条大街，从下一个转弯处再往前走不到五分钟的距离，就是他之前买空白笔记本的旧货店。再过去不远处有一家小文具店，他在那里买了钢笔杆和墨水。

他在台阶最高处停了下来。巷子另一端有一家肮脏的小酒馆，窗户看上去好像结了一层霜，其实只是蒙了一层灰。一个年纪很大、驼着背但是行动敏捷的老头推开门走了进去，脸上白色的胡子像虾须一样向前翘着。温斯顿站在那里看着他，心想这个老头至少也得有八十岁，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步入中年。像他这样的人现在已经没几个健在了，他们是与业已消失了的资本主义世界仅存的联结。就算在党内，也已经没几个思想在革命爆发前就定型的人了。绝大多数老一代人都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中消失了，仅存的几个也早已吓破了胆，从思想上缴械投降了。如果现在还有哪个健在的人能和你真实地描述20世纪初的历史，那他就只能是群众中的一员。突然，从教科书上抄录到日记本里的那段话浮现在他脑海中，让他再也无法抑制一个疯狂的冲动。他要走进酒吧，同老头搭话，然后向他提问。他会跟老头说：“跟我讲讲你的童年。那时候生活怎么样？跟现在相比，是更好还是更坏？”

为了不让自己有时间畏缩，他急忙走下台阶穿过窄巷。这么做简直是疯了。照例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党员同群众交谈或光顾他们的酒吧，但这种行为太过反常，一定会引起注意。如果巡逻队突然出现，他可以声称突然感到头晕，但他们多半不会相信。他推开门，一股劣等酸啤酒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他一进门，里面嗡嗡的说话声就轻了一半。他能感觉到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盯着他身上的蓝色工作服。室内那个原本正在投飞镖的人也停了大约三十秒之久。他跟随的那个老头坐在吧台边，正在为了什么事和酒保争执。那个酒保是个大块头，身材结实，长着鹰钩鼻，小臂极为粗壮。他俩身边围着一群人，手里拿着酒杯在看热闹。

“我问得够客气了吧，不是吗？”老头气冲冲地挺起胸说，“你是说这个鸟酒馆里压根就没有一品脱[1]的杯子？”

“品脱他妈的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酒保手指按住吧台，前倾着身

体说。

“听听！还自称酒保呢，竟然不知道品脱是什么！告诉你，一品脱就是半夸脱[2]，四夸脱是一加仑[3]。是不是还要我教你认字！”

“没听说过。”酒保没好气地说。“我们这里只按一升或者半升卖。杯子就在你面前的架子上。”

“我就要一品脱，”老头不依不饶，“你顺手给我倒个一品脱不就完事了。我年轻的时候不用什么狗屁升。”

“你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还住在树上呢。”酒保说着瞥了其他顾客一眼。

这句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温斯顿进门导致的紧张气氛似乎已经烟消云散。老头胡子拉碴的白脸涨得通红。他掉头走开，嘴里自言自语嘟囔着，一头撞到温斯顿身上。温斯顿轻轻搀住他的手臂。

“我能请您喝上一杯吗？”他说。

“真是个有教养的小伙子。”老头又一次挺起胸，似乎没注意到温斯顿的蓝色制服。“品脱！”他挑衅地对酒保说，“一品脱麦酒。”

酒保拿出两个刚在吧台下面水桶里涮过的玻璃杯，往里面各倒了半升啤酒。啤酒是群众酒吧里你能喝到的唯一一种酒。按道理说群众是不能喝金酒的，但实际上他们很容易就能搞到。投飞镖的那群人又热热闹闹地玩了起来，吧台边的那群人又开始聊彩票了。温斯顿的出现暂时被人们抛之脑后。窗台下有一张桌子，和老头坐在那里说话就不用担心被偷听了。虽然这种事情极其危险，但不管怎么说这个酒吧里面没有电屏，他刚进门就观察清楚了。

“他完全可以倒一品脱给我的，”老头坐下来对着面前的酒杯嘟嘟囔囔，“半升不够，不尽兴。一升又太多，喝得我老想撒尿。价钱上就更别说了。”

“从年轻时候到现在，您一定看到周围起了很大变化吧。”温斯顿试探性地说。

老头淡蓝色的眼睛从飞镖盘移到了吧台，再从吧台移到了男厕所的门，似乎希望从这家小酒吧里找到什么变化。

“啤酒味道更好了，”他最后说道，“也更便宜了！我年轻时，淡啤酒，当年我们叫麦酒，一品脱卖四便士。当然，那是在战前。”

“是哪场战争？”温斯顿说。

“总是在打仗，”老头含糊地说，他拿起酒杯，又挺了下胸，“祝你身体健康！”

他突出的喉结在瘦长的脖子上以令人诧异的速度上下移动，将啤酒一饮而尽。温斯顿又走向吧台，回来的时候手里又拿了两杯半升的啤酒。老头似乎忘了自己对喝一升啤酒的成见。

“您比我年长许多，”温斯顿说，“我刚出生的时候您已经成年了。您一定记得当年，也就是在革命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吧。我这个年纪的人对那个年代所知甚少。只能从书里读到一些，而书里讲的又不一定是真的。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历史书上说革命前人们的生活和现在完全不同。当时人们遭受着严重的压迫、不公、贫困，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就在伦敦这里，大部分人从生下来到死去，就没吃过一顿饱饭。他们中有一半甚至没靴子穿。他们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九岁就辍学，十个人挤在一间房里睡觉。与此同时，少数人，只有几千人，就是被称作资本家的人，却有钱有势。他们生下来就一无所缺，住着富丽堂皇的大房子，仆人多达三十个，坐汽车或四轮马车出门，喝香槟，戴高顶礼帽……”

老头突然眼睛一亮。

“高顶礼帽！”他说，“有意思，你竟然提到了那玩意儿。不知为啥，就在昨天，我也想到了它。我当时还想，都有好几年没看到高顶礼帽了呢。这种帽子过时了。我最后一次戴，是在我嫂子的葬礼上。那是在……哎，我记不清到底哪一年了，但肯定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当然，你知道，租那帽子也就为了参加葬礼。”

“高顶礼帽并不是很重要，”温斯顿耐心地说，“关键是资本家，这些人，还有少数靠他们为生的律师和牧师之类的人，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利益而存在。你们——普通人、工人们

——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可以对你们为所欲为。他们可以把你们当牛一样运到加拿大。只要乐意，他们就可以睡你的女儿。他们可以叫人用一种叫九尾鞭的东西抽打你们。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你必须行脱帽礼。每一个资本家出门都有一帮狗腿子相伴，他们……”

老头的眼睛又亮了。

“狗腿子！”他说，“这个词我可很久没听到了。狗腿子！这词可完全把我带回了过去。我记得，噢，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经常星期天下午去海德公园听那些人演讲。救世军、罗马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这么一个人，唉，我叫不出他名字了，不过真是个厉害的演讲家。开起口来毫不留情！‘狗腿子！’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级的奴才！’他们的另一个名字叫寄生虫。还有豺狼，他肯定用过豺狼这个词来形容他们。当然，你知道，他骂的是工党。”

温斯顿觉得他们两人的谈话牛头不对马嘴。

“我真正想了解的是这个，”他说，“您有没有感觉到现在比以前更自由了？有没有被更当作一个人来对待？在过去，有钱人，上层人……”

“上议院。”老头带着怀旧之情插话。

“如果你愿意的话，讲讲上议院吧。我想问的是，那些人是否仅仅因为自己有钱而您很贫穷，就把你当作下等人对待？比方说，碰到他们的时候，您就一定要称呼他们为‘阁下’并且脱帽致敬，这是真的吗？”

老头似乎在沉思。他喝掉了杯中四分之一的啤酒，才开始说话。

“对，”他说，“他们喜欢看到你向他们脱帽行礼，这表示尊敬。我个人不赞同这么做，但还是做了很多次。就像你说的，非这么做不可。”

“是不是经常有这种事发生，我只是引用在历史书上读到的话，就是那些人和他们的仆人会把你推到阴沟里，这种事是不是经常发生？”

“有人推过我一次，”老头说，“我记得很清楚，好像就发生在昨

天。那天晚上有划船比赛，只要晚上有划船比赛，那些人就闹得很凶，我在沙夫茨伯里大街撞到了一个小年轻身上。那人穿得人模人样的——礼服衬衫、高顶礼帽、黑色大衣。他在人行道上东倒西歪地走着，我没留神就撞到了他身上。他说：‘你走路不看道吗？’我说：‘他妈的这条街是你买的啊？’他说：‘再不老实当心我把你的狗头拧下来。’我说：‘你个醉鬼，信不信我半分钟就把你扭送给警察。’我可没胡说，他用手在我胸口猛地一推，我差点没给公交车轧死。唉，我当时年轻气盛，正要一拳抡上去，只是……”

温斯顿感到无可奈何。这个老头的记忆里尽剩下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琐事。就算问他一整天也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党编的历史可能依然是真实的。他最后又试了一次。

“可能我没能把意思表达清楚，”他说，“我想问的是，您已经活了这么久时间，有半辈子是在革命前度过的，比如1925年的时候您已经成年了。从您还能记得的事情上看，1925年的生活和现在相比，是好还是坏？如果您可以选择的话，您想生活在当时还是生活在现在？”

老头若有所思地看着飞镖盘，喝光了啤酒，喝的速度比之前的慢了许多。他再次开口说话时，神态像一个看破世事的哲学家，似乎啤酒使他变得更稳重了。

“我知道你指望我说什么，”他说，“你指望我说我想返老还童。大多数人被问到时都会说他们想返老还童。年轻时，身体又好，又有力气。可是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身体就不会好受了。我双脚不利索，膀胱更是一塌糊涂，一晚上要起夜六七次。反过来说，当个老头也好处多多。你不用为年轻时候的烦心事操心了。不用和女人纠缠这件事就很好。我已经快有三十年没碰过女人了，你信吗？而且是我自己不想去找。”

温斯顿向后靠在了窗台上。没必要继续了。他正要再去买些啤酒，老头突然起身，拖着脚，快步走向对面臭气熏天的小便池。多喝的半升啤酒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温斯顿坐在那里，盯着空玻璃杯发呆，一两分钟后，他不知不觉走回街上。他想，最多再过二十年，“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更好”这个重大而简单的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回答了。其实，哪怕在现在，这个问题也无法得到回答。因为零星活着的几个旧世界遗老无法对这两个时代做出比较。他们把数不清的琐事记在脑中，例如和工友的争吵，寻找丢了的自行车打气筒，早已去世的姐妹脸上的表

情，七十年前一个冬天早晨被风卷起的尘土。但是却看不清与此相关的事实真相。他们就像蚂蚁，只看得见芝麻小事，却看不到大事。一旦记忆消失，书面记录又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就只能接受党所声称的人们的生活水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因为检验这句话是否真实的标准没有了，而且再也不可能有了。

这时，他的思绪突然中断。他停下脚步，抬头张望。自己正身处一条狭窄的街道中，几家灰暗的小店铺零星散落在住宅之间。就在他头顶，挂着三个色彩斑驳的金属球，似乎先前曾镀过金。他好像认得这个地方。没错！他现在正站在先前买过笔记本的旧货店外面。

一阵恐惧席卷他的全身。起先买笔记本的行为已经足够鲁莽，他也曾发过誓再不涉足此地。但是一个恍惚，双脚就不由自主地走到了这个地方。他之所以写日记，就是为了防止这种自取灭亡的冲动。与此同时，他注意到尽管现在已经接近21点，旧货店依然在营业。他觉得与其在人行道上游荡招人怀疑，还不如进店。他迈进门，如果受到盘问，他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是进来买剃须刀片的。

店主刚点上一盏悬挂式油灯，油灯散发出一股不干净却友好的气味。店主约六十岁，身材单薄，弯腰驼背，长着一个长鼻子，看起来挺和善，厚厚的眼镜，目光温和，但双眼透过镜片看显得大小有些失真。尽管头发几乎全白了，但眉毛却依然又浓又黑。他的眼镜以及他轻手轻脚、注意细节的动作和他身上那件陈旧的黑色天鹅绒外套，都让他隐约带着一种知性的气息，好像是个文人或音乐家。他说话柔声细语，声音像要飘走似的，而且他的口音也不像大部分群众那么粗鄙。

“你在门外人行道上的时候，我就认出你了，”温斯顿一进门店主就开口说道，“你就是买了那本年轻女士的纪念本的先生。那纸张真漂亮，以前叫作米色直纹纸。已经没有这样的纸了。唔，我敢说已经有五十年不生产了。”他从眼镜架上方瞟着温斯顿，“你具体想要买什么？还是只想随便看看？”

“我只是路过，”温斯顿含糊其辞地说，“就进来看看，没特别想买什么。”

“也好，”店主说，“因为我估计这里也没你想要的东西。”他伸手做了一个抱歉的姿势，他的掌心是绵软的。“你也看见了，可以说就是个空铺子。我跟你私下讲，古董生意差不多是要走到头了，既没有需求，

也没有存货。家具、瓷器、玻璃都慢慢坏掉了。当然，金属器具大部分都被拿去回炉了。好多年了，我连一个黄铜烛台都没见过。”

事实上，店铺狭小的空间被塞得满满当当，让人感到些许压抑，但这些东西里几乎没有一件是值钱的。店里几乎无处下脚，因为每一面墙边都堆着不计其数落满尘土的画框。橱窗里放着一碟碟螺丝螺母，缺口的折叠刀，失去光泽、一看就不走的手表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破烂。只有角落里一张小桌子上，扔着一些杂七杂八的小东西——漆制鼻烟盒、玛瑙胸针，还有其他类似的小玩意——或许里面会有些有意思的东西。正当温斯顿朝那张桌子慢慢走去时，他的目光被一个浑圆、光滑的东西吸引住了，这件东西在灯光下发出柔和的光，他伸手拿了起来。

这是一块很重的玻璃，一面圆，一面平，几乎是个半球形。无论从颜色还是质地上看，这块玻璃都非常柔和，如雨水一般。中心位置被弧面放大，里面放着一块奇特的粉色物体，外形卷曲缠绕，让人联想起玫瑰或海葵。

“这是什么？”温斯顿饶有兴趣地问。

“这是珊瑚，就是那个，”老店主说，“肯定是从印度洋捞来的，他们以前总会把珊瑚镶在玻璃里。这块东西至少有一百年了，从样子上看年代还要久。”

“真漂亮。”温斯顿说。

“的确漂亮，”店主赞赏地说，“但这年头没几个人识货了。”他咳了一下。“要是你现在想要的话，算你四块钱。我记得像这么一个东西，以前能卖到八镑，八镑是……唔，我也算不出来，反正是一大笔钱。但这年头谁还关心真正的古董啊，再说古董也所剩无几了。”

温斯顿立马付了四块钱，把这个心仪之物揣进口袋。这个东西之所以吸引他，并不是只是因为好看，而是它拥有一种迥异于现代的年代感。这块柔和、雨水般的玻璃与他先前见过的玻璃都不同。这件东西正因为完全无用，才变得无比诱人，尽管他有理由猜测它曾经只是被当作镇纸。它在口袋里沉甸甸的，不过幸好体积不大，没有让口袋显得鼓鼓囊囊的。党员拥有这么一件东西，不仅奇怪，甚至会惹祸上身。凡是老旧的东西，以及那些美丽的东西，都会多少让人产生怀疑。拿到四块钱后，老店主明显高兴了起来。温斯顿这才意识到就算给他三块钱，甚至

两块钱，他都是肯卖的。

“楼上还有一个房间，你可能有兴趣看上一眼，”他说，“东西并不多。就那么几件。我们上楼的话，我就去拿盏灯。”

他又点燃了一盏灯，弓着背走在前面，慢慢爬上陡直而破旧的阶梯，穿过一条小走廊，进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不临街，窗户对着一个铺着鹅卵石的院子和一片林立的烟囱。温斯顿注意到，从房间里的家具布置来看，这里好像还有人住。地板上铺着一块地毯，墙上挂着一两幅画，壁炉边靠着一把又脏又破的高背扶手椅，壁炉台上放着一台正在滴答走时的老式玻璃钟，钟面上的刻度是以十二小时分的。窗下有一张几乎占据房间四分之一面积的大床，床上还摆放着床垫。

“老伴死之前，我们一直住在这里，”老店主略带歉意地说，“之后我就把家具一点一点卖掉。这是一张漂亮的红木床，当然，你得先把上面的臭虫清干净。不过我觉得对你来说有点太笨重了。”

他把灯高高举起，好照亮整个房间。温暖而昏暗的灯光下，整个房间看上去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温斯顿脑海中掠过一个想法，要是敢冒险的话，应该很容易就能以每周几块钱的价格把这间房间租下。这个想法实在太疯狂而且不切实际，他刚想到就放弃了。不过这个房间唤起了他的某种怀旧之情，某种年代久远的回忆。他似乎非常清楚自己坐在这样一个房间里会是什么感觉，坐在壁炉边的扶手椅上，双脚翘到壁炉的挡板上，壁炉搁架上放着水壶。在这里绝对孤独，绝对安全，没有人监视你，没有声音打扰你，除了水壶烧水时的嘟嘟声和时钟悦耳的滴答声以外，没有别的声音。

“这儿没有电屏！”他不由自主嘀咕了一句。

“啊，”老店主说，“我这儿从来没有那种东西。太贵了，不知怎的，我也从来没觉得需要装那个。那边墙角有一张挺不错的折叠桌。不过要是你想用到边上的桌板，恐怕就得先换上新铰链才行。”

在另一个墙角，有一个小书架，温斯顿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但是书架上除了几本垃圾书以外什么都没有。在群众居住的地方，查抄、销毁书籍做得和其他地方一样彻底。在大洋国的任何一样角落都不可能找到一本1960年前印刷的书。老店主拿着灯站在一幅镶着红木框的画跟前。画挂在壁炉另一侧，正对着床。

“那个，如果你恰好对老画片感兴趣的话……”他委婉地开口说道。

温斯顿走过去细看那幅画。那是一幅钢板雕刻版画，画的是一座椭圆形建筑，上面有长方形的窗户，前方有一座小塔。建筑物周围有栏杆，后面好像还有一个雕塑。温斯顿盯着画看了一会。这座建筑物让他觉得似曾相识，但那个雕塑却记不起来。

“画框是固定在墙上的，”老店主说，“但我可以给你卸下来。”

“我知道那座建筑，”温斯顿终于开口说道，“现在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就在正义宫外面那条街上。”

“没错，就在法院外面。被炸掉了。喔，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曾经是座教堂，名叫圣克莱蒙教堂。”他带着歉意地笑了，好像觉得自己说的话有点荒谬似的，最后加了一句，“圣克莱蒙的钟声唱着：橙子和柠檬！”

“什么？”温斯顿说。

“喔，‘圣克莱蒙的钟声唱着：橙子和柠檬。’这是我小时候的一首歌谣。我记不全整首，但结尾我还记得，‘点起蜡烛让你去睡觉，抡起斧子把你头砍掉。’这是跳舞时唱的，别人把手臂抬高让你钻过去，当唱到‘抡起斧子把你头砍掉’时，他们就压下手臂把你抓住。这首歌谣里尽是教堂的名字。伦敦所有教堂都提到了，所有主要的教堂一个不落。”

温斯顿隐隐想知道这座教堂建于哪个世纪。想确定伦敦建筑的年代总是很困难。凡是气势恢宏的大型建筑物，如果从外表看够新，就自然而言被断言为革命后所建，而所有那些显然很古旧的建筑物，其建造年代都被归于某个名为“中世纪”的黑暗年代。资本主义时代被认为没有创造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人们从书上学不到历史，从建筑上也无法学到历史。雕塑、铭文、纪念碑、街道名……一切可能透露过去信息的东西都被有组织地更改了。

“我从不知道它以前是教堂。”温斯顿说。

“还有很多保留了下来，真的，”老店主说，“尽管都用来干别的了。那个，歌是怎么唱的来着？啊！我记起来了！

圣克莱蒙的钟声唱着：橙子和柠檬；圣马丁的钟声说着：你欠我三法新[4]——

嗯，我只能记起这么多了。法新是一种小铜板，看上去和现在的一分钱很像。”

“圣马丁教堂在哪里？”温斯顿说。

“圣马丁教堂？还在那儿啊，就在胜利广场，靠着美术馆。就是那座前面有三角形柱廊，台阶很高的建筑。”

温斯顿对那块地方很熟悉。那是一座承办各种宣传展览的博物馆，有火箭弹和漂浮堡垒的微缩模型，展示敌人残暴行径的蜡像，诸如此类的东西。

“它以前叫田野里的圣马丁教堂，”老店主补充说，“尽管我不记得那边有什么田野。”

温斯顿没有买那幅画。比起玻璃镇纸，拥有这幅画更加不合适，而且没办法拿回家，除非把它从画框里取下来。但是他又在店里多逗留了几分钟，和老店主聊天。他发现，店主的并不姓威克斯——从店门口的招牌来看，你很可能认为店主就叫这个名字——而是姓查林顿。查林顿先生似乎今年六十三岁，是个鳏夫，在这间铺子里住了三十年。他一直想把橱窗上的名字改过来，却从未着手去做。两人谈话时，温斯顿脑中一直萦绕着那首支离破碎的歌谣。“圣克莱蒙的钟声唱着：橙子和柠檬；圣马丁的钟声说着：你欠我三法新！”说来奇怪，当你心中默念这几句词，恍惚间就真的听见了钟声，来自那个现已逝去，被掩饰，被遗忘，却依然在某地存在的伦敦的钟声。这洪亮的钟声似乎是从一个个鬼影般的尖塔里传出的。但就他记忆所及，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听到过教堂的钟声。

他与查林顿先生告别，独自下楼，不想让老店主看到自己出门前四处窥探街道的样子。他已经下定决心，再适当过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月——他会再次冒险来这个店里。这或许并不比缺席社区活动中心一个晚上更危险。最蠢不过的是自己买了日记本以后，在没弄清楚这个店主是否值得信赖的情况下又去了第二次。然而……

是的，他想了一下，他会再回来的。他会买下那张圣克莱蒙教堂的

版画，把它从画框里取下，藏在工作服的上衣里面带回家。他会从查林顿先生的记忆里把歌谣的剩下部分挖出来。甚至租下楼上房间的疯狂计划也再次涌上心头。大约五秒钟后，他已经被兴奋冲昏了头脑，变得麻痹大意起来。他在没有隔着窗户观察外面的情况下就走上了人行道，甚至即兴哼唱了起来：

圣克莱蒙的钟声唱着：橙子和柠檬；圣马丁的钟声说着：你欠——

突然他不寒而栗，吓得屁滚尿流。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人影正沿着人行道朝他走来，距离不足十米。是小说司的那个女孩，那个黑发女孩！尽管灯光昏暗，但还是不难认出是她。她直直看着他的脸，接着好像没看到他一样快步走开。

温斯顿被吓得几秒钟不能动弹。随后他向右转身，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开了，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走错了路。不管怎样，他弄清楚了一个问题，这个女孩毫无疑问在监视他。她肯定是一路跟踪他到这里的，因为绝不可能那么巧，她竟然和自己在同一个晚上出现在同一条和党员住处足足隔了几公里的昏暗小巷中。她到底是思想警察的密探，还仅仅只是个爱管闲事的业余探子已经不再重要。单单她监视他这件事就足够说明问题。她可能还看见他进了那家酒吧。

温斯顿走得很吃力。每走一步口袋里的玻璃球就撞一下他的腿，他几乎想把它掏出来扔掉。最糟糕的是他肚子疼。有那么几分钟，他觉得要是还找不到厕所，自己就要一命呜呼了。但这种地方是不会有公共厕所的。后来腹部痉挛过去了，只留下阵阵隐约的痛楚。

这条街是个死胡同。温斯顿停下脚步，站了几秒钟，茫然地思索该怎么办，接着他转过身沿原路返回。转身的时候，他想到那个女孩仅在三分钟前和自己擦身而过，如果一路奔跑，应该能追得上。他可以尾随她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捡一块鹅卵石砸烂她的脑袋。他口袋里的玻璃球分量够重，可以拿来一用。但他马上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需要花力气的事连想一下都觉得无法承受。温斯顿跑不动，也没力气砸她。况且她年轻力壮，足以自卫。他也想快点到社区活动中心，然后在那里待到关门，以此作为这天晚上不在别处的部分证据。但这也是不可能的。他感到累得不行，满脑子就想快点回家安安静静地坐着。

他回到家时已经22点多了。23点30分会集体熄灯。他走进厨房，灌了差不多一杯胜利金酒。接着走到凹室的桌子旁，从抽屉里拿出日记

本，但他没有立即打开。电屏里传出一个粗嗓门的女声，正在高唱一首爱国歌曲。他坐在那里，双眼直直地盯着日记本大理石纹的封面，尽力想把歌声屏蔽在意识之外，结果却只是徒劳。

他们在夜里来抓你，总是在夜里。正确的做法就是在他们抓到你之前自我了断。无疑有些人就是这么做的。许多失踪事件其实就是自杀。但在一个根本弄不到枪支和快速致死毒药的世界里，自杀需要决绝的勇气。他有点震惊地想到，从生物学角度来看，痛苦与恐惧全然无用，人体总是在需要它做出特别努力的时候变得瘫软无力。如果下手够快，他也许能够让那个黑发女孩永远闭嘴，但恰恰因为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他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他突然意识到，在危急时刻，人们斗争的对象从来就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自己的身体。即便是现在，尽管喝了金酒，腹部的隐痛依然让他无法连贯地思考。他意识到，在所有看起来英勇或悲剧的情况下，也都一样。在战场上，在刑讯室里，在逐渐下沉的船上，你为之奋斗的事总是被抛之脑后，身体的种种因素会被无限放大，即便你没有被吓瘫，也没有痛得呼天抢地，生命依然只是与饥饿、寒冷、失眠、消化不良、牙痛做着一刻不停的斗争。

他打开日记本，现在写下点什么很重要。电屏里的女人开始唱一首新歌，歌声像玻璃渣一样刺进温斯顿的大脑。他努力去想奥伯里恩，这本日记就是为他而写，是写给他看的。然而他却开始想象自己被思想警察抓起来以后会经历什么事。要是他们立刻处死他，那也就无所谓了，因为被杀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死之前（尽管没人说起过这些事，但每个人都知道），却要经历逼供的过程，趴在地上呼天喊地求饶，骨头被打断，牙齿被打得七零八落，头发上结着块块血痂。既然结局都是一样的，你为什么非要吃这些苦头呢？少活个几天或几星期难道不可以吗？没有人躲得过侦查，也没有人不招供的。一旦犯下思想罪，那离死期也就不远了。既然这种恐惧什么都改变不了，那为什么还要担惊受怕活下去呢？

他又一次试着在心中勾画奥伯里恩的形象，这次比先前成功了一些。“我们会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奥伯里恩对他说。他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他自认为知道，没有黑暗的地方就是想象中的未来，人们永远看不到未来，但凭着先见之明，便能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感知它。由于电屏传出的声音在他耳边聒噪，他跟不上自己的思绪了。他叼起一根香烟，半卷烟丝就这么掉到了舌头上，烟丝呈碎末状，极为苦涩，吐都吐不干净。老大哥的脸浮现在他脑海里，取代了奥布里恩的

脸。就像前几天那样，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来看，硬币上的脸凝视着他，粗犷的脸型，平静的表情，令人心安。但是，藏在他黑色胡子下面的又是怎样一种笑容呢？仿佛一声沉闷的丧钟，那几句话在他耳边响起：

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无知就是力量

---

[1] 品脱，英美制容量单位，1品脱约等于568.26毫升。全书同。

[2] 夸脱，英美制容量单位，1夸脱约等于1136.52毫升。全书同。

[3] 加仑，英美制容量单位，1加仑约等于4546毫升。全书同。

[4] 法新，英国1961年以前使用的旧铜币，等于四分之一便士。

第二部分

第一章

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温斯顿离开工作隔间去上厕所。

灯火通明的长走廊另一头，走来一个孤独的身影，是那个黑发女孩。自从那天在旧货店外面遇到她后，已经过去四天了。她走近时，温斯顿看到她右臂吊着绷带，由于绷带和她工作服的颜色一样，所以从远处看不出来。她大概是在转动某台“拟出”小说情节的巨型“万花筒”时，被压伤了手，这种意外在小说司十分常见。

两人相隔大约四米的时候，女孩绊了一下，几乎正脸朝下摔到了地上。她惨叫一声，定是正巧压着了受伤的胳膊。温斯顿马上停下脚步。女孩已经爬起来跪在地上，她脸色蜡黄，嘴唇反而显得更为红润。她双眼紧紧盯着他，神情恳切，但这样的神情更像是出于恐惧而不是疼痛。

温斯顿心头涌起一种奇特的情感，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欲置自己于死地的敌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陷于痛苦之中的人，可能连骨头都折断了。他本能地走上前去帮忙，她跌倒压着受伤的胳膊时所遭受的痛苦，他似乎能够感同身受。

“疼不疼？”他说。

“没事。就是胳膊，一会就好了。”

她说话时心脏似乎在砰砰直跳，脸色变得煞白。

“没摔伤吧？”

“没，我没事。就这会儿有点疼而已。”

她朝温斯顿伸出左手，他将她扶起来。她脸上恢复了一些血色，看起来好多了。

“没事了，”她简短地说，“就手腕扭了一下。谢谢你，同志。”

她说完就继续向前走，动作轻快，就好像真的没事了一样。整个过程不超过半分钟。尽管不让情感外露已经成了一种本能的习惯，再说这件事情发生时，他们正对着电屏，然而不流露出一丝惊讶仍然非常困难，因为在他搀扶女孩起身的两三秒钟时间里，女孩往他手里塞了什么东西。毫无疑问，她是故意这么做的。那个东西体积不大，十分扁平。他走进厕所后，顺手将其揣入口袋，并用指尖摸了摸。那是一张折成方形的纸片。

他站在小便池前，略费了些周折，终于用手指将其展开，显然上面写着什么信息。那一瞬间，他有冲动想立即走进厕所间，把纸片拿出来看。但他清楚地知道，这样做再愚蠢不过了。因为毫无疑问厕所间是被电屏二十四小时监视的地方。

他回到自己的工作隔间，坐了下来，随手把纸片丢到了桌上的一堆纸里，戴上眼镜，把说写器拉向自己。“五分钟，”他对自己说，“至少再等五分钟！”他的心脏砰砰直跳，声音大得吓人。幸好手头的工作只是例行公事，修改一连串数据而已，并不需要全神贯注。

无论纸上写了什么，一定带有某种政治意义。就他能想到的，只有两种可能性，其中一种可能性较大，即这个女孩是思想警察的特务，这也是他所担心的。他不知道为什么思想警察会以这种方式传递信息，不过他们或许有自己的理由。纸上写的可能是警告，可能是传唤，可能是一条让他自杀的命令，也可能是某种陷阱。不过他脑中不停浮现出另一种异想天开的可能性，并且挥之不去，那就是这张纸条根本就不是来自思想警察，而是来自某个地下组织，也许兄弟会真的存在！黑发女孩可能就是其中一员！毫无疑问这种想法十分荒谬，不过他一拿到纸条，这个想法就从脑中冒了出来。几分钟之后，他才想到了另一个更切实际的解释。即便现在，尽管理智告诉他，这张纸条可能就意味着死亡，但他依然不相信，那个不切实际的希望依然挥之不去，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对着说写器说话的时候，他费了好大劲才控制住自己，不让声音发颤。

他把已经完成的一叠工作材料卷起来扔进气流输送管。八分钟过去了，他扶了扶眼镜，叹了口气，把另一批工作材料拉到自己身边。那张纸片就在最上面，他将纸片展开摊平，上面写着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

我爱你。

有那么几秒钟时间，他愕然地坐在那里发呆，甚至忘了把这招罪之物扔进记忆洞。尽管他很清楚对此表现出太大兴趣的危险，但依然忍不住又读了一遍，以确认上面写的确实是这三个字。

上午接下来的时间里，便再难做什么工作了。而比起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系列琐碎的工作之上，更难做到的是必须在电屏前掩饰自己的激动之情。他感到腹内好像有一团火在燃烧。在闷热、拥挤、嘈杂的餐厅吃午饭简直就是煎熬。他原本希望午饭时间能够一个人待一会，但倒霉的是那个白痴帕森斯一屁股坐到他身边，滔滔不绝地讲有关仇恨周的准备情况，身上那股汗臭味几乎盖过了炖菜的金属味。他女儿所在的特工队为此特地用硬纸板做了一个两米宽的老大哥头像，他对这件事特别来劲。令人恼火的是在一片嘈杂中，温斯顿几乎听不清帕森斯到底在说些什么，只好不停地请他重复那些蠢话。他只看到了那个女孩一次，她和另外两个女孩远远地坐在食堂的另一头。她似乎没看见他，他也没再往那个方向看。

这天下午就好过一点了。午餐刚结束，就来了一份复杂难做的工作，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而且做的时候需要把别的事情统统放到一边。这项工作是篡改两年前一份产量报告中的数据，以此来诋毁一名核心党高级成员的声誉，这个人现在已经失势。这是温斯顿擅长的工作，两个多小时里，他成功将女孩完全抛到脑后。在此之后，记忆中女孩的脸又浮现心头，他涌起了一个无法遏制的强烈愿望，想找个地方独自待着。除非一个人待着，否则根本无法把刚才发生的这件事理出头绪。今晚是他去社区活动中心的日子，他在食堂狼吞虎咽扒下一顿晚饭后，立即动身赶去活动中心，参加了一个看似严肃，实则愚蠢的“讨论小组”，玩了两局乒乓球，吞下几杯金酒，坐着听了半小时题为《英社与象棋的关系》的演讲。心中尽管无聊得不行，却头一次没有逃离活动中心的冲动。从看到“我爱你”三个字的那一刻起，他心中就充满了活下去的欲望，冒点小险的想法现在看来也变得愚不可及。直到23点，回家躺到床上后，他才得以连贯地思考问题。在黑暗中，你是安全的，只要保持安静，甚至能够躲避电屏的监控。

有一个实际问题亟待解决：如何联系上女孩并安排见面。他不再觉得她可能是在给自己设套了，他知道不是这样，因为她把纸条塞给他时，情绪明显是激动的。很显然当时她也吓得六神无主，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就在五天前的那个晚上，他还想过用鹅卵石将她脑袋砸烂，但

那已经不再重要。他想到她一丝不挂的年轻肉体，就好像在梦中见到的一样。他原以为她和其他人一样蠢，头脑中充斥着谎言与仇恨，只有一副铁石心肠。一想到自己可能会失去她，这个雪白、年轻的身体可能从自己身边溜走，他心中就紧张不已。他最担心的是，如果不尽快和她联系上，她可能很快就变心了。但是实际见面的难度巨大，就好像下棋，在被将死的情况下依然试图走下一步。不论转向哪个方向，电屏都对着你。实际上，在看到纸片的五分钟内，他就想到了和她联系所有可行的办法。而现在，有了思考的时间，他把这些方法一条条在脑中过了一遍，就好像在桌上将工具一列排开似的。

显然，像上午那种邂逅是不能重演了。要是她在档案司工作，那事情会相对简单，但他只大概知道小说司在大楼哪个方位，而且也没有借口去那里。如果他知道她住在哪里和下班时间的话，他可以设法在她回家的路上见她，不过尾随她回家这个方案并不安全，因为这就意味着得在真理部外面游荡，必定会引人注意。至于通过邮局给她寄信，那完全不可行。所有信件都会在邮递过程中被拆阅，这种例行的程序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事实上，几乎没人写信，偶尔需要传递消息的时候，就用现成印好文字的明信片，这种明信片上印着一长串字词，你只要将不合适的划去就行了。反正他也不知道女孩的名字，更别说住址了。最后，他认定食堂是最安全的地方。如果能在她独自一人时坐到她那张桌子前，最好在食堂中间，不要过于靠近电屏，而且周围有嘈杂的说话声。如果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差不多三十秒时间，就有可能和她说上几句话。

此后一星期，他的生活仿佛一个辗转反侧的梦。第二天一直到他离开食堂，女孩都没有出现，那时哨声已经响起了，可能她被调去上下一个班次了。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看都不看对方。接下去的一天，她在平常时间来到餐厅，但身边有其他三个女孩，而且就坐在电屏下方。接下来的三天就十分难熬，因为她完全没有出现。这使他身心受尽折磨，变得极为敏感，好像一碰就会碎。他几乎无法掩饰自己，他的一言一行、所见所闻都让他觉得痛苦。就算在睡梦中，他都无法摆脱她的倩影。这几天他没碰日记本，如果说有慰藉的话，那就是工作，在工作中，他有时候能一口气处于忘我状态长达十分钟之久。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一无所知，也无从询问。她可能已经人间蒸发了，她可能已经自杀了，她可能已经被调到大洋国的另一端。最坏的也是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她也许就只是变了心，决定躲开他。

第二天，她又出现了，胳膊上的绷带去掉了，手腕上贴着橡皮膏。再次见到她，温斯顿大大松了一口气，忍不住直直地盯了她好几秒钟。接下来那天，他几乎成功和她搭上话了。他走进食堂的时候看到她正坐在一张离墙很远的桌旁，身边几乎没人。这时还早，食堂人并不多。买饭的队伍缓缓前进，就在温斯顿要排到柜台前的时候，因为前面有人抱怨没拿到糖精片而耽搁了两分钟。当温斯顿拿着餐盘朝她桌子走去的时候，那个女孩依然独自坐着。他若无其事地朝她走去，眼神在她身后的桌子上扫来扫去。她现在距离他大约有三米，只需两秒钟就能走到。突然身后有人在叫他，“史密斯！”他装作没听到，“史密斯！”那个人又喊了一声，声音更响了。没办法，他转过身。一个发色金黄、一脸傻相的年轻人正满脸笑容地邀请他坐到自己桌边的空位上。这个人名叫威舍尔，和温斯顿只是点头之交。拒绝他不是安全之举，既然被认出来了，他就不能再过去和一个孤身一人的女孩坐到一起了，这太惹人注意了。他友好地笑笑，接着坐下。那张顶着一头黄发的傻脸也笑意盈盈，温斯顿恨不得抓起一把十字镐朝这张傻脸抡去。几分钟后，女孩坐的那张桌子上坐满了人。

不过她肯定看到他朝她走去，也许也领会了这种暗示。接下来一天，他特地早早地来到食堂，果然，她和前一天一样独自坐在同样的位置。队伍里排在温斯顿前面的是一个体型矮小、动作敏捷、甲虫一样的男人，此人面部扁平，闪烁的目光中充满猜忌。温斯顿拿着餐盘从柜台转身的时候，看到那个矮男人径直朝女孩坐着的桌子走去。他的希望又要落空了。再过去的一张桌子上有个空位，但从矮男人脸上的表情能看出他会为了让自己坐得舒服而选择人最少的位置。温斯顿揣着凉了半截的心尾随其后，除非他能和女孩单独坐在一起，不然就一点用都没有。这时传来一声巨响，矮男人朝前摔了个狗啃泥，餐盘飞了出去，汤和咖啡洒得地板上到处都是。他爬起来，恶狠狠地瞪了温斯顿一眼，显然怀疑是温斯顿把他绊倒的。不过没关系，五秒钟后，温斯顿坐到了女孩桌旁，心扑通扑通狂跳不止。

他没有看她，只是放下餐盘，随即吃了起来。在还没人来的时候赶紧说话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他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自从她第一次接近他以来，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她可能变心了，她一定是变心了！这种事情不可能有什么好结局的，现实生活中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要不是这时他看到那个长着毛茸茸耳朵的诗人安普福斯正拿着餐盘有气无力地转来转去找位置坐，没准他就临阵退缩，再不开口了。安普福斯对温斯顿怀着模糊的好感，要是看到温斯顿，准会到他身边坐下。可能只有

一分钟时间了，想行动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温斯顿和女孩都在不紧不慢地吃着稀薄的炖菜，其实就是扁豆汤。温斯顿开始轻声说起话来。两人都没有抬头，只是不紧不慢地用勺子舀起汤水往嘴里送，在舀汤的间隙不动神色地低声交换几个必要的词。

“你几点下班？”

“18点30分。”

“我们在哪里碰头？”

“胜利广场，纪念碑旁。”

“那边到处是电屏。”

“人多就没事。”

“约定暗号吗？”

“不用，等人多了以后再接近我，别看我，待在我旁边就行。”

“几点？”

“19点。”

“好。”

安普福斯没看到温斯顿，坐到了另一张桌子旁。温斯顿和女孩再没有说话，尽管面对面坐着，却再没有看对方一眼。女孩吃完午饭后立马起身离开，温斯顿没有起身，而是点了支烟。

温斯顿早于约定时间来到了胜利广场，在纪念碑带凹槽的巨大圆柱形基座附近来回走着。基座上面是老大哥的塑像，面朝南方，凝视天空。第一空降场战役中，他曾在那里击落过欧亚国的飞机（几年前的表述是东亚国的飞机）。正对纪念碑的街道上有一座骑着马的雕像，应该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约定的时间过去了五分钟，女孩依然没有出现。温斯顿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中。她不会来了，她变心了！他慢慢向广场北面走去，认出圣马丁教堂的时候，心中多少有了一丝喜悦，教堂钟声——当它还有钟的时候——曾经轰鸣着“你欠我三法新”。就在这

时，他看到了女孩站在纪念碑基座旁，正在读，抑或是假装在读贴在基座上的海报。现在人群聚集得还不够多，走到她身边是很危险的。教堂门廊顶上的三角墙周围装满了电屏。这时，他左边某处传来人群的喊叫声和重型车辆的隆隆声。突然之间，所有人似乎都在奔跑着穿过广场。女孩敏捷地跳过纪念碑基座上的狮子雕像，加入了奔跑的人群。温斯顿跟在她后面。奔跑时，他从人们的喊叫声中听到有一列装着欧亚国俘虏的车队正在经过。

这时密密麻麻的人群已经将广场南面堵得水泄不通。温斯顿通常碰到这种混乱场面总会不知不觉被挤到最外面，但这次他却推搡着往人群中心挤。没过多久，他距离女孩就只有一臂之遥了，但他们之间却挡着一个身躯壮硕的群众还有和他体格相差无几的女人，这两人很有可能是夫妇，他们仿佛形成了一堵牢不可破的肉墙。温斯顿侧过身来，猛地一挤，终于把肩膀挤到了那两人中间。有那么一阵子他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仿佛就要被这两个健硕的臀部夹成肉泥了。随后，他终于从两人中间挤了出来，身上沁出了汗水。他到了女孩身边，两人肩并肩，目光都直视前方。

长长的卡车队缓缓开过街道，车上四角都直直站着面无表情、手握冲锋枪的守卫。车厢里蹲着几个矮小的黄种人，身上穿着破烂的绿色军装，挤成一团。他们有着蒙古人种特有的脸型，满脸苦相，漠然地望着外面。卡车偶尔颠簸的时候，就会传来金属的碰撞声，所有俘虏都带着脚镣。满脸苦相的俘虏就这么一车一车被运了过去。温斯顿知道车上装着俘虏，但只是时断时续地看到他们。女孩的肩膀和上臂都紧贴着他的。女孩的面颊也和他的几乎贴到一起，似乎都能感受到她的体温。跟先前在食堂里一样，女孩马上掌握了主动，开始用上次那种不动声色的嗓音讲话，双唇几乎不动，这种低声的呢喃轻而易举地就被鼎沸的人声和卡车的隆隆声淹没了。

“能听得见吗？”

“能。”

“周日下午能出来吗？”

“能。”

“听仔细了，一定要记住。去帕丁顿车站……”

她告诉他所要走的路线，精确得像军队部署一样，让他吃惊不已。搭半小时火车，出站后左转，再走两公里，来到一扇顶上没有横梁的大门，沿着一条田间小路，来到一条荒草丛生的小径。灌木丛中有一条小道，还有一棵长满苔藓的枯树。仿佛她脑中有一幅地图似的。“都记住了吗？”她最后低声问道。

“记住了。”

“先左拐，再右拐，再左拐。那扇大门顶上没有横梁。”

“好，几点？”

“大约15点。你可能要等我一下。我沿另一条路过去。你确定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那就赶紧走。”

其实她不说他也知道。但当时他们无法从人群中脱身。车队慢慢驶过，人们依然在张着嘴围观，好像百看不厌似的，开始还发出几声嘘声，但也只是人群中的党员发出的，而且很快就停止了。不论是从欧亚国还是从东亚国来的外国人，都是一种陌生的动物，除了以俘虏的样子出现，人们几乎看不到他们，即便是俘虏，人们也只能匆匆瞥见一眼而已，也不知道他们的下场如何，除了几个被当作战犯吊死之外，其他人就这么消失了，可能被送进了劳改营。蒙古人种的圆面孔消失后，出现了比较像欧洲人的脸，肮脏憔悴，满脸胡子。一双双眼睛从满是胡茬的颧骨上方与温斯顿视线相接，有时眼神炽热，但这种怪异的神情一会就烟消云散了。车队快过完了，最后一辆车上，他看到一个老头，须发灰白，直挺挺地站着，手腕在身体前方交叉，仿佛习惯双手被绑在一起。几乎快到与女孩分手的时候了。但就在最后一刻，当人群将他们重重包围的时候，女孩的手摸索到了他的手，迅速地捏了一下。

这过程可能持续都不到十秒，但他俩的手似乎已经在一起握了很长时间。他有充裕的时间感知她手的每一个细节，他摸索到她长长的手指，齐整的指甲，因为干重活而满是老茧的手掌，还有手腕下光滑的肌肤。尽管只是通过触觉，他也仿佛就像亲眼看到了一样。与此同时，他突然想到自己并不知道女孩眼睛的颜色，好像是棕色的，但黑头发的人

有的也长着蓝眼睛。转过头看她这样的举动是极其愚蠢的。两人双手紧扣，隐没于茫茫人海中，他们的双眼一动不动望着前方。温斯顿看到的不是女孩的眼睛，而是一头乱发之中，老俘虏向自己投来的悲伤目光。

第二章

温斯顿沿着光影斑驳的小径一路走，阳光透过树枝的间隙洒在地上，形成片片金色的水洼。他左手旁的树下开满了蓝铃花。和风亲吻着他的肌肤。这天是5月2日，树林深处传来了斑鸠的咕咕叫声。

他来得有点早，沿途都很顺利，女孩显然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因此他并没有像平常那样害怕。或许应该相信她为两人见面找的地方是安全的。通常情况下，乡下并不一定比伦敦安全。没有电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依旧危险四伏，到处都装着隐秘的话筒，你的声音会被拾取、辨认。除此之外，一个人要想独自旅行而不被注意到，亦非易事，虽然出行一百公里以内并不需要在通行证上贴签注，但有时候巡逻队会在火车站附近出没，一遇到党员就要查看他们的证件，并盘问一些刁钻的问题。但这次巡逻队没有出现，出火车站后，他一路谨慎地不时回头张望，确认自己没被跟踪。火车上挤满了群众，所有人都因为夏日般温暖的天气像度假一样兴高采烈。他所在的那节木椅车厢被一个大家庭塞得满满当当，上有掉了牙的曾祖母，下有刚满月的小婴儿，全家人准备花上一下午去乡下亲戚家串门，顺便——他们毫无顾忌地和温斯顿说——去黑市弄些黄油。

小径渐渐变宽，不出一分钟，他来到了她之前提到的小道上，这是条夹在灌木丛中由牛群踩出来的小道。他没有手表，但现在应该不到15点。脚下到处都是蓝铃花，走路的时候根本没法不踩上去。他跪到地上，开始采花，半是用来打发时间，半是隐约打算和女孩见面的时候向她献上一束。他采了一大把，正凑上去嗅那并不好闻的淡淡花香时，身后传来一声响动，让他吓得动都不敢动，不会错的，那是脚踩在树枝上的声音。他继续采花，这是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女孩来了，也可能自己一直就被人跟踪。四处张望是心虚的表现，他只好一朵接一朵不停地采。一只手轻轻地搭到了他的肩上。

他抬起头，是她。女孩摇了摇头，显然在警告他不要出声，接着扒开灌木丛，领着他快步沿着小道走到树林里。很显然她来过这里，因为她走路的时候，似乎很有经验地避开泥泞的地方。温斯顿跟在后面，手里依然攥着那束花，他的第一感觉是松了一口气，但当他看到自己面前

女孩健美苗条的身体，腰上的红腰带恰到好处地显出了她臀部的曲线，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沉沉地压在了心上。他觉得即便到了现在，当她转身过来看到他的时候，还是会打退堂鼓。甜甜的空气和翠绿的树叶让他感到泄气，就在从车站出来的时候，五月的阳光已经让他觉得自己污秽不堪、苍白虚弱，他是个过惯室内生活的人，每个毛孔里都嵌着伦敦的粉煤灰。他突然想到，直到现在，她可能都没有在光天化日下见过他。他们来到她提到过的枯树下，女孩一跃而过，拨开灌木丛，那边看上去并不像会有空地。温斯顿跟着她过去，才发现别有洞天，他们来到一个绿草茵茵的小土墩上，四周树木环绕，将这块地方围了个严严实实。女孩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到了。”她说。

他面对着她，中间隔着几步距离，但他不敢向她靠近。

“我不想在小路上说话，”她继续说道，“以防那边藏有话筒。我觉得那边没有，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那些猪猡里总有人可能会辨出你的声音，在这儿就没事了。”

他依然没勇气向她走去。“这儿没事。”他傻傻地重复道。

“是的，看那些树。”那是些矮小的栲树，一度被砍掉，后来又长出来形成一片小树林，一棵棵都还没有手腕粗。“这边的小树没有一棵大到能藏得住话筒。而且，我之前来过这里。”

他们只是在没话找话说。他现在已经朝她走近了些，她直直地站在他面前，脸上带着有嘲讽意味的笑容，似乎在问他为什么这么拖泥带水。蓝铃花掉到了地上，似乎像是自己掉下去的一样，他抓住了她的手。

“你相信吗，”他说，“在此之前，我都还不知道你眼睛的颜色。”他注意到她的眼珠是褐色的，一种浅浅的褐色，而睫毛颜色却很深。“现在，你看到我究竟长什么样了，你能受得了吗？”

“能啊，这有什么难的。”

“我三十九岁，有个甩不掉的老婆，还得了静脉曲张，嘴里还有五颗假牙。”

“我一点也不在乎。”女孩说。

接着，很难说是谁主动，她已经在他怀里了。起初，除了不可思议之外，他没有任何感觉。这个年轻的身体正和自己紧紧抱在一起，一头浓密的黑发正贴着自己的脸颊，啊，就是这样！她真的抬起了脸，他正亲吻着她张开的红唇。她双臂勾住他的脖子，喊他亲爱的、宝贝、爱人。他将她扑倒在地，她任他摆布，他可以对她为所欲为。但事实上，他除了肉体的接触之外，毫无生理反应，他只感到不可思议和骄傲自豪。进展太快了，她的年轻与美貌把他吓到了，他已经太习惯于没有女人的生活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女孩自己直起身，从头发里扯下一朵蓝铃花，她靠着他坐下，搂着他的腰。

“没关系，亲爱的，不着急，我们有一下午时间呢。这地方够隐蔽的吧？我在一次社区远足的时候迷了路，就发现了这里。如果有人来，隔着一百米就能听到动静。”

“你叫什么？”温斯顿说。

“茱莉亚。我知道你的名字。温斯顿，温斯顿·史密斯。”

“你怎么知道的？”

“在调查事情方面，我可比你在行，亲爱的。跟我说说，在我给你递纸片那天之前，你对我是什么印象。”

他不想骗她。从一开始就挑最坏的讲，也是一种表达爱意的方式。

“我恨你，都不想看见你，”他说，“我想把你先奸后杀。两周前我真的想过要用鹅卵石砸烂你的头。如果你真想知道原因，我当时觉得你和思想警察有联系。”

女孩开心地笑了，显然把这句话当成是在称赞自己高超的伪装技巧。

“思想警察！你不会真的那样以为吧？”

“好吧，可能也不是完全那样想。但单从你的外表上看，仅仅因为你年轻，涉世不深，身体又健康，你懂的，我觉得也许……”

“你觉得我是个好党员，言行举止都很纯洁，举着横幅、参加游行、喊着口号、积极参与比赛和社区远足，总是做这类事情。你觉得我一有机会就会去揭发你，说你是个思想犯，然后把你除掉，是不是？”

“是的，差不多就这样。许多年前女孩子都那样，你知道的。”

“都是这个鬼东西惹的祸。”她说着扯下青年反性团的鲜红色腰带，随手扔到一根树枝上。然后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在自己腰上摸了一下，从工作服口袋里拿出一小片巧克力。她把巧克力掰成两半，分了一半给温斯顿。在他接过巧克力之前，凭气味就能判断出这块巧克力非同寻常。颜色又黑又亮，外面包着银色纸片。平常的巧克力颜色暗淡，而且一碰就碎，味道就如人们所描述的，吃起来带着一股烧垃圾的烟味。但她给他的这块巧克力的味道，他似乎曾几何时尝到过。自从闻到了这块巧克力的香味，他心中就有某段记忆被唤醒，但他又无法记得真切，这段记忆在他心中久久萦绕，令他坐立不安。

“这是从哪弄到的？”他说。

“黑市，”她毫不在意地说，“其实，我就是那种女孩。我比赛成绩很好，曾经当过特工队队长。我每周花三个晚上给青年反性团做志愿工作，在伦敦四处张贴他们那些胡扯淡的标语，一贴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在游行的时候总是举着横幅的一端。我看上去一直兴高采烈，从不畏畏缩缩，总会和人群一起高喊，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

第一口巧克力已经在温斯顿舌头上融化。味道好极了。但那段记忆依然在他意识边缘徘徊，是某种能够清楚感知，却无法诉诸形状的东西，就好像是从眼角看到的东西一样。他把这种感觉撇在一旁，只知道这是一段有关他某个行为的记忆，这个行为让他十分懊悔，却又无力回天。

“你很年轻，”他说，“你比我小十到十五岁。我这样一个男人，你看上我什么了？”

“看上了你脸上流露出的某种气质。我觉得自己应该试一试，我很善于发现与众不同的人。我见你的第一眼起，就知道你反对他们。”

他们，很明显，指的是党，特别指核心党。她谈论起这些人，总带

着不加掩饰的嘲弄和仇恨，这一点让温斯顿感到不安，尽管他知道不会有其他地方比这里更安全。有一件事让他感到十分震惊，就是女孩满嘴粗话。党员不应该说粗话，温斯顿自己也极少骂人，至少不会大声骂人。不过，茱莉亚一提到党，尤其是核心党，就非得用上那些用粉笔写在污水遍地的小巷墙壁上的字眼。温斯顿并不觉得讨厌，这仅仅是她反感党及其所作所为的一种表现，而且她的粗话说得自然而健康，就好像马闻到烂草料打响鼻一样。他们已经离开了空地，在光影斑驳的树荫下散步，只要路面能够容纳两人并行，他们就会搂着彼此的腰并肩走。他发现，拿掉腰带后，她的腰柔软多了。他们像耳语一般轻声说话。茱莉亚说，在空地外面，最好别出声。这时他们来到了一片小树林边，她让他停下来。

“别去空旷的地方，可能有人监视，我们待在树丛后面就不会有事。”

两人站在榛树丛的树荫下。阳光穿过头顶上数不清的叶子，照到脸上依然炽热。温斯顿向远处田野张望，不知何故，心里渐渐有了一种震惊的感觉，他认得这个地方。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就是那片被啃得乱七八糟的古老草场，有一条小路从中间穿过，草场上到处都是鼹鼠洞。草场另一头有一圈参差不齐的树篱，围着迎风轻舞的榆树，树叶在风中微微颤动，像大团大团女人的头发。虽然看不到，但是肯定在附近某处还有一条小溪，溪流汇成碧绿的池塘，池塘里还有雅罗鱼在游弋。

“这儿附近是不是有条小溪？”他低声说。

“对，有条小溪。其实就在那块地的边上。里面有鱼，还挺大。在柳荫下你能看到池塘里的鱼摆着尾巴游来游去。”

“这里是黄金乡，应该就是。”他喃喃地说。

“黄金乡？”

“没什么，真的，这片风景我在梦里见过。”

“看！”茱莉亚低声说。

一只画眉鸟停到了距离他们不到五米远的树枝上，几乎与他们的脸齐平。鸟儿似乎没看到他俩，因为鸟在阳光下，他俩在阴暗处。它把翅

膀伸展开来，又小心地将其收拢，低了下头，像给太阳行了一个礼一样，接着开始引吭高歌。午后的静谧中，鸟的叫声显得尤为嘹亮。温斯顿和茱莉亚依偎在一起，听得入了迷。它不停地唱，一分钟又一分钟，曲调变化无穷，从不重复，好像在有意炫耀自己的歌喉一般。有时候它会停上几秒钟，伸展一下翅膀，再将其收回，然后再次挺起斑斑点点的胸脯唱起来。温斯顿带着隐约的崇敬看着它。这只鸟是为了谁，为了什么而歌唱？既没有配偶欣赏，也没有对手观看，是什么使它站在这片树林的边缘将自己的歌声投向虚无？他想知道周围附近是否藏着话筒。他和茱莉亚说话轻声轻气，话筒应该捕捉不到他们的话语，然而会捕捉画眉鸟的歌声。也许在那个设备的另一端，有一个长得像甲虫的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窃听，听到的却是鸟叫。然而这如潮水般的乐声渐渐将他脑中的思虑冲刷干净。这声音仿佛醍醐，同树叶间透出的阳光融合在一起，倾泻在他身上。他不再思考，只是感受。女孩的腰在他的臂弯里，柔软而温暖。他把她搂向自己，两人胸贴着胸。她的肉体仿佛要融进他的身躯，他双手所到之处，她的身体都像水一样顺从。他们吻到了一起，这个吻和早些时候急不可耐的亲吻大不相同。当他们再次移开脸的时候，两人都深深地呼了口气。鸟儿一惊，扑腾着翅膀飞走了。

温斯顿把嘴凑到了她耳边，“现在来吧。”他轻声说。

“这儿不行，”她轻声回答，“回到那片空地上去，那边比较安全。”

两人飞快地沿路返回空地，路上偶尔踩断了一两根树枝。刚回到树丛环绕的空地，她就转过身面对着他。两人都呼吸急促，但她的嘴角又露出了笑容。她站着看了他一眼，接着伸手去摸工作服的拉链。没错！和他梦中看到的一样，几乎和他想象中一样快，她一把扯下身上的衣服，接着用一种像要摧毁整个文明的华丽姿势将其抛开。她的身体在阳光下闪着洁白的光。但是，有那么一瞬间，他没有看她的身体，他的目光被那张有着点点雀斑、带着大胆浅笑的脸庞牢牢吸引。他跪到她的面前，握住她的手。

“之前做过吗？”

“当然了。几百次，好吧，不管怎样，几十次总是有的。”

“和党员？”

“是的，都是和党员。”

“和核心党员？”

“才没有和那些猪猡，一次也没有。不过只要有半点机会，那些人里好多人都乐意。他们可不像装出来的那么神圣。”

他的心狂跳起来。做过几十次，他希望她做过几百次，几千次。任何暗示着堕落的事都让他充满狂想。谁知道呢，可能党在内部已经腐坏，对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极力鼓吹只是为了掩盖其邪恶行径而编织出来的谎言。如果他能让那些人都染上麻风或梅毒，他会非常高兴地去做！任何能起到腐坏、削弱、破坏作用的事都行！他把她向下拉，两人面对面跪着。

“听着。和你睡过的男人越多，我就越爱你。明白吗？”

“明白。”

“我痛恨纯洁，我痛恨善良！我不想让世上还存在什么道德，我想让所有人都腐化到骨子里。”

“好啊，我迎合你，亲爱的。我就是腐化到了骨子里。”

“你喜欢做这个吗？我不仅仅指和我，我指这件事本身？”

“喜欢极了。”

这句话是他最爱听的，不仅因为爱一个人，也因为动物的本能，一种简单而不加区别的欲望，这种力量足以把党摧毁成碎片。他把她按在草地上，就在散落的蓝铃花中。这次很顺利。不久，他们胸口的起伏速度逐渐恢复正常，带着某种愉悦的无力感分开，瘫软在地上。阳光似乎更热了，两人都起了睡意。他伸手抓过扔在一旁的工作服，半搭在她身上。他俩几乎立刻就睡着了，这一睡就是半小时左右。

温斯顿先醒，他坐起来看着身边睡得正香的女孩，女孩的头枕着手掌，脸上雀斑点点。除了嘴巴，她算不上漂亮。凑近一看，能看到她眼睛周围有一两条皱纹，一头黑色的短发异常浓密柔软。他突然想到自己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姓什么，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

这具年轻、健美的躯体在睡梦中显得无依无靠，唤醒了他心中的怜爱和保护欲。但在榛树下听画眉鸟唱歌时感受到的那种抛开一切念想的

柔情却没有完全回来。他拉开工作服，看着她滑嫩细白的腰身。他心想，在过去，男人看着女孩的肉体，产生了欲望，那事就成了。但如今已经没有纯粹的爱情或纯粹的欲望了。没有一种感情是纯粹的，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与仇恨。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役，高潮即是胜利。这是向党挥去的一击，是政治行为。

第三章

茱莉亚说：“这儿我们可以再来一次，通常情况下，一个地方来两次还是安全的。不过当然，中间要隔上一两个月。”

她醒来后，举止大变，变得警觉而不带感情。她穿上衣服，系上红腰带，开始安排返程的细节。把这一切留给她安排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很明显她处理现实问题时的狡黠正是温斯顿所缺乏的，而且她似乎通过无数次社区远足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对伦敦郊区了如指掌。她给温斯顿定了一条与来时迥然不同的路线，要他到另一个火车站乘车回去。“千万不要原路返回。”她说道，好像在阐明一条重要的原理似的。她会先走，温斯顿要等上半小时再动身离开。

她还说了一个地方，四天后两人晚上下班，可以在那里碰面。那个地方位于贫民区的一条街上，那里有一个露天市场，通常情况下总是熙熙攘攘。她会在摊子前转来转去，假装在找鞋带或缝纫线。如果她觉得四周安全，则会在他接近的时候擤一下鼻子，否则，他就从她身边走过，假装不认识。但如果运气好的话，两人可以在人群中讲上一刻钟话，并安排下次见面。

“现在我必须走了，”温斯顿刚记住所有安排，她就开口说道，“我得在19点30分的时候回去，为青年反性团服务两小时，做些发传单之类的事，是不是很恶心？帮我梳一下头好吧？我头发里有没有树枝？你确定？那再见吧，亲爱的，再见！”

她扑到他怀里，近乎粗暴地亲了他一下。片刻之后，她拨开小树，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树林里。直到现在，他依然不知道她姓什么，住在哪里。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不可能在室内见面，也不可能有什么书面交流。

事实上，他们再没有回过树林中的那块空地。五月间，他们只有一次机会真正意义上成功做了爱。地点在茱莉亚知道的另一个隐蔽的地方，在一座废弃教堂的钟楼里。由于三十年前遭到原子弹轰炸，教堂四周几乎成了一片荒原。一旦抵达那里，那的确是个很好的藏身处，但去的路途危机重重。除此之外，他们只能在街上碰面，每晚换地方，而且

每次见面从不超过半小时。在街道上，总还是能勉强说上几句话的。两人在拥挤的人行道上漫无目的地走，前后保持一小段距离，也不看对方，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断断续续地交谈，仿佛灯塔的光在空中明灭。一旦有穿着党员制服的人走近或到了电屏附近，谈话会戛然停止。几分钟后，再接着刚才没说完的那句话继续往下说。到了约定好分手的地方，两人也会硬生生地把嘴边的话咽下，到了第二天，几乎都不需要开场白，就接着往下说。茱莉亚似乎很适应这种谈话方式，她称之为“分期谈话”，她说话时甚至能够不动嘴唇，而且技巧娴熟得令人吃惊。在近一个月的夜晚约会中，他们只成功接过一次吻。当时两人默默走过一条小街（一离开大街，茱莉亚就闭口不语），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大地都颤了起来，四周一下子变暗。温斯顿发现自己倒在地上，满身淤青，吓得魂不附体。肯定有一枚火箭弹掉在了附近。突然他发现茱莉亚的脸距离自己只有几厘米之遥，脸色煞白，就像一张白纸，甚至连嘴唇都是白的。她死了！他一把将她抱住，却发现自己正在亲吻着一张活生生的、温热的脸，然而有些粉末状的东西进了他的嘴里，两人的脸都盖上了厚厚的一层灰泥。

有几个晚上，两人刚来到约会的地点，就不得不招呼都不打各走各的。要么因为巡逻队刚从街角出现，要么因为头顶上有直升机盘旋。哪怕不那么危险，依然很难挤出时间见面。温斯顿一星期工作六十小时，茱莉亚的工作时间更长，而且他们的休息日会根据工作的紧迫程度进行调整，往往凑不到一块。不管怎样，茱莉亚几乎没有一个晚上是完全空闲的，她会花费惊人的时间在听讲座，参加游行，为青年反性团发传单，为仇恨周准备横幅，为例行节约运动募捐等诸如此类的活动上。她说，这么做是值得的，这叫伪装，如果你遵守这些小规则，就能破坏大规则。她甚至还劝说温斯顿在晚上没事的时候抽空参加兼职军火生产，这个活动是义务的，参加的都是些党内的积极分子。由此温斯顿每周都要花上一个晚上，干四小时无聊透顶的工作，把或许是炸弹引信的金属零件用螺丝拧到一起。工作的车间里过堂风很大，灯光昏暗，锤子的敲打声和电屏中的音乐声混杂在一起，单调得令人生厌。

他们在教堂钟楼相会的时候，补上了常日里没来得及说的话。那是个炎热的午后，钟楼顶上方形的小屋内空气凝滞，极其闷热，充斥着鸽子粪的臭味。他们坐在布满灰尘、到处是树枝的地板上聊了好几个小时，不时有一个人站起身，从垛口向外张望，以确保没人走近。

茱莉亚二十六岁，和另外三十个女孩一起住在集体宿舍（“身边总

是一堆女人，多得发臭！我恨死女人了！”她补充道）。不出温斯顿所料，她在小说司里负责修理小说写作机，她喜欢这份工作，工作内容主要是运行和维护一台功率强大、很难伺候的电机。她“不聪明”，但喜欢动手，和机器在一起就觉得如鱼得水。她能够完整地描述出小说的创作过程，从计划委员会发出总指示到改写小组进行最后润色都能讲得头头是道。但她对最终的成品不感兴趣，她说自己“不怎么喜欢读书”。书只是一种必须生产出来的日用品，和果酱、鞋带等东西别无二致。

她完全不记得60年代初以前的事情了，她所认识的人中，唯一一个经常说起革命前日子的是在她八岁时消失的爷爷。上学时，她当过曲棍球队长，连续两年获得体操比赛奖杯。她还当过特工队队长，加入反性团之前，是青年团团支书。她的口碑一向很好，甚至被挑去色科工作（这是品行良好的确凿证明）。色科是小说司的下属部门，负责生产低级的色情书籍并在群众中发行。她说，内部工作人员称色科为“垃圾站”。她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参与生产那些装在密封盒里，起着诸如《打屁股故事集》或《女校一夜》等书名的小册子。群众青年会像购买违禁品一样偷偷摸摸地买了看。

“这些书写些什么？”温斯顿好奇地问。

“噢，垃圾到极点。无聊透顶，真的。情节一共就六种，他们颠来倒去地用。当然，我只负责‘万花筒’，从来没去改写组干过。我没文化，亲爱的，还不够格干那种活。”

他得知色科里除了部门领导，工作人员全是女孩的时候，吃了一惊。如此安排的理论依据是，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的要难控制，更有可能会被自己生产的淫秽作品腐蚀。

“他们甚至也不用已婚妇女，”她补充道，“女孩通常被认为很纯洁。不过你身边这个不算。”

她十六岁时谈了第一场恋爱，对象是一个六十岁的党员，后来他为了避免被抓自杀了。“了断得也算干净利落，”茱莉亚说，“否则在他招供的时候，会把我供出来。”在此之后，她又谈了各种各样的男人。在她看来，生活很简单。你想要获得快乐，“他们”——指的是党——会阻挠你拥有快乐，你尽可能打破规矩。她似乎认为，“他们”想剥夺你的快乐和你想要逃避抓捕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她憎恨党，而且会用最粗鄙的字眼来表达这个想法，但并没有对党进行概括性的批评。除非涉

及她的个人生活，她对党的教义毫无兴趣。他发现，除了那些已经成为日常用语的字词以外，她从不用新话词汇。她从未听说过兄弟会，也不相信其存在。在她看来，任何有组织的反党叛乱都注定会失败，因此那么做十分愚蠢。聪明人会在破坏规定的同时保全自己。他茫然地想，生长于革命后的年青一代中，又有多少人能像她这样。那些年轻人什么都不懂，坚信党和天空一样，是不可撼动的，他们绝不会反抗党的权威，而是一味躲避，就像野兔躲避猎狗一样。

他们没有讨论结婚的可能性。这种事太过遥远，不值得去想。即便能够摆脱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也无法想象哪个委员会会批准这样一桩婚姻。就算在白日梦中，这样的事也是绝无希望的。

“她是个怎样的人，你老婆？”茱莉亚说。

“她啊，你知道新话中有个词叫‘思想好’吗？意思是天生思想正统，不会有坏想法。”

“不，我不知道这个词，但我知道这类人，再了解不过了。”

他开始跟她讲自己的婚后生活，但奇怪的是，她仿佛早就知道了其中的关键部分。像是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一样。他跟她描述，他一碰凯瑟琳，她的身体就开始僵硬，甚至在她双手紧紧抱着温斯顿的时候，依然像在全力将他推开。跟茱莉亚在一起，他觉得说这些事一点都不难以启齿。总之，想起凯瑟琳，温斯顿感到的早已不是痛苦，而是厌恶。

“要不是那件事，我本还可以忍下去。”他说。并对她讲述了凯瑟琳强迫他每隔一周晚上必须进行的那个索然无味的仪式。“她恨那件事，却没有什么能阻止她去做。她曾经称这件事为……你肯定猜不到。”

“为党尽义务。”茱莉亚马上说。

“你怎么知道？”

“我也上过学，亲爱的。十六岁以上的学生，每月要接受一次性教育，青年团里也有。他们会年复一年将这种理论灌输给你。我敢说在很多人身上奏效了。但是，这件事谁都说不准，人人都是伪君子。”

她开始借题发挥讲了起来。和茱莉亚在一起，所有事都能扯到她自

己的性欲上来，一涉及这个话题，她总能一针见血。和温斯顿不同，她已经抓住了党施行禁欲主义的深层含义——不仅因为性本能能够形成一个不受党控制的世界，因而必须摧毁，而且更重要的是性压抑会导致歇斯底里，而这种歇斯底里能够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这正中党的下怀。她是这么说的："做爱时，你会耗尽精力。之后会感到愉悦，所以管他妈发生什么事，你都无所谓。他们无法忍受你这样。他们要让你时刻精力充沛，来回游行、摇旗欢呼，所有这一切都是性欲的变态发泄形式。如果你心里高兴，干吗还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节目这类莫名其妙的事激动呢？"

一点也没错，他想，禁欲和政治正统之间确实存在直接而紧密的联系。因为除了压抑某种强大的本能，并将其转化为动力之外，还有什么能把党要求党员具备的恐惧、仇恨、疯狂的盲从保持在适当高度？性冲动对党来说是危险的，于是党对此加以利用。他们也对父母的天性采取了类似手段加以玩弄。家庭是无法完全废除的，而事实上，党也鼓励人们以一种古而有之的方式爱自己的孩子。而另一方面，则有计划地教孩子与父母为敌，教他们监视父母并汇报其越轨行为。家庭实际上成了思想警察的衍生品。如此一来，不论白天黑夜，每个人身边都会有告密者，而这些告密者正是和他们十分亲近的人。

他冷不丁回想起凯瑟琳。凯瑟琳要不是因为太蠢而没发现他的异端思想的话，无疑早就向思想警察揭发他了。但这时真正让他想起凯瑟琳的却是午后令人窒息的闷热，他额头已经因此冒汗。他开始向茱莉亚讲述之前发生过的一件事，或者说未能发生的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十一年前，当时也是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

那时，他和凯瑟琳刚结婚三四个月。两人参加社区远足来到肯特郡的时候迷了路。他们只落后其他人几分钟时间，但拐错了个弯，不久发现走到了一座旧白垩矿厂边缘。陡峭的悬崖有十到二十米深，底下全是大石头。周围没人可以问路。一发现迷路，凯瑟琳就变得心神不宁，哪怕和那些吵吵嚷嚷的同伴只分开一小会，也让她有一种做错事的感觉，她想赶紧按原路返回，换一个方向寻找。就在此刻，温斯顿发现脚下的崖壁上长着几丛珍珠菜，其中一丛有品红、砖红两种颜色，显然是同一株上长出来的。他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花，于是喊凯瑟琳过来看。

"看，凯瑟琳！看这些花。靠近底下的那丛，看到了吗？有两种颜色。"

她本已经转身想走，但还是不情愿地折了回来，站在悬崖边探出身子朝他手指的方向看去。他站在她身后不远处，用手扶住她的腰好让她站稳。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这附近连个人影都没有，仅有他们两个。连树叶都纹丝不动，甚至没有一声鸟鸣，在这种地方，装有话筒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就算有，也只能录到声音而已。正值下午最热，最容易打瞌睡的时刻，太阳火辣辣地照着他俩，汗滴在他的脸上流下，痒痒的。一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

“为什么不推她？”茱莉亚说，“要我的话我就推。”

“是啊，亲爱的，你的话你会推。要是我现在，也会推。或者说可能会推，我不确定。”

“你后悔没推吗？”

“是的，总体来说，我后悔没推。”

他们肩并肩坐在满是灰尘的地板上，他把她拉向自己，她的头枕在他的肩上，令人愉悦的发香盖过了鸽子粪的臭味。他想，她还很年轻，仍对生活有所期待，并不理解把一个碍事的人推下悬崖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其实那也无济于事。”他说。

“那你为什么后悔没推？”

“仅仅因为比起消极应付，我更喜欢主动出击。在这场我们参与的游戏中，我们无法获胜。只不过失败的方式有好有坏而已。”

他感到她耸了耸肩表示不同意。当然说起这类事的时候，她总是反对。她不会接受个人总会失败是自然规律这种说法。虽然她从某种意义上也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思想警察早晚会抓到她并将她处死，但在她内心的另一个角落，她相信建立一个可以按自己意愿生活的秘密世界多少还是可能的。需要的只是运气、狡黠、无畏。她不懂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幸福这回事，唯一的胜利将在遥远的将来，你死后很久才会取得，因而从对党宣战的那一刻起，你最好把自己当作一具尸体来看待。

“我们是死人。”他说。

“我们还没死。”茱莉亚直说道。

“我不是指肉体上。六个月，一年或五年，应该还是能活得到的。我怕死。你年轻，所以想必要比我更怕死。显然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把死期向后推，但几乎不会改变什么。只要人类依然保持人性，那生和死都一样。”

“呸，瞎说！你更愿意和谁睡，和我还是和一具骷髅？你不喜欢活着吗？你不喜欢这种感觉吗？这是我，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腿，我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活着的！你不喜欢这样吗？”

她扭过身，胸脯抵着他。他能透过工作服感受到她的胸部，丰满而紧实。她的身体似乎要把青春与活力注入他体内。

“是，我喜欢这样。”他说。

“那就别说死。现在听我说，亲爱的，我们必须确定下回见面的时间。我们还可以回到树林里的那个地方，已经隔了这么长时间没去了。但你这回必须换一个路线过去。我已经都计划好了，你坐火车，瞧，我这就给你画出来。”

茱莉亚以她特有的务实方式聚拢一小方尘土，从鸽子窝上面取下一根树枝，开始在地板上画地图。

第四章

温斯顿环顾了一下查林顿先生店铺二楼的破旧小房间。窗下那张大床已经铺上了一条破毯子，上面还放着一个没套枕套的长靠枕。十二小时制的老式座钟在壁炉台上滴滴答答走着。墙角的折叠桌上，他上次买的那个玻璃镇纸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发出幽幽的柔光。

壁炉围栏里放着查林顿先生给的一个破旧的锡制煤油炉、一口炖锅、两只茶杯。温斯顿点上炉子，在上面烧上一锅水。他带来了满满一信封胜利咖啡和几块糖精片。时钟指针显示7点20分，其实是19点20分。她19点30分到。

愚蠢啊，愚蠢，他心里不停地说，明知故犯、无缘无故、自寻死路的愚蠢。所有党员能犯的罪行中，就数这一条是最不能掩盖的。事实上，这个念头起初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是以折叠桌光滑的桌面反射出玻璃镇纸的画面出现的。正如他预想的一样，查林顿先生毫不犹豫地就把这间房间出租了，他显然很高兴能有几块钱入账，当知道温斯顿要这间房间是为了幽会，他也没表露出吃惊或反感。反而顾左右而言他，神情微妙，让人觉得他好像半隐形了一样。他说，独处是十分宝贵的，每个人都想要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偶尔独自待着，当他们找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任何知情的人都不应声张，这是最基本的礼貌。他甚至还说这栋房子有两个出口，其中一个穿过后院，直通一个小巷。说话时，他似乎已经遁于无形。

窗下有人在唱歌。温斯顿躲在平纹细布窗帘后面偷偷向外张望。六月的太阳依旧高悬，洒满阳光的院子里有一个五大三粗的女人正迈着笨重的脚步来回于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晾出一批白色见方的东西，温斯顿认出那是婴儿尿布。这个女人壮得像诺曼式建筑的立柱，胳膊通红，腰上围着粗麻布围裙。只要嘴里没叼着夹子，就会用浑厚的女低音唱道：

这无望的爱恋，

如四月般逝去，

一个眼神，一句言辞，搅乱了我的梦！

偷走了我的心！

这首歌已经在伦敦传唱了好几周。这是音乐司下属的一个部门为群众创作的无数类似歌曲中的一首。歌词是由一种名为写歌机的机器制作，完全不需要任何人力。但这个女人唱得如此动听，把这首难听至极的垃圾歌曲几乎变成了一首悦耳的好歌。除了能听到那个女人在唱歌，他同时还能听到她的鞋子在石板路上的摩擦声、街头孩子的叫嚷声、远处隐隐的交通嘈杂声，而多亏没有电屏，房间里出奇地安静。

愚蠢，愚蠢，愚蠢！他又开始想。他们到这里幽会，不出几周肯定会被抓到。但是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室内的而且近在咫尺的藏身处，这样的诱惑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在教堂钟楼相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没办法安排碰面。为了迎接仇恨周，工作时间大大延长。离仇恨周还有一个多月，但是冗杂的准备工作使得每个人都不得不加班加点。最后，两人终于设法在同一天下午休息。他们之前商量好这次去树林里的空地上。那天前一晚，他俩在街上短暂地见了个面。和平常一样，两人在人群中慢慢走近的时候，温斯顿几乎没看茱莉亚，但匆匆的一瞥让他觉得她的脸色比平时苍白。

“全完了，”她确认可以安全说话后，马上开口低声说道，“我是说明天。”

“什么？”

“明天下午，我来不了。”

“怎么就来不了了？”

“唉，就是那个。这次来得比较早。”

在那么一瞬间，他气得不行。在他认识她的一个月里，他对她的欲望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起初，这种欲望中性欲的成分很少，他们第一次做爱只是觉得理应如此。之后第二次就变得不同了，她的发香、她嘴唇的味道、皮肤的触感似乎已经融入了他的身体，或者说渗入了他周围的空气。她已经成了他生理上的必需品，变成了一种他不但需要，而且觉得有权拥有的东西。她一说不能来，他就觉得她在骗他。而就在这

时，人群把他俩挤到了一起，两人的手在无意中碰了一下。她迅速地捏了一下他的指尖，而这个动作勾起的不是性欲而是爱意。他突然想到，男人和女人一起生活时，这种失望必定再正常不过，且会时时发生。他的内心被一种深深的柔情占据，这是一种在此之前他对她从未有过的柔情。他希望他们是一对已经结婚十年的夫妻，他希望到那时两人能够同现在一样一起走在街上，却是正大光明的，毫无畏惧的，说着生活琐事，买些家用杂物。他最希望的是两人能够拥有一个独处的地方，而不必每次见面都觉得非做爱不可。而事实上，把查林顿先生的房间租下来的想法是在第二天，而不是在当时重回他脑海的。当他向茱莉亚提议的时候，她出乎意料地欣然同意了。两人都知道这是个疯狂的举动，如同有意走向坟墓。他坐在床边等待的时候，又一次想起仁爱部的地下室。说也奇怪，那命中注定的可怖之事竟然可以在人的意识中进进出出。那件事就在那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在死亡之前，就像九十九之后是一百一样确凿无疑。你无法躲避，但或许能够推迟。不过恰恰相反，人们总会时不时有意识地存心做一些事，缩短那件事发生前的那段间隙，让其提前发生。

这时，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茱莉亚冲进房间，手里拎着一个粗糙的棕色帆布工具包，就是他有时在部里见她拎着上下班的那个。他上前搂她，但她急忙挣脱开来，一部分原因是她手里还抓着包。

“等一会，”她说，“给你看看我带来了什么。你有没有带恶心的胜利咖啡？肯定带了吧。扔了，我们不需要了。看这里。”

她跪到地上，一把扯开工具包，把上面一层扳手、螺丝刀之类的东西掏出来，下面整整齐齐地排着几个纸包。她递给温斯顿的第一个纸包有一种奇怪却又隐约很熟悉的感觉。里面装着某种沉甸甸的，沙子一样的东西，一捏一个坑。

“是糖吗？”他说。

“是真正的糖。不是糖精，是糖。还有一块面包，真正的白面包，不是我们吃的那种鬼东西。还有一小罐果酱。这儿还有一罐牛奶。不过，看！这东西我超爱的，我不得不在外面包了些麻袋布，因为……”

不过似乎她不需要告诉他为什么要把它包起来。香味已经弥漫了整个房间，是一种浓郁强烈的气味，似乎来自于他的童年，但即便是当下，依然偶尔能够闻得到。在门关上之前在过道上飘散，或者在熙攘的

大街上弥漫，一瞬间能够嗅到，却又马上消失无踪。

“是咖啡，”他喃喃说道，“真正的咖啡。”

“是核心党咖啡。整整一公斤。”她说。

“你怎么搞到这些东西的？”

“这些都是核心党用品。那些猪猡什么都有，一样不缺。当然，服务员、勤务员也能顺手牵羊，嗯，看，我还弄到一包茶叶。”

温斯顿在她身边蹲下，撕开纸包的一角。

“是真正的茶叶，不是黑莓叶。”

“最近有不少茶叶，不知道他们是攻占了印度还是哪儿。”她含糊地说，“不过亲爱的，你听好，我想要你转过身背对我三分钟。去坐在床的另一边，不要离窗户太近。我叫你转身你再转身。”

温斯顿茫然地透过细布窗帘向外看。下面的院子里，那个手臂通红的女人依然踏着大步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来来回回，她从嘴上拿下两个架子，深情地唱道：

他们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

说你迟早会忘记，

但多年来的笑容和泪水，

仍让我思绪万千！

她好像对这首口水歌烂熟于心，歌声伴着怡人的夏日微风袅袅上升，十分悦耳动听，并且带着一种甜蜜的忧伤。人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六月的夜晚无穷无尽，要洗的衣服没完没了，哪怕让她在这儿待上一千年，边晾尿布边唱垃圾歌曲，她都能甘之如饴。他突然想到一件奇怪的事，就是他从没听过党员独自自发地唱歌。这种行为似乎看起来有点不那么正派，就像自言自语一样是一种危险的怪癖。可能只有当人们吃不饱肚子的时候，才会有题材可唱。

“你可以转过来了。”茱莉亚说。

他转过身，一时几乎没能认出她来。事实上，他原本期待的是看到她赤身裸体，但她并没有赤身裸体。现在发生的转变比看到她赤身裸体要令人吃惊得多。她脸上化了妆。

她一定是溜进了贫民区某个商店买了一整套化妆品。她的嘴唇抹成了深红色，脸颊搽了胭脂，鼻子也扑了粉，甚至眼睛下面还涂了什么东西，看起来更亮了。这个妆化得不算高明，但温斯顿在这方面的要求也不高。他以前从没见过，也从没想象过女党员会在脸上涂脂抹粉。她的容貌有了惊人的提升，只是在脸上正确的部位上了一些颜色，就让她看起来不仅漂亮了许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变得更有女人味了。她的一头短发和男孩子气的工作服只是加强了这种效果。他搂着她的时候，一股人工合成的紫罗兰香味涌进了他的鼻子。他记起了昏暗的地下室厨房，还有女人黑洞洞的嘴。那女人用的是同样的香水，但此时这已经不重要了。

“还涂了香水啊！”他说。

“是啊，亲爱的，还涂了香水。你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吗？我要去弄条真正的女式连衣裙穿，再不穿这破裤子了。我还要穿丝袜和高跟鞋！在这间房里，我要做一个女人，而不是党员同志。”

他们扯掉身上的衣服，爬上了红木大床。这是他第一次在她面前脱光。直到现在，他还是对自己苍白瘦弱的身体，小腿上突出的静脉曲张，以及脚踝上变了颜色的伤疤感到自惭形秽。床上没有床单，但他们身下的毯子已经被磨得十分光滑。两人都没想到这张床竟然这么大，弹性还那么好。“床上肯定到处都是臭虫，不过管他呢。”除了在群众的家里，现在人们已经看不到双人床了。这种床温斯顿小时候偶尔睡过，在茱莉亚的印象中，她一次都没睡过。

很快他们就睡着了。温斯顿醒来的时候，时钟的指针已经悄悄地移到快9点的位置了。他并没有动，因为茱莉亚还在他的臂弯中睡得正香。脸上大部分的妆都蹭掉了，不是蹭到了他的脸上，就是蹭到了长靠枕上。但是一抹淡淡的胭脂依然凸显出她美丽的脸颊。夕阳黄色的余晖穿过床脚，照亮了壁炉。锅里的水滚滚沸腾着。下面院子里，那个女人已经停止歌唱，不过街上孩子的叫嚷声仍依稀飘进了房间。他隐隐约约地想，在这么一个凉爽的夏夜，一男一女赤身躺在床上，想做爱就做

爱，想聊什么就聊什么，没有觉得非起床不可，就这么躺着，听着外面平和的声音，这种事情在那业已被摧毁的过去，是否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肯定不会有什么时候，这种事会是平常的吧？茱莉亚醒了，揉了揉眼睛，用胳膊撑起身子，看着煤油炉。

“水都烧干一半了，”她说，“我起床，过会煮些咖啡，我们还有一个钟头时间。你家什么时候熄灯？”

“23点30分。”

“我宿舍23点熄灯。不过得提前回去，因为……嘿！滚开！你这脏东西！”

她突然扭过身探出床沿，抓起地板上一只鞋子，像男孩子一样猛地抡起胳膊把鞋朝屋角扔去，这动作和那天早晨两分钟仇恨节目的时候，她朝古登斯坦扔字典如出一辙。

“是什么？”他吃惊地问。

“老鼠。我看到它从护壁板下面伸出鼻子，那边下面有个洞。不管怎样，我狠狠地吓了它一下。”

“老鼠！”温斯顿喃喃地说，“在房间里啊！”

“到处都有，”茱莉亚躺下身子，满不在乎地说，“我们还在宿舍厨房抓到过呢。在伦敦的一些区域，老鼠已经泛滥成灾了。你知道它们有时候还会袭击小孩子吗？会的，它们真的会。有几条街上，女人们都不敢离开婴儿两分钟时间，都是那些个头巨大、毛是褐色的老鼠干的。恶心的是这些家伙会……”

“别说了！”温斯顿紧紧闭着双眼着说。

“亲爱的！你脸色都发白了，怎么了？被它们恶心到了？”

“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老鼠！”

她紧紧地抱住他，四肢缠绕在他身上，像是在用自己的体温抚慰他一样。他没有立即睁开眼睛。有那么一会儿，他觉得自己回到了那个在他一生中反复出现的噩梦中，梦境总是一模一样。他站在一堵黑暗之墙

跟前，墙的另一端是某种无法忍受、可怕得让人不敢面对的东西。在梦里，他最深刻的感受是一种掩耳盗铃般的自欺，因为他其实知道黑暗之墙背后到底是什么。只要奋力一试，像把自己的大脑扯一块下来那样，他甚至就能把那东西拉到明处了，不过他总在还没有发现那东西是什么之前就醒来。不过那个东西不知怎的，和他打断茱莉亚的话时她正说着的东西有关。

“真不好意思，”他说，“没事了，我不喜欢老鼠，仅此而已。”

“别担心，亲爱的，这边不会再有那些脏东西了。我们走之前，我会用布把那个洞堵起来。下次来的时候，我带些灰泥，把它好好砌上。”

刚才那惊惶的黑色时刻大半已抛之脑后。温斯顿靠着床头坐起来，觉得有点难为情。茱莉亚下床穿好工作服，去煮咖啡。锅里冒出的香味是如此浓烈且让人振奋，他俩不得不把窗关上，以免外面有人闻到后心生好奇。比咖啡味道更好的是加了糖以后那丝滑的口感。吃了多年糖精后，温斯顿几乎把这种口感淡忘了。茱莉亚一手插口袋，一手拿着一片涂了果酱的面包，在屋里走来走去。她漫不经心地瞥了眼书架，指出修理折叠桌的最佳办法。她一屁股坐到破旧的扶手椅上，感受一下舒不舒服。她以一种带着宽容的娱乐精神仔细端详那个滑稽的十二小时制座钟。她把玻璃镇纸拿到床边，在光线比较好的地方仔细端详。他从她手里拿过镇纸，这块玻璃雨水般温润的质感每次都让他心醉神迷。

“你觉得这是什么东西？”茱莉亚说。

“我觉得它什么都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觉得这东西没派过什么用场，我就喜欢这一点。这是一段他们忘了篡改的历史。如果有人懂得如何解读的话，这还是一则来自一百年以前的消息。”

“挂在那边的画，”她朝着对面墙上的版画扬了扬下巴，“会不会有一百年？”

“不止。我敢说，得有二百年了。不过谁都说不准，现在没人能弄清楚东西的年代。”

她走过去看画，“那东西就是从这里探出鼻子的，”说着踢了踢画正下方的护壁板，“这是什么地方？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这是座教堂，或者说至少曾经是座教堂。名字叫圣克莱蒙教堂。”查林顿先生教他的那几句歌谣片段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带着些许怀旧吟了出来，“圣克莱蒙的钟声唱着：橙子和柠檬。”

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她居然接了下去：

圣马丁的钟声说着：你欠我三法新，

老贝利的钟声喊着：你什么时候还我？……

“我不记得接下来的词了。但不管怎样，我记得最后一句是‘点起蜡烛让你去睡觉，抡起斧子把你头砍掉。’”

这就像是接头暗号的两部分，不过，在“老贝利的钟声喊着”后面，肯定还有一句，如果给予适当的提示，也许能从查林顿先生的记忆中挖掘出来。

“谁教你的？”他说。

“我爷爷。我小时候他曾经念给我听过。我八岁那年他人间蒸发了，反正就是不见了。我想知道，柠檬是什么，”她扯开话题，说道“我见过橙子，那是一种圆圆的黄色水果，皮很厚。”

“我记得柠檬，”温斯顿说，“50年代的时候很常见，味道特别酸，闻一闻都会让牙齿发软。”

“我敢打赌这幅画后面有臭虫，”茱莉亚说，“哪天我把它卸下来好好洗洗。我觉得我们该走了，我得马上把脸上的妆洗掉，真烦人！过会我再把你脸上的口红印擦掉。”

温斯顿又躺了几分钟。房间里暗了下来，他转身对着光，盯着那块玻璃镇纸，它让人百看不厌的地方并不是里面的珊瑚，而是玻璃内部的空间，有深度，但又如同空气般透明。玻璃表面就好像是苍穹，笼罩着下面那个小小的世界，连大气层都一应俱全。他感觉自己能够进入那个世界，事实上，他已经身处其中，与他一起的，还有红木床、折叠桌、座钟、钢板雕刻版画，以及镇纸本身。镇纸即是他身处的这个房间，珊瑚是茱莉亚和他自己的生命，镶在晶体的中心，成为某种永恒。

第五章

塞姆消失了。一天早晨，他没来上班。几个缺心眼的人还议论他旷工。到了第二天，就再没人提起他了。第三天温斯顿走到档案司的门厅看布告板，有一个布告上印着象棋委员会的名单，塞姆曾经是其中之一。这份名单看上去和之前的几乎一模一样，并没有划去任何人的名字，但却少了一个人名。这就足够了，塞姆已经不存在了，他从未存在过。

天气酷热难当。在迷宫般的部里，没有窗户，开着空调的房间保持着常温，但是在外面，人行道被晒得烫脚，高峰时段的地铁里臭气熏天。仇恨周的准备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各司的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加点。游行、会议、阅兵、演讲、蜡像展览、电影展、电屏节目都得组织安排起来。此外还得搭摊位、制作模拟人像、撰写口号、谱写歌曲、传播谣言、伪造照片。小说司里茱莉亚那个部门已经停止生产小说，转而赶制一批揭露敌人暴行的小册子。温斯顿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每天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检查过去的《泰晤士报》档案，修改、润色将要在演讲中被引用的内容。一群群吵嚷的群众深更半夜在街上闲逛，整个城市呈现出异样的火热气氛。火箭弹的袭击比以往更为频繁了。有时在远处会传来巨大的爆炸声，谁都无法解释，而与之相关的谣言却此起彼伏。

一首即将作为仇恨周主题曲的新歌（歌名为《仇恨之歌》）已经谱写完成，正在电屏上没完没了地播放。这首歌节奏野蛮、像吠叫一般，根本称不上是音乐，倒和鼓声有几分相像。歌曲配合着行军的步伐，由几百个人一齐吼唱，令人不寒而栗。群众已经爱上了这歌，在深夜的街上，这首歌和另一首仍然还在流行的《只是场无望的爱恋》此起彼伏。帕森斯家的孩子没日没夜地用卫生纸包着梳子吹这首歌，令人不胜其烦。温斯顿晚上的工作从未排得像现在这么满过。帕森斯组织的志愿者小队正在为这条街的仇恨周活动作准备。他们缝制横幅、绘制海报、在楼顶上竖旗杆，还冒险从街道上方两端拉起铁丝，用来挂三角旗。帕森斯吹嘘单单胜利大厦一栋楼就会挂出长达四百米的彩旗。在这类活动中，他如鱼得水，兴高采烈。天气炎热加上体力劳动让他有借口连晚上都穿着短裤和开襟衬衫。不管哪里，一有需要他就会马上过去，推拉锯敲、就地取材、用同志间劝告的口吻为每个人打气，同时，身上每一处

皮肉相叠的皱褶里，都源源不断地散发出刺鼻的汗臭。

同样一幅新海报突然贴满了伦敦全城。上面没有说明文字，只有一个野蛮的欧亚国士兵形象，有三四米高，一张蒙古人种的脸，面无表情，脚上穿着巨大的靴子，正大步前行，冲锋枪从腰的一旁伸出来。不论你从哪个角度看，用透视法放大的冲锋枪枪口都直直对着你。海报贴满了每面墙的每块空白处，数量甚至超过了老大哥的画像。平常对战争漠不关心的群众也受到鼓动，激起了一阵间歇性的爱国主义狂热。像要配合大众的情绪一般，被火箭弹炸死的人数也比平常的要多。一枚火箭弹落在了斯特普内区的一家拥挤的电影院里，将几百个受害者埋在了废墟中。附近的所有居民都出门，参加一场拖得很久的葬礼，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演变成一场泄愤大会。另一枚弹落在了一块用作游乐场的荒地上，几十个孩子被炸得粉身碎骨。后来爆发了愤怒的游行，古登斯坦的画像被焚毁，几百张欧亚国士兵的海报被撕下扔到了火堆中，混乱中许多家店铺遭到了洗劫。接着，四处传播着一条谣言，说有间谍用无线电波为火箭弹定位。一对老夫妇被怀疑有外国血统，他们的房子因此被烧毁，两人都因为大火而窒息身亡。

查林顿先生店铺楼上的房间里，每次只要他俩能去，就会并排躺在打开的窗下那张没有被褥的床上，为了图凉快，两人会脱个精光。老鼠再没有出现，但是臭虫却在炎热中以惊人的速度繁殖。这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无论肮脏还是干净，这间房间就是天堂。他俩一到这里，就用在黑市上买来的黑胡椒到处撒，接着扯掉衣服，满身是汗地云雨一番，然后沉沉入睡。醒来后发现臭虫已经重整旗鼓，准备发动反攻。

六月间，他们幽会了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温斯顿戒掉了一天到晚喝金酒的习惯，他似乎不再有那种需要了。他胖了，静脉曲张溃疡也好了，只在脚踝上方留下了一块褐色的疤痕。清晨的急促的咳嗽也停了。生活不再让他觉得无法忍受，他也不再有对着电屏做鬼脸或是高声骂脏话的冲动了。现在他们拥有了一个安全的藏身处，几乎像个家一样。即便只能偶尔见面，并且每次只有几个小时，似乎也不觉得苦。重要的是，旧货店楼上这间房间必须存在。知道它在那里安然无恙就相当于身处其中。这个房间自成一个世界，是一块袖珍的过去，现已灭绝的动物可以在那里徜徉。温斯顿想，查林顿先生也是另一种现已灭绝的动物。他经常在上楼前驻足和查林顿先生聊上几句。这个老人似乎不怎么出门，或者从来不出门。另一方面，这个店铺也几乎没人光顾。他像个魂灵一样出没于这间又黑又小的店铺和更小的后厨之间。他在后厨做

饭，厨房里除了其他东西，还有一台老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留声机，上面有一个巨大的喇叭。他似乎很乐意与人聊天。他鼻子尖尖的，戴着厚眼睛，穿着丝绒西装，驼着背在那些一文不值的存货间踱来踱去，神情隐约像个收藏家而不是商人。他会带着一丝热情在一堆垃圾里摸摸这，摸摸那——瓷瓶塞、破鼻烟盒的彩绘盖子、装着一绺某个早已夭亡的婴儿头发的黄铜吊坠……也从不问温斯顿要不要买，只是让温斯顿好好欣赏。与他聊天就好像听一个破旧的八音盒叮咚作响，他从记忆深处又挖出了几句歌谣片段，其中一首讲二十四只黑八哥，另一首讲弯角奶牛，还有一首讲可怜的知更鸟先生之死。每次想起一段新歌谣的时候，他总会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我觉得你应该会对这段感兴趣。"但是每首歌谣，他都只能记起三两句。

温斯顿和茱莉亚都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念头从来没有从他们脑中消失过——眼前的一切不可能长久。有时，死亡正在逼近这一事实就像他们身下的床一样真切，他们会带着绝望纵欲，紧紧相拥，就像遭受审判，即将堕入地狱的灵魂，在钟声敲响前五分钟，纵情享受最后的欢愉。但有时候，他们不仅会幻想两人是安全的，而且可以天长地久。两人都觉得，只要真的待在这个房间里，就不会受到伤害。虽然来这里的路上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但是这个房间本身就是避难所。温斯顿盯着镇纸中心看的时候，总觉得能够进入那个玻璃的世界，一旦进去，时间就会凝固。他们常常让自己沉溺在逃避现实的白日梦中，觉得好运会一直持续下去，觉得下半辈子都能像现在一样偷偷摸摸地混在一起。要么凯瑟琳会死掉，这样两人精心安排一下就能结婚。要么两人可以一同自杀。要么结伴出逃，隐姓埋名，学着群众的口音说话，在工厂找份工作，在某条小街上过着隐居的生活。不过，两人都知道，这些都是痴心妄想。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根本无处可逃。哪怕唯一可行的方案——自杀——他们也无意为之。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得过且过，虽然毫无未来可言，却苟延残喘，这似乎是人类不可遏制的本能，就好像只要有空气，人的肺就会不由自主地呼吸一样。

有时，他们也会谈论采取实际的反党行动，但是总想不出如何踏出第一步。就算传说中的兄弟会真实存在，如何加入依然是个难题。他告诉她，自己和奥伯里恩之间存在着，或者说似乎存在着一种奇怪的亲切感，还有他有时候会有一个冲动，想径直走到奥伯里恩跟前，宣布自己是党的敌人并寻求他的帮助。很奇怪的是，她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鲁莽至极的举动，她习惯于以貌取人，所以温斯顿因为一个眼神而认为奥伯里恩值得信赖，对她来说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此外，她想当然地认为每一

个人，或者说几乎每一个人私下里都恨党，一旦觉得安全，就会违反规定。但她不相信存在，或可能存在分布广泛并且有组织的反动派。她说，有关古登斯坦和其地下军队的传言只是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编造出来的，你不得不假装相信。在无数次党的集会以及自发的游行中，她扯着嗓子高喊，要求处死那些她既没有听说过名字，也根本不相信犯下了被控罪行的人。举行公审时，她会和其他青年团的成员一起，围着法庭，从早到晚，每隔一段时间就喊一句“处死叛徒！”两分钟仇恨节目进行时，在辱骂古登斯坦的时候，她总是骂得比别人更大声。不过，她对古登斯坦本人，和他所宣扬的主义却知之甚少。她是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年纪太小，不知道五六十年代发生的意识形态斗争。她无法想象会有独立的政治运动这类事，她觉得党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战胜的。党永远存在，而且经久不变。你反抗党的方式只有暗中不服从，或者最多实施一些孤立的暴力行为，例如杀掉某个人或炸掉某个东西。

在某些方面，她比温斯顿敏锐得多，党的宣传对她的影响也小得多。有一次，他碰巧提到与欧亚国的战争，她漫不经心地说在她看来根本没在打仗，这让温斯顿大吃一惊。她说每天掉在伦敦的火箭弹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发射的，用来“吓唬老百姓而已”。这种看法是他从未想到过的。她还说在两分钟仇恨期间，她总要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这一点让他觉得多少有些羡慕。但她只有当党的教义触及她自己生活的时候，才会对其产生质疑。通常，她会坦然接受官方的胡说八道，仅仅因为在她看来，对和错之间的区别似乎并不重要。例如，她在学校里学到过飞机是由党发明的，她相信这个说法。（温斯顿记得，在他读书的时候，也就是50年代末，党只声称发明了直升机。刚过了十几年，茱莉亚读书的时候，便已经声称发明了飞机。到了下一代，就要宣称蒸汽机都是党发明的了。）而当他告诉她在他出生以前，在距离革命爆发很久以前，飞机就已经存在了，但她对这个事实完全不感兴趣。说到底，飞机是谁发明的又有什么关系呢？从两人偶尔的谈话中，他发现她不记得四年前大洋国正和东亚国开战，而和欧亚国处于和平状态，这一点令他更为吃惊。没错，她认为整场战争都是假的，但很显然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敌人的名字已经变了。“我以为我们一直在和欧亚国打仗。”她含糊地说。这使他感到有点吃惊。诚然，飞机是在她出生前很久发明的，但是战争对象的改变仅仅在四年前，她那时候早已成年。他和她针对这个话题争论了将近一刻钟。最后，他总算成功使她的记忆复苏，让她多少记起有那么一段时间，敌人是东亚国而非欧亚国。但她依然觉得这件事不重要。“谁在乎呢？”她不耐烦地说，“狗屁战争一个接着一个，反正所有的新闻都是假的。”

有时候他会和她谈起档案司以及他在那里从事的无耻的伪造工作。这些事显然没有吓着她，想到谎言变为真实，她并没有觉得脚下出现了万丈深渊。他跟她讲起了琼斯、阿伦森、卢瑟福的故事，还有那张他曾经夹在指间的、重要的报纸。这件事也没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事实上，一开始她甚至都没领会他讲这个故事的目的。

“他们是你的朋友？”她问。

“不，我和他们素不相识，他们是核心党员。而且，他们年龄比我大好多。他们是革命之前那个年代的人。我好不容易才认出了他们。”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每时每刻都有人被杀，不是吗？”

他试着让她理解，“这是个特例，不仅是某个人被杀的问题。你有没有意识到，从昨天开始，过去已经被摧毁了？如果过去还存在，那就在少量没有文字说明的实物上，比如说那块玻璃。我们已经对革命和革命之前的情况一无所知了。每一条记录要么被摧毁，要么被篡改；每一本书都被重写；每一张照片都被重印；每一座雕像、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建筑都被更名；每一个日期都被改动。而且这个过程每天、每分钟都在进行。历史已经停止了。除了党永远正确的无尽的当下之外，一切都不复存在。当然，我知道过去是被篡改了，但我无从证明，尽管我自己就在从事篡改工作。事情做完以后，任何证据都不会被留下。唯一的证据就在我心里，但我完全没有把握是否有人和我有着同样的记忆。我一辈子只有在那件事发生之后——好多年之后，才掌握了实实在在的证据。”

“那又有什么用？”

“没有用，因为几分钟后我就把它扔了。但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我会把证据保存下来。”

“好吧，我不会！”茱莉亚说，“我很愿意冒险，但只为值得的事，不会为了一片旧报纸。就算你把它保存下来了，你又能做什么呢？”

“也许也做不了什么事，但它是个证据。假如我把它拿给别人看的话，也许就能在各处撒下怀疑的种子。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是改变不了什么了，但我能想象各地会萌发小规模的反抗团体——一小群人聚集到一起，逐渐壮大，甚至还会留下一些记录。从而，后世的人们就能将他们

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

“我对下一代不感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感兴趣。”

“你就只知道用下半身造反。”他说。

她觉得这句话特别风趣，高兴得扑到他的怀里。

她对党的理论分支完全不感兴趣。只要他开始谈起英社原则、双重思想、过去的可变性、否认客观现实、使用新话词汇，她就觉得不胜其烦、困惑无比，并说自己从来没有关注过这类事情。既然知道这些都是垃圾，那为什么还要去费心思呢？知道什么时候该欢呼，什么时候该喝倒彩，那就够了。如果他坚持要说这些话题，她就会习惯性地睡着，让他难堪。她是那种随时随地都能睡着的人。他发觉，和她说话时，在不知道正统为何意的情况下摆出一副思想正统的样子是多么的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世界观最容易灌输到那些无法理解它的人身上。能使他们接受再明显不过的违反现实的事情，因为这些人从未完全弄明白自己为此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而且他们对公共事件漠不关心，也没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也正因为缺乏理解力，所以他们保持了清醒。他们不管什么都一口吞下，而他们吞下的东西伤害不到他们，因为这些东西在他们体内穿肠而过，就像一粒玉米未经消化就穿过鸟儿的身体一样。

第六章

那件事终于发生了。期望中的消息终于传来。他的一生仿佛都在等待这一刻。

在部里长长的走廊上，他走着。快走到茱莉亚之前把纸条偷偷塞到他手里的位置时，才发觉后面有个大高个子正跟着自己。只听到那个人轻咳一声，显然是想说话。温斯顿突然停下转身。是奥伯里恩。

他们终于面对面了，而温斯顿唯一的冲动似乎就是逃走。他的心猛烈地跳动，甚至说不出话来。可奥伯里恩继续按照之前的步调往前走，一只手友好地在温斯顿的胳膊上搭了一会儿，于是他们便并肩而行。那个人用相当有礼貌的语气说话，这是他与核心党大部分成员的不同之处。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和你谈谈，”他说，“我有一次在《泰晤士报》上读了一篇你用新话写的文章。我觉得你对新话有学术上的兴趣，是吧？”

温斯顿稍稍定了定神，“很难说是学术上的，”他回答，“我只是个新手，那不是我的专长，我之前没做过什么跟语言实际结构有关的事。”

“但你倒写得一手好文章，”奥伯里恩说，“不只我一个人这么看。前不久，我刚和你的一个朋友说过，他可是个专家。不过一时之间，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温斯顿的心再次刺痛起来。显然，话中所指是塞姆。但塞姆不仅已不在人世，而且已被消灭，只算非人了。只要提到他就有生命危险。奥伯里恩的话明显是个信号，是暗语——通过犯思想罪的小行动，把两个人变成了同盟。他们继续在走廊上慢慢走着，这时，奥伯里恩停下来，他扶了扶眼镜，成功地用这个动作表达奇怪的亲切感。接着，他继续说：“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在你的文章中，我注意到两个已经过时的词，不过也是最近才过时的。你见过第十版《新话字典》了吗？”

“没有，”温斯顿回答，“我想应该还没出版。我们档案司还在用第九版。”

“我觉得第十版过几个月就会出版了。不过已经有了几本样书，我也有一本，你应该有兴趣想看看吧？”

“我很想看看。”温斯顿立刻就领会了话锋所指。

“有些修订还非常巧妙，动词词条删减了一些，我觉得这一点应该会吸引你。我想想，我是不是应该派个人把字典给你送过去？不过我总是忘记这种事，你方便的时候，能不能来我的公寓一趟？等一下，我给你地址。”

他们站在电屏前，看似心不在焉的奥伯里恩摸了摸两个口袋，拿出一个小的皮面本和一支金的彩色铅笔。他立刻就开始写，就在电屏下，电屏另一边的人完全能看清他写的内容。奥伯里恩写好地址，把纸页撕下来，递给温斯顿。

“我一般晚上在家，”他说，“如果我没在家，仆人就会把字典拿给你。”

奥伯里恩走了，留下拿着纸条的温斯顿，这一次，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无论如何，温斯顿小心地记下了上面的内容，几个小时后把那张纸条和其他文件一起丢进了记忆洞中。

他们那会儿最多只说了几分钟话，那番话的铺垫只有一个意义——让温斯顿知道奥伯里恩的地址。这很有必要，因为除非直接询问，否则根本不可能知道别人住的地方。根本没有任何形式的通讯录。“如果你想见我，就到这里来找我。”这就是奥伯里恩告诉温斯顿的事。也许，字典里暗藏着某种信息。但无论如何，有件事是确定的，温斯顿梦想中的阴谋的确存在，而他自己竟也已经接触到了外围。

温斯顿知道自己迟早会遵从奥伯里恩的召唤。也许在明天，也许在很久之后，他自己也不确定。刚发生的事不过是多年前就已开始的某个进程的结果。第一步就是秘密而自发的思考。第二步是开始记日记。温斯顿从思想过渡到了语言，现在就把语言变成了行动。最后一步将发生在仁爱部里。他早已接受了结局，结局已蕴含在开始之中。但结局让人害怕，或者更确切地说，结局是死亡的预告，就像少了一些生命力。哪

怕他正在和奥伯里恩说话，一旦这些话的意义浮现在脑海，温斯顿就会脊背发凉。他觉得像走进了湿冷的墓穴，虽然他早就知道墓穴已在那里等着它，可还是会不寒而栗。

第七章

温斯顿醒了，满眼泪水。茱莉亚困倦地翻了个身，背对着他，模糊地说了点什么，好像是“怎么了？”之类的。

“我梦见……”温斯顿开口了，却不知从何说起。梦中的场景太过复杂，难以言喻。除了那个梦，与梦境相关的回忆也在醒来后几秒钟内涌进温斯顿的脑海。

他躺下来，闭上眼，沉浸在梦中无法自拔。刚才的梦场面宏大，刺眼夺目，仿佛夏日雨后的夜晚，他的一生都如画卷一般在眼前铺开。梦中的一切都发生在玻璃镇纸中，但玻璃的表面是天空的穹顶，穹顶之下，一切都带着清晰柔和的光芒，无穷无尽。那场梦也可以通过他母亲的一个动作来理解。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说，梦就包含在那个动作之中。三十年后，温斯顿在一部新闻电影中看到一个犹太女人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试图在子弹中保护自己的小儿子，而后来直升机把他们都炸成了碎片。

“你知道吗，”他说，“直到此刻，我依旧觉得是我杀了我母亲。”

“你为什么杀她？”昏昏欲睡的茱莉亚说。

“我没有谋杀她。不是直接杀死她的那种。”

梦中，温斯顿记起了自己最后看到母亲的一瞬间。梦醒一会儿后，所有细枝末节全部涌来。那肯定是他多年来刻意忘掉的记忆。他不确定日期，但觉得事情发生时，自己应该已经超过十岁，甚至超过了十二岁。

他的父亲在那之前就消失了，他不记得那是多久之前的事，只知道当时那种动荡不安、人心惶惶的氛围——空袭不时发生，人们总要躲到地铁站里，四处都是残垣断壁，街角张贴着难以理解的标语，帮派年轻人穿着同样颜色的衬衫，面包店外总是挤满了人，机关枪的声音一直从远处传来……最严重的是，吃的永远不够。他记得，漫长的下午，他总会和其他男孩一起在垃圾箱或垃圾堆附近费力寻找，捡菜叶子、土豆

皮，有时候甚至能找到不新鲜的面包皮，找到后，他们就会小心翼翼地把上面的炉渣弄掉。此外，他们还会等着沿固定路线行驶的卡车经过，那些卡车装着牛饲料，行驶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有时会颠出一点儿油饼来。

父亲消失之后，他母亲没有惊讶，也没有伤心欲绝，只是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完全没了生气。甚至连温斯顿都能明显地感觉到母亲在等着她知道必然会发生的事发生。母亲仍会做所有该做的事——做饭、洗衣、缝补、铺床、擦地、扫灰——只是动作很慢，一幅例行公事的样子，仿佛是会自己移动的艺术家模型。母亲很胖，但体态不错，她似乎很自然地陷入了静止的状态。有时，她几个小时都会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给温斯顿的小妹妹喂奶。他的小妹妹只有两三岁，体弱多病，非常安静，瘦骨嶙峋的，像只小猴子。偶尔，母亲也会把温斯顿抱在怀中很久，一言不发。尽管温斯顿年幼无知，但他也很清楚，这和从未提到的那件将要发生的事有关。

温斯顿记得一家人住的地方，黑暗逼仄，阴凉潮湿。套着白色床罩的床占了房间的一半，此外，还有一台煤气灶和一个食物柜。外面的楼梯处还有一个棕色的陶土洗手台，是几户人家共用的。他记得母亲雕像般的身躯弯在灶台前，搅拌着炖锅里的东西。除此之外，他记得饥饿缠身的滋味，也记得吃饭时的斗争。温斯顿会一直纠缠母亲，反复地问为什么吃的总不够；他也会朝母亲大喊（他甚至记得自己的语调，当时他已经提前出现了变声的迹象，低沉的声音有时很奇怪）；他还会发出苦恼的声音，博得同情，好得到更多的食物。温斯顿的母亲通常会多给他一些，因为她认为“男孩”理应得到最多的一份。然而，无论母亲给温斯顿多少，他都嫌不够。每次吃饭时，母亲都会恳求温斯顿不要自私，要记得还有个生病的妹妹，也需要食物，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如果母亲不肯多给他一些，温斯顿就会愤怒地大喊，把锅和勺子从母亲那里夺过来，或者把妹妹盘子里的饭抢过来。温斯顿知道自己这样会让母亲和妹妹挨饿，可他控制不了自己，他甚至觉得自己有权这样做，饥肠辘辘就是他的理由。两餐之间，如果母亲一时没看到，温斯顿还经常会从食物柜里偷拿一点东西吃。

一天，巧克力的定量供应到了。过去几周，甚至几个月都没发放过巧克力了。温斯顿对那一小片珍贵的巧克力记忆颇深。巧克力有两盎司（当时，人们还用盎司这个单位），要分给三个人。显然，巧克力应该被平均分成三块。可突然之间，像受人指使一般，温斯顿听到自己咆哮

着的要求，要得到一整块巧克力才肯罢休。他母亲让他不要贪婪。于是，不断的争论又开始了，还伴随着大喊大叫、呜咽、泪水、规劝、讨价还价。温斯顿的小妹妹双手抱住母亲，像极了小猴子。她坐着，大大的眼睛里满是悲伤，从母亲身后看着温斯顿。最后，母亲把巧克力的四分之三给了温斯顿，把剩下的四分之一给了他妹妹。小女孩把巧克力抓在手里，呆呆地看着，仿佛不知道那是什么一般。温斯顿站着看了她一会儿，接着，他突然纵身一跃，夺走了妹妹手里的巧克力，朝屋门跑去。

“温斯顿，温斯顿！”他母亲在身后叫着，“回来！把你妹妹的巧克力还给她！”

温斯顿停下来，但没有回去。他母亲焦虑的目光盯在他脸上。即使在那个时候他还在想着那件肯定要发生的事，但他还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温斯顿的妹妹明显知道别人抢走了自己的东西，虚弱地哭了起来。他母亲双手搂住女儿，让她把头靠在自己胸口。这个姿势让温斯顿意识到，自己的妹妹就在死亡的边缘。他转过身，跑下楼梯，手里的巧克力黏糊糊的粘在手里。

温斯顿再也没见到过母亲。狼吞虎咽地吃掉巧克力之后，温斯顿觉得有点愧悔，便在街上晃悠了几个小时，直到饥饿把他带回家。回家之后，温斯顿发现母亲也不见了。当时的一切都是平常的样子，除了母亲和妹妹，家里的一切都在。她们没带走任何衣服，甚至母亲的外套都还在。直到今天，温斯顿都不确定母亲是否还活着。其实，母亲很有可能被送到了劳改营中。至于妹妹，可能也和自己一样，被送到了为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准备的集中院（人们称那里是回收中心），内战时期，这种机构层出不穷。妹妹也有可能和妈妈一起被送到了劳改营，也可能只是被丢在某处，或者已经死了。

脑海中的梦境依旧清晰，尤其是母亲搂住孩子的那种保护性姿态，仿佛充满了整个梦境。温斯顿又想到了两个月之前的一个梦。那个梦里，母亲就坐在铺着白色床罩的脏乎乎的床上，小妹妹抓着她，接着，母亲又坐到正在下沉的船中，远在温斯顿身下，每一秒钟都在下沉，可母亲的眼睛还是透过黑暗的海水仰望着他。

温斯顿给茱莉亚讲了母亲消失的事情。而茱莉亚没睁开眼睛，只是翻了个身，换了一种更舒服的姿势。

“我猜你当时是个蛮横的小怪物，”茱莉亚嘟囔着，“孩子们都是小怪物。”

“没错，但我要说的是……”

从茱莉亚的呼吸判断，她显然又要睡着了。温斯顿本想继续说自己的母亲。凭借对母亲的记忆，他觉得母亲一定不同寻常，但算不上聪明。不过母亲有自己的标准，所以带着一种高贵、纯洁的气质。她的情感只属于自己，不为外界所动。她从不认为没有实际效用的事就没有意义，她认为如果爱一个人，就好好爱他，就算已经不能再付出什么，也还能给他爱。温斯顿带着巧克力走后，母亲紧紧抱住了自己的孩子。但这没有用，并不能改变什么，既变不出更多的巧克力，也无法让孩子或自己逃脱死亡的命运。然而，那是她自然而然的动作。船上那个逃难的女人也用双臂护住年幼的儿子，可这个动作和一张纸没什么区别，都挡不住子弹的侵袭。可怕的是，党会让你相信那些不过是冲动，是感情，没有任何意义，也剥夺了你对物质世界的控制力量。一旦落入党的股掌之中，你感受到的或者你没感受到的以及你做过的或者不能做的，实际上都没什么区别。无论曾发生过什么，你终将消失，而你的言行再不会为人所知。你会被历史的洪流彻底卷走。然而在两代人之前，这种做法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不想篡改历史。他们毫无疑问地控制着自己的私人忠诚感。重要的是人际关系，而完全没用的姿势、拥抱、眼泪、话语或对将死之人说的话都有其内在价值。温斯顿突然想到，群众一直都是这样。他们不忠诚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或一种思想，却相互忠诚。有生以来第一次，温斯顿没有鄙视群众，也没把他们仅仅看作是某天将焕发生机、改变世界的潜伏力量。群众有人性，他们的内心依旧柔软，他们坚持着原始的情感，而温斯顿却需要有意识的努力才能重新获得。想到这里，温斯顿记起了一件没什么关系的事，几天前，他在人行道上看到了一只断手，就把它踢到了马路边，好像那只是颗圆白菜。

“无产者是人，”温斯顿大声说，“我们不是。”

“为什么不是？”茱莉亚又醒了，问道。

温斯顿想了一会儿。“你有没有想过，”他说，“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就是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离开这里，然后再也不见？”

“想过，亲爱的，我的确想过几次。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这样做。”

“我们一直很幸运，”温斯顿说，“但也没多长时间了。你还年轻，看上去很正常，也很天真。如果你离我这种人远一些，就可能多活五十年。”

“不，我已经想明白了。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别灰心。我会活很久的。”

“我们可能还能在一起六个月，或者一年，没人知道。最后，我们肯定要分别。你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孤立无援吗？一旦被抓，都无法为对方做任何事，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如果我认罪，他们会枪毙你。如果我拒绝认罪，他们还是一样会枪毙你。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或者不说什么，都不能让你再多活五分钟。我们两个人都不知道对方是死是活，什么办法都没有。唯一重要的是我们不会背叛对方，虽然这也没什么用。”

“如果你说的是认罪，”茱莉亚说，“我们当然该认罪，谁都没错。人们总会认罪。你也没办法，他们会折磨你。”

“我不是说认罪，认罪不是背叛。你怎么说或者怎么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感觉。如果他们让我不再爱你，那才是真正的背叛。”

茱莉亚仔细想了想。“他们做不到，”她最后说，“这是他们无法做到的事之一。他们能让你说任何事——所有事——但他们不能让你相信。他们控制不了你的思想。”

“的确，”温斯顿有了一点希望，“没错，你说得很对。他们控制不了你的思想。如果你觉得自己还像个人，就算什么都得不到，你也还是打败了他们。”

温斯顿想到了日夜监听的电屏。它们无时无刻都在监视你，但如果你还有理智，就能战胜它们。穷尽其能，它们都无法掌握一个人思想的秘密。也许，真正落到他们手里时，这一点会变。你不会知道仁爱部里发生的事，但可以猜得到——折磨、毒品、检测神经活动的精密仪器还有长久不眠、单独禁闭和从不间断的询问带来的精神崩溃。无论如何，事实总会暴露。讯问让事实有迹可循，折磨总会让你将事实说明。但如果一个人的目的不是活着，而是保持人性，最终又会带来什么不同？他们无法改变你的情感，而且就算你想，你自己也无法改变情感。无论巨细，他们能让你做过的、说过的、想过的暴露无疑。但你内心世界的运

转连自己也无法理解，它坚不可摧。

第八章

来了，终于来了！

他们站在灯光柔和的长方形房间里。电屏很暗，低声嗡嗡响着。厚厚的深蓝色地毯让人有踩在天鹅绒上的感觉。房间另一边，奥伯里恩坐在桌边，桌子上有绿色灯罩的台灯，左右两边各有一叠厚厚的文件。仆人们把茱莉亚和温斯顿领进来时，奥伯里恩都没抬眼。

温斯顿的心剧烈地跳动着，觉得自己已无法讲话，脑子里想的都是他们来了，他们终于来了。毕竟，就算他们来时走的路线不同，只在奥伯里恩的门口才碰面，但来到这里已是冲动之举，两个人一起来更是愚蠢至极。光是走进这样的地方就需要极大的勇气。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别人才能走进核心党员的住所或者走到他们的住宅区来。这里的一切——街区公寓大楼的整体氛围，所有事物的华丽和宽敞，甜美食物和优质烟草与众不同的香味，沉默以及速度快到难以置信的电梯还有穿着白上衣来来往往的仆人——都让人望而生畏。尽管温斯顿来这里的理由很充分，但仍是每走一步，都会担心穿着黑色制服的守卫会突然从街角出现，检查他的证件，命令他离开。然而，奥伯里恩的仆人没多说什么就让两个人进来了。他是个小个子，长着深色头发，脸型像块钻石，面无表情，像个中国人。仆人带他们走过的通道上铺着柔软的地毯，两侧墙壁上贴着奶白色的壁纸，护墙板则是纯白色的，一切都一尘不染。这也让人望而生畏。这是温斯顿第一次看到没有被人蹭黑的墙。

奥伯里恩手里捧着一叠纸，仿佛正在专心阅读。他粗犷的脸低垂着，鼻子的轮廓清晰可见，看上去既可怕又智慧。奥伯里恩坐了二十多秒都没有动。接着，他拉过说写器，用不常用的混合行话发布了一条通知：

“一逗号五逗号七完全批准句号建议包含的项目六加倍荒谬濒临犯罪思想取消句号取消建设直到及其费用估计完成句号通知结束。”

奥伯里恩慢吞吞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踏在无声的地毯上，朝他们走来。说完刚刚的新话，他的官员气场少了一些，但表情却比平常更严肃，似乎不喜欢被人打扰。突然，温斯顿的恐惧被一种常见的尴尬取代

了。在他看来，自己很可能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自己有什么切实证据证明奥伯里恩是个政治阴谋家？除了眼神和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别无其他。此外，只有他自己的私下里的想象，而且完全是构建在梦中的。他甚至不能说自己是来借字典的，否则茱莉亚的出现就无法解释。走到电屏附近时，奥伯里恩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停下来，转过身，按了一下墙上的开关。只听清脆的“啪”的一声，电屏里的声音就中断了。

茱莉亚惊讶地轻轻喊了一声。而陷于恐慌中的温斯顿也忍不住开口了。

“你竟然能关掉它！”

“没错，”奥伯里恩回答，“我们能关掉，我们有这个特权。”

现在，奥伯里恩就站在他们面前。奥伯里恩魁梧的身材笼罩着他们，脸上的表情依旧难以捉摸。他有点严肃地等着温斯顿说话，可要说什么？即使这一刻，奥伯里恩看起来也像一个恼火的大忙人，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打扰。没人出声。关掉电屏后，屋里死一般的寂静。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压力也逐渐增大。温斯顿尽力盯着奥伯里恩的眼睛。接着，眼前严肃的脸突然露出半笑不笑的模样。奥伯里恩又做出了标志性动作，扶了扶眼镜。

“是我来开口还是你来？”他问。

“我来吧，”温斯顿马上说，“那个东西真关了吗？”

“没错，一切都关掉了。只有我们。”

“我们来这里，是因为……”

温斯顿停下来，第一次发现自己动机不明。由于他不知道自己想从奥伯里恩身上得到什么帮助，因此他说不清自己的目的。温斯顿继续说着，意识到自己的话听上去一定是软弱空洞：“我们认为有某种密谋存在，有某个秘密组织正进行着反对核心党的活动，而你也参与其中。我们也想加入，为其工作。我们是核心党的敌人，我们不认同英社原则。我们是思想犯，我们也是通奸犯。我说这些是因为我们想臣服于您。如果您想让我们用其他方式犯罪，我要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温斯顿停下来，目光从肩膀扫过去，感觉门开了。没错，黄色皮肤的小个子仆人没敲门就走了进来。温斯顿看到他托着盘子，盘子上有一个醒酒器和几只玻璃杯。

“马丁也是我们的人，”奥伯里恩不动声色地说，“马丁，把酒端到这里来，放在圆桌上。椅子够吗？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你自己也搬把椅子，马丁。这是正事，接下来的十分钟你不是仆人。”

那个小个子坐下来，非常放松，然而仍有一种仆人的样子，不过是享受特权的仆人。温斯顿用余光瞄着他，意识到这个人穷其一生都在扮演某种角色，而哪怕放弃这个假身份几分钟都是危险的。奥伯里恩拿起醒酒器，往杯子里倒满深红色的液体。这让温斯顿隐约记起自己之前在墙上或广告牌上看到的东西——电灯组成的大瓶子上下移动，把瓶子里的东西倒进杯子。广告中，杯子里的东西几乎都是黑色的，但在醒酒器里，却是如红宝石一样的颜色，闻起来又酸又甜。温斯顿看到茱莉亚拿起酒杯，闻了一下，满是好奇。

“这是葡萄酒，”奥伯里恩微笑着说，“你肯定在书上读到过。我想外围党很少有人见过。”他的表情又严肃起来，他举起酒杯，“我想应该先祝大家身体健康。向我们的领袖伊曼努尔·古登斯坦致敬。”

温斯顿带着渴望举起酒杯。他曾经读到过葡萄酒，很想尝尝。如同玻璃镇纸和查林顿先生模糊的歌谣，葡萄酒属于业已消逝的浪漫过去。温斯顿私下里喜欢称之为旧时光。不知为何，温斯顿一直认为葡萄酒非常甜，像黑莓酱的味道，喝一口就会醉。但当温斯顿一饮而尽时，却对葡萄酒失望极了。事实上，喝了这么多年金酒的他，实在喝不惯葡萄酒。于是，温斯顿放下了空酒杯。

“这么说，确实有古登斯坦这个人？”温斯顿问。

“没错，有这个人，而且他还活着。至于他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密谋，或者组织？是真的吗？不会是思想警察捏造的吧？”

“不是，密谋是真的，我们叫它兄弟会。你只会知道兄弟会的确存在，而你是其中一员，别的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一会儿再说这个。”奥伯里恩看了看手表，“核心党的人把电屏关上半小时也不是好

事。你们不该一起来，而且走的时候也不能一起走。你，同志……”他朝茱莉亚点点头，“你先走。我们还有二十分钟。你们应该明白，我得先问你们几个问题。总的来说，你们想做什么？”

“做我们能做到的事。”温斯顿回答。

奥伯里恩稍稍侧身，直面温斯顿。他几乎完全忽视了茱莉亚，想当然地认为温斯顿说的也能代表茱莉亚。有一会儿，奥伯里恩一直低垂着眼睛。后来，他开始用一种毫无感情的低沉语气问问题，仿佛是例行公事，是教义问答，大多数问题的答案他已了然于胸。

“你们愿意付出生命吗？”

“愿意。”

“你们愿意杀人吗？”

“愿意。”

“你们愿意从事也许会杀死数百位无辜群众的破坏活动吗？”

“愿意。”

“你们愿意向外国力量出卖祖国吗？”

“愿意。”

“你们愿意欺骗、作假、威胁、腐蚀儿童心灵、贩卖毒品、鼓励娼妓、传播花柳病，愿意做任何能带来堕落沉沦、削弱核心党的事吗？”

“愿意。”

“假设，如果把硫酸泼到孩子脸上能为我们的事业做贡献，你们也愿意这样做吗？”

“愿意。”

“你们愿意放弃自己的身份，当一辈子侍者或者码头工人吗？”

“愿意。”

“假设我们命令你们自杀，你们也愿意吗？”

“愿意。”

“你们，你们愿意分别，永不再见吗？”

“不！”茱莉亚插话道。

显然，温斯顿过了很久才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会儿，他似乎无法开口，嘴里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只能做出一个单词第一个音节的口型，可却说不准确，反复几次后，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了。“不。”温斯顿终于说出了口。

“你这样告诉我最好，”奥伯里恩说，“我们得知道所有的事。”

奥伯里恩面向茱莉亚，语气稍稍缓和了一些。

“即使他没有死，也可能变成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你明白吗？我们得给他一个新的身份。他的脸、动作、手的形状、头发的颜色，甚至他的声音都会不同。你自己也可能变得完全不同。我们的外科医生可以把人变得面目全非。有时这是必要的，有时我们甚至会给人截肢。”

温斯顿忍不住瞄了一眼马丁蒙古人似的脸，没看到什么疤痕。茱莉亚面色苍白，雀斑也更明显了，可她还是勇敢地看着奥伯里恩。茱莉亚咕哝了一句话，仿佛是同意的意思。

“很好。这就算说定了。”

桌子上的银色盒子里有香烟，奥伯里恩心不在焉地推给他们，自己也拿了一支。接着，他站起来，来回踱步，仿佛站着能让他更好地思考。那是优质香烟，烟草紧实，包装也不错，烟纸也异常光滑。奥伯里恩又看了看手表。

“马丁，你最好还是回厨房吧。”奥伯里恩说，“我再有15分钟就会打开电屏。走之前好好看看这两位同志。你之后还会看到他们，我就不一定了。”

就像刚刚在大门口那样，那个小个子的黑眼睛扫过他们的脸，他的举止中完全没有一丝友好。他记住了他们的长相，但对他们没有兴趣。温斯顿想也许人造的脸无法变换表情。马丁没说话，也没有告别，悄悄关上门就走了。奥伯里恩来回走着，一只手插在黑色外套兜里，另一只手夹着烟。

“你们知道的，”他说，“你们是在黑暗中战斗。你们会一直待在暗处，收到命令，执行命令，却不能问为什么。一会儿我会给你们一本书，让你们了解社会的实质，说明我们摧毁它的方式。你们读完书，就成了兄弟会真正的成员了。但你们知道总体目标以及当前的任务，再无其他。我能告诉你们兄弟会的确存在，但无法告诉你们会员究竟是有几百个还是一千万个。你们自己自始至终只能说出十几个成员。你们会有三四个联系人，他们消失的时候，就会有新的联系人。这是你们的第一次，所以记录会保存下来。你们会从我这里接到命令，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联系你们，就会派马丁过去。你们被抓的时候就认罪，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你们能供认的东西很少，只能供认你们自己的行动，你们只能供出几个不怎么重要的人，你们甚至无法供出我。但也许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或者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有另一张完全不同的脸。”

奥伯里恩仍旧不停地在软地毯上走。尽管他身材高大，举手投足间却透着明显的优雅，甚至他单手插兜或夹烟的动作都是这样。比起力量感，他身上更带着一种自信和带着讥讽色彩的理解力。然而，他再认真都没有狂热分子的执拗。他提到谋杀、自杀、花柳病、截肢和换脸时，带着一种戏谑。他的声音仿佛暗示着“那不可避免，是我们毫不犹豫要做的事。但生活再次充满意义时，就不必再做了”。温斯顿非常欣赏奥伯里恩，近乎崇拜。他一度忘了古登斯坦这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人物。看着奥伯里恩宽阔的臂膀和棱角分明的脸——虽然不好看，却很文雅——很难相信他会失败。奥伯里恩能应对所有阴谋，也能预见所有风险。似乎连茱莉亚都被震撼了，她专心致志地听着，手里的烟熄灭了也不知道。

奥伯里恩继续说：“你们会听到有关兄弟会的传言。当然，你们自己也想象过它的样子。也许你们会认为它是由很多密谋分子组成的地下网络，大家聚在地下室开会，在墙上留下信息，通过暗语或者特殊手势识别彼此。然而，这种事根本不存在。兄弟会的成员们互不相识，只知道几个人的身份，此外，根本没可能知道其他人。就算古登斯坦自己被思想警察抓住，也无法提供完整的成员名单，更提供不了能让他们找到

完整名单的信息，因为名单根本不存在。兄弟会之所以经久不息，就是因为它不是平常意义上的组织。它只靠一种无法磨灭的理念将成员们凝聚在一起。除了这种理念，你们没有别的支撑。你们无法与其他成员发展情谊，也得不到任何鼓励。最终被抓时，也得不到任何帮助。你们永远无法帮助其他成员。有必要让一个人永远无法开口时，我们最多会把刀片送进狱室。你们要习惯没有结果和希望的生活。你们先工作，再被抓住，继而认罪，最后死去。这是你们能预见的唯一结果，一生都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们已经死了，唯一的真实生活只存在于将来。我们不过是未来的一抔尘埃和几片碎骨。但未来究竟多远，尚未可知，也许是千年以后。目前只能慢慢让更多人清醒。我们无法合作行动，只能靠个人传播我们了解的知识，再代代相传。面对思想警察，这是唯一的方法。”

奥伯里恩停下来，第三次看了看表。

“你差不多该走了，同志，”他对茱莉亚说，“等一下，酒还剩一半。”

奥伯里恩倒满酒，举起酒杯。

“这次为什么举杯？”奥伯里恩还是带着一种讽刺的语气，“为思想警察的迷惑不解？为老大哥的毁灭？为了人性？还是为了未来？”

“为了过去。”温斯顿说。

“过去更为重要。”奥伯里恩神情严肃地表示了赞同。

他们一饮而尽，过了一会儿，茱莉亚就站起来准备走了。奥伯里恩从柜子上面拿出个小盒子，又从小盒子中拿出白色小药片递给茱莉亚，让她含在嘴里。奥伯里恩说这样很重要，否则别人就会闻到葡萄酒的味道，电梯服务生非常敏感。茱莉亚刚关上门出去，奥伯里恩似乎就忘记了她的存在。他又走了一两步才停下来。

“还有一些细节要确定，”奥伯里恩说，“我想你应该有藏身之处吧？”

温斯顿描述了查林顿先生店铺上面的房间。

“目前还可以，之后我们会给你安排别的地方。藏身的地方得常换。同时，我还会送一本那本书给你，”——温斯顿注意到，就连奥伯里恩说这几个字的时候都带着着重的语气——“古登斯坦的书，你知道的，我尽快给你。我可能得过几天才能拿到一本。你应该想象得到，这书本来就没有几本。思想警察一直不断寻找这书，找到就销毁，跟我们制造的速度差不多。不过也没什么用，书是无法销毁的。就算最后一本也没有了，我们也能一字不差地再复制一本。你上班的时候提公文包吗？”奥伯里恩问。

“当然，这是规定。”

“公文包是什么样的？”

“黑色，很旧，有两根皮带。”

“黑色，两根皮带，很旧，很好。不远的将来——我说不好哪天——你早上的工作文件中会有一个错别字，你就要求文件重发。第二天，你去上班时不要提箱子。那天的某个时间，路上的一个人会碰你胳膊一下，说‘你的手提箱掉了’。那个人给你的手提箱里会有一本古登斯坦的书。你半个月内还回来。”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你走之前还有几分钟，”奥伯里恩说，“我们应该还能见面，如果我们再见面。”

温斯顿抬头看着他。“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略有迟疑地问。

奥伯里恩点点头，毫不惊讶。“在没有黑暗的地方，”他说，仿佛明白了其中的含义，“此时此刻，你离开之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有什么消息吗？还有疑问吗？”

温斯顿想了一下。似乎没什么想问的问题了，他也不想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他想到的跟奥伯里恩或者兄弟会没有直接关系，反而是母亲最后几天居住的黑暗的卧室、查林顿先生店铺上的小房间、玻璃镇纸以及红木框中的钢板雕刻版画交织在他的脑海中。他只是随意说了一句：

“你听过那首老歌谣吗？开头是‘圣克莱蒙的钟声唱着：橙子和柠

檬’。”

奥伯里恩又点了点头，彬彬有礼地念完了整个章节：

圣克莱蒙的钟声唱着：橙子和柠檬，

圣马丁的钟声说着：你欠我三法新，

老贝利的钟声喊着：你什么时候还？

肖迪奇的钟声念着：待我有钱之日。

“你居然知道最后一句！”温斯顿说。

“没错，我知道最后一句。我觉得你该走了。等一下，我给你小药片。”

温斯顿站起来，奥伯里恩也伸出手。他用力一握，几乎要捏碎温斯顿的手了。走到门口时，温斯顿回头看了看，但奥伯里恩仿佛已经准备忘掉他了。奥伯里恩的手放在电屏的开关上。温斯顿看到奥伯里恩身后的写字台、有绿色灯罩的台灯、说写器和装满文件的铁筐。事情结束了。温斯顿知道，三十秒之内，奥伯里恩就会回到之前的工作中，为党完成重要的工作。

第九章

温斯顿累懵了。懵是很合适的字。他整个人不仅像果冻一样软，也仿佛变得半透明了一样。温斯顿觉得如果自己举起手，仿佛就能看到光透过来。繁重的工作榨干了他的血液和淋巴液，只剩下神经、骨头和皮肤构成的脆弱结构。温斯顿的各个感官更敏感了。工作服压在身上，人行道硌疼了脚，就连手掌的开合都会让关节咯咯作响。

五天中，他工作了九十个小时。部里的其他人也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明天早上之前，温斯顿什么都不用做，没有任何党的工作需要完成。他可以在藏身之处待六个小时，之后还可以在自己的床上睡九个小时。在午后温和的阳光下，温斯顿沿着脏乎乎的路，一边不紧不慢地朝查林顿先生的店走去，一边观察巡逻队，但毫无来由地认为下午根本不会有任何人来找麻烦。他每上一级台阶，沉甸甸的公文包就会碰到膝盖，使得温斯顿的大腿一阵阵发麻。公文包里装着那本书，它到温斯顿手里已经六天了，可温斯顿还没打开过，甚至一眼都没看。

仇恨周中的整整六天，都是游行、演讲、嘶喊、歌唱，四处都拉着横幅、贴着海报、放着电影、摆着蜡像，鼓声和号角不绝于耳，游行持续不断，坦克不停驶过，飞机轰鸣而至，枪声时时可闻，最后，顶峰时刻到来了。公众对欧亚国的仇恨可谓咬牙切齿，如果当天要被绞死的2000名欧亚国的战犯落在公众手中，肯定会被撕成碎片。可就在此时，通知来了，大洋国并未与欧亚国作战。大洋国的敌人是东亚国，而欧亚国是盟友。

当然，这种改变绝不会被承认。消息很突然，所有人都知道了：欧亚国不是敌人，东亚国才是。那时，温斯顿正在伦敦中心的广场游行。正值夜间，白色的脸庞随处可见，红色的旗帜铺天盖地。广场上聚集着几千人，还有大约一千名穿着特工队制服的学童占据了一个街区。红色的讲台上站着一位核心党的演讲人，他矮小瘦削，胳膊却长得不成比例，光秃秃的脑袋上只有几缕头发，正滔滔不绝地讲着。那个人像个侏儒怪，仇恨扭曲了他，只见他一手抓着话筒，另一只长在瘦瘦的胳膊上的大手正在头顶上张牙舞爪地挥来挥去。扩音器中传出来的声音沙哑刺耳，长篇大论地谈论着暴行、屠杀、驱逐、强奸、虐待俘虏、杀害平

民、虚假宣传、无理侵略以及撕毁条约等。他说的这些让人们不得不信服，不得不愤怒。每隔几分钟，人们就会万分激奋，数千人难以抑制的狂野吼声会将话筒传出的声音淹没。其中，学童们的声音最为野蛮。演讲进行了二十分钟左右时，有人把一张纸条递到了讲话人手里。讲话人一边继续，一边看了看纸条。他的声音和举止没有丝毫变化，演讲的内容也没有改变，但突然之间，国家名称变了。不言而喻，人们瞬间明白了所有。大洋国正在和东亚国打仗！接着，大规模的混乱发生了。遍布广场的旗帜和海报全都错了！上面的一半内容都是错的！这是蓄意破坏！是古登斯坦的特工搞的鬼！人们乱作一团，迅速把墙上的海报拽下来，还扯碎条幅，踩在脚下。小特工队员们的表现更为精彩，他们爬上屋顶，把挂在烟囱上的横幅剪断。然而，一切不过在两三分钟内就结束了。讲话的人还是一手抓着话筒，他的肩膀稍稍前倾，另一只手仍挥舞着，根本没有停止讲话。又过了一分钟，人们再次爆发了愤怒的吼声。仇恨依然如故，从未停歇，变的只是对象。

回想起来，温斯顿最惊讶的是，讲话人讲到一半转换对象时居然没有停顿，甚至句法结构都没有错。不过，当时温斯顿正忙着别的事。大家忙着撕下海报时，一个温斯顿之前从未见过的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打扰一下，我想你忘拿公文包了。”温斯顿一言不发，心不在焉地接过了公文包，知道自己这几天都不会有机会看了。游行结束后，他直接回到了真理部。尽管已经快23点了，但部里所有人都来了。电屏上让他们回到各自岗位的命令似乎没什么必要。

大洋国在和东亚国打仗，自始至终都是大洋国和东亚国在打仗。于是，五年来的大部分政治文件都得作废。各种记录、报告、报纸、书籍、手册、电影、音频、照片，所有都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更正。尽管没有明确指示，但大家心知肚明，部门负责人希望一周之内，所有关于与欧亚国作战或与东亚国结盟的消息了无痕迹。工作量繁重得吓人，而由于此事不可明言，所以一切更为艰难。档案司的人每天都要工作十八个小时，只能休息两次，每次三小时。地下室里的床垫摆到了走廊中，连包含三明治和胜利咖啡的餐点都由侍者从餐厅送来。每次，温斯顿被睡眠的魔咒打倒，他都想先尽力完成桌面上的工作，然而每次他困得眼睛生疼，几乎睁不开似的回来时，就会发现桌子上的文件再次堆积如山，多得会埋住说写器，而且还有一些落在了地板上。于是，他只好先整理一下，腾出地方工作。最难对付的是，这种工作并非是机械性的。虽然通常只是名称的替换，但涉及细节报告时，就得小心处理，还要发挥想象力。把战争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对一个人的地理

知识是极大的考验。

第三天，他的眼睛疼到难以忍受，每隔几分钟就得擦擦眼镜。这仿佛是在与会让人崩溃的体力劳动斗争，你既有权力拒绝完成，却又神经质地想赶紧完成。温斯顿对说写器说的每句话以及他彩色铅笔下的每个字都是谎言，如果有时间，那他记录这个事实时肯定不会不安。他和司里其他人一样尽力编织着完美的谎言。第六天早上，传送管道的运送量逐渐减少，半小时之内只有一批，后来又来了一批，就再没有了。几乎在同时，所有事务都处理好了。司里所有人都暗暗长吁了一口气。这项永不能提及的工作完成了。现在，文件中已无法找到与欧亚国作战的蛛丝马迹。正午，消息传来，第二天早上之前，部里全体人员放假。这几天，温斯顿工作时就把装着那本书的手提箱放在双脚之间，睡觉时就放在身下，现在他提着手提箱回到家，刮了刮胡子，洗了澡，尽管水不怎么热，可他还是差点在浴缸里睡着了。

温斯顿爬上查林顿先生店铺的梯子时，全身的关节都在咯吱作响。虽然他还是很累，却没什么睡意。他打开窗，点亮不怎么干净的小煤油炉，还烧了壶水煮咖啡。茱莉亚很快就会来了，现在还有那本书。他坐在邋遢的椅子上，解开手提箱的搭扣。

里面有一本黑色的大厚书，装订得不怎么好，封面没有名字也没有标题。印刷看上去也有点粗糙。书页的边缘已经磨损，一不小心就会散架，看来这本书已经被传看多次了。书名页上写着如下内容：

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伊曼努尔·古登斯坦

温斯顿开始看书：

第一章

无知就是力量

有史以来，即新石器时代结束时，世上就有三种人：上等阶层、中等阶层和下等阶层。通过不同的方式，他们还能分成好几种，他们有不同的名字，且其相对数量以及对其他人的看法也因时代有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从未改变。沧海桑田般的巨变过后，原来的格局总会出现，

如同无论让陀螺沿着何种方向旋转，它总会找到平衡。

这三种人的目的完全不可调和……

温斯顿放下书，想享受一下在安全和舒适中阅读的感觉。他独自一人，没有电屏，不必担心隔墙有耳，不用紧张有人在身后偷看，也不用捂住书页。只有夏日清新的微风拂过脸颊。远处传来孩子们隐约的喊声，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时钟的滴答声。温斯顿挪了挪身子，把脚搭在架子上。这绝对是幸福，是永恒。一时之间，他随手翻开了书页，所有知道自己会反复阅读某本书的人都会随手翻开看看。温斯顿正好翻到了第三章，他继续读起来：

第三章

战争就是和平

世界终将分化为三个超级大国，20世纪中叶就可以预见这一点了。俄罗斯吞并欧洲、美国吞并大英帝国后，三个已有强国中的欧亚国和大洋国存在已久，另外一个东亚国是十年混战后才出现的。这三个超级大国的边界有的是随意划定的，有的是根据局部战争的胜负划定的，但大部分是根据地理界限划分的。欧亚国占据亚欧大陆的北部，从葡萄牙到白令海峡；大洋国的领土包括南北美洲、大西洋各岛屿、英伦三岛、澳大利亚以及非洲南部；东亚国领土面积较小，包括中国、中国以南诸国以及日本各岛屿，但边界常有变化。

无论相互交恶还是结盟，三个超级大国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一直交战。然而，战争已经不再是20世纪早期时不共戴天的情形，而是为了有限的目标而进行。任何两个国家结盟都无法摧毁第三个国家，而且战争也没有实质性的原因，更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方式或态度少了一些残酷，多了一点道义。相反，三个国家对战争的极度渴求普遍存在、持续不断。诸如强奸、抢劫、杀害儿童、奴役人民，甚至用烹煮、活埋的方式虐待战俘的行为时有发生，此外，如果上述行为不是敌方所为而是我方所为，则会被视为尽忠立功。不过，实际战争影响的人并不多，且大多士兵都经过高级训练，所以伤亡并不多。如有战事，则一般会在遥远的边界，确切的地点只能猜测，或者是在海上通道守卫战略要地的漂浮堡垒附近。文明的国度中，战争不过是物资短缺以及会造成几十人丧命的火箭弹而已。事实上，战争的性质已经变了。更确切地说，战争原因的重要次序已经改变。20世纪初业已出现却

不重要的动机现在已占支配地位，它被广泛接受，因而得以施行。

要了解当前战争的性质——尽管敌友关系每隔几年总会变化，但战争就是战争——人们首先要明白的就是战争永远不会有结果。即使三个超级大国中的两个结盟，也不能确定会绝对摧毁第三个国家。它们势均力敌，天然屏障难以逾越。欧亚国有无垠的土地，大洋国有广阔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东亚国则依靠人民的勤劳多产。此外，从物质角度看，战争的动机也不复存在。之前，战争是为了争夺市场，随着自给自足的经济建立以及生产消费相互促进，这一动机已告终结，争夺原材料也不再有性命攸关的意义。无论如何，三个超级大国的领土广袤非常，疆土之内，可以获得一切原材料。战争最后的直接经济目的只是争夺劳动力资源。三个超级大国的边界时常变化，但基本围成了一个四边形，以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港以及香港为四角，人口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三个超级大国频繁的斗争不过是为了这一地区的稠密人口以及北边的冰盖，然而却没有一个超级大国能完全占有这片区域的。由于盟友不断变化，突然的背叛总会造成四边形部分区域的易主。

反复争夺的地区富含稀有矿产，有些地方还生长着重要的植物产品，比如在寒冷地带需要昂贵的方法人工合成的橡胶。但最重要的是，廉价劳动力资源无穷无尽。一个国家控制着赤道地区的非洲、中东国家、南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群岛，就意味着掌控着数十亿廉价勤劳的苦力。这些地区的人多少已公开沦为奴隶，被各个征服者轮流掌管，如煤矿或石油一般，转化为更多武器，占领更大面积的领土并掠夺更多劳动力，之后再生产武器、占领土地、掠夺劳动力，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循环，永无止息。值得一提的是，战争从未真正超出被争夺地区的界限。欧亚国的边界在刚果盆地与地中海北岸之间进退；大洋国和东亚国两国则反复争夺印度洋及太平洋；欧亚国和东亚国对蒙古的争夺从未停歇；至于北极周围，三个超级大国都宣称占有很大领土，却无人居住，也无人探查。然而，三个超级大国的实力总是能基本保持平衡，中心地带一直平安无事。再者，赤道附近被剥削的劳动力对世界经济来说并非真正不可或缺。他们对世界财富没有太大贡献，因为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都会用于战争，而战争的目的则是争取在另一场战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受到奴役的人加快了持续战争的节奏。但如果没有努力，世界的结构以及维持该结构的方式并不会有根本上的不同。

现代战争的主要目标（根据双向思维原则，核心党对这一目标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是消耗所有机器生产的产品却不提高生活水平。19世纪

末以来，剩余产品该如何处理一直是工业社会中潜在的问题。目前，虽然尚有人衣食无着，但显然，这一问题并不迫切，而就算没有人为破坏，这一问题也可能不会到紧要的程度。同1914年之前的状况比起来，当今世界贫瘠、饥馑、破败，比之当时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则更是如此。20世纪初，人们期许未来社会是相当富裕、悠闲、秩序井然、效率颇高的社会，是玻璃、钢筋、白色混凝土构建的灿烂世界。当时的科技飞速发展，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会一直如此。然而，事与愿违，部分原因是经年累月的战争造成了贫困，另一部分原因是科技进步依靠以经验为基础的思维习惯，而这一习惯在严格管制的社会中无法存活。整体而言，当今世界比之五十年前更为原始落后。某些落后地区得以发展，与战争及警察侦察相关的设备也有改进，然而，试验和发明却大规模停滞不前，19世纪50年代原子战争造成的破坏从未复原，即使如此，机器固有的危险仍旧存在。自机器出现，所有的有识之士都知道，人类不必如之前一样辛劳，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也会消失。如果人类有意识地将机器用于这一目的，则几代的时间内，饥饿、过度劳动、肮脏、污秽、文盲就将不复存在。实际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五十年间，机器并未用于上述目的，而是形成了以某种自动的进程生产财富，由于财富不得不进行分配，因此，机器确实极大地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

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财富的全面增长可能会毁灭等级社会。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毁灭。身处所有人工时缩短、不愁食物、住房中有浴室和冰箱且拥有汽车甚至私人飞机的世界中，那么不平等最明显或者可能最重要的形式也就消失了。一旦人人都拥有财富，那么一切将毫无差别。显然，有可能产生一种在个人财产及奢侈品方面，财富被平均分配，但权力却仍掌握在少数特权阶级手中的社会。实际上，这种社会不可能长期稳定。假设所有人都能享受休闲，得到安全，则之前被贫穷束缚的大部分人则会开始学习，逐渐独立思考。一旦如此，他们迟早会意识到少数特权阶级毫无作为，就会铲除特权阶级。从长远角度看，等级社会只能建立在贫穷与物质的基础上。20世纪初，有些思想家想回到过去的农业社会，但那不切实际，与机械化趋势冲突。而机械化趋势在整个世界中几乎已成了一种本能，且任何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在军事上也会处于劣势，会被其他先进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

依靠限制生产而让人们不得脱离贫困也并不是让人满意的解决方法。1920到1940年间，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限制生产的情况非常普遍。很多国家任由经济停滞、土地荒芜而不增加资本设备，大批群

众没有工作，依靠政府救济挣扎在水深火热中。可军事孱弱也由此而生，由于因此引发的贫困显然毫不必要，反抗也会不可避免。问题是如何在不增加世界真正财富的基础上保持经济持续运转。产品必须生产，但不一定要分配，而实践中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战争。

战争最基本的行为就是毁灭，不一定是夺取人的性命，而是毁掉人类劳动所得的产品。有些物资能让人过上舒适的生活，长期来说，也会让人过于聪明，而战争则能把这些物资打得粉碎、化为轻烟、沉入深海。即使战争的武器实际没有消耗掉，但生产武器仍是既不生产消费品又消耗劳动的捷径。例如，建造漂浮堡垒所牵制的劳动力可以建造几百艘货船。最终，堡垒将因过时而被拆除，却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实质性的好处，而建造新的漂浮堡垒则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原则上说，战争的目的不过是消耗掉满足人口最低需要后可能剩余的物资。实际上，对人口的需要总是估计不足，因此一半的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然而这却被视为有利情况。这是有意为之的事，即使特权阶级也可能挣扎在艰苦的边缘，如此普遍匮乏的情况下，小小特权就会显得愈发重要，进而扩大了阶层之间的差别。以20世纪初的标准看，就连核心党的成员都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即使如此，成员享有的少数特权——布置完善的宽敞住所、布料更好的衣装、更精致的食物、饮品和烟草、两三个仆人、私人汽车或直升机——让他与外围党的人有明显差异。但与被我们称之为“群众”的下层人民相比，外围党的成员也享有相似的有利地位。社会氛围犹如围城，一块马肉就足以划分贫富群体。同时，人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处于战争中，因此也就是处在危险中，这样，为了生存而将权力交给一小部分人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

之后可以知道，战争不仅完成了必要的摧毁，而且完成的方式也是心理上可以接受的。理论上说，通过建造庙宇或金字塔、挖坑后再填上，甚至通过生产大量货物再一把火烧掉就可以消耗过多的劳动力，但对等级社会来说，这只能带来经济基础，而非感情基础。只要群众有稳定的工作，其态度就可以忽略不计，因此，需要关注的不是群众的情绪，而是党自身的情绪。在党中，最卑微的党员也应该勤劳尽职，甚至在有限范围内也要聪明，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也应该是个轻率无知的狂热分子，以恐惧、憎恨、谄媚以及欣喜为主要精神状态。换言之，他有必要保持与战争相一致的精神状态。战争是否真正发生或战争情势如何并不紧要，因为决定性的胜利不会出现。只要有战争状态就够了。党需要党员做到智力分裂，而战争状态下更容易做到这一点，且现在这一点已非常普遍，职位越高，这一点就越明显。恰恰是在核心党中，对战争

的狂热以及对敌人的憎恨才最强烈。作为管理者，核心党的成员有必要知道战争消息中的某一点并不真实，而他通常也应该明白整场战争不过是虚构的，且战争的原因或发动战争的目的也不是对外宣称的那样，但双向思维很容易就能削弱这种认识。同时，核心党的党员有着神秘的信念，坚信战争是真实的，且必然以胜利告终，大洋国将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主宰。

核心党所有党员都把战争的胜利当作信条。通过逐渐吞并更多的领土，确立压倒性的力量或者研制其他国家无法抗衡的新武器是赢得战争的两种方法。对新武器的研发从未停止，这也是具有创造力、勤于思考的人少数用武之地之一。目前，在大洋国，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几乎已消失殆尽。新话中并没有表示“科学”的词汇。过去的科学成就所依靠的以经验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英社最根本的原则相悖。甚至只有在能以某种方式削弱人类自由的产品身上才能看到技术的进步。所有的实用技术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倒退。马匹犁地，而书籍却由机器书写。但在紧要问题上——也就是战争和警察侦探活动上——以经验为基础的方式仍能得到鼓励，至少，这种方式能为人容忍。党有两个目标：征服全世界以及一举消灭独立思考的可能性。因此，党的当务之急也有两个：如何在他人非自愿的情况下探知其思想以及如何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几秒内杀死几亿人。目前，科学研究也只在这两个领域进行。当今的科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既是心理学家也是审讯者，另一类不是化学家、物理学家就是生物学家。前者专门研究人的面部表情、动作以及声音所蕴含的意义，试验吐真剂、休克疗法、催眠、肉体拷打的效果；后者只研究如何用自己的专业夺取他人性命。在和平部大型实验室中或者隐藏在巴西森林、澳大利亚沙漠或南极不为人知的岛屿中的试验站里，一组组专家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有些专家负责策划未来战争的后勤诸事；有些专家负责设计体积越来越大的火箭弹、威力越来越强的炸药以及防护性越来越好的装甲；有些专家研制新的致命气体、能消灭大陆上所有植物的可溶性毒药以及对所有抗生素都有抵抗力的病菌；有些专家不遗余力地制造像能在水中自由穿行的潜艇一般轻松穿行于地下的车辆以及像帆船一样不需要基地的飞机；还有一些专家的研究方向更令人匪夷所思，比如通过把透镜架设于几千公里外的太空而让太阳光聚焦，或者利用地心热量人为制造地震或海啸。

然而，上述计划中，任何一项都还没有实现的希望，而三个超级大国中也没有任何一个明显领先于另外两个。更值得注意的是，三个超级大国都已拥有原子弹这种比目前任何武器都要强大的武器。虽然按照其

惯例，党认为原子弹的发明归功于自己，但早在20世纪40年代左右，原子弹就已出现，十年后第一次被大规模使用。当时，几百枚炸弹被投放到工业中心，集中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西欧以及北美地区。其效果让所有国家的统治集团明白，再投放几颗原子弹就会带来有序社会的末日，那他们的权力也将不复存在。此后，尽管没有正式签订协定或相互暗示，三个国家都没有再投放过原子弹。于是，三个超级大国只是继续制造原子弹并储存起来，因为它们都相信决定性的胜利迟早会到来。同时，战术已保持了三四十年没有变化。直升机的使用更为频繁，轰炸机被自动推进式炮弹取代，而易受攻击的移动战舰则让位给了无法击沉的漂浮堡垒，其他方面则没有显著进展。坦克、潜艇、鱼雷、机关枪，甚至步枪和手榴弹仍在使用中。尽管媒体和电屏上报道的都是杀戮，但战争初期那种几周内导致数万甚至数十万人死亡的战争却再没发生过。

没有一个超级大国冒险采取可能带来重大失败的措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是对盟国的突袭。三个国家采取的或者说自认为所采取的策略都一样，即结合战争、交涉、时机恰当的背叛等手段而占领一圈基地，包围一个敌国，之后与这个敌国签订友好条约，维持数年和平，直到其放松警惕。几年时间足以将装载着核弹头的火箭部署到各个战略要地。最后，火箭同时发射，极强的破坏力阻止了反击的发生。之后，就要与剩下的超级大国签订友好条约，准备另一场袭击。显然，这一计谋不过是南柯一梦，根本不会实现。不仅如此，除了赤道和北极附近被争夺的地区，没有哪个国家进攻过敌国的领土，这说明各大国之间的某些边界是确定的。比如说，欧亚国可以轻易占领地理位置属于欧洲的不列颠群岛，而大洋国也可以将领土扩张至莱茵河或维斯图拉河。然而，这样将打破各大国不成文的文化整合原则。如果大洋国想要侵占曾经的法国和德国地区，就得消灭或者同化当地居民，这一任务相当艰巨，因为其技术发展水平与大洋国相当。三个超级大国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其结构来说，除了与战俘或黑人奴隶的有限接触外，不能与其他任何外国人来往。甚至对当前的正式盟国也有极度猜度之心。除了战俘，大洋国的普通公民从未见过欧亚国或东亚国的公民，而且不得学习外语。如果能与外国人接触，他会发现自己与外国人并无二致，他所知道的关于外国人的说法，绝大部分都是谎言。他生活着的封闭世界将会被打破，而以恐惧、仇恨和自以为是为基础的精神世界也将坍塌。因此，三个大国都意识到，无论波斯、埃及、爪哇岛或锡兰[1]被几度易手，只有炸弹才能越过主要疆界。

这种策略的背后隐藏着从未宣之于口却心知肚明的事实，这也是行

动的基础，即三个超级大国的生活状况相差无几。在大洋国，主流哲学被称为英社，欧亚国则称之为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用中文命名其为“死亡崇拜”，但也许解释为“自我毁灭”更精准一些。大洋国的公民不得了解其他两种哲学的教义信条，它们被认为是违背了道德和常识的野蛮行径。实际上，三种哲学难分彼此，且它们织就的社会系统也难以区分。它们都有同样的金字塔结构，永远崇拜半人半神的领导者，同样的靠战争维持且为战争服务的经济。因此，三个超级大国不仅不能征服其他两个国家，且征服并不能使其获利。相反，只要仍处于冲突之中，就能像三捆秸秆一样相互支撑。通常，三个超级大国的统治集团对其所作所为既清楚又不完全清楚。它们致力于征服世界，但也知道有必要让战争在无法取胜的情况下持续下去。同时，由于征服或被征服的可能并不存在，因此否认现实则成为可能，这也是英社和与其对立的另外两种思想体系的特征。在此，重复之前说过的内容很有必要，即持续不断的战争彻底改变了战争的性质。

历史上，从定义看，战争迟早要结束，非胜即败。同样，过去的战争也是人类社会与物质现实联系的手段。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试图将错误的世界观强加给追随者，但不会支持任何有可能损害军事效用的错觉，因为后果不堪设想。失败意味着失去独立，或者会带来一般被认为不好的结果，因此必须认真准备，以防失败。具体事实无法忽略不计。无论从哲学角度、宗教角度、道德角度还是政治角度看，两两相加可能等于五，但设计枪支或飞机时，两两相加只能是四。效率低下的国家迟早会被征服，而追求效率就要摒弃错觉。此外，追求效率就要借鉴过去，意味着要对过去有清晰的认识。当然，报纸和历史书籍总会歪曲事实、带有偏见，但现在的伪造活动绝不会发生。战争绝对能让人保持理智，这可能也是统治阶级最重要的保障。尽管战争有胜负，但任何统治阶级都无法置身事外。

战争真正持续不断的话，也就不再危险。战争永无止息，军需就不复存在。技术进步停滞不前，最明显的事实也会被否认或者漠视。如上所述，能被称为科学的研究仍以战争为目的，但根本上说，这些研究也不过是白日做梦，而且就算研究不出成果也没什么关系。效用已不是必要条件，甚至军事效用都已不再重要。在大洋国，只有思想警察才有效用。三个超级大国均不可征服，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各自为政，思想如何歪曲都没有关系。现实体现在日常生活的需要中——饮食、住房、衣着、避免服毒或跳楼的需要等。生死之间、肉体享受与肉体痛苦之间仍有区别，但仅此而已。大洋国的公民与外界隔绝，也不知过去，如同生

活在太空，分不清上下左右。这种国家中，统治者至高无上，连法老和恺撒也只能望其项背。他们必须避免追随者大批饿死，以免对自己不利。此外，军事技术上也必须与敌国水平相当。但满足了最基本的条件后，统治者们就可以随意歪曲事实。

因此，如果按照从前的标准衡量，战争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如同反刍动物之间的斗争，角都长成了不会伤害对方的角度。然而，虽然战争并不真实，但并不是没有意义。战争消耗了剩余消费品，帮助保留等级社会需要的特殊心理氛围。可以想见，战争纯粹是内部事务。过去，尽管各个国家的统治集团可能意识到了共同利益，因此限制了战争的破坏力，但还是相互斗争，胜利国也会掠夺战败国。而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根本不是在相互斗争。统治集团针对人民发动战争，目的也不是为了攻占或保卫领土，而是为了保持社会结构。因此，“战争”这个词已名不副实。也许，正是由于战争不断发生，所以说战争已不复存在更为准确。自新石器时代到20世纪初期，战争带给人的特殊压力已经消失，由全新的事务取代。如果三个超级大国互不开战，同意永远和平相处，绝不侵略对方的领土，结果也不会改变分毫。因为那种情况下，每个国家仍是自成一体，永远不会因外部危险而变得清醒。永恒的和平与永恒的战争一样。虽然绝大多数的党员对这一点的理解相当肤浅，但这就是党口号的内在含义：

战争就是和平。

温斯顿放下手头的书。远处，一颗火箭弹“轰隆”一声爆炸了。在没有电屏的房间中读禁书的乐趣仍然萦绕着。独处和安全是身体上的感觉，不知怎的，和疲惫感、沙发的舒适感以及窗外微风吹拂在脸上的感觉交织在一起。这本书让温斯顿非常着迷，更确切地说是让他感到安心。某种意义上说，他知道书中的所有内容，但这也恰好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如果温斯顿能整理一下凌乱的思绪，就会发现书中的内容正表达了温斯顿想说的。这本书出自一个跟温斯顿思想相近的人之手，只是那个人更有力、更系统、更无畏。温斯顿认为，最好的书能告诉你那些你已经知道的东西。温斯顿刚把书翻回第一章，就听到了茱莉亚走上梯子的声音，便站起来去迎接她。茱莉亚把棕色的工具包撂在地上，投入他的怀抱。他们已经整整一周没有见面了。

“我拿到那本书了。”松开彼此后，温斯顿说。

“噢，你拿到了？很好，”茱莉亚并没有太大兴趣，只是马上在煤油

炉旁蹲下来煮咖啡。

他们在床上躺了半小时后，才再次回到这个话题。夜晚很凉爽，得盖上床单才好。楼下传来熟悉的歌声和鞋子走在地上的声音。温斯顿第一次来就见过的那个胳膊通红的结实女人几乎成了院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白天，她一直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之间来回，不是叼着衣夹就是哼着情歌。茱莉亚躺下来，快要睡着了。温斯顿则从地板上拿起书，靠着床头坐起来。

“我们得读一读，”温斯顿说，“你也得读，兄弟会的所有成员都要读。”

“你读吧，”茱莉亚闭上眼睛，“大点声，这样最好，你可以一边读一边给我解释。”

时针指向六，也就是说到了18点了。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温斯顿把书放在膝上读起来。

第一章

无知就是力量

有史以来，即新石器时代结束时，世上就有三种人，上等阶层、中等阶层和下等阶层。通过不同的方式，他们还能分成好几种，他们有不同的名字，且其相对数量以及对其他人的看法也因时代有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从未改变。沧海桑田般的巨变过后，原来的格局总会出现，如同无论让陀螺沿着何种方向旋转，它总会找到平衡。

“你睡着了吗？茱莉亚。”温斯顿问。

“没有，亲爱的，我在听，继续读吧，写得很不错。”

温斯顿继续读道：

这三种人的目的完全不可调和。上等阶层希望保住其地位，中等阶层希望跟上等阶层调换位置，而下等阶层经常因繁重的工作而难以脱身，偶尔才能意识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情，如果他们有目标，那目标就是消灭所有差别，创造人人平等的社会。因此，历史上，斗争的主要特点相差无几：很长一段时期内，上等阶层似乎牢牢掌控着权力，但迟早

有一天，他们不是会对自己丧失信心，就是会失去有效统治的能力，也可能二者皆有。之后，中等阶层就会假装是为了自由和正义而斗争，获得下等阶层的支持，推翻上等阶层。而一旦中等阶层达到目的，就会把下等阶层打回到之前受奴役的位置，自己坐上上等阶层的宝座。这时，新的中等阶层就会从剩下的一两个阶层中分化出来，于是，斗争就会重新开始。在三种人之中，只有下等阶层从来没有达到目标，哪怕是暂时性的目标也没有。若说自古以来下等阶层从未有过实质上的进步太过夸张。即使在当今下降时期，一般人的生活水平也比几个世纪前要高。但财富的增长、举止的文明、改革或革命都从未将人类的平等向前推进一丝一毫。从下等阶层的角度看，历史性的改变不过是主宰者称谓的变化。

19世纪后期，很多观察者都意识到了这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因此，很多思想家成立了一个学派，称历史是循环的，认为不平等是人类生活的永恒法则。当然，一向有很多人支持这种说法，但如今这种说法提出的方式却有了巨大变化。过去，对社会等级形式的需要是上等阶层的学说。国王、贵族以及过着寄生生活的律师和牧师都会这样鼓吹，通过对人们承诺在轮回之后的世界可以得到补偿，这一学说变得易于接受。中等阶层争取权力的时候，总会使用自由、正义、博爱这种字眼。但现在，兄弟情谊观念就已开始被尚未掌权却不久后就会掌权的人攻击。过去，中等阶层打着平等的旗号闹革命，而旧的统治一旦被推翻，新的专制统治就会建立。实际上，新的中层集团事先就已经宣称要进行专制统治。社会主义于19世纪出现，是古代奴隶起义时一系列思想链条上的最后一环，也深受旧时代乌托邦主义的影响。但大约自1900年以来，社会主义的各种分支都已多少公开放弃了构建自由平等的目标。20世纪中叶的新运动，即大洋国的英社，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以及东亚国称为“死亡崇拜”的主义，都有着明确的目标——不自由、不平等永远持续。当然，这些新运动皆由旧运动发展而来，不过是徒有虚名，那些思想也不过是空头支票。然而，上述三种运动的目标都是阻挠进步，让历史在某个时刻停滞不前。通常钟摆式的运动会再次发生，继而停止。按照惯例，上等阶层会被中等阶层推翻，而中等阶层则会成为上等阶层，但这次，有意识的策略将让上等阶层永保其地位。

新的学说之所以兴起，部分原因是历史认识的积累以及历史意识的增强，而这些在19世纪之前几乎并不存在。历史的循环运动现已为人所理解，至少看上去如此。如果历史的循环运动可以被理解，那也就可以被更改。但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早在20世纪初期，技术上的平

等就已成为可能。人们天赋各异，这一点亘古不变，而且人们各有所长，有些人是会占据有利地位，但阶级差别以及贫富悬殊已经没有实际必要了。之前各个时代，阶级差别不可避免，而且有利可图。不平等是文明的代价。然而，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使人们分工不同仍有必要，但却没必要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或经济水平中。因此，从即将攫取权力的新集团的角度看，人类平等不再是理想的目标，而是要避开的危险。在更为原始的时代，正义和平的社会不可能存在，但让人相信其存在却相当容易。几千年来，对人人友爱，无需法律，没有辛劳这一人间天堂的憧憬一直纠缠着人们。而这一愿景确实曾对能在历史变革中获益的人有一定吸引力。法国、英国以及美国革命的继承者们对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说法半信半疑，甚至其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影响。但从20世纪40年代起，所有主流政治思想都带有独裁主义色彩。人间天堂即将实现的一刻，人们却放弃了信念。无论称谓如何，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都指引着倒退至等级化和军事化的道路。1930年左右，强硬的观点逐渐变得普遍，废止已久的做法，甚至已经废止几个世纪的做法不仅成了常态，而且还受到自认为文明开化的人的保护——包括未审羁押、以战俘为奴隶、公开处决、刑讯逼供、绑架人以及驱逐所有居民等。

国际战争、国内战争、革命以及反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十年后，英社及其他两种主义才成为被全面贯彻的政治理论。然而，出现于20世纪早期，被统称为集权主义的多种体制崭露头角，此外，震荡之后新世界的轮廓也已不言而喻，什么人将统治世界也变得显而易见。新生贵族绝大部分由官僚、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职业政客组成。这些人源于中等阶层的工薪阶层以及工人阶级的上层，由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构建的贫瘠世界造就，也因此团结。与过去相应阶层的人们相比，他们没那么贪婪，不易被奢侈品诱惑，更加向往纯粹的权力，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更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更坚定地要镇压反抗。最后一种区别至关重要，与当今的专制相比，旧时的专制并不彻底，也不高效。过去，统治集团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由思想的影响，漏洞颇多却视而不见，只关注公然蓄意的行为，并不关注人民的思想。甚至以现在的标准看，中世纪天主教教会也颇为宽容。这种现象产生的部分原因在于，过去，所有政府都无法持续监视人民。可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公众意见易于操纵，而电影和收音机更是推进了这一方面。随着电视的发展以及使用同一设备实时接受并传送信息技术的进步，私人生活的时代宣告终结。由于其他渠道均已断绝，每位公民，或者至少是每位值得注意的公民，都全天候处在警察的

监视之下，也浸泡在官方宣传的声音之中。至此，被迫完全遵从国家意志的可能以及对所有事件看法的绝对统一第一次实现了。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后，社会阶层再次重组，依旧形成了上等阶层、中等阶层以及下等阶层。但新的上等阶层与以往的不同，他们不会冲动行事，知道如何保障其地位。他们早已认识到集体主义是寡头政治最稳固的基础。财富和特权掌握在集体手中时更容易捍卫。20世纪中期所谓的“消灭私有财产”运动实际上意味着将财富集中在比以往更少的人手中，不同的是，新的拥有者是一个集团，而不是大量单独的个体。从个人角度说，除了很少的个人财产，党员们什么都没有。但从集体角度看，党拥有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党控制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产品。革命后的多年间，党一直占据着主宰地位而没有遭到反抗，因为所有行为都是集体化的。通常，人们认为资产阶级消失后，社会主义肯定会随之而来，而且资本家的一切，包括财产、工厂、矿山、土地、房屋以及交通工具也必然会被剥夺。由于上述各项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一定是公有财产了。英社从早期社会主义发展而来，沿用了社会主义说法，实际上也践行了社会主义纲领的主要内容。因此，可以预见的也是实现安排的结果最终出现——经济不平等永远不变。

但维持等级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只有四种情形会导致统治集团的坍塌：外部势力的颠覆，因无能而导致的公众反抗，强大而愤恨的中等阶层出现，其自己丧失了统治的自信和意愿。上述原因相辅相成，一定程度上相互支撑，规律也正是如此。如果统治集团能抵御上述四种危险就能永远掌权。根本上说，决定性因素在于统治集团本身的精神状态。

20世纪中叶后，第一种危险不复存在。除非人口数量缓慢变化，否则三个瓜分世界的超级大国均不可征服，而拥有广泛权力的征服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这一点。同样，第二种危险也只是理论上的。人们不会自发造反，也不会仅仅因为被压迫而造反。其实，只要他们永远不被允许知道比较的标准，也许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受到了压迫。旧时代周期性经济危机实际上毫无必要，现在也不允许发生了，而其他同样大范围的动荡却可能发生，也确实会发生，但由于无法明确表达不满，因此也不会产生政治性后果。生产过剩一直是社会中潜伏的问题，由机械技术的进步导致，可以通过不断地战争解决（见第三章），而战争可以鼓舞士气，使之保持在必要的水平。因此，从当前统治者的角度看，唯一真正的危险是从自身分化出既有能力又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并渴求权力的一群

人，从而产生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也就是说，教育才是问题所在。这个问题一直塑造着领导集团以及仅次于领导集团的大批行政集团的意识——需要对大众思想进行负面引导。

以此为背景，即使人们之前并不了解大洋国社会的主要结构，也可以推断出来。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他一贯正确，无所不能。每次胜利、每项成就、每种科学发现、所有知识、所有智慧、所有幸福、所有美德都因其领导和鼓舞而实现。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牌上的一张脸，是电屏中的一个声音。我们确信他长生不老自有道理，至于他何时出生，则无人确定。老大哥是党向世界展示的自己的伪装，负责演绎爱、恐惧与崇拜的汇聚点，相较于面对某个组织，面对个人时，人们的这些感情更容易得到。核心党位于老大哥之下，人数限制在六百万以下，或者大洋国总人口的2%以内。核心党之下是外围党，如果核心党可以称之为国家的大脑，那么外围党就好比国家的手。再下一层则是愚昧的大众，即习惯称的“群众”，约占全国人口的85%。根据之前的分类，群众属于下等阶层。由于赤道地区被奴役的人总在征服者之间易手，因此他们并非社会结构的固定部分，也不是必要部分。

原则上说，三个阶层的成员身份并非世袭。核心党党员的子女理论上并非生来就是核心党党员。如果入党，必须要在十六岁时经过考试。考试不歧视种族，也不看重地域。党内高级官员包括犹太人、黑人以及纯印度血统的南美人，此外，地区行政长官皆由该地区的居民选出。大洋国的居民都不认为自己是遥远首都奴役下的人民。大洋国没有首都，名义上的元首是行踪不明的人。英语是其主要通用语言，新话是官方语言，集中化也只表现在这两个方面。国家统治靠的不是血缘，而是对同一种教义的信奉。的确，我们的社会分为不同层次，而且分层非常严格，乍看之下，层次等级是以世袭为基础的。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比资本主义时期以及工业化之前的时代要少得多。党的两个分支之间有一定数量的变化，但只是为了将意志薄弱的人剔除出核心党并提拔不会造成危害且雄心勃勃的外围党党员。实际上，群众不会被提拔入党。群众中天赋异禀的人可能会成为传播不满的中心人物，只会被思想警察盯上并消灭掉。但这种情况并非一成不变，也并非是原则性问题。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因此并不一定要将权力移交给下一代。如果没有其他能让栋梁之才留在高层的方法，就完全可以从群众阶层中选拔新的一代。关键年代中，党并非世袭的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反抗情绪。旧式社会主义者接受过训练，反对所谓的“特权阶级”，他们认为如不世袭就无法永恒。他们并不知道，寡头政治的延续不必具有实际意义，而他们

自己也没有想过，世袭贵族的统治通常会带来短命王朝，而天主教教会这种吸收性组织，有时则会维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寡头政治的基础规则并非代代相传，而是坚持逝者强加于生者身上的对某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坚持。统治集团只要能指派后继者，就永远会保持统治的地位。党并不关心血统的持续，而是关心自身的不朽。只要等级结构一直不变，谁掌权并不重要。

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信仰、习惯、品位、情感以及精神状态真正的作用有两个：保持党的神秘性并防止当前社会的本质被人看透。当前情况下，造反以及对造反的铺垫都不可能实现。群众不足为惧，任其自生自灭，他们就会世代如此，工作、生养、死去，他们不仅没有造反的冲动，也不理解世界另外的样子。只有工业技术的发展使之必须得到更高层次教育时，他们才可能变得危险，但既然军事对抗和经济对抗已不再重要，则大众教育水平实际上是在下降。群众是否有意见并不重要。群众之所以享有思想自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思想。但作为党员，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也不能有丝毫不同意见。

党员自生至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就算自己一个人，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在独处。无论他身处何方，无论他是否在睡觉、是否在工作，无论他是在洗澡还是休息，都可以在毫无预警且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监视。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朋友、娱乐、面向妻儿时的行为、一个人时的表情、梦话，甚至身体的标志性动作都经受着严密的监视。不只是实际过失，就连不起眼的古怪行为、习惯上的微小变化以及紧张的情绪都可能是内心挣扎的表现，肯定会被发现。党员们无从选择，况且他们的行为不受法律或其他明文规定的限制。大洋国没有法律，会招致死亡的思想或行为并未明文禁止，而持续不断的政治清洗、逮捕、拷打、监禁和人间蒸发并不是为了惩处确实犯下罪行的人，而是为了消灭之后可能犯罪的人。党员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也要有正确的本能。要求党员拥有的信念和态度从未明确说明，否则英社的内在矛盾就会暴露无遗。如果一个人天生思想正确（即新话中的“思想好”），就能不假思索地知道正确的信念或应有的情感。无论如何，由于孩提时期就已接受过围绕着“罪止”“黑白”“双向思维”等新话词语进行的心智精神训练，党员们早就不愿意深入思考某个问题，也丧失了深入思考的能力。

党员不能有私人感情，却要永保热情。他们应该一直生活在对外敌和叛徒狂热的憎恨中，为胜利欢呼，在党的力量和智慧面前看到自己的渺小。无聊且不如意的生活带来的不满可以通过“两分钟仇恨”节目而外

移并消散，而他们早年学会的纪律则能提前消除怀疑精神和反抗态度，纪律中最初步也是最简单的阶段就是新话中的“罪止”，甚至小孩子也能学会。“罪止”是在任何危险思想即将产生时，如本能一般，快速终止的能力。它包括无法类比、不知逻辑错误、误解对英社不利的最简单的观点以及延误或抵制某个可能导致异端思想产生的思绪。简而言之，“罪止”就是保护性愚蠢。但愚蠢还不够，相反，完整意义上的正派意味着像杂技演员控制自己身体一样自如地控制自己的思维。大洋国社会最根本的信条是，老大哥无所不能，而党也永远正确。由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对待现实时，要无时无刻、坚持不懈地保持灵活性。“黑白”是这一部分的关键。如新话中诸多词语一般，“黑白”同时包含两种矛盾的意义。将之应用于对手身上，代表不顾事实而指黑为白的无耻习惯；而将之用在党员身上，则表示党的纪律有要求时，要有愿意颠倒黑白的忠诚。此外，这个词还意味着两种能力：相信黑即是白；知道黑即是白并忘记自己曾相信过黑是黑，白是白。这就要求对历史持续不断地篡改，需要依靠真正包容所有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新话中的“双向思维”。

有两个原因能说明篡改过去的必要性。一个原因是次要的，即预防性的。也就是说，党员之所以要像群众一样忍受现状，部分原因是党员也没有对比标准。他必须与过去隔绝，就像与外国隔绝一样，因为他必须相信自己比祖先生活得更好，而且物质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升。但到目前为止，篡改过去更重要的原因是要保持党的正确性。不仅讲话、数据以及记录要时时更新，以表明党的所有预测都无懈可击，而且教义变化及政治联盟变化也得不到认可。因为改变自己的思想，甚至是自己的方法，都等于是对自身缺点的承认。例如，假设欧亚国或东亚国（无论哪个）是现在的敌国，那它永远都是敌国。如果与事实不符，就要篡改历史，因此，历史一直被重写。这种日复一日对过去的伪造由真理部负责，对政权的稳定来说，这与仁爱部进行的镇压和侦察同样必要。

过去的突变性是英社的中心教义之一。英社认为，过去的事件并非客观存在，只存在于书面记录和人的记忆中。过去不过是记录与记忆重叠的部分。由于党完全控制着书面记录，也控制着党员的思想，因此过去的情形由党决定。就算过去可以篡改，但具体事例却没有被篡改过。因为无论当时需要如何篡改历史，新版本也就已经成了过去，而不同的过去绝不会存在。就算同一事件一年内被多次篡改——这种情况很常见——上述情况仍然存在。党自始至终掌握着绝对真理，显然，真理永远是当前的样子。之后可以看出，控制过去主要依靠对记忆的训练。保证所有书面记录与当前的正统思想相符不过是机械行为。但记住所有事件

按照党所希望的方式发生很有必要。此外，要想重新安排记忆或篡改书面文件，忘掉某件事曾如此发生也很有必要。和其他思维技巧一样，这种窍门也可以学到，大部分党员都学会了，那些既聪明又正派的人自然也已完全掌握。旧话直白地称之为“现实控制”，新话中则称之为“双向思维”——尽管双向思维也包括其他含义。

“双向思维”意味着同时具有并接受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的能力。党内知识分子知道自己的记忆改变方向，因此也知道自己是在愚弄现实，但“双向思维”能让他心安理得地认为现实并没有改变。这一过程的进行既是有意识的行为，也是无意识的行为。前者保证其精准度，后者防止虚假情绪或罪恶感的产生。“双向思维”是英社的中心思想，因为党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绝对诚实保持目的坚定性，同时进行有意识的欺骗。蓄意撒谎的同时诚心诚意地相信谎言、忘记一切不合时宜的行为并在需要时从遗忘中提取、否定客观现实的存在却重视被否认的现实，是不可或缺的。就连使用“双向思维”这个词，也要践行“双向思维”。因为使用这个词表明人们在篡改事实，而践行“双向思维”，人们就会忘掉这件事。如此循环往复，谎言总能走在事实的前面。通过“双向思维”，党最终能够左右历史的轨迹，而且，我们也心知肚明，党可能会在之后几千年中一直如此。

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寡头之所以垮台，不外乎两种原因：变得僵化或软弱。前者使之愚蠢自大，不能因势利导而被推翻；后者则因为其开明而怯懦，在应该使用武力时让步，因此也被推翻了。制造两种情况并存的思想系统是党的一大成就，这是党的统治常葆青春的唯一思想基础。想要统治并持续统治，就必须打乱现实感，统治的秘诀就在于将自己永无错漏的信念与从过去中汲取教训的能力相结合。

毋庸置疑，“双向思维”最高明的践行者就是创造“双向思维”并清楚地知道它是实施思想欺骗的完美工具的人。社会中，对事实洞若观火的人也最看不清事情的本质。总之，理解越透彻，误解越深刻，越聪慧就越昏庸。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人的地位越高，对战争的狂热就越严重。最能理智看待战争的人来自被争夺地区，对他们来说，战争是持续不断的灾难，如潮汐一样反复冲刷着他们的肉体。胜利属于哪一方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清楚地知道，改朝换代也无法改变自己要做同一件事的命运，而新的统治者对待他们的方式与之前的毫无二致。我们将地位稍高一点的工人称之为“群众”，他们很少意识到战争的存在。必要时，可以刺激他们产生极度恐惧和仇恨的情感，但如果对他们放任自流，那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会意识到战争的存在。只有在党的高层，特别是核心党才能找到对战争真正的狂热情绪。坚信能征服世界的人深知这一点不会发生。这种特殊的对立联系——博学而无知、怀疑而狂热——正是大洋国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官方意识形态中充斥着矛盾，却找不到任何实际原因。因此，党拒绝并攻击之前社会主义运动坚持的每种原则，却以社会主义之名做着同样的事。党对工人阶级采取了几个世纪都不曾有过的轻视态度，却让党员穿上某个时期典型的工人制服，而这样的决定也是出于对工人阶级的轻视。党系统性地破坏家庭的稳定，但对领导人的称谓却又能唤起对家庭忠诚的感情。就连四个统治部门的名称都暴露了蓄意混淆事实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编造谎言、仁爱部负责刑讯，而富足部负责制造饥荒。这些矛盾并非偶然，也不是虚伪所导致的，而是“双向思维”的结果。只有调和矛盾才能永久保住权力，这是打破古老循环的唯一方法。如果要永远避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称之为上等阶层的人要永远保持统治地位，那么主流精神状况必须被控制到疯狂的地步。

然而，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要避免人人平等。假设整个机制已确切说明，那么为了将历史凝固在某个特定时刻而进行缜密精确的计划是出于何种动机？

这是最深层次的奥秘，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双向思维”是党的神秘性的基础，尤其是核心党神秘性的基础。但原始动机，即最初引起夺权，继而引申出“双向思维”、思想警察、持续不断的战争以及随后出现的各种必要机制的从未受到质疑的本能仍隐藏在更深的层次中。实际上，这种动机包括……

温斯顿察觉到了沉默，如察觉到其他动静一样。他意识到茱莉亚很久没动了。茱莉亚侧躺着，腰以上什么都没盖。她枕着自己的手，一缕黑发散在眼睛上，胸部缓慢而平稳地起伏着。

“茱莉亚。”

没有回答。

“你还醒着吗？茱莉亚。”

仍没有回答。茱莉亚睡着了。温斯顿合上书，小心地放在地板上，也躺下来，把床罩盖在两个人身上。

温斯顿思考着，他仍未了解到最深的秘密，他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第一章和第三章一样，不过是将他之前知道的东西系统化了。但读过之后，温斯顿知道了自己还没有疯。成为少数派不会让人发疯，就算少数派里只有一个人。世界上既有真理也有谬误，只要坚持真理，哪怕要对抗全世界，人们也不会疯。落日金色的光芒透过窗户，落在枕头上。温斯顿闭上了眼睛，夕阳照在温斯顿的脸上，身边那个姑娘光滑的身躯给了温斯顿既强烈又昏昏欲睡且自信的感觉。他是安全的，安然无恙。他念叨着“理智不是统计学概念”睡着了，他认为这句话中蕴含着深刻的智慧。

---

[1] 锡兰，现译为斯里兰卡。

第十章

温斯顿醒来时，感觉自己睡了很久。他瞄了一眼旧式时钟，发现才20点30分。他又眯了一会儿，听到楼下院子里又传来了如往常一样的低沉歌声：

这无望的爱恋，

如四月般逝去，

一个眼神，一句言辞，搅乱了我的梦！

偷走了我的心！

这首莫名其妙的歌似乎经久不衰，随处可闻，比《仇恨之歌》还受欢迎。听到歌声，茱莉亚也醒了，她舒服地伸了个懒腰，下了床。

“我饿了，”茱莉亚说，“我们煮点咖啡吧。该死！炉子没油了，水也是凉的。”她拿起炉子晃了晃，“没油了。”

“我们可以找老查林顿要一些。”

“奇怪的是，我确定之前是满的。我先穿上衣服，”茱莉亚继续说，“好像越来越冷了。”

温斯顿也起床穿上衣服。歌声仍在继续：

他们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

说你迟早会忘记，

但多年来的笑容和泪水，

仍让我思绪万千！

温斯顿束紧工作服腰带，走到床边。太阳已经落山，院子里已经没

有了阳光的踪迹。地上的石板很湿，仿佛刚被冲洗过一般。温斯顿觉得天空也仿佛刚刚被冲洗过，从屋顶上的烟囱望出去，天空蓝得澄澈。院子里的女人不知疲倦地走来走去，一会儿叼着衣服夹子一会儿取下来，一会儿唱歌一会儿又默不作声，没完没了地晾着尿布，一片接一片。温斯顿不知道她是以洗衣为生，还是为二三十个孙儿操劳。茱莉亚走到温斯顿身边，他们一起看着楼下那个结实的女人，有点着迷。温斯顿看着她晾衣服的姿态，粗壮的胳膊伸向晾衣绳，壮实如母马的臀部向后撅着，温斯顿第一次发现这也是一种美。温斯顿从没觉得一个女人五十岁后，由于生养而身材走形，之后又因为劳作而变得结实，最后粗糙到如熟过头的萝卜一般的女人会是美丽的。但事实如此，温斯顿想着，有什么不可以？健壮而毫无曲线的身躯如花岗岩一般，再加上粗糙的红棕色皮肤，与少女的身体相比就如同玫瑰果与玫瑰花相比。果实为什么比花朵低级？

“她很美。”温斯顿小声说。

“她的臀部至少有一米。”茱莉亚说。

“那正是她独特的美。”

温斯顿一只手就能轻易地揽住茱莉亚柔软的腰部。从臀部到膝部，茱莉亚的身体一直贴着他。他们不能生儿育女，永远不会有孩子。这个秘密只能通过语言和思想相互传递。楼下的那个女人没什么头脑，只有壮实的胳膊、温暖的内心和多产的肚子。温斯顿想知道她生过多少孩子，很可能有十五个。她曾有过短暂的花期，也许只有一年，如野玫瑰一样美丽，之后很快就开始孕育果实，逐渐变得结实、红润、粗糙。后来，洗衣、拖地、缝补、做饭、扫地，修理、擦亮物品等，先是为孩子们洒扫洗衣，之后又是为孙子们，三十年如一日，不曾间断。但她还是能尽情歌唱。不知怎么，温斯顿对楼下的女人有了一种崇拜感，和烟囱之上的天空混合到了一起，天空万里无云，朝遥远的地方延伸。说来奇怪，人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无论来自欧亚国、东亚国，还是这里。天空下的人也几乎一样，世界上所有地方的人多达几百亿，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被仇恨和谎言构筑的墙彼此隔开，不过却几乎完全一样。他们从没有学会思考，可心里、肚子里、肌肉里却积蓄着终有一天要推翻世界的力量。如果希望存在，那么希望一定存在于群众身上！温斯顿不用读完那本书，就知道古登斯坦最后要传递的消息，未来属于群众。但他是否能确定群众翻身成为双手构建的世界的主人时，他自己，温斯顿·史密斯会感到那个世界如现在党的世界一样陌生？没错，因为

至少那是一个理智的世界。有平等，就有理智。迟早有一天，力量会化为觉悟。群众是不朽的，看到院子里那个勇敢的女人，就会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他们终将觉醒，哪怕会有一千年之久，他们在那天到来前也会克服各种困境，像鸟儿一样，将活力代代相传，那是党没有的，也是党消灭不了的。

“你记不记得，”温斯顿说，“第一天，树林边对我们唱歌的画眉？”

“它不是在对我们唱歌，”茱莉亚说，“它唱歌是为了自己高兴，也不能这么说，它只是在唱歌。”

鸟儿唱歌，群众也唱歌，但党却不唱歌。全世界的各个地方都站着同样坚强而无法征服的身躯，伦敦、纽约、非洲、巴西，边界神秘的禁地，巴黎和柏林的街上、俄罗斯无垠的村庄中，日本和中国的市场上，无处不在。他们由于生养和自生到死的劳作而变得结实健壮，可仍在唱歌。他们的双腿之间，某天总会诞生一个觉悟的民族。你们已经死了，未来属于他们。但如果你们能像他们保持身体灵活一样保持思维活跃，并把二加二等于四这样的神秘教义传承下去，就也能享受未来。

“我们已经死了。”温斯顿说。

“我们已经死了。”茱莉亚温顺地附和。

“你们已经死了。”他们身后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

他们马上向两边跳开。突然之间，温斯顿脊背发凉。他看着茱莉亚瞳孔周围的白色眼珠，看到她脸色蜡黄，面颊上的腮红格外明显，仿佛游离于皮肤之上。

“你们已经死了。”冷冰冰的声音再次说道。

“那幅画后面。”茱莉亚小声说。

“那幅画后面，”那个声音说，“原地站好。没有命令不许乱动。”

这是开始，终于开始了！他们只能四目相对。赶紧逃命，趁一切来得及赶紧离开这间屋子，他们没想过这么做。他们从未想过不遵守墙上那个声音的命令。只听“咔嚓”一声，既像是开锁，也像是玻璃掉了下来。原来是那幅画掉下来了，露出一块电屏。

“他们能看到我们了。”茱莉亚说。

“我们能看到你们了，”那个声音说，“站到屋子中间，背对背站着，手放到脑袋后面，不许互相接触。”

他们没有接触。但也许是自己在发抖，温斯顿觉得茱莉亚在发抖。他咬紧牙关，这样牙齿就不会打颤，但却控制不了双膝。下面的屋子里传来一阵皮靴声，院子里仿佛站满了人。有什么东西被拖过石板路。女人的歌声突然中断了，仿佛是洗衣盆一样的东西被推过院子，拖着长长的声音。接着是愤怒的喊声，最后是痛苦的尖叫。

“屋子被包围了。”温斯顿说。

“屋子被包围了。”那个声音说。

温斯顿听到茱莉亚咬紧牙齿，“我们最好先告别吧。”茱莉亚说。

“你们最好先告别吧。”那个声音说。接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开始说话。那个声音听上去很细，也很有教养，温斯顿仿佛觉得之前听到过。“趁现在，顺便说一下：‘点起蜡烛让你去睡觉，抡起斧子把你头砍掉’！”

温斯顿身后，有个东西捶到床上。梯子从窗户伸进来，压坏了窗框，有人从窗户爬进来。也有穿着皮靴的人走上楼梯。房间里站满了壮汉，他们套着黑色制服，穿着钉了铁掌的皮靴，手里拿着警棍。

温斯顿不再颤抖，眼珠也一动不动。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不要乱动，不要乱动，别给他们打你的理由！有个人走到温斯顿面前，他的下巴像拳击手的一样扁平，嘴巴只是一条缝，拇指和食指惦着警棍，上下晃悠，仿佛正在思考。温斯顿和他对视了一眼。温斯顿手放在脑袋后面、脸和身体完全没有遮挡，如同赤裸一般，这种感觉几乎让人难以忍受。那个人伸出白色的舌尖，舔了一下应该是嘴唇的地方，走开了。有东西被打碎了，一个人从桌子上抄起玻璃镇纸，甩到壁炉的石头上，镇纸被摔成了碎片。

那片小珊瑚是一片粉红色皱皱的小东西，很像蛋糕上的玫瑰花蕾，只见它滚过了床垫。温斯顿暗想着，真是小啊，一直都这么小！他听到

背后有吸气的声音，接着，“砰”的一声，温斯顿的脚踝处被狠狠踢了一脚，害得他差点摔倒。另一个男人一拳砸在茱莉亚的胸口，茱莉亚倒在地板上，像折尺一样折起身体，根本喘不过气。温斯顿不敢转身，但余光有时能看到茱莉亚努力想喘气的苍白的脸。温斯顿自己也怕极了，但仿佛对茱莉亚的痛苦感同身受，但对茱莉亚来说，彻骨之痛并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能喘气。有两个人过来抓住茱莉亚的膝盖和肩膀，像抬麻袋一样把茱莉亚带走了。温斯顿扫了一眼茱莉亚的脸，那张脸朝向地面，脸色蜡黄，已经没了之前的模样，茱莉亚闭着眼睛，脸颊上的腮红还在。那是温斯顿最后一次见到茱莉亚。

温斯顿一动不动地站着，还没人打他。他的脑子里挤满了这种想法，但他却不怎么感兴趣。温斯顿想知道查林顿先生是不是被抓了，也想知道院子里的女人怎么样了。温斯顿很想去洗手间，他自己暗暗吃惊，因为两三个小时前他才刚去过。他注意到壁炉台上的时钟指向九，也就是21点了。但光线很强。八月二十一点时，光线不是应该逐渐变暗吗？温斯顿怀疑自己和茱莉亚是不是搞错了时间，他们也许多睡了十二个小时，那时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温斯顿没再往下想，没什么意思。

走廊里响起了另一种比较轻的脚步声，查林顿先生走了进来。那些穿制服的突然驯顺了一些。查林顿先生的外表有了些变化，目光落在玻璃镇纸的碎片上。

“把碎片捡起来。”查林顿先生严厉地说。

有个人弯下腰，完成他的命令。查林顿声音中的土腔土调消失了。温斯顿突然意识到不久之前，电屏里传出的声音就是这样。查林顿先生仍旧穿着那件旧丝绒夹克，但一头几乎全白的头发则变成了黑色，眼镜也不见了。他狠狠瞪了温斯顿一眼，仿佛看看有没有弄错人，然后就没再理温斯顿。温斯顿还能看出来是查林顿先生，只是变了模样。查林顿的身体挺直了，仿佛比之前更魁梧。他的脸变化不大，却仿佛经历了巨变。查林顿的眉毛不再浓密，皱纹也消失了，整个脸的轮廓似乎也有变化，而且鼻子好像短了一点。这张脸属于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人，警觉而严肃。温斯顿明白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心知肚明地知道，面前这个人是个思想警察。

第三部分

第一章

温斯顿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大概是在仁爱部，但没办法确定。他待着的房间天花板很高，没有窗户，墙上还有白色瓷砖。暗藏着的灯发出清冷的光，足够照亮整间牢房。另外，房间里还充斥着一刻不停的嗡嗡声，温斯顿觉得跟换气系统有关。除了牢门门口处，四面墙都安装了长凳，或者说是搁板，宽度刚好可以坐下一个人。牢门对面有个马桶，但没有木坐垫。牢房里四面墙上各有一块电屏。

温斯顿的腹部隐隐作痛，自从那些人把他带上没有窗户的囚车，温斯顿就一直觉得肚子疼。同时，温斯顿也饿了，是那种啃噬着人的不健康的饥饿感。他可能一天没吃东西了，也可能是一天半，他自己也不知道被捕的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了。自被捕以来，温斯顿就再没吃过东西。

温斯顿坐在窄窄的长凳上，尽量保持不动，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他早就学会了一动不动地坐着，只要乱动，就会有人从电屏后面呵斥他。想吃东西的感觉折磨着温斯顿，他最想要一片面包。温斯顿以为工作服的口袋里还有点面包渣，甚至有可能有块小面包，他这样想是因为仿佛有东西总在蹭他的腿。最后，想一探究竟的诱惑压过了恐惧，他悄悄把手伸到口袋里。

“史密斯！”电屏那头传来一声呵斥，“6079号，温斯顿·史密斯！牢房里不许把手放进口袋！”

温斯顿又回到了之前的坐姿，一动不动，双手依旧交叉，抱着膝盖。被带到这里之前，温斯顿还被带到过一个地方，他估计是普通监狱，要么就是巡逻队的临时拘留所。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不过应该有几个小时，没有钟表也没有日光的情况下，很难判断时间。那个地方很吵，臭气熏天。他们把温斯顿丢进和现在这间差不多的牢房里，但那里很脏，总是挤着十到十五个人，大部分是普通罪犯，也

有几个政治犯。温斯顿只靠着墙，静静地坐着，被脏乎乎的人们挤来挤去。恐惧和腹痛攫住了他，因此他没怎么在意周围的环境。不过，他还是注意到了党员囚犯和其他囚犯的区别。党员囚犯总是沉默不语，脸上写满了恐惧，但普通囚犯似乎对什么都不在意，他们大骂看守，财物被没收时会反抗，会在墙上写下流话，还会把吃的藏在衣服里偷偷带进牢房，此外，电屏里的声音试图维持秩序时，他们的喊声都能盖过那个声音。而且，普通囚犯中有几个似乎跟看守关系不错，他们喊看守的绰号，还花言巧语地骗看守把烟从门上的窥探孔递过来。就算看守们有时必须粗暴，但对待普通囚犯也还算宽容。那里说得最多的就是劳改营，因为绝大多数犯人都会被转移到劳改营。温斯顿想明白了，只要能打点好，再懂点技巧，待在劳改营也“不错”。劳改营里少不了各种形式的行贿受贿、后台交易和敲诈勒索，有同性恋和娼妓行为，还能从土豆中非法蒸馏出酒。普通囚犯总是被信任，特别是流氓和杀人犯，他们都成了监狱里的特权阶层，而所有的脏活累活都得政治犯完成。

临时拘留所里，各种囚犯来来往往，毒贩、小偷、强盗、黑市交易人员、醉汉，还有妓女。有些醉汉很凶，其他囚犯得合力才能控制住他们。有个女人大概六十多岁，虎背熊腰，胸部下垂，浓密的白色卷发在挣扎时散开了，四个看守分别抓着她的腿和胳膊，把她抬进牢房，而她还在乱蹬乱叫。看守们从她四处乱踢的脚上扯下靴子后，直接把她朝温斯顿的大腿上扔过去，差点压断了温斯顿的腿。那个女人坐直后，朝着走出去的看守们大声喊着：“妈的，这些狗杂种！”之后，她觉得自己坐的地方不平，就滑下温斯顿的膝盖，坐到了长凳上。

“对不起了，小兄弟，”她说，“我没想坐到你身上，都是那些混蛋把我扔到这儿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一位女士，对吧？”她停下来，拍了拍胸口，打了个嗝，“对不起，我有点儿难受。”

她向前探了探身子，一下吐在地板上。

“舒服多了，”她说着，又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要我说，忍不住就吐，省得留在肚子里。”

她定了定神，转过身来看了温斯顿一眼，仿佛立刻就喜欢上了他。她用粗壮的胳膊搂着温斯顿，把他拉到身边。啤酒和呕吐后的气味扑在温斯顿脸上。

“亲爱的，你叫什么？”她问。

“史密斯。”温斯顿回答。

“史密斯？”那个女人反问道，“有意思，我也叫史密斯，真有这事儿，”她多愁善感地继续说，“也许我是你母亲！”

温斯顿想，她没准是自己的母亲。年龄、体型都差不多，在劳改营待了二十年，人总会有些变化。

再没人跟温斯顿说过话。普通犯人根本不搭理政治犯，这很奇怪。普通犯人管政治犯叫“政棍”，带着一种漠不关心的轻蔑感。党员囚犯似乎很害怕跟别人说话，更害怕相互交谈。温斯顿只在两个女党员犯被挤到一起时听到了一些话，他听到那两个人迅速交谈了几句，特别提到了“101房间”，不过当时他并不明白。

大概两三个小时前，温斯顿被带到了这里。腹部隐隐的痛从未消退，时好时坏，他的思绪也随之放松或紧缩。疼得厉害时，他脑子里只有疼痛感和对食物的渴望。疼得不那么厉害时，温斯顿就完全陷入了恐惧之中。有时，他能真切地预见即将发生的事，就会心跳过速，无法呼吸。他感到警棍抽在肘部，钉着铁掌的靴子踩在小腿上。他看到自己在地上爬，牙齿被打落了还大声求饶。他没怎么想到茱莉亚，他没办法把心思放在茱莉亚身上。温斯顿爱她，不会背叛她，但那只是个事实，就像算术规则一样。他感觉不到对茱莉亚的爱，甚至也没怎么想过她的遭遇。他经常想到奥伯里恩，带着星星点点的希望。奥伯里恩一定知道自己被捕了，他曾说过，兄弟会不会营救自己的成员。不过，奥伯里恩还说过刀片，说情况允许的话就会把刀片送进来。看守冲进牢房前大概有五秒钟，刀片会带着刺人的冰冷刺入他的身体，甚至会切到拿着刀片的手指的骨头。一切痛苦都涌进他生病的躯体，就连最微弱的痛苦也让他瑟缩不已。温斯顿不确定就算有机会，自己是否会使用刀片，多活一会儿算一会儿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就算被拷打，多活十分钟也行。

有时，温斯顿会试着数数牢房墙上有多少块瓷砖。本来这并不难，但他总会数错。更多的时候，温斯顿想的是自己在哪儿，现在几点。有一会儿，温斯顿确定外面是白天，可过一会儿，他又肯定地认为外面是黑夜。本能告诉温斯顿，牢房里的灯永不会熄灭，这里永远不会有黑暗。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奥伯里恩似乎知道那个暗示了。仁爱部没有窗户。他的牢房可能在大楼中心，也可能在外墙附近；可能在地下十层，也可能在第三十层。他的思绪随意翻飞，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试图通过身体的感觉确定自己是身在高空还是深陷地下。

外面传来皮靴的声音，铁门“哐当”一声被打开，一个年轻警官走进牢房。他穿着整洁的黑色制服，浑身上下像刚擦亮的皮革般隐隐泛光，苍白而没有表情的脸仿佛是蜡制面具，他示意外面的看守把囚犯带进来。只见诗人安普福斯踉跄着进来后，铁门“哐当”一声又被关上了。

安普福斯不安地移动了一两步，仿佛觉得还有另外一扇门可以出去，之后就开始在牢房里走来走去。他还没注意到温斯顿，只是不安地盯着温斯顿头顶上方一米处的墙。安普福斯没穿鞋，大脏脚趾顶破了袜子，露在外面。他也几天没刮胡子了，又短又硬的胡须都长到了颧骨附近，像土匪的模样，跟他高大而虚弱的身体和不安的动作形成了奇怪的反差。

温斯顿从萎靡不振中恢复了一些。就算被电屏那边的人呵斥，他也得冒险和安普福斯说话。他甚至觉得安普福斯会把刀片送进来。

“安普福斯。”温斯顿说。

电屏那边没传来斥责的声音。安普福斯停下脚步，有点吃惊，目光慢慢聚集在温斯顿身上。

“啊，史密斯！”他说，“你也被抓了！”

“你为什么被抓？”

“告诉你实话，”安普福斯笨手笨脚地坐在温斯顿对面，“过错只有一种，对吧？”

“你犯了？”

“显然犯了。”

他一会儿把手放在额头，一会儿又压在太阳穴，仿佛想记起什么事。

“总有这种事，”安普福斯含糊地说，“我能记起来一次，可能是这次。显然，那是我一时不慎。我们当时正在给吉普林的诗歌定稿，我在某一行的末尾保留了‘上帝’这个词。我也是没办法！”他抬头看着温斯顿，几乎要气疯了，“那行没法改，押的是‘一’这个韵。你知道吗？只有十二个词能押上这个韵。我都快崩溃了，确实没别的押韵的词了。”

安普福斯的表情都变了，但没有了那种愤怒感，有一会儿还带着几分高兴。那是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热情，是学究发现某个没用的事实时的喜悦，连他脏乎乎的胡子茬上似乎都绽放着光彩。

“你有没有想过，”他说，“押韵的字词不足对诗歌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

“你知道现在几点吗？”温斯顿问。

安普福斯仿佛又吃了一惊，“我好像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们大概两三天之前抓了我。”他的眼睛在墙上扫来扫去，好像在找窗户，“这地方白天晚上都一样，我不知道怎么确定时间。”

两个人说了几分钟话，完全驴唇不对马嘴，突然，电屏中传来了斥责声，让他们闭嘴。温斯顿双手交叉，安静地坐着。安普福斯身躯庞大，总是不能舒服地坐在窄窄的凳子上，只能不安地扭来扭去，瘦长的胳膊一会儿搭在这个膝盖上，一会儿搭在那个膝盖上。电屏那边的人厉声让他老实坐着。时间一直流逝，二十分钟、一个小时……难以判断。皮靴声再次响起，温斯顿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很快，相当快，也许再过五分钟，也许就是马上，靴子的声音意味着轮到自己了。

铁门打开了，冷着脸的年轻警官走进来。他简单地指向安普福斯。

“101房间。”他说。

安普福斯被两个看守架着，不情愿地走了出去，他的脸上隐约带着不安，且仍十分迷茫。

仿佛又过了很久，温斯顿的腹痛更强烈了。他的想法在同一段轨道上来来回回，犹如一个球反复掉进同一个球洞中。温斯顿心里只装着六件事：腹痛、一片面包、鲜血和尖叫、奥伯里恩、茱莉亚以及刀片。这时，他心头又是猛地一紧，沉重的皮靴声再次靠近。铁门打开时，难闻的汗味扑面而来，穿着卡其布短裤和运动衫的帕森斯走进牢房。

这次轮到温斯顿目瞪口呆了。

“竟然是你！”温斯顿说。

帕森斯瞥了温斯顿一眼，眼神中既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惊讶，只有痛苦。帕森斯惶惶不安地走来走去，显然安静不下来。每当他伸直胖鼓鼓的膝盖，别人都会发现他在颤抖。帕森斯的眼睛瞪得很大，仿佛必须得盯着不远处的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被抓？”温斯顿问。

“思想罪！”帕森斯快哭了，声音中既包含完全认罪的情绪，也有难以置信的震惊，不敢相信这个词竟会出现在自己身上。帕森斯站在温斯顿对面，急切地向他倾诉：“你觉得他们会枪毙我吧？会吗，老伙计？如果你实际上没做什么，他们就不会枪毙你对吧？那只是想法，谁都控制不了。他们应该会给我机会辩解的。他们肯定知道我的贡献，对吧？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可不是什么坏人。虽然我不怎么聪明，但很诚恳。我为党奉献了所有，不是吗？顶多判我五年，你觉得呢？或许十年？像我这种人在劳改营很有用，他们不会因为我犯一次错就枪毙我吧？”

“你有罪吗？”温斯顿问。

“当然有罪！”帕森斯边说边还奴颜婢膝地看着电屏，“党不会逮捕无辜的人，对吧？”他青蛙一样的脸镇定了一些，表情甚至还带着点虔诚，“老伙计，思想罪相当可怕，”他一副为人师表的语气，“思想罪很阴险，能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控制你。你知道它怎么控制我的？我睡觉的时候！没错，就是这样。我每天兢兢业业地工作，尽职尽责，根本不知道脑子里有这种坏想法，后来我就开始说梦话。你知道他们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他压低了声音，仿佛因为医学上的原因不得不说脏话一样。

“‘打倒老大哥！’没错，我就是说了！好像还说了好几遍。老兄，我只跟你说这件事，很高兴他们在我没进一步发展之前抓住了我。你猜我会在法庭上说什么？‘谢谢你们，’我会这么说，‘谢谢你们及时挽救了我。’”

“谁揭发的你？”温斯顿问。

“我的小女儿，”帕森斯半伤心、半自豪地说，“她透过锁眼听到的。她听到我说了那种话，第二天就报告给了巡逻队。她才七岁，可是

已经很聪明了对不对？我一点儿都不怪她，还为她骄傲。无论如何，至少我把她培养得很好。”

帕森斯又开始惶惶地走来走去，瞟了好几眼马桶，最后猛地扯下短裤。

“对不起，老伙计，”他说，“我忍不住了，憋了很久。”

他的臀部以下盖到马桶上，温斯顿用手捂住了脸。

“史密斯！”电屏里的声音喊道，“6079号，温斯顿·史密斯！手放下。牢房里不准捂脸。”

温斯顿放下手。帕森斯在马桶上排泄，声音很大，肚子清理得很干净。结果，抽水装置出了问题，之后几个小时里，牢房里都臭气熏天。

帕森斯被带走了。又有一些囚犯被神秘地带来又被带走。有个女人被派到“101房间”，温斯顿注意到那个词让她整个人都瘫软了，脸色都变了。后来到了某个时候——如果他是上午来的，那当时就是下午；如果他是下午来的，那当时就是上午——牢房里有六个人，有男有女，全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温斯顿对面是个男人，胖到看不见下巴，牙齿还露在外面，很像某个个头很大却对人无害的啮齿动物。他的脸很胖，红一块白一块的，脸颊胖得下垂，别人很容易认为他嘴里藏着一些吃的。他灰白色的眼睛胆怯地在人们脸上扫来扫去，接触到别人的目光时就会迅速转移。

铁门再次开了，又一个囚犯被带进来，他的面目让温斯顿暗暗吃了一惊。他长相普通平庸，可能是工程师，也可能是技术员，但让人惊讶的是他面孔瘦削，如骷髅一般，而正因如此，他的眼睛和嘴巴也大得不成比例，眼睛里似乎有一种对某人或某事怀有刻骨仇恨的神情。

那个人离温斯顿不远，温斯顿没再看他，但那张扭曲如骷髅一样的脸却深深刻在他脑海里，仿佛那个人就在眼前。温斯顿忽然明白了，那个人快饿死了。仿佛一瞬间，牢房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板凳上的人稍稍有些骚动。那个胖到没有下巴的人一直瞥着那个瘦骨嶙峋的人，但马上会带着一丝愧疚转移目光，可又会再次忍不住被吸引过去。接着，他变得坐立不安。终于，他站起来来，手插在工作服的口袋里，慢慢挪过去，有点难为情地拿出一片发黑的面包递给那个脸似骷髅的

人。

电屏中传来愤怒的咆哮声，震耳欲聋，吓得那个没有下巴的男人一下跳起来。骷髅脸赶紧把手放到背后，仿佛是向全世界宣告自己拒绝了这种馈赠。

“巴姆斯德！”那个声音咆哮着，“2713巴姆斯德·杰！把面包扔在地上！”

没有下巴的男人把面包扔到了地上。

“站着别动，”那个声音说，“面向门。不准动。”

没有下巴的男人遵从了命令，胖乎乎的脸颊不可控制地颤抖着。铁门“哐当”一声打开了，年轻警官走到牢房一边，一个肩膀宽阔、胳膊粗壮的矮胖看守从他身后出现。看守站在没下巴的男人对面，得到警官的确认信号后，猛挥一拳，力道十足地砸在那个男人的嘴边，几乎要把他打飞了。那个没有下巴的男人一下从牢房这头跌到那头，撞在马桶底座。他愣了一会儿，仿佛很头晕。鲜血从嘴巴和鼻子里涌出来。他发出微弱的呜咽声，或者说是哼哼着。接着，他扭着身子，摇晃着双手双膝着地，想站起来。鲜血和口水一起流下来，被打成两半的假牙也掉了出来。

犯人们都坐着，动都不敢动，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没有下巴的人爬回原来的地方，一侧脸庞发青，嘴巴则肿成了一团肉，成了樱桃色，中间的嘴巴成了黑洞。

不时就会有血滴到工作服胸前的位置。他灰白色的眼睛仍在每个人脸上扫来扫去，更加愧疚了，似乎想弄清楚自己受到的羞辱会让人鄙视到什么程度。

铁门开了。年轻警官稍稍朝骷髅脸做了个手势。

“101房间。”

这几个字让温斯顿身边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还引发了一阵骚动。那个男人一下跪到地上，双手紧扣在一起。

“同志！长官！”他大喊着，“别带我过去！我不是已经全交代了

吗？您想知道什么？我全坦白，全都坦白！你想知道的，我全都说！写下来我就签字！什么都行！别带我去101房间。”

“101房间。”警官重复了一遍。

那个男人的脸早已苍白无比，听到这里还变了颜色。温斯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人脸上罩着一层青色，绝没有错。

“对我怎么样都行！”他大喊着，“你们好几个星期没让我吃东西了。干脆杀了我吧，枪毙我，绞死我，判我25年。你想让我揭发谁？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不管是谁，随你怎么处置他。我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不到六岁，你把他们全带走，就算在我面前划开他们的喉咙都行，我可以在旁边看着，只是别带我去101房间！”

“101房间。”警官再次重复。

那个男人发狂似的扫视了一下其他囚犯，仿佛想找个替罪羊。他的目光落在刚刚那个脸被打开花的男人身上。突然，他伸出瘦骨嶙峋的胳膊。

“你应该带走他，不是我！”他依旧大喊着，“你不知道他被打之后说了些什么。给我个机会吧，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他才是反党的，不是我。”看守们向前跨了一步。男人的声音变成了尖叫：“你没听到他的话！”他一直重复着，“电屏出问题了。你们应该抓他，带走他，放开我！”

两个强壮的看守走过来，想抓住他的胳膊，就在这一瞬间，那个人一下扑倒在地板上，抓着长凳的铁腿，发出野兽般的嚎叫。两个看守按住他，想把他拉开，但他的力气惊人，怎么也不肯放手。看守们大概拽了有二十秒钟。犯人们依旧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目视前方。嚎叫声已经停止，那个男人只是紧紧抓着凳子腿，没力气再发出其他声音。后来，他又换了一种哭喊声。一个看守用皮靴跺断了他一只手的手指，于是，两个看守把他拽起来了。

“101房间。”年轻警官又说了一遍。

那个人被架出去了，走也走不稳，头低垂着，摸着受伤的手，不再做任何抵抗。

又过了很久。如果那个骷髅头被带走的时候是午夜，那现在就是上午。如果他被带走的时候是上午，那现在就是下午。温斯顿一个人待在牢房里，他已经一个人待了好几个小时了。窄窄的凳子硌得他生疼，所以得不时站起来走动一下，还好电屏那边没有人斥责他。那一小片面包还留在看不见下巴的男人丢下它的地方。开始，温斯顿得费很大力气才能忍住不看它，但很快，比起饥饿，他更觉得口渴。温斯顿的嘴巴很干，口气也不好。嗡嗡的声音和一成不变的白色灯光让人眩晕，他觉得脑袋里空空如也。温斯顿骨头痛得难以忍受时就会站起来，可由于头晕站不住，又马上要跌倒。他的感官稍一正常，恐惧就会占据他的心。有时，他抱着一丝希望，想到奥伯里恩和刀片，也许刀片就藏在可能会给他送来的食物中。他依稀也会想到茱莉亚，她可能正在某个地方受折磨，比自己更痛苦。此刻，可能茱莉亚正在因疼痛而大叫。温斯顿想到：如果增加我的痛苦能救茱莉亚，我会那样做吗？没错，我会的。但那只是理智的决定，他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知道自己理应如此。温斯顿没有感受到那种疼痛，这里除了痛苦和对痛苦的预知，什么都没有。再说，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如果正在承受痛苦，还会希望增加自己的疼痛吗？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仍没有答案。

皮靴声再次靠近。铁门开了，奥伯里恩走了进来。

温斯顿猛地站起来，奥伯里恩的出现让他太过震惊，忘记了谨慎。多年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忘记电屏的存在。

“他们也抓到你了！”温斯顿大声喊道。

“他们早就抓到我了，”奥伯里恩不紧不慢地说，透着几许带有歉意的讽刺。他往旁边一让，一个胸肌发达、拎着长长警棍的看守出现了。

“温斯顿，你知道的，”奥伯里恩说，“别骗自己了。你早就知道，一直都知道。”

没错，温斯顿现在明白了，他一直都知道，只是没时间思考。他盯着看守手里的警棍，警棍可能打在他身体的任何地方，头顶、耳朵、上臂、肘部……

打到了肘部！温斯顿一下跪倒在地，身体都软了，手紧紧捂着被打的地方，眼前直冒金星。想不到，真想不到打一下竟如此疼痛！恢复了一下后，温斯顿看到另外两个人正俯视着自己。看守对着他蜷缩的身体

狞笑着。他总算得到了一个答案：无论如何，你永远不希望疼痛增加，只会希望疼痛赶紧终止。世界上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身体上的疼痛。疼痛面前没有英雄，一个都没有。温斯顿徒劳地抱着被打伤的左臂在地上打滚时，这句话一直在他脑海里出现。

第二章

温斯顿应该是躺在行军床上，只不过这张床离地面更高，而且他被绑了起来，动弹不得。比往常更强烈的灯光打在脸上。奥伯里恩站在旁边，低头注视着他。床的另一边站着个穿白大褂的人，手里拿着注射器。

睁开眼睛后，温斯顿慢慢观察着周围的环境。他感觉自己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来，从深海而来，游到这个房间。他不知道自己在海底待了多久。自从被捕，他就没见过黑夜和白昼，记忆也断断续续的。有时，意识会完全消失，就连睡觉的意识也会消失不见，空白期后又逐渐恢复，至于空白期是几天、几周还是几秒，温斯顿也不得而知。

自肘部被打以来，噩梦就开始了。之后，他知道了，那不过只是前奏，几乎每个囚犯都要接受这种常规审问。人们理所当然会坦白一系列罪行——间谍罪、破坏罪之类的。坦白是惯例，而拷打则是实实在在的。温斯顿数不清自己被打了多少次，也不知道每次被打了多久，总之，五六个穿着黑色制服的人会同时打他，有时用拳头，有时用警棍，有时是铁棍，有时则是皮鞭。很多次，温斯顿在地上滚来滚去，如牲口般不知羞耻，扭动着身体，试图躲避拳打脚踢，然而这只会招致更多的殴打，打在他的肋骨、腹部、肘部、小腿、腹股沟、睾丸以及尾骨等部位。这种殴打有时候似乎无穷无尽，温斯顿甚至会觉得最残忍最无法原谅的不是看守的殴打，而是自己无法做到不省人事。有时，温斯顿都快被吓死了，毒打开始前就开始大声求饶，看到拳头收回准备出击，就能让他坦白所有事，有些事是真的，有些事是想象出来的。有时候，他会下定决心不说出一个字，痛到不行才会说几个字。有时候，他也会软弱，想折中一下，对自己说：可以坦白，但还不到时候；一定要等痛到受不了的时候再说；再忍三脚，再忍两脚，我就给他们想要的。有时候，温斯顿被打得站不稳，像袋土豆一样瘫在牢房的石头地上，几个小时后又被拉出去痛打。也有时候他得恢复很长时间。他记不清了，因为恢复期间都在睡梦中或者眩晕中度过。他记得有间牢房里有张木板床，墙上有个架子，还有一个脸盆，送来的饭是热汤和面包，有时还有咖啡。他记得有个脾气暴躁的理发员给他刮胡子、剪头发。他还记得有个公事公办、毫无表情的白衣男护士给他测脉搏，检测神经反应，翻他的

眼皮，用粗糙的手指摸来摸去看他有没有骨折，最后，那个人会在他胳膊上打一针，让他昏睡过去。

拷打的频率降低了，威胁转而登场，那是一种你的回答让人不满时随时可能再次被殴打的恐怖感。审讯他的人不再是穿着黑色制服的暴徒，而是党内知识分子。他们身材矮胖、动作敏捷，还带着亮闪闪的眼镜。这些人轮番上阵，温斯顿觉得每次审讯大概会持续十到十二个小时，他是这么觉得的，不过也没办法确定。这些审讯人员要保证他一直处于轻微的疼痛中，但他们的主要目标不是让他感到疼痛。审讯人员抽他耳光，拧他耳朵，让他单足站立，扯他的头发，不允许他去洗手间，还用炫目的灯光照得他不停流眼泪，不过，他们只是为了羞辱温斯顿，摧毁温斯顿争辩、推理的能力。审讯人员真正的武器是没完没了的残酷审讯，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他们会提出具有迷惑性的问题，让温斯顿说出本不想说的话，还会设置陷阱，歪曲温斯顿的回答，抓住每个谎言和每句自相矛盾的话，直到温斯顿因耻辱和疲劳而哭泣。有时，一次拷问会让他哭上五六次。大多数情况下，审讯人员会大声辱骂他，而温斯顿稍有迟疑，审讯人员就会威胁说再把他交给看守殴打。有时，审讯人员也会突然改变策略，称温斯顿为同志，让他看在英社和老大哥的份上，悲伤地问他是否对党还有一丝忠诚，支撑他改正错误。几个小时的审讯后，温斯顿就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恳求的话都会让他涕泪交流。最后，比之拳打脚踢，喋喋不休的声音更能让他彻底垮掉。无论如何，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让他签字他就签字。温斯顿在乎的只是发现他们想让自己坦白什么，之后在被凌辱前迅速坦白。他承认自己曾刺杀党内高级领导人，散发煽动性小册子，贪污公款，出卖军事秘密，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等；承认自己早在1968年就是东亚国的间谍；承认自己有宗教信仰，崇拜资本主义，是个变态；承认自己杀害了妻子，虽然自己和审讯人员都知道他的妻子还活着；还承认他多年来一直与古登斯坦有个人联系，是地下组织的成员，而该组织也几乎吸纳了所有他认识的人。坦白所有事、指认所有人并不难，况且，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事实。他的确是党的敌人，因为在党的眼里，思想与行为没有差别。

另有一些记忆也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它们是独立的片段，如同黑色圆圈中的照片。

他在一间说不出是否明亮的房间里，因为他只能看到一双眼睛。近在咫尺的某处，传来缓慢而有规律的滴答声。那双眼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亮，突然，温斯顿从座位上浮起来，一头扎进那双眼睛里，消失不

见。

温斯顿被绑在周围都是仪器的扶手椅上，刺眼的灯光下，有个穿白大褂的人正在读取数据。外面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铁门“哐当”一声打开，有蜡像般面孔的警官走进来，身后跟着两个看守。

“101房间。”警官说。

穿着白大褂的人没有转身，也没有看温斯顿，只是盯着仪表盘。

温斯顿正穿过一条有一公里宽的走廊，沐浴在灿烂的金色光线下，大声笑着叫着，高声坦白了所有事。他什么都承认了，就连拷打时咬牙没说的话也承认了。他将一生都告诉了一个深知他底细的人。警卫、其他审讯者、穿白大褂的人、奥伯里恩、茱莉亚还有查林顿先生都和他一起穿过走廊，高声笑着。潜伏在未来的恐怖之事已经过去，没有发生。一切都安然无恙，不再有疼痛，他生命中最细枝末节的东西都摆到了台面上，他得到了理解和原谅。

躺在木板床上的他目视前方，奥伯里恩的声音显得很不真切。整个审讯过程中，虽然他没看到，但觉得奥伯里恩就在旁边，只是没出现在视线范围内。奥伯里恩操纵着所有事，就是他派看守们殴打温斯顿，也是他让看守们留下活口。他决定温斯顿什么时候该痛苦尖叫，什么时候该恢复一些。他决定何时让温斯顿睡觉，何时把药物注射进他的胳膊。也是他提问并给出答案的提示。奥伯里恩折磨别人、保护别人也审问别人，他是朋友。可能是在打了针之后的梦中，可能是在正常的梦中，也可能是暂时清醒的时候，总之有一次，温斯顿听到耳边有人说：“别担心，温斯顿，你现在由我看管。我观察了你七年，现在到了转折点。我会救你的，我会让你出类拔萃。”温斯顿不确定那是不是奥伯里恩的声音，但七年前的梦中，有人告诉他“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时，也是这个声音。

温斯顿不记得审讯是如何结束的。一阵漆黑过后，他就到了现在的牢房里，或者说是房间里，逐渐看清了周围的东西。他几乎是平躺着，无法移动。身体的主要部分都被绑起来了，甚至后脑勺也以某种方式被固定住了。奥伯里恩正低头看着他，表情相当严肃悲伤。从下往上看，奥伯里恩的脸粗糙而衰老，不仅有眼袋，而且鼻子到下巴的部分还因为劳累而长出了皱纹。他比温斯顿想象的还要老一些，可能有四十八岁或者五十岁。奥伯里恩手里有个仪器，上面有个控制杆，仪器盘上标有刻

度。

“我说过，”奥伯里恩说，“如果我们能再见，就会在这里。”

“没错。”温斯顿说。

没有任何防备，奥伯里恩的手稍稍一动，温斯顿的身体里就滚过一波疼痛感。那种疼痛令人恐惧，因为他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觉得自己正经受着致命的伤害。温斯顿不知道伤害是真实发生的，还是电流引起的，只知道身体扭曲变形，关节逐渐分离。尽管疼痛让他的前额挂满汗水，但最可怕的是，他的脊椎就快断了。温斯顿咬牙坚持着，通过鼻孔用力呼吸，尽量保持沉默。

“你害怕了，”奥伯里恩看着他的脸说，“一会儿就会有东西断掉。你尤其害怕脊椎断掉。你能清晰地看到脊椎断裂、脊髓液滴下来的画面。温斯顿，这就是你刚才想到的，对吧？”

温斯顿没有回答。奥伯里恩把控制杆拉回去。疼痛消失了，如它到来时一样迅速。

“这才四十，”奥伯里恩说，“你看，刻度最大是一百。你记住，我们说话的时候，我随时能让你觉得疼，要多疼有多疼。你要敢撒谎或者想搪塞过去，或者回答与你平常的智力水平不符，我就马上让你疼得喊出来。明白了吗？”

“明白了。”温斯顿回答。

奥伯里恩的态度缓和了一些。他若有所思地扶了扶眼镜，来回走了几步。再次开口时，他的声音里透着温柔和耐心，像医生、教师和传教士，似乎只想解释说服，不想惩罚。

“温斯顿，我为你担心，”他说，“是因为你值得，你清楚问题的所在，很多年前你就明白了，只是不肯承认。你精神不正常，有记忆缺陷。你记不住真正的事实，还说服自己记住从未发生过的事。幸好，这种病可以治。你之所以未能痊愈，是因为你的抗拒。你还没准备好付出努力。我很清楚，直到现在，你仍旧认为自己的病是种美德，不想改变。好了，我们举个例子，现在跟大洋国打仗的是谁？”

“我被捕的时候，是在和东亚国打仗。”

“跟东亚国。很好。一直是这样，对吧？”

温斯顿吸了口气。张嘴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他忍不住，一直盯着那个仪器。

“说实话，温斯顿，你说实话。告诉我你觉得自己记得的事。”

“我记得我被捕前一周，我们并没有跟东亚国打仗，它是盟友。我们当时在跟欧亚国打仗，打了四年了。再之前……”

奥伯里恩打了个手势，让他住口。

“再举个例子，”他说，“几年前，你确实有很严重的错觉。认为三个分别名为琼斯、阿伦森和卢瑟福的人曾是党员，他们对叛国罪和破坏罪供认不讳，被处决了，而你认为他们并没有犯下那些罪行。你觉得自己看到了毋容置疑的文件，足以证明他们的清白。还有某张让你产生了幻觉的照片，你以为自己亲手碰到过。那张照片就像这样。”

奥伯里恩的手里出现了一张长方形的报纸，在温斯顿的视线范围内停留了大概五秒钟。那是张照片，而且绝对就是那张照片。是琼斯、阿伦森和卢瑟福在纽约完成党务时的照片。温斯顿十一年前见过，但照片立即被销毁了。可他确实见过，绝对见过，毫无疑问！他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想挣脱上半身的束缚，然而无论朝哪个方向都无法移动一寸。温斯顿一度忘记了那个仪器，只想把照片握在手里，哪怕再看一眼也好。

“它本来就存在！”温斯顿喊道。

“不。”奥伯里恩说。

他走到房间的另一边，对面的墙上有个记忆洞。奥伯里恩掀起盖子，那张薄薄的纸片瞬间就被暖流卷走，消失在了火焰之中。奥伯里恩转过身来。

“化为灰烬了，”他说，“认不出来了。成了尘土。它不存在，从未存在过。”

“但它的确存在！它是存在的！它存在于我的记忆中。我记得，你也记得。”

“我不记得。”奥伯里恩说。

温斯顿的心沉了下去，这就是双向思维，他感到极度无助。如果他能确定奥伯里恩是在说谎，那也没什么，但很可能奥伯里恩确实忘了那张照片。果真如此，那他肯定也会忘记对此的否认，之后会遗忘忘记这一行为本身。凭什么确定这只是个花招？也许混乱的大脑中真的会发生这种事，这种想法打败了温斯顿。

奥伯里恩低头看着他，沉思着，更有了一种教师的气质，不辞劳苦地教育着任性却还有前途的孩子。

“有条党的标语专门讲述对过去的控制，”奥伯里恩说，“如果你知道，就跟我重复一下。”

“掌控过去的人掌控未来，掌控现在的人掌控过去。”温斯顿顺从地重复道。

“掌控现在的人掌控过去，”奥伯里恩重复了一遍，点点头，表示赞许，“温斯顿，那你是不是认为，过去真的存在？”

无助感再次袭来。温斯顿的眼睛盯着那个仪器，他不知道到底是肯定的答案还是否定的答案能让他免受苦楚，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

奥伯里恩微笑了一下，“温斯顿，你不懂形而上学，”他说，“直到现在，你都不知道存在的含义。我再说得明确一些。过去是具体地存在于空间中吗？有没有某个地方或者某个物质世界中仍有过去？”

“没有。”

“那过去存在于何处？”

“记录中。写下来的。”

“记录中。还有？”

“脑子里。在人的记忆里。”

“在记忆里。很好。但我们，也就是党，控制着所有记录，也控制着所有记忆，因此我们也控制着过去，对不对？”

“但你们如何阻止人们记住所发生的事？”温斯顿叫道，再次忘记了仪器的存在，“那是自然而然的，不由人控制的。你们怎么能控制记忆？你们还没控制我的记忆！”

奥伯里恩的态度又严厉起来。他把手放在了仪器上。

“恰好相反，”他说，“是你没有控制记忆，这就是你在这里的原因。你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你既不谦虚，也没有自律。服从是理智的行为，可你却没做到。你宁愿当一个疯子，当一个人的少数派。温斯顿，只有经过训练的大脑才能看到现实。你认为现实是客观的，是外界的，是独立存在的。你也认为现实的本质是自我彰显。你欺骗自己看到某种东西时，还假设所有人都看到了。但我告诉你，温斯顿，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只存在于人的头脑里。现实不是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党的头脑里，因为个人的头脑会犯错，且无论如何，很快就会消亡，但党的头脑则是集体性的，也是不朽的。党认为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除非站在党的角度，否则就看不到现实。温斯顿，这就是你要重新学习的事实。这要求你有自我毁灭的方式和意志上的努力。你得先谦虚，才能理智。”

奥伯里恩有一会儿没说话，仿佛等着温斯顿消化这番话。

“你记得吗？”奥伯里恩继续说，“你在日记中写过，‘自由就是能自由说出二加二等于四’。”

“记得。”温斯顿回答。

奥伯里恩举起左手，手背对着温斯顿，他伸出四根手指，把大拇指藏起来。

“这是几根手指，温斯顿？”

“四根。”

“如果党说这不是四根而是五根的话，你觉得这是几根？”

“四根。”

这两个字让他马上陷入了痛苦。仪器上的指针一下跳到了四十五。温斯顿出了一身汗。他用力吸气，呼气的时候则带着低沉的呻吟，咬紧牙关也抑制不住。奥伯里恩看着温斯顿，仍然伸出四根手指。他把控制杆往回移动了一点，稍微减轻了痛苦。

“温斯顿，几根手指？”

“四根。”

指针跳到了六十。

“四根！四根！还用说嘛？就是四根！”

指针肯定移动到了更高的刻度，但温斯顿没看到。他只能看见阴沉着的严肃脸庞和四根手指。那些手指像柱子一样戳在温斯顿眼前，巨大而模糊，虽然仿佛在摇摆，但就是四根没错。

“温斯顿，几根手指？”

“四根！快住手，住手！怎么还不停下！四根！四根！”

“温斯顿，几根手指？”

“五根！五根！”

“没用的，温斯顿。你在撒谎，你心里还是认为是四根手指。告诉我到底是几根？”

“四根！五根！四根！你说几根就是几根。赶紧停下，住手吧！”

突然，温斯顿靠着奥伯里恩揽住他肩头的手臂坐起来。也许他昏过去了几秒钟，绑着他的绳子松开了。温斯顿觉得很冷，不由自主地战栗，牙齿“咯噔咯噔”地响，眼泪顺着脸颊不住淌下。温斯顿像婴儿一样抱着奥伯里恩待了一会儿，奇怪的是，抱着他肩膀的结实手臂让温斯顿倍感安慰。他忽然觉得奥伯里恩在保护自己，而疼痛是别人施加给他的，奥伯里恩能让他免于受苦。

“你学得很慢。”奥伯里恩和蔼地说。

“我能怎么办？”温斯顿啼哭着说，“我怎么能对眼前的东西视而不见？二加二等于四。”

“温斯顿，有时候是这样。但有时候二加二等于五，或者等于三，或者三种答案都对。你一定要更努力，理智并不容易。”

奥伯里恩把温斯顿放回床上，再次绑紧他。但温斯顿已感觉不到疼痛，他也不再颤抖，只感到虚弱和寒冷。奥伯里恩向穿着白大褂的人点头示意，之前那个人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白大褂弯下腰，仔细查看温斯顿的眼睛，摸了摸他的脉搏，耳朵贴在他的心口，四处敲了敲后，朝奥伯里恩点了点头。

“再来一次。”奥伯里恩说。

温斯顿的身体再次感受到了疼痛，指针一定到了七十或者七十五。这次，温斯顿闭上了眼睛。他知道手指还在那里，也知道还是四根。重要的是不能死去，要坚持到疼痛结束。他没在意自己是否流泪了，疼痛减轻了一些，他睁开眼睛，奥伯里恩往回拉了拉控制杆。

“温斯顿，几根手指？”

“四根。我想是四根。如果是五根我就会看到五根，我正努力看到五根。”

“你想说什么？说服我你看到了五根还是你的确想看到五根？”

“的确想看到五根。”

“再来一次。”奥伯里恩说。

也许指针指向了八十，甚至就是。温斯顿根本不记得为什么会感到疼痛。他紧闭双眼，手指森林跳舞一般出现在眼前，一会儿重叠，一会儿又分开。这个压在那个上面，之后再次分离。温斯顿努力想数清楚，却不记得为什么要数清楚，只知道数清楚是不可能的，这也许就是四和五之间的神秘性。痛苦再次减轻。温斯顿再次睁开眼睛时，景象依然没有变化，数不清的手指像移动着的树木，朝着两个方向移动，交叉、分开。温斯顿又闭上了眼睛。

“温斯顿，我举着几根手指？”

“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再那么做我就死了。四根、五根、六根……真的不骗你，我不知道。”

“有进步。”奥伯里恩说。

一个针头刺进温斯顿的手臂。顿时，令人愉快且带有治愈性的温暖蔓延到了温斯顿全身。疼痛消失了一半。温斯顿睁开眼，感激地看着奥伯里恩。看到那张阴沉而布满皱纹，丑陋却十分睿智的脸，温斯顿的内心还是挣扎。如果温斯顿能够活动，他就会把手搭在奥伯里恩的胳膊上。仿佛他从未如此刻一般真挚地爱着奥伯里恩，而原因不仅仅是他终止了自己的疼痛。说到底，奥伯里恩是敌是友并不重要，旧的感觉回来了，奥伯里恩是可以谈心的人。也许比起被人疼爱，被人理解更为重要。奥伯里恩疯狂地折磨自己，显然很快就会把自己送上死路，但那并不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种感情超越了友谊，他们是至交。虽然无法吐露真言，但总有什么能让他们面对面交谈。奥伯里恩俯视着他，透露出深有同感的表情。他再次开口时，带着平易近人的谈话语气。

“温斯顿，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吗？”他问。

“不知道，但我猜是在仁爱部。”

“你知道自己到这儿多久了吗？”

“不知道，或许是几天、几周、几个月了，我觉得有几个月了。”

“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把人们带到这里？”

“让他们认罪。”

“错了，不是这个原因。你再想想。”

“惩罚他们。”

“也不对！”奥伯里恩大声说。他的声音变化很大，表情突然变得严厉而生动。“不对！不仅仅是为了拿到你的供词，也不是为了惩罚你。我告诉你为什么要带你过来，是为了治疗你！让你变得理智！所有人离

开时都已经被治好了，明白了吗，温斯顿？我们对你犯下的蠢事没兴趣。党对有意为之的行为没兴趣。我们只关心思想。我们不止消灭敌人，还要转化他们。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他朝温斯顿俯下身。由于距离很近，温斯顿觉得他的脸硕大无比，而由于是仰视，那张脸也显得极其丑陋。此外，那张脸上还洋溢着得意和狂热。温斯顿的心再次缩紧。如果有可能，他愿意更深地蜷缩在床上。他确定奥伯里恩会随心所欲地波动指针。但此时，奥伯里恩转过身，他走了几步，以略微平静的语气继续说：“你要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这里没有英雄。书本告诉你之前曾有过宗教迫害，中世纪还有宗教裁判所。那是个败笔。它本想消除异端邪说，结果却使之永恒。它想把每个异端分子烧死在十字架上，可一人倒下后，千千万万个人却站了起来。为什么？因为宗教裁判所公开杀死敌人，在敌人没有悔改之前就杀死了他们，因为他们不肯悔改。他们被杀是因为不肯放弃真正的信仰。因此，光荣自然属于殉难者，而羞耻则落在烧死他们的迫害者的肩头。20世纪，所谓的集权主义者出现了。他们是德国的纳粹分子以及苏联的共产主义者。俄国人对异端邪说的迫害比宗教迫害更为严苛。他们以为自己从宗教中汲取了教训，无论如何，他们知道绝不能出现殉难者。于是，公开审理受害者之前，他们先有意识地摧毁受害者的尊严，通过严刑拷打和单独禁闭，他们把受害者折磨成了摇尾乞怜的可怜虫，使受害者愿意承认任何罪行，愿意辱骂自己，也愿意攻击别人保全自己。但几年之后，历史再次重演，死去的人成了烈士，他们的可耻下场被人遗忘。再问一遍，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他们是被刑讯逼供的，我们不会犯这种错误。所有的供词都是真实的，我们想办法让供词是真实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允许死人站起来反抗。温斯顿，别以为后代能让你沉冤得雪。后代不会知道你这个人，你已经被抛出了历史的长河。我们将你化为气体，消失在虚无之中。你根本无迹可寻，登记簿上没有你的名字，人们也没有关于你的记忆。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你已经被消灭了，从未存在过。”

那拷打我是为了什么？温斯顿暗想着，感到一阵怨恨。奥伯里恩停下了脚步，好像温斯顿刚才把那个念头大声说出来了一样。他丑陋的大脸凑过来，眯起眼睛。

“你在想，”他说，“既然要彻底消灭你，让你的所说所做都无足轻重，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拷问你？你是在思考这个吧？”

“没错。”温斯顿回答。

奥伯里恩笑了一下。“温斯顿，你是整幅图景上的败笔，是必须抹去的污点。我刚才提到了吧？我们和之前的迫害者不同。我们不满足于消极服从，就算是最卑躬屈膝的服从也不行。你最终投降时，必须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我们不会因为异端分子的反抗而消灭他们，只要他们反抗，我们就绝不会消灭他。我们转化他们，控制他们的内在思想，重新塑造他们。我们铲除他头脑中的邪恶和幻觉，将他带到我们的阵营中。这不是表面功夫，而是让他全心全意地归顺。杀掉他之前，我们会把他转变为自己人。对我们来说，就算错误观念存在之处相当秘密，且它的力量相当微弱，只要它存在，就是不可容忍的。将死之人也一样，不能带着任何歪理邪说死去。过去，异教徒走向火刑柱时，仍是异教徒，他宣扬着异端邪说并因此洋洋自得。即使俄国大清洗出来的死刑犯也是一样，在走廊里等着被枪毙时，脑子里装着的还是反抗思想。然而，我们要在人们脑袋开花前将之变得完美。旧式专制主义的教条是‘你不得如此’，集权主义的命令是‘你必须如此’，我们的信念是‘你就是如此’。被带进这里的人最终绝不敢反对我们。每个人都被洗干净了。就连那三个你曾经信任的可怜叛国贼也是，我们最终还是把琼斯、阿伦森和卢瑟福打倒了。我自己也参加了审讯工作，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点点垮掉。他们呜咽着、爬着、哀求着，最后只剩下悔悟之心，而没有了痛苦或恐惧。审讯结束时，他们只剩下了一副躯壳。他们只有深深的懊悔和对老大哥浓浓的爱意。看到他们对老大哥的热爱，真是让人感动。他们乞求自己马上被枪决，这样死去的时候，思想依旧纯净。”

奥伯里恩几乎是在呓语，他的脸上仍挂着兴奋和狂热的神情。温斯顿认为，他不是装的，他不是伪君子，他对自己说的每个字深信不疑。最折磨温斯顿的是自己的智慧比不上奥伯里恩。温斯顿看着他庞大而优雅的身躯来回踱步，在自己的视线中来来去去。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奥伯里恩都要胜过自己。至于自己所有已经想到或者可能想到的念头，奥伯里恩都早已知晓，经过思考后都一一摒弃了。奥伯里恩的思想囊括了温斯顿的思想。既然如此，发疯的怎么可能是奥伯里恩？那么发疯的肯定就是温斯顿自己了。奥伯里恩停下脚步，俯视着温斯顿。他的声音又严厉起来。

“温斯顿，无论你向我们屈服得多么彻底，都别觉得能救自己的命。只要踏上迷途，就绝不能幸免。就算我们让你活到寿终正寝，你也逃脱不了我们的手掌心。这里发生的事永久存在。你最好提前搞明白，你再也没有重头来过的机会。就算你千岁万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仍是万劫不复的。你无法再拥有正常人的情感，内心的一切早已死掉。你无

法拥有爱和友谊，也无法感受生活的喜悦、笑声、好奇、勇气以及正直。你是空洞的。我们要把你榨干，再用我们自己把你填满。”

奥伯里恩没再说下去，而是跟白大褂打了个招呼。温斯顿明显觉得脑袋下面放了很重的仪器。奥伯里恩在床边坐下，这样他的脸就和温斯顿的脸差不多处在同一高度。

“三千。”奥伯里恩对温斯顿头顶那边的白大褂说。

两个微微湿润的软垫放在了温斯顿的太阳穴。温斯顿畏缩了。疼痛袭来，是另一种痛感。奥伯里恩伸出一只手，近乎慈祥地放在温斯顿的手上。

“这次不会疼的，”他说，“盯着我的眼睛。”

此时，毁灭性的爆炸发生了，或者说像是某种爆炸，但并不确定是否真的有什么声音。不过，一道炫目的强光的确划过了。温斯顿没觉得痛，只是感到自己被放平了。尽管他已经是仰卧着，但那件事发生时，他却奇怪地感到自己是被打成了现在的姿势。没有痛感的强烈打击让温斯顿平躺着，思维仿佛也受了某种影响。温斯顿的眼睛能重新看清东西时，他记起了自己是谁，记起了自己的处境，也认出了盯着自己的那张脸。可确实出现了大片空白，仿佛大脑一部分被取走了。

“一会儿就好了，”奥伯里恩说，“看着我的眼睛。大洋国到底是在跟谁打仗？”

温斯顿思考了一下。他知道大洋国是什么，也知道自己就是大洋国的公民。他还记得欧亚国和东亚国，但他不知道到底是跟哪个在打仗。实际上，他根本不知道战争这回事。

“我想不起来了。”

“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记住了吗？”

“记住了。”

“大洋国一直跟东亚国打仗，从你出生、从党建立、从历史起点开始就是如此，战争持续不断，从未改变。记住了吗？”

“记住了。”

“十一年前，你编造了有关三个因叛国罪而被处死的人的传奇故事，你以为自己看到了能证明他们无辜的剪报。但其实那并不存在，是你虚构的，但你逐渐信以为真。你现在还记得当初编造这个谎言的时刻。记住了吗？”

“记住了。”

“刚才我朝你伸出了手指，你看到了五根手指。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奥伯里恩伸出左手，拇指弯着。

“这是五根手指。你是不是看到了五根手指？”

“是的。”

的确，思维改变前的一瞬间，温斯顿确实看到了。他看到了五根手指，而且并没有畸形。接着，一切恢复了常态，过去那种空虚、那种憎恨还有迷惑接踵而至。但有一刻，奥伯里恩的新说法填补了那一大片空白，成了绝对真理，如有需要，二加二既可以等于三，也可以等于五，至于那一刻有多久，温斯顿也不知道，也许有三十秒，但那三十秒里，一切都清晰明白。奥伯里恩的手刚放下，一切就消失了，尽管温斯顿无法重现那一刻，但仍记得。正如一个人过去的某段生活鲜活地出现在眼前，可人却完全不同了。

“你看到了，”奥伯里恩说，“无论如何，这是有可能的。”

“没错。”温斯顿回答。

奥伯里恩带着一种满足感站起来。温斯顿看到站在奥伯里恩左边的白大褂打开一管针剂，抽了一管。奥伯里恩面带笑容，转向温斯顿，用几乎和从前一样的方式，扶了扶架在鼻子上的眼镜。

“你日记里写过，”他说，“我是敌是友并不重要，至少我理解你，能和你谈心，你还记得吗？你写得没错。我喜欢和你聊天，你的想法很吸引我，我对你的思维很感兴趣，跟我的差不多，只不过你已经疯了。

我们结束这次谈话前，你可以随意问我问题。”

“什么问题都可以？”

“什么问题都可以。”奥伯里恩看温斯顿瞟了一眼仪器，“我已经把它关了。你想先问什么？”

“你们把茱莉亚怎么样了？”

奥伯里恩微笑了。“温斯顿，她背叛了你，迅速而决绝。我从没见过那么快就投降的人。你再见到她可能也会认不出来。她的反叛、欺骗之心、愚蠢还有污秽的思想都已经被彻底清除干净了。那是非常完美的转变，是应该写进教科书的那种。”

“你们拷打过她吗？”

奥伯里恩没有回答。“下一个问题。”他说。

“老大哥真的存在吗？”

“当然，党是存在的，老大哥是党的化身。”

“他是像我一样存在的吗？”

“你并不存在。”奥伯里恩回答。

无助感再次占领了温斯顿。他知道，或者说能想象到证明自己不存在的理由，但那都是无中生有，是文字游戏。“你不存在”这种说法不也包含了逻辑上的荒谬吗？但说出来又有什么用？想到奥伯里恩用来驳倒他的疯狂理由，温斯顿觉得束手无策。

“我想我是存在的，”温斯顿无精打采地说，“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我曾出生，将会死去。我有胳膊有腿，占据着宇宙中某个特定的位置，并不与其他个体重合。从这种意义上说，老大哥真的存在吗？”

“这并不重要。他的确存在。”

“老大哥会死吗？”

“当然不会，老大哥怎么会死？下一个问题。”

“兄弟会存在吗？”

“温斯顿，这一点你永远无法知道。就算审讯完放了你，而你也活了九十岁，你仍然无法知道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只要你活着，这就是你头脑里永远的谜。”

温斯顿沉默地躺着，他的胸脯急促地起伏着。他还是没问出第一个想到的问题。他一定要问，但他仿佛说不出来。奥伯里恩脸上有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就连他的眼镜都反射着嘲弄的光。温斯顿突然明白了，奥伯里恩知道，他知道温斯顿要问什么！想到这里，那个问题脱口而出：“101号房间里有什么？”

奥伯里恩脸上的表情丝毫没变。他冷冷地回答：“温斯顿，你知道101房间里有什么。每个人都知道101房间里有什么。”

说完，奥伯里恩朝白大褂举起一根手指。显然，这次对话结束了。针头扎进温斯顿的胳膊，他很快就昏睡过去了。

第三章

奥伯里恩说：“你的改造分为三个阶段，学习、理解和接受。现在是第二个阶段。”

和之前一样，温斯顿平躺着。但最近绑得没那么紧了。他们还是会把温斯顿绑在床上，但他能稍微活动膝盖，也能左右转动头部，还能抬起小臂。一切都没那么可怕了。如果温斯顿够机智，就能免遭痛苦。只有温斯顿反应迟钝时，奥伯里恩才会扳动控制杆。有时，整个谈话过程中，都没有用过一次仪器。温斯顿不记得谈话进行了多少次，整个过程似乎拉长了，难以估计，可能是几个星期吧。谈话间隔有时可能是几天，有时则是一两个小时。

“你躺着的时候，”奥伯里恩说，“经常想那个你曾经问过我的问题：为什么仁爱部要在你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你被释放之后，困扰你的基本也就是这个同样的问题。你理解社会的运行机制，却不明白潜藏的动机。记得吗？你日记中写过‘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你想到‘为什么’时就会怀疑自己的神智。你读了那本书，就是古登斯坦的书，至少读了一部分。它告诉了你之前不知道的东西了吗？”

“你读过吗？”温斯顿问。

“就是我写的，意思是我参与了书的写作。你也知道，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完成一本书。”

“书里说的都对吗？”

“作为描述来说是对的，而列出的计划则是胡说。认知的秘密积累——启蒙范围的逐渐扩大——群众最终的造反——党的统治的推翻。你自己也知道书会这么写。这全是胡说。群众永远不会造反，再过上千年万年也不会。他们没这个能力。我早就告诉过你原因，你早就清楚了。如果你曾怀有暴力反抗的梦想，还是趁早放弃的好。党无法被推翻，党的统治永久长存，要把这个当作你思考的出发点。”

奥伯里恩朝床又走了几步，“永远如此！”他重复道，“现在回到‘怎

么做’和‘为什么’的问题上。你清楚地知道党如何维系权力。现在，告诉我，为什么要紧紧抓住权力？我们的动机是什么？”见温斯顿没有开口，奥伯里恩又加了一句：“好了，说说看。”

但温斯顿还是有一阵没说话，疲惫感奔涌而来。奥伯里恩的脸上隐隐透出狂热的神情，他早就知道奥伯里恩要他说什么，党之所以要掌权，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了大多数人。党要掌权是因为群众意志薄弱，胆怯庸懦，无法忍受自由，也无法面对事实，必须被更强大的人统治，也必须被更强大的人有系统地欺骗。人类面临着两种选择——自由或幸福。对大多数而言，选择幸福比较好。此外，党永远保护弱者，具有献身精神，为了美好的未来可以作恶，可以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的幸福。温斯顿想，可怕之处在于奥伯里恩说到这些的时候，他自己是相信的。这一点从他的表情就可以判断出来。奥伯里恩无所不知，他对世界真相的理解比温斯顿透彻一千倍，也就是他明白大多数人的生活穷困潦倒，也明白党为了让人们忍耐而采取的谎言和暴行。奥伯里恩一清二楚，也盘算过，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这些都因最终的目的而变得正当。温斯顿心里想着，面对比自己聪明的疯子又能怎么办？他认真听取你的观点，却仍然坚持自己的疯狂。

“你们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统治，”温斯顿有气无力地回答，“你们认为人类不适合管理自己，于是……”

还没说完，温斯顿就差点大叫出来。剧痛刺穿了身体，奥伯里恩把控制杆推到了三十五的位置。

“温斯顿，你说的都是蠢话，愚蠢之极！”他说，“你知道自己不该说这种话！”

他把控制杆扳回来，继续说：“我来告诉你答案，是这样的，党之所以掌权，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我们对别人的幸福不感兴趣，只对权力感兴趣。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财富、奢华、长寿或者幸福，只是权力，纯粹的权力。你很快就会知道什么是纯粹的权力。我们跟寡头统治者不一样，我们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其他和我们类似的人，不过是懦夫和伪君子。德国纳粹分子和俄国共产主义者运用的统治手段和我们的很像，但他们永远没有勇气承认。他们假装自己不情愿地取得了权力，而且只在有限的时间里，不远的将来，人人自由而平等的天堂将会出现，或许他们是自己相信的。我们不一样，我们知道，取得权力不是为了放弃。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一个人不会为了保卫革命而建立

独裁政权，可一个人则会为了独裁政权的建立而革命。迫害的本质就是迫害，权力的本质就是权力。你开始明白了吧？”

如之前发生过的，温斯顿又被奥伯里恩脸上的疲惫神情打动了。那张脸坚强、鲜活而残酷，充满智慧和某种被抑制的热情，这张脸让温斯顿感到无助，但那也是一张写满疲惫的脸，眼睛下方有眼袋，而颧骨处的皮肤也已松弛。奥伯里恩探向温斯顿，有意将充满疲倦神色的脸靠近他。

“你在想，”他说，“我的脸衰老疲惫。你在想我可以对权力高谈阔论，却无法阻止身体的衰败。温斯顿，你难道不明白吗？一个人只是一个细胞，只有细胞的疲惫才能造就机体的活力。你给自己剪指甲时会死吗？”

他从床边转身走开，再次来回踱步，一只手插在口袋里。

“我们是权力的牧师，”他说，“上帝就是权力。不过目前对你来说，权力仅仅是个词语。现在，你应该对权力的含义有所了解。首先你必须意识到，权力是集体的。个人只有在不是个人时才能获得权力。你知道党有一句口号是‘自由就是奴役’。你想过没有，这句口号可以颠倒——奴役就是自由。一个人独处之刻就是自由之时，也最容易被打败。这是必然的，因为每个人注定都会死，这是最大的失败。但如果他能做到完全彻底的服从，如果他能摆脱个体身份，如果他能融入党，那他就是党，无所不能，亘古长存。你必须明白的第二件事是权力是施加于人的权力，施加于身体的权力，但最重要的是施加于思想的权力。施加于你们所说的外部现实的权力并不重要。我们对物质有绝对控制。”

温斯顿暂时忘了仪器。他极力想坐起来，却只是感到体内一阵痛苦。

“那你们如何控制物质？”温斯顿马上说了出来，“你们甚至不能控制期货或者重力定律，也控制不了疾病、痛苦、死亡……”

奥伯里恩做了个手势，让他住口，“我们通过控制思想而控制物质，现实是装在脑子里的。温斯顿，你慢慢就知道了。我们能做到所有事——隐身、升空——所有事。如果我想如肥皂泡一样漂浮于地板之上，我就能做到。但我不想这样，因为党不想这样。你一定要摒弃那些19世纪时关于自然法则的思想。自然法则是我们规定的。”

“可你们并没有！你们不是星球的主宰。就说欧亚国和东亚国吧，你们连它们都还没征服。”

“无关紧要。时机合适我们就会征服它们。就算没有，又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让它们不复存在，大洋国就是整个世界。”

“可世界本身是一粒尘埃。人生来如此渺小，无依无靠。人类出现才多久？有几百万年，地球上根本没有人类。”

“胡说。地球与人类同时出现，绝不比人类更古老。地球怎么可能更古老？除非经由人的意识，否则一切皆不存在。”

“可石头里都是已经灭绝的动物的骨头，有猛犸象的、乳齿象的，还有大型爬行动物的。人类出现很久之前，这些动物就出现了。”

“温斯顿，你见过那些骨头吗？当然没有，那是19世纪的考古学家杜撰的。人类出现之前一无所有，假设人类也将灭绝，那么人类之后也将一无所有。除了人类，什么都没有。”

“但整个宇宙都在我们之外。看那些星星！有的远在几百万光年之外，永远不可触及。”

“什么是星星？”奥伯里恩漠不关心地问，“那不过是几公里之外的火光。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到达，或者说可以让它们消失。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和星星围绕地球转动。”

温斯顿又挣扎了一下，这次他什么都没说。奥伯里恩继续说，仿佛在回答对方提出的反对意见：“当然，为了特定目的，这话就不是真的。我们在海上航行或者预测日食月食的时候，假设地球围绕太阳转动而星星远在亿万公里之外更容易理解。但那又如何？你觉得我们创造不了天文学的双重体系吗？星星或远或近，要看我们的需要。你以为数学家做不到吗？你忘记双向思维了吗？”

温斯顿在床上瑟缩了一下。不管自己说什么，信手拈来的回答都仿佛是当头一棒。他知道，自己是正确的。至于那种头脑之外别无他物的信念肯定能有某种方式证明其错误吧？很久以前不就已经证明那是谬论了吗？它甚至有个名字，不过温斯顿忘记了。奥伯里恩俯视着他，嘴角挂着一抹淡淡的笑意。

“温斯顿，我说过，”奥伯里恩开口了，“形而上学不是你的专长。你想说的词是唯我论，但你错了。这不是唯我论。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集体唯我论。然而，二者并不相同，事实上还相互对立。这都是题外话了，”奥伯里恩换了种腔调说，“真正的权力，也就是我们日夜为之奋斗的权力，不是施加于实体的，而是施加于人的。”他停顿了一下，有一瞬间又回到了老师向尚有前途的学生提问的样子，“温斯顿，一个人怎么将权力施加于另一个人？”

温斯顿想了想，说：“通过折磨他。”

“完全没错，就是折磨他。顺从是不够的。如果不折磨他，怎么知道他服从的是你的意愿而不是自己的？权力存在于痛楚和羞辱中。权力就是撕碎人的思维再重新拼凑成新的模样。这样，你有没有明白我们正在创造怎样的世界？我们创造的与之前改革家们设想的愚蠢的享乐主义乌托邦刚好相反。我们创造的是充满恐惧、背叛、痛苦的世界，是一个践踏和被践踏的世界，是一个随着自身的完善而愈加残忍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的进步是发展更多的痛苦。旧式文明宣称友爱和正义是其赖以建立的基础，而我们的文明则是建立在仇恨之上。在我们的世界中，除了恐惧、愤怒、狂喜和自卑外，没有任何情绪。我们会摧毁一切，摧毁所有。我们已经打破了革命之前遗留下来的思维习惯，也切断了父母子女之间、男人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情感联系。再没有人敢信任妻子、孩子或者朋友了。而将来也不会再有妻子和朋友。孩子们刚出生就会被带离母亲身边，就像把鸡蛋从母鸡身边拿走一样。性本能将被永远根除。生育将像更新定量供给卡一样成为一年一度的例行手续。我们还会废止性高潮。这一点，神经学家正在研究。人们只能对党尽忠，只能热爱老大哥。除了打败敌人后的欢笑不会有别的笑声。没有艺术，没有文学，也没有科学。我们无所不能后，就不再需要科学了。美丑的界限不复存在，好奇心和生命中的乐趣也会消失，其他快乐的感觉也会被摧毁。但是，温斯顿，你不要忘记，始终都要记得，对权力的沉醉永远存在，不断增强，也越来越微妙。胜利带来的激动和践踏手无寸铁的敌人带来的激动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如果你想知道未来的图景，就想象皮靴踩在人脸上的感觉吧。这一切颠扑不破。”

他停下来，等着温斯顿开口。温斯顿在床上缩得更紧了。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他的心仿佛凝固了。奥伯里恩继续说：“记住，这一切颠扑不破。永远有可以践踏的脸庞。异端分子和社会敌人总会存在，因此总可以被反复击倒、羞辱。你落入我们手中经历过的所有事都将一如既

往，也会越来越残酷。侦察、背叛、逮捕、折磨、处决和失踪永远不会停歇。这个世界既充满恐惧，也充满狂喜。党越强大，容忍度就越小；反抗越弱，专制就越严厉。古登斯坦和他的歪理邪说将永远存在，每一天，每一刻，这些都将被打败、被怀疑、被嘲笑、被唾弃，但仍旧存在。过去七年里，我和你之间上演的把戏将会代代上演，反复无穷，只是形式上越来越微妙。我们手中总有可以随意摆布的异端分子，他们因疼痛而尖叫、崩溃、变得卑鄙，最终则会幡然悔悟，从自我中得到拯救，匍匐在我们脚下。温斯顿，这就是我们正在建设的世界。一场接一场的胜利，一次又一次的狂喜，对权力的神经进行无穷无尽、没完没了地压迫。我看得出，你已经开始渐渐了解这个世界，但最后你不止会了解它，还会接受它，欢迎它，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温斯顿恢复了一些，能说话了，“你们做不到。”他虚弱地说。

“温斯顿，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创造不出你刚才描述的世界。那是个梦，不可能实现。”

“为什么？”

“文明不可能以恐惧、仇恨和残忍为基础。这是不可忍受的。”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它没有活力。它会自行瓦解，会自行毁灭。”

“胡说。你觉得仇恨比爱更消磨心志，为什么会这样？即使如此，又有什么关系？假设我们选择更快衰退，假设我们加速了人的生命进程，三十岁就开始衰老。然而，那又怎样？你难道不明白？个人的死亡不是死亡，党才是永生的。”

像之前一样，奥伯里恩的话将温斯顿打入了无助的深渊。此外，他非常担心，固执己见会促使奥伯里恩扳动控制杆。但他不得不说话，于是便萎靡不振地反驳起来，没有争辩，也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只有对奥伯里恩所说之言的极端厌恶。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反正你们不会成功的，总有东西能打败你们。生活会打败你们。”

“温斯顿，我们控制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幻想的那种人性，会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愤慨，因而反对我们。但人性是我们创造的，人的可塑性难以想象。也许你又会觉得群众或者奴隶会站起来推翻我们。赶紧忘了吧。他们就像动物，没什么办法。人性就是党，其他都是外在的、毫不相干的。”

“我不管，最终他们将打败你们。迟早他们将看清你们的真面目，之后就会把你们撕成碎片。”

“你有什么证据佐证吗？或者有什么理由吗？”

“没有，我相信这一点。我知道你们终将失败。宇宙中的某种东西你们无法逾越，我不知道是什么，也许是某种精神，也许是某种原则。”

“温斯顿，你相信上帝吗？”

“不相信。”

“那么打破我们的会是什么原则？”

“我不知道。人类精神。”

“你认为自己是人吗？”

“是的。”

“温斯顿，如果你是人，那你就是最后一个人了。你的种族已经灭绝，我们是继任者。你不明白吗？你已经孤立无援，游离在历史之外，不复存在。”奥伯里恩的举止有了变化，语气也更严苛，“你以为，就因为我们会说谎，而且残忍，你就在道德上高我们一等吗？”

“对，我觉得自己比你们优越。”

奥伯里恩没有说话。这时，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传来了。一会儿，温斯顿就认出了自己的声音，是他报名加入兄弟会那晚与奥伯里恩的交谈。他听到自己保证会撒谎，盗窃，造假，杀人，鼓励人吸毒卖淫，传播性病，朝小孩脸上泼硫酸等。奥伯里恩不耐烦地比划了一下，仿佛这番演示没什么必要。他扭动了一个按钮，声音就停止了。

“下床。”奥伯里恩说。

温斯顿身上的束缚自动松开，温斯顿走下床，左摇右晃地站在地板上。

“你是最后一个人了，”奥伯里恩说，“你是人类精神的守护者，你会看到自己真实的模样。脱掉衣服。”

温斯顿解开把工作服束在一起的细带子。拉链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温斯顿不记得被捕以来自己有没有脱过衣服。工作服里面挂着肮脏的破布，黄乎乎的，勉强能看出是残存的内衣。温斯顿脱衣服时，注意到房间那头有分成三面的镜子。他朝镜子走去，突然停下，禁不住大哭起来。

“继续走，”奥伯里恩说，“站在镜子面前，看看你自己的侧面。”

温斯顿之所以停下脚步，是因为被吓坏了。镜子中，一个驼着背、面色苍白、貌若骷髅的东西正朝他走来。温斯顿知道那是自己，他恐惧的不是这个，而是那个东西的实际外表。温斯顿又向前走了走，由于那个怪物弯腰驼背，所以脸也向前突出。那是囚犯绝望的脸，宽阔的前额后是光秃秃的头顶，他的鼻子是鹰钩鼻，颧骨仿佛被打过一般，而颧骨之上则是凶狠而警觉的眼睛。那张脸上布满皱纹，嘴巴也凹了进去。显然，那是温斯顿自己的脸。但在温斯顿看来，与内心相比，脸部变化更多。他自己感受到的与脸上的表情很不一样。温斯顿已经部分谢顶，他开始以为自己已经变得苍白，但只是头皮变白了而已。可除了手和脸，他浑身上下都是苍白的，布满陈年污垢，污垢下面则是红色疤痕。脚踝附近的静脉曲张已经红肿溃烂，皮屑一直脱落。但真正吓人的是他身体的消瘦程度。他的上身俨然一副骷髅模样，腿部萎缩得不成样子，膝盖比大腿还粗。这时，温斯顿也明白了奥伯里恩为什么要让自己看看侧面，脊椎的弯曲程度让人震惊，瘦削的肩膀向前窝着，凹着胸腔。而皮包骨头的脖子似乎不堪头颅的重量，要折了一般。如果让他猜测，他会说这个人已经六十岁了，而且患上了不治之症。

“你有时候会想，”奥伯里恩开口了，“我一个核心党党员的脸看上去衰老而疲惫。你觉得自己的脸如何？”

他抓住温斯顿的肩膀，让他面向自己。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奥伯里恩说，“看看你浑身上下的污垢，看看你脚趾缝的灰尘，看看你腿上恶心的溃疡。你知道吗？你身上臭得像只猪。也许你已经不在意了。看看你的憔悴样子。看到了吗？我一只手就能握住你的胳膊，还能像掰断萝卜一样弄断你的脖子。你知道吗？落到我们手里之后，你已经瘦了二十五公斤，就连头发也是一把一把地掉。你看！”说着，他就从温斯顿头上扯下了几缕头发，“张开嘴，九、十、十一，还剩下十一颗牙齿。你到这儿的时候有几颗？就连这几颗也待不了多久了。你看！”

奥伯里恩用有力的拇指和食指抓住温斯顿最后一颗门牙。温斯顿的上颌感到一阵刺痛，奥伯里恩把那颗松动的牙齿拽下来，扔到了牢房那头。

“你正逐渐腐烂，”奥伯里恩说，“你正变成碎片。你是什么？一袋垃圾。转过去看着镜子。看见面前的东西了吗？那就是最后一个人。如果你是人，那这就是人性。穿上衣服吧。”

温斯顿僵硬地穿上衣服。他自始至终都没想到自己会如此瘦弱。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落入狼窝的时间比自己想象得更久。穿上破烂不堪的衣服后，温斯顿为自己被践踏的身体感到悲哀，突然跌倒在床边的凳子上嚎啕大哭起来。他知道自己丑陋不堪，不过是裹在破布里的骨头，正在刺眼的白色灯光下哭泣，但他控制不住。奥伯里恩把手搭在他肩上，近乎仁慈。

“不会太久了，”奥伯里恩说，“你可以选择什么时候结束。一切都取决于你。”

“是你！”温斯顿哽咽着，“是你把我害成了这幅样子！”

“不，温斯顿，是你自己。这是你决心与党对抗时就已经接受的，第一步行动就预示着这样，你已经预见了所有会发生的事。”

奥伯里恩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们打败了你，温斯顿，我们把你打垮了。你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身体，而你的思想也没什么差别，你已经没什么自尊了。你经历了拳打脚踢、侮辱谩骂。你因疼痛而尖叫，还滚过地板上自己的血迹和呕吐物。你哀求告饶过，背叛了所有的人和事。你想想，哪件丢脸的事是你没做过的？”

温斯顿不再出声，只是眼泪还在不停向外涌着。他抬头看着奥伯里恩。

“我没有背叛茱莉亚。”他回答。

奥伯里恩带着沉思的表情，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没有，”他说，“没有，的确没有，你没有背叛茱莉亚。”

温斯顿的心里萌生了对奥伯里恩的奇特敬意，仿佛一切都摧毁不了。温斯顿想到，真有智慧，太有智慧了！奥伯里恩理解他所有的话。而世界上其他人都会马上说他已经背叛了茱莉亚。严刑拷打之下，还有什么是他没坦白过的呢？温斯顿说出了茱莉亚的一切，她的习惯、性格、过去的生活。温斯顿事无巨细地坦白了他们每次见面时发生的一切，包括所有的对话，在黑市上吃过的餐点，他们之间的奸情，针对党而制定的模糊计划，方方面面。但从那个词的本意上看，温斯顿并没有背叛茱莉亚。温斯顿没有停止爱她，对她的感情没有改变。奥伯里恩不需要他解释，就明白了温斯顿的意思。

“告诉我，”温斯顿问，“他们还有多久才会枪毙我？”

“可能会很久，”奥伯里恩说，“你的情况比较棘手。但不要放弃希望，每个人迟早都会痊愈，最后才会被枪毙。”

第四章

温斯顿好多了。如果“每天”这个词还能用来形容时光，那么他每天都在长胖，也每天都变得更强壮。

白色光线和嗡嗡的声音一如既往，但牢房比其他温斯顿待过的都要舒适一些。木板床上放着枕头和床垫，牢房里还有一把可以坐的椅子。他们让温斯顿洗了个澡，还允许他能经常在锡盆里洗澡，甚至还供应洗澡的热水。他们给了温斯顿新的内衣和一套干净的工作服，给他静脉曲张的溃疡处涂上镇痛的药膏，还把他剩下的牙齿拔掉后配了套假牙。

肯定又过去了几星期或者几个月。如果温斯顿仍有兴趣，还是能计算时间的，因为三餐都是按正常时间送来的。据他判断，自己每二十四小时会吃三顿饭。有时候，温斯顿会琢磨那几顿饭是白天送来还是晚上送来的。食物相当美味，每三顿就能吃到一次肉，有次他还得到了一盒香烟。温斯顿没有火柴，而那个从不说话的看守则会给他点火。第一次抽烟时，温斯顿觉得有点恶心，不过他坚持下来了。他每餐之后抽半根，这盒烟抽了好久。

他们还给了温斯顿一个白色记事板，记事板一角还绑着个铅笔头。开始，温斯顿没怎么用它。因为就算睡醒了，他也根本不想动。两顿饭的间隔，温斯顿都一动不动地躺着，有时在睡觉，有时则会迷迷糊糊地乱想，不愿睁眼。温斯顿早就习惯伴着强烈的白光睡觉，仿佛毫不在意，但他的梦更连贯了。这段时间，温斯顿做了很多梦，而且总是愉快的梦。他不是在黄金乡，就是和母亲、茱莉亚还有奥伯里恩一起坐在广袤无垠、环境适宜、阳光遍布的废墟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家常。睡醒后，温斯顿总在想自己的梦，没有了疼痛的刺激，他仿佛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但温斯顿并不无聊，他不想说话，也不想分心。在房间里独处，没有殴打，没有审讯，有足够的食物，而且全身上下都干干净净的，就让人非常满足了。

渐渐地，温斯顿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但他仍不想起床。他只想静静躺着，感受能量在身体里汇集。他会戳戳自己，想确定肌肉愈发结实而皮肤愈发紧绷并不是幻觉。最后，确定无疑的是，他正在长胖，大腿

也比膝盖粗了。之后，温斯顿还是定期锻炼。开始他并不愿意锻炼，不过很快就能连续走上三公里了。那是通过在牢房里计步得到的结果。他内扣的肩膀也挺直了一些。温斯顿想做些更复杂的动作，却做不到，这让他觉得既震惊又羞愧。温斯顿只能走，跑不起来，也举不起凳子。每当他想单腿站立，就肯定会跌倒。他试着蹲下去，可每次大腿和小腿上钻心的痛都让他不得不赶紧站起来。温斯顿趴在床上，想靠双手撑起身体，可他根本做不到，一厘米都不行。但几天过后，吃了几天正常饭后，他竟能做到了。最后竟能一口气做六次。温斯顿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很自豪，而且他经常想，自己的脸也会恢复成原来的模样。只有他不经意间碰到光秃秃的头皮时，才会想起镜子中曾经布满皱纹、饱受折磨的脸。

温斯顿的思维逐渐活跃。他坐在木板床上，靠着墙，写字板就放在膝盖上。温斯顿开始工作，有意识地重新教育自己。

他投降了，这一点已得到认同。实际上，他现在觉得在这个决定做出前很久，他就已经准备投降了。没错，从他踏进仁爱部，甚至是他和茱莉亚听从电屏背后冷冰冰的命令而不知所措地站着时，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反抗党的权力不过是螳臂挡车。他现在明白了，七年来，思想警察一直监视着自己，而他就像放大镜下的甲壳虫，所有动作、低语都在他们的监视下，所有的思维也都在他们的猜测中。就连他日记本上那粒白色的灰尘也被小心地替换了。他们给温斯顿播放过音频，展示过照片，有的是与茱莉亚的合照，有的是他的单人照。没错，甚至还有……温斯顿不能再和党作对了。而且，党是对的，一定是这样。不朽的集体主义头脑怎么会出错？有什么外部标准能佐证你的判断？理智是统计学上的概念，只是要学会他们的思考方式而已。不过……！

温斯顿握着前臂，觉得又粗又不好用。他开始记下自己想到的东西，他先用歪歪扭扭的粗体字写下了这几个字：

自由就是奴役

接着，他没停顿，又写了六个字：

二加二等于五

但之后他停了下来，仿佛大脑在躲避什么，无法集中思想。他知道自己之后还想写些什么，只是提笔忘字，想不起来了。他终于记起来

后，发现那不是自然出现的，而是通过有意识的推理得来的。温斯顿写道：

上帝就是权力

温斯顿接受了所有，过去可以更改，过去从未被更改。大洋国当时是与东亚国打仗，大洋国一直在跟东亚国打仗。琼斯、阿伦森和卢瑟福罪有应得。他从未见过证明他们清白的照片，那张照片从未存在，是他编的。温斯顿记得自己曾记住相反的事情，但那是错误的，是自我欺骗的产物。竟然如此简单！只要投降，一切都很自然。如同逆水游泳，无论怎样用力都无法前进，但突然你就决定要顺流而下而非逆流而上了。只有你自己的态度变了，但命中注定的总会发生。温斯顿不知道自己为何曾反抗。一切都很容易，除了……！

任何东西都可能正确，所谓的自然规律不过是胡说，重力定律也是胡说。奥伯里恩曾说：“如果我想如肥皂泡一样漂浮于地板之上，我就能做到。”温斯顿领悟到了：如果他认为自己漂浮于地板之上，而我同时也认为自己看到了他那样做，那么这件事就发生了。突然，像原来被淹没的巨石突然露出水面，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在温斯顿的脑海：那不是真的发生，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是幻觉。温斯顿马上遏止住这个想法，它的荒谬显而易见。它假设个人之外的某处存在着“真实的”世界，其中发生着“真实的”事情。但怎么可能有那个世界？除了自己的头脑，我们哪里知道别的知识？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的头脑中，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就都是真实发生的。

温斯顿毫不费力地驳倒了这个谬论，而且他根本没有屈服，但他仍意识到自己根本不该有这种念头。危险思想崭露头角时，大脑应该产生一个盲点，这一过程应该是自动的，是本能的，新话称之为“罪止”。

温斯顿开始锻炼自己学习罪止，他给自己命题——“党说地球是平坦的”“党说冰比水重”——然后训练自己，遇到与上述观点矛盾的，就强迫自己视而不见或是迷惑不解。这并不容易，需要很强的推理和即兴反应能力。例如，“二加二等于五”这一说法引出的算数问题还未被温斯顿掌握。罪止还要求大脑进行类似体育运动的活动，这一秒能运用最缜密的逻辑，下一秒就变得看不出最明显的逻辑谬误。愚蠢和智慧同样必要，而这也难以学习。

与此同时，温斯顿也在思考自己还能活多久。“一切都取决于你自

己”，奥伯里恩曾经这样说过，但温斯顿知道有意识的行为无法让那一刻提前到来。枪毙可能发生在十分钟之后，也可能是十年之后。他们可能把自己一个人独自关上好几年，也有可能把他送到劳改营，偶尔也会释放他一段时间。而被枪毙之前，他被捕和被审讯的完整过程完全有可能重新上演。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死亡总在不经意间到来。传统，那个不言而喻的传统是，尽管你从未听说过，但你总是知道，他们会从背后枪毙你，子弹总会打入后脑，没有警告，就在你沿着走廊，从一间囚室走到另一间囚室时，死亡就到来了。

某天，但“某天”并不是正确的表达，因为这件事可能会发生在深夜。曾经，他陷入了奇特而愉快的幻想之中，他正沿着走廊往前走，等着那一刻到来。他知道子弹下一刻就将到来。一切都得以解决、消除、和解，疑惑、争辩、痛楚和恐惧都会消失不见。他的身体健康而强壮，他轻快地走着，因运动而快乐，仿佛走在阳光下。他已不在仁爱部窄窄的白色走廊中，而是在充满阳光的通道里，有一公里宽。他仿佛由于药物作用而处于极度兴奋之中。他在黄金乡，沿着小径，走过野兔啃噬过的草场。他能感觉到脚下松软的草皮和脸上河西的阳光。草场边缘竖立着榆树，微微颤动，而草场另外一边的某处则有溪水流过，雅罗鱼在柳树下的绿色池塘中悠闲自得地游曳。

突然，他变得异常惊恐，脊背直冒汗。他听到自己大声喊：“茱莉亚！茱莉亚！茱莉亚，我的爱人！茱莉亚！”

有一会儿，茱莉亚就在身边的幻觉非常强烈，仿佛茱莉亚不在面前，而是在他身体里，渗入了他的皮肤肌理中。那一刻，他对茱莉亚的爱比他们自由地在一起时更强烈。他也知道在某个地方，茱莉亚仍然活着，需要自己的帮助。

温斯顿躺回床上，试图镇定下来。自己做了什么？一时的软弱会让他的苦役生涯增加多少年？

又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外面传来皮靴声。这种发作必然会被惩罚。如果他们之前不知道，现在也知道了，温斯顿刚刚破坏了双方的协议。他服从于党，但仍旧憎恨党。过去，他将异端情绪隐藏在顺从的外表下，现在他又倒退了，大脑已经投降，但他希望自己内心深处依然如故。温斯顿知道自己错了，但他宁愿做错。他们会明白的，也就是奥伯里恩会明白的，愚蠢的喊声中坦白了所有。

他得从头经历一遍，可能得花上几年。他抚摸着自己的脸，想熟悉自己的新面孔。脸颊上有深深的凹陷，颧骨很尖，鼻子则变平了。此外，自从上次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模样后，温斯顿就得到了一套新假牙。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长相，就很难保持不可思议的表情。无论如何，仅仅控制表情是不够的。温斯顿第一次明白了，想要保住秘密，也必须对自己隐瞒秘密。你必须一直知道它就在那里，但不必要时决不能让它以任何可以被冠名的形式出现在你的意识中。从现在开始，他不仅必须做到思想正确，也要做到感觉正确，梦境正确。同时，仇恨必须封锁在他的体内，就像有形的球体，如囊肿一般，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也与其他各部分没有关系。

有一天，他们会决定枪毙自己。枪毙的时间不得而知，但可以提前几秒猜到。走在走廊上时从后面开枪，十秒钟就够了。那时，他的五脏六腑会翻来覆去。接着，突然之间，不必开口，不必停止，也不必改变表情，伪装一下就消失了。接着，“砰！”仇恨的战争打响了，仇恨的烈焰在他体内燃烧，而几乎就在那一刹那，子弹也会“砰”的一声射出，太晚了，或者是太早了。他们在没有成功改造他之前就把他的脑袋打开了花。异端邪说没有受到惩罚，没有得到悔改，且已永远无法碰触。他们这样等于是向自己的完美开了枪。自由就是死的时候依旧带着对他们的仇恨。

温斯顿闭上眼睛。这比接受思维准则还难。这是一个贬低自己、践踏自己的问题，他必须到最肮脏的污秽中去。什么是最可怕最恶心的？他想到了老大哥，那张庞大的脸（他经常在海报上见到，总觉得那张脸有一米宽），浓密的黑色胡子，那盯着你的眼睛仿佛自动浮现在脑海。他对老大哥的感情真挚吗？

走廊里传来沉重的皮靴声。铁门一下打开了。奥伯里恩走进来，后面跟着蜡像般面孔的年轻警官和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卫。

“站起来，”奥伯里恩说，“过来。”

温斯顿站在他面前。奥伯里恩双手有力地扣住温斯顿的双肩，死盯着他。

“你有过欺骗我的想法，”他说，“真是愚蠢。站直。看着我的脸。”

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用温和一些的语气说：“你进步了。思想上

没什么大毛病，不过感情上没什么进步。温斯顿，告诉我，不许说谎。你知道我总能知道你是不是在说谎。告诉我，你对老大哥的感情真挚吗？”

“我恨他。”

“你恨他。很好。那你现在该进行最后一步了。你必须热爱老大哥。服从还不够，必须爱他。”

他把温斯顿轻轻推向警卫。

“101房间。”奥伯里恩说。

第五章

在被关押的每个阶段，温斯顿都知道他大概在这栋没有窗户的大楼中的位置，或者说似乎知道，可能是因为气压略有差别。看守们殴打他的牢房在一层，奥伯里恩审讯他的房间几乎快到顶楼，而现在这个地方深入地下，仿佛是在最底部。

这间牢房比他之前待过的要大一些，但他顾不上观察周围。他只注意到正前方有两张铺着绿呢布的小桌子，其中一张离他只有一两米，另一张远一些，在靠近门的地方。温斯顿被直直地绑在椅子上，丝毫不能动弹，连脑袋也被固定住了。有个类似垫子的东西从后面卡住他的脑袋，迫使他只能往前看。

他独自待了一阵，后来铁门打开，奥伯里恩走进来。

“你曾经问过我，101房间里有什么。我当时告诉你，你自己知道，每个人都知道。101房间里有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奥伯里恩说。

铁门又打开了，一个看守走进来，手里提着铁丝编织的东西，像是盒子、篮子之类的。看守把那个东西放在远处的桌子上，而由于奥伯里恩站的位置，温斯顿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什么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奥伯里恩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可能是活埋，可能是烧死，可能是溺死，可能是被钉子钉死，也可能是其他五十种死法。但对有些人来说，最可怕的东西恐怕非常普通，甚至不会致命。”

奥伯里恩往旁边移了移，这样温斯顿就能看到桌子上的东西了。那是个长方形的铁笼子，顶端有个可以拎的把手。固定在笼子前面的是击剑面罩一样的东西，凹面朝外。尽管离温斯顿有三四米，他还是能看清笼子被纵向隔成了两半，每一半里都有某种动物——老鼠。

“对你而言，”奥伯里恩说，“世界上最可怕的是老鼠。”

温斯顿刚瞥见老鼠，就浑身战栗，心里的恐惧感难以言喻。此刻，

他明白了笼子前面为什么要安装面罩一样的东西，一下就被惊呆了。

“你不能这样做！”他高声喊着，声音都嘶哑了，“你不能，你不能这么做！这不可能！”

“记得吗？”奥伯里恩说，“记得常出现在你梦中的恐慌时刻吗？你面前有一堵黑色的高墙，耳朵里充斥着喧闹的声音。而墙那边还有某种可怕的东西，你也知道那是什么，可就是不敢把它们拖出来。是老鼠。”

“奥伯里恩！”温斯顿尽力控制自己的声音，“你用不着这样对我。你想让我干什么？”

奥伯里恩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他带着有时会表现出来的学校老师的神态，若有所思地望向远处，仿佛在对温斯顿身后的听众讲话。

“就其本身而言，”他说，“疼痛并不总能发挥作用。有时，人类能忍住疼痛，甚至可以忍到死亡的那一刻。但所有人都无法忍受一件事——某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这与勇气或胆怯无关。从高处落下，抓住绳子并不是懦夫之举。从海底浮上来，大口呼吸空气也不是懦夫之举。那只是本能，无法毁掉的本能。老鼠也是一样，你忍不了老鼠。它们让你有无法承受的压力，就算你想承受也一样。你会做别人要求你做的事。”

“什么事？是什么？我不知道的话怎么能做到？”

奥伯里恩提起笼子，小心翼翼地放到距离温斯顿比较近的桌子上。温斯顿感到自己血气上涌。他觉得自己深陷于孤独中，就像在空旷无垠的平地上，那是阳光照射下的平坦沙漠，所有声音穿过沙漠，从极为遥远的地方传来。但那个装着老鼠的笼子离他还不到两米。那两只老鼠很大，口鼻的部分已经扁平，非常凶猛，毛色不是褐色，而是灰白色。

“老鼠，”奥伯里恩依旧一副对着看不见的观众演讲的样子，“尽管是啮齿动物，但也是肉食性的。你自己也明白，也听说过发生在城市贫民窟里的事。有些地方，女人们都不敢把婴儿单独放在屋子里，哪怕五分钟也不行。老鼠肯定会袭击婴儿，很快就会把孩子啃得只剩下骨头。它们也会袭击生病的人或者快死的人。老鼠的智力高得让人吃惊，它们知道人在何时最无助。”

笼子中传来“吱吱”的尖叫声，温斯顿觉得那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两只老鼠在打架，想冲破隔离网，相互撕咬。温斯顿还听到绝望地低吼。同样，那也仿佛来自身体之外的某处。

奥伯里恩拎起笼子，同时按了下笼子上的某个地方，发出一声脆响。温斯顿疯狂地想从椅子上挣脱。但那不可能，他身体的各个部分，就连脑袋都动弹不得。奥伯里恩把笼子举得更近，离温斯顿的脸还不到一米。

“我已经按下了第一个控制杆，”奥伯里恩说，“你知道这种笼子的构造。那个面罩会套在你头上，没有任何空隙。我扳动另一个控制杆时，笼子的门就会滑开。这些饿疯了的东西会像子弹一样蹿出来。你见过老鼠跳到空中的样子吗？他们会跳到你的脸上，咬住不放。有时候它们会先攻击你的眼睛，有时候会从颧骨的地方挖过去，先咬掉舌头。”

笼子又靠近了一点，慢慢逼近。温斯顿听到一连串的尖叫，显然是脑袋顶上的某个地方传来的。他和自己的恐慌激烈地斗争着。思考，思考，哪怕只剩下最后一秒钟，思考也是唯一的希望。突然，老鼠难闻的气味冲进鼻孔。他极度想呕吐，几乎就要失去意识了。眼前一片漆黑，有一瞬间他都快疯了，像是一头尖叫的动物。但漆黑之中，他想到了一种挽救自己的方法，他要把另一个人——另一个人的身体——放在自己和老鼠之间。

面罩离得很近，挡住了温斯顿的视线，他什么都看不到。铁丝门离自己只有两个手掌的距离。两只老鼠知道猎物近在眼前。其中一只一直上下跳动，另一只是阴沟里的，都老得脱毛了，它粉红色的爪子搭在铁丝栅栏上，站立着，一个劲儿地嗅着空气。温斯顿能看到老鼠的胡须和黄色的牙齿。那种黑色的恐慌再次战胜了他，他什么都看不到，不知所措，一片迷茫。

“这是中国帝制时期常见的惩罚。”奥伯里恩的声音一如既往，带着训诫的音调。

面罩快碰到脸了，铁丝蹭过面颊。接着，不，没什么用，只是希望，一星半点的希望。太迟了，也许真的太迟了。他突然想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让温斯顿将惩罚转移过去，他只能将这个人的身体放在自己与老鼠之间。他发狂一般拼命喊着：

“咬茱莉亚！咬茱莉亚！别咬我！咬茱莉亚！你们怎么咬她都行。撕破她的脸，吃她的骨头。别咬我！咬茱莉亚！别咬我！”

温斯顿向后倒去，仿佛掉进了深渊，离开了老鼠。他的身体仍被绑在椅子上，但他连人带椅子一起倒下去了，穿过地板，穿过大楼的墙壁，穿过泥土，穿过海洋，穿过大气层，掉进了太空，掉进了宇宙。离老鼠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他已掉出了几光年的距离，但奥伯里恩仍在他身旁，他的脸上仍贴着一根冰冷的铁丝。但四周一片漆黑之际，他听到“咔嚓”一声，知道笼门已经关上了，并没有被打开。

第六章

栗树餐厅里几乎空无一人。一束阳光透过窗户斜射进来，照在落满灰尘的桌面上。下午3点，店里没几个客人，电屏中播放着轻柔的音乐。

温斯顿坐在自己常坐的角落位置，盯着一个空玻璃杯。他不时会瞄一瞄对面墙上一直盯着自己的巨大面孔。标题是这么写的——“老大哥在看着你”。一个服务员主动走过来，往他的杯子里倒满了胜利金酒，又拿过一个瓶塞中插着管子的瓶子，往酒里倒了几滴，晃了晃。那是丁香味道的糖精，是这家咖啡店的特色。

温斯顿听着电屏中传来的音乐，现在它只是在播放音乐，但随时可能变成和平部的特别公报。非洲前线的新闻让人不安，温斯顿总是为此担心。一支欧亚国的军队（大洋国在跟欧亚国打仗，一直都是）正快速向南推进。午间公告没明确指明地区，但很可能刚果河口也已成了战场。布拉柴维尔和利奥波德维尔有陷落的危险。不看地图，人们也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不是欧洲中部陷落的问题，而是大洋国的领土受到了威胁，这在整场战争中还是第一次。

一种强烈的情感在温斯顿的心中燃烧起来，之后又消退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恐惧，而是难以名状的激动。这段时间，温斯顿根本无法将精力长久集中在某件事上。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如往常一样，他不禁打了个寒颤，甚至还觉得有些恶心。太可怕了。丁香和糖浆本就容易让人恶心，但还是压不住油腻的味道，而最可怕的是金酒的气味——他身上一天到晚都是这个味道——在他脑海里，与某种东西的气味混合在一起，不可分解，那是……

他从未说明，甚至在思想里也没有说明，只要能做到，就尽量不去想象它们的形状。它们隐约会出现在他的记忆中，在他面前上蹿下跳，臭味扑鼻。杜松子让他反胃，发紫的嘴唇打了个嗝。他被放出来后就发福了，恢复了之前的脸色，实际比之前还好。他健壮了，鼻子上和脸颊上的皮肤微微发红，连光秃秃的头顶也红多了。服务员再次主动服务，送来了棋盘和当天的《泰晤士报》，正好翻到棋局艺术那一页。看到温

斯顿的杯子空了，服务员便又端起酒瓶倒满。温斯顿不用开口，服务员们都知道他的习惯。棋盘是他的，角落的位置也总为他保留。就连店里客满时，那张桌子也只属于他一个人，因为没人想靠近他。温斯顿从来不数自己喝了多少。一会儿，就会有人给他送来一张脏乎乎的纸，说是账单，但温斯顿总觉得他们少算了钱。就算把数字倒过来算也没关系。他如今不缺钱，甚至还有个工作，虽然是个挂名差事，但比之前的工作待遇强多了。

音乐中断了，电屏中有人说话。温斯顿抬头细听，不是前线的公报，而是富足部的简短公告，上一季度第十个三年计划鞋带产量超额完成了98%。

温斯顿看了看报纸上的棋局，把棋子摆开。这局棋非常巧妙，关键在于两只马。白先行，两步即胜。温斯顿抬头看着老大哥的画像，他带着一种模糊的神秘感想到，白方总能获胜。这种棋局毫无例外，都是这样安排的。开天辟地以来，黑方从未取胜。这是不是象征着邪不胜正？那张巨大的脸看着温斯顿，充满镇定的力量。白方总会获胜。

电屏上的声音稍稍停顿后，又用一种相当严肃的语气说：“15点30分有重要公告，请注意收听。15点30分有重要公告，请注意收听，不要错过。15点30分。”美妙的音乐再次响起。

温斯顿的内心无法平静。是前线来的公报，他预感那是个坏消息。整整一天，他带着一种兴奋感，断断续续地想到非洲大败，仿佛真的看到欧亚国的军队蜂拥而至，穿过从未被突破的边界线，像排成纵队的蚂蚁一样直捣非洲南部。为什么不能从侧翼包抄？温斯顿的脑海中生动地浮现出了非洲西海岸的轮廓。他拿起白方的马跳了一步。这一招很妙。甚至，他看到黑色大军向南行进时，也看到了另外一支军队不知如何集结起来，突然插入后方，切断了陆路和海路。温斯顿认为，他能通过意愿，他能凭空召集一支军队，但要迅速行动。如果其他军队控制了欧洲，在好望角建造了飞机场或潜艇基地的话，大洋国就会被一分为二。这样可能会带来某些后果——失败、瓦解、世界的重新分割以及党的毁灭！温斯顿深吸了一口气，百感交集，但准确地说并不是如此，而是层层叠叠，看不清最深处的是什么，一直在他内心挣扎。

情感的爆发过去了。他把白方的马放回原来的位置，但他已经不能认真思考棋局了。他开始走神，不由自主地在桌面的灰尘上写下了如下内容：

2+2=5

“他们控制不了你的思想。”茱莉亚曾经这样说。但其实他们可以。“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永远不会改变。”奥伯里恩曾经说。那才是实话。你无法恢复某些事或自己的行为，你内心的某些东西被杀死了，被烧尽了，被焚毁了。

温斯顿后来见到过茱莉亚，甚至还跟她说过话，但这已不会有什么危险，他似乎本能地认为，那些人如今对他的所作所为基本不感兴趣了。如果一方愿意，温斯顿可以安排再次与茱莉亚见面。实际上，他们是偶遇的。三月寒风刺骨的一天，公园的地面坚硬如铁，小草似乎早已绝迹，四处都没有花蕾，就连几株费力冒出头的番红花也被风吹得残败不堪。温斯顿双手冰冷，眼里还蓄满泪水，他步履匆匆，却发现茱莉亚就在前方不到十米的地方。温斯顿一眼就看出茱莉亚变了，只是说不出怎么变了。他们毫无表示地擦肩而过，接着，温斯顿转身，慢吞吞地跟在茱莉亚身后。他知道那不会有危险，因为没人注意。茱莉亚没说话，只是斜穿过草地，似乎想摆脱温斯顿，又仿佛接受了他的存在。很快，他们来到了一丛乱蓬蓬而且没有叶子的灌木丛里，既无法藏身，也挡不住风。他们停下脚步，天冷得难以言喻。寒风呼啸着吹过树枝，撕扯着零星几朵蒙着尘土的番红花。温斯顿伸手揽住茱莉亚的腰。

那里没有电屏，但肯定藏着话筒，另外他们也能被别人看到。但这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如果他们愿意，就可以躺在地上，胡作非为。想到这里，温斯顿就因恐惧而变得僵硬。茱莉亚没什么反应，也没想挣脱温斯顿的怀抱。现在，温斯顿明白茱莉亚的变化了，她的脸上染了一层灰黄色，从前额到太阳穴还有一道长长的疤痕，被头发遮住了一些，但这并不是主要变化。茱莉亚的腰粗了一些，而且让人惊讶的是，腰肢已变得僵硬。温斯顿记得一次火箭弹爆炸后，他帮忙从废墟中拖拽尸体。当时让温斯顿震惊的不仅是尸体的重量，更是其僵硬程度和处理的难度，因为那仿佛不是血肉之躯，而是石头。现在，茱莉亚的身体摸上去也是这种感觉，她的肌肤与曾经相差甚远。

温斯顿没想问她，他们也没说话。走回草地时，茱莉亚第一次直视着温斯顿。那短暂的一瞥中满是轻蔑和厌恶。温斯顿不知道茱莉亚厌恶的纯粹是过去还是他肿胀的脸庞和寒风吹出的泪水。他们坐在两张铁椅子上，虽然并排，但没有紧紧挨着。温斯顿注意到茱莉亚就要开口了。茱莉亚抬起脚，往旁边挪了几厘米，故意踩断了一根树枝。温斯顿注意到茱莉亚的脚似乎变宽了些。

“我背叛了你。”茱莉亚直言不讳。

“我背叛了你。”温斯顿说。

茱莉亚再次厌恶地瞥了他一眼。

“有时候，”茱莉亚说，“他们会用某种东西威胁你，你根本忍受不了，想都不能想。你就会说：‘别对我这样，对某某做这种事吧，对某某这样做吧。’事后你可能会说那是装的，是权宜之计，好让他们住手，自己的本意并非如此。但那是说谎。当时你真的是那样想的。你认为没有别的办法拯救自己，所以只能用那种方法。你希望那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不管他会承担怎样的苦难。你只关心自己。”

“你只关心自己。”温斯顿附和道。

“之后，你对那个人的感情就不一样了。”

“没错，”他说，“不一样了。”

他们似乎无话可说。薄薄的工作服被风吹得紧贴着身体。他们几乎同时认为一起坐着不说话非常尴尬，而且坐着不动也很冷。于是，茱莉亚说要去赶地铁，就准备起身离开。

“我们一定要再见面。”温斯顿说。

“没错，”她说，“我们一定要再见面。”

温斯顿离茱莉亚约半步，犹豫不决地跟着她走了一小段路。他们没再说话，茱莉亚也没想真的甩掉他，只是保持着刚好不会与他并肩而行的速度。温斯顿下定决心陪茱莉亚走到地铁站，但突然之间，他觉得在寒风中跟着别人既没有什么意义，也让人无法忍受。离开茱莉亚回到栗树餐厅的想法如此强烈，似乎那个地方此刻对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温斯顿非常怀念角落里的桌子，也怀念报纸、棋盘和不断续杯的金酒。最重要的是，那里很暖和。又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有意让一小拨人把自己和茱莉亚隔开。温斯顿迟疑着是否要去赶上她，但又放慢脚步，转身朝反方向走了。走了五十米后，温斯顿回头看了看。那条街上没多少人，但他已找不到茱莉亚的身影。十几个匆忙而过的人都可能是茱莉亚。也许茱莉亚现在既粗壮又僵硬的身体已无法从背影辨认。

“那件事发生的时候，”茱莉亚之前说，“你就是那样想的。”他的确是那样想的，温斯顿不仅说了，而且还切实地那样期盼过。他希望是茱莉亚而不是他自己被交给……

电屏里的音乐变了，一个嘲弄似的音符响起来，是预警用的。接着，有个声音唱起了歌，也许并没有发生，也许只是和记忆中的某个声音很像：

在繁茂的栗树下，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温斯顿的眼睛里涌出泪水。一个经过的服务员看到他杯子空了，就拿着酒瓶走过来。

他拿起杯子闻了闻。每喝一口，温斯顿都觉得那种难喝的程度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强烈了。可他的生活已不能没有酒，那是他的生命、他的归宿，也是他的重生。正是金酒让他夜里得以安眠，也是金酒每天早上让他恢复精力。温斯顿很少11点之前起床，而且醒来时，总会睁不开眼睛，嘴里不舒服，后背也像断了一样。如果没有前一晚放在床边的酒瓶和茶杯，温斯顿可能根本就站不起来。中午时分，温斯顿就面无表情地坐着，握住酒瓶，听着电屏中传出的声音。从下午3点到打烊，他是栗树餐厅里的固定顾客。没人在意他做什么，没有吵醒他的哨声，电屏中也不会传出警告他的声音。大概每周有两次，温斯顿会到真理部满是灰尘的办公室做点正事，或者说工作一会儿，那里似乎已被人遗忘。他被分配到无数个委员会中的某个分会的下属委员会，目的是编纂第十一版《新话字典》中遇到的次要难点。他们负责编写所谓的中期报告，但温斯顿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要报告什么，似乎与逗号应该放在括号里面还是括号外面这一问题相关。这个下属委员会中还有四个人，情况都跟温斯顿差不多。有时候他们会聚在一起，但很快就会各自分散，坦诚地告诉别人实际上他们都无事可做。可某些天里，他们都会热忱忘我地投入工作，做足了表面功夫，不是填写记录，就是起草没有完成的备忘录。他们争论的问题可能引起更复杂、更深奥的争论，对定义吹毛求疵，还东扯西拉地说些题外话，他们一直争吵、威胁，甚至扬言捅到上级那里。可突然之间，他们又都没了精神，围坐在桌子边，眼神黯淡，面面相觑，仿佛听到鸡鸣的鬼魂一样。

有一会儿，电屏里没有任何声音。温斯顿再次抬起头。公报！但是

没有，他们只是换了音乐。温斯顿的脑海里都是美洲地图，军队的动向可以用示意图，黑色的箭头直插向南，白色的箭头横切往东，穿过黑色箭头的尾部。仿佛是为了寻找安慰，温斯顿抬头看着那张肖像上泰然自若的面孔。会不会第二个箭头根本就不存在？

温斯顿没什么兴趣了。他又喝了一口酒，拿起白方的马试探着走了一步，将军。但显然这一步并不正确，因为……

毫无预兆的，一段记忆浮现在脑海。他看到一个点着蜡烛的房间里有一张罩着白色床罩的大床，还看到了自己。他当时只是个九岁还是十岁的小孩，坐在地板上，摇着色子盒，兴奋地笑着。他的母亲坐在对面，也哈哈大笑。

那肯定是母亲失踪前一个月的事。那是和解的时刻，他暂时忘记了肚子里永不停歇的饥饿感，对母亲的爱意也暂时复苏了。他清楚地记得，那天外面电闪雷鸣，大雨瓢泼，雨水顺着玻璃窗汩汩而下，而屋子里太黑，没办法看书。两个孩子待在黑暗拥挤的屋子里很无聊。温斯顿吵吵嚷嚷，闹着要东西吃，他翻箱倒柜，东拉西扯，对着墙拳打脚踢，闹得隔壁邻居都敲墙抗议。而年纪小一些的妹妹则断断续续地哭着。最后，温斯顿的母亲说：“乖乖待着，我去给你买个玩具。很好玩，你肯定会喜欢。”说完，母亲就冒雨出门，去了附近开着的一家百货店。母亲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纸板盒，装着蛇梯棋。温斯顿还记得潮湿棋盘的味道。那副棋做工很差，棋盘开裂，木头色子有的切割得也不够整齐，都站不住。温斯顿看着这个玩具，不怎么高兴，也没什么兴趣。但母亲点上了蜡烛，和他一起在地板上玩。很快，看到棋子有希望到达终点却几乎一下要退回起点时，温斯顿就变得非常兴奋，笑声不断。他们玩了八局，各赢了四局。温斯顿的小妹妹还太小，不知道那是什么游戏，只能靠着床腿坐着，跟着他们一起笑。整整一下午，他们都很高兴，仿佛回到了他更小的时候。

温斯顿把这个场景赶出脑海，那是虚假记忆。偶尔，虚假记忆会困扰着他。但只要知道它们的本质，虚假记忆也就不足为惧了。有些事情发生过，有些没有发生。温斯顿的注意力回到棋盘上，再次拿起白方的马。就在此时，白方的马“咔哒”一声掉到棋盘上，吓了温斯顿一跳，仿佛大头针刺进身体一样。

尖锐的小号声划破天空。公告来了！胜利了！新闻之前的小号声就意味着胜利。电流般的颤抖席卷了咖啡馆。就连侍者也被吓了一跳，竖

起了耳朵。

小号之后是吵闹的噪音。电屏里传来激动的声音，急促地念着什么，但刚开始念，就被外面雷鸣般的欢呼声淹没了。新闻奇迹般地传遍了大街小巷。温斯顿只能勉强听到电屏里的声音，明白了事情确实是按照自己的预测发生的，巨大的海上舰队秘密集结，突袭了敌人后方，白色箭头撕裂了黑色箭头的尾巴。胜利的段落不时从喧嚣之中冒出来："伟大的战术——巧妙配合——完全击溃——五十万俘虏——士气完全丧失——控制整个非洲——向战争的结束迈出了一大步——胜利——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温斯顿的双脚在桌子下不停地乱蹬。他仍坐着没动，但在脑海里，他在奔跑，飞奔着，和外面的群众一起，呼喊声震耳欲聋。他又抬起头看了看老大哥的画像。那可是主宰世界的巨人啊！是让亚洲的乌合之众头破血流的人！他想起十分钟前，自己还心存疑虑，暗自思量战争是胜是负，没错，还不到十分钟。啊，这不只是欧亚国一支军队覆灭的事！自从他到了仁爱部的第一天起，温斯顿身上就发生了不少变化，但那个决定性的、不可或缺的、治愈性的变化到此刻还没有发生。

电屏里的声音还在滔滔不绝地播报着关于俘虏、战利品和屠杀的消息，但外面的欢呼声低了一些。侍者们又开始工作了，其中一个拿着酒瓶走过来。温斯顿依旧坐着，沉浸在甜美的幻想中，没注意到自己的酒杯已经满了。他不是在奔跑，也不是在欢呼，而是回到了仁爱部，得到了宽恕，灵魂如雪一样洁白。他站在被告席上，坦白了所有事，指认了所有人。他走在铺着白色瓷砖的走廊上，仿佛走在阳光之下，一个持枪的看守跟在他身后。那颗让他等待良久的子弹终于射进了他的大脑。

他抬头看着那张巨大的面孔。他花了四十年才领会到深色八字胡下的微笑。噢，真残忍，这是不必要的误会！噢，真顽固，从博爱的胸怀中的自我放逐！两滴混着金酒气味的泪珠顺着鼻子侧面落下来。但那也还好，都还好，斗争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附录 新话原则

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其设计是为了满足英社——即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1984年时，无论是口头上还是书面上，没人能用新话作为唯一的交流手段。《泰晤士报》的头条新闻就用新话写成，但那是特殊的技巧，只有专家才能做到。按计划，新话将在2050年前后取代旧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标准英语）。同时新话将稳步扩大影响，党员的日常对话中也会更多地运用新话词语和语法结构。1984年使用的新话版本以及第九版和第十版《新话字典》中的条目都是临时性的，包含不少多余的词和过时的结构，之后都将废止。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新话的最终完善版，即《新话字典》的第十一版。

新话不仅是表达媒介，用来表达与表现对英社忠实信徒来说恰当的世界观及思维习惯，而且还要让其他思考模式成为不可能。新话的真正意图是，旧话被遗忘、新话被彻底采用后，任何异端思想将永远不会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至少在思想以话语表达为基础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而异端思想则是指与英社原则相悖的思想。新话的词汇之所以如此构建，是为了让党员在想要恰当表达各种意图时都能精准且时常能便捷地表达，从而排除存在有其他意图并通过间接途径使其得以表达的可能。要做到这一点，部分依靠新词汇的发明，但主要手段有两个：消灭不符合需要的词，并清除保留词汇的非正统含义，而且只要有可能，就将此词所有二级含义全部清除。简单举例，“free”（“自由”）一词仍存在于新话中，但只能用于陈述句，如“This dog is free from lice”（“这只狗身上没有虱子”）或者“This field is free from weeds”（“这片地没有杂草”），而不能使用其之前的含义，比如“politically free”（“政治自由”）或“intellectually free”（“思想自由”）。因为“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已不复存在，因此有必要废止这类词语。而且废止不仅限于确实有异端性的词语，词汇数量的减少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能省略不用的词汇都不能存在。新话的意图不是为了扩展思想范围，而是为了缩小它，将可以选择的词汇数量减少到最低，间接利于这一目的的达成。

新话的基础是我们现阶段掌握的英语，但很多新话句子，包括不含有新造词的句子也让我们现在说英语的人难以理解。新话的词汇分为不同的三类，包括A类、B类（复合词）以及C类。更为简明的方法是分别

描述三类词汇，但语法上的独特性仅可在讨论A类词汇时提及，因为同样的规则均适用于这三类词汇。

A类词汇包括日常生活中需要用到的词。涉及吃、喝、穿、工作、穿衣、上下楼、乘车、培植、烹调等。这类词几乎都是我们已经掌握的词，例如打、跑、狗、树、糖、房屋、田野等，但同目前英语词汇相比，这些词数量极少，而且意义限定也更为严格。含义上的模糊和多层都要清除。只要有可能，这类新话词汇就只是表示单一明确概念的声音。绝不能用于文学目的或对政治、哲学的讨论，它的用途只是表达简单且有目的的思想，一般只涉及具体事物或身体动作。

新话语法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同词类几乎可以完全互换。任何一个词（原则上这甚至适用于“if”（“如果”）或“when”（“何时”）这样非常抽象的词）都可既用作动词，又用作名词、形容词或副词。若有同一词根，就没有形式上的变化，因此导致了许多古老形式的废止，例如，新话中并没有“thought”（“思想”），而是由“think”（“思考”）同时充当名词和动词。这种没有词源学规则可以遵循，有时保留原来的名词，有时保留原来的动词。甚至意义相近而词源无关的动词和名词也都取其中之一而废止另一个。例如，新话中没有“cut”（“切割”）一词，因有“knife”（“刀”）就够了。形容词可在兼做动词和名词的词后面加后缀“-ful”，副词加上“-wise”即可，例如“speedful”意为“迅速的”，“speedwise”意为“迅速地”。我们目前使用的有些形容词如“good”（“好”）、“strong”（“强壮”）、“big”（“大”）、“black”（“黑色的”）、“soft”（“柔软的”）等仍保留，但保留下来的总数很少。人们很少用到这些词，因为几乎任何形容词都可以在身兼动词和名词的词后加上“-ful”而得到。现有副词则被全部废止，极少数原来词尾是“-wise”的除外，这一词尾始终不变，例如“well”一词改用“goodwise”。

此外，任何词加上前缀“un-”就有了否定意义，或加前缀“plus-”就加重了语气，表示进一步强调则可以加上“doubleplus-”，这在原则上适用于新话里的所有词。例如，“uncold”（“不冷”）与“warm”（“温暖”）意义相同，而“pluscold”（“加冷”）和“doublepluscold”（“双倍加冷”）则代表“very cold”（“很冷”）和“superlatively cold”（“非常冷”）。和现代英语一样，也可以增加“anti-”“post-”“up-”“down-”等介词前缀来限定几乎所有词的含义。这种方法可以大大减少词汇量。比如，有了“good”，就不必有“bad”（“坏”），因为“ungood”（“不好”）足以表达同样的意义。只要两个词互为反义词，则只需决定废止哪一个即可，例

如，“dark”（“黑暗”）可以用“unlight”（“不明亮”）代替，“light”（“明亮”）也可以用“undark”（“不黑暗”）代替，一切视偏好而定。

新话语法的第二个特点是其规律性。除了下文即将提到的几种例外情况，所有字形变化都遵循同一规则。因此，所有动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都以“-ed”收尾。“steal”（“偷窃”）的过去式是“stealed”，“think”（“思考”）的过去式是“thinked”，全部如此。“swam”（“游泳”的过去式）、“gave”（“给予”的过去式）、“brought”（“带来”的过去式）、“spoke”（“讲话的过去式”）、“taken”（“带走”的过去分词）等形态被全部废止。所有复数都以“-s”或“-es”结尾。“man”（“人类”）、“ox”（“公牛”）、“life”（“生活”）的复数分别是“mans”“oxes”和“lifes”。形容词比较级和最高级分别加上“-er”和“-est”（如“good”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分别是“gooder”以及“goodest”，不规则形态的“more”（“更多”）和“most”（“最多”）取消）。

唯一仍可以有不规则变化的一些词是代词、关系词、指示形容词以及助动词，按照原来的形态，除“whom”（“谁”的宾格）因作用不大而被取消，“shall”（“应该”）、“should”（“应该”）则用“will”（“将要”）和“would”（“将要”）代替，仍按照之前的用法使用。另外，为达到快速简便讲话的需要，难以发音或容易听错的词就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词，为了悦耳要么得加上几个字母，要么就得保留原始形态。不过这主要在B类词汇中。至于发音的方便为何如此重要，将在下文述及。

B类词汇是为了政治目的而专门创造的词。也就是说，这些词不仅各有政治含义，而且目的是让这些词汇的使用者具有特定的思想态度。如果没能充分了解英社原则，就很难正确使用这些词汇。有时这些词也可译成旧话，甚至可以译成A类词汇，但这往往需要拖泥带水的解释，而且总要损失一定的附带含义。B类词汇仿佛是语言缩写，常常把多个含义包括在少数几个音节中，但比一般语言更精准有力。

B类词汇都是复合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成，或由几个词的不同部分组成，最终形式很容易发音。这样的合成词一般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按一般规则变形。如“goodthink”（“思想好”）大体上可以理解为“orthodoxy”（“正统”）。如果用作动词，意思就是“按正统方式思想”。它的形态变化如下：动词和名词为“goodthink”，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为“goodthinked”，现在分词为“goodthinking”，形容词为“goodthinkful”，副词为“goodthinkwise”，名词化动词则

为“goodthinker”。

B类词汇完全没有遵循词源学计划。它们用来构成的词可能有任何词性，按任意顺序排列，可以作任何删节，既表明词源，又要做到容易发音。例如“crimethink”（“犯罪思想”）的“think”在后，而在“thinkpol”（“思想警察”）中却是在前，而后面的词“police”（“警察”）又略去了第二个音节。由于做到悦耳比较困难，因此B类词汇中的不规则构成比A类词汇多。例如“Minitrue”（“真理部”）、“Minipax”（“和平部”）以及“Miniluv”（“仁爱部”）的形容词分别是“Minitruthful”“Minipeaceful”和“Minilovely”，仅仅是因为如果改为“-trueful”“-paxful”或“-loveful”的话，发音会比较困难。但原则上所有B类词汇都可以变化，而且变化方式完全相同。

有些B类词汇意思极为隐晦。没有完全掌握新话的人很难理解。例如，《泰晤士报》头条新闻中有这样一个典型句子：“Oldthinkers unbellyfeel Ingsoc”。用旧话翻译，最简短的译法是“Those whose ideas were formed before the Revolution cannot have a full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s of English socialism”（“那些在革命之前思想业已形成的人无法对英国社会主义有充分的情感理解”）。但这种翻译方法并不完整。首先，为了充分了解上述新话的句子，就得清楚地了解“英社”的含义。此外，只有充分了解英社的人才能了解“bellyfeel”的完整含义，即当今很难想像的，盲目热情的接受。“oldthink”（“旧思想”）也是如此，它与邪恶腐败的想法密切相关。但包括“oldthink”在内的新话中的部分词语，其特殊职能不是表达意思而是消灭意思。这些词必然为数不多，但含义一再引申后，则达到了一个词可以表达多个单词组成之后的含义。因此，许多单词组成的短语就可以废弃了。因此，《新话字典》的编纂者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创造新词，而是创造了新词以后确定它们的含义，也就是确定由于它们的出现和存在而可以废止的词语。

我们在“free”一词的应用中已经看到，以前有过异端含义的词，有时为了方便予以保留，就要先清除其不良含义。其他如“honour”（“荣誉”）、“justice”（“正义”）、“morality”（“道德”）、“internationalism”（“国际主义”）、“democracy”（“民主”）、“science”（“科学”）和“religion”（“宗教”）等许多其他的词都已不复存在。另有少数几个复合词代替了它们，因此消灭了它们。例如，所有表示自由和平概念的词都包含在“crimethink”中，而与客观和理性

有关的词都包含在“oldthink”中。可再要细分就会非常危险。党员必须具备与古希伯来人一样的看法，认为除了族人外，其他民族的人崇拜的都是“伪神”。他不需要知道这些神的名称，不需要知道Baal、Osiris、Moloch、Ashtaroth之类的。也许按照正统教义，他知道得越少越好。他知道耶和华以及耶和华的戒律，因此，他知道有其他名字和属性的神都是伪神。与此相似的是，党员也同样知道什么是正确行为，因此，也极其含糊笼统地知道什么是不正当行为。例如，他的性生活完全由新话的两个词来约束，即“sexcrime”（“性犯罪”）和“goodsex”（“好性”）。“sexcrime”指一切性方面的不端行为，包括私通、通奸、同性恋等，也包括正常性行为。没必要区分它们，因为它们都是有罪的，原则上说都可以让你被处死。C类科技词汇中，也许有必要对某些不端性行为给予专门名称，但普通公民并不需要。他知道“goodsex”的意思就是夫妻的正常性行为，唯一目的是生儿育女。女方毫无肉体上的快感，此外都是“sexcrime”。在新话中很少可能进行异端思考，最多只是意识到那是异端思想而已，此外就没有必要的词汇让人进一步思索了。

B类词汇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中性词，替代性的隐语很多，例如，“joycamp”（强制劳动营）和“Minipax”（和平部，即战争部）的含义与字面意义恰巧相反。有些词则带着蔑视，直白地表达了对大洋国社会真实性质的了解，例如“prolefeed”指的是党给群众的廉价娱乐和虚假新闻。其他的词又是模棱两可的，用在党身上有“好”的意思，用在敌人上则有“不好”的意思。除此之外，有大量的词乍看之下仅是缩写，但其意识形态色彩来自结构而不是含义。

只要有可能，一切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政治意义的词就都属于B类。一切组织、团体、学说、国家、机构和公共建筑的名字无一不缩减到为人熟知的词性。那个单词很好发音、音节最少而且保持了原来的词源。例如真理部里，温斯顿·史密斯所在的档案司被称为“Recdep”，小说司被称为“Ficdep”，电讯司被称为“Teledep”，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节约时间。甚至早在20世纪初，缩略语就已经成了政治语言的一个典型特点，而且早有人指出，使用缩略语在集权国家和集权组织中最突出，例如“Nazi”（“纳粹”）、“Gestapo”（“盖世太保”）、“Comintern”（“共产国际”）以及“Agitprop”（“鼓宣”）等。当初，这种做法是无意识的，但是在新话中这是有意识的，目的是能减少原来的大部分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含义，进而巧妙地改变了该缩写的含义。例如“Communist International”（“共产国际”）使人想到的是全世界人类友爱、红旗、街垒、马克思、巴黎公社等结合在一起的图像。而“Comintern”却仅仅意味

着一个严密的组织和已明确被阐释的学说。它所指的东西几乎如桌椅板凳一样容易辨认、指代有限。“Comintern”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口，而“Communist International”却得花点时间想想。同样，“Minitrue”引起的联想要比“Ministry of Truth”少，而且容易控制。这不仅是养成使用缩略语习惯的原因，也是竭力使每个词都容易发音的原因。

在新话中，除了确切词义，悦耳是最重要的因素，必要时语法规则也可以做出让步。这样做是有理由的，按照要求，政治性词汇最需要的是意义明确，而简短的词不仅是发音容易，而且在说话人心中引起的反响也最低。B类词汇甚至因为它们非常相似而显得有力。如“goodthink”“Minipax”“prolefeed”“sexcrime”“joycamp”“Ingsoc”“bellyfeel只包含两三个音节，重音分别位于两个音节。使用这些词能形成机械单调的腔调，目的就是让讲话，尤其是任何主题下意识形态上非中性的讲话，尽可能独立于意识。日常生活中，得三思后言，但党员必须对某件事发表政治或道德意见时，他就得能像机关枪发射子弹一样，发表正确的看法。他训练有素、有新话充当几乎万无一失的工具，而且词语的组成又是抑扬顿挫、十分难听，非常符合英社精神，因此他用起来也很称手。

可选词汇很少也很有帮助。与现今的词汇量相比，新话词汇量很少，而减少词汇量的方法仍在不断出现。新话与其他语言的区别就是它的词汇量逐年减少而不是增多。每次减少都是一种进步，因为选择范围越小，思想的诱惑就越小。最终，喉咙可以直接讲话，而不必经过大脑。新话“duckspeak”一词赤裸裸地说明了这一点，它的意思是“像鸭子一般叫”。“duckspeak”像B类词汇中的其他的词一样意义不明。如果发表的是正统意见，那就是赞扬。如《泰晤士报》提到一个党的演说家时用了“doubleplusgood duckspeaker”（“双倍好的鸭子叫”），那是热情且难得的赞扬。

C类词汇是对其他两类词汇的补充，完全是科学和技术名词。它们同今天使用的科学名词相似，由同一词根组成，但定义极其严格，没有任何不恰当的其他含义。它们的语法规则与其他两类一样。日常谈话或政治演说中很少应用C类词汇。科学工作者或技术人员都可以在本专业的词汇表中找到需要的词，但他们对于非本专业词汇表中的词顶多能做到一知半解。只有极少数的词存在于所有单词表中，并且，无论其所属分支为何，没有一个词汇表将“科学”与思维习惯或思维方法这种功能联系起来。实际上，甚至“科学”一词也没有了，因为英社一词已完全包括

了它所有可能的意义。

由此可见，新话中，表达非正统的思想时，需要用到很低的语言水平。当然，异端邪说也可以由非常粗鲁的形式表达出来，比如侮辱谩骂。例如，“Big Brother is ungood”。但有着正统思想的人认为这种句子缺少必要的论证词汇，仅能表达一种不言而喻的荒谬，无法论证。反抗英社的思想只能以含糊的且无法表达的方式出现，只能用十分笼统的名词说明，而这些笼统的名词加在一起不用解释就能否定大批异端邪说。实际上，只有把有些词非法译成旧话后，才能把新话用于非正统目的。例如，“All mans are equal”（“人人皆平等”）可能出现在新话中，和旧话中“All men are redhaired”（“人人皆红发”）属于同一类。它没有语法错误，但表达的内容显然并不真实，即人人有同样的身高、体重或力量。政治平等的概念已不复存在，因为这个旁义已从“equal”（“平等”）的含义中剔除了。1984年时，旧话仍是普遍的交流工具，理论上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人们使用新话时，可能会记得原来的含义。实践中，深谙“doublethink”的人不难作到这一点，但一两代以后，甚至这种失误的可能性也会消失。对成长的语言环境只有新话的人来说，他们不会知道“平等”曾经有过“政治平等”这样的次要含义，也不会知道“自由”曾有“思想自由”的意思，正如从未接触过国际象棋的人才会知道“后”和“车”的次要含义。人类已无力犯下很多罪行和错误，因为没有名词表达这些罪行和错误，因此也无法想象。可以想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话的突出特点会越来越明显——词汇越来越少、含义越来越严格，应用不当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旧话完全被取代后，同过去的最后一丝联系就被切断了。历史已经重写，但有关过去的零星记录散落四方，没有被彻底检查。会用旧话的人仍能读懂那些记录。将来，即使这些片段得以保存也很难读懂、很难翻译了。除非是技术步骤，或某种非常简单的日常行为，或是已有正统化的（新话称之为“goodthinkful”）倾向，否则很难把任何一段旧话译成新话。实际上，这意味着大概1960年之前写的书，根本无法被翻译。革命前的记录只能进行意识形态上的翻译，既要修改语言，也要修改意义，例如《独立宣言》中著名的一段话。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给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要在保持原义的基础上把它翻译成新话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把这整段的话用一个词包括——“crimethink”。完全译出只能是意识形态上的翻译，把杰弗逊的话变成对绝对权利政府的颂词。

的确，通过这种方法，过去的大批文献都已被改写。出于对名声的考虑，有必要保持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但同时，他们的成就要与英社哲学一致。因此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都在翻译中。这项工作完成后，他们的原作及过去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将被销毁。这项翻译工作费时费力，21世纪前一二十年恐怕也无法完成。另外，大量实用文献——不可缺少的技术手册——也要这样处理。主要是为了留出时间完成初步翻译工作，新话的最终采用时间才定在遥远的2050年。

奥威尔作品集

奥威尔散文集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罗爽 易小又 曹聿非 译

ORWELL'S ESSAY COLLECTION

奥威尔首先是先知，其次才是圣徒。
——止庵

他能够在目睹最糟境况的同时为最美好的东西而战。
——Granville Hic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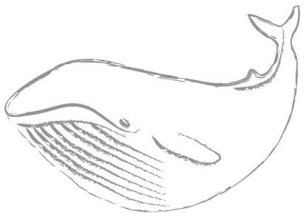
待在那个黑漆漆、软绵绵、大小刚好合适的地方，和现实之间隔着厚厚的一层鲸脂，不论外面发生什么，你都可以完全不予理会。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奥威尔散文集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罗爽 易小又 曹聿非 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威尔散文集/（英）奥威尔 著；罗爽 易小又 曹聿非 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5（奥威尔作品集）

ISBN 978-7-5680-1419-9

Ⅰ.①奥… Ⅱ.①奥…②罗… Ⅲ.①散文集—英国—现代 Ⅳ.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4341号

奥威尔散文集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罗爽等 译

Orwell Sanwenji

策划编辑：刘晚成

责任编辑：黄验

特约编辑：徐心 王瑜玲 罗爽

封面设计：喃风

责任校对：何欢

责任监印：张贵君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3

印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1.25

字数：263千字

版次：201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49.8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由的保障，良知的坚守

待在那个黑漆漆、软绵绵、大小刚好合适的地方，和现实之间隔着厚厚的一层鲸脂，不论外面发生什么，你都可以完全不予理会。

- 收容站
- 绞刑
- 书店记忆
- 猎象记
- 矿井之下
- 北方与南方
- 马拉喀什
- 查尔斯·狄更斯
- 查尔斯·里德
- 在鲸腹中
- 英国，你的英国
- 威尔斯、希特勒与世界国
- 鲁迪亚德·吉卜林
- 马克·吐温——特许的弄臣
- 诗与麦克风
- 教士的特权——小记萨尔瓦多·达利
- 英国的反犹主义
- 好的坏书
- 为P.G.伍德豪斯辩护
- 无意义诗
- 变味的复仇
- 买书与买烟
- 书评人的自白
- 穷人之死
- 政治与英语
- 大蟾蜍随想
- 我为什么写作
- 李尔王、托尔斯泰与弄人
- 这，这就是快乐

收容站

傍晚时分，我们四十九人——四十八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躺在草地上等着收容站开门。大家都累得不怎么说话，只是筋疲力尽地胡乱躺着，蓬头垢面，嘴里叼着自制的香烟。头顶上的栗子树开满了花，四周的天空一片澄澈，羊毛般的云朵几乎纹丝不动。我们就像城里肮脏的乌合之众，在草地上横躺竖卧，就像沙滩上的沙丁鱼罐头和纸袋一样大煞风景。

我们谈论着这所收容站的站长，都认为那家伙是魔鬼、蛮人、暴君，是条狂吠不止、不可一世的恶犬。只要他在场，你就得受他支配。许多流浪汉曾经仅仅因为顶嘴就被他半夜踢出了收容站。他搜身的时候，会直接把你倒着提起来摇晃。要是让他发现你身上带有烟草，就有你好看的了；如果你身上还带着钱（这可是违法的），那就自求多福吧。

我身上就有八个便士。“天啊，哥们儿，别把钱带进去，”老手们奉劝我，“带八便士进去，你会被关上七天七夜！”

于是我把钱藏在树篱下的一个洞里，放了块打火石做记号。接着我们设法把火柴和烟卷夹带进去，因为所有收容站几乎都严禁携带这些东西，进门时就该全部上交。我们把火柴和烟草藏在袜子里，不过有十来个人没穿袜子，他们只好把东西塞进靴子里，甚至夹在脚趾缝里。我们把袜子脚腕处塞得鼓鼓的，别人看见恐怕都会以为我们得了象皮病。好在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便是最刻薄的收容站长也不会搜查你膝盖以下的部位。最后只有一个人被逮住了，那就是斯科蒂。他是个毛发浓密、个子矮小的流浪汉，说话混杂着伦敦东区和格拉斯哥口音。他用来装烟头的盒子不凑巧地从袜子里掉出来，然后就被没收了。

六点整，收容站大门打开，我们拖着脚走进去。门口有人负责登记名字和其他信息，并收走我们的包裹。那个女人被送去了济贫院，我们其他人则进了收容站。收容站阴暗冰冷，墙上刷着石灰，里面只有一间浴室、一间食堂和百来间石砌的狭窄房间。可恶的站长已经在浴室门口等着我们。他把我们赶进浴室，命令我们脱光衣服接受搜身。他四十岁

上下，像个军人，而且举止粗鲁，把我们当成水塘边的羊群推来搡去，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咒骂。但走到我面前时，他却紧紧盯着我，然后问：

“你是绅士？”

“我想是的。”我回答道。

他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唉，你真是倒了血霉了，先生，”他说，“倒了血霉了，真的。”此后，他对我怜悯有加，甚至还带着些许敬意。

那间浴室真让人作呕。我们内衣上的不雅秘密都在此暴露无遗：污垢、缺口、补丁、作纽扣用的细绳，以及层层叠叠的破烂衣衫，有的破得只剩下洞，靠泥污黏在一起。流浪汉们热腾腾的裸体挤在一起，身上的汗味儿和收容站里令人作呕的粪臭竞相往鼻子里钻。有些人不愿洗澡，只洗了“裹脚布”——几片用来裹脚、油腻且恶心的布条。每个人只有三分钟的洗澡时间，而且所有人只能合用六张套在滚筒上油腻且湿滑的环状毛巾。

洗完澡后，大家的衣服都被收走了。我们换上济贫院里像睡衣一样、遮掉半条大腿的灰棉布衣服。随后，我们被打发到食堂，松木桌上已经摆好了晚饭。收容站的早中晚饭都一个样：半磅面包、一小块人造黄油、一品脱[1]所谓的茶。我们花了五分钟狼吞虎咽完这些既廉价又有害身体的食物。饭后，站长发给每人三条棉毯，然后把我们赶去房间睡觉。快到七点钟时，有人从外面把门锁上，这一锁就是十二小时。

房间长八英尺[2]、宽五英尺，除墙壁高处的小铁窗和门上的监视孔以外，没有任何照明设备。房间里也没有臭虫，倒是有床架和草垫，这都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在很多收容站里，流浪汉只能睡在木板上，有些收容站甚至让流浪汉睡地上，把衣服卷起来当枕头。有间单人房，有张床，我希望晚上能睡个好觉。但我未能如愿，因为收容站里总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这所收容站的缺点在于寒冷。已经进入五月份了，或许是为了庆祝夏天到来，又或许是为了祭祀春神，主管部门停了暖气。三条棉毯几乎不管用。我整晚辗转反侧，只睡了十来分钟就被冻醒，然后睁眼等着天亮。

收容站里总是这样，等到最终我能安然入睡时，起床时间也到了。站长迈着沉重的脚步沿过道走来，挨个儿把门打开，嚷嚷着让我们起

床。过道里转眼就挤满了人，大家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冲向浴室，因为早晨只有一桶水供所有人用，先到先得。我到浴室时，已经有二十个流浪汉洗完了脸。我瞥了眼水面上那层黑压压的浮垢，决定脏着脸过一天。

我们匆忙穿上衣服，赶到食堂狼吞虎咽地吃早饭。面包比往常还糟，因为这个军人头脑的白痴站长昨晚把面包切成薄片，所以面包片硬得像压缩饼干一样。不过我们还是很高兴，经过寒冷的不眠之夜后，我们至少有茶可以喝。难以想象要是没有这杯茶，或者说没有这杯被他们称之为茶的东西，流浪汉们该如何是好。这可是他们的果腹之物，是他们的灵丹妙药，是他们抵御所有不幸的法宝。如果他们每天不喝那大约半加仑[3]的茶，我深信他们都没法活下去。

早饭过后，我们又得脱下衣服接受医疗检查，防范天花。医生还有四十五分钟才到，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四周，看看大家是怎样的一群人。这一幕颇具启发意义。我们光着上身在过道里站成长长的两列，冷得瑟瑟发抖。幽蓝的滤光灯透着寒意，毫不留情地把我们照得清清楚楚。如非亲眼所见，没人能想到我们看起来就是一群肚子圆滚、体格退化的怪胎。蓬乱的头发、胡子拉碴、哭丧的脸、凹陷的胸口、扁平足、松弛的肌肉……各种身体畸形和病态在这儿都能看见。流浪汉们的皮肤松弛暗淡，只是因为被太阳晒黑，看不出来而已。有两三个人的模样深深印在了我脑海里。其中一个是七十四岁的“老爹”。他捆着疝气带，双目充血并且噙着眼泪，胡须稀疏，而且脸颊凹陷；他饿得瘦骨嶙峋，活像早期画作中的拉撒路[4]的遗体。还有一个四处游荡、含糊傻笑的弱智。他的裤子动不动就掉下来露出屁股，让他觉得害臊不已，但却又乐乎乎的。我们当中没几个人能好到哪里去，体格健壮的不到十人，而且我觉得一半的人早就应该到医院接受治疗了。

这天是周日，我们得在收容站里度过整个周末。医生前脚刚走，我们就被赶回食堂，然后被关在里面。食堂墙壁用石灰粉刷，地板用石头铺就；食堂里面的松木桌和条凳，以及牢房般的气味，有着一种难以言表的阴郁。食堂窗户很高，根本没法看到外面；仅有的装饰物就是墙上挂的规章制度，规定行为不端的流浪汉会被严惩。我们把房间挤得水泄不通，动下胳膊都会撞到别人。才到早上八点，我们就已经腻烦了这种被囚禁的状态。我们无话可聊，只有闲谈路上的见闻，谈谈哪些收容站待遇好，哪些收容站待遇差，哪些郡的人心慈，哪些郡的人心坏，以及警察和救世军的不公之处。流浪汉们谈论的几乎都是这些话题，可以说他们只是在谈论自己的流浪生活。他们的对话算不上对话，因为饥饿的

肚子让他们无法思考。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太过艰难。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让他们只能思考到哪儿去找下一顿饭这种问题。

我们又熬过两小时。上了年纪的“老爹”有些愚钝，坐着一声不吭，背驼得像一张弓，泪水从他红肿的双眼流出，慢慢滴到地上。脏兮兮的老流浪汉乔治嘀咕自己在路上丢了一包口粮，他有戴帽子睡觉的怪癖，所以大家都认识他。游手好闲的比尔体格最为健壮。这位身强力壮的乞丐即便在收容站里待上十二小时，身上也还有一股啤酒味儿。他给我吹嘘他到处揩油的事迹，讲有人请他在酒馆里喝了几品脱啤酒，还说有个牧师向警察告密，害他被关了七天。当过渔民的威廉和弗雷德是两个来自诺福克的年轻人。他们唱了一首哀伤的歌，歌曲讲的是贝拉遭遇背叛，最后死在雪地里的不幸事迹。那个弱智胡言乱语，假想某个有钱人曾经给过自己二百五十七个金币。时间在这些忧愁的谈话和无聊的污言秽语中流逝。大家都在抽烟，但斯科蒂没有，因为他的烟草被没收了。看他没烟抽的样子实在是可怜，我给了他一些够卷一支烟的烟草。我们抽烟时都藏着掖着，一听到站长的脚步声，就像学生那样立刻把烟藏起来。收容站默许抽烟，但这实际上却是明文禁止的。

多数流浪汉在沉闷的食堂里熬过了十小时，难以想象他们如何能再多熬一小时。我认为无聊才是流浪汉最难以忍受的东西，比饥饿和病痛更可怕，比来自社会的长年累月的耻辱感更糟糕。把一个愚昧的人关上一整天，还让他无事可做，这种做法实在是既愚蠢又残忍，就像用铁链把狗锁在圆桶里，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忍受这种无聊，因为他们有东西聊以自慰。流浪汉几乎都是文盲，面对自己的穷困潦倒束手无策，脑袋里面空空如也。在毫无舒适感的长凳上连坐十小时的他们全然不知该如何打发时间，如果说他们会想到什么，那就是哭诉命运不济，渴望找到工作。他们无力忍受无聊带来的恐怖。而且，因为他们的生活大半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所以才会因无聊而备受煎熬。

我比他们幸运得多，因为站长十点钟时让我去济贫院厨房打杂，这可是大家最梦寐以求的差事。厨房里其实没什么活儿，而我又可以很快离开，和几个躲避周日早上工作的济贫院贫民一起，躲进放马铃薯的棚里。棚里燃着火炉，有可以舒服坐在上面的货箱，有许多《家庭先驱报》（*Family Herald*）的过刊，甚至还有一本从济贫院图书馆流出来的《业余神偷拉菲兹》（*Raffles*）。比起收容站，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我的晚饭也是在济贫院吃的，那是我吃过的最丰盛的晚饭。无论是在收容站里，还是在收容站外，流浪汉都不可能在一年内吃上两顿这样

的大餐。那些贫民告诉我，他们总是在周日大吃特吃，然后饿着肚子过接下来的六天。吃完饭后，厨子吩咐我洗碗，让我把吃剩的东西倒掉。浪费的食物实在是触目惊心：大盘大盘的牛肉、成桶的面包与蔬菜就像垃圾一样被扔掉，随后又被倒掉的茶叶弄脏。我把这些美味塞满五个垃圾桶时，我的流浪汉同伴正坐在离我两百码[5]远的收容站里，吃着经久不变的面包，喝着经久不变的茶，勉强混个半饱，或许为了庆祝周末到来，他们还能多得到两个冰冷的煮土豆。如此看来，济贫院宁可有意倒掉食物，也不会把食物分给流浪汉。

下午三点，我从济贫院厨房回到收容站。食堂里拥挤不堪，让人难受得忍无可忍。就连烟都没得抽了，因为他们能抽的烟草仅是别人丢掉的烟头；他们就像食草动物，如果离路边的草场太远，就只好饿肚子。为了打发时间，我和一位比较体面的流浪汉——穿着衬衣、打着领带的年轻木匠——聊了起来。他说自己是因为没有工具才走上这条道的。他和其他流浪汉保持着距离，认为自己更像自由人，不像流浪汉。他颇有文学修养，总是随身带着本斯科特的小说。他告诉我，他宁愿睡在树篱下或者草垛里，除非是饿得没法，否则他绝不会踏进收容站半步。他曾经白天沿着南方海岸行乞，晚上睡在游泳更衣车里，每次都会这样过几个星期。

我们谈到了流浪生活。他谴责现行体制让流浪汉在收容站里度过十四小时，剩下的十小时里却要东游西荡，而且还要躲避警察。他谈及自己的情况——因为没有价值三英镑[6]的工具，他接受了六个月的政府救济。真是愚蠢，他说。

后来我把济贫院厨房浪费食物的事情告诉他，还给他说了我的看法。他的语气瞬间发生转变。我看我是唤醒了沉睡在英国工人内心的优越感。虽然和大家一样饿着肚子，可是他立刻就明白了为什么宁可把食物倒掉也不分给流浪汉们。他让我大感惊诧。

“他们必须这样，如果把收容站这些地方变得舒适宜人，那么全国上下的人渣都会蜂拥而至。只有难以下咽的食物才能让那些人渣止步收容站。这些流浪汉都是不想工作的懒骨头，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千万不要纵容他们，他们都是败类。”

我提出几条论据证明他不对，可是他不听，反而不断重复：

“你不用怜悯这些流浪汉，他们都是败类。你也不用拿评判像你我

这样的人的标准去评判他们。他们就是人渣，仅此而已。”

看他如此巧妙地把自己和流浪汉同伴区分开来，实在是很有趣。他已经整整流浪了六个月，但他似乎在暗示，上帝不认为他是个流浪汉。他的躯壳或许在收容站，可他的灵魂早已冲上云霄，加入了纯洁的中产阶级队伍。

钟表指针缓慢地走着，真够折磨人的。我们连话都懒得再说，食堂里只能听见咒骂声和此起彼伏的呵欠声。你逼着自己不看时钟，感觉过了很久很久，可回头一看，其实才过了三分钟而已。倦怠像冷却的羊脂一样堵塞了我们的灵魂，骨头因此而酸痛起来。时针终于指到四点，但六点才能吃晚饭。月亮渐渐升起，而这里实在没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总算熬到了六点，站长和助手带来了晚饭。呵欠连天的流浪汉们立刻来了精神，就像到了饭点的狮子。但晚饭让人失望至极。早上的面包已经足够难咽，没想到晚上的面包竟完全没法吃，硬得连牙口最好的人也拿它没辙。尽管我们大多人已经饥肠辘辘，但年长的流浪汉还是空着肚子离开，也没有人把自己那份食物吃光。晚饭一结束，就有人把毯子发给我们，然后把我们赶回空荡冰冷的房间里。

十三小时过去了。我们在七点钟时被叫醒，飞奔着争抢浴室里的水，接着很快吃完面包，喝完茶。我们就要熬到头了，但当局十分恐惧天花，生怕它通过流浪汉传播，所以我们还得等医生再次检查之后才能走。医生这次让我们等了两小时，所以直到十点钟我们才得以解脱。

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我们获准走到院子里。走出昏暗阴沉、臭气熏天的收容站，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明媚！风是那么的清新！站长把包裹都还给我们，还给每个人一大块面包和奶酪当作午饭，然后我们就上路了，迫不及待地想要远离收容站，远离它的清规戒律。这便是我们短暂的自由。浪费了一天两夜后，我们大概有八小时去消遣，去捡光路上的烟头，去乞讨，去找工作。当然，我们还会走上十英里[7]、十五英里或许二十英里路去下一家收容站，在那里一切又会重新上演。

我挖出我那八便士，然后和诺比一起上路。诺比是个品行端正却意志消沉的流浪汉，他背着一双备用靴，走遍了所有劳工介绍所。我们之前的同伴就像床垫里的臭虫一样四散而去，只有那个弱智还在收容站门口徘徊，最后站长不得不把他赶走。

我和诺比动身前往克罗伊登。路上没有汽车经过，很是安静。栗子树开满繁花，宛如一根根巨大的蜡烛。整个世界是那么安静，空气闻起来是那么清爽。难以想象，就在几分钟前，我们还和那群流浪汉一起挤在下水道和肥皂的恶臭之中。其他流浪汉都已不见踪影，走在这条路上的似乎只有我们二人。

那时我听见身后传来匆忙的脚步声，有人拍了拍我的手臂。原来是矮个儿的斯科蒂，他喘着粗气追上了我们。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脸上挂着友好的微笑，像是要报恩似的。

“哥们儿，这给你，”他热切地说，“我欠你几个烟头。昨天你请我抽了根烟。早上出来的时候，站长把烟头盒子还给我了。礼尚往来嘛。给你。”

然后他把四只肮脏恶心的湿烟头塞到了我手里。

---

[1] 品脱，容量单位，主要在英国、美国及爱尔兰使用。

[2] 英尺，英美制计量单位，1英尺约为0.3米。

[3] 加仑，英美制容量单位，英制1加仑约为4.5升，美制1加仑约为3.8升。

[4] 拉撒路，耶稣的门徒与好友。据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记载，他病死后埋葬在一个洞穴中，四天之后耶稣吩咐他从坟墓中出来，因而奇迹似的复活。

[5] 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3英尺，合0.91米。

[6] 英镑，英国国家货币和货币单位名称。1英镑=240便士（旧制），约为人民币10元。

[7] 英里，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等于5280英尺，合1.6公里。

绞刑

时值缅甸雨季，一个到处都湿滴滴的早晨。昏暗的日光像黄色的锡纸，越过高墙，斜着照进监狱的院子里。我们等在死囚牢房外面，那是一排前面有两道栅栏的棚房，就像关动物的小笼子。每间囚室长宽均约十英尺，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木板床和一罐饮用水。几间囚室的内侧栅栏后面蹲着棕色皮肤的犯人，他们沉默不语，身上裹着毯子。他们都是死刑犯，一两个星期内就会被绞死。

一个囚犯被带出了囚室。他是印度人，身材瘦小，头发已被剃光，双眼迷茫却清澈。他嘴上的胡子浓密茂盛，与他的身体极不相称，很像电影里滑稽角色的小胡子。六个高大的印度狱卒看守着他，准备送他上绞刑架。其中两个狱卒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一旁，剩下四人正在给他戴手铐，并用铁链穿过手铐，固定到他们的腰带上，然后又把他的胳膊牢牢捆在两侧。六个人紧紧地拢在他周围，小心且爱抚似的抓着他，好像要时刻确保他在那里，就像抓着一条随时可能跳回水里的活鱼。但他站在那里，丝毫没有反抗，双臂有气无力地任由绳子捆着，好像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浑然不觉。

八点的钟声敲响了，号角声从远处的营房飘过来，在潮湿的空气中显得凄凉单薄。监狱长站在一旁，用手杖怏怏不乐地戳着地上的碎石，一听到号声就抬起了头。他是个军医，声音粗哑，留着牙刷形的灰白胡子。“拜托，抓紧些，弗朗西斯，”他烦躁地说，“这个人现在应该死了才对。你还没准备好吗？”

弗朗西斯是狱卒头儿，一个肥胖的达罗毗荼人，穿着一身白色粗斜纹布套装，戴着金边眼镜。他挥了挥黑乎乎的手。“是，长官，是，长官，”弗朗西斯急忙说，“一切准备完毕，绞刑吏正等着呢。我们可以出发了。”

“那就赶快走。这活儿不干完，犯人们就吃不成早饭。”

我们开始往绞刑架走去。囚犯两边各跟着一个挎着步枪的狱卒，另外两个狱卒紧靠着他，抓着他的胳膊和肩膀，既像是推着他，又像是在扶着他。我们其余人以及治安官等人跟在后面。刚走出十码远，队伍却

在没有收到任何命令或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停住了。原来发生了一件烦心事——院子里跑来一条不知从哪里来的狗，蹿到人群中间狂吠，围着我们上蹿下跳，整个身子摇来晃去；看到这么多人在一起，它高兴得发狂。那是只多毛的大狗，是万能梗犬和野狗的混种。它围着我们跳了一会儿，还没有人来得及阻止，它就朝囚犯冲去，跳起来想要舔他的脸。大家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吓得没人敢去抓它。

“谁放这只该死的畜生进来的？”监狱长怒道，“来人，抓住它！”

一个狱卒从押送囚犯的队伍里走出来，笨手笨脚地追着那条狗。但是它欢快地跳着，就是不让人抓住，把这一切都当成游戏。一个欧亚混血的年轻狱卒抓起一把碎石扔过去，想把它吓走，但是它躲开石头，又朝我们奔来。狗吠声回响在监狱里面。被两个狱卒押着的囚犯漠不关心地看着这一切，好像这只是绞刑的另外一个环节。过了好几分钟才有人抓住这条狗，然后大家用我的手帕拴住它的项圈又继续前进，那只狗仍然在挣扎低吠。

离绞刑架大概还有四十码远。囚犯走在我前面，我看着他那赤裸的棕色后背。他的双臂被捆着，走起路来笨拙但却相当沉稳。他的步态上下颠簸，和那些从来打不直膝盖的印度人一样。他每走一步，肌肉就跟着一张一弛，头皮上的那绺头发也随着上下舞动，双脚也在潮湿的沙砾上留下印记。尽管他的双肩都被狱卒押着，但为了避开路上的水坑，他还是往旁边挪了一小步。

真是奇怪，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处死一个身体健康且神志清醒的人意味着什么。看见这个囚犯为躲开水坑往旁边挪步时，我才明白处死一个正值壮年的人意味着什么，才明白那种无法言表的错误。他并非垂死之人，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个活生生的人。他全身的器官都在运转——肠子在消化食物，皮肤在新生，指甲在生长，组织也在生成——所有这一切都在严肃却愚蠢地忙活着。当他站在绞刑架的下落板上时，当他从上往下坠落、只有0.1秒可以活时，他的指甲仍在生长，他的眼睛还可以看见黄色的碎石和灰色的墙壁，他的大脑仍在记忆、预见和思考——甚至会考虑到水坑。他和我们走在一道，看见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了解到的都是同一个世界。但两分钟后，随着急促的咔嚓一声，我们之中就会有一人离去——少一个头脑，少一个世界。

绞刑架设在一个独立于监狱主体建筑的小院里，那里长满了高高的带刺杂草。绞刑架用砖砌成，就像一个有三面墙的棚房，顶上铺着木

板，木板上立着两根柱子和一根横梁，梁上系着的绳套晃来晃去。绞刑吏是个头发灰白的囚犯，穿着白色的囚服，正候在绞刑架旁。我们进去时，他卑躬屈膝地迎接我们。弗朗西斯一声令下，那两个狱卒把囚犯抓得更紧，半拉半推着把囚犯带到绞刑架前，帮助他笨拙地走上梯子。随后绞刑吏爬上去把绳套套在他的脖子上。

我们站在五码开外等着。狱卒围着绞刑架大致站成了一个圈。然后，绞刑吏系紧绳套，囚犯开始呼喊他信仰的神。他不断高声重复着“罗摩[1]！罗摩！罗摩！罗摩！”声音不像祈祷或者求救那样急切和恐惧，而是像钟声那样平稳有节奏。听到这声音，那条狗哀鸣了一声。绞刑吏仍旧站在绞刑架上，拿出一个像面粉袋的小棉布口袋套在囚犯头上。但囚犯的叫声仍在继续，只是隔着棉布有些含混不清；他反复叫着：“罗摩！罗摩！罗摩！罗摩！罗摩！”

绞刑吏从绞刑架上爬下来，做好准备，站在那里抓着拉杆。过了大概几分钟，囚犯平稳而低沉的叫声仍在继续，没有丝毫颤抖，“罗摩！罗摩！罗摩！”监狱长耷拉着头，慢吞吞地用手杖戳着地面；或许他正在数囚犯的叫声，允许他叫五十或一百声。每个人的脸色都变了。印度狱卒的脸灰得像劣质咖啡，其中一两人的刺刀还在摇晃。我们看着这个囚犯站在下落板上，双臂被捆着，脑袋上蒙着口袋；我们听着他的喊叫——每一声叫喊就意味着他又多活了一秒。大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哎，快杀了他吧，赶快完事，打住这厌恶的声音！

监狱长突然下定决心。他猛然抬起头，迅速挥了下手杖。“行刑！”监狱长几乎是恶狠狠地说道。

只听见哐当一声，接着是死一般的沉寂。囚犯不见了，只剩绳子在那儿拧着打转。我放开那只狗，它立即飞奔到绞刑架后面，到达那里后却突然停住，叫了几声，然后退到院子一角，站在野草丛中，战战兢兢地望着我们。我们绕到绞刑架后去检查囚犯的尸体。他还吊在那里，脚尖径直指着地面，身子缓慢旋转着，僵死如石。

监狱长伸出手杖，戳了戳那具赤裸的尸体，尸体随即微微摆动。“他没问题了。”监狱长说道，然后从绞刑架下退出来，深深地呼了一口气，闷闷不乐的表情在他脸上瞬间消失。他看了下手表，“八点零八分。得，今天早上就这样吧，谢天谢地。”

狱卒们卸下刺刀走开了。那只狗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刚刚行为不

当，灰溜溜地跟着他们。我们走出绞刑院，经过死囚牢房和等在里面的囚犯，来到监狱中央的庭院里。手握警棍的狱卒已经在指挥囚犯领取早饭了。囚犯蹲成长列，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个金属盘，两个狱卒提着饭桶给他们舀饭；绞刑之后，这样的场景看起来分外普通、愉快。完成了任务，大伙如释重负，有着想唱歌、想奔跑、想窃笑的冲动，大家突然就开始欢快地交谈起来。

那个走在我身旁的欧亚混血青年，用头指了指我们来的方向，狡黠地笑道："您知道吗？长官，咱们那位朋友（他指的是那个被绞死的囚犯）听到他上诉被驳回时，在牢房里尿了一地，那是给吓的！赏个脸抽支烟吧，长官。您喜欢我这个新的银色烟盒吗？长官，在小贩手上买的，两个卢比加八个安那[2]。上等欧洲货色。"

有几个人笑了。至于笑什么，似乎没人知道。

弗朗西斯走在监狱长身旁，啰哩啰唆地说："好啦，长官，一切都已经圆满完成了！就是那么顺利。并不是每次都这样顺利！噢，不！我知道有几次还要医生钻到绞刑架下面拉囚犯的腿，确保囚犯死掉。实在是太恶心了！"

"还在扭动，唔？那真糟糕。"监狱长说道。

"啊，长官，如果囚犯不听话那更糟！我记得有个囚犯，我们进去带他出来，他紧紧抓住牢房的栅栏不放。说了你都不会信，长官，六个狱卒才把他拉了下来，三个人扯一条腿。我们还给他讲道理。'亲爱的伙计，'我们说，'想想你这样会给我们带来多少痛苦和麻烦啊！'但没用，他根本不听！哎，太能惹事了！"

我发现我笑得尤其大声。大家都在笑，连监狱长也忍不住咧嘴笑了。"你们最好都来喝一杯，"他说得十分和善，"我车里有瓶威士忌，我们可以干掉它。"

我们走出监狱的双扇大门，来到马路上。"拉他的腿！"有个缅甸治安官突然喊道，然后放声咯咯大笑。我们又笑了起来。那个时候，弗朗西斯讲的轶事似乎特别好笑。我们一起喝了酒，不分本地人还是欧洲人，都十分友善。而那具尸体就在一百码开外。

---

[1] 罗摩，阿逾陀国的王子，是印度古代传说中的伟大英雄，为印度教所信奉的重要神祇之一。

[2] 印度货币，1卢比等于16安那。

书店记忆

我在一家旧书店打过工，印象最深刻的是店里真正爱书的人少得可怜。没在旧书店做过事的人，很容易把书店想象成天堂，总觉得那里有风度翩翩的老先生翻阅着小牛皮封面的对开本。我们店里异常有趣的书籍数量颇多，但我怀疑懂得区分书籍优劣的读者恐怕不到十分之一。自以为懂行、只买首版书的人比文学爱好者更常见，而为廉价教科书讨价还价的东方留学生比比皆是，但最常见的还是那些想给侄子买生日礼物的糊涂女人。

光顾我们书店的大多属于一类人，他们走到哪儿都招人烦，在书店更是如此。比如说，这位可爱的老太太想要“买本书给病人看”（这种要求很常见），那位可爱的老太太在1897年读过一本好书，想让你帮她找找。可惜她既记不起书名，也想不起作者是谁，更别提书里讲的什么内容了。她只记得那是本红色的书。除此之外，众所周知，还有两类讨厌的人，他们常常在各处旧书店出没。一类是浑身散发着陈年面包皮气味、形容消瘦的人，他们每天都会来，有时一天来好几次，向你兜售一些毫无价值的书。另外一类人会订购许多书，却从未打算掏腰包。我们店从不赊账，但如果顾客稍后会来取走的话，我们可以先替他们把书拿出来，有必要的话我们也接受预定。然而，真正回店里取书的人不到一半。起初我很是困惑，他们究竟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跑到店里找寻罕见又昂贵的书，然后让我们再三承诺替他保留那本书，之后他们便消失不见，再也没有回来。但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妄想狂，这点毋庸置疑。他们总是以浮夸的口吻谈论自己，然后编造些聪明绝顶的故事来解释他们怎么碰巧没带钱出门——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自己都相信这些故事。在伦敦那样的城市里，总有许多不太容易被看出是疯子的人走在大街上，他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往书店跑，因为书店是为数不多的不用花钱就可以在里面转悠很久的地方。到最后，你几乎能一眼把他们认出来。不管他们怎么吹牛皮，都给人一种迂腐和散漫的感觉。对付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是妄想狂的顾客，我们往往先把他要的书拿出来，待他一走便立刻把书放回书架。我注意到，他们倒是没有想过不花钱就取走那些书的；对他们来说，订书就已经足够了——想来这能给他们一种真正消费的幻觉。

和大多数旧书店一样，我们书店也兼营各种商品，如二手打字机和邮票——我指的是用过的邮票。集邮者是一类怪异、沉默、如同鱼一般的人，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不过仅限于男性；女性显然看不出将这些五颜六色的纸片贴到邮册里的独特魅力所在。我们还出售价格为六便士的占星图，它们的绘制者声称自己曾经预言过日本大地震。这些图密封在信封里，我从未打开看过。但买图的人经常跑回书店给我们讲占星图有多“准”（无疑所有占星图都很“准”，如果它们说你对异性特别有吸引力，说你最大的毛病就是过于慷慨）。我们也出售许多儿童读物，但主要是些“库存书”。现代儿童读物实在不敢恭维，尤其是当你看到它们扎堆的时候。比起巴里[1]的《彼得·潘》（*Peter Pan*），我倒宁愿给孩子看佩特洛尼乌斯·阿尔比特尔[2]的书，但比起后来那些效仿者，巴里似乎也算得上有益心智，具有男子汉气概。圣诞时节，我们会忙上十天，销售圣诞贺卡和日历，工作乏味至极，但这些东西在圣诞季的销量还比较可观。像这种利用基督教情感牟利的刻薄行径倒是让我颇感兴趣。早在六月份时，圣诞贺卡公司的人就会捧着卡片目录来到书店。在他们的一张发票上，有句话让我记忆犹新——“耶稣圣婴与兔子，两打”。

但我们的兼营业务主要是租书——“两便士、无押金”，和一般租书店一样，可租的书有五六百册，全是小说。偷书贼对这种地方该是有多喜欢啊！在这家书店花两便士租本书，然后撕掉标签，拿到另一家书店卖一先令[3]，这算是世上最轻巧的犯罪活儿了。即便如此，书店老板们发现，丢几本书（我们店经常每月丢一打）比用押金吓跑顾客要划算得多。

我们书店刚好坐落在汉普斯特和卡姆登镇的交界处，店里有各种类型的常客，上至男爵，下至公交车售票员。或许到我们店里租书的人算得上整个伦敦公众阅读的缩影。所以，值得一提的是谁的书被租得最多——普里斯特利[4]？海明威？沃波尔[5]？还是伍德豪斯？错，都不是！是埃塞尔·梅·戴尔[6]，沃里克·迪平[7]紧随其后，排名第三的应该说是杰弗里·法诺[8]。当然，戴尔小说的读者都是女性，但正如人们所预料到的那样，不只有那些愁眉苦脸的老处女和烟草商的胖太太，而是各种类型、各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有。要说男性不读小说，那是假的，但他们确实对很多类型的小说避而不读。大体上说，人们所谓的普通小说——即那些模仿高尔斯华绥且被视为英国小说典范的平庸之物——似乎只为女性而存在。男人读的要么是能让他肃然起敬的小说，要么就是侦探小说。不过他们对侦探小说的消化能力可真够惊人。据我所知，我们店里有位顾客在连续一年多的时间里，每个星期都要读四五本侦探小说，还

不包括他在其他书店租的书。最让我诧异的是每本书他只读一遍。显然，所有那些令人震惊的大批垃圾（我计算过，他每年读的书平铺开来恐怕要占地四分之三英亩[9]），已经永久地储存在他的记忆当中。他从不在意书名或者作者，但他只需扫一眼内容就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读过了”。

在租书的地方，你能见识到人们真正的阅读品位，而不是他们装出来的样子，而且你会觉得惊讶于那些“经典”的英国小说家从来无人问津。把狄更斯、萨克雷、简·奥斯汀、特罗洛普等人的作品放到租书区，完全就是摆设，没有人会把它们从架上取下。一看到19世纪的小说，人们就会说，“天啊，这也太过时了！”然后立刻退避三舍。但狄更斯的小说还是相当好卖，就像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好卖。狄更斯是人们“一直打算”去读的作家之一，而且和《圣经》一样，人们对他的了解也是间接得来的。人们道听途说，以为比尔·赛克斯是个窃贼，认为米考伯是个光头，正如他们道听途说，认为摩西是人们在芦苇丛中一个篮子里发现的，并且摩西见到过上帝的“后背”。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美国的书籍越发被人冷落。另外，短篇小说也不受欢迎，出版商每隔两三年就会因此头疼不已。那种请店员帮忙挑书的顾客几乎每次都会先说“我不想读短篇小说”或者“我不喜欢读那种小故事”，我们店有个德国顾客就经常这样。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有时会说，每篇短篇小说都有新角色，每次都要去熟悉这些角色太麻烦了。他们喜欢“扎进”那种读完第一章便无须思考的小说。不过，我认为这更应该归咎于作者而非读者。大多数现代短篇小说，不管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都完全没有生气，毫无阅读价值，它们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大部分长篇小说要严重得多。但真正称得上故事的短篇小说还是很受欢迎，就拿D.H.劳伦斯来说，他的短篇小说就和长篇小说一样受人追捧。

难道我想当职业书商不成？总的来说，不想！虽然书店老板待我很好，我在书店也度过了一些快乐时光。

只要地段不错，资金足够，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开书店，虽然收入微薄，但却衣食无忧。学习怎么卖书并不难，但要卖那种“罕见”的书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你还懂点书的话，那么你起步时就占有很大优势（大部分书店老板都没这个底子，随便看看他们征集旧书的行业报纸，你就能知道他们大概几斤几两了；他们不是把博斯韦尔当成《衰亡录》（*Decline and Fall*）的作者，就是把T.S.艾略特误认为是《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的作者。开书店也是高雅行业，不会

被过度庸俗化。联合企业不可能像排挤杂货商或送奶工那样挤占这种小型独立书店的生存空间。但经营书店的工作时间会很长，这种生活并不健康——我只是个兼职雇员，而我的老板每周要工作七十小时，这还不包括他经常出去收购图书的时间。通常，书店在冬天寒冷异常，因为若是太暖和，书店橱窗上就会起雾，而书店老板正是靠橱窗过活。此外，书本里飞出来的灰尘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多，连绿头苍蝇都愿意飞到书上了结一生。

但是我之所以不想终生卖书，是因为在书店打工时，我对书籍的热爱就已全然不见。书店老板卖书时不得不说谎，这反而会让他们对书产生厌恶。更糟糕的是，书店老板还得经常打扫灰尘，把书搬来搬去。曾经有段时间，我对书的确爱不释手——我喜欢它们的样子，喜欢它们的气味，喜欢它们的触感，我指的是那些至少有五十年或以上历史的旧书。最让我开心的莫过于在乡村拍卖会上花一先令买到许多这样的书。那些和你不期而遇的书，虽然破旧不堪，但却别有风味：18世纪无名诗人的作品、过时的地名词典、被人遗忘的小说散卷、19世纪60年代的女性杂志合订本。当你躺在浴缸里时，半夜累得睡不着时，或者在等着吃午饭时，随手翻翻过期的《少女自己的报纸》（*Girl's Own Paper*）最好不过了。但开始在书店打工后，我就再也没买过书了。一次性看见少说五千、多则一万的书籍，实在无趣，甚至有点倒胃口。现在，我偶尔也会买本旧书，但只有在我想读但又借不到的情况下才会买，而且我再也不买无用的旧书。那些发黄书页散发出的芳香对我已不再有任何吸引力。只要看到它们，我就会想起那些患妄想症的顾客和死掉的绿头苍蝇。

---

[1] J.M.巴里（J.M.Barrie，1860-1937），苏格兰剧作家、小说家，《彼得·潘》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2] 佩特洛尼乌斯·阿尔比特尔（Petronius Arbiter，公元27年-公元66年），罗马帝国讽刺作家，著有喜剧故事《萨蒂利孔》（*Satyricon*）、《萨蒂尔的故事》（*Tales of Satyrs*）。

[3] 先令，英国的旧辅币单位。旧制1先令=12便士，新制1先令=5便士。

[4] 约翰·普里斯特利（John Priestley，1894-198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5] 休·沃波尔（Hugh Walpole，1884-1941），英国小说家，四部历史系列小说《流氓哈里斯》（*Rogue Herries*）是他最具代表性的畅销小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沃波尔在俄罗斯红十字军中服役，1937年被封为爵士。

[6] 埃塞尔·梅·戴尔（Ethel M.Dell，1881-1939），英国女作家，著有三十多部言情小说和几部短篇故事。

[7] 沃里克·迪平（Warwick Deeping，1877-1950），英国作家，其最受欢迎的小说是《索瑞尔父子》（*Sorrell and Son*）。

[8] 杰弗里·法诺（Jeffrey Farnol，1878-1952），英国著名浪漫故事作家，其《明确的目标：纽约爱情故事》（*The Definite Object: A Romance of New York*）一书是美国1917年小说类的畅销书，书中充满了浪漫的情节、生动的人物、有趣的历险。

[9] 英亩，英制中计量土地面积的一种单位。1英亩＝0.405公顷＝6.072亩。

猎象记

在下缅甸的毛淡棉时，我遭到许多人憎恨。我竟显要到遭人憎恨，这在我一生中也仅此一回。我是毛淡棉的分区警官，那里盲目而狭隘的反欧情绪让人非常痛苦。他们不敢发动暴乱，但如果欧洲女性只身穿过集市，或许会有人往她衣服上唾槟榔汁。我这个警官就是个明显的目标，他们只要觉得安全，就会对我进行嘲弄。我在足球场上被某个敏捷的缅甸人绊倒，而同是缅甸人的裁判却视而不见，这时人们就会可憎地大笑起来。这种事情发生过多次。最后，我随处都能遇见嘲笑我的黄色年轻面孔，能听见人们在身后稍远处辱骂，这让我颇为心烦。年轻的和尚最为恶劣。城里有好几千个年轻和尚，全都无所事事，只知道站在街角嘲弄欧洲人。

这让我感到茫然和苦恼，因为那时我坚信帝国主义是个邪恶的东西，下定决心尽早辞职离开。理论上说——当然也只能私底下说——我完全支持缅甸人，反对压迫他们的英国人。至于我的工作，我已经憎恨到无法言表。从事那样的工作，你可以近距离观察大英帝国的卑鄙勾当。可怜的囚犯挤在臭烘烘的监狱里，刑期长的罪犯脸色苍白而胆怯，受过鞭刑的人臀部结满伤疤，这些都让我承受着巨大的负罪感。但我却无法正确看待这一切。我当时还很年轻，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不得不在彻底的沉默中思考自己的困惑——这种沉默被强加于所有身处东方的英国人身上。我甚至不知道英帝国已行将就木，也不知道它比那些即将取代它的新帝国好很多。我只知道我进退维谷，既憎恨我所效力的帝国，又对那些试图阻挠我工作的卑鄙小人感到愤怒。我将英属印度视为坚不可摧的专制政权，永远压迫着那些被征服民族的意志；同时我又认为，在那些和尚的肚子上捅一刀将是世上最大的乐事。这种感觉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副产品；你可以去问任何一个英属印度的官员，如果你能在他不上班时找到他的话。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从侧面得到了启发。那件事情本身很小，但却让我更加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专制政府所作所为的真正动机。那天清晨，镇子那头警署的副督察打来电话，说集市里有头大象在横冲直撞，问我能否过去处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是我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便骑上一匹矮种马动身前去。我还带上了我的步枪，一

把老式的0.44英寸[1]温切斯特步枪。这把枪口径太小，打不死大象，但我觉得枪声或许可以吓走它。路上许多缅甸人拦住我，告诉了我大象都干了些什么。那当然不是野生大象，而是一只被驯化了的发情公象。被驯化的大象在发情时都会被拴起来，但在头天晚上，这头大象挣脱链子逃了出来。只有驯养它的象夫能够驾驭它，而象夫十二小时前就出发去寻象，可是他追错了方向，大象却在今天早晨突然出现在镇上。缅甸人没有武器，拿它毫无办法。它已经撞毁了一幢竹屋，顶死了一头母牛，袭击了几处水果摊，吃掉了水果摊上的水果。它还撞上了镇上的垃圾车，司机跳车逃命后，它就把车掀翻，肆意破坏。

缅甸副督察和几位印度警察正在发现大象的街区等着我。那个街区很穷，肮脏的竹屋错综复杂，蜿蜒坐落在陡峭的山坡上，屋顶盖着棕榈叶。我记得那是雨季伊始时的一个早晨，多云且沉闷。我们开始询问大象的去向，却照旧没有问出任何确切信息。在东方，情况总是这样：在远处时事情听上去很清楚，可离现场越近，事情就变得越模糊。有人说大象去了这边，有人说去了那边，甚至还有人说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大象。就在我几乎肯定整个事件就是一连串谎言时，我们忽然听见不远处有人喊叫。有人惊恐地大喊：“孩子们走开！快走！”一个老妇手里拿着鞭子从一间竹屋后面出来，凶狠地驱赶着一群光着身子的孩子。她后面跟出来几个妇女，惊讶地叫喊着。那边显然有孩子不应该看到的东西。我绕到竹屋背后，看见泥泞中躺着一具男尸。那是个印度人，一个黑皮肤的达罗毗荼苦力，几乎全身赤裸，而且看样子没死多久。人们说大象在竹屋附近突然攻击了他，用鼻子抓住他，然后用脚踩在他背上，把他踩到泥里。时值雨季，泥土松软，他的脸在地上划出了一条深一英尺、长好几码的沟痕。他双臂张开趴在地上，脑袋明显扭向一边。他的脸上满是泥土，双目圆睁，牙齿外露，嘴咧着，脸上一副痛苦至极的表情。别告诉我死去的人看上去都很安详，我见过的尸体大多都惨不忍睹。大象用脚蹭掉了他背上的皮肤，蹭得就像人们剥兔子皮一样干净。看到这具尸体后，我立即派勤务兵去附近朋友家借射象用的步枪。我还让人把我的马牵了回去，以免它嗅到大象的气味，受惊吓把我扔下马背。

几分钟后，勤务兵带回一把步枪和五颗子弹，同时有些缅甸人来告诉我大象在几百码外的稻田里。我动身前去，几乎整个街区的人都从家里出来，跟在我后面。他们看见了步枪，知道我要射杀大象，全都兴奋地叫喊着。大象毁坏他们的房子时，他们并未对大象表现出多少兴趣，可等到要射杀大象时，他们却又兴趣大增。他们觉得射杀大象很有意思，英国人可能也会觉得如此；而且他们想要象肉。这让我隐约有些不

安。我并不想射杀大象；我让人去取步枪，仅仅是为了在必要时自卫。而且，有一群人跟在你身后时，你总会很紧张。我肩上挎着步枪走下山坡，身后紧跟着越聚越多的人群；我看上去就像傻瓜，自己也感觉像傻瓜。远离竹屋的山坡脚下有一条碎石路，再远处是许多荒芜的泥泞稻田。稻田宽一千来码，虽然没有犁过，但在几场雨后都变得泥泞，零星长着杂草。大象在离马路八十码远的地方站着，身子左边朝向我们。它并未注意到人群在接近。它拔起一撮撮草，在膝盖上拍打干净，然后塞到口中。

我停在路上，看见大象时我就确信不该射杀它。射杀一头可以干活的大象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就等于捣毁一台昂贵的大机器。显然，人们应该尽量避免射杀大象。它站在那儿安静地进食，看上去如奶牛一般无害。我当时觉得，现在也觉得，它的发情期已经过去，所以它并不会攻击人，只是在那儿闲逛，等着象夫回来抓它。而且我根本就不想射杀它。我决定观察片刻，确保它不再发狂之后便可回家。

可我又环视了跟着我来的人群。人很多，至少有两千人，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人群挤满了马路两边。花花绿绿衣服上面，有着一张张因这件趣事而开心和激动的黄色面孔。他们都觉得我会射杀大象，就像看魔术师变戏法一样看着我。他们并不喜欢我，但拿着那把神奇步枪的我暂时还值得他们一看。我突然觉得自己最终还得射杀大象。他们期待我那样做，我非做不可。我能感受到两千人的意志在强迫我那样做，这让我无法抵抗。就在我手握步枪站着那儿的时候，我第一次理解到白人在东方统治的空洞与徒劳。我这个握着步枪的白人，站在一群没有武装的土著前面，看似是主角，实则只是个滑稽的傀儡，被身后这群黄面孔左右。此刻我意识到，白人的专制摧毁的正是他自己的自由。他成了空虚无力、装腔作势的傀儡，这已经成为白人老爷[2]的固有形象。因为他统治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终生镇住“土著”，所以在关键时刻他就必须按“土著”的期待行事。他戴着面具，脸孔也逐渐长得适合面具。我不得不射杀那头大象。派人去借枪时，我就表明了要射杀它。老爷做事就得有老爷的样子，他必须表现得坚决果断。我拿着步枪，身后跟着两千人来到这里，然后又临阵胆怯，就此罢手——不，这绝对不行。他们会嘲笑我；而我的一生，每个身处东方的白人的一生，都在漫长地挣扎着避免被嘲笑。

可是我并不想射杀它。我看着它在膝盖上拍打杂草，全神贯注，无比安详。在我看来，射杀它就是谋杀。那个年纪的我并不反感杀死动

物，但我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想射杀大象（不知为何，杀死大型动物总让人感觉更加糟糕）。而且，我还得考虑大象的主人。这头大象活着时至少值一百英镑，而死后恐怕只有象牙能值五英镑。可我必须加快行动。我向几个看上去很有经验的缅甸人求助，他们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我问他们大象表现如何。他们的回答都一样：你不管它，它就不理会你；你要是离它太近，它可能会攻击你。

我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我应该靠近它，比如说走到离它二十五码以内，试探它的反应。如果它攻击我，我就可以开枪；如果它不理睬我，我就可以放心不管它，直到象夫回来。可是我也知道自己不会这样做。我的步枪枪法不准，而且脚下的泥土松软，每走一步我就会往下面陷一些。如果大象攻击我，而我却没有打中它的话，我就会像压路机下的蛤蟆一样难以活命。但即便在那时，我想到的也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身后那群警惕的黄面孔。在那个时候，人群看着我，我并没有像只身一人时那样感到普通意义上的害怕。在“土著”面前，白人不能胆怯，所以通常也不会胆怯。我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有什么闪失，这两千缅甸人就会看着我被大象追赶、抓住、踩踏，最后就像山坡上那个印度人一样，成为一具咧着嘴的尸体。如果真是那样，他们当中就会有人嘲笑我。这绝对不行。

我别无选择。我往弹匣里压入子弹，卧倒在路上以便瞄准。人群变得十分安静，无数人的嗓子中发出了低沉却开心的叹息，就像看戏的观众终于看到帷幕升起一样。他们终于可以看到好戏上演了。那把步枪是一把德国造的好枪，配有十字瞄准器。我那时并不知道射杀大象时应该让子弹贯穿大象的两个耳孔。大象侧身对着我时，我应该瞄准它的耳孔，可我却瞄准了耳孔前面几英寸的地方；我以为那儿就是象脑。

扣动扳机的时候，我并未听到枪声，也没有感觉到后坐力——射中目标时你是感觉不到枪声和后坐力的——但我听到了人群中爆发出欢快的喝彩。就在子弹击中目标的那个瞬间，你会觉得大象身上发生了神秘而巨大的变化。它没有被激怒，也没有倒下，可是它身上的纹路全都变了样。它突然没有了力量，身子也萎缩了，看上去极其苍老，似乎子弹的巨大力量没有击倒它，只是让它瘫痪在那里。最后，似乎过了很久——我敢说过了五秒钟——它才无力地跪倒在地。它的嘴里淌着口水，似乎变得十分衰老，看上去有好几千岁。我又瞄准同样的地方开了一枪。它被击中后并没有倒下，而是非常缓慢地站了起来；它虚弱地直立在那儿，四肢无力，脑袋耷拉着。我又开了一枪。这是击倒它的一枪。

你能看到它的整个身体因痛苦而颤抖，四肢上仅存的力量也消失殆尽。可在倒下的过程中，它似乎想要站起来；它就像一块即将倒下的巨石，后脚已经瘫在地上，上身却向上抬起，鼻子像大树一样指向天空。它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出嚎叫，然后腹部朝向我倒了下去；它重重摔在地上，甚至在我趴着的地方也感觉到了震动。

我站了起来。那群缅甸人已经争先恐后地跑到田里。大象显然不会再站起来，可是它还没有死。它还在有节奏地喘着气，发出长长的喘息声，巨大的半边身子痛苦地上下起伏。它大张着嘴，我能看到其淡粉色喉咙的深处。我花了很长时间等它死去，但它的呼吸并没有减弱。最后，我把剩下的两颗子弹对着我认为是心脏的地方打了出去。浓稠的血液如同红色丝绒一般涌出来，可它依然没有死去。被最后两枪击中时，它的躯体甚至都没有抽动；它仍然痛苦地呼吸着。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正慢慢死去；可是它却身处某个远离我的世界，在那里子弹无法再伤害它。我觉得自己必须结束它那可怕的喘息声。这头巨兽无法移动，也无法死去。我看着它躺在那里，无法终结它的生命，感觉痛苦至极。我差人回去取来我的小口径步枪，向着它的心脏和喉咙接连开了几枪。可这几枪似乎毫无作用，它痛苦的喘息声仍然持续不断，就像时钟的嘀嗒声一样。

最后，我无法再忍受下去，便离开了那里。后来听说它半小时之后才死去。甚至在我离开之前，那些缅甸人就带来砍刀和篮子，据说那天下午他们就剥光了象肉，留下了一堆骨架。

当然，人们后来对射杀大象议论不断。大象的主人大发雷霆，可他只是个印度人，对此也无可奈何。而且从法律上讲，我并没有做错，因为如果大象主人控制不住发狂的大象，那么这头大象就必须像疯狗一样被杀掉。欧洲人意见不一，年长的说我做得对，年轻的则说因为一个苦力就杀掉大象实在可惜，因为大象比科林吉[3]苦力值钱。后来，我很感激那个苦力的死，那让我在法律上有正当的理由，让我有充分的借口射杀那头大象。我常常想，当时是否有人知道，我射杀那头大象仅仅是为了避免出丑。

---

[1] 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等于1英尺的1/2，合2.5厘米。

[2] 老爷，殖民地时期印度人对欧洲男士的尊称。

[3] 科林吉，从印度南部迁至缅甸谋生的印度人。

矿井之下

我们的文明，请切斯特顿[1]原谅我的不同意见，是以煤炭为基础的，其基础地位比人们停下来思考时所认识到的更彻底。我们赖以生存的机器，以及制造机器的机器，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着煤炭。在西方世界的新陈代谢中，煤矿工人的重要性仅次于种地的农民。他们就好比女像柱，支撑着几乎所有不肮脏的东西。因此，如果你有机会，而且不嫌麻烦，那么煤炭开采的真实过程就尤其值得观察。

下到煤矿井中时，很有必要在“装填工人”工作时去采掘面。这并不容易，因为在开采工作进行时，参观者不受欢迎，而且很令人讨厌，但如果在其他时候去采掘面，你可能会得到完全错误的印象。例如，星期天的煤矿看上去就尤为宁静。你应该在机器轰鸣，煤尘把空气染黑，并且能亲眼看到矿工工作的时候去采掘面。这些时候的采掘面犹如地狱，至少像是我设想中的地狱。一想到地狱，大多数人会想到高温、嘈杂、混乱、黑暗、污浊的空气，尤其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狭窄空间；这些在采掘面都有，不过那里并没有火，只有安全灯和手电筒发出的微弱光线，而这些光线几乎无法穿透空气中厚厚的煤尘。

最终到达采掘面——到达那里本身就需大费周折，我稍后会解释——你爬行穿过最后一排坑木，看到面前是一堵三四英尺高的光亮黑墙。那就是采掘面。头顶是煤矿开采后留下的光滑岩石，脚下也是岩石，所以你所处的巷道就和煤矿脉一样高，大概一码多点。会暂时盖过一切的第一印象便是煤炭传送带震耳欲聋的可怕噪声。空气中的煤尘遮挡住矿灯的光线，所以能见度并不高，但你可以看到两边跪着的半裸工人，相互间隔四五码，用力铲起掉到地上的煤炭，然后快速从左肩上方抛到背后。他们把煤炭铲到转动着的橡胶传送带上。传送带宽两英尺，在工人身后一两码的地方运转。闪闪发光的煤炭像河流一样，在传送带上奔流不息。在大型煤矿中，传送带每分钟可以运走数吨煤炭。它将煤炭运到主矿道上，然后倒进能装半吨的矿车中。矿车被拖到升降车里，再运送到矿井外。

看到“装填工人”工作，你就会嫉妒他们的强壮。他们的工作异常艰苦，在普通人看来几乎就是超乎常人的工作，因为他们不仅要铲走大量

煤炭，而且工作环境也让工作难度倍增。他们站起来就会撞着头顶，所以必须一直跪在地上。你尝试一下便能知道这有多么辛苦。站着铲煤相对轻松，因为你能使用膝盖和大腿挥动铁铲；而跪着的时候，所有压力都由手臂和腹部肌肉负担。其他的环境因素也让工作变得更加困难。矿井里温度很高，不同矿井温度不同，有的却热得让人窒息；煤尘会堵住你的喉咙和鼻孔，还会堆积在你的眼睑上；而且传送带不停地发出噪音，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就像是不停射击的机枪。可是装填工人就像铁人一样观察和工作。他们看上去的确就像锻造而成的钢铁塑像，从头到脚沾满了煤尘，就像穿着光滑的外套。只有在矿井里看到赤膊的矿工，你才会发现他们有多伟大。他们大多是小个子（大个子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却几乎都拥有最为非凡的身躯，宽大的肩膀、修长柔韧的腰部、窄小却显眼的臀部和强壮的大腿，全身没有丝毫赘肉。在较热的矿井里，他们穿着薄内裤、木屐和护膝。在特别热的矿井里，他们只穿木屐和护膝。单看外表你很难判断他们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可能位于六十或六十五岁以下的任何年龄段，但是在赤身裸体、浑身黝黑时，他们看上去都一个样。没有年轻人或士兵般的身板，就无法胜任他们的工作；腰间多上几磅赘肉，就无法反复弯腰。你一旦过目，那种场景就会让人永世难忘：一排工人弯腰跪在地上，全身被煤尘染黑，挥动着大铁铲，用惊人的力量和速度铲着煤炭。他们每天工作七个半小时，理论上从不休息，因为他们没有“休息”时间。实际上，他们可以挤出大约十五分钟吃自带的食物——通常是一大块抹油面包和一瓶冷茶。第一次看“装填工人”工作时，我在煤尘中摸到了某种恶心黏稠的东西。那是一块被咀嚼过的烟草。矿工几乎都要咀嚼烟草，据说那样可以有效解渴。

或许你得多下几个矿井，才能充分理解身边进行着的采煤流程。这主要是因为在路上所耗费的精力，就让你很难再去注意其他事情。从某些方面看，这甚至有些让人失望，或者至少与你的期待有出入。你走进升降车——宽度与电话亭相等、长度是电话亭两倍或三倍的铁箱子——升降车能容下十人，可是里面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而且高个子在里面无法站直。铁门在你面前关上，在上面操作绞盘的人将你们降到深井当中。在升降车里，你通常会短暂地感觉到反胃。升降车接近井底时会突然减速，让你觉得它又开始上升，这个时候反胃的感觉最为严重。升降车下降途中，速度可能达到每小时六十英里；在更深的矿井中速度会更快。到达井底缓慢走出电梯时，你大概在地下四百码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头顶上有一座小山；几百码厚的坚硬石头、已经灭绝的动物遗骨、底土、燧石、植物根部、绿草地，以及草地上吃草的奶牛——这些都在你头顶上，由小腿粗的木头支撑着。不过，因为升降车的速度很

快，而且整个下降过程完全黑暗，所以你几乎不会觉得自己的位置比皮卡迪利地铁站底部更深。

另外，让人惊讶的是你需要在地下横着走很远。在下井之前，我大概想象过矿工从升降车出来，走上几码路便开始挖煤的情形。我并没有想到他们在开始工作前，必须爬过许多通道，差不多有伦敦桥到牛津圆环那么远。当然，竖井起初能够直抵矿层附近，但是旧矿层开采完后就要接着开采新矿层，矿坑也就离竖井底部越来越远。竖井底部到采掘面的距离，一英里只是平均数，三英里再正常不过，据说在有几家煤矿里甚至达到了五英里。不过这些距离与地面距离并不对应，因为那一英里或三英里的距离几乎都不在主矿道里，而且即使是在主矿道里，能让工人站直身子的地方也不多。

走上几百码远，你才能感受到那种影响。你得微微弓着腰，在昏暗的巷道里往下走；巷道有八英尺或十英尺宽，大约五英尺高，墙壁就像德比郡的石墙那样由页岩石板垒成。每隔一两码就有支撑着横梁和大梁的木柱；有的大梁被压得十分弯曲，必须低着头才能过去。脚下通常是厚厚的灰尘或锋利的页岩块，给人的感觉也很糟糕；在有水的煤矿里，脚下就是农田般的烂泥。巷道里还有像微型铁轨一样的矿车轨道，枕木相间一二英尺，走在上面也很累。页岩尘把所有东西都染成灰色；似乎所有煤矿里都有着同一种尘土飞扬的灼热气味。你能看到许多不知道用来做什么的神秘机器，还能看到一捆捆挂在绳子上的工具，有时也能看到老鼠飞快地从矿灯的光线里跑过。老鼠尤为常见，尤其是在曾经用过或依然用着马匹的煤矿里。真是有趣，它们最初是如何到达这里的呢？或许是从竖井上面掉下来的——有人说老鼠从再高的地方掉下来都不会被摔着，因为它们身体的表面积相对体重而言很大。你紧挨着墙壁躲开一排排矿车。矿车由地面上无尽的钢缆牵引着，缓缓颠簸着驶往竖井。你爬过麻布门帘和厚厚的木门。木门打开时，会冲出强劲的气流。这些木门是通风系统中的重要环节。废气通过风扇从一个竖井排出，新鲜空气自动流入到另一个竖井。可是，如果不采取措施，空气就会选择最短的线路流动，导致较深的矿坑无法通风，所以所有的近路都必须封闭起来。

刚开始时，弯腰前进十分滑稽，不过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我个子很高，弯腰尤为不便。在巷道顶部只有四英尺或更低时，只有侏儒或小孩才不会觉得难走。你不仅需要加倍弯腰，还需要一直抬头观察，躲避横梁和大梁。因此，你的颈部会持续痉挛，不过与膝盖和大腿上的痛

苦相比，这算不上什么。只需前进半英里（我并没有夸张），你就会觉得痛苦难耐。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走到终点，而且还会考虑自己到底如何回去。你的速度越来越慢。你要穿过一段几百码长的过道，过道十分低矮，只能蹲着前进。接着过道突然变高——或许是因为顶部曾经垮塌过——你便能站直身子走上二十来码，疼痛也就减轻了许多。可接下来又是一百码长的低矮过道，还有连串的横梁，你必须从横梁下爬过去。你只能匍匐前进，在蹲着前进后，即使是爬行也能缓解痛苦。然而，当你爬过横梁，试着站起来时，你发现自己的膝盖会短暂地罢工，让你无法站立。你厚着脸皮要求停下来，说要休息一两分钟。向导（一名矿工）同情你，知道你的肌肉和他的不同。“只有最后四百码了。”他鼓励道。你的感觉却是他还不如说还有最后四百英里！不过你最终还是爬到了采掘面。你花了几乎一小时才走完一英里，而矿工只需二十多分钟。到达采掘面后，你必须花几分钟在煤尘里伸展身体、恢复体力，才能清醒地观察采煤作业。

归途更加糟糕，这不仅是因为你已经筋疲力尽，也因为返回竖井走的是轻缓的上坡路。你以龟速穿过低矮处；膝盖无法直立时，你也不再因为要求停下来休息而羞愧。就连你携带的矿灯也让人讨厌。你被绊着脚的时候，它或许会从你手里掉到地上；如果是盏安全灯，掉到地上就会熄灭。低头躲避横梁也越发费力，有时候你会忘记低头。你尝试像矿工一样埋头前进，那样你就得捶打自己的后背；矿工们也得经常捶打后背。这就是为什么在很热的煤矿里——在这种煤矿里，矿工需要半裸身子——许多矿工都有他们所说的“背上的纽扣”，也就是长期存在于两块椎骨上的老茧。在轨道下坡段，矿工们有时把底部中空的木屐套在轨道上滑下去。在“旅途”特别艰难的煤矿里，矿工们都会携带长约两英尺半的拐棍，拐棍把手以下的部分都是中空的。通常情况下，矿工会握着拐棍顶部；在低矮处他们则把手伸进中空的地方。这些棍子大有用处。木制头盔——最近才有的新发明——也是天赐之物，它们看上去像是法国或意大利钢盔，不过它们由木髓制成，十分轻便且坚固，就算头上承受重击也没有什么感觉。最终回到地面时，你已经在地下度过大概三小时，走了两英里。你觉得比在地面上走二十五英里还要累。随后一周里，你的大腿会僵硬到连下楼也很困难；你必须直着膝盖，以奇怪的姿势侧身下楼。你的矿工朋友发现你走路僵硬，会拿你开玩笑：“在矿井里工作怎么样？啊？”不过，即使是很久没有工作（因为生病等缘故）的矿工，在重回矿井工作时，也会在头几天疼痛不已。

听起来我像是在夸大其词，但下过这种老式矿井（英国的矿井大多

都是老式矿井）、真正走到采掘面的人，恐怕就不会说我夸大其词。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往复爬行极其辛苦，对普通人而言就相当于一天的辛苦工作，但对矿工而言，这并不是工作的一部分，只是额外的事情，就像城里人每天乘地铁上下班一样。矿工往复穿行这条线路，中间还要辛苦工作七个半小时。我到达采掘面最多只走过一英里多一点的距离，然而到采掘面通常要走三英里的路程，除了矿工，我和大多数人都无法走完三英里到达采掘面。这点常常容易被人们忽视。想到煤矿时，你想到的是深井、高温和黑暗，想到的是挖掘着煤壁、全身黝黑的工人；你未必会想到这数英里需要往复爬行的路程。时间也是个问题。七个半小时的工作时间听起来并不太长，但是我们必须加上每天一小时的“上下班”时间，很多时候要加两小时，有时甚至要加上三小时。当然，严格说来“上下班”并非工作，矿工并没有“上下班”的报酬，但是这其实和工作没有两样。你可以轻松地说工人们并不在乎。诚然，他们对此的看法和我们并不相同。他们自幼就开始这样，应该强健的肌肉也已变得强健；他们在地下往返移动时十分敏捷。他们低头快速移动，跨着轻快的大步，穿过那些我跌跌撞撞才能穿过的地方。在矿坑里，你看到他们像狗一样爬着绕过坑木。但是，如果你认为他们很享受“上下班”，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和许多矿工讨论过，他们都承认“上下班”很辛苦。只要谈到矿井，他们就会说起“上下班”的事情。据说下班要比上班快，可是矿工们都说辛苦工作一天过后，往回走才最为烦人。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他们能够应付，但无疑也很费力。这或许就和你每天爬一座小山上下班差不多。

下过两三个矿井之后，你就能慢慢理解地下的工作流程。顺便说一句，我对于采矿技术一无所知，我只是描述我所见到的场景而已。煤炭藏在厚重的岩层之间，所以实际上采煤就像舀出三色冰激凌中间的那层。矿工们过去使用铁镐和铁锹直接采掘煤矿，那样速度极慢，因为最初的煤矿就像石头一样坚硬。如今则有电动的采煤机预先作业。采煤机大体上就是极其坚硬有力的带锯机，它沿着水平方向运转，锯齿长数英寸，厚半英寸或一英寸。采煤机能依靠自身动力前后移动，操作员也能自由转动采煤机。另外，采煤机发出的噪音，是我听过的最厉害的噪音之一。它还会产生大量煤尘，让人只能看见两三英尺远，而且让人几乎无法呼吸。采煤机沿着煤壁移动，切割煤层底部五英尺或五英尺半深。切割过的煤矿相对容易采掘，但是在“采掘困难”的地方，则需使用炸药来将煤矿震松。工人使用电钻——就像是用来修缮街道的那种电钻的袖珍版——在煤层上间隔着钻孔，往孔内填入炸药，再用黏土堵住，然后绕到附近的角落里（工人应该撤离到二十五码以外的地方），用电流引

爆炸药。这并不是为了将煤炭炸出来，而是将煤层震松。当然，有时炸药过于强劲，不但会将煤炭炸出来，还会将采掘面顶部炸垮。

爆破过后，“装填工人”将煤炭捣垮敲碎，然后铲上传送带。最初的煤块体积巨大，能有二十吨重。传送带将煤炭倒入矿车，矿工将矿车推到主矿道上，然后把矿车挂到不停循环的钢缆上，钢缆再将矿车牵引到升降车里。然后煤炭被提升至地面，进行筛选分类，必要时也会进行冲洗。矿井里尽量使用“泥土”——也就是页岩——来铺路。不能用来铺路的，就被运到地面倒掉。因此，像丑陋的灰色大山一样的巨大“土堆”是采煤区的独特风景。采掘完采煤机切割过的煤层后，采掘面就前进了五英尺，新形成的顶部就用新坑木来支撑。下一个轮班时，矿工将传送带拆卸，向前移动五英尺后重新组装。切割、爆破和采掘这三个步骤尽量分三次轮班进行，午班切割，晚班爆破（法律规定爆破时附近必须无人工作，只是这项规定经常被忽视），早上六点到下午一点半的早班进行“装填”。

你观察采掘作业的时间或许很短，只有在些许计算后你才意识到“装填工人”任务的艰巨。通常每个工人负责四码或五码宽的区域。采煤机切割煤层底部五英尺深，如果煤层高三到四英尺，那么每个工人采掘、敲碎并装填到传送带上的煤炭，就有七到十二立方码。也就是说，按一立方码重二十七英担[2]来算，每个工人每小时要铲走近两吨煤炭。我用过铁镐和铁铲，所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在自家花园里挖沟渠时，如果一下午挖走两吨泥土，就会觉得自己应该好好享受下午茶。可是与煤炭相比，处理泥土轻松得多，而且我不用跪着工作，工作环境也并非一千英尺深的地下，没有让人窒息的高温，不用每次呼吸都吸入煤尘，开始工作前我也不需要用力弯着腰走上一英里。我无法胜任矿工的工作，就像无法表演空中飞人杂技或赢得全国马赛冠军一样。我不是体力劳动者，而且谢天谢地我不会成为体力劳动者，但是必要时我也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可以当一位勉强称职的马路清洁工、效率不高的园丁，甚至是差劲的农场工人。但无论怎么努力或训练，我都无法成为矿工。当上几周矿工，我就会被累死。

观察矿工作业，你会很快意识到人们所生活的世界有多么不同。生产煤矿的地下是一个世界，外面的人能够对它闻所未闻就轻松度过一生。或许大多数人宁愿不去听闻，但对于我们上面这个世界而言，它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所有活动，从吃雪糕到穿越大西洋，从烤面包到写小说，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需要煤炭。我们需要煤炭来维持和平；若是

战争爆发，我们则更需要煤炭。矿工在革命时期必须继续工作，否则革命就必须终止，因为革命和镇压革命一样需要煤炭。不管地面上发生什么，地下的采掘工作都不能停止，或者最多只能停止几个星期。煤炭必须随时可得，以防希特勒的军队进攻、教皇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板球迷聚集到劳德板球场，或者诗人们串通一气。可是大体上说，我们并未意识到这点，我们都知道“煤炭必不可少”，但我们很少、甚至从未记得煤炭的采掘过程。我正坐在温暖的煤火前写作，虽说现在已是四月，但我仍然需要煤火。每隔两周，运煤的大车就会开到门前，穿着皮坎肩的工人把大袋大袋散发着焦油气味的煤炭搬进我家，稀里哗啦地倒进楼梯下的煤洞里。做脑力劳动时，我很少将煤炭与遥远矿井中的劳动联系起来。煤炭就是煤炭，是我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一堆不知来自何处的黑色东西，若非需要付钱，它们简直就是天赐之物。你可以轻松开车横穿英格兰北部，却完全想不到在公路下面数百英尺深的地方，矿工们正在采掘煤矿。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矿工们在驱动着你的汽车前进。地下那个用矿灯照明的世界，对地上这个日光下的世界而言必不可少，就好像根部对花朵而言必不可少一样。

过去矿洞里的条件比现在还差。几位年轻时在矿井里工作过的老妇仍然在世。她们当年在腰间系着挽具，挽具上的链条经过双腿间与矿车连接，然后她们匍匐着牵引矿车移动。有孕在身时她们也经常这样工作。即使是现在，如果没有孕妇往返拖动矿车就无法生产煤炭，想来我们也会让她们继续工作，而不会让自己缺少煤炭。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宁愿忘掉她们在那样工作。各种体力劳动都是这样：它们维持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却遗忘了它们的存在。矿工或许是最典型的体力劳动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辛苦得如此夸张，也因为他们的工作如此必不可少，却又远离我们的生活，那么隐形，让我们能够像忽视自己血管里的血液那样忽视它。甚至观察矿工作业也不光彩。观察他们作业让你怀疑自己“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的身份，因为你能彻底理解，至少在观察他们工作时能彻底理解，正是因为他们拼命劳动，上层人士才得以保持上层身份。你、我、《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的编辑、诗人、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写作《马克思主义婴幼儿读本》（*Marxism for Infants*）的某位同志，我们相对体面的生活都要归功于地下辛苦劳动的矿工，归功于全身黝黑、喉咙里积满煤尘、用钢铁般的手臂和腹肌挥动着铁铲的矿工。

---

[1] 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1874-1936），英国著名作家，认为英国文明建立在抽象概念之上。

[2] 英担，英国的法定重量单位，一英担相当于50.80千克。

北方与南方

当你一路向北时，因为看惯了南部或东部的风景，所以直到路过伯明翰后，你才会注意到景色有所不同。路过考文垂时，你或许感觉自己还在伦敦的芬斯伯里公园；到了伯明翰的斗牛场[1]，你就会发现它和诺维奇市集[2]并无两样，而且在英格兰中部的城镇之间，有着与南部毫无差别的别墅文明。只要你再往北前进，走到陶瓷镇[3]或陶瓷镇以外的地方，你就会与工业文明的丑陋不期而遇，那种丑陋如此引人注目，让你似乎不得不接受。

矿渣堆杂乱无用，充其量只是种丑陋的东西。它们就是些被倾倒在地上的东西，就像从巨人的垃圾桶里倒出来的一样。采矿城镇的郊区有着可怕的景观，地平线被四周参差不齐的灰色山丘完全遮蔽，你的脚下踩着烂泥和废墟，头上是钢缆，载着矿渣的桶框在钢缆上缓缓穿过辽阔的乡间。矿渣堆通常都在燃烧，晚上你能看见红色的火焰蜿蜒摇曳，还能看见硫黄燃烧产生的蓝色火焰缓缓摇动，它们总是在似乎快要熄灭时又立马蹿起来。即使是最终难免塌陷了的矿渣堆，也保持着山丘的形状，上面也只会长一两株发黄的野草。维根镇的贫民区里有一处倾倒场，现在被人们用作休闲场地，它看上去就像是波浪翻滚的海洋被突然冻结，当地人称其为“大垫子”。即使过上几百年，等到那些昔日的煤矿场都已被翻耕时，从飞机上往下看，这些古老的矿渣堆仍会清晰可辨。

记得有个冬日的午后，我身处环境恶劣的维根镇郊区。四周是许多矿渣堆，如同月球表面。从北边矿渣堆中间那些可以称为道路的地方看过去，你或许能看见工厂的烟囱排出一缕缕浓烟。运河河道里混杂着煤渣和结冰的泥土，无数的木屐印在上面交错重叠；远处的矿渣堆周围是许多“水潭”；以前的矿坑塌陷形成洼地，死水渗入洼地就积成了“水潭”。天气寒冷异常，“水潭”表面结着棕土[4]色的冰，驳船船员用麻袋裹住全身，运河的闸门上也结了冰霜。这里就像是一个没有植物的世界，只有烟雾、页岩、冰冻、泥土、灰烬和死水。但是与谢菲尔德相比，维根镇还称得上漂亮。在我看来，将谢菲尔德称为旧大陆[5]上的最丑城镇恰如其分。希望自己的家乡在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的谢菲尔德人，很有可能就要为谢菲尔德争取这个名号。谢菲尔德有五十万人口，可它拥有的体面建筑的数量，却低于东安格利亚地区人口仅有五百的普

通村庄。谢菲尔德还臭气熏天！你好不容易摆脱了硫黄味，却又闻到了煤气味。即使是那条穿城而过的浅水河，也常常因为某种化学品而变成鲜黄色。有回我停在街上数了数我能看见的工厂烟囱。我数出了三十三个烟囱，而且若不是烟雾遮挡的话，我还能数出更多。有一幕景象尤其难忘，那是一快触目惊心的荒地——谢菲尔德的荒地肮脏不堪，就连伦敦的荒地恐怕也没有那么脏——上面被踩踏得寸草不生，随处扔着报纸和旧锅。荒地右边是孤零零的一排四室房屋，它们寒碜不堪，深红色的外墙已然被烟熏黑。左边是无尽的工厂烟囱，一个接着一个，逐渐消失在灰蒙蒙的雾霾中。我的身后是一条用炉渣筑成的铁路路堤，身前的荒地对面是一栋由红砖和黄砖砌成的建筑，上面刷着“托马斯·格罗科克：运输承包商”。

在晚上看不见房屋的丑陋外表和万物的污秽时，谢菲尔德这样的城镇有着一种邪恶的壮丽。有时，空中的烟雾混杂了硫黄，泛着红色；铸造厂烟囱的烟囱盖下喷着火焰，火焰边缘像圆锯般参差不齐。朝铸造厂敞开着的门里看去，你能看见身子被映得通红的男孩来回运送着火红的弯曲铁条。你还能听见蒸汽锤的呼呼声和重击声，以及重击下铁条发出的刺耳声。陶瓷镇也差不多同样丑陋，只是其丑陋不如谢菲尔德那般宏大。算得上是街道一部分的一排排污黑小房屋中间，有着许多陶瓷厂。陶瓷厂就是许多砖砌的锥形烟囱，像是被埋在地里的巨大酒瓶，喷出的烟雾几乎直冲人脸。你会遇到巨大而丑陋的黏土坑，宽度和深度都有好几百英尺。锈迹斑斑的小桶框在上面的链条索道上缓缓移动，下面的工人则像采集圣彼得草那样紧贴坑壁，用铁镐在坑壁上挖掘。我路过那里时正在下雪，而雪花甚至也是黑色的。陶瓷镇都很小，你不经意间便能走出其范围，这或许就是它们的最大优点。往外走上不足十英里，你就能站在干净的乡村里，站到光秃秃的山丘上，而那些陶瓷镇则仅仅是远方的一处污迹。

思索这种丑陋时，你会想到两个问题。这种丑陋是否无法避免？是否事关紧要？

我并不认为工业文明天生丑陋，也不认为这种丑陋无法避免。和宫殿、狗窝或教堂一样，工厂甚至煤气厂都并非天生丑陋。丑陋与否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建筑传统。北方的工业城镇之所以丑陋，是因为在它们被修建之时，人们还不了解现代钢结构建筑方法和除烟技术，而且所有人都在忙着挣钱，无暇思考其他事情。后来它们仍然丑陋，主要是因为北方人已经习以为常，没有注意到它们的丑陋。如果让谢菲尔德人或曼彻

斯特人到康沃尔悬崖边上去闻闻，他们大多可能会说什么也没有闻到。但一战以后英国工业倾向于南移，并因此变得漂亮起来。典型的战后工厂不是寒碜的临时工房，不污黑杂乱，也没有冒着浓烟的烟囱，而是亮白的混凝土钢结构，安装着玻璃，周围是绿色草坪和郁金香花坛。从伦敦出发，沿着大西部铁路行进，你可以看看沿线的工厂。它们也许说不上赏心悦目，但却不像谢菲尔德的煤气厂那样丑陋。不过，虽然丑陋是工业文明最显眼的特征，也是来客惊呼反感的一个方面，但我觉得它并非最为重要。而且，工业文明或许并不应该把自己伪装起来。奥尔德斯·赫胥黎[6]先生曾中肯地评价，黑暗的撒旦磨坊就应该像黑暗的撒旦磨坊，不能像供奉着神秘辉煌的神仙的庙宇。而且，即使是在最糟糕的工业城镇中，我们也能看到许多从狭义的审美观念来讲并不丑陋的东西。冒着浓烟的烟囱或恶臭连天的贫民窟让人觉得反感，主要是因为它们暗示着扭曲的生活和体弱的孩子。单纯从审美上看，这或许有种可怕的魅力。我发现，那些无比奇怪的东西，即便我对它们心存厌恶，也往往会在最后令我着迷。我在缅甸时，缅甸的风景就像噩梦般骇人，但后来它们却萦绕在我脑海中，让我不得不写一部关于它们的小说来摆脱它们。在所有关于东方的小说中，风景才是真正的题材。要像阿诺德·贝内特[7]一样从工业城镇的肮脏中发现美或许十分容易；例如，我们可以轻松想象波德莱尔写关于矿渣堆的诗歌。但是工业文明的美丑并不重要。它真正的邪恶藏在更深层的地方，而且无法根除。记住这点尤为重要，因为我们总是容易认为，工业文明只要干净有序，就不会带来伤害。

但是，当你到达工业化的北方时，除了发现陌生的风景以外，你还会意识到自己踏进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这部分是因为南北间确有差异，但更多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耳濡目染的南北对立。英国有着对于北方的奇特膜拜，有点像是北方的自命不凡。在南方生活的约克郡[8]人总是不厌其烦地让你知道他看不起你；你若是问他为什么，他会告诉你说只有北方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北方的产业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居住在北方的才是“真正的”人民，而南方人都是食利者和寄生虫。北方人“坚毅”，他们严肃、严厉、勇敢、热情、民主；南方人则势利、柔弱、懒惰。这就是北方人的观点。所以，到访北方的南方人都会——至少第一次会——隐约感到自卑，就像文明人冒险走进野蛮人中间一样。而约克郡人和苏格兰人一样，来到伦敦时就像外出劫掠的野蛮人。这种源于传统的情感，并不受可见事实的影响。北方人相对南方人的优越感，就好像一个高五英尺四英寸、胸围二十九英寸的英国人觉得自己在身体上比拉丁佬优越一样。我记得有个骨瘦如柴的约克郡小个子，如果他碰见猎狐狗对着他狂吠，肯定会转身逃跑，可是他却告诉我他在英国

南方感觉自己“像是野蛮的入侵者”。然而，拥有这种崇拜的常常不是生于北方的人。一两年前，我有一位在南方长大、现居北方的朋友开车载我穿过萨福克郡。我们路过一个挺漂亮的村庄时，他不以为然地看了一眼乡间房屋说：

“约克郡的村庄大多丑陋不堪，不过约克郡人却都不错。可是到了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村庄虽然漂亮，人却不怎么样。这些村庄里的人全都是卑鄙小人，绝对的卑鄙小人。”

我忍不住问他是否刚好认识那个村庄里的某个人。他并不认识任何人；他之所以那样说，是因为在东安格利亚，人们就是卑鄙小人。我还有一位同样生于南方的朋友，他从不放过任何扬北抑南的机会。这是他在给我写的信中的原话：

“我在兰开夏郡的克利瑟罗……我觉得相比富饶慵懒的南方，沼泽地和山区的流水更加引人入胜。莎士比亚说的‘自鸣得意的银色特伦特河’[9]；要我说，特伦特河越往南越‘自鸣得意’。”

这就是崇拜北方的有趣例子。不仅你、我以及南方的所有人都被贬低为“富饶而慵懒”，甚至水到了北方就不再是H_2O，而成了一种不知为何就更高贵的东西。有趣的是，说这段话的这位朋友极其聪明而且思想“进步”，尤其蔑视普通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如果在他面前提出“一个英国人顶过三个外国佬”之类的观点，就会遭到他痛斥。但如果谈到南方和北方之间的问题，他却十分乐意一概而论。民族间的区别——因为头骨形状不同或方言不同就自认为高人一等——全都是虚妄之谈，但是只要人们认为它们存在，它们就很重要。毫无疑问，英国人看不起南方人的观念根深蒂固；即使是我们的外交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这种观念支配。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指出这种观念产生的时间和原因。

在民族主义最初被奉为圭臬时，英国人看着地图，发现不列颠岛位于北半球偏北的地方，便一厢情愿地认为越往北走人们越高尚。我在小时候接触到的历史，往往开篇就无比天真地说寒冷让人活跃，炎热让人懒惰，所以英国人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人（其实是欧洲最懒惰的民族）更有活力这种荒唐观念已经流传了至少一百年。1827年的一期《评论家季刊》（*Quarterly Reviewer*）中写道，“宁愿被迫为国家利益而劳动，也不愿纵情于橄榄树间、葡萄藤下和恶行当中。”“橄榄树、葡萄藤和恶行”便概括了英国人对于拉丁人种的典型看法。在卡莱

尔[10]、克雷西[11]等人的错误观点中，北方人（条顿人，即后来的北欧人）被描绘为强壮有力的家伙，长着金色胡子，道德高尚；而南方人则被描绘成狡猾、懦弱和放荡之人。这种观点从未被推理到其逻辑终点，即爱斯基摩人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民族，这也就等于承认居住在英国北方的民族比英国人优越。因此在过去五十年里，对于苏格兰和与苏格兰相关事物的崇拜才会根植于英国人的生活里。然而，正是北方的工业化才让南北对立有了特别的偏见。直到最近，英国北方仍然落后、封建，而工业则集中在伦敦以及英国东南部。例如，在英国内战中——粗略说来英国内战就是金钱与封建之间的战争——北部和西部是保皇派，南部和东部则是议会派。不过随着北方对煤矿工业的利用逐渐增加，自力更生的北方商人这类新人群得以出现，如狄更斯作品中的朗斯威尔先生和庞德贝先生。秉持讨厌的“不成功便成仁”哲学的北方商人，在19世纪占据支配地位，而且现在仍然阴魂不散地专横统治着我们。他们受到阿诺德·贝内特启发，白手起家，最后腰缠万贯，而且以挣到钱后变得更加粗野为荣。总之，挣钱的天赋是他们唯一的长处。我们应该崇拜他们，因为他们虽说心胸狭隘、卑鄙下流、贪婪无知、野蛮粗野，但他们很“坚毅”，是“成功”人士；换句话说，他们知道如何挣钱。

这种道貌岸然的说法如今看来完全不合时宜，因为北方商人繁荣不再。但是事实却没能让思想传统消亡，北方人“坚毅”的传统仍然存在。人们依然隐约觉得，北方人还会“成功”，也就是说能挣到钱，而南方人却还是会失败。每个来到伦敦的约克郡人和苏格兰人，都隐隐觉得自己与狄克·惠廷顿（Dick Whittington）相似，幻想自己是能从卖报起家，最后当上市长。他们的自负正是源自这种想法。若是认为真正的工人阶级也有这种想法，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几年前初次去约克郡时，我以为那里是野蛮人之乡。我见惯了在伦敦的约克郡人，他们总是夸夸其谈，而且骄傲地自认为其方言很有特色——“我们约克郡西区就说，‘小洞及时补，免遭大洞苦’”。我以为会遇到许多无礼行为，可却完全没有遇到，至少在矿工中间没有。实际上，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矿工对我十分和善与客气，甚至都让我觉得有些尴尬。如果说有一类人让我自愧不如的话，那就是煤矿工人。他们根本没有人因为我来自外地就表现得看不起我。在牢记英国那种地域歧视是民族主义的缩影时，我的经历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说明了地域歧视并非工人阶级的特色。

但南北之间确有不同，而且把南英格兰描绘为住满闲人的巨型布莱顿[12]，至少也有些真实性。鉴于气候原因，寄生虫般的食利阶级倾向于定居南方。在兰开夏郡的产棉镇里，转悠几个月恐怕也听不到“有教

养的”口音；而在英国南方的城镇里，随便扔块砖头恐怕都难免砸到某个主教的私生女。因此，在没有小士绅先行的情况下，北方工人阶级虽然在资产阶级化，但是其进程却相对较慢。例如，北方口音几乎都稳固不变，而南方口音则全都在电影和BBC[13]面前败下阵来。所以，你的“有教养的”口音给你贴上的标签是外地人，而非小士绅。这大有益处，因为它让我们与工人阶级的交往容易了许多。

但是，与工人阶级亲密无间真的可能吗？这个问题稍后讨论，我现在只说我认为不可能。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在北方与工人近乎平等地接触要比在南方容易。在北方时，住到矿工家且被他们视为家庭成员十分容易；可到了南方郡县，这样和农场工人接触或许毫无可能。我见过许多工人，所以不会把他们理想化，但我知道，如果能走进工人阶级的家中，你可以了解到许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接触那些不一定优于你，但却一定不同于你的人，对于你的中产阶级理想和偏见是一种考验。

以家庭观的不同为例，工人阶级的家庭和中产阶级的家庭同样团结，但是工人阶级的家庭关系却远没有那么专制。工人阶级男人的肩上并没有承担着像磨石一样沉重的家庭威望。我以前说过，中产阶级人士在贫穷的影响下会完全崩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行为，因为他们在没有“成功”时，会被很多亲戚没日没夜地抱怨和纠缠。工人阶级懂得如何团结，中产阶级却不懂，这或许是因为二者对家庭忠诚有着不同的理解。中产阶级工人无法组成有效的工会，因为在罢工期间，几乎所有中产阶级妻子都会怂恿丈夫去当工贼，顶掉他人的工作岗位。工人阶级还有一个乍看有些尴尬的特征，那就是对待自己眼中的同等之人时，他们说话都十分坦率。如果你送东西给某个工人，而他并不想要，他会告诉你他不想要；而中产阶级人士为了不得罪人，则会收下你送的东西。再看看工人阶级对于“教育”的态度。他们的教育观与我们有天壤之别，比我们的合理许多。对于向他人学习，工人阶级总是怀有隐隐的敬畏；若是“教育”妨碍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也能看得破，并以正常的本能加以拒绝。以前，想到十四岁的男孩被强迫辍学从事糟糕工作时，我常常会觉得十分可惜。“工作”的劫数降临在十四岁的孩子身上，这让我觉得十分可怕。现在我当然知道，工人阶级的孩子几乎全都渴望离开学校。他们想要做真正的工作，不想在历史、地理等荒唐而无用的课程上浪费时间。在学校里面待到快要成人，这对工人阶级来说简直是既可鄙又丢人。年满十八的大男孩，本应该每周交给父母一英镑，却穿着可笑的校服去上学，甚至因为没有做功课被责打！想一想！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十八岁男孩，居然容许自己被人责打！他已经是个成年人，可责打他的

人却还是一脸孩子气。在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中，欧内斯特在粗略了解现实生活过后，回顾他在公学和大学里接受的教育，发现它就是一种“病态且害人的堕落”。从工人阶级的视角来看，你就会发现中产阶级生活中有许多看上去病态和害人的地方。

在工人阶级家庭中——此时我考虑到的不是失业的家庭，而是相对富足的家庭——你能感受到温暖、亲切且十分有人情味的氛围，这种氛围在其他地方很难感受得到。我要说，体力工人如果工作稳定，工资也不错——这个假设的范围可以越来越大——那么他们也许比“有教养的”人更有可能幸福，他们的家庭生活似乎能更加自然地变得理智且舒适。工人阶级家中那种独特且轻松的圆满，那种可谓完美的对称，常常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喝完下午茶之后的冬日傍晚，壁炉里烧着旺火，火光映在铁围栏上，父亲只穿着衬衫，坐在壁炉一边上的摇椅上读着赛马结果，母亲坐在壁炉另一边做着针线活，孩子们开心地尝着花费一便士买来的薄荷糖，狗懒洋洋地趴在碎布地毯上烤火……如果你足够融入这个家庭，家里的成员也对你习以为常，那么这个家庭就是个好地方。

这样的场景虽然已经不如战前那么常见，但依然可以在大多数英国家庭中见到。这些家庭幸福与否主要取决于一点——父亲是否有工作。需要注意的是，我设想的这幅画面——工人阶级家庭在吃完腌鱼、喝过浓茶后围坐到煤火前——仅仅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将来。飞跃两百年去到乌托邦式的未来，情景会完全不同。我所设想的事物几乎都不会存在。在那个没有体力工人，所有人都有“教养”的年代，父亲也不可能还是手掌巨大的粗人，不可能喜欢只穿着衬衫坐着，不可能说“噢，我们上街逛逛去”。也不可能有生着煤火的壁炉，只有某种看不见的取暖设备。家具都由橡胶、玻璃和钢材制成。如果到那时还有晚报之类的东西，那么上面肯定不会有赛马新闻，因为在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里，赌博将毫无意义，而且马匹也将不复存在。为了卫生起见，狗也会被驱除。如果节育员工作得法的话，也不会有太多小孩。后退到中世纪，也同样是一个迥异的世界——在没有窗户的棚舍里，没有烟囱的柴火炉冒着熏人的烟雾；食物是发霉的面包和腌鳕鱼干；到处都是虱子，坏血病肆虐；每年生育一个孩子，也每年夭折一个孩子；还有牧师拿地狱的故事恐吓你。

耐人寻味的是，让我意识到我们这个年代总体上并不糟糕的，不是

现代工程的种种成就，不是收音机，不是电影放映机，不是每年出版的那五千本小说，也不是雅士谷马场和伊顿-哈罗板球赛场上的人群，而是关于工人阶级家里的回忆，尤其我在战前偶尔与他们接触的记忆，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英国也仍然繁荣昌盛。

---

[1] 斗牛场，伯明翰的商业中心。

[2] 诺维奇市集，位于诺维奇市中心，可以追溯到诺曼时期，英国最古老的市集之一。

[3] 陶瓷镇，陶瓷镇总共有六个，它们于1910年合并成为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市。

[4] 棕土，含有红色氧化铁和氧化锰的天然棕色泥土，用作颜料。

[5] 旧大陆，即在新大陆发现之前，欧洲人所认识的世界，包括欧洲、亚洲和非洲。

[6]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英国作家，著名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之孙，著有反乌托邦作品《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7] 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英国作家，其许多小说都以斯塔福德郡的“五镇”瓷器区为背景，描写了工业区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文风精细认真但有时又太过冗长沉闷。

[8] 约克郡，位于英国东北部。

[9] 语出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Henry* Ⅳ）上篇，第三幕，第一场。

[10]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讽刺作家，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社会评论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对德国文化的欣赏和反民主观念被部分人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前奏。

[11] 约翰·克雷西（John Creasey，1908-1973），英国犯罪和科幻小说作家，小说作品多达六百余部，于1953年创建英国犯罪作家协会。

[12] 布莱顿，英国东南部的海滨市镇。

[13] BBC，英国广播公司。

马拉喀什

尸体经过时，成群的苍蝇飞离餐馆的饭桌，飞速云集在尸体后面，可几分钟后又飞了回来。

那一小群送葬的人——全是男人和男孩，没有女人——穿行在集市里的石榴堆、出租车和骆驼中间，悲恸地反复吟咏着祷文。真正吸引苍蝇的，是在这里从不入殓的尸体，而只是用破布包裹起来，放在粗制的木制停尸架上，由四位朋友用肩膀抬着送葬。到达坟场后，朋友们挖出一个一两英尺深的矩形墓坑，把尸体扔进坑里，再盖上些像破碎砖块一样的干燥土块儿。没有墓碑，没有名字，没有任何能说明死者身份的标志。坟场只是一片土丘林立的巨大荒地，如同荒废的工地。一两个月过后，甚至没有人能确切地记得自己的亲人葬在何处。

这个城市有二十万人口，其中至少有两万人除了身上的破衣烂衫便一无所有。穿过这样的城市，看到这里的人们如何生活，看到他们动辄死亡，你很难相信自己走在人类中间。这其实就是所有殖民帝国的基础。他们都是棕色面孔，而且数量庞大！他们都和你一样是血肉之躯吗？他们有名有姓吗？或者他们只是某种无法区分彼此的棕色物种，就像蜜蜂或珊瑚虫那样独特？他们从泥土中冒出来，饿着肚子辛苦劳作几年，然后沉入墓地上的无名土丘中，而且没人注意到他们的离去，就连他们的坟墓也会很快化成土壤。有时，你外出散步，穿行在仙人镜[1]中，你会发现脚下凹凸不平；如果你感觉到脚下是某种有规则的东西，那么你踩着的就是尸骨。

我在公园里给一只羚羊喂食。

羚羊几乎是唯一一种在活着时看上去很好吃的动物。其实，看到羚羊的臀部及后腿，难免就会想起薄荷沙司。我喂的那只羚羊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因为它虽然接受我递给它的面包，但却明显不喜欢我。它迅速咬一小口面包，然后低头想要顶我，然后又快速地咬一口面包，又试图顶我。它或许在想，如果能把我顶开，面包应该还能悬在半空中。

在附近路上工作的一位阿拉伯苦工放下沉重的锄头，犹犹豫豫地朝我们走来。他的视线从羚羊上转移到面包上，又从面包上转到羚羊上。

他带着某种安静的诧异，似乎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最后，他用法语胆怯地说：

“我想吃点面包。”

我撕下一块面包给他。他满怀感激地将面包藏在破烂的衣裳里面。他是市政当局雇佣的苦力。

穿过犹太人居住区，你就能大概想象中世纪贫民区是什么样。在摩尔人的统治之下，犹太人只允许在某些特定的地区拥有土地。这种待遇持续数百年后，犹太人也就不再因为过度拥挤而烦恼。许多街道远不到六英尺宽，房屋完全没有窗户。无数眼睛红肿的小孩像苍蝇一样成群结队，随处可见。街巷当中往往尿液横流。

在集市上，许多庞大的犹太家庭在苍蝇成灾、黑暗如洞穴的货摊后面劳作。他们都身穿黑色长袍，头戴黑色无檐便帽。一个木匠盘腿坐在老掉牙的车床边上，飞快地车削着凳子腿。他右手拿弓，左脚控制钻头。由于常年保持这种姿势工作，他的左腿已经弯曲变形。在他身旁，六岁的孙子已经开始做着较为简单的木工活。

我路过铜匠铺时，刚好有人看见我点烟。四周黑暗的洞穴里立刻冲出一群疯狂的犹太人，其中不乏胡子花白的老头，吵闹着跟我要烟。就连在后面棚屋里听说有烟的盲人，也缓缓走了出来，伸手在空中摸索。差不多一分钟，我就发完了一包烟。我想，这些人每天都得工作至少十二小时，而且几乎全都把抽烟看作不可企及的奢侈享受。

犹太人住在独立的社区里，也像阿拉伯人那样从事着各种行业，不过农业除外。水果商贩、陶匠、银匠、铁匠、屠夫、皮匠、裁缝、送水工、乞丐、门房，各行各业都是犹太人。其实，城里的一万三千名犹太人都住在这几英亩大的地方。幸好希特勒不在这里，不过他或许正在来的路上。你经常能听到关于犹太人的邪恶传言，这些传言不仅来自于阿拉伯人，还来自较为穷困的欧洲人。

“是的，老兄，他们抢走了我的工作，然后给了一个犹太人。犹太人！他们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他们掌握着所有的钱。他们控制着银行和金融，控制着一切。”

“可是，”我说，“普通的犹太人也是工人，每小时也差不多只挣一

便士，不是吗？”

“噢，那是在作秀！他们其实都是放高利贷的人。他们太狡猾了。”

同样，在几百年前，许多可怜的老妇常常被指控施展巫术而被烧死，可她们甚至没有足够的法力为自己弄一餐美食。

依靠双手劳动的人或多或少都会被忽视。他们的工作越重要，他们就越会被忽视。尽管如此，白种人总是更引人注意。在北欧，你看见有人犁地时，或许会多看一眼。而在热带国家，在直布罗陀以南或苏伊士以东，你或许都不看他们一眼。这种情况我见过多次。在热带地区，我们能看见人类之外的一切，能看见干燥的土壤、仙人镜、棕榈树和远方的高山，但总是看不见锄地的农民。农民和大地有着同样的颜色，但远不如大地那样引人注意。

正因如此，饥馑的亚非国家才会成为旅游胜地。没人愿意到贫困地区去参加劣质的旅行，但是在棕色人种居住的地方，人们的贫穷直接被人忽视。摩洛哥对法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柑橘园，或者意味着在政府部门谋职。对英国人来说呢？摩洛哥意味着骆驼、城堡、棕榈树、法国外籍军团、铜制托盘和强盗。在摩洛哥住上好几年，人们或许都不会注意到，对于十分之九的摩洛哥人来说，生活其实是永无尽头的辛苦挣扎，只为从风化的土壤中争取少许食物。

摩洛哥的大部分地区荒凉至极，比野兔大的野生动物都无法在那里存活。曾经覆盖着森林的大片土地已经变成没有树木的荒原，土壤和破碎的砖块一模一样。但人们却花费令人震惊的劳力，在许多这样的土地上耕作。所有工作都由双手完成。妇女排成长排，佝偻着腰，像个倒着写的L字母，缓慢地在地里移动，徒手拔起带刺的杂草。收集紫苜蓿做草料的农民，不用刀割，而是直接把紫苜蓿拔起来，这样每株就能多收一两英寸。木制的犁头更是破烂不堪，可以轻松扛在肩上。犁头下面装着粗糙的铁制犁刀，能将土壤翻大约四英寸深，这刚好与畜力相当。这里的农民往往用一头牛和一头驴共同拉犁。两头驴的力气不够，而饲养两头牛却又花费稍多。农民没有耙，所以只好从不同的方向多犁几次，最后粗略犁出沟垄，然后再用锄头将整块地分成矩形的小块儿，以便节约用水。只有在罕见的暴雨来袭后的一两天里，地里才不会缺水。人们在土地的边缘挖出三四十英尺深的沟渠，收集在底层土壤中流淌的涓滴之水。

每天下午，总有一排背着柴火的老妪从我门前的马路上经过。岁月和日晒干瘪了她们的身躯，而且她们全都十分瘦小。在落后的社会里，妇女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身体似乎都会萎缩得像孩子那样。一天，有个顶多四英尺高的可怜老妪背着大捆木柴，慢慢地从我面前走过。我叫住她，往她手里塞了一个面值五苏[2]的硬币（稍多于四分之一便士）。她回以一声尖利的哭号，几乎可以说是尖叫，部分是因为感激，但主要还是因为惊讶。我想，在她看来，我对她有所关注，几乎就是违背自然法则。她接受了自己的老妪身份，也就是说接受了她驮兽的角色。一个家庭出行时，父亲和成年儿子常常都是骑驴走在前面，而老妪则背着包裹，步行跟在后面。

奇怪的是，人们对这些老妪视而不见。几个星期以来，那排老妪几乎每天都在同一时间背着柴火蹒跚路过我的门前。她们虽然映入我的眼球，但我并不能说自己真正看见了她们。我看见的，只是柴火从我面前经过。直到有一天，我碰巧走在她们后面，看见柴火一上一下，我才注意到下面的人。我头一次注意到木柴下面年迈可怜的泥土色身体，那些身体瘦得皮包骨头，被沉重的木柴压得佝偻不堪。但是，在我踏入摩洛哥还不到五分钟时，我就看到那里的驴负载过重，因此还十分生气。摩洛哥人对驴分外残忍，它们差不多和圣伯纳犬一般大，但它们驮运的物品，若是放到英国军队里，用一米五高的骡子来驮运或许也会过于沉重。而且，它们的驮鞍通常接连几周不卸下来。尤为可怜的是，它们是地球上最顺从的生物；它们如忠犬一般跟着主人，不需要套笼头，也不需要系缰绳。尽力工作十多年后，它们突然累垮死去，随后被主人丢弃在沟渠中，尸骨未寒，内脏就被村中的狗撕扯出来。

这种事情让人怒火中烧，可总的来说，人类的困苦则无法带来这样的反应。我并不是在指责什么，我只是指出这个事实。棕色皮肤的人们几乎被完全忽视。驴背上的擦伤会得到众人同情，而我们却往往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会注意到背着柴火的老妪。

鹳群北飞，黑人南下。那是一支风尘仆仆的长队，先是步兵队伍，接着是炮兵队伍，后面又是更多的步兵队伍。他们总共四五千人，在道路上蜿蜒行进，军靴踏出沉重的声音，金属车轮咯咯作响。

他们是塞内加尔人，非洲肤色最深的黑人。他们肤色太深，有时甚至看不出他们后颈上的发际线。健壮的身体穿着陈旧的卡其制服，双脚紧塞在木块般的靴子里，头上的钢盔似乎都小上几号。天气很热，他们已经走了很多路。他们背着沉重的包袱，懒散地坐在地上，异常敏感的

黑色脸庞上，汗珠闪闪发光。

他们路过时，一个年少的高个黑人转过身，目光与我相遇。他的眼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没有敌意，没有蔑视，不阴沉，甚至也不好奇。那是一个大眼睛黑人的羞涩眼神，实际上还带着深深的尊敬。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可怜的少年是法国公民，因此被强迫离开森林到部队擦地板，而且在驻地染上了梅毒。他其实对白人心怀敬畏，曾经有人教育他白人是主人，而他现在仍然深信不疑。

但是，所有白人（不管他们是否自称社会主义者）在看到黑人军队路过时都会想："我们还能哄骗这些人多久？他们再过多久就会调转枪口对着我们？"

确实很奇怪，那里的白人心中都暗藏着这种想法。我有，其他旁观者有，骑在汗涔涔马背上的军官有，队伍中的白人军士也有。这个秘密众所周知，但我们都很聪明，不会将它说出来。只有黑人还蒙在鼓里。这支全副武装的队伍绵延一两英里，看着他们缓缓前行，就像看着牛群一样。他们头顶上的白色大鸟朝着相反的方向飞去，像纸片一样闪闪发光。

---

[1] 仙人镜，又名郁金香仙人掌，果实可以食用。

[2] 苏，旧时法国的一种硬币，币值很小。

查尔斯·狄更斯

一

狄更斯属于那种相当值得窃取的作家。就连他的遗体也被安葬在西敏寺，想来也算是一种偷窃。

在为“人人丛书”版的狄更斯作品作序时，切斯特顿似乎很自然地认为狄更斯也拥有自己那种极具个人特色的中世纪精神。而且，近来还有位名叫T.A.杰克逊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作家斗志昂扬地要把狄更斯变成“嗜血”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说，狄更斯“近乎”马克思主义者，天主教徒则称狄更斯“近乎”天主教徒，而且他们都声称狄更斯拥护无产阶级（或者按切斯特顿的说法，拥护“穷人”）。另外，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1]在她那本关于列宁的小书里讲到，列宁在去世前曾去观看由《壁炉上的蟋蟀》（*The Cricket on the Hearth*）改编而成的戏剧，却因为无法忍受狄更斯那种“中产阶级的多愁善感”而中途离场。

按照克鲁普斯卡娅的本意来理解“中产阶级”，那么她的这个评价或许比切斯特顿和杰克逊的评价更加准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这个评价暗含着对狄更斯的异乎寻常的讨厌。不少人觉得狄更斯不值一读，但极少有人对其作品的基本精神抱有敌意。几年后，贝克霍夫·罗伯茨[2]发表小说《盲目崇拜》（*This Side Idolatry*）抨击狄更斯，但这本书纯属人身攻击，主要讲的是狄更斯如何对待妻子。书中提到的种种轶事，狄更斯的读者几乎闻所未闻，而且它们无法抹杀狄更斯作品的价值，正如莎士比亚将次好之床遗赠予妻子一事抹杀不了《哈姆雷特》（*Hamlet*）的价值一样。这本书实际上说明，作家的文学魅力与他的性格关系不大，或者完全没有关系。或许正如罗伯茨所述，狄更斯确实是个不顾他人感受的利己主义者。但狄更斯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性格却与此截然不同，而且这种性格为狄更斯赢得的朋友远远多于敌人。但事实也可能恰恰相反，因为就算狄更斯属于中产阶级，他肯定也还是一位具有煽动性的作家，一个激进分子，而且说他是反叛者也不为过。博览狄更斯作品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以写狄更斯的作家中最为出色的吉辛[3]

为例，他本身并不激进，也不喜欢狄更斯身上的这种气质，而且觉得这种气质还是没有为好，但他从未想过要否定它。在《雾都孤儿》（*Oliver Twist*）、《艰难时世》（*Hard Times*）、《荒凉山庄》（*Bleak House*）和《小杜丽》（*Little Dorrit*）中，狄更斯猛烈抨击了英国的名人，其程度至今无人能及。但他并未因此招来恨意，而且那些受他抨击的人也极其沉默地忍受了抨击，让他也成了英国的一位名人。在对待狄更斯的态度上，英国大众就像是被手杖打了一下的大象，感觉像被人挠痒一样开心。在我还未满十岁时，老师就开始灌输狄更斯的作品。早在那时我就觉得老师很像克瑞克尔先生。人们不用说也知道，律师们喜欢布兹福兹警官，而内政部官员则最喜欢读《小杜丽》。狄更斯似乎成功做到了既抨击所有人，又不引发任何人的反感。这让人不禁好奇，他对社会的抨击是否有不实之处？他的社会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究竟是什么？一如既往，如果首先确定狄更斯不属于哪类人，那么要确定他的立场就更为容易。

首先，狄更斯不是切斯特顿和杰克逊所暗示的“无产阶级”作家。他从不写无产阶级，在这点上他和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小说家一样。如果要在小说，尤其是英国小说中寻找工人阶级的身影，最后只能是徒劳。或许这个说法需要加以限定。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农业劳动者（在英国属于无产阶级）在小说中频频出现，小说家也不吝笔墨描写犯罪分子、流浪汉，以及近来出现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而那些让车轮得以转动的普通城市无产阶级，却总是被小说家忽略。当他们被写入书中时，几乎都是受人同情的对象，或者是滑稽的角色。狄更斯小说的中心情节几乎总是发生在中产阶级环境中。仔细研究他的小说，你会发现它们真正的题材是伦敦的商业中产阶级和他们的奉承者——律师、职员、售货员、旅店老板、小工匠、佣人。狄更斯没有描写过农业劳动者，而且也只描写过一个产业工人，即《艰难时世》中的史蒂芬·布莱克普尔。《小杜丽》中的普洛尼希一家或许是狄更斯对工人阶级家庭的最佳描写——佩葛蒂一家不算工人阶级——但总的说来，他对这类人物的处理并不成功。要问普通读者记得狄更斯作品中的哪些无产阶级人物，他们几乎都会提到三个人：比尔·赛克斯、山姆·维勒和甘普太太；一个是窃贼，一个是男仆，一个是酗酒的产婆，他们都算不上典型的英国工人阶级。

其次，从革命一词广为人所接受的意义上说，狄更斯不是“革命”作家，但在此需要就他的立场作些说明。

不管狄更斯是什么，他都不是暗地里的灵魂拯救者，不是那种以为修订一些法规或禁绝一些反常现象就会让世界完美无瑕的好心白痴。比如，我们可以将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和狄更斯进行比较。比起狄更斯，里德博学得多，而且在某些方面更有公益心。他痛恨那些他所了解到的陋习，并在他写的一系列小说中将它们揭露出来，那些小说足够荒诞，可读性因此也极强。在一些细微但重要的问题上，他或许也曾有助于影响舆论。但他无法理解的是，在当时的社会形态下，有些陋习无法消除。他的想法是，紧抓住这样那样的细微问题，将它们公之于众，呈送至英国陪审团面前，就能万事大吉。无论如何，狄更斯都不会认为割掉丘疹就等于治愈丘疹。读者在狄更斯作品的每一页都能发现，他意识到社会的根基出了问题。读者若是问“什么根基”，那么就开始明白狄更斯的立场了。

事实是，狄更斯对社会的批判几乎只局限于道德层面，因而他在书中从未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他批判法律、议会制政府、教育体系等，却从未明确提出以何物取而代之。提出建设性意见固然不是小说家或讽刺作家的义务，但问题在于，狄更斯的态度根本上说连破坏性都谈不上。没有明显迹象表明他希望推翻现有的社会秩序，也没有明显迹象表明他认为如果现有秩序被推翻，社会就会天翻地覆。实际上，他所针对的与其说是社会，倒不如说是“人性”。在他的书中，我们很难找到哪段话表明经济制度本身有问题。例如，他就从未抨击过私营企业或私有制。在《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中，死者拥有着通过愚蠢遗嘱来干扰活人的能力。然而，即使在这样的作品中，狄更斯也并未暗示人们不应该拥有这种不负责的能力。当然，我们可以自己得出这种结论，也可以从《艰难时世》结尾部分对庞得贝遗嘱的评论中推测出这点，而且从狄更斯的全部作品中，我们的确可以推断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弊端，但狄更斯本人从未有过这样的推论。据说麦考利[4]不赞成《艰难时世》中“阴郁的社会主义”，所以拒绝为这本书写书评。显然，麦考利所说的“社会主义”，其性质相同于素食餐或在二十年前被用来指称立体派绘画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严格说来，《艰难时世》中没有一行文字可以被称作有社会主义倾向。实际上，如果书中有什么倾向的话，那也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倾向，因为全书的寓意是让资本家和善，而不是让工人反叛。庞得贝恃强凌弱、满嘴空话，葛雷梗则善恶不分，但假如他们能变得更好，那么制度就会运作得很好，这便是该书自始至终的寓意所在。就社会批判而言，如果不有意曲解，我们就只能从狄更斯作品中读出这层寓意。乍看之下，他的全部“启示”像是老生常谈：如果人们行事规矩，世界就会变得美好。

这自然就需要塑造几个有权势的角色和确实能规矩行事的角色，因此，善良富人的形象才会反复出现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在狄更斯早年的乐观时期里，这种角色尤为常见。这种角色通常是“商人”（狄更斯不一定会说明他做什么生意），而且往往还是心肠特别好的老绅士，每天四处“奔波”，给员工涨工资，拍拍孩子脑袋，保释欠债的人出狱，总之就是别人的福星。当然，这个角色纯属幻想，比斯奎尔斯和米考伯更脱离现实生活。狄更斯本人肯定也会偶尔反思，如此急于送钱出去的人，首先必定挣不到那么多钱。比如，匹克威克虽然“一直待在城里”，但难以想象他能在那里赚到大钱。尽管如此，这样的角色却贯穿了狄更斯早期的大多数作品。匹克威克、切尔以布兄弟、老翟述伟、史库吉——翻来覆去都是同样的角色，都是施舍钱财的好心富人。不过，狄更斯的作品的确有发展的迹象。在他的中期作品中，好心富人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淡出。《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和《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中都没有这种角色，《远大前程》实际上是对乐善好施的明确批评，而在《艰难时世》中，或许只有改过自新的葛雷梗勉强算是这种角色。这种角色还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重新出现过，如《小杜丽》中的米格尔斯、《荒凉山庄》中的约翰·詹狄士，或许有人还会加上《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中的贝特西·特罗特伍德。不过在这些书里，好心富人已经由“商人”沦为食利者。这点很重要。食利者属于有产阶级，他们可以，而且在几乎不自觉的情况下，也的确能够让其他人为自己工作，但他们几乎没有直接的力量。他不像史库吉和切尔以布兄弟那样，可以通过提高工资息事宁人。狄更斯在19世纪50年代的作品相当消沉，这似乎暗示着狄更斯当时已经明白，好心人在腐朽的社会中是多么的孤立无援。尽管如此，在狄更斯的最后一部完整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问世于1864至1865年间）中，好心富人以博芬的形象荣耀回归。无产阶级出身的博芬只因得到一笔遗产而变得富有，但他照例还是个用来解围的人物，到处撒钱解决大家的困难。他甚至还像切尔以布兄弟那样“奔波”。从多个方面来看，《我们共同的朋友》重返狄更斯的早期风格，而且还不算失败。狄更斯的思想似乎兜了整整一圈，个人的善良再次成为万能药方。

对于雇佣童工这个需要矫正的弊端，狄更斯所言甚少。他在书中大篇幅描写受苦的儿童，但他们通常都是在学校，而不是在工厂受苦。在《大卫·科波菲尔》中，狄更斯描述了小大卫在默德斯通和格林伯货栈里洗瓶子的场景，这是他对童工仅有的一次详细描写。当然，这一描写具有自传性质。因为狄更斯本人十岁时就在河岸街的华伦鞋油厂里做工，这段经历同书中的描写十分相像。对他来说，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

回忆，部分是因为他觉得整件事有损父母的名誉，他甚至在婚后长期瞒着妻子。他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回顾这段时期时说：

我到现在都还很诧异，自己居然那么小就被随意抛弃了。我能力出众，观察敏锐、机敏、热心、行事得体，但我很快就身心俱损；让我惊讶的是竟然没有人打算为我说话，完全没有！于是，我在十岁时就成了默德斯通和格林伯货栈的童工。

在描述了和他一起做工的那些粗野男孩之后，他又说：

我居然沦落到和这些人为伍，内心的痛苦真是难以言表……我原本想长大成为一名学识渊博、才能卓越的人，但我觉得这种希望已经在我心里破碎了。

显然，讲这句话的不是大卫·科波菲尔，而是狄更斯自己。他在几个月前开始写作、随后又放弃的自传中写过几乎相同的话。诚如狄更斯所言，天资聪颖的孩子不该每天工作十小时往瓶子上面贴标签，但狄更斯没有说所有孩子都不应该遭受这种命运，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推断他会这么想。大卫从货栈逃了出来，但是米克·沃克、赛白粉·马铃薯和其他孩子仍旧待在那里，而且我们也看不出这会让狄更斯感到特别不安。狄更斯照旧没有认识到社会结构可以改变。狄更斯鄙视政治，不相信国会能做好事，他曾经在国会当过速记员，这段经历无疑让他不再抱有幻想，而且他对当时最有希望的工联主义也有些敌视。《艰难时世》把工联主义说得和敲诈勒索差不多，认为它兴起的原因在于雇主不够温和。在狄更斯看来，史蒂芬·布莱克普尔拒绝加入工会简直就是美德。另外，正如杰克逊先生所指出的，狄更斯那个时代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工会，都有自己的秘密集会和暗号等，而《巴纳比·拉齐》（*Barnaby Rudge*）（其中有西蒙·台波提的那部小说）中对学徒协会的描写，或许就是对那些公会的攻讦。显然，狄更斯希望工人们得到体面的对待，但并无迹象表明他希望工人们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更不用说是通过公开暴力的方式。

事实上，在《巴纳比·拉齐》和《双城记》这两本小说中，狄更斯提及过狭义的革命。《巴纳比·拉齐》中的革命不如说是暴乱。1780年的戈登暴乱虽然以宗教偏见为借口，但似乎与一场混乱的劫掠没什么区别。狄更斯最初打算将暴乱头目写成逃出精神病院的三个疯子，他对革命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他在别人劝阻之下并未那么写，但书中的主角实际上是个乡野白痴。在描写暴乱的章节中，狄更斯对暴民的暴力行径

表现出深切的厌恶。狄更斯以描写“人渣”们的兽行为乐。这些章节颇具心理学意义，因为它们表明了他对这个话题的思考深度。他描述的那些事情只可能源于想象，因为在他有生之年从未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暴乱。例如，他曾这样描述：

就算把疯人院的大门敞开，跑出来的疯子也不会像那天晚上那样疯狂。有人踩在花圃上跳舞，就好像是在践踏敌人。他们拧断花梗，就像野人拧断敌人的脖子。有人把点燃的火把扔向天空，结果火把掉到他们的头上和脸上，烫出又大又难看的水泡。还有人扑进火里，然后像是在水里一样用双手划行。而其他人则被拦着，没法跳进火里满足他们急切的渴望。有个喝醉酒的小伙子，看样子不到二十岁，他躺在地上，嘴里含着酒瓶，屋顶上被烧化的铅皮倾泻而下，白热的铅水像融化蜡烛一样融化了他的脑袋……但是在咆哮的人群中，竟无人对此情此景表示同情或恶心，也无人发泄够那愚蠢、毫无意义的怒火。

你几乎会觉得这是佛朗哥将军的拥护者在描述“红色”西班牙。当然，我们应该记得，在狄更斯写作的时候，伦敦还有“暴民”存在（如今没有暴民，只有人群）。低工资、人口的增长和流动孕育了一支“庞大且危险”的贫民窟无产阶级队伍，而且直到19世纪中早期，才出现像样的警察。砖块满天飞时，你要么关上窗户，要么命令军队开火。在《双城记》中，狄更斯描写了一场真正有些内涵的革命，他的态度虽然有所变化，但并非全然不同。事实上，《双城记》这本书往往会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尤其是在读罢一段时间过后。

读过《双城记》的人都会记起雅各宾专政。断头台、往返的死囚车、血淋淋的铡刀、弹跳到篮子里的脑袋、边看行刑边织衣服的不祥老妪，这些在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实际上，这些场景只出现在少数章节里，但描写得异常有力度，而这本书的其他情节则都相当缓慢。但《双城记》不是《红花侠》[5]的姊妹篇。狄更斯明白法国大革命势必会发生，那些被处死的人大多罪有应得。他说，若像法国贵族那样行事，定会有恶报降临。狄更斯再三重复这句话，他不断提醒我们，在贵族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四个穿着制服的仆人喂他吃巧克力，而外面的农民正忍饥挨饿时，森林中的某棵树木正在生长，而且这棵树木很快就会被锯成木板，用来搭建断头台，等等。从起因来看，雅各宾专政实属必然，狄更斯用最清晰的话语说明了这点：

这样谈论这场骇人的大革命……太过分，好像这场革命是天底下唯一没经历过播种的丰收，好像这场革命是无源之水，好像那些目睹了数

百万法国人民悲惨境况，目睹了原本应该造福人民的资源遭到滥用的观察家，多年前没有预见大革命必然会到来，没有用清晰的话语把他们所看到的记录下来。

他还说：

自想象能得以实现以来，想象中所有贪得无厌的怪物都融合在断头台这项发明之上。但是在土地资源丰富、气候多种多样的法国，却没有一颗绿草、一片树叶、一条树根、一座温泉、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能够生长成熟，而在不那么有利的条件下，在法国却产生了这种恐怖统治。即使用类似的锤子再次捶打人性，它也能将自己扭曲回原来那痛苦的模样。

换句话说，法国贵族早给自己挖好了坟墓。但这里并不存在如今所谓的历史必然性。狄更斯知道，从起因来看，大革命的爆发无法避免，但是他认为那些起因或许可以避免。大革命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法国农民数百年来被压迫得不像人样。如果丑恶的贵族能像斯库吉那样以某种方式改过自新，法国大革命就不会爆发，扎克雷起义就不会发生，断头台也不会出现，一切都会变得更好。这正好同“革命”态度背道而驰。从“革命”观点来看，阶级斗争是进步的主要动力，所以剥削农民、激起农民反抗的贵族和将贵族推上断头台的雅各宾派一样，在阶级斗争中不可或缺。狄更斯从未写过可以被如此解读的话。在他看来，“革命”不过是暴政所催生出的恶魔，往往通过吞噬参与者而终结。借助西德尼·卡尔顿在断头台下的幻想，狄更斯预见到了德法奇和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其他领袖都将死在同一把铡刀下，而这同实际发生的情况大致相同。

狄更斯确信革命就是恶魔，所以大家都记得《双城记》中的革命场景。这些场景有如噩梦一般，这也正是狄更斯自己的噩梦。他一再坚称革命的恐怖行为毫无意义——大屠杀、不公、无处不在的恐怖密探、暴民们可怕的杀戮欲望。《双城记》中对巴黎暴民的描述——比如在九月屠杀囚犯之前，成群的杀人犯围着磨石争先恐后地磨快手中的兵刃——胜过了《巴纳比·拉齐》中的任何描写。在狄更斯看来，这些革命者似乎只是堕落的野蛮人，甚至就是疯子。狄更斯用异乎寻常的想象力构思出他们的疯狂。例如，他描述过他们跳“卡马尼奥拉舞”的场景：

他们有五百多人，但跳起舞来就像五千头恶魔……他们跟着这支流行的革命歌曲舞蹈，节拍疯狂激烈，仿佛众人齐齐咬牙切齿……他们前进、后退、彼此击掌、相互抓头、独自旋转、相互抓着、成对旋转，直

到纷纷倒下……突然，他们再次停下来，暂停一会儿，然后重新踏起坚定的节拍，排成和街道一样宽的长排，低着头，高举双手，尖叫着猛冲而去。没有什么争斗能比得上这场舞蹈的一半可怕。这简直就是一项堕落的运动，曾经纯洁无邪，此刻却残忍至极。

狄更斯甚至认为，这些恶棍中有人还有斩杀儿童的癖好。应当完整读读我在上面节选的那段话。它和其他类似段落都表明了狄更斯对革命的歇斯底里有多恐惧。注意他写“低着头，高举双手”等句子时使用的手法，以及这些句子所表现出的罪恶情景。德法奇夫人是个真正可怕的人物，她无疑是狄更斯塑造的最成功的恶人角色。德法奇等人不过是“从旧压迫者垮台的过程中走出来的新压迫者”，而主持革命法庭的是“最底层、最残忍、最糟糕的人”。从始至终，狄更斯都在强调革命时期噩梦般的动荡，在这点上，他显得很有先见之明。“一部由犯罪嫌疑人制定的法律，打碎了自由或生命的一切保障，把无辜的好人交付给有罪的坏人；监狱挤满了没有犯过任何罪的人，而且他们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这句话极其适用于当今的一些国家。

任何一场革命的辩护者通常都会极力淡化革命的恐怖，而狄更斯却想要夸大。从历史的角度看，他的描写的确很夸张。即使是雅各宾专政，也远比不上他笔下的描述。他尽管没有引用数字，但却让人觉得那是一场持续多年的疯狂屠戮，而就死亡人数而言，雅各宾专政同拿破仑的任何一场战役相比都不值一提。但是血淋淋的铡刀和往返颠簸的死囚车在他脑中留下了异常险恶的画面，然后他又成功地把这种画面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因为狄更斯，“死囚车”这个词有种凶残的感觉；人们忘了它原本只是一种农用推车。直到今天，对普通的英国人来说，法国大革命只不过意味着堆积如山的头颅。奇怪的是，比同时代的大部分英国人更加认同法国大革命理念的狄更斯，居然参与制造了这种印象。

如果你痛恨暴力，不信仰政治，那么教育便是唯一的补救方法。或许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但对个人而言，如果能在年少时唤醒他们，那么希望就会一直存在。这种信念可以部分解释狄更斯对童年的执著。

没有人，至少没有英国作家，描写童年能胜过狄更斯。尽管人们此后积累了不少知识，尽管现在的儿童都能得到相对理智的对待，但没有哪个小说家能像狄更斯那样驾驭儿童的视角。初读《大卫·科波菲尔》时，我大概才九岁。开头几章的精神氛围对我而言简单易懂，我甚至隐约以为它们出自儿童之手。而且，在长大成人后重读这本书，读懂摩德斯通夫妇从注定要灭亡的大人物沦落到有些滑稽的怪物时，那几章的魅

力丝毫不减。狄更斯能同时从内外两方面驾驭儿童的心理，这样一来，对于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来说，同样的场景既可以是肆意的讽刺，也可以是凶险的现实。比如，我们可以看看大卫·科波菲尔被错误地怀疑偷吃了羊排的情节，或者可以看看《远大前程》中的这个场景：皮普从郝维香小姐家回来后，发现自己完全不能描述所见所闻，就扯了一通弥天大谎，而人们对他的谎言自然深信不疑。儿童时期的所有孤独感都得以体现。狄更斯极其准确地记录了儿童的思维状态，记录了儿童思维的形象化倾向，以及儿童思维对某些印象的敏感。皮普说自己小时候对死去父母的印象全来自于他们的墓碑：

父亲墓碑上的字形让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觉得他是一个健壮结实、皮肤黝黑的男人，长着一头黑色卷发。从铭文“及其爱妻乔治亚娜”的字体和笔锋，我又得出幼稚的结论，认为母亲是个长有雀斑、体弱多病的女人。而那五块小小的菱形石头，每块大约一英尺半长，整整齐齐地排成一行，立在他们墓碑旁边，专门用来纪念我那五个小兄弟……我曾经虔诚地相信，他们生来就像在坟墓里那样躺着，双手插在裤袋里便从未拿出来过。

《大卫·科波菲尔》中也有类似的段落。在咬了摩德斯通先生的手后，大卫被送到学校，背后被迫贴上告示，上面写着“当心，他会咬人”。他看见男孩们在操场大门上刻的名字，他从这些名字的样子上，似乎就能看出他们会用什么样的口气来读他背后的告示：

有个叫詹姆斯·斯提福兹的男孩把名字刻得特别深，而且刻了好几处，我想象他用异常洪亮的声音读出我背后的告示，然后还拉扯我的头发。还有个叫汤米·特拉德的男孩，我担心他会以此捉弄我，而且还会假装很害怕我。还有个男孩叫乔治·邓普尔，我想象他会把告示唱出来的。

我在儿时读到这段话，觉得那些名字就会唤起那些画面，这自然是因为谐音。但在狄更斯之前，又有多少人能注意到这些？在狄更斯的时代，人们对孩子的同情远不如现在。19世纪早期不是适合儿童生活的年代。在狄更斯青年时，仍旧有儿童“在刑事法庭受到严厉审讯，被高高举起让大家看到”，十三岁男孩因为小偷小摸而被绞死也不是很久远的事。“摧垮儿童精神”的信条正得其时。直至19世纪晚期，《费尔柴尔德一家》（*The Fairchild Family*）仍然是标准的儿童读物。这本有害的书现在以俗丽的删节本发行，但我们还是应该阅读原版。它能让你了解儿童有时会受到多么严厉的惩罚。比如，费尔柴尔德先生若是撞见孩子们

吵架，首先就会抽他们一顿，边打边念叨着瓦茨博士的“让狗以吠叫和狂咬为乐”，接着让他们在绞刑架下呆一个下午，而绞刑架上还悬着杀人犯腐烂的尸体。19世纪早期，数以万计的儿童几乎在矿井和纺织厂里工作到死，有的甚至才六岁。在时髦的公学里，男孩们会因为在拉丁诗上犯错被鞭打得鲜血淋漓。狄更斯似乎意识到了一件同时代大部分作家都没注意到的事，那就是鞭打中的施虐成分。我认为，《大卫·科波菲尔》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Nicholas Nickleby*）足以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对儿童的精神虐待和肉体虐待一样，都让狄更斯震怒。狄更斯笔下的校长往往都是恶棍，尽管有不少例外。

除了大学和大型公学，英国当时的各种教育机构都遭到了狄更斯的批评。其中之一便是使劲给儿童填塞希腊语的布林伯博士学院。还有当时那些令人反感的慈善学校，它们培养出了许多典型人物，比如诺亚·克莱博和尤赖亚·希普。此外还有萨伦学校、多西伯义斯学校，以及伍普赛先生的伯祖母办的那所名声不好的家庭小学。狄更斯所说的一些情况甚至如今依然存在。萨伦学院是现代“预科学校”的原型，两者仍然有许多相似之处；至于伍普赛先生的伯祖母，几乎现在每个英国小镇都有那样的骗子。但狄更斯的批评照旧没有新意，也没有杀伤性。教育体制的基础是希腊词汇和打蜡的教鞭，狄更斯看清了这种愚蠢之处；另外，狄更斯也不喜欢19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那种新式学校，那种对“事实”揪住不放的“现代”学校。那么，狄更斯到底想要什么？一如既往，他想要的是似乎是现存事物的道德化变体，他想要的依旧是旧式学校，但没有鞭笞，没有欺凌，不会食不果腹，不教那么多希腊语。大卫·科波菲尔从默德斯通和格林伯货栈逃跑后，来到了斯特朗博士的学校。这所学校简直就是萨勒姆学院，只是少了恶行，多了大量“古老的灰色石头”的氛围。

斯特朗博士的学校非常出色，同克瑞克尔先生的学校大相径庭，如同善恶泾渭分明。学校纪律严明，体制健全，井井有条；所有事物都能唤起男生们的荣誉感和善念……这样颇有效果。我们都觉得自己参与了学校的管理，参与维护了学校特色和尊严。因此，我们很快就深深地喜欢上它——我确信我是其中之一，而且在校期间，我从未听说有哪个男生不喜欢这所学校——而且我们决心努力学习，希望为学校增光。在课余时间，我们玩高雅的游戏，而且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我记得，即便在那时，我们在小镇里也口碑不错，不管是我们的外貌，还是礼仪，我们几乎没有让斯特朗博士和学校里的学生蒙羞。

从这段含混不清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狄更斯对教育理论一窍不通。他只能设想一所好学校的道德氛围，别的什么都想不到。孩子们“决心努力学习”，但是他们要学什么？无非还是布林伯博士的课程，只是稍加缩减。就狄更斯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对社会的态度而言，我们会很惊讶他将大儿子送去伊顿公学，把其他孩子送去普通教育机构。吉辛似乎认为，狄更斯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吉辛在此或许是受到自己对传统知识热爱的影响。狄更斯几乎没接受过正规教育，但并未因此而错过什么，而且总的来说，他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如果斯特朗博士的学校或现实生活中的伊顿公学是狄更斯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学校，或许是因为狄更斯有着一种与吉辛的猜测不同的思维缺陷。

狄更斯每次批判社会时，似乎总是将矛头对准精神上而非结构上的改变。尝试确定狄更斯的解决方案只会是徒劳，更不用说确定他的政治信条。他的方案总是停留在道德层面。在关于斯特朗博士的学校和克瑞克尔的学校如同“善恶泾渭分明”的评论中，我们能充分总结出他的态度。两种事物可以浑然相似，却也可以截然不同。天堂和地狱同在一处。狄更斯基本上都是在说：改变体制而不“改变心灵”是没用的。

假如这就是全部，那么狄更斯或许就只是一个励志作家，一个极端保守的伪君子。“心灵的改变”实际上是那些不想危及现状的人们的托词。但如果把某些小事情除外，狄更斯并非伪君子，从他的书中我们看到他对暴政的憎恨。我早前说过，狄更斯不是公认意义上的革命作家。但我们并不能断言，纯粹的社会道德批判不能像当前盛行的政治经济批判那样具有“革命性”，毕竟革命意味着翻天覆地。布莱克不是政客，但在《伦敦》（*London*）之类的诗中，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认识胜过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文学。进步并不是幻想，它会发生，只是进程缓慢，总是让人失望。新暴君总是在等着取代旧暴君，新暴君通常不那么坏，但仍旧是暴君。因此，总能站住脚的观点有两种。其一，不改变制度，如何改善人性？其二，人性若无改观，改变制度又有何用？对不同的个人来说，这两种观点各有吸引力，而且它们或许会在不同的时刻交替出现。道德家和革命者正在不断地削弱彼此。核心问题——怎样预防权力滥用——仍未解决。狄更斯没有那样的远见，看不到私有制对进步的阻碍，但他却预见到了这种结局。“如果人们都能行事规矩，世界就会变得美好”这句话，并不像听起来那样陈腐平庸。

二

比起大多数作家，或许我们能从社会出身的角度更完整地诠释狄更斯，虽然他的家族史和人们从小说中推断出来的大不相同。他的父亲是政府职员，通过母亲的家族，和陆军、海军都拉上了关系。但从九岁起，他就生活在伦敦的商业环境下，基本上是在与贫困做斗争的氛围之中长大的。他在思想上属于城市小资产阶级，且他恰好是这个阶级的绝佳代表，可以说所有的阶级“特点”都相当成熟。这部分说明了他为何如此引人注目。如果要寻找现代版的狄更斯，那么最合适的人当是H.G.威尔斯。他的成长史和狄更斯非常相似，而且作为小说家，他的成功明显要归功于狄更斯。从本质上来看，阿诺德·贝内特也属同类，但他却又有所不同，因为他来自于英格兰中部，有着工业和新教徒的背景，而不是商业和英国国教徒的背景。

城市小资产阶级最大的缺点，同时也是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们有限的眼界。他们把世界看成中产阶级的世界，超出他们眼界的事物，要么让人发笑，要么是略微邪恶。一方面，他们不同工业或土地打交道；另一方面，他们又和统治阶级毫无瓜葛。仔细研究过威尔斯小说的人都会注意到，虽然威尔斯对贵族恨之入骨，但并不特别排斥富人，而且对无产阶级也不热心。他最痛恨国王、地主、牧师、民族主义者、士兵、学者和农民，他认为这些人应该为人类所有痛苦负责。乍看起来，这份以国王开始、以农民结尾的名单，仅仅像是涵盖所有人物的杂烩，但其实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过时的群体，受传统支配，眼光放在过去；因此，他们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相对立，后者将金钱投放于未来，只将过去视作不散的阴魂。

事实是，虽然狄更斯生活在资产阶级方兴未艾的时代，但他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特征却不及威尔斯明显。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未来，对生动的描写（“古雅的老教堂”等）有一种伤感的喜爱。不过，他最憎恨的人物类型同威尔斯所憎恨的类型，有着十分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狄更斯略微站在工人阶级这边——因为工人阶级受到压迫，所以对他们怀有笼统的同情——但实际上，他对工人阶级知之甚少；他书里的工人阶级主要是仆人，而且还是滑稽的仆人。另外，他还讨厌贵族，比威尔斯好的是，他还讨厌大资产阶级。他真正的同情上不超过匹克威克先生，下不低于巴基斯先生。但是就狄更斯厌恶的人物类型而言，“贵族”这个词含义模糊，需要明确界定。

实际上，狄更斯抨击的对象，与其说是几乎从未在他书中出现过的大贵族，还不如说是他们卑微的旁系亲戚，那些在伦敦高级住宅区行乞的寡妇，以及官僚和职业军人。通览狄更斯的作品，他对这些人充满敌意的描写数不胜数，几乎从未好言相向。比如，他几乎从未善意地描写过地主阶级。也许人们会觉得莱斯特·戴洛克爵士可能是例外，此外就只有沃德尔先生（老套的“心地善良的老乡绅”角色）和《巴纳比·拉齐》里的哈雷戴尔。哈雷戴尔是一个受迫害的天主教徒，因而得到了狄更斯的同情。而且，狄更斯对军人（即军官）也毫不客气，对海军军人更是如此。至于官僚、法官、地方行政官，他们中大部分人在“兜圈子部”[6]里工作会觉得十分舒适。显然，狄更斯善意描写过的行政人员只有警察。

狄更斯的态度对英国人来说很好理解，因为这是英国清教徒传统的一部分，这种传统时至今日仍未灭亡。狄更斯所属的阶级，至少说他自己选择的那个阶级，在经历了一两百年的默默无闻之后，突然变得富有起来。这个阶级主要成长在大城市里，同农业没有联系，在政治上软弱无能；从它的经历来看，政府不是进行干涉，就是进行迫害。因而，这个阶级没有公共服务的传统，也没有太多做贡献的传统。如今，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个19世纪的新贵阶级毫无社会责任感。他们从个人成功的角度看待一切，几乎没有意识到公众的存在。另外，泰特·巴纳克之类的人物即使玩忽职守，也大概能知道自己的疏忽在何处。狄更斯的态度绝不是不负责任，更不是孜孜求利的斯迈尔斯[7]路线。但狄更斯在心底里总是有些相信，整个政府机构毫无必要存在。国会无非就是库德尔勋爵和托马斯·杜德尔爵士，大英帝国无非就是白格斯托克少及其印度仆人，军队不过就是乔塞上校和斯拉莫医生，而公共服务机构不过是班布尔和“兜圈子部”，等等。他看不到，或者只是偶尔才会看到的是，库德尔、杜德尔，以及其他18世纪遗老遗少们所做的事情，匹克威克和博芬都不屑去做。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狭隘的视野对狄更斯而言是极大的优势，因为开阔的视野对讽刺作家来说是致命的。在狄更斯看来，“良好”的社会不过就是乡村白痴们的集合。这是怎样的一群人啊！蒂平斯女士！高恩太太！维拉斯福特爵士！鲍勃·斯泰伯斯！斯巴塞太太（她的丈夫曾是鲍勒家的人）！泰特·巴纳克一家！努普金斯！这简直就是精神病人的病案簿。但与此同时，他同地主-军人-官僚阶级的疏远，也使他无法展开全面的讽刺。对于地主-军人-官僚阶级而言，狄更斯只有在将他们描绘成精神有缺陷时才算成功。狄更斯在世时，人们指责

他“不会描写绅士”，这种指责很不妥当，但他对“绅士”阶级的言论几乎都是隔靴搔痒，从这方面来看，人们对他的指责倒也不假。比如，马尔伯里·霍克爵士就是狄更斯描写缺德男爵这类人的糟糕尝试。《艰难时世》里的哈特豪斯要好一些，但对特罗洛普或萨克雷而言，这个人物的塑造并不出彩。特罗洛普的思维几乎跳不出“绅士”阶级，而萨克雷却拥有脚踩两个道德阵营的巨大优势。萨克雷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同狄更斯非常相似。同狄更斯一样，他认同清教徒富裕阶级，反对玩牌、赖账的贵族。在萨克雷看来，18世纪正以缺德的斯太恩勋爵为代表挺进19世纪。《名利场》（*Vanity Fair*）是狄更斯《小杜丽》中几个章节的完整版本。但从出身和教养来说，萨克雷恰有几分接近自己所讽刺的那个阶级。因此，他可以创作出潘登尼斯上校和罗顿·克罗莱这类相对精巧的角色。潘登尼斯上校是个浅薄的势利老头，而罗顿·克罗莱是个愚蠢无知的恶棍，丝毫不觉得常年靠欺诈商人谋生有何不妥。但萨克雷意识到，依照他们自己复杂的道德准则，他们都不是坏人。比如，潘登尼斯上校不会在空头支票上签名，而罗顿肯定会，但在另一方面，罗顿不会在朋友危难时弃之不顾。他们两个人在战场上都会有不错的表现，而狄更斯对战争不怎么感兴趣。结果就是，读者最后会对潘登尼斯上校有种愉快的包容，而对罗顿则近乎尊敬；他们还会发现，在光鲜社会边缘那种谄媚、乞求的生活方式已经糜烂透顶，而且这种描写比长篇大论的尖刻批评更有效。狄更斯却不大能做到这点。在他笔下，潘登尼斯上校和罗顿都会沦为老套的滑稽人物。而且总体而言，他对“良好”社会的抨击都很敷衍。在他的作品中，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一般都是“幕后音”，是舞台两侧发出的齐声大笑，就像泼孜纳普的晚宴一般。当他创作出具有破坏力的精妙角色时，如约翰·杜丽和哈罗德·斯金波，这个角色往往都是无足轻重的普通人。

考虑到他所生活的时代，狄更斯有一点尤其引人注意，那就是在他身上找不到庸俗的民族主义。所有成了国家的民族，都有蔑视外国人的倾向，但英语民族无疑是个中魁首。他们一旦充分了解某个民族，就会给它取一个侮辱性的外号，由此可见他们对外国人的鄙视。意大利佬、拉丁佬、法国佬、北欧佬、犹太鬼子、犹太佬、黑鬼、中东佬、中国佬、拉美佬、林肯郡懦夫——这些只是一小部分。1870年以前，这个清单要短一点，因为当时的世界版图和现在不同，英国能完全认识的外国民族只有三四个。但对于这些民族，尤其是对法国这个最招人讨厌的邻国，英国的施恩态度让人实在无法忍受，以至于有关英国人“傲慢”和“排外”的传说至今还在流传。当然，即使是现在，这种传说也并非完全失实。直至今日，所有英国儿童依然从小就会接受歧视南欧种族

的教育，而且学校的历史课也以罗列英国获胜的战役为主。但是若想明白何为真正的自吹自擂，你得读读19世纪30年代的《评论家季刊》之类的刊物。那时，英国人自己树立了“强健岛民”和“顽强的橡树之心”的神话，而且人们都认为一个英国人抵得上三个外国人是科学事实。19世纪的所有小说和讽刺报纸里，都有“法国佬”的传统形象——滑稽可笑的矮个子，留着一小撮胡须，戴着尖尖的高顶礼帽，总是在手舞足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自负且肤浅，喜欢吹嘘自己的英勇事迹，但危险真正来临时却总是逃之夭夭。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健壮的英国侍卫”约翰牛，或者（更具公学风范的）查尔斯·金斯利、汤姆·休斯等“坚强沉默的英国人”。

以萨克雷为例，虽然他有时会识破并嘲笑这种观点，但他仍然执著于它。有个历史事实在他脑海里根深蒂固，那就是英国赢得了滑铁卢战役。阅读他的作品，不难发现他会不时提及此事。在他看来，英国人战无不胜，因为他们有着惊人的强健体魄，而这主要是因为他们都以吃牛肉为生。与同时代的大部分英国人一样，萨克雷有一种奇特的错觉，以为英国人的体格比其他种族的人都大（萨克雷恰好比大部分人更魁梧），因此他才能写出这样的篇章：

我跟你说，你比法国人强。我甚至可以用钱打赌，正在读这段话的你身高不止五英尺七英寸，体重不止十一英石[8]；而法国人只有五英尺四英寸高，体重不到九英石。法国人汤后吃蔬菜，而你吃的是肉。你是与他们不同、比他们更优秀的动物，是能打败法国人的动物（几百年的历史可以为你证明）。

类似的段落散见于萨克雷的作品中，而狄更斯却绝没有犯过这种错误。要说他在书中从来没有嘲笑过外国人当然是夸张，他自然同几乎所有19世纪的英国人一样，不为欧洲文化所动。但是，他从未沉湎于那种典型的英国式吹嘘，从未有过类似于“岛屿民族”“斗牛犬种”“小而紧凑的岛国”这种风格的言论。在整本《双城记》中，没有一行字可以被理解成“瞧瞧这些讨厌的法国人的行为举止！”只是在《马丁·翟述伟》（*Martin Chuzzlewit*）中关于美国的那几章里，狄更斯才表露出常见的对外国人的憎恨。然而，这仅仅是心胸豁达之人对伪善言辞的回应。如果狄更斯还活着，他会游历苏联，然后回来写一本与纪德的《访苏归来》（*Retour De L’URSS*）相仿的书。但他显然不会愚蠢地把民族视为个人。他甚至几乎从不拿民族开玩笑。比如，他不会利用滑稽的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形象，这并不是因为他反对老套的角色和现成的笑话，而

且他显然不反对它们。更重要的也许是他对犹太人没有偏见。在《雾都孤儿》和《远大前程》中，他的确想当然地认为收赃的是犹太人，这在当时可能是合乎情理的。但是，那种英国文学所特有、直到希特勒之后才消失的“犹太笑话”，并未出现在狄更斯的作品中，而且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他还好心但却不那么让人信服地尝试过维护犹太人。

狄更斯没有庸俗的民族主义，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他的思想真正博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那消极、无用的政治态度。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但他却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点。当然，身为英国人的念头也没有让他兴奋激动。他没有帝国主义情绪，对国际政治没有明确观点，而且不为军事传统所动。从气质上来说，他其实更像是信奉新教的小商人，看不起英国士兵，认为战争是邪恶的——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但战争总归是邪恶的。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几乎不写战争，他甚至还谴责战争。纵使有卓越的描写才能，能够描述出从未见过的事物，他也从未描写过战斗，除非你认为《双城记》中进攻巴士底狱的情节也算战斗。或许他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但不管怎样，他不会认为战争可以解决任何值得解决的问题。这近乎一种下层中产阶级的清教徒心态。

三

狄更斯是在近乎贫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害怕贫穷。他尽管心胸豁达，却还是摆脱不了落魄绅士所特有的偏见。人们通常称他为“平民”的作家和“被压迫人民”的声援者。事实的确如此，只要认为他们受到了压迫，狄更斯就会声援他们；但决定他态度的有两点。首先，他是英国南方人，而且是伦敦人，因此他接触不到大多数真正受压迫的人民，接触不到工业和农业劳动者。有趣的是，同是伦敦人的切斯特顿总说狄更斯是“穷人”的代言人，却没有明说“穷人”到底是谁。对切斯特顿来说，“穷人”就是小店主和仆人。他说，山姆·维勒“是英国特有的平民文学中的伟大标志”，而山姆·维勒是个贴身男仆！其次，狄更斯早期的经历让他对无产阶级的“粗暴”心怀恐惧。只要写到穷人中最穷的人，也就是写到贫民窟居民时，他的这种恐惧就展露无遗。他对伦敦贫民窟的描写总是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反感：

道路泥泞狭窄，商店和房屋破旧不堪，人们长相丑陋，邋遢不堪，身体半裸，醉醺醺的。和许多污水池一样，小巷和拱门里散发出恶臭，

流溢出泥污，走出邋遢的人，直逼零落散乱的街道；整个城区充斥着罪恶、污秽和悲惨。

狄更斯的作品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段落。我们可以从其中感受到全部底层人民的状况。狄更斯认为他们让人无法容忍，而现代那些空谈理论的“社会主义者”，也几乎以同样的方式，蔑称他们为“流氓无产者”。

狄更斯对不法之徒的同情也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多。他深知犯罪的社会和经济根源，但他似乎常常认为，人一旦触犯法律，就等于自绝于人类社会。在《大卫·科波菲尔》结尾的一章中，大卫去了拉蒂默和尤赖亚·希普服刑的监狱探监。实际上，狄更斯似乎认为那些恐怖的“模范”监狱太过人性化，而且查尔斯·里德在《亡羊补牢犹未晚》（*It is Never too Late to Mend*）中，对这些监狱的抨击也令人印象深刻。狄更斯抱怨监狱的伙食太好！遇到犯罪或极度的贫穷时，他就会流露出“我总是让自己保持体面”的思维习惯。在《远大前程》中，皮普对马格维奇的态度（显然就是狄更斯自己的态度）极为有趣。皮普始终都明白自己对乔的忘恩负义，可是他却远不知道自己对马格维奇的忘恩负义。发现多年来施惠于他的那个人其实是个被流放的罪犯时，皮普就变得极度反感——“就算这个人是头可怕的野兽，我对他的厌恶和恐惧，那种让我远离他的反感，都无法被超越”，等等。从文中可以发现，这并不是因为皮普小时曾在教堂墓地受到过马格维奇的恐吓，而是因为马格维奇是个已定罪的罪犯。皮普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不能拿马格维奇的钱，其中更有“让自己保持体面”的心理。马格维奇的钱并非犯罪所得，而是通过正当途径得来的，但这些钱属于有犯罪前科的人，所以“不干净”。从心理层面上说，这也没什么错。《远大前程》的后半部分，从心理层面上看，差不多是狄更斯写得最好的内容；读完这部分，你会觉得“是的，皮普就该那么做。”但问题在于，在马格维奇这件事上，狄更斯支持的是皮普，他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势利的。结果，马格维奇便和福斯塔夫或堂吉诃德一样，同属怪异的角色，他们比作者原本想要描写的更加可怜。

如果提到的只是没有犯罪前科、正派且辛苦劳作的普通穷人，狄更斯的态度自然毫无轻蔑。对于佩葛蒂一家和普洛尼希一家这类人，他怀有最诚挚的钦佩。但他未必真的平等看待他们。对比阅读《大卫·科波菲尔》的第十一章和狄更斯的自传片段（部分能在约翰·福斯特[9]的《狄更斯传》中读到）无比有趣。对于黑鞋油厂这段人生插曲的感受，狄更斯在自传中表达得比在小说中强烈许多。在随后二十多年里，这段

记忆仍然让他痛苦不已，所以他总是竭力避免提起在河岸街的经历。他说，经过河岸街的时候，“即使在我的长子学会说话以后，我还是会痛哭。”下面的引文清晰地表明，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回忆往事时，最让狄更斯痛苦的是被迫与“下层”同伴为伍：

我沦落到每天与这群人为伍。将他们与我快乐儿时的同伴对比时，我的内心苦不堪言。但我在鞋油厂也有一定地位……至少我很快就和其他孩子一样双手灵巧了。虽然我和他们十分熟络，但我的行为举止和他们大不一样，足够让我和他们拉开距离。他们和那些大人总是叫我“小绅士”。有个大人……在同我说话时，偶尔会叫我“查尔斯”，但我觉得这多半是在我们俩关系非常亲密的时候……波尔·格林有一次起来反对“小绅士”这个叫法，但鲍勃·费金很快便让他安静了下来。

你看，狄更斯依然认为“我们之间保持距离”是应该的。不管狄更斯有多么钦佩工人阶级，他都不希望自己和他们相似。考虑到他的出身和他生活的时代，他也只能如此。在19世纪早期，阶级仇恨或许不如现在那么尖锐，但阶级之间表面上的差异却比现在大得多。“绅士”与“平民”必然看似两种不同的群体。狄更斯十分真诚地站在穷人这边反对富人，但他几乎不可能不把工人阶级的外貌视作耻辱。在托尔斯泰的一则寓言中，某个村落的农民根据外来人的双手来评判他们。如果他们的掌心因为干活而长满茧子，那么就让他们进村；如果双手细皮嫩肉，就赶他们出去。这对狄更斯而言几乎不可理喻；他笔下的所有主人公都有一双细嫩的手。他笔下的年轻男性尼古拉斯·尼克尔贝、马丁·翟述伟、爱德华·契斯特、大卫·科波菲尔、约翰·哈蒙——通常都是“男配角”。他喜欢资产阶级的外貌和资产阶级（不是贵族）的口音。其中有个奇特的问题是，他不会让主要角色说起话来像工人。山姆·维勒之类的滑稽主角，或者史蒂芬·布莱克普尔之类纯粹的可怜人，说话就可以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但年轻男主角们总是操着BBC口音，即使这样不尽合理。比如，小皮普由埃塞克斯口音浓重的人抚养长大，但却从小就说一口上层阶级的英语；实际上，他应该像乔，或者至少像葛吉瑞太太一样讲同样的方言（毕蒂·伍甫赛、莉齐·赫克瑟姆、西西·尤佩、奥利弗·退斯特也是一样）。或许还应该加上小杜丽。即使是《艰难时世》中的雷切尔，说话也几乎不带兰开夏口音，这绝对不可能。

小说家在阶级问题和性问题冲突时所持的态度，往往能够让我们一窥他在阶级问题上的真实情感。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会相当痛苦，所以那种“我不势利”的姿态容易在此分崩离析。

可以看出，阶级区分在其最明显的时候也就是肤色区分。类似于殖民观点（“土著”女人就是受嘲弄的对象，而白人女子却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以隐晦的形式存在于纯白人社区中，给双方都带来了痛苦和怨恨。当这个问题出现时，小说家们通常会回归原始的阶级情感，而这些情感在其他时候则会受到他们的谴责。安德鲁·巴顿（Andrew Barton）那本被世人遗忘的小说《克洛普顿人》（*The People of Clopton*），就是“阶级意识”反应的绝佳例证。作者的道德准则明显与阶级仇恨相互交织。他觉得富人诱奸穷女孩是一种残暴行为，是一种玷污，而且与被同阶层男人诱奸有天壤之别。特罗洛普在《三个职员》（*The Three Clerks*）和《阿林顿小屋》（*The Small House at Allington*）中两次涉及这个题材，而且正如读者所料，他的视角完全是上层阶级的视角。在他看来，同酒吧女招待或者房东太太的女儿私通，只不过是一件应该避而远之的“麻烦事”。特罗洛普的道德标准十分严格，他不会允许诱奸之事真正发生，但他总是在暗示工人阶级女孩的感受无关紧要。在《三个职员》中，他甚至通过强调工人阶级女孩的“臭味”，表现出典型的阶级反应。《罗达·弗莱明》（Rhoda *Fleming*）的作者梅瑞狄斯[10]的“阶级意识”更为强烈。萨克雷则一如既往地犹豫不决。对于《潘登尼斯》（*Pendennis*）中的芬妮·博尔顿，萨克雷的态度与特罗洛普无异；在《悲惨华丽的故事》（*A Shabby Genteel Story*）中，他的态度则更接近于梅瑞狄斯。

从特罗洛普、梅瑞狄斯或巴顿对阶级和性主题的处理手法中，我们就能大概推测出他们的社会出身。对狄更斯也可如此推测，但我们的推测照旧是狄更斯更倾向于把自己标榜为中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有件事情看似与之矛盾，即《双城记》中曼内特医生的手稿里有个关于年轻乡下女孩的故事。然而，这仅仅是个插曲，用来解释德法奇太太无法消解的仇恨，狄更斯并没有假装赞成。在《大卫·科波菲尔》中，狄更斯写了一起典型的19世纪诱奸事件，他似乎并不认为阶级问题最为重要。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性犯罪必然会受到惩罚，因此斯提福兹才会淹死在雅茅斯海滩。但是，狄更斯、佩葛蒂，甚至于哈姆，似乎都不觉得斯提福兹因为身为富家子弟而罪加一等。斯提福兹一家受阶级动机所驱使，而佩葛蒂一家则没有，即使在斯提福兹太太和老佩葛蒂吵架的时候也没有。当然，如果他们确实受到阶级动机驱使，他们大概会像与斯提福兹反目一样，也与大卫·科波菲尔反目。

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对待描述尤金·瑞博恩和莉齐·赫克瑟姆的那段情节时，狄更斯非常现实，毫无阶级偏见。根据“放开我，禽

兽！”的传统，莉齐要么应该“轻蔑地拒绝”尤金，要么应该任由尤金糟蹋，然后纵身跳下滑铁卢桥；而尤金要么应该做个没心没肺的背叛者，要么应该做个决心反抗社会的英雄。两人最后都没有这样做。莉齐被尤金的追求吓跑，却也没有假装讨厌他的追求；尤金被莉齐迷住，但由于受太多道德规矩束缚，他并没有试图引诱莉齐，而且因为自身家庭原因，也不敢娶莉齐为妻。虽然两人最终结为夫妻，近乎皆大欢喜，但是特姆罗太太除外，因为她将因此丢掉几次晚宴约会。这和实际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十分相似。但若是有“阶级意识”的小说家，就会让莉齐嫁给布拉德利·韩德斯通。

不过，如果情况恰恰相反，如果穷人去追求比他“高贵”的女性，狄更斯就会立马重拾中产阶级态度。他相当热衷于维多利亚时代那种认为女性比男性“高贵”的观念。皮普觉得埃斯特拉比自己“高贵”，埃斯特·萨默森比格皮“高贵”，小杜丽比约翰·奇弗瑞“高贵”，露西·曼内特比西德尼·卡尔顿“高贵”。这种“高贵”有些仅限于道德层面，而其余则属于社会层面。发现尤赖亚·希普正在密谋迎娶艾格尼丝·维克菲尔时，大卫·科波菲尔的反应显然就是阶级反应。可恶的尤赖亚突然宣布自己爱上了艾格尼丝：

“啊，科波菲尔少爷，对我的艾格尼丝走过的地面，我有着纯粹的爱。”

我相信，我当时有个狂热的念头，想从火中抓起炽热的拨火棍，刺穿他的身体。这个念头来得那么突然，就像枪膛中射出的子弹；我看着他歪歪扭扭地坐着，似乎他那卑鄙的灵魂紧紧钳住了他的身体；艾格尼丝的形象纵使受到这个红发畜生那种想法的侮辱，却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令我头晕目眩……

大卫·科波菲尔随后说道：

“我认为艾格尼丝·维克菲尔远胜过你，她就像月亮，你永远无法企及。”

考虑到整本书都在反复提及希普的社会地位多么低下——他卑躬屈膝，说话时略去“H”音，等等——狄更斯情感的本质并无太多不确定的地方。当然，希普是个恶棍角色，但恶棍也有性生活。想到“纯洁”的艾格尼丝和一个说话省掉“H”音的男人同床共枕，狄更斯就深感恶心。男人爱上比自己“高贵”的女人这种事，往往被狄更斯视为笑话。这是英国

文学中的老套笑话之一，滥觞于马伏里奥[11]。《荒凉山庄》里的格皮就是个例子，此外还有约翰·奇弗瑞，而且在《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里的“晚宴”中，狄更斯对这一主题的处理相当恶毒。在描述巴思温泉里的男仆时，狄更斯说他们过着一种幻想中的生活，模仿那些比他们“高贵”的人举办晚宴，自欺欺人地觉得年轻的女主人都爱上了他们。这显然让他觉得相当滑稽。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不过人们可能会提出异议，相对于简单地、无可辩驳地接受自己的社会地位，男仆们拥有这样的幻觉岂非更好？

在对待仆人的态度方面，狄更斯并没有超前于时代。19世纪，反抗家庭式雇佣的运动才刚刚开始，年收入超过五百英镑的人们大为不快。19世纪的漫画报纸上刊登着无数以傲慢的仆人为主题的笑话。《笨拙》（*Punch*）杂志连续多年刊登的“仆人主义”系列笑话，主题都是仆人也是人这个在当时令人震惊的事实。狄更斯不时为这种事情深感内疚。他的书中有很多滑稽可笑的普通仆人，他们不老实（《远大前程》）、不称职（《大卫·科波菲尔》）、不爱美食（《匹克威克外传》）等，他们的心态全都像是郊区的家庭主妇，手下有个备受欺压的掌厨杂佣。但奇怪的是，狄更斯作为19世纪的激进分子，想要塑造出令人喜欢的仆人角色，但他塑造出的却是明显封建式的仆人。山姆·维勒、马克·塔普莱、克拉拉·佩葛蒂全部都是封建人物，都是“老式家庭仆人”；他们自视为主人家中的一员，对主人既像狗一样忠诚，又像家人一样亲密。从某种程度来说，马克·塔普莱和山姆·维勒都源自于斯摩莱特[12]，因此也源于塞万提斯；但有趣的是，狄更斯竟然被这类仆人角色给吸引住了。山姆·维勒的态度无疑是落后的。他有意被捕是为了追随匹克威克先生去弗利特监狱；他后来拒绝成婚，是因为觉得匹克威克先生仍然需要他伺候。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次典型对话：

“不管付不付钱，管不管饭，我山姆·维勒都和当初您从市里的旧旅馆里带出来时一样，会跟随您左右，不管发生什么……”

“我的好伙计”，当维勒再次坐下，为自己的过分热情感到十分窘迫时，匹克威克先生说道，“你同样得为那位年轻的女士考虑啊。”

“我为她考虑的，先生，”山姆说道，“我已经把她考虑在内了。我也和她说过了。我告诉了她我的处境，她愿意等我准备好，我也相信她会等我。如果她没有等我，那她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女孩了，我随时都可以放弃。”

很容易想象，这位年轻的女士在现实生活中会对此说什么。但请注意书中的封建氛围。山姆·维勒自然愿意为主人奉献几年，而且他也可以当着主人的面坐下来。这是现代男仆绝对不会想做的两件事。在仆人问题上，狄更斯的观点只是希望主仆相互关爱。《我们共同的朋友》里的斯洛皮虽然被塑造得很失败，但他表现出来的忠诚同山姆·维勒别无二致。当然，这种忠诚自然而然、充满人性、招人喜欢，但封建主义也同样如此。

照例，狄更斯所做的努力，似乎就是为现存事物寻找理想化的变体。在他写作的那个年代，家庭式雇佣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完全不可避免的弊端。当时没有节省劳力的种种设备，贫富悬殊巨大。那时家庭人口众多，三餐华而不实，住房毫不方便，仆人们在地下厨房里每天辛苦工作十四小时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考虑到奴役的事实，封建式的主仆关系是唯一可以容忍的关系。山姆·维勒和马克·塔普莱都是理想中的角色，正如切尔以布兄弟一样。如果一定要有主仆关系存在，如果主人都像匹克威克先生，仆人都像山姆·维勒，那该多好啊！当然，如果根本就没有仆人的存在就更好了——但这大概是狄更斯无法想象的。没有高度发达的机械，人类平等就不可能实现，而狄更斯尝试告诉我们，人类平等也是无法想象的。

四

狄更斯从来不写农业，却没完没了地写食物，这不仅仅是个巧合。他是伦敦东区人，而伦敦是地球的中心，就像肚子是身体的中心一样。伦敦是消费者的城市，人们十分有修养，但并不怎么能干。深入阅读狄更斯的作品，你会发现他相较于19世纪的其他小说家而言显得尤为无知。他不谙世事。乍看之下，这种说法明显失实，所以还需要加以限定。

狄更斯多次生动而简短地描写过“下层生活”——比如负债人监狱里的生活。他同样也是个平民小说家，能够写普通人。典型的19世纪英国小说家也能写普通人。他们在自己生活的世界里轻松自在，而今天的小说家却是那么孤独无助，以至于典型的现代小说就是在写小说家本身。以乔伊斯为例，他花费十来年耐心地接触“普通人”，结果笔下的“普通人”却是犹太人，而且还是个有些风雅的犹太人。至少狄更斯不用为此

烦恼，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引入普通的动机、爱情、野心、贪婪、报复之类的东西。不过，他显然没有写过工作。

在狄更斯的小说中，所有具有工作性质的事情都在幕后。大卫·科波菲尔是他笔下唯一一个拥有看似可信工作的主人公。他起初是速记员，后来成为狄更斯那样的小说家。至于其他大多数主人公，他们的谋生方式在小说中都没有详细说明。比如，皮普在埃及“做生意”，但具体做什么生意，我们却不得而知；整本书只有半页内容介绍皮普的工作生涯。克莱南在中国做什么生意没有细说，后来他和多伊斯做的另一桩生意也没有详细说明。马丁·翟述伟是个建筑师，但似乎没有太多工作时间。他们的奇遇全都不是直接来源于工作。在这点上，狄更斯与特罗洛普之间的差异大得惊人。原因之一无疑是因为狄更斯对笔下人物应该从事的职业知之甚少。葛雷梗的工厂里究竟情况如何？泼孜纳普是怎么赚到钱的？梅德尔如何行骗？我们知道狄更斯无法像特罗洛普那样，对议会选举的细节和证券交易所里的骗局穷追不舍。只要涉及贸易、金融、工业或者政治，狄更斯就会借用含糊的语言或者讽刺来逃避。就连提到他必定相当了解的法律程序时也是一样。例如，从他小说中随便找个官司，与《奥利农庄》[13]中的官司相比，我们就能看出这点。

这多少可以解释狄更斯小说中为何有那些不必要的支线发展，那种糟糕的维多利亚式“情节”。当然，他的小说并非全都这样。《双城记》就是一个十分不错且相当简单的故事，《艰难时世》也是如此，只是方式不同，但恰好常常有人认为这两部小说“不像狄更斯”。附带一句，两部小说都没有在月刊上连载。这两本采用第一人称的小说，除了它们的次要情节以外，故事情节也同样质量上乘。但是典型的狄更斯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雾都孤儿》《马丁·翟述伟》《我们共同的朋友》），围绕的总是同一个剧情框架。读过这些书的人最后记住的都不会是主要情节。另外，我认为，凡是读过这些书的人，都会终生记住个别几页的内容。狄更斯对人的观察极其生动，但他总是从私人生活的角度来观察，将他们视为小说中的“角色”，而不是有能动性的社会成员。换言之，他以静态的眼光观察人物。因此，狄更斯最成功的作品是《匹克威克外传》，这本书根本就不是一个故事，它仅是一系列短篇作品的集合。他没有尝试去丰富情节，书中人物只是不断登场，行为举止像白痴一样。只要狄更斯让角色活动起来，情节剧就开始了。狄更斯无法让角色围绕着他们寻常的工作活动，因此才会写出诸如巧合、阴谋、谋杀、伪装、埋藏的遗嘱、失散多年的兄弟等错综复杂的情节。到最后，连斯奎尔斯、米考伯这样的人，也陷入了这种手法。

当然，如果说狄更斯是个含糊的作家，或者说他只能写出闹剧情节，那实在是很荒谬。他的作品大多极其真实，而且他唤起人们视觉图像的能力恐怕无人能及。只要是狄更斯描述过的事物，它们唤起的画面能跟随你一生。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他视野的具体性恰好说明了他欠缺什么。因为他所看到的毕竟只是漫不经心的旁观者通常所看到的——事物的外观、无用之事，以及事物的表面。风景当中的人从来看不见这道风景。狄更斯虽然可以将外表描写得出神入化，但却不常描写过程。狄更斯在人们脑海中成功留下的那些栩栩如生的画面，几乎都是在闲暇时刻、乡村旅店的咖啡屋或者透过马车窗所能看到的；他所注意到的不外乎旅馆招牌、铜质门环、彩绘罐子、商店和私宅的内景、衣服、面孔，甚至还有食物。狄更斯从消费者的角度观察一切。写到库克斯敦时，他仅仅用了几个段落就成功渲染出了一个略有反感的南方游客眼中的兰开夏郡城镇的氛围。

库克斯敦有一条黑色运河，有一条流淌着恶臭紫色染料的河流，还有无数满是窗户的建筑物。在那些建筑物里，喧嚣和震颤成天不断，蒸汽机的活塞单调地往复运转，犹如一只忧郁发狂的大象脑袋。

这算是狄更斯对工厂机械最近距离的描写了。工程师或棉花商人会看到全然不同的景象，但他们都不可能运用大象脑袋这种印象派的手法。

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上来说，狄更斯对生活的态度是极端抽象的。他是个用眼睛和耳朵，而不是用双手和肌肉来感受生活的人。实际上他并不像这句话所暗示的那样习惯久坐不动。尽管他身体羸弱，可是他却相当好动。他一生都是个了不起的徒步者，而且他的手工活儿还不赖，至少能搭起舞台背景。但他并不属于那种觉得有必要使用双手的人。比如，很难想象他会在白菜地里把锄劳作。没有证据表明狄更斯对农业有所了解，他显然也对各种游戏或运动一窍不通。比如，他对拳击就毫无兴趣。相对于他写作的那个年代，狄更斯的小说里关于身体暴力的描写少得让人惊讶。例如，面对那些经常用左轮手枪和鲍伊刀威胁他们的美国人，马丁·翟述伟和马克·塔普莱却显得极其温和。换作一般的英美小说家，就会让他们对准对方下巴狠狠出拳，然后拔枪四射。狄更斯在这方面太过文雅。他认识到暴力的愚蠢，而且他属于小心谨慎的城市阶级，不会用拳头解决问题，即便是在理论上也不会。他对运动的态度也掺杂着社会情感。出于地理上的原因，英国的运动，尤其是户外运动，都与摆绅士架子难解难分。比如，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在听说列宁热

衷于射击时，常常会断然表示怀疑。在他们眼中，射击、打猎等运动就是地主乡绅们的势利习俗。他们不知道，在俄国这种幅员辽阔、未被开发的国家里，这些运动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在狄更斯看来，几乎各种运动都只是讽刺的对象。因此，那种在里奇[14]为瑟蒂斯[15]所绘插画中活灵活现的19世纪生活——拳击、赛马、斗鸡、挖獾、偷猎、捕鼠——并不在狄更斯的描写范围之内。

更让人惊诧的是，狄更斯看似是个“进步”的激进分子，但却对机械并没有热情。他对机械的细节和功能都不感兴趣。正如吉辛所言，狄更斯从没有像描写乘公共马车旅行那样热情地描写过火车之旅。他的作品几乎都给人一种生活在19世纪头二十年的奇怪感觉，而且他的确有回到那个年代的倾向。写于19世纪50年代的《小杜丽》，描写的是19世纪20年代末的事情；《远大前程》（1861年）没有点明年份，但显然写的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好几项催生了现代社会的重大发明和发现——电报、后膛枪、橡胶、煤气、木浆纸——都是在狄更斯有生之年问世的，但他在书中却几乎没有提及。没有什么能比狄更斯在《小杜丽》中谈起多伊斯的“发明”时的含糊其辞更显古怪，狄更斯把它描写成极具独创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对他的国家和同胞极其重要”；多伊斯的“发明”也是书中重要的辅助纽带，但狄更斯却从没告诉我们这项“发明”是什么！另外，多伊斯的外貌在狄更斯典型的描写手法下也变得惟妙惟肖；他转动大拇指的方式很奇怪，是典型的工程师动作。自那之后，多伊斯就在人们的记忆中根深蒂固；但狄更斯照例是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外部事物上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的。

有人（比如说丁尼生）虽然缺乏机械方面的才能，但却能洞察机械的社会潜力。狄更斯没有这种头脑，他几乎对未来毫无意识。谈及人类进步时，他指的往往是道德进步——人们会不断进步；也许他永远不会承认，人类的进步会受到机械发展水平的制约。这是狄更斯与和他相似的现代作家H.G.威尔斯区别最大的地方。威尔斯视未来为重担，而狄更斯却缺乏科学思维，这两者都有害，只是方式不同。缺乏科学思维让狄更斯拥有积极态度难上加难。他敌视封建的、农业的过去，却又没有真正接触过工业化的现在。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未来（意味着科学、“进步”等），但他却几乎没有考虑过未来。因此，在抨击所见的一切事物时，狄更斯并没有明确的对比标准。我之前已经指出，他对现行教育制度提出了完全正确的批评，但除了让校长更善良以外，他终究没有提出任何方案。为什么他不指明学校本应该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他没有让儿子接受自己计划的教育，而是把他们送到公学接受希腊语填鸭呢？因为

他缺乏那方面的思考。他拥有永远正确的道德意识，却几乎没有求知欲。狄更斯对工作毫无概念，这的确使得19世纪显得离我们很远，也的确是狄更斯的重大缺陷。

除了勉强算是例外的大卫·科波菲尔（他不过是狄更斯本人），狄更斯的主人公中没有第二个对自己工作深感兴趣的人。他笔下的主人公之所以工作，是为了维持生计和迎娶女主角，而不是因为对特定事物怀有强烈的兴趣。比如，马丁·翟述伟对建筑师的工作并无热情，他做个医生或律师可能也没问题。总之，在典型的狄更斯小说里，最后一章总会出现带着一袋金子的解围人，让主人公免于继续挣扎。“这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其他一切我都不感兴趣。即便这意味着饿死，我也会这样做”，这种信念让不同性情的人变成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牧师、探险家和革命者。然而这个主题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几乎毫无踪影。众所周知，狄更斯本人工作起来就像奴隶一样，而且对工作信心满满，很少有小说家能够做到这样。但除了写小说（或许还有表演），似乎没有其他职业可以让他如此投入。就他对社会抱有的消极态度而言，这再自然不过。说到底，狄更斯赞赏的只是普通人的正派。科学索然无趣，机械残忍且丑陋（就像大象的脑袋）。做生意也只是庞得贝那种恶棍才会从事的职业。至于政治，留给泰特·巴纳克吧。狄更斯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目标只是迎娶女主角、安稳生活、不欠债、为人善良。你在生活中可以把这几件事做得更好。

或许，我们可以在此一窥狄更斯从未言明的故事背景。什么是他眼中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在马丁·翟述伟和叔叔言归于好时，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通过结婚得到大笔财富时，在约翰·哈曼因为博芬而致富时，他们都在做什么？

他们显然什么也没做。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用他妻子的钱同切尔以布兄弟一起投资，然后“成为腰缠万贯的成功商人”，但在他很快退居到德文郡时，我们可以说他并没有努力工作。斯诺德格拉斯夫妇“买下并经营了一个小农场，但更多的是为了打发时间，而不是盈利。”狄更斯的小说大多以这种精神结尾——有着几分春风得意的闲散。狄更斯之所以反对年轻人无所事事（赫德豪士、亨利·高恩、理查德·康斯坦，以及洗心革面之前的瑞博恩），是因为他们愤世嫉俗、品行不端，或者因为他们是别人的负担；但如果你“善良”且经济独立，那你就完全可以仅靠红利过上五十年。维持家庭生活总是足够的。毕竟，这是他那个时代的普遍看法。“优雅的富足”“足够的收入”“自力更生的绅士”或“生活优裕的

绅士”——正是这些字眼让人们了解18、19世纪中产阶级的奇怪、空虚的梦想。这是追求“完全闲散”的梦想。查尔斯·里德在《真金白银》（*Hard Cash*）结尾完美地表达了这种精神。《真金白银》中的阿尔弗雷德·哈笛是19世纪小说中典型的（公学风格）男主人公，他天赋异禀，里德将他描述为“天才”。他毕业于伊顿公学，后来成为牛津大学的学者，熟读绝大部分的希腊和拉丁经典著作，他能和职业拳击手抗衡，能在亨利镇的钻石单人双桨划艇比赛上夺冠。他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当然也在其中表现出了完美无缺的英雄气概。后来，他在二十五岁时继承遗产，娶了茱莉亚·多德，在利物浦郊外安顿下来，与岳父母同住：

多亏阿尔弗雷德，他们才一起生活在阿尔比恩别墅……啊，你这座幸福的小别墅！就像是人间天堂。然而有一天，你的四面围墙再也无法容纳所有快乐的居住者。茱莉亚给阿尔弗雷德生了个可爱的男孩；家里又请了两个保姆，别墅都快被挤爆了。两个月后，阿尔弗雷德和妻子搬到了邻近相距二十码的另一所别墅；这次迁居还有两个原因。和久别重逢后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上帝又赐给多德上校和太太一个孩子在他们膝下玩乐……

这就是维多利亚式的圆满结局——幸福的大家庭，三世或者四世同堂，像海床上的牡蛎那样挤在一起，繁衍生息。这种结局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暗含着一种舒适、安全、毫不费力的生活。这种生活不像乡绅韦斯顿的生活那样极端懒散。

这就是狄更斯的城市背景和他对粗鄙而尚武的生活层面不感兴趣的意义所在。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旦发了财并“安定下来”之后，不仅不去工作，甚至也不去骑马、打猎、射击、决斗、和女演员私奔、在赛马场输钱。他们只是待在家里，过着安逸体面的生活，最好还有过着同样生活的亲戚当邻居：

尼古拉斯在成为腰缠万贯的成功商人后，首先就是买下父亲的老宅。随着岁月流逝，他的身边逐渐多了一群可爱的孩子，因此也翻修和扩建了房子，但是他们没有拆除任何旧屋子，也没有拔掉任何老树，与过去有关联的一切都没有挪动或改变。

咫尺之遥便是一个因孩子们欢声笑语而生机勃勃的地儿。那里住着凯特……和少女时一样，依然真诚友善，还是那个天真的妹妹，依然热爱着身边的一切。

和上面引用自《真金白银》的片段一样，这段话也有着同样的小团体氛围。这显然是狄更斯的理想结局。《尼古拉斯·尼克尔贝》《马丁·翟述伟》《匹克威克外传》完美地做到了这点，他的几乎所有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这种理想结局。不过《艰难时世》和《远大前程》属于例外——后者确有“圆满结局”，但这个结局和小说的总体倾向相左，而且是应布尔沃-利顿[16]的要求才添加的。

那么，应该追求的理想似乎是：十万英镑、一座爬满常春藤的古朴老宅、一个有女人味儿的温柔妻子、一群孩子，以及不用工作。一切都安全、轻松、平静，尤其还充满了家的气息。马路那头长满青苔的教堂墓地里，埋葬着那些还未得到圆满结局就已然去世的挚爱之人。家里的仆人既封建又滑稽，孩子们在脚边咿呀学语，老朋友坐在火炉旁边叙旧，丰盛的餐宴一顿接一顿；此外，还有冰凉的潘趣酒和尼格斯酒、羽绒床加上暖床器、有猜字谜和捉迷藏游戏的圣诞晚会。然而，除了每年都有孩子降生以外，什么都没有发生。奇怪的是，这的确是一幅幸福的画面，或者说狄更斯有能力让它显得幸福。只要想到这番场景，他就会心满意足。仅仅这点就足以告诉人们，自狄更斯首部作品问世以来，一百多年已经过去了。没有哪个现代人能够把这种漫无目的的生活写得如此鲜活。

五

狄更斯的爱好者读到这里，大概都会生我的气吧。

我一直在从“寓意”的角度讨论狄更斯，几乎忽略了他的文学素养。但是每个作家，尤其是小说家，无论承认与否，都有他的“寓意”，即便作品中最琐碎的细节也会受到“寓意”的影响。所有艺术都是宣传。无论是狄更斯还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小说家，都不会否认这一点。然而，并非所有的宣传都是艺术。我在前面说过，狄更斯是属于那种值得窃取的作家。窃取狄更斯思想的有马克思主义者，有天主教徒，甚至还有保守党人。问题是，狄更斯有什么可窃取的？为什么大家都会关注狄更斯？为什么我要关注他？

这类问题永远无法轻易作答。通常，审美偏好要么无法解释，要么受到非审美动机的腐化，让人觉得文学批评全都是谎言。就狄更斯而

言，让事情复杂化的是他的名气。人们从小就被灌输“伟大作家”的作品，而他恰巧是其中之一。在那个年龄段，这种灌输会引起抗拒和反感，但日后却可能会显出另一种影响。例如，几乎每个人都暗中喜爱孩提时代熟记的爱国诗歌，如《英格兰的水手》（*Ye Mariners of England*）、《轻骑兵的冲锋》（*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等。人们喜欢的与其说是诗歌本身，不如说是它们所勾起的回忆。这种联想的力量在狄更斯身上同样起作用。或许大部分英国家庭里都摆放着一两本狄更斯的作品。许多孩子在识字之前就已经开始能认识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因为狄更斯还算幸运，能拥有不少插画家。幼时接受的事物不会遭受批判性的评价。想到这里，你就会想到狄更斯作品中糟糕愚蠢的东西——一成不变的“情节”、失败的角色、冗长乏味的章节、以无韵诗写成的段落，以及连篇的“悲悯”。然后我就会想，在我说喜欢狄更斯的时候，我是否只是在说我喜欢回忆童年？狄更斯是否只是出名而已？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狄更斯就是一位无法摆脱的名人。人们想起某位作家，甚至是他喜欢的作家的频率如何，这很难确定；但是我觉得，真正读过狄更斯作品的人，每周都会在各种场合想起狄更斯。无论你是否认同，他就在那里，像纳尔逊纪念碑[17]一样。有些场景或角色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脑海里，而你甚至都不会记得它们出自哪部小说。米考伯的信！证人席上的温克尔！甘普太太！维提特里太太和汤雷·斯纳芬爵士！托德格斯酒店（乔治·吉辛说过，当他经过伦敦大火纪念碑时，脑袋里想起的从来都不是伦敦大火[18]，而是托德格斯酒店）！利奥·亨特太太！斯奎尔斯！塞拉斯·韦格和沙俄的衰亡！米尔斯小姐和撒哈拉沙漠！伍普赛扮演哈姆雷特！杰里比太太！曼塔丽妮、杰瑞·克朗彻、巴基斯、潘波趣、特蕾西·杜普曼、斯金波、乔·葛吉瑞、佩克斯列夫——如此持续不断。这不只是一本本书，倒更像一个世界。而且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喜剧世界，因为人们还会记住他维多利亚式的病态、恋尸癖、暴力场景——赛克斯之死、库鲁克的自燃、死囚牢房里的费金、围着断头台织衣物的妇女。即使是对此漠不关心的人，这一切也会意想不到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杂耍戏院喜剧演员可以（至少最近可以）登上舞台，扮演米考伯或者甘普太太，并且很有把握观众能知道他扮演的是谁，尽管观众十有八九没有完整地读过一部狄更斯的作品。就连那些假装鄙视狄更斯的人，也会无意识地引用狄更斯的话。

从某种程度上说，狄更斯是位可以模仿的作家。真正的通俗文学——比如，“大象与城堡剧院”版的《理发师陶德》（*Sweeney Todd*）——对狄更斯的剽窃已经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然而，人们所模仿的，

只不过是狄更斯从以前的小说家那里借鉴并发展出的一种传统：对“性格”，也就是对怪癖的膜拜。人们无法模仿的是他丰富的创造力，不是角色创造力，更不是“情景”创造力，而是措辞和细节方面的创造力。狄更斯的写作有个显著且确凿的特点，那就是其中的不必要的细节。我在此举例加以说明，下面的故事并不特别有趣，但其中有个词就像指纹一样独特。在鲍勃·索耶的派对上，杰克·霍普金斯先生正在讲述孩子吞掉姐姐项链的故事：

第二天，孩子吞了两颗珠子；第三天，他又吞下三颗珠子。以此类推，他在一周里吞掉了整根项链，共计二十五颗珠子。孩子的姐姐是个勤奋女孩，很少花钱给自己置办华丽饰品。没了那串项链，她哭得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她四处找寻，但不用我说，她最后并没有找到项链。几天后，一家人正在吃晚饭——烤羊肩配土豆。孩子没饿，所以在房间里玩耍。房间里出现巨大的噪音，就像在下小冰雹似的。“儿子，别闹。”孩子的父亲说道。“我什么也没做啊。”孩子说。“好啦，不准再闹了。”父亲说。短暂的沉寂之后噪音又开始了，而且比之前还厉害。“小鬼，你要再不听话，”父亲说，“就给我马上上床睡觉去。”他摇晃小孩的身体，想让他乖乖听话，但却响起一阵大家闻所未闻的响声。“天啊！声音是从肚子里传出来的，”父亲说道，“他的哮喘病生错了地方！”“不是，爸爸，我没病，”孩子说着就哭了起来，“是项链，爸爸，我把项链给吞了。”父亲抱起小孩，跑去医院。孩子肚子里的珠子随着一路颠簸发出响声。人们抬头张望，低头四看，不知这怪异的声音是从哪儿来的。“他现在已经到医院了，”杰克·霍普金斯说，“他走路的时候声音特别响，他们怕他吵醒其他病人，不得不在他身上裹上一件守夜人的外套。”

总的来说，这个故事可能在19世纪的任何一份滑稽报刊上看到。但“烤羊肩配土豆”却明显是狄更斯的笔法，其他人不可能有这种措辞。这对故事的发展有什么帮助？答案是没有帮助。这种细节毫无必要，就像书页上华丽的花边。然而，正是这些花边渲染出了狄更斯那种独特的氛围。我们还会注意到，狄更斯讲故事的方式很费时间。举个有趣的例子，那就是《匹克威克外传》第四十四章里山姆·维勒讲的关于顽固病人的故事，因为原文太长，所以无法在此引述。因为狄更斯有意或无意地剽窃别人的作品，所以我们碰巧有了比较的标准。有位古希腊作家也讲过那个故事。我没法找到原文，但我在多年前上学时就读过这个故事，内容大致是：

有个色雷斯人因顽固而著称，他的医生警告他，要是再喝一壶酒就会小命不保。这个色雷斯人喝了一壶酒，随即从屋顶上跳下去摔死了。他说：“这样我就可以证明我不是喝葡萄酒喝死的。”

那位古希腊作家只用大约六行字便讲完了整个故事，而山姆·维勒却用了近一千字。在切入正题之前，他要先讲这个病人的服装、饮食、举止，甚至还要讲他读的报纸，以及医生所乘马车的特殊构造，这种构造掩盖了马车夫的裤子和外套不搭的事实。接着他还要讲述医生和病人的对话。“大夫，烤饼有益健康。”病人说。“先生，烤饼无益健康。”医生愤怒地说道。最后，原本的故事就被埋没在细枝末节之中。最典型的狄更斯文章都是这样。他的想象力如野草般淹没了一切。斯奎尔斯站起来同孩子说话，我们便听见他说博尔德尔的父亲还缺少两英镑十先令，以及莫布斯的继母因为听说莫布斯不吃肥肉而气得卧病在床，希望斯奎尔斯先生能够狠狠抽他一顿，让他知足一点。利奥·亨特太太写了一首题为《将逝之蛙》（*Expiring Frog*）的诗，书中还列出了整整两节。博芬喜欢假装守财奴，我们立刻就读到一些18世纪守财奴的无耻行径，读到诸如“贪婪鬼”霍普金斯和尊敬的布鲁贝里·琼斯之类的名字，还有“羊肉馅饼的故事”“粪堆中的珍宝”这种章节标题。而且，狄更斯对根本不存在的哈里斯太太的细节描写，比寻常小说中对三个角色的描写还多。例如，句子读到一半，我们就知道了有人看到哈里斯太太还在襁褓中的侄子在格林尼治集市上的一个瓶子里，一同出现的还有红眼女郎、普鲁士侏儒和活骷髅。乔·葛吉瑞描述了盗贼是如何闯进做玉米和种子生意的潘波趣家里——“他们拿走潘波趣的钱包和钱柜，喝了他的酒，吃了他的食物，还扇了他耳光，揪了他鼻子，把他绑在床柱上，然后揍了他一顿，在他的嘴里塞满开着花的草，让他叫不出声。”开着花的草——这显然又是狄更斯的笔法，而且其他任何小说家都只能写出这些暴行的一半。一切事物叠床架屋，细节和修饰层层叠叠。因为这种笔法过于华丽而反对的做法纯属徒劳——倒不如以这个理由反对婚礼蛋糕。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19世纪的其他作家，瑟蒂斯、巴勒姆、萨克雷，甚至是马里亚特，多少都有狄更斯那种过度修饰的风格，但程度都不及狄更斯。这些作家的魅力如今部分取决于时代特色，虽然马里亚特依旧被认可为“儿童作家”，虽然瑟蒂斯在狩猎者中还享有某种盛名，但阅读他们作品的恐怕多半都是书呆子。

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最成功的作品（不是最好的作品）是《匹克威克外传》《艰难时世》和《双城记》。《匹克威克外传》不是小说，《艰难时世》和《双城记》并不幽默。作为小说家，狄更斯天生丰富的

想象力极大地阻碍了他，因为他所无法抵挡的诙谐讽刺常常会在本该严肃的地方出现。《远大前程》的第一章中就有个典型的例子。逃犯马格维奇刚好在教堂墓地抓住了六岁大的皮普。从皮普的视角来看，这个场景一开始就足够恐怖。浑身是泥、脚上拖着锁链的囚犯马格维奇突然出现在坟墓之间，他抓住皮普，把他倒提起来，还抢走了他身上的钱。然后马格维奇开始恐吓皮普，让他去找食物和锉刀：

他抓着我的双臂，让我直挺挺地坐在墓碑顶上，接着对我说了番吓人的话：

“明天早上把锉刀和吃的带来，带到那边的古炮台给我。乖乖照做，不准告诉任何人，也不准让别人看出你看到过我这样的人或者其他什么人，这样我就可以饶你一命。如果你不照做，或者走漏风声，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也会把你的心肝掏出来烤着吃。不要以为就我一个人，和我一起的还有个年轻人，和他比起来，我可算得上是个天使。我说的话他全都能听见。他可有一套了，专门抓小孩挖心挖肝。想要躲开他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就算小孩子锁上门，躲到温暖的被窝里，或者藏到某个地方，用衣服蒙住头，觉得自己既舒服又安全，那个年轻人照样可以悄悄地爬到他面前，然后撕开他。我现在可是费尽千辛万苦让那个年轻人不伤害你，而且我发现要让那个家伙不挖你的心肝吃可是相当困难啊！你说现在怎么办呢？”

在这段话里，狄更斯就没有经受住诱惑。首先，亡命天涯又饥肠辘辘的逃犯不会那样说话。而且，尽管这段话显示了作者对儿童心理十分了解，但其实际用语和情节发展格格不入。这让马格维奇看起来有些像童话剧中的坏叔叔，或者如果从孩子角度来看，像个可怕的怪物。但在后文中，他既不是坏叔叔也不是怪物，而且情节所需的夸张谢意也因这段话而变得难以置信。和往常一样，狄更斯没能战胜自己的想象力。栩栩如生的细节描写实在太过精彩，不忍舍弃。在塑造比马格维奇更言行一致的角色时，狄更斯也容易倒在诱人的辞藻面前。例如，摩德斯通先生在每天早上给大卫·科波菲尔上完课后，都习惯出一道讨厌的算术题。题目开头总是这样：“假如我去干酪店买了四千块双料格洛斯特干酪，每块干酪四个半便士，那么我总共该付多少钱？”双层格洛斯特干酪，这又是典型的狄更斯式细节。但这种写法对摩德斯通来说过于人性化，他应该去买五千个钱匣子才对。这种细节只要出现，就会影响小说的整体性。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狄更斯显然是一位重视局部胜过整体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碎片和细节——建筑物破烂不堪，建

筑上的石像装饰却美轮美奂。他最拿手的，就是刻画前后行为矛盾的角色。

当然，人们很少因为狄更斯将角色写得前后矛盾而批评他。通常，人们批评他是因为他做了相反的事情。他想让角色成为“典型”，让每个角色都大致代表一种性格，都贴上便于分辨的标签。人们常常指责狄更斯“只是一位讽刺作家”，这种指责既过于公正，又有失公正。首先，他并未觉得自己是讽刺作家，而且他总是让那些本应完全静止的角色动了起来。斯奎尔斯、米考伯先生、莫切尔小姐[19]、韦格、斯金波、佩克斯列夫等许多角色，最后都在他们不该出现的“情节”中登场，做出难以置信的事。他们出场时是幻灯片，落幕时却融进了三流电影。有时候你可以明确指出哪句话打破了最初的幻觉。《大卫·科波菲尔》里就有这样的句子。在那场有名的晚宴（羊腿没烤熟那次）后，大卫正在送客。他在台阶上边拦住了特拉德：

“特拉德，”我说，“米考伯先生并没有恶意，可怜的家伙，但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什么都不会借给他。”

“亲爱的科波菲尔，”特拉德笑着说，“我没什么可借。”

“可是你有名声啊。”我说。

这段话在书中读起来略显违和，尽管这样的事迟早会发生。这个故事十分写实，而且大卫正在慢慢长大，最终他一定会认清米考伯先生的真实面目——四处乞讨的无赖。当然，狄更斯后来又被自己的感伤打败，米考伯因而得以洗心革面。但自那以后，不管狄更斯怎么努力，最初的那个米考伯却再也回不来了。一般说来，狄更斯笔下人物所卷入的“情节”并不十分可信，但至少能有接近现实的样子，而他们所属的世界却是个虚幻的世界，永无终结。然而，在此我们就能理解，“只是一位讽刺作家”的论调并非真正的责难。尽管狄更斯一直在努力成为其他类型的作家，却总被视为讽刺作家，这个事实或许最为明确地显示出了他的天赋。狄更斯塑造的那些畸形角色，尽管卷入了可能存在的情节剧里，但仍然作为畸形角色被人铭记。他们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极为生动，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无法将它磨灭，正如在童年时代认识的人，我们似乎总能记住他们的某种姿态，记住他们在做某件事情。斯奎尔斯太太总是在舀硫黄和糖蜜，古米治太太总是在低声哭泣，葛吉瑞太太总是抓着丈夫的脑袋往墙上撞，而杰里比太太总是在画传单，因而忽视了自己的孩子。她们都像是鼻烟盒盖上闪闪发亮的微型画像，永远定格在那

里，虚幻至极，让人难以置信。但不知何故，她们比那些严肃小说家努力创造出的角色更加可靠，更让人难以忘怀。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衡量，狄更斯也是一位极其做作的作家。正如拉斯金[20]所说，狄更斯“选择在舞台的光亮中间工作”。他笔下的人物甚至比斯摩莱特的人物更失真和单一。但写小说并没有规则，对于艺术品而言，只有一种考验值得关心——能否流传下去。由此看来，狄更斯的角色是成功的，哪怕记住这些角色的人们几乎不把他们视为人类。他们虽是怪物，但至少他们没有消失。

尽管如此，狄更斯在刻画怪物方面也有缺点，那就是他只能描写几种情绪。人类心智中的大片地方他从来不碰。他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诗意的情感，也没有真正的悲剧，甚至连性爱都不在他的书写范围之内。其实，他的作品并不像人们有时所宣称的那样没有性爱内容。就他写作的时代而言，他算得上是相当直率。但是，他的作品中丝毫没有《曼侬·莱斯科》（*Manon Lescaut*）、《萨朗波》（*Salammbo*）、《卡门》（*Carmen*）和《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中的那种情感。据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言，D.H.劳伦斯曾说巴尔扎克是“巨人般的侏儒”，而狄更斯则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如此。狄更斯完全不了解或不愿提及的领域相当多。除非通过相当迂回的方式，否则你不可能从狄更斯那里学到什么。话及此处，我立刻想起19世纪伟大的俄国小说家。为什么托尔斯泰的理解能力似乎比狄更斯强很多——为什么他似乎更能让你了解自己？不是因为他天赋更高，说到底也不是因为他更聪明，而是因为他写的都是成长中的人物，他们都在苦苦寻找自己的灵魂，而狄更斯笔下的人物都已经至臻完美。在我看来，较之于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狄更斯塑造的人物更常见和生动，但他们却像图画和家具，总是一成不变。你可以假想与皮埃尔·别祖霍夫对话，但却无法假想与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对话。这不仅仅是因为托尔斯泰更严肃——你也可以想象和很多喜剧角色交谈，比如布卢姆、佩居榭，甚至于威尔斯笔下的波利先生。还因为狄更斯笔下的人物没有精神生活，他们把该说的话说得无可挑剔，但你无法想象他们还能说别的什么。他们从不学习，从不思考。狄更斯塑造的人物中，最善于思考的或许是保罗·董贝，但他的思绪却是一摊糨糊。这是否意味着托尔斯泰的小说比狄更斯的小说更“好”？事实上，比较两者孰优孰劣非常荒谬。如果一定要比较托尔斯泰和狄更斯，我会说托尔斯泰的感染力从长远看来或许更为广泛，因为非英语文化的读者很难理解狄更斯的作品。另外，狄更斯能够影响普通人，托尔斯泰却不能。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可以跨越国境，而狄更斯的人物则可以被印在香烟卡上。你不必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正如你不必在香肠和玫瑰之间做出选

择一样。他们的意图几乎没有交集。

六

如果狄更斯只是一位讽刺作家，那么现在可能就不会有人记得他的名字，或者充其量只有少数作品能流传下来，就像《弗兰克·法雷》（*Frank Fairlegh*）、《韦尔当·格林冒险记》（*The Adventures of Mr.Verdant Green*）、《考德尔太太的枕边训导》（*Mrs.Caudle's Curtain Lectures*）那样，作为维多利亚风格的遗迹，就像是牡蛎和黑啤酒散发出的淡淡的宜人气息。狄更斯在《小杜丽》《艰难时世》等作品中摒弃了《匹克威克外传》中的风格，谁不会偶尔为此感到遗憾呢？人们总是要求畅销小说家反复写作同样的书，然而他们不知道，会两次写出同一本书的作家，其实连一本也写不出来。凡是有生气的作家，其写作生涯就像抛物线，有上升就必然有下落。乔伊斯起步于手法生硬的《都柏林人》（*Dubliners*），终于语言梦幻的《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而《尤利西斯》（*Ulysses*）和《青年艺术家的画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都是这条抛物线的一部分。狄更斯是道德家，觉得自己"有话要说"，这驱使他走入一种并非真正适合自己的艺术形式，但这种艺术形式却让我们记住了他。他总是在布道，这就是他创造力的终极奥秘。因为只有在乎，才能有所创作。斯奎尔斯和米考伯之类的人物，不可能出自于专门寻找逸闻趣事的雇佣文人。值得一笑的笑话总是包含着一种思想，而且这种思想通常具有颠覆性。狄更斯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引人发笑，是因为他反对权威，而权威总是人们嘲笑的对象。砸向他们的蛋糕从不嫌多。

虽然狄更斯的激进思想含糊至极，但是我们总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这就是道德家和政治家的区别所在。他没有建设性的建议，甚至也不能看清他所抨击的社会的本质，他只是在情感上觉得事情不对劲，最终能说的只是"行事规矩"。正如我上文所说，"行事规矩"并不总是像听上去那么肤浅。大多数革命家都是潜在的托利党人，因为他们以为只要改变社会形态就能万事大吉。只要社会形态得以改变——有时的确如此——他们就觉得不必改变其他事物。狄更斯没有这类粗俗思想。他的不满情绪模糊不清，也就说明了这种情绪会永远存在。他反对的不是某种制度，正如切斯特顿所说，他反对的是"人脸上的一种表情"。他的道德观大概是基督教徒的道德观，尽管他从小受到英国国教的熏陶，但他实际

上是个圣经-基督教徒，他在写遗嘱时就有意表明过这点。不论怎样，狄更斯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徒。他确实“有宗教信仰”，只是他的思想里并没有太多虔诚意义上的宗教[21]。说狄更斯是基督教徒，是因为他似乎本能地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反对压迫者。无论在何时何地，他都自然地站在弱势一方。照这样的逻辑，在弱势一方取得优势之后，狄更斯的立场也应该随之改变。事实上，他的确有这种倾向。比如，他原本憎恶天主教，但是在天主教徒遭到迫害时（《巴纳比·拉齐》），他却站到天主教徒这边。他对贵族阶层更是恨之入骨，但是在他们真正被推翻时（《双城记》中写革命的那几章），他却转而同情他们。只要偏离这种情感态度，他就会迷失方向。《大卫·科波菲尔》的结尾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读者便会觉得它有些不对劲。不对劲的地方在于，小说最后几章都弥漫着对成功的狂热崇拜，这种崇拜虽然微弱，但却显而易见。这是斯迈尔斯的信条，而非狄更斯的信条。书中那些吸引人的穷角色都不见了，米考伯发财了，希普入狱了——这些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甚至为了让位于艾格尼丝，朵拉也被杀死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朵拉看成狄更斯的妻子，把艾格尼丝看成朵拉的妹妹，但关键是狄更斯已经“变得体面”，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本性。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中艾格尼丝最不招人喜欢，她就是维多利亚爱情故事中真正的无腿天使，几乎和萨克雷笔下的劳拉一样讨厌。

成年人在读过狄更斯的作品后，都能感觉到他的缺点，但也能感受到他与生俱来的广阔胸襟。这种胸襟好比船锚，几乎总能让狄更斯坚守自己的位置。这或许就是他深受喜爱的主要原因。狄更斯那种和蔼的反律法主义是西方大众文化的标志之一。在民间故事和讽刺歌谣中，在诸如米老鼠和大力水手（都是巨人捕手杰克的变形）这种虚构角色中，在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抗议（从未奏效，但并不全是伪善）中，在富人开车轧死穷人后让陪审团判决大量赔偿金的本能中，你都可以看见狄更斯那种和蔼的反律法主义。那是一种你总是站在受压迫者一边，总是支持弱者、反对强者的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感已经过时五十年了。普通人仍旧活在狄更斯的精神世界里，但现代知识分子几乎都已投靠某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从精神领域来看，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从未进入到“现实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世界。他们也许会在不久后进入这个世界，到那时狄更斯就会成为明日黄花。但在他那个年代和我们这个时代里，他之所以一直都深受大众喜欢，主要是因为他能用滑稽、简明并因而令人难忘的形式表现出普通人与生俱来的正派。重要的是，由此看来，形形色色的人们都可以被称为“普通人”。像英国这种国家，尽管有其阶级结构，但也的确存在着某种文化

一致性。纵观整个基督教时代，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世界就弥漫着自由和平等的思想。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思想，但却感染了社会各阶层。骇人听闻的不公、残忍、谎言和势利虽然随处可见，但很少有人像古罗马奴隶主那样无动于衷地看待这些行径。即便是百万富翁也会隐约感到内疚，就像偷吃了羊腿的狗一样。不论实际行动如何，几乎每个人都会在情感上响应人类互爱的信念。狄更斯提出的准则，人们在过去相信，总的来说现在也仍然相信，即使是与之背道而行的人也深信不疑。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得到劳动人民的青睐（与他同等声望的小说家身上就没有这种事发生），而他本人也得以安葬在西敏寺。

读到个性强烈的作品，你会觉得看到了书页背后的那张脸庞。它不一定是作者的真实面目。在阅读斯威夫特、笛福、菲尔丁、司汤达、萨克雷、福楼拜时，我就有这种感觉，尽管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些人的相貌，而且我也不想知道。你看见的是作者应有的面貌。就狄更斯而言，我看见的那张脸庞，并不完全是照片中的狄更斯，尽管两者十分相似。我看到的是一位年届四十的男人的脸庞，留着小胡子，脸色红润。他正在大笑，笑声里又带着一丝愤怒，但没有喜悦，也没有恶意。这张脸庞属于一个不断与某种东西斗争的男人，但他的斗争光明磊落，毫不畏惧。这张脸庞属于一个愤怒的男人——换句话说，属于一个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属于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憎恨那些争夺我们灵魂、散发着恶臭且狭隘的正统思想，同时也被这些正统思想所憎恨。

---

[1] 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1869-1939），列宁的妻子和遗孀，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政治家，1929年至1939年任苏联教育部副部长。

[2] 贝克霍夫·罗伯茨（Bechhofer Roberts，1894-1949），英国作家和记者。

[3] 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英国小说家，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

[4]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辉格党政治家。

[5] 《红花侠》（*The Scarlet Pimpernel*），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艾玛·奥希兹（Emma Orczy，1865-1947）所著的系列小说，故事背景为雅各宾专政。

[6] 兜圈子部（The Circumlocution Office），指以因循推诿和手续繁多为能事的政府机关，典出狄更斯小说《小杜丽》。

[7] 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苏格兰作家、政府改革家，提倡依靠个人努力取得成功。

[8] 英石，英制质量单位，1英石约为14磅。

[9] 约翰·福斯特（John Forster，1812-1876），英国传记作家、批评家，狄更斯的好友，著有《狄更斯传》（*Life of Charles Dickens*）。

[10] 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诗人、小说家。

[11] 马伏里奥，莎士比亚戏剧《第十二夜》中的人物。

[12] 托比亚斯·乔治·斯摩莱特（Tobias George Smollett，1721-1771），苏格兰诗人、作家，以创作恶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闻名，其作品对狄更斯有一定影响。

[13] 《奥利农庄》（*Orley Farm*），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小说。

[14] 约翰·里奇（John Leech，1817-1864），英国插画家，19世纪50年代曾为瑟蒂斯的小说绘制了许多描绘运动场景的插画。

[15] 罗伯特·史密斯·瑟蒂斯（Robert Smith Surtees，1805-1864），英国编辑、小说家、运动作家。

[16] 爱德华·布尔沃- 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1803 - 187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和政客。

[17] 纳尔逊纪念碑（Nelson’s Column），为纪念死于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的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而兴建，位于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高51.59米。

[18] 伦敦大火（Great Fire of London），英国伦敦历史上最严重的火灾，发生于1666年9月2日至5日，烧毁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在内的无数建筑物。

[19] 狄更斯之所以将莫切尔小姐刻画成某类女主人公，是因为其原型在读了小说前几章后深受打击。他原本打算让她成为坏角色，但这样一个角色做出的任何行为看上去都会不协调。（作者原注）

[20]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主要的艺术评论家之一，其写作题材十分广泛，写作风格和体裁多变，代表作有《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

[21] 狄更斯在1868年给小儿子写的信中说道：“你要记住，你在家从未受到宗教仪式或礼节的烦扰。在我的孩子还未长大，对这些东西还无自己的观点时，我不想拿这些东西去烦扰他们。因此，你们能更好地理解，我为什么要十分郑重地让你们认识基督教的真理和美。这种真理和美来自基督本身，虚心且虔诚地尊重，你就不会犯下大错……切勿荒废有益心智的早晚祷告。我从未荒废过，所以我知道它所带来的宽慰。”（作者原注）

查尔斯·里德

查尔斯·里德的书出了廉价版，我们可以说他仍然还有追随者，但是主动阅读他作品的人却很少见到。对大多数人来说，他的名字至多只会唤起一种模糊的记忆，一种将《患难与忠诚》（*The Cloister and the Hearth*）作为学校假期作业来“做”的记忆。人们记得他这本特别的书，是他的运气不好，就像人们记住马克·吐温主要是因为被拍成电影的《误闯亚瑟王宫》（*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里德写了几本枯燥无味的书，《患难与忠诚》便是其中之一。除《万事通》（*A Jack of All Trades*）和《小偷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 Thief*）等优秀短篇故事之外，他还写过三本小说，而且我敢说，这三本小说会比梅瑞狄斯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所有作品都流传得更久远。

里德的作品有何吸引力？说到底还是和奥斯汀·弗里曼[1]的侦探小说或者海军少校古尔德[2]的探险故事一样——无用知识的吸引力。我们可以把里德称作百事通。他知道很多互不相关的信息，并利用生动的叙事天赋，将这些信息塞进可以被称为小说的书中。如果你对日期、清单、目录、具体细节情有独钟，喜欢阅读关于对过程、旧货店橱窗和旧《贸易与市场报》（*Exchange and Mart*）的描述，想准确地知道中世纪石弩的工作原理或19世纪40年代监狱牢房里的物品，那么你定能从里德的作品中获得乐趣。当然，他本人不会这么看自己的作品。他对自己的精确引以为荣，而且作品也大多由剪报汇编而来，但与他自己设定的“目的”相比，他收集的奇特信息却处于次要位置，因为他是一位零敲碎打的社会改革者，猛烈抨击过放血疗法、踏车惩罚、私人收容所、教士独身主义、束身等多种恶行。

我最喜欢他的《卑鄙行径》（*Foul Play*），这本书并未特别抨击任何事情。和大多数19世纪的小说一样，它太过复杂，所以很难总结，但它主要讲的是年轻牧师罗伯特·彭福德的故事。彭福德被冤判伪造罪，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后来伪装潜逃，与女主角一起遭遇海难后被困荒岛。这种故事自然是里德的拿手好戏。他是有史以来最适合写荒岛故事的人。荒岛故事良莠不齐，但紧扣求生细节的荒岛故事并不拙劣。列出海难幸存者的物品清单，或许是小说中最为成功之处，甚至胜于审判场

面。大概在三十年前，我读过R.M.巴兰坦[3]的《珊瑚岛》（*Coral Island*），至今还记得书中三个主角所拥有的物品——一支望远镜、一根六码长的鞭绳、一把袖珍小刀、一个铜环、一个铁箍。即使是《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那样整体上乏味到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第二部的书，在描述鲁滨孙费力做桌子和陶器以及种小麦时也显得很有趣。但是，里德在创作荒岛题材方面是专家，至少他对当时的地理教科书了如指掌。他还是那种置身荒岛也能从容自如的人。他决不会像鲁滨孙那样，被发酵面包之类的简单问题难住。而且和巴兰坦不同，他知道来自文明世界的人无法钻木取火。

和里德塑造的多数主角一样，《卑鄙行径》主角也是个超人。他是英雄、圣人、学者、绅士、田径运动员、拳击手、领航员、生理学家、植物学家、铁匠以及木匠的合体，集合了里德想象里能从英国大学中取得的所有才能。这个优秀的牧师自然能在一两个月内就让荒岛运转得像伦敦西区的酒店一样。甚至在到达荒岛前，几位幸存者在小船里快要渴死时，他就展现出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一个罐子、一个热水瓶和一截管子做成了蒸馏器。不过，最为成功的还是他逃离荒岛的办法。他被悬赏通缉，应该很乐意留在荒岛上，但是不知道他是囚犯的女主角海伦·洛尔斯顿自然急于逃离荒岛。她让罗伯特发挥“聪明才智”离开荒岛。第一个难题当然是确定荒岛的准确位置。幸好海伦戴着手表，手表上仍然是悉尼时间。罗伯特在地上插一根棍子，然后通过观察影子确定当地正午时间，接着就能轻松算出当地经度，因为像他这样有才的人自然知道悉尼的经度。通过观察植物特征，他当然也能确定当地纬度，而且偏差也只有一两度。第二个难题是如何向外界送信。思考过后，他用海豹胆囊制成几张仿羊皮纸，用胭脂虫制成墨水，在纸上写下了一连串信息。他注意到候鸟会到岛上歇脚，而且因为野鸭迟早都有被射杀的可能，所以他决定利用野鸭送信。他使用印度人常用的方法抓来几只野鸭，把求救信绑在鸭脚上放飞。最终，其中一只野鸭飞上了一艘船，他们二人也因此获救。但即使到了这一步，故事也还没有进展到一半。随后的故事情节错综复杂，在各种阴谋、反阴谋、胜利和灾难之后，罗伯特最终洗清了罪名，与海伦结为了夫妻。

在《卑鄙行径》《真金白银》《亡羊补牢犹未晚》这三本里德最好的作品中，作者并没有只关注技术性的细节。他的描写能力，特别是描写暴力情节的能力，也十分吸引读者。写连载故事时，他的情节设计也十分出色。单纯从他的小说家身份来说，他并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因为他对人物的塑造和可能性毫无概念，但是他却另有优势——即使是自

己故事中最为荒诞的细节，他也深信不疑。他按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来描写生活，而且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于生活的理解也和他一样：生活就是一系列精彩的情节剧，获胜的关键往往是美德。仍然值得阅读的19世纪小说家当中，恐怕只有他一人与时代合拍。他不落俗套，自有“目的”，积极揭露社会弊端，但从不提出任何根本性的批判。除一些表面上的邪恶之外，他不认为贪婪的社会有什么问题。在那个社会里，金钱等同于美德，富人虚伪，牧师信奉国家全能。在《卑鄙行径》开篇介绍罗伯特·彭福德时，查尔斯·里德说罗伯特是学者，是板球运动员，然后才近乎随意地说他是牧师。这点便能让我们最好地估量查尔斯·里德。

这并不是说里德的社会正义感不对。从几个细小方面来看，他或许还有助于教育舆论。他在《亡羊补牢犹未晚》中对于监狱系统的抨击，至今（或者说直到几年前）还有借鉴意义。据说他的医学理论也很超前。他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不明白早期的铁路时代，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特殊价值体系，都是无法永远维持下去的。想到他和温伍德·里德[4]是兄弟时，就有点让人吃惊了。无论温伍德·里德的《人类殉难记》（*The Martyrdom of Man*）在现在看来有多么草率和不理性，它都是一本视野宽阔到让人震惊的作品，而且它或许还是现今流行的“纲要”类作品的滥觞，只是还未得到公认而已。查尔斯·里德或许可以写一本颅相学纲要、橱柜制作纲要或鲸鱼习性纲要，但是他不可能写人类历史纲要。他只是一位正义感稍强于多数人的中产阶级绅士，是一位碰巧喜欢大众科学而不喜欢经典著作的学者。正因如此，他才是写作“逃生”类小说的最好作家。例如，《卑鄙行径》和《真金白银》就是两本好书，可以送给忍受着阵地战痛苦的士兵。它们的内容中没有问题，也没有真诚的“寓意”，只有在极端限制下发挥作用的天才的吸引力，而且能像下象棋或拼图那样让人完全脱离现实生活。

---

[1] 奥斯汀·弗里曼（Austin Freeman，1862-1943），英国侦探小说家，倒叙推理小说的鼻祖。

[2] 鲁伯特·古尔德（Rupert Thomas Gould，1890-1948），英国皇家海军少校，因其对钟表学的贡献而出名。

[3] R.M.巴兰坦（R.M.Ballantyne，1825-1894），苏格兰青少年小说作家，曾写作过数百本书籍。

[4] 温伍德·里德（Winwood Reade，1838-1875），英国历史学家、探险家和哲学家。

在鲸腹中[1]

一

当亨利·米勒[2]的小说《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于1935年问世时，迎接它的是颇为谨慎的赞赏，这显然是害怕流露出对情色描写的欣赏。赞赏它的人包括T.S.艾略特、赫伯特·里德[3]、奥尔德斯·赫胥黎、约翰·多斯·帕索斯[4]和埃兹拉·庞德——总的看来，他们在当时都算不上名家。这本书的题材，一定程度上说还有它的精神氛围，其实都属于20世纪20年代，而不是20世纪30年代。

《北回归线》是一部以第一人称写的小说，也可以说是小说形式的自传，这两种看法见仁见智。米勒本人坚持说它是纯粹的自传，但却用了小说式的节奏和叙事手法。故事讲述的是身在巴黎的美国人，情节却不落俗套，因为书中的美国人恰好都是穷人。在美元供应充足、法郎汇率较低的繁荣年代，大批艺术家、作家、学生、艺术爱好者、观光客、浪荡子和闲人涌入巴黎。据估计，在这个城市的有些街区，所谓的艺术家比有正经工作的人还多。20世纪20年代末的巴黎有着多达三万名画家，其中大部分都是滥竽充数。市民对艺术家已经见怪不怪，嗓门粗大、身穿灯芯绒马裤的女同性恋者和穿着古希腊或中世纪风格服装的年轻人在大街上根本无人注意；塞纳河畔的巴黎圣母院旁，摆满速写凳的地上几乎无立足之地。那是黑马辈出和怀才不遇的时代，人人都念叨着“有朝一日待我崛起”。可到头来，没人能“崛起”，萧条就像再次来袭的冰期那样降临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成群艺术家消失了；就在十年前，蒙帕纳斯的那些大咖啡馆里还总是充斥着装腔作势之人，喧嚣直至凌晨，如今却已变成连幽灵都不愿停留的幽暗坟墓。米勒所写的——包括温德汉姆·刘易斯[5]的《塔尔》（*Tarr*）在内的其他小说也曾写过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但他描写的只是这个世界的底层，是一群处于社会边缘、由真正的艺术家和真正的无赖组成的流氓无产者，正是这种结合才让他们在萧条中活了下来。那里有被埋没的天才，有永远“即将”写出让普鲁斯特黯然失色的小说的狂人，但只有在偶尔不用为下一顿饭操心的时候，他们才是真正的天才。小说讲的大部分都是工人旅馆中爬满臭

虫的房间、斗殴、酗酒、廉价妓院、俄国难民、乞讨、诈骗和临时短工的故事。还有外国人眼中巴黎贫民窟的气氛——卵石小巷、酸臭的垃圾、有着油腻的白铁柜台和破旧砖砌地面的小餐馆、塞纳河的碧波、共和国卫队的蓝色制服、破碎的铁尿槽、地铁站特有的甜腻气味、揉碎的香烟、卢森堡花园里的鸽子——一切尽在书中，至少你可以感觉到它们。

表面看来，这些素材让人完全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北回归线》出版之时，意大利人正向阿比西尼亚进军，希特勒的集中营已然人满为患。罗马、莫斯科和柏林是全球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时刻，一本关于在拉丁区讨酒喝的潦倒美国人的小说，似乎不会有什么突出价值。小说家当然没有直接书写当代历史的义务，但一般来说，完全无视重大公众事件的小说家不是混子就是白痴。如果光看《北回归线》的题材，大部分人恐怕都会觉得它只是20世纪20年代玩世不恭的流毒而已。事实上，每位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立刻发现它不属此类，而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有多好，为什么好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最好还是从《北回归线》给我留下的印象说起。

初次翻开《北回归线》，看到满眼的猥亵之词，我的第一反应便是拒绝受它影响。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有同样的反应。但一段时间过后，全书的氛围和无数的细节似乎奇怪地徘徊在我的记忆中。一年后，米勒的第二本书《黑色的春天》（*Black Spring*）出版了。现在感觉如何？《北回归线》在我心中比初读时鲜明许多。《黑色的春天》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它比不上《北回归线》，它事实上也不具备后者的整体感。又过了一年，《黑色的春天》里的很多片段也在我心中扎下了根。显然，它们都属于读毕之后让人回味的书——如俗话所说“创造了一个属于它们自己的世界”。能做到这一点的不一定就是好书，可能是《业余神偷拉菲兹》《福尔摩斯探案集》（*Sherlock Holmes*）那种“好的坏书”，也可能是《呼啸山庄》或《绿色百叶窗之屋》（*The House with the Green Shutters*）那样荒谬病态的书。但时不时也有些小说通过展现常见事物，而不是奇人异事来展开一个新世界。比如，《尤利西斯》的真正出色之处就在于素材的平凡。《尤利西斯》的价值当然远不止于此，因为乔伊斯既有几分诗人气质，又是个老成的学问家，但他真正的成就却在于让寻常事物落到笔下。他敢于——这对勇气的要求丝毫不亚于技巧——暴露内心深处的愚蠢，并由此发现了一个就在大家眼皮底下的美国。你以为这个世界上满是那些天生就无法言传的东西，但有人却成功传达了其中之义。人们生活在孤独之中，但这种孤独至少借此得以暂时

打破。在阅读《尤利西斯》的某些片段时，你会觉得乔伊斯和你的思想合为一体；觉得他虽然从未听过你的名字，却对你无所不知；觉得和他共同置身于时空之外的某个世界。尽管亨利·米勒在其他方面与乔伊斯并不相像，但这一点上却有所相通。但并非处处如此，因为他的作品良莠不齐。有时候，尤其是在《黑色的春天》里，他常常废话连篇或陷入拥挤的超现实主义者的世界里。但把他的书读上五页十页，你会觉得异常轻松，这种感觉与其说是来自你对小说的理解，不如说是更多地来自被理解。“他理解我的一切，”你会觉得，“这本书是他特意为我写的。”仿佛你能听到有个声音与你对话，一个友好的美国人的声音，没有谎言、没有说教，只有“我们都是相似的”这个隐含的假定。从那一刻起，你就摆脱了谎言与片面，摆脱了普通小说、甚至一些尚且优秀的小说中木偶般的僵化刻板，进而开始讨论人类的实际经历。

但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人？米勒写的是街上的普通人，但遗憾的是，这条街上的人竟然都是兄弟。这是对远离故土的惩罚。这意味着把你的根移到更薄的土壤里。也许背井离乡对小说家的伤害要比对画家甚至诗人更大，因为这会让他脱离故乡的劳动生活，他的视野被局限在街道、咖啡馆、教堂、妓院和画室里。总之，你会在米勒的书中看到侨居国外的人，看到他们饮酒、交谈、冥思、通奸，但却看不到工作、结婚、生儿育女的人；这是个遗憾，因为他本应在描述一类活动的同时也抓住另一类。《黑色的春天》里有一段关于纽约的精彩倒叙，那是欧·亨利时代爱尔兰人泛滥的纽约，但最出色的还是在巴黎的场景，虽然作者承认咖啡馆里的醉鬼和流浪汉对社会毫无用处，但那种角色感和纯熟的技巧在近来任何一部小说中都不曾出现过。所有的一切不但可信，而且完全为人们所熟悉；你会觉得他们的所有奇遇都像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他们的奇遇本身并不怎么出奇。亨利和一个忧郁的印度学生一起找了份工作，当一场连厕所都冻住了的寒潮来袭时，他在一所糟糕的法语学校里又找了一份工作，接下来又和他的朋友柯林斯船长一起在勒阿弗尔豪饮，去有漂亮黑人姑娘的妓院厮混，和他的朋友范·诺顿交谈，诺顿是个小说家，构思出了一部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却从没能让自己下笔写作。他的朋友卡尔原本快要饿死，却偶遇一位想嫁给他的有钱寡妇。在哈姆莱特式的冗长对话中，卡尔试图确定挨饿和与老妇上床哪个更糟。他无比细致地描述了拜访那位寡妇的经历，自己如何穿着最好的衣服去酒店，如何在进门之前忘了小解，整个晚上因此变成不断升级的痛苦折磨云云。到头来，一切都是假的，那个寡妇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只是卡尔为了让自己显得重要而臆想出来的。全书都是这种风格。那么这些鸡毛蒜皮的琐碎细节为何会如此引人入胜？这只是因为读

者对全书的气氛都极为熟悉，因为你总会觉得这些事情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有人选择了放弃普通小说中的高贵语言，把内心中的权力政治拖到了明处。对米勒而言，与其说这是一个探索内心活动机制的问题，不如说是在坦言日常事务与日常情绪。因为事实上，大部分普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的言行举止，恰恰与书中的描写是一样的。《北回归线》中人物冷淡粗鄙的对话方式在小说里非常少见，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极为平常；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人们这样对话，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粗鄙。值得注意的是，《北回归线》并非出自年轻人之手。米勒在这本书出版时已年逾四旬，尽管他在那之后还写了三四本别的书，但这本处女作显然经过了多年酝酿。它属于那种在贫穷和无名中渐渐成熟起来的书，作者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因此才能耐心等待。书中的文字令人惊喜，《黑色的春天》中有些地方甚至更好。很遗憾，因为书中几乎随处可见的污言秽语，我在这里不能加以引用。但手拿一本《北回归线》，一本《黑色的春天》，重点阅读它们的前一百页。你就会知道，即使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为英语散文做些什么。在这两本书中，英语被当成一种口头语言毫无顾忌地使用，也就是说毫不顾忌修辞，毫不忌讳独特或诗意的用词。在十年流放之后，形容词终于回归了。这是一种奔涌不息、势将迸发的文字，有着自己的节奏，与当下流行的平淡谨慎的宣言和小餐馆里的土语大相径庭。

当《北回归线》这样的书问世时，人们自然会首先注意到它的淫秽之处。鉴于我们当前所谓的高雅文学，要客观公正地去对待这样一本不宜刊印的书实属不易。人们要么觉得震惊恶心，要么感到一种病态的刺激，要么决定不为所动。最后，这种反应也许最常见，因此，不宜刊印的书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注意。常常有人会说，没有比写淫书更简单的了，人们写这样的书只是为了成为谈资和挣钱等。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被警方和法庭认定为淫秽书籍的作品显然少之又少。假如写些污言秽语就能轻松挣钱，干这行的人也许会多得多。但是，因为“淫秽”书籍并不常见，它们很容易被毫无道理地混为一谈。有人泛泛地把《北回归线》和《尤利西斯》《长夜行》[6]联系在一起，但它和这两本书并不怎么相似。米勒和乔伊斯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愿意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无聊肮脏。抛开技巧上的差异，《尤利西斯》中的葬礼场景完全可以融入《北回归线》，整个章节都是某种自白，暴露出了人们内心可怕的冷漠。但两部小说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作为小说，《北回归线》远不如《尤利西斯》。乔伊斯是艺术家，某种意义上说，米勒不是，也许也不愿成为艺术家，而乔伊斯无论怎么说，都做着更多的尝试。他探索着不同层面的意识、梦境、幻想（“古铜伴金色”一章）、醉态等，让它们结

合成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模式，如同维多利亚式的“情节”。米勒却只是一个谈论生活的冷峻的人，一个有着智识上的勇气和文字天赋的普通美国商人。他看似十分符合人们对美国商人的印象，这一点也许很重要。将《北回归线》和《长夜行》相比更加离谱。两本书都用词淫秽，都带有自传色彩，但相同点仅此而已。《长夜行》有其目的，它的目的是抗议现代生活的——其实，是生活本身——恐怖和无意义。它是难耐厌恶的呐喊，是来自污水池的声音。《北回归线》则几乎完全相反。它十分独特，甚至看上去几近反常，但它的作者却是快乐的。尽管程度稍弱，《黑色的春天》也同样如此，因为很多地方带着怀旧色彩。饥饿、流浪、污垢、失败、露宿街头、与移民官的争执、为了一点钱而无尽挣扎，在过了多年无产者的生活后，米勒发现自己乐在其中。生活中让赛利纳恐惧的地方却恰恰吸引着他。他非但不去反抗，反而选择了接受。正是“接受”一词，让人想起了一个真正和他相似的人，另一个美国人——沃尔特·惠特曼。

若是把惠特曼放在20世纪30年代，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假如惠特曼本人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写出和《草叶集》（*Leaves of Grass*）哪怕还有一丝相似的作品。毕竟，他所说的就是“我接受”，而当时和现在的接受天差地别。惠特曼写作的年代正是美国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但更重要的是，他所在的那个国家有真正的自由。他一直讲的民主、平等和同志之谊并非遥远的理想，而是他眼前的现实。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们觉得自己是自由且平等的，他们也确实曾是自由且平等的，而且是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外最自由、最平等的。当时也有贫困，甚至还有阶级差别，但除了黑人之外，没有固化的底层阶级。人人心中都有一种核心信念，知道自己不用逢迎他人，就能挣得体面的生活。当你读到马克·吐温笔下的密西西比河上的船工和领航员，或布雷特·哈特[7]笔下的西部金矿工人时，他们看起来比石器时代的食人族更遥远。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是自由的人。对东部各州平静、驯良的美国——属于《小妇人》（*Little Women*）、《海伦的孩子》（*Helen’s Babies*）、《从班戈出发》（*Riding down from Bangor*）的美国——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你能切身感受到生活的轻松无忧。这正是惠特曼所赞美的，尽管他的赞美其实并不高明，他属于那种告诉你应该感受到什么，而不是让你自己去感受的作家。也许，就他的信仰来说，他是幸运的，他去世太早，没能见到美国人的生活随着大规模工业的兴起和对廉价移民劳动力的剥削而日益堕落。

读过米勒的人都会发现，他的观念同惠特曼非常接近。《北回归

线》的结尾颇具惠特曼之风，在纵欲、诈骗、斗殴、酗酒和愚行之后，他只是颇为神秘地对现状照单全收，坐看塞纳河水流过。唯一的问题是，他接受的到底是什么？首先，不是美国，而是欧洲的古老骨堆，在这片土地上曾有无数人死去。其次，不是扩张和自由的时代，而是恐惧、暴政和严密管制的时代。在当下这样的时代，说出“我接受”就等于说你接受了集中营、橡胶警棍、希特勒、斯大林、炸弹、飞机、罐头食品、机关枪、暴动、清洗、标语、贝杜皮带、防毒面具、潜艇、间谍、内奸、媒体审查、秘密监禁、阿司匹林、好莱坞电影和政治谋杀。当然，不只是这些，不过它们尽在其中。这基本上就是亨利·米勒的态度。但也不是处处如此，因为他也会不时显露出那种颇为常见的文学怀旧情绪。《黑色的春天》的前半部分里，有一大段歌颂中世纪的文字，作为散文来看也许算得上是近年来最优秀的篇章之一，但其中的观点却和切斯特顿差别不大。在《马克斯与白细胞》（*Max and the White Phagocytes*）中，米勒从一个厌恶工业主义的文人的普通视角，抨击了美国现代文明（谷类早餐、玻璃纸包装等）。但他总的观点是“让我们全盘接受吧”，因此才有对污秽和生活的肮脏一面看似痴迷的表现。只是看似而已，因为事实上，恐怖在日常生活中的比重，要比小说作者们通常愿意承认的多得多。惠特曼本人“接受”了许多同时代作家难以启齿的东西。因为他所写的不仅仅是草原，他也在城市里游荡，观察自杀者破碎的头骨和“自渎者灰暗的病容”等。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至少就西欧而言，还不如惠特曼写作的时代健康和充满希望。与惠特曼不同，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萎缩的世界。“民主的前景”被铁丝网终结。创造与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少，对不停摇摆的摇篮关注得越来越少，对一直在熬煮的茶壶却关注得越来越多。接受文明实际上意味着接受腐坏。这种接受已经不再是奋发的态度，而是消极被动，甚至可以说是“颓废”的姿态，如果“颓废”这个词真有什么意义的话。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被动地体验生活，米勒才会比那些更有目的性的作家更能接近普通人，因为普通人也是被动的。在小圈子里（家庭生活，也许还有工会和地方政治活动），他觉得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但面对大事，他就像在风暴面前一样无助。他不但不去努力改变未来，反而躺着等待万事降临。过去十年来，文学越来越深地陷入政治，因此留给普通人的空间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最少的。比较有关西班牙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我们就能看出主流文学态度的变化。描写西班牙内战的书，至少就那些用英语写的作品而言，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们令人震惊的枯燥与拙劣。但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这些书，不论左翼还是右翼的，都是由那些过度自信、想告诉你应该思考什么的

各党成员从政治角度出发写成的，而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都是由普通士兵或下级军官们写的，他们甚至根本不会去假装自己能够理解那一切。《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火》（*Le Feu*）、《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英雄之死》（*Death of a Hero*）、《告别往事》（*Good-Bye to All That*）、《一个步兵军官的回忆录》（*Memoirs of an Infantry Officer*）和《索姆河上的中尉》（*A Subaltern on the Somme*）的作者都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宣传干将。他们事实上是在说："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天知道。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但这还是更接近于米勒的观点，而不是如今流行的全能全知，尽管米勒写的并不是战争，从整体看来也不全是在写不幸。《支持者》（*The Booster*）这本曾由米勒兼职编辑的短命期刊，曾在广告中标榜自己"非政治、不说教、无进步、不合作、无道德、非文学、不调和、非当代"，而米勒本人的作品也大致可以用这些词来形容。他的作品是来自大众、社会底层、三等车厢的声音，是来自非政治、与道德无关、消极被动的普通人的声音。

我只是在很笼统地使用"普通人"这个词，我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普通人"存在，而现在却有人否认这一点。我并不是说米勒笔下的人物是社会中的大多数，更没有说他描写的是无产者，还没有英美小说家认真做过完全描写无产者这样的尝试。此外，从《北回归线》当中人物的闲散、不堪与或多或少的"艺术气质"来看，他们远远称不上普通。前面说过，这很遗憾，但却是侨居海外不可避免的结果。米勒笔下的"普通人"既不是体力劳动者，也不是郊区大宅的主人，而是被遗弃的人，是落魄者，是冒险家，是丧失了根基与金钱的美国知识分子。尽管如此，这种人的经历也会和普通人有所重叠。米勒把颇为有限的素材发挥到了极致，因为他敢于认同那些素材。普通人——"平凡的俗人"——被赋予了说话的能力，就像巴兰的驴[8]一样。

不难看出，这些东西已经落伍，或者说至少已经不再流行。平凡的俗人已经不再流行。对性和内心真实的执著已经不再流行。身在巴黎的美国人不再流行。像《北回归线》这样的书，在这种时候问世，要么无聊造作，要么与众不同，我认为读过它的大部分人都会同意它不属前者。这种逃离当前文学风尚的做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探究。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认清它的背景，也就是一战结束后的二十年来英国文学的发展。

二

人们说某个作家流行，事实上是说他得到了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的赞赏。在我所谈及的这个时代的早期，也就是一战战时和战后不久，霍斯曼[9]几乎可以算是在有思想的年轻人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在1910-1925年之间的青少年中，霍斯曼的影响力无比巨大，现在看来很难理解。1920年，我差不多十七岁，几乎能够背诵整本《西罗普郡少年》（*A Shropshire Lad*）。我想知道，《西罗普郡少年》会给如今年龄相仿、心境多少有些相似的男孩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这些男孩肯定听说过它，甚至还看过两眼，也许会觉得它是小聪明——恐怕仅此而已。正是这些诗，我和我的同龄人们曾经一遍遍默默吟诵、迷醉其中，就像此前的几代人吟诵梅瑞狄斯的《山谷里的爱情》（*Love in the Valley*）、斯温伯恩[10]的《冥府女王的花园》（*The Garden of Proserpine*）一样。

我的心中满是悔恨

为了我曾经的良友，

为了多少玫瑰唇的少女

为了多少捷足的少年。

在宽广难越的溪滨

捷足的少年们已埋下；

玫瑰唇的少女们长眠

在玫瑰花落的田野。

毫无内涵。不过在1920年似乎并非如此。泡沫为何总会破裂？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考虑到让某些作家在特定时代流行起来的外部条件。在发表之初，霍斯曼的诗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是诗歌当中的什么让190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如此沉迷呢？

首先，霍斯曼是“乡村”诗人。他的诗中充满了旧时村庄的魅力，还有地名带来的怀旧之情——克朗顿与克兰伯里、奈顿、勒德洛、“在温洛岭”“布莱登的夏日”、茅草屋顶与铁匠铺的叮当声、草原上野生的黄

水仙和“令人难忘的蓝色山丘”。除了战争诗歌之外，1910年至1925年这一时期的英语诗歌大多是“乡村诗”。这无疑是因为食利-专业阶级正毅然决然地离开土地，但无论如何，当时流行着一种比现在强烈得多的回归乡村、反感城镇的势利态度。当时的英国并不比现在更像农业国，但至少在轻工业遍地开花之前，人们还是很容易那么以为。大部分中产阶级男孩都在农场附近长大，吸引他们的自然是农村生活如画的一面——犁地、收割、打谷等。如果没有亲身经历，一个男孩是很难体会到挖芜菁、凌晨四点起来挤奶牛皲裂的乳头是多么辛苦和无聊。因此，战前、战后和战争期间，正是“自然诗人”的大好时光，是理查德·杰弗里斯[11]和W.H.哈德森[12]的全盛时期。鲁伯特·布鲁克[13]写于1913年的明星诗作《格兰切斯特》（*Grantchester*）不过是“乡村”情感的倾泻，就像把满腹地名一下子吐个干净。作为诗歌，《格兰切斯特》一无是处，但却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记载了有思想的中产阶级青少年在当时的感受。

不过，霍斯曼并没有像布鲁克等人那样怀着欢度周末的轻松心情去赞美蔷薇。“乡村”主题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但往往只是被当成背景。他的大部分诗歌都有一个拟人化的主题，一种理想化的乡下人形象，就像是过去的诗里情郎和田园牧人形象的重现。这种做法本身就颇具吸引力。经验表明，过分文明的人们钟爱农人题材（关键词：“亲近土地”），觉得他们比自己更粗粝、更有激情。因此，才会出现谢拉·凯耶-史密斯[14]的“黑土地”之类的小说。当时偏爱“乡村”生活的中产阶级男孩会在农业劳动者，而不是城市工人身上找到认同。大部分男孩都幻想着理想化的农夫、吉普赛人、偷猎者或猎场看护人的形象，经常把他们想象成野性自由、四处漂泊的剑客，过着猎兔斗鸡、骑马纵酒、红颜环绕的日子。梅斯菲尔德[15]的《永恒的仁慈》（*The Everlasting Mercy*）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杰作，在战争期间深受男孩们喜爱，它所描绘的也是未经雕饰的景象。但霍斯曼诗中的莫里斯和特伦斯值得认真看待，梅斯菲尔德诗中的索尔·凯恩却并非如此；从这方面来看，霍斯曼正是有忒奥克里托斯[16]之风的梅斯菲尔德。而且他的诗歌都以青春期为主题——谋杀、自杀、痛苦之爱和夭折。它们讲的都是简单明了的灾祸，让人感觉仿似遭遇生活中的“基本事实”：

太阳在山腰燃烧，

如今血液已经干涸；

而莫里斯长眠于草堆，

我的刀子在他身旁。

再有：

他们如今把我们送进舒兹伯利监狱，

口哨吹出孤寂，

火车在铁轨上哀鸣整夜，

为死于黎明的人。

调子都大同小异。一切都陷入了混乱。“内德长眠于墓地，汤姆长眠于狱中”。同时，也要注意到那种细腻的自怜，那种“无人爱我”的感觉：

钻石般的露珠点缀，

草原上的低矮土丘，

它们是清晨的泪水，

它在哭泣，却不是为你。

老兄，真是不幸！这些诗也许专为青春少年而作。在那些被成群赶进公学，以为女人遥不可及的男孩子们看来，恒久不变的性悲观（心爱的女孩不是逝去就是另嫁他人）似乎是一种智慧。霍斯曼是否也让女孩如此着迷？我表示怀疑。他在诗里从未考虑过女性的观点，“她”不过是仙女、是塞壬[17]，是那种凶险的半人生物，总在面前不远处吸引着你，而后又悄然离去。

但如果霍斯曼只有这些特点，他决不会让1920年的年轻人如此着迷，他还有着不敬神、反律法和“愤世嫉俗”的气质。属于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总会有争斗，这种争斗在一战末期更是异乎寻常的激烈，这部分是因为战争本身，部分是因为俄国革命的间接影响，但不管怎么说，知识分子的抗争当时都已风雨欲来。战争几乎没有侵扰英国人轻松安定的生活，也许正是因此，思想成熟于19世纪80年代或更早些时候的人里，很多人的思想到了20世纪20年代依然少有改变。与此同时，对年轻一代来说，官方信仰如沙堡一般分崩离析。比如，宗教信仰的崩塌就令人感

慨万分。多年来，两代人之间的对立成了真正的仇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战争一代到头来发现，老一代仍在高呼1914年的口号，而年轻一代的男孩们却在思想下流的单身教师面前痛苦不堪。霍斯曼正是利用他含蓄的性反叛和个人对上帝的不满赢得了他们的欢迎。他是爱国的，这并不假，但他爱国的方式却传统而无害，要身着红色军装而不是头戴钢盔，要唱《天佑女王》[18]（*God Save the Queen*）而不是《绞死德皇》（*Hang the Kaiser*）。他反基督教的立场也满足了读者——他代表着一种痛苦且反叛的异教，坚信人生短暂，坚信上帝总是逆人而行，而这恰恰契合了年轻人的普遍心态；一切尽在他那几乎完全由单音节词组成、迷人而易逝的诗句中。

从我的探讨看来，有人会觉得霍斯曼似乎只不过是一个鼓动家，满口格言和值得引用的“特有观念”。他显然还有更多内涵，我们也没必要因为多年前的过誉而去看轻他。尽管如今这么说会让人遇上麻烦，他的许多诗歌（比如《在我的心头有风如刀割》，还有《我的马队是否在犁耕》）恐怕并不会一直不受欢迎。其实，决定一名作家是否受欢迎的还是他的“倾向”，他的“目的”，他的“寓意”。这方面的证据显而易见，如果一本书沉重地打击了你心底的信仰，那么你就很难再从书中发现什么文学价值。真正中立的书根本就不存在。不论诗歌还是散文，我们总能从中看出种种倾向，即便它们只决定了作品的形式和意象的选择。但像霍斯曼这样广受欢迎的诗人，一般说来写的都是格言诗。

战后，继霍斯曼和自然诗人之后出现了一批倾向与他们全然不同的作家——乔伊斯、艾略特、庞德、劳伦斯、温德汉姆·刘易斯、奥尔德斯·赫胥黎、里顿·斯特拉奇[19]。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运动”跟奥登、斯彭德等人在过去几年里发起的“运动”别无二致。当然，这一时期的天才作家并非全都符合这个模式。以E.M.福斯特[20]为例，尽管他最优秀的作品问世于1923年左右，但他本质上却更像战前作家；而叶芝在两个创作阶段里的作品似乎都不属于20世纪20年代。其他一些仍然在世的作家——莫尔、康拉德、贝内特[21]、威尔斯和诺曼·道格拉斯[22]等人——在战前就已文思枯竭。另外，萨默塞特·毛姆也可以算是上面所说的战后作家，尽管从狭义的文学角度来说，他并不“属于”其中。当然，这里所说的时期划分并不十分准确，这些作家中的大多数在战前就已经有作品发表，但仍然可以被归为战后作家，就像如今从事写作的年轻人被算作“后萧条”一代一样。当然，你同样可以在不了解这些作家的“运动”的情况下阅读他们在那个时期的大部分作品。当时，文学新闻界的大人物们甚至要比其他时候更加忙于掩饰，假装上一个时代仍未过

去。史奎尔[23]主宰着《伦敦信使》（*London Mercury*），吉布斯（Gibbs）和沃波尔被图书租赁业视若神明，人们狂热追求快乐与男子气概、啤酒与板球、石楠烟斗与一夫一妻制，人们随时都能靠写文章诋毁“风雅之士”来赚取几个金币。但即便如此，俘获年轻人的还是这些被蔑视的风雅之士。这股来自欧洲大陆的风潮早在1930年之前就已经吹掉了啤酒与板球派的遮羞布，他们唯一剩下的就是自己的爵士头衔。

但是，人们对上面那些作家的第一印象，也许是他们并不像一个群体。而且其中几位恐怕会强烈反对与另外几位相提并论。劳伦斯与艾略特在现实生活中彼此嫌恶，赫胥黎崇拜劳伦斯但却被乔伊斯反感，其他大部分人也都瞧不起赫胥黎、斯特拉奇和毛姆，而刘易斯则轮番攻击所有人，他的作家声望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攻击。尽管如此，他们在气质上依然有所相似，这在十多年前还不那么清楚，但如今却已显而易见——也就是悲观主义的世界观。但首先要明确的是，悲观主义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乔治王时代[24]诗人的主旨是“自然之美”，那么战后作家的主旨便是“生活的悲剧感”。比如，霍斯曼的诗所蕴含的精神不是悲剧的，充其量只是牢骚；那是失望的享乐主义。哈代也是如此，尽管有人会觉得《列王》（*The Dynasts*）属于例外。但乔伊斯-艾略特这一派出现较晚，清教主义并非他们发难的主要对象，他们从一开始就“看穿”了前辈们想去争取的大部分事物。他们所有人的气质都与所谓“进步”相悖；让人们觉得进步非但没有发生，而且不该发生。在这种整体上的相似之外，我所提到的这些作家自然手法各不相同，才华有高有低。艾略特的悲观主义部分是基督教式的悲观主义，暗含某种对人类疾苦的漠视；部分是对西方文明衰弱的哀叹（“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腹中塞满稻草的人”等），这是一种“诸神的黄昏[25]”之感，最终让他掌握了让现代生活显得比实际更糟的高难技巧，他的《肌肉萎缩》（*Sweeney Agonistes*）就是一例。在斯特拉奇身上，这种悲观主义只是18世纪那种彬彬有礼的怀疑主义与揭露现实的嗜好的结合。而在毛姆身上，它是一种坚忍的顺从，像在苏伊士以东地区上任、长着坚毅上唇的老爷们一样坚持着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就像罗马皇帝安敦宁[26]。劳伦斯乍看起来不像是个悲观的作家，因为他和狄更斯一样“善变”，总是强调说只要稍稍改变视角，当下生活就会显得美好。但他所主张的是一场远离当前机械文明的运动，而这却不可能发生。因此，他对现状的愤怒又变成了对过去的理想化描述，那是真正虚无的过去，是青铜时代[27]。当劳伦斯在伊特鲁里亚人[28]（他的伊特鲁里亚人）和我们自己之间选择了前者的时候，

我们很难不同意，但那毕竟是一种失败主义，并非世界发展的方向。他所渲染的那种生活围绕着简单的奥秘展开——性、土、火、水、血——那不过是个注定会失败的目标。他的所有作品因此都表达着一个愿望，想让事情以显然毫无可能的方式发生。“要么一波宽容，要么一波死亡，”他说，但此间的世界显然并无宽容。所以他逃到了墨西哥，于四十五岁时去世；那时，死亡之波还没涌起。有人也许又会觉得，在这里讨论这些人的时候，我似乎没有把他们当成艺术家，而是当成宣扬某种“教谕”的宣传家。同样，所有这些人显然不只是宣传家。以《尤利西斯》为例，如果认为它仅仅是对现代生活的恐怖之处、对庞德所谓的“肮脏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时代”的揭露的话，那就太荒唐了。比起大多数作家，乔伊斯实际上更具“纯艺术”气质。一个仅仅玩弄文字游戏的人写不出《尤利西斯》；它源自一种观察生活的独特视角，一种失去了信仰的天主教徒的视角。乔伊斯想说的是“看吧！这就是没有上帝的生活。”尽管他在技巧上的创新同样也很重要，但它们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服务的。

但这些作家身上有一点值得注意，他们的“目的”都非常虚无。他们并不关注迫在眉睫的问题，尤其是狭义的政治。我们的注意力被引向罗马、拜占庭、蒙帕纳斯、墨西哥、伊特鲁里亚，到潜意识，到我们的心口——唯独没有事情实际发生之地。回顾20世纪20年代，最奇怪的是，英国知识分子忽视了欧洲大陆上的所有重大事件。以俄国革命为例，从列宁去世到乌克兰大饥荒[29]之间的差不多十年几乎完全从他们的意识中消失了。在那些年，俄国只意味着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开出租车的流亡伯爵。意大利则意味着画廊、废墟、教堂和博物馆，而不是黑衫军[30]。德国意味着电影、裸体主义和精神分析，而不是希特勒，人们直到1931年才注意到这个名字。在“文化”圈子里，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延伸为对虚无的崇拜。人们认为，文学仅仅是玩弄辞藻而已。通过题材来评判作品好坏的做法被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行，就连了解其题材也被当成品位的堕落。1928年左右，《笨拙》杂志登出了它战后最有名的三个漫画之一，在这幅漫画里，一个不可理喻的青年告诉他的姑妈自己想要“写作”。“你想写些什么呢？亲爱的。”姑妈问。“亲爱的姑妈，”青年决绝地说，“不用考虑写什么，只管写就行。”20世纪20年代最优秀的作家们并不认可这个说法，他们的“目的”在多数情况下都相当明确，但这种“目的”往往以道德、宗教、文化为主线。而且，如果用政治术语来说，他们从来都不是“左”的。总而言之，所有这派作家都倾向于保守主义。以刘易斯为例，他曾经多年狂热攻讦“布尔什维克主义”，哪怕是在很不可能存在这种东西的地方也能发现它的踪迹。也许因为近

来受到了希特勒对待艺术家的态度的影响，他的观点有了些许改变，但我敢打赌，他不会变得太左。庞德似乎坚定地推崇法西斯主义，至少对意大利法西斯的态度是这样的。艾略特似乎对这些无动于衷，但如果拿枪逼着他在法西斯主义和某种较为民主的社会主义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也许会选择法西斯主义。赫胥黎起初秉持对生活常见的绝望态度，但在劳伦斯“阴暗之腹”的影响下开始尝试所谓的“生命崇拜”，并最终皈依和平主义——这样的立场是站得住脚的，在当前看来十分可敬。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派中的大多数作家都对天主教会怀有某种亲切感，尽管这并非是正统天主教所能接受的那种感情。

无疑，悲观主义与反动观点之间的精神联系显而易见。但不太清楚的是，为何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作家大多秉持悲观主义呢？为什么总是那种堕落的感觉，总是骷髅与仙人掌，总是向往失落的信仰和没有希望的文明呢？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身处一个无比安逸的时代吗？“宇宙的绝望”只有在这样的时代才会盛行。饥肠辘辘的人绝不会对宇宙绝望，他们甚至都不会去想宇宙这回事。1910年到1930年这段时间整体而言相当繁荣，即使在战争年代，只要你没在协约国军队中服役，物质生活就完全可以忍受。至于20世纪20年代，那是食利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是一个前所未见的不负责任的时代。一战已经结束，新的极权国家尚未崛起，种种道德与宗教禁忌都已消失，金钱却滚滚而来。“幻灭”成了时尚。任何每年能稳稳地挣到五百英镑的人都开始附庸风雅，开始培养自己的厌世情绪。那个时代属于鹰与性感女子，属于廉价的绝望，属于后院里的哈姆莱特，属于深夜里的廉价回程票。在当时一些二流的典型小说中，比如《愚人之言》（*Told by an Idiot*）这样的书里，对生活的绝望发展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自怜气氛。连那些最优秀的作家对世事的态度也太像奥林匹亚诸神，随时准备逃避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他们把生活看得过分复杂，在这个问题上比之前与之后的作家都严重，但他们却拿反了手中的望远镜。不过这并不能否定他们的作品本身的价值。能否流传下去，这是艺术作品要过的第一关，事实上，在1910年到1930年间成书的作品有很多都已流传至今，而且看上去还要继续流传下去。只要想想《尤利西斯》和《人性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想想劳伦斯的大部分早期作品，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还有艾略特1930年以前的全部诗歌，就不禁让人怀疑如今的作品还能不能长久流传。

但在1930年到1935年间，事情突然起了变化。文学风向有所改变。奥登、斯彭德等新一派作家已经亮相，尽管他们的某些技巧取自前辈，但“倾向”却截然不同。刹那间，我们便已离开诸神的黄昏，走进一种以

军装短裤和团体合唱为代表的童子军氛围。作家的典型形象已不再是倾向天主教会、有文化的外国侨民，而是热情奔放、倾向共产主义的学生。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的主旨是“生活的悲剧感”，那么新一代作家的创作主旨就是“严肃的目的”。

路易·麦克尼斯[31]在他的《现代诗歌》（*Modern Poetry*）一书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两派作家的差异。当然，这本书完全是从年轻一代的观点出发的，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标准更优越。按照麦克尼斯的说法：

《新记》[32]的诗人们和叶芝与艾略特不同，都有强烈的党派属性。叶芝提倡回避欲望与仇恨；艾略特则不采取任何行动，带着倦怠与讽刺性的自怜观察他人的情绪……而奥登、斯彭德和戴·刘易斯却暗示着他们有自己的欲望和仇恨，而且，他们认为有些事物应当去追求，有些则应被仇恨。

还有：

《新记》的诗人们回到了……古希腊人对消息和宣言的偏爱。言之有物是首要要求，然后必须尽可能地自圆其说。

换句话说，“目的”回归了，年轻一代的作家们开始“走进政治”。正如我先前已经指出的，艾略特等人并不像麦克尼斯所暗示的那样没有党派之见。尽管如此，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界相比如今更强调技巧而不是题材这个说法，大体上还是准确的。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奥登、斯彭德、戴·刘易斯、麦克尼斯，还有很多作家多少也有类似倾向，比如伊舍伍德（Isherwood）、约翰·雷门（John Lehmann）、阿瑟·考尔德-马歇尔（Arthur Calder-Marshall）、爱德华·厄普伍德（Edward Upward）、阿利·布朗（Alee Brown）、菲利普·亨德森（Philip Henderson）等人。和之前一样，这只是以倾向为依据的简单归类。显然，他们的才华天差地别。但和乔伊斯、艾略特等人相比较，我们一眼就能发现，他们更容易归为一派。他们在技巧上的联系更为紧密，政治观点几乎完全相同，他们对彼此作品的评论（说得委婉些）总是温和的。20年代的杰出作家们出身各有不同，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普通的英国式教育（顺便说一下，除劳伦斯以外，那些顶尖作家都不是英国人），他们过去大都曾与贫困、蔑视，甚至露骨的迫害抗争过。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的作家们几乎都是公学-大学-布鲁姆斯伯里模式的产物。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个别人也很早就脱离了那个阶级，渐次浸淫于

奖学金和伦敦“文化”的染缸。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派作家当中有好几位不但曾在公学中就读，后来还在学校里当了教师。多年前，我曾说奥登是“胆怯的吉卜林”。这个说法作为评论而言没什么价值，其实只是一种恶意的评价，但奥登的作品，尤其是其早期作品，其实从不缺少鼓动氛围——与吉卜林的《如果》（*If*）和纽伯特（Newbolt）的《生命的火炬》（*Play up, Play up, and Play the Game!*）非常相似——这倒是句实话。以“你即将离去，孩子们，这由你们决定”为例，这纯粹是童子军队长的口吻，调子和关于自渎危害性的十分钟恳谈别无二致。无疑，其中有些刻意而为的拙劣模仿，但也有一种无意识的更深层次的相似。当然，这种道学先生的口气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身上十分常见，这是一种解脱的征兆。在抛弃了“纯艺术”之后，他们摆脱了被人嘲笑的恐惧，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创作空间。

三

如果这是一个发起文学“流派”的时代，亨利·米勒也许会是一个新“流派”的起点。至少他确实标志着一种意料之外的剧变。在他的书中，人们看不到“政治动物”，回到了一种个人化且完全消极的观点——认为自己把握不了，也完全不想去把握世界变幻的人的观点。

我在1936年底途经巴黎前往西班牙时，第一次见到了米勒。他身上最让我好奇的是，他对西班牙内战丝毫不感兴趣。他只是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只有白痴才会在此时去西班牙。他能够理解任何出于好奇等纯粹的个人原因去那里的人，但出于责任感而掺和那些事的人却是愚蠢透顶。不管怎样，我那些与法西斯斗争、捍卫民主之类的想法全是胡扯。我们的文明注定要被扫除，要被那些差别大到甚至不能被认为是人类产物的东西替代——这样的前景并不会让他感到困扰，米勒说。他的作品中贯穿着这样的观点，到处都是大难临头的感觉，几乎到处都暗示着他认为这无关紧要。据我所知，他唯一一份出现在报刊上的政治宣言是全然负面的。大约一年前，一家名为《马克思主义者季刊》（*Marxist Quarterly*）的美国杂志给很多美国作家发了问卷，让他们阐述自己对战争的态度。米勒用极端反战主义的措辞作了答复，表达了一种个人对战争的拒绝，而且似乎丝毫不指望说服他人认同这个观点——这实际上是一份无责任宣言。

但这不仅仅是无责任。通常来说，不认同当时历史进程的作家，要么不予理会，要么与之抗争。如果他们忽视了这种进程，他们也许是傻瓜。如果他们对这种进程的理解足够深刻，想要与之对抗，他们也许也有足够深刻的远见，知道自己毫无胜算。以《吉卜赛学者》（*The Scholar Gipsy*）这样的诗为例，看看诗中对“现代生活的怪病”的斥责，还有最后一节中宏大的失败主义比喻。诗中表达的是一种常见的文学态度，也许是过去一百年来文学界的主流态度。另一方面，还有“进步作家”、唯唯诺诺之人，还有萧伯纳、威尔斯之流，他们总是飞跃着迎接未来，而这种未来其实不过是自我的投影。总的说来，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选择了前一条路，而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选择了后一条。当然，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都会有很多巴里、迪平和黛尔（Dell）那样毫不关心时事的人。米勒的作品之所以具有重要的预兆意义，是因为他没有接受上述任何一种态度。他既不去推动世界进步，也不想让世界倒退，但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对此视而不见。我想说的是，他比大多数“革命”作家都更坚定地相信西方文明的崩塌迫在眉睫，他只是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做些什么。大火焚烧罗马之时，他在拉琴，而且，和绝大多数同道之人不同，他是面对着火海拉琴的。

在《马克斯和白细胞》（*Max and the White Phagocytes*）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作家通过谈论他人，讲述了很多有关他自己的事情。书中有一大段关于阿娜伊斯·宁（Anais Nin）日记的评论，我只读过几个片段，相信它还没有出版。米勒断言，不论那些日记意味着什么，它们都是有史以来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不过，其中一处非常有趣，米勒把阿娜伊斯·宁——显然是一位非常主观、内向的作家——被比作鲸腹中的约拿[33]。他顺便提到了奥尔德斯·赫胥黎多年前的一篇关于埃尔·格列柯（El Greco）的画作《腓力二世之梦》（*The Dream of Philip the Second*）的文章。赫胥黎写道，埃尔·格列柯画中的人看上去总像是在鲸腹之中，他还说自己在“内脏牢笼”这个想法里发现了某些异常恐怖的东西。米勒反驳说，相反，相较于被鲸吞入腹中，更可怕的事情多得是，那段话表明赫胥黎本人觉得这个念头很有吸引力。他在此提及了一个也许流传甚广的假想。也许我们应当注意到，每个人，至少每个说英语的人，都总是提到约拿和鲸的故事。吞下约拿的当然是一条鱼，《圣经》里就是这样说的，但孩子们却很自然地把鱼和鲸弄混了，这块儿童语言的碎片却被习惯性地带进了成人世界，这也许体现了约拿的神话对我们想象力的强大影响，因为置身鲸腹其实是一种颇为安逸、舒适、亲切的感受。历史上的约拿，如果我们能这么称呼他的话，很高兴能逃出来，但无数人都在自己的想象中，或是在白日梦中嫉妒着他。原因当然

很简单。鲸的肚子像个大得足够装下成人的子宫。待在那个黑漆漆、软绵绵、大小刚好合适的地方，和现实之间隔着厚厚的一层鲸脂，不论外面发生什么，你都可以完全不予理会。哪怕一场足以掀翻世上所有战列舰的风暴袭来，你在里面连个响都听不到。也许连鲸本身的动作都不会对你有任何影响。它也许会在海面的波浪间翻滚，也许会潜入黑暗的深海（按照赫曼·麦尔维尔的说法，可以深达一英里），但你却不会感觉到任何异样。除了死亡，这便是无法超越的、终极的无责任状态。不管阿娜伊斯·宁如何，米勒无疑身在鲸腹之中。他最优秀、最具代表性的篇章都是以约拿，一个心甘情愿的约拿的视角写就的。他并不那么内向——实际上恰恰相反。在他的世界里，这头鲸是透明的。只是，对于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他感受不到任何想要改变或掌控的冲动。他采取的是一种完全约拿式的举动，让自己被鲸吞下，一直被动，一直接受。

人们将会看到其中的意义。这是一种寂静主义，意味着要么没有信仰，要么信仰已经上升到了神秘主义的层次。其中的态度要么是“我不在乎”，要么是“他虽杀我，我仍要信靠他”[34]，从两个方面看都行，因为两者的实际目的一样，两者的行为准则都是“作壁上观”。但在当下的时代，这种态度还站得住脚吗？注意，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我写下这篇文章时，我们依然身处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书必须是积极、严肃和“富有建设性”的。十多年前，这种想法会为人所讥笑。（“亲爱的姑妈，不用去考虑写些什么，只管写就行。”）艺术只是纯粹的技巧，这种肤浅的说法已经退潮，钟摆已经摆到了另外一头，人们相信，只有基于“真实”生活观写成的书，才是“好”书。自然，认同这一点的人同样也会相信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比如，天主教批评家常常认为，只有具有天主教倾向的书才是“好”书。

过去的一些信仰如今看来是错的，有的甚至十分愚蠢，但大部分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都贯穿着这些信仰，而且这些信仰实际上正是它们的基础（灵魂不灭的信仰就是一例）。如果把能否流传当成评判标准，它们就是“好”作品。以17世纪的英国为例，当时的宗教和政治纷争与如今的左右对立非常相似。回顾历史，大部分现代人都会觉得，相比天主教-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清教徒的观点更接近真理。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家并非全部或大部分是清教徒。此外，有些“好”作家的世界观不管在哪个时代都会被视为错误和愚蠢的。埃德加·爱伦·坡就是一例。爱伦·坡的世界观往好了说是狂放的浪漫主义，往坏了说其实比临床意义上的精神病好不了多少。既然这样，那为什么《黑猫》（*The Black Cat*）、《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和《厄舍府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等几乎可以算作疯言疯语的小说并没有让人感到虚假呢？因为它们在某个特定框架下看来是真实的，像日本画一样遵循着它们那个独特世界里的规则。由此看来，想要成功地描写这样一个独特的世界，就必须得相信它。在我看来，朱利安·格林（Julian Green）的《子夜》（*Minuit*）是营造类似氛围的一种不真诚的尝试。对比《子夜》和坡的小说，我们一眼就能看出两者的区别。《子夜》会立刻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所有情节都像是随意安排的，人物情绪变化毫无联系。但爱伦·坡的小说恰恰不会给人这种感觉。故事中狂乱的逻辑在各自的背景中变得很有说服力。比如，当醉汉抓住黑猫，用小折刀挖出它的眼睛时，读者会清楚地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做，甚至会觉得换做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对于富有创造力的作家而言，真挚的情感似乎比对“真实”的把握更加重要。作家还需要才华，但才华似乎是这样一种东西，它需要你有心，需要你真正相信你的信仰，不管它们是对还是错。比如，赛利纳和伊夫林·沃的区别就在于情感的强烈程度。这也是真正的绝望和至少有些许做作的绝望之间的区别。从这里可以引出一个也许不那么明显，但又必须考虑的问题：有些时候，人们对“不正确”的信仰可能会比对“正确”的信仰更真诚。

如果读一读有关一战的个人回忆录，你就会注意到，几乎所有在岁月流逝之后依旧可读的东西都是从消极和负面的角度来写的。它们记录的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是虚空中的噩梦。它们描述的并不是真实的战争，而是真实的个人反应。朝着重机枪的弹幕前进、站在洪涝齐腰的战壕中的士兵，只知道这是一种恐怖的经历，只能感觉到自己的无助。相比假装有能力正确地把握一切而言，他们更能从自己的无助和无知出发写出好书。就一战期间写就的那些书而言，最优秀的作品都出自那些对战争漠然置之的人们。E.M.福斯特曾经描述过他在1917年读到《普鲁弗洛克》（*Prufrock*）等艾略特早期诗歌时的感受，在当时能够读到“没有掺杂任何公共精神”的诗是多么让他感到振奋：

它们歌颂个人的嫌恶与羞怯，歌颂那些因为不起眼或无力而显得真实的人物……这是一种抗议，一种无力的抗议，因为无力而更容易被接受……那些对女人的抱怨和会客室的喧闹不加理会的人，反倒守护着我们的那一丁点自尊，传承了人类的遗产。

这段话说得很好。麦克尼斯在我前面提及的那本书里也引述了这段话，还自以为是地加上了一段按语：

十年之后，诗人们发出的抗议不会再那么无力，人类遗产的传承方

式会截然不同……对破碎世界的沉思变得让人厌烦，而艾略特的后继者们对扫清这些碎片更有兴趣。

类似的话在麦克尼斯的书中随处可见。他想要我们相信，相比艾略特在协约国军队进攻兴登堡防线时发表《普鲁弗洛克》，他的“后继者们”（也就是麦克尼斯和他的朋友们）能以某种方式提出更有效的“抗议”。只不过我不知道从哪里才能看出这些“抗议”。但对比福斯特和麦克尼斯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出两类人的区别，一类了解1914到1918年的战争，另一类却几乎对它毫无印象。1917年的真实情况是，一个敏感、有思想的人什么都做不了，他只能让自己不失为人。无助甚至轻浮的举动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我是一战期间在前线的士兵，我一定会选择《普鲁弗洛克》，而不是《第一个十万》（*The First Hundred Thousand*）或霍雷肖·博顿利（Horatio Bottomley）的《致战壕里的男孩们》（*Letters to the Boys in the Trenches*）。我也会有和福斯特一样的感受，通过与战争的疏离和对战前情绪的感受，艾略特继承着人类的遗产。在那样的情况下，读读中年秃顶的文人雅士的思想文字是多好的放松啊！跟刺杀训练完全不同！在轰炸、食品配给点前的长队和征兵海报之后，终于听到了人的声音！多么轻松！

但是，一战毕竟只是一连串危机中的一个高潮。如今，甚至不需要战争，我们就能理解这个社会的瓦解和所有正派之人与日俱增的无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亨利·米勒作品中那种消极、不合作的态度是合乎情理的。不论它是否表达了人们应该感受到的东西，它恐怕都已经近于展现人们的实际感受。这又是在硝烟战火中的人的声音，一个友好的美国人的声音，“没有掺杂任何公共精神”。没有说教，只有主观的真实。按照这种路子，显然还是能写出好小说来的。它不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只要值得阅读，能被记住就行。

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正在走向极权独裁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思想自由首先会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行，之后将变成毫无意义的抽象概念。独立的个人将不复存在。但这意味着文学，从我们熟知的形式上说，必将遭受至少是暂时的毁灭。自由主义文学正在走向终结，而极权主义文学尚未诞生，我们也很难想象它的样子。至于作家，他正坐在一座不断融化的冰山上，他只不过是一个时代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时代的残余，像河马一样注定要灭绝。在我看来，米勒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因为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早地看穿了这个事实并将之公之于众。实际上，许多人当时还在扯着什么文学复兴。温德汉姆·刘易斯多年前就曾说过，

英语语言已经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的主要部分，不过他的观点建立在和米勒不同的琐碎理由基础上。但对于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来说，从今往后唯一重要的事实是，这个世界将不再属于作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在新世界的建设中发挥作用，而是说他们再也不能作为作家参与其中。因为作为作家，他们是自由主义者，而那种进程要消灭的正是自由主义。因此，在言论自由时代余下的岁月里，任何值得阅读的小说都会或多或少地遵循米勒的那种路子——我指的不是技巧或者题材，而是其中隐含的观点。那种消极的态度将会回潮，而且要比以前更具自觉性。进步和反动到头来都是骗局，剩下的似乎只有寂静主义——通过臣服于现实来剥夺它的恐怖。躲进鲸腹吧——或者说承认自己已在鲸腹之中（当然，你确实身处其中）。把你自己交给世界进程，别再对抗，也别再假装能够掌控它；只需接受它，忍受它，记录它。所有敏感的小说家当前都可能会这样做。既遵循更积极的、“建设性的”路线，又拥有真挚情感的小说，我们现在还很难想象。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米勒是“伟大的作家”，是英语文学的新希望呢？并不是这样。米勒本人既不想索求、也不需要这种头衔。他无疑会继续写作——人们一旦开始写作，就总会继续写下去——认同米勒的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迈克尔·弗伦克尔（Michael Fraenkel）等作家有着和他类似的倾向，几乎可以算是个“流派”了。但在我看来，米勒本质上只有一部作品。我认为他迟早要堕入神秘和庸俗：他后来的作品都有这两个迹象。我甚至还没读过他的新作《南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不是不想读，而是因为警察和海关查得太严，我还没能弄到这本书。但如果这本书能稍微接近《北回归线》或者《黑色的春天》开头几章的水平，我都会感到吃惊。和其他某些自传性的小说家一样，他只能完美地做好一件事，这件事他已经做过了。鉴于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创作水平，这已属差强人意。

米勒的书由巴黎方尖碑出版社（Obelisk Press）出版。在战争已经爆发、出版人杰克·凯恩（Jack Kathane）也已去世的情况下，我不知道方尖碑出版社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但无论如何，米勒的书还能买得到。我诚挚地建议，每一个没读过《北回归线》的人都应该把它找来读读。只要想想办法，或者是付点比标价略高的价钱，你就能得到这本书，即便其中有些地方会让你反感，它还是会根植于你的记忆中。这同样是一本“重要”的书，我这里说的“重要”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用法。通常说来，以“重要”一词形容的小说，要么是对某件事情“可怕的控诉”，要么是因为它引入了某种创新手法。《北回归线》无法归入这两类。它

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征兆。我认为，他是英语民族中多年来出现的唯一一位几乎没有价值但又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即使有人认为这是过誉，人们也应该承认，米勒是位不平凡的作家，值得加以关注；但说到底，他是完全负面、不具建设性、不遵守道德准则的作家，他不过是现代的约拿，消极地接受了邪恶，他算得上是尸群中的惠特曼。从预兆层面上说，这比英国每年出版五千本书，其中四千九百本都是废话这个事实更有意义。这让我们看到，在世界格局在动荡之后、重建之前，我们不会再有任何伟大的文学作品。

---

[1] 此文为节选。

[2]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891-1980），美国作家，1930年迁居巴黎，此后十年间同穷困潦倒的侨民和放荡不羁的巴黎人混在一起，获得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他被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群体誉为自由和性解放的先知。

[3] 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1893-1968），英国诗人、艺术批评家、美学家，曾任英国美学学会主席。

[4] 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896-1970），美国小说家，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曾是美国共产党支持者。

[5] 温德汉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1884-1957），英国作家、画家，“漩涡派”创始人。

[6] 《长夜行》（*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法国著名作家路易-斐迪南·赛利纳（Louis-Ferdinand Cé line，1894-1961）于1932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7] 布雷特·哈特（Bret Harte，1836-1902），美国西部文学代表作家。以描写加利福尼亚州的矿工、赌徒、娼妓而负有盛名，曾与马克·吐温合作创作名剧《啊！罪恶！》。

[8] 巴兰的驴，典出《圣经·旧约·民数记》第二十二章第十八节，巴兰用杖打驴，上帝叫驴开口。代指平常沉默驯服，现在突然开口抗议的人。

[9] A.E.霍斯曼（A.E.Housman，1859-1936），英国诗人，因《西罗普郡少年》一诗成名。他的诗中体现了英国乡村青少年的苦闷与失望，在一战前后极具影响力。

[10] A.C.斯温伯恩（A.C.Swinburne，1837-1909），英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批评家，1903至1909年间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1] 约翰·理查德·杰弗里斯（John Richard Jefferies，1848-1887），英国自然作家，因散文、小说和自然史中对英国乡村生活的描绘而知名。

[12] W.H.哈德森（W.H.Hudson，1841-1922），英国作家、鸟类学家。

[13] 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Chawner Brooke，1887-1915），英国空想主义诗派诗人，他的作品反映了一战初期英国人的英雄主义激情，但未能体现出战争残酷的一面。

[14] 谢拉·凯耶-史密斯（Sheila Kaye-Smith，1887-1956），英国女作家，作品主要描绘英国乡村生活。

[15] 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1878-1967），英国诗人，1930年被授予桂冠诗人头衔。

[16] 忒奥克里托斯（约公元前310年-公元前250年），古希腊著名诗人、学者，西方田园诗派的创始人。

[17] 塞壬，希腊神话中人首鸟身的女怪物。根据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中描写，塞壬居住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的一座遍地是白骨的岛屿上，她们用自己天籁般的歌喉迷惑过往的水手，使航船触礁沉没。

[18] 《天佑女王》，英国国歌，男性君主在位时称《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

[19] 里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1880-1932），英国作家、评论家，布鲁姆斯伯里派核心成员。

[20] E.M.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英国作家，小说几乎都是反映英国中上层阶级的精神贫困，在每部

作品中主人公都试图通过挣脱社会与习俗的约束来求得个人解放。

[21] 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英国作家，一战中曾在英国信息部负责对法宣传。

[22] 诺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1868-1952），英国作家，曾任外交官。

[23] J.C.史奎尔（J.C.Squire，1884-1958），英国诗人、作家、历史学家，是一战前较有影响力的文学编辑。

[24] 乔治王时代，英国乔治一世至乔治四世在位时期（1714-1830）。

[25] 诸神的黄昏，北欧神话预言中的一连串巨大劫难，包括造成许多重要神祇死亡的大战，无数的自然浩劫，之后整个世界沉没在水底。

[26] 安敦宁·毕尤（Antoninus Pius，公元138年-公元161年在位），罗马帝国“五贤帝”中的第四位。

[27] 青铜时代，古罗马的诗人奥维德在著作《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将人类世纪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青铜时代，人类陷入战争，但仍然保持着对众神的信仰。

[28] 伊特鲁里亚人，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生活在亚平宁半岛中北部的一个民族，伊特拉斯坎人在半岛上建立起兴盛先进的文明，于公元前6世纪达至巅峰，在习俗，文化和建筑等诸多方面对古罗马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9] 乌克兰大饥荒，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大饥荒。据估计，大约有240万至750万乌克兰人死于这一事件。

[30] 黑衫军，意大利法西斯准军事组织，活跃于一战后直到二战结束时被解散，有时也称为国家安全志愿军。

[31] 路易·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1907-1963），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奥登一派成员。

[32] 《新记》（*New Signatures*），出版于1932年。（作者原注）

[33] 典出《圣经·旧约·约拿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天三夜。”

[34] 语出《圣经·旧约·约伯记》第十三章第十五节。

英国，你的英国[1]

一

在我提笔时，高度文明的人类正驾驶着飞机在我头上飞行，设法置我于死地。

他们对我个人并无敌意，我对他们也是一样。正如常言所说，他们“只是在执行任务”。我相信他们大多是善良守法的人，私下里从未想过杀害他人。另一方面，假如其中某位能把炸弹扔得够准，成功地把我炸成碎片，他也决不会因此辗转难眠。他正在为国服役，国家有权赦免他的罪行。

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国与国之间的分歧是以观点的不同为基础的。直到最近，假装相信全人类都十分相似的这种做法还被认为是对的，但明眼人其实都知道，在不同国家里，人们的典型行为天差地别。能在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可能并不会在另外一个国家出现。比如，希特勒发动的六月清算[2]就绝不可能在英国发生。和一般的西方人相比，英国人相当与众不同。几乎所有外国人都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所反感，这种态度相当于间接承认了英国的不同。欧洲大陆上的人们很少能忍受在英国生活，甚至连美国人也觉得待在欧洲大陆更加自在。

从外国返回英国时，你立刻就能感觉到自己呼吸着一种不同的空气。哪怕在最初抵达的几分钟里，几十件细微事物都会一起带给你这种感觉。这里的啤酒更苦，硬币更重，草地更绿，广告更加俗艳。大城市中满脸疙瘩、满口坏牙、举止优雅的人群，也和欧洲大陆上的人群不同。而后，英国的辽阔会将你吞没，有那么一会儿，你会恍惚觉得整个民族有某种明显的特征。民族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我们难道不是四千六百万个彼此不同的独立个体吗？还有这个民族之中的多样性，还有其中的混乱！兰开夏郡磨坊小镇上木鞋的啪嗒声、大北路上来来往往的货车、职业介绍所门外的长队、苏荷酒吧里弹球桌的摩擦声、穿过秋日晨雾去参加圣餐礼的老处女——所有这一切不只是英国景象的碎片，而且

是典型的碎片。在这样的混乱之中，怎样才能找出它们的共性？

但在和外国人交谈、读外国书报时，你也会产生同样的感受。是的，英国文明中有些与众不同、明显可辨的东西。这种文化和西班牙文化一样都十分独特。和它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丰盛的早餐和阴郁的星期天、烟雾笼罩的城市和蜿蜒的街道、绿色的原野和红色的邮筒。它有着自己的风格。而且它还在不断延续，来自过去，走向未来；它像一个鲜活的生命，身上有些持续不变的东西。1940年的英国和1840年的英国有哪里相同？话说回来，你和你母亲放在壁炉上的照片里的五岁小儿又有哪里相同？没有，除了你和照片里的人恰好是同一个人之外。

而最重要的是，它是你的文明，它就是你。无论你怎样讨厌或嘲笑它，哪怕只离它片刻，你都永远无法再快乐起来。牛油布丁和红色邮筒已经深深地印在你的心中。不论好坏，它都是你的，你也是它的一部分，只要你身在人世，就永远无法摆脱它留给你的印记。

同时，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正在改变。和世间万物一样，它的改变只能沿着某些方向进行，而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见这些方向。这并不是说未来已经确定，而是说有些方向可行，而另一些则不然。一粒种子可能发芽，也可能不发芽，但芜菁种子无论如何都不会长出欧洲防风。因此，在猜想英国在世界大势中能够扮演的角色之前，最重要的是先要努力弄明白英国到底是什么。

二

要确定一个国家的特点并非易事，在确定下来之后，它们不是变成琐碎的细节，就是变成看似毫无关联的独立元素。西班牙人残忍地对待动物，意大利人不发出震耳欲聋的噪声就干不成事。显然，这些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毕竟一切都事出有因，就连英国人牙齿不好这个事实也能让人看到英式生活的一些现实。

下面我们来举几例关于英国的概括性言论，它们几乎得到了所有观察者的认可。其一，英国人缺乏艺术天赋。他们不像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那样精于音乐，绘画和雕塑在英国也从未像在法国那样兴盛。其二，按照欧洲人的说法，英国人不擅思考。他们害怕抽象思维，觉得自己完全

不需要哲学或系统性的“世界观”。这并不是因为英国人像他们自己喜欢说的那样“务实”。只要看看英国人制定城市和供水系统规划的方法，他们对一切过时和烦琐事物的执著，那种无视分析性的拼写体系，以及那套只有编纂算术书的人才能搞清楚的度量衡系统，就能看出他们有多么不在乎起码的效率问题。但他们那种不经思考便开始行动的做法也自有其力量。他们那种世界闻名的虚伪——比如他们对帝国的双重态度——与之紧密相关。而且，整个民族会在深重危机面前立刻团结起来，以一种本能，一种几乎人人都能理解，但从未成文的行为规范展开行动。希特勒为德国人创造出来的“梦游民族”一说其实用在英国人身上更合适。其实，梦游民族之名丝毫不值得骄傲。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有一个非常明显，但不常被人论及的小小特点，那就是对花卉的热爱。当人们从国外，尤其是南欧国家抵达英国时，这是他们首先会注意到的特征之一。这和英国人对艺术的不感兴趣矛盾吗？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连毫无审美能力的人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但与之相关的是英国人的另一特征，它在我们身上渗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几乎注意不到它，这就是我们对业余爱好和消遣的迷恋，也就是英国生活的个人性。我们这个民族不但有很多爱花之人，而且还有很多集邮者、养鸽子爱好者、木工爱好者、优惠券收集者、飞镖玩家和填字游戏迷。英国文化中最具本土特色的部分都是围绕着那种民间性质的公共场所展开的——酒吧、足球赛、后花园、壁炉旁和“一杯好茶”。几乎和19世纪时一样，人们依旧相信个人自由。但这一点和经济自由，也就是那种通过剥削他人获利的权利无关。这是拥有自己的房子、在闲暇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是不用接受地位比你高的人安排娱乐活动、自己随心选择的自由。英国人最讨厌的，恐怕要数那些爱打听闲事的人。当然，这种纯粹的个人自由显然注定会消失。和所有现代人一样，英国人也正处于被编号、被归类、被征召、被“协调”的进程之中。但是，他们的本能却在往相反方向拉动，加诸其上的管理措施也会因此有所调整。不会有党代会[3]，不会有青年团[4]，不会有黑衫队和褐衫队，不会有对犹太人的迫害，不会有“自发”游行，也绝不可能有盖世太保。

但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普通人的生活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与现行秩序相悖。真正的英国大众文化是在表象之下的民间文化，多多少少让当局感到不悦。如果直接观察普通人，尤其是大城市里的普通人，我们就能注意到，他们并没有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他们是积习已久的赌徒，舍得拿手头全部工资买啤酒喝，好讲荤段子，说着差不多全世界最

污秽的语言。即使面对着令人惊讶的伪善法案（特许经营法和彩票法等），他们的这些嗜好也依然需要满足，这些法案原本的设计是要干涉所有人的生活，但在执行中却并没有对任何事情构成阻碍。而且，这些普通人并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数百年来都是如此。英国国教对他们从未有过真正的约束力，而是那些拥有土地的上等人的专属之地。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教派也只在少数人群中才有影响力。尽管深受基督教感情的影响，他们却几乎连耶稣之名也不记得。欧洲大陆上那种崇拜权力的新宗教虽然已经感染了英国知识界，但却从未触及普通人。强权政治从未对他们造成负面影响。日本和意大利报纸上鼓吹的“现实主义”足以让他们毛骨悚然。从廉价文具店橱窗里的彩色漫画明信片上，我们就能充分了解英国的这种精神。它们就像是某种形式的日记，英国人通过它们无意识地记录下了自己。他们过时的观点，他们等级鲜明的势利，融合在他们身上的低俗与伪善，他们的极端优雅，他们对待生活极为道德化的态度，都反映在其中。

优雅也许是英国文明最显著的特点。在踏上英国土地的那一瞬间你就会注意到它。在这个国家里，公共汽车售票员脾气很好，警察从不佩枪。在英国，推开人行道上的人群要比在其他所有白人为主的国家都更容易。随之而来的，就是总是被欧洲观察者们贬之为“颓废”或伪善的特点，即英国人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憎恶。这种态度由来已久，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同样强烈地反对战争。接连不断的战事让这种态度有所动摇，但并没能将它消灭。在我们的记忆里，“红衣大兵”[5]走在街上总会引来嘘声，知名酒吧的老板也常常禁止士兵入内。在和平年代，哪怕是在失业人口高达两百万的情况下，小小的常备军都很难满编，担任军官的往往是乡绅和一部分专业化的中产阶级，当兵的则是农场雇工和来自贫民窟的无产阶级。大多数民众既缺乏军事知识，也没有军事传统，他们对战争也总是存有戒心。没有政客能够通过向民众许诺战争的胜利和军事“荣耀”而上台，《仇恨的颂歌》（*Hymn of Hate*）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从未有过吸引力。在上一场战争中，士兵们自编自唱的歌曲并没有什么复仇的意味，相反却是幽默和假装失败主义的[6]。他们只把准尉们称为敌人。

在英国，所有那些自吹自擂的豪言壮语，像《统治吧，不列颠尼亚！》（*Rule, Britannia!*）之类的东西都只是一小撮人的大作。普通人的爱国主义不大听得到，甚至感知不到。他们对于历史的记忆里，从来都没有军事胜利之名。英国文学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一样，充满了和战争有关的诗歌，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广受欢迎的诗歌所讲述的往往是灾

难与撤退。比如，特拉法加海战和滑铁卢战役就从未留下什么为人赞赏的诗歌。约翰·穆尔爵士（Sir John Moore）所部在科伦纳渡海撤退[7]（和敦刻尔克一样！）前的拼死抵抗比一场辉煌的胜利更有吸引力。最激动人心的那首英国战争诗讲述的是一个选错了进攻方向的骑兵旅的故事。至于上一场战争，真正在大众记忆中留下印记的是蒙斯、伊普尔、加里波利和帕斯尚尔这四个地名，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是一场灾难。至于最终击溃德军的那几场重大战役，它们的名字根本就不为大众所知。

英国人的反军国主义之所以让外国观察者觉得反感，是因为它忽略了大英帝国的存在。这种做法看似十足的伪善。英国毕竟占据着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土地，凭借一支强大的海军维持着它的统治。他们怎么还好意思掉过头去说战争是邪恶的？

毋庸置疑，英国人对待他们帝国的态度是伪善的。在工人阶级身上，这种伪善的表现形式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帝国的存在。但他们对常备军的反感却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本能。海军所需要的人数相对较少，作为部署在海外的军力，它也很难直接影响国内政治。陆军军人的独裁随处可见，但却从来没有过海军独裁这回事。几乎各个阶级的英国人都从心底反感趾高气扬的军官，反感马刺的叮当声和军靴踏在地上的声响。早在希特勒声名远播几十年前，“普鲁士”一词在英国人眼中的意思和如今的“纳粹”一样。这种情感的影响极其深远，以至于近百年来，和平年代的英国军官们在业余时间总是身着便装。

通过观察一个国家军队的阅兵步伐，我们就能又快又准地看出这个国家的社会氛围。和芭蕾一样，阅兵其实是一种仪式性的舞蹈，反映着某种生活哲学。以正步为例，它是世上最骇人的场景之一，比俯冲式轰炸机恐怖得多。它是赤裸裸的炫耀武力，有意要传达军靴践踏人脸的景象。丑陋是其本质的一部分，因为它想传达的话语就是“是的，我很丑陋，但你却不敢笑话我”，就像欺凌弱小的人向受害者扮鬼脸一样。为什么英国人不走正步呢？天知道有多少军官想要推行这种东西。英国人不走正步，是因为路人会发笑。某种程度上说，只有在那些普通民众不敢嘲笑军队的国家，炫耀武力的做法才行得通。直到意大利完全落入德国掌控之后，意大利人才接受了正步，而且不出意外，意大利人的正步走得不如德国人好。如果法国维希政府幸存下去，残存的法国军队一定会推行更加严格的阅兵纪律。英国军队的训练既严格又复杂，充满了18世纪的痕迹，但并没有明目张胆的虚张声势；军队的齐步走只不过是正式一些的步行。这当然是一个在利剑统治下的社会，但这把利剑却永远

都不能出鞘。

尽管如此，英国文明的优雅之中也混杂着野蛮和与时代不符的东西。我们的刑法就像伦敦塔里收藏的火枪[8]一样已经落后于时代。为了惩罚纳粹冲锋队员，你不得不指派那种典型的英国人物——惯于判处绞刑的法官，让这些思想扎根于19世纪、饱受痛风之苦的老恶棍来签发野蛮的判决。绞刑在英国依然适用，犯人依然会被九尾鞭抽打。这两种刑罚不但可憎，而且残忍，但民众从未真心呼吁废除它们。人们像接受天气一样接受了它们（还有达特穆尔监狱和博斯托尔少年犯管教所）。它们是“法”的一部分，人们认为，法不可改变。

这又体现出了英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对宪政和法律的尊重，人们相信“法”高于国家、高于个人，它当然既残酷又愚蠢，但至少是廉洁的。

这并不是说人人都认为法律是公正的。谁都知道法律面前贵贱分明。但没有人会接受这种说法所暗示的东西，人人认为法律理应受到尊重，当法律不受尊重时，他们就会感到愤怒。“他们无权拘留我，我没做任何错事”或“他们不能这样，这是违法的”这样的话是英国氛围的一部分。所谓的社会公敌在这方面会有和其他人同样强烈的感觉。这一点体现在威尔弗雷德·麦卡特尼（Wilfred Macartney）的《狱墙能言》（*Walls Have Mouths*）和吉姆·费伦（Jim Phelan）的《监狱之旅》（*Jail Journey*）等以监狱为主题的书中，体现在对拒服兵役者的审判中那种庄重的愚蠢上，体现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名教授刊登在报纸上指责种种事件体现“英国司法不公”的来信里。人人都真心相信法律可以、应当，而且大体上将继续公正施行。那种无法无天，只论权力的极权主义思想从来都站不住脚。即便是知识界也只是在理论上接受了这一点。

假象可以成为亦真亦幻的事实，面具可以改变人的表情。那种认为民主和极权主义“一样”或“一样坏”的熟悉论调从未考虑到这个事实。所有这些论调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说法，半截面包和没有面包一样。在英国，人们依旧相信公正、自由和客观真相之类的概念。它们也许是假象，但却是强有力的假象。这种信念影响着行动，国民生活也因此而不同。看看你自己，你就是这句话的证据。橡胶警棍在哪里？蓖麻油在哪里？剑依然在鞘中，只要它还在那里，腐败就不会超过一定程度。比如说，英国的选举制度几乎就是公开的骗局。为了满足富有阶层的利益，公开操纵选举的办法有十几种之多。但只要公众心里没有发生某种深层转变，它就不会彻底腐败。当你来到投票点时，不会有人用枪逼着你如

何投票，选票的计数不会出错，也不会出现直接的贿选。就连伪善也成了有力的保护措施。惯于判处绞刑的法官——那些身穿猩红长袍、头戴假发的老恶棍——是英国的标志性形象之一；只有炸药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身处哪个时代，但他们至少会照本宣科地解释法律，而且无论如何都不会受贿。他们象征着现实与假象、民主与特权、谎言与正派的奇妙结合，象征着微妙的妥协之网。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这个国家才能维持着这个我们熟悉的样子。

三

我一直在说“民族”“英国”“不列颠”，好像这四千五百万人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但英国分为富英国和穷英国这个事实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吗？难道有人胆敢说一年能挣十万英镑和每周只挣一英镑的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吗？恐怕就连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读者都会有所不满，因为我用“英国”这个词比“不列颠”更频繁，好像伦敦周围诸郡以及英国北部和西部的人们没有各自独有的文化。

如果先考虑一下这个小问题，我们就能更好地掌握整体情况。所谓不列颠各民族确实都认为彼此之间差异很大。比如，如果你称一个苏格兰人为“英国人”，他并不会领情。从我们称呼这几个岛的名字多达六个这一点上，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这几个岛合起来叫英国、叫不列颠、叫大不列颠、叫不列颠群岛、叫联合王国，在高唱颂歌时也叫阿尔比恩。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英格兰南北两部分之间的差异也很突出。但在欧洲人面前，来自英国不同民族的两个人的差异却会悄然消失。除了美国人之外，很少有外国人能够分清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他们甚至连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都分不出来。在法国人眼里，布列塔尼人和奥弗涅人之间似乎差别很大，而马赛口音早就是流传于巴黎的笑话了。尽管如此，当我们提到“法国”或“法国人”的时候，我们把法国当成了一个整体，看成一个单一的文明，它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在外国人看来，就连伦敦人和约克夏人之间都表现出了很强的家族相似性。

而且，如果从外界观察，就连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异都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英国无疑存在着财富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比任何一个欧陆国家都更严重，只需看看最近的街道就可以看到这个事实。从经济角

度讲，英国当然有两个民族，如果不是三个甚至四个的话。但与此同时，绝大部分英国人都觉得他们属于同一民族，知道他们彼此相像，而不是更像外国人。爱国主义往往比阶级仇恨更有力，而且总是比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都有力。除1920年前后的一小段时间（“不干涉俄国”运动）之外，英国的工人阶级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不具国际性。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们眼看着自己的同志在西班牙慢慢地被绞杀，却连一次表示声援的罢工都没有举行过[9]。但当自己的国家（勒菲勋爵[10]和蒙塔古·诺曼爵士[11]的国家）面临危险时，他们的态度却大不相同。在英国面临侵略危险时，安东尼·艾登[12]通过电台发出了招募地方防卫志愿军的倡议。他在第一天里就得到了二十五万人的响应，在之后的一个月里又有一百万人应征。只要将这个数字和拒服兵役者的数目作个对比，我们就能看出这种传统的忠诚与新形式的忠诚相比，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在英国，爱国主义在不同阶级中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但依然像一根线一样几乎把各个阶级都连在了一起。置身事外的只有那些欧化的知识界人士。作为一种积极情感，中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比上层阶级更强烈。比如，和学费较高的公学相比，学费较低的公学里的学生更愿意参加爱国游行。但真正给国家带来危险的富人，那种拉瓦尔[13]、吉斯林[14]式的卖国贼恐怕很少。工人阶级当中蕴藏着深远但却无意识的爱国主义。在见到英国国旗时，工人们并不会心潮澎湃。但英国人著名的“孤立”和“仇外”心态在工人阶级身上表现得比资产阶级更明显。无论在哪个国家，穷人都比富人更爱国，但英国工人阶级的突出特点是他们对外国生活习惯的厌恶。即便被迫居于国外多年，他们也还是会拒绝接受外国菜，拒绝学外语。几乎每一个出身于工人阶级的英国人都认为，读准外语词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工人阶级少有地深入接触了外国人。这种接触的唯一结果是，他们带回了对所有欧洲人的仇恨，德国人除外，因为他们钦佩德国人的勇气。他们甚至在法国驻扎了四年之后都没学会享受葡萄酒。英国人的孤立倾向和他们拒绝认真对待外国人的做法是愚蠢的，有时还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这也是英国神秘性的一部分，有些知识分子试图纠正这一点，但他们的影响总体而言也是弊大于利。事实上，正是英国人的这种特点，既让游客退避三舍，又让侵略者望而兴叹。

这里，我们又回到了上一章开头看似不经意间提到的英国人的两个性格特征。一是缺乏艺术才能。这恐怕和说英国人身处欧洲文化之外是一个意思。因为他们只在一种艺术形式上表现出了十足的天赋，也就是文学。但这同样也是唯一一种无法跨越国界的艺术。文学，尤其是诗

歌，只是一种家庭笑话，对说其他语言的人几乎没有价值，抒情诗受到的限制最为严重。除了莎士比亚之外，顶尖的英国诗人在欧洲大陆都很少为人所知，甚至根本没人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拜伦是唯一一个作品流传甚广的诗人，但欧洲人欣赏他却是出于错误的原因；而奥斯卡·王尔德只是被当成英国式伪善的受害者而受人怜悯。尽管不那么明显，但与之相关的另外一点是英国人哲学思维的欠缺，几乎所有的英国人似乎都不需要有序的思维体系，甚至连逻辑都不需要。

某种程度上说，民族团结的意识取代了“世界观”。因为爱国主义的普遍存在，即使富人也不能置身事外，有些时候，整个民族能够迅速团结起来做同一件事，就像面对着狼的牛群一样。在法国的军事灾难发生之后，我们就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在对这场战争的意义茫然思考了八个月之后，英国人突然认清了他们要干什么：首先，让大军从敦刻尔克撤退，其次就是阻止侵略。这仿似巨人的觉醒。快！危险！参孙哪，非利士人拿你来了！[15]接着立刻就是敏捷的统一行动——而之后，唉，又很快地睡了回去。在一个分裂的国家，这恰恰会是大规模和平运动发起的时刻。这是否意味着英国人的本能总是能让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呢？完全不是，它只不过能让英国人做相同的事情罢了。以1931年的大选为例，我们非常一致地犯了错误。我们和加大拉的猪群[16]一样心无旁骛。但老实说，我并不认为我们是被违心地赶下悬崖的。

由此可见，英国的民主其实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虚伪。外国观察家只注意到了严重的贫富不均，不公正的选举制度，以及统治阶级对报刊、电台和教育的控制，并因此得出了他们的结论，认为民主只不过是独裁的雅称。但这种观点忽视了不幸存在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广泛共识。不管你多想否认这一点，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英国政府在1931年到1940年期间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它容忍了贫民窟、失业和怯懦的外交政策。这是事实，但民意同样如此。这是一段停滞期，其间的领袖尽是平庸之辈。

尽管有几千人掀起了左翼运动，但相当确定的是，大部分英国人都支持张伯伦的外交政策。而且，相当确定的是，张伯伦思想上的挣扎同样也发生在普通人的脑海里。反对他的人称他为邪恶狡猾的阴谋家，密谋把英国出卖给希特勒；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只不过是一个糊涂的老人，按照自己糊涂的考虑尽了全力。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他自相矛盾的政策，解释他为何错过了所有机会。和大多数民众一样，他既不想为和平，也不想为战争付出代价。民意始终是支持张伯伦的，支持着那些

总是相互矛盾的政策。在他前往慕尼黑的时候，在他试图和俄国达成和解的时候，在他对波兰做出承诺的时候，在他履行这个承诺的时候，在他三心二意地谴责战争的时候，民意都支持着他。直到他的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已经显而易见时，民意才开始反对他，也就是说，开始反对自身七年来的软弱。于是，英国人民选择了一个更合其脾性的领袖——丘吉尔，他至少明白，仗不打是赢不了的。

这是说英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吗？不是，就连《每日电讯报》的读者也不会轻信这一点。

英国是天底下阶级色彩最浓重的国家。这是一个势利与特权的国度，统治者大多是老人和愚人。但在算计这个国家时，必须考虑到它情感上的团结，和面临巨大危机时全民同仇敌忾的可能。这是唯一一个没有迫使数以十万计的国民流亡国外，没有把他们送入集中营的欧洲大国。在战争开始一年之后的今天，依然有人在街上售卖辱骂政府、褒扬敌人和呼吁投降的报纸和小册子，这样的行为几乎不受干预。与其说这是言论自由的表现，不如说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些东西无关痛痒。让《和平新闻》（*Peace News*）这样的东西继续出售对安全并没有什么损害，因为可以肯定的是，95%的国民根本就不会想去看这些东西。整个民族被看不见的锁链捆绑在了一起。平时，统治阶级总是会掠夺民众，会胡乱治理，会阴谋破坏，会把我们带入困境；但只要能让他们看到民意，自下而上地给他们一种无法视而不见的推力，他们就很难不做出反应。左翼作家把整个统治阶级斥为“亲法西斯派”的言论是对实际情况的过度简化。即便在那些把我们带到如今境地的政客圈子当中，蓄意叛国的人是否存在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类腐败在英国极少发生。英国的腐败几乎都更像是自我欺骗，好像假装右手不知道左手干了什么。由于这种无意识，腐败是有限的。这在英国媒体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英国媒体诚实吗？一般说来是非常不诚实的。所有重要的媒体都依赖广告主生存着，广告主也对新闻进行着间接的审查。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有哪家英国报纸可以拿现钱明目张胆地贿赂。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现象，绝大部分报纸都可以像买奶酪一样被收买。英国的公众生活在明面上从来都不会如此肮脏。它还没堕落到让骗子落地生根的地步。

英国并不像莎士比亚经常为人引用的那句话所说，是镶着宝石的岛屿，也不像戈培尔博士所描述的那样是地狱。它更像一个家庭，一个保守的维多利亚式家庭，家中败家子不多，但却不乏丑事。家里有人人叩

头跪拜的富亲戚，也有被饱受欺凌的穷亲戚，还有人就家中的收入来源问题结成了攻守同盟。在这个家庭里，年轻人往往被束缚着，而大部分权力却掌握在不负责任的叔叔伯伯和体弱多病的婶婶阿姨手里。尽管如此，它还是一个家庭，有着自己的语言和共同的记忆，在敌人靠近时会团结一致。这是由错误的成员掌权的家庭——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英国，这个说法恐怕最合适不过。

四[17]

也许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取胜的，但之后所有战争的第一场战役也都败在那里。统治阶级能力的退化是近七十五年来英国命运中最明显的事实之一。

1920到1940年间，这种退化以化学反应般的速度进行着。尽管如此，在本文写作时，这样一个统治阶级依然存在。如今的英国社会上层就像是一把换过两次刀刃和三次刀柄的刀，还是和19世纪中期差不多。1832年之后，旧地主贵族逐步丧失了权力，但这个群体没有消失，也没有拒绝改变，而是通过和取代了他们的商人、工厂主和金融家通婚，迅速地同化了他们。富有的船主和纱厂老板把自己伪装成乡绅，而他们的儿子在公学里学习的正是贵族的言谈举止，这些公学就是为此而建立起来的。统治英国的是一个贵族阶级，它不断地从新贵阶层吸收新成员。想想这些白手起家的人所拥有的能量，想想他们为了进入一个至少还有着公共服务传统的阶级花钱买路，人们也许还曾指望这种方式能够带来一些能干的统治者。

尽管统治阶级不知为何发生了退化，失去了它的能力、它的勇气，甚至最后也失去了它的冷酷，直到艾登或哈利法克斯这样的自命不凡的人作为非凡的天才脱颖而出。至于鲍德温[18]，我们甚至都不能用自命不凡这个词来抬举他。他只不过是个花瓶。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对国内问题的处理已经是一团糟，1931年到1939年间的外交政策更是举世称奇。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每个关键时刻，尽管拥有如此正确的本能，英国政治家全都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背后的事实是，富有阶级的整个权位早已不再正当。他们坐在统治者的位子上，在这个庞大的帝国和全球金融网的中心坐收渔利，然后花

光了这些钱——花在哪里了呢？公平地说，大英帝国的生活水平在很多方面高于国外。尽管如此，这个帝国仍然是欠发达的，印度沉睡在中世纪，各个自治领域一片空虚，外国人却因为猜忌而被挡在门外，就连英国国内也到处是贫民窟，失业率攀升。只有住在乡间大宅里的五十万人能实实在在地享受现行体制的好处。此外，小企业合并成大企业的趋势让富有阶级越来越多地丧失原有的作用，他们最终只享有对企业的所有权，从他们手里领取工资的职业经理人和技术人员替他们完成了那些工作。从很久之前开始，英国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毫无作用的阶级，靠着连自己也不知道投资在什么地方赚来的钱生活，这就是“有闲富人”，你可以在《尚流》（*Tatler*）和《旁观者》（*Bystander*）杂志上看到他们的照片，他们也总是以为旁人想看看他们的样子。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他们的存在都是不合理的。他们不过是寄生虫而已，对社会的贡献还不及跳蚤对狗的贡献。

到了1920年，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切。而到了1930年，已经有好几百万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英国的统治阶级显然不会承认自己已经百无一用。一旦他们承认了，那就得放弃权力。他们不可能把自己变成纯粹的匪徒。他们像美国的百万富翁那样有意识地牢牢抓住不公的特权，通过贿赂和催泪弹来打击对手。他们毕竟还属于一个有着一定传统的阶级，他们曾经接受过公学教育，在必要的情况下为国捐躯是公学里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戒律。哪怕是在掠夺同胞的时候，他们也必须相信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显然只有一条路可逃——逃向愚蠢。他们之所以能维持社会现状，仅仅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改良的可能性。尽管这很难，但通过把眼光锁定在过去，通过对周遭的改变视而不见，他们还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这可以解释英国的很多事情。它解释了乡村生活的堕落，因为驱使较有干劲的一部分劳工离开土地的伪封建制还在继续。它解释了公学的守旧，这些公学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改变。它解释了军队的无能，这种无能一次又一次地震惊世界。自19世纪50年代起，英国参加的每一场战争都以一系列灾难开局，灾难之后挽回局面的都是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人。出身贵族的中高级指挥官从来都不能为现代战争做好准备，因为要做好准备就必须先承认世界正在变化。他们总是坚守过时的战法和武器，因为他们会不可避免地把每一场战争都看成是上一场的重复。在布尔战争之前，他们按照祖鲁战争的模式备战；在1914年之前，他们按照布尔战争的模式备战；在如今的这场战争之前，他们是按照一战的模式准备的。即便是现在，英国还有几十万人正在接受刺杀训练，

而刺刀这东西如今除了开罐头之外已经毫无用处了。值得一提的是，海军和近来的空军总是要比陆军正规军更有战斗力。但海军只是部分处在统治阶级势力范围内，而空军则几乎完全不受他们掌控。

必须承认，只要万事安宁，英国统治阶级的做法对他们大有益处。臣民显然都容忍着他们。不管英国的组织形式有多不公，至少它没有被阶级冲突撕裂，没有被神出鬼没的秘密警察困扰。没有任何一个面积与大英帝国相当的国家曾像它这般平静。在它辽阔的疆域里，军人总数甚至还不如一个巴尔干小国。单纯从自由和消极的角度来看，英国的统治阶级作为高高在上的人，确实有理由存在。他们比那些真正的现代人，比纳粹和法西斯更可取。但长久以来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在任何严重外患面前都无能为力。

英国统治阶级认为，法西斯主义和自己站在一边，他们也没有全错。事实上，任何没有犹太血统的有钱人对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恐惧都甚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一点，因为掩饰这点是德国和意大利全部宣传工作的目标。与希特勒议和是约翰·西蒙、塞缪尔·霍尔和张伯伦等人的天性。但是——就在此刻，我之前提到的英国生活的一个特点，那种深切的民族团结发挥了作用——他们要想这样做就只有将帝国拆散，只有出卖英国人民，让他们陷入半奴隶状态。一个真正腐败的阶级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就像我们在法国看到的那样。但在英国，事态并没那么严重。在英国的公众生活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奴颜婢膝地宣扬“为征服者效忠的责任”的政客。在收益和原则之间摇摆不定的张伯伦等人只能两头吃亏。

有一件事总能让我们看到英国统治阶级道德上的可靠，那就是他们在战争期间甘愿为国捐躯。最近在法兰德斯的战斗中，好几位公爵、伯爵等贵族战死疆场。如果他们真的像有人说的那样是自私自利的无赖，事情就不会是这样。很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误解他们的动机，否则便无法预测他们的行为。他们不会当叛徒，在战斗中也不会是懦夫；我们应当预料到他们的愚蠢、无意识的破坏和一贯做出错误决定的本能。他们并不坏，或者说并不那么坏；他们只是不可教化而已。只有在丢失了金钱和权力之后，他们当中的年轻人才会开始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

五

大英帝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里的停滞影响了每一个英国人，但给中产阶级之中的两个重要阶层的影响尤为直接。其一是有军人背景和帝国主义思想的中产阶级，人们给他们起了“老顽固”的绰号；其二则是左翼知识分子。这两个看似敌对、具有象征意义的群体——领取半薪、像恐龙一样脖子粗脑袋小的上校，以及前额隆起、脖子细如草梗的博学之士——在精神上其实是相同的，彼此之间互动频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很大程度上属于同一家族。

三十年前，“老顽固”阶级就已经在逐渐丧失活力。吉卜林颂扬的那种子嗣繁盛却缺乏文化修养，身为陆海军军官的儿子们驻守在从育空河到伊洛瓦底江的所有荒凉之地的中产阶级家庭早在1914年前就已经开始衰落。扼杀他们的是电报。随着时空距离的缩短，白厅掌管的事务越来越多，个体发挥主动性的空间逐年缩小。克莱武[19]、纳尔逊[20]、尼科尔森[21]和戈登[22]这样的人物在如今的大英帝国中将毫无立足之地。到1920年，几乎每一寸殖民地都被白厅牢牢掌握着。充满善意又过度开化、身穿黑衣头戴黑帽、左前臂夹着收拾利落的雨伞的人们，把他们停滞不前的人生观强加于马来亚、尼日利亚、蒙巴萨和曼德勒。曾经的帝国缔造者如今却成了办事员，在堆积如山的文牍中越埋越深。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我们曾见证过那些享受过更多自主权的年长官员在这种改变中的无力挣扎，这种情形遍及整个大英帝国。从那时起，英国几乎再也无法让那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参与帝国的治理。在政界之外，商界的情形也是如此。大型垄断企业吞噬了许许多多的小型贸易商。人们不再深入印度寻求那些充满风险的买卖，而是选择在孟买或新加坡坐办公室。孟买和新加坡的生活事实上比伦敦更加无趣和安逸。主要由于家庭传统的影响，帝国主义情绪在中产阶级当中依旧强烈，但充当帝国治理者的工作却不再有吸引力。若是有办法逃避，有能力的人们极少会去向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地方。

帝国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普遍衰落，以及整个大英帝国的斗志在某种程度上的低落，部分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功劳，他们正是在帝国发展的停滞中成长起来的。

需要注意的是，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无一不“左”。T.E.劳伦斯[23]也许是最后一个右翼知识分子。从1930年前后开始，每一个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都生活在对现存秩序长期抱有不满的状态中。这是必然的，因为社会结构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空间。在一个走向了停滞，既不能继续发展又没有分崩离析的帝国中，在这个统治者除了愚蠢之外

什么能力都没有的英国，“聪明”成了值得怀疑的同义词。如果你的才智足够理解T.S.艾略特的诗和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上级官员就会注意到你，将你排除在所有重要岗位之外。只有在文学评论界和左翼政党中，知识分子才能找到自己的角色。

要研究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可以从他们的五六份周报和月报入手。牢骚满腹的消极态度是它们最突出的特点，而且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设性意见。他们除了从未掌握过权力，而且也从不想掌权所特有的不负责任的牢骚之外，他们身上也不剩下什么了。他们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作为生活在思想世界，极少接触现实社会的人，他们的情感十分浅薄。很多左翼知识分子在1935年前都是软弱的和平主义者，在1935到1939年间却大声疾呼对德国开战，而在战争真正开始之后却又迅速平静了下来。尽管不那么准确，我们还是可以大体上说，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叫嚣“反法西斯”最响的人，也正是如今最卖力地鼓吹失败主义的人。这种表现背后，是关于大部分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与英国大众文化的背离。

至少从目的上看，英国知识分子已经欧化了。他们的技法得自巴黎，观点取自莫斯科。在全国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背景下，他们形成了一个不同政见的孤岛。英国也许是唯一一个让国内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国籍为耻的大国。在左翼圈子里，总会让人觉得当英国人有些丢脸，让人觉得自己有义务嘲笑从赛马到牛油布丁在内的所有英国风物。这一点很是奇怪，但毫无疑问的是，几乎所有英国知识分子都觉得，在《天佑吾王》奏响时立正行礼要比从捐款箱里偷钱更可耻。在英国面临的每一个危急时刻，总是有很多左翼人士在不停削弱英国人的士气，有时鼓吹全面的和平主义，有时极力宣扬亲俄观点，不过在反英上却始终如一。这种做法到底有多大效果还值得怀疑，但它必定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果英国人民的士气连续多年被不断削弱，让法西斯国家认为他们已经变得“颓废”，觉得贸然发动战争并没有什么危险，左翼知识分子的破坏要对此负一定责任。《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和《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都曾强烈反对慕尼黑协定，但即便是它们也曾为这份协定的签署做过贡献。对“老顽固”们持续十年之久的系统性辱骂，甚至让老顽固们自己都受到了影响，而且让聪明的年轻人们比过去更加不愿参军。在帝国陷入停滞的背景下，有军事背景的中产阶级注定要退化，但肤浅的左派观点加快了这一进程。

显然，英国知识分子在过去十年中作为纯粹的消极人物的特殊地位

和单纯反对“老顽固”的立场，都是统治阶级的愚蠢所带来的副产品。社会无法利用他们，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对国家的热爱需要“不分甘苦”。老顽固和博学之士都把爱国主义和才智的分离看成理所当然，仿佛那是一种自然定律。如果你是爱国者，你会去读《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会因为自己“不聪明”而公开感谢上帝。假如你是个知识分子，你会去嘲笑英国国旗，认为血气之勇是野蛮的表现。这种荒谬的思维惯性显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布鲁姆斯伯里派的学者与他们机械性的嘲讽和骑兵军官一样落后于时代。爱国主义和才智需要再次走到一起来。我们确实正在打仗，这场特殊的战争也许会为它们的结合创造可能。

六

中产阶级向上层和下层的扩展是英国在过去二十年间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这种变化的规模是如此之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小业主）社会分级几乎已经不再适用。

英国的不动产和财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现代英国，除了衣服、家具，可能还有房子之外，很少人能拥有别的什么东西。农民很久之前就已不见，独立店主正在消失，小商人的数量也在大量减少。但与此同时，现代工业的复杂性要求它雇佣大批经理、销售、工程师、化学家和其他各种技术人员，而且他们的工资都相当高。这种变化又造就了一个由医生、律师、教师、艺术家等群体构成的专业人员阶层。因此，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趋势是扩大中产阶级，而不是像曾经看起来的那样要消灭他们。

但中产阶级思想与习惯在工人阶级中的扩散要远比这种变化更重要。与三十年前相比，英国工人阶级几乎有了全面改观。这部分归功于工会的努力，部分归功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即便实际收入不变，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在某些严格条件下依然可以提高。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我发展。不论一个社会的组织形态多么不平等，某些特定的技术进步也注定会让社会整体得利，因为有些商品必须由大家共享。比如，百万富翁不能让路灯只为自己点亮，而要他人摸黑。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公民如今都享受着良好的道路、洁净的饮水、警察的保护、免费的图书馆，也许还有一定程度的免

费教育。英国对公共教育的资金投入十分有限，但它依旧得到了发展，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师们全心全意的努力；阅读的习惯也比过去更为普及。富人和穷人阅读同样书籍的情况越来越常见，而且他们还在看着同样的电影，听着同样的广播节目。随着平价服装的大批量生产和住房条件的改善，穷人和富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也越来越小。从外表看，穷人和富人在着装上的差异，尤其是女性服装的差异，比三十年甚至十五年前小了很多。在住房问题上，贫民窟这种文明的污点在英国依然存在，但在过去十年里完成了很多住房项目，其中很多是由地方政府建设的。现代化的政府公屋里有浴室，也有电灯，它们虽然比证券经纪人的乡间别墅小很多，但看起来却像是同一类房子，和农场雇工的小屋完全不同。在政府公屋里成长起来的人可能——其实这已是明显的事实——在思想上比成长在贫民窟里的人更接近中产阶级。

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就是举止上的全面变化。现代工业对体力劳动的需求越来越低，人们下班之后相比过去更有精力，人们的行为举止因此进一步变化。很多轻工业工人的劳动强度还不及医生或杂货店主。在品位、习惯、礼节和观点上，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日益趋近。不公平的差别依然存在，但真正的不同却在减小。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穿无领衫、胡子拉碴、因为重体力劳动而肌肉扭曲的人——依然存在，但他们的人数正在不断减少，只有在英格兰北部的重工业区才在工人当中占多数。

1918年后，一种前所未见的新事物在英国出现：社会阶级划分不明的人。在1910年，只要看看衣服举止，听听口音，你就能迅速确定这片岛屿上每一个人的“分类”。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至少，在那些因为廉价汽车和工业南迁而发展起来的新城镇中已经无法这么分类了。要想寻找未来英国的萌芽，就要把眼光放到轻工业区和交通干线沿线。在斯劳、达格南、巴尼特、莱奇沃斯和海斯——几乎所有大城市的周边——传统的模式正渐渐被新模式所取代。在这片玻璃和砖石的荒原上，找不到旧式城镇里贫民窟与公馆的鲜明对比，也看不到乡村里田园大宅与肮脏村舍之间的显著差异。这里的收入差异也不小，但人们却过着同一种生活，只是水平高低不同，他们都住在混凝土公路旁的廉价公寓或政府公屋里，同享游泳池里赤裸裸的民主。这是一种没有宁静、没有文化的生活，一切都围着罐头食品、《图片邮报》（Picture Post）、收音机和内燃机转。在这样的文明中长大的孩子精通永磁发电机，却对《圣经》一无所知。属于这一文明的是那些最明确无误地属于现代世界，在其中过得最舒适的人，那些技术工人、高薪的熟练工人、飞行员和他们

的机械师、无线电专家、电影制片人、当红记者和工业化学家，等等。他们同属一个无法定位的阶层，传统的阶级区分正从这里开始消失。

只要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不被打败，这场战争就将带走现存的大部分阶级特权。希望保留它们的人每天都在减少。我们也不用担心这种形式上的改变会让英国生活失去它特有的韵味。大伦敦地区新出现的红色市镇十分粗糙，但这些只不过是伴随着改变而出现的阵痛。无论从战争中重新崛起的英国会是什么样子，前文提到过的种种特征都将深深地印在它身上。想看到英国被俄国化或德国化的知识分子会感到失望。那种文雅、伪善、缺乏思辨、对法律的尊重和对制服的仇恨都将继续存在，当然也依然会有牛油布丁和阴霾的天空。只有长期被外敌占领之类的深重灾难，才能摧毁一国的文化。证券交易所的行情会走低，马拉犁会被拖拉机取代，乡村庄园会变成孩子们的假日野营地，伊顿和哈罗之间的竞争将被遗忘，但英国仍然会是英国，像永生的生灵一样走过过去与未来，如同芸芸众生，尽管面目全非，内里却依旧如故。

---

[1] 本文为《狮子与独角兽》的第一部分。

[2] 六月清算，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希特勒对纳粹冲锋队及其领导者恩斯特·罗姆发起清算行动，纳粹政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处决，至少有85人死于清算，大多数死亡者为纳粹冲锋队成员。此事件又称长刀之夜或蜂鸟行动。

[3] 党代会，指纳粹党1923至1938年间一年一度举行的集会。1933年纳粹党夺权后，党代会成为纳粹政治宣传的重要途径。

[4] 青年团，即大德意志青年运动（Greater German Youth Movement），是纳粹青年组织希特勒青年团的前身。希特勒青年团是纳粹德国唯一的青年组织，成员人数达870万人左右，占当时德国青年的98%。

[5] 红衣大兵，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多数英国士兵制服上衣均为红色。

[6] 比如：
我不想当这该死的兵，
我不想走向战争；
我再也不想闲逛，
我更想待在家中，
靠妓女挣钱为生。
他们的战斗精神却和这首歌里唱的不一样。（作者原注）

[7] 科伦纳渡海撤退，在1808年半岛战争期间，英国陆军中将约翰·穆尔爵士率军增援西班牙的英军，在被切断到葡萄牙的退路后被迫从科伦纳撤退。穆尔在反击作战中阵亡，但该反击战确保了英军顺利撤退。

[8] 现在的伦敦塔主要是一个旅游景点，塔中有皇家军械库收藏的大量精美旧式武器。

[9] 他们确实以资金形式提供了部分支援。尽管如此，支援西班牙的各种基金所募集到的资金合起来还不到同期赌球资金的百分之五。（作者原注）

[10] 勒菲勋爵（The Lord Nuffield，1877-1963），英国汽车资本家、慈善家。

[11] 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1871-1950），英国银行家。

[12] 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1897-1977），英国政治家，二战时担任外相，后在20世纪50年代出任英国首相。

[13] 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1883-1945），法国政治家，曾任总理。二战期间支持菲利普·贝当上台，法国沦陷后任维希政府副总理、总理，二战结束后被巴黎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

[14] 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1887-1945），挪威军人、政治家，挪威沦陷后任政府总理，二战后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

[15] 语出《圣经·旧约·士师记》第十六章第二十节。

[16] 加大拉的猪群，典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节，耶稣把鬼赶入猪群，结果猪群闯下山崖，落海淹死。

[17] 此部分为节选。

[18] 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出任财政大臣及三任英国首相，被舆论认定为战前绥靖政策的支持者。

[19] 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1725-1774），英国军人、政治家，为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建立起军事、政治霸权，是英属印度殖民地建立过程中的早期关键人物。

[20] 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英国著名海军将领，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中击溃法国及西班牙组成的联合舰队，于战事进行期间中弹阵亡。

[21] 约翰·尼科尔森（John Nicholson，1822-1857），英国军人，英属印度传奇人物，在镇压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

[22] 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1833-1885），英国军官。因在中国指挥“常胜军”协助清军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获清朝皇帝封赏而被取绰号为“中国人”。后任苏丹总督，被民族起义暴动军队斩首。

[23] T.E.劳伦斯（T.E.Lawrence，1888-1935），也称“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英国军官，在1916年至1918年的阿拉伯起义中作为英国联络官的角色而出名。许多阿拉伯人将他看成民间英雄，推动了他们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统治中获得自由的理想。

威尔斯、希特勒与世界国

自作聪明的人说，英国会在三月或四月遭到毁灭性打击……我很难想象，希特勒能拿什么来打击。他那不断消耗、四处分散的军事资源现在恐怕不比在希腊和非洲一试身手前的意大利强多少。

德国的空军力量已是强弩之末。它落后于时代，而且大部分一流人才不是已经战死，就是士气低落、筋疲力尽。

1914年，霍亨索伦王朝的军队天下第一。如今那个在柏林声嘶力竭的矮个白痴背后却没有这样的军队……而我们的军事“专家”还在讨论它那徘徊的幽灵。在他们的想象中，它有着完美的装备和无敌的纪律。它会向西班牙或北非发起决定性“一击”，或者是踏过巴尔干各国，从多瑙河走向安卡拉、波斯、印度，或者是“打垮俄国”，或者从勃伦纳山口“涌进”意大利。几周时间过去了，这个幽灵却完全没有那么做——这有一个极好的解释。它并没有那样的实力。希特勒入侵英国的愚蠢佯攻挤占和浪费了它本不充足的枪炮和弹药。在人们慢慢认识到闪击战已经不再奏效，认识到战争的报应就在眼前的时候，它那外强中干的纪律就越发懈怠。

这些话并不是从《骑兵季刊》（*Cavalry Quarterly*）里摘出来的，而是选自H.G.威尔斯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现在又结集成《新世界指南》（*Guide to the New World*）一书重新发表。在这些文章写成后，德军占领了巴尔干国家，而且夺回了昔兰尼加[1]，它随时可以穿过土耳其和西班牙，并且已经开始入侵俄国。我不知道这场战争结果如何，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还有一定话语权的德国总参谋部对三个月内取胜不是很有把握的话，它也许就不会发动战争。有关德军只是虚张声势，德军装备不足，德军士气低落之类的说法还是省一省吧。

威尔斯要拿什么来对抗“在柏林声嘶力竭的矮个白痴”呢？只是他关于世界国的老调重弹，加上试图给基本人权和反极权运动下定义的《桑基宣言》[2]。他如今尤其关心通过世界联邦掌控空军军力的主意，除此之外，他宣讲的还是那一套四十年来一成不变的福音，总是带着一种发现别人连如此浅显的东西都不懂时又惊又气的态度。

说我们需要一个世界联邦来掌控空军有什么用呢？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来实现它。指出世界国值得拥有又有什么用？问题在于，五大军事强国无一愿意考虑服从这个东西。过去几十年来，所有明智的人都大致认同威尔斯的说法；但这些明智的人手中没有权力，而且他们太多时候不愿牺牲自己。希特勒是个有罪的疯子，而且有百万大军、上万架飞机和数万辆坦克。正是因为他，一个伟大的民族自愿苦干六年，然后再打上两年的仗；而为了威尔斯提出的常识性的、本质上是快乐主义的世界观，却几乎没有人愿意流一滴血。要想谈论世界重建，甚至是谈论和平，都必须首先消灭希特勒，这意味着带来一种新生力量，它未必和纳粹相当，但对“开化”的快乐主义者来说也许十分难以接受。是什么在过去一年里让英国站住了脚跟呢？无疑，部分是某种关于更好的未来的含糊信念，但主要还是原始的爱国主义情绪，以及英语民族在外国人面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过去二十年来，打破这种感情是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主要目标，如果他们成功了，我们此刻也许就能看见党卫军在伦敦街头巡逻。同样，为什么俄国人会像猛虎一般抵抗德国的侵略呢？也许部分是因为某些已经记不太清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但主要目的却是保卫神圣的俄罗斯（“祖国的神圣土地”云云），斯大林用一种略有差异的形式复活了这个概念。真正能影响这个世界的力量都源自情绪——种族自豪、领袖崇拜、宗教信仰、对战争的热爱——自由派知识分子机械地把这些感情看成过时的东西，他们往往把自己身上的这些感情摧毁殆尽，以至于完全丧失了行动的力量。

说希特勒是反基督者或圣灵的人们，要比某些知识分子更接近于理解真相，在这痛苦的十年中，那些知识分子始终认为他不过是喜歌剧中无足重轻的角色。这种思想所反映的其实是英国生活不受外界侵扰的状况。左翼图书俱乐部实际上是苏格兰场[3]的产物，正如和平誓言联盟是海军的产物一样。“政治图书”这种混杂着历史与政治批评、变得更厚重的宣传册子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出现，这是近十年来的一大发展。但是这种书的优秀作者们——托洛茨基、劳施宁[4]、罗森堡[5]、西隆尼[6]、博克瑙、库斯勒[7]等人——都不是英国人，而且几乎都是某个极端主义政党的变节者，都曾近距离观察过极权主义，了解流放和迫害的意义。只有在英语国家，希特勒是无足轻重的狂人、德国坦克是纸老虎这种看法才会在战争临头时依旧时髦。从我上面摘引的话中可以看出，威尔斯现在依然相信类似的说法。我认为，不论是空袭还是希腊战役，都没能改变他的观点。终生不变的思维习惯让他无法理解希特勒的力量。

与狄更斯一样，威尔斯也属于没有军事背景的中产阶级。他显然对枪炮的轰鸣、马刺的叮当作响和传统旗帜飘过时的哽咽无动于衷。他对生活中的战斗、狩猎和冒险怀有坚定的仇恨，这都体现在他早期作品中对骑兵的激烈诋毁。军事冒险家拿破仑是他的《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的头号恶棍。如果有人看过他过去四十年的全部作品，就会发现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为构建有计划的世界国而努力的科学人物和试图恢复过去混乱局面的反动人物之间的一种假想的对立。在小说、乌托邦、散文、电影、宣传册中，这种对立都以多少相似的形式出现，一面是科学、秩序、进步、国际主义、飞机、钢铁、混凝土和卫生，另一面是战争、民族主义、宗教、君主制、农夫、希腊语教授和骑兵。在他看来，历史就是科学主义者对浪漫主义者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他认为一个“合理”、有计划、由科学家而不是巫医来治理的社会迟早会到来，这种想法现在也许是对的，但如果说它马上就要实现，却是另一回事。这种错误认识在威尔斯对待纳粹的态度上以相反的形式再次出现。希特勒是有史以来所有军阀和巫医的集大成者。因此，威尔斯指出，他是荒谬之人，是来自过去的幽灵，注定会很快消失。但不幸的是，科学和常识并非总是相等。飞机就能说明这个事实，人们原本期待飞机推动文明的发展，但它事实上除了扔炸弹之外别无用处。现代德国远比英国更科学化，但也远比英国野蛮残暴。威尔斯所想象和努力的很多东西已经在纳粹德国成为现实。秩序、计划、国家对科学的鼓励、钢铁、混凝土、飞机，这些在德国都有，但却都在为那些只适用于石器时代的思想服务。科学正在为了迷信而奋战，这显然是威尔斯无法接受的。这和他的作品赖以为基础的世界观相悖。军阀和巫医必将倒下，而属于常识的世界国，正如一个不为军号所动的19世纪自由主义者所见，必将胜利。只要没有背叛和失败主义，希特勒就不可能成为威胁。所谓他的最终取胜，就像詹姆斯二世党人复辟[8]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历史逆流。

但是，像我这么大（38岁）的人对H.G.威尔斯的批评岂不是意味着杀害亲人吗？某种意义上说，生于世纪之交的理性人正是由威尔斯创造出来的。纯粹的作家，尤其是作品能够很快产生影响的“流行”作家能有多少影响力，这个问题还有待解答，但我怀疑在1900到1920年间写书的人里，至少在用英语写作的人里，还有谁对年轻人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如果威尔斯未曾存在过，我们所有人的思想，还有这个现实世界，都会和现在大相径庭。只不过，思想上的单一，以及让他看似爱德华七世时代优秀预言家的想象力，让如今的他成了一个肤浅、不够格的思想家。在威尔斯年轻时，科学与反动之间的对立所言非虚。当时统治社会

的是那些心胸狭窄、毫无好奇心的人——以掠夺为业的商人、头脑呆滞的乡绅、主教、能够引用贺拉斯但却从未听说过代数学的政客。科学被看成不光彩的东西，而宗教信仰却是强制性的。传统主义、愚蠢、势利、爱国主义、迷信和好战似乎都站在同一边，需要有人来表达不同观点。在20世纪初，发现H.G.威尔斯对男孩子来说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在一个充满了学究、教士和高尔夫球手的世界里，未来的雇主警告你“不努力就滚”，父母系统性地扭曲你的性生活，愚蠢的教师因为他们的拉丁语短语而窃笑；而这时却有个出色的人能对你讲外星居民和海洋深处的故事，还知道未来和那些体面人的想象不一样。早在飞机制造在技术上可行之前十年左右，威尔斯就已经知道人类过不了多久就能飞翔。他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自己也想要飞翔，因此坚信人们会继续在这方面努力探索。另一方面，哪怕在我小时候，在莱特兄弟已经成功让他们的机器离开地面五十九秒之后，人们依然普遍认为，如果上帝想让我们飞翔，他就会让我们拥有翅膀。直到1914年，威尔斯还大体是个名副其实的预言家。从现实细节上看，他对新世界的远见已经应验到了惊人的程度。

但因为他属于19世纪，属于一个非军事化的国家和阶级，所以他无法理解，那个在他心中以喜好猎狐的托利党人为代表的旧时代有着巨大的力量。他过去无法理解，现在依然无法理解的是，民族主义、宗教偏执和封建忠诚要远比他笔下的理智更有力。中世纪的产物一路踏进了现代，如果它们真是幽灵，那也是需要强有力的魔法才能制服的幽灵。真正透彻理解了法西斯主义的，不是那些受尽法西斯主义之苦的人，就是那些本身就有法西斯倾向的人。相比《美丽新世界》和《未来世界》（*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铁蹄》（*The Iron Heel*）等写于三十年前的粗糙作品更能准确地预言未来。如果要从和威尔斯同代的作家里面找出一个能对他的观点有所修正的人，我们也许可以选择吉卜林，他没有对权力和军事“荣耀”的恶魔之声充耳不闻，不论自己的观点如何，他都能理解斯大林的魅力所在。威尔斯太过理智，因而无法理解现代世界。写给下层中产阶级的系列小说曾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但却在另一场战争开始时戛然而止，之后便再未继续；1920年以来，他便把自己的才华挥霍在了与纸龙的战斗上。但无论如何，他毕竟还有才华可以挥霍。

---

[1] 昔兰尼加，在阿拉伯语中称为拜尔盖，是利比亚东部的一个地区，得名于古希腊城市昔兰尼。

[2] 《桑基宣言》，即《桑基人权宣言》（*Sankey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以英国工党政治家、曾任大法官的桑基勋爵命名，由H.G.威尔斯起草于1940年。

[3] 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所在地。

[4] 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1887-1982），德国保守派革命家，1932年加入纳粹党，1934年退出纳粹党后开始公开谴责纳粹，著有《与希特勒对话》（*Gespräche mit Hitler*）一书。

[5] 阿瑟·罗森堡（Arthur Rosenberg，1889-1943），德国作家、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1927年退出政党后转入学术领域，纳粹掌权后经瑞士移民英国。

[6] 依纳奇奥·西隆尼（Ignazio Silone，1900-1978），意大利作家、政治家，反斯大林主义，著有《方塔马拉》（*Fontamara*）等书。

[7] 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记者、批评家，犹太人。

[8] 詹姆斯二世党人复辟，1688年光荣革命后，詹姆斯二世被推翻，逃亡法国后致力于争取法国和西班牙支持其夺回英国王位。詹姆斯党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拥有广泛支持，许多詹姆斯党人认为，英国议会废黜詹姆斯二世是不合法的，试图策划恢复其王位，但最终失败。

鲁迪亚德·吉卜林

在为吉卜林这本诗选所作的长序中，艾略特先生竟如此保守，这真是令人遗憾；不过这也在所难免，因为在谈论吉卜林之前，人们必须摒弃那种由两类没有读过吉卜林作品的人所捏造的传说。吉卜林的地位很特别，他在五十年里一直名声不佳。在五代文学人中，所有进步人士都鄙视吉卜林；但到了最后，那些进步人士十有八九已被人遗忘，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却依然记得吉卜林。艾略特先生对于这点的解释无法让人满意，因为在回应吉卜林是“法西斯”这个浅薄而又熟悉的指责时，他犯了相反的错误，在无法辩护的地方为吉卜林辩护。他没有必要伪称文明人会接受甚至谅解吉卜林的生活观。例如，我们没有必要说，在描写英国士兵为抢钱而用通条抽打“黑鬼”时，吉卜林仅仅是作为记者在记录，而且他并不一定赞成自己记录下的东西。他作品中毫无迹象表明他不赞成那种做法；相反，他的作品中确实有种施虐狂的格调，而且他的残忍较同类作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吉卜林是一位信奉沙文主义的帝国主义者；他毫不顾及道德，他的审美也让人反感。我们最好先承认这点，然后再尝试解释为什么那些嘲笑他的风雅之士被尽数遗忘，而他却能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

尽管如此，我们还需回应吉卜林是“法西斯”这个指责，因为要想从道德上和政治上理解吉卜林，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他并非法西斯。与当今那些最仁慈或最“激进”的人相比，吉卜林离法西斯更远。人们反复引述他的话，却从不关注其语境，也不了解其意义。《退场赞美诗》（*Recessional*）中那句“无法无天的劣等民族”便是个有趣的例子。在那些左翼胆小鬼的圈子里，这句诗常常受到讥讽。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劣等民族”就是“土著人”，联想到戴着遮阳帽的老爷踢打苦力。从上下文来看，这句诗的意思恰好与此相反。“劣等民族”指的几乎肯定是德国人，尤其是指那些泛日耳曼作家；说这些人“无法无天”只是说他们不守法纪，而非无权无势。全诗习惯上被认为是肆意吹嘘，但实则是在斥责强权政治，既斥责英国，也斥责德国。其中两节值得引述（我将它们视为政治，而非诗歌）：

如果，迷醉于权力的盛宴，我们放纵

那对您毫无敬畏的狂野唇舌，

像无法无天的劣等民族，

抑或像非犹太民族那样，自吹自擂——

万物之主，与我们同在，

以免我们遗忘——以免我们遗忘！

因为野蛮的心灵相信

冒烟的枪管和纷飞的弹片，

和所有层层叠叠的遗骸，

以及守护；它不配您的守护，

因为它说过浮夸愚蠢的话语——

宽恕您的子民吧，主！

吉卜林的遣词多取自《圣经》。他在写第二节时，脑中想到的无疑是《诗篇》第一百二十七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些文字并没有给后希特勒时代的人们留下太多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没人相信会有比武力更强大的约束力，没人相信可以不依靠更强大的武力来战胜武力。世上没有“法则”，只有权力。我并不是说这是一种正确的信仰，我只是说这是一种现代人的确都有的信仰。否认这点的人，要么是智识上的懦夫，要么是拙劣伪装下的权力崇拜者，或者就是那些跟不上时代的人。吉卜林的观点属于前法西斯时代。他仍然相信骄傲会使人失败，上天会惩罚傲慢。他没有预见到坦克、轰炸机、广播、秘密警察，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心理效应。

我这样说是在否定我上面说的吉卜林的沙文主义和残忍吗？不是，这只是说19世纪的帝国主义态度和现代的歹徒态度是两回事。吉卜林无疑属于1885至1902年这段时期。一战及其后果让他深感苦恼，但他似乎

并未从布尔战争之后的种种事件中学到任何东西。英帝国主义处于扩张阶段时，吉卜林便对其大肆鼓吹（除诗歌以外，他那本鲜有人读的小说《消失的光芒》（The Light that Failed）也能让人感受到当时的社会氛围）。他还是英国1914年才开始转型的老式雇佣军队里的非官方史学家。他的全部自信，他那恣肆粗俗的活力，源自法西斯分子和近法西斯分子都没有的诸多局限。

吉卜林的整个下半生都郁郁寡欢，这无疑是因为他对政治的失望，而不是因为他在文学上的渺小。历史总不遂人意。在取得有史以来最辉煌的胜利后，英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已不如从前，而相当敏锐的吉卜林能看清这点。他所美化的那些阶级已无美德；年轻人不是纵情享乐，就是心怀不满；征服世界的欲望也已消散。他无法理解当时的情况，因为他全然不懂英帝国扩张背后的经济力量。很明显，他和普通士兵或殖民地官员差不多，似乎并未意识到英帝国首先是个挣钱的大企业。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是一种强行传教。用格林机枪对着一群手无寸铁的“土著人”，然后就能建立起包括公路、铁路和法院在内的“法则”。因此，吉卜林并没有预见到，那些造就了英帝国的动机，最终也会将其摧毁。例如，英帝国当初在马来半岛砍光丛林建立橡胶园的动机，就与现在将橡胶园完整地交给日本人的动机相同。现代极权主义者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而19世纪的英国人并不清楚。两种态度都各有优势，但吉卜林的态度却不可能转变。他毕竟是一位艺术家，所以他的态度和那些吃俸禄的官僚一样；那些官僚都看不起“小贩”，而且往往终其一生都不会明白“小贩”才是决定局势的人。

但是，因为他自认为属于官僚阶级，所以他有着一种“开明”人士很少有或从来没有的东西，也就是责任感。中产阶级左翼之所以憎恨他，是因为他的残忍和庸俗，同样也因为他的这种责任感。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左翼政党其实全都是骗子，因为他们自告奋勇地反对某种他们并不想摧毁的东西。他们有着国际主义的目标，同时他们又努力保持着与其目标不相容的生活水平。我们依靠剥削亚洲苦力而生活，而我们当中的“开明”人士全都认为应该解放苦力；但我们的生活水平，以及我们的“开明”，都要求将这种剥削继续下去。人道主义者都是伪君子，吉卜林对于这点的理解，或许正是他能写出生动词句的诀窍。他说英国狭隘的反战主义是“嘲弄那些在我们睡觉时守护着我们的军人”，这真是言简意赅。确实，吉卜林不能从经济层面上理解风雅之士和老顽固之间的关系。他不明白，征服世界的主要目的是剥削苦力。他注意到的不是苦力，而是英属印度的公务员；但即使在这个层面上，他对人们的职责，

对谁保护着谁这个问题的理解也十分深刻。他清楚地认识到，有些人之所以能成为高度文明的人，是因为其他不够文明的人在保护和供养着他们。

吉卜林赞美管理者、士兵和工程师，然而他又在多大程度上自视属于他们呢？并没有某些人以为的那么彻底。他在年轻时周游各地，在平庸的环境中成长出聪明的头脑，而且他有着某种神经质的性格特征，这让他更喜欢主动的人，不喜欢敏感的人。在他崇拜的人当中，19世纪的英裔印度人最不讨人喜欢，可他们总归是做事的人。或许他们所做的都是邪恶之事，但他们却改变了地球的面貌（看看亚洲地图，比较一下印度和周边国家的铁路系统，你就会明白这点）；如果普通英裔印度人的态度和E.M.福斯特相同，那么他们就会一事无成，手中的权力也会连一个星期都维系不了。吉卜林对于19世纪英属印度的描写虽然俗丽而浅薄，但却是我们唯一拥有的相关文学记载。他能够做到这点，仅仅是因为他足够粗俗，能存在于社团和军队食堂中，还能在其中闭口不言。但是他与他崇拜的人并无太多相似之处。我从私人渠道得知，许多与他同时代的英裔印度人都不喜欢或不赞成他。他们说他完全不懂印度，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在他们看来，他太过于阳春白雪。在印度时，他喜欢和“错误”的人混在一起；他肤色黝黑，人们误以为他有亚洲血统。他生于印度，且早年辍学，他的成长大多可以追溯到这点。如果他的出身略有不同，他也许可以成为优秀的小说家或杂耍剧院的编剧。但他真是粗俗的沙文主义者，是塞西尔·罗兹[1]的宣传家吗？他确实是，但他并不唯唯诺诺，也不趋炎附势。在创作早期过后，他就从不讨好舆论。艾略特先生说，吉卜林之所以不受人们待见，是因为他通俗地表达了不受欢迎的观点。这种说法把问题简化为“不受欢迎”等于不受知识分子欢迎，但吉卜林的“说教”确实是大众不想要，也是大众从未接受的。19世纪90年代和现在一样，大多数人都反对军国主义，厌烦英帝国，而且只是无意识地爱国。欣赏吉卜林的官方人士，现在和过去都是“机关”中产阶级，是那些阅读《布莱克伍德杂志》的人。在20世纪初那愚昧的几年中，老顽固们终于发现了吉卜林这个可以称为诗人且和他们站在一边的人，他们盲目崇拜吉卜林，并把吉卜林的一些说教性诗歌，比如说《如果》，奉为圭臬。他们在阅读吉卜林的作品时，恐怕不比他们在阅读《圣经》时认真多少。他们根本不会赞成吉卜林的多数观点。在国内批评英国的人当中，很少有人的言辞比吉卜林这位粗鄙的爱国者更刻薄。他所抨击的通常是英国工人阶级，但也并非总是如此。“三柱门边穿法兰绒衣服的愚蠢击球手和足球门前脏兮兮的傻瓜守门员”这个说法至今仍然流行，直指伊顿-哈罗板球赛和优胜杯决赛。他就布尔战争所写的

有些诗歌，就其主题而言，有着一种奇怪的现代感。写于1902年左右的《斯泰伦博斯》（*Stellenbosch*），便能概括明智的步兵军官们在1918年或今天的观点。

吉卜林对英格兰和大英帝国心怀幻想，但如果没有阶级偏见的话，这些幻想也许并不重要。细读他最优秀的代表作，也就是他的军旅诗，特别是诗集《营房谣》（*Barrack-Room Ballads*），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暗含的施恩姿态是最大的败笔。吉卜林美化陆军军官，尤其是低级军官，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而那些可爱而浪漫的士兵，在他笔下却成了滑稽人物。士兵总是操着模式化的伦敦东区方言，虽然话语不太低俗，但是所有“h”和词尾的“g”都被刻意省略。这通常让人觉得尴尬，就像是教友联谊会上幽默的朗诵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能改进吉卜林的诗歌，使其不那么滑稽与露骨，只需通读一遍，将其中的伦敦东区方言改为标准用语就行。他那些能真诚抒情的叠句尤其如此。下面举两则例子加以说明，一则与葬礼有关，一则与婚礼有关：

敲灭你的烟斗，跟我走！

结束你的指责，跟我走！

噢，听着大鼓的召唤，

跟我走！跟我回家！

以及：

为警官的婚礼欢呼——

再欢呼一次！

灰色战马拉着车子，

流氓娶了婊子！

我还原了其中的“h”等字母。吉卜林应该更加清楚，应该知道第一段的最后两句十分优美，也应该克服那种嘲笑工人口音的冲动。在古代歌谣中，贵族和农民说的是同样的语言。吉卜林做不到这点，他以扭曲的阶级视角看待问题。他的诗性正义毁掉了他最优秀的诗句，刻意使用的伦敦东区方言让诗句变得丑陋不堪。即使在音韵上没有影响，他对伦

敦方言的嘲笑也仍然让人愤怒。不过，人们大多在口头引述他的诗句，而非对着书本阅读，而且大多数人在引用时会本能地做出必要的纠正。

不论是在19世纪90年代还是现在，有谁能想象士兵在阅读《营房谣》时会感觉到作者在为他说话？这真是难以想象。凡是能够阅读诗集的士兵都会立刻发现，吉卜林对军队中那种与别处相同的阶级斗争毫无知觉。他不仅认为士兵滑稽可笑，还认为他们爱国且封建，乐于恭维军官，而且以身为女王的士兵为荣。这当然也不全错，否则仗就没法打了，但是“英格兰，我的英格兰，我为你做了什么？”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疑问。几乎所有工人都会立即反问，“英格兰为我做了什么？”吉卜林知道这点，简单地将其视作“下层阶级的极端自私”（他的原话）。在写“忠诚的”印度人，而不是写英国人时，他有时将“您好，老爷”这个主题利用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但是，与当时或现在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相比，他确实更关注普通士兵，更希望他们能受到公平对待。他知道，普通士兵保卫着有些人的收入，可这些人却忽视、薄待甚至虚伪地鄙视他们。“我逐渐意识到，”他在死后才出版的自传中写道：“士兵生活的恐怖和他们所承受的不必要的折磨。”人们指责他美化战争，或许确有其事，但他并没有像平常人那样美化战争，而是假装战争和足球赛差不多。和许多能写战争诗的人一样，吉卜林也从未上过战场，但他对战争的想象是现实的。他知道子弹会伤人，知道在炮火之下人人都会胆战心惊，知道普通士兵从不了解战争的意义，不了解战场意外发生的事情，他还知道英国士兵和其他国家的士兵一样，也经常临阵脱逃：

我听到身后的刀声，却不敢回头面对敌人，

我不知要去向何处，因为我未停下来观察，

我不停向前奔跑，直到听见有人大声求饶，

我想我知道那是谁的声音，那是我的声音。

如果用现代文风来写这首诗，那么它会像是从20世纪20年代某本揭露战争的书中摘录而来的句子。还有一则例子：

凶险的子弹呼啸着穿过尘埃，

没人想面对它们，而士兵必须面对；

像戴着镣铐一般，他们不愿意前进，

他们被迫并肩前进，僵硬且缓慢。

再比较下面这首：

轻骑兵，向前进！

是否有人垂头丧气？

没有！尽管士兵们知道

有人已经犯下大错。

如果有不妥的地方，那便是吉卜林夸大了战争的恐怖，因为按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在吉卜林年轻时发生的战争几乎算不上是战争。这或许是因为他那神经质的性格和对残忍的渴求。但他至少知道，士兵们在受命攻击极其困难的目标时会垂头丧气，还知道每天四便士的军饷并不算多。

对于19世纪末服役期较长的雇佣军，吉卜林的描写有多全面或真实呢？必须得说，吉卜林对雇佣军的描写，和他对19世纪英属印度的描写一样，是我们现有最优秀而且也是唯一的文学记载。他记录了大量内容；如果没有这些记录，我们便只能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或枯燥无味的军队历史记录来回忆。他对军旅生活的描绘恐怕比实际上更全面和准确，因为所有英国中产阶级人士都见识广博，能够填补其中的不足。我在阅读埃德蒙·威尔逊[2]已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有关评论吉卜林的文章[3]时发现，许多在我们看来无比寻常的事情，对美国人来说却难以理解。但是，吉卜林的早期作品似乎确实呈现出一幅前机枪时代的老式军队画面，生动逼真却不会严重误导读者——位于直布罗陀或勒克瑙的湿热军营、红色军装、陶土染白的腰带、筒状军帽、啤酒、打架、鞭刑、绞刑、钉死在十字架上、军号、燕麦和马尿的气味、长髭盈尺并不停咆哮的中士、血腥的冲突、拥挤的运兵船、霍乱肆虐的兵营、“土著”情妇，以及最终在济贫院中的死亡。这是一幅粗野低俗的画面，其中既有杂耍戏院里的短小节目，似乎也有左拉作品中的血腥段落，但后人会通过这幅画面对长期服役的志愿军有所了解。他们同样也会了解到汽车和冰箱还未面世时英属印度的情况。有人会错误地以为，乔治·摩尔[4]、吉辛、托马斯·哈代等人如果有吉卜林的机会，或许会写出更加优秀的作

品。这种假设绝无可能。19世纪的英国作家不可能写出《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这样的书，也不可能写出托尔斯泰那些关于军旅生活的短篇小说，如《塞瓦斯托波尔故事》（*Sebastopol*）或《哥萨克》（*The Cossacks*），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才能，而是因为敏感到能写出这类书的作家，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军旅生活。托尔斯泰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军事帝国中，那里的年轻人几乎都要到军中生活几年，而英帝国的非军事化程度之高，在欧洲大陆观察者看来几乎难以置信。文明人很难离开文明中心，而且在大多数语言中，称得上殖民地文学的作品少之又少。吉卜林笔下的艳俗画面——伴着庙宇的钟声，士兵奥特里斯和豪克斯比夫人倚着棕榈树——源于多方面因素的结合，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点是：吉卜林本身就是个半文明人。

吉卜林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创造新短语的英国作家。那些我们信手拈来却不知其渊源的短语和新词，其实并非来自于那些我们崇拜的作家。例如，听见纳粹广播员称俄国士兵为“机器人”就很奇怪，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词源于他们正在追杀的一个捷克民主人士。以下是吉卜林创造的六条短语，我们能在低俗小报的短评中看到，或者从雅座酒吧里那些几乎没听说过吉卜林的人的口中听到。看得出来，这六条短语有着某种共同特征：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白人的负担

不了解其他地方，又怎能说了解英国？

女人比男人致命，

苏伊士以东

上交丹麦金[5]

还有其他许多短语，其中有些比其上下文流传得更久远。例如，“咬死克留格尔[6]”这个短语直到最近仍然有人使用。用来指代德国人的“匈奴佬”也可能滥觞于吉卜林，至少他在1914年战争刚打响时就开始使用这个词语。上面所列短语的共同之处，在于人们在口头使用它们时都多少带有嘲笑意味，就像使用“我要成为五月女王，母亲，我要成为五月女王”时一样，但人们迟早都会使用它们。比如，《新政治家》

杂志对吉卜林的蔑视最为厉害，但是在慕尼黑会议期间，这家杂志知道自己引用了多少次“支付丹麦金”这个短语吗[7]？除了拥有些小聪明和将许多低劣的场景浓缩成寥寥数语（“棕榈树和松树”“苏伊士以东”或“通往曼德勒之路”）的才能之外，吉卜林所讨论的确实都是人们格外关注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算那些会思考的体面人站在他的对立面也无关紧要。“白人的负担”会立刻唤起一个现实问题，尽管有人会觉得这个词应改为“黑人的负担”。我们或许打心底里不同意《岛国人民》（*The Islanders*）中的政治姿态，但我们却不能说它轻率。吉卜林传达的是低俗却又永恒的思想。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作为诗人或韵文作家，他的地位到底如何呢？

艾略特先生将吉卜林那些带韵律的作品称为“韵文”而非“诗歌”，不过他却补充说那是“伟大的韵文”，并进一步明确地说，一位作家只有在某些作品“说不清是韵文还是诗歌”的情况下才能被称为“伟大的韵文作家”。吉卜林显然是位偶尔写诗的韵文作家，但遗憾的是，艾略特先生没有指明吉卜林的哪些作品是诗歌。问题在于，每当需要从审美方面评判吉卜林的作品时，艾略特先生总是过于保守，没能坦率地说明他的观点。艾略特先生没有说的，也是我认为讨论吉卜林时首先要说的，是吉卜林的多数诗歌极其庸俗，让人觉得像是观看一名脸上照着紫色灯光的三流杂耍戏院演员朗诵《吴芳福的辫子》（*The Pigtail of Wu Fang Fu*）；尽管如此，吉卜林也有很多诗歌能让懂诗的人开心愉悦。吉卜林最差的一面，也是他最为重要的一面，是《甘加·丁》（*Gunga Din*）或《丹尼·迪福》（*Danny Deever*）等诗所带来的那种近乎羞耻的乐趣，就好像中年人偷偷品尝廉价糖果的感觉。即使是在阅读他最优秀的诗歌时，我们也确实会感觉到被某种虚构的东西所引诱。只要不是自命不凡或满口谎言的人，谁也不能否认喜爱诗歌的人能从下面这种句子中得到快乐：

棕榈树间吹着清风，寺庙的钟声在呼唤：

“回来吧，英国士兵，回到曼德勒！”

不过，这两句并非诗歌，就像《菲利克斯·兰道尔》（*Felix Randal*）或《当冰锥挂在墙上》（*When Icicles Hang by the Wall*）是诗歌一样。我们不必折腾“韵文”和“诗歌”这两个词，把吉卜林称为“优秀的坏诗人”或许更为贴切。他就是诗人，就好比哈里特·比彻·斯托[8]是小说家。吉卜林的诗作依然在流传，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认为它们粗俗不

堪，却又一直在阅读。这个事实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的某些特点。

英语中有许多“优秀的坏诗歌”，应该说它们全部面世于1790年之后。我特意选择几首不同的诗歌作为例子：《叹息桥》（*The Bridge of Sighs*）、《小伙，趁世界还年轻》（*When All the World is Young, Lad*）、《轻骑兵的冲锋》、布雷特·哈特的《狄更斯参军》（*Dickens in Camp*）、《埋葬约翰·莫尔爵士》（*The Burial of Sir John Moore*）、《珍妮吻了我》（*Jenny Kissed Me*）、《拉弗尔斯顿的基斯》（*Keith of Ravelston*）、《卡萨比安卡》（*Casabianca*）。这些诗都太过于多愁善感，但却能给读者带来真正的快乐，尽管读者很清楚它们的不足之处。若不是因为这类诗太过出名而无须重印出版，我们或许可以就它们编撰出一本大部头诗集。

不必羞于承认，“优秀”诗歌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能真正流行。只有极少数人狂热追随着它们，它们是最不得宽容的艺术形式。或许应该对这种观点加以限定。只有将自己伪装起来，真正的诗歌才能偶尔为大众所接受。从现存于英国的民间诗歌中，我们便能找到例证，如童谣、帮助记忆的韵文，以及士兵创作的歌曲，包括听到军号时士兵所喊的口号在内。但是在我们这个文明中，“诗歌”这个词经常招致不友好的嘲讽，人们最好的反应也就是像听到“上帝”这个词时那种面无表情的反感。如果擅长拉六角手风琴的话，你或许去一趟邻近的酒吧，五分钟内就能吸引许多知音听众。但是，如果你提议念几首莎翁的十四行诗，这群听众又会有何反应呢？如果事先营造好气氛的话，“优秀的坏诗歌”是能够吸引那些不想听诗歌的听众。几个月前，丘吉尔在广播讲话中引用克拉夫[9]的《努力》（*Endeavour*），引发了一阵轰动。和我一起听着丘吉尔讲话的，还有许多不怎么关心诗歌的人；我相信，丘吉尔引用的诗句打动了他们，而且并没有让他们感到尴尬。不过，丘吉尔若是引用其他更好的诗句，那么这群听众肯定也会表示反感。

就韵文作家能得到大众喜爱而言，吉卜林就曾经——或许现在仍然——受到大众喜爱。在他生前，他的一些诗歌就超出了有阅读习惯的群体、学校颁奖日、童子军的歌唱、软皮书、烫画和日历的范畴，甚至还走进了杂耍戏院的世界。然而，艾略特先生认为，他的诗有必要加以修改，这也就承认了一种许多人都拥有但却不愿实说的喜好。“优秀的坏诗歌”能存在，说明了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之间有情感交集。知识分子不同于普通人，但也仅仅是某些个性上的不同，而且即使是这些方面的不同也并非总是存在。“优秀的坏诗歌”有何特征呢？一首“优秀的坏诗

歌”，能优雅地提醒人们显而易见之事。它以便于记忆的形式——诗歌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记忆——记录着几乎所有人都有的情感。《小伙，趁世界还年轻》等诗歌的优点在于，它们不论多么多愁善感，表达的却是“真”感情，而且这种感情迟早都会引发你的思索；如果你碰巧知道某首诗歌，那么它就会在你脑海中重现，而且让你觉得它比之前更有味道。这些诗歌就是带韵律的格言，而且受人欢迎的诗歌通常都是格言警句。以吉卜林一段诗作为例：

洁白的双手抓紧缰绳，

松开靴子跟部的马刺；

最柔软的声音大喊“再次调头！”

红唇玷污鞘中的钢刀，

厚望丧失于温暖家中——

独行者前进速度最快。

这段诗清晰表达了一种粗俗的观点。这种观点或许不对，但至少每个人都有。你迟早都会有那么一刻觉得独行者的前进速度最快。这种观点已经存在，它可以说是现成的，在那里等着你。所以，一听到这句诗，你就会记住它。

吉卜林之所以能写出“优秀的坏诗歌”，原因之一我已经提过——他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让他能拥有世界观，尽管这种世界观碰巧并不正确。虽然与任何政党都没有直接联系，但他却是个保守党人。如今并不存在所谓的保守党人，那些自称是保守党人的，要么是自由主义者，要么是法西斯或法西斯的帮凶。吉卜林将自己归于统治集团而非反对派。对于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来说，这让人觉得奇怪甚至厌恶，但这确实也有助于他把握现实。统治集团一直面对着“在各种情况下该怎么办”的问题，而反对派则不用承担责任，也不用做任何实质性的决定。如果像在英国那样，反对派长期是反对派，而且还领取津贴的话，那么他们的思想质量也会相应退化。而且，拥有悲观、反动生活观的人，事实常常会证明他们是对的，因为乌托邦永远不会实现，而所谓“字帖标题[10]之神”却总是阴魂不散。吉卜林背弃自己的原则，在情感上而非经济上投靠了英国统治阶级。这影响了他的政治判断，因为英国统治阶级并非他

所想的那样，而且这还让他逐渐掉进愚蠢和势利的深渊，但他至少还试着设想何为行动和责任，并从中得到了相应的好处。他不聪明，不“大胆”，也无意让中产阶级铭记，但这对他来说是件好事。他写的东西大多都是陈词滥调，可是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充满陈词滥调的世界里，所以他说的话大多都留存下来。相比同时期的“开明”言论，如王尔德的隽语诗或《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结尾处收集的迷人格言，即使是吉卜林最为愚蠢的话语，也没有那么浅薄，没有那么讨厌。

---

[1] 塞西尔·约翰·罗兹（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英裔南非商人、矿业大亨与政治家。他是殖民主义的虔诚信徒，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因其得名。

[2]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美国著名评论家和作家，其文学批评深受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影响。

[3] 收在文集《创伤与神弓》（*The Wound and the Bow*）中。（作者原注）

[4] 乔治·摩尔（George Moore，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和批评家。

[5] 丹麦金，中世纪英国为免受维京人侵扰而征收来交付和平赎金的一种税。

[6] 保罗·克留格尔（Paulus Kruger，1825-1904），1883年至1900年任德兰士瓦总统，在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领导了布尔人争取脱离英国统治的独立斗争。

[7] 米德尔顿·默里（Middleton Murry）先生在其新书《亚当与夏娃》（*Adam and Eve*）的首页中引用了吉卜林的著名诗句：创作部落歌谣有六十九种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是对的。但他说这些都是萨克雷的诗句。这或许就是著名的“弗洛伊德式错误”。文明人不愿意引用吉卜林的话，也就是说，他们不想觉得是吉卜林替他们表达了想法。（作者原注）

[8] 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美国著名作家、废奴主义者，代表作《汤姆叔叔的小屋》。

[9] 亚瑟·克拉夫（Arthur Clough，1819-1861），英国诗人、教育家，著名护士弗罗伦斯·南丁格尔的忠诚助手。

[10] 字帖标题，即19世纪英国学生的习字帖上印着的格言，供学生抄写用。

马克·吐温——特许的弄臣

马克·吐温闯进了人人丛书[1]高耸的大门，但只有《汤姆·索亚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这两本书打着“儿童读物”（实际并非如此）幌子的书，为大众所熟知。他最出色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苦行记》（*Roughing It*）、《傻瓜在国内》（*The Innocents at Home*），甚至还有《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Life on the Mississippi*），在英国几乎无人记得，尽管它们在美国因爱国主义与文学评判混杂而得以流传。

马克·吐温的作品种类多得令人惊奇，既有乏味伤感的圣女贞德“传记”，也有伤风败俗以至于从未公开出版的小册子，但是他作品的精华都集中在密西西比河和荒凉的西部矿镇上。马克·吐温生于1835年（他出身于南方家庭，家里经济条件刚够买一两个奴隶），他的青年时期和成年早期正值美国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北美大平原已在开发，财富和机遇源源不断，人们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他们也的确是自由的，而这种自由过去从未有过，也许未来数百年间也不会重现。《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和我提到的另外两本书是奇闻轶事、风景描写，以及严肃且讽刺的社会历史的大杂烩，但它们的中心主题或许都可以归结为“这就是人类在不受失业威胁之时的行为举止”。在撰写这些书时，马克·吐温并非在有意识地歌颂自由。他主要关注的是“个性”，是人性在不受经济压力和传统束缚时，所能展现出的各种怪诞、甚至近乎疯狂的面貌。他笔下的撑筏者、密西西比舵手、矿工和强盗或许并没有太过夸张，但他们和现代人截然不同，彼此间也大相径庭，犹如人类和中世纪教堂上的石像装饰的差别。因为没有任何外界压力，所以他们还能发扬他们怪异且有时邪恶的个性。国家几乎不存在，教会软弱且不统一，土地则是唾手可得。如果讨厌自己的工作，你可以揍老板一顿，然后西行；此外，金钱也尤为充足，即使是流通中的最小硬币，也值一先令。美国的拓荒者并非超人，他们也并非特别勇敢。采金的矿工身强力壮，但却缺少镇压土匪的公共精神，所以许多采矿的小镇都忍受着土匪的恐吓。他们甚至还未摆脱阶级差别。在采矿小镇的街上横行霸道的亡命徒在背心口袋里插着德林格手枪，身负二十条人命，但却身穿长礼服，头戴闪亮的大礼帽，语气坚定地自称“绅士”，还对餐桌礼仪特别讲究。不过，他们的命运并非在出生时就已注定。自由的土地得以持续存在，“从木屋到白

宫”也并非神话。在某种程度上说，巴黎的暴民正是为了这个目标才去攻占巴士底狱。读着马克·吐温、布雷特·哈特和惠特曼的作品，我们很难认为他们只是瞎忙活一场。

然而，马克·吐温不只想做密西西比河和淘金热的记录者。在其得意之时，他曾是闻名全世界的幽默作家和诙谐演说家。在纽约、伦敦、柏林、维也纳、墨尔本、加尔各答，他让成千上万的观众笑得前俯后仰，但那些笑话如今几乎都已经没了笑点。值得注意的是，马克·吐温的演说只在英国和德国观众面前才算成功。相对成熟的拉丁民族却对那些演说不屑一顾，马克·吐温曾抱怨说，他们的幽默总是围绕着性和政治。但除此之外，马克·吐温还以社会评论家，甚至是某类哲学家自居。他有一种打破传统，甚至是革命性的气质。显然，他想要将这种气质贯穿始终，却始终未能如愿。他本可以成为谎言的揭穿者，成为比惠特曼更令人钦佩的民主先知，因为他更健康、更幽默。可是他却成了不可信的“公众人物”，享受签证人员的恭维和皇宫贵族的款待。他的经历反映了内战结束后美国生活的腐化。

人们有时会把马克·吐温与同时代的阿纳托尔·法朗士[2]相比。这种比较并非像听上去那样毫无意义。他们都是伏尔泰的精神后裔，都对生活持讽刺和怀疑的态度，他们快乐的外表之下都是与生俱来的悲观主义；他们都知道现有的社会秩序只是骗局，那个社会所珍视的信仰大多都是错觉；他们都是偏执的无神论者，深信（马克·吐温是受到达尔文的影响）世间无法忍受的残酷。但他们的相似之处也只有这些而已。和马克·吐温相比，这个法国人要博学、文明得多，审美上更具活力，而且还更有胆识。他抨击自己所怀疑的事物，不像马克·吐温那样总是躲在“公共人物”和特许弄臣的友善面具背后。他甘愿承担惹怒教会的风险，而且在德雷福斯案[3]之类的争议中总是站在少数派一边。可能除了短文《人算什么》（*What is Man*）之外，马克·吐温从未以可能招致麻烦的方式抨击既定信仰。他也无法摆脱那种认为成功即美德的观念，这种观念或许是美国人所独有的。

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中，有个地方似乎能揭露马克·吐温主要的性格缺陷。该书基本上属于自传作品，但书前面部分的日期有所改动。马克·吐温在描述自己作为密西西比河舵手的奇遇时，说得好像自己只有十七岁，但实际上他当时已近而立之年。他这么做有其原因。该书前面部分还描述了他在美国内战中显然并不光彩的英勇事迹。此外，他一开始参加的是南方军，如果这算得上真正参战的话，可他后来在临

近战争结束时却投靠了北方。这种行为出现在男孩身上要比出现在成人身上更情有可原，所以马克·吐温才会改动日期。然而，同样很明显的是，他变节的原因是他认为北方胜利在望。他尽可能站在强者一边，而且相信强权即公理的倾向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显而易见。《苦行记》中有一段对悍匪斯莱德的描写十分有趣。斯莱德暴行无数，曾犯下了二十八起谋杀案。马克·吐温对这个令人厌恶的恶棍的崇拜昭然若揭。斯莱德成功了，因而值得钦佩。这种如今仍然常见的观点，可以用“成功”这个重要的美式措辞来概括。

在内战后那段孜孜求利的时期，任何性情如同马克·吐温的人都难挡成功的诱惑。亚伯拉罕·林肯代表的那种古老、简单、亲民的民主正在消亡，现在这个时代属于廉价的移民劳动力和不断扩张的大企业。马克·吐温曾在《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中不温不火地讽刺过同代人，但他自己也曾沉溺于淘金热潮，挣过也亏过许多钱。马克·吐温有几年甚至弃笔从商；将时间挥霍在插科打诨上，不仅大办巡回演讲和公众宴会，还写了《误闯亚瑟王宫》那样的书，故意奉承美国生活中最糟糕、最粗俗的东西。这个本可成为乡村伏尔泰的人，却变成了世界一流的餐后演说家，魅力同样在于他的趣闻轶事和他让商人自我感觉成为公益家的本领。

马克·吐温没有写出他应该写的作品，人们常常将这点归咎于他的妻子。显然，她确实专横地对待过马克·吐温。每天清晨，马克·吐温都会将前一天所写的内容给妻子过目，克莱门斯太太（马克·吐温原名塞缪尔·克莱门斯）会用蓝铅笔进行修改，划掉所有她认为不合适的地方。即使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她似乎都是位极端的删改者。据W.D.豪威尔斯[4]在《我的马克·吐温》（*My Mark Twain*）中的记载，马克·吐温和妻子曾因《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一句令人不快的诅咒而争吵。马克·吐温求助于豪威尔斯，而豪威尔斯承认那个词“正是哈克贝利该说的”，但他也赞同克莱门斯太太的说法，认为那个词不可能发表出来。那个词就是“该死”。然而，没有哪个作家会真正成为妻子的精神奴隶。克莱门斯太太无法阻止马克·吐温写他真正想写的作品。或许她可以让马克·吐温更轻易地向社会投降，但他投降是因为他本质上的缺陷，即无法蔑视成功。

马克·吐温的某些作品注定会流传下去，因为它们描述了无价的社会历史。他的一生涵盖了美国扩张的伟大时期。当他还是孩子时，他经常带着便当去观看废奴主义者的绞刑；当他去世时，飞机已不再是新鲜

事物。这段时期美国的文学作品产量相对较少；如果没有马克·吐温，我们对密西西比河上的明轮船或穿越大平原的驿站马车的印象就会模糊许多。但是，研究过马克·吐温作品的人，大多会觉得他本应更有作为。他始终给人一种欲言又止的奇怪印象，所以我们在阅读《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以及其他作品时，总觉得它们背后好像还有一部更优秀、条理更加分明的作品。意味深长的是，他在自传开头就说，人的内心是无法言说的。我们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那本现在已经佚失的小册子《一六〇一》或许能给我们些许提示，但我们也许能猜到，他想要说的东西或许会让他声名扫地，让他的收入下跌到合理水平。

---

[1] 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由英国出版商登特（Joseph Malaby Dent）于1906年创立，旨在为包括工人、学生、有识之士等在内的读者提供价格低廉的经典文学书籍。

[2] 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诗人、记者、小说家，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3] 德雷福斯案，犹太裔法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于1894年被错控向德国提供军事情报罪。他的审判和监禁曾引起政治风波，最终于1906年得以平反。

[4] W.D.豪威尔斯（W.D.Howells，1837-1920），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文学批评家，1861至1865年任美国驻威尼斯领事。回国后在波士顿、纽约等地创办文学杂志，创作长篇小说。1909年担任美国文学艺术学会第一任主席。

诗与麦克风

大约一年前，我和其他一些人参与了一个面向印度听众的文学类广播节目，在节目中播送了不少现当代英国作家的诗——有艾略特、赫伯特·里德、奥登、斯彭德、狄兰·托马斯[1]、亨利·特里斯[2]、亚历克斯·康福特[3]、罗伯特·布里奇[4]、埃德蒙·布伦登[5]、D.H.劳伦斯等人的作品。只要有可能，我们都会让作者亲自朗诵他们的诗。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特别的节目（这是广播大战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包抄行动），原因在这里不必解释，我要补充的是，节目受众是印度人这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要用的手段。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文学广播针对的是印度的大学生，任何可以称作英国宣传的东西都很难接近这个怀有敌意的小群体。我们事先已经知道，听众最多不过几千人，因此我们有理由让电波中的内容比普通节目的更“风雅”。

听众能理解我们的语言，但和我们没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如果要对他们播送诗歌，就必须加上一定程度的评论和解释，我们经常把这个节目当成文学月刊来运作。想象一下，编辑们坐在办公室里，讨论下期要刊登什么诗歌。有人推荐了一首，又有人推荐了另外一首，在短暂的讨论之后，再来看诗本身，要让不同的人来朗诵，最好能找来作者本人。一首诗会自然引出另一首，节目就这样继续了下去，两首诗之间往往会留出至少半分钟的讨论时间。对于时长半小时的节目而言，六首诗似乎是最合适的。这类节目自然没有什么固定形式，但却可以围绕某个主题编排，由此带来一种统一感。比如，这份虚构的杂志有一期专门以战争为主题。其中选了两首埃德蒙·布伦登的诗、奥登的《1941年9月》（*September 1941*）[6]、G.S.弗雷泽[7]的长诗《给安妮·里德勒的一封信》（*A Letter to Anne Ridler*）的节选、拜伦的《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和T.E.劳伦斯的《沙漠革命记》（*Revolt in the Desert*）的节选。这六首诗和穿插其间的评论相当完整地涵盖了对待战争可能出现的各种态度。这些诗歌和散文诗的节选在节目中占了二十分钟，评论占了约八分钟。

这种方式看起来也许有些可笑，也显得相当高高在上，但其优势在于，在播送严肃、有时很“难懂”的诗歌时，难免会出现单纯的教导痕迹和教科书式的主题，但当它们作为非正式的讨论出现时，便会显得亲切

得多。各位主持人看似对话的东西，实际上是说给观众听的。此外，借助这种方式，我们至少可以介绍诗歌的背景，而这正是普通人读诗时所缺乏的。当然，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常用的手段之一就是为诗歌配上音乐。我们会介绍说接下来几分钟会播出某某诗；然后我们会放上差不多一分钟的音乐，然后音乐淡出，开始播放诗歌，不再加上标题或介绍，之后音乐淡入，继续播放一两分钟——全过程要花大约五分钟。选择合适的音乐很有必要，但毋庸赘言，音乐的真正目的是区分诗歌和节目其他部分。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在新闻公告之后的三分钟里插入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而且至少在我听来不会有任何不和谐。

我提到的这些节目本身并没有太大价值，但我提起它们的原因是，它们让我和其他一些人想到了利用广播推广诗歌的可能性。我首先想到的是，如果说让诗人在广播中朗诵自己的诗会产生什么影响，受影响的不光是听众，还包括诗人自己。我们必须记住，广播诗歌的尝试在英国还非常罕见，而且很多写诗的人从未想过把诗朗诵出来。但如果能坐到麦克风前，尤其是在可以定期这样做的情况下，诗人就能和自己的作品建立新的联系，如今在英国，任何其他方法都无法产生这种效果。诗歌与音乐和口语越发疏离，这是现代社会——近二百年来——的寻常事。诗歌只能依赖印刷文本而存在，同样，人们也不再要求诗人吟唱甚至朗诵自己的作品，就像不再指望建筑师会给天花板抹灰泥一样。几乎没有人再去写抒情色彩强烈和辞藻华丽的诗歌，在任何一个民众具备阅读能力的国家，普通人对诗歌的敌意都被看作理所当然。而且，这样的缺口一旦存在，就总会不断扩大，因为那种认为诗歌本质上是印刷的东西，认为诗歌只能被少数人所理解的观念，会鼓励晦涩的文字和“小聪明”。面对一眼就能看懂的诗，有多少人会近乎本能地觉得不对劲？要改变这种趋势，恐怕只能利用电台作为媒介，让诗歌朗诵回归常态。但这里应当注意到电台的独特优势——它能选择合适的听众，以及消除怯场与尴尬的能力。

在广播中，我们并不知道听众是谁，但他们可以被看作一个人。听众也许会有几百万人，但他们不是独自一人，就是作为某个小团体的成员在收听，每个听众都会（或者说应该会）觉得你在和他单独对话。此外，我们有理由认为，听众都对我们的节目有好感，至少有兴趣，因为觉得无趣的听众只需拧一下旋钮就能立刻离场。尽管听众可能抱有好感，但他们无法对你产生影响。这正是广播与演讲、讲座的区别所在。经常公开演讲的人都知道，站在台上的人几乎不可能让自己的语气不受观众影响。用不了几分钟，你就能看出听众的好恶，发现自己几乎不得

不去迎合在你看来最愚蠢的那个听众，还要通过被称作“个性”的大呼小叫来取悦他们，否则就几乎一定会遭遇冷场的尴尬。“诗朗诵”之所以让人觉得可怕，是因为总会有些听众觉得无聊，甚至直接表示反感，他们又无法通过拧动旋钮脱身。实际上，正是因此——因为剧场对观众别无选择——在英国没法看到令人满意的莎士比亚戏剧。广播中却不存在这种限制，诗人会觉得自己正对着一个喜爱诗歌的人说话，而且在麦克风面前，习惯广播的诗人能够发挥出在直面观众时无法展现的娴熟技巧。想象的元素在这里并不怎么重要。关键在于，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诗人才能进入这样的状态——朗诵诗歌似乎变成了自然而然、不显尴尬的事，是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流，而且这还会让诗人把自己的作品看作声音，而不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这样一来，诗歌和普通读者离和解便更近了一步。不论电波那头发生着什么，电波这头的诗人已经有了改变。

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电波的那头。有人会觉得我把诗歌说成了让人尴尬、甚至是有伤风化的东西，好像普及诗歌本质上和给小孩灌药、为受迫害的教派争取宽容一样需要战略安排。但不幸的是，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在我们的文明中，诗歌无疑是名声最差的艺术形式，普通人其实看不出它的任何价值。阿诺德·贝内特曾经说过，在英语国家里，“诗歌”这个词能比高压水龙更快地驱散人群，他这么说丝毫没有夸张。正如我所指出的，这种缺口一旦打开就会扩大，普通人越来越反感诗歌，诗人变得越来越傲慢和晦涩，直到诗歌和大众文化的分道扬镳被当成自然法则为人所接受，尽管这种情况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地球上的一小片地方出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高度文明的国家中的普通人在审美观上还不如最落后的野蛮人。人们往往认为，这种局面不可能通过任何自觉的行动加以改变，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只要社会形态变得更友好，这种局面就会自发改善。无政府主义者和宗教信徒会对你说类似的话，整体看来，这种说法无疑是对的。世上种种丑陋现象有其精神和物质原因，并不能用单纯所谓偏离传统的说法来解释。但这并不是说当前的框架下不容许任何进步，也不是说对审美方面的提升不是救赎社会整体进程中的必要环节。因此，我们应当停下来思考一下，是否有可能让诗歌脱离困境，让它不再是人们最讨厌的艺术形式，为它争取至少与音乐相当的社会宽容。但我们不禁要问，诗歌为何不受欢迎？它有多不受欢迎？

表面上看，诗歌的不受欢迎已经到了不能再严重的地步。但转念一想，从某种独特的角度来说，情况其实没那么糟。首先，现在依然有不少人人皆知、时常引用的民间诗歌（比如儿歌等），它们是每个人思想

背景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古典歌谣一直为人们所喜爱。此外，那些通常以爱国或伤感为主题的“好的坏诗”还比较受欢迎，至少能被人们所容忍。如果这些“好的坏诗”并不具备真正的诗歌当中看似让普通人心生厌恶的全部特质，那么这些诗便意义不大。它们有诗的形式，有韵律，描述的是高尚的情感，用着不寻常的语言——这一切都非常明显，因为几乎不证自明的是，坏诗总比好诗更有“诗意”。即使人们不是特别喜欢它们，但至少也能容忍。比如，就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正在听着两个BBC喜剧演员在九点档新闻之前的例行节目。最后三分钟里，其中一人忽然说他“想要严肃一会儿”，然后开始朗诵一篇题为《一个完美的英国老绅士》（*A Fine Old English Gentleman*），用来称颂国王陛下的爱国主义胡话。好啦，对于这番突然出现的低劣至极、押韵夸张的豪言壮语，听众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们不会强烈反对，否则BBC就会收到大批愤怒的信件，要求他们不再这样做。我们可以断定，尽管大众反感诗歌，但并不怎么讨厌韵文。说到底，如果押韵和格律本身就会让人厌恶，那么歌曲和不正经的五行打油诗就不会受人欢迎。人们反感诗歌，是因为它往往让人觉得晦涩，觉得诗人是在炫耀自己的才智，觉得它不合时宜。它的名字本身就会让人产生糟糕的印象，就像“上帝”这个词和牧师衣服的白色硬领一样。某种程度上说，诗歌的推广实际上意味着打破一种后天习得的反感，意味着要让人们去聆听，而不是习惯性地嗤之以鼻。如果我们能把真正的诗歌介绍给大众，让它像我刚刚听到的那段废话一样显得平常，那么我们就能消除对诗歌的部分偏见。

我们很难相信，在付出认真的努力，凭借有效的策略甚至是诡计对公众品位进行教育之前，诗歌能够再次普及开来。T.S.艾略特曾指出，诗歌，尤其是戏剧体诗，也许可以通过杂耍戏院这样的媒介重回普通人的意识；他也许还应该加上童话剧，人们似乎从未完全发掘出它的巨大潜力。他在写作《肌肉萎缩》时也许就有这样的打算，我们事实上可以考虑把它作为短剧在杂耍戏院上演，它至少可以成为讽刺剧里的场景。我曾经指出，电台是一种更有前途的媒介，我也已经讲过它的技术优势，尤其是从诗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建议之所以乍看起来没什么希望，是因为极少有人能够想到，电台除了播送一些废话之外还能有别的作为。人们听着从全世界的大喇叭里流出的涓滴信息，然后就认为无线电只有这么点用处。事实上，“无线电”这个词让人想到的不是独裁者的咆哮，就是宣布我们的飞机有三架未能返航的嘶哑做作的声音。广播中的诗歌听起来仿佛是穿着条纹裤子的缪斯。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当将某种工具的功能和它的实际用途混为一谈。广播之所以变成这样，并不是因为麦克风和发射台本身的庸俗、愚蠢和不诚实，而是因为全球所有广

播节目现今都在政府或大型垄断公司的控制下，它们千方百计地想要维持现状，想要以此阻止普通人变得太聪明。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电影院里，它和电台一样问世于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而且运营成本高得惊人。所有的艺术形式中都存在类似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作品推广渠道被官僚掌控，而官僚们的目标是消灭艺术家，至少是要把他们阉割掉。如今，世界各国都在转向极权主义，而且这种转变无疑还将继续下去，如果没有那种甚至在短短五年前还很难预见到的进步来阻止这种转变，那么前途将是一片黯淡。

也就是说，由于巨大的体量和不断地膨胀，将我们每一个人都包含在内的巨型官僚主义机器已经开始运转不畅了。现代国家有着消灭思想自由的倾向，但与此同时，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在战争压力之下的国家，都越来越需要知识分子来做宣传。比如，现代国家需要宣传册写手、海报画家、插图画家、广播员、演讲者、电影制片人、演员、作曲家，甚至还有画家和雕塑家，更不用说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生化学家和数学家等。这场战争开始时，英国政府曾多少公开地表示要将文学界排除在外，但在战争进行了三年之后，几乎所有作家，不论政治经历或观点有多不受欢迎，都被吸收到了政府各部或BBC里，即使是那些参军的作家也往往在一段时间后进入公关部门，或者承担起其他一些以文字为主的工作。政府很不情愿地吸纳了这些人，因为它发现，若是没有了他们，自己将寸步难行。从政府角度看，最理想的情形是把所有宣传工作交给像A.P.赫伯特[8]和伊恩·海之类“安全”的人，但因为这种人数量不够，不得不起用现有的知识分子，官方宣传的调子甚至内容都在某种程度上做了相应的调整。熟悉过去两年里政府宣传册、陆军新闻局的说教、纪录片和针对敌占区的广播节目的人都认为，但凡能找到别的办法，当权者们就不可能去资助这些东西。但是，随着政府的机器变得越来越庞大，其中遗留的问题和被遗忘的角落就越多。这也许是个小小的慰藉，但它并不可鄙。这就意味着，自由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恐怕永远都不会完全沦陷于官僚主义的暴政。穿着条纹裤子的人会继续掌权，但只要它们被迫保留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能享有一定的自主权。比如，如果政府需要拍摄纪录片，它就必须雇佣熟知电影技术的人，必须允许他们享有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自由；因此，那种在官僚看来一无是处的电影总是有可能出现的。在复杂的现代国家所需要的绘画、摄影、剧本撰写、新闻报道、演讲等所有艺术和半艺术领域，情况都是这样。

这在广播中体现得很明显。目前看来，大喇叭是有创作力的作家的敌人，但随着广播节目数量的增长和范围的扩大，它们在未来并不一定

还是敌人。当前，尽管BBC确实对当代文学还有那么点兴趣，但在广播中抽出五分钟播放诗歌要比花上十二小时传播谎话连篇的宣传、事先录制好的音乐、老掉牙的笑话、虚假的“讨论”等更难。情况也许会像我说的那样有所改变，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认真地尝试在广播中播放诗歌，完全不用考虑目前阻碍我们这样做的种种不利影响。我并不能断言这样的尝试一定能够取得很好的结果。电台在诞生之初就已经官僚化了，广播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能理清。麦克风不一定是那个能把诗歌带回到普通人身边的工具，我们甚至也不能肯定从书面向口头的转变能让诗歌有所起色。但我想呼吁的是，这种可能性毕竟是存在的，那些在乎文学的人也许应该多多考虑这种被严重轻视的媒介，它的正面作用或许已经被乔德教授[9]和戈培尔博士的声音掩盖了。

---

[1] 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英国诗人、作家，二战期间为BBC服务，战后仍为该公司的一套文艺节目写稿播音。1946年，托马斯发表了他最重要的一部诗集《死亡和出场》，评论界普遍认为托马斯是继奥登以后英国的又一位重要诗人。托马斯的诗作大体属于超现实主义流派，托马斯很注重押韵，其诗以便于朗诵闻名。

[2] 亨利·特里斯（Henry Treece，1911-1966），英国诗人、作家，作品涉猎极广，最主要的作品为青少年历史小说。

[3] 亚历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1920-2000），英国科学家、医生，和平誓言联盟的活跃成员，同时也写作虚构和非虚构作品。

[4] 罗伯特·布里奇（Robert Bridges，1844-1930），英国诗人，1913至1930年获桂冠诗人头衔。

[5] 埃德蒙·布伦登（Edmund Blunden，1896-1974），英国诗人、作家、批评家，诗歌和散文作品多以其一战经历为主题。

[6] 此处为作者之误，奥登这首诗原题为《1939年9月1日》（*September 1, 1939*），1942年出版的诗歌选集《战时诗选》（*Poetry in Wartime*）中将这首诗的标题误作《1941年9月1日》（*September 1, 1941*）。

[7] G.S.弗雷泽（G.S.Fraser，1915-1980），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学者。

[8] A.P.赫伯特（A.P.Herbert，1890-1971），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法律改革活动家。

[9] 西里尔·乔德（Cyril Joad，1891-1953），英国哲学家、广播节目名人。他因在BBC战时广播谈话节目《智囊团》（*The Brains Trust*）中的表现而名声大噪，1948年因火车逃票丑闻名誉扫地。

教士的特权——小记萨尔瓦多·达利[1]

只有那些自揭丑事的自传才是可信的。对自己大加赞赏的人很可能是在撒谎，因为不论是谁，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看来都只是一连串失败。但是，哪怕是最大言不惭地扯谎的书（弗兰克·哈里森[2]的自传性作品就是一例）也会在不经意间展露作者真实的一面。达利最近出版的《生活》（*Life*）[3]就属此类。其中记载的一些事情让人完全无法相信，还有些被重新编排和夸大了，书中不但回避了尴尬和耻辱，甚至连日常生活永恒的平淡都被排除在外。即便照他自己的标准看来，达利也是个自恋的人，他的自传不过是一场众目睽睽之下的脱衣舞表演。但是，作为对幻想，对在机械时代方有可能发生的本末倒置的记录，它极具价值。

此外，书中记录了达利自幼以来的若干生活片段。孰真孰假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这些都是达利曾经想要做的事。

在六岁的时候，他曾经因为哈雷彗星的出现而感到些许兴奋：

突然，父亲办公室里的一个职员出现在客厅门口，说可以从阳台上看到彗星……我穿过大厅时，突然看到我那三岁的小妹妹正悄悄从门口爬过。我停下脚步，犹豫片刻，然后像踢球那样重重踢在了她的头上，然后带着这种野蛮行为所激发的“狂喜”迅速跑开。但身后的父亲却抓住了我，把我关在他的办公室里，直到晚饭时才把我放了出来。

在这一年以前，达利还曾“就像我的大部分思想迸发时那样，突然”把一个小男孩从吊桥上扔了下去。书中还记述了好几件这样的事，包括（在他二十九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打倒在地，蹂躏她“直到他们把她从我手中救出，鲜血淋漓”。

在差不多五岁的时候，他抓住了一只受伤的蝙蝠，把它放在一个铁皮桶里。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这只蝙蝠已经奄奄一息，身上爬满了正在噬咬它的蚂蚁。他把蝙蝠连同蚂蚁一起放进嘴里，几乎一口把它咬成两截。

他尚在青春期时，一个女孩疯狂地爱上了他。他亲吻她、爱抚她，

尽可能地让她兴奋起来，之后却拒绝再做些什么。他决心让这样的关系维系五年之久（他称之为自己的“五年计划”），享受着对她的羞辱和这样做带来的权力感。他时常告诉她，在这五年之后会抛弃她，时间一到，他果然那么做了。

成年很久之后，他依然还会自渎，而且似乎喜欢对着镜子这样做。按通常的标准看，他似乎在三十岁之前都是性无能的。当他初次见到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加拉时，有一种将她推下悬崖的强烈冲动。他知道，她想要自己对她做些什么，在初吻之后，他作了下面这番告白：

我揪住加拉的头发把她往后拽，我歇斯底里地颤抖着，命令道：

“现在告诉我你要我对你做什么！但慢慢说，看着我的眼睛，用最粗暴、最凶残淫秽、让我俩都觉得最可耻的话说出来！”

加拉最后一丝快意的表情变成了专横的凶光，回答道：

“我要你杀了我！”

这个要求让他有些失望，因为这只不过是他已经想做的事情。他考虑过把她从托莱多大教堂[4]的钟楼上扔下去，但还是忍住了。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达利精明地没有表明立场，还去了趟意大利。他觉得自己对贵族越来越着迷，经常出入讲究的沙龙，为自己找到了富有的赞助者，他和大腹便便的诺阿耶子爵[5]合影留念，称其为自己的“梅塞纳斯”[6]。欧洲战争逼近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既能安享美食，又能在危险迫近时溜之大吉的地方。他选择了波尔多，又在法国战役爆发前夕及时逃往西班牙。他在西班牙呆得足够久，打听到几段讲述反共暴行的故事，之后又去了美国。这段故事以他的声名鹊起告终。三十七岁的达利变成了忠诚的丈夫，他的失常之处也得以治愈，或者说部分治愈，而且他还彻底皈依了天主教。据说，此时的他财源滚滚。

尽管如此，他却依然以自己在超现实主义时期创作的《伟大的自慰者》（*The Great Masturbator*）、《雾状的头盖骨鸡奸三角钢琴》（*Sodomy of a Skull with a Grand Piano*）等作品为荣。这类作品的复制品在书中随处可见。达利的很多画作都属于具象派，我下面会提到它们的特征。但他的超现实主义画作和照片有两个明显的特点——性变态和

恋尸癖。性物品和性象征——有些广为人知，比如我们的老朋友高跟拖鞋；有些则是达利本人的独创，比如拐杖和盛着热牛奶的杯子——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关于排泄的主题也颇为突出。谈到画作《悲哀的游戏》（*Le Jeu Lugubre*）时，他说：“我用极为得意的写实手法画出溅满粪便的短裤，超现实主义小团体里的所有人都因而痛苦地思考：我是否有食粪癖？”达利坚定地说他没有，而且他认为这种反常行为“令人厌恶”，但他似乎只是此时才对粪便没有兴趣。甚至在讲述观看女人站着小解的经历时，他也要加上她因为没对准地方而弄脏了鞋子的细节。没有人会集所有恶习于一身，达利也自称并非同性恋，但除此以外，他身上的变态之处仍超出人们的想象。

不过，他最显著的特征是他的恋尸癖。他对此毫不讳言，而且自称已经根除了这个癖好。死人的面孔、骷髅头、动物尸体在他的画作中经常出现，噬咬着濒死蝙蝠的蚂蚁形象更是出现了无数次。有一张照片上是挖出来的高度腐败的尸体。另一张是三角钢琴上正在腐烂的死驴，这后来成为超现实主义电影《一条安达鲁狗》（*Un Chien Andalou*）的一部分。达利回顾起这些死驴时依旧兴致盎然：

我把大桶大桶的胶水泼在那些驴身上，“制作”出它们腐烂的场景。我挖出了它们的眼珠，用剪刀把眼眶弄得更大。我用同样的方法粗暴地铰开它们的嘴，好让它们一排排的牙齿更清楚地显露出来，我还在每个驴嘴上加了几个下巴，尽管这些驴已经腐烂，看起来却好像还想多吐出一点死亡的气息，而在驴嘴上面，黑色钢琴的琴键就像是又一排牙齿。

最后，还有那张——显然是想方设法假造出来的——题为《在出租车里腐烂的模特》（*Mannequin Rotting in a Taxicab*）的照片。在这个显然已经死去的女孩腐烂肿胀的脸和乳房上，爬着巨大的蜗牛。在照片下方的文字说明里，达利强调说，那些都是勃艮第蜗牛——也就是说，是可以食用的品种。

当然，这本厚达四百页的四开本书里还有很多其他内容，但我认为，我对达利道德基调和精神状态的描述不失公允。这是一本令人掩鼻的书。如果真有哪本书每一页都带着臭气，那就是这一本，这也许正中达利下怀，他在初次追求后来成他妻子的加拉时，在自己身上涂满了用鱼胶熬过的羊粪油膏。不过，与此相对的一个事实是，达利是个天赋异禀的画师。从画作的精细与沉稳看来，他也是个勤奋的人。他喜欢张扬自己，一心往上爬，但他不是骗子。与大多数指责他的道德作风、嘲笑他的画作的人相比，达利的才华要高出他们五十倍。这两组事实合在一

起，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任何共识，这个问题几乎从未得到过真正的讨论。

关键在于，这本自传是对理智与高雅，甚至是对生命本身——因为达利的部分画作可能会像色情明信片一样荼毒人们的想象力——直接而明确的攻击。达利的所作所想存在争议，但在他的观点和性格之中，人类最基本的准则杳无踪迹。他就像跳蚤一样反社会。这样的人显然不受欢迎，一个能让这种人发迹的社会肯定出了什么问题。

假如把这本书和其中的图画给埃尔顿爵士[7]，给阿尔弗雷德·诺耶斯[8]，给因“风雅之士的没落”而狂喜的《泰晤士报》（*The Times*）主笔看——事实上，给任何“明智的”厌恶艺术的英国人看——我们可以轻松想象出他们的反应。他们会斩钉截铁地否认达利有任何价值。这些人不光不会承认道德水准极低的东西也可能具有审美价值，而且，他们真正想做的是拍拍每个艺术家的后背，告诉他们无须思考。在如今这个时代，他们格外有害，因为信息部和英国文化协会把权力授予了他们，因为他们不仅想要摧毁每一个新生的天才，还要阉割过去。看看现在英国和美国对风雅之士展开的新一轮攻讦吧，他们攻击的对象不光有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劳伦斯，甚至还包括T.S.艾略特。

不过，就算你跟那些能够看出达利的价值的人交谈，他们的回应一般来说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你说达利尽管是个出色的画师，但却是个无耻的小恶棍，你就会被他们看作野蛮人。如果你说你不喜欢腐烂的尸体，说那些喜欢腐尸的人精神有毛病，你会被认为是审美判断力欠缺，因为他们认为《在出租车里腐烂的模特》是一幅佳作。这两种谬论之间没有中间立场，但我们却很少听闻相关讨论。一边是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另一边是“为艺术而艺术”（尽管这个措辞本身已经不再流行）。色情是个难以开诚布公讨论的问题。人们既不敢表现出震惊，也不敢表现得无动于衷，不敢言明艺术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为达利辩护的人们所主张的，是一种教士的特权。他们把艺术家排除在了束缚普通人的道德标准之外。只要念出“艺术”这个咒语，便可百无禁忌：可以脚踢小女孩的脑袋，甚至可以拍《黄金年代》（*L’Age d’Or*）这样的电影[9]。达利当然更可以在多年依靠法国赚钱之后，在法国面临危险时抱头鼠窜。只要画画得够好，一切皆可原谅。

如果把这种主张扩展到普通犯罪之上，我们就能看出它错得有多离

谱。在我们这样一个艺术家皆非常人的时代，必须赋予他一定程度的豁免权，就像孕妇那样。尽管如此，没人会说孕妇有权谋杀他人，也没人会为艺术家提出类似的主张，无论他们多有才华。假如莎士比亚明天复活，我们发现他最爱的消遣是在火车车厢里强奸幼女，我们不可能因为他可能会写出又一部《李尔王》（*King lear*）而允许他那么干。而且，不管怎样，最恶劣的罪行并不一定能受到惩罚。鼓励恋尸幻想的危害也许和在赛马场扒窃差不多。我们应当同时记住两个事实，达利是个优秀的画师，也是一个令人反感的人。两者不能互相否定，或者说不能影响彼此。我们对一堵墙的首要要求就是能立起来。如果能立着，那便是好墙，至于用途却与此无关。如果这堵墙围着的是一个集中营，那么就算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墙，它也应当被推倒。同样，也许可以这么说：“这是一本好书或一幅好画，它应当被公众刽子手烧掉。”如果不能讲出，或者至少是想到这一点，我们便是在逃避艺术家也是公民、也是人这一事实的意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达利的自传和作品应当被查禁。除了地中海港口城市常卖的淫秽明信片之外，恐怕查禁任何东西的做法都值得商榷，而达利的幻想也许有助于我们看清资本主义文明的堕落。但他最需要的显然是接受诊疗。问题并不在于他是什么，而在于他为什么会那样。他无疑是个病态的聪明人，这也许并没有因为他自称皈依宗教而改变多少，因为真诚的忏悔者或已经回归理智的人不会如此洋洋自得地炫耀过去的罪恶。他是世界病的表现之一。重要的不是把他斥为应受鞭笞的无赖，不是把他当成不受诘问的天才来辩护，而是要弄清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特殊的变态行为。

答案也许就藏在他的作品中，那些我本人无力鉴赏的东西里。但我可以指出一条也许能够帮我们找出答案的线索。这就是达利在成为超现实主义者之前想要回归的那种旧式的、过分华丽的爱德华时代[10]画风。达利的部分画作和丢勒[11]相似，有一幅画似乎体现出了比亚兹莱[12]的影响，还有一幅画似乎从布莱克那里有所借鉴。但他的作品中最常见的还是爱德华时代的画风。当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看到无数的页边插图时，我觉得它们很像某种东西，一时又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看到第一部分开头那个装饰性的烛台时，我停住了。它让我想起了什么呢？终于想起来了。它让我想起了一本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书（译本），那是一本厚重、粗俗、装饰奢华的书，应该出版于1914年左右，它的章节前后都有装饰性的纹样。达利自传中的烛台纹样，一端看起来像是蜷曲的鱼形动物（似乎以传统的海豚形象为原型），有种奇怪的熟

悉感；另一端像是一支燃着的蜡烛。这支在画作中反复出现的蜡烛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仿都铎风格的乡村酒店里，常有那种模仿烛台形状、边上还做出蜡滴模样的电灯，画中的蜡烛就是这个样子。这支蜡烛和它下面的纹样，一下子就传达出了一种强烈的感伤情绪。似乎是为了中和这种感觉，达利在整张纸上撒了整管墨水，但却收效甚微。这种印象在书中比比皆是。比如，第六十二页页脚处的标志仿佛取自《彼得·潘》。第二百二十四页上的人物虽然头颅被拉长得像香肠，但还是童话书中女巫的样子。第二百三十四页上的马和第二百一十八页上的独角兽像是詹姆斯·布朗奇·卡贝尔[13]作品中的插图。第九十七页、第一百页等处脂粉气十足的年轻人画像也给人以同样的印象。别具风格的感觉不断出现。如果去掉那些骷髅、蚂蚁、龙虾、电话和其他装饰，你会发现自己回到了巴里、拉克姆、邓萨尼[14]和《彩虹深处》[15]的时代。

颇为奇怪的是，达利自传中的某些低级手法是和那个时代连在一起的。读到开篇处引用的关于踢妹妹脑袋的那段文字时，我隐约觉得它和另一样东西有些相似。是什么呢？对！哈利·格雷厄姆[16]的《无情之家的残忍歌谣》（*Ruthless Rhymes for Heartless Homes*）。这些歌谣在1912年左右非常流行，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可怜的小威利哭得那么伤心，

他是个难过的小男孩，

因为他拧断了妹妹的脖颈，

便没有了果酱配下午茶。

这首歌谣的原型也许正是达利的轶事。当然，达利一定清楚自己对爱德华时代风格的偏好，而且多多少少地通过模仿拼凑加以利用。他对1900年尤为钟情，声称1900年的每种装饰品都充满了神秘、诗意、情色、疯狂、变态等。不过，模仿拼凑总是意味着对被模仿对象的由衷喜爱。知识分子——就算不是全部，至少也有大部分——倾向于带有这种非理性、甚至孩子气的冲动。例如，雕塑家对飞机和曲线感兴趣，但也乐于鼓捣黏土或石块。工程师喜爱工具的触感、发电机的轰鸣和石油的气味。精神医生自己往往也有性变态倾向。达尔文之所以成为生物学家，部分是因为他乡村绅士的身份和对动物的喜爱。也许因此，达利对爱德华时代事物看似执拗的迷恋（比如，他对1900年地铁入口的“发现”）或许只是更深层次、更无意识的钟爱的表现。达利在页边上随处

散布着无数范本式的精美插画，郑重其事地印着夜莺、钟表等纹饰，这样做也许半是玩笑。第一百零三页上穿着灯笼裤玩空竹的小男孩就是一个完美的时代象征。但这些东西之所以会出现在书上，也许还因为达利情不自禁地要画上它们，因为他确实属于那个时期、那种画风。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他的变态行为就有些说得通了。也许这就是他确保自己与众不同的方式。达利无疑拥有两个特质，一是绘画的天赋，二是极度的自我。“七岁时，”他在《生活》这本书的第一段说，“我想当拿破仑。从那时起，我的雄心就在不断膨胀。”他故意用一种让人吃惊的方式讲出了这句话，但那无疑是真的。这种感觉颇为常见。“我知道我是天才，”有人曾对我这么说过，“远在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天才之前。”假如你除了自我便一无所有，手肘以下都不灵便；假如你真正的天赋是创作细节丰富、传统的具象派画作，你真正的专长是为科学教科书绘制插图。你又怎么能成为拿破仑呢？

但总会有路可走——走向邪恶。不停地做那些会让人震惊和受伤害的事情。五岁时把小男孩扔下桥，鞭打老医生的脸、打碎他的眼镜——或者至少想要这么做。二十年后，用剪刀挖出死驴的眼珠。只要这样做，你就总会觉得自己独树一帜。而重要的是，这样做有回报！这比犯罪安全得多。考虑到达利在自传中的各种掩饰，他显然不曾因为自己的怪癖而吃过亏，而如果他生活在之前的年代，事情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他成年之后面对的是腐化的20世纪20年代，那时的人们普遍都很世故，欧洲各国的首都满是放弃了体育和政治，转而资助艺术的贵族和食利者。如果你把死驴扔向人群，他们便会抛回金钱。对蝗虫的恐惧——几十年前只会招人嘲笑——已经成了有利可图的有趣“情结”。当这个世界在德军面前崩塌的时候，还有美国在等着你。你甚至可以通过皈依宗教而洗净一切，不用忏悔就能从巴黎的时尚沙龙跳进亚伯拉罕[17]的怀抱。

这，也许就是达利所处的历史背景的大体轮廓。但他的变态行为为何那么特殊，他为何能够那么轻松地把腐尸这种恐怖画面“卖”给世故的公众，这些都还有待心理学家和社会评论家解答。或许某些学派的评论家会认为，它们是“资产阶级的堕落”（和“尸毒”“腐朽的食利阶级”等说法类似），仅此而已。尽管这阐明了事实，但并没有揭示其中的联系。人们还是想知道达利为什么会喜好尸体（而不是爱慕同性），想知道为什么食利者和贵族们会买他的画，而不是像他们的祖父那样去打猎和做爱。单纯的道德谴责是不够的。但是，我们也不应当以“超然”的名义，

假装说《在出租车里腐烂的模特》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它们都病态而令人反感，任何探究都应当从这个事实入手。

---

[1]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著名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画家，因其超现实主义作品而闻名。

[2] 弗兰克·哈里森（Frank Harris，1856-1931），爱尔兰裔美国作家、记者、编辑、出版家。其五卷本自传《我的生活与爱情》（*My Life and Loves*）因内容过于色情在欧美被禁多年。

[3] 《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Salvador Dali*），出版于1942年。

[4] 托莱多圣母主教座堂，西班牙天主教托莱多总教区的主教座堂，是西班牙三座13世纪哥特式主教座堂之一，被认为是西班牙哥特式风格的杰作。

[5] 夏尔·德·诺阿耶（Charles de Noailles，1891-1981），法国贵族、艺术赞助者。

[6] 盖乌斯·梅塞纳斯（Gaius Cilnius Maecenas，公元前70年-公元前8年），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的谋臣，著名的外交家，同时还是诗人艺术家的保护人。诗人维吉尔和贺拉斯都曾被他提携。他的名字在西方被认为是文学艺术赞助者的代名词。

[7] 戈弗雷·埃尔顿（Godfrey Elton，1892-1973），英国历史学家。

[8] 阿尔弗雷德·诺耶斯（Alfred Noyes，1880-1958），英国诗人、短篇小说作家、剧作家。

[9] 达利提及《黄金时代》，并补充说该电影的首映被流氓们搅乱了，但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具体情况。按照亨利·米勒的说法，除了别的东西之外，片中还有女人排便的特写镜头。（作者原注）

[10] 爱德华时代，指1901年至1910年英王爱德华七世在位的时期。

[11]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 ü rer，1471-1528），德国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及艺术理论家。

[12] 奥伯利·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1872-1898），19世纪末最伟大的英国插画艺术家之一。

[13] 詹姆斯·布朗奇·卡贝尔（James Branch Cabell，1879-1958），美国作家，作品以道德寓言为主。

[14] 爱德华·约翰·摩顿·拉克斯·普朗克，邓萨尼男爵十八世（Edward John Moreton Drax Plunkett, 18th Baron of Dunsany，1878-1957），爱尔兰小说家、剧作家，以幻想小说和惊悚小说闻名。

[15] 《彩虹深处》（*Where the Rainbow Ends*），儿童剧，由约翰·拉姆齐（John Ramsey）和克利福德·米尔斯（Clifford Mills）创作于1911年。

[16] 哈利·格雷厄姆（Harry Graham，1874-1936），英国作家、诗人，因作品中的怪异与黑色幽默出名。

[17] 亚伯拉罕，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先知，是耶和华从地上众生中所拣选出并给予祝福的人。

英国的反犹主义

英国原本有约四十万名犹太人，1934年后又有数千或至多数万名犹太难民流入英国。犹太居民几乎全都集中在五六个大城镇里，大多在食品、服装和家具等行业中服务。犹太人拥有或部分拥有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等一些大型垄断企业、一两家主流报纸和至少一家大型连锁百货商店集团，但这与犹太人主宰英国商界的说法相去甚远。相反，犹太人似乎并没能跟上大规模并购的现代潮流，而是依然坚守必须依靠较小的规模和旧式方法维持的行业。

之所以我要先讲这些任何见多识广的人都知道的背景信息，是为了强调英国并不存在真正的犹太人“问题”。犹太人数量不多、实力不够强大，只在广义上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才有明显的影响力。尽管如此，人们普遍承认反犹主义正在蔓延，承认战争导致这个问题严重恶化，承认那些富有同情心且文明开化的人们也不能免受影响。它并未以暴力形式出现（英国人几乎总是优雅和守法的），但还是颇具恶意，而且在合适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政治后果。下面是过去一两年里我听到的反犹主义言论中的几个例子：

中年办公室职员：“我一般情况下都乘公共汽车上班。这样比较花时间，但我现在根本不想在高特格林站坐地铁。那条线上被拣选的族类[1]太多了。”

烟草店老板（女）：“不，我可没火柴卖给你。我应该找街那头的女士试试。她总是有火柴。被拣选的族类的一员，你懂的。”

中产阶级女性：“呃，没人能说我是反犹主义者，但我确实认为这些犹太人的行为方式讨厌至极。比如他们拼命往队伍前头挤的样子等。他们自私得令人发指。我认为他们很大程度上是自作自受。”

送奶工：“犹太人不去工作，不会像英国人那样工作。他们太聪明了。我们用这个工作。”（绷紧肱二头肌）“他们用这个。”（指指额头）

特许会计师（聪明，未经引导的左翼）：“这些该死的犹太佬都亲

德。要是纳粹打过来，他们一夜之间就会倒戈。我在工作中见过很多犹太人。他们发自内心地崇敬希特勒。他们会奉承任何欺负他们的人。”

聪明的女性（在交给她一本有关反犹主义和德国暴行的书后）：“别让我看这个，请别让我看这个，它只会让我比以前更加痛恨犹太人。”

类似的言论不胜枚举，但上面这些已经足够使我们讨论下去了。其中暴露出了两个事实。其一，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们以反犹主义为耻，小心翼翼地在“反犹主义”和“讨厌犹太人”之间划出界线——这一点非常重要，稍后我必须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其二，反犹主义是非理性的。说上面那些话的人因为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犹太人的某种冒犯（比如排队领取食品时的不当行为）而对他们加以指责，但这种指责显然只是为了对某种深层的偏见加以辩护。用事实和统计数字来反驳这些言论的尝试毫无用处，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上面最后一条言论表明，在完全清楚自己的立场站不住脚的同时，有些人依然会坚持反犹主义，至少也会坚持反对犹太人。如果你讨厌某人，这种厌恶便会一成不变，念及他的美德并不会让你的态度有所改善。

这场战争助长了反犹主义，而且在很多普通人看来，它甚至给了反犹主义些许正当理由。首先，可以确定地说，盟国的胜利会让犹太人这个种族得益。因此，所谓“这是一场犹太战争”的理论显得有点道理，更何况犹太人为战争胜利而付出的努力很少得到应有的认可。大英帝国是一个很大程度上依赖多方共识而结合起来的巨大、多元的组织，经常必须以损害更为忠诚的成员为代价来讨好不那么可靠的成员。宣传犹太士兵的英勇事迹，甚至只是承认在中东地区有相当多的犹太人部队，都会激起南非、阿拉伯国家和帝国其他成员的抵触，更简单的做法是忽略这些事，让普通市民继续认为犹太人尤其擅长逃避兵役。而且，犹太人所从事的正是那些在战时必然会招致民众不满的行业。犹太人从事的职业大多和食品、服装、家具和烟草销售行业有关——这些恰恰都是长期短缺的物资，短缺随后又会引发索价过高、黑市交易和徇私等问题。此外，所谓犹太人在空袭中表现得极为懦弱的常见指责，也因为1940年的大空袭[2]而显得有些可信。凑巧的是，犹太人聚居的白教堂区是最先遭到大规模轰炸的地点之一，这自然导致了大批犹太难民散落到伦敦各个角落。只从这些战时现象来看，很容易因为这些错误的前提把反犹主义看成一种准理性的东西。自然，反犹分子视自己的存在为合理。只要在报纸文章中提到这个话题，我总是能收到不少“反驳”，总是有些信件来

自头脑清醒、显然不用为经济问题苦恼的普通人——比如医生。这些人总是说（就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说的）他们起初对犹太人不抱偏见，只是通过观察现实才被推到了如今的立场上。相信那些不可能是事实的谣言，这种本领正是反犹主义的特征之一。1942年发生在伦敦的一场奇怪的事故就是很好的例子，当时，被邻近爆炸的一枚炸弹吓坏了的人群涌向一个地铁口，导致一百多人被踩踏致死。那天，整个伦敦不停流传着“犹太人要为此负责”的说法。显然，如果人们相信这类东西，那么和他们争论也没什么用。唯一有用的对策是，搞清楚为什么他们会在某个问题上轻信谬论，同时又能在其他问题上保持理智。

但现在先回到我先前提及的问题——反犹思潮的盛行众人皆知，却没人愿意承认自己也有份。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反犹主义被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过，与对其他种族偏见全然不同。人们会不遗余力地证明自己并非反犹主义者。因此，1943年在圣约翰伍德的一个犹太教堂为波兰犹太人举办代祷仪式时，地区当局声称其非常渴望参加，镇长盛装出席，皇家空军、地方志愿军、护士、童子军和其他组织的代表也都参加了活动。表面上看，这令人动容地体现出人们与受苦受难的犹太人团结一致。但这实质上是一种为了让自己的行为显得体面而采取的有意识的行动，他们的主观感受很多时候必定截然不同。在有部分犹太居民的圣约翰伍德，反犹主义十分猖獗，而且据我所知，在那座犹太教堂里坐在我身旁的一些人也受到了影响。地方志愿军里我所在那个排的排长事先非常热心地嘱咐我们在代祷仪式上“好好表现”，但他其实曾是莫斯利的黑衫军成员。只要这种感情分化依旧存在，对大规模反犹暴行的容忍，以及更危险的对反犹法律的容忍，就不可能在英国出现。反犹主义当前确实不可能抬得起头。但这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是件好事。

发生在德国的迫害行为的影响之一是它妨碍了对反犹主义的严肃研究。“大众观察”[3]组织一两年前在英国进行过一项简单且不全面的调查，但如果针对这个问题还有过其他任何调查，结果也一定都被严格保密了。与此同时，所有细心的人都在有意识地压制着任何可能伤害犹太人脆弱感情的事物。1934年后，犹太笑话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从明信片、杂志和杂耍戏院舞台上消失了，在小说中描写不友好的犹太人角色也会被视为反犹主义。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文明人中形成了一种社交礼节，要认可犹太人的论据，避免审视阿拉伯人的主张。这个决定本身也许是正确的，但人们接受这一立场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不该责备本已身处逆境的犹太人。因此，因为希特勒，媒体界事实上受到了有利于犹太人的审查，而私底下的反犹主义却在壮大，甚至已经渗透到了敏感和聪

慧的人群中。这在1940年的难民拘押事件中尤为明显。自然，理智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有责任抗议把所有不幸的外国人全关起来的做法，这些外国人大部分只是因为反对希特勒才会流亡英国。但私底下我们却能听到极为不同的观点。少数难民的行为很不得体，针对他们的不满情绪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反犹主义的暗流，因为他们大多是犹太人。工党的某位大人物——我不会点出他的名字，但他却是英国最受尊重的人之一——带着强烈的情绪对我说："我们从未邀请这些人来这个国家。既然他们选择来这里，就让他们承担后果吧。"不用说，这位先生会支持任何反对拘押外国人的请愿书和宣言书。认为反犹主义罪恶、可耻，认为文明人不应受其感染的情绪并不利于科学探讨，事实上，很多人会承认他们害怕在这个问题上太过深究。也就是说，他们不光害怕发现反犹主义正在蔓延，而且害怕发现自己已受感染。

要正确看待这一点，必须向前回溯几十年，回顾那个希特勒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失业画家的时代。我们会发现，尽管反犹主义如今在英国颇为明显，但也许还不如三十年前那般猖獗。诚然，作为一种精心构思的种族或宗教学说，反犹主义从未在英国活跃过。英国从未有过多少针对通婚，针对犹太人在公众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负面情绪。不过，三十年前，人们多多少少地认为犹太人理应是可笑之人，而且——尽管他们智力超群——"性格"略有缺陷。理论上说，从未有法律宣布犹太人不具备某种资格，但他们实际上仍然被某些行业拒之门外。比如，他们恐怕当不上海军军官，也进不了陆军的"精锐"团。犹太男孩在公学的经历几乎全是痛苦。当然，如果他特别有魅力，或是特别擅长运动，他也许能够忘掉自己的犹太身份，但这种身份就像是口吃和胎记那样属于先天残疾。富有的犹太人往往会用英格兰或苏格兰贵族的名字作为掩饰，这种做法在普通人看来似乎非常自然，就像罪犯想要尽可能地转换身份一样。大约二十年前，我在仰光和一位朋友正要搭上出租车时，一个衣衫褴褛、面色苍白的小男孩冲到我们面前，向我们讲起他乘船从科伦坡来，想讨点钱回去的复杂故事。他的举止和外貌让人很难"归类"，我对他说：

"你的英语很好。你是哪国人？"

他急切地用印度腔的口音说："我是犹太人，先生！"

我记得当时自己转向朋友，半带玩笑地说："他竟然公然承认了。"在那之前，我认识的所有犹太人都以身为犹太人为耻，至少会避谈自己的种族，若是不得不提，他们往往会用"希伯来人"这个词。

工人阶级的态度也同样糟糕。在白教堂区长大的犹太人会觉得，如果闯入临近的基督徒贫民区，受到人身侵犯和嗤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杂耍戏院和漫画报纸上的“犹太笑话”几乎总是带着恶意[4]。此外还有文学上对犹太人的羞辱，贝洛克、切斯特顿及其追随者笔下的污秽之词几乎和欧陆文学相当。非天主教作家有时在这件事上也有些微过失。自乔叟以来，英国文学中就能看出反犹主义的影响，我甚至不用起身翻书，就能记起莎士比亚、斯摩莱特、萨克雷、萧伯纳、H.G.威尔斯、T.S.艾略特、奥尔德斯·赫胥黎等许多作家笔下那些放在今天会被指为反犹主义的片段。在希特勒的时代到来之前明确支持过犹太人的英国作家，我无须思索就能想到的只有狄更斯和查尔斯·里德。对于普通知识分子而言，无论他与贝洛克和切斯特顿的共识是多么的少，他都不会明确提出反对。切斯特顿在小说和散文中用最苍白的托词塞进了对犹太人无休止的冗长攻讦，但他却从未因此遇到麻烦——他反倒是英国文学界最广受尊敬的人物之一。如今，任何想要用这种口吻写作的人都会招致口诛笔伐，而更有可能的是，他的作品压根就发表不了。

若真是如我所说，对犹太人的成见早已在英国广为传播的话，我们就不应认为希特勒真正地削弱了这种思潮。他只不过是让两类人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一边是有政治意识、认识到现在不该指责犹太人的人，另一边是缺乏政治意识、心中固有的反犹主义又被战争的紧张局面激发起来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很多宁死也不愿承认反犹情绪的人，背地里反而是倾向于这种情绪的。我已指出，我认为反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恐惧症；当然也有将它合理化的辩解，人们真心相信这些说法，而且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的。普通人的辩解是，犹太人是剥削者。这么说部分是因为英国的犹太人大多是小业主，也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方式比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更明显、更容易被看穿。知识水平较高的人群对反犹主义的辩解是，犹太人散布不满情绪，削弱了民族士气。这在表面上看也有其合理性。过去二十五年来，所谓“知识分子”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破坏性的。如果这些“知识分子”干得更彻底一些，英国在1940就得投降，我觉得这么说并不夸张。但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中必然有不少犹太人。犹太人是英国文化和民族士气的敌人，这种说法乍一看有点道理。若是仔细分辨，就能看出这是一派胡言，但总会有些名人能够被引作例证。过去几年里，对肤浅的左翼思想的反攻逐渐形成，这种思想是此前十年中的时尚，左翼图书俱乐部之类的组织正是典型例子。这场反攻带有反犹色彩，阿诺德·卢恩的《好猩猩》（*The Good Gorilla*）和伊夫林·沃的《升起更多旗帜》（*Put out More Flags*）就是例证，假如反犹不是明显的危险话题，这种特征也许会更明显。几十年来，英国从未

出现过值得担心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但英国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也许会复苏，如果这次大战严重削弱了英国国力，这种复苏就很可能发生。1950年的年轻知识分子们也许会像1914年的年轻人一样天真地爱国。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在法国反德雷福斯事件中盛极一时，那种切斯特顿和贝洛克想要引入这个国家的反犹主义，也许就能在此立足。

关于反犹主义的起源，我并没有什么定论。现有的两个解释，一则将其归因于经济问题，另一则认为它是中世纪的遗产，这两者在我看来都不够满意，尽管我承认它们合在一起可以解释事实。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反犹主义是更广义的民族主义问题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尚未得到认真研究；犹太人显然是替罪羊，尽管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成为替罪羊。我撰写本文时所依据的几乎完全是有限的个人经验，也许每一个结论都会被其他观察者推翻。事实上，这个话题上几乎没有任何数据可用。但基于这些结论本身的价值，我依然要加以总结。概括起来主要是：

英国的反犹主义比我们愿意承认的严重，而战争又加重了这一问题，但如果把眼光放远到几十年，而不是几年来看的话，我们并不能确定反犹主义问题正在恶化。

它在现阶段并不会导致公开迫害，但却会让人们对其他国家犹太人的遭遇漠不关心。

它实质上是颇为非理性的，而且不会被证据说服。

发生在德国的迫害导致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反犹情绪，让整体局面不再明朗。

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的研究。

只有最后一点值得展开。要科学地研究任何问题，我们都需要有公正的态度，这在牵涉到利益和情感时显然更难做到。很多人都能在有关海胆或二的平方根的问题上保持客观，但在虑及自己的收入来源时却会自相矛盾。有关反犹主义的所有文献几乎都受到了作者的自负的影响，他们都认为自己能对其免疫。“既然我知道反犹主义是非理性的，”他争辩道，“因此它跟我无关。”因此，他就不能从那个能够找到可信证据的地方——也就是他自己的内心——开始研究。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种被笼统地称作民族主义的恶疾，如今几乎影响着整个世界。反犹主义只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并非所有人都身染这种特定形式的疾病。比如，犹太人不会是反犹主义者，但很多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我看来不过是颠倒了的反犹主义者，就像很多印度人和黑人时常表现出反向肤色歧视一样。问题在于，现代文明中缺少某种东西，某种精神维生素，因此我们或多或少地染上了一种精神疾病，相信整个种族、整个民族是无法解释的优秀或邪恶的。我敦促所有的现代知识分子细致、诚实地审视自己的内心，不去想民族忠诚和各种各样的仇恨。他们当然会感受到这些东西所带来的情感冲击，但也能冷静地审视它们的本来面目，正是这点赋予了他们成为知识分子的资格。由此可见，针对反犹主义的任何研究都不应当从“为什么这种明显非理性的信念吸引了其他人？”入手，而应该从“为什么反犹主义吸引了我？它有哪些地方让我觉得是正确的？”出发。如果有人问及这样的问题，他至少能发现自己的辩解，也许还能看到更深层的东西。应当着手研究反犹主义，研究者当然不该是反犹分子，但至少应该是那些知道自己不能对反犹主义免疫的人。到希特勒覆灭之时，我们就能对这个问题展开真正的调查研究，最好不要一开始就揭穿反犹主义，而是要从整理自己和他人心中所有的辩解和借口入手。这样一来，我们也许能够发现一些线索，帮助我们找到反犹主义的精神根源。但若是说在更严重的民族主义恶疾尚未治愈的情况下我们就能根除反犹主义的话，我无法苟同。

---

[1] 被拣选的族类，指犹太人，语出《圣经·旧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2] 大空袭，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英国首都伦敦实施的战略轰炸。

[3] “大众观察”，英国研究机构，成立于1937年。

[4] “犹太笑话”和“苏格兰笑话”的比较很有意思，两者是杂耍剧院里的娱乐形式，在表面上都非常相似。偶尔会有人讲一个把两个民族放在平等位置上的故事（比如，一个犹太人和一个苏格兰人一起走进酒吧，两个人却都渴死了），但总的来说，人们认为犹太人只是狡诈与贪婪，而苏格兰人除此之外还有强健的体魄。举例来说，这一点在犹太人和苏格兰人一起参加聚会的故事里有所体现。广告上说这个聚会是免费的，但意外的是，参加这个聚会需要募捐，为了逃避捐钱，犹太人晕倒了，苏格兰人扛起他走了出去。在这个故事中，苏格兰人承担了扛起他人的壮举。如果两者的角色颠倒过来，看起来就会很不对劲。（作者原注）

好的坏书

不久前，有家出版社重印了伦纳德·梅里克[1]的一本小说，委托我写篇序言。这家出版社似乎要重新出版一系列20世纪不太知名、已经被人部分遗忘的小说。在如今这种无书的日子里，这种做法很有价值。我真的很羡慕那些以在小书箱里寻找儿时最爱书籍为工作的人。

那种如今似乎很少出现，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却广为流行的作品，就是切斯特顿所说的“好的坏书”。这类书从不标榜文学性，然而在严肃作品消亡时，它们却仍然值得阅读。拉菲兹系列和福尔摩斯系列显然是这类图书的杰出代表，在无数“问题小说”“人类文献”“劣质起诉书”等被人忘却时，这两个系列的故事却仍然安如泰山。柯南·道尔和梅瑞狄斯，谁被遗忘得更厉害呢？奥斯汀·弗里曼早期写的小说，如《歌唱的白骨》（*The Singing Bone*）、《死神之眼》（*The Eye of Osiris*）等，还有欧内斯特·布拉玛（Ernest Bramah）的马克斯·卡拉多斯系列小说，都属于这类。如果把标准稍微放低，盖伊·布思比（Guy Boothby）的西藏题材惊险小说《尼古拉医生》（*Dr.Nikola*）也可以包括在内。这本书可以看作是《鞑靼游记》（*Travels in Tartary*）的学生版，与它相比，真正的中亚之旅或许也会黯然失色。

除了惊险小说，这个时期还有许多不太知名的幽默作家，比如说其长篇小说似乎不再值得阅读的佩特·里奇（Pett Ridge）、著有《寻宝人》（*The Treasure Seekers*）的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只要不碰政治就算得上优秀的乔治·伯明翰（George Birmingham）、写色情作品的宾士德（Arthur M.Binstead），也就是《体育时报》（*The Pink' Un*）上的“投球手”，如果加上美国作家，还有写作彭罗德系列故事的布思·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巴里·佩恩（Barry Pain）比这些作家都要优秀，想来他的一些幽默作品现在仍然在版，但对那些偶然了解到他的读者，我会推荐《克劳迪斯的八天》（*The Octave of Claudius*），但这本杰出的恐怖小说想必已经绝版。年代较晚的还有彼得·布伦德尔（Peter Blundell），他以W.W.雅各布斯（W.W.Jacobs）的风格，写了许多关于远东海港城镇的作品，尽管H.G.威尔斯曾在书中赞扬过他，但他似乎已经被人莫名其妙地遗忘了。

但是，所有这些书都明显属于“逃避”文学。它们给人们留下了快乐的记忆，让人们能偶尔安静地回忆起它们；不过，它们几乎不会假装与真实生活有任何联系。还有一类“好的坏书”，它们的目的较为严肃，而且我认为它们体现了小说的本质，解释了小说为什么会在今天衰落。过去五十年里有许多作家，其中有些仍在写作，他们从任何严格的文学标准来看都难称“优秀”，但他们是天生的小说家，有着真诚的品质，这或许是因为没有受到高尚品味的束缚。这类作家包括伦纳德·梅里克、W.L.乔治（W.L.George）、J.D.贝雷斯福德（J.D.Beresford）、欧内斯特·雷蒙德（Ernest Raymond）、梅·辛克莱（May Sinclair）和A.S.M.哈钦森（A.S.M.Hutchinson）。A.S.M.哈钦森虽然比不上其他几位，但在本质上却和他们相似。

他们大多都是多产作家，作品质量自然也参差不齐。每个作家都有一两部杰出的作品，如梅里克的《辛西娅》（*Cynthia*）、贝雷斯福德的《真相候选人》（*A Candidate for Truth*）、W.L.乔治的《卡利班》（*Caliban*）、梅·辛克莱的《联合迷宫》（*The Combined Maze*），以及欧内斯特·雷蒙德的《我们是被告》（*We, the Accused*）。在这些书中，作者都能将自己与想象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与他们感同身受，并且博得同情；他们的那种放纵，比他们聪明的人都难以做到。他们让人们知道，智识的优雅之于讲故事的人，就像之于戏剧演员，有可能是一种阻碍。

以欧内斯特·雷蒙德的《我们是被告》为例。这本谋杀小说或许改编自克里平谋杀案，它尤其污秽，而且十分令人信服。对于书中人物那种可怜的庸俗，作者只是部分理解，因此也并不厌恶他们，不过我想这对小说的成功大有益处。或许，这本书甚至和西奥多·德莱塞的《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一样，受益于笨拙冗长的写作方式；作者将细节层层堆叠，几乎毫无取舍，而这种做法营造出了可怕的残忍效果。《真相候选人》也同样如此。其中没有那种笨拙，但却有那种认真看待普通人问题的能力。类似的还有《辛西娅》和《卡利班》的前半部分。W.L.乔治的作品大多是垃圾，但是在以诺斯克里夫勋爵为原型写成的《卡利班》中，他成功描绘出一幅关于伦敦中低阶层生活的难忘而真实的画面。这本书或许带有部分自传性质，而“好的坏作家”有一个长处，那就是他们在写自传时没有羞耻感。表现癖和自怜是小说家的祸患，但如果小说家过于害怕这两方面困扰，他们的创作天赋就会受到影响。

“好的坏书”能使我们开心、激动甚至感动，而我们却又不会将它们当真；这类书的存在提醒我们艺术和思考是两回事。我认为，不论以何种方式来衡量，卡莱尔都要比特洛勒普聪明。但是特洛勒普的作品仍然值得一读，而卡莱尔的却不值得；卡莱尔聪明有加，但却写不出简单明了的英语文字。小说家和诗人差不多，他们很难将才智与创造力联系起来。优秀小说家可能会像福楼拜那样极能自律，或者会像狄更斯那样思维发散。温德汉姆·刘易斯倾注在他所谓的小说——如《塔尔》《傲慢的准男爵》（*Snooty Baronet*）——中的才华，足以造就十多位普通作家。但要读完这些书会十分辛苦。它们缺少的某种无法定义的品质，缺少文学维生素，而即使是在《如果冬天来了》[2]这类的书中也能找到。

《汤姆叔叔的小屋》或许是“好的坏书”的绝佳范例，其中充斥着荒诞不经的情节，但这并非作者有意为之。它同时也十分动人，描述的也基本是事实；我们很难说它有什么突出的特色，但作者毕竟试着将其写得严肃，并反映现实世界。那些坦率逃避现实、创作惊险小说和“轻”幽默作品的作家又如何呢？《福尔摩斯探案集》《反之亦然》[3]《德古拉》[4]《海伦的孩子》[5]或《所罗门王的宝藏》[6]呢？这些书都是绝对荒谬至极，人们更有可能嘲笑它们，而非从中取乐，而且就连作者也很少认真对待它们。但它们却流传了下来，而且或许还会继续流传下去。我们只能说，只要我们的文明仍然如此，人们还是偶尔需要娱乐消遣，那么“轻”文学就有一席之地；而且，纯粹的技巧或天赋，也许比学问或智力更有流传价值。与各种诗集中四分之三的东西相比，有些杂耍戏院里的滑稽歌曲更加优秀：

请到酒价实惠的地方来，

请到饭菜足量的地方来，

请到老板慷慨的地方来，

请到一墙之隔的酒馆来。

或者这首：

双眼乌黑又可爱，

让人感到好意外！

只是因为叫错人，

双眼乌黑又可爱！

我宁愿写这两首歌，也不愿写《被祝福的达莫塞拉》[7]或《山谷之恋》[8]之类的东西。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汤姆叔叔的小屋》会比弗吉尼亚·伍尔夫或乔治·摩尔的所有作品都流传得久，尽管我不知道有什么严格的文学标准能够说明前者胜在何处。

---

[1] 伦纳德·梅里克（Leonard Merrick，1864-1939），英国小说家。

[2] 《如果冬天来了》（*If Winter Comes*），英国作家A.S.M.哈钦森的小说。

[3] 《反之亦然》（*Vice Versa*），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安斯蒂·格里斯（Thomas Anstey Guthrie）的滑稽小说。

[4] 《德古拉》（*Dracula*），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的小说。

[5] 《海伦的孩子》（*Helen's Babies*），美国作家约翰·哈伯顿（John Habberton）的作品。

[6] 《所罗门王的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英国小说亨利·赖德·哈格德（Henry Rider Haggard）的小说。

[7] 《被祝福的达莫塞拉》（*The Blessed Damozel*），英国画家、诗人丹蒂·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的诗作。

[8] 《山谷之恋》（*Love in the Valley*），乔治·梅瑞狄斯的诗作。

为P.G.伍德豪斯辩护

1940年初夏，德国人迅速掠过比利时。除其他收获外，他们还抓获了P.G.伍德豪斯[1]先生。战争初期，伍德豪斯先生一直住在勒图凯的别墅里，他似乎到最后一刻才意识到自己身处险境。据说，他在被带走的路上曾说：“或许在此之后我应该写本严肃的书。”他被暂时软禁起来，然而从他后来的言论来看，德国人对他似乎相当友好，附近的德国军官经常“进来洗澡、聚会”。

一年多过后的1941年6月25日，有消息说伍德豪斯已被释放，住在柏林的阿德隆酒店。第二天，在得知他已同意通过德国电台做些“非政治性”的广播节目后，公众感到分外震惊。这些广播节目的完整文本如今已很难找到，但从6月26日到7月2日被德国人再次叫停之前，他似乎做了五期节目。6月26日的首期节目并未在那家纳粹电台制作，而是采取了访谈的形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时仍有驻柏林的记者，采访伍德豪斯的便是该公司的代表哈利·弗兰纳里（Harry Flannery）。伍德豪斯还在《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发表了一篇在监禁营中写成的文章。

他的文章和广播节目主要说的是他被监禁的经历，不过其中也有些许关于战争的评价。下面是几个不错的例子：

我对政治从不感兴趣，也很难培养出任何形式的好战情绪。就在我正要对某个国家产生敌意时，我遇到了一个不错的家伙。我和他一起外出，抛掉了好斗的思想与情绪。

不久前，他们在阅兵时拜访了我，找对了路子，把我们送到当地的疯人院。我在疯人院度过四十二个星期。关于被监禁的事情，要说的实在太多。它让你远离交际，让你保持阅读习惯。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得长期离家。和妻子重聚时，为了安全起见，我最好带上一封介绍信。

在战前的日子里，我总是因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些许自豪，但在这个装满英国人的箱子或仓库里度过数月后，我现在也不太确定了……我对德国人让步的唯一念想就是给我一块面包，让大门边上那些扛着步枪的绅士们转过头去，然后让我一个人待着。作为回报，我打算将印度拱

手相让，并赠送一套我亲笔签名的书，告诉他们暖气片上烹制土豆片的诀窍。本提议有效期至下周三。

上面的第一段话让英国人大为光火。还有人指责伍德豪斯（在接受弗兰纳里采访时）说过“无论英国胜败与否”的话。在另外一期广播节目中，他还对比利时狱友的肮脏习惯进行指责，这也让人们尤为愤怒。德国人录下这段节目，而且重播了多次。他们似乎并没有严格审查伍德豪斯的节目，不仅允许他拿监禁中的困苦来说笑，还允许他说“关在托斯特监禁营中的人都坚信英国最后将赢得战争”。然而，他那些节目的总体结局是，他未遭德国人苛待，也没有心怀怨恨。

这些广播立刻在英国引起骚动。国会提出质询，报上登着愤怒的社论，作家同行纷纷来信，他们几乎全都表示反对，尽管也有一两位作家建议先别下结论，还有几位为伍德豪斯辩护说他或许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同年7月15日，BBC的国内电台播放了一段《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卡桑德拉”所写的按语，极其激烈地谴责伍德豪斯“出卖祖国”。这段按语毫无保留地用着“叛徒”和“崇拜元首”这样的词语，主要指控伍德豪斯为获得自由而答应为德国做宣传。

“卡桑德拉”的按语引来一些反对声音，但总体上却似乎激化了公众对伍德豪斯的反感，无数图书馆也因此中止外借伍德豪斯的作品。下面是一则典型的新闻：

本报专栏作家卡桑德拉的按语播出后不到二十四小时，波塔当（北爱尔兰）的市区议会就查禁了公共图书馆中伍德豪斯的作品。爱德华·麦卡恩表示，卡桑德拉的广播最终促成了此事。伍德豪斯不再是一个有趣的作家。（《每日镜报》）

除此以外，BBC也在此后几年禁播了伍德豪斯的抒情诗。甚至到了1944年12月，国会中仍然有人要求将伍德豪斯作为叛徒进行审判。

老话说，众口可以铄金，而且人们指控伍德豪斯的方式相当奇特，让人觉得伍德豪斯的那些广播（倒不是说还有人记得他在其中说过什么）证明了他不仅是叛徒，而且还是法西斯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者。甚至当时就有人给报刊写信，说伍德豪斯的书中有“法西斯倾向”，这样的指控此后便一再被重复。我下面就会分析这些书中的精神氛围，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1941年的那些事件至多只能证明伍德豪斯的愚蠢。而真正有趣的问题在于伍德豪斯为何会如此愚蠢。1941年6月，弗

兰纳里在阿德隆酒店才见到伍德豪斯（已被释放，但仍受监视）时，就发现他对政治一无所知。在准备广播访谈时，他不得不提醒伍德豪斯不要发表过于不恰当的评论，不要发表带有反俄暗示的评论。尽管如此，“无论英国胜败与否”这句话还是从他嘴里溜了出来。访谈结束后不久，伍德豪斯就告诉弗兰纳里，说他要到纳粹电台上做广播；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特殊意义。弗兰纳里在《派驻柏林》（*Assignment to Berlin*）中评论道：

德国人利用伍德豪斯的阴谋已经显而易见。这是纳粹战争宣传中最高明的招数之一，也是他们首次从人的角度进行宣传……普拉克（戈培尔的助手）曾去格莱维茨附近的监禁营看望伍德豪斯，发现这位作家毫无政治头脑，于是心生一计。他向伍德豪斯提议，作为释放他的条件，他得写几篇关于监禁生活的广播稿；这些稿子无须审查，而且要他亲自播出。普拉克的这个提议，表明了他对伍德豪斯有所了解，知道他总是在自己的小说中取笑英国人，知道他别无其他写作风格，还知道他仍然生活在自己笔下的那个时代，并且对纳粹及其意图一无所知。伍德豪斯就是他自己小说中的伯蒂·伍斯特。

伍德豪斯和普拉克之间达成了真正的协定，这似乎只是弗兰纳里自己的理解。他们之间的协定或许并没有这么明确，而且从广播内容来看，伍德豪斯制作广播节目主要是为了与读者保持联系，并且博取他们的笑声——这是喜剧作家最热爱之事。很明显，这些广播节目并非埃兹拉·庞德或约翰·艾默里[2]那种叛国者的言论，恐怕也不是一个能够理解叛国本质的人所作的言论。弗兰纳里似乎警告过伍德豪斯做广播不是明智之举，但他的警告并不十分严厉。他还补充道，伍德豪斯（虽然在一次节目中自称为英国人）似乎自视为美国公民。伍德豪斯曾考虑过入籍美国，但他从未填写过所需的文件。他甚至对弗兰纳里说过“我们并没有和德国打仗”这样的话。

我面前有一份伍德豪斯的书目索引，上面列出了差不多五十本书，但显然还不全。我首先应该承认，伍德豪斯的许多作品，大概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我都还没有读过。确实，要读完一个基本上只出简装本的畅销作家的全部作品并非易事。但是自1911年（当时我才八岁）以来，我就一直密切关注着他的作品，对其中独特的精神氛围已经分外熟悉；当然，这么多年来，这种氛围并非一成未变，但从1925年左右起就变化很小。留心伍德豪斯的读者定会注意到上面引用的那段文字中的两个说法，一是伍德豪斯“仍然生活在自己笔下的那个时代”，二是纳粹宣

传部利用伍德豪斯的原因是他“取笑英国人”。第二种说法来源于一种误解，我会在后面进行讨论。但是，第一种说法却相当准确，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伍德豪斯的行为。

关于伍德豪斯的小说，人们常常忘记其中那些较为有名的作品是写于何时。我们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愚蠢，但实际上，他笔下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和人物，都出现于1925年以前。施密斯首次出现于1909年，而且在他早期所写的校园故事中就能看见施密斯的影子。巴克斯特和埃姆斯沃思伯爵所居住的布兰丁斯城堡首次出现于1915年。吉夫斯系列故事始于1919年，其中的吉夫斯和伍斯特之前就有过短暂露面。乌克里奇出现于1924年。看一看伍德豪斯自1902年往后的书目，我们就能发现有三个时期值得一提。首先是校园故事时期，包括《金球板》（*The Gold Bat*）和《冠军猎手》（*The Pothunters*）等小说，最为精彩的是1909年出版的《迈克》（*Mike*）。次年出版的《施密斯进城》（*Psmith in the City*）虽然与校园生活不直接相关，却也属于这个时期。其次是美国时期。1913年到1920年期间，伍德豪斯似乎生活在美国，而且有一阵子他的语言习惯和观点都有美国化的倾向。1917年出版的《有一双左脚的男人》（*The Man with Two Left Feet*）中的有些故事似乎受到了欧·亨利的影响；而且他在同时期所写的其他书中，也有些英国人基本不用的美式英语用词（如用“高杯酒”代替“威士忌加汽水”）。然而，他在这个时期的几乎所有作品——《记者施密斯》（*Psmith，Journalist*）、《小金块》（*The Little Nugget*）、《鲁莽的阿奇》（*The Indiscretions of Archie*）、《皮卡迪利·吉姆》（*Piccadilly Jim*）等——的表现力都依赖于英美的习俗差异。英国角色出现在美国场景中，或美国角色出现在英国场景中。他也写了几个纯英国的故事，但却很少写纯美国的。第三时期可恰当地称为乡间别墅时期。到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伍德豪斯一定收入不菲，而他作品中人物的地位也随之上升，不过乌克里奇系列故事多少算是例外。此时他作品中的典型场景是乡间住宅、豪华的单身公寓或费用不菲的高尔夫俱乐部。早期作品中学校男生对运动的喜好逐渐淡去，板球和足球让步于高尔夫，而且滑稽和讽刺元素更为明显。毫无疑问，他后期的许多作品，如《夏日的闪电》（*Summer Lightning*），都是轻喜剧，而非纯粹的滑稽故事；但是散见于《记者施密斯》《小金块》《比尔来了》（*The Coming of Bill*）、《有一双左脚的男人》等其他校园故事中的道德说教已不再出现。迈克·杰克逊变成了伯蒂·伍斯特。不过这种蜕变并未让人感到十分惊讶。伍德豪斯最引人关注的一点是他的止步不前。他在20世纪初所写的小说，如《金球板》和《圣奥斯丁故事集》（*Tales of*

St.Austin's）等，就已经有了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氛围。在被监禁前的十六年中，他虽然居住在好莱坞和勒图凯，却在继续写关于英国生活的故事，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伍德豪斯的后期作品有多么程式化。

《迈克》无疑是英语中最好的校园"轻"小说之一，只是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未删节的全本。虽然这本小说中的情节多为闹剧，但它绝非讽刺公学体系，而《金球板》和《冠军猎手》等作品更说不上是讽刺。伍德豪斯在达利奇学院上学，然后在一家银行任职，后来通过写廉价的新闻逐渐开始写小说。看得出来，伍德豪斯在多年时间里十分"依恋"母校，讨厌他所从事的枯燥工作，讨厌自己所处的下层中产阶级环境。在他早期的故事中，描写公学生活"魅力"的内容很多（如校内比赛、使唤低年级学生、围坐在书房火炉边喝茶等），"公平竞赛"的道德准则也被全盘接受。伍德豪斯虚构的莱金公学，便是一所比达利奇学院更时髦的学校。对比《金球板》和《迈克》，我们就能感觉到莱金公学变得更加奢华，更加远离伦敦。伍德豪斯的早期作品中，最能揭示其内心世界的是《施密斯进城》。在这本书中，迈克·杰克逊的父亲突然破产，而十八岁左右的迈克就和伍德豪斯本人一样，被迫接受了银行里的底层工作；施密斯的工作也差不多，但是他从事这样的工作并不是因为经济所迫。这本书和《记者施密斯》都不同寻常，因为它们展示了一定的政治意识。这个阶段的施密斯自称社会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者仅仅意味着无视阶级差别，而伍德豪斯无疑也这么认为。有一次，施密斯和迈克在克拉芬公园参加露天集会，随一位年长的社会主义演说家回家喝下午茶；对这位演说家的死要面子的家，伍德豪斯描写得尤为准确。该书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迈克无法割舍对学校氛围的思念。他在工作时没精打采，而正如读者期待的那样，他并不想去找一份即有趣又有用的工作，而是想着去打板球；在不得不寻找住处时，他就到达利奇安顿了下来，因为那儿离学校近，他能听到板球撞击球板时发出的愉悦声响。该书的高潮部分讲的是，迈克获得机会到县上参加比赛，并为此辞掉了工作。重点在于伍德豪斯赞成迈克；其实，他将自己与迈克联系起来，因为迈克之于伍德豪斯，正如于连·索黑尔之于司汤达。不过，伍德豪斯也创造了其他基本相似的角色。在前两个阶段的作品中，他创造了一系列男青年角色，对于这些角色来说，比赛和"健身"足以成为毕生的事业。伍德豪斯几乎无法设想出一份称心的工作。最好是自己有钱，如果没钱就要找份闲差。1915年出版的《新鲜事》（*Something Fresh*）的主角给一位消化不良的富翁当健身教练，从而逃离了底层记者的工作——从道德上和经济上看，这都被视为一种提升。

他第三阶段的作品中没有了自恋，也没有了严肃的插曲，但其潜在的道德和社会背景却变化不大。将伯蒂·伍斯特和迈克对比，甚至是将其与早期校园故事中打橄榄球的学生长进行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唯一真正不同的地方，就是伯蒂·伍斯特更富有且更懒惰。伯蒂·伍斯特的理想和早期角色几乎相同，但他却没能遵从这些理想来生活。《鲁莽的阿奇》中的阿奇·默法姆，就是一个介于伯蒂·伍斯特和其他早期角色中间的人物；他头脑愚笨，却也诚实善良，爱好运动且很有勇气。伍德豪斯始终都认为公学中的行为准则理应如此，只是在后期更为复杂的作品中，他更喜欢让笔下的角色违反或违心地遵从这些准则：

“伯蒂，你不会让哥们儿失望吧？”

“不，我会。”

“可我们曾经是同学啊，伯蒂。”

“我不在乎。”

“我们是同学啊，伯蒂，同学啊！”

“哎呀，够了！”

伯蒂这个懒散的堂吉诃德，并无意与风车作战，但如果是为了荣誉，他或许也不会拒绝那样做。伍德豪斯想要写的受人喜爱的角色，大多都是寄生虫，其中有些简直就是傻瓜，但却很少能被称为不道德。乌克里奇也只是个空想家，而不是纯粹的骗子。伍德豪斯笔下的角色中，吉夫斯是最不道德或非道德的；他的作用是衬托伯蒂·伍斯特的高尚，也许还象征着许多英国人拥有的那种观念，即聪明差不多就等于无耻。从作品中没有任何荤段子这点可以看出，伍德豪斯有多么固守传统道德。对于滑稽故事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他的作品中不仅没有荤段子，而且也很少出现有失体面的情景，邪恶的主题几乎被完全回避。当然，他多数标准长度的小说中也有“爱情主题”，但通常都是在轻喜剧的层面上：在一幕幕简单的场景中，主角之间的爱情纠缠不清，但到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发生”。重要的是，本质上是滑稽故事作家的伍德豪斯，却能够和伊恩·海合作；伊恩·海是一位半严肃半滑稽的作家，极其拥护“英国人要恪守道德”的传统。

在《新鲜事》中，伍德豪斯发现了嘲笑英国贵族的可行性，于是便

刻画了一系列滑稽但不可鄙（少数例子除外）的男爵、伯爵等。这颇为奇怪地让国外读者认为他是在尖刻地讽刺英国社会。所以弗兰纳里才会说伍德豪斯“取笑英国人”，这也是伍德豪斯可能会给德国人，甚至美国人留下的印象。伍德豪斯在柏林做了广播过后，我与一位替伍德豪斯热切辩护的印度民族独立主义者讨论过那些广播。他认为伍德豪斯投靠敌人的做法理所当然，而且那也是正确的做法。让我感兴趣的是，我发现他视伍德豪斯为反英作家，认为他颇有益处地揭露了英国贵族的真实面目。英国人很难犯这样的错误，这也很好地说明了作品，尤其是幽默作品，到了国外就会丢失其精妙之处。显然，伍德豪斯既不反对英国，也不反对上层阶级。相反，我们从他的全部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无害的旧式势利。聪明的天主教徒能看得出波德莱尔或乔伊斯对神明的亵渎不会严重损害天主教义；同样，英国读者也能看得出，伍德豪斯尽管塑造了许多贵族人物，但他并不是真的在攻击社会等级制度。实际上，真正蔑视贵族的作家并不会写那么多关于贵族的作品。伍德豪斯对于英国社会制度的态度，和他对于公学道德准则的态度一样——表面上的小玩笑掩盖着不加思考的接受。埃姆斯沃思伯爵这个角色之所以滑稽，是因为伯爵应该更显威严，而伯蒂·伍斯特对于吉夫斯的完全依赖之所以好笑，部分是因为仆人不应该比主人优越。美国读者或许本身就是仇英分子，而这些角色刚好符合他们对于英国没落贵族制度的先入之见，所以他们可能会将这些角色误认为是不怀好意的讽刺。穿着鞋罩、握着手杖的伯蒂·伍斯特正是舞台上传统的英国人形象。但是，每个英国读者都会明白，伍德豪斯想把伯蒂·伍斯特塑造成招人喜爱的角色，而他真正的过错在于将英国上层阶级刻画得比现实好得多。他在书中总是对某些问题避而不谈。他刻画的富家公子，几乎都谦逊有礼、易于交往，而且并不贪婪；施密斯为他们定下了基调，他保持着上层阶级的外表，却靠称呼所有人为“同志”来填补了社会差距。

但是，有关伯蒂·伍斯特另一个重点是他的过时。虽然构思于1917年前后，但伯蒂·伍斯特却属于更早的时代。他是1914年之前那个时期的“花花公子”，传颂在《傻瓜吉伯特》（*Gilbert the Filbert*）和《摄政宫里的莽雷吉》（*Reckless Reggie of the Regent’s Palace*）等歌谣里。伍德豪斯偏爱描写“俱乐部会员”或“社交老手”的生活。优雅的伯蒂·伍斯特整个早上在皮卡迪利街上闲逛，腋下夹着手杖，纽扣孔中插着康乃馨，而这种生活到20世纪20年代几乎就不复存在了。值得注意的是，伍德豪斯在1936年居然还能出版名为《穿着鞋罩的年轻人》（*Young Man in Spats*）的书。那个年代谁还穿鞋罩？它们都已经过时十多年了。但传统意义上的“花花公子”，那种“皮卡迪利公子”就应该穿着鞋罩，就像哑剧

里的华人应该留着辫子一样。幽默作家不必跟上时代；伍德豪斯在发现一两种不错的写作风格后，就一成不变地使用它们。这样做无疑更加简单，因为在被监禁之前的十六年里，他从未踏入英国一步。他对英国社会的印象形成于1914年以前，认为英国社会天真传统，而且本质上值得向往。他也没有真正地美国化。我已经指出，伍德豪斯的中期作品确实有自发的美式英语特征，但是他的语言习惯仍然保持着足够的英国特色，所以才会觉得美国俚语有一种有趣且让人感到些许震惊的新鲜感。他喜欢在古旧的英语中插入俚语，但是在与美国有任何联系之前，他就已经有了这种习惯，而他断章取义的做法在英国作家中间则十分常见，甚至还可以追溯到菲尔丁。正如约翰·海沃德[3]先生所指出的[4]，伍德豪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英国文学，尤其是对莎士比亚的了解。他的目标读者显然不是高雅之士，而是那些接受传统教育的人们。例如，在说某人的叹息就像“普罗米修斯看见秃鹫飞下来啄食时发出的叹息”时，他就是在假定读者对希腊神话有所了解。他在年轻时或许崇拜过巴里·佩恩、杰罗姆·克拉普卡·杰罗姆（Jerome K.Jerome）、W.W.雅各布斯、吉卜林以及弗兰克·安斯蒂[5]，而且这些作家对他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才思敏捷的美国喜剧作家，如林·拉德纳（Ring Lardner）或达蒙·鲁尼恩（Damon Runyon）。在接受弗兰纳里访谈时，伍德豪斯表示不确定“自己笔下的人物和英国是否能在战后继续存活”，他没有意识到那些人物早已成了鬼魂。弗兰纳里说，“他仍然生活在自己笔下的那个时代。”他或许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但是伍德豪斯其实是生活在爱德华时代；而且如果伯蒂·伍斯特真的存在的话，也在1915年左右就已经命丧黄泉了。

如果我对伍德豪斯心态的分析得到认可，那么那种认为伍德豪斯在1941年蓄意帮助了纳粹宣传机器的观点就站不住脚，甚至还有些荒唐。或许，德国人确实以提前释放为诱饵引诱他做广播（他本来在几个月后迎来六十岁生日时就可以重获自由），但他确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论会损害英国利益。我在上面阐述过，伍德豪斯的道德观，仍然和公学学生的道德观一样，而且根据公学的道德准则，战时叛国是最不能原谅的罪恶。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仅大大帮助了德国人的宣传，而且还会招致许多人的反对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两件事情。首先，从他出版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完全没有政治意识。所谓他的作品存在“法西斯倾向”的说法全是胡扯。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1918年以后的政治倾向，但确实存在着对阶级差别的忧虑，偶尔也会提及社会主义，他对社会主义无知但并不反感。小说集《傻瓜的心》（*The Heart of a Goof*）中有一篇尤其愚蠢的小说，这篇小说写的是

一位俄国小说家，其灵感似乎来源于苏联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但是这篇小说中提及苏联体制的地方全都很肤浅，而且在当时也算不上带有明显的敌意。这差不多就是我们在伍德豪斯作品中能发现的政治意识。据我所知，他几乎没有使用过“法西斯”或“纳粹”这两个词语。在左翼圈子里，甚至在各种“开明”圈子里，在纳粹电台上做广播或与纳粹有任何瓜葛，不论是在战前或战时，都令人震惊。但这是在近十年的反法西斯意识形态斗争中形成的思维习惯。别忘了，1940年以前英国人民对这种意识形态斗争都麻木不仁。埃塞俄比亚、西班牙、中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法西斯对于这些国家的侵略，以及其在这些国家犯下的罪行，都没有让英国民众有所警觉；他们认为那是外国人之间的争吵，所以“不关我们的事”。普通英国人认为“法西斯”仅仅与意大利有关，当这个词被用来指代德国时，他们却感到困惑不已，从这点就可以衡量出普通英国人对于法西斯的无知。伍德豪斯的作品中没有任何迹象能让我们看出他比普通读者知道得更多，比他们更关心政治。

我们还需要记住，伍德豪斯被德国人监禁时，二战正好处于如火如荼的阶段。我们现在已经忘记了这些事情，但在那之前，人们对于战争的态度却不温不火。几乎没发生什么战斗，张伯伦政府不得人心，精英政论家暗示英国应该尽快妥协以寻求和平，全国的工会和共产党机构都在通过反战决议。当然，事情在后来起了变化。英国军队战胜艰难险阻从敦刻尔克撤退，法国陷落，英国孤军奋战，伦敦遭到密集轰炸，戈培尔叫嚣要使英国“陷入屈辱和贫穷”。1941年中期，英国人民知道了敌人是谁，对敌人的愤怒也空前强烈。但是在此期间，伍德豪斯正好身陷囹圄，而监禁者对他似乎也还不错。他错过了战争的转折点，而且他在1941年时的反应还和1939年一样。遭遇这种情况的并非伍德豪斯一人。在这段时期中，德国人还把几个英国战俘带到了麦克风前，其中有些人和伍德豪斯一样说话毫无分寸。但是他们并未受到人们关注，即使是像约翰·艾默里那样彻头彻尾的叛徒，也没有像伍德豪斯那样激起公众的极大愤怒。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伍德豪斯这位年届花甲的小说家，说了几句愚蠢却无害的话，就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公愤呢？我们必须在那些对宣传战而言必不可少的肮脏东西里寻找可能的答案。

伍德豪斯广播的时间无疑是一个重点。他在苏联被入侵前两三天被释放，而且纳粹高层当时肯定知道对苏联的入侵已经迫在眉睫。德国人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美国参战，而且他们也确实采取了更能取悦美国的

态度。德国人不可能指望击败苏联、英国、美国的同盟，但是他们若能快速打败苏联——他们或许就是这样想的——美国或许就不会干涉。释放伍德豪斯只是小动作，但在安抚美国孤立主义者方面却并非无效。伍德豪斯闻名美国，而且他嘲笑穿着鞋罩、带着单片眼镜的英国人，所以受到美国仇英人士欢迎——或者说德国人是这么认为的。德国人相信他能在广播上削弱英国的声望，而他的获释也能展示出德国人是好伙伴，知道如何有风度地对待敌人。德国人或许就是这么算计的，不过伍德豪斯只做了一周的广播，可以看出他并未达到德国人的期望。

但是在英国方面，相反但类似的算计却行之有效。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的两年中，英国人民之所以士气高涨，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仅是一场保卫民主制度的战争，也是一场普通人必须依靠自己努力取胜的战争。英国上层阶级的绥靖和1940年的灾难让他们名誉扫地，社会走向平等的进程也已开始。在公众的思想中，爱国主义与左翼思潮被联系在一起，而且无数干练的新闻工作者让这种联系越来越紧密。普利斯特里在1940年的广播，以及“卡桑德拉”在《每日镜报》上的文章，都是当时盛行的煽动性宣传的极佳例子。在这种气氛下，伍德豪斯刚好是个理想的替罪羊。人们认为富人都是卖国贼，正如“卡桑德拉”在广播中有力地指出，伍德豪斯就是富人。但是对他这种富人的攻击并不会受到惩罚，也不存在有损社会结构的风险。谴责伍德豪斯，与谴责比弗布鲁克男爵[6]不一样。伍德豪斯只不过是个小说家，不论挣钱多少都不属于有产阶级。即使年收入五万英镑，他也只是外表像富翁而已。他就像赌赢了加尔各答德比的人一样，只是一个侥幸获得财富的局外人，而且他的财富也不会持久。因此，伍德豪斯的轻率之举正好是宣传的大好机会，人们可以借机“曝光”一位富有的寄生虫，同时又不会让人注意到那些真正有影响的寄生虫。

在当时那种绝望的环境中，在伍德豪斯身上表达愤怒情有可原，但是在三四年后仍然谴责他，还给人们留下他故意通敌的印象，就不可原谅了。当前人们对叛徒和卖国贼的追捕，可谓是这场战争中在道德上让人最为反感的事情。这充其量也只是罪人惩罚罪人。在法国，各种不忠的小人物——警察、底层新闻工作者、与德军士兵上床的女性——全都遭到追捕，而那些大人物则全部逃之夭夭。在英国，谴责叛徒最激烈的，是那些在1938年推行绥靖政策的保守党人，以及那些在1940年鼓吹绥靖政策的共产党人。我努力让读者知道可怜的伍德豪斯——仅仅因为他的成就和移民让他在精神上停留在爱德华时代——如何成了宣传试验的试验品，而且我建议此事就此了结。如果美国当局抓捕并枪决埃兹拉

·庞德，那么就会让他诗人的声誉流传数百年；即便在伍德豪斯这件事上，如果我们将他逼到美国，剥夺他的英国国籍，那么我们最终定会羞愧万分。同时，如果我们确实想惩罚那些在关键时刻损害国家士气的人，那么较之于伍德豪斯，还有其他罪人离我们更近，更值得我们去追捕。

---

[1] P.G.伍德豪斯（P.G.Wodehouse，1881-1975），英国幽默小说家，1940年被德国人监禁，其父曾任英国驻港法官。

[2] 约翰·艾默里（John Amery，1912-1945），英国法西斯分子，曾制作广播节目为纳粹德国作宣传，二战后被处死。

[3] 约翰·海沃德（John Hayward，1905-1965），英国编辑、评论家，曾编辑过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许多作品。

[4] 见《P.G.伍德豪斯》（*P.G.Wodehouse*），作者约翰·海沃德，刊于1942年《周六文集》（*The Saturday Book*）。我相信这是唯一一篇未经删节的关于伍德豪斯的评论。（作者原注）

[5] 弗兰克·安斯蒂（F.Anstey），英国幽默小说家托马斯·安斯提·格思里（Thomas Anstey Guthrie，1856-1937）的笔名。

[6] 比弗布鲁克男爵（Lord Beaverbrook，1879-1964），原名威廉·马克斯韦尔·艾特肯（William Maxwell Aitken），加拿大裔英国报业大亨、政治家和作家。

无意义诗

据说，许多语言中都没有无意义诗，就算在英语中它们的数量也不多。它们大多都是童谣和零散的民间诗歌，其中有些最初不是无意义诗，但在原始功用被遗忘后，它们便成了无意义诗。下面这首关于玛芝莉·朵的短诗便是例子：

跷跷板，玛芝莉·朵，

杜宾的主人会更换，

他每天只有一分钱，

因为他只能走这么慢。

我小时候在牛津郡还听过另外一个版本：

跷跷板，玛芝莉·朵，

卖掉床铺睡秸秆，

卖掉床铺睡地上，

岂不是个蠢婆娘？

或许真有过一位叫玛芝莉·朵的人，而故事中的杜宾或许也确有其人。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让埃德加说的“小雄鸡坐在小雄鸡山上”之类的话，都是些没有意义的片段，但这些片段无疑来自某些被人忘却的民谣，而且它们当初无疑是有意义的。人们无意间引用的某些典型的民谣片段并非毫无意义，而是对常见事情音乐般的注解，如“一分钱，两分钱，十字面包香又甜”，或者“波利快烧水，我们要喝茶”。有些读起来愚蠢可笑的短诗，实际上表达出一种极其悲观的生活态度，表达出农民那种听天由命的智慧。例如：

所罗门·格兰迪，

星期一出生落地，

星期二接受洗礼，

星期三举行婚礼，

星期四疾病附体，

星期五无药可医，

星期六撒手归西，

星期天葬入土里，

所罗门·格兰迪就此终矣。

这是个悲观的故事，但是同你我的故事极其相似。

在超现实主义逐渐影响那些无意识的人之前，除歌曲中无意义的副歌以外，以无意义为目的的诗歌似乎并不常见。爱德华·利尔[1]因此享有特殊地位，他的那些无意义短诗刚由R.L.梅格罗兹先生（R.L.Megroz）编辑成书；在战争爆发一两年前，梅格罗兹先生还在企鹅出版社负责编辑了利尔的诗集。利尔是最早涉猎纯幻想作品的作家之一；他们虚构国度，编造新词，但却没有任何讽刺目的。利尔的诗并非全是无意义诗，其中有些依靠颠倒逻辑而获得效果，不过它们却全都相似，因为它们的深层情感都悲伤但不痛苦。它们表达出一种亲切的疯狂，以及对虚弱和荒唐之事自然的同情。利尔堪称五行打油诗的始祖，尽管之前的作家也写过格律几乎相同的诗句。而且，他的五行打油诗首句与尾句同韵，人们有时认为这是它们的弱点，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它们的魅力所在。极细微的变化会让它们无用的效果得到强化，而突兀的变化却会破坏这种效果。例如：

有位姑娘来自葡萄牙，

梦想成为海员游天涯；

她爬上大树

看大海，

说她永不离开葡萄牙。

重要的是，在利尔之后，没有打油诗能既适合刊出，又有趣到值得引用。不过，利尔的某些长诗才是他最优秀的作品，如《猫头鹰和小猫》（*The Owl and the Pussy-Cat*）或下面这首《求爱的扬基邦基伯》（*The Courtship of the Yonghy-Bonghy-Bò*）：

科罗曼德尔海岸边，

嫩南瓜在风中颠簸，

在森林中间，

居住着扬基邦基伯；

旧椅子两把，蜡烛剩半边，

一个旧罐子，把手已不见，

都是他的好物件；

在森林中间，

所有这些好物件，

都属于扬基邦基伯，

都属于扬基邦基伯。

后来，诗中出现了一位带着几只白色的杜金母鸡的女士和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梅格罗兹先生的观点颇有道理，他认为这首诗或许与利尔生活中的某件事情有关。利尔终生未娶，不难猜想他的性生活有着严重问题。从他的画作和反复使用的生造词语中，精神科医生定能发现各种含义。利尔的身体不佳，出身贫穷，而且有二十位哥哥和姐姐。他肯定从小就懂得焦虑和困苦。尽管他有好朋友，但他显然很不幸，而且生来孤寂。

奥尔德斯·赫胥黎称赞利尔的幻想是对自由的维护。他指出，利尔的五行打油诗中的“他们”代表着常识、合法性和枯燥无味的美德。“他

们”是现实主义者，是讲求实际的人，是戴着礼帽的清醒公民，总是热切地阻止你做值得做的事情。例如：

怀特黑文有位老人，

和渡鸦舞成方阵；

但他们说：“荒唐，

怎能让这只鸟癫狂！”

于是砸烂了怀特黑文的老人。

因为和渡鸦跳方阵舞就砸烂别人，这正是“他们”会做的事情。赫伯特·里德也称赞过利尔，认为利尔的诗比刘易斯·卡罗尔[2]更好，因为其诗中的幻想更为纯粹。在我看来，我必须得说，利尔在最不随意时，在他的诗中出现滑稽元素或扭曲逻辑时，他的诗才最有趣味。而利尔任想象力肆意发散时，就像在那些虚构的名字里，或在《家庭烹饪的三份食谱》（*Three Receipts for Domestic Cookery*）之类的东西里，他却既愚蠢又乏味。《没有脚趾的波宝》（*The Pobble Who Has No Toes*）中隐约有些逻辑，想来正是这种感觉元素才让这首诗显得有趣。也许还有人记得，波宝去布雷斯托海峡里抓鱼：

船员和司令齐声大叫，

他们见他靠近船的远角——

“他要去抓鱼，喂乔比斯卡婶婶的

那只红胡须的好好猫咪。”

这首诗中有趣之处在于其中的滑稽元素——“司令”。而其中的随意之举，如“好好”和猫咪的红胡须，都让人觉得尤其愚蠢。波宝在水中时，某些不明生物咬掉了他的脚趾。他回家后，他婶婶这样说道：

全世界的人们都清楚，

没有脚趾的波宝更幸福。

这两句也很有趣，因为它们有其意义，甚至能说它们有政治意义，因为独裁政府的全部理论，都能简而言之为“没有脚趾的波宝更幸福”。下面这首著名的五行打油诗也一样：

贝辛有位老年人，

镇定自若令人惊；

他买来一匹骏马，

骑着骏马快出发，

逃离贝辛那些人。

这首诗并不那么随意，其有趣之处在于它对贝辛人的温和批评；贝辛人也是“他们”，是体面的人，是思想正直、憎恨艺术的大多数。

同代作家中与利尔最接近的是刘易斯·卡罗尔，但他在本质上却不如利尔虚幻，而且在我看来，他还不如利尔有趣。正如梅格罗兹先生在序文中指出，利尔的影响力很大，但是很难说都是好的。如今儿童作品中的那种离奇古怪的情节，恐怕在一定程度上就滥觞于利尔。反正，刻意写作无意义诗的想法，虽然在利尔身上成功了，但仍然值得怀疑。最优秀的无意义诗，或许是逐渐和偶然写成的，而它们的作者并非个人，而是社会。另外，作为一位漫画家，利尔带来的影响肯定是有益的。例如，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就肯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利尔的影响。

---

[1] 爱德华·利尔（Edward Lear，1812-1888），英国艺术家、插画家、诗人，以无意义诗，尤其是五行打油诗而著称。

[2]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原名查尔斯·路特维奇·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英国作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摄影家，以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及其续集《爱丽丝镜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而闻名于世。

变味的复仇

每每读到“战争罪审判”“惩罚战犯”之类的词语，我就会想起早些时候在德国南部一个战俘营里见到的场景。

一个来自维也纳的犹太青年带着我和另外一位记者参观战俘营。他已经加入了美国陆军下属的一个负责审讯战犯的部门。他大概二十五岁，性格机警，面容俊俏，长着金色头发；他的政治知识也比普通美国军官渊博得多，和他在一起让人颇感愉快。战俘营建在飞机场上，我们看过监狱后，他带我们去了机库；许多被分门别类的战俘就在那里接受“筛查”。

机库的一头，有十二三个人并排躺在水泥地上。向导告诉我们，这些人是从战俘中区分出来的党卫军[1]军官。其中一人穿着肮脏的平民服装，双臂交叉搭在脸上，似乎已经睡着了。他的双脚畸形，既奇怪又可怕。那双脚十分对称，但却被棍棒打成奇怪的球形，看起来更像是一对马蹄。我们走近时，那个犹太青年似乎在努力让自己激动起来。

“真是猪猡！”他说着，突然抬起沉重的军靴，正对着那人畸形脚的肿胀处狠狠踢去。

“起来，你这头猪！”那人醒过来时，犹太青年叫道，接着又用德语重复了一遍类似的话。那个战俘吃力地爬起来，笨拙地站成立正姿势。犹太青年带着努力让自己愤怒起来的神情——他说话的时候差不多是手舞足蹈——向我们讲了那个战俘的履历。他是“真正”的纳粹，他的党员编号表明他很早就是纳粹党员；他在党卫军政治部门工作，职位相当于将军。可以很确定，他过去负责管理过集中营，主管过拷打和绞死犹太人的工作。简短来说，他代表着我们在过去五年中反抗的一切。

与此同时，我打量着他的外貌。和其他刚被俘虏的人一样，他衣衫褴褛，饿着肚子，而且胡子拉碴。此外，他还让人反感。可他的外表并不野蛮，也不让人害怕；看上去他只是异常焦虑，而且还有些卑劣的聪慧。他那双暗淡、躲闪的眼睛，因为眼镜度数过高而变了形。他本可以是个被剥夺职位的教士，是个因酗酒而前程尽毁的演员，或者是个灵媒。在伦敦的公共寄宿公寓里，以及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我都见过

很多十分类似的人。他显然心理失衡；其实，他是否头脑清醒还说不定，尽管他当时已经清醒到害怕再被踢一脚。但是，犹太青年告诉我的这个战犯的经历应该全都是实话，或者可能都是实话！这么一来，人们想象中的纳粹施虐者，人们多年来与之斗争的丑恶人物，就变成一个卑微可怜的人；显然，他现在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某种心理治疗。

后来，犹太青年又继续进行羞辱。他命令一位高大健壮的党卫军军官脱掉上衣，让我们看他纹在腋下的血型编号，还强迫另外一位军官给我们解释他是如何掩盖党卫军身份，试图伪装成国防军普通士兵的。我想知道这位犹太青年是否真的很享受这种新获得的权力。我认为他并非真正享受，他只是——像是去妓院的男子、初次抽烟的男生或游览画廊的疲惫旅客——告诉自己他喜欢那样做，并且按照自己在无助时所做的计划行事。

德裔或奥地利裔犹太人报复纳粹的做法无可非议。天知道这个犹太人有多少伤痕需要抹去；他的家人或许已经被全部杀害；毕竟，与希特勒政权犯下的残暴罪行相比，恶意踢上的一脚并算不上什么。不过，此景和我在德国的其他所见让我知道，整个复仇和惩罚的想法就是一个幼稚的白日梦。严格说来，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复仇这种东西。我们在无能为力时才想要复仇，也是因为无能为力才会打算复仇；无力感一旦消除，复仇的欲望也就消失殆尽。

在1940年时，想到能目睹党卫军军官被脚踢和羞辱，有谁不会高兴得跳起来呢？但是当一切成真时，你又只会觉得怜悯和反感。据说在穆索里尼被暴尸示众时，有位老妪拿出左轮手枪，在穆索里尼的尸体上连开五枪，大喊：“这是为我的五个儿子打的！”报纸常常编造这种故事，但也可能确有其事。她肯定在好几年前就梦想枪打墨索里尼，但她到底从这五枪中能得到多少慰藉呢？她能靠近墨索里尼向其开枪的前提，是墨索里尼已经变成一具尸体。

现在强加于德国之上的丑恶的和平协定，英国大众要负担责任，因为我们之前不知道惩罚敌人并不会给自己带来慰藉。将东普鲁士的德国人全部驱逐出境之类的罪行，我们就算不能制止，至少也应该反对，但我们却默许了，原因是德国人曾经让我们愤怒和害怕；也正因如此，我们过去才会确信德国人在战败时并不会得到我们的怜悯。我们坚持这些政策，或者让别人替我们坚持这些政策，因为我们隐约觉得，既然决定惩罚德国，我们就应该放手执行。实际上，几乎没有英国人极端仇恨德国，而且我想，占领军对德国的仇恨应该更少。只有少数行为恶劣的施

虐狂，才会对追捕战犯和内奸兴趣十足。你去问普通人应该以何罪名审判戈林、里宾特洛甫等人，他们根本答不上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对这些恶魔的惩罚，在成为可能的同时，似乎也失去了吸引力；其实，这些恶魔一旦被关起来，就不再是恶魔了。

不幸的是，人们常常要在经历具体的事件之后，才能认识到自己真正的感情状态。我还记得在德国的另外一次经历。法国军队占领斯图加特几小时之后，我和一位比利时记者进入了仍有些混乱的斯图加特城。那个比利时人为BBC的欧洲分部全程报道了二战；几乎与所有法国人或比利时人一样，他对“德国佬”的态度比英国人或美国人强硬许多。进城的主要桥梁都已被炸毁，我们只好通过一处人行桥进城。显然，德军曾在此严防死守。一名死去的德国士兵平躺在桥梁阶梯脚下。他的脸色蜡黄，有人在他胸口上面放了一束正遍地盛开的丁香花。

我们从尸体边上路过时，那个比利时人把脸转了过去。过桥很远之后，他才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死人。他当时应该有三十五岁，在广播中从事战争宣传也有了四个年头。几天过后，他的态度与之前大相径庭。他厌恶地看着被炸得满目疮痍的城市，看着德国人所遭受的羞辱，甚至还出面制止过一次抢劫行为。在离开斯图加特时，他把我们带来没喝完的咖啡都给了同营舍的德国人。在那一周之前，把咖啡送给“德国佬”这种想法或许都会让他很愤慨。他告诉我，看到桥头那个可怜的死人时，他的感情就发生了变化，突然理解了战争的意义。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恰好经由另一条线路进城，他或许就不会看到那具尸体，而那具尸体只是战争带来的两千万（大概）具尸体之一。

---

[1] 党卫军，德国纳粹党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和军事组织。

买书与买烟

几年前，我的一位报社编辑朋友和几名工厂工人一起监视火险。他们开始说起我朋友编辑的那份报纸，这份报纸他们大多都读过，而且觉得还不错。然而，当问起他们对文学版的看法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不会指望我们读那些东西吧？为什么？它们半数时间都在谈论要卖一先令六便士的书！像我们这种家伙，不可能浪费那么多钱买一本书。"我朋友说，如果是花几英镑去布莱克浦一日游，这些人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许多人认为，买书甚至读书，都是花费颇高的爱好，普通人力不能及。这种观点流传甚广，值得仔细研究。阅读成本难以按每小时花费多少便士来精确计算，但我首先着手盘点了自己的书，算出它们的总价，再算上其他开支，我十有八九能推算出我过去十五年来的阅读花销。

我清点并计价的都是我公寓里的藏书。另外还有同样多的书存放在别处，所以如果要算出总额，就得把结果乘以二。清样、破书、平装书、小册子和未合订成书的杂志等零头，我都没有计算在内；那些压箱底的废书，如学校的旧教材，也没有计算在内。我只计算那些我自愿获得，或者本应该自愿获得的书，以及那些打算保留的书。按这样计算，我发现我共有442本书：

购买的（多为二手书）	251本
别人赠送或用购书券购买的	33本
书评用书和出版社赠书	143本
借来没还的	10本
临时借出的	5本
合计	442本

现在说说计算价格的方式。我自己购买的书按全价计算——我尽量准确得出它们的全价。别人送的书、临时借的书、借来未还的书也按全

价计算，因为送的书、借的书和“偷”的书的数目多少能相互抵消。严格说来，我的一些书并不属于我，但许多人手里也有我的书，因此那些我没有付钱的书，可以与我付了钱但不在手上的书相抵消。另外，书评用书和出版社赠书按半价计算。这些书的大多数我只会买二手货，而二手货差不多就是半价。有些书的价格我只能靠猜，但相差并不会太远。花费如下：

	英镑	先令	便士
购买的	36	9	0
别人送的	10	10	0
书评用书等	25	11	9
借来没还的	4	16	9
借出去的	3	10	0
书架	2	0	0
其他合计	82	17	6

加上放在别处的书，我一共有近九百本书，总共花费一百六十五英镑十五先令。这是我过去近十五年积累下来的——实际不止十五年，因为其中有些书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但还是就算十五年吧。算下来我的阅读花销平均每年十一英镑一先令，但若要估算完整的阅读花销，就必须把其他费用计算在内。开支最大的是订阅报纸和期刊，我估计每年八英镑是个比较合理的数字，包括两份日报、一份晚报、两份周日版报纸、一份评论周刊，以及一两份月刊。这样，我每年的阅读开销就达到十九英镑一先令，但是想要计算出总额，我必须得另外估算一番。显然，我们经常在阅读上花了钱，但之后却没有东西能证明。这里面有图书馆订阅费，以及那些买来后弄丢或扔掉的书，这些大多是企鹅版和其他廉价版本的书。不过，按照我的其他花费来看，这类开销似乎每年六英镑就已经足够。所以，过去十五年里，我每年的阅读花销约为二十五英镑。

每年二十五英镑听起来很多，但如果对比其他开销，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我每周的阅读花销约为九先令九便士，这些钱现在只能买到大约八十三支普莱耶香烟，而哪怕是在战前，这些钱也买不到两百支。以目前的香烟价格来看，我在烟上花的钱要远比花在书上的多。我每周抽

六盎司[1]烟草，每盎司花费二先令六便士，每年差不多四十英镑。即使是在战前，每盎司烟草只需8便士时，我每年的烟钱也不止十英镑；如果我平均每天花六便士喝一品脱啤酒，这两样花销加起来就将近二十英镑。这个数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不了多少。1938年，英国人每人每年的烟酒钱约为十英镑。然而，英国人口中有20%是十五岁以下的孩子，还有40%是妇女，所以抽烟和喝酒的人每年在烟酒上的花费远不止十英镑。1944年，英国人每人每年在烟酒上花费至少二十三英镑，像前面那样除去妇女和儿童，每人每年的花费应该有四十英镑。每年花上四十英镑，差不多就能每天抽一包忍冬牌香烟，每周有六天能喝一品脱的淡啤酒，而这并算不上是奢侈。当然，物价全部都在上涨，书价也不例外；然而，就算你不去借书，而是花钱买书，再订不少期刊，你的阅读花销也不会高过烟酒钱。

我们很难将书的价格和从书中获得的价值联系起来。这里说的“书”包括小说、诗歌、教科书、参考书、社会学专著等，书的篇幅和价格并不成正比，对于习惯买二手书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一首五百行的诗歌或许要花费十先令，而一本二十年才翻阅几次的字典却可能只要六便士。有些书你会反复阅读，有些书你则浅尝辄止；有些书融入为你的思想，彻底改变你的人生态度；还有些书你一口气读完，但一星期后就忘得一干二净，而就金钱而言，它们的花销或许都一样。但如果你只把读书当成消遣，就好比去看电影，那么你就能粗略估算阅读花销。如果你只阅读小说和“轻”文学，而且要买下所有读过的书，再假设每本书花费八先令，读完每本书需要四小时，那么你每小时就会花费二先令，和电影院里的高价位置价格差不多。如果你主要阅读严肃书籍，而且也要买下所有读过的书，那么你的花费也差不多。这类书更贵，但要花更多时间去读。无论哪种情况，你都可以将读过的书保留下来，而且它们还能以原价的三分之一出售。当然，如果你只买二手书，阅读花销就会少很多，也许只有每小时六便士。另外，如果你从不买书，只租书看的话，那么阅读花销也就每小时半个便士；如果你只从公共图书馆借阅，那么几乎不用花钱。

为了证明读书属于比较便宜的消遣方式，我已经说得够多了；除了听收音机，或许就数阅读最为便宜。另外，英国大众实际花在书上的钱有多少呢？我找不到任何数据，但肯定有数据存在。不过我知道，包括重印本和教科书在内，英国战前每年会出版约一万五千种书。如果每本书售出一万册——即便把教科书也算在内，这个数字或许都过高了——那么普通人每年大概只直接或间接地买三本书。这三本书可能总共只需

花一英镑，或许更少。

这些数字纯属猜测，如果有人纠正它们，我会很感兴趣。但是，如果我的估算几近正确，那么对于这个几乎没有文盲，而且普通人在香烟上的花销比印度农民一生的积蓄都要多的国家来说，这些数字并不值得骄傲。如果英国的书籍消费量持续低下，那我们至少得承认，这是因为与看赛狗、看电影、泡酒吧相比，读书没那么振奋人心，而不是因为买书或租书太过昂贵。

---

[1] 盎司，英美制重量单位，1盎司等于1/16磅，合28克。

书评人的自白

房间坐卧两用，寒冷却不透气，到处都是烟头和半空的茶杯，一个身穿破旧睡袍的男人坐在快要散架的桌旁，想在桌上落满尘土的纸堆中为打印机腾个地儿出来。他没法扔掉这些纸，因为废纸篓已经装满了，而且在那堆尚未回复的信件和未付的账单里，恐怕还能找到一张两几尼[1]的支票，他几乎可以确信自己忘记把它存进银行。还有些信件上的地址应该记到通讯录上，但通讯录已经找不到了。想到要把它找出来，甚至光是想到要去找东西，他就会产生强烈的自杀冲动。

他才三十五岁，但看起来已经年届半百。他已经秃顶，青筋毕露，而且还戴着眼镜，或者说，如果他仅有的那副眼镜不是经常失踪的话，他就会戴着眼镜。如果他处于自己的常态之中，他会遭受营养不良的折磨，但如果最近走运，折磨他的会是宿醉。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半，按计划他在两个钟头前就该开始工作，但就算他竭尽全力，也会受到几乎接连不断的打扰：电话铃声、婴儿的叫嚷、街上电钻的噪声、债权人上下楼梯时的沉重脚步声。刚才打断他的，是今天早上的第二通邮件——两张广告传单和一张红色的所得税催缴单。

不用说，这个人是个作家。他也许是诗人、小说家、电影编剧或电台专题节目作者，因为文人差不多都一样，但我们姑且说他是书评人。纸堆里露出半个大包裹，里面是编辑寄给他的五本书，附言说五篇书评“应该一起交”。它们四天前就到了，但在过去四十八小时里，道德上的无力感让他打不开包裹。昨天，他下定决心解开了包裹上的绳子，发现这五本书是《十字路口的巴勒斯坦》（*Palestinians at the Cross Road*）、《奶牛科学养殖》（*Scientific Dairy Farming*）、《欧洲民主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European Democracy*）、《葡属东非部落习俗》（*Tribal Customs in Portuguese East Africa*），还有本小说《躺下更舒服》（*It’s Nicer Lying Down*），可能是弄错了才放到包裹里的。他的书评——就算八百字吧——得在明天中午前“到位”。

他对其中三本书的主题一无所知，所以他至少要读五十页才不至于出现低级错误。否则，这些错误不仅会在作者（书评人的习惯作者当然都一清二楚）面前出卖他，甚至在普通读者面前也一样。到了下午四

点，他才从包裹里取出书本，但焦虑感还是让他无力翻开它们。想到必须读这几本书，甚至光是闻到纸张的味道，他就感觉像是要去吃冰冷的蓖麻油米粉布丁一样。但奇怪的是，他的稿子还是会按时交到编辑办公室。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可以按时交稿。到晚上九点，他的脑袋会相对清醒一些，他在房间里坐到下半夜。房间越来越冷，烟雾越来越浓，他熟练地略读一本又一本书，每放下一本书时他就会说：“天啊，全是垃圾！”到了早晨，双眼浑浊、面色阴沉、满脸胡茬的他会盯着白纸看上一两小时，直到钟表上咄咄逼人的时针吓得他赶紧动手。然后，他突然打起精神开始写稿。所有那些陈词滥调——“这是一本不容错过的好书”“每页都令人难忘”“各个章节都具有特殊价值”等——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一样各就各位。书评会在篇幅正好合适时收尾，而距离交稿时间还剩三分钟。与此同时，又会有一包杂七杂八、倒人胃口的书寄到。如此继续。可就在几年前，这个饱受蹂躏、精神紧张的可怜虫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时，曾怀抱着多么美好的期待啊！

我是否有夸大其词？请问经常撰稿的书评人——任何每年至少评论一百本书的人——是否能问心无愧地说自己的习惯和性格与我的描述不一样？无论如何，每位作家都是那样的人，但长期不加选择地写书评是一份特别费力不讨好的恼人工作。这份工作不仅要赞美垃圾——此乃实话，稍后我将加以说明——而且还要不断捏造情感反应，而实际上那些书根本不会让人自发产生感情。书评人虽然对此已经腻烦，但还是职业性地对书籍很感兴趣；在每年出版的数千本书中，也许还是有五十或一百本会让他们乐于评论。如果他是业界一流的书评人，或许就能分到其中的十本或二十本，但多数情况下他只能分到两三本。他们所写的其余书评，无论在赞扬或批评时有多么尽职尽责，实质上都是谎话。他们正在将自己的不朽精神倒入下水道，每次倒掉半品脱。

绝大多数书评对所评书籍的描述都不充分或者具有误导性。自二战开始以后，出版商已经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左右文学编辑，无法让文学编辑吹捧他们出版的每一本书，但是由于版面不足和其他不便，书评水准反而不如从前。看见这种情况，有人说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将书评工作从雇佣文人的手里夺过来。专业的书籍应该由专家来评论，但许多书评，尤其是小说的书评，交给业余作家也未尝不可。几乎每本书都能引发某些读者的强烈情感，哪怕是强烈的厌恶，他们的看法也肯定比厌烦书评的职业人士更有价值。但遗憾的是，编辑们都知道这样的工作难以组织。在实践中，编辑也常常要回去求助他们的写手团队——用他们的话说，那就是他们的“正规军”。

只要想当然地认为每本书都值得一评，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若要评论大量书籍，就几乎不可能不过分吹捧其中的绝大部分。与书籍建立起某种职业上的联系后，你才会发现大部分书有多差劲。对九成以上的书来说，唯一客观真实的评价就是“这本书毫无价值”，而书评人自己对这些书的反应很可能是“我对这书毫无兴趣，要不是有钱，我才不会为它写书评”。但大众读者不会掏钱看这类书评。为什么要掏钱？他们想要某种读书指南，想要某种价值评价。但只要提到价值，标准便会坍塌。如果你说《李尔王》是部优秀的戏剧，而《四义士》（*The Four Just Men*）是本优秀的惊险小说（几乎每个书评人每周至少要说一次这种话），那这里的“优秀”是什么意思？

于我而言，最好的做法总是干脆无视大部分书籍，只为少数有分量的书籍撰写长篇书评——至少一千字以上。为即将出版的书写一两行短评也有所助益，但一般六百字左右的中篇书评，即使书评人是真心想写，也注定毫无价值。通常，书评人并不愿意写这种东西，因为一周接连一周地产出零碎文字，很快就会使他们变成文章开头那种身穿睡袍、被工作压垮的人。然而，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瞧不起的人；我得说，根据我从事书评和影评的经验，书评人的日子要比影评人好过点。影评人不能在家工作，必须参加早上十一点钟的试映，而且除了一两次明显的例外，他们还得为一杯廉价的雪莉酒出卖自己的尊严。

---

[1] 几尼，英国的旧金币，值1镑1先令。

穷人之死

1929年，我在巴黎十五区的X医院里待了几个星期。前台的工作人员照例拷问了我一番，我大约回答了二十分钟的问题，他们才让我进去。如果你在拉丁语系的国家填写过表格，你就会明白我所指的是哪种问题。之前几天里，我一直无法将列式温度转换为华氏温度，但我知道我的体温大概是华氏一百零三度。拷问结束时，我几乎都站不稳了。我身后有几个低眉顺眼的病人，提着彩色方巾扎成的包裹，等待着接受盘问。

盘问之后就是洗澡——这显然是所有新人必经的程序，就像进监狱或收容站一样。他们收走了我的衣服。在五英寸深的温水里颤抖着坐了数分钟后，我得到了一件亚麻睡衣和一件蓝色的法兰绒晨衣——没有拖鞋，他们说没有我穿的大号拖鞋——然后就把我带到了室外。那是1929年2月的夜晚，而我正身患肺炎。我的病房在两百码外，要走到病房，似乎得穿过整个医院。有人在我前面打着灯笼蹒跚而行。脚下的碎石小路已经结霜，寒风吹动睡衣拍打着我的小腿。走进病房时，我觉得有些莫名的熟悉，但直到深夜才发现这种感觉从何而来。这间病房光线昏暗，低矮狭长，总是有人窃窃私语，三排床铺挨得出奇的近。病房里还有一股排泄物的气味，恶臭中却有一丝甜味。我躺到床上，看见对面坐着一个半裸的男子。他个子矮小，含胸驼背，头发呈浅褐色。一位医生和一名学生正在他身上做着奇怪的手术。首先，医生从他的黑色口袋里取出十来个酒盅似的小玻璃瓶，然后学生在每个瓶子里点燃火柴耗尽里面的空气，接着医生把杯子迅速扣在男子的背上和胸上，瓶中的真空在他身上留下巨大的黄色水疱。后来我才明白到他们在做什么。这种疗法叫拔火罐，你可以在以前的医学教科书里读到，而在那之前我隐约以为那是一种给马治病的方法。

室外的冷空气或许降低了我的体温，我漠然望着这种残酷的治疗方式，甚至还觉得有些乐趣。然而，医生和学生随后来到我的床前，把我提溜起来，二话不说就要用那些玻璃瓶给我拔火罐，而且那些瓶子根本没有用任何方式消过毒。我如同动物一般，虚弱地抗议了几声，却没有得到回应。他们毫无人情味地折腾我，让我印象极为深刻。我从未进过医院的公共病房，这是我初次碰见医生对病人一声不吭就开始折腾病

人，甚至不把病人当人看。他们只在我身上用了六个玻璃瓶，但之后他们却划破那些水疱，又开始第二次拔火罐。这时，每个玻璃瓶里都抽出了少量的深色血液。当我再次躺下，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辱、恶心和害怕时，我以为他们至少会放我一马。但事情绝非这么简单。另一项治疗——贴芥子膏药——紧随其后，这似乎和洗热水澡一样也是常规程序。两个不修边幅的护士已经准备好了膏药，然后将膏药紧紧地糊在我胸上，就像给我穿上紧身衣似的。几个身穿衬衫和裤子、在病房里闲逛的男人开始围到我病床边上，有些同情地咧嘴微笑着。后来我才明白，观看护士给病人贴膏药是病房里的最佳消遣。膏药通常要贴十五分钟，只要被贴的不是自己，这件事确实还是挺有趣的。最初的五分钟疼痛剧烈，不过你以为自己还能撑下去。接下来的五分钟，这种念头消失了，但是膏药紧扣在背后，根本无法摆脱。这就是旁观者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我注意到，在最后五分钟里，你会感到有些麻木。撕下膏药后，他们往我头下塞了个装满冰块的防水枕头，然后就把我扔在了一边。我整夜没睡，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唯一一次躺在床上却彻夜未眠，连一分钟都没能睡着。

进医院的第一个小时，我接受了一系列各不相同且互相矛盾的治疗。但这些都是骗人的，因为通常而言，你基本上得不到什么治疗，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除非你的病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或者能对他们有所帮助。早晨五点，护士就来叫醒病人，然后给他们量体温，但却不给他们洗漱。如果你身体状况还行，那么可以自行解决，否则就只能指望那些能下地走动的好心病友。尿壶和便盆——在这里别名“砂锅”——往往也得病人自备。早餐在八点送到病房，号称“部队汤”，这是种寡淡的蔬菜汤，上面漂着黏糊糊的面包块。晚些时候，那个神情严肃、留着黑色胡子的高个医生会来查房，一名实习医生和一群学生紧跟其后，但是我们病房里有六十来个病人，而且他显然还要去其他病房查房。他每天都要经过许多病床，有时身后还会传来病人哀求的哭声。另外，如果你得的病刚好是学生想要了解的，那么你就会相当受关注。我就是支气管炎的绝佳标本，有时会有多达十来个学生排队听我的胸腔。那种感觉非常奇怪，因为这些学生有着浓烈的学习兴趣，而且似乎丝毫不觉得病人也是人。说来也奇怪，有些年轻学生在上前诊视时会兴奋得发抖，就像小男孩终于摸到一台贵重的机器一样。随后他们接连将耳朵——年轻男孩的、女孩的、黑人的耳朵——贴到你的后背上，并不停地用手指严肃却笨拙地叩击后背。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也不会正眼看你。作为身穿制式睡衣、免费住院的病人，你的身份主要是标本，我虽然不讨厌这个身份，但也绝不会习惯。

几天后，我的身体有所好转，可以坐起来观察其他病人。在这间不通风的病房里，窄小的病床之间近得可以让你轻松摸到邻床的手。我想，这里除急性传染病以外，应该各种病患都有。我右边病床上躺的是一个红头发的补鞋匠，个子不高，双腿长短不一。他经常向我吹口哨，大声叫道“43号”（或者其他病床号），并把双手举到头顶上挥舞，以此宣告某个病人的死亡（他总是最先听说有人去世，所以这样宣布过很多次）。这个人没什么大病，但在我视线范围内的大部分病床上，正上演着肮脏的悲剧或恐怖至极的场景。跟我脚对脚的那张病床上，躺着一个瘦小干枯的病人，至死（我们没有见到他死去，他们给他换了张病床）都忍受着不知什么疾病的折磨，让他全身变得异常敏感，连翻个身，有时甚至是被子的重量，都会让他疼得大叫。最痛苦的是小便的时候，他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做到。护士给他拿来尿壶，然后一直站在他旁边吹口哨，就像马夫对马匹所做的那样。最后，他痛苦地大喊“尿了”，然后才开始小便。在他旁边的浅褐色头发的男人是我之前看见被拔火罐的那位，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咳嗽，痰里还带着血丝。我左手边是个高个儿年轻人，看起来脆弱无力，医生会定期往他后背里插入一根管子，从他身体某个部位抽出带着泡沫的液体，量多得不可思议。再过去的病床上，躺着一位参加过1870年战争的垂死老兵。那是一位英俊的老人，下巴蓄着白色的胡须。允许探视时，他的床边总会坐着四个上了年纪的女性亲属，她们穿着一身黑色，俨然四只乌鸦，显然是在算计他那可怜的遗产。在我对面较远的病床上是位秃头老人，留着八字胡，脸庞和身体极其臃肿。由于身患某种疾病，他几乎小便不断，床边总是放着一个巨大的玻璃罐。一天，他的妻子和女儿来探望他。一看见她们，老人肿胀的脸庞立刻变得神采飞扬，又惊又喜地笑了起来。她的女儿长相标致，大约二十来岁。她走近病床时，我看见他缓缓地将手从被子里抽出来。我似乎可以想象他接下来的动作——女孩跪在床边，老人把手放在她头上，在临终前为她祝福。但他没有，他只是把尿壶递给她，而她迅速接过尿壶，把尿液倒进玻璃罐里。

十来张床之外是身患肝硬化的57号，应该就是57号。病房里的人都认得他，因为他有时是医学课的研究对象。那个高大严肃的医生每周有两个下午会在病房里给一群学生讲课。年老的57号不止一次坐在手推车上，然后被推到病房中央。医生会卷起他的睡衣，用手指挤着他肚子上巨大松弛的凸出物——应该是病变的肝脏——然后严肃地解释说，这是种酗酒引起的疾病，在饮酒国家更为常见。像往常一样，他既不会和57号说话，也不会对他微笑、点头或给予任何形式的认可。他说话时身子笔直，表情十分严肃，双手按着57号瘦弱的身体，不时还会轻微地来回

摇晃，就像女人用擀面杖一样。57号倒是毫不介意。显然，他已经住院很久，经常在课堂露面，他的肝脏早就成了病理学博物馆的标本。他对医生的话完全不感兴趣，当医生把他当成古瓷器来展示时，他也只是躺在床上，双眼无光，眼神涣散。他六十来岁，身体异常干瘦，脸苍白如纸，皱缩得似乎还没有洋娃娃的脸大。

一天早晨，护士还没来，临床的补鞋匠就拉扯着我的枕头把我叫醒。“57号！”他的双臂在头顶上挥舞着。病房里的灯光足以让我看清事物。我看见年迈的57号侧身蜷缩在床上，脸朝着我的方向支出了床沿。他是在夜里去世的，所以没人知道具体时间。护士来到病房听到这个消息时，表情漠然，接着又继续工作去了。过了很久，大概一两小时，另外两个护士才像士兵一样并肩走进来，木鞋在地上发出沉重的响声。她们把57号的尸体捆扎到床单里，但晚些时候尸体才会被挪走。同时天也更亮了些，我有时间仔细观察57号。其实我是侧躺在床上观察他的。说来也怪，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去的欧洲人。我之前也见过死人，不过都是亚洲人，而且往往都是死于非命。57号仍旧睁着眼睛，张着嘴巴，瘦小的脸上痛苦地扭曲着。但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张惨白的脸。他的脸庞之前十分苍白，但现在比包裹他的床单稍黑一些。盯着他那张瘦小扭曲的脸庞，我突然想到，这具等着被运到解剖室木板上的恶心废物，竟是你在启应祷文中所祈祷的“自然”死亡。没错，我想这就是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后等待着你的结局，这就是活到老的幸运儿的死法。人当然都想活着，但其实正是由于对死亡的畏惧，人才能继续活下去。然而，我一贯认为，人还是在岁数不太大的时候死于非命更好。人们谈论着战争的恐怖，但是在人类发明的武器中，又有哪件能像寻常百姓患的某些疾病那样残忍呢？顾名思义，“自然”死亡意味着缓慢、发臭和痛苦。即便如此，死在自己家里和死在公共机构还是有区别的。这位油枯灯灭的可怜老人甚至无足轻重到临终前都没有人守在病床旁边。他只是一个编号，接着成为学生们解剖的“对象”。在这种地方，连死亡都为众人所知，真是悲惨至极！X医院里的病床挨得特别近，中间连帘子都没有。想想与我脚对脚的那个瘦小男人的死法，就是那个让被子碰到都会疼得大叫的男人。我敢说“尿了”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将死之人或许不会为这类事情烦心——至少标准答案应该是这样的。尽管如此，只要还没到最后一两天，垂死之人多少还是神智清楚的。

在医院的公共病房里，你会看到许多恐怖的场景，而这些场景在那些设法死在家里的人身上似乎并不会发生，看起来某些疾病只会侵袭低收入人群。但事实上，我在X医院看到的有些场景在英国医院里的确看

不到。比如，这伙人就像动物一样死去，没有人守候，没有人关心，甚至死了之后到第二天早晨才被发现——这种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你在英国肯定不会看见这种事，更不会看到尸体暴露在其他病人眼前。记得一次在英国一家乡村医院，有人在我们喝茶时死去。病房里虽然只有我们六个人，但护士处理事情十分熟练，我们喝完茶才知道有人去世，而且尸体已经被移走。在英国，我们拥有大批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护士，这或许是个被低估的优势。英国护士的确十分愚钝，她们可能会用茶叶算命，会佩戴国旗徽章，会在壁炉台上摆放英国女王的照片，但她们至少不会纯粹因为懒惰而不给病人梳洗，不会让病人躺在没整理过的病床上忍受便秘的痛苦。X医院的护士身上仍有些甘普太太[1]的气质。后来，在西班牙共和国军队的医院里，我还见过无知得连体温都不会量的护士。你也不会在英国看到像X医院那么肮脏的地方。后来，我身体恢复到能够自己到浴室洗漱时，我发现浴室里面有个大包，里面装着残羹剩饭和肮脏的伤口敷料，而且护墙板里蟋蟀成灾。当我拿回自己的衣服，双腿也变得有力时，尽管还没到出院日期，也没得到出院许可，我就从X医院逃了出来。X医院并非我逃离过的唯一一所医院，但它昏暗的光线、简陋的布置、令人作呕的气味，最主要的是它的精神氛围，都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我之所以被送到X医院，是因为它隶属于我所在的十五区。住进去之后，我才知道这家医院名声很差。一两年后，著名的骗子阿诺小姐因为在羁押中生病而被送到了X医院。几天后，她成功躲过警卫，打车回了监狱，她解释说因为监狱里要舒服点。毫无疑问，即使在当时，X医院也并非典型的法国医院。但是X医院里的病人——几乎都是工人——逆来顺受得让人吃惊。一些病人甚至觉得医院条件近乎舒适，因为其中至少有两个装病的穷人觉得进医院是过冬的好办法。护士默许他们装病，因为他们会帮着干些杂活。但大多数病人的看法是：这个地方的确很恶心，但你还能指望什么？早晨五点你就被叫醒，然后等上三小时，喝些清汤当成早餐；病人去世时没人陪在身边；甚至想要得到治疗，你也得在医生路过时引起他的注意。对他们来说，这些似乎都不足为奇。按照他们的传统，医院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病得很重，如果你穷得没法在家里治病，那么你就必须去医院。一旦到了医院，你就像进了军队一样，必须忍受冷酷和不适。此外，让我感兴趣的是，我发现仍然有人相信一些老掉牙的故事，这些故事如今已经淡出英国人的记忆——比如说医生会仅仅因为好奇就对你开胸破肚，或者医生认为在完成麻醉之前开始手术会很有趣。还有些恐怖故事，说浴室远处有间小手术室，里面传出过可怕的尖叫声。我没见过任何能证实这些故事的证据，它们无疑都是胡说八道，虽然我确实看见过医生的两个学生杀死，或者说差点杀死一个十六岁的男孩（我离开医院时，他似

乎已经奄奄一息，但也许后来康复了）。他们在男孩身上做了有害的实验，而这种实验不可能发生在付费病人身上。我还清楚地记得，人们过去认为伦敦某些大医院会杀死病人，将尸体用来解剖。我在X医院没有听到这样的传言，不过我倒觉得这里有些病人会相信这个说法。在这家医院里，虽然19世纪的治疗方法或许并未流传下来，但那时的作风却得以留存，这便是这家医院的特点所在。

近五十年来，医患关系发生了巨变。阅读19世纪晚期以前的文学作品，你就会发现人们普遍认为医院与监狱没有两样，而且还是那种像地牢一样的旧式监狱。医院是肮脏、痛苦和死亡的聚集之地，是坟墓的前奏。只要不是一贫如洗，人们绝对不会考虑去这种地方接受治疗。尤其是上世纪初，在医学变得更加大胆却很少取得成功的时候，普通大众对医学界充满了恐惧和忧虑。特别是外科手术，更被人们视为是施虐狂的一种十分恐怖的表现。只有在盗尸者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做到的解剖，甚至被人们混淆成巫术。在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你可以找到许多关于医生和医院的恐怖作品。想想可怜的乔治三世，他在年老昏聩的时候，看到外科医生来“给他放血放到昏厥”，就吓得尖叫求饶！想想鲍勃·索耶和本杰明·艾伦[2]的对话，那绝不是什么拙劣的模仿；想想《崩溃》[3]和《战争与和平》中的野战医院，想想梅尔维尔在《白外衣》（*White-Jacket*）中对于截肢的骇人描述！就连19世纪英国小说中医生的名字——斯拉西尔、卡沃尔、索耶尔、菲尔格雷夫[4]等，而且人们通常将外科医生戏称为“锯骨者”——既令人毛骨悚然，又让人忍俊不禁。丁尼生那首题为《儿童医院》（*The Children’s Hospital*）的诗歌，或许最能体现反对外科医学的传统，尽管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晚至1880年，但基本上还属于前麻醉时代。而且，关于丁尼生在这首诗中记录的情形，值得说道的还有很多。想想无麻手术会是什么样，想想过去那些臭名昭著的无麻手术，你很难不去怀疑那些实施手术的人的动机，因为学生们翘首企盼的这种血腥手术（“斯拉西尔主刀的话，场面会十分壮观”[5]事实上几乎毫无价值：接受手术的病人就算没有因为休克当场死亡，往往也会因为坏疽而死，这种结果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即使是现在，医生的动机也令人怀疑。经常生病的人，或者听到过医学生谈话的人，都会明白我的意思。但麻醉剂和消毒剂的运用都是转折点。如今，无论是在世上的哪个地方，你都不可能看到亚克塞尔·蒙特[6]在《圣米歇尔的故事》（*The Story of San Michele*）中描述的场景：邪恶的外科医生头戴大礼帽，穿着长礼服，浆洗过的衬衣前胸，满是血渍和脓液，他用同一把刀肢解一个又一个病人，成堆的断手断脚被扔在桌边。此外，国家医疗保险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不再把工人阶级的病人看作不值得关注的

穷人。到了20世纪，大医院在给没付费的病人拔牙时依旧经常不用麻醉剂。他们没有付钱，凭什么要用麻醉剂——这就是当时医院的态度，不过这种态度如今也有所改变。

尽管如此，每种社会机构的过去都会在人们心中留下一些挥之不去的印象。吉普林笔下的鬼魂仍旧在军队营房中出没；走进济贫院，人们就会想起《雾都孤儿》。医院最初是让麻风类病人在里面死去的临时处所，后来成为医学生利用穷人尸体学习医术的地方。从医院那种以阴暗著称的建筑上，你还能看出其历史留下的些许印迹。我不会抱怨我在英国医院所接受的治疗，但我的确知道，正是一种合理的本能警告人们尽可能不去医院，尤其是不进集体病房。如果医院的态度是“要么接受，要么离开”，那么不管法律如何规定，你都必然难以掌控自己的治疗，更难以确定他们不会在你身上做那些愚蠢的实验。寿终正寝固然不错，但死于非命仍然是上佳选择。无论医院多么友好和高效，死在医院的病人都会感到些许残忍和肮脏，这或许不值一提，但却会给人留下十分痛苦的记忆。而这种记忆源于医院是一个办事草率、拥挤不堪、毫无人情味，每天都有人在陌生人之中死去的地方。

对医院的畏惧或许仍然停留在极度贫穷的人们心中，这种畏惧在我们其他人心中也只是在最近才消失。它是我们内心浅处的阴影。我早前说过，我在走进X医院的病房时，觉得有种莫名的熟悉。当然，当时病房里的场景让我想到的，是19世纪时那种臭气熏天、充满痛苦的医院，那种医院我虽未亲眼见过，但却有所耳闻。有些东西，或许是拿着肮脏黑包、身穿黑衣的医生，又或许只是病房里面难闻的气味，奇怪地从我记忆深处挖出了那首被我遗忘了二十年的《儿童医院》。碰巧的是，我小时候曾有一位护士给我读过这首诗；丁尼生写这首诗的时候，她或许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她对老式医院里那种恐怖和痛苦记忆犹新。我俩都被这首诗吓得浑身颤抖，但我后来似乎就把它忘了。即使是这首诗的题目也无法唤起我的回忆。但一看到那个呻吟阵阵的昏暗病房，看到里面的病床挨得那么近，我的思绪就突然被唤醒了。那天晚上，我发现自己记起了这首诗的故事和气氛，还记起了许多完整的诗句。

---

[1] 甘普太太，狄更斯小说《马丁·翟述伟》中的人物，道德堕落、邋遢，是维多利亚时期不称职护士的典型。

[2] 鲍勃·索耶、本杰明·艾伦，都是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客外传》中的人物。

[3] 《崩溃》（*La Débâcle*），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的作品。

[4] 这四个名字在此处为音译，其原文字面意思分别为砍杀者、切肉者、锯木匠、建墓者。

[5] 此句出自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

[6] 亚克塞尔·蒙特（Axel Munthe，1857-1949），瑞典医生和作家，著有回忆录《圣米歇尔的故事》。

政治与英语[1]

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大多会承认，英语这门语言病痛缠身，但人们普遍认为，即便是有意识的行动也无济于事。我们的文明已经堕落，而我们的语言——这种观点认为——必将毁于这场大崩溃。因此，防范语言陋习的任何挣扎都是多愁善感的拟古主义，就和偏好蜡烛胜于电灯、偏好双轮马车胜于飞机一样。这种观点背后是一种半自觉的信念，相信语言是自然的产物，而不是能由我们随心操控的工具。

显然，语言的衰落根本上必有其政治和经济动因，原因不仅仅是某位作家个人的恶劣影响。但结果也可能变成原因，由此强化最初的原因，让结果变本加厉，如此不断循环。一个人也许会因为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而开始酗酒，之后又因为酗酒而更加失败。英语语言的遭遇正是如此。它因为我们愚蠢的思想而变得丑陋和不准确，而语言上的不修边幅又让我们更容易产生愚蠢的想法。重点在于，这一过程是可逆的。现代英语，尤其是书面英语中充满了经由模仿而不断蔓延的坏习惯，但只要我们愿意花点必要的工夫，就能避免这些坏习惯。只要摆脱陋习，我们的思考就会更加透彻，而透彻的思考是走向政治革新必不可少的第一步：由此，针对恶劣英语的斗争并非无足轻重，并非只是专业作家需要考虑的问题。之后我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到时候我的意思能显得更清楚。另外，下面四个例子可以体现出人们如今的写作习惯。

选择这四个片段并不是因为它们特别糟糕——如果刻意去选，我能找出比这些还差得多的——而是因为它们体现出了我们当前面临的多种思维之弊。这些例子略低于平均水平，但却很有代表性。我给它们编了号，以便后文需要时加以引用：

（1）I am not, indeed, sure whether it is not true to say that the Milton who once seemed not unlike a seventeenth-century Shelley had not become, out of an experience ever more bitter in each year, more alien (sic) to the founder of that Jesuit sect which nothing could induce him to tolerate.

（一）的确，我无法确定这样说是不是不正确，弥尔顿曾经一度看似并非不像17世纪的雪莱没能成为的样子，在年复一年地经受着越来越

深的痛苦之后，没有变得和他完全无法容忍的耶稣会的创始人越发不同（原文如此）。

——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教授在《自由言论》（*Freedom of Expression*）杂志的刊文

（2）Above all, we cannot play ducks and drakes with a native battery of idioms which prescribes such egregious collocations of vocables as the Basic PUT UP WITH for TOLERATE or PUT AT A LOSS for BEWILDER.

（二）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浪费了原本就存在、优美地将单词组合在一起的习语，比如基本的用put up with代替tolerate（put up with和tolerate均有“忍受、容忍”之意），或者用put at a loss表示bewilder（put at a loss和bewilder均有“使……迷惑”之意）。

——兰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 Hogben）教授《辅助通用语》（*Interglossa*）

（3）On the one side we have the free personality; by definition it is not neurotic, for it has neither conflict nor dream.Its desires, such as they are, are transparent, for they are just what institutional approval keeps in the forefront of consciousness; another institutional pattern would alter their number and intensity; there is little in them that is natural, irreducible, or culturally dangerous.But ON THE OTHER SIDE, the social bond itself is nothing but the mutual reflection of these self-secure integrities.Recall the definition of love.Is not this the very picture of a small academic? Where is there a place in this hall of mirrors for either personality or fraternity?

（三）我们一方面有着自由人格这种从定义上看并非神经质，因为它既无冲突又无幻想的东西。它的愿望实际上是透明的，因为它们只是被放在意识最重要的地方的制度性许可；另一种制度性模式会改变它们的数量和强度；其中鲜有自然、无法简化或在文化上存在危险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关系本身只是这种自我防卫的安全状态的共有体现。回顾一下爱的定义。这难道不正是一个小学者的样子吗？在这光怪陆离之处，人格和友爱的位置又在哪里呢？

——纽约《政治》（*Politics*）杂志有关心理学的文章

（4）If a new spirit is to be infused into this old country, there is one thorny and contentious reform which must be tackled, and that is the humanization and galvanization of the B.B.C.Timidity here will bespeak canker and atrophy of the soul.The heart of Britain may lee sound and of strong beat, for instance, but the British lion's roar at present is like that of Bottom in Shakespeare's MIDSUMMER NIGHT'S DREAM-as gentle as any sucking dove.A virile new Britain cannot continue indefinitely to be traduced in the eyes, or rather ears, of the world by the effete languors of Langham Place, brazenly masquerading as "standard English." When the *Voice of Britain* is heard at nine o'clock, better far and infinitely less ludicrous to hear aitches honestly dropped than the present priggish, inflated, inhibited, school-ma'am-ish arch braying of blameless bashful mewing maidens.

（四）如果要把一种新的精神注入这个古老的国家，就必须应对一场艰难且富有争议的改革，也就是BBC的人格化与觉醒。胆怯在这里意味着灵魂的腐朽与萎缩。比如，不列颠之心也许还很强健，还强有力地跳动着，但不列颠的狮吼如今却像是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波顿的吼声，像乳鸽一样轻柔。雄浑的新不列颠再也不能因为朗豪坊[2]上无耻地乔装成"标准英语"的颓废倦怠，无限制地被全世界的听众和观众诟病下去了。当人们在九点听到《英国之声》（*Voice of Britain*）时，会听到真实的丢掉了"H"发音的底层民众口音，这要比听着现在这种自命不凡、华而不实、拘谨压抑、就像女学监教训无辜害羞、小声嘟囔的女学生的嘶吼好得多，而且也没那么可笑。

——《论坛报》（*Tribune*）刊登的来信

这些片段各有缺陷，但除了可以避免的丑陋行文之外，它们有两点共性。一是意象陈腐，二是不够准确。作者要么有话表达不出，要么无意间说成了别的意思，要么毫不在乎自己的话到底有没有意义。这种含糊的表达和单纯的无能的结合，是现代英语散文，尤其是各类政治文章最突出的特点。一旦提到某个话题，具体就变成了抽象，人们能想到的似乎只有陈腐的措辞：文章中根据词义来挑选的词越来越少，搭鸡舍般堆砌起来的短语越来越多。下面我列出了遣词造句中各种惯用的把戏，附有解释和例子：

垂死的比喻。新创的比喻通过唤起视觉意象来帮助思考，而在严格意义上说已经“死亡”的比喻——比如iron resolution（铁一般的决心）——事实上已经复归于普通词，在平时使用中也不失生动。但在两者之间还有一大摞陈旧的比喻，它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唤起意象的能力，人们只是因为懒得创造新的短语才继续使用它们。比如：ring the changes on（变换花样）、take up the cudgels for（尽力捍卫）、toe the line（服从命令）、ride roughshod over（横行霸道）、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同心协力）、play into the hands of（授人可乘之机）、an axe to grind（别有用心）、grist to the mill（有利的事）、fishing in troubled waters（浑水摸鱼）、on the order of the day（蔚然成风）、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swan song（天鹅之歌）、hotbed（温床）。在使用其中很多比喻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它们的本意（比如，rift是什么意思），互相矛盾的比喻经常被用在一起，这是作者对自己说的话毫不关心的明确标志。一些比喻如今已经偏离了本意，使用者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比如，toe the line有时会被写成tow the line。又比如，人们如今往往以为between the hammer and the anvil（进退两难，字面意义为铁锤和铁砧）指的是铁砧被打坏了。事实上被打坏的总是铁锤，而不是铁砧。只要停下来想想自己在说什么，作家就会意识到这一点，就能避免误解短语的原意。

运算符，或曰文字的义肢。它们免去了选择合适的动词与名词的麻烦，与此同时，在句子里塞上几个音节还能让它显得匀称。典型的短语有：render inoperative（使……无效）、militate against（妨碍）、prove unacceptable（证明……不可接受）、make contact with（与……接触）、be subjected to（遭受）、give rise to（引起）、give grounds for（提供理由）、having the effect of（有……后果）、play a leading part/role in（担当主角）、make itself felt（暴露出来）、take effect（生效）、exhibit a tendency to（表现出……倾向）、serve the purpose of（为……服务），等等。个中要义在于消灭简单的动词。人们不再使用break（打破）、stop（停止）、spoil（破坏）、mend（改正）、kill（杀死）等单一动词，而是用在prove（证明）、serve（服务）、form（形成）、play（扮演）、render（使）等用途广泛的动词之后加上名词或形容词而创造出的短语。此外，能用被动语态的地方决不用主动语态，能用名词短语就不用动名词（比如用by examination of代替by examining）。通过加后缀“ize”和前缀“de”可以进一步缩小动词的范畴，通过“not un-”（并非不……）的结构让平庸的表述显得深沉。简单的连词和介词被with respect to（关于），having regard to（虑及）、the fact

that（事实上）、by dint of（借助）、in view of（鉴于）、in the interests of（为了）、on the hypothesis that（假定）等短语所取代。为避免句末太过平淡，还要用些响亮的陈词滥调，如greatly to be desired（殷切期望）、cannot be left out of account（必须加以考虑）、a development to be expected in the near future（近期可预见的发展）、deserving of serious consideration（值得慎重考虑）、brought to a satisfactory conclusion（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不一而足。

狂妄的措辞。Phenomenon（现象）、element（元素）、individual（个人）、objective（客观的）、categorical（绝对的）、effective（有效的）、virtual（实际上）、basis（基础）、primary（首要的）、promote（提升）、constitute（构成）、exhibit（表现）、exploit（压榨）、utilize（利用）、eliminate（消灭）、liquidate（肃清）等词被用来修饰简单的陈述，还能让偏见显得科学公正。Epoch-making（划时代的）、epic（史诗般的）、historic（历史性的）、unforgettable（不可忘却的）、triumphant（胜利的）、age-old（古老的）、inevitable（不可避免的）、inexorable（不可阻挡的）、veritable（名副其实的）等形容词被用来粉饰国际政治中的肮脏勾当。旨在美化战争的文章往往带着古典色彩，典型用词有：realm（王国）、throne（王权）、chariot（战车）、mailed fist（铁腕）、trident（三叉戟）、sword（利剑）、shield（盾牌）、buckler（圆盾）、banner（旗帜）、jackboot（长筒军靴）、clarion（号角）。而cul-de-sac（僵局）、ancient ré gime（旧制度）、deus ex machina（扭转乾坤之力）、mutatis mutandis（已做适当修正）、status quo（现状）、gleichschaltung（一体化）、weltanschauung（世界观）等外来词和外来用法被用以附庸风雅。除了i.e.（也就是）、e.g.（例如）和etc.（等等）这些有用的缩写之外，英语中如今使用的数百个外来短语其实并不必要。拙劣的作者，尤其是科学、政治和社会学领域的作者，几乎总是醉心于拉丁词和希腊词比撒克逊词更高贵的观点，expedite（促进）、ameliorate（改善）、predict（预测）、extraneous（外来的）、deracinated（根除）、clandestine（秘密的）、sub-aqueous（水生）和数以百计的类似词汇相对盎格鲁-撒克逊词汇而言日渐占据上风[3]。创造新词的一般做法是在拉丁语或希腊语词根前后加上合适的词缀，在必要时加上“ize”。生造这类词汇（deregionalize（整体化）、impermissible（禁止的）、extramarital（婚外的）、non-fragmentary（非碎片化的）往往比选择合适的英语词汇更省事。总体而言，这样做的结果正是让语言变得越发含糊暧昧。

无意义的词汇。在某些类型的文章，尤其是文艺批评中，经常可以看到几乎全无意义的冗长段落[4]。诸如romantic（浪漫的）、plastic（可塑的）、values（价值）、human（人类）、dead（死亡）、sentimental（感伤的）、natural（自然的）、vitality（活力）之类的词汇在艺术批评中毫无意义，因为它们既不指向明确的对象，读者也别指望从中发现什么意义。当一个批评家说“某先生大作的突出特点就是其生命力”，而另一个批评家说“某先生的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其特有的死寂”时，读者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两种不同意见。如果他们用的词是“黑”和“白”，而不是“生命力”和“死寂”这样的行话，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这里用词不当。很多政治性的词汇也像这样被滥用了。Fascism（法西斯主义）一词现在除了代表“不可取的东西”之外再无其他意义。Democracy（民主）、freedom（自由）、patriotic（爱国的）、realistic（现实的）、justice（正义）这些词都有着互不相容的多个不同含义。以“民主”为例，各方不但没有给予它公认的定义，甚至还反对这样的努力。几乎人人都觉得，当我们说一个国家“民主”的时候，我们是在称赞它。因此，各种政体的辩护人都说他们的政体是民主的，他们害怕的是，如果这个词的含义确定下来，自己也许就再也不能用这个词了。这种词往往都被用于蓄意欺骗。也就是说，使用这些词的人私下里有他自己的定义，但却让听者觉得他说的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贝当元帅[5]是真正的爱国者”之类的陈述几乎全都是蓄意的欺骗。其他有着多重含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或多或少带着欺骗的词语有：class（阶级）、totalitarian（极权主义的）、science（科学）、progressive（进步的）、reactionary bourgeois（反动资产阶级）、equality（平等）。

在列举了写作中的种种欺骗和误用之后，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看这些做法会有什么影响。这回得找一个原本就是虚构的例子。我要把一段优美的英语用最糟糕的现代英语翻译出来。下面是《传道书》中著名的一节：

I returned, and saw under the sun, that the race is not to the swift, nor the battle to the strong, neither yet bread to the wise, nor yet riches to men of understanding, nor yet favor to men of skill; but time and chance happeneth.（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赀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6]

译成现代英语就是：

Objective consideration of contemporary phenomena compels the conclusion that success or failure in competitive activities exhibits no tendency to be commensurate with innate capacity, but that a considerable element of the unpredictable must invariably be taken into account.（对当前现象的客观思考引出的结论是，竞争性活动中的成败并未表现出与先天能力相关的趋势，但必须将影响颇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考虑在内。）

这只是不太夸张的戏仿。比如，上面的例三里就有好几处同样的缺陷。我明显没有全文照译。开头和结尾的句子与原文含义还比较接近，但中间的具体例证——快跑、力战、粮食——消失在含糊的“竞争性活动中的成败”之中。我只能这样翻译，因为我所讨论的这类现代作家——会写出“当前现象的客观思考”这种短语的人——当中，没有人能准确、详尽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与具体性渐行渐远是现代散文的总体趋势。下面我们更细致地分析一下这两个句子。第一句话包含四十九个词，却只有六十个音节，而且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词语。第二句话有三十八个单词和九十个音节，其中十八个词是拉丁词、一个是希腊词。第一句话中有六个生动的意象，只有一个短语——time and chance（当时的机会）——可以算是含糊的。第二句话中连一个引人注意的新鲜意象都没有，尽管有九十个音节，却只能表达出原文的部分含义。然而，类似后者的表述在现代英语中日益普遍。我并不想言过其实。这样的写法还没全面开花，最糟糕的文章里不时也能见到简练的表述。尽管如此，如果有人让你我就人类命运的不确定性写几行话，我们的构思也许更接近我编出来的那些句子，而不是《传道书》（*Ecclesiastes*）的原文。

正如我想要说明的，最糟糕的现代写作根本不会去根据意义选择词汇，不会为了更清晰的表达而创造意象。这样的写作只是将他人早已安排好的一串串字词粘在一起，用纯粹的废话让文章看起来像点样子。这种写作方法的诱人之处正是它的简单。说“在我看来，不妨假定……”要比说“我认为……”更简单——如果你已经养成了习惯，那样说还更快些。如果选用现成的短语，你不但不再需要推敲用词，也不再需要操心句子的韵律，因为这些短语差不多都很悦耳动听。在匆忙中创作的时候——比如口授给速记员或发表公开演讲——你的作品很容易落入做作的拉丁风格。“一件我们必须牢记心中的事”或“一个我们一致欣然认可的结论”之类的口头禅会让很多句子不至于结束得太过突兀。用陈旧的比

喻、隐喻和习语，你可以省不少脑筋，不过这样做的代价是让语义变得含糊，不光在读者看来是这样，对你自己而言同样如此。这就是混杂使用比喻的问题所在。唤起视觉意象是比喻的唯一目的。当这些意象发生冲突时——比如在“法西斯集团唱起了它的天鹅之歌”“暴政被投入了熔炉”这样的表述中——我们可以肯定，作者并没有在脑海里看到他所提及的意象；换句话说，他其实没动脑子。回顾一下我在本文开头所举的例子。拉斯基教授在例一的五十三个词里用了五次否定。其中一个毫无必要的否定让整段话不知所云，此外，他还把akin（接近）误作alien（疏远），让这段话更加难以理解，而且几处本可避免的混乱导致整体含义更加含糊。例二中的霍格本教授浪费了本可提出对策的机会，而且在否定常用短语put up with的同时又懒得翻开字典查查egregious是什么意思。不客气地说，例三简直就是废话：我们恐怕得读完整篇文章才能知道作者想表达什么。在例四里，词汇与含义几乎毫不相干。以这种方式写作的人往往想要表达某种整体情绪——他们不喜欢某个事物，想表达自己对另外一种事物的青睐——但却对话语的细节毫不在意。严谨的作家每写下一句话，都至少要问自己四个问题：我想说什么？要用哪些词汇来表达？什么样的意象或习语会让意思更清晰？这种意象是否足够新颖，能否有效？他也许还会追问两个问题：我的表达能否更简练？我是否说了什么本可避免的丑陋话语？不过，你也不用总是这么麻烦。你可以不再为思维把关，让现成的短语鱼贯而入。它们会替你造句——某种程度上甚至能替你思考——在必要的时候还会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让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正是这一点，体现出了政治和语言的堕落之间的特殊联系。

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文章往往都很糟糕。凡是正统思想，不论立场如何，似乎都需要通过缺乏原创性的乏味文风来表达。从各个政党的宣传册子、社论、宣言书、白皮书和各部次长的讲话来看，它们的政治话语固然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其中几乎都找不到鲜活、生动、独创的措辞。看着疲态尽显的雇佣文人在台上机械地重复着熟悉的短语——bestial atrocities（兽行）、iron heel（铁蹄）、bloodstained tyranny（罪行累累的暴政）、free peoples of the world（全世界自由的民族）、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同心协力）——总会让人有种奇怪的感觉，台上似乎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傀儡：当灯光打在他的眼镜上，反光的镜片背后似乎没有眼睛的时候，这种感觉会突然变得更加强烈。这并非全是幻想。如此遣词造句的人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他的喉咙发着恰当的声音，但他并没有像自己选择用词时那样用脑。如果这是一篇他已经习惯于不断重复的演讲，他恐怕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说什么，

就像人们在教堂里随声应和一样。对于政治服从来说，这种意识弱化的状态，就算不是必不可少的，至少也会有所帮助。

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性言论多半是在为那些无可辩解的事情辩护。诸如英国延续对印度的统治、苏联的大清洗和集体流放、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类的事情，诚然可以为之辩护，但辩护的论点必然会残酷到让大多数人不忍直视，而且也无法与政党所标榜的目标相契合。因此，政治语言必须包含大量的委婉说法、循环论证和赤裸裸的闪烁其词。轰炸不设防的村庄，把居民们赶到野外，用机枪射杀人群，用燃烧弹焚毁田舍：这叫“绥靖”。将数百万农民驱离土地，只让他们带着随身行李沿路跋涉：这叫“人口迁移”或“调整边境”。不经审判便将人们投入监狱关押多年，或是从脑后将他们枪决，或是让他们在北极圈以北的伐木营里死于坏血病：这叫“消除不稳定因素”。在需要提到某件事情，又不想唤起人们的想象时，就需要用这种措辞。

当一个人心口不一时，他会像乌贼喷墨汁一样，本能地使用复杂的长词和早已用滥的习语。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远离政治”这回事。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而政治本身就是由一堆谎言、遁词、愚行、仇恨和精神分裂组成。整体气氛变坏了，语言也必被殃及。

但若是说思想会腐蚀语言，语言同样也能腐蚀思想。拙劣的用语会借助惯例和模仿广为传播，甚至连那些应该知道、也确实知道更好用法的人也不能幸免。上文中所讨论的那种拙劣的语言从某些方面看确实很方便。A not unjustifiable assumption（并非毫无道理的假设）、leaves much to be desired（有待改进之处甚多）、would serve no good purpose（无助于任何正面目标）、a consideration which we should do well to bear in mind（我们必须牢记心中的事）这样的短语就仿佛我们手边的一包阿司匹林，是持续不断的诱惑。回头看看这篇文章，你一定会发现我自己也一次又一次地犯了我所批评的毛病。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本描述德国形势的小册子。作者告诉我，他“觉得不得不”写这本册子。随手翻开一页，我看到的第一句话是：“（盟国）得到了一个机会，不但可以对德国的社会政治结构进行彻底变革以避免在德国激起民族主义的反抗，而且同时可以为欧洲的合作与团结打下基础。”瞧，他“觉得不得不”写——也许是觉得自己有什么新见解——而他笔下的词语就像听到军号的战马那样，自动集结成常见的沉闷句式。要避免现成的短语（“打下基础”“进行彻底变革”）对思维的入侵，我们只有时刻提防，而且每一个这样的短语都会让大脑多一分麻痹。

我前面说过，英语的衰落恐怕还有药可救。反对这一点的人如果还能摆出论点来，也许会争辩说，语言不过是当前社会形势的反映，我们不可能通过直接改动词语和句法结构来影响它的发展。从一种语言的整体风格与精神来说，这也许是对的，但对具体问题而言却并非如此。不少愚蠢的词句之所以会消失，不是通过缓慢的演变，而要归功于少数人的有心之举。Explore every avenue（探索各种途径）和leave no stone unturned（千方百计）是最近的两个例子，它们在几位记者的揶揄下消失了。如果对这个工作感兴趣的人足够多，我们可以用类似的办法来消灭大量陈腐的比喻，可以用嘲笑根除“not un-”的结构[7]，可以减少日常句子里拉丁词和希腊词的使用，可以赶走外来短语和用错了地方的科学用语，总的来说，要让做作不再流行。保卫英语的内涵远不止于此，也许我们应该先来说说它不包括什么。

首先，这不是抢救废词和旧式文风的拟古主义，也不是要建立一种不可违反的“标准英语”。相反，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丢掉所有已经毫无用处的词句。这也和正确的语法和句法无关，只要能表意清晰，能避免美式英语的影响，并形成所谓的“好的散文文风”，它们并不重要。另一方面，我们拒绝虚假的简洁，拒绝书面英语的口语化。我们甚至也不打算让撒克逊词在所有情况下取代拉丁词，尽管我们希望用尽可能简短的词语来完成表述。最重要的是，要让意义来选择用词，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在行文中，最不可取的就是听任词汇摆布。在思考具体的对象时，心中必须排除词汇，而后，如果想描述出脑海中视觉化的意象，你也许就会坚持寻找最准确的用词，直到找到为止。在思考抽象的事物时，你更可能从一开始就依赖文字，如果不刻意提防，现成的说法就会涌入你的头脑，越俎代庖，它们会让你的本意变得模糊，甚至被改头换面。也许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推迟引入词汇的时机，通过形象或感受来尽可能地清晰表达我们的意思。而后方可选择——而不是简单地接受——最合适的短语，然后再换位思考，看看这些词句可能会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最后这种思维上的努力能够排除所有陈旧呆板和模棱两可的意象、所有预先编制的词语、不必要的重复、谎言和模糊的表达。但我们可能会经常对词汇或短语的效果抱有疑问，需要有一套在本能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可以依赖的规则。我想，以下几条规则能够应付大部分情况：

1.不要使用你在书刊报纸上经常见到的隐喻、明喻或其他修辞方式；

2.用词能短则短；

3.词语能删则删；

4.能用主动语态则不用被动语态；

5.不用外来词、科学术语和行话，除非在日常英语中找不到替代；

6.哪怕打破所有这些规则，也不要用不规范的说法。

这些规则听起来很简单，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于时下流行文风的人来说，它们意味着态度上的根本转变。即使遵守了所有这些规则，写出的东西依然可能很糟糕，但再差也差不过我在本文开头引用的四个例子。

这里考虑的并非文学性的语言，我在这篇文章中把语言视为表达思想，而不是隐瞒和妨碍思想的工具。斯图尔特·蔡斯[8]等人的主张近乎认为所有抽象词汇都没有意义，并以此为借口宣扬政治上的寂静主义。若不知法西斯主义为何物，又如何能与之斗争？我们不该轻信这种谬论，但我们应当认识到，当前政坛的混乱与语言的退化有关，我们也许可以通过语言方面的努力来带来些许改善。若你能让你的英语变得简练，就能摆脱正统观念中的那些最愚笨的想法。你就不会再用那些不可避免的行话，要是发表了什么愚蠢言论，其中的愚蠢之处连你自己都能一眼看穿。政治语言——对于从保守党到无政府主义政党的所有党派来说都是一样，尽管细节各有不同——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谎言变得真实、让谋杀显得可敬，为了让空话听起来切实可信。我们无法立即改变这种状况，但我们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的习惯，如果我们放声嘲笑，我们有时甚至可以将那些陈旧无用的短语——jackboot（长筒军靴）、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hotbed（温床）、melting pot（熔炉）、acid test（严峻的考验）、veritable inferno（真正的地狱）——统统丢进垃圾桶里。

---

[1] 此文为节选。

[2] 朗豪坊（Langham Place），英国伦敦西区西敏市的一条街道，BBC广播大厦建于此地。

[3] 关于这一点的有趣的例证是，英语中花卉的名称近来越来越多地被希腊词取代，snapdragon（金鱼草）变成了antirrhinum，forget-me-not（勿忘我）变成了myosotis等。很难看出这种变化之风有任何现实原因，这也许是因为人们本能地远离本土词汇，模糊地认为希腊词更科学。（作者原注）

[4] 例：Comfort's catholicity of perception and image, strangely Whitmanesque in range, almost the exact opposite in aesthetic compulsion, continues to evoke that trembling atmospheric accumulative hinting at a cruel, an inexorably serene timelessness...Wrey Gardiner scores by aiming at simple bulls-eyes with precision.Only they are not so simple, and through this contented sadness runs more than the surface bittersweet of resignation.（康福特对观念和形象的包容，几乎可以说是惠特曼式的，几乎和美学冲动完全相悖，依然在用一种残忍、无情而宁静的永恒激发着那种令人战栗、朦胧、累积性的暗

示……雷伊·加迪纳的成就源自对简单的靶心的精确瞄准。只不过它们并不是那么简单，而且这种满足的悲伤之中流淌着比表面上苦乐参半的顺从更多的东西。）（作者原注）

[5] 亨利·菲利普·贝当（Henri Philippe P étain，1856-1951），法国陆军将领、政治家，1940年任法国总理时向入侵法国的德国投降，战后被判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

[6] 《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九章第十一节。

[7] 记住这句话，就能治好“not un-”的毛病：A not unblack dog was chasing a not unsmall rabbit across a not ungreen field（一只并非不黑的狗正在一片并非不绿的地里追赶一只并非不小的兔子）。（作者原注）

[8] 斯图尔特·蔡斯（Stuart Chase，1888-1985），美国经济学家、社会理论家、作家。

大蟾蜍随想

在燕子归来、水仙绽放之前，雪花莲开放之后不久，大蟾蜍结束了秋冬两季的蛰伏，钻出地洞，急不可耐地爬向离自己最近的宜人水塘，以自己的方式向春天的来临致意。有些东西——也许是大地的战栗，又或许只是气温高了几度——把它从沉睡中唤起，尽管总有些贪睡的蟾蜍会错过这一年一度的时刻——至少我就不止一次在仲夏挖到过蟾蜍，它们不但活着，而且活得挺好。

在漫长的斋戒之后，此时的蟾蜍看起来颇有些仙风道骨，就像大斋期[1]将尽之时严守戒律的圣公会信徒。它的动作虽然迟缓，却坚定果断，它身体消瘦，衬出大得出奇的双眼。你会注意到一个在其他时节可能发现不了的特点，蟾蜍的眼睛恐怕是所有动物里最漂亮的。它的眼睛像金子一样，更准确地说是像那种经常被镶在图章戒指上的金色宝石，我想是叫金绿玉。

爬进水塘之后的头几天里，蟾蜍吃着小虫，一心一意地养精蓄锐。这时的它，体型已经复原，随后便会进入发情期。至少对于公蟾蜍来说，它唯一的念头就是要抱住什么东西，如果给它一根小棍或是一根手指，蟾蜍也会用大得出奇的力气将它紧紧抱住，很久之后才会发现那并非异性。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二十只蟾蜍胡乱抱成一团在水中翻滚，不分性别地抱紧彼此。不过，它们总会渐渐地成双成对，公蟾蜍总是趴在母蟾蜍背上。这时候便可以分出它们的公母，因为公蟾蜍体小色暗，而且总是占上位，前肢紧搂母蟾蜍的脖子。一两天之后，蟾蜍就会产下长长的卵带，缠绕在苇丛中的卵带不久便会消失不见。再过几周，无数的小蝌蚪就会让水塘充满生气，小蝌蚪们很快就会长大，先长出后腿，然后是前腿，然后尾巴退化消失。最后，差不多要到仲夏，比指甲盖还小，却已完全成型的新生代蟾蜍爬出水塘，展开全新的一生。

我之所以要提到蟾蜍的产卵，因为这是春天里最吸引我的现象，蟾蜍不像云雀和报春花，它从未得到诗人的偏爱。不过，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爬虫和两栖动物，我也不是说要享受春天就必须关心蟾蜍。春天还有番红花，还有榔鸹，还有布谷，还有黑刺李，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是，人人都能享受春日的愉悦，而且无须任何花销。就算是在最邋遢的

街上，春天也会用各种迹象让人们看到它的到来，哪怕只是烟囱之间那变得更明亮的蓝天，或是空袭的废墟上老树萌发的新芽。在伦敦市中心，大自然自顾自地延续着它的存在，这是多么的神奇。我见过红隼飞过德普福德煤气厂，听过乌鸫在尤斯顿路上第一流的歌声。方圆八里有着数以十万计——如果没有数百万之多的话——的鸟儿，想到它们连半分钱房租都不用交，实在是让人欣慰。

说起春天，就连英格兰银行周边那些逼仄阴暗的街道也无法将它拒之门外。它就像是能够穿透各种过滤装置的新型毒气，悄悄地从四面八方渗透进来。人们经常把春天说成是“奇迹”，近五六年来，这个陈旧的比喻又重现生机。在近来我们不得不经历的这种冬天过后，春天确实像是奇迹，因为人们越来越难相信春天真的会再来。1940年以来，每年二月我都会想，这个冬天也许会持续下去。但珀耳塞福涅就像蟾蜍一样[2]，总会在差不多的时节重回人间。三月末，奇迹突然出现，我所居住的破败贫民窟瞬间变了模样。广场边上被烟熏黑的女贞变得翠绿，栗树的叶子渐渐变厚，水仙怒放，桂竹香含苞，警察制服突然透出一抹愉悦的蓝，鱼贩微笑着迎接顾客，就连麻雀也换了新装，在感受到空气中的芬芳之后终于决心一洗过去九个月积累的风尘。

感受春天和其他季节变换带来的愉悦有错吗？更准确地说，当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的镣铐中呻吟，或者至少是应该呻吟的时候，指出人生因为乌鸫的歌声，因为十月里金黄的榆树，或者因为其他无须花销、不用从左翼报纸编辑的所谓阶级观点来看待的自然现象而更加珍贵，这在政治上难道有何不当吗？无疑，很多人正是这么想的。经验告诉我，我的文章中对“大自然”的赞美恐怕会带给我很多辱骂信，尽管这些信件的关键词往往是“多愁善感”，但其中包括两种观点。其一是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任何愉悦都会助长某种政治上的寂静主义。按照这种思路，人们就该感到不满，我们要做的就是放大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从已经拥有的东西里寻得更多乐趣。另一种观点是，如今是机器时代，厌恶机器，哪怕只是想限制机器的影响，就意味着保守、反动，还有些荒唐。支持这种观点的还有这么个说法——热爱自然只是城里人的怪癖，这些人根本不知道真正的自然是什么样的。这个说法还指出，那些真正要靠土地谋生的人并不喜爱土地，而且除了纯粹的实用主义观点之外，不会对花鸟产生任何兴趣。要热爱乡村，就必须住在城里，只在温暖时节的周末偶尔下乡游玩。

后面这种观点显然是错的。比如，包括流行民谣在内的中世纪文学

作品中，充满着与乔治王时期相仿的对大自然的热情，中国和日本等农耕民族的艺术也总是围绕着花鸟山水展开。另一种观点在我看来也是错的，它错得更加微妙。我们当然应该感到不满，我们不该只是逆来顺受，但若是将现实生活中的乐趣全部扼杀，我们又该让自己面对什么样的未来呢？如果人们连春日的归来都享受不了，那又怎会在无须太多劳作的乌托邦中感到快乐呢？在机械带来的闲暇里，他们又可以干些什么呢？我一直怀疑，如果我们的经济和政治问题都被真正解决，生活会变得更简单而不是更复杂，而且发现第一朵报春花的乐趣会比伴着沃利策[3]钢琴的旋律品尝冰淇淋大得多。我想，如果能留住人们儿时对树木、鱼儿、蝴蝶和——回到我最初举的例子——蟾蜍的喜爱，我们就会离平静舒适的未来更近一步；如果只是宣扬“只有钢筋和混凝土值得赞颂”的信条，那我们也只能离另一种未来更近些——除了仇恨与领袖崇拜，人类过剩的精力别无出路。

至少春天已经来临，甚至连伦敦北一区也没错过，而他们也无法阻止你享受春天。想到这一点，还算让人满意。多少次我站着观察蟾蜍交配，看着野兔在玉米地里打斗，想起了所有那些会阻止我享受这一切的大人物。但幸运的是，他们阻止不了。只要你没有生病、没在挨饿、没有受惊吓、没有被困在牢狱或假日野营地中，春天就还是春天。工厂里的子弹堆积如山，警察在城市里四处巡行，大喇叭里不停播放着谎言，但地球毕竟还在围绕着太阳转动，不论是独裁者还是官僚，不管他们的反对有多么强烈，都无法阻止春天的到来。

---

[1] 大斋期，亦称大斋节、大斋节期，基督教教会年历的一个节期。整个节期一共四十天。天主教徒以斋戒、施舍、克己及刻苦等方式补赎自己的罪恶，准备庆祝耶稣基督的由死刑复活的“逾越奥迹”。

[2] 珀耳塞福涅，希腊神话中的冥后，她是众神之王宙斯和农业女神得墨忒耳的女儿，被哈得斯绑架到冥界与其结婚，成为冥后。珀耳塞福涅每年春天回到母亲身边时，得墨忒耳才不再悲伤，春天才得以万物复苏。

[3] 沃利策（Wurlitzer），钢琴品牌。

我为什么写作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时，我就知道自己长大后会是作家。大概在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试着摆脱这种想法，不过我能意识到那样做是在违反自己的本性，自己迟早还是会坐下来写书。

我在家中三个孩子里排行老二，但是与哥哥和弟弟都相差五岁，而且我在八岁前很少见到父亲。因为这种种原因，我多少有些孤单，很快便养成了难相处的个性，因此在上学时始终不受欢迎。我也有了孤单孩子的那种习惯，开始编造故事，并且和假想的人物对话。我想，从一开始，我的文学抱负就融合了孤单和自卑感。我知道自己有文字天赋，有能力直面令人不快的事实；我觉得这些能力创造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我能在其中逃避日常生活中的失败。但是，我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所写的严肃作品——有严肃意图的作品——加起来还不到六页。我在四五岁时写了第一首诗歌，母亲按我口述将其记了下来。我已经想不起那首诗的内容，只记得那是一首关于老虎的诗，那只老虎长着“椅子般的牙齿”——相当不错的措辞，不过我觉得这首诗算是剽窃威廉·布莱克的《老虎》（*Tiger*）。在我十一岁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好爆发，我当时写了一首爱国诗，发表在了当地报纸上。两年后，在赫伯特·基奇纳[1]去世时，我又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随着年岁渐长，我也不时写一些乔治时代风格的劣质诗歌，而且常常都是未完成的“自然诗”。我也尝试写过一篇短篇小说，结果却糟糕透顶。这些便是那些年我写在纸上的所有准严肃作品。

但是，在这几年时间里，我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文学活动。首先是那种命题文章，我写得很快也很轻松，却无法从中感受到多少乐趣。学习之余，我还写了一些应景的韵文和半滑稽的诗歌。我写这类东西的速度现在看来快得惊人；十四岁时，我只花一个星期，就模仿阿里斯托芬写了一整部押韵的戏剧。我还协助编辑了几份校园杂志，既有印刷版，也有手抄版。这些杂志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差劲的滑稽之作，与现在最廉价的报纸杂志相比，我在它们身上花费的精力要少很多。但与此同时，在至少十五年的时间里，我还进行着迥然不同的文学练习，那就是持续编写着关于自己的“故事”，就像是在脑海中写日记。我相信这是一种儿童和青少年都有的习惯。我在很小时，就常常想象自己是罗宾汉

之类的人物，设想自己是精彩的探险故事中的主人公；不过，我的“故事”很快便不再是简单的自恋，而是越来越多地简单描绘我所做和所见的事情。偶尔会有那么几分钟，我会在脑海中构想这样的句子：“他推开门走进房间。一束昏黄的阳光，透过细棉布窗帘，斜射在桌子上，桌上一盒半开的火柴放在墨水壶旁边。他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到了窗前。下面的街上，一只玳瑁猫正在追逐一片枯叶。”这种习惯持续到我二十五岁左右，贯穿了我还未从事文学活动的岁月。虽然我必须寻找适当的词语，也确实努力寻找过，但我写这些描述性的文字，似乎并非本意，而是受到了外力的驱使。我想，这些“故事”应该反映我在不同年龄段所崇拜的不同作家的风格，不过我记得它们总是有着过度的细节描写。

大约在十六岁时，我突然发现了词语本身的乐趣，也就是它们的发音和联想。下面这两句摘自《失乐园》（*Paradise Lost*）：

所以他忍受着艰难困苦

前行：忍受着艰难困苦。

现在看来，这两句并非特别精彩，但在当时却让我的脊背一阵战栗，而且原文将“he”拼写成“hee”，更让人感到愉悦。至于描写事物的必要性，我当时也已全部明白。因此，如果说我当时打算写书的话，我已经明白自己想要写哪种书。我想写那种有着悲伤结局的大部头自然主义小说，其中要充满细致的描写和生动的比喻，而且通篇都是辞藻华丽的段落，用词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追求音韵的效果。我的首部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正属此类。这本书写于我三十岁那年，但是构思却要早得多。

之所以介绍这些背景信息，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对作家的早年经历一无所知，读者就不可能理解作家的动机。作家的写作主题由他所处的年代决定——至少在我们这个动荡、变革的时代是这样——但作家在开始写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一种永远无法完全摆脱的情感态度。无疑，作家有责任磨炼性情，避免陷入某种不成熟的状态或某种反常的情绪；但如若完全摆脱早期所受的影响，就会扼杀自己的写作冲动。撇开谋生的需要不说，我认为作家的写作动机，至少说写作散文的动机有四大方面。每个作家都多少有着这四个写作动机；作家所处的环境不同，这四个动机的比重也有所不同。这四个动机是：

一、纯粹的自我主义。渴望显得聪明，渴望被人谈论，渴望死后被

人铭记，渴望报复那些在你童年时冷落过你的成年人，等。说这不是写作动机就是虚伪。这是个很强的写作动机。作家在这点上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成功商人——简而言之，所有上层人士——一样。绝大多数人并不十分自私，他们在三十来岁过后便几乎完全抛弃了个人意识，开始主要为别人而活，或者只是被压抑在苦差之下。不过，也有少数人天资聪慧且固执己见，下定决心要为自己活到最后，作家就属于这类人。应该这样说，严肃作家整体而言比新闻工作者更自负，更以自我为中心，尽管他们不那么在意金钱。

二、审美热情。对外部世界的美的感知力，或者对词语和正确词语组合之美的感知力；由音律带来的冲击、优美文章的铿锵有力，或优秀故事的节奏清晰所带来的愉悦；分享有价值且不容错过的经历的冲动。审美动机在许多作家身上微乎其微，但即使是写小册子或教科书的作家，也有各自偏爱的词语或短语，这种偏爱并没有功利性的目的。他们或许还对印刷排版、页边距等有强烈的感觉。只要是层次高于铁路指南的书，都会受到审美因素的影响。

三、述史冲动。渴望看见事物的真实面目，渴望发现并为后人记录真相。

四、政治目的。这里的“政治”是最为广义的政治。渴望推动世界向某个方向发展，渴望改变别人对理想社会的看法。同样，所有书都会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艺术应当与政治无关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观点。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动机必定会相互冲突，而且定会因时因人而异。从本性来看——把“本性”理解为人刚成年时的状态——在我身上前三种写作动机多于最后一种。若是生活在和平年代，我或许会写辞藻华丽或纯描述性的书，或许会对自己的政治信仰懵然无知。而实际上，我被迫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写作宣传小册子的人。首先，我在一份不适合自己的工作（驻缅甸的印度皇家警察）上浪费了五年，后来又经历了贫困和失败。这深化了我天生对权力的憎恨，也让我初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且在缅甸的工作也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所了解，但这些经历还不足以让我有明确的政治取向。后来，希特勒上台，西班牙内战爆发。到了1935年底，我仍然没有明确的抉择。记得我在当时写过一首小诗，表达了我的两难：

两百年之前的我

或许是幸福的牧师
宣扬着永恒的命运
看着我的胡桃树成长；

哎！我生在邪恶的时代
错过了那惬意的港湾，
因为我嘴上长出胡子来
而牧师们全都把胡子刮光。

后来的日子还不错，
我们都那么容易满足；
我们将混乱的思绪哄入梦乡，
让它们睡在树的怀抱里。
无知的我们敢于拥有
那些我们现在掩饰的欢乐；
苹果枝上的金翅鸟
能让我的敌人颤抖。

然而姑娘的肚子、杏子、
浓荫下小溪中的拟鲤、

马匹、黎明时飞翔的野鸭，

全都是美梦一场。

无法再做梦的我们，

伤害或掩饰着那些欢乐；

马匹都由铬钢制成，

小胖男人骑着它们驰骋。

我是从不翻身的蠕虫，

是没有妻妾的阉人；

我在牧师和政委之间，

像尤金·阿拉姆[2]那样前行。

政委在为我算命，

收音机正放着广播，

可是牧师许诺我一辆奥斯丁七型车，

因为马彩经纪人从不赖账。

我梦到自己住在大理石宅邸中，

醒来后发现果真如此；

我不是为这样的时代而生，

史密斯呢？琼斯呢？你呢？

发生在1936年至1937年间的西班牙战争和其他事件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此后我便清楚了自己的立场。我在1936年后写下的严肃作品，每一行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我觉得，在如今这种时期，那种认为我们在写作时可以避开这些话题的想法纯属谬论。所有人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写这些话题。这只是一个支持哪一方和采用何种方法的问题。我们越清楚自己的政治立场，就越有可能在参与政治的同时坚持自己审美和思想上的正直。

我在过去十年来最想做的就是让政治写作成为艺术。我写作的出发点，永远都是一种党派意识，一种不公正感。坐下来写书时，我并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创作一部艺术作品”。我之所以写书，是因为我想揭穿谎言，想让人们关注某些事实，而且我最初是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过，如果写作不是一种审美体验的话，我也是无法写书的，甚至无法为杂志写长篇报道。如果有心细读我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即便在纯粹的宣传中，也包含着许多在全职政治家眼里不切题的内容。我不能，也不想完全抛弃自己在童年时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还活在世上，我就会对散文体深有感触，就会热爱地球上的万物，就会在坚实的物体和无用的信息中自得其乐。我无须压抑自己的这一面。时代迫使我们参与到公共的非个体活动中，而我需要做的，是将自己内心深处的好恶与这些活动调和到一起。

这并非易事，其中涉及结构问题、语言问题，还有全新形式的真实性问题。我来举例说明其中的困难。我那本关于西班牙战争的《致敬加泰罗尼亚》，自然是一本直白的政治性作品，但我在写这本书时，大体上保持着超然的态度和对形式的关注。在这本书中，我努力讲述全部事实，同时不违背自己的文学本能。但是，这本书里有很长的一章，全是我从报纸上引用的文字，用来为那些被指暗中勾结佛朗哥的托派人士辩护。很明显，这种在一两年后就会无法吸引普通读者的章节，肯定会毁掉整本书。有位我敬重的批评家曾就这章内容批评过我。“为什么要用这种东西？”他说，“本来是部优秀作品，却被你弄成了新闻报道。”他说得没错，但是我别无选择。我恰好知道有无辜的人遭到了虚假指控，但这在英国很少有人知道。如果我不曾愤慨，那么我就永远都写不出这本书。

这个问题总是变换着形式反复出现。语言问题更为微妙，讨论起来也颇费时间。我只能说，最近几年来我尝试让自己的文字多些精确，少些描绘。我发现，当你已经将一种写作风格演绎到至善至美，那么这种风格就已经不再适合你。我在写《动物庄园》（*Animal Farm*）时，首次有意识地尝试将政治目的与艺术目的结合。现在我已经有七年没有写过小说了，但还是希望很快能再写一本。它注定会失败，所有作品都会失败，但是我十分清楚自己想要写一本什么样的小说。

回头看看上面的内容，我好像是在说我写作的动机完全是因为热心公众事务。我不想在最后给读者留下那样的印象。所有作家都自负、自私而且懒惰；他们写作的根本动机还是个谜。写书是场可怕的斗争，让人筋疲力尽，就像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大病。若不是受到某个既无法抗拒，又无法理解的魔鬼驱使，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我们知道，这种魔鬼无异于婴儿那种为引起注意而哭闹的本能。而且，如果不持续地努力抹去自己的个性，作家就写不出值得阅读的东西。好文章就像窗户玻璃。我不能确定地说我的哪些写作动机最强烈，但是我知道哪些值得追寻。回顾自己的全部作品时，我发现在缺乏政治意图的时候，我写下的都是些没有生命力的书，都是些辞藻华丽的段落、毫无意义的句子、矫揉造作的形容词和连篇的谎言。

---

[1] 赫伯特·基奇纳（Herbert Kitchener，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参与过多场殖民战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扮演了重要角色，1916年溺水身亡。

[2] 尤金·阿拉姆（Eugene Aram，1704-1759），英国语文学家，因涉嫌多起当地谋杀案，于1759年被抓捕归案并接受审判，最终被判处死刑，其头骨仍保存在金斯林镇的博物馆中。

李尔王、托尔斯泰与弄人[1]

短评册子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最鲜为人知的部分，他攻击莎士比亚[2]的文稿如今已很难找到，至少就它的英译本而言是这样。因此，在尝试探讨这本册子之前，也许有必要先概括一下它的内容。

托尔斯泰首先指出，莎士比亚让他终生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反感和乏味”。他知道文明世界的观点都与自己相悖，因此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莎士比亚的作品，一遍又一遍地读了它们的俄语、英语和德语版本；但“我始终有着同样的感觉；反感、厌烦和困惑”。这时，七十五岁的他再一次重读了包括历史剧在内的莎士比亚全部作品，但是：

我更加强烈地体会到了同样的感觉，但这次没有困惑，而是坚定不移地确信，莎士比亚身负的伟大天才这一不可置疑的荣耀，激励着我们同时代的作家竞相模仿他，推动着读者和观众在他身上寻找本不存在的优点，并由此扭曲了他们的审美和道德思维的光环，像所有谎言一样，贻害无穷。

托尔斯泰接着写道，莎士比亚非但不是天才，甚至连“普通作家”都算不上，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仔细审阅了《李尔王》，还援引了哈兹立特[3]、勃兰兑斯[4]等人的言论证明这是一部被过誉的剧作，已经算是莎士比亚最优秀的作品。

托尔斯泰接着对《李尔王》的情节作了一番解读，发现它处处都是愚蠢、拖沓、做作、晦涩、空洞、鄙俗和乏味，充满了令人无法信服的事件、“胡言乱语”“沉闷的笑话”、时代错误、不相干的废话、污言秽语、陈旧的舞台布景，以及其他道德和审美缺陷。总之，《李尔王》只是对早先由佚名作者所作、优秀得多的《雷尔王》[5]的剽窃，莎士比亚窃取并毁掉了它。为了举例说明托尔斯泰是如何进行分析的，有必要引用一段原文。他对第三幕第二场（李尔王、肯特和弄人一起置身暴风雨中）总结如下：

李尔在荒野中四下乱走，念着意在表现绝望的台词：他希望狂风猛烈地吹，吹裂他们的脸颊，希望大雨淹没一切，希望闪电烧焦他的白

发，希望霹雳击平地球，摧毁“制造忘恩负义的人类”的种子！弄人不停说着比李尔更不知所云的话。肯特上前：李尔说，因为某种原因，所有的罪人都会在这场暴风雨中被揪出来定罪。李尔依旧没能认出肯特，他力劝李尔去茅屋里躲雨。这时，弄人说了段与这情景完全无关的预言之后，三人下场。

托尔斯泰对《李尔王》的最后结论是，任何清醒的观察者——如果真有这样的观察者的话——读完全剧，只会感到“反感与厌烦”。“莎士比亚所有其他备受好评的戏剧，更不用提《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Pericles*）、《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暴风雨》（*The Tempest*）、《辛白林》（*Cymbeline*）、《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等毫无意义的戏剧故事”也全都如此。

解读完李尔王，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提出了一个更笼统的指控。他发现，莎士比亚有一定的技巧，这些技巧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他的演员经历，但他的长处也仅限于此。他无力描摹人物，也不能让台词和动作自然地出现在场景中。他的语言一贯是夸张和荒唐的，总是把自己一时兴起的想法顺手塞进角色嘴里。他显得“完全没有美感”，他的文笔“与艺术和诗歌毫无共性”。

“不管莎士比亚对你来说是什么，”托尔斯泰总结道，“他绝非艺术家。”此外，他的观点既非原创，也不有趣，他的倾向是“最低级和最不道德的”。奇怪的是，在做出最后这条结论时，托尔斯泰所依据的并非莎士比亚自己的话语，而是格维努斯[6]和勃兰兑斯这两位批评家的言论。照格维努斯（或者至少是托尔斯泰对他的解读）看来，“莎士比亚教导说……人也许会太过善良”；而勃兰兑斯认为，“莎士比亚的根本原则是……目的决定手段。”托尔斯泰自己还补充说，莎士比亚属于那种最恶劣的沙文主义爱国者，而且，他认为格维努斯和勃兰兑斯已经对莎士比亚的人生观作出了准确且充分的描述。

托尔斯泰在随后的几段里又重复了一番曾在别处详细论述过的艺术理论。简而言之，艺术需要高尚的题材、真诚和高超的技艺。伟大的艺术作品必须以“对人类生活举足轻重”的东西为主题，必须表达出作者的真实感受，所运用的技巧必须要能实现所需的效果。鉴于莎士比亚道德观恶劣、手法拙劣，而且一刻都不曾做到真诚，他显然只能面临责难。

但这就带来了一个难题。如果莎士比亚真像托尔斯泰所描述的那样，他为何会如此广受赞誉呢？这似乎只能通过某种集体催眠或“流行

性暗示”来解释。整个文明世界似乎都被迷惑了，相信莎士比亚是个优秀的作家；哪怕是对相反观点最明了的论证都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那不是理性的观点，而是某种近乎宗教信仰的东西。古往今来，托尔斯泰说，这样的“流行性暗示”无穷无尽，比如十字军东征、寻找贤者之石[7]、曾经席卷荷兰的郁金香狂热[8]等。他还意味深长地援引了一个当代的例子，也就是让全世界不知为何狂热且激愤不已的德雷福斯案。新兴的政治与哲学理论或某位作家、画家、科学家，也会引起昙花一现的狂热。以达尔文为例，他（在1903年）已经“开始被人遗忘”。而在某些情况下，毫无价值的公众偶像也许会一连好几百年受人吹捧，因为“由于偶然出现的特殊有利条件，这种狂热与当时流行的人生观，尤其是文学界的人生观相一致，因此才会长久延续下去。”莎士比亚的戏剧很久以来一直为人赞赏，因为“它们契合莎士比亚的时代以及我们这个时代上流社会的那种漠视宗教、无视道德的心境。”

至于莎士比亚盛名的由来，托尔斯泰的解释是，这是德国教授们在18世纪末“抬举”出来的。他的美名“起源于德国，而后才传回英国”。德国人之所以抬高莎士比亚，是因为当时没有值得一提的德国戏剧，而法国古典文学已经开始显得呆板做作，他们被莎士比亚“巧妙的剧情发展”迷住了，而且还发现他充分表达了他们的人生观。歌德把莎士比亚誉为伟大的诗人，其他所有评论家也跟着鹦鹉学舌，对莎士比亚的普遍迷恋自此便延续了下去。结果是戏剧的进一步堕落——托尔斯泰在批评当时的戏剧时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作品也包含在内——和主流道德观的进一步败坏。因此，“对莎士比亚的错误美化”罪大恶极，托尔斯泰觉得自己有责任与之一战。

这就是托尔斯泰短评册子的实质。它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在把莎士比亚描写成恶劣作家的过程中，他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但这不是问题。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或论证能够证明莎士比亚或其他任何作家的“优秀”。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不容置疑地证明——比如说——沃里克·迪平的“拙劣”。根本上说，除了能否流传之外，没有什么能够证明文学作品的价值，能否流传本身就是衡量大众观点的指标。托尔斯泰的这类艺术理论其实没什么价值，因为它们不光以主观臆断为出发点，还把可以随心解释的含糊说法（“真诚”“重要”等）当成标准。确切地说，没人能回应托尔斯泰的责难。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攻击莎士比亚？并且他用了很多无力和不实的论据。我们有必要将部分这类论据摘出来，并不是因为它们化解了他的主要指控，而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证明了他的恶意。

首先，他对《李尔王》的分析并不像他反复重申的那样“公正”。相反，这是冗长的曲解。显然，在向没读过《李尔王》的人介绍故事梗概时，你如果这样介绍一段重要台词（李尔在科迪利娅死于他怀中时所说的台词）：“李尔又开始了他那可怕的胡言乱语，就像不好笑的笑话那样让人难堪”，这便算不上真正的公正。在很多时候，托尔斯泰略微改动和扭曲了他所批评的原文，让情节变得有些复杂和不合情理，或者让语言显得更为夸张。比如，他告诉我们李尔“没有必要也没有动机逊位”，尽管李尔逊位的原因（他已经老了，希望摆脱公务的牵累）在第一幕第一场就明确交代过了。甚至在我前面引用的那一段中，托尔斯泰都有意曲解了一个短语，略微改动了另一短语的意思，让一段从上下文看来十分合理的话成了废话。这些误读本身都无足轻重，但加起来却夸大了这部戏剧心理状态上的前后不一。而且，托尔斯泰无法解释为什么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他去世两百年后（也就是在“流行性暗示”蔓延开来之前）依然还在出版和演出，他对莎士比亚为何名声大噪的解释也只是由明显错误的说法堆砌起来的臆断。此外，他的种种批评自相矛盾。比如，他一边说莎士比亚不过是个演员而且“并不正经”，一边又说莎士比亚总是假借剧中角色之口表达自己的想法。整体上看，很难认为托尔斯泰的批评是出于好意。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完全相信自己的论点，也就是说，他无法相信整个文明世界被一个弥天大谎蒙蔽了一个多世纪，只有他才能看穿。当然，他确实对莎士比亚心存厌恶，但个中原因却不是，或者说不全是他公开所承认的那些；这正是他的短评册子让人感兴趣的地方。

到这时候，我们就得猜猜看了。不过，这里有一条可能的线索，或者至少有一个可能指向那条线索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托尔斯泰在三十多个剧本里独独把《李尔王》当成靶子？当然，《李尔王》非常有名而且广受赞誉，是实至名归的莎士比亚代表作；不过，从敌意分析的角度来说，托尔斯泰选中它，也许是因为这是他最讨厌的剧本。他格外敌视这部戏剧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是他有意无意地从李尔王的故事中看到了自己呢？但我们最好从相反的角度来研究这条线索，也就是说，分析《李尔王》本身，以及其中托尔斯泰没有提到的特质。

面对托尔斯泰的短评，英国读者首先会注意到，他几乎完全没把莎士比亚当成诗人。莎士比亚被他看成戏剧家，而且莎士比亚的盛名并非空穴来风，但托尔斯泰却将其归因于让聪明演员获得好机会的编剧技巧。从英语国家的情况来看，这不是事实；莎士比亚的拥趸评价至高的几部戏剧（比如《雅典的泰门》（*Timon of Athens*））很少或者从未上

演，而《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等最适合上演的戏剧却最不受欣赏。最欣赏莎士比亚的人最推崇的是他对语言的运用，是连另一个对他抱有敌意的批评家萧伯纳都承认“无可抗拒”的“以文述乐”。托尔斯泰忽略了这一点，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诗歌对说同种语言的人可能具有的特殊价值。但就算和托尔斯泰换位思考，把莎士比亚视为外国诗人，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托尔斯泰遗漏了什么。诗歌也许不仅是在同种语言之外便毫无价值的声音和联想的艺术。否则，为什么有些诗歌，包括用已经消亡的语言所写的诗歌能够在各国之间交流呢？显然，像“情人佳节就在明天”[9]这样的抒情诗无法被恰如其分地翻译出来，但莎士比亚的主要作品中确实存在着那种可以称作诗歌，又能与文字分离的东西。托尔斯泰说《李尔王》作为戏剧而言并非佳作，这是对的。它拖得太长，而且人物和支线剧情太多。一个坏女儿就已足够，埃德加也是个多余的角色，如果去掉葛罗斯特父子，这部剧也许会好得多。但是，某种模式，又或许只是某种气氛，并没有被剧情的复杂冗长所磨灭。我们可以把《李尔王》想象成木偶剧、哑剧、芭蕾舞剧或连环画。剧中的部分诗意或许正是它的精华，是故事中固有的东西，它既不依赖独特的文笔，也无须真实的表演。

闭上眼睛想想《李尔王》，最好别去想剧中的对白。你看到了什么？下面至少是我能看到的：一位身穿黑色长袍的威严老者，苍白的须发随风飘动，就像布莱克画中的人物（但奇怪的是，也很像托尔斯泰），他游荡在暴风雨中，诅咒着上天，陪伴着他的是一位弄人和一个疯子。这时，场景转换，老者依旧在诅咒，依旧什么都不明白，他怀抱一位死去的女子，弄人却吊在背景里的绞架上。这就是这部剧作最基本的框架，而托尔斯泰甚至在这里都想要去掉大部分不可或缺的东西。他认为暴风雨毫无必要，认为弄人只不过是令人讨厌的累赘和蹩脚笑话的借口，在他看来，科迪利娅之死剥夺了这部剧作的道德内涵。托尔斯泰认为被莎士比亚改编的那部更早的《雷尔王》结尾更加自然，相比莎士比亚的作品更为符合观众的道德需求；《雷尔王》里的高卢国王征服了姐姐们的丈夫，科迪利娅没有死，而是帮助雷尔重登王位。

换句话说，这部悲剧本应是喜剧，或者也许应该是传奇剧。很难说悲剧感是否与对上帝的信仰相容。至少，它和对人类尊严的怀疑不相容，和那种因为美德的失败而倍感受骗的“道德需求”不相容。悲剧情景恰恰存在于道德没能取胜，但仍然能让人感受到人比摧毁他的力量更高贵的情节之中。也许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认为弄人的存在毫无意义。弄人在这部剧作中不可或缺，他不但充当了旁白角色，通过比其他人物

更机智的评论让核心剧情更清楚，而且还反衬了李尔的狂乱。他的笑话、谜语和顺口溜，他对李尔高贵的愚蠢无休止的挖苦，从单纯的嘲弄到忧郁的诗歌（“你把其他所有的尊号都送给了别人，只有这一个名字是你娘胎里带来的”），仿佛一条理智的细流贯穿全剧，提醒人们，尽管这里有不公、残忍、阴谋、欺骗和误解，但别处的生活依然一如往昔。从托尔斯泰对弄人的不耐烦里，我们可以一窥他和莎士比亚更深层次的分歧。他不无理由地反对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不和谐、离题的事物、怪诞的情节和夸张的语言，但实际上他最讨厌的也许是其中蓬勃的生机，和某种索取的倾向，与其说是一种乐趣，不如说是对实际生活的关注。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托尔斯泰看作一个向艺术家开火的道学家。他从没说过艺术是邪恶或无聊的，甚至也没有否定高超技巧的重要性。但晚年托尔斯泰的主要目标是压缩人类意识的范围。一个人的兴趣，一个人对现实世界和日常斗争的依恋，应该越少越好，而不是相反。文学必须由寓言构成，应当脱离细节，几乎可以独立于语言而存在。寓言本身必须是艺术作品，但其中绝不能出现欢乐与好奇——这也正是托尔斯泰和庸俗清教徒的不同之处。科学也必须和好奇脱离。他说，科学的职责不是探索世界，而是教导人们如何生活。历史和政治也是如此。很多问题（比如德雷福斯案）根本不值得解决，他情愿不去关心它们。他的“狂热”和“流行性暗示”理论把十字军东征和荷兰郁金香狂热这样的事情都包括在内，整套理论事实上体现出了一种倾向，认为人类的很多行动如蚂蚁的四处奔忙一般，莫名其妙、平淡无趣。显然，他不可能有耐心去面对莎士比亚这样一个纷乱无序、一丝不苟又不着边际的作家。他的反应就像是因为吵闹的孩子而备受困扰的暴躁老人。“为什么老是这么上蹿下跳？为什么不能跟我一样安静地坐着？”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老人是对的，但问题在于，孩子的肢体中有着老人早已失去的活力。知道这种活力存在只会让他徒增烦恼，只要有可能，他就会让这个孩子也变成老人。也许托尔斯泰并不知道他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错过了什么，但他知道自己错过了一些东西，而且坚信别人也不该看到。他生来就既傲慢又自我。早已成人的他依然不时在生气的时候殴打仆人，按照他的英文传记作者德里克·莱昂（Derrick Leon）的说法，后来“往往别人稍一惹他，他就有扇那些人耳光的冲动”。皈依宗教并不一定能让人改掉这种脾气，而且这种重生的幻觉显然会让人的性格缺陷变本加厉，虽然这些缺陷的表现形式也许会更隐秘。托尔斯泰能够摆脱外在的暴力，能够看到它意味着什么，但他做不到宽容和谦卑，而且即便有人对他的其他作品一无所知，也依然能够从这本册子中看到他的精神暴力倾向。

托尔斯泰不光想要从别人身上夺走那种他自己享受不到的快乐。他

确实是在那么做，但他和莎士比亚还有更深层次的分歧。这是宗教和人文这两种人生观的分歧。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李尔王》的中心思想，托尔斯泰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尽管他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剧情。

李尔是莎士比亚剧作中少数明显带有某种寓意的角色之一。托尔斯泰说得不错，把莎士比亚说成哲学家、心理学家和“伟大的道德导师”云云的垃圾文章已经不少。莎士比亚不是一个成体系的思想家，他的大部分严肃思考都是不经意或间接说出来的，而且我们没法知道他是在多大程度上带着“目的”来写作的，甚至不知道被归于他名下的作品究竟有多少真正是他写的。他甚至从没在十四行诗中提到过自己的戏剧成就，尽管他确实有些惭愧地间接提到过自己的演员经历。可能至少有半数作品被他当成糊口的工具，而且只要能凭借往往是剽窃而来的材料拼凑出能在舞台上站得住脚的东西，他就极少在意什么目的或可能性。但这还不是全部。首先，就像托尔斯泰指出的，莎士比亚惯于把多余的一般想法塞到角色嘴里。这对剧作家而言是严重缺陷，但这却和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描述不尽相符：莎士比亚是粗俗平庸的作家，没有自己的见解，只想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效果。此外，莎士比亚在1600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所写的五六部剧作无疑都有深意，甚至有其道德寓意。它们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展开，这个主题有时甚至只用一个词就能概括。比如，《麦克白》（*Macbeth*）的主题是野心，《奥赛罗》（*Othello*）是嫉妒，《雅典的泰门》是金钱。《李尔王》的主题是放弃，除非刻意无视，否则就不可能看不出莎士比亚想说什么。

李尔放弃了王位，但却希望人们继续像对待国王一样对待他。他并没有意识到，如果他放弃了权力，其他人就会利用他的软弱。而且那些奉承他最多的人，也就是里甘和戈纳瑞，恰恰成了最反对他的人。当他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让人听命于他的时候，便陷入了托尔斯泰所谓“奇怪且不自然”的暴怒，但这其实完全符合他的性格。在他的疯狂与绝望中，他经历了两种情绪的变化，从他的处境看来这也非常自然，尽管在其中一种情绪中，他也许某种程度上成了莎士比亚的喉舌，讲着莎士比亚的观点。两种情绪其一是憎恶，李尔后悔曾经为王，生平头一次感受到了徒有其表的正义和庸俗道德观的堕落。其二是无助的愤怒，他向那些辜负了他的人完成了想象中的复仇。“一千条烧红的铁钎吱啦吱啦戳到她们的身上！”还有：

用毡子包马蹄倒是一条妙计；

我要试它一下，

偷偷进入我那两个女婿的营里，

然后就杀，杀，杀，杀，杀，杀！

直到最后，清醒过来的他才意识到，权力、复仇和胜利并不值得：

不，不，不，不！来，让我们到监牢里去……

……在囚牢的四壁之内，

我们将要看那些大人物的派系，

随着月亮的圆缺而升降。

他的这一发现已经太晚，因为他和科迪利娅的死已经注定。故事就是这样，除了讲述中略有生硬之外，这是个非常好的故事。

但这岂不是奇怪地与托尔斯泰本人的故事很相似吗？两者之间整体上的相似几乎无法忽视，因为托尔斯泰一生中令人印象最深的事，和李尔王一样，是无偿放弃了极有价值的东西。老年的他放弃了庄园、爵位和版权，想要试着逃离特权地位，过上农民的生活——这是一次真诚的尝试，尽管并不成功。但更深层次的相似在于，托尔斯泰和李尔一样，都循着错误的动机而动，都没能实现他们想要的目标。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幸福是每个人的目标，而且只有按照上帝旨意而行才能得到幸福。但是，依着上帝的旨意行事意味着放弃所有尘世的乐趣与野心，只为他人而活。因此，托尔斯泰最终弃绝了世界，以为这会让他更加幸福。但如果说他的晚年有什么是确定的，那便是他的不幸。周围人的行为几乎逼得他发疯，他们迫害托尔斯泰正是因为他放弃了一切。就像李尔一样，托尔斯泰并不谦逊，也不大看得清人心。他有时会倾向于回归贵族的姿态，尽管他穿着农民的衣衫，而他甚至也有两个深得他的信任、最后却与他为敌的孩子——尽管不像里甘和戈纳瑞那样疯狂。他对性欲的夸张反感也和李尔十分相似。托尔斯泰说婚姻是“奴役、餍足和憎恶”，意味着忍受与“丑恶、肮脏、臭气、酸楚”的亲近，恰如李尔著名的怒吼：

腰带以上是属于天神的，

腰带以下全是属于魔鬼的：

那里是地狱，那里是黑暗，那里是硫黄火坑，

热烫、恶臭、腐烂。

尽管托尔斯泰在写下这篇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时没法预见，但就连他的死——想要穿越整个国家的心血来潮的旅行，陪伴他的只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女儿，最后死在陌生村庄的茅屋里——似乎也是《李尔王》幽灵般的重演。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托尔斯泰看出了这些相似之处，也不能认为有人向他指出这些时他会承认。但他对这部剧作的态度肯定受到了其主题的影响。放弃权力，放弃土地，这些本应是他深有感触的话题；因此，也许相比莎士比亚的那些和自己的生活并不怎么贴近的作品——比如《麦克白》——这部剧作的寓意让他感到了更深的愤怒与困扰。但《李尔王》的寓意究竟是什么？其中显然有两种寓意，一种浅显，一种隐含在故事之中。

莎士比亚首先提出，放弃权力便会招致攻击。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转而反对你（肯特和弄人自始至终都支持李尔），但有些人很有可能会那样做。一旦放下武器，某个不那么诚实的人就会将它们捡起。如果你在右脸被打之后把左脸也转过来，你会被打得更重。事情不会总是这样，但发生这种情况也完全正常，如果真是这样也别抱怨。这么说吧，你挨的第二下是转过脸去这一做法的一部分。因此，首先就是弄人总结出来的那个粗俗的常识性寓意：“不要放弃权力，不要放弃土地。”但其中还有另一种寓意。莎士比亚从来没有用很多话表达过它，他自己是否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并不那么重要。这种寓意蕴于故事之中，这些故事毕竟是他为了自己的目的编造或修改出来的。这就是“如果想要放弃土地，那就请便，但别指望借此获得幸福。你可能得不到幸福。如果为他人而活，那就必须真的为了他们活着，别指望借此谋利。”

这两个结论显然都不能让托尔斯泰满意。前者表现出了那种寻常而现实的自私，这正是他真心想要避免的。后者与他鱼和熊掌都要兼得的欲望——既要打破自己的利己主义，又想借此获得永生——相冲突。当然，《李尔王》并非宣扬利他主义。它只是指出了出于自私而自我否定的结果。莎士比亚是个很世俗的人，如果强迫他在自己的戏剧中偏袒一方，他也许会和弄人站在一起。但他至少能看到整个问题，会从悲剧层面上来面对。恶已受惩罚，善却未得报偿。莎士比亚后期悲剧的道德观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观点，而且无疑不是基督教的道德观。其中只有《哈姆莱特》和《奥赛罗》可能发生在基督教时代，即使在这两部作品中，除了《哈姆莱特》中那个幽灵的古怪举动之外，并没有体现出一个事事有报的“阴间”的存在。这些悲剧都以人文主义的观点为出发点，尽管生活充满悲伤，却依然值得活下去，而且人是高贵的动物——晚年的托尔斯泰并不相信这一点。

托尔斯泰不是圣人，但却竭力想成为圣人，而他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也是超越世俗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圣人和凡人之间有质的区别，而非量的不同。也就是说，不能把凡人看作是不完美的圣人。圣人，至少说托尔斯泰心目中的圣人，不会去追求世俗生活的改善。他想要终结这种生活，用别的东西来取代它。禁欲“高于”婚姻的主张明白地体现了这一点。托尔斯泰实际上想说，如果我们能够不再繁殖、战斗、抗争和享受，如果我们能够摆脱自身的罪孽，摆脱和包括爱在内的将我们束缚在尘世的一切牵绊，那么整个痛苦的过程都将终结，天国就将降临。但是常人并不想要天国，他们希望尘世生活继续下去。这并不只是因为他们“软弱”“有罪”，渴望“享受”。大部分人都能在生活中发现颇多乐趣，但总的来说，生活即痛苦，只有年轻天真或愚蠢至极的人才不这么想。根本上说，自私和享乐正是基督教的态度，因为基督教的目标从来都是逃离尘世间痛苦的抗争，在什么天堂或极乐世界里寻得永恒的宁静。人文主义的观点是，抗争必将延续，死亡就是人生的代价。“人必须忍受他们的离去，正如忍受来到这里。最重要的是准备停当。”——这是非基督教的看法。人文主义者和宗教信徒之间往往会在表面上休战，但他们的态度其实不可能和谐共存，尘世与来世必选其一。绝大多数人，只要能理解这个问题，都会选择尘世。当他们继续工作、生育和死亡，而不是为了在别处重获新生的希望而放弃一切的时候，他们便已经做出了决定。

我们对莎士比亚的宗教信仰了解有限，从他的作品来看，我们很难证明他真有什么信仰。但至少他不是圣人，也不想当圣人。他是个人，而且从某些方面看并不是个很好的人。比如，他显然喜欢结交权贵，能用最低三下四的招数奉承他们。他在表达不受欢迎的意见时即使不说是怯懦，也得说是特别小心谨慎。在可能被认为是他自己的角色口中，他几乎从未说过煽动性和怀疑性的话。在他的所有剧作中，那些眼光敏锐的批评者，那些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谬误所蒙蔽的人，都是丑角、恶棍、疯子，或者是装疯卖傻、歇斯底里的人。这个倾向在《李尔王》中尤其突出。剧中有大量隐晦的社会批评——托尔斯泰忽视了这一点——

但全都出自弄人，装疯时的埃德加，或发疯的李尔之口。在神志清楚的时候，李尔几乎从没有过什么高明的见解。尽管如此，莎士比亚还是必须用这种花招，这让我们看到了他思想的广度。他忍不住要对几乎一切事物发表意见，尽管他为此戴上了种种面具。如果你曾用心读过莎士比亚，就几乎会每天都引用他的话，因为他以缺乏系统性但却富有启发的方式讨论或提及过几乎所有重要话题。即便是遍布在他每一部剧作中的不相干的东西——双关、谜语、人名列表、像《亨利四世》中脚夫的荤笑话那样的零碎“报道”、失传民谣的片段——都只不过是精力过剩的产物。莎士比亚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科学家，但他确实富有好奇心，他热爱尘世和人生——需要指出的是，这不等于享乐与苟活的欲望。当然，莎士比亚流传至今并不是因为卓越的思想，如果他不是个诗人，那么他作为戏剧家也许甚至不会被人记住。他吸引我们的主要是他的语言，从毕斯托尔的台词中我们也许就能推断出莎士比亚是多么地沉醉于语言的音乐美。毕斯托尔所说的大多是废话，但如果单独来看，就会发现它们是非常华丽的诗篇。显然，那些响亮的废话（“让洪水泛滥，让魔鬼因为没得吃而嘶号”等）不停地在莎士比亚的脑海里自动出现，要让它们派上用场，就得创造几个疯疯癫癫的人物。

英语不是托尔斯泰的母语，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对莎士比亚的诗无动于衷而责备他，也许甚至不能怪他不相信莎士比亚有不同寻常的语言技巧。但托尔斯泰同时也完全反对因为诗歌的和谐统一而重视它们——也就是说把它们视为一种音乐。即使我们能向他证明，他对莎士比亚成名的整个解释都是错的，证明至少在英语民族中莎士比亚的声誉是真的，证明莎士比亚光靠排布音节的技巧就让一代又一代的英语民族体会到了莫大的快乐，他也不会把这些看作莎士比亚的优点，而是相反。这只不过是莎士比亚及其仰慕者漠视宗教和被世俗束缚的又一证据。托尔斯泰会说，诗歌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意义，醉人的声音只会掩盖其中错误的寓意。不管从哪个层面看，这都是同一个问题——尘世抑或天国。语言的音乐美无疑属于尘世。

和甘地一样，托尔斯泰的性格总是让人有所疑问。他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庸俗的伪君子，如果不是因为每走一步都受到身边人，尤其是妻子的阻碍的话，他也许会做出更大的牺牲。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轻信他的信徒对他的评价。可能——事实上很有可能——他们只是用一种形式的利己主义取代了另一种。托尔斯泰放弃了财富、名望和特权，戒除了一切形式的暴力，甘愿为此受苦；但我们很难相信他放弃了胁迫他人的行事原则，或者至少是放弃了胁迫他人的欲望。有的家庭中，父亲会

对孩子说，“再这样就揍你。”而泪眼蒙眬的母亲会抱住孩子，爱怜地说，“宝贝，为了妈妈，别这样了好吗？”有谁能说第二种做法不如第一种专横？真正重要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暴力，而是在于是否有权力欲。有些人深信军队与警察都是坏的，但在道德观上却比那些认为在适当场合可以使用暴力的普通人更狭隘，更苛刻。他们不会对人说“要么干这个，要么去坐牢”，但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钻进别人脑袋里，巨细无遗地指挥别人的思想。和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类的信条表面上看是要完全放弃武力，但实际上却在鼓励这种思维习惯。如果你所接受的信条看似摆脱了政治的肮脏——你也不指望从中得到什么物质好处——这就能证明你有理吗？你越是有理，其他人就会越自然地被胁迫着以类似方式来思考。

从托尔斯泰在短评册子中的说法来看，他从来都不曾看到莎士比亚的任何价值，而且总是因为发现屠格涅夫、费特[10]等同时代作家有不同观点而感到诧异。我们也许可以肯定，当他在精神上焕然一新之前，他的结论会是这样的：“你喜欢莎士比亚，我不喜欢。就这样吧。”而后，在放弃了不惜一切代价创造新世界的想法之后，他会觉得莎士比亚的作品会给自己带来危险。人们从莎士比亚身上得到的乐趣越多，就越不会听信托尔斯泰。因此，不能允许任何人欣赏莎士比亚，就像不能允许任何人饮酒吸烟一样。确实，托尔斯泰不会用武力阻止他人。他没有要求警察查抄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但只要有可能，他就会抹黑莎士比亚。他会设法钻进每一个喜欢莎士比亚的人的脑海中，处心积虑地抹杀人们的乐趣，包括——就像我在概括他的短评时所指出的——用那些自相矛盾、甚至让人怀疑是否诚实的论据。

但到头来最引人注意的是，这种做法收效甚微。我之前说过，我们无法回应托尔斯泰这本短评册子，至少无法回应其中的主要论点。没有什么论据能用来为一首诗辩护。它要么用流传为自己辩护，要么便无可辩解。如果这种考验站得住脚，我想莎士比亚一案的判决一定是“无罪”。就像所有作家一样，莎士比亚迟早会被遗忘，但不大可能受到更重的指控。托尔斯泰也许是那个时代最具声望的作家，肯定也不是那个时代最无能的短评册子作者。他就像是一艘火炮齐射的战列舰，用尽全力诋毁莎士比亚。结果如何呢？四十年过去了，莎士比亚毫发无伤，除了那本纸页发黄、无人再读的短评册子之外，打倒他的尝试已经烟消云散，如果托尔斯泰不是《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作者，这本册子恐怕已经没人记得了。

[1] 本文中引用的莎士比亚戏剧原文中文译本均取自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

[2] 《莎士比亚与戏剧》（*Shakespeare and the Drama*），写于1903年左右，旨在介绍欧内斯特·克罗斯比（Ernest Crosby）的小册子《莎士比亚与工人阶级》（*Shakespeare and the Working Classes*）。（作者原注）

[3] 亨利·哈兹立特（Henry Hazlitt，1894-1993），自由意志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曾任《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报刊记者。

[4] 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1842-1927），丹麦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运用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决定论研究文学发展史，同时也注重作家的生平和心理状态。

[5] 《雷尔王》（*King Leir*），于1594年注册，并于1605年正式出版，全名为《雷尔王与他的三个女儿戈纳瑞、里甘和科迪利娅的真实编年史》（*The true Chronicle History of King Leir and his three daughters, Gonorill, Ragan and Cordella*）。与《李尔王》不同的是，这部戏剧最后是一个圆满的结局，雷尔在科迪利娅的帮助下恢复了王权。

[6] 格奥尔格·格维努斯（Georg Gervinus，1805-1871），德国文学史、政治史学家。

[7] 贤者之石（Philosopher's Stone），一种存在于传说或神话中的物质，被认为能将一般的非贵重金属变成黄金，或制造能让人长生不老的万能药，又或者医治百病。

[8] 郁金香狂热，1637年发生在荷兰，是世界上最早的泡沫经济事件。当时由鄂图曼土耳其引进的郁金香球根异常地吸引大众抢购，导致价格疯狂飙高，然而在泡沫化过后，价格仅剩下高峰时的百分之一，让荷兰各大都市陷入混乱。

[9] 见《哈姆莱特》第四幕第五场。

[10] 阿法纳西·阿法纳西耶维奇·费特（Afanasy Afanasyevich Fet，1820-1892），俄国著名诗人。

这，这就是快乐

到了克罗斯盖茨后不久（不是刚到那里时，而是在一两周后，那时我似乎习惯了学校的日常生活），我就开始尿床了。我那时已经八岁，而尿床则是我四年前就该摆脱掉的习惯了。

在那种情况下尿床，现在看来十分自然。儿童从家搬到陌生的地方生活，尿床是正常反应。然而，尿床在当时却被视为儿童故意而为的恶心罪行，最合适的疗法就是一顿毒打。我却不用别人来告诉我这是种罪行。我每晚都在祈祷，“上帝啊，别让我再尿床了！上帝啊，别让我再尿床了！”我从未如此虔诚地祈祷过，但我的祈祷却几乎毫无作用。有时我仍会尿床，有时则不会。我无法控制，也毫无意识。准确说来，我并没有故意尿床，我只是早上醒来发现床单湿透了而已。

在第二次或第三次尿床后，我收到警告说再犯就会被揍，但警告的方式拐弯抹角得有些奇怪。一天下午，我们喝完茶鱼贯而出时，校长夫人辛普森太太坐在一张桌子的上座和一位女士聊天。我完全不认识那位女士，只知道她是下午来访的客人。她令人生畏，看上去有些男子气，身穿女式骑装，或者说我以为那是女式骑装。我正要离开房间时，辛普森太太叫我回去，似乎要把我介绍给那位女士。

辛普森太太外号“宾戈”。我在这里用她的这个昵称，是因为我很少想到她的其他昵称。不过，我们在公开场合还是称她为“妈妈”，这或许是戏仿公学学生用“太太”称呼校长妻子。辛普森太太身子敦实，脸颊冷酷泛红，头发梳成平顶，眉毛浓密，深陷的双眼疑心重重。她很多时候都在假装热情，用男性化的俚语（“伙计，振作起来”等）鼓励大家，甚至还称呼别人的教名，但她那种焦虑和责备的眼神始终丝毫未减。你很难在直面她时不感觉到内疚，即使是你并没有做什么坏事。

“这个小男生，”宾戈指着我对那位陌生女士说，“每天晚上都尿床。”“你知道如果你再尿床我会怎么办吗？”她转向我补充道，“我会让六年级学生来揍你。”

那位陌生女士假装瞠目结舌，大声说：“我也觉得该这么做！”我当时经历了一种愚蠢且近乎荒唐的误解，这种误解我们在童年时每天都会

经历。六年级学生是年长的男生，他们因为有“品质”，所以被挑选出来，受权体罚低年级的男生。我那时还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所以我把“六年级学生”错听成了“柳年纪女士”。我以为她说的是那位陌生女士——我以为，她的名字是柳年纪。没有人会叫这个名字，不过小孩子在这种事情上没有判断力。所以，我以为宾戈要让她来体罚我。把体罚这种事情交给与学校毫无联系的陌生访客，并没有让我觉得奇怪。我只是以为“柳年纪女士”是个严格执行纪律的人，喜欢体罚别人（不知何故，她的长相就让人有这种感觉）；我立马就联想到她身着全套骑装，带着猎鞭来学校惩罚我的恐怖画面。我这个穿着灯芯绒短裤的圆脸小男孩，站在那两个女人面前差点羞愧到晕过去，那种心情我现在还能体会到。我哑口无言；我觉得如果“柳年纪女士”打我的话，我可能会一命呜呼。不过，我的主要感觉不是恐惧，更不是怨恨；我感到的只是羞愧，因为知道我丑事的人又多了一个，而且还是个女人。

不久后，我知道了负责体罚的并非“柳年纪女士”，不过我已经忘了当时是怎么知道的。我记不得当晚我是否尿床，但我确实又在之后不久尿床了。唉，那种残忍的不公是多么让人绝望，我祈祷了那么多次，下过许多次决心，却还是在湿湿的床单上醒来！我无法掩饰事实。那个名叫达芙妮的严厉女舍监专门来宿舍检查我的床铺，她拉开床铺，然后站起身来，那可怕的话像惊雷一般从她口中说出：

“早餐后自己去给校长汇报！”

在克罗斯盖茨生活的前几年里，我不知道自己听过多少次这句话。它几乎总是预示着我会挨揍。这句话在我听来总是带着不祥的预兆，就像低沉的鼓声，像是在宣判死刑。

我去给校长汇报时，宾戈在书房旁的接待室里那张光亮的长桌上做事。我从边上经过时，她用让人不安的眼神将我打量一番。在书房里，辛普森先生（外号“辛姆”）正在等我。他弓背曲肩，面相愚蠢；他的身材并不高大，但走路时却拖着脚；他那张圆胖的脸庞就像个巨婴，让人觉得他脾气不错。他当然知道我为何找他，所以已经从柜子里拿出了一根骨制把手的短马鞭；然而，亲口汇报自己的丑事也是惩罚的一部分。我说完过后，他就简短却夸张地训斥我一番，然后揪住我的脖颈，把我转了过去，开始用马鞭打我。他习惯在鞭打我时继续训斥，我还记得他踩着鞭子的节奏说“你这个脏小子”。鞭打并不疼，或许因为这是第一次，他并没有太用力。我走出书房时，感觉好了很多。校长打得并不疼，也算得上是种胜利，还部分抹去了我尿床的愧疚。我甚至还粗心地

笑了起来。有几个男生在接待室门外的走廊里闲逛。

“挨打了？”

“不疼。”我自豪地说。

这全被宾戈听见了，她的尖叫立刻从我身后传来：

“过来！马上过来！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打得不疼。”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怎么敢那么说？你觉得那样说合适吗？进去再给校长汇报！”

辛姆这回来真的了，他连续打了我很久，让我既害怕又惊讶。他似乎打了差不多五分钟，直到鞭子被打断。骨制的把手飞到了房间那头。

“瞧瞧你逼我做了什么！”他手举断掉的马鞭，愤怒地说。

我坐到一把椅子上，轻声哭泣着。我记得这是我童年时唯一一次被人打哭，但奇怪的是，我甚至不是因为疼痛才哭泣。第二顿打也不是很疼。恐惧和羞愧似乎已经将我麻醉。我之所以会哭，部分是因为我应该要哭，部分是因为真心忏悔，但也有部分是因为某种更深处的悲痛，这种悲痛只有在童年时才有，而且难以言表：感觉自己孤独无助到绝望，感觉囚禁自己的世界不但充满敌意，而且善恶交织的规则让我无法遵循。

我知道尿床让人憎恶，而且我也无法控制。我明白第二点，而且也没有质疑过第一点。所以，有些坏事可能你无法避免，不愿意去做，而且做了还不自知。坏事不一定是你主动做的，它可能只是降临在你身上。我并不是要说，这种想法是在辛姆鞭打我时才初次闪现在我脑海中的；在离家之前，我肯定就短暂有过这种想法，因为我童年的早期并不快乐。但这至少是我少年时期学到的重要而影响深远的一课：我处在一个无法做好自己的世界里。这两次鞭打是个转折点，它们让我首次理解到，我被抛弃于其中的这个环境有多么残酷。生活比我想象的更加可怕，而我也比我想象的更讨人厌。我坐在辛姆书房里的那张椅子边上，在他对我狂吼大叫时甚至脆弱得无法站起身来；当时我觉得自己邪恶、愚蠢和软弱，而我现在已经记不起在那之前是否有过这些感觉。

一般说来，人们关于某段时期的记忆，肯定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化。人们总在经历新事，而过去的经历就必须让位。二十岁时，我可以准确地写下我的上学经历，而现在却不行了。不过，人们的记忆也有可能在很久之后变得更加清晰，因为人们以全新的眼光回顾过去，似乎能够从许多事情中，发现并留意之前无法区别的事情。下面的两件事情，可以说我还记得，不过最近才让我觉得奇怪或者有趣。首先，我当时似乎认为辛姆对我的第二次鞭打合情合理。在被鞭打过一次后，我不明智地说打得不疼，从而又被更狠地鞭打一次，这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上天有嫉妒心，有钱就得藏起来。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认为马鞭被打断是我的错。我还记得自己在看到马鞭把手躺在地毯上时的心情——就像是做了无礼而又笨拙的事和损坏了贵重物品时的那种心情。辛姆说我弄断了马鞭，而我也相信了。领受罪责的这种做法，在我记忆中存在了二三十年，而我却从未察觉。

尿床的事情就讲到这里。不过我还要说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再也没有尿床——至少我后来只尿过一次，又挨了一顿打，之后便再没有了尿床的困扰。所以，我毫不怀疑，这种野蛮疗法也许确实有用，尽管它的代价很大。

这些全都是至少三十年前的事情。问题是：现在的孩子在学校里还会有同样的经历吗？

我想，唯一诚实的答案是，我们并不确定。当然，如今人们对于教育的态度与从前相比，显然要人性与合理得多。我上学时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势利态度，如今几乎已经无法想象，因为滋养它的社会已经消亡了。我想起了在离开克罗斯盖茨约前一年的一段对话。那是个俄国男生，比我大一岁，身材健壮，一头金发。他问我：

“你爸每年挣多少？”

我按自己的设想告诉了他，为了显得体面些还多加了几百英镑。这个俄国男生熟练地拿出铅笔和小本子计算了一番。

“我爸挣的钱是你爸的两百多倍。”他带着一种愉悦的轻蔑说。

当时是1915年。我想知道，那些钱在几年后会有何变故？我更想知道，这样的对话如今还会出现在小学里吗？

显然，即使是在不爱思考的普通中产阶级中，人们的观点也会发生巨大变化，也会普遍变得更为“开明”。例如，宗教信仰以及其他种种谬论，现在已基本消失。想来现在很少有人会对孩子说，如果手淫就会被关进精神病院。体罚也深受诟病，甚至有许多学校都已废除了体罚。不让学生吃饱也不再是正常和值得赞扬的举动。现在没有人会像从前那样，公开地给学生很少食物，或者告诉学生饭后和饭前一样饿有益健康。儿童的整体状况得到改善，部分是因为孩子数量相对减少。哪怕是普及一点点心理学知识，也能让父母和教师更难以纪律的名义纵容自己的反常行为。这里要讲一件我个人并不熟悉，但有位我能信任的人熟知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一位牧师的小女儿，到了不应该尿床的年纪却还会尿床。她父亲为了惩罚她这种讨厌的行为，带她参加了一个大型的花园派对，对所有人说她要尿床；而且为了强调女儿做的坏事，他还事先把女儿的脸涂成黑色。我不是说宾戈和辛姆也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会对这种做法感到惊讶。毕竟，事情总是在改变。但是——！

问题不在于现在的男生是否在周日还要穿成伊顿公学的学生那样，也不在于是否还有人告诉他们婴儿是从醋栗丛下挖出来的。这类事情诚然已经消失。真正的问题在于，学生们在非理性的恐惧和愚蠢的误解中生活多年这种事是否仍然正常。我们很难知道孩子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他们在看上去还算开心时，或许正承受着无法表达的痛苦。他们生活的世界陌生而隐秘，我们只能凭记忆或预测来了解。我们曾经都是孩子，这是我们所拥有的主要线索；而且许多人似乎都完全忘记了他们童年时的氛围。例如，我们可以想想，人们在把穿错衣服的孩子送去学校，而且认为这没有什么影响时，给孩子造成了哪些多余的折磨。对于这类事情，孩子们有时会表示抗议，但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只会掩饰自己的看法。在七八岁后，不向成人表达真实感情似乎是孩子的本能。即使是人们对孩子的喜爱，以及保护和珍爱他们的欲望，都会造成误解。人们对于孩子的爱，或许可以比他们对成人的爱更深，但若以为孩子会感到这种爱，却可谓轻率鲁莽。回顾我婴儿期之后的童年生活，我相信除了母亲以外，自己没有爱过任何成年人；而且我连母亲也不信任，因为腼腆让我隐藏了自己对她的大多数真实感情。那种自发的、毫无保留的爱，我只会给予年轻的人。而对于年老的人——对于孩子来说，超过三十岁甚至二十五就是“年老”——我会感到敬畏、钦佩或内疚，但是我与他们之间似乎被一层薄纱隔断，这层薄纱中混合着恐惧、腼腆和肉体上的反感。孩子对成人身体避而远之，而人们却太容易忽视这点。成年人庞大的身形、难看而僵硬的躯干、满是褶皱的皮肤、没精打采的眼睑、

发黄的牙齿，还有他们的身上总是散发着的衣服的霉臭味、啤酒味、汗味和烟味！成人在孩子眼里之所以丑陋，部分是因为孩子通常是从下向上看，他们那样很少能看到成人脸庞最漂亮的一面。而且，孩子本身就涉世未深，对皮肤、牙齿和面容等也就有很高的标准。不过，他们对年龄的错误认识才是最大的障碍。孩子很难展望三十岁以后的生活，他们在判断人们的年龄时，还会犯一些荒诞的错误；他们会把二十五岁的人当成是四十岁，会把四十岁的人当成是六十五岁。所以，在我喜欢上艾尔西时，我认为她是个成人；在我十三岁再次与她相遇时，我觉得她肯定二十三岁了。我当时觉得她就是个中年妇女，青春年华早已逝去。在孩子看来，年纪的增长几乎就是种令人厌恶的灾难；他们认为，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这种灾难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在孩子看来，年龄在三十开外的人都是无趣丑陋的人，都在无休止地因小事而忧虑，而且从孩子们能理解的角度看，他们都是在漫无目的地活着。只有孩子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校长自以为深受学生爱戴和信任，但实际上却被学生们在背后模仿和嘲笑。看上去不危险的成人，似乎总是滑稽可笑。

我回忆自己童年时的见解，从而归纳出这些结论。记忆虽说靠不住，但在我看来却是我们探索孩子思维的主要手段。只有通过唤起记忆，我们才能意识到孩子的世界观被扭曲得多么严重。可以想一想，如果以我现在的年龄回到1915年，我会怎么看待那时的克罗斯盖茨？我会对宾戈、辛姆以及那些强大可恶的坏蛋们有何看法？我会认为他们愚蠢、浅薄、无能，急切地在社会阶梯上攀爬；然而任何会思考的人都明白，这一社会阶梯即将倒塌。他们给我带来的恐惧，不会比睡鼠带来的恐惧更甚。而且，我当时觉得他们年纪很大，不过——虽然我不能确定——我现在觉得他们当时要比现在的我年轻。那个双臂结实、脸孔泛红且带有讥笑的约翰·霍尔呢？他只会是个邋遢的小男生，和其余几百个邋遢的小男生没什么两样。这两组事实能共存于我脑中，因为它们刚好是我自己的记忆。但是我很难知道其他孩子的想法，如果依靠想象，我可能会被带入歧途。孩子和成人的世界完全不同，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无法确定，对于许多孩子来说，现在的学校或寄宿学校是否仍像从前那样令人厌恶。就算宗教、拉丁文、教鞭、阶级差别和性禁忌不再存在，但恐惧、憎恨、势利和误解也许还在。在大家看来，我的主要问题是完全缺乏平衡感或概率感。这让我接受暴力行为，相信荒谬之事，因小事而饱受折磨。说我“愚蠢”且“本应该了解更多”并不够。回顾你自己的童年，想想你当时相信的那些谬论，想想那些让你痛苦的小事。当然，我自己的经历有所不同，但是本质上和无数男生的经历一样。孩子的弱点在于他们生来就是张白纸，既不理解也不质疑他们所生活的世

界；他们轻信别人，所以别人能影响他们，让他们有自卑感，让他们害怕违反某些神秘且可恶的规则。我在克罗斯盖茨的经历，或许在最“开明”的学校中也会发生，只是更加不易察觉罢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相当肯定，那就是寄宿学校比走读学校糟糕。家庭庇护就在身边时，孩子能有更好的机会。我认为，英国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的性格弱点，部分是因为孩子还在八九岁，甚至七岁的时候，就被送到远离家庭的地方上学，而这种做法直到最近才没有那么普遍。

我再没有回过克罗斯盖茨。从某个方面来说，在过去十年里我才真正开始思考我的上学经历，那时的记忆常常生动地萦绕在我脑海中。我现在相信，如果克罗斯盖茨还在的话，我再见到它时也不会有什么感觉。如果我走进那里，再次闻闻大教室里那种墨水和尘土的气味，闻闻教堂里的松脂味，闻闻室内游泳池的污浊气味和洗手间里冰冷的恶臭，想来我的感觉只会和大家故地重游时的感觉相同：一切竟然变得那么渺小，自己竟然退步得那么严重！